

后浪汗青堂

帝国开拓者

(套装共四册)



后浪出版公司

后浪汗青堂·帝国开拓者

（套装共四册）

目录

查理大帝

前言 帕德伯恩，公元799年夏

第1章 法兰克人的传统

第2章 对伦巴第人的战争

第3章 对异教徒的战争

第4章 帝国重生

第5章 查理大帝与欧洲

第6章 个人及其家庭

第7章 帝国的管理：制度

第8章 帝国的管理：资源

第9章 帝国的管理：司法体系

第10章 知识工程

第11章 法兰克人的军事机制

第12章 一种新的经济

第13章 恩庇与奴役

第14章 老年与死亡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狮心王理查

作者序

平装本出版序

缩略语

第一章 至上英主，无道暴君

第二章 穆斯林眼中的理查

第三章 阿基坦的理查，1157——1172

第四章 父子相争，无爱之战，1173——1174

第五章 阿基坦公爵理查，1174——1183

第六章 继承权悬而未决，1184——1189

第七章 诺曼底公爵，英格兰之王，1189

第八章 穿越法兰西，登陆西西里，1190

第九章 征服塞浦路斯

第十章 阿克围城战，1191

第十一章 进军耶路撒冷

第十二章 征途终章：雅法与阿什凯隆

第十三章 狮心王身陷囹圄

第十四章 狮心王之秉性逸闻

第十五章 重返英格兰，1194——1199

第十六章 征战法兰西，1194——1196

第十七章 征战法兰西，1197——1198

第十八章 霸业未竟，抱憾身死

第十九章 狮心虽逝，余威犹存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弗里德里希大王

弗里德里希的家谱

引言

第一部 弗里德里希的苦难与荣耀

第二部 战争与和平

第三部 在国内

结语 死亡与形象变化

致谢

缩略语

出版后记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前 言

2012年版序言

1991年重印序言

序言与致谢

地图和战役平面图目录

略语表

年 表

谱系图

第一章 马其顿的腓力

第二章 弥达斯花园

第三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第四章 王国的要害

第五章 统帅

第六章 通往伊索斯之路

第七章 永生的宣示

第八章 亚洲之主

第九章 探寻大洋

第十章 巴比伦之路有多远？

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

注释及引文

资料来源

译名对照表

后浪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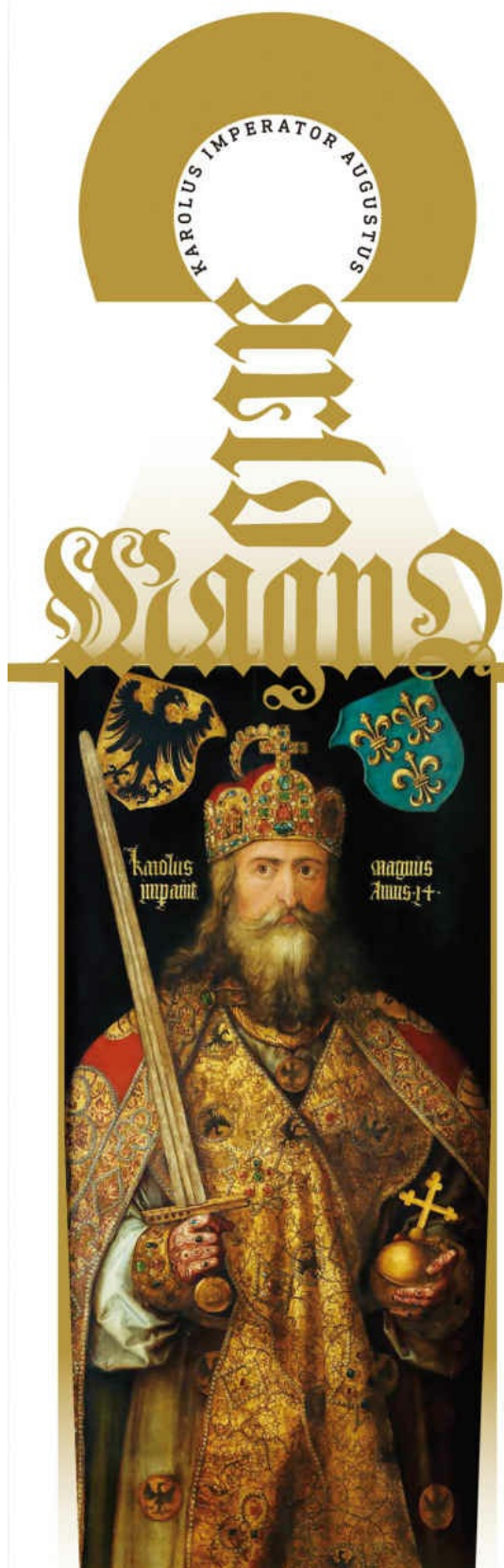
[意] 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
ALESSANDRO BARBERO 著

欧洲之父 查理

CARLO
MAGNO
大帝
UN PADRE
DELL'
EUROPA

赵象察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查理大帝

[意]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Alessandro Barbero) 著
赵象察 译

版权信息

书名：查理大帝

作者：[意]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Alessandro Barbero)

译者：赵象察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前言 帕德伯恩，公元799年夏

第1章 法兰克人的传统

第2章 对伦巴第人的战争

第3章 对异教徒的战争

第4章 帝国重生

第5章 查理大帝与欧洲

第6章 个人及其家庭

第7章 帝国的管理：制度

第8章 帝国的管理：资源

第9章 帝国的管理：司法体系

第10章 知识工程

第11章 法兰克人的军事机制

第12章 一种新的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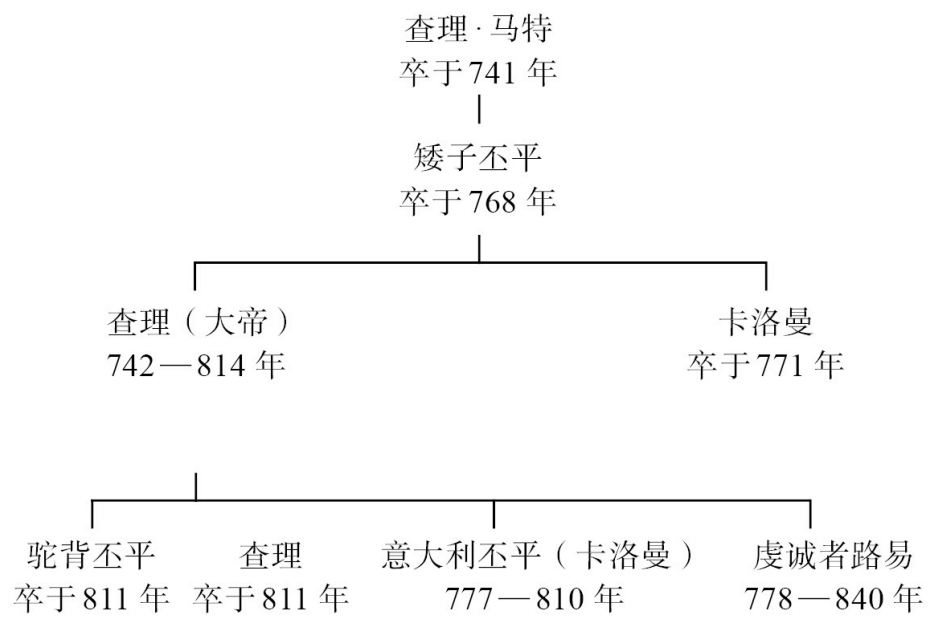
第13章 恩庇与奴役

第14章 老年与死亡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彩插



加洛林王朝男性统治者



加洛林帝国（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地图）

前言

帕德伯恩，公元799年夏

公元799年8月，法兰克国王查理率军在帕德伯恩（Paderborn）扎营，这里是刚被征服的萨克森地区的核心地带。营地里熙熙攘攘的是砖瓦匠和木匠。由卫队护送的货运马车，沿着泥泞的小道，日夜不息地将砖石和泥灰运到此地。还有一些建材由驳船从水路运抵。查理国王正在这片森林与沼泽之地建设一座新城。在这片异教徒刚刚皈依的土地上，此城将成为基督徒的桥头堡。城中的殿宇和教堂可与在亚琛的相媲美。但此时查理国王无暇思考城市的建设计划，甚至连他的军事计划也暂时搁置一边。他正焦急地等待自己的儿子查理归来。小查理此时奉命远赴易北河，与定居河畔地区的斯拉夫部族谈判。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教宗利奥三世此时突然驾临帕德伯恩。在教宗驾临之前，关于罗马城暴动的消息就已经传来。传闻说教宗被暴动者囚禁，并被挖去双眼、割掉舌头，而教宗随后在上帝奇迹般的眷顾之下逃脱了。¹

然而教宗到来之时，他的样子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他的眼睛和舌头显然还在原位。利奥三世解释说，是上帝的奇迹让它们长了回来。出于礼貌，在场的听众都表示深信不疑。查理国王却很难相信这位丑闻缠身的教宗。在教宗继位之时，查理就曾向他写过一封不合常规的信，劝诫教宗要谨言慎行，勿使他人议论。² 不过利奥三世毕竟是教宗，世人皆

知法兰克国王是西方教会的忠实保护者，国王还是要竭尽所能地维护教宗应有的声望。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有关教宗的流言，查理就有义务去平息罗马的暴动，并在举世瞩目之下恢复教宗的权威，尽管查理并不愿这么做。

就在帕德伯恩的这个炎热又多尘的夏季，这场教宗与国王之间的会谈提出并充实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想法：当查理兵临罗马之时，永恒之城的民众会像历史上拥立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一样，拥立查理为皇帝。这样，法兰克人的国王将登基为罗马皇帝，跟君士坦丁堡的“巴西琉斯”（*basileus*）平起平坐。而且没有人能反对他干涉永恒之城——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事务。可能这个计划已经在亚琛的宫廷，以及当时位于拉特兰圣若望大殿及教堂的教廷中流传了一些时日。799年夏季的帕德伯恩会谈十分微妙，并没有留下书面记录，但可以推定，直到这次会谈，这个计划才得到认真讨论。

当时有一位被史学家反复提及的匿名诗人（一般认为他是宫廷里的一位学者），创作了一首拉丁文六步格短诗，这首诗的抄本题为“查理大帝与利奥教宗”（*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³ 这首诗文采斐然，然而较之文学价值，我们更关注这位匿名诗人的政治倾向。在当时的记述中，教宗明确宣称他必须抗击自己的敌人，而查理是世上唯一有能力恢复教会威严的君主。因此，更确切地说，需要让整个西欧的基督徒认识到查理是他们的领袖，而他仅有的国王头衔是不足以正名的。这位诗人显然参与了帕德伯恩的密谋，他意识到法兰克人的国王将登基为罗马皇帝，他会在亚琛施行统治，犹如第二罗马。他高呼查理为“欧洲之父”。

这时欧洲大陆的各民族意识到，他们从民族主义这套意识形态的死结中找到了出路，这出路就是一个统一的、超越民族观念的欧洲。这一愿景由这位帕德伯恩的诗人出人意料地呈现了出来。总之，是查理大帝首创了一个欧洲的单一政治架构，这个架构以莱茵河和北海诸港为贸易

中心，从汉堡延伸到贝内文托，从维也纳延伸到巴塞罗那。与以地中海为中心、其中东地区最为文明富庶的罗马帝国截然不同。引用近百年来的伟大史学家们的话说，“当罗马帝国衰亡之时，欧洲出现了”（马克·布洛赫语）；“查理曼^①的帝国，第一次塑造了我们所说的欧洲”（吕西安·费弗尔语）。⁴

当然，每一代史家都会构筑自己的历史图景。查理帝国与欧洲实体诞生之间的关系，在史学界也并不总是共识。大约二三十年前，在意大利斯波莱托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早期中世纪史方面的重要专家参会。研讨会的主题提出了一个问题：“欧洲的诞生与加洛林帝国：仍需证明的联系。”研讨会上的观点有很大分歧，其中一些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但总体而言，将查理大帝视为欧洲之父这一观点显得有些陈旧，或者说最起码不像前一代学者布洛赫、费弗尔之时那样无可辩驳。⁵

现在，历史的钟摆又摆向了另外一边，这一观点再次得到了广泛支持。这得益于研究领域尤其是经济史领域的一次真正的变革。直到几年前，关于查理大帝军事成就的研究还几乎占据着学界的全部视野，而查理大帝所推动的文化复兴事业只是被视为表面浮华，在这表面之下，实质是倒退的社会和停滞的经济。现在，各种各样的线索指引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加洛林时代奠定了人口与经济恢复的基础，公元1000年左右恢复的结果清晰地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欧洲才以一种充满生机的状态诞生。不仅是2000年新世纪每个欧洲人表面洋溢的那种热情，更是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成果，使我们有信心再次使用十二个世纪前那位匿名诗人所称，称呼查理大帝为“欧洲之父”。

注释

¹ 参见第4章，公元800年的加冕，以及Alcuini, 178。

²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138.

3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366–81.

4 M. Bloch, “Problèmes d’Europe,” *Annales ESC* 7(1935): 476; L.Febvre, *L’Europe: genèse d’une civilization* (Paris, 1999).

5 *Nascita dell’Europa ed Europa carolingia: un’equazione da verificare* (Spoleto, 1981).

① Charlemagne是拉丁词Carolus Magnus的法文转写，词缀-magne（曼）即magnus（大）。为了全书行文统一，除了书名和法文语境等仍从定例外，“查理曼”统作“查理大帝”。（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下同）

第1章

法兰克人的传统

法兰克人在高卢的定居情况

欧洲人的观念中，对查理大帝的身份最根深蒂固的印象，是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上午，他在圣彼得教堂被授予的皇帝头衔。实际上，他只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十四年拥有这一头衔。之前的三十二年，他一直是法兰克人的国王，甚至在他获得皇帝头衔后，他依然保留着这一称号。显而易见，皇帝与国王是截然不同的头衔，并且皇帝头衔并不排斥查理于768年9月从自己的父亲“矮子”丕平那里继承的王权。在查理死后多年，长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的作者称他为“查理国王，我们伟大的皇帝”（*Charles li reis, nostre emperere magnes*），作者显然清楚意识到了这两个共存的身份。¹

在8世纪末这个时期，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意味着什么？早在查理率军小规模越过莱茵河并定居在日耳曼地区之前的三四个世纪，法兰克人就在日耳曼诸民族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了。他们最初是西罗马帝国的盟友，后来成了当地的统治者。严格来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来自莱茵河流域的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ii*）、卡图利人（*Cattuarii*）、

卡马维人（Camavi）组成的部落联盟，他们说着同样的日耳曼语族方言，拥有相同的宗教崇拜仪式，跟随着同一个军事领导集团。因此他们最终接受了“法兰克人”这个集体称呼，不过这个称呼最初只构成了极其微弱的身份认同。“法兰克人”的原意是“勇者”，稍后的意思是“自由民”。

5世纪，基督教主教、罗马古典诗人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描述过他在高卢所了解的法兰克人。他在文中塑造了法兰克人的具体形象，这个形象对于地中海地区的读者来说充满了异域风情。他在文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蛮族勇士的钦佩：

他们的红头发从头顶垂下，他们且剃光脖颈后的头发。他们灰蓝色的眼睛清澈透明。他们不留须，用梳子把窄胡髭卷曲起来。他们偏爱的娱乐是向靶子投掷战斧，转动盾牌，反复投掷并收回长矛。他们从儿时起就对战事有着强烈的热情。如果在战事中寡不敌众或者处于不利地形，他们将拼死奋战，毫无畏惧。²

西多尼乌斯最后写道：“他们甚至似乎能驯服怪兽。”这些法兰克蛮族勇士是否真的驯服了怪兽不得而知，但他们在西罗马帝国末期控制了高卢。在日益衰落的西欧，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和繁荣程度都远超西班牙和意大利。他们立刻表明决不让他人染指此地：先前定居于高卢南部——今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西哥特人，被他们击败并被驱赶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定居在罗讷河谷的勃艮第人，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王的权威，向其臣服。拜占庭的将军们，以及后来的伦巴第诸王也想方设法，提防着这些新的高卢统治者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但十分困难。

这些罗马人，或者说有着凯尔特或意大利血统的说拉丁语的罗马—高卢人，在承认法兰克王的权威后，就可在高卢诸省定居。事实上，他们中不仅有农民和奴隶，也包括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显贵家族和天主教

士。无论从哪方面说，法兰克人并没有定居在高卢全境，并取代生活在这里的数百万罗马人，他们的人口不到20万，其中还包括老弱妇孺。那些身形魁梧的战士大多和他们的家族定居在高卢北部的莱茵河、默兹河、摩泽尔河沿岸。只在这一区域，他们的人口超过罗马人。实际上，直到今天，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分界线仍在这一区域。

与出产啤酒、肉类、黄油的高卢北部不同，在出产葡萄酒、谷物、橄榄油的南方，法兰克人自身的特点就不太明显。这里的罗马—高卢人更容易同化这些征服者，并用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影响后者，促进了现代法国的诞生。在法兰克诸王最爱流连的巴黎附近，是罗曼语而不是日耳曼方言占据主导地位。在几乎没有法兰克人的卢瓦尔河以南地区，这里的罗马—高卢人在臣服于北部的蛮族国王并纳税之后，依旧继续他们过去的的生活。

法兰克人的王权

墨洛温王朝

高卢的法兰克王国实际上是诸多小国组成的。法兰克诸部族短暂地尊无情而有力的克洛维为王，他带领诸部族皈依了基督教。但这种统一没有持续太久。法兰克人的习俗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王国的继承权，这使得法兰克诸国分合不定。最东部的王国位于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这里法兰克人占绝对多数，使用原始的日耳曼语，被称为“东部王国”，也被称为“奥斯特拉西亚”或“奥地利”。他们凭借其地理优势统治着南日耳曼的诸多部族，将图林根人、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的诸多公爵领纳入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

在更远的西部，在广阔的阿登森林（覆盖了现代比利时的一部分）之外，巴黎、奥尔良、苏瓦松等国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这里以罗曼语为主要语言，以卢瓦尔河为南部边界。法兰克人称之为“纽斯特里亚”，大意是“西部王国”。从孚日山脉向东南延伸至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地区的是勃艮第王国。尽管他们被迫放弃独立的王权而承认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王权，但他们依旧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更南的地方，法兰克人的民族特征更少体现。这里由一名有着“执政者”（*patrizio*）头衔的罗马官员统治，不过他听命于法兰克国王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最后在西南方是阿奎丹，在这里罗马—高卢人紧邻桀骜不驯的边民巴斯克人而居，尽管阿奎丹是由公爵而不是独立的国王统治，但他们有摆脱法兰克人控制的倾向。

在统治法兰克人的诸多君主中，最为有力的王室建立了墨洛温王朝

。这个王朝以其先祖墨洛维得名。墨洛维曾短暂统一过法兰克诸国，然而在他死后王国又重归分裂。这个王朝的大部分国王对高卢的统治权最初都源自远在拜占庭的皇帝的册命，他们更像教士而不是战士。在文献中他们被称为“长发王”（*reges criniti*），长发也就成了他们王权的标志。依照传统信仰的观念，这种异于常人的长发代表着国王的神秘力量。这能使他们能为民众带来繁荣，能使女性和土地多产而丰饶。随着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这些传统异教中神化国王统治权的观念逐渐消失，墨洛温王朝的这些教士国王发现他们的权威也逐渐消解。

宫相

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这两大王国的实际统治权落入了另一些人手中，他们并不自夸拥有神力，而是懂得如何领导法兰克人在战争中获得胜利。这些人被称为宫相（*maestri di palazzo*），他们是有实权的大臣或地方总督。他们名义上是国王的代表，实际上却逐渐夺取了权力，而使国王成为纯粹礼仪性的角色。最初每个王国都有一个宫相。688年，丕平在奥斯特拉西亚独掌大权。他在战场上击败了纽斯特里亚的贵族后，也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西部王国。从那时起，法兰克人虽然仍有两位国王，却实际上被一位宫相统治。史学家称他为赫斯塔尔的丕平（*Pipino di Héristal*），他就是查理大帝的曾祖父。

丕平家族与奥斯特拉西亚的另一显贵阿努尔夫家族（*Arnolfingi*），在老丕平和阿努尔夫时期联姻（二人都于640年去世），创造了后来的加洛林家族。丕平的女儿嫁给了阿努尔夫的儿子阿努尔夫——后者成为梅斯（*Metz*）的主教，最终被尊为圣人。这场联姻诞生了赫斯塔尔的丕平——法兰克王国的唯一宫相。714年丕平去世后，权位由儿子查理·马特继承，他就是查理大帝的祖父。最初由于各地的武装叛乱，查理·马特的权位并不稳固。他被迫用武力对抗。后因为他带领法兰克人战胜

了史无前例的威胁，他的地位得以加强。这个威胁就是穆斯林，他们刚灭亡了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试图向北越过比利牛斯山，在南高卢定居。

732年，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Poitiers）击败了已进逼到卢瓦尔河、一路散布恐慌的阿拉伯军队。第二年，法兰克军队以武力收复了法国南部地区，并且惩罚了阿奎丹和勃艮第人的首领，因为他们试图与穆斯林合作，摆脱法兰克人的压迫。现代历史学家试图降低普瓦提埃战役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穆斯林军队的目的不是征服法兰克人，而是劫掠图尔（Tours）的圣马丁修道院的财富。然而，当时的法兰克人和基督徒普遍认为，将穆斯林驱出高卢为宫相赢得了持久的声望。他被称颂为“新约书亚”，随那位收复应许之地的以色列国王之名。

741年，查理·马特去世，留下儿子矮子丕平和卡洛曼，此时宫相在国内已经树立了毋庸置疑的权威。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依旧是形式上的国王，但他只是宫相所立的傀儡，毫无地位，甚至不再保有礼仪上的地位。当时的编年史家称查理为统治法兰克人的王公（princeps）。查理的儿子们则更进一步，卡洛曼在他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中称法兰克为“我的王国”（regno meo）。³ 在他被剥夺权力退隐修道院之后，他的兄弟丕平独自统治整个王国。丕平就顺理成章地宣称拥有早已实至名归的“法兰克国王”头衔。

751年，丕平行受膏礼（涂油礼），标志着法兰克人认同了改朝换代的权力更迭。我们要考虑一件在这之前几年发生的事件。这件事当时不为人所关注。实际上，没有编年史家愿意费心记下此事，但此事标志着我们的故事真正开始。

查理出生

丕平的妻子贝特拉达（Bertrada）来自奥斯特拉西亚的一个有权势的家族，拥有大量土地，与丕平家族一直是政治上的同盟。查理·马特去世后不久，贝特拉达生下了与丕平的第一个孩子，这个男孩以他刚去世的祖父为名。在法兰克人的语言里，“查理”这个名字代表有力和阳刚之气，这个孩子也注定要继承自己祖父的地位。我们不知道他的出生地，或者说找寻他的出生地是没有意义的。丕平在卢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封地内有许多宅邸，分娩时，贝特拉达可能被安置在其中的任何一所。法国与德国学者为查理出生在现代法国还是现代德国境内做了繁杂的考证，只有那些迟钝的民族主义者才能解释他们为何这样做。对我们而言，弄清这位未来皇帝的确切出生日期更为重要，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问题甚至不成立，因为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查理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记载查理于814年1月驾崩，“他生命的第七十二年，统治的第四十七年”。⁴如果我们减掉这个数字，就得出他出生于742年。如今能看到的最为正式的官方资料是《法兰克王室年鉴》（*Annali Regi*，以下简称《年鉴》），我们试图从中找到更有参考价值的内容，但其中的记载不那么确切。《年鉴》记录查理之驾崩“大约在他生命的第七十一年，征服意大利的第四十三年，他统治的第四十七年以及他被称为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第十四年”⁵。《年鉴》的史官一定是对具体的年份有所存疑，特别是征服意大利的年份，所以他加了一个“大约”，提示我们对准确性不要太期待。亚琛的查理大帝陵墓的墓志铭则记载得更为含糊，简要地称他是“古稀老人”（*septuagenarius*）。⁶这并不意味着他正好享年七十，而似乎是足以表示他越过了七十的关口，又再续了一两年。似乎没有人关心确切的年份。

这是马克·布洛赫评价中世纪观念时所说的“对时间极其不关心”的一个极好案例。计量和控制时间是十分困难的，也许那时的人对时间并没有那么漠不关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在我们现代人认为至关重要的出生日期这个问题上，上述三则史料并没有费心地标出具体日期。我们从同时代的另一份包含日历的手稿中得知，皇帝的生日是4月2日。如果将这些互相冲突的信息综合起来，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艾因哈德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年鉴》史官。这样我们就得到了742年4月2日这个日期，这一天作为查理的出生日期也被各种文本所承认。虽然有一些缺乏证据的德国历史学家认为查理的出生日期要晚得多，但我还是引用这个观点。⁷

一个确切的日期没有那么重要，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很少记录自己的年龄，也不像我们有庆祝自己生日的习惯。时间是由农业节律和传统仪式的年度循环来计量的。以耶稣诞生开始纪年的习俗刚刚开始在西欧传播开来，也仅有编年史家和公证人使用这种纪年法。并且，正如我们刚才所知，他们在确切纪年上也有很多困扰。孩童的出生和死亡都非常频繁，父母们不会费事去记住他们的确切年龄，成年人对他们的年龄只有大概的概念。这一现象可以由审判的记录证实，证人们总是以近似或大概的数字表示自己的年龄，比如50岁或65岁之类。为了理解他们，我们要开始像他们一样思考；所以，我们放弃弄清查理确切出生日期的想法，知道他大约在742年出生，年逾古稀时驾崩就足够了。

。

传统观念与政治宣传

特洛伊起源说

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查理出生以前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是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构建的。而当时宫相的儿子受教的历史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当时的人们用另一种世界观来解释法兰克人的历史。这种世界观在今人看来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对他们而言是确凿可信、毋庸置疑的。查理的同代人对自己本民族历史的了解还不如我们现在的史学家，他们确信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这一传说最早于660年左右记载在《弗雷德加编年史》（*Die Fredegar Chroniken*）中，差不多是查理出生前一个世纪。⁸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在蛮族战士与罗马世界接触以后，这种传说在他们之中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这似乎并不是学者的创造，而是一种流传甚广的传统观念。

特洛伊起源说明明确表明了一种与罗马人有关的比较性甚至竞争性的意义。根据维吉尔的诗歌，罗马人从普里阿摩斯（Priamus）的儿子——流亡拉丁姆的埃涅阿斯这里继承了特洛伊的血脉。法兰克人则相信他们承自另一位特洛伊王子——法兰西欧（Francio），法兰西欧不仅把自己的名字赋予了他们部族，而且带领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西欧，定居于莱茵河畔。因此他们是罗马人的血亲；当埃涅阿斯的子孙（罗马人）逐渐衰弱，不再享有统领的资格时，这种亲缘关系使他们有权统治高卢乃至更广阔的地域。较之世俗之人，这个观念应该在教士中传播得更为广泛。但毫无疑问，从查理年幼之时，这个观念就逐渐灌输入他的思想之中，影响着这个后来头戴罗马皇冠的孩子。

有趣的是，法兰克人与罗马人是同宗血亲的观念并不尽是虚妄之词。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发现罗马帝国时期这两个民族之间是高度融合的，而这段历史在查理的时代已被人遗忘。法兰克人并不是野蛮地打过莱茵河边界，全部族大规模迁入高卢。在3世纪至4世纪，法兰克战士们为罗马服役，和平定居在帝国境内。事实上，法兰克人在罗马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完成了本民族的自我认同。3世纪时阵亡在东部潘诺尼亚行省的军团战士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Francus ego cives, romanus miles in armis.”可以翻译为：“我属于法兰克民族，但拿起武器时，我是一名罗马士兵。”⁹这位战士很可能并不知道特洛伊起源的传说，但他对这一观念并不会感到惊奇。

上帝选民说

法兰克人的历史包含另一层意味，旨在强化自己是罗马继承者的主张。这成为他们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独特联系。这种联合可以追溯到克洛维皈依的时代，他在圣诞节于高卢受洗。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年份，但应该是496年。另一些日耳曼部族是受由希腊教会影响的传教士的教化而改宗基督教，他们信仰的是阿里乌派（*ariana*）。当时阿里乌派在东罗马帝国广泛传播，但在西部帝国鲜有人知。与天主教不同，阿里乌派信仰的基督，人性多于神性，其在本质上比圣父要低一些。阿里乌派回避了三位一体的复杂教义，这样的解释对于缺乏神学与哲学修养的部族来说，更容易接受。其结果是，在皈依阿里乌派后，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难以理解罗马天主教。他们不仅在教义上有分裂，在教会等级上也有竞争和分裂。在罗马天主教世界看来，这些蛮族是基督徒中的异端，他们比异教徒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

法兰克人到达高卢时，还是多神信仰，他们是在当地教士的监管下皈依的。因此他们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天主教的忏悔仪式。这种历史机缘

对法兰克王国的未来产生了有利的影响：罗马—高卢的主教和元老贵族们发现和法兰克诸王合作更为便利，故把他们视为保护者而不是压迫者。因此，起码较于其他罗马—蛮族国家而言，这些国王能建立起相当有效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在罗马人眼中，他们是合法的政权。他们不是篡位者，而是如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以来一直统治他们的罗马皇帝一样，是上承神恩的统治者。

最重要的是，法兰克人信仰天主教，这使得他们能和天主教会的最精神领袖——教宗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些圣彼得的继任者从理论上说依然继续臣服于远在拜占庭的罗马皇帝，人们依然认为他们要依靠皇帝来抵御外敌——比如信仰阿里乌派的野蛮伦巴第人，他们自568年进入意大利以来，就对罗马城构成了真正威胁。然而，拜占庭皇帝离这里太远，并且他们用希腊语祈祷，他们的宗教仪式在经历几代人的分隔之后也和拉丁教会日渐不同。

在这种种原因之下，教宗意识到寻找一个在地理和信仰上都更为接近的保护者的意义。他们唯一的候选人就是法兰克国王。于是教廷开始宣称法兰克人是上帝新的选民。教宗司提反二世756年给丕平的信中就写道，是圣彼得本人亲自向法兰克人布道，告诉他们，上帝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民族，注定要承担和罗马人一样的伟大使命。¹⁰几年之后，新任教宗保罗一世打破古老的传统，没有将教宗选举的结果照会东罗马皇帝，而是告知了丕平。他对法兰克人说：“你们民族的声望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法兰克王国在上帝面前光彩夺目。”他接着引用《新约》：“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9）¹¹

这封信并没有被置若罔闻：法兰克人最重要的法律文献——国王丕平于763—764年（查理时年21岁）下命起草的萨利克法（lex Salica）——的开篇就写道：“自未开化之时起即上承天命、声名卓著、战时骁勇、和时忠贞、皈依天主、不信异端的法兰克人。”法兰克人认为自己不

仅和罗马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了他们。毕竟他们以武力击败了尼禄与戴克里先的继承者，这两位罗马皇帝都曾迫害过真正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以武力推翻罗马压迫的民族，他们接受了洗礼，并把那些被罗马人处以火刑、斩首、兽决的圣徒之遗骸，镶以黄金和珠宝。”¹²

孩提时的查理，是在自己父亲的宫廷里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不会像现代史学家声称的那样，认为法兰克人是一个没有原始内聚力的部落联盟，是在那些为罗马服役的军事领袖的不断进取之下，逐渐转变为一个国家的。对他而言，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和罗马人一样高贵。并且和他们一样，法兰克人注定有朝一日要统治世界，维护基督教信仰。他们的一切事业都是在神意的指导和庇佑之下，因为他们是基督之民，就和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是上帝的选民：“荣耀归于基督，恩泽法兰克人。”萨利克法的前言如是写道。这个“新以色列”的君主不仅像查理·马特那样，是一位新的约书亚，更是一位新的摩西、新的大卫、新的所罗门。这种观念不仅流传在高卢主教们的逢迎讨好之辞中，也反映在罗马教宗的官方公告中。如果我们以查理从父亲手中继承法兰克人的领导权之时为始，去理解查理的整个生涯，我们就要记住，这种观念不只是舆论和看法，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家族传统

对丕平的儿子而言，本家族的历史也远不是我们之前篇章中所说的那种枯燥的统治者年谱。查理宫廷中的一位伦巴第学者助祭保罗（Paulus diaconus），应查理之命记述了一位本朝创始者——梅斯主教圣阿努尔夫的故事。他依照皇帝的要求写道，一次阿努尔夫请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他将一枚戒指扔进摩泽尔河作为忏悔的信物，发誓直到戒指回到自己手中，他才能得到宽恕。多年之后，一名厨师为阿努尔夫主教烹鱼时，在鱼腹中发现了这枚戒指，于是上帝宽恕了阿努尔夫的罪过，并归

还了他的信物。

这个戒指扔入水中又在鱼腹重现的故事，显然是许多神话故事中都出现过的民间文学母题。有些人认为这类虚构故事有着极其悠久的起源，在发现查理将这类神话传说运用到自己家人的真实故事中时，他们都会觉得这很迷人。然而我们都不该忽略这个故事的意识形态暗示。这个故事极有可能就是在宫相的宅邸里口述，然后写下的，所以查理一定在童年时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奇迹中所赞扬的阿努尔夫的圣洁之名，必定要在他的后世子孙中代代传扬，让他们相信自己属于神赐天恩的家族。助祭保罗将这个故事写进自己的著作《梅斯历代主教纪》（*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也就顺理成章了。并且他还写道，阿努尔夫的福报使他的后裔有权统治法兰克人。¹³总而言之，这一作品是受查理出于政治目的委托而写成的。

自查理儿时起，官方的宣传就已经在强化这么一种说法，那就是丕平家族奉天承运，注定要统治法兰克人。丕平的叔父奇尔德布兰（Childebrand）以及后来他的儿子尼伯龙（Nibelung）都继续编写《弗雷德加编年史》，他们在文字中都暗示，查理·马特和他儿子取得的胜利都符合神意。¹⁴换句话说，就是神选王朝将统领神选之民。这个戒指的故事，查理七八岁时听到，并没齿不忘。他此时听到也是恰如其时，此时他的父亲丕平不再满足于以宫相的身份统治法兰克人，决定称王的时机到了。

丕平掌权

丕平夺权

丕平计划的基础在于教宗。教宗自克洛维皈依之时起就是法兰克人的天然盟友。尽管当时罗马主教并不享有如今在天主教会中这样的绝对权力，但是他在政治和精神领域的权威在整个拉丁教会的信徒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如果犯下难以宽恕之罪，比如篡夺了某个基督教国王的王位，教宗是能够将之合法化的。在明确宣称称王之前，丕平曾向教宗扎加利（Zacharias）写信询问，法兰克国王之名加于没有实权之人是否恰当。教宗基于自己承自圣奥古斯丁和格里高利一世的权威，回复道，国王的头衔应该由实际掌权的人持有。¹⁵

丕平家族与法兰克贵族相处已超过一个世纪，已得到认可，再得到这封信的支持，丕平于751年11月召集国内贵族，宣布称王。他被高卢主教涂油，而原来法定的墨洛温国王被送往修道院，以静修度过余生。教宗扎加利也在不久后去世，他的继任者司提反，因为受到伦巴第人对罗马城的威胁，而让新的法兰克国王许诺以武力介入意大利，一劳永逸地解决威胁。作为回报，司提反754年前往高卢，再次为国王行受膏礼。这是史上第一次教宗出行到这么远的国家，让人印象极其深刻。这标志着教会最终认可了这个新王朝，尤其是教宗当面表示，他不仅愿意为丕平涂油，也愿意为他的儿子查理及其弟卡洛曼涂油。

在这次会见中，国王和教宗宣誓达成一个严肃的友好协定，他们的继任者则重申这一协定，并建立一个罗马与法兰克王国之间的持久联盟。基于此条件，教宗赐予丕平和他的儿子们以“罗马人的执政者”的头衔

。尽管这个称呼的准确法律含义有些模糊，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法兰克国王成了教宗圣座的保护者。没有加地理限制的“执政者”头衔，传统上是由东罗马皇帝授予的，属于拉韦纳的拜占庭总督（*esarca*）。但此时拉韦纳已落入伦巴第人之手，在意大利也不再拜占庭的总督了。即使这样，“罗马人的执政者”的称呼在拜占庭人听来还是有蛮族意味。毫无疑问，教宗将之授予法兰克国王，意在鼓动他取代东罗马皇帝，承担起保卫永恒之城的责任。

为了加强司提反与丕平之间的联盟，一种精神守护的关系建立起来。教宗在754年之后与国王的关系如同教父与教子，他将查理和卡洛曼视为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子嗣，并给他们施洗，尽管他们早已过了年龄。教宗此举的确切动因并不明确，很有可能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教父地位。继任的几代教宗对这种父母与教父母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视，他们尽己所能继续这种关系。当757年查理的妹妹吉斯拉（*Gisla*）出生时，丕平国王将婴儿受洗时所包的襁褓送给新任教宗保罗一世。教宗以庄严的礼仪接收了此物，并立刻给国王回信，自此，他自视为这个女孩的教父，就如同他亲自把她放入洗礼盆中一样。¹⁶ 显而易见，丕平家族（在查理·马特凯旋之后开始被称为加洛林家族）通过与教宗的关系，开始享有特殊地位，并因此在法兰克世界和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取得了无人可及的优势。

神圣的王室血脉

751年丕平所采用的受膏仪式，代表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革新。在此之前法兰克国王是通过欢呼仪式继位的。如果说当时社会舆论中有什么和神秘领袖之力相关的内容，那就应该是流淌在他们血管里的王室血脉。丕平用圣油行受膏礼，采用的是《旧约》中记载的仪式。根据记载，扫罗王就是通过先知撒母耳的涂油而获得王国的控制权。在他

之后，大卫和所罗门也是通过受膏继位的。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仪式已经被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采用，但此时他们的王国已经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丕平不仅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神圣仪式的法兰克国王，也是当时唯一采用这种仪式的基督教国王。随后不久，英格兰诸王就效法了他。

受膏礼不仅为国王笼罩了一层神圣的氛围，也像以色列诸王一样，授予了他一种教士的特质。借此，丕平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为主所选定”。并且他可以像对自己的王国一样，对教会宣称自己的权威。而一个仅仅被加冕的世俗国王则无法这样做。从教宗保罗一世的角度看，他毫不犹豫地将丕平说成是一位新的大卫王，由神选出保护基督徒。他用《诗篇》中的词句加于丕平，“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诗篇》89：20）¹⁷。借此，法兰克人又像“长发王”时代那样，再次被一位教士国王统治，不过这次国王的神圣领袖力完全来自基督教，而不是墨洛温时代的异教。这并不意味着国王放弃使用武力；国王以神圣的意志佩带宝剑，可以在需要时拔剑保卫信仰。不久查理就会证明法兰克国王从这种宗教法统中获得的巨大优势。

注释

1 *Chanson de Roland*, v. I .

2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描述发现于A.Ebenbauer, *Carmen historicum: 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Dichtung im karolingischen Europa* (Vienna, 1978), 5:237–50.

3 *CFR*, 10.

4 Einhardus, 30.

5 *ARF*, 140.

6 Einhardus, 31.

7 这一问题由K. F. Werner重新提及，“Das Geburtsdatum Karls des Grossen,” *Francia* 1 (1973): 115–57，《佩塔维安编年史》（*Annales Petaviani*）中声称查理出生于747年的一段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是这一原始材料是孤立的，尤其和查理宫廷中提

供的三份文献相比，缺少可信的权威。M. Becher在“Neue Überlegungen zum Geburtsdatum Karls des Grossen,” *Francia* 19 (1992): 37–60中注意到，编年史家按照东部的方式纪年。因此如果查理出生在4月2日，所提供的日期将会是在748年而不是747年。这对于反驳747年4月2日这一日期很有用。这一天是复活节周日，如果真的是查理的生日，这一巧合不太可能不被注意。所以归根到底，如Becher所提出的，偏向742年这一传统的日期，似乎比推迟到748年更符合逻辑。

8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7. und 8. Jahrhunderts*, ed. A. Kustemig (Darmstadt, 1982), 84.

9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3:3576.

10 CC, 10.

11 CC, 12–13, 39.

12 *MGH, Leges*, IV/2:2–9.

13 *MGH, Scriptores*, 2:264.

14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7. und 8. Jahrhunderts*, ed. H. Haupt (Darmstadt, 1982), 272–324.

15 *ARF*, 8.很好奇，如此重要的文档居然在《加洛林法典》（*Codex Carolinus*）中缺失了，在查理的命令下，教宗致法兰克宫相和国王的书信集被归拢一处。

16 CC, 14.

17 CC, 33.

第2章

对伦巴第人的战争

继承权的艰难划分

768年9月，国王丕平在巴黎驾崩，可能死于水肿病。他的两个儿子，查理与卡洛曼，分享了父亲的王国。当时还没有实行长子继承制，甚至在王国中也是这样，财产要在男性子嗣中分配。在决定如何分割领地时，临终的国王并没有沿袭法兰克王国的传统边界，而是如同之前他的父亲查理·马特那样，大体进行了新的领土划分。查理继承了法兰克人领土的外围，一大块新月形的土地。从阿奎丹北部的大西洋海岸开始，沿着卢瓦尔河以北延伸至纽斯特里亚的一部分和奥斯特拉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再继续沿着海岸线至弗里斯兰（Frisia，亦译弗里西亚），然后转向东南，囊括了大部分的日耳曼省份，直到图林根。卡洛曼继承了内部的领地，包括奥斯特拉西亚的一小部分、日耳曼东南的阿勒曼尼亚诸省、大部分的纽斯特里亚（包括塞纳河流域），还包括从孚日山脉沿着罗讷河谷直到地中海的勃艮第王国、高卢的大部分东南地区，以及阿奎丹的内陆地区。

在这新的现实背后，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淡化传统的法兰

克王国观念，强调法兰克民族的统一。有两位国王，但只有一个王国。两兄弟分别在努瓦永（Noyon）和苏瓦松两城行受膏礼并非巧合，两城离得很近，这个地区是丕平国王最常居留的地方，也是他们的母亲贝特拉达客居的修道院之地。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紧张。可能是分割导致的地缘政治因素，迫使他们采取对抗政策。查理得到了向日耳曼异教地区自由扩张的机会，而卡洛曼却要面对最危险的边界——面对穆斯林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以及最敏感的边界——面对意大利的伦巴第王国。可能他们兄弟二人以及他们身边世俗与神职的权贵们，都是非常谨慎的。查理继位第二年，就镇压了阿奎丹的叛乱。而卡洛曼的追随者们却建议自己的国王不要插手协助查理。当然，我们也要记住，这个事件现在可见的唯一记录，是在查理的宫廷里记述的。当时卡洛曼的史官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版本。¹

他们彼此间的不信任还能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在卡洛曼生前，除了查理出征惩罚阿奎丹的叛乱，兄弟二人都没有指挥过军事战役。如果我们想到查理曾经空出手来，就会感到很惊讶。查理几乎没有哪年不在向周边民族发动战争。简言之，分割王国导致一种不稳定的状况，只是他们的母亲居中调停才维持了两兄弟的和平。然而造化弄人，这种平衡没有持续太久。771年12月1日，在患病数月之后，卡洛曼撒手人寰。这位不幸的国王虽然年仅二十，但已经有两个儿子，两人由他们的母亲盖博嘉（Gerberga）摄政。王国的权贵们也觊觎王位。查理迅速行动抢占先机，宣称自己是法兰克人唯一的国王，并占领了他弟弟的领土。许多曾经效忠卡洛曼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都臣服于新的主人，但另一些人则追随先王的遗孀和王子，逃往意大利寻求庇护。

这种逃亡本身就说明了兄弟二人互有芥蒂。《年鉴》中的条目声称“国王并没有为他们背逃意大利而气恼，觉得此事无足轻重”。这段在查理宫廷中撰写的历史记录，带有一方派系杜撰出的夸耀意味。²一段时间后，爱尔兰人卡特伍尔夫（Catwulfo）给查理写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书信，信中他迫不及待地恭祝查理兵不血刃征服了兄弟的王国。³如

果统一是一件必然且众望所归之事，那这种恭维就显得有些突兀。这位顺应全体法兰克人民意的国王，不再关注自己的弟妹，以及那些追随她逃往意大利的流亡者。现在他感到可以随心所欲，将自己的雄心转向他处。在卡洛曼去世几个月以后，按捺许久的查理率军渡过莱茵河，与北方的异教徒作战。

772年夏季发动的对萨克森人的战役，是短促而决定性的。法兰克人深入敌境，以武力强行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强迫萨克森人交付12名来自高贵家族的人质，以保证他们的臣服。当查理回到位于列日附近赫斯塔尔的祖居庆祝圣诞之时，这位凯旋的法兰克人的唯一国王应该不会想到，为了最终使萨克森人彻底臣服，自己的整个余生都在不断对他们发动战争。但在他完成这项事业之前，他首先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意大利，这里是卡洛曼家人的避难所在。

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世仇

法兰克人与他们的邻居伦巴第人的关系，总是容易变得糟糕。当教宗放弃了从拜占庭得到协助的希望，转而向高卢的天主教国王和宫相们寻求保护以后，尤其如此。739年，教宗格里高利三世对查理·马特极尽逢迎之词的书信，就直白地表明了，尽管查理·马特不是国王，但他在圣彼得继承者的眼中是法兰克人的真正领导者。教宗恳请他率军介入，对抗威胁罗马的伦巴第王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o）。为了答谢他并非现成的协助，教宗甚至史无前例地将圣彼得陵墓的钥匙赠予他，暗示授予他罗马教会保护者的身份。他写道，除了上帝，只有查理（马特）能从蛮族手中拯救教会。⁴

754年由教宗司提反为丕平涂油，并授予他罗马人的执政者头衔，这同时也包含着武力介入意大利半岛的承诺。这次法兰克国王言出必行，在当年夏季，他将伦巴第王阿斯图尔夫（Aistulfo）围困在帕维亚城（Pavia），迫使他按照教宗的意愿，放弃中意大利所有被他们征服的土地，并承认法兰克人的霸权。仅两年后，756年，阿斯图尔夫自食其言，兵临罗马，迫使教宗司提反绝望地向丕平恳求。据说他以使徒彼得的第一人称口吻写道：“快来，快来救我们。”⁵ 法兰克大军迅速行动，迫使阿斯图尔夫献上中意大利22座固守城池的钥匙，让一切回归正轨。丕平依照礼仪把钥匙放置在圣彼得的祭坛上。

在这次胜利之后，法兰克国王的意大利政策改变了。在经历了如此奇耻大辱之后，伦巴第国王承认了法兰克人的霸权地位，自居为扈从，而不是对手。无怪乎丕平在法令中避免使用罗马人的执政者的头衔，因为这个头衔要求他干涉意大利事务，义务太重，并不符合他的利益。查理与卡洛曼两人继位后，情况并没有改变：伦巴第王国对他们二人而言

都是一个潜在的有力盟友，所以756年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继承阿斯图尔夫的王位之后，兄弟二人都热心于维持与他的关系。《年鉴》770年的条目里提及了一件由母后贝特拉达主持的与意大利有关的事件。⁶ 尽管我们对此事所知不多，但依照逻辑可以推断，贝特拉达作为和平倡导者，提出了一个三方协议，使相互竞争的兄弟二人谁都不能利用和伦巴第人的联盟去对付另一人。

在卡洛曼死后，他的遗孀和儿子以及众多的追随者前往直意大利避难，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生前与德西德里乌斯的良好关系。然而查理同样和帕维亚的宫廷有着良好关系。就在这一时期，他迎娶了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A.曼佐尼（A. Manzoni）在诗中破格称她厄曼嘉达（Ermengarda），而实际上同时期的编年史家都没有记录她的名字。⁷ 这一联盟似乎是要停止法兰克人倾向教宗的政策，并确认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的共存关系。从教宗司提反三世写给法兰克国王抱怨这一决策的一封措辞尖刻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多么愚蠢啊：你们高贵的法兰克民族，众族之光。你们的名誉和高贵地位被恶臭而奸诈的伦巴第人玷污了，他们甚至不够被称为一个民族。难道不知，是他们带来了麻风病吗？”⁸ 但是年迈的贝特拉达克服了这种反对的声音，伦巴第公主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她的未婚夫结婚了。

为什么这场婚姻还不到两年，查理就入侵意大利了呢？正如常见的那样，这个问题的原因很难以可靠的方式解答。不仅是因为所有同时期的记录都是十分厚颜地偏向一方，也是因为这一系列事件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我们很难分清孰因孰果。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在771年和772年之间发生了三件标志性事件，但不知道确切的顺序。一件是德西德里乌斯鼓动卡洛曼的遗孀宣称自己的儿子拥有先王的继承权，并要求教宗为孩子涂油。伦巴第人此举是通过将法兰克分裂成两个政权而瘫痪其军事力量，保护自己的后方，趁机再发动战争，占领罗马。第二件事在查理这一边，他抛弃了尚未生子的妻子，将她送还她的父亲。这一事件可以解释为一次合法的行为，因为国王需要一位能生育继承人的妻子，但此举

极大地破坏了贝特拉达苦心构建的外交平衡。最后一件，新当选的教宗阿德里安一世写信给查理，告诉他罗马处于伦巴第人空前的威胁之中。他请查理效法自己的父亲，率军保卫圣城。毕竟查理还是罗马人的执政者。⁹

显然，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能引发一场危机，并且难以确定准确的发生顺序，我们必须克制住将这些事件归为引发战争的政治责任的想法。似乎可以确定，直到最后一刻，查理依旧保留着外交解决的通道，这与他一贯的残酷手段相反。他面对敌人，尤其是异教徒时，总是十分急切，有时不宣而战。这次法兰克国王并没有冷酷地寻求战争，他刚显露出向北方异教徒扩张的兴趣，没有急于进攻意大利，尽管目前的国际形势变得对他有利。卡洛曼的儿子并没有继续宣称王位。如果德西德里乌斯按照计划进军罗马，强迫教宗为他涂油的话，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伦巴第王的计划，在772年至773年的冬季，在永恒之城的门前终结了，一部分原因是阿德里安一世威胁开除他的教籍。

这种情况下，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之间的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法兰克贵族也不愿卷入其中，实际上他们以前对丕平的意大利远征也并不热衷。因此查理试图在他的前岳父和教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提议后者以14,000金币的高昂补偿金，换取伦巴第人从已占领的土地上撤军。然而，教宗不肯妥协，谈判破裂了。因为教宗看到了能一劳永逸地从伦巴第人的威胁中解脱的机会，查理开始计划他的意大利战役。

773—774年的战争

战争计划

在策略层面，问题只有一个，但也难以轻易解决：如何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尽管有多条能让旅行者在夏季轻松通过的小路，但能够允许军队携带战马和辎重通过的罗马大路只有两条。最常用的是法兰西吉纳大道（Via Francigena），从里昂出发沿着阿克山谷（Val di Arc），越过赛尼斯山口（Moncenisio），再沿着苏萨山谷（Val di Susa）下山直到都灵。朝圣者们经常沿着这条路前往罗马，所以它也被称作罗马大道（Via Romea）。但是在山谷的入口，伦巴第人修复了防御工事系统。这些工事在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就藩卫着意大利平原。它们被称为封锁通路出口的“要塞”（clusae）。现在也因圣米迦勒修道院之名被称作“圣米迦勒门禁”（Chiuse di San Michele），这座修道院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控制着狭窄的山谷。

另一条通往意大利的罗马大路，是圣伯纳德大道，当时被称为焦韦山口（Monte di Giove），也是一条中世纪朝圣者和商人经常使用的道路。在这里“要塞”也守卫着伦巴第王国的边境；时至今日，在道路抵达平原的地方还能看到巴德（Bard）要塞。让人惊奇的是，两国的边境线是沿着山区进入平原的路口划分，而不像现代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那样沿着阿尔卑斯山分水岭划分。实际上，法兰克人比他们的邻居更强大，更进取。他们早就占据了苏萨山谷和奥斯塔山谷（Val d'Aosta）地区，他们处心积虑地保护对这两条重要道路的控制权。时至今日，意大利语皮埃蒙特方言区和高卢罗曼语地区的法兰西—普罗旺斯方言区的边界就是沿着这两条山谷的入口处划分的。

“要塞”的存在，尤其是在苏萨山谷的“要塞”，给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19世纪的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戏剧《阿德尔奇》（*Adelchi*）中，曼佐尼将这些要塞作为阻碍因素，并构想查理无法越过要塞而放弃了整个计划。上帝为了助他实现目标，派遣助祭马丁（*Martinus diaconus*）向他指出了绕过障碍的另一条路。不久后，公元1000年的《诺瓦莱萨编年史》（*Cronaca di Novalesa*）将“要塞”描述为巨大而坚实的屏障，一堵由石料和泥灰建起的古老城墙，从峡谷的一侧横亘到另一侧。并宣称它的废墟在谷底依然可见。¹⁰ 在距我们更近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描述表示怀疑，提出“要塞”是一连串的临时工事、瞭望塔和关卡，而不仅仅是一堵巨大的石质壁垒。似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彻底推翻了集体想象流传下来的浪漫意象。然而，更多的近期研究表明，末期伦巴第诸王鉴于以前与丕平作战的惨痛教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加固“要塞”。并且他们不同于习惯以灵活方式防御的前任国王，他们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做了这些准备工作，能够以深沟高垒封锁住入侵者的通路。总而言之，至少在德西德里乌斯的时代，可能确实有一堵高墙封锁谷底。

查理决定入侵意大利，就开始在日内瓦集合军队。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从这里出发，查理既可以选择取道苏萨山谷顺罗讷河而下，也可以选择取道圣贝尔纳多（*San Bernardo*），再绕着日内瓦湖溯罗讷河而上朝向马蒂尼（*Martigny*）进发。选择日内瓦这一地点很有战略敏感性。从广大的法兰克王国各省召集军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显然敌人会适时得知军队集合点的情报。查理的选择意味着伦巴第人难以猜测军事打击会从哪个方向而来。

甚至即使伦巴第人猜中了，如果查理两路出击，他们也很难占上风。他决定兵分两路出征：一路通过圣伯纳德大道，由他恰巧也叫伯纳德的叔父统率；另一路取道赛尼斯山口，由他亲自统率。这是第一次有证据显示出他独特的战略倾向：在他作为军事统帅的生涯中，查理偏爱使用钳形攻势，这展现了他规划和协调兵分两路行动的独特能力。显然，

查理统率的大军强于自己的敌人，只有作为这样军队的统帅，才可能实行这样的战略。我们可以称查理是一位伟大的将领，但没有身处劣势时的杰出战略能力。他更像一位现代模板的统帅，擅长组织和后勤。

入侵

773年夏季法兰克人跨越阿尔卑斯山是一次史诗般的壮举，除却战象，可以和汉尼拔相比。查理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强调：“翻越阿尔卑斯山是多么困难啊，群峰直达云霄，法兰克人穿过难以跨越的连绵群山和嶙峋的岩石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¹¹而给人更深印象的是，查理迅速击败了守候在山谷的敌人。时至今日，这一事件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毋庸置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曼佐尼，但也不尽然。当时的编年史家也认同，由于伦巴第人已经在“要塞”中占据有利位置，查理并没有正面进攻他们，而是转而包围他们。史官们有的将这次胜利归于查理的统御能力，有的将之归于神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¹²直到新的千年，《诺瓦莱萨编年史》中虚构了一段叙述，说一位伦巴第行吟诗人为了金钱，向查理指出了绕过要塞的道路。¹³这位匿名编年史家直接激发了曼佐尼的灵感，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混合了神迹介入的古老传统。他以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助祭马丁替代了这位叛国的行吟诗人的角色。

法兰克人行军的确切线路依旧是个问题。在苏萨山谷中，有一条当地传统中称为“法兰克小径”的小路。由于被假定为查理曾经取道之处，最近人们在评估这条路的旅游潜质。实际上，这条路只是中世纪时期构成法兰西吉纳大道的路径之一。实际上，一条中世纪道路没有必要像古罗马道路那样，被定义为一条精心铺设的直线通路；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可能分成数条路径。现代历史学家将之定义为道路区域。关于查理绕过“要塞”的路径记述，最为可信的文本，是用战略术语记载，由

诺瓦莱萨的僧侣提供的。根据他的记载，法兰克人右转下行到桑格那山谷（Val Sangone），再下行到贾韦诺（Giaveno），然后上行爬回到阿维利亚纳（Avigliana），从而处在敌人的后方。在惊讶之余，伦巴第人慌乱地远遁至帕维亚，在这里德西德里乌斯国王和他残存的战士把自己关在城中，他的妻子和儿子阿德尔奇斯（Adelchis）甚至逃回了维罗纳。

直到此时，查理的远征成果和他父亲相比还没有什么不同。当年丕平击败了阿斯图尔夫国王，包围了帕维亚，并在此撤军。几天之后，在实现了归还教宗宣称的土地并移交人质的结果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土。在此我们可见查理的政治策略及其宽广的眼界，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帝国主义。法兰克国王围攻帕维亚超过一年之久，直到774年6月。此时德西德里乌斯粮尽援绝，被迫无条件屈服。获胜者查理入主伦巴第王宫，并将他岳父的财宝分配给自己的战士。而德西德里乌斯则被迫成为修道士，被禁闭在远方的科尔比（Corbie）修道院。至于伦巴第人的最后希望——阿德尔奇斯，则被人从维罗纳赶走，被迫离开意大利，在君士坦丁堡寻求庇护。他在拜占庭皇帝的庇护之下一直等待着夺回故土，直到老迈之年也未能实现。法兰克国王没有废弃新征服的国度，但也没有将其并入自己的王国。他决定继续维持其管理体制和行政自治，自此，他担负起伦巴第国王（rex Langobardorum）的头衔。

法兰克人征服的结果

教宗国的诞生

查理对自己的境况是如此自信，甚至在德西德里乌斯投降之前，他就离开帕维亚前往罗马庆祝774年的复活节，这也是他第一次访问罗马。他受到了与阿德里安教宗接待拉韦纳总督和罗马人的执政者同等的礼遇，实际上礼节非常端庄适度。查理跪行爬上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他亲吻每一级台阶，以证明他对此地所蕴含的巨大宗教力量的重视，他已经是这里的保护者了。在停留罗马期间他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和教宗的会谈。由于法兰克和教宗双方编年史家的分歧，我们无法确认他们有什么进展。但毫无疑问的是，二人重申了二十年前丕平和司提反二世之间的友好协定。更进一步，阿德里安教宗要求查理确认他父亲之前签署的书面承诺，并向国王宣读了这个文件。根据教宗这边的编年史家记载，他同意签署文件。该文件极大扩展了教宗统治的领地，创立了所谓的“圣彼得共和国”，而法兰克人保留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波河流域地区，南及帕维亚。拜占庭人占有卡拉布里亚（Calabria）、西西里和撒丁岛。¹⁴

这个文本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一些质疑，他们不认为查理和他之前的丕平会作出如此之重的承诺。但即使我们取信教宗的文本，也要记住查理和阿德里安会谈之时，与伦巴第人的战争依旧在继续；德西德里乌斯困于帕维亚城中，继续抵抗，而意大利半岛未来的划分就已经被决定了。但我们不要感到惊奇，查理很快会夺取伦巴第国王的冠冕，他会思虑再三。显然，他不会去实际承担国王责任，但如果按照字面上的要求，他的新王国将会分裂。只有教宗在罗马这一自古以来的领地的权威得到承认，再加上萨比纳（Sabina）这块前拜占庭总督领地，和“五城地区

”（Pentapolis）这块在亚平宁山区的一连串带状区域。建立圣彼得共和国，是历代教宗自8世纪以来就一直有的雄心。至此教宗国的最终疆域大致形成，直到千年之后炮火轰破了罗马庇亚门（Porta Pia）的城墙，教宗国的最后残余才终于陷落。

776年的叛乱

伦巴第王国的覆灭毫无疑问带来了恐惧和猜疑。774年5月，德西德里乌斯投降前一个月，在亚平宁山区埃米利亚（Emiliano）地区一座还没有被法兰克人占领的要塞，有人写下一份私人文件，用前所未有的口吻证明了王国所遭受的灾难打击：“以耶稣之名，写于野蛮时期的章程。”¹⁵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伦巴第公爵对保卫国家毫无热情，迅速臣服了他们的新的主人，这也解释了征服伦巴第为何如此容易。内部异议一直是伦巴第王国的弱点。756年选举德西德里乌斯时，以鲁莽著称的图斯亚（Tuscia）公爵将此事视为对对手弗留利（Friuli）公爵的一次打击和羞辱。意大利的贵族因此而分裂，一些贵族似乎对国王十分冷漠，不愿意无条件效忠。无怪乎查理认为在征服后重新安置这些贵族并无必要，而是让他们在各自的省份保留原有的地位。

名叫罗斯高德（Rothgaud）的弗留利公爵，很快组织了一次暴动。所有残存的在位公爵都参与了行动。当他们目睹德西德里乌斯倒台时，他们并未太在意，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标志着伦巴第独立的结束；他们现在想重新开始斗争。在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和他的保护对象阿德尔奇斯饶有兴致地旁观事态的发展，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775年秋，从萨克森远征归来途中，查理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德里安教宗的书信，信中他告知查理国王，罗斯高德与贝内文托公爵阿里奇斯（Aricchi）密谋，正准备明春发动叛乱。查理迅速行动，他没有依照惯例回家过冬直到来年复活节，而是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在阿尔卑斯山脚过冬。

，他在776年2月或3月出现在弗留利。

在那里，叛乱的伦巴第诸公爵正等待着查理，不过最终只有弗留利、特雷维索、维琴察三地的公爵。对这次会战的结果，法兰克和伦巴第两方的史官的记述截然不同：根据《年鉴》，罗斯高德战死，查理接连攻克叛乱的城市，以法兰克人的伯爵取代伦巴第人的公爵。他在特雷维索庆祝复活节，随后赶回受萨克森人威胁的莱茵河边界。¹⁶ 另一方，伦巴第人的编年史家，安德里亚·达·贝加莫（Andrea da Bergamo），在一个世纪后写道，反叛的公爵们在利文扎河（Livenza）大桥上直面意在烧杀抢掠的法兰克人。他们浴血奋战，挫败了法兰克人。最终使查理同意保留公爵们原有的地位；作为回报，公爵们宣誓效忠并永不违誓。¹⁷

安德里亚的记述可以被解释为伦巴第人的胡思乱想，即使过了如此之久，他还是不能接受本民族败于法兰克人之手。这种情绪之后存在了很久，这可以从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公爵领地的编年史传统中得到印证；此地直到下个千年一直保持独立。现在，大部分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法兰克人编年史中的记载，他们相信是由于公爵们的叛乱，查理才对伦巴第贵族失去了信任。他以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主教、伯爵和封臣系统性地代替他们，导致意大利贵族阶层剧烈变动，并且这不是在帕维亚城投降以后就立即发生的。

从伦巴第人的政权到意大利王国

776年法令

不管结果如何，毫无疑问的是776年的叛乱让查理感到害怕，导致他寻求通过立法手段来让他的新臣民达成一致。尽管安德里亚·达·贝加莫的记录可能确实有所夸张，“全意大利一片荒芜，死于刀剑、饥馑和野兽之口的人太多了，以致在乡村和城市都生者寥寥”¹⁸，但对伦巴第人的征服确实使意大利境内遍布贫穷和衰败。阿德里安教宗也在一封写于776年的书信中提及了饥荒及其悲惨的影响，并谴责了丧尽天良的希腊商人增长的基督徒奴隶贸易。为了逃离饥荒，伦巴第人出售自己的奴隶，或者只身登上希腊商船以图避祸苟生。¹⁹同年2月，在准备与叛军作战之时，查理颁布了他的第一部意大利法令集，换言之，这是他第一部遍及整个新征服王国的法律，旨在缓和侵略战争造成的创伤。

这次立法是史无前例的。查理国王了解到，在他军队经过之地，荒乱导致许多人将妻儿甚至自己卖身为奴，另一些人则“迫于饥馑”将自己的财产捐赠或出售给教会，或者低价出售自己的土地。国王宣布所有的这类财产转让一律作废，如果能证明卖主是迫于饥馑，则与之有关的交易事实也将取消。无论何种情形，所有的这类交易都要交由法庭评估，以战前的价格来评估财产的价值，并评估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所有的奴隶交易也自然取消，甚至给教会捐献的情况也要暂缓执行，重新评估当事人的具体情形。²⁰

这个重要决策证实了安德里亚·达·贝加莫的记述：法兰克人的入侵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王也难以忽视，不得不采取行动减轻新臣民的

痛苦。查理的法律详细说明这种评估只能在“朕及朕之大军所经之地”方可实行，并且不能干涉发生在之前“德西德里乌斯时代”的交易。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主要针对世俗与教会的伦巴第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收益来自贫困的农民，则他此举自有道理。此时正值查理准备与反叛者对阵疆场之际，这部法令可以理解为对反叛者利益的直接打击。无论如何，在临近利文扎河战役之时颁布这一法令是明智之举，旨在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使他们与自己的领导者相互分裂。这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变。从这时起，这成为查理所采取的路线：他向广大伦巴第人传递一个信息，他们和法兰克人一样，都彻底臣服于国王，也意味着在所有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行政官员和教士之中系统地任命法兰克人和自己所信任的外国人，以削弱不忠的本土统治集团。

王国的管理

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伦巴第王国的自治持续到781年复活节，直到查理与王后希尔德嘉德（Hildegard）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名叫卡洛曼，在罗马受洗于教宗，更名丕平，又被教宗涂油而成为伦巴第国王。

²¹ 从此以后就有了两个国王，父亲主要居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儿子则居于王国的旧都帕维亚。丕平年仅4岁，国家由查理任命官员进行实际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赖兴瑙（Reichenau）修道院院长沃尔多（Waldo）。查理国王曾试图任命他为帕维亚城的主教，却因教宗的缘故而未能实现。后来，年幼的国王成长起来，能够亲自统率主要由伦巴第人组成的王国军队。796年对阵阿瓦尔人，针对贝内文托公爵发动多次惩罚性军事行动，在东部边境与拜占庭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包括810年夺取威尼斯。在这年去世时，年轻的丕平不再是一个傀儡统治者，而是一位深谙统治之道的真正君主，宫廷诗人赞颂他的胜利。

²²

尽管任命了大量的法兰克人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伦巴第王国

的管理依旧保持了其特色，没人想要有意识地破坏它。地方官员使用了伦巴第人的地方官头衔，诸如“加斯塔尔迪”（gastaldio）、“斯库达伊斯”（sculdahis）、“洛可波斯图斯”（locopositus），他们在来自法兰克或阿勒曼尼亚地区的伯爵领导下继续履行职责。在王国的外围区域，这里的管理依照伦巴第人的传统交付给公爵，并持续了很久。不过从弗留利到斯波莱托，伦巴第的当权者都被法兰克人取代。但这些举措是逐步进行的，甚至在776年叛乱之后也是如此。几乎可以说查理似乎是在等待公爵老死，再任命一位可信的继任者。这使得新老政权的过渡更加平顺温和。

另一方面，查理和不平时常在意大利直接颁布法令，这也是他们设计的王国自治的另一种体现。事实上这些法令的意图也延伸到了新王国的制度和行为法规（例如针对教士的）中，这些制度和法规已经在法兰克王国广泛实践。事实上，法律的主体是在明确限制意大利，尽力维持其伦巴第王国的身份，防止其融入帝国之中。甚至这些法律在查理大帝去世之后，在帝国的语境下重现生机。但一个改变还是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伦巴第人的王国”这一称呼被放弃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意大利政权”（regnum Italiae）或意大利王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其为古意大利王国，和1861年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以示区分。

历史与神话

铁君王与食骨者的传说

查理对伦巴第人的战争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并催生了一系列广泛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少带有奇想的性质。围攻帕维亚激发了一位后世作家的灵感，他生活在查理大帝曾孙辈的时代，塑造了法兰克国王领导大军的难忘描写。这段描写当然是十分传奇的，对于理解查理大帝的形象很有裨益，被后世反复抄录，铭记不忘。这是一个非凡的文本，值得在此完整复述。作者是“诺特克·巴布鲁斯”（Notker Balbulus，意为口吃者），一位圣加尔（San Gallo）修道院的僧侣。他的作品《查理大帝纪事》（*Gesta Karoli Magni*），大约写于886—887年，献给皇帝胖子查理，这是一部集合了史实与杜撰逸闻的传奇作品。他告诉我们，德西德里乌斯被困于帕维亚城，身边有一位名叫奥特克乌斯（Otkerus）的法兰克贵族，他因为曾与查理争执而到伦巴第人这里寻求庇护。顺便一提，这个人物似乎就是我们在中世纪“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中发现的奥吉尔（Ogier），在意大利语版本中奥吉尔被称为丹尼斯（丹麦）的乌吉里（Uggieri il Danese）。

风闻查理军队逼近，德西德里乌斯和奥特克乌斯登上了帕维亚城最高的塔楼。

出现的辎重队伍可以和大流士与恺撒出征时的相比，德西德里乌斯对奥特克乌斯说：“查理在这支大军中吗？”他回道：“还不在。”当看到由广大帝国各地召集而来的士兵组成的军队

时，他有把握地对奥特克乌斯说：“显然查理一定傲然立于这支军队之中了。”奥特克乌斯回道：“没有，还没有。”德西德里乌斯开始焦躁不安，说：“当他和更强大的军队一起到来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奥特克乌斯说：“当他到来时你会看到的，至于我们的命运会如何，我无从知道。”当查理整装待命的卫队出现时，德西德里乌斯看到了他们，用震惊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查理了。”然而奥特克乌斯说：“不是，还不是。”

接踵而至的是主教、修道院院长、礼拜神父和他们的随从。看到他们，德西德里乌斯畏惧光明，只求一死，他抽泣着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下去藏身地下吧，不要再面对这么一个可怕对手的怒火！”奥特克乌斯曾经在查理的宫廷中有过一段好时光，对查理无可匹敌的力量和性格都有所了解，此时他吓坏了，说道：“当你看到田野里突显一片铁的庄稼，黑铁的洪流如同海中的波涛一般拍打着城墙，那时你就可以说查理来了。”他话音未落，一片黑云一般的风暴就在西方出现，将白天的光明变为一片可怕的灰暗。皇帝接近的时候，被围城中的人觉得这个白昼比任何黑夜还要黑暗，因为他们面对着雄壮的军队。

随后他们看到了如钢铁般坚定的查理，头戴铁盔，双臂披铁臂甲，铁胸甲和肩甲保护着身体，左手高举着铁质的长枪，右手时刻握着无坚不摧的利剑。其他人为了更易于骑马，大腿的外侧没有护甲，而他则是以铁片防护。至于胫甲，全军也和他一样是铁的。在他的盾牌上你只能看到铁。甚至他的战马也闪着黑铁的青光，心如铁石。保护他的卫士侧立在他的身边，也尽可能在装备上效法他。铁充斥着田野和平原。密集的铁队

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人们因恐惧而战栗，屈膝于冷酷的钢铁。铁的闪光照亮了黑暗的地窖，市民们喧闹的叫声不断回响：“哦，铁！唉，铁！”²³

虽然这是僧侣文风，但我们透过文风可以看出此文明显揭示了法兰克人军事上的自豪，借此查理成为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形象，而伦巴第王和他被围困的人民成为悲惨的形象。但不能忘记的是，集体记忆同样创造并保留了相反的形象，他们的英雄是被入侵者无理剥夺了继承权的阿德尔奇斯王子。甚至在新千年，《诺瓦莱萨编年史》的作者，在现属伦巴第大区的洛梅利纳（Lomellina）的布雷梅（Breme）修道院中写道，有一天阿德尔奇斯潜入了被法兰克人占领统治的帕维亚，进入了查理正在举行盛宴的大厅。他隐身于宴会的众多宾客之中，狼吞虎咽吃下多得不可思议的食物，他像狮子用自己的利爪一样，掰断骨头，吸食骨髓。他在桌子下留下一堆骨头后消失了。当查理发现这一堆骨头时，他意识到只有一位有王室血脉的王子才能如此进食，阿德尔奇斯曾到过这里，并嘲弄了他。²⁴

曼佐尼与《阿德尔奇》

如果我们考虑到理解阿德尔奇斯在后世被人所构想的人物形象，就必须以曼佐尼的同名戏剧为这一章结尾，主要是因为这是大部分意大利人在学生时代就熟知的情节。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先入之见并不一定是坏事。曼佐尼对他的作品作了精确的研究，他为这部悲剧所收集的材料实际上也用在了他关于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历史随笔之中。²⁵至于相关的政治与军事事件，《阿德尔奇》还是相当忠于历史，尽管偶有一些离奇的成分，最明显的是在戏剧结尾主角死去。事实上我们知道阿德尔奇斯在伦巴第王国覆灭的灾难中幸存了下来，并且前往君士坦丁堡

寻求庇护。其中同样有一位充满诗意色彩、名为厄曼嘉达的传奇女性角色，但我们没有能证明德西德里乌斯女儿名字的实际资料。一个世纪后的一部圣徒传中称她为德西德拉塔（*Desiderata*），这可能是和她父亲的名字混淆了。有趣的是，厄曼嘉达这个曼佐尼创作出来并使之流传的名字，在有些地方被学术界采用，最终进入权威的《法国名人传记词典》（*Dictionnaire de biographie*）中。²⁶

毕竟，历史学家很难为这些人物角色的心理找到十分可信的证据，尤其是厄曼嘉达和阿德尔奇斯，他们本质上都是浪漫文学的产物。谴责作者迎合当时观众的口味也是可笑的。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基于史学理论对曼佐尼进行了批判，指出他将伦巴第人简单地视为外来统治者，完全与沦为奴隶的拉丁“散落之民”区分开来。在这里作家在思想上注重描绘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意大利的情形。他用一副历史面具阻碍了对真实历史的理解。在查理时代，伦巴第王国已经没有民族主义的基础，它成了一个地域实体。伦巴第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再怎么为曼佐尼辩护，也不能在这一点上为19世纪史学客观存在的局限开脱。同时代的另一位米兰作家西斯蒙第（*Sismondi*）认为两个民族在迅速融合，这是法兰克人征服所寻求的统一，而这预期的统一进展被教会打断了。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意大利百废待兴，以及第一次烧炭党（*Carbonari*）起义，西斯蒙第的立场清楚地表示出强烈攻击教宗政治的意味，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曼佐尼这样狂热的天主教徒不能接受这样去解释自己祖国的古代历史。

注释

¹ *ARF*, 29.

² *ARF*, 33.

³ *MGH, Epistulae Karolini aevi*, 2:501–5.

4 CC, 1–2.

5 CC, 10.

6 ARF, 31.

7 厄曼嘉达是阿历山德罗·曼佐尼大获成功的浪漫主义悲剧《阿德尔奇》（Milano, 1822）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角色。也见于他的作品*Discorso sopra alcuni punti della storia longobardica in Italia* (Milano, 1822)。

8 CC, 45.

9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 ed. P. Jaffé (Leipzig, 1885), 2396.

10 *Cronaca di Novalesa*, ed. G. C. Alessio (Torino, 1982), 146–49.

11 Einhardus, 6.

12 ARF, 36; *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ed. B. von Simson (Hannover, 1905; vol 10 di *MGH, Scriptores*), 60; *Le Liber Pontificalis*, ed. L. Duchesne (Paris, 1955), 1:495.

13 *Cronaca di Novalesa*, 148–51.

14 *Liber Pontificalis*, 1:498.

15 *Codice diplomatico Longobardo*, ed. L. Schiaparelli,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no. 38 (Roma, 1933), 291; V. Fumagalli已经在*Il Regno italico* (Torino, 1978), 3–4中提出对“tempore barbarici”一词的解释。

16 ARF, 44.

17 *MGH,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icarum*, 224.

18 Ibid.

19 CC, 59.

20 CRF, 88.

21 参见第6章，“781年危机”。

22 W. Pohl, *Die Awaren: Ein Steppenvolk in Mitteleuropa, 567–822* (München, 1988), 323.

23 Notker, 2. 17.

24 *Cronaca di Novalesa*, 168–73.

25 Manzoni, *Discorso sopra alcuni punti*.

26 这一错误由E. Delaruelle在“Charlemagne, Carloman, Didier et la politique du mariage franco-lombard,” *Revue historique* 170 (1932): 216n中指出，但他没有意识到是曼佐尼，也没能找出其起源。

第3章

对异教徒的战争

在战胜伦巴第人之后，查理意图成为西方唯一的基督教君主。尽管盎格鲁-撒克逊和西班牙诸小国的国王自封了许多头衔，但他们的权力只局限于本地，而查理是两个大国的统治者。他的统治从北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囊括了大部分使用拉丁教仪的基督徒。上帝之敌环伺四周：信仰异教的萨克森人生活在广袤的日耳曼北部森林中，在他们之外是同样崇拜偶像的丹麦人和斯拉夫人；曾经被查理·马特击败的阿拉伯穆斯林，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最后是居住在潘诺尼亚平原的阿瓦尔人，他们是残暴的匈人王阿提拉的继承者。法兰克人是一个战士的民族，他们热衷于进攻并征服他们的邻居。查理·马特和随后的丕平每年带领法兰克人取得远征的胜利，获得荣耀和战利品，因而获得了法兰克人的支持。而现在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侵略战争有了明确的宗教理由。每次查理剑指他的邻居时，教宗都会为他赐福。而护佑军队的上帝，居于天国，正以喜悦之心观看着查理的事业。这样他怎能失败呢？

对萨克森人的战争

宗教战争的暴行

实际上，查理国王几乎没有败绩，但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您既爱和平之百合，亦慕战争之红玫；您的光彩洁白而又殷红。”这些是宫廷诗人奉承查理的华美之词，但实际上玫瑰与鲜血的颜色远胜过百合花的洁白，战争几乎伴随着查理统治生涯的每一年。其中最为严酷、最为混乱而使查理忧虑的，就是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战争持续了超过二十年，将基督教信仰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将整个日耳曼区域都纳入了法兰克王国。回溯到772年，查理就曾经召集战士并带领他们与北方异教徒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占领了萨克森的主要圣所伊尔明苏尔（Irminsul）——圣树的所在处。这棵萨克森人认为支撑着天国的圣树被焚毁，他们的偶像也被摧毁。但是由于萨克森人认为征服使他们的部族失去独立，也让他们丢弃了传统的信仰，故他们坚持反抗，因此惩罚性的远征年复一年地重复。

查理并没有一开始就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让萨克森人皈依正确的基督信仰。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和祖父就曾与他们作战，在每次击败萨克森人后，他们都满足于受贡。当战争的创伤已经平复之时，艾因哈德以非常官方的口吻写道：“有太多破坏和平的因素，例如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边界是在开放的平原，只有很少几处有广袤的森林和连绵的群山，将我们清晰地分为两国。因此双方都持续发生谋杀、袭掠、纵火等行为。”他将查理平定莱茵河以外地区归功于令人安心的宗教命定。按照编年史家的观点，这种与蛮族接壤的边境上的不安定，必然意味着“最终被激怒的法兰克人不能再安于击退一次又一次的袭击，而决定对他们发动一

次全面的战争”¹。

显然宗教动机和政治动机密不可分，自查理·马特的时代起，法兰克人的利剑就同样在莱茵河以外承担着传教的使命。丕平击败萨克森人后所强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法兰克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可以在这一区域自由从事传教事业，不受阻碍。显然对这些传教士而言，查理的战争有其宗教理由。“如果你们不接受上帝的信仰，”圣徒勒布因（Lebuin）曾对萨克森人说，“就会有一位邻国的国王进入你们的土地，征服你们的土地并使之荒芜。”²但萨克森人顽固地拒绝信仰，所以最终国王不得不行动。

这是一场在几无文明可言的国度进行的残酷战争，这里没有道路和城市，全境覆盖着森林和沼泽。和皈依基督之前的日耳曼人一样，萨克森人祭杀战俘献给诸神，同样，法兰克人也毫不迟疑地处死拒绝受洗的人。最终萨克森人的首领被不分季节周而复始的战争拖垮，寻求和平，交付人质，接受洗礼，并允许传教士从事他们的工作。但每当警觉松懈，查理又忙于边境另一侧的事务时，叛乱就会爆发。法兰克人的守卫受到攻击和屠杀，修道院被劫掠。甚至边境上的法兰克国土也并不安全。778年，萨克森人得知查理国王率军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作战，即使强行军数周也无法返回，他们就在莱茵河谷出现了。当地的长官难以应付他们，只得任其破坏和劫掠。

在叛乱期间，有一位领导者从萨克森人中脱颖而出。他被称为维杜金德王公（Princep Widukind），他的权威得到了所有部族的认可。此时查理还认为自己已经平定了这个区域，并得到了萨克森贵族的效忠。就是这位领导者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叛乱，意在迅速清除法兰克人的武装力量。782年他与查理在辛特尔山（Süntel）会战。查理满怀对背叛的愤怒，并在此战中失去了两位近臣——他的王室总管（camerario）阿达尔吉斯勒（Adalgisile）和治安官（connestabile）盖洛（Geilo）。查理带来的生力军迫使反叛者屈服，除了维杜金德，他逃往丹麦人处寻求庇护

。萨克森人被迫交出他们的军队，当他们落入查理手中之后，查理一天之内就在西部的附属国——阿勒尔河（Aller）畔的韦尔登（Verden）处决了4,500名萨克森人。这一事件给他的名声造成了最大的污点。

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减轻查理对屠杀所负的责任，他们强调几个月前查理国王认为他已经平定了这一区域，萨克森贵族已宣誓效忠，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任命为伯爵。因此叛乱被视为叛国行为，叛乱者当被处以死刑。同样的罪行，萨克森法所施加的处罚也是十分严厉的，甚至针对最无关紧要的罪行也是如此。另一些试图歪曲对原始资料的解释，他们论证萨克森人是在战斗中被杀死的，而不是遭冷血的屠杀，甚至动词“*decollare*”（斩首）也是抄写者错抄，实为“*delocare*”（重新安置），所以俘虏只是被放逐了而已。但这些想法都没有可信的论证。实际上，如果不考虑这些观点甚嚣尘上的时代，即20世纪30年代，则发掘这些论证并没有什么意义，当时的环境使之成为一种可怕的论调。在那时的纳粹史学家眼中维杜金德是一位日耳曼民族的英雄，而查理是一个半罗曼的（*halbwelsch*）和拉丁化的征服者。且纳粹史学家攻击那些试图否认大屠杀真实性的同行们，用戈培尔妖魔化先锋艺术时使用的词句，来指责他们在创造“堕落的历史编纂”（*entartete Geschichtschreibung*）。³

实际上，韦尔登大屠杀这一事件最可能是受《圣经》的启发。被持续的叛乱激怒之后，查理想实际扮演一下以色列国王。亚玛力人（*Amaleciti*）敢于起义背叛上帝的选民，因此全部消灭他们也是正当的。耶里哥城（*Gerico*）被攻占后，城中的所有生灵都被置于刀剑之下，包括男人、女人、老人、孩童，甚至牛、羊和驴，这样他们的一切痕迹都被抹除了。查理喜欢拿来自比的大卫王，在击败了摩押人（*Moabiti*）之后，将俘虏押到野外，处死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一次也是国王得到了《旧约》的启发，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实发生的韦尔登屠杀残酷事件，是在效仿这一原型。此外，在几年之后记载此事的王室史官笔下，对萨克森人的战争被归于这么一种类型：“他们要么承认失败并臣服于基督教，要么被彻底清除。”⁴

在782年之后的一年，查理进行了一场无比残酷的战争。他第一次在敌境越冬，并且第一次系统性地破坏这个地区，使反叛者陷于饥荒。与此同时，他公布了自己此生颁布的最为严苛的法律《萨克森法令》（*Capitulare de partibus Saxonie*），规定任何冒犯基督教信仰和教士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并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强制萨克森人改宗的体系。⁵当读到不遵守周五斋戒的人将判处死刑的条目时，我们不寒而栗。这反映了一种与《新约》最初的精神相去甚远的严酷信仰。然而我们要注意，不能一概谴责这样的野蛮行径。《萨克森法令》这样一部法规，体现了一种通过恐惧打破整个民族反抗的普遍企图。如同许多20世纪的统帅要为他们非人道举动负责一样，查理也同样要背负道德责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这部法令因其严酷而招致查理周围人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查理最言听计从的精神导师阿尔昆的严厉批评。⁶

恐怖和焦土政策最初取得了成效。785年，在法兰克人掠夺至易北河之后，维杜金德屈服了，他现身阿蒂尼（Attigny）的行宫受洗。查理国王扮演了教父的角色。阿德里安教宗恭贺胜利者，并感谢他为整个基督教会带来伟大的信仰胜利。但是武力强加的洗礼并没有奏效。793年，法兰克人镇压一切恢复异教仪式之行为的严酷统治到达了顶峰，激起了北萨克森地区另一次大规模暴乱，这一地区只是表面基督化。“再一次抛弃了他们的信仰”，王室史官如此写道，萨克森人焚烧教堂，屠杀教士，并准备再次退入森林中坚持抵抗。⁷

现在，查理的手段日益残暴，实际上甚至使用了更为迅猛骇人的先进手段。他没有局限于毁灭叛乱者，使萨克森民众陷于饥荒，更多的是整体地驱逐他们，在这些区域规划安置法兰克人和斯拉夫人的移民。不论怎样，他是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需要修改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加强了与萨克森贵族领袖的联系，寻求与他们合作。797年在亚琛的一次大型集会上，查理依据他们的建议，颁布了一部新的法令，与前一部相比更为温和。⁸由于明确保证了萨克森贵族与新政权的合

作，这两项政策迅速奏效。为修道院院长斯托米（Sturmi）立传的富尔达（Fulda）修道院僧侣艾吉尔（Egil），在这段年月里写道，查理“通过战争、说服还有恩赐”⁹将基督教的轭强加于萨克森人，这表明他已充分理解，这种弹性政策是如何成功地使这些顽固的异教徒融入基督教帝国之中的。

查理在这个新征服国度的中心帕德伯恩建造的城池，就是这种融入的标志。此城矗立在排干水的沼泽地上，包括一座王室宫殿和一座辉煌的大教堂。当需要查理亲临萨克森对付反叛者时，这里就是国王的居所。799年，就是在这里，他接见了为了躲避政敌而逃离罗马的教宗利奥三世。这里也是传教士的出发点，他们跟随着圣卜尼法斯的脚步，取代法兰克人的利剑，在短期内更有效地清除异教信仰。信仰的传播十分成功，在帕德伯恩任命的第一位主教就是一个萨克森人，哈图玛（Hathumar）。这个新的省份迅速融入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在萨克森部族中定期征兵并将兵员加入帝国军队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远征斯拉夫部族。远征变得日益常态化，萨克森人也从中受益，他们的农民在易北河右岸地区发现了殖民的新机会。

北日耳曼的这条战线至此终结，而另一条东部战线从此拉开，日耳曼统治者在此继续奋战了几个世纪。这就是“向东进军”（Drang nach Osten）战线，在这里，日耳曼民族侵犯斯拉夫人，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要记住他们截然不同的出发点，不能把查理和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甚或希特勒混为一谈。查理国王在做政治决策时，肯定没有考虑到任何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原则。比如，他毫不迟疑地利用那些承认他权威的斯拉夫人首领来对抗萨克森人。当考虑到远在易北河以北的广阔平原时，在此寻求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间的想法与他也毫不相干，终其一生，他都认为易北河是帝国的天然疆界。他最后一项针对萨克森人的举措，也是德国历史学家最为诟病的，就是804年驱逐居住在易北河右岸的萨克森人，将他们的土地赏赐给比邻的斯拉夫部族奥波德里人（Abodriti）。

萨克森战争的战略

现在我们已经一览战争的概况，这场战争占据了查理统治生涯一半时间的每一年。对这片土地上的战役我们所知多少？从军事观点来看，对萨克森人的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控制棘手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入侵者在纯粹的军事条件上有巨大的优势，但他们劳师远征，因此完全仰仗于建立并守卫先头据点。另一方，这里的原住民，尽可能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并在入侵者的战线后方组织起残酷的游击战。当他们谋划统一行动时，他们集中力量，围攻并毁坏敌人缺少防护的基地。

可见，查理针对萨克森人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本质上和德鲁苏斯（Drusus）以及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在1世纪时面对的问题一样，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截然不同。¹⁰ 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能够在河道内航行直达内陆。因此他们不仅能从利珀河（Lippe）和莱茵河交汇处溯流而上，从西部发动战役，也可以溯埃姆斯河（Ems）及其支流哈瑟河（Hase）而上，发动攻击。因此他们的军团可以抵达条顿堡森林，这里是瓦卢斯曾奋战的古战场。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他们最初的要塞都沿河而建。不同的是，尽管查理定期使用水路运送给养，但他总是从陆路深入敌境。如果军队在莱茵河中游集结，则随后就可沿着利珀河和鲁尔河（Ruhr）的河谷向东进军。另一方面，如果在莱茵河上游集结，就可向北渡过美因河，然后继续北进。其渡河之地现在叫作法兰克福，意为“法兰克人渡河之地”。

两种情况下，军队都沿着这条河的上游河段，迪默尔河（Diemel）与埃德河（Eder）交汇之处，威悉河以西的高地进入敌境。起先，萨克森人在迪默尔河边建造了一座名叫艾瑞斯堡（Eresburg）的要塞，以阻挡入侵者的通路。从772年查理发动第一次萨克森战争开始，他就夺取了艾瑞斯堡，在此驻扎一队守军。随后前往埃德河畔的布拉堡（Bürabu

rg），这里是法兰克人在北日耳曼的重要前哨。在随后的战役中，这一地区成为法兰克军队重要的行动基地，也是在这里，查理忧虑于如何改变萨克森地区。他建立了一座最重要的基督教桥头堡——科维（Corvey）修道院，随后，他又在此建造了新城帕德伯恩。他在这里举办了777年的法兰克人年度集会，也是在此他修建了自己在萨克森领地上最喜爱的宅邸。

从军事观点看，若要控制高地，最紧要之处是控制艾瑞斯堡的要塞，因为萨克森人的抵抗力量反复占据这里。773年，当查理国王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与伦巴第人作战时，艾瑞斯堡被攻占并摧毁。在775年的战役中，查理在面对威悉河的山地上重建了艾瑞斯堡，与之一起重建的还有更前方的吕贝克要塞。萨克森人决定进攻，并计划使用诡计。他们打算混进法兰克人的征粮队，在他们到乡村搜寻完粮食重回营地时进入要塞。守军伤亡惨重，并且很难击败这些渗透者，他们消失在森林里，无影无踪。776年，当查理在利文扎河与伦巴第人作战时，萨克森人在艾瑞斯堡起兵，并劝说守军撤离，这样要塞再次被摧毁。但到了夏季，查理国王又返回重建了要塞。与此同时他在利珀河畔建造了另一座要塞，称作卡尔斯堡（Karlsburg）。在778年的暴动中，卡尔斯堡被摧毁。

为了和法兰克人对抗，萨克森人也同样建起了木质要塞，以对抗对方的前进。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查理夏季战役的目的都是占领并摧毁这些要塞，同时巩固法兰克人的要塞，他们也会在可能的地方建立新的要塞。这是一种辛苦的作战方式，并且不能带来辉煌的胜利。但长远看，入侵者巨大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优势将导向胜利。萨克森人的攻城装备，尤其是弩炮（petrariae），不如法兰克人的有效。编年史家将他们的失败归于神意，¹¹但更可能的原因是萨克森人的工程师技术水平不够。征服萨克森人是这种缓慢绞杀战术的最终结果，网格化的要塞互相支撑，封锁了所有河流。法兰克人能派出军队，劫掠敌境、散布恐怖而使居民屈服。与此同时，对手的要塞被缓慢但稳妥地夺取，一座接一座被

摧毁。

但是，可能在萨克森战争呈现出凄惨而又单调的境况之时，战争的残酷程度突然加剧了，查理显然想逼迫对手就范。总体而言他胜利了。在辛特尔击败萨克森人的暴动后，他于782年夏季入主萨克森地区。查理在韦尔登展开屠杀，象征性地为他阵亡的将士复仇。此时发动一场大型战役为时已晚，查理国王回到蒂永维尔（Thionville）过冬。很快在783年复活节过后，他带领大军回到了萨克森，然而大军难以协同，初次作战他只能调动一部分军队对敌。最终，他集中兵力，击垮了对手。在此之后，他毫不迟疑地乘胜追击，渡过威悉河，第一次推进至易北河。他的王后希尔德嘉德4月去世，他的母亲贝特拉达在7月去世，为了处理家事，他听从建议，回国在沃尔姆斯越冬。国王留驻境外是不合适的。尤其是考虑到他要续娶法斯特拉达（Fastrada），婚事在他回来后立即操办。

至此，从整体战略角度来看，查理要苦战到底。784年他又发动了战役，按照惯常的方式沿着利珀河行军至威悉河，但这时暴雨造成了洪水，使地面无法通行。查理国王没有像上次那样班师。他给自己的儿子查理留下足够的军队防止叛乱，率领主力穿越图林根，一直向东，在萨勒河（Saale）和易北河之间破坏萨克森人的土地。他在秋季之前回到沃尔姆斯，但他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战果，他召集了更多部队替换下这些在夏季战役中疲惫不堪的军队。他紧接着再一次在威悉河宣扬武力；随着冬季来临，他撤回艾瑞斯堡，第一次在敌境越冬。他的决策很坚定，带了妻子法斯特拉达和孩子在身边。按照传统，在冬季要推迟行动，但他坚持己见继续征伐，惩戒叛乱。

相较于查理谨慎规划针对伦巴第人的毁灭性闪电战，冬季战役更能清晰证明查理的战略和逻辑能力。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打击概念，一种对敌人肉体和精神都很沉重的持续打击。不仅是通过不间断的恐怖宣传，打击反叛者的反抗精神，而且精确打击敌人的要塞，使之无法在将来成

为进攻的障碍。维持通信路线，同时在前线要塞艾瑞斯堡积累配给和物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等待好天气的来临，在785年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事实也是如此。到了夏季，维杜金德和其他叛军领袖发现自己身处荒芜之地，孤立无援，而法兰克人的骑兵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进，如入无人之境。当查理许诺饶过他们的性命时，他们情愿投降，接受洗礼，被放逐到法兰克。

这种基于控制要塞、建造前哨堡垒的策略，同样被运用到针对斯拉夫人的作战中，成为萨克森战争的延续。789年法兰克人的军队第一次越过易北河，在河上修建了两座木桥，其中一座有木堡和土垒守卫。当地的斯拉夫人首领德拉加维特（Dragawit）思虑之后，觉得最好还是投降，交出抵抗的要塞，他本人亲自向法兰克国王臣服。806年，查理大帝之子查理领导了另一次大规模远征，斯拉夫人败退。他在易北河畔和萨勒河畔各修筑了一座要塞。两年后，在易北河畔又修筑了两座要塞，这清晰地表明这里已经成为帝国的边疆——一条防卫严密的边境，能够在需要时发动攻击。此时，查理统治时期的一项政策第一次显现出来：通过修建要塞，安置守军保护日耳曼定居者，鼓励日耳曼移民，以此征服斯拉夫人的土地。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也效法这项政策；在更近的时代，纳粹使这项政策进一步理论化，并计划以这种方式占领乌克兰和俄罗斯。

对阵战

查理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是一场围攻战，不辞辛苦地清空森林，建立要塞；驳船沿着河流深入敌境，支援守军。他们使用粗糙的作战器械。还有山地伏击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对阵战（*battaglie campali*）是罕见的。艾因哈德证实，查理本人只进行了两场会战，都是在783年夏季的同一个月里进行的。¹²他先是在利珀河，随后在哈瑟河击垮了两支聚

集起来的叛军。有理由相信法兰克编年史家在他们的文辞中进行了粉饰，实际上第一场在代特莫尔德（Detmold）附近进行的战役中，查理被击退了。第一次交战后，兵力不足，查理国王退回帕德伯恩，迅速集合援军。萨克森人没有丝毫动摇，也准备下一场战役。在第二场战役中，查理国王部署占有数量优势的军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之后，法兰克人渡过威悉河，推进至易北河，在他们所到之地劫掠敌境。

但我们提及最多的战役不是一场胜利。法兰克人受到重创，和在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发生的情形类似。这场最沉痛的惨败引起编年史家最大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通常他们更习惯于胜利。这场我们不止一次提及的战役，发生在辛特尔山脉脚下，靠近威悉河。这可能是查理征战生涯中唯一有相当细节留存下来的战役，我们因此得以评价其战略目的和战术演进。¹³

782年夏季，维杜金德重启战端的消息开始传播。当时由王室总管阿达尔吉斯勒、治安官盖洛、帕拉丁伯爵（conte di palazzo）沃拉德（Worad）统率的军队正在萨克森地区准备对斯拉夫人发动战役，国王向他们下令，指令他们转去进攻正在集合的萨克森人。这支军队最初组建的目的是入侵和破坏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的斯拉夫领地，所以主要是由骑兵组成。并没有迹象表明边境行动已经着手实施，军队依旧在萨克森领地中，基本可以确定在威悉河以西。军队很快到达叛军集合的辛特尔山区，他们就在大河的另一边。这支军队遇上了国王在莱茵河地区紧急召集的另一支队伍，这队援军由国王的亲属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伯爵统率。

法兰克侦察兵发现萨克森人在威悉河以外的山区扎营，法兰克指挥官决定行动，封锁住萨克森人的退路。这进一步证明了法兰克人对自己的优势是如此自信，他们安全地在敌境行动。而萨克森人发现自己处于游击战的境地，时常被追击，受到被歼灭的威胁。狄奥多里克接近敌军营地，在他们对面扎营，此时他还在威悉河的另一侧。与此同时，另一

一支军队绕过河，占据了敌军后方的位置。这本是一次出色的行动，我们不禁要钦佩构想并执行这一计划的指挥官。但这一次，情况开始变糟。可能和其他无数统帅一样，法兰克人也发现不同队伍协同调动并同时发起攻击是十分困难的。也可能像编年史家所论证的那样，他们通过心理分析认为，另一支军队的三位将领想从这场轻松的战役中获得荣誉，而不想和狄奥多里克分享。不管怎样，他们独自进攻了。

法兰克人低估了敌军的规模和士气，他们快马加鞭向下直冲敌营，但他们没预计到对方早有准备，背水一战。按照日耳曼人传统列阵徒步作战的萨克森人，可能将他们引入了不适宜骑兵作战的地形，在击退第一次冲锋后，萨克森人逐渐占据上风，着手包围歼灭敌人。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阿达尔吉斯勒、盖洛和四位伯爵战死。只有少数败军越过山脉和河流，逃到狄奥多里克伯爵的营地。伯爵随后把这场灾难的重要消息报告给查理国王。（伯爵继续在前线作战多年，直到793年死于萨克森人之手；从那时起，他的儿子威廉被任命为图卢兹伯爵，他就是武功歌中有名的“短鼻子纪尧姆”[Guillaume au court nez]，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¹⁴

很难说从辛特尔战役中能收获什么军事经验。一些分析者将其与黑斯廷斯战役最初的情形相比较。诺曼人的重骑兵没能突破撒克逊步兵在山顶位置牢固竖立的盾墙，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查理之骑兵的昂贵花费与其突破敌阵的能力相比，显得没有必要。另外，这个情形让我们想起了小巨角河（Little Big Horn）战役，志在必得的卡斯特将军没有充分估计印第安人的数量和作战意志，使一场本可轻易获胜的战役变成了灾难。确定无疑的是辛特尔战役是一个特例，在编年史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阵战的通则就是，法兰克军队大幅优于自己的对手。

对穆斯林的战争

778年作战

在查理的整个统治生涯中，他对西班牙穆斯林的态度总体而言是防御性的。罗马古城纳博讷（Narbonne）和图卢兹的城墙得到了加固。从丕平统治时起，阿奎丹当地的统治者就频繁叛乱，因此查理国王也不惧迎战任何侵犯阿奎丹的入侵者。然而，778年春季，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由于内部斗争而被削弱，似乎提供了一个进攻的黄金机会。查理取消了已经和教宗约定好的罗马行程，着手组织跨越比利牛斯山的作战，协助巴塞罗那的统治者苏莱曼·亚赞·伊本·阿拉比（Sulayman Yaqzan ibn al-‘Arabi）和其他“萨拉森王公”；他们准备起兵反叛科尔多瓦（Cordova）的埃米尔，并远赴帕德伯恩请求法兰克人协助。¹⁵ 发动战役的首要原因毫无疑问是预期能轻易征服此地，但查理依旧写信给教宗，说明穆斯林威胁入侵他的王国，他的行动是预防措施。教宗的回信是恳求的口吻，期待上帝派遣天使在作战中引领法兰克军队征伐异教徒，并凯旋归国。¹⁶ 显而易见，宣传和操纵舆论已经成为帝国政策基本的手段。

为跨越比利牛斯山作战，查理国王规划了他最热衷的钳形运动。他亲自领兵穿越巴斯克人的领地，他们是基督徒，但查理对此地的控制有名无实。另一支军队远在东部，从这里越过山脉。编年史家的叙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后勤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在纽斯特里亚和阿奎丹征召的军队在大西洋沿岸集合，来自奥斯特拉西亚、普罗旺斯、日耳曼和意大利的部队在地中海沿岸集合更为方便。¹⁷ 两支军队在萨拉戈萨城下集合，而当地统治者，阿拉伯编年史家称其为寇罗（Qârlo），违反诺言，拒绝投降，使城市陷入围困之中。然而查理并没有成功夺取城市

，在一个半月之后，由于萨克森边境传来的叛乱消息，他决定回国。778年8月15日，撤退中的后卫部队在比利牛斯山的峡谷中，遭遇了山地巴斯克部族的突然袭击和屠杀。艾因哈德写道，总管（siniscalco）艾吉哈德（Eggihard）、帕拉丁伯爵安瑟姆（Anselmo）还有布列塔尼边区长官罗兰（Roland）或称“罗德兰都斯”（Hruodlandus），在战斗中殒命。¹⁸

这位罗德兰都斯只在少数文献中被提及，他是否为国王近臣尚且存疑。《罗兰之歌》中那位在龙塞斯瓦列斯斩杀无数野蛮人后倒下的主角，除了他注定要成为西方文学中著名的英雄人物，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因为历史上的巴斯克人，在普遍的观念中早已是基督徒，但他们皈依为穆斯林。这位主角在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等大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奥兰多（Orlando，或译罗兰）。然而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罗德兰都斯真的是在伏击中被杀的，因为他的名字在重要文献《查理大帝传》的一些手抄本中并没有出现，并且可能是受广泛传播的传奇故事影响才加入其他抄本中。而关于龙塞斯瓦列斯，写于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第一部提及这个山谷的文献。对于朝圣者来说，他们知道这里是战场遗迹，同样也熟知这是前往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道路。而当时的资料只是称之为比利牛斯山峡谷。¹⁹

虔诚者路易的战争

尽管龙塞斯瓦列斯的插曲会让我们认为在西班牙的作战是一场失败，但最终这种脆弱的平衡并不尽是消极的，因为比利牛斯山另一侧的基督徒现在开始认为法兰克人是他们唯一可能的保护者。查理也从损失中了解到，将来再想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需要制订更大的计划。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建立独立的阿奎丹王国。781年，查理的儿子路易受膏成为这里的国王，同时他的另一个儿子丕平成为伦巴第的国王。阿奎

丹人在过去时常叛乱，现在他们在这种新的名分之下变得安定。当然，这种名分纯粹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新国王路易年仅3岁。政务由直接向查理负责的摄政参议会运作，他们全力防御比利牛斯山的边境，关注着西班牙发生的事件。

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数次要请求法兰克人的协助，例如785年的赫罗纳（Gerona）居民。但当时穆斯林看起来更强势。793年他们击溃试图拦截他们的图卢兹伯爵威廉，推进到纳博讷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城下，随后满载战利品和基督徒俘虏毫发无伤地回到西班牙。可能这一事件说服了查理，比利牛斯山边境的问题只能以激进的方式解决。穆斯林诸王公的分歧再次提供了可介入的机会，查理为路易准备所需的资源。797年，在科尔多瓦埃米尔死后不久，他的兄弟阿卜杜拉（‘Abd Allāh）来到亚琛，请求查理国王协助废黜他的侄儿。此时其他的叛军已经控制了巴塞罗那，将此城献给法兰克人。路易奉父王之命越过比利牛斯山，包围了韦斯卡（Huesca），随后证明他的能力还不足以实现目标。第二次作战由伯雷利（Borrell）伯爵统领，他们攻占了要塞比克（Vich），以及其他一些战略要冲。他趁机在比利牛斯山另一侧建立了长期的行动基地。征服的后果不久就显现出来，799年，韦斯卡的埃米尔写信给查理，承诺下一次他会为法兰克人打开城门。

此时，阿奎丹的国王正值年少气盛，他觉得自己已足够强大，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征服作战。800年，他引领大军重返西班牙，夺取了莱里达（Lérida）。801年他围攻了巴塞罗那，该城在抵抗七个月后陷落，他将这里交托给一位哥特人伯爵贝拉（Bera）。在随后几年，路易都在有计划地拓展自己在伊比利亚的领地。直到810年，科尔多瓦的埃米尔求和，并承认埃布罗河（Ebro）以北为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这块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的区域并入了帝国，并实行军事化，成为边境要塞省，或者用帝国行政术语称为“边区”，即“马克”（mark）。这块西班牙边区（limes Hispanicus），最早被基督徒收复，与阿奎丹也有行政上的联系，这造就了其独特的未来。现在这块地区被认定为加泰罗尼亚，其语言和风

俗都和法国南部地区接近。传统上都认为这里比西班牙其他地区更欧洲化。

从严格的军事角度说，西班牙作战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知识。但它明确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尽管穆斯林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有补给问题的敌人作战，他们也总是避免对阵战，极其依赖城墙防御；但这种依赖并没有错，因为在城镇化如此之高的地区，法兰克人发现取得进展是一件极其缓慢的事，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攻城器械还不完善。²⁰ 和与萨克森人的战争一样，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他们的军队在野战中远强于穆斯林。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与阿瓦尔人的战争中。

对阿瓦尔人的战争

草原骑兵

根据艾因哈德的说法，查理对阿瓦尔人的战争，是“除了与萨克森人的战争以外最重要的战争；并且他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庞大的资源投入其中”²¹。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阿瓦尔人是不幸引起查理注意的敌人中，最不闻名的一个。他们付出了比其他人更高的代价，并且直到不太久以前，人们认为他们就这么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最近，历史学和考古学才把他们从被法兰克人击败后就被遗忘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并且还揭示了，查理向他们发动的残酷战争并不完全是他们衰落的原因。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几个世纪前，阿瓦尔人的名称经常被用来描述游牧部落、突袭者、以养马为生的民族，他们的习俗和亚洲人的外表与匈人相差不远。实际上法兰克人的文献也称他们为：匈人（Huni）。此外，这个部族大约形成于阿提拉死后一个世纪，可能确实包括一些匈人的群体。他们在一位首领的领导下，采用突厥语的头衔“可汗”（khagan），西方的编年史家将其拉丁化为“卡卡努斯”（cacanus）。阿瓦尔人进攻拜占庭帝国，定居并统治了多瑙河平原，这里刚好由于伦巴第人迁移至意大利而形成真空。他们统治同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保加尔人（Bulgar）、日耳曼民族中的格皮德人（Gepid），还有日益增多的斯拉夫部族。

因此从民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阿瓦尔人的汗国内部是异质而不均衡的。到了查理的时代，大部分居民已经放弃了游牧生活，以耕地养牛

为生，和东欧的斯拉夫部族生活类似。统治者形成了一个由骑兵战士组成的贵族阶层，他们和农民不同，依旧保留了过去来自草原的传统，比如他们把长头发梳成两条辫子，这也是公认的阿瓦尔人最显著的特征。考古发现显示，这些贵族中加入了其他来自亚洲的游牧群体，因此贵族阶层依然说源于突厥语族的语言，而他们的臣民主要说斯拉夫语。在他们灭亡之前，阿瓦尔人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同部族的人共同遵从一个可汗的民族，他们中任何拥有武器、马匹、财宝的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威。突厥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的首领和贵族只要接受对可汗的效忠关系，就算是阿瓦尔人。

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这些也只是最近才被发现。真正的问题是，查理对他们所知多少？对他而言，阿瓦尔人似乎是一个对立民族。一方面，他所能阅读到的和他们有关的一切都是套用过去草原游牧民的刻板印象，就像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笔下的匈人：野蛮、残忍、渴求劫掠的嗜血野人和突袭者，顽固地坚持异教信仰，做出一切渎神的举动。查理宫廷的一位学者，来自弗留利的伦巴第人助祭保罗，他生活之地充满着过去饱受阿瓦尔人袭掠的鲜活记忆，他会去讲述有关他们的残忍邪恶的恐怖故事。他也可能告诉查理，在早些年代，“匈人，现在叫阿瓦尔人”，曾经和法兰克人在多瑙河和日耳曼发生冲突，并强迫他们缴纳贡金。²²

另一方面，阿瓦尔汗国是一个进入基督教世界外交关系圈的政治实体，甚至助祭保罗回忆起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卡努斯——匈人之王（rex Hunnorum）遣使来到意大利和高卢，与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国王签订了和平协议。²³ 尽管信息很少，但西方还是能从阿瓦尔人与拜占庭自查士丁尼时期就开始的漫长外交史中了解到一些信息。换言之，汗国并不是一个由哥革和玛各（Gog e Magog）的后裔组成的凶恶部落，来自山区，杀掠所经之地。尽管他们是异教徒，需要谨慎对待，但他们是一个可以和查理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与此相反，并不是关于阿提拉的可怕记忆促使阿瓦尔人与法兰克人爆发战争，而有证据证明是可汗有些

轻率的外交谈判的结果造成了这一切。

塔西洛的灭亡

日耳曼民族中与阿瓦尔人接壤的是巴伐利亚人，他们在多瑙河平原上定居的区域，现在分别在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境内。他们的公爵塔西洛宣誓效忠丕平以及后来的查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寻求与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结盟，与国王的女儿结婚，以平衡法兰克人的优势。774年伦巴第王国灭亡，塔西洛（Tassilo）失去了支持，他放弃了谋求政治独立的希望。但如果我们采信编年史家的说法，那就是他从不放过挑衅法兰克国王的机会，直到后者别无选择，只能对他采取强硬措施。实际上，他灭亡的故事非常复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²⁴ 法兰克的史家坚持认为塔西洛背信弃义，但这不足以消除我们的怀疑——巴伐利亚公爵就是强邻玩弄权术的受害者，查理操纵事态的发展，直到忍无可忍之时将其彻底清除。

我们可以确定，787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当公爵得知国王身处罗马，就向教宗遣使，请求调解。阿德里安果断回复，塔西洛效忠查理，就必须服从，否则就会被开除教籍。法兰克国王在回国途中以威胁的口气写信给公爵，告知他必须遵从教宗的命令，立刻现身驾前。塔西洛没有理会这一警告，这就为查理指控他不忠诚并军事干涉巴伐利亚提供了口实。有了阿德里安的赐福，查理师出有名。这次入侵规划成为一场大型的作战，三支军队在敌境会合，其中一支来自意大利，名义上由丕平国王指挥，途经特伦托（Trento）和博尔扎诺（Bolzano）。战争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因为公爵同意臣服于查理，并交付13名人质，其中一人是他的儿子。

似乎查理原谅了一切，但他和塔西洛之间并没有结束纠缠。第二年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举行的全体集会中，公爵自己的大部分主教

和封臣都由新政权任命，他们指控塔西洛违背诺言，与阿瓦尔人达成协议反对法兰克人。这暗示着，他现在受妻子柳特珀尔嘉（Liutperga）的唆使，因为她是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有理由仇恨查理。无论这种指控是否是捏造的，塔西洛都很难从这种情况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公爵眼见无论如何都要失败，就铤而走险。对他而言，可汗可能曾经试图与查理对抗，此时塔西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即使查理没有秘密牵线操纵事态，他作为最后一个坚持抵抗查理权威的王公，也没时间去把握机会撇清自己。

塔西洛在受指控之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囚犯了，他因叛国和逃避军事义务而被判处死刑。但国王只要将他关在修道院里就满足了。“他自愿进入修院，在那里过着圣徒般的生活。”王室史官不带一丝讽刺地如是记述。²⁵与此同时，就像明摆着要证实他的罪行一样，阿瓦尔人在巴伐利亚和弗留利发动了袭击，但这并不是大规模的入侵，因为地方指挥官动用当地的军队就击退了他们。进入意大利的军队推进到波河流域，直达维罗纳，焚毁了这里的圣芝诺（San Zeno）教堂。进攻巴伐利亚的军队使事情变得更糟了，他们在边境受到追击，被困在多瑙河，当地几乎完全被摧毁。查理是一位颇具手段的政治家，他无意让问题继续发展而不寻求解决。除掉塔西洛后，现在巴伐利亚公国失去了自治权，被纳入法兰克王国。其与阿瓦尔人的边境现在在弗留利与伦巴第王国的边境连在了一起，这条新边境的重要性并不比之前的弱。他们必须保证安全，而军事行动将会使巴伐利亚人长久效忠。

阿尔昆证实查理在789年开始计划针对阿瓦尔人的战争。²⁶由于可汗使节的到访，军事行动被推迟了。法兰克国王向使节口述了自己的条件。根据法兰克编年史家的说法，查理要求重新划分两国的边界。²⁷将之与20世纪发生的事件比较则令人惊讶，我们会怀疑查理是否知道他处在更强势的地位，并迫使可汗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要么引发战争，要么是接受等同于投降的新边界。阿瓦尔人和巴伐利亚人之间沿着恩斯河（Enns）划分边界已经超过一个世纪，阿瓦尔人也已经显示出保卫这

里的决心。（781年，塔西洛宣誓效忠查理之时，可汗的使节觐见查理，重申其和平意图。与此同时阿瓦尔军队在恩斯河集结，但没有越过河界。他们以此宣示武力，并表明必将捍卫边界。）

几年之后，阿瓦尔君主得到使节从沃尔姆斯带回的消息，并和到访的法兰克使节会谈。不出意料，他宁可选择战争，也不愿选择屈辱地投降或可能发生的政治自杀。将边界向东移动将会打开法兰克人进入潘诺尼亚平原的道路。并且早已在日耳曼和斯拉夫人边界地带定居的日耳曼人，将会强行进入新领地，他们的路程也会缩短。可以确定的是，谈判在拖延超过一年后破裂了。791年夏季，法兰克国王在巴伐利亚集结战士，准备第一次进攻。

791年对阿瓦尔人的战争

在文献记载中，这次战争是一场彰显查理武功的挑战。重装的阿瓦尔骑兵，装备十尺长的长枪、传统的游牧弓箭，还有他们的对手不曾见过的马镫。他们是西方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基督徒望而生畏的对手。拜占庭的将军们对阿瓦尔人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已经研究了几个世纪，甚至法兰克人的编年史家也极不情愿地赞赏他们骑兵的行动力，其能力是无可匹敌的。他们会假装被击溃，再突然用埋伏的预备队给对手杀个回马枪。他们出战之时，会发出狼群聚集时的嚎叫般的战吼，给敌人心理上的震撼。当历史学家面对查理战胜阿瓦尔人这一出人意料的胜利，他们倾向于认为可汗的力量仅仅是过往的记忆，但做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实际上战争是不确定的，我们最好去采信艾因哈德，他写道，查理为了备战，空前地兴奋和投入。²⁸

从军事角度看，791年夏季在雷根斯堡（Ratisbon）召集的军队可能是查理统率过的人数最多的军队，除了法兰克人、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还有萨克森人和弗里斯兰人的先遣队。由于多瑙河是进入阿瓦尔人

领地的天然途径，国王决定兵分两路，分别沿着多瑙河两岸行军。北路由伯爵狄奥多里克和王室总管麦金弗里德乌斯（Meginfredus）率领，南路由他亲自率领。随行的还有一支船队，沿着多瑙河为两支军队供应给养，为两岸军队做快速沟通。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按照查理预先周密的部署，从后方攻击阿瓦尔人，这是查理此生从未后悔的决定。这支由弗留利边境出动的军队，由他的儿子意大利国王丕平指挥。

这个沿着多瑙河两岸长途推进的作战计划，显示了查理寻求决定性会战的企图。摆在入侵者面前的战略问题是，整个潘诺尼亚平原被多瑙河分为两半，难以轻易跨越。如果法兰克人只是一路入侵，他们的行动就被局限在广大的河流盆地的一侧。查理的计划意味着，多瑙河两边整个阿瓦尔人的领地都面临毁灭；如果可汗集中兵力进攻一侧的分遣队，另一分遣队就会用船队渡河，加入战斗。

之前的行动中，兵分两路是为了后勤补给的需要。北部分遣队主要由萨克森人和弗里斯兰人组成，他们不用跨过多瑙河，并且很容易就和本土保持联系。当然，和所有依赖不停协调不同分队的运动和时机而取胜的战役一样，这个计划有其内在的风险。查理选择的指挥官，必须能承担得起这个任务，因为当他统率的军队在恩斯河畔的洛尔施（Lorsch）到达阿瓦尔王国的边界时，另一支军队也要准时到达约定的地点；王室总管麦金弗里德乌斯可以通过小船亲自接受国王给他的指令。

可能整个战役中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军队立足敌境之前，这一事件体现了计划实施时的认真和焦虑。教士们强制斋戒三日，为军队祈求上帝的恩惠。在一封写给王后法斯特拉达的信中，国王提到全军都禁止食肉。同时捐赠多达一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亦译索里达）甚至更多的财富的人将会获得饮酒的许可，而其他每个人凭着良心捐赠。²⁹ 教士吟诵弥撒、唱诵诗篇、背诵主祷文。战士们斋戒并捐赠，以求在战前净化灵魂，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依旧恐惧。

巴伐利亚的贵族们利用查理现身的机会将他们的纷争呈送给他，查

理忙于周旋裁决。其结果就是军队在洛尔施的营地停留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到了9月底才进入敌境。与此同时他们收到了消息，丕平已经离开意大利，攻占了阿瓦尔人防卫边境的要塞，俘获众多。军队的士气因此高涨，对战果最初的预期看来可以实现。法兰克人沿着多瑙河推进，这里的居民望风而逃，抛弃了住房和牲口，也没有抵抗。防卫边境的要塞受到猛攻，接连陷落。

很快阿瓦尔人就避免交战，而用焦土政策对抗。广阔无垠的潘诺尼亚平原使阿瓦尔人能在敌人到来前撤退，疏散人口，在要塞据点避难，以作持久的抵抗。当查理的军队抵达拉布河（Raab）时，身后留下了一条满是燃烧废墟和毁坏之地的行军轨迹，他们的秋季推进十分顺利。现在已经是10月中旬，补给越来越缺乏。查理意识到，马匹由于过于劳累和得不到良好饲养开始死去，他的战士也由于在不利的季节在无人之境打长久战而受苦，查理决定暂停行动而回国。他已经掠夺了一个省份，这只是整个阿瓦尔人领地的很小一部分。他也无法迫使敌人与他决战。几乎没有作战，他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马匹和许多战士，其中还有两位因疾病而死的主教。

阿瓦尔汗国的瓦解

因此，791年作战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而告终。同时查理深入敌境没有遇到抵抗，也没能在他所经之地破坏村落，俘获人口。换言之，他也清楚地知道了，没有冬季的协助和焦土政策，阿瓦尔人无力和法兰克人对抗。直到793年结束国王还停留在巴伐利亚，他在这里谋划作战不下于两年，计划重启战端，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阿瓦尔问题。我们再一次从艾因哈德那里得到证实，除了征服萨克森人，查理在对阿瓦尔人的战争中投入了比其他计划更多的热情和资源。实际上，国王花费了两年时间建设基础设施，为将来的入侵做准备。

查理进行的工作，证实了水路是进行长距离作战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暗示了多瑙河上的船队不足以保证通信和补给部队。首先，国王建造了一条跨河的浮桥，我们要知道，多瑙河上还没有永久性的桥梁。随后，他提出了一个计划，开挖连通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通航运河。国王立刻亲自出发选择地点，征集了大量劳工，开始着手建设史称“加洛林运河”（fossa Karolina）的工程。但规划这一工程的工程师显然未能胜任工作：挖掘工作在793年秋季持续进行，但是地质条件不能支持运河，雨水很快就将其冲毁，所以运河从来没有实际运作。最终萨克森和比利牛斯山边境叛乱的消息在年底传来，查理被迫放弃这一计划，返回国内。

法兰克人的骑兵在791年秋季穿越潘诺尼亚并非毫无战果。可汗的权威受到动摇，几位阿瓦尔人的头领开始寻求政治上的独立。其中一位有着突厥人的“吐屯”（tudun）头衔，他在795年向查理派出使节，声称他意图臣服于查理，并成为基督徒。在他叛变后一年，阿瓦尔汗国就像纸牌屋一样瓦解了。可汗被他的对手刺杀。弗留利公爵埃利希（Erich）组织了对阿瓦尔首都的远征，那里有数量众多的要塞矗立在多瑙河左岸，法兰克人称之为“环”。他的军队洗劫了都城，没有遭遇抵抗。受到这次经验的鼓动，意大利国王丕平以更强大的军队入侵了阿瓦尔人的领地。新的可汗出来与他会面，并举行了投降仪式，但并不能阻止法兰克人再次洗劫“环”，夺走他们所有剩余的财宝。在这边，吐屯按照约定来亚琛觐见并受洗，又带着大量赐礼回国。

很长时间以后，在劫掠“环”中所夺取的战利品成为惊人的传说。阿瓦尔人在那里保存着巨额贡金，这是过去拜占庭皇帝付给可汗的，在有些年份超过了20万枚金币。艾因哈德用恍如梦寐的文笔写道：“所有长期积累的金钱和财宝都被掠夺了，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没有哪一次法兰克人发动的战争像这样获得如此多的财富，装满了金库。”³⁰ 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个描述。事实上，考古学家已经证实阿瓦尔人占有大量黄金。很少有阿瓦尔战士或者他妻妾的墓葬中不埋藏黄金珠宝，“阿瓦尔人的

黄金”是近期一次非常成功的考古展览的名称。³¹ 因此根据编年史家的记载，可汗的财宝装满了15辆四头牛拉的货车是非常可能的。在亚琛，这些战利品的一部分由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分享，这证实了法兰克国王知道如何恰当地奖励这些效忠他的人。他也向上帝表示感激，感激在战场上给予他的神佑。另外一些战利品被用来装饰建设中的亚琛的宫殿，还有一部分作为礼品献给了教宗。

阿瓦尔人的终结

征服阿瓦尔汗国，并没有使之像伦巴第王国那样并入法兰克王国。毕竟，大部分阿瓦尔人还是异教徒，尽管早在796年夏季，丕平就在营地中认真地规划这些蛮族的皈依计划。³² 当然，查理不会像加冕为伦巴第国王那样，有加冕为可汗的想法。恩斯河的边界向东推进，肥沃的土地对前来的日耳曼定居者敞开。皈依的吐屯作为法兰克国王的封臣，统治着直到多瑙河的地域。而在这之外的提萨河（Tisza）平原，其他逃离了法兰克人铁蹄的阿瓦尔部众在这里居住，或投奔曾臣服于他们的保加尔人，而保加尔人不失时机地了结了宿怨。

就像在意大利和萨克森发生过的那样，在轻而易举的征服的几年后，跟随着大规模的叛乱。799年，查理在东部边境的两个主要代表都被刺杀。弗留利公爵埃利希在伊斯特里亚（Istria）被某城居民所杀，他们可能是受了拜占庭的煽动。巴伐利亚边区的长官巴约阿里亚·格罗尔德（Baioariae Gerold），因私人仇杀被害。这些都几乎与阿瓦尔人起义同时发生，他们在吐屯的领导下反抗法兰克人的统治。这场反抗运动并未得到查理特别的关注，他没有返回帝国边境，而是不久后前往罗马加冕为皇帝。当地长官花了几年时间平息了叛乱。

尽管编年史家没有给我们透露什么，但这毫无疑问是一场不光彩的战争。802年，卡达鲁斯（Cadalus）和冈特拉姆努斯（Gontramnus）两

位伯爵在与阿瓦尔人的战斗中被杀，证明这场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此之后，面对严峻的形势，查理大帝决定返回巴伐利亚的基地。从这里他派出一支军队，尽管不是他本人指挥，但带着他的命令，要决定性地解决阿瓦尔问题。命令随信而至，法兰克人带着许多俘虏回到皇帝身边：“许多斯拉夫人和匈人。”（multi Sclavi et Hunni）³³其中也包括吐屯，他举行了更隆重的投降仪式后，再次得到了宽恕。显然，尽管对阿瓦尔人来说，这一事件对他们来说更具戏剧性，但这是他们第二次激怒查理。根据艾因哈德的描述，连年的残酷游击战和镇压比791年和796年兵不血刃的作战更具有可靠性：“当时流血之多还可以从现在潘诺尼亚荒无人烟的情况看出来，可汗王宫所在之地已经如此荒败，没有人类曾经居住的痕迹；所有匈人贵族也在战争中战死。”³⁴

这段评论代表了一种态度。法兰克人对阿瓦尔人有一种憎恶的态度，这很难在与法兰克人发生过战争的其他民族那里发现。对阿瓦尔人的战争成为一场圣战，这可以很明显地从791年战前的斋戒和祈祷之中得到证实。最近，历史学家试图表明，法兰克人本身并没有想灭亡阿瓦尔民族，他们从欧洲消失这一现象的原因更为复杂，其原因很快就会明晰。但法兰克人意图发动灭绝战争得到了大量证据的证实，一首献给丕平、歌颂其胜利的诗中对战败可汗的简略描写，可以表明这种喜悦的野蛮气：

狼狈汝可汗！

王国已毁灭，

天命今日终！

丕王如天降，

雄军身相随；

侵夺尔疆土，

残杀尔民众。³⁵

叛乱镇压之后，阿瓦尔人永远失去了军事能力。留给阿瓦尔贵族的只有绝望，他们转向法兰克人寻求保护，以免受曾经的臣民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侵犯。805年，一位皈依基督的阿瓦尔王公提奥多汗（kapkhan Theodore）来到亚琛觐见查理，献上他的拉布河以西的土地。这一地区属潘诺尼亚的一部分，法兰克国王早先几乎完全掠夺过。这样他就可以从斯拉夫人的猛攻下转移自己的部众。几个月后，另一位自称可汗的王公向皇帝派遣使节，请求承认他对于全体阿瓦尔人的权威，条件是受洗皈依。他十分急切地做出这一举动，取了亚伯拉罕的教名。

在古阿瓦尔地区最西端，一个汗国重新建立，但这只是阿瓦尔曾经辉煌的幻影，他们臣服于皇帝并向他纳贡。这个傀儡政权直到查理大帝驾崩后依然存在，但法兰克人对保护它已经心生厌倦。没过多久，它就在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下分裂了。我们知道阿瓦尔人更像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民族，所以随着汗国的分崩离析，明确的阿瓦尔人概念也消失了。整个民族的后裔也消失无踪，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让他们重见天日。一位中世纪的罗斯编年史家写道：“阿瓦尔人身材魁梧强壮，他们个性暴躁，上帝扫除了他们，他们全都灭亡，一个人也没有幸存。时至今日，罗斯人有这么一句话：‘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流散，没有留下’

任何子孙后代。””³⁶

注释

¹ Einhardus, 7.

² *Vita Lebuini*, i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7. und 8. Jahrhunderts*, ed. H. Haupt (Darmstadt, 1982), 388.

³ A. Barbero, “Interpretazionidi Carlo Magno nella crisi della democrazia tedesca,” (2002): 23–32.

⁴ *ARF*, 41.

⁵ *CRF*, 26.

⁶ *Alcuini*, 107, 110, 111, 113;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 172–76.

⁷ *ARF*, 94.

⁸ *CRF*, 27.

⁹ *MGH, Scriptores*, 2: 376.

¹⁰ K. Brandi, “Karls des Grossen Sachsenkriege,” in *Die Eingliederung des Sachsen in das Frankenreich*, ed. W. Lammers (Darmstadt, 1970), 5.

¹¹ *ARF*, 44 .

¹² Einhardus, 8; *ARF*, 64–67.

¹³ 对这次战役，有充分的描述，实际上是一段离题的文字，见编年史的修订版（*ARF*, 61–65）。

¹⁴ 关于狄奥多里克伯爵和图卢兹的威廉，见E. Hlawitschka, “Die Vorfahren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1: 51–82。

¹⁵ 主要的西方史料是*ARF*, 48–49。

¹⁶ *CC*, 61.

¹⁷ *ARF*, 50.

¹⁸ Einhardus, 9.

- 19 *ARF*, 51; Einhardus, 9.
- 20 见第11章, “集结封臣加入王室军队”。
- 21 Einhardus, 13.
- 22 Paulus Diaculus, *Historia Langobardorum* , 4:1 and 37.
- 23 Ibid., 4:12, 20, 24 .
- 24 关于后续事件的主要史料, 都出自法兰克人一方, 即*ARF*, 74–85 ; Einhardus, 11 ; 以及*CRF*, 28。
- 25 *ARF*, 83.
- 26 *Alcuini*, 6.
- 27 *ARF*, 87.
- 28 Einhardus, 13.
- 29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 528.
- 30 Einhardus, 13 .
- 31 *L’oro degli Avari: popolo delle steppe in Europa*, ed. E. A. Arslan e M. Buora (Udine, 2000).
- 32 *MGH, Concilia aevi*, 1: 172–76; *Alcuini*, 107, 110, 111, 113.
- 33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 528–29.
- 34 Einhardus, 13 .
- 35 英译“You miserable khagan! Your kingdoms are destroyed; you won’t reign any more! King Pepin is approaching with a strong army; he will occupy your lands and slaughter your people ”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116–17)。
- 36 W. Pohl, *Die Awaren: Ein Steppenvolk in Mitteleuropa*, 567–822 (München, 1988), 323.

第4章

帝国重生

教宗与法兰克人的联盟

法兰克国王，拉丁基督徒的保护者

征服伦巴第人、萨克森人、穆斯林和阿瓦尔人的结果就是，查理的地位已经和最初的法兰克王国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了。在当代欧洲的地图上，他的领地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奥地利的全境，远达德国的易北河一带、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伊斯特里亚、波希米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匈牙利的多瑙河一带，最后是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比利牛斯地区。尽管教宗领、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公爵领地都在查理的影响之下，不过南意大利仍属拜占庭统治，主要使用希腊语和希腊式的教仪。法兰克国王现在统治着除了不列颠、爱尔兰和剩余的伊比利亚诸公国以外所有使用拉丁教仪的基督徒。甚至在传统上和拜占庭皇帝联系更紧密的地区，由于查理的声望，现在也转而向他寻求保护。800年，耶路撒冷宗主教（patriarcha）赐予他圣地保护者的头衔，给他送去圣墓的钥匙。¹

这解释了将法兰克国王提升为皇帝的想法是如何在罗马和亚琛产生的。从785年开始，查理就在亚琛建设富丽堂皇的宫殿、巴西利卡式大教堂和温泉浴场。如果查理真如教宗阿德里安一世在他战胜伦巴第人之后所言，是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大帝，那他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受这一头衔和皇冠。因此西部欧洲将会再次有一个以拉丁教仪祈祷的皇帝，他的法律和通信将以拉丁文书写，他用拉丁语讨论政治和神学。与专制的东部统治者相比，教宗更容易和他达成共识。尽管事实上这个新皇帝看起来基本就是个野蛮人，而不是有教养的罗马人或拜占庭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障碍。甚至回溯到帝国的黄金时代，蛮族出身的统帅也经常夺取帝国皇位，却没人有过多怨言。

关于继承罗马帝位，有一个重大的法统问题。居于君士坦丁堡的巴西琉斯是君士坦丁大帝无可置疑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领袖。实践证明罗马帝国的东方和希腊地区与西部拉丁化的地区很难统而治之。戴克里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划分开。因此东部的统治者继续使用（希腊语的！）罗马皇帝的头衔，他将难以接受另一位在罗马的统治者加冕为皇帝。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宗教事务上。拉丁神学家与希腊神学家之间日益疏远，几乎摧毁了他们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统一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猜忌。但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整体，必须有一个上承神命的皇帝来领导信仰基督的民众。因此将一位蛮族领导者升格为皇帝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可能被东部的皇帝解读为严重的羞辱。我们需要回到查理出生之前的时代，去理解教宗为何要走如此之远。

教宗与拜占庭之间的冲突

罗马教会与法兰克人之间联盟的历史，在800年皇帝加冕时达到顶峰，联盟的日益紧密与教宗和意大利各民族对东部皇帝的日益不满相关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人的统治都被视作外来的占领，而不是合法的罗马统治。对意大利人而言，帝国的使节不仅语言上是外来人，宗教上也是。对基督教义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日益疏远，罗马与拜占庭之间的神学冲突是当时流行的话题。与东方的牧首不同，教宗明目张胆地赞赏巴西琉斯干涉宗教争论，这当然不可能增进两大教会的关系。

从7世纪末以来，这些教义冲突就不断加剧，成为真正的对抗，不止一次地挑战了皇帝的政治权威和他对意大利的军事控制。随着帝国的军队渐渐不能为意大利人抵御伦巴第人，这种倾向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教宗在与巴西琉斯的关系中主动寻求政治独立，并开始成为意大利人的合法代表，捍卫他们的利益，这也不令人惊奇。在706年左右，教宗约翰七世计划在帕拉丁山建造宫殿，那时这里还保留着帝国的行宫。这一想法没有实现，但在那个权力的象征物极其重要的时代，没有人会不懂其中的象征价值。约翰的继任者总是承认皇帝的权威，但多次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甚至否认他的代表有进入罗马的权利。这实际上使人确信，在永恒之城，帝国的权威已经终结，并且意味着教宗现在在拉特兰宫统治着这座城。

这种彼此间的不信任随后由于特别严重的宗教争论而加剧，争论涉及反对圣像崇拜的论战。相比于西部地区，在东方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中，圣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到今天还是如此。8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的一些人极其热忱地在圣像前祈祷，似乎要沦为偶像崇拜者。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相对比则加剧了对这种行为的担忧，因为这两种宗教都明确禁止任何代替神的行为。最终在726年，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利奥三世被说服，他认为有必要打击圣像崇拜，开始了破坏圣像（iconoclasm）运动。这在希腊地区意味着毁灭圣像，皇宫入口处的基督圣像被移走。这一运动旨在削弱修会的政治力量，他们是圣像最主要的保护者。运动导致信众的疯狂反对，他们受到了官方的审判和屠杀。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反对圣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皇帝严酷地迫害圣像的守护者

。

在西方的公众层面，争论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争论挑起了教会的愤怒，并且确实实破坏了与拜占庭的关系，拜占庭皇帝现在被认为是异端。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和其子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被其对手称为柯普罗尼穆斯（*copronymus*）或“屎”——统治期间，是对圣像崇拜者迫害最为激烈的时期。恰好同时，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崩溃，这里受到了伦巴第人的进攻。帝国军队不能再进行有效的抵抗，并且当地民众往往怨恨不已。在这种情形下，教宗别无选择，只能向法兰克人寻求保护，并试图利用他们的协助，重建他在意大利的政治统治，扩大他已经运用在罗马的统治手段。

在第2章我们已经提及，739年，格里高利三世和查理·马特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盟。²虽然这个联盟实际上并没有导致军事介入，不过一切都表明，从此刻起教宗停止依靠巴西琉斯的保护，将他们的支持对象整体转向法兰克人。这个转折点最大的象征性事件就是，格里高利三世是最后一位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向拜占庭皇帝照会（教宗）当选结果并要求认可的教宗。^①他的继任者，741年当选的扎加利，在罗马再一次受到伦巴第人威胁之时打破了这一传统，而且他对丕平作出著名的裁决，即这个对全体法兰克人执行王权的人，也同样应当获得国王头衔。³

扎加利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752—757年在位），通过给丕平加封国王头衔，并且亲自前往高卢以圣油为他涂油，强化了自己从（拜占庭）帝国独立出去的地位，并实际上对其发起了挑战。因为原本只有巴西琉斯才有权力将蛮族人提升为国王。新王朝（加洛林王朝）与教宗之间的情谊，成为当时欧洲政治的轴心，与（拜占庭）帝国的古老关系迅速失去其重要意义。查理在位时期，事情更进一步。阿德里安一世不再以巴西琉斯的统治纪年来签署他的官方文件，而是改用他自己的教宗纪年。他在罗马铸币厂铸造的货币上去除了皇帝的头像而以他自己的头像取而代之。显然，教宗在拉特兰宫努力声称自己对现称为圣彼得共和国（

respublica Sancti Petri) 的领土的权力。这项权力宣告来自一份有名的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赠礼》，这份文件可能是由当时罗马的教士伪造的。

对于教宗提供了什么来换取现在在西部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兰克人的保护，我们并不清楚。回溯到778年，查理在圣彼得教堂加冕前二十二年，阿德里安一世授予他“新的信仰基督的神授君士坦丁元帅”(novus Christianissimus Dei Constantinus imperator) 称号⁴，而且在西部教会的大部分地区，自古以来信众就拥护的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现在被法兰克王国及其君主取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教宗眼中，查理扮演了一个与之前东部皇帝类似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宗有意声称自己是法兰克国王的臣民，甚或宣布放弃自己对中意大利的权力；现在这一地区已经被希腊人放弃，任其自生自灭。查理与阿德里安一世之间的深厚友谊，由他们二人亲自或以书信多次确认，贯穿他们二人的一生。其中也隐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注定要深刻影响数个世纪的西方历史。

利奥三世的矛盾心理

尽管阿德里安的许多举动向我们表明，一切都在指向800年的皇帝加冕，但我们别忘了这位教宗在加冕的五年前就已经去世。放弃与拜占庭的合作并热情地接受法兰克国王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从希腊人向法兰克人的转移，在当时阿德里安认为这是最有前途的政策。但他也可能会见机行事放弃这一政策。甚至从教宗书信的措辞中，历史学家也仔细筛选出了查理日益靠近帝位的蛛丝马迹，以此证明其结果就是必然的。当伊琳娜(Irene) 女皇和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终结了破坏圣像运动的迫害后，几年前将查理视为新君士坦丁的教宗，现在以十分相似的口吻写信给巴西琉斯和他的母亲，乐于将他们视为新的君士坦丁和海伦。他邀请他们像之前法兰克国王那样，向教会展示其慷慨。⁵

教宗与拜占庭决裂并臣服于法兰克宫廷，只在795年才有可能，接替阿德里安一世的利奥三世，是一位经历可能暧昧不清但政治上确实更软弱的教宗。新的教宗是一位出身普通的教士，晋升自拉特兰宫的官僚群体，缺乏有影响力的罗马家族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遭到有侵吞财富等背德行为的严厉指控，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可能获得法兰克国王的有效保护，甚至作出阿德里安一世不愿作出的让步。他刚荣登圣座，就将自己当选的结果照会查理，并献上圣彼得陵墓的钥匙和罗马城的旗帜，这些物品传统上是用来迎接皇帝进入永恒之城的。阿德里安教宗从巴西琉斯那里撤回的尊贵特权已得恢复，但如今又归于法兰克国王头上。第一次，在使用现任教宗统治年份纪年的同时，教宗官邸开始用查理统治意大利的年份来为文件纪年。

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当选，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教宗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与法兰克人的联盟上。比起他更为积极主动的前任，他统治期间的这种依赖关系更为明显。除了历史领袖人物的个性，政治史同样受事件的影响或者支配。797年，一件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并最终引发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旷日持久的分裂。一直以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的名义统治的伊琳娜女皇，废黜了君士坦丁六世的继承权，弄瞎他的双眼，自己僭取了之前从不属于女性的巴西琉斯之位。听闻这一消息后，利奥三世决定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时机。女性亲自支配帝国的天命是闻所未闻之事。所以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此时更恰当的时机，可以把帝国称号从东部转移到西部。他的前任阿德里安奉承查理为新的君士坦丁；而现在，利奥要将他加冕为皇帝。

利奥教宗突然又表现出与他性格相反的一面。他统治早期的举措表明他限制自己的权力，奉承顺从查理。但当在罗马加冕的计划在他手中实施之时，他一定在梦想着权力关系的倒转。这种希望在那一时期充斥着罗马，这可以由796—800年拉特兰宫接待大厅内一系列受教宗委托而创作的马赛克肖像揭示出来。在中央，基督命令他的使徒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在左侧，基督再次出现，将大披肩（*pallium*）和旗帜交到跪在

他面前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 I）和君士坦丁大帝手中。在右侧，圣彼得将大披肩托付给利奥三世，将旗帜托付给查理。法兰克国王再一次以新的君士坦丁的身份出现，但他只是由圣彼得临时授权，而不是直接得自上帝。因此皇帝从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其地位在教宗的护卫之下，而护卫被安置在使徒右手边的尊贵位置上。

法兰克宫廷的帝国野心

查理与拜占庭之间的冲突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教宗的视角考察了导向查理加冕的事件，教宗是主要的鼓动者。但我们不能认为法兰克国王是被动卷入了一个比他更大的计划之中。在法兰克宫廷之中，查理经常被拿来和巴西琉斯比较，结果是后者不胜其职，法兰克国王更适合领导基督徒。不过在统治的早期，查理一直试图与君士坦丁堡维持良好关系。虽然阿德尔奇斯王子在东部的首都受到崇高的礼遇并被加以执政者的头衔，查理还是相当的成功。阿德里安一世旨在扩大罗马教会在南意大利的领地，其对手是贝内文托的伦巴第人和拜占庭的残存势力。他不厌其烦地向查理灌输阿德尔奇斯的支持者使用拜占庭的资金策划阴谋。但查理并没有因教宗的主张而表现出警觉。781年，伊琳娜女皇请求查理的女儿罗特鲁德（Rotrude）与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联姻，查理接受了求婚。来自拜占庭的宦官埃利撒欧斯（Elissaios）为公主教授希腊语，并为她的新生活做准备。国王则指派助祭保罗，一位新近来到宫廷的知识分子，将他关于希腊的知识传授给教士们，好让他们在希腊同行面前留下好印象。

西部与东部两个基督教政权的和谐共处似乎相当可行。然而在787年春季，当拜占庭使团抵达并准备执行护送公主的外交使命时，查理拒绝让她离开，使者空手回到君士坦丁堡。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政治情势急转突变，问题的核心是两国宫廷关系的恶化，联姻无限期拖延。在前一年冬季，法兰克国王为了使贝内文托公爵阿里奇斯臣服，率军远征南意大利。他一定意识到，女皇的代表现在仍统治着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而她不希望法兰克人进一步强化在意大利的霸

权。撕毁婚约可能不是避免危机的最佳方式，但这一次，查理对自己女儿众所周知的感情，以及他异乎寻常地不愿意与她们分离（这些甚至得到了忠实的艾因哈德的承认），超越了理性的政治盘算。⁶ 其结果就是，伊琳娜以两个借口挑起了事端，她向贝内文托公爵提供支持。在多次虚张声势之后，阿德尔奇斯终于在卡拉布里亚登陆了，他试图鼓动伦巴第人反对篡位者。这场计划波及全国的暴动并没有发生，但是西部和东部之间不信任的怒火再次燃起。在这些事件后很多年，两大政权在南意大利和巴尔干边界上的紧张气氛依旧存在，这里成为军事冲突的舞台。

意大利这种难以捉摸的政治力量平衡，并不是查理撕毁婚约、与拜占庭帝国冲突的唯一原因。同样重要的是伊琳娜在神学争论上所提出的政策突然转变，政策在东部传播开来。同样在787年，女皇在数年的协商之后，冒着一定风险恢复了圣像崇拜，并谴责她前任破坏圣像的政策为异端。东正教会视为普世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对圣像的信仰尊崇并不是指向偶像，而是指向圣像所代表的存在，并且据此而言，圣像崇拜是每一个善良基督徒的义务。

总而言之，公会议的成果没有什么西方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阿德里安教宗的代表也全程参会。然而查理对他们表示愤怒。他可能并没有理解他们，然而我们也难以为此谴责他。因为他对希腊文一无所知，他所读到的拉丁文翻译错误百出。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感到高兴。因为如此严肃的一个神学问题居然由东部的女皇指示解决，而不是由他。并且召集这次普世公会议没有知会法兰克主教。针对教宗的意见，查理拒绝承认尼西亚公会议的结论，命令他的一位廷臣，可能是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以文辞驳斥之。这些论战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知的《查理之书》（*Libri Carolini*）。这是查理时代最充满野心的神学作品。⁷ 该作构成了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基调。这场会议794年由查理亲自主持，希腊主教在尼西亚通过的观点，在此都予以正式的谴责。

从神学角度看，《查理之书》认为无论希腊的神学家如何加以复杂

的论证，破坏圣像都是错误的，而强制推行崇拜圣像也是错误的。但最重要的回应是政治性的。聚集在法兰克福的主教们明确声称尼西亚公会议的成果都是空洞且无效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会议是由女性主持的。圣保罗曾写道：“我无法容忍女人来教导，或者越权于男人之上。”更大程度上说，他们声称甚至在伊琳娜以前，希腊的皇帝们就已经越轨。皇帝们给自己加以仪式崇拜，其程度已接近偶像崇拜，所以他们似乎成为君士坦丁之前异教时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个信息很明确：法兰克国王、罗马人的执政者、罗马主教的保护者，不再承认东部帝国享有对信仰问题的最高权威。用阿尔昆的话说，他向信仰天主教的西部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唯一领导者”。⁸

在这种已经升温的气氛下，传来了女皇和儿子不睦的消息，随后不久伊琳娜篡夺了帝位。君士坦丁六世有意背离其母亲的政策，在身边聚集了破坏圣像运动的支持者。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结论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些人希望从查理这儿寻求支持以挑战伊琳娜。797年拜占庭的西西里总督奉君士坦丁六世之命，往亚琛送出一封信件，其内容编年史家讳莫如深，但被国王欣然接受。⁹ 这位使节或者不久之后的另一位使节可能提议，向查理献上东部帝国的皇冠。尽管这一步显得毫无来由，但也并不是不可能。在伊琳娜政变的惊愕之余，君士坦丁堡中的一些人愿意考虑这么一种激烈的举动。但这些事件随后并没有发生。798年，帝国外交使节觐见法兰克国王，正式告知他伊琳娜已经掌权，《年鉴》告诉我们，使者只为言和。¹⁰ 而查理也无意为已成盲人的君士坦丁六世和圣像破坏者发动战争。从政治角度看，显然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声望已经降到谷底。

模仿帝国

与此同时，查理的权势不断增长，明确表现出帝国的意味。这个帝国有基督教方面的意义，并不仅仅指罗马帝国。而在《查理之书》之后，“罗马帝国”在某些方面已变得信誉扫地。阿尔昆在796年至800年间的信件揭示出，他日渐关心那些能够威胁及推翻利奥三世统治的丑闻。

¹¹ 在这种语境下，将基督教视为一个帝国的顾虑已经消除——基督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其领导者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教宗。我们不能轻视这些表达，或者认为它们归根结底只是文字而已。这些文字是通晓词句之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而成，他们完全明白这些词语字面意思之下的政治影响。所以当阿尔昆在800年之前开始时常提到“基督教帝国”，其统治权由上帝授予查理及其子孙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完全明白自己所言。¹²

阿尔昆效力期间，他提及查理时，时常用“新大卫王”这一文学形象。自796年以后，阿尔昆在他呈给查理的信中，习惯性地写上“致大卫王”。并详细指出：“借由此名，我们的领袖与向导将以同样的美德和信仰实行统治：在这位首领的庇护之下，信仰基督之民将得到安寝，他也会在异教国度施行恐怖的打击。这位首领终身不息地献身天主教信仰，凭借对福音的坚定信仰对抗异端的追随者。”¹³ 这一称号曾被司提反二世用于丕平，大卫王之名意味着国王是神选之民的领导者，受上帝神启，以智慧统治信众的团体。从法理上说，这是拜占庭皇帝应该扮演的角色，现在法兰克国王为自己寻求这一地位。从宫相跃居国王的丕平，可能不会有更高的目标，但查理没有这种良心上的不安。在800年之前很长时间，他的宫廷就开始在查理的称号前加上曾用于巴西琉斯的修饰语，诸如“最祥和的”“正统的”；并且在法令中加入一些正式的元素，如交织

字母（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以及象征帝国传统的封印。

亚琛的宫廷

无论对罗马还是亚琛来说，将法兰克国王升为皇帝都不是一个直到8世纪最后几年才产生的新观念。随着伊琳娜篡位后君士坦丁堡发生一系列事件，法兰克国王身边的廷臣们认为，想把自己的领袖升格为皇帝，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查理投身于实现这种期待，历史学家称之为“模仿帝国”（*imitation Imperii*）。这体现在由他计划建造的亚琛宫殿的象征性含义中。他亲自监督工程，宫殿的主体在798年完工。负责建设这座新的壮观居所的设计师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亚琛必须能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相比，要如同拉韦纳一般。拉韦纳的壮丽我们如今会有所忽视，但这里在4世纪曾经是西部皇帝的居所、狄奥多里克的都城，后来又成为拜占庭总督的驻地。在西部，拉韦纳仅次于罗马。

因此，法兰克国王声称他试图效法古代的罗马皇帝、意大利的哥特国王、同时代的拜占庭君主甚至是教宗。他的方式是建造一所能够和拜占庭的帝国宫殿和教宗位于罗马的拉特兰宫相比的居所建筑群。首席设计师是一位法兰克人，名叫梅斯的奥多（Odo），他主要依靠的是维特鲁威乌斯（*Vitruvius*）的古典文献；他也同样听取宫廷学院学者们的意见，他们来自各国并拥有数学知识，在这件事上可以证明他们发挥了特别的作用。例如，伦巴第人助祭保罗能够提供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建筑的知识。宫廷建筑群的主要建筑是正殿和礼拜堂（*cappella*），由木质柱廊相连接，在这里他们竖立起了从拉韦纳移来的狄奥多里克骑马雕像。象征性的力量集中在八角形的礼拜堂，这里占据显要位置的是一幅全能的主耶稣的马赛克画。在这幅马赛克画下，阳光照射之处有一块抬高的位置，这里是君主的宝座。这显然是要在众目之下将君主置于神与信众之间的中介之位。

在筹建这座礼拜堂时，查理可能受到了罗马拉特兰宫洗礼堂的启发。这座亚琛的建筑，在当时与拉特兰宫齐名，但我们不幸所知甚少。但最为重要也最具政治象征意味的启示是“金躺椅大厅”（Chrysotriclinos），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皇宫中央的金质三面躺椅餐厅（triclinium）。这处建筑既是教堂也是正殿。正如费希特瑙所写：“它侍奉上帝及其在尘世的委托者，巴西琉斯和基督圣像。”¹⁴ 查理从未去过君士坦丁堡，尽管他非常热心地从使节那里寻求君士坦丁堡城中教堂的相关信息，但我们知道的是“金躺椅大厅”与拉韦纳城中圣维塔莱（San Vitale）教堂中的躺椅餐厅非常相似。一位建筑师被派去研究这处建筑，他回到亚琛时，带着建筑计划和充足的测量数据，以建造一座相似的建筑。其中，查理提出了一种充满政治意义的变化。他计划将自己的宝座安置在表示谦卑的西侧，与祭坛相对。而罗马的继承者，傲慢的拜占庭皇帝，却神化自己，将宝座放在东侧祭坛应在的位置。甚至法兰克国王在模仿他们的建筑的同时，也用《查理之书》中的文辞批驳东部皇帝不虔敬，并将自己推至前台，作为基督教上帝的真正代表。

我们会很自然地进一步深入察觉到，这种对罗马和拜占庭模式的模仿是一种政治声明。由于无知，一些同时代的人们相信，801年，竖立在宫殿柱廊的狄奥多里克青铜雕像是君士坦丁的雕像。既然雕像被认为是代表君士坦丁，则很可能查理希望将之与教宗拉特兰宫中（而现在位于坎皮多利奥广场）的马可·奥勒留著名的骑马雕像相比。除了更进一步的象征和政治含义，雕像自身也是古代艺术的杰作，展现了伟大君主壮丽堂皇的财富。就像一年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送来的大象礼物一样，查理总是将其带在身边，直到810年大象死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行为更多的是对古代建材的再利用，而不是对过去的效仿，这些材料的质量不能和同时代的艺术品相比。艾因哈德写道，查理拥有从罗马和拉韦纳送来的圆柱和大理石，因为他难以从其他地方获得。¹⁵ 我们也不要忘了，现在在亚琛能看到的一切，自查理时代以来都经历过重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皇帝的宝座是有目

的地模仿《圣经》中所描述的所罗门的宝座而制作的。但是一些新的发现显示宝座在19世纪被重塑了。阿尔昆也将礼拜堂和所罗门圣殿相比：亚琛是一座新的耶路撒冷，“一座在我们土地上的新耶路撒冷”¹⁶。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的历史和《旧约》中对君士坦丁、大卫和所罗门的记忆，汇聚到法兰克国王身上，人们将他视为神选之人。

800年加冕

799—800年的罗马危机

我们已经知道，自从利奥三世795年当选以来，他称呼查理的方式日益明显地显示出帝国的含义，这让我们相信将查理加冕为帝的计划从那时起就开始成形。但是，当时环境不允许教宗施行自己的计划，而是使他被迫在紧急情况下献上皇冠。799年，发生了针对利奥三世的篡权事件，由罗马教廷中两位最高官员领导。教团首领（*primicerius*）帕斯夸尔（*Pasquale*）和财务官（*sacellarius*）坎波罗（*Campolo*），他们都是阿德里安一世的侄子。利奥落入敌人手中，他们试图按照拜占庭帝国永久罢免重要官员时的习惯，挖出他的眼睛，割去他的舌头。这使他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地位，无法请求自己的敌人为自己的死而向上帝作答。但教宗不打算给对手展示虔诚的机会，他计划出逃，在斯波莱托公爵处寻求庇护，公爵护送他前往帕德伯恩面见查理。最初，逃亡者似乎使国王确信，他的眼睛和舌头已经被割去，又被圣彼得奇迹般地治愈了。不久，罗马政变策划者代表团来到帕德伯恩，他们重申对教宗的通奸以及伪证的指控，同时澄清了并没有对教宗加以残害，因此事实上奇迹也没有发生。

理清这团混乱取决于国王。他的罗马人执政者的头衔不能明确表明允许他对教宗进行裁判，查理觉得要向阿尔昆寻求意见。阿尔昆回应道，三个人应该处于最高的地位：教宗、君士坦丁堡皇帝，还有法兰克国王。但是自从每个人都知道教宗和皇帝都曾被废黜、遭到自己民众的背弃之后，国王现在超越了他们，成为教会的唯一希望。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阿尔昆又补充道：“我们已经知道教宗在永恒之城的圣座之上发

生了什么。现在轮到您独自去裁判了。”¹⁷这消除了查理的疑虑，查理决定，对罗马传来的这股腐败的乌烟瘴气追根究底。用阿尔昆的话来说，就是带来一股公平和正义的清流。他下令对有关利奥三世的指控加以质询调查。严格地说，教宗享有豁免权，任何人都不得对其加以审判。这种地位甚至阿尔昆也认为是不可置疑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说，躲在这种豁免权背后是不明智的，所以利奥认为最好还是面对质询。一些人谨慎地建议利奥最好放弃这件事，放弃教宗之位，退隐修道院颐养天年，¹⁸但利奥非常坚持。国王决定派遣一队护卫将他送回罗马，指派专员处理质询调查。

在799年教宗返回罗马，一年后国王会到来，在这之间的间隔中，有许多情形都暗示查理并不情愿开启罗马之行。如果对利奥的指控被认为是无中生有，由两名大主教、五名主教和三名伯爵组成的质询委员会会立刻着手恢复他的地位。阿尔昆想尽快解决此事，但让他惊讶的是，事情证明比预期的更为严重。不仅因为所有的指控都不能被无视；而且据传言，一些委员会成员接受贿赂，倒向了另一边。十人中最有声望、地位最高的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诺，在一封信中详述了调查的结果。我们无法得知这封信的语气如何，因为阿尔昆想要将之烧毁。但我们可以通过阿尔昆的回应进行想象，他的主要观点是“让无罪之人扔出第一块石头”¹⁹。但查理已经下定决心要撤销对利奥的一切指控，恢复他的所有权力，现在很明显他要亲自行动了。

因此，当800年11月23日查理以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和罗马教会保护者的身份驾临罗马城时，利奥三世心领神会，亲自出城12英里迎接。这个距离是凯撒驾临（*adventus Caesaris*）——迎接皇帝入城的古代仪式规定距离的两倍。如果我们考量774年查理的上一次罗马之行，阿德里安一世在圣彼得教堂门前等候查理，而不是出城迎接，而且使用的仪式规格没有超越拉韦纳总督，我们就能意识到法兰克国王和罗马教宗之间的权力平衡产生了多大的变化。12月1日，查理以新君士坦丁的身份，在梵蒂冈大教堂启动了针对教宗指控的审判会议的程序。当时，所有人

都知道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利奥会洗脱罪名全身而退。会议确认，在法理上没人能审判教宗，并且允许教宗以《新约》郑重起誓证明自己无罪，教宗立刻就这么做了。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会议审判教宗期间，意大利和高卢的主教和几位世俗的显贵正式通过了查理加冕的决议，并且以帝位空缺为由而将加冕合法化。²⁰ 伊琳娜所采用的头衔实际上没有得到教宗的承认，所以这个被女性篡夺的帝位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空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个委员会已经限定要去接受一项几个月前谈判已经通过的决议，但很遗憾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利奥三世在他停留帕德伯恩期间，已经声称他愿意加冕查理为帝，然而最终的决定可能一直拖延到委员会最终裁定时才确定下来。能够确定的是，在圣诞节上午，利奥三世将皇冠戴在查理头上。加冕仪式今人看来遵循成规，但在当时看更符合高卢—罗马世界的风格，而不是日耳曼风格。根据王室史官所言，教宗以圣油为查理行受膏礼，并俯伏在国王面前，行东方的跪拜（proskynesis）之礼。²¹ 在这里，梵蒂冈的教士们代表罗马民众，伴随于教宗身边，向查理致敬，拥立他为皇帝和奥古斯都。这一仪式不仅拥有荣誉上的影响；依据罗马帝国的传统，也具有法律效力，它正式认可了一位新君主的产生。

皇帝并不情愿？

我们还要解释一下艾因哈德的出人意料之言：查理对加冕感到很烦恼，如果他知道已经准备好的仪式是怎样的，哪怕那天是庄严的一天，他也不会去教堂的。²² 当然，可能艾因哈德是在效法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只是为了强调查理的谦虚，他如同克劳狄皇帝一样认为自己配不上皇帝的头衔，是被迫上位的。可能查理的烦恼不是关于加冕本身，而是加冕背后的诡计及其可能的政治影响。带着耻辱，利奥三世最终成功恢复了帝国，并且使一切仿佛都是在教会的指导下进行的。通过

将皇冠加于新的皇帝头上，教宗实际上也声称教宗拥有超越皇帝的至高权威。

当时这种声称是纯神学性的，鉴于查理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实际上，他从教宗这里获得了一切可能的统治权的认可。在几年前征服贝内文托公爵之后，法兰克国王坚持要将贝内文托官邸的所有文件的时间都改成他的统治纪年。公国的货币要印上查理的名号和交织字母。²³在加冕后，新皇帝向罗马提出同样的要求。教廷自阿德里安一世起就开始以教宗纪年来为文件纪年，在利奥三世时期也只是把查理的统治纪年添加到第二位，现在只根据查理的统治年份来纪年，就像过去巴西琉斯统治时实施的那样。利奥三世的货币现在也印着查理的名号和皇帝头衔，紧挨着教宗的交织字母和圣彼得之名。现在我们对这些象征性的现象会有些不以为意，但在过去不是如此。通过在文件中加以查理统治纪年，将他的名字印在罗马铸造的货币之上，教宗实际上意图承认皇帝的政治权力已加于永恒之城。

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公开的举动会给每个人的记忆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拥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利奥三世将皇冠戴在跪下的国王头上就是这样一种举动。这样一种仪态的含义很难逃出查理这种有才智的政治家的眼力，但以这来解释他的不安还是不够。不出意料的是，十三年后，他要求自己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加冕为帝，以支持路易的统治，并为继位做准备。查理组织好了仪式，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礼仪，并且去掉了自己加冕时所有不满意的成分。路易在亚琛的宫廷礼拜堂加冕，他受到的欢呼不是罗马人的，而是法兰克人的。最重要的是，新皇帝并不是跪在教宗面前，而是由他的父亲加冕，或者根据另一部编年史，是由他自己加冕的。这样的仪式编排很明智，但此时有些晚了。813年加冕礼的光彩完全被800年的盖过，帝国也一直受制于与教宗之间悬而未决而又模糊不清的关系。千年之后，另一位皇帝拿破仑意识到了这一系列影响，有目的地邀请教宗为他加冕，但又确保是他自己将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国际关系中的新帝国

与东部帝国的关系

加冕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嘲笑和蔑视。直到那时罗马皇帝只对日耳曼首领承认表示从属地位的国王头衔，但无法想象他们中的一员能僭取皇帝（imperator）的头衔。拜占庭编年史家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故意用嘲讽的语句描绘查理的加冕仪式，并且说，教宗用圣油为他行受膏礼，“从头顶直到脚趾”，好像这极其虚假。他最后冷漠地说道：“自此起，罗马就处在野蛮人的统治之下。”²⁴查理大帝自己担心利奥三世的举动会在东部挑起敌对的反应，802年，他派遣一位伯爵和一位主教前往君士坦丁堡，向女皇重申自己的和平意图。都城之中甚至有传言说，法兰克使节提议查理与伊琳娜联姻，以创造两大帝国之间联合的可能。无论如何，他们的到访遭到了一部分拜占庭高官的冷遇和敌视，他们不久后组织了一场政变，废黜了伊琳娜，将她的一位大臣送上了帝位，史称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I）。

尽管查理大帝和新的巴西琉斯都没有开战的愿望，但两大政权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和南部的边界问题悬而未决。这些地区由从拜占庭获得自治权的威尼斯和扎拉商人开发，贝内文托公爵再一次发起叛乱，反对法兰克人的霸权，这些足以导致不断的事端。811年，尼基弗鲁斯一世在战场上被保加尔可汗克鲁姆所杀。他的继任者，米海尔一世·兰加比（Michael I Rhangabe）想与西部寻求和平。一个拜占庭代表团前往亚琛，尽管咬牙切齿，但还是承认了查理的皇帝头衔。《年鉴》记载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称呼他，用希腊语，称他为皇帝和巴西琉斯”²⁵，不过他们为了保留颜面，没有承认他是罗马的皇帝。查理以一封信回复，

信中他对“东部和西部帝国”之间建立起和平表示满意。²⁶ 几世纪前戴克里先为罗马帝国的划分创造了一种双帝国共存的模式或者法理，二者都是罗马，都在同一个基督教世界里。

在西部，这一共存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并持续使用了很长时间。而拜占庭皇帝顽固地要坚持对抗。824年，巴西琉斯米海尔二世称呼虔诚者路易为“朕亲爱的兄弟路易，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荣耀的国王及他们所称的皇帝”²⁷。871年，查理的曾孙路易二世收到了一封来自巴西琉斯的信，信中尖刻地提醒他，只有一个帝国。法兰克君主礼貌地回应道，路易已经在罗马加冕，有权称自己为罗马皇帝，他的臣僚也有称呼他为新罗马皇帝的自由。²⁸ 这些是意识形态领域有代表性的外交小冲突，但我们也不应该高估他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查理的时代。他所处的欧洲，人们用拉丁语祈祷和书写，与另一部分以希腊语书写和祈祷的欧洲人很少或实际上没有联系，与远方国家的君主在礼仪上竞争并无那么重要。

然而，查理在加冕时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皇帝，他决定在法令中修改自己的头衔，称自己为“最祥和的奥古斯都，上帝加冕、伟大而又热爱和平的皇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上承神恩的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的国王”²⁹。严格来说，成为皇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意味着是罗马人的皇帝。查理采用这样的头衔，表明他对拜占庭是否关注很敏感，并通过巧妙使用这种礼仪来使自己可以与他们相比。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因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Romanum gubernans imperium*）是查士丁尼曾经用过的称号之一，也毫无疑问是一位罗马皇帝效法的权威范例。总体而言，加洛林王朝在800年后采用的权力象征符号，总是追溯到罗马帝国。查理将自己的肖像印于货币之上，戴着桂冠，身着紫袍。他的印信是一个在几个世纪都有极其深远影响的政治口号：“再造罗马帝国”（*renovatio Romani imperii*）。

逐渐明晰的是，最终的问题并不是将帝国定义为罗马，而是帝国与

罗马人之间的联系。在当时法兰克人的眼中，罗马人归根结底就是教宗和查理身边那些等级庞杂、人品堪忧的教士们。拒绝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可能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根据艾因哈德的记载，圣彼得教堂内受到的欢呼让查理不高兴。没有削弱法兰克人国王的头衔很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权力的真正根基；这也不会导致罗马教士超越法兰克权贵成为新帝国的政治精英，从而导致政治危机。

帝国与教宗

利奥三世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模棱两可，但不考虑这一点，皇帝加冕认可了查理加于拉丁教会和教宗自身之上的至高地位。通过采用皇帝头衔，统治者正式宣称了仅靠法兰克人的国王无法轻易确认的最高权威，尽管查理在800年以前曾经有作为基督徒领导者的实践。在他的法令集中，他这么称呼自己：“承蒙上帝的恩典及其仁慈的慷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和教区长（rettore），神圣教会的忠实捍卫者和谦卑的助手。”³⁰但我们不要被他表面的谦卑所误导。国王给予教会的协助包括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监督他们的举止，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召集他们开会，亲自制定会议议程，公布会议的结果，这些我们今天认为是教宗应该承担的义务。799年，教宗利奥三世来到帕德伯恩，逃避背德和财政违规的指控，教会谦卑的捍卫者派遣护卫将他送回罗马，随后亲自主持了一个委员会，使他通过审判。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基督徒有一个最高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是法兰克国王而肯定不是教宗。775年，爱尔兰神父卡特伍尔夫写信给查理道：“因为你在这儿是上帝的代表，保护并统治他的各支子民，你将承担此责直到审判日，而教宗只居于第二位，并且只代表基督。”³¹在面临批评时，君主不失时机地指出，他是引导船只穿越风暴的舵手，而教宗只负责祈祷水面能够平静。当他谴责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反对

阿德里安一世的观点时，查理断言：“朕已肩负管理教会之责，穿越暴风骤雨的世界之海。”³² 几年之后，面对一个比年迈的阿德里安更为顺从的教宗时，国王在写给新当选的利奥三世的信中更进一步：

上承天意，以武力对抗教会之外的异教徒侵略，毁灭不信教者，以公教信仰永久强化教会，是朕的责任。而你，最神圣之父的责任，就是如同摩西一样向上帝伸出双臂，支持朕的战斗。这样，通过你与上帝的沟通，信仰基督之民就能战胜教会的敌人。³³

但教宗真的是圣彼得的继承者吗？这一点甚至不是很重要。800年，当查理准备离开，前往罗马主持审判利奥三世之时，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写道，圣彼得亲自将尘世的钥匙交付给查理，这是梵蒂冈大教堂的钥匙，也是通向天国的钥匙，国王替他保管，因此管理教会、教士、基督徒民众是国王的责任。³⁴ 教宗处于较低的地位，可以从804年冬季发生的一段模糊的小插曲中表现出来。查理得知利奥渴望在他的陪同下过圣诞节。皇帝对这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感到惊讶，因为这需要教宗在前往亚琛之前翻越群山，不过皇帝决定前往兰斯与他会面。在相伴仅仅八天后，皇帝将他送回罗马，强迫他在糟糕的天气中从漫长的原路返回。³⁵ 不考虑迫使教宗经历如此艰辛旅途所施加的压力，此事也明确显示出二者地位的高低。它也证实，查理与利奥之间并没有查理与阿德里安之间的那种融洽关系。

这就是我们解释查理所采用的教会协助者与保护者的头衔为什么如此谦卑的意义所在。在806年让他的诸继承人分割王国的《分国诏书》（*Divisio regnorum*）中，皇帝亲自强调了诸子守护教会的义务。³⁶ 他将这一义务首先定义为守护圣彼得的教会，对抗其敌人，并保护其权利。其次，守护所有的教堂和主教区，换言之，这些都处于他们的权威之

下。我们不能歪曲事实，得出结论，皇帝感受到了坐在罗马圣座之上的人的遵从。皇帝依然认为，罗马教座是他帝国中所有大主教教座里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个地位也是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分派的，罗马的唯一区别是其在列表上处于第一的位置（“众所周知，他的王国有21个大主教区，其名称如下：罗马、拉韦纳、米兰、阿奎莱亚、格拉多 [Grado] ...”）。³⁷

在800年圣诞节和801年复活节之间，查理在永恒之城接连度过了五个月，并且在此停留期间，明确确认了他的君主权力。对国王来说，在国境之外庆祝年度最重要的节日是不可思议的。像在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那样，在新征服的地区作冬季长期居留并度过节日，是查理声称拥有这一地区主权的标志性做法。此外，年鉴的作者证实，800年加冕为帝，是基于上帝认为赐予查理加诸罗马的权威是合适的。“这里曾是凯撒们一直生活之地”，其地位超越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古老的都主教（*metropoli*）教座。³⁸在799年和800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有几位教宗想要挑战皇帝的最高地位，声称他们自己拥有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导权；但同时，没有人，尤其是利奥三世，能够质疑查理加诸罗马城和教会之上的至高权威。

查理大帝和哈伦·赖世德

查理声称的帝国形态持续多年，直到800年由他在圣彼得教堂加冕而得以确认。这也反映在他与穆斯林中同地位的统治者，巴格达的哈里发的关系之中。当时，伊斯兰教信徒的君主是哈伦·赖世德（*Hārūn al-Rashīd*，哈伦·拉希德），他在786—809年间任哈里发，也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主人公之一。和查理一样，他也成了他人民中的传奇。基督徒皇帝和穆斯林统治者之间有极好的关系。法兰克的编年史家称他为“波斯国王亚伦”（*Aaron rex Persarum*）。³⁹801年，哈里发的大使在比萨

登陆，并将犹太人伊萨卡（Isaac）送回家；四年前查理曾派他前往巴格达。他们带来了著名的大象阿布·阿拔斯（Abul Abbas）作为礼物，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年鉴》反复提及。⁴⁰ 艾因哈德声称大象是应查理的要求而运来的，为了补充他的动物园。哈里发为了取悦他，决心献出自己仅有的一头大象。然而，之后的一些细节很值得怀疑。⁴¹

亚琛宫廷中的一位知识分子，爱尔兰人迪库尔（Dicuil），以对大象的直接观察来反驳罗马地理学家索利努斯（Solinus），后者曾经声称这些动物不能躺下；“然而，它们像牛一样卧倒，正如查理皇帝时期，法兰克王国的人经常能看到的大象那样”⁴²。显然这头厚皮类动物有巨大的吸引力，可能有很多好奇的民众聚集在查理的宫殿外，比国王本人更渴望见到大象。然而拥有大象或者其他外国动物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是皇帝特权的象征，上帝托付给他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责任，他的名声将闻于远方的土地。查理与哈伦，肯定都知道这些含义。

807年，另一个来自巴格达哈里发的使团带来了贵重的礼物，包括猴子、奢华的纺织品、东方的香草和膏药、有活动人像的鸣响机械钟、铜的枝状烛台，甚至还有一顶扎营用的大帐篷。编年史家们断定这是东方能出产的所有奢侈品。⁴³ 查理的回赠无法与这些奢华精巧的礼物相比，他回赠的是猎狗、马、骡子和珍奇的纺织品，这些似乎并没有给阿拉伯的编年史家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显然，两位统治者不顾宗教上的差异，尽一切可能维持友善的关系。他们的帝国隔得足够远，不用彼此担心。得知他们联盟的消息，他们共同的敌人感到不安，那就是拜占庭帝国和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

查理有另一个理由去和巴格达维持良好关系：因为仁慈的哈伦·赖世德对圣地的基督徒责无旁贷，这些基督徒生活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时常与贝都因部族发生纠纷。他经常对这些相关的群体给予经济协助。毫无疑问，皇帝会暗示哈里发，在这一领域的善意姿态能极大地提升关系，哈伦·赖世德也会同意他的愿望。他实际上给予了一个象征性的礼

物，即圣墓所在的土地。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法兰克国王和哈里发互换使节和礼物，耶路撒冷宗主教视查理为圣地的保护者，并送去圣墓的钥匙。⁴⁴ 查理作为基督徒最高领导人的声望并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

注释

¹ *ARF*, 112; *Alcuini*, 214.

² *CC*, 1–2.

³ *ARF*, 8.

⁴ *CC*, 60.

⁵ P. Jaffé,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 (Leipzig, 1885), 1:2448.

⁶ Einhardus, 19.

⁷ *Libri Carolini*, A. Freeman e P. Meyvaert ed. (Hannover, 1998; in *MGH, Concilia*, II/1) .

⁸ *Alcuini*, 174.

⁹ *ARF*, 100.

¹⁰ *ARF*, 104.

¹¹ *Alcuini*, 159, 173, 179.

¹² *Alcuini*, 136, 148, 177, 185, 200, 202.

¹³ *CC*, 41, 111, 118, 121–22.

¹⁴ Fichtenau, capi. 2n81.

¹⁵ Einhardus, 26.

¹⁶ *Alcuini*, 145.

¹⁷ *Alcuini*, 174 e 177.

¹⁸ *Alcuini*, 179.

- 19 *Alcuini*, 179, 184.
- 20 *Annales Laureshamenses*, in *MGH, Scriptores*, 1:38.
- 21 *ARF*, 112.
- 22 Einhardus, 28.
- 23 Erchempert, *Historia Langobardorum Beneventanorum*, in *MGH,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icarum*, 236.
- 24 Migne, *Patrologia Graeca*, 108:952.
- 25 *ARF*, 136.
- 26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4:556.
- 27 F. Dölger, *Regesten der Kaiserurkunden des ösrimischen Reiches 565–1453* (München-Berlin, 1924), 408.
- 28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5:385–94.
- 29 *CRF*, 45.
- 30 *CRF*, 22.
- 31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03.
- 32 *Libri Carolini*, 98.
- 33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137.
- 34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523–24.
- 35 *ARF*, 119.
- 36 *CRF*, 45.
- 37 Einhardus, 33.
- 38 *Annales Laureshamenses*, in *MGH, Scriptores*, 1:38.
- 39 *ARF*, 114, 131; Einhardus, 16; Notker, 2.8–9.
- 40 *ARF*, 116, 117, 131.
- 41 Einhardus, 16.
- 42 Dicuil, *Liber de mensura orbis terrae*, G. Parthey ed. (Berlin, 1870), 55.

43 *ARF*, 123–24; Einhardus, 16.

44 *ARF*, 112; Alcuini, 214.

① 一说最后一位报巴西琉斯批准当选的教宗是扎加利。

第5章

查理大帝与欧洲

回溯到799年夏季，当国王在帕德伯恩接受了逃难的教宗之时，一位匿名的诗人称查理为“欧洲之父”。¹ 仅仅一年之后他成了皇帝，他统治之地所延伸而成的领地，现在被正式定义为重建的罗马帝国。但我们今天所知的欧洲曾经被一种政治架构所预示吗？这一架构沉浸于过去，其原型是一个五百年前繁荣昌盛的帝国吗？从19世纪起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与流行的文化风潮所不同的含义。据我们所知，民族主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这一时代，这一问题表现为：鉴别这个重建的帝国甚或扩展至整个现代西欧文明，其根源是拉丁的还是日耳曼的。没有人会不明白这个史学问题的政治含义。

在二战后，受亨利·皮朗的名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影响，这一争论转变成古代经济与制度的遗存问题。² 似乎这些遗存并没有像之前认为的那样，完全被日耳曼人的入侵彻底扫除。所以现在这一问题成了古代历史是否在查理时代前后终结。正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正反两方的支持者之间有激烈的争论，因此我们的回应十分依赖于引发了问题的诸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欧洲在21世纪的未来发展，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看待加洛林时代事件的方式。在这一章我们会审视刚刚提及的两个观点，我们把一个定义为民族

问题，另一个定义为经济与制度问题。这样，我们将试图评估现在通行的说法——查理大帝的帝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视为现代欧洲的间接前身？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

卡尔大帝还是查理曼？

那些以民族主义，或者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以种族主义话语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主要来自法国和德国，他们是彼此充满怒火、互视为对手的两大民族中知识分子的发言人。查理帝国的主要构成，是法兰西人自视为其继承者的罗马人，还是新德意志帝国所自豪宣称的日耳曼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主义热忱在欧洲盛行时的氛围中，这一争论所能释放出的激情。坚持查理本质上是德意志人而不是法兰西人，认定他是卡尔大帝（Karl der Grosse）而不是查理曼，也就是声称德国而不是法国在现代欧洲具有中心地位。同样，声称查理建立的帝国不是基于罗马的遗产，而是基于新兴的日耳曼民族的能力，也就意味着采取与当时明显相同的政治立场。

现在，人们不再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了。查理不是，也不可能是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中的任何一方，因为这两个民族当时还没有形成。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早已是显而易见。卡尔·费迪南·维尔纳（Karl Ferdinand Werner）教授多年担任位于巴黎的德国历史学会领导，他曾经苦劝德国大使，不要在官方演说中将卡尔大帝作为伟大的德国人提起。³ 不仅因为那时德国还并不存在，同样也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依旧存疑，即我们现在纯粹从语言角度所定义的那些日耳曼诸部族，是否意识到存在一个自己本部族之上的共同体；并且他们之间是否有一种稳定的存在形式。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查理大帝在构建现代欧洲过程中的重要性，都必须抵制19世纪的史学家所理解的民族维度。我们所知的欧洲各民族是在查理大帝的帝国分裂之后才形成的。

“罗马人愚蠢，佩基洛人智慧”

这并不意味着，查理大帝的欧洲没有因为民族分化而分裂，民族分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帝国被正式称为罗马帝国，但罗马人还是几乎被视为外国人。“罗马人”之名既用来称呼教宗统治的永恒之城的居民，也用来称呼一直与反对法兰克国王的叛乱有关的阿奎丹居民。他们与北高卢的西法兰克人、仍旧生活在日耳曼的东法兰克人，以及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更别提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形成反差，这些民族都认为自己优越于罗马世界。

查理自己是名法兰克人。他对这一定义非常明确也非常自豪。他很留意不去模仿自己头衔上罗马皇帝的做派。艾因哈德告诉我们，“他愿意穿着民族的，也就是法兰克人的服饰”；“他排斥并反对穿着外国服饰，尽管它们很华美，除非他在罗马。受阿德里安教宗请求之时，以及另一位阿德里安的继任者利奥恳求之时，他会穿着罗马式束腰短袍和短斗篷，鞋也是罗马风格的”。⁴ 当这些教宗恳请他们的盟友法兰克国王按照他们的意愿升格为皇帝，并请求他至少在罗马打扮成罗马人的样子以示亲切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外在的物质形式、强制力、共存观念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在查理征服这里以前，法兰克人势不可挡的崛起都意味着对罗马世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击。这种对抗无所不在，在丕平统治的最后几年起草的萨利克法高度官方的序言中就有清晰的表达。序言拔高法兰克人，他们代表新的以色列，撼动了“罗马人强加的沉重枷锁”并且取代他们成为领导基督徒的民族。⁵ 民族维度与宗教维度交织在一起：法兰克人应该统治世界，因为他们从未受到异端的玷污，而数个世纪以来，罗马人迫害并处决基督徒。他们对拜占庭的希腊人的敌意，也是因为承认后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然而根据《查理之书》所提出的，法兰克人已经战胜并将准备继续战胜他们专断的异教做派。这种对抗注定要

持续很久。10世纪末克雷莫纳（Cremona）的主教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受皇帝奥托之命前往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无礼对待。巴西琉斯尼基弗鲁斯·弗卡斯（Nicephorus Phocas）称他的君主是一个野蛮人而不是皇帝，还说“你不是罗马人而是伦巴第人！”利乌特普兰德回应道，他并不对自己不是罗马人感到羞耻，实际上他也不想成为手足相残的罗慕路斯及其匪盗和逃奴团伙的继承者。“你们自称幽暗世界统治者（kosmocratores），也就是皇帝，继承了这一尊贵的地位。但我们伦巴第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非常鄙视你们，当我们羞辱敌人时，就会称他是罗马人。”⁶

事实上，利乌特普兰德显然说意大利语，在语言上他会被划分为拉丁人而不是条顿人。但他所表达的这番恶语，并没有损害日耳曼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实际上，对共同体的意识，并不是共享语言认同的产物。并且这种认同甚至可能在早年就不存在。而且由于伦巴第人采用了罗曼语，并有大量的法兰克人杂居其中，这种认同也完全成为过去。813年，图尔会议命令神父不再以高雅的拉丁语，而要以“乡土化的罗马语或条顿语”（rusticam Romanam linguam aut Theotiscam）布道，这样所有人都能听懂布道台上所言。但要知道，语言上的这种现实绝不能反映出民族上的分化，说“罗马语言”的纽斯特里亚法兰克人和他们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同胞一样都是法兰克人。⁷

日耳曼民族中的集体认同感，是从他们入侵的集体记忆中萌发的。自古以来定居于帝国的罗马人，和战胜他们、征服了高卢和意大利的入侵者之间仍然有明显的差别。可能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这种长久的差别实际上是基于虚构的历史书写，是由对入侵者和原住民之间一体化过程的无知而造成的。现在我们知道，高卢的法兰克人在罗马人中只是极少数，他们很快就被融合了。但在查理的时代，所有生活在卢瓦尔河以北的人都被视为法兰克人，人们并没有考虑他们可能源自拉丁人。当时的编年史家认为，在那个入侵的时代，显然克洛维已经消灭了罗马人，或者至少将他们逐出了国境。语言在民族认定上再一次变得无足轻重，实

际上，很多法兰克人随后仅仅出于好奇而开始说一种罗曼语。一份9世纪的手抄本写道：“似乎在那时，法兰克人从居住在那里的罗马人处学习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语言。这里没人知道自己的母语了。”⁸

分化源自历史而不是语言的另一个同样具有象征性的事实就是，那些定居在帝国行省的入侵者在提及当地人时，总是使用无法翻译的通称“维尔舍”（Welsche），这个词直到今日在德语里依旧是负面意味，并且无差别地适用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不考虑他们的语言差别。这一词语在查理时代广泛使用，长期表达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自古以来的敌视。在当时的一个译本中，巴伐利亚的作者乐于使用下面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表达来作为语法范例：“Tole sint Uualha, spahe sint Peigira /Stulti sunt Romani, sapienti sunt Paioari”，这分别是“罗马人愚蠢，佩基洛人（巴伐利亚人）智慧”的巴伐利亚语和拉丁语翻译。⁹甚至在查理时代，欧洲的地理观也由定居于此的日耳曼民族主导，并得到了彻底的重构。当然，知识分子依然使用古典时代地理学家所用的古代术语：高卢、日耳曼、意大利，这些术语从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开始就没有变化。但那些并不知道这些学术概念的普通大众却充分意识到，入侵者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欧洲。他们的态度得到了一份8世纪手抄本的证实，其中包含所谓的“注释表”（glosse），就是将一串拉丁文单词翻译为日耳曼语言。这个词表，应该和查理在学习书写时放在面前的相似，它将古典地名翻译如下：“高卢/维尔舍地区，阿奎丹/加斯科涅地区，日尔曼尼亚/法兰克地区，意大利/伦巴第地区，诺里库/佩基洛地区。”（Gallia uualho lant. Equitania uuasconolant. Germania franchonolant. Italia lancpartolant. Ager Noricus peigiro lant.）¹⁰

因此，在用日耳曼语言思考的人中，这幅地理图景与古典图景完全不同。一个人若身处自己国王的居所亚琛，会认为自己身处法兰克人的土地。往南移动，他迟早会进入“维尔舍”或罗马人的土地，他们生活在卢瓦尔河以南，这是法兰克人很少出现的异域之地。再往西南部的阿奎丹是加斯科涅地区（Vuasconoland）或称巴斯克领地；巴斯克之名当时

意味着被围困在比利牛斯山避难的少数民族，但在过去他们占据着名叫加斯科涅的广阔区域。不过，如果我们的人从亚琛往东，他将会到达曾经的诺里库地区（亦作Noricum），现在这里成了佩基洛地区。从这里越过群山，他将到达的不是意大利，而是伦巴第人的土地。这种地理划分只是在表面上尊重古代的术语，实际上是以取代先住民“维尔舍”的日耳曼人的居住地来解释欧洲。这种分化表示了一种明显的敌对态度，而不仅仅是差异。

回归罗马

一个帝国的定义，不是依靠使之建立起来的民族情感，甚至也不是靠皇帝的个人情感。在他穿着罗马式束腰短袍和短斗篷的时候，查理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法兰克人，并感到不快。但当他宣布自己遗愿的庄严之刻到来时，在他眼前的是这个帝国。他下令将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二分配给臣服于他的领地上的21位大主教，21个大主教教座所在地排列如下：“罗马、拉韦纳、米兰、奇维达莱（Cividale）、格拉多、科隆、美因茨、萨尔茨堡、特里尔、桑斯（Sens）、贝桑松（Besançon）、里昂、鲁昂、兰斯、阿尔勒、维埃纳、塔兰泰斯（Tarantaise）、昂布伦（Embrun）、波尔多、图尔和布尔日。”¹¹ 它们的顺序反映了从灰烬中重生的罗马帝国的政治地理，并且与当时的教会地理分布产生了关联；教会地理自1世纪产生以来就再没有修正。首先罗马以其法统居于首位，随后是西部帝国的旧都拉韦纳和米兰。接下来将古代的阿奎莱亚主教区分一分为二：奇维塔莱和格拉多，它们在与阿瓦尔人和拜占庭的边界上具有重要地位。

法兰克王国的大主教教座在五大意大利教座之后才出现。我们现在认为这些是德国城市，但它们实际上是莱茵河左岸的古罗马城市：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萨尔茨堡是例外。查理大帝本人将萨尔茨堡提升为

大主教区，目的是为了组织阿瓦尔人改宗，并组织巴伐利亚人在多瑙河以东定居。无怪乎这是唯一的古典地名无法准确定义的教座。所以当时起草遗嘱的教士用当时通行的惯例做出翻译：“尤瓦乌姆（Juvavum）也就是萨尔茨堡。”接下来就是古高卢的城市桑斯、贝桑松、里昂、鲁昂、兰斯，然后沿着罗讷河通向地中海，阿尔勒、维埃纳，两个阿尔卑斯地区的教座塔兰泰斯、昂布伦，接着是波尔多、阿奎丹的大主教教座，最后回到高卢中心，图尔和布尔日。

应该说明，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理划分，因为一个教会区域的划分反映了基督教的传播情况，也导向古典时代的终结。那个时代的地理划分在很多方面已经和当时的人口分布以及贸易路线不相符了。一些都主教省区极小，另一些则太大。一些主教区沿着莱茵河，可以监视北日耳曼的广大平原，这里最近才在刀剑之下皈依了基督教。一些大主教区是不起眼的城市，如桑斯和兰斯。而巴黎和亚琛，是查理帝国的重要大型中心城市，却没有设置都主教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查理口述这一名单时的原则，它就是已经说过的一种对帝国的概括，这一原则非常明确。我们这里没有罗马人或日耳曼人，也没有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或阿奎丹人。这是一个基督教帝国，就是罗马，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罗马是上帝所选，是基督的宗教中心。

古代世界的终结与欧洲的诞生

皮朗关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的理论

1937年，亨利·皮朗的名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在其死后出版，为19世纪就发起的关于加洛林欧洲的史学问题讨论带来了转折。¹²皮朗自己是一个19世纪的史学家，一瞥他留着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的肖像照，就可以确信他的出生时间——1862年。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他在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的边界处出生并接受教育。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能克服法国与德国历史学家之间对立的民族主义僵局。通过分析贸易形式和货币流通，皮朗得出结论，查理的帝国根本就不代表罗马帝国。然而蛮族入侵终结了古代世界、对经济只有负面影响也不是他的观点。是阿拉伯人入侵地中海地区，动摇了罗马人环绕“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建立的古代世界。随后，我们现在所知的欧洲开始形成，地中海成为它的边界而不是中心。

如今，皮朗的理论因为他所代表的经济论而被完全抛弃。实际上，地中海贸易的衰落、货币危机，可追溯到帝国最后几百年，查士丁尼的破坏性战争进一步加剧城市衰落，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异议。同样，这些因素并不能证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书中提出的关于文明的全面衰落、市场近乎全面地消失这些问题的解释。中世纪早期实际产生的是一种新的经济空间，其基础是贸易线路指向北海的欧洲大陆，而不是地中海。不考虑其局限性，皮朗的视角被证明极有成果。因为在他之后，争论不再纠结于查理帝国的罗马或日耳曼属性，而是关注帝国与早先和随后时代的关系。换言之，争论转变成了帝国塑造自身的形式，即至少在其结构上，是否与罗马有相似性。如果和奥古斯都的帝国不相似，是否和

戴克里先或君士坦丁的相似？或者查理统治的大陆是否已经截然不同，导向了现代欧洲？

当前，论证历史连续性的第一种解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皮朗的主要论敌——奥地利历史学家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 h）胜之不武，他看到了在尤利乌斯·恺撒的时代到查理的时代之间潜在的连续性。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最终胜出的解释是一条第三方道路：史学已经能够日渐清晰地证明，古代晚期这个时代与古典时代的概念截然不同，这个时代大约是从公元3—4世纪，随着戴克里先改革和基督教的兴起而开始的。这是古代晚期，不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许多史学家认为，这个时代延伸至查理时代，甚至直到公元1000年。甚至他们无意中回应了马克斯·韦伯的妙语，即查理大帝是“戴克里先迟来的执行者”¹³。不过，这一观点意味着抛弃由伊斯兰教兴起而造成剧烈断层的说法；同时也对皮朗的基本看法示以敬意，那就是日耳曼人的入侵并不代表西方历史的决定性断裂。

我们同样受惠于皮朗的另一个解释，那就是意识到由法兰克人统一的欧洲大陆是一个与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这个观点的主要支持者——考古学家与经济史学家，采用了《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可能最有说服力的一幅图景：一个在古代晚期至关重要的加洛林欧洲，其被地中海所隔离，丧失了与非洲和东方的联系。即使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罗马世界并不拥有我们曾经认为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要素，其经济实际上主要受国家干涉，也由于国家干涉而崩溃；查理时代基于莱茵河的欧洲，显然也和戴克里先以及君士坦丁时代基于地中海的欧洲少有共同之处。这个变化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3—4世纪，是通过多条途径实现的，其中包括极其重要的宗教因素。如皮朗所认为的那样，转折迅速发生。然而，穆斯林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原本稳定的公共财政崩溃，东方通往欧洲北部出现贸易新线路。新线路在查理时代达到了贸易高峰。

“罗马不会衰落”：激进的罗马主义观点

显然，如果以上解释是两个得到考虑的论证，这对于支持古代晚期和加洛林时代之间有连续性这一观点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认为政府加于西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入侵而消除。这确切来说是一个基础论证，以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推向前台，为的是表明古代晚期类型的社会、经济、立法组织贯穿查理时代，直至后世。那些被论敌不怀好意地称作激进罗马主义者的学者试图证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帝国最核心也最具普遍代表性的税收制度在蛮族入侵中保留了下来，并在法兰克王国以及随后再创造的加洛林帝国中继续发挥作用，本质上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是，财富被法兰克国王征收了，并大体上再次分配给权贵和教会。他们在查理的时代，依旧构成王室税收政策的主要基础。大规模的贵族地产、修道院与教会的财产，在技术上说并不包含土地所有权，但是包含了土地税，这些从戴克里先改革时代以来就保持不变。遗憾的是，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基于对史料有失偏颇的解读。并且这些激进的罗马主义学者，或自称的财政主义者，他们所使用的术语，在绝大多数同行眼里是不足为信的。¹⁴

法国历史学家居伊·博伊斯（Guy Bois）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这种观点试图保留连续性，同时批判激进的罗马主义者的信条。他基于社会和实际的经济生产而不是行政和财政，对10世纪和11世纪进行了再解读。他表示，查理曼的欧洲与古代欧洲相比并没有很大不同。¹⁵ 他论证的核心是对奴隶的分析；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史料称之为“servi”，史学家通常称之为农奴（serf）。博伊斯意识到，在加洛林时代，这些农业劳动力屈从于村庄里的富农和大地产主。他们在法律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称作奴隶，正如西塞罗时代他们所遭遇的那样。

和激进的罗马主义者一样，博伊斯的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实际上大部分被推翻了。已经证实，当时的这些受奴役的劳动力，和古代晚

期受雇于大地主和大庄园、编成班组的农业奴隶很不一样。他们结合成农民的共同体，拥有相应的劳动条件，甚至还有一些公民权。在查理的时代，奴隶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妻儿，与自由劳动者和小土地持有者并肩工作。博伊斯的尖锐观点，实际上比激进的罗马主义者的狂热观点更有价值，他促使我们认识到，加洛林时代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转变，这场转变绝没有稳固下来。这种转型的许多特点，对同时代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可以联系到古代晚期时代。只有历史学家察觉到了，未来的雏形正从过去的时代破茧而出，逐渐变为现实。

欧洲的视角

如果我们抛开对社会和经济的争论，回到政治空间的问题上来，即查理大帝改变了政治空间，并为政治空间的大规模拓展做出了贡献；那么我们很难不去认为，欧洲概念最早的确立和成形，是由于法兰克人的霸权，并且其采取的形制，无论好坏，都与我们今天相关。无论皮朗的理论有什么内在的弱点，无可置疑的是，古代罗马帝国是一个地中海政治实体，其统治囊括欧洲、非洲以及“我们的海”的亚洲沿岸。而查理的帝国是一个大陆性的政治实体，其重心是莱茵河流域。帝国已经构建起民族与区域的轮廓，将会塑造第二个千年的欧洲。

当然，前所提及的这些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都可以追溯到晚期罗马帝国，并随着蛮族入侵而急剧加速。确切地说，这一因素如此重要，必须联系到早先的时代。那时，古罗马的行省正经受灾难，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某种程度上的独立之后，被一个新的政治实体重新统一，这个实体只在形式上与那个古代帝国有联系。当我们说它们是统一的时，我们指的不只是它们遵从同一位皇帝，它们也只遵从了几十年；更是指其中一个由法兰克人统治的行省——高卢——的法律、政府架构和经济规则得到了发展，并拓展到了整个欧洲。我们会发现这一缓慢进程的基础，

是法兰克人自墨洛温时代起就加于周围国家的霸权，尽管这一霸权直到800年圣诞节才得到正式确认。

查理的加冕为这个新的政治空间的诞生带来了神性，这一空间在千年之后依旧让人感到熟悉。这是一个以法国和德国为主要伙伴的欧洲，北意大利与加泰罗尼亚，相比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其他地区更融入其中，而大不列颠从某种程度上被排除了。这是一个北方的大陆性的欧洲，是查理大帝的遗产。拉丁—日耳曼的文化深入其中，与地中海地区大不相同，而东部的希腊和斯拉夫则几乎被完全忽视了。无怪乎现在欧盟的首脑核心都设立在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马斯特里赫特，它们都是古代法兰克人领地的核心。

同样我们不该感到意外的，就是在查理的时代，“欧洲”之名突然出现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作品之中。就如同查理童年时他们庆贺查理的祖父在普瓦提埃的胜利一样，那些匿名的作者将之理解为欧洲人（*Europenses*）的胜利。他们统一在法兰克人宫相的领导之下，阻止了伊斯兰的浪潮。或者如卡特伍尔夫神父775年从爱尔兰写信给查理所宣称的那样，“为了欧洲王国更大的荣耀”¹⁶，上帝令他登上宝座。不要忘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位帕德伯恩的诗人，他在799年的夏季，称查理为“欧洲之父”。

注释

¹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366–81.

² H.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Bruxelles, 1937), trad. da B. Miall com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London, 1939).

³ K. F. Werner, *Karl der Grosse oder Charlemagne?* (München, 1995), 3.

⁴ Einhardus, 23.

⁵ MGH, *Leges*, IV/2: 2–9.

6 Liutprand,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 12, in *Die Werke Liudprands von Cremona*, J. Becker ed. (Hannover-Leipzig, 1915; vol. 41 in *MGH, Scriptores*), 182–83.

7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288.

8 E. Ewig, “Volkstum und Volksbewusstsein im Frankenreich des 7. Jahrhundert,” *Settimana* 5 (1958): 648.

9 “Romans are foolish, Bavarians are clever” (R. Aman, “Medieval maledicta,” *Maledicta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erbal Aggression* 12 [1996]: 28).

10 *Die althochdeutschen Glossen*, E. Steinmeyer e E. Sievers ed. (Berlin, 1879–1922), 3: 610. “Gallia, land of the welsch. Aquitania, land of the Basques, Germania, land of the Franks. Italy, land of the Lombards. Ager Noricus, land of the Bavarians.”

11 Einhardus, 33.

12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13 引文见于G. Petralia, “A proposito dell' immortalita di Maometto e Carlomagno (o di Costantino),” *Storica* 1 (1995): 49.

14 讨论见于C. Wickham, “La chute de Rome n’aura pas lieu,” *Le Moyen Age* 99 (1993): 107–26。

15 G. Bois, *La Mutation de l’an mil* (Paris, 1989).

16 关于普瓦提埃之胜，参见*MGH, Auctores Antiquissimi*, 11: 362, 关于Catwulf的信件，参见*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03。

第6章

个人及其家庭

国王的外貌

查理到底长什么样？查理的权势在欧洲史上鲜有人可比，并在处理自己的继承问题上卓有成效。历经千年之后，去重新发现他的个人维度，是否可行？亲身了解他的艾因哈德，在其死后创作了查理大帝的传记。实际上他剽窃了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因为他必须去证明查理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罗马帝王，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与生俱来的继承者。但作为亲眼见证之人，艾因哈德也同样添入了大量的个人观察。

他身体健壮而结实，身形伟岸而又并不过分，身高七尺。他的头颅呈圆形，双眼大而有神，鼻子比常人略大些，华发迷人，表情明快而又愉悦，脖子粗短，腹部略微突出。他的声音清晰，但较之他的高大身材，不如人所预期的那样强而有力。除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受到发热的影响，他的身体十分健康。最后他的一条腿跛了。直到此时，他还是顽固地随心所欲，不

听医生的劝告。实际上他厌恶他们，因为他们想劝说他停止吃烤肉的习惯，以煮肉取代。¹

当一位中世纪编年史家描绘出国王的肖像时，读者不完全从字面上理解他的文字显然是更明智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在查理的时代，更倾向于柏拉图主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们对模板，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实更感兴趣；他们更喜欢抽象化的完美形象，而不是不完美的现实。因此君主形象往往符合理想中的国王模板，而不是个人的瞬息万变的特征。不过艾因哈德幸运地避免了这些弊病：从他描述查理的方式中，我们看出年龄的衰老印记，一个拥有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在他足够富有、能够随心所欲吃肉时所经历痛苦。实际上，编年史家的那些主要取自苏维托尼乌斯的文章不会让人感到不适：中世纪的作者考虑到格调的优雅，会重构那些取自古代以及《圣经》中的文章，并将它们转变成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

艾因哈德所描绘的查理大帝外貌，得到了同时代关于皇帝之描写的印证。²铸在货币上的皇帝形象就是一个有着粗脖子、垂着胡髭的富态男子。他的头发剪短了，头上像罗马皇帝那样戴着桂冠。我们可以从一座骑马的镀金铜像上发现相似的形象，这座铜像高约8英寸，保存在卢浮宫。雕像的主题毫无疑问是一位加洛林君主，过去一直认为是查理大帝，现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雕像人物属于更晚的时期。雕像表现了一个圆头颅的健壮男性，丰满的脸颊，短头发，大胡髭，头戴王冠，很像艾因哈德描绘的查理大帝。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是受皇帝的继承者——可能是秃头查理——委托而作的塑像。

图像方面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796年至800年受利奥三世委托为拉特兰宫而作的马赛克画已经遗失，但我们还有几幅16世纪和17世纪的素描。其中有法兰克国王身着蛮族的服饰，腿部缠绕着布条，跪在圣彼得脚下的形象，毫无疑问是试图展现现实。问题是在一些类似的素描里，

查理并不是只留有胡髭，也留着浓密的黑短须。的确，一幅更晚时期的传统皇帝画像上留有白色的长须。但据我们所知的法兰克人习俗，应该相信查理下巴是不留须的。当贝内文托公爵格里默德（Grimoald）被击败后，他表示臣服的一个象征性举动，就是根据法兰克习俗将自己和部下的下巴刮净。³ 因此，创作拉特兰宫中描绘查理大帝形象之马赛克的艺术家，鉴于他从未亲自见过皇帝，极有可能是根据意大利习俗给查理加上了胡须。罗马圣苏珊娜（Santa Susanna）教堂拱顶的马赛克，可能是受教宗利奥三世委托于799年所建，也已经遗失。但如果我们能路过这幅画像，国王的形象更可能是留有胡髭的。9世纪诞生了第一幅查理大帝的小型肖像，是一件较晚的作品，但是由一位艺术家在法兰克而不是在罗马创作的，因此这上面也没有须。皇帝仍然被描绘为一个脖子粗短的强健之人，留着长胡髭，而且可能还有双下巴，这再一次印证了艾因哈德的描述。

当他声称皇帝身高7尺时，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怀疑传记的真实性，根据现代英制度量衡，皇帝应该超过6英尺3英寸。这是赫拉克勒斯般的身材，尤其是当时的人们都比现在的人更矮小——实际上，奇怪的是艾因哈德并没有觉得这很异常。在这里，考古学家再一次证实了传记作家提供的信息：1861年，查理大帝的陵墓被科学家打开，他们重构了他的骨架，测量出身高是74.9英寸（约190厘米）。⁴ 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人更矮，但存在例外。罗马作家曾惊异于日耳曼人的高大身材，他们比地中海民族更高，而且很有可能首领比农民更高，这都得益于烤肉的功劳。

这位巨人说什么语言呢？在他出生之时，定居在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已经采用了当地人的“罗马语言”，而奥斯特拉西亚的法兰克人继续说开始时提及的条顿语（lingua Theotisca）或“日耳曼语”。在一些法令中，查理使用的一些术语是用其原始的语言，然后用诸如“正如我们用日耳曼语所说”⁵ 的分句去介绍这些术语。艾因哈德并没有使用日耳曼语这个术语，但每当提及皇帝的母语（sermo patrius）时，他会说是日

耳曼方言，也就是法兰克语。和其他的许多古代日耳曼方言一样，法兰克语拥有丰富的元音结尾，元音发其本音，比现代德语听起来更显厚重。例如，法兰克民族被称为“theoda Frankono”，他们的语言则是“frenkis ga zunga”。⁶

艾因哈德提及，查理同样学习了拉丁语，并且能像母语一样流利地会话。⁷这意味着他能和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用他们的罗曼方言对话，而当他和有学问的人甚至教宗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同样可以用语法严谨的拉丁语表达自己。他一定在儿时就曾略知拉丁语，他可能只是学习了如何用这种语言阅读，但伦巴第人比萨的彼得（Pietro da Pisa）在查理30岁以后帮助他完善了拉丁语的学问。他可能是用更婉转的意大利式发音来进行教学，与阿尔昆这样来自欧洲北部的学者使用的发音有所区别。

日常生活

国王的例行日常

在当代，我们每一天是按照几次用餐的时间来划分的；查理每一天的划分则更多地取决于礼拜仪式，并且他觉得自己应该以僧侣般的热忱投入其中。毕竟，他最迫切的责任之一是与上帝对话。上帝从天堂注视着他，而他自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此他要求自己在破晓时醒来，在正式着装之前，他会身着长及双脚的长袍，前去参加晨祷。“一件长袍，直到今天……”诺特克在一个世纪后写道，“……还在继续使用，但所有者的姓名已无从查找。”⁸长袍里面，他穿的是亚麻衬衫和亚麻衬裤，这是常人穿着的服饰，不是王室或贵族所用的华服。

当晨祷结束，皇帝会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升起了炉火。在此他会根据情况的需要，适当作奢华装扮。在内衣之外，他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束腰长袍，用腰带扎紧。这是典型的法兰克人服装，仅仅是布料的材质和装饰的穗带彰显了国王的高贵，与平民有所区分。他们是通过颜色区分的：穷人穿着未经染色的羊毛布，因此是灰色或者棕色；而富人穿着颜色明快的衣服，尤其是红色和紫色。查理在束腰长袍下穿着裤子，这是一种普通但并不普遍的装束，因为当时人的腿都是裸露的。他们总是穿着袜子，还有皮质鞋底凉鞋，脚面上不再覆盖其他的鞋类装束。鞋子由布带绑在脚上和腿上。当天冷了以后，国王习惯将自己包裹在长及双脚的斗篷里。诺特克发现，在查理的一生中，社会风尚倾向于缩短斗篷。但个性粗犷的查理批评道，斗篷这么短，意味着当你解手时，会使双脚受冻。他也不鼓励出售斗篷。⁹除了他喜爱的蓝色斗篷，在需要时他还会穿着水獭皮、鼠皮或羔羊皮的普通短外套。最后，他每日不离

身的还有腰上的佩剑，以及一根镶着金银护手的、有木结的苹果木权杖。

即使这些编年史家提供的描述似乎完全可信，我们也不该忘记这些形象的意识形态意味。很可能查理并不喜欢艾因哈德或诺特克所说的简朴装扮。他们二人赞颂简朴以及昔日的高尚，是为了和自己所在的堕落时代相对比。这可以在诺特克所写的一则逸事中读到：一次周日弥撒过后，查理决定和他随行的贵族一起去狩猎，并且他命令他们立刻上马，不给他们换衣服的时间。皇帝穿着简朴的羔羊皮衣，而其他人穿着节日的华服。更糟糕的是他们刚刚在意大利换上了珍贵的紫色丝绸衣料，这些是威尼斯商人从东方进口，在帕维亚的市场上出售的。在带领他们穿越泥泞和大雨达几小时后，他们回到了宫殿。查理命令他们不许更衣，在火边把自己烘干，然后留他们一直工作到晚上。第二天他想看看他们的衣服都怎么样了，结果发现早已破烂不堪。然后查理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羔羊皮短外套，没有一点损坏，于是他责备他们如此浪费金钱。¹⁰

查理在更衣时就已经忙于工作了，他在更衣时会见大臣，发布命令，甚至做出判决。因此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每天醒来脑中就是大量的思绪。这符合他晚上睡眠糟糕的事实，他会多次醒来，甚至起床工作。但别忘了艾因哈德认识查理时，查理已经是老年，失眠会变得频繁。目前为止没有提及早餐，显然当时没有咖啡、茶还有巧克力。因此我们所知的早餐概念在当时并不存在。很可能直到上午很晚的时候他才进食，享用汤或者浸在奶或酒中的面包。

上午结束时会有弥撒，查理每天都出席——夏季会略早，冬季会稍晚。我们要知道，当时一天中的时间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固定，而是根据季节而变动。一个小时是白昼的十二分之一，而白昼是日出与日落之间的时段。其结果是，这一体系下，夏季的一个小时是我们的一个至一个半小时，而到了冬季会缩短为四分之三个小时。这种变动使得试图确定与那个时代生活习惯相关的确切时间很困难或者说没有意义。此外，

从一定程度上说，僧侣是那个时代时间表相对确定的唯一群体。查理是根据类似僧侣的方式进行礼拜功课，尽管如此，我们在精准定义时还是会发现他在时间上更加自由，这毫无疑问。

和古人一样，正餐被称为“寇纳”（coena），在弥撒过后，因此大致说来是在下午早些时候。国王很少有客人，除了宗教节日时会邀请大量的客人。总体而言，他独自进食或者和自己的子女们一起。在国王用餐过后，轮到他随从中的要员用餐，他们在此之前恭敬地看着他用餐。其他的官员和仆从按照顺序排在他们之后。大斋节期间，应该禁食直到夜晚，查理会早一些进行晚祷，在天还未黑时就开始进食。曾有一位主教敢于在这一点上责备他，随即这位主教被命令直到仆人们最后都用餐完毕了才能坐到餐桌旁，于是他强守斋戒直到午夜。皇帝最后轻易地说服了他，出于基督徒的仁爱，要求他尽快开始进食。然而，诺特克想要强调查理一点也没有破坏斋戒，他每日每餐都严格遵守《圣经》的要求。¹¹

随行的廷臣出席王室餐会，以及他们用餐的确切顺序，让我们想起了离我们更近时代的情况，比如太阳王在凡尔赛宫用餐。这增加了我们的疑虑，查理的宫廷是否真如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宗法严明？不止一条资料提及，某位伯爵或主教与国王用餐时站立在一旁，甚至像仆人一样在旁侍候。当然，用餐的礼节没有繁复到拜占庭帝国的那种程度，有些时候他们成了西部的笑谈。例如，曾有传言称在君士坦丁堡禁止把鱼翻过来，也不允许在皇帝面前谈笑，所以每个人只吃鱼的上半部分，违反者将被处死。¹²但当法兰克国王出席的时候，仍然要遵守规则；而且查理似乎很容易被冒犯，他首先要确定规则得到遵守，甚至因此不乏粗野之举。一位主教受邀用餐，他在自己的桌子上为一块面包祈祷，随后立刻为自己切了一块，之后才把面包献给皇帝，查理愤怒地回道：“你还不如自己全吃了。”¹³

他很喜欢饮食，但并不喝醉，这在蛮族中十分引人注目。然而在这

一点上，我们要注意不要相信艾因哈德。查理感到斋戒难以忍受，在能吃肉的日子里，他不仅热衷于吃烤肉，还乐于亲自用肉叉烹饪。这对于一个伟大的君王来说再适当不过了，他们绝不想过被剥夺爱好的生活。在进食同时，他也喜欢听人读书，聆听古代的故事、他先祖的伟业或者时下的道德教化之作，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至少根据艾因哈德记录的版本是如此。¹⁴但另外一些资料提及，皇帝在餐桌上很享受酒歌甚至低俗的故事。¹⁵在夏季，在吃过水果喝完酒后，他会像晚上一样宽衣，让自己睡一个长长的下午觉。醒来后，他会在出席晚祷前吃一些东西，结束白天。要考虑到，甚至是僧侣，也允许在白昼漫长之日进两餐。

饮食、睡眠、工作、出席弥撒：如此看来皇帝的的生活如同教宗。然而君王的生活也有俗世的欢愉。他对留居下来纵情于后妃并不十分有兴趣，可以说查理把更多时间投入骑马狩猎中。除了这些本民族过去的典型消遣，他也继承了罗马人洗浴的爱好，尤其是热水浴，这在中世纪曾经被长久遗忘。他是一个游泳健将，经常乐于水疗。在晚年，他选择亚琛作为定居地，确切来说就是因为这里的水质。宫殿配备有水疗设施，皇帝会在此下水，陪伴他的有自己的孩子、友人、王国的权贵。艾因哈德提到，有时他甚至会邀请侍卫进入浴池，有时水中一次能超过一百人。¹⁶阿尔昆也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曾经和皇帝一起在热水浴中讨论神学。¹⁷

我们对于查理日用家具的了解，来自描绘国王和贵族生活的微缩画，总体而言是《圣经》中的风格。我们知道他们不像古罗马人那样躺着进食，而是坐在圆形或矩形的桌子旁，甚或更矮小的单人桌子，盖着白色的小桌布。他们通常坐在带着彩色坐垫的高背椅、板凳或折叠椅上，靠背椅和我们今天所用的也没有很大不同。显然，他们用手进食，因为叉子还没有发明。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餐具，或者不需要遵守餐桌礼仪。肉和面包用刀切开，汤则用勺子进食。

另一种日常生活的重要家具就是床。床是木质的，低矮，有四、八甚至十条腿。椭圆形的软床垫放在木板上，有一到两个枕头。就寝时，人们把自己包裹在被单里。被单是白色的，也有稀有的紫色。不排除被单是羊毛做的，因为它似乎会取代毯子。当天冷时，白天用来保暖的斗篷也用于夜晚。这解释了查理为什么喜欢长斗篷。家具有时会饰以绘画，主要是红色。坐垫和靠垫可能饰有绳编或花边。甚至在富丽的宫殿里，微缩画的描绘也带有斯巴达式的简朴风格。壁炉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舒适，地面上盖着地毯，壁毯则用珍贵的布料做成。

国王和他的圈子

一份有关查理宫廷日常生活的描述，通过他的诗人流传给我们，尽管有失偏颇，但十分吸引人。在漫长的冬季，诗歌提供了消遣；同时由于皇帝喜欢评判诗歌，诗歌也提供了一场生动竞赛的机会。对必须远离宫廷度日的人而言，这些以诗歌为形式的信函创作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分析这些优质的文学流露，揭示出了皇帝身边那些人的团体精神。这些诗歌的特点是持续、密集而混乱的暗示、笑话，以及只有其最初的讲述者才能理解的诙谐逸闻。查理自己也参与到这场智力娱乐中，尽管那些署他之名的诗歌可能经过了他的一位诗人重新修订。当助祭保罗刚刚加入宫廷的时候，国王送给他一首经比萨的彼得润色的诗。在诗中他问保罗，是愿意进监狱还是愿意被送去教化丹麦人。助祭保罗对这个黑色幽默的回答十分机智（他说他愿意去教化丹麦人，但他不懂他们的语言）。¹⁸ 在此，我们看到了征服异教徒、传播基督信仰这一官方政策的个人日常层面，体现在国王和友人的谈话之中，而不是教会法令和公会议的严肃话语里。

有时诗人的描述带有恶毒的讽刺。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在描述一个充斥着低劣的诗歌的法庭时，显得十分刻薄。法庭是由最高级官员诸如

王室总管麦金弗里德乌斯、总管奥杜尔夫（Audulf）主持的。他们笨拙地绞尽脑汁，最终写出一首蹩脚的六步格诗以取悦国王。一场激烈的竞争在宫廷知识分子和粗人之间造成了分裂。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外国人，而那些从军的粗人被认为是查理热衷的另一个圈子，他们陪伴他外出狩猎，参加战役。狄奥多尔夫讽刺他们中的一人，威伯德伯爵，他高大肥胖，当他走动时，整个宫殿都会晃动。而且他很愚蠢，无法理解狄奥多尔夫取笑他的诗作，所以他常喃喃自语，诅咒给他带来痛苦的人。¹⁹

可以充分设想，没有人会冒险在君主面前动粗。只是有夸张的赞颂之词这样提及查理：赞颂他是最高的文学鉴赏者、全能的保护者，后者某种程度上是他真实的写照。但这并不意味着偶尔的小插曲没有传递出现实。在描绘君主返回宫殿时，狄奥多尔夫写道，他的儿子们推挤着接过他的手套和剑，而他的女儿们给他带来鲜花和水果，坐下来和他谈笑。²⁰更普遍的是，查理乐于坐在他的文人面前，让他们在他面前赛诗、编谜语甚至进行细致的语法讨论，这幅画面为我们所了解的查理形象又增添了新的维度。但是，如此费心地亲近他本人难以掌握的文化，更加暗示他是一个蛮族首领，而不是一位罗马皇帝。

查理控制文化和文学活动，同样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权威，也为了附庸风雅。查理坐在礼拜堂里，周围是轮流阅读经典的教士，皇帝喜欢突然用手或权杖指向一位教士，那个人就必须立刻朗读正在阅读的篇章。根据诺特克的记载，当他听够了之后会打呼噜，那些热衷于取悦他的朗诵者会立刻停下，即使一句话还没读完。²¹这则逸闻表现了这位年老的独夫对待自己仆从的一种可怕情形。但是要考虑到，相对于查理统治的方方面面来说，这不太体面的一点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了。此外，诺特克的作品是他教导自己教士们的手段，他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世上最杰出的读者，甚至他们在不知道自己在阅读什么时也不会犯错！

查理的个性

我们如今能贸然猜测一下查理的个性吗？不考虑艾因哈德对苏维托尼乌斯的模仿，他描绘的形象显然有其独特性。这是一个既富有内涵也暴虐的人。他同样也是个能够享受人生欢愉的感官主义者，这一点就不能用来形容奥古斯都。伟大的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费希特瑙（Heinrich von Fichtenau）提出，查理的性情在抑郁和豪爽之间不断转变，尽管没有严重到显示出病态症状的程度。²² 根据心理学，这些有循环性人格（cyclothymic）的人，现实中也极其有能力，热衷于肉体的欢愉。他们也拥有强大甚至是过分的自信，并且有一种不能为自己设定限度的倾向。当他们独处或沉默时就会陷入抑郁，有时会突然爆发出暴力。尽管在20世纪的上半叶，费希特瑙写作之时的读者较之今日的读者而言更相信这些半科学化的描述，不过事实上，查理的这些特点，编年史家已经给我们作了描述。

我们知道皇帝非常喜欢公开演讲，甚至连崇拜他的传记作者也认为他有点啰唆。²³ 我们知道他不愿独处，要求自己的同伴不间断地武装环绕在他周围，包括他的顾问、女儿还有护卫，包括他进餐甚至沐浴的时候。来访者首先会被这种喧闹所震惊，然而查理却怡然自得。我们知道他有时对所有人都很和蔼，有时会突然爆发出怒火，显示出凶残的恶意。这里没有提到他那不指明的残暴，艾因哈德对此并不讳言，并将残暴归于查理一位王后的坏影响。²⁴ 我们会对诺特克的一则故事感到震惊：一天，当查理前往教堂，一位主教在旁侍候，查理骄傲地向他指出一位教士，教士正以美妙的声音唱赞歌。这位主教并不知道这位被谈论的教士是皇后的一个亲戚，他带着玩笑的口气说，他曾经听见农民在赶牛时发出这样的尖叫。愤怒的皇帝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杜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作家传播这个故事，并声称自己的目的是赞颂查理的伟大。²⁵

这些故事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是由于国王爱好吹嘘。曾经，据说当他正在思考那片将他的国土与拜占庭帝国分开的海域时，他大呼：“要是没有这片小池塘，我们就能分享东方的财宝了。”²⁶ 他完全被自己的

才华所折服，容易受到奉承的影响。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写过，皇帝的美德比尼罗河还要雄伟，比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还要宏大，比恒河还要威严，而且查理最终并没有显示出惊讶。²⁷同时，皇帝也能开得起玩笑，他更信任的廷臣会对他加以更为夸张的描述。为了给国王一个展示的机会，阿尔昆向他请教，想弄清一个复杂的礼拜历法问题。查理写了一份书面回复，并假装自己是作者。阿尔昆认为回复完全错了，他建议国王下一次寻求一位不那么无知的教士的协助。²⁸另一次查理又以他习惯性的傲慢说：“要是我能有十二个像圣奥古斯丁或圣哲罗姆那样博学的教士就好了。”阿尔昆立刻回复道：“连上帝都只有两位那个等级的人，你竟然想要整整一打！”²⁹

最后一个特点，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些相比，不算过分，那就是查理经常在言行中显得粗犷甚至粗俗。一位从君士坦丁堡归来的使节报告说，巴西琉斯希望得知萨克森战争的进展。当他听到这个地区还没被平定时，说道，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这么琐碎的事情里如此困苦，他很不开心。这种称呼法兰克国王的方式可能符合拜占庭的礼节，但查理觉得很糟心。当使节提及巴西琉斯说起萨克森人时，认为他们是无足轻重、很容易被击败的民族，查理觉得情况更恶劣了。拜占庭皇帝最后向震惊的法兰克人说道：“听着，我将他们赏赐给你们。”这则逸闻毫无疑问是杜撰的，是西方民族妄想东方君主之华贵的一个例子。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传说中查理的回答，回答带有明显的粗俗意味：“他要是赏赐给你一条旅行用的内裤就更好了！”³⁰

国王的家庭

查理时代的婚姻

精力充沛、耽于美色、热衷于肉体欢愉，这样的形象从对查理的描绘中浮现，并且被皇帝的两性活动所证实。终其一生，他都被多位妻妾环绕，她们接连死去或被抛弃，后来者又不断紧跟而来，最终与他同居。这种纷乱的家庭生活，呈现在所有人面前，造成了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丑闻。直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查理那一代人的婚姻形式和基督教婚姻完全不同，后者随后才开始仅仅被前卫的主教们提出。同样也不要忘了，国王的家庭生活，与他的妻妾、兄弟姐妹、子女之间的关系，不仅像我们这样属于感情或肉体范围，而且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婚姻，正如查理在其青年时所理解的那样，依旧和传统的日耳曼观念一致，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婚礼的圣礼价值。婚姻纯粹是个法律的协定。国王结婚是为了生孩子，保证继承。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什么比国王死后无嗣更可怕了。因此一个不能给丈夫生孩子的妻子注定要被抛弃（没有人想过丈夫不育的可能性）。这就是法兰克人婚姻的首要特征，这与教会所要求的截然相反。教会试图说服基督徒只娶一位妻子，甚至丧偶后也不再婚。事实上，人们普遍是草率地休妻，紧接着是第二次婚姻。

对国王来说，婚姻也是一个组成联盟的方式，因此并不需要妻子个人的同意。要考虑到，这对所有人都是成立的，因为无论你是位高权重之人还是一介农民，都要在评估个人倾向之前考虑家庭的利益。日耳曼习惯法也为此做了规定，区分了由公开约定而建立的真实婚姻与被称作

临时婚姻或私下婚姻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后一种婚姻就是所谓的“费德利赫”（Friedelehe），这是一个模糊的词语，我们可以将之翻译为“爱的结合”，而且只在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会在女方家庭同意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家庭条件逊于自己的女人，女方家庭也乐于与有名望者之间建立情谊。这不需要法律的允许，也没有真实婚姻中经济上的羁绊。这种结合仍然是合法和光荣的，但这只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且女性也没有借此摆脱父亲的权威而置于丈夫的权威之下。若出于家族利益，或者君主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解除这种关系也无需繁文缛节。

据说，教会对这种习俗很反感，并且觉得这种按照“费德利赫”关系娶来的妻子和庸俗的情妇一样不可宽恕。755年的一次宗教会议规定：“平信徒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结婚都必须举行公开的婚礼。”³¹但是以前历代主教长期无视婚姻问题，都认为此事牵涉肉体关系，令人生厌，如今的主教为此付出了代价。其结果是，教会事实上并没有关于婚礼的明确教义。婚礼还没有被定义为圣礼，对婚礼本质的反思还没有开始。加洛林的神学家会极其缜密地深思洗礼与圣餐的本质，却对婚礼一言不发。同样，关于婚礼的礼仪也是空白，这意味着在婚礼仪式中，神父的角色是不必要的。只有在涉及自己主教区管理的时候，主教们才会偶尔提到婚礼，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禁止教士参与这种亵渎的放纵狂欢。

对宗教生活的改革由卡洛曼和不平发起，由查理继续，最终因婚姻习俗的彻底改变而结束。到皇帝814年驾崩时，关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之间的界限，与查理出生和加冕的时代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费德利赫”是最首要的受害者。权贵仍然继续与临时情妇纵情，但她们不再能轻易地与妻子相混淆。其结果是，合法妻子所生的孩子与现在被认为不合法的情妇所生的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查理为了提升基督徒的道德的承诺而支持这一发展。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为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痛苦的结果。

国王的原生家庭

查理统治期间习俗和道德的演进，也同样清晰体现在编年史家提及他的出生时所表现出的窘迫上。艾因哈德声称，不可能对皇帝的童年做出任何的评论，因为没有人留下书面的记录，也没有在世之人能回忆起来。³² 许多人发现，作者如此明显地抛开苏维托尼乌斯的模式，显得十分奇怪，苏氏总是会描述皇帝的出生以及童年。当然，艾因哈德的沉默可以这样解释，中世纪编年史家所遵守的方法论，偏好于区别对待自己的亲眼所见、其他亲历者所言，以及写下的记录。很显然，寻找五十年前的文字记录是非常困难的。当艾因哈德说，他不愿意写查理人生最初几年这么遥远时代的事件时，他只是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而已。

但这种沉默也同样可能有避讳的因素。查理出生时，他的母亲贝特拉达和国王丕平并不是以公开结婚的方式，而是以“费德利赫”的私下婚约而结合的。她在几年之后才成为他完全意义上的妻子。根据当时最新的宗教观点解释，查理是婚外生子。换言之，他是个非法的孩子，一个私生子。他的继承权会受到父亲的次子卡洛曼的挑战，卡洛曼是在父母正式结合后来到这个世界的。对国王丕平和查理而言，这个问题肯定是完全次要的，他们甚至会难以理解教会解释这一问题的术语。因此我们可以排除这一观点——如一些人猜测的那样，查理对自己的不合法出生已有觉察，这造成了他的心理问题。但艾因哈德写作的时代，是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教会对私人生活的影响正在大幅增强，自己父亲的出身问题会对新皇帝造成尴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我们无法得知查理的童年情况，以及他和父亲的关系，其父去世时他26岁。无论什么原因，艾因哈德对此都负有责任。他的母亲贝特拉达一直活到783年，然而她再也无法获得如同768—770年间那样的政治地位。彼时，她是查理与其弟卡洛曼、伦巴第国王之间关系的有力影响者。³³ 在她逝世后，国王极其隆重地将其安葬在圣德尼（St-Denis）修道

院^①，和丕平葬于一处。我们对他们兄弟二人童年时的关系一无所知。在他们父亲去世之前，二人之间因竞争所生的芥蒂有所缓和。我们对查理和他唯一的妹妹吉斯拉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查理与她应该相当亲近，任命她为重要的谢勒（Chelles）修女院的院长。查理统治期间最重要的一部赞美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作品《梅斯编年史》（*Annales Mettenses*），就很有可能是在吉斯拉的鼓动下写成的，甚至可能实际上由她亲笔所作。³⁴ 我们还有一些她和阿尔昆之间的书信，这暗示着这位强势的修女院院长和比她更强势的兄长之间有持续的亲密关系。

妻子：希米尔特鲁德、“厄曼嘉达”、希尔德嘉德和她们的孩子

查理早期的婚姻和家庭经历是他父亲的真实写照，是教会影响力还未进入宫廷的标志。查理的第一次结合，和他父亲一样，不是和一个正式的妻子公开结婚，而是和一位名叫希米尔特鲁德（Himiltrude）的“费德利赫妻”（Friedelfrau）结合。和预想的一样，艾因哈德写作之时考虑到官方道德规范的发展，对这段关系三缄其口。³⁵ 但查理年轻时，事情则完全不同。教宗司提反在一封书信中提及了这场婚姻（他对此事有极大的兴趣），称其为“一次合法的结合”，也是牢不可破的关系。³⁶ 换言之，和贝特拉达是丕平的妻子一样，希米尔特鲁德是查理的妻子。770年，她为查理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受洗，取其祖父之名丕平，这意味着查理将其视为自己正统的继承人。

对儿子名字的选择有其政治意味。新生儿必须重复其先祖之名，确切地说，这种由名字带来的身份认定给予他们继承权。在尚有争议的时代里，这个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名字不是查理，而是丕平。这是家族创始者的名字，也是其后裔中第一位受膏为王者的名字。因此历史学家更偏好称呼这一时期的家族为丕平家族，而不是加洛林家族。当查理和希

米尔特鲁德的儿子出生时，他的兄弟和竞争者卡洛曼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很自然也取名丕平。这一定促使查理加快了行动，并且为他自己的儿子取了同样的名字，以保证自己有继承人。他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孩子是由私下婚约所生还是公开的婚姻所生。毕竟，他的父亲最终和贝特拉达公开结婚，因此查理和希米尔特鲁德之间也没有障碍，因此丕平的地位是绝对合法的。

但政治迫使他做出另一个选择，这一选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痛。在他的地位还未完全巩固的动荡年份中，与伦巴第国王之间的良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查理在贝特拉达的建议下，同意与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结婚。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有些人称她为德西德拉塔，这似乎是与她父亲的名字混淆了。曼佐尼没有设置一个匿名的女角色，而是称她为厄曼嘉达，但没有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³⁷ 无论怎样，婚姻没有长久维持，因为查理与伦巴第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敌对。为了能放开手脚，他不失时机地抛弃了她，这可能发生在771年，婚后还不到一年。与此同时，这一公开的婚姻将希米尔特鲁德扫进阴暗之处，因此强化了她与查理关系的临时性。

国王摆脱伦巴第妻子如此迅速，也许能说明，从他自己的角度看，抛弃希米尔特鲁德让他多么愤恨，因为这个女人为他生了第一个孩子。他离婚后没有再和她结婚的确切原因很难说明。可能因为是希米尔特鲁德死亡或再嫁他人，使之变得不可能。总之，这件事一团糟，国王服从自己母亲的建议，也不会高兴。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恶化甚至败坏了查理的生活。希米尔特鲁德的儿子丕平还是个孩子，他完全认为自己是长子和继承人。根据艾因哈德的记载，他残疾了，因此历史学家称他为“驼背丕平”，与其他的丕平以示区分。³⁸

查理想要另一位女子的陪伴，也想要更多的孩子，因此他不失时机地选出自己的新王后，希尔德嘉德。她783年4月去世，年仅25岁。去世之前，她为他生了九个孩子，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她12岁就结婚了：

在当时，女孩在到达青春期后就会尽快结婚，充分利用其生育能力。四个男孩理所当然地受洗了，取了传统的法兰克国王的名字。第一个名叫查理，取其父亲和曾祖父之名。第二个生于777年，继承了其叔父和叔祖之名卡洛曼。778年出生的双胞胎受洗所取的是更加古老、并非加洛林血统之名。一个名叫路易，实际上是第一位皈依基督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名字的变形。他几个月后就夭折的双胞胎兄弟名叫洛泰尔（Lothar），是另一位伟大的墨洛温国王克洛泰尔（Chlothar）名字当时的写法。显然，使用这些来自古代编年史书中的名字，表现了一种与墨洛温王朝建立联系的渴望，强调了一种王朝更迭后法兰克王国的连续性。查理可能在778年这个灾难之年，目睹了对穆斯林作战的失败和萨克森人第一次戏剧性的暴动后，迫切地意识到此举的政治必要性。

对女孩来说，名字的政治意味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她们不是继承人。然而，她们的名字也延续着家族的传统。希尔德嘉德所生的五个女儿，一个取其母亲之名，另一个叫作阿德莱德（Adelaide），两人都年幼早夭。存活下来的女儿，分别取查理祖母、母亲、妹妹之名罗特鲁德、贝特拉达和吉斯拉。

781年危机

准确地说，由于其政治重要性，名字甚至是可以改变的，正如781年查理与希尔德嘉德的第二个孩子那样。他在此之前叫卡洛曼，现在在罗马接受了教宗的洗礼，取了新名字丕平。由于他出生在777年，这表明阿德里安教宗为他施洗，重新与他建立起教父子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联合了他的前任与丕平国王，象征性地强化了他与法兰克人之间的情谊。查理承诺778年带自己的儿子去罗马，但西班牙的政治情势突然发生变化，迫使他推迟了计划，以领导跨越比利牛斯山的远征。但对教宗作出的承诺，如果没有外交上的重大变化，是不能撤销的。因此，洗礼

推迟到国王有时间前往罗马之时，也就是781年的复活节。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他们将孩子的名字改成丕平的时候，第一位丕平依旧健在。对此只有一个解释：教士开始对年近四十的成年国王有更强的控制。他们向他解释，现在教会认为第一位丕平是一桩不合法的婚姻所生，没有资格坐上王位。当然，希尔德嘉德必须尽自己的本分劝说她的丈夫，因为这意味着剥夺“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继承权，而把自己的孩子推向前台。当教会给予她如此支持的情况下，哪位母亲能抵制住这种诱惑呢？

查理让步了，就如过去他做出让步，抛弃了希米尔特鲁德，去迎娶伦巴第人；并且他尽快地创造了另一位丕平，这一次是一个合法的丕平。通过取这个名字，他让世人知道，自己的长子已经被边缘化。如果驼背同意放弃继承权，他被许诺成为梅斯的主教——这个职位曾经属于王朝的奠基者阿努尔夫。等到驼背成年有能力自己做决定时，人们不会让他境遇太糟。所以，尽管小查理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但丕平还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正式意义上还是长子。791年，梅斯的主教去世，压力又来了。唯一的原因就是第二年20岁的驼背丕平策划了一场针对自己父亲的阴谋。他被逮捕，后被判处死刑。国王挽救了丕平，将他送到普吕姆（Prüm）修道院，他待在那里直到811年去世。梅斯的主教教座一直空缺，似乎查理一直希望他这个叛乱的儿子有一天能屈服并接受自己的命运。

法斯特拉达、柳德嘉德和诸位姬妾

783年，希尔德嘉德去世时，查理才刚到40岁。他已经有了三位妻子，其中两位是合法的；他当时有四位儿子、三位女儿在世。作为国王，他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国家生育继承人，任何身处其位之人都会对其现在的境遇感到满意，而且可能会听从教士的建议，继续独身的鳏居

生活。但是查理不想这样。在他妻子过世后几个月，他从萨克森的战事中脱身回到本土，只为迎娶法斯特拉达。这位非常年轻的新娘在十一年中给他生了两个女儿，狄奥德拉达（Theodrada）和希尔特鲁德（Hiltrude）。她于794年8月去世，正值法兰克福宗教会议期间。这些女性死于丈夫之前很正常，因为尽管她们避免了战争的痛苦和风险，但生孩子的痛苦和风险更大。国王的妻子更是如此，她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和王朝生育尽可能多的备选继承人，她们简直被不断的生育给拖垮了。“唉！”助祭保罗在希尔德嘉德的墓志铭中写道，“噢，国王的母亲。唉，光荣而又痛苦！”³⁹

法斯特拉达对查理的影响似乎并不是正面的。786年的哈德拉德（Hardrad）和792年驼背丕平这两次密谋反对国王的事件，都发生在她做王后期间，这也许并不是巧合。根据王室编年史家的记载，在第二次事件中，密谋者决定采取行动就是因为王后的残暴。⁴⁰也可能是因为夫妻间关系的日益恶化。艾因哈德极不情愿地承认，在查理与法斯特拉达的婚姻期间，一位他声称不知道姓名的姬妾为国王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罗泰德（Rothaid）。⁴¹他甚至对查理的旺盛活力表示体谅，这是我们现有的唯一提及国王正式婚姻期间有姬妾的文献。另一个事实是，查理唯一留存的私人书信，就是写给法斯特拉达的。信中，他像千百年来的战士一样，抱怨法斯特拉达给他写信不够多。⁴²

法斯特拉达去世的时候，查理已经五十多岁，他再一次结婚，迎娶了名叫柳德嘉德（Liudgard）的阿勒曼尼新娘。她没有为他生下任何孩子，或者没有孩子在生命之初危险的几个月中幸存下来。在那个时代，一半的孩子在一岁之前就夭折了。在800年，加冕为帝之前几个月，柳德嘉德也去世了。她受到了憎恨法斯特拉达的宫廷学者们的沉痛哀悼。⁴³在她之后，皇帝就不再有合法的妻子，只有姬妾。可能的原因是，他的三个合法子嗣都已成年，其中两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王国的继承权得到了保障，没有理由再生育子嗣，去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艾因哈德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细节，也为我们提供了查理最后一位妻子死后，他的四位女性伴侣的名字。第一位是玛德尔嘉德（Madelgard），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罗提尔德（Ruothild）。萨克森人格斯芬达（Gersvinda）为他生了另一个女儿，阿德尔特鲁德（Adeltrude）。瑞吉娜（Regina）生了两个男孩，道戈（Drogo）和雨果（Hugo）。阿达琳达（Adalinda）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提奥多里克（Theodoric）。⁴⁴这三个儿子都是在查理60岁以后所生的，显然是庶子。也没有人认为他们能和自己的异母长兄共享继承权。他们也确实被冠以先祖之名，但都是没有成为君王的先祖。父亲死后，他们三人都被异母长兄虔诚者路易削发，送去献身神职。路易待他们很宽厚。道戈成为梅斯的主教和帝国大教长（Archicapellanus）。雨果是几座重要修道院的院长，包括圣贝尔廷（St-Bertin）、圣昆廷（St-Quentin），可能还包括诺瓦莱萨，直到844年路易诸子内战时，他战死沙场。只有提奥多里克在818年时未成年就夭折了。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修道院的院长，圣里基耶（St-Riquier）修道院的里克波都斯（Ricbodus）和穆捷一圣一让（Moutier-St-Jean）修道院的伯纳德（Bernard），被确信为皇帝与不知名女子所生的儿子。但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感情与性关系完全私密的王国，因此许多事情我们都已无可稽考了。

做父亲的感受

关于查理的两性欲望问题的最终总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仅仅考量他那些确定存在的妻妾和子女。史料表明他有五位正妻、六名姬妾，为他生育了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查理以自己的方式无度地溺爱这些孩子，从纯粹的感情角度看，他与女儿的关系比与儿子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且不论驼背丕平的悲剧，另一位丕平和路易早在童年时，就在意大利和阿奎丹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他们在此的存在是象征性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和父亲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更为密切，可

以确定的是比不上女儿及那些庶子。

皇帝人生的最后几年，为一连串的早逝所伤痛。意大利国王丕平，逝于810年，享年33岁。同一年查理的长女罗特鲁德去世，她曾被许配给君士坦丁六世，但随后毁约。第二年，驼背丕平在拘禁多年后，死于普吕姆修道院。更糟的是，他的嫡长子查理也在这一年去世，他本应继承法兰克王国和皇帝的冠冕。他现存的唯一男性子嗣，是从781年起就成为阿奎丹国王的路易，他存活下来，并在其父去世前一年成为共治皇帝。他的个性大概与精力充沛、耽于享乐、率意为之的父亲相去最远。艾因哈德本想把自己心中的英雄（查理大帝）塑造成信奉斯多葛主义的古代哲人，但他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查理难以以基督徒的方式接受自己孩子的早逝，而是公然表现出悲痛和哭泣。⁴⁵ 只有丕平留下了一个儿子伯纳德，还有五个女儿。祖父希望自己的孙子能继承意大利的王位，但这没能挽救他在叔父虔诚者路易统治之下的悲惨命运。

女儿们的陪伴使查理的晚年少了一些不愉快。皇帝不允许她们结婚，但是法兰克宫廷中的宽松道德意味着她们中的几位与他人可以有非正式的长期关系。罗特鲁德与伯爵曼恩的洛贡（Rorgon del Maine）有一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他后来成了圣德尼修道院的院长。贝特拉达与圣里基耶修道院院长、诗人安吉尔伯特（Angilbert）有几个儿子，其中一位是史学家尼塔德（Nithard）。在查理的暮年，他的这些成年女儿中又加入了意大利国王丕平的五个孤女，他希望她们在亚琛陪伴他。就是这些女性在814年1月28日操办了老皇帝的葬礼。作为她们的兄弟和叔父，虔诚者路易在急切地赶到皇宫后，立刻“赶走了一群数不胜数的女人”（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称赞的那样）。⁴⁶ 我们只能再一次说，这父子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

注释

- 1 Einhardus, 22.
- 2 P. E. Schramm, “Karl der Grosse im Lichte seiner Siggel und Billa sowie der Bild- und Wortzeugnisse über sein Aussehen,” in *KdG*, 1:15–23.
- 3 Erchempert, *Historia Langobardorum Beneventanorum*, in *MGH,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icarum*, 236.
- 4 Fichtenau, capi. 1n2.
- 5 *CRF*, 74, 98.
- 6 H. Thomas, “Frenkisk: Zur Geschichte von *theodisus* und *teutonium* im Frankenreich des 9. Jahrhunderts,”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egnum Franorum*, R. Schieffer ed. (Sigmaringen, 1990), 67–95.
- 7 Einhardus, 25.
- 8 Notker, 1.31.
- 9 Notker, 1.34.
- 10 Notker, 2.17.
- 11 Notker, 1.11.
- 12 Notker, 2.6.
- 13 Notker, 1.12.
- 14 Einhardus, 24.
- 15 Fichtenau, capi. 1nn92–99.
- 16 Einhardus, 22.
- 17 *Alcuini*, 262.
- 18 *Die Gedichte des Paulus Diaconus*, K. Neff ed. (München, 1908), nos.21–22. G. Gandino, “La dialettica tra il passato e il presente nelle opere di Paolo Diacono,” in *Paolo Diacono e il Friuli altomedievale (e V7-X)* (Spoleto, 2001), 74–77.
- 19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488.
- 20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485–86.
- 21 Notker, 1.7.

- 22 Fichtenau, capi. 1nn5–11.
- 23 Einhardus, 25.
- 24 Einhardus, 20; 比较 *ARF*, 91.
- 25 Notker, 1.19.
- 26 Notker, 1.26.
- 27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484. 我受惠于Fichtenau (capi. 1nn22–23) 对此的分析及其随后的文本。
- 28 *Alcuini*, 143–45.
- 29 Notker, 1.9.
- 30 Notker, 2.5.
- 31 *CRF*, 14.
- 32 Einhardus, 4.
- 33 Einhardus, 18; 另见第2章，关于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自古以来的敌意。
- 34 J. L. Nelson, “Gender and Genre in Women Historian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L’Historiographie médiévale en Europe*, J.-P. Genet ed. (Paris,1991), 156–60.
- 35 Einhardus, 20.
- 36 *CC*, 45.
- 37 *ARF*, 31; *Cronaca di Novalesa*, G. C. Alessio ed. (Torino, 1982), 168–73.
- 38 Einhardus, 20.
- 39 *Die Gedichte des Paulus Diaconus*, no. 26.
- 40 *ARF*, 91; 比较 Einhardus, 20.
- 41 Einhardus, 18.
- 42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28.
- 43 *Alcuini*, 197–98.
- 44 Einhardus, 18.
- 45 Einhardus, 19.

⁴⁶ Astronomus, *Vita Hludowici imperatori*, E. Tremp ed. (Hannover, 1995; vol. 64 in *MGH, Scriptores*), 23.

① 圣德尼，古罗马时巴黎主教，法国和巴黎的守护圣徒。

第7章

帝国的管理：制度

国王和他的臣僚

国王和司祭

“法兰克王国的基本制度就是王权本身。”¹ 比利时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路易斯·冈绍夫（François-Louis Ganshof）以这么一段话完美地描述了查理时代的情况。国王在自己的王国内行使君主的权力。王国内所有居民，无论阶层和民族，都完全臣服于他的权威。最起码从法律层面来说，法兰克人与罗马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相比，并没有享有更多特权，至少法律方面是如此（在政治领域他们享有特权）。贵族和高级教士与其他自由民一样，自愿服从他们的国王，国王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伦巴第的国王也和法兰克一样。查理可能复述过其长辈远亲罗塔利斯（Rotharis）的话：“如果国王身边的哪个人要决定另外某个人的生死，或者执行他的命令处死某人，那么他没有犯任何罪；因为我们相信国王的心在上主的手中（《箴言》21：1），为一个被国王下令处死的人辩护是不可能的。”²

然而这个绝对的权力并不是暴政，这是一种以以色列国王的先例为模范的有益王权。查理，即新的大卫王，是其继承者。按照习惯，基督徒们会将他们身处的世界理解为在他们之前存在的圣经世界的一个新版本。在他们眼中，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已经在《圣经》中有预示，神选之民的国王也与上帝之间有稳定的关系，上帝赐予他们的王权以一种司祭的特质。794年，聚集在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主教们表达了希望国王“能够救助被压迫者，抚慰鳏寡，为不幸者带来慰藉。既是主人也是父亲，既是国王也是司祭，是全体基督徒的睿智君主”³。当然，国王兼司祭（rex et sacerdos）的概念严格来说只是一种修辞的说法：查理从未想过走上神坛讲解弥撒，因此不是司祭。但他被上帝授膏，被主教们以圣油祝圣（consacrato），他就和其他世俗君主不同了。

800年的加冕，为他的王权增加了皇权成分，但在此之前法兰克诸王就知道自己必须顺应基督徒们的要求。主教们提醒他们，要以父亲般的仁爱来统治臣民，而不是用残暴的权力。尽管政治上的私欲会驱使他们使用无情的诡计和残酷的谋算，但总体而言，查理大帝竭尽所能遵循传统，可以从他对待失败敌人的方式中看出这一点。一个生活在像20世纪这样残酷时代的人，会惊讶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查理乐于将自己的死敌削发，送去修道院，让他们忏悔余生，例如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和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那样。他没有像同时期处境类似的拜占庭人那样，出于象征意义和安全考虑，滥用残损肢体的刑罚。

作为与上帝直接对话者，法兰克国王扮演了天堂与尘世之间的中介角色。通过每年不断重复的一系列活动，他履行这一角色；这些活动固定不变，十分有规律。在春季召集所有自由民来到国王身边，批准他的决议，聆听他的告诫。夏季发动的军事战役证明了他领导法兰克人劫掠并取得胜利的能力。感谢上帝的垂青，一直伴随着他。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宗教节日，标示出漫长的冬季休整期。在两年之间的过渡期，会举行仪式庆祝上帝与国王之间的和谐。换言之，法兰克人的时间是循环的。这种时间的节奏构成了国王身边的集体事务，这些事务是一些象征

性的标志，超越实际的需要。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意外，在790年夏季，当查理十分意外地发现自己没有敌人可战的时候，“为了不造成慵懈怠惰、空耗时光的印象，他沿着美因河航行到萨勒河畔修建的塞尔兹（Seltz）的行宫，再从此顺流而下来到沃尔姆斯”⁴。直到年迈迟钝之时，国王也一直未曾停歇，因为整个法兰克民族要靠他才能生存下来。

和更晚些时候的绝对君主不同，法兰克国王的举动不仅要上帝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民众负责。最初，这就是春季集会的意义所在。王权的法统来自两条途径：神的意志和法兰克人的认同，二者不无含糊地共存。查理本人似乎试图寻找一种修正方式，尽管模糊且无头绪。首先国王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使他越来越不能接受自己要接受世俗的评判。因此春季集会的功能在逐渐消减，在查理的时代，集会的任务仅仅只是欢呼。集会倾向于变成一种宗教活动，借此年度集聚的机会可以召集主教会议。其次，国王对全体基督徒承担的责任，意味着仅仅靠法兰克人的意愿，已经不足以使他的举措合法化了。因此他需要找到另一条与自己的全体臣民建立联系的方法，不论其民族。于是他开始广泛使用集体的效忠誓言。

集会与舆论共识

三月场或称年度集会，从无法考证的时代开始起，就是法兰克民众与国王之间寻求表达、获得一致的场合。君主在漫长冬季中所考虑的法令，将在此公布。经过集体赞同后，将会生效。回溯到596年，希尔德伯特（Childebert）国王觉得需要一个书面备忘录，记录集会的决定，又命令抄写之前三年的重要决议。⁵ 这证明即使在这么久远的时代，这个被史学家认为主要是军事功能的集会，也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讨论的论坛。实际上，这已经成了其主要的功能。

在查理的时代，集会的性质已经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改变。在他父亲

丕平统治时期，3月的第一天召集集会就已经是一种传统了，但现在已经推迟到了较晚的日期。法兰克军队的成分中，骑兵的比例日渐扩大，并且更大范围的行动需要大量的牛拉辎重队伍作为后勤补给支持。因此在战役开始之前，草料必须已经堆高备足。更进一步，越来越多的主教出席原先由战士们独占的集会，这意味着在接近圣周（复活节前一周）的时候召集集会有诸多不便。

一个更重要的转变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兰克人都参加集会。现在法兰克人这一名称不再确切地在种族上表示这些入侵者的后代，而是更广泛地表示所有生活在王国内自由民，全体法兰克人的出席变得无法想象。现在这一集会召集教俗两界的权贵——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这意味着有数百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随从。一些编年史家继续将这个集会称作“法兰克人的会议”或者“全体法兰克人集会”⁶，以强调这个集会代表着全民族同意国王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是经过王国内最有权势的人思考后做出的。

查理另一项革新是把集会的频次增加了一倍。除去现在被官方称为“五月场”的春季集会（尽管经常在6月或7月举办），在秋季举办另一场集会也是很常见的。在此，国王并不召集所有的战士，或者所有的教俗权贵，而是召集所有他希望给予确切指示的人，例如委命王室使节和巡按钦差（*missi dominici*）执行新法规，或召集主教来讨论神学和仪式问题。晚些时候，集会已经难以和宗教会议相区别了，人们也习惯于国王召集和主持高级教士的会议。

另一个问题，就是集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或者影响国王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在像查理这样精力充沛的君主统治下，集会保有多大的自主权是个疑问。当然，编年史家经常写道，国王在“法兰克人的建议”⁷之下做出决定，而法令集的前言有时会含有“所有人同意”⁸的字眼。即使我们不想将其仅仅当作宣传考虑，这样的字眼也意味着接受了王室的意志，并承诺遵守。这显然不是某种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收回、使君主的决定无效的附带条件的许可。

甚至这种公众的同意，也只有象征性意义。当国王必须做出诸如宣战这样的实践决议时就是多余的。他是国王，这就是他存在的意义。他所不能做的，就是在没有通过集会或者更广泛基础之同意的情况下，推出新的法律。803年，他向全民提出一系列国家法令的附加条款，这些法令代表着迈向帝国司法统一的第一步。查理大帝认为集会的批准还不够。至少在纸面上，这仍旧是法兰克人的集会，他必须将变革之举合法化，使之能影响巴伐利亚人和伦巴第人的法律。因此他组织了一次帝国全体居民参与的普世商议会，并且告诉自己的使节，“要询问人们关于最近添加的法条的问题，在他们都同意后，要在上述的条款上签名或打叉”⁹。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有人可能会拒绝。但事实上，当修正传统律法时，尽管在组织问题上有困难，皇帝还是计划让全体臣民签名同意修改。这表明他的权力主要还是基于协商所达成的一致。

在806年的《分国诏书》中，查理大帝扮演了全民意志代表的角色。¹⁰ 在深思熟虑、做出这一极其重要的举动之时，皇帝已年届六旬。他将自己的遗产划分给三个合法子嗣，他们彼时都还在世。查理小心谨慎地分配给他们，并且规定了他们其中一人逝世后的继承事宜。去世子嗣的那一份国土将分给另外两人，他确立了这次分国的确切条款。但是，他立刻补充道：“如果这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人拥有子嗣，且民众有意愿拥护他作为其父王国的继承人，朕期望他的叔父应该同意并允许该子嗣统治先前属于其父的国土。”当然，在这里是由权贵们来传达民众的意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如此重要的规定时，查理的意愿是令其服从于民众（*populus*）的许可。

效忠誓言

将合意的范围从仅仅有法兰克民族，扩大到整个多民族帝国，其中

一部分是依靠频繁使用效忠誓言的方式实现的。首先，只要出生在臣服于国王的国土之上，效忠国王就是一项义务。与过去德意志史学家所支持的理论不同，王室的权力根本不是一种人身权力，而是一种领地权力，和现代国家一样。然而，根据当时的观念，在自愿缔结的前提下，个人对国王的承诺优先于对国王的忠顺。这一承诺就是宣誓。在一个确信誓言为神圣甚至具有魔力的社会中，宣誓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一个誓言能将一群意图组织密谋的人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密谋者都确信，自己所做的举动较之对国王的忠诚，拥有更大的道德重要性。这解释了查理为什么不信任一切形式的基于私人关系的集体宣誓，以至于他禁止自己的臣民在建立以互助为目的的宗教社团组织时做出宣誓。¹¹

他的疑心在786年的春季被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查理发现了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贵族们策划的一次阴谋，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哈德拉德的伯爵，他们试图突袭拘捕国王，甚至想处死他。在实施阴谋之前他们就被逮捕了，并被分散关押在修道院中。一些人甚至被送往罗马。密谋者被强迫在圣物面前对查理及其继承人宣誓效忠，随后被判处流放，财产充公。其中的一些人被弄瞎眼睛。并不清楚他们的领导者是否被处死：艾因哈德写道，只有三位密谋者死于拒捕。¹²即使我们认为他粉饰了现实，但他认为自己必须这么做这一行为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彰显仁慈依旧是一位基督徒国王的义务。

忠诚的问题在788年春天变得极其重要，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在英格尔海姆召集人马，意图反叛。这一戏剧性的冲突结果，酝酿了数十年，一方是原先独立的王公，另一方是希望强迫他承认自己臣属地位的法兰克国王。这是一个晦暗不清的事件，现在很难理解谁要为之负责，或者对抗的双方谁背信弃义。可以确定的是，塔西洛被指控违背了向查理效忠的义务，并试图劝说自己的臣民做出同样的举动：“他命令自己在向查理宣誓效忠时有所保留，并且在宣誓时说谎。”¹³公爵被判处死刑，随后国王宽恕了他，将其关在修道院中度过余生。问题在于集会

日复一日地聆听无休止的证言和指控，同一个问题被一次次提及：忠诚和确保忠诚的方式。

这些经历毫无疑问促使查理强迫王国内所有自由民宣誓效忠。这并非完全是一件新鲜事，古代的法兰克国王也使用相似的集体宣誓，只是有时他们又停止使用。有其他的方式召集臣民，让他们公开表示忠诚。在危机时刻，统治者会命令全王国为国王公开祈祷，并特别要求每个人必须热忱参与。在哈德拉德的密谋与塔西洛的叛变之后，国王觉得祈祷还不够。789年，王室特使被派往王国的各个省份，他们的任务是召集所有自由民，让他们背诵以下准则。尽管按照当时的拉丁语规范来看，誓言有些语法问题，但其影响力不容置疑，尤其是在教堂里一手按圣经或圣物起誓：“我〔起誓者〕，发誓在与我的君主查理国王和其子嗣的关系中，我是忠实的，并且终生不怀叛逆和邪恶的企图。”¹⁴

履行这一誓言的情况一定是非常参差不齐的，显然在王国内推行这一工作本身就非常困难，王国内居住着数千万居民，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出生或死亡登记。实际上这也没能阻止另一场密谋发生。几年之后密谋在792年被发现，领导者是查理的合法子嗣驼背丕平。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父亲试图剥夺他的继承权，转而青睐自己的兄弟时，他决定孤注一掷。当密谋者被发现并且遭逮捕时，他们否认自己背叛了誓言，因为他们没有作出那个众所周知的声明。查理对此非常关注，他将丕平拘禁在修道院中，将他的大部分追随者绞死或斩首后，立即下令采取进一步措施进行集体宣誓，这一次所有人确实要被迫宣誓了。

要求巡按钦差组织宣誓效忠，这一指令是加洛林政权推行的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它也证明了国王对此举赋予了多么重大的意义。使者首先要解释最近发现的密谋，使得宣誓急切而必要；他们也向民众保证，这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只是一种自古以来的惯例。这为之前失败的效忠宣誓做出一些说明：“使者在解释时，必须提及古代的习俗，为宣誓的必要性找出理由。那些不忠之人想要在我们君主查理的王国内造成混乱，

密谋威胁他的生命，当被审问的时候，他们说自己没有发过任何誓言。
” 15

每一位使者都负责一大片区域，必须亲自安排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王室封臣、助祭长、教士团（*canonici*）和其他高阶神职人员的宣誓。每位伯爵都要在王室使者的监督下，组织领地内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宣誓，首先是公职人员和神父，随后是其他自由民，但并没有就此停止：被释放的奴隶、为王室和教会领地工作的奴隶也在此列，甚至包括那些被委以重任或者成为其主人武装侍从的私人奴隶。很难想象王室的权威还能作出更细致的要求，这超出了过往的任何一次，只有那些为私有地产主的大庄园做苦工的最卑下的乡村奴隶逃过了国王的法眼。其他所有生活在这个庞大帝国中的人，即使在法律上并不自由，也必须服从他的权威。

这一通用誓言在802年皇帝加冕后再次重复。查理认为对国王的效忠誓言必须得到保证和扩大，因为他现在的责任增加了；并且自从793年以来，许多年满12岁的年轻人还没有宣誓。这一次，使者们受命推行如下誓言：

我在此宣誓，从即日起忠于我的君主查理、最虔诚的皇帝、国王丕平和王后贝特拉达之子。在我与他的关系中，我心地纯良，举止不怀欺诈和恶意。为了王国的荣誉，我按照律法的要求，尽一个人应该为君主所尽的一切。愿我得上帝之助，以及此地圣物之助。 16

这一命令补充道，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宣誓此举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并且意识到不服从相当于伪誓，甚至逃税也是。最起码在纸面上，这是王权观念在罗马-日耳曼欧洲所达到的最高点：服从君主不再仅仅是归属于他的民族或者居住在他的王国内这样的问题；而是强化为个人

信仰承诺的问题，是个人来世灵魂的声明。尽管实际上没有人想依照对伪誓者适用的刑罚，去砍掉不忠实纳税人的双手，但从象征意义上说，皇帝凌驾于臣民之上的权威已经无以复加。

在查理大帝的暮年，集体誓言被永久确立在帝国的基本制度之中。806年3月，皇帝命令所有还未宣誓的人，主要是那些当时刚成年的年轻人，必须宣誓。几天前，他确立了在自己的子嗣中划分帝国的规则，即我们所知的《分国诏书》，所以他命令所有人也必须公开声明同意这一文件。¹⁷最后一次重申誓言发生在811年，皇帝去世前三年。当时使者们接到命令：“让我们的人民依照早先所确立的习俗，再一次宣誓忠诚，他们要向民众解释，并阐明向朕宣誓效忠的仪式，这一仪式必须被遵守。”¹⁸

查理得知全体臣民宣誓效忠的消息后感到安心，但他同样感到不安的是，民众中广泛传播的是以国王及其子嗣的生命起誓。毫无疑问，那些使用这种方式的人只是觉得这样起誓，比以自己和自己子嗣的生命起誓更庄重。但现在他怎么能确定这些人中不会偶有一些背誓者？尤其在司法场合，人们被要求起誓时，这种誓言使他们可以轻易摆脱罪责。更进一步，他如何克服对这种誓言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惧？如果誓言是假的，会带来一些可怕的不幸，降临到皇帝和年轻的国王们头上吗？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查理大帝在803年命令他的使者，要确保届时起再没有人以这种方式起誓。¹⁹

中央政府

居所还是首都？

与拜占庭和伦巴第王国不同，法兰克王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首都。国王不断迁移，在当年计划发动军事行动的战区召集春季集会，并在整个夏季带领军队作战。在秋季大规模狩猎旅行之后，查理会在国土内的一处居所过冬，一般会从圣诞节一直待到复活节，有时会出于政治或者礼拜的目的，走访一些城市和其他地区。分析他的行程，会发现他的父亲喜爱纽斯特里亚的行宫，诸如韦比耶（Verberie）、阿蒂尼、奎亚兹（Quierzy）和贡比涅（Compiègne）。查理更偏爱居住在奥斯特拉西亚，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尤其是赫斯塔尔，这里是他先祖的祖产；随后是蒂永维尔、沃尔姆斯，这里的行宫在790年被焚毁后就放弃了；还有英格尔海姆、奈梅亨（Nijmegen）。从794年起，国王开始表现出居住在亚琛的偏好，几年之前，他就在这里着手建立最壮丽的宫殿。

这个新的中心距离赫斯塔尔只有一天的旅程，选择这里不是因为政治地理的考虑。其吸引力仅仅在于这里的温泉，这对于需要治疗关节炎的老年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些历史学家目眩于查理在此仿照罗马、拉韦纳和君士坦丁堡风格所建的建筑，得出结论，皇帝最终决定为自己的帝国确定一个首都。实际上，亚琛只是一处他喜爱的居所，并非固定的行政中心。这也解释了查理为什么一直没有将此地作为主教的教座之地，如果他真的想将此地打造成新罗马的话，这只是举手之劳。他长期居住在亚琛，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年岁日高。尽管出于政治尤其是军事的原因他不得不一次次迁移，但他越来越不愿意这么做。807年以后，不论冬夏他都不愿意再离开亚琛（除了在附近的阿登森林例行狩猎出游）。

810年丹麦边境发生的事件和811年挪威人入侵西部海岸，他都没有亲临现场监督，要考虑到他已经年近七旬了。

行 宫

没有首都，国王主要的有效管理机构就是行宫（palatium）。这个称呼并不意指一处居所，而是指一整套协助君主的人员系统，他们在迁徙中一直陪伴着国王，并在骑士文学中留下了不朽的名称——圣骑士（paladini）。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宫相的职位自从丕平的时代起就被撤销了。现在最重要职务可能就是帕拉丁伯爵，他们的职责是审查送达宫廷的那些浩如烟海的司法诉状。²⁰ 然后还有王室总管，他的职责是管理财政，或者按照更符合那个时代的说法，是王室财库的管家。而总管，起源于负责王室餐饮的首席膳务员，后来发展为监管王室财产，保证宫廷的供给。还有一位仆役长（bottigliere）负责酒窖，也负责王室地产中葡萄园的酒类生产。马房官（comes stabuli）或称治安官照看王室马厩，因此也为军队供应马匹。

我们不要高估了这些臣僚的专业性，他们每个人都肯定会有大量的助手，他们会将日常管理委派给助手，而他们自己去尽政治上的责任。他们要尽力获得国王的信任，并且每日与他会面。他们会被授命执行和自己职位无关的任务，比如外交使节，或者更常见的是领导军事行动。他们中的一些领袖人物，我们料想他们会在宫廷里指导各个部门，而他们却在担任军事指挥官时战死。总管艾吉哈德和帕拉丁伯爵安瑟姆在778年死于龙塞斯瓦列斯，王室总管阿达尔吉斯勒和治安官盖洛782年死于辛特尔战役。²¹

礼拜堂和文书部

负责礼拜堂的礼拜神父（cappellanus）和教士是宫廷人员的一部分。“礼拜堂”这个词语在现代有非常广泛的意指，但在当时只有法兰克人使用，特指宫廷中礼拜祈祷的地方。这里有一件特别珍贵的圣物：高卢的守护圣徒圣马丁的斗篷，圣徒为了给一位穷人蔽体，用自己的剑将斗篷分为两半。每天礼拜神父们都为来此的国王准备弥撒。当他们进入宫廷效力的时候，会将自己交到国王手中，他们会立下和封臣一样的效忠誓言。不难理解，当查理想任命一位主教时，他会经常在这些人中选择；他们与他私下里很熟，并且献身为其效力。礼拜堂因此也成为大部分帝国高阶教士的训练场。

礼拜神父的领袖被称为大教长。圣德尼修道院的院长福尔拉都斯（Fulradus），在784年之前一直担任这一极其重要的圣职。随后是梅斯的主教安吉拉姆努斯（Angilramnus），791年他死于对阿瓦尔人的作战中。最后是科隆主教希尔德巴尔德（Hildebald），他是查理大帝遗嘱的第一位签名人。大教长负责礼拜，同时也在王国内拥有最高的宗教权威；国王会在教阶和教会纪律问题上询问他的意见。查理特别授予安吉拉姆努斯和希尔德巴尔德二人大主教头衔（但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教座依旧还是主教教座，他们是“神圣王宫的”大主教），并免除了他们常驻教座的义务，以便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当一位礼拜神父被提拔为主教，大教长将处理这个程序，这意味着高阶教士职业生涯的成败都系于他之手。

对礼拜神父手握重权，也不乏批评之声。查理的堂兄弟、科尔比修道院的院长瓦拉（Wala）就谴责道：“为宫廷效力的教士俗称为礼拜神父（因为他们根本不属于神职品级 [ordine]）。他们在这儿只为升官发财。他们不像其他教士那样服从主教，也不像修士那样服从修道院院长，所以他们无法无天，不对任何人负责。”²²显然，效力于宫廷礼拜堂的这些人享有的特权激怒了许多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闲言碎语在查理死后才逐渐公开。瓦拉院长一直等到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才作出这些指控，他比自己的父亲更愿意恭听这些针对高阶教士的批评。

一些效力于王室礼拜堂的礼拜神父被授命起草法令，可能还包括通信和教会法令集。这个团体受制于一位神职官员，他被称为首席书记官（*protonotario*）或文书大臣（*chancellarius*），尽管他的职位在大教长之下，但他掌管的文件记录在政治上相当重要。我们也不要夸大这个文书部的重要性，它还没有像中世纪晚期的公国里那样，成为真正主导政府的力量。查理统治时期只留下了数量非常有限的法令——平均每年3~4部。当然起草的法令只有很少一部分流传到我们现在，但是这和虔诚者路易发布的法令有惊人的差别，后者达到了年均25部，并且这一数值在随后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缓慢上升。²³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得出结论，查理的文书部相较于其继任者而言，输出文件非常节制。甚至在他自己的统治时期，文书活动就已经减少了，从早年的每年6~7部法令，到最后几年下降到一两部。一切都在表明，皇帝并不是通过文书部来进行管理。

王室编年史家在813年提到，文书部获得了一份附加的档案；编年史家还提到，在皇帝的命令之下，美因茨、兰斯、图尔、沙隆（Chalon s）和阿尔勒都召集了议事会：“那些想看法令的人，可在上述五座城市看到，在宫廷档案中也有一份复件。”²⁴ 一般认为这份档案并不很重要。例如，在查理大帝逝世十三年后，圣万德里勒（St-Wandrille）修道院的院长安瑟吉苏斯（Ansegisus）受虔诚者路易指派，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法令集，但只收集到26部，而现在我们所知的有大约100部。²⁵ 这意味着王室档案中只粗略保存了查理颁布法令的四分之一。然而，可能是修道院院长只选择了有效的材料，并且档案比我们通常所想的更为重要。这更符合帝国政府广泛使用书面记录的情况，我们随后会审视这个问题。

地方管理

将帝国细分为郡

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皇帝所能直接支配的管理者队伍十分有限。现在的问题是查理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土。在那个时代，交流通信只能依靠已经严重损坏的古罗马道路，以及沿大河而行的缓慢驳船，缓慢而又不可靠。解决的方法就是建立遍及帝国的高度同质化的立法和行政体系，用武力的方式将法兰克王国的地方管理模式扩展到新增的领地上。正是由于这种同一的力量驱使，加洛林帝国在所有被查理征服的土地上都留下了十分深刻而又能轻易识别的印记，尽管时间相当短暂。

在扩张的顶点时期，帝国被分为数百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在国王的代表管理之下，这代表称为伯爵。这一体系并不新奇，因为法兰克国王早已经开始利用顶着这一头衔的地方代表所组成的网络。伯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在高卢统治的后期。因此可以确信，查理大帝并不像教科书上时常说的那样，将帝国分割成诸多郡，他所维系的是一个已经在法兰克王国地方管理中成功确立的代理人体系。与此同时，查理通过将新征服的土地划分为郡，并加强这些领地在王国内的团结，从而强化了这一体系，这毫无疑问是明智的。从774年开始，尤其是776年伦巴第人叛乱之后，法兰克伯爵被引入意大利。778—781年，基于伯爵的行政体系被引入阿奎丹，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地位从行省转变成了查理儿子路易的王国。780年郡制扩展到了图林根，782年进入萨克森，当时国王错误地认为这里已经平定。在788年塔西洛被废黜以后，轮到了巴伐利亚

。

在行政术语上，这些委托给伯爵的行政区被称为“pagus”（在法语中变为pays，意大利语中变为paese），意为村庄、领地，大致相当于一座罗马城市的领地范围，或者未罗马化地区一个日耳曼部落定居的区域；当然几块行政区处于一位伯爵权力之下的情形也大量存在。在查理的时代，另一个术语“comitatus”开始流行，现在我们将之翻译为“郡”。在高卢，尤其是意大利，郡相当于主教教区，但在较晚基督教化的地区，主教教区要大很多，包括几个郡。因此每位伯爵都有义务和一位主教共事，有时他们的比例是1：1，另一些情况下几位伯爵对应一位主教。查理给官员的指令，从来没有试图强调与教会固定不变的合作关系，也没有强调要顺从教会的权威。

一些历史学家提出，郡制并没有覆盖一整块领地。换言之，每位伯爵都被认为是一个权力中心的代表，整合大小不同的各个区域，这几块区域可能并不毗邻。传言他们对土地和人口属于王室的地区拥有权力。但事实似乎并不一样。帝国被完全划分为明确的诸行政区域，每块区域都归入一位伯爵名下。唯一在其权力之外的是教会的产业，伯爵不能在此逮捕违法者、征税、执行判决，因为国王在此作出了妥协，这被称为豁免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权力在此无效，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会将这些义务托付给自己信任之人，而这些人的任命要通过国王的审查。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在法理上要 and 伯爵合作。

伯爵的权力

一位伯爵统治的辖区和英国的一个郡差不多，控制起来要相对轻松一些。在郡内，伯爵的一切努力和目的都是为了代表国王：他征税，维持公共秩序，管理司法，发布并执行王室法律，在必要时召集有武装能力的人，带领他们前往军队集结地。伯爵绝不是此地的主人，他只是皇帝的代表，若皇帝愿意，随时都可以将其解职。换言之，他是一个公职

人员，不过他的工作不需要资质也不需要专业的技能。然而，他需要有统率的能力、相当的手段、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只要他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或者有公开的不忠之举，伯爵将终生保有这一职位。

实际上，在许多实例中，伯爵的职位在同一个家族中从父亲传给儿子、叔伯传给子侄，经历了几代人。奥伯莱茵高（Oberrheingau）或上莱茵伯爵的职位属于一位名叫鲁佩特（Rupert）的人，其764年去世；随后是他的儿子坎克（Cancor），死于771年；随后传给其子艾默里克（Eimeric），其785年去世。后来到795年，这个郡再次被他们的亲戚，另一位叫鲁佩特的堂兄弟掌握。他807年去世后，由他同样也叫鲁佩特的儿子继承。这种情形给史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在一些地区，一个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家族的支持，对国王是十分重要的。国王通过控制伯爵的职位，建立并巩固自己的世袭权威。事实上，像上文提及的这样一个家族垄断的情况，只有少数被记录下来了。大多数情况下，伯爵毫无疑问是非常富有的人，他们拥有大规模的家族地产，并且在自己的亲族关系网中处于高层，但这个职位本身并不是排外的，也没有贵族的世袭特权。²⁶

查理规定，允许伯爵拥有个人收入以外的其他财源，并允许他保有所有罚金的三分之一。加洛林欧洲的经济基于土地及其收成，尤其是谷物和酒类，并不很依赖金钱。为了保证其代表人有充足的财源，国王必须将辖区内王室领地的一部分分配给他们，由其控制。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土地分配几乎一无所知。这一问题并不涉及任何法律文书的起草，实际上也没有改变所有权，只是临时改变了土地使用的受益者。在法律术语上，分配的这一块王室领地是伯爵职位的一部分，或者用当时的解释来说，是一种荣誉。在当时已经有一种明确的倾向，就是将这些配额纳入其他的终身薪俸，以补偿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这种情况广泛推广，已经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当时的惯例是将政府的职位与恩地/采邑（beneficium）归为一类。将来，这种关联会给帝国的管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查理的时代还没人预见到这一点。

边境指挥官与各级官员

所有的学校课本都告诉我们，和郡一样，帝国也划分为（边区）马克，并委任侯爵管理。实际上，情况略有不同。帝国各地的基本国土单位都是郡，马克只是对法兰克王国边境地区的一个通用说法，这里是基督教世界对抗异教世界之地。这些边境地区充满危险，而伯爵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动，很难协调一致抵御军事入侵。军事指挥部沿着边境建立起来，一些博学的作家敏锐地给这些地区冠以古罗马的名称“边区”（limes）。因此就有了面对潘诺尼亚的阿瓦尔边区（limes Avaricus），后来成为东部边区（Ostmark，即奥地利）的核心地带；比利牛斯山外的西班牙边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穆斯林掠夺；布列塔尼边区（limes Britannicus）位于与布列塔尼蛮族的边界上；等等。

这些地区比郡要大很多，但并没有取代郡，但是在协调军事行动时，包括了一定数量的郡。例如，西班牙边区包括10个郡。他们的军事指挥官还不叫侯爵，这一名称在虔诚者路易时期才开始使用。他们还叫伯爵或者冠以长官（praefectus）的头衔。因此战死于龙塞斯瓦列斯的罗兰伯爵，艾因哈德称他为“布列塔尼边区长官”。²⁷查理的内兄格罗尔德伯爵，在塔西洛被废黜以后被称为巴伐利亚长官，他被派遣统治巴伐利亚，直到799年死于对阿瓦尔人的作战中。²⁸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边境地区的行政和军事责任归于公爵这一古代的头衔。回溯到748年，矮子丕平的异母兄弟格里弗（Grifo）被封为公爵，并就职于勒芒（Le Mans）以监视布列塔尼边区，他管辖之地多达12个郡。790年，同样的职衔暂时被授予查理的嫡长子，他的名字也叫查理。²⁹

诺特克在赞美皇帝时也提到了这些军事指挥官，他说皇帝不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君主那样，“他没有给一个伯爵分配一个以上的郡，除非他们在边境上或者与蛮族接壤”³⁰。似乎这一赞美并不完全名副其实，

因为查理大帝确实让一位伯爵控制过一个以上的郡，最起码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是这样。808年，召集军队的指令要求每位伯爵带领自己的封臣赶往集合地，除了两位留在后方保护自己的妻子，“还有另两位将被授命留在家中，履行自己的职责，运作朕的行政机构”。查理随后又附加道：“和那两位留下来保护妻子的伯爵一样，这两位伯爵可以在家中留下足够多的人手以维持自己的职责。”这明确地表示，一位伯爵可以同时负责几个郡。³¹

王室封臣

当法令提及王室封臣时，会称其为“*vassi dominici*”，这似乎意味着，这些人的一切责任和目的都是国王在各省份的代表，他们直属于伯爵，比代理神父（*vicari*）、百户长（*centenari*）这些地方代表拥有更高的地位。总而言之，他们是那些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子嗣通过“推荐”为国王效力，宣誓忠于他。他们在战争中提供武器、马匹以履行效忠义务，毫无疑问还要提供一队自付开支的武装随从。只要他们在宫廷中，就受国王的支配，执行各种任务。这种组织与家仆有联系，基于一种从未被完全遗忘的原始附庸感。在晚年查理受到一位主教的指责，他指责查理过于频繁地在“宫廷里那些最贫穷的封臣”里挑选使节，这些人在他看来很容易堕落。³² 在查理死后，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Walafrid Strabo*）在王室封臣和王室礼拜神父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前者是世俗的，后者属于教士，但二者都被平等地推荐给国王，献身宫廷侍奉于他。³³

国王的大部分封臣凭借功劳或者有影响力的关系从王室财产中领取一定的配额，是当时的惯例。以这种方式，封臣被安置在各个省份，他们通过与伯爵合作，运作司法系统，召集武装人员，从而构成了一条能够完好维持地方管理的传动带。当一个新的省份加入进来时，会任命伯爵，王室封臣也会派遣到领地上。在阿奎丹最终臣服，年幼的路易被立

为国王之后，一位编年史家写道，查理不仅为这个省份送去自己信任的伯爵和主教，还有“其他许多属于法兰克民族、被称为封臣的人”。³⁴ 系统性地引入法兰克人的封臣，让他们居住在阿奎丹的罗马人之中，以及其他被征服的地域之中，是维系帝国团结的决定性要素。

王室使节

正如查理大帝的继任者们后来发现的那样，这个体系的真正弱点，是缺乏对伯爵行为的控制。确实，他们必须出席每年的总体集会，这给了皇帝为数不多的机会，去聆听他们的建议，要求他们汇报自己的行政工作。但是唯一能限制他们滥用权力的途径就是查证他们在远方的省份是否称职。只要是某郡有一座有一定重要性的城市，皇帝就会十分倚重当地主教。813年，在无数次重复伯爵和主教要互相友善相处之后，查理申明，针对那些难以解决的冲突，尤其是牵涉宫廷的问题，伯爵必须服从主教。与此同时，主教们必须证实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伯爵没有收取贿赂或者做伪证。³⁵

在这个制度中，那些专门负责报告伯爵表现的人被称为巡按钦差。钦差就是王室使节，被授予全权，走访那些受调查的地区。有些情况下，他被派遣执行特殊任务，例如，在一场重要的讼案中通过判决，或者带去王室决策的消息。另一些情况下他监控当地的权贵，尤其是那些曾被指控滥用职权的人。晚些时候，查理建立了一项简单而极其有效的规程：使节停驻在那些没能正确执行司法的伯爵家中，由伯爵承担开销，直到所有的错误都得到纠正。在某种程度上，用古老的术语来说，使节是国王肉体人格的延伸。实际上，武装反抗使节等同于危害王权罪（lès e-majesté），刑罚是处死。在另一种意义上，系统地使用使节，代表了查理有相当强的中央集权倾向，有一种使统治规程合理化的努力。最能揭示这一点的是，使节必须对自己的行动保留书面记录，并且在回到宫

廷时出具一份任务报告。

在查理统治的漫长时间里，王室使节被授命处理突发事件时，经常是两人甚至三到四人一组。有时他们也会孤身一人，尤其是执行特殊任务时。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789年和随后793年组织全体臣民宣誓效忠时，王国全境被分成不同的执行区域，每个区域都任命了一些使节。这些使节在远离国王视野的遥远省份执行任务时，似乎并不总是能抵制住贿赂。798年，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和里昂的莱德拉德（Leidrad）两位主教被派往南高卢执行任务。他们报告当地的贵族为他们献上丰厚的礼物，并且在他们拒绝接受后表现得非常惊讶，而之前的使节没有感到这么不安。³⁶

特里尔的主教里克波都斯（Ricbodus），同样也是洛尔施修道院院长，并修撰了以此修道院为名的编年史，他表示他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些使节这么容易就堕落。国王过于偏好从宫廷中还没有分配俸禄的那些封臣中选择使节，这让他们在面对贿赂时更容易受影响。802年，皇帝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理应表示拒绝这种人执行任务（编年史家的评论是“由于贿赂”），他转而倾向于派遣教士和伯爵，“那些不需要从穷人那里获得礼物的人”。³⁷然而在这之前，使节也经常是主教、伯爵或地方长官，所以我们不应该太过相信这一改变。此外，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甚至位高权重之人也会被腐蚀，里克波都斯之言有失偏颇。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推测，802年查理采取措施，限制成为王室使节的资格条件，并且给那些他派去监控整个行省的高级官员增加了相关特权。而那些无数的王室使节被广泛用于更小的事务，比如说收税。

使这个体系更加合理化的更重要的举动是802年推行的另一次革新。此举设立了“遣使区”（legazione）或称“钦差区”（missaticum）的概念，即一个特定的区域任命两名使节或钦差。³⁸这样一个区域的边界由基本的地理标准来确定，而郡和主教区的边界都只是一个已经限定的范围。使节都是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给他们这一职位意味着他们已

经在这些区域行动了，或者靠近这些区域。例如，大主教鲁昂的马吉纳德（Maginard）和伯爵马德尔高德（Madelgaud）一起被指派到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包括八个郡，从塞纳河以西到布列塔尼（Breton）地区的边界。由于他的大主教区被塞纳河一分为二，皇帝认为只把河西岸的地区划为遣使区更符合实际。其他的使节，例如桑斯的大主教马格努斯（Magnus）和伯爵戈德弗里都斯（Godefridus），被授命的是一条巡回路线，而不是一连串的郡。他们从奥尔良出发，统领远达贝桑松的广大区域，最后回到卢瓦尔河的出发点。

实际上，802年查理授命给他最信任的大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的任务，是监督一块广大地域上整个行政和教会体系的运作，这片区域对他们来说是近便的，而他们已经在此履行日常工作。这被视为一次政策上的逆转，因为从此开始，使节不再是从宫廷里派出，或者外派前往他们自己尚未掌控的区域。实际上，在这个新的设定下，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已经在这个特定的区域有其自身的利益。但实际上，在过去查理就已经有一种偏好，即从那些官职、亲缘、经济利益都已经和自己将要去履职的地区有着很强关联的当地人物中选择使节。保证他们行为端正的并不是他们对当地情况的无知，这已经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而是基于皇帝对他们个人的信任，实际上也基于他们必须就自己的举动亲自接受皇帝的问询。

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这一体系的内部一致性，无论是使节的构成还是他们将要行动的区域都不应夸大。事实上，802年每个遣使区都分派了两名使节，其中一位是大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另一位是伯爵，但也有记录表明，随后几年里，在某一特定任务所划定的区域里，会派遣三到四人。例如，804年皇帝派遣一位神父和两位伯爵去伊斯特里亚调查当地管理者滥用职权的问题。³⁹两年后，一次任务由两名伯爵和一名修道院院长组成使团；这位修道院院长同时也是帝国文书部的负责人，当他告病不得不放弃出行的计划时，两位修道院院长接替了他的位置。

⁴⁰ 换言之，这个体系还没有像后来虔诚者路易时期那样，正式构建成

官僚体系。虔诚者路易要求每位大主教都在自己的大主教区履行使节职责。查理拥有选择使节的自由，这个选择落在了那些已经证明自己忠诚的人身上。因此，王室使节应该视为他的一项最具灵活性的管理手段。

查理大帝要求他的使节向那些将要接受调查的伯爵们发出的通知文书范式如下：

我们和我们君主的其他所有使节，受命将王国内截至四月中旬发生的事报告于他。包括他近些年命令要完成的那些事，以及那些被疏忽的事，以便充分奖赏那些恪尽职守之人，相应责备那些没能尽责之人。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告知你的吗？他要求我们所查证的，不外乎那些符合他命令的事，那些被疏忽的事，以及谁要为这些疏忽负责。因此，我们指示你重读你的法令集，并口头提醒你所有要求你做的事。尽一切努力去获得上帝的恩典，并且从我们的伟大君主那里得到奖赏。⁴¹

查理大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对这些人的信任只能到此为止，但他决心要保证自己的政令畅通。

书面记录的使用

正如上文所引用的这些证明所示，书面记录在帝国的管理中有着重要地位。尽管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但法兰克人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基于口头交流而凝聚起来的原始社会。其宗教是书面的宗教，这要求所有教士要有能力使用书面语言。尽管国家的法律诉讼程序绝大部分是通过口头执行的，其法律体系还是基于以书面形式留存的司法传统，书面证据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同样，政府管理实践鼓励广泛使用书面文档，不过政府还是必须再三敦促此举，这一现实就暗示着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

必定会有抵制或者怠政。

对书面文字的使用可以由各种层级的文件来证明。在年度集会之前，国家会起草一份议题的草案，并且会提前送给与会者。其中的一些议程留存了下来。⁴²所做出的决议会以传单的形式传递给那些执行的地方权力机关。王室使节从国王那里直接获得口头指令，也会获得冗长的书面指示。军事动员的书面命令会送给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命令中会详细指示他们将要召集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所要携带的装备。内外使节会带着征用信出发，征用信授权他们在执行文件所规定的任务时，获得交通、食宿、补给。

查理要求他的官员所写的书面报告也很重要。每位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都必须提供公证服务，这样的需求并不少见。这样的情况并不限于司法程序中，司法程序显然需要法庭审判的书面记录。使节必须递交一份他在履职期间所委任的助理法官（*échevins*）、律师和公证人的名单。还有那些不履行军事义务、没有财产缴纳罚款的人员名单，进入每个区域的移民名单，那些收入来自所分配的王室财产的人员名单，并附上他们的情况报告。甚至神父也要留存自己所征收的什一税的书面记录，以及税收的用途记录，还有每年献给国王的马匹记录，附带捐献者的名单。

那些管理王室地产的土地代理人也需要保存记录。《庄园敕令》（*Capitulaire de villis*）要求他们必须保存一切他们所消耗和花费之物的记录，并将自己的存量书面告知宫廷。每年他们都必须递交一份自己所有收成和收入逐条列举的完整报告。“圣诞节前将一切报告于朕，细分条目，以便朕知其何有，各有几何。”皇帝在结尾处如是说。⁴³显然，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管理者都有能力履行对他们的要求。认真调查后，史料揭示出查理的管理倚重于书面文档的程度，超过了我们基于其之前时代历史条件所作的预期。

教士在治理中的角色

制度上的含混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查理管理自己民众的方式，仿佛是一套现代国家机构，拥有中央政府，其领土上驻扎有地方官员。这样一种方式是合法的，因为当时也有一种明确的观念，就是公权力控制一块特定的领地，管理生活在那里的每一个人，既符合共同的利益也符合法律。不论对他们行为的管理控制是多么微弱，他们滥用权力、施行暴力是多么频繁，虽然恩地（采邑）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我们不要混淆或忘记，从“伯爵”一词的每个意义上看，伯爵都是公职官员。

然而这样描述帝国是如何管理，有失偏颇。查理控制自己的王国，统领自己的民众，并且通过教会维持公共秩序，这种方式完全符合实际，没有人感到不妥。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公共秩序的支柱，他们对皇帝负责，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皇帝任命的官员。而且在制度上固有的含混，是法兰克人所建立的欧洲的特点，其原因是教士广泛涉入了政府事务中，包括司法甚至是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以我们的观念理解有困难，这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受限于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那个时代教俗之间的区分逐渐清晰。

国王喜好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作为有经验的政治人才来使用，他们比自己的那些世俗臣僚更有文化。他们的组织已经根植于王国领土的全境，他们习惯于在等级制度下工作，因此他们能很好地受命传播并执行他的命令。我们可以以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考察查理时代所固定下来的常见惯例，尽管其实际发生在虔诚者路易统治的早年。817年，特

里尔的大主教赫蒂（Hetti）写信给自己的副手，图尔的主教弗洛塔利乌斯（Frotarius）：

我们从我们的君主皇帝那里得到一条可怕的命令，根据命令我们必须布告全境内的居民，我们代表他，让他们做好准备，参加在意大利的战争。因此我命令你以我们的君主皇帝之名，立即热忱地通知所有的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伯爵、王室封臣和教区的所有民众，所有这些对国王有军事义务的人，做好自身准备。⁴⁴

在这个例子中，大主教像一个负责广大区域的王室使节一样，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传递国王的命令，这个区域和他自己的大主教区差不多。因此同一个人也保有两个职位，一个是教会的，一个是政府的。并且作为都主教，赫蒂认为让他的副手主教在当地执行命令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在图尔地区，不仅是修道院院长和修女院院长，同样伯爵和王室封臣也从主教那里接受了国王的命令，以自己的行动回应他。要注意的是弗洛塔利乌斯和赫蒂不同，没有任何政府公职。他只是一个主教，但也应当涉入帝国的日常管理中，尽管这一职责十分繁重。

另一个更进一步的例子是在查理大帝的晚年。813年，修道院院长阿德拉德、另一位王室使节和一些意大利的教士收到了一位神父的请愿，他被卢卡（Lucca）的主教开除了教籍并逐出了教会。修道院院长命令卢卡的主教重新调查，在调查了情况后，伯爵认定主教的程序不合法。因此他命令再次审判，这一次按照教会法的要求，要有至少另一位主教和一定数量的神父在场。为了更加保险，他还命令自己的助理法官参与审判，助理法官是为每位伯爵工作的法律专家。我们在此拥有了一个关于教会法的实例，在这个例子中，大家讨论的是教会法的规范，并且这个案子是由一位伯爵在王室使节的要求下进行监督，而这位使节恰好

是一名教士。⁴⁵

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去设想这一体系中行政与教会各等级的重叠，他们都效力于皇帝。实际上，如果区分这两套等级，将伯爵和王室使节放在一边，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修女院院长放在另一边，肯定会导致尴尬。实际上，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同一个组织体的一员，位于组织体顶端的是君主，虽然他们各自从事的领域已经部分分化了（“各人对应授命与他的部分。”虔诚者路易如是说）。⁴⁶ 两大等级的成员是政府公职（*ministerium*）的维系者，这些职位是由国王委任的。这足以让他们无条件服从。

为国王效力往往意味着，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不得不处理与他们的教牧和修道使命完全无关的事务。丰特内尔（Fontenelle）修道院院长格洛尔德（Geroald）被任命为海峡港口监管，赴任国际大商埠昆托维克（Quentovic），任务是征收关税。⁴⁷ 因为大部分与英格兰的贸易都是通过昆托维克，每当查理想向奥法（Offa）国王遣使的时候，一贯会借助格洛尔德。似乎这位修道院院长就再没时间祈祷了；然而，过了一代人后，这种系统地使用教会人员，使其脱离宗教职责的做法，开始使一些人感到害怕。在查理的时代，对待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习惯是首先将其视作国王的人，其他的考量则在其次。

应该加一句这样的话：要求主教应尽的政治职责无论如何都比以前减少了。在墨洛温王朝，高卢的主教们在自己的城市中被广泛授予了财政、司法和军事权力。随着王权的衰退，他们开始偶尔独立行使这些权力，逐渐形成名副其实的主教国。然而在查理继承自其父丕平的王国内，主教的权力已经急剧缩减。主教国完全被清除，伯爵担负起所有的财政、司法、军事职责。主教只保留了一些不稳定的象征性特权，比如对教士和教会雇员的审判权、三分之一或一半的税收、贸易职责和一些伯爵继续付给当地主教的罚金。

其中一些特权，尤其是关于司法的特权，会时常涉及在教会土地上

工作的数以万计的农民。这相当重要，并帮助主教们确立了公共权威代表的地位。然而，在查理大帝的帝国中，为履行特殊的行政职责，以执行君主的命令，而完全将教士的人事和财产关系转变为公职关系，这样的实例并不多。特别要说的是，这一切都出于他们的自愿，包括在任何条件下传达国王的命令；涉入地方居民的管理体系中；以伯爵管理他们的方式接受国王的质询监督；最后，他们还要经常被任命为王室使节。

控制主教的任命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教从属于任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教在本质上都是国王的人。西方尚未因为圣职叙任权（investiture）的冲突而分裂；而主教的选举，名义上是地区教士们的职责，但如果君主对选举进行操纵，也没有人会感到震惊。以这种方式任命不称职或腐败的主教会导致丑闻，但事实是，如果需要什么作为保障的话，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导者将会监控这些任命。因此我们要忘却现代天主教会的方式——主教的任命是教宗独有的特权，我们要设法去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由国王选拔最合适的候选人，他这么做的具体原因是关注教会的顺畅运作，以及关心自己臣民精神领域的安康。简言之，国王往往会选择自己最为信任且有能力接受考验的人。这解释了为什么有大量的主教人选来自王室礼拜堂，这里是教士辉煌职业生涯的摇篮。这同样也意味着，任命主教的国王可以同样撤免他们。他将那些招致他不悦的人驱逐出教座，前提是需要为这样重大的举措找出充分的理由。以词源来说，“主教”一词来自希腊语的“监察者”（episkopos），诺特克称查理为“主教们的主教”，很难想象出一个更贴切的称呼了。⁴⁸

显然，当一位主教去世的消息传到宫廷时，许多人都非常高兴。计划填补这一空缺的阴谋立刻就会开始。权臣们和王后在自己的亲信中都有人选，并且他们会毫不顾忌地向国王施压，影响他的决定。⁴⁹ 在其

驾崩后很长时间内，关于查理大帝选拔主教候选人标准的各种逸闻还在教会中流传。传说在教历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圣马丁节前夜，一位教士被告知将被提拔到空缺的主教职位上。“他心满意足，邀请了很多宫廷里的官员和来自主教区的客人，并且办了一场丰盛的晚宴。但他暴食过度，滥饮更甚，达到了溺于酒中的程度。他没有出席这个最为神圣夜晚里的晚间布道。”王室礼拜堂祷告的规则是，每个人必须吟唱特定的应唱圣歌（*responsorio*）。当轮到缺席的教士时，没人知道谁该来吟唱。当大家都陷入尴尬时，祷告中断了。“嗯，来个人吟唱。”国王生气地下令道。这时一个无人注意的穷教士大胆地吟唱起圣歌，尽管大家都想要让他闭嘴，他还是继续唱到结束。可以预见到，醉酒教士的主教职位会被夺去，转而授予这位穷教士。⁵⁰

唯一需要教宗批准的情况是那些辅佐罗马教座的意大利主教和大主教的任命。教宗是西部唯一能给大主教区授予圣职的最高权威，他将大披肩授予大主教，作为职位的象征。在这些事情上，教宗是否能勇敢地面对王室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宗的个人品格。这意味着，相较于阿德里安一世时，在利奥三世时期，查理更为轻松。在790年左右，国王任命修道院院长赖兴瑙的沃尔多为其子丕平的摄政，丕平当时还是个孩子，已经加冕为意大利的国王。作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要求阿德里安任命修道院院长为意大利王国首都帕维亚的主教。但阿德里安并不同意这一任命，尽管这并没能阻止沃尔多执掌帕维亚教区，但他一直没能正式任命为主教。⁵¹

利奥三世的当选引领了一个时代，一个紧密跟随法兰克国王政治纲领的时代。这在798年表现出来。查理决定将萨尔茨堡从主教区变为大主教区，使之成为对阿瓦尔人传教工作的中心。名义上，是巴伐利亚的主教们提出申请，利奥以轻慢的口吻回应道，他乐于接受他们的恳求，任命他们的同僚萨尔茨堡的主教阿尔诺为大主教。但他写信给查理时用的是截然不同的口吻：“得神之庇佑的吾王陛下，命令我们为阿尔诺主教授予大披肩，任命他为巴伐利亚人省份的大主教。”他接着很谦卑地

向国王保证，他已经执行了他的命令。⁵² 在查理统治期间，法兰克人的国王从各个方面说都是天主教会实际上的领袖，教宗差不多就是他的属下。

帝国内修道院院长的地位也是他们的君主授予的。这一范畴首先就包括查理兴建的修道院，被授予大量的王室领地。基于常理，他们的存在得益于国王，他们的生活也依赖国家的开销，因此，这些修道团体完全服从他的意志，他们接受国王任命的修道院院长，没有丝毫意见。另外也有一些修道院，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修道院，例如洛尔施和圣加尔，其院长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认为将修院托付给国王，将僧侣置于国王的保护之下，更为合适。作为回报，僧侣不仅保证为国王和他的家人与军队祈祷，也允许将修道院和它所有的财产置于他的完全控制之下。

不言而喻，皇帝并不总能了解到地方上的情况，也不能完全接受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关于候选人的建议，他们总想自己安排继任者。无论如何，查理在这一问题上制定的规则，说明了他有多么不信任这些提名：

无论主教还是修道院院长，都不应该因自己的喜好而偏爱无能之人。他们也不应该因为这些人自己有关系或者迫于某种压力而授予他们职位，却瞒匿排挤更好的候选人，而把他们推荐给朕。朕命令这绝不允许发生，这让朕感到受了欺骗和愚弄。每个修道院都要提拔一名对朕有用的候选人，对举荐他们的人论功行赏。⁵³

查理在结尾处提醒每个人，无论如何最终决定权都是他的。

职位同化为恩地（采邑）

教会任命的职位被同化为公共职位，这同样表现在当时的惯例中，当时人们倾向于将这些职位视为恩地（采邑）。（这一术语包含一切财产，有土地、收益和职位，职位并不被视为财产，而是作为皇帝的恩赐，他可以将其收回。）在查理大帝生命最后几年颁布的一部法令集中，使节们受命起草公共资产的清单，“他们不仅要详述主教、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伯爵和朕的封臣的恩地，也要详述朕自己的王室财产”⁵⁴。在819年，虔诚者路易颁布的一部法令规定：“那些身为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的使节，当他们靠近自己的恩地时，不得受他人的供养。而当他们离开恩地后，他们有权征用供给。”⁵⁵当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声明这些恩地并不是职位，而是那些与之有关的财产，是十分合理的。实际上，二者的区别并不明显。主教区和修道院最终被视为一种恩地，国王按照自己喜好分配它们，这恰似郡的管理权，或者来自王室财产收益的终身薪俸。

在查理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更多灵魂人物挑战和批评将高级教士视为国王的封臣这一现象。858年，兰斯的大主教辛克玛（Hincmar）愤怒地写道：“教会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恩地，更不是国王可以凭一己之好随意予夺的财产，因为一切属于教会的，也奉献给了上帝。我们主教，是奉献给上帝的人，和世俗之人不同，尽管我们能让自己和教会承担维护和协助政府的义务，以提升教会组织的良好管理。但我们中不会有人隶属于他人。”⁵⁶但这只是孤立的观点，广泛的舆论还是认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皇帝的人。查理大帝的曾孙胖子查理某天夜里梦见自己进入了往生世界，经历了地狱的苦难。他首先遭遇了一些受诅咒的高级教士。“我们是你父亲和叔父的主教。”他们与他交谈，解释说他们没有缔造和平而是传播混乱，因而被放逐于此受折磨。“你的主教们也会来这里，”他们最后说道，“如果他们继续自己现在的行为的话。”⁵⁷“你的主教们”：尽管教会是一个与世俗世界相分离且明显不同的组织，但教士们最终应答皇帝时，就像其他政府官员应答一样，没有比这个（你的主教们）更简洁的表达了。

注释

- 1 F.-L. Ganshof, “Les traits généraux du système d’institutions de la monarchie franque,” *Settimane* 9 (1962): 94.
- 2 *Rothari*, 2 (in *LL*, 14).
- 3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142.
- 4 *ARF*, 87.
- 5 *CRF*, 7.
- 6 *ARF*, 14, 18, 48.
- 7 *ARF*, 34, 74.
- 8 *CRF*, 20, 27.
- 9 *CRF*, 40.
- 10 *CRF*, 45.
- 11 *CRF*, 16.
- 12 Einhardus, 20.
- 13 *ARF*, 80; cf. *ARF*, 74–85; Einhardus, 11; e *CRF*, 28.
- 14 *CRF*, 23.
- 15 *CRF*, 25.
- 16 *CRF*, 34.
- 17 *CRF*, 46.
- 18 *CRF*, 80.
- 19 *CRF*, 40.
- 20 参见第8章，关于作为“审判官”的代理人。
- 21 参见*ARF*, 61–65。关于狄奥多里克伯爵和图卢兹的威廉，参见E. Hlawitschka, “Die Vorfahren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1:51–82；以及Einhardus, 9。
- 22 Paschasius Radbertus, *Vita Walae*, in *MGH, Scriptores*, 2: 550.

23 R.-H. Bautier, “La chancellerie et les actes royaux dans les royaumes carolingien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42 (1984): 5–80.

24 ARF, 138.

25 *Die Kapitulariensammlung des Ansegis*, G. Schmitz ed (Hannover, 1996; in MGH, *CR F*, n.s., vol. 1).

26 奥伯莱茵高伯爵他们后来自称罗伯特家族人 (Robertingians), 其家谱可以在 R. Le Jan, *Famille et poroir dans le monde franc* (Paris, 1995), 254 e 440 中找到。另一些家谱在该作的其他部分有所讨论, 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证明, 在查理的时代官职是世袭接替的。这少量例子同样被一些人常常提及, 他们是贵族领导权长期确立观点的支持者。这些家族有巴黎伯爵、莫城 (Meaux) 伯爵, 还有圭多尼德家族 (Guidonides) 出身的布列塔尼边区的伯爵及侯爵。并且其中个别家族绵长的福祚反映出其与统治王朝之间较近的亲缘, 如王后希尔德嘉德的兄弟与子侄, 其中一人是边区长官拜奥阿伊·格罗尔德。实际上, 这不足以证明作者对官职世袭问题的强调, 以及他对排斥贵族领导权 (这是目前占据优势的观点) 的偏向。而一种相反的开放性观点, 着眼于加洛林王朝官员的社会出身和职业生涯, 得到了如下支持: D. A. Bullough, “‘Leo qui apud Hlotharium magni loci habebatur’ et le gouvernement du Regnum Italiae à l’époque calomnieuse,” *Le Moyen Âge*, 67 (1961): 221–45; 以及 D. A. Bullough, “‘Europae Pater’: Charlemagne and his achievemen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5 (1970): 59–105。

但是必须承认, 即使我们使用了最新的群体传记学 (prosopographico) 技术, 史料的缺乏仍是一个固有而难解的问题。例如, 根据 R. Le Jan (“Prosopographica neustrica: les agents du roi en Neustrie de 639 à 840,” in *La Neustrie: les pays au nord de la Loire de 650 à 850*, H. Atsma 编辑 [Sigmaringen, 1989], 1: 231–69) 所绘列表, 在 8 世纪初至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之间有 86 名纽斯特里亚的伯爵留存有文档证据。在他们之中, 有多达 12 人被证明属于统治王朝的旁系分支, 至少关系密切; 剩下的 74 人中只有 6 人确定是伯爵的子嗣。即便我们再加上 3 或 4 名可能的人, 依然可以清晰地表明, 查理的时代并未显示出伯爵职位的世袭接替是惯常现象。然而如果不去审查我们所知的所有伯爵, 而是将我们的考察限制在那些已经知道是父子关系的伯爵中, 这幅图景会迅速改变; 并且在统计之中, 伯爵的官职在一个家族中保留超过两代人的情况会更频繁地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方法论上的选择能够使文献或多或少地说出我们所想要的信息, 因此将此问题悬而不决可能是正确的。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 在这些相关的考察报告中, 在同一个样本中会发现帕拉丁伯爵的出身比诸省伯爵要低微, 16 人中只有一人可以确定是伯爵的子嗣, 并且无一人是国王的亲属。

27 Einhardus, 9.

28 Einhardus, 13.

29 J.-P. Brunterc'h, "Le duché du Maine et la marche de Bretagne," in *La Neustrie*, 1:29–128.

30 Notker, 1.13.

31 *CRF*, 50.

32 *Annales Laureshamenses*, in *MGH, Scriptores*, 1:38. e J. Hannig, "Pauperiores Vassi d e infra palatio? Zur Entstehung der karolingischen Königs-botenorganisatio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91 (1983); 309–74.

33 *MGH, CRF*, 2:515.

34 Astronomus, *Vita Hludovici Imperators*, E. Tremp ed (Hannover, 1995; vol. 64 in *MGH, Scriptores*), 3.

35 *CRF*, 78.

36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498.

37 见上, 注释32。

38 *CRF*, 34; 但请参见W. A. Eckhardt, "Die Capitularia missorum specialia von 802," *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 12 (1956): 498–516随后所做的编辑和评论。

39 Manaresi, 17.

40 *CRF*, 85.

41 *CRF*, 85.

42 *CRF*, 71–73.

43 *CRF*, 32.

44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 277–78.

45 Manaresi, 16 and 26.

46 *CRF*, 150.

47 该院长是"procurator ... per diversos portos ac civitates exigens tributa atque vectigalia , maxime in Quentawic" (S. Lebecq, "La Neustrie et la mer," in *La Neustrie*, 1:405–40)。

48 Notker, 1.25.

49 Notker, 1.4.

50 Notker, 1.5.

51 D. A. Bullough, “Bajuli in the Carolingian Regnum Langobardiae and the career of Abbot Waldo,”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7 (1962): 625–37.

52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 58–60.

53 *CRF*, 33.

54 *CRF*, 80.

55 *CRF*, 141.

56 *MGH, CRF*, 2:297.

57 Harilf, *Chronicon Centulense*, F. Lot ed (Paris, 1901), 144–48.

第8章

帝国的管理：资源

公共资产

王室财产

王室财产是君主统治的核心部分。法兰克人的国王在蛮族入侵的时代就确立了王室财产。并且随着每一次新的征服，以攫取并声称占有那些被放逐的首领及其追随者的财产，而将王室财产扩大。这些变成了巨大的财富：可能有一千处地产，按照当时的说法被称为“田庄”（villae）。这些地产在规模上变化很大，但平均都有几百农民作为劳动力。这意味着在广大的帝国里，有50万人为王室地产劳作，他们除了国王以外没有别的领主。他们劳动的所有剩余产品都由国王支配，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国王非常精于使用这些产品。

国王的财产在王国的腹地尤其密集。例如，在纽斯特里亚，有一份文件证实了存在超过400处的王室地产，几乎没有哪个主教区内没有国王的财产。这幅图景并不是分散的土地统一在一起，而是广泛地散布开来，在少数地区高度密集。不超过四分之一的主教区密集地居住着王室

佣工。国王会时常造访这些地方，当他在这些地区巡游时，他会时常停留在自己的“田庄”中。在新近臣服的地区，例如普罗旺斯、阿奎丹、意大利和萨克森，他只会偶尔来访。在这些地方王室地产较为稀少，并且彼此相隔甚远。这可能就是“法兰克人的王国”（*regnum Francorum*）这一观念，在法兰克王国扩大并转型为帝国之后仍然保留的原因。

“像另一个国家”：教会的财产

王室财产，包括丕平家族的大量私人财产，也包括广大的教会地产。统计可知，查理大帝的帝国包括近200处主教区和超过600处修道院，他们的财产有时十分庞大。富尔达修道院是日耳曼地区基督教世界的前哨，雇用了大约1.5万家农户；另一个靠近阿瓦尔边区的前哨，巴伐利亚的泰根湖（*Tegernsee*）修道院，雇用了2万户。教会的财产依靠国王的捐赠而得到持续的支持。但如果把这种所有权的转移视为对王室财产的不断侵蚀就错了。譬如查理，和之前他的父亲与祖父一样，将教会的土地视为另一种公共资产，其收益完全受自己支配。实际上，当皇帝命令自己的皇家使节起草一份关于“在分配给他们的每一块土地上朕所拥有的一切”的清单时，这一命令并不只是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王室财产，也包括教会财产。¹ 文书部设计了同一套格式来描述教会和王室地产，显然就是把它们视作同一种类型。

教会的财产并不能被国王随意没收，转交他人。这样的行为会被视为暴政，招致暴力反弹，虽然在孤立的事件中，教会的人会倾向于缄默不语，而不是和国王冲突。简而言之，查理已经习惯于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视为自己的人，他们的职位都来自自己。他能够得到他们来自教会的收益，并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这也是完全合理的。这就像一个第二公共领域：“像另一个国家”（*Quasi Alteram Rem Publicam*），这句话来自查理驾崩几年后他的堂弟瓦拉的说法。² 将大地产和大量的农民

从王室转移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里，只是意味着后者被授权保证这些地产产生收益并组织运用这些劳动力，但说到底他们还是代表着国王。

王室财产的经济开发

国王的给养维持

许多王室地产，大约有150~200处，实际上是王室驻地。一般都会配有一座行宫，在必要时，有适当供给的情况下，君主和他的随从会在其中居住几个月。实现这一目标，得益于仓库中的储备，还有周围地区其他王室地产代理人的补给护送队，他们得知国王抵达后就会尽快将补给送出。这些驻地，在古代法兰克人的领地上有很多，例如在塞纳河、瓦兹河（Oise）、默兹河、摩泽尔河和莱茵河流域。驻地沿着道路有规律地间隔分布，直到边境，因此这也涉及一个有规划的行止点系统。如果查理从亚琛启程，前往萨克森或者意大利，他要能够随时在自己的居所过夜，可能有时也停留在主教区或者修道院。这一点也大体上证实了王室产业和教会产业大致上的平等地位。可想而知，当前者（至少在字面上）能够足以保证国王及其随从的供给时，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依然有义务在每次有需求时，自己负担开销，向国王提供款待服务。

我们不要相信这样的传说，认为查理被迫不断地从一处地产迁移到另一处，消费这些地方出产的谷物、酒和火腿，其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道路和交通手段将这些物资运送到他这儿来。确实，国王想要停留的行宫，周围都有几处庄园，以保证王宫较长一段时间的供给，而且他大体上也主要停留在拥有更多王室地产的帝国区域。但“田庄”如此众多，又如此分散，其中有些代理人从不需要招待自己的主人，这无疑极大地减轻了每个人的负担。这并不意味着谷物留在仓库里喂了老鼠，酒留在储存的木桶中任其变质。每一年，每位代理人都会收到如何处理剩余产品的确切指示。如果庄园距离皇帝计划过冬的宫殿不远，他们就会将物

资转移过去；如果规划中的夏季战役有需要，这些物资就会成为供给军队的庞大后勤队伍的一部分。此外，更常见的情况是，代理人将其出售，连同明细清单一起送往宫廷。

管理的手段可能更为复杂。国王，和他的许多修道院院长一样，意识到将每个“田庄”分配作不同用途的价值，规定哪些供应王室亲眷，哪些供应军队。显然，这一体系意味着管理者必定有主动性：可能组织每个“田庄”劳动力的农民领班（maior）并不是这样，但那些掌管账目、为国王负责一处或一群庄园的代理人（actor）则是主动的。在管理术语上这些庄园地产被称为王田（fiscus）或者公职田（ministerium）。如果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代理人有时是从领班提拔而来，并曾经当过农奴的话，就会理解这些王室地产的存在会刺激经济，也会影响整个乡村社会。

教会地产的开发

教会的财富也用于王室。国王时常造访的这些区域的修道院，与当地地产代理人合作，以纳贡的形式供给王室，这很快就被视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惯例。圣德尼修道院拥有大片的葡萄园，每年需要向附近的田庄供应大约3,200加仑葡萄酒。

更常见的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需要每年向皇帝的居所或者年度集会地运送供给。这些供给被委婉地称作捐赠（dona）或礼物，但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强制且极其繁重的课税，这可以从806年查理大帝送给圣昆廷修道院院长的信件得知。在给武装骑兵分遣队的详细指示的末尾，皇帝补充要求修道院院长将物资运送到年度集会地。

关于那些你必须在集会时送予朕的礼物，在五月中旬送到朕彼时所在之地，如果你能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亲自将它们送

与朕，将会甚合朕意。如果你还想保有朕的恩宠，就不要疏忽大意。³

还有一个故事同样揭示了这一点。查理出人意料地现身一座城市，成为主教的客人。由于是星期五，他不能吃肉，主教也找不到鱼，被迫给他献上奶酪。皇帝拿来一把刀，削去外皮，开始吃奶酪中柔软的部分。主教和其他仆从一起出席国王的宴会，他控制不住自己，说道：“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您扔掉的是最好的部分。”查理是一个不喜欢被反驳的人，尝了尝外皮，发现确实好吃，他尖刻地回应道：“你说的不错，每年准备两车这样的奶酪送到亚琛给我。”主教担心起自己的主教职位，说道：“陛下，我可以弄到奶酪，但我不能保证和这个一样。我担心自己可能被训斥。”但查理毫不退让，结束了对话：“那你就把它们切成两半，如果你发现它们和这个一样，就用锋利的长钉子把两半钉回到一起，再把它们送给我。你可以保留其他的，给你自己、你的教士或者你的仆人。”⁴

从皇帝的语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礼物完全不是自愿的。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作一种税。但我们可能错了，因为在那个时代，赠送礼物是表示承认国王权威的一条途径，并且会引发一连串的互惠举动，国王也有义务去遵守。这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他选择捐赠人之偏好的真实证据。诺特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奶酪的逸闻，结局是，从此以后三年，主教遵守了国王的命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查理为了补偿他，慷慨地捐赠出王室土地。817年，虔诚者路易立下遗嘱，在他死后，两个幼子要臣服于长子，每年为他提供适当的礼物。但他立刻加上，长子收到礼物后，必须要赐予他们价值更高的礼物，以彰显自己拥有更大权力的现实。⁵显然，我们会意识到，如果这仅仅是一种强制税收的话，那这种交换会很快枯竭。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一样，世俗的权贵也提供这种礼物。一首宫廷诗歌带着满足之意描述了这一场景，贵胄们以大堆的金银、装着宝石的箱子、紫色长袍、骏马作为礼物，向国王表示尊崇。⁶

但国王出于利益考虑，还有其他的手段开发教会地产。在一些像富尔达这样几乎完全由王室巨资捐赠修建的大修院的地产上，农民要像在王室地产上工作一样，在付给僧侣地租的同时，付给国王一种“森苏斯”（census）。大体上说，中世纪拉丁语术语“census”意思更接近一种租金而不是税收。尽管国王已经捐出了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为教会工作的，但他还是坚持从佃户这里征收“森苏斯”，和征税类似。在其他情形下，强加给修道院的义务包括让其劳工向王室金库缴纳年金。巴黎近郊圣日尔曼（St-Germain-des-Prés）修道院要求其佃户缴纳一种名叫“hostilitium”的费用，以装备供给军队的辎重车队。实际上修道院扮演了国王代理人的角色，对其佣工征收费用，送入国库，也无怪乎一些历史学家将这种征收视为一种公共税收。

当然，不是所有的修道院都有同样的义务，原则上说，这只会涉及所谓的王室修道院。这些修院是由国王创办的，或者至少受其恩惠。其他的修道院，只对当地主教甚至私人捐赠者的家族负责，在法律上不需要缴纳这种征收款。812年，皮斯托亚（Pistoia）的圣巴尔托洛梅奥（San Bartolomeo）修道院的院长，向当时在意大利执行任务的王室使节递交了一份上呈宫廷的法律申请，陈说他的修道院是私人兴建的，因此不需要纳贡。但自从修道院的所有权非法转让给一位世俗之人后，就确立了纳贡的习惯。“从那天起，他们强迫我前往军队，为使者提供食宿，向宫廷纳贡，这一切都不是法律所要求的。因为已故的盖多尔多（Gaidaldo）建造了这一修道院，并将其留给了自己服军役的后裔。”法官裁定，这个创建者家族已经尽到其公共义务，强迫他们和修道院是错误的，因此判决支持修道院。⁷

此外，也不是所有的王室修道院必须缴纳同样多的款额。当虔诚者路易继承王位后，他发现自己被僧侣们的抱怨声所包围，他们声称自己因过度征收而陷入贫困。不久后，他收到了一份在自己保护之下的修道院的清单，现在只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⁸在这份清单上，14座修道院需要同时为军队送去礼物、进行捐赠，16座只需要提供礼物，还有18座

只要提供更少的资源，“不需要提供礼物和履行军事义务，只需要为皇帝和其子嗣的救赎以及帝国的稳定祈祷”。规则是多变的，但潜规则是，在需要时，教会必须提供君主所需。

作为补偿而对修道院进行的分配

作为更长远的手段，国王会将整个修道院作为终身的赏赐。例如，一座修道院可以作为一份恩地赏赐给一位当地的伯爵，条件是他同意用此地的收益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让步冒着引起僧侣们不满的风险。因为尽管查理不是一个会被一时的闲言碎语所阻挠的人，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伯爵的恶习，他们会将这意外恩赐的修道院的利益榨净。对这些修道院更为现实的使用方法是，任命那些效力国王以求回报以及那些国王希望其继续效力的人为其修道院院长。

第一批名单包括许多为宫廷效力的饱学之士。最好的例子就是阿尔昆，他在796年被任命为极为富饶的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在第二批的名单中，考虑到这些公职人员要继续在宫廷中为国王效力，所任命的这些修道院院长不需要前往当地到任。掌管王室文书部的文书大臣，通常会赏赐一所大修道院。777年卸任的文书大臣伊特里乌斯（*Iterius*）是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他的继任者拉多（*Rado*）被任命为阿拉斯的圣瓦斯特（*St-Vaast d'Arras*）修道院的院长。另一位获得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并在多个职能上持续为国王效力的政治人物，是伦巴第人法多尔夫（*Fardulf*），他在792年将驼背丕平的密谋报告给了查理，获得了富饶的圣德尼修道院作为奖赏。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僧侣身份并不是成为修道院院长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一种限制会削弱奖赏的价值。因此受到王室任命的修道院院长，被称为“世俗修道院院长”，尽管他们常常并不是世俗之人，而是教士的一员（例如，阿尔昆曾是一名助祭）。任命一位主教为一所或多所修

道院的院长，是国王最常使用的增强其财力并强化其忠诚的方式。当时最有名的主教之一安吉尔拉姆努斯，是梅斯主教和王室大教长，同时也是基姆湖（Chiemsee）和塞诺尼斯（Senones）两处修道院的院长；希尔德巴尔德是科隆的主教，并继任了安吉尔拉姆努斯的大教长职位，又是蒙德湖（Mondsee）修道院院长；特里尔主教里克波都斯，是洛尔施修道院院长；萨尔茨堡的大主教阿尔诺，同时是圣阿曼德（St-Amand）和圣坎迪多（San Candido）修道院院长；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尔夫，同时是圣艾吉南（St-Aignan）和洛布斯（Lobbes）修道院院长；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不过其中一些例子包括了由修道院院长提拔为主教的情况。

对僧侣们而言，接受一位上面指派的修道院院长，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主要是因为这些外来者会很快用光他们集体的资源。图尔的僧侣就为他们新院长阿尔昆大量的访客感到沮丧，他们以修道院的经费款待作乐：“又来了一个不列颠人还是爱尔兰人拜访他的同乡。神啊，从这些不列颠人手中拯救我们的修道院吧！”⁹ 对于处在王室保护之下的修道院的僧侣来说，向国王请愿重新考虑这一任命，并授予他们自己推选修道院院长的权利，这并非稀奇之事。一份用来起草法律文书的标准文本集中，就包含这类请愿的模板：“从您将我们赏赐给他作为圣俸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失去了您的庇佑，从那天起我们缺衣少食，没有肥皂和食物，而这些在之前都是惯例。”¹⁰ 但查理在世之时，这些悲苦的抱怨声不可能大规模实现其目的：封赏这些修道院作为主教、伯爵以及与宫廷相关的学者和官僚的补给资源，对皇帝的行政体系而言太过重要，他无法放弃。

王室财产和劳动力的组织

作为审判者的代理人

王室财产在权力的运作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也由于这些财产使得国王可以不通过中介，直接控制土地和人。这就是实际占有大片有人定居土地的结果，这里的每个人对国王来说不是奴隶最起码是佣工。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在《庄园敕令》中，查理以难以置信的精细方式，规定了王室财产的管理，当地的代理人被称为“审判官”（iudices）。¹¹ 在法兰克人的传统中，这个词一般用于公职人员。但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虑，这个词意指人的规训，更强调政治角色而不是经济角色。可以确信的是，王室领地上的居民，在他们违规或者提出诉讼时，直接由代理人而不是伯爵审判和责罚。当然，自由人和奴隶之间还是作出了区分，前者有按照法律接受审判的权利，后者要屈从于残酷的肉刑。

教会地产：维护人与豁免权

在这里，教会地产中同样的问题也呼之欲出了。那些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管理教会地产的得力之人被称为“维护人”（advocati）。教会法令集提到他们时，仿佛把他们当作和伯爵及其下属一样的公职人员看待。实际上，考虑到他们要规训和惩罚那些和家人一起居住在教会土地上的众多劳工，他们实际上就是公职人员。皇帝强调，维护人需要知晓律法，公正裁判。为了确保这一点，皇帝规定，他们必须由王室使节任命

，最起码也要一位伯爵为其作见证。¹² 尽管他们为教会效力，但他们在公共管理领域很有影响力。对此虔诚者路易给了我们明确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查理时代就有所暗示，当他提到“朕的维护人”时，与之并提的是“朕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封臣”。¹³

维护人拥有审判者地位，原因是实际上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通常享有豁免权。这一王室授予的特权，禁止伯爵和其他审判者进入教会的领地内审判违法者、罚款、收税、要求教会人员招待他们或者征用车辆和马匹等这些他们在其他地方允许做的事。豁免权由最早的基督教皇帝授予教会的庇护权发展而来，法兰克国王之后对其加以确认。但我们不能因其广泛的使用，而推定这一地区的全部领地和在籍人口都逃脱了公共权力的控制，因为直接的事实是，主教、修道院院长及其维护者和伯爵及其下属一样是公职人员。在拥有豁免权的土地上，公共司法还是得到了保证，给国库和军队的税款还在继续征收，但这是由教会的代理人对其负责，而不是伯爵的人。换言之，授予豁免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国王的权力和司法，而是在效力国王的人中，权力和司法从一些人转移给了另一些人，二者都具有公共性。

豁免权也有其特别的限制。如果窃贼或杀人犯在教会的保护下寻求庇佑，伯爵会命令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将其移交。遭到拒绝的话，将会处以罚款，并会再次提出要求。第二次拒绝的话，罚款会加倍，并会再三命令移交犯罪的当事人。第三次拒绝后，伯爵有资格强行进入享有豁免权的领地，拘留被通缉的人（尽管为了降低滥用权力的风险，查理规定任何使用暴力的行为都必须优先让他知道并同意）。这个程序似乎很复杂，但实际上留下了很大的协商空间，允许双方声明自己的权利，保留颜面并且不破坏公共秩序。

显然，豁免权时常会导致冲突，就像在阿尔昆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他是图尔的修道院院长，他在他的教堂里授予豁免权以掩护一名教士，后者在奥尔良犯了罪。这个人已经受到当地主教的人的追捕。这

个主教被证实是狄奥多尔夫，他可能是阿尔昆在查理宫廷的学者中最有名的对手。尽管狄奥多尔夫的人出具了一份王室授权令，授权他们逮捕逃亡者，但修道院院长拒绝将其移交；并且图尔的民众因为害怕自己的会堂可能受到进攻，他们操起棍棒，威胁将这些外来者打死。愤怒的狄奥多尔夫报告皇帝，查理草率地通知阿尔昆，他犯错了。皇帝派出的使节展开了调查，使一些被控挑动暴乱的僧侣遭到逮捕、鞭笞和监禁。这场冲突不能被解释为公共司法权力试图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一次侵犯：纵然逃亡者受到修道院院长的人保护，但追捕他的是主教的人。而国王倾向后者，是因为他判断是阿尔昆而不是狄奥多尔夫滥用了自己的权力，而双方都是公权力。¹⁴

恩地使用王室和教会地产

王室财产的一种特殊使用方式就是分配其作为恩地。最常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可撤销的终身权利。一块恩地，对一位负责管理公职地的伯爵或者一位受命为国王提供武器和马匹的王室封臣来说，带来了相当可观的资源。恩地同样也利用了教会的财产。从查理·马特时代起，分配使用教会地产的行为就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称呼“王谕请求”（*precariae verbo regis*），“*precariae*”意为利益相关者提出的要求或请求，“*verbo regis*”代表着强迫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同意的王室法令。教会对这种分配并不高兴，因为这冒着财产永久转移的危险。而查理为保留其颜面，很注意保证这些恩地最起码依法交付租金。但他肯定没有像教士们期待的那样，怀有将这个体系废除的想法。

再一次，这种不满只在查理死后才显现出来。828年，修道院院长瓦拉在承认教会财产最基本的公共属性后，提出教会财产的使用最起码要与王室财产的使用相区分：“这样国王就能拥有用于维持自己军队的公共财产，基督应该拥有教会财产，作为第二位的公共产业，为了穷人和侍奉基督者的福祉。”¹⁵ 世俗的权贵反驳说，谁也不应该干涉这个体制，如果需要干涉，更好的办法是留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仅够生存所用的财产，剩下的分配给战士们，因为基本的王室财产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修道院院长很快走到对立面并宣称，只要教会一直得到应得的尊重，在需要纳捐供应军队时，教士会继续像过去一样捐献。

在行省中代表国王权威的伯爵，以及那些宣誓成为国王的盟友并以武器和马匹在战争中为其效力的位高之人，临时授予他们教会以及王室的土地作为恩地（采邑），这种现象在查理的时代开始出现，随后变成了封建制度。以往历史学家描述这些现象时，认为这有破坏公共产业的

风险，导致王权的弱化。不能否认的是，滥用职权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尽管皇帝尽一切所能将其扑灭。在阿奎丹，这块查理几乎从未涉足的异域之地，王室财产就远比其他地区稀少，并且实际上被随着征服而在此境内就任的法兰克人伯爵和修道院院长们私有化了。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当781年路易被父亲任命为阿奎丹的新国王时，他在维持自己的资源供给方面遭遇了切实的困难。但在更常见的情况下，风险是恰恰相反的：受封恩地者毫无顾忌地开发分配给他们的王室土地，并且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财产是属于自己的，故他们将收益再投资到自己的私有财产中。查理多次命令自己的使节，要他们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¹⁶

税收

义务

在查理的时代，王室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王室地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强制臣民服从的体系；这个体系尽管有着不符合时代的风险，但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税收。虔诚者路易在他统治的第一年，向那些来自西班牙并希望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定居的难民授予了需要重新安置人口的无主之地。并且他保证他们可以在此完全自由地生活。

以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类似于其他和伯爵一起在军队里效力的自由人，他们要居住在边境地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侦察和监视的工作，这用通行的用语叫作守卫义务。他们在合理的限度内，受伯爵的统领和建议。此外，当朕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节和子嗣以应朕要求时，要向他们显示出应尽的好客之礼，并提供马匹。对从西班牙派遣而来的大使也是如此。但伯爵或他的任何下属和官员都不能要求他们缴纳另外的“森苏斯”

。 ¹⁷

关于传统上强加给帝国居民的义务，在此我们作出并不完备的描述。国王的使节和大使、在面见国王途中的外国大使，更常见的是执行任务的各级官员，有权要求居民提供住所，并征用他们的马匹。前去参军的武装队伍被授权在当地放马，必要的话，可以征收饲料。组织供给时也需要准备车辆、牛马的配给还有食物，以此代替所要缴纳的金钱。原

则上说，这些义务代表着公民参与国家的运作，且其主要落在私人土地所有者和自由佃户的身上，因为在印象中他们更容易履行义务。国王的代理人主要倾向于直接向那些在王室地产上工作的人征收，也包括那些拥有自己住所的奴隶。而教会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将自己的人员排除到这些义务之外。

租金

已经提及的这些义务，还没有到构成财产税的程度。这些义务要求帝国居民的直接目标是协助行政运行，并且从不涉及缴款入帝国金库作非专门用途。但这意味着就没有如同古罗马和现代社会所理解的税收吗？最近，“财政学派”的历史学家——其论敌称其为“狂热的罗马主义者”——提出，曾经让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们获取大部分收入的财产税并没有消失。他们声称在加洛林的文献中发现了证据，只是用词发生了系统的变形。的确查理的立法十分关注被称作“森苏斯”的款项，数量庞大的臣民都要向国王缴纳这一款项，而且规定“没有人敢忘记需要缴纳的森苏斯”，“率土之滨，王室森苏斯必须缴纳，无论是针对人头的，还是土地的”，还有“无论谁缴纳王室森苏斯，都要在其父亲和祖父曾经按常规缴纳的地点缴纳”。实际上，森苏斯简而言之是一种年度租金，“那些通过请求契约（*per precariam*）获得朕之土地的自由民，都必须缴纳”，和王室土地上的佃农甚至获释奴隶一样。后两者要缴纳双倍作为人身依附的认定。¹⁸

当然，森苏斯也有和税收相似的方面。在一些情况下，也在不属于国王而是属于教会的土地上征收。其中显示出的差异可以被解释为，实际上当查理给教会捐赠土地的时候，他经常附加一个条款，规定农民应该继续向国王支付森苏斯，尽管名义上他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人。当农民的村庄完全属于诸如富尔达或者近郊圣日尔曼这样的大修院，并且所

有的居民都向修道院缴付租金，同样也缴纳王室森苏斯，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最终就会被解释为一种公共税收，但这并不代表罗马财产税一直存在而从未间断。

通行费

税收的一种基本来源是在货物的流通和销售中征收的“通行费”（teloneum/toll）。这些不是横征的税收，而是当政府提供实在的服务时，作为交换要求商人缴纳的贡金，例如维护桥梁和港口、对市场进行监管。在一些情况下，查理和之前的丕平一样，规定只有实际打算用于贸易的货物才应该征税，大地主从他的土地开往宅邸的车队不在此列。他还规定不能随意设立新的税收，只能对商人征收通行费，不能针对朝圣者。并且“当人在其他地方过河不会耽误时间时，不能强迫其过桥并收取通行费。还有不能在国境中心没有桥梁或渡口的地方征收通行费”。¹⁹所有这些措施证明，这些征收显然是暂时且难以控制的收入来源，地方政权倾向于增加这些征收的数额。这并非毫无意义，在查理大帝去世很久以后，伴随着帝国分裂而来的就是通行费的横征暴敛。

税收过度了吗？

强加在臣民身上以维持帝国政府的负担难以量化。在其他时代，例如戴克里先改革后的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可以提出，帝国的税收过于繁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并造成了广泛的社会问题。查理时代的税收负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当繁重，人们认为也是如此。这给独立的小农户造成了很大问题，迫使他们向当地的教会当权者或有权势的人效忠，甚至成为他们的奴隶，以逃避所有自由民所需承受的一些义务。804年在伊斯特里亚爆发的冲突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证实了该省份的统治从拜占庭转移到法兰克时，税收负担突然增加。²⁰

那一年，由于当地对公爵约翰的抱怨，三位王室使节、一名神父和两位伯爵被派遣到伊斯特里亚；公爵在意大利国王丕平及其父皇的授意下统治这一区域。伊斯特里亚在与拜占庭人战争之前十七年就已经被法兰克人占领，当地居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迅速将“希腊人的时代”的情况和法兰克人所带来的各种境况进行对比。他们声称，当约翰公爵掌权后，他将民众放牧牲畜的森林和草地充公。当收到使节质询时，公爵坦言：“你们所说的森林和草地，我认为它们属于王室，是皇帝的财产。但如果你们发誓说情况不是这样，我就不再质疑。”

但抱怨没有就此停止。

在希腊人的时代，我们从没有被强迫提供饲料，从没有为公共庄园无偿工作，我们从不喂狗，我们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交钱。我们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为畜群交钱，每年必须缴纳绵羊和羊羔。我们不得不为远达威尼斯、拉韦纳、达尔马提亚以及沿

河的交通提供服务，这些我们之前并不需要做。当公爵必须离开这里为皇帝作战时，他带走我们的马匹并且强行带走我们的儿子。他要求他们带来运货马车，然后拿走一切，再送他们步行回家。他把我们的马匹留在法兰西，或者分享给他自己的人。在希腊人的时代，他们从拥有相当数量羊群的人那里，百只羊取走一只，以供帝国使节之需。现在任何拥有超过三只羊的人每年都要缴纳一只。我们被强力逼迫，必须满足这些需求和款项，原因是我们的父辈没有这么做。我们受到住在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的亲属和邻居嘲笑，甚至包括曾经统治我们的希腊人。

这些伊斯特里亚居民所抱怨的征收，其中很多很可能是由约翰公爵非法征取的。他们指控其意在为自己和家人中饱私囊，而不是按照义务送给国王。然而伊斯特里亚民众所抱怨的税收，不难看出其大部分为法兰克王国内强加的惯常征收。其他地区的自由民已经对之习惯了，但生活在拜占庭统治下的人一定会视为压迫。尽管公爵被发现行止专横、滥用职权，并且最后被迫放弃了几乎所有受质疑的税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推行的统治与帝国其他地方强行推行的统治有显著不同。出于政治原因，查理倾向于把自己的新臣民从这样的征收中解脱出来，这很快就被接受，没有其他人抗议。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针对格拉多的宗主教和其副主教的抗议，他们从受查理的统治之后就表现出一副新的态度。他们开始表现得仿佛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共治者，事实上他们在西部帝国就是如此。“曾经，教会缴纳了帝国征收的所有税收的半额，但现在不再如此了。在公海上，以前所有人在一起捕鱼。现在我们不敢再捕鱼了，因为教会的人用棍棒攻击我们，割断我们的渔网。”与同期针对约翰公爵和他的人滥用职权的抱怨一样，抱怨的冗长清单继续以一种类似的脉络，针对突然而来且傲慢无礼的主教们及为其工作的人。

在帝国的外围和被征服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加洛林政府显现出最为轻慢的一面。排除掉其他一切问题，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之所以了解到这些事情，是因为有一天，皇帝的使节离开亚琛，远赴伊斯特里亚调查事情的进展。这是政府机制在运行的标志，尽管是以费力的方式。同样，我们仍然拥有一幅国家管理的清楚图景，公权力与教会的代理人在其中紧密协同工作，管理着一个命令架构和税收体系，拥有彻底的、近乎专制的权力。对自由民而言，保护自己的权利并不容易，甚至当司法体系介入维护他们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注释

- 1 *CRF*, 80.
- 2 Paschasius Radbertus, *Vita Walae*, in *MGH, Scriptores*, 2: 548.
- 3 *CRF*, 75.
- 4 Notker, 1.15.
- 5 *CRF*, 136.
- 6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 396.
- 7 Manaresi, 25.
- 8 *CRF*, 171.只有一部分列表留存下来。
- 9 *Vita Alcuimi*, in *PL*, 100:102.
- 10 *MGH, Legum sectio K, Formulae*, 262.
- 11 *CRF*, 32.
- 12 *CRF*, 102.
- 13 *CRF*, 152.
- 14 *Alcuini*, 245–49.
- 15 Radbertus, *Vita Walae*, 2: 548.

16 *CRF*, 46, 49, 59, 80, 140.

17 *CRF*, 132.

18 *CRF*, 33, 44, 80, 140, 144. 参见W. Metz, *Das Karolingische Reichsgut* (Berlin, 1960) 中的讨论。

19 *CRF*, 20, 44, 57, 58, 61.

20 Manaresi, 17.

第9章

帝国的管理：司法体系

法官

当地法庭

加洛林官方推出的主要的管理举动，就是维持法律体系，当然，这是从以军事为目的的人口组织中分离出来的。实际上有一个如同官员的概念，在当时的词汇中没有与之近似的词，通常翻译为“审判官”（*indices*）。法兰克教堂中所吟唱的祷文，是为国王、他的子嗣、王国的审判官以及作为整体的法兰克民族，而向上帝祈求他们的长寿。¹在此背景中，“审判官”一词的确切含义是泛指那些国王向其委派自己一部分权力的人。使用这一词语，可能的原因是实际上司法并不是托付给专业人士，因此它也没有构成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分立的权力。司法直接受那些代表国王的地方官员的管理，主要是伯爵。

每位伯爵都被要求按期主持一次公众集会，称为“马尔鲁斯”（*mallus*），届时，他会聆听并裁定上呈至他的案件，由一些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协助他。这些“贤达”（*boni homines*）选自显赫人家，拥有实际的

法律学问。遗憾的是，他们可能有利益要维护，也拥有颇具势力的亲友。每一次开庭被称为“诉讼会”（*placitum*）。举办一次“诉讼会”包括不菲的花销，这是当地居民应该承担的义务。查理规定，伯爵每年召开不超过三次“诉讼会”，如果没有案件需要听审，不得强迫任何人参与。²在更低的地方层级里，同样的集会由更低级的官员组织，他们经常被称为“低级”（*iuniores*）伯爵。他们在法兰克王国里被称为代理神父或者百户长，在伦巴第王国被称为“加斯塔尔迪”“斯库达伊斯”“洛可波斯图斯”。他们更多地掌管各种“诉讼会”，并且处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案件。皇帝命令，所有威胁到个人财产和自由的案件，都要伯爵当面听审，无论指控涉及哪个社会阶层。³

这种概略性的描述，显然为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留下了余地。例如，在意大利王国，伯爵制度就只能逐渐推行，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伯爵经常处于侧位。在主持诉讼时，他们被当地主教甚或“加斯塔尔迪”和“斯库达伊斯”取代。在许多领域，甚至是相当广泛的领域里，居民仍旧服从公共的司法权，由不同的官员进行审判。例如，在大的王室地产上，所有人，包括自由劳工和奴隶，都听从于代理人：不出意料的是，后者在法令集中被称为“审判官”。⁴同样，司法权也分配给了那些为主教区和修道院地产工作的人，他们以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名义行事。⁵随之也出现了主教区法院，所有教士要受其制约，就如同在有关婚姻的法律情境下，世俗之人要坦白自己宗教上的罪过一样。尽管法庭如此多样，但是在查理的帝国中，公共司法还是涉及所有自由人，并且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要素，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宫廷法院

除了地方司法，也存在君主在自己宫廷里实施的个人司法。查理规定了几种情况下他要亲自审查的审判类型，因此这些也必须适用于宫廷

。有时，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皇帝试图把太多的事务置于自己的掌控中。其中，他要求转送被控同性恋的僧侣、没有正式结婚而养情妇的神父、那些在狗身上打上王室印记进入禁猎区非法狩猎之人。事实上，在宫廷中听审的法律诉讼要满足两方面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是宗教，承担涉及特定道德问题罪行的司法权；另一方面是政治，意图维持皇帝对其他更重要案件的控制，涉及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一般而言的“良家子弟”等法令集所规定的人。⁶

王室宫廷也起到了全王国以及随后整个帝国的最高上诉法庭的作用，尽管权力下放的意大利王国和阿奎丹王国自身拥有具有类似功能的宫廷（palatia）。实际上，日耳曼法并没有像罗马法中流传至今的定义那样，为上诉定义一个确切的字眼。那些生活在萨利克法和伦巴第法（lex Langobardorum）之下的人，在他们觉得司法不公的时候，可以向国王提出申诉；如果申诉得到支持，不仅案件得到赦免，法官也要受到惩罚。一部法令集表述道：“如果有人想说自己没有被公正审判，就把他带到朕面前。但他们并不能单独这么做，以拖延对他人的审判。”⁷这种上诉的形式是否如法律专家所认为的是蛮族式的，或者换言之，是一种倒退，这个问题我们留给聪敏的读者。这里要阐明的重要的事是，在宫廷中听审的大部分案件都是这种性质的。

宫廷司法依照一种特定的程序来管理。法律诉讼接受帕拉丁伯爵的审查，他们自己处置简单的案件，将其他的案件转交给国王。艾因哈德写道，查理大帝习惯在早晨更衣的时候接见伯爵，如果有特别紧急的案件需要听审的话，他能够让当事人加入进来，聆听他们的争论，当场作出判决。⁸对更重要的案件，国王并不是自己作出判决，而是借助顾问们的帮助，他们被召集的人数视事务的重要程度而定。783年的一个判决由3位主教、11位伯爵、多达44位的顾问，以及帕拉丁伯爵签署。⁹为了提高那些难以应付开支的穷人案件的审判效率，也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查理规定较轻的案件应由帕拉丁伯爵审理，国王不用亲自参与。

出于对社会的了解，我们发现很难相信穷人真的能接受到皇帝亲自作出的审理。然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农民群体向宫廷上诉，抗议当权者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案件得到了最高法庭的审理。例如，800年，当查理主持完法庭，从美因河归来时，他发现自己淹没在农民们的请愿之中，这些农民在行省里为教会和王室地产工作，他们没有被传唤到“诉讼会”。可能当地的统治者觉得，不应该让君主受到无尽的法律诉讼的搅扰；这些诉讼是关于地主土地上的农民必须提供的劳役程度之问题，但国王对此有不同观点。当他回到宫廷后，他发布了对整个省份生效的判决，预先阻止了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一切争论。¹¹

法律程序

书面证据

现今存在一种偏见，即中世纪的司法基于极其非理性的程序。关于中世纪题材的电影和小说反复描绘各种司法程序，其中一些审理的方式带有不同程度的野蛮折磨。实际上，查理的宫廷中书面证据才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关于财产的争论，其中一方能提供证明自己权利的有效文件，问题就能立刻解决。毫不奇怪的是，任何面对审判的人，若知道自己有过错，都会试图隐匿有罪嫌疑的文件。一部法令集清晰地就一个案件作出了规定，这个案件中，主人诈称要求收回一个已经被释放的奴隶，他首先就销毁了这个人的自由许可证。¹²

这种欺诈在审判记录中经常有记载。意大利列蒂（Rieti）的主教条托（Theuto）对他的兄弟潘多（Pando）提出了法律诉讼，他宣称列蒂的圣安吉洛（Sant' Angelo）修道院是其私有财产，他证明了修道院处于王室保护之下，因而赢得了此地。但当主教临终之时，现代社会学家所说的非道德的家族主义观念占据了上风，他向自己的兄弟和子侄移交了确认修道院的公共所有权的判决书。“然而我们，”潘多供述道，“立刻在火中烧掉了文件。”法官问他文件上写了什么时，潘多回答道：“如果不是对我们不利，我们不会烧了它。”¹³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无足轻重，因为书面文本的神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生畏的。此外，人们总是避免自己有污点，因为他们不知何时会被召去发誓言。786年在卢卡的公爵面前进行的一次审判中，名叫德伍斯多纳（Deusdona）的圣安吉洛教堂执堂（incubent）神父，就受

到另一位神父的指控。后者指控德伍斯多纳将教堂的管辖权转授给他后，就窃取了相关文件，因为德伍斯多纳想把教堂转交他人。德伍斯多纳强烈否认他做过此事，声称教士阿尔珀图斯（Alpertus）同时在教堂供职，是他想将之据为己有；他，德伍斯多纳，曾经建议他取得文件并将其销毁。

并且这个教士阿尔珀图斯偷走了文件，带给我说：“这就是你叫我拿走的文件，现在把教堂给我。”但我告诉他：“如果你不毁掉这个文件，我不能将教堂给你。”我这么说的时候，教士阿尔珀图斯当着我的面，把文件给了一位路过的不列颠朝圣者，这个不列颠人当着我们的面把文件扔进火里烧了。¹⁴

不出意外，文件在审判时经常遗失。同样，文件存在时，它们的有效性也经常受到质疑，因为那个时代伪造文件并不困难。此言不虚，查理的一部法令集中规定，被释放的奴隶，除了他的自由许可证及该文件的有效性证明，没有其他证据能实际证明他已被自己的主人释放。要与另两份由同一公证人签署的文件相比较才能证明，“公证人必须是被这一地区居民熟知且接受的人”。¹⁵

证人

与书面文件相关的神圣性意味着，最频繁的程序也包括召唤证人。召唤可能不是恰当的词语，因为不是法官召唤证人，也没有法律强行规定要呈上证人。普遍的观念是争执的一方，通常是被告而不是原告，被要求证明己方的正当性；随后，法官会给予他一次休庭，让他换取保释以提供其宣誓的证明。审判的结果取决于出示证据并证实证据的能力，可以预计，这里会牵涉许多隐藏的阴谋。审判中并非没有令人哗然的戏

剧性情节（*coups de théâtre*），因为曾听说过证人在对事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当事的一方煞费苦心地说服而临时供述的情况。¹⁶

真正由法庭召唤证人，只在一种特定程序下发生，这种程序被称作“证据调查”（*inquisitio per testes*），在伦巴第人的司法实践中已经长期存在，并且被查理谨慎地引入法兰克人的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常是王室使节，被派去调查未能解决的犯罪，或者审查呈交皇宫的请愿，传唤证人并调查他们与案件的关系。和一般的程序不同，证人并不是由被告召集以证清白，或者由原告召集以支持指控，而是法官从当地德高望重的人中选择。他们的证言是判决的基础，不受诉讼双方的任何影响，由使节本人宣判，或者使节向国王提供证人的证据后，由国王即时作出宣判。这一程序定然能迅速作出决定，但实际上由于不可能影响到结果，其中存在着风险，即会出现压迫性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法律强制行为。

宣誓与试炼审判

无论是否存在书面证据或是证人，被告都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宣誓而自证清白。这是一种最终手段，法官在没有其他办法解决问题时才使用。巴伐利亚法（*lex Baiwariorum*）规定：“案件必须确凿无误地在法官掌管下进行检查和裁决。任何人不允许起誓，而且裁决必须接受。另一方面，在法官的调查没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要起誓。”¹⁷ 这是一个极其形式化的程序，和我们信仰的观念相比十分缺少理性。被告的誓言是不够的：其他人需要和他一起起誓。他们从专业意义上说并不是证人，因为法庭不会就事实而对他们交叉盘问，实际上，他们只是起誓他们不相信被告有罪。法律规定了每一种指控所需的誓言数量。根据里普阿利安（法兰克）法（*lex Ribuaria*），一个人被指控偷窃一群羊，需要72人起誓以证清白。查理将这个数量减少到12。¹⁸ 考虑到起誓意味着

请求神为自己作证，并且以自己的灵魂做担保，所以当没有其他证据时，取信一个愿意发誓人的陈词就没有那么荒谬了。换言之，在缺乏证据时，以此来判决或开罪更好。

只有当面临严重的指控并且证据相互矛盾时，被告会被要求以试炼（*ordalia*）或者“神判”来证明清白。最常见的方式要求被告将手放进沸腾的水中，或者光脚走在烧红的犁头上。如果烧伤在指定的时间内愈合，被告就被认为是无罪的。“神判”也可以以被告与原告之间竞技这种形式实施，尤其是后者不愿意接受法律所规定的特殊情形下的宣誓无罪裁决时。这意味着一场合法的决斗，但并不会导致一方死亡，因为通常是用棍棒和盾牌战斗。查理鼓励另一种不那么野蛮的方式，就是十字架审判。两名对手在十字架前举着自己的武器：先受不住放弃的一方输掉诉讼。虔诚者路易先是提倡在所有当事人不能战斗或者只是不敢战斗的情况下使用，随后又决定禁止这种试炼审判，因为这对基督的受难不敬。

19

“神判”也用于当缺少明确证据时对财产的争执。这实际上被认为是更可取的人为判决，只在特定的环境里有效。775年巴黎的主教和圣德尼修道院院长争论修道院的所有权，他们都提交了表面上可靠的书面文件支持自己的宣称。国王决定，双方都应该提名一位代表参与十字架审判。²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方法。实际上，晚些时候有一位主教，里昂的阿格巴德（*Agobard*）认为，在缺乏证据时使用“神判”解决诉讼是荒谬的，并且认为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仰仗法官。法官要像所罗门王所做的那样，以明智手段发现真相，来证明自己能胜任此职。²¹

阿格巴德以其怀疑主义思想而为历史学家所熟知，但早在查理出生以前，伦巴第国王利乌特普兰德就提出严格限制使用试炼审判，并且表示，如果他个人能决定的话，他就会全部废除，“因为朕不能确信‘神判’，朕听闻许多人因为决斗审判而输掉了案件，但朕不能废除这条法律，因为这是我们伦巴第民族的习俗”²²。与之相比，查理尽管试图限制试

炼审判中野蛮的一面，但实际上似乎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他向自己的臣民发布指令，声明在少数使用“神判”的案件中，所有良善的基督徒须相信其效力，这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²³

公共司法和争端的处置

公共司法不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常用的方式。协商解决的方式更为常见，这牵涉到友邻的参与，以及任命当事人都宣誓遵守其决定的仲裁者。只有当这个调停人无法成功地找到一个可接受的方案，或者当事的一方能够确证自己权利，并决定直面对方时，法庭的裁决才会取代和解。

国王的裁决根本上也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手段，甚至应用到了我们认为应该属于刑事法律管辖的情形中。这解释了他们司法实践中一个最令人意外的矛盾：对盗窃的处罚比杀人的更残酷。779年，查理规定，初犯的窃贼要挖去一只眼睛，再犯割去鼻子，三犯将被处死。²⁴另一方面，杀人既可能实际上也能有效地以赎金免罪。这种做法可能偶尔会让理念先进的主教义愤填膺，但这似乎已经被其他人完全接受。

起初，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这个严厉而又原始的社会认为财产比人命更重要。偷窃实际上是故意且蓄谋已久的犯罪。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随身携带武器，容易喝醉，当察觉到冒犯，随时拔刀相向，杀人一定非常频繁，不会引起真正的关注。对那时的人来说，偷窃完全是一种犯罪，必须依法进行最为严厉的处罚，而且能够将其压制，尤其是犯罪当事人反复犯罪时，能将其驱逐出社会。另一方面，杀人是犯罪的极端形式，是无法预料的，很可能是某个人或者整个家族想要解决争端然而似乎又无法解决时，诉诸暴力行为的一个结果。官方因此介入，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解决争端，终结一系列的血亲复仇。血亲复仇，大体上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基督教国王应当阻拦这种行为。最好的解决方

法是强令犯罪的一方支付赔偿，受害的一方接受赔偿。这就能公开地终结争端，没有人觉得还存在冒犯，需要寻求血亲复仇；如果凶手被处死，还会有事不断发生。

查理与司法体制的改革

与腐败的斗争

查理时代司法体制的真正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审判者的不可靠。首先要指出的是伯爵，他们往往缺乏法律能力，并且毫无原则地忠于强大的家族利益。这意味着他们很容易受到个人偏好和腐败的影响。针对伯爵的数量众多的控诉，证明了事实上他们在司法行为中压制弱者，默许强者。当有重要的案件要处理，或者要为普通人提供司法服务时，他们完全能早早休庭去打猎。²⁵

司法系统的糟糕状况，被如同惊险犯罪小说般的故事揭示出来。例如，一位法官受命保护一位富有的寡妇，接管了她的财产。法官篡改契据，接管了土地，如同它们是自己的。他把寡妇从自己的产业中赶走，她向皇帝申诉，皇帝派遣王室使节。不管怎样，法官以某种方式提供了证据，证明了自己的权利，案件被搁置一边。然后寡妇亲自启程前往亚琛，然而事情发生在意大利，她必须在隆冬时节翻越阿尔卑斯山。皇帝任命了一位新长官审查案件，这次是他的堂弟瓦拉。在瓦拉启程之前，法官派出杀手谋害了寡妇，然后杀手被迅速处死。瓦拉到达后，发现证人们都宣誓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费时费力地调查后，罪行被揭发，证明法官有罪。然而他受到一大群有影响力的友人庇护，他们都在意大利王国的宫廷中占据要职。²⁶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教士群体对查理有如此大的影响，尤其是阿尔昆。他们坚持改革司法体系的重要性，并提出这是构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首先，腐败必须消除。从789年的《广训》（*Admonitio gene*

ralis) 开始, 许多法令都三令五申, 禁止接受礼品。²⁷ 这条禁令更加难以施行, 这个社会以人类学家的研究看来, 在许多方面都接近原始社会, 在这里礼物代表建立互惠关系的一种正常方式。当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在南高卢执行任务, 陈述他拒绝接受礼物时, 人们是多么震惊。我们不能简单地推断所有人都习惯于贪腐, 但是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 即掌权者包括审判官都以这种方式彰显自己的荣耀。²⁸ 甚至在圣德尼修道院和卢瓦尔河畔圣伯努瓦 (St-Benoît-sur-Loire) 修道院的院长之间也有争端, 后者指控法官接受了其对手的礼物, 而没有接受他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当事人的眼中, 法官接受礼物, 既是权利也是义务。²⁹

然而, 历史学家认为古代社会任何广泛存在的习俗都必然被所有人接受, 他们把人类学家的学说引申过头了。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 他生活在那个时代, 显然比我们更了解他的世界, 他观察到使用礼物不可避免会导致买通判决, 并且当法官没有收到礼物时, 他们会索贿, 有时甚至会导致当事人破产。802年, 王室使节和巡按钦差改革中提出, 被确定接受了礼物的官员不能正常履职。³⁰ 实际上, 一份礼物通常会换来公开承认的偏爱, 这种方式被当时的道德所接受,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腐败观念。回溯到755年, 国王丕平下令“任何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世俗之人在作为法官时都不得接受非法贿赂, 因为当开始以礼物做交易时, 公正就无存了”³¹。

对皇帝而言, 有效减少滥用职权和腐败的主要手段, 是由自己的使节执行监察。地方法官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采取了对策, 如我们所知的, 使节委员会发出一份通告, 发给他们将要巡访之地的伯爵: “确保你不会和那些想要请愿的人说, ‘在使节走之前闭嘴, 随后我们会在自己的司法机构里协商解决’, 这样的话宫廷的作用就作废了。你们还不如在我们到来前就尽一切可能解决问题。”³² 如果没有别的, 就很难说宫廷官员对省份里发生的事存在错觉。

陪审体制改革

查理认定要优先做的另一事务，就是提高法律从业者的水平和数量，而不增加自由民的负担，他们已经受到了伯爵的过分压迫。毫无疑问，为了回应这一需求，更有效地与腐败斗争，在802年之后，王室使节受命，不仅监管各郡的伯爵，也要接管他们的职能。使节召开“诉讼会”达每年四次之多。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庭的组成得到改革。先前，在召集居民参加“诉讼会”时，会在每个郡内任命陪审成员。改革后，专业的助理法官陪审团建立了起来。他们终身任职，直接受到使节的监督。助理法官从郡中的低级官员中招募，他们可能是公证人员。然而偶尔也会有地方的高级官员，他们可能是文盲，但精于法律事务。他们在固定不变的团体里工作，每郡不少于七人。有时他们甚至会在负责伯爵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实际上，频发给审判官的帝国指令，也可能会像对伯爵、代理神父、百户长一样，解释给助理法官。

从表面上看，改革的益处是明显的，既是因为构建陪审团的助理法官更加专业，也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公职人员，在面对伯爵的压力时，会不那么脆弱。然而，有理由相信，在很多情况下，助理法官没有专业的训练，他们的推选很大程度上受伯爵影响。最为重大的进展可能是废除了在陪审团中任职的义务，这减轻了维系司法体系时给当地民众造成的负担。809年，皇帝特别命令道：“除了助理法官和伯爵的封臣，自由人不被强制出席‘诉讼会’或‘马尔鲁斯’，除非他们自己的案件正在听审。”³³但即使这样，措施也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尽管自由平民个人从费时费钱的“诉讼会”中解脱出来，但伯爵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己的封臣来管理法律诉讼。这预示着司法体系的私人化，这对随后集体自由衰落的影响不容小觑。

法律的多样性

在许多场合，查理指示伯爵们，要基于书面法律判案，而不是基于自己一时的想法。³⁴首要就是尊重程序，即便有的案件伯爵极不情愿去浪费时间。例如，在罪犯被抓现行的时候有一个简便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快得多，但遵守这一程序还是必要的。伯爵没有遵循程序就吊死违法者，将可能被指控杀人，并处罚金。³⁵

为了遵守程序，法官必须通晓法律。因此他们必须拥有许多书籍，因为整个帝国不止一部法典，而且每个人都有权要求按照自己本民族的法律接受审判。丕平在其去世前不久已经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他下令，在阿奎丹“全体成员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就像罗马人和萨利安法兰克人一样。任何来自外省的人，都在其自己故乡的法律之下生活”³⁶。因此一个案子可能会根据萨利克法、里普阿利安法、巴伐利亚法或者伦巴第法来审理。而个人原则，较之地域原则，在现代世界中更为盛行。

在查理的时代，每个省份的本土居民都认为自己应该是独一的民族，以独一的司法传统来认定身份。例如，纽斯特里亚的居民都自视为法兰克人，所有的阿奎丹居民都自视为罗马人，所有意大利王国的居民都自视为伦巴第人。据此，一些学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谈论属地法而不是属人法，但这种区别很容易变为文字游戏。事实上，即使自己迁往他国，每个人也有根据自己所属地域的法律来受审判的权利。法兰克人外迁至每个被新近征服的土地，就意味着那里存在两种有效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有三种，因为有关教会的事务更偏向于适用源自简化的《狄奥多西法典》的罗马法。

因此，在审理案件之前，法官必须与当事人就使用何种法律协商一致。查理告诉一位向他询问如何明确法律费用偿付问题的人时说：“阅读罗马法，你找到就按照上面所写的去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案件涉及萨利克法，并且你找不到该怎么做的参照时，就将问题提交给朕的大会。”³⁷然而，民族法在应对新情况时过于死板，成文形式往往不适当

，仅仅依靠它们的规定来管理司法会受到许多缺陷和矛盾的困扰。因此，它们得到了帝国法令规定的补充。法令本是纯粹的行政管理性质，但常采用指令的性质，而且无论如何都应用到了整个帝国。

这并不是全新的情况，在过去，日耳曼人的国王就可能作出一般性的指示，在自己统治的整个领地内生效，无关民族，这是对民族法的补充。但只有在查理这里，这一法律——先是王室的，随后变成帝国的——变得非常复杂和系统化，完全取代了先前存在的法律。查理充分意识到介入的重要性，其目的是凝聚帝国里的各民族。803年，在对民族法提出了一系列的补充指示后，他命令自己的使节召集民众，解释这一革新，每个人都要签名或画叉。³⁸

此后不久，一些特别敏锐的学者开始发问，每个人与他们本民族的法律传统继续关联是否真的有必要，鉴于他们都是基督徒，也是同一个帝国的臣民。817年，里昂的阿格巴德写信给虔诚者路易，指出此举的荒谬。“五个一同度日甚或列席同座的人，受到同一法律的约束，关乎他们永恒的命运，但他们涉及世俗事务时，遵守的却不是同一法律。”³⁹但这些是与下一代有关的问题，他们成长在帝国中，习惯于统一的力量。查理这一代人乐于调和民族法，这样他们就不用遵守其中的矛盾之处。与此同时，他们从每个人都遵守的本民族传统习俗中，获得民族认同感。

法律的多样性，实际上对法官实际获得真正的法律权限有复杂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法都如查理倡导的那样书面成文。最重要也最具政治意味的例子就是785年萨克森法（*lex Saxonum*）的起草，此时萨克森人完全显示臣服，使其民众融入帝国的计划也在进行中。⁴⁰在此之前，他们的法律靠口头流传。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法律体系也进行了更新，官方试图用修订文本的形式传播信息。法官日常使用的法律手册，直到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才在帝国文书部的直接监督下开始标准化生产。

查理在改革中所做努力的成效，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法令集中所宣称的规范，更多地有道德训诫的意味，而不是现实的准则，这很常见。并且法令没有改变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使审判中盛行轻慢与腐败。当国王反复强调，命令伯爵不要在吃饭后——其目的是防止他们喝醉——召开“诉讼会”时，我们显然不应对司法体系的行为标准有太多的期待。⁴¹然而，尽管考虑到司法体系的局限，公共司法也不仅仅是一个表象，因为所有的自由民都能够在有需要时求助于它，甚至在地方法官犯错时，直接上诉至国王。农民的境遇逐渐恶化，祖辈是自由民的人大量被奴役，这些都在查理死后发生了，其和公共司法体系的衰落和最终消失不无关系。

注释

¹ E. H. Kantorowicz, *Laudes regiae: 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 2a ed. (Berkeley, 1958), 15, 43.其使用的*iudices*一词与同时期其他作者的意思相同：例如参见*Le Liber Pontificalis*, L. Duchesne ed. (Paris, 1955), 1: 495–97。

² CRF, 40, 61, 102, 104.

³ CRF, 64–65, 80.

⁴ 参见第8章，关于作为“审判官”的代理人。

⁵ 参见第8章，关于教会地产的维护人与豁免权。

⁶ CRF, 79.

⁷ CRF, 69.

⁸ Einhardus, 24.

⁹ MGH, *Diplomata Karolinorum*, 1: 148.

¹⁰ CRF, 80.

¹¹ CRF, 31.

¹² CRF, 39.

- 13 Manaresi, 5.
- 14 Manaresi, 7.
- 15 *CRF*, 104.
- 16 参见*Codice diplomatico longobardo*, IV, C. Brühl ed.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no. 65 (Rome, 1981), 1:78–83中776年斯波莱托诉讼会（*Spoletine placitum*）的例子。
- 17 *Lex Baiuvariorum*, IX, S. 18 (in *MGH, 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V/2: 381).
- 18 *CRF*, 41; cf. *Lex Ribuaria*, S.19 (in *MGH, 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II/2: 81).
- 19 *CRF*, 134, 135, 138.
- 20 *MGH, Diplomata Karolinorum*, 1: 102.
- 21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 158–64.
- 22 *Liutprand*, 118 (in *LL*, 186–88).
- 23 *CRF*, 62.
- 24 *CRF*, 20.
- 25 *CRF*, 23, 49.
- 26 Paschasius Radbertus, *Vita Walae*, 1: 26, in *MGH, Scriptores*, 2:543ff.
- 27 *CRF*, 22, 33, 35, 61, 78.
- 28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 498.
- 29 *Miracula Sancti Benedicti*, 24, de Certain ed. (Paris, 1858).
- 30 参见第7章, 注释32。
- 31 “Quia, ubi ipsa dona currunt, iustitia evacuator”: *CRF*, 14. 另见*Alcuini*, 254。
- 32 *CRF*, 85.
- 33 *CRF*, 61.
- 34 *CRF*, 33, 57, 60.
- 35 *CRF*, 52.
- 36 *CRF*, 18.
- 37 *CRF*, 58.

38 *CRF*, 40.

39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 158–64.

40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785年这个时间：参见F.-L. Ganshof, “Charlemagne et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dans la monarchie franque,” in *KdG*, 1: 395。

41 *CRF*, 23, 35, 40.

第10章

知识工程

国王的教育

查理在他的时代令人称奇，死后迅速成为传奇人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知识无限好奇，他涉猎了所有的知识领域。艾因哈德写道，他不仅能轻松说好法兰克母语这种日耳曼方言，拉丁语也行。这记录是可信的，因为纽斯特里亚法兰克人的语言就是一种通用类型的拉丁语，而古典类型的拉丁语可能只是用于学术讨论，因为当时的地方语言缺少充足的词汇。同样可信的记录是，他试图学一点希腊语，这对和拜占庭的外交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很成功，因为他很少试着去说。¹

在学习阅读，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学习阅读拉丁语之外，查理完全可能没有接受真正的正式教育。我们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甚至在他年老时结识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知道。可能宫相的儿子也有某种被认为是必要的正式教育，但这个也无法确定。他的父亲曾经在圣德尼修道院长大，但这也不能确定僧侣们为丕平提供了正式教育。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推测，可能由于其不合法的出身，查理的教育被故意忽视了。这个还未被人关注的问题我们已经处理。²实际上，就他那个时代的法兰克权贵而言

，他的阅读能力可能绰绰有余。

然而，查理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好奇心。他刚刚成年，就四处搜寻能给予他指导的学者。在征服伦巴第王国后，他让比萨的彼得来到宫廷教他拉丁语语法，这与当时的基础教育是一致的。他随后转向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学者阿尔昆，以接受我们所说的中等教育，其基础是我们所说的博雅技艺。对于“三艺”（trivium）中的人文学科，这位王室的学生尤其会研习修辞和逻辑，这些与其演说的爱好很接近，在政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四艺”（quadrivium）中的自然科学，他主要的兴趣在天文学，也曾学过数学；他以热烈的兴趣研究天体运行的轨迹。³这对国王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科目。天空是神的巨大的可复写羊皮卷，神在其中向人类写下自己的信息，若拥有解释它们的能力，就能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事务有极大的帮助。

他对语言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可能是统治这个多民族帝国的艰巨任务，激起了他这种个人偏好。他刚掌握拉丁语语法，就开始为当时还没有语法的法兰克人的语言构建语法。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母语正面临不再被使用的风险，连带着被遗忘的是他所属民族的古代传统。他尽己所能对其进行保护。他转录抄写颂扬古代诸王伟大功业的古代歌谣，并且他想以法兰克人的语言创造特定的词语，表示一年的十二个月和十二种风，这样提及它们时，就不再需要借助拉丁语了。⁴

现代读者可能会感到有趣的是，尽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智力活动，但查理并不知道如何书写。艾因哈德向我们证实，他尝试去学习，并且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在枕头下放置蜡板和羊皮纸，在受失眠困扰时，用来练习书写。但这项作业被证明对年事已高之人太过困难，他没有什么进展。⁵在我们感到优越之前，要记住在那个时代，阅读和书写并不是可以同时学习的两种相关活动。尽管查理拥有阅读者专门为他大声诵读，这是自古就有的标准惯例；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必要时，他知道如何自己阅读，不过书写就是一件难事了。彼时学习不像现在这样基于

书写，而是靠大声诵读和回忆练习。比如，他们可以不写一个单词就学习拉丁语。书写是一种稀少的专业行为，需要精于使用复杂的工具，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实用目的。这是留给专业匠人的。国王唯一需要使用文字的场合就是用羽毛在书信和法令上签字，但是书写一个人的签名，被证明是每个国王都可以默记的技能。显然查理也是这种情况，他的签名和交织字母在众多的法令底部处于明显位置，发挥着效力。

宫廷学者

在文化领域，查理能仰仗一个广大圈子里的学者协助，这些学者是当时能接触的最好的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人，阿尔昆，提及这个圈子时，将之视为一个学会。⁶ 尽管学会之名暗示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组织性和持续性，但其仍被历史学家欣然提起。这些学者大部分并不是法兰克人，这证明了当时法兰克人文化的尴尬处境。许多人来自意大利，例如语法学家比萨的彼得，曾经在德西德里乌斯的宫廷中居于要职；历史学家助祭保罗，除了其他成果，还留给我们一部名著《伦巴第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还有诗人保利努斯，后来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另外有哥特人，来自穆斯林西班牙的难民，包括我们已讲明的几位人物，例如神学家和诗人狄奥多尔夫，查理任命他为奥尔良的主教；还有阿格巴德，另一位神学家和学者，被任命为里昂的大主教。最后，还有众多的爱尔兰人，他们引起了其他宫廷官员的怨恨，然而他们的名字现在对我们并无什么意义了。

最重要的是阿尔昆，他在自己的国家负责约克郡的主教座堂学校。他专于教学，正如他工作的头衔所示，他们主要投身于语法、逻辑、修辞和正词法。实际上几乎所有下一代的学者都曾先后是他的学生。在他的一封书信中，当谈及为宫廷提供教学时，他提到了一所宫廷学校。从此他创造了一个被历史学家所热心关注的说法。⁷ 但阿尔昆的影响力远远超越教育领域。有几次，查理在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向他寻求建议，例如，接受萨克森人和后来阿瓦尔人的皈依，还有他加冕为帝的合法性。⁸ 他可能在查理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几份规划文件的起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广训》和《教化书简》（*Epistola de litteris colendis*），这是两部关于教士及民众的教育和道德的政治宣言。⁹

阿尔昆的效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有不少于五座修道院分配给他，而没有麻烦他立下修道的誓言。这些修道院包括法兰克王国中最古老也最富庶的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他从796年开始就居于此。他的产业十分广大，据说他可以穿越整个帝国，并且总能够在其中的一处地产休息。托雷多（Toledo）的大主教以利班都斯（Elipandus）是其在神学上的论敌，为此严厉地批评他，提出需要两万奴隶工作才能使他保有此等奢华。¹⁰ 实际上，尽管阿尔昆的工作博得清贫的美德，那是学者的真正朋友，但实际上他充斥着财富。¹¹ 他晚年时开始受到这种矛盾的困扰，并且为自己的贪婪感到后悔，害怕会危及自己的灵魂。¹² 为了纠正这一点，根据当时的习俗，他将自己的一些金钱投入祈祷之中，主要方式是给故乡英格兰的教堂送去大量捐赠。

对宫廷学者慷慨回报是宫廷里的通常惯例。给那些已取得神品者授予主教职，给另一些人授予修道院，似乎是国王确保供养自己的顾问最便捷也最为实际的途径。这种对神职薪俸的便捷分配，与查理确信自己的宫廷学者是帝国力量一大支柱的观念相一致。这种分配确立了一种制度传统，在他自己的统治下起到了作用，但之后这个制度衰落了。毫无疑问以这种方式投资教会的财富很适合查理，与其说学者们称他为语法博士、修辞大师、最杰出的逻辑学家，超越加图（Cato）、西塞罗和荷马，给他带来快慰，¹³ 不如说发展帝国的意识形态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锐如刀剑的笔锋，时刻准备介入任何神学争论。

在学者群体中出现了苦斗，就如狄奥多尔夫和阿尔昆之间的那样。796年，两人都被要求为阿德里安教宗创作一篇墓志铭，镌刻在大理石板上，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的继任者利奥三世。最后国王选择了阿尔昆的文本。两人都深入《圣经》的修订工作中，这是查理改革方案的一大优先要务。但这次，阿尔昆提交的文本又比狄奥多尔夫更为成功，而后者在现在看来无疑更为前卫。不感意外，随后奥尔良的主教心有记恨，他在讽刺文中以嘲讽阿尔昆为乐，嘲讽他在谜语中卖弄才学，嘲讽他对粥的狂热喜好，尤其是往粥里大量洒入葡萄酒或啤酒。¹⁴ 阿尔昆在图

尔任职后，如法回应，他拒绝移交一名从奥尔良逃走的获刑之人，并且在圣马丁的会堂为他提供庇护。他试图把一切丑闻归咎于狄奥多尔夫，并写信给皇帝，是他（狄奥多尔夫）而不是那个负罪之人应该锁入镣铐之中。¹⁵

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值得强调的事实是，这一代学者在整个查理统治时期并未一直都留在宫廷。比萨的彼得和保利努斯在776年以后才来到这里，阿尔昆、助祭保罗、狄奥多尔夫782年左右入侍王伴，随后助祭保罗在787年左右回到了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当保利努斯被任命为阿奎莱亚的宗主教时，他已回归自己奇维达莱的教座有些时日了。比萨的保罗似乎在790年左右回到了意大利。在790年至793年在母国英格兰长期留驻之后，阿尔昆在796年离开宫廷，就任自己在图尔的修道院的职位。狄奥多尔夫797年成为奥尔良的主教。当然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为国王工作，他们与之有许多通信，除此之外，他们可能被要求在年度集会上和其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一起定期拜访国王。但到了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种日常的亲密关系就不再存在。这实际上是大规模介入文化领域的时代，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语言从墨洛温时代广泛存在的语法和修辞错误中解脱出来，有意识地回归古典用法。似乎这种改革直接与阿尔昆以及其他学者的到来有关。在他们的国家，拉丁语知识比在高卢保存得更好。

当他们去世，或者我们可称之为退隐之后，阿尔昆这一代学者被他们培养的本土学者取代，他们是成长在文化与权力中心的自信青年。其中包括诗人安吉尔伯特，他自觉无愧于朋友所给的“荷马”称号，并且长期和查理的一个女儿有声名狼藉的关系；另一位诗人，莫都努斯（Modoinus），被人拿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的名字戏称为“纳索”“奥维德”，后来成为欧坦（Autun）的主教；尤其是艾因哈德，他成了查理的传记作者。在宫廷中，艾因哈德主要以拉丁语文学的专业领袖著称，但到了查理统治的后期，他被用于重要的外交任务。例如，806年，查理派遣艾因哈德去罗马，将自己给三个儿子划分

帝国的计划知会教宗。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创作时间未知，但肯定是在查理死后，可能是许多年后，那时有关查理的回忆逐渐被淡忘。那些年，帝国开始受虔诚者路易的软弱和诸子纷争的影响。艾因哈德因此从宫廷隐退，在自己的塞利根施塔特修道院安享晚年，他一定觉得有必要整理出自己的回忆，写下自己在其麾下度过青年时代的伟大帝王之颂词。

教会改革

复兴还是有限的改革？

尽管查理对文化领域有极大的兴趣，但也不要搞混淆了：他实施的改革方案，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其基本的理想是提升教士的教育水平，整顿他们的作风，这并非新事。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的基督教皇帝，和后来罗马—蛮族国度的君王，都曾多次订立这一目标。“不行整顿者亦不得统治。”古代晚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o di Siviglia）如此写道。并且他进一步警告统治者，神会根据他们王国内信仰的教导情况来评判他们。以神的恩典统治基督教，查理终其一生的强烈想法就是，他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保证教士的道德和受教育水平，他们向臣民传播上帝之言。这可能是最为重大的责任。

因此皇帝进行如此具有文化意义的改革，其首要动因是宗教。正如他们那时所言，基督教是一种基于书籍的宗教，查理认为书籍准确、经过修订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正统信仰的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一个语法错误可能会导致人们以错误的方式祈祷，会使神不悦。“任何想以正直为人之道取悦于神的人，也一定不能忽视以正确的言谈取悦于他。”查理在一则给自己王国内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通告中如此写道。“确实有这样的文字，‘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12：37）。”¹⁶ 出于同样的原因，神父必须很好地掌控用来写下圣书的语言和他们用来祈祷的语言，在他们称呼上帝时，避免硬伤。789年的大法令《广训》，号召教会遵守长久以来被遗忘和践踏的古代教规。其中强调，为实现这一目标，关于拉丁语这种礼拜仪

式语言的正确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教士要去上好学校，主教要关注神父的才智训练，甚至在广大帝国的最偏远教区也是如此。¹⁷

查理宫廷中书写的典雅拉丁文，和之前几个世纪的蛮族语言形式截然不同，是古典六步格诗的浮华形式。为其效力期间，作家们以这种文字接连著书。这只是他们努力的最表面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截然不同。加洛林文艺复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时代：文化尤其是教育复兴了，其目的是表达改革的决心、修正教会工作的方法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目的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恢复理想中的纯粹，这种纯粹已经被过往岁月和人类软弱的破坏性影响所腐蚀。加洛林的知识分子，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注重原创，在神学和礼拜仪式上尤其如此。里昂的弗洛鲁斯（Florus）写下了对一次主教集会的惊讶感受，主教中的一员，梅斯的阿马拉留斯（Amalarius）被问及自己在哪里读到自己布道的教义时，“回复道，他既不是从经卷上读到的，也不是由教堂神父教导传授的，甚至也不是来自异端，而是来自自己心中”。主教们齐声回复道，“这就是错误的精神！”¹⁸ 历史学家想要以其他词语取代“复兴”（renaissance）这个因为常被使用而变得根深蒂固的词语，不无道理；他们想换成不太会造成误导的词语“纠正”（rectificazione），即教育和行为方式的“纠正”。¹⁹

卡洛曼与丕平治下的改革

查理的个性无疑对改革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帝推行这一雄才大略的计划时，比前任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但他的父亲丕平、叔父卡洛曼也曾意识到需要做些事情。741年，卡洛曼接手了查理·马特的烂摊子，后者更专注于战争领域而不是学术和宗教领域。教育在高卢几近消失，智力生活已经减退到了十分衰弱的境地。只有屈指可数的修道院保留了一些还过得去的活力，鲜有神学和文学作品的痕迹，甚至

在手稿抄写方面也是这样。王室判决甚至法令中的拉丁文，足以让最为宽松的学校教师气得发抖。

对于法兰克教会，742年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卜尼法斯这么向教宗扎加利描绘它的状况：

据最年长的主教说，他们已经有超过八十年没有集会见面了。他们没有大主教。大部分的主教职被贪得无厌的俗人或不贞、放荡、世俗的教士占据。主教们没有谁宣称不私通奸淫的，他们酗酒，玩忽职守，狩猎消遣。助祭，或者最起码说有此头衔的人，是生活在罪恶中的人；他们纳四五十名姬妾在床，但在诵读福音书或者获取司铎职甚至主教职时毫不感觉羞耻。

20

修道院和属于主教区的财产，在宫相与对手的斗争期间受到了大规模的掠夺，留给它们的只有贫穷和无力。因此，如果加洛林家族的宫相们想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根基，在基督徒的眼中成为可信的信仰守护者，那么法兰克教会的改革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首要的。

查理·马特死后，改革立刻热烈开始，由丕平和卡洛曼共同发起，可能后者牵涉的更多。最初由卜尼法斯指导改革，他被教宗授予了广泛的权力。随后是法兰克人例如梅斯的主教克洛德冈（Chrodegang）、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福尔拉都斯。后者在查理统治早期站在他这边。两位教友起草的法令不断重申同一个举措：每座城市都需要一个主教，教区内的所有教士都要服从他。每一年，主教都要在宗教会议上会面，向君主报告他们的进展情况。从教会非法夺取的财富要归还。修士和修女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自己的修院。私通奸淫的神父和助祭要降职，强行忏悔。宫相不惜使用责打、监禁且只提供面包和水等严厉方式惩处犯罪，尽全力“恢复上帝的律法，以及在过去君王时代已经沦落消散的教会信仰，

以期基督徒能得到灵魂的拯救，不受错误神父虚伪欺诈的戕害”²¹。

卡洛曼和丕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官员拉入改革之战中，并且告诉他们，要把自己看成自己辖区内教会的守卫者。伯爵不仅领命根除一切残存的异教余毒，也被期待以强力保证神父被召集到年度宗教会议时服从他们的主教。当然，他们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伯爵可以介入教会司法，那些犯下抗命之罪的人，还要受主教的司法权管辖。但是，那些不参加宗教会议的神父被处罚的60苏勒德斯金币巨额罚款，是由伯爵征收，并纳入王室财库。²² 查理的童年时代就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存在：以宣称保护教会为名，国王及其官员实际上施行着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权力，既野蛮又简单。然而，其结果证明总体而言是积极的，因为教会首先也最为需要得到保护，免受来自自身的侵害。

大主教教座是保证主教遵守纪律的基础，但是，正如卜尼法斯曾经抱怨的，在大主教的指导之下聚集各主教区，且副主教与主教都服从于他，这种惯例已经在高卢消失了。这一趋势被卜尼法斯扭转，他在卡洛曼同意之下，被教宗任命为大主教。为了不落后于自己的兄弟，丕平也急切地重建了两个传统的大主教教座：桑斯和兰斯。与此同时，卜尼法斯也回归了自己的本职，在美因茨建立了自己的大主教区，作为协调莱茵河彼岸传教工作的中心，并向基督教化的日耳曼任命新的主教。

查理基于《广训》的改革

因此，查理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已经在致力改革的教会，即便他发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出所料，这位年轻国王做出的第一个举措，很大程度上就是追随父亲和叔父的脚步，主要关注教士的道德和风气，以及先前时有调控的世俗问题，比如基于宗教立场的婚姻问题。最终，他推出了一些举措保证教会有必要的资源去体面地履行自己的使

命。方式是强迫所有人缴纳什一税供养教士，“无论他们是否情愿”，正如丕平如此断然的命令所说。²³

查理也完成了自己前任为恢复教会辖区所做的工作。在丕平的时代，经常发生主教职空缺或被当地修道院院长临时任命的世俗权贵攫取职位的情况。查理设法祛除陈疾，保证每个主教区都有一名真正的主教。甚至他刚登上王位就系统地着手恢复大主教的工作，几年之内，所有的古代大主教区就恢复了自己的职权。自然这不仅对教牧活动有益，也对政府有益，要考虑到大主教是连接国王和副主教之间的命令架构的一部分，他们会向副手传递来自宫廷的命令和召唤。不出意料，他们也定期被任命为王室使节。

从789年《广训》颁布之日起，查理与教会有关的举措，其范围较之前任突然扩大了。他不再被称作法兰克人的国王，而是全体基督徒的君主，并且呼吁遵守古代的教规，这不仅具有道德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这不再仅仅是一个与法兰克教士的腐败和轻慢作斗争的问题：现在所有人，教俗两界，都卷入了教宗组织的伟大征程中，旨在普世改良。十五年前教宗阿德里安一世就为查理颁布了一部教会法令集，被称为《狄奥尼修-哈德良教令》（Dionysio-Hadriana），它构成了789年所颁布文本的主体部分。这些规定，是几世纪来由众多的教宗和公会议在国王的请求和教廷的指导下确立下来的。它们成为统一于皇帝权杖之下的西部地区基督教生活的基础。

在《广训》的前言中，查理已经被称为一个新的大卫、新的所罗门，并展望着《圣经》中的另一个模范，约书亚。“确实，朕在《列王纪》中读到，圣洁的约书亚试图在神赐予他的王国里恢复对真神的崇拜，他巡游全国，警省世人。我不敢自比他的圣洁，但我们必须追随圣贤的榜样。”²⁴他投身于继承自前辈的改革事业，现在它转变成了查理自己的雄心壮志，甚至是乌托邦计划：劝说基督徒真正像兄弟的团体一样生活。尽管这个计划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这个君主向他所有的民众，无

论教俗、贫富，提出并邀约，请他们生活在和平与公正之中，以福音书中的善意爱自己的邻人，其中蕴含着无可置疑的伟大。

国王提出的改革，立刻被他得力的主教们所推行。在8世纪的最后几年和9世纪的头几年，许多主教效法阿尔昆的榜样，写下小册子，向他们的教士解释主要的礼拜问题，尤其强调洗礼和赎罪。这些小册子通常题献给国王，他充分赞成他们所主张的目标，即保证主持圣礼不会退化成为一种死板的仪式，而是蕴含着对礼拜仪式中神秘象征的真正理解。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曾提出，主教制度的运行是为了“指导神父们，并通过他们的忠诚去解释文辞和圣礼仪式的含义，并引导他们穿越象征与符号的困难领域，以考验他们的教导能力”²⁵。查理确切地感受到教导的使命，他孜孜不倦地将之传达给教士，尽一切努力将影响传递给全体基督教教众。

此外，皇帝并不是在搭建空中楼阁。他频繁召集会议，其显示出主教参与的固定特点。实际上，主教们通常作为国王的高级官员被召集参加年度集会，这使得确定查理统治时期召集宗教会议的确切次数变得很困难。不过我们不会太偏离事实，我们可以宣称，在总计四十六年中，最起码有十八年国王都召集并出席了一次重要的教会会议。并且像794年在法兰克福那样，他时常会主持会议。因此，在查理出生之时已有八十年未曾举行过会议的法兰克教会，现在在国王提议的改革之中，形成了几乎不变的集会合作惯例。在同一时期，在罗马只举行了三次会议，包括800年审判利奥教宗的那一次，这种对比可证实：论资质，领导西部教会的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教宗。此外，会议所达成的结论，哪怕涉及修订教规，也通常以法令集的形式公布，因此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晚些年推出的举措

查理首要关心的，依旧是教士的教育和道德。802年，随着加冕为

帝，君主颁布了范围广泛的举措，它们总体而言让人回想起了《广训》里的道德义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越。皇帝意识到了自己新的责任，他召集臣民与他合作，并且个人尽自己权力之内的一切所能，建立起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和正义，“因为他，皇帝陛下，不能单独躬临每个人去致以适当的关怀和纠正的举措”²⁶。树立好的榜样，要取决于主教、修道院院长、神父和僧侣，皇帝专门为他们建立了一连串规定。最初的规定是一般性的，随后分类且细化，这暗示他收到来自各个省份的报告，谴责广泛存在失德行为。

这一次，不再有针对违纪、失德、非法同居、买卖圣职、滥饮、暴力、侵占挪用以及抗命等行为老生常谈般的无尽训诫。皇帝向各省份派出使节，带着特别准备的问卷，并授权他们对全体教士，不分教阶，进行彻底调查。必须全面检查他们的教义教育水平，让他们背诵祷文，检查正确性；让他们吟唱诗篇，检查他们是否遵循罗马传统。考虑到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不是其自身，而是旨在提高整体民众的教育水平，故他们也必须询问世俗之人，保证每个人都知晓信经，牢记主祷文。曾经在主显节期间，皇帝出席一大群孩子的集体洗礼，他决定检测下教父们实际准备的情况如何。他一个一个检查他们的信经和主祷文，“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些”，结果让查理惊骇不已。²⁷

但他主要关注的还是教士的行止。几年之后，811年，皇帝想开展另一次调查，这一次他想亲自来做。帝国的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被召集到亚琛参加年度集会。在那里他们对他们询问什么，我们知之甚少，他的询问偶或变成充满讽刺的长篇激烈演说。

告诉朕放弃尘世生活意味着什么？你们如何识别谁放弃了尘世？谁还生活在尘世中？只是他们不能携带武器，不能合法结婚吗？告诉朕，当一个人每天都不择手段意图增加自己的财富，以天堂的极乐和地狱的永恒受难怂恿恐吓他人，清除对他

们财产的无知，戕害他们的后嗣，这样的人是否真的放弃了俗务？²⁸

从这些询问中呈现出的法兰克教会的形象，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主教与教士们依旧畜养鹰犬行猎。在一些修道院里，见不得人之事还是时有发生，在各地，神父和僧侣还是或多或少地关注个人的私事、和女人同居、携带刀剑、从事放贷、在客栈中饮酒。年迈的皇帝纠正这些糟糕现实的努力似乎成了空想，并且多年以后还需要重申同样的禁令，这一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的徒劳。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从811年的质询之后，教会中的违纪行为在增多，因此帝国权威有一定的崩溃。他们得出结论，查理大帝统治的最后几年，要视作一段衰落和失败的时期，这位老人针对这些现象的责骂，只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标志。²⁹

实际有所不同。皇帝所认定的众多教士的举止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没有理由相信事情在临近他814年驾崩的那些年里明显恶化。因此802年和811年推行的举措，是皇帝特定意向的产物，而不是外部环境的产物。这些意向建立在他深思熟虑、坚信不疑的信念之上。他多年来追求这些信念，通过阅读帝国法令的文本，很容易确定它们的发展路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在像他的前任一样发布命令，要求帝国内的所有僧侣应该遵守本笃会规章之后，查理大帝显然开始有一些疑虑，试图在高卢寻找，是否有僧侣在推行这套规章之前就众所周知是出身于意大利的。当证明有这种人后，他想从教士那里查明他们曾经遵守的是什么规章，“因为朕曾经读到，圣马丁是一位僧侣，他手下有很多僧侣，生活在圣本笃生前很久远的时代”³⁰。

有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更关注教士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更偏爱擅长唱诵而不是为人诚实的教士。在他针对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斥责中，可以发现同样平静而理性的倾向。

要明确，唱诵和阅读的技能，在教会中并不是完全被轻视的，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鼓励。然而，万物是平等的，我们的观点是吟唱中的瑕疵比为人的瑕疵更能被接受。尽管教堂的建筑美丽是一件好事，但善行的装饰比建筑更美好。因为朕相信，教堂的构造确实与旧约相关，而严格来说，对举止的提升，属于新约和基督的教导。³¹

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以极其正式的方式体验宗教。这些论证所揭示出的区分形式和实质的能力，已经足以证明查理对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的思考有多么深刻。

皇帝后来采取的举措显然反映出了一些先知的风格，这需要引起一些关注。我们会跳到结论，认为在这个阶段，这个老人已经无法再控制世界，他与它脱节了。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要思考他是否是故意冒着乌托邦般的过火风险。让所有基督徒真正生活在神圣的律法之下、生活在福音书所传达的和谐之中，我们无须质疑这一计划的乌托邦本质。但是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时刻，值得去冒这个风险，并且就是此时？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在上帝授膏的皇帝领导之下，他四周的异教徒都在基督胜利的旗帜下低头。如果不是此时，更待何时？

礼拜仪式与教育的改革

礼拜仪式的标准化

在改革的氛围中，查理主要关心的一点就是修正礼拜书籍，这是帝国无数教堂中神父每天举行的复杂仪式的基础。仪式的正确进行，是使上帝满意的核心，这样他就会向自己的子民展现出善意。尽管艾因哈德告诉我们，查理和其他信众一样，避免在礼拜期间诵读，并且只低声伴唱圣歌，但他非常关心文本在文献学上的正确性和圣歌的确切发音，自己亲身参与，并成为真正的专家。³²《广训》中说道：“一些想更为得体地向上帝祈祷的民众，却因为不正确的书籍而错误地祈祷。”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要阻止初学者在阅读和书写神圣的文本时向文本中引入错误，“如果需要誊写福音书、圣诗和弥撒文，要由成年人书写”³³。

尽管当时人们的想法不像马基雅维利之后那样，认为区分宗教和政治是有用处的，但这些举措也有政治性的一面。考虑到帝国是一个整体，即基督教世界，各地的礼拜仪式都必须以统一的方式主持。鉴于宗教法统是基于与罗马教宗的联盟，推行罗马礼拜仪式最为合适。这个决策也意味着抵制一切拜占庭的影响，这明显也富含政治意义。丕平国王在过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今官方效仿他的范例，要求帝国内所有教堂的神父都要以罗马仪式唱诵圣诗，由政府出资为他们提供抄本。这意味着法兰克放弃了在高卢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本地传统。

改革并没有这么简单。785年，查理请求教宗送给他一份关于格里高利圣礼的抄本，陈述在罗马施行的礼拜仪式。³⁴但是，当珍贵的手

抄本送达后，人们就意识到在制作副本之前，需要一次重大的修订。罗马送来的文本实际上是五十年前的，已经不再反映永恒之城实际使用的礼拜仪式情况。也许教宗误解了查理的事由，认为他想要一份礼物而不是一件工具，因此送给了他一份价值昂贵但过时的古抄本。修订花费了几年的工作，主要由阿尔昆组织。格里高利圣礼必须与正在使用的礼拜仪式文献对照。遗失的篇章要补充，文法的错误要修正。为了给遍及整个帝国的礼拜仪式实践创造一个有效的标准化工具，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必要的。

不要高估改革的结果。一个世纪后，诺特克提及这些举措时，感到惊奇甚至是难以置信。“这些事，”他写道，“我们当代人会觉得很难相信。实际上，我自己写下它们时，鉴于我们的圣歌和罗马人的之间有巨大不同，我也倾向于不去相信。”³⁵ 这位日耳曼僧侣继续写了一个故事，即教宗在查理的要求下，送来了十二位精于唱诵圣诗的教士，向法兰克王国引入罗马的礼拜习俗。“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总是嫉妒法兰克人的荣耀”，教士们商定在各地教授另一种有弊病的仪式。在骗局被揭穿后，法兰克教士隐姓埋名前往罗马去研习这些习俗，并将其带回故土；否则恶意的罗马人会使他们永远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个故事显然是伪造的，但是其至少证明了国王试图根除陈习、为其多民族的教士们施加统一模式时所遭遇的困难。

修订《圣经》

所有用于圣礼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显然就是《圣经》。查理一直关心制作一个改进校正过的《圣经》版本，以取代当时教士们所使用的充满错误、有失偏颇的文本。这一挑战吸引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具有学术能力又拥有资金和组织资源的人。所有这些提交自己版本的人物中，一些人不太有名，例如科尔比修道院院长莫德拉姆努斯（Mordram

nus）、梅斯的主教阿吉尔拉姆努斯。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如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还有阿尔昆自己，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都致力于这一工作，当时他是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

现在，我们认为狄奥多尔夫版文本的价值超过其他人的。他的作品十分具有现代性，在传统手抄本中每一段诵读起点的页边空白处都提供了注释。现代学者对阿尔昆的版本嗤之以鼻，但他的作品在当时大获成功。原因与他作品的文献质量关系不大，更多取决于他在宫廷中享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可供他支配的巨额财产。市场被阿尔昆版《圣经》所充斥，图尔誊抄室生产的抄本十分奢华，大开本，插图丰富，非常适合作为厚礼，所以我们现在拥有这一版本的数量远多于狄奥多尔夫在奥尔良监制的版本。后者使用小开本，书写紧凑，配备的批注显然超过了当时的需要。

增加学校出勤

学习拉丁文的教科书也和《圣经》、礼拜仪式文献一样重要，因为要培训有教养且见多识广的教士主持教堂，它们至关重要。在知会王国内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通告，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教化书简》之中，查理谈及，他经常收到一些修道院的来信，在其中他感受到了那些为他祈祷的僧侣们的热忱。他说，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语言充满了错误，笔者的学识不堪配自己的虔敬。“因此，朕担心他们的写作不够熟练，可能对神圣经典更不熟识，朕深知不正确地使用文辞是危险的，意思的错误是最为危险的。”³⁶查理继续论述，《圣经》不是由简单的语言写就的，而是充满了修辞手法。任何想要理解其精神含义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文学训练。国王随后明确命令道，从即日起，神父和僧侣都要投身研习拉丁文，以其为他们的宗教义务之首。

在这个背景下，复兴教会学校变得势在必行。789年，《广训》命

令神父召集男童进行指导，无论男童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出身。随之开办学校教授“圣诗、注解、唱诵、教会历法和文法”³⁷。尽管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潦草的指示才能被视作真正的教育改革，但已经存在一个明确的战略目的。后来由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发布的教区法令证实了他们的实际行动。³⁸ 所有的神父都被要求在基础教育中授业，这意味着用拉丁语阅读。想要继续学业的男童被送到主教城市的教堂学校和修院学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兰克的宗教会议时常会讨论开办和维持乡村学校的问题。他们顾虑颇深，暗示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³⁹

唯一不依赖于教会组织的学校，就是在帝国宫廷中为官宦子弟可能还包括仆从开办的学校。诺特克讲述的故事中最有名的一则就是描述查理忙于纠正这些孩子们提交的作业。那些出身低微的孩子学习努力，远超过预期。那些来自高贵家庭的则很懈怠。皇帝模仿末日审判中的基督，将最好的学生唤到他的右侧，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我会赐予你们最富庶的主教区和修道院，我会一直以你们为荣。”他直率地告诉其他人，自己毫不在意他们的贵族出身，他们如果认为仅凭自己是要人的子弟就能拥有成功的事业，那就大错特错了。⁴⁰ 这则逸闻很好地阐释了查理的体制下宫廷学校的真正意义。这里是教会最高级官员的摇篮，他们要热忱地为皇帝效力，而各主教堂学校要根据各地的水平复制其培训体系。

书籍与图书馆

制书业

和教育改革一样，查理同样也为图书馆殚精竭虑。在当时，鉴于羊皮纸的花费和所需的专业劳动力，做一本书需要相当可观的投入。国王的政策鼓励这样的投入，在必要时资助那些意图扩大自己图书馆的修道院。首先，要在宫廷里建设一座图书馆，据我们所知，查理即位之时在宫廷里几乎找不到一本书。这项工作在8世纪80年代才开始，那时宫廷成为学术讨论和文学作品创作的中心。国王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拥有古典作家和教父作品的人，要将作品或其抄本作为礼物献给他。⁴¹一旦宫廷图书馆建成，就可以整理那些全国之内国王想使用的文献的可靠副本。其中既有助祭保罗专门受托而作的劝诫书，也有查理在卡西诺山亲自下令颁行的本笃会规章，据信这份规章是圣本笃亲笔书写的文本的副本。⁴²

在保持精工细作的同时，制书业在加洛林时代经历了一次相当大的扩张。基督教最初的八百年为我们提供了总计1,800份拉丁文手稿，而9世纪保存下来的就超过7,000份。《圣经》和礼拜书，是教士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例如，圣马丁修道院的誊抄室每年就至少出产两套《圣经》，这些《圣经》通过帝国宫廷，分配到最偏远的主教和修道院。如果我们考虑到仅仅制作一部《圣经》的羊皮纸需要宰杀数百只羊，就能理解这项工作的浩大。装帧也花费不菲。查理将一片森林连同其中的鹿群一起捐赠给了圣德尼修道院，这样他们就有皮革来装订修道院图书馆的书。⁴³

图尔出产的每一份手抄本都需要一个僧侣团队的艰苦努力，僧侣和修女共同做的这一系列工作被其他作坊的文献记录了下来。一部圣奥古斯丁《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的抄本，就由一个14位修女的团队制作出来，她们在书籍装订时，要同时处理33折不同的书稿。⁴⁴ 单独一个抄写员也可以负责整部手抄本，例如阿伽姆伯特（Agambert）在抄写完成圣哲罗姆的《评注》（*Commentarii*）之后，加入了一条注释，说他在34天内就完成了工作，从806年7月1日到8月4日，平均每天11页。⁴⁵ 大部分抄写者是僧侣，但有理由相信为主教座堂工作的教士，有时甚至是专业的世俗之人也被动用来生产手抄本。

制书的增长不只适用于《圣经》，也适用于教父的作品。当时编年史家和圣徒传记的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也得到了重视和传播，同样的还有古典时期拉丁语作家的作品，它们因为加洛林抄本而保存至今。除了神学文献，查理的图书馆也囊括了卢坎（Lucan）、泰伦斯（Terence）、尤维纳尔（Juvenal）、提布鲁斯（Tibullus）、贺拉斯（Horace）、马提亚尔（Martial）、西塞罗、李维和撒路斯特（Sallust）的作品。许多这类文献都在宫廷里复制，供给重要的修道院图书馆。对古代世俗文学的兴趣是查理时代的特征之一，至少在表面上证明了“复兴”之名得自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苏。

与传说相反，古典文献并没有埋没于修道院的图书馆，而是流通了起来。主要的学者，往往是一所或多所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互相闻名，似乎忙于借还图书，用于抄写复制。费里埃（Ferrières）修道院院长卢普斯（Lupus）写信给当时塞利根施塔特修道院院长艾因哈德，为不能归还奥卢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而道歉，因为另一位修道院院长，富尔达的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正用其为自己的图书馆制作一本副本。⁴⁶ 主要的修道院图书馆的目录是公开的，所以图书管理员可以查阅它们，开始通过繁杂手续借阅他们感兴趣的手抄本，并进行抄写。古代晚期的文学作品读起来令人愉悦，宫廷诗歌被认为直接追随了这一传统，并且依旧具有生

气，不只是如人文主义者那般模仿。由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口述的对查理的赞美诗，即使放在狄奥多里克大帝位于拉韦纳的宏伟宫廷之中，也不失其度。⁴⁷

文化并没有被教会中人所独占。然而查理身边的学人大部分是教士，他们几乎所有人最终都成为主教、一或多处修道院的院长，少数人名义上是俗人。一个例子就是安吉尔伯特，他与查理的一个女儿有着长期的关系（他们的一个儿子尼塔德成了史学家）。他向圣里基耶修道院捐献了两百本书，他已就任院长，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⁴⁸ 书籍在贵族家庭中也并没有消失，大部分是宗教书籍，可能主要是由妻子和女儿来使用。比起发展修道院，建立代代相传的永久图书馆的冲动则没有那么明显。在他的遗嘱里，查理大帝亲自规定，任何想要购买他的书籍的人，都要出合适的价格，所得钱财要发放给穷人。⁴⁹ 手抄本的高昂价格显然会影响他们的认知方式，也意味着其价值不仅限于自身所包含的知识。但在今天，学者的藏书经常在自己死后就流散了。

加洛林小写字体

加洛林文化复兴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我们今天仍用于印刷的字体。查理成为国王之时，抄写员最常使用的字体是刻意复杂化的，满是草书、花体和数不尽的笔锋，只有高卢少数修道院的抄写室尝试用更为实用的字体。这种字体字母统一、整齐对称，最重要的是清晰易读。这种字体专业名称为加洛林小写体（*minuscola*），在查理的时代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逐渐取代广阔帝国领地内之前使用的各种字体。正如巴托里·朗热利（*Bartoli Langeli*）所说，这引导并创造了“一种欧洲字体，在随后的众多世纪里于一切书写实践中都留下了印记，直到今日。无人知晓还会继续多长时间”⁵⁰。这就是加洛林字体，其有意模仿古代文字，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印刷者青睐这种字体，现代字体也源于它。

专业人士倾向于否认将加洛林小写体的成功归功于查理的特别要求，我们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存在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皇帝十分关心不称职的抄写员给神学文献带来的错误。因此创造这种尽可能清晰易读的字体，很可能与他自己的目的一致。尽管没有刻意谋划，但实际上加洛林的学者在宫廷效力一段时间后，经常被调往远方的主教区和修道院。他们随身携带书籍，在那里他们会致力于增加书籍的生产，抄写宫廷图书馆里的作品。这就足以解释，尽管在查理的时代各地变体字依旧存在，但一种统一的书写形式还是逐渐确立下来。新字体的传播可以完全看作推动帝国宗教和智力生活统一的工作之一部分，是加洛林历代帝王们卓有成效的政策。

甚至我们今天使用的标点，本质上也是那些聚集于查理宫廷的学者们的遗迹。阿尔昆、科尔比修道院院长莫德拉姆努斯致力于让他们抄写室的抄写员采用一种统一的符号体系，代替之前因人而异的任意标准。问号在这个时代的手稿中第一次出现，一个弯曲的形状明确预示了其现今通行的样式。

守护信仰

保卫正统

查理频繁介入神学领域，与教宗竞争，并时常与他有分歧，这证实了其在宗教领域的治理计划。他认为必须介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嗣子说”（adoptionism），这个学说由西班牙主教托雷多的以利班都斯和乌尔戈尔的菲利克斯（Felix di Urgel）提出，据此观点，基督只是神的养子。两位高级教士，后者定居在近期并入法兰克王国的比利牛斯边区，然而前者是一位“不信教之地”（in partibus infidelium）的主教，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在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核心区工作。不是教宗，而是法兰克国王组织了针对他们学说的讨论。这证实了，甚至在加冕为帝之前，查理就已经认为自己是西部基督教的最高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教会继续运行，并不是处于地下状态，而是享受着阿拉伯政权的宽容政策。这个教会的主教必然和比利牛斯山彼侧的教友联系很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神学能采用其他地区认为不正统的形式。托雷多的以利班都斯无法被管到，但792年，乌尔戈尔的菲利克斯被邀约现身雷根斯堡的王室行宫。在那，法兰克主教会议斥责他的学说为异端，随后将他送往罗马，让他在阿德里安教宗面前放弃自己的错误。菲利克斯回到故乡后，恢复了原先的信仰，随后在塞普提马尼亚（Settimania）、现在的朗格多克（Languedoc）开始传播学说，这里有许多来自西班牙的难民。也就是在此时，查理开始公开表明自己是正统的守护者，与离经叛道的拜占庭作斗争，他一定对传入耳中的惊人指控十分恼火。

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集会讨论希腊人的神学地位问题，并涉及圣像崇拜问题。议程中添加了“嗣子说”问题，对之进行了充分谴责。之后，阿尔昆等人持续写信给以利班都斯和菲利克斯，敦促他们放弃自己的学说。两位主教不为所动，甚至798年，当教宗利奥三世决定涉足此事，公开宣布将此新异端逐出教门时，他们还是如此。第二年，国王召唤菲利克斯前来，并在亚琛证明他的举动合法。宫廷中的学者们毫不质疑这些出自国王权威的举措。阿尔昆给菲利克斯写信道，他必须前来，并“向国王解释自己所信仰的教义”⁵¹。正如克劳迪欧·莱昂纳迪（Claudio Leonardi）评论所言，是国王来检验并压制离经叛道之说：“宗教法庭在宫廷之中。”⁵²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宗教法庭，只是完全没有之后时代的残酷。就如菲利克斯，他在与阿尔昆的公开讨论中落败后，安然回到西班牙的家中，多年来继续向愿意聆听他的人传布自己的学说。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查理认为自己要亲自为正统信仰负责，教宗只是他身后一个辅助的角色。

法兰克福宗教会议非常具有象征性，法兰克国王的角色现在成了西部基督教的首脑。这次宗教会议，应国王的要求而召集，讨论他的议程，清楚地意图成为一次普世公会议。意大利、盎格鲁-撒克逊和西班牙的主教与法兰克主教并席而坐。然而地点的选择史无前例，这证明了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严重偏向法兰克王国。讨论的确实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包括嗣子说，也谴责了787年东部主教们在尼西亚集会时所宣称的圣像崇拜。⁵³如果我们思量这次国王召集的普世公会议^①是如何决定谴责尼西亚的结论、公开反对教宗所声明的底线，我们就能判断查理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他设法让教会阶层接受他作为教会的真正领导，甚至事关纯粹的神学问题时也是如此。

皇帝涉足所谓的“和子说”（filioque）问题，同样也是很大胆的。今天，几乎没有天主教徒在背诵信经时会意识到，他们是在重复查理大帝亲自确定的教义。最初在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中，对于怎么解释第一次用希腊文写下的传统文献，基督徒中就存在分歧。正教的教士认为，

圣灵自圣父通过圣子而出。西部拉丁教会倾向于相信圣灵同等地自圣父和圣子而出。拉丁语“filioque”意为“和（来自）圣子”，尽管这一术语在希腊文文献中并不存在，但还是被引入了信经的教义中。查理加冕为帝几年之后，在耶路撒冷附近橄榄山任职的法兰克僧侣与圣撒巴（St. Sabas）修院的僧侣起了争论，并请求教宗介入，问题就在于帝国礼拜堂的礼拜仪式是基于“和子说”的教义。

那时罗马处于正教基督徒之中，在此有更多古老的教义还在使用，因此教宗认为法兰克僧侣是错的。但这个问题意义重大，他想听听查理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皇帝没有考虑这个已经由教宗宣判解决的问题，而是于809年在亚琛召集了一次法兰克教会会议，会议毫无疑问地认定利奥是错的，并确立“和子说”的正统性，之后查理煞费苦心地写信给教宗，告知他这一错误。利奥三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拒绝承认这一决定，继续在罗马使用传统的教义。但是在西部教会的其他地区，亚琛会议的决定被自然而然接受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罗马教会使用的礼拜仪式和其他拉丁教会保持着不同。这种差异最终调和了，以弥撒时背诵信经的形式传遍了查理的帝国，与此同时古代诵经的方式只在洗礼时使用，并在罗马依旧盛行。最终，大约到接近1000年时，罗马让步了，并将信经引入弥撒中，使用西部其他地区使用的形式，也就是“和子说”的形式。直到今日，天主教徒会说，“我信仰圣灵，其由圣父和圣子所发”，就是依据查理大帝所推行的教义。

异教徒皈依

从查理祖父的时代开始，改革法兰克教会的想法，就与向萨克森人和北方的弗里斯兰人传播福音联系在一起。那些越过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去执行传教任务的人，同样需要高卢主教和僧侣的品质，即为了恢复纪律和礼节而培养精力，进行文化训练。不出所料，在查理·马特和随后

卡洛曼与丕平治下的第一次教会改革中，最重要的教士和缔造者是一位传教士卜尼法斯。卜尼法斯欣然接受了法兰克宫相的友谊，他们为其在日耳曼履行使徒使命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卜尼法斯同意在晚年接手法兰克教会改革的原因。随后他在八旬之年回归自己的真正使命，754年被弗里斯兰的异教徒所杀。

据我们所知，在查理统治下，使异教徒皈依的问题是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处理的。然而对法兰克国王和他的教会顾问来说，使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从来不是简单地在刀剑的指点下，强迫他们受洗这么简单。实际上，这一任务需要大量的传教工作和教会组织工作，这些工作要随着这一地区的军事臣服而同时推进。误解产生了，争执日起，需要持续的政策调整。最初，被征服的地区被规划为传教区，主要委托给法兰克诸修道院的神父和僧侣。单单富尔达修道院就在775—777年间向萨克森派遣了不少于70名或80名传教士。

被征服之地的信仰前哨站长期以来持续暴露在暴动的威胁之下。只有后来，当领地被稳固控制以后，才可能将重要的传教区转变为主教区，同时将先前存在的部落领地转化为郡。787年，传教士维利哈德（Willihad）被任命为不来梅（Bremen）和韦尔登的主教。约796年，在明登（Minden）任命了一位法兰克主教。到799年，在帕德伯恩，这个新征服土地心脏地带的王室居所，也任命了一位主教，并且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主教人选第一次是萨克森人，即哈图玛。因此萨克森从政治和宗教管理两方面都可以说全面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个省份，尽管直到查理去世后很久，划分主教区的边界才变得可能。

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为异教徒施洗，编年史家在几处都记录了大型的洗礼。洗礼并不总是暴力强迫的，哪怕洗礼紧随在军事击败之后，过去常有这类情况。当日耳曼人不能以战斗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们通常表现出愿意放弃自己信仰的诸神，从这一点看，可以证明法兰克人的神更为强大。同样，我们也不要轻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传教士，例如卜

尼法斯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萨克森人共同的记忆记录了移民海外和留在大陆的萨克森人之间的先祖的联系。他们的语言十分相似，所以这些传教士会被认为是远房的兄弟，他们的布道会有特别的影响。

然而萨克森人仍然如故，在被强迫受洗后，利用第一次机会反叛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叛乱都以焚烧教堂、屠戮神父开始。在782年的大暴动之后，查理对这些暴行十分恼怒，渴望寻求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促使他颁布了骇人听闻的《萨克森法令》，他宣称其目的是保证“现在正在萨克森建设的基督教会奉献给上帝，使其荣耀超过虚伪的偶像庙宇，要得到更多更好的崇拜”。实际上，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施行恐怖统治，将死刑的刑罚不仅加于杀人犯和暴徒，也加于拒绝受洗、继续秘密施行异教仪式、在四旬斋期间违背斋戒义务的人。⁵⁴

即便在查理的近臣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恐怖的政策。阿尔昆写道：“信仰来自意愿，而不是强制。你可以说服一个人去信仰，但你不能强迫他。你能够强迫他去受洗，但这对于向他灌输信仰无益。”⁵⁵ 阿尔昆的批评十分刺耳，在当时伴随军事胜利的是基督徒的横征暴敛，以胜利者身份掠夺萨克森人。萨克森需要“布道者，而不是掠夺者”。以阿尔昆的观点，在王国内普遍存在的什一税制度，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拓展得太快，其结果是萨克森人将基督徒的征收理解为暴力勒索：“他们说，什一税摧毁了萨克森人的信仰。”他设想，如果基督派遣使徒外出传布他的语录，而使徒却向自己的听众榨取什一税，那会发生什么？⁵⁶

这些思考，在组织另一个被击败的民族——阿瓦尔人皈依时，发挥了作用。796年为此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大家在议程中谴责了运用于萨克森的方式。法兰克人现在必须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急切的大规模受洗不再是目的，大家明白现在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方法。阿奎莱亚的宗主教保利努斯与萨尔茨堡的主教阿尔诺一起主持了会议，并受命协调对阿瓦尔人的传教工作。保利努斯写道，尽管他们是“野蛮而无理性的民

族，总而言之无知、目不识丁，所以他们去理解神秘的事物时，只会不情愿且困难重重”，然而，没有先进行开导和劝说，是不会对他们施洗的，同时教导也更多地基于爱而不是恐惧。必须提及地狱的受难，但同样也要提及天堂的欢愉，无论如何也不以武力强行推行圣礼，只有自己提出要求的人才会受洗。至于什一税，阿尔昆向国王强烈建议，对新皈依的教徒要推迟征收，他强调，像他这样一个生而为基督徒并且受了如此高的教育的人，完全缴纳税款也非易事。⁵⁷

这个会议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潘诺尼亚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而且在萨克森也立刻改变了政策。次年，国王为萨克森人颁布了新的法令，废除了先前的法令并急剧缩减了恐怖体制。例如，先前杀害神父要被判处死刑；现在，像所有日耳曼法律体系中通常的情形那样，同样的罪行可以作为普通犯罪，缴纳“赎杀金”（*wergeld*）赎罪。⁵⁸ 尽管在如阿尔昆和保利努斯这样的学者的通信和诗歌中，他们对自己的恩庇人长篇累牍地无耻吹捧时常让我们震惊，但我们要记住，在这件事上，这些学者知道针对这一最为微妙的问题，如何表达极具批判性的观点；而国王也反过来准备接受这些批评。

与迷信的斗争

他们不仅要向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传播信仰。查理大费心力培养教士，是因为他们负责给他所有的子民进行宗教指导。生而为基督徒，仅仅为了有意识地体验信仰是不够的。在《广训》中，国王提醒主教，他们本人的职责就是向民众布道，并且组织他们的神父布道。他甚至细致到了明确确定需要向信众布道些什么。他们必须教导所有人，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统一的全能的神，要依据查理亲自推行的信经，避免出现异端的危险。他们要解释道成肉身的神，所有人都会回归他的权威之下，他会根据人的功过审判所有人，查明他们是否真的相信死后重生，

这样他们就会通过肉体体验到福报和惩罚。⁵⁹

传播福音是最为急切的任务，因为查理从马太和保罗的警示中得知，伪先知（pseudodoctores）会在世界末日之前出现，试图引导基督徒远离正途。尽管据他们所知，世界末日非常遥远，但一些伪先知已经现身，以混淆信仰。在查理出生之前，某一位叫阿德尔伯特（Adalbert）的人就突然获得了巨大的名望。他在田野和泉水处竖立起十字架，聚集民众，即兴举行祈祷集会。我们不知道他布道的内容，但他肯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当权者极大的关注，因为744年，丕平下令焚毁所有他竖立起的十字架。⁶⁰

每一代人都注定会有自己的伪先知。近半个世纪之后，传言自天堂降下充满神圣启示的书信，消息开始散播，一些神父宣称曾见过它们。国王禁止阅读和讨论这些文字，下令将之烧毁，避免其他任何人再接触到类似的思想。可能因为宗教沉迷的情绪有点太过疯狂，查理下令，对那些四处游荡，声称受上帝启发；或者带着锁链裸身蹒跚，声称以苦修赎罪的无家可归者和法外之人，要保持控制。国王对这些人没有同情，地方当权者必须阻止这些流浪者，尤其是那些想向民众布道的人。如果他们想要苦修，就要通过工作来实现，而不是浪费时间在乡间游荡。⁶¹

在查理眼中，这些受欢迎的布道者，他们所推行的这些做法，比如在靠近树木和泉水的地方露天祈祷，是十分危险的，接近异教习俗。这正是他煞费苦心通过武力要从萨克森人中根除的问题，而其遗存却甚至在法兰克人中留存了下来。这个问题在他父亲和叔父的年代更为迫切。卡洛曼命令他的主教和伯爵们齐心协力“让神的子民不要沉迷于异教的做法，抵制排斥所有异教信仰的秽行”，又补充了一长串异教仪式和迷信行为的清单。⁶² 总体而言，查理没有表现得如此关切，但在他整个统治期间，他颁布了多部法令，更新禁止行为的名单。例如，禁止随意翻开《诗篇》或者《新约》中的一页，寻找预兆，从牛马的粪便中解读

未来，为钟施洗，或写下咒语挂在杆子上以避免冰雹。⁶³

这些习俗与其说是异教信仰的遗存，不如说揭示了普通人对大众宗教的体验，他们天真无知，意识不到宗教、迷信和魔法之间的区别，对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这些是截然不同的。在查理的圈子里存在一种基本的理性思想，这将引导我们将这些镇压举措归因于对迷信无知的恼怒，而不是对异教信仰越来越有可能回归的担忧。当天空中的新月暗淡之时，民众会喊道“努力啊，月亮！”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天体正陷于苦战，需要帮助。⁶⁴但807年，当太阳的光辉因黑斑而变得暗淡时，查理宫廷中年鉴的作者写下了他的计算，他确定这个黑斑是水星。随后他以一种明白无疑的超然科学的口吻记录道，他观察这一汇合现象已经八天了，“但由于云层的原因，我们还不能记录何时进入汇合，何时走出”⁶⁵。几乎不出所料，统治者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声嘶力竭地喊叫以表达自己支持月亮的贫苦百姓，最终这个习俗还是加入了被禁迷信行为的清单中。

在与迷信的斗争中，最伟大的人物可能是里昂的主教阿格巴德，他是查理最年轻的门客（protégés）之一。他被民众的无知和愚昧所震惊，写了一本小册子谴责常见的信仰错误。810年一场动物传染病在帝国全境传播，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牛类疫情。阿格巴德告诉我们，当时在民众间立刻就有流言说，贝内文托公爵格里默德散布带有有毒粉末的瘟疫传播装置，污染草场和水源，为的是杀死牛类。和预期的一样，许多人因被指控传播带病粉末而被处以私刑，而主教看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人设法说服自己，认为这些人真的曾传播毒物。

这种信念如此普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荒谬。他们从来没有用理性想过，如何才能制造出这样一种粉末，会导致牛类死亡却对其他动物无害？并且他们如何设法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传播？即使生活在贝内文托的每个男女老幼都驾着装载粉末的大车离开自己的国家也不可能。但这个可悲的世界受到

了白痴的压制，基督徒愿意相信甚至连异教徒也不信的谬论。
66

尽管查理和他身边的学者做了所有这些努力，但保护他的基督徒不受错误的戕害，依旧任重道远。

注释

- 1 Einhardus, 25.
- 2 对此问题的无端疑虑，参见第6章，注释32之后的文本。
- 3 Einhardus, 25.
- 4 Einhardus, 29.
- 5 Einhardus, 25.
- 6 *Alcuini*, 170 e 308.
- 7 参见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177n.
- 8 参见*Alcuini*, 107, 110, 111, 114, 173, 174, 177; 以及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172–76。
- 9 *CRF*, 22 e 29.
- 10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302.
- 11 *Alcuini*, 53.
- 12 Fichtenau, *capi.* 3nn77–83.
- 13 这就是那位帕德伯恩的诗人：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367–68。
- 14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486–88.
- 15 *Alcuini*, 245–49.
- 16 *CRF*, 29.
- 17 *CRF*, 22.

18 *PL*, 119: 82.

19 P. E. Schramm, “Karl der Grosse: Denkart und Grundauffassungen; Die von ihm bewirkte *Correctio* (‘Renaissance’),” *Historisches Zeitschrift* 198 (1964): 306–45.

20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1:298–302.

21 *CRF*, 10.

22 *CRF*, 13.

23 *CRF*, 17.

24 *CRF*, 22.

25 P. Toubert, “La théorie du mariage chez les moralistes carolingiens,” *Settimane* 24 (1977): 270.

26 *CRF*, 33.

27 *CRF*, 122; 130.

28 *CRF*, 72.

29 F.-L. Ganshof, “Note sur les ‘Capitula de causis cum episcopis et abbatibus tractandis’ de 811,” *Studia Gratiana* 13 (1967): 3–25. 另见第14章对查理统治的评价。

30 *CRF*, 72.

31 *CRF*, 72.

32 Einardus, 26.

33 *CRF*, 22.

34 *CC*, 89.

35 Notker, 1.10.

36 *CRF*, 29.

37 *CRF*, 22.

38 *PL*, 105: 196.

39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 471, 581, 632, 675.

40 Notker, 1.3.

41 这种通告并不存在，但在B. Bischof, “Die Hofbibliothek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2: 42–62中，作者以充分的理由假定它为前提。

42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 509–14.

43 *MGH, Diplomata Karolinorum*, 1: 87.

44 R. McKitterick, “Nuns’ scriptoria in England and Francia in the eighth century,” *Francia* 19 (1989): 7–10.

45 R. McKitterick,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1989), 256.

46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4: 17.

47 *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 483–89.

48 Hariulf, *Chronique de St. Riquier*, F. Lot ed. (Paris, 1894), 88.

49 Einhardus, 33.

50 A. Bartoli Langeli, “Scritture e libri da Alcuino a Gutenberg,” in *Storia d’ Europa*, vol. 3: *Il Medioevo*, G. Ortalli ed. (Torino, 1994), 946.

51 *Alcuini*, 193.

52 C. Leonardi, “Alcuino e la Scuola palatina: le ambizioni di una cultura unitaria,” *Settimane* 28 (1981): 488.

53 参见第4章，“查理与拜占庭之间的冲突”。

54 *CRF*, 25.

55 *Alcuini*, 113. e 110.

56 *Alcuini*, 107, 110, 111.

57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172–76; *Alcuini*, 107, 110, 111, 113.

58 *CRF*, 27.

59 *CRF*, 22.

60 *CRF*, 12.

61 *CRF*, 22, 35.

62 *CRF*, 10.

63 *CRF*, 19, 22, 23, 33, 35, 96, 108; *Alcuini*, 268, 290–91.

64 *CRF*, 108.

65 *ARF*, 123.

66 Agobard, *Contra insulsam vulgi opinionem de grandine et tonitruis* (in *PL*, 104: 16).

① 此次会议并非天主教会公认的普世公会议。

第11章

法兰克人的军事机制

我们已经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尽管偶有挫折，但法兰克人总体而言战胜了自己的敌人。在法兰西与日耳曼所有教堂中香烟缭绕的空气里，传出了祷告，祈祷查理的军事努力取得胜利。但祈祷不是这些接连不断胜利的唯一原因。首要的原因一定是皇帝的军队在数量和组织上的优势。这些战士行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与伦巴第人战斗，直面阿拉伯人，兵临潘诺尼亚平原消灭阿瓦尔人，多年间纵横北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泽地追寻萨克逊人，逐渐将国王的权威和他们的宗教远拓至波罗的海沿岸。是时候去探索他们的征兵和战斗方式了。

法兰克人如何战斗

入侵时代

考虑到大部分法兰克人以务农为生，不是草原民族那样游牧的牧人，显然最初绝大部分法兰克人只能徒步作战。从技术视角来看，他们是一个发展迟缓的社会，其中的个体甚至缺少地间劳作的金属工具，农民不得不制造使用木质锄头，因此他们的军事装备也一定同样比较低级粗陋。尽管在法兰克人的社会里战争如此重要，他们愿意花费大量财富以获得高质量的武器，但这就是普遍的情况。

在蛮族入侵的时代，法兰克战士携带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其次是战斧，斧子很受他们欢迎，罗马人称之为“法兰克斧”（*francisca*）；还有一或多支投矛，通常是一种强化的样式，称为“安戈矛”（*ango*）。他们也熟悉刀剑，但只有富人能买得起重型的罗马“斯帕达剑”（*spatha*），而广泛使用的是类似单侧开刃的短剑，罗马人称之为“半斯帕达剑”（*semispathae*），法兰克人称之为“猎刀”（*scramasax*）。防御武器只有一面木质圆盾，大多数装有金属凸钮加强。只有那些指挥的人能用得起钢铁头盔；可能还有“洛瑞卡甲”（*lorica*），这是一个罗马词语，表示覆盖着金属板的锁甲衣或皮甲，这可能模仿自草原游牧民。

因此克洛维时代的法兰克军队可以被概括为一支多样化的步兵部队，枪矛林立、木盾森严，他们能够在对手靠近之前就投掷斧子和投矛，予以打击。他们由少数几乎同样装备的骑马战士支援，这些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意味着他们能负担得起一匹坐骑、一把长剑，可能还有一顶头盔和一套“洛瑞卡甲”。这一幅图景得到了里普阿利安法的证实，其较古

老的版本里规定一匹种马价值12苏勒德斯金币，一匹马3金币，一顶头盔6金币，一套铠甲（brunia）高达12金币，一把带鞘的剑7金币，然而2金币就足以装备一支矛和一面盾。¹显然在大规模动员的情况下，较之徒步作战的人，骑兵的数量必须尽可能少。即使绝大部分战士装备一支矛和一面盾，其花费金额也不可小视：相当于一头牛或一匹马价格的三分之二。这也就明确了为什么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民才能配得起作战的装备。

查理治下对骑兵的武装

到了查理的时代，法兰克人作战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些武器消失，而另一些武器广泛使用这么简单。总而言之，步兵的装备与骑兵之间有了巨大的差距，骑兵开始被称为骑士（caballarii）。在793年的一部法令中，偶然可见武装的封臣环绕在有权势的人身边，有时也包括一些由主人为其提供装备的奴隶。装备包括“马、骑枪、盾、长剑和短剑”²。这些都是传统的武器，但有意思的是它们是作为一整套而提及，似乎可以明确，每个骑兵，无论地位多低，一般都全部拥有这些装备。

十几年后，806年，查理大帝向圣昆廷修道院院长福尔拉都斯发布一份召集令，确定了一名骑兵参战所需的装备。这一清单和十三年前的完全相同，证明了这就是标准装备。但是其中添加了一样让人好奇的东西，一套弓箭：“因此每位骑士都要拥有盾、骑枪、剑、短剑，弓和一袋箭。”³拜占庭编年史家阿嘉提阿斯（Agathias）声称原始的法兰克人并不熟悉弓箭。受他的影响，历史学家推测，是与阿瓦尔人作战的经验说服了查理，为骑兵装备弓箭有用。甚至他的这一想法可能是源自罗马军事理论家维吉提乌斯（Vegetius），其著作当时刚被重新发现。⁴

实际上，没有理由相信弓箭是一项革新，因为在墓葬中发现的箭头

表明法兰克人对这一武器绝非无知。萨利安法兰克人与里普阿利安法兰克人的法律中包含频繁提及弓箭使用的内容，超过了其他任何武器。⁵可能有人提出，弓箭对骑兵来说是一项革新，但即使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在查理出生五十年前，伴随他曾祖父赫斯塔尔的不平的武装侍从就装备有“洛瑞卡、头盔、盾、骑枪、剑和装满了箭的箭袋”⁶。显然当时的法兰克骑兵就已经和查理时代的相似了，包括弓箭，与草原骑兵的冲突并没有教给他们什么不曾知晓的东西。

骑兵装备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铠甲。肖像画经常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加洛林战士穿着的这种外套，一种覆盖有金属鳞片的皮质短上衣。铠甲如此昂贵，并不是所有查理的骑兵都能负担得起一件，但皇帝决定将其变成所有拥有相当财产的人的义务。805年的一条法律规定，所有至少拥有十二户农民为其工作的人，在应召从军时都需要穿着铠甲。⁷从无到有配备一件铠甲必定是难以小视的付出：一位名叫罗达卡尔（Hrodachar）的巴伐利亚贵族，就以自己一部分土地为代价，向弗莱辛（Freising）的主教换取了一件铠甲。⁸

我们可以因此得出结论，查理的军队拥有一群核心的武装骑兵，其中可能有几千人的着甲骑兵，还有人数更多的无甲骑兵，但鉴于他们的武器装备，也不能认为他们是轻骑兵。此外，我们不应该对这两个群体作出明显的区分，因为政府能够给大量负担不起铠甲的骑兵提供一套铠甲。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为他们的人提供铠甲和刀剑。查理命令他们将这些分配给可信的随从，或者仅凭他的许可分配给外人。如果他们的装备在武装自己所有的封臣后还有剩余，他们就要将此情况直接告知他。⁹如果我们考虑到与这些规定同时存在的，是再三禁止将军事装备卖到国外，尤其是铠甲，就能明确在查理的时代，配备武装不再是私人举动，现在被政府管理所关注。¹⁰

对步兵的武装

那些不需要提供马的人必须有一支矛、一面盾、一张有一根备用弦的弓和十二支箭。国王补充说，只备有一根棍棒的人不可向军队报到，这种情况显然会发生。那些负担不起更多的人至少要装备一张弓前来。¹¹ 这些规定告诉我们，和骑兵不同，步兵的武器比以前退步了。考古学家已经证实步兵武器装备已经减少到了最基本的程度。曾经在法兰克人中十分受欢迎的战斧，和称作“安戈”的短投矛，自7世纪初开始都不见踪迹。甚至剑，无论长短都变成了骑兵的装备，他们如果自己没有，就会从主人那里得到一把。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一名战士的财富足以拥有一把剑，他也能负担得起一匹马。

最引人注意的是坚持要有一张弓，查理大概认为这是步兵的基本装备，实际上也是最穷步兵的唯一装备。这个观点被《庄园敕令》所证实，其中指示管理者如何准备供应军队的大车：每辆大车装载的既有面粉或酒，也包括“一面盾、一支矛、一个箭袋和一张弓”，推测是武装护卫用的。¹² 查理的举措可以与伦巴第国王阿斯图尔夫的法律作可行的比较，后者颁布于750年。其说明，所有负担不起一匹马的战士“如果有一面盾的话，就应该有一张弓和装有箭的箭袋”¹³。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该法律将一副弓箭作为步兵单一的基本装备，而半个世纪后我们可以在皇帝的法令中发现同样的意图，此时伦巴第人的军事组织已经完全整合到了加洛林的战争机制中。

采用弓作为步兵的首要武器，证实了骑兵已成为军队最重要的部分。在火药发明前，一支战术力量依赖步兵的军队必须为其战士装备枪矛和刀剑以提供战斗力。只有凭借这些武器，步兵才能在几乎无法得到骑兵支援的情况下占领并守住阵地。相反，装备有弓箭的步兵，只能在骑兵代表军队战术核心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援。查理的军队中越来越多的步兵装备弓箭，证明了在皇帝漫长的一生中，骑兵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这一倾向可能早年已经在伦巴第人中存在，但在查理去世前的法兰克人中才清晰可见。

重骑兵：一场革命？

还存在其他迹象，表明装备有骑枪和剑、以铠甲和头盔保护的骑兵，与众多徒步作战的士兵相比，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甚至远溯到755年，丕平统治时期，每年军事战役之前对法兰克贵族和战士的召集，就从3月转到了5月：军事动员中马匹的数量增加，因此有必要等草长到足够喂养它们之时。编年史家反复记录军事行动中因饲料供给能力而造成的限制。798年，萨克森人趁着罕见的荒年影响，在初春时叛乱了，“此时军队由于缺少饲料，不能开始作战”¹⁴。

气候的不确定性和行动的缓慢解释了为什么召集经常发生在6月或7月，转面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兰克人必须延缓某些作战行动，比如791年针对阿瓦尔人的作战：因为季节太晚，马匹再也找不到食物。¹⁵此外，辎重队中拉车的数千头牛也必需饲料。法兰克人的军队如果想深入敌境并维持数月，这些笨重的护卫队必不可少。在战略规划中保障资源的这种方式，证实了在这支军队中，马匹至关重要。

没有必要再解释马镫的引入带来的改变，美国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已经做过分析了。¹⁶我们并没有发现马镫在查理的时代被法兰克人广泛使用，也极少发现确定可以追溯到8世纪的马镫。甚至在虔诚者路易的时代，手稿中的插图描绘了没有马镫的战士在马背上战斗。在皇帝逝世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诺特克叙述了一则口头流传到那时的逸闻：查理曾向一位年轻的教士许诺一个主教的职位，教士欣喜地离开宫殿，无视仆从为他提供的上马凳，一跃而上马背。皇帝通过大门看到了这一切，认为此举对主教来说不够庄重，他叫教士回来，告诉他战场上更需要这么矫健的人，而不是在教会里。因此他暂缓了主教的任命，转而任命他为礼拜神父以跟随自己参加军事战役。不考虑实际是否真的如此，这则逸闻证明当时并未使用马镫。¹⁷

事实是，法兰克骑兵所承担的更大的战术重要性，并不依靠单一的

革命性技术而发展，而是反映了社会能够利用更多的财富，能够在战争中经常使用马匹。但在过去，广泛使用马匹曾遇到客观存在的限制。加洛林时代经济的逐渐繁荣，同时反映在缓慢但逐渐传播的各种技术革新（包括无可置疑的马镫，还有铠甲），以及更强大的马匹使用能力上。不出所料，8世纪初起草的里普阿利安法新版本中所有武器的价格没有变化，但一匹马的价格从12苏勒德斯金币大幅降到了7金币。同样一头公牛的价格从3金币降到了2金币，一头母牛从3金币降到了1金币。¹⁸因此这不是一次突然的急剧发展，而是以重武器、重护甲来装备骑士的能力增强了，这使查理部署一支日渐庞大、装备精良的骑兵成为可能。

比起导致这些武器和战术发展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展导致的加洛林军队中社会成分的变化。马匹和铠甲更加实用，意味着较为贫穷、不能负担起装备花费的小土地持有者所能做的贡献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与其让他们拿着棍棒，皇帝更愿意规定使用弓，这种武器显然比其他武器便宜。然而，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一概免除他们的军事义务，而强迫他们以其他一些方式为战争作贡献。加洛林时代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仅仅关乎法兰克人武装和作战的方式，也关乎军队征募的原则。

征 募

缩小社会基础

严格来说，在受到召集时，为其君主作战是所有自由民的义务。这一原则对有些民族来说非常牢固，比如伦巴第人，他们的自由民被称为“阿利马努斯”（*arimannus*），其日耳曼语词根与现代德语的“*Heer*”（军队）和“*Mann*”（人）相对应。这个术语在拉丁语文献中很容易被翻译为“*exercitalis*”（军队），它不仅有军事意义，也有政治和法律意义。实际上同一份原始材料中也称伦巴第民族为“幸运的军队”（*felix exercitus*）。同样，在高卢的教堂里唱颂的连祷文，会祈求基督保护国王查理、他的子嗣、他的审判官“和法兰克人的整个军队”，其中的术语“*exercitus*”，意为“军队”，也与“民众”同义。¹⁹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一次召集中，每个自由民都必须参战。但简言之，如果国王和其地方上的代表认为有必要的话，原则上可以召集所有人。真正的大型征兵活动，可能只在一个地区直接受到入侵威胁时才会发生，这种征兵在晚些时期的法令里被称为“兰特维里”（*lantweri*），这一术语类似19世纪普鲁士的“卫国后备军”（*Landwehr*）。²⁰除了字面上相似，这种情况也确实在查理的时代发生了：例如778年萨克森人沿莱茵河突袭，793年阿拉伯人入侵塞普提马尼亚，北欧人袭击西部海岸，800年之后阿拉伯人越加频繁地进攻地中海诸岛。另一方面，当几乎每年法兰克人计划入侵敌国时，军队通常都是从邻近的区域召集。只有在一些更具开拓性的作战中，比如778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和791年对阿瓦尔人的作战，我们才知道存在所有省份同时征兵的情况。

那些地方官员收到命令，需要召集起一切有能力作战的男子组成军队，如果他们太轻易地授出免除兵役权，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管理征兵的气魄，表现在特里尔大主教赫蒂写给自己的副手图尔的主教弗洛塔利乌斯的一封著名的信件中：

我们从我们的君主皇帝那里得到一条可怕的命令，根据命令我们必须布告全境内的居民，我们代表他，让他们做好准备，参加在意大利的战争。因此我命令你以我们的君主皇帝之名，立即热忱地通知所有的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伯爵、王室封臣和教区的所有民众，所有这些对国王有军事义务的人，做好自身准备。²¹

在通常的观念中，命令涉及所有人；而具体实际中，只涉及那些需要承担军事义务的人，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是，接近查理统治后期时，他的指令开始将携带武器参战的义务限定在拥有充足财产的人之中。皇帝使用的标准是为每个土地所有者工作的农户数量。只有那些拥有三至四户奴隶或佃农为其工作，因而享有一定程度经济保障的人，需要自付开销承担军事义务。其他人免除兵役，但必须组织起来，共同汇集资源以供给战士。因此，根据808年作战的指示，每四位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没有奴隶、自己耕种土地的农民，必须达成一个协议，其中一人应征入伍，其他人为他提供装备。²²

根据即将进行作战的不同情况进行装备，经济基础是必要的，尤其是战争期间。这证明了主要的花费在于食物的供给。806年，在萨克森，命令六个人为第七人进行装备，为远及西班牙的军事出征做准备；而针对邻近的斯拉夫人的出征，只需两个人为第三人做准备即可。²³一些学者提出，因此每组中受援助的人可骑马应征，以这种方式征募成为轻骑兵，他们构成了法兰克军队的主体。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解释。

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在算入那个前去作战的人的捐税后，装备一位战士的所有花费是5或6苏勒德斯金币。²⁴ 考虑到开销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食物上，可以明确，根据上述里普阿利安法中提及的税率，即使我们取配给的最小值，也不足以武装一名骑兵。因此显然军资并不宽裕的战士将徒步前往参战。

关于乡邻如何汇集资源，以获取武器、配给、交通工具的问题，一份巴伐利亚的文档也许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一体制的早期例子。有三个人，拉特帕德（Ratpald）、奥德尔曼（Odalman）和凯珀特（Kerperht）向蒙德湖修道院院长奥珀图努斯（Opportunus）出售了几块土地，换取了一匹公马、两匹母马、一头母牛、六头公牛、一些盾牌和一支骑枪。²⁵ 显然他们比查理的规定之后所针对的那些人的社会阶层要高：尽管我们看到军队使用了大量的公牛，但用公牛仅运送一名战士，就太过分了，并且总体的花费相当于武装一名骑兵的花费，而不是一名贫穷的步兵。我们可以推断，每一次拿起武器的命令到达一个省份，那些必须获取必要武器和供给的人，就会发起许多这样的交易。

集结封臣加入王室军队

征募方式的改变，随之明显减少了步兵或者最起码说无装备步兵的人数，伴随着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变化。它反映了隶属关系在法兰克社会中承担的重要性。每位有权势的人身边都环绕着一群封臣，他们效力的方式首要的是军事性质的，包括持有可能是领主赐予的武器和马匹，以及有关使用武器和马匹的知识。对于这些人，查理认为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统计他们的财产规模，并据此调整他们的军备。在他看来，属于封臣的一员意味着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战士，尤其是他们领受了来自领主的恩地。他们应召从军，无须多言。807年，皇帝下令，“首先，那些拥有恩地的人都要从军”²⁶。

但情况没有这么简单。这帮封臣各自组成了受过训练的战士团体，他们习惯共同作战，所以将他们分开是不明智的。皇帝因此下令，每个其财富足以承担义务的人，应征参军时，如果他有领主，就可以成为自己领主侍从队的一员。只有那些没有保护人或者其效力的领主没有参战的人，可以依据传统习俗加入集结地当地伯爵的随从队伍。自然，命令也提及了自由民，但有理由相信，武装随从的散布实际上修改了将自由民定义为能够携带武器的人这一传统规则。之前提及的793年法令，想当然地认为存在大量的“由其领主赐予封臣身份的奴隶，并可以拥有马匹和武器、盾和矛、长剑和短剑”²⁷。他们要和自由民一样宣誓效忠领主，如果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军队，却在他们领主所率的单位之外，将会十分奇怪。实际上，查理并没有对那些身为自由民和奴隶的随从加以区分，并且规定，一般而言他们都要跟随他们宣誓效忠的伯爵、修道院院长或主教。

与此同时，他宣布号召武装帝国全境所有自由民，皇帝单独向每位教会的和世俗的权贵发去指令，要求他们亲自为自己的封臣负责。一个例子就是806年写给圣昆廷修道院院长福尔拉都斯的贺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军队实际集结方式的好方法。

你应该知道，朕今年已经在东萨克森的伯特河（Bote）边叫作施塔斯福特（Stassfurt）的地方召集了将领集会。因此朕命令你带着自己的人于六月十七日整装到达此地，备好武器装备和战争所需的所有食物和衣物。每位骑兵应该有盾、骑枪、剑、短剑、弓、装有箭的箭袋，你的车辆应该装有各种工具，即斧、刨、钻、短柄斧、锹、铁铲和其他军队所需的工具。作为储备，应该有从该日期起三个月的配给，和供六个月之用的武器和衣物。²⁸

拉教士服军役

以这般强制的语气将召集从军的命令送达修道院，我们不应感到意外。教会应负的军事义务也是法兰克军事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或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从查理·马特时代起，教士所拥有的广大地产就为宫相和后来的国王所用，他们以此安置自己的武装随从，随从因此有了财产为自己配备武器、铠甲和马匹。为这些土地工作的农民依然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正式佣工，他们缴纳年租以作回报，但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供养和装备那些受到特许的武装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外来者宣誓效忠于以土地给他们提供收入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因此教士给那些被吸引到他们身边的武装之人提供恩庇（*patronatus*），其方式与国王和世俗人物对围绕在身边的封臣没有什么区别。显然，国王后来认为这类高级教士要为这些武装之人负责，更加确定的是，他们必须亲自领导自己的人从军。

在国王看来，将高级教士卷入自己的军事事务中，符合自己权力的宗教性质，并且他确信神的恩典庇佑法兰克人之剑，鼓励他们加入针对异教徒的正义战争。然而，正如一位编年史家所痛斥的那样，一些人并不喜欢这些腰悬刀剑、脚蹬皮靴马刺、传达圣意的强势教士。²⁹ 查理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阿奎莱亚的宗主教保利努斯，以充满敬意而又坚定不移的辞藻写信给他，说明与上帝可见的敌人作战是国王的职责，他应该单独留下教士去与那些不可见的敌人斗争。教士所要挥舞的是精神武器，而不是钢铁武器。他们所需的营地，是上帝的隐喻之营，而不是国王的持械之营，即使国王受神所爱也是如此。³⁰ 查理的老盟友阿德里安教宗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他乞求他不要强迫他的主教拿起武器：如果他们必须陪伴他作战，他应该让他们单独去从事祈祷、布道和告解。³¹

不得不说，没有证据证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被强迫血洒沙场，但国

王明显对他们有更多的期望。参与军事远征是一件费力之事，包括离家数月漫长的劳师之苦，以及供给人员和马匹的沉重开销。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卷入战斗。然而对于涉身其中数年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危险而劳苦的工作。阿尔昆写信给他的朋友美因茨的大主教利库尔夫（Riculph），说他“非常担心你即将参加远征的旅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会遭遇很多危险”³²。在791年对阿瓦尔人的作战中，两名主教死于军队陷入窘境之时，但他们死于疾病或衰竭，而不是战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得知队伍预备作战时，他们的指挥官是伯爵或宫中的大臣，从来不是主教。前者战死疆场有无尽的描述，如总管艾吉哈德、宫廷伯爵安瑟姆和布列塔尼边区长官罗兰，他们都殒命龙塞斯瓦列斯战场。还有王室总管阿达尔吉斯勒、治安官盖洛和四位伯爵死于辛特尔之战。³³但在查理漫长的统治期间，没有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死于战场的记录，而这在他的孙辈内战期间时常发生。

处理逃避者

军事义务如此沉重，各地的人们都在试图逃避。查理的法令集非常清晰地训诫他的伯爵，要求“无人敢大胆到无视他们的君主即皇帝的从军召唤，没有伯爵敢独断专行，免除那些需要离家参战人的义务，因为这可能是受强大关系的影响，或者收受了贿赂”³⁴。规定十分细致，要求每位伯爵最多只能免除两位封臣的军事义务，留在家中保护妻小，另两位接管他的职责。如果一名伯爵管辖一个以上的郡，他可以在每个郡留下两个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正式意义上不允许拥有妻室，只可以授权留下两个人。³⁵

现实中，不合理的军役免除极其频繁；实际上，这是地方权贵施行自己“黑手党式”权威的最有力工具。他以此偏私自己的人，损害那些不遵从其规矩的人。一篇法令斥责这些权贵，他们滥用权力，征召那些他

们想要毁灭的人服军役，以夺取他们的土地：

人们说，拒绝将土地交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或审判官的人，他们会找到途径责难他，他们一般会送他参战，直到他陷入贫困，并无论自愿与否都被迫放弃财产为止。另外那些已经放弃土地的人，留在家中，无人去打扰他们。³⁶

但也有“另一些人说，他们强迫最穷的人从军，而那些付得起钱的人，留在家中”。实际上，小土地持有者为了避免这一义务，愿意做任何事。义务每年都无情地重复，强迫他们保有昂贵的装备，花费大量资财用于供给，无意义的繁重劳动，还有可能失去马匹，离家数月，更不要说丢失生命、损害肢体的危险。由于广泛出现的严重情况，皇帝甚至禁止自由民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捐献给教会，“因为朕听闻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出于奉献，而是为了躲避军役以及其他对国王应尽的义务”³⁷。同样也有一些人与权贵联合，甚至臣服于他而做奴隶，仅仅是换取帮助他们留在家中的承诺。这种现象在随后的年份里变得越来越常见，所以811年，皇帝在集会的议程中加入了“人们无法完成军事义务的原因”³⁸。预备材料中包括了明确的断言：“整体而言，与过去相比，居民们更加不服从伯爵和使节。”事实是，在多年的战争后，法兰克人厌倦了作战，作战的辛劳超过了荣耀，更重要的是，开销超过了战利品所得。

名义上，任何不能完成自己军事义务的人，需要缴纳巨额罚金“赫里班”（heriban）或称军队罚金。王室使节被鼓动征收罚金，要不留情面，此举或更是为了避免他们受贿。一般会认为他们进入有罪者家中，不仅没收他的金钱，也没收他的牲畜和动产，包括衣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妻儿要被剥去衣物”，查理谨慎地建议道），相当于一个相当富裕的人一半财产的价值，对于不太富裕的人这一比例会逐渐降到四

分之一。无法缴纳罚金的人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在报告皇帝之前暂缓执行程序。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将会被迫作为奴隶为王室效力，直到他们付清自己所欠的所有罚金。对罪行的惩罚如此严厉，其意图是使他们再不敢这么做，而又不完全毁掉他们，“所以下一次他们就能够武装备战，为神和朕的利益效力”³⁹。

为了避免征收“赫里班”变成又一次滥用权力的机会，此举绝不包括没收土地、建筑或奴隶。此外，征收罚金的工作绝不托付给地方伯爵，而是托付给王室使节和称作“赫里班按察使”（haribannitores）的专门官员。这造成了无法预见的结果，使伯爵召集军队变得更难了。因为考虑到此事不再处于他们的司法权之下，他们辖区里的人会或多或少不守信用加以抵制。⁴⁰ 那些迟到营地的人，会根据他们迟到的天数，惩罚他们在和迟到天数一样的时间内只得到面包和水。没有许可擅离军队，实际视为逃兵，“在日耳曼语中我们称为‘赫里斯利兹’（herisliz）”，要被处以死刑并没收所有财产。⁴¹ 这一现实在类似查理的帝国这样严重依赖庇护者的社会中继续存在，尽管再三训诫，还是会充斥着滥用权力的行为。集体的厌倦和他个人的懈怠，也许解释了，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为什么皇帝在他的晚年表现得不再像他年轻时那样好战。⁴²

战略

后勤

查理的时代征兵的另一个特征，可以从他写给修道院院长福尔拉都斯的那封信中显现出来，那就是将军队召集起来要花费漫长的时间。鉴于在他召集人员和供给后，从圣昆廷修道院前往伯特河需要两个月，故武装的召集令必须在行动预期开始日期前几个月送出。显然夏季作战的目标必须在很久之前就预先决定下来，可能要提前到前一年秋季的集会。同样，征募的方式也必须和召集大型军队相符合，从容不迫，以攻击敌境为目的，如此法兰克人就能够决定行动的时间和地点。查理在世之时，这一体制卓有成效，因其能够做出充足的战略准备，以召集有巨大数量优势的军队，这足以应对任何单一对手可能在战场上造成的任何情况。

许多学者试图统计帝国所能提供的军事力量的总体规模，但这一尝试得到了有分歧的荒谬结果，其范围从五千至五万骑兵不等。这一结果的意义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一个国家越大，则它在任何特定时刻，与人口和经济资源成比例，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就越少。在像查理大帝所创造的这么一个庞大帝国之中，在召集人员、行军至敌境并在作战期间对他们提供充足的供给中出现的实际困难，毫无疑问首先会限制行动中的军队数量的扩张。这明显不可能充分发掘人的潜能，人类的潜能相形之下是无限的。

较之统计帝国中能够征募的骑马战士的人数，考虑万余人在行军中的困难更有意义。其中一些人会沿着一条单一的道路徒步行军，通过一

条狭窄而又人烟稀少的走廊进行补给，因此敌人会在此采用焦土政策。上述所说的是军队的最佳规模，即使在大型战役中，两三支军队同时动员，从不同的方向在敌境内集合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员和马匹的总体动员能力允许查理在规划联合行动时留有最大的机动空间。当每一位地方指挥官都能保证自己有充足的军事力量击败自己面对的敌人时，这一能力也能允许同时组织行动面对不同边境的不同敌人。根本上说，这就是法兰克人胜利背后的秘密。正如拿破仑很久以后意识到的那样，事实就是，神站在拥有更大兵营的一方。

限制军队规模的一个因素是所需车辆和拉车牲畜的惊人数目。如我们所知，查理的军队携带着为持续数月作战所需的充足供给，否则作战无法进行。战士们毫无疑问会尽己所能从当地居民那里征用补给，而牲畜可以在路边牧养。然而，当他们还在帝国境内时，征用范围被限定为草料、木材和水源；一旦他们进入敌境后，就可以更自由地获取供给，而庄稼经常在入侵者到达前已经销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要携带面粉作为口粮，为了保持马匹的良好状态，需要给马补充谷物，草和干草可以沿途获得。

行军队列沿着纵横于帝国内的罗马大道绵延数里，进入敌境后道路通常会更糟糕，甚至消失。队列的巨大规模应该要归功于辎重车队。普通两轮大车通常由共轭的两头牛拉动，能够装载半吨面粉，几乎是500人一天的口粮。因此运1,000人超过三个月作战所需的口粮，需要180辆大车和360头牛。还有葡萄酒，这在当时是社会各阶层的日常饮品，并且算是重要的热量补充。鉴于一辆车可以装载130~160加仑，同样的1,000人在作战时需要另外180辆车。一匹马每天需要22磅饲料，其中的一半可以是草或干草，而另一半必须是大麦或燕麦。因此100匹马在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需要消耗另外90车的装载量。这还没有计算运送武器和装备的车辆，以及军队从自己的家乡到行动集合点之间漫长旅途所需的供给。

计算结果非常直接：一支约1.2万人的军队，其中3,000人骑马，从进入敌境时算起要伴随着1.2万头公牛拉动的6,000辆车！这解释了查理战略的一些特点，比如将大军分为两三支，分开线路行军。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比如773年入侵意大利，就有意识地使用钳形运动绕开敌人的防御。更常见的是，这种分开军队的方式，是既能发挥法兰克军队的数量优势，而又不快速耗尽他们所经地域有限的草、干草和水源的唯一现实的方式。显然，在可能的时候，查理会使用水路，在驳船上为军队运送特定战略行动所需的补给，代价是限制了战略行动。比如791年针对阿瓦尔人的作战，就是沿着多瑙河两岸进行的。

显然，辎重车队限制了机动。军队不是按照步兵的节奏，而是以更慢的拉车牛的节奏行军：在可能的最好情况下也不超过一天9~10英里。在敌境内大半径的攻击破坏，是由骑兵小队实现的，他们离开主力军队，将给养携带在马背上而不是大车上。鉴于每匹马能承载220磅，每天消耗11磅，同时骑手消耗2.2磅，理论上一小队骑兵能够以平均每天19~25英里的速度独立作战10天。因此他们可以入侵的整个地域是十分广大的。

军队的主体依赖于牛，故我们必须发问，年度集结从3月推迟到5月，是不是因为给牛寻找草料的需要，而并不是为了马匹？这个理论似乎合情合理，不仅因为牛比马多，而且因为马至少一部分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完全以大麦或燕麦来饲喂，而牛只能在草地上放牧饲养。在最终的分析中，卑微的牛对查理的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远超过高贵的马，但显而易见的是，刀剑相交之时，重装骑兵是法兰克军队的主力。

要塞与围攻

在讨论查理的战争时，我们应该经常避免将战斗等同于对阵战。在古代和现代欧洲，对阵战都有其重要性，这意味着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

从长时段来看，对阵战并不是战争的核心。查理的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时期。查理统治超过半个世纪，并每年组织一或多次军事远征，然而这个时期，以现代观念可以计数的战役可以用一只手数过来：778年的龙塞斯瓦列斯，782年的辛特尔，783年的代特莫尔德和哈瑟河战役。其原因是查理的战役几乎总是以优势兵力入侵，敌军更偏向于退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区域进行防御。尽管伦巴第人、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作战传统和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战术。

因此作战的目的不是野外会战，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面对查理的装甲骑兵和众多为其提供支援的弓箭手。作战就是通过围攻敌人的要塞并将之夺取，以占领这一区域。查理·马特和不平在阿奎丹作战期间，文献资料所提及的成功围城战十分普遍，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蛮族军队曾经十分困扰于无法围攻被要塞坚守的阵地，而现在他们已经克服了。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建立永久的要塞，以实现征服，尤其是在像萨克森和阿奎丹这样少有人口中心的区域。其意图是在大军归乡后保证被征服土地的防御。它们也起到了未来战役的前进阵地和供给仓库的作用。

问题出现了，法兰克人是否仿效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而掌握了先进的围攻技术？不过这种技术也许不是皇帝的秘密武器。坦白说，文献资料很少直接提及对工程器械的使用，尤其是投石机。第一次明确提及法兰克人使用这一装备，要回溯到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⁴³ 集合军队的法令，通常会十分细致地说明每个人需要携带的武器和物资，却在攻城器械方面完全无记载。然而王室编年史家证实，在围攻查理建造在莱茵河右岸的要塞期间，萨克森人使用了投石机，我们可以确信排除这些异教徒具有超过皇帝的技术的可能性。⁴⁴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法兰克军队也使用类似的装备。因此法令中对器械的省略，可以被解释为，投石机和其他机械，是在决定了需要围攻夺取要塞之后在战地建造的。这恰好解释了，法令要求车辆携带军队特别声明所必需的木工工具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攻城器械在技术上的限制，其效力因所要进攻的要

塞种类的不同而变化。在查理作战期间，法兰克军队经常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敌人的要塞。例如，791年和796年两次入侵阿瓦尔人的领地和786年针对布列塔尼人的行动中，建造在森林和沼泽地的城堡和要塞都被征服了。810年，意大利国王丕平在海陆协同作战中占领了威尼斯潟湖中的群岛。但所有这样的要塞都主要是由土木建造的，和那些法兰克人自己建造的要塞一样：当需要围攻由石墙守护的古罗马城市时，这就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了。

在对伦巴第人作战期间，帕维亚与维罗纳都是在极长时间的围城后，因为城内敌人饥困而夺取的。帕维亚围攻持续了几乎一年。在翻越比利牛斯山作战期间，萨拉戈萨和随后的巴塞罗那也在疲困的围城之后陷落。巴塞罗那之战由皇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指挥，编年史家厄莫都斯·尼格鲁斯（Ermoldus Nigellus）在对此次围攻的记载中描绘的唯一战争器械是破城槌，其对城市坚固的围墙毫无作用。如奥尔多·塞提亚（Aldo Settia）尖锐地指出，他所描绘的路易王子骑马至城下，猛然掷出长矛扎入石墙，既是在表达一种蔑视的姿态，也是在承认无能。⁴⁵可能是他作为阿奎丹国王，在比利牛斯山以南的西班牙这么一个满是罗马城市的地区作战，这种经历促使路易大量投入，以置办攻城器械。在他的统治期间，一位编年史家第一次描述了在围攻另一座西班牙城市托尔托萨期间，军队使用了投石机；从此时起，投石机开始在中世纪战争中经常使用。⁴⁶

注释

¹ *Lex Ribuaria*, S 40; 参见E. H. Kantorowicz, *Laudes regiae: 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 2a ed. (Berkeley, 1958), 15 e 43。

² *CRF*, 25.

³ *CRF*, 75.

- 4 B. S. Bachrach, “Procopius, Agathias and the Frankish military,” *Speculum* 45 (1970): 435–41.
- 5 *Lex Salica*, S 13.3 e 17.2; *lex Ribuaria*, S 5.7.
- 6 *Vita Landiberti episcopi Traiectensis*, in *MGH,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6:365.
- 7 *CRF*, 44.
- 8 引文见W. Störmer, *Früher Adel* (Stuttgart, 1973), 145。
- 9 *CRF*, 74.
- 10 *CRF*, 20, 40, 44.
- 11 *CRF*, 77.
- 12 *CRF*, 32.
- 13 *Ahistulf*, 2 (in *LL*, 250).
- 14 *ARF*, 103.
- 15 参见第3章，关于791年对阿瓦尔人的战争。
- 16 L.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62).
- 17 Notker, 1.6.
- 18 *Lex Ribuaria*, S 40.
- 19 Kantorowicz, *Laudes regiae*, 15 e 43.
- 20 *MGH, CRF*, II/1: 204.
- 21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 277–78.
- 22 *CRF*, 50.
- 23 *CRF*, 49.
- 24 *CRF*, 48.
- 25 Störmer, *Früher Adel*, 145.
- 26 *CRF*, 48.
- 27 *CRF*, 25.

28 CRF, 75.

29 Astronomus, *Vita Hludovici imperatori*, E. Tremp ed. (Hannover, 1995; vol. 64 in *MGH, Scriptores*), 378. 我十分受惠于F. Prinz, *Klerus und Krieg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71)中对此的分析和随后的文本。

30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25.

31 CC, 88.

32 Alcuini, 25.

33 ARF, 61–65; Einhardus, 9.

34 CRF, 33.

35 CRF, 50.

36 CRF, 73.

37 CRF, 44.

38 CRF, 73.

39 CRF, 44 e 74.

40 CRF, 57 e 73.

41 CRF, 74 e 98; ARF, 80.

42 参见第14章, 关于查理大帝统治的末期。

43 Astronomus, *Vita Hludowici imperatoris*, 330.

44 ARF, 44.

45 A. A. Settia, “La fortezza e il cavaliere: tecniche militari in Occidente,” *Settimane* 45 (1998): 570.

46 Astronomus, *Vita Hludowici imperatoris*, 330.

第12章

一种新的经济

封闭式经济的神话

20世纪关于加洛林经济情况的历史编纂，长期受制于一种令人不悦的偏见。根据亨利·皮朗的理论，在阿拉伯人入侵后，西方曾经一度被剥夺了入海口，其经济退化到了被个体消费所支配的纯粹农业生产的水平，长距离贸易几乎完全消失。贸易的弱化甚或消失，必然意味着封闭经济的说法广泛地被教科书接受，其中描绘了一幅偏狭沉闷的农业生活场景。因此学界也很难认为加洛林时代是繁荣的，即便更温和的或者那些皮朗之前的经济推动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并承认查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这一显而易见的结论。“彻底缺乏技术，土地失去控制，几乎没有建立起定居点，稀有且极其普通的剩余物资被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用于交换，生产结构机能几乎完全失调，至少生产效率很低”：直到1981年，像罗伯特·福西耶（Robert Fossier）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才觉得有责任这样总结一下加洛林帝国的经济现实。¹

但是这一次，存续了半个世纪的正统说法受到了挑战，正如福西耶自己一定也曾意识到的那样，他补充道，“但除此之外，同样的事实是

，人口数量可能增加了，少量的迁移，货币多了一点，存在一种渴求更好的愿望”。如今，这些以他的观点来说还不足以称为成长的现象，得到了更好的认识，并且倾向于形成一种显然更为积极的历史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释成功地提供了一幅各方力量角逐的全景：从生产组织到大地产所有权，从帝国政府的经济和财政介入到大修道院的推动作用。因此这允许我们将加洛林经济看作查理的治理中充满活力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背景。

这就是我们对其的设想。农业主宰了经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其中许多人是小土地持有者，居住在自己的住宅里，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可能这些农民真的生活在个体消费的基础上，食用自己生产的面包和猪肉，饮用自己的酒。大地产主则是完全不同的角色。他们雇佣的农民数量庞大，可能占据了大多数的农民人口。这些大地产和古代的大庄园（latifondi）不同，倾向于用一种历史学家称为封建庄园（maniera）制度的新方式来自我组织。总体而言，大地产必须为其所有者提供食物，通常是修道院甚或国王。但它们也在一个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为系统化的基础上生产剩余物资，这些剩余物资用于贸易。

考虑到这些贸易活动，从地理布局偏好来说，大规模的王室、贵族、主教区和修道院的地产都位于卢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帝国核心地带。在失去了地中海的出海口之后（正如皮朗所指出的），法兰克人统治的欧洲并没有停滞在个体消费经济之中，而是将其贸易线路指向了西部和北部。817年，本笃会僧侣被授权使用猪油和牛油以替代橄榄油；按照规定他们应该使用橄榄油，但其在帝国的很多地区几乎无法获得，这一惊人的现象标志着贸易线路的转向。牺牲地中海水域，转而偏向北海，并不导致贸易规模全面缩减。与此同时，修道院坚持要求免除他们运送农产品的代理人的通行费，国王在价格和货币领域立法；布伦（Boulogne）港口的古罗马灯塔得以修复，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受到王室许可保护的商业中心不断涌现，遍布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的河道流

域，以及佛兰德和弗里斯兰海岸。这吸引了为大地主效力的交易商（negotiatores），他们搜寻自己主家的土地所不能生产的产品。盎格鲁-撒克逊、弗里斯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提供鱼、奶酪、纺织品、皮毛和奴隶以换取谷物、酒、武器和陶器。而像马赛这样的旧地中海港口逐渐衰落，沿着罗讷河的交通已经停滞。像塞纳河口的鲁昂、英吉利海峡边的昆托维克、莱茵河口的杜尔施塔特（Dorestad）这些新的贸易中心开始在基督教世界声名鹊起。

因此，在对传统解释的壮观的反转中，大型庄园农场占据优势，不再意味着欧洲陷入了个体消费经济的悲惨境地之中。欧洲最终形成了一张新的城市定居点组成的密集网络，政府有意于维护道路和河流的联系，并推行财政改革，以保证一种遍及整个西部且易于管理的统一货币流通。正如朱塞佩·彼得拉利亚（Giuseppe Petralia）所正确指出的，“皮朗所理解的没有贸易出口的封闭经济处境，已经转变为另一种处境，西欧不可阻挡的活力正在其中孕育”²。从这个观点来看，查理的立法行动和统一政策，正是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欧洲繁荣发展的起点。

庄园地产

庄园或“田庄”

经济的最核心部分，是依照庄园模式组织起来的大型农业地产。在我们近距离研究商人和贸易之前，这必须是我们的起点。应当明确，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说服了我们，我们认为帝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独立的农民，他们经营的经济和大地产经营的经济并不一样。他们为自己工作，然而更可能的是，在许多地区，村落和耕作以庄园的形式组织起来，它们是特例而不是一种制度。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因为一般认为，大地产而不是独立的农户，是整个经济的推动力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农民如何生活、吃什么、如何工作没有兴趣。我们从书面资料中无法得知的这些情况，现在开始从考古调查中显现，我们随后将会见到。然而，要理解加洛林经济如何运行，我们必须首先描述庄园地产。

皇帝、大修道院、主教和贵族家族拥有大片的土地，其中有数千奴隶、获释奴隶和佃农。这些地产分布在广大的地域中，同时在皇帝看来，这些领地也恰好是帝国领土本身——大约40万平方英里。对一个修道院院长或一个伯爵来说，在距离他们主要的居所数百英里之外拥有土地并控制着劳工是十分常见的。出于管理的原因，这些土地无论位于何处，都组合而成农业复合体，以当时的拉丁语称作“库尔特”（*curtes*）或“田庄”，其中每一处地产都由一位代理人负责，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得到管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大土地所有者拥有不止一处而是多处“田庄”，可能有几十处；如果是皇帝，有数百处。例如巴黎的近郊圣日尔曼修道院，拥有多达25处“田庄”，大部分位于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

，总面积超过12.4万英亩。

这些田庄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古代的大庄园不同。首先，其在地理上并不是紧密相连的地产：拥有谷物和橄榄树的田地，目力所及之处都属于同一个主人。不同的是，“田庄”的田地、葡萄园、草地和森林不一定毗邻，但出于管理的原因，组合成一体。当然，和所有社会中一样，大地产者倾向于进一步扩大土地，并吸纳周围毗邻的小地产，这样在一处或多处农民的定居点，大部分的土地或实际上所有的土地都会属于同一位土地所有者，并在同一个“田庄”内组织起来。大型王室地产或当时文件中所称的“王田”，尤其喜欢采取这种形式。在法国，一个现代公社的领地，甚或两三处相邻的公社，它们的边界和古代的王室地产一致。“田庄”几乎总是包含着分散的地产和各自孤立的劳作者，而和一些属于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一样，农民的小地产在主人的田地之间保留了下来。

劳动力

庄园地产和古代大庄园的第二个不同是，最起码在其典型形式下，其所有者不再拥有足够的奴隶在基础极其广阔的全部土地上工作，以此迎合市场的需求。在查理和其继任者的时代编制的少数大型修道院持有地产的清单显示，不到一半的劳作者是奴隶。在此我们并不关心相关的奴隶人口减少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发生了，但这只是土地所有者所采取的反制手段。基本上来说，这牵涉到维持地产上指定区域直接管理的决议，这些区域继续通过奴隶劳工进行开发，而剩余的区域划入农场之中。根据最后几位罗马皇帝统治时开始传播的习俗，每一个农场都被托付给一个农民家庭，他们向土地所有者承担一系列义务，而其中支付租金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义务。

这促进了分散化组织的兴起，分散组织成为庄园地产的典型。每个

“田庄”都有部分土地直接由一队奴隶耕作，收益归主人；而另一部分土地在农民中细分，他们或多或少能独立地组织劳动。前者被称为“dominicum”（直领地）或“pars dominica”，即“主人的部分”；后者被称为“massaricum”（佃农地）或“pars massaricia”（佃农的部分），来自术语“massarius”，该词表示居住在土地上的佃农。这并没有说明土地是差不多平均划分的。租出的土地和直接管理的土地之间的比例极易变动，不过在查理的时代，分割成小农场的那一部分可能已经趋向于大于主人留存的那一部分，这一倾向还在继续。

这种发展是特定政策的产物，倾向于将奴隶转变为在其自己土地上独立劳作的农民。他们的工作若出于这一动机，将会更有成果。出于宗教的原因，法律要求地主允许他们的奴隶结婚并尊重他们的婚姻。这进一步成为给每个人分派一所房屋的原因。宗教也鼓励释放奴隶，他们的人数不断减少，宗教的作用并非无关紧要。奴隶拥有者总是会选择一种方式，有条件地释放奴隶，并保证释放的奴隶受主人的约束，迫使他们作为小土地持有人在庄园内劳作。

“份地”

“田庄”的本质，是通常并不互相毗邻的地产的集合体，它们拥有不同品质的土地，并不总是适合同一种类型的耕作方式，而且“田庄”倾向于将大部分土地转变为佃户的农地，当时的文献称之为“份地”（mansus）。术语“份地”意味着居住的房屋以及一户或更常见的多户农民所耕作的土地。这个词的词源可以回溯到居住的概念，仅此而已。这个词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比如所有权的形式。提及“份地”的文献主要是大地产的财产清单，其中每块“份地”都归入一处“田庄”。另一方面，查理的法令集中经常提及的小土地或中等土地持有者，只能拥有一至三块“份地”，它们可以被租给同样数目的农民，而并不在庄园地产内组织生产。一

户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的自由农民的居所和农田也可能被称作“份地”。实际上，在添加了形容词“indominicatum”（土地所有者的）之后，这个词同样可以指代一处“田庄”中保留给土地所有者进行大规模耕种的土地，也可以称作庄园农场。

可能归于一处地产之下的“份地”最终成了一个主要的管理概念，而不含有任何地理上的意义，因为一户农民可以分配到村庄中的一所房屋、所有居民共同耕种的大片土地中的一份、未开垦的放牧牲畜的土地中的一份，还有养猪以及从森林中取用木柴的权利，可能还有在河中捕鱼的权利。所有的这些财产和权利构成了土地所有者眼中的“份地”。在另一些情况下，“份地”代表了我们所说的农场（podere），字面含义是指一连串与农民所居住的房屋相连的小块耕地。不论独立的小农户还是大地产主的佃户，其“份地”并没有任何区别。

如今，再没有人提出“份地”规模的问题，这个问题曾长期被税收史学家所关注。我们同样也很难理解他们对同一“田庄”内“份地”规模的巨大差异表现出惊奇。即使今天在乡村区域里，也能发现老人在小块土地上辛苦劳作，紧邻着的是十或二十倍大的繁荣农场，由兄弟两三人合伙经营。所以将土地划为“份地”，并不是一种人为的义务，而是反映了社会的自然推动力，这种划分将会产生广泛不同的变化。此外，土地的肥力还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不同的区域适合耕种粮食作物、辟为葡萄园或者养牲口。所有这些差异都对“份地”的规模和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当时的测量和会计技术还十分原始，帝国的统治者不顾其可变性，将“份地”视为衡量地产和财富的最有效的单元。按照皇帝的命令起草本院财产清单的修道院，以及在某一区域的地产主中分配军事义务负担的地方官员，都将他们的统计建立在“份地”数量的基础上，这些“份地”组合成每一处“田庄”，或者归属于每一位土地所有者。“份地”被用作衡量耕作土地并收取地租的单位，也成为统计政府征收税负的单位。很容易就能想到，这一定会导致许多不公正和不平等。但税收体制不就是这样吗？

徭役

分散的庄园系统为什么能普及？为什么大地产所有者在必须将自己土地的一部分转变为小地产时，并没有将他们的一些“田庄”完全分开，而将另一些完整保留，并将之置于直接管理之下？这些都有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为什么每个独立的“田庄”都既有直接耕种的土地，也有租种的土地？其原因是，在一个技术资源有限的社会里，农民们的劳动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季节的规律。一位希望在广大地域里大规模耕种的土地所有者，比如在“直领地”或大“田庄”里的庄园农场，在收获和割草季节都需要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但最少的劳动力就足够使用的月份也会很多。因此雇佣数量最少的“雇工”（*prebendarii*）就有其意义，正如人们所说，奴隶无论自己工作与否，主人必须全年养活他们。在需要更大规模劳动力的时节，例如收获时节，土地所有者就会召集他们的佃农来协助。同时他们强迫佃农在需求最多的时节尽其所能地犁地，并且将收成运送到市场和主人的住所，也就省下了在“直领地”里维护犁、大车和牛的费用。

因此居住在一块“份地”上的农民，承诺向土地所有者提供自己的劳动力，达到一定的天数，如果有必要，还需用上犁和大车。这种承诺提供劳动力的义务，被称为徭役（*Corvée*），大体上取代了领薪劳工。领薪劳工在其他时代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查理的时代很少使用。原因是当时缺少流通的货币，同时国家人口较少，总体上也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因此就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无地劳工阶层，愿意出售自身劳动力换取薪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土地所有者需要保证耕种并且运送收成的所有土地上，以徭役形式无偿提供的劳动力是必不可少的。这随后成为庄园经济的核心。

这些劳役并不只有经济的目的，或者说它们的作用远超过了纯粹经

济的范畴。因为佃农被契约所束缚，契约通常是口头的，并且父子相传；因为他们在主人的土地上肩并肩地和奴隶们一起工作，尽管只是特定的时段，但经常包括繁重的苦工，他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是象征意义上，还是实际意义上，都依赖于自己主人。尽管他们生来是自由的，但他们是土地所有者的人——以一种和奴隶不同的方式，确实如此，不过实际比较起来没有那么不同，但在社会共识上，不能将其描述为一种同化。之后存在着获释奴隶的后代的问题。这些“自由”（liberti）或被释放的奴隶，世代受其主人的束缚，需要为他工作，崇敬他。因此，一旦他们都定居在农场里，开始自己耕种之后，他们很快就变得和那些受奴役的人没什么区别了。那些所有在大地产里为一个主人卖力的人都渐渐被看作一种大规模的隶属劳动力，或者，让我们使用这个词语“农奴”来描述他们。这种趋势至关重要，其终结了古代奴隶制度，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农奴制。在此制度之下，大量的农民失去自由，持续许多个世纪。

地产的管理

“田庄”在规模上变化很大，从500英亩至5万英亩不等，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2,500英亩至5,000英亩。因此直接雇佣的劳工数量也相应地变化。农户的数量可能从几十到数百。最大的王室地产之一位于意大利的贝内·瓦吉恩那（Bene Vagienna），其组织了超过3,300名劳工为其工作，他们连同自己的妻儿，在这一区域就相当于1.5万人。很自然，这一规模并不是静态不变的：“田庄”和所有类型的地产一样，是一种活跃的组织，因此也在变化中。荒年、疫病折磨或者边境之地战争的破坏，会彻底摧毁难以代替的农民家庭。修道院的财产清单会经常提及“空缺份地”（mansi absi）或“无人居住的土地”，不过不得不说，这些“份地”还是经常被人莫名其妙地耕种。

无人居住的“份地”出现，可能也反映了一种不间断的重组甚或是开垦新土地的活动，这些新地佃农们还无法永久居住。尽管帝国总体而言人口稀疏，但人口还是倾向于增长。当劳动力增加的时候，主人就会下令开垦新土地：清理灌木丛林地、砍倒树林、排干沼泽地以开辟新的农田。在拥有劳动力进行耕作的前提下，不存在土地短缺。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开拓精神是广泛存在的。不过在大规模提高土地使用率上，这种开拓精神并没有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土地使用率的大增直到下一个千年的早期才发生。

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相信，所有的“田庄”都以同样的体制进行组织，不考虑当地的条件，生产主人所需的一切。这种情况下，那些为主人消费而留存的土地，必须包含大量不同的产品，从酒到麻类、从牧养牲畜的草地到采伐薪炭并养猪的林地。代理人会一直居住在庄园里，他代表着地产的管理中心。紧邻庄园的是畜棚、谷仓、马厩、仓库，生产奶酪、咸肉、啤酒的场地，以及菜园、养鸡场和渔场。有时候还会有作坊，其根据古代的惯例被称作“内室”（*gynaecea*），在这里工人的妻子们为全体劳工的家庭织布制衣，这成为一种劳役的形式。

如今，我们拥有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大部分的“田庄”属于那些另外还拥有许多“田庄”的业主，他们能够以确定的预判来专门规划生产。显然，代理人会根据自己是否要准备接待主人在此过冬、是否为军队准备辎重队或者是否将收成出售而将收益送给主人，来有区别地组织自己的工作。尽管“田庄”是独立管理的，但其仍然是一个大型生产循环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大型王室地产的情况是，几处相邻的“田庄”将会置于同一位代理人的权力之下，管家（*maiores*）和工头都要对其负责。

当地的条件也会影响到土地里生长的作物类型。在特别合适的区域，主要的庄园农场专门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这涉及相关设备的重大投入。在气候和土壤适宜的地方，庄园农场会被指派完全用于牧养牲畜。

在边境地区或者难以进入的地带，农民们必须和稠密的灌木丛或者沼泽地作斗争。例如波河下游流域，这里几乎所有土地都需要拓殖，土地所有者经常会决定将庄园农场的规模减到最小，让定居者从事繁重的劳动，以犁开垦新地。与之相反，在土地肥沃的广阔平原，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通常会倾向于在大范围内种植大量的谷物。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建立一个大型的庄园农场，并且残酷地剥削自己佃户的自由劳动力。

在大地产中耕作，人们会在有250英亩至500英亩农田的大片区域里种植谷物，其目的是为了储存而不是立刻消费。这种特点明确地表现在庄园农场所偏好种植的谷物类型上。在所有地区里，最珍贵的谷物是小麦和黑麦，高卢北部大地产中的庄园农场主要种植大麦和斯佩尔特小麦（*spelta*），还有另一些现在已经消失的谷物。哪些谷物容易保存下来，可以说明他们偏好哪些谷物。他们在大地产中耕种的偏好，是低风险且适合储存的谷物。回溯到罗马帝国的时代，边境守卫就在他们的仓库里主要储备斯佩尔特小麦。有人认为僧侣和贵族食用以大麦或斯佩尔特小麦制作的面包，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庄园仓库里储备这些谷物，只能被解释为一种精打细算，以建立起持久的储备，供养奴隶，为每年前去作战的军队提供补给，甚至必要时在公开市场中出售。引人注意的是，在查理的时代之后，奴隶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大型军事作战变成了一种久远的回忆，贸易也变得越加危险和困难，庄园农场就放弃了大麦和斯佩尔特小麦，偏向于生产黑麦和小麦。

交换经济

贸易在大地产管理中的作用

为了理解加洛林经济的动力，我们必须抛弃先入之见，即多多少少自动把贸易和现实的城市联系起来。在查理的时代，古代的罗马城市屈指可数。其中有许多城市，可能多达一百，只存在于意大利，比如帕维亚和罗马，它们保持了重要的地位，并拥有超过几千的居民。其他城市仅有的现实意义就是有一位主教或偶有一位伯爵居于此地。让·法维耶（Jean Favier）曾经指出：“当时的城市是什么？视野之内是一座教堂，大教堂；环绕其周围的是一些房屋，一层或两层，很少有三层的。偶或有一道城墙或者其他什么残存的东西……12公顷〔共30英亩〕土地以及两三千居民构成了一座城市。”³重要的沿海和沿河港口发展成为北部海岸交通十字路口的重要商贸中心，并且它们逐渐有了城市的意识，但它们的喧闹和兴盛本质上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副产物。人口和武装是在乡下缓慢增加的，在那里森林被砍倒，沼泽地被排干，为耕犁开道；也是在那里，货币开始流通，尽管总额依然非常小；还是在乡间，市场开始涌现，其中最为成功的市场随后转变为城市。

在乡间，民众劳作、生产、消费、储存并且再次大规模地投入，这些是我们之前所相信的，在这里有一种决定性的推动力从大型修道院地产中产生。它们是唯一被文献充分记录下来的案例，在其中我们了解了土地的清单、设备、农民，在少数幸运的情况中，甚至还有主人与其代理人之间的通信。无论我们何时了解到它们的信息，我们都能认识到，修道院院长有非常清楚的想法，知道如何去运作他们的产业，并且他们肯定不乐于仅仅被动地消费地方代理人送给他们的剩余物资，隐退到自

己祈祷和反思的世界中。当然，他们并不像中世纪晚期的生意人，更不像现代的资本家。这些修道院院长的动机显然不是逐利，在财务方面依然很少获益，但毋庸置疑，他们有更多的企图，决心要让修道院的产业尽可能出产更多东西。

修道院院长不是生意人，这值得重申，但教规要求他们为自己的僧侣提供衣食，慈善需要他们帮助穷人，而且国王的命令要求他们为朝圣者，偶尔为国王自己和使节们提供容身之所，同样也要派出整装的骑兵小队奔赴战场。所有这些都要求仓库装满谷物，地窖里装满成桶的葡萄酒、啤酒和油，食品间装满猪油和盐，柴棚里装满原木，有大群的马和牛。随后，所有这些产品都必须运送到修道院，有时距离十分遥远，数量令人吃惊。科尔比修道院每天消费一吨谷物！

修道院院长不能仅仅坐等，以自己的收入为生：他们必须积累、分配、规划并投资。使用最广泛的政策构建在预算修道团体所需消费的基础上，并且提前预估修道院所拥有的每个农场所需要的供给。在计算日常制作面包所需的谷物后，科尔比修道院院长就会确定有多少谷物必须来自庄园农场的收成，又有多少必须来自修道院所拥有的磨坊的收入。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给每年僧侣餐饮所需的所有产品进行估价，他会在一定数量的“田庄”中分配供给的任务，并且命令剩余的“田庄”提供僧侣的衣物。圣万德里勒修道院的院长列出了修道院地产所能生产的一切，按照省区进行分类，将一年中各个月供养修士团体的任务各分配给一两处“田庄”，并且分别计算还需要获取的必需品，以补充给修道院土地的产出。近郊圣日尔曼修道院院长在评估修道院的财产“直到每一只鸡每一个蛋”之后，将其分割，分派一部分供给僧侣，另一部分供给国王的军事活动，最后一部分留给修道院院长个人消费。⁴

尽管计量的技术可能还是原始的，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对大地产的理性管理以及一定程度内对需求的预算，代表了一种对僧侣的关注。为了使体制运作起来，修道院院长需要有能力通过陆路或水路长距离组织

并运送供给。因此他们设定了路线，护卫可以沿着路线行动，在属于修道院的地产里停歇；他们装备了驳船，为合适的当地农场配备港口设施，为驿马和辘重车队雇佣劳动力，并且不断向国王请愿，希望他能够保证道路的安全，并且免除修道院代理人的通行费和市场义务。这一稠密的交通网，其自身就足以反驳封闭经济的说法，即便人们广泛认为自给自足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买卖和以物易物

然而，这一理想可能很难进入实践。这就是货物运送在何处变成贸易。有一份修道院的列表：圣瓦斯特、圣里基耶、圣贝尔廷、近郊圣日耳曼、圣万德里勒、费里埃。这些修道院试图在大港口昆托维克甚至其周边地区购买仓库，以此作为他们经营贸易的基地，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了。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购买和出售，因为费里埃修道院的例子证明了以物易物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阿尔昆也是靠近卢瓦尔河的这所修道院的院长，查理曾赐予他一块位于佛兰德海岸的泥炭沼泽地的地产，就在滨海圣约瑟（St-Josse-sur-Mer），距昆托维克很近。从此，修道院就能获得蜜蜡、衣物、蔬菜、奶酪以及干鱼、腌鱼的供给，能够履行皇帝要求的接待的公共义务。在查理死后，一位继任国王收回了这一恩赐，于是新的院长卢普斯，突然发现自己无法为72名僧侣提供得体的衣食：“我们穿着磨损且布满布丁的衣服，仆人几乎裸体受冻，我们不得不困于饥饿，食用花园中的草药。”⁵

显然，僧侣可以在自己当地获得所需，实际上他们最终也决定这么做：卢普斯院长在通信中不厌其烦地无数次提及，需要在奥尔良的市场购买蔬菜、谷物和啤酒来供养自己的团体。所以就存在一个市场，有补品出售，也有货币去购买货品，不过有些阶段，货币用光了，院长被迫出售教堂里的珍贵器具。对卢普斯而言这不是运作一种良性经济的方

法：系统性地用金钱购买产品对他而言似乎最为可耻，并且长此以往注定会让修道院变穷。甚至以前曾经产自滨海圣约瑟的物资也显然主要从昆托维克的市场购买，但这就存在一种不同的逻辑：那一地区的修道院产业，使得创造剩余产品并将其放在市场上交易变得可能，大体上不需要用到货币。

同样顺理成章的是，使用原始的赠予和回报体制，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现金的缺乏；没有这些，想购买货物和服务会极其困难。费里埃的卢普斯的通信里充满了请求。有一次，他请求一位朋友赠予他20根长树干，并向他提供一些木匠。他要让他们和自己的木匠一起建造一艘船，他指出要做得更好，要超过他见过的待售的船。随后他请求普吕姆修道院院长送给他一些昂贵的衣物，他想将其送给教宗。然后他写信给英格兰国王，乞求他将盖教堂屋顶要用的铅送到昆托维克，他的代理人将会在那里接收。所有这些情况里，他们从未提及偿付问题：这暗示了在这些通信者需要费里埃修道院院长效力的时候，院长会回报他们。不论这一体制如何原始，它终归起效了。这既是交易，也是一种稠密的社交义务网，任何人若试图用更现代的偿付体制来取代它，都会面临冒犯与之交往的人的风险。这就是在费里埃的卢普斯身上切实发生的情况。当他请求科尔比修道院院长偿付那艘最重要的船（他最终设法造出来了）的租金时，他遭到了愤然的拒绝。⁶

货币在加洛林的经济中只有辅助的作用，然而今天它是交换货物和服务最为关键的途径。甚至对那时的富人来说，他们的理想是个体消费，而不是获利，更不用说社会中的其他人了。在任何可能的场合，赠予和以物易物都会在有需要货币交易的地方使用。然而，尽管货币可能是边缘化的，并且经常匮乏，但在市场上购买其他手段无法获得的产品或者交税时，还是需要货币。更有先见之明的修道院院长会通过出售他们剩余的粮食和酒来储蓄货币，以应对艰难时期。代理人也受命出售牲畜、磨坊里收的面粉、菜园里的蔬菜。实际上，有时出售意味着用粮食或酒以物易物，以成桶的酒或成车的盐来偿还债务，虽然如此，但还是有一

些货币在流通。虔诚者路易下令，欠教会的什一税通常以产地的一部分收成或牲畜来缴纳，但他补充道，如果主教更愿意，他们可以以货币来征收。⁷通过此举，他证明了那个时代对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完美理解：它可以被称为一种可选择的资源，严格说来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但实际上还是被许多人珍视并追求。

在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只是更便捷，比大宗的食品更容易流通。在帝国的所有地区，修道院都倾向于要求那些居住较远的农民用货币缴纳地租，而那些在附近工作的农民用实物缴纳。比如科尔比修道院院长期望他的佃户用实物来缴纳地租，并将其送至修道院的仓库，但他允许那些居住较远的人出售货物，以货币缴纳来履行自己的义务。⁸缴纳的方式无甚差别，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乐于和征收成包的粮食、成桶的酒一样征收货币。这给佃农带来了压力，他们被迫积累成打的银币，每年缴纳给他们的上家。

因此乡民也成了市场的一部分。从国王到最卑微的劳工都毫无疑问有着共同的个体消费理想，但其可行性在实际中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对两者加以区分。当然，农民不必像教会一样为做蜡烛而购买蜜蜡，也不必像贵族一样购买高质量的酒。农民依靠土地供养自己的能力，在每家各户、各乡各村都会有所变化，这可以从近郊圣日尔曼修道院院长伊尔米诺（Irmino）下令所写的清单中，那冗长的佃农列表中得见。因此，在各个村庄及相邻的村庄之间，交易货物是很常见的。但不排除偶尔有些富裕的农民凭借靠近可通航的水路之便，将自己的剩余物资，通常是酒，进行长距离贸易。乡下商人的资料记录在各地都多少有所留存，他们并不只是和修道院的代理人以及有权势的人交易。查理曾经禁止他庄园里的劳工浪费时间去逛市场，这就意味着市场是农民们聚集的场所，他们并不是只会在那里目瞪口呆。⁹

商人和集市

本地贸易一部分由农民组织，而长距离贸易由商人管理，他们以贸易为生。在帝国的一些地区，他们构成了一个富裕而又有影响力的群体。一个例子就是意大利，在这里波河为来自亚得里亚海的盐和由威尼斯商人进口的东方布料提供了天然的流通线路。当查理还是孩子的时候，伦巴第国王阿斯图尔夫颁布法令，要求每个与他的财产有关的臣民都需要持有武器装备，他囊括了“那些并不拥有实体产业的商人”¹⁰。显然，他认定富有的商人能够和大地产主一样购买马匹和盔甲。

商人密度最高的区域是弗里斯兰人居住的北海沿岸。尽管近期才臣服并基督教化，但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法兰克人的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并入加洛林政权可能是弗里斯兰商贸活力的顶点，其成功建立了位于杜尔施塔特的商贸中心，这里是通往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真正门户。为了向北方的市场出口以获利，来自法兰克人腹地的货物必须装上船，而拥有专门装货技术的人就是来自海边的弗里斯兰人。这解释了他们对国际贸易的实际垄断。

少量来自东方市场的奢侈品依然进口到了高卢，它们掌控在犹太商人的手中。他们主要居住在罗讷河沿岸的城市中，并且不是通过海路进口货品，而是通过穆斯林的西班牙。有迹象表明，政府出于道德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对他们的存在表示关切。806年，皇帝命令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看管好教堂里的珍宝，“因为犹太商人还有另一些人夸口说，他们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一切”¹¹。随后里昂的主教阿格巴德诉苦，为了取悦犹太人，有必要变更集市的日子，之前是在周六。¹²但是阿格巴德此举是怀有恶意的，因为犹太商人在查理治下十分成功，在虔诚者路易时期更甚，他们向宫廷供应葡萄酒、香料和纺织品，并享有广泛的特权。这包括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法律接受审判、雇佣基督徒，甚至在帝国宫廷里也能奉行自己的宗教。

关于通过陆路向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居住的广大东欧平原出口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随着皇帝作战胜利，逐渐强迫这些民族屈服，出口

贸易变得越发重要。805年，在准备与易北河沿岸的斯拉夫人作战时，查理颁布了严格的限制令，限制商人在这一区域的行动，禁止他们出口武器和盔甲，违反此令的代价是没收全部财产；并且指定了沿边境的十个口岸，禁止他们在此越境。在每一地，都专门任命了一位帝国官员来保护商人，同时也监管他们的贸易。¹³

保护臣民，包括保护国际贸易，是君主的一项专门职责。在和麦西亚国王奥法的谈判中，查理要求当“朕的商人”在英格兰活动时要给予优惠条件。¹⁴后来虔诚者路易恩赐那些供应宫廷的商人，除了昆托维克和其他边境地区的关税义务，也免除他们帝国内所有的税负。¹⁵这显示出，皇帝对那些愿意冒险、出海从事大规模进出口的臣民态度慷慨，并且意图鼓励他们的活动。另外，他也不是唯一重视商人的国王。808年，丹麦国王戈德弗里德（Godefrid）攻击了居住在易北河口的斯拉夫人，并且摧毁了加洛林欧洲和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商贸中心。随后他强迫所有商人迁移到海特哈布（Haithabu）这一新据点，位于他的王国边境，在这里他已经建成了一个商贸中心。¹⁶尽管他的方法很不正派，但这昭示出商业战概念的诞生，其目标是欧洲北部的兴旺贸易。

较之重要的国际贸易者，在地方活动的商人更少被人了解；尽管他们并不同样拥有致富的机会，但看起来地方商人并不缺人。一位8世纪的圣徒传作者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穷人的财产只有一头驴，他和这头动物从一座城市游荡到另一座，他在一地购买物资，在另一地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圣徒传作者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商人（mercator），他载着盐从奥尔良到巴黎，显然是为自己工作。可能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我们很少有机会能从资料中发现他们，除非是完全碰运气。¹⁷

关于那些代表修道院进行贸易并受其保护的商人，我们有一点更多的信息，他们享受通行费豁免，这是国王慷慨赐予修道院团体及其代理人的特权。775年，在重新授予圣德尼修道院的特权时，查理特别规定，免税适用于所有属于修道院的食物，无论它们是以大车、船、驮畜还

是搬运工来运输。对那些来自僧侣地产以外来“经营或买酒”的买主，以及所有属于修道院并在其保护下活动的交易商，免税政策都适用。¹⁸

确实，圣德尼不是随便一所修道院。自古以来，在10月9日那里就会举办一次集市，即圣德尼节庆。那天，商人从各个国家来到这里，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北方的弗里斯兰人，他们购买葡萄酒再出口到遥远的国家。这个集市孕育出活跃于整个巴黎盆地的河流贸易。修道院本身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葡萄酒生产商，在组织和监督集市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它享有王室特许的权利，可以保留所有相关的税收，税收范围不仅有修道院周围的集市区域，而且包括整个巴黎郡。

圣德尼集市的普及，以及鲁昂、奥尔良、杜尔施塔特和昆托维克这些沿海、沿河的商贸中心，也和贸易最根本的弱点有关联。大量商人和买家聚集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往往不能在其他地方买到自己所需之物。艾因哈德在老年时成了两所修道院的院长：美因河畔的塞利根施塔特和根特（Ghent）的圣巴冯（St-Bavon），它们的位置相隔有百里之遥。一次他在塞利根施塔特写信给在根特的代理人，要求他提供这里无法提供的蜂蜡，因为接连两年的坏年景已经毁掉了养蜂业。¹⁹ 贸易不是所有人都喜好的经济行业，或者说任何人，只要可以，没有贸易也过得去，这种情况不足为奇。但是贸易和货币不顾一切地持续发生和流通，这种固执恰恰证明了，不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加洛林经济。

国王的政策

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王的积极有为。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只是对经济的间接关注，但其影响并不小。查理需要让教会经济资源为其所用，因此宫廷使节要求将教会的财产列出清单。这反过来劝服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他们觉得必须去规划好他们土地的管理，使之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最终，这一压力导致了庄园体制的普遍化。但是国王的直接介入也同样重要，并且他的介入证实了对经济问题以及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可能作用的认识在逐渐提升。有时会有一般的规定，旨在控制商业活动，保证消费者利益。例如，禁止在夜间交易金银盘子、珠宝、奴隶、马匹和牲口——换言之，所有可能欺诈买主的物品。在日落之后，只有必需的补给品和干草能在客店卖给旅行者。²⁰ 查理推出的其他措施，涉及重要而复杂的计划，树立了一种自觉的意图，即在更细微的层面介入经济体制：这些改革影响到了度量衡、通货和食品价格。

度量衡

查理持续关注的一点，就是对帝国境内使用的度量衡进行标准化。其出发点和往常一样，是道德。他想要保证没人会被欺诈，依据《圣经》里的诫言，针对那些使用“各色度量衡”²¹的人。当务之急是秩序、稳定与和谐，这些似乎主导了查理的立法，这些立法随后在市场中产生了作用。这意味着介入经济，首先是为了监察，随后是控制。当不平还是宫相的时候，他曾命令每位主教都要监管当地市场使用的度量衡。²² 他的儿子更进一步，想要在自己的整个王国强行采用标准度量衡。

他可能在787年就已经在思考此事，他巡访意大利，并在卡西诺山修道院停留，归来后他写信给修道院的院长，请求他送来曾由圣本笃确定下来的一磅面包和一份酒。²³其当下的目的是为了给王国的数百家修道院里的僧侣确定食物消费的标准，但查理不失时机地扩大了他的计划的范围。794年，推出一种新的容量标准，液体和固体，或者用更实际的说法，即酒和谷物都适用。这种容量被称作“公斗”（*publica modius*），与之前使用的“斗”（*modius*）相区分。同一年，法兰克福会议命令所有人使用同样的度量衡即“最近推出的公斗”，以确定市场价格。²⁴新的“斗”比之前的标准大不少。802年，皇帝下令，从此起，以前缴纳三斗地租和税款的人，现在只交两斗。²⁵

改革成功与否，存在一些不确定。查理命令所有王室地产的代理人都要在家中保留一个之前所说的“斗”器，其形制和宫廷中的一样。²⁶然而，对实际使用中五花八门的度量衡的抱怨，三令五申使用官方的“斗”而排除其他度量衡，这些证明了旧的度量衡仍在使用。甚至在822年，当虔诚者路易努力使人们最终接受他父亲的改革措施时，科尔比修道院院长并不掩饰他的愤怒：“这种新‘斗’是我主皇帝强加给我们的”；与此同时，他命令自己的磨坊工对旧斗和新斗进行比较，计算两者尺寸的比例。²⁷对变化的本能抵抗，以及执行中的实际困难，共同抵制着加洛林皇帝试图统一的雄心壮志，欧洲必须等到拿破仑和十进制的时代，才得以在整个大陆上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

货币流通

对度量衡的标准化，同样也牵涉到所谓的修道院改革，实际上是一系列由丕平发起，并由查理继承的立法措施。在这个领域，皇帝能够以一种全面而又系统的方式继续执行并扩大他父亲的政策。改革首要是推行一种基本单位制体系。在商业交易中只使用银币，以取代从罗马帝国

那里继承的金银币共用体系。从这些方面看，改革似乎像皮朗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货币流通和贸易减慢甚或衰败的结果。毕竟，尽管这些当地铸造的金币与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金币相比，难以立足，但是墨洛温王朝从未停止过金币的流通。而加洛林王朝的国王认定不值得再铸造金币，似乎他们认识到有一种突如其来且不可转变的衰退。

然而持续铸造货币其本身并不是经济大繁荣的证据；实际上可能相反。在几乎整个7世纪，法兰克国王只铸造金币，忽略银币。因此流通中最小的单位是金“特瑞米斯”（tremis），其推算的重量是0.053盎司，其价值能让一个人生活数月。看上去这并不是一个对小规模商业交易有利的时代。当加洛林的宫相开始在高卢铸造并流通一种新的银币“迪纳厄斯”（denarius）时，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危机，反而是贸易的复兴，尤其是在地方层面。

丕平以及随后查理推出的立法，并没有局限在鼓励并监管银币的铸造，而显然更加看好新的通货及其所能带来的潜在统一性。改革为整个西欧带来了唯一的通货，其基本地位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英格兰直到1971年。如今，我们略带调侃但并不挖苦地谈论查理的“原始欧元”。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决定按照固定比率铸造货币，所有的铸币都要遵守此比率。一磅银子铸造240枚迪纳厄斯银币。迪纳厄斯银币是帝国内唯一铸造的货币。尽管在交易中会使用多倍的迪纳厄斯，但多倍单位只是纯粹用于计算，并不对应实际铸造的货币。罗马帝国使用的苏勒德斯古金币，被指定价值等于12迪纳厄斯；而“利布拉”（libra）在英语里被称为“镑”，显然就等同于240迪纳厄斯或20苏勒德斯。

查理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8世纪90年代提高了迪纳厄斯和利布拉的重量。从远古时代起，迪纳厄斯的重量是0.045盎司左右，依照罗马—日耳曼欧洲使用的重量体系，相当于20粒大麦的重量。查理决定将其转变为一种基于小麦颗粒重量的体系，因为如今小麦已经是最有价值的作物品种。他规定迪纳厄斯银币重量是32粒小麦，即0.047盎司

。考虑到利布拉相当于240迪纳厄斯，这就意味着将利布拉的价值改为14.5盎司。这一改变的重要结果就是，在帝国内流通的国王硬币更大、更重，比他的前任者的货币更受重视，这无疑是政治的副产品。

改革也想恢复王室对铸币的垄断，前几个世纪是大量的独立铸币，主要是教会的团体，他们铸币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控制。国王的名字取代了铸币者在货币上的印记，并且从那时起，是国王而不是制造者来保证货币的质量。授权铸币者的数量从几百急剧下降到数十，即便是这些保留铸币权的修道院和主教区，也必须采用王室的铸币印记，停止在货币上使用他们自己的名号。自从唯一类型的迪纳厄斯在全帝国流通以来，教俗两界的地方权威必须保证所有人都接受这种“君王货币”（*dominica moneta*），违反者将失去自己的职位。

借此，查理大帝给予自己的帝国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保证了通货的品质，因此其能在各地流通。只有贸易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经济环境，才能解释这种意图。当然，即使新的银币是用皇帝的名号和肖像来保证的，它也不是与东方贸易的最佳手段，然而，这一点简单地证实了贸易路径的重新定向。地中海贸易算不上什么了。重要的贸易是在北海，那里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很乐于接受用查理的银币来支付。实际上，他们的国王立即开始在自己的铸币上模仿法兰克人的迪纳厄斯，这是通货领导权的确切标志。

查理决定使用单一的金属货币，这并没有阻止黄金流通于帝国里那些与地中海开放贸易的地区。在靠近博洛尼亚（Bologna）的雷诺河（Reno）的河床里，有人发现了一名来自南意大利的商人的行李。他是在查理统治的最后几年渡河时溺毙的。他的包裹里只有金币，大部分是拜占庭的和贝内文托公爵领的；剩下的是阿拉伯的。²⁸ 劣质金币仿造查理为正式场合制作的金质奖章，被人欣然用于哄骗来自北方的商人。因此强行推行银币，从根本上可以被解释为企图在庞大的帝国内统一基本的经济活动，而并不去压制数不胜数的地方特性。

为了消除从这种描述中可能产生的乐观看法，必须强调，尽管有加洛林改革，但西部仍然缺少真正用于日常交易的小额货币。794年，迪纳厄斯银币是帝国境内大部分地区流通的最小额货币，其价值相当于12条小麦面包或15条黑麦面包。我们不知道他们只购买一条面包时该怎么处理。可能所有人，包括不在土地上工作的人，都需要获取成袋的面粉，通过向面包师支付一定比例的面粉来换取自己的面包。广泛而言，虽然没有证据，也可以认为那些去市场买卖鸡和鸡蛋的人也是凭着信任这么做的。小商贩能够在熟客的基础上算账、支付。这种做法，在一个人们之间互相认识的乡土社会中被证明是方便可行的。

食品配给政策

尽管在查理统治时，可以确定农村没有受到令人绝望的贫穷的压制，但在有些年头，坏气候会导致穷困；如果不是大灾之年，帝国各地实际上还有收成。这时饥馑就会到来，面包的价格涨到惊人，这会让少数投机商从穷人的苦难中发财。这种范围的饥荒在查理统治期间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792年到793年，第二次是805年到806年。第一次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有编年史家记录了有人沦落到同类相食的事件，记录了在一些区域出现集体幻觉，饥民们认为自己看见庄稼不仅生长在田野里，也生长在丛林和沼泽中。他们甚至感到自己能碰到这些庄稼，“但没人能吃到”²⁹。两次饥荒中，政府都积极介入，减少饥荒的影响，缓解穷人的苦难，尽管我们不知道取得了什么成果。

我们不要感到可笑，他们采取的第一项举措是共同祈求神，让饥荒远离基督徒的土地。民众确信神会具体介入人间的事物。即使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神决定让他们接受考验，他们悔悟的样子也可能会感动神，让神心生怜悯。792年春季，国王命令王国内所有神父要举行三次弥撒，第一次为国王自己；第二次为“法兰克军队”，或者换个说法，法兰

克人民；第三次“为了当下的苦难”，以终结饥荒。教士也被要求斋戒两日，伯爵、王室封臣和他们的仆从也是如此。更具体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起供养饥民的责任，直到下一次收获到来。³⁰和往常一样，他们也采取了切实的宗教举措，并不是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举措的效力有信心。在教士之外，民众被授予免除斋戒义务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支付金钱，作为基金帮助“饥民”。

805年秋季，皇帝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措施，讲明在饥荒、疫病或其他灾祸的情况下，无须等待王室敕令，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向神祈祷。鉴于当前的问题是饥荒，查理大帝命令所有的土地所有者要尽力养活自己的民众，低价出售自己的粮食。他同时也禁止食物从帝国出口。³¹稍后，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决定还是组织共同的祈祷比较好。歉收的消息从各地纷至沓来，气候也没有改善，饥饿的幽灵正在逼近。查理给主教们送去了一份通知，要求所有信众遵守每月三天的斋戒，持续三个月。³²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预防性的举措。查理在794年的法兰克福会议中规定了谷物的最高价格，当时饥荒还是一种悲惨的记忆。无论粮食充裕还是短缺，都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他规定在危机时，王室公共储备（*annona publica domni regis*）将会以低价慎重地投入市场：大麦和燕麦是官方价格的一半，黑麦是三分之二，小麦是四分之三。³³换言之，大规模王室地产的目标并不只是供给国王和他的臣僚，并为军队提供食物；它们也积累储备，在饥荒时救济民众。诺特克曾夸口说，在查理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将“欧洲的财富，就是小麦、酒和油”，送给非洲的埃米尔们，以救济他们的饥民。这可能是纯粹的宣传，但这证明了积累并分配食物是官方的政策。³⁴在寻常年份，主教们也被鼓动建立储备，并且他们并不只是使用自己土地上出产的谷物，也以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收成。这一政策激起了不满，但其肯定有助于在坏年景里减轻饥荒的毁灭性影响。

涉及王室地产管理的规定，著名的《庄园敕令》也许能反映查理在792年至793年饥荒后的心境，可能他意图阻止另一场类似的灾难，或至少试图缓和其严酷的后果。国王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确保“行为不端的人不会在地下或其他地方藏匿朕的谷物种子，以致没有充足的收成”³⁵。他的这种关切泄露了接连的坏年景中的情况，王室地产里工作的仆从可能会做出藏匿之事。

806年3月，在另一次饥荒的高峰期，皇帝颁布了法规，一部分内容重复了法兰克福会议决议，一部分进行改进。所有拥有储备的人都不能在仓库里囤积储备，等待价格升高，而要在为自己人保留足够储备之后，立即将它们以固定价格出售。但是806年的固定价格要高于794年。这显示出，经验告诉查理，人为强行规定太低于市场的价格是困难的。但是新的举措也展现了断然惩罚的企图。主教和伯爵必须养活自己的穷人，不允许他们游荡行乞。流浪者必须免费得到供养，但他们也必须去工作。³⁶可能饥荒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因为在道路上会涌现大量的穷困民众，他们很难控制，并且给征兵工作制造大量问题：受灾区域的征兵义务需要专门免除。³⁷这解释了在查理大帝的最后几年里推出的预防举措为何越来越多。这些措施要求主教和伯爵给穷人派发粮食，让他们免受饥饿之苦，并且重申了土地所有者必须养活所有为其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自由民还是奴隶。禁止在收获之前就预购农民的作物，因为新的收成到来之前，这是令人绝望的几个月，是饥荒时期特别困难的时刻，此时贱价出售还在生长中的谷物，会导致许多人完全毁掉自己，落入投机商的掌控中。³⁸

查理时代的村庄

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查理时代的经济，大土地利益的组织分配，贸易的发展，修道院长关心的管理以及皇帝所采取的正确举措。我们还需要知道社会的底层是什么样的：农民们的生活与工作情况，西部的经济体系最终依赖于他们的劳苦。书面材料告诉我们的很少，但有时，一种新兴的科学，中世纪考古学，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一问题。近些年有一个村庄被耐心发掘，重见天日。

维勒耶一勒一塞克的定居点

在法兰西岛（Île-de-France）的维勒耶一勒一塞克（Villiers-le-Sec），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留存的三座农民房舍，每一座都和周围的附属建筑一起组成居住单元，附属于圣德尼修道院的一块“份地”。³⁹ 房舍高大宽敞，木质框架，建筑在一个矩形平面上。墙壁的格子里填充着黏土，屋顶覆盖着茅草。它们之间间隔100英尺，并且距离从巴黎到亚眠的重要道路有250英尺。这不是临时定居点。此地从高卢—罗马时代起就持续有人居住，并且这一定居点可能还包括许多这一类型的其他“份地”。它们之间都相隔得足够远，保持一种分散的乡村定居点的样子，不是一个紧密的聚合村庄，更不是一个筑有防御措施的村庄。这幅图景证实了我们对查理的时代乡村定居点的一般认识，即一连串在教堂或城堡周围的房舍组成的村庄还没有普及，在许多地区流行的是小村庄，只有少量的家庭，甚至是孤立的住所。

这三座房舍的尺寸都是类似的：长只有40英尺，宽是一半。这足够

大，可以推测建筑的一部分被用作牛棚，直接通向人居住的部分，这种传统直到最近在农民的世界里还有所保留。炉灶是在地面挖出坑，用石头砌出边界。它直接位于茅草屋顶的一个洞下方，以便烟排出。第一所房舍附带有一个铁匠的熔炉。第二所周围有一间和主建筑一样大小的谷仓，还有其他几座外围建筑，包括一个地下的烘焙坑，用一块木料和草秆做的构件保护着。第三所有一个坚固的矩形谷仓，用极厚的树干制成；还有一间单坡屋，下面是一条40英寸深的沟渠，在其中建有一架织机。从遗址中发现的众多细节来判断，女性会在这里纺织麻布和一些羊毛。下部的构造是为了在纺织麻线时保持必要的湿度。

这些木材、黏土、草秆建成的建筑给人以宽大的印象，但较之高卢一罗马时期的砖石类型建筑，还是显得不够稳固，甚至比之乡间砖石建筑也是如此。但它们是坚固的建筑。承重梁是用橡木制成，最差也是榉木，墙上的格子用的是榛木、悬铃木、泥灰和柳条。可以明确的是木材十分充足，珍贵的橡木在炉子中燃烧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黏土取自当地，拌入切碎的草秆，随后在格子的内部和表面凝固成块，直到格子表面像覆盖了一种石膏一样。在这些编条和涂料干燥之前，会用木质的泥铲修整光滑。屋顶可能是用黑麦秆制成，比小麦秆更长也更坚韧。尽管墙和屋顶很薄，但还是能在地上生起火的情况下提供一些避寒作用。

房舍也有窗户，用木质的窗板关起来；至少有一扇门，用木质的框架固定。在他们的建筑中金属的作用不可忽视，不只是铰链、门闩、锁、链子，将木质结构连接在一起的钉子和两爪钉也都是铁制的。不必说窗户没有玻璃，因为最有可能的是，天冷时窗户是保持封闭的。然而，房舍并不完全是黑暗的，因为除了炉火，还有红陶油灯，还同样使用便宜的牛油烛台。

在每个房舍之外，都有挖入地下、开口狭小的洞，其容量大约有1.3立方码^①，用于储藏谷物。一旦装满了，粮洞就会用一层草秆加一层黏土密封，在较好的条件下，能将谷物保存相当长一段时间。地面谷仓

和地下粮洞共存的情况，可以解释为，谷仓是用于保存还需要去脱粒的谷物，或者饲草和草秆；当脱粒完成后，在地下保存就更为安全。磨粉，在古代是用手推石磨完成的，现在通常是把成袋的粮食送到水力磨坊，磨坊为一或多个定居点服务。水力磨坊使用得越来越多，代表了中世纪一个主要的技术进步。

在烹饪的时候女性可以选择方式。面包是在紧邻房舍挖空泥土的烤炉里烤出的。尽管这种方法很需要技术，并且能生产出精美的面包，但这种烤炉用不了很久，因为迟早土壤会崩塌将其掩埋。有人曾计算过这种烤炉平均可以烘烤二十次，假设一星期烤一次面包的话，最多也就是几个月。随后他们就必须再挖一个。汤是在家中的炉火上做出的。烹饪是在红陶器皿里完成的，几乎完全没有金属锅具。这些器皿形状像圆形的瓶子，被直接放置在火上，下方用石块支撑，或者是一些来自古代高卢—罗马建筑的砖块。一些器皿有把手，但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是用链子吊在火上的；这在晚些时候才得到广泛运用。

人口和田间劳动力

居住在这些房舍中的农民的身体外貌是什么样的？墓地里挖掘出的骨架，平均身高男性是5英尺5英寸，女性是5英尺1英寸，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各地的身高记录基本都是这样。这说明中世纪人身材较矮的观念是谎言：他们比我们矮，但是和20世纪早期的征兵标准差不多。当时高死亡率同样是常态。根据埋葬在维勒耶—勒—塞克的骨架年龄来判断，不到60%的人活过了20岁，超过20%的孩童在5岁前死去。这些数据很让我们吃惊，但必须澄清这在前工业时代的人口中是正常的，并且和假设的“黑暗时代”无关。在法国“太阳王”统治时期，数据大体上相同。在那些到达成年的人中，骨骼疾病和关节炎十分常见，牙齿的情况也很糟。很显然这些农民缺乏任何医疗保护，总体而言易于生病，健康状况很危

险，尽管他们基本上身材健壮。

最可能的情况是，在考古学家发现的每一座房舍下，都居住着一个家庭，由一位农民、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组成。在集体想象中广泛接受的概念是，在过去特定的条件下，农民的家庭会扩大。比如意大利现代时期的“佃农”（mezzadri），但研究认为他们不属于中世纪。在查理的时代，家庭通常由五至六人组成，那就是父亲、母亲、三四个孩子。卫生和经济条件不允许更高的人数；而且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使用避孕措施，女孩结婚也很早，大约十三四岁，但据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可以确认，一对夫妻很少能超过这个生育率。当然，存在两三个兄弟长到成年，继续一起在父亲的“份地”里工作这种情况。这些人口过剩的“份地”为学者们所熟知，并且学者证明，尽管他们生活的条件很困难，人口还是倾向于增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兄弟也都各自组成了自己的独立家庭，或者按照当时的话说，各起“炉灶”。

通过分析花粉，考古学家可能重构出村庄周围的植被。在查理的时代，维勒耶-勒-塞克的耕地增加，侵害了林地。然而橡树和榉树依然很常见，较早时期具代表性的栗子树和酸橙树消失了。在房舍周围，农民们种有樱桃、苹果、梨、胡桃和榛子树，还有覆盆子和黑莓，这些帮助他们丰富食谱。菜园提供胡萝卜、蚕豆和豌豆，显然没有马铃薯、菜豆和西红柿，这些将来自美洲。但他们食谱里的主食，是周围田地里出产的谷物。

农民们使用的工具极其原始，并且主要是木质的。金属工具是收割庄稼的镰刀、割草的长柄大镰刀，还有伐木的斧子。但是锄头，我们认为这种工具显然除了木把手以外就是金属，但其实它几乎完全是木质的，只有一条铁质的边，以便更好地切入地面。安纳佩斯（Annapes）的大型王室地产覆盖接近7,500英亩的土地，饲养超过100头牛，几乎同样多的马，超过800只绵羊、山羊和猪，然而其财产清单上罗列的所有金属工具只有两把长柄大镰刀、两把镰刀、两把铁边锄头。随后加上“必

要的木质工具”字样，似乎这些并不需要像铁制工具那样列入清单，铁是珍贵的金属。⁴⁰

我们不应该夸大中世纪的落后程度：实际上高卢—罗马时代的农民也使用木锄。至于王室地产里缺乏金属工具，可以明确的是佃农都拥有他们自己的长柄大镰刀和镰刀，这些不包含在清单中。但我们也肯定不能说这是进步，他们使用的犁的类型可以显示出这一点。犁很轻，有一个把手，仍然完全是木制的，或者最多装配有金属犁头。需要用共轭的两头牛拉动且装有轮子的重犁，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还无人知晓；并且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装有犁板以翻转土地，犁板算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技术进步。可以谨慎地推断，大多数农民没有这种先进的工具，因此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用锄头完成的，这是轻犁不可缺少的从属工具。

谷类作物耕种

查理的时代，种植的谷物广泛而多样。它们包括耐受力较强的黑麦、价值更高的小麦、数量较少的燕麦和大麦，后两者都适合饲喂动物，也能做成汤粥或啤酒的形式为人所食。实际上，啤酒被认为是保存谷物的一种可选手段。土壤和气候有所变动，同样的谷物在整个帝国都有种植。另一种重要的谷物是斯佩尔特小麦，尽管在维勒耶—勒—塞克没有发现斯佩尔特小麦，但因其易于保存，故在庄园农场中经常种植。田地并不只用于种植谷物：特定的区域留作种植麻类，尤其是亚麻，女性用其制作衣物。

在维勒耶—勒—塞克区域，和整个帝国的北部一样，有利的气候条件允许农民一年种两季。在夏季犁过的地，在秋季播种黑麦、小麦和大麦，而冬季犁过的地在春季播种，有时候是麻类和蔬菜，但基本上是燕麦。这是三年轮耕制，得益于冬春季谷物的轮替，允许农民每年留下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避免肥力耗尽。他们的祖辈，甚至同时代居住在帝

国地中海一方这样气候不适宜春种作物地区的人，被迫保留一半的土地休耕。三年轮耕制有利于跨年分配工作和变换作物，有助于避免颗粒无收，而耕种燕麦使得维持更大数量的马群成为可能。但是考古学家相信农民们实际上使用另一种耕作体系，即“内外田”（infield-outfield）体系。内部区域是充分施肥、永久耕作的土地；外部区域是不集中耕作的土地，经常留作休耕或用于放牧。

这一理论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让我们回到了关于产量的古老争论：出产粮食的数量与播种数量之间的关系。对加洛林农业最为消极的解释基于这么一种统计：根据大庄园农场和王室地产的清单，可确定产量是种子的1.5倍至2倍。说得更明白一些，2比1的产量意味着一半的收成必须储存用作下一次播种。甚至假定在更好土地的产量提升到3：1，这依旧很低，并且在一次坏收成后就会将许多人置于饥荒的边缘。显然，如果干旱或大风使作物减半，产量就会从3倍跌到1.5倍。但无论如何，其中1要留作播种，只有0.5维持消费，这是正常总量的四分之一。

近代的经验证明了，集中一切可能的人力畜力，在小块土地上施肥并且集约劳作，可能获得高得多的产量，可达到10：1，甚至20：1。这就是“内外田”体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庄园地产中的佃农生产出了大量的粮食和大麦，其代价是在靠近他们住所的土地上进行非常集约的劳动，在不近便的土地上不那么勤勉，在好年景种上少量富余的黑麦和燕麦。这种体系基于个体消费，不排除偶尔进入市场出售剩余物资，以此保证了佃农的生存。大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另一套逻辑，涉及庄园农场中的大规模农业；在那里，由于经济规模的原因，他们还能从2或3：1的产量中获益，这对于独立小农户来说是难以为继的。

家养动物

对维勒耶—勒—塞克遗留动物的分析，得出了关于经济活力和饮食

习惯极其有用的信息。狩猎和捕鱼似乎基本微不足道，除了偶尔有一些野兔和鸽子，这就是它们在农民食谱上的地位。发掘的动物遗迹中，野味和鱼总计只有1%。这一比例与城市或贵族遗迹的发掘物相比有显著差异，在后两种遗迹中野生动物的骨骼在总数的5%~10%之间变动。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查理的时代，农民们已经逐渐遵守义务，将野味留给大土地所有者，并没有自己食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和自己对应的几个世纪前的人群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家养动物比我们今天所见的要小。狗在古代高卢是没有剩余食物来喂养的，当时已经用作守卫和垃圾清理。虽然有较大的个体，但它们的平均高度不超过20英寸。一头公牛平均高度是46.5英寸，重约550磅，这并不是很大。检测公牛骨骼后我们发现，曾经在高卢—罗马时代存在的饲养技术消失了。绵羊和山羊也变小了，而猪的大小是合理的，但现代的猪更肥。听起来重复的是，马、驴甚至鸡都比现代的小很多，但也和高卢—罗马时代差不多。这显示出古代文明缓慢而又无聊地逐渐消解，在养殖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比耕作领域更为严重。尤其是马的身高，不仅在维勒耶—勒—塞克，而且差不多在所有的加洛林考古遗迹中，都表现出大约55英寸，甚至通常更矮。这意味着，当我们认为重甲骑兵构成了查理军队的中坚时，这种动物绝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么雄壮。

至于食谱，猪肉是文献和图像中最为强调的肉类，但在维勒耶—勒—塞克的发掘显示，最广泛消费的肉类是牛肉，猪肉和羊肉居于次位。农民们也吃马肉和驴肉，而禽类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排除掉小牛肉的消费，按照我们今天的饮食习惯，我们会专门养殖小牛，并在它们最为柔嫩的时候宰杀食肉。过去不到三分之一的牛在年幼时被宰杀，并且绝不会在15~18个月大之前，而大多数的情况是古人只在它们幸苦劳作一生后食用，等到十岁或更大。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马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幼年被宰杀的马数量与牛相近，这迹象表明马肉也很珍贵，并非只是备用品。唯一普遍也习惯于在幼年宰杀的动物是猪，通常在一岁至一岁

半之间宰杀，但更小的时候宰杀也并不罕见。在一定程度上，羊羔和小山羊也是如此，有一大半是在一岁半宰杀。其他地区的发掘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习惯，比如在大约两岁半左右宰杀猪和绵羊。从这个巨大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从地中海延伸至波罗的海，各地农民显然有非常不同的本地习俗，将它们简化为一种模式是荒谬的。

无论如何，对肉类消费的这一分析都引导我们，对维勒耶—勒—塞克的农民食谱不应该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分析他们骨骼后我们发现，其中存在很高比例的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营养不良，所以我们目前讨论的各种肉必须看作宴会日的菜肴，是对日常食谱非常不规律的补充。日常食谱主要是汤、面包、奶、蛋、黄油和奶酪，加上从热量角度考虑很有价值的葡萄酒和啤酒。最后，当今考古学家使用的高度精密的技术已证实，考古发现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肉是炖煮而不是炙烤的。由于动物通常较老，这也是有可能的，并且无论如何，炖煮也是最不浪费营养的烹饪方式。

注释

1 R. Fossier, “Les tendances de l’économie: stagnation ou croissance?” *Settimane* 28 (1981): 273.

2 G. Petralia, “A proposito dell’immortalità di Maometto e Carlomagno (O di Costantino),” *Storica* I (1995): 76.

3 J. Favier, *Charlemagne* (Paris, 1999).

4 J.-P. Devroey, “‘Ad utilitatem monasterii’: mobiles et préoccupations de gestion dans l’économie monastique du monde franc (VIII^e–IX^e s.),” *Revue bénédictine* 103 (1993): 224–40.

5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4:nn11, 42–62, 71, 83, 88, 92. e J.-P Devroey, “Courants et réseaux d’échange dans l’économie franque entre Loire et Rhin,” *Setimane* 40 (1993): 34 1.

- 6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4:nn13, 14, 66, 68, 75, 85, 111–12. e Devroey, “Courants,” 353.
- 7 CRF, 150,
- 8 *Corpus Consuetudinum Monasticarum* (Siegburg, 1963), 1: 388–403.
- 9 CRF, 32.
- 10 Ahistulf, 3 (in LL, 250).
- 11 CRF, 46.
- 12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182–85.
- 13 CRF, 44.
- 14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145.
- 15 MGH, *Leges*, V, *Formulae*, 315.
- 16 ARF, 126.
- 17 *Translatio S. Germani Parisiensis*, in AASS maii, 6:782.
- 18 MGH, *Diplomata Karolinorum*, 1:93.
- 19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137.
- 20 CRF, 55.
- 21 CRF, 22.
- 22 CRF, 12.
- 23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11.
- 24 CRF, 28.
- 25 CRF, 35.
- 26 CRF, 32.
- 27 *Corpus Consuetudinum Monasticarum*, 1:375, 379.
- 28 P. Grierson, “Carolingian Europe and the Arabs: the myth of the *mancu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32 (1954): 1064.
- 29 *Amales Mosellani*, in MGH, *Scriptores*, 16: 498.

30 CRF, 21.

31 CRF, 44, 46.

32 CRF, 124.

33 CRF, 28; 46.

34 Notker, 2.9.

35 CRF, 32.

36 CRF, 46.

37 CRF, 48.

38 CRF, 46, 48, 62, 63.

39 随后的段落基于一个法国团队1981年至1987年间所做的考古发掘：参见*Un Village au temps de Charlemagne: moines et paysans de l'abbaye de St-Denis du VIIe siècle à l'an mil* (Paris, 1988)。

40 CRF, 128.

① 1码约0.9米。

第13章

恩庇与奴役

基于恩庇的社会

法律分类的不健全

曾经有一位王室使节，请求查理大帝阐明一桩疑难案件。案件涉及一个奴隶和一个“女隶农”（colona）的子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后者是因世袭义务而为王室地产工作的女农，但她在字面上和真正的奴隶不同，这一规则可追溯到罗马皇帝统治时期。查理回复使节道，不要太严苛的定义，也不要简单地把这个母亲当作一个奴隶，“因为只存在自由民和奴隶”¹。回复如此明确，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作为一把理解当时社会的钥匙。当时古代的奴隶制实际上还有效，因此在判定社会环境时，自由民和奴隶在法律上的区别可能是决定性的要素。

现实有一些不同。在开始时，这个明晰的回复，反映了查理对使节的气愤态度，他看上去一点也不满意。进一步，在回复另一个问题时，他甚至命令道：“朕已经口头命令你去做这事，但你还是不明白！”另外，只存在自由民和奴隶，这个断言不是他的原创，只是一句来自罗马法

律的引文；仓促选择这句话，不是为了追寻普适的社会理论，仅仅是作为针对个别案例的实际解决方法。总而言之，这个概念并不明晰，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会论证，拉丁语“servus”是否更应翻译为“奴隶”，而不是译为类似“农奴”这样的模糊术语。尽管奴隶制在查理的帝国中极其重要，但是法律分类不是去理解这个时代的农民的最佳途径。

同样，对作为社会另一极的贵族也可以这么说。不用怀疑，帝国中存在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组成的圈子。他们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关系，通常和皇帝自己也有关系。在他们所在的省份，他们的话语就是法律；他们专横地命令农民，垄断了类似伯爵和主教这样的高级职位。我们同样可以确定，许多这样的家族吹嘘自己的古老世系，鄙视那些不属于他们圈子的人，甚至是那些因受皇帝偏爱而有钱有势的人。一位名叫埃博（Ebbo）的新人，出身于为王室地产做苦力的农民之家，是一个获释奴隶。当虔诚者路易任命他为兰斯的大主教时，特里尔的主教特甘（Thegan）当时就批评道：“皇帝也许能让你成为自由民，但他没有让你成为贵族，因为那是不可能的！”²

这个例子也显示出，皇帝的统治阶层不仅仅是由贵族组成的。此外，特甘和与他类似的人所声称的贵族也没有像随后中世纪中的那种法律地位。贵族意味着出生在一个不仅富有而且有名望和影响力的家族。这意味着在合适的位置有朋友和关系，并且他们的交往建立的时间越长越好，但他们无权享有法律认可的特权。至少法兰克人中的情况是如此；而其他的民族，比如萨克森人，其贵族就明显与低等级的自由民不同，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认可。³显然这些在皇帝看来是例外，而皇帝的法律架构总体而言反映了法兰克人的法律传统，并没有为贵族作出区别对待的规定。

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

因此审视不同类型的法律地位，并不是描述查理时代的社会的最佳途径。当查理试图考虑自己治下的民族构成时，他从不用这种标准。让他最为震惊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即所有人，无论贵族或平民，自由民或奴隶，都牵涉进效忠关系中，其中一些是世袭的，另一些是自由选择的，这通常导向某种恩庇模式。正是这种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决定了社会身份。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793年国王组织集体效忠宣誓时使用的标准。⁴查理命令他的使节去让众人宣誓，首先是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王室封臣、副主教（*vicedomini*，主教的助手）、助祭长（每个主教区内最高级的教会权贵）以及教士团，换言之，就是教俗两界的高阶管理人员。

紧接着是生活在团体里的僧侣和教士，他们实际上被免除了宣誓，因为和他们自己的誓言相冲突。但他们必须在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面前许诺忠诚，院长将会给国王一份详细的报告。“随后是维护人、代理神父、百户长、俗界神父。”查理继续说道。这再一次证明了这两个阶层是如何交叠的。因此，不只是管理教会地产和他们仆从的那些维护人，还有作为整体构成了教会低级管理层的神父，与之并行的是对伯爵负责的地方官员。至于“作为整体的民众”，国王下令所有超过12岁的身体健壮之人都要去宣誓，他按照社会阶层自上而下将他们列出：“独立的小土地持有者，随后是所有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或其他领主的人，还有所有王室土地的仆从和‘隶农’，还有那些接受主人委任和俸禄的奴隶：让他们宣誓。”

换言之，社会各阶层都充满了对另一些人宣誓效忠的人，这种效忠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不是一种死板的定义：一个人的阶层是由其效忠的类型决定的，无论是自由选择效忠的封臣，还是那些更普遍的选择一个恩庇人的人，或是那些逐渐混为一谈的接受世袭效忠的获释奴隶和事实奴隶。臣民与恩庇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是意味深长的，这会导致国王任命一位“忠实的”（*fideles*）伯爵或主教，或者导致一个土地所有者提拔他的一个奴隶，将一处地产的管理托付给他。但总之要紧的是那

些作为效忠对象的个人或组织的身份，因为对自由和武装的封臣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奴隶和获释奴隶而言，成为国王的人，还是修道院的人，或只是私有土地所有者的人，是非常不同的。

只有一种范畴脱离了这种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翻译过来即我们所称的“独立小土地持有者”。他们是普通的自由民，最初构成了法兰克民族的中坚，除了在军中作战和交税，没有别的义务。正如我们在本章结尾将会看到的，他们在查理的时代毫不意外地处于危险之中，可能甚至处于快速消亡途中。这些不是非常富有的人，维持他们在社会、经济甚至司法上的独立性都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在未来将会变得不可能。

所有国王的人

权 贵

在顶层，法兰克社会是由那些获得国王信任、取得职位的人来管理的，在世俗或教会的管理中都是如此。他们是伯爵、王室封臣、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那些当时的文献十分正式地称为“权贵”（*potentes*）的人。但他们到底有多少？在帝国扩张的最高点，有189个主教教座，因此也有同样数量的主教，查理本人都了解他们，甚至自己任命他们。⁵修道院的数量更多。有超过500座，但并不都是处在国王的直接保护之下。那些受他直接保护、由他任命院长的修道院大概有200座。至于世俗的权贵，皇帝在各省份的代表有差不多200~250名伯爵，都由他亲自任命，至少还有1,000名王室封臣。

除了受到皇帝信任的个人关系，这些精英也以其占有的巨大财富而与一般人相区分，尽管各人的财富是明显不平等的。当793年下令特别捐赠以缓解饥荒的影响时，查理主张那些能付得起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支付20苏勒德斯，那些不太富有的支付10苏勒德斯，最次等的支付5苏勒德斯。至于伯爵，最富有的也要拿出20苏勒德斯，其他的10苏勒德斯。那些拥有至少200处产业的最富有的王室封臣（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必须捐赠10苏勒德斯，那些至少有100处产业的交5苏勒德斯，随后那些只有二三十处产业的也按比例减少。⁶这意味着最穷的国王封臣也有二三十户农民为其工作，最富有的拥有几百户。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可以轻易拥有1,000户农民，实际上最富有的也超越了这个门槛。近郊圣日耳曼修道院拥有超过1,600户佃农，他们大多是自由民。如果我们算入他们自己、其家人还有庄园农场的奴隶，有超

过1.5万人为这个修道院工作。

那些来自伯爵或主教职位的实际天赋资源，为财富的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实际上大部分权贵人物是生来富有的。那些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在古代被称为大庄园，现在以“田庄”的形式加以组织，有深厚的传统，便于管理。毕竟，在一个几乎仅从事农业的社会，在土地上工作的奴隶和佃农受他们的土地所有者的极大束缚，他们运营一座地产，同时也意味着统治并奖惩这里的人。不出意料，国王会主要在这个圈子里选拔他的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更基层的王室封臣。经济上的至高地位自然会伴随着公共服务的义务，他们对此不会一丝不苟，这就意味着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快速扩充自己的财富。

自然而然的是，这个阶层的人倾向于在本阶层联姻。当时还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和父系家系这种概念，也没有姓氏和盾形纹章这些中世纪晚期和“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才存在的典型贵族标志。贵族的亲属关系包括一个由联姻和血亲关系联合而成的灵活核心家族，大量的叔伯、姑姨、子侄、连襟妯娌和堂或表兄弟姐妹，经常会把继承权从一人转移到另一人。这样一种对亲属关系的灵活组织增加了优势，有助于家族稳固长久，同时避免了因为人丁因素而消失的危险。只有在挑战政权这样的事件上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涉及死刑和没收财产这样的灾难才会终结一个大家族的命运。除此之外，即便没有与生俱来的法律特权的保证，这些家族显然也会持续存在。

权贵的财产能够成为其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事实偶尔可以得到一些文件的证实。739年，为查理·马特统治普罗旺斯的阿伯恩（Abbon）留下一份遗嘱，将丰厚的遗产遗赠给诺瓦莱萨修道院，它位于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一侧，连同其他教堂一起都由阿伯恩创立。⁷他首先列出了自己位于苏萨山谷的财产，这是他从父母处继承的，通常托付给代理人，这些人通常是奴隶或者获释奴隶；又费心地列出了他们的家庭。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遗产清单拓展到了后来被称为萨伏依（Savoy）、

多菲内（Dauphiné）、里昂和勃艮第的地区，并继续沿着罗讷河谷远及地中海。第一个评注遗嘱的人乔万尼·塔巴克（Giovanni Tabacco）注意到了一些情况：

一系列“绝对所有权土地”（allodia）〔不臣属于某一上级〕在各地涌现，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购买或继承而来。它们在清单上不同的地方被称为“我们的本有地”（ingenui nostri）、“我们的自由地”（liberti nostri），随之一起出现的是表示这些“绝对所有权土地”来源的卖主名字和先祖或旁系亲属的名字。这些都证明了权贵亲属群体和其从属人口的普遍而长久的历史，后者主要是奴隶出身，例如阿伯恩的母亲鲁斯蒂卡（Rustica）把获释的奴隶（他的妻儿也被记录了下来），从日内瓦的村庄（pagus）转移到了盖普（Gap）的村庄。⁸

但在继承和购买而来的“绝对所有权土地”的边上，突然提及了“奉上谕”（per verbo dominico）或者说奉宫相的命令授予阿伯恩的地产。一般说来，这些地产是从那些反抗法兰克人征服的南高卢权贵处没收而来，他们和阿伯恩不一样，选择了错误的一边。

确切说来，站队导致了德国历史学家曾提出的“帝国贵族”（Reichsadel）的形成。这是个家族圈子，查理从中选择自己的合作者，他的父亲和祖父也曾这么做，这也反映了他广阔的国际活动范围。在大多数地区，在加洛林王朝之前，权贵家族就已经存在。在深度罗马化的南高卢，甚至有声称血统源自古代元老院贵族的家族。随着王国和之后帝国的规模扩大，这些亲属集团不断发现自己也有发展的机会，他们侍奉新王朝的忠心得到了慷慨的回报。因此他们计划在不同省份甚至不同王国里获得并维护地产，他们所获得“田庄”的位置有时相隔几百里，在离他们家族起源地较远的地区也自然处于一种托管状态。与此同时，他们也会

涉入复杂的联姻网络，与地理上源出不同地区的同一阶层的家族结盟。

奖励与封臣制度

根据习俗，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从他们任职的那一刻起就宣誓效忠国王。他们屈从于国王的保护之下，并许诺侍奉他。他们以“基于恩庇”甚或“黑手党式”的形式臣服于国王，这种做法在罗马帝国时代就非常盛行，此时依旧风行。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臣服于国王保护的人。尽管不论目的和意图如何，习俗都使之成为一种义务，但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而已。实际上，只要他们不束缚在世袭而来的奴役（世袭的奴役束缚着奴隶和获释奴隶）之中，任何牵涉进与国王的的关系并以自己的能力为国王效力的人，都必须公开地臣服于他的仁德。如此，他们正式成为最强大的一个恩庇体制中的一部分。

从属于王室礼拜堂的教士，进入了这种形式的效忠关系之中，和那些以武器、马匹效力的战士一样，他们通常被称作封臣。一位贵族希望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效力，或者一位修道院院长希望皇帝能关注他最看好的年轻修士，他们会将候选人带至宫廷，将他推荐给皇帝，可能同时带着君主熟知的另一位权贵人物或学者的一封介绍信。当有一个职位空缺或者一处恩地（采邑）可用时，查理就会从这一群在宫廷中与他同起居的、背景强大的年轻人中，选择新的教会官员和王室封臣。

那个时代的一些精英人物的书信得以保存，例如艾因哈德，这些书信显示出恩庇人与受助者之间的交换是多么密集而复杂，一个年轻人的职业有多么倚重于正确的情谊，那些侍奉国王得力的人或者仅仅只是与高层有足够联系的人，国王能够分配给他们的财富有多少。⁹他通过从王室和教会地产里安排出恩地来分配财富。这种授予，严格法律意义上被称为“请求”（*precarium*），因为这样的需求需要递交公开的申请书。通常使用的术语是“恩地”，因为显然对所有人而言，这些特许只能来自

国王的恩惠，凭借忠诚、有权势的朋友甚至赠予才能享有。无论如何，都很难想到一个术语，能更精确地表达这种以恩庇为基础的对权力和王室地产的运用。

这种人情、受保护者、宠信和效忠的网络随后被所有的权贵人物效仿。这并不牵涉到国王，也没有去破坏支撑着国王的社会支柱。然而，查理决定改变这种私人恩庇关系的一个方面。通常，一个像伯爵、主教这样的权贵或者一个低级官员、大地主身边都聚拢着一队武装的人。如果这些人是自由民而不是他花费组织的武装奴隶，他们就会屈从于他的保护，并向他宣誓效忠。这种极其古老的法兰克古代传统被称作“亲兵队”（*trustis*），其日耳曼语词根是信任和忠诚，这构成了恩庇习俗的军事方面，在罗马-日耳曼社会中广泛传播。

查理并不想让这些武装的受保护者成为一种颠覆性的角色，他下令这种惯例要根据封臣的程序来合法化，这种程序是他用来约束他的封臣的。这意味着公开宣誓效忠，并且任何进入这种臣属关系的人不仅要效力于自己的领主，也要效力于皇帝。封臣在每次他的领主被召集作战时，必须也在皇帝的军队里作战。然而，恩庇的广泛使用反映了社会的习俗大体上基于恩庇关系。封臣关系的广泛使用出自国王试图控制并规范恩庇纽带的愿望，或者最起码暗示着军事意味，给予他们一个不会被错误理解的公共意义。

王室和教会地产上的工作者

目前我们讨论了社会中的那些成功者，那些出身良好或者最起码有正确关系的人。因此他们从恩庇体制里收到了实际的利益，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意味着盘剥和苦难。换言之，我们只看到了受保护者而没有看到那些卑躬屈膝者。后者包括奴隶、获释奴隶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工，他们在一起代表了一个可观比例的人口，甚至可能是农民的

大多数。“servi”一词严格意义上还是意味着真正的奴隶，和古时候一样。但这个词也已经用于一些情况，表示所有那些屈从者，他们屈从于土地所有者的程度相当于农奴的程度。在这里，根据环境不同的程度而确切定义的法律地位，又一次不足以描述社会地位。那些农民所必须效忠的主人，仍然和其自身的法律地位一样重要。那些生来就要在王室或教会地产（它们的情况几乎相同）上工作的人，会昂首睥睨那些在私人所有者的土地上受苦的人。那些为王室或教士工作的人能享受一点国王反射出的荣耀。

查理将奴隶、获释奴隶和一切束缚在私人地产上工作的人排斥在他793年组织的宣誓之外，事出有因。¹⁰这些人没什么重要性，并且国王不需要他们的忠诚，只要有他们主人的忠诚就足够了，但国王自己的人和那些教会的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所有的“纳税者”（fiscalini）和“教会劳动者”（ecclesiastici）都要和所有“隶农”（coloni）一样宣誓效忠。术语“纳税者”和“教会劳动者”从法律视角来看都有些模糊，但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准确的，基本表示了所有的农民，无论是奴隶还是获释奴隶，在王室地产还是教会土地上工作。¹¹甚至在古代法兰克的法律中，他们就归于特权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自由民是平等的，更不要说奴隶了。他们的地位和查理时代的一样。当然，我们必须在他们中间加以区分：那些在远方省份的王室地产上和其他穷人一起工作的人，依然没有什么地位；而那些设法获得一个管理职位、负有一些职责的人，会转变成为一个当地的知名人士，比许多自由民更有权势。

不出意料的是，一些人用自己的职位谋利，以各种方式滥用权力获取财富。毕竟，能够滥用权力犯罪而又不受惩罚，是成功的标志。查理禁止王室农奴将在王室地产上工作的奴隶出售给代理神父或百户长这样的地方官员，因为奴隶显然是王室的财产。他的命令揭示出一个违法、密谋、滥用权力的网络，而宫廷很难进行阻止。¹²伊斯特里亚先前属于拜占庭，查理兼并了此地，在教会土地上工作的人也受到了类似机会的诱惑。他们突然变得自大起来，就像当地居民在804年抱怨的那样：“

在希腊人的时代，他们不敢惹怒一个自由民，或者用棍棒打他；实际上，他们从不敢坐在自由民面前。但现在，他们殴打我们，并用刀剑威胁我们，而我们不敢抵抗我主皇帝的威严，只恐他们做出更恶劣的行径。”¹³当然，只有极少人能效仿埃博的人生，他出身获释奴隶，最终成为兰斯的大主教。但有些人有希望成为神父或者自己所工作农场的工头。查理时代的社会存在的流动性是如此之小，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较之私人地产，在国王或教会控制的地产上更是如此。

农民的世界

庄园及其当地的实际

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少量富有的精英能够竞争国王分配的高级职位。查理巨大的阴影，覆盖着人数巨大的民众，他们的经济和法律地位更适中。在王室和教会地产上工作的奴隶和获释奴隶，反而只是更大的社会领域的一部分——其中更稳定、更少被严酷盘剥的那一部分，而其余部分由为私人地产工作的广大农民组成。在一些地区，这些不幸的人构成了全部的农村人口。

他们的法律地位有些不同，并不仅仅只是在纯粹规范的层面。奴隶和获释奴隶二者的权利和机会存在实际的不同。那些被迫定居在农场的“隶农”，与持有书面契约、最起码理论上拥有和土地所有者缔结契约自由的“契约佃农”（*libellarius*）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在审视这些范畴之前，值得再一次强调，在查理的时代甚至可能在此之前，这些人地位上的不同就逐渐消失，他们进入一种共同的压迫之中，这种义务是由土地所有者和法律强加给每个人的。这种义务更多地塑造了现实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农民发现了自身这个阶级，而不是他们之间在法律上的区别。

将大地产组织成“田庄”促进了这一倾向。某一特定农场的所有者，一旦建立农场之后，就不太可能再改变他所要求的地租和劳役。多年以后，农民死去，他的子辈接手经营这处小土地，但是对土地所有者的义务没有改变。农民不再具有契约的效力与他们重新谈判，而土地所有者倾向于遵照古代的习俗，保留管理上的便利。另一方面，这些义务在各省有所变动，根据实际耕作的类型，以及省份的大部分居民所属的法律

传统是法兰克人的、罗马人的、萨克森人的还是伦巴第人的等不同情况而变化。实际上，从一处地产到另一处，义务就会根据土地所有者所投资的类型和农民中奴隶所占比例而变化（对奴隶会加以更繁重的义务）。

这样一种人人遵守的习俗，在所有的私人地产中确立下来，最终被供奉进入法律之中。在一些情况下，法律明确介入，并作出规范。800年，查理在这一年有许多其他的事要操心，他还必须处理美因省在王室和教会地产上工作的农民上陈宫廷的抱怨。他们谴责代理人所要求的高压徭役，“因为事情组织的形式不同，有一些人被迫整周劳作，另一些人是半周，还有一些人是两天”。皇帝颁令于全省，那些为王室或教会地产工作的人，如果他们拥有足够的牛去拉犁，就要为主人的土地犁一天，而那些没有牛的人将要提供三天的人工劳动。“朕以这种方式作出规定，这样地产上的农民就不能逃避上述的义务，但是同样土地所有者也不能要求更多。”¹⁴但即使缺乏这样强制的介入，当时的政策普遍规定，为地产工作的农民，包括那些签订了契约的自由民，必须在有争议的事情上接受土地所有者的司法裁决。因此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义务，逐渐脱离了协商，转变成永久的习俗，而土地所有者依照法律成为习俗的保证人。

奴隶

奴隶依旧是那些为主人工作的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像古代那么重要。在庄园农场里工作的“雇工”不是在“田庄”里工作的唯一奴隶；还有那些被分配小土地的人，他们被允许成家。在一些大的修道院地产（我们唯一能评估的）中，在土地上工作的农民，略超过一半是自由佃农，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已成家的奴隶，剩余的是“雇工”。因此布雷西亚地区的圣朱利亚（Santa Giulia）修道院为庄园农场里的3,000人提供

了工作，并为小土地中超过5,000人提供了工作，其中3,000人是自由的，剩下的是奴隶。¹⁵显然这些数据在大地产中是合理的，但并不反映社会整体的奴隶比例，因为在小土地广泛分布的地区，奴隶的人数远远要少。查理减轻了那些“发觉自己如此贫穷，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土地，依自身的权利本有这些”的人的军事义务，这意味着甚至一个小土地持有者也可以拥有少量奴隶协助其工作。¹⁶

从法律上说，奴隶依旧是其所有者的财产，可以像罗马世界里一样转移和出售。806年，当他确立规则，以控制将要继承帝国的三个儿子的关系时，查理大帝声明他们不得在另一位兄弟的领地上购买不动产，例如土地、葡萄园、森林“和那些已经成家的奴隶”，而他们可以购买黄金、白银、宝石、武器、衣物和“还未成家的奴隶，换言之，所有商人买卖的货物”¹⁷。在经济术语中，奴隶是商品，一些商人贩卖他们致富，尽管宗教在法律的支持下再三限制这种贸易。分开出售夫妻会被劝阻，将基督徒卖出基督教世界是明确禁止的。¹⁸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虐待，远溯到779年，查理命令每次出售奴隶都要在主教、伯爵或者至少一名可靠的证人面前进行，并且他禁止将奴隶出售到帝国边境之外。¹⁹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丕平在意大利重申了这一法令，并且规定秘密购买奴隶、将他们走私到其他地区是非法的。²⁰

为了避免这些限制，奴隶贸易倾向于关注来自查理对异教徒的胜利中的战俘：萨克森人和随后的斯拉夫人。历史显示出这种贸易构成了向穆斯林西班牙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而进口奴隶没有显著改变帝国内奴隶的人口层次，可能日耳曼地区是例外。在那里，可能奴隶劳动力主要由斯拉夫人构成，这导致一种词源学发展，最后延伸至所有西方语言，由此种族的名称“斯拉夫”（Slavs）成了“奴隶”的同义词。一份巴伐利亚的文献将为圣埃默拉姆（Sankt Emmeram）修道院工作的农民划分为“巴伐利亚人和斯拉夫人，自由民和奴隶”；最后，这两种表述简化成了一种：“自由民和斯拉夫人。”²¹但在高卢和意大利，大多数奴隶是土生的：他们和主人说同样的语言，像他们一样受洗，不过在取名字的习惯上

有区分，奴隶通常使用小词尾。从种族的观点看，他们被看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尽管严格说来，这些词语是留给自由民的。

能够将自己卖身为奴，增加了奴隶的供应量，这种做法得到了法律的许可，并在受饥荒的农民中实际发生了。当无法支付罚金的时候，犯事者会成为王室的奴隶，可能是基于一种临时的基础，直到罚金被付清。丕平曾规定，如果一个已婚的自由民不论何种原因降格为奴，他的妻子有资格离开他，另嫁他人，“除非他是出于贫困、迫于饥谨而出售自己，而她也同意了，并因为出售自己丈夫的价钱而免于饥谨”²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妻子由于自己配偶这般牺牲的代价而得到拯救，她应该向他表示，当他处于奴役中时还保证留在他这一边，这样是正确的。查理有时也会阻止这种情况，比如，随着对意大利的征服，他得知许多穷人出售自己或妻儿以躲避战争导致的贫困，所以他撤销了所有这样的交易。²³但这只是政治姿态，不是决定性的原则，并且卖身的实践继续广泛存在。

对奴隶贸易的最大限制在于其经济性质。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当一个土地所有者为一个奴隶家庭提供一块小土地来安家时，他显然没有任何兴趣去出售他们。他可能会在出售土地时这么做，因为任何买家都会有兴趣获得连同土地一起的劳动力，但除此之外他不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他将土地捐献给教会以拯救灵魂，他也要转让在那里工作的农民，可能要释放他们，将他们转变为教会的获释奴隶。换言之，成家的奴隶实际上有了终身的保证，不会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在先前提及的查理大帝806年的规定中，就明确了这一点，他们转变成了不动产，或者不可移动资产。这种发展在人类尊严方面可能并不好，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对他们的重要征服。

随着家庭的建立，奴隶也获得了保有少量收益的机会，他会设法通过努力工作来储蓄。这一权利首先被习俗所接受，随后是法律。甚至有些奴隶设法通过自己的积蓄做一些小生意。当查理推行新的通货，并且

命令所有的贸易者无理由地接受时，他规定了一项针对自由民的罚金：“但如果他是处于奴役中的，并且他是用自己的财产贸易，他将会失去自己的生意，或者在众人面前被公开鞭笞。”²⁴ 对一处小土地或者生意的责任，将负责的奴隶置于与自由小土地持有者并无不同的社会境况中，允许这些奴隶像他们一样自由规划自己的工作甚至拥有自己的奴隶。丕平的一条法律中提及了奴隶将自己的女性奴隶收作妾的情况，并承认他有权离开她去迎娶“一个和他同等的人，一位属于他主人的奴隶女子，但如果他自己还养着奴隶则更好”²⁵。但这只是纯粹在主教指导下的形式上的同意，主教其实是反对离婚和一夫多妻制的。

我已经暗示了另一个依然惊人的进步。正是由于奴隶是基督徒，他们才有资格结婚，他们的所有者必须尊重他的婚姻。伦巴第国王利乌特普兰德曾经规定，如果一个奴隶所有者强奸了他的一个已婚女性奴隶，她和她的丈夫将获得自由。²⁶ 丕平判决，如果一对奴隶夫妻被分开出售，神父就会向他们两人布道，讲述以基督徒的坚毅接受必须贞洁的义务，同时他也说明要尽一切可能使两人重新结合到一起。²⁷ 查理更进一步，规定如果分属不同主人的男女两人要结婚，只要他们以适当的形式结合，并得到主人的同意，就不能再将他们分开。²⁸ 不过奴隶中一直存在滥交，尤其是纺织业中存在大量女性劳动力的时候。诺特克提到，在亲身伺候皇帝的奴隶之中，“在科尔马（Colmar）的女性住所里有两个私生子出生了”，这展示了一种和千年以后工业革命时代所造就的工厂生活类似的情况。²⁹

基督教的影响也导致废除了所有者决定奴隶生死的权力。当然，那些可怜人，除了设法养少量牲畜，并在市场出售他们的出产来积攒少量金钱，此外一无所有，他们依然会因为最轻的错误而受到肉刑处罚。他们会受到责打的处罚，更严重的情况是绞刑，而自由民在同样情况下是交罚金。但只有王室法官能通过死刑的判决，而奴隶所有者若因严酷的责打而致奴隶死亡，则会被惩罚。奴隶制的严酷依然体现在屈从于肉刑，这标志着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区别；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审判中

证明一个人曾经被“像奴隶一样责打”的证据，在确定一个人身份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³⁰但是，在前基督教时代对奴隶灭绝人性的待遇，现在已经走向终结。

获释奴隶所期待的命运

获释奴隶的数量甚至超过奴隶，他们的社会身份却没有很大不同。我们已经审视了在王室和教会地产上工作的获释奴隶，但还有很高比例甚至大部分的在各地大地产中工作的农民是由获释奴隶组成的。被释放的奴隶，依旧对其先前的所有者保持着屈从的关系，现在所有者成了他的恩庇人，拥有和上古时代相似的地位。但是在基督教的统治下，释放奴隶是一种深受基督教鼓励的正义之举，并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奴隶对恩庇人的义务逐渐加重，束缚着奴隶，这样其所有者就不会在经济上有所损失。所有的日耳曼法都接受不同形式的释放；最严肃的形式，是在国王面前用书面文件举行释放，这使得一个获释奴隶成为拥有所有权利的自由民，他本人不再对恩庇者有任何义务。其影响就是，完全释放的案例极其罕见。一般而言，获释奴隶必须生活在主人的土地上，为其工作，缴纳租金。没有他的新恩庇人的允许，他无权离开。

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解决方法。一个获释奴隶将自己置于没有小土地的情况下来劳作，没有恩庇人保护，这会使最贫穷的农民阶层膨胀起来；尽管农村的人口依旧足够少，足以让每个人最终都找到工作，但还没有少到可以决定环境的程度。在虔诚者路易时代，列蒂地区有几十名奴隶出于当地一名“加斯塔尔迪”的遗愿而被同时释放，他们接受了来自法尔法（Farfa）修道院的小土地。他们必须接受极其严厉的合约条件，这意味着在每年最忙的季节，两周中就有一周要在庄园地产上工作，同时还要缴纳繁重的地租。³¹获释奴隶构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无产阶级，尤其是在那些第一次犁种的地域里，他们的工作对庄园体制经济繁荣

的贡献并不小。因此绝不能肯定，他们的释放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在大部分情况下，获释奴隶依旧被束缚于曾经释放他们的所有者。法律将之转变为一个道德问题。伦巴第国王阿斯图尔夫曾疑惑，为什么没有迹象表明获释奴隶敢于背弃他们的恩主。国王曾经被告知，如果奴隶所有者不能确定他能够依赖奴隶的劳动时，他会犹豫是否释放他们。因此国王规定，即使在完全释放的情况下，一个获释奴隶因此全方位地成为一个伦巴第人，前所有者依然有资格在自己的余生要求获释奴隶来侍奉。³² 法兰克人没有这样明确的举措，但普遍的实践是一样的：获释奴隶被称为“利图斯”（litus），不是自由民，而是有义务成为他的恩庇人的人。

这种条件下获释的奴隶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们和奴隶之间只有名字上的差别，再无其他。实际上，鉴于他们仍旧需要永久地留在恩庇人的土地上，无论他何时有何种需求，都要为他效力，不能像自由农民那样协商更好的合约条件，获释奴隶发现他们自己其实和先前一样受压迫。无数的叙述都证明了一个获释奴隶的社会境遇近似奴隶，而不是真正的自由民。754年，丕平颁布了一条针对乱伦的法律：犯罪的一方，如果他是自由的，必须要付沉重的罚金；如果他不能支付，他将被监禁。但“如果他是一个奴隶或获释奴隶，他将被多次责打，他的主人也不应再允许他犯错”³³。802年，查理大帝命令所有受到挪威突袭者威胁的北部海岸居民，在当地政府召集行动时，都要立刻前来。那些未能履行的人，如果他们是自由民，就要向国王缴纳罚金；但如果他们是奴隶或者获释奴隶，“他们会在背上承受王室罚金”，或者换言之，更多的责打。³⁴

因此，随着时间过去，奴隶与获释奴隶之间的区别，对那些掌权的人以及文字工作者来说无足轻重，那些文人在羊皮纸上塑造了我们对他们社会的印象。“Servus”是最广泛使用的定义古代奴隶的词，也是被高卢和意大利当地方言保留下来的唯一相关词语，开始被无差别地同时用

于奴隶和获释奴隶；且不说还有其他类型的乡村从属劳动者，例如“隶农”，他们是人身自由的农民，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似乎要永久地居住在小土地上。查理的时代这种混淆开始出现，甚至逐渐进入法令中。但长期来看，这会导致欧洲乡村古代奴隶制的消失，并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从属关系，叫作农奴制。农奴制囊括了绝大多数从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农民，他们都同样臣服于当地庄园所强加的条件。

权贵与贫民（pauperes）

皇帝对获释奴隶的命运毫无兴趣，正如他对犹豫不决的使节的著名回复清晰地指出：“只存在自由民和奴隶。”在本章开头将“女隶农”当作奴隶对待的那个语境中，我们所引用的这句直白的评论，绝对清晰地证明了，多数农民的隶属关系自身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尽管有些情况下，查理自己关心他们的主人是否正确地对待他们，并且尊重他们的权利，将之当作自己的义务。折磨着自由小土地持有者的困难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被国王提出的要求压垮了，并且对有权势的人滥用权力作恶毫无办法。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自由的小土地持有者依旧构成了军人和纳税人的大多数。实际上他们中太多的人被迫变卖家产还债，为一个主人效力，这令人极其不安，并造成了政治上的影响。

因此，查理的法令集中保护穷人免受滥权伤害的举措激增。这种情况下的“穷”并不是指真正的贫穷。奴隶和获释奴隶受他们主人的盘剥，但在传统观念中，自由民构成了法兰克民族的中坚力量。毋庸置疑，最有效的举措是免除兵役，但皇帝并不是让人觉得他会允许人逃避兵役。如我们所知，他严厉地对待逃避者；而且请求当地官员，不要从兵役中获利，不要毁掉这些人，令他们失去自己的土地，尽管可能没什么效果。³⁵另一方面，查理并没有承诺自己会减轻司法管理的负担。他废除了所有自由民必须出席“诉讼会”的义务，不过这造成了纵容伯爵及其亲友将公共司法当作纯粹私人事务的风险。³⁶最后，皇帝规定，那些自由身的穷人可以支付罚金，将判决转变为责打，以此“用他们的脊背”来偿付他们欠王室的债，避免牲畜被抄没，不然这将会把他们置于穷困的境地。³⁷

但这些举措大部分都不过是警告，表示皇帝将不再容忍当权者对穷

人的各种滥权。³⁸不幸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指责往往也是形同虚设。在整个帝国，自由民都让自己顺从于强大恩庇人的仁慈，不是做武装封臣，而是做依附者。还有更多的人，出于饥馑，实际上卖身为奴隶。并不是说前者的命运就与后者不同，如我们所知，要考虑到地方的习俗逐渐倾向于将整个农民阶层等同于单一形式的臣服者。这一时期，农民群体期望宫廷重新确认他们的人身自由，反对想把他们当奴隶一样对待的主人，这种诉讼案件的增多，证明这并不是巧合。偶尔农民会获胜，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输。

查理死后，法律本身恶化了为主人工作的自由民的境遇。虔诚者路易重申了曾经推行的举措，尽管他再次申明他们被认为是自由的，但他们不能为法庭提供证据，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如果是伪证的话就不能对他们采取措施。³⁹事实证明，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所支撑的自由，在实践中越来越难得到维护。长期来看，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法律都曾规定，长期居住在他人土地上的自由民，对土地所有者负有责任；如果他犯罪了，他的主人要逮捕他，并移交给当局。⁴⁰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的合约，甚至那些在意大利依旧使用的书面合约，都应该在理论上给予农民更多的保护；但即使是这些合约，也规定了在无法实现合约的情况下，农民自愿服从土地所有者所执行的司法。

夹在恩庇与奴役这两个世界之间，自由小土地持有者的存在逐渐岌岌可危。更多富裕的人，拥有一些奴隶，能够买一些武器和马匹，训练去使用它们；他们能进入当地的恩庇网络中，可能成为王室封臣，获得有保障的地位。一旦查理保证的相对安宁消失，其他人逐渐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臣服于滥权，卖掉他们的财产，加入逐渐增长的为领主工作的农奴阶层。

注释

- 1 CRF, 58.
- 2 Thegan, *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 E. Tremp ed. (Hannover, 1995; vol. 64 in *MGH, Scriptore*), 232.
- 3 CRF, 26, 27.
- 4 CRF, 25. 比较第7章, “效忠誓言”。
- 5 对政府机构规模的估算, 见K. F. Werner, “Heeresorganisation und Kriegführung im deutschen Königreich des 10. und 11. Jahrhunderts,” *Settimane* 15 (1968): 818–20, 在K. F. Werner, *Naissance de la noblesse* (Paris, 1998), 130中有部分调整。
- 6 CRF, 21.
- 7 *Monumenta Novaliciensia vetustiora*, C. Cipolla ed.,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no. 31 (Rome, 1898), 1: 20–38.
- 8 G. Tabacco, “La connessione fra potere e possesso nel regno franco e nel regno longobardo,” *Settimane* 20 (1973): 141–42. P. Geary的著作 (*Aristocracy in Provence: The Rhône Basin at the Dawn of the Carolingian Age* [Stuttgart, 1985]) 同样也非常倚赖Abbo的证词。
- 9 *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109–45.
- 10 参见注释4。
- 11 A. Barbero, “Liberti, raccomandati, vassalli: le clientele nell’eta di Carlo Magno,” *Storica* 14 (1999): 22–28.
- 12 CRF, 77.
- 13 Manaresi, 17.
- 14 CRF, 31.
- 15 *Inventari altomedievali di terre, coloni e redditi*,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no.104 (Rome, 1979), 41–94.
- 16 CRF, 48.
- 17 CRF, 45.
- 18 CRF, 20, 90, 105.
- 19 CRF, 20.

20 CRF, 102.

21 引文见 J. Schmitt, *Untersuchungen zu den Liberi Homines der Karolinger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7), 152.

22 CRF, 16.

23 CRF, 88.

24 CRF, 28.

25 CRF, 16.

26 Liutprand, 140 (in LL 202).

27 CRF, 16.

28 CRF, 105.

29 Notker, 2.4.

30 关于类似“batabant eum pro servo”这样的表达的含义，我不支持B. Andreolli and M. Montanari, *L’azienda curtense in Italia* (Bologna, 1983), 103中的解释，他们将之视为一种公开的售卖而不是公开的责打。同样参见F Bougard, “La justice dans le royaume d’Italie aux IX^e–X^e siècles,” *Settimane* 44 (1997): 149n。

31 *Liber Largitoris vel Notarius monasterii Pharpensis*, G. Zuccheti ed. (Rome, 1913–32), nos. 7, 9, 15, 17, 21.

32 *Ahistulfi Leges*, 11 (in LL, 254).

33 CRF, 13.

34 CRF, 34

35 CRF, 73; 参见第11章，“处理逃避者”。

36 参见第9章，注释30。

37 CRF, 34.

38 CRF, 34, 35, 44.

39 CRF, 165; CRF II/1: 193.

40 CRF, 93–94; Liutprand, 92 (in LL, 174).

第14章

老年与死亡

查理大帝的失败？

查理大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常常表现为一段衰退的时期，几乎好像君主身体的逐渐恶化和他所创造的帝国命运相似。老病的皇帝基本不走出他在亚琛的宫殿，他被一个小团体以及一伙作威作福的奉承者所包围，他们企图瞒着他而为自己谋求财富。¹ 他的合法子嗣互相怀疑地看着对方，等着老人死去，他们以便继承。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包藏着有幸排除掉兄弟而由自己统治的想法。但讽刺的悲剧是，死亡带走了三个可能的继承人中的两个——长子查理和意大利国王丕平，留下较弱的阿奎丹国王虔诚者路易，这一系列丧亲之痛，使他们的父亲生命最后几年十分酸楚。长期以来的征服战争，创造了统一、积累了财富，现在战争结束了。而挪威沿海的袭击者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征兆，会在查理大帝死后加速帝国的崩溃，将基督教世界蛮族化。年迈的皇帝在他后期的几部法令集中的政策，已经被解释为遏止腐败蔓延和帝国道德崩溃的绝望而不成功的尝试。

这幅令人遗憾的场景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不过要分解成各种各样的

要素。从军事角度说，不可否认，后面几年皇帝不复自己先前的进取心。801年，他立刻同时接受了巴西琉斯尼基弗鲁斯和科尔多瓦的埃米尔提出的和平提议，他们都已经厌倦了战争。事实上，与埃米尔的协议确认了阿奎丹国王路易在比利牛斯山以外取得的进展，将帝国的边界拓展至埃布罗河。但同样是事实的是，为了与拜占庭缔结和平，查理同意归还威尼斯潟湖，这里刚被征服。同样，丹麦人在陆地边界上挑起的事端，也没有导致皇帝像早年那样去入侵他们的国土，以清除掉这些使人恼怒的邻居。他在沿着易北河的边界上修筑要塞，与他们的国王谈判。811年，他不辞远途签署了双边协议，仿佛双方是平等的。这种政策上无可置疑的变化，仅仅是皇帝年事已高的表现，还是法兰克贵族（他们在先前的胜利中已经获得财富，比他们最疯狂的梦中想象的还要多）共同的决定，这还需要探查。他们现在可能偏好更为谨慎、较少冒险的政策。

至于查理，当然他已经年迈，不再热衷于离开亚琛。甚至800年他在圣彼得教堂加冕的时候，他已经接近60岁，在当时已是个老人。一些人提出，他只从水路出行，是因为关节炎甚至痛风导致他不能骑马，这似乎不足为信。恰恰相反，尽管他频繁高热，腿部疼痛，但他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仍旧继续狩猎。然而，有些时候，他曾偏好让自己的儿子们领导军事作战。远溯到796年，毁灭阿瓦尔汗国的行动是由意大利国王丕平执行的，他在随后的几年断断续续地监视着东部边境拜占庭人和南意大利贝内文托公爵的举动。同样，阿奎丹国王路易指挥了在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旷日持久的作战，领导了对巴塞罗那的围攻，并将其征服。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一区域的责任托付给他所信任的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恰巧这个人是他的儿子，他任命其为国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至于最年长的继承人查理，他将会继承法兰克王国。很自然，他从年少时就被训练如何指挥，受命独立控制对萨克森人的行动；800年之后，他经常受命在对抗斯拉夫人和丹麦人的中央前线独立指挥作战。皇帝逐渐老去， he 有三个强大的年轻儿子，他们会在军事行动中有效地代替他，肯定

不会有危机的迹象。

此外，我们对查理人生最后几年的负面印象，也受到不公正记录的影响。记录者是他儿子路易的编年史家，尤其是诗人厄莫都斯·尼格鲁斯，他声称，臣民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新皇帝，他立即着手改正他父亲犯下的错误，释放囚犯，召回流放者。² 根据这些作家的记录，查理在最后几年里，极度衰老，与世隔绝。即使那些还没有腐败的顾问，也坚持认为他应该把更多的责任交与他还存世的儿子手中。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不足以说明那些年是个衰落的时期。在更近的时代，另外一些活到高龄的皇帝的经验，例如维多利亚女王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表明君主身体甚至精神的衰落都并不必然反映在帝国的管理上。尽管总是存在一帮不耐烦的支持者聚集在他的继承人周围，准备庆祝年老的在位者死亡，将之视作一种解放。

将查理最后几年的法律行动解释为一种失败，这尤其令人难以接受。在805年至813年间，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集，不断致力于追求改革的成效。尤其在813年，见证了对法兰克教会前所未有的动员，查理召集了五次教省会议，它们的记录全都保留了下来。³ 这些年的法令集，是极具意识形态意义的法律举动，传达出对帝国权力的深刻反思。似乎老君主曾经仔细考量了“奥古斯都”这个最初引起自己关注的新称呼，他逐渐相信其带来的与基督教民族相关的责任。他用来针对法官腐败和教士缺陷的尖锐挖苦，以及近乎偏执地坚决主张和谐（*concordia*）、共识（*consensus*）、一致（*unanimitas*），最重要的是博爱（*caritas*），将鼓舞政府的行动，提升臣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批评和主张可能会被解释为虚弱和衰老的迹象，但是，查理希望坚持遵从继承自基督教帝国概念中的道德意涵，我们难对此加以责备。

与海盗的斗争

在查理统治的最后几年，他的王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威胁，对此有许多要说的。威胁来自海盗，他们逐渐开始袭击帝国的海岸线，令海上旅行和贸易变得不安全。实际上这些袭击一直持续，并在他死后加剧，达到了使基督教世界屈膝投降的地步。后世来看，年迈的皇帝采取的举措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避免用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时代的事件。靠近来审视，查理大帝对海盗袭击所采取的反应，就当时所能判断的威胁规模而言，似乎是合适的。实际上这证实了他的精力和远见卓识，这对于那个时代一个70岁的衰老之人来说是非凡的。

挪威人

最危险的敌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挪威人，他们更多地被称作维京人。⁴ 793年，维京人的第一次侵袭冲击了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的修道院，这是一个远离英国海岸的岛屿。他们屠杀僧侣，焚毁修院，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消息传到查理的宫廷，来自这一地区的阿尔昆试图安慰他，认为这一灾难是神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罪孽的惩罚。⁵ 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无人能从神圣的愤怒中幸免：针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开始蔓延；不久，799年他们袭击了加洛林帝国的大西洋海岸。⁶ 从那时起，在英吉利海峡中航行就不再安全了，而英格兰是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809年，一名派去会见诺森布里亚国王的教宗使节，在渡过海峡返回罗马时被海盗擒获。

一切都表明，查理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因为他没有仅仅

满足于在北部海岸地区推行一个快速动员武装人员的体系，还命令在北部港口建造战船。⁷ 811年，他坚持亲自检阅停在根特和布伦的锚地里的舰队。从后来的眼光看，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在船舰建造上投入得不够，尽管海军力量是最难以提升的。然而，皇帝在死前肯定深信他已经处理了威胁。实际上，海盗的进攻只是他与丹麦国王关系这个更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稍作犹豫之后，查理投入他盛年的全部精力对此采取决定性行动。

自从法兰克人降服了萨克森人，将他们的边境转移至北海，丹麦人就发现自己处在帝国的边界上。他们的国王，戈德弗里德，立即表明自己不打算容忍法兰克的威胁。804年，当查理站在自己的军队前头，越过易北河去清除最后一个萨克森人的核心据点时，戈德弗里德在标志着两国边界的河口，聚集起他的舰队和骑兵。在这一次宣示武力之后，我们并不知道丹麦国王是否同意将叛乱者移交给皇帝，但我们知道皇帝向他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

从那时起，法兰克人知道他们必须谨慎对待丹麦人，纵然艾因哈德可能有所夸张，他声称戈德弗里德“变得如此膨胀，妄想自己征服整个日耳曼，并吹嘘自己很快就能现身亚琛”⁸。更严重的是，生活在易北河口附近的斯拉夫部落受到了丹麦人的持续进攻。因为他们曾帮助法兰克人对抗萨克森人，查理大帝将他们视作保卫帝国的卫星区。808年，戈德弗里德洗劫了他们的海岸，征服了他们的要塞，吊死了他们的一个领导者，驱逐他们背井离乡。他击败这些部落后，立刻强迫他们纳贡，他快速在自己的王国边境建立起防御。很快，查理准备效法他的对手，投入自己大部分资源沿着边界建立起自己的防御，甚至允许开始谈判。他的谨慎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标志，因为810年，一支丹麦舰队出现在弗里斯兰，这里距亚琛的宫殿只有几天的行军路程；这些袭击者强迫沿海的民众支付高达100磅白银的贡金以免遭掠夺。

拖延的时候过去了，年迈的国王最终决定像他年轻时候那样做出反

应，准备自己亲自指挥，对丹麦人发动一次闪电战。810年夏季开始的时候，他在莱茵河畔的利珀汉姆（Lippeham）准备召集军队，当时传来了戈德弗里德被刺杀的消息。丹麦王国卷入了内战，武装干涉的必要已经消失，因为临时出现的领导者乐于与皇帝签署和平条约以示善意。后世看来，会认为没能入侵丹麦使得帝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在当时，没有参战就让这么一个危险的敌人表现出无害，这是人人都高兴的。查理开玩笑说“我没能见到我的基督徒与这些狗头人（cynocephali）作战是多么遗憾啊”，间接提到了地理学家所说的传说：在北方冰冻而神秘的荒野中，居住着长着狗头的人。⁹

这并没有阻止诺特克在887年写作时，称赞皇帝拥有战略远见。这位圣加尔的僧侣告诉我们，当查理访问一个高卢的港口时，一艘挪威人的船出现在海岸，第一次探索这个地区。这些维京人一得知皇帝本人在那里，立刻就溜走了。但查理没有很高兴，他长时间站在窗前，眼中带泪。他随后向自己惊慌的随从们解释说，他的眼泪并不是因为害怕敌人会对他怎么样，因为他若在世，他们不敢袭扰海岸；但他意识到自己死后，他们会给自己的继承者带来难以言表的恐怖。¹⁰ 似乎远在《罗兰之歌》之前，就有了传奇的查理大帝哭泣的故事。在那些后来者的印象中，随着他的去世，基督教帝国所承受的巨变太过剧烈，无法粉饰并改变他们对皇帝最后几年的看法。

穆斯林海盗

同一时期，基督教世界的南边正在经历摩尔人海盗的第一次突袭，他们接下来制造了长达千年的危险和不安。¹¹ 最初，帝国尤其是意大利王国的组织能力似乎能提供一定程度的防御能力，甚至海军力量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还不能说阿拉伯人主宰了地中海。798年，摩尔人洗劫了巴利阿里群岛（Balears），但接下来的一年，一队法兰克人的舰艇

协助岛民击退了另一次入侵，并缴获了海盗的徽章，立即呈送给了皇帝。806年，摩尔人攻击科西嘉岛，并击败了意大利国王丕平派去拦截他们的舰队，杀死了指挥官热那亚伯爵。但接下来的一年，另一支基督徒的海军力量成功击败了他们，俘获13艘船。然而，这样的成功在接下来的年份里逐渐稀少，而袭击逐渐扩散。

812年，基督徒中传言，非洲和西班牙的萨拉森人准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掠夺意大利。皇帝似乎意识到在地中海投入海军防御的资源不足，他派去他的堂弟瓦拉，任务是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因为有一队穆斯林的舰艇在撒丁岛沉没了，但同时另一队洗劫了科西嘉，没有遇到抵抗。下一年，海盗在马略卡岛（Majorca）附近受到了安普利亚斯（Ampurias）伯爵指挥的一支基督徒舰队的拦截，损失了8艘船，超过500名奴隶重获自由。总体而言，意大利和阿奎丹的国王没有办法主宰海洋，以地中海港口为基地的海军纵然可以让海盗的日子不好过，但无法保证海岸的安全。813年摩尔人再来，他们第一次现身陆地，袭击了远至尼斯和罗马附近琴托切莱（Centocelle）等地的市镇。甚至在查理去世前，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就处于守势，但审视这些行动，这些一连串的胜利和失败证明了法兰克海军争取主导的能力和意愿，超过了我们通常的认识。

继位的规定

806年对王国的划分

在查理人生的最后几年，最给他增添忧愁的是如何在诸子中划分继承权。法兰克法律规定，每个男性都有资格分得父方的产业。没有人，甚至是皇帝，能够无视这一点。806年，在蒂永维尔大会（Dieta）上，查理颁布了我们所知的《分国诏书》，规定在他死后，他统治的国土划分成三个王国，赐予他三个在世的儿子：查理、丕平和路易。¹²真正的长子驼背丕平还在世，他因为针对父亲的阴谋而被托管在修道院里。他早已被决定排除到遗嘱之外，因为教会颁布的婚姻新规定和查理自己的法令集都认为他是非法生子。¹³

有些人解释说，这次划分证明皇帝基本上是不在意皇帝头衔的，或者至少是不愿在自己死后还让其存续。当时正处在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糟糕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东部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头衔。仿佛在面对自己急切的继承需求时，查理突然忘记了支撑着自己后期法令集的那些关于帝国权力性质的高谈阔论，开始将帝国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按照他的意愿在继承人中划分。实际有些不同，精心构建的《分国诏书》证明了查理苦心努力以保护自己儿子的权利，同时保护自己耐心构建多年的政治大厦不被毁坏。

为了理解查理分国计划的性质，我们需要把它当成一系列长期决议的产物来分析。由于皇帝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他关注自己的继承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回溯到781年，计划的轮廓就已经显现，那时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后来变作丕平的卡洛曼是四岁，还有路易是三岁，分别

受膏成为意大利和阿奎丹的国王。他的合法长子查理，并没有被授予一个王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宠了。即使他们是国王，而他不是，但在教会诵读的连祷中，他的名字依然优先于他的兄弟。显然小查理注定要继承他父亲最为重要的王国，法兰克王国，781年的两子加冕显然是一个关于继承的政治声明。一部编年史记下了这一事件：“国王在他的诸子中划分了王国。”¹⁴

丕平和路易被安置在自己的王国，由导师和顾问辅佐，在那里成长，逐步学习当地事务；他们的兄长查理留在家中父亲身边，逐渐扮演他的副手的角色，承担军事和外交责任。800年，他23岁时，陪伴父亲前往罗马，加冕为国王，被教宗一并涂油。¹⁵他是唯一在永恒之城举行自己加冕礼的法兰克国王。六年后的《分国诏书》，不过是对早已在实际中实现的继承权划分盖上橡皮图章。因此，意大利和阿奎丹两个王国都有部分的自治权，尽管查理大帝已经尽可能减少兄弟间的不平等，但它们依旧臣属于法兰克王国。丕平被授予他已经拥有的意大利王国，还有巴伐利亚。而路易的阿奎丹王国扩展至包括塞普提马尼亚、普罗旺斯和一部分勃艮第。所有的这些合并，在地理意义上都有理可循，并且绝不能侵占传统的法兰克王国架构，那是属于小查理的，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也因法兰克人传统的平等主义而有所缓和。

813年虔诚者路易的加冕

806年颁布《分国诏书》时，皇帝已年过六十，他有资格期望这一划分不再变化。但天命自有安排，查理经历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接连去世，810年的意大利国王丕平和811年将要继承他的法兰克宝座的查理。当他从这个沉痛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后，年迈的皇帝认识到，接手继承的任务现在完全落到了路易的肩上，并且他想让自己幸存的儿子们的事情尽可能简单。813年9月11日，在出席法兰克权贵和主教的全体大会时，查理

承认他的儿子为他的继承人，将皇帝冠冕加于他头上，使他与帝国联系起来，并命令现在起人们要以奥古斯都的头衔称呼他。

授予路易帝国继承权，并不完全意味着806年蒂永维尔的决议就无效了。阿奎丹王国已经是路易的，实际上失去了自治权。查理保护了意大利王国，因为前一年他承认将国王头衔授予自己的孙子——丕平之子伯纳德。伯纳德的加冕典礼于813年9月在亚琛举行，紧接在虔诚者路易的加冕礼后。帝国与王国之间的关系基于一种变动的几何学，使二者能够根据皇帝家族的需要来分割和合并。而臣服于皇帝是无须讨论的。因此尽管伯纳德接受了国王头衔，但没有接受保留给法兰克国王的受膏礼。

在父亲还在世时，为皇帝的儿子加冕这一习俗，是为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联合统治，让帝国处于两个君主的统治之下，从而实现顺利过渡。这起源于东部帝国，毫无疑问查理有意识地加以仿效，在他为路易加冕时复制了拜占庭的仪式。812年，与巴西琉斯的关系回归正常，尽管咬牙切齿，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还是接受了查理的皇帝头衔。随后，可能是通过对两位皇帝的类比得出了合理的结论：他们都是罗马皇帝，他们和平地共享对基督教民族的统治，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从这个观点看，路易813年的加冕失去了警告甚至急迫的含义，这些是过去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加以曲解的。恰恰相反，这是另一个事实，证实了一个观点：查理大帝死期不远，他确信已完成自己的使命，将一个有秩序、安全的国家交给他的儿子。

查理大帝的遗嘱

除了帝国，查理大帝还留下了大量的私人财产，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并不一定要留给继承人。我们在此不是要讨论大量的王室地产。当时的人们没有与君主的个人财产相区分的公共财产概念，对此已

经讨论得太多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出于充分理由，由于“公共事务”（res publica）是属于王室的，查理大帝从未想过将其作为私人事务处理。但他觉得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处置财宝：亚琛宫廷中的那些数量巨大的珠宝和钱币，来自外国大使以及他自己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的赠礼，还有来自军事作战的战利品，尤其是阿瓦尔人的黄金。

艾因哈德告诉我们，皇帝试图口授一个正式的遗嘱，依据罗马法的规范，为每个女儿和非正式婚姻所生的儿子留下一份遗产，但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事务，查理已经太晚了，并没有设法完成他的遗嘱。但是在811年，他签署了一份差不多等效的文件，尽管不那么正式，但是给出了分享财宝的指示。¹⁶ 这份文件，有11位主教、4位修道院院长、15位伯爵签名，声明将所有保存在皇帝宝库内的黄金、白银和宝石分成三份。其中两份进一步分成21份，对应帝国分成的21个大主教教座。皇帝死后，它们被分给21个大主教，他们将其进一步分配给自己的副手。

留下的第三份是为查理大帝将来所用。在他死后，它被分成四份，一份平均分给21位大主教，一份分给他的子女和孙子女，一份分配给穷人，一份赐予宫廷中的仆从。所有铜质和铁质的炊具和餐具以及武器、衣物、毯子和家具都一并添入第三份的金银中，增加捐赠的规模。至于图书馆内的书籍，想要的人必须付出所值的价格，这些收益要赐予穷人。书籍可能并没有被拍卖，而是被他的继承人赎买了，据我们所知，路易至少拥有父亲的一些书籍。艾因哈德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写作，他因为皇帝的这笔财产而蒙受皇帝之惠。他断定在查理死后，新皇帝获知了这份文件，并且他谨慎地遵守了文件。¹⁷

查理大帝之死

在中世纪和在古代，如苏维托尼乌斯充分证明的那样，皇帝去世前总是会有凶险的预兆。中世纪没有什么不同，查理大帝也不例外。¹⁸从806年起，日食和月食的次数突然增加，有一次，一个黑点使得太阳的光芒黯淡了整整一周。即使这些现象能得到天文学家的解释，不会引起不理性的恐慌，但它们是引人担忧的因由，因为人们坚定地相信，神操纵着宇宙的奇迹，他试图向人类展示一些非凡之事。在军事作战期间，查理自己也曾留心天体的运动。一次在与萨克森人作战时，他写信给阿尔昆，询问他火星与巨蟹座相交是否被认为是坏的预兆。¹⁹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鉴于皇帝的高龄，不可能在预兆的意义上欺骗他。

没有什么预兆不是源自宇宙的规律。耶稣升天节那一天，连接到王室礼拜堂大厅的柱廊突然崩塌了。艾因哈德的回忆可能有混淆，因为年鉴记录这一事故发生在817年，查理大帝死后三年，并且将原因归于糟糕的木工质量。²⁰美因茨的莱茵河大桥火灾也被解释为一个坏预兆。这座大桥花了十年来建造，三个小时内就被火焰摧毁。随后又有几次震颤震惊了亚琛的宫廷，在皇帝起居房间的天花板里传来不吉利的声音。不清楚这种震颤是来自地震，还是仅仅由于建造皇帝住所用的劣质材料。更严重的是，除了这些凶险的预兆，查理在810年远征丹麦期间发生了事故。一支燃烧的火炬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受惊的马失足，拖拽他摔了下来。几天之内，他的大象阿布·阿拔斯死了。这头动物是哈伦·赖世德赠送的礼物，在旅途中一直跟随着皇帝。

然而数年中查理大帝都从这些预兆中幸免，在他为儿子路易加冕四个月后，他进入垂死状态。我们试图去设想，在确定了继承之后，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可以离世了。但是史料反驳了这个浪漫的解释

。 ²¹ 仪式一结束，查理立刻派遣路易前往阿奎丹王国，他在此已经统治了三十年；然后自己欣然前往靠近亚琛的阿登森林狩猎，就如他每年都做的那样。这是秋季，理想的狩猎季节，狩猎也是他主要的娱乐，既是游戏，也为他提供最喜欢吃的菜肴。面对这些诱惑，高龄显然不足以使查理大帝止步。

但他在狩猎期间受了风寒，不得不在亚琛的宫中卧床。他斋戒，相信这能像过去那样退去高热。但反而，他感到肋中格外疼痛，毫无疑问这是肺炎，而老人的身体已经由于缺乏营养而虚弱，再坚持不住了。814年1月28日上午九时，他在领了圣餐之后去世。他的遗体按照习俗清洗装裹，送至王室礼拜堂。皇帝没有为自己的埋葬地留下指示，但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地方比他自己出资修建的宏伟会堂更合适的了。他于同一天被安葬在自己从罗马带回的精美古石棺中，他的坟墓上镌刻着拉丁铭文，写道：这里停放着查理的遗体，“伟大而正统的皇帝” ²²。

查理大帝去世了，统治了四十六年。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与新的君主亲近的人，肯定把这一消息视作乐事。时代变化了，先前受阻的事业现在可以进行，新的机会为那些先前被紧紧束缚的人们敞开。另一些人，可能是大多数人，会若有所失，因为查理活着的时间长到所有人都能记住他。只有非常老的人能回忆起他的前辈，但帝国的绝大多数臣民都算年轻，只知道这一位君主。但也没理由惊恐。在天意佑助之下，皇冠已经传给了他的合法子嗣，没有挑战、异议，或者过去经常发生的内战威胁。至于未来，那是在神的手中。

注释

¹ 802年后阿尔昆即是: *Alcuini*, 254。

² *Ermold le noir, Poème sur Louis le Pieux*, E. Faral ed. (Paris, 1932), 60–64.

³ *ARF*, 138; e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 245–306.

- 4 随后事件的主要史料被逐年记入ARF。
- 5 *Alcuini*, 16.
- 6 *Alcuini*, 184.
- 7 *CRF*, 34, 74.
- 8 Einhardus, 14.
- 9 Notker, 2.13.
- 10 Notker, 2.14.
- 11 随后事件的主要史料再一次被逐年记入ARF。
- 12 *CRF*, 45.
- 13 参见第6章, “781年危机”。
- 14 *Annales Sancti Amandi*, in *MGH, Scriptores*, 1:12.
- 15 *Alcuini*, 217.
- 16 Einhardus, 33.
- 17 Einhardus, 33.
- 18 后续参见Einhardus, 32; 以及*ARF*, 122–37。
- 19 *Alcuini*, 155,
- 20 *ARF*, 146.
- 21 Einhardus, 30.
- 22 Einhardus, 31.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查理大帝的所有主要史料，当今使用的版本和关于它们的最近的参考文献。第二部分，由与书中章节相对应的段落组成，包括一份关于查理大帝统治的参考文献，有注解且更新过。

所用文献缩写如下：

<i>BEC</i>	<i>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i>
<i>BISI</i> <i>MeA</i> <i>M</i>	<i>Bullettino dell' 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evo e archivio muratoriano</i>
<i>CRF</i>	<i>MGH, Legum sectio II,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i> , vol. 1. ed. A. Boretius (Hannover, 1883)
<i>DA</i>	<i>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i>
<i>EHR</i>	<i>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i>
<i>FMSt</i>	<i>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i>
<i>HF</i>	<i>Historisches Jahrbuch</i>
<i>HZ</i>	<i>Historische Zeitschrift</i>
<i>KdG</i>	<i>Karl der Grosse: Lebenswerk und Nachleben</i> , 4 vols. (Düsseldorf, 1965–67)
<i>MÂ</i>	<i>Le Moyen Âge</i>

<i>MGH</i>	<i>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i>
<i>RBP H</i>	<i>Revue Belge de philology et d'histoire</i>
<i>RH</i>	<i>Revue historique</i>
<i>RSI</i>	<i>Rivista storica italiana</i>
<i>Savigny</i>	<i>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i> , in three sections, Germanistische (Germ.), Romanistische (Rom.), Kanonistische (Kan.)
<i>Scriptores</i>	<i>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i>
<i>Settimane</i>	<i>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i> , Spoleto

史料

最重要的一部编年史是《法兰克王室年鉴》（*Annales Regni Francorum*），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官方的，从公元787年起由查理直接控制，可能由不止一个人撰写。而第二个重订版与艾因哈德的文本极其相似，艾氏的文本可能基于此，也可能是其来源。刚提到的是F. Kurze的版本 (Hannover, 1895; vol. 6 in *MGH, Scriptores*)。第二种重要史料是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写于公元817年至831年。我使用的版本是L. Halphen per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38)。关于查理大帝统治后期，同样非常重要的重要是Thegan, *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和Astronomer, *Vita Hludowici imperatoris*，现由E. Tresp出版了单卷本 (Hannover, 1995; vol. 64 in *MGH, Scriptores*)。另一本著名的编年史，是《梅斯第一编年史》（*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ed. B. von Simson [Hannover, 1905; vol. 10 in *MGH, Scriptores*]），在公元802年之后不久写成，可能是应查理大帝的妹妹，修女院长吉斯拉之邀，作于谢勒。

之后所作，但在收录逸闻方面无与伦比的，有诺特克*Gesta Karoli Magni imperatoris*, ed. H. F. Haefele, Berlin, 1959; vol. 12, n. s. in *MGH, Scriptores*）。

关于加洛林历史修撰的介绍，参见M. Innes e R. McKitterick,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ed. R.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4), 193–220及其参考文献。关于艾因哈德，及其作品中依旧有争议的日期，参见H. Löwe, “Die Entstehungszeit der Vita Karoli Einhards,” *DA* 39 (1983): 85–103; *Einhard: Studien zu Leben und Werk*, ed. H. Schefers (Darmstadt, 1997); K. H. Krüger, “Neue Beobachtungen zur Datierung von Einhards Karls vita,” *FMSt* 32 (1998): 124–45。关于《

梅斯编年史》，参见J. L. Nelson, “Gender and Genre in Women Historian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L’Historiographie médiévale en Europe*, ed. J.-P. Genet (Paris, 1991), 156–60。

另外的官方史料是A. Boretius收集整理的法令集，收于CRF；A. Weirrminghoff出版的*concilia* (Hannover, 1906; vol. 1 in *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加上重要的*Libri Carolini*, ed. A. Freeman e P. Meyvaert (Hannover, 1998); E. Mühlbacher等人出版的特许证书，*Die Urkunden Pippins, Karlmanns und Karls des Grossen* (Hannover, 1906; vol. 1 in *MGH, Diplomata Karolinorum*)。

这些史料中最为深思熟虑的毫无疑问是法令集，它们的版本也有很多缺点。除了F-L. Ganshof, *Recherches sur les capitulaires* (Paris, 1958)中所做的日期考据的必要工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 Bühler的观察评论，“Capitularia relecta: Studien 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der Kapitularien Karls des Grossen und Ludwigs des Frommen,” *Archiv für Diplomatik* 32 (1986): 305–501, H. Mordek与G. Schmitz所做的补充，“Capitularia relecta: Studien 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der Kapitulariensammlungen,” *DA* 43 (1987): 361–439, 由H. Mordek为新版本而作的卷本，*Bibliotheca capitularium regum Francorum manuscripta* (München, 1995; vol. 15 in *MGH, Hilfsmittel*), 其中有一篇拓展的参考文献，并收录了H. Mordek的诸文章，*Studien zur fränkischen Herrschergesetzgebung* (Frankfurt am Main, 2000); 有C. Azzara和P. Moro为意大利而作的版本，*I capitolari italici* (Roma, 1998)。关于*concilia*，可以从W. Hartmann开始，*Die Synoden der Karolingezeit im Frankenreich und Italien* (Paderborn, 1989)。

关于通信，参见*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头四卷，尤其是I: 469–657，包含了《加洛林法典》以及教宗与法兰克诸王之间的通信集，以及2: 1481包含阿尔昆的通信。关于诗歌，见*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的四卷。对加洛林诗歌的介绍，尤其是其政治意义，参见A. Ebenbau

er, *Carmen historicum: Untersuchungen zur bistorischen Dichtung im karoli ngischen Europa* (Wien, 1978)以及P. Godman, *Poets and Emperors: Franki sh Politics and Carolingian Poetry* (Oxford, 1987); 更具文学性的研究方法, 参F. Stella, *La poesia carolingia* (Firenze, 1995)。

日耳曼民族的法律已发布在MGH的相关部分中: *Legum section I, Le 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但关于伦巴第法, 参见C. Azzara e S. Gaspa rri, *Le leggi dei Longobardi* (Milano, 1992)的最近版本。

文献指南

前言 帕德伯恩，公元799年夏

营建帕德伯恩对查理的政策的重要性已经由Karl Hauck的研究所证明，最近的研究见“Karl als neuer Konstantin 777: 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in Paderborn in Historischer Sicht,” *FMSt* 20 (1986): 513–40。

关于查理与利奥三世的会面，参见最近在帕德伯恩的展览的目录和研究，799—*Kunst und Kultur der Karolingerzeit: Karl der Grosse und Paps t Leo III in Paderborn*, ed. C. Stiegemann e M. Wemhoff (Mainz, 1999)。

直到几年前，所有人都将所谓《帕德伯恩叙事诗》（*Paderborner Epos*）的时间定在799年，但今天受到了猛烈的挑战。许多人倾向于称其为《亚琛叙事诗》（*Aachener Epos*），在801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作于亚琛。但是，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来抛弃传统的理论。作为最近看法的回顾，见E. D’Angelo, “Carlo Magno e Leone III: osservazioni sullo *Aachener Karlsepos*,” *Quaderni medievali* 36 (1993): 53–72; 以及C. Ratkowitsch, *Karolus Magnus—alter Aeneas, alter Martinus, alter Iustinus: Zu Intention und Datierung des “Aachener Karlsepos”* (Wien, 1997)。

关于1979年“斯波莱托会议”（*Settimane* 28 [1981]）中所出现的分歧观点，可与Karl Ferdinand Werner讲座的结论“关于会议的主要问题：加洛林世界所起到的作用，是否对欧洲的出现至关重要？我们将借此回答：在政治制度领域，是的”（“À la question générale du Colloque, si le rôle du monde carolingien a été essentiel dans l’éclosion de l’Europe, nous répond rons donc, pour le domaine politico-institutionnel: Oui”），以及Robert Foss

ier的“由此，我需要回答本周议题所强调的问题：中世纪欧洲来自加洛林欧洲，在最近的将来，就经济上而言，我会坚定地回应说：‘不！’”

（“Puisqu’il me faut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qui soutient le theme de cette ‘semaine’ : l’Europe médiévale est-elle issue de l’Europe carolingienne, dans l’immédiat, et en ce qui concerne l’économie, je réponds fermement: ‘non’ !”）做比较。作为一个更为平衡的总结，参见G. Tabacco的开幕讲座“加洛林欧洲的形成进程”（“I processi di formazione dell’Europa carolingia,” *ibid.*, 15–43）以及O. Capitani的结论（*ibid.*, 973–1011）。

关于查理大帝在塑造现代欧洲方面所扮演角色的近期观点，对其的考察，见*Carlo Magno: le radici dell’Europa*, ed. G. Andenna e M. Pegrari (Roma, 2002)。

在查理大帝现存的众多传记之中，我们只提到最近的：M. Becher, *Karl der Grosse* (Munich, 1999)，一部综合的短作；D. Hägermann, *Karl der Grosse: Herrscher des Abendlandes* (Berlin, 2000)，内容充实的著作；J. Favier, *Charlemagne* (Paris, 2000)，同样内容充实但时间不是近期的。

第1章 法兰克人的传统

法兰克民族起源的历史编纂视角，一段时间内受种族进化学支配，其认为主要日耳曼民族的起源是一个较小且通常异质的部落核心（*nuclei/Stämme*）的集合。其基本著作是R. Wenskus,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Cologne, 1961); 同样见S. Gasparri, *Prima delle nazioni: popoli, etnie e regni fra antichità e medioevo* (Roma, 1997)。

关于法兰克民族起源最近的综合著作是P. Perin e L.-C. Feffer, *Les Francs* (Paris, 1987)与E. James, *The Franks* (Oxford, 1988)。同样参见T. And

erson, Jr., “Roman Military Colonies in Gaul, Salian Ethnogenesis and the Forgotten Meaning of Pactus Legis Salicae, 59.5,” *Early Medieval Europe* 4 (1995): 129–44; H. J. Hummer, “Franks and Alamanni: a discontinuous ethnogenesis,” in *Franks and Alamanni in the Merovingian Period*, ed. I. Wood (San Marino, 1998), 932。

对墨洛温时代的总体分析，有一份遵循传统世系的可靠文献，见I.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1994); 涵盖查理统治较简明的版本是S. Lebecq, *Les Origines franques: Ve–IXe siècle* (Paris, 1990); 一部更复杂也更发人深省的著作是P. Geary,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 (Oxford, 1988)。关于“长发王”问题，参见A. Cameron, “How did the Merovingian Kings wear their hair?” *RBPH* 43 (1965): 1203–16。

关于查理·马特，参见论文集*Karl Martell in seiner Zeit*, ed. J. Jarnut e U. Nonn (Sigmaringen, 1994)。

关于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其称呼随着时间在变化，见E. Ewig在*Spätantikes und fränkischen Gallien* (München, 1976) 中的文章，同样见“Überlegungen zu den merowingischen und karolingischen Teilungen,” *Settimane* 28 (1981): 225–53; 关于主要的两个王国，各见E. Cardot, *L’Espace et le pouvoir: étude sur l’Austrasie mérovingienne* (Paris, 1987) 以及H. Atsma ed., *La Neustrie: les pays au nord de la Loire de 650 à 850* (Sigmaringen, 1989)。

特洛伊起源的神话，在古代和中世纪有着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对这一问题最近的阐明，参见A. Giardina, “Le origini troiane dall’impero alla nazione” *Settimane* 45 (1998): 177–209。关于法兰克人是神选之民的观念，发祥自查理·马特的时代，参见E. H. Kantorowicz, *Laudes regiae: 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 2a ed. (Berkeley, 1958); R. Schmidt-Wiegand, “‘Gens Francorum inclita’: Zur Gesta

lt und Inhalt des Langeren Prologes der Lex Salica,” in *Festschrift A. Hofmeister* (Halle, 1955), 233–50; E. Ewig, “Zum christlichen Königsgedanken im Frühmittelalter,” in *Das Königtum*, ed. T. Mayer (Konstanz, 1956), 7–73。

关于查理大帝的宗谱，参见E. Hlawitschka, “Die Vorfahren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1:51–82; E. Hlawitschka, “Merowingerblut bei den Karolingern,” in *Adel und Kirche: Festschrift G. Tellenbach* (Freiburg, 1970), 66–91。

关于加洛林家族的家族传统和宣传，见O. G. Oexle, “Die Karolinger und die Stadt des heiligen Arnulf,” *FMSt* 1 (1967): 250–364; I. Haselbach, *Aufstieg und Herrschaft der Karlinger in der Darstellung der sogenannten 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Lübeck, 1970); M. Sot, “Historiographie épiscopale et modèle familial en Occident au IXe siècle,” *Annales ESC* 33 (1978): 433–49; W. W. Goffart, “Paul the Deacon’s *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 and the early design of Charlemagne’s succession,” *Traditio* 42 (1986): 59–93; M. T. Fattori, “I santi antenati carolingi tra mito e storia: agiografie e genealogie come strumento di potere dinastico,” *Studi medievali* 34 (1993): 487–561; G. Gandino, “La memoria come legittimazione nell’età di Carlo Magno,” *Quaderni storici* 94 (1997): 21–41。由官方历史编纂者归于加洛林家族身上的神圣魅力，较之虔诚者路易将家族宗谱与墨洛温家族相联系，更有说服力（参见E. Hlawitschka, “Die Vorfahren”）。

关于丕平加冕和法兰克君主与教宗之间联盟起源的参考文献不胜枚举。若要考察，可从T. F. X. Noble,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apal State, 680–825* (Philadelphia, 1984)和C. Azzara, “L’ideologia del potere regio nel papato altomedievale (secoli VI–VIII),” *Settimane* 44 (1997)开始。关于丕平在754年所做保证的争议性质，之后由查理在774年重申，参见P. E. Schramm, “Das Versprechen Pippins und Karls des Grossen für die römische Kirche,” *Savigny* (Kan.) 27 (1938): 180–217; A. M. Drabek, *D*

ie Verträge der fränkischen und deutschen Herrscher mit dem Papsttum von 754 bis 1020 (Wien, 1976); J. Jarnut, “Quierzy und Rom: Bemerkungen zu den ‘Promissiones Donationis’ Pippins und Karls,” *HZ* 220 (1975): 265–97; A. Angenendt, “Das geistliche Bündnis der Päpste mit den Karolingern (754–796),” *HF* 100 (1980): 1–94。

受膏仪式，与长期以来认为的相反，并非模仿教会受膏仪式，后者在后来才被引进；而是通过明确参照《旧约》与《新约》，在国王与教士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并列关系；参见A. Angenendt, “Rex et sacerdos: Zur Genese der Königssalbung,” in *Tradition als historische Kraft*, ed. N. Kamp e J. Wollasch (berlin, 1982), 100–18；以及J. Jarnut, “Wer hat Pippin 751 zum König gesalbt?,” *FMSt* 16 (1982): 45–57。

关于教宗成为君王子女的教父所创生的父亲关系（*compaternitas*），参见A. Angenendt, *Kaiserherrschaft und Königstaufe* (Berlin, 1984)。

关于罗马人执政者头衔的辩论，参见J. Deér, “Zum Patricius-Romanorum-Titel Karls de Grossen,” *Archivm Historiae Pontificiae* 3 (1965): 31–86，以及H. Wolfram, *Intitulatio* (Graz, 1967), 1: 225–36。

关于将法兰克国王视为新大卫，以及广泛运用旧约模范，激发加洛林王权，参见W. Mohr, *Studien zur Charakteristik des karolingischen Königtums im 8. Jahrhundert* (Saarlouis, 1955)；W. Mohr, *Die Karolingische Reichsidee* (Münster, 1962)；W Mohr, “Christlich-alttestamentliches Gedankengut in der Entwicklung des karolingischen Kaisertums,” in *Judentum im Mittelalter*, ed. P. Wilpert (Berlin, 1966), 382–409；A. Graboïs, “Un mythe fondamental de l’histoire de France au moyen âge: le ‘roi David’ précurseur du ‘roi très chrétien’ ” *RH* 287 (1992): 11–31。

第2章 对伦巴第人的战争

查理与卡洛曼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伦巴第王国的政策，已经是一个精细分析的课题，尽管总是受阻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对存续的那一方有所偏袒。参见M. Lintzel, “Karl der Grosse und Karlmann,” *HZ* 140 (1929): 1–22; E. Delaruelle, “Charlemagne, Carloman, Didier et la politique du mariage franco-lombard,” *RH* 170 (1932): 213–24; M. V. Arv, “The Politics of the Frankish-Lombard Marriage Alliance,”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 19 (1981): 7–26; J. Jarnut, “Ein Bruderkampf und seine Folgen: Die Krise des Frankenreiches (768–771),” in *Herrschaft, Kirche, Kultur: Festschrift F Prinz* (Stuttgart, 1993), 165–76。

对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以及教宗之间关系的全面审视，已经颇有成果：参见R. Holtzmann, “Die Italienpolitik der Merowinger und des Königs Pippin,” in *Das Reich: Idee und Gestalt, Festschrift F. Haller* (Stuttgart, 1940), 95–132以及T. F. X. Noble,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apal State, 680–825* (Philadelphia, 1984)。

关于查理带领军队进入意大利选择的路径，参见G. Tangl, “Karls des Grossen Weg über die Alpen im Jahr 773,”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 37 (1957): 1–15。关于“要塞”，参见E. Mollo, “Le Chiuse: realtà e rappresentazioni mentali del confine alpino nel medioevo,” *Bollettino storico-bibliografico subalpino* 84 (1986): 333–90以及A. A. Settia, “Le frontiere del regno italico nei secoli VI–XI: l’organizzazione della difesa” *Studi storici* 30 (1989): 155–69。关于罗斯高德和利文扎战役，参见H. Krahwinkler, *Friaul im Frühmittelalter* (Vienna, 1992), 119–43; P. Moro, *Quam borrida pugna: elementi per uno studio della guerra nel l’alto medioevo italiano (secoli VI–X)* (Venice, 1995), 32–35。关于伦巴第精英对于王国陷落的反应，参见K. Schmid, “Zur Ablösung der Langobarden-herrschaft durch die Franken,”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 52 (1972): 1–36。

关于伦巴第人时期与加洛林时代的意大利历史，参见C. Wickham, *Early Medieval Italy: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Ann Arbor, Mich., 1989)，以及极有原创性的新作：P. Cammarosano, *Nobili e re: l'Italia politica dell'alto medioevo* (Roma, 1998), *Storia dell'Italia medievale: dal VI all' XI secolo* (Rome, 2001)。这些著作较之那些唤起回忆的作品更为可取，如V. Fumagalli, *Il Regno Italic* (Torino, 1978)以及G. Albertoni, *L'Italia carolingia* (Roma, 1997)。

关于意大利的国王丕平，基本的分析来自E. Manacorda, *Ricerche sugli inizi della dominazione dei Carolingi in Italia* (Roma, 1968)，同样在细节上分析了意大利的法统。关于后一问题，同样参见G. Tabacco, “L'avvento dei Carolingi nel regno dei Longobardi,” in *Langobardia*, ed. S. Gasparri e P. Cammarosano (Udine, 1990), 375–403；以及*I capitoli italiani* (Roma, 1998)，这是意大利法令集一个近期的版本，由C. Azzara和P. Moro从拉丁文翻译成意大利文。

加洛林王朝对意大利王国的统治已经得到了多角度的分析。关于人员的征募，尤其是高阶人员，参见D. A. Bullough, “Leo qui apud Hlotharum magni loci habebatur et le gouvernement du Regnum Italiae a l'époque carolingienne,” *MÂ* 67 (1961): 221–45；D. A. Bullough, “Bajuli in the Carolingian Regnum Langobardiae and the career of Abbot Waldo,” *EHR* 77 (1962): 625–37。关于政治高层的法兰克人员调转，参见E. Hlawitschka的人物传记分析*Franken, Alemannen, Bayern und Burgunder in Oberitalien (774–962)* (Freiburg, 1960)；同时关于法兰克人在意大利的地方官职和封臣的调动，参见A. Castagnetti, *Minoranze etniche dominante e rapporti vassallatico-beneficiari: Alamanni e Franchi a Verona e nel Veneto in età carolingia e post carolingia* (Verona, 1990)。关于在王国的行政中持续存在的伦巴第贵族以及自由民，参见S. Gasparri, “Strutture militari e legami di dipendenza in Italia in età longobarda e carolingia,” *RSI* 98 (1986): 664–726。关于教会在加洛林的意大利统治中的独特地位，可能最重要的革新举措在伦巴第人

时代之后就已引入，参见O. Bertolini, “I vescovi del regnum Langobardorum al tempo dei Carolingi,” in *Vescovi e diocesi in Italia nel medioevo* (Padua, 1964), 1–26, 以及J. Fischer, *Königtum, Adel und Kirche im Königreich Italien* (Bonn, 1965)。作为概要，参见P. Bonacini, “Dai Longobardi ai Franchi: potere e società in Italia tra i secoli VIII e IX,” *Quaderni medievali* 35 (1993): 20–56。

关于意大利郡体系拓展的争论，由P. Delogu, “L’istituzione comitale nell’Italia carolingia,” *BISIMeAM* 79 (1968): 53–114开启，作者受到当时主流德国历史研究趋向的影响，提出这一体系的应用方式是无规律且间歇的，提出乡村的“加斯塔尔迪”拥有持续的自治权。今天，盛行的说法强调加洛林国王的集权化决心，不顾地方上的不同情境，以及“加斯塔尔迪”逐渐受到伯爵的压制，成为臣属，这得到了一些审慎研究的证实：V. Fumagalli, “Città e distretti minori nell’Italia carolingia: un esempio,” *RSI* 81 (1969): 107–17；A. Castagnetti, “Distretti fiscali autonomi o circoscrizioni della contea cittadina? La Gardesana veronese in epoca carolingia,” *RSI* 82 (1970): 736–43；以及V. Fumagalli, “L’amministrazione periferica dello stato nell’Emilia occidentale in età carolingia,” *RSI* 83 (1971): 911–20。关于这些结论的总体解释，参见V. Fumagalli, *Terra e società nell’Italia padana: I secoli IX e X* (Torino, 1976)，以及A. Castagnetti, *‘Teutisci’ nella ‘Langobardia’ carolingia* (Verona, 1995)。

司法体系的运作，已经在之前提到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现在是E. Bougard专门研究的主题：*La Justice dans le royaume d’Italie: de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e siècle* (Rome, 1995)；同样参见他的文章，“La justice dans le royaume d’Italie aux IXe–Xe siècles,” *Settimane* 44 (1997): 133–76。

第3章 对异教徒的战争

关于查理向异教徒发动战争的旧约精神，E. Delaruelle,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 l'idée de croisade*, *Bulletin de littérature ecclésiastique* 42 (1941): 24–45 依旧具有参考价值，现已收入E. Delaruelle, *L'Idée de croisade au moyen âge* (Torino, 1980); 同样几次提到这一主题的是G. Fasoli, “Pace e guerra nell’alto medioevo,” *Settimane* 15 (1968): 15–47; 但首先见E. Cardini, *Alle radici della cavalleria medievale* (Firenze, 1981), 148–69。

没有单独关注查理的战争的著作。对主要战斗的简要分析，见J. F. Verbruggen, “L’armée et la stratégie de Charlemagne,” in *KdG*, 1: 420–36; 敏锐的洞察之作，见B. S. Bachrach, “Charlemagne’s cavalry: myth and reality,” *Military Affairs* 47 (1983): 120。在更为宽广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T. Reuter提供了有趣的评论，“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5 (1985): 75–94，以及T. F. X. Noble, “Louis the Pious and the frontiers of the Frankish realm,” in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ed. P. Godman and R. Collins (Oxford, 1990), 333–47。

关于对萨克森人的战争，参见论文集W. Lammers ed., *Die Eingliederung der Sachsen in das Frankenreich* (Darmstadt, 1970)，除了分析军事作战和基督教化，还论述了三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孕育对德国历史编纂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评价维杜金德与查理各自的作用、“凡尔登大屠杀”、“堕落的历史编纂”等方面（参见219、238、242）。关于当今德国历史学争论（Historikerstreit）问题的总概，参见A. Barbero, “Interpretazioni di Carlo Magno nella crisi della democrazia tedesca,” *Il Mulino* 51 (2002): 23–32。同样重要的是收于M. Lintzel, *Ausgewählte Schriften* vol. 1 (Berlin, 1961)中的文章，其中推出了著名的理论，声称在民众与偏向查理的萨克森贵族之间存在分裂。更近的评论，参见H.-D. Kahl, “Karl der Grosse und die Sachsen: Stufen und Motive einer historischen Eskalation,” in *Politik, Gesellschaft, Geschichtsschreibung: Festgabe F. Graus* (Köln, 1982), 49–130。

关于维杜金德的洗礼，参见G. Althoff, “Der Sachsenherzog Widukind als Mönch auf der Reichenau: Ein Beitrag zur Kritik des Widukind-Mythos,” *FMSt* 17 (1983): 251–79, 其中提出这位萨克森领袖被强迫受洗，成为一名僧侣。相反的观点，参见A. Angenendt, *Kaiserherrschaft und Königstaufe* (Berlin, 1984)。

关于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的“东方政策”，参见M. Hellmann, “Karl und die slawische Welt zwischen Ostsee und Böhmerwald,” *KdG*, 1: 708–18; L. Dralle, “Wilzen, Sachsen und Franken um das Jahr 800,” in *Aspekte der Nationenbildung im Mittelalter*, ed. H. Beumann and W. Schröder (Sigmaringen, 1978), 205–27; 更近期的是M. Innes, “Franks and Slavs c. 700–1000: the problem of European expansion before the millennium,” *Early Medieval Europe* 6 (1997): 201–16。

关于在伊比利亚前线作战的全面分析，参见B. S. Bachrach,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Aquitaine under the early Carolingians,” *Speculum* 49 (1974): 1–33; 以及P. Sénac, “Charlemagne et l’Espagne musulmane,” in *Carlo Magno: le radici dell’Europa*, ed. G. Andenna e M. Pegrari (Roma, 2002), 55–80。更专于778年跨越比利牛斯山军事远征的论文，R.-H. Bautier, “La campagne de Charlemagne en Espagne (778): la réalité historique,” in *Roncevaux dans l’histoire, la légende et le mythe* (Bayonne, 1979), 1–47。同样参见J. Horrent, “La bataille des Pyrénées de 778,” *MÂ* 78 (1972): 197–227; P. Abischer, “Roland: mythe ou personnage historique?,” *RBPH* 43 (1965): 849–901特别关注了艾因哈德所提到的“罗兰都斯”问题。

关于阿瓦尔人，必须提到的著作是W. Pohl, *Die Awaren: Ein Steppenvolk in Mitteleuropa*, 567–822 (München, 1988)，根据最近的人种理论写成。其涵盖了最近关于查理针对阿瓦尔人军事作战的讨论，其中有差异明显的解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J. Deér的传统记录：“Karl der Grosse und der Untergang des Awarenreiches,” *KdG*, 1: 719–91。关于阿瓦尔人的武

器，存在极具分歧的观点：B. S. Bachrach, “A Picture of Avar-Frankish Warfare from a Carolingian Psalter of the Early Ninth Century in the Light of the Strategico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6): 5–27；G. Fasoli, “Unni, Avari e Ungari nelle fonti occidentali e nella storia dei paesi d’Occidente,” *Settimane* 35 (1988): 13–43。考古发掘的回顾，带有拓展参考文献，见I. Bóna, “Die Geschichte der Awaren im Lichte der Archäologischen Quellen,” *Settimane* 35 (1988): 437–63。关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运河，见H. H. Hofmann, “Fossa Carolina,” *KdG*, 1: 437–53。

关于塔西洛与法兰克君王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多的历史研究；最近的是M. Becher, *Eid und Herrschaft: Herrscherethos bei Karl dem Grossen* (Sigmaringen, 1993)以及P. Depreux, *Tassilon III et le roi des Francs: examen d’une vassalité controversée*,” *RH* 293 (1995): 23–73。

关于针对布列塔尼人的战争，参见J. C. Cassard, “La guerre des Bretons armoricains au haut moyen âge,” *RH* 110 (1986): 3–27，提醒法兰克人针对布列塔尼发动的战争包括掠夺、围攻与伏击，作者似乎认为，与其他战区的战争方式没有不同。

第4章 帝国重生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查理加冕为帝存在激烈的历史争论。参见随后的综述：F.-L. Ganshof, *The Imperial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 Theories and Facts* (Glasgow, 1949)，该文后发表于*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Frankish Monarchy* (London, 1971), 41–54；以及H. von Fichtenau, “Il concetto imperial di Carlomagno,” *Settimane* 1 (1954): 251–98。随后是R. Fölz几乎同时出版的概述，*Le Couronnement imperial de Charlemagne* (Paris, 1964) 以及P. Classen, “Karl der Grosse, das Papsttum und Byzanz: Die Begründung des karolingischen Kaisertums,” *KdG*, ed. ampliata vol. 1 (Sigmarin-

en, 1985), 争论很大程度上已消散。

总体而言, 教宗的倡议对加冕为帝具有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他并不是独自行动的。关于教宗转让先前保留给巴西琉斯的荣誉特权, 见 P. E. Schramm, “*Die Anerkennung Karls des Grossen als Kaiser*,” *HZ* 172 (1951): 449–515, 他声称在公元800年的加冕之前查理就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皇帝了; 相反的观点是 J. Deér, “*Die Vorrechte des Kaiser in Rom*,” *Schweizer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 Geschichte* 15 (1957): 5–63, 目前可在 *Zum Kaisertum Karls der Grossen*, ed. G. Wolf (Darmstadt, 1972), 30–115 中读到。关于教宗铸币的政治意义, 参见 P. Grierson, “*The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 and the Coinage of Pope Leo III*,” *RBPH* 30 (1952): 825–33。

关于教宗的倡议更近期的研究评价, 一部丰富细致的例子是 G. Arnaldi, “*Il papato e l’ideologia del patere imperiale*,” *Settimane*, 28 (1981): 341–407。对教宗国长时段政策最为细致的重构是 T. F. X. Noble,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apal State, 680–825* (Philadelphia, 1984), 其将查理晋升帝位归于教宗的周密计划, 其目的是在意大利获得政治特权。关于查理与教宗之间的关系, 同样参见 A. Angenendt, “*Das geistliche Bündnis der Päpste mit den Karolingern (754–796)*,” *HF* 100 (1980): 1–94; 以及 G. Thoma, “*Papst Hadrian I und Karl der Grosse: Beobachtungen zur Kommunikation zwischen Papst und König nach den Briefen des Codex Carolinus*,” *Festschrift E. Hlawitschka* (Munich, 1993), 37–58。

有理论认为加冕为帝对于查理而言是必要的预备, 用于审判和惩处袭击利奥三世的行凶者。关于这一点的考察, 参见 O. Hageneder, “*Das crimen maiestatis, der Prozess gegen die Attentäter Papst Leo III, und die Kaiserkrönung Karls des Grossen*,” in *Aus Kirche und Reich: Festschrift F. Kempf* (Sigmaringen, 1983), 55–80。

关于利奥三世委托而作的马赛克, 参见 C. Davis-Weyer, “*Das Apsismosaik Leo III. In Susanna*,” *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 28 (1965): 177

-94, 以及K. Belting, “Die Beiden Palasttaulen Leos III. im Lateran und die Entstehung einer päpstlichen Programmkunst,” *FMSt* 12 (1978): 55–83, 凡是作者提到的都有涉及。可能左侧的人物是圣彼得而不是圣西尔维斯特。

关于君士坦丁赠礼的争论范围很广, 甚至在此进行简略概括也不可能, 但是一段时间盛行的解释是, 无论其何时所写, 都没有证据表明其在查理时代对教宗政策有影响。对该问题的概括, 参见H. Fuhrmann, “Das frühmittelalterliche Papsttum und die 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 Meditationen über ein unausgeführtes Thema,” *Settimane*, 20 (1973): 257–92。

法兰克人在加冕为帝中的独特作用, 我们能够在阿尔昆的信件以及其他宫廷诗人的作品中找寻到细节, 这些细节也存在于查理的建筑计划中。20世纪中叶一些德国学者提出了这一理论, 其推出的法兰克帝国概念与教宗主张的罗马帝国概念存在争执, 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辩护, 见H. Beumann, “Romkaiser und fränkisches Reichsvolk,” in *Festschrift E. Stengel* (Münster, 1952), 157–80; H. Beumann, “Nomen imperatoris: Studien zur Kaiseridee Karls des Grossen,” *HZ* 185 (1958): 515–49; H. Beumann, “Das Paderborner Epos und die Kaiseridee Karls des Grossen,” in *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 Ein Paderborner Epos vom Jahre 799* (Paderborn, 1966), 1–54。更近的尤其重要的著作, 与下列研究相关: K. Hauck, “Die Ausbreitung des Glaubens in Sachsen und die Verteidigung der römischen Kirche als konkurrierende Herrscheraufgaben Karls des Grossen,” *FMSt* 4 (1970): 138–72; K. Hauck, “Karl als neuer Konstantin 777: 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in Paderborn in historischer Sicht,” *FMSt* 4 (1970): 513–40; 其中提出, 效仿君士坦丁的观念, 早在查理774年行至罗马时就已提出。同时, 他的建造一座新首都的观念也在帕德伯恩开始成形, 早于亚琛。该观点最近的一个变种提出, 加冕为帝为查理统治萨克森提供了原初的合法性: H. Mayr-Harting, “Charlemagne, the Saxons and the imperial coronation of 800,” *EHR* 111 (1996): 1113–33。最近对法兰克人帝国观念的全面讨论, 参见H. Anton, “Beobachtungen zum Fränkisch-Byzantinischen Verhältnis

im Karolingischer Zeit,” in R. Schieffer ed.,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egnum Francorum* (Sigmaringen, 1990), 77–119。

亚琛宫殿群的意识形态意义主要由如下文章探究：H. von Fichtenau, “Byzanz und die Pfalz zu Aache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59 (1951): 1–54；以及H. Löwe, “Vom Theoderich dem Grossen zu Karl dem Grossen,” *DA* 9 (1952): 353–401。这两篇文章的结论分别被L. Falkenstein, *Der ‘Lateran’ der karolingischen Pfalz zu Aachen* (Köln, 1966)以及H. Hoffmann, “Die Aachener Theoderichsstatue,” in *Das erste Jahrtausend* (Düsseldorf, 1962)1: 318–35做出考察。同样参见L. Falkenstein, “Charlemagne et Aix-la-Chapelle,” *Byzantion* 61 (1991): 231–89。关于帝国意识形态对查理的影响，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见C. Heitz, *Recherches sur les rapports entre architecture et liturgie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Paris, 1963)。

几乎没有人追随Ohnsorge的理论，即拜占庭帝国在基督教世界中有持续的中心地位，西方的任何意识形态规划都必须符合这一地位。这不仅合乎利奥三世的情况，人们认为他是希腊出身；也符合查理自己的情况，皇帝的头衔，是一种将法兰克国王上升至与巴西琉斯同级别的方式。参见W. Ohnsorge, *Das Zweikaiserproblem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Hildesheim, 1947)，以及他的文集*Abendland und Byzanz* (Darmstadt, 1958)，*Konstantinopel und der Okzident* (Darmstadt, 1966)，*Ost-Rom und der Westen* (Darmstadt, 1983)。关于利奥三世的出身，参见H. G. Beck, “Die Herkunft des Papstes Leo III,” *FMSt* 3 (1969): 131–37。

关于《查理之书》作者身份的争论，甚嚣尘上超过四十年。不过盛行的观点认为此人是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A. Freeman第一个如是主张，而不是L. Wallach认为的阿尔昆。最近的观点，参见D. A. Bullough, “Alcuin and the kingdom of heaven: liturgy, theology and the Carolingian age,” *Carolingian Renewal: Sources and Heritage* (Manchester, 1991), 161–240

及其参考文献, n69。对该作的全面评价, 参见G. Arnaldi, “La questione dei Libri Carolini,” *Culto Cristiano e politica imperiale carolingia* (Todi, 1979), 61–86。

伊琳娜女皇的生平是最近一篇论文的主题: J. A. Arvites, “Irene: Woman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Her Life and Times” (Ph.D., Michigan, Ann Arbor, 1985)。

799年初针对教宗的罗马密谋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晰, 同时代的记录是矛盾的; 参见W. Mohr, “Karl der Grosse, Leo III. und der römische Aufstand von 799,” *Archivum Latinitatis Medii Aevi* 30 (1960): 39–98。甚至利奥三世誓言的文本, 及其实际法律意义都高度存疑。参见H. Adelson e R. Baker, The Oath of Purgation of Pope Leo III in 800, *Traditio* (1952): 5–80; L. Wallach, “The genuine and the forged oath of Pope Leo III, *Traditio* 11 (1955): 37–63; M. Kerner, “Der Reinigungseid Leo III. von Dezember 800,” *Zeitschrift des Aachener Geschichtsvereins*, 84–85 (1977–78): 131–60。

关于皇帝加冕礼, 许多情况依旧不清晰, 尤其是利奥教宗所使用皇冠的实际性质和意义, 参见E. H. Kantorowicz, *Laudes regiae: 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 2a ed. (Berkeley, 1958)存在部分偏见的解释; P. Classen, “Karl der Grosse, das Papsttum und Byzanz,” *KdG*, vol. 1; K. J. Benz, “‘Cum ab oratione surget’: Überlegungen zur Kaiserkrönung Karls des Grossen,” *DA* 31 (1975): 337–69; 最近的有C. Brühl, “Kronen-und Krönungsbrauch im Frühen und Hohen Mittelalter,” *HZ* 234 (1982): 1–31, 其中审视了加冕本身的概念。

关于虔诚者路易的加冕, 参见W. Wendling, “Die Erhebung Ludwigs des Frommen zum Mitkaiser im Jahre 813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Frankenreiches,” *FMSt* 19 (1985): 201–38。

关于查理大帝正式所承的头衔, 及其意识形态意义, 参见P. Classen

, “Romanum gubernans imperium: Zur Vorgeschichte der Kaisertitulatur Karls des Grossen,” *DA* 9 (1951): 103–21; H. Wolfram, “Lateinische Herrschertitel im neunten und zehnten Jahrhundert,” in H. Wolfram ed., *Intitulatio* (Wien, 1973), 2: 19–178。对皇冠、权杖、皇座以及其他帝国权力的实体象征的总体考察，参见P. E. Schramm, *Herrschaftszeichen und Staatssymbolik* (Stuttgart, 1954–56)以及同一作者的论文，收于*Kaiser, Könige und Päpste* (Stuttgart, 1968)。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史书关注的重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集中于肖像学、建筑学、权力象征等在通行政策和宣传方面的意义，更近时期的撰史实践，已与之有别。注意Analdi可爱的嘲弄之语（见“*Il papato e l’ideologia*,” 365）：“所有围绕权杖、对君主的赞美、金球、宝座和皇冠的强烈骚动，似乎并未有助于改变我们对中世纪早期政治观念史的认识。”或是D. A. Bullough, “*Imagines regum and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in *Carolingian Renewal*, 39–96更为存疑的观点，其中他挑战了亚琛的礼拜堂是受君士坦丁堡金躺椅大厅启发而建的观点，Bullough同样对比了对狄奥多里克雕塑的占有和对大象的占有（或者，就此而言，如同对劳斯莱斯的占有）。

关于在基督教传统中教会与帝国之间关系的问题，基本的著作是G. Tabacco, *La relazione fra i concetti di potere temporale e di potere spirituale nella tradizione Cristiana fino al secolo XIV* (Torino, 1950)。关于法兰克国王以及后来的皇帝作为基督教世界暨教会之领袖的角色，参见E. Ewig, “Zum christlichen Königsgedanken im Frühmittelalter,” *Das Königtum*, ed. T. Mayer (Konstanz, 1956), 7–73; H. H. Anton, *Fürstenspiegel und Herrscherethos in der Karolingerzeit* (Bonn, 1968); 以及H. Fuhrmann, “Das Papsttum und das kirchliche Leben im Frankenreich,” *Settimane* 28 (1981): 419–56。关于卡特伍尔夫，参见最近的论文M. E. Moore, “La monarchie carolingienne et les anciens modèles irlandais,” *Annales ESC* 51 (1996): 307–24。关于哈里发与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关系，参见F. W. Buckler, *Harun u’l-Rashid and*

Charles the Great (Bari, 1963); 以及M. Borgolte, *Die Gesandtenaustausch der Karolinger mit den Abbasiden und mit den Patriarchen von Jerusalem* (Munich, 1976)。

第5章 查理大帝与欧洲

试图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利用查理大帝，这已经由K. F. Werner, *Karl der Grosse oder Charlemagne?* (Munich, 1995); R. Morrissey, *L'Empereur à la barbe fleurie: Charlemagne dans la mythologie et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1997); M. Kerner, *Karl der Grosse: Entschleiderung eines Mythos* (Köln, 2000) 等做出分析。最为激烈的篇章无疑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青年史学家之间发生的冲突，他们敌视查理大帝，因为他被当作萨克森人的屠杀者，更传统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将他视为典型的日耳曼人物。后者的观点当前更为盛行。参见多名作者的论文集*Karl der Grosse oder Charlemagne? Acht Antworten deutscher Geschichtsforscher* (Berlin, 1935)以及W. Lammers ed., *Die Eingliederung der Sachsen in das Frankenreich* (Darmstadt, 1970); 最近的评论，A. Barbero, “Interpretazioni di Carlo Magno nella crisi della democrazia tedesca,” *Il Mulino* 51(2002): 23–32。

关于法兰克王国集体想象中的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参见E. Ewig, “Volkstum und Volksbewusstsein im Frankenreich des 7. Jahrhunderts,” *Settimane* 5 (1958): 587–648; 将相互矛盾的含义归咎于如“高卢”和“日耳曼”这样的名称，参见E. Ewig, “Beobachtungen zur politisch-geographischen Terminologie des fränkischen Grossreiches und der Teilreiche des 9. Jahrhunderts,” in *Spiegel der Geschichte: Festgabe M. Braubach* (Münster, 1964), 99–140。两篇论文都重新发表于他的*Spätantikes und fränkisches Gallien* (München, 1976)。

这里有一份关于罗马语言与条顿语并列的扩展参考文献，尤其侧重

语言学方面。有用的总结见于W. D. Heim, *Romanen und Germanen in Charlemagnes Reich* (München, 1984)。现在广泛接受的是，语言身份并不与民族身份恰好吻合。参见R. Wenskus, “Die Deutschen Stämme im Reich Karls des Grossen,” *KdG*, 1: 178–219, 更近的论作有：H. Thomas, “Der Ursprung des Wortes Theodiscus,” *HZ* 247 (1988): 295–333; H. Thomas, “Fränkisch: Zur Geschichte von theodiscus und teutonicus im Frankenreich des 9. Jahrhunderts,” in R. Schieffer ed.,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egnum Francorum* (Sigmaringen, 1990), 67–95。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是伦巴第人，他们说一种罗曼语，因此他们在语言上与条顿民族相区分：参见A. Castagnetti, *‘Teutisci’ nella ‘Langobardia’ carolingia* (Verona, 1995)。其历史后果由C. Brühl, *Deutschland-Frankreich: Die Geburt zweier Völker* (Köln, 1990) 考察，但是，其中没有充分强调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共有的敌对感，其基础更多的是被侵略的记忆，而不是语言上的区别。

尽管显而易见，但此问题中微妙的细节值得多次提及，入侵时代种族上的区分并没有持续到这个时代。在整个西部，吞并融合的进程既没有急剧发展，也没有彻底完成，鉴于法兰克人或伦巴第人这样的称呼，其意指居住在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根据我们的估计，他们大多数出身罗马。所有这些问题，参见S. Gasparri, *Prima delle nazioni: popoli etnie e regni fra antichità e medioevo* (Rome, 1997), 161–229。但我们不要忘记，尽管我们多少清楚这些种族形成和融合的进程，但当时的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一些声称是法兰克人或伦巴第人的人，他们乐于深信自己是这些入侵者的后代。因此这些种族划分在当时人的想象中有所不同，而我们已经不再接受（在与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有关的例子中，我的解释与Gasparri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

关于皮朗命题的问题，有浩繁的参考文献。为了了解这一点，一个上佳的起点是G. Petralia, “A proposito dell’immortalità di Maometto e Carlomagno (o di Costantino),” *Storica* 1 (1995); 38–87。所有争论的起点是H.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Brussels, 1937)。一个有用的再版中有

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批判性切入思考，见A. F. Havighurst ed., *The Pirenne Thesis: Analysis, Criticism and Revision* (Boston, 1976)。关于皮朗命题最重要的修订本已经出版，使用了考古资料：R. Hodges and 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Archaeology and the Pirenne Thesis* (London, 1983)，其中展现了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早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西部罗马帝国经济漫长而痛苦的运行，以及查理的统治恰好伴随着朝向欧洲北部的长距离贸易的复兴。

关于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特别振奋人心的是C. Wickham的论文集*Land & Power: Studies in Italian and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400–1200* (London, 1994)。

激进罗马主义学派的立场，可参见J. Durliat, *Les Finances publiques de Dioclétien aux carolingiens (284–889)* (Sigmaringen, 1990)。在他的前言中，K. F. Werner恰切地赞美此书摧毁了中世纪是日耳曼本质的观念。对J. Durliat的立场以及其他的激进罗马主义者，比如E. Magnou-Nortier的主要批判，可以见C. Wickham, “La chute de Rome n’aura lieu,” *MÂ* 99 (1993): 107–26。

G. Bois的立场展现在*La Mutation de L’an mil* (Paris, 1989)中。*Médiévales* 21 (1991) 的一期刊物全面讨论了这一问题。

“欧洲”观念的演化，在查理大帝的时代既标志着法兰克帝国也标志着西部基督教世界，参见J. Fischer, *Oriens—Occidens—Europa: Begriff und Gedanke Europa in der späten Antike und im frühen Mittelalter* (Wiesbaden, 1957)。

第6章 个人及其家庭

同时代对查理大帝外貌的描写和记录，参见P. E. Schramm, “Karl de

r Grosse im Lichte seiner Siegel und Bullen sowie der Bild-und Wortzeugnisse über sein Aussehen, ” *KdG*, 1: 15–23; D. A. Bullough, “*Imagines regum and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Carolingian Renewal: Sources and Heritage* (Manchester, 1991), 39–96。关于查理大帝的人格与心态，参见H. von Fichtenau, *The Carolingian Empire* (1949; Toronto, 1979)，以及P. E. Schramm, “Karl der Grosse: Denkart und Grundauffassungen; Die von ihm Bewirkte *Correctio* (‘Renaissance’),” *HZ* 198 (1964): 306–45。关于拉丁语的发音，见R. McKitterick,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1989), 7–22; R. McKitterick, “Latin and Romance: 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 in *Latin and the Romance Languag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ed. R. Wright (London, 1991), 130–45。

关于服饰、家具与膳食参见P. Riché,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mpire carolingien* (Paris, 1973)，还有展览目录的阐释和评论*Un Village au temps de Charlemagne: moines et paysans de l’abbaye de St-Denis du VIIe siècle à l’an mil* (Paris, 1988)。

关于宫廷诗歌，参见A. Ebenbauer, *Carmen historicum: Untersuchung en zur historischen Dichtung im Karolingischen Europa* (Wien, 1978); P. Godman, *Poets and Emperors: Frankish Politics and Carolingian Poetry* (Oxford, 1987); M. Garrison, “The emergence of Carolingian Latin literature and the court of Charlemagne,”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ed. R.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4), 111–40; 以及作品选集: F. Stella, *La poesia carolingia* (Firenze, 1995)。

婚姻史是近几十年最高产的历史主题之一。作为概观，参见论文集*Il matrimonio nella società altomedievale* (Spoleto, 1977)，尤其是P. Toubert, “La théorie du mariage chez les moralists carolingiens,” 233–82; 另见同一作者近期的修正文“L’institution du mariage chrétien, de l’Antiquité tardive à l’an Mil,” *Settimane* 45 (1998): 503–49。关于法兰克人的婚姻及其政

治运用，基本的著作是R. Le Jan, *Famille et pouvoir dans le monde franc* (Paris, 1995), 不过该作有时不加批判地支持德国个人研究 (personenforschung) 的系统化理论，有些问题。同样参见S. Fonay Wemple, *Women in Frankish Society: Marriage and the Cloister 500 to 900* (Philadelphia, 1981), 更近的是I. Réal, *Vies de saint, vie de famille: représentation et système de la parenté dans le royaume mérovingien (481–751)* (Turnhout, 2001)。

关于查理时代的父子关系，参见R. Schieffer, *Väter und Söhne im Karolingerhause*,”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egnum Francorum*, ed. R. Schieffer (Sigmaringen, 1990), 149–64。关于皇帝宫廷中妻妾尤其是女儿们的角色，参见J. L. Nelson, “Women at the Court of Charlemagne: A Case of Monstruous Regiment?” *Medieval Queenship*, ed. J. C. Parsons (New York, 1993), 43–61。

现存的关于查理妻妾与子女传记资料，可以见K. F. Werner, “Die Nachkommen Karls des Grossen bis um das Jahr 1000,” in *KdG*, 4: 403–82; 更简略的是J. L. Nelson, “La famille de Charlemagne,” *Byzantion* 61 (1991): 194–212。对法斯特拉达形象的澄清之尝试，参见J. L. Nelson, “The siting of the council at Frankfort: some reflections on family and politics,” in *Das Frankfurter Konzil von 794: Kristallisationspunkt karolingischer Kultur*, ed. R. Berndt (Frankfurt am Main, 1997), 149–65。关于希尔德嘉德，参见K. Schreiner, “Hildegardis regina: Wirklichkeit und Legende einer karolingischen Herrscherin,”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57 (1975): 1–70, 主要关注于后来文学中的王后形象，同样对研讨有所贡献的是*Autour d’Hildegarde*, ed. P. Riché et al (Paris 1987)。意大利国王丕平已经被E. Manacorda, *Ricerche sugli inizi della dominazione dei Carolingi in Italia* (Roma, 1968) 详细分析。关于换名问题，参见G. Thoma, *Namensänderungen in Herrscherfamilien der mittelalterlichen Europa* (München, 1985), 77–83, 其中她提出这是教宗的压力而造成的。关于公元778年出生的双胞胎克洛维和克洛泰尔的姓名选择，参见J. Jarnut, “Chlodwig und Chlothar: Anmerkungen zu

den Namen zweier Söhne Karls der Grossen,” *Francia* 12 (1984): 645–51, 其中提出了他们选择这两个墨洛温名字特别而偶然的原因。关于驼背丕平和梅斯主教的论断, 参见W. Goffart, “Paul the Deacon’s *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 and the early design of Charlemagne’s succession,” *Traditio* 42 (1986): 59–93。

关于教宗作为皇帝之子的教父, 参见A. Angenendt, *Kaiserherrschaft und Königstaufe* (Berlin, 1984)。

第7章 帝国的管理：制度

关于法兰克王国和后来加洛林帝国的制度, 首先要参阅F.-L. Ganshof, *Les traits généraux du système d’institutions de la monarchie de la monarchie franque*,” *Settimane* 9 (1962): 91–127; 以及“Charlemagne e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monarchie franque,” in *KdG*, 1: 349–93; 更新颖且不那么严格的描述, 参见J. L. Nelson, “Literacy in Carolingian Government,” in *The Uses of Literacy in the Early Medieval Europe*, ed. R.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0), 258–96。在准备此书过程中, 我未能查阅M. Innes令人兴奋的新作*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Middle Rhine Valley 400–1000* (Cambridge, 2000)。

关于皇权的性质存在广泛的争论; 参见J. L. Nelson收集的参考文献“Kingship and Empire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 in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ed. R.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4), 52–87。基本的研究是E. Ewig, *Zum christlichen Königsgedanken im Frühmittelalter, Das Königtum*, ed. T. Meyer (Konstanz, 1956), 7–73; 以及H. H. Anton, *Fürstenspiegel und Herrscherethos in der Karolingerzeit* (Bonn, 1968), 其中主要探究宗教维度; 而H. W. Goetz, “Regnum: zum politischen Denken der Karolingerzeit,” *Savigny* (Germ.) 104 (1987): 110–89考察了政权和领土方面

。关于涂油礼及其结果，参见A. Angenendt, “Rex et sacerdos: Zur Genese der Königssalbung,” in *Tradition als historische Kraft*, ed. N. Kamp e J. Wollasch (Berlin, 1982), 100–18。

关于效忠誓言，最近的分析是M. Becher, *Eid und Herrschaft: Herrscherethos bei Karl dem Grossen* (Sigmaringen, 1993)，其超越了之前F.-L. Ganshof, “Charlemagne et le serment,” *Mélanges L. Halphen* (Paris, 1951), 259–70的概论，不过我无法信服他的提议，即将25号法令的时间回推到789年（而不是Ganshof所提议的793年），而将之与哈德拉德的密谋联系起来，而不是“驼背丕平”。如此一来，传统中认为不同的两次集体誓言就视为同一次。关于监禁在修道院是作为对叛乱的惩罚，参见M. De Jong, “What was public about public penance? *Paenitentia publica* and justice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 *Settimane* 44 (1997): 863–902。关于查理禁止的誓言关联，参见O. G. Oexle, *Francia* 10 (1982): 1–19。

关于集会起源的争论，及其日期的推移，相关的参考文献可以见B. S. Bachrach, “Was the Marchfield part of the Frankish Constitution?,” *Medieval Studies* 36 (1974): 178–85（我在第11章的注释中讨论了他的结论）。集会后续的演变，参见J. T. Rosenthal, “The Public Assembly in the Time of Louis the Pious,” *Traditio* 20 (1964): 25–40。一个广泛流行的德国史学观点，受到神话的误导，即贵族血统者有资格参与行使权力，该观点误解了权贵集会所要表达的集体认可的含义，以及他们和君王之间的总体关系。这种误解最典型的是K. Brunner, *Oppositionelle Gruppen im Karolingerreich* (Wien, 1979)以及J. Hannig, *Consensus fidelium: Frühfeudale Interpretationen des Verhältnisses von Königtum und Adel am Beispiel des Frankenreiches* (Stuttgart, 1982)。

关于亚琛作为首都的问题，参见E. Ewig, “Résidence et capitale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RH* 230 (1963): 25–72；C. Brühl, “Remarques sur les notions de ‘capitale’ et de ‘résidence’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Journal*

des savants (1967): 193–215; 尤其是L. Falkenstein的重要文章“Charlemagne et Aix-la-Chapelle,” *Byzantion* 61 (1991): 231–89。

关于查理大帝的住所和旅行更为概略的著作，参见A. Gauert, “Zum Itinerar Karls des Grossen,” *KdG*, 1: 307–21; C. Brühl, *Fodrum, Gistum, Servitium Regis* (Köln, 1968); 还有最近的R.-H. Bautier, “Le poids de la Neustrie ou de la France du nord-ouest dans la monarchie carolingienne d’après les diplômes de la chancellerie royale (751–840),” in *La Neustrie*, ed. H. Atsma (Sigmaringen, 1989), 535–63。关于宫殿的体系，参见J. Barbier, “*Le système palatial franc*,” *BEC* 148 (1990): 245–99。

关于帕拉丁伯爵，参见H. E. Meyer, “Die Pfalzgrafen der Merowinger und Karolinger,” *Savigny* (Germ.) 42 (1921): 380–463。

关于礼拜堂的基本著作是J. Fleckenstein, *Die Hofkapelle der Deutschen Könige* (Stuttgart, 1959)。关于文书部，见R. H. Bautier, “La chancellerie et les actes royaux dans les royaumes carolingiens,” *BEC* 142 (1984): 5–80; 以及D. A. Bullough, “Aula Renovate: the court before the Aachen Palace,” *Carolingian Renewal: Sources and Heritage* (Manchester, 1991), 123–60。

关于伯爵职位的起源，参见D. Claude, “Untersuchungen zum frühfränkischen Comitatus,” *Savigny* (Germ.) 81 (1964): 1–79; E. Ewig, “Die Stellung Ribuariens in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Merowingerreichs,” *Vorträge der Gesellschaft für Rheinische Geschichtskunde* 18 (1969): 1–29, 该文重新发表在他的*Spätantikes und fränkischen Gallien* (Munich, 1976)中。关于术语，参见J. Prinz, “Pagus und Comitatus in den Urkunden der Karolinger,” *Archiv für Urkundenforschung* 17 (1941): 329–58; W. Metz, “Bemerkungen über Provinz und Gau in der karolingischen Verfassungs- und Geistesgeschichte,” *Savigny* (Germ.) 73 (1956): 361–72。

不同省份郡体系的介绍，参见S. Krüger, *Studien zur sächsischen Graf*

schaftsverfassung im 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50); O. Clavadetscher, “Die Einführung der Grafschaftsverfassung in Rätien und die Klageschriften Bischof Viktors III. von Chur,” *Savigny* (Kan.) 39 (1953): 46–111; E. Ewig, “L’Aquitaine et les pays rhénans au haut moyen âg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1 (1958): 37–54; P. Delogu, “L’istituzione comitale nell’Italia carolingia,” *BISIMeAM* 79 (1968): 53–114（比较上文，有关第2章的参考文献中的观察评论）；U. Nonn, *Pagus und comitatus in Niederlothringen: Untersuchungen zur politischen Raumgliederung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Bonn, 1983); M. Borgolte, *Geschichte der Grafschaften Alemanniens in fränkischer Zeit* (Sigmaringen, 1984); F. Cagol, ‘Gaue,’ *pagi e comitati nella Baviera agilolfingia e carolingia* (Verona, 1997)。

随着这些研究而来，在一些德国史学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否认存在系统的郡组织，而假定存在多种类别的“郡县”（Grafschaften）。但同样存在反对且有说服力的论证，见H. K. Schulze, *Die Grafschaftsverfassung der Karolinger in den Gebieten östlich des Rheins* (Berlin, 1973); H. K. Schulze, “Grundproblem der Grafschaftsverfassung: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einer Neuerscheinung,” *Zeitschrift für württembergische Landesgeschichte* 44 (1985): 265–82; H. K. Schulze, “Die Grafschaftsorganisation als Element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Staatlichkeit,” in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des Feudalismus* 14 (1990): 29–46。

对郡数量的估算各有不同；F.-L. Ganshof, “Charlemagne et les institutions”中估计，除了意大利王国，约有400个郡；K. F. Werner, “Heeresorganisation und Kriegsführung im deutschen Königreich des 10. Und 11. Jahrhunderts,” *Settimane* 15 (1968): 819中认为至少有500个，随后在“Missus-marchio-comes,” in *Histoire compare de l’administration* (Munich, 1980), 191中将其推至600或700个，但在最近的*Naissance de la noblesse* (Paris, 1998), 130中他将自己的估算降至300处帕古斯领地（pagus）以及“大约200位或250位伯爵”。

关于伯爵的社会来源，参见R. Le Jan, “Prosopographica neustrica: les agents du roi en Neustrie de 639 à 840,” in *La Neustrie* 231–69; R. Le Jan, *Famille et pouvoir dans le monde franc* (Paris, 1995) 强调了一小群大家族对统治权的继承；但与之对比是D. A. Bullough, “*Leo qui apud Hlotharium magni loci habebatur* et le gouvernement du Regnum Italiae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MÂ* 67 (1961): 221–45更为微妙的结论；以及D. A. Bullough, “‘Europae Pater’: Charlemagne and his achievemen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EHR* 85(1970): 59–105。

森特纳（*centena*），或者说“百户”（hundred），在德国“新学说”（*neue Lehre*）中被视为一群安居在王室土地上的王室自由民（*königsfrei*），这很可能是郡的一种普遍地理细分单位：参见最近的M. Schaab, “Die Zent in Franken von der Karolingerzeit bis ins 19. Jahrhundert,” in *Histoire comparée de l’administration* 345–62。在H.-J. Krüger, “Untersuchungen zum Amt des ‘centenarius’ —Schultheiss,” *Savigny* (Germ.) 87 (1970): 1–31以及88 (1971): 29–109中，有全面的文献分析。

关于帝国的其他内部划分，参见E. Ewig, “*Descriptio Franciae*,” *KdG*, vol. 1, 该文再版于他的*Spätantikes und fränkischen Gallien* (München, 1976), 274–322。K. F. Werner对所谓公爵领或“公国”（*regna*）分析，还是要小心对待，最起码要考虑到查理的时代，例如K. F. Werner, “La genèse des duchés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Settimane* 28 (1981): 175–207。

关于“巡按钦差”或王室使节，参见W. A. Eckhardt, “Die Capitularia missorum specialia von 802,” *DA* 12 (1956): 498–516; Werner, “Missus-marchio-comes,” 191–240。而802年改革细致的背景化研究，参见J. Hannig, “Pauperiores vassi de infra palatio? Zur Entstehung der karolingischen Königsbotenorganisatio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91 (1983): 309–74; J. Hannig, “Zentrale Kontrolle und Regionale Machtbalance: Beobachtungen zum System der karolingischen Königsboten

n am Beispiel des Mittelrheingebietes,”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66 (1984): 146。

关于在政府管理中使用书面文字，除了F.-L. Ganshof的古老文章“*Carlemany et l’usage de l’écrit en matière administrative*,” *MÂ* 57 (1951): 1–25，参见R. McKitterick的基础研究*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1989)；J. L. Nelson, “Literacy in Carolingian Government,” in R. McKitterick, ed. *The Use of Literacy in the Early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1990), 258–96；以及最近的*Schriftkultur und Reichsverwaltung unter den Karolingern*, ed. R. Schieffer (Münster, 1996)。

关于加洛林帝国中君主与主教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其间所生的矛盾，比我在此书中所能总结的要复杂得多，参见G. Tabacco, “L’ambiguità delle istituzioni nell’Europa costruita dai Franchi,” *RSI* 87 (1975)，该文再版于他的*Sperimentazioni del potere nell’alto medioevo* (Torino, 1993), 45–94；意大利的特别状况，参见G. Tabacco, “Il volto ecclesiastico del potere in età carolingia,” in *Storia d’Italia Einaudi, Annali 9: la Chiesa e il potere politico* (Torino, 1986)，同样再版于*Sperimentazioni*, 165–208。

介绍加洛林时代教会组织的教科书，参见J. Imbert, *Les Temps carolingiens (741–891): l’église; les institutions* (Paris, 1994)，其参考文献有些过时。

关于消除主教政体，将其主教整合进王国的行政，参见R. Kaiser, *Bischofsherrschaft zwischen Königtum und Fürstenmacht* (Bonn, 1981)；R. Kaiser, “Royauté et pouvoir episcopal au nord de la Gaule (VIIe–IXe) siècles,” in *La Neustrie* 143–60。关于高阶教士在行政中的作用，更为专业的论述参见Werner, “Missus-marchio-comes,” 191–240。关于他们的军事职责，参见F. Prinz, *Klerus und Krieg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71)；J. Nelson, The Church’s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ninth century: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view? in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86), 117–32。关于王室土地的收益分配给主教, 见R. Kaiser, “Teloneum episcopi: du tonlieu royal au tonlieu episcopal dans les civitates de la Gaule (VIe–XIIe siècle),” in *Histoire comparée de l’administration* (München, 1980), 469–85。

关于将修道院推荐 (commendatio) 给君主, 参见J. Semmler, “Traditio und Königsschutz,” *Savigny* (Kan.) 45 (1959): 1–33。

第8章 帝国的管理: 资源

关于王室庄园或王田, 基本的著作依旧是J. W. Thomps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arolingian Fisc in the Ninth Century* (Berkeley, 1935) (尽管下文有所保留), 同样还有W. Metz, *Das Karolingische Reichsgut*, (Berlin 1960), 其修订见W. Metz, “Zum Stand der Erforschung des karolingischen Reichsgutes,” *HJ* 78 (1959), 1–37, W. Metz, *Zur Erforschung des karolingischen Reichsgutes* (Darmstadt, 1971); 同样参见J. Barbier, “Aspects du fisc en Neustrie (VIe–Xe siècles),” in *La Neustrie*, ed. H. Atsma (Sigmaringen, 1989), 129–42。这一理论最早由J. W. Thompson提出, 即对王室地产的管理在虔诚者路易之后衰落, 其原因是不负责任地买卖资产, 这一观点受到了J. Martindale, “The Kingdom of Aquitain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arolingian Fisc,” *Francia* 11 (1983): 131–91的挑战。

关于《庄园敕令》的基本参考资料, 可以参见B. Fois Ennas, *Il Capitulare de villis* (Milano, 1981)。

关于维持君主供给的体系以及教会的义务, 尤其是与招待相关的义务, 参见C. Brühl, *Fodrum, Gistum, Servitium Regis* (Köln, 1968)。关于修道院的捐赠和对政府的各种贡赋, 参见J. Semmler, “Traditio und Königsschutz,” *Savigny* (Kan.) 45 (1959): 1–33; J.-P. Devroey, “Problèmes de critiq

ue autour du polyptyque de l'abbaye de St-Germain-des-Prés,” in *La Neustrie*, 441–65; J. Durliat, “Le polyptyque d'Irminon et l'impôt sur l'armée,” *BEC* 141 (1983): 183–208。

关于服务于君主的修道院的任务分配，以及世俗修道院院长的问题，参见F. J. Felten, *Äbte und Laienäbte im Frankenreich: 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Staat und Kirche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80)。关于使用教会资产来恩惠伯爵们，参见当地的研究：O. Clavadetscher, “Die Einführung der Grafschaftsverfassung in Rätien und die Klageschriften Bischof Viktors III. von Chur,” *Savigny* (Kan.) 39 (1953): 46–111。

关于豁免权，见F.-L. Ganshof, *L'immunité dans la monarchie franque, Les liens de vassalité et les immunités*,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no.1 (Bruxelles, 1958), 171–216; E. Magnou-Nortier, “Étude sur le privilege d'immunité,” *Revue Mabillon* 60 (1984): 465–512; B. H. Rosenwein, *Negotiating Space: Power, Restraint and Privileges of Immunit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Ithaca, N.Y., 1999)。阿尔昆与狄奥多尔夫之间的冲突在法律上的微妙之处，见L. Wallach, *Alcuin and Charlemagne: Studies in Caroling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thaca, N.Y., 1959), 97–140的分析。

关于教会的拥护者，参见J. Riedmann, “Vescovi e avvocati,” *I poteri temporali dei vescovi in Italia e Germania nel medioevo*, ed. C. G. Mor e H. Schmidinger (Bologna, 1979), 35–76。

关于那些持有与教会有关系的“王谕请求”契约，而占有教会土地者，其承担的义务，参见G. Constable, “Nona et decima: An aspect of Carolingian economy,” *Speculum* 35 (1960): 224–50。

关于劳役的义务，参见H. Dannenbauer, “Paraveredus-Pferd,” *Savigny* (Germ.) 71 (1954): 55–73; C. Brühl, “Das fränkische Fodrum,” *Savigny* (Germ.) 76 (1959): 53–81。

关于财产税的遗留，以及“森苏斯”的财政性质的理论，由J. Durliat和E. Magnou-Nortier提出，其方法十分刻意，难以令人信服。参见更近的著作E. Magnou-Nortier, “La gestion publique en Neustrie: les moyens et les hommes (VIIe–IXe siècle),” in *La Neustrie 271–320*以及J. Durliat, *Les Finances publique de Dioclétien aux carolingiens* (284–889) (Sigmaringen, 1990)。Metz在*Das Karolingische Reichsgut* (Berlin, 1960) 中的论证——“森苏斯”只是农民和王室土地上各种持有请求契约者所支付的不同名目的租金——依旧有效。同样参见E. Müller-Mertens, *Karl der grosse, Ludwig der Fromme und die Freien: Wer waren die ‘liberi homines’ der karolingischen Kapitularien?* (Berlin, 1963), 74–78, 以及J. Schmitt, *Untersuchungen zu den Liberi Homines der Karolinger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7), 110–36。

关于通行费，参见F.-L. Ganshof, “À propos de tonlieux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Settimane* 6 (1959): 485–508；其他关于交通的税收，参见F.-L. Ganshof, “À propos des droits sur la circulation au sein de la monarchie franque,” *Studi storici in onore di O. Bertolini* (Pisa, 1972), 1: 361–77。

第9章 帝国的管理：司法体系

自从接受了让法学家来研究法律史问题，近期法律史得到极大复兴，采用人类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之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更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加上F.-L. Ganshof的经典文章 “Charlemagne et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dans la monarchie franque,” *KdG*, 1: 394–419。关于加洛林司法体系的性质和效用的不同定位，参见J. L. Nelson, “Dispute settlement in Carolingian West Francia,” in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ed. W. Davies e P. Fouracre (Cambridge, 1986), 45–64；P. Fouracre, “Carolingian justice: the rhetoric of improvement and contexts of abuse,” *Settimane* 42 (1995): 771–803；R. McKitterick, “Perceptions of justice in we

stern Europe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Settimane* 44(1997): 1075–1102. 作为总结，参见R. Le Jan, “Justice royale et pratiques sociales dans le royaume franc au IXe siècle,” *Settimane* 44 (1997): 47–85。

关于帕拉丁伯爵的职务，参见H. E. Meyer, “Die Pfalzgrafen der Merowinger und Karolinger,” *Savigny* (Germ.) 42 (1921): 380–463。

关于法律程序，尤其在意大利，参见C. Wickham, “Land Disputes and their Social Framework in Lombard-Carolingian Italy,” in *Land & Power: Studies in Italian and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400–1200* (London, 1994), 229–56。关于意大利王国司法管理的特性，更为概括的著作，参见P. Delogu, “L’istituzione comitale nell’Italia carolingia,” *BISIMeAM* 79 (1968): 53–114（与第2章参考文献注释中提到的Fumagalli与Castagnetti的著作对比），尤其是F. Bougard, *La justice dans le royaume d’Italie: de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Roma, 1995); F. Baugard, “La justice dans le royaume d’Italie aux IXe–Xe siècle,” *Settimane* 44 (1997): 133–76。

关于“证据调查”，L. Wallach提出了经典的分析，见其作*Alcuin and Charlemagne: Studies in Caroling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thaca, N.Y., 1959), 117ff。D. A. Bullough证明了证据调查源自伦巴第，与Ganshof, “‘Europae Pater’: Charlemagne and his achievemen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EHR* 85(1970): 92–96存在争论。

法律的人格问题，本质上和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融合相关；一个基于最近研究的存疑的观点，参见P. Amory,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Ethnic Terminology in the Burgundian Laws,” *Early Medieval Europe* 2 (1993): 1–28以及S. Gasparri, *Prima delle nazioni: popoli, etnie e regni fra antichità e medioevo* (Roma, 1997)。

关于后加洛林时代司法系统的私有化，参见G. Duby开创性的著作“*Recherches sur l’évolution des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pendant le Xe et le XIe*

siècle dans le sud de la Bourgogne,” *MÂ* 52 (1946): 149–94以及53 (1947): 15–38。另一部颇具洞察的作品是C. Wickham, *Legge, pratiche e conflitti: tribunale e risoluzione delle dispute nella Toscana del XII secolo* (Roma, 2000)。

第10章 知识工程

关于加洛林文艺复兴，存在大量的文献；在近半个世纪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幅逐渐明晰的图景，即查理的改革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我们放弃了早先强调的文学复兴，以及对古典时代的重新发现。为了领会这一转变，我们可以将P. Lehmann, “Das Problem der Karolingischen Renaissance,” *Settimane* 1 (1954): 309–58的传统观点，与最近的文章做比较：J. J. Contreni,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in *Renaissances before the Renaissance*, ed. W. Treadgold (Stanford, 1984), 59–74以及G. Brown, “Introduction: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ed. R.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4), 1–5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倾向：认为卡洛曼和丕平最早自承天命来提升教会道德并改革教仪，随后查理接手这一事业，大规模推行。参见J. Hubert, “Les prémisses de la Renaissance carolingienne au temps de Pépin III,” *Francia* 2 (1974) : 49–58；以及P. Riché, “Le renouveau culturel à la cour de Pépin III,” *Francia* 2 (1974) : 59–70；还有C. Vogel提及的下文教仪改革的各种论文。

关于王室学者的参考文献浩如烟海，尤其是关于阿尔昆的。作为入门，参见D. A. Bullough, “Aula Renovata: the court before the Aachen Palace,” in *Carolingian Renewal: Sources and Heritage* (Manchester, 1991), 123–60以及J. Fleckenstein, “Alcuin im Kreis der Hofgelehrten Karls des Grossen,” in *Science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 in Carolingian Times*, ed. P.

L. Butzer e D. Lohrmann (Basel, 1993), 3–21。近期的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一主题：C. Leonardi, “Alcuino e la Scuola palatina: le ambizioni di una cultura unitaria,” *Settimane* 28 (1981): 459–96。最有趣的方面，包括阿尔昆对查理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以及政治事务上的协助，参见L. Wallach, *Alcuin and Charlemagne: Studies in Caroling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thaca, N.Y., 1959); I. Deug-Su, *Cultura e ideologia nella prima età carolingia* (Roma, 1984); 以及D. A. Bullough, “Alcuin and the kingdom of heaven: liturgy, theology and the Carolingian age,” in *Carolingian Renewal*, 161–240。关于助祭保罗，参见一篇最近振奋人心的论文：G. Gandino, “La dialettica tra il passato e il presente nelle opera di Paolo Diacono, in *Paolo Diacono e il Friuli altomedievale (secc. VI–X)* (Spoleto, 2001), 67–97。

作于查理宫廷中的拉丁文诗歌，其高度的文学价值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古代晚期传统的直接延续模仿，这个问题F. Stella, *La poesia carolingia* (Firenze, 1995)已经论证，书中包含一部优秀的文本选集。关于宫廷中科学的、百科式的文化，参见之前提及的Butzer和Lohrmann编订的论文集*Science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 in Carolingian Times*。关于学校和教学，见F. Brunhölzl, “Der Bildungsauftrag der Hofschule,” in *KdG*, 2:28–41以及P. Riché, “*Les Écoles et l’enseignement dans l’Occident chrétien de la fin du Ve au milieu du XIe siècle* (Paris, 1979)。

关于查理改革的启发性影响，参见P. E. Schramm, “Karl der Grosse: Denkart und Grundauffassungen; Die von ihm bewirkte *Correctio* (‘Renaissance’),” *HZ* 198 (1964): 306–45。

关于教会改革，参见R. 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Church and the Carolingian Reforms (789–895)* (London, 1977); 尤其是关于在811年采取的举措，参见F.-L. Ganshof, “Note sur les *Capitula de causis cum episcopis et abbatibus tractandis* de 811, *Studia Gratiana* 13 (1967): 3–25。关于《狄奥尼修—哈德良教令集》，参见H. Mordek, “Dionysio-Hadriana und Vetus

Gallica—historisch geordnetes und systematisches Kirchenrecht am Hofe Karls des Grossen,” *Savigny* (Kan.) 55 (1969): 39–63。关于查理召集的宗教会议，参见W. Hartmann, *Die Synoden der Karolingerzeit im Frankenreich und Italien* (Paderborn, 1989)。关于修道院改革，参见J. Semmler, “Karl der Grosse und das fränkische Mönchtum, in *KdG*, 2: 255–89; J. Semmler, “Mönche und Kanoniker im Frankenreichs Pippins III. und Karls des Grossen,” in *Untersuchungen zu Kloster und Stift* (Göttingen, 1980), 78–111; R. Grégoire, “Benedetto di Aniane nella riforma monastic carolingia,” *Studi medievali* 26 (1985): 573–610。

关于教仪改革，参见C. Vogel, “La réforme liturgique sous Charlemagne,” in *KdG*, 2: 217–32; C. Vogel, “Les motifs de la romanisation du culte sous Pépin le Bref et Charlemagne,” in *Culto Cristiano e politica imperial carolingia* (Todi, 1979), 15–41。关于修订圣经，参见B. Fischer, “Bibeltext und Bibelreform unter Karl dem Grossen,” in *KdG*, 2: 156–216; 更专门的关于狄奥多尔夫文本，参见E. Dahlhaus-Berg, *Nova antiquitas et antiqua novitas: Typologische Exegese und isidorianisches Geschichtsbild bei Theodulf von Orléans* (Köln, 1975); 关于阿尔昆的文本，参见D. Ganz, “Mass production of early medieval manuscripts: the Carolingian Bibles from Tours,” in *The Early Medieval Bible*, ed. R. Gameson (Cambridge, 1994), 53–62以及R. McKitterick, “Carolingian Bible Production: The Tours Anomaly,” *The Early Medieval Bible*, 63–77（较之先前的解释，有一种弱化其支配权的趋势）。

关于书籍的生产及其花费，参见R. McKitterick,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1989); R. McKitterick, “Script and book production,” in *Carolingian Culture*, 221–47; 还有同一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收录于*Book, Scribes and learning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 6th–9th Centuries* (London, 1994)和*The Frankish Kings 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1995)。对查理时代抄写员活动的探索，参见B. Bischoff, “Panor

ama der Handschriftenüberlieferung aus der Zeit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2: 233–54。关于查理大帝的图书馆，参见B. Bischoff, “Die Hofbibliothek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2: 42–62。

加洛林小写字体的问题，比之前认为的更为复杂；参见A. Pratesi, “Le ambizioni di una cultura unitaria: la riforma della scrittura,” *Settimane* 28 (1981): 507–23以及A. Bartoli Langeli, “Scritture e libri da Alcuino a Gutenberg,” *Storia d’Europa Einaudi* vol. 3: *Il Medioevo*, ed. G. Ortalli (Torino, 1994), 935–83。

关于拉丁语改革，参见J. Fontaine, “De la pluralité à l’unité dans le latin carolingien?” *Settimane* 28 (1981): 765–805；关于将查理时代的拉丁语视为一门会话语言而不是学术语言，更为整体的论述，参见McKitterick,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令人振奋的反思。

关于查理对神学的介入，概述参见H. Nagel, *Karl der Grosse und die theolog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seiner Zeit: Zur Wechselwirkung zwischen Theologie und Politik im Zeitalter des grossen Frankenherrschers* (Freiburg, 1998)。关于嗣子说的争论，参见W. Heil, “Der Adoptionismus, Alkuin und Spanien,” in *KdG*, 2:95–155，以及更近期的J. C. Cavadini, *The Last Christology of the West: Adoptionism in Spain and Gaul, 785–820* (Philadelphia, 1993)。关于与拜占庭人的神学冲突以及法兰克福会议，参见论文集794—*Karl der Grosse in Frankfurt am Main: Ein König bei der Arbeit*, ed. J. Fried (Sigmaringen, 1994)以及*Das Frankfurter Konzil von 794: Kristallisationspunkt karolingischer Kultur*, ed. R. Berndt (Frankfurt am Main, 1997)。关于“和子说”问题，参见M. Borgolte, “Papst Leo III., Karl der Grosse und der Filioque-Streit von Jerusalem,” *Byzantina* 10 (1980): 401–27。

就其自身而言，卜尼法斯的传教工作不属于这份参考文献；其与查理统治相关的历史意义的反思，参见G. Arnaldi, “Bonifacio e Carlomagno,” *Settimane* 20 (1973): 17–39。关于萨克森人皈依，参见论文集*Die Eingl*

iederung der Sachsen in das Frankenreich, ed. W. Lammers (Darmstadt, 1970)以及H. Beumann, “Die Hagiographie ‘bewältigt’ : Unterwerfung und Christianisierung der Sachsen durch Karl den Grossen,” *Settimane* 29 (1982): 129–68。关于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皈依, 参见H. Wolfram, *Conversio Bagoariorum et Carantanorum: Das Weissbuch der Salzburger Kirche über die erfolgreiche Mission in Karantanien und Pannonien* (Wien, 1979)。萨尔茨堡和汉堡大主教区的奠基与传教工作之间的联系, 参见B. Wavra, *Salzburg und Hamburg: Erzbistumsgründung und Missionspolitik in karolingischer Zeit* (Berlin, 1991)。关于传教的组织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教会地理重组, 参见H. Büttner, “Mission und Kirchen-Organisation des Frankenreiches bis zum Tode Karls des Grossen,” in *KdG*, 1:454–87, 此问题应该由*Kirchengeschichte als Missionsgeschichte*, 2/1: *Die Kirche des früheren Mittelalters*, ed. K. Schäferdiek (München, 1978)中所辑论文, 以及A. Angenendt, *Kaiserherrschaft und Königstaufe* (Berlin, 1984)所列的参考文献, 加以修正。

关于与迷信的斗争, 参见H. Mordek e M. Glatthaar, “Von Wahrsagerinnen und Zauberern: Ein Beitrag zur Religionspolitik Karls des Grossen,”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75 (1993) : 33–64。

第11章 法兰克人的军事机制

关于加洛林军事组织的一般研究现在相当过时了。参见J. F. Verbruggen, “L’armée et la stratégie de Charlemagne,” in *KdG*, 1: 420–36; F.–L. Ganshof, “Charlemagne’s Army, *Frankish Institutions under Charlemagne* (Providence, R.I., 1968) , 59–68; F.–L. Ganshof, “L’armée sous les carolingiens , *Settimane* 15 (1968) : 109–30。

对此的修正, 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Bernard S. Bachrach的研究中, 始于*Merov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481–751 (Minneapolis, 1972), 其

中倾向于将传统上认为是加洛林时代的革新提前到墨洛温时代，既包括骑兵的角色，也包括利用武装封臣。这一点，即便在精神上没有，在逻辑上也与他的另一论文有些相反：“Charlemagne’s cavalry: myth and reality,” *Military Affairs* 47 (1983) : 1–20。此文倾向于减弱这些因素在加洛林时代的重要性。关于这些和其他问题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反思，是A. Setti a, “La fortezza e il cavaliere: tecniche militari in Occidente,” *Settimane* 45 (1998) : 555–80。此书最初版本的发表先于B. S. Bachrach, *Early Carolingian Warfare: Prelude to Empire* (Philadelphia, 2001)。

关于入侵时代法兰克人的军事组织，参见H. Elton, *Warfare in Roman Europe, A.D. 350–425* (Oxford, 1996), 45–88；关于武器，参见主要基于考古发现的著作P. Perin&L.-C. Feffer, *Les Francs* (Paris, 1987), 2: 83–124；关于书面史料的分析，参见B. S. Bachrach, “Procopius, Agathias and the Frankish military,” *Speculum* 45 (1970): 435–41。

里普阿利安法所规定的军事花费，应该被解释为纯象征性的规定，因为鉴于不同的通货价值，其他的史料可能反映出其需求过剩，其例证参见J. Durliat, “Le polyptyque d’Irminon et l’impôt sur l’armée,” *BEC* 141 (1983) :183–209的计算。

S. Coupland, “Carolingian arms and armour in the ninth century,” *Viator* 51 (1990): 29–50在加洛林王朝的军备问题上，做出了主要而全面的贡献（其中有关于铠甲的非常规理论）。

年度集会的变动与放牧军马的需求相关，这一观点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挑战，他们提出，Campus Martii这一术语从古代起就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是3月（Marzo），而是战神马尔斯（Marte）。因此很久后在《王室年鉴》中所记载的变动，实际并没有发生。参见L. Levillain, “Campus Martius,” *BEC* 197 (1947–48): 62–68；D. A. Bullough, *EHR* 85 (1970): 85–86；还有最近的B. S. Bachrach, “Was the Marchfield part of the Frankish Constitution?” *Mediaeval Studies* 36 (1974): 178–85。但是，这一反对意见

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最早在596年国王希尔德贝特二世时，年度集会就被称作“Kalendas Martias”而不是“Campus Martii”（*CRF*, n7）。此外在卡洛曼（*CRF*, n11）和不平（*CRF*, n12）治下时，集会是在古历3月第一天召集，伦巴第国王则是在3月1日召集，这能在利乌特普兰德、阿斯图尔夫和拉奇斯（Rachis）的法律中见到，法律通常也在那一天公布（*Le leggi dei Longobardi*, ed. C. Azzara e S. Gasparri [Milano, 1992]），阿勒曼尼人中也有同样的情况（*Leges Alamannorum*, ed. K. A. Eckhardt [Hannover, 1966]; vol. 7 in *MGH, 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80 e n）。因此在证据面前，用马尔斯替代3月的观点似乎难以立足。

关于马镫，参见L.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62)。对怀特观点的批判，参见P. H. Sawyer e R. Hilton, “Technical Determinism: the Stirrup and the Plough,” *Past & Present* 24 (1963): 90–100; B. S. Bachrach, “Charles Martel, mounted shock-combat, the stirrup, and feudalism,”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7 (1970): 45–75。

加洛林的肖像学史料，系统地描绘了马镫的使用，这些材料来自9世纪晚期，例如圣加尔的圣咏集。但是热隆（Gellone）的圣礼书与特里尔的《启示录》，都是在查理在世时加饰插图，还有年代为820—830年的斯图加特圣咏集和830年左右的乌特勒支圣咏集，其中都描绘了没有马镫的骑兵，甚至身披重甲时也是如此。描绘有马镫的骑兵，身处那些仍旧没有使用马镫的人群，这类手稿最古老的是瓦朗谢讷（Valencienne）的《启示录》，其年代依旧存在争议（中世纪初期或九世纪中期？），并且由于其源出西班牙，所以其表现的是皮革和木材制成的阿拉伯马镫，而不是最终进入欧洲的金属马镫。关于这些小型人像的复制品和细节，很多内容能在这一节提到的参考文献中发现，尤其是D. Nicolle, *The Age of Charlemagne* (London, 1984)。

需要注意的是，将加洛林时代肖像描绘作为武器装备研究史料，其

可靠性在今天比在过去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参见B. S. Bachrach, “A Picture of Avar–Frankish Warfare from a Carolingian Psalter of the Early Ninth Century in the Light of the Strategico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6): 5–27, 还有之前提到的S. Coupland, “Carolingian arms and armour in the ninth century,” 但是他在铠甲的问题上挑战了肖像研究的可靠性。

一些论证可解释加洛林时代骑兵越来越重要，对有关论证的全面讨论，参见F. Cardini, *Alle radici della cavalleria medievale* (Firenze, 1981), 256–91。关于查理大帝死后不久，骑兵在法兰克军队和社会中的重要性，参见J. L. Nelson, “Ninth-century knighthood: the evidence of Nithard,” in *The Frankish World* (London, 1996), 75–87。

关于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自由民及其军事义务，参见G. Tabacco, “I liberi del re nell’Italia carolingia e postcarolingia,” *Settimane* 13 (1966); S. Gasparri, “Strutture militari e legami di dipendenza in Italia in età longobarda e carolingia,” *RSI* 98 (1986): 664–726。关于征兵时实际适用的军事义务范围和选拔标准的问题，尽管很重要，但难以解决，参见对此振奋人心但无定论的反思：T. Reuter, “The end of Carolingian military expansion,” in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ed. P. Godman e R. Collins (Oxford, 1990), 391–405。

关于将封臣纳入军队，参见J. Fleckenstein, “Adel und Kriegertum und ihre Wandlungen im Karolingerrich,” *Settimane* 28 (1981): 67–94（但是他夸大了加洛林军队自身参与恩庇结构的程度）。关于教士的军事义务，参见F. Prinz, *Klerus und Krieg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71); J. L. Nelson, “The church’s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ninth century: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view?” in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86), 117–32。

对军队规模的计算，参见K. F. Werner, “Heeresorganisation und Kriegsführung im deutschen Königreich des 10. Und 11. Jahrhunderts,” *Settimane*

15 (1968): 816–22。

关于后勤，参见B. S. Bachrach, “Animals and welfare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Settimane* 33 (1985): 707–51。

试图基于偶发的军事状况而对查理的军事法令进行分析，尤其是关于比利牛斯山前线，已经产生了非常有趣但时常存在争议的结果；参见B. S. Bachrach,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Aquitaine under the early Carolingians,” *Speculum* 49 (1974): 1–33。在阿奎丹的作战提供了加洛林围城战的典型案例：G. Fournier, “Les campagnes de Pépin le Bref en Auvergne et la question des fortifications rurales au VIII^e siècle,” *Francia* 2 (1974): 123–35。

第12章 一种新的经济

皮朗最初在*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 âge* (Paris, 1933)中阐释了加洛林经济的理论，I. E. Clegg将其译为*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36)；之后其遗作*Mahomet et Charlemagne* (Brussels, 1937)阐释更充分，B. Miall将其译为*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London, 1939)。最近试图重拾这一悲观解释的是R. Fossier, “Les tendances de l'économie: stagnation ou croissance?” *Settimane* 28 (1981): 261–74（但也同样参见随后的热烈讨论，275–90）。

扭转这一趋势的第一个标志，与农业相关，参见R. Delatouche, “Regards sur l'agriculture aux temps carolingiens,” *Journal des savants* 12 (1977): 73–100。对当前各解释的一个总结，其中对待贸易问题的新态度同样很重要，参见J.-P. Devroey, “Reflexions sur l'économie des premiers temps carolingiens (768–877): grands domaines et action politique entre Seine et Rhin,” *Francia* 13 (1985): 475–88；A. Verhulst, “Marchés, marchands et comm

erce au haut moyen âge dans l'historiographie récente,” *Settimane* 40 (1993): 23–43; G. Petralia, “A proposito dell’immortalità di Maometto e Carlomagno (o di Costantino),” *Storica* 1 (1995): 38–87。

对加洛林王朝、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贸易的重新评估，遵循R. Hodges, *Dark Age Economics: The Origins of Towns and Trade, A.D. 600–1000* (London, 1982)所阐发的模式；同样参见R. Hodges e 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Archaeology and the Pirenne Thesis* (London, 1983)以及J.-P. Devroey, “Courants et réseaux d’échange dans l’économie franque entre Loire et Rhin,” *Settimane* 40 (1993): 327–89。由于我1999年已经完成此书的初版，所以我没能参考一些重要的新作： *The Long Eighth Century: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Demand*, ed. I. L. Hansen e C. Wickham (Leiden, 2000)，以及M.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900* (Cambridge, 2002)，不过它们很符合一般的倾向，即对加洛林经济的活力做出大量充实的重新评估。

关于弗里西亚市场，参见S. Lebecq, *Marchands et navigateurs frisons du haut moyen âge* (Lille, 1983)； S. Lebecq, “Dans l’Europe du nord aux VI^e–IX^e siècles: commerce frison ou commerce franco-frison?” *Annales ESC* 41 (1986): 361–77； S. Lebecq, “La Neustrie et la mer,” in *La Neustrie*, ed. H. Atsma (Sigmaringen, 1989), 405–40。这些研究论证了弗里西亚贸易完全整合进帝国经济中的想法，似乎遭到了S. Lebecq, “Francs contre frisons (VI^e–VIII^e siècle),” in *La Guerre et la paix au moyen âge* (Paris, 1978), 53–71的反驳。

关于市场和商人，更概括的研究参见M. Rouche, “Marchés et marchands en Gaule du Ve au Xe siècle,” *Settimane* 40 (1993): 395–434；还有已出版的专著和论文，见 *Untersuchungen zu Handel und Verkehr der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n Zeit in Mittel- und Nordeuropa*，自1985年起在哥廷根出

版，尤其是P. Johanek, *Der fränkische Handel der Karolingerzeit im Spiegel der Schriftquellen* (Göttingen, 1987), 4: 7–68。

甚至对庄园体系的描述也倾向于更加强调贸易的作用，一劳永逸地驱除了庄园模式必然意味着封闭经济的观点。除了Devroey, “Courants et réseaux d’échange,” 尤其参见P. Toubert, “Le strutture produttive nell’alto medioevo: le grandi proprietà e l’economia curtense,” in *La Storia: Il medioevo*, ed. N. Tranfaglia e M. Firpo, 2a ed. (Milano, 1993), 51–90; P. Toubert, “La part du grand domaine dans le décollage économique de l’Occident (VIIIe–Xe siècles),” in *La croissance agricole du haut moyen âge: chronologie, modalités, géographie* (Auch, 1990), 该文再版于P. Toubert, *Dalla terra ai castelli: paesaggio, agricoltura e poteri nell’Italia medievale* (Torino, 1995)。

德国的史学研究，尽管更为谨慎，但还是对他们所称的“封建庄园制”（Grundherrschaft）做了大量研究；作为总结和参考文献，参见L. Kuchenbuch, “Die Klostergrundherrschaft im Frühmittelalter,” in *Herrschaft und Kirche*, ed. F. Prinz (Stuttgart 1988), 297–343；专门的研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主要修道院土地管理的考察：L. Kuchenbuch, *Bäu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Klosterherrschaft im 9. Jahrhundert: Studien zur Sozialstruktur der Familia der Abtei Prüm* (Wiesbaden, 1978) 以及U. Weidinger, *Untersuchungen zur Wirtschaftsstruktur des Klosters Fulda in der Karolingerzeit* (Stuttgart, 1991)；还有论文集*Strukturen der Grundherrschaft im frühen Mittelalter*, ed. W. Rösener (Göttingen, 1989)。

庄园制传统观念的瓦解，这种观念被一种更为灵活且分化的方法所取代，主要反映了涉及地中海区域以及修道院经济活力的研究的发展。关于第一点，参见P. Toubert, “L’Italie rurale aux VIIe–IXe siècles: essai de typologie domaniale,” *Settimane* 20 (1973): 95–132；P. Toubert, “Il Sistema curtense: la produzione e lo scambio interno in Italia nei secoli VIII, IX e X,” in *Storia d’Italia, Annali* 6 (Torino, 1983), 3–63；V. Fumagalli, *Terra e soci*

età nell'Italia padana: I secoli IX e X (Torino, 1976); B. Andreolli e M. Montanari, *L'azienda curtense in Italia* (Bologna, 1983)。关于第二点, 参见J.-P. Devroey, “Les services de transport à l'abbaye de Prüm au IXe siècle,” *Revue du Nord* 61 (1979): 543–69; J.-P. Devroey, “Un monastère dans l'économie d'échanges: les services de transport à l'abbaye St-Germain-des-Prés au IXe siècle,” *Annales ESC* (1984): 570–89; J.-P. Devroey, “‘Ad utilitatem monasterii’: mobiles et préoccupations de gestion dans l'économie monastique du monde franc (VIIIe–IXe s.),” *Revue bénédictine* 103 (1993): 224–40。

关于“田庄”和“份地”的完全不同的解释, 由“财政主义”或“激进的罗马主义”学派提出。参见J. Durliat, “Du caput antique au manse medieval,” *Pallas* 29 (1982): 67–77; J. Durliat, *Les Finances publiques de Dioclétien aux carolingiens* (284–889) (Sigmaringen, 1990); E. Magnou-Nortier, “La gestion publique en Neustrie: les moyens et les hommes (VIIe–IXe siècle),” in *La Neustrie*, 271–320; E. Magnou-Nortier, “Le grand domaine: des maîtres, des doctrines, des questions,” *Francia* 15 (1987): 659–700; 但同样参见J.-P. Devroey, “Polyptyques et fiscalité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une nouvelle approche?” *RBPH* 63 (1985): 783–94以及C. Wickham, “La chute de Rome n'aura pas lieu,” *MÂ* 99 (1993): 107–26的批判。尽管很难同意其前提, 不过一些关于“份地”的重要观点能够在J. Durliat, “Le manse dans le polyptyque d'Irminon: nouvel essai d'histoire quantitative,” in *La Neustrie*, 467–504中找到。关于“空缺份地”, 参见J.-P. Devroey, “Mansi absi: indices de crise ou de croissance de l'économie rurale du haut moyen âge?” *MÂ* 82 (1976): 421–52。

关于加洛林王朝农业现存最为重要的史料, 近郊圣日尔曼的多联画屏, 参见D. Hägermann, *Das Polyptychon von Saint-Germain-des-Prés: Studienausgabe* (Köln, 1993)的新版以及K. Elmhäuser e A. Hedwig, *Studien zum Polyptychon von Saint-Germain-des-Prés* (Köln, 1993)的相关研究。

关于粮食耕作，J.-P. Devroey, “La céréaliculture dans le monde franc,” *Settimane* 37 (1990): 221–53说明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和政治关联，从那些只流于表面的技术性质的争论中可以推断出这一关联。关于产量问题，此作也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一点，普遍产量与种子比是2或3比1的传统解释已经受到了各方的挑战，多位学者推测有效的产量是5比1甚至7比1。例证参见J. Durliat, “‘De conlaboratu’: faux rendements et vraie comptabilité publique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56 (1978): 445–57。

关于中世纪早期经济中开垦新土地以及森林的作用，存在大量的参考文献；一个绝佳的起点是C. Wickham, “European forest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andscape and land clearance,” *Settimane* 36 (1989): 479–548。

加洛林经济的总体乐观的观点架构，产生于今天学者们普遍一致的看法，其中同样包括重估水力磨坊的传播，先前大家认为这是下一个千年的发展成果。参见D. Lohrmann, “Le moulin à eau dans le cadre de l’économie rurale de la Neustrie,” in *La Neustrie*, 367–404。

对经济复苏有贡献的因素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因素是有益的气候时期，其时间可以确定为8世纪的后半叶起，持续到13世纪。参见M. Pinna, *Il clima nell’alto medioevo. Conoscenze attuali e prospettive di ricerca*, *Settimane* 37 (1990): 431–51。

关于度量衡改革，J.-P. Devroey, “Units of Measurement in the Early Medieval Economy: The Example of Carolingian Food Rations,” *French History* 1 (1987): 68–92。关于货币改革，参见经典作品P. Grierson, “Money and Coinage under Charlemagne,” in *KdG*, 1: 501–36, 还有S. Suchodolski, “La moneta,” in *Storia d’Europa*, 3: *Il Medioevo*, ed. di G. Ortalli (Torino 1994), 847–94更近的总结。对查理铸币的货币学分析，参见J. Lafaurie, “Les monnaies imperiales de Charlemagne,” *Comptes-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78): 154–80。关于饥荒救济，参见A. Verhulst,

“Karolingische Agrarpolitik. Das Capitulare de villis und die Hungersnöte von 792/3 und 805/6,”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13 (1965): 175–89以及K. O. Scherner, “‘Ut propriam familiam untriat’: Zur Frage der sozialen Sicherung in der karolingischen Grundherrschaft,” *Savigny* (Germ.) 111 (1994): 330–62。

1981—1987年间，在维勒耶—勒—塞克的考古发掘，成为*Un Village au temps de Charlemagne: moines et paysans de l’abbaye de St-Denis du VIIe siècle à l’an mil* (Paris, 1988)的主题，这是同名展览的编目。另外一个结果并无本质不同的农业模型，由W. Groenman-van Waateringe et L. H. van Wijngarden-Bakker, *Farm Life in a Carolingian Village* (Assen-Maastricht, 1987)所讨论。

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多屏联画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农民的人口学和家庭结构的研究：参见P. Toubert, “Le moment carolingien (VIIIe–Xe siècles),” in *Histoire de la famille*, ed. C. Klapisch-Zuber et F. Zonabend (Paris, 1987), 1: 333–59。

关于定居点的形式，参见F. Schwind, “Beobachtungen zur inneren Struktur des Dorfes in karolingischer Zeit,” in *Das Dorf der Eisenzeit und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Göttingen, 1977), 444–93，以及其他同卷的论文。

第13章 恩庇与奴役

这一章呈现的一些观点在A. Barbero, *Liberti, raccomandati, vassalli: le clientele nell’età di Carlo Magno*,” *Storica* 14 (1999): 7–60中有所发展和详述。

中世纪贵族的历史修撰如此浩繁，不可能举出一个样本。参见K. F. Werner, *Naissance de la noblesse* (Paris, 1998)长达42页的参考文献，但这

并不是概论的著作，而是高度偏向贵族起源于罗马帝国公共官职的理论。一份同样广泛的参考文献可参见R. Le Jan, *Famille et pouvoir dans le monde franc* (Paris, 1995)，其中分析了中世纪早期贵族典型的更广泛的亲属群体。

总体而言，这一领域被德国史学所支配，其人物肖像学研究和关于“部落贵族”（Stammesadel）和“帝国贵族”的争论，参见各种意义上的批判性回顾：H. K. Schulze, “Reichsaristokratie, Stammesadel und fränkische Freiheit,” *HZ* 227 (1978): 353–73，对盛行观点的可靠表达，参见K. F. Werner, “Bedeutende Adelsfamilien im Reich Karls der Grossen,” in *KdG*, 1: 83–142，以及H. W. Goetz, “Nobilis. Der Adel i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karolingischen Zeit,”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70 (1983): 153–91。尽管严格的法律视角已经成为过去，但很多此类史学研究都受制于日耳曼社会中贵族血统的支配权理论（Herrschaftstheorie），并且极其依赖“人物研究”（Personenforschung）与“姓名研究”（Namenforschung）的技术。但是，一些当地的研究不带偏见地阐明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例如，参见R. Sprandel, “Grundherrlicher Adel, rechtsständische Freiheit und Königszins,” *DA* 19 (1963): 1–29。

关于“帝国贵族制”的重要研究，及其在一个区域的运作方式，除了偶尔有争议性的讨论，参见W. Störmer, *Früher Adel: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Führungsschicht im fränkisch-deutschen Reich vom 8. Bis 11. Fh.* (Stuttgart, 1973)；R. Wenskus, *Sächsischer Stammesadel und fränkischer Reichsadel* (Göttingen, 1976)；P. Geary, *Aristocracy in Provence: The Rhône Basin at the Dawn of the Carolingian Age* (Stuttgart, 1985)。

土地所有权在保证日耳曼贵族阶层亲属群延续上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总体上被德国史学所低估，这一点已经在一部基础著作中表现出来：G. Tabacco, *La connessione fra potere e possesso nel regno franco e nel regno longobardo*,” *Settimane* 20 (1973): 133–68。

关于加洛林社会中的恩庇，没有令人满意的参考文献。Mitteis与Ganshof的经典著作，更多专注于封臣，由于过度拘泥法律方法而显得陈词滥调（H. Mitteis, *Lehnrecht und Staatsgewalt* [Weimar 1933]; F.-L. Ganshof, “L’origine des rapports féodo-vassalique: les rapports féodo-vassaliques dans la monarchie franque au nord des Alpes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Settimane* 1 [1954]: 27–69; F.-L. Ganshof, *Qu’est-ce que la féodalité?* 5a ed. [Paris, 1982]; F.-L. Ganshof, “Das Lehnwesen im fränkischen Reich. Lehnwesen und Reichsgewalt in karolingischer Zeit,” in *Studien zum mittelalterlichen Lehnwesen* [Konstanz, 1960]），同时S. Reynolds具有煽动性的著作*Fiefs and Vassals* (Oxford, 1994)过于专注经济问题，而不是恩庇关系。然后更好的是一部老但振奋人心的著作C. Odegard, *Vassi and fideles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Cambridge, Mass., 1945)，还有遗作W. Kienast, *Die Fränkische Vasallität: Von den Hausmeiern bis zu Ludwig den Kind und Karl dem Einfältigen* (Frankfurt am Main, 1990)。同样参见最近的新路向：B. Kasten, “Aspekte des Lehnwesens in Einhards Briefen,” in *Einhard: Studien zu Leben und Werk*, ed. H. Schefers (Darmstadt, 1997), 247–267; B. Kasten, “Beneficium zwischen Landleihe und Lehen—eine alte Frage, neu gestellt,” in *Mönchtum-Kirche-Herrschaft 750–1000* (Sigmaringen, 1998), 243–60。

关于奴隶的地位，以及自由民沦为农奴，参见系统化的论证，包括F. Panero最近提供的史学论证*Schiavi servi e villani nell’Italia medieval* (Torino, 1999)，尽管标题如此，但同样对法兰克地区有效。我的一些保留意见已经在回顾中论证，发表于*Storica* 12 (1998 [sic] ma 1999): 133–41。更多专注于加洛林时代的研究，参见H.-W. Goetz, “Serfdom and the beginning of a ‘seigneurial system’ in the Carolingian period: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Early Medieval Europe* 2 (1993): 29–51。关于小土地持有者的奴隶，参见G. Bois, *La Mutation de l’an mil* (Paris, 1989)。对自由民臣服于大地主权力的机制分析，参见S. Epperlein, *Herrschaft und Volk im karolingischen Imperium* (Berlin, 1969)以及B. Andreolli e M. Montanari, *L’azien*

da curtense in Italia (Bologna, 1983)。有必要记住广泛存在的乡村奴隶转化为隶农的现象，中世纪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一现象发生在中世纪早期，古典史学家认为发生在古代晚期：参见C. Wickham, “Marx, Sherlock Holmes, and late Roman commerce,” in *Land & Power: Studies in Italian and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400–1200* (London, 1994), 77–98, 以及D. Vera, “Le forme del lavoro rurale: aspetti della trasformazione dell’Europa rurale fra tarda antichità e alto medioevo,” *Settimane* 45 (1999) : 293–338。关于宗教影响下奴隶生活条件的提高，参见H. Hoffmann, “Kirche und Sklaverei im frühen Mittelalter,” *DA* 42 (1986): 1–24。关于获释奴隶的命运，参见M. Bloch, *Mélanges historiques* (Paris, 1963)的研究，这依旧是基本著作；同样参见H. Grieser, *Sklaverei im spätantiken und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allien* (5.–7. Jh) (Stuttgart, 1997)。

关于“贫民”的概念，参见K. Bosl, “Potens und Pauper,” in *Festschrift O. Brunner* (Göttingen, 1963), 60–87。然而Bosl坚持有限的自由概念，即“王室自由”（Königsfreientheorie），这在德国史学所谓的“新学说”中成了统治性的理论。H. K. Schulze, *Rodungsfreiheit und Königsfreiheit: Zu Genese und Kritik neuerer Verfassungsrechtlicher Theorien*,” *HZ* 219 (1974): 5 29–50以及H. K. Schulze, “Reichsaristokratie, Stammesadel und fränkische Freiheit,” *HZ* 227 (1978): 353–73的批判性观点，为处理这一学说设立了一个合适的起点。更一般来说，“王室自由”理论已经被E. Müller-Mertens, *Karl der Grosse, Ludwig der Fromme und die Freien: Wer waren die liberi homines der karolingischen Kapitularien?* (Berlin, 1963); G. Tabacco, “I liberi del re nell’Italia carolingia e postcarolingia,” *Settimane* 13 (1966); H. Krause, “Die liberi der Lex Baiuvariorum,” in *Festschrift Max Spindler* (München, 1969), 41–73; J. Schmitt, *Untersuchungen zu den Liberi Homines der Karolinger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7)彻底反驳。这些文本，尤其是施密特的，是审视查理和虔诚者路易所实施的保护自由民政策的基础论著。同样参见J. Devisse, ‘Pauperes’ et ‘paupertas’ dans le monde carolingien: ce

qu' en dit Hincmar de Reims,” *Revue du Nord* 48 (1966): 273–87; E. Magno u-Nortier, “Les *pagenses*, notables et fermiers du fisc durant le haut moyen âge,” *RBPH* 65 (1987): 237–56。

第14章 老年与死亡

对查理大帝统治最后几年的悲观阐释，由F.-L. Ganshof, “L’échec de Charlemagne,” *Comptes-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47): 248–54; F.-L. Ganshof, “La fin du regne de Charlemagne: une décomposition,” *Zeitschrift fü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 28 (1948): 533–52提出。最近的研究，同样参见R.-H. Bautier, “Le poids de la Neustrie ou de la France du nord-ouest dans la monarchie carolingienne d’après les diplômes de la chancellerie royale (751–840),” in *La Neustrie*, ed. H. Atsma (Sigmaringen, 1989), 548–49。

关于他统治的最后几年提升道德的立法，参见H. Mordek and G. Schmitz, “Neue Kapitularien und Kapitulariensammlungen,” *DA* 43 (1987): 361–439; 以及W. Hartmann, *Die Synoden der Karolingerzeit im Frankenreich und Italien* (Paderborn, 1989), 128–40。

关于查理扩张政策的终结，基本的著作是T. Reuter, “The End of Carolingian Military Expansion,” in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Oxford, 1990), 391–405。关于对丹麦人的作战，参见H. Jankuhn, “Karl der Grosse und der Norden,” in *KdG*, 1: 699–707。

史学家与公元806年的《分国诏书》以及813年虔诚者路易的加冕问题进行长期的斗争，尤其是在《分国诏书》中没有提及任何皇帝的头衔。经典的分析是W. Schlesinger, “Kaisertum und Reichsteilung. Zur Divisio

Regnorum von 806,” in *Forschungen zu Staat und Verfassung: Festgabe F. Hartung* (Berlin, 1958), 9–51。关于更近时期阐释的讨论，参见H. H. Anton, “Beobachtungen zum Fränkisch-Byzantinischen Verhältnis im Karolingischen Zeit,”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egnum Francorum*, ed. R. Schieffer (Sigmaringen, 1990), 77–119。同样参见D. Hägermann, “‘Quae ad profectum et utilitatem pertinent’: Normen und maximen zur Innen- und Aussenpolitik in der *Divisio Regnorum* von 806,” in *Peasants and Townsman in Medieval Europe*, ed. J.-M. Duvosquel e E. Thoen (Ghent, 1995), 605–17。

关于将法兰克王国留给合法长子查理，以及确定将意大利和阿奎丹王国分给丕平和路易，专门研究参见P. Classen, “Karl der Grosse und die Thronfolge im Frankenreich,” in *Festschrift H. Heimpel* (Göttingen, 1972), 3: 109–34。Classen提出主要的继承权问题，源于小查理与真正的长子驼背丕平之间的遗产划分；不过参见W. Goffart, “Paul the Deacon’s *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 and the early design of Charlemagne’s succession, *Traditio* 42 (1986): 59–93。同样赞同Classen的是E. Ewig, “Überlegungen zu den merowingischen und karolingischen Teilungen,” *Settimane* 28 (1981): 225–53以及H. Beumann, “Unitas Ecclesiae—Unitas Imperii—Unitas Regni: Von der imperialen Reichseinheitsidee zur Einheit der Regna,” *Settimane* 28 (1981): 531–71。传统的立场，认为806年的分国本质上是对法兰克法律中平等主义规则的屈服，并且临时撇开了皇帝之名（*nomen imperatoris*），这显然与817年虔诚者路易的《帝国诏令》（*Ordinatio imperii*）不一致，这一观点已经在D. Hägermann, “Reichseinheit und Reichsteilung: Bemerkungen zur *Divisio regnorum* von 806 und zur *Ordinatio imperii* von 817,” *HF* 95 (1975): 278–307中重提。

关于813年加冕仪式的罗马—拜占庭源流及其含义，参见P. Delogu, “*Consors regni: un problema carolingio*,” *BISIMeAM* 76 (1964): 47–98以及W. Wendling, “Die Erhebung Ludwigs des Frommen zum Mitkaiser im Jahre 813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Frankenreiches,”

FMSt 19 (1985): 201–38。

有一段时间，历史学家在重新考量虔诚者路易的历史地位；参见P. Godman e R. Collins ed.,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Oxford, 1990)以及E. Boshof, *Ludwig der Fromme* (Darmstadt, 1996)。

关于查理大帝的遗嘱，参见M. Innes, “Charlemagne's will: piety, politics and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EHR* 112 (1997): 833–55。关于葬礼，参见A. Dierkens, “Autour de la tombe de Charlemagne: considerations sur les sépultures des souverains carolingiens et des membres de leur famille,” *Byzantion* 61 (1991): 156–81。

关于头衔“Magnus”与名字“Karolus”相连是否是他同时代人的一种习惯，存在长期的争议。盛行的观点以及其他观点，在K. F. Werner, *Karl der Grosse oder Charlemagne?* (München, 1995), 32–34中有表述，其中认为将头衔与他的名字相连，只在他死后很久，大概9世纪时才发生，并且在像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这样的作品里，头衔也只是添加在后来的手抄本中；“伟大的皇帝查理”（Karolus, magnus imperator）这一形式，出现在他的墓碑和其他地方，但这只是草案，并不是钦定之名。我们并不挑战这一解释，可能会注意到这一草案在查理的生平中成了一种标准，其范围令人吃惊：高度官方的史料，例如《王室年鉴》，通常称呼他为“伟大的国王查理”（Carolus magnus rex，参见769年、772年、781年和784年）。甚至更有意思的是，查理依旧在世的时候，与意大利国王丕平以及后来的伯纳德相关的意大利官署就已采用了这一用法：参见C. Manaresi, *I placiti del 'Regnum Italiae,'*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no. 54 (Roma, 1955), vol. 1, nos. 13 (801) e 16 (803): *Pipinus magnus rex*; e no. 26 (813): *Bernardi magni regis*。同样的头衔在同时代的*Ritmo veronese* (*Versus de Verona: Versus de Mediolano civitate*, ed. G. B. Pighi [Bologna, 1960])中也用于丕平（*magnus...rex Pipinus piissimus*）。因此对“magnus”头衔

的广泛使用，被认为是查理时代的典型，并且因此可能是随后盛行的“Karolus Magnus”这一形式的先驱。

出版后记

2020年1月，英国正式脱欧，四年纠葛落下大幕。世人的目光重新投向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共同体”欧洲。

遥想公元5世纪，环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三百多年后，一位法兰克国王前往罗马，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地中海以北，巍然矗立一个新帝国。

他就是本书的主角查理大帝，奠定现代欧洲之基的“欧洲之父”。

关于查理大帝的著作，国内并不多见。《查理大帝传》是古人所作，《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其实是社会经济史。而巴尔贝罗的这本《查理大帝》，是历史学家所作的传记。作者凭严肃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告诉我们，查理身高一米九，不留须，嗜烤肉，高大威严的法兰克帝王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在书中，查理是一个精力充沛、既暴烈又深沉的帝王，吃肉打猎，勤奋好学。他的五位妻子先后去世，他养育几个儿子，最后只剩幼子。难得的是，巴尔贝罗的细腻文笔外还有开阔的视野，通过查理的生平，他描绘了时人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基督教信仰。通过查理征战扩张、建立帝国的经历，巴尔贝罗也展现了教宗、拜占庭和西部欧洲的关系，分析了武器装备、兵员组织、军事战术、政府机构、王室地产的情况。他

分析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奴隶和农民的生存境况。还有查理热衷的文教事业，加洛林的文艺之光。

本书可谓严谨传记和帝国整体史的结合，颇有年鉴学派之风。相信读者从这本著作中能认识不一样的查理大帝，感受他的帝国之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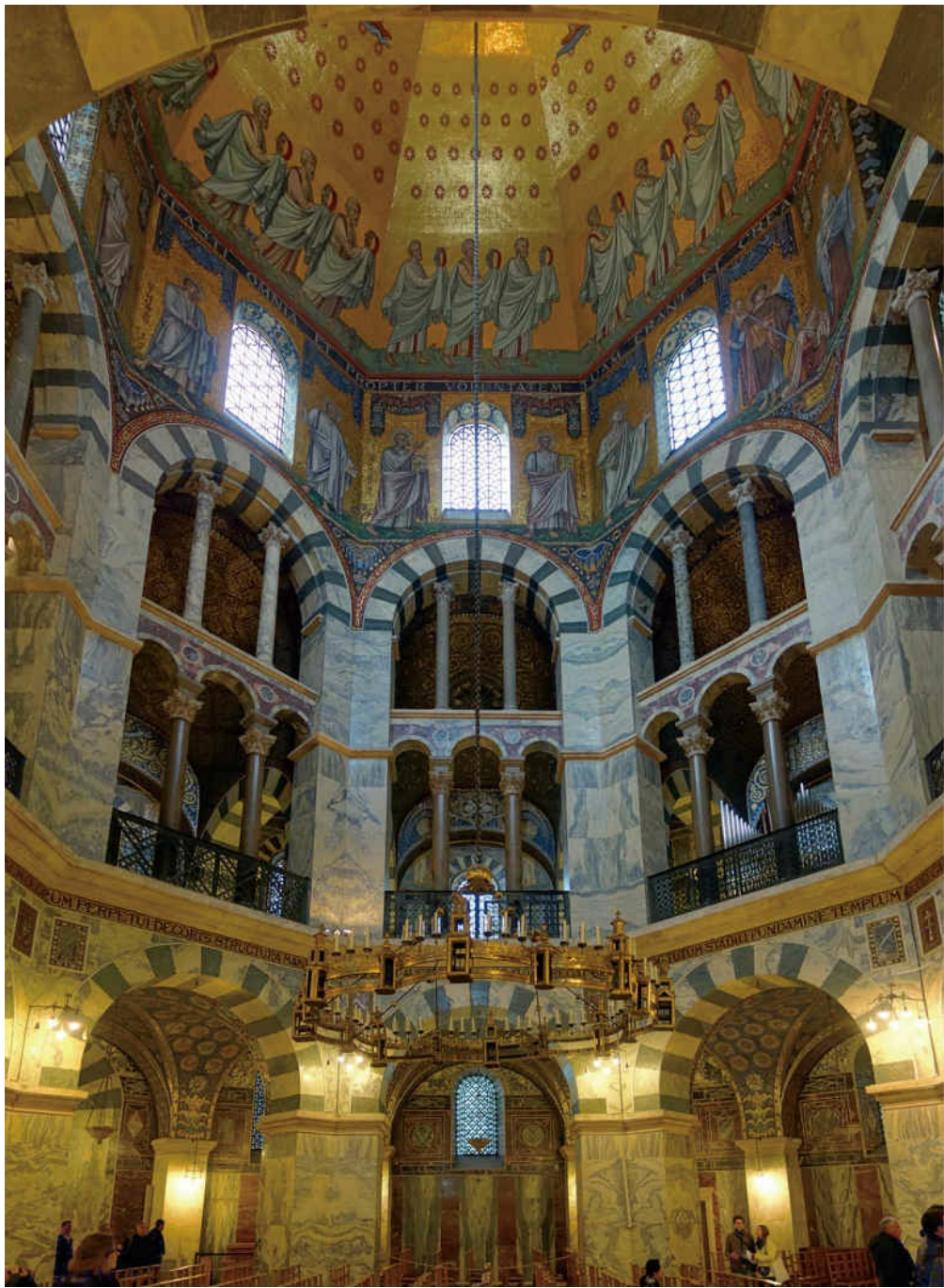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后浪出版公司
202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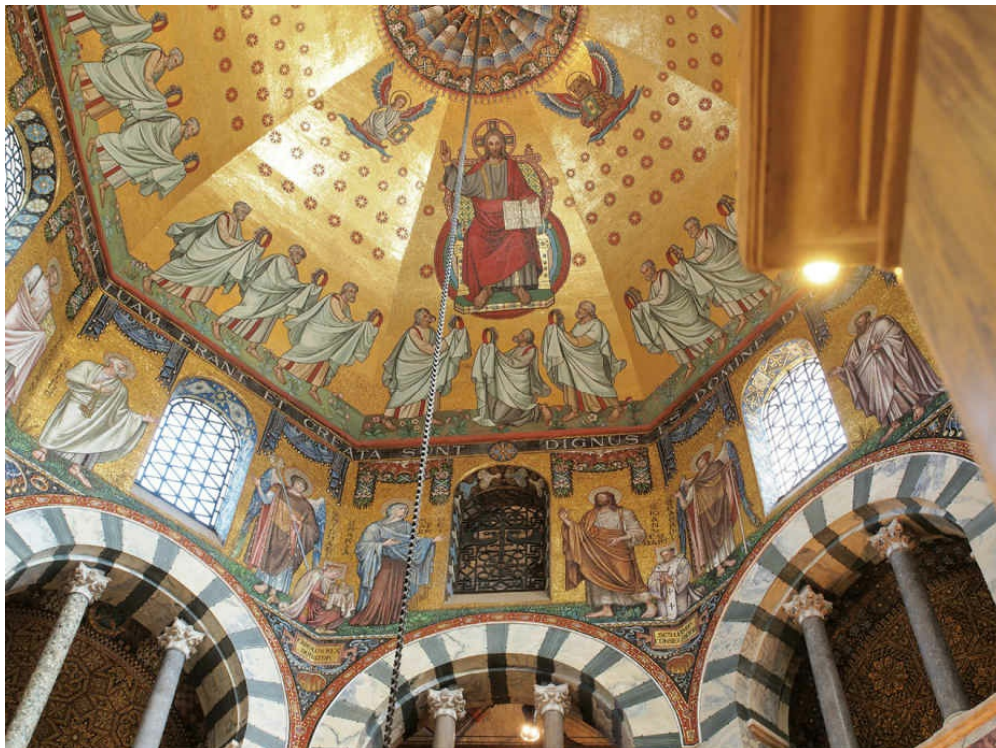
加洛林家族世系图，中间最上者为始祖阿努尔夫，往下依次是赫斯塔尔的不平、查理·马特、矮子不平、查理大帝等。



亚琛宫廷礼拜堂的大厅。这座八角形的大教堂，是查理大帝长眠之地。



亚琛宫廷礼拜堂的查理大帝宝座。按照查理的安排，宝座安置在表示谦卑的西侧，与祭坛相对。



亚琛宫廷礼拜堂穹顶，马赛克耶稣像，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塔西洛圣餐杯，铜制，镀金银，由塔西洛公爵妻子捐制。



印有查理大帝仿古肖像的银币，其上有字样“KAROLUS IMPAUG”。银币上的查理大帝头戴月桂冠。



所谓“查理曼象棋”的象子，其原型就是哈伦·赖世德送给查理的大象阿布·阿拔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拉特兰宫利奥三世接待厅外墙的马赛克画。中间是基督和使徒。左侧，基督将大披肩和旗帜交到跪在他面前的西尔维斯特一世教宗和君士坦丁大帝手中。右侧，圣彼得将大披肩托付给利奥三世，将旗帜托付给查理。



拉斐尔的壁画生动展现了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的场景，梵蒂冈藏。



伊琳娜女皇和查理大帝。女皇和皇帝的手中都托着“帝国之球”。取自薄伽丘《著名女性》（*De mulieribus claris*）的德译印刷本木版画插图，约1474年。



查理大帝和妻子希尔德嘉德，卡尔·鲍迈斯特（Karl Baumeister）绘，德国布森教堂嵌板画。



亚琛大教堂马赛克画中的查理大帝，他有胡子，但下巴没有留须，比较符合真实的形象。



加洛林君主骑马铜像，卢浮宫藏。过去大家认为这是查理大帝，现在更多证据表明铜像人物的年代更晚。据推测，它可能是受秃头查理委托所作。



查理大帝和侍卫，巴黎圣母院广场雕塑。



查理大帝像，丢勒绘。他左手拿着拿着象征皇权的“帝国之球”，头戴神圣罗马帝国皇冠，其上方是德意志单头鹰纹章和法兰西百合花纹章。这是后人心目中建构的皇帝形象。



9世纪的斯图加特圣咏集插图，展现了农民耕地情景。

INCIPIT LIBER EXODVS



HÆC SUNT **Cap. 1.**
NOMINA
FILIORUM
ISRAEL
QUINGRES
SISUNT IN
ÆGYPTU
CUM IACOB
SINGULI
CUM DOMI
BUS SUI
INTROIRE
RUNT

Ruben. symeon. leui. iuda. isachar. zabulon
et beniamin. dan. ephraim. gad. et aser.
Erant igitur omnes animæ eorum quæ egres
sæ sunt de domo iacob. septuaginta quinque.
Ioseph autem. in ægypto erat. Quomodo et
uniuersis fratribus et omni cognatione sua
filiis et creuerunt. et quasi germinantes multi
pliati sunt. et robore nimis impleuerunt terram.
Surrexit interea rex nouus super ægyptum
qui ignorabat ioseph. Et ait ad populum suum.
Ecce populus filiorum israel multus et fortior
nobis. et uenit sapienter opprimamus eum. ne
forte multiplicetur. Et stringuerunt eum ad
bellum. adduxeruntque in eum. Expugnauitque
nobis. egredietur ex terra. Præposuitque eis
magistros operum. ut affligerent eos oneribus.
Aedificaueruntque urbem tabernaculorum phar
raoni. phiton et ramesses. Quamquam opprime
bantur. tamen magis multiplicabantur et cre
cebant. Oderantque filios israel ægyptii et affli
gebant illudentes eis. atque ad maiorem
ducebant uitam eorum. operibus dumtaxat
laci et lacris. omni familia uero in operibus
mebantur. Dixit autem rex ægypti obsecra
re hebræorum quæ munera uocabatur. sephira
alexandria. præcipiens eis. quando obsecra
bitis hebræos. et parit tempus aduenire.
si masculus fuerit interficite illum. si femina.
reseruare. Timuerunt autem obsecrantes dñi
et non fecerunt iuxta præceptum regis ægypti. sed
conseruabant masculos. Quibus adseueratis re
xit. Quidam est hoc quod facere uolueris. ut

pueros seruares. Quæ responderunt. non
sunt hebræi. sicut ægyptiæ mulieres. Ipsæ
obsecrantes habent scientiam. Priusquam ue
niamus ad eas pariuimus. Bene ergo fecisti obse
crantibus. et creuit populus. Confor
tatisque enim. Et quia mulieres obsecrantes
dñi. aedificauit illis domos. Præcepit ergo pha
rao omni populo suo dicens. Quicquid masculi
sexus natus fuerit in flumine proicit. Quicquid
femine. et seruet.

Cap. 2
Egresus est pharaon uir de domo leui. accepit uxore
sempiternam. quæ concepit et peperit filium.
Et uidens eum elegantem abscondit eum in mensis.
Cumque iam celare non posset. sumpsit fiscella
scirpam. et liniuit eam bitumine. et pice. posuitque
in eis infantulum. et exposuit eum in carcerem prope
fluminis. scilicet procul forore eius et considerante
euentum rei. Ecce autem descendebat filius pha
raonis. ut lauaretur in flumine. et puellæ eius
gradiebantur per strepidinem alui. Quæcum
uidisset fiscellam in papyratione. misit unam ex
mulis suis. Et allatam aperientem. cernens quæ
paruum uagientem. misit ad eam. Dicit in
tibi hebræorum est hic. Cui respondit pueri. Uir in
quit ut uadam. et uocem tibi hebræam mulierem
quæ nutrire possit infantulum. Respondit.
Unde perrexit puella. et uocauit matrem eius.
Ad quam locuta filia pharaonis. Accipe puerum
et nutre eum. et nutrimus. ego tibi dabo mercedem.
Suscepit mulier. et nutriuit puerum.
A dulcemque tradidit filia pharaonis. Quem
illa adoptauit in locum filii. Uocauitque nomen
eius moysi dicens. quia de aqua tui eum

Cap. 3
In diebus illis postquam creuerat moyses. egresus ad
fratres suos uidit afflictionem eorum. et uirum
ægyptium percutientem quendam de hebræis
fratribus suis. Cumque circumspexisset. huc. et il
luc. et nullum ad se uidisset. percutit eum ægyp
tium abscondit in sabulo. Et egresus iudicauit.
conspexit duos hebræos rixantes. Dixitque ei qui
faciebat iniuriam. Quare percutis proximum
tuum. Qui respondit. quis constituit te principem
et iudicem super nos. Num occidere tu me uis. scilicet
occidisti hebræum ægyptium. Timuit moyses. et ait.
Quomodo palam fuerit uerbum istud. Audiu
itque pharaon sermonem hunc. et quærebatur occide
re moysen. Qui fugiens. decenspectus. mora
tus est inter ægyptios. et sedet iuxta puteum.
Erant autem sacerdotes adian. septem filii. quæue
nerunt ad hauriendam aquam. et impleti.



阿瓦尔人的金酒杯，可能模仿了拜占庭圣餐杯，制于约70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龙塞斯瓦列斯之战，右边持长剑者为罗兰。图尔奈挂毯画，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加洛林军队对抗维京人，安格斯·麦克布莱德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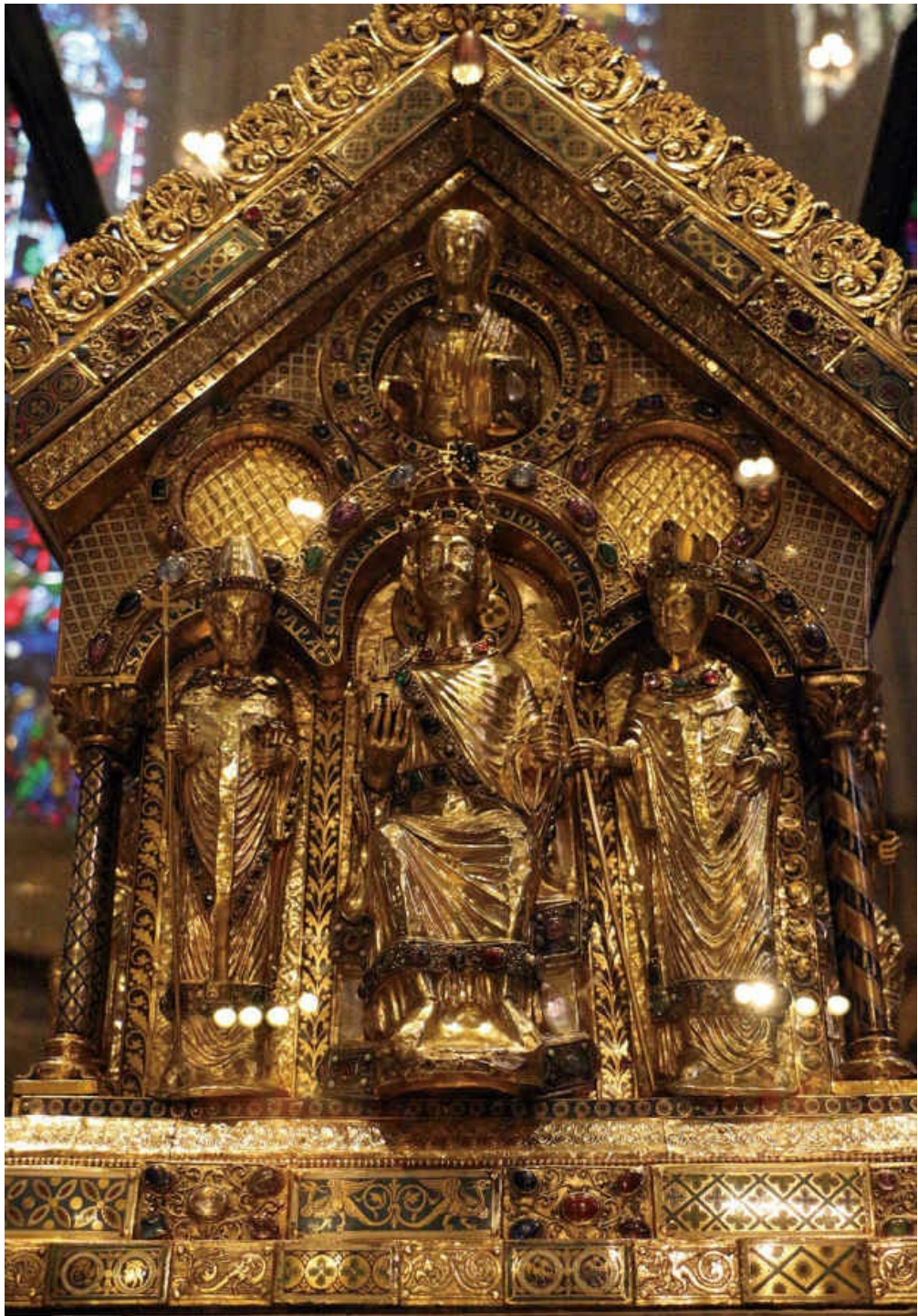
6世纪的法兰克士兵，安格斯·麦克布莱德（Angus McBride）绘。



神圣罗马帝国皇冠，本是奥托一世加冕所用，另名查理大帝皇冠。



查理从罗马带回的精美古石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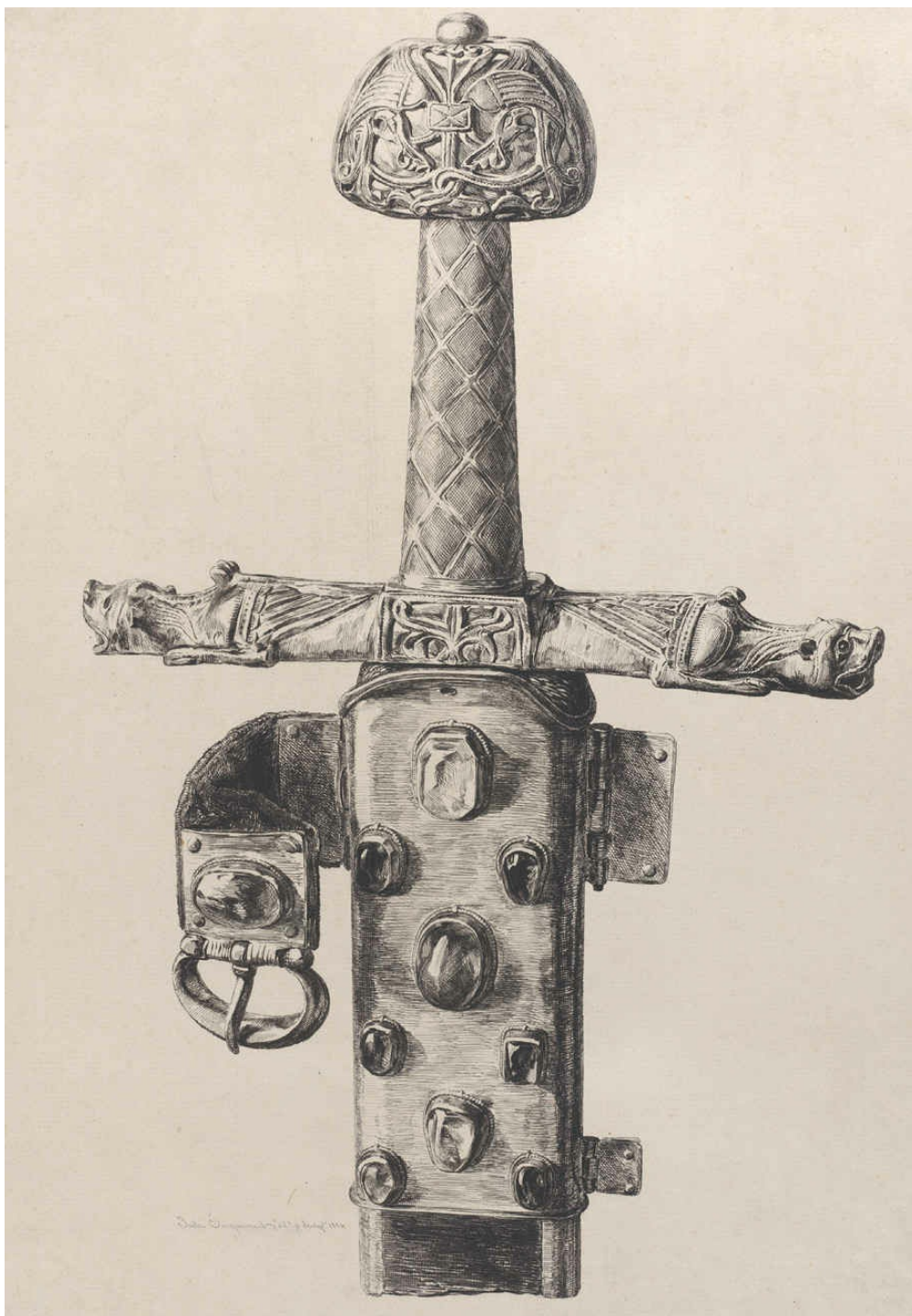




查理大帝圣骨箱（上、下图），腓特烈二世皇帝命人制作，安放查理大帝的遗骨。



查理大帝胸像圣骨盒，查理四世皇帝捐制，安放查理大帝的头盖骨



传说属于查理大帝的“欢乐”宝剑，三年铸成，可令对手失明。查理死后消失，法王腓力三世登基时重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素描。



虔诚者路易加冕，手抄本插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理查

R

ICH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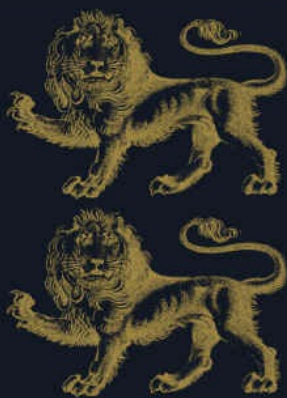
John Gillingham

狮心王

In John Gillingham, Richard I has found his most able biographer. This is a tremendous book and a great read compellingly written.

● S. D. Church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后浪出版公司



〔英〕
约翰·吉林厄姆

黄明浩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In this new account of Richard the Lionheart's reign, John Gillingham scrutinises the king's fluctuating reputation over the centuries and provides a convincing revised interpretation. Neither a feckless knight-errant nor a neglectful king, Richard I was in reality a masterful and businesslike ruler.*

● *This paperback edition includes an updated bibliography.*

● 一部杰出的中世纪史著作，吉林厄姆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尼古拉斯·文森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论。● 这部著作对传统观念进行了令人信服的修正……堪称中世纪政治史研究著作的典范。/ 斯科特·沃格，《不列颠研究季刊》。● 一部大师之作……作者综合运用多种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 西蒙·亚罗，《教会史研究期刊》。● 约翰·吉林厄姆无疑是最杰出的理查德传记作者……这是一部令人信服的绝佳著作。/ 马·丘奇，《英国历史评论》。● 一部关于英格兰最著名十字军统帅的权威传记。/ 马·斯旺森，《释义时代》。

狮心王理查

[英]约翰·吉林厄姆 著
黄明浩 译

版权信息

书名：狮心王理查

作者：[英]约翰·吉林厄姆

译者：黄明浩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序

在诸多英格兰国王中，理查一世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而他也因此备受争议。在过去的很多年中，理查既是大众认知中最著名的英格兰国王之一，也是学术界研究程度最低的英格兰国王之一。理查的传奇英雄形象使他人尽皆知，但他的生平无法引起传统历史学界的兴趣，无论是英国史、法国史还是十字军史，也未能引起社会史与政治史学家的兴趣，因为理查对当时英格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几乎毫无贡献。作为英格兰国王，理查众所周知的事迹是：他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待了6个月。他率部参加十字军，在十字军国家仅仅停留一年有余，也未能完成收复圣城耶路撒冷的任务。当理查结束远征后，又在回国途中遭遇横祸，被奥地利公爵抓获，并被监禁了一年以上。在理查被囚禁期间，他的大陆领地不断被法王腓力侵吞。在理查逝世5年之后，他从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的父亲亨利二世那里继承的广阔疆域——从苏格兰延伸至比利牛斯山的“安茹帝国”已彻底瓦解，它在法兰西的大部分领土都已被法王占领。因此，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著作《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中对理查评价如下：“他的一生恰似一场盛大的游行，结束之后只留下一片荒芜。”丘吉尔的这一评价，也反映了大多数英语世界历史学家们对理查的认识：这是一位名气虽大却无实际建树的国王。

另一方面，对理查一世本人及其统治状况的研究意义重大。他在不

同地区与其政敌的斗争尤其值得关注。从未有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像理查一样，在世界的不同地区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政敌，并遭受他们不同角度的非议。无论是在卡佩王朝治下的法兰西，还是在德意志、意大利、低地国家和中东地区，编年史家在记载当地统治者——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以及萨拉丁的事迹时，都代表着他的君主的利益，也都留下了关于理查的记载。无论这些记载真实与否，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统治者形象（rulership）的认识，这恰恰为我们认识理查的统治状况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从未有任何一位国王像理查一样，得到如此众多外国编年史家们的全面观察和研究，甚至是远在亚洲的萨拉丁的编年史家们也留下了诸多关于理查的记载。因此，上述材料为我们研究理查的统治状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另一个同样意义重大，但居于次要地位的方面则是理查的生前评价。有赖于同时代的英格兰编年史家（同时也是他的封臣）的记载，理查在世时就被塑造为传奇英雄般的人物，在他逝世后的数个世纪内也仍被视为杰出统治者的典范。从史学史角度来说，12世纪晚期，尤其是12世纪90年代堪称英格兰历史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其中包括以叙事详尽著称的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wden）、迪切托的拉尔夫（Ralph of Diceto），以强烈的批判性著称的纽堡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以突出的世俗性和讽刺性著称的迪韦齐斯的理查（Richard of Devizes），以及以突出的独创性著称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de Barri）。这些与理查同时代的著名的中世纪英格兰编年史家们也无一例外地在著作中留下了关于理查生平的诸多记载。相较而言，极少有英格兰国王能像理查一样，被同时代的众多编年史家们视为“理想国王的典范”。

我在这部作品中并不打算讨论理查的“私人生活”（inner life）。举例言之，理查与他的母亲埃莉诺的关系便属于理查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他们只在极少的时候会提及理查和母亲的关系，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的看法，更不知道这段关

系的“现实”。母子关系尚且如此，理查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更不会受到编年史家们的青睐了。时至今日，理查的性取向问题也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尽管我们可以说，现存的原始资料中，没有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是同性恋，但是我们也无法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关于理查的性取向问题，我会在书中稍做分析，但我只会关注原始材料，不会去论证他的性向。换言之，我不是要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理查的“真实形象”，而是要向读者们展示理查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不同看法。因此，我不关心理查是一个“英雄”或者“恶棍”，而是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为何包括理查的政敌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他视为英雄人物，其余的人又为何将他视为傲慢奸诈之徒？

另外，这也并非一部研究“理查一世时期的英格兰政府”的专著。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且有待完善的基础研究领域，我也没有能力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1935年时，莱昂内尔·兰登（Lionel Landen）便已整理出理查在位期间签署的565份文书；而尼古拉斯·文森特博士（Dr Nicholas Vincent）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上千份由理查签署的文书，这一数量极为可观。如今，理查统治时代英格兰财政署记录已被妥善整理出来，而文森特·莫斯博士（Dr Vincent Moss）则致力于诺曼底财政署档案的整理工作，他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当我们对理查统治期间的相关政府档案进行学术编辑后，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政府概况。这种研究能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政府结构和行政体系提供新的视角，但我们无法了解理查作为国王的能力。上述材料对研究理查被囚禁时期英格兰政府的运作并无太多帮助，这正是文书材料的局限所在：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文书的套话了解当时的王权观念，但我们无法知晓理查是否遵循这些观念进行统治。不过，这些文书和审判令状还提供了理查的日程安排、随员名录等有用资讯，我们可以从中得知理查曾在哪些人的陪同下前往某地，他又曾对哪些人施予了恩赐等具体内容。但是，理查在英格兰、大陆领地进行统治期间，以及在圣地参加十字军东征是否明智，他是否做到了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这都是观点的问题。另一部分值得

注意的文献则是财政记录。我们既能从中了解理查在位期间的税收类别和税收总额，也能了解理查的日常开支状况，而一位国王是否善于合理使用财富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众所周知，国王有时候十分富有，当时的记载表明，爱德华二世（Edward II）和理查二世（Richard II）在1326年和1399年时都拥有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对他们助益极少。在理查统治期间的首次会议上，他将财政署官员理查·菲茨尼格（Richard FitzNigel）提拔为伦敦主教，菲茨尼格在他的著作《财政署对话录》（*The Dialogue of the Exchequer*）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位国王的荣耀不在于他能积累多少财富，而在于了解如何使财富在适当时机物尽其用。”但如何使用这些财富也是见仁见智的。然而，同时代的人的意见可以让一位国王政治生命延续，或者将他推翻。这份政治传记的核心就是要分析当时人的意见和让我们接触到这些意见的文献，无论是拉丁文还是当时的各国语言。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大约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5年。我在1978年出版的*Richard the Lionheart*一书中第一次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初步探讨。此书主要关注的是理查在法兰西地区的事迹（毕竟他三分之二的政治生涯都在此地度过），他在阿基坦地区的事迹则是我叙述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我未能对下列两个令理查成为知名英格兰国王的重要方面进行充分探究：第一个方面是理查领导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事迹，他在十字军中的突出战功也使其成功跻身传奇英雄之列；第二个方面则是对“理查疏于治理英格兰”这个似是而非的传统观念的批判，17世纪以来的诸多英格兰史家们将其视为理查“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本书的大致框架如下：第三至六章主要叙述的是理查继承王位以前在阿基坦的事迹，但它只是在1978年著作的基础上稍做补充而已；在剩余的章节内，我将以作为“英格兰国王”的理查为叙事重点，对他统治安茹帝国期间的事迹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当然，写作本书的过程也涉及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在理查统治的10年中，他对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西里、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

王国等地的历史发展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也留下了许多用当地语言记载的理查生平。作为他的传记作者，我若能对上述所有地区的历史均有所了解，并掌握所有的当地语言，无疑对写作此书更有裨益。然而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掌握阿拉伯语，只能通过阿拉伯语原始史料的英译本了解穆斯林眼中的理查。因此，书中所使用的经过转写的阿拉伯语名词难免有错漏之处，也请精通阿拉伯语的读者们见谅，并请指正。

此外，由于诸多友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完成此书。当我在慕尼黑首次与汉斯·艾伯哈德·迈尔（Hans Eberhard Mayer）会面时，便开始对十字军东征及理查在十字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产生兴趣，感谢他数年以来在十字军史方面对我的热心帮助。其次我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供的慷慨赞助，由于校方的资金支持，我得以前往法兰西进行充分的实地考察工作，此后我也得以提前退休，全身心投入本书写作当中。我还要感谢伊凡·克洛拉斯（Ivan Cloulas）和金雀花王朝古道研究会（Association de la Route historique des Plantagenêts）为推广宣传这段历史的努力，他们使理查一世变得人尽皆知；克里斯托弗·法尔库斯（Christopher Falkus）首次邀请我写作一两部关于理查的著作，我对他极为感激；金蒂·尼尔森（Jinty Nelson）曾组织了1989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召开的“理查一世加冕800周年专题研讨会”，感谢她为筹备会议做出的诸多努力；弗雷德里克·肖维涅（Frederique Chauvenet）和马丁·奥热尔（Martin Aurell）同样为筹办在卡昂（Caen）和图阿尔（Thouars）举行的“纪念理查一世逝世800周年”专题会议操劳甚多，在此也向他们致谢。还有我曾经的学生理查德·本杰明（Richard Benjamin），是他让我领悟了研究历史的愉悦，遗憾的是他已因一场车祸英年早逝；我的恩师约翰·普雷斯特维奇（John Prestwich）教授则指导我了解理查一世，并教会我阅读12世纪原始文献的方法，时至今日仍能听他教诲，我感到不胜荣幸。感谢珍妮·马丁代尔（Jane Martindale）在阿基坦历史方面的指导；吉姆·霍特（Jim Holt）与戴维·卡彭特（David Carpenter）在观点相

左时的辩论也使我受益颇多。多年以来，还有许多其他友人和同事们将一些相关论著，甚至是他们将要出版或尚未出版的著作慷慨相赠，多亏他们的帮助和敦促，我才得以将理查一世铭记于心。在此，我谨向下列诸位表示诚挚感谢：玛丽安妮·艾勒斯（Marianne Ailes）、尼克·巴拉特（Nick Barratt）、彼得·艾德布里（Peter Edbury）、克劳德·法根奈（Claude Fagenen）、约翰·法兰斯（John France）、鲁斯·哈维（Ruth Harvey）、理查·海瑟（Richard Heiser）、汤姆·基弗（Tom Keefe，我永远将他铭记在心）、奥利维尔·德·拉伯德里（Olivier de Laborderie）、西蒙·劳埃德（Simon Lloyd）、艾玛·梅森（Emma Mason）、汉纳斯·默林（Hannes Möhring）、戴维·摩根（David Morgen）、文森特·莫斯、乔纳森·菲利普（Jonathan Philips）、多米尼克·皮特（Dominique Pitte）、丹·波尔（Dan Power）、马修·斯特里克兰（Matthew Strickland）、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与尼克·文森特（Nick Vincent）。我还要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提供的一系列帮助，感谢罗伯特·巴尔多克（Robert Baldock）以果敢而耐心的态度接下了这一出版项目，感谢阿历克斯·尼斯比特（Alex Nesbit）让这本书顺利付印，尤其感谢我的编辑贝斯·汉弗莱斯（Beth Humphries）对书稿的耐心校对和修订。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但被我遗漏的朋友和同事们，希望他们能够提醒我。

1999年

平装本出版序

在平装本中，我已对第一版中的错漏部分进行了修正。本书第一版面世之后，我也欣慰地看到，由让·弗洛里（Jean Flori）撰写的另一部关于理查的最新论著已经出版，作者在书中研究了作为“骑士国王”（*Roi-chevalier*）典范的理查，而我认为理查正是最糟糕的“骑士国王”。此外，在他的帮助下，我还更新了参考文献，以便读者进行检索。伊恩·肖特（Ian Short）帮我填补了一些空白。通过他的介绍，我才得知法国为纪念理查逝世8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另外，我还要感谢西蒙·阿什当（Simon Ashdown），他发现了800年后理查声望的有力证明——一个马克杯。在这个别出心裁的马克杯上，刻着代表12至20世纪的九位伟人：代表20世纪的伟人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世纪的代表查尔斯·达尔文，18世纪的代表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世纪的代表艾萨克·牛顿，16世纪的代表伽利略·加利雷，15世纪的代表列奥纳多·达·芬奇，14世纪的代表但丁·阿利吉耶里，13世纪的代表马可·波罗，最后就是12世纪的代表理查一世。马克杯底部印着“宣传品，泰国制造”的字样。这件礼物也使我想起一句箴言：“世界因此荣耀倍增（*sic crescit gloria mundi*）。”

2001年8月

缩略语

Actes: Recueil des actes de Philippe Auguste, i and ii, ed. H.-F. Delaborde, C. Petit-Dutaillis and J. Monicat (Paris, 1916–43)

Ambroise: Ambroise, L’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ed. G. Paris (Paris, 1897), cited by line number to facilitate reference to the forthcoming translation by Marianne Ailes as well as to that by M. J. Hubert and J. La Monte, *The Crusade of Richard Lionheart* (New York, 1941)

Annales angevines: Recueil d’Annales angevines, ed. L. Halphen (Paris, 1903)

ANS: Anglo-Norman Studies

Ansbert: Historia de Expeditione Friderici, ed. A. Chroust, (MGH SRG, 1929)

Baha al-Din: Beha ed-Din, What Befell Sultan Yusuf, trans. C. W. Wilson (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 xiii, London, 1897).

BIHR: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Born: The Poems of the Troubadour Bertran de Born, ed. W. D. Paden, Jr, T. Sankovitch and P. H. Stäblein (Berkeley, 1986)

Boussard: J. Boussard, *Le Gouvernement d'Henri II Plantagenêt* (Paris, 1965)

CCM: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Chron.: Roger of Howden, *Chronica*, ed. W. Stubbs (4 vols, RS, 1868–87).

Chron. Maj.: Matthew Paris, *Chronica Majora*, ed. H. R. Luard (7 vols, RS, 1872–84). This contains within it a useful edition of Roger of Wendover's *Flores Historiarum*

Coggeshall: *Radulphi de Coggeshall Chronicon Anglicanum*, ed. J. Stevenson (RS, 1875)

DA: *Deutsches Archiv*

Devize: *The Chronicle of Richard of Devizes*, ed. and trans. J. T. Appleby (London, 1963)

Diceto: *Radulfi de Diceto Decani Londiniensis Opera Historica*, ed. W. Stubbs (2 vols, RS, 1876)

Edbury: P. W. Edbury,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and the Third Crusade. Sources in Translation* (Aldershot, 1996)

EH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Foedera: *Foedera, conventiones, litterae*, i, part 1, ed. T. Rymer, A. Clarke, F. Holbrooke and J. Caley (London, 1816)

Gabrieli: F. Gabrieli,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London, 1969)

Gerald, Opera: *Giraldi Cambrensis Opera* ed. J. S. Brewer, J. F. Dimock and G. F. Warner (8 vols, RS, 1861–91). Separate works are cited as follows. Figures in parentheses refer to Rolls Series volume number.

Gerald, *Descrip.: Descriptio Kambriae* (6)

Gerald, *Expug. Hib.: Expugnatio Hibernica. The Conquest of Ireland*, by Giraldi Cambrensis, ed. and trans. A. B. Scott and F. X. Martin (Dublin, 1978)

Gerald, *Princ.: De Principis Instructione* (8)

Gerald, *Top.: Topographia Hibernica* (5)

Gervase: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Gervase of Canterbury*, ed. W. Stubbs (2 vols, RS, 1879–80)

Gesta: Roger of Howden, *Gesta Henrici II et Richardi I*, ed. W. Stubbs, (2 vols, RS, 1867)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J. Gillingham, *Richard Coeur de Lion. King ship, Chivalry and War in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94)

HGM: *Histoire de Guillaume le Maréchal*, ed. P. Meyer (3 vols, Paris , 1891–1901). Cited by line number.

HSJ: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Ibn al-Athir: Ibn al-Athir, *el-Kamil*,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rientaux*, ii, part 1 (Paris, 1887)

Imad al-Din: Imad al-Din, *Conquête de la Syrie et de la Palestine par Saladin*, trans. H. Massé (Paris, 1972)

Itin.: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in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the Reign of Richard I*, i, ed. W. Stubbs (RS, 1864). Cited by book and chapter to facilitate use of the translation by Helen Nicholson,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Ashgate, 1997) as well as to the edition of the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itself, ed. H. E. Mayer, *Das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Stuttgart, 1962)

JMH: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Kessler: U. Kessler, *Richard I. Löwenherz. König, Kreuzritter, Abenteurer* (Graz, 1995)

Landon: *The Itinerary of King Richard I*, ed. L. Landon (Pipe Roll Society, London, 1935)

Lyons and Jackson: M. C. Lyons and D. E. P. Jackson, *Saladin: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War* (Cambridge, 1982)

Magna Vita: Adam of Eynsham, *Magna Vita Sancti Hugonis*, ed. D. L. Douie and H. Farmer (2 vols, Edinburgh, 1962)

Map: 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Courtiers' Trifles*, ed. and trans. M. R. James, C. N. L. Brooke and R. A. B. Mynors (OMT, Oxford, 1983)

MGH SRG: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

MGH SS: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MRSN: *Magni Rotuli Scaccarii Normanniae*, ed. T. Stapleton (2 vols, London, 1840–4)

Nelson, *Coeur de Lion*: J. L. Nelso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London, 1992)

Newburgh: William of Newburgh, *Historia Rerum Anglicarum*, ed. R. Howlett, in *Chronicles of the Reigns of Stephen, Henry II and Richard I*, i and ii (RS, 1884). Cited by book and chapter to facilitate reference to *History of William of Newburgh*, trans. J. Stevenson, 1856 (repr. Felinfach, 1996)

Norgate: K. Norgate, *Richard the Lionheart* (London, 1924)

OMT: Oxford Medieval Texts

Philippidos: William the Breton, *Philippidos*, in *Oeuvres de Rigord et de Guillaume le Breton*, ed. H. F. Delaborde, ii (Paris, 1885)

Powicke: F. M. Powicke, *The Loss of Normandy* 2nd edn (Manchester, 1961)

PR: Pipe Roll

Prestwich: J. O. Prestwich, 'Richard Coeur de Lion: *rex bellicosus*', in *Richard Cuor di Leone nella storia e nella leggend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roblemi attuali di scienza e di cultura, ccliii, Rome, 1981);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L. Nelson (London, 1992)

RHF: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Rigord: Rigord, *Gesta Philippi Augusti* in *Oeuvres de Rigord et de Guillaume le Breton*, ed. H. F. Delaborde, i (Paris, 1882)

RS: Rolls Series

Selected Letters: *Selected letters of Pope Innocent III concerning England*, ed. C. R. Cheney and W. H. Semple (London, 1953)

Sicard: Sicard of Cremona in Salimbene de Adam, *Cronica*, ed. G. Sciala (Bari, 1966)

Sig. Cont.: *Sigeberti Continuatio Aquicincta*, MGH SS, vi (written by Andreas of Marchiennes)

Torigny: *The Chronicle of Robert of Torigny* in *Chronicles of the Reigns of Stephen, Henry II and Richard I*, ed. R. Howlett, iv (RS, 1889)

Vigeois: 'Chronica', in *Novae Bibliothecae Manuscriptorum Librorum*,

ed. P. Labbe (2 vols, Paris, 1657), ii, 279–329. Since there is a better edition of Book 1 of Geoffrey in an unpublished thesis, P. Botineau, ‘La Chronique de Geoffroi de Breuil, prieur de Vigemois’ (Paris, 1964) and a more accessible one of Book 2 in *RHF*, xviii, 211–23, I have cited this chronicle by the common numbering of book and chapter.

Warren: W. L. Warren, *Henry II* (London, 1973)

WB: William the Breton, *Gesta Philippi Augusti in Oeuvres de Rigord et de Guillaume le Breton*, ed. H. F. Delaborde, i (Paris, 1882)

目录

作者序

平装本出版序

缩略语

第一章 至上英主，无道暴君

第二章 穆斯林眼中的理查

第三章 阿基坦的理查，1157——1172

第四章 父子相争，无爱之战，1173——1174

第五章 阿基坦公爵理查，1174——1183

第六章 继承权悬而未决，1184——1189

第七章 诺曼底公爵，英格兰之王，1189

第八章 穿越法兰西，登陆西西里，1190

第九章 征服塞浦路斯

第十章 阿克围城战，1191

第十一章 进军耶路撒冷

第十二章 征途终章：雅法与阿什凯隆

第十三章 狮心王身陷囹圄

第十四章 狮心王之秉性逸闻

第十五章 重返英格兰，1194——1199

第十六章 征战法兰西，1194——1196

第十七章 征战法兰西，1197——1198

第十八章 霸业未竟，抱憾身死

第十九章 狮心虽逝，余威犹存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第一章

至上英主，无道暴君

独一无二、冠绝英格兰诸王的理查一世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了积极的领导角色，参与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争夺中东地区进行的斗争。相较之下，所有其他与理查一样统治英格兰的国王们都显得黯然失色——无论他们曾是多么聪明睿智、雄心勃勃、富有才干或渴求权力，都仅仅满足于偏安一隅，将其统治和征战的范围局限在欧洲西北一角。理查之前及之后的国王中也无人再能像他一样，承担起率领一支舰队和一支大军前往地中海东岸作战的重任，更不必说在那儿迎击，乃至挫败一位如伟大的萨拉丁般可怖的敌手了。无疑，长期以来理查一世都被视为最伟大的英格兰国王，根据一位生活于14世纪且作品广为人知的世界史作者雷纳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记载，不列颠人夸口称他们的亚瑟王是堪与希腊人的亚历山大、罗马人的奥古斯都、英格兰人的理查以及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媲美的人物。¹ 不过，我们不应将希格登这一记载视作对理查的溢美之词，他只是认为这就是当时英格兰人对理查的看法而已。此外，14世纪波尔多的《风俗之书》（*Livre des coutumes*）所记录的部分大事年表也能表明当时人们对理查的推崇：

公元542年 这年大不列颠的亚瑟王逝世。

公元827年 这年查理曼逝世。

公元813年 这年罗兰伯爵逝世。

公元1199年 这年英格兰的理查国王逝世。²

这就是那时人们观念中可与理查并称的伟人：亚历山大、奥古斯都、罗兰、查理曼和亚瑟王。

然而最近两三百年间，正统观念对理查的评判变得更加严苛。“他无疑是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君主之一。”³这样的观念无疑是基于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这些最优秀及最有影响力的早期历史学家们所达成的共识而产生的。在休谟看来，理查的行为“多受激情驱使，缺乏政治考量”，理查本人也是个“性情直爽但思虑不周、暴躁易怒且不安职守的君主”。所以，“即便在那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时代，也没人能比他更加勇敢无畏了”，理查的臣民们当然也“有理由为他统治期间持续发生的血腥暴力事件而深感忧虑”。⁴吉本则认为：“如果将冷酷无情和匹夫之勇定为评判英雄业绩的标准，那么理查无疑能够凌驾于所有时代的伟人之上。”⁵而19世纪时的伟大学者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表示：“哪怕我们再怎么体谅理查，他仍是一位失败的君主：与其说他精力充沛，不如说他焦躁不安，对战争的热爱以及为之而生的天赋更令他完全无法保持平和，他也完全缺乏谨慎处事的政治常识。”⁶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十字军史权威、英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朗西曼爵士（Sir Stephen Runciman）的观念中，理查尽管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战士”，却更是“一个不孝子，一个不合格的丈夫，一个失败的国王”；同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则将理查称作“无情少谋的骑士”（ce paladin impolitique et brutale）。⁷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理查开始被称为“同性恋者”，他作为一个不合格丈夫，一个玩忽职守、未确立合适王位继承人的冒失君主形象也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新近一项研究更是断定，“作为十字军领袖，理查是一位令人沮丧的失败者”，而且“他并非英雄，只是一个永远都想单骑决斗的莽夫”。⁸曾经位列至上英主的理查就这样成了一位无道暴君。我们又应如何解读这两种截然相

反的评价？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理查投身十字军的史实。对理查严加指责的英国史学家们批评他通常是因为他们认为理查对十字军的狂热导致他对英格兰置之不理；法国人则认为，理查对十字军活动的领导是残暴且愚蠢的，并以他在阿克城（Acre）屠杀穆斯林俘虏的行动为证据。然而，过去人们之所以将理查与亚历山大、奥古斯都、查理曼以及亚瑟王相提并论，只因为他曾领导了十字军——这正是令理查威名响彻拉丁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些参加了阿克围城战的人们坚信，他们此刻正如进行特洛伊围城战的先人们一样，置身伟大的历史瞬间之中。西方作家将1187年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灭亡耶路撒冷王国的事件视为一场亚非联军进攻欧洲的洲际战争的结果，⁹相应地，阿克围城战则被视为来自欧洲的回击。此刻，基督教世界变得如此团结一致，甚至连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这对宿敌也能为这一共同事业齐心协力。尽管那些厌恶理查的人们仍认为他傲慢无情，但理查领导的十字军更为他提供了使自己的卓越将才和绝伦勇武获得众人赞誉及拥护的世界舞台。理查的绰号也来自当时的一位吟游诗人和历史学家安布鲁瓦兹（Ambroise），他在描述理查首次目睹被围攻的阿克城及遍布城边山丘的那些“怀有摧毁基督教之心”的萨拉丁士兵营帐的情景时，第一次用了“狮心王”（coeur de lion）这个传诵至今的名号称呼理查。¹⁰此后，十字军东征的一系列传奇事件开始为人所知，萨拉丁和理查两人单骑决斗的图景也在文学作品和装饰艺术中展现。可以说，理查正是通过十字军东征跻身传奇之列，并以此名垂青史的。被认为是英格兰最古老酒馆的“耶路撒冷之路酒馆”（The Trip to Jerusalem Inn）就宣称建于1189年——这正是理查加冕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发起之年。“但是我们的国王在阿克打了场漂亮仗。”¹¹英国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写道。正如约翰·普雷斯特维奇所言：“若是忽视了那些令理查成为传奇人物的特质，我们将无法了解历史上真正的理查。”¹²理查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理查是手握王者之剑（Excalibur）踏上十字军征途的。

然而，十字军曾经争议重重，如今人们对它的讨论更是如此。从宗教意义上说，第三次十字军的目标在于收复圣城，而理查显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是否就能断言，第三次十字军或理查本人因此就一无是处了呢？在理查时代，确实有人认同这一看法。对那些认为十字军一事无成的人，安布鲁瓦兹在他的《神圣战争史》（*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中评论道：“只因为耶路撒冷没能光复，许多无知而愚蠢的人们就反复声称，他们（指十字军战士）在叙利亚一事无成。但这些人的看法是不恰当的，不过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妄加批判，对自己从未踏足之地夸夸其谈罢了。”安布鲁瓦兹的反驳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我们率先亲临其境、亲眼看见一切并在此承受苦难。以见证者之名，我们绝不会散布那些为天主之爱而受苦的人们的谣言……（那些献身于此的人们）必将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并侍立天主之右，因为他们征服了另一座耶路撒冷。”¹³ 不过，很少有现代历史学家会认同安布鲁瓦兹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理查不过是个没能收复耶路撒冷，却在阿克城大肆屠杀数千俘虏的十字军领袖罢了。¹⁴

将宗教和道德考量暂且搁置，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虽然理查没能重夺耶路撒冷，但他征服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在宗教意义上虽然无足轻重，但在战略意义上无疑比耶路撒冷更加重要。现代历史学家们往往也认为，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过度重视是他的战略错误，理查则避免了这一错误。当时他所做出的选择——征服塞浦路斯、收复巴勒斯坦的沿海城市、发起对埃及的远征——均有战略意义，它们也都可能为中东地区支离破碎的基督教据点持续带来大量收益。若理查挥兵直指耶路撒冷，他可能已经将其攻克，并迅速获得极高的声望。不过理查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也难以持久。很显然，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理查的当代人或随后时代的人们开始采用非宗教的标准对他领导下的十字军进行评判，而理查的勇武和征服事业甚至还得到了修士们的认可和赞誉。比如这位作为理查晚辈的西多会修士——奥布里·德·特鲁瓦-方丹（Aubri de Trois-Fontaines），他由于效忠法国王室，对理查的许多事迹都持明确的

批判态度，然而他叙述理查在十字军中的事迹时，则将理查以其统御和勇气在陆地和海上创造的伟业编入书中：“理查的这些伟业都值得铭记和赞誉。首先，他攻陷了墨西拿，随后又征服了至今仍被拉丁基督徒们占据的塞浦路斯，接着他又在海战中击沉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大船……再之后他解除了雅法（Jaffa）的危机。”¹⁵

即便是在面临更稳妥的选择——留在本国时，在那些曾参加十字军的人里，也不再会有人像理查一样仍然置身于极端情形之中。理查的难题在于，当他在1189年即位时，距离他与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的姐姐艾丽丝订婚已过去20年，而在这20年间，艾丽丝曾处于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的监护下，据称亨利二世没能抵制诱惑，诱奸了她。无论此事是否属实，理查都以此为理由拒绝履行与艾丽丝的婚约。但20年后将她再送回其弟处，这一举动无疑会令法国王室极大受辱，也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法王以战争相威胁，索取大量土地赔偿。在此情况下，理查不可能独自参加十字军，慷慨地给腓力国王留在后方并任意复仇的机会。另一方面，考虑到英格兰和法兰西以外的情况，理查又如何能拒绝参加十字军？西欧已经对耶路撒冷的陷落产生了极大的情绪反应，各地都将这视作基督教世界的危机。¹⁶ 尽管欧洲能够解除这一危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解除危机的难度也会逐渐增加。这样一来，作为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位做出反应的君王，理查又怎能不高举十字，将收复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理查当时无疑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一位同时代的年轻仰慕者看来，理查有着“涅斯托尔般的雄辩，尤利西斯般的谨慎”，¹⁷ 也许正因为这些特质，理查在短期内可以通过绕开它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理查与腓力两位国王一同踏上了十字军的征途。但是，这不过将理查的难题延后罢了。理查在西西里宣布与艾丽丝的婚约作废，随后在塞浦路斯与纳瓦拉的贝伦加丽娅（Berengaria of Navarre）成婚，以这一既成事实回应了腓力——一场在塞浦路斯举行的英格兰王室婚礼！这无疑令法兰西国王备受羞辱，勃然大怒，不和的种子就此埋下。当重要的阿克围城战激战正酣时，腓力尚且不敢撤军，

然而当胜利几成定局时，腓力便迅速率部脱离十字军，返回法国，决心让理查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而此时腓力面临的难题是，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攻占属于参加十字军者的地产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腓力只能将理查彻底塑造成一个凶狠而无耻的人物，并宣称理查为掩饰自己倒向穆斯林的事实，故意做出保护基督教世界的姿态。腓力的御用传记作者圣德尼的里戈（*Rigord of St-Denis*）和布列塔尼的威廉（*William the Breton*）则称，腓力是因为患病才不得不撤军的（从传到萨拉丁处的消息可知，理查在阿克围城战期间同样患病，且病势更重，他们显然隐瞒了这一事实），并称理查的举止十分可疑，进而编造出他向法王下毒和他背叛基督教的一系列故事。很快，谣言传遍整个西方，称理查曾收买萨拉森人的职业杀手“阿萨辛派”，以刺杀腓力的盟友、提尔领主蒙特费拉的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在一段时间内，腓力也绝不在没有武装护卫陪同的情况下出行，以此表明他对理查的刺客的恐惧——腓力担心这些手持长刀的刺客将跨越叙利亚进入法国，对他进行突袭。腓力在巴黎甚至建立了一个反面宣传工作室，成功地创造了有利于他入侵理查领土的舆论条件。¹⁸于是，以为了证实理查是否犯下如此大罪为借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Henry VI*）与奥地利公爵在奥地利将远征归来的理查逮捕，并将他囚禁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很快发现能够轻易利用这些被法王广泛传播的故事和谣言，于是在德意志和奥地利编年史家笔下，理查成了一个傲慢、无情而阴险的人。

理查的支持者们受到国王本人的激励，也自然对腓力的毁谤行为做出了回应。因此，在理查一生中，他始终以一个争议重重的形象置身于这场激烈宣传战的中心。奥地利、德意志、低地国家、意大利和海外诸国，以及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历史学者和编年史家们全都卷入了这场关于理查声誉的论战之中。吟游诗人吉罗·德·波尔内伊（*Giraut de Borneil*）在理查死后不久创作了一首挽歌，他在挽歌中写道：“我曾听闻，若有两人哀悼这位国王，就会有第三个人出来诋毁他。”¹⁹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后，那些最老练的政治家们，甚至许多法兰西的政治家也都认清了法

王编造谣言、文过饰非的意图。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在他的《圣路易传》（*Life of Saint Louis*）中记载了路易九世的宫廷顾问们举出理查立即投身十字军的例子，以理查作为路易应效仿的榜样，并对比了路易祖父腓力和理查二人的举止：“在阿克城被攻占的时刻，腓力国王却因逃回法国之举备受谴责。”²⁰ 从这则逸事中可以看出，那些十字军的亲历者们都对理查的成就深表赞许。这时，同代人批判理查的政治共鸣已然消散，理查的传奇事迹则依然存留，在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理查也以传奇人物和英勇的圣战士形象为人所知。²¹

但对当代历史学家而言，产生于12世纪90年代的这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扩散或虚或实信息的国际战争仍然是值得发掘的丰富资源，尽管学者们并非总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那些流言蜚语也早已流通散布开来，并逐渐生成许多甚至连编年史家都感到精彩到无法舍弃的故事。下文的例子是来自古法语著作《提尔的威廉的历史的古法语续编》（*Continuation of William of Tyre*）中收录的一个记述了理查策划谋害腓力性命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被人们视作记录海外事件的一个可信版本：

理查国王因为计划在不接触法王的情况下将他谋害之事，犯下滔天大罪。当时法王正卧病在床，理查国王前去探视。理查到达后，便向法王询问病情和身体状况。法王说他正饱受重病折磨，只求上帝恩典。随后理查国王说道：“我想告诉您您的儿子路易的事，并前来给予您安慰。”法王便问：“我的儿子路易怎么了？我为何要得到安慰呢？”“正因为他，”英王答道，“我特地来安慰您，因为您的儿子已经离世。”

事实上，留在国内的路易并未离世。这个故事的后续是：腓力询问了他的顾问和医生们，得到了“理查这么说只是希望在您病重时加剧您

的悲痛，使您一病不起罢了”这样的答复。于是，腓力便集结舰队回国了。²²

现代英国史学家们往往会因为理查未对其王国恪尽职守而批评他，但与理查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却不认同这个观点。尽管其中有些怀着后见之明的人认为，理查对其弟约翰过于慷慨，但他们都赞美了理查投身十字军的举动。如果说他们与现代史家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他们批评理查的“苛政”，而并非现代史家所说的“失职”。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和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wden）便是批评理查苛政的代表，他们经历了税赋繁重的理查统治末期，自然有极好的理由为理查“永不满足的贪欲”，以及在审判庭和森林巡回法院重压下“日渐穷困”的国家而哀叹。²³他们也承认这笔巨资是为了支持国王的正义战争所征收的，所以，虽然理查加于其封臣的沉重税负无疑有损于他的英雄之名，但理查的封臣们仍将理查看作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就像安布鲁瓦兹一样。稍晚时期的史学家们则由于不需为理查纳税之故，更易于关注理查的英雄一面。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和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则是其中对理查最为推崇的史家，他们笔下的理查全知智睿、战无不胜、至善至仁（*sapientissimus, victoriosissimus, clementissimus*）。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逸事是：亨利三世造访巴黎时，曾邀请法王路易九世到一间挂满盾牌的房间中赴宴，而理查的盾牌就挂在当中，有人开玩笑般指责这样的布置是对法王的无礼戏谑，在这面盾牌下用餐的法王除了因回忆往昔而感到恐惧、浑身发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²⁴ 这面盾牌以理查使用的第二枚国玺的图样装饰，此后这一图样也成为英格兰的王室纹章。²⁵ 这无疑也是表明理查已成为英格兰王权典范的最佳图像例证。在一首宣称于理查在世时期完成（尽管它实际上很可能完成于理查逝世后）的诗中，文绍夫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nsauf）以这样的开头向英格兰致辞：“正是到了理查国王统治的时代，英格兰方能令列国之女王——英格兰扬威四方！女王陛下！理查助您主宰世界，您的地位因这位伟大舵手坚如磐石！……理查国王正是照亮您的璀璨之星，是给您助力的支柱，并以

雷霆之势打击您的仇敌！”²⁶

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早期写作的一首诗的一句为“看啊！他的璀璨光芒宛若理查再世”（Behold he shines like a new Richard），这表明理查已成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国王们渴望追逐的目标。²⁷当然，理查也成为判定其他国王们是否合格的标准。《爱德华二世传》（*Life of Edward II*）的作者对爱德华二世的评价便是例证：

吾王爱德华已统治整整6年，至今却仍未取得任何值得赞颂或纪念的功绩。反观理查国王，他早年的统治何等不同！统治的第三年尚未结束，他的武名便已传至海外：他仅用一天便挥兵攻克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又用两周时间令塞浦路斯称臣，随后他来到阿克城下浴血奋战，令他在异国他乡的光辉事迹得以被拉丁世界和法语世界的人们广为传诵。哦！若吾王爱德华也能有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将多么幸运！²⁸

与此类似的是，《短韵文编年史》（*Short Metrical Chronicle*）中记载：爱德华一世未能履行参加十字军的诺言，这也与其先辈理查一世在东征时取得的赫赫武功形成鲜明对比。阿克城于1291年陷落，此时距离理查攻占阿克城恰好过去了100年。在阿克城陷落之日，作为英吉利民族象征的理查再度引人追思，而理查的历次亲征也宣示了英格兰人凌驾于其他民族，尤其是法兰西民族之上的至高权威。²⁹尽管14世纪时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发起战争使苏格兰人产生了对英格兰诸王的敌对情绪，然而理查的声誉却并未因此受损。富尔顿的约翰（John of Fordun）就认为理查是“对苏格兰人友善的高贵君王”，而在理查统治时期“两国建立起诚挚友好的同盟关系……两国人民也一体同心，不分彼此”。³⁰

将罗宾汉（Robin Hood）和小约翰（Little John）在英格兰活动的时期定在1193至1194年理查在从十字军征途归来、身陷囹圄时，也是苏

格兰史家约翰·梅杰（John Major）在1521年时最先提及的。³¹ 尽管随后也出现了关于罗宾汉活跃时间的其他说法，但当时最流行的仍然是约翰·梅杰的版本，这很可能与理查这位历史人物兼具传奇和浪漫色彩的特质有关。在一部以失传的13世纪法国传奇故事为蓝本、成书于14世纪的英格兰传奇故事中，理查能将手伸入狮子的喉咙，并将其心脏拔出。

³² 类似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王》（第一幕，第一景）中，法孔布里奇夫人（Lady Faulconbridge）告诉其子腓力（Philip），他的父亲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理查国王之后，剧中的主角腓力却并无责备其母之意：

母亲，我不再祈望能有更好的父亲.....

他能用强力掏出狮子的心，

自然也容易赢得一个女人的心。³³

正如腓力·法孔布里奇（Philip Faulconbridge）在剧中的情感所揭示的那样，16世纪的史学家们仍然将理查视作伟大的国王。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尽管主动使用人文主义者惯用的拉丁语写作，但他对理查的君王风度和男子气概的赞美仍是中世纪式的。他认为，理查赋予某些人的高傲印象，不过是他伟大天性的自然流露罢了；编年史家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观点与维吉尔类似，他将理查称为“值得所有王侯效仿的知名典范”；³⁴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尽管是一个坚定的反教宗者，但他却支持十字军，认为理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勇士，更是一位高贵、宽容、慷慨而富有才智的人物。³⁵ 生活于詹姆士一世统治早期的制图学兼历史学家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也将理查视为“决断英明、才思敏捷的高贵君王”，理查的统治“体现了他对英格兰人的关爱和对正义的关切”。斯皮德还为“那招致死亡阴云遮蔽凯旋之喜，令闪耀的骑士之星倏然黯淡的致命劫难”深深哀恸，而这

次使理查再也不能重返耶路撒冷的劫难也“在此时令所有基督徒深感悲痛”。³⁶

首位对统治英格兰史学界400余年的观念提出异见并开始建立评价理查的新式正统观念的学者，是宫廷诗人兼历史学家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在他著名的《英格兰历史集成》（*Col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England*）——我认为这是第一部英格兰中世纪史的经典著作——中，他对理查的评价是，“他向这个王国所索取的和消耗的财富，要远远超过自诺曼王朝以来的所有先辈君王，但他获得的成就与此毫不相称。理查不在这里生活，并没有为这个王国留下什么，他没有留下对天主虔诚的纪念物，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更没有对国民福祉表现出仁爱和关切之情，他所做的不过是掠夺一切可获得的资源罢了”。尽管萨缪尔·丹尼尔认为理查除了他的勇武一无所值，他也坦承“理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也深获他们爱戴，因而封臣们尽力为他效劳，为了赎回和保护他们的封君而不遗余力”。正如这段文字所表达的那样：

从未有过一位君王像理查一样麻烦缠身、躁动不安，导致他陷入困境的既有投身圣战的缘故，也有捍卫基督的缘故，他在圣战中遭受苦难，这使得教会对他的要求一概来者不拒，对他的事务毫不干预。而那些满足于了解理查在海外冒险中的非凡勇武和惊险遭遇（以及随后对法作战的胜利等事迹）的民众，仍然要背负日渐沉重的压力。

作为当时杰出史家的丹尼尔意识到，在他对理查一世进行批判，并穿透当代观念的樊篱探寻隐藏其后的“历史真相”时，他的观念却体现出既独具一格又时空错位的矛盾性。于是我们能看到，他在另一篇重要文章里迅速对过去的冒失言辞表示了歉意。“先祖啊，请宽恕我们！若我们曾因受到这个时代的风尚影响，而对您的事迹判断不公，这不过是我

们接受了当下观念的结果：当我们的后代讨论我们这代人时，正如我们总是认为今人比古人更有智慧，并因此妄议先祖一样，他们也会因为施展自己的想象力犯下与我们类似的错误。”³⁷

值得注意的是，在稍早的16世纪90年代，丹尼尔还不吝惜对理查的赞美。³⁸那么，他为何要在看到他人使用这种时空错位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批评后，又有意地接受这套方法呢？这或许与丹尼尔所处的宫廷情况有关。当他还是为王后的王室住宅服务的廷臣时，正在写作其史书中将要进献给当时的王后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的1612年至1618年的纪事部分，这部分在他看来是“我在尊贵的王后门下效劳期间完成的最重要部分”。应该说，他对理查的新批评是对当时宫廷斗争内容的部分反映。当时负债累累的詹姆士一世竭力抵制宫廷内部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的意见，他们迫切希望他成为欧洲大陆清教徒们反抗西班牙的“十字军”领袖。而丹尼尔对理查以“残暴压迫”征集大量财富，并在海外耗尽财富行为的批评，也无疑符合詹姆士一世宫廷的利益。

不过，当时以这样激进的新观念对这位英格兰历史上最具英雄色彩，且因传奇声名更盛的国王进行的重新解读，显然无法立刻获得所有人的支持。比如，史学家理查·贝克爵士到1641年时还认为理查“英勇、睿智、慷慨、仁慈、公正、至虔至诚，是为基督教世界福祉而生的君王”。³⁹尽管如此，这时也还是发生了一些推动丹尼尔的思路成为标准解读的事件。宗教改革使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抛弃过去人的观点，约翰·福克斯甚至说，“那个时代的任何证词都是不可信的，人们因为迷信而愚昧堕落”。事实上，在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十字军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639年，托马斯·富勒称“迷信不仅污染了（十字军的）外在，也腐蚀了它的核心”。⁴⁰富勒认为“比起一位将军，理查更像是一位挥霍民财的败家子”，随着军队统帅亲自参加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少见，这一评价显得更加尖锐。类似地，他认为阿克城的大屠杀“令理查的声望极大受损”，这一观点也成为现代观念的先导。⁴¹作为一名圣战君主的理查所具有的愿与将士们同生共死的品质，也由于不符合当时的统帅标

准逐渐不被公众认可。所以，丹尼尔将理查视为置其王国于不顾、在海外挥霍财富的君主的新观念也变得更易为人们所接受。1675年，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在为理查三世平反后，将理查一世称作“我们所有的理查国王中最糟糕的一位”，他认为理查是“不孝之子、无爱父亲、无情兄长和顽劣之君”；“上述特质也使理查在他的臣僚前毫无价值，他不仅与其臣民形同陌路，更让臣民有被外来生人统治之感”。⁴² 丘吉尔的思路也被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史家们认可，劳伦斯·厄查德（Laurence Echard）强调了理查“从未在英国驻留”这一方面。⁴³ 保罗·拉宾（Paul Lapin）则认为，理查除了对金钱贪得无厌的爱和“蛮横凶暴”的性格外毫无德行，再加上他的傲慢和贪欲，导致英格兰这片“他整个统治期间仅停留不足8个月的土地，因其统治而怨声载道”。⁴⁴ 大卫·休谟将十字军视为“所有时代以来，所有民族之中曾出现过的最为持久也最能体现人类愚昧的典型事件”，无疑，他自然也不会对这位最伟大的英格兰十字军战士有什么好感。尽管休谟承认“由于国王精湛武技赢得的荣光令英格兰人都倍感欣慰”，然而理查“鲁莽暴烈的性情”也使他“更容易以其盖世武功扬名立万，令人瞩目，却无法通过施行善政造福民众，增进名望”。⁴⁵ 休谟对理查的诠释也在随后的200年间被奉为圭臬。以至于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也未能免俗，他在《艾凡赫》中对理查统治的总结是，“为民间歌手和行吟诗人提供了题材，却不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而历史往往只青睐后者”。置王国于不顾的理查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尽管20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们也对理查的统治进行了最详尽的研究，但凯特·诺尔盖特（Kate Norgate）和莫里斯·波威克（Maurice Powicke）的研究中也只能暗含着对上述观点的质疑。普尔（A. L. Poole）则在《牛津英格兰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中提出了理查的“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观念，认为“理查将英格兰当作可以获取和透支财富的银行，以此为他雄心勃勃的海外冒险提供经济支持”。⁴⁶ 一部出版于1974年的理查传记则指出，“若以理查所处时代和他身处的具有侠义精神的统治阶层及骑士阶

层的标准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和伟大的人物。理查也作为美德典范成为他们最崇敬的人，对他们来说，理查的缺点和过失则居于次要地位”，但他继续写道，教会和市民阶层的看法则全然不同，“理查的道德缺陷招致教会指责，他荒唐的税收政策则令市民们惊恐不已”。⁴⁷到了20世纪50年代，即便是孩童在学校操场上玩“扮演狮心王理查”的游戏时，也会得到这样的教诲：“理查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王，他只关心手下的士兵。”⁴⁸

到了20世纪后期，对理查的负面看法仍然被希望影响大众观念发展的权威人士们使用。⁴⁹比如，巴里·诺曼（Barry Norman）在他的一篇题为《罗宾汉：经久不衰的角色》（The Evergreen Role of Robin Hood）的短文中指出，电影中“将罗宾汉支持的‘狮心王’理查描写为正面角色，而约翰王子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从而将罗宾汉打造为一个超级英雄。事实上理查才是个极坏的君主……约翰尽管不慎在沃什河口将王室御宝遗失，但他可能是比他兄长更好的国王”。⁵⁰正如这段文字所暗示的，16世纪时产生的理查与罗宾汉之联系，对塑造理查缺席的国王的形象适时地提供了有力支持，罗宾汉则作为保护人民，帮助他们反抗压迫的斗士，履行起国王应尽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这也是好莱坞所塑造的理查形象。1938年埃罗尔·福林（Errol Flynn）主演的电影《罗宾汉历险记》中，由福林饰演的罗宾汉成了“教导理查对其国家职责所在的不法之徒”。而1973年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出品的动画电影《罗宾汉》则将十字军归结为本性善良的理查被约翰亲王的阴险顾问西斯爵士（Sir Hiss）催眠后所做出的“疯狂之举”。20世纪时，“狮心王”（Coeur de Lion）一词也不再用于描述一位强力人士或大胃王，而成了“缺勤怠工”的同义语。“因他无论何时返回英格兰，都会立刻出发前往地中海，所以被称作‘里昂车站的理查’（Richard Gare de Lyon）”^①。⁵¹

总之，无论我们如今对发起十字军一事的看法如何，本书的目标都在于：将理查还原为一位12世纪的统治者和国王，并根据同时代人对理查功过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理查是否符合其预期的评估状况进行研究。

无疑，我们只能接触到那些被人们记录下来的观点，这些观点的记录者们常常试图提出新观点，而非仅仅转述旧观点。因此，本书关键在于阐明两个相关问题：理查本人的声誉如何？这些对立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注释

1 *Polychronicon Ranulphi Higden*, ed. C. Babington and J. R. Lumby (9 vols, RS, 1865–86), V, 336.

2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Bordeaux, v: Livre des coutumes*, ed. H. Barckhausen (Bordeaux, 1890), 396.

3 J. A. Brundage, *Richard Lionheart* (New York, 1974), 258. “最糟糕的英格兰国王之一”：J. J. Norwich, *The Kingdom in the Sun* (London, 1970), 141. “他无疑是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君主之一”，G. Regan, *Lionhearts. Saladin and Richard I* (London, 1998), 230.

4 D. Hume, *History of England*, 1871 repr. of 1786 edn, i, 261, 263, 265, 279. “每个人都阅读休谟的著作。作为历史学家，休谟的观点总会成为我们自己的观点。”19世纪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廉·史密斯如是说。Ibid., p. x.

5 E.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906 repr., vi, 350.

6 在斯塔布斯看来，理查还是一个“在长期征战中犯下杀戮罪恶的嗜血者，他更是一个不孝子，一名不称职的丈夫，一位自私残忍的君主，一个品行不端的人。”*Itin.*, pp. xvii, xxi, xxvii.

7 S.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rs*, iii (Cambridge, 1954), iii, 75. R. Grousset, *Histoire des croisades*, iii (Paris, 1936), 2. 我们不应忘记，朗西曼本人是一个“将十字军视作基督徒式荒诞狂热故事的吉本派亲希腊者”，R. Irvin, ‘Saladin and the Third Crusade: a Case Study i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M. Bentley,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97); 格鲁塞还相信，黎凡特一处丰饶的法国殖民聚落遭到类似英格兰的理查般的十字军狂热者摧毁。一位研究理查同时代人物的当代德国学者近期称，理查“算不上一位伟大国王”（war kein grosser König）。P. Csendes, *Heinrich VI*, (Darmstadt, 1993), 129.

8 M. Markowski, ‘Richard Lionheart: Bad King, Bad Crusader?’, *JMH*, xxiii (1997), 351

–65. 事实上，马尔科夫斯基写道：“从理查的时代至今，作者们和传说都十分推崇理查，这种做法所反映的作者与读者的特点要远多于它所能反映的理查的特点。”这是正确的，而且本书要研究的也是和理查同时代的作者与读者。

9 *Itin.*, Preface and Bk 1, chs. 32, 38.

10 Ambroise, 2310–20.

11 T. S. Eliot, Choruses from ‘The Rock’,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London, 1963), 180. 多亏了凯特·阿什当（Kate Ashdown）提供的参考文献。

12 J. O. Prestwich, ‘Richard Coeur de Lion: Rex Bellicosus’,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I. Nelson (London, 1992), 16.

13 Ambroise, 12, 224–56. 在安布鲁瓦兹看来，3000名如今侍立天主之右的人死于阿克围城战中的疫病饥饿，而10万名十字军战士之死是他们选择禁欲生活的结果（见下文192页）。此外文多弗的罗杰还提及一件逸事：理查曾从萨拉丁手中买回了后者攻占耶路撒冷时缴获的圣物。或许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另一个试图表明十字军在宗教意义上获得部分成功的证据。 *Chron, Maj.*, ii, 378–9.

14 “（理查）因其冷血本性制造了这起野蛮而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也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Cet acte de barbarie inouïe, perpétré de sang-froid, produit dans tout l’Islam un effet désastreux），R. Grousset, *Histoire des croisades* iii, 61–2。格鲁塞坚信理查屠杀战俘的事件既野蛮又愚蠢。

15 *Chronica Albrici Monachi Trium Fontium*, MGH SS, xxiii, 869.

16 想了解1187年对十字军历史的重要意义，可参见C. Tyerman, *The Invention of the Crusades* (London, 1998), 26–8。

17 *Itin.*, Bk 2, ch.5.

18 Kessler, 191–9.

19 *The cansos and sirventes of Giraut de Borneil: A Critical Edition*, ed. R. V. Sharman (Cambridge, 1989), 475, 478.

20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N. de Wailly (Paris, 1868) 28, 199; 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M. R. B. Shaw (Harmondsworth, 1963), 183, 304. 关于理查和圣路易的另一类比，可参见如下评论：“在对国家的认知方面，农民倾向于追随一位理想而可信赖的统治者，而英格兰的理查一世或法兰西的路易九世便是他们时常提及的典范。”C. Wickham, ‘Gossip and Resistance among the Medieval Peasantry’, *Past and Present*, clx (1998), 22.

21 ‘Il buono re Ricciardo’, in *Il novellino*, ed. G. Favat (Genoa, 1970), 302–3. M. H. Jones

s, 'Richard the Lionheart i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D. Hook, 'The Figure of Richard I in Medieval Spanish Literature', both in Nelson, *Coeur de Lion*; C. Edwards. 'The Magnanimous Sex-Object: Richard the Lionheart in the Medieval German Lyric' in *Courtly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ontext*, ed. K. Busby and E. Kooper (Utrecht Publication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xxv, Amsterdam, 1990).

22 Edbury, 108–9. 朗西曼认为, 且不论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属于与理查相关的“大量滑稽故事之一”, 这一故事都产生于腓力仍在阿克城的时期, 腓力也因此故事坚定了他撤军回国的念头。Runciman, *History*, iii, 52. 欲了解关于此故事的不实性及晚近成型的论述, 参见P. W. Edbury, 'The Lyon Eracles and the Old French Continuations of William of Tyre', in *Montjoie: Studies in Crusade History in Honour of Hans Eberhard Mayer*, ed. B. Keder, J. Riley-Smith and R. Hiestand (Aldershot, 1997)。

23 Coggeshall, 92; *Chron.*, iv, 62–3.

24 *Chron. Maj.*, ii, 354; iii, 213; v, 478f.

25 A. Ailes, *The Origins of the Royal Arms of England* (Reading, 1982).

26 对这段诗句的翻译基于*Poetria Nova of Geoffrey of Vinsauf*, trans. M. F. Nims (Toronto, 1967), 28–31。关于杰弗里在理查逝世后的著名挽歌, 可参见下文445——446页。

27 *Thomas Wright's 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 ed. P. Coss (Cambridge, 1996), 128.

28 *Vita Edwardi Secundi*, ed. N. Denholm-Young (Edinburgh, 1957), 39–40.

29 关于本段文字的讨论及理查作为“勇猛的英国骑士”(doughty knights of England)的爱国领袖, 他在西西里岛用“英格兰出产的木料”建起一座攻城塔楼的事迹, 可参见T. Turville-Petre, *England the Nati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1290–1340* (Oxford, 1996), 120–4, 130–1。

30 John of Fordun, *Cronica Gentis Scotorum*, ed. and trans. W. F. and F. H. Skene (Edinburgh, 1871), ii, 269–71.

31 J. Mayor, *Historia maioris Britainniae* (1521), trans. A. Constable, *A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Scottish History Society, x, 1892), 156–7.

32 *Der mittellenglische Versroman über Richard Löwenherz*, ed. K. Brunner (Vienna, 1913). ll, 880–1100. 另见下文363页。

33 关于戏剧中典型国王和典型臣民形象的分析, 可参见O. de Laborderie, 'Du Souvenir à la réincarnation: l'imag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dans la *Vie et Mort du Roi Jean* de William Shakespeare', in Nelson, *Coeur de Lion*, 141–65。

34 Polydore Vergil, *Anglicae Historiae*, Liber xiv (1649 edn), 340; R. Holinshed,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London, 1807, reprint of 1586 edn), 266, 270–1.

35 John Foxe, *Acts and Monuments* ii, part 1 (1854 edn), 302–3, 317, 319.

36 John Speed, *The Histori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611), 473, 477, 481.

37 S. Daniel, *The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 (London, 1621), 101–2, 107. 然而，我并不认为在丹尼尔之前没有英格兰史学家对理查进行过批评，我的观点是，丹尼尔是第一位从基本负面的角度看待理查的学者。

38 在丹尼尔的《内战记》（*Civile Wars*）第一版中，作者赞美了理查的征服伟业，并认为理查使英格兰摆脱“初生号哭的幼儿期”，获得了进入青年期的力量。Daniel, *Collected works* 5 vols, ed. A. B. Grosart (London, 1885–96) ii, 16–7.

39 R. Baker,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London, 1641), 67.

40 转引自C.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095–1588* (Chicago, 1988), 5。若想了解关于英格兰十字军理想逐渐消退的详细分析，可参见ibid., 341–7。

41 T. Fuller, *The Historie of the Holy Warre* (3rd edn, Cambridge, 1647), 123, 127.

42 W. Churchill, *Divi Britannici* (London, 1675), 215–16. 丘吉尔在此书中仍然保持了丹尼尔以当代标准评判过去历史的观念——“尽管后世的人们避免将关于他的记忆模糊化，不过在当代也没理由继续崇拜他了”。

43 “尽管他有许多高贵的品质，然而英格兰在他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对财富持续不断的需求，若他不在英格兰，他手下贪欲惊人的司法官们也会大肆盘剥以满足主君。事实上，理查整个统治期间从未在英格兰停留超过8个月的时间。”L. E. char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707), 229.

44 Paul Rapin de Thoyra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732), 257.

45 *History of England* (as n. 4), 162, 279; W. Scott, *Ivanhoe* (London, 1933), 455.

46 A. L. Poole, *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2nd edn, Oxford, 1955), 350.

47 Brundage, *Richard Lionheart*, 263. 布伦戴奇认为“现代的学院派史学家更倾向于对教士和商人们的意见持同情态度”。

48 L. Du Garde Peach, *Richard the Lionheart* (Ladybird History Book, London, 1965), 46. 发生在操场上的情景可参见A. Bridge, *Richard the Lionheart* (London, 1989), 244.

49 对这一问题，我曾以拙著*Richard the Lionheart* (1978, 2nd edn, 1989)对此看法提出质疑，而我相信这已取得一定成功。不过我所关注的是理查作为阿基坦公爵和他在法兰西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时下流行的、将他视作参加十字军的英格兰国

王这一看法，事实上我对此避而不谈，不打算直接讨论。

50 *Radio Times*, 15–21 February, 1997.

51 W. C. Sellar and R. J. Yeatman, *1066 and All That* (London, 1930), 23.

① 里昂车站（Gare de Lyon）是巴黎市中心的火车站，十分繁忙。它的发音与法语的狮心王（Coeur de Lion）十分相近。此处指理查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

第二章

穆斯林眼中的理查

西方基督教世界关于理查功过是非的宣传战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从某种角度来说，对理查品性和才干最为公正的评判很可能来自与基督教世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敌人：穆斯林，他们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斗争漠不关心。至少有三位与理查同时代的穆斯林史学家——伊马德丁（Imad al-Din）、巴哈丁（Baha al-Din）和伊本·安西尔（Ibn al-Athir）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争斗。其中，伊马德丁和巴哈丁两人对这位英格兰国王的政治品格有着特别的关注。作为萨拉丁总部的成员，他们都专注于这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持续征战，帮助他们的苏丹制定击败理查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并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巴哈丁与萨拉丁的关系尤其紧密。¹ 因此，他们二人有充分理由密切留意理查的策略，并试图了解他的真实面貌——毕竟此前并没有其他的英格兰国王，或是中世纪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像理查一样，被来自世界另一侧见识广博的观察家们以他们的视角研究过。显然，作为萨拉丁的拥护者，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理查塑造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劲敌。否则，他们又将如何解释萨拉丁在阿克、阿苏夫（Arsuf）和雅法被理查击败的原因呢？但是还有一个或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眼中，理查是因何而令人生畏的？而第三位史学家，摩苏尔的伊本·安西尔的立场与前两位完全不同

，他以对萨拉丁的冷淡态度和批判观念著称，并在数个世纪中享有“最为出色的伊斯兰史学家之一”的声誉。² 萨拉丁无疑是伟大的伊斯兰教捍卫者，但在伊本·安西尔眼中，萨拉丁还是策划推翻摩苏尔的赞吉王朝（Zengid dynasty）的阴谋家，而这也也许就是他将理查而非萨拉丁称作“我们时代最为非凡的人物”的原因。³ 当然，我们仍有疑问：为何一位摩苏尔的史学家会将理查视作如此非凡的人物？

他们不可避免地首先将理查视为军事统帅——从很多方面来说，他是基督教世界的萨拉丁。因而，我们在研究他们对理查的态度时，应当考虑到他们对萨拉丁的看法。巴哈丁这样描述萨拉丁：“他怀着真正的激情以真主之名发动战争，他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并为此竭尽心力。他不谈论战争之外的事情，他所考虑的一切都与战争事务相关，他的士兵们也都万众一心。”⁴ 当理查向阿克城进军时，巴哈丁将他称作是“法兰克人之中极为强悍的人物，有着出众的勇气和伟大的灵魂。他曾经历数次伟大的战役，并显示出对战争的强烈热情”。⁵ 随后，当理查开始围攻阿克城时，巴哈丁则评论称“他有着非凡的胆略、明智的判断力、广博的见识和永不满足的雄心”。⁶ 不过，现代的理查传记作者时常指出，即便穆斯林也会批评他过度的匹夫之勇，他们的根据是发生于理查最信任的顾问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和萨拉丁之间的一次对话。休伯特·沃尔特在这次对话中赞美了理查的勇猛无畏、骑士风度和慷慨大度：

“阁下，我要在此自豪地宣称：

我的主君便是这世上最优秀的骑士……”

苏丹听完主教的发言后

答道：“我相信

你们的这位国王确实勇敢高贵，

但他总是使自己陷入冒失轻率的境地！

我想，一位伟大的君王更应当

保持理性、克制和慷慨，

而不应过度炫耀自己的勇武。”⁷

事实上，这是一番安布鲁瓦兹杜撰的对话，换言之，这是来自一位理查追随者而非穆斯林敌手的言论。这无疑能成为理查的顾问们批评他匹夫之勇的绝好证据。⁸但穆斯林们的看法也是如此吗？

若萨拉丁的拥护者们也是这么看待理查的，那将是令人惊讶的。巴哈丁将苏丹描述为不仅对战争有着强烈热情，而且英勇无比的人物。“苏丹是一切勇者中最勇敢者。当我们靠近敌阵时，苏丹总是坚持要每天对敌阵进行一两次侦察。当两军激战正酣时，他习惯于在一位年轻侍从的陪同下策马穿越两军阵线。”萨拉丁的顾问们一度也认为他这种以性命冒险的行为过于莽撞。“我们试图劝他放弃这样的行为，因为他总是只带着很少的人随侍在旁，而提尔的法兰克人已经全副武装，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行为。然而苏丹对我们的规劝却毫不在意。”而“伊斯兰坚城”（the bulwark of Islam）萨拉丁对那些指责他拿自己性命冒险的人们则是这样回应的：“对我来说，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形不过是迎来自己最崇高的死亡罢了。”⁹此外，上述三位穆斯林史学家都记录了理查在一次骑马外出巡视时，几乎落入敌手的著名事件——多亏理查手下一位富有牺牲精神的随从勇敢地挺身而出，巧舌如簧地说服了这些攻击者，使他们相信了他才是真正的理查国王，理查这才幸免于难。不过他们的记录中并没有对理查是否过于冒失进行评价，只是解释了理查远离他的主力部队外出巡视的原因：理查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那些履行其职责的伐木者和征粮员，不仅因为他们对军队必不可少，也是为了防止他们陷入被附近敌军攻击的危险境地。¹⁰

巴哈丁还有另一次关于理查夜间策马出营的记录，不过这回他是为了侦察穆斯林主力部队的位置。此事发生于1192年6月，当时在耶路撒冷城内的萨拉丁正下令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率领一支援军从埃及前来解围。显然，理查必须尽力阻止这两支穆斯林军队会师。当受雇于理查的贝都因人（Bedouins）告诉他，这支来自埃及的军队正在一处易受攻击的绿洲地带宿营过夜时，“理查起初并不相信这个消息，不过他还是带上卫队跟随贝都因人出发了。当理查靠近营地时，他将自己打扮成贝都因人的样子，并绕营巡察了一圈，直到他欣慰地发现营中已万籁俱寂，所有人都睡下为止”。随后，理查在拂晓时对这支前来解耶路撒冷之围的军队发起猛攻，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这无疑是一场最为可耻的失败，”巴哈丁写道，“伊斯兰世界已经很久没有遭遇过如此严重的灾难了，再没有比这更令苏丹悲伤和焦虑的事件了。”¹¹ 我们暂且不论理查夜晚乘马巡察埃及军队营地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根据穆斯林文献中对理查声誉的记载，他们相信这类事情正是理查会做的，而他们之所以对此坚信不疑，也是因为理查确实会偶尔为之。

让我们重新审视1192年8月1日的一系列事件。此前萨拉丁出其不意地进军并攻陷了雅法的城区，只有基督徒控制下的要塞仍在继续抵抗。这时，理查的舰队恰好抵达。巴哈丁记录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双方激战正酣时他就在现场。“我们在拂晓时听见了法兰克人的号角声。苏丹立刻将我召来，对我说：‘他们的援军果然从海上来了，但在海滩上有足够的穆斯林军队能够阻止他们登陆。’”然而萨拉丁失算了。“当理查国王听到要塞仍在坚守的消息，他便下令向海岸全速前进，国王的旗舰率先靠岸，这艘船被漆成红色，甲板上有着红色顶篷，船头还升着一面红旗。在我们的注视下，其余的士兵仅用了不足一小时便从所有桨帆船上登陆完毕。随后这支援军向我军发起冲锋，我军被打得四散奔逃，被他们逐出港口。目睹此景，我迅速将这一消息禀报了苏丹。”¹² 萨拉丁闻讯，立刻后撤至凯撒里亚（Caesaria）。三天后，萨拉丁意识到，趁夜色进军可以在理查的后续部队尚未抵达，身边只有少量军队的情况下对

他发动奇袭，于是他率兵折返。巴哈丁记载了随后的事件：

苏丹在当天夜晚继续进军，在拂晓时分突然出现在雅法城下。英格兰国王此刻正在雅法城墙之外宿营，他的身边只有17名骑士和大约300名步兵。然而在听到第一声警报后，这个勇猛无畏、在军事方面有绝佳判断力的可怕家伙便立刻策马出营。不过他并没有向雅法城内后撤，¹³ 而是选择直接迎击。此时除了朝向大海的一面外，穆斯林军队已经在其他侧面将理查团团围住。不过理查还是命令他的部下摆好了战斗阵形。苏丹因为急切地希望利用己方的兵力优势，便下达了冲锋的命令。但是在死战不退的法兰克人面前，我军将士战意低落，他们只将包围圈稍稍后退，与敌军营帐拉开距离。那时我因为生病与辎重队一同留在后方，没能参战，不过有亲临战阵的人告诉我，理查手下最多只有17名骑士——实际上可能只有9名，步兵的数量则少于300人——尽管也有另一些人宣称是1000人左右。苏丹见状暴怒不已，于是他向各个团队许诺，如果他们重新向敌军冲锋将有重赏，却无人响应。苏丹见他的部下皆无战意，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无法继续在此地驻留了：御驾亲征的苏丹被一小撮敌军蔑视，这无疑会使他的名声极大受损。于是他愤怒地离开了战场。那天的亲历者还向我保证，他们亲眼看见了英王手持骑枪，沿着我军阵线从右向左地策马奔驰而过的情景。然而我军却连一位敢于离开本阵应战的勇士都没有。¹⁴

从巴哈丁记载的这两个事件来看，理查的胆略可说是强有力的武器。在1192年6月时，理查的胆略帮助他获得了有用的准确信息，而在同年8月，他的胆略又成功震慑了敌军。理查的传奇形象也通过这些故事逐渐建立起来。这一传奇形象不仅伴随他的一生，也长存于他的敌人们心中。¹⁵

然而，令穆斯林恐惧的不只是理查的英勇气概，理查的政治手腕和外交技巧也令他们心生畏惧。“这个可怕的家伙是多么地诡计多端啊！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往往会采用先兵后礼的策略。愿真主保佑穆斯林们粉碎他的阴谋，在我们的敌手之中，还从未见过比他更勇敢、更狡诈的人物。”伊马德丁还补充道：“他总是在缔结条约后将它弃如敝屣，他总是在许下诺言后又出尔反尔，每当我们相信‘他这回一定会遵守信用’时，他却再度失信。”¹⁶ 不过从伊马德丁和巴哈丁的叙述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传奇英雄理查的形象并不完全符合人们预期的一面，即在巴勒斯坦停留期间，率先发起外交对话的人总是理查，他持续地寻求与穆斯林建立外交联系，并接连不断地向萨拉丁的营帐派去使臣。由此看来，理查似乎对探讨和平与发起战争都有着同样的热忱。不过，穆斯林方面总是认为：理查只是在利用议和手段为自己争取时间罢了。“对我们来说，”巴哈丁写道，“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这次的会谈又会像过去的会谈一样，变成这位国王用于争取时间的手段。不过这时我们已对他的伎俩了如指掌。”¹⁷ 穆斯林们十分清楚理查这套把戏，毕竟他们也时常使用这种方法达成相同的目标。双方也都清楚，进行和平会谈的用意之一就是获取对方的信息。“敌方与我方大使频繁会面的目标在于确定我们的精神状态，弄清楚我们更倾向于抵抗或让步；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同样的动机了解敌方的信息。”¹⁸

尽管如此，理查总是在外交上居于主动，提出新的建议的做法仍然令人惊讶。1191年6月，理查抵达阿克城不久后，他向萨拉丁派出了一位使者。“理查向我们派来一位使者，他向我们传达了理查的口信：按惯例，如果两位国王有幸彼此相邻，那么双方应当互赠礼物，现在他便应陛下之托带来一份值得苏丹接受的礼物，他在此请求将它献给苏丹。”¹⁹ 此后双方互换礼物也成为惯例。²⁰ 理查之所以这么做，与他不稳定的身体状况有关，当时他饱受疟疾困扰。根据巴哈丁的记载，“国王持续派出使者请苏丹给他送来水果和冰雪，因为他当时身患疾病，迫切渴望梨子和桃子。苏丹也常常给他送去一些，希望通过这些频繁的交流往

来获知他迫切需要的信息”。²¹

不过，更引人注意的还是理查外交风格中令穆斯林们震惊的方面。在1191年6月18日（理查抵达阿克城10天后），理查的使臣来到穆斯林营中，“表示英格兰国王希望与苏丹进行一次会晤”。不过萨拉丁拒绝了，他对使臣说道：“按惯例国王之间无须会面，除非他们此前曾确定了双方签订条约的基础。因为他们在进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还要给予对方相互信任的象征，他们不会对另一方发动战争。我认为，在会面前首先做好这些准备措施是十分必要的。”²² 1191年11月，理查再次请求与萨拉丁的“首脑峰会”，却再次无功而返。²³ 不过理查还是成功地与萨拉丁的兄弟、对他最有影响也最可信的顾问阿迪勒（al-Adil，他也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最终成了萨拉丁的继承人）进行了多次会面。双方的首次会面是在1191年9月5日，但第一次会面时阿迪勒轻蔑地拒绝了理查的提议。²⁴ 不过理查在随后数周与阿迪勒谈判时，还是将他称作“我的朋友和兄弟”。²⁵ 他们在11月8日再次会面。“当英格兰国王来到阿迪勒的营帐与他见面时，得到了阿迪勒最高规格的接待。随后理查邀请阿迪勒来到他的营区，并设下宴席，以他认为最符合阿迪勒口味的特色菜肴招待对方。阿迪勒享用这些菜肴，理查和他的随从们也享用了阿迪勒为他们准备的菜肴。”后者“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多样的饮品以及许多宜于王侯间相互赠送的华贵礼物。最终，他们建立起诚挚的情感，并怀着对彼此的相互信任 and 良好祝愿向对方告别”。²⁶ 伊马德丁还记载，在理查离开前“他们轻声交谈了很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理查是在阿迪勒心腹官员的陪同下离开的。²⁷ 不过此后他们再未进行会晤，直到1192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和约。和约达成后阿迪勒来到雅法，尽管当时理查身患重病，但还是坚持与阿迪勒见面。²⁸

根据巴哈丁的记载，另一位理查费尽心思与之打交道的穆斯林是阿迪勒的宫廷大臣阿布·伯克尔（Abu Bekr）。阿布·伯克尔在某次呈交给萨拉丁的文书中，记录了他与理查的一次私密谈话的主旨，介绍了“他恰巧与理查国王独自相处时的谈话”。²⁹ 在莱昂（M. C. Lyons）与杰克

逊（D. E. P. Jackson）对萨拉丁的研究中，他们注意到理查“在海岸地带停留显然是为了维系他与穆斯林显贵们的联系”。³⁰ 在此方面最为鲜明的例证便是1192年8月1日时，理查在雅法海岸成功实施他无畏的登陆计划后数小时内与穆斯林的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中理查邀请阿布·伯克尔和其他一些穆斯林首领与他会面。会面时穆斯林们发现，理查身边的陪同者是一些在阿克城被俘虏的马穆鲁克（Mamelukes）显贵们，这些马穆鲁克“得到了英王诚挚友好的招待，他们也时常应英王之召与他见面。英王谈吐亦庄亦谐。此外他还说道：‘你们的苏丹十分强大，在伊斯兰世界中亦无人能出其右。那他为何一见到朕的身影就要退避三舍？以天主之名起誓，朕抵达此地时甚至都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你们看，朕现在还穿着水手靴呢。’随后他又说道：‘以至高至善的天主之名起誓，朕起初还认为你们的苏丹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攻陷雅法，然而他只用了两天就做到了。’”³¹ 在这一会面中，理查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仍然惯于以亦庄亦谐的口吻进行谈话，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仅调侃了萨拉丁在早晨的举动，还嘲弄了自己早些时候对萨拉丁的轻视。不过，证据显示，理查在谈判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事件中亦庄亦谐的口吻。因而在巴哈丁的记录中，当理查第一次提出互赠礼物时，阿迪勒“十分清楚应以何种语气答复，于是也以戏谑的口吻回应”。³² 理查也正是在此情形下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议和条件：实现阿迪勒和理查之妹琼（Joan）的联姻。出乎所有顾问的意料，萨拉丁立刻接受了这个提议。不过深知内情的巴哈丁给出了解释：“这不过是理查计划中愚弄和欺骗他的手段罢了。”当琼表示拒绝与一位穆斯林结婚后，理查说，阿迪勒说不定会成为一名基督徒呢。这无疑又是理查的一句戏言，不过在巴哈丁看来，“理查的这些言论仍保留了双方未来谈判的可能”。³³ 理查就是这样时常寻求与其敌手的会面，他对自己个人魅力、交涉能力和高层会晤中的外交技巧拥有强烈的自信。

不过，这些由巴哈丁所记录的体现理查与萨拉丁部分顾问和官员间的相对缓和甚至十分融洽的关系的证据也令人费解：我们应如何理解与

此截然相反的那些对理查背信弃义的控诉呢？某种程度上，穆斯林们仍然将理查视作不守信义的人，原因只在于他是以背信弃义著称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³⁴同时，较早前理查在十字军中所做的两件事，也使穆斯林加深了对理查的这种成见。第一件事是理查对塞浦路斯的攻占。理查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征服塞浦路斯，除了通过欺诈手段将其统治者擒获之外可能别无他法。³⁵更为重要的第二件事，则是理查在阿克城投降后对城内俘虏的大屠杀，双方互不信任无疑也是导致这场大屠杀的重要原因之一。³⁶它们也都发生于理查与阿迪勒的首次会面之前，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双方或许希望通过这次会面建立起此前从未存在的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在类似的会晤进行之前，萨拉丁曾评论道：“在这样的场合中，做出相互信任的模样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为了维持互信的氛围，理查也做了许多努力，如伊马德丁所言：“他持续地向我们保证与阿迪勒的友谊，并表现出他的真挚情感。”然而，比巴哈丁更为多疑的萨拉丁内廷大臣对此却并不相信，对他来说“这不过是带着重罪和背信的箭矢罢了”。³⁷有时，穆斯林还是做出了同样的善意回应：“既然你怀着如此诚意信任我们，那么理当善有善报，苏丹也会把你的外甥当作他自己的儿子看待的。”这正是1192年7月萨拉丁对理查的直接答复。³⁸至少此后没再发生任何大屠杀。

无疑，理查与伊斯兰世界间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都是他进行政治考量后的结果。一位好战的十字军领袖竟对穆斯林文明兴趣盎然，这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此，仅在穆斯林史料中提及的两件逸事至少为我们理解理查的性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当理查通过一次拂晓突袭击溃埃及军队并掠夺其战利品时，一位名叫哈拉维（al-Harawi）的地理学者和旅行家的笔记也被夺去。当发现这些笔记并没有任何军事机密内容后，理查非但没有将其视作无用的呓语并毁掉它们，恰恰相反，理查找出了作者，他私下里还向哈拉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哈拉维能够前来十字军营地，那么这些被掠去的财物将被归还给他。但哈拉维并未应邀前来。而这不过是理查诸多未获成功的主动结交的举动之

一。³⁹ 另一逸事则来自伊本·安西尔，他记录了1191年11月8日与阿迪勒会面时理查表现出的吟游诗人特质。理查国王“询问阿迪勒能否让他听些阿拉伯的歌曲，于是阿迪勒让一位带着六弦琴的女子在英格兰国王面前歌唱，理查也对她的表演十分满意”。⁴⁰

虽然理查与穆斯林领袖们保持了友好关系，但理查与穆斯林建立互信的尝试却引发了他与其他十字军间的相互猜疑。巴哈丁的记载表明，当理查计划与萨拉丁的首次会晤时，“全体法兰克贵族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举动将对基督教事业带来危害”。⁴¹ 巴哈丁的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基督教世界史料的证实。在理查的英雄气概和举世闻名的战功之外，理查与伊斯兰世界进行交流的开放态度也可悲地成为诸多流言蜚语产生的肥沃土壤，不久后，将他逮捕监禁的教友们还会将这些流言蜚语作为监禁他的依据。

注释

1 作为萨拉丁的文书，伊马德丁主要负责起草条约，并处理萨拉丁的官方信函（因此他有着修辞高度华丽的文风）；显然，他的叙事风格并不像巴哈丁那么坦白直率。比如，伊马德丁评论理查在阿苏夫之战的大胜时（见下文247至249页）称，“假如法兰克人没能在城内找到庇护所的话，他们早就被彻底击败了”。Imad al-Din, 344. 巴哈丁则并不试图隐瞒这次惨重的失败，他更乐于与萨拉丁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他有时也会强调这种关系。下边这段文字便是一例：“这天（1191年9月22日），我因为受微疾困扰，整天都无法随侍在他（萨拉丁）身旁。尽管有许多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他还是三次问我的健康状况。”Baha al-Din, 299–300.

2 H. A. R. Gibb, ‘The Arabic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Saladin’, *Speculum*, xxv (1950), 58–72.

3 Ibn al-Athir, 43.

4 Baha al-Din, 24; Gabrieli, 100. [此处引用的段落也见于加布里埃利（Gabrieli）《十字军时期的阿拉伯史学家》（*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一书中的翻译节选，而我通常会引用这一书中的译文，因为它比其余版本都更容易获得。] 当然，巴哈丁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极力强调萨拉丁有着许多其他与理查截然不同的品质。

5 Gabrieli, 213.

6 Baha al-Din, 249. 很遗憾，我无法阅读阿拉伯文，只得依赖有译本的阿拉伯文史料，而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一。比如，上文采用了威尔逊（Wilson）的译文，加布里埃利对此句的翻译则是“这的确是一位兼具智慧、见识、勇气和活力的国王”，Gabrieli, 214。

7 Ambroise, 12, 134–52.

8 然而连理查本人也以自夸的口吻否定了他们的建议。

9 Baha al-Din, 21–7; Gabrieli, 97–102.

10 Baha al-Din, 302; Imad al-Din, 347（数周后可见类似的记录）373; Ibn al-Athir, 52。

11 Baha al-Din, 343–5. 更详尽的叙述可参见284至285页。

12 Baha al-Din, 368–70.

13 此时理查的困境在于，他身边的部队数量不足以守住城墙。

14 Baha al-Din, 36, 375–6. 伊本·安西尔还听说了理查在穆斯林军队的注视之下镇定地用餐的故事。Ibn al-Athir, 64.

15 无疑，当萨拉丁的部队拒绝向雅法进军时，已处在萎靡不振的状态。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类故事从维持己方士气和动摇敌方士气两方面强调了军队士气的双重意义。

16 Baha al-Din, 359; Imad al-Din, 354.

17 Baha al-Din, 383–7. 着重说明的是理查争取时间的方法。

18 Baha al-Din, 257.

19 Ibid., 256–7. 萨拉丁的兄弟阿迪勒代表苏丹接受了礼物，“前提是他（理查）会接受我们送出的等价回礼”。

20 法王腓力也得到了萨拉丁的赠礼，尽管此时他已在回国途中，萨拉丁赠礼则是为了了解腓力的计划，苏丹的传记作家们也认为此事值得一提。Baha al-Din, 271; Imad al-Din, 328. 根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在阿克围城战期间，萨拉丁“频繁地向英王和法王赠送来自大马士革的梨子及其他许多当地的水果，此外还有许多小的赠礼，他希望能以此跟对方议和”，*Gesta*, ii, 171; *Chron.*, iii, 114. 豪登直到7月才抵达阿克城，而此时理查开始的礼物往还模式已经建立起来。

21 Baha al-Din, 379. 理查对获得来自萨拉丁的食物和饮品的迫切需求，与法王腓力

对其中毒药的恐惧形成鲜明对比。

22 1191年11月，萨拉丁也意识到，找到一位能被双方都信任的翻译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Baha al-Din, 252, 351; Imad al-Din, 309.

23 实际上，这场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会谈并没有发生过，尽管1191年6月时他们一度十分接近达成会谈的意向。Baha al-Din, 256, 321. 另外我们不应应对巴哈丁这种惊讶的态度感到奇怪，理查在1191至1192年的谈判中所做出的提议，是在此前的西欧-穆斯林关系中从未有过的。M. A. Köhler, *Allianzen und Verträge zwischen fränkischen und islamischen Herrschern im Vorderen Orient* (Berlin, 1991), 354.

24 Baha al-Din, 287; Imad al-Din, 339–40.

25 Baha al-Din, 304, 307–8, 310–11; Imad al-Din, 378.

26 Baha al-Din, 320.

27 Imad al-Din, 353.

28 Baha al-Din, 384.

29 Ibid., 371–2, 377–80.

30 Lyons and Jackson, 351–52.

31 Baha al-Din, 371–2.

32 Ibid, 257.

33 Ibid., 304, 307–8, 310–11. 事实上，这些看似可笑的联姻提议中还包含了关于向这对幸福新人赠予土地的讨论事项，而他们的结合也有助于促进双方未来最终和议的签署。

34 参见Ibn al-Athir, 46–7的类似记载。伊本·安西尔还提及康拉德对理查的背信举动十分畏惧，见ibid., 51。然而他们断定蒙特费拉的康拉德是比理查更会背信弃义之人（见下文259页）。

35 Imad al-Din, 292；另见Ibn al-Athir, 43。然而在巴哈丁关于理查征服塞浦路斯的简短记录中，并未提及使用欺诈手段一事。总体上，与伊马德丁相比，巴哈丁较少关注理查的背信方面。

36 另一根本原因是，相对来说，基督徒对穆斯林的死伤情况漠不关心。对此事更详细的分析见下文232至233页。

37 Imad al-Din, 378.

38 Baha al-Din, 355.

39 Lyons and Jackson, 351–2.

40 Ibn al-Athir, 53. 法语中的对应词是“guitare”。

41 Baha al-Din, 256.

第三章

阿基坦的理查，1157——1172

理查体现出的那些令穆斯林印象深刻的政治特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法兰西，尤其是在他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领地阿基坦成长时就已形成的。理查在阿基坦度过了他少年时光的大半，并从1172年起成为阿基坦公爵。由于他的父亲亨利二世来自法国的安茹，从理查的家谱中找到一位有英格兰血统的祖先十分必要，而亨利二世将理查的血统追溯到他的曾祖母之一、亨利一世国王之妻伊迪丝（Edith）身上。这支与安茹王室相连的英格兰血脉尽管较为微弱，但它依然在欧洲王侯的宫廷间广为人知。家族渊源在理查生活的时代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着个人命运，还左右着诸多地区和王国运势的走向。当时一位对此颇有研究的学者、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迪切托的拉尔夫将理查的谱系从伊迪斯进一步上溯至威塞克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以及塞迪克（Cerdic），并通过他们将谱系再延伸至奥丁（Woden）和诺亚（Noah）时代。¹ 尽管理查的英格兰先祖们声名显赫，甚至日耳曼人的战神也位列其中，但他们对生于英格兰的理查而言却几乎毫无意义。理查于1157年9月8日生于牛津，地点很可能就在博蒙宫中。幼年的理查以戏谑的口吻将自己称作异教恶魔的后代，不过，这并非对其先祖奥丁不敬的言论。

理查所指的其实是安茹传说故事中的“梅露辛”（Mélusine），这位绝色美人嫁给了一位安茹伯爵，并为他生了四个子女。对她本人及其婚姻的所有描述都完美无缺，除了以下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她厌恶进入教堂，也对出席领取圣体的祝圣礼十分抵触。那些嫉恨梅露辛的言论也反复地对伯爵提及这些事实，最终伯爵决定对她进行考验。伯爵将他的妻子叫来教堂参加礼拜，在祝圣礼进行时，梅露辛打算离开教堂，但她被四名士兵阻止了。但当士兵们抓住了她的斗篷时，她将斗篷从肩上抖落，怀抱着她的两个孩子从窗口飞了出去，此后她的丈夫和另外两个被她留在丈夫身边的孩子便再没见到她。² 理查的言论实际上表明：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传奇的家谱，对他而言更加亲近的都是来自法兰西西部，而非来自英格兰或诺曼底的家系。

至于理查双亲的结合，也是有着当时少见的强烈政治影响的婚姻。这桩婚姻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理查的人生。亨利与埃莉诺的结合是在1152年5月，当时距离埃莉诺结束与法王路易七世的第一桩婚姻不过8周时间。作为疆域广阔、占现代法国领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阿基坦公国的继承者，埃莉诺将这份令其新任丈夫财富和声望倍增的巨大赠礼带给了亨利。³ 这一选择也显然会令她的前夫路易七世震怒不已：毕竟亨利当时已身兼安茹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他从父亲杰弗里·金雀花（Geoffrey Plantagenet）那里继承了安茹领地，⁴ 又从他的母亲玛蒂尔达（Matilda）那里继承了诺曼底。此时他又与埃莉诺结婚，并以埃莉诺丈夫的身份统治了阿基坦，他的实力显然已经跃居法王之上。尽管法理上作为伯爵和公爵的亨利仍然要向法王效忠，但他与埃莉诺的婚姻仍令路易七世倍感不快。在路易七世看来，这无疑是本末倒置。⁵ 除此之外，作为前任英王亨利一世的孙子、英格兰王位有力争夺者的亨利二世也令路易七世更感恐慌。虽然路易七世离婚后仍然保持着阿基坦公爵的派头，并仍然将前妻视作他的被监护人，但正統的阿基坦女公爵、30岁的埃莉诺在目睹其前夫懊悔不已的情形时，感到十分自在。两年后，英王斯蒂芬被劝服，接受亨利作为自己的继承人。1154年12月

，亨利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王。如今，他成了全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为富有。亨利的权势也完全压过了他名义上的封君法王路易七世。当埃莉诺与路易成婚后，路易七世曾一度是诸王国中最强大的君主，那么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决定要与她离婚呢？

路易与埃莉诺于1137年结婚，当时埃莉诺的父亲阿基坦公爵威廉十世（Duke William X of Aquitaine）在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朝圣途中突然逝世，并未留下男性继承人。而埃莉诺的叔叔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Raymond, count of Tripoli）是一位十字军国家的统治者，他与埃莉诺相距甚远，既不能对她施以援手，也无法将她继承的领地占为己有。对一个失去父亲和叔叔庇护的15岁女继承人而言，与路易的婚姻能和他结成可靠的同盟。此外，同时代的人们也普遍相信，作为丈夫的路易七世给予了她关爱和保护。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桩婚姻变得令人失望。路易在婚后逐渐成了一个极度虔诚而清心寡欲的人。曾有故事说到，有一次路易身患重病，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若他愿意与女人同床，这将会增加他康复的概率。人们将一位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带到他的床前，可他甚至宣称自己宁可病死，也不愿遵照医嘱犯下如此通奸罪恶。⁶可想而知，美丽活泼的埃莉诺与清心寡欲的路易是何等格格不入，不过也有人说，埃莉诺在安条克时就以顽固而轻浮著称。不论这些评价真实与否，关于埃莉诺私生活的谣言都已广泛传播开来。最终，这些谣言几乎将埃莉诺描述成如同梅萨丽娜（Messalina）一般的传奇人物。米什莱写道，她才是真正的梅露辛。⁷难怪埃莉诺曾抱怨道，比起国王来说，路易更像是一个修士。⁸

到12世纪40年代末，埃莉诺和路易两人显然已经极不相容了，但仅仅因为性格的差异还不足以使他们解除婚姻。⁹在当时，婚姻的首要职责便是传宗接代，然而埃莉诺和路易的婚姻却未能给他们带来一位男性继承人。在他们14年的婚姻中，埃莉诺除了一次流产外，只为路易生了两个女孩。虽然埃莉诺本人得以继承她的领地，但近期于英格兰和诺曼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足以说明：一名女儿根本不可能成功保有她所继

承的领地。假如路易七世要想避免在法国重蹈英王斯蒂芬的覆辙，他就必须要有儿子。所以，当1154年教会判决他与埃莉诺的婚姻无效后，路易与卡斯提尔的康斯坦丝（Constance of Castille）结婚。然而她仍然只为路易生育女儿，1160年，康斯坦丝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后不久去世。对法兰西王位男性继承人的极度渴求，促使路易在康斯坦丝去世5周后又找了第三任妻子：香槟的阿德拉（Adela of Champagne）。终于，路易在1165年8月有了自己的儿子。当时还是学生，住在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一间出租屋里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仍对多年前巴黎民众们听到这一期盼已久的喜讯时的欢乐情景记忆犹新：在一个温和的夏夜，他突然被响彻全城的洪亮钟声惊醒，同时看到窗外闪耀的焰火之光。杰拉尔德最初认为巴黎发生了火灾——毕竟在那个以木料作为主要建材的时代，火灾的威胁无处不在。但那火光其实是篝火，钟声传递的并非警报而是喜讯，狭窄的街道上此刻也挤满了人。杰拉尔德很快便明白了当时巴黎民众狂喜的原因：“感谢上主的恩典，今夜我们的新王降生了，他将给予英格兰王沉重的一击。”这个男孩被取名为腓力。¹⁰ 日后，他将成为理查的十字军战友，也将成为理查的劲敌。

不难想象，当理查于1157年降生时，还没有儿子的路易七世是何等恼怒：他与埃莉诺14年的婚姻没能给他的王国带来一个继承人，然而在埃莉诺第二段婚姻的前5年里，她就已经给亨利二世生下4个孩子，其中3个是男孩：他们分别是1156年早夭的威廉、小亨利和理查。事实上，亨利二世和埃莉诺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他们最小的孩子约翰生于1167年。这无疑说明亨利二世不是路易那样的苦行僧式人物。1157年时，亨利年方24岁，体格壮实，比他的妻子年轻了12岁，即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亨利二世35年的统治期间，作为西方基督教世界中一位老练政治家，他总是能够通过强力手段或巧妙智谋压制和挫败所有对手。只是在他晚年受困于疾病并与之斗争时才遭到失败。亨利二世富有智慧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用法语或拉丁语与人交谈辩论。此外，在那个视狩猎为贵族风范重要象征的时代，亨利二世对狩猎的热爱也无人能与之

相比。对他来说，再没有比在拂晓前就跨上马鞍开始狩猎更好的事情了，¹¹也总是有人目睹他简单地穿着耐磨的猎装的模样，不过他的廷臣之一沃尔特·马普（Walter Map）却说，“他经常穿着用华贵材料织成的与其身份相宜的袍子”。¹²亨利二世厌恶久坐不动，始终保持着不断活动的状态，看起来总是一副坐立不安、不知疲倦的样子，为避免无所事事的情况发生，他宁愿拿起针线亲自缝补自己的衣服。¹³沃尔特·马普认为，在亨利二世施政方式之中之所以会存在极易招人愤怒的一面，与他母亲的教育不无关系。正如理查和其他人所见的那样：

他应当尽可能地将所有人的事务拖延，将所有空缺的官职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利用官职空缺从中获利，始终让那些渴求高位者心怀得以晋升的希望。他还使用一个并不友善的比喻佐证自己的这一见解：当训练一只难以驯服的鹰时，若在给它喂肉时先以肉示之，然后将肉迅速拿开或隐藏起来的话，这只鹰将因为对肉的渴望加剧，表现得更加温顺服从。¹⁴

不过，由于亨利二世统治着北达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南抵比利牛斯山脉的广阔领地，他不得不比大多数王侯和统治者经历更多更加漫长也更为紧张的旅程。虽然谣传称亨利二世能够自在飞翔，但他实际上由于不停乘马四处奔走而双腿疼痛不已。

亨利二世的性格和他的上述举动，无疑会在理查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心中留下一个不易亲近、时刻奔忙的父亲形象。亨利二世可能将子女们留在相对安稳的英格兰，他则经常在海外居留，致力于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治理自己的大陆领地。亨利二世是如此与子女疏远，以至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奥巴尔德（Theobald）在1160年夏季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让国王返回英格兰的请求。除了讨论其他事务，大主教还提醒国王关心自己的子女：“即使是最铁石心肠的父亲，在如此长的

时间内都不与自己的子女见面，也会于心不忍的。”¹⁵ 不过大主教在信中的这一劝告并未奏效，亨利二世直到1163年1月才回到英格兰，这时距他上次离开英格兰已过去了4年半的时间。应该说在亨利二世人生的这一阶段，他并没有什么关爱子女的表现，随后的另一件事也证实了这一说法：1165年5月，王后埃莉诺将理查和他出生于1156年的姐姐玛蒂尔达带回诺曼底。两周后，亨利二世渡过英吉利海峡回到英格兰，将他的家人抛在身后，发起了一场对威尔士人的不甚成功的大型攻势。¹⁶ 所有关于亨利晚年生活的记载也都表明：对理查来说，母子关系远比父子关系更为亲密。但埃莉诺也时常外出旅行，于是在埃莉诺旅行期间，理查的乳母自然地承担起每日关爱和抚育他的工作。12世纪时的传奇故事通常告诉读者，一位贵族妇女亲自哺乳并养育她的子女是极为少见的体现母爱的举动。幼年的理查被托付给一位名叫霍迪尔纳（Hodierna）的乳母抚养，而他也对这位乳母心怀感激。30余年后理查成为国王时，他慷慨地赠给乳母一笔不菲的年金。¹⁷ 霍迪尔纳也变得富有，并成为当地的知名人物——毕竟她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自己的姓名成为地名的乳母：威尔特郡的诺伊勒·霍迪尔内（Knogle Hodierna）教区便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¹⁸

和其他所有王室子女一样，在理查的父母看来，理查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在外交活动中担当人质的角色，而理查日后也十分擅长使用这样的外交手段。因为当时的外交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各国王室间的家庭关系开展的，王室子女们也都会被要求较早地订婚，早婚更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亨利二世在1158年和1159年订立的两个婚约，便深刻地影响了理查的一生。其中较早的婚约是他的兄长小亨利与路易七世之女玛格丽特（Margaret）订立的，这位玛格丽特是路易七世的第二任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当时小亨利只有3岁，玛格丽特还是婴儿，但按照当时的风俗，她已经被指定获得一份嫁妆，这份嫁妆便是位于塞纳（Seine）河、埃普特（Epte）河与昂代勒（Andelle）河之间的诺曼维克桑（Norman Vexin）地区。一旦两人成婚，这片土地就将被纳入安茹王朝治

下。此外双方还商定，两人成婚前路易七世仍然保有诺曼维克桑，不过玛格丽特应转由亨利二世监护。于是在1158年9月，亨利二世前往巴黎将玛格丽特带回了诺曼底。这一婚约的重要性在于其中包含的嫁妆——诺曼维克桑内的诸多城堡恰好控制着巴黎到鲁昂（Rouen）之间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维克桑地区以埃普特河为界分为两块：埃普特河东岸的法兰西维克桑（French Vexin）地区归法王所有，西岸的诺曼维克桑地区则归诺曼底公爵所有。然而1145年时，安茹伯爵杰弗里及其子亨利将诺曼维克桑划给了路易七世，以换取他对二人进行诺曼底征服行动的默许。现在亨利二世打算重夺诺曼维克桑，对他来说，只有重新占有吉索尔（Gisors）、诺夫勒（Neaufles）、当居（Dangu）等众多城堡，他才能在鲁昂地区高枕无忧。1160年11月时，他认为小亨利和玛格丽特已经到了能成婚的年纪，决定为他们举行婚礼——然而当时小亨利也不过5岁，玛格丽特的年龄则更小。婚后不久，亨利二世便将诺曼维克桑重新纳入自己治下，令路易七世甚感不快。¹⁹

此前，亨利二世也为理查订立了婚约。1159年初，亨利二世前往法国南部，穿过普瓦图（Poitou）和圣通日（Saintonge）后，来到吉伦特（Gironde）河畔的布莱（Blaye），在那里与巴塞罗那伯爵雷蒙德·贝伦加四世（Raymond Berengar IV）会面。虽然贝伦加四世当时已和阿拉贡女王结婚，并与他的妻子一同统治阿拉贡，但他拒绝了本应获得的国王称号，在他看来“以最伟大的伯爵之名为人所知，更胜于只做一位第七伟大的国王”。亨利二世不仅与贝伦加四世缔结同盟，还承诺理查将与他一个女儿订婚，婚后还将把阿基坦公国封为理查的领地。²⁰亨利二世之所以要订立这一婚约，是为了发动对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Count Raymond V）的战争。这时富有而强力的贝伦加四世恰好与雷蒙德不和，这一婚约的订立无疑能使他成为亨利二世对付雷蒙德的强力盟友。然而，作为埃莉诺丈夫的亨利二世此举违背了昔日阿基坦公爵与图卢兹伯爵间的旧有盟约。埃莉诺的祖父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Duke William IX）娶了图卢兹伯爵威廉四世（William IV）唯一的女儿菲丽帕（Phil

ippa) 为妻，而菲丽帕此前已被她的叔叔、威廉四世的弟弟驱逐，但在她的后代看来，菲丽帕才是正统的图卢兹女伯爵。为此，他们时常发起战争，重申她的正统地位。对亨利二世而言，若因此放弃对图卢兹这片富饶之地的索求，这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传统上，作为阿基坦地区西哥特王国故都的图卢兹看来确实属于阿基坦的一部分。将拉罗谢尔 (La Rochelle)、波尔多 (Bordeaux)、巴约讷 (Bayonne) 等大西洋沿岸港口与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连接在一起的要道交点上的图卢兹，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为确保从波尔多到图卢兹的加隆 (Garonne) 河水道都能通行无阻，人们将周围的沼泽全部抽干，并清除了河岸上的树木。²¹ 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战略角度考量，埃莉诺对图卢兹统治权的主张对亨利二世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不过，现任的图卢兹伯爵显然不愿未经一战就将图卢兹拱手相让。作为路易七世之妹康斯坦丝 (Constance) 的丈夫，雷蒙德五世可以从他的这位连襟那里获得援助。1159年夏季，亨利二世发起了对图卢兹的远征，这也是他在位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管这次远征未能使他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迫使图卢兹伯爵臣服，但他成功地攻占了卡奥尔 (Cahors) 和凯尔西 (Quercy)。²² 这时理查的婚约也无果而终，曾与他订婚的那位女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甚至时至今日她的姓名也无人知晓。不过这段短暂的外交经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标志着理查开始与阿基坦紧密相连。

阿基坦公国疆域广阔，它的总面积甚至比亨利二世治下的诺曼底和安茹领地面积之和还要大。身兼普瓦图伯爵 (Count of Poitou) 的历代阿基坦公爵同时还长期统治着普瓦图和圣通日，并被昂古莱姆 (Angoulême)、拉马什 (La Marche) 和佩里戈尔 (Périgord) 的伯爵们，以及利摩日 (Limoges) 子爵们视为他们的封君。到11世纪中叶，阿基坦公爵又获得了加斯科涅 (Gascony)，这使他们成为波尔多的统治者，广布于加隆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诸多领地也将他们视为封君，而这些领地的总面积约为普瓦图面积的两倍。在阿基坦东边的是贝里 (Berry) 和奥弗涅 (Auvergne)，阿基坦公爵虽然对它们有名义上的宗主权，

但当地人时常对此表示质疑。至于阿基坦地区内使用的语言则是五花八门：普瓦图的居民们说一种法兰西北部方言；圣通日以南通用的则是利穆赞（Limousin）方言，这是普罗旺斯语（Provençal）或奥克语的一支，也是吟游诗人用于写作诗歌的语言，它与法国北部使用的奥依语（Langue d’Œuil）有很大不同，而南部的人则使用奥克语（Langue d’oc）。在更南边靠近纳瓦拉（Navarre）地区的居民则说巴斯克语（Basque），这种语言除了当地人外无人能懂。²³ 一个古老的故事曾说道：魔鬼试图学会巴斯克语，以夺取巴斯克人的灵魂，但经过7年不间断的学习之后，魔鬼最终却只学会了3个单词。在获得加斯科涅之后，阿基坦的政治倾向也有所变化。起初，身为普瓦图伯爵的阿基坦公爵们主要关注法兰西北部的政治形势，当他们身兼加斯科涅伯爵后，他们便开始更多地关注南方的图卢兹和西班牙，并投入到与穆斯林的圣战之中。随着阿基坦公爵将关注焦点转向南部地区，这一举措不仅使他们疏远了与北方地区的关系，也使他们在那些主要关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盎格鲁-诺曼领地的影响广泛的作家心中退居次要地位。

虽然从父系角度上说，理查属于安茹人，但他更像母亲一方的南部阿基坦人。在理查一生中记忆最为深刻的母系祖先，是他的曾外祖父——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威廉九世不仅是一位十字军领袖，更以他的英勇、慷慨和英伟相貌受人仰慕。此外，威廉还是第一位知名的吟游诗人，堪称欧洲文学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生活态度固然令同时代人们感到愉悦，却也使他们感到惊奇甚至担忧。根据当时的英格兰史家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记载，威廉九世的缺点在于他对凡事都漫不经心，“他把所有事情都讲成笑话，让他的听众们都开怀大笑”。²⁴ 不过从威廉九世抒情诗文中体现的精妙文采来看，他在创作诗歌和演奏音乐时还是非常严谨用心的。受威廉九世影响，阿基坦也成为当时法兰西境内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省，那时仅有的另一位知名吟游诗人旺塔多的埃布勒斯（Ebles of Ventadour）便来自利穆赞地区；下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比如塞尔卡蒙（Cercamon）、马卡布鲁（Marcab

ru）、若弗雷·吕德尔（Jaufré Rudel）和旺塔多的贝尔纳（Bernard de Ventadour）都在阿基坦的边境范围内生活创作。体现当时文化氛围的另一逸事是，理查的祖父、安茹家族的杰弗里·金雀花伯爵有一次将4位普瓦图骑士俘虏，但这4位骑士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颂其逮捕者的歌谣，最终他们也因此重获自由。在欧洲音乐史上，12世纪可以说是欧洲音乐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式的共奏音乐让位于复调音乐，不过这种新式的复调却让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这样的传统学者感到十分厌恶，他对这类音乐颇有微词：“（复调音乐）不过是由繁杂矫饰的旋律演奏的、荒诞无比的靡靡之音，它们就是塞壬海妖（sirens）的和声。”若我们想了解12世纪音乐史的总体特征，再没有较利摩日的圣马夏尔修道院（abbey of St Martials）更著名、更有代表性的地方了。修道院保存的抄本里不仅有教会音乐的记录，也包含了许多附带旋律的早期吟游诗人们的诗歌。²⁵ 视觉艺术方面，利摩日也是当时欧洲珐琅工艺的重镇。在昂古莱姆的大教堂和普瓦捷的圣母大教堂（Notre-Dame-la-Grande）的正面，都能看到精美绝伦与繁复的雕塑。不过，更令人惊叹也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位于圣通日地区的许多罗马式小教堂里的雕刻。这里重要教堂的外部装饰大多在阿基坦公爵或昂古莱姆伯爵赞助下完成，无疑都出自国际知名的工匠之手，而村庄教堂也完全展现了地方传统精湛工艺的影响力。²⁶

当然，阿基坦公国不只是法兰西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它也拥有足以支持优秀艺术创作的丰厚财富。博学的英格兰史家迪切托的拉尔夫就曾以热情洋溢的话语，描述了富庶的阿基坦：

阿基坦充满多样的财富，它所拥有的财富总量竟远远胜于西方世界的其他所有地区。历史学家们也总是将它视为高卢最为丰饶繁荣的省之一，它有着肥沃的田地、高产的葡萄园以及盛产珍禽异兽的森林。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整个乡村地带都得到了加隆河与其他许多河流的灌溉滋养，也正是这些滋养万物的

生命之泉（*aquae*）将它的名字和丰饶属性都赋予了阿基坦（*Aquitaine*）。²⁷

为阿基坦带来丰厚财富的两大主要出口物分别是盐和酒。作为维持生命不可或缺之物的盐，在阿基坦公国内临近大西洋的整个海岸地带都有出产，其中的主要来源包括：产自阿基坦北部普瓦图和布列塔尼（*Brittany*）交界处的布尔纳夫湾（*Bay of Bourgneuf*）的海盐、产自奥莱龙（*Oléron*）岛和雷（*Ré*）岛后部避风海岸晒盐池的布鲁阿日（*Brouage*）盐以及产自南部巴约讷地区的盐。不过，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所知更多的是，葡萄酒贸易在12世纪时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在波尔多地区已出现大量新的葡萄园，即使是普瓦图人也开始承认波尔多产的葡萄酒有着极佳的品质。但当时最重要的葡萄酒出口产地，还是位于阿基坦北部的奥尼斯（*Aunis*）和圣通日地区。²⁸ 优质的白葡萄酒在尼奥尔（*Niort*）、圣让-当热勒（*St Jean d'Angély*）和拉罗谢尔生产完毕，随后在拉罗谢尔集中运往海外。拉罗谢尔港虽然直到12世纪30年代才建成，但它很快便具备了新兴城市的一切特征。²⁹ 拉罗谢尔有当时最先进的码头，它十分适于容纳一种被称为柯克船（*cogs*）的新式大型桨帆船。到12世纪后期，柯克船已成为在波罗的海、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两岸进行海上贸易所使用的最主要船型。柯克船的使用，也使得拉罗谢尔的商人们得以在英格兰和佛兰德斯（*Flanders*）的市场上，与那些来自巴黎盆地附近和莱茵兰地区（*Rhineland*），同样从事葡萄酒生产的商人们竞争逐利。拉罗谢尔的葡萄酒成功打入英格兰市场后，很快使当地的葡萄园都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与这些进口酒相比，英格兰自产酒的质量正如一位12世纪晚期的作家所评价的那样：人们只有在紧闭双眼、咬紧牙关的情况下才能喝下英格兰葡萄酒。总之，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出口贸易对阿基坦公爵可谓意义重大。阿基坦公爵在保护境内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同时，也通过向商人们征收通行费和关税获利——若公爵统治的范围扩展至所有进口阿基坦葡萄酒的英格兰和诺曼底港口，这些

收入总额还会加倍。尽管如今我们已无从知晓和计算它的总额，但它无疑帮助阿基坦公爵成为西欧地区最强大和富有的领主之一。³⁰

安茹的亨利与埃莉诺的联姻，以及亨利在结婚两年后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这两起重大事件，也促使那些生活在不同行省、互不相知的人们开始处于同一王权的统治之下。从1066年以来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英格兰和诺曼底已成为统一政治体的两大重要部分，英吉利海峡并未使它们疏离，而是成为连通盎格鲁-诺曼领地之间的重要通道。人们自如地来往于海峡两岸，许多富有的家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也都置办了地产。语言方面，即使那些对语言最为敏感的行家老手们很快开始嘲弄“带马尔伯勒口音的”法语，但海峡两岸的上层阶级们使用的却都是盎格鲁-诺曼法语。³¹ 不过，当时的英格兰人仍然对阿基坦知之甚少。为此，迪切托的拉尔夫在他的编年史中用心写下了介绍阿基坦公国及其居民概况的长篇记录。只有那些出于对宗教虔诚或出于冒险好奇心，踏上前往著名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旅的人们，才有可能在他们穿越阿基坦的行程中，了解到对理查一生都至关重要的阿基坦地区的一些知识。12世纪时，对“摩尔人屠夫”圣雅各（Santiago Matamoros, St James the slayer of Moors）的崇拜开始兴起，圣雅各崇拜也开始像葡萄酒贸易一样使英格兰和欧洲西南部地区建立联系。亨利一世在雷丁（Reading）修建的最大修道院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1156年时亨利二世也将他早夭的第一个儿子威廉安葬于此，这座修道院就是献给圣雅各的。另外，尽管雷丁修道院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圣物——比如亚伦（Aaron）之杖的一部分和基督的圣包皮，但这些遗物中价值最高的无疑是圣雅各之手，它是由理查的祖母玛蒂尔达王后从意大利带回到英格兰的。³² 1173年时，一位雷丁修道院院长成为波尔多大主教，1181年时亨利二世还以圣雅各之名，在波尔多为贫穷的朝圣者们出资修建了收容所。³³

至12世纪中叶时，为满足数量众多的朝圣者们的需求，一部阿基坦的旅行指南应运而生。这本指南的作者是一位对普瓦图十分熟悉的教士，他为来访的朝圣者指明道路，并告诉他们在行进途中将会看到的景观

。书中提及的一些著名景点至今仍然存留，比如位于普瓦捷的圣伊莱尔大教堂（St Hilaire-le-Grand）和位于桑特（Saintes）的圣优特罗庇乌斯（St Eutropius）教堂，人们相信，这位圣优特罗庇乌斯就是波斯王薛西斯（Xerxes）的后裔。不过许多景点如今已不复存在，比如当时富有的圣让-当热勒修道院，11世纪时，人们奇迹般地发现了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of Baptist）的头颅，此后它便在这座修道院里备受人们的尊崇。位于吉伦特河口北岸的布莱也是名胜之一，朝圣者们可以在此俯瞰《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的主角罗兰的墓，而《罗兰之歌》也是所有传世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a*）中最为知名的。虽然罗兰实际上是在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隘口遭遇巴斯克人伏击，并于此役阵亡的，但12世纪的传奇故事却将罗兰描述成在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大战中光荣牺牲的人物。随着朝圣者们逐渐接近比利牛斯山，他们将更加深入一片乡村地区，这一地区的所有遗迹都或多或少地与罗兰相关。朝圣者们将在波尔多的圣瑟兰（St Seurin）修道院中看到罗兰当年携带的号角。尽管罗兰可以在刚刚遭遇伏击时便吹响号角，召集援军来到龙塞斯瓦列斯支援他与伏兵作战，但珍惜荣誉甚于生命的罗兰拒绝吹号求援，直到他发现自己身处死地，打算吹响号角时，已然回天无力。正是罗兰传奇故事遍布的这幅图景使理查认识到，反对萨拉森人的圣战理想是如此真切，如此近在咫尺。

另外，那位普瓦图教士的指南还为朝圣者们提供了他们途经地区内居民概况的实用信息。按他的记载，普瓦图人坚韧好斗，精通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艺。战争时期他们英勇奋战，在追击逃敌时迅速敏捷；和平时期的普瓦图人穿着优雅考究，给人以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慷慨大方、热情好客的印象。相较而言，圣通日人的谈吐富有乡村气息，波尔多人的言谈则更加粗野不堪。放荡不羁、衣着简朴的加斯科涅人喜欢搬弄是非，还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加斯科涅人在用餐时一般围坐在火堆旁而非餐桌上，他们不仅在用餐时共用酒杯，睡觉时无论男女主人，还是仆从和其他客人，都睡在同一张破烂的稻草垫上。巴斯克人和纳瓦拉人与

加斯科涅人十分相似，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甚至比后者更加恶劣：用餐时，他们像是围着食槽的猪群一般围着一口大锅狼吞虎咽，他们说话时的声音则与犬吠无异。当他们打算在火堆前暖身时便掀起短裙，对暴露自己私处的行为毫不感到羞耻。此外，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他们的女人，兽奸行为也很常见。事实上，他们甚至还会出于嫉妒，为他们的母马和骡子戴上贞操带。³⁴可悲的是，这部指南的作者对阿基坦南部的记载表明：他描述的地区越是靠近南方，他就越是不熟悉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他对陌生地区的偏见也以越来越尖酸刻薄的语句体现出来。实际上，朝圣者们也因为极少偏离他们前往圣地和客栈的固定线路，而对他们所经地区的社会情况知之甚少。像别的旅客一样，他们除了历史遗迹和旅店之外不会探访其他去处。在大多数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看来，甚至连普瓦图都是一片位于偏远南部地区的未知之地。因而，阿基坦仍被他们视作未曾探索的化外之境，阿基坦的居民更被视作以反复无常和背信弃义著称的人群，没有任何思维健全的英格兰人会信任他们。

不过，上述偏见将无疑会导致我们对阿基坦产生错误认知，将它视作一片广阔的政治荒地——佃农在这里发起反对他们地主的叛乱，侄儿在这里与他们的叔叔交战，这些激烈的暴力事件也必将导致阿基坦公爵几乎无法有效统治他的领地。实际上，直至今日也仍然有历史学家以此种方式描述当时阿基坦的政治情况。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容易地举出这个案例：康伯恩（位于利穆赞地区）的埃贝尔斯二世（Ebles II of Comborn）与他的叔叔贝尔纳之间的著名纷争。埃贝尔斯在众目睽睽下强奸了他的婶婶，这起纷争随后以贝尔纳将他的侄子阉割并谋害告终。³⁵但我们不宜由于对政治常识和政治地理学的无知而以偏概全，将此类极端案例视作阿基坦政治的常态。比如，仅仅依据在苏格兰边境地区的几起特殊事件便判定英格兰国王权力大小的举动无疑也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当时所有的君王都要面对在偏远动荡的边境地区发生的种种问题，相对来说，得到良好治理、境内保持安定的阿基坦公爵“直属领地”范围如下：领地最北端的界线从普瓦捷向西延伸至塔尔蒙（Talmont）海

滨，领地西端的界线则以塔尔蒙为起点，沿海岸线向南抵达波尔多后延加隆河谷而上，一直到领地最东端的阿让（Agen）。这片“直属领地”的面积，大致与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面积之和相当，领地里还包含着整个公国中一些经济最为繁荣、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诚然，诸如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和迪韦齐斯的理查这些12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史学家们都将阿基坦描述成几乎无法统治的地区——但这不过是他们为赞美理查对它卓有成效的统治而故作曲笔罢了。³⁶

不过，年轻的理查还是提前遭遇了此后将习以为常的与阿基坦公国的统治相关的特殊问题。当时，那些受两大贵族势力——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与昂古莱姆伯爵所控制的城堡偶尔会成为普瓦捷、桑特及波尔多这三座城市间陆路交通的阻碍。它们既是古老的罗马式主教城市，也是阿基坦公爵治下的三大行政中心。属于泰尔弗（Taillefer）家族的昂古莱姆伯爵及其封臣的领地和城堡包括雅纳克（Jarnac）、布特维尔（Bouteville）、阿尔夏克（Archiac）、巴伯齐厄（Barbezieux）、蒙蒂尼亚克（Montignac）以及昂古莱姆，这些领地都位于将普瓦捷和桑特与圣通日相连的大道上；属于吕西尼昂家族及其封臣的领地和城堡则包括库埃（Couhé）、武旺（Vouvant）、沙托拉尔舍（Château-Larcher）、弗隆特奈（Frontenay）以及吕西尼昂，这些领地则位于将普瓦捷与桑特和著名的拉罗谢尔港相连的大道上。而政治地理学方面的材料便足以表明，阿基坦公爵在许多事务上都与泰尔弗家族和吕西尼昂家族意见相左，而与这些家族的纠纷，也成为12世纪早期的阿基坦公爵们的主要议题。³⁷ 尽管吕西尼昂家族看似实力要弱于昂古莱姆伯爵——毕竟后者在阿基坦中心地区统治着一个独立伯国，且更为富裕，更具影响力——但在1168年初的一场暴动中，吕西尼昂家族却成为这次风暴的核心。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由于当时亨利二世正忙于围攻距普瓦捷西南部15英里处的叛乱者主城，无暇东顾，或者仅是由于昂古莱姆伯爵威廉的名望已经在1168年时被精力更为旺盛的吕西尼昂家族新领袖杰弗里·德·吕西尼昂（Geoffrey de Lusignan）彻底压倒。这时的杰弗里·德·吕西

尼昂即将开始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日后的一系列经历也将使他成为整个欧洲世界和十字军中的伟大骑士，并使他的家族跃居普瓦图地区所有男爵家族之上，稳固地居于基督教世界主要王侯的行列之中。³⁸ 不过，彼时的吕西尼昂家族还不是正值权力巅峰的亨利二世的对手，吕西尼昂的杰弗里（Geoffery of Lusignan）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亨利二世摧毁他的家族及其追随者们的土地，属于吕西尼昂家族的巨大城堡也被亨利二世攻克并夷为平地。³⁹ 若不是亨利二世因忙于其他事务而调转兵锋，吕西尼昂家族将无法绝处逢生。

亨利二世之所以要在1168年3月选择率部北进，正是由于他和路易七世的谈判进行到了紧要关头。此前，亨利二世已对他的王朝和领土的未来做了慎重思考，并打算在此时完成对家庭成员的财产分配，但这并非易事：不仅因为亨利二世有众多孩子和幅员广阔的领土，更重要的原因是，亨利二世对这些领土的分配必须要经过埃莉诺的前夫、他的封君路易七世的准许，才具有法律效力。不过，亨利二世也深知路易七世对圣地的事务十分关注，于是他向路易表明：当下自己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将家务安顿好并确保孩子们无后顾之忧，完成上述事情后，他愿意率部加入封君前往圣地的十字军队伍。亨利二世的计划如下：他此前继承的所有领地（安茹、曼恩、诺曼底和英格兰）将由自己的长子小亨利继承；属于理查的领地，则是由他和埃莉诺的婚姻所带来的阿基坦公国。

⁴⁰ 路易七世暂时认可了这一安排，并要求亨利二世前来签署条约以最终确定此事。除了将理查指定为阿基坦公爵外，这份条约还为他 and 路易之女艾丽丝订立了婚约。条约中并未讨论安茹王室对图卢兹地区的所有权问题，不过卡佩王朝的立场十分明确：图卢兹问题只能在法王宫廷中进行裁决。⁴¹ 于是，亨利二世在北上与法王见面前，命王后埃莉诺负责普瓦图的事务，并指定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索尔兹伯里伯爵帕特里克（Earl Patrick of Salisbury）担任她的军事顾问。趁着亨利二世离开之际，叛军也重新集合在吕西尼昂，重新修建吕西尼昂城堡。亨利二世闻讯，决定再次返回普瓦图，委派自己的几位朝臣继续与路易七世

讨论条约事宜。法王似乎将亨利二世此举视作对他的侮辱，于是他迅速与普瓦图地区的叛军取得联系（如果他之前尚未和他们联系的话），并在布尔日（**Bourges**）会见了叛军派来的使臣。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建立同盟，彼此宣誓绝不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与亨利二世议和。路易承诺帮助普瓦图人收复失地，作为他们遵守盟约的保证，普瓦图人则向法王交出人质。

到4月初时，亨利二世考虑到自己的家事尚未安排完毕，于是准备组织对普瓦图的赔偿，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但路易七世的行动更为迅速，在英王决定出兵的同时便宣布撤销他对理查和艾丽丝婚约的认可。正当亨利和路易在诺曼底边境为此事争执不休时，帕特里克伯爵与杰弗里·德·吕西尼昂的部下在普瓦图地区爆发冲突，并由此导致了帕特里克伯爵的死亡。尽管对一位活跃的贵族而言，投身战争是家常便饭之事，但在当时，贵族殒命于战场实在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原因之一是，当危险来临时，贵族可以穿着防护良好的贵重护具——头盔和锁子甲——以抵御武器伤害；另一原因则是，即使他陷入极端不幸的境地，他的敌人们一般也不会将他杀害，而更愿意将他俘虏并利用他索取赎金，这样的做法不仅更加有利可图，同时也会给俘虏的朋友和家人们带来经济压力。换言之，在12世纪的战争中，人们认为只有拿不出赎金的穷人会战死。因此，帕特里克伯爵之死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⁴²对此，普瓦图人宣称：他们在与对方进行和平谈判时遭受攻击，于是不得不实行自卫，伯爵之死绝非他们有意为之；然而包括伯爵的年轻侄子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在内的伯爵随从们却对此矢口否认，他们宣称伯爵是在未穿甲冑的情况下遭遇敌军伏击，从身后被刺死的。当时威廉尽管没戴头盔，却仍然如猛狮般奋战，希望为他死去的叔叔复仇，但被人数占优的敌军压制，威廉自己也因身后中了剑而被俘虏。时隔数年后，威廉仍对此事记忆犹新：由于惧怕亨利二世的暴怒，俘虏威廉的敌人借着森林掩护，暗中拖着未受包扎且伤口未愈合的威廉在不同的藏身处之间到处游走。这段令威廉极为痛苦的经历也使他对普瓦图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

象，在他看来，普瓦图人都是不守信用、彻头彻尾的反贼。⁴³

帕特里克伯爵死于这种混乱而令人极其难堪的境地，无疑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增大了议和的困难。双方虽然于1168年7月在贝尔纳堡（La Ferté-Bernard）举行了一次会谈，但由于彼此怀疑、互不信任，这次毫无成果的会谈最终破裂。此外，法军大营中不仅有来自普瓦图、布列塔尼、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使臣们，还有来自加斯科涅的特使，这也给未来的阿基坦公爵带来了另外一个令他不安的理由：如今公国内部正纷争四起、叛乱丛生。1168年的整个下半年也都在战争中度过。⁴⁴所幸的是，亨利二世仍一如既往地在与路易七世的交锋中居于上风，他比后者更为富有，有能力招募大量雇佣兵的同时，还使用献金政策笼络路易七世的重要封臣——佛兰德斯伯爵、布洛涅（Boulogne）伯爵和布卢瓦（Blois）伯爵。为使他们在战时保持中立，亨利二世赠给他们大量金钱。我们可以通过路易七世对沃尔特·马普讲的话，了解到两位国王在战略资源方面的巨大差距：

“你的封君，英格兰之王应有尽有——他帐下兵强马壮、金银满仓，丝绸珠宝乃至各类物产皆无比丰富。身在法兰西的朕除了圣餐所用的面包和酒，以及由此带来的欢乐，一无所有。”以上便是我记录的路易国王言论，这虽听来轻松，却也是由衷之语。⁴⁵

历尽艰辛之后，双方最终于1169年1月在蒙米拉伊（Montmirail）达成和约。亨利二世重新向路易七世行臣服礼，并看着他两位较年长的儿子——继承诺曼底、安茹和曼恩的小亨利，继承阿基坦的理查——行臣服礼。理查与艾丽丝的婚约也最终敲定，但艾丽丝不会为这桩婚事带来任何嫁妆。⁴⁶

在这充满战事和外交谈判的一年中，我们并不知晓理查当时身处何

方，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不仅因为阿基坦属于她的领地，也正是在她的授意下这片土地才被封给理查的。⁴⁷ 理查的父亲则对《蒙米拉伊和约》的签订感到十分满意。为了回报路易对他的家庭安排的允准，他同意与普瓦图的叛军和解，并补偿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不过，路易其实并没有能力迫使亨利二世遵守这个承诺。无论法王是否清楚这一点，他都放弃了他的普瓦图盟友。处理完家事的亨利二世并不打算按照之前的约定踏上十字军征程，而是下定决心惩治叛军。在亨利二世看来，尽管他和路易七世已经在蒙米拉伊达成和平，但他对叛军作战的行为并不受和约束缚：毕竟他根本没与叛军互致和平之吻，约定彼此休战。

于是，亨利二世再度出兵平叛，在阿基坦南部度过了1169年的春季和初夏时光。亨利二世的军队攻占了许多由违抗国王权威的叛军控制的城堡，并将它们化为齑粉。昂古莱姆伯爵和拉马什伯爵只得向亨利臣服，与此同时，在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他们的盟友之一罗伯特·德·赛亚克（Robert de Seilhac）也已死去，据称他是在被亨利二世囚禁期间，遭遇酷刑虐待而死的。⁴⁸ 另一方面，尽管理查和他的兄长已经为获得他们的封地向路易七世行臣服礼，但他们的父亲无疑还不打算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不过到1170年8月时，纵使亨利二世再不情愿，他也因为身患重病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自觉大限将至的亨利二世再次确认了在蒙米拉伊达成的领地分配协定，并希望自己埋在利穆赞的格朗蒙（Grandmont）修道院中，因为这所修道院中的一位修士曾在议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康复后，亨利二世还前往凯尔西的罗卡马杜尔（Rocamadour）圣地朝圣。⁴⁹ 此外，他还将他的女儿埃莉诺许配给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八世（Alfonso VIII of Castile），谋划了一场在奥弗涅地区的战役，还宣称阿基坦公国对布尔日大主教辖区有正当统治权。上述事件都无疑表明，亨利二世在这几个月内仍然对他的南部领地事务极为关注。⁵⁰ 即使是1170年12月29日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发生了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谋杀案之后，阿基坦境内仍有众多教堂向亨利二世寻求帮助和

庇护。一个典型例子是，1171年3月时，处境窘迫的利摩日圣马夏尔修道院修士们虽然有些尴尬，仍请求亨利二世帮助他们平定由拉马什伯爵奥德贝尔（Count Audebert of La Marche）主使，爆发于拉苏特兰（La Souterraine）的镇民叛乱。⁵¹

在亨利二世镇压拉苏特兰叛乱后不久，理查也在母亲的陪伴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这时距他在蒙米拉伊向路易七世行臣服礼只过了两年。1171年时，埃莉诺和理查一同为利摩日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奠基。大约在12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理查真正形成了对阿基坦方言和音乐的热爱，以及对埃莉诺的政治才能的信任，随后理查也将在不同场合中强调这一点。1172年6月，14岁的理查正式就任阿基坦公爵的时刻终于到来。典礼在普瓦捷的圣希拉里（St Hilary）修道院举行，4年前死去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帕特里克便安葬于此。理查坐在修道院院长的座位上，从波尔多大主教和普瓦捷主教手中接过了作为公爵权位象征的圣矛和旗帜。已是阿基坦公爵的理查自然不愿意仅行使普瓦图伯爵的职能，于是他前往利摩日，并在那里再度举行了公爵就任礼。当时还是圣马夏尔修道院修士之一的利摩日编年史家维茹瓦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gois）见证了这次典礼。⁵²理查戴上圣瓦勒里之戒（ring of St Valerie）的举动，也成为典礼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在12世纪的传说中，在利摩日生活并在此殉教的圣徒圣瓦勒里是阿基坦的化身，她安葬在利摩日的遗体“千年不朽”的故事也在利摩日广为人知，这无疑是为了表明，利摩日是一座比普瓦捷更为神圣崇高的城市。三年前理查还在蒙米拉伊向路易七世表示臣服，如今他已戴上圣瓦勒里之戒宣示着自己对公国的统治权，并与阿基坦的民众和天上的圣徒们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盟。总之，理查在普瓦捷和利摩日举行的两次典礼宣示着阿基坦公国事实上（de facto）已独立于法王统治，⁵³它们也可能标志着理查获得了独立支配阿基坦公国，不受其父干预的权利。不过，无论这些典礼有着多么重大的象征意义，当时的亨利二世仍然是王国唯一的实权统治者。

注释

1 Diceto, i, 299.

2 Gerald, *Princ.*, 301.

3 最好的埃莉诺研究论著包括以下著作。J. Martindale, ‘Eleanor of Aquitaine’, in Nelson, *Coeur de Lion*, 17–50; repr. in Martindale,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Aldershot, 1997)。更实用的参考文献来自 *Eleanor of Aquitaine: Patron and Politician*, ed. W. W. Kibler (Austin, Texas, 1976), 尤其值得关注的文章是 E. A. R. Brown, ‘Eleanor of Aquitaine: Parent, Queen and Duchess’。

4 尽管有差不多当时的证据表明杰弗里采用了“金雀花” (Plantagenet) 的名号——参见 *Chroniques des comtes d’Anjou*, ed. L. Halphen and R. Poupardin (Paris, 1913), 170, 不过“金雀花”开始作为家族姓氏使用应不早于15世纪, 而“一小支金雀花” (sprig of broom) 故事的成形时间还要在此之后。

5 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法国政治状况的文献资料包括: J.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Oxford, 1985), E. M. Hallam, *Capetian France 987–1328* (London, 1980) and K. F.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ies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in *The Medieval Nobility*, ed. and trans. T. Reuter (Amsterdam, 1979); S.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Oxford, 1994), ch. 7 ‘The Kingdom of France 1100–1300’; G.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91)。

6 Gerald, *Princ.*, 132. 另见 Gerald, *Opera*, ii, 216–17。

7 E-R. Labande, ‘Pour une Image véridique d’Aliénor d’Aquitain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l’ouest*, 4th series, ii (1952), 175.

8 Newburgh, Bk 1, ch. 31.

9 ‘Love, Marriage and Politic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J. Gillingham, *Richard Coeur de Lion. Kingship, Chivalry and War in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94), 251–2.

10 Gerald, *Princ.*, 292–3.

11 关于过度狩猎导致亨利缺乏时间和精力处理政事和制定法律的观点, 可参见 B. Lyon, ‘Henry II: A Non-Victorian Interpretation’, in *Essay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G. P. Cuttino*, ed. J. S. Hamilton and P. Bradley (Woodbridge, 1989)。

12 Map, 116–17.

13 *Magna Vita*, i, 113–19.

14 Map, 478–9.

15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ed. W. J. Millor and H. E. Butler, i (London, 1955), no. 121. 任何打算对这一时期的特定双亲与特定子女关系进行研究的尝试，都由于缺乏论据而停滞不前。Cf. R. V. Turner, ‘Eleanor of Aquitaine and Her Children: an Inquiry into Medieval Family Attachment’, *JMH*, xiv (1988), 321–35.

16 Torigny, 225. 1163年时伦敦的郡长们为理查支付了一些经费；PR 9 Henry II, 71。

17 PR 2 Richard I, 118; PR 3–4 Richard I, 118, 281.

18 Norgate, 2–3.

19 Torigny, 208.

20 Ibid., 200; Newburgh, Bk 2, ch. 10.

21 关于埃莉诺对图卢兹的主张，可参见J. Martindale, ‘Succession and Politics in the Romance-speaking World c. 1000–1140’, in *England and her Neighbours: Essays in Honour of Pierre Chaplais*, ed. M. Jones and M. Vale (London, 1989), 34–7; repr. in Martindale,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关于经济地理的分析，可参见Warren, 82–8; 关于加隆河河道的维护，可参见J. H. Mundy, *Liber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oulouse 1050–1230* (New York, 1954), 4, 48。

22 R. Benjamin, ‘A Forty Years War: Toulouse and the Plantagenets, 1156–96’, *Historical Research*, lxi, (1988), 271.

23 R. Collins, *The Basques* (Oxford, 1986), 234–48.

24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vol. 1, ed. and trans. R. A. B. Mynors, R. M. Thomson and M. Winterbottom (Oxford, 1998), c. 439. 相关评论参见J. Martindale, ‘“Cavalaria et Orgueil”: Duke William IX of Aquitaine and the Historian’, in *The Ideals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Knighthood*, ii,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1988), 87–116; repr. Martindale,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25 关于南部宫廷地区对音乐发展的贡献，可参考这部著作的前几章：C. Page, *Voice and Instr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87)。

26 L. Seidel, *Songs of Glory. The Romanesque Facades of Aquitaine* (Chicago, 1981).

27 Diceto, i, 293–4.

28 C. Higounet, *Bordeaux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Bordeaux, 1963), 246–58. R. Dion,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59); X. de P

lanhol,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Cambridge, 1994), 228–9.

29 关于拉罗谢尔在葡萄酒贸易中的地位，可参见R. Favreau, ‘Les Débuts de la ville de La Rochelle’, *CCM*, xxx (1987), 23–8。布列塔尼的威廉甚至将它称作“酒神之城”（the town of Bacchus），*Philippidos*, xii, 821。

30 Martindale, ‘Eleanor’, 24–8.

31 I. Short, ‘Patrons and Polyglots: French Literature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ANS*, xiv (1991), 229–49.

32 K. Leyser, ‘Frederick Barbarossa, Henry II and the Hand of St James’, *EHR*, xc (1975).

33 Torigny, 255.

34 J. Vielliard, *Le Guide du pèlerin de Saint-Jacques de Compostelle* (Macon, 1938), 16–32, 62, 66, 78. 对此可参考C. Hohler, ‘A Note on Jacobu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 xxxv (1972)。关于波尔多地区罗兰崇拜现象的讨论，可参见Higounet, *Bordeaux*, 142–3。

35 Vigeois, Bk 1, ch. 25.

36 Gerald, *Top.*, 195–6: Devizes, 76.

37 政治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参见J. Boussard, *Le Gouvernement d’Henri II Plantagenêt* (Paris, 1956)，以及下面两篇未发表的博士论文：J. Martindale, ‘The Origins of the Duchy of Aquitain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s of Poitou’ (D.Phil., Oxford, 1964) and R. C. Watson, ‘The Counts of Angoulême from the Ninth Century to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Ph.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79)。

38 关于吕西尼昂家族的论著可参见S. Painter, ‘The Houses of Lusignan and Châtellerault, 1150–1250’, *Speculum*, xxx (1955)以及‘The Lords of Lusigna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Speculum*, xxxii (1957)，它们都在下列著作中重新出版：*Feudalism and Liberty: Articles and Addresses of Sidney Painter*, ed. F. A. Cazel (Baltimore, 1961)。

39 Torigny, 235–6.

40 对相关问题的简短讨论可参见Gillingham, *The Angevin Empire* (London, 1984), repr. in *Coeur de Lion*。亨利的第三个儿子杰弗里当时已经与布列塔尼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订婚。

41 关于上述计划及后续事件的原始史料，出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一封信件，参见*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ed. W. J. Millor and C. N. L. Brooke (Oxford, 1979), no. 272。

42 M.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 (Cambridge, 1996).

43 *HGM*, 1623–881.

44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no. 279; Torigny, 237.

45 *Map*, 450–1.

46 Torigny, 240;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no. 288, 636–49. 关于“不附带嫁妆”的条款，参见前书648——649页。

47 “按照他母亲的意愿分配”，Vigeois, Bk 1, ch. 67。

48 Torigny, 241–2; Vigeois, Bk 1, ch. 66; A. 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de Poitou 778–1204* (2 vols, Paris, 1903), ii, 150; Norgate, 8, n. 1.

49 *Gesta*, i, 6–7; Torigny, 247–8;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nos 287–8.

50 *Gesta*, i, 10–11; Torigny, 247.

51 Vigeois, Bk 1, ch. 66; 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 158–9.

52 Vigeois, Bk 1, ch. 67. 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有多种观点，1170年说主要参见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i, 150，许多作者也赞同此说；我和诺尔盖特则赞同1172年说，因为维茹瓦的杰弗里在叙述1173年亨利二世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在利摩日的会面时，称其为“在下一年里”（anno sequenti）发生的事件。

53 关于这些典礼的意义，可参见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i, 150–3; H. Hoffman, ‘Französische Fürstenweihen des Hochmittelalters’, *DA*, xviii (1962)。

第四章

父子相争，无爱之战，1173——1174

1173年春，理查参加了路易七世在巴黎举办的一次盛大会议，这一年里他也被路易七世册封为骑士，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不过，路易七世册封他是为了鼓动理查举起反旗对抗他的父亲。¹而理查在巴黎的这次行动也标志着他将站在自己的母亲和兄长亨利一方，与他们进行对抗父亲亨利二世的战争，这场战争也被当时的诗人们称作“无爱之战”（la guerre senz amur）。²

在理查前往巴黎数周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1173年2月，亨利二世在奥弗涅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与莫里耶纳伯爵亨伯特（Count Humbert of Maurienne）会晤，以确定亨利最小的儿子约翰与伯爵的女儿、他的潜在女继承人的婚约。这次会晤也因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of Aragon）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的出席，而显得更为声势浩大，不过阿方索二世和雷蒙德五世此行是为了请亨利二世作为仲裁者对他们的长期争端进行裁断。这时，罗马的教宗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正准备将三年前被谋害的托马斯·贝克特封为圣徒，但与贝克特政见不合的老对手亨利二世这时却声望日隆。为了向世界展示众多王侯因能参加舞会而深感荣幸，亨利二世还请来纳瓦拉国王，并计划于月底与他们在利摩日宫廷会面。就这样，1173年2月25日，

雷蒙德伯爵在众多王侯的见证下向亨利二世行臣服礼，随后伯爵也依次向亨利的儿子小亨利和理查行臣服礼。³举行这个仪式是为了表明，统一的安茹家族终于获得了他们对图卢兹宿敌的胜利。不过，亨利二世的命运之轮却在此刻开始转动。此前他还是一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君王，而且正如沃尔特·马普所言，他令半个基督教世界都不得安宁，且对此毫不愧疚。然而从1173年开始，亨利二世变得越来越保守，如纽堡的威廉所言，他最终“对战争极其厌倦”。⁴

这场“无爱之战”的起因是，当亨利二世成为莫里耶纳伯爵女儿的监护人后，伯爵询问国王，他女儿未来的丈夫约翰将从父亲那里获得多少财富⁵——那时年仅五岁的约翰就是未来的“失地王”约翰（John Lackland）。在凯特·诺尔盖特看来，伯爵的问题“引发了一个将永远无法解决的麻烦，直到这个当时看似无害的起因导致的结果令他的父亲极为伤心”。⁶对此，亨利二世的答复是：约翰将获得希农（Chinon）、卢丹（Loudun）以及米尔博（Mirebeau）三座城堡。然而，亨利二世的这一声明激怒了他的长子，年轻的小亨利。虽然小亨利此前已在蒙米拉伊向法王行臣服礼并获得了诺曼底和安茹，还在1170年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但小亨利和他的王后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领地，已年满18岁的小亨利迫切希望成为自己领地的统治者，于是他在1172年11月时与岳父路易七世在诺曼底边境会面，据称当时路易七世鼓动他向父亲索取自己应得的一切。不过“幼王”亨利一定清楚，想要劝服他的父亲让出哪怕一点权力和财富都并非易事。那时“老王”亨利还未满40岁，他提出将希农、卢丹和米尔博转至还是孩童的约翰名下，不过是为确保自己能在随后数年间控制这三座重要城堡而使用的小手段罢了。这样的手段当然瞒不过作为安茹伯爵的小亨利，他愤怒地拒绝了父亲的要求，还向父亲提出：至少应将英格兰、诺曼底或安茹这三片领地之一立刻转交由他继承。对儿子的强硬要求，父亲同样一口回绝。此后，亨利二世和他的长子便处于持续争吵的状态中。

亨利二世在处理与他的继承人之间的关系时，很可能料到了自己将

要面临的艰难状况，但他很可能没能料到随后而来的打击。雷蒙德伯爵曾私下找到亨利二世，将埃莉诺与其余诸子也在合谋反对他的消息告诉后者。至少维茹瓦的杰弗里此时认为，鉴于亨利二世将理查和三子杰弗里（Geoffrey of Brittany）都留在埃莉诺身边，他误解了雷蒙德伯爵的这番秘密谈话。⁷无论如何，亨利二世在得知此事后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以参加狩猎活动为名，离开利摩日，带着他的长子匆忙北上，⁸并下令所有属于自己的城堡进入战备状态。不过在途经希农时，小亨利趁夜间父亲酣睡之机偷偷离开，来到路易七世宫中。至于照顾着理查和杰弗里的埃莉诺，亨利二世认为，尽管她很可能如雷蒙德伯爵此前所说，加入反抗他的家庭阴谋中，但他相信她不会将这起阴谋升级为内战，更不可能和她的前夫路易七世联手与他对抗。不论亨利二世当时作何考虑，但从事态发展看来，他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埃莉诺一面将理查和杰弗里送往法王宫廷与他们的兄长会合，一面在普瓦图亲自召集军队。

埃莉诺的举动无疑令人震惊。博学的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追古溯今，试图为1173——1174年的内乱寻找类似事件，尽管他找到了超过30个儿子们反抗双亲的事例，其中就有近期发生在安茹和普瓦图的事例，但他指出：从未有过王后反叛其夫君的先例。在一封以鲁昂（Rouen）大主教之名、由著名诗人布卢瓦的彼得（Peter of Blois）写给埃莉诺的信中，有劝告埃莉诺向她的丈夫屈服以免遭受教会制裁的内容：“众所周知，你要回心转意，与你的丈夫重归于好，否则你的行为将导致彻底的毁灭。”⁹和埃莉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12世纪的英格兰史家们对埃莉诺在这次内战中的角色进行分析时，显然都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认为埃莉诺应为此负责；另一方面，他们却以“据说如此”（so it was said）之类的语句避免直接表明自己的结论。¹⁰内战后不久，豪登的罗杰在他的《亨利国王传》（*Gesta Henrici*）中将责任归咎于路易七世，但他在书中还补充了“有人认为，埃莉诺和她的叔叔、普瓦图宫廷总管拉尔夫·德·法伊（Ralph de Faye）也应为此负责”的语句。不过，当罗杰在12世纪90年代初重新回顾他的记录时，埃莉诺已再度成为英格兰

举足轻重的人物，因而他选择省略关于埃莉诺参加内战的情节。¹¹ 不过，拉尔夫·德·法伊在当时无疑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廷臣，他参与了众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分别在1170年和1173年为两位王室子女——埃莉诺和约翰——订立婚约。¹² 不过从埃莉诺晚年治理阿基坦时所展现的娴熟技巧来看，另找一位有权支持者的行为实属多余。更何况，若没有母亲的指示，我们很难相信15岁的理查和14岁的杰弗里会接受所谓“幕后主使”的劝说，发起反抗父亲的叛乱。

事实上，正是埃莉诺本人做出了儿子们一同对抗丈夫的决定。不过这一决定背后仍有着令旧时史家和现代史家都困惑不解之处。埃莉诺最小的儿子约翰生于1167年12月，零散的证据表明，从1170年秋季到1172年末在希农举行最后一次圣诞聚会的两年多时间内，埃莉诺和亨利两人都没有见面。¹³ 虽然在此期间亨利二世仍然是全权主政者，不过埃莉诺似乎已开始负责阿基坦的日常管理，并作为次子理查的唯一监护人对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普瓦图这片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土地。据说普瓦捷宫廷里“来自阿基坦和普瓦图的纨绔子弟们沉浸在骑士传奇之中”。宫廷中歌舞升平，骑士比武盛行，还有许多歌颂游侠骑士与骑士之爱的吟游诗人。而置身欢愉宫廷中心、主导一切事物的人正是埃莉诺，“（埃莉诺）以她出众的智慧、对文学艺术和标志性的优雅文辞的热爱统治着所有人”。¹⁴ 与之相反，亨利二世的宫廷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宫中的法学家和行政官员们则更热衷于对最新颁行的王室令状中的术语修辞彻夜争论不休。¹⁵

那些对普瓦图文化进行深度研究的文学史家们偶尔会提出，当时盛行的骑士之爱不仅是供人娱乐、消磨时间的时髦风尚。他们认为，骑士之爱这一文化现象是对当时伦理道德的革命性颠覆。将对有夫之妇的爱慕之情美化，这既是对当时的顺从观念的蔑视，也是对男权社会的两大精神支柱——教权和夫权的嘲弄和破坏，并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史学家们一般将埃莉诺和她的长女、香槟女伯爵玛丽（1140——1198）视作这一危险文化运动的重要赞助人。当时的谣言宣称：埃莉诺曾是

一位通奸者，她所做的事情可能不过是为自己的过去实践活动辩护罢了；玛丽则经常带着当时法兰西最伟大的诗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来到母亲位于普瓦捷的宫中居留。克雷蒂安的作品之一，记录兰斯洛特骑士与他的君主亚瑟王（King Arthur）的王后之间的暧昧恋情的浪漫故事《兰斯洛特》（*Lancelot*）便是应玛丽的要求创作的。此外，埃莉诺和玛丽还成了《论爱情》（*De Amore*）一书中的主角，其作者安德鲁是12世纪80年代初香槟伯国境内的一位牧师。《论爱情》也常以“骑士之爱的艺术”（The Art of Courtly Love）之名为人所知，它是“爱情法庭”这个传说的源头。当奉行骑士之爱的情侣们发生争执、寻求法律仲裁时，像是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她的长女玛丽这样的权威便会来到法庭，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定。¹⁶ 玛丽在一次法庭辩论中明确宣称“男人与他的妻子之间不存在真爱”，并据此做出判决。如今人们已不相信玛丽和埃莉诺会负责裁决此类法庭争端。¹⁷ 更为人们接受的理念是：骑士之爱只是杜撰的文学游戏罢了。不过，人们仍然相信，当玛丽和“她的”牧师安德鲁、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前来普瓦捷与埃莉诺见面时会十分热衷此道。基于这种观念，埃莉诺成为象征新兴社会文化的骑士之爱的代言人，她还作为吟游诗人的故乡、法兰西南方（Midi）文明区的代表对抗她的丈夫——象征冷酷无情、粗野无礼、崇尚野蛮的北地统治者“北风之王”（King of the North Wind），并巧妙地令后者的权威荡然无存。此后不久，埃莉诺就将发动对其丈夫的公开叛乱。若我们考虑到理查的父母之间自12世纪60年代末开始便已关系紧张的事实，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亨利二世和埃莉诺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相异性格的冲突，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我们也实在难以想象，年轻的理查是怎样在如此复杂多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的。

然而上述来自同时代史家的记录并不真实，当下关于骑士之爱传奇故事的新看法仍然如旧观念一般缺乏依据。实际上，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女伯爵玛丽、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和“牧师”安德鲁曾造访过位于普瓦捷或是其他地方的宫廷，因为埃莉诺这几年间并不一直在普瓦捷居住

。《论爱情》则迟至1186年才完成，而那时安德鲁很可能已经不为玛丽服务，他在书中假托为埃莉诺所做的两起裁决，都至少表明其本意是对埃莉诺进行嘲讽。在第一个故事中，埃莉诺对近亲结婚强烈谴责，并判决其婚姻无效，然而她本人有过两桩与自己近亲的婚姻。在第二个故事中，一位女子因选择伴侣的问题请求她裁决，她的两位追求者分别是一位十分正直的成年骑士和一位一无所有的青年。据安德鲁的记载，埃莉诺的裁决是：若她打算从中选一位较为次等的人作为伴侣，这将是较不明智的举动。而埃莉诺本人也正是这样——她在30岁时，便选择与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前夫路易七世离婚，与年仅19岁的亨利二世结婚。安德鲁的读者们显然都能读出他书中强烈的嘲讽意味，而此书很可能写成于法王宫廷的事实则更加强了讽刺效果。至于书中另一处提及女伯爵玛丽否认婚姻中存在真爱的内容，安德鲁将其发生时间设定在1174年5月——这是书中出现的唯一一个具体时间，正是埃莉诺沦为其夫亨利二世阶下囚的时刻。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文字游戏不是1169——1173年的埃莉诺进行的，而是12世纪80年代末写作的“牧师”安德鲁完成的。安德鲁在《论爱情》中幽默讽刺的笔调不禁令人深思：对外遇之爱这一“新观念”十分认同的特定时代真的存在吗？¹⁸

然而，对阿基坦的埃莉诺最为严重的误读在于，她与丈夫亨利二世的差异被现代人过分夸大了。埃莉诺确实是著名的文学艺术赞助人，但和其他君主一样，亨利二世同样热衷此道，而且由于后者更具权势，能施与更多恩赏，艺术家们往往更乐于向亨利二世而非他的妻子埃莉诺献上作品，以求得到他的恩宠。比如，著名的抒情诗人、旺塔多的贝尔纳就更频繁地向亨利二世而非埃莉诺进献他的诗作。¹⁹ 不过考虑到个中缘由，我们不应感到过于意外。尽管关于王后可能犯下通奸罪的谣言听起来似乎言之凿凿，而且考虑到当时的人在性观念方面有明显双重标准，比亨利二世的众多情妇的故事更加令人震惊，那么如果他们中有人发生了婚外情，那也更有可能是亨利二世，而不是埃莉诺。亨利二世的情妇之一、被他亲切地称作“美人罗莎蒙德”的罗莎蒙德·克利夫德（Rosam

und Clifford) 于1176年去世时，她的墓地上不仅覆盖着丝绸，受亨利二世捐赠的歌德斯托女修道院（Godstow Priory）里的修女们直到1191年时还遵照亨利二世生前的嘱咐管理她的墓地。²⁰可以说，埃莉诺的传奇故事中关于她本人和她丈夫的部分都与史实有着极大出入：亨利二世对文艺的爱好既被抹去，埃莉诺的个人品格也遭抹黑。若我们拨开笼罩在埃莉诺身上的传说迷雾，便不难发现她确实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只不过不是以传说中的那种方式。不过，当我们讲述这些关于埃莉诺的传奇故事之时，也应当更为谨慎，以免把她与洗着驴奶浴的埃及艳后相混淆了。

另外一些作家则认为，是亨利二世的外遇，尤其是他与罗莎蒙德·克利夫德的婚外恋情公开化一事令埃莉诺怒不可遏，使她最终决定诉诸暴力，起兵反抗其夫。这一说法的依据同样来自一些不实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嫉恨交加的王后成了导致罗莎蒙德死亡的罪魁祸首：一个故事说埃莉诺将这位国王情妇的双眼挖出；另一故事的情节则是，埃莉诺强迫她在服毒自尽和用刀自杀这两种方式之间做出选择。²¹也有人试图从政治因素而非情感因素做出解释：埃莉诺起兵反叛是出于对亨利二世的怨恨，因为后者的大权独揽令她变得无足轻重。²²它虽然说明了叛乱爆发的背景，但仍然无法解释“叛乱为何会发生在1173年而非其他年份”的问题。上文提及的小亨利由于不满父亲令他让出部分领地的请求而勃然大怒一事无疑是原因之一，不过，那时的小亨利还手无实权、软弱无力，相较于奋起反击，他更可能会陷入长期郁郁寡欢之中。既然如此，埃莉诺选择在此时引发家族危机，发起这场“无爱之战”的原因何在？也许我们可以从此前在利摩日的臣服事件中获得一些线索。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的臣服无疑是属于亨利二世的一大胜利，但在埃莉诺的眼中却并非如此。作为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此前已经继承了图卢兹的领地，不过雷蒙德除了向阿基坦公爵表示臣服外，还向“幼王”亨利表示臣服。这是否象征着阿基坦将永久臣服于盎格鲁-诺曼统治者？若真是这样，九泉下的历代阿基坦公爵们必将不得安宁，而普瓦图贵族们同样会心

怀不满。²³ 他们中的一员、绍维尼的休（Hugh of Chauvigny）就宣称他憎恨所有的英格兰人。而不久前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帕特里克之死事件，仍是能激起双方彼此仇恨的片段。

追随埃莉诺发动叛乱的封臣们包括以昂古莱姆伯爵威廉，吕西尼昂的杰弗里，吕西尼昂的盖伊（Guy of Lusignan），他们的侄子、塔耶堡（Taillebourg）领主杰弗里·德·朗孔（Geoffrey de Rancon），以及被称为“大主教”的帕尔特奈（Parthenay）领主威廉²⁴等人为首的贵族们。由于拉尔夫·德·法伊是沙泰勒罗（Châtellerault）子爵家族的一员，这意味着，除了此前因和埃莉诺发生争执遭到冷遇的图阿尔（Thouars）子爵拒绝加入埃莉诺的队伍，埃莉诺的行动得到了普瓦图和昂古莱姆地区内所有重要男爵的支持。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阿基坦公国的其他地区——比如此前激荡不安的拉马什、利摩日以及整个加斯科涅地区也都没有加入叛乱。利穆赞地区的领主们由于卷入利摩日子爵艾玛尔五世（Aimar V）与他的叔叔们的长期争端，脱不开身。²⁵ 利穆赞的例子似乎足以证明：比起卷入安茹家族的内斗，人们对地方利益更加关注。²⁶

与此同时，1173年春季时，理查和他还在巴黎的兄弟们共同发誓：除非得到法王和他手下男爵们的许可，他们绝不与自己的父亲单独议和。²⁷ 此外，一个由苏格兰之王威廉一世、佛兰德斯伯爵、布洛涅伯爵、布卢瓦伯爵所组成的强大的反亨利贵族同盟也已做好进攻亨利领地的准备，并希望获得亨利领地内叛乱者的支持。不过，亨利二世在面对自己统治期间首个重大危机时表现得异常冷静，在召集部队、准备给敌军致命一击之前，他选择静待战机，后发制人。此外，亨利二世还利用自己的大量财富招募了众多雇佣军为他效忠。这些佣兵通常以“游荡佣兵团”（routiers）之名为人所知，此外，他们也时常被赋予一个具有种族意义的名称——“布拉班特人”（Brabançons）。不过，他们有时也会被视为纳瓦拉人、巴斯克人或德意志人，但是，它们并不是对佣兵成员来源地的真实描述，只是当地人为将自己与这些说着未知语言的外来人区分所用的特殊称谓罢了。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既因无畏善战名声显著，

却也因对乡村地带的无情掠夺而令人畏惧。²⁸手握强力雇佣军的亨利二世就这样做好了应对入侵的准备。1173年7月，理查和他的兄弟们在佛兰德斯伯爵腓力麾下参加了对诺曼底东部的进攻，然而这次进攻最终一无所获：在德林库尔（Drincourt）围城战中，腓力伯爵的兄长、布洛涅伯爵马修（Matthew of Boulogne）身中弩箭，数日后不治身亡，腓力闻讯只得收兵。²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理查初次参战时发生的这起意外预示了理查最终的结局。此后，其他战场的攻势也逐渐减弱，到秋季时，路易七世和安茹王朝的王子们已经十分沮丧，准备发出和平试探。在吉索尔的会议上，亨利二世向他的儿子们提出了己方的和平条件：他承诺，理查将获得阿基坦年收入的一半，并得到4座城堡的统治权；小亨利和杰弗里也得到了类似的承诺。对亨利二世而言，他十分乐于向仲裁者提出这些条件，并允许他们进行调整，以使自己继续保有对领地的统治和司法全权。亨利二世也只打算在涉及财富而非权力的问题上讨价还价。然而，在路易七世授意下，理查和他的两位兄弟都拒绝了父亲的提议。³⁰于是战火再起，1173年11月初时，亨利二世带着他的布拉班特佣兵突入希农地区南部，兵锋直指拉尔夫·德·法伊的领地。随后，亨利二世攻克了拉艾耶（La Haye）、普勒伊（Preuilly）和尚皮尼（Champigny）城堡，³¹并俘虏了他的妻子埃莉诺。根据坎特伯雷的杰维斯（Gervase of Canterbury）记载，埃莉诺被俘时女扮男装。³²很可能是母亲被俘的消息促使理查独自做出了自己的首个政治决策。理查此时只有16岁，长期处于背景中，他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兄长小亨利的行动，他和小亨利的光芒也彻底被他们的封君路易七世掩盖。但在埃莉诺被俘之后，理查必须承担起领导普瓦图地区叛乱的重任了。³³

面对眼前的形势，理查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进兵拉罗谢尔。不过对亨利二世十分忠诚的拉罗谢尔市民们选择紧闭城门与理查对抗。他们相信，若是亨利二世在此次内战中获胜，将对维护他们的利益更为有利。具体说来，作为统一的普瓦图、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统治者，亨利二世的统治对维持拉罗谢尔赖以成名的葡萄酒贸易极为重要。然而，同样有许

多城镇对突然发迹的拉罗谢尔城心怀嫉妒，将它视为“暴发户”（nouveaux riches），沉迷贸易带来的享乐的罪恶渊薮。如果说拉罗谢尔反对理查，那桑特就是理查的盟友。桑特和拉罗谢尔的争端由来已久，早在1150年时，为了容纳更多礼拜者，拉罗谢尔市民曾向桑特主教提出修建一座新教堂的请求，然而这一请求遭到回绝。拉罗谢尔市民们只得绕开主教，从教宗那里获得许可。主教的拒绝当然有其顾虑：作为圣通日地区古老的主教驻地，桑特素来以其光辉历史为荣，圣通日的神庙、圆形竞技场和环绕城市的罗马式城墙都见证了它的光辉。然而迅速发展的拉罗谢尔城却令圣通日人深感不安，他们担心拉罗谢尔将最终取代圣通日的地位。³⁴当然，桑特的历任主教对其竞争对手修建教堂提议的回绝十分成功——毕竟直到17世纪时，拉罗谢尔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主教座堂。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亨利二世占据普瓦捷时，理查选择将他的主营设在桑特，并将城内的主教座堂改建为军械库也是十分合理的。虽然理查正确地认识到拉罗谢尔的重要性，体现出他的战略眼光和雄心壮志，但此时他显然还不是父亲的手下。亨利二世不仅在人力财力方面都有优势，出其不意、用兵神速的作风也是他克敌制胜的重要秘诀。正当理查认为父亲还在普瓦捷庆祝圣灵降临节时，亨利二世已经率兵对桑特进行了突袭，并迅速攻破了城门。理查和少数随从匆忙逃出城，前往杰弗里·德·朗孔治下的塔耶堡的城堡，他的主力部队则撤回到主教座堂内，苦战数日后败北。³⁵尽管亨利二世为了确保行军速度并没有从普瓦捷带来攻城器械，无法威胁到城防坚固的塔耶堡，但身处塔耶堡内的理查在此役后失去了他的所有军事物资，部下的60名骑士和400名弓箭手也在桑特被俘虏。这年夏季时亨利二世再次率兵北进，只留下部分将领负责阿基坦的军务，损失惨重的理查尽管仍然拒不认输，但他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理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不久后，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在1174年7月13日的阿尼克（Alnwick）之战中被俘，最终为这场内战画下了休止符。当时的人都忍不住指出，就在前一天，亨利二世刚刚在坎特伯雷为他之前发表的导致贝克特被害的草率言论做了公开忏悔。

尽管年轻的阿基坦公爵理查还在负隅顽抗，拖延英法两国国王的议和进程，但在9月8日时，双方还是签署了和约，约定从圣米迦勒节（9月29日）起停战，但停战的范围特别把理查排除在外。³⁶在消除所有其他战争威胁后，亨利二世终于可以管制不安分的理查了。听说父亲向他进军的消息后，理查迅速撤退，并不打算与他正面对抗。然而，曾经的盟友路易七世和小亨利将他抛弃的消息传来，对此十分愤怒、感到孤立无援的理查这才知道大势已去。9月23日，理查终于出现在亨利二世面前，他匍匐在亨利二世脚下，哭泣着请求宽恕，随后父亲将儿子扶起来并给予他和平之吻。于是，一切都如期顺利地进行着：圣米迦勒节当天，交战双方在位于图尔（Tours）与昂布瓦斯（Amboise）之间的蒙特卢伊（Montlouis）再次召开和会，理查效仿他的兄弟，接受了比去年秋季时更为苛刻的条款：理查虽然仍获得阿基坦年收入的一半，但他只获得两处城堡，其中一处还是未设防的地区。可见，尽管亨利二世在经济方面对他的儿子们十分慷慨，但他始终牢牢掌握着治下国土的全权。

对于其他的国王封臣来说，《蒙特卢伊和约》则总体上使他们回到了内战爆发前15日前的状况。那些失去其领土和城堡的忠诚男爵们最终收回了自己的失地，而亨利二世也在未索取赎金的情况下释放了大多数被俘的贵族，并归还了他们的领地。尽管亨利二世十分渴求和平，也希望依靠和平获得缓解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的机会，但他也有容忍的底线。亨利二世能够允许叛乱的贵族们重获原有领地，但他下令摧毁这些领地里所有在战前修建的防御要塞。随后的年月证明，亨利二世对城堡的这一认识有着先见之明。最终，被摧毁的城堡废墟遍布亨利二世的各处领土，它不仅象征着国王的至高权力，也展示了国王对反叛贵族们的严厉惩罚。³⁷相应地，帮助亨利二世获胜的功臣们也都获得了赏赐。拉罗谢尔便获得了市镇地位：市民们不仅享有自治权，还可选举产生自己的市长。³⁸

不过，《蒙特卢伊和约》并没有提及埃莉诺——因她而起的这场叛乱，对亨利二世的事业和尊严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亨利二世

下定决心要严惩自己的妻子，将她作为人质长期监禁，以警示她那些犯上作乱的儿子们，³⁹尤其是新任阿基坦公爵理查。

注释

¹ *Gesta*, i, 63.

² *Jordan Fantosme's Chronicle*, ed. R. C. Johnston (London, 1981), line 20.

³ *Gesta*, i, 35–6; *Vigeois*, Bk 1, ch. 67, 维茹瓦的杰弗里在这里说明了具体日期。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迪切托的拉尔夫则对富丽堂皇的蒙费朗（Montferrand）宫廷更为印象深刻，他还指出了豪登的罗杰和杰弗里详细记载中的不实之处，他认为当时理查并未接受雷蒙德的臣服礼。参见Diceto, i, 353。

⁴ Map, 484; Newburgh, Bk 3, ch. 14.

⁵ 关于此段描述的事件，可参见*Gesta*, i, 34–5, 41。Torigny, 255.

⁶ K. Norgate, *England under the Angevin Kings* (2 vols, London, 1887), ii, 134.

⁷ *Vigeois*, Bk 1, ch. 67.

⁸ *Gesta*, i, 41–2.

⁹ Diceto, i, 355–66; *RHF*, xvi, 629–30.

¹⁰ Gervase, i, 242, “他们说”（dicebatur）；Diceto, i, 355, “他们说”（sicut dicitur）；Newburgh, Bk 2, ch. 27, “他们说，母亲暗中指示他们”（connivente, ut dicitur, matre）。

¹¹ *Gesta*, i, 42, “据某些人说”（ut a quibusdam dicebatur）；*Chron*, ii, 46。

¹² 其他事例还可参见*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 ii, no. 212。

¹³ Torigny, 255; *Gesta*, i, 35.

¹⁴ R. Pernoud, *Eleanor of Aquitaine* (London, 1967), 151, 155. 将埃莉诺浪漫化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法国前总理与波尔多市长J. Chaban-Delmas, *La Dame d'Aquitaine* (Monte Carlo, 1987), 以及对中世纪文学比对中世纪生活更加了解的中世纪文学专家的作品，例如D. D. R. Owen, *Eleanor of Aquitaine* (Oxford, 1993)。正如马丁代尔指出的那样，这种活动是建立在“缺乏考虑的移情作用”或者“作者对女性及其在社会中的理想地位”上的，Martindale, ‘Eleanor’, 35–8。

15 并没有表明亨利二世曾经参与这些讨论的相关记载，参见Gillingham, ‘Conquering Kings: Henry II and Richard I’, in *Coeur de Lion*。

16 Andreas Capellanus, *On Love*, ed. and trans. P. G. Walsh (London, 1982) 还指出，在当时的手稿中并不存在将此书称作“骑士之爱的艺术”的证据。他也认为，这一别称的主观色彩过于强烈。

17 J. F. Benton, ‘The Court of Champagne as a Literary Center’, *Speculum*, xxxvi (1961). 我认为，此文作者的观点比下文中的观点更具说服力：J. H. M. McCash, ‘Marie de Champagne and Eleanor of Aquitaine: A Relationship Re-examined’, *Speculum*, liv (1979)。

18 在对克雷蒂安·德·特鲁瓦的《兰斯洛特》进行评价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19 P. Dronke, ‘Peter of Blois and Poetry at the Court of Henry II’, *Medieval Studies*, xxxviii (1976), 186–8. 关于埃莉诺和旺塔多的贝尔纳，可参见Martindale, ‘Eleanor’, 37–8。关于亨利二世与克雷蒂安的两部早期作品《埃里克和恩尼德》（*Erec and Enide*）和《克里盖斯》（*Cligés*）之间的关系，可参见Chrétien de Troyes, *Arthurian Romances*, trans. W. W. Kibler (Harmondsworth, 1991), 5–6。

20 *Gesta*, ii, 231–2; *Chron.*, iii, 167–8.

21 “埃莉诺并没有出于报复而谋害罗莎蒙德，事实上她比后者更为美貌，也在普瓦图地位显赫”，E-R. Labande, ‘Pour une Image véridique’, 208–9。佩尔努（Pernoud）则同样支持因爱生恨的观点：“亨利二世打破了他自己的誓言，将纵欲至于一切之上，外遇之爱的乐趣最终消失，他也自食其果。”Pernoud, *Eleanor*, 151。关于“美人”罗莎蒙德的全部故事则可参见Owen, *Eleanor*, 114–48。

22 Warren, 120–1.

23 “从政治意义上说，埃莉诺可能对阿基坦被并入‘安茹帝国’感到十分愤怒。”Martindale, ‘Eleanor’, 33. 马丁代尔在新近的研究中提出，当时埃莉诺很可能拒绝了雷蒙德伯爵的臣服，因为这意味着承认他独立治理图卢兹伯国的权利，也收回了她此前对图卢兹的领土主张——这曾是她的丈夫在1159年希望以战争手段获得之物。

24 *Gesta*, i, 46–7. 帕尔特奈领主的相关内容参见G. T. Beech, *A Rural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the Gâtine of Poitou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Baltimore, 1964)。

25 根据维茹瓦的杰弗里描述，“这是一次涉及诸多贵族的严重敌对事件”，Vigeois, Bk 1, ch. 68。

26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居于阿让河畔卡斯蒂永（Castillon-sur-Agen）的阿诺德·德·博维尔（Arnold de Boville）。*Gesta*, i, 101. 另见下文75——76页。

27 *Gesta*, i, 43–4.

28 Newburgh, Bk 2, ch. 27.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291–329.

29 *Gesta*, i, 49.

30 *Ibid.*, 59.

31 *Ibid.*, 62–3.

32 只有杰维斯曾提及此事（i, 242），并称埃莉诺当时已“丧失信心”——在这位修士眼中，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其他同时代作家们对此都十分谨慎，并未谈及任何与埃莉诺的行踪和被俘相关的问题。

33 一位生活在昂热（Angers）的圣欧班（St Aubin）修道院的编年史家认为，许多普瓦图人是由于对亨利二世的怨恨，而非对理查的拥戴选择追随理查一方的，*Annales angevines*, 38。考虑到当时理查的年龄，这一结果并不意外。这位作者同样没有提及埃莉诺在这次叛乱中的作用。

34 关于拉罗谢尔和桑特的相互竞争以及拉罗谢尔在叛乱中的活动，可参见Favreau, ‘Les Débuts’, 8–9。Richard the Poitevin, *RHF*, xii, 420.

35 *Gesta*, i, 71; Diceto, i, 380. 理查向塔耶堡撤退的记录出现在某一版的《圣欧班编年史》（*Annals of St Aubin*）的页边，参见*Annales angevines*, 38。但这处记录存在年代错误，并非由当时的作家完成。

36 此段内容参见*Gesta*, i, 76–9。

37 *HGM*, 2202–21.

38 Favreau, ‘Les Débuts’, 23–4.

39 Martindale, ‘Eleanor’, 34.

第五章

阿基坦公爵理查，1174——1183

或许因为理查在1174年内战中的顽强抵抗给父亲亨利二世留下深刻印象，1175年1月，亨利二世将理查派往阿基坦执行任务，理查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蒙特卢伊和约》的限制。按亨利二世的指示，阿基坦境内的大部分城堡应恢复至内战爆发前15日的状态，还有一些城堡要被夷为平地。¹在亨利二世看来，这一任务可说是一举两得：既能使叛乱者得到惩处，也能使他的次子获得实用的政治经验。而为了帮助理查完成这一任务，亨利二世给予理查动用公国军队的权力，并命令当地的官员向他上缴税款。从此开始，维护阿基坦的稳定、镇压境内叛乱成为理查随后8年内的主要任务。此外，从豪登的罗杰在其历史著作《亨利国王生平述略》（*The Deeds of King Henry*）中所收录的理查寄给父亲亨利二世的文书来看，理查无疑成了亨利二世在阿基坦的代理人。若没有这些史料，我们也将无从知晓理查担任阿基坦公爵时的诸多事迹了。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文书的内容几乎都是“顺利完成任务”的清单——毕竟失败的任务不值得被记录。我们可以从第一封文书中了解到如下信息：叛乱城堡的数量有所减少；另外，在历时两个月的围城战后，处在阿诺德·德·博维尔（Arnold de Boville）控制下、驻守着30名骑士的阿让附近的卡斯蒂永的城堡于1175年8月向理查投降。而在另一份极为

简短的文书中，理查还专门记录了攻城器械的使用情况。在自己指挥的第一场围城战中就能攻克以坚固著名的卡斯蒂永城堡，这无疑令理查极为自豪。²

然而到了1176年春季时，理查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十分强大、难以对付的贵族同盟的威胁。为首的是昂古莱姆伯爵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异姓兄弟利摩日子爵艾玛尔五世、将妹妹嫁给昂古莱姆伯爵威廉的蒂雷纳子爵雷蒙德二世（Viscount Raymond II of Turenne），此外还有沙巴奈（Chabanais）和马斯塔克（Mastac）的领主们。为了寻求援军与这个强力同盟对抗，理查决定前往英格兰面见父亲。³应该说，这场叛乱绝不只是对1173——1174年内战的延续。除了参与叛乱的昂古莱姆伯爵诸子，参加1176年叛乱的贵族和前一次内战的贵族成员完全不同。此前的内战主要集中于阿基坦北部的普瓦图和圣通日地区，而1176年叛乱则集中于阿基坦东南部的昂古莱姆和利穆赞地区。事实上，理查在与普瓦图的宫廷贵族们进行商议后便率军向昂古莱姆进发。然而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发生了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1176年叛乱。

除了1176年叛乱之外，当时的诺曼和英格兰史家们也都记录了另一件看似与这次叛乱无关的事件，它发生于平静的英格兰萨里郡（Surrey）乡村地带，而非遥远又动荡的阿基坦。1175年圣诞节前不久，亨利一世的一位私生子康沃尔伯爵雷金纳德（Reginald, earl of Cornwall）在切特西（Chertsey）逝世，并被安葬在他的父亲修建的雷丁修道院里。⁴雷金纳德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作为继承人。根据英格兰传统，他的所有领地将在三位女儿间进行分配。然而亨利二世不仅将康沃尔伯国收归自己治下，还将雷金纳德伯爵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诺曼底的所有领地统统没收，将它们都分给自己最小的儿子约翰，只给伯爵的三位女儿留下了一小部分。事实上，处在雷金纳德治下的康沃尔伯国独立于受英格兰王室统治的诸郡，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自主权极大的自治封国。一度对此束手无策的亨利二世自然乐于趁伯爵逝世、后继无人之机，将此时锡矿产量大增的康沃尔领地纳入统一的安茹帝国治下。12世纪时，随着欧

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锡制生活用品、教会对用于铸钟的铜锡合金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因而康沃尔的锡矿资源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而此事与阿基坦的联系在于，当年幼的利摩日子爵艾玛尔还在亨利二世监护下时，便与雷金纳德伯爵的长女萨拉（Sarah）订立了婚约。对艾玛尔而言，这无疑是一桩令他身价倍增的婚姻，而利摩日人也都将雷金纳德伯爵视为有影响力的伟大人物，认为他帮助亨利二世赢得了英格兰王位。由于伯爵膝下无子，这桩婚事也得到了极高期望，然而亨利二世将康沃尔据为己有的行为令人们大失所望。⁵此前，艾玛尔子爵仍然保持着对亨利二世的忠诚：1173年2月时，他在利摩日款待了来此赴会的亨利二世和其他众多王侯，宴饮持续7天之久；当1168年叛乱和1173年至1174年内战爆发时，利摩日的艾玛尔也并未介入其中。然而1176年时，艾玛尔突然决定与安茹王室为敌，这一对抗政策也一直持续到他1199年逝世为止。不过13世纪时的利摩日子爵们也仍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康沃尔血统。⁶亨利二世在1175年至1176年对幼子约翰的过度关心导致了利摩日子爵艾玛尔的叛乱，这种关心也在他统治的最后16年中不断表露出来。他的继承人理查——可能对他的弟弟约翰过度慷慨——也没能恢复与利摩日的友好关系，理查最终也在一次对利摩日子爵领地内城堡的围城战中身受致命伤，倏然而逝。

1176年4月，亨利二世慷慨地答应了理查的请求，为他提供了足以应对此次威胁的额外经费支持。理查回到阿基坦后，立刻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批雇佣军。对理查来说，这些部队的加入无异于雪中送炭——叛军领袖之一、昂古莱姆的武尔格林（Vulgrin of Angoulême）不仅已使他的城堡完成备战，还带领一支布拉班特佣兵——据迪切托的拉尔夫所言——蹂躏了普瓦图。不过到了5月末时，理查率军在圣迈格兰（St Maigrin）与布特维尔之间的地带击败了武尔格林的这支军队。⁷随后，理查对仍在坚守的武尔格林的城堡置之不理，调转兵锋进攻艾玛尔子爵。理查率军深入利穆赞并攻陷艾克斯（Aixe）城堡，打开了沿维埃纳（Vienne）河进军利摩日的通道。正如12世纪的其他许多城镇一样，利摩日正

围绕着两个功能不同的核心区域逐渐发展起来。利摩日城的一侧是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和主教宫殿，这正是“城市区”的中心部分；另一侧则是以圣马夏尔修道院和子爵居住的城堡为核心的“城堡区”（Castrum）。城堡区也是利摩日城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带，这里有着众多生产著名的利摩日珐琅的工场。不过，维茹瓦的杰弗里特别指出，富足的利摩日市民拒绝服从任何权威，因此导致生活在城堡区的子爵本人与修道院院长和市民们之间纷争不断，然而，城堡区的居民却出于与主教的城市区的对立情绪而团结起来。组成利摩日城的两大部分在地理上彼此相隔，城区外围都有着独立的围墙，而导致利摩日城周边争斗不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主城区和城堡区的对立。1173年至1174年内战期间，城堡区的居民们利用周边势力无暇顾及的空隙，将他们的围墙改造为环绕城区的城墙。虽然他们利用了阿基坦公爵权威衰弱的时期，然而它并非用于对抗阿基坦公爵的权威，而是为了防备主城区居民的进攻。⁸

理查于1176年6月开始围攻利摩日，经过数日的战斗后，艾玛尔所在的城堡区向理查投降。6月末时，得胜归来的理查回到普瓦捷，并与他的兄长小亨利见面。小亨利此前曾向父亲提出前往孔波斯特拉朝圣的请求，然而亨利二世认为这是他有意摆脱自己控制的借口，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求，还将他派往阿基坦帮助理查镇压叛乱。于是，理查和小亨利在普瓦图宫廷与贵族们进行会谈后，率军进入昂古莱姆伯国境内。在将武尔格林的军队从领地上彻底清除后，考虑到武尔格林的父亲、昂古莱姆伯爵威廉不会对儿子的战败坐视不管，理查决定斩草除根，攻打泰尔弗家族的城堡。在经过14天的围城战后，理查攻克了昂古莱姆西部的重要城堡：位于连接普瓦捷和波尔多的必经之路上、控制着夏朗德（Charente）河上桥梁的沙托讷夫堡（Châteauneuf）。攻克沙托讷夫堡后，小亨利收拾行装离开了——他本就不愿前来支援，而为自己的弟弟充当副手一事更令他不满意。缺少应对艰苦战役的兴趣，也是小亨利离开的原因之一。然而，小亨利的离去无关紧要，理查继续进军，并在另一场为期10天的围城战中攻克了穆兰讷夫（Moulineuf）。随后，理查转向昂古

莱姆，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昂古莱姆城中已聚集了此前所有逃过了理查追击的败将：昂古莱姆伯爵威廉和他的儿子武尔格林、利摩日子爵艾玛尔、旺塔多子爵以及沙巴奈领主。他们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然而理查只用了6天时间便迫使他们投降了。威廉伯爵的居城昂古莱姆以及受他控制的所有主要城堡——布特维尔、阿尔夏克、蒙蒂尼亚克、拉谢斯（Lachaise）和梅尔潘（Merpins）——都向理查表示臣服。于是理查将他们扣押为人质，并将这些人质和其他俘获的叛党送往英格兰，让他们到亨利二世那里请求宽恕。9月21日，亨利二世在温切斯特接受了这些人质，不过准备前往诺曼底的亨利二世推迟了对他们的审判，便又将他们送回到阿基坦。⁹

此时的亨利二世和他的长子一样，不时产生前往孔波斯特拉朝圣的念头。不仅如此，1176年至1177年，亨利二世对西班牙诸王国的复杂政治形势产生了强烈兴趣，于是他指示理查：务必确保包括朝圣者、商人以及廷臣在内的所有旅行者都能在波尔多到比利牛斯山的大道上通行无阻。理查和他手下的匪兵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这件事，令当时很多习惯了散漫行事风格的观察家大为惊讶。理查在波尔多度过1176年圣诞节后，于1177年1月9日率兵包围了在达克斯（Dax）子爵和比戈尔伯爵桑图勒（Count Centulle of Bigorre）领导下反抗他的达克斯城，并将其攻克；随后理查包围了巴约讷子爵赖以反抗他的据点巴约讷城，同样攻克此城。攻克达克斯和巴约讷后，理查向位于西兹（Cize）的“西班牙之门”进军，他在此地攻克了圣皮埃尔（St Pierre）城堡，并将其夷为平地。理查在深冬时节、人们还沉浸在圣诞节欢愉气氛时发起的这场闪电战，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巴斯克人和纳瓦拉人的领袖们纷纷向理查宣誓，他们将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状况，并确保朝圣者们能不受打扰地通过这里。任务完成后，理查班师返回普瓦捷，并在1177年2月2日时派出使者向父亲传达完成任务的消息，并宣布他已完全平定整个阿基坦地区。¹⁰理查显然夸大了这一胜利。在作战结束后，他将部下的布拉班特佣兵辞退，而这些失去雇主和军饷来源的佣兵们便开始在周边地区大肆劫

掠，以获得补给和金钱，毕竟这是他们所擅长的。数月以来，他们在一位还俗修士、著名佣兵队长威廉·勒克莱尔（William le Clerc）的率领下给利穆赞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最终，在圣马夏尔修道院院长伊桑贝尔（Isambert）的呼吁下，当地贵族和民众才组织起一支民兵与其作战。这支被称为“和平之军”的部队得到了从耶路撒冷带回的十字架庇护，他们在靠近布里夫（Brive）的马勒莫尔（Malemort）将这些佣兵击败，并对其大肆杀戮以释放心中的怒火。¹¹

数月之前，当理查还在比利牛斯山区的丘陵地带作战时，位于阿基坦东北部、有着肥沃而开阔牧场的贝里西部地区爆发了一场危机。由于阿基坦公爵在此处并没有自己直辖的土地或城堡，因而他在此地的权威极弱，只能依靠当地最高领主的权力行使权力。贝里也是不容忽视的战略要地，控制着布尔日的卡佩王朝可以在此迅速发起对图尔和普瓦捷的进攻。因此，对贝里极为重视的亨利二世也在时刻寻找能够介入贝里事务的理由和时机。虽然亨利二世在1170年时一度孤注一掷出兵布尔日，但路易七世带兵赶来后，亨利二世立即撤退了。1176年末，机会终于到来：沙托鲁（Châteauroux）领主代奥勒的拉尔夫（Ralph of Déols）逝世，只留下他三岁的女儿丹尼丝（Denise）作为继承人。亨利二世见状，宣布将她置于自己的监护下，但丹尼丝的亲属们拒绝将她交出，选择增强防务，与亨利二世对抗。考虑到代奥勒领主的年收入据说几乎与诺曼底的收入持平的情况，亨利二世不会错过这个将代奥勒吞并的良机。不过此时亨利二世正忙于处理英格兰事务，于是他命令长子“幼王”亨利率领诺曼底和安茹的军队向代奥勒全速前进，将其尽快攻占。¹²

“幼王”亨利的军队在开战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后来停止了攻击，亨利二世决定介入。现在是时候将贝里的混乱政局理清了。1177年6月，亨利二世派出使臣前往巴黎，提出了导致事态恶化的要求。亨利二世要求路易七世兑现此前关于他的两位女儿——玛格丽特和艾丽丝的婚约，将（玛格丽特嫁妆的剩余部分）法兰西维克桑地区转交给亨利二世，还应将布尔日划为艾丽丝的嫁妆。¹³ 路易七世对这些无理要求

的回应则是：率先破坏协议的一方正是亨利二世，他作为艾丽丝监护人的时间过长。此外，路易七世还说服教廷使节将下列事实公之于世：路易七世是按照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禁令对亨利二世的领土进行处置的，除非立刻举行婚礼，否则这一禁令将不会解除。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教宗本人也应法王之请，不断向亨利施压，迫使他做出选择：要么将艾丽丝交还给路易七世，要么立刻将她嫁给理查。¹⁴ 教廷禁令的公开威胁，迫使亨利二世在协商时变得更加谨慎。1177年8月，亨利二世来到诺曼底并召集他的儿子们进行家庭会议。1177年9月，亨利二世与教廷使节和路易七世会面后，双方在诺南库尔（Nonancourt）达成了一份新的协议。协议规定：沙托鲁地区和其他发生于贝里和奥弗涅（Auvergne）境内的领土争端均交由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理查将立刻与艾丽丝完婚；路易七世和亨利二世最终同意参加十字军，并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¹⁵ 这起复杂的外交事件也对理查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他不仅成了艾丽丝的未婚夫，还成了贝里西部地区和奥弗涅的最高领主；但最重要的影响则是，理查于1177年9月在诺曼底首次听到教廷使节讲述耶路撒冷王国所面临的危机，这使他未来成为一位十字军领袖。萨拉丁的名字也从此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留下印象。

亨利二世在《诺南库尔条约》上盖章完毕后，便开始完成去年9月在温切斯特时做出的许诺，对昂古莱姆伯爵威廉、昂古莱姆的武尔格林、利摩日子爵艾玛尔以及其他被击败的叛乱分子进行惩处。亨利二世派理查先行前往贝里南部地区，他则随后而至。此时，“幼王”亨利仍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执行着父亲交给他的任务。很快，亨利二世如愿得到了代奥勒的丹尼丝，并将她送往希农城堡以确保安全。¹⁶ 随后，亨利二世率军前往利穆赞。他与理查在那里用一个月时间“严惩了罪有应得的叛乱分子”。¹⁷ 不过，这句话的作者豪登的罗杰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模糊语句的含义。¹⁸ 另一位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y）则宣称，理查为惩罚曾支持昂古莱姆伯爵的利摩日子爵，决定将他居住的城堡据为己有。¹⁹ 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说明对昂古莱姆伯爵的处置

，但直到1199年时，昂古莱姆伯爵阿德马尔（Ademar）仍然在试图收复他的父亲威廉伯爵在位时失去的领土，这些失去的领土很可能就是在1177年被纳入安茹王朝治下的。亨利二世及其次子理查率军驾临利穆赞地区，无疑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沃尔特·马普的记载称，英王的军队在利穆赞地区横行无阻，而军中一些四处抢掠的人还声称，“我们并不是强取豪夺，而是为了恢复当地的和平和秩序”，他指的很可能就是1177年10月时的情形。²⁰

11月中旬时，亨利二世回到贝里，在格拉赛（Graçay）就他与路易七世在奥弗涅的争执问题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果的会谈。由于据说奥弗涅地区的贵族们宣示“按照惯例，奥弗涅应属于阿基坦公国”，亨利二世似乎从容不迫地将解决争端的事宜交给调查委员会处理。²¹ 这显示，亨利二世还有比奥弗涅更重要的目标——事实上，他也确实有。他迅速返回利穆赞，结束了一项准备已久的谈判事宜。亨利二世在他最钟爱的地方，也是他1170年重病时希望埋骨于此的格朗蒙修道院与拉马什伯爵奥德贝尔会面。虽然拉马什是阿基坦公爵治下的一块重要封地，但它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拉马什伯爵治下的领土控制着从利摩日向北前往普瓦图和贝里的要道。奥德贝尔伯爵此前参加了1168年叛乱，还在1171年煽动了拉苏特兰民众的叛乱，但此刻他却由于家庭突遭横祸之故，决定离开故土：奥德贝尔先是怀疑他的妻子出轨，在复活节时杀死她的情夫，并与她断绝关系；他的独生子也在不久后离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他杀死妻子情夫的报应。这样一来，他除了一个据说已无法生育的女儿之外再无亲人。于是，心灰意冷的奥德贝尔决定变卖拉马什，并前往圣地朝圣。此前已成功控制代奥勒的亨利二世自然不会错失良机：1177年12月时，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亨利二世以付出15000安茹里弗尔（合6000马克），并为奥德贝尔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提供40头驮兽的代价，获得了整个拉马什伯国。可以说，亨利二世占了大便宜——毕竟人们认为拉马什伯国的实际价值是2万马克，不过这样的价码只会提供给一个有足够现金储备的买家。而拉马什伯国转入亨利二

世治下一事，也改变了整个阿基坦东部的权力结构。这一交易无疑令许多奥德贝尔伯爵的邻居们深感不安，他的远亲吕西尼昂家族和泰尔弗家族对此尤为不满，却无计可施。²²亨利二世在接受了拉马什贵族和骑士们的臣服礼后回到昂热欢度圣诞，1177年的圣诞节无疑也是他统治期间最为盛大的节庆之一：不仅他的儿子们悉数到场，还有众多骑士簇拥在旁，这不禁令人想起亨利二世盛大的加冕礼。²³毕竟，这是一起值得欢庆的重大事件。

像其他维护自己领土内和平的王侯一样，安茹王朝为保持治下领地的和平，也通常需要获得当地教会的支持，然而在利摩日却发生了国王打击当地教会权威的事件。1178年2月，圣斯蒂芬大教堂的一位教士塞布朗·沙伯（Sebrand Chabot）被秘密选举为主教，然而他与国王的不和众所周知。当这位新主教在9月上任时，他们一行人便被理查的官员们逐出了城市，理查的官员们还将大教堂封闭了21个月之久。²⁴1178年，除了这件事，我们只对理查在年末的活动有所了解。²⁵从豪登的罗杰次年夏季收到的文书来看，1178年末，理查率领大军前往达克斯，并在此地惊喜地发现，当地居民已经将他的老对手——比戈尔伯爵森图勒抓获并囚禁起来。随后，阿拉贡国王、巴塞罗那伯爵阿方索二世请求理查释放森图勒。显然，阿方索二世与理查进行了会面，并为他的朋友森图勒做了担保：比戈尔伯爵此后保证不再违抗阿基坦公爵或亨利二世的命令。为防再生动乱，理查下令森图勒将克莱蒙和蒙布龙城堡交予他统治。²⁶此外，记录中将比戈尔伯爵描述为“阿方索国王之友”的内容也表明，这并不只是一起封君管束桀骜封臣的事件。近年来，身为吟游诗人以及吟游诗人赞助者的阿方索二世似乎大有成为“比利牛斯地区的皇帝”之势。1162年，年仅5岁的阿方索继承父亲的王位，但年轻的阿方索从12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向周边地区展示他的力量。1173年，贝阿恩（Béarn）女子爵玛丽退位进入修道院，她的小儿子成为贝阿恩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实权则掌握在由阿方索二世指派的摄政之手。然而贝阿恩的部分领地还属于阿基坦公国治下，这无疑是对阿基坦的挑衅。随后数年

内，阿方索二世的行动更为迅速，他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长期作战，并迫使后者在1176年将治理普罗旺斯的权力转交到自己手中；1177年，阿方索二世占领了鲁西永（Roussillon）；1178年3月，阿方索二世为对抗地处山区的纳瓦拉王国，恢复了与卡斯提尔王国的同盟。此外，他还通过联姻获得了比戈尔伯爵的支持，并在1175年将战略要地阿兰谷地（Val D'Aran）赠予后者。²⁷阿方索二世在比利牛斯地区的不断扩张，使他拥有了贝阿恩、比戈尔、鲁西永和普罗旺斯等新领地。对于他的邻居们——阿基坦公爵、纳瓦拉国王和图卢兹伯爵而言，阿方索二世不只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更令他们感到芒刺在背。所以，理查在达克斯的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有着阻止阿拉贡王国势力向北扩张的意图。

从达克斯返回后，理查在桑特度过了圣诞节，但这时昂古莫瓦地区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昂古莱姆伯爵威廉似乎准备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将他的长子武尔格林任命为新的家族领袖。理查闻讯后打算将武尔格林召至桑特斯向他行臣服礼，但后者由于不甘忍受不久前理查对其家族的打击而拒绝了这一要求。武尔格林的强硬态度也得到了他的盟友杰弗里·德·朗孔的支持，后者在普瓦图和圣通日都有大量领地，也是昂古莱姆伯爵封臣之一的马西亚克领主。朗孔家族曾参加了1168年和1173年至1174年的两次叛乱，他们也和泰尔弗家族一样，对安茹家族在由桑特向东穿过科尼亚克、直指昂古莱姆的夏朗德河谷地带扩大政治影响的行为深感不安。而杰弗里·德·朗孔的两座重要城堡——塔耶堡和蓬斯都正好位于能够控制波尔多、桑特和拉罗谢尔这三座城市间交通的关键位置。理查在1179年初召集大军对蓬斯发起了第一次进攻，尽管理查军占有数量优势，但杰弗里·德·朗孔显然预见到了这次攻击并为守军提供了充足的补给，导致这次围城战收效甚微。到了复活节周时，理查意识到正面进攻防御如此坚固的城堡终将徒劳无功，出于政治考量，他感到为了一次胜利赌上自己的名誉太过冒险。于是理查下令主力部队继续围困蓬斯，他则率领少数部队北进，穿过科尼亚克，开始围攻里什蒙。经过三天战斗，理查攻破里什蒙并将它彻底摧毁。理查在随后三周内又接连攻克并

摧毁了让萨克（Genzac）、马西亚克（Marcillac）、格鲁维尔（Grouville）和昂维尔（Anville）4座城堡。²⁸但是，连战连捷的理查并没有返回蓬斯与主力会合，而将目标定为塔耶堡。1179年5月，令理查一战成名、奠定他杰出围城战统帅地位的塔耶堡之战正式打响。

位于夏朗德河右岸的塔耶堡在一片突出地面的浅色岩层上建成，塔耶堡的下方现在仍有一座桥梁，过去，它还控制着一条供旅行者们穿越沼泽地带的堤道。事实上，此处没有可供渡河的浅滩，也无其他桥梁，可以说塔耶堡控制着桑特和托奈夏朗德（Tonnay-Charente）之间的唯一通道。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塔耶堡是一座难攻不落之城。五年前被父亲亨利二世逐出桑特、曾在此处避难的理查当然也深知这点：塔耶堡三面是陡峭的岩壁，第四面则有特别加固的城墙，这样的天险地利无疑能令守军高枕无忧。没有人胆敢向它发起进攻——至少迪切托的拉尔夫是这么认为的。5月1日，理查调集攻城器械，开始对塔耶堡四面的城墙进行轰击，并将主攻点设定在塔耶堡的第四面城墙，那里下方有一个小镇。²⁹轰击城墙的同时，理查还率军掠夺城堡周围的田地和葡萄园，断绝城内守军的补给。此时，坚守在城内的守军承受着双重压力：他们既要忍受攻城器对城墙的不断轰击，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理查的军队焚毁和掠夺他们在城堡外的财产。于是，过于高估自身实力的守军在5月8日对理查安置在城墙附近的营地发起突击，然而这正中理查下怀，他随即率军反击。双方在城门附近展开激战，守军最终被击退，乘胜追击的理查军则紧追不舍，攻破城门。战败的守军退入城堡，将整个小镇和他们的大量补给丢给了理查。最终，塔耶堡在5月11日向理查投降。而理查攻陷塔耶堡的消息也令杰弗里·德·朗孔大为惊讶，于是蓬斯也迅速开城投降。随后，理查将两座城堡彻底摧毁。武尔格林伯爵眼见他的盟友们被理查各个击破，只得放弃抵抗，将昂古莱姆和蒙蒂尼亚克移交给理查，理查也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的城墙拆毁。在经过5年艰苦的征战磨炼后，21岁的理查不仅领悟了战争之道，还在塔耶堡赢得了军事生涯至今最伟大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理查在此役中还展现了他的勇猛气质：当

两军在城门附近激烈鏖战，战局摇摆不定的危急关头，理查选择了投身战斗，身先士卒地与敌军奋勇厮杀，激励部下最终克敌制胜。作为胜利者，回到英格兰向父亲汇报喜讯的理查也享受了征服者凯旋式的极大殊荣。³⁰

1175年至1179年间，阿基坦公爵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拉马什、利摩日以及比利牛斯地区的领主们都臣服于理查的权威。即使是公爵治下最强力的封臣、始终致力于维持其独立统治地位的昂古莱姆伯爵们，也分别在1176年和1179年两度被理查击败。另一象征着昂古莱姆伯爵向安茹家族臣服的事件是，1179年前不久，昂古莱姆伯爵武尔格林与深得安茹家族信任的昂布瓦斯领主休（Hugh）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这桩婚事对来自图赖讷（Touraine）的泰尔弗家族来说，也意味着昂古莱姆伯爵与佩里戈尔、利穆赞、拉马什和圣通日的领主们之间历史悠久的、通过联姻形成的政治同盟关系自此中断。³¹ 若我们以埃莉诺的父亲威廉十世公爵统治时发生的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与此进行对比，将能更好地反映出阿基坦公爵的权力消长情况：威廉十世坚称自己有权为利摩日子爵的潜在女继承人安排婚事，然而对“普瓦图之轭”十分畏惧的利穆赞贵族们联手成功制止了威廉十世的行动，这位女继承人最终按他们的意愿嫁给了一位昂古莱姆伯爵。³²

不过，埃莉诺与亨利二世的婚姻使阿基坦公爵缺乏权威的状况大为改观。由于亨利二世可以调集整个安茹帝国雄厚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为他所用，阿基坦公爵真正成为强力的政治权威，具备了摧毁所有政敌及其城堡的能力。1156年，亨利二世取代年幼的艾玛尔五世的叔叔们成为艾玛尔的新监护人，并为他安排了与康沃尔的萨拉（Sarah of Cornwall）的婚事。³³ 但亨利二世也像其他强力人物一样有着自己的弱点：难以及时顾及他广阔领土的每一部分。尽管亨利二世精力旺盛，但安茹帝国毕竟疆域过于广大：事必躬亲的亨利二世若要处理偏远地区的危机，或是为与各地领主作战的官员们提供支持，都要消耗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于是从1174年开始，亨利二世将他的儿子们安置在帝国的不同地区，

希望能使处理各类事务的行动变得更加机动灵活，并加快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1177年初，亨利二世下令长子小亨利处理代奥勒事务时，他认为这一任命对自己的权力并无影响，如今这么多人同时统治这片区域，若是他的儿子们还是遭到失败，可就是耻辱了。³⁴遗憾的是，幼王亨利没能达到父亲的预期。诚然，幼王亨利慷慨有礼且富有骑士风度，参加的骑士比武数量居于所有骑士之冠，他也因给年轻骑士们带来欢愉，使他们得以谋生而深得他们爱戴；但他在处理政事和面对战争时仍然显得十分稚嫩，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也缺少长远思考的意识，行事全是心血来潮，不加思考地以最新的传言作为决策的依据。1177年夏，小亨利怀孕的妻子离开自己的丈夫，回到她父亲的宫廷。³⁵

相较而言，理查超过了父亲的期望。理查成功地将父亲的优势——安茹帝国的强大实力和时常现身阿基坦所带来的重大政治影响力，与自己坚定的决心和迅速增长的军事才能结合起来，维护了阿基坦的和平，令最桀骜不驯的地方领主也不敢妄动。塔耶堡之战后，一些阿基坦的显贵们决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其中一些人可能是在主张和平、摒弃物质享乐的教会强制下做出这一决定的，教会做出的这一精神制裁实际上也获得了掌握权力的世俗贵族们的支持。其他人则是为了减轻压力，他们希望通过远离自己被摧毁的城堡遗迹，避免自己再次想起此前被理查击败的惨痛经历。这支由前昂古莱姆伯爵威廉和他的继子利摩日的艾玛尔率领的朝圣队伍在1177年7月7日启程，与拉马什的奥德贝尔一同踏上前往耶路撒冷之路。然而出发仅一个月，威廉便逝世于墨西拿（Messina）；1178年时奥德贝尔也在君士坦丁堡逝世。值得注意的是，从1179年夏季到1181年夏季的两年间，我们对理查的行迹几乎一无所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父亲亨利二世自1180年4月至1181年7月都在欧洲大陆；另一方面，众多最为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贵族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之举，无疑使昂古莫瓦和利穆赞居民情绪低落。利摩日的艾玛尔于1180年圣诞节回到阿基坦，亨利二世也于第二年的四旬斋期间在格朗蒙与塞布朗·沙伯重归于好。³⁶

然而，阿基坦的和平局面在1181年6月29日时被打破了。和此前发生的导致争端的事件一样，这又是一起由于领主逝世引起的继承风波。昂古莱姆伯爵武尔格林突然逝世，只留下一个幼小的女儿玛蒂尔达。维茹瓦的杰弗里认为，武尔格林的逝世“是昂古莱姆重大灾难的起因”。³⁷理查认为，武尔格林之女应当继承昂古莱姆，而他作为阿基坦公爵和昂古莱姆伯爵的封君，理应将她置于自己的监护下。但是，按照法兰西西部的继承习惯，昂古莱姆领地应该在死者的兄弟之间进行分配，而非按照理查的计划处理。³⁸理查已经习惯于按照他在1176年和1179年镇压叛乱的方式对付忤逆自己意志的人，他也显然不会向当地贵族让步。武尔格林的兄弟威廉和阿德马尔也坚决反对理查，并宣称他们有权继承昂古莱姆。理查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将他们赶出昂古莱姆。威廉和阿德马尔则逃到他们的异姓兄弟、此前与理查积怨颇深的利摩日子爵艾玛尔处。武尔格林逝世前不久，理查再次执意要求艾玛尔将圣马夏尔的围墙全部摧毁，这令后者极为愤怒。³⁹很快，旺塔多子爵、康伯恩（Comborn）子爵、蒂雷纳子爵和佩里戈尔伯爵也加入叛军阵营，这些重要贵族之间存在利穆赞和昂古莫瓦地区传统的广泛通婚建立的亲缘关系。理查对他们所珍视的继承传统表现出的不屑态度，使这些受到威胁的贵族们团结起来，抵御外来者对本地正当秩序和传统习俗的干预。

叛乱一触即发之际，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护境内民众利益的法兰西国王也介入双方的争端中。此时法兰西的统治者已不再是晚年病痛缠身的路易七世，路易七世在确保自己选定的继承人能够顺利继位后不久，于平静中逝世，他的儿子腓力二世成为法兰西的新王。尽管父亲逝世时（1180年9月18日）腓力年仅15岁，但与父亲大不相同的是，他很快体现出诡计多端的政治家特质。然而考虑到他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之一，腓力二世使用的手段都因最后的结局而获得了正当性：安茹帝国的瓦解。通过一个成文稍晚、叙述了初出茅庐的腓力早年经历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国王的雄心壮志：一日，腓力召集部下的贵族们进行廷议，然而他却独坐一旁，嚼着一段榛树枝，对其他事情毫不在意。当

部下询问他究竟在思考何事时，腓力说他所思考的是“应如何使法兰西恢复查理曼时代的伟大荣光”。⁴⁰然而讽刺的是，在腓力统治初期，他却不得不仰仗自己一直试图分裂的对手——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巩固自己的统治。1181年末，理查按亨利二世的命令，与他的两位兄弟小亨利和杰弗里合兵一处，发起对桑塞尔（Sancerre）伯爵斯蒂芬的进攻。这次远征的目标，正是帮助腓力压制专横跋扈的香槟伯爵家族，稳定他的统治。⁴¹然而，当威廉和阿德马尔在昂古莱姆发起叛乱时，眼见有机可乘的腓力便立刻忘记了安茹王朝对他的帮助，接受了昂古莱姆叛军的效忠。对于腓力的这一行动，颂扬利穆赞反叛理查的诗人贝尔特兰·德·博恩写道：“腓力国王究竟要亦步亦趋地效仿其父，还是要成为新时代的查理曼，我们将很快知晓。”⁴²

1182年至1183年可谓是决定理查对阿基坦统治的未来的时刻，多面受敌的理查几乎陷入绝境。不过理查仍一如既往地军事方面占得先机。1182年4月11日，理查先发制人，对佩里戈尔伯爵治下、位于佩里格（Périgueux）地区的皮伊-圣弗隆（Puy-St-Front）要塞发起突袭，并占领了这座要塞。然而，只有少量兵力的理查自知无法长期驻守于此，于是他穿越埃克斯西德伊（Excideuil），攻入利穆赞地区的叛军心脏地带，毫不留情地摧毁途中顽抗的叛乱村镇。理查之所以会自信满满地采取积极攻势，想来是他已向父亲请求支援，并获悉援军将至的缘故。果不其然，亨利二世在1182年5月中旬率领援军抵达阿基坦，并召集叛军首领前往格朗蒙举行会议。⁴³亨利二世估计就是在这时对贵族们关于理查的指控有所耳闻。而这些关于理查的指控也在不久后被一些英格兰编年史家获知。据坎特伯雷的杰维斯（Gervase of Canterbury）记载，“阿基坦的显贵们对理查粗野残暴的作风极为厌恶”；圣保罗的教长迪切托的拉尔夫则称，他听说，理查“时常对他的封臣们提出不当的要求，并以暴政压迫他们”。不过，更为详尽的记载仍然来自豪登的罗杰：“（贵族们指控理查）以暴力手段将封臣们的妻子、女儿和女性亲属们全部劫掠到他身边，将她们当成自己的泄欲工具。而当理查满足了自己的色欲

后，他就将这些女性分给他的士兵们，任他们肆意处置。此外，理查对他治下的民众也是恶行累累。”⁴⁴但亨利二世对这些指控并不在意，在维护公爵权力问题上，他和理查的观点一致。亨利二世写信给长子小亨利，命他前来阿基坦协助处理当地事务，亨利二世本人则与理查一同进行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他们首先对艾玛尔子爵及其封臣们控制的主要据点——埃克斯西德伊、圣伊里耶（St Yrieix）和皮埃尔-比菲耶尔（Pierre-Buffière）系统性地发起进攻，并将它们尽数占领，随后他们直指佩里戈尔伯爵，再次围攻皮伊-圣弗隆。7月1日时，小亨利也率军加入亨利二世和理查的联军。面对占据上风的王军，艾玛尔子爵和佩里戈尔伯爵埃利（Elie of Périgord）决定求和。艾玛尔承诺绝不再向他的两位兄弟提供支援，并将他的长子和三子交给国王一方作为人质。埃利伯爵则将皮伊-圣弗隆转交国王，理查随后将它的城墙彻底摧毁。⁴⁵

1182年夏季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表明，团结一致的安茹王室成员们无疑对他们治下的广大领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王子们遵照父王指示，齐心协力地击败任何胆敢反抗他们的敌人，这令安茹王朝的统治稳如泰山。然而，问题也是存在的：亨利二世逝世后，形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幼王亨利会继承父亲的事业吗？若幼王亨利成为新任国王，他能够驾驭年轻的弟弟们吗？他的弟弟们究竟会与兄长团结一致，向他效忠，还是各行其是，令安茹帝国陷入分裂？对上述这些问题，理查和小亨利无疑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为了应对这一无法回避的紧迫问题，亨利二世试图找到保持家族团结并维持其统治体系的万全之策。若亨利二世在继承人问题上效仿他的同时代人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的做法，他也会和深受敬仰的腓特烈一样，度过安稳的晚年。然而亨利二世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他在晚年时被叛乱的儿子们击败，并在悲愤交加中逝世，可谓晚景凄凉。不过，亨利二世当时并未考虑自己的晚年归宿。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安抚自己的长子小亨利。尽管小亨利将继承王位，但他的光芒长期被父亲掩盖，而且缺少实权。相较之下，理查统治着阿基坦，杰弗里统治着布列塔尼，然而本应属于小亨利的安茹、英

格兰和诺曼底一直被亨利二世统治着。尽管小亨利知道自己将获得比他的弟弟们更为广大的领地，但他十分渴望拥有实权，不愿继续等待下去。很快，1182年的阿基坦叛乱让小亨利感到时机已到，他认为可以利用这次叛乱达成目标；同时，这些叛乱者虽然被击败，但也意识到小亨利的价值，他们同样认为可以利用小亨利达成目标。

在小亨利前往皮伊-圣弗隆与父亲和弟弟会合的途中，他曾在利摩日和圣伊里耶短暂停留。在利摩日停留期间，小亨利慷慨地将一件绣着“亨利国王”（Henricus Rex）字样的华贵斗篷捐赠给圣马夏尔修道院的修士们。⁴⁶此外，通过了解所到之处的民情，小亨利也对理查在阿基坦的专横统治以及当地反对派的实力有所认识。若小亨利敢于迎难而上，以反抗理查暴政之名联合当地势力讨伐自己的弟弟，他似乎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但面对有着善战名将之名的理查，小亨利纵然嫉恨不已，却也难以下定决心。除了忌惮理查的才能，小亨利还得考虑这一问题：若他决定与理查作战，他们的父亲又将站在哪一方？随着小亨利逐渐转向与理查作战的不归之路，并对叛乱者做出公开承诺，他的一生也显露出了受多疑无决折磨的印记。事实上，小亨利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的忠诚，他曾经怀疑部下最为知名的骑士威廉·马歇尔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有染。但小亨利的做法毫无魄力：他既不去阻止流言传播，也没有对马歇尔进行讯问。于是，对此极为不满的威廉·马歇尔在圣诞节大声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并离开了小亨利去参加新的骑士比武。数月之前，小亨利还曾在1182年秋季时再次向父亲请求将诺曼底公国划为他的领地，以便为他部下的骑士们提供给养。然而亨利二世再次拒绝了这一请求，愤怒的小亨利立刻进入法兰西王国境内，宣称要从此出发前往耶路撒冷。虽然亨利二世最终劝服他的长子回到诺曼底，但法王腓力已经知晓了他这位姐夫的困境及其尚未成形的计划。⁴⁷

当幼王亨利还在三种选择——继续向父亲效忠、前往耶路撒冷以及进军阿基坦——之间摇摆不定时，叛乱者们打算承认他作为新任阿基坦公爵的消息一度使他心动不已，此外他可能还受到了弟弟布列塔尼的杰

弗里的怂恿。杰弗里尽管在镇压阿基坦叛乱时似乎并未出力，但那年夏季时他还是留在了利穆赞地区。根据维茹瓦的杰弗里记载，圣约翰节（6月24日）时，杰弗里“与数名贵族”在格朗蒙与他的父亲见面。⁴⁸ 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贵族的真实身份，也并不知道作者为何要含糊其词——是为了有意隐瞒事实？保持行文简洁？还是出于谨慎的考量？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即便杰弗里在格朗蒙时的行迹是单纯无辜的，他在1183年初时就已经在策划一场十分邪恶的阴谋了。杰弗里的选择无疑令人意外：他的长兄小亨利因为不满父亲的待遇起兵作乱，尚且可以说是事出有因，然而得到父亲优渥待遇的三子杰弗里又为何会心生邪念？也许这个原因就像当时的编年史家们所说的那样简单。豪登的罗杰将原因归结为他的性格，“杰弗里诡计多端……而且心术不正”。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的描述则更为详尽：“（杰弗里）巧舌如簧、口蜜腹剑，他能言善辩，因而有着四处传播混乱和不安的力量，两大王国因他摇唇鼓舌而遭毁灭打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制造争端。”⁴⁹ 1182年秋季时，阿基坦再度爆发战争。⁵⁰ 泰尔弗家族的威廉和阿德马尔兄弟再次得到以阿尔夏克和沙莱（Chalais）领主为首的昂古莱姆贵族们的支持。利摩日子爵艾玛尔见状，也开始在加斯科涅招募佣兵，并宣布撕毁不久前达成的和议。

对“幼王”亨利而言，这似乎正是起兵的大好时机，但他认为他还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出师有名的理由，父亲也不会因此认可并宽恕他对理查的进攻。不久后，“幼王”亨利等待已久的正当理由终于出现了：理查对克莱尔沃（Clairvaux）城堡进行重建，并加强了它的防务。理查重建克莱尔沃城堡的行为可以被看作他向自己兄长的挑衅，而理查这一行动的原因也长期令学者们困惑不已。⁵¹ 1183年初，利穆赞吟游诗人贝尔特兰·德·博恩急于将幼王亨利拉入叛军阵营，创作了一首有着如下内容的讽刺诗（sirventes）：

克莱尔沃地区位于普瓦捷与利尔布沙尔（l'Île Bouchard）

、米尔博、卢丹和希农之间，
正是安茹地区的中心地带，
竟有人胆敢来到平原当中，
在此堂而皇之地修建城堡，
我不愿幼王亨利闻听此事，目睹此景，
因为这必然令他义愤填膺，
但建城的岩石如此雪白，
他肯定能从马特弗隆（Mateflon）城堡看到他。⁵²

尽管诗中的内容与真实地理情况不符，但它无疑成功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作用，揭示了阿基坦公爵理查在安茹伯爵领地的中心地带修建城堡的事实。这不由令人深思：理查究竟意欲何为？他增强边境守备的用意，难道是为了夺取日后将被他无能的长兄所继承的、安茹王室的重要军械库和金库所在地——希农吗？的确，这可能是理查的用意所在。不过克莱尔沃所在的位置似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真正的答案。克莱尔沃位于沙泰勒罗西边，与后者只有6英里的距离，12世纪30年代的文献记录则表明，当时的克莱尔沃城堡领主是普瓦图地区举足轻重的贵族之一、沙泰勒罗子爵的封臣。埃莉诺的父亲、阿基坦公爵威廉十世就与一位沙泰勒罗子爵的女儿结婚；另一位沙泰勒罗家族的女性成员则是威廉九世公爵最著名的情妇。沙泰勒罗城堡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位于维埃纳（Vienne）河与连接图尔和普瓦捷的大道的交界地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然而，理查在1184年重回沙泰勒罗时，又在沙泰勒罗城堡东北部12英里处的圣雷米德拉艾耶（St Rémi de la Haye）附近克勒兹河的桥梁边建立新的市镇、修建新城堡。理查在沙泰勒罗附近大兴土木的举动，无疑损害了沙泰勒罗子爵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令后者极为不满。所有事实均表明，在理查修建克莱尔沃城堡之初，他想要激怒的主要是沙泰勒罗

子爵，而非他的兄长小亨利。然而克莱尔沃城堡的问题在于，它虽然位于普瓦图，但是安茹的伯爵可以声称拥有它。与更为重要的卢丹城堡和米尔博城堡一样，克莱尔沃城堡也是安茹伯爵在10世纪末期从普瓦图伯爵手中夺取的。不过，居于次要战略地位的克莱尔沃城堡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被安茹伯爵部下的次要封臣控制，到12世纪30年代，它似乎与沙泰勒罗子爵的关系更密切一些。⁵³ 若理查在动工修建这座位于沙泰勒罗政治半径内的城堡之前，能事先了解此地与安茹家族的古老渊源的话，他很可能因为想到此前数年与父亲的合作关系，而认为这个渊源不值一提。但不管理查的初衷如何，他修建克莱尔沃城堡的行动给了幼王亨利可乘之机。他的兄长认为，理查修建克莱尔沃城堡、制造边境威胁一事，足以让父亲亨利二世在这起安茹家族的内部争端中成为己方的支持者，与他一同讨伐理查。

时间很快来到1182年末，这时还在昂古莫瓦作战的理查返回后方，前往卡昂（Caen）参加父亲亨利二世在此地举行的圣诞庆典。这不仅是诺曼底地区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圣诞庆典，亨利二世也希望借此机会展示团结一致的安茹家族的强大实力。除了他的儿子们，亨利二世之女玛蒂尔达也带着她的丈夫、曾经的萨克森（Saxony）公爵和巴伐利亚（Bavaria）公爵“猛狮”亨利（Henry the Lion）出席庆典，这位最强大的德意志诸侯刚刚被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放逐，正在前往孔波斯特拉朝圣的路上。此外，这年圣诞节时，也没有一位诺曼底贵族举办自己的圣诞庆典，他们都来到卡昂与国王一同庆祝，簇拥在公爵城堡和卡昂宫廷中的骑士足有千余人之多，⁵⁴ 著名的吟游诗人贝尔特兰·德·博恩也位列其中。贝尔特兰此时正因为奥特福（Hautefort）城堡的归属问题与他的弟弟康斯坦丁（Constantine）争执不休，这座城堡位于佩里戈尔和利穆赞两地的交界处，他这次来到卡昂很可能是为了说服亨利二世和理查——或者是至少说服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支持自己对城堡的主张。而在另一首宫廷诗歌中，贝尔特兰写道，只有与美丽的公爵夫人玛蒂尔达共处相谈，才能使他脱离庸俗而乏味的诺曼底宫廷生活，“她的胸部能让黑夜变为

白昼，若你能看到更下面的美景，整个世界都将因她熠熠生辉”。⁵⁵ 但如果贝尔特兰真的在诺曼底北方待到圣诞节结束，那他不太可能感到其余的行程都十分无趣。幼王亨利在场，而贝尔特兰对他怀有极高的期待。事实上，若贝尔特兰想要在奥特福的争端中获得胜利，必然要有人出现推翻利穆赞地区现有的政治秩序。在随后数周时间里，安茹宫廷将从卡昂移驾到诺曼底南部地区，紧张的局势浮上水面，贝尔特兰·德·博恩本应是这些混乱、争吵与怨恨的忠实记录者。

此时，为了建立安茹帝国的合法统治秩序，亨利二世要求理查和杰弗里向他们的长兄小亨利宣誓效忠，他希望能借这种明确小亨利权威的行为安抚情绪低落的小亨利。考虑到长期以来布列塔尼与诺曼底之间存在从属关系，杰弗里很快答应了这一要求，他也在勒芒向长兄小亨利宣誓效忠。然而理查以他和小亨利出身同样高贵为由，拒绝向后者效忠。于是继1173年的利摩日会议后，亨利二世决定再次重申阿基坦从属于安茹帝国统治的原则。随后，亨利二世以许诺让理查及其继承人永远保有阿基坦为条件，最终劝服理查向他的长兄效忠。然而，此时幼王亨利却又退却了，转而拒绝接受理查的效忠，这无疑令亨利二世非常愤怒。

⁵⁶ 在幼王亨利看来，理查永远保有阿基坦这一条款令他极为不满，远不如他与叛军所达成的协议。不过，毫无理由、简单粗暴地拒绝理查的效忠显然并不合适。根据豪登的罗杰记载，1183年1月时发生了如下的事情：

在众多教士和世俗贵族们的注视下，幼王亨利自愿将他的双手放在神圣的四福音书上开始宣誓。他承诺，从今天开始，在自己的余生中都将作为忠实的臣仆向他的父亲、他的封君亨利二世国王尽忠。幼王亨利随后又表示，他不希望自己的内心再受任何怨恨邪念的折磨，因而做了一件可能会导致父亲不悦的事情，他向父亲坦白了自己支持阿基坦贵族们反对弟弟理查的实情，并将原因归结为理查擅自在将由他继承的安茹王室领

地——克莱尔沃地区修建城堡。⁵⁷

不过，克莱尔沃城堡的争端很快得到解决，理查尽管心怀不满，但还是很快地将城堡转交给父亲，然而这并没能消除两兄弟之间的矛盾，它不过是兄长用于挑起事端所用的借口罢了，真正的问题出在别的地方。

不久后，亨利二世又将三兄弟召集到昂热，让他们签署确保兄弟间永不争斗的和约。但若想保证其中的条款能切合实际，也需要阿基坦地区的叛乱贵族们加入缔约谈判。于是他们最终决定，将在米尔博重新召开会议确认这份协议，届时还将邀请叛乱贵族代表前来参会。做出这一决定后，亨利二世将杰弗里派往利穆赞地区，让他与不服从理查的贵族们和谈，劝服他们参加和议。然而杰弗里并没去完成这一使命，反而加入了叛军一方。而事先已经知晓杰弗里计划的幼王亨利随后向父亲提出，自己将继续完成弟弟的议和使命。与此同时，他还说服父亲接受了这一条件：若叛乱贵族不愿接受去年夏季时与亨利达成的和议条款（而他们显然不愿接受）的话，他们将会在国王的宫廷参加新的听证会。⁵⁸这极大损害了理查的利益：他已经按照父亲的旨意交出了克莱尔沃城堡，并向他的兄长宣誓效忠，他在1182年时获得的胜利成果此刻又要化为乌有，凡此种种都让理查难以忍受。而亨利二世诸子不和的消息传开后，去年叛乱未遂的贵族们闻讯又重新振作起来，吕西尼昂的杰弗里曾保持谨慎不愿卷入叛乱，但他此时果断加入了叛军阵营。不过，可能仍有忠于理查的贵族们向他通风报信，使理查能够知晓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并了解他的兄弟们与叛军来往的消息。尽管如此，谈论着“和平”的亨利二世在纵容杰弗里和小亨利蒙蔽他，令阿基坦公国逐渐脱离理查的控制。最终，不甘任人摆布的理查与父亲大吵一架，并在未经其父同意的情况下急忙赶回普瓦图，增强治下城堡和市镇的防务。⁵⁹

在理查不辞而别的同时，幼王亨利正带着亨利二世的和平使命前往

利穆赞，他将自己的妻子送往腓力·奥古斯都的宫廷，并于2月初时在利摩日与杰弗里会合。⁶⁰随后他们与艾玛尔子爵在此会面，后者手下招募了一支由威廉·阿纳尔德（William Arnald）统领、人数众多的加斯科涅佣兵。在这支强大佣兵部队的影响下，利摩日城堡区的居民们也加入叛乱队伍中。曾在1177年领导义军与入侵的布拉班特佣兵交战，并素以忠诚于阿基坦公爵著称的圣马夏尔修道院院长眼见形势危急，也离开了修道院，前往拉苏特兰避难。与此同时，威廉·阿纳尔德的叔叔雷蒙德·勒布伦（Raymond le Brun）则率领另一支佣兵北上支援艾玛尔子爵。带着一队骑士来到利摩日的杰弗里也开始行动：他在布列塔尼招募佣兵，并命令他们从西北方向进攻普瓦图。尽管准备充分的叛军已经集结了数量可观的部队，但理查毫无示弱求和之意。理查首先对布列塔尼佣兵发起猛攻，将其击败，处死了所有俘虏，还趁势在杰弗里的领地内进行了有组织的报复性掠夺。随后理查又重演了1182年4月的英勇举动：他率领一支骑兵小分队连续乘马前进两天两夜，在2月12日追上了艾玛尔子爵的佣兵团。当时正在进攻利摩日以西12英里处的戈尔（Gorre）教堂的佣兵们还以为理查仍在普瓦捷以北的某地，被他的突袭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理查又一次赢得了奇袭的胜利，他本人还在交战中亲手斩杀了佣兵首领威廉·阿纳尔德。由于理查疲惫不堪的战马已无法追击，艾玛尔子爵才侥幸逃过一劫。不过，他部下的大多数佣兵们成了理查的俘虏，并在战后被押往艾克斯：有的在维埃纳河中溺死，有的被理查的部下杀死，仅有的幸存者们都刺瞎了双目。维茹瓦的杰弗里则将这些佣兵们的遭遇称作“作恶者应得之报应”。⁶¹

在理查急速进军的同时，亨利二世也正在赶往利穆赞的途中。他试图为解决诸子争端寻求和解方案，然而现在看来已是希望渺茫；而且他的行程也显得有些匆忙——尽管他事先可能已经做好部署，预计在下月时能够集结一支大军，但他来到利摩日时，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随从。更加不巧的是，此刻圣马夏尔修道院的所在地——城堡区内的民众正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当亨利二世一行人靠近城门时，一位看守误将国

王的旗帜认作是前来掠夺的主城区民众的旗帜，并拉响了警报，听到警报的民众纷纷冲出城外，试图驱逐这支“敌军”。混乱之中，终于有一位英格兰人认出了亨利二世的王旗，双方这才恢复平静。此时一名国王的近臣已在混战中负伤，国王本人也险些受伤。随后亨利二世调转马头前往相对安全、处在理查控制下的艾克斯城堡。亨利二世抵达艾克斯当晚，小亨利便前来面见父亲，试图解释事情原委，然而对长子的行为震怒不已的亨利二世并未听信他的辩解，小亨利见状便重新回到利摩日的叛军阵营之中。这时，艾玛尔子爵下令圣马夏尔的民众宣誓成为幼王亨利的盟友，并准备固守城池。由于城堡区原有的城墙已在1181年被摧毁，守军只得通过拆除城内的教堂来获取修建工事所需的泥土、石料和木料。然而亨利二世和理查此时还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围城战，而主力部队至少要两周后才能抵达，于是在此期间他们只能一边等待援军，一边依托主城区密切关注敌军的动向。不过，亨利父子还在此后数周内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成果的谈判：激动地和解、争吵、扭打，做出许诺又最终违背诺言。豪登的罗杰还记载了谈判期间亨利二世遭到突袭，死里逃生的一段插曲：若不是亨利二世的战马当时抬起头来，正好挡住了一发箭矢，他就将胸口中箭，性命垂危了。在记录这些事件时，罗杰还对幼王亨利和杰弗里纵容部下做出危害自己父亲使臣性命的举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⁶² 事已至此，幼王亨利虽然可能考虑过诚心悔过，但为时已晚，再无退路。不过在罗杰看来，他向父亲提出的重归于好的建议，不过是为杰弗里的军队在当地制造恐怖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罢了。不久后，腓力·奥古斯都派来的布拉班特佣兵团也作为援军加入叛军一方，这一行动也标志着将持续30年之久的安茹-卡佩王朝战争正式拉开序幕。这支布拉班特佣兵先是迅速攻占了圣莱奥纳尔-德诺布拉（St-Léonard-de-Noblat），大肆屠杀当地居民，随后又越过利摩日，劫掠了布朗托姆（Branthôme）。雪上加霜的是，艾玛尔子爵和蒂雷纳子爵雷蒙德麾下的佣兵团也在利穆赞南部地区肆虐。⁶³ 贝尔特兰趁乱将他的弟弟康斯坦丁逐出奥特福城堡，将其据为己有。利穆赞乡村地带顿时混乱不堪。

亨利二世和理查期待已久的主力部队终于在3月1日抵达战场，但他们并不打算利用这支大军四处出击，讨伐分散劫掠的佣兵队，而是决定集中兵力进攻叛军的中心据点：控制着圣马夏尔修道院的利摩日城堡区。为此，亨利二世仍将指挥部设置在利摩日主城区，理查则随后率军占领了圣瓦勒里（St Valerie）并控制了横跨维埃纳河两岸的圣马夏尔桥（Pont St Martial），切断了城堡区与外部城镇的联系。对双方而言，这场艰苦的围城战都是极大的考验。不过守军一方首先出现了金钱耗尽的状况。幼王亨利与艾玛尔子爵招募了所有愿意为他们效忠的佣兵首领，以免他们转为亨利二世效力。当然，他们若能保证发放军饷的话，这无疑是合理的决策。然而，由于亨利二世已经中断了给幼王亨利的一切津贴，耗尽金钱的他只得向市民们“借债”，但借来的钱仍然难以长期填补资金空缺。于是他只得将圣马夏尔祭坛上的圣杯、圣盘以及其他所有珍宝全部充作军饷。不久后，利摩日城堡区的所有财富也被洗劫一空。幼王亨利只得率部离开利摩日，前往其他地区为部下的佣兵收集军饷，为此他劫掠了格朗蒙和邻近昂古莱姆的拉库罗纳（La Couronne）修道院。⁶⁴与此同时，城内守军在布列塔尼的杰弗里、艾玛尔子爵以及吕西尼昂的杰弗里这三位统帅的率领下仍然紧闭城门，坚守不出。眼见久攻不下，加之潮湿阴冷天气的折磨，围城的军队士气逐渐低落，纷纷躲进营帐之中，一些部队甚至在围城战仅持续了14天后便擅自离开了战场。随着时间推移，攻城方要想继续维持对城堡区的封锁也变得日渐困难。到了4月和5月之交时，亨利二世最终决定停止围城，而这一举动似乎标志着亨利二世和理查一方开始居于下风，形势也变得更加严峻。

正当亨利父子交战正酣，战争规模再度达到1173年至1174年决战的规模时，周边地区的领主们也开始向阿基坦进军。此次站在幼王亨利一方的有法王腓力、勃艮第公爵休以及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对雷蒙德来说，若幼王亨利最终取代理查成为新的阿基坦公爵，那么1173年沦为阿基坦公爵附庸的图卢兹伯国将能重新恢复过去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不过，雷蒙德伯爵在普罗旺斯的劲敌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二世支持理查。我们

并不清楚理查在此期间的具体事迹。由于此时维茹瓦的杰弗里的叙事重点为利穆赞，尤其是他所钟爱的圣马夏尔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因而很可能没有对阿基坦其他地区的战况进行记载。但仍有其他作家留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记录。贝尔特兰·德·博恩在亨利父子相持不下、胜负未分之时创作了一首题为“我因国王祈祷而咏唱”（*Ieu chan, que l reys m'en a preguat*）的诗，诗中写道“（理查）以武力攻占了昂古莫瓦地区，并使圣通日和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获得光复”。即使诗中存在夸张内容，但它至少表明理查在此期间确实取得了一些未被他人记载的战果。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贝尔特兰已经投身叛乱，但他却被理查的坚毅果敢深深折服：理查决不背离自己的道路，即使他遭人背叛，也仍能英勇作战，毫不退缩。⁶⁵另一方面，在利摩日，幼王亨利绕过了攻击。虽然幼王亨利最终被高呼着“我们不愿接受此人统治”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守军逐出城外并遭嘲弄，但他占领了很可能被亨利二世和理查遗弃、防卫薄弱的艾克斯城堡。然而攻占艾克斯仅三天后，幼王亨利在5月26日突然患病，在某段时间内，他的身体状况尚能支撑他劫掠了罗卡马杜尔的圣地，然而这只是回光返照，6月11日，幼王亨利在马尔泰勒（Martel）病逝。⁶⁶

幼王亨利的病逝也导致了1183年叛乱的终结。尽管他的疑虑曾使贵族们摇摆不定，尽管他直到生命尽头都处在金钱短缺的窘境中，但叛乱的贵族们最终仍然选择了向他效忠。⁶⁷无论这次叛乱的最初目标为何，它都在1183年初转变为“以幼王亨利取代‘暴君’理查成为新的阿基坦公爵为目标”的政治斗争。讽刺的是，尽管财源匮乏的幼王亨利只是个手无实权的傀儡统帅，但他是这次叛乱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的加入，叛军一方的行为才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对邻近地区的王侯们而言则更是如此：他们并不打算卷入昂古莱姆伯爵的继承人之争，但他们的加入对叛乱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幼王亨利一旦死去，他们自然也会由于“出师无名”而选择置身事外。因而，勃艮第公爵休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在得知他的死讯后便迅速收兵了。总之，幼王亨利在这次事件

中的角色犹如国际象棋中的王：虽然自身威力极小，但少了它的棋局将无法继续。

注释

1 此时亨利二世正前往安茹执行类似的政策，他还将杰弗里派往布列塔尼执行这一政策。 *Gesta*, i, 81–3.

2 Ibid., 101. 豪登的罗杰称这座城堡是“阿让北边的卡斯特隆”，布萨尔（Boussard, 514）和沃伦（Warren, 565）则认同斯塔布斯观点，认为应该是“多尔多涅河畔卡斯蒂永”（Castillon-sur-Dordogne）。诺尔盖特则认为，这座城堡是位于加龙河畔阿让北部的“大城堡”（Grand-Castel）（Norgate, 19, n. 1）；另见J. Andrieu, *Histoire de l'Agenais* (Agen, 1893), i, 38–42。1161年时，亨利二世仅用不足一周时间便将其攻克，此事“令加斯科涅人闻风丧胆”，Torigny, 211。然而只有豪登的罗杰一人提及了1175年的这场围城战。

3 *Gesta*, i, 114–15.

4 Ibid., 105.

5 Vigeois, Bk 1, ch. 56; G. R. Lewis, *The Stannaries* (Cambridge, Mass., 1906), appendices J and L.

6 T. D. Hardy, *Rotuli Litterarum Clausarum* (Record Commission, 1833), 429, 437.

7 这次战役的发生时间——“圣灵降临节后不久”——和发生地点的记载，均来自Howden, *Gesta*, i, 120。圣迈格兰和布特维尔分别位于昂古莱姆的南边和西边。然而关于1176年时武尔格林及其布拉班特佣兵被击败的更详尽的另一记载则来自迪切托的拉尔夫（Diceto, i, 407），据他记载，战场位于“靠近巴伯齐厄”的地方，而巴伯齐厄肯定位于圣迈格兰和布特维尔中间；但他还写道，巴伯齐厄之战获胜方的指挥官并不是理查，而是普瓦捷主教约翰（John）和特奥博尔德·沙伯（Theobald Chabot），当时理查还在英格兰，与他的父亲一起。迪切托的拉尔夫还强调，巴伯齐厄的胜利以及约翰主教部下的轻微损失是由于得到了天主之助，而非世俗力量的结果。考虑到罗杰这份记载的官方文书性质和较早的成文时间，以及拉尔夫的记载参考了约翰主教的叙述（Diceto, i, 5–6）这些因素，事实上，造成记载偏差的原因可能是，拉尔夫将两次不同战役混为一谈了：正是理查在巴伯齐厄击败了布拉班特佣兵；而在理查尚未从英格兰返回指挥巴伯齐厄战役之前，约翰主教和特奥博尔德·沙伯就已经率军与布拉班特佣兵交战，迫使后者离开普瓦图，并将他们驱赶到昂古莱姆以南地区。

8 *Gesta*, i, 120. 关于利摩日的地理特征和政治结构，可参见G. Verynaud, *Histoire de Limoges* (Limoges, 1973), 26–8。

9 *Gesta*, i, 121. 豪登的罗杰的这段记载实际上效仿了寄给亨利二世的“官方报告”的文风，而他在描述“幼王”亨利不辞而别的原因时，使用了“受错误建议误导”（*pravo usus consilio*）这样的语句，这无疑是他对此事的个人评价。关于亨利二世接收人质的地点和时间，可参见Diceto, i, 414。

10 *Gesta*, i, 131–2.

11 Vigeois, Bk 1, ch. 70; *Chroniques de Saint-Martial de Limoges*, ed. H. Duplès-Agier (Paris, 1874), 59, 189.

12 *Gesta*, i, 127, 132, 195–6; Diceto, i, 425; Torigny, 274.

13 *Gesta*, i, 168–9.

14 *Gesta*, i, 180–1; Landon, 223–4.

15 *Gesta*, i, 190–4.

16 关于代奥勒的丹尼丝之后的历史记载，参见N. Vincent, ‘William Marshal, King Henry II and the Honour of Châteauroux’, *Archives* (forthcoming)。

17 *Gesta*, i, 194–6. 根据豪登的罗杰记载，亨利二世还审判并惩处了那些在1173年至1174年“内战年代”中支持他的儿子们与他对抗的贵族，但利摩日人当时并未参与。更重要的是，亨利二世对利摩日子爵艾玛尔的惩处说明，这是对1176年叛乱的惩罚。

18 尽管亨利二世和理查都身在利穆赞地区，但当时却没留下任何关于此事的书面报告，所以罗杰的记载也缺乏准确的消息源。

19 Torigny, 275.

20 Map, 96–7. 不过这一评论事实上也可能指的是1182年时利穆赞地区发生的劫掠事件。

21 *Gesta*, i, 196.

22 *Ibid.*, 196–7. 关于奥德贝尔伯爵不幸遭遇的记载，来自Vigeois, Bk 1, ch. 70, 以及*Chroniques de Saint-Martial*, 188–9。当时6000马克的价格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数据不仅被维茹瓦和贝尔纳采用，也被其他英格兰和诺曼作者记录。尽管在拉贝（Labbe）版本的维茹瓦著作记载为5000马克，但其他大多数手稿都采用了6000马克的数据。另外，“国王亲口承认”只为价值20000马克的拉马什出价6000马克的说法来自Torigny, 274–5。迪切托的拉尔夫也记载为6000马克，见Diceto, i, 425。为他提供这一消息

的普瓦捷主教约翰当时身处会谈现场。关于吕西尼昂家族的主张，参见Painter, ‘The Lords of Lusignan’, 33。

23 Torigny, 276.

24 作为图阿尔的领班神父和普瓦捷教长的塞布朗·沙伯出身于一个曾参加1173年内战的家族，Vigeois, Bk 1, ch. 70。不过考虑到1176年时另一位沙伯家族的成员——特奥博尔德曾帮助理查作战，理查本人或许不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对这位新主教充满敌意，他之所以采取行动可能是由于对这一秘密决定的不满，以及遵照父亲的命令行事。Diceto, ii, 4–5称这件事发生在1180年，Vigeois, Bk 1, ch. 72则称，塞布朗尽管尚未恢复对亨利二世的支持，他仍然试图回到利摩日。

25 1177年后豪登的罗杰减少了在亨利二世的宫廷中驻留的时间，因而他能接触到的理查的报告也较之前有所减少。

26 *Gesta*, i, 212–3. 这份文书还叙述了1179年前5个月发生的重大事件。

27 关于“尚武的年轻国王”阿方索的简要介绍，可参见T. N. Bisson, *The Medieval Crown of Aragon* (Oxford, 1986), 35–7; P. Tucoo-Chala, *La Viscomté de Béarn et la problème de la souveraineté* (Bordeaux, 1961); C. Higounet, ‘La Rivalité des maisons de Toulouse et de Barcelone pour la prépondérance méridionale’, *Mélanges d’histoire du moyen âge dédiés à la mémoire de Louis Halphen* (Paris, 1951)。理查很可能也说服阿方索放弃了对整个贝阿恩地区的宗主权。

28 *Gesta*, i, 213.

29 此处关于塔耶堡之战的记载基于Diceto, i, 431–2，尽管他记录的日期与豪登的罗杰在*Gesta*, i, 213的记录略有不同。托里尼的罗伯特也强调了城堡的守备力量，参见Torigny, 281–2。罗杰在他的简要报告中只提及理查在5月3日开始围攻城堡，并在三天后将其攻陷。罗杰将塔耶堡的其他情况完全省略，虽然这种做法符合官方文书的体例，却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

30 迪切托的拉尔夫将这些被摧毁后的城堡描述为“盗匪巢穴”，他还记载了亨利二世用“至高的荣耀”（cum honore maximo）欢迎理查。Diceto, i, 432. 此外，根据托里尼的罗伯特记载，理查除了与父亲会面外，还前往圣托马斯的圣地朝拜。参见Torigny, 282。

31 这一观点得到了罗恩·沃特森博士（Dr Rowan Watson）的启发，在此向他致谢。

32 Vigeois, Bk 1, ch. 48.

33 Ibid., ch. 56.

34 *Gesta*, i, 132.

35 Ibid., 169.

36 1181年，理查在阿基坦进行的有记载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加斯科涅。战争起因似乎如下：阿让南部的洛马涅（Lomagne）子爵领的继承者拒绝臣服于理查。理查则派兵占领了子爵领的重要城镇莱克图尔（Lectoure），负隅顽抗的洛马涅子爵继承人直到8月中旬时才向理查臣服，理查在圣瑟韦（St Sever）将他封为骑士。Vigeois, Bk 1 chs. 71–2.

37 Ibid., ch. 72.

38 J. Yver,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u groupe de coutumes de l’ouest de la Franc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4th series, xxx (1952).

39 Vigeois, Bk 1, ch. 72.

40 Gerald, *Princ.*, 293–4 (Bk 2, ch. 25).

41 Diceto, ii, 9; Gervase, i, 297.

42 Born, 176–83, no. 10, ‘Pois Ventedorns’. 贝尔特兰还写道，当一个国王已经做出承诺（正如腓力将昂古莱姆转交泰尔弗家族那样），那么他就不应违背自己的诺言。这一言论很可能是向腓力二世和阿基坦的叛乱者们暗示理查的绰号“模棱两可者”（O c e Non），敦促他们做到果决与公正。

43 Vigeois, Bk 2, ch. 2.

44 Gervase, i, 303; Diceto, ii, 19; *Gesta*, i, 292. 当罗杰在12世纪90年代早期重新修改这部分内容时，他将所有关于贵族们指控理查的部分删去，反而叙述了幼王亨利的阿基坦盟友们侵害理查权益的内容，*Chron*, ii, 274.

45 Vigeois, Bk 2, ch. 2; *Gesta*, i, 288.

46 Vigeois, Bk 2, ch. 2.

47 *HGM*, 5095–848; *Gesta*, i, 289–9, 296. D. Crouch, *William Marshal* (London, 1990), 45–6.

48 Vigeois, Bk 2, ch. 2.

49 *Gesta*, i, 297–8; Gerald, *Top.*, 200, 这部分成文于1180年末的记录在*Princ.*, 178–9中也有出现。关于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杰弗里在1181年或1182年时发生的暴力争端，可参见J. Everard, ‘The “Justiciarship” in Brittany and Ireland under Henry II’, *ANS*, xx (1997), 102.

50 Vigeois, Bk 2, ch. 6.

51 Torigny, 302.

52 Born, 182–3. 译者补注：“马特弗隆”是一个常在吟游诗人作品中出现的城堡名字，“Mateflon”由两个单词matar（奥克语，意为“毁灭”）与felon（奥克语，意为“叛徒”）组合而成，其名称的含义即是“消灭叛徒”。此处是暗喻理查将作为叛徒而被消灭。

53 对理查修建克莱尔沃城堡的解释建立在他在克勒兹河畔圣雷米（Saint-Rémy-sur-Creuse）兴建工程（记载于*Archives historiques du Poitou*, viii, 39–53）及克莱尔沃城堡早期历史的记录的基础上，后者参见C. Chevalier, ‘Cartulaire de l’abbaye de Noyer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Touraine*, xxii (1872), 402, 476, 486, 505–6, 528–9, 626; idem, ‘Documents concernant le prieuré de St Denis en Vaux’, *Archives historiques du Poitou*, vii, 347。关于理查在阿基坦地区进行的其他城镇建设工程，可参见M. Beresford,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Gloucester, 1988), 351–2, 636。

54 HGM, 5693–714; Torigny, 304; Map, 488.

55 ‘Casutz sui de mal en pena’, Born, no. 8, 160–7，在另一首诗中还提及了亨利二世或理查曾介绍贝尔特兰与玛蒂尔达认识的事情，见‘Ges de disnar’, no. 9, 168–73。

56 *Gesta*, i, 291–2；只有迪切托的拉尔夫对亨利二世抱有十分同情的态度，他明确指出了“阿基坦属于理查和他的继承人们”这一条款，见Diceto, ii, 18。

57 *Gesta*, i, 294.

58 Ibid., 295. 而迪切托的拉尔夫的记载稍有不同（Diceto, ii, 18）。在故事最后，幼王亨利强迫理查在圣遗物前向他效忠的要求激怒了后者，随后理查回应称，正如长子是父亲王位的正统继承者一样，他也正是自己的母亲、阿基坦女公爵的正统继承者。理查还强调，父亲逝世之后，他将以法王封臣而非安茹封臣的身份从法王手中获得阿基坦。理查的上述回答也令亨利二世愤怒不已。Norgate, 50, n. 1.

59 *Gesta*, i, 291–2; Diceto, ii, 18–9.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经过，因为罗杰先对此事做了简要记载，随后在解释事件起因时又再次回顾了一些此前发生的事件。关于吕西尼昂的杰弗里在利摩日的事迹，参见HGM, 6408–13。

60 *Gesta*, i, 296.

61 理查与杰弗里部下的布拉班特佣兵作战的记载来自豪登的罗杰，见*Gesta*, i, 292–3。在利穆赞地区作战的记载则来自Vigeois, Bk 2, ch. 6。通过维茹瓦的杰弗里和贝尔特兰诗歌中的记载，我们知道布列塔尼的杰弗里忙于南部地区的事务，至于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布列塔尼的问题，也仍然如豪登的罗杰所说“尚有争议”，Norgate, 51, n. 5。事实上，罗杰也在重新修订的编年史中删减了这一部分，见*Chron.*, ii, 274。

62 Vigeois, Bk 2, ch. 7; *Gesta*, i, 296–9. 豪登的罗杰对1183年春季时发生在利穆赞地区的诸多事件都留下了详细记载，这表明他在当年5月返回诺曼底之前曾在此地停留了一段时间，*Gesta*, i, 299–300。

63 Vigeois, Bk 2, chs 8–11. 然而圣德尼的里戈和布列塔尼的威廉均未提及腓力派兵干预一事。而里戈的记载中还着重提及了亨利二世对腓力的大度表现，这似乎证明里戈和威廉的记载更符合实情。见Rigord, 34–5。

64 Vigeois, Bk 2, chs 12–16.

65 Born, no. 14, 204–13. “来自拉瓦莱埃（La Vallée，位于安茹地区）的士兵们因惊恐而作鸟兽散”的诗句，似乎显示了如下事实：此诗写于亨利二世对利摩日的围城战失败之后，此时贝尔特兰仍对获胜充满希望。

66 Vigeois, Bk 2, chs 16–19; *Gesta*, i, 300–1. 关于阿方索二世加入战局的内容，参见*Gesta*, i, 303。

67 关于对幼王亨利的领导力感到失望，并认为杰弗里在这方面胜于长兄的观点，可参见‘D’ un sirventes’, Born, no. 11, 184–9。

第六章

继承权悬而未决，1184——1189

尽管幼王亨利的叛乱令安茹王朝在阿基坦的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震荡，但当他逝世后，收拾残局的工作便十分轻松了。得知幼王亨利的死讯后，艾玛尔子爵和吕西尼昂的杰弗里离开利摩日，将他的遗体护送至格朗蒙。当这支向北行进的队伍接近于泽尔克（Uzerche）时，编年史家杰弗里正和维茹瓦修道院的几位修士一同站在山丘上，俯瞰着从他们下方经过的送葬者们。根据杰弗里的记载，当天天气很好。¹而亨利二世和理查也趁此机会率军重返利摩日，再度围攻艾克斯和利摩日城堡区。6月24日，据守利摩日的艾玛尔子爵宣布投降，并表示绝不再支持他的异姓兄弟在昂古莱姆的叛乱，利摩日城堡区新建不久的城墙也再度被拆除。亨利二世在击败艾玛尔后便返回安茹，理查则与阿方索二世国王一同围困了据守奥特福的贝尔特兰·德·博恩。虽然奥特福被人称为牢不可破的城堡，但它在阿基坦-阿拉贡联军的进攻下也只坚持了7天。7月6日，联军攻克奥特福，并将它还给了原来的主人康斯坦丁·德·博恩。²攻克奥特福后，阿方索二世收兵返回巴塞罗那，让理查自行处置属于佩里戈尔伯爵及其盟友们的领地。³最终，所有叛乱的贵族都向理查臣服，并签署了和平协议。其中一些贵族的城堡被彻底摧毁，其余贵族的城堡则被纳入国王的直接统治下。布列塔尼的杰弗里也因为参与叛乱而失

去了他在布列塔尼的所有要塞。尽管此时安茹王朝在阿基坦的政治秩序业已恢复，但理查本人的政治地位却仍然不甚明确。这场几乎成功推翻理查统治的叛乱，很可能使亨利二世对理查治理阿基坦的能力产生怀疑。若理查就此让出阿基坦公国，他的这一举动也将对时局产生诸多微妙的影响。然而，亨利二世仅仅收回了那些在1183年叛乱爆发前曾许诺交给理查的城堡。⁴但考虑到他已经成为亨利二世第一顺位继承人，理查充满耐心地承受了权威的丧失。

到1183年米迦勒节时，亨利二世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将理查和约翰召集到诺曼底，命令理查将阿基坦交给约翰，以此换取约翰对前者的效忠。我们似乎不难理解这一提议：若理查将像幼王亨利那样成为王位继承人，那么尚未成为“失地王”的约翰自然也应效仿理查，通过向他的兄长效忠以获得原属理查的领地。然而理查的想法并非如此：此前他为了维护阿基坦的秩序奋战了8年之久，绝不打算将它拱手相让。在贝尔特兰·德·博恩笔下，理查在统治阿基坦期间“从阿让至农特龙的土地获得了大量财富，但也为之消耗了同样的金钱，承受并处理各种打击，忍受了饥渴与疲惫”。⁵更重要的是，若理查交出阿基坦的话，他无疑将重蹈幼王亨利的覆辙，被亨利二世完全控制。⁶因此，理查当即表示需要几天时间与他的朋友们讨论后再做决定，得到许可后他便离开了会场，并趁着夜色策马赶赴普瓦图，只在途中派出信使向他的父亲传达这一信息：理查决不允许任何人夺去他的阿基坦公爵之位。这意味着理查已经再次接管了属于阿基坦公爵的城堡。于是，亨利二世为他此前疏于造访阿基坦，极少召集普瓦图及其南部贵族到他的宫廷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过去，尽管理查在危急时刻时曾向父亲求援——父亲当然也向他伸出援手，但理查在管理阿基坦日常事务期间显然已习惯了按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与他相距甚远的亨利二世无暇关注阿基坦的状况，理查开始自行分配公国税收，并逐渐将自己的宫廷发展成为阿基坦南部地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心。因此，理查赢得了大多数阿基坦民众的拥护，他在民众心中的声望无疑远胜父亲亨利二世。此外，法王腓力也一

直在给亨利二世制造麻烦，腓力表示：既然幼王亨利已死，他的遗孀玛格丽特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吉索尔和其他位于诺曼维克桑地区的城堡都应当归还法王。最终，英法双方为此于1183年12月6日在吉索尔和特里（Trie）交界地区召开会议，腓力虽然允许英王继续控制诺曼维克桑，但他也向亨利二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每年为玛格丽特提供2700里弗尔的年金；二是亨利将让诸子之一与艾丽丝成婚，并把这片土地赐给这个儿子。虽然艾丽丝此前已经与理查订婚，但从这次会谈达成的协议措辞来看，亨利二世似乎更倾向于让她嫁给约翰而非理查。不过对腓力而言，任何能使他这位异母姐姐和她的丈夫得到妥善安排的计划都是可以接受的，无论他的姐夫得到的是阿基坦还是其他更广大领地。在这次会议上，亨利二世还为他治下的所有欧洲大陆领地向法王行了臣服礼。⁷亨利二世的这一声明，其实是为了强调自己有权干预阿基坦事务。不过，一旦父子二人为争夺阿基坦公国而兵戎相见时，自1175年以来形成的人际联系和忠诚宣誓无疑比“合法的统治权”更为重要。

在1183年至1184年冬季期间，亨利二世努力使理查远离阿基坦的权力中心，然而他恩威并施的手段毫无作用。最终，愤怒的亨利二世甚至允许约翰率军进攻阿基坦，试图以武力将其夺取。然而理查对此早有防备：他在拉罗谢尔以北的塔尔蒙（Talmont）庆祝圣诞节时，慷慨地向臣下赠予礼物以笼络人心。⁸但仅仅通过赠礼的手段并不足以确保所有封臣的忠诚，对理查来说，更为有效的手段还是雇佣一支忠诚于己的军队。就在此时，一位名为梅卡迪耶（Mercadier）的佣兵首领开始与理查建立起紧密的联系。1183年，梅卡迪耶还作为理查的敌人，率领一支佣兵队伍在利穆赞南部地区制造混乱，但在随后15年间，他成了全欧洲最为知名的职业军人。梅卡迪耶并没有像其他雇佣兵一样频繁变换雇主，始终对理查忠贞不贰，并在沙吕（Chalus）陪伴着奄奄一息的理查度过了临终时光。梅卡迪耶对理查之所以如此忠诚，可能是由于理查向他提供了比其他雇主更高的报酬，但他们通过长期共事后，无疑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从梅卡迪耶在1196年所说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我始终忠心耿耿地为他奋战，从未违抗他的意志，对他唯命是从。我也因自己的付出得到了他的赏识，并被提拔为军队指挥官。”1184年2月，梅卡迪耶第一次以理查部下的身份参与战斗，他受命率一支部队劫掠了埃克斯西德伊。此次行动无疑是对利摩日子爵艾玛尔的警告，因为他此前希望趁亨利二世与理查争吵时借机渔利。⁹

尽管亨利二世此前威胁要对阿基坦发起进攻，然而直到他在1184年6月返回英格兰时，计划中的阿基坦征伐都没有实施。而到了6月末时，亨利二世的官员们又在拉罗谢尔与一位葡萄牙公主会晤，并护送她安全地穿越了普瓦图地区。这似乎表明，亨利二世并没有打算将自己的那句气话付诸实践。但他不安分的儿子们又开始借此制造事端。考虑到约翰当时年仅16岁，诡计多端的杰弗里无疑才是真正的主谋。当时杰弗里已经返回布列塔尼，恢复了权力。尽管理查和杰弗里曾在1183年时握手言和，但双方在利摩日交战时结下的仇恨仍未消弭。不久后，杰弗里和约翰两人便开始突袭普瓦图，理查的回应则是率军进入布列塔尼大肆劫掠。1184年秋季时，身处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他立刻将三个儿子叫来英格兰。从三人皆应约前来的情况看，亨利二世对他的安茹帝国仍然有着极强的控制力。1184年12月，在父亲的调解下，理查、杰弗里和约翰三兄弟在威斯敏斯特达成了公开和解意向。¹⁰事实上，亨利二世在1184年下半年都在努力寻求继承人问题的解决之道。当他回到英格兰后，便立刻释放了被监禁的埃莉诺。重获自由的埃莉诺甚至还出席了年末这次重要的御前会议，并很可能参与了对阿基坦事务的讨论。亨利二世希望埃莉诺能适当约束一下她的儿子们，尤其是理查的行动。此外，亨利二世还在考虑将艾丽丝嫁给他另一个儿子的可能性。他曾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使臣会晤，并初步确定了让理查与腓特烈的一个女儿联姻的计划。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原定嫁给理查的公主在计划确定后不久便去世了。值得注意的是，1184年，亨利二世让理查和约翰在英格兰待到了圣诞节后，却将杰弗里派往诺曼底，命他“监管该地”。¹¹亨利二世是否想借此暗中警告理查：切勿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英格兰

、诺曼底和安茹领地的继承人？若理查仍然坚持不让出阿基坦的话，他是否将失去继承其他安茹王室领地的权利？不过，亨利二世正在计划立约翰为爱尔兰国王，这似乎暗示阿基坦仍然可以由理查继续控制。若亨利二世果真希望按此行事，他又会因为这一让步向理查提出怎样的条件呢？理查无疑对父亲未知的计划深感忧虑，于是他在度过圣诞节后立刻返回阿基坦，并很快与杰弗里再度开战。¹²

亨利二世闻讯，认为理查应为战争的爆发负责，这是对他近期禁令的公然蔑视，于是他在1185年4月渡海前往诺曼底，在当地召集军队。但亨利二世很快又找到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自己这个桀骜不驯而令人生畏的儿子：他写信给埃莉诺，命她前来与自己会合，当埃莉诺到达后，他便给理查写信，让理查“将阿基坦转交给他的母亲、正统的阿基坦女公爵”。对于受母亲影响极深的理查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亨利二世的一张制胜王牌。结果也正如他所料：理查立刻宣布停战，并要求他治下的城主们遵从埃莉诺的命令，随后他“如同孝子”（*sicut filius mansuetus*）一般，回到父亲的宫廷中。¹³ 实际上，理查也对阿基坦重归母亲所有这一结果感到满意：这意味着埃莉诺恢复了阿基坦女公爵的所有权力，¹⁴ 由于理查是埃莉诺领地的继承人，所以这也确保了理查未来仍能拥有阿基坦公爵之位，此时不过是将它暂时转交母亲罢了。同时，亨利二世、埃莉诺和理查三人开始共同治理阿基坦，但三人共治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在确认一位封臣的权利时，有时甚至需要颁发至少三封内容相同的特许令（这些封臣既是幸运的，也可能是恼怒的，毕竟他要为每份特许令付钱）。¹⁵ 当然，在三人共治的名义下，掌握实权的仍然是亨利二世：人事任免、征收税赋、分配税收这三项重要权力都由他掌握。不过，当亨利二世在1186年4月返回英格兰时，理查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了。1186年3月，亨利二世曾与法王腓力在吉索尔再次会面，确认了1183年12月达成的协议，不过亨利在这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将把艾丽丝嫁给理查，而非嫁给“他的诸子之一”。¹⁶ 布列塔尼的杰弗里非常清楚这项协议的重要性，因为他希望继承安茹帝国大部分领

地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杰弗里将法王腓力视为实现目标的唯一希望，并立刻像他的兄长们、曾经心怀不轨的幼王亨利和理查那样前往巴黎。有传言称，他已经说服法王让他担任宫廷管家，这暗示他的目标是安茹伯爵的领地，因为这是安茹伯爵们过去拥有的头衔。¹⁷

正当杰弗里在巴黎密谋对抗理查时，理查则在进行讨伐图卢兹的战争。亨利二世为他提供了充足的军费，这次进攻也可说是师出有名：他的宿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曾在1183年支持幼王亨利的叛乱；1186年初雷蒙德五世之子雷蒙德六世又派遣佣兵进入利穆赞地区，试图勾结艾玛尔子爵对1184年2月时梅卡迪耶进攻埃克斯西德伊的行动进行报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前后两代图卢兹伯爵无疑趁着理查1184至1185年时深陷窘境、无暇南顾之机占领了凯尔西地区的争议地带。¹⁸不久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1184年时，维茹瓦的杰弗里因为被掉落的砖石击中头部，在受伤数月后便逝世了。他所编写的编年史戛然而止，我们也无法通过他的作品了解1184年2月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了。¹⁹理查在1186年对图卢兹的这次反击则进展顺利，1186年4月，他还与老盟友阿方索国王在纳雅克-德-鲁埃格（Najac-de-Rouergue）重新缔结盟约。²⁰雷蒙德伯爵此时则进退两难：他既不敢与理查的大军正面交战，此前向法王腓力的求援也没有得到回应。²¹腓力之所以在此时选择置身事外，大概是认为此时他没有能力再向合法且高效的统治者亨利二世或理查施加压力。

然而，另一位重要人物的突然死亡使形势再度发生了变化：1186年8月，布列塔尼公爵杰弗里在巴黎参加一次骑士比武时不慎落马，遭到踩踏伤重而死。以布列塔尼封君自居的法王腓力闻讯后，宣布将杰弗里的两个女儿置于自己的监护下，要求亨利二世立刻将她们交给自己，否则他将率军进攻诺曼底。随后，腓力又要求理查停止对图卢兹的军事行动。1186年10月，两位国王进行和谈，双方约定停战至1187年1月，但我们并不清楚图卢兹地区的战事是否包含在这项停战协议中。有证据显示，理查仍然保持着比他的父亲更为咄咄逼人的态势：和议达成后不久

，吉索尔的骑兵统帅便在一次遭遇战中杀死了一位法兰西骑士，为此他向理查请求庇护以自保。1187年2月，理查从阿基坦南方返回诺曼底，迎接从英格兰驾临此地的父亲亨利二世。尽管此后英法双方又进行了两次会面，将停战期延长至1187年仲夏，但也使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调和。²²法王腓力除了再次要求控制布列塔尼之外，还重申了艾丽丝的婚姻问题和诺曼维克桑的归属问题，这似乎表明：1186年3月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解决如果艾丽丝一直未完婚，安茹王朝是否能继续控制维克桑地区的问题。艾丽丝婚姻问题的关键在于：若理查或约翰与她成婚，更肯定了腓力“这块领地是他的姐姐的嫁妆”的说法，这样的话，这块领地日后也很可能重新被纳入法国国王的统治范围；另外，若亨利二世仍然希望坚称维克桑地区是诺曼底公爵的传统领地，那么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要将此事与艾丽丝的婚事混作一谈。²³无论法律上的对与错，只要安茹王朝还控制了战略要地吉索尔，亨利二世在谈判中就占据优势，他相信法王总有一天会被迫让步。相较而言，艾丽丝的命运就显得比较悲惨了：她在亨利二世监护下已有25年，至今仍未成婚。艾丽丝长期未婚的事实不仅令现代史家们困惑，当时的人们也都十分不解。有传言称，亨利二世曾诱奸了艾丽丝，把她当作自己的情妇，因而理查才一直不愿与她成婚。²⁴这或许是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亨利二世和理查根据1183年后形势的变化进行外交考量后，都一致认为不将艾丽丝嫁给任何一位安茹王室成员是最明智的做法。更重要的是，继续保持对艾丽丝的控制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之效：这既能使安茹王朝在谈判中继续保持主动，也可防止腓力将她嫁给其他王侯，遏制新的反安茹同盟形成。尽管这条政策极其奸诈无情，但它还是有一些缺点：若法王打算制造事端，他总有一个适当的理由。²⁵

时间来到1187年初夏，英法双方都在积极备战。法王腓力此前已质疑了亨利二世对艾丽丝的监护权，并对亨利在布列塔尼和维克桑的统治权提出挑战，这使他拥有了主动权。他可以任意选择进攻方向，而亨利二世只能被动地调遣军队防卫他漫长的边境线。1187年6月，腓力正式

出征，率军向贝里前进。经过事先安排，伊苏丹（Issoudun）领主投靠腓力一方，将境内所有城堡对法军开放；位于卢瓦尔河谷北部的弗雷特瓦勒（Fréteval）领主大开城门迎接法军。贝里的政治形势则较为复杂：安茹王室和卡佩王室的领土交错分布，使这里的领主难以彻底倒向某一方。伊苏丹领主、法王腓力的堂兄德勒的罗贝尔（Robert of Dreux）对此显然深有感触。但腓力的进军在沙托鲁停止了，理查和约翰坚守沙托鲁，为父亲亨利二世率领主力前来支援争取了足够的时间。腓力见状，暂时解除了对沙托鲁的包围，但他不愿自己的声望在第一次与安茹王朝的公开敌对中因主动撤军而受损，于是法军在6月23日摆出作战态势，亨利二世见状也下令全军严阵以待，双方的主力会战一触即发。²⁶

然而，双方在最后时刻都选择了后撤。毕竟中世纪还是一个主力会战极为罕见的时代，他们若真的展开一场主力会战，将是更令人惊讶的举动，国王之间也极少有通过此类会战解决争端的先例。事实上，亨利二世一生都未曾进行过此类会战；至于腓力，尽管他1214年赢得的布汶（Bouvines）战役令他荣耀倍增，但战前他也极力避免与敌方进行决战。通过腓力当时尽力避战的表现来看，我们便不会对这一事实感到惊讶了：即使是武名卓著的理查，也未曾在欧洲大陆上进行过主力会战。当然，1176年理查与昂古莱姆的武尔格林率领的雇佣军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可能是例外，但他们之间的战斗很可能只是“屠杀”，并未达到“主力会战”的标准。主力会战也并非中世纪战争的主要形式。构成中世纪战争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敌方领土的摧毁战、对后撤敌军的追击战和以要塞攻防为核心的围城战。而大多数战役是围城的结果，正如1187年6月的沙托鲁围城战那样：当围城军队发现守军的支援抵达后，双方只能一战。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在双方都配备全副武装的骑士和步兵且势均力敌时，双方统帅也极少选择进行大规模主力会战。诚然，主力会战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但它也伴随着巨大的损耗和风险：在一场主力会战中，任何意外都可能决定战争的走向，损失的人力、物力将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彻底恢复。中世纪战争的另一特点是：将俘虏或击杀敌军

统帅视为最有效的取胜之道。如在著名的黑斯廷斯（Hastings）之战中，诺曼军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敌方统帅、英王哈罗德的阵亡。即使考虑到骑士在战场上阵亡率较低的情况，统帅在下达作战命令时也已使自己身处险境，因而大多数君主都会出于谨慎考虑而尽可能避免进行风险极大的主力会战。²⁷ 另外，贵族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对中世纪战争有着重要影响。在沙托鲁对峙的两军阵营中，都有许多彼此相互熟识的贵族，许多人因为一同参加骑士比武或进行朝圣之旅而熟识，或者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因此，无论当两国国王召集他们出兵时多么虚张声势，他们其实极不愿意自相残杀。这时，教宗乌尔班三世（Urban III）派出的教廷特使带着调解欧洲西北部两大国争端、组织新的十字军的任务抵达了沙托鲁。在特使的努力下，双方阵营的许多贵族和教士都试图促成和议，然而双方的统帅腓力和亨利都不愿向对方让步，毫无签署和约之意，不过他们愿意为了组织十字军进行停战谈判。十字军的需要和濒临主力会战边缘的状态说明他们需要一段相对长的停战时间。最终，双方在达成为期两年的停战协议后各自收兵，伊苏丹和弗雷特瓦勒则归腓力所有。

除了这些领地的统治权之外，法王腓力还通过这次战争获得了更为重大的成果：理查随他一同返回了巴黎。“腓力对他十分优待，”豪登的罗杰写道，“他们每日都一同就餐，品尝同样的菜肴，夜晚也一同就寝。两人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亨利国王得知此事后深感不安，认为这突如其来的友谊将对自己不利，因而他决定暂缓返回英格兰的计划，打算弄清腓力和理查的真正用意。”²⁸ 一些现代作家据此认为理查和腓力存在同性恋关系，这当然是由于今日观念所造成的误解。实际上，两个性别相同的人同睡一床的现象在当时十分常见，罗杰也毫不担心他的读者们会对这一记载产生误解，他的真正用意在于提醒读者：应当对理查和腓力之间异常紧密的政治联系有所关注。无独有偶，迪切托的拉尔夫也留下了亨利二世与幼王亨利在1175年曾“一同就餐，夜晚同寝”的记录，其中也无疑暗含着政治意味。²⁹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两个男人互换

亲吻是表达友谊或和平的象征，而非激发爱欲之举。我们显然不能以当代人的观念去解读800年前人们举动的真实含义。亨利二世很清楚，理查与腓力一同乘马前往巴黎的举动是对他政治权威的挑衅。这种行为是当时政治话语的一种表达。但精明的腓力总能利用这类政治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据说在布列塔尼的杰弗里即将下葬时，腓力悲痛万分，甚至一度打算跳进杰弗里的墓中与他一同安葬。³⁰而此次他对理查的优待也起了预期的作用：亨利二世在1187年夏季期间频繁地派出信使，请求理查返回英格兰，并承诺将给予他应得的一切。理查佯装从命，离开了巴黎，但他却径直前往希农，并将城堡中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将其用于阿基坦境内城堡的重修和新建工作。对此无可奈何的亨利二世只得派出更多的信使，最终说服理查与他见面。理查在见面时则称，自己此前受离间父子关系的谰言蛊惑，此时愿意悔过。随后，理查在昂热向父亲亨利二世宣布效忠，并以福音书发誓，自己将永远忠于父亲，并与他一同对抗所有的敌人。³¹

尽管父子二人再度重归于好，但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仍然令人困惑：父子之间为何会突生裂隙？此前还坚守沙托鲁，与腓力兵戎相见的理查又为何在战后如此迅速地与前者相伴而行？要想解答上述问题，还得从气氛紧张的大战前夜说起。当时理查似乎在和平谈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两军之间来回奔走，他的这一行动也令父亲十分疑惑：难道他的儿子会接受那些他绝不认可的条款吗？亨利二世可能也在此时开始怀疑理查已经背叛了他。另外，若理查是作为亨利二世的王位及其领地继承人与对方进行和谈的话，他的行动也将可能再度改变亨利二世从1185年春季起便悬而未决的继承人问题。³²然而，双方在战场上组成战斗阵形遥遥相望的紧张时刻绝非讨论继承问题的最佳时机。因而，腓力选择了这个最为敏感的时刻与理查接近，重新挑起了令亨利二世晚年始终困扰不已的继承人问题。

让我们暂时回到1187年6月23日的沙托鲁城堡，城内的亨利二世和城外的法王腓力还在为是否让军队投入主力会战而犹豫不决。在这个令

所有中世纪指挥官们都极难抉择的问题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避战撤军。然而在此事发生10天后，即1187年7月3日清晨，在加利利（Galilee）地区的塞弗里亚城（Saffuriya）扎营的耶路撒冷国王在经过一夜苦思冥想后，却做出了与英法两国国王相反的决定：与敌军进行主力会战。当时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正在围攻他的重要据点太巴列（Tiberias），而他也深知，一旦决定出兵，离开大本营，他将有极大的风险与穆斯林作战，但他仍下令出兵驰援。³³ 而由耶路撒冷国王亲自率领的援军也没能到达太巴列：这支在酷暑下行进的部队除了要忍受高温的炙烤外，沿途不断侵扰的穆斯林骑射手也令他们疲于应对，于是他们不得不在缺少水源的哈丁（Hattin）暂作休整，打算次日继续前进。³⁴ 然而在哈丁扎营的基督徒士兵们度过的却是一个干渴无眠之夜，敌军点燃了营地外围的灌木丛，将浓烟引向疲惫不堪的基督徒。到了第二天清晨时，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深知大势已去，他疲惫不堪的军队已经身陷重围。尽管被包围的基督徒在最神圣的真十字架（Holy Cross）鼓舞下与敌军奋勇作战，但最终穆斯林仍然取得了一场大胜。7月4日，这支耶路撒冷王国的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吕西尼昂的居伊和真十字架均落入敌手，而基督教军队中的精锐部队，那些幸存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俘虏们也在战后被迅速处决。显然，穆斯林不希望这些修道骑士们在日后继续与他们为敌。

由于绝大多数军人已在哈丁之战中阵亡或被俘，此刻的耶路撒冷王国已经无力抵挡穆斯林的进攻了。为了平息天主之怒，拯救圣城耶路撒冷，圣城的守卫者们纷纷开始进行赎罪活动。母亲将自己女儿的头发剃光，并让她们来到加略山（Hill of Calvary），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裸着洗冷水浴以示悔罪。然而一切皆徒劳无功。穆斯林军队在10月2日攻入耶路撒冷，曾被基督徒改建为教堂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又被恢复为供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新的穆斯林征服者们对城内的非穆斯林居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不但允许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4位天主教神父还被任命为圣墓大教堂的管理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

99年攻占耶路撒冷的第一次十字军曾对居住于此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大开杀戒。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是只属于基督徒的圣城。

吕西尼昂的居伊于1180年来到中东，在他成为耶路撒冷国王还不满一年时便遭遇了哈丁的惨败，击败居伊的是一位比他更伟大的穆斯林统治者：马利克·纳西尔·萨拉丁·优素福（Al-Malik al-Nasir Salah ed-Din Yusuf），他以萨拉丁之名为西方人所知。³⁵ 萨拉丁从1169年开始统治埃及，并在1176年将叙利亚纳入治下。他也作为圣城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在伊斯兰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但这也掩盖了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精明强干的老练政治家的事实。他的政治经验来自努尔丁（Nur al-Din），此人曾在1154——1174年统治叙利亚，也是这一时期十字军最强大的对手。萨拉丁从努尔丁的经历中认识到了发起对抗非穆斯林的“圣战”（jihad）的重要意义，并利用圣战的强大宗教影响力促进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大业。他也像努尔丁一样成为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宣扬圣战之道的诗人和布道者们的保护人和朋友，以及圣战事业的领袖。萨拉丁虽然不以军事才能见长，但他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才干远远高于中东地区的所有穆斯林和基督徒对手们。萨拉丁也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慷慨大度的价值。吕西尼昂的居伊虽然并不是别人眼中的华而不实之辈，但他在争夺耶路撒冷王位期间已极大损耗了王国国力，这导致他的统治极不稳固，因而在面对强大的萨拉丁时，他可说毫无胜算。到1187年年末，只有三座海滨城市——提尔（Tyre）、的黎波里（Tripoli）以及安条克仍然处在基督徒控制下，内陆地区的诸多城堡在得到了萨拉丁饶恕城中军民性命的承诺后，便纷纷向穆斯林投降，因为他们知道他会信守诺言。此时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还不满百年，基督徒曾占领的“海外领地”（Outremer）便几乎丧失殆尽。由于1148年的第二次十字军战绩不佳，西欧青年们也因此不再愿意前往东方作战，然而哈丁之战惨败、耶路撒冷陷落这两起震惊欧洲的重大事件完全改变了这一状况。

1187年秋季，理查在新建的图尔大教堂里正式宣布参加十字军。60年前，理查的曾祖父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Fulk V of Anjou）曾跪倒在

旧教堂的圣坛前，接受了十字军的号召，准备启程前往耶路撒冷继承王位。此时，安茹的理查响应了来自东方的号召。理查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所有君主中，最先宣布参加十字军的一位，³⁶他这次匆忙的行动甚至都没有征得父亲的许可。³⁷贝尔特兰·德·博恩对此事的评价是：“作为安茹伯爵、阿基坦公爵以及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理查这一敢为人先的举动令他身价倍增。”然而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对十字军似乎并没有如此高涨的热情，诺曼底宫廷的坎特伯雷修士们则目睹了亨利二世得知此事时极其惊讶的反应：在随后的几天内，亨利二世甚至拒绝与任何人见面。³⁸法王腓力无法接受可能成为自己姐夫的理查将要长期在海外作战的消息。腓力决定撕毁停战协议，在圣诞节后立即召集了一支大军，对亨利二世进行威胁：亨利二世应交还吉索尔城堡或强迫理查与艾丽丝结婚，否则他将率领大军重启战端。1188年1月21日，两位国王在吉索尔和特里的交界地区再次会面，然而此次谈话的重点并非吉索尔城堡，而是耶路撒冷。亲临此地的提尔大主教以激情洋溢的演讲打动了他们，最终亨利和腓力都决定参加十字军。而豪登的罗杰以及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在记载此事时，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当两位国王正式宣布参加十字军时，他们上方的天空中立刻浮现出一片十字架形状的云朵。³⁹

尽管早在1172年时，亨利二世就曾做出参加十字军的许诺，但时至今日他都并未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不过他为受困的耶路撒冷王国提供过大量经济支持。⁴⁰起初腓力也和亨利一样对十字军毫无兴趣，但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他们也不得不转变态度。此时，所有的布道者和吟游诗人们都开始努力唤起民众对十字军事业的热情。那些拒绝参加十字军的男人会被赠予纺纱杆和羊毛，以此表示他们和女人无异。根据穆斯林史家的记载，布道者们通常会利用图像作为宣传手段。“他们会在人群面前展示一张绘有弥赛亚的图像，画中正被阿拉伯人痛击的弥赛亚已血流满面——愿真主保佑他！随后对人群说：‘这幅画所描绘的，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被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所攻击的场景，他打伤了基督并杀死了他。’”在另一幅类似主题的画作中则描绘了有着弥赛亚之墓的

圣墓大教堂。“墓地上方是一位骑着战马的萨拉森骑士，他正令马大肆践踏圣墓；与此同时，这匹战马也在向圣墓撒尿。这幅画在各处市场和集会所被广为传阅，随身带着这些绘画的教士们也会发出‘真是天主之耻’的悲叹。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基督徒们组织起一支大军，恐怕也只有真主才能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⁴¹

当然，那些投身十字军事业的人们则在世俗和宗教方面都有着可观的回报。从世俗利益上说，他们此前欠下的债务可以等到远征归来后再归还，而十字军战士们的财产也都处于教会保护下。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宗教方面：教会承诺，十字军战士们都将获得大赦，免受入炼狱和地狱受苦之折磨，他们也将能通过发动对穆斯林的圣战在天堂获得永生。12世纪最伟大的圣徒、克莱尔沃的圣贝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便发表过一番内容相似的演说：

哦！英勇的战士，善战的人们啊！现在正是需要你们奋勇作战的时刻，你们无须担忧灵魂受损，因为投身圣战事业将使你们荣耀倍增，虽死犹荣！若你是一位渴望获取世界财富的精明商人，那么我现在就要向诸位指明这条一本万利而无法抗拒的道路——投身圣战，接受这个十字标记吧！它将消除你此前诚心祈求欲得赦免的所有罪恶。尽管这十字标记并不昂贵，但我要告诉诸位的是，若你们怀着谦恭之心将它带在身上，它最终将令你们拥有天国。⁴²

与模棱两可的父亲亨利二世不同，理查对十字军事业怀着极高的热情。对于像他这样善战的勇士来说，与萨拉森人的战争将无疑能令他扬名立万，而考虑到这场对萨拉森人圣战的地点是维系着整个基督教世界共同情感的圣地，这就意味着战争中所有的英勇事迹和骑士武功也将传诸后世，为人铭记。不过，理查除了希望通过参加十字军博取英名，也

希望借此寻求大赦。以下的记载便足以证实这点：当理查在进军圣地途中经过墨西拿时，由于深受内心罪恶感的折磨，他将西西里追随自己的大主教和主教们召集起来，突然跪倒在他们脚下；随后赤裸的理查还握着三支鞭子，向这些主教们忏悔自己的罪行。⁴³ 尽管我们已经无从知晓理查打算为何种罪行忏悔，但他的这一行为无疑也表明：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场重要的军事远征，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宗教意义。在邻近洛什（Loches）的博利厄（Beaulieu）修道院，理查还见到了取自圣墓的石块。他的祖先、曾以粗野著称的“黑”富尔克（三世）有过三次前往耶路撒冷的经历，据称在富尔克的一次朝圣之旅中，当他来到圣墓跪地祈祷时，从圣墓上掰下了这块石头，将它带回欧洲。⁴⁴ 而对那些意在悔罪的人们来说，以一位十字军战士而非手无寸铁的朝圣者身份前往圣地也是更好的选择。正如吟游诗人蓬斯·德·卡普德耶（Pons de Capdeuil）所言：“还有什么能比只要立下赫赫武功便可令自己免受地狱烈火炙烤更吸引国王们的呢？”⁴⁵

当然了，要想确保十字军事业的成功，确保有序组织和维持宗教热忱同等重要。早在1188年1月21日的会议便对相关标志的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法王部下将佩戴红色十字，英王部下将佩戴白色十字，佛兰德斯伯爵的部下则佩戴绿色十字。1188年1月底，在勒芒还召开了另一次会议，理查与来自安茹、曼恩及图赖讷的其他贵族们也陪同父亲亨利二世参加了这次勒芒会议。这次会议对征收“萨拉丁什一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安排，确定了十字军战士们所享有的经济特权，并对他们的行为规范制定了相应的章程，如，十字军战士们禁止诅咒他人或从事赌博活动，仅有品行良好的洗衣妇允许随军前往圣地（因为十字军需要穿着得体，打扮朴素）。根据豪登的罗杰的记载，由于十字军战士可以免缴什一税，当《勒芒敕令》公布之后，西欧各地都掀起了参加十字军的热潮。⁴⁶

然而，1188年初，可能就是正当理查参加勒芒会议时，阿基坦再次爆发了叛乱。根据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叛乱爆发的标志是吕西尼昂的

杰弗里杀死了阿基坦公爵理查最信赖的一位顾问。随后杰弗里的旧盟友们——昂古莱姆的阿德马尔和杰弗里·德·朗孔等人也纷纷高举反旗，加入叛军阵营，他们合兵一处，劫掠了理查位于阿基坦的一些领地。自从数年前威廉逝世以来，阿德马尔便已成为泰尔弗家族无可争议的领袖。看起来在此之前，理查已经放弃了坚持由武尔格林之女玛蒂尔达继承昂古莱姆的主张。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双方此前的积怨：泰尔弗家族长期对拉马什虎视眈眈；阿德马尔为使理查承认自己的伯爵地位，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人们常说，理查率军杀入叛军领地，不断地占领并摧毁他们的要塞，但是我们仅仅有一个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它显示，杰弗里·德·朗孔所控制的坚城塔耶堡也继1179年后再次成为事件的中心，并再次被理查攻克。在理查的攻势面前，叛军也很快提出求和请求，在得到叛乱贵族们保证参加十字军的承诺后，理查便与他们达成了和议。⁴⁷随后，以吕西尼昂的杰弗里为首的贵族们也很快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因为杰弗里本人在1188年夏季就已经抵达了近东地区。⁴⁸

在平定1188年叛乱后不久，理查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之间又爆发了新的冲突。自1183年以来，双方已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令双方的敌意达到顶峰：此前有人向理查控告雷蒙德，称后者曾逮捕了一些在图卢兹境内通行的阿基坦商人，将他们囚禁，施以剜目或阉割之刑，或直接将其杀害。为了报复雷蒙德的暴行，理查也针锋相对地袭击了图卢兹，并逮捕了图卢兹宫廷的一位重要人物——彼得·塞扬（Peter Seillan），他是代表图卢兹伯爵管理图卢兹的家族的一名成员，是图卢兹伯爵最亲近的顾问之一。在逮捕彼得·塞扬后，理查认为塞扬应对这些混乱负责，不仅拒绝将其释放，还回绝了雷蒙德提出的缴纳赎金赎回或用他交换俘虏的要求，哪怕这些俘虏中有两位亨利二世麾下的骑士，他们是在从孔波斯特拉朝圣返回时行经图卢兹被扣押的。但当雷蒙德提出以这两位骑士作为交换的价码时，理查也毫不动心。而雷蒙德也强硬地表示：理查应释放彼得·塞扬，否则他绝不会释放此前扣押的朝圣者。法王腓力曾前往南方试图让他们和解，但双方却丝毫

没有妥协意愿，腓力最终也无功而返。腓力对未能解决两位敌对封臣之间的矛盾感到非常愤怒，而1188年春季发生的事件也使这种愤怒加剧了：理查在平定昂古莱姆叛乱后，他便率领自己的布拉班特佣兵大举进攻图卢兹。此次他的目标并非进行小规模边境骚扰，而是要进行收复1183年来丧失领土的大规模作战。很快，理查便已攻占了17座城堡，并在卡奥尔（Cahors）和穆瓦萨克（Moissac）派兵驻守，控制了凯尔西地区。⁴⁹当理查兵临图卢兹城下时，图卢兹民众也开始借机试图摆脱雷蒙德的统治。眼看自己在图卢兹西部的统治已摇摇欲坠，雷蒙德不得不再度向他的封君法王腓力求援。而腓力这次终于回应了雷蒙德的请求。根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向亨利二世抱怨理查行为不端，亨利二世则表示理查的行为没有得到他的建议与支持，他也不会为其辩护。⁵⁰若这就是亨利二世的公开立场，那么关于亨利二世此前曾为昂古莱姆叛军和图卢兹伯爵提供经济援助的谣言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迪切托的拉尔夫便认为，亨利二世暗中向理查敌对者提供支持是导致父子反目的原因。⁵¹

腓力认为，理查对图卢兹的进攻违背了1188年1月时达成的和约，但理查对此则矢口否认。⁵²腓力以此为依据，在12个月内第二次率军入侵贝里。考虑到此前亨利二世表示不为理查行动负责的立场，腓力断定理查将无法得到来自父亲的支持，因而他对此行动颇有信心。此外，腓力还调集了一支攻城部队随军行进，其中包括训练有素的工兵和攻城技师。6月16日，腓力顺利攻克沙托鲁城堡，这次攻城进行得太过容易，以至于人们都说城内有叛徒。在腓力的威胁下，尽管仍有许多听命于理查的城堡仍在坚守，但贝里地区的全体领主们已准备承认腓力对此地的统治权。而在更北部，早在去年6月时便受法王统治的弗雷特瓦勒以西的地区，旺多姆领主也向法王表示效忠。⁵³得知腓力进军的消息后，理查迅速返回阿基坦东北地区组织防御，他的父亲亨利二世则惊讶于贝里地区的迅速易帜，也由于担心洛什等安茹中心地带的其他重要城堡可能落入腓力之手，急忙在英格兰召集军队。⁵⁴值得一提的是，亨

利二世大军中的威尔士步兵将很快赢得令人胆寒之名。在风暴肆虐的英吉利海峡勉强躲过一场沉船事故后，7月11日时，亨利二世率军抵达诺曼底。⁵⁵ 得知亨利的动向后，腓力迅速从贝里撤回，以防御诺曼底边境的领土，他的后撤也给了理查收复失地的良机。然而，在准备重夺沙托鲁城堡时理查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沙托鲁城堡的守将威廉·德·巴雷斯（William des Barres）是腓力麾下最著名的骑士，腓力后撤时命他镇守此地。威廉·德·巴雷斯也不负腓力所望，成功抵挡了理查发起的攻势，还让理查身陷困境——在城门附近的一次混战中，理查一度坠马，有赖于一位强壮屠夫的搭救，他才得以化险为夷。⁵⁶ 然而，在诺曼底按兵不动的亨利二世并没有入侵法王领地的计划：为避免自己陷入1187年进攻沙托鲁时进退两难的境地，亨利选择在诺曼底驻扎以巩固防卫。而亨利采取守势的举动，也令腓力重夺先机。腓力将诺曼边界托付给自己的表兄、好战的博韦（Beauvais）主教腓力后，便率军从旺多姆出发，沿卢瓦尔河谷率军西进。虽然腓力在特鲁（Trou）遭遇了顽强抵抗而未能攻克这座城堡，但他还是俘虏了40名骑士，并将城堡周边的市镇付之一炬。理查得知此事后，也立刻率军攻入卢瓦尔河谷，并攻克了位于特鲁和旺多姆之间的勒罗什（Les Roches）要塞。⁵⁷ 腓力见状便率军撤回巴黎，理查则与他同时出发，继续向诺曼底进军。

向诺曼底进军的理查来到亨利二世的营地与父亲会合，他的到来也令此前无所作为的亨利二世结束了无为状态：此前他除了一直控诉腓力入侵自己领地的不义之举外，并无实际行动。法王腓力也自然对亨利的抱怨不屑一顾——在此前召开的一次和议上，腓力还将位于历代法王和诺曼底公爵会面之地、长期以来作为界标的一棵老榆树砍倒。腓力认为，这样的和议毫无意义，这棵榆树也早已失去价值。如果亨利希望腓力认真对待他的抱怨，他必须首先言行一致。1188年8月30日，安茹大军越过厄尔河畔帕西（Pacy-sur-Eure）附近的边界，向芒特（Mantes）进攻。亨利和理查相信，腓力此刻就在芒特。在进军途中，理查还与包括他的老对手威廉·德·巴雷斯在内的数位法兰西骑士进行了一场小规模

遭遇战。然而关于这次遭遇战的记载则令人疑惑且混乱不堪，但双方都指责对方欺诈。豪登的罗杰称，威廉·德·巴雷斯在这场遭遇战中被击败，并在就一系列条件宣誓后被释放，这是当时骑士比武和战争的惯例，然而他之后便违背誓约，骑着一匹骑士扈从的马逃跑了。然而几十年后，布列塔尼的威廉则留下了不同的记载，他用一大段拉丁文解释了威廉·德·巴雷斯——这位“法兰西骑士传奇”——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当理查发现自己无法用正当手段击败威廉时，他便使用诡计，用剑刺中了威廉的坐骑。⁵⁸ 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骑士战斗也是当时的编年史家们经常记录的中世纪战争形式。作者们对自己的贵族赞助者们英勇行为进行歌颂也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但无论这些英勇骑士间的战斗是否具有骑士精神，这样的战斗形式在中世纪战争里实际上并不多见。亨利二世的大军向芒特进军的情景才是中世纪战争更为典型的形式——所到之处，一切皆被劫掠或烧毁。在《洛林之歌》（*chanson des Lorrains*）中记载的这段情景便十分清楚地展现了中世纪战争的特点：

进军已经开始。位于队伍最前方的是侦察兵和纵火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粮秣征集队，他们的工作便是征集粮草，并将它们放在大车上运走。很快，一切都陷入混乱——正要下田的农民们放声大喊、四散奔逃，牧羊人们则将牲畜聚拢起来，赶入附近的林地中，试图保全他们最重要的财产。然而他们的努力终究徒劳无功。纵火部队焚烧了乡村后，征粮队便开始大肆掠夺。那些惊恐万分的民众们或遭火焚，或被捆上双手带入军中，成为索取赎金的人质。很快，尚未遭劫的其他地区也鸣响警钟，乡间弥漫着恐怖的氛围。无论何处，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战时景观——士兵的铁盔在阳光下熠熠闪耀，燕尾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浩大的骑兵队伍遍布旷野。军队所到每一处，便将乡野间的所有财富及牲畜掠夺一空，居于此地的农民和牧人们早已落荒而逃，遭受劫掠之地只剩下一片浓烟密布、余烬未散的废

《洛林之歌》中的这段内容便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战争的常见形式。1174年时的佛兰德斯伯爵腓力也说道：“在我看来，开始一场战争的方式应该是将某处夷为平地。”⁶⁰而亨利二世的大军也以一次劫掠拉开了又一次战争的序幕。1188年8月30日夜，已掠夺了大量物资的安茹军队返回伊夫里（Ivry）进行休整。理查得知父亲出兵的消息后，也于次日返回贝里，承诺将尽心尽力地为他效忠。⁶¹

到了1188年秋季时，战争虽然仍在继续，但交战双方逐渐开始不再愿意将其继续下去。由于担心战争继续下去将影响农业和酿酒业的收入，加之维持大量军队所需的经济压力已变得难以负担，一些法兰西的重要贵族们开始拒绝攻伐已经决定参加十字军的其他贵族，他们联合请求腓力停战议和。尽管腓力此前在吉索尔砍倒榆树的行为已表明自己不愿和谈的态度，但在压力之下他别无选择，只得应允贵族们的要求。10月7日，理查与父亲亨利二世来到位于图赖讷和贝里交界处的安德尔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Indre）与腓力进行和谈。不过，腓力在这次和谈中明显占据上风：这不仅由于他是法兰西贵族们的唯一代表，还由于他巧妙地利用了亨利和理查父子存在利益分歧的弱点。腓力在会谈时坚称：除非理查将此前占领的图卢兹领土归还给雷蒙德伯爵，否则他绝不会从攻占的贝里领土上撤军。然而，尽管理查和亨利二世都愿意将这两片土地占为己有，但理查显然比他的父亲更重视被攻占的凯尔西的价值。但在随后的谈判中，显得过于自信的腓力进而要求亨利交出厄尔河畔帕西，以作为领土交换期间的抵押，而正是这一提议使亨利二世极为不满并愤怒地中止了和谈。⁶²

在理查看来，若父亲亨利仍然坚持让自己放弃此前征服的领地，那么对他来说，直接与法王腓力对话或许能使他获得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若他亲临法王宫廷，接受腓力的条款，明确承认腓力作为图卢兹

和阿基坦最高领主的地位，对此感到满意的腓力应当会有所回报。无论如何，这是腓力在布尔日解散雇佣兵时理查提出的条件。尽管理查声称，自己的这一举动是为了争取实现和平的机会，以确保十字军能够如期启程，但亨利二世对他的这一说辞极为不满。亨利可能认为，若是他们承认名义上的封君可以解决两位安茹王室成员的争端，将削弱安茹家族的政治实力。⁶³ 双方的分歧也导致父子再次反目。当理查开始与腓力谈判时，腓力便已经开始利用理查的恐慌，尤其是谣言引发的理查的恐慌——谣言称，亨利二世将不再承认理查的继承人身份，欲将幼子约翰立为新的王储。⁶⁴ 而约翰并未参加十字军的事实也令理查深感担忧。于是，理查和腓力在重启和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在理查的倡议下，英法两王同意再開和议。⁶⁵ 为实现和平并获得腓力对其王位继承权的最终支持，理查一改昔日的冷淡，表示将尽快地与艾丽丝成婚——至少他口头上是这么说的。

11月18日，三人在邦斯穆兰（Bonsmoulins）会面，当亨利二世看到理查和腓力一同抵达会场时，他显得极为不安，会谈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尽管在会谈首日双方还能平静交谈，但从次日开始，形势便急转直下：双方开始争论不休，到第三天时双方更是吵得不可开交，在形势最为紧张时两位国王麾下的骑士们甚至都做出了拔剑相斗的姿态。腓力在会谈中再次提出了交换领土的要求，但理查表示拒绝，认为这一行动将使自己丧失包括凯尔西在内的大片领土，而这些领土能带来至少1000马克的年金；至于交换所得的贝里地区，尽管它们在名义上属于阿基坦，但它们的实际统治者均独立于阿基坦公爵，无法给自己带来多少直接经济利益。这些分歧可能是预先安排好的，为了减少腓力和理查之间的合作，于是，理查和腓力再度修改了这些条款，经过商议后，他们的方案如下：腓力同意将去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理查，但亨利二世应当让理查与艾丽丝结婚，并命令他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所有附庸向王位继承人理查宣誓效忠。至于亨利二世的反应，则有不同的记载。迪切托的拉尔夫称，亨利拒绝了这一提案，并表示自己绝不让步；坎特伯雷的杰维

斯则称，亨利当时并未表明态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果然是他的一贯做派”。理查得知此事后则表示：“我现在终于明白，自己此前对父亲的期望确实无法实现啊。”随后，他向腓力下跪，为诺曼底、阿基坦、安茹、曼恩、贝里以及他所征服的图卢兹地区行臣服礼。理查还表示愿与腓力一同对抗后者的敌人，只保留自己对父亲亨利二世的忠诚。也就是说，在理查行臣服礼后，腓力也归还了自己此前占领的所有土地，使理查保住了对图卢兹的征服成果。邦斯穆兰会议便以这样令人惊讶的局面而告终。随后，英法两王也同意在1189年1月中旬之前进行休战，并在那时再次召开会议。⁶⁶在此期间，威廉·马歇尔曾建议亨利二世派人找到理查并劝说他回到父亲身边，于是亨利便委派威廉·马歇尔和贝尔特兰·德·韦尔东（Bertran de Verdon）前去寻找理查。他们赶往理查正在过夜的昂布瓦斯，但当他们赶到时，理查已经匆忙离开。两位使臣还得知，理查极为匆忙地召集了他的部下，并在一夜之间写了至少200封信，将它们悉数寄出。理查的行动表示，他不会跟着使臣返回父亲身边，两人不必浪费时间前来追赶。⁶⁷尽管理查已经表明立场，但亨利二世仍然不愿罢休。据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当亨利二世命令他的私生子、御前大臣杰弗里视察安茹地区城堡并确认它们平安无虞后，便亲自赶往阿基坦地区，他可能认为自己仍能获得大多数阿基坦民众的效忠，尤其是那些亨利在不久前就曾策动反叛理查的阿基坦人。但根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的记载，尽管亨利二世深入勒多拉（Le Dorat）地区，但仍然一无所获。⁶⁸

尽管有谣言称亨利二世要废黜理查的继承人地位，但实际上亨利可能并没有改立约翰为王储的计划。⁶⁹正如我们所知，除了不坚持让约翰参加十字军外，亨利二世并没有采取什么使约翰实力增强的举措。或许是由于意识到自己曾在确立小亨利为继承人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亨利二世打算总结经验，以免重蹈覆辙。⁷⁰然而，亨利二世这回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错误地将理查与小亨利视为同一类人，但理查与他的哥哥完全不同。31岁的理查已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和军事领袖，⁷¹

且能妥善地处理各类政务。⁷² 若贸然将理查现有的权力剥夺，亨利二世无疑将为自己制造一个比小亨利更为难缠的对手。而与理查结盟的法王腓力比起12世纪70年代的路易七世也更难对付。总之，亨利二世没能及时认识到理查的真实能力是一个重大失误，这也使他一直在用错误的策略对待后者：在事关理查未来的问题上，亨利二世始终模糊处理，从未给出明确答复，试图以此制约他桀骜不驯的次子。但这么做无疑是得不偿失的，正如W. L. 沃伦（W. L. Warren）教授所说：“亨利二世已习惯于迫使理查保持一切悬而未决的状态以制约后者，但他却弄巧成拙，并最终为这一策略所害。”⁷³ 这一策略或许能在初期见效，但若想依靠它一劳永逸地约束理查则并不现实：当理查的挫败感由于诸事未定而不断增强，且人们所期待的十字军东征又迫在眉睫而未能成行时，这种挫败感必然会转为对父亲有意控制的怨恨，加之亨利二世在此问题上的固执态度，于是父子之间的决裂在所难免。若我们从1214年的布汶战役开始回溯这段历史，便可以将1188年视为双方大规模灾难性战争的开始之年。⁷⁴

最终，年迈的亨利二世落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当亨利在索米尔（Saumur）度过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时，他意识到部下许多贵族已开始远离自己——这明确显示着这些男爵已准备改向理查和腓力效忠了。在这令人沮丧的情况下，亨利二世一度卧病不起，甚至无法参加1189年1月时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亨利的对手们却认为这不过又是他惯用的缓兵之计，于是他们在停战期限结束后迅速重启战端。雪上加霜的是，布列塔尼人这时也趁机作乱，再次试图趁亨利无暇顾及之际赢得独立地位。⁷⁵ 因病行动不便的亨利二世别无他法，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派出使臣请求理查返回自己身边，但即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这般显赫的人物亲自出马，也未能使理查回心转意。对此，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称，虽然亨利对激怒理查的行为感到十分悔恨，但理查已不再相信父亲说的任何言语了。⁷⁶ 眼见无法使理查回到自己身边，亨利转而试图离间理查和腓力的关系。威廉·马歇尔受命前往巴黎完成这一任务，但当他

抵达时发现自己已错失先机。包括理查最信任的顾问、他的御前大臣威廉·隆尚（William Longchamp）在内的一众辅臣们早已抵达宫廷，使亨利的计划再度破灭。⁷⁷直到复活节后，亨利才稍稍恢复，得以参加另一次英法之间的会谈，但仍然一无所得。最终，教廷特使阿纳尼的约翰（John of Anagni）受教宗之托来到法兰西北部，力促两位国王达成最终的停战协定。他从两位国王那里得到许诺，他们将接受仲裁会议的仲裁，这个会议除阿纳尼的约翰外，还有兰斯、布尔日、鲁昂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参与。1189年圣灵降临节时，英法双方代表与教廷代表在勒芒东北部25英里的曼恩地区贝尔纳堡（La Ferté-Bernard）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两位国王都带着武装侍卫随行以防不测。在会议上，腓力和理查正式提出了三项议和条件：亨利将艾丽丝嫁给理查，亨利应正式确认理查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约翰应参加十字军东征。此外，理查还补充称，除非约翰同意与他一同东征，否则他将不会前往耶路撒冷。但上述条件均被亨利否决。阿纳尼的约翰见状，便向腓力发出威胁：若后者不与英王和解，他将代表教宗颁布教廷禁令，禁止法兰西境内的一切宗教活动。但腓力不为所动，反唇相讥称特使收了英王的贿赂，约翰的钱包里“装满了英格兰的白银”。⁷⁸最终双方不欢而散，亨利则返回勒芒。

但理查和腓力并未撤回巴黎，他们发起了新的军事行动，成功突袭了贝尔纳堡。随后，勒芒东北部的其余城堡——孟福尔（Montfort）、马莱塔布尔（Maletable）、博蒙（Beaumont）与巴隆（Ballon）也纷纷被理查接管。6月12日，两人再次进军：他们做出攻击图尔的姿态，真正的兵锋却直指勒芒。猝不及防的亨利二世只得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急忙向北逃往诺曼底避难。⁷⁹但身后的追兵仍对他紧追不舍，理查本人更是一马当先，并在追击途中与威廉·马歇尔率领的殿后部队进行交战。在威廉·马歇尔看来，若不是他指挥有方，他们很可能就被理查击溃了。他调转马头，殊死一搏，单枪匹马直取理查，由于他们之前认为自己要面对的是漫长的骑行追逐战，当时双方都未穿甲。正当马歇尔平放骑枪，准备刺向理查时，理查眼见性命难保，便放声喊道：“以天主之

腿起誓（这是理查最喜欢的誓言之一），马歇尔，看在我手无寸铁的份上，请别杀我！否则你将犯下罪孽！”“还是让魔鬼来处决你吧，”威廉·马歇尔答道，“我当然不会做此恶行。”随后他调整了骑枪的目标，让骑枪从理查的战马旁划过。这个令狮心王免于死的故事正是由马歇尔本人亲自讲述的，由于马歇尔从来不是个谦逊的人，所以他可能对故事进行了美化。⁸⁰正是这次事件中马歇尔所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和政治素养深深震撼了理查，于是在数周后，理查便扩大了马歇尔的领地和权力，对他极尽恩赏。最终，由于马歇尔的奋战，亨利才得以摆脱追兵的威胁，暂时脱险。

即使如此，亨利二世所期待的和平仍然未能实现，他放弃了继续前往诺曼底召集军队反攻曼恩的计划，而是调转马头返回自己的城堡，静待临终时刻的到来。就这样，饱受病痛折磨且疲惫不堪的亨利带着少数随从来到安茹家族的世袭领地希农城堡，在此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与此同时，理查和腓力还率军在曼恩和图赖讷地区四处征伐，并于7月3日攻克了安茹帝国的战略要地图尔。尽管此时重病的亨利已几乎无法骑马，但在得知图尔失守的消息后，他还是在次日强撑病体在巴隆与理查和腓力会面，宣布同意他们此前的要求：亨利向腓力支付2万马克并臣服于后者；艾丽丝将被转交给一位理查指定的卫士看管，待理查结束十字军东征后，再将她交给理查；亨利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所有封臣都应向理查宣誓效忠；此外，英法十字军的出发时间也最终确定为1190年的大斋期（Lent），两位国王与理查都应在规定时间内来到韦兹莱（Vézelay）集结。若亨利无法履行上述条款，那么他的封臣将转而效忠于理查和腓力。⁸¹关于这一事件的始末，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留下了最为详尽（尽管可能不是最可信）的记录，他记载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当双方确认同意条款后，亨利被要求给予理查和平之吻。亨利故作亲吻姿态，却暗中凑近理查耳边低声说道：“天主保佑，愿我在有生之年能完成对你的复仇。”⁸²

结束了在巴隆的会面后，亨利二世乘着肩舆返回希农城堡。但他未

能实现自己复仇的誓言，于1189年7月6日逝世。逝世前的亨利还得知了一个更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幼子约翰也已弃他而去。⁸³ 勒芒陷落的消息使约翰确认，他的父亲已经靠不住了。亨利的遗体被从希农城堡运往丰特夫罗（Fontevraud），并安葬在丰特夫罗修道院中。⁸⁴ 理查则在父亲安葬后来到丰特夫罗，径直骑马进入修道院，但他在父亲的灵柩前面无表情，一言未发⁸⁵，不一会儿便离开了。对已成为英格兰新王的理查来说，还有许多亟待完成的重要工作在等待着他。

注释

1 Vigeois, Bk 2, ch. 19.

2 Ibid., ch. 18. 根据维茹瓦的杰弗里记载，贝尔特兰此前“背信弃义地”驱逐了自己的弟弟，失去奥特福城堡后，他转而对阿方索二世怀恨在心。然而，贝尔特兰在一首名为《穿行花园间，得见百花开》（*Qan vei pels vergiers despleiar*）的诗中略带讽刺地原谅了阿方索二世，因为阿方索二世是“受普瓦图领主之托前来此地作战的，而一位国王若想得到一位领主的回报，恐怕也只能通过强制手段才行”，Born, 280–1。

3 根据豪登的罗杰记载，亨利二世还重赏了阿方索二世。*Gesta*, i, 303. 根据贝尔特兰的记载，阿方索二世带着国王的赏金回国，并没有用这笔钱赎回他被俘的部下。Born, 278–9. 综合其他记载来看，在平定1183年叛乱的过程中，阿方索二世的战功显然不止攻占奥特福城堡一件。参见Benjamin, ‘A Forty Years War’, 277–8。

4 *Gesta*, i, 302–4.

5 参见‘Qan la novella flors’, Born, 286–7。

6 在一首大约创作于1183年的讽刺诗中，贝尔特兰称一个依靠少量年金生活的国王为“愚人之王”。Ibid., 186–7.

7 *Gesta*, i, 304–6, 308. 另见Rigord, 27f. 关于亨利二世对阿基坦民众缺少关注的重要研究，可参见N. Vincent, ‘King Henry II and the Poitevins’, *CCM* (forthcoming)。

8 *Gesta*, i, 311; Vigeois, Bk 2, ch. 28.

9 Vigeois, Bk. 2, chs 25, 28. 梅卡迪耶的话引自Powicke, 232。

10 Diceto, ii, 28–9; *Gesta*, i, 311, 319–20.

11 *Gesta*, i, 313, 319–21. 若想了解究竟是腓特烈的哪位女儿参与此事，以及亨利二世确定这一计划的用意，可参见Kessler, 34–5。

12 *Gesta*, i, 334, 337.

13 *Ibid.*, 337–8.

14 迪切托的拉尔夫笔下的“撕毁契约之鹰”（the eagle of the broken covenant）即埃莉诺，“将因她的第三个儿子而重获欢乐”（shall rejoice in her third nesting，按出生顺序，理查是亨利二世与埃莉诺的第三个儿子），“因他的作为令母亲之名荣耀倍增”。*Diceto*, ii, 67–8.

15 J. C. Holt, ‘Aliénor d’Aquitaine, Jean sans Terre et la succession de 1199’, *CCM*, xxix (1986), 95–100.

16 *Gesta*, i, 343–4.

17 *Ibid.*, 350; Newburgh, Bk 3, ch. 7; Gerald, *Princ.*, 175–6 (Bk 2, ch. 10).

18 *Vigeois*, Bk 2, ch. 28. 关于将原始文献中的“派拉科”（Pairaco）认定为卡奥尔以北50千米处的“佩拉克”（Payrac），以及图卢兹伯爵收复1159年时失去的领地的相关问题，可参见Benjamin, ‘A Forty Years War’, 276–7。

19 杰弗里记录了自己遭遇的这次不测，见*Vigeois*, Bk 2, ch. 25。

20 在这份盟约中，两人同意一同对雷蒙德伯爵发起进攻，若其中一人无法参战的话，他可派出200名骑士帮助另一人作战。关于盟约的具体内容和缔约时间（根据手稿显示，它签订于1185年4月）以及其中相关条款的研究，可参见Benjamin, ‘A Forty Years War’, 277–84。

21 *Gesta*, i, 345, 347. 这部分记录很可能是根据理查提交给父亲的报告写成的，其中并未提及阿方索二世国王的贡献。

22 *Ibid.*, 350, 353–5, ii, 5. *Diceto*, ii, 43–4.

23 *Gervase*, i, 346; *Rigord*, 77–8.

24 除了豪登的罗杰在1191年的记录（见下文200页），亨利二世诱奸艾丽丝的故事也来自Gerald, *Princ.*, 232 (Dist. III, c. 2)，布列塔尼的威廉也提及了这一故事，见*Philippidos*, iii, 631–7, iv, 126–9。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Andreas of Marchiennes）在12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记载中称“亨利始终将艾丽丝带在身旁，从未将她交给儿子理查。尽管因此事产生了颇多流言，但我认为将虚妄的流言与真实的历史混淆是不恰当的（verba ventosa et dubia in veraci historia）”，*Historia regum Francorum*, MGH, SS, xxvi, 211。迪韦齐斯的理查则记载理查“对与艾丽丝的婚约持怀疑态度”，*Devizes*, 26。也有记载表明，艾丽丝与亨利二世生有一子（死于1190年），参见*Chronica monaste*

rii de Melsa, ed. E. A. Bond (3 vols, RS, 1866–8), i, 256。尽管这部编年史成书于14世纪晚期，但它却详细记载了200年前的安茹王朝历史，这可能引用了桑海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Thornham）的记载。关于编年史来源的考证可参见C.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095–1588* (Chicago, 1988), 65。

25 对此问题的分析宜参考Kessler, 38–44。她在书中指出：当幼王亨利仍然在世时，亨利二世之所以迟迟未将艾丽丝嫁给他人，并非受到维克桑问题的影响。至于亨利二世诱奸艾丽丝的流言，其出现时间应不早于1189年。而1180至1183年间亨利二世与艾丽丝的联系，似乎可以解释亨利二世在这期间对法政策含混不清的原因，尤其是亨利二世在艾丽丝的弟弟、法王腓力统治的初期对后者采取宽容态度的原因。

26 Rigord, 78–9; *Gesta*, ii, 6–7.

27 J. Gillingham, ‘Richard I and the Scienc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in *Coeur de Lion*, 211–26.

28 *Gesta*, ii, 7.

29 Diceto, i, 399.

30 Gerald, *Princ.*, 176 (Bk 2, ch. 10).

31 *Gesta*, ii, 9.

32 关于沙托鲁城堡谈判始末的最详尽记载，来自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和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两人，但他们的记载中都对亨利二世充满敌意，对理查则是一片赞美之词。根据杰维斯的记载，理查为确保停战达成，并努力将父亲从自掘坟墓的境地挽救出来，愿意在腓力面前自降身份。杰维斯坚信理查确实为了父亲如此行事，并对此记忆深刻。Gervase, i, 370–3, 377–82, 432. 由于1187年夏秋季节时，坎特伯雷的教士们在英王在法国的宫廷处理事务，因而杰拉尔德的记载很可能是基于这些教士提供的材料完成的。杰拉尔德则称，亨利二世曾致信腓力，提出将艾丽丝嫁给约翰，并由约翰继承除诺曼底之外的所有大陆领地的方案。他也将促成停战的功劳归于理查。Gerald, *Princ.*, 232–3 (Bk 3, ch. 2).

33 R. C. Smail, ‘The Predicaments of Guy of Lusignan, 1183–87’ in *Outremer*, ed. B. Z. Kedar, H. E. Mayer and R. C. Smail (Jerusalem, 1982).

34 B. Z. Kedar, ‘The Battle of Hattin Revisited’ and C. P. Melville and M. C. Lyons, ‘Saladin’s Hattin Letter’, both in *The Horns of Hattin*, ed. B. Z. Kedar (London, 1992), 190–212.

35 Lyons and Jackson, 255–66.

36 与理查同时代的英格兰编年史家们在记载此事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理查首

先宣布参加十字军”这一事实，并将理查视为高尚的典范。Diceto, ii, 50; Devizes, 5; Newburgh, Bk 3, chs 23, 25; *Radulfi Nigri Chronica*, ed. R. Anstruther (London, 1851), 95; Ambroise, 60–5, 185. 当时杰拉尔德还希望由亨利二世来领导一场成功的十字军，Gerald, *Expug. Hib.*, 206–9，他在另一著作中也有类似记载，见 *Princ.*, 239–40 (Bk 3, ch. 5)。此事也令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印象深刻，参见 *Sig. Cont.*, 425; *Historia regum Francorum*, MGH SS xxvi, 211。然而豪登的罗杰仅仅提及了理查参加十字军一事，并未对他有过多赞誉，见 *Gesta*, ii, 29，这似乎表明这时他对理查的做法并不赞同。

37 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称，理查“并没有征求（他的）父亲的建议或意愿”，见 Diceto, ii, 50。纽堡的威廉则记载理查“并未与（他的）父亲商议此事”，见 Newburgh, Bk 3 ch. 23。对理查是否曾就此事征求父亲亨利二世的意见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论，若理查确实询问了并遭到拒绝，那么理查当时将无疑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Kessler, 48。

38 Born, no. 36, ‘Nostre seingner somonis el mezeis’, 386–7; Gervase, i, 389.

39 *Gesta*, ii, 29–30; Gervase, i, 406.

40 H. E. Mayer, ‘Henry II of England and the Holy Land’, *EHR*, xcvi (1982). 关于亨利二世对参加十字军的抵触态度，可参见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40–56；对亨利参加十字军的意图的较为温和的评论来自 Jonathan Philips, *Defenders of the Holy Land* (Oxford, 1996)。

41 Gabrieli, 182–3, 208–9.

42 引自 H. E. Mayer, *The Crusades* (2nd edn, Oxford, 1988), 34.

43 *Gesta*, ii, 146–7. 另见下文 366 页。

44 *Chroniques des comtes d’Anjou*, 50–1.

45 C. A. F. Mahn, *Die Werke der Troubadours*, i (Berlin, 1846), 355.

46 *Gesta*, ii, 30–2; Newburgh, Bk 3, ch. 23.

47 *Gesta*, ii, 34; Diceto, ii, 54. 只有杰拉尔德提及了理查攻克塔耶堡一事，*Princ.*, 245 (Bk 3, ch. 7)。

48 *Itin.*, Bk 1, ch. 17.

49 豪登的罗杰记载了理查对图卢兹宣战的原因（*casus belli*），*Gesta*, ii, 34–6.

50 *Gesta*, ii, 36.

51 迪切托的拉尔夫认为，亨利二世暗中向理查的敌人们提供支持这一说法不过是谣言，见 Diceto, ii, 55；然而杰拉尔德认为这一说法符合事实，见 Gerald, *Princ.*, 244–

5 (Bk 3, ch. 7)。杰拉尔德认为，亨利这么做是为了阻止理查参加十字军。我们如今在杰拉尔德的大作《论君王的教育》（*De Principis Instructione*）中读到的这部分内容在当时还未完成，但在随后写作的该书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杰拉尔德试图将亨利对待十字军的态度当作这位伟大君王最终陨落的原因。相关内容参见K. Schnith, ‘Betrachtungen zum Spätwerk des Giraldus Cambrensis: *De Principis Instructione*’ in *Festiva Lanx* (Munich, 1966)。这篇文章认为，《论君王的教育》一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实际上成书于理查统治初年。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与时间以及杰拉尔德对十字军的热情，可参见R. Bartlett, *Gerald of Wales 1146–1223* (Oxford, 1982), 69–70, 77–86。沃伦教授则认为，尽管杰拉尔德“观念狭隘且倾向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中“对相关事件的理解毫无价值”。Warren, 618。

52 豪登的罗杰称，理查曾告诉他的父亲，图卢兹伯爵拒绝承认他与法王腓力达成的停战协定。随后罗杰还记载了都柏林大主教约翰·库明（John Cumin）将理查的信息转达给亨利二世一事。这位大主教与罗杰是旧相识，罗杰关于此事的记载很可能参考了前者的叙述，见*Gesta*, ii, 40。但可以确定的是，图卢兹伯爵雷蒙德未同意参加十字军，因此他确实不受1188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议约束。而腓力也将图卢兹视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因而迪切托的拉尔夫才会有如下记载：腓力对理查“无视法王权威，向他的王国发起进攻的行为极为反感”。见Diceto, ii, 55。杰维斯也对腓力持同情态度，见Gervase, i, 432。

53 Rigord, 90–2.

54 新近的研究发现了一份传讯令，亨利二世曾向威廉·马歇尔许诺：如果他能够召集数量尽可能多的骑士为他尽忠效力，加入远征的话，他将得到沙托鲁城堡作为奖赏。参见N. Vincent, ‘William Marshal’。

55 *Gesta*, ii, 39–40; Gervase, i, 433.

56 仅有杰维斯提及了这一事件，见Gervase, i, 434。

57 *Gesta*, ii, 45. Rigord, 92.

58 *Gesta*, ii, 46. *Philippidos*, iii, 431–565，其中记载了威廉·德·巴雷斯是通过理查盾牌上的狮子纹章将他辨认出来的，见445——446页。关于12世纪90年代纹章学的讨论，可参考Ailes, *Origins of the Royal Arms of England*, 67–71。

59 转引自A. Luchaire, *Social France at the Times of Philip Augustus*, trans. E. H. Krehbiel (London, 1912), 261。

60 *Jordan Fantosme’s Chronicle*, l. 450.

61 *Gesta*, ii, 46. 这次大规模的劫掠给英法双方边境上的居民留下了极为长久的记忆。正如威廉·马歇尔事后回忆的那样，这就是骑士战争的典型代表，而这次劫掠也正

是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发起的。*HGM*, 7782–852. 另见‘War and Chivalry in the *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 in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231–2。

62 *Gesta*, ii, 48–9.

63 *Ibid.*, 49. 只有豪登的罗杰记载了理查的上述解释。

64 杰维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查转而向腓力求援并不意外。Gervase, i, 435.

65 威廉·马歇尔认为，在邦斯穆兰会议召开之前，理查和腓力就已经达成了共识，而这也是亨利二世臣属们的普遍看法。参见*HGM*, 8065–175；迪切托的拉尔夫则认为，这次会议是“在理查倡议下”召开的。参见Diceto, ii, 57。

66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我的主要参考文献是Gervase, i, 435及Diceto, ii, 58。此外，里戈的记载也完善了一些细节，见Rigord, 92–3。另外，豪登的罗杰的简略记载还强调了腓力为回报理查的效忠准备做出多少牺牲，见*Gesta*, ii, 50。

67 *HGM*, 8217–54. 马歇尔事后也告诉亨利，理查实际上已经背叛了他。见*HGM*, 8258。

68 Gervase, i, 436. *HGM*, 8285–9. 纽堡的威廉认为，在1189年战争中，整个阿基坦都站在理查一方，见Newburgh, Bk 3, ch. 25。其中一些最著名的骑士，比如安德鲁·德·绍维尼（Andrew de Chauvigny）、菲利普·德·科隆比耶斯（Philippe de Colombiers）和艾默里·奥达特（Aimeri Odart）等人都加入理查一方，见*HGM*, 8632–4, 8705–10, 8811–14。

69 不过，仍有许多当时的材料表明亨利曾有废黜理查、改立约翰的计划：*Radulfi Nigri Chronica*, ed. Anstruther, 95; Gerald, *Princ.*, 232; Ambroise, 102; Newburgh, Bk 3, ch. 25。也有许多现代史学家认同这一看法，凯特·诺尔盖特认为，正是由于亨利对约翰的偏爱，才使他“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Norgate, 70。另一种解释称，亨利只是想利用约翰，作为他对抗理查的王牌而已，Kessler, 22。

70 Gervase, i, 436; Howden, *Chron*, ii, 355. 在继承权问题上，亨利二世始终掌握主动权，试图不断扰乱和削弱他的合法继承人，Kessler, 45 (e.g. Rigord, 93)。

71 亨利二世逝世前不久（见下文），杰拉尔德完成了《爱尔兰风土记》（*Topographia Hibernica*）一书的第二版，他在书中对理查和小亨利两兄弟进行了比较，对理查深表赞许，在文末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古至今，我还从未见过生于同一位国王而秉性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位兄弟。”Gerald, *Top.*, 198.

72 尽管杰拉尔德对理查治理阿基坦期间的功绩有颇多溢美之词，但理查确实在此期间有所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截至1189年时，理查已在普瓦图增设了5个公爵直属的司法区，从而使司法区数量从1174年时的10个增加至15个。R. Hajdu, ‘Castles, Castel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Poitou, 1152–1271’, *JMH*, iv (1978), and Gilling

ham, 'The Angevin Empire', *Coeur de Lion*, 42, 78.

73 Warren, 622–3.

74 *HGM*, 8079–81, 8185–8.

75 *Gesta*, ii, 61.

76 Gervase, i, 438–9; cf. Newburgh, Bk 1, ch. 25. 尽管亨利二世确实在3月患病，但杰维斯很怀疑亨利此时是否还在病中。另见*HGM*, 8292–6; Gerald, *Princ.*, 259。

77 *HGM*, 8313–34. 威廉·马歇尔声称，此时亨利二世答应将斯特里吉尔（Striguil）的女继承人许配给他。另见*HGM*, 8303–6。

78 Gervase, i, 446–7; *Gesta*, ii, 66–7; 在豪登的罗杰稍晚时的记载中，亨利二世提出应让艾丽丝嫁给约翰，*Chron.*, ii, 363。若亨利确实有此提议，这实际上表明他已无计可施：腓力冷淡的反应显然已经告诉他，此时腓力显然不会接受这一提议，而这一提议也无形中证实了此前关于亨利打算废除理查、改立约翰的传言。参见Norgate, 86。

79 *Gesta*, ii, 67; Diceto, ii, 63; Gerald, *Princ.*, 283 (Bk 2, ch. 24).

80 *HGM*, 8831–50; Gerald, *Princ.*, 286 (Bk 3, ch. 25).

81 *Gesta*, ii, 68–70. 尽管如此，但条约中仍然没有写明“理查应与艾丽丝成婚”一事；与此相对，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法王腓力的建议则是，当理查“结束东征，返回欧洲”后，便与艾丽丝结婚，Diceto, 63, n. 1。关于这一措辞含义的分析参见Kessler, 61–2。

82 Gerald, *Princ.*, 296 (Bk 3, ch. 26). 根据杰拉尔德记载，当理查回到腓力身边时，他便在法王宫廷中讲述了自己与父亲议和的方式并以此取乐。

83 Gerald, *Princ.*, 295 (Bk 3, ch. 24); *Radulfi Nigri Chronica*, 95; *HGM*, 9068–98. 在豪登的罗杰修订后的编年史中，他详细叙述了约翰的背叛是如何加剧亨利二世的悲伤，并令后者悲愤而亡的，*Chron.*, ii, 366。但相较而言，*Gesta*, ii, 72中的记载已含蓄地表明上述内容，它所成文的时代更近且表达更简洁。

84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当理查来到希农城堡时，发现已死去的亨利二世竟然鼻孔出血，“仿佛他的灵魂因为看到理查到来而震怒不已一样”。理查当场痛哭流涕并护送尸体来到丰特夫罗下葬。*Gesta*, ii, 71; *Chron.*, ii, 367. 罗杰关于理查护送父亲安葬的记载很可能并不准确，但他的记载表明，他认为是理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可对比Gerald, *Princ.*, 305 (Bk 3, ch. 28)。在克雷蒂安的诗歌《骑士伊万》（*Yvain*）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主角伊万杀死了一位骑士后发现，自己与这位骑士的尸体被困在一间屋子里，尸体上的伤痕便开始出血，这使得所有人都知道了真正的凶手、已

故骑士遗孀口中的“杀人犯和叛徒”就在附近。幸运的是，伊万因为有一枚隐身戒指而并未被人发现。Chrétien de Troyes, *Arthurian Romances*, 307–9.

85 这一记录的出处来自HGM, 9292–303。在克雷蒂安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当圆桌骑士埃雷克（Erec）得知自己的父亲、前任国王逝世后，“尽管他十分悲伤，但他在民众面前却并无悲伤之态，因为对一位国王而言，在公众面前流露悲伤是不合适的”，*Arthurian Romances*, 117。纽堡的威廉则认为，理查在葬礼上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父亲在世时犯的过错，Newburgh, Bk 3, ch. 25。威廉·马歇尔则称，理查下令“厚葬我的父王”，HGM, 9358–60。关于理查这一指令的潜在意义，见下文。

。

第七章

诺曼底公爵，英格兰之王，1189

当理查处理完父亲的葬礼后，他便下令让先王部下两位最忠实的大臣——威廉·马歇尔与克隆的莫里斯（Maurice of Craon）前来觐见。“马歇尔，还记得你几乎就要取朕性命之日么？朕若不格开你的长矛，此时君臣便无法相见了吧。”理查首先对威廉·马歇尔说道。这句话无疑令马歇尔感到十分难堪，他辩解称，若自己当时真想杀死理查，那么谁也无法阻止他将长枪刺向理查。然而理查的下一句话便使马歇尔顾虑顿消：“马歇尔，朕不计前嫌，在此宽恕你并赦你无罪。”理查并未对父亲亨利二世时代的老臣们反攻倒算，恰恰相反，他对威廉·马歇尔及那些在先王弥留之际仍陪侍在侧，并惶恐地在丰特夫罗修道院等待理查前来参加葬礼的前朝大臣们均大加赏赐，同时赞扬了他们的忠诚。当时，理查的御前大臣告诉他，亨利二世在世时，曾答应将威尔士边区的斯特里吉尔（Striguil）家族的女继承人伊莎贝尔·德·克莱尔（Isabel de Clare）许配给马歇尔，马歇尔还将从女继承人那里获得彭布罗克（Pembroke）郡及爱尔兰伦斯特（Leinster）的广大领地。这时理查突然说道：“以天主之腿起誓！可这些承诺都还没有兑现啊，既如此，朕现在便准许你娶她为妻。”威廉·马歇尔得知此事后，便立刻赶往迪耶普（Dieppe），匆忙乘船渡海来到英格兰，并在抵达伦敦后迅速与伊莎贝尔完婚。¹ 理查这一

系列精心策划的慷慨举动使马歇尔一夜暴富。这种规模的恩赏常常需要国王权势的支撑，对这种恩赏的微妙把握也是国王日常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理查还派出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以“维护当地和平”的名义出使威尔士。作为当时威尔士最强大的统治者德赫巴斯之王里斯（Rhys of Deheubarth）的表兄，杰拉尔德此行的使命便是安抚他的表弟，制止他发起对英格兰收复失地的战争。²而理查此前任命威廉·马歇尔为镇守南威尔士的地方领主也可谓一举两得：既解决了威尔士的防务问题，又以自己的慷慨赢得了臣下的拥戴。

随后理查开始继续处理亨利二世尚未履行的其他诺言，其中的一件重要承诺则是将代奥勒的丹尼丝许配给贝蒂讷的鲍德温（Baldwin of Béthune），并将沙托鲁城堡赐给鲍德温。³然而，对阿基坦防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沙托鲁城堡自1188年6月起便处于亨利二世敌人们的控制下，因此，理查此前则将这位女继承人许配给了安德鲁·德·绍维尼（Andrew de Chauvigny），他是理查麾下最忠诚可信的骑士之一。不过鲍德温同样也以英勇善战和珍视荣誉著称，能体现他才干的一个典型事例是：15年后（1204年），约翰王在与法王腓力的战争中失去了诺曼底，当时许多在诺曼底有地产的英格兰领主们见状，便打算改向腓力效忠，以换取后者承认自己在诺曼底的土地所有权。这些请愿的领主们还声称，尽管自己的躯体向法王效忠，但自己的内心仍然忠于英王。约翰得知此事后便向鲍德温寻求建议，鲍德温则留下了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论：“若这样的情形在我身上发生，那么我将会从这些自称内心仍然忠诚的人们身上取出忠诚之心随侍在旁，而将他们背叛我的躯体弃于茅厕之中。”而在1189年，理查无法承担失去鲍德温这样人才的风险，于是他向鲍德温许诺：将使后者得到价值等同于沙托鲁城堡的适当补偿。理查也确实言出必行——后来，鲍德温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成了欧马勒（Aumâle）伯爵。安德鲁和鲍德温两人也成为理查在十字军东征中最亲密的战友，当理查在德意志身陷囹圄时，随侍在旁的正是鲍德温。1194年理查返回英格兰后也表示，自己亏欠鲍德温的恩情比亏欠其他任何人的

都要多。⁴ 诸如威廉·马歇尔、贝蒂讷的鲍德温以及克朗的莫里斯这样的骑士们被当时的文人们视为骑士精神的典范，并在游吟诗人的诗文中被广为传颂。⁵ 理查也成功地使这些模范骑士们尽皆效忠于他。

在稳定了与前朝旧臣的关系后，理查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对外战略问题上。不久前的7月3日，他与腓力联手攻克图尔，而此事也成为导致亨利二世最终心灰意冷的最后一击。图尔的地缘政治比较复杂：尽管它位于安茹帝国的疆域内，但它的两座主要教堂——图尔大教堂及圣马丁修道院周边都有独立的城镇聚落，且与法王关系密切，享有特权。历代法王也都非常珍惜这种关系，并妥善地利用了图尔的特殊战略价值，早在1167年路易七世与亨利二世作战时，他便向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及司库写信求助：

朕希望得知关于英格兰国王动向的情报：他究竟要向普瓦图进军，还是返回诺曼底沿海？若你们对此有确切消息，就以信件形式交给我方军士；若尚无确切消息，可将已知情报告知一位我方军士，让他先行回来复命，其他人等继续留在此地，待得知新消息后再向朕回报。⁶

类似的信件也令理查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图尔地区的问题。很快，理查便与腓力在圣马丁修道院的牧师会礼堂会面，两人达成协议，同意消除一切可能导致圣马丁修道院与安茹伯爵之间爆发冲突的隐患。⁷ 这一协议对双方也各有好处：对腓力而言，它可以防止修道院以其人力物力进行反对法王的战争；对理查而言，保持与图尔教会的和谐关系可以使它与法王疏离，防止它成为法王的间谍。

与腓力会面后，理查便沿卢瓦尔河谷前往诺曼底。7月20日，理查在鲁昂被授予了诺曼底公爵之剑，并接受了公国教俗两界代表的效忠。正式就任诺曼底公爵后，理查开始料理自己的家事。他首先将自己的侄

女玛蒂尔达许配给佩尔什（Perche）伯爵继承人杰弗里，这无疑是一桩有利于巩固安茹帝国在曼恩东北边境防务的婚事，毕竟理查曾在数周前与腓力一同率兵攻入此地，深知加强防御的重要性。理查对他的兄弟们也都各有安排，对于弟弟约翰，理查将父亲亨利二世曾经许诺给他的领土纷纷兑现：约翰得到了位于诺曼底的莫尔坦（Mortain）伯国，以及英格兰境内价值4000英镑的领地；另外，理查还授意约克教会将他的异母兄弟杰弗里选举为约克大主教，以实现亨利二世生前的心愿。⁸ 7月22日，理查又骑马出了吉索尔城堡与腓力进行了另一次会谈，根据法王腓力的御用编年史家圣德尼的里戈记载，当理查在行进途中骑马穿过一座木桥时，木桥突然坍塌，导致他连人带马落入沟渠中。⁹ 里戈据此认为，这个不祥之兆预示着吉索尔城堡将不复为理查所有。虽然腓力在会谈时再度索要诺曼维克桑地区，但当理查表示出与艾丽丝结婚的意愿后，腓力便又收回了这一要求。¹⁰ 理查还提出，除了此前亨利二世承诺支付的20000马克，他还可以再提供4000马克给腓力作为军费。最终，腓力将包括沙托鲁城堡在内的占领地区归还理查，但格拉赛和伊苏丹仍在法王控制下。于是，除了亨利二世时期已损失的领土，以及安茹帝国仅在名义上实施统治的奥弗涅地区之外，理查已经继承了安茹帝国的其他所有欧洲领地。而腓力没有归还格拉赛和伊苏丹也与理查的态度有关，后者在1188年11月的邦斯穆兰会议上并未特别提及应让法王归还上述两地。¹¹ 无论如何，亨利二世晚年时持续数年的动荡及近期数周来的乱局终于得以平息，这样的结果一定也令理查感到满意。完成领土交接后，理查便任命安德鲁·德·绍维尼驻守在沙托鲁城堡，使贝里地区的安全得到保障；理查还恢复了麾下另一位杰出军人——莱斯特伯爵罗伯特在亨利二世时期被收回的所有领地，¹² 后者恢复帕西领主身份，拱卫诺曼底的边防要地。

自从父亲逝世后，理查一直致力于恢复个人形象。他曾为自己起兵反抗父亲的罪过进行忏悔，并得到了教会的赦免：他到达诺曼底的塞斯（Seés）时，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鲁昂大主教便已宣布了赦令。¹³ 然而，

声誉才是令理查更加不安的问题。他是否做了不名誉的行为？1188年威廉·马歇尔是否在父亲面前检举他的“罪无可赦的背节行为”？¹⁴当亨利二世尚在位时，理查就曾在邦斯穆兰会议上公然表示与他对立，那么这件往事是否会使人们把他与那些阳奉阴违，暗中卖主求荣，并在危急时刻抛弃主君的人们相提并论呢？在当时的观念中，背信弃义的时间点是判断其严重性的最重要标准。于是，理查挑出了三个反面典型：居伊·德·沃（Gui de Vaux）、富热尔的拉尔夫（Ralph of Fougères）以及朱埃爾三世·德·马耶讷（Juhel III de Mayenne）。这三个人很晚才加入对抗亨利二世的战争，理查没收了他们的所有领地，宣称“这就是那些在危急时刻抛弃自己主君的臣仆们应得的最佳奖赏”。显然，理查此举意在昭示公众：英格兰新王格外重视荣誉感，决不允许背叛之事发生。相应地，豪登的罗杰所做的下述记载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理查对那些尽职尽责服侍他父亲的忠实臣仆们加以恩赏，不仅赞美了他们的忠义之举，还将他们官复原职，因为他认为他们值得。至于那些抛弃亨利二世、转投自己一方的教俗贵族们，理查则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统统解职。”¹⁵可以看到，对理查最重要的是荣誉，或者说他重视荣誉的名声，尤其在他反抗父亲之时，以及在决定与萨拉丁议和之时。正如贝尔特兰·德·博恩在一首可以肯定写作于1188年的诗歌《吾王陛下在召唤》（*Nostre Seignier somonis el mezeis*）中所描述的那样，理查“对荣誉的渴求远胜于所有人，胜于所有基督徒和异教徒，他不断追求并取得荣誉，以使自己声望日隆”。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理查的一个仅有9行的小节中，“荣誉”（pretz）一词竟出现了7次以上。¹⁶自1189年即位以来，理查一直在努力将自己的不服从行为与其他人的背叛行为区分开来。但在这些背叛亨利二世的贵族中，理查唯独原谅了自己的幼弟约翰，被编年史家罗杰认为是“导致他的父亲悲愤而死的直接诱因”¹⁷的约翰反而得到了理查的奖赏。¹⁸

当然，理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埃莉诺。当理查还在丰特夫罗时，便已下令解除亨利二世1188年末时对埃莉诺发布的禁令，使她重获自

由。埃莉诺恢复自由后的主要任务，便是将理查塑造成为废除亨利二世时代暴政独裁、重建正义秩序的新王形象，此时理查也开始将亨利二世时代所没收的地产还原主。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不仅重新获得了自己原有的领地，他还评论道，理查将他父亲所剥夺的一切合法财产都物归原主。另外，理查还实行了大赦，使得各地监狱人去屋空。那些仅仅因为国王或法官命令便无端下狱的人们如今得到释放，那些依正当法律程序入狱的人则得到开庭审判的保证。目睹此景的埃莉诺也不禁感慨：因她的自身经历，她十分明白摆脱监禁、重获自由是何等乐事。不过几年之后，纽堡的威廉却以批判的笔触写道，理查这一系列政策所带来的唯一结果，便是能让恶人们更加盛气凌人地四处通行无阻了。¹⁹但无论如何，1189年，理查的诸多行动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使他深得民心。根据杰维斯记载，理查“友善地与所有接近他的人交谈，并成为广受爱戴的人”。²⁰

当完成与腓力的第二次会面后，理查便赶往巴夫勒尔（Barfleur），乘船回到英格兰。在王位继承权已经确定无疑的情况下，他并不急切地希望加冕为王，入主英格兰。在长久的焦虑之后，英格兰出现了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国王的某个儿子成为王位无可争议的继承人的情况。约翰也与理查在巴夫勒尔一同登船，但他们的目的地不同：理查航向朴次茅斯，约翰则前往多佛尔（Dover）。²¹从这一计划上看，理查似乎不希望约翰与自己一同接受英格兰民众对新王的致敬。此外，理查还精心策划了这次英格兰之行的入场式。当理查抵达英格兰时，人们发现他还带着一位身系沉重锁镣的囚犯：图尔的斯蒂芬（Stephen of Tours），因其贪得无厌和粗野蛮横而臭名昭著的安茹宫廷总管，也是亨利二世手下最不得人心的大臣。²²理查此举的用意昭然若揭：若有权贵胆敢在国王手下滥用权力、谋求私欲，那么他必将遭到这样的正义惩罚。另外，理查还将一首原本为亨利二世创作的挽歌改编为向自己致敬的欢迎曲。²³

黄昏逝去，旧朝终矣
晨星冉冉升起
闪耀着美德和欢乐之光
朝阳升起，繁荣之世重现
我们满怀喜悦等您到来
并将向您奉上骑士之花
它满含诚挚的真理之言
它带来无尽的丰盈财富
纵使它慷慨赠予，却仍觉奉献不足
宫廷上下恭迎尊驾，唯您马首是瞻
民众亦将心怀敬畏效忠于您——
普瓦图的理查，英格兰的新王！²⁴

理查于1189年8月13日抵达朴次茅斯，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人们普遍相信，新王加冕将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让他们过上更为安逸的生活。西多会修士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在理查死后回顾他的统治生涯时，便认为理查在其统治之初便被视作诸王之鉴。²⁵ 这对一位曾起兵反叛父亲，并间接令父亲忧愤而死的不孝子而言，无疑是极高的评价。可见，理查此前为改善个人形象所做的宣传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9月13日（周日），理查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正式举行加冕礼。通过豪登的罗杰留下的记载，我们得以首次了解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详尽细节。然而加冕礼的核心内容并非对新王的加冕，而是加冕前的涂油礼。在举行涂油礼时，理查只着短裤和一件衬衣，衬衣敞开着，露出他的胸膛。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将圣油分别抹在他的头部、胸口和双手上

。人们相信，接受了涂油礼的国王将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结束涂油礼后，理查便换上加冕礼服，戴上王冠。在时代稍晚的加冕礼上，一般由大主教从圣坛上取下王冠，再将它戴在新王头上，而1189年理查加冕时的做法则有所不同：理查先从圣坛上取下王冠，再将它交给大主教完成加冕。无论这一举动是否是理查的创新，它都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成就的姿态。将王冠交给鲍德温大主教后，理查便登上王座，完成加冕，并参与了随后的弥撒。待加冕礼结束后，到场的宾客们便出席宫中的加冕晚宴。教士们按照品级高低顺序与国王同坐一桌，其他世俗贵族们——伯爵、男爵和骑士们也依序在不同的桌旁落座，所有参加晚宴的人们都得到款待。²⁶ 这次晚宴的盛大规格，仅从使用的餐具数量便可见一斑：整个宴会至少准备了1770个水罐、900个杯子以及5050个碟子，²⁷ 而这正符合理查对盛大排场的偏好。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据说在精通音律的理查的加冕礼上演奏的歌曲再度重申了“光明新时代”的主题：

黄金时代已重现，
世界秩序将再造。
不义富者皆惧恐，
平民大众得欢愉。²⁸

当整个宫廷沉浸于新王加冕的欢乐气氛中时，伦敦城内却突然发生了暴乱：一些犹太人带着礼物打算向新王理查献礼，但他们被基督徒阻挡在宫门外。更加恶劣的是，基督徒们向犹太人发起攻击，杀死数人并将其余人打伤。这场反犹太骚乱也迅速扩展到整个伦敦城，持续了一整夜。城内的犹太人纷纷被杀，他们的财物被劫掠一空，房屋也遭到焚毁。得知此事后，理查于次日下令逮捕了一些暴乱主谋，其中三人因行为尤其恶劣而被绞死；一位被暴乱者恐吓的犹太人为了保全性命，同意改宗基督教，理查鼓励这位犹太人回归自己的宗教。随后理查向英格兰各

郡发出敕令，下令各地基督徒均不得骚扰犹太人。²⁹ 据13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拉昂的无名氏记载，理查还派使臣前往诺曼底和普瓦图传达了同样的命令，以免在欧陆领地上也发生类似的暴乱。³⁰ 尽管理查和同时代的其他君主一样，都将犹太人视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他对犹太人的宽容态度，以及颁布法令将犹太人置于自己保护下的行为在当时极为少见。³¹ 纵使理查明令禁止侵扰犹太人，但随后数月内仍在多地爆发了反犹太暴乱：林恩（Lynn）、诺里奇（Norwich）、林肯（Lincoln）和斯坦福德（Stamford）等地的犹太人均未能幸免。对这期间发生反犹太暴乱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人们对十字军的狂热情绪：人们迫切希望来到耶路撒冷，见到真十字架，自然对这些曾经嚷着要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后裔心怀怨恨。此外，考虑到这次远征的巨额开销和犹太人普遍较为富裕的状况，对许多打算参加十字军的贫穷而虔诚的平信徒来说，从犹太富人手中掠夺财富充当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的经费，无疑是最合适的手段。这股反犹太浪潮也在1190年3月的约克城达到顶峰，此时理查已离开英格兰，无暇顾及内政了。大约150名约克城的犹太人躲过了暴民的袭击，逃入约克城堡寻求庇护，但在一位狂热隐士的鼓动下，暴民们开始围攻城堡。当被困的犹太人们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后，大多数人在杀死妻儿后自尽，其余的人在得到“改宗即可保命”的承诺后出来投降，但他们被背信弃义的基督徒们全部杀死，无人幸免。³²

1189年9月中旬时，理查来到位于北安普敦郡科尔比（Corby）附近的派普威尔修道院（Pipewell Abbey）召开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理查解除了拉努夫·格兰维尔（Ranulf Glanville）的最高司法官职务，并指定两人接任此职：欧马勒伯爵、埃塞克斯（Essex）伯爵威廉·德·曼德维尔（William de Mandeville），以及达勒姆（Durham）主教休·德·皮塞（Hugh du Puiset）。后者此前治理达勒姆教区长达35年，有丰富的政治经验。³³ 随后，理查任命了四位新主教：温切斯特主教戈弗雷·德·卢西（Godfrey de Lucy）、伦敦主教理查·菲茨尼格（他同时也是《财政署对

话录》的作者）、伊利主教隆尚（Longchamp）和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此外，理查还任命了包括塞尔比（Selby）修道院院长和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院长在内的其他教会职务。³⁴ 理查这些授予教会职务的行动也是为了表明他与他父亲的所为完全不同：亨利二世习惯于保持主要教区的职务空虚，以便将该教区的收入据为己有。³⁵ 但在迪韦齐斯的理查眼中，被理查任命的这四位新主教都是“声誉卓著之人”，³⁶ 而这一评价似乎并不适用于选举产生的约克大主教杰弗里。有谣言称，这位先王亨利的私生子始终希望身居高位，他曾将一只金碗的盖子扣在头上，并询问他的朋友们这顶金冠是否适合自己。毕竟，诺曼王朝的开国之君“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早年也因其出身被人称作“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同年稍晚时候，另一位私生子莱切的坦克雷德（Tancred of Lecce）正准备即位成为西西里国王。一些证据显示，这些谣言并非毫无根据：早年他曾被选为林肯主教，他却放弃接受这一教职，因为杰弗里十分清楚，若自己成为教士，今后将无法获得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世俗头衔。理查很可能也对这位野心勃勃的异姓兄弟十分警惕，于是他在1189年7月时授意约克教会选举杰弗里担任新的约克大主教，但约克教会的反对派表示：杰弗里出身不正、杀人成性，且犯下通奸之罪，他们无法接受声名狼藉者成为大主教。不过理查仍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教廷特使的确认下，极为不满的杰弗里还是被选为约克大主教。9月23日，他被授予圣职。一个月后，理查又打算任命他为约克主教长和教会司库，但杰弗里拒绝了这些职务，并与他将度过余生的这座教堂的神职人员发生争执。³⁷

随后，理查还成功解决了当时最为棘手的一起教会争端，而我们也得以通过这一事件的档案，直接了解到理查解决争端的能力——这是一位国王政治智慧的一个核心方面。这起争端的一方是出身于西多会修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福特的鲍德温（Baldwin of Ford），另一方则是坎特伯雷教区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们。事件亲历者之一、编年史家坎特伯雷

的杰维斯热情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杰维斯认为，鲍德温大主教是比萨拉丁更为恐怖的基督教之敌。事件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186年，当时鲍德温曾计划在哈金顿（Hackington）修建一所用于纪念殉道圣徒圣托马斯和圣斯蒂芬的联合教堂，但当地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的修士们认为这会影​​响本地教会的地位和声望，于是他们持续抵制这一计划。为了使大主教彻底打消这一念头，他们甚至多次向英王和教宗寻求帮助。另外，一直到1188年1月，修士们都被禁闭在修道院中，仅仅依靠坎特伯雷居民的善意活过了一年半的时光。杰维斯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当地居民们的食物援助。但各类宗教活动也因此废止了一年半之久。杰维斯也通过这次争端更近距离地观察亨利和理查两代君主的品性。杰维斯将亨利二世称为拖延无决者和一位“诺言不足为信”的两面派，³⁸ 历史学家戴维·诺尔斯（David Knowles）则进一步指出，亨利二世本人“便是双方实现和解的最大阻碍”。³⁹ 亨利二世逝世后，争议双方曾短暂议和，于是修道院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与言而无信的父亲不同的是，理查自加冕后便努力促成双方和解，为此他还特地成立了一个仲裁团处理此事。然而1189年10月时，鲍德温大主教任命一位名为罗杰·诺里斯（Roger Norreys）的修士担任新的修道院院长一事却使事态再度恶化：此前修士们被监禁时，罗杰·诺里斯（据称通过下水道）逃出了大门紧闭的修道院，并转投大主教一方，因而被其他修士们视为叛徒，他们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位叛徒的领导。最终，理查确定亲自出马，他带着王太后埃莉诺和其他所有主教于11月时来到坎特伯雷，打算进行最终裁决。理查同时表示，不希望教宗参与此事，并禁止为此事而来的教廷特使渡过多佛尔海峡。⁴⁰

杰维斯对随后数日内的活动及理查的参与也做了详细的叙述。在国王的敦促下，修士们同意接受仲裁，并提出了两个条件：大主教应废止在哈金顿修建教堂的计划，罢免罗杰的修道院院长之职。理查将修士们的条件转告了鲍德温，并表示若后者不同意这两个条件，他会将罗杰免职并摧毁哈金顿的教堂。不过随后鲍德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理查已

经接受对方的两个条件的情况下，让他屈服于这样的仲裁是不公平的。理查也同意他的观点，再度询问修士们：若大主教在上述两方面做出让步，他们是否也愿意接受大主教以西多会的方式对其他教会事务进行裁决。修士们极不情愿地同意了理查的这一提议，但他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确认自己特权得到保障的文书应立刻在此公示。理查在对鲍德温耳语几句后，便告诉修士们：当宣读文书时他们不必担忧，为避免羞辱大主教，文书内的某些字句会经过一些“必要的调整”。待最终宣读文书时天色已晚，在阴暗的礼拜堂中的人们即使连理查闪闪发光的长袍都无法看清，满怀困惑的修士们只得静静地听着调停人之一、鲁昂大主教库唐斯的沃尔特（Walter of Coutances）宣读文书。沃尔特念道：“我们裁定：坎特伯雷大主教有权自由选择修建新教堂的地区，并有权任命他所指定的修道院院长。愿诸位修士向大主教请求宽恕，他必将克制怒火，与你们达成和解。”一时间，修士们大惊失色——原以为值得信赖的国王竟然欺骗了他们！一位修士试图抗议，但理查立刻命令他们全体跪下。认为遭到背叛与恐吓的修士们只得屈从，在黑暗中跪着请求大主教宽恕。鲍德温也随即表示：自己愿与修士们和解，并请修士们原谅自己此前的冒犯之处。当修士们再次打算发言时，罗切斯特主教起身宣布了最终的判决：哈金顿已修建的联合教堂将被拆毁，修士们所憎恨的修道院院长将被免职。“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教堂齐唱赞美诗，并交换和平之吻吧。”罗切斯特主教最后说道。第二天，双方便签署了和解协议，争端就此平息。⁴¹ 理查利用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威，并妥善地运用了灵活务实的策略使双方都毫无怨言地达成和解。斯塔布斯认为，理查“不使用欺诈或恐吓的下作手段”便取得了理想的结果，而他在处理坎特伯雷争端时“表现出的开诚布公、坚定不移的特质也与父亲亨利二世形成鲜明对比。另外，理查决不允许罗马政令凌驾于本国法律之上，也避免使自己陷入如托马斯·贝克特所称的亨利二世的陷阱：过于精明的亨利总是试图将他的对手们引入自己的陷阱，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却未能引导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⁴² 尽管斯塔布斯在此对理查赞誉颇多，但他进行

研究的时代，人们对理查的评价过于统一，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对理查的整体评价。

1189年秋季，亟待理查处理的另一件重要事务则是：确保英格兰边境的安全。边境安全的确至关重要，据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1185年时亨利二世拒绝参加十字军的理由便是要留在国内抵御“蛮族”，即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入侵。⁴³而在理查即位前，德赫巴斯之王里斯便在得知亨利逝世的消息后对英格兰发动了进攻，并攻克了拉恩（Laugharne）和兰斯特凡（Llanstephan），围困了卡马森（Carmathen）。⁴⁴当时还在派普威尔进行会议的理查闻讯后，立刻派出新任格拉摩根勋爵约翰率军支援，理查本人则在9月末来到伍斯特（Worcester）“与其他威尔士王公会面”。⁴⁵理查很可能通过这次会面赢得了一项重大外交成果：威尔士王公们均承诺，在理查参加十字军期间不向英格兰发动进攻。⁴⁶1189年10月，约翰勋爵还将里斯带到牛津，打算让后者与理查会面，但理查拒绝与里斯会谈，于是里斯愤而归国。⁴⁷可能当约翰勋爵将自己与里斯会谈时提出的条件——即威尔士编年史中提及的“个人和解”（*pax privata*）告知理查时，理查对此并不认可，因而没有与里斯见面。⁴⁸眼见和谈未果，里斯便重启战端，1189年圣诞节时他又攻克了圣克莱尔斯（St Clears），并在随后数年内攻克了威尔士西南部地区的其他城堡。对于镇守此地的两位英格兰大贵族——未来的彭博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和格拉摩根勋爵约翰而言，里斯无疑已成大患。但令人惊讶的是，随后数年内威尔士统治者们均恪守1189年时的诺言，里斯及其继承人们甚至在1193至1194年理查之弟约翰叛乱期间也并未趁机干预英格兰内政。

1189年11月，理查又派自己的另一个弟弟杰弗里前往特威德河（Tweed）与苏格兰人之王“狮子”威廉会面，并护送后者进入英格兰。威廉和他的弟弟亨廷顿（Huntingdon）伯爵戴维此前曾在伦敦出席过理查的加冕礼，这次他们则来到坎特伯雷与理查会谈。双方达成了一份意义重大的著名文件——《坎特伯雷弃权状》（Quit-claim of Canterbury），在

这份签署于1189年12月5日的文书中，理查同意将1175年时被亨利二世占领的罗克斯堡（Roxburgh）及贝里克堡（Berwick）归还威廉，并承认苏格兰王国的独立地位。苏格兰史籍《梅尔罗斯编年史》（*Melrose Chronicle*）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份文书将苏格兰从“压迫与奴役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相应地，威廉应向理查支付10000马克的金钱补偿。⁴⁹《坎特伯雷弃权状》的签订也使理查在诸多苏格兰历史著作中得到了较高评价。然而许多认为“苏格兰应从属于英格兰”的现代英国史家们则不以为然，他们在对这份弃权状的评价上沿用了杰拉尔德的观点：“这份条约毫无价值，它使英格兰蒙受损失，令英王冠冕黯淡无光。”⁵⁰但对理查而言，《坎特伯雷弃权状》的意义绝不只是为他的十字军远征提供了部分经费，它同时还消除了苏格兰入侵边境的隐患：当1193至1194年约翰趁理查被囚禁发起叛乱时，苏格兰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在为理查筹集赎金时，“狮子”威廉也出力颇多。若没有理查在1189年时所取得的对威尔士、对苏格兰外交的上述成果，当1193至1194年英格兰国内动荡之际，两国将极可能乘虚而入，造成更大的破坏。可以说，正是理查的外交成果使英格兰避免了如1173年至1174年内战及1215年至1216年内战时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局面。而理查在1189年的两次重要会谈上也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他不仅促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当地修士的和解，还确保了北部边境的和平。难怪豪登的罗杰会心怀敬意地写道，当会谈结束后，踏上归途的人们“都对国王的丰功伟绩赞不绝口”。⁵¹

结束了坎特伯雷会谈后，理查前往多佛尔，并在12月12日渡海来到加莱（Calais），然而等到理查下一次返回英格兰时，已经是四年多后的事了。理查此次前往欧洲正是为了处理他即位以来的头等大事：准备十字军东征。而理查在征召军队、调集物资和筹措经费方面的情况都要优于其他所有十字军领袖，他因此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这次十字军的核心角色。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称为“理查的十字军东征”：这不仅因为理查统治着最为广大的领土，在他治下的安茹帝国还有着当

时最完备的行政系统，以确保准备工作的高效进行。这一点在英格兰体现得最明显。我们可以从英格兰现存的财政署卷宗（Pipe Rolls）中了解到理查是如何进行准备工作的。⁵² 在理查的指示下，他手下的官员们奔走于各个港口之间，征用当地所能找到的性能最佳、载重量最大的船。关于船舶征集行动的主要记载来自英格兰，如五港同盟（Cinque Ports）就提供了至少33艘船。不过诺曼底、布列塔尼和阿基坦地区同样需要承担提供船只的任务。相关开支方面，理查支付总费用的三分之二，剩余三分之一则作为十字军税负的一部分由地方民众承担。此外，理查还负责支付所有船员们的工资：每位水手的日薪为2便士，每位舵手的日薪为4便士。在始于1189年圣米迦勒节的新财年期间，主要负责海运事宜的王室官员康希尔的亨利（Henry of Cornhill）便在上述方面投入了超过5000英镑的资金。理查还要求每艘船都应装满必要的战争补给品，比如出产于迪恩林区（Forest of Dean）的5万件铁制马掌便按照指示装船备用。⁵³ 可以看到，统治着庞大海运帝国的理查充分利用了国内资源，使自己成为首位有能力自行组织并武装船队航往海外之地的十字军国王。⁵⁴

为了完成备战工作，理查还需要筹集大量的金钱。当理查抵达英格兰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官员到各地王家金库中清点父亲亨利二世存留的财富总额，并将这些财富划入自己名下妥善保管。⁵⁵ 不过，亨利二世的遗产无法满足理查的需求，尤其是因为其中2.4万马克是积欠法王腓力的债务。⁵⁶ 但此前理查已经开征了萨拉丁什一税，再开征新税显然不是良策。理查将目光转向富人阶层：考虑到国家财富主要集中于少数与国王有着法律和政治联系的富人之手，通过不同方式将他们的财富变为国王所有，无疑是比较好的办法。1189年8月伊利主教的逝世便为理查提供了第一个机遇，这位主教既无遗嘱也无继承人，于是理查便将死者名下的所有动产——价值3000马克的银币，以及金银器皿、珍贵衣物、谷物、马匹和其他牲畜都据为己有。⁵⁷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则认为，比起通过征税获取收入，安茹诸王更加依赖这类不

定期的巨额收入：“国王就像一个不断在街道上徘徊、伺机作案的强盗，他不停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搜索侦察，当他们发现弱点后便乘虚而入，夺走其中的财富。”⁵⁸

另外，对那些怀有野心的富人而言，向国王付出巨资为自己换得特权和领地，或为自己谋求官职以便日后谋利的行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也是12世纪政治体制的重要特点。理查加冕后便迅速开始进行这样的权钱交易，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国王将手里所有的一切都摆上货架：政府官职、贵族身份、伯爵领地、郡长管区、城堡市镇、各类地产等皆在其列”。很快，掌握着英格兰最富裕教区的温切斯特主教戈弗雷·德·卢西得到了汉普郡（Hampshire）郡长之职和温切斯特、波切斯特（Porchester）两地的城堡，随后戈弗雷又支付3000马克，将原本属于温切斯特教会的两个庄园据为己有，支付1000马克以得到他应得的遗产。⁵⁹对戈弗雷的举动我们不应感到奇怪，正如12世纪的一句俗语所说：“成为郡长便意味着得到无尽财富。”按惯例，一年中，郡长应两次向财政署提交本郡区财政状况的报告，除此之外，他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约束。权力自然意味着获利。当然，这些手握重权的高官同样受到约束：由于他们的权力来自国王任命，因而当国王对某人不满意，便将其解职也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如伍斯特郡郡长罗伯特·马米恩（Robert Marmion）便因为渎职被国王解职，并罚款1000英镑，然而马米恩在一年内就支付700马克的罚款，这大概也显示了这些贪婪的郡长可以在职位上获得多少金钱。而马米恩的继任者威廉·博尚（William Beauchamp）则花费100马克得到了这一职务。原约克郡长拉努夫·格兰维尔放弃郡长职务后，在他任职期间担任他副手的管家莱纳也被罚款1000马克。⁶⁰随后威廉·马歇尔的兄弟约翰·马歇尔成为新的约克郡长。拉努夫·格兰维尔的女婿阿登的拉尔夫（Ralph of Arden）被解职时也被处以1000马克以上的罚金，他的职务转由威廉·隆尚（William Longchamp）的兄弟接任。数据表明，在亨利二世统治末期担任郡长的27人中，只有5人在理查时期仍然担任郡长，东盎格利亚地区的郡长大多能够继续任职，其他地区的郡

长则经历了洗牌，频繁的官职任免行动也为国王带来了一定收入。不过由理查任命的新郡长们都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并非能力缺乏的新手。一般认为，理查缺乏像父亲一样的政治才能，且疏于管理官员任免事务，但这一描述并不符合事实。⁶¹ 近期，理查·海瑟博士对理查所任命的所有郡长（不仅是编年史中提及的著名人物）进行了详尽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理查在任命郡长时并非轻率而为，而以十分谨慎且富有远见的态度处理此事”，而且“从理查与这些官员的交往情况来看，他能正确认识到部下的才干，这表明他十分注重保持英格兰王国的行政系统合理有效运作”。⁶² 买卖官职、头衔特权和特许状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只不过理查将通常需要几年完成的工作集中在一年完成，以实现为十字军东征筹集足够资金的任务。⁶³ 最终，理查也在短期内成功地筹集了一笔巨款。⁶⁴

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对理查早期英格兰统治进行批判的历史学家层出不穷。批评者们认为，理查醉心于十字军东征就是“对英格兰置之不理”，因此，他此前所做的一系列措施也不可避免地被贬损为“一位怠于职守的国王的权宜之计”。⁶⁵ 然而，理查同时代的人们却并不这么认为。豪登的罗杰在其《理查国王传》（*Gesta Ricardi*）中写于1189年至1190年间的这个著名文段常被认为是同时代人对理查的严厉批判：

理查国王不仅解除了拉努夫·格兰维尔的英格兰司法官职务，也解除了其他所有郡长及其手下官员们的职务，与他父亲关系越密切的人，受到的打压越严重——若某人被他认为不合己意，他便将这位官员逮捕并处以监禁，这些不幸的囚犯也只能在狱中暗自哭泣，咬牙切齿地咒骂国王。随后理查国王便开始任命新人接任这些职务。他将手里的一切都摆上货架：政府官职、贵族身份、伯爵领地、郡长管区、城堡市镇、各类地产等皆在其列。

随后，罗杰还以达勒姆主教休·德·皮塞、温切斯特的戈弗雷以及令人敬畏的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萨姆森（Samson）这三位教士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罗杰称上述三人的职务都是向国王买来的，“理查国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易获得了巨额财富，此时他已经比自己的任何一位先祖都要富有了”。⁶⁶

我们并不清楚豪登的罗杰的这段文字是否是对理查明确的批判。首先，罗杰对这些被解职的郡长们的态度是什么？究竟是为他们感到惋惜，还是为理查的举动拍手称快？实际上，罗杰对被解职的拉努夫·格兰维尔并无多少好感。无论拉努夫在法学上有多大的成就，罗杰都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厌恶且腐败透顶的法官。⁶⁷在亨利二世统治末期，拉努夫及其亲属还一度在英格兰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权力，因而当理查采取行动削弱格兰维尔家族权势时，罗杰应当是持赞同态度的。其次，罗杰在多大程度上认为理查是在变卖英格兰王室的权力，他们的“传家宝”？关于理查出售官职领地一事，在罗杰写下上述文字八九年后，纽堡的威廉认为，这是当时包括理查友人在内的多数民众的共同看法。当友人们责备理查时，对此不以为然的理查还随口答道：“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买主，朕甚至愿意出售伦敦城呢！”这类故事更加推动了下面的谣言的传播：理查当时对自己的健康深表担忧，认为自己恐怕无法从征途中安全返回。而此前理查略显无度的赠礼行为已经给人一种对统治毫不在意的印象，他出售官职领地的行为自然也容易被误认为是他对英国君主制的未来并不关心。看起来理查是在进行“清仓甩卖”。但纽堡的威廉接着写道，后面的发展很快显示，理查其实并非愚蠢地不在乎王权，而是十分重视自己的王权，并巧妙地诱使贪婪的富人们掏空了他们的钱袋。⁶⁸迪韦齐斯的理查1193年的记录也证实了威廉的上述观点，他认为理查在1189年所说的“出售伦敦城”这句玩笑话，实际上是在暗喻一句英格兰谚语：“当一个聪明人开始经商时，他会仅仅为了赚取一个半便士而付出十二个便士的开销。”⁶⁹理查正是利用了富人们渴望谋利的贪婪心理，制造出“清仓甩卖”的假象，使他们自认为得利而沉迷其中

，但理查才是真正的赢家——他在权威毫发无损的情况下，赚得了大量收入。当时也有贵族察觉到理查的真实用意。据罗杰记载，休·德·皮塞在1189年圣诞节时才意识到，理查并非因为维护公正，而是由于对金钱的需求才将自己任命为司法官的。若真如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罗杰对理查的上述评论有所偏颇，这或许与他的职务有关。当时担任王室文书的罗杰还是理查与多次犯错的达勒姆主教之间的调解人，罗杰受到欺骗，因而罗杰在记录此事时极为不满。⁷⁰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当罗杰记录1189年12月理查在坎特伯雷的事迹时，仍然对理查大加赞扬。⁷¹

另一段常被人们当作同时代人批判理查依据的文字，是一份迪切托的拉尔夫留下的简要记录：理查“仅仅与少数人讨论国内的少数事务”，当他离开英格兰时已成为历代英王中最为富有者。⁷² 这段文字或许有明显的批判性，但它究竟在批判什么？考虑到拉尔夫关于1190年至1191年英格兰事件的记录十分平实严谨、缺少个人色彩，我们难以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只能进行猜测。他是在暗中批判自己昔日的老友、如今已成御前大臣的威廉·隆尚，还是在对理查支持幼弟约翰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Isabel of Gloucester）成婚一事进行批评呢？若我们认为罗杰和迪切托的拉尔夫是在批评理查在1189年的各项政策，那也是含蓄而内敛的。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在1195年时的记载则更令人震惊。他对理查被囚禁一事感到十分困惑：这或许是天主对理查的公正惩罚，但为什么罪名降下天罚呢？他也并不清楚。但从上下文上看，无论是理查支持约翰与伊莎贝尔的婚事，还是他提拔隆尚一事，都不是科吉舍尔的拉尔夫所认为的导致审判的理由。⁷³

事实上，在理查有生之年，对其出征前的诸多政策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同时代史家只有纽堡的威廉一人。威廉的批评主要涉及理查对约翰的过度纵容，以及任用威廉·隆尚这两方面。威廉在他的编年史中名为“论国王对其兄弟之爱”的一章中，对理查纵容约翰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理查对约翰过于慷慨，对约翰大量赠予土地，使得约翰几乎拥有了

英格兰王国土地的三分之一（此外，他在爱尔兰、诺曼底以及英格兰也拥有领地）；另外，理查准许约翰与自己的堂亲伊莎贝尔结婚也是不合法的。威廉认为，正是理查这种缺乏智慧且不合时宜的纵容行为使约翰的野心不断膨胀，为后者背叛兄长埋下祸根。⁷⁴ 在对待约翰的问题上，即使是对理查赞誉有加的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也表示了自己的质疑。他在谈及此事时表示，理查已给了约翰太多恩惠，以至于“在街谈巷议和窃窃私语中，人们都普遍相信，若约翰与生俱来的野心无法得到抑制，他强烈的权力欲将促使自己夺取兄长的王位”。⁷⁵ 当然，比起威廉来说，他的评论严格来说并不是实时的。但这两位编年史家都极具后见之明：约翰确实已权倾朝野。早在理查加冕前，他便已经许诺将德比郡（Delby）和诺丁汉郡（Nottingham）、蒂克希尔（Tickhill）、沃灵福德（Wallingford），以及下列四处带有城堡的领地——佩弗里尔（Pe verel）、兰开斯特（Lancaster）、马尔伯勒（Marlborough）和拉德格舍尔（Ludgershall）封给约翰。1189年8月29日，约翰又不顾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禁止血亲结婚的命令，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成婚，得到了布里斯托（Bristol）、格拉摩根边区和纽波特（Newport）。而教廷特使于12月时宣布约翰的婚姻合法，并废除了鲍德温对约翰婚姻的禁令。同时，理查还将康沃尔、德文（Devon）、萨默塞特（Somerset）和多塞特（Dorset）四郡封给约翰，这或许是为了兑现父亲亨利二世的承诺：要让约翰在英格兰拥有年收入4000英镑的领地。

然而，无论纽堡的威廉和迪韦齐斯的理查后来怎么想，1189年时，理查一世却别无选择。若理查不做出这类维护兄弟之情的姿态，他也很可能使自己身陷险境。毕竟约翰不是一位普通的封臣，他和理查一样，也是安茹王室成员之一。尽管约翰此前已在爱尔兰拥有自己的领地，但他仍然向理查索要安茹、阿基坦或布列塔尼。考虑到这一情况，两位编年史家后自然来认为理查将大量英格兰领地封给约翰的行为很危险。但1190年时的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可能认为，虽然约翰每年能获得一笔与其地位相符的不菲年金，但他却没有实权——至少约翰本人无疑是这么

想的。⁷⁶ 他所接管的领地中最为重要的城堡仍在理查的控制下。显然，理查也十分清楚，若他将这些城堡交给约翰，后者很可能会趁自己不在国内时兴兵作乱。那么，若要避免后院起火，让约翰与自己一同参加十字军似乎是更好的对策，但这一策略也存在自身的危险。约翰此前与法王腓力建立的盟友关系，也是他得以对理查产生威胁的重要基础。不过腓力已同意与理查一同出征，约翰留在国内对理查比较有利。总之，理查早已认识到约翰的潜在威胁。1190年3月在诺曼底召开的一次家庭会议上，理查便要求约翰当场立誓：除非得到特许，他在此后3年内均不得进入英格兰。但根据豪登的罗杰的记载，在母亲埃莉诺的劝说下，理查不久后又改变了主意。⁷⁷ 理查当时或许认为：既然约翰无论身在何方都可能成为祸患，那倒不如让他处在母亲和自己委任的精干官员们的联合制约下，这一措施应该也能有效抑制其野心。此前理查慷慨地将英格兰地产赠予约翰的行为，也有助于阻止后者在1192年初投奔腓力并发起夺取领地的叛乱，因为他们可以威胁约翰没收他的领地。⁷⁸ 另外，理查允许约翰与父亲所指定的女子成婚，也避免了约翰与艾丽丝成婚，进而受到法王控制的局面出现。总之，直到理查出乎意料地在德意志被囚禁之前，他的上述措施都确保约翰能够安分守己，约翰也只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开始蠢蠢欲动的，我们似乎不应将约翰的变化归咎于理查此前的一系列慷慨举动。

纽堡的威廉对理查的第二点批判是：理查在并未听取大臣意见且未获贵族赞同的情况下，便将行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御前大臣，伊利主教威廉·隆尚。在威廉看来，隆尚是一位“事迹鲜有人知，其才干和忠诚均令人怀疑的外国人”。⁷⁹ 然而，这其实是威廉的后见之明与偏见。他强烈反对教士参与世俗政治，因而此时他关于隆尚的记录都较为片面，这一点在1189年的记载中也体现过。⁸⁰ 实际上，早在为理查效力前，隆尚就曾在亨利二世的王家法庭中担任文书，并以勤勉忠诚而为人所知。此外，隆尚还富有才干，他写作了一篇关于民法的论文，深得同样学识渊博的迪切托的拉尔夫赏识。但威廉·隆尚并非唯一可能主掌朝政之人，

当理查将伦敦塔与王室印章都交由隆尚管理时，他的竞争对手休·德·皮塞无疑对此深感失望。在威廉·德·曼德维尔死后，休成为唯一的首席司法官，他本以为自己能主掌朝政。⁸¹隆尚和休两人也因此争执而无法共事。为解决争端，理查曾在1190年3月时试图以亨伯河为界划分两者权限：亨伯河以北地区由休负责治理，隆尚则担任英格兰其他地区的最高司法官。但这一措施最终失败，而隆尚的地位也逐渐超过了休，他的权力也在1190年6月时达到顶峰：一人身兼御前大臣、最高司法官和教廷特使三职，其权力之大远胜此前任何一位王家大臣。⁸²当前任最高司法官威廉·德·曼德维尔逝世后，理查在英格兰试验了一系列政府管理的方案，这些方案在他逗留英国时可以及时得到调整。但理查在动身远征前还是决定将治国重任交给了隆尚。理查必须指定一位最为信任的部下，从1189年7月起担任自己在英格兰的代理人。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质疑这一决策，即使是持反对态度的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在1189年纪事中也只是简单提及了“理查国王任命隆尚主持英格兰政务”一事。⁸³由于隆尚未能成功平息1191年约翰所引发的政治动荡，理查任命隆尚确实是失策，但这与他同政敌达勒姆主教休的争执不同，在1189年时是无法预见的。早在1190年时理查还看到隆尚与其他几位辅政大臣共同行使最高司法官的权力：威廉·马歇尔、杰弗里·菲茨彼得（Geoffrey Fitz Peter）、威廉·布鲁尔（William Brewer）、怀特菲尔德的罗伯特（Robert of Whitefield）以及罗杰·菲茨莱恩弗雷（Roger FitzReinfrey）。而理查的预备措施也对平息1191年叛乱起了一定作用（见下文315——318页）。当理查脱离监禁，返回英格兰后，隆尚也一同返回，继续担任御前大臣直至1196年逝世。除了在处理1191年叛乱时的失误之外，隆尚在其他方面都十分成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深受纽堡的威廉观念影响的现代史学家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英格兰国王就应该留在英格兰境内，而非贸然进行远征。但1189年时人们的想法并非如此，他们普遍认为：对理查而言，最重要的使命便是收复耶路撒冷。对理查而言，收复耶路撒冷不仅有

重大的宗教意义，也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当时已摇摇欲坠的耶路撒冷王国在理查看来是家族遗产，耶路撒冷王后西比拉（Sibylla）和她的丈夫吕西尼昂的居伊试图恢复其合法继承权，而他们均和理查有所联系：西比拉属于安茹家族的分支，是理查的远亲，居伊则是理查在普瓦图地区的封臣。因而，继父亲亨利二世之后成为安茹家族领袖的理查有义务帮助家族远亲，他作为居伊的封君也应对自己的封臣施以援手。⁸⁴然而，理查远征必然带来问题，而他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以下任何情况的出现，都将极大影响其政治和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转：继承人年龄过小，继承人患有疯病或智力低下，继承人被囚禁或因参加十字军长期远离国土。但上述问题都有解决之道。第二次十字军时期，当路易七世及其王后埃莉诺都远离本土时，由韦芒杜瓦的拉尔夫（Ralph of Vermandois）及圣德尼的苏热（Suger of St Denis）主持王国政事，而与后来的隆尚一样，在苏热主政时期也爆发了居留国内的王弟试图推翻兄长统治的叛乱——掀起叛乱的路易七世之弟德勒的罗贝尔（Robert of Dreux）也同样野心勃勃。⁸⁵有了路易七世的前车之鉴，理查显然能意识到幼弟约翰会趁自己远征时在国内兴风作浪，尤其是由于自己尚无合法子嗣，且约翰也试图成为王位继承人。理查踏上远征，苦难势必会出现。如果理查在十字军东征后很快返回，他在1189至1190年所采取的措施及1191年在西西里对其政策的调整都还是有效的。至于随后约翰掀起叛乱并极大地破坏安茹帝国的政治结构一事，则完全是理查在德意志意外被囚禁而导致的意外结果。理查的批评者的责任就是显示理查本可以做更多以维持约翰的忠诚，约束迪韦齐斯的理查在1193年所说的约翰的“先天行为”（innatos mores）。⁸⁶

注释

1 HGM, 9304–409, 9469–550. 这一故事无疑是为了突出理查和父亲亨利二世的区别：前者慷慨且言出必行；后者则言而无信，不能及时履行诺言。尼古拉斯·文森特在

他的新作中也介绍了类似故事及其含义，见Vincent, ‘William Marshal’。

2 Gerald, *De Vita Sua* (*Opera*, i), 80–1, 84. Gillingham, ‘Henry II, Richard I and the Lord Rhys’, *Peritia*, x (1996), 225–36.

3 参见Vincent, ‘William Marshal’。

4 HGM, 9374–98, 10, 117–36; *Histoire des ducs de Normandie et des rois d’Angleterre*, ed. F. Michel (Paris, 1840), 99–100. 当理查到达英格兰数天后，他便将长期居住在英格兰的这位女继承人许配给安德鲁为妻。见*Gesta*, ii, 76.

5 R. Harvey, *Moriz von Craûn and the Chivalric World* (Oxford, 1961), 50–3. 关于莫里斯在担任布列塔尼宫廷总管时的事迹，可参见Everard, ‘The Justiciarship in Brittany’, 105。

6 转引自J. C. Holt, ‘The End of the Anglo-Norman Real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i (1975), 35。

7 记录这项协议的文件于1190年7月正式达成，并由两位国王签字确认。而在条约中，理查提到了“在他登基前”举行的一次会议，*Actes*, i, no. 361 (Landon no. 259)。在前一条注释中所引的霍尔特的文章中首次阐明了这份条约的战略意义，然而图尔地区的问题在1189至1190年仍未真正解决。

8 *Gesta*, ii, 73.

9 Rigord, 97.

10 豪登的罗杰最初并未提及理查所说的这句话。当罗杰对腓力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后，他在稍晚时候的记载中写道，若理查在与艾丽丝结婚的问题上屈从于腓力，这将给自己的名誉带来永远无法消除的污点。见*Chron.*, iii, 4。

11 *Gesta*, ii, 73–4. 见上文131页。

12 *Gesta*, ii, 75.

13 数年后，当理查在德意志被囚禁时，迪切托的拉尔夫又重新考虑了理查的罪孽问题，他认为这是天主对理查进攻病重父亲之举的正义惩罚。但1189年时身在诺曼底的拉尔夫似乎对理查的忏悔十分满意，并认为理查通过善待母亲弥补了自己在对待父亲时的过失，见Diceto, ii, 67–8。

14 HGM, 8258. 事件始末见上文。

15 *Gesta*, ii, 72, 107.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作为始终伴随亨利二世的教士之一，迅速被理查委以重任，详见上文145页。

16 Born, 386–7. 这首诗中提及了参加十字军的诸位国王。但九行诗中出现七次“荣

誉”一词的表述，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17 *Gesta*, ii, 72.

18 我们仍然只能揣测理查的真实动机，但理查对母亲的孝敬以及兄弟间的关爱等传统观念显然起了一些作用。

19 *Gesta*, ii, 74–5; Newburgh, Bk 4, ch. 1.

20 Gervase, i, 451.

21 *Gesta*, ii, 75. 成文较晚的 *Chron.*, iii, 5, 这个细节反而被模糊了。

22 关于图尔的斯蒂芬（或称马尔赛的斯蒂芬）的相关记载，参见 J. Boussard, *Le Comté d'Anjou sous Henri Plantagenêt et ses fils 1151–204* (Paris, 1938), 114–17; *Gesta*, ii, 71–2; HGM, 8015–24, 9178–204; Devizes, 4–5。

23 *Gesta*, ii, 75–6. 即使素以行文简洁著称的罗杰，此时也以热情的笔触赞美新王理查，并提及当时的人们极少有为旧王之死感到悲伤的。

24 选段来自“当君王之星陨落”（*In occasu sideris*）这首拉丁文挽歌，英译文本出处为 *Music for the Lion-hearted King. Music to Mark the 8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ronation of Richard I of England*, Gothic Voices, dir. Christopher Page (Hyperion CDA 66336, 1989)。

25 Coggeshall, 91. 当然，拉尔夫认为，正因为理查在即位之初便享有盛名，他的壮年而逝也才如此令世人悲伤。但即使是那些将理查视为无能统治者的现代史家们也赞成下面这个对比的存在：一方面，理查威名赫赫，个性极为突出；另一方面，父亲亨利二世却善于见风使舵，且对财富极为渴求。见 J. T. Appleby, *England without Richard* (London, 1965), 20。

26 *Gesta*, ii, 80–3.

27 PR 1 Richard I, 21, 30, 216.

28 欲了解歌词原文及原曲的读者，可参考 Gothic Voices, *Music for the Lion-hearted King*。

29 *Gesta*, ii, 83–4. Newburgh, Bk 4, ch. 1. 迪切托的拉尔夫为发生在伦敦的反犹太人暴乱深表遗憾，并认为“外国人”挑起了这场骚乱，Diceto, ii, 69。

30 *RHF*, xviii, 707. 作者被认为是一位生于英格兰的普雷蒙特雷派（Premonstratensian）教士。而诺曼底的犹太人聚居区仍是一副安定繁荣的景象。见 N. Golb, *The Jews in Medieval Normandy* (Cambridge, 1998), 356–9。

31 H. G. Richardson, *The English Jewry under Angevin Kings* (London, 1960), 164–5. 腓

力·奥古斯都在其统治的一开始对犹太人采取了如下行动：将犹太人驱逐并没收其土地，废除基督徒拖欠他们的债务，他本人则将债款的20%据为己有。当腓力仓促中止十字军远征回国后，他对基督的信仰饱受质疑，他在布里（Brie）以使用活人祭祀的罪名拘捕了80多位犹太人，并将他们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不久后他又改变主意，允许犹太人回到巴黎，这令里戈感到十分失望。见Rigord, 15–6, 24–33, 119, 141。

32 R. B. Dobson, *The Jews of Medieval York and the Massacre of March 1190* (Borthwick Papers, xlv, York, 1974). 一位骑士曾在约克的反犹太人暴动中担任领袖，后来参加了约翰的叛乱，当约翰即位后他便因此履历而飞黄腾达，见H. Thomas, ‘Portrait of a Medieval Anti-Semite: Richard Malebisse’, *HSJ*, v, (1993) 1–15。

33 当亨利二世临终时，威廉·德·曼德维尔也随侍在旁，理查即位后提升了他的官职。HGM, 8782.

34 *Gesta*, ii, 85.

35 Newburgh, Bk 3, ch. 26; Coggeshall, 97.

36 Devizes, 7.

37 Gerald, *Vita Galfridi* (*Opera*, iv), 368, 373–5, 379; *Gesta*, ii, 88, 91, 100. D. L. Douie, *Archbishop Geoffrey Plantagenet and the Chapter of York* (York, 1960).

38 Gervase, i, 372, 382, 392, 418, 420, 435, 439.

39 M. D. Knowles, *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Cambridge, 1940), 322.

40 斯塔布斯在他所修订的《坎特伯雷书信集》的引言中，对这起争端进行了最详尽的叙述，见*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the Reign of Richard I*, ii, repr. in hi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to the Rolls Series*, ed. A. Hassall (London, 1902), 384–411。斯塔布斯认为，理查对教廷特使的态度反映出他“比父亲亨利二世更为重视个人权力和尊严，决不允许他人冒犯自己”，*ibid.* 407。

41 Gervase, i, 474–81.

42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ii, cxiv.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434.

43 Diceto, ii, 8, 34.

44 Gervase, i, 457; Gerald, *Itinerarium* (*Opera*, vi), 80，哪怕杰拉尔德声称自己成功地完成了议和使命；*De Vita Sua*, (*Opera*, i) 80–1, 84。

45 *Annales Cambriae*, ed. J. Williams ab Ithel (RS, 1860), 57; *Gesta*, ii, 87–8. 关于证明是理查而非约翰在伍斯特与威尔士王公们会面的相关论述，可参见Gillingham, ‘Henry II, Richard I and the Lord Rhys’, 225–36。与理查会面的威尔士王公具体有哪些人我

们并不清楚，但格温内斯的戴菲德（Dayfdd of Gwynedd）可能就在此列。尽管罗杰在编年史中将威尔士统治者称为“国王”（kings），但他们实际上更喜欢“王公”（princes）这个头衔。相关分析参见D. Crouch, *The Image of Aristocracy in Britain 1000–1300* (London, 1992), 85–93; H. Pryce, ‘Owain Gwynedd and Louis VII: the Franco-Welsh Diplomacy of the First Prince of Wales’, *Welsh History Review*, xix (1998), 21–4。

46 Devizes, 7.

47 *Gesta*, ii, 97. 在修订版的编年史中，罗杰补充说亨利二世通常会与里斯会面，认为理查拒绝里斯一事意义重大。*Chron.*, iii, 23. 罗杰的真正用意究竟是如现代历史学家所言，是对理查的暗中批评，还是对亨利二世的批评？从罗杰1184年对亨利二世与威尔士王公会谈的记录看，他认为威尔士人贫穷而野蛮，与他们会谈无异于浪费时间。在他提到亨利二世的“惯常做法”时，通常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48 *Annales Cambriae*, 57. 另见Norgate, 25–6。在理查离开英格兰之前，杰拉尔德已经取消了参加十字军的计划，成为隆尚的幕僚，他很可能仍在1189年秋季期间继续担任威尔士相关事务的顾问。

49 *Gesta*, ii, 81, 97–8; A. O. Anderson, *Early Sources of Scottish History* (repr., Stamford, 1990), ii, 322.

50 Gerald, *Princ.*, 156.

51 *Gesta*, ii, 99.

52 “极少有军事指挥官能像理查那样，充分认识到合理高效地征集和使用金钱的重要性。”见Prestwich, 11–12。

53 关于英格兰筹备十字军的详细情况，参见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66–83。

54 我们至今仍不清楚理查决定从海路进军的确切时间，但亨利二世最初希望从陆路进军（*Diceto*, ii, 51–4）。另据杰拉尔德记载，此时（大约在1188年初），理查便决定要从海路进军了（*Princ.*, 245）。或许在与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和热那亚人交流后，亨利二世也改变计划，同意从海路进军。见H. Möhring, *Saladin und die dritte Kreuzzug* (Wiesbaden, 1980), 71–2, 77–8。

55 据豪登的罗杰在1189年的估计，这些财富总价值为90万英镑，但他随后将这一数值修正为“10万马克以上”。斯塔布斯认为，罗杰很可能将9万英镑误记为90万，即实际数目应为9万英镑（即13.5万马克）。原始记载见*Gesta*, ii, 76–7; *Chron.*, iii, 8。

56 据理查统治时期的第一份财政署卷宗记载，有价值25000马克的财富从欧洲大陆转至英格兰。见PR 1 Richard I, 5。

57 Diceto, ii, 68. 可将此事与亨利二世吞并约克大主教罗杰财产一事相比。亨利二世一事见Diceto, ii, 12。

58 Gerald, *Princ.*, 316.

59 Devizes, 7–9. 财政署卷宗的内容证实了戈弗雷购买庄园的记载，但它并未记录戈弗雷担任汉普郡郡长一事。实际上戈弗雷也并未获得这一职务。PR 2 Richard I, 136, 151.

60 据迪韦齐斯的理查德记载，格兰维尔还需为此缴纳15000英镑的罚金。这一数额应是根据他所担任的最高司法官这一职务，而非郡长一职所确定的。

61 可证实理查参与任命郡长的相关材料，参见Richard Heiser, ‘The Sheriffs of Richard I: Trends of Management as Seen in the Shrieval Appointments from 1189 to 1194’, *HSJ*, iv (1992), 111–12. 基于‘The Sheriffs of Richard Lionheart: A Prosopographical Survey of Appointments, Politics and Patronage, 1189–99’ (unpub. Ph.D. thesi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93) 一文的系统研究，理查·海瑟认为理查一世“与他伟大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也有着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

62 R. R. Heiser, ‘Richard I and His Appointments to English Shrievalties’, *EHR*, cxii (1997), 1–19, 11. 关于应当如何看待理查与郡长们的交流，可参见E. Amt, ‘The Reputation of the Sheriff, 1100–1216’, *HSJ*, viii (1996–9), 95–7.

63 一项对1180至1212年间超过100英镑的官职等买卖记录的研究显示，除了某两年，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个名目下臣民积欠国王的债务都超过了国库收入，但在1189至1190年，国库收入则是债务数额的两倍，完全不同于其他的情况。T. K. Keefe, ‘Proffers for Heirs and Heiress in the Pipe Rolls: Some Observations on Indebtedness in the Years before Magna Carta (1180–1212)’, *HSJ*, v (1993), 99–109. 另一个特殊的年份是1196至1197年。

64 根据1190年财政署的记录，该财年的收入为31089英镑，是上一财年收入的两倍。参见N. Barratt, ‘The English Revenues of Richard I’ (即将由Archives du Calvados, Caen发表于1999年的会议论文集)。这一数值直到1204年至1205年才被超过。但我们仍不清楚这一时期英格兰王室的总收入，因为诸如1188年至1189年征收的“萨拉丁什一税”以及1190年中期时为赎回理查所征收的赎金等大量财富的数额缺少相关记录。

65 1189年时理查在英格兰停留的四个月时间内“竭尽全力扫除了他的父亲曾强加于英格兰之上的一系列稳固有秩序的统治机构”，Appleby, *England without Richard*, 36–7. 他所采取的措施也都“毫无章法”，见D. A. Carpenter, ‘Abbot Ralph of Coggeshall’s Account of the Last Years of King Richard and the First Years of King John’, *EHR*, cxiii (1998), 1225.

66 *Gesta*, ii, 90–1.

67 Ibid., i, 314–16. 据迪韦齐斯的理查记载，他怀疑格兰维尔利用亨利二世的信任为自己谋利。见Devizes, 5。

68 Newburgh, Bk 4, ch. 5.

69 Devizes, 9.

70 关于数月来罗杰与休的关系的分析，参见D. Corner, ‘The *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 and *Chronica* of Roger, Parson of Howden’, *BIHR*, lvi (1983), 132–9。作者认为，那段关于理查售卖一切的文字应写于1190年1月之后，当时罗杰认为自己无法在新政权下保持稳定的地位。

71 *Gesta*, ii, 99.

72 Diceto, ii, 73. 在引用的那段文字前，迪切托的拉尔夫还提及了约翰的婚事，并在那段文字后提及了威廉·德·曼德维尔逝世一事。这似乎表明，拉尔夫在提到“少数事务”时，想到的是约翰或隆尚，又或者是同时想到两者。不过，拉尔夫也可能另有所指。几乎可以肯定，理查咨询的人肯定包括他的母亲。实际上，埃莉诺几乎参加了1189年内的所有重大会议，而当时的编年史家们也都认识到了她的政治影响。

73 拉尔夫显然是想到约翰了，因为他在前面的文字中对约翰的叛乱进行了批判，但当约翰成为国王后，他便迅速改掉了这些记录。见Coggeshall, 52。

74 Newburgh, Bk 4, ch. 3. 类似的记载见Poole,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349。

75 Devizes, 6.

76 也有学者指出，未给予约翰足够的权力也是理查的失策之处。见Barratt, ‘English Revenues’。

77 *Gesta*, ii, 106. 约克大主教杰弗里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诺将远离英格兰。

78 见下文318页。

79 Newburgh, Bk 4, ch. 5.

80 关于威廉反对主教参与世俗政治的分析，可参见N.Partner, *Serious Entertainments .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1977), 88–92。

81 根据*The Handbook of British Chronology* (3rd edn, 1986), 450, 460, 埃塞克斯伯爵威廉·德·曼德维尔于1189年11月14日逝世，而欧马勒伯爵威廉·德·曼德维尔于12月12日逝世。

82 豪登的罗杰记载了休·德·皮塞的上述观点，*Gesta*, ii, 101, 106, 108。关于理查1189年政治规划的讨论及支持理查的论据，参见F. J. West, *The Justiciarship in England 1066–1232* (Cambridge, 1966), 67。

83 Coggeshall, 28–9.

84 Prestwich, 6–7.

85 L. Grant, *Abbot Suger of St-Denis* (London, 1998), 156–78. 但苏热成功平息了这一叛乱。显然，更为“年长也更加善变”的苏热在处理国内政事方面比隆尚更有经验。

86 Devizes, 6. 并在此向A. A. Mline致歉。

第八章

穿越法兰西，登陆西西里，1190

1189年12月30日，理查与腓力在诺南库尔附近会面。两人在会上共同发誓：维护英法十字军的共同利益，彼此相互信任。若英王领地遭受攻击，法王将如保卫巴黎一般协助前者击退敌军；若法王领地遭受攻击，英王亦将如保卫鲁昂一般协助前者击退敌军。两位国王手下的男爵们也彼此承诺：在国王远征期间互为同盟，保持和平。¹在诺南库尔会面时，腓力或许仍然希望理查能够遵守诺言，与艾丽丝结婚，但他也已预感理查很可能会出尔反尔。贝尔特兰在1188年创作的一首诗歌中就将理查称为“立伪誓者”：因为理查在已经与纳瓦拉国王之女订婚的情况下，发誓将娶腓力的姐姐艾丽丝。²实际上，理查不再希望与艾丽丝结婚，自从父亲逝世后，也没有人能够再阻止他。此前他承诺将迎娶艾丽丝，但不是现在，同时采取了各种拖延的措施。他需要保持承诺，以获得腓力对自己继承王位的支持。在他登上王位并准备踏上东征之时，他仍要维持遵守承诺的假象。若此刻他贸然回绝，不仅将导致英法十字军的分崩离析，被激怒的腓力也极可能进攻安茹帝国，这无疑会令他疲于奔命。可以看到，理查在婚约问题上延续了父亲惯用的两面派作风。³幸运的是，腓力此前已经承诺与理查一同参加十字军，而且耶路撒冷陷落对基督教世界的巨大影响，使十字军领袖们无法推卸收复圣城的责任。尽

管理查和腓力之间心存芥蒂的状况仍然对这次联合远征的前景有所影响，但等待援军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存亡并不仅仅依赖英法十字军。早在1189年9月，就已有相当数量的十字军陆续抵达圣地。最重要的是，最晚宣布参加十字军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尽管年事已高，却最先踏上征途。腓特烈于1189年5月从雷根斯堡（Regensburg）启程，沿多瑙河（Danube）缓慢向南进军。至1190年复活节时，他率领的十字军便已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

而理查在1190年上半年期间则主要忙于巡视自己的欧陆领地，并进行人员任免。理查再度起用威廉·菲茨拉尔夫（William FitzRalph）为诺曼底宫廷总管，此人精明能干，从1180年起便担任此职务，此后他又在任上度过十年，直到1200年逝世。⁴ 安茹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前任宫廷总管图尔的斯蒂芬一度为佩恩·德·罗什福尔（Payn de Rochefort）所取代，但斯蒂芬于1190年5月重返理查宫廷，可能在理查远征期间再度担任安茹宫廷总管一职。不论是谁担任安茹宫廷总管，安茹并未爆发任何动乱。阿基坦的情况则又有不同，理查在此任命了两位总管：普瓦图宫廷总管由彼得·贝尔坦（Peter Bertin）担任，此人曾是贝农（Benon）修道院院长，并长期在阿基坦公爵手下任职；加斯科涅宫廷总管则由拉塞勒的埃利（Elie de la Celle）担任，此人出身于一个知名的官僚世家。⁵（值得一提的是，理查以亨伯河为界将英格兰分为南北两部分进行治理很可能就是借鉴了自己统治阿基坦的经验，但由于两位首席司法官隆尚和休相互敌视而未能实施。而阿基坦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尽管阿基坦素以动荡著称，但这里并没有出现什么混乱，理查任命的两位宫廷总管也有效地控制了当地局势。

1190年5月至6月初，理查一直在阿基坦南部地区。他首先来到巴约讷，绞死了比利牛斯山区曾犯下拦路抢劫罪的希斯（Chis）城堡的领主。⁶ 虽然这位领主的受害者多是前往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但理查之所以深入比利牛斯山区，绝不只是希望和朝圣者们一样前往祭拜圣雅各。理查最近击败了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并迫使他向自己臣服，怀恨在心的雷

蒙德很可能会趁他远征期间兴风作浪，从而威胁阿基坦东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而雷蒙德也是所有法兰西大贵族中唯一没有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因而他理查对策是：重建并强化与雷蒙德的劲敌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同盟。毕竟阿方索二世曾给予他有力支援：他曾帮助理查平定了1183年叛乱，还在1187年2月帮助理查收复贝阿恩（Béarn），令贝阿恩伯爵向理查效忠。纳瓦拉国王桑乔六世（Sancho VI）也加入安茹-阿拉贡同盟：此前阿拉贡和纳瓦拉已渐渐倾向于合作，以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八世。三位君主很快达成了正式协议，而理查也大致在此时与桑乔六世之女、纳瓦拉的贝伦加丽娅（Berengaria of Navarra）确立婚约。

理查和贝伦加丽娅的婚姻可说是曲折离奇。⁷ 1190年冬季至1191年春季期间，理查都在西西里度过，贝伦加丽娅则在1191年3月来到理查位于墨西拿的宫廷，随后两人于5月12日在塞浦路斯岛莱梅索斯（Limassol）的圣乔治礼拜堂成婚。桑乔六世的决定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他为何要选择远征途中的理查作为自己的女婿，并急切地要让贝伦加丽娅举行婚礼？事实上，理查直到1191年3月才最终废除与艾丽丝的婚约，但贝伦加丽娅早在1190年11月或12月便已启程前往西西里。桑乔六世将一位已有婚约的十字军领袖视为女儿理想丈夫的观念显然十分独特。他一定要求理查做出了诸多保证，哪怕他再往好处想，贝伦加丽娅离开纳瓦拉前的条件谈判也一定是漫长而复杂的。而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仍然存在疑点：究竟是哪方主持了会谈？会谈于何时开始？由于将贝伦加丽娅带到西西里岛的是理查的母亲埃莉诺，因而有史学家认为：会谈由埃莉诺发起，双方在1190年夏秋季进行了会谈。理查这时已经踏上征途。也正因此，传统观念认为，理查在不考虑婚姻和继承人问题的情况下就贸然参与十字军，这是极为冒失的举动。但也有证据显示，这次谈判发生的时间更早。理查的部下们认为：早在理查还是普瓦图伯爵时，他便已经与贝伦加丽娅订婚。最重要的是，贝尔特兰在另一首1188年的诗作中也特别警告腓力：坐视理查与纳瓦拉国王之女订婚，无疑是对法王的极大羞

辱。由于理查无意与艾丽丝成婚，他很可能已经决定迎娶贝伦加丽娅。然而桑乔六世是怎么想的呢？理查在1188年11月的邦穆斯林会议、1189年7月与腓力的会谈上都表现出愿与艾丽丝结婚的意愿，他显然希望腓力二世相信他的承诺。桑乔能相信这样一个恶劣的骗子吗？

1190年圣烛节（2月2日），理查在加龙河畔的拉雷奥勒（La Réole）召开会议，加斯科涅地区的许多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教士出席，贝阿恩伯爵和阿马尼亚克（Amagnac）伯爵等世俗贵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可能主要是为了与自己的封君、已成为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的理查进行首次会面，并向他致敬。值得注意的是，萨克森公爵“猛狮”亨利之子亨利的到来，似乎表明理查的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重要的外交问题。二十年前，亨利二世在波尔多也召开过一次类似的会议，当时的议题是理查之妹埃莉诺和年轻的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八世的订婚事宜。但这些还不过是捕风捉影，更令人震惊的是，有证据显示，在此期间理查还派出一位文书返回英格兰，召集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及其他主教于3月中旬时前往诺曼底参加另一次会议。受理查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家庭会议的，除可以就婚姻法问题提供重要意见的主教们之外，还有自己的弟弟约翰和杰弗里、母亲埃莉诺，以及与自己订婚的艾丽丝。尽管我们可以猜测，这次会议必然讨论了理查与艾丽丝婚约的相关事宜，但编年史家并未留下相关记载——这毕竟是王室内务，属于皇家机密。不过我们可以确知的是，理查在会上要求约翰和杰弗里立誓在随后三年内不得进入英格兰。显然，家庭政治是理查在这次会议上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结束诺曼底会议后，理查在1190年3月16日与腓力再度见面。由于远征准备工作较为滞后，双方又将出发的时间延后至施洗者约翰节（6月24日）。不过，就在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时，腓力的王后埃诺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Hainault）在产下一对双胞胎后于3月15日不幸逝世。⁸这进一步推迟了出征的日期。不过，当时有人将其视为天主已开始失去耐心的预兆。另一方面，理查的婚事同样困难重重：在这样混乱不堪且

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要想劝说桑乔六世将女儿送往国外的某个地方举办婚礼也并不容易。此时桑乔六世尚未打消对理查可能毁约的顾虑。不过，理查早在1190年2月和3月便意识到，双方仍然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很可能在5月与6月初，他再度来到邻近纳瓦拉边境的巴约讷与桑乔六世会谈，并最终达成了共识。一位西班牙小国公主能与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君主——英格兰国王联姻，无疑是荣幸之至（如果不是，我们很难想象桑乔为何会同意这样特别的安排）。但这桩婚姻对理查的外交战略同样意义重大：它有助于维护安茹帝国南部边境的安全，而且在他离开远征时，一旦图卢兹再次发生叛乱，他在阿基坦的宫廷总管们也有了可以求援的盟友。现在，理查终于可以踏上征途。然而理查并不是不顾无子嗣问题就开始远征，而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是在婚姻问题完全解决后才正式出发的。理查在西西里等到了腓力妥协，以及贝伦加丽娅抵达。理查的优先事项是十字军，但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准备就踏上战场的狂徒。

当理查结束了与桑乔六世在巴约讷的会面后，理查返回安茹，在希农城堡颁布了管理十字军舰队海员的航海规定，这支舰队将前往首个汇合点，即靠近里斯本（Lisbon）的塔古斯河（Tagus）河口。规定写道：

若某人被证实谋杀他人，将处以偿命之罚。若案发地点位于海上，犯人与尸体将被从甲板上抛入海中；若案发地点位于陆上，犯人将与死者一同埋葬。若有目击者证实某人曾持刀威胁他人，犯人持刀的手将被砍去。若有人挥拳攻击他人，但未致人流血的，伤人者将被缚在船底，并被拖曳至船头，反复三次。若某人恶语伤人或言语渎神，将视情节轻重课以数额不等的罚金。若某人被证实犯偷窃罪，犯人将像角斗士一样被剃光毛发，他的全身将被涂上沥青，粘上羽毛，并在船能靠岸时便立刻将其弃于岸边。⁹

颁布法令后，理查前往图尔，并获得了常赠予朝圣者的礼物——手杖和香囊。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当理查倚靠在手杖上时，手杖突然断裂。但是哪怕这样的不祥之兆真的发生过，理查也毫不在意。¹⁰ 随后理查率军穿过安茹领地，于7月2日在韦兹莱与腓力会师。¹¹ 此时，两军很可能已经计划好分别前往热那亚和马赛登船，并在最适于前往近东地区的深水良港墨西拿会合。¹² 理查和腓力在韦兹莱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他们将在这次战争中赢得土地、财富和荣耀，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双方“共同约定平分战利品”。¹³ 但安布鲁瓦兹的意思是，平分战利品的情形只适用于双方共同作战所得。不过这份协议并未留下文本，只见于各种信件与编年史家的记载中。所以协议中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终于，万事俱备的英法十字军在1190年7月4日，哈丁之战三周年纪念日之际启程。理查的十字军征程也从此开始。

联军从韦兹莱出发，首先抵达里昂，在此地还有许多人加入到十字军队伍中。安布鲁瓦兹记载，十字军在这里遇到了第一次挫折：罗纳河上的一座木桥在军队通过时突然坍塌，导致后方部队的行进推迟了三天。幸运的是，尽管当时有上百人落水，但除了两人溺亡外，其他人都平安无事。为此，安布鲁瓦兹还写了一段有着强烈宗教色彩的文字：

桥落之事不足惧，诸位且听我一言——

纵使河水波涛涌，亦只数人被吞没。

亡者虽离人世去，至天主侧得清白。

此生之道已注定，如其所求得救赎。¹⁴

另外，安布鲁瓦兹表示，在里昂聚集的十字军总数达10万人以上，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实际数量或许只有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¹⁵ 但

可以确定的是，有证据显示，以12世纪的标准来看，英法十字军无疑是一支规模极为庞大的军队。而这样庞大的军队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由于里昂乡村无法继续负担联军的巨大开销，于是理查和腓力决定在此分兵前进。¹⁶ 腓力选择前往热那亚，他花费5850马克雇用了一支热那亚船队负责将军队运送到圣地。这支船队不仅要运送650名骑士、1300名扈从和他们所用的马匹，还装载了足以支撑8个月之久的粮秣和可用4个月的葡萄酒。¹⁷ 由于许多法兰西贵族此前已自行率军前往阿克（Acre），因此腓力的部队规模并不大，这与理查集中管理的大军形成了鲜明对比。英法军队规模与管理方式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大王国政治结构的差异。¹⁸

7月31日，理查到达马赛，准备与计划事先抵达、由上百艘船组成的大船队会合。¹⁹ 但这支船队此时还未抵达直布罗陀海峡。由63艘船组成的主力分队在罗伯特·德·萨布莱（Robert de Sablé）和理查·德·康维尔（Richard de Canville）率领下，已经安全抵达塔古斯河河口。但在主力分队等待由奥莱龙的威廉·德·福尔（William de Fors of Oléron）率领的其余30艘船到达时，登岸休息的船员和士兵们在里斯本引发了一阵混乱。在宗教狂热情绪的驱使下，他们对城中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发起攻击，烧毁其住宅并掠夺其财产。但在奸淫妇女、掠夺葡萄园时，他们却并不区分基督教徒与异教徒。愤怒的葡萄牙国王紧闭城门，将数百名在城中游荡的酩酊大醉的肇事者悉数逮捕入狱。直到7月24日，事态才最终平息，所有船只也终于会合，船队在两天后开始沿西班牙海岸向东航行。但里斯本的意外事故还是导致船队比原定计划迟了三周，于8月22日才抵达马赛，而此时理查早已离开。²⁰ 事实上，理查只在马赛等了一周，眼见船队迟迟未至，他决定将从韦兹莱带来的部队分为两路前进。一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拉努夫·格兰维尔，以及格兰维尔的侄子、新任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沃尔特率领，直接航向近东（很可能另外雇用了船只）。这支部队最终于9月16日率先抵达提尔。²¹ 第二路军则由理查亲自率领，全军分乘10艘大型双桅帆船和20艘桨帆船向东缓

慢前进。²² 理查拜访了热那亚，此时腓力正住在临近当地圣劳伦斯教堂的一间房屋中养病，据迪韦齐斯的理查所言，腓力正饱受晕船困扰。²³ 理查在热那亚的波托菲诺镇（Portofino）停留了5天，两人产生了远征中的第一次分歧：腓力希望向理查借5艘桨帆船，而理查表示只能借给他3艘，这令腓力十分不满，借船一事便不了了之。这次分歧虽小，却也埋下了两人日后不和的种子。

离开热那亚后，理查沿意大利海岸线南下，并不时登岸活动腿脚。当理查来到台伯河（Tiber）口，距罗马仅数英里处时，他却并未费心安排与教宗克莱芒三世的会面。²⁴ 事实上，教廷已派出一位枢机主教与理查见面，他带来的条件和理查想象的一样贪婪。而理查也以1500马克的代价使教宗将威廉·隆尚任命为教廷驻英格兰教会特使。当时的讽刺诗人说，罗马传播的福音不过是银马克的福音。理查也没在罗马停留太久，他先来到那不勒斯（Naples），在当地度过10天后又来到萨莱诺（Salerno）待了5天，共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观光旅行。²⁵ 据称理查曾在萨莱诺寻访名医，但豪登的罗杰并未记载此事。

当理查在萨莱诺停留时，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他的船队在马赛休整一周后，已经启程前往墨西拿。于是理查迅速动身，于9月22日渡过墨西拿海峡。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稍早时候他还曾侥幸逃过一劫：理查在仅有一名随从陪同的情况下，从米莱托（Mileto）出发进行陆上旅行，当他路过一个村庄时突然听到一间屋子里传来鹰的叫声。理查认为只有贵族才享有养鹰特权，于是便夺门而入将鹰抢走，但他很快就被一群愤怒的村民包围。当理查拒绝物归原主后，村民们使用棍棒和石头对他发起攻击。理查用剑背迅速击倒一位持刀攻击他的村民时，他的剑刃突然折断。理查见状只得拾起身边一切可用之物扔向村民们，试图摆脱因自己一时之失而陷入的窘境。²⁶ 当理查成功脱险后，第二天他又摆出一副盛大排场，精心策划了进入墨西拿的入城式。豪登的罗杰对入城式的情景记载如下：

理查的船队由许多双桅帆船、桨帆船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大型船只组成，这支声势浩大的船队在驶入港口时奏响号角，令全城居民大为震惊。法王腓力带着他的部下们前来围观，墨西拿城的贵族、教士和市民们也站在岸上，并为自己所见的英王的仪仗与权力而惊叹不已。²⁷

理查的确惯于以浩大声势震撼他人，正如安布鲁瓦兹所言：以盛大排场进入一座城市，正是与伟大王侯身份相称的举动。然而，理查的入场式在墨西拿城似乎恰得其反。据安布鲁瓦兹称：“城内的希腊居民（G rifons）对这阵喧闹感到十分愤怒，伦巴第人也怨声载道，他们对理查进入墨西拿的方式感到很不自在。”²⁸与理查的盛大排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腓力，他在一周前抵达墨西拿时，表现得极为低调，并接受当地统治者的安排居住在王宫中。显然，腓力也对理查这种行为十分不悦，于是在与理查进行短暂会面后，他表示自己即日将航往圣地。但腓力的船队驶离港口后风向突变，他只得又返回墨西拿，准备与理查再次会面。不过理查并未像腓力一样住在宫中，他选择与自己的军队一起在岸边宿营。

十分偶然的是，此时的西西里王国正处于它的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刻。在统治着南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和西西里岛的西西里王国，尚未被山羊破坏的土地肥沃多产：它不仅是地中海世界重要的谷物产地之一，还盛产柑橘、柠檬、棉花、甘蔗等农产品。²⁹正因如此，西西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多次遭受外来入侵而动荡不安。目前西西里王国由一支诺曼人的后裔统治，他们的祖先曾在1060至1090年时征服了这里，而他们的远亲则征服了英格兰。但西西里令这些北方征服者们最为印象深刻的既非它的物产，也非它高度完备的行政系统，而是当地居民的多样性：希腊人、穆斯林以及拉丁人（主要是伦巴第人和诺曼人）比邻而居，他们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西西里王国也显示出明显的文

化多样性特征：在首都巴勒莫（Palermo）的宫廷内通用诺曼法语，但在发布文书时则会使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尽管近期以来基督徒频繁劝说穆斯林改宗的现象令人不快，但长期以来不同群体间也算相安无事。根据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祖巴约（Ibn Jubayr）1184年游览西西里时的记载，穆斯林对基督徒并无怨恨，基督徒妇女甚至还开始模仿阿拉伯妇女的言行举止：她们在外出时戴上面纱，并总是滔滔不绝。多元文化在此地交汇，也塑造了西西里独特的文明形态，旅行者在巴勒莫、蒙雷阿莱（Monreale）和切法卢（Cefalù）等地都能看见体现西西里文化多样特征的艺术和建筑杰作。

但1190年时西西里面临着再遭征服的危机。前任国王威廉二世于1189年11月逝世，但威廉身后无子，他的继承人是他35岁的姑母康斯坦丝。康斯坦丝此时已嫁给腓特烈·巴巴罗萨还活着的最年长子和继承人霍亨斯陶芬的亨利（Henry of Hohenstaufen），这样一来，亨利便很可能与妻子共同治理西西里王国。但西西里民众并不希望接受一位德意志国王的统治，教宗克莱芒三世也担心亨利会借此机会增强实力，届时坐拥环绕教宗领土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亨利将对教宗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教宗联合西西里贵族们反抗亨利和康斯坦丝，最终，先王威廉二世的堂兄的私生子莱切的坦克雷德继承王位。坦克雷德其貌不扬且身材矮小，他的敌人们也乐于肆意嘲笑这一不足，并将他称为“一只戴着王冠的猴子”。坦克雷德在王位上就没坐稳过：西西里岛上正爆发穆斯林暴乱，王国的大陆领土面临着叛乱贵族和德意志侵略军的威胁。这两个威胁解除后，这支驻扎在自己动荡国土上的十字军大部队又开始令他忧心忡忡。³⁰ 尽管十字军们理应前往耶路撒冷，但谁能保证他们在进军途中不会制造什么事端呢？而就在不久后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另一支前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在1204年攻陷并洗劫了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莫里斯·波威克爵士便指出：“若理查兵临君士坦丁堡前，无疑将令人心潮澎湃。”³¹ 对坦克雷德而言，此刻驻扎在墨西拿的理查显然令他最为焦虑。事实上，

理查和坦克雷德处理西西里王室事务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先王威廉二世娶了理查之妹琼，逝世前还给他的遗孀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但坦克雷德对这位前王后并不信任，他不仅将她监禁，还将遗产据为己有。

³² 理查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妹妹被如此欺侮，他一抵达西西里便派出使臣前往巴勒莫，要求坦克雷德将琼释放，坦克雷德则答应了这一要求。9月28日，琼来到墨西拿与理查会合。豪登的罗杰还记载了一段逸事：法王腓力看到琼时一见倾心，不久后便传出了法王有意娶她为妻的流言，³³ 但理查对此有些不悦。更令理查不快的是，尽管坦克雷德给予琼一定的金钱补偿（迪韦齐斯的理查称，坦克雷德赠给她100万塔里金币），但他仍然没有归还原本属于她的遗产。³⁴ 除他的妻子外，威廉二世还给岳父英王亨利二世留下了包括大笔金钱，大量金器、谷物和葡萄酒，以及100艘桨帆船在内的丰厚遗产。³⁵ 由于亨利早于威廉逝世，因而坦克雷德认为这一遗赠已经失效，已不需兑现；理查则认为，这笔遗产是用于支援亨利二世准备十字军的重要物资，理应按死者遗愿交付其继承人理查。于是，理查再次向坦克雷德索要其中的金钱和战船。³⁶ 为了威慑坦克雷德，理查同时还采取了军事行动：他在9月30日攻克了墨西拿海峡大陆一侧防御严密的重要据点巴尼亚拉（Bagnara）修道院，将琼和她的家人们安置于此。³⁷

以希腊人为主的墨西拿居民们与十字军之间的矛盾很快恶化，他们也从相互憎恶升级为暴力冲突，使形势更加复杂化。正如安布鲁瓦兹所言：

城里的乌合之众们——

既有野蛮的希腊野种

也有萨拉森血统的贱民

蜂拥而起，欺压朝圣之人

他们肆意嘲笑我们
将我们蔑称为恶臭贱狗
终日在此行凶作恶
有时杀害我们的教友兄弟
并将死者弃尸于厕
暴行如此，上天可鉴！³⁸

食物价格上涨很可能是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毕竟规模庞大的十字军长期在此停留，势必导致物资供不应求、物价上涨的情况发生。但十字军们将物价上涨归咎于当地商人的贪婪，因而他们很快便与大量愤怒的墨西拿人爆发冲突。理查抵达西西里时，他便面临着如何处置坦克雷德和墨西拿人的问题。但到10月8日，理查便已成功解决问题。

10月2日，理查攻占了圣萨尔瓦多（San Salvatore）的希腊修道院，并将它作为船队的补给站，随后理查还决定要在西西里过冬。³⁹ 加上此前占领的巴尼亚拉修道院，现在理查已完全控制了墨西拿海峡两岸，而在忧心忡忡的西西里人看来，这不过是理查征服西西里的开始。⁴⁰ 次日双方爆发冲突，而理查无力结束冲突。眼见局势失控，10月4日理查便邀请法王腓力、坦克雷德王朝驻墨西拿的海军元帅马加里特（Margarit）、主持西西里防务的若尔丹·德尔潘（Jordan del Pin），以及墨西拿、蒙雷阿莱和雷吉奥三地的大主教来到他的住处召开和议。⁴¹ 正当双方即将在物价或军队纪律方面达成协议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墨西拿人开始攻击十字军，并攻击了一位阿基坦贵族——吕西尼昂的休（Hugh of Lusignan）的居住地。理查见状，立刻离开会场，命令部下全副武装，打算以武力平息事端。为避免事态继续恶化，理查决心控制整个墨西拿。战斗开始时，墨西拿人在高地聚集，试图

对理查发动了背叛性的突袭（至少豪登的罗杰这么认为），但“理查国王带着少数部队登上了这处人们认为无法攀登的陡坡，突然对敌军发起攻击”之后，墨西拿人便被击退了。⁴²随后，城门被击倒，理查率部乘胜追击，一马当先地攻入城内，杀死了许多墨西拿人。但理查也有25位随从在巷战中丧生。令罗杰愤怒的是，腓力和他的部下并没有支援理查的攻势，甚至在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他们仍在城内四处游荡，仿佛身在故乡。安布鲁瓦兹还指责了腓力部下与理查的船队交战，守卫这座港口，理查方的两位桨手也在此战中被杀。⁴³但陆上，理查领导的进军极为顺利，这些人有英格兰人、诺曼人、普瓦图人、加斯科涅人、曼恩人和安茹人，安布鲁瓦兹曾自豪地说，这些人都曾攻克过许多城镇。就这样，理查迅速赢得了胜利，以至于安布鲁瓦兹还打趣称：英格兰国王攻占墨西拿所用的时间，比教士进行晨祷的时间还要短。战斗结束后，那些奋力冲锋的胜利者们便开始按惯例掠夺战利品，安布鲁瓦兹也对这一场景进行了描述：

正如你们确知的那样，
胜利者们迅速攻克城市，
将败者的财物席卷一空；
敌舰皆被击沉，海面烟焰张天，
贫者难逃厄运，妇女尽遭劫掠，
胜者肆意横行，纵享征服之乐。⁴⁴

征服墨西拿后，理查将自己的旗帜插上城头。腓力看到在墨西拿城墙和塔楼上插遍英王旗帜的情景时极为愤怒，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因为他此前曾向墨西拿居民承诺将确保其安全。于是腓力要求理查取下旗帜，并挂上他的旗帜。按照惯例，胜利者将己方旗帜插在被征服城镇的

城墙上，便意味着公开宣示接管当地的政府和财产，理查此举无疑宣布了墨西拿由他占领、归其处置的事实，腓力显然不希望理查独享如此殊荣，他还提醒理查，此前两人曾在韦兹莱有平分战利品的约定。最终理查做出让步，撤下了自己的旗帜，同意在与坦克雷德谈判期间插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旗帜，直到双方达成协议为止。⁴⁵ 在安布鲁瓦兹看来，这场关于旗帜的争论

使法王燃起了
时间无法消磨的嫉妒之情，
并引发英法战争，
致使诺曼底满目疮痍。⁴⁶

尽管理查表面上做出让步，但他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势。理查挑出一些城中的富裕居民作为人质，并开始在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丘上修建一座木制城堡。理查将这座城堡命名为“马特格里芬”（Mategriffon），意为“杀尽希腊人”。⁴⁷

此时坦克雷德已别无选择，为了收回墨西拿，他只能接受胜利者的条件。10月6日，王国议会同意接受理查的和约。除了此前已支付给琼的100万塔里金币之外，坦克雷德还将再支付给理查4万盎司黄金——其中一半是琼应得的遗产，另一半则用于理查的日常开销，以及坦克雷德之女与理查之侄、三岁的布列塔尼的亚瑟（Arthur of Brittany）结婚时的嫁妆。理查此前已宣布：若自己死后无嗣，将由亚瑟继承英格兰王位。另外，若理查或亚瑟一方无法如约举行婚礼，则应向坦克雷德一方返还2万盎司黄金。而理查也承认了他对西西里的要求已经全部实现，并表示他在西西里期间将为后者提供军事支援，一同对抗入侵西西里之敌。⁴⁸ 尽管付出了大量财富，但坦克雷德如愿为自己找到了一位能与霍

亨斯陶芬的亨利（此时亨利已继承德意志王位，是为亨利六世）相抗衡的强力盟友。另据圣德尼的里戈记载，坦克雷德此前也曾向腓力提出联姻之请，但腓力因不愿破坏与亨利六世的友谊而拒绝了这一提议。⁴⁹事实上，理查与神圣罗马皇帝对立已久，他继承了父亲亨利二世的策略，在12世纪最后20年都与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对手“猛狮”亨利公爵保持着密切的家族往来和政治联系，因而他更愿意站在坦克雷德一方对抗亨利六世。坦克雷德向暂时驻扎在这里帮助他们的十字军支付4万盎司黄金也算是十分沉重的代价了。⁵⁰而理查与坦克雷德的友谊带来的外交资产才是更有价值的收获。当亨利六世于次年进军意大利，并入侵西西里之际，曾在1190年2月来到加斯科涅的拉雷奥勒与理查会面的“猛狮”亨利之子布伦瑞克的亨利（Henry of Branswick）在德意志后方发起了反对亨利六世的叛乱，从而使亨利六世的远征计划化为泡影。至少在理查看来，条约得来的利益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琼表示愿意将自己获得的黄金全部用于支持十字军事业的情况下。理查则将亚瑟与坦克雷德之女的订婚视为占有另一半黄金的正当理由。眼下亨利六世入侵在即，无论坦克雷德是兵败退位，还是成功击退入侵者证明自身价值，理查都将让自己或亚瑟得到这2万盎司黄金。另外，理查很可能在得知贝伦加丽娅将从纳瓦拉出发的消息后就指定亚瑟为其推定继承人，他不希望自己死后没有继承人。⁵¹

10月8日，理查将从坦克雷德处所得财富的三分之一赠给腓力，从而暂时缓和了两人的紧张关系。⁵²为避免因物价上涨导致的动乱再度发生，理查、腓力和坦克雷德三位国王对物价进行了调整，规定一条面包的单价应为1便士，并相应地调整了葡萄酒价格，将商人盈利率上限定为10%。我们并不清楚这一政策事后是否被严格执行，但十字军又在这里停留了6个月，没再遇到任何大麻烦。另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还主动提出将在墨西拿掠夺的财物还给当地居民，他也因此赢得了西西里民众的极大尊重。⁵³另一个引发纠纷的因素来自军队内部，许多士兵沉迷赌博，并拒绝偿还欠下的债务，因为十字军士兵享有延期偿还债

务的特权。最终，人们不得不规定这一特权仅适用于出征前便已拖欠的债务。理查与腓力整顿军纪，严禁普通士兵和水手趁长官不在场时进行赌博，违禁者将赤裸上身，被处以连续三天的鞭刑；骑士和教士的每日赌资上限设为20先令，超出限额者将处罚金。当然，两位国王并不受此限制。另外，联军还成立了专门管理十字军共同财产和维持军纪的财政与纪律委员会，阵亡士兵的一半财产将由该委员会管理支配，其管理者由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高级军官担任，圣殿骑士团大团长罗伯特·德·萨布莱、勃艮第公爵休和安德鲁·德·绍维尼等人均在此列。⁵⁴

尽管理查已在西西里驻留许久，但此时他并没有露出急切离开之意，他很可能早就决定等到贝伦加丽娅抵达西西里后再启程。不过，许多十字军战士却开始失去耐心，他们

认为不应继续

在此徘徊不前，并因空耗大量财富

而怨声载道。⁵⁵

为了平息部下的抱怨，理查继续采用慷慨馈赠之法，而得到理查赠予坦克雷德的黄金的腓力也得以向他的部下们赠礼。而坦克雷德也不再将十字军视为威胁，十字军的影响力使当地的一些穆斯林向自己臣服。

⁵⁶ 各方势力也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⁵⁷

值得一提的是，在理查等待新娘抵达期间，他还抽空与著名的西多会的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乔基姆（Joachim of Fiore）面谈。乔基姆相信自己已参透《圣经》，尤其是其中《启示录》一章的所有奥义，这种参悟使他能够发现历史的规律，预知未来之事。于是满怀好奇的理查便将他请来与自己见面。在与理查会面时，乔基姆首先将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圣父时代、圣子时代与圣灵时代，而圣灵时代将是人类历史发

展的顶点，届时世界将充满仁爱、欢乐和自由，人人心怀天主，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都将消失，代替它们的将是一个由抛弃物欲的圣徒们组成的公社，人们也不再需要财富和劳作。在经过精密计算后，乔基姆认为圣灵时代已经临近了，即将于1200——1260年的某个时刻到来。而更令理查感兴趣的是乔基姆关于萨拉丁的预言，乔基姆将萨拉丁视为圣子时代的七大基督迫害者中的第六位，并预言萨拉丁将很快被逐出耶路撒冷王国，本人也将被杀，所有的异教徒们也将在萨拉丁死后尽遭屠戮，基督徒们将重返耶路撒冷。随后乔基姆对理查说道：“而天主早已决定将要借您之手完成这番伟业，若您持之以恒地继续这项伟业，天主必会助您战无不胜，使您英名永存。”不管理查有多么自信，他听罢这番豪言后仍激动不已，但乔基姆又告诫他：击败萨拉丁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终结，当萨拉丁被击败后，第七位基督迫害者——敌基督（Antichrist）将会现身人世，进行为期三年半的统治。而据乔基姆说，敌基督此时便已在罗马降生，年仅15岁，他在邪恶真相暴露之前还将被选为教宗。这番言论不禁使理查心怀疑虑：如此说来，他所不喜的现任教宗克莱芒三世也可能是敌基督（克莱芒三世在位大约三年半）？但他的年龄显然不符合乔基姆的计算。而理查对这一问题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敌基督生于埃及或安条克并将统治圣地，当敌基督死后，将有六天时间供那些曾受敌基督引诱而堕落的人们为其罪过忏悔。但乔基姆在听了理查的意见（或偏见）后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陪同理查旁听对话的其他教士们仅仅对乔基姆的言论表现出了一些兴趣，但并未为其倾倒，⁵⁸ 毕竟他们多是务实之人，理查正是因为看重其指挥才能和后勤能力，而非其神学思想才命他们随军远征的。不过，乔基姆派的上述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剧烈变革后将迎来光明的第三时代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⁵⁹

随着冬季到来，海运受阻，在圣地被萨拉丁围困的基督徒们陷入了补给缺乏的困境。守军不仅要应对穆斯林的进攻，同时还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带来的疾病的困扰。每当有一匹马被杀后，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为

了抢夺一块马肉不惜大打出手，马头、肠子等其他部位也被他们吃得一干二净。到处都能看到跪地啃食草根勉强度日的士兵。与圣地守军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扎在西西里的理查大军的补给处于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保护下，破损的舰船也能被拖到岸边得到修理。理查在马特格里芬城堡以盛大排场度过了1190年圣诞节，应邀前来的法王腓力和其他贵客们无不对宴席上闪闪发光的金银餐盘、种类繁多的肉类和饮品感到惊叹不已。⁶⁰

注释

1 *Gesta*, ii, 104–5.

2 Born, no. 35, ‘S’ieu fos aissi’, 380–1.

3 法王腓力的御用编年史家们认为，理查的政策“至少是极不可靠的”，但这一观点无疑有局限性。J.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1223* (London, 1998), 78. 有人认为理查在尽力避免在立誓时说谎，参见Kessler, 62–5。

4 *HGM*, 9710–14.

5 Boussard, *Comté d’Anjou*, 114–17; Landon, nos 216, 217, 219, 223.

6 *Chron.*, iii, 35. Landon, no. 291.

7 关于随后发生的事件，参见‘Richard I and Berengaria of Navarre’, in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19–39。

8 *Gesta*, ii, 104–5; Diceto, ii, 73–4, 77.

9 *Gesta*, ii, 110–11. 这份法令上还留有“朕已亲鉴”（Teste me ipso）的字样。关于这一时期的文书规范，见J. C. Holt., ‘Ricardus rex Anglorum et dux Normannorum’, in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London, 1985), 29–30。

10 *Chron.*, iii, 36–7. 另据罗杰记载，当十字军尚未启程时，理查在韦兹莱领取了手杖和香囊，且没有遇到意外。*Gesta*, ii, 111. 安布鲁瓦兹认为，理查可能在图尔和韦兹莱进行了同样的仪式。Ambroise, 303–64.

11 关于理查从图尔前往韦兹莱，以及随后前往里昂和马赛的事迹，安布鲁瓦兹的《神圣战争史》并未记载，我们所知的记录来自理查·德·坦普洛的著作《理查国王朝

圣远征记》（*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安布鲁瓦兹著作的拉丁文翻译，成书年代约为1220年，见*Itin.*, Bk 2, chs. 8–10。在该书的第十章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的表述“我们穿越”（we crossed），因此年轻的作者很可能亲自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不过在同时代的基督徒史料中，十字军中有关“集体凝聚力”的表述十分常见，而理查这段的行程应该来自另一作者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除非有理由证明理查·德·坦普洛翻译使用的版本比现存的安布鲁瓦兹手抄本要更完整，我认为《理查国王朝圣远征记》这部作品是作者在三十年后（关于理查的传说形成的时期）重新整理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十字军事迹的补充和修缮的成果。现存的安布鲁瓦兹手稿在某些记载上有明显缺漏，见第十二章注释85，及M. L. Colker,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Leaf of Ambroise’s *L’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Revue d’histoire des textes*, xxii (1992)。

12 D. Matthew,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Cambridge, 1992), 74–5, 137.

13 Ambroise, 365–70; 理查·德·坦普洛认为，这是一份“关于双方平分战争所得战利品的条约”，*Itin.*, Bk 2, ch. 9。与安布鲁瓦兹一样，纽堡的威廉在这份协定的英文本中只提及了“双方应平分共同作战所得的战利品”，*Newburgh*, Bk 4, ch. 21。1198年时，教宗英诺森三世总结了法国方面的看法，认为它宣称“自从向耶路撒冷进军开始，途中所得的所有战利品都应平分”，*Selected Letters*, 6。

14 Ambroise, 473–80.

15 Ambroise, 419. 除了夸张的人数记载，另一个问题是安布鲁瓦兹依赖的目击者（可能就是他自己）很可能实际上并未亲眼看过这支军队，直到理查抵达墨西拿之后才加入理查的军队中。除断桥事件外，安布鲁瓦兹在理查从韦兹莱前往墨西拿期间并未留下任何记载。

16 *Gesta*, ii, 112. 豪登的罗杰在马赛加入了十字军。

17 *Codice diplomatico d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ed. C. Imperiale di Sant’Angelo (3 vols, Genoa, 1936–42), ii, 366–8.

18 需要注意的是，理查实际上是率领着一支由来自安茹帝国不同地区的士兵所组成的联军来到墨西拿的，他的部队中包括“诺曼人、普瓦图人、加斯科涅人、曼恩人、安茹人、英格兰人以及其他许多我从未见过的民族的人”，*Ambroise*, 743–7。不过英格兰人是这支军队的主体，理查也顶着英国国王的头衔，因而当时的编年史家将理查的大军简称为“英军”。

19 关于船只总量及相关开销，参见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81。

20 *Gesta*, ii, 115–22.

21 *Ibid.*, 115; *Epistolae Cantuarienses*, in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the Reign of Rich*

ard I, ed. W. Stubbs (RS, 1865), ii, 328–9, trans. Edbury, 171.

22 豪登的罗杰关于此次十字军之旅的记载也起于此时，当他将休·德·皮塞对隆尚的怨言汇报给身在马赛的理查后，才离开军队。Corner, ‘The *Gesta Regis*’, 135.

23 Devizes, 15.

24 Diceto, ii, 84.

25 理查在那不勒斯时，还来到圣热内罗（San Gennaro）修道院的地下室探访了法兰西诗歌中的英雄埃蒙（Aymon）四个儿子“在皮毛与骸骨中”的遗骸。这首名为《埃蒙四子传》（*Quatre Fils Aymon*）的诗歌（它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雷诺·德·蒙托邦》，感谢玛丽安娜·艾尔斯的指正）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查理曼针对埃蒙之子雷诺·德·蒙托邦与他的三个兄弟发起了残酷的战争，雷诺为了赎罪，踏上了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而理查在征讨图卢兹期间，很可能已探访过蒙托邦。罗杰关于理查意大利之旅的其他记载中包括理查探访其他历史古迹或文学作品中的地点的经历，如与维吉尔（Virgil, 前70——前19, 古罗马诗人）、卢坎（Lucan, 39——65年, 古罗马诗人）以及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 1015——1085年, 诺曼军事冒险家）有关的古迹。Gesta, ii, 112–15, 124–5.

26 Gesta, ii, 125.

27 Gesta, ii, 125–6.

28 Ambroise, 555–604. 他惯用“Grifon”一词称呼希腊人，“伦巴第人”则用于称呼那些在做礼拜时使用拉丁仪式的当地居民（自6世纪起，伦巴第人便开始在意大利定居）。腓力抵达墨西拿时只有一艘船驶入港口，与理查的盛大排场显然无法相提并论。另外，安布鲁瓦兹还认为，腓力努力避免被围观的人看到，也令那些因好奇而来到港口迎接他的民众们感到失望。

29 Matthew, *Norman Kingdom*, 71–85; D. Abulafia, *The Two Italies* (Cambridge, 1977).

30 Matthew, *Norman Kingdom*, 286–9; Norwich, *Kingdom in the Sun*, 356–61; E. Jamison,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London, 1957), 80–5.

31 Powicke, 105.

32 坦克雷德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威廉二世留给琼的遗产、领地蒙泰圣安杰洛伯国（county of Monte Sant’Angelo）此时正面临德意志军队入侵的威胁。

33 Gesta, ii, 126. 此时，罗杰认为，理查和腓力在经过数次会面后又重归于好。

34 Devizes, 17. 每枚塔里金币含有 $16\frac{1}{3}$ 克拉（约合3.27克）黄金，按当地度量衡计算，30枚塔里金币重1盎司。见P.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1988), 167–9.

35 *Gesta*, ii, 132–3; Devizes, 17.

36 据杰拉尔德记载，理查早在1188年时便已开始和威廉二世讨论组建十字军船队的事情。见*Princ.*, 245。

37 *Gesta*, ii, 127.

38 Ambroise, 549–58. 另一方面，安布鲁瓦兹还表示，墨西拿人对“朝圣者”与他们的妻子的谈话十分担忧。Ambroise, 611–12.

39 关于冬季对海运停航的影响，参见J. H.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87–9。理查在10月6日与坦克雷德签订的条约中，便提及自己因“狂风巨浪和恶劣天气”而航行受阻之事，*Gesta*, ii, 133–4。

40 *Gesta*, ii, 127. 迪韦齐斯的理查为此写了一篇长诗，以“这头可怕的狮子”代指理查，并指出理查攻占墨西拿是为了报复墨西拿人对其部下的恶劣态度，Devizes, 19–22。

41 *Gesta*, ii, 127–8. 罗杰和安布鲁瓦兹都认为，马加里特和若尔丹正是煽动暴乱的主使。Ambroise, 671–4. 关于马加里特的讨论另见Möhring, *Saladin*, 149–52。

42 *Gesta*, ii, 128–9; 安布鲁瓦兹还补充道：“世上从未出现过像理查国王这样的勇士。”Ambroise, 686.

43 *Gesta*, ii, 129; Ambroise, 779–86. 数年后，理查的使臣曾在罗马教廷向教宗当面控诉此事：“法王一方率先加害于我们，当我们与坦克雷德国王的部下作战时，我们向他求援。他们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对我们发起攻击，法王本人还用弩射死了我方三名士兵。”这显示了腓力的袖手旁观给理查的军队带来的怨恨心理。*Selected Letters*, 6–7. Coggeshall, 33.

44 Ambroise, 741–5, 809–10, 813–20.

45 *Chron.*, iii, 58. 但在罗杰的原始记录中，他并没有提及腓力对双方议和的态度和主张。

46 Ambroise, 827–30.

47 *Gesta*, ii, 138.

48 *Ibid.*, 132–8. 虽然亨利六世常被视为最可能的潜在入侵者，而穆瓦希德王朝（Almohad）也可能为了支援西西里的穆斯林而进攻西西里王国。Möhring, *Saladin*, 192–207.

49 Rigord, 106. 但腓力将坦克雷德视为西西里的合法统治者，而腓力在墨西拿宫中

的住所正是由坦克雷德分配的。腓力也许是在结束十字军远征返回国内时才与亨利六世结盟的。

50 理查于1191年4月10日乘船离开墨西拿，亨利六世入侵西西里王国的时间则是4月29日。

51 关于这份条约的影响和在英格兰随后发生的事件，见下文316页。

52 法军营中普遍认为，腓力应当得到财富的二分之一，但腓力“为了和平”仅仅索取了三分之一。见Rigord, 106。然而，数年后腓力的使臣便在教宗英诺森三世面前抱怨称，他们并未如约得到应有的一半财富。见*Selected Letters*, 6。

53 Ambroise, 1029–32. 豪登的罗杰认为，理查攻陷墨西拿后，使英格兰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参见*Gesta*, ii, 39; 另可对比Devizes, 16–17。

54 *Gesta*, ii, 129–32.

55 Ambroise, 1053–6. 其中一些人在理查和腓力之前就抵达了墨西拿，他们已在此等待许久。

56 Rigord, 106–7; *Gesta*, ii, 141.

57 *Gesta*, ii, 137–46.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士和使臣，豪登的罗杰很可能获得了更加重要的任务，根据*Gesta Regis*的137——146页，他被理查派往罗马，在完成其任务后，他还在12月19日时成功地帮助理查处理了达勒姆和约克的商业事务，随后他在圣诞节时返回墨西拿。详见*Gesta*, ii, 142–3; *Chron.*, iii, 71。

58 *Gesta*, ii, 151–5.

59 但乔基姆的这些言论无疑使豪登的罗杰振奋不已，当他过后修正这段记述时，他首先根据自己所知的事实将乔基姆的十字军预言加以修改，并加入了关于敌基督的见解。罗杰在1201年去世前还表示，博学的人都会相信，恶魔此时已降临人世。*Chron.*, iii, 80–6, iv, 161–2.

60 Ambroise, 1081–108.

第九章

征服塞浦路斯

冬去春来，1191年2月，在西西里等待许久的十字军已逐渐失去耐心。尽管他们也在此期间完成了诸如建造有用的攻城器械之类的工作，但这显然不是他们远赴海外的主要目的。理查只能继续以慷慨地赠礼和发放金钱的手段维持军队士气。不过这种过于悠闲的状态也令理查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的情绪也极易通过一些琐事诱发冲突。有一次，理查和腓力部下的骑士骑马出行，在途中遇见了一位带着大量藤条的农民，于是他们夺过藤条，开始了一场即兴比武。理查又一次与自己的老对手威廉·德·巴雷斯交手，由于双方宿怨已深，这场骑士比武很快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插手的混乱的斗殴，理查试图将威廉从马上击落，但威廉紧紧挂在马脖子上，毫不动摇。当理查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取胜时，他的情绪彻底失控，愤怒地勒令威廉迅速离开此地，永远不要在自己面前出现，并宣布从此开始，他将视威廉为敌人。理查确实迫使腓力将威廉送走了。直到腓力即将离开西西里的前夜，理查才终于平息怒火，允许威廉返回腓力身边继续为十字军效力。而且，是在包括腓力在内的其他所有十字军领袖都在理查面前下跪，请求两人和解后，理查才最终做出让步的。虽然理查仍然拒绝与威廉·德·巴雷斯和解，但事端平息之后他没有表现得像个不情愿的给予者：“他慷慨地将自己从英格兰带来的许多

船只分给了法王及其部下，并继续向麾下的伯爵、男爵、骑士和普通军士们进行馈赠。理查仅在2月用于馈赠他人的开支，便已等同于此前的英格兰诸王们一年的馈赠总额。我们认为理查正是以此方式获得了天主的眷顾，‘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9：7》）¹

理查过于慷慨大度的表现，无形中已令腓力自愧不如，理查最终拒绝与艾丽丝的婚姻一事，则更令腓力感到羞辱万分。1191年2月下旬，在佛兰德斯伯爵腓力陪同下，埃莉诺和贝伦加丽娅终于抵达那不勒斯。理查闻讯后立刻派出船队与她们会合，将她们护送至墨西拿。但一行人中只有腓力伯爵被获准登陆，坦克雷德的官员说，墨西拿无法容纳埃莉诺与贝伦加丽娅的庞大随从队伍、拒绝让她们登陆，而是让她们在布林迪西（Brindisi）暂时停留。显然，所谓“人数过多，难堪重负”不过是借口，理查在得知此事后立刻与坦克雷德会面，寻求解释。3月3日，理查与坦克雷德在卡塔尼亚（Catania）会面，并共处了5天时间。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坦克雷德最终表示，他是听从腓力的挑拨才这么做的。腓力此前曾告诉坦克雷德，理查的言论不足为信，他即将撕毁去年10月签订的和约，计划将坦克雷德逐出西西里，因而坦克雷德才决定拒绝她们进入墨西拿。²但罗杰的这一记载令人困惑：虽然他消息灵通，但以他的身份不可能听到两位国王的私人谈话。无论如何，埃莉诺和贝伦加丽娅未能进入墨西拿的事实都说明，豪登的罗杰并不是在单纯重复带有反法情绪的谣言。

不过，坦克雷德当时的确对十字军心怀畏惧。他并不担心腓力的少数部队，理查麾下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安茹大军才是他的心头之患。尽管理查已成为他的盟友，但考虑到理查此前突袭墨西拿的行动，以及这份和约签订的背景，他仍然无法打消顾虑。对坦克雷德来说，当务之急是了解理查的真实用意。坦克雷德对理查的顾虑使腓力能再次发挥其外交才能，正如他此前离间亨利二世父子所做的那样，他也成功地在理查和坦克雷德之间营造了不安定氛围。而腓力的用意也很明确：他要努力

挽回艾丽丝的名誉。艾丽丝与理查订婚已有二十余年，在如此漫长的婚约后被抛弃对腓力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当埃莉诺带着贝伦加丽娅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南意大利的消息传来时，腓力起初十分焦虑，但他认为，可以趁她们尚未抵达之时先将坦克雷德拉到自己一方，以此向理查施压。当时恰好也传来一个令坦克雷德倍感焦虑的消息：亨利六世已离开德意志，正率部向西西里进军。坦克雷德还得知，1191年1月20日，埃莉诺曾与亨利六世在距米兰不远的洛迪（Lodi）会面。³埃莉诺在会谈中表示，理查将尽快离开西西里，将此地让给亨利六世。不过坦克雷德对这一消息仍然半信半疑：难道英格兰国王真的打算将自己的命运与亨利六世绑在一起吗？这正是理查与坦克雷德在卡塔尼亚进行会谈的背景，理查也借此机会成功打消了后者的疑虑，重新巩固了同盟。会谈结束后，双方还互赠礼物作为重归于好的证明：理查将传说中亚瑟王所使用的王者之剑赠给坦克雷德，坦克雷德的回礼则较为实用——4艘大型运输船和15艘桨帆船。⁴

腓力之前一直在冒险。当坦克雷德确信不应再畏惧理查之后，腓力的阴谋给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此时腓力只得辩白称，这一切都是阴谋，理查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拒绝履行与艾丽丝的婚约寻找借口所营造的骗局。但他的辩白也苍白无力：首先，坦克雷德的官员曾阻止贝伦加丽娅离开那不勒斯，若理查与坦克雷德只是在装模作样，坦克雷德的官员并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其次，获准进入墨西拿的佛兰德斯伯爵在政治立场上属于腓力的对手、理查的盟友，坦克雷德这一决定也显然表明自己仍然信任理查。无论如何，此时腓力都已彻底陷于孤立与劣势。理查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他向腓力解释道，他本就无意抛弃艾丽丝，但她此前曾是父亲的情妇，还为自己的父亲生下一子，这样一来，他显然无法履行婚约，与她结婚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指控，但理查表示，他有许多证人可以证实此事。于是，为了避免此事外泄而使艾丽丝声名狼藉，腓力只得同意取消她与理查的婚约，⁵仅要求理查支付1万马克作为赔偿。理查和腓力1191年3月在墨西拿新签订条约的其他

条款，就其他争议事项达成了下列共识：吉索尔城堡和诺曼维克桑两块争议领地将归理查及其男性后代所有；若理查没有合法继承人，理查逝世后它们将转归法王及其继承人所有；若腓力没有合法继承人，腓力逝世后它们将并入诺曼底公国。其他地区的归属则维持现状。理查承认腓力对伊苏丹、格拉赛和奥弗涅地区的统治权，腓力则承认理查对卡奥尔和凯尔西的统治权。⁶ 腓力认为这个条约是对自己的巨大羞辱，为表明自己的不满和抗议，他决定在3月30日离开墨西拿，就在埃莉诺和贝伦加丽娅抵达的数小时之前。⁷ 圣德尼的里戈据此认为，英法两王的争端便源于理查拒绝履行与艾丽丝的婚约一事。⁸ 更确切说，此时双方原先的冲突变成了敌对。如乌尔里克·凯斯勒（Ulrike Kessler）所言，自此开始，腓力参加十字军的主要目标便由对抗萨拉丁转为对抗理查。⁹

年已七十的埃莉诺在经过三天休整后便返回诺曼底，将贝伦加丽娅托付给理查之妹琼照顾。关于贝伦加丽娅的外貌，当时史家的记载差异极大。迪韦齐斯的理查从未见过贝伦加丽娅，他不屑地认为“她十分明智，但不过是相貌平平之辈”。¹⁰ 安布鲁瓦兹很可能见过她，他的评价更加温和：“她是理查国王的至爱，她富有智慧、性情温和、出身高贵、相貌出众，更可贵的是，她内心纯洁、毫无邪念。”¹¹ 虽然纽堡的威廉也未见过贝伦加丽娅，但仍将她称为“因才貌俱佳而闻名遐迩的少女”。而且从威廉对贝伦加丽娅抵达西西里的描述来看，他认为，当贝伦加丽娅来到西西里与理查成婚后，这桩婚姻必将能使理查生活美满，并让他远离淫邪之举。¹² 上述记载中均未提及理查和贝伦加丽娅的性向，不过从史实记载来看，他们似乎都没有同性恋倾向。¹³

尽管贝伦加丽娅已抵达西西里，但由于正值大斋期，婚礼不得不再度推迟。虽然不能结婚，但理查至少可以踏上旅途。他认为，既然准新娘已经抵达，便无必要在此地继续久留了。于是理查开始准备出发。他将马特格里芬城堡拆解为不同部分装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1191年4月10日，理查指挥着一支有200余艘船的庞大船队驶离西西里。¹⁴ 这支船队满载着维持战争所需的一切——舰队不仅带着士兵、战马、武器盔

甲，还有重型攻城器械、粮秣以及大量财富。船队中既有作为战船的桨帆船和冲锋艇，其他用于海战、侦察和突击的各类船只也应有尽有。迪韦齐斯的理查十分偏爱准确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船只数量的确切数字：156艘帆船、24艘货船、39艘桨帆船，总计219艘。另外，根据他提供的船只的平均载人数，我们可以计算出这支远征军的规模：理查大约统率着1.7万名士兵和海员。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确实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大军。¹⁵

当船队驶离墨西拿三天后，船队在耶稣受难日（4月12日）当天突然遭遇风暴。¹⁶不过在理查的指挥下，大部分船只仍然聚集在一起、安然无恙。入夜后，为防止船只偏离方向，理查在自己乘坐的旗舰桅杆顶部挂上一盏长明灯，作为船队的向导标志。安布鲁瓦兹对这一行为描述如下：

理查国王领导着这支强大的舰队，
并如母鸡悉心照料它的鸡仔一般，
照看着舰队的船只和士兵们，
而这正是他与生俱来的骑士精神的体现。¹⁷

不过，当船队于4月17日抵达第一个集结点克里特岛时，有25艘船脱离了大部队，其中就包括载着贝伦加丽娅和琼的大船。但理查仍然继续乘风前进，于4月22日抵达罗得岛，并在这里停留了10天。当时身有微恙的理查希望在此暂歇养病，等待桨帆船队前来会合，他还命令部下搜索其他走失的船只，并收集关于“塞浦路斯暴君”的情报。¹⁸事实上，走失的这25艘船中的部分船只（包括贝伦加丽娅和琼的那艘）并没有遭遇海难，它们比主力部队更早地航向塞浦路斯，于4月24日抵达了塞浦路斯南部的莱梅索斯海岸，但其中的3艘船（贝伦加丽娅与琼那艘不在

其中）在此搁浅，所载的货物被劫走，一些船员和乘客也在意外中溺水而亡，死者还包括理查的副掌玺大臣兼掌印大臣罗杰·马凯尔（Roger Malcael），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们在上岸后则被当地人囚禁，他们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¹⁹ 5月2日，塞浦路斯的统治者伊萨克·杜卡斯·科穆宁（Issac Ducas Comnenus）抵达莱梅索斯，在此之前，一些士兵已经从监禁自己的要塞中逃出，他们也得到了战友们的协助，最终成功地与岸边的船队会合。理查也很快得知了走失船只的行踪，他于5月1日（伊萨克抵达莱梅索斯的前一日）驶离罗得岛。²⁰ 他能快速寻找到贝伦加丽娅和琼的下落，并且在他们对素有暴君之名的伊萨克有些畏惧的情况下，仍选择留在莱梅索斯，这说明他们在此之前就选择此地作为他们自离开墨西拿后的第二个集合点。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当理查得知腓力已经投入阿克围城战时，他“立刻有了新的计划”，逆风航向塞浦路斯。²¹ 理查的新计划就是：征服塞浦路斯。²²

数世纪以来，塞浦路斯一直处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现任统治者伊萨克·科穆宁于1184年开始统治此地，此人出身于前朝王室科穆宁家族，与如今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安杰勒斯王朝（Angelus dynasty）相互敌对。²³ 对那些熟悉近东基督教形势的人而言，塞浦路斯对维持从南意大利到近东地区的物资补给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若拉丁人占领此地，他们将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使塞浦路斯成为支援十字军行动的重要后方基地，耶路撒冷王国的形势也将大为改观。前不久理查还在西西里时，或许便已认识到塞浦路斯的价值。²⁴

伊萨克·科穆宁肯定得知，这支东征的军队此前曾在西西里过冬，眼下这支不请自来的大军还在他治下的海岸地带登陆，这显然是不宣而战的标志。事实也的确如此：此前的一支小分队虽然进攻受挫，但他们并未逃离，这显示他们在等待主力援军抵达。对理查的行动深感困惑的伊萨克可能在此时决定与萨拉丁建立同盟，而这令许多西方人震惊不已。安布鲁瓦兹对此事评价如下：

传言称希腊人与穆斯林签订条约时，

他们会彼此喝下对方的血

作为确认友谊的标志。

而现实情况正是如此，绝非天方夜谭。²⁵

理查于5月6日抵达莱梅索斯，但此时伊萨克已经将当地所有可用的物资——房门、长椅、木箱、木板条、石堆、废弃船只残骸等都搬走，并利用这座城市加固海岸防卫。²⁶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首先向伊萨克派出使臣，要求他赔偿己方遭受的损失并归还夺走的财物，但伊萨克回绝了这一提议，据说他还轻蔑地说了一句“让你的陛下见鬼去吧”作为回复。²⁷尽管伊萨克在决策上极其失败，但没有比在敌人面前强行登陆更危险的事了。正如安布鲁瓦兹所言：“若此时开战，我们无疑将处于下风——我们远道而来，且饱受风浪颠簸之苦；我们现有的船只也太小；士兵们都徒步前行，还要身负沉重的武器。敌人却本土作战，以逸待劳。”但无畏的理查并不在意，并命令部下做好恶战一番的准备，随后他们迅速登上小船，向岸上的敌军发动进攻。当守军进入己方远程部队射程内时，理查便下令船上的弓弩手们向他们射击，迫使他们后撤。在弓弩手的掩护下，理查一马当先，率一支突击队跃入浅水区域，冲向海滩。经过一番激战后，由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塞浦路斯守军被击退。但理查出于谨慎并未在未知的山区追击逃敌，而是全面接管了莱梅索斯的城镇和港口，他们还在这里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补给。²⁸

罗杰和安布鲁瓦兹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记载却截然不同。据罗杰记载，伊萨克得知战败消息后重整部队，并在距莱梅索斯5英里处扎营，宣布他将在明日发起反攻。但理查的侦察兵探明了敌军的动向并向他汇报，理查闻讯后便悄悄地调集军队，趁敌军夜间酣睡时对大营发起突袭并大获全胜，伊萨克甚至顾不上穿衣披甲便慌忙逃窜。安布鲁瓦兹的

记载则是：理查趁着夜色让船上的战马登岸，待它们充分活动后，便亲自率领至多50名骑士趁夜色冲击敌营。理查出阵前，一位名为于格·德·拉马尔（Hugo de la Mare）的教士认为敌众我寡，试图劝说理查后撤，理查则不以为然地答道：“以天主和圣母玛利亚之名起誓，我的教士先生，请你专注于写作吧，战斗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这些骑士好了。”说完这番话后，理查便率军以“迅于惊雷之势”发起猛攻，横扫敌军。但上述记载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一，他们都记录了伊萨克遭受理查突袭的事件（安布鲁瓦兹还补充道，伊萨克根本没想到理查带着战马随行，更没想到他在航海一个月后还能骑马）；其二，他们都记录道，理查在这次突袭中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伊萨克随军带来的所有珍宝、牲畜、战马（安布鲁瓦兹表示，它们都优于理查军中的战马）、武器等物统统被理查缴获，战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专属于伊萨克的王家战旗，它以金线织成，极为贵重。战后理查便立刻决定将这面战旗献给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²⁹ 不过，安布鲁瓦兹的记载似乎比罗杰的记载更符合实际情况。但无论发生了什么，理查仅在一天内便赢得两场大胜，这足以震慑当地人，使他们相信臣服于自己方为上策。很快，许多塞浦路斯地主来到理查营中，向他交出人质，表示臣服。5月11日，眼见越来越多的部下归附理查，众叛亲离的伊萨克只得求和。

就在伊萨克决定求和当天，又有一群访客来到莱梅索斯。为首的是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和他的弟弟、理查的宿敌杰弗里。但吕西尼昂家族此时已不再在普瓦图地区继续兴兵作乱，他们此行是为了与理查联手，对抗他们的共同政敌法王腓力。当腓力于4月20日到达阿克后，便发起政变将居伊逐下王位，以蒙特费拉的康拉德取而代之。居伊早在1188年6月便已被萨拉丁释放，结束了一年的监禁，付出的代价是他立誓不再与萨拉丁敌对。然而，对居伊而言，找到一位教士使他解脱誓言束缚并非难事。不幸的是，在居伊被囚禁期间，康拉德由于保卫提尔的功绩成为基督徒心中的新英雄，康拉德也认为自己比居伊更适合当国王。 1187年9月，当萨拉丁攻取耶路撒冷王国几乎所有市镇和城堡后，

决定先围攻耶路撒冷，而不是围困重要的沿海要塞提尔。正是在康拉德的有力指挥下，提尔守军利用这为期数周的喘息之机重整军队，加强防务。10月2日，正是先知穆罕默德从耶路撒冷升往天堂的纪念日，当天萨拉丁也如愿进入圣城。萨拉丁的文书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的宣传价值，将许多热情洋溢歌颂这一功绩的书信传遍伊斯兰世界。耶路撒冷是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三圣地，它在萨拉丁的努力下得到光复，这一不世之功足以使萨拉丁的英名万古流传。

攻占耶路撒冷后，穆斯林全军达到了1187年出征以来情绪最激动的时刻。悲惨的是，事情还未结束。萨拉丁决定乘胜追击，指挥着自己的久战之师开始围攻提尔。但11月时提尔的城防工事达到了最好的状态，这使穆斯林军队陷入极为艰苦而持久的消耗战之中。若提尔守军能坚守过冬季，它将无疑能为随后抵达的基督徒援军提供登陆的滩头阵地，从战略角度来讲，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提尔具有比耶路撒冷更为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若法兰克人丢失了这个重要据点，他们也将永远失去收复圣墓教堂的希望。而萨拉丁在随后数年内也将为自己在1187年9月过于重视政治因素、轻视军事因素的决策感到后悔不已。当然，这不过是后见之明，至少在1187年秋季，萨拉丁的凶猛攻势仍然显得不可阻挡，耶路撒冷和提尔这两座孤城也都显得不堪一击。

最终，提尔成功击退了萨拉丁的进攻，1188年1月1日，萨拉丁下令从提尔撤军。康拉德将这一胜利视为自己时运已至的标志，于是他便开始以王国实际统治者自居，并拒绝了居伊让他交出提尔的要求。居伊这时也成了真正的“无地王”，康拉德认为他已经不再是国王了。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居伊组织部队围攻阿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王位变得更加岌岌可危。雪上加霜的是，1190年秋季，居伊的妻子西比拉和两个女儿先后因军中流行的疫病逝世。众所周知，居伊的王位继承权直接来自与王国女继承人西比拉的婚姻，西比拉逝世之后，居伊的权力合法性就不再是无可置疑的了。尽管居伊坚持认为，自己已经过神圣的涂油礼加冕为王，理应继续统治，但他1186年9月的加冕礼同样争议不小。

³⁰ 拥有继承权的西比拉已经逝世，那么她的妹妹伊莎贝拉应获得继承权。于是，康拉德试图与伊莎贝拉结婚以使自己成为合法的耶路撒冷国王。有传言称，康拉德曾有过两段婚姻，而他的意大利前妻和希腊前妻中至少有一人仍然健在，但这些在军营中散播的谣言并不可信。另外，伊莎贝拉无疑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多伦的汉弗莱（Humphrey of Toron）依然健在，他此刻也参加了阿克围城战。但是军营中也有教士，而只要有教士在，他们就可以宣布解除某些人的婚姻关系。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于1190年10月抵达圣地时，康拉德很可能向他提出了这一请求，但被鲍德温严词拒绝。随后康拉德又以增加比萨在近东地区的商业特权为条件，获得了比萨大主教的帮助。一切就绪后，伊莎贝拉被绑出她在阿克城外的营帐，她的母亲劝说她接受了她与汉弗莱的婚姻非法的结果。尽管汉弗莱极力抗议，但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康拉德和伊莎贝拉于11月24日结婚。但这桩婚姻其实违反了教会法禁止近亲结婚和重婚的规定：伊莎贝拉的姐姐西比拉曾经是康拉德的兄长威廉的妻子，而伊莎贝拉的前一桩婚姻也不是合理解除的，教宗的调查团最终也认为伊莎贝拉重婚。不过这起法律上的闹剧至少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耶路撒冷王国需要一位坚定有力且有技巧的统治者，汉弗莱则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康拉德与伊莎贝拉返回提尔，将居伊留在阿克，这使他们在几个月内免于发生直接冲突。但当法王腓力抵达阿克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康拉德重新加入围城战中，腓力还承认了他的国王候选人身份。³¹

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下理查会选择支持居伊。从亲缘关系上说，已经逝世的西比拉是理查的表妹，哪怕在她去世后，他仍视居伊为合法的国王。同时，作为阿基坦公爵，理查很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吕西尼昂家族的封君和保护者，根据封建关系，他应当帮助封臣维护其合法权利。另外，还有一位吕西尼昂家族成员、居伊和杰弗里的侄子休（Hugh）正在理查麾下效力，这或许也是促使理查支持居伊的原因之一。当然，理查出于对腓力的不满也自然会站在反对后者的一方。在得到了理查的支持后，居伊率领包括多伦的汉弗莱在内的所有部下向理查宣誓效忠。

³²次日（5月12日），理查与贝伦加丽娅在莱梅索斯的圣乔治礼拜堂完婚，埃夫勒（Evreux）主教约翰还在婚礼上将贝伦加丽娅加冕为英格兰王后。³³理查在塞浦路斯成婚可能出于以下考虑：尽快向腓力显示自己已婚的既成事实，让他彻底死心；而相对平静的塞浦路斯也显然比战火中的阿克更适合举办婚礼。因此，一位英格兰王后在塞浦路斯城镇被诺曼教区的主教加冕。理查是英格兰的国王，但他管理的土地远不止英格兰本土，依赖理查生存的人也需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范围内活动。在埃莉诺仍健在的情况下，贝伦加丽娅还获得了属于她的寡妇产——加隆河以南的加斯科涅地区的全部权利，这是理查在实现他与纳瓦拉的桑乔婚约中的承诺。³⁴

不久后，伊萨克也派出使臣回报理查，表示同意和平条件，并宣誓将效忠理查。于是理查便送还了缴获的部分战利品，包括伊萨克专用的三顶华贵营帐：在“议会”（和谈）期间，这位“皇帝”就将这三顶营帐支在双方谈判代表之间。但这些和平条件实在太过苛刻，他似乎并不打算遵守条约。³⁵这很可能只是伊萨克的缓兵之计，他打算借此了解理查的真正计划。他突然离去，再次抛弃了他的营帐和装备。³⁶不过，据说这正中理查下怀，³⁷伊萨克的行为恰好给了理查征服整个塞浦路斯的正当理由。据豪登的罗杰描述，理查当时“显得十分谨慎”。他将部分军队交给居伊，令他们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追击敌军并俘虏伊萨克；其余的部队则重新登船，理查指挥一半部队从岛的一侧开始巡航，索恩厄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Thornham）则指挥另一半部队从另一侧开始巡航。³⁸在巡航期间，两只船队还趁机攻占了一些沿海市镇和城堡，并俘虏了一些敌舰。当理查在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暂留时，还与腓力的两位使臣——德勒·德·梅洛（Dreux de Mello）和博韦的腓力（Philip of Beauvais）见面。两位使臣请求理查尽快前往阿克支援围城军队，但由于博韦主教此前曾主持康拉德和伊莎贝拉的婚礼，并宣布婚礼合法，理查和居伊对腓力选自己这位表兄做特使极为不满。³⁹据安布鲁瓦兹记载，会谈的氛围也极为恶劣，在会谈时理查表示：

哪怕给他半个罗斯的财富，
也不会改变自己征服塞浦路斯的计划，
待夺取它的所有财富后，
他自会率军前往叙利亚。⁴⁰

很快，理查便率军从法马古斯塔进入塞浦路斯内陆地区，向首府尼科西亚（Nicosia）进发。据安布鲁瓦兹记载，为了防止遭受突袭，理查亲自指挥殿后部队。正如理查所料，伊萨克试图发起突袭，但被有备而来的十字军击退。当理查攻克尼科西亚后，越来越多的塞浦路斯人开始向理查臣服。有证据显示，伊萨克的统治并不得人心。作为征服者的理查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起宣传战。一个典型的将伊萨克描述为一位残暴的篡位者的故事是，一位诚实的贵族劝伊萨克向理查投降，却被伊萨克判了剐刑。⁴¹

尽管首府失守，但伊萨克仍在塞浦路斯北部山区的重要城堡——布法文托（Buffavento）、坎塔拉（Kantara）和圣希拉里翁（St Hilarion）坚守。法兰克人又将圣希拉里翁城堡称为“爱神之堡”（Dieu d’Aamour），声称它是塞浦路斯女王维纳斯（Venus）为儿子丘比特（Cupid）所建，这个传说无疑也符合这里的浪漫色彩。伊萨克认为理查迟早会离开这里前往圣地，决定暂时据守城堡，待理查出兵前往圣地后再伺机夺回失地。这个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居伊攻克海岸要塞凯里尼亚（Kyrenia）并俘虏了伊萨克的独生女。⁴²伊萨克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欲绝，彻底放弃抵抗，于1190年6月1日正式向理查投降。投降时（据说）他只向理查提出一个条件：不要让自己戴上铁镣铐。理查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命人用白银特地为他打造了一副镣铐。⁴³这个故事流传颇广：它引人发笑却又令人惊叹。⁴⁴

虽然塞浦路斯的面积只与东盎格利亚大致相等，但它的多山地形使

征服此地变得极为困难。理查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塞浦路斯，除了成功利用伊萨克爱女心切的弱点之外，他在战前的精心谋划，以及海陆军协同作战才是取胜的关键。例如，攻克凯里尼亚的决定性胜利便有赖于“海陆军的相互配合”。⁴⁵ 最终，征服者理查如愿以偿得到了塞浦路斯的巨量财富。除了缴获的战利品和没收的反抗者财产，他向每一个塞浦路斯人征收了50%的资产税；相应地，他许诺将尊重当地的法律与风俗习惯。但是从现在开始，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成了得到安茹军队支持的安茹官员。作为新统治的标志，理查还下令所有希腊男人像西欧人一样剃去大胡须，并任命两位英格兰人——索恩厄姆的罗伯特和理查·德·坎维尔（Richard de Canville）治理塞浦路斯。⁴⁶ 并不是所有人都臣服了，一些人在一位伊萨克亲戚的率领下发起暴动，但暴动被索恩厄姆的罗伯特迅速镇压，伊萨克的这位亲戚也被俘虏并绞死。⁴⁷ 这起暴动也让理查产生了迅速将塞浦路斯转给他人的想法，于是他很快以10万第纳尔的价格将塞浦路斯卖给了圣殿骑士团，后者则一次缴纳了其中的4万第纳尔作为首付。⁴⁸ 斯塔布斯认为，理查对待征服领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在书中轻蔑地写道，理查“根本没有像其父亲或他的对手腓力那样拥有延续一生的扩张领土的计划”，他如此轻易地夺取了塞浦路斯的巨额财富，又更加轻易地抛弃了它。⁴⁹ 尽管后世史家大多认为塞浦路斯是英格兰王国的一部分，但安布鲁瓦兹认为“英格兰国王不过是以天主之名攻城略地，并将其战果交予天主任其处置罢了”。⁵⁰

但不可否认的是，征服塞浦路斯是理查的一着好棋，它对保卫圣地有着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尽管相对来说，它距圣地较远，不易受到攻击，但它距地中海东岸仍然很近。只要从岛上的斯塔夫洛伏尼（Stavrovouni）修道院周边的丘陵向东远望，便能看到对岸黎巴嫩覆满雪松林的山地。这一重大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阿克城外十字军的士气，正如安布鲁瓦兹所言：

理查国王征服塞浦路斯的伟业，

令基督徒全军士气大振，
因为从此他们重获补给，
保持战力。⁵¹

理查很有可能在东征一开始就打算征服塞浦路斯，但是最了解情况的人——理查本人似乎并不这么想。我们可以从理查在8月6日时写给隆尚的一封信中，读到理查自离开墨西拿后对其经历的自述：

.....我们离开了墨西拿，继续朝圣之旅。为了寻找遭遇海难的船队，我们便来到塞浦路斯（*Cyprum divertimus*）。但当地那位既不尊崇天主，亦不善待民众的暴君自称为拜占庭皇帝，不仅掠夺了海难幸存者，并监禁了快要饿死的人，还组织大军试图将我们逐出港口。于是，为了帮他们复仇（*vindictam*），我们勇敢地与他作战，并在天主保佑下迅速取胜。我们还将暴君和他的女儿俘虏并戴上镣铐，整个塞浦路斯岛及其重要据点也统统向朕表示臣服。⁵²

在这段自述中，理查并未说明自己征服塞浦路斯的用意，只是简单地将它称为一起复仇事件并称自己远离了东征路线（“我们的朝圣路线”）。到8月6日时，无论理查是否计划了这次征服，他将其称为复仇的原因显现了出来：身在阿克的腓力要求理查按照此前在墨西拿的约定，将一半的战利品和半个塞浦路斯岛转交给他。理查则回复称，他和腓力的约定只适用于处置“在耶路撒冷”获得的战利品，但若是腓力愿意将半个佛兰德斯伯国，以及佛兰德斯伯爵腓力和圣奥梅尔（*St Omer*）城主所留给腓力的遗产的一半交给自己，他就答应腓力的要求。豪登的罗杰记录的在这次争执后制订的新条款是，平分战利品与征服地的做法适用于耶路撒冷。⁵³但“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的收获是否应平分，人们却有分歧

。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原始版本与墨西哥和阿克的修改版本中都存在刻意模糊的用词。若腓力将“以天主之名”与理查平分东征所得的战利品，那么理查称征服塞浦路斯是为应对海难而实现的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不是东征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更符合他的利益。8月6日，腓力已踏上回国之路，并在路上宣扬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权利。理查自然也需要向他的领土上的人宣扬他的版本的条款。如果他计划了征服塞浦路斯一事，他也有理由不说实话。⁵⁴

注释

1 *Gesta*, ii, 155–7.

2 *Ibid.*, 157–9.

3 *Die Regesten des Kaiserreiches unter Heinrich VI*, ed. J. F. Böhmer and G. Baaken (Cologne-Vienna), *Regesta Imperii* IV/3, no. 116.

4 *Gesta*, ii, 159. 根据这份报告，理查起初表示，他不接受除“某个特定的小小戒指”之外的任何礼物。关于礼物交换的讨论，见M. Warren, ‘Roger of Howden Strikes Back : Investing Arthur of Brittany with the Anglo-Norman Future’, *ANS*, xxi (1998)。

5 *Gesta*, ii, 160. 此前，已有人为针对亨利二世的这一指控进行了辩护，见Warren, 611。但我们很难忽视豪登的罗杰详细记述了这是理查告诉腓力的，也很难相信理查编造了这个故事以逃避他不愿接受的婚姻。因为如果只是要逃避婚约，他只需找一个证人说艾丽丝曾经育有一子，而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足够了（“我从未与她发生关系。”*Philippidos*, iv, 129.），他不需要说他的父亲是这个孩子的生父。无论理查与他父亲的关系在后者死前多么糟糕，我都很难看出他有什么理由要编造这样的故事。相关分析见Kessler, 40。

6 关于这一条约的内容及分析，参见Landon, 228–32。但据罗杰记载，在条约中，理查同意将诺曼维克桑归还给腓力。*Gesta*, ii, 161; *Chron.*, iii, 99. 但罗杰的这一记载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数年后腓力的使臣在教宗面前陈述英法争端时，没有提及理查拒绝归还维克桑的违约之事，*Selected Letters*, 6–7. Kessler, 72–3. 这或许是由于热衷于档案的罗杰在与腓力一同返回时才看到腓力给他的条约备份，而这个备份是伪造的假文书。罗杰直到1192年夏季才完成我们所见到的对十字军之旅的记录，见*Gesta*, ii, 150. 贝尔特兰·德·博恩还嘲笑了腓力将吉索尔城堡赠给理查的慷慨之举，见Born, no. 42。

7 *Gesta*, ii, 161.

8 Rigord, 107–8.

9 Kessler, 75.

10 原文为“*puella prudentiore quam pulchra*”, Devizes, 25。他的这句话追求的是压头韵，而不是事实的准确性。

11 Ambroise, 1140–3.

12 Newburgh, Bk 4, ch. 19.

13 关于理查与贝伦加丽娅婚姻的其他讨论，见下文364页。

14 Devizes, 35. 迪韦齐斯的理查认为，“理智的年轻女士”贝伦加丽娅“此时可能仍是处女之身”。

15 Devizes, 28, 35. 关于军队规模的计算，参见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66。对船队和军队数量的分析，参见Prestwich, 7–8。

16 *Gesta*, ii, 162. 从这时起，罗杰关于理查航海历程和征服塞浦路斯的记载均缺少明确日期，只在记录理查的婚礼、贝伦加丽娅被加冕为英格兰王后这两件事时提到了当天的日期——6月1日。考虑到罗杰会在他可以的时候给出确切日期，尤其是皇家行程的日期，这表明他在4月12日至6月初的这段时间内并非事件的见证者。罗杰当时很可能乘坐的船不在理查统率的大部队之内，而安布鲁瓦兹所乘的船却在大队中，所以后面的事件我主要参考了他的说法。

17 Ambroise, 1247–50. 关于对理查海军统帅才能的赞誉，见Devizes, 35。

18 Ambroise, 1269–312. 由于桨帆船的船舷较低，因而在遭遇强风大浪时极易沉没。据安布鲁瓦兹所言，它们只能跟在理查的旗舰后排成一行缓缓航行。另见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69–71。

19 *Gesta*, ii, 162–3. 当罗杰·马凯尔的尸体被冲上岸后，他通常用链子戴在脖子上的印章被人发现。罗杰的这一记载或许来自档案记录。只有理查·德·坦普洛记录了发生海难的时间：圣马可节（4月25日）前夜。*Itin.*, Bk 2, ch. 30. 他或许是翻译了安布鲁瓦兹的相关记载，但这未必就是准确的事发时间。

20 Ambroise, 1315–18.

21 *Ibid.*, 1340–7.

22 关于“理查事先制订了征服塞浦路斯计划”的观点，最先由萨拉丁的大臣伊马德丁提出，见Imad al-Din, 291。他显然是在理查征服塞浦路斯后留下了这一记载。现代史家中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rundage, *Richard Lionheart*, 100–1。普雷斯特维奇提

出了支持这一论点的相关证据，见Nelson, *Coeur de Lion*, 8–9，凯斯勒则进行了进行了完善，见Kessler, 127–50。

23 P. W. 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and the Crusades 1191–1374* (Cambridge, 1991), 3–4.

24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纳布卢斯的加尼尔（Garnier of Nablus）就是一个出生在圣地的人。他在1190年12月曾与理查一同待在墨西拿。早些时候，加尼尔作为医院骑士团英格兰分团长，参加了1189年9月的派普威尔会议和戈丁顿（Geddington）会议，Landon nos 41, 54, 346。关于加尼尔的生平，参见J. Riley-Smith,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c. 1050–1310* (London, 1967), 107–8。

25 Ambroise, 1391–4. 关于伊萨克与萨拉丁结盟的时间，参见Möhring, *Saladin*, 186–7。理查·德·坦普洛增补了安布鲁瓦兹的记载，称伊萨克试图引诱琼和贝伦加丽娅上岸，欲行不轨。见Itin, Bk 2, ch. 31。

26 和塞浦路斯岛的其他城镇一样，莱梅索斯外围也没有城墙保护。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14.

27 Ambroise, 1447–62. 13世纪的近东编年史中，均详细记载了理查征服塞浦路斯一事。译文见Edbury, 100–4, 176–8。尽管这些记载均基于地理常识提出了一些具体地名，但它们都与安布鲁瓦兹的叙述并不相符。因而我在此并未引用，但它们无疑可以作为50年后这里的人们如何认识理查征服塞浦路斯的相关佐证。

28 Ambroise, 1503–64. 另见Gesta, ii, 163–4; Chron., iii, 107。

29 Gesta, ii, 164; Ambroise, 1565–694.

30 B. Z. Kedar, ‘The Patriarch Heraclius’ in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 Prawer*, ed. B. Z. Kedar, H. E. Mayer and R. C. Smail (Jerusalem, 1982), 196–8; Gillingham, ‘Love, Marriage and Politics’, in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244–6.

31 见下文220页。

32 Ambroise, 1701–27; Gesta, ii, 165. 当时和居伊一同向理查效忠的贵族还有安条克公爵博希蒙德（Bohemund）及一位亚美尼亚贵族利奥（Leo），后者于1197年成为亚美尼亚王国国王。

33 Gesta, ii, 166–7.

34 E. Martène and U. Durand, *Veterum Scriptorum et Monumentorum Amplissima Collectio*, i (Paris, 1924) cols 995–7. 当埃莉诺逝世后，她的寡妇产—在英格兰、诺曼底、曼恩、图兰和普瓦图所获得的领地都转为贝伦加丽娅所有。不过，理查的继承人似乎对

这一协定没有异议。见I. Cloulas, ‘Le Douaire de Bérengère de Navarre, veuv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et sa retraite au Mans’, *CCM* (forthcoming)。

35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伊萨克当时还愿意支付3500马克作为补偿，并率领500骑兵进攻叙利亚的穆斯林。此外，伊萨克还提出将所有城堡交给理查作为凭证，待理查确认他的忠诚后再归还自己。Ambroise, 1775–832. 但罗杰记载的条款更为苛刻：伊萨克应支付20000马克，提供更多的军队，并将他的独生女交给理查，由理查为她指定丈夫。Gesta, ii, 165.

36 Ambroise, 1833–50.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蒙特费拉的康拉德的部下该亚法的派恩（Païen of Caiphas）建议伊萨克逃离会议，继续为塞浦路斯对抗理查。一旦理查支持吕西尼昂的居伊，那么阻止理查在占领塞浦路斯的情况下抵达阿克城下更符合康拉德的利益。若康拉德确实派出这位部下与伊萨克共谋，这个计划显然落空了。通过迎娶伊莎贝拉，康拉德已经与一位科穆宁家族的公主结婚，使他与伊萨克建立了亲戚关系。Kessler, 146–7.

37 现存的相关材料均对理查更有利，但我们不宜简单地完全采信。如果安布鲁瓦兹关于派恩的故事（见上一注释）真的有可信的地方，那也应当是派恩提醒了伊萨克当心理查的奸诈手段。而伊马德丁也认为，理查使用诡计征服了塞浦路斯，Imad al-Din, 292。康拉德派去面见萨拉丁的使臣很有可能向伊马德丁提供了这一信息。

38 Gesta, ii, 166. 尽管罗杰称理查在莱梅索斯登陆时，船队中已有桨帆船，但安布鲁瓦兹则记载：直到理查举行婚礼后，他“期待已久”且已全副武装的桨帆船队才抵达塞浦路斯，Ambroise, 1745–8。如果理查真的不顾恶劣天气匆忙起航离开罗得岛，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何他的桨帆船队姗姗来迟。直到这些具有近岸作战能力的桨帆船抵达，理查才得以开始征服塞浦路斯的战斗。

39 Ambroise, 4129; Edbury, 96.

40 Ambroise, 1899–902. 另见Gervase, ii, 88，杰维斯认为，腓力当时试图诱使理查尽快离开塞浦路斯。

41 Ambroise, 1907–62.

42 Ibid., 1967–2006. 居伊获胜的消息传来时，理查正因病在尼科西亚休养。关于“伊萨克·科穆宁的宝库所在地，全岛守备最为严密之地”凯里尼亚的重要地位，见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13。

43 Ambroise, 2014–46; Gervase, ii, 88.

44 Prestwich, 3. 安布鲁瓦兹加入了一段关于伊萨克与女儿重聚的感人情节，Ambroise, 2057–9。

45 Ambroise, 1972.

46 *Gesta*, ii, 167–8; Ambroise, 1945–8. 理查·德·坎维尔在此不久后逝世。

47 *Gesta*, ii, 172–3. 14世纪晚期的《莫斯修道院编年史》（*Chronicle of Meaux Abbey*）记载了理查向塞浦路斯政府提出的要求，而这一修道院与索恩厄姆的罗伯特关系密切，编年史的相关记载很可能参考了罗伯特的回忆，其中还提及了罗伯特将叛乱者绞死、激怒理查一事。据说理查认为，哪怕是绞死一位僭称国王的人也是对王室尊严的侮辱。*Chronica Monasterii de Melsa*, ed. E. A. Bond (RS, 1866), i, 258–60.

48 Edbury, 112.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是：当理查参加阿克围城战期间，圣殿骑士团提出向他购买塞浦路斯岛的请求。*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5 vols, Paris, 1844–95), ii, 189. 双方就此讨论了交易细节问题。但是交易不可能在豪登的罗杰（他并未记载此事）离开阿克返回英格兰之前完成。他离开的时间约在8月初。理查在1191年8月6日的一封信中没有提及转卖塞浦路斯一事，他的措辞显示塞浦路斯仍然在他的控制下。Edbury, 178–9, *Epistolae Cantuarienses*, in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the Reign of Richard I*, ed. W. Stubbs (RS, 1865), ii, 347. 里戈则确认了双方以25000马克达成交易，而从腓力索要半个塞浦路斯岛的声明来看，法王宫廷似乎十分关注达成交易的条件，Rigord, 118.

49 Stubb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321. (Itin., i, xxv)

50 Ambroise, 2081–2. 对于之后英格兰方面的看法，见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11–12. 亨德尔创作于1727年的歌剧《理查一世，英格兰之王》（*Riccardo primo, Rè d’Inghilterra*）主要叙述的便是理查征服塞浦路斯的事件。

51 Ambroise, 2367–70. 关于塞浦路斯对十字军补给重要意义的类似叙述，参见Coggeshall, 31–2; Sicard, 21.

52 *Epistolae Cantuarienses*, 347. Trans. in Edbury, 179.

53 *Gesta*, ii, 171. 在英诺森三世裁决英法纠纷时，法王表示他要求只得到塞浦路斯战利品的一半，英王一方则表示腓力要求得到他离开近东之前的所有利益的一半。*Selected Letters*, 6–7. 佛兰德斯伯爵腓力于1191年6月1日在阿克逝世，而根据1180年他与法王腓力签订的条约，此时法王有权成为阿图瓦的新统治者。

54 Prestwich, 8. 当时的英格兰人普遍认为，理查征服塞浦路斯的行为并不在原计划内，如Coggeshall, 31. 在纽堡的威廉记载的理查和腓力两人的争执中，理查表示自己征服塞浦路斯“并非既定计划，只是一起意料之外的复仇事件”，Newburgh, Bk 4, ch. 21. 威廉的记载表明，此前他很可能阅读过理查8月6日的信件。J. Gillingham, ‘Royal Newsletters, Forgeries and English Historians: Some Links between Court and History in the Reign of Richard I’, *CCM* (forthcoming).

第十章

阿克围城战，1191

两年以来，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关注焦点都集中于阿克城，而这场围绕阿克城进行的攻防战也给亲历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路过提尔，从山上远望阿克城时，我们开始估算聚集在阿克的军队数量。西顿（Sidon）领主认为那里有50万人，但我认为至少有60万人。”¹当理查接近阿克城时，据安布鲁瓦兹所言，他看到“全世界的骑士之花都在此安营扎寨”。巴哈丁则表示，阿克城周围聚集了“来自海岸边，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阿勒颇、埃及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军队。城内驻守着穆斯林全军最知名的埃米尔们，他们都是最勇敢的伊斯兰捍卫者”。²阿克城守将则是萨拉丁麾下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巴哈丁·卡拉古什（Baha al-Din Qaragush）。若阿克失守，这无疑会让哈丁之战的胜利者、耶路撒冷的解放者萨拉丁英名受损。

然而在两年前的1189年8月，此前曾被萨拉丁击败的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冒险率军围攻已被穆斯林占领的阿克城时，全世界都认为这是极不明智的举动。³居伊的军队未能在第一波攻势就登上城墙，这也预示了居伊无功而返的结局：显然，仅凭居伊这支孤军是无法攻下阿克城的。阿克于1187年7月被萨拉丁攻占，此前它是耶路撒冷王国内最大的城市，也是王国的重要港口之一，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到萨拉丁得知居伊

的攻势，迅速率兵前来解围时，居伊就将被夹在城内守军和城外强大的穆斯林主力援军之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他的政敌喜欢声称他头脑简单，但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愚蠢。居伊将营地设在了阿克以东四分之三英里处的多伦山上，虽然他没法占领阿克城，但前来解围的萨拉丁也没能将居伊彻底驱逐。很快，居伊便得到了一支来自西方的援军：一支比萨船队尝试从海上封锁，在阿克以北占领了一片海岸，维持着居伊赖以生存的海上通信。这无疑减轻了居伊的压力，但这支援军仍然无法阻止穆斯林船队向阿克城内持续运送补给。为防止遭受守城军与萨拉丁的部队的两面夹击，基督徒们挖掘了一条横跨半岛的双重壕沟，开始对半岛上的阿克城进行陆上封锁。十字军依托壕沟保护，使用攻城器械开始轰击阿克城墙，守军则以同样的方式还击。十字军有时也会动用包括攻城塔和冲车在内的攻城部队对城墙发起正面攻击，试图使战线前移，但在守军的防御武器“希腊火”面前，攻城塔和冲车都显得不堪一击，屡屡受挫。攻守双方就这样陷入僵局。萨拉丁将大营设在距十字军7英里处的沙法兰（Shafar'am）山上，直到守军需要援军时，他才将大营前移到距十字军2.5英里处的阿亚迪耶山（Tell Ayadiah）。双方都陷入了消耗战，除了使用攻城器交锋之外，也围绕壕沟展开堑壕战。萨拉丁在城外全程督战也显示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为确保各自战线，双方在1190年和1191年春季海运恢复后努力向前线输送补给和援兵。在此期间，曾有两支埃及舰队突破封锁进入阿克，但被萨拉丁寄予厚望，希望能以此打破基督徒对地中海东岸封锁的桨帆船舰队在抵达阿克之后却无法参战：船员们抵达阿克之后，不得不加入守军队列中坚守城墙，与十字军展开殊死搏斗。连安布鲁瓦兹都为城内穆斯林守军“在全世界都试图摧毁阿克时坚持苦战”的信念所折服。⁴ 围城战的持续时间从以月计算变为以年计算，许多男人（以及法兰克女人）为此战斗与牺牲，受难与英雄主义的传说越来越多，战争的风险与紧张程度也越来越高。⁵

1191年4月20日，腓力·奥古斯都抵达阿克，这正是围城十字军期待已久的支援。正如巴哈丁所言：“显然，敌军抓紧一切机会提醒我们法

国国王即将到来，法王的崇高地位也将使他在抵达前线后立刻成为围城军总指挥。法王和他的主要将领至少乘坐6艘船前来，他们还为前线带来了必要的补给和急需的战马。”不过腓力的援军也大大弱于穆斯林的估计，这又使穆斯林全军振奋起来。⁶很快，腓力便立刻承认蒙特费拉的康拉德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合法统治者，这一举措无疑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但它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十字军内部的分裂。⁷随后，腓力便投入到围城战中，他将攻城器布置完毕，派兵填平城外的壕沟并持续轰击城墙。尽管守军烧毁了腓力的一部分攻城器械，但腓力的猛攻仍然十分成功。圣德尼的里戈表示，若非腓力为了等待理查抵达而推迟发起总攻，阿克城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了。⁸至6月5日，形势对守军已极为不利，萨拉丁见状，也将大本营从沙法兰山前移至阿亚迪耶山。⁹

就在萨拉丁将大本营前移当天，理查也从法马古斯塔起航。他首先来到马尔加（Margat）的圣约翰骑士（Knights of St John）城堡，将伊萨克置于此地囚禁。随后理查继续向南航行，于6月6日抵达提尔。但受腓力和康拉德指挥的提尔守军拒绝了理查入城的请求。¹⁰理查只得在城外宿营，次日继续前往阿克，并在途中赢得了一场大战。据克雷莫纳的西卡尔（Sicard of Cremona）记载，当理查指挥着24艘船为船队殿后时，他在途中偶然发现了一艘从贝鲁特出发、向阿克守军运送补给和援兵的巨型三桅帆船。豪登的罗杰称，这艘船上至少载有1500名精兵。这一描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它的巨大外形无疑给罗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¹¹而试图拦截敌船的理查也遇到了困难：这艘巨舰吃水较深，吨位更是理查一方战船的许多倍，除非理查的战船能占据风向便利，否则它们将无法阻止巨舰前进。¹²然而据巴哈丁记载，“天意使海风到来”，这使理查的战船得以接近巨舰，并在经过一番激战后成功将其击沉。尽管西卡尔对理查多有批评，但他仍然对理查在海战中的决断和计策表示赞扬：即使巨舰占据高度优势且火力强大，理查也有决心与能力促使船长们带领船员不顾伤亡，英勇作战，最终赢得了这一胜利。而传入萨拉丁大营的报告则称，当三桅帆船的船长发现自己败局已定时，他便主

动将船凿沉，以免重要的物资和攻城器械落入理查之手。但这无疑是穆斯林的一次重大损失，巴哈丁记录的萨拉丁的反应说明了这一点：苏丹无奈地表示“这次失败亦是天意注定”。伊马德丁则认为，这场胜利是阿克围城战的重要转折点。¹³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此后，理查已开始规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他在前往阿克途中时一直在思考攻破城墙的方法，并为此“苦思冥想，持续地制订及修改作战计划”。¹⁴ 理查于6月8日抵达阿克，并受到十字军的热烈欢迎。此前理查征服塞浦路斯、确保补给线路的战功早已传遍全军，为人称道，他在进军途中又意外获得了海上的胜利，这无疑激励着十字军。当晚，全体十字军在营中彻夜欢庆，人们围着火炬和篝火欢歌起舞。另一方面，理查的到来则令穆斯林倍感沮丧，据巴哈丁记载，“理查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军需装备，但他亲临阿克的消息更令他们恐惧”。¹⁵

这时腓力才意识到，他此前承认康拉德为耶路撒冷国王的举动将使他在进行战争的同时，需要花费同样多的精力参与政治。据罗杰记载，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均表示愿为理查服务，但理查表示：由于热那亚人此前已向腓力和康拉德效忠，因此他将不接受热那亚人的服务。¹⁶ 吕西尼昂的杰弗里自信理查会支持他，遂以他哥哥的名义控告康拉德犯有谋反罪。但罗杰记载称，由于担心引发动乱，没有人敢于伤害康拉德。于是康拉德便逃往提尔暂避风波。巴哈丁记载，康拉德认为，若当时他继续留在阿克，他无疑将被理查逮捕，提尔城的统治权也将被转交给居伊。¹⁷ 即使在与萨拉丁的对抗最激烈的时刻，理查与腓力仍在彼此争斗：腓力曾许诺，将给每位愿意效忠自己的骑士支付3枚拜占庭金币，理查得知此事后，则将他支付的报酬增加至4枚拜占庭金币。¹⁸ 理查和腓力的明争暗斗也在两国编年史家互相贬损对方君主的行动中延续：忠诚于理查的作家们将腓力的功绩抹去，腓力的传记作家们则贬低理查的贡献。腓力一方的作家们认为，只有将理查描述为一个冥顽不化、言而无信且阴险狡诈之人，才能为腓力回国后进攻这位“十字军战友”的领土找到正当理由。在圣德尼的里戈笔下，理查对阿克围城战的唯一贡献便是

击毁了那艘载着援军的巨舰（还是在“我军”在提尔附近也击沉了一艘类似的运输船的情况下）。里戈还指出，由于理查在抵达阿克后表现得极为狡猾，拒不与腓力合作，孤立无援的腓力只得寻求“忠诚之神”（Fidelis Dei）的帮助。¹⁹有鉴于这一时期的英法史料记载中相互贬损的情况，我们最好从较为中立的穆斯林一方的史料记载中了解两位国王在十字军中的真实表现。

与记载腓力抵达时较为平实的语气不同，萨拉丁的部下在报道理查抵达的消息时沮丧地写道，理查国王带来了25艘船，“每艘都如同城堡般庞大”。²⁰但它们只是理查船队的一小部分，载着大部分男爵、军队和攻城器械的主力船队此时仍停在提尔，由于受到南风影响无法航行，直到数周后才抵达阿克。²¹因此，理查拒绝了腓力要求联军发起总攻的建议，随后法军的攻势也被守军击退。²²当阿克城头响起战鼓声，守军听到信号突然冲出城外对十字军发起袭击时，理查本应率领部下参加外部壕沟的防御。吕西尼昂的杰弗里则在这天立下最大战功。²³理查也将他的攻城武器投入战场，加入腓力、勃艮第公爵休以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攻城活动中。²⁴在十字军的持续轰击下，城墙开始出现坍塌。至6月24日，守军已陷入绝境。巴哈丁的描述如下：“城内守军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无法休息，必须终日毫不松懈地守在城墙上，不断抵挡敌军的进攻。雪上加霜的是，自从英格兰国王加入围城战之后，敌军的猛攻便从未停止过。”眼见胜利在望，理查却突然身患重病，在伊马德丁看来，这无疑使阿克守军获得了修复城墙和重整士气的良机。²⁵更加不巧的是，腓力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当时的编年史家将他们的疾病称为“阿尔诺迪亚症”（Arnaldia）或“列奥纳迪症”（Leonardie），患者持续发烧，而他们的头发和指甲也随之脱落。从这一描述来看，理查和腓力应患上了坏血病或战壕口病。理查一度性命垂危，但当他感到有所好转后，便坚持乘坐肩舆来到前线，继续指挥作战并使用弩弓射击敌军。²⁶

理查的突然患病也打乱了他的外交部署。早在6月18日时，理查便

派出使臣与萨拉丁见面,表达了自己希望与萨拉丁面谈的意愿。萨拉丁则表示,只有在双方已经初步达成和解意向的情况下,他才会与理查见面。于是使臣再次建议,双方可以在仅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私下见面,但萨拉丁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他也做出让步,同意让自己的弟弟阿迪勒先与理查会面。²⁷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没再听到理查的消息,他们怀疑其他法兰克贵族对理查的这一计划表示反对。但理查的使臣又出现了,向萨拉丁传达了的口信:“切勿相信其他任何谎言,朕近来身体有恙,因而暂时不能与阁下会面。朕仅对自己负责,无人可凌驾于朕。”随后理查提议双方互赠礼物,并率先行动:7月1日,理查的使臣将一位穆斯林俘虏交还给萨拉丁。但巴哈丁十分清楚理查的真实用意:“这类频繁的外交行动不过是为了刺探我军士气,而敌军正试图以此手段干扰我方,使我们相信他们所制造的信息。”于是萨拉丁也将计就计,在7月4日时批准理查的三位使臣进入穆斯林军营中的集市,使臣们则对集市的壮观景象惊叹不已:其中有7000家餐馆和1000间浴室为全军提供服务(十字军营地中常见的酒铺和妓院则并未在穆斯林军中出现)。²⁸

不过,萨拉丁军队的士气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穆斯林军队的士气曾在6月末、7月初因为击退法军进攻而有所恢复:当时法军再次对阿克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腓力的工兵成功破坏了阿克城防守要地“诅咒之塔”(Accursed Tower)附近的一段城墙,随后法军试图冲进城内扩大战果,但碎石填满了壕沟,使他们举步维艰,这次进攻最终失败,法军也损失惨重。²⁹但守军此时也疲惫至极,由于人数不足,他们无法得到充足休息,始终处于疲劳作战的状态,十字军一方则充分利用了人数优势:在使用车轮战术不断消耗守军的同时,他们还有足够的兵力可以防备萨拉丁对己方壕沟的进攻。击退法军次日,一位守军将领马什图布(Al Mashtub)举起休战旗帜,试图与十字军讨论投降条件。马什图布请求十字军能保证守军的生命安全,并指出,在法兰克人祈求怜悯时,守军曾饶他们一命。但腓力的回复(无论翻译官是怎么表达的)使

他愤怒地返回城内。³⁰ 当晚，城内的一些埃米尔便趁夜色乘小船悄悄离开了阿克城。为挽救败局，萨拉丁在7月4日和5日连续在清晨和夜晚对十字军发起猛攻，但仍然无济于事。³¹ 7月5日，理查的工兵部队在攻城隧道内放火，成功在次日夜晚破坏了一大段城墙，守军只得再次提出议和请求。但7月7日法军在“诅咒之塔”附近的战斗中再度损失惨重。³²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为激励部下，公开表示：若有人能从摇摇欲坠的“诅咒之塔”上带回一块石头，他将赏给这位勇士2枚金币。后来，理查又将赏金提高到3枚，乃至4枚金币。³³ 守军仍誓死抵抗，他们在7月7日写给萨拉丁的信中便表示将死战至最后一人。³⁴ 守军破釜沉舟的勇气甚至令十字军都敬佩不已，但守军显然不能仅靠勇气支持城内防御，于是十字军再次与萨拉丁和守军同时开始谈判。萨拉丁提出归还真十字架，并释放与守军数量相等的俘虏作为议和条件，但十字军坚持要求萨拉丁释放所有俘虏，并归还所有占领的耶路撒冷王国土地。³⁵

眼见议和不成，7月11日，理查率军与比萨人再次对阿克发起猛攻，尽管这次进攻最终功亏一篑，但它也使守军彻底失去战意，决定向十字军投降。“眼见城墙坍塌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大，守军担心，若失去屏障的城市在猛攻下陷落，他们都将死于刀剑之下。”³⁶ 7月12日，守城军与十字军达成了初步协议：守军交出阿克城，并将城内所有店铺、攻城器械和船只转交十字军控制。对十字军而言，“夺取城内停泊的埃及舰队与攻占阿克同样重要”，它意味着“萨拉丁对基督徒制海权的挑战”最终宣告失败，萨拉丁也因此成为中世纪最后一位敢于争夺逐渐成为“意大利内湖”的地中海控制权的埃及苏丹。³⁷ 这些船只未被船员焚毁，这显示十字军一方明确宣布，除非守军将船只全部完好交出，否则他们将不接受投降。另外，为保证城内幸存守军及其妻儿的性命安全，萨拉丁还应向十字军缴纳20万第纳尔的赎金，并释放1500名俘虏（以及100至200位由十字军指定的人士），并归还真十字架。除此以外，作为调解人的康拉德还应得到1万第纳尔的赏金。³⁸ 当萨拉丁得知上述条件时惊讶不已，但为时已晚——十字军的旗帜已插遍阿克城头，标志着他们

最终赢得了阿克围城战的胜利。两天之后，萨拉丁后撤至沙法兰山，开始为确定正式和约与十字军展开进一步谈判。³⁹

7月13日，理查和腓力将阿克城区分为两半，并将城内所有财物平分，还共同瓜分了穆斯林俘虏。⁴⁰ 随后数天内，理查开始重建城市、整修教堂，于7月21日带着贝伦加丽娅和琼搬入王宫居住。⁴¹ 就在两天前，那些不属于英王或法王部下的伯爵和男爵们在城外抗议，其中一些人甚至在阿克城下苦战两年，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奖赏。虽然过后理查和腓力许诺将给予这些愤愤不平的贵族令人满意的酬劳，但他们却没有做出实际行动。最终，那些极为不满的十字军战士们只得变卖他们的装备，踏上回乡之路。⁴² 对两位国王而言，眼下还有比补偿他们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7月20日，很可能是为了向萨拉丁继续施压，理查试图说服腓力与他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宣布十字军将在此停留三年，或者直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止。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迫使腓力采取行动。他在7月22日表示，自己已打算收兵回国。此时腓力确实有充分的撤军理由：1191年6月1日，佛兰德斯伯爵腓力于阿克逝世，但他没有留下继承人，法王腓力也对伯爵的遗产之一、富饶的阿图瓦（Artois）领地拥有继承权。⁴³ 与比自己更为富有且权势强大的理查一同共事显然没有得到阿图瓦有吸引力。而想要得到阿图瓦，他必须尽快回国。但同行的法兰西贵族都劝说腓力继续留在圣地，于是腓力借此向理查施压：若理查愿意将半个塞浦路斯转交给自己，那么他将改变主意，留在圣地作战。这一要求再度被理查拒绝，于是腓力正式决定回国。⁴⁴

得知腓力即将离开的消息后，脱离了保护人且与理查不和的康拉德感到自己即将陷入险境，于是他在7月26日时跪倒在理查面前，请求理查原谅他此前对吕西尼昂的居伊的冒犯行为。次日，康拉德和居伊在理查和腓力的面前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双方于7月28日在理查的王宫中和解并达成协议：居伊在有生之年仍然是合法的耶路撒冷国王，但无论居伊此后是否再婚，有没有合法继承人，当他逝世后，王位将由康拉德和伊莎贝拉及其继承人继承。王国税收也将由两人共同管理；耶路撒冷王

国北部的包括提尔在内的大片土地归康拉德所有，若在此期间贝鲁特和西顿得以收复，它们也将成为康拉德的领地。居伊的弟弟杰弗里将获得南部的雅法和阿什凯隆的统治权。由于此时杰弗里的侄子“褐发”休九世（Hugh IX ‘le Brun’）已经成年，再加上理查仍然将吕西尼昂家族的势力排除在拉马什之外，普瓦图已经几乎没有杰弗里的立足之地。对于封地不足的杰弗里而言，如果能重夺雅法和阿什凯隆，使它们成为自己的领地将是极好的补偿。⁴⁵ 7月29日，腓力也正式宣布了自己回国的决定。罗杰的记载如下：

腓力不顾部下贵族的反对，要求理查准许他提前回国。理查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腓力在所有人面前以福音书起誓，他将绝不侵犯属于英王的领土，或损害英王封臣的利益，并将努力保卫英王的领土及其封臣不受损害。与此相反，腓力承诺，他将保卫他们的和平，若有人胆敢入侵英王领土，他将如守卫巴黎一般尽力为击退来敌提供援助。⁴⁶

宣誓完毕后，腓力还任命勃艮第公爵休担任法军总指挥，并将自己治理的阿克城区转交给康拉德。7月30日时，理查和腓力又重新瓜分了阿克的穆斯林俘虏。7月31日，腓力带着属于他的俘虏离开阿克，前往提尔。⁴⁷ 康拉德由于不愿在吕西尼昂家族统率的军队中效力，也一同前往提尔。8月3日，腓力在提尔登船，踏上回国之旅。

1191年7月繁忙的政治活动终于结束，似乎所有争议问题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处理。但事实并非如此，心怀怨恨返回欧洲的腓力显然是理查极为危险的敌手：此前理查在墨西拿拒绝履行婚约一事已使他感到受辱，而腓力回国时更是感到颜面无光。若腓力部下的所有贵族们愿意与他一同回国，或许能使他稍感宽慰，但除了纳韦尔的彼得（Peter of Nevers）陪同腓力回国之外，腓力部下其他所有贵族，包括最著名的骑士威

廉·德·巴雷斯和最强大的贵族勃艮第公爵在内，都选择留在圣地继续作战。据罗杰记载，贵族们此前曾请求腓力继续留在圣地，以捍卫法王尊严。不论腓力的贵族说了什么，又或者没说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留在圣地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腓力中途离开之举的无声批判。⁴⁸ 腓力当然也深知这一行动将有损名誉，他派往教宗英诺森三世处的使臣便提到了因为这一事件遭到的责备。对此，腓力将这些责备归咎于理查，称理查以利益诱使他的盟友、他部下的骑士和他的亲属不再忠诚于他，迫使他回国。⁴⁹ 腓力的言下之意是，由于理查在权势和财力方面都远胜于他，令他有相形见绌之感，因而他不愿留在圣地，屈居人下，尤其是腓力认为，他身为法王，又是理查的封君，决不允许自己的地位被理查超越。⁵⁰ 恐怕就只有圣路易这样的圣人能够忍受这样难堪的事情。另一方面，理查也深知腓力回国后的危险：一旦腓力回到巴黎，他很可能将试图以武力攻占吉索尔城堡和诺曼维克桑地区，并夺取阿图瓦的统治权。肆无忌惮且愤怒的腓力自然不会错失这个十字军东征所赐的良机，这实在是无法抵挡的诱惑。而理查此前对他的冒犯也成为用兵的最好理由：既然理查已出尔反尔，拒绝与艾丽丝结婚，那么腓力自然也不必再遵守与理查的誓言了。⁵¹ 当然，理查也绝不会天真到相信腓力回国前的表态，他在腓力离开阿克后，便立刻采取行动：他派出包括豪登的罗杰在内的一些部下赶上腓力的船队，与腓力一行返回欧洲。⁵² 此举无疑是为了及时警告人们注意可以预见的攻击，以便在腓力发起进攻时做好应对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为腓力写传记的作家们，如圣德尼的里戈、布列塔尼的威廉等人都尽力为腓力中途回国之举辩护。据里戈记载，此前腓力得知理查曾与萨拉丁互派使臣、互赠礼物的事迹后，便怀疑理查暗中通敌，加上腓力当时正好患病，于是出于对理查通敌的不满和养病的需要，他才极不情愿地决定离开，他的健康状况是在回到西方后才变好的。正是由于腓力对十字军事业怀有极高热情，他才会只带着3艘桨帆船返回国内，而将其余军队和大量财富（据布列塔尼的威廉称，这些财

富足以支付500名骑士3年的军饷）统统留在圣地，交给自己的封臣勃艮第公爵管理。⁵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腓力最多放弃了尚未支付的穆斯林俘虏的赎金，而在赎金到达之前，腓力为了帮助勃艮第公爵解决经济问题，还向理查借了5000马克。腓力将俘虏带到提尔转交给康拉德的行为，则无疑增加了获得赎金的难度。总之，尽管腓力使卡佩王室的权威有所增加，并对增强王权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途回国这一不光彩的事迹仍永远令他蒙羞。当让·德·茹安维尔向腓力之孙、后来的圣路易介绍腓力和理查两人的事迹时，他告诉路易，腓力“在参加十字军时因为中途回国之举而为人诟病”，理查则“坚持留在圣地，并立下赫赫战功”。⁵⁴

但对理查而言，此时腓力的离开对他也有益处。罗杰认为，若理查真的希望腓力留在圣地，他本可以同意腓力的要求，将半个塞浦路斯交给后者。温切斯特的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则对理查和腓力的关系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对理查而言，腓力就像是系在猫尾巴上的一只锤子。虽然理查肩上的重担与他需要承担的支出都增多了，但此时与他不睦的腓力和康拉德也已撤离阿克，这意味着理查已成为阿克十字军中无可置疑的最高统帅。⁵⁵例如，敦促萨拉丁尽快履行此前达成的和约成了理查的责任。但这对萨拉丁而言并非易事：1187年以来，萨拉丁手下的埃米尔们已负担了太多军役和赋税，他们此时已不堪重负，难以在约定的时间（即阿克陷落一个月）内迅速凑到足够的金钱与俘虏。和约的详细内容和双方的谈判细节有些模糊，基督徒和穆斯林方面对和约条款的记载也存在差异。但在一个细节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巴哈丁的记述。据巴哈丁记载，双方会谈至8月2日时，十字军接受了萨拉丁提出的赔偿条件，例如，萨拉丁必须在阿克城投降后30天内归还真十字架、交出所有基督徒俘虏并缴纳一半赎金作为首批赔偿。另外，萨拉丁还将真十字架展示在理查的使臣面前，以示诚信。当使臣们见到真十字架时，他们恭敬地在十字架前俯身長跪，直到满面尘土方才起身。

然而当支付首批赔偿的约定日期（8月11日）到来时，萨拉丁又提

出，十字军若想得到首批赔偿，他们还应答应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十字军应释放所有穆斯林俘虏，并在获得其余赔偿前允许他保留十字军俘虏作人质；若不愿意释放俘虏，他们则应向萨拉丁交出人质作为担保，待穆斯林支付全部赔偿且十字军释放俘虏后再将人质交还。但十字军拒绝了萨拉丁的要求，敦促萨拉丁首先履行诺言，支付赔偿，并让他接受他们将在得到剩余的赔偿后释放穆斯林俘虏的现实。而萨拉丁由于担心对方在获得占总赔偿比例极高的首批赔偿后就出尔反尔，便同样拒绝支付赔偿。互不信任的双方都要求对方做出他们无法接受的承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交付首批赔偿当日面临的困难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就算理查想要交出所有穆斯林俘虏，他也无能为力，此前被腓力带往提尔的另一半俘虏此时还未回到阿克。⁵⁶为解决这一问题，理查于8月5日派出以休伯特·沃尔特和德勒伯爵罗伯特为首的使团前往提尔，让他们将剩余俘虏带回阿克。但令使团失望的是，腓力此时已经离开，康拉德则拒绝交出俘虏。⁵⁷于是理查又派出了由勃艮第公爵率领的第二个使团，并威胁道，若康拉德拒绝交出俘虏，他将亲自前往提尔废除其统治权。康拉德这才妥协。直到8月12日，勃艮第公爵一行终于带着另一半俘虏返回阿克。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20日。⁵⁸当时理查一方普遍认为，萨拉丁不过是以谈判作为缓兵之计，巴哈丁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但他拖延的时间越长，对十字军完成收复圣城的使命越为不利。另外，十字军船只已在月初时装满了攻城器械和各类军需物资的补给，随时准备继续南下收复失地。⁵⁹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始终无法出发，军中流言丛生，十字军们受此影响，也开始变得愤怒不安。两军之间仍在不断爆发小规模冲突。8月19日，一则很可能有意捏造的谣言传遍了十字军内部：据称萨拉丁已经杀死了所有基督徒俘虏！⁶⁰巴哈丁记载，理查曾发誓，若萨拉丁未能如期履行诺言，他将把所有的穆斯林俘虏变成奴隶。⁶¹

理查就这样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暴露了他计划做的事情，哪怕他收到了钱与俘虏。这也是他的教友后来告诉我们的。8月20日（伊斯兰教历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理查率领全军来到平原中部，随后他将那些注定受难的三千余名戴着枷锁的穆斯林俘虏带到阵前，并下令士兵用剑与矛冷血地屠杀俘虏。我们的侦察兵向苏丹汇报了敌军的这一举动，苏丹闻讯后立刻派出援兵，试图拯救我方俘虏，但为时已晚，当我军抵达时，敌军已将俘虏全部杀死。我军意识到这一惨剧后极为愤怒，并对敌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至夜晚，均损失惨重。次日早晨，穆斯林们想要查看有哪些人战死了，发现受难者还躺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并认出了部分死者，这令全军都极为悲伤。他们决定，此后，除了有身份的基督徒贵族和强壮劳动力之外，其他的基督徒俘虏将被一律处死。导致这场大屠杀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理查是为了给己方此前被穆斯林杀死的俘虏复仇；有人则认为，理查即将向阿什凯隆进军，不希望将这么多俘虏留在阿克后方拖累全军。但理查的真实用意，恐怕只有真主才知道了。⁶²

理查在10月1日写给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中对8月20日的屠杀事件进行了简要概述：“萨拉丁在约定时间内并未履行他之前的承诺，于是为了惩处他的背信之举，我们便适时地处死了我们监管的2600名萨拉森俘虏，只留下一些重要贵族作为日后交换真十字架和我方其他身份更尊贵的俘虏的筹码。”⁶³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尔沃的圣贝尔纳此前曾写下“基督徒将因杀死异教徒而获得荣耀，因为耶稣将以此获得荣耀”这样宗教色彩强烈的句子，但理查在写给圣贝尔纳继任者的信件中只是客观陈述了事实经过，对此并无太多溢美之词。

在理查的所有事迹中，这是受到现代史家们最猛烈抨击的事件之一

。他们认为，屠杀俘虏这一野蛮而愚蠢的行为表明，在愤怒之中，为了缓解他所谓的挫折感，理查什么都做得出来。⁶⁴无疑，理查是愤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因愤怒而陷入失控。实际上，愤怒是王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他在多数情况下做出的愤怒姿态也都是有意为之、刻意控制的结果（但并不总是这样）。⁶⁵毫无疑问，屠杀俘虏的决定也得到了其他所有十字军首领的一致支持，作为法王代表的勃艮第公爵正是赞成者之一。⁶⁶就连布列塔尼的威廉都表示理查因愤怒而屠杀俘虏的行为是正当的，并认真论证了这一决定也与法王密切相关。⁶⁷《提尔的威廉的历史的古法语续编》确实说阿克大屠杀发生于腓力回国之前，理查和腓力两人共同做出了杀死俘虏的决定。随后的版本则说，这个决定主要是由理查做出的，因为他同情那些因被萨拉丁欺骗而悲伤痛哭的人。理查也因其怜悯之心而得到极大赞誉。⁶⁸自从阿克被十字军攻占以来，穆斯林俘虏们便深知自己已成为任由十字军处置的筹码。8月20日，理查放弃了这个筹码，当萨拉丁得知理查杀死俘虏后，他便将筹集来的赎金分发给自己的部下。理查现在必须前进了。在萨拉丁未能按期履行诺言的情况下，这些本应作为筹码的俘虏们此时已成为束缚他前进的负担，而不是资本。⁶⁹在大军出征、守卫缺乏的情况下，仅留一支守卫部队看守3000名穆斯林俘虏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萨拉丁的坚壁清野政策已使十字军无法从阿克周边地区获得补给，继续保留俘虏就将加大十字军的后勤压力。若理查按照萨拉丁的要求做出让步，在接受首批赔偿后释放俘虏，他将因向萨拉丁屈服而损害自己在军中的威信。⁷⁰总之，这些俘虏在8月20日时对十字军而言已不再有利可图，且成为使他们进退两难的尴尬存在。理查及其部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便毫不后悔地采取了当时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残暴地杀死所有俘虏。

另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和稍晚时代的基督教作家们也并未以批判态度看待此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由于战败方萨拉丁未能按时履行诺言，十字军屠杀俘虏不过是必然结果。因而他们多以赞同或偏中立的态度叙述此事。⁷¹安布鲁瓦兹便认为，这是“为基督教复仇”，为阿

克围城战中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死难者复仇。⁷²但多数人认为，理查的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宗教复仇。后来在1216至1228年担任阿克主教的法国教士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认为，腓力在对待俘虏时比理查更为温和，但他随后补充道：“但英格兰国王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极大地削弱了敌军实力。若让这些异教徒们都活着，他们将无疑对基督徒造成更大伤害。”⁷³西多会修士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则认为，萨拉丁未能成功拯救阿克俘虏，导致了他随后的更大失败：海法（Haifa）、凯撒里亚、阿苏夫、雅法、加沙、阿什凯隆等沿海重镇都被理查成功占领；萨拉丁也因此失去民心，当地居民普遍认为萨拉丁将无法在危难之际保护民众，弃城而逃。⁷⁴纽堡的威廉也与拉尔夫观点一致，他更强调人们对萨拉丁背信弃义的愤怒。总之，这些神职人员与所有时代的军人一样，都认可“以屠杀敌军为己方赢得军事优势”的观念。⁷⁵

对于受害的穆斯林一方，这一惨案不仅令他们极为愤怒，也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穆斯林最终重夺阿克城后，1291年，一位后来的埃及编年史家阿布·勒马哈辛（Abu l-Mahasin）写道：

感谢全能真主的恩赐，我们得以在当年法兰克人攻占此地的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将阿克收复。在1191年时的那次围城战中，他们曾许诺将保全穆斯林的性命，但后来他们却背信弃义地将我们的教友们杀害。如今我们终得真主之助夺回此地，苏丹向法兰克人传达接管城市的消息后，便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手段杀死了城内的法兰克人。这正是全能真主对那些刽子手后代的正义复仇。⁷⁶

这段时隔百年的记载是针对伊斯兰历法上的时间巧合的有感而发。但1191年时穆斯林一方的真实反应则与此不同。据巴哈丁记载，萨拉丁

闻讯后“震怒不已”，在8月28日至9月10日不幸被捕的所有基督徒俘虏都被处死了，他还不止一次允许部下尽情地将尸体砍成碎块，“以满足他们的复仇欲望”。⁷⁷与同时代的基督徒一样，巴哈丁也认为这场屠杀有着极大的军事意义。他在阿克失守当天写道：“得知这一噩耗时，我正在苏丹营中值勤.....于是我请求苏丹慎重思考其他沿海城镇和耶路撒冷的命运，并请他尽快赎回在阿克被俘的穆斯林。”巴哈丁还提及，萨拉丁十分清楚阿什凯隆即将不保，决定疏散城内居民，将它夷为平地，“苏丹深知，阿克失守的消息已使士兵害怕闭城战斗，他们担心战败后将遭遇阿克守军的悲惨结局”。⁷⁸阿克大屠杀两周后，双方又在9月4日恢复谈判。9月5日，理查与阿迪勒正式会面。⁷⁹两次会面后，双方又迅速恢复了6月至7月礼尚往来的外交态势，此后双方的外交往来更为紧密，氛围也更加友好。在理查驻留圣地期间，这一良好的外交状况也就此延续下去。

注释

¹ 此处的“我”指伊贝林的贝里昂。这是他与萨拉丁的传记作家巴哈丁的对话，见Baha al-Din, 21。

² Ambroise, 2313; Baha al-Din, 21, 259–60.

³ 关于围城战的经典分析，参见R. Rogers, *Latin Siege Warfa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Oxford, 1992), 212–35，关于穆斯林对围城战的叙述与看法，参见Lyons and Jackson, 295–330。

⁴ Ambroise, 5072–4.

⁵ 在围城者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是，一位狂热的女子在围城战中身受重伤后，要求其他士兵在她死后将她的遗体投入壕沟，以帮助基督徒填平壕沟。

⁶ 当时所有的穆斯林史料都提及了这点，参见Baha al-Din, 240 (Gabrieli, 212); Imad al-Din, 289–90; Ibn al-Athir, 41。

⁷ 1191年5月7日，在阿克城签署的一份保证威尼斯人特权的文书（除此之外，康拉德的所有文书都在提尔签署）中，已成为提尔领主的康拉德被称为“当选国王”（rex

electus），这一称号得到了法王腓力、佛兰德斯伯爵腓力、勃艮第公爵和奥地利公爵的承认。关于这份文书的讨论，参见H. E. Mayer, *Die Kanzlei der lateinischen Könige von Jerusalem* (2 vols, Hanover, 1996), ii, 443–4, 474–6, 479–80。此前法王腓力就有意指定康拉德为王，腓力在1190年11月时，曾派出他的表兄博韦主教帮助康拉德与伊莎贝拉成婚。

8 Rigord, 108. 豪登的罗杰认为，腓力当时只不过进行了部署攻城武器的工作。*Gesta*, ii, 169.

9 Baha al-Din, 246–7. 当时巴哈丁或许已经知道了理查征服塞浦路斯的消息。

10 *Gesta*, ii, 168. 理查可能是自愿选择在城外过夜的，但豪登不是这么记载的。

11 Sicard, 22; *Gesta*, ii, 168–9. 巴哈丁认为船上装有650名士兵，Baha al-Din, 249–50。伊马德丁则认为有700名士兵，Imad al-Din, 299。这对守军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增援。

12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120–1. 某次，基督徒的4艘这样的巨舰便能抵挡150艘桨帆船的进攻。

13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战后船上几乎所有乘客都已溺死，但理查还是救出了大约35名埃米尔和攻城技师。他还表示，如果这艘船上的增援成功抵达阿克，十字军将无法取得围城战的胜利。Ambroise, 2141–299. 尽管这一数字存在争议，且双方对沉船时间的记载都不尽相同（穆斯林方的史料所记载的时间较晚），但双方都承认这是一次意义极为重要的海战。

14 Ambroise, 2331–2, 2350–4.

15 Baha al-Din, 249 (Gabrieli, 213–14).

16 *Gesta*, ii, 170. 比萨人也曾支持康拉德，但当时他们（再次）改变了立场。

17 Ibid., ii, 170–1; Baha al-Din, 254; Imad al-Din, 304–5. 据伊本·安西尔记载，康拉德担心理查不守信义。根据穆斯林方面的记载，康拉德于6月25日离开阿克。而罗杰在6月10日至7月3日期间对阿克相关事件的记载十分简略，这似乎表明他当时并不在场。

18 Ambroise, 4575–99, 4686–90。据理查·德·坦普洛记载，这是支付给骑士的月薪，但它低于骑士阶层的正常收入水平，*Temple, Itin.*, Bk. 3, ch. 4。较符合实际的薪金标准参见*Gesta*, ii, 176。理查之所以只愿支付如此之低的薪金，或许与这一事件有关：此前腓力的一些攻城器械由于缺少防备被穆斯林军队烧毁，因而腓力将那些失职的部下统统解散，随后理查便将他们纳为己用。

19 Rigord, 108–10, 115.

20 Baha al-Din, 248–9（25艘船，Gabrieli, 213），Imad al-Din, 297。安布鲁瓦兹也谈到了理查船队中桨帆船的体积和性能，理查是否可能在桨帆战船之外，还有后来常说的“大型桨帆船”呢？关于大型桨帆船的记载，参见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43–54。

21 Ambroise, 4610–15, 4704–36. 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士也参加了十字军，它的执事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当理查的舰队离开塞浦路斯时，舰队中包括13艘大型双桅帆船、100艘运输船和50艘桨帆船。Diceto, 93.

22 Ambroise, 4600–90. 萨拉丁一方的编年史家提及了十字军在6月14日和18日发动的两次猛攻，在发起第一次进攻时，十字军受中午的高温影响而筋疲力尽，最终放弃进攻。里戈为了证明腓力对十字军事业的热忱，将法军发起进攻的时间记为理查到达阿克的次日。据里戈记载，理查起初表示愿意支援法军的攻势，但他最后却改变主意，没有出兵，因而导致了法军攻势的失败。Rigord, 108–9. 与安布鲁瓦兹记载不同的是，里戈没有解释理查未与腓力合作的原因。

23 理查和腓力约定，当法军对阿克城发起突击时，英军应承担防御十字军大营的任务。Gesta, ii, 173. 关于吕西尼昂的杰弗里，安布鲁瓦兹将他称为“自奥利弗和罗兰（两人都是查理曼麾下的骑士）以来最杰出的骑士”，Ambroise, 4655–67。

24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的投石机投掷用的石块来自西西里，当时他还建起了一座攻城塔。Ambroise, 4799–800, 4781–6; cf. Devizes, 43. 关于上述内容的质疑，见Rogers, *Latin Siege Warfare*, 225。

25 Baha al-Din, 253, 255; Imad al-Din, 307. 有时候城内的信使可以越过十字军的防线，与萨拉丁取得联系，若无法派出信使，守军则通过信鸽与萨拉丁保持联系。

26 理查实际上效仿了腓力的做法。Ambroise, 4820–2, 4935–40, 4970–2.

27 关于这次会面的重要意义，见上文27页。

28 Baha al-Din, 252, 256–7, 263; Imad al-Din, 309–10. 伊马德丁还典型地文采斐然地描述了十字军大营中遍布妓女、卖淫盛行的状况：

这些浓妆艳抹的性感女子对基督徒们有着无尽的诱惑，她们不仅热辣奔放，那悦耳的声音和丰满的大腿也令男人们欲罢不能……这些妓女惯于用自己的肉体供他人欢乐，为此她们将大腿在身体一侧高高抬起，露出下体，这时她们的银脚链便会与金耳环相撞、发出清脆的声音。……她们就是这样赤裸裸地

勾引男人的，使自己成为爱欲战场上男人们以梭镖、长矛或标枪等武器肆意追逐的对象.....她们在交欢时用双腿紧紧缠住男人，并与一个又一个男人合为一体，就像将鹅毛笔插入墨水瓶、使急流涌入河谷、将宝剑插入剑鞘或是将木柴投入火炉.....她们声称自己所做的就是无与伦比的虔诚之事，尤其是对那些远离家乡和妻子的基督徒而言。（英译文参考了Gabrieli，205-6。）

29 Ambroise, 4867-908. 此时豪登的罗杰似乎已（再次？）来到阿克，并在一系列有详细日期的条目中，他将对法军发动的这次进攻记录在7月3日。*Gesta*, ii, 173-4. 不过萨拉丁一方的编年史家将这次进攻的时间记为7月2日。

30 Baha al-Din, 258-62. 如果理查尚未恢复健康的话，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巴哈丁仅记载腓力的无谋举动。另见*Gesta*, ii, 172, 174.

31 Imad al-Din, 312-14; Baha al-Din, 263-4; *Gesta*, ii, 174.

32 *Gesta*, ii, 174-6.

33 Ambroise, 4941-64.

34 Baha al-Din, 264-5 (Gabrieli, 220).

35 Imad al-Din, 317-8; Baha al-Din, 266.

36 Baha al-Din, 266 (Gabrieli, 222).

37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125-30. 据克雷莫纳的西卡尔记载，十字军总共缴获了70艘桨帆船。Sicard, 22.

38 Imad al-Din, 318. 罗杰则将由十字军指定交出的俘虏的数量记载为200个有姓名的人，但他并未提及支付给康拉德的1万第纳尔赏金（这或许是康拉德与穆斯林守军在议和时达成的秘密协定，罗杰对此事的质疑，参见*Gesta*, ii, 173-4），但他关于指定俘虏人数的记载与伊马德丁的记载一致。*Gesta*, ii, 178. 巴哈丁则称，支付给康拉德的赏金为4000第纳尔，法兰克人还要求穆斯林立刻释放600名基督徒俘虏。Baha al-Din, 266-7.

39 Baha al-Din, 268-9.

40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起初十字军一方提出，只要穆斯林俘虏愿意受洗并改信基

督教，他们便能获得自由。据说许多穆斯林也答应改宗，但他们重获自由后又回到萨拉丁一方。随后腓力和理查便废止了这一做法。*Gesta*, ii, 179.

41 *Ibid.*, 179–82. 腓力则占据了城中的宗教建筑，*Chron.*, iii, 123.

42 *Gesta*, ii, 181. 克雷莫纳的西卡尔还严重指责了理查和腓力毫无廉耻地对这些“来自罗马帝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十字军战士们的不公待遇，他们早在理查和腓力抵达之前，便一直为收复阿克而奋战，比两位国王付出了更多的心血。*Sicard*, 22–3. 此时回国的贵族还包括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

43 在从道义角度为法王腓力提前回国的事情进行开脱时，里戈和布列塔尼的威廉并未提及了腓力回去继承佛兰德斯伯爵遗产一事。但不只是支持理查的编年史家认为这是腓力回国的真实动机之一。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便明确指出，腓力正是由于贪婪而置十字军事业于不顾，为后来许多胆怯的战士树立了恶劣的榜样。*Historia regum Francorum*, MGH SS, xxvi, 212, cf. *Sig. Cont.*, 427–8. 另一位对理查怀有敌意的奥地利编年史家安斯贝尔（*Ansbert*）也有类似观点。*Ansbert*, 100.

44 *Gesta*, ii, 181–3.

45 *Ibid.*, 183–4. 8月1日，理查下令向阿什凯隆进军。

46 *Ibid.*, 184.

47 *Ibid.*, 185. 腓力的这一行为令人费解：他本可以将俘虏交给身在阿克的勃艮第公爵。将他们带到提尔，除了会使理查与萨拉丁的谈判更加复杂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作用。而腓力之所以将俘虏交给康拉德，或许是为了补偿自己在5月给后者希望后，又给后者造成的损失。

48 *Ibid.*, 183. “我必须诚恳地说，猛烈地/法王的部下们批评了法王。他们/极不赞成自己国王和封君的这一行为/并对此/心怀不满和怨恨。”*Ambroise*, 5285–8. 豪登的罗杰和安布鲁瓦兹当然没什么偏见。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则将腓力形容为“胆小如鼠之辈”（见前注43），而对理查充满敌意的编年史家克雷莫纳的西卡尔也认为，中途归国的举动令腓力蒙羞。*Sicard*, 23.

49 *Selected Letters*, 6. Cf. Jacques de Vitry, *History of Jerusalem*, 113–14; Edbury, 108–9. 罗杰和安布鲁瓦兹都没有提及腓力的亲属在阿克背叛他的事情，不过英诺森的信件似乎可以证实迪韦齐斯的理查所说故事的真实性：香槟伯爵亨利此前曾向腓力借款，但腓力要求后者交出香槟伯国作为抵押，于是愤怒的香槟伯爵随后便转而向理查效忠。*Devizes*, 43–4.

50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也提及这一点，*Coggeshall*, 33–4. 德意志编年史家则对腓力的不安处境表达了同情，见下文314页。

51 关于理查是否曾明确宣誓要与艾丽丝结婚的讨论，参见Kessler, 62–6.

52 过去人们曾相信，理查为应对腓力的入侵，还让他手下最为善战的佣兵首领梅卡迪耶返回欧洲。它出自一封日期署为1191年8月1日的信件，Landon, no. 359。但这封信并非理查在阿克所写，而是一封于1840年伪造于巴黎的伪作。参见R. H. Bautier, ‘La Collection de chartes de croisade dite “Collection Courtois”’, 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1956); Gillingham, *Richard the Lionheart*, 301。

53 Rigord, 116–17. 布列塔尼的威廉还重复了腓力曾被人下毒的谣言，WB, 193。

54 Joinville,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M. R. B. Shaw, 304–5.

55 Devizes, 78. 但并非所有人都乐于接受理查作为他们的统帅。对那些仍然希望继续参加十字军，但此前曾在腓力和（或）康拉德麾下效力的人而言，获得权力的理查似乎过于傲慢。

56 巴哈丁将支付首批赔偿的约定日期记为8月11日，而罗杰则记为8月9日。这说明了为何我们选择相信巴哈丁记录的时间。*Gesta*, ii, 187.

57 Ibid., 186. 安布鲁瓦兹记载，康拉德称，若他能得到真十字架的一半，他将交出属于腓力的一半俘虏。*Ambroise*, 5421–35.

58 据罗杰记载，正是由于提尔的这一半俘虏姗姗来迟，理查才同意将约定日期推迟至8月20日。*Gesta*, ii, 186–7.

59 Ibid., 185.

60 Ibid., 189.

61 尽管在实行奴隶制的穆斯林社会中，威胁把俘虏变为奴隶的事情十分常见，但12世纪晚期的西欧人并不蓄奴，这个威胁看上去不太可能存在。因此，在这一事件上双方都存在误解。若理查和其余基督徒统帅们强调，在穆斯林毁约的情况下，他们将自由处置这些人的“性命”，萨拉丁一方很可能将之理解为穆斯林俘虏将沦为奴隶——从马什图布与法王腓力的谈判中，我们便能看出双方的认识差异，参见Baha al-Din, 262。1192年5月的达鲁姆围城战时，穆斯林守军向理查无条件投降，随后安布鲁瓦兹表示“这些俘虏无疑应该成为奴隶”（sanz contredit chaitifs esclaves），参见Ambroise, 9351。克雷莫纳的西卡尔则确实认为，十字军应该将这些俘虏作为奴隶。Sicard, 23.

62 Baha al-Din, 272–4 (Gabrieli, 223–4). 另见Imad al-Din, 328–30。在哈丁之战获胜两天后，萨拉丁将俘虏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全部处死，没有给十字军一方缴纳赎金的机会。据伊马德丁记载，萨拉丁面带愉快地围观了这一场面，并认为这起屠杀是在为十字军“洗清罪恶”。转引自Gabrieli, 138–9。

63 *Chron.*, iii, 131. 罗杰还列出了那些逃过一死的“身份更为尊贵”的俘虏名单，*Gesta*

, ii, 189–90。作为文书署的文员，他无疑乐于看到“阿克的文书卡赫丁”（Kahedin qui erat scriptor in Accon）也在其中。

64 Grousset, *Histoire des croisades*, iii, 61–2.

65 就像理查在8月7日对康拉德动怒的事件，参见*Gesta*, ii, 186–7。“当11或12世纪关于政治事件的记载中出现了‘某人公然发怒’的内容，这并不意味着此人情绪失控。实际上，这往往是当事人有意在漫长的政治竞赛、纠纷中表达自己立场的一种方式”，见S. D. White, ‘The Politics of Anger’, in *Anger’s Past*, ed. B. H. Rosenwein (Ithaca, New York, 1998), 127–52, 142。

66 *Gesta*, ii, 189; Ambroise, 5513–42. 不久后，一位姓名不详的基督徒俘虏曾告诉萨拉丁，理查是这次屠杀事件的唯一责任人。Baha al-Din, 279–80. 但这位是个只求自保的身居高位者。

67 *Phippidos*, iv, 218–24. 以下作者也曾提及理查的愤怒：Rigord, 117–8; Ansbert, 99; Jacques de Vitry, *History of Jerusalem*, 113。

68 Edbury, 107–8. 较早的版本参见*Chronique d’Ernoul*, ed. L. de Mas-Latrie (Paris, 1871), 276–7。

69 萨拉丁将他的基督徒俘虏送往大马士革，再次获得了谈判优势。理查可能本想将穆斯林俘虏送往塞浦路斯，但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塞浦路斯当地爆发叛乱（见上文210页），他的计划没能实现。

70 想来，出于不信任，萨拉丁本也不会允许向理查交出首批赔偿换取俘虏，却没想到那些免于被杀的身份较为尊贵的穆斯林俘虏的情况发生。这些身份较高的俘虏无疑对萨拉丁意义更为重大，也是萨拉丁更希望解救的对象。

71 纽堡的威廉持赞同态度，Newburgh, Bk 4, ch. 23; 迪切托的拉尔夫持中立态度，Diceto, ii, 94–5。另可参见*Gran Conquista de Ultramar*, ch. ccxxiii, 转引自Hook, ‘The Figure of Richard I’, 125。

72 Ambroise, 5536–615. 当理查和萨拉丁于1192年夏天签订休战和约后，安布鲁瓦兹认为穆斯林将对前往圣地的朝圣者们进行报复，但在萨拉丁御前会议的有效控制下，类似事件并未发生。Ibid., 11971–2012.

73 De Vitry, *History of Jerusalem*, 112–13.

74 Coggeshall, 33–4.

75 我注意到的唯一不赞成这一观念的编年史家是克雷莫纳的西卡尔，他认为，即使萨拉丁无法按期缴纳赎金，更好的办法应是俘虏们卖为奴隶，而非将其杀死。西卡尔也严厉指责了理查下达的屠杀命令，认为这既非法亦非正义之举（contra fa

s et licitum)。西卡尔还表示，萨拉丁并未以暴易暴，用类似的手段对待他的基督徒俘虏。Sicard, 23.

76 Gabrieli, 349.

77 Baha al-Din, 278–81, 295. 另见Ibn al-Athir, 49。在阿克大屠杀之前，萨拉丁偶尔也会处决基督徒俘虏。Baha al-Din, 29.

78 Baha al-Din, 268, 296; 另见Imad al-Din, 346及第十一章注19。

79 Baha al-Din, 287–8; Imad al-Din, 339–40. 双方恢复谈判后，便开始讨论应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见Baha al-Din, 323; Imad al-Din, 351）。不论条约具体内容为何，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双方的俘虏通常能够得到较为安全的对待。但这也只是大体而言。伊马德丁曾提及一起例外事件：1192年3月1日，穆斯林在雅法附近抓获了一批俘虏，当穆斯林士兵发现有一些俘虏已经无力前进时，便将他们全部斩首，以让幸存者加速前进。Imad al-Din, 375.

第十一章

进军耶路撒冷

为了准备下一阶段的进军，理查在8月22日时将自己的大营移至阿克城壕沟外，将他的妻子和妹妹都安置在阿克城中。理查在随后3天内等待全军集结，并规定那些“负责清洗衣物且像猴子一样擅长驱赶虱子的年长洗衣妇”是唯一被允许随军出征的妇女。理查的这一命令使一些已习惯于阿克城生活的士兵们感到不满，但安布鲁瓦兹认为，此时的阿克已成为“罪恶和淫邪聚集的邪恶之巢”。¹8月25日，理查正式向雅法进军。²而他的战略也十分明确：先攻占从雅法直至阿什凯隆的沿海地带。³作为此次进军的终点，防御森严的海港要塞阿什凯隆是连接叙利亚和埃及之路上的战略要地，它对防御耶路撒冷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穆斯林仍然控制阿什凯隆的情况下，已控制埃及和叙利亚的萨拉丁便可以畅通无阻地从埃及向前线运送补给，十字军将更难收复耶路撒冷。若十字军将此地交给一位善战的将领管理，并利用它严重威胁萨拉丁的补给线，那么圣城仍可能长期处在十字军控制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理查早在7月28日就任命吕西尼昂的杰弗里为雅法和阿什凯隆的统治者：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居伊国王的兄弟，更是因为杰弗里骁勇善战，曾在阿克围城战中立下大功。⁴但理查的这一战略仍未被全军一致接受，许多人仍然主张尽量直取耶路撒冷，在攻克圣城，入城祈祷完毕后，结束

朝圣之旅，返回故土。至于耶路撒冷未来的前景，他们则无疑会表示“天主自有安排”——正如第一次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时那样。⁵ 不过，讨论耶路撒冷的未来显然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十字军随后选择何种战略，眼下他们都应首先攻占位于通往阿什凯隆之路，且距耶路撒冷最近的海港——雅法。

对十字军而言，尽管他们在阿克围城战面对的困难与他们此前在欧洲进行的任何一次围城战均无区别。他们安全地躲在壕沟和要塞构成的复合防线后，著名的突厥骑兵也始终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优势。⁶ 但在随后的远征中，这些突厥骑兵将为十字军制造前所未有的威胁。萨拉丁部下的突厥骑兵基本都是骑射手，他们通常携带一面小圆盾和一柄长矛、长剑或长棍作为近战之用，但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弓箭。相较而言，突厥骑兵所用的武器较轻，在与欧洲骑士的近战中也明显处于下风。他们要利用自己马匹的速度与灵活性，与敌军保持一定距离，并以遮天蔽日的箭雨打击敌军。这些轻骑兵都是擅长弓术的高手，进军时他们不仅能在高速奔跑的战马上保持平衡，精准射击，后撤时他们也能从马鞍上回身射杀追击的敌军。而突厥骑兵最惯用的战法便是利用其机动性迅速包围敌军，从四面八方对包围圈中的敌军进行齐射，当远程火力给敌军造成惨重损失后，他们才会放下弓箭，冲入敌阵大肆杀戮。

与穆斯林在轻骑兵方面的突出优势不同，十字军一方最重要的战术武器是在集群冲锋时威力巨大的重骑兵。这些重骑兵在作战时左手握着缰绳和盾牌，右手紧握一柄骑枪，借助马匹在加速冲锋时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用骑枪猛击敌军，这威力巨大的攻势无人能挡。当时有传言称：一位策马冲锋的法兰克人可以在巴比伦城墙上冲破一个大洞。当重骑兵们冲入敌阵后，他们便会使用长剑和钉头锤（而不是长矛）进行肉搏战，充分发挥冲锋带来的优势。通常来说，只要十字军的重骑兵能够成功冲入护甲较薄弱的穆斯林军阵中，他们将获胜无疑。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也是这么困难。若重骑兵在不当时机发起冲锋，他们便极易被机动灵活的突厥轻骑兵甩开，无法接近对方发挥近战优势，冲锋结束后，他们也

将失去严密的阵形，这些分散开来的重骑兵便会成为突厥轻骑兵反击的活靶子。突厥骑射手如飞虫般反复骚扰冲锋失败的重骑兵，令后者陷于困境。利用冲锋击溃这些散兵就像用一只拳头击打飞虫。人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混乱的人群中的横冲直撞：

当我军试图追击突厥骑兵时，我们
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坐骑迅捷如燕，
行走如风，令我们难以企及。
这些突厥人十分善于躲避
我们的追击，又总是令我们疲于奔命。
他们有如恶毒
而令人生厌的牛虻。
若我们追击，他们将逃走，
如我们回防，他们又将继续攻击。⁷

总之，若十字军重骑兵的集群冲锋未能将突厥轻骑兵拖入近战，较灵活的突厥骑兵将反复袭扰十字军，直至拖垮他们。因而，使用重骑兵的最佳方法便是在开战后静待时机，在正确时刻一击制胜。但在对方轻骑兵持续的挑衅式射击面前，要想保持克制、耐心等待也并非易事。实际上，这些轻骑兵使用的轻型突厥弓威力较小，只有在极近距离时才会射穿重骑兵的锁子甲，给穿甲者造成伤害，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远距离射出的箭矢只是嵌入锁子甲，因而那些冒着箭雨冲锋的十字军重骑兵看起来往往和刺猬或豪猪无异。比起这较不光彩的形象，重骑兵们更应注意的是勿使自己护甲较少的战马在冲锋时被射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步兵才能派上用场。因而，统帅应在重骑兵发起冲锋之前确保骑兵及

其坐骑安然无恙。于是，以长矛兵和步弓手为主的步兵便承担了保护重骑兵的任务，他们排成紧密的防御阵形，如城墙一般将重骑兵保护起来，将突厥轻骑兵驱至步弓手的有效射程之外。显然，若十字军希望在这样的战斗中赢得胜利，他们首先应努力保持阵形稳定，并坚守军纪，切勿轻举妄动。

在理查的指挥下，向雅法进发的十字军很好地贯彻了上述战略。⁸ 他们紧靠海岸线向南进军，利用海洋和己方海军保护右翼。由于此前在阿克停泊的埃及舰队已被十字军缴获，因而此时海洋上已无穆斯林威胁。理查将骑兵分为三队，并将步兵布置在左翼防御突厥轻骑兵的骚扰。由于步兵需要承受突厥骑兵不断地袭扰，为减轻外围步兵的压力，理查还将步兵分为两拨进行轮换：当一半步兵在左翼护卫骑兵时，另一半步兵可以和辎重队一起，在骑兵与海岸之间行进，暂作休整。萨拉丁在得知理查进军后也挥军南下，与十字军保持距离，平行前进，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十字军进行袭扰。理查则严令所有士兵均不得理会敌军挑衅，不得擅自出战，敦促全军保持行军阵形。任何人不得脱离阵线。萨拉丁见状，便转而对十字军殿后的步兵部队进行袭扰，因为这些步兵有时候不得不在倒退着行军的同时反击突厥部队。事实上，十字军在行军首日便出现了太过分散的问题：由勃艮第公爵指挥的殿后部队一度落后，突厥轻骑兵便在此时切入阵形，开始攻击辎重部队。理查闻讯后立刻从前军折返，率部击退敌军。而这次反击战也成功地化解了一起宿怨：目睹了威廉·德·巴雷斯在此战中的英勇之姿后，理查抛弃了对前者的长期怨恨。⁹ 当然，此次遇袭也极大地警示了全军。此后，全军严格执行理查的所有军令，而殿后部队也改由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担任。巴哈丁尤其对十字军步兵严守纪律的表现赞叹不已：“我曾目睹一些法兰克步兵身上插着数量不等的箭矢，但他们未受影响，仍然纪律严明地在队列中行进，并没有贸然出击……在没有任何权力，也无法获得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忍受种种苦难，其忍耐和自制力实在是令人崇敬。”¹⁰

就这样，十字军日复一日地艰难行进着，他们行经海法，跨越卡梅尔山（Mount Carmel），还途经凯撒里亚。但令十字军沮丧的是，穆斯林军队永远比他们率先抵达，并已采用坚壁清野战术将周边给养劫掠一空。不过得益于随行的舰队，理查仍然可以从海上为军队提供补给，那些生病或疲劳的士兵也可以在船上进行休整。¹¹然而天气极为燥热，令身着毛毡马甲和锁子甲的士兵们感到极为痛苦，许多人也因为高温中暑倒地，还有更多人因突厥轻骑兵的箭矢伤亡。理查本人也在遭遇战中被长矛刺伤，所幸伤势并无大碍。纵然困难重重，十字军仍在理查指挥下秩序井然地缓慢前进，丝毫没有混乱或溃败的迹象。萨拉丁直到9月初时才意识到：想要阻止十字军前进的步伐，他必须投入比现在更多的军队。于是，当理查提出要与阿迪勒会谈时，萨拉丁便将他的兄弟派往十字军大营进行谈判，希望为他征集援兵争取时间。但这一缓兵之计并未奏效：理查仍然坚持要穆斯林交出侵占的所有耶路撒冷王国领土，因而9月5日的会谈无果而终。¹²

此时，萨拉丁已经选好了与十字军决战的场所：阿苏夫以北的平原地区。9月6日，十字军因穿过阿苏夫附近的森林时未受侵扰而稍感宽慰，传说当他们行进至森林中部时，有人打算在林中纵火。十字军在走出森林后，终于发现了自己在此期间未受侵扰的真正原因：萨拉丁用了一天时间调集了一支在十字军看来十分庞大的军队。理查见状，只得率军在开阔的地段朝阿苏夫城外果树林行进。9月7日，为准备决战，理查又对全军阵形做了细致调整：担任先锋的是圣殿骑士团；第二阵是布列塔尼和安茹部队；之后则是由居伊国王率领的普瓦图部队；第四阵由诺曼人和英格兰人组成，他们还负责护卫理查的龙旗；法兰西部队被安排在第五阵；需要面对最多危险的殿后部队则是最精锐的医院骑士。全军组成极为紧密的阵形，若向军队抛掷一颗苹果，它必然会砸中马匹或士兵。作为全军统帅，理查则与勃艮第公爵率领部分精锐骑士在不同军阵间游走，对萨拉丁的动向进行反复侦查，并确保全军维持作战阵形。与往常一样，步兵仍然肩负着保护重骑兵的重任。但与双方此前两周半的交

战有所不同的是，萨拉丁下令穆斯林主力发起总攻，从而给了理查一个可让重骑兵冲入敌阵的良机。若理查把握战机，他将必胜无疑。

阿苏夫之战于9月7日上午打响。萨拉丁率先下令进攻，大批突厥骑兵发出可怖的呐喊，冲向十字军阵线，目睹敌方进攻情景的安布鲁瓦兹对此终生难忘：

不计其数的战旗纷飞，
猎猎飘扬如浪奔涌，
逾三万突厥骑兵
列队整齐，
装备完毕，向我军迅猛冲来。他们坐下战马快如闪电，
身后掀起了滚滚烟尘，
号手一马当先，
埃米尔们紧随其后，
还有一些人
无须参与战斗，
只需要将大小战鼓齐齐奏响，
并大声咆哮助阵。
他们的鼓声轰天震耳欲聋，
恍若天主之雷现世。 ¹³

尽管十字军步兵的长矛和箭矢给突厥骑兵造成了惨重损失，但在贝都因人和努比亚辅助部队的支援下，突厥骑兵仍然不断地以车轮战法对

十字军发起冲击，试图突入十字军军阵深处。他们射出的大量箭矢如此密集，连天色都因此晦暗。殿后的医院骑士感到极大的压力。医院骑士团团长见状，数次向理查请求允许骑士团冲向敌阵，但理查将这些请求一一驳回，并要求骑士团团长等待总攻信号。理查规定，当全军发起总攻前，号手会依次在前军、中军和后军各吹响两声号角，随后军队方能出击。理查认为，应等待突厥骑兵离己方距离较近且人困马乏时再发起总攻。起初医院骑士们还能坚守不动，但随着时间流逝、气温升高，战场上四散的尘土与嘈杂的号角声和铜钹声也使他们变得极为烦躁不安。医院骑士们开始认为，总攻命令将不会下达，他们若再不动，显然会被视为面对屠戮过于耐心的懦夫。更为不利的是，骑士们的战马在敌军攻击下开始迅速减少。此时有两位骑士终于按捺不住，冲出军阵：带头冲锋的是骑士团团长和一位名叫鲍德温·卡鲁（Baldwin Carew）的骑士。当他们冲向敌阵时，其他的医院骑士和法兰西骑士们也紧随其后发起冲锋，使在他们外围护卫的步兵措手不及，慌忙避让。而这正是阿苏夫之战的转折点。虽然医院骑士的过早反击并不合适，其他骑士为保护友军也不得不提前冲锋，因为后军与主力失去联系后，数量占优的突厥部队可以趁机消灭后军，进而威胁十字军主力。理查毫不犹豫地率领部下骑士一同冲锋，并命令布列塔尼、安茹和普瓦图部队也投入战斗。

巴哈丁记录了战斗的危急时刻：

当我看到敌方骑士在步兵阵线的保护下开始集结，准备提前出击，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他们拼尽全力一战，才有可能阻止我军赢得这场必将赢得的胜利。这些骑士手握骑枪，发出高昂的战吼，步兵也让开道路让他们从阵中穿过；随后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向我方左、中、右翼冲击，令我军陷入混乱。当时我身在中军，眼见周围已血肉横飞，便试图赶往左翼避难，但发现左翼也陷入混乱；当我试图赶往右翼时，却发现那里更加混乱不堪。¹⁴

但身经百战的萨拉丁仍然镇定自若，他的帅旗仍然飘扬，穆斯林军的战鼓声仍然响彻战场，这时的他们仍是充满战斗力的。十字军骑士们极可能因为冲锋过度而破坏齐整的阵形，从而一头扎入敌人的陷阱。理查显然也意识到己方面临的潜在威胁，于是他下令诺曼人和英格兰人作为后备部队原地待命，他的王旗仍作为军队集结点。这样一来，若突厥骑兵发起反击，十字军部队可以退至此处重整阵形。随后，双方将各自的预备队投入战场，阿苏夫之战达到最为激烈的时刻。最终，由理查和威廉·德·巴雷斯率部发起的数次冲锋彻底打垮了萨拉丁，后者率军撤退，十字军继续向南进军。不过当晚仍有许多十字军战士悄悄回到战场，从死者身上掠夺财物。

长期以来，十字军的阿克进军和阿苏夫之战都被认为是“十字军的杰出战功”，甚至被称作“基督徒在近东地区的最后一次伟大胜利”，第三次十字军首次在正面交锋中击败了令人生畏的劲敌萨拉丁，这使这次胜利更加伟大。¹⁵ 萨拉丁在阿克受挫后，又在阿苏夫遭到重创，这也使他的声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正如巴哈丁所言：“这次失败令我们身心俱遭摧残。”¹⁶ 此时理查则达到了个人声望的巅峰，部下们自然都对他在白刃战中的英勇表现赞叹不已，并大力传颂他的英雄事迹。安布鲁瓦兹甚至还编造了一个故事：当战败的萨拉丁在战后怒斥遭受惨败、士气低落的部队时，一位埃米尔打断了萨拉丁，并指出导致穆斯林失败的两大原因——法兰克人坚不可摧的甲冑及英勇无畏的某位骑士。这位埃米尔还说道：“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勇猛之人，他始终在前线奋战，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他无疑是一位久经沙场而值得信赖的骑士，敌军将士都将他称为‘天使理查’。”¹⁷ 理查勇猛无畏的特质显然能使他的部下敬佩不已，并使他们保持忠诚，但他杰出的统帅之道才是十字军赢得阿苏夫之战的真正原因。尽管医院骑士犯下了贸然出击的大忌，但理查随机应变，并在短时间内通过有效的指挥调度防止全军因过度冲锋陷入混乱，重新夺回胜机。难怪新近出版的一部关于1000年至1300年西方战

争的研究著作对理查有如下评价：“毫无疑问，他就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统帅。”¹⁸

阿苏夫之战三天后，十字军于9月10日抵达雅法。从阿克到雅法的距离不过81英里，但十字军用了19天才完成这段行程。阿苏夫之战后，双方仍然持续爆发小规模冲突，但十字军已不再贸然出击，穆斯林也避免与十字军进行主力会战。在破坏雅法城墙的过程中，萨拉丁的军队造成了太多的损失，以至于他们无法在城内找到寄宿处，只得在城外的一片橄榄树林扎营。萨拉丁一方认为，理查打算继续向阿什凯隆进军。巴哈丁对此还补充称：“敌军在迅速杀死当地守军后，会将阿什凯隆作为进攻耶路撒冷的前线基地，进而切断我们与埃及地区的联系。”尽管萨拉丁希望同时守卫耶路撒冷和阿什凯隆，但他的埃米尔们纷纷表示，他们已无法为防御两地提供足够的军队。在经过讨论后，埃米尔们决定摧毁阿什凯隆。萨拉丁让阿迪勒带领一支部队监视雅法的动向，他则于9月11日抵达阿什凯隆，在此停留至23日。巴哈丁和伊马德丁的记载也都表明，他们和萨拉丁在此期间都受到了羞辱。他们也认为萨拉丁的举动有辱英名：“当地居民们得知自己的居所——这座有着坚固城墙和美丽建筑的城市将化为一片废墟，自己将因此失去家园，流离失所后，都显得不知所措。”来自民众的压力也促使萨拉丁思考是否应“将所有沿海城镇交给法兰克人”，主动促成双方的议和。更令萨拉丁担心的是，一旦法兰克人得知自己试图摧毁阿什凯隆，他们将很可能继续向穆斯林进攻以阻止他，这令萨拉丁寝食难安。¹⁹

实际上，十字军一方早就洞察了萨拉丁的用意。据安布鲁瓦兹记载，早在萨拉丁正在摧毁阿什凯隆的流言传出时，一度有人认为这是假消息，甚至是个玩笑，他们认为萨拉丁绝不会如此软弱。于是，为了证实流言真伪，理查派出他指定的未来阿什凯隆领主——吕西尼昂的杰弗里乘坐一艘桨帆船从海上侦察阿什凯隆的情况。²⁰当杰弗里返回大营汇报军情后，理查便迅速召开了军议会。理查在会上提出，现在应当直取阿什凯隆，但大多数人希望在原地休整，并恢复雅法的防御，因为他们

认为这是较快结束他们朝圣之旅的方法。他们认为，既然大军已控制了距耶路撒冷最近的港口雅法，理应在休整完毕后直接深入内陆，攻克圣城。但以理查现有的兵力，是否能在围攻耶路撒冷同时保护好十字军的补给线？若萨拉丁切断补给线，将使十字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前理查从阿克向雅法的进军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他们利用了海洋掩护侧翼，并能通过随行船队保障大军补给。若深入内陆，理查将无法利用海洋这一地利。更重要的是，尽管穆斯林在阿苏夫遭遇重创，但他们主力犹存，突厥轻骑兵的骚扰战法在内陆地区也更具威胁。总之，理查与其部下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思维的反映：一种是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认为有效控制征服领土与攻陷城镇一样重要；另一种则从宗教角度考虑，以进入耶路撒冷，完成朝圣之旅为根本目标。不过理查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了大多数人的要求。²¹ 记载此事的安布鲁瓦兹认为，向耶路撒冷而非阿什凯隆进军是一个错误决定。若十字军按照理查的主张行事，他们将取得令萨拉丁最为恐惧的成果。由于理查指挥的这支十字军实际上是由多国部队组成的松散联军，（和萨拉丁一样）若理查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感受，他将难以取得成功。事实上，十字军和穆斯林军队存在部队多样、难以统一管辖的共同弱点。不过，当时十字军内的主流意见仍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在雅法进行休整有助于消除大军向阿苏夫进军途中的疲劳。²² 十字军自1191年9月开始在雅法休整至10月，在此期间他们还重建了雅法的城防工事，安享城市及周边果园带来的惬意时光。但安布鲁瓦兹对那些从阿克来此的军妓们极为反感：

军妓们紧随而至，

又开始在军营中不知羞耻地进行肉体交易。²³

尽管两军暂时休战，但双方仍然近在咫尺，外出征粮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任务。

9月29日，一支十字军征粮队遭到穆斯林先头部队的袭击，巴哈丁记录下了他听到的后续：“当敌军得知己方部队遇袭的消息后，他们迅速派出一支骑兵前来支援。据我军的一位基督徒俘虏称，理查国王也在这支援军中，随后双方再次交战，我军一名士兵试图以长矛刺杀理查，眼看长矛即将刺向理查，敌军一位士兵挺身而出，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击。不过理查也在战斗中负伤。这就是我听到的情形，但真主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²⁴当理查险些丧命的消息传开后，部下纷纷劝他们的统帅切勿再度执行这样的危险任务：“若您希望痛击突厥人，那么请您在有大军保护时行动。因为我们的性命也掌握在您手中，您若遭遇不测，失去统帅的大军必将土崩瓦解。”但理查受到他的祖先征服者威廉的鼓舞，深知获得准确情报的重要意义，因而他并未听从这些劝告。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继续执行巡逻任务，并始终在与穆斯林的遭遇战中一马当先。²⁵与欧洲中世纪的其他许多战争一样，穆斯林与十字军在圣地的战争也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在这样的消耗战中，在固定战场的主力会战并不多见，双方主要以小规模遭遇战和伏击战形式频繁地进行交锋。而理查随后也成功地干扰了穆斯林军队的补给线，补给吃紧的萨拉丁于10月4日决定从拉姆拉（Ramla）后撤至拉特伦（Latrun），穆斯林军队撤退前还将拉姆拉与利达（Lydda）两地彻底摧毁。²⁶

此时，理查也制订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他在一份1191年10月1日发出的简报中写道：“若得天主恩典，我军希望在圣诞节后20天内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及圣墓，完成这一使命后，我们将能返回故土。”²⁷此时距信中提及的截止日期——1192年1月中旬仍有三个半月时间。这并不是说理查认为他们会陷入过于漫长的围城战中，但他明白进军内陆仍需要耗费数周时间。更重要的是，缺少了海洋的保护和船队的支援，十字军将难以重现从阿克向雅法进军时的作战方式。为此，十字军应首先建立一条安全的补给线，这意味着他们通行的道路都应得到妥善保护。不过，由于萨拉丁的坚壁清野战术已系统性地破坏了沿途据点，十字军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重建它们。这无疑会是个漫长的过程。²⁸理查也开

始考虑收复耶路撒冷的善后事宜：他需要更多的金钱和物资，还需要更多的人员守卫圣城以及他们已经收复和即将收复的海滨城市。10月1日时，理查还给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写了另一封信，将上述需求告诉后者，并请求后者改变主意，组织布道，鼓励更多人参与十字军，在1192年春天随下批物资前往圣地增援。为强调事情的紧迫性，理查还在信中指出，此时勃艮第公爵、香槟伯爵以及其他参加远征的伯爵、男爵和骑士们都已耗尽财富，他们至多只能在叙利亚坚持至1192年复活节。²⁹ 尽管理查在信中表达了对补给增援的迫切需求，但他仍计划在圣地停留更长时间，并做出了更宏大的战略构想。

早在1191年8月初，身在阿克的理查将行军目标定为阿什凯隆时，他便开始思考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了。只是最初理查希望切断埃及与叙利亚的联系，但10月时他已开始认真制订征服埃及的计划。不过理查并非这一计划的首倡者，12世纪的历代耶路撒冷国王都曾有此考虑，而这可能还是个错误的计划，因为他们对埃及的进攻最终导致埃及和叙利亚在萨拉丁统治下统一。这种统一无疑对穆斯林极为有利：萨拉丁可以利用尼罗河谷的财富控制耶路撒冷。13世纪时的名言“耶路撒冷城的钥匙就在开罗”也成为当时十字军的战略共识。理查也正是基于“维护圣地与圣城安全”的目标制订了征服埃及的计划，并在1191年10月11日以信件形式寄送给热那亚人寻求支持。理查在信中希望热那亚人派出一支携带大量补给的船队前往圣地，参加预定于1192年夏季发起的攻势。为此理查承诺，他会立刻支付热那亚舰队从港口出发后所有花销的一半；这支热那亚船队也将依其规模大小获得比例不等的战利品。³⁰ 在此之前，理查都是延续吕西尼昂的政策，与比萨人结盟，而法王腓力和康拉德的盟友的则是热那亚人。此外，由于比萨和热那亚素有世仇，说服双方携手作战也非易事。但若无足够的海军支持，征服埃及这样庞大的计划将无法实施。³¹ 于是，1191年10月，理查一面向热那亚人许以特权，一面承诺保护比萨人的既有特权，他还要求居伊向双方提供同样的条件。³² 不过，我们已无法得知理查是否真的希望征服埃及，较可能的推

测是，他将“直接打击萨拉丁统治的帝国内部最脆弱的地区”的埃及攻势看作“迫使萨拉丁主动与十字军议和，并达成对十字军有利的和约”的有效措施。³³ 理查始终希望以双方缔结和约的方式解决与穆斯林的争端，不论原因为何，他从1191年10月开始便努力促成此事。

理查寄给热那亚人的信件最终从阿克发出。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当时之所以要前往阿克，是为了将妻子和妹妹，以及那些之前更喜欢阿克的酒馆，不想参与雅法重建和补给的人带回雅法。³⁴ 但萨拉丁的线人认为，理查返回阿克另有原因：理查发现了康拉德与穆斯林结盟，并计划联手进攻阿克的事实，有人告诉萨拉丁，理查返回阿克是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康拉德此前无疑已与萨拉丁谈论此事，并承诺，当他攻占阿克后，便立刻将其转交给穆斯林，从穆斯林手中换回西顿和提尔。³⁵ 但理查并未在阿克停留太久，他在10月13日率领一支大舰队又返回了雅法。穆斯林对此的理解是，理查已有成功保卫阿克的万全之策，但他们仍不清楚理查的下一步行动——他究竟会直取耶路撒冷，还是进军阿什凯隆？³⁶ 在此期间，理查与阿迪勒的谈判也变得更加频繁。巴哈丁认为，无论敌人（特指理查）何时得知了萨拉丁与康拉德结盟的消息，“他们都要努力与穆斯林达成对其有利的和约，否则他们将陷入困境”。³⁷ 安布鲁瓦兹似乎直到11月6日后才注意到理查与阿迪勒的谈判，他此时也并不清楚双方讨论的具体事项。不过，曾参与高层对话的巴哈丁和伊马德丁都完整地记录了会谈的相关细节。10月17日，理查要求阿迪勒派出使臣与他会面，阿迪勒便派出他的重臣伊本·安纳哈尔（Ibn an-Nahhal）前往理查大营。巴哈丁记载如下：

理查跟安纳哈尔为达成和平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谈话，并向后者承诺“绝不背弃对兄弟及友人的诺言”。随后理查还请安纳哈尔将他的亲笔信转交苏丹，信中写道：“向阁下致敬。穆斯林与基督徒间因仇恨而久经战火，以致国土荒芜、生灵涂炭。这一两败俱伤的争端应该就此停止。我特向阁下提出如下建

议。众所周知，我们争斗的中心便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以及圣地的统治权。对我等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是至高无上的宗教圣地，只要我们尚有一人在此，便绝不会放弃收复它的希望。从这里一直到约旦河另一侧的土地也理应归我们所有。至于真十字架，对你们而言，它不过是一块毫无价值的木头，但它对我们意义重大，若阁下愿意将其归还我方，双方将能在达成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实现永恒的和平，一劳永逸地终结这场无尽的战争。”苏丹阅读来信后，便召集他的顾问讨论应对之策。苏丹的回信如下：“耶路撒冷既是你们基督徒的圣地，也是我们穆斯林的圣城，它在穆斯林心中的地位更为神圣，因为我们的先知曾在此升入天堂，全体穆斯林也将在审判之日时聚集于此，要让我们交出圣城绝无可能。其次，圣地原本就是穆斯林的既有领土，你们基督徒不过是近期趁穆斯林力量衰退才以武力（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将其强占的。至于真十字架，它将成为我方的重要筹码，以达成对伊斯兰世界有利的条约，否则我方绝不会将其交出。”回信完成后，我们将信交给理查的使臣，让他回禀自己的君主。³⁸

随后阿迪勒派去面见理查的信使（很可能就是伊本·安纳哈尔）又带回了英王新的方案，10月20日，巴哈丁和伊马德丁同这些信使一起讨论了这些条件。

不过这份议和方案始终令史学家们困惑不解。原因之一是，它们并未见于基督教世界史料的记载；另一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这些方案太不可信，若它们真的存在的话，看上去像个笑话。但从巴哈丁和伊马德丁的记载来看，这份议和方案是确实存在的。理查在方案中提出：若萨拉丁愿意将巴勒斯坦交给阿迪勒统治，他将把自己的妹妹琼嫁给阿迪勒，并将十字军目前占领的所有沿海城市作为嫁妆一同转交给穆斯林，这个新的“王国”将成为萨拉丁领土的一部分。阿迪勒和琼婚后则居住在耶路

撒冷，此后基督徒将可以自由往来耶路撒冷。萨拉丁应将真十字架归还基督徒作为补偿。双方还应释放所有俘虏。伊马德丁十分慎重地考虑了理查的提议，他和巴哈丁都认为，阿迪勒也认真考虑了这一计划的可行性。经过商议后，他们决定由巴哈丁将这份方案交给萨拉丁定夺。阿迪勒指示巴哈丁，他应告诉苏丹，若苏丹认同这一方案，阿迪勒将遵照苏丹旨意行事；若苏丹反对这一方案，巴哈丁应解释称：“这已是双方关于实现和平的最终方案，而正是苏丹您本人将其彻底回绝。”事实上，当萨拉丁得知理查的新方案后，他立刻表示同意，这令他的幕僚们感到十分惊讶。不过萨拉丁认为这是理查玩弄的小把戏，后者并不会认真对待此事。³⁹可以确定的是，当阿迪勒的使臣与理查再度会面时，理查又告诉使臣，当他的妹妹听说了这一计划后，显得十分愤怒，并发誓她绝不会成为一位异教徒的妻子。他借此建议阿迪勒改宗基督教来解决这一问题。巴哈丁认为：“理查的这一建议，确保双方仍可能在将来进行和谈。”⁴⁰由于出自一位“讲话亦庄亦谐”⁴¹的君主之口的这项婚约附带了分割领土的条款，它成为后来成功谈判的切入点，因为1192年8月时达成的最终和约与提议中的领土划分方案极为相似。不过通常情况下，在最终和约达成前，双方仍然会持续苦战，力竭方休，而他们达成的最终和约的条款往往也曾出现在他们早期的谈判中。此时的一切接触都是十字军评估穆斯林阵营氛围的手段——而此时穆斯林阵营中明显出现了分歧。⁴²此前数月萨拉丁所遭受的失败也加剧了军中的紧张情绪。应该说，理查的上述提案还有着窥探萨拉丁宫廷内部矛盾，制造分裂的作用。理查尤其希望挑拨他与阿迪勒的关系，他是萨拉丁最欣赏、最尊重也最信任的兄弟，而他显然也会威胁萨拉丁后代的继承权。⁴³于是，理查一边加强与穆斯林的外交往来，一边为十字军从雅法向内陆进军备战。

1191年10月31日，理查率军离开雅法，并且占据了伊苏尔（Yasur）地区的两个被摧毁的要塞——平原城堡（Casal of the Plains）和中央城堡（Casal Moyen）。⁴⁴十字军花了两周时间将其重建。在此期间，

两军仍在不断地向对方的后勤部队发起袭击。11月6日，一支由圣殿骑士护卫的征粮部队遭遇敌袭，形势危急，当时还在监督中央城堡修复工作的理查闻讯后，便派出莱斯特伯爵与圣波勒（St Pol）伯爵率部先行支援，然而理查的两支援军又在返程中遭到一支更大规模的穆斯林军队伏击。在理查武装完毕，带领另一支小部队赶到时，十字军已经陷入困境。战前理查的部下在评估局势后，劝告他不必以身涉险：“您手中的兵力不足以拯救他们，任他们力战而死，总比您冒险出战，危及整个东征活动要好。”尽管理查理解他们的说法并感谢他们的建议，但他仍然决定出战，因为他更加受到另一种价值观的鼓舞：“他们是奉了朕的命令前往此地才遭此难的，若朕不能挽救他们的性命，必将愧对国王之名。”安布鲁瓦兹记载，随后，理查“猛踢马腹，以迅捷如鹰的速度纵马狂奔，以雷霆之势杀入萨拉森人阵中，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⁴⁵

在理查完成这一充满骑士精神的行动两天后，他又在11月8日与阿迪勒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谈话。两人起初在阿迪勒营帐中交谈，随后他们又来到理查营中继续谈话。⁴⁶ 双方还互赠礼物，并在各自的营中为对方设置了欢迎仪式，这意味着两军上下都知道了双方正在进行和谈。⁴⁷ 当安布鲁瓦兹记载这次谈判的经过时，他特别记录了理查提出的条件——收回所有被穆斯林占领的耶路撒冷王国领土和从埃及缴纳的赋税，并强调他有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利。安布鲁瓦兹说，理查当时表示，“他的祖先征服了这片土地，而他继承了这些权利”。⁴⁸ 由于穆斯林方面记载理查与阿迪勒继续讨论了婚约的具体内容，这显示他可能确实强调了他的世袭权利。不过安布鲁瓦兹认为，理查或许被萨拉丁表面上讨价还价的行为所蒙蔽，阿迪勒关于“萨拉丁真切期望和平”的说法也并不真实。与大多数人一样，安布鲁瓦兹认为，穆斯林不过是以和谈为他们摧毁可被十字军利用的城堡争取时间，而十字军修复它们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⁴⁹ 同时，关于理查打算与穆斯林勾结、背叛十字军事业的谣言也开始传播开来。为粉碎这一谣言，理查结束巡逻，返回主力部队，还带着突厥士兵的头颅，以此显示他对十字军事业的热忱和忠诚。安布

鲁瓦兹被理查的行动说服了（如果说他曾怀疑过的话）。他认为，造成问题的原因不是理查获得了什么，而是理查因为这些花费他大量金钱的人失去了什么。但这些人认为，理查早就该收复圣地了。⁵⁰

11月9日，萨拉丁与理查的使臣多伦的汉弗莱会面。巴哈丁记录道：

国王表示：“我十分珍视与阁下的亲密友谊，正如我之前承诺的那样，这些巴勒斯坦地区的沿海城镇将归阁下的兄弟阿迪勒所有，希望阁下可以在双方划分土地时仲裁此事。不过我方仍希望能在耶路撒冷保有一个落脚点，希望阁下的公正裁决可以不使穆斯林降罪于阿迪勒，也不使基督徒对我愤怒不已。”

巴哈丁认为理查的这番言论给萨拉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使如此，“苏丹在会面结束后对我说：‘若我们真的与这些法兰克人议和，我们将难以防备他们的背信弃义之举’”。而伊马德丁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理查终将撕毁与穆斯林签订的条约。也难怪为制约基督徒一方，在与汉弗莱会面的同一天内，萨拉丁还倾向于接受康拉德提出的另一份“精心制定以在法兰克人中制造分裂”的条约。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份条约中，萨拉丁要求康拉德发起对其他基督徒贵族的战争。⁵¹ 无论如何，两天后（11月11日），萨拉丁召集顾问们讨论理查和康拉德提出的不同条款时，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接受理查的条件，因为“基督徒与穆斯林和睦相处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穆斯林不受基督徒的奸计所害”。这说明，在他们眼中，与其面对与过去的敌人建立军事同盟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割让领土。⁵² 于是，双方继续讨论琼与阿迪勒的联姻计划，萨拉丁和理查也频繁互派使臣。但最终萨拉丁却得到了理查的这一来信：

基督徒们对我未经基督教会领袖——教宗的许可便将妹妹嫁给阿迪勒一事并不赞成，为此我派出使臣面见教宗以谈论此事，他将在三个月内返回。若教宗承认这桩婚姻，我们将继续原定计划；若教宗否决这桩婚姻，我将让另一位侄女嫁给阿迪勒，这就不必经过教宗许可了。⁵³

从信中理查的措辞来看，虽然安布鲁瓦兹认为理查遭到萨拉丁的蒙蔽，但与萨拉丁一样，理查也在努力为己方行动争取时间。这也显示了理查是如何利用假信息的：基督教档案中丝毫没有提到理查提出的联姻计划，这说明“基督教人民”根本没有机会提出反对。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不仅理查没让安布鲁瓦兹知道此事，他的许多基督教政敌们也对此一无所知。⁵⁴理查竟然将居伊国王也蒙在鼓里，而他才是除琼外，受到一个穆斯林的“耶路撒冷王国”建立影响最大的人。当然，无论居伊是否得知此事，理查应该已经在考虑如何给予居伊适当补偿的问题。

那么，理查设想的这桩婚姻是否可行？理查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提出让阿迪勒为了婚约改信基督教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实际上，在当时的西欧使穆斯林改宗的想法已十分普遍，根据一份档案，早在1173年萨拉丁与腓特烈·巴巴罗萨讨论两家的联姻事宜时，萨拉丁就提出他的儿子可以改宗基督教，和腓特烈的女儿结婚。⁵⁵而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正直的萨拉森人”或“正直的异教徒”也逐渐成为常见的脸谱形象，德意志诗人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在他的伟大作品中就塑造过这样的典型人物。⁵⁶然而，没有比萨拉丁和阿迪勒更受尊崇的穆斯林人物了。安布鲁瓦兹在评价萨拉丁时说道，“他的美名在全世界的每个宫廷中都被传颂”，认为萨拉丁是“慷慨而勇敢的萨拉森人”。至于阿迪勒，安布鲁瓦兹认为他“富有智慧，并且品德高尚，绝不会与蒙特费拉的康拉德结盟”，迪韦齐斯的理查则认为他“举止优雅，智慧过人”（*multum civilis et sapiens*）。⁵⁷据理查·德·坦

普洛记载，理查还将阿迪勒的一个儿子册封为骑士（尽管这段文字没有出现在安布鲁瓦兹唯一保存下来的编年史中）。⁵⁸ 在沃尔夫拉姆的代表作《帕西瓦尔》（*Parcival*）中，主人公帕西瓦尔的父亲，也是前几章中的主角——安茹的加米雷（Gahmuret of Anjou）的妻子，便是一位美丽而富有智慧的穆斯林黑人王后贝拉卡妮（Belekane）。这段故事也成为中世纪德意志文学里常被讨论的对象：安茹的加米雷这一人物的原型是否就是“安茹的”英王理查？⁵⁹ 或许加米雷的原型另有其人，但如果理查的价值观受到当时的世俗文学和宗教观念的影响，理查将他的妹妹嫁给萨拉丁的兄弟并不是什么怪事。自11世纪以来，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联姻在西班牙等地已十分常见。

如前所述，理查的频繁和谈不过是为他下一步的进军争取时间。于是，当理查将城堡整修完毕后，他便中止和谈，骑着“用大麦饲养的良马”开始向拉姆拉进军，迫使萨拉丁后撤至拉特伦（骑士的托伦）。这天是11月7日。⁶⁰ 据伊马德丁记载，萨拉丁十分担心基督徒对耶路撒冷发起进攻，为此他每天都派出哨兵监视敌军动向。但十字军却在距海洋仅10英里的拉姆拉地区陷入困境：由于雨季到来，密集降雨导致道路泥泞、难以通行，他们不得不在此停留了六周时间储备物资。这一状况无疑令人沮丧：对这场消耗战而言，双方几乎都已到达极限，此时的关键在于，哪一方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冬季恶劣天气给行军带来的困难意味着这往往是军队解散、军人返乡的时节。尽管萨拉丁坚持将军队保持至12月12日，但在埃米尔和军队的压力下，以及崩溃的士气面前，他最终还是做出让步。穆斯林在平原边上的拜特努巴（Beit Nuba）保留了一个前进基地，萨拉丁则与包括伊马德丁和巴哈丁在内的重臣们撤往耶路撒冷，并将主力部队遣散。正如安布鲁瓦兹所言：“穆斯林将平原丢给我们，转而退守山地。”⁶¹ 理查也将他的指挥部前移至拉特伦，并在此地度过了1191年圣诞节。圣诞节后，理查要求十字军主力进驻距耶路撒冷仅12英里、丘陵脚下的拜特努巴。然而十字军当时又遭遇了恶劣天气的困扰：暴雨夹杂着沙尘暴，遍地都是泥泞；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食

物因被浸湿而开始腐烂，衣服湿透了，武器盔甲也开始生锈。不过，全军上下仍然坚信他们的补给足以坚持到围攻圣城结束，士兵们仍然士气高涨，并为天主指引他们来到距圣城近在咫尺之地而感激不已：

我们皆心怀崇敬，
齐赞美天主恩典！
圣墓已映入眼帘，
全军亦欢欣鼓舞，
忘却伤悲忧愁，
愿早日收复圣地。⁶²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十字军的前景感到乐观。萨拉丁仍不断派出巡逻部队和侵扰部队，他们集中在雅法附近的道路上，不断攻击十字军的补给线，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据伊马德丁记载，穆斯林军队曾于1192年1月3日在拉姆拉附近成功地伏击了一支法兰克人的补给车队。根据安布鲁瓦兹对同一件事的记载，理查在当天夜晚试图对这支穆斯林军队发起突袭，挽回了一些损失。⁶³ 这些事件更凸显了问题的急迫性。

1192年主显节（1月6日）后，理查再次召开军议会。熟悉当地地形的人（主要是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们）认为，若理查坚持围攻耶路撒冷，他将陷入城内守军和穆斯林援军的前后夹击。此时十字军主力已远离海洋和船队的支援，他们的补给线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攻击，他们有多大的可能逃出陷阱呢？即使理查如愿收复耶路撒冷，其前景又如何呢？那些一心只为朝觐圣墓而来的十字军战士们一旦实现心愿，完成朝圣任务后便会立刻动身返乡，又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在此守卫耶路撒冷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明显的。因此，军议会最终决定：按照理查最初的计划向阿什凯隆进军。⁶⁴

穆斯林观察家对理查的困境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理查对军中生活在叙利亚的法兰克人说道：‘朕此前未曾见过耶路撒冷，请为朕绘制一幅耶路撒冷地图吧。’于是他的部下照做了，理查注意到山谷环绕着耶路撒冷城，仅在北部有一块小缺口，便向部下询问谷地深度等相关情况。”得知当地状况后，理查最终表示，即使穆斯林军队并未对十字军海岸补给线造成破坏，只要萨拉丁的主力部队还未被消灭，十字军仍然无法攻占耶路撒冷。至少记录上述理查对局势分析的伊本·安西尔是这么认为的。⁶⁵ 1月13日，理查下令全军撤回拉姆拉，这一命令无疑使大多数普通士兵（朝圣者）感到极为失落。此前他们尽管面对重重困难，却从未放弃收复耶路撒冷的希望。在撤军途中，士兵们也开始对原本尚能忍受的恶劣天气抱怨不已，许多人甚至悲观地认为，周围的一切物体都在嘲笑他们。安布鲁瓦兹也对此时全军沮丧的状况做了生动的描述：

他们肩负重担，
在泥泞中蹒跚前行，
不时还跌倒在地。
人们不断咒骂着
将自己献给了地狱恶魔。
天主啊，且听我一言：
从未有如此优秀的军队
如此哀伤痛苦。⁶⁶

随后他还写道，自天主创世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意气消沉的军队。

自从理查接受当地军人建议，决定放弃进攻耶路撒冷后，他的这一

决定便成为后世争论的焦点。那些主张应继续进攻耶路撒冷的人认为，此时十字军距圣城已近在咫尺，而根据随后的记载（无论对错），突厥军队也陷于危机之中，此时正是一鼓作气攻占耶路撒冷的良机。⁶⁷ 不过他们只考虑了攻占耶路撒冷的问题，但长久统治耶路撒冷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正如理查·德·坦普洛在他的编年史中为这段历史的记载留下这样结尾：“我们将注定无法长期控制圣城，因为那些只为朝圣而来的士兵们在实现心愿后便会悉数回国，届时将无人守卫圣城。”⁶⁸

注释

1 *Gesta*, ii, 190; Ambroise, 5669–86, 5693–8.

2 这是豪登的罗杰与法王腓力一同返回欧洲之前留下的关于十字军的最后记载。见 Corner, ‘*The Gesta Regis*’, 140; 另见 D. M. Stenton, ‘Roger of Howden and “Benedict”’, *EHR*, lxxviii (1953), 579.

3 Ambroise, 5548–9. 这一目标早在8月初时便已宣布。*Gesta*, ii, 185–6. 另见 Prestwich, 9–10.

4 Ambroise, 4657–66. 他在此处将吕西尼昂的杰弗里与查理曼手下的圣骑士罗兰和奥利弗相提并论。

5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参见 Markowski, ‘Richard Lionheart: Bad King, Bad Crusader?’, 351–65.

6 关于两类骑士战争形式的经典分析，参见 R. C. Smail, *Crusading Warfare 1097–1196* (Cambridge, 1956), 75–83, 112–15; 关于突厥人的战术和装备，可参见 J. France, *Victory in th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 (Cambridge, 1994), 147–9.

7 Ambroise, 5653–62.

8 相关分析见 J. F. Verbruggen, *The Art of Warfare in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97), 232–9; 关于纪年错误的指正，参见 Lyons and Jackson, 334–8.

9 Ambroise, 5756–808; Baha al-Din, 275; Ibn al-Athir, 49.

10 Baha al-Din, 282–3.

11 在行军时，主力部队曾暂停一天，等待运输船向陆上部队提供补给。Ambroise, 5936–42.

12 Baha al-Din, 287–8.

13 Ambroise, 6226–40. 关于这次战役的详细记录参见Ambroise, 6091–613。

14 Baha al-Din, 290–1. 他们“冲锋时步调一致，如同一人”，见Ibn al-Athir, 49。

15 Verbruggen, *The Art of Warfare*, 232.

16 Baha al-Din, 293–4.

17 Ambroise, 6799–834.

18 J. France, *Western Warfar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1000–1300* (London, 1999), 14 2.

19 Baha al-Din, 295–8; Imad al-Din, 345–6. 伊马德丁认为，若不是因为阿克城的失败令穆斯林军队丧失勇气，他们本可以且应该坚守阿什凯隆。

20 Ambroise, 6960–86. 但安布鲁瓦兹并未记载杰弗里进行侦察的准确日期。据巴哈丁记载，9月22日，医院骑士团在阿什凯隆附近设置的一座戒备森严、用于指挥海运的瞭望塔仍然完好无损，见Baha al-Din, 299。但也有观点称，萨拉丁为避开理查的重大攻势已迅速后撤，见Lyons and Jackson, 340。

21 Ambroise, 6957–7030.

22 有学者认为，十字军应把握良机，赶在萨拉丁增强耶路撒冷防御力量之前立刻围攻耶路撒冷，才最有可能攻克这座城市。见J. Prawer, *Histoire du royaume latin de Jérusalem* (2 vols, Paris, 1969–70), ii, 83。但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十字军内部有人赞成这一观点。这表明，即使是十字军内部最为狂热的朝圣者领袖们也认为，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军队得到休整，同时应增强重要桥头堡——雅法的防御。另外，鉴于萨拉丁的野战部队仍然完整，贸然进攻无疑有极大风险。最重要的是，十字军的补给线仍遭受严重威胁，即使他们能在1191年9月时攻占耶路撒冷，也难以成功守卫此地。实际上，穆斯林也并不担心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他们更担心十字军迅速攻占阿什凯隆，见Ibn al-Athir, 51–2。

23 Ambroise, 7041–2. 从相关记载来看，安布鲁瓦兹显然因此对十字军在雅法停留过长感到更加不满。Ambroise, 7076–8.

24 Baha al-Din, 302. 据伊马德丁记载，当时理查之所以能侥幸脱逃，是因为他隐瞒了真实的身份。穆斯林军队俘虏了理查的一位部下，他假称自己便是理查，并让穆斯林相信了这点。Imad al-Din, 1347. 这很可能与安布鲁瓦兹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并指出是一位名叫威廉·德·普雷奥（William des Préaux）的骑士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国

王，见Ambroise, 7091–146。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参与此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敌军情报，这与两位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记载有所不同，毕竟理查派出的保护征粮队的部队和收集情报的部队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尽管安布鲁瓦兹并未记载事情发生的准确日期，但他认为此事应发生在10月下半月期间。

25 Ambroise, 7147–76. 关于征服者威廉的类似行动，参见‘William the Bastard at War’和‘Richard I and the Scienc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reprinted in M. Strickland, ed., *Anglo-Norman Warfare* (Woodbridge, 1992)。

26 Baha al-Din, 303.

27 *Chron.*, iii, 130.

28 关于这一战略的分析，参见Gillingham, ‘Richard I and the Science of War’。

29 *Chron.*, iii, 130–3，译文引自Edbury, 179–81。

30 *Codice diplomatico d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ed. C. Imperiale di Sant’Angelo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89. 3 vols, Genoa, 1936–42), iii, 19–21. 其中一封信的译文引自Edbury, 181–2。

31 值得注意的是，理查还在1192年1月时提出了建造长船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并未实现。Ambroise, 7930–32.

32 M-L. Favreau-Lilie, *D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Amsterdam, 1989), 288–93.

33 历史学家普雷斯特维奇二战期间在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时思考过类似问题，也有过相似的评估，见Prestwich, 9。J. O. Prestwich, ‘Military Intelligence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in *Law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Normandy*, ed. G. Garnett and J. Hudson (Cambridge, 1994), 2–3, 21.

34 Ambroise, 7051–78.

35 Baha al-Din, 302–4. 尽管萨拉丁乐于接受这一提议，但在康拉德攻占阿克并释放所有俘虏前，他不会将贝鲁特和西顿交给康拉德。8月时理查和萨拉丁仍然处在互不信任的状态，此时的萨拉丁和康拉德之间也一样。

36 *Ibid.*, 306–7.

37 *Ibid.*, 325 (Gabrieli, 231). 伊马德丁也有同样的观点，见Imad al-Din, 377。

38 Baha al-Din, 307–9 (Gabrieli, 225–6). 巴哈丁将理查描述为主动请和的一方显然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但此时十字军绝不满足于仅仅维持现状。早在6月时，理查的使臣就一直在询问穆斯林们的需求，并从阿迪勒口中得知：“是你们（基督徒）有求于我们，而非我们有事相求。若你们有什么提议，就来此告知我们，我们也乐意倾听。”

Baha al-Din, 257.

39 Baha al-Din, 310–12 (Gabrieli, 226–8, 这段译文的意思是, 这其实是阿迪勒的计划)。Imad al-Din, 349–50.

40 Baha al-Din, 312. 伊马德丁认为, 琼本人乐于接受这桩婚姻, 只是由于教会的介入, 她才终止了这一念头。Imad al-Din, 350–1.

41 见上文28——29页。

42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 萨拉丁曾在7月时试图与围攻阿克的十字军结盟, 并承诺, 若十字军愿意帮助他打击穆斯林对手, 他将愿意满足十字军的任何条件。*Gesta*, ii, 175–6. 但这记载实际上只是某些十字军战士的一厢情愿, 并非萨拉丁的优先事务。

43 Kessler, 205.

44 关于这些城堡的介绍, 参见D. Pringle, ‘Templar Castles between Jaffa and Jerusalem’, in *The Military Orders*, ed. M. Barber (Aldershot 1994)。当罗杰返回英格兰后, 他还提及了修复这两座城堡的事, 这也显示了它们的重要意义。见*Chron.*, iii, 174.

45 Ambroise, 7177–367. 从记载来看, 莱斯特伯爵和圣波勒伯爵当时应该遭遇了直属于萨拉丁的精锐部队, 不过当时认为自己占据上风的穆斯林并不知道理查本人也在援军之中。Baha al-Din, 318–20; Imad al-Din, 352–3.

46 Baha al-Din, 320; Imad al-Din, 353. 根据理查·德·坦普洛的补充记录, 11月7日, 由于刚刚受伤流血, 理查当天并未与阿迪勒会谈, 但是命令索恩厄姆的斯蒂芬 (Stephen of Thornham) 摆出丰盛的宴席招待阿迪勒。*Itin.*, Bk 4, ch. 31. 另外, 根据Ambroise, 8705–8, 安布鲁瓦兹显然知道斯蒂芬参加与阿迪勒和萨拉丁的会谈一事, 那么理查·德·坦普洛应是根据一份比现存文本更完备的安布鲁瓦兹手稿得知此事并加以记录的。

47 关于欢迎仪式以及理查要求演奏阿拉伯音乐的记载, 参见上文27、30页。

48 关于理查所指权利的分析, 参见Gillingham, ‘Roger of Howden on Crusade’, in *Coeur de Lion*, 144–6, 尤应注意注释27。

49 Ambroise, 7371–418. 理查此时也希望获得荣耀的和平, 见Ambroise, 7413–4。

50 Ibid., 7367–446. 安布鲁瓦兹认为, 萨拉丁的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 当双方讨论涉及位于耶路撒冷王国南部边境的蒙特利尔城堡 (Crac de Montréal) 的议题时, 由于意见不同, 最终不欢而散。见*Itin.*, Bk 4, ch. 31。

51 Baha al-Din, 322–4 (Gabrieli, 229–30, cf. Lyons and Jackson, 344); Imad al-Din, 354.

52 Baha al-Din, 323–4 (Gabrieli, 230). 关于会议详情及召开时间, 参见Lyons and Jack

son, 344。

53 Baha al-Din, 324–5 (Gabrieli, 230–1).

54 Kessler, 200.

55 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参见Möhring, *Saladin*, 127–8.

56 有学者在分析沃尔夫拉姆的《帕西瓦尔》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基督徒一样，异教徒们也同样拥有纯粹的骑士精神和高贵品质。”见H. Sacker, *An Introduction to Wolfram's Parzival* (Cambridge, 1963), 14–15。

57 Ambroise, 5497–500, 7390, 8692–700, 10902; Devizes, 75.

58 *Itin.*, Bk 5, ch. 12.

59 M. H. Jones, ‘Richard the Lionheart in German Literature’, 93–7.

60 Ambroise, 7447–78. 或许理查正是在此时告诉萨拉丁，他已经派出使臣前往罗马，也就是说，虽然此时理查已中止和谈，但似乎仍有意保持双方和谈的可能性。

61 Imad al-Din, 354–5; Baha al-Din, 326–7. Ambroise, 7617–18. 由于天气状况不佳，萨拉丁认为直到春季时理查才能发起一次重大攻势。

62 Ambroise, 7619–88.

63 Imad al-Din, 356; Ambroise, 7661–6, 7717–60. 事实上，萨拉丁早在12月22日便得到了来自埃及的援军。

64 Ambroise, 7691–717, 7761–80. 可能在安布鲁瓦兹记载的基础上，理查·德·坦普洛补充道，他们建议理查暂缓向耶路撒冷进军，就是为了保证更多的未完成誓言的朝圣者更长时间留在圣地。见*Itin.*, Bk 4, ch. 35.

65 Ibn al-Athir, 55–6.

66 Ambroise, 7781–832.

67 *Ibid.*, 7799–810. 正如安布鲁瓦兹所言，十字军当时并不了解敌军状况，那些主张进攻圣城的人不过是“后见之明”而已。更重要的是，根据他后来所见，萨拉丁当时同样受到补给短缺的困扰，可见消耗战对其确实影响巨大。

68 *Itin.*, Bk 5, ch. 1. 这一看法与安布鲁瓦兹一致（Ambroise, 7707–16），理查·德·坦普洛在写作此段时可能参考了安布鲁瓦兹的相关手稿。

第十二章

征途终章：雅法与阿什凯隆

尽管攻占阿什凯隆并恢复其防御功能是个非常靠谱的军事策略，但许多千里迢迢赶来圣地的士兵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部分主张围攻耶路撒冷的法军开始向雅法后撤，有些人甚至还撤往阿克和提尔。不过，那些由理查的侄子、香槟伯爵亨利率领的法军仍然追随理查。¹ 尽管这些中途撤离的部队令十字军实力受损，理查还是率领其余部队于1月21日抵达已成废墟的阿什凯隆。² 由于恶劣天气导致海运中止，加剧全军补给压力，十字军在阿什凯隆度过了令人沮丧的第一周。³ 但他们在随后的4个月内将它重建为巴勒斯坦沿海地带最强大的要塞。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还亲自为此支付了四分之三的修缮费用。⁴ 从重建工作的一开始，理查也得以利用阿什凯隆这一重要据点，对连接埃及和叙利亚的陆上交通线构成了威胁：在达鲁姆（Darum）附近的一次袭击中，理查成功截下了一支将基督徒俘虏运往埃及的车队，解救了所有俘虏。⁵ 有人认为，既然康拉德获得了王国税收的一部分，他应该参与阿什凯隆的重建与扩张，但他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也并不令人意外。勃艮第公爵曾在2月初短暂访问阿什凯隆，但当他得知理查已无法向自己提供借款后，又立刻返回了阿克。⁶

另一方面，此时的阿克正陷入一片混乱中：据称热那亚人与勃艮第

公爵麾下的法军试图以康拉德的名义夺取城市控制权，但他们随后被仍忠于居伊国王的比萨人逐出城外。随后，康拉德又指挥一支小型舰队来到阿克城下，并与城内的比萨守军进行了三天的战斗。⁷当康拉德与阿克守军爆发冲突时，身在凯撒里亚、不明真相的理查还试图劝说康拉德与自己结盟，一同对穆斯林军队发起攻势。但理查随后便接到了比萨人的求援信，于是他立刻北上，于2月20日抵达阿克，却发现康拉德和勃艮第公爵得知理查抵达的消息后立刻撤往了提尔。⁸理查促成了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之间的暂时和解后，便继续北上，试图与康拉德会面。虽然理查和康拉德在通往提尔之路上的安贝尔城堡（Casal Imbert）举行了会谈，但会谈中双方皆恶语相向，最终康拉德拒绝率部与阿什凯隆的十字军会合。随后理查则组织了一个新的议事会，会议宣布剥夺康拉德对耶路撒冷王国部分税收的支配权。但鉴于康拉德获得了当地大多数男爵和法兰西贵族的支持，这一判决难以真正执行。

在阿克停留期间，理查又恢复了与萨拉丁的外交往来，并再次寻求与“他的兄弟”阿迪勒进行会面。此时阿迪勒也得到了萨拉丁的指示：应以达成和约为首要目标；若无法达成，则应利用和谈手段为来自不同省份的大军集结争取时间。阿迪勒则请求萨拉丁列一份说明清单，说明他为了达成和约能做出的最大让步。⁹与此同时，萨拉丁也得知了理查的方案：理查希望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耶路撒冷王国进行划分。除了“大卫塔”城堡和先知的“登霄石”仍属穆斯林所有外，穆斯林应将其余部分归还基督徒。当萨拉丁将这份提案交给他的埃米尔们进行讨论后，埃米尔们一致认为这一条款可以接受——他们甚至还允许阿迪勒在某些细节上接受对方更进一步的条件。巴哈丁对此表示：“由于全军已陷入不利境地，我们不得不做出让步。长期作战不仅令军费短缺，更使全军士兵疲惫不堪、思乡心切，他们此时也已无心恋战。”¹⁰看起来双方将要达成一致，萨拉丁又在3月27日时得到消息：近期表现得极为大度的理查在尚未与阿迪勒会面的情况下，便已经离开阿克。萨拉丁认为，这无疑是对己方的挑衅。无论如何，至4月中旬时，萨拉丁已经确信，理查

已熟知己方内政问题，认为自己能以军事压力迫使萨拉丁做出让步，独断协议内容。¹¹但这正是理查为蒙蔽萨拉丁所制造的假象。¹²毫无疑问，对一个十字军国王来说，与自己的前线部队一同度过基督教节日是十分重要的，但理查于3月31日就回到阿什凯隆，而1192年的复活节是4月5日，他本可以再多等几天。

然而理查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坏消息。康拉德和勃艮第公爵的信使在他之前抵达，并告知尚在前线作战的法王封臣们：法王腓力已与康拉德结盟，封臣们应听从勃艮第公爵的号令。尽管理查表示愿意继续支付这些封臣们的薪酬，请求他们继续与自己一同作战，但还是有700多名法兰西骑士决定离开阿什凯隆，返回提尔。¹³据安布鲁瓦兹记载，这些骑士返回提尔后便可以开始尽情享乐：

那些返回提尔的骑士们告诉

我们，他们终日纵情起舞

直至深夜。他们头戴各式

花环冠冕，

他们坐在酒桶上狂饮，

待晨祷钟声响起方才罢休。

在他们的回乡之路上，

更有无数妓女相伴在旁……¹⁴

复活节后，理查便立刻前往萨拉丁去年摧毁的加沙附近地区和尚还完好的达鲁姆进行侦察和巡逻任务。为了寻找进攻达鲁姆最合适的突破口，尽管当时城堡内有不少弓弩手，理查还是在他们的射程范围内绕着城堡转了一圈，理查明显做了足够的防护措施。¹⁵

在对达鲁姆进行围攻之前，理查利用一条来自国内的消息，首先解决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内政问题。受威廉·隆尚委派的赫里福德（Hereford）修道院院长抵达阿什凯隆，并告知理查：约翰已在国内发动叛乱，推翻了威廉·隆尚，并试图夺取最高权力。修道院院长还建议理查尽快回国以平定叛乱。虽然理查此时尚无回国意愿，当他得知国内生变后，也开始思考自己回国后近东局势的发展前景了：已势如水火的康拉德与居伊显然不会握手言和，若他们继续敌对，萨拉丁将能利用王国内讧之机夺回他在此前一年内丧失的所有领土。萨拉丁始终保持与康拉德和理查的双线联系，并与康拉德建立军事同盟，甚至可能许诺将联军攻占的城镇转交给康拉德进行统治。王国急需一位权威毫无争议、在军事和政治才能方面均能与萨拉丁匹敌的统治者。此时唯有康拉德能担此重任。巴哈丁认为康拉德是“精力最旺盛的领袖、经验最丰富的勇士，更是法兰克人内部最富智慧的重臣”。¹⁶与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相比，关于王位正统性的争论已没有那么重要。于是理查决定承认康拉德为耶路撒冷国王，下令次日召开会议讨论此事。¹⁷

次日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参会者们一致决定选康拉德为耶路撒冷国王。¹⁸尽管理查的传记作家们和十字军编年史家们都宣称“这一结果令理查惊讶不已”，但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诚然，在此之前，理查一直站在居伊一边，但这实际上意味着理查无疑才是这段时间内耶路撒冷王国的实际统治者，有名无实的居伊早已被架空。若理查希望居伊在自己离开之后继续保持王位，他显然不必召开这次会议，并给部队两个不同的选项。鉴于理查的部下们已经将居伊视为合法国王，只有在理查考虑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这次会议才说得通。居伊那令人敬畏的兄弟——吕西尼昂的杰弗里很可能已经决定放弃对雅法和阿什凯隆的统治权，返回普瓦图。一旦杰弗里离开圣地，居伊也将更加岌岌可危。假如作为实际统治者的理查继续留在圣地，那么作为理论上的统治者，居伊仍能得到他的荫庇。但理查既没有能力击败康拉德，也无法保证他的合作，若失去了理查这一靠山，居伊显然无法与狡黠多智的康拉德抗衡。假使居

伊能在此前成功夺回阿克，形势或许将对他更为有利。但为时已晚，在贵族们的心中，居伊不过是导致哈丁惨败的败军之将罢了。理查在参加阿克围城战的6周时间内（或许更早）也已深知居伊缺乏威望，或许他当时就已产生承认康拉德为新王的念头。而萨拉丁同样对康拉德十分重视，据巴哈丁记载，当萨拉丁与康拉德谈判时，还向后者承诺，若理查将除阿什凯隆外的王国统治权交给康拉德，那么当萨拉丁与理查达成和约后，康拉德也将能获得和约带来的利益。萨拉丁的使臣在4月13日前便已出发，携带这份提案向康拉德回报，那么此时康拉德可能也已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将成为耶路撒冷新王。¹⁹

幸运的是，理查仍能给予失去王位的居伊一笔极大的补偿。虽然此前理查已将塞浦路斯岛卖给了圣殿骑士团，但骑士团此时仍然愿意就塞浦路斯的归属问题与理查再度谈判。据13世纪的《历史的古法语续编》记载，截至双方再度会谈时，骑士团只支付了10万第纳尔的40%。为筹集剩余款项，骑士团试图对塞浦路斯的希腊居民强征重税，但他们的这一政策引发了塞浦路斯民众的叛乱。看来塞浦路斯带来的麻烦要远超过它的价值了。若理查之前就在考虑将塞浦路斯转让给居伊，此时时机已经具备了。（理查在数月前计划阿迪勒与琼的联姻，这意味着此时理查也已经花了数月时间考虑如何补偿居伊。）²⁰ 骑士团为摆脱陷入混乱的塞浦路斯，也顺水推舟答应了这一提议。于是，居伊向骑士团退还了4万第纳尔，换得了塞浦路斯的统治权，或许他此时还承诺要将剩下的6万第纳尔偿还给理查。若他做出了上述承诺，那双方可能都很清楚这个承诺必然无法实现。在理查看来，实际上是他将塞浦路斯送给了居伊。²¹ 随后，吕西尼昂家族在塞浦路斯统治了近300年，直至1489年塞浦路斯并入威尼斯为止。

同时，理查还派香槟伯爵亨利前往提尔，将康拉德成为国王的消息告知他。当康拉德得知此事时，他立刻双膝跪地，感谢天主。另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康拉德还祈祷称：若他不堪重任，他绝不会被加冕为王。²² 由于形势紧迫，双方商议决定：康拉德应在随后数日内前往阿克完

成加冕。亨利随后返回阿克，为新王加冕礼进行准备。然而数天之后传来噩耗：康拉德于4月28日在提尔被人刺杀。关于康拉德被刺的细节，穆斯林和基督徒方面的记载都十分一致：在与博韦主教共进晚餐后，康拉德在回家途中被两名刺客杀死。一名刺客当场被杀，另一名刺客则在被处死前供认，他们是阿萨辛派的刺客。²³

所谓“阿萨辛派”，实际上是被西方人称为“山中老人”的拉希德丁·锡南（Rashid al-Din Sinan）的追随者。12世纪晚期的一位德意志编年史家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对欧洲人心中的“山中老人”形象进行了如下描述：

山中老人使用魔法成功地蛊惑了受他统治的所有民众，使他们抛弃所有信仰，全心全意地对他顶礼膜拜。他还向自己的信徒们承诺，他们死后能在彼岸世界尽享永恒之乐，这使他们变得乐于赴死。只要这位老人稍一点头，得到指示的信徒们便会纷纷从高墙上跳下，摔得头骨破裂，极为痛苦地死去。此外他还告诉信徒们，那些服从他的命令将人杀死后又被别人所杀的人，才是真正的神佑之人。无论何时，只要他的信徒们表示愿以此种方式赴死，他首先会给每人分发一把被奉献给谋杀的短刀，并给杀手们一剂致幻毒药，让他们沉迷于虚无的幻象之中。他用魔法让他们目睹极乐梦幻。他们对他们承诺，他们若是在遵命杀人时死去，将能如愿在这样的极乐世界中得到永生。²⁴

从1169年起，到1193年逝世为止，拉希德丁·锡南一直都担任一个11世纪末在波斯兴起的伊斯兰革命教派的叙利亚分支的领袖。统治波斯的正统穆斯林统治者们都将其视为异端邪说，并致力于将其消灭。但这些人不愿屈服于迫害，逃入厄尔布尔士山区，并在此地建立了阿拉穆特（Alamut）城堡作为秘密据点，并开始反击他们的敌人。他们选择匕首

作为武器。12世纪初期，这些人进入叙利亚，“阿萨辛”这个为人熟知的名字开始成为该组织成员的统一称呼。“阿萨辛”一词来自阿拉伯语“hashish”（意为大麻或大麻制剂）。他们的敌人们也宣称他们频繁服用大麻，对外人来说，大麻的致幻作用或许是可以解释这些极端分子们行为方式的最简单原因。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阿萨辛派与大麻存在直接联系，但阿萨辛派确实以恐怖谋杀作为其政治武器，因而12、13世纪的欧洲人开始以“阿萨辛”一词称呼那些职业杀手。

由于阿萨辛派多以秘密行动完成暗杀，他们也因此令人恐惧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没人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谁。下面这个与萨拉丁有关的故事便足以体现锡南的巨大影响力。山中老人曾派出信使向萨拉丁报信，但他指示信使，只有在与萨拉丁一人私下会面的情况下才能转达消息。在信使进入萨拉丁营帐前，萨拉丁下令对他搜身，但并未发现任何武器。随后萨拉丁遣散其余部下，只让他信任的顾问留在帐中，但信使仍拒绝向他转达消息。于是萨拉丁便又将顾问们遣散，只留下两名随身侍卫。但信使仍不愿说话。萨拉丁见状说道：“这两位侍卫如同我的儿子一般，他们绝不会离开我的身旁。若这一解释还不足以使你改变主意，那就请你自便吧。”信使听了这番话后，便询问两名侍卫：“若我在此以我家主人的名义让你们杀死萨拉丁，你们是否愿意从命？”两人拔出了他们的剑，异口同声地答道：“听候您的指示。”随后信使让他们将剑收回剑鞘，并与他们一同走出萨拉丁的营帐。锡南的消息也就此传达到了。要知道，作为正统伊斯兰教的守卫者，萨拉丁随时可能审判异端，这也意味着他的性命面临着比大多数基督徒更大的危险，时刻处于阿萨辛派的威胁之下。据称，为躲避阿萨辛派刺客，萨拉丁一度只敢在一座特制的木塔里睡觉。在1176年，他似乎与叙利亚的阿萨辛派达成和解。但在此之前，阿萨辛派至少策划了两起谋杀萨拉丁的行动。

25

那么，阿萨辛派为何要在此时谋杀康拉德？穆斯林方面的相关史料一致认为：凶手遗言暗示理查与这起谋杀案或许有关。如伊本·安西尔

所言：“法兰克人都因此对理查横加指责。”但伊本·安西尔认为，萨拉丁此前向山中老人支付重金，委托后者派出刺客谋杀康拉德和理查。可山中老人只愿杀死康拉德一人，因为他深知，若自己将理查一同杀死，基督徒一方将无人能制衡萨拉丁的势力，已无敌手的萨拉丁恰好可以趁机剿灭阿萨辛派。²⁶但伊本·安西尔的这番言论显然怀有对萨拉丁的偏见，他对山中老人思考内容的设想，实际上更加强了他对理查能力的高度认可。与萨拉丁关系密切的两位穆斯林作家都没有提及杀害康拉德的可能嫌疑人，但都暗示他们的主人不是凶手。伊马德丁在提及此事时只是简单地说道：“这对我方毫无益处。”巴哈丁则提及萨拉丁刚刚（4月24日）与康拉德达成协议一事。²⁷据巴哈丁记载，4月21日时，萨拉丁得知康拉德将与其他法兰克贵族达成协议，而这些贵族在缔约后就将启程回国。如果这说明萨拉丁认为康拉德将结束与理查一直以来对他有利的争端，那么我们也应注意到他是在4月24日从耶路撒冷向在提尔的康拉德派信使，而康拉德是在4月28日被害的。²⁸

但仅凭这些证据仍然无法确认山中老人谋杀康拉德的真实用意：他究竟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后者痛下杀手，还是得到理查、萨拉丁或是其他幕后主谋的请求才代人行凶？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人们怀疑的对象是理查。按阿萨辛派惯例，当他们完成暗杀任务后，便会在敌对阵营内散布流言，扰乱人心。考虑到理查和康拉德的敌对状态，理查很可能为了报复而雇凶杀人。如果有任何人听到了凶手死前的供词，那只能是提尔城内审讯他们的人，也就是为当地最有权势的博韦主教腓力和勃艮第公爵休两人服务的人。²⁹安布鲁瓦兹认为他们“嫉妒理查取得的伟大功绩，时刻抹黑后者”，这起意外的发生恰好给了他们嫁祸于人的良机。腓力和休声称：“正是理查雇用杀手行刺了康拉德。随后他们还派出信使将此事告知法王腓力，让他增派侍卫，加强安保工作，还宣称理查在暗杀康拉德后又派出4名刺客潜入法兰西，伺机谋杀法王。天哪！这样的言论实在荒诞至极！狠毒至极！理查还因此莫须有之事在回国途中遭到嫉妒他在叙利亚功绩的卑鄙之徒的囚禁。”³⁰纽堡的威廉也表示：“

由于理查和康拉德有过节，因而许多人倾向于认为理查有意雇凶杀人，那些支持康拉德的法兰西人更是趁机恶意诋毁他，他们将康拉德被谋杀一事塑造为整个西方的一大丑闻。当法王得知康拉德的死讯后，他也抓住机会不遗余力地抹黑理查。为了增强人们对理查的偏见，法王甚至一改祖先的做法，做出一副‘没有护卫陪同便绝不出行’的姿态，仿佛他真的受到理查雇用的刺客威胁一般。”³¹

随着时间推移，理查最终还是成功洗刷了这一罪名。在一封据称是山中老人寄给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的信中，山中老人表示，由于他此前曾与康拉德发生争执，于是他心怀不满，向提尔派出刺客将康拉德杀死。³² 尽管这封信有可能是理查的追随者们为平息谣言而伪造的，但它包含的信息（无论真假）都传达到了。圣德尼的里戈在1195年写道，当腓力得知理查雇用刺客潜入欧洲的消息时，他一面增强防卫，一面遣使向山中老人查证消息是否属实。当使臣返回宫廷后，他们带回了为理查洗脱一切罪名的一封信。³³ 总之，无论1192年至1193年间博韦主教曾告诉法王什么，到1195年时，法王也已对它们不屑一顾了。13世纪的《提尔的威廉的历史的古法语续编》中记载的也是这个得到认可的版本。它们先是记载了康拉德因为海盗行为冒犯了锡南，他的死是山中老人的报复，然后提到关于理查雇凶杀害康拉德并劝说阿萨辛派首领派人暗杀法王之类的言论均不符合事实。³⁴ 但不幸的是，到1195年之前法王都从未停止反理查的宣传战，这也令理查和他的英格兰封臣们付出了极大代价。

康拉德的意外遇害也使圣地局势变得十分混乱。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由勃艮第公爵率领的法军试图以法王名义接管提尔，但康拉德怀有身孕的遗孀伊莎贝拉将自己禁闭在城堡中表示抗议，并坚称，若法王返回圣地，她会将提尔拱手让出，否则她将遵照丈夫遗嘱将提尔转交给理查或其他的王国合法统治者。³⁵ 但谁又能继康拉德之后成为下一任合法统治者呢？吕西尼昂的居伊会再次成为国王吗？后来的记载也说明，当时比萨人也怂恿他重夺王位。³⁶ 但当时已获得塞浦路斯的居伊并无这

一打算。那么，伊莎贝拉的首任丈夫多伦的汉弗莱又是什么立场呢？或者，年仅21岁并有过两段婚姻的女继承人伊莎贝拉应该通过第三次婚姻为王国找到新的统治者？正当提尔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时，香槟伯爵亨利恰好从阿克返回此地，于是提尔“民众们”便请求他与伊莎贝拉结婚并加冕为王。亨利表示，他需要得到叔叔的许可方能如此从事，于是他立刻派出信使征求理查的意见。理查闻讯后，鼓励亨利接管耶路撒冷王国，但据安布鲁瓦兹记载，他对与伊莎贝拉联姻一事持保留态度。毕竟若康拉德与伊莎贝拉的婚姻已经失效，她是否与多伦的汉弗莱仍处于婚姻状态呢？无论理查是否有所顾虑，亨利还是与伊莎贝拉成婚。据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两人于5月5日举行婚礼。³⁷若拉尔夫的记载准确，那么亨利不太可能有时间在听到康拉德死讯后从阿克赶到提尔，随后从提尔派信使去见可能在雅法的理查再赶回来。³⁸在过去的几天中，耶路撒冷王国的政局在康拉德死后不久便发生了剧变，而在理查看来，他也得以首次独自掌握王国的所有军队。若此前理查有意扶植亨利，他需要消除康拉德的威胁，并给予居伊适当的补偿以示安抚——而这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种可能性是理查在事情的每一个节点都采取了稳健的措施，另一种可能则是某些人预见到了事情的发展，或者准备了应急措施。理查将康拉德推为国王和将塞浦路斯送给居伊的决定也同样充满预见性。难怪《历史的古法语续编》的作者们便认为安排这桩婚姻的人并非亨利和伊莎贝拉夫妇，亦非法兰西贵族，而是理查。而且他们认为理查利用这一意外事件迅速掌握全局，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占得先机。³⁹

当理查离开圣地后，亨利便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实际统治者，但可能由于无法在耶路撒冷加冕，或者担心人们对这桩婚姻合法性存疑，亨利在他统治期间从未使用国王称号。1197年，亨利不慎从高处窗户跌落而意外死亡。亨利死后，伊莎贝拉又嫁给了第四任丈夫——居伊的兄长艾默里（Aimery）。艾默里死于1205年，死因是过度食用鲷鱼。⁴⁰但无论如何，安布鲁瓦兹就以十分浪漫的口吻记述了1192年亨利与伊莎贝拉的婚姻：

以我的灵魂起誓，面对这样美若天仙的女子，
我也将毫不迟疑地将她纳入怀中。
愿天主应我祈求，
保佑这桩婚姻美满幸福，
勿受邪恶侵扰吧！

另外，安布鲁瓦兹也认为法兰西贵族会对这桩婚姻表示认可，毕竟亨利伯爵不仅是英王理查的外甥，还是法王腓力的外甥。⁴¹而这桩政治联姻也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使理查的部下与勃艮第公爵统率下的法军达成了极不寻常的合作关系。

当政局恢复稳定后，理查便找来亨利与法国军队，希望他们能与自己一同进攻阿什凯隆以南20英里的达鲁姆。若十字军能够攻克此地，将扩展基督徒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领地，并对萨拉丁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补给线施加更大的压力。但理查还未与法军部队会合，便率自己的亲兵先行出发，占领了达鲁姆附近的滩头阵地，为他携带补给的船队清理了一片合适的登陆场。尽管萨拉丁目前兵力紧张，但他深知达鲁姆对己方的重要意义及理查的意图，还是派出一员将领阿拉姆丁·凯萨尔（Alam al-Din Qaisar）率部前往支援守军，但凯萨尔的援军选择在城外驻扎，而非进入城内加强防御。⁴²城外的穆斯林援军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无论是5月17日，理查抵达达鲁姆时，还是在他将从阿什凯隆运来的三台攻城投石机重新部署时。安布鲁瓦兹惊叹英王与贵族们都投入到部署工作中，将这些器械从海滩移到了近1里格（约合4.8千米）之外的城堡。尽管攻城部队的数量并不足以包围整个达鲁姆，但理查似乎通过早期侦察确定了要塞主塔楼的弱点，⁴³并在随后三天三夜内对要塞持续轰击，不断派出工兵破坏城墙。巴哈丁和安布鲁瓦兹事后也一致认为，理查的工兵部队为此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理查开始攻城后的第四

天（5月22日），守军提出，若十字军愿意保证他们的妻子和财产不受侵犯，他们便答应投降。但理查拒绝了守军的提议，并在当天突击攻克了达鲁姆。值得一提的是，安布鲁瓦兹记录了首批攻入城内的部队名录，这些人并未出现在其他记录中。最终，城内残余守军只得无条件投降，沦为俘虏。⁴⁴

香槟伯爵和勃艮第公爵率领的法军于理查攻克达鲁姆的次日抵达。当理查得知法军抵达后，他立刻将攻占的达鲁姆交给新的耶路撒冷统治者——香槟伯爵亨利以示尊重，这似乎意味着十字军内部终于重新恢复团结，并有望获得胜利。在达鲁姆留下必要的守备部队后，十字军在5月28日又继续向哈西（al-Hasi，“棕鸟之地”）前进，并在那里发起了被巴哈丁成为“十字军攻占平原地区的开始”的行动。⁴⁵但在十字军不断推进时，信使阿朗松的约翰（John of Alençon）从欧洲带来一个对理查极为不利的消息：理查之弟约翰已和法王腓力结盟，正策划一起反对其兄长的阴谋。理查陷入两难之中：此时是十字军事业重要，还是安茹帝国重要？考虑到阿朗松的约翰抵达圣地至少用了八周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国内事态又有了怎样的发展？若此时选择回国，在他踏上归途的两三个月时间内，形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毕竟耶路撒冷已近在咫尺，他是否应该再次尝试夺取它呢？他成功的希望并不大（如果说真的有希望的话），但他是否愿意被人们看作不愿意尝试的国王呢？更重要的是，此时十字军已不再遭受暴雨和泥泞的折磨。若理查能创造奇迹，收复耶路撒冷，这一伟大功绩必然能消除导致国内叛乱的阴谋——约翰和腓力将找不到愿意对抗“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圣城的圣地征服者”的人。但若是围城失败，回国平叛却为时已晚，又会发生什么呢？正当理查犹豫不决、谣言四起时，十字军中的其他贵族们单独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来自法兰西、诺曼底、普瓦图、英格兰、勒芒和安茹等地的贵族们都一致表示，无论理查做何选择，他们都将对耶路撒冷发起进攻。当士兵们得知将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消息后，都显得十分高兴，

他们彻夜不眠，纵情欢歌起舞，
直至午夜时分已过，依然沉迷其中。⁴⁶

另一方面，萨拉丁也得到了新的增援，于是他下令对十字军发起反攻，后者在5月31日和6月1日时向阿什凯隆退却。⁴⁷ 这看起来像是撤退，但实际上是为了暗中收集补给，召集更多部队。全军仍然士气高涨。理查却显得闷闷不乐：毕竟围攻耶路撒冷的计划有违他的初衷。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当时理查退居到自己的营帐中，在苦闷和无助中度过了数天时间，直到国王的一位随军教士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使理查重新振作起来。威廉使国王想起此前他由于得到天主恩典所赢得的一系列胜利，由于天主庇佑得以化解的一切危机。如今天主正引导他向最后胜利进发，若此时半途而废必将被人耻笑。

此时，所有基督徒们都万众一心地期待着
您能为基督教世界带来收复圣城的无上荣耀，
他们都将您视为父亲和兄长一般的人物，
若您就此离开圣地，令他们孤立无缘，
这些被抛弃的基督徒们也将必死无疑。

理查静静听完了威廉的劝解，仍然一言未发。不过，理查于次日宣布，他将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直到下一个复活节到来，全军也将立刻准备围攻耶路撒冷。⁴⁸

6月6日，萨拉丁得到消息，一大支十字军已离开阿什凯隆，并深入内陆19英里（31千米），在萨菲亚山（Tell al-Safiya）扎营。⁴⁹ 随后十字军继续北进，至6月9日时他们已在拉特伦附近地区宿营，并意外攻击

了一支从雅法劫掠归来的穆斯林军队。次日，十字军已抵达拜特努巴，他们仅用5天时间便走完了去年历时两个月才完成的行军旅程。安布鲁瓦兹记载了他们快乐而自信的氛围，说除了有两名士兵在途中被毒蛇咬伤，中毒而死之外也并无损失。此前香槟伯爵亨利返回阿克寻找援军，于是理查下令全军在此暂待援军前来。虽然两军之间仍然频繁发生各类伏击战和遭遇战，但十字军主力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为安定的状态。在此期间，安布鲁瓦兹还记载了理查的一件逸事。理查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登上一座小山顶部，当他向下俯瞰时，清楚地看到了耶路撒冷的面貌。理查登高远望之地的名字很可能是“喜悦之丘”（Montjoie），正是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们首次目睹圣城全貌的地方。⁵⁰当然，这也是理查距离耶路撒冷最近的一次。13世纪时，人们给这段故事又增加了一段更具戏剧性的结局：当理查目睹了耶路撒冷的景象时，他举起盾牌遮住双眼，潸然泪下，并暗中向天主祷告——愿天主让他在目睹圣城之后，能成功将其收复。⁵¹

然而亨利伯爵的援军迟迟没能抵达，这令十字军士兵们开始感到不耐烦，而穆斯林军队的突袭和伏击也使他们有些疲于应对。安布鲁瓦兹对其中的两次遭遇战做了详细记录，巴哈丁则明确指出了穆斯林的战略目标：“从雅法到敌营的大道上满是敌军的补给车辆，因而苏丹命令我军前锋部队抓住一切机会发起进攻，尽可能破坏敌军补给线。”⁵²与此前的十字军在征途中发现圣物，成功激励全军士气的经历一样，理查也发现了一件足以令全军振奋的圣物。情报显示，有人将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埋在附近、使它免于被异教徒们夺取。当理查和部下的骑士在埋藏者的带领下赶往藏宝处时，藏宝者便是

极为神圣虔诚的圣以利亚修道院院长，

平日仅以植物根茎和面包为生，

他蓄着未经修剪的浓密胡须，

像一个真正的圣人。⁵³

找到部分真十字架的意外之喜固然使一些士兵重新振作，但这并未消除十字军领袖们的担忧。十字军又回到他们半年前的进军终点，法兰西贵族们认为，此刻应当把握机会围攻圣城。理查则再次表示反对，他指出，一旦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周围的山地，萨拉丁便能趁机切断从雅法到拜特努巴的补给线。据安布鲁瓦兹记载，随后理查又补充道，相信有很多法国人乐于看到他将军队带入了一个灾难性的陷阱，而他没有愚蠢到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下令围攻耶路撒冷。和往常一样，理查还劝说法兰西贵族们重视熟悉内情的当地贵族们的意见。于是，为确定最终方案，他们决定设置一个由5名圣殿骑士、5名医院骑士、5名法兰西贵族以及5位耶路撒冷王国贵族组成的二十人议事会进行裁决。

二十人议事会选择了远征埃及的计划，这一结果也正如理查所料：毕竟议事会中的十五人都十分了解圣地局势，理查也与他们保持着密切交往并经常咨询他们的意见。此时，理查的补给船队正停泊在阿克，已做好将远征军所需的补给品运往尼罗河三角洲的准备。看起来，他脑海中的想法终于实现了。理查则率领直属于自己的700名骑士和2000名重装步兵沿海岸线南下进攻埃及，他们的所有开销将由理查承担。然而，勃艮第公爵和其他法兰西贵族却拒绝合作，并表示耶路撒冷是他们唯一的军事目标。理查答道，若他们坚持进攻耶路撒冷，他也将会一同前往，但他不会率领他们前行。他会以友军和朝圣伙伴的身份与法军一同前往圣城，而不是他们的统领。⁵⁴正当十字军内部将要陷入对立之际，6月21日，一条紧急消息又促使他们为达成战略目标而重新团结一致，并立刻采取了卓有成效的行动。

萨拉丁对来自埃及的补给部队期待已久，而后者此时由阿迪勒的异姓兄弟法拉克丁（Falak al-Din）率领。理查同样深知埃及在萨拉丁治下的阿尤布王朝的重要地位，并对这支至关重要的埃及援军保持着密切关

注。法拉克丁的军队从比勒拜斯（Bilbeis）出发，踏上前往耶路撒冷之路，随军前行的还有一支携带着大量骆驼和骡子的大型商队，但巴哈丁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阿拉伯恶棍们”一直在向敌人提供他们行动的消息。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敌我双方都互相有充分了解的战争。由于战争发生在一个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或讲阿拉伯语，穿着打扮都是阿拉伯风格的地方，从“平民”阶层来说，他们很难区分一个人是敌是友。侦察兵和间谍们也能够在这两军中畅通无阻地收集情报。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关于埃及援军的重要情报是由“生于叙利亚的间谍贝尔纳”和另外两位与穆斯林打扮迥异、会说阿拉伯语且有丰厚收入的“巴巴里人”在6月21日告知理查的。

理查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他当夜便率领500名骑士和1000名武装侍从离开拜特努巴，前往埃及军队营地。当理查许诺将三分之一战利品分给法军后，勃艮第公爵也率领法军与他一同进发。他们趁夜色掩护向加拉太（Galatie）强行军，并在此地等待来自阿什凯隆的食物和饮用水补给。⁵⁵ 6月22日，萨拉丁也得知了理查率军南下的消息，于是他派一名高级将领率一支分队前往警示埃及援军，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援。23日，当理查还在向哈西行进时，埃及统帅法拉克丁决定从最短路线进军，但他并未冒险趁夜色进军。为避免队伍分散，他选择在距哈西仅14英里处的库瓦利非亚山（Tell al-Khuwialifia）扎营。当理查的侦察兵回报了这一情况时，理查起初对此表示怀疑，于是他又派出另一支化装成贝都因人的巡逻队再次确认情报的真实性。⁵⁶ 当这支巡逻队表示情报无误后，理查便下令全军用餐并喂饱战马，随后他率军疾行14英里，在拂晓时趁敌军将行李装上骆驼时发起突击。安布鲁瓦兹详细叙述了这场战斗，称“高贵无畏的理查国王/率领麾下的贵族们取得了一场完胜”，并记录了理查获得并分发出去的多样且数量庞大的战利品。⁵⁷ 被击溃的援军主力部队则分散到荒漠中，逃回埃及。巴哈丁得知埃及援军惨败的消息后哀叹不已：“这些自称是勇士的埃及士兵要感谢他们胯下的快马救了他们一命！”巴哈丁还估计，约有500名埃及士兵被俘，还有约3000

头骆驼和大量战马被缴获。当时的人们也将此次成功突袭视为理查最伟大的军事成就之一。与理查同时代的人认为，这确实是理查最伟大的战略胜利之一。从战略上来讲，这是一次重要的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埃及援军，从而使萨拉丁调集大量增援力量支持前线的计划宣告破产。正如巴哈丁所言：“这真是十分丢脸的事情。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沉重而令人痛心的灾难……噩耗传来时我正在苏丹营帐内，一位年轻的马穆鲁克从马厩走入营帐，向我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当他讲述完毕后，苏丹显得极为悲痛不安，我还从未见过苏丹显露出如此哀伤的神情。”⁵⁸

萨拉丁得知败报后，立刻下令摧毁耶路撒冷周围的所有蓄水池，并填平水井。巴哈丁还生动地记载了萨拉丁总指挥部中的一幕，埃米尔们认为，与其困守耶路撒冷，他们更应尽快组织部队与十字军正面交战。正面交战中的胜利无疑能够改变当前的不利态势；即使不幸战败，穆斯林军队至少还能利用机动性优势逃出生天。此时，阿克城失守的梦魇也仍然令萨拉丁心有余悸。到7月3日（周五）时，萨拉丁眼见形势危急，决定不在耶路撒冷继续停留，将圣城转交给他的侄孙统治。离城前，萨拉丁还来到阿克萨清真寺主持周五礼拜，一度泪如雨下。

然而在7月3日夜晚，穆斯林先锋部队传来消息：十字军已离开宿营地又再度返回，这一行为显示了他们的犹豫不决。⁵⁹ 尽管在6月29日，理查的军队满怀赢得胜利和财富的欣喜返回他们在拉姆拉和拜特努巴的基地时，亨利伯爵的援军已经抵达，但这种状况还未发生变化。虽然这些胜利令十字军感到振奋，但对虔诚的人来说，这并不能与围攻耶路撒冷相比。事实上，十字军由于缴获的牲畜大量消耗谷物导致谷物价格上涨而抱怨不已。受此影响，十字军内部分裂为两大阵营，但他们的相互抱怨于事无补。⁶⁰ 此外，萨拉丁破坏水源的举动也为所有军队增加了新的问题。法兰西十字军在抱怨他们认为使萨拉丁有时间摧毁水源的拖延。⁶¹ 勃艮第公爵休还为此编写了一首辱骂理查的歌谣，他的部下则高声传唱以释放压力。理查得知此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击。

⁶² 但他们的争斗除了为吟游诗人的艺术做贡献，对解决全军的分裂问题毫无助益。

7月4日，十字军开始撤退，这一定也是令理查极为悲伤的一天：他冒着比其他所有人更大的风险留在圣地坚持作战，却没能取得应有的战果。理查甚至悲观地认为，他已经因为自己的决定失去了安茹帝国。撤退的十字军从不同的道路返回沿海地区。此时萨拉丁仍然担心理查会率军进攻埃及，尤其是此时理查拥有了大量骆驼与驮畜，威胁更大。⁶³ 的确，从军事角度考虑，在这个时间节点，理查率军进攻埃及对萨拉丁的威胁也比围攻耶路撒冷更大。但正如莱昂和杰克逊所言，十字军内部的困境是此时“十字军已经极不团结，急切需要为实现全军的既定战略目标寻找权宜之计。实际上，他们仅是因为围攻耶路撒冷这一目标才得以保持团结和纪律严明的状态，一旦这一目标消失，萨拉丁将重新占得先机”。⁶⁴ 若十字军真的围攻了耶路撒冷，他们是否能够维持全军脆弱的团结呢？一些当代史学家们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理查能否真正收复耶路撒冷，而在于任何一位十字军统帅都应当遵从全军意愿，遵从教宗和其他十字军领导者的愿望，如萨拉丁期待的那样尝试进入耶路撒冷”。⁶⁵ 围城战的愿景可以带来的东西，也可以被围城战的现实毁灭。萨拉丁和他的顾问们显然更愿意看到十字军就地解散，返回欧洲的结局，但鉴于过去一年中十字军已经给穆斯林军队造成了惨重损失，他们无疑也愿意努力将十字军困在耶路撒冷山中，看到他们缺水少食，时刻可能受到阿迪勒、阿夫达勒和其他东方军队的袭击。⁶⁶ 这正是十字军的困局：尽管他们可以利用控制海洋的优势，通过恰当的军事部署收复沿海地区，但若想收复圣城，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仍然是与穆斯林进行谈判。在相对强势的情况下，为确保谈判成功还应达成下列条件之一：十字军要么进一步向埃及地区施压，派出战船沿尼罗河向前线运输补给；要么等待萨拉丁逝世后阿尤布王朝由于陷入继承人之争而土崩瓦解。但无论要达成哪一个条件，基督徒一方都需要在圣地保持一支大规模常备军，而不是一帮为满足心愿前往耶路撒冷朝

圣并在达成心愿后立刻返回的“朝圣队伍”。眼下基督徒并没有这样的常备军，熟悉当地情况的军事顾问们都认为，围攻耶路撒冷应当是一个美好愿景，但也只能是个愿景。

此时十字军撤离耶路撒冷的决定无疑十分不受欢迎，而西欧民众也在寻找应当指责的人。豪登的罗杰认为，理查原本打算继续进攻圣城，但勃艮第公爵在法王指使下拒绝与他一起作战，从而导致进攻计划破产。⁶⁷ 长期以来，罗杰的上述解释逐渐成为共识，甚至许多非英语史家也认同此说。在《提尔的威廉的历史的古法语续编》中也对勃艮第公爵加以指责，作者认为，勃艮第公爵不愿意看到理查在“法王先行逃离圣地后”赢得胜利，他为了使腓力和法兰西王国的荣耀不受损失，有意阻挠十字军既定计划的实施。⁶⁸ 茹安维尔也声称是勃艮第公爵阻止了十字军围攻圣城的行动，“因为他不希望听到人们说，是英格兰人收复了耶路撒冷”。⁶⁹ 总之，从稍晚时代的相关记载来看，当时的编年史家一致认为：勃艮第公爵是导致第三次十字军功败垂成的罪魁祸首，此前曾英勇奋战的理查则无须负责。然而，与理查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安布鲁瓦兹等人的记录则明白显示，尽管理查在从耶路撒冷撤退前率领十字军立下了诸多战功，但他在世时，许多人从未将他视作英雄，尤其是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他们认为理查应为第三次十字军的失败负责，放弃进攻圣城、撤军回国的决定也有损于理查此前立下的诸多战功。当时理查或许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他才发誓将会重返圣地，继续未竟的东征事业。⁷⁰

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谈判再次开始后，理查也希望通过谈判手段努力重占先机。不过安布鲁瓦兹似乎对此期间双方的谈判一无所知。早在7月6日，理查便委托马什图布向萨拉丁传递一份私人消息：“切勿被我军的后撤行动所蒙蔽，要知道攻城槌在撞破城门之前也需要稍稍后退，为此积蓄力量。”但理查随后也表示“我们已无力再战”，承认了己方人困马乏的事实。⁷¹ 双方也即将达成协议。此外，理查还以赞美萨拉丁慷慨大度之名提出了他的额外要求：“听说当一些被驱逐的僧侣们请求

阁下赐予他们一座教堂时，阁下从未让他们失望而归，那么朕也在此请求阁下能赐予基督徒一座教堂。”理查的要求如下：一是允许西欧的朝圣者进入耶路撒冷朝圣，二是将城中的圣墓大教堂划归基督徒所有。萨拉丁不仅应允了上述条件，还同意将沿海地区割让给理查的侄子、香槟伯爵亨利（“你妹妹的儿子”）统治。据巴哈丁记载，穆斯林一方给理查的回复如下：“既然阁下如此信任与我方对话，那么理当善有善报，苏丹也会将阁下妹妹的儿子当作他自己的儿子看待的。”⁷² 不过萨拉丁也提出了相应的前提条件：理查必须将阿什凯隆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但理查并不打算摧毁这座耗费重金和时间修建的要塞，他反而向阿什凯隆增派驻军，提醒萨拉丁他对埃及的威胁。⁷³ 随后理查还告诉萨拉丁，除非和约能够确保基督教一方控制从安条克至达鲁姆之间的沿海地区，否则他绝不会在和约上签字；尽管此时双方都已人困马乏，损失惨重，但他仍然会应士兵的要求，继续留在圣地作战。⁷⁴ 得知理查的回复后，巴哈丁不禁感慨道：“这个可怕的家伙是多么地诡计多端啊！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往往会采用先兵后礼的策略与我们打交道。哪怕现在他知道自己必将离开，仍然维持以上策略。只有真主能保佑穆斯林们粉碎他的阴谋，在我们的敌手之中，还从未见过比他更勇敢、更狡诈的人物。”⁷⁵

正当双方围绕阿什凯隆争论不休时，理查离开雅法前往阿克，并于7月26日进入阿克城内。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向北进攻贝鲁特。若这次突袭取得成功，将为十字军一方带来两大收益：它不仅能消除贝鲁特对的黎波里和塞浦路斯之间海运的威胁，此外还可以将萨拉丁的势力引到巴勒斯坦北部，从而为雅法和阿什凯隆的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创造战机。若这真是理查的想法，这一计划将注定无法实施，因为早在7月22日，萨拉丁的顾问们已经识破了理查的真实用意。⁷⁶ 于是，萨拉丁决定突袭雅法。此时萨拉丁恰好得到来自阿勒颇的援军，阿迪勒也率领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部队前来支援，萨拉丁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若萨拉丁能成功夺回雅法，他也将进一步收复自去年9月以来被理查攻占

的所有失地。7月27日，一支穆斯林大军突然出现在雅法城外——此时距理查抵达阿克仅仅过去了一天。7月28日，穆斯林开始围攻雅法。作为目击者之一的巴哈丁对这次战役的全过程进行了最详细记录。当穆斯林的攻城部队和工兵开始工作时，“所有人都认为雅法将在一天内被攻克”，但守军的顽强抵抗令他们始料未及，“英勇不屈、坚持作战的守军”也挫败了穆斯林的攻势，他们利用对方攻城武器和工兵制造的壕沟成功进行了防卫，巴哈丁也不禁赞叹道：“哦，这些士兵是多么优秀，多么英勇无畏。”然而攻城部队还是在7月31日早晨取得了重大进展：穆斯林工兵在五架投石器（Mangonel）的火力配合下，成功破坏了一大段城墙：“城墙倒塌宛如世界末日……倒塌的城墙掀起遮天蔽日的烟尘，当烟尘散去后，城墙的空隙处已经布满了由手握长枪和钩镰枪的基督徒们组成的人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坚定不移、毫不畏惧地屹立于此，行动也井然有序。”但这堵人墙也被石弩抛射的石块所击垮。受此影响，守军投降。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后，守军便撤离雅法城区，进入堡垒据守，穆斯林军队则进入城中大肆杀戮抢掠。此时，萨拉丁也从阿克附近的军队得知了理查正率军前往雅法试图解围的消息。萨拉丁立即与堡垒守军和谈，想要在确保守军安全的情况下让他们和平撤离，以便在理查抵达前接管雅法防务。但穆斯林军队拒绝服从萨拉丁的这一命令。“我军将士已许久没有取得如此大胜并缴获如此多的战利品了，因此他们都急切地要求乘胜追击，通过一次猛攻占领堡垒。”穆斯林军队在当天的剩余时间内便继续劫掠，雅法城内烟焰张天、喧嚣不已。尽管城区遭此劫难，但守军仍然依托堡垒得以幸存，并等到了理查的援军抵达。次日清晨，穆斯林便听到了“法兰克人的号角声”。⁷⁷

身在阿克的理查于7月28日晚得知雅法遭到围攻的消息后，便立刻与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一起乘船前去支援。尽管勃艮第公爵统率的法军拒绝出兵，但香槟伯爵亨利响应了理查的号召，他率领另一支由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组成的部队同时向南进军。不过亨利的援军在途经凯撒里亚时，由于穆斯林军队已将道路堵塞被迫停止前进。另一方面，理查的船

队也被来自卡梅尔山的风影响了驰援速度，直到7月31日或8月1日才逐渐抵达雅法。⁷⁸ 清晨降临时，看起来理查到达得已经太晚了。雅法城区内遍布穆斯林的军旗；海浪声、士兵的嚎叫、“只有一个真主”“真主至大”的呼声，使甲板上的士兵无法听到城内居民向船上的援军发出的求援呼声。他们只能看出堡垒已经沦陷。萨拉丁此时信心十足。巴哈丁也记载了萨拉丁的反应：“苏丹立刻将我唤来，对我说道：‘从海上来了一支援军试图解救城中守军，但我方部署在海滩上的部队足以阻止他们登陆。’”随后巴哈丁便受命监督堡垒守军的和平撤离事宜。随着时间流逝，守军由于没见到援军登陆而开始动摇，一部分人已经放下武器离开了堡垒。终于，一位士兵突然意识到理查如此谨慎的原因。“一位被围困的守军士兵决心守卫弥赛亚，于是从堡垒中纵身跃下，由于地面是沙滩，落地时他毫发无损。他游入水中，被一艘友军的船只救起，随后被送到理查国王的旗舰上。这名士兵向国王讲述了当前雅法的战况。当国王得知守军仍未投降时，他立刻下令船队向海岸全速前进，国王的旗舰率先靠岸，这艘船被漆成红色，甲板上有着红色顶篷，船头还升着一面红旗。在我们的注视下，其余的士兵仅用了不足一小时便从所有桨帆船上登陆完毕。随后这支援军向我军发起冲锋，我军被打得四散奔逃，被他们逐出港口。目睹此景，我迅速将这一消息禀报了苏丹。”⁷⁹

对于理查的登陆行动，安布鲁瓦兹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十字军首先利用弓弩手的火力掩护，在海岸地带清理出一片登陆场，随后理查率先脱掉护胫，跳入水中涉水上岸。⁸⁰ 在这位吟游诗人的记载中，理查当天的英勇气概甚至胜于龙塞沃（Roncesvaux）之战中的罗兰。当十字军在海滩上确定立足点后，其中一部分人便开始搜集一切木材建起滩头阵地，剩余的部队则在理查率领下继续前进，攻入雅法城区。此时的穆斯林军队仍充满信心，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一部分人仍在掠夺财物，无心战斗；另一部分人则误以为守军已经投降，因此当守军突然杀出，配合理查的援军夹击时，他们毫无防备。很快，围困堡垒的穆斯林军队非死即伤，余者逃之夭夭。萨拉丁见状也开始向内陆后撤，穆斯林军队

在撤退途中还遭到了十字军弩手的持续打击。

理查国王下令

将他的营帐立于

此前萨拉丁弃守的主营所在地，

“理查大王”（Richard the Great）就在此扎营。⁸¹

萨拉丁选择此时突袭雅法无疑十分英明，若这次进攻取得胜利，依托沿海地区重获新生的耶路撒冷王国将被分割成孤立的两块狭长领地。但萨拉丁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守军的勇气使他们恰恰抵抗了足够久的时间，而理查在千钧一发之际率援军及时赶到，面对理查、他的骑士和十字弓手，穆斯林军队毫无胜算。若理查抵达的时间再晚几个小时，那么萨拉丁便会完全控制雅法，并在与理查的博弈中占得先机，他更能凭借攻占雅法的胜利恢复自己在1187年时的威名，重新赢得埃米尔们的拥戴。

雅法之战后不久，双方又立刻开始谈判。与往常一样，率先行动的仍然是理查。在击退穆斯林军队的当天下午，理查便邀请阿迪勒的宫廷大臣阿布·伯克尔和另一些穆斯林首领前来与他会面。巴哈丁对这次会面的记录也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理查不同于其他刻板记载的一面。会面时穆斯林们发现，理查身边的陪同者是一些在阿克城被俘虏的马穆鲁克显贵们，这些马穆鲁克“得到了英王诚挚友好的招待，他们也时常应英王之召与他见面。英王在谈话时仍然保持着亦庄亦谐的风格。在讨论其他事务前，英王首先说道：‘你们的苏丹十分强大，在伊斯兰世界中无人能出其右。那他为何一见到朕的身影就要退避三舍？以天主之名起誓，朕抵达此地时甚至都没有完全穿好战甲。你们看，朕现在还穿着水手靴呢。’随后他又说道：‘以至高至善的天主之名起誓，朕起初还认为你们

的苏丹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攻陷雅法，然而他只用了两天就做到了。’接着他对阿布·伯克尔说道：‘请你向苏丹转达朕的问候，并转告苏丹，朕以天主之名请求他给予朕所希望的和平。这场战争应当彻底终结，朕在大海彼岸的王国正遭摧残，继续交战对双方都无益处。’”⁸²此后双方的使臣频繁往来，但萨拉丁仍然坚持要求理查在阿什凯隆问题上做出让步。第二天（8月2日），理查派出信使向萨拉丁宣布，若萨拉丁允许他继续保有阿什凯隆，那么最终和议将能在一周内达成，他也会立刻返回故国，无须在圣地过冬。

苏丹听罢，毫不迟疑地答道：“若这就是理查国王的最后条件，那么他恐怕还要在此地度过又一个冬季。一旦理查国王离开此地，他所征服的领土很快将被我们收复。诚然，他此时仍然精力过人，仍在可以享受人生的年纪，但他此时远离故国，返回本国还需要至少两个月的漫长旅程，就算他能勉强留在这里，他也会知道我方在此继续作战有着明显优势。我身处王国中心地带，身边还有诸多家臣和子孙陪伴，一支规模庞大、能在冬夏两季自由轮换的军队也随时待命。更重要的是，我依真主旨意行事，为推进真主的事业而战，因此绝不退让。”⁸³

理查也深知，这是非常有力的论据。但他同样深知阿什凯隆的重要战略意义，也绝不打算将这座通向埃及远征的重要据点转让出去。

眼看理查仍不让步，萨拉丁便决定趁理查尚缺少马匹，在从陆路来的援军与理查的两栖部队会合前，突袭驻扎在雅法城外的理查大本营。理查的人马太少，不足以防御城墙的破损部分，而且留在城外也比进入城内更容易维持军队的凝聚力。⁸⁴但这也使他的大本营暴露在外、易受威胁。萨拉丁也察觉到理查的这一弱点。8月4日，萨拉丁的一支骑兵趁夜色悄悄向雅法进军。据安布鲁瓦兹记载，这次突袭十字军的行动同

样功亏一篑。理查此前及时得知敌军来犯的消息，提前组织部队摆好了战斗阵形，尽管有些士兵在敌军发起第一次攻击时仍未武装完毕，但全军仍然组织有序。理查的布阵如下：前排第一线部队单膝跪地，每位士兵均手持盾牌护身，将长矛对准斜上方以防骑兵冲击；在一线重步兵身后的是两人一组进行射击的弩手，当一人进行射击时，另一人则负责为第二把弩机上弦。基督徒看到数量远多于他们的敌军时开始感到畏惧，理查率领骑兵来到阵前，发表演说以鼓舞全军士气。穆斯林骑兵率先发起冲锋，但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突破十字军刺猬般的防御阵形后，便立刻转头回撤。根据安布鲁瓦兹和西多会修道院院长科吉舍尔的拉尔夫（拉尔夫宣称，他的记录是根据当时亲临战阵的少数乘马骑士之一休·德·内维尔的叙述整理的）记载，穆斯林骑兵发起了多次冲锋，但都无功而返。两位作者也都说，穆斯林军队攻入雅法城区，又被击退。对理查而言，消灭这支敌军刻不容缓。然而据拉尔夫记载，理查和他的6名骑士比3000名萨拉森人还要强。⁸⁵ 双方从凌晨战至9时，最终基督徒一方成功将敌军击退。这天，理查与麾下的少量骑士一同谱写了这段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除理查之外，当时参战的骑士还包括香槟伯爵亨利、莱斯特伯爵罗伯特、安德鲁·德·绍维尼、拉乌尔·德·莫莱翁（Raoul de Mauléon）、威廉·德·莱唐（William de l'Étang）、休·德·内维尔、巴托罗缪·德·莫尔泰梅（Bartholomew de Mortemer）、杰拉德·德·富内瓦尔（Gerard de Furneal）、罗杰·德·萨奇（Roger de Sacy），泰约斯的亨利（Henry le Tyois）则充当掌旗官，紧握理查的狮子王旗立于战场之上。理查·德·坦普洛也满怀热情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评论：

当一位真正的王者陷于数千人的包围时，他将能在此逆境中做出怎样的壮举呢？我现在将要记录的，便正是这样一位王者的伟大事迹。受此鼓舞，我的内心已激情澎湃，握笔书写的手指也因此颤抖不已。我不知道理查国王是如何在面临如此不利的局面时仍然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或许是得到天主庇佑

的缘故。理查国王拥有一副刀枪不入的钢铁之躯，每当他右手挥剑对敌军使出雷霆一击时，总能将面前的敌人斩为两半，而他的奋战之姿也无处不在。⁸⁶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在描述这场战斗时也同样满怀激情，他用了7篇幅描述这次战斗的经过，使用了4次“难以置信”（incredible）一词。⁸⁷ 他们的记载也使后人相信：1192年8月5日发生在雅法城外的这场战斗是“令全世界震撼的伟大奇迹”。⁸⁸

抛开上述感情色彩浓厚的叙述不谈，这次战斗胜利的真正原因或许并不是少数英勇的十字军骑士对穆斯林骑兵的成功突击，而是理查指挥下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对一团散沙、士气低迷的穆斯林军队的胜利。此外，理查成功解除雅法之围的战绩也令穆斯林军队心生畏惧，而萨拉丁在指挥上的失误也成为导致穆斯林战败的重要原因。萨拉丁试图劝降雅法守军，以和平方式接管防务的策略（尽管安布鲁瓦兹因此称赞了萨拉丁的宽容大度），令无法尽情掠夺本应属于他们的战利品的穆斯林全军大为不快，一位埃米尔也提醒萨拉丁，若他希望自己的军队还能继续作战，就应当派出自己的亲兵彻底攻占雅法，并将战利品分发给全军。但巴哈丁也认为，8月5日的战斗无疑也使理查成功跻身传奇人物之列。“那天的亲历者还向我保证，他们亲眼看见了英王手持骑枪、沿着我军阵线从右向左策马奔驰的情景。然而我军却连一位敢于离开本阵应战的勇士都没有。”⁸⁹

下面我们讨论的多属于传说范畴了。在随后数个世纪中，最常被人提及的一段轶话，记录了萨拉丁或阿迪勒向理查赠送数匹骏马一事。据安布鲁瓦兹的原始版本，“勇敢、慷慨而修养良好的”阿迪勒由于对理查在雅法城外的英勇事迹感到震撼，因此给理查送去两匹阿拉伯骏马。⁹⁰ 通常来说，这样一份赠礼并不令人意外，但他不大可能在双方尚处交战状态时采取如此行动。阿迪勒确实会由于对他人的敬意赠送礼物以

示尊重，但他显然不会在自己的兄长萨拉丁调集军队，全力与十字军交战时给敌方统帅赠送礼物，当时阿迪勒也很可能并未亲临雅法前线。巴哈丁暗示，当时阿迪勒因病驻于外地（因此无法参加8月4日夜间的急行军）。⁹¹或许阿迪勒赠礼的故事不大可信，但安布鲁瓦兹仍然将其记录下来（且是最早的版本），为理查取得的“无与伦比的胜利”添加了重要注脚，进一步彰显了理查的传奇色彩。

当然，理查在战后又立刻开始与萨拉丁进行谈判。8月8日，理查的使臣与阿布·伯克尔一同返回雅法，阿布·伯克尔还带着阿迪勒的书信（或许还有两匹骏马？）前来。会谈后阿布·伯克尔告诉萨拉丁：“理查国王并未让我进入雅法城内，而是亲自出城与我见面，并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朕究竟还要在此地花费多少时间，继续向你们苏丹提出他不会接受的条件呢？朕所做的一切只为能尽快返回本国，但现在雨季开始，冬季将至，似乎朕不得不继续留在此地了。’”⁹²与理查相比，萨拉丁的状况显然要好得多，他的援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来自摩苏尔的援军于8月8日抵达，来自埃及的援军于8月20日抵达，萨拉丁之侄曼苏尔所部也于8月22日抵达。这时理查却突患重病，迫切想要梨子和桃子，于是他请求萨拉丁为他送来水果和冰雪水。萨拉丁也应允理查，为他送去所需之物，并借机查明雅法的状况。此时萨拉丁得知，驻扎在雅法的骑士至多只有300人——实际数量很可能仅有200人，他们正在修复堡垒防御工事（理查之所以决定与阿布·伯克尔在城外会面，或许正是因为不希望穆斯林获知这一情报）。另一个有利于萨拉丁的消息则是：尽管香槟伯爵努力挽留，但法兰西十字军仍然决定返回欧洲。在十字军兵力减少的情况下，萨拉丁此时仍有攻占雅法的机会。萨拉丁部下的埃米尔们也赞同这一看法，尤其是此前穆斯林军队对雅法周边地区的劫掠被一支不足300人且靠骑乘骡子作战的十字军击退。但萨拉丁的军队在8月27日夜间接近雅法，萨拉丁本人则前往拉姆拉后，阿布·伯克尔又回报了早前“他恰巧与理查国王独处”时的谈话内容，当时理查对阿布·伯克尔说道：“请乞求朕的兄弟阿迪勒劝说苏丹达成和议吧，让苏丹允许朕保留

阿什凯隆的话，朕就立刻离开此地，那样的话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回其他被基督徒占领的地区，朕只希望保持自己在基督徒中的威望不受损害。另外，若苏丹坚持他对阿什凯隆的主张，那就让阿迪勒给予我方一定的补偿吧，毕竟朕为了修复这座要塞耗费巨资。”而这也是萨拉丁第一次得知理查愿意放弃阿什凯隆。

得知此事后，萨拉丁便中止了对雅法的既定攻势，打算利用理查退让之机达成和议。8月28日，萨拉丁秘密向阿迪勒派出一名心腹，对他的兄弟传达了如下指示：“若基督徒愿意放弃阿什凯隆，那就与他们达成和议，毕竟我军也已因常年征战而疲惫不堪，耗尽军资了。”同日，休伯特·沃尔特也与萨拉丁麾下最有影响力的将领之一、对理查较为友善的穆斯林前线部队统帅巴德尔丁·迪尔迪瑞姆（Badr al-Din Dirdirim）进行了会谈。休伯特告知巴德尔丁，英王愿意在不索要赔偿的情况下放弃阿什凯隆。得知这一保证后，萨拉丁的顾问们也一致通过了苏丹提出的和平条款：理查继续保有雅法及其附属地区，但拉姆拉、利达、尤布纳（Yubna）、迈吉代勒·雅巴（Majdal Yaba）不在其中；他还将保留凯撒里亚、海法和阿克及其附属地区，但不包括拿撒勒和塞弗里斯（Sepphoris）。8月30日，理查否认他曾提出不要赔偿，但他最终还是表示接受和约，并表示他需要依赖萨拉丁的慷慨。9月1日，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并起草了和约。阿迪勒带着和约草案来到雅法，在城外的一座帐篷中等待身患重病的理查前来会面。⁹³阿迪勒将和约交给了理查，不过理查由于重病已无法阅读，但他仍然表示“属于朕的和平已经实现”。和约规定，双方将从1192年9月2日起进入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停战期。9月2日，双方的领导人正式宣誓将遵守和约，这份和约也同样适用于安条克、的黎波里和阿萨辛派的控制地区。条约的其他内容还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将能在彼此的控制区之间自由往来，阿什凯隆的城墙将被摧毁，拉姆拉和利达地区的税收将由当地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平分。理查最终也得到了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在萨拉丁决定进攻雅法的8月27日，除去低落的士气，萨拉丁拥有

巨大的战略优势。⁹⁴ 萨拉丁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传达给他身边的埃米尔们。但为了最终达成和解，他仍需要向埃米尔们的意见妥协。据和约起草者之一伊马德丁所说，埃米尔们指出，若萨拉丁解散军队，此前他所建立的一切优势都将化为乌有。而穆斯林军队的士气问题也成为不容忽视的巨大隐患。巴哈丁也认为，萨拉丁最终勉强与理查议和也是由他的军队需求和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苏丹渴望实现和平，因为他的军队已经损失惨重，军费即将耗尽。他深知将士们都急切想要返回故土，而全军在雅法拒绝服从苏丹的进攻指令一事仍然令他记忆深刻。因此，苏丹认为必须要给予军队足够的休整时间，使他们忘记目前这些令人不快的状况。否则，当苏丹下次再需要军队为他服务时，他将极可能陷于孤立无缘的境地。⁹⁵

当然，萨拉丁也担心，从长远来看议和或许并非良策，但“苏丹意识到此时议和是有意义的，因为军队已无心恋战，军中抗命不从之风盛行”，穆斯林军队的厌战情绪也在经历了阿克、阿苏夫和朗德西斯滕的惨败后，在1192年7月到8月间穆斯林进攻雅法受挫时达到顶峰。相较而言，十字军的战意更为高涨。尽管此前他们两次围攻圣城均无功而返，但在理查统率下，全军仍然战意昂扬、坚定不移，士气仍然高涨。伊马德丁转述的萨拉丁埃米尔们的言论便能体现这点：“若无法达成令基督徒满意的和约，他们仍将竭尽全力、誓死捍卫其荣誉和地位，并怀着无比的勇气战斗至死。仍会坚决捍卫信仰，不会向我方屈服。”⁹⁶ 无疑，理查的统率力是十字军得以保持高昂斗志的重要原因。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当重病的理查提出想要返回阿克疗养时，亨利伯爵和骑士团统帅们都表示，若理查不能留在雅法，他们将无法组织力量对抗手握重兵、近在咫尺的萨拉丁。⁹⁷ 诚然，理查臣僚们的褒奖使他们的主君获得了无上的声誉，但在当时的情境下，理查敌人们的言论或许更有意义：尽管

穆斯林知道理查正身患重病，但他们仍然选择议和，而非趁理查卧病之时继续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多同时代的西欧人为失去阿什凯隆悲伤不已，但他们并未将此归咎于理查。吕贝克的阿诺德、对理查怀有强烈敌意的奥地利人“伪安斯贝尔”（Pseudo-Ansbart）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十字军无法继续保有阿什凯隆的原因做了解释。⁹⁸但从安布鲁瓦兹为和约辩护的内容来看，当时仍有人因此非议理查，他也记录了批评者都是什么人。在其他人都找船回国时，理查更愿意达成和约，哪怕这使圣地仍处于危险中。若理查仍然坚持作战，日后阿什凯隆也难逃被穆斯林攻克的命运，提尔和阿克或许也将步其后尘。因此，理查为确保自己在圣地期间赢得的功绩不受损失，而选择了损害较小的方案。在第三次十字军后期，法兰西十字军非但没有为理查提供援助，事后他们还对理查极尽批判。⁹⁹腓力的宫廷史家圣德尼的里戈便认为，理查收受敌军贿赂，才导致阿什凯隆遭到摧毁；里戈的这一观点也被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和布列塔尼的威廉所沿用。¹⁰⁰迪韦齐斯的理查则从另一角度反驳法兰西人的指责，为理查辩护。他认为：由于理查意外患病，基督徒一方的形势因缺乏统帅而急转直下，休伯特·沃尔特与其他的英王重臣均认为，在此情况下与萨拉丁休战才能使他们免遭失败之灾。因此，尽管他们在议和时仍然做出一副极不情愿接受这份“令人憎恨的和约”的模样，但实际上他们急于接受任何能够实现休战的和约。随后，迪韦齐斯的理查还借“高贵的阿迪勒”之口维护理查的声誉，说阿迪勒要求对病中的理查隐瞒和约的具体条款。¹⁰¹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则认为：由于理查已慷慨地负担了法兰西十字军和其他外国十字军一年的军费，这使他财富耗尽，因此不得不与萨拉丁议和。¹⁰²上述内容并没有反映巴勒斯坦地区的真实情况，¹⁰³但它们成了日后宣传战中常被引述的材料。

尽管和约允许穆斯林到雅法市集进行贸易，并允许基督徒进入耶路撒冷朝圣，但理查却并未借机前往耶路撒冷。数十年后，法王路易九世在类似的情况下也未进入圣城。据茹安维尔记载，当时路易的顾问们援

引理查不去朝圣的事例劝告他们的主君，若像他们这样的国王在无法将圣城从天主之敌手中收复的时候进城朝圣，这样的先例一旦被效仿，将导致他的后继者们止步不前，无助于完成收复圣城的大业。¹⁰⁴ 理查并未进入圣城的原因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当时萨拉丁的顾问们认为，理查其实不希望看到众多朝圣者实现心愿。理查担心，一旦这些人达成心愿，他们将不会再次投入十字军事业中，而他此前已宣誓将再次东征。因此，他们解释道，理查曾向萨拉丁提出，若朝圣的基督徒没有获得他本人或亨利伯爵的许可书信，萨拉丁应拒绝让他们进入圣城。但萨拉丁出于同样的考虑拒绝了理查的要求，他还鼓励更多基督徒趁双方休战之际尽快前来朝圣。¹⁰⁵ 显然，理查无法禁止他的追随者前往耶路撒冷，因此，理查只能尽力组织朝圣者在三个来自不同势力的指挥官带领下分三批进城朝圣，他还鼓励朝圣者为加强雅法的防务进行捐献，而不是捐给圣地。¹⁰⁶ 不过，理查未能前往圣城或许只是由于他身患重病，无法出行。巴哈丁宣称，当时理查的病情一度不断恶化，甚至传出他已驾崩的谣言。

尽管理查的身体仍未完全恢复，但当他的追随者们都达成朝圣的夙愿后，他便决定立刻启程回国。回国前，理查还以十名在阿克俘虏的穆斯林贵族换回了威廉·德·普雷欧，后者在前一年曾使理查脱离被俘的险境。随后理查宣布将付清所有欠款，而安布鲁瓦兹也表示，理查确实兑现了这一诺言。¹⁰⁷ 最终，理查于1192年圣德尼节（10月9日）启程回国，¹⁰⁸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的十字军东征就此告终。这次十字军未能收复圣城，所以它是失败的。但考虑到理查和他的同僚们在抵达圣地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困境，这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仍然令人惊叹。¹⁰⁹ 据巴哈丁记载，当萨拉丁证实理查已经启程回国后，他立即于10月14日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大马士革。显然，萨拉丁此时仍然担心沿海地区的十字军会对巴勒斯坦的其余地区发起进攻。虽然萨拉丁在世时无须担忧，但当他故去后，近东的局势将变得难以预料。事实上，萨拉丁也深知自己逝世后家族内部必将因权力斗争发生内乱。若理查如他所

言，在圣地待到1193年复活节时（他也几乎做到了，因为10月9日是当年适合航行的最后期限），或许将能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不过历史给理查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萨拉丁于1193年3月4日逝世，此时距复活节还有三周时间，然而理查此时已在德意志身陷囹圄。

注释

1 香槟伯爵亨利于1190年8月抵达阿克，由于他是英王和法王的外甥，因此得以在围城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2 关于日期的记载参见Imad al-Din, 373。这显示，当理查经过伊贝林向阿什凯隆进军前，他或许曾在拉姆拉休整数日。理查·德·坦普洛则将日期记为1月20日，他很可能参考了安布鲁瓦兹的记载。关于他对进军日期的计算，参见H. E. Mayer, *Das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Stuttgart, 1962), 145。在继续进军前，理查很可能需要数日时间恢复此前行军的疲劳和伤病。参见Ambroise, 7830–9。

3 Ambroise, 7897–932.

4 Ibid., 8073–7. D. Pringle, ‘King Richard I and the Walls of Ascalon’,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 cxvi (1984). 与此同时，萨拉丁也在强化耶路撒冷的防御，为此他甚至用自己的马鞍装载石块，并动用了2000名基督徒战俘和50名来自摩苏尔的石匠进行工程。参见Imad al-Din, 356, 367–78, 371; Lyons and Jackson, 346–7。

5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理查解救的俘虏至少有1000人。十字军后来又攻击了一支往返于埃及与叙利亚的车队，这显示这座堡垒很快就能自我防御了。Ambroise, 8089–138, 8286–304. 但这些车队并不都是单向运货的，Imad al-Din, 373–5。

6 此前勃艮第公爵已向理查借款5000马克。参见Ambroise, 5351–6, 7967–94, 8158–76。

7 此事最早的记载参见Ambroise, 8157–270。理查·德·坦普洛将安布鲁瓦兹的记载翻译后做了重新整理，参见*Itin.*, Bk 5, chs 10–14。作为上述事件的记录者，安布鲁瓦兹、理查·德·坦普洛和豪登的罗杰都对康拉德和勃艮第公爵有很多偏见，所以我们应当谨慎对待他们的记录。据罗杰记载，勃艮第公爵和法兰西贵族们都希望康拉德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他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来自索恩厄姆的罗伯特对政治斗争的分析。尽管罗杰将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定为“复活节之后”，但这很可能是“复活节前不久”的误写。参见*Chron.*, iii, 180–1。关于事件时间的讨论，参见Favreau-Lilie, *Die Italiener*, 294–5。

8 安布鲁瓦兹的记载中并未出现“2月20日”这一日期，但他著作的译者使用了“圣灰星期三的次日”这一表述，理查·德·坦普洛可能是在安布鲁瓦兹记载的基础上推算出这一日期的。参见Mayer, *Das Itinerarium*, 145。

9 阿迪勒要求萨拉丁提交文件说明，表明他既认为双方的和平可能达成，也希望自己能不因具体条款而受指责。这或许表明1191年11月8日时理查与阿迪勒的谈判十分认真，因为它的基本内容与正式和约差异不大。

10 Baha al-Din, 327–9. 阿迪勒的大臣阿布·伯克尔将理查的最新提议汇报给穆斯林方面，阿布·伯克尔还告诉萨拉丁，自己曾多次与理查会谈，并试图说服后者调整部分内容。

11 Ibid., 331. 萨拉丁的一员将领塔克丁（Taqi al-Din）之子纳西尔丁（Nasir al-Din）担心萨拉丁将会剥夺属于其父的收入，因此希望立刻结束战争处理此事。当塔克丁逝世后（这一消息于1191年11月1日传至萨拉丁处），有传言称纳西尔丁有意投靠萨拉丁的穆斯林政敌。这可能导致了正文所述的情况。

12 这一结论来自阿克的穆斯林守军指挥官马什图布，当时他刚刚向基督徒交纳赎金获得自由。

13 随后理查下令禁止这些骑士进入阿克城。参见Ambroise, 8305–80。

14 Ibid., 8458–65. 据克雷莫纳的西卡尔所言，由于“理查支付的薪酬过于微薄”，法兰西男爵们和500名骑士才离开了阿什凯隆，而他们在提尔对穆斯林聚居点的突袭往往收益颇丰。Sicard, 23.

15 *Itin.*, Bk 5, ch. 19. 这段文字或许是理查·德·坦普洛从安布鲁瓦兹的作品中转抄的。另见Imad al-Din, 378。

16 Baha al-Din, 318. 伊本·安西尔对康拉德的评价则是：“他是所有法兰克人中最邪恶者，愿真主降祸于他。”Ibn al-Athir, 58 (Gabrieli, 24).

17 安布鲁瓦兹和理查·德·坦普洛只说修道院院长是在复活节后到的，没说具体日期。见Ambroise, 8519。

18 Ibid., 8519–648. 安布鲁瓦兹认为，当时的王位候选人只有康拉德和居伊两人。然而克雷莫纳的西卡尔则宣称，有些人倾向于第三位候选人——香槟伯爵亨利。参见Sicard, 25。若西卡尔的记载并非是经过后续发展的后见之明，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亨利在数周后被迅速认可。然而此时，相较于居伊而言，康拉德几乎不大可能向亨利效忠。

19 Baha al-Din, 329–30. 萨拉丁的保留态度再次显示了阿什凯隆的重要战略意义。

20 没有相关史料记载居伊正式获得塞浦路斯的日期，安布鲁瓦兹和豪登的罗杰暗

示，居伊获得塞浦路斯的时间应距康拉德被暗杀后不久。尽管这时尚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居伊似乎不大可能被冷落了数周时间，否则他和他的兄弟们必然会抱怨不已。根据希腊方面的史料，塞浦路斯岛的叛乱爆发于4月5日。圣殿骑士团因这一叛乱意识到自己难以控制塞浦路斯，于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打算将其转让，这也与理查打算补偿居伊的方案不谋而合。当此事在诺曼底和英格兰传播开来后，理查便决定召开三方会议讨论转让事宜。

21 *Itin.*, Bk 5, ch. 38. 理查·德·坦普洛宣称，理查并未向居伊收取任何费用，就将塞浦路斯岛转交给后者。虽然理查·德·坦普洛再次沿用了安布鲁瓦兹的说法，但现存的安布鲁瓦兹的书稿中并未记载居伊是否向理查支付金钱。参见Ambroise, 9119–23。据《历史的古法语续编》记载，理查当时对居伊“极为慷慨”，见Edbury, 112–13; P. Edbury, ‘The Templars in Cyprus’, *The Military Orders: 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ed. M. Barber (Aldershot, 1994), 190。法王宫廷则认为理查将塞浦路斯“卖给了”居伊，参见Rigord, 118。克雷莫纳的西卡尔同样持此观点，认为理查以2万拜占庭金币的价格将塞浦路斯卖给居伊。Sicard, 25。

22 Ambroise, 8715–46.

23 *Ibid.*, 8780–818; Baha al-Din, 333.

24 B. Lewis, *The Assassins* (London, 1967), 4–5. 关于山中老人及他与萨拉丁的相关故事，可参见此书第五章。安布鲁瓦兹认为，这些阿萨辛派的刺客在孩童时就被洗脑。Ambroise, 8519–46.

25 Lyons and Jackson, 87–8, 105–6.

26 Baha al-Din, 333; Imad al-Din, 376; Ibn al-Athir, 58 (Gabrieli, 239, 241).

27 Imad al-Din, 377 (Gabrieli, 240); Baha al-Din, 332. 若伊马德丁确实记载，当理查得知康拉德的死讯后，他认为自己似乎不应将塞浦路斯转交给居伊，这很可能意味着伊马德丁认为，理查对这起谋杀案事先一无所知。参见Gabrieli, 240. 对伊马德丁记载的修正参见Grousset, *Histoire des croisades*, iii, 89–91。

28 Baha al-Din, 330, 332. 另见Kessler, 230.

29 参见Kessler, 214.

30 Ambroise, 8879–908.

31 Newburgh, Bk 4, ch. 25.

32 Diceto, ii, 127–8. 隆尚事后曾将这封信件抄送给迪切托的拉尔夫，因此拉尔夫在1195年的著作中写入了这部分内容。

33 Rigord, 120–1. 据纽堡的威廉记载，1195年时腓力在听人读过这些信件后，决定

与理查议和。参见Newburgh, Bk 5, ch. 16。关于这些伪造信件的讨论，参见Gillingham, 'Royal Newsletters, Forgeries and English Historians'。

34 Edbury, 114–15. 也有人将目标指向吕西尼昂的居伊。

35 Ambroise, 8856–64, 8910–24.

36 Edbury, 115–16, 120. 虽然比萨人可能花了一两天考虑这个提议（根据克雷莫纳的西卡尔记载，亨利伯爵禁止居伊进入阿克），但《历史的古法语续编》中的故事并不可靠。这本书说，理查计划在将塞浦路斯交给居伊几天内就将他推为统治者，而居伊还向萨拉丁征求统治塞浦路斯的意见（这听上去太过传奇）。因此我不太愿意将它视作可靠的资料，比较可靠的是Favreau-Lilie, *Die Italiener*, 304–10。Möhring有力地论证道，阿迪勒报告塞浦路斯统治者与理查闹翻的信（见Lyons and Jackson, 349）是1191年5月写给伊萨克的，而不是1192年5月写给居伊的。

37 Diceto, ii, 104. 此外并无其他材料提及婚礼的日期。

38 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当理查得知康拉德的死讯时，他正在拉姆拉平原作战。见Ambroise, 8951–6。随后理查很可能便立刻返回提尔。理查·德·坦普洛则记载了4月16日至5月1日期间的诸多事件，其中包括理查在阿什凯隆、达鲁姆和耶路撒冷乡村地区进行的巡逻、粮秣征集和小规模作战等行动，而理查也不乏出色表现，他在捕杀一头野猪时展现了良好的马术技巧。参见*Itin.*, Bk 5, chs 30–3。我认为这些内容是理查·德·坦普洛在安布鲁瓦兹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但它们或许来自别的文献，参见Mayer, *Das Itinerarium*, 150。

39 Edbury, 115–16. 根据这一记载，亨利对与伊莎贝拉联姻一事感到犹豫不决：此时伊莎贝拉已经怀孕，若她生下一位男孩，那么亨利的前景将极不明朗。据说理查安慰亨利，称日后他们将一同收复整个耶路撒冷王国，进而征服其他异教徒的土地，甚至将拜占庭帝国彻底征服！

40 伊莎贝拉当时33岁，已离婚一次，并由于丧偶而三次成为寡妇。

41 Ambroise, 8987–9102. 伊马德丁则对伊莎贝拉腹中的孩子属于康拉德一事感到十分震惊。克雷莫纳的西卡尔则认为，这桩婚姻违背了伊莎贝拉的意愿。参见Sicard, 25.

42 Imad al-Din, 378.

43 见上文271页。

44 Ambroise, 9160–370. 据理查·德·坦普洛的记载，被俘的300名守军连同妇女儿童一起被带走。*Itin.*, Bk 5, ch. 39. 随后安布鲁瓦兹举出了在达鲁姆树立旗帜的一些重要势力：比萨人、热那亚人、斯蒂芬·德·隆尚（Stephen de Longchamp）、莱斯特伯爵罗伯特、安条克亲王继承人雷蒙德。巴哈丁和伊马德丁都将达鲁姆陷落的时间记载

为5月23日，当天恰好是周六，见Baha al-Din, 337和Imad al-Din, 378。理查攻占达鲁姆一事也令豪登的罗杰感到极为振奋，但他对这次战斗的记载不太可靠，除了理查在周一开始围城，并于周五通过一次突袭将其攻克的概况。参见*Chron.*, iii, 180。

45 对上述成功行动的讨论，参见Imad al-Din, 379; Baha al-Din, 337–9; Ambroise, 939 5–432。

46 Ambroise, 9436–508.

47 Imad al-Din, 379; Baha al-Din, 339; Ambroise, 9509–18.

48 Ambroise, 9550–720. 只有理查·德·坦普洛记载了这次会面的日期——6月4日，参见*Itin.*, Bk 5, ch. 46。

49 Baha al-Din, 340; Imad al-Din, 379.

50 Ambroise, 9748–884. 伊马德丁还记载了基督徒一次不成功的突击，当时他们距耶路撒冷仅有五英里。参见Imad al-Din, 380。

51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nglish trans. M. R. B. Shaw,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304–5.

52 Ambroise, 9885–10088; Baha al-Din, 341–2.

53 Ambroise, 10089–139.

54 *Ibid.*, 10140–252. 安布鲁瓦兹认为，围攻耶路撒冷是“极不明智”的举动。*Ibid.*, 10 263–6.

55 *Ibid.*, 10269–312.

56 Baha al-Din, 343–4. 关于巴哈丁对这次行动的看法参见上文23——24页。

57 Ambroise, 10509–96. 战利品中还包括地理学家哈拉维的笔记，此事参见上文30页。

58 Baha al-Din, 344–5.

59 *Ibid.*, 346–51.

60 安布鲁瓦兹认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基督教军队关系十分和谐，与此时军队中的分裂形成鲜明对比，但他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叙述并不支持他的观点。参见Ambroise, 8494–518. 这并不是为了鼓吹某种军事策略，见Markowski, ‘Richard Lionheart’, 362。

61 巴哈丁还原了激进的法兰西十字军与理性的理查之间的争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则是人员和牲畜的用水问题。参见Baha al-Din, 14, 351–2。若十字军从拜特努巴直接

向耶路撒冷进军，他们将不会对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援军进行突袭。

62 Ambroise, 10593–662.

63 Baha al-Din, 252. 关于萨拉丁如何应对理查远征埃及带来的麻烦的讨论，参见Lyons and Jackson, 352–3。

64 Lyons and Jackson, 355.

65 Markowski, ‘Richard Lionheart’, 363. 作者在第360页认为理查本应攻占耶路撒冷。然而他错误地采用了莱昂与杰克逊的分析以支持其论述。事实上，他们认为萨拉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十字军直接进攻耶路撒冷，而是对埃及发起进攻。

66 Lyons and Jackson, 355.

67 随后罗杰以同样的理由解释了1192年1月时十字军的后撤。参见*Chron.*, iii, 175, 183。

68 *Chronique d’Ernoul*, ed. L. de Mas-Latrie (Paris, 1871), 278–9.

69 *Histoire de Saint-Louis*, 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304.

70 Coggeshall, 52, 91. 虽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对理查的勇猛无畏极为赞叹，他也认为理查收复了圣地的大部分领土，但是当理查逝世后，拉尔夫仍指出，理查未能完成朝圣。

71 Baha al-Din, 353. 马什图布宣称，当他在会面结束后与理查再次交谈时，理查对他说：“请阁下担任朕和苏丹之间的调解人吧。”

72 *Ibid.*, 355.

73 *Ibid.*, 356.

74 理查在5月时对达鲁姆的进攻已摧毁了大部分城墙，使其失去防御能力。不久后理查便将其彻底摧毁。

75 Baha al-Din, 353–9.

76 Imad al-Din, 384; Baha al-Din, 360. 另见Lyons and Jackson, 355–7。

77 Baha al-Din, 361–6. 安布鲁瓦兹记载了那些天雅法杀声震天、烟尘蔽日的景象（10858–68, 11040–66, 11271–86），但他也提及了萨拉丁赦免守军的要求。

78 Ambroise, 10958–1028. 据巴哈丁记载，理查的船队由15艘轻型桨帆船和35艘其他船只组成。Baha al-Din, 370.

79 Baha al-Din, 368–70. 安布鲁瓦兹说这位跳出堡垒的守军士兵是一位不知名“唱弥

撒的修士”。见Ambroise, 11111。

80 14世纪时的《卢卡诺伯爵故事集》（*El Conde Lucanor*）一书认为，理查纵身跃下的举动，为自己预留了在天堂的一席之地。另见Hook, ‘The Figure of Richard I’, 129–39。

81 Ambroise, 11128–238. 穆斯林军队迅速撤走，意味着他们也将此前缴获的战利品全部遗弃。这些战利品中还包括他们夺回的一部分原属于埃及商队的补给品，这令他们十分恼怒。

82 Baha al-Din, 371–2.

83 Ibid., 373–4.

84 当时亨利伯爵从凯撒里亚乘船来到雅法，他的陆军部队则被留在凯撒里亚。当时城内由于死尸堆积而爆发疫病，安布鲁瓦兹认为，理查之后身患重病正是受到这一疫情的影响。Ambroise, 11318–20, 11338–40, 11683–90. 另见Coggeshall, 51。

85 Coggeshall, 50. 据理查·德·坦普洛记载，只需两位骑士和一些弩手便可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Itin.*, Bk 6, ch. 22. 这显然是基于安布鲁瓦兹的完整记载，目前保留的版本丢失了提及两位骑士之事的一行。见Ambroise, 11579。

86 理查·德·坦普洛在记载此事时采用了比安布鲁瓦兹更为激情的笔触，参见*Itin.*, Bk 6, ch. 23。

87 Coggeshall, 44–50.

88 Ambroise, 11345–6.

89 Baha al-Din, 375–6. 巴哈丁对雅法之战的（更可靠的）记录参见上文25页。

90 Ambroise, 11544–64. 关于赠马这一逸事的后续发展，参见‘Some Legends of Richard the Lionheart’,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83。

91 Baha al-Din, 376.

92 这段文字与下文的两段文字均引自Baha al-Din, 376–87。关于理查处理基督徒-穆斯林关系时所采用的激进新策略，参见Köhler, *Allianzen und Verträge*, 347–54。

93 理查起初拒绝放弃索要赔款，但在休伯特·沃尔特的劝说下他最终做出了让步，很可能是受到了理查病情的影响。

94 关于当时战略形势的分析，见Lyons and Jackson, 358–60。

95 Baha al-Din, 383.

96 Imad al-Din, 389–91; Gabrieli, 234–7. 在这次混乱的谈判期间，巴哈丁认为，“我

们十分担心这次谈判又会和以前一样毫无收获，被英王当作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对他的伎俩了如指掌”。见Baha al-Din, 383–7。

97 Ambroise, 11731–48, 11795–8. 当时“两军都能看见对方的营火，我们能听见基督徒营中的钟声，他们也能听见我们的祷告”，见Baha al-Din, 23。

98 Arnold of Lübeck, *Chronica Slavorum*, ed. J. M. Lappenberg, MGH, SRG, 1868, 1930, Bk 4 ch.16 (146); Ansbert, 99.

99 Ambroise, 11719–24, 11756–64, 11843–4.

100 *Sig. Cont.*, 429; *Philippidos*, IV, 382–6. 关于法兰西编年史家的其他讨论，另见Aubri des Trois Fontaines, MGHSS, 869。

101 Devizes, 74, 78–9.

102 Coggeshall, 51–2.

103 据理查·德·坦普洛记载，晚至1192年8月时，理查为阻止人们离开十字军队伍，许诺向为他效力的人发放薪酬，他最终招募到了50名骑士和200名步兵。*Itin.*, Bk 6, ch. 27. 安布鲁瓦兹可能也有类似记录，见注释85。

104 Joinville,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304.

105 Baha al-Din, 388–9; Imad al-Din, 394. 法兰西人得知此事后显得十分愤怒，认为理查有意为难他们。根据安布鲁瓦兹记载，许多人立刻离开圣地。Ambroise, 11839–62. 巴哈丁则认为，理查的这一要求只会让基督徒们对朝圣更为狂热。

106 Ambroise, 11868–83.

107 *Ibid.*, 12263–88.

108 Diceto, ii, 106. 理查·德·坦普洛记载的日期，以及贝伦加丽娅和琼先行乘船离开的日期（在9月29日圣米迦勒节）也来自这本书。豪登的罗杰则认为理查于10月8日启程，参见*Chron.*, iii, 185。

109 雅法和约“使十字军国家得以再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成就”。参见H. E. Mayer, ‘Henry II of England and the Holy Land’, *EHR*, xcvi (1982), 739。

第十三章

狮心王身陷囹圄

1192年12月28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致信法王腓力，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近来朕因得天主恩赐而倍感欢喜，朕之帝国亦因此荣耀倍增。朕相信此事也会让阁下与阁下之王国增添荣光。因此，朕认为应当将此人——与朕之帝国为敌并扰乱阁下王国的英王理查回国期间的相关事件告知阁下。当他渡海返回其王国时，他所乘坐的船只在伊斯特拉海岸（Istrian Coast）遭遇风暴，并在阿奎利亚（Aquileia）与威尼斯之间的海域沉没，但理查本人和少数随从幸免于难。朕的一位忠实封臣、格尔茨伯爵迈因哈德（Count Meinhard of Görz）得知了理查遭遇海难一事，由于他对理查在圣地期间犯有叛逆罪且作恶多端有所耳闻，便决定将其逮捕。伯爵率部抓获了理查身边的八位骑士，但理查逃脱了这次追捕。随后理查一行来到位于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弗利萨赫（Friesach），朕之另一封臣、佩陶的腓特烈（Friedrich of Pettau）又在此地抓获了理查的六名骑士，不过理查再一次逃出生天，但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三位随从，艰难地向奥地利赶去

。朕下令严密监视该地区内的所有道路。最终，我们亲爱的侄子、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在维也纳附近一间破旧的房屋中成功将理查抓获，如今理查已在朕的控制之下。朕确信，这一喜讯必将让阁下感到欢欣鼓舞。¹

这封信件的内容与语气无疑令人震惊：神圣罗马皇帝致信法王，并向后者介绍了自己将英王俘虏的事件。而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前任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法王腓力以及英王理查还曾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事业而与异教徒作战，如今亨利六世和腓力却在为俘虏他们的共同敌人而弹冠相庆，他们对英王理查的指控——“在圣地期间犯有叛逆罪且作恶多端”一语也令人大为惊讶，这样指责这位曾在阿苏夫和雅法击败萨拉丁的伟大统帅十分奇怪。怎么会这样呢？

事实上，那些提前返回欧洲的人们感到耻辱，并认为他们是因理查受辱。其中最活跃的反理查派是法王腓力。自从理查拒绝履行与腓力之妹艾丽丝的婚约后，他便成了理查的敌人。腓力于1191年末先行回国，豪登的罗杰也与他一同返回欧洲。正是由于罗杰的记载，我们才得以了解腓力回国期间的详细行程。²当腓力一行抵达罗马时，教宗塞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赦免了这些人提前返回未完成耶路撒冷朝圣的罪行，但据罗杰记载，腓力对此仍不满足，并希望从教宗处谋取更大的利益：

为掩盖其显而易见的邪恶本性，并撤销他在离开圣地前与理查国王订立的誓约，腓力在教宗和所有枢机主教面前都对理查大肆抱怨，宣称理查犯下许多“与其身份不符”的罪行。腓力声称，理查将他从圣地驱逐出去，且从未向他提供任何援助。为此，腓力请求教宗允许他进攻理查的领地。但教宗驳回了他

的请求，因为教宗深知他的动力仅仅是嫉妒，并告知腓力，若他胆敢冒犯理查本人或侵略其领地，教廷将对他处以绝罚。³

以此为标志，腓力正式发起了反理查的舆论战。腓力由于对教宗的答复不满而离开罗马，前往直意大利北部，进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鉴于腓力在前往圣地的路上曾与亨利六世的政敌、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结下友谊，因此亨利六世得知腓力的动向后心怀疑虑。但根据一位消息灵通的奥地利编年史家记载，双方在米兰进行会面后便建立了同盟关系。⁴豪登的罗杰知道，腓力若想安全通过亨利六世的领地，他必然需要向后者表示效忠，并发誓从未为坦克雷德提供帮助，之后也不会帮助他。然而罗杰并不了解双方会面的内情，至少他对此只字不提，而罗杰也很可能直到1192年夏季时才得知两人结盟一事，这时他恰好停止了《理查国王传》的写作。罗杰直到12世纪90年代末在他的《编年史》中对腓力回国的记录进行修正，并写下他所了解的情况时，才记录道，亨利六世向腓力承诺，若理查回国时途经他的领地，他会将其逮捕。⁵上述事实表明，亨利六世与腓力在1191年时建立的秘密同盟在当时尚不为人所知。

除腓力外，另一位认为自己遭受理查羞辱的重要人物是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当十字军攻占阿克后，利奥波德曾声称他也对胜利做出了贡献，这意味他也将获得一份战利品，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而当时，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将其视作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安布鲁瓦兹和豪登的罗杰都未记载此事。最早的记载则来自迪韦齐斯的理查和坎特伯雷的杰维斯，但他们的记载是在利奥波德将理查囚禁之后才成文的。据迪韦齐斯的理查记载，利奥波德入城时就带着他的旗帜（也是对他要求的象征），但他的旗帜随后就被取下并遭到践踏。这位编年史家相信，即使理查没有直接下达这一命令，这一行为也无疑得到了他的默许。当时利奥波德虽然强忍怒火回到营中，但满怀愤怒的奥地利公爵也因此立刻启程回国。⁶那么，这一事件的原因究竟如何？理查为何要公然羞辱利奥波德？要想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就需要对利奥波德在十字军中的地位进行更

为深入的分析。利奥波德于1191年春季抵达阿克，他抵达的时间比英王和法王稍早。随后利奥波德便成了德意志十字军的实际领袖。这是因为此前率领德意志十字军主力出征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未能抵达圣地，他于1190年6月溺死于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流中。皇帝既死，庞大的德意志十字军立刻分崩离析，⁷只有极少数的军队仍然坚持前往阿克。在皇帝的次子、士瓦本公爵腓特烈的率领下，德意志十字军的残部最终于1190年10月抵达阿克，他们还带着已故皇帝的一些遗骨，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其安葬在耶路撒冷。1191年1月，腓特烈公爵也由于染上军中扩散的瘟疫而病故。因此，利奥波德在抵达阿克后便成为当地最为尊贵的德意志贵族。尽管利奥波德家世显赫，与霍亨斯陶芬王族和科穆宁家族均有渊源，但他缺乏使自己在整个十字军中建立威望的资源：阿克的德意志十字军规模较小，他本人的随员也不多；他的收入十分微薄，无法像理查在马赛招募军队时那样出手阔绰。总之，此时的奥地利公爵只是一个游离于英、法两大阵营之外的小角色。⁸以他当时的地位而言，想将自己的旗帜插在阿克城头几无可能。⁹

假如理查和腓力允许利奥波德将他的旗帜插在阿克城头，他们即公开表示愿意与后者一同分享战利品。然而在这次东征开始前，理查和腓力便已经默认将平分战争中获得的所有战利品。两位国王虽然贪婪，但贪婪并未蒙蔽他们的双眼。多年以来，圣地的贵族们一直受到王位继承问题与军事危机的困扰，他们表示，任何一位来自西欧的君主若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上述危机，他就能掌握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权，新的王国统治者也可以利用这一权力获得王国的财政收入。¹⁰不过，上述政治和经济收益需要通过收复失地的战争方能获得，因此理查和腓力平分战利品的协定也与当地的政治结构和法理传统相符。问题部分出在利奥波德在十字军中极为尴尬的境地，部分则在于理查与腓力较晚才加入对阿克的围攻。利奥波德绝对不是唯一对两位新来的国王独占战利品不满的人，其他许多曾在阿克城下苦战一年有余甚至更长时间的男爵和骑士也对此颇有怨言——他们曾饱经磨难，到头来却极可能一无所获。这些战士

无法获得回报，便只能因为耗尽财富而不得不返回故土。他们对此抱怨不已，利奥波德便成了他们的发言人，由此确定了自己十字军中的角色。¹¹在战利品分配事宜上，腓力始终与理查保持一致，但采取实际行动的都是理查，而且他表现得过于骄横且专断独行。至于利奥波德的扯旗事件，则很可能发生于十字军入城期间或入城之后不久。腓力无疑也参与了此事，但他并未遭受任何非议。所有记载此事的编年史家——甚至是英格兰史家们都一致仅对理查横加指责。¹²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虽小，也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理查的财富、名望、统帅地位和军事才能都令人妒忌，理查的出现也会令在场的其他人产生自愧不如之感。据安斯贝尔记载，理查“篡夺”了十字军中的最高权力，对所有人都不屑一顾。他对自己法理上的封君、法王腓力毫不尊重，对蒙特费拉侯爵康拉德也极为轻慢，对奥地利公爵更是彻底无视。¹³据圣布莱西恩的奥托记载，当腓力因“领土遭受入侵”返回欧洲后，理查和利奥波德仍然坚持围攻阿克。攻占阿克后，理查傲慢地宣称胜果由他独享，公然羞辱利奥波德，将所有战利品都分给了自己的手下，并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所有事务。若不是慑于圣殿骑士团的权威，受到蔑视的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最终，他们也出于对英格兰人背信弃义的憎恨，不愿再为理查服务，与利奥波德一同返回本国。¹⁴包括腓力在内的他国十字军将领均认为自己受到了理查的蔑视。一位科隆的编年史家宣称，理查“对德意志人的勇气始终极为怀疑”。¹⁵总之，利奥波德显然有充足的理由憎恶理查。¹⁶

第三位早于理查返回欧洲的重要人物是博韦主教腓力。他或许并未被理查直接羞辱，但他与蒙特费拉侯爵康拉德关系密切，对理查同样心怀不满。据迪韦齐斯的理查记载，博韦主教在回国途中

每到一地，都会大肆宣称英王理查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他将自己的封君法王腓力出卖给萨拉丁。他暗杀了蒙特费拉侯

爵，派出刺客用刀割开了侯爵的咽喉，并下毒谋害勃艮第公爵。理查是这样的野蛮无道之人，令人不快，心如钢铁般冷硬，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¹⁷

上述记载显然对理查怀有偏见，不过迪韦齐斯的理查所言得到了另一位编年史家——圣德尼的里戈的认同。据里戈记载，当腓力得知理查将派阿萨辛刺客进入法兰西暗杀自己的消息后，便增派护卫昼夜警戒。¹⁸ 纽堡的威廉则用不那么温和的语言指出：“法王十分乐于利用这一良机贬损英王……法兰西人也成功地在整个西方世界遍传了对英王的诽谤之语。”安布鲁瓦兹则为理查高呼不平：“如此毁谤之举实在愚蠢至极！毒辣之至！他们出于对理查国王在叙利亚赫赫战功的妒忌，才使用这样的毒计毁其荣誉，并导致理查国王遭到非法拘禁。”¹⁹

当返程中的理查刚刚抵达科孚时（或许早在抵达科孚之前），就已得知了腓力发起的舆论战的规模，深知自己在归途中人身安全也将受到威胁。据迪切托的拉尔夫记载，至圣马丁节（11月11日）时理查已经到达科孚岛，²⁰ 若他按照这个速度从威尼斯前往诺曼底，那么他将能在1193年1月回到自己的王国。若理查能在那时安全返回英格兰，当时的编年史家和现代史家们都确信，有赖于理查出征前的妥善部署，安茹帝国在他出征期间仍然维持着良好的治理状态。他将回到毫发无损的安茹帝国。

不过，安茹帝国内部仍然存在政治隐患，理查那位野心勃勃、心术不正的弟弟约翰便是最大的威胁。理查在1190年10月与坦克雷德的协议中将侄子亚瑟确立为继承人的举动，对这种状况毫无改善。²¹ 在确立继承人后一年间，理查任命的英格兰主政官（伊利主教、教廷特使、英格兰首席司法官兼财政大臣）威廉·隆尚仍能有效控制局势。²² 不过隆尚与约翰的关系十分紧张，1191年2月时理查还在墨西拿期间便已得知这一状况。为防止局势失控，理查让鲁昂大主教库唐斯的沃尔特带上自

己的亲笔信回国，在必要时接管政府。不过当时英格兰尚未爆发危机，也未出现紧急事态，于是大主教便在墨西拿一直待命。当埃莉诺和贝伦加丽娅于3月30日抵达墨西拿后，大主教才与埃莉诺一同悠闲地踏上归途，直至6月末才抵达英格兰。隆尚这时也终于艰难地和约翰达成妥协，隆尚表示，若理查在东征中阵亡，他将尽全力帮助约翰获得英格兰王位。（不过在理查去世的情况下，任何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都会采取该行动。支持较为年幼且无实力的亚瑟显然不切实际。）做出承诺后，隆尚得以在1191年夏季继续治理英格兰，约翰也被人们当作王储。然而在1191年9月，隆尚的一个致命失误给了约翰夺取王位的机会。当时，理查和约翰的异母兄弟、约克大主教杰弗里背弃将远离英格兰3年的誓言，决定重返英格兰。当杰弗里在多佛尔登陆后，隆尚的连襟、多佛尔城堡的治安官试图将他逮捕，于是杰弗里逃往圣马丁修道院避难，在修道院里负隅顽抗4天后，隆尚的部下于1191年9月18日冲入修道院，他们紧拽着杰弗里的四肢将他拖出修道院，在他们试图将他从修道院教堂的圣坛上拖离时，杰弗里的脑袋还撞到了地上。

然而这一暴力行径不禁使人想起殉难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隆尚则扮演了亨利二世的角色。得知此事后，英格兰教会开始群起反对隆尚。从那天起，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暴君行径或犯罪行为（无论是政治上、性方面的还是财政上的）是隆尚做不出来的。约翰和他的党羽们毫不费力地挑起了人们对隆尚的厌恶之情，隆尚眼见无力控制局面，只得丢脸地逃出伦敦。约翰的朋友们所用的宣传策略可以从他们对隆尚逃离英格兰的描述中看出来。1191年10月的这天，隆尚在多佛尔海岸寻找船只，试图渡过海峡，隆尚的政敌更是称他“身材矮小，形似猩猩，热爱玩弄男孩”。下列关于隆尚窘境的记载来自约翰的主要追随者之一、考文垂主教诺南的休，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考文垂主教在1198年临终前对他一生犯下的滔滔罪行进行忏悔，却找不到一位愿意为他赦免罪行的教士。

尽管隆尚极为厌恶女性，但他此时不得不将自己的教士袍脱下，换上一身娼妓服饰，化装为一个女人。堂堂伊利主教竟会女装示人，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一幕，他也因此使自己沦为众人的笑柄。他穿着一条过长的绿色长袍，快速地踉跄着（因为这个可怜的矮小男人是个瘸子）从城堡高处逃到海边，然后坐在一块岩石上稍做休整。这时，一位赤裸上身的渔夫注意到了隆尚，这位渔夫刚从湿冷的海水中上岸，误以为隆尚是那种能使他浑身燥热的女人，于是他走上前去，将左臂环绕在隆尚的脖子上，右手则伸向他的下身随意抚摸。当渔夫突然将隆尚的长袍掀开，无耻地想要更进一步时，才看到了显示自己面前的“女人”其实是由男人假扮的证据。惊讶不已的渔夫便叫来他的同伴，让他们围观这令人印象深刻的怪异生物。²³

考文垂主教随后还补充道，虽然隆尚的仆人们最终将他从渔夫手中救出来，但隆尚在遭此劫难后仍被投入多佛尔监狱，被关押一周后才得以渡海前往佛兰德斯。尽管约翰的同党们可以使隆尚声名狼藉，但他们却无法保证约翰能稳掌觊觎已久的王权而不受侵犯。库唐斯的沃尔特按照理查的计划接管了政府事务，成为新的政府首脑，约翰对此十分失望，他在法王腓力回国后的行为也反映了这一点。

腓力于1191年圣诞节时回到枫丹白露，随后“重获安全的法王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将蹂躏英王的领土”。²⁴ 1192年1月20日，法王又与诺曼底总管威廉·菲茨拉尔夫在吉索尔和特里的交界地带会面。腓力在会面时伪造了与理查在1191年3月时签订的《墨西拿条约》。这份伪造的条约规定，诺曼维克桑地区是作为艾丽丝与理查联姻的嫁妆并入安茹帝国的，但此时理查已和贝伦加丽娅结婚，于是腓力以理查未履行婚约为由，要求理查将诺曼维克桑地区和艾丽丝移交给他，但腓力的要求被菲茨拉尔夫和其他诺曼底男爵们所拒绝。随后腓力愤然离开，发誓将以武

力夺取诺曼维克桑地区。为执行这一计划，腓力首先邀请约翰前往巴黎。人们认为，若约翰愿与艾丽丝结婚，腓力将承认约翰为法兰西境内所有安茹领地的主人（尽管当时约翰已婚，但腓力显然认为这不是个问题）。关键时刻，约翰的母亲埃莉诺出手干预，身在诺曼底的埃莉诺立刻赶往英格兰，与她最小的儿子、即将前往法王宫廷的约翰见面。埃莉诺与摄政沃尔特一同向约翰施压，并威胁他，若约翰胆敢与法王见面，他现有的领地将被悉数没收。约翰只得取消行程，继续留在英格兰。腓力计划对诺曼底发起军事进攻。但他手下的贵族们拒绝攻击一位仍在参加圣战的十字军统帅的领土，于是这一计划也化为泡影。²⁵ 无论如何，腓力还有另一件重大事宜需要处理——佛兰德斯伯国的继承问题。腓力于1192年初将埃诺伯爵鲍德温指定为佛兰德斯伯国的继承人，并允许博蒙特的埃莉诺（Eleanor of Beaumont）继承瓦卢瓦（Valois）和韦芒杜瓦（为了得到这两块土地，她立刻交出了佩罗纳）；相应地，腓力也得到了阿图瓦地区的控制权。由于阿图瓦地区内不仅有阿拉斯、巴波姆（Bapaume）、圣奥梅尔和朗斯伯国等战略要地，还享有吉纳伯爵、圣波勒伯爵、里尔伯爵和布洛涅伯爵的效忠，这使腓力成功控制了极为富饶而意义重大的法兰西东北部地区。为了这片土地提前回国完全是值得的。²⁶

显然，腓力提前回国之举也使安茹帝国境内属于理查的城堡进入全面备战状态。²⁷ 理查的应急措施也开始起到预期作用，腓力想从内部分化瓦解理查封臣的计策只在阿基坦地区获得暂时成功：当时理查任命的加斯科涅总管拉塞勒的埃利恰好患病，无力理政，于是许多地方领主便趁机作乱，佩里戈尔伯爵和布罗斯（Brosse）子爵则成为此次叛乱的领袖。但埃利恢复健康后便迅速重夺主动权，他很快攻克了主要叛乱贵族的城堡，或将其摧毁，或将其纳入治下，将叛乱镇压下去。不过，腓力的暗中唆使并非导致这次叛乱的唯一原因，图卢兹伯爵雷蒙德自1188年被剥夺领土之后，也极力希望将其收复。这时，理查通过与贝伦加丽娅联姻建立的安茹-纳瓦拉同盟开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当阿基坦爆发

叛乱时，贝伦加丽娅之兄纳瓦拉的桑乔七世率领大批骑士前来支援埃利，两人合力攻入图卢兹伯国境内，兵临图卢兹城下。²⁸因此，尽管腓力在1192年费尽心力地试图破坏安茹帝国的内部秩序，但安茹帝国直到1192年末都仍然保持稳定状态，最大的麻烦也出自阿基坦而非英格兰本土地区。理查出征前的人事部署和他通过婚姻建立的外交同盟均足以应对阿基坦的危机。

相较于腓力对安茹帝国的破坏，对理查而言更关键的问题则是：在关于理查的丑闻传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情况下，他要如何才能安全返回本国？我们可以逐一分析理查可能的回国路径：若理查打算在北意大利或法兰西南部登陆，并途经普罗旺斯返回阿基坦的话，对他怀有强烈敌意且控制上述地区的图卢兹伯爵将对他的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若理查打算取道法兰西东部或莱茵兰地区，他将很可能被腓力或亨利六世伺机俘虏。在科孚岛时，理查应该也能通过坦克雷德在当地的官员得知欧洲的最新消息。事实上，坦克雷德始终密切关注着亨利六世的动向，他无疑已经知晓腓力与亨利六世在米兰会面并结盟一事。²⁹可想而知，理查在1190年10月与坦克雷德的结盟，以及两个家族的联姻一定程度上招致了亨利六世的敌意。亨利六世在1191年的西西里远征中战败，他的妻子康斯坦丝也被坦克雷德俘虏，他计划再次入侵西西里，为此他与比萨和热那亚建立同盟，他们均承诺提供海军支援。这样一来，若理查打算向西沿海岸航往巴塞罗那，并假道阿拉贡和纳瓦拉王国返回的话，途中将可能遭到比萨人、热那亚人或图卢兹人的拦截。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西北部地区也处在与理查敌对的蒙特费拉家族控制下。此时冬季即将到来，若理查在海上停留的时间过长，遭遇海难的风险也会与日俱增。按惯例，入冬后地中海地区的一切海运贸易都会暂时停止（如比萨曾规定，每年11月30日后便禁止一切海上活动）。因而理查也无法在冬季将至时进入地中海，也更不可能进入大西洋。据12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Edrisi）所言，大西洋是一片极为黑暗、难以航行的海域，海中狂风不断且巨浪滔天，只有最无畏的英格兰水手会冒险在这里航

行，但他们也只敢在夏季时出航。想要进入大西洋都是不可能的。他们根本无法航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因为这里风高浪急，洋流自西向东，海峡两岸也被穆斯林把守。³⁰ 这时理查才发现，他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几乎所有可行的回国之路都被封锁。

眼下，理查唯有向他的表兄弟、统治德意志东北部的“猛狮”亨利的领土前进。³¹ 他或许计划取道匈牙利国王的领土返回本国。³² 若理查的计划确实如此，糟糕的天气与那场海难可说令他计划尽毁：由于遭遇海难，理查只得在阿奎利亚和威尼斯的中间地带登陆，但这比他预计的登陆点偏西太多。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对理查启程回国至被俘期间的经历有着最为详细的记载。据拉尔夫记载，理查在科孚停留期间放弃乘坐自己的旗舰，转而雇用了两艘较小的桨帆船。³³ 与理查一同换乘小船的随从只剩下贝蒂纳的鲍德温、莱唐的威廉等忠诚骑士，少数圣殿骑士及他最信赖的教士——普瓦图的腓力（Philip of Poitou）。这意味着理查已经决定，若他的政敌们不给他通行证，他将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以较为隐蔽的方式穿过他们的领地。³⁴ 然而不幸的是，这场海难迫使理查在对他最危险的地区登陆。当地的统治者——格尔茨伯爵迈因哈德不仅是亨利六世的忠实臣仆，还是蒙特费拉侯爵康拉德的侄子。亨利六世在写给腓力的信中将追捕理查的过程轻描淡写地称为“抓捕盗匪”，但当时巴伐利亚的编年史家莱谢尔斯贝格的马格努斯（Magnus of Reichersberg）的记载则与此不尽相同。据马格努斯记载，理查一行人先是遭到当地贵族的袭击，他们杀死和砍伤了理查的一些随从，但理查还是带着少数人逃出，并穿过卡林西亚（Carinthia），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理查进入了奥地利公爵的领地。最终，当理查在维也纳的一处贫民窟里为他的部下们准备食物时，被公爵在维也纳的官员们发现并逮捕。³⁵ 而豪登的罗杰的记载与马格努斯又有不同。据罗杰记载，尽管理查一行人已经化装为朝圣者，但他们出手阔绰的作风还是引起了旁人的怀疑。当理查意识到危险将至时，他便离开贝蒂纳的鲍德温和其他随从，让他们做诱饵，只带着一位侍从日夜兼程骑马赶

路，在维也纳附近的小村庄里休息。不幸的是，当理查睡觉时，他的侍从在外出购置食物时被奥地利公爵手下的官员们认出。³⁶一位出身茨韦特尔（Zwettl）家族的编年史家认为理查所在的小村庄名为埃德伯格（Erdberg），如今它已成为维也纳市的一部分。这个家族与杜恩斯泰因（Dürnstein）领主库恩灵的哈德玛二世（Hadmar II of Kuenring）关系密切，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了解一些细节。³⁷其他记载理查被擒一事的时代编年史家和稍晚时代的编年史家们也在罗杰记载的基础上，加入了乔装打扮的理查一行人因随身携带的大量财富引人生疑，被识破后遭到逮捕的情节。据一位被理查与萨拉丁的战斗震撼的佚名萨尔茨堡编年史家记载，理查于圣多马节（12月21日）被捕，科吉舍尔的拉尔夫编年史的页边注也使用了这个日期。³⁸一些人认为，理查在这天被捕无疑是天主的旨意。迪切托的拉尔夫相信，这是对理查反叛已故父亲的惩罚。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只是含糊地表示“这是天主的旨意”。安斯贝尔则认为，理查被捕是对他三大罪行的惩罚：在阿克羞辱利奥波德公爵，非法拘禁利奥波德的亲属伊萨克·科穆宁及其妻子，并涉嫌谋杀蒙特费拉侯爵。³⁹

成功逮捕理查后，利奥波德将他送往建立在陡崖高处的杜恩斯泰因城堡。这座可以俯瞰多瑙河的城堡属于奥地利公爵最有权势的封臣之一——库恩灵的哈德玛二世。⁴⁰据传说，理查最忠实的吟游诗人布隆德尔为了寻找理查的踪迹几乎踏遍整个德意志，每当他抵达一处城堡，便会演唱他与理查共同创作的一首诗歌的开头几行。当布隆德尔抵达杜恩斯泰因城堡演唱这段诗歌时，终于听到城堡内传出了随后的副歌。布隆德尔的这一故事最早出自13世纪后半期一位生活在兰斯的吟游诗人之口。⁴¹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其真实性，但它无疑是吟游诗人用于演唱传诵的极佳素材。实际上，理查被俘的这段故事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奥地利公爵和他的封君亨利六世都无意隐瞒理查被捕一事，他们都希望利用理查为其谋利，因此他们向欧洲大肆宣传此事。当12月28日奥地利公爵已经将理查被捕的消息告知亨利六世后，后者便立刻写信告知法王腓力

，并表示“朕确信，这一喜讯必将让阁下感到欢欣鼓舞”。⁴²很快，整个基督教世界也得知了这一惊人的消息：令人景仰的十字军统帅在如此丢脸的情况下身陷囹圄。⁴³当腓力接到亨利六世的来信后，他立刻写信告知利奥波德，理查曾雇凶杀害了康拉德，奥地利公爵不应在未与他商议的情况下将理查释放。⁴⁴

对深陷政治困境的亨利六世而言，此时抓获理查无疑是天赐之喜。此前他谋划的西西里远征不仅劳民伤财，还使他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德意志的统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⁴⁵当时的德意志境内仍然诸侯林立，尽管这位最强大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成员拥有国王头衔，但当霍亨斯陶芬家族试图令德意志全境的诸侯服从其命令时，必然会招致心怀不满的诸侯发起叛乱。不过性格强势的亨利六世不愿向地方势力让步妥协，于是他继续以强力手段宣示王权。1191年的列日主教选举引发了布拉班特公爵和埃诺伯爵的争执。得知此事后，亨利六世打算以调停争执之名将自己的代理人扶植为新的列日主教，并几乎在1192年秋季时取得成功。然而在1192年11月24日，与亨利六世敌对的候选人布拉班特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rabant）被一批骑士刺杀。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亨利六世正是这起谋杀案的主使。⁴⁶这起意外引发的抗议浪潮也迫使亨利六世不得不同时间面对两个叛乱的威胁：一派是德意志东部和北部地区的韦尔夫（Welfs）家族及其盟友；另一派则是德意志西北部的诸侯们，在两位颇有权势的高级教士——科隆大主教和美因茨大主教的号召下，下莱茵地区的贵族们也群起反对亨利六世的统治。在几乎半数的德意志诸侯参与叛乱的情况下，亨利六世很有可能会被推翻。而阿尔伯特的弟弟、布拉班特公爵亨利则被认为是德意志王位的有力争夺者。正是在亨利六世岌岌可危之际，命运将理查这份大礼送到他的手中。于是亨利六世立刻命令利奥波德将理查带到他位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宫廷，一场政治交易就此开始。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诸王列侯都对理查的归属争论不休。此前人们认为，这位十字军统帅获得了基督保佑。⁴⁷但当理查落入亨利六世之

手后，他便成了一枚对欧洲政治棋局有着重大影响的棋子，成了政客们讨价还价的目标，令各方陷入激烈争夺之中。这场涉及一国之君的政治交易将对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乃至拜占庭帝国的政局产生巨大影响。第一场交易是奥地利公爵要将理查卖给亨利六世，但互不信任的双方在此问题上都有各自的目标，不肯轻易退让。1193年1月6日，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与格尔茨伯爵迈因哈德带着理查来到雷根斯堡。12世纪90年代欧洲两位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亨利六世与理查还进行了第一次简短的会面。但利奥波德担心亨利六世趁机将理查劫走，于是他又将理查送回奥地利严加看守。经过六周的讨价还价后，亨利六世和利奥波德于1193年2月14日在维尔茨堡（Würzburg）达成协议。⁴⁸ 协议中当然并未使用“赎金”一词，但他们一致商定，理查应支付10万马克以换取自由；利奥波德将获得5万马克，这笔赎金将作为理查的侄女布列塔尼的埃莉诺与利奥波德之子的嫁妆，于次年圣米迦勒节他们成婚时带至奥地利；此外，理查还应在不索取赎金的情况下，释放此前在塞浦路斯俘虏的伊萨克·科穆宁和他的女儿。利奥波德的母亲与科穆宁家族有密切联系，他用这一善举掩盖了他的政治目的（伊萨克·科穆宁获释后便立刻与当时的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三世争夺皇位，但他却很可能因遭人投毒而突然逝世，重建科穆宁王朝的野心也化为泡影）。⁴⁹ 双方还一致同意，理查应为亨利六世提供50艘满载士兵（100名骑士和50名弩手）的桨帆船，他本人还应率领100名骑士和50名弩手支援亨利六世的下次西西里远征，直至亨利六世征服西西里或准许他离开后，理查方能回国。达成上述共识后，利奥波德同意将理查转交给亨利六世。作为交易保证，理查应向皇帝提供200名人质，其中的50人则转交给利奥波德。⁵⁰ 当然，这些条款都是亨利与利奥波德商定的，理查毫无发言权。

这时，法王腓力也将理查被囚禁的消息告诉了他认为可以最充分利用这个消息的人物——理查之弟约翰。1193年1月中旬时，约翰已经启程前往法兰西。⁵¹ 抵达巴黎后，约翰向腓力行臣服礼，以此换得诺曼底和包括英格兰在内（至少英格兰人是这么说的）的理查所有领地。此

外约翰还表示愿与艾丽丝结婚（腓力则承诺将阿图瓦地区作为艾丽丝的嫁妆转交给约翰），并将吉索尔城堡和诺曼维克桑地区交给腓力。鉴于此前腓力已成为阿图瓦地区的统治者，这意味着沿海地区的吉纳伯国和布洛涅伯国也处于腓力控制下。在布洛涅伯爵的帮助下，卡佩王朝的国王得以首次从海上对英格兰本土产生直接威胁。在布洛涅伯国境内的维桑（Wissant）地区，一支准备进攻英格兰的舰队已经集结完毕。⁵² 此时约翰也返回英格兰准备起兵。他试图拉拢苏格兰国王威廉帮助他夺得王位，但威廉不愿参与约翰的叛国计划，这正是理查在1189年对苏格兰的外交让步（即签署《坎特伯雷弃权状》一事）所获得的回报。而埃莉诺和司法官们也在英格兰境内组织力量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防卫。但除了一小部分被俘的鲁莽士兵，英格兰并没有出现有规模的入侵。约翰最大的动作，就是征集了一些威尔士和佛兰德斯佣兵守卫温莎城堡和沃灵福德城堡。他随后诈称理查已经战死，他将继承英格兰王位。虽然有一些人听信谣言投靠了约翰，但埃莉诺和司法官们仍然控制着局面，大多数男爵们也仍然忠于理查。他们深知约翰的本性，而此前摄政库唐斯的沃尔特获得了亨利六世给腓力亲笔信的一份复制品，因此英格兰贵族们也清楚理查仍然活着，他们也已得知巴斯主教萨瓦里克·德·博恩（Savaric de Bohun）和亨利六世会面的消息（萨瓦里克与亨利六世是远亲）。早在亨利六世与利奥波德会谈时，巴斯主教便已就释放理查的事宜与亨利六世进行了初步交涉。1193年2月28日，沃尔特在牛津召开大会议商议赎回理查一事。

经过讨论后，大会议决定派出两位西多会修士——博克斯利（Boxley）修道院院长与罗伯茨布里奇（Robertsbridge）修道院院长前往德意志了解相关情况。⁵³ 3月19日，两位修道院院长在距维尔茨堡不远的美因河畔小镇奥克森富特（Ochsenfurt）与理查见面，此时利奥波德正在将理查带往斯派尔（Speyer）转交给亨利六世的途中。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与两位修道院院长见面，他们也成为理查被囚禁以来最早能为他提供英格兰和诺曼底可靠消息的人，所以理查

也问了他们很多问题。尽管理查对约翰的叛乱感到十分痛心，毕竟此前理查曾赠予他诸多领地和爵位，但他仍然表示：“朕深知约翰之本性，只要有人出来反对他，他就绝不会以武力夺取朕的土地。”随后三天内，两位修道院院长陪同理查抵达斯派尔后，便返回英格兰。罗杰或许正是基于两人回国后的报告完成了他的记录。据罗杰记载，理查在这极为艰难的时刻仍能保持乐观态度，依然待人有礼、举止谨慎，尽管理查遭遇命运的无情嘲弄，但这些可贵的品质仍然使他赢得了周围所有人的尊重，让人们觉得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

1193年复活节时，理查不得不在一位真正皇帝的宫廷中经历了一场表演式的审判。据豪登的罗杰记载，3月21日，亨利六世通过中间人向理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尽管理查当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仍然拒绝了。然而实际情况是，无论亨利六世是否对理查做出威胁姿态，他的生命都不会遭到任何威胁，理查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维尔茨堡条约》的条款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这次审判的结果，而且亨利六世和利奥波德仍然要确保理查的人身安全，甚至需要请理查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合作，否则他们将难以如期获得赎金。毕竟理查绝非普通战俘，因而他们需要一些必要的程序，来合法化理查所要交的赎金。3月22日，亨利六世召集忠于他的诸侯们一同旁听审判，指控理查背弃圣地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理查与萨拉丁议和是收受了后者贿赂的结果），涉嫌谋杀蒙特费拉侯爵康拉德（康拉德的弟弟蒙特费拉的卜尼法斯也是亨利六世最忠诚的封臣之一），破坏与亨利六世的条约三项罪名。罗杰并未说明“破坏条约”所指事宜，但亨利六世在此很可能指的是理查与西西里的坦克雷德结盟一事。⁵⁴可见，上述三项罪名中的前两项无疑受到了法王腓力自结束东征后便开始的反理查宣传的影响。但理查针对上述指控逐一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的雄辩口才也赢得了出庭的德意志诸侯的支持，成功地将他们拉到自己一边。⁵⁵就连腓力的宫廷诗人布列塔尼的威廉也被理查在法庭上的风采所震撼。他写道：“当理查开始为自己辩护时，他展现出庄严的王者风范和无与伦比的勇气，他的杰出辩才也令人印象深刻。

此刻，他仿佛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位身陷囹圄、任人处置的囚徒，而是宛如帝王一般，安坐在安茹家族位于林肯或卡昂（Caen）的御座上对群臣发布谕令。”⁵⁶当亨利六世意识到法庭的舆论倾向发生变化后，便撤回了上述指控。亨利六世还赞美了理查的辩才，并给予他和平之吻，承诺将帮助他与腓力达成和解。这一幕也让法庭上的旁听者们喜极而泣。从3月23日起，利奥波德正式将理查交给亨利六世看管。⁵⁷但无论亨利六世在法庭上是否给予了理查和平之吻，理查仍需交纳赎金方能获得自由。3月25日，理查表示愿意支付10万马克赎金，并在一年内向亨利六世提供50艘桨帆船和200名骑士。据说，这是理查理应付给亨利的，因为亨利六世促成了英法和解，这个金额也是奥地利公爵尽力调停的结果。⁵⁸如果人们真是这么认为的，这必然给亨利带来巨大的麻烦。协议刚一签订，来自腓力的使臣就来到这里，并以法王的名义挑衅了理查。⁵⁹

为更好地协调英格兰政府的运作，以便更快地为自己筹集赎金，理查准备任命休伯特·沃尔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曾与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一同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并作为英格兰十字军的先锋部队于1190年秋季率先抵达阿克。当鲍德温大主教于1190年11月逝世后，休伯特便成为英格兰十字军的临时统帅，指挥英军继续围城，直到理查率主力抵达。此后，休伯特便成为理查在圣地期间形影不离的重要伙伴，他出色的军事、外交和行政才能也在理查麾下得到充分施展。当理查决定伪装一番从科孚启程回国时，休伯特很可能被留在了科孚岛。当他得知理查中途被捕的消息时，他仍在西西里。他立刻赶往罗马面见教宗塞莱斯廷三世，请求教宗对奥地利公爵实行绝罚，他还努力帮助理查恢复自由。面见教宗后，休伯特又冒险赶赴德意志，在1193年3月30日理查写给母亲埃莉诺的一封信中，他称休伯特努力游说皇帝和诸侯，试图让他们释放理查。于是理查投桃报李，在信中授意他的母亲确保休伯特当选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一重要教职自从鲍德温逝世后便处于空缺状态。理查在信中写道，除了他的自由，没有什么比休伯特获得大

主教职位更重要的了。⁶⁰随后，休伯特便与两位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返回英格兰。

理查立即要求英格兰国内应向亨利六世提供人质并派出船只将他接回国内。⁶¹理查或许认为，只要他按照亨利六世要求交出人质，自己便能获释。但亨利六世绝不会轻易让理查这张王牌溜走，他对理查也缺乏信任。尽管亨利六世曾在斯派尔对理查表示了戏剧性的友好，但他也依然顾及腓力的态度，并希望保持英法相争的态势，以求从中渔利。随后，亨利六世派重兵将理查送至建于斯派尔西部山区内的特里费尔斯（Trifels）城堡。由于此前理查在斯派尔受审时为自己赢得了诸多支持者和同情者，因此亨利六世打算让他远离德意志政治中心，处于真正的监禁状态。⁶²不过，理查的另一位老朋友威廉·隆尚通过外交活动帮助他脱离了特里费尔斯城堡的囚禁。尽管隆尚此前因约翰叛乱而被逐出英格兰，但他没有背叛理查的信任和他的职务，仍然说服亨利六世允许理查回到位于哈根瑙（Hagenau）的帝国宫廷中，甚至与后者商定了释放理查的具体时间：当英格兰已支付7万马克赎金，并为剩下的金额提供人质后，理查便可重获自由。随后隆尚也带着理查和亨利六世的亲笔信返回英格兰，要求理查的臣民尽快筹集赎金。理查在信中不仅说明了筹集赎金的各种方法，还要求司法官们以身作则进行捐献，他还希望得知每位大贵族的出资数额，“这样一来朕将清楚应如何向他们表达谢意”。当埃莉诺和司法官们收到理查的最新来信后，他们立刻下令对各类收益和动产征收25%的所得税，并向全英格兰的西多会修道院征收一年的羊毛收成，要求全国的教堂捐献金银器皿。⁶³理查的其他领地也接到了类似信件，并开展了类似行动以筹集赎金，唯一的例外是诺曼底，因为它尚未建立英格兰式的完备官僚行政体制。

当安茹帝国上下为筹集赎金而奔忙时，腓力和约翰也没有闲着，他们联手从英格兰、阿基坦和诺曼底三个方向对安茹帝国发起了进攻。在英格兰，约翰得以利用理查前途未卜之机兴风作浪。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约翰反复宣称理查将永远无法回到英格兰，但他的宣传几乎毫无效果

。为应对叛军，英格兰司法官们对王室城堡进行修复，增派卫戍部队并征召新兵，成功地将叛军逐回温莎和蒂克希尔城堡，随后将两地的叛军围困。正当人们认为被困的叛军准备献城投降时，从德意志返回的休伯特·沃尔特于4月20日抵达英格兰，他或许是在理查的授意下建议与叛军达成为期半年的休战。如果此时想在受约翰控制的诺曼底和英格兰领地为理查筹集赎金，帮助他早日恢复自由，英国应优先确保国内和平。司法官们对于是否要与一位可能成为国王的人敌对犹豫不决，在收到休伯特的建议后便立刻照办。根据停战协议，约翰仍可保有诺丁汉和蒂克希尔的城堡，但他应在休战期间将温莎、沃灵福德和德比郡的皮克城堡交给母亲埃莉诺。⁶⁴ 在阿基坦，昂古莱姆伯爵阿德马尔宣称，昂古莱姆伯爵属于法王而非阿基坦公爵的封臣，于是开始对普瓦图的安茹王室领地发起进攻。不过，忠于理查的阿基坦政府官员们成功击退了叛军，并将祸首阿德马尔俘虏。⁶⁵ 第三战场诺曼底的形势则与英格兰和阿基坦不同，腓力亲自指挥法军对诺曼底发起进攻，并对整个诺曼底公国的防御进行了沉重打击。4月12日，边界战略要地吉索尔城堡和邻近的诺夫勒城堡均向腓力投降。⁶⁶

但诺曼底的决定性弱点在于政治，而非军事方面。亨利二世和理查都为吉索尔和诺曼维克桑地区的城堡耗费巨资，但腓力并不需要对这些防线发起强攻，吉索尔城堡也并非由于遭受封锁或强攻而投降的。当腓力包围吉索尔时，城主吉尔伯特·德·瓦斯科厄伊（Gilbert de Vascoeul）未经抵抗便开城投降。记载此事的英格兰和诺曼底编年史家也一致对吉尔伯特的背叛行为严加指责。⁶⁷ 无疑，吉尔伯特背叛了他的封君理查，但他所处的尴尬境地也使其难以继续保持对理查的忠诚。1190年至1191年冬季时，当时还在西西里王国驻留的吉尔伯特已经深知，亨利六世和腓力没有任何理由对理查怀有反感。若理查最终并未被释放，而他又坚持抵抗的话，吉索尔城堡的后果将难以设想。当腓力将约翰封为新的诺曼底公爵时，吉索尔将成为卡佩王朝领地，而安茹帝国境内恐怕也没有其他领主像吉尔伯特·德·瓦斯科厄伊那样，如此直接地遭受来自法兰

西的威胁了。1193年春季时，已有许多诺曼底边区领主在腓力软硬兼施的手段面前屈服，其中包括欧马勒和厄镇的领主们、古尔奈的休（Hugh of Gournay）、卡约的威廉（William of Caieux）、默朗伯爵罗伯特（Count Robert of Meulan）以及佩尔什伯爵杰弗里（Count Geoffrey of Perche）。⁶⁸至少有卡约的威廉、古尔奈的休和佩尔什伯爵杰弗里三人曾与理查一同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杰弗里还娶了理查的一位侄女为妻。但他们与理查的亲密关系并不能保证自己的领地能抵御腓力大军的攻势。这些边区领主的共同困境是：他们同时拥有边界两侧的地产，并且难以确保永远只对其中一方的君主效忠。可以说，他们时常在法兰西国王和诺曼底公爵之间摇摆。这些见风使舵的领主们也曾在1173年至1174年的内战中加入叛军一方反抗亨利二世。若无法及时临机应变，他们的势力将可能被彻底摧毁。当腓力成为阿图瓦的统治者后，诺曼底东北部的领主们也开始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受上述现实因素的影响，在理查身陷囹圄或约翰在位时，一些诺曼底边区领主背负了朝秦暮楚的名声也并不令人惊讶。但大多数领主所面临的军事和道德困境又与吉尔伯特有所不同：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变节解释为保全祖辈领地的无奈之举，吉尔伯特尽管也是一位富有的诺曼地主，但他在吉索尔和诺夫勒地区都没有自己的地产，作为吉索尔城主，他只需向自己的封君理查效忠。⁶⁹无论如何，吉索尔与诺曼维克桑地区其他城堡的失守使安茹帝国在军事上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腓力将能深入诺曼底腹地，直接威胁首府鲁昂的安全。

占领吉索尔后不久，腓力率大军迅速对诺曼底公国的首府鲁昂发起围攻。腓力的大军中，还包括由佛兰德斯伯爵兼埃诺伯爵鲍德温八世率领的佛兰德斯佣兵。豪登的罗杰还宣称，腓力至少还带来了23台攻城器。在腓力的大军面前，鲁昂守军起初开始动摇，但理查的另一位十字军战友——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的到来令守军重振士气，使局势有所好转。当腓力要求鲁昂守军投降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复：“我军已大开城门，阁下打算何时进入都悉听尊便。”但腓力不会被如此明显的诡计所骗

，于是他下令围困鲁昂，但守军打开城门的自信表现使他心烦意乱。据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记载，腓力在攻城失败后“勃然大怒”，焚毁了所有攻城器，“灰溜溜地撤军回国”。⁷⁰ 不过，腓力撤军的原因是寻找比正面强攻更为有效的策略。虽然腓力在韦尔讷伊也遭到守军抵抗，但他随后攻占了埃夫勒和帕西，鉴于后者是莱斯特伯爵的领地，这尤其令他满意。尽管腓力的进军势头在鲁昂被暂时中止，但1193年3月至4月的军事成就仍然使他心满意足。从此开始，吉索尔城堡也成为威胁理查的肉中刺。

或许在腓力攻占吉索尔城堡后不久，身陷囹圄的理查也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诗歌《狱中哀思》（*Ja nus hons pris*）。此时一些曾与他一同参加十字军的战友们弃他而去的情景仍然令他记忆犹新。全诗如下：

并无囚徒能够直抒胸臆，
佯装自己从未因此悲戚，
但他至少还能作诗以叙幽情，
朕虽友人甚多，但他们待我却少有真心，
他们都应对我未被赎出惭愧至极，
朕已身陷囹圄两个冬季。
无论英格兰人、诺曼人还是阿基坦人，
朕麾下的骑士和男爵们尽皆知晓，
无论朕的同伴在战斗中深陷何等险境，
朕绝不会弃他而去，使他受牢狱之灾，
朕虽无意责备他人，
但此刻朕仍然身陷囹圄！

深陷于此的朕已心知肚明，
世上举目无亲、孑然一身之人，
唯有已故亡者、被困囚徒而已，
但他们若因缺金少银而将朕遗弃，
这既令朕心碎，朕之子民亦将饱受苦难，
他们亦将遭人唾骂——
假如他们继续任朕身陷囹圄。
朕已心伤难愈，但这不足为奇——
圣父已将朕的疆土废弃，任其遭人蹂躏，
若他尚且记得那神圣的誓言，
记得我们一同对天主的许诺，
朕将必然不会陷此困境，
旷日持久地饱受囹圄之苦。
那些佩尔什和卡约的领主们，
曾得朕之恩宠，朕亦以友待之，
据传他们亦已弃朕而去，此事真伪难辨——
然而朕已问心无愧，从未亏欠他们！
他们若是恩将仇报、兴兵伐朕，
朕因身陷囹圄，只得徒呼奈何。
还有曾为朕效力的安茹和图兰骑士，
如今都已富可敌国、安家乐业，

竟然将他们的封君遗忘！
他们本应助朕重获自由，
助朕离开偏远的德意志，
但他们已沉迷享乐，无意相助，
甘心让朕继续深陷囹圄。⁷¹

在德意志身陷囹圄的经历也为理查随后几年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

由于诺曼底贵族认为理查重获自由的可能性已日益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茹帝国在诺曼底的防线。诺曼底民众对12世纪时另一位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的遭遇仍然印象深刻：罗伯特公爵于1106年被英王亨利一世俘虏，直到他逝世为止的近三十年内都处于监禁状态。腓力和约翰的宣传已使诺曼底民众开始相信理查将无法重获自由，而腓力更是为使他的政敌继续被囚禁而不遗余力。腓力又计划于6月25日与亨利六世会面，⁷²虽然亨利六世表面上希望通过这次会面使理查和腓力重归于好，但理查坚信，若这次会面成功举行，他将可能被转送至法王的控制下，从而永远失去重获自由的机会。为了将理查永久监禁，腓力愿向亨利六世提供政治或经济支持。比如，腓力将可能支持亨利六世同时从边界两侧镇压下莱茵地区的德意志诸侯叛乱。⁷³总之，理查必须尽力阻止这一情况发生，为此他开始扮演外交官的角色，从中调和亨利六世与叛乱诸侯的关系。1193年初夏，在理查的斡旋下，亨利六世与一些叛乱的诸侯达成和解。由于下莱茵诸侯们与英格兰和诺曼底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因此他们必须认真聆听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理查的意见。亨利六世也十分渴望与下莱茵诸侯们和解，以便腾出经费支持他的西西里远征计划。最终，腓力与亨利六世的6月会面并未如期举行，亨利六世也与下莱茵诸侯们彻底和解。亨利六世发誓，他并未谋害布拉班特的

阿尔伯特，并允许在列日进行新的主教选举仪式。⁷⁴ 作为这个政治议程的一部分，他们针对理查的赎金进行了重新谈判，到6月29日时，理查赎金数额也在沃尔姆斯最终确定：理查只有在缴纳10万马克和相应数量的人质后方能获释，但在他获释后的7个月内还应向亨利六世再缴纳5万马克以换回人质。在此期间，理查还应将布列塔尼的埃莉诺送至奥地利，与利奥波德的儿子成婚。不过，若理查能实现他对前任萨克森公爵“猛狮”亨利的诺言，这笔5万马克的额外支出将被免除。⁷⁵ 因此，尽管理查暂时挫败了腓力的阴谋，但他仍然要为重获自由向他的封臣们索要大笔金钱。不过，理查也已经不需要在亨利六世远征西西里期间为后者提供成本高昂的军事援助了。

当腓力得知亨利六世与理查达成的最终协议后，他立刻致信约翰：“当心，恶魔即将脱离牢笼。”⁷⁶ 随后，腓力为巩固自己已有的战果，决定与理查在诺曼底的官员们议和。1193年7月9日，双方在芒特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条规定腓力可以继续保有已征服的领土。⁷⁷ 协议还规定，约翰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领地也应被恢复；当理查获释后，他还应分4次向腓力支付2万马克，为保证理查会支付这笔款项，他还应将洛什（Loches）、安德尔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Indre）、德林库尔和阿尔克四座重要城堡暂时交给腓力；昂古莱姆伯爵及其封臣获得释放，均不会因阿基坦叛乱而遭受惩罚。尽管对理查来说上述条款显得过于苛刻，但理查清楚（比腓力更清楚）自己重获自由仍需时日，因此有必要暂做任何让步，使腓力停止蚕食安茹领地。

当然，对诺曼底的进攻只是腓力“反理查战争”的一部分，他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展开行动。很明显，理查重获自由后将立刻出兵收复失地，不过腓力仍然希望攻入英格兰本土，为此他开始与丹麦王室商议联姻。1193年8月15日，腓力与丹麦国王克努特六世（Cnut VI）之女英格堡（Ingeborg）结婚。作为11世纪时曾成功征服并入主英格兰、建立丹麦王朝的克努特大王的后代，克努特六世在法理上仍然有权主张英格兰王位，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⁷⁸ 腓力正是由于对这两大条

件的重视，才选择与丹麦王室联姻的。但他在婚礼第二天后就对英格堡失去兴趣，⁷⁹ 他不仅宣布与她断绝关系，还试图将她交还给随行护送的丹麦使臣们。然而丹麦使臣们拒绝了腓力的无理要求并立刻离开法兰西，让英格堡独自面对被遗弃的现实。随后数年内，腓力宁可忍受教会的谴责，也不愿将英格堡承认为自己的王后，此前“丹麦入侵”的战略构想也成为困扰他的一大噩梦。但一心打算击败理查的腓力并不会因为这些小挫折而罢休，他利用听命于自己的法兰西主教们以近亲结婚的名义，于1193年11月5日废除了他与英格堡的婚姻。博韦主教腓力也参与了此事，当年他在阿克围城战期间就曾以类似的理由为蒙特费拉的康拉德废除了一桩婚姻。尽管教宗并未批准法兰西主教们自行其是的决定，但腓力认为他已能够另觅佳偶。为使自己在德意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能与理查抗衡，腓力计划与阿格尼丝（Agnes）结婚。这位阿格尼丝是亨利六世的叔叔、莱茵宫廷伯爵霍亨斯陶芬的康拉德（Conrad of Hohenstaufen）的女儿和爵位继承人。

至1193年12月20日，理查在英格兰及大陆上的封臣们已筹集了足够的赎金。于是亨利六世决定于1194年1月17日释放理查。亨利六世还表示，他将册封理查为“普罗旺斯国王”，并于1月24日为后者加冕。⁸⁰ 若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理查将成为一个从阿尔卑斯山延伸至罗纳河流域的王国的统治者，马赛港也将纳入理查的统治之下。尽管这片疆域理论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亨利六世并无直接在当地贵族头上强加一位君主的权力。因此，理查的“普罗旺斯国王”称号不过徒有虚名。⁸¹ 他的封臣图卢兹伯爵正是“普罗旺斯侯爵”，这层合法的封建关系也将有助于增强理查对图卢兹的控制力。至少对亨利六世来说，这一册封增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地位，理查在法理上成为他的封臣，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外交筹码。

然而理查在诺曼底北部与约翰和解的计划却极不顺利。当约翰接受理查邀请，离开法王宫廷前往诺曼底接管那些属于他的城堡时，却发现大多数城主根本不信任他，拒绝遵从理查的命令向他移交城堡。约翰见

状，一怒之下再次转投腓力。腓力为安抚约翰，便将德林库尔和阿尔克两处城堡交给后者作为补偿，然而根据此前在芒特达成的条约，上述两座城堡还在兰斯大主教的控制下。⁸² 绝望的约翰决定孤注一掷，他在1194年1月与腓力达成了另一份新的条约，这份极为屈辱的条约足以向世人表明，为何约翰在当时会陷入无人信任的境地。在新条约中，约翰不仅将除鲁昂及其附属地区之外的整个塞纳河以东的诺曼底地区统统献给腓力，还将包括韦尔讷伊和埃夫勒在内的伊顿（Itun）河以南地区和沃德勒伊（Vaudreuil）城堡拱手让出。此外，约翰还将穆兰和邦斯穆兰转交给佩尔什伯爵，它们在1168年以前曾属于佩尔什伯爵；旺多姆则被转交给布卢瓦伯爵路易；约翰还应允了昂古莱姆伯爵阿德马尔的要求，同意昂古莱姆独立于阿基坦公国之外。然而，约翰对安茹帝国破坏性最大的举措则是将图兰的数座重镇——图尔、阿泽莱里多（Azay-le-Rideau）、昂布瓦斯、蒙巴宗（Montbazou）、蒙特里夏尔（Montrichard）、洛什与安德尔河畔沙蒂永统统交给腓力。⁸³ 为了取代理查成为英王，约翰不惜将父亲和兄长此前夺取并努力巩固的大量领地拱手让给腓力，他的举动不仅使安茹帝国的土地大为减少，众多边防重镇的丧失也使安茹帝国的防御体系变得支离破碎。无疑，约翰为满足一己之私的疯狂举动也令腓力极为鄙视，这将对1199年后英法关系的发展产生极为关键的影响。⁸⁴ 无论如何，腓力和约翰当时至少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随后他们又在1194年1月与亨利六世会谈，并提出了如下条件：若亨利六世继续囚禁理查，他们将每月提供1000英镑；若亨利六世将释放理查的时间推迟至当年秋季（即1194年适合战争的季节结束之后），他们愿意为此支付8万马克；若亨利六世答应将理查囚禁一整年或直接将理查转交给他们，他们则愿意为此支付15万马克。豪登的罗杰在记载此事时不无讥讽地评论道：“瞧啊，他们对理查国王的热爱竟然到了这种程度！”⁸⁵

在腓力和约翰提出的优渥条件面前，亨利六世开始动摇，他甚至对腓力产生了一丝同情。另一方面，腓力试图与阿格尼丝联姻的计划也戏剧性地宣告破灭：阿格尼丝的母亲认为腓力是一位不称职的丈夫，不愿

将女儿许配给他，而是默许了阿格尼丝与“猛狮”亨利之子、理查的外甥布伦瑞克的亨利的秘密婚姻。⁸⁶然而这桩私密婚姻令亨利六世极为不快，后者担心这桩婚姻将增进“猛狮”亨利与理查的关系。于是，亨利六世决定推迟释放理查，并召集帝国诸侯于2月2日在美因茨召开议会。⁸⁷理查最为信赖的两大顾问——鲁昂大主教沃尔特、御前大臣隆尚，以及他的母亲埃莉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亨利六世将腓力和约翰写给他的信件交给理查阅读，而事态的发展一度如鲁昂大主教所言：“谈判陷入僵局，形势令人不安。”⁸⁸然而，理查的监禁时间已经不太可能会继续延长下去。早在数日前于维尔茨堡召开的另一次帝国议会上，亨利六世已表态承认布伦瑞克的亨利与阿格尼丝的婚姻。⁸⁹这一举动表明，霍亨斯陶芬家族已和韦尔夫家族初步和解，这无疑有助于使理查重获自由。1月底在维尔茨堡的还有与理查亲近的下莱茵诸侯们，包括美因茨大主教与科隆大主教当选者阿道夫，以及可能极为渴求金钱，不想再拖延的奥地利公爵。因此，德意志诸侯们的联合足以说服亨利六世拒绝腓力和约翰的进一步要求。⁹⁰即便如此，亨利六世仍向理查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埃莉诺的建议下，理查同意将英格兰王国交给亨利六世，再由亨利六世将其作为封地分封给理查；⁹¹此外，理查还应向他的封君亨利六世每年支付5000英镑。这样一来，理查在名义上已成为腓力和亨利六世的封臣，安茹帝国的大陆领地和英格兰王国也分别成为法王和神圣罗马皇帝的领地，但英格兰几乎无人（如果真的有的话）承认这层封建关系，人们也对这一条款避而不谈。⁹²然而在亨利六世的宫廷看来，英格兰王国已成为他王冠上的一颗明珠。⁹³最终，当英格兰方面已按要求缴纳了10万马克，并以足够的人质作为尚未支付的5万马克的抵押后，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于2月4日将理查移交给他的母亲埃莉诺，这意味着理查真正重获自由。⁹⁴

据豪登的罗杰计算，理查总共被囚禁了一年六周零三天。当理查重获自由后，他便立刻派出信使告知香槟伯爵亨利和其余留在圣地的贵族们：当他确保国内和平，并依天主旨意对他的敌人们实行复仇后，他将

会如约返回圣地，继续帮助他们对抗异教徒。⁹⁵ 理查获释当天，亨利六世和其他帝国诸侯也写信警告腓力与约翰，若后者不归还理查被囚禁期间占领的领土，他们将采取一切手段帮助理查夺回这些地区。理查从他那仿佛取之不尽的国库中掏出了大量金钱，以此换得了许多贵族的效忠。向理查效忠的贵族们包括：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列日主教、布拉班特公爵、林堡（Limburg）公爵、荷兰伯爵以及下莱茵地区的另外几个德意志诸侯；此外，奥地利公爵、蒙特费拉侯爵卜尼法斯、士瓦本公爵以及莱茵宫廷伯爵也向理查效忠。⁹⁶ 理查并未从这些德意志封臣处获得直接军事援助，因此这些德意志诸侯被认为是华而不实的点缀，但他们后来参与了构建对腓力的包围网，切断腓力与他最有价值的盟友——佛兰德斯伯爵的联系。最了解这个地区当时政局的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八世的内政大臣蒙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Mons）也比当时所有的编年史家都更清楚这点。⁹⁷ 腓力得知理查获释后，也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派出军队接管约翰在1194年1月的条约中同意割让给他的领土——毕竟此时约翰的表态还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腓力仍然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才能将这些领土据为己有。腓力从诺曼底入手。在1194年2月期间，腓力率军先后攻占了埃夫勒、勒讷堡、沃德勒伊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据点，并将其中一些据点彻底摧毁”，这标志着他已控制了塞纳河两岸，鲁昂已触手可及。当腓力撤军前，他又对鲁昂进行了第二次试探性进攻。⁹⁸ 随后腓力又转向南方的桑斯（Sens）地区，并在此地接受了理查的两位阿基坦重要封臣——杰弗里·德·朗孔与布罗斯子爵贝尔纳的效忠。

正当腓力加紧蚕食安茹帝国的领土时，理查也已踏上归途。科隆成为理查归途中的第一个落脚点，他与科隆大主教在此度过了三天。2月12日，大主教还在科隆大教堂内作为唱诗班的一员唱起了8月1日弥撒时应诵读的一段经文：“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使徒行传》12：11）⁹⁹ 2月16日，理查抵达鲁汶；2月25日，理查抵达布鲁塞尔。¹⁰⁰ 当理查抵达布拉班特的主要港口安特卫普时，

来自英格兰的船队已在此等候多时，于是理查搭乘阿兰·特朗什默（Alan Trenchmer）的船只前往茨温（Zwin），并在此待了五天。理查直至3月12日才决定跨过英吉利海峡，返回英格兰。对于正遭受侵略的安茹帝国而言，理查的返程显得过于拖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表示，由于天气状况不佳，理查不得不推迟归期。¹⁰¹ 拉尔夫的解释或许属实，但理查在此期间所做的绝非只是等待好天气来临。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每夜都在一艘来自莱伊（Rye）的装饰精美的大船上休息，第二天清晨时再回到他的桨帆船上，“因为较轻便的桨帆船能使他更迅速地在岛屿间穿行”。¹⁰² 这是理查在享受此地美景，还是在趁机侦查茨温和斯凯尔德河口及岛屿？约翰于1194年1月时将塞纳河以东的诺曼底地区割让给腓力的行为，使腓力得以趁机攻占阿尔克、厄镇，以及迪耶普、特雷波尔两处港口。如今腓力和他的盟友们已控制了佛兰德斯、布洛涅以及诺曼底东部地区的所有港口。¹⁰³ 作为英格兰历史上最有海战经验和最善于两栖作战的国王，理查应清楚地意识到安茹帝国在海陆两面都遭到严重的威胁。1213年，当时已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约翰曾在达默（Damme）之战中击败了来犯的法军，约翰赢得胜利的地点正是理查1194年时巡游的水域，达默之战的胜利也以英国海军最早的军事胜利之一为人铭记。¹⁰⁴ 更重要的是，罗杰记载道：“茨温位于佛兰德斯地区，是埃诺伯爵的领地。”而理查的船队于1194年3月在此出现（由茨温可以顺流而下抵达布鲁日），或许是在向佛兰德斯伯爵与埃诺伯爵施加军事压力。自1194年2月起，布拉班特公爵便遭到佛兰德斯和法兰西联军的进攻，¹⁰⁵ 理查的军事威胁使佛兰德斯伯爵撤军，减轻了他的盟友布拉班特公爵的压力。若这一记载属实，那么蒙斯的吉尔伯特关于理查背弃与布拉班特公爵盟约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当时吉尔伯特写道：“英王从不信守对他人的诺言，难怪当他遭遇危机时，他的盟友也不会遵守盟约。”¹⁰⁶

3月13日，理查于桑维奇登陆，并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¹⁰⁷ 威廉·马歇尔当时正因为他的兄弟约翰逝世而悲伤，但当他得知理查回到英格兰的消息后便欣喜若狂，为此他甚至没有参加兄弟的葬礼，而是急

忙赶去面见理查。威廉·马歇尔事后坦承：“国王归来的消息的确令人振奋，更令我足以忍耐我本无法承受的悲伤。”¹⁰⁸回到英格兰后，理查立刻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和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进行祈祷，感谢天主使他重获自由。¹⁰⁹

理查虽重获自由，但他和他的封臣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过，理查在远征前对国内的政治部署和设置的应急防御机制都产生了相应的作用。从1190年7月开始东征至1193年3月重回本国，理查已远离英格兰两年半之久，但在此期间，安茹王朝的国家机构仍在阿基坦、安茹和诺曼底地区有效运转，英格兰地区除了爆发由约翰和隆尚的冲突引起的骚乱，总体上也平安无事。¹¹⁰在此期间，负责地方管理的各地宫廷总管和司法官们无疑出力甚多，但理查的知人善任之功同样不应忽视。理查率领十字军在圣地征战期间，虽然许多观察家们根据理查的天性认为他可能一去不复返，他们仍然按照他将返回的方式行事。但理查在回国途中意外被他的政敌捕获，这也引发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危机。理查最强劲的政敌法王腓力利用了这场危机，成功地挑动了约翰的野心和阴谋，迫使理查的封臣们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封君可能一去不返的现实。¹¹¹腓力迅速采取行动使理查的封臣们无法再继续观望，迫使他们权衡利弊，尽快在理查和腓力之间进行抉择。在理查身陷囹圄，腓力不断率军推进的情况下，那些边区领主们显然会选择向腓力效忠，以保全自己的领地。比起同样遭受囚禁的英王斯蒂芬（他于1141年2月至11月在诺曼底被囚禁）所面临的领土损失，理查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大陆领地的主要部分基本得以保全。无论如何，腓力还是成功策反了一些阿基坦领主发起叛乱，控制了卢瓦尔河和塞纳河流域与法兰西东北部的一些战略要地。理查回国后也将面临极为艰巨的挑战：他需要为收复失地展开战争，但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将使臣民的经济压力进一步增加。为了赎回理查所筹措的10万马克巨资，甚至超过了理查在英格兰年收入的两倍，¹¹²而这笔巨款的绝大部分都落入了亨利六世的腰包。亨利六世在1193年至1194年间似乎好运不断：1194年2月20日，他的政敌、西西里国王坦克

雷德逝世，继承西西里王位的威廉三世尚还年幼。随后亨利六世利用理查的赎金组织了新的西西里远征，于1194年5月率军跨越阿尔卑斯山，并成功地于1194年11月22日在巴勒莫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但在理查的政敌中，有两个人却没什么值得庆祝的理由。其中一位是理查的弟弟约翰，理查重获自由意味着他试图争夺王位的政治豪赌宣告失败，约翰在英格兰的城堡遭到围困，必将被王军攻克。据传，当康沃尔的圣迈克尔山（St Michael's Mount）城堡的城主得知理查在英格兰登陆的消息后，便因惊吓过度而死。虽然腓力此前曾将诺曼底的阿尔克、德林库尔和埃夫勒三处城堡交给约翰作为补偿，但这比起理查1189年的馈赠而言显然微不足道。早在理查抵达英格兰之前，英格兰大会议便已没收了约翰的所有领地，主教们宣布对他实行绝罚。¹¹³此时约翰只得主动投降并请求兄长的宽恕。总之，他除了成功令他仍有可能继承的安茹帝国大伤元气之外一事无成，还让其他人充分了解了他的无能与不忠。

抓获理查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对此也颇为不快。由于非法监禁十字军统帅，他被教廷施以绝罚，还被要求返还此前收取的赎金。不过利奥波德拒绝交还赎金，毕竟他当时已花掉了大部分已经到手的赎金（约2.6万马克），并期待着布列塔尼的埃莉诺与自己的儿子尽快成婚，以便获得剩下的2万马克嫁妆。¹¹⁴然而距理查获释过去7个月后，新娘仍未到达。焦急的利奥波德不惜为此威胁理查：若后者不立刻将布列塔尼的埃莉诺送到奥地利，他将处死所有英格兰人质。当时作为人质的贝蒂纳的鲍德温受命将这一消息转达给理查。利奥波德的威胁最终奏效，1194年12月，鲍德温护卫着布列塔尼的埃莉诺与伊萨克·科穆宁之女动身返回奥地利。然而利奥波德突遭横祸：12月26日，在他外出骑马时他的马不慎摔倒，压伤了他的脚，第二天时，他受伤的脚已经变成了黑色。御医便建议他进行截肢手术，但利奥波德找不到敢于为他进行这一危险手术的人选。他极力恳求，但即使是他的继承人也不愿承担这一任务。最终，利奥波德只得自己握着斧头，对准骨头，并命令一位仆人挥舞棒

槌击打斧头使其砍下。如此反复三次后，利奥波德腐烂的伤腿终于被截断。然而为时已晚，利奥波德于12月31日逝世，他在临终前宣布与教会和解，并承诺归还理查的所有赎金。¹¹⁵ 在安茹方面看来，利奥波德之死无疑是天主为他们被囚禁的君主伸张正义的表现。另一位13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史家则认为，这不仅是对利奥波德囚禁理查这一罪行的惩罚，而理查被囚禁一事也导致了圣地至今未能收复的结果。¹¹⁶

注释

1 *Chron.*, iii, 195–6. 信件内容出自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官方档案”，见Rigord, 121–2，及*Annales Marbacenses*, ed. H. Bloch, MGH SRG (1907), 165。马巴赫编年史的相关研究参见W. Wattenbach and F. -J. Schmale,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im Mittelalter*, i (Darmstadt, 1976), 120–4。

2 *Gesta*, ii, 192–8, 203–4, 206, 227–30. 腓力于10月10日抵达奥特朗托（Otranto）。

3 *Ibid.*, 229.

4 Ansbert, 100; Otto of Blasien, *Chronica*, ed. A. Hofmeister, MGH SRG (1912), 56. 此事或许发生于12月初。参见P. Csendes, *Heinrich VI*, 104。关于安斯贝尔与圣布莱西恩的奥托，参见Wattenbach and Schmale,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99–101, 113–14。

5 *Gesta*, ii, 228; *Chron.*, iii, 167. 斯塔布斯认为，理查还是有一定可能经过包括北意大利在内的霍亨斯陶芬王室领地。

6 Devizes, 46–7. 其他的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史料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也都赞成这一点，如Gervase, 514; Rigord, 118; Otto of St Blasien, *Chronica*, 54。

7 腓特烈·巴巴罗萨意外身亡一事对阿克围城战影响极大，因为德意志十字军的进军令萨拉丁十分忧虑，使他无法专注于围城。

8 记载最为详细的奥地利史料也承认，利奥波德在阿克军中的地位并不如他的爵位显赫。Ansbert, 98.

9 首次对这一观点进行充分论述的著作是Heinrich Fichtenau, ‘Akkon, Zypern und das Lösegeld für Richard Löwenherz’, *Archiv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cxxv (1966)。布莱西恩的奥托则认为，利奥波德与理查和腓力的地位等同。参见Otto of St Blasien, C

hronica, 53–4。马巴赫编年史家也认为，攻占阿克的功劳应由三人共享。*Annales Marbacenses*, 165.

10 R. C. Smail,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150–92’,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ands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ed. P. M. Holt (Warminster, 1978), 23–43.

11 迪韦齐斯的理查将利奥波德称为“最早围攻阿克的十字军将领之一”，理查和腓力则属于“较晚参与围城者”。Devizes, 46. 于1191年春季才抵达阿克的利奥波德此时确实成了其他更早参与围城的十字军将领们的发言人。

12 Rigord, 118.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将此事发生的时间记为腓力离开圣地之后。Gervase, ii, 88.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则认为此事发生在雅法。Coggeshall, 59.

13 Ansbert, 98. 关于理查在阿克的类似记录，参见*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 MGH SS, xvii, 520。

14 Otto of St Blasien, *Chronica*, 54–5.

15 *Chronica Regia Coloniensis*, ed. G. Waitz, MGH, SRG (1880), 154,

16 纽堡的威廉看法与此不同。鉴于此前理查曾向利奥波德提供金钱支持，他认为利奥波德的怨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举。Newburgh, Bk 4, ch. 23.

17 Devizes, 80.

18 Rigord, 120–1.

19 Newburgh, Bk 4, ch. 25; Ambroise, 8879–908.

20 Diceto, ii, 106.

21 Ibid, 136.

22 关于1191年英格兰重大事件的叙述，参见Appleby, *England without Richard*与F. J. West, *The Justiciarship in England*, 69–77。

23 *Gesta*, ii, 215–20.

24 Ibid., 235.

25 Devizes, 60–1; *Gesta*, ii, 236–7.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当时还索要欧马勒和厄镇的控制权。除此以外，他对腓力在1192年1月时提出要求的记载与1191年3月时达成的协议内容并无二致。或许罗杰当时看到了腓力的文书们准备的一份1191年协议的副本？

26 J. W. Baldwin, *The Government of Philip Augustus* (Berkeley, California, 1986), 80–1.

若博蒙特的埃莉诺没有留下继承人，那么腓力将在她逝世后接管瓦卢瓦和韦芒杜瓦地区。事实上，埃莉诺历经四段婚姻仍然没有子女，这是很有可能的。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则对1192年腓力与鲍德温伯爵的协议极为不满。见*Sig. Cont.*, 428。

27 Devizes, 59.

28 *Chron.*, iii, 194.

29 由于安德鲁·德·绍维尼曾在1192年3月时出使罗马，因此理查可能在较早时候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参见*Chron.*, iii, 193。

30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13, 92, 196. 凯特·诺尔盖特认为，“理查没有选择经过赫拉克里斯之柱（pillar of Hercules）回英格兰的原因难以猜测”，Norgate, 265。但在她进行写作的时期，历史学家们尚未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31 根据一位与贝蒂纳家族有关的编年史家于1220年左右留下的记录，理查正向萨克森地区前进。这可能反映了贝蒂纳的鲍德温的想法。参见*Histoire des ducs de Normandie*, 87。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也认为，理查打算与他的侄子萨克森公爵会合。*Sig. Cont.*, 430. 另见*Continuatio Admuntensis*, MGH SS ix, 587。

32 Arnold of Lübeck, *Chronica Slavorum*, Bk 4, ch. 16. 理查或许希望途经达尔马提亚和匈牙利进入摩拉维亚。但当时的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Bela III）与艾丽丝的异姓姐妹玛格丽特结婚，因此理查认为，他拒绝与艾丽丝结婚一事可能会招致玛格丽特的怨恨。关于利奥波德和贝拉三世的争执，参见*Annales Marbacenses*, 164。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和豪登的罗杰都记录理查在匈牙利的扎达尔（Zara）登陆——这可能就是他原本的计划。Coggeshall, 54; *Chron.*, iii, 185.

33 Coggeshall, 53–4. 后来人们在布林迪西见到了理查的大船，参见*Chron.*, iii, 194。此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艘船的名字是“自由之舟”（*Franche Nef*），但新近的详细考证表明，这个错误的名字可能是与美国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这个地名混淆才产生的。H. E. Mayer, ‘A Ghost Ship Called Frankenef: King Richard I’s German Itinerary’, *EHR* (forthcoming).

34 Coggeshall, 54. 在一条边栏批注中，修士安瑟伦被记为理查的随从之一。参见Coggeshall, 54–5。

35 *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 519–20. 冬季若想穿越阿尔卑斯山可谓困难重重。由于当时亨利六世与波西米亚的奥托卡（Ottokar of Bohemia）处于敌对状态，理查得知此事后很可能打算前往波西米亚。Csendes, *Heinrich VI*, 113, n.70.

36 *Chron.*, iii, 185–6. 豪登的罗杰关于此事的记载可能来自海难的幸存者之一、后来的达勒姆主教普瓦图的彼得。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后来听到了一段关于这次追逐更戏剧性的叙述，他称其来自修士安瑟伦，Coggeshall, 54–5。

37 MGH SS, ix, 679. 但原文将此事记为1212年。

38 Ibid., xiii, 240; Coggeshall, 54–6. 迪切托的拉尔夫认为此事发生于12月20日。Diceto, ii, 106.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和迪切托的拉尔夫随后都详细叙述了奥地利人的野蛮行径。受此影响，英格兰人对奥地利人普遍缺乏好感。如迪切托的拉尔夫所言：“奥地利人比一般人更为粗暴野蛮，与野兽并无差别。”

39 Diceto, ii, 107; Coggeshall, 56–7; Ansbert, 102.

40 *Annals of Zwettl*, MGH SS, ix, 679. Ansbert, 102.

41 *Récits d'un ménestrel de Reims*, ed. N. de Wailly (Paris, 1876), 41–4; trans. E. N. Stone, *Three Old French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x, Seattle, 1939). B. B. Broughton, *The Legends of King Richard I* (The Hague, 1966), 126–8;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84–5.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认为，理查和布隆德尔之间可能存在性关系，参见N. Lofts, *The Lute Player* (London, 1951)；A. L. Rowse, *Homosexuals in History* (London, 1977), 3. 以及下文354、365——366页。

42 *Chron.*, iii, 195–6. 然而，腓力的传记作者圣德尼的里戈虽然对理查怀有诸多非议，仍然认为理查遭遇了亨利六世的非法拘禁。Rigord, 122. 圣奥班的编年史家则认为，亨利六世是听取了腓力的建议后才将理查拘禁的。*Annales Angevines*, 26. 利摩日编年史家也持此看法。*Chroniques de Saint-Martial*, 192.

43 Ansbert, 105. 他使用了“流言广为传播”进行描述。一封亨利六世信件的复制品“流传”到了司法官库唐斯的沃尔特手中，随后沃尔特便将这封信件继续复制传播，豪登的罗杰正是根据达勒姆主教手中的复本完成了他的记录。

44 Ansbert, 105–6. 无论这封信件的真实性的如何，它在奥地利历史叙述中的地位是明确的：利奥波德与康拉德之死无关，理查是谋杀康拉德的真正凶手。见Kessler, 258–9。

45 P. Csendes, *Heinrich VI*, 106–14; J. Ahlers, *Die Welfen und die Englischen Könige 1165–1235* (Hildesheim, 1987), 158–9.

46 R. H. Schmandt, ‘The Elec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Albert of Louvain, Bishop of Liège 1191–2’, *Speculum*, 1967, 653–60.

47 利奥波德十分清楚教会对他拘禁理查之举的惩处，因为他在与亨利六世谈论释放理查的条件时，还加上一条：当理查被释放后，他应请求教宗收回对利奥波德的绝罚。

48 协议全文参见Ansbert, 103–5。这份协议与此相关的其他文件都被收录在*Urkundenbuch zur Geschichte der Babenburger in Österreich*, ed. H. Fichtenau and E. Zöllner, iv, Part 1 (Vienna, 1968)。

49 关于此事的后续发展与伊萨克之女的情况，参见Fichtenau, ‘Akkon’, 25–31。

50 *Chron. Magni Presbiteri*, 520; Ansbert, 102–5.

51 后续内容参见Gervase, i, 514–5, *Chron.*, iii, 196–7, 204–5。当约翰抵达诺曼底时，他发现诺曼底的宫廷总管威廉·菲茨拉尔夫已经召集诺曼底男爵们在阿朗松召开会议，讨论理查的释放问题。当诺曼底男爵们拒绝接受约翰为他们的封君后，约翰便前往巴黎。随后腓力发动了对诺曼底的入侵，但据罗杰记载，诺曼底贵族在刚刚返回国内的十字军将领、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52 Gervase, i, 514. 当时达马尔坦的雷诺（Renaud of Dammartin）已将布洛涅女继承人劫持，并娶她为妻，随后腓力于1192年承认他为布洛涅伯爵，以此换取了这位强力封臣的忠诚。Rigord, 138.

53 下列两段依据的主要原始文献来自*Chron.*, iii, 198–9, 205–6。

54 根据一位与亨利六世的宫廷关系密切的马巴赫编年史家记载，理查曾发誓，在他途经亨利六世的领地前往圣地期间，将不会损害皇帝的利益，但理查却违背誓言，在西西里与坦克雷德组成同盟；随后理查又收受萨拉丁的贿赂，摧毁了意义重大的战略要地阿什凯隆。MGH SS, xvii, 164–5. 这或许正是亨利六世在亲笔信中提及的理查罪状。但这位编年史家并未提及康拉德被暗杀一事，或许是当他写作期间，理查涉嫌谋杀康拉德的指控已被“否定”了。关于理查与坦克雷德的同盟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损害，参见Peter of Eboli, *Liber ad honorem Augusti*, ed. G. G. Siragusa (Rome, 1905–6), 75. 另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理查对待利奥波德和伊萨克·科穆宁的恶劣态度也成为指控他的罪名之一。但即使理查在阿克对利奥波德和德意志十字军的侮辱确有其事，它也从未被作为正式罪名提出过指控。Coggeshall, 59.

55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在记载此事时，对理查在斯派尔充分展现的杰出口才和雄辩技巧印象颇为深刻。Coggeshall, 59–60.

56 *Philippidos*, iv, 393–6. 布列塔尼的威廉随后转述了理查当时的言论，他或许从斯派尔的法王特使那里了解到事件的经过，这些特使很可能在3月22日或者稍晚已经抵达。

57 Diceto, ii, 106.

58 亨利六世表示，若他未能调解理查与腓力的矛盾，他将在不收取赎金的情况下释放理查。在理查看来，为亨利六世提供军事支持的条件似乎比《维尔茨堡条约》中的条款稍好一些。

59 相关内容参见*Annales angevines*, 26。

60 *Epistolae Cantuarienses*, 362–3. 这封信件将有助于解释这一问题：杰维斯如何将被囚禁的理查塑造为一位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心系坎特伯雷大主教教职空缺一事的

君主形象。Gervase, i, 516.

61 *Chron.*, iii, 206.

62 关于特里费尔斯城堡的不良声誉，参见Diceto, ii, 106–7。

63 理查寄给母亲埃莉诺和司法官们的信件，以及亨利六世写给英格兰民众的信件日期均为1193年4月19日，豪登的罗杰收录了这两封信。*Chron.*, iii, 208–11. 理查许诺，过后将以同等价值的器皿补偿教会的损失。另见*Epistolae Cantuarienses*, 362。而理查也在1195年时履行了诺言，参见*Chron.*, iii, 290, *Itin*, Bk 6, ch. 37。

64 *Chron.*, iii, 206–7. 关于休伯特·沃尔特的角色，参见Gervase, i, 516。

65 圣奥班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这件事，*Annales angevines*, 26。随后腓力与约翰在芒特的和约的某条也提及了这点，*Chron.*, iii, 218。

66 腓力宣称，他只是为了收复被亨利二世和理查非法占据的诺曼维克桑地区。Rigord, 123. 关于这一问题另见上文110页。圣德尼的一位修士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因为腓力收复沙托讷夫堡并将其交给圣德尼修道院的举动维护了修道院的利益。

67 *Chron.*, iii, 206; Coggeshall, 61; Newburgh, Bk 4, ch. 34; Ambroise, 1166–7; *Annales de Jumièges*, 75; *Le très ancien contumier de Normandie*, ed. E. J. Tardif (Rouen, 1881), 108.

68 上述三位领主转变阵营反映在了《芒特条约》的条款中，见*Chron.*, iii, 218。理查在诗歌中也提及了卡约的威廉，另见下文332页。关于欧马勒的情况，参见Newburgh, Bk 4, ch. 34。

69 关于吉尔伯特的研究，参见Powicke, 96与D. J. Power, ‘Between the Angevin and Capetian Courts: John de Rouvray and the Knights of the Pays de Bray, 1180–1225’, in *Family Trees and the Roots of Politics*, ed. K. S. B. Keats-Rohan (Woodbridge, 1997), 375–9。吉尔伯特的主要地产位于昂代勒河谷，远离埃普特河前线，因此他将吉索尔城堡拱手让给腓力的行为通常也被视为不忠之举。但事实上大多数吉索尔领主主要是有着诺曼底和英格兰地产的法兰西贵族，因此我们不应为1193年吉索尔城堡易主之事感到太过惊讶。参见J. Green, ‘The Lords of the Norman Vexin’, in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84), ed. J. Gillingham与J. C. Holt, 58–9。

70 *Chron.*, iii, 207; *Sig. Cont.*, 430; Gislebert of Mons, *Chronicon Hanoniense*, ed. L. Vanderkindere (Brussels, 1904), 285; *Annales angevines*, 26; *Annales de Jumièges*, ed. J. Laporte (Rouen, 1954), 75. 里戈并未提及这年有围攻鲁昂的战事。见本章注释98。坎特伯雷的杰维斯也一改关于此前对腓力的正面评价，开心地将他称为“丢脸的国王”，见Gervase, i, 515–6。

71 译文基于Norgate, 278。关于此诗的评价，见下文355——356页。

72 *Chron.*, iii, 212, 214–7.

73 Newburgh, Bk 4, ch. 37.

74 *Chron.*, iii, 214. 据罗杰记载，萨克森公爵（他仍用这一头衔称呼“猛狮”亨利）并不受和约保护，若亨利希望受此保护，他应放弃统治萨克森公国，亨利自然会拒绝这一要求。

75 我们并不清楚这一条款的具体内容，因为这一条款故意用晦涩的语言写成。一个被人们详细讨论过的较为可能的情况是：理查劝说“猛狮”亨利之子、布伦瑞克的亨利取消他与莱茵宫廷伯爵康拉德之女及继承人阿格尼丝的婚约。参见Ahlers, *Die Welfen*, 162–3。若理查当时确实尝试过的话，当腓力求娶阿格尼丝时，他应该也不再愿意阻挠亨利与阿格尼丝了。理查更可能当时承诺劝说固执的“猛狮”亨利放弃统治公国，以实现双方的和解。参见下文337页。

76 *Chron.*, iii, 216–7.

77 豪登的罗杰记录了这份协议的全文，参见*Chron.*, iii, 217–20。根据协议，腓力将控制洛什和沙蒂永，德林库尔和阿尔克则处在兰斯大主教的控制下。上述四地守军的支出由英王全部负责。相关评论参见*Annales angevines*, 26。

78 关于12世纪晚期丹麦国王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参见Gillingham, ‘Gaimar, the Prose Brut and the Making of English History’, in *L’Histoire et les nouveaux publics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ed. J-P. Genet (Paris, 1997)。

79 *Chron.*, iii, 224–5. 关于腓力与英格堡婚姻的评价参见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17–85。

80 *Chron.*, iii, 225–7. 其中包括理查从斯派尔寄出的信件，以及亨利六世从盖恩豪森（Gelnhausen）寄出的信件的复本。

81 关于现实状况的分析参见*Chron.*, iii, 225–6。

82 *Ibid.*, 227–8.

83 *Foedera*, i, 57. 关于条约签订的日期，参见Powicke, 97, 99; Landon, 205, n. 6。

84 “这个满怀诡计的人，已经背叛了他的父亲，最近又背叛了兄弟，不可能不同样背叛他的国王。”*Philippidos*, iv, 449–50. 他曾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如今又背叛了他的兄长和法兰西国王。1196年时，圣德尼的里戈写道，约翰与腓力签订的条约极不可靠。Rigord, 126. 关于腓力对约翰的轻视，可参见HGM, 10163–70。

85 *Chron.*, iii, 229.

86 纽堡的威廉乐于见到腓力的沮丧，并将这一故事记录下来。他认为，亨利六世

曾接纳了腓力的提议。Newburgh, Bk 4, ch. 32. 另见Arnold of Lübeck, *Chronica*, Bk 5, ch. 20; *Annales Stederburgenses*, MGH SS, xvi, 227. Ahlers, *Die Welfen*, 164–5.

87 *Chron.*, iii, 229. 一些德意志史家认为，亨利六世责备理查未能阻止这桩婚事。

88 Diceto, ii, 112. 记载来自一封大主教给拉尔夫的信。

89 据吕贝克的阿诺德记载，由于他的父亲未能以军事手段恢复其名誉，布伦瑞克的亨利感到失望，决定通过这场冒险的联姻达到同一目的。不过，很可能是受腓力废止与英格堡的婚姻一事的影响（他可能在腓力拒绝英格堡后就出发了），布伦瑞克的亨利才最终决定提出联姻。H.-J. Freytag, ‘Der Nordosten des Reiches nach dem Sturz Heinrichs des Löwen’, *DA*, xxv (1954), 517–20. Jordan, *Henry the Lion* (Oxford, 1986), 197. 琴代什感叹了亨利六世接受这桩婚事的速度，参见Csendes, *Heinrich VI*, 142.

90 G. Baaken, *Die Regesten des Kaiserreiches unter Heinrich VI*, *Regesta Imperii IV/3* (Cologne, 1972) nos 331–2. 鲁昂大主教在写给迪切托的拉尔夫的信中，强调了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在促成理查与奥地利公爵、亨利六世谈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Diceto, ii, 112–13.

91 对理查抵抗萨拉丁的伟业印象深刻（见上文321页）的这位佚名的萨尔茨堡编年史家，也强调理查要向亨利六世行臣服仪式，以及理查的母亲埃莉诺“急切地想要使她最爱的儿子重获自由”而来到美因茨的经过。MGH SS, xiii, 240. 关于萨尔茨堡大主教于2月初现身美因茨的记载，参见*Chron.*, iii, 232.

92 迪切托的拉尔夫并未提及此事，只提及双方还达成了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Diceto, ii, 113. 豪登的罗杰详细记载了所有条款，参见*Chron.*, iii, 202–3. 不过罗杰的记载大约在1201年才插入进去的，而且肯定是在亨利六世死后，亨利六世在临死前宣布英格兰王国不再向神圣罗马帝国臣服，见Corner, *EHR*, xcvi (1983), ‘The Earliest Surviving Manuscripts of Roger of Howden’s *Chronica*’, 309.

93 *Annales Marbacenses*, MGH SS, xvii, 165. Cf. the Salzburg annalist, MGH SS, xiii, 240. 在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时，美因茨大主教齐格菲还对理查的誓言记忆深刻。S. Kuttner and A. Gracia y Gracia, ‘A New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Traditio*, xx (1964), 115–78.

94 *Chron.*, iii, 231–3. 这些人质中，有鲁昂大主教、御前大臣、巴斯主教萨瓦里克、纳瓦拉国王桑乔之子斐迪南、“猛狮”亨利的两个儿子奥托和威廉、索恩厄姆的罗伯特、鲍德温·维克（Baldwin Wake）以及罗杰·德·托斯尼（Roger de Tosny）的一个儿子。不过他们都未在德意志停留太久。当理查获得自由后，他仍在向亨利六世交纳赎金。1195年11月时亨利六世减免了1.7万马克赎金，这很可能就是当时尚未较缴清的余款总额。*Chron.*, iii, 303.

95 *Ibid.*, 233–4.

96 Ibid. 对于一些德意志诸侯来说，这相当于理查承诺将回报他们为使查获得自由而提供的帮助。Ibid., iv, 37–8. 关于1194年的德意志诸侯，可参见A. L. Poole, ‘Richard the First’s Alliances with the German Princes in 1194’, in *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F. M. Powicke*, ed. R. W. Hunt, W. A. Pantin and R. W. Southern (Oxford, 1948), 90–9。

97 Gislebert of Mons, *Chronicon*, 284–5. 他说，理查承诺，将帮助鲁汶公爵（或布拉班特公爵）对抗埃诺伯爵、佛兰德斯伯爵兼那慕尔（Namur）侯爵鲍德温八世。鲍德温八世的内政大臣对理查与德意志诸侯的同盟并无好感，因为其中一位获得赐金的人是鲍德温的儿子。

98 Rigord, 125–6. 据里戈记载，腓力正是此时在盛怒之下放火烧毁攻城武器的。根据瑞米耶日的编年史记载，鲁昂市民在其他诺曼底民众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腓力的攻势。*Annales de Jumièges*, 75.

99 Diceto, ii, 114; *Chron.*, iii, 235. 当时还是科隆大教堂教长的阿道夫大主教曾参加了1193年3月在斯派尔的审讯，他可能也是为理查辩护的德意志诸侯之一。

100 J. Falmagne, *Baudouin V, comte de Hainaut 1150–95* (Montreal, 1966), 278–9.

101 Coggeshall, 62.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每年的这个时节，春分前后的大潮导致至少有10天人们无法穿过海峡。”Falmagne, *Baudouin*, 279.

102 *Chron.*, iii, 235. 罗杰或许是从普瓦图的腓力那里得到了消息。Landon, no. 394.

103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总结道，腓力在1193至1194年获得了远至迪耶普的土地。Coggeshall, 61.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还记录了当时的一条流言，说腓力当时打算从海上伏击理查。Gervase, 524.

104 在同样的水域内，爱德华三世于1340年赢得了斯鲁伊斯（Sluys）海战的胜利。

105 关于这次对布拉班特公爵的军事行动，参见Gislebert of Mons, *Chronicon*, 291. 尽管埃诺的御前大臣将鲍德温八世的失败归结于天气因素，但理查的船队在安特卫普和茨温出现时带来的外部压力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也提及理查率领船队出现在安特卫普一事。*Sig. Cont.*, 431.

106 Gislebert of Mons, *Chronicon*, 285. 吉尔伯特这一偏见明显的言论意味着，任何历史学家在使用他的记载时都应十分谨慎。

107 *Sig. Cont.*, 431; Newburgh, Bk 4, ch. 42; Diceto, ii, 114. 另可参见Coggeshall, 62–3。 *Philippidos*, iv, 428. *HGM*, 10012–16. *Annales angevines*, 28.

108 *HGM*, 10018–86. 此事在《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中有详细说明。参见Crouch, *William Marshal*, 72–4.

109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提及，理查称在拜访坎特伯雷大教堂之前，绝不进入其他英格兰的教堂。这一细节或许表明，理查此时清楚应如何面对坎特伯雷的僧侣们。Gervase, i, 524. 理查拜访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记录参见Coggeshall, 62。

110 英格兰的巡回法庭制度在1191年至1192年仍然正常运作，但1193年由于约翰的叛乱而陷于停滞。不过，如果将税收状况当作判断政府运行状况的唯一或者主要标准，那么英格兰的政治状况在1191年至1192年可以说很糟糕。从财政署的记录来看，1191年至1193年的收入分别为12418英镑、9857英镑和10506英镑。也许在1190年的巨额收入后，英国人民也需要短暂的休养生息（1190年的收入不少于31089英镑，参见第七章注释64），但这三年的税收总额也少于亨利二世统治末年及理查统治的最后几年内的税收总额（这些数据来自巴拉特博士，我在此向他表示感谢）。不过我们也应清楚，税收总额的减少也与理查不在国内，相应开支的减少有关。若在理查远征期间仍然保持较高的“平均”税率，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显然也并不合理。尽管在1192年圣米迦勒节到1193年圣米迦勒节期间的收入只有10506英镑，但1193年春季开始在全英格兰征集赎金的行动一定也征得了十分可观的数额。遗憾的是，当时单独的赎金财政署的档案并未保存下来。

111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曾两次将理查重返英格兰描述为“意料之外的事件”。Gervase, i, 525, 526–7.

112 当然，这些收入不完全来自英格兰。如圣马夏尔修道院就从自己的地产征收了50马克，又从租户处征收了50马克上缴国库。参见*Chroniques de Saint-Martial*, 192. 作者也写道，“王国境内的”所有修道院都应缴纳税赋，这里的“王国”显然不仅是英格兰王国。关于诺曼底财政署卷宗里关于巨额赎金支付的内容，参见V. Moss, ‘The Norman Fiscal Revolution 1193–98’, in *Crises, Revolutions and Self-Sustained Fiscal Growth*, ed. R. Bonney and M. Ormrod (Stamford, 1999)。

113 *Chron.*, iii, 236–8.

114 在萨尔茨堡大主教阿达贝特的一封信中，他认为利奥波德死时还有2万（或者2.1万）马克赎金未返还。参见*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 522。相关讨论参见Kessler, 260–1, 301–2。

115 *Chron.*, iii, 276–8. 利奥波德临终前，萨尔茨堡大主教阿达贝特正在他的床前倾听遗言，而从阿达贝特的信件内容来看，罗杰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基本相同。1195年1月25日，理查还致信阿达贝特，感谢他的努力，并委托他关注赎金返还的情况。*Chron. Magni Presbiteri*, 521–3。然而，这笔赎金直到1198年5月时都尚未返还。参见*Selected Letters*, 4–5。

116 Arnold of Lübeck, *Chronica*, Bk 4, ch. 20. B. U. Hucker, ‘Die Chronik Arnolds von Lübeck as “Historia Regum”’, *DA*, xlv (1988), 98–119, esp. 105.

第十四章

狮心王之秉性逸闻

在漫长的监禁期内，理查一定只能依靠自己。尽管今日我们已无法知晓理查的真正性格，但理查的性格无疑在当时受到了极端的考验，甚至连布列塔尼的威廉都对理查身处逆境时的坚忍不屈印象深刻。在理查被囚禁期间，两位曾拜访过他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则见证了理查成功战胜无常命运，赢得周围人们敬重的过程。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很可能就是在两位修道院院长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对囚禁期间的理查做出了如下评价：“任何苦难都不足以使这位最尊贵的君王面露愁容，他仍能与人谈笑风生，而面对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地点或时机，他又能表现得凶恶，或以超常的勇气迅速采取行动。”¹ 无论是身陷囹圄的囚徒，还是率领十字军征战沙场的统帅，理查在人们心中都已成为传奇英雄的典范。与理查被囚禁最密切相关的两则传说则涉及他的“隐私”：他的音乐才能和性取向。

在他与吟游诗人布隆德尔的传说的最早版本中，正是布隆德尔率先发现理查被囚禁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城堡中”。这一故事最早的记载如下：当时布隆德尔恰好在囚禁理查的塔楼下方的一处花园内休息，塔楼上的理查发现了布隆德尔的身影后，遂唱起了一首由他们共同创作且仅有他们知晓的诗歌的第一小节（他唱得非常好）。² 于是布隆德尔便得知

理查被囚禁在此。事实上，在早期吟游诗人的作品中，至少有两首诗被认为出自理查之手，一首正是理查被囚禁时创作的叠句多节诗（*rottrouenge*）《狱中哀思》，另一首则是他为回应奥弗涅继承人所创作的讽刺诗。³ 尽管并没有充足证据表明理查就是它们的真正作者，但有大量证据表明，理查确实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理查早年的教育经历已不可考，但有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值得注意：首先，音乐是当时每位年轻贵族的必修课之一；其次，理查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法兰西西南部地区在音乐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部创作于12世纪70年代的盎格鲁-诺曼文学作品《霍恩传奇》（*Romance of Horn*）中，作者托马斯大师将书中的主角霍恩描述为一位典型的多才多艺的王子，而理查一定读过这本书。霍恩不仅精通狩猎和训鹰之道，他还是一位剑术和马术大师，然而霍恩最杰出的方面在于，“对于世界上一切为人所知的乐器，高贵的霍恩王子都比其他凡人精通”。当霍恩拿起竖琴开始弹唱时，“所有在场的观众都会因他拨动琴弦而产生共鸣，有时观众们还会一致地与他共同演唱，他的音乐使人们仿佛感受到天堂中的和谐景象。”⁴ 理查很可能并没有如此高超的演奏技巧，历史上也缺少关于他演奏乐器的记载，但理查确实会不时创作一些像上述两首诗歌那样政治色彩较强的诗歌。据安布鲁瓦兹记载，勃艮第公爵曾写诗攻击理查，理查则以牙还牙，创作诗歌回击了他。⁵ 理查对所有类型的音乐也都满怀兴趣。科吉舍尔的拉尔夫曾提及理查沉醉于教会音乐的情景。当王家礼拜堂内的教士们演唱弥撒时，理查总会在唱诗班的队列中穿行，兴致勃勃地挥手或出声鼓励他们更有激情地演唱。⁶ 更令人惊讶的是，理查对阿拉伯音乐同样兴趣盎然。据伊本·安西尔记载，理查曾邀请穆斯林乐手为他演奏几首阿拉伯歌曲，听罢演奏后他也颇为享受（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⁷ 正是由于理查对音乐的广泛兴趣，人们有理由相信上述两首诗歌为他所作。理查被囚禁期间创作的《狱中哀思》一诗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初看之下，这首诗歌并不引人注目，作者并不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全诗平静、舒缓而伤感，但细读过后我们将能发现作者眼中的亮

光、他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骄傲和他讽刺式的幽默，我们意识到这正是专属于作者的独特风格，作者极不寻常的人格魅力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令我们印象深刻。”⁸这段评论中提及的“他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骄傲和他讽刺式的幽默”也与巴哈丁的评论异常一致。

而在谈及骑术和剑术时，即使是《霍恩传奇》的作者托马斯可能也会承认，理查在这两项技艺上都能与霍恩媲美。我们并不知道理查从哪里学得了这些技艺。尽管理查将骑士比武视为极好的战争训练方式（见下文384——385页），但鲜有证据表明他曾参加过这样的骑士比武。豪登的罗杰暗示理查曾参与过，他记载，1178年，理查的弟弟、布列塔尼的杰弗里曾参与一次骑士比武，希望以此赢得与他的兄长们等同的武名，“因为只有通过战争演练了解战争技艺（ars bellandi），才能在真正的战场上熟练运用”。⁹而理查唯一为人所知的“骑士比武”事迹则是在西西里时使用藤条与威廉·德·巴雷斯的比试，但这场混乱的决斗不过是打发时间的消遣，与真正的骑士比武相去甚远。在狩猎方面，理查实际上也没有突出事迹。不过，理查·德·坦普洛记录道，当理查遭遇一头野猪时，他展现了自己作为“杰出骑手及勇敢而熟练的猎手”的一面，虽然当时理查并非在打猎，而是外出巡逻。¹⁰虽然理查偶尔也会效仿他的祖先“征服者”威廉公爵放鹰捕猎并将之与侦察结合起来，但他算不上一位闻名遐迩的猎手。¹¹总之，理查既不像他的兄长“幼王”亨利那样沉迷于骑士比武，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热衷狩猎。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早在12世纪80年代末就指出，当“幼王”亨利还沉迷于战争游戏时，理查早已在真实战场上出生入死了。¹²豪登的罗杰也曾提及理查为数不多的狩猎经历，但他只是将其作为行程延误期间打发时间的临时消遣罢了。¹³另外，在理查被囚禁期间，他或许也曾通过鹰狩打发时间。¹⁴

理查早年受过良好教育的另一个影响是，理查有着极高的文字水平。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当不大博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讲出一个语法错误百出的拉丁语笑话时，理查也能充分理解这个笑话的笑点。¹⁵而理查精通各地方言与善于雄辩的特质也给科吉舍尔的拉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 ¹⁶ 《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中还记载了理查与教廷特使卡普阿的彼得（Peter of Capua）进行对话的情景，理查能言善辩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¹⁷ 当然，这段文字真正展示的可能是作者的口才，而非理查的口才，但理查的政敌们同样对理查的雄辩能力印象深刻。 ¹⁸ 贝尔特兰·德·博恩为何称呼理查为“是与非者”（Yea and Nay）？ ¹⁹ 是因为理查过于善变、出尔反尔；或是因为理查的言论往往另有深意，令人难以理解；还是因为理查能当机立断，以简洁的话语切中要害？正如《马太福音》所言：“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言说，便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到12世纪中期，第三种理解已逐渐成为共识。 ²⁰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理查确喜欢言简意赅的表述。当克罗兰修道院院长亨利因与斯伯丁修道院（Spalding Priory）的争执，来到理查面前陈述情况时，他便感到“国王对他简洁明了的发言表示满意”。 ²¹

历史记录中出现的理查讲笑话与妙语的数量令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震惊不已。不过对大多数现代人而言，理查留下的这些“风趣评价”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看上去并不能令人发笑——可能还要包括华特·迪士尼1973年的电影《罗宾汉》中理查说的一句知名台词，“看来我似乎用一位守法臣民换来了一位法外之徒”。 ²² 然而，据巴哈丁记载，理查谐谑的说话风格能够跨越文化的界限，被和他文化背景迥异的穆斯林接受。当理查逝世后，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回顾理查生平事迹时，他不仅忆起了理查在工作中受人打扰时，勃然大怒的情景，他也回忆道，当理查与家人共处时，他则显得十分放松，并会与家人们互相逗乐游戏。拉尔夫还相信，理查在被囚禁期间有时会让他的看守们喝得大醉，并制造恶作剧捉弄他们聊以自娱。 ²³

理查最出名的俏皮话之一，就是他对著名传教士纳伊的富尔克（Fulk of Neuilly）的反驳。当时富尔克指责理查有三位邪恶的爱女——骄傲、贪婪与色欲，理查则反驳道：“既然如此，朕将骄傲许配给圣殿骑士团，将贪婪许配给西多会，至于色欲则与本笃会十分般配。”理查的回应也暗喻了当时著名修会内部弊病颇多的状态，理查的廷臣们和威尔士

的杰拉尔德也都以此为乐，豪登的罗杰则对此不以为然。不过，这反映了教会改革者们的观点，而非敌视基督教的观点。²⁴ 而且虽然理查揶揄了西多会，但他仍任命一位以乐善好施著称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担任赈济专员一职，并据后来埃塞克斯的科吉舍尔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和法国三泉修道院的奥布里（Aubri des Trois Fontaines）称，理查还极力扶持西多会的发展。理查每年为西多会全体会议（Cistercian General Chapter）提供120马克的年金，这使西多会一直对他保持善意，他写给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的诸多信件也广为流传。²⁵ 此外，奥布里还按照惯例在诺曼底的邦波尔（Bonport）地区建立了一所西多会修道院，在雅尔建立了隶属于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的“上帝之所”修道院，并在旺代（Vendée）建立了隶属于本笃会的古尔费耶（Gourfaiiles）修道院。²⁶ 此后，古老的本笃会也不再遭受冷遇，13世纪中期以后，圣奥尔本斯地区的本笃会修道院与国王有着密切的联系。²⁷ 理查明显对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充满兴趣，这或许与他在阿基坦时对英格兰的了解有关。对于像他这样热衷于十字军事业的君主而言，这个纪念一位在与异教徒战斗中阵亡的国王的圣地无疑深受他的青睐。²⁸ 考虑到理查对音乐和各类庆典颇有兴趣，我们可以理解他对教会的宗教仪式的热爱。他会一丝不苟地参加弥撒，不过据豪登的罗杰暗示（见下文364页），理查不参加晨祷。他对宗教仪式的表现也堪称君主中的典范。²⁹ 为此，作为英王的理查身边时常有王家礼拜堂的教士陪同，因此他有充分的机会享受各种仪式。毕竟，这还有助于增进他的名声。

著名圣徒、林肯主教休（Hugh of Lincoln）的传记作者恩舍姆的亚当（Adam of Eynsham）记录了理查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季期间的事迹。当时理查决定没收林肯教区的地产，于是林肯主教休决定亲自前往诺曼底进行申诉。当主教抵达理查新建在安德里岩上的盖亚尔城堡时，他得知理查正在礼拜堂内倾听为庆祝圣奥古斯丁节举办的大弥撒（High Mass）。主教立刻向理查致意。当时理查正端坐在礼拜堂入口处的王座

上，达勒姆主教和伊利主教侍立在侧……当主教踏上通往礼拜堂的阶梯时，正好听到唱诗班高声唱出“向久负盛名的基督之主教致敬”一句。他将此视为吉兆但理查却并未回应他的问候，反而皱着眉头将脸转向一旁。但主教并未放弃。

他对理查说道：“陛下，请您亲吻我。”理查听罢，又将头偏了偏并望向远处。主教见状，便紧紧抓住理查王袍的胸口处，一边用力摇晃一边说道：“我长途跋涉、历经艰苦前来拜见您，难道您不应向我致意吗？”理查则答道：“你不值得朕赐予亲吻。”听到这一答复后，主教又抓住理查的斗篷更加用力地摇晃，并大胆地说道：“我当然有权这么做，快亲吻我！”被主教的勇气和决心所打动的理查这才改变主意，稍做停顿后便微笑着亲吻了他。

随后，当理查和家人们谈起这次会面时，他感慨地说道：“若其他主教都像林肯主教一样行事，那么任何君王和世俗统治者们都不敢抬头看他们。”³⁰正如休的任命者、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一样，理查也对休的勇气和高尚品德赞赏有加。

不过，恩舍姆的亚当所记的这段逸事的含义远超过他想要说的内容。在他倾听弥撒期间，理查就坐在唱诗班和主教们中间——当时在场的有两位枢机主教和五位大主教。简而言之，理查成为这场教会仪式的中心人物。此外，侍立于王座下方的两位主教也都接受国王任命，协助他处理政务。在普瓦图的腓力于1197年被任命为达勒姆主教之前，他就已在宫廷中担任文书职务，并成为国王的贴身伙伴，他也曾与理查一同奔赴圣地，并经历了回国途中的种种苦难。³¹于1198年被任命为伊利主教的尤斯塔斯同样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他从1194年起便担任御前大臣一职，并负责管理国王的印章。腓力和尤斯塔斯也成为这一时期新型公

务员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在大学中完成学业，并自称为“Master”。虽然理查对林肯主教休充满敬畏，但理查并不希望自己任命的主教都像这位圣徒一样。对理查而言，这些主教职务不过是赐予那些忠心耿耿又精明能干的教士们的奖励。即使在被囚禁期间，教士们也会去面见理查以获得青睐，理查也会做出回应，或者像对待休伯特·沃尔特那样，保证他选择的人能当选相应职务。

另外，理查的声望还使他被视为两大英格兰军事组织的创始人，它们分别是阿克城的圣托马斯骑士团（Order of St Thomas at Acre）和著名的嘉德骑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³² 理查曾拜访过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也曾在那不勒斯瞻仰了雷诺·德·蒙托邦及其兄弟们的遗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理查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虔诚。但当他遭遇现实危机时，则会遵循另一套价值规范，一种“崇尚武道的贵族们的世俗荣誉准则”——骑士精神。莫里斯·基恩认为，骑士精神“将追求荣耀的理想、评判个人品行的准则与标志社会认同的荣衔三大要素合而为一”。³³ 享有“世上最强骑士”之名的国王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值得获得“社会认同”。³⁴ 贝尔特兰·德·博恩在约1188年创作的《吾王陛下在召唤》一诗中写道，理查“比其他所有基督徒和异教徒们都更为渴求荣誉（pretz），他急切地渴望建功立业，赢得不朽英名，他的名望也因此与日俱增”。如前所述，贝尔特兰在其中九行有关理查的诗句中七次使用了“荣誉”一词。³⁵ 不过，最能表明理查渴望荣誉的证据来自巴哈丁的记载。1192年8月，理查在与阿迪勒的宫廷大臣阿布·伯克尔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坦承：“朕只希望保持自己在基督徒中的威望不受损害。”³⁶

当然，理查为赢得荣誉也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他需要与他的士兵们共同面对一些危险。就连与理查为敌的编年史家布列塔尼的威廉也对理查爱兵如子的品质极为赞赏。威廉在一段十三行的拉丁文诗句中，便描述了一段理查坚决冒险拯救一支被包围的守军的英雄事迹。在这些诗句中，威廉三次提及理查为赢得荣誉不惜令自己身陷困境，两次称赞了他的“高贵天性”，两次将他形容为“雄狮”。³⁷ 当然，理查经常被人们称

为雄狮，贝尔特兰·德·博恩也在诗中多次这样提及：“替我转告理查阁下，他在我眼中如雄狮一般；腓力国王在我眼中则与羔羊无异。”在另一首题为《宜人时节今已至》（*Ar ven la coindeta sazoz*）的诗中，贝尔特兰写道：“我赞赏雄狮的处世之道，它的高贵天性始终能挫败傲慢者，对自己的手下败将却并不残忍。”³⁸ 不过，那些在阿克城中遭到包围并最终被理查击败的穆斯林守军显然不会做如是之想，³⁹ 而诸如豪登的罗杰这样的教士和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这样的修士们也都对理查的“仁慈品质”持保留意见。⁴⁰ 然而，“骑士精神”只是通用于特定社会阶层的道德准则。根据这一准则，低阶战俘被屠杀，高阶士兵得以保命是很常见的事。⁴¹ 除了偶尔的特例外，理查遵循这一准则。比如在诺丁汉围城战后，理查绞死了城中的武装军士，但饶恕了骑士们的性命。⁴² 此外，理查在攻占阿克后也饶恕了穆斯林高级贵族们的性命。毫无疑问，理查此举有部分务实的考虑，这些穆斯林贵族们也深知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对理查的举动表示感激，这也成为日后理查与穆斯林和谐共处的基础。然而在那些一本正经的基督徒看来，理查与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关系显得令人生疑。

可以确定的是，理查至少对待他的弟弟约翰极为宽宏大量。在《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约翰急切渴望获得理查的宽恕，但他不敢走到理查面前，而旁人的一席话使他打消了顾虑：“陛下为人坦诚且宽宏大量，他对待您的态度要比您对待他的态度更为友善。”⁴³ 来自理查政敌的记载也表明了这一点。布列塔尼的威廉记载，尽管理查对约翰的诸多恶行极为厌恶（约翰曾突袭埃夫勒，并大肆屠杀当地居民，威廉对此事仍然记忆犹新），但重视兄弟之情的理查仍然尽兄长之谊包容约翰。⁴⁴ 只有考虑到理查对兄弟情谊的重视，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始终对约翰保持宽容的态度。

理查另一符合骑士精神（而非基督教精神）并广受推崇的特质则是慷慨解囊。尽管批评者们说理查对金钱十分贪婪，但他们从未指责过理查囤积财富之举。三泉修道院的奥布里写道：“理查在战斗中总是精力

充沛，他在需要解囊时也总是十分大方。”⁴⁵ 理查·菲茨尼格也在《财政署对话录》的前言中写道，国王的荣耀不是来自囤积财富，而是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财富。而理查在花销与礼物方面也的确毫不吝啬。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在1191年2月曾向臣下大量赠礼，“许多人感叹道，理查在一个月内送出的礼物比任何一位先王在一年内送出的都要多”。⁴⁶ 一位生活在13世纪中期的东方基督教作家则认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至少有300名马穆鲁克由于理查慷慨大度加入他的麾下，“当理查离开圣地时，还带着其中120名马穆鲁克一同回国”。⁴⁷ 理查的侄子、英王亨利三世则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彩绘大厅（Painted Chamber）门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知施予的国王终将一无所获。”⁴⁸ 尽管话中并未明示，但此处亨利三世无疑是在以理查的例子自勉。此外，理查在1189年对苏格兰人之王“狮子”威廉的外交让步也使他在1193年至1194年遭遇危机时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同时代的著名德意志诗人瓦尔特·冯·沃格威德（Walter von Vogelweide）认为，正是理查之前的慷慨举动使他的封臣们都愿意筹集赎金，以此帮助他获得自由，获得他此刻最迫切需要的东西。瓦尔特在表达这一观点的那首诗歌中还将两位均以慷慨大度著称的理想化统治者——理查和萨拉丁相提并论。⁴⁹ 和理查一样，萨拉丁也十分渴望追求荣誉。据伊马德丁记载，萨拉丁曾说过：“渴求荣誉之心使我拒绝休战，继续奋斗，维护荣誉亦是我的行事准则。”⁵⁰

然而除对待弟弟约翰之外，理查在对待其余令自己失望的人时都不会心慈手软。在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忆中，理查的发怒总是事出有因。1196年，一位名叫罗伯特·德·罗斯（Robert de Ros，此人后来成为《大宪章》建立的二十五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的男爵受命看守一位重要的法兰西囚犯，然而这位囚犯却暗中买通了罗伯特委托看管他的军士，并在后者帮助下成功逃走。理查得知此事后便将罗伯特囚禁，并处以1200马克的巨额罚款，那位背叛主人的军士被判绞刑。⁵¹ 另一事例则是，在1195——1196财年期间，林肯郡郡长、林肯郡内最大的地主库迈的西蒙（Simon of Kyme）由于在安茹-卡佩战争期间放任商船和商人们

离开圣博托尔夫（St Botolph）的集市被理查罚款1000马克。禁运是理查对法战争的一部分。⁵²

理查被囚禁期间的第二个传说则关于他的性取向问题。根据一个可能成型于13世纪但有14世纪版本留存于世的浪漫诗歌，在理查被囚禁期间，一位德意志诸侯莫德雷德（Modred）的女儿玛格丽（Margery）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人曾数次共度良宵，最终被她的父亲发现。莫德雷德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于是他打算将一头饥饿的狮子放入理查的囚室中，以此方式谋杀理查。然而理查将手伸入狮子的咽喉，活生生地将它的心脏扯出体外，杀死了狮子。由于此前理查的手臂上已紧紧包裹着玛格丽赠予他的40块丝绸手帕作为保护，这并没有那么困难。杀死狮子后，理查简短地感谢了天主，便走入大厅，将盐洒在狮心上，并将它生吞下去。目睹此景的莫德雷德及其廷臣们无不大惊失色。⁵³ 这一故事的作者认为，理查无疑是一位嗜食生肉的异性恋者，而其他类似的（当时的）传说也赞同这一说法。理查在阿基坦的政敌们则宣称，理查曾对阿基坦臣民们的妻女发泄欲望，随后便将这些女子交给他的士兵们玩弄。迪韦齐斯的理查也宣称，曾有人告诉萨拉丁，理查会将他的敌人生吞活剥。⁵⁴ 13世纪广受欢迎的布道家、多明我会修士波旁的斯蒂芬（Stephen of Bourbon）还讲述了一则理查沉迷女色的故事。理查曾深深迷恋一位丰特夫罗修道院的修女，为此他一度威胁修道院院长将她交出，否则就要放火焚毁整个修道院。这位修女询问理查为何对自己如此着迷，理查答曰，她的眼睛令人着迷。随后修女便叫人拿来一把刀将自己的双眼挖出，并说道，“现在就把国王日思夜想之物交给他吧”。⁵⁵

从上述传说来看，相较于现实中的妻子贝伦加丽娅，理查似乎与这位虚构的玛格丽小姐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关系。事实上，理查在结束东征后便很少与他的妻子共处。有时他们确实受客观原因限制而无法相见，但也有时候是理查自己选择不与妻子相伴。据恩舍姆的亚当记载，林肯主教休曾因此告诫理查，他对妻子的不忠已成为妇孺皆知之事。豪登的罗杰则在理查生前记载了1195年的一个事件。一位修士前来朝见理查，

对他未尽丈夫义务一事进行了严厉指责。“请您想想索多玛毁灭时的惨状，立刻停止那些不洁之事吧，否则天主终将实施天罚。”起初理查对这一警告不以为然，但他不久后却突患重病，这时他才想起修士之前的劝告，于是他进行了忏悔，据豪登的罗杰记载，他还表示要摒弃恶行。为了救赎，理查应每日参加教堂晨祷且不得中途离席，并对穷人进行施舍，此外他还应断绝一切不正当关系，与妻子同床共枕，尽到他过去常常忽视的丈夫的责任。⁵⁶ 无论理查做了什么，又或者没做什么，他与贝伦加丽娅的结合未能留下合法子嗣，而留下合法子嗣是大部分国王的渴望，无嗣常常被视作国王的失职。不过，理查还是留下一位私生子科尼亚克的腓力，他也成为莎士比亚《约翰王》这出戏剧的主角。⁵⁷ 剧中作为品格完美的英格兰人象征的腓力·法孔布里奇显然与他的历史原型相去甚远。理查生前曾将这位私生子任命为科尼亚克领主，以加强对昂古莱姆伯爵的控制。⁵⁸ 若《约翰王》的知名度和《李尔王》一样高，腓力·法孔布里奇可能也能像《李尔王》中的格洛斯特伯爵之子埃德蒙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不幸的是，《约翰王》的流传度并不高。很多情况我们只能猜测，但贝伦加丽娅很可能患有不育症。理查曾考虑以此为由废止与她的婚姻，但他为了保持与纳瓦拉王国十分重要的同盟关系而没有贸然行事，直到1196年“外交变革”（diplomatic revolution）前仍然与她保持着夫妻关系。⁵⁹ 理查逝世后贝伦加丽娅也并未再婚，其真实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当时或后来的人似乎也不认为她的感受有多重要。唯有与她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恩舍姆的亚当留下了一段记载：当理查逝世后，林肯主教休前来探望贝伦加丽娅，他用自己出色的口才安抚了这位因丧夫而过分悲伤、濒临崩溃的寡妇。⁶⁰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某些记载表明理查可能有过婚外情，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无所知。自然，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虽然豪登的罗杰在1187年时留下了理查曾与腓力一同就寝的记载，但他的这一举动只是必要的政治社交礼仪而非同性之爱的表现。⁶¹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两人在公共场合互换亲吻或

牵手的行为，只是友好或同盟关系的象征，并非爱欲之举。1198年，当法王腓力看到理查同时握着佛兰德斯伯爵与布洛涅伯爵的手进入会场时，他显得极为不快。导致腓力不快的原因当然不是三人公开展示同性恋情，而是他意识到，这一亲密的姿态表明理查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强力的政治同盟，因此他才心生忌惮。⁶²当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理查在被囚禁期间被严加看守，他的随从也被禁止与他过夜一事时，主要是为了突出理查当时在政治上的孤立境地，而不是在谈论理查的性欲困境。

⁶³ 1187年腓力与理查一同就寝的记录，以及1195年时修士对理查的警示都成了“理查同性恋说”的两大主要论据。不过，当宗教人士提及“索多玛的毁灭”这一典故时，并不是要暗示理查所犯罪过的性质，主要还是警示理查犯错所要面临的惩罚有多么可怕，毕竟《圣经》记载中整个索多玛就是被火与硫磺摧毁的，那景象仿若天启。那些时常聆听布道的信徒们便不难理解这些宗教典故的真实含义。比如，一位17世纪的圣公会主教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在读到关于理查疑似不忠的记载时便评论道：“理查随后改变了他的行事方式，一改往日的冷遇，对他的王后贝伦加丽娅更为钟爱。毕竟相比爱他们的妻子，士兵们常常对周围的其他女人过于热情。”⁶⁴

18世纪的一两位作者开始认为理查是同性恋。劳伦斯·厄查德（Laurence Echard）将1195年修士对理查的警告与“反自然的不洁行为”（unnatural impurity）联系起来（但“反自然的不洁行为”并未出现在豪登的罗杰的文字中），并认为在理查和腓力之间“已经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不当关系，他们常常同桌就餐，同床就寝”。⁶⁵随后，厄查德的崇拜者、著名的胡格诺派英格兰史学家拉宾·德·托瓦拉斯（Rapin de Thoyras）接受了厄查德的观点，他也认为理查犯下了“违背自然本性的罪行”，认为腓力“允许理查与他共枕”，这暗示这些爱抚对不知内情的英格兰王子而言是极大的诱惑。⁶⁶但如果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理查是同性恋者，为何在我看来，他们的一些读者——比如大卫·休谟却似乎并不赞同他们的看法。理查遭受修士警告是在1195年，但早在1182年，他就曾由于与异

性的情感纠葛陷入麻烦（见上文91页）。豪登的罗杰并未说明1195年他犯了什么罪，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猜测反映的都是我们的思维与时代，而无法反映理查的真实行为。一位德国学者曾写作了一部关于腓力·奥古斯都生平的六卷本里程碑式著作，他在写作过程中也对理查的生平进行了详尽研究。当他阅读到罗杰记载的理查在西西里进行悔罪的事迹时，他认为“理查让自己彻底沉溺于墨西拿的放荡生活，毕竟墨西拿当地的女人对这些来自北方的将士们有着极强的诱惑力”。⁶⁷ 因此J. H.哈维在1948年将理查描述为一位同性恋者时，宣称“将打破围绕在传奇英雄理查周围蓄意的缄默”。⁶⁸ 随后，哈维的这一观点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正统观点，并得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论证。比如，史料记载，理查在登基时禁止女性和犹太人出席他的加冕仪式，然而一些人却将它曲解为正是由于理查的同性恋倾向，他才把自己的加冕仪式弄成一个没有异性参加的单身汉派对。⁶⁹ 然而，早期英格兰诸王加冕时不允许女性出席仪式实属由来已久的惯例，并非理查的独创。12世纪的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便认为，英王加冕式的这一惯例可以追溯到早期不列颠人统治时期，他们“仍遵循着特洛伊人的古老传统”。换言之，使用“同性恋者的单身汉派对”来论证所有不列颠王和中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君主都为同性恋可能更有说服力。⁷⁰

抛开“同性恋者”这一子虚乌有的标签，我们至少可以从更为浪漫的角度看待加冕式上的理查。据理查·德·坦普洛的记载，加冕式上的理查“身材高挑，体态优雅，有着介于红色和金色之间的发色，四肢灵活而笔直。他的一双长臂非常适于舞枪弄剑，并能给予敌军致命打击；他的长腿也与全身极为协调”。⁷¹ 但这一记载成文于1217年至1220年，此时距理查逝世已过去了近二十年，理查已成为一段传奇，人们可能为理查附会了一个符合英雄身份的完美形象。与理查真实形象更为相符的描述或许是“身体偏胖而脸色苍白”。⁷² 但这一描述的证据也过于零碎。而理查棺材上的雕像也创作时间不明，我们难以断定它是否按照理查本人的真实相貌制作——理查之母埃莉诺的雕像就完全不似一位八十岁的妇女。

⁷³ 根据纽堡的威廉记载，当时人们对理查健康状况有各种夸张的猜测，比如，有人说理查曾饱受疟疾热的困扰；有人则宣称，理查身上有上百处溃疡，处处流着脓；另一些人则说，理查由于过早开始军旅生活且常年征战，他的身体已十分衰弱且伤痕累累。⁷⁴ 但从理查看过的医生数量来看，他一直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过，无论真实的理查有着肥胖或健美的身躯，他都怀着极大的勇气继续征战（就像某些人记录的那样），直至死亡突然降临。

12世纪最博学的人物传记大师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对理查唯一的外貌描述就是理查的身高超出平均水准。杰拉尔德的记录完成于1189年，当时理查尚未继位。⁷⁵ 但杰拉尔德对理查的政治才能极尽赞美。他称理查不仅恢复了阿基坦的传统边界，同时还在这个此前难以治理的行省内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⁷⁶ 理查还致力于实现和平与正义，为此他不惜拿起武器，浴血奋战，即使是最为险要的峭壁和最为坚固的塔楼都无法令他的步伐受阻。理查也因其极为严苛的统治之道而被人冠以残忍之名。然而，理查一旦用这些严酷的手段达成目的后，他会通过向世人表明自己兼有宽容与仁慈的高尚品质，来达到政局的最佳平衡。

这样一位像雄狮一样（且比雄狮更为勇猛豪迈）的君主也如狮子常会受到四日疟（quartan ague）这一疾病的困扰，他内心最为强烈的冲动受到抑制。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尽管这并非由恐惧所致），他颤抖时的姿态使整个世界因畏惧而瑟瑟发抖。此外，他还拥有三种极为可贵的品质：他不仅勇猛无畏、精力过人，同时慷慨大度、富有威严，还拥有居于所有美德之上且对一位王侯而言最为重要的第三种品质——对目标始终坚定不移并言行一致地努力将其实现。⁷⁷

那么，我们又应如何看待杰拉尔德的颂词呢？在完成这份颂词后不

久，杰拉尔德曾坦承：自己在著作中过度美化了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那么他在描述理查时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无疑，杰拉尔德所写的上述文字是他认为理查喜闻乐见的，他认为理查即将登基，希望以此取悦即将登基的新王并获得奖赏。1189年夏季时，杰拉尔德完成了他的新作《爱尔兰征服史述略》（*The conquest of Ireland*），并将其献给理查，希望理查能将他聘用为王室御用的史学家。⁷⁸然而杰拉尔德并未如愿以偿。因此，他在理查逝世后完成的另一部著作《论君王的教育》中，刻意将法兰西卡佩诸王描写为良好君主的典型，而将安茹诸王视为反面典型。由于杰拉尔德未能在理查统治期间实现自己平步青云的理想，因此他完全可能出于怨恨给予安茹诸王更为恶劣的评价。⁷⁹尽管理想破灭（他后来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杰拉尔德在《论君王的教育》一书中仍然保持了惊人的与之前一致的评价。他不仅完整保留了1189年时写给理查的颂词，还增加了一些对理查十字军功绩的赞颂。杰拉尔德对理查做了如下总结：若理查能够改变自己傲慢的态度，以更为谦卑的心态对助他成就伟业的天主表示感恩的话，他将无疑成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统治者。⁸⁰这是在寓褒于贬。

注释

1 *Philippidos*, iv, 393–6; *Chron.*, iii, 199; Coggeshall, 58.

2 *Récits d'un ménestrel de Reims*, 41–4; trans. Stone, *Three Old French Chronicles*.

3 全诗收录于F. Genrich, *Die altfranzösische Rotrouenge* (Halle, 1925), 20–1; C. A. F. Mahn, *Die Werke der Troubadours*, i (Berlin, 1846), 129–30.

4 ‘Romance in Horn’, in *The Birth of Romance*, trans. J. Weiss (London, 1992), 9, 59, 66. 狩猎和驯鹰的技术中还包括训练猎犬和其他鸟类的相关技巧。

5 Ambroise, 10660–2. 事实上，安布鲁瓦兹本人也是一位吟游诗人，这增强了这一事件的说服力。仅仅是人们将这两首诗署名为理查，就足以说明他在吟游诗人中享有的声望。P. Bec, ‘Troubadours, trouvères et espace Plantagenêt’, *CCM*, xxix (1986), 10–11.

6 Coggeshall, 97. 这应是科吉舍尔的拉尔夫目睹的场面。

7 Ibn al-Athir, 53.

8 P. Dronke, *The Medieval Lyric* (2nd edn, London, 1978), 212. 凯斯勒认为，理查采用叠句多节诗这一流行创作体裁，是为了扩大诗歌传播范围，帮助征集赎金。Kessler, 356 n. 639.

9 *Gesta*, i, 207; *Chron.*, ii, 166.

10 *Itin.*, Bk 5, ch. 31. 安布鲁瓦兹并未记载此事。

11 *Ibid.*, Bk 4, ch. 28. 由于安布鲁瓦兹并未记载理查放鹰捕猎之事，这或许是理查·德·坦普洛的个人想象。

12 Gerald, *Top.*, 198; *Princ.*, 248. 贝尔特兰·德·博恩在另一首诗歌中则说，当和平降临后，理查便投入训练猎狗、灰犬、雄鹰和游隼等动物的活动。‘Rassa, mes sison pri mier’, Born, no. 18, 244–7.

13 豪登的罗杰记载了理查首次游览舍伍德森林时的喜悦心情，但并未提及理查曾在此狩猎的事情。 *Chron.*, iii, 240, 251.

14 关于理查将他驯养的鸟类送往德意志的支出，参见PR 5 Richard I, 2。随后这些鸟又被送往诺曼底，PR 6 Richard I, 213。

15 Gerald, *De Invectionibus*, ed. W. S. Davies (London, 1920), 100–1.

16 “一位口才极佳的演说家”，Coggeshall, 59–60。

17 见下文435页。

18 关于布列塔尼的威廉对理查的崇拜，见上文326页。巴哈丁对理查的赞美则参见上文27页。

19 相关事例可参见Born, nos 2, 20, 30, 32, 34, 37, 40。

20 在不同的语境下，理查的这一绰号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有人指出，在某一首诗歌中，是与非先生正在出老千，因此这里应该是指这个人反复无常，谈话时总是模棱两可、另有深意。

21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Marsh lying between the Abbey of Croyland and the Priory of Spalding, 1189–1202’, in D. M. Stenton, *English Justice between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Great Chapter 1066–1215* (London, 1965), 178.

22 不得不说，我很喜欢这句台词。

23 Coggeshall, 58, 92.

24 *Chron.*, iv, 76. Gerald, *Opera*, iv, 54. 杰拉尔德在后来版本的《威尔士纪行》（*Journey through Wales*）中也加入了同样的故事，参见*Journey through Wales*, trans. L. Thorpe (Harmondsworth, 1978), 104–5。

25 Coggeshall, 97–8; Aubri des Trois Fontaines, *Chronicon* MGH SS, xxiii, 876. 海斯特巴赫的凯撒里乌斯认为，理查既是一位慷慨的西多会赞助人（凯撒里乌斯本人就是一位西多会修士），也是一位信念极为坚定的基督徒。Caesarius of Heisterbach, *Diallogus Miraculorum*, ed. J. Strange (2 vols, Cologne, 1851), ii, 249–50. A. D. A. Monna, ‘Diagnose van een omstreden 13e eeuwse kalender uit de Servaasabdij te Utrecht’,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de Katholieke Kerk in Nederland*, xxv (1983).

26 A. Gosse-Kischinewski, ‘La fondation de l’abbaye de Bonport’, *Connaissance de l’Europe*, lxxxix–xc (1993). 另见E. M. Hallam, ‘Henry II, Richard I and the Order of Grandmont’, *JMH*, i (1975); 关于理查在邦波尔和小安得利地区教堂的建筑风格，参见L. M. Grant, ‘Gothic Architecture in Normandy c. 1150–1250’ (unpub.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6)。理查或许还为圣托马斯礼拜堂（今日的朴次茅斯大教堂）修建了华丽的圣坛和袖廊（参见下文379页）。关于理查对普瓦捷附近的勒潘（Le Pin）地区的赞助，参见下文448页。

27 *Chron.*, *Maj.*, ii, 403, 413–16.

28 理查曾于1189年和1194年两次到访该地，参见*Gesta*, ii, 164。理查还将伊萨克·科穆宁的旗帜带到了贝里，见上文205页。贝尔特兰·德·博恩则将英格兰称为“圣埃德蒙之岛”，参见Born, no. 23, 288–9。

29 Coggeshall, 97; *Chronicon Turonense Magnum*, ed. A. Salmon, *Recueil des chroniques de Touraine* (Tours, 1854), 144; *Roberti canonici S. Mariani Autissiodorensis Chronicon*, MGH SS, xxvi, 259.

30 *Magna Vita*, ii, 101–2, 105–6.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在他的《林肯主教休生平》（*Vita Hugonis*）对这一故事的描述更为简洁，不过在他的笔下，“暴君般的”理查在对待休的说教和批评时显得更为谦卑和耐心。*Opera*, vii, 103–6.

31 关于腓力在御前大臣法庭中的履历，参见H. E. Mayer, ‘Die Kanzlei Richards I von England auf dem Dritten Kreuzzu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lxxxv (1977), 22–35。

32 A. J. Forey, ‘The Military Order of St. Thomas at Acre’, *EHR*, xcii (1977). 有说法称，理查由于受圣乔治崇拜的影响，而产生了建立嘉德骑士团的念头。不过，首位对嘉德骑士团进行细致研究的史学家就否认了这一说法。参见E. Ashmole, *The Institution, Laws and Ceremonies of 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 (London, 1672), 181。

- 33 M. Keen, *Chivalry* (London, 1984), 252–3.
- 34 Ambroise, 12, 135–6.
- 35 Born, 386–7; 另见上文148页。
- 36 Baha al-Din, 380.
- 37 *Philippidos*, v, 194–206.
- 38 Born, nos 42, 43.
- 39 关于理查在阿克屠杀俘虏一事，参见上文230——233页。
- 40 见下文453——454页。
- 41 参见M.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180–1, 223.
- 42 *Chron.*, iii, 239; iv, 14–5.关于对这一准则的执行与破坏，参见第十五章注释2。另可参考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202。理查的这一行动或许效仿了他的父亲。
- 43 *HGM*, 10397–9. 更为详尽的描述参见P. Hyams, ‘What Did Henry III of England think about in Bed and in French about Kingship and Anger?’, in *Anger’s Past*, ed. B. Rosenwein (Ithaca, New York, 1998), 115。
- 44 *Philippidos*, v, 471–80. “但是由于理查是他的兄弟，并且憎恨这个被所有人厌恶的行为，他没有拒绝约翰。”
- 45 MGH SS xxiii, 876.
- 46 见上文198页。
- 47 Edbury, 118. 关于腓力在诺曼底雇用穆斯林的证据参见下文407页。
- 48 P. Binski, *The Painted Chamber at Westminster* (London, 1986), 13.
- 49 参见M. H. Jones, ‘Richard the Lionheart in German Literature’, 85–8。
- 50 Gabrieli, 235.
- 51 *Chron.*, iv, 14–15. 关于罗伯特的地产和生平，参见J. C. Holt, *The Northerners* (Oxford, 1961), 24–6。
- 52 PR 8 Richard I, 248–9. 沃尔特·德拉西（Walter de Lacy）在1197年至1198年期间同意交付3100马克以换回他的地产和“国王的恩典”，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何受罚，或许与对抗威尔士人不力有关。PR 10 Richard I, xxix, 213.
- 53 *Der mittellenglische Versroman über Richard Löwenherz*, ed. Brunner, ii, 880–1100.

54 *Gesta*, i, 292（见上文91页）；Devizes, 77。

55 *Anecdotes historiques...d'Etienne de Bourbon*, ed. A. Lecoy de la Marche (Paris, 1877), 211, 431. 理查的同时代人“领唱者”彼得（Peter of Chanter）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此人是巴黎学校中的名人。不过他在作品中只提到是一位英格兰国王，并未写出姓名。或许这是他谨慎的决定。可以确定的是，波旁的斯蒂芬宣称自己曾听过“领唱者”彼得的布道。另见J. W. Baldwin, *Masters, Princes and Merchants: The Social Views of Peter the Chanter and his Circle*（2 vols, Princeton, 1970），i, 245; ii, 183–4。关于修女之眼的故事，可参见Broughton, *Legends*, 132–6。

56 *Magna Vita*, ii, 104. *Chron.*, iii, 288–90.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也被纽堡的威廉记录下来，参见Newburgh, Bk 5, ch. 9。随后数段中更为详细的叙述可参见Gillingham, ‘Richard I and Berengaria of Navarre’。

57 Olivier de Laborderie, ‘L’Imag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dans *La Vie et la mort du roi Jean* de William Shakespeare’, in Nelson, *Coeur de Lion*, 141–65。

58 ‘Comptes d’Alfonse de Poitiers’, in *Archives historiques du Poitou* (Poitiers, 1875), iv, 21–2; PR 3 John, 283.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科尼亚克的腓力为了帮助父亲复仇，杀死了利摩日子爵。*Chron.*, iv, 97. 但这一记载并无实据，或许只是罗杰一厢情愿的想法。见第十八章注释29。

59 见下文423页。关于1196年事件的相关证据，参见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37–8。

60 *Magna Vita*, ii, 136.

61 *Gesta*, ii, 7. 见上文118页。

62 HGM, 8984.

63 Coggeshall, 58.

64 Thomas Fuller, *The Historie of the Holy War* (3rd edn, Cambridge, 1647), 131.

65 Laurence Echar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707), 211, 226.

66 Paul de Rapin-Thoyra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732), 241, 257.

67 A. Cartellieri, ‘Richard Löwenherz’, in *Probleme der englischen Sprache und Kultur: Festschrift Johannes Hoops zum 60 Geburtstag überraicht*, ed. W. Keller (Heidelberg, 1925), 136. 20世纪初的类似的想法可参见A. 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i, 330。

68 J. H. Harvey, *The Plantagenets* (London, 1948), 33–4.

69 Brundage, *Richard Lionheart*, 257.

70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trans. L. Thorpe (Harmondsworth, 1966), 229. 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他所记载的199位不列颠国王中，明确指出2位是同性恋。尽管杰弗里在他的著作中有诸多荒诞不实的描述，但他并不希望读者认为理查是同性恋。关于早期英王加冕礼的相关研究，可参见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35。

71 *Itin.*, Bk 2, ch. 5.

72 这一记载出自纽堡的威廉（但他可能从未见过理查），不过得到了科吉舍尔的拉尔夫的证实（他曾见过理查）。据拉尔夫记载，理查“过于肥胖”，导致外科医生难以处理他的致命伤口。参见Newburgh, Bk 4, ch; Coggeshall, 95。

73 哪怕这通常被认为是理查的雕像。而有人认为他父亲亨利二世棺材的雕像并不属于亨利二世本人。

74 Newburgh, Bk 4, ch. 5.

75 这段记载收录于《爱尔兰风土记》的第二版当中，然而《爱尔兰风土记》第一版的英译本（企鹅经典）中并没有加入杰拉尔德后来的增补内容，见J. O'Meara, *Gerald of Wales: The History and Topography of Ireland* (Harmondsworth, 1982)。

76 在迪韦齐斯的理查1193年的记录中，类似的赞美也曾假借德高望重且广为人知的萨法丁之口说出。参见Devizes, 76。

77 Gerald, *Top.*, 195–6.

78 Gerald, *Expug. Hib.*, 20–5.

79 关于杰拉尔德无法在英格兰政府内晋升原因的解释，参见Bartlett, Gerald, 19, 65; Gillingham, 'Henry II, Richard I and the Lord Rhys', 235。

80 Gerald, *Princ.*, 247–50 (Bk 3, ch. 8). 在随后的写作中，杰拉尔德也提及了理查之死，并认为是理查“专横跋扈的作风”招致了天主的惩罚。*Princ.*, 326 (Bk 3, ch. 30). 另见前注30。布列塔尼的威廉也持有与杰拉尔德类似的看法。（若理查能尽到作为腓力封臣的本分）他将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为杰出且战无不胜（*invictissimus*）的国王。参见Philippidos, iv, 393–424。

第十五章

重返英格兰，1194——1199

当理查返回英格兰时，大多数曾受约翰控制的城堡都已向王军投降。至1194年2月中旬，仍然坚持抵抗由坎特伯雷大主教、首席司法官休伯特·沃尔特所率领的王军的城堡只剩两处：蒂克希尔和诺丁汉。蒂克希尔城堡内的守军为了查明理查是否如传言所说回到国内，便派两名骑士出城打探情报。当他们得到确切消息后，便立刻开城投降了。而诺丁汉城堡的守军仍在负隅顽抗。1194年3月25日，伴随着“鼓号齐鸣的奏乐声”，理查抵达诺丁汉城下。¹然而守军认为这不过是王军愚弄他们的把戏，因此继续抵抗。在交战中，理查身旁有一名随从被城垛上射来的火箭击中，理查见状，便下令立即对城堡发起总攻，并亲自出阵。作战时，理查仅着一件轻型锁子甲，头戴铁盔，在前方巨大盾阵的掩护下前进。他们成功占据了外部栅栏和外堡区。夜幕降临时，他们停止了进攻。守军连夜焚毁城堡外围的其他防御工事。既然他们已经无望守住这座城堡，那他们就要尽可能剥夺这座注定被占领的城堡的防御能力。次日，理查又发起了全新的攻势：他将攻城器械调至第一线，并在守军面前竖起绞刑架，将昨日俘虏的一些士兵当场绞死。他的用意不言自明：若守军继续顽抗，待城破之后他们都将难逃一死。3月27日，在获得安全保证后，诺丁汉守军派出两名骑士前往理查大营。理查接见了这两名

骑士，并询问他们：“朕是否如你们所见，已经来到城下？”当两位骑士返回报告后，有14人立刻逃离城堡，其余守军则于次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虽然大多数人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们也向理查缴纳了不菲的赎金。²

我们对1194年3月25日至5月3日期间理查在英格兰境内活动的了解异乎寻常地多。当时豪登的罗杰已返回宫廷，很可能是和达勒姆主教休·德·皮塞一同，他记录了理查在此期间几乎每一日的事迹，只有一天例外。³通过罗杰的宫廷记录，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到理查的日常行程。收复诺丁汉城堡后，理查先在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短暂旅行，（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此前从未来过这里，这也是理查离传说中的人物罗宾汉最近的时刻。随后他便回到诺丁汉主持了一场为期四天的重要会议。⁴在会议第一天（3月30日），理查任命了一系列新的郡长。在财政署有记录的28位郡长中，19位郡长的职务发生了更替。在进行人员更替时，财政署趁机也出台了一项新的财政政策。新政策规定，郡长们需要交纳自己庄园利润中比以往更多的部分给国库。通过这一举措，理查“更为有效地收取了各郡不断增长而之前难以收归国库的大笔财富”。一些人认为理查大举重新任命郡长的举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敛财，但这一观点被有力地反驳了。理查的异母兄弟杰弗里为获得约克郡长一职需要缴纳3000马克，尽管他实际上不太可能支付这笔巨款，但这笔欠款和这种负债关系将使理查更为有效地控制这位难以驾驭的王室成员和大主教。⁵近期海瑟博士关于理查统治时期郡长状况的研究也表明，“理查直接参与了任命郡长的过程，将他中意的人选任命为郡长为其效力，他显然十分清楚应如何将潜在的资源转化为实际的财富。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过去对理查疏于政事、不顾后果的评价。”⁶

会议第二天（3月31日）则讨论了如何处置发起叛乱的王弟约翰和以诺南的休为首的约翰党羽。⁷会议一举没收了大量地产，为彻底查明没收地产的情况，理查恢复了曾在1189年至1190年时首次使用的行政措施，他派出两名官员负责监督地产充公事宜：休·巴尔多夫（Hugh Bard

olf) 负责清查英格兰北部地区，圣梅尔埃格利斯的威廉 (William de St Mère Eglise) 则负责清查英格兰南部地区。会议第三天 (4月1日) 则主要讨论了税收和征兵事宜。理查要求开征犁头税 (carucage)，并将税率定为每1海德土地2先令。随后理查还要求征召全国三分之一的骑士与他一同前往诺曼底，愿意应征的骑士则可免于缴纳盾牌钱。受此影响，至1194年圣米迦勒节为止，这一财年内只征收了2000英镑的盾牌钱。⁸ 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一财年内犁头税的税收总额，但与1189年至1190年间一样，理查在英格兰停留的数月内，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取收入：一是那些渴望获得官职或特权者所缴纳的金钱，二是诸如犹太人和林肯市民等社会团体为寻求政府庇护或购买特权所缴纳的金钱。⁹ 那些曾在1189年时出资买官的人们以为，他们已永久获得这一职位，但理查回国后宣布，他们只是购买了数年的官位任期，而现在任期已满。¹⁰ 若他们打算继续保有官职，则需要为此再度缴费。另外，西多会为免除向王室缴纳当年的羊毛，也向理查缴纳重金。尽管如此，西多会修士、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应是在1194年至1195年间记录下了理查在东征期间与被囚期间的光荣事迹并大加赞美。经财政署审核，至1194年圣米迦勒节时，当年收入总额达25292英镑，几乎是去年同期收入的2.5倍。¹¹

会议第四天 (4月2日) 讨论决定，将于4月17日在温切斯特举行一次隆重的戴冠典礼。但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理查起初并不同意这一计划，但为了向公众表明自己平安回国，无论是漫长的监禁还是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臣服都未影响他的君威，理查最终还是被大臣说服。¹² 他的迟疑主要是因为他担心筹备的时间过长。坎特伯雷的杰维斯指出，这样的戴冠典礼此前有过先例：当斯蒂芬国王于1141年获释后，他也在坎特伯雷举行了戴冠礼。而在1194年，要举办理查的戴冠礼仍然需要一些研究准备。在斯蒂芬生活的时代，英王们通常一年内要两到三次戴上王冠，但亨利二世废除了这一惯例。¹³ 但此前计划随理查前往诺曼底的军队和船只在朴次茅斯集结同样需要时间，理查完全可以在等待

军队集结的同时举行戴冠典礼。会议最后一天的其余时间则由理查亲自完成对国王而言最费心力而恼人的工作：解决纠纷。他要倾听请愿，调解大贵族们之间的争端。¹⁴ 随后数周内，理查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调解杰弗里大主教和休伯特、杰弗里与威廉·隆尚、达勒姆主教休·德·皮塞与苏格兰国王威廉之间的三起纠纷。¹⁵ 不过，由于休伯特·沃尔特与坎特伯雷的修士们仍处在关系融洽的蜜月期，因此与他相关的纠纷并不严重，这至少能稍微缓解理查的压力。

理查从诺丁汉前往绍斯维尔（Southwell），并于4月4日与苏格兰国王威廉会面。两位国王的会面持续至4月22日，其间气氛融洽。威廉要求理查将诺森布里亚转让给他（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目标），鉴于此前威廉曾帮助筹措资金营救理查，这使得理查几乎难以拒绝威廉向他索取的回报。对此，理查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既能婉拒威廉的要求，又不会惹怒威廉，维持北部边境的安全状况。于是理查以准备和参加戴冠典礼为由，表示对威廉的要求暂缓答复。¹⁶ 到了复活节后的周日（4月17日），戴冠典礼如期举行。理查身着全套王袍，头戴王冠，与威廉一同从温切斯特大教堂边上的圣斯威辛修道院走入大教堂内，另有两位手持宝剑的伯爵在两位国王行进时走在他们前头，他们身后则是高级教士、伯爵、男爵、骑士等世俗贵族和大批民众。理查的母亲埃莉诺和她的侍女们则早已在教堂的耳堂等候多时。戴冠典礼后，理查在圣斯威辛修道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待晚宴结束后，理查便返回温切斯特城堡过夜。¹⁷

4月22日，威廉国王返回北方，理查也已做好渡海的准备，他收到了来自诺曼底的坏消息。¹⁸ 4月24日，理查抵达朴次茅斯，却由于两起特殊事件而待到5月12日才得以出航。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对行程延误感到极为不满，于是他在4月28日来到斯坦斯特德（Stansted），并在此狩猎一天。¹⁹ 当理查外出狩猎时，他部下的布拉班特部队又与威尔士部队发生冲突。5月2日，一切准备就绪，理查终于可以下令将物资装船。理查不顾海员们的劝阻，自己登上一艘长船冒着风暴试图出海航

行，但其余的船只不愿在这样的海况下离开港口。5月3日，理查受风暴影响不得不折返回港，又等待了超过一周时间。5月12日，这支由100艘满载士兵和物资的船只组成的船队终于开始航向巴夫勒尔。²⁰

尽管在朴次茅斯的延误事件令人不快，但理查还是利用这一空隙在朴次茅斯港建立了一处海军基地。²¹当理查抵达朴次茅斯时，他不仅看到了波切斯特的老城堡和长期以来被历代英王用于集结船队的良港，还看到了一个由让·德·吉索尔建立的新城。让·德·吉索尔是维克桑地区的主要地产拥有者之一，他曾被迫向腓力和约翰效忠，但此时他的所有地产（包括这座新城）都要被收归王室所有，并由圣梅尔埃格利斯的威廉进行管理，由他建立的朴次茅斯自然也不例外。理查在5月2日首次出航前，便颁布了朴次茅斯的第一份王室特许状。根据这份特许状，威廉在1196年圣诞节负责管理朴次茅斯，监督一所新王宫的建造工程。1194年间，共有160英镑资金用于朴次茅斯的各类开销，其中大部分资金则用于营造王宫。根据财政署卷宗的记录，这座王宫的建设开支要远高于理查统治时期英格兰其余地区任何建筑的建设开支，甚至超过了他用于修缮威斯敏斯特宫的费用。至1212年时，建立者让·德·吉索尔已经被人们遗忘，朴次茅斯成为“理查所建的城镇”。王室投资的规模如此之大，也说明朴次茅斯已成为这一时期王室关注的新焦点：从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转运往诺曼底的财富、军队和其他物资都在朴次茅斯进行中转。霍尔特称这一航线是“一条财富通道，它对促进安茹王朝财富增长的作用，和满载美洲金银的殖民船队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们意义一样重大”。²²

在1194年，没人担心理查可能不再返回英格兰（与1189年不同）。不过，理查为了收复此前失去的领土，还将在欧洲大陆上度过五年——而后来的事实显示，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在理查离开英格兰奔赴欧陆之前，他决定将英格兰托付给休伯特·沃尔特管理，后者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臣之一。作为亨利二世的司法官拉努夫·格兰维尔的侄子，休伯特早年为亨利二世效力期间便积累了最初的政治经验，但直

到他与理查一同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才开始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当1187年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英格兰后，许多主教都曾发誓要参加远征收复圣城，然而只有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和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沃尔特两人履行了诺言。当休伯特从圣地返回时，他已闻名遐迩，受人敬重。当鲍德温大主教于1190年11月在阿克逝世后，有许多极有影响力的候选人也希望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一重要教职，但理查中意的继任者只有休伯特·沃尔特，休伯特也于1193年5月顺利成为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193年圣诞节时，休伯特又接替库唐斯的沃尔特担任首席司法官；1195年3月，休伯特又被授予教廷特使一职。²³

休伯特·沃尔特不仅集政府和教会的重要职务于一身，还得到英王理查的有力支持，这无疑使他的地位坚如磐石。当然，休伯特也因其身居高位而招致了一些批评。他的批评者中既有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这种仕途不顺而充满怨恨的文人，也包括林肯主教休这样节欲克己的圣徒。当林肯主教进行临终忏悔时，他还向天主和休伯特·沃尔特请求宽恕，因为他的良心促使他对这个位高权重的大主教进行更多抨击。²⁴ 总之，这两位批评家从不同角度针对一条教规对休伯特进行了批评：教士不得干预世俗政务。虽然教会为维护自己拥有的财富和特权，不免要介入到社会事务之中，但像休伯特·沃尔特一样深度参与经济、司法甚至军事等世俗事务，还是会令教会人士不自在，一些人因此攻击他，也有诸如迪切托的拉尔夫这样的开明派对他的行为多加维护。当然，休伯特也极不自在：1198年时，休伯特辞去了首席司法官一职，一位平信徒接替了他的职务。但他随后仍然继续为理查效力，并在新王约翰时期担任御前大臣这一重要职务。休伯特远离政务后，颇有“离水之鱼，不得其所”之感（至少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是这么说的）。²⁵ 理查则认为，他对休伯特的上述任命恰到好处，由于安茹帝国幅员辽阔，理查难以在大多数时间内全面兼顾各地情况，因此他只能挑选一位值得信赖的助手为他处理重要的教会和世俗事务，为他消除南征北战的后顾之忧。当年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将御前大臣托马斯·贝克特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也对后者

怀有同样的期望。理查此前对隆尚的任命也是如此。然而这两起任命都未达预期：托马斯·贝克特在亨利二世统治后期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动荡；隆尚则由于未能平息约翰叛乱导致自己声名受损，若是在政治环境较好的时候，他或许不会那么失败。相较而言，休伯特·沃尔特取得了更为彻底的成功。以此观之，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治世能臣。

不过，人们对休伯特·沃尔特能力的赞美也有过誉之词，对那些认为英格兰行政制度发展本身就值得赞美的人们而言则更是如此，诸如“理查统治期间确立的伟大行政体制应归功于休伯特·沃尔特的个人才能，理查在此过程中毫无贡献”之类的言论则完全没有依据。²⁶ 持有上述观念者仍然坚信较为古老且广为传播的传统观念：理查对治国理政毫无兴趣。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理查亲自挑选并任命司法官和宫廷总管为他处理法律和经济事务，并成功地维持了安茹帝国不同领地的稳定，只有英格兰地区在理查东征期间因人选不当稍有动荡，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理查对这些人所负责的事务有一定了解。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制度史研究者，尤其是研究财政制度史的历史学家们对理查怀有偏见。他们往往忽视了这一事实：对任何政府而言，如何合理使用财富与如何积累财富同样重要。从已有史料来看，理查无疑十分清楚使用财富之道。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一个国家要想赢得战争，必须具备强大的行政机构，能将经济储备转换为军事资源的能力，并确保这些资源能在合适的时机物尽其用。正如普雷斯特维奇所言：“在理查眼中，一位真正的战士还应充分认识小麦、大麦和肉类的重要意义。”²⁷ 理查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就是他致力于确保十字军作战期间物资补给的历史——尤其有些时候，他往往要面对两难抉择。总之，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很难想象为何过去的人会认为理查是不理政事的君主，也许英国政治史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一位英格兰国王极少在“治理有方”的英格兰王国内停留，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ipso facto*）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²⁸

幸运的是，自1985年以来，有赖于詹姆斯·霍尔特爵士（Sir James Holt）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如今已极少有人继续相信上述荒唐的论点了。

²⁹ 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霍尔特在强调休伯特·沃尔特“是史上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同时，还指出：“即使在休伯特担任首席司法官期间，从王室令状（*brevia regis*）的记录来看，理查仍然频繁影响首席司法官的决策，并始终牢牢控制着英格兰政府。”值得一提的是，霍尔特认为，王室文书上的“朕已知悉”（*teste me ipso*）显示了理查在政治活动中的个人兴趣与干涉行为。此外，霍尔特还指出，理查对“英格兰政治中心区”的状况极为关注。霍尔特所定义的“英格兰政治中心区”指的是介于伦敦、威斯敏斯特与温切斯特、南安普顿和朴次茅斯之间的区域，当英格兰地区的财富、军队和其他物资需要通过海运前往欧洲大陆之前，都会在这一区域内事先集结。³⁰ 此后，其他一些学者在霍尔特的基础上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拉尔夫·特纳对理查统治期间的主教选举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尽管理查长期不在英格兰，但他仍然对英格兰教会保持着极强的控制力。”理查能够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主教，因此“在控制教会方面，理查无疑比父亲亨利二世和弟弟约翰更为成功”。³¹ 在立法方面，能够证明亨利二世在其统治期间对立法给予更多关注的证据，并不比理查对立法兴趣方面的证据要多。理查在位期间颁布的法令主要包括：1190年的海军法令集、1194年的审判指导条例集、1195年的“王室敕令”（*royal edict*，诸多维持和平的相关指令）、1197年颁布的修订版《森林法》（*Forest Assize*）和《度量衡法令》（*Assize of Weights and Measures*）。尽管对研究英国宪政史的学生而言，其中的大部分文献都并不陌生，但过去人们认为，这些法令都出自大臣而非理查国王之手。然而，在理查东征期间与被囚禁期间英格兰并没有新的法令颁行，这似乎意味着，只有在获得国王许可的前提下，英格兰政府官员才有权制定并颁布新的法令。³²

在理查统治期间，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则是由他建立的王家关税系统。海关的设置显然会让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十分不满，但由此征收的关税对维持与腓力及其盟友的战争极为重要，所以一定是理查力排众议，坚持设置了这一机构。在1194年至1195年期

间，根据财政署统计，本年度征收海外贸易关税的比例为10%。雅茅斯的威廉（William of Yarmouth）在诺福克郡和林肯郡内的港口记录的关税总计537英镑14先令又2便士。³³虽然与其他开征的新税种一样，海关关税并未受到财政署的管理和审查，因此其税收总额未有精确统计，而从《财政署卷宗》附带的记录来看，至理查逝世时，海关关税仍在持续征收。但征收关税并非易事，它需要有完备的港口管理制度作为基础，这一制度不仅有助于实施对卡佩王朝的经济战，还促进了财政政策的发展。³⁴至1198年时，监督与指导港口管理的职能落到了巡回法庭身上。³⁵另外，王室官员们不仅要为维持战争购买大量食物与其他军需物资，还负责将缴获的战利品换为金钱的工作，因此为确保交易稳定，政府颁布了一部《度量衡法令》。³⁶鉴于此前理查为重获自由向亨利六世支付了大笔赎金（由于专门负责筹集赎金的“赎金财政署”的档案全部消失了，因此我们已不清楚实际缴纳的真正数额），自1194年以来，国库内财富的稳步增长可说十分惊人：12世纪90年代末时国库的年收入要高于约翰统治初期的年收入。³⁷然而在12世纪末，诺曼底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高于英格兰地区的收入增速。理查可能为此在1196年时任命诺曼底财政署的主要官员之一、卡昂的圣斯蒂芬修道院院长罗伯特与他的机要代理人普瓦图的腓力一同对英格兰财政署的账册进行彻底清查。然而罗伯特在与休伯特·沃尔特共进晚餐时突然生病，并在五天后（1196年4月11日）逝世。³⁸当年（也可能是在不久后），休伯特便告诉理查：他在过去两年将110万马克交付国库。这一数字显然过于夸张，但我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由于编年史家的笔误所致，还是休伯特有意夸大其词所致。³⁹

多数史学家们更愿意将把骑士比武引入英格兰的功劳归于理查，他们也认为这是理查独一无二的创举。据纽堡的威廉记载，自从这种模拟战争的游戏在英格兰开展以来，时常引发比武者之间的争执。因此亨利二世延续了父亲亨利一世的做法，禁止在英格兰境内进行骑士比武。因此，那些渴望在比武中一展身手的英格兰骑士们只能奔赴海外。

因此，声名显赫的理查国王意识到，正是这种额外的军事训练形式使法兰西人得以在战争中保持更强的战斗力，他也希望英格兰的骑士们能在本国开展这一活动，通过骑士比武掌握真实战争中的作战技能，让法兰西人再也无法把英格兰骑士蔑称为“粗鲁无礼而战技拙劣的家伙”。⁴⁰

1194年8月，理查在英格兰境内划出五片区域作为举办骑士比武的指定场地，它们分别是威尔特郡的索尔兹伯里与威尔顿的交界地带、沃里克郡的沃里克与肯尼尔沃斯（Kenilworth）的交界地带、北安普敦郡的布拉克利（Brackley）与米斯伯里（Mixbury）的交界地带、（可能是萨福克郡的）斯坦福德与瓦林福德（Warinford）的交界地带以及诺丁汉郡的布莱斯与蒂克希尔的交界地带。按照规定，骑士比武的主办方事先应缴纳经费获得许可证，而每位参与者也会根据等级高低缴纳一定的参赛费用，从伯爵等级到无封地的骑士一级，费用则依次降低。⁴¹ 理查任命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担任骑士比武监察官，休伯特·沃尔特则任命他的兄弟西奥博尔德（Theobald）担任收费官。⁴² 不过我们已不清楚这项“国有化”的骑士比武在英格兰的流程度，它的盈利状况我们也不得而知。纽堡的威廉数年后记载了骑士比武受到追捧的状况：“时至今日，尽管教廷反复重申禁止骑士比武的命令，但这一禁令却被热切渴望赢得军功并获得国王青睐的年轻骑士们视而不见。”威廉的评论或许表明，理查并未对参赛者收取过高的费用，使国内骑士可以踊跃参赛。许多年后，威廉·马歇尔则回忆称，在理查统治末期，30名英格兰骑士可与40名法兰西骑士匹敌。⁴³

理查在密切关注他的大陆领地边界的战争的同时，也对英格兰的边境防务极为重视。理查在位期间与苏格兰保持了较为长期的和平关系。⁴⁴ 豪登的罗杰记载，威廉宣布要将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理查的侄子奥托，并将奥托确立为苏格兰王位继承人，但作为唯一记载了这一事件

的档案，罗杰并未提及威廉是否咨询了理查的意见。尽管苏格兰内部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但威廉仍然力排众议，坚持与英格兰联姻。于是理查派出使臣（很可能正是罗杰本人）作为全权代表与威廉进行联姻计划的初步谈判。至1195年末时，由于双方进展十分顺利，休伯特·沃尔特已动身前往苏格兰进行进一步对话，为此，他在约克度过了圣诞节。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威廉将洛西恩（Lothian）地区赐予女儿玛格丽特作为她的嫁妆，理查则将诺森布里亚与坎伯兰（Cumberland）伯爵领赠予奥托。当玛格丽特和奥托结婚后，英格兰将获得洛西恩地区及其附属城堡的控制权，苏格兰将获得诺森布里亚和坎伯兰伯爵领及其附属城堡的控制权。然而，当威廉的王后已经怀孕的消息传出后，这一联姻计划便被搁置，因为威廉希望王后能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⁴⁵ 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它至少为消除导致两国冲突的最大隐患——苏格兰方面对诺森布里亚的领土要求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爱尔兰地区，理查则撤了由约翰任命的司法官，以约翰·德·库尔西（John de Courcy）和沃尔特·德·拉西（Walter de Lacy）取而代之。1195年，两位新司法官在阿思隆（Athlone）地区与康诺特（Connacht）之王奥康纳家族的“刽子手”卡瑟尔（Cathal Crobderg Ua Conchobar）签订和约。⁴⁶

约翰·劳埃德爵士认为，当理查结束东征、重获自由并重返英格兰后，“英格兰人在与威尔士人的外交关系上无疑显得更为强势”。不过，约翰·劳埃德仍将这一转变归功于休伯特·沃尔特，当然也有人将其归功于理查。无论如何，至少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人们其实对此并不关心。1195年时，两位英格兰贵族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与威廉·德·布里尤兹（William de Briouze）进行了新一轮的威尔士征服，英军推进至梅利恩尼德（Maelienydd，威尔士中东部）与圣克莱尔斯（威尔士西南部），这两位贵族都深受王室喜爱。⁴⁷ 德赫巴斯之王里斯之子、“撒克逊人”海韦尔（Hywel Sais）在圣克莱尔斯被英军击败后，答应让被他囚禁的父亲获得自由。然而，这位年事已高却余威犹存的威尔士君主重获自由后，便又对威尔士-英格兰边境地区产生了新的威胁。

此人很可能就是1196年4月理查写信给休伯特·沃尔特表达对威尔士关切的原因。他不仅要求后者尽快向诺曼底派出援军，还要求让威廉·德·布里尤兹、威廉·达尔比尼以及其他的威尔士边区男爵们留在自己的防区内加强守备。⁴⁸此后，无论是休伯特·沃尔特，还是接替休伯特担任司法官的杰弗里·菲茨彼得（Geoffrey FitzPeter），都将威尔士事务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1197年12月，休伯特在牛津主持召开了一次议会，转达了理查的新指示：英格兰的男爵们应向他提供300名骑士，并承担他们一年的开销；境内的其他市镇则应向他提供500名武装军士。理查的这一要求并无先例，而无先例的要求往往会遭到反对。但据罗杰记载，仅有林肯主教休拒绝接受这一要求。⁴⁹其他的教士们——尤其是索尔兹伯里主教虽然十分不悦，但他们最终或是被恫吓，或是被劝服。⁵⁰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萨姆森（Samson）为执行命令前往诺曼底，但据他的传记作家记载，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法接受国王只想要士兵，不想要金银的想法，“尽管萨姆森院长给国王陛下赠送了许多礼物”。最终，萨姆森只得花费36马克雇用了4名骑士，让他们在随后40天内为他效力，并支付了100英镑以免除当年继续供养他们的义务。⁵¹虽然林肯主教这样的圣徒有更关注的事务，但当时英格兰的编年史家们与萨姆森的观点基本一致：尽管理查的这一要求令人不满，但他们认同催生这一要求的政策。一位国王为收复因叛徒行为丧失的土地而采取任何必要手段都理所应当。⁵²

无疑，休伯特·沃尔特为处理国政已承担了巨大压力。即使他在1197年12月时已不再担任大主教和教廷特使之职，但他仍然需要在国王与群臣之间来回斡旋。自1194年以来，休伯特便反复表态要退隐，并最终于1198年宣布退休。⁵³1198年7月11日，理查在一封给英国臣民的公开信中宣布，将任命杰弗里·菲茨彼得为新任司法官，并特地对休伯特数年来的付出表示感谢：

休伯特此前常常诚恳地请求朕允许他告老还乡，并举出了许多充分理由——他已年老体弱、身患疾病并有着其他种种困难。但为了朕与臣僚们的利益，为了维护王国的和平，朕拒绝了他的请求。然而，现在他是真的已经年老体衰，已经承受不了如今的重责，朕在此同意他告老还乡、安享天年。⁵⁴

从理查重获自由到逝世的五年内，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诺曼底居留。然而他在此期间行程记载的空白过多，因此我们无法像整理约翰统治期间的行程一样，为理查绘制出一幅精确的行动日程表。⁵⁵ 1195年时，理查大约有五个月留在诺曼底，有五个月留在安茹。但他与法王争夺的焦点逐渐集中于维克桑和诺曼底东北部地区，因此他在诺曼底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1196年，理查在诺曼底待了十个月，1197年待了九个月，1198年同样待了十个月，他在位于塞纳河流域、鲁昂与莱桑德利之间方圆二十英里的“战略要地”停留的时间也与日俱增。⁵⁶ 不过，身在欧陆的理查仍能像同样有着杰出领导力的英王亨利五世一样，牢牢控制着英格兰。理查甚至会将那些不服从他的司法官命令的人们招至诺曼底。正如他在1196年初写给休伯特的信中所言：“若有人胆敢违背我们的书面命令，那就立刻将他送至朕处，届时再让朕亲口（viva voce）向他下令吧。”⁵⁷

注释

1 关于诺丁汉围城战的记录来自HGM, 10177–289（威廉·马歇尔在理查赶赴诺丁汉的途中与他见面，见上文340页）；*Chron.*, iii, 237–40。关于理查战前准备希腊火的记载参见PR 6 Richard I, 175。

2 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编年史的页边注，理查对其中一位战俘罗伯特·布里托（Robert Brito）更加残酷，他命令将后者在监狱里活活饿死。参见Coggeshall, 33。罗伯特·布里托被认为是诺南的休的一位兄弟（Carpenter, ‘Abbot Ralph’, 1223, n.1），当理

查在德意志被囚禁时，作为约翰支持者的罗伯特拒绝充当人质，因此触怒了理查，罗伯特最终于1195年死于多佛尔监狱。*Chron.*, iii, 232–3, 287. 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则记载，约翰一位最亲近的随从——他的管家被处以剥皮之刑。*Sig. Cont.*, 431.

3 Corner, ‘The *Gesta Regis*’, 243. 豪登的罗杰也参与了理查与苏格兰人之王威廉会面的准备工作。

4 关于具体议程，参见*Chron.*, iii, 240–3。

5 豪登的罗杰指出：“这样一来，杰弗里成了国王的臣仆，并处于国王的直接控制下。”*Chron.*, iii, 241. 另见D. M. 斯坦顿的相关研究，PR 6 Richard I, xxix–xxxii。

6 Heiser, ‘Richard I and his Appointments to English Shrievalties’, 1–19中，对他较早的一篇文章‘The Sheriffs of Richard I’和他的论文‘The Sheriffs of Richard Lionheart’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补充。关于1194年郡长任命的意义，参见D. A. Carpenter, ‘The Decline of the Curial Sheriff in England, 1194–1258’, *EHR*, 91 (1976), 3–7。

7 1195年时，诺南的休通过缴纳5000马克重新恢复了他的职位。*Chron.*, iii, 287.

8 PR 6 Richard I, xxiv.

9 约克为“庆祝理查从德意志回国”支付了200马克。至少一位财政署官员是这么说的。PR 6 Richard I, 163. 考虑到约克此前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立场，这一举动有着极强的讽刺意味。财政署卷宗随后还记载，理查·马勒比舍（Richard Malebisse）试图通过缴纳300马克使理查宽恕自己的罪行，其中就包括他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一事。

10 关于温切斯特主教戈弗雷的记录，参见*Chron.*, iii, 246. PR 6 Richard I, xxii.

11 所有理查在位期间英格兰的税收资料均来自N. Barratt, ‘The English Revenues’ (forthcoming). 但其中并没有记录与赎金相关的大笔支出。

12 Coggeshall, 64.

13 据杰维斯记载，当时王室为举办戴冠礼还咨询了坎特伯雷教会（很可能咨询了杰维斯本人）。相关记载参见Gervase, i, 524–7。

14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当时有许多人对杰弗里大主教不满，御前大臣还对杰拉尔德·德·坎维尔（Gerard de Camville）抱怨不已，甚至还进一步指控他犯有叛国罪。*Chron.*, iii, 242. 为此，杰拉尔德向国王支付了2000马克，以获得国王的宽恕，他的土地也被归还。PR 6 Richard I, 118, 120.

15 *Chron.*, iii, 246–50. 作为一位广泛参与苏格兰事务的达勒姆教区牧师，罗杰对苏格兰国王威廉与休·德·皮塞之间的争端十分了解，他还记载了理查被达勒姆主教激怒一事。*Ibid.*, 245–6.

16 Ibid., 243–5, 249–50. 威廉出价1.5万马克试图购得诺森布里亚及其所有城堡的控制权，但理查不愿将诺森布里亚境内城堡的控制权转让出去。因此威廉失望而归，但这对双方关系影响不大。次年威廉便提议让理查的侄子奥托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17 Ibid., 247–9. 1141年和1194年这两起事件的差异在于，1141年，斯蒂芬的王后尽力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自由，她也头戴王冠出席了戴冠礼；而贝伦加丽娅1194年并不在英格兰，而且理查的母亲埃莉诺对理查重获自由的贡献更大。

18 Ibid., 250.

19 见上文256页。

20 *Chron.*, iii, 250–1.

21 可参考拙作‘Richard I, Galley-Warfare and Portsmouth: the Beginnings of a Royal Navy’,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VI*, ed. M. Prestwich, R. H. Britnell and R. Frane (Woodbridge, 1997), 12–4.

22 Holt, ‘Ricardus Rex’, 29.

23 目前关于休伯特·沃尔特的质量最好且篇幅合适的传记是C. R. Cheney, *Hubert Walter* (London, 1967)。

24 *Magna Vita*, ii, 188–9; Gerald, *Opera*, iii, 164.

25 Gerald, *De Invectionibus*, ed. W. S. Davies (London, 1920), 97. 关于休伯特·沃尔特对两位英格兰圣徒——瑟普林厄姆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Sempringham）与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Wulfstan of Worcester）的崇拜及支持，参见R. Bartlett, ‘The Hagiography of Angevin England’,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V* (Woodbridge, 1995), 51–2.

26 Appleby, *England without Richard*, 223.

27 Prestwich, 13. “理查不仅是个实干家，而且知人善任，他的治国才能和他的传奇色彩一样名副其实。”参见M. 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272* (London, 1983), 142.

28 H. G. Richardson and G. O. Sayles, *The Governance of Medieval England* (Edinburgh, 1963), 328–9.

29 虽然我在1978年的《狮心王》一书中就已大致讨论过这一问题，但那些研究政治史的学者们仍局限于对行政文书的关注。因此，关于理查统治研究的转折点应始于1985年。霍尔特在1981年时就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理查国王》（*Ricardus Rex*），但当时英美的大学生都还未能读到文章。1985年，这篇文章得到了重印。霍尔特在《理查国王》一文中使用了更为“合适”的材料——包括特许令、财政署卷宗以及王室法庭的司法记录等，以研究理查对政府事务的管理（包括他对各种事务的赞助

)。

30 Holt, ‘Ricardus Rex’. 也有说法称, 这一表述是由一位文书署的官员——很可能是御前大臣威廉·隆尚首先使用的。不过, 真正决定让这一表述出现在特定的文书上的人应该仍是理查。参见C. Fagnen, ‘Le Vocabulaire du pouvoir’, 89–90。

31 R. V. Turner, ‘Richard Lionheart and English Episcopal Elections’, *Albion*, xxix (1997), 10–11. 这篇文章强化了“理查始终在处理英格兰教会事务”这一较早形成的观点。参见C. R. Cheney, *From Becket to Langton: English Church Government 1170—1213* (Manchester, 1956), 10。

32 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05–18.

33 PR 7 Richard I, 79. T. H. 劳埃德认为,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一新税种的意义被历史学家们高估了”, *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77), 8。

34 关于“维护”伦敦港的人的薪酬和他们购买船只（很可能是海关艇或水上安全艇）的费用, 参见PR 8 Richard I, 18。关于理查对那些向他的敌人们销售谷物者的罚款, 参见PR 10 Richard I, xiv–xv。

35 *Chron.*, iv, 62.

36 *Ibid.*, 33–4. 令罗杰不满的是, 在约翰统治时期, 商人们已不再遵守理查所制定的法律了。*Ibid.*, 172.

37 N. Barratt, ‘The English Revenues’.

38 *Chron.*, iv, 5; Newburgh, Bk 5, ch. 19. 纽堡的威廉认为, 休伯特·沃尔特看到财政署受到这样的监察并不开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卡昂的罗伯特所执行任务的资料, 我要对文森特·莫斯表示感谢。

39 *Chron.*, iv, 12–13. 据罗杰记载, 休伯特·沃尔特一直在考虑辞去司法官的职务。

40 Newburgh, Bk 5, ch. 4.

41 J. Barker, *The Tournament in England 1100–1400* (Woodbridge, 1986); R. Barber, *The Knight and Chivalry* (revised edn, Woodbridge, 1995), part III ‘Chivalry in the Field’. R. Barber and J. Barker, *Tournaments. Jousts, Chivalry and Pageants in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89). 尽管乔治·杜比低估了威廉·马歇尔的才智, 但他对“骑士比武能够促进实战经验的生长”这一观点的分析可以一读, 参见G. Duby, *Guillaume le Maréchal* (Paris, 1984), 111–36。G. Duby, *The Legend of Bouvines* (Berkeley, 1990), 84–97, Gillingham, ‘War and Chivalry in the 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 in *Coeur de Lion and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104 ff., 149 ff.

42 相关内容参见Diceto, ii, lxxx–lxxxii; *Foedera*, i, 65。豪登的罗杰也有记录, *Chron.*,

iii, 268。

43 HGM, 11064–7.

44 见上文9页和113页。

45 *Chron.*, iii, 298–9, 308. A. A. M. Duncan, *Scotland. The Making of the Kingdom* (Edinburgh, 1975), 239–40; D. D. R. Owen, *William the Lion* (East Linton, 1997), 83–5. 在此之前，有人还计划让奥托成为约克伯爵，但这个计划很快失败了，*Chron.*, iii, 86; PR 3 Richard I, 61。关于豪登的罗杰1195年秋季时前往苏格兰的经历，参见拙作‘Travels of Roger of Howden and his Views of the Irish, Scots and Welsh’, *ANS*, xx (1997), 157–8。

46 M. T. Flanagan, *Irish Society, Anglo-Norman Settlers, Angevin Kingship* (Oxford, 1989), 282–3. 当理查德取代约翰接管爱尔兰后，沃尔特·德·拉西和威廉·马歇尔也取代了约翰任命的官员，成为爱尔兰地区的领主。

47 J. E. Lloyd, *History of Wales* (3rd edn, London, 1939), ii, 579–80; J. J. Crump, ‘The Mortimer Fami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rch’,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VI* (Woodbridge, 1997), 119–20.

48 Diceto, ii, lxxix–lxxx.

49 *Chron.*, iv, 40. 但罗杰错误地将时间记为1198年，很可能在会议期间，他在罗马。距此事15年后的较晚记载强调了林肯主教休对这个“压迫性”命令的反抗，参见 *Magna Vita*, ii, 98–100; Gerald, *Opera*, vii, 103–4。另见上文258——259页。

50 根据《温切斯特编年史》的记录，1198年初时温切斯特主教和索尔兹伯里主教都前往诺曼底，后者当时还承受着只有林肯主教休这样的圣徒才能承受的巨大压力。*Annales Monastici*, ii, ed. H. R. Luard (RS, 1865), 67. 相关研究另见PR Richard I, xix–xxiv。

51 *The Chronicle of Jocelin of Brakelond*, ed. H. E. Butler (London, 1949), 85–7. 这些骑士后来被送往厄镇。

52 “法王仍然占据着趁他被囚禁并反抗国际法期间非法占有的领土，那么与前者和解将有损于他的荣誉”，Newburgh, Bk 5, ch. 15。

53 Gervase, i, 527; *Chron.*, iv, 12–13.

54 *Foedera*, i, 71.

55 参见Landon。这份行程表有诸多空白，其中某些空白时期持续了很久，如1194年10月和11月。文森特博士之后将发表他关于更多他发现的文书的研究成果，这将有助于我们填补其中的空白部分。

56 Gillingham, *The Angevin Empire*, 56 (repr. in *Coeur de Lion*).

57 Diceto, ii, lxxx.

第十六章

征战法兰西，1194——1196

许久之后，威廉·马歇尔仍然对理查抵达巴夫勒尔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理查每到一地，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男女老少齐聚一堂，为庆祝国王到来而载歌载舞：“理查国王重获天主庇佑，法王腓力必将落荒而逃。”¹但严峻的事实是，理查此时面临着众多问题。从1193年4月吉索尔城堡向腓力投降后的十二个月内，理查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领土损失。²腓力已经占领了塞纳河以东的大部分诺曼底地区，包括阿尔克和厄镇，及其附属港口迪耶普、特雷波尔。在1185年夺得亚眠地区（Amienois）后，腓力又在1192年时从佛兰德斯伯爵手中夺得阿图瓦，腓力在法兰西东北部地区的财力和权威已超过了加洛林王朝以来的任何一位法王。³腓力在塞纳河以西也占领了一块深入诺曼底腹地的突出地带，这块突出地带从蒂利耶尔（Tillières）向阿夫尔河（Avre）以北延伸至博蒙勒罗歇（Beaumont-le-Roger）、勒讷堡（Le Neubourg）和沃德勒伊一带。有了这些根据地，腓力将能从塞纳河两岸直接威胁鲁昂。理查之弟约翰被授予莫尔坦伯爵（Count of Mortain）之位后，得到了诺曼底西南部的大片土地，腓力还将重镇埃夫勒交给约翰治理。⁴除约翰外，其他著名的诺曼底边区领主们——卡约的威廉、古尔奈的休、理查·德·韦尔农（Richard de Vernon）、默朗伯爵罗伯特以

及佩尔什伯爵杰弗里等人人都已转投腓力麾下。⁵若他们不想遭到与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相同的下场，唯有效忠腓力一途。由于坚守对理查的忠诚，莱斯特伯爵失去了他的帕西城堡。而在图兰和贝里地区，洛什与安德尔河畔沙蒂永的失守对理查同样是沉重打击。在阿基坦，昂古莱姆伯爵、佩里格伯爵、布罗斯子爵与杰弗里·德·朗孔也纷纷起兵作乱，幸运的是理查还有盟友。贝伦加丽娅的兄弟、纳瓦拉国王桑乔七世及时派出援军，帮助理查平定叛乱。⁶但理查最为强力的盟友、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此时已率兵南下，全力继续他的西西里征服大业。法兰西境内的贵族们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加入腓力的行列一同蚕食安茹帝国的领土，图卢兹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洛涅伯爵和蓬蒂厄伯爵则充当了腓力大军的急先锋。若上述内容还不足以说明理查所面临的艰难处境，那么现代学者们的下列估计或许更能直白地说明双方的差距：据研究，当时卡佩王朝的财力已经胜于安茹王朝。考虑到理查面临的这些困难，他所获得的成功是令人震惊的。若现代学者的上述估计是正确的，那这一成功就更惊人了。

事实上，1194年5月，腓力的进军仍然没有停止。尽管在这年的圣灵降临节期间双方应当短暂休战，但腓力宣称安茹方面率先破坏了协议，于是又再度发起进攻。⁷5月10日，腓力对守备严密的战略要地韦尔讷伊城堡发起围攻。由于守军曾在1193年时击退过腓力的围攻，因此他们对再次挫败腓力的攻势信心十足，还对腓力进行嘲弄：守军先是大开城门，做出邀请腓力入城的姿态；随后他们又在门上绘制了一幅讽刺腓力的漫画，画中的腓力手执权杖，在他们关上城门后，腓力的军队就会看到它。⁸守军乐观地认为，理查此时正在率领援军前来的路上，这可能是他们如此自信的原因。然而理查在5月10日时还由于风暴阻碍无法出航，仍在朴次茅斯停留。因此，腓力获得了趁着理查援军未至的机会攻克韦尔讷伊，赢得巨大胜利的最后一次机会。法军的攻城器摧毁了一部分城墙。⁹根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的记载，当理查抵达利雪（Lisieux）之后，他由于担忧韦尔讷伊而无法入睡。然而，此时战局出现

了转机：理查之弟约翰在韦尔讷伊胜负未分之际逃离腓力阵营，前往利雪，来到理查的所在地——阿朗松的约翰的居所，向他的兄长下跪忏悔，请求饶恕。理查立即表示既往不咎，原谅了他的弟弟，据理查的崇拜者声称，理查的态度十分大度，但也充满轻蔑。他对约翰说道：“别担心，约翰，你毕竟还是个孩子，将要受到惩罚的是那些让你误入歧途并引诱你犯下恶行的家伙。”不久后，理查将部分没收的地产归还给约翰，但此前属于约翰的城堡仍被扣留。尽管如此，虽已27岁，却还被理查称为“孩子”的约翰仍然获得了比他应得的更为优厚的待遇。正如阿朗松的约翰当面告诉他的那样，他获得的待遇也远比他可能对待理查的态度好得多。¹⁰

饶恕了约翰之后，理查立刻从利雪向距韦尔讷伊西边20千米处的蒂博厄（Tubœuf）进发，并于5月21日抵达该地。在蒂博厄，理查遇见了一位从韦尔讷伊突围的骑士，他为寻求援军成功穿过法军防线来到此地。理查急于解韦尔讷伊之围，把自己从英格兰带来的大军远远甩在了身后。不过理查并未直接向腓力邀战（这个战术会提高法军的警惕），他派出一支由骑士、武装军士和弩手组成的分遣队突破围城法军的防线，以支援韦尔讷伊守军（这支分遣队也达成了既定目标），其余的军队则向韦尔讷伊以东进军，切断腓力的补给线。于是，在胜利唾手可得之时，形势突然变得对腓力极为不利。5月28日，腓力得到消息，约翰已经返回埃夫勒，不仅将城内法军全部杀死，还宣布他现在是为理查（而非腓力）守卫埃夫勒。难怪卡佩编年史家也与安茹编年史家一样，对他极为蔑视。¹¹得知埃夫勒易帜的消息后，腓力立刻赶往埃夫勒试图将其重新夺回。尽管腓力在韦尔讷伊留下了足够的围城部队，但围城的法军决定于次日（圣灵降临节前夜）撤军。此时法军由于担心补给受到威胁而陷入士气低落的状态，而理查的主力部队正从诺曼底和安茹向前线进发的消息则进一步动摇了法军军心，腓力的突然折返则给了法军最后一击，迫使他们后撤。法军的攻城器械最终也被守军缴获，令腓力再次蒙羞。¹²为了发泄被羞辱后的烦闷，腓力在埃夫勒大肆劫掠，摧毁了当

地的教堂和圣物，但这也显示，腓力无法再继续控制埃夫勒了。¹³随后，理查率部对撤退中的法军进行反复袭扰后，于5月30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心地进入韦尔讷伊。为感谢守军的艰苦奋战和忠诚，理查亲吻了每一位守军士兵，并许诺将给他们重赏。¹⁴ 韦尔讷伊的胜利也标志着战局开始逐渐对理查有利。

当然，韦尔讷伊的再次受挫并不意味着腓力的彻底失败。当腓力在埃夫勒发泄怒火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仍有逼近鲁昂的机会，为显示他对鲁昂的威胁，腓力重整旗鼓，渡过塞纳河向距鲁昂仅四五英里的方丹发动进攻。虽然约翰和莱斯特伯爵此时都身在鲁昂，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够支援方丹，只得坐视腓力不受阻碍地围攻方丹。尽管如此，腓力为攻占方丹这块弹丸之地也花费了四天时间（进攻从6月10日持续至14日），但腓力攻占方丹后迅速将其摧毁又再度后撤。¹⁵ 迪切托的拉尔夫在记载此事时，对腓力费尽心思动用王家军队方能攻克小城方丹的行为表示极为不屑。¹⁶ 然而腓力在撤军途中有了更大的收获，当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率军掠夺古尔奈的休的领地时，被腓力俘虏。¹⁷ 当腓力获得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谈判筹码后，他立刻再次议和，提出与理查休战三年的要求，但理查拒绝停战，他不希望看到那些曾抛弃他的贵族们受到停战协议的保护。豪登的罗杰写道，战争随后愈演愈烈。¹⁸

此时，理查已经率军攻克了比方丹更为重要的三座城堡，其中包括战略要地洛什。而在韦尔讷伊集结的主力部队此时也分兵前进：来自安茹和曼恩的部队开始向曼恩与佩尔什的交界地带进军，他们“成功围困、攻克并彻底摧毁了蒙米赖城堡”。¹⁹ 英格兰-诺曼底军队则向北进发，攻占了属于默朗的罗伯特的重要城堡博蒙勒罗歇。罗伯特正是此前背叛理查，转投腓力阵营的诺曼底边区领主之一。²⁰ 理查此时关注的主要是阿基坦南部地区的战况。理查的盟友纳瓦拉的桑乔正率领一支包括150名弩手在内的大军对昂古莱姆伯爵阿德马尔与杰弗里·德·朗孔的领地发起进攻。²¹ 尽管桑乔在得知父亲桑乔六世国王病危的消息后返回纳瓦拉，但纳瓦拉军队仍然攻入图兰，并包围洛什，理查曾约定将在洛什与

他们会合。此前洛什的失守可能极大地削弱了安茹帝国在图兰地区的控制力，当理查于6月11日抵达图尔时，他不仅将圣马丁修道院全体修士们的房屋和财产全部充公，甚至还接受了当地居民交出的2000马克巨款，这说明当地居民也觉得他们的行为惹怒了理查。²²6月12日，理查如约抵达洛什与纳瓦拉军队会合时，纳瓦拉的军队尚未采取任何行动，这很可能是因为纳瓦拉军队没有带来攻破这样的小城所需的攻城器械，只能封锁城堡。然而在6月13日，理查到达后仅用一天，便通过一次强力而持久的攻势拿下了洛什城堡。²³

当理查恢复自己在图兰地区的权威后，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彻底平定阿基坦的叛乱。与理查的和谈失败后，腓力便立刻率军南下、试图以此在南方牵制理查（此时南方已成为主战场）。但腓力很难在牵制理查的同时完全避免与理查交战，而与腓力进行决战正是理查求之不得的事情。7月初时，理查进军至旺多姆（这是约翰在1月交出的另一个城镇），并在城外宿营。罗杰夸口称，在城外宿营的理查与在有城墙保护的内城宿营时一样安全。理查这一次封锁了腓力向卢瓦尔河河谷进军的必经之路。法军哨兵告知腓力理查的军队已在他们正前方严阵以待后，腓力立即派人告知理查，他将于早晨对理查发动进攻，同时却下令全军调转方向准备后撤。7月4日，理查在弗雷特瓦勒追上了腓力的殿后部队，于是腓力又迅速逃往沙托丹（Châteaudun），但理查怀着活捉腓力的决心继续穷追不舍。据罗杰记载，当理查的战马因追击而筋疲力尽时，梅卡迪耶便迅速为他换上另一匹新马以继续追击。尽管腓力最终逃脱了理查的追捕，但法军的运输车队悉数落入理查之手。理查缴获的战利品中不仅包括大量马匹、帐篷、攻城器，还有腓力本人的许多珍宝。另外，理查还俘虏了腓力的王家礼拜室，因此缴获了部分法兰西王室文书，其中一些文书内还记载着即将倒向法王的理查封臣们的姓名。²⁴

尽管理查极为渴望将自己的仇敌腓力抓获，但他却并未因追击腓力而打乱自己的战略部署。理查手下最有经验的将领之一威廉·马歇尔既没有参加追击战，也没有对法军运输队进行袭击，他按照理查的命令密

切注视着法军动向，以防他们卷土重来。在理查收获颇丰的当天夜晚，全军士兵都在吹嘘他们赢得的功绩、俘虏的骑士以及缴获的大量战利品，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理查夸奖了威廉·马歇尔，同时也暗中夸耀了自己：“威廉·马歇尔立下了比在座诸位更大的战功，如果有任何情况，他都能随时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若你们拥有足够充分的准备，那么你们在面对敌人时也会无所畏惧。”²⁵ 仅在40天内，腓力便遭遇了两次屈辱的失败与撤军：他先是在韦尔讷伊损失了所有攻城器械，随后又在弗雷特瓦勒失去了整支补给车队。²⁶ 腓力已经被驱逐出了主战场，理查终于得以全力应对阿基坦的叛军。

不久后，理查从旺多姆开始南下。但我们对理查这次南征的战斗经过知之甚少，唯一的记录来自理查写给休伯特·沃尔特的一封信。理查在信中写道：

在公正全知的天主庇佑下，朕率军成功占领了塔耶堡、马西亚克以及杰弗里·德·朗孔的所有领地。包括昂古莱姆城、夏朗德河畔沙托讷夫（Châteauneuf-sur-Charente）、蒙蒂尼亚克、拉谢斯（Lachaise）在内的所有昂古莱姆领地也已在朕的控制下。朕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昂古莱姆伯国首府昂古莱姆攻克。除收复上述地区外，朕还俘虏了大约300名骑士和4万名士兵。7月22日见证于昂古莱姆，理查。²⁷

显然，从弗雷特瓦勒大捷后的两周半时间内，理查都一直忙于镇压阿基坦的叛乱。理查的心腹大患、杰弗里·德·朗孔与昂古莱姆伯爵之间强大的同盟也在这次决定性的攻势后被彻底粉碎。当然，由桑乔率领的纳瓦拉联军也为理查的胜利反攻奠定了基础。占领昂古莱姆也是理查这两个月内所有军事胜利中最为重大的成果。在此期间，理查先解除了韦尔讷伊之围，接着收复了洛什，随后赢得了弗雷特瓦勒大捷，并乘胜追

击攻占了塔耶堡，最终赢得了占领昂古莱姆的伟大胜利。正如迪切托的拉尔夫所言：“从韦尔讷伊延伸到比利牛斯山的查理十字架（Charles's Cross，中世纪加斯科涅与纳瓦拉的边境）之间的广大地区内，再也无人敢于挑战理查国王的权威。”²⁸

然而理查在韦尔讷伊以北的军事行动则进展缓慢。在1193年至1194年期间，诺曼底地区一直遭受法王主力部队的进攻。在1194年6月的和谈与之后两个星期内，腓力致力于保持法军对卢瓦尔河谷及周边地区的威胁。然而他转向弗雷特瓦勒并遭遇惨败后，他不得不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更北面的地方。腓力曾打算向阿基坦南部叛军提供象征性的援助（就像他1182年以来做的那样），但他不愿意彻底站在叛军一方作战。然而诺曼底的情况完全不同。塞纳河谷地对身在巴黎的法王有着极为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他自然会坚决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而腓力不遗余力地在阿基坦煽动叛乱，也是为了分散理查对诺曼底的注意力。腓力的这一策略最终取得了成功，理查正是在与阿基坦封臣的冲突中意外战死。不过，理查最后四年内的基本战略却并未因腓力的这一战略改变：他要坚持维护自己在巴黎和鲁昂的交界地区的控制权，为此他不仅要与腓力争夺塞纳河沿岸的桥梁和城堡的控制权，还要争夺对这一地区领土和地区内资源的支配权。²⁹

取得弗雷特瓦勒大捷后，理查继续南下，向圣通日和昂古莱姆地区进军，腓力则快速挥师北上。趁着腓力北上期间，莫尔坦伯爵约翰与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对沃德勒伊发起围攻。³⁰当诺曼维克桑地区于1193年被腓力控制后，沃德勒伊便成为双方边境的防御重镇，它扼守着鲁昂以南10英里处的蓬德拉尔什（Pont de l'Arche）和当地横跨塞纳河的桥梁。沃德勒伊在诺曼底公爵眼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与鲁昂、卡昂和法莱斯（Falaise）等战略要地都是诺曼底公爵的宝库。沃德勒伊于1194年2月被腓力攻陷，这对安茹帝国无疑是沉重打击，腓力则将其视为卡佩王朝的伟大胜利，他也不会甘心让这块战略要地再度易手。讽刺的是，此时率领诺曼底军队围攻沃德勒伊的约翰，正是六个月前将此地交

给腓力的罪魁祸首，这也预示了约翰的未来。得知沃德勒伊遭到围攻的消息后，腓力从沙托丹开始驰援，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到达沃德勒伊，腓力的传记作家们评论道，这一进军速度极为惊人，通常情况下，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至少需要一周才能完成100英里的行军。腓力的神速进军也令约翰和阿伦德尔伯爵大为惊讶，腓力也并未给他们喘息之机，于拂晓时分率军对约翰的营帐发起猛攻并大获全胜。尽管大多数诺曼底骑士成功逃走，但大部分步兵与约翰带来的攻城器都被腓力俘获。³¹ 7月中旬时腓力在沃德勒伊的胜利表明，理查无法在诺曼底-法兰西战线上复制他在其余战线上的成功。在诺曼底，双方将注定陷入艰苦的拉锯战，任何一方若想取得突破，除了需要进行周密的准备外，还需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理查无法继续保持自5月10日以来的作战强度和进军速度。为使他的军队得到休整，理查委派他在诺曼底的全权代表、御前大臣隆尚与腓力讨论停战事宜。1194年7月23日，双方达成了《蒂利耶尔停战协议》。根据协议，双方从即日起停战至1195年11月1日。与此前的停战协议一样，这份协议也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达成的。³² 因此，缔约双方将保持协议达成时各自的控制范围。这意味着腓力仍然控制着沃德勒伊及其在卢维埃、阿基尼（Acquigny）和莱里地区的附属城堡。此外，吉索尔、诺曼维克桑、韦尔农、加永（Gaillon）、帕西、伊利耶-莱韦克（Illiers-l'Évêque）、厄尔河畔马尔西利（Marcilly-sur-Eure）、卢伊埃、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Tillières-sur-Avre）和诺南库尔也仍然在腓力的控制下。理查还在协议中承认了腓力占有在诺曼底东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厄镇、阿尔克与德林库尔成为腓力的直辖地，欧马勒与博瓦尔（Beauvoir）则归古尔奈的休，莫尔泰梅则属于卡约的威廉，新马尔谢（Neufmarché）则属于威廉·德·加兰（William de Garland）。尽管默朗伯爵失去了博蒙勒罗歇，但他仍然保持与腓力结盟。停战协议的条款足以表明，理查收复失地的任务是何等艰巨：他不只失去了诺曼底东部地区的大片土地，腓力在诺曼底西部地区的狭长地带也大量摧毁良田、拆

毁城堡。根据这一协议，理查只能重建四处城堡：诺曼底东北部的德林库尔，埃夫勒以西的勒讷堡、孔什（Conches）与布特勒伊（Breteuil）。曾在阿基坦作乱的布罗斯子爵和昂古莱姆伯爵也同样受到这一停战协议的保护。停战协议缔结于7月23日，理查在诺曼底的全权代表并未考虑到阿基坦的最新战况。但理查在7月22日时已经征服了属于杰弗里·德朗孔和昂古莱姆伯爵的所有土地，考虑到这一成果，他或许对7月23日达成的“维持现状”之协议也表示满意。与1194年2月形势最为恶劣的时期相比，理查也在诺曼底地区收复了一些失地。腓力曾试图保留某些城堡，但最终不得不将它们摧毁，其中就包括埃夫勒和德林库尔，而勒讷堡、孔什与布特勒伊很可能也在此列。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对停战协议的条款并不满意，这可能反映了他对那些背叛他的变节者们得以享受停战协议的保护感到极为不满。³³

然而，这一协议注定不会长久。这部分是因为边区的领主们与英法双方都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他们极易因此发生争执，甚至相互征伐。³⁴实际上，《蒂利耶尔停战协议》并未解决英法双方任何已有的矛盾和问题，不像和平协定一样为实现长久和平奠定基础。德林库尔的归属问题便悬而未决。腓力认为德林库尔的佃户属于他的支持者，因为他坚持该地同样应该受到停战协议的保护；理查在诺曼底的支持者们则认为，按协议规定，德林库尔属于理查有权重建的城堡之一，因此它应该纳入理查的统治。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形势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在停战协议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理查决定把握任何机会进行反击，收复被卡佩军队占领的城堡，以消除此前丧失土地的耻辱。就连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纽堡的威廉都认为，虽然理查出于谨慎考虑接受停战，但腓力继续占领那些本属于理查的领地也是不正义的。³⁵理查必然会要么全力备战，对腓力进行全面反攻，要么试图与腓力展开谈判，实现稳定的和平——当然，他更可能同时做两手准备。从1195年夏季的谈判成果来看，理查的双管齐下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经过谈判，腓力决定将除诺曼维克桑、加永、（塞纳河畔的）韦尔农、伊夫里和莱斯特伯爵的

帕西城堡之外其他已占领的领土归还给理查。腓力的慷慨让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他之所以做出让步只可能有两个原因：他此前占领的土地已经被理查夺回，或是处于将要被理查夺回的状态。上述事实也足以表明，双方在停止武装冲突的同时，仍在进行着其他方式的斗争。³⁶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当腓力得知从西西里凯旋的亨利六世鼓动理查入侵法兰西，并承诺给予理查支持的消息后，他便宣布废止停战协议。这件事情也迫使腓力采取了参加十字军期间理查强占阿什凯隆时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腓力眼见自己无法在理查的攻势下守卫这些城堡，他便将诺曼底地区的这些城堡统统摧毁。”³⁷ 1195年7月，理查与腓力在沃德勒伊附近地区会面。腓力此时已决定摧毁沃德勒伊城堡，据英格兰史料记载，他希望借双方会面之机为己方工兵摧毁城墙争取时间。当理查听到不远处城墙坍塌的声音时，他才得知腓力的真实用意。随后理查“以天主之腿起誓”，要将敌军彻底消灭，下令全军立即投入战斗。腓力慌忙渡过塞纳河，并在渡河后摧毁了位于茹瓦港（Portjoie）的桥。被腓力欺骗的理查便回到沃德勒伊，接管了这座重要城堡，并俘虏了被腓力抛弃的法军士兵。尽管双方史料均留下了对这一事件生动详细的记录，但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它发生的准确日期。³⁸ 不过，假如沃德勒伊会议只是个孤立事件的话，那么腓力试图摧毁沃德勒伊的决定便显得十分愚蠢。从英格兰方面的文书记录来看，早在1195年7月前，理查的文书署就曾在沃德勒伊发布了至少两份特许令，标注的时间分别是1195年1月和1195年6月。这或许表明，理查在此前便能在沃德勒伊城门口召开宫廷会议。换言之，理查已使沃德勒伊的法军失去作战能力。³⁹ 继续维持一支无法控制城堡周围地区的部队实在过于奢侈，腓力很可能抛弃这支部队。

另诺曼底财政署的记录表明，至1195年9月的财年结束时，理查曾耗费巨资在沃德勒伊以北三四英里的蓬德拉尔什修建城堡。这座新城堡距理查在邦波尔修建的西多会修道院不远，它控制着横跨塞纳河的渡桥及由此前往鲁昂的必经之路。只要蓬德拉尔什的渡桥还处在理查的控制

下，他便能随意利用鲁昂充足的人力资源，调集部队支援沃德勒伊，这足以保证沃德勒伊守军可以仅仅守在城堡内。此外，这些档案记录还显示，理查还在奥里瓦尔（Orival）和穆利欧（Moulineaux）附近修建了一座城堡。理论上说，用于修建这些城堡的经费在沃德勒伊被腓力攻占之后就已支出，但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记载，理查收复沃德勒伊前就已在蓬德拉尔什和奥里瓦地区修建城堡。⁴⁰ 理查给予腓力的这种长期压力虽然容易引发小规模冲突，但是很难酝酿成会引起编年史家关注的大型军事行动，也少有人将其理查修建的城堡视为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但理查的筑城行动同样也可以被看作另一种战争手段。双方在1194年7月至1195年7月间停战很可能也是一种消耗战，理查继续对一些仍臣服于腓力的诺曼底城堡施加压力，逐渐使它们失去防御作用，使它们失去以往能从周边乡村获得的税收和补给。

至1195年夏季时，腓力决定要在诺曼底东北部与沃德勒伊止损。不过此时诺曼底的形势比塞纳河谷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若理查在诺曼底边界地区的困境确实是由此前诺曼底领主的背叛之举造成的，理查此时应任命更为忠诚的封臣统治诺曼底边区的战略要地。在整个12世纪90年代始终忠于理查的家族是吕西尼昂家族，无论在圣地、塞浦路斯还是普瓦图，他们都始终对理查忠心耿耿。于是，理查选择了吕西尼昂家族中的埃克索登的拉尔夫（Ralph of Exoudun），并将厄镇的女伯爵继承人嫁给他。埃克索登的拉尔夫是当时吕西尼昂家族领袖休九世（Hugh IX of Lusignan）的弟弟。1194年8月时，拉尔夫以厄镇伯爵之名首次在史料中出现。而这个地区的另一位拥有大量地产的女性——寡居的欧马勒伯爵夫人则被理查许配给另一位忠心耿耿的部下——刚从奥地利返回的贝蒂纳的鲍德温。我们并不清楚举行婚礼的具体日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理查支付了这次婚礼全部或部分的开销，而且这次婚礼发生在1195年1月至9月间。⁴¹ 然而，迎娶一位伯爵夫人（或女伯爵）为妻与直接获得她的地产显然完全不同。根据《蒂利耶尔停战协议》，腓力此时仍然控制着厄镇和阿尔克，他也将欧马勒赐给了古尔奈的休。1195年8月

时，腓力又将厄镇和阿尔克作为艾丽丝的嫁妆连同艾丽丝一起交给蓬蒂厄伯爵威廉。⁴² 总之，此时，同时各有两位贵族声称拥有欧玛勒和厄镇，一位受到理查宫廷的认可，另一位则得到腓力宫廷的支持。埃克索登的拉尔夫和贝蒂纳的鲍德温很可能为了赢得属于自己的领地而在诺曼底东北部地区展开了一场未被历史记录的消耗战。从1195年时的和谈经过来看，他们的攻势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后来的事件还证明，理查也成功收复了迪耶普，但距迪耶普仅数英里的阿尔克仍在腓力控制下。

总之，在1195年停战期间，理查在军事上占得先机。下文所述的这一战役便能证明这点。理查在1189年继承王位时，曾放弃了对奥弗涅、伊苏丹和格拉赛地区的统治权。不过，当腓力窃取（至少理查是这么看的）了部分诺曼底领地后，理查便认为自己应该在另一战线上得到补偿。只有纽堡的威廉留下了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载：理查率领布拉班特佣兵首先攻克了伊苏丹和贝里地区的几座要塞，之后便开始向奥弗涅进军，俘虏了奥弗涅伯爵，占领了他的城堡。威廉也认为这一战役大大扩展了安茹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威廉并未说明这些战斗发生的具体日期，只笼统地说是在收复沃德勒伊的那个夏季进行的。⁴³ 一份有理查署名的文书签发于1195年7月3日的伊苏丹，诺曼底财政署卷宗则记载了一笔1440里弗的支出，用于奖励那些“战时在伊苏丹投向国王的男爵和骑士们”。⁴⁴ 理查在返回沃德勒伊时可能已将指挥权交给梅卡迪耶，但看起来，他仍然指挥了较早阶段在贝里地区的战斗。

在此期间，双方仍然在进行时断时续的和谈。战争与外交活动通常同时进行，编年史家在记载这一时期的战争和外交状况时，通常认为记载双方的和谈细节比记载双方的交战经过更加有趣。迪切托的拉尔夫曾记载，1194年法方曾提议双方以五名勇士决斗的方式解决争端，理查对这一提议极有兴趣，并要求腓力和他一起参与决斗，不过这一提议最终未能实现。⁴⁵ 当然，这类提议往往只是一种宣传手段，双方以此公开显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义一方，并将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证明这一点。同样，英法双方也要显示自己对圣地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战争十分关

注。因此当1195年7月末西班牙传来噩耗（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八世被穆瓦希德王朝的叶尔库白·曼苏尔击败）后，双方都表示应当暂且搁置争议，以便对付共同的敌人穆斯林。在1195年8月的和平会议上，理查将艾丽丝交还腓力，腓力也做出让步，表示愿意将此前征服的大片诺曼底领土归还理查。据豪登的罗杰对这一提议的总结，若理查的侄女埃莉诺愿与腓力之子路易联姻，腓力愿将诺曼维克桑、伊夫里、帕西和韦尔农以及2万马克交给路易和埃莉诺；相应地，腓力则将交出理查声称拥有的昂古莱姆、欧马勒、厄镇、阿尔克以及“其他许多城堡”。理查表示需要征求盟友亨利六世的意见，于是双方暂时休战至11月8日，等待理查的最终答复。⁴⁶ 艾丽丝的丈夫、蓬蒂厄伯爵威廉也急于将新得到的厄镇和阿尔克的统治权抓在手中，不希望1195年8月的和议成功。将诺曼维克桑地区作为新娘的嫁妆转交给路易王子的想法永远无法实现。纽堡的威廉记载，当腓力与理查议和时，腓力已公开宣布，理查并未涉嫌谋杀康拉德。⁴⁷ 虽然理查也洗清了雇佣刺客暗杀腓力的嫌疑，但这对理查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并不担心自己因雇佣穆斯林而遭人非议或令人畏惧。据诺曼底财政署的记录，理查曾在栋夫龙（Domfront）和帕西斯森林（forest of Le Passeis）雇佣穆斯林为他效力。⁴⁸

当停战协议到期后，双方之间战火的激烈程度达到了新高度。不过这都在双方的预料之中。8月28日，另一支英格兰大军渡海抵达巴夫勒尔，克罗兰修道院院长亨利也随军抵达。当他登陆后，得知虽然两军休战，理查仍然“为备战日夜操劳，对营帐设置与控制城堡等事宜格外关注”的情况，便决定推迟自己面见国王的计划。⁴⁹ 豪登的罗杰记载，法国人在11月8日的谈判中采取了一些卑鄙手段，这表明他们早已做好准备。两天后，法军从不同方向对理查的部分领地同时发起进攻。⁵⁰ 若这一记载属实，那么法军此时无疑已意识到并成功利用了己方的内部沟通优势。此次行动中最值得记录的攻势无疑是腓力对迪耶普港的突袭，腓力亲自带兵成功洗劫了这座海港，并使用希腊火烧毁了港内的一些船只。鉴于罗杰曾记载理查近期修复迪耶普港一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

腓力可能于7月撤离此地时，这座海港就已遭受破坏，或者被刻意削弱了防御工事。无论如何，腓力8月将阿尔克送给蓬蒂厄伯爵时，应该仍牢牢控制着阿尔克，因为据圣德尼的里戈记载，当腓力率领600名精锐骑士成功劫掠迪耶普时，理查正对阿尔克发起围攻。⁵¹ 尽管留下的少量证据难以说明这年的具体情况，但阿尔克和迪耶普在1195年时无疑都受到英法双方激烈争夺。而从1196年1月达成的和约来看，理查最终赢得了这两地。

此时，腓力或许认为理查已经被法军在诺曼底多地展开的攻势分散了注意力，于是他试图收复贝里地区的失地。另外，腓力也希望理查的阿基坦封臣们能够忙于对付新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以及佩里戈尔地区的叛乱。腓力在围攻伊苏丹时，未在海岸地区遇到什么阻碍，并且迅速占领了伊苏丹城，然而伊苏丹守军仍然依托城堡坚守，并成功向理查求援。当理查得知伊苏丹被困的消息后时，他正身处沃德勒伊。于是理查不仅立刻命令部队支援，他本人也以惊人的速度一马当先赶往伊苏丹。据罗杰记载，理查的行动极为迅速，以至于他一天便走完了其他人需要三天才能走完的路程。理查抵达伊苏丹后便立刻突破法军防线，进入被围困的城堡内与守军会合。由于此时理查身边只有一小支部队，腓力便决定继续围攻，但安茹军队在随后几天内不断出现，反而将腓力率领的攻城部队包围。腓力这才发现，法军不仅处于下风，自己也身陷重围，难以像在弗雷特瓦勒时那样逃脱。因此，他不得不在1195年12月5日接受了理查的条件，双方约定于圣诞节后再次见面讨论和约内容，并进入短暂的休战状态。⁵²

按照约定，理查和腓力在位于塞纳河谷地内的卢维埃会面，此地位于沃德勒伊与加永之间。若我们将1196年1月达成的《卢维埃和约》与1194年7月的《蒂利耶尔停战协议》进行比较，我们将发现理查在1195年的战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诺曼底，理查收复了除诺曼维克桑与新马尔谢、韦尔农、加永、帕西、伊夫里和诺南库尔城堡之外的所有失地，最重要的是消除了法军对英吉利海峡的威胁。在贝里地区，理查则收

复了安德尔河畔沙蒂永（1193年7月向腓力投降的城堡之一）、拉沙特尔（La Châtre）、圣沙尔蒂耶（Saint-Chartier）、沙托梅扬（Châteaumeillant）、伊苏丹和格拉赛。在阿基坦，腓力正式承认昂古莱姆伯爵、布罗斯子爵以及佩里戈尔伯爵应向阿基坦公爵效忠。腓力还表示，若图卢兹伯爵不愿签订这份和约，那么他将放弃他的这个盟友。《卢维埃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理查在这一阶段中赢得了巨大的优势，他分封的厄镇伯爵埃克索登的拉尔夫与欧马勒伯爵贝蒂纳的鲍德温也通过这一和约成功地赢得了厄镇和欧马勒的领地。⁵³此外，《卢维埃和约》还规定，当古尔奈的休逝世后，他在诺曼底的领地将归诺曼底公爵所有；若他在逝世前恢复向理查效忠，那么他的领地自动归理查统治。《卢维埃和约》显示，古尔奈的休部下的一些骑士一直在理查军中作战，这说明古尔奈的统治地位已经被削弱。因而当古尔奈的休于1197年重新向理查臣服时，这一结果也并不令人意外。不过，这份和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要腓力仍然占据着一寸理查认为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土，那么双方将无法保持长期和平。⁵⁴然而，这终究是一份和约，而且从腓力的角度看，这份和约毕竟意味着理查从此将失去对维克桑地区的控制。圣德尼的里戈也将其视为腓力的外交胜利。腓力后来前往圣德尼修道院举行庆典时，也将这份和约当作了胜果来展示。⁵⁵

尽管《卢维埃和约》仅仅提供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但理查认为他现在有能力开始在另一战线上展开行动。1196年春季，理查将布列塔尼女公爵康斯坦丝召入他的宫廷。自从她的第一任丈夫、理查的弟弟杰弗里逝世后，康斯坦丝改嫁给了切斯特伯爵雷纳夫。然而婚后，康斯坦丝宁愿留在布列塔尼，雷纳夫却希望在英格兰或诺曼底居住，布列塔尼公国开始独立发展。虽然理查掌握着康斯坦丝之女埃莉诺的监护权，并不止一次地打算为她安排婚姻，但理查若要巩固诺曼底公国对布列塔尼的控制，他要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需要获得对布列塔尼的真正继承人亚瑟的控制权。理查认为，年满9岁的亚瑟已不需母亲照顾，而他邀请康斯坦丝前来正是为商议此事。然而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康斯坦丝刚抵达诺

曼底不久，便被她的丈夫劫持，带往位于圣雅姆德伯福龙（St James-de-Beuvron）的城堡。康斯坦丝在布列塔尼的顾问们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认为理查是背后主使（无论这个指控是否有理），于是这些控制着亚瑟的顾问们便向腓力寻求帮助并放弃向诺曼底公爵效忠。⁵⁶ 若布列塔尼落入腓力之手，英格兰和诺曼底与阿基坦之间的海上通道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是理查决定向布列塔尼进军。在理查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面前，布列塔尼的叛乱立刻被平定。据布列塔尼的威廉记载，理查的进攻十分冷酷无情，甚至在耶稣受难日当天也并未停止。⁵⁷ 尽管理查平定叛乱，但他却在政治上落于下风：亚瑟的监护人们先是将他藏匿，随后又将他送到安全的腓力宫廷。腓力通过为亚瑟提供庇护，公开宣布与理查恢复敌对状态。早在耶稣受难日四天前（4月15日），他从布列塔尼就致信休伯特·沃尔特，让后者在6月2日前派出骑士支援诺曼底前线，为长期战争做准备。他认为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⁵⁸

正如理查所料，1196年6月，佛兰德斯伯爵、布洛涅伯爵与蓬蒂厄伯爵都来到法王宫廷。⁵⁹ 尽管腓力由于《卢维埃和约》失去了诺曼底东北部的一些领土，但他仍维持着与当地贵族的同盟。与此同时，腓力还向蓬蒂厄伯爵提供补偿，这将有助于后者接受曾被安茹王室抛弃且名声不佳的艾丽丝作为他的妻子。⁶⁰ 此外，腓力还成功劝说新任佛兰德斯和埃诺伯爵鲍德温九世沿袭父亲的外交政策，与法王结盟。万事俱备后，腓力便于1196年7月开始进攻欧马勒。⁶¹ 腓力的这支大军不仅有鲍德温九世的佛兰德斯军队，还携带了大量攻城器械。不过他们难以突破欧马勒固若金汤的防御。理查则夺取了诺南库尔作为回击。据法兰西编年史家记载，当时的诺南库尔城主还未与理查交战便立刻投降，为了赎他的背叛之罪，他便前往圣地，加入了圣殿骑士团。⁶² 随后理查从诺南库尔向欧马勒进军，但他对法军大营的进攻被击败。对理查的这一败绩，只有法兰西方面留下了一些记载，英格兰方面则要么闭口不提，要么试图为此开脱，说理查为避免正面作战遭遇过度损失，选择调转兵锋进攻卡佩王朝的领土。⁶³ 无论如何，理查此次对欧马勒的救援并不成

功。理查不太愿意作战一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布列塔尼的威廉的支持。他记载，理查认为，若他未给守军任何帮助就立刻撤退，必然会面上无光，他若一战，还有一点胜利的可能，前者对个人名誉的损害大于后者。于是理查在迟疑之下才对欧马勒发动进攻。⁶⁴对荣誉十分重视的理查向来不会将自己的败绩公之于众，英格兰方面记载也不足以证明什么。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理查勉强对防守严密的法军大营发起进攻，在遭受一些损失后被法军击退。在理查战败约一周后，欧马勒守军于8月20日向腓力投降。理查支付了3000马克将他没能拯救的欧马勒守军全部赎回。由于法军的攻城器械已对欧马勒城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因此腓力决定将其彻底摧毁，而非将其修复并驻军守卫。⁶⁵一位瑞米埃日的修士认为，腓力在此战中遭受了严重损失。⁶⁶理查在1196年夏季的其余时间也极不顺利，他在围攻加永时又被弩箭射伤了膝盖。⁶⁷诺南库尔也被腓力重新夺取，圣德尼的里戈认为这是一次“出色的突袭行动”。⁶⁸令理查稍感宽慰的是，王弟约翰夺回了诺曼维克桑地区的加马什（Gamaches）城堡。⁶⁹

理查依靠《卢维埃和约》已经夺回了大部分土地，但靠近腓力统治中心且防守严密的维克桑地区仍然是一块极为难啃的骨头。理查在1196年的受挫表明，他若以更正当的理由收回他在诺曼维克桑的权利，仅靠本国的力量 and 个人的将才还远远不够。除了与腓力的正面对决之外，他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更多助力。

注释

¹ HGM, 10429–52.

² 根据克罗兰修道院当时的一份记录，“腓力通过阴谋手段而非暴力手段窃取了诺曼底地区最为富庶、面积最为广大的部分”。参见‘The Case concerning the Marsh lying between the Abbey of Croyland and the Priory of Spalding 1189–1202’, in D. M. Stenton, *English Justice between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Great Charter* (London, 1965), 17

6–8。

3 正是由于腓力夺取上述地区的战功，圣德尼的里戈才给腓力冠以“奥古斯都”之名。Rigord, 6.

4 诺曼底财政署卷宗未能完整保存下来，莫尔坦、坦什布赖（Tinchebrai）、加夫莱（Gavray）和阿夫朗什（Avranches）地区的市政官记录全部遗失，这显示了约翰在诺曼底的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MRSN, i, 215–6; ii, 292–3.

5 关于理查·德·韦尔农的记录，参见ibid., i, 148, 153。据1195年的财政署卷宗记载，佩尔什伯爵杰弗里按照家族传统争夺穆兰和邦斯穆兰，对上述地区发起了进攻。1195年诺曼底为防御这些重要的边区城堡耗费了巨资，诺曼底财政署留下了记录。MRSN, i, 244–6. 另见D. J. Power, ‘What Did the Frontier of Angevin Normandy Comprise?’, *ANS*, xvii (1994), 189. 1195年阿朗松地区市政记录的大量遗失或许正是由于佩尔什伯爵的入侵所致。感谢文森特·莫斯在上述问题上的帮助。

6 *Chron.*, iii, 252–3.

7 *Sig. Cont.*, 431. 这或许就是理查在朴次茅斯停留期间听到的坏消息？

8 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同样提及了这个故事，以及韦尔讷伊的防御力量，ibid。这想来是个极好的故事，因为布列塔尼的威廉也记载了此事（他是在布汶战役后记录此事的，此时他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Philippidos*, iv, 481–5。根据14世纪的法兰西编年史家纪尧姆·吉阿尔（Guillaume Guiart）记载，腓力当时曾雇用了众多全副武装的佣兵保护自己免受暗杀，此举仅是为了迷惑他们，参见Guillaume Guiart, *Branches des royaux lignages*, ed. J. A. Buchon (Paris, 1820), ll. 1820–5。后来布列塔尼的威廉写作他的散文体编年史时，这些佣兵仍为腓力效力，WB, 194。

9 Rigord, 127.

10 *HGM*, 10365–419. 迪切托的拉尔夫认为，他们在布里斯（Brix）会面。Diceto, ii, 114. 豪登的罗杰尽管并未记载会面地点，但他提及，在理查母亲埃莉诺的调解下，理查与约翰重归于好。*Chron.*, iii, 252. 纽堡的威廉的记录与罗杰相同。Newburgh, Bk 5, ch. 5. 1195年，约翰也恢复了对莫尔坦、艾耶（Eye）和格洛斯特统治的统治（但上述地区的城堡控制权除外），还从曾接受他统治的地区获得2000英镑的年金。*Chron.*, i ii, 286.

11 根据布列塔尼的威廉记载，约翰当时像“亨吉斯特和霍萨”（Hengist and Horsa，最早入侵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首领）一样，邀请不明真相的法兰西人前来赴宴，并在宴会上将他们全部杀死。*Philippidos*, iv, 452–69. 威廉记载了他对理查对此事态度的看法，参见上文361页。

12 迪切托的拉尔夫详细记载了法军在韦尔讷伊的大溃败时的耻辱，他还收录了署

名为杰弗里（可能是文索夫的杰弗里）的一段拉丁语诗歌。Diceto, ii, 114–8. 昂热的圣欧班编年史也有类似记录，参见*Annales angevines*, 26。

13 里戈和布列塔尼的威廉都对腓力的暴行感到十分遗憾。Rigord, 127; WB, 196; *Philippidos*, iv, 497–8. 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则认为，腓力对埃夫勒及其教会的疯狂劫掠发生于“圣灵节”。*Sig. Cont.*, 431–2. 这无疑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惨案。参见Newburgh, Bk 5, ch. 2, 与*Annales Angevines*, 26。因此，尽管豪登的罗杰消息灵通，但他所记载的时间很可能有误。参见下文注18。

14 *Chron.*, iii, 252; Rigord, 127; *HGM*, 10456–508. 正如文森特·莫斯所言，赏赐给韦尔讷伊守军的一笔大额支出在1195年诺曼底财政署卷宗里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15 据罗杰记载，当腓力对方丹发起进攻时，由诺曼底宫廷总管和库唐斯的沃尔特带领的和谈代表团正在蓬德拉尔什，他们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仍期待着腓力的使节前来议和。*Chron.*, iii, 253.

16 Diceto, ii, 116. 迪切托的拉尔夫对此事的相关记载以及他的态度，主要来自他的朋友库唐斯的沃尔特事后的叙述。

17 卡佩王朝的编年史家们均提及了莱斯特伯爵被俘一事，里戈称他是“坚强又勇敢的”，Rigord, 12; 布列塔尼的威廉则说他是“充满活力的”，WB, 196。但他们并未提及腓力攻克方丹一事。为重获自由，莱斯特伯爵不仅支付了1000英镑赎金，还放弃了帕西。

18 *Chron.*, iii, 253–5. 正如戴维·康纳所言，1194年6月中旬时罗杰本人正在鲁昂。Cormier, ‘*The Gesta Regis*’, 143–4. 因此他对这一失败和议的内容有所了解。罗杰之所以提及腓力劫掠埃夫勒一事，似乎是希望通过这一极具说服力的事例证明这场战争已经越来越残酷。

19 *Chron.*, iii, 252; Diceto, ii, 116–17. 后者认为理查攻克的这座城堡是属于佩尔什-古埃的威廉城堡。引号中的内容同时出现在两位编年史家的记载中，这或许表明他们当时依据同样的消息源完成了写作，圣欧班编年史家们也对安茹军队的勇气颇感自豪，参见*Annales angevines*, 27。

20 *HGM*, 10545. 虽然里戈、迪切托的拉尔夫和罗杰均未提及博蒙勒罗歇被攻占一事，但布列塔尼的威廉留下了相关记录，威廉将博蒙勒罗歇称为“固若金汤之城”（*cast rum munitissimum*）。WB, 196. 另见*Philippidos*, iv, 526。

21 Diceto, ii, 117; *Chron.*, iii, 252–3.

22 *Chron.*, iii, 252; Diceto, ii, 117. 两位编年史家的记载都表示，这笔金钱是当地居民“自愿提交”的，但它很可能就不是。圣德尼的里戈则明确表示，理查强迫圣马丁修道院缴纳了一笔巨款。Rigord, 127–8. 关于事后理查的补偿，参见Diceto, ii, 122。

23 圣欧班的编年史家对这次战役印象深刻，理查“勇敢地一举攻下了”这座强大而坚固的要塞，“当时他身边只有数名随从，仅用了两小时便将它成功占领”，并俘虏了220名敌军。*Annales angevines*, 27.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战后俘虏了5名骑士和24名（*quatuor et viginti*）武装军士。*Chron.*, iii, 253. 迪切托的拉尔夫则指出，城内有15名骑士和80名（*quarter viginti*）武装军士。*Diceto*, ii, 117. 罗杰在人数书写上可能存在错误，两者可能有共同的消息源，相关分析参见Gillingham, ‘Royal Newsletters’。

24 *Chron.*, iii, 255–6; *Diceto*, ii, 118; *Annales angevines*, 26–7. 据腓力的编年史家们记载，理查当时发起了突袭。*Rigord*, 129; *WB*, 196–7; *Philippidos*, iv, 530–42. 这一记载也可能是真的。由于双方对事件经过的记载差异过大，因此很难弄清战斗的“实际情况”。只有理查获得了一场大胜这一结果是确定的。

25 *HGM*, 10583–676.

26 迪切托的拉尔夫极为愉悦地记录了这段经历。*Diceto*, ii, 118.

27 *Chron.*, iii, 257. 迪切托的拉尔夫还看到了这封信的复制品。*Diceto*, ii, 118–19. 不过，4万人这一数字显然是夸大其词。

28 *Ibid.*, ii, 119.

29 威廉·马歇尔在对这场“大战”的总结中也这么认。*HGM*, 10564–80.

30 据布列塔尼的威廉记载，“狮子”威廉的兄弟、亨廷顿伯爵戴维和约克的杰弗里也参与了这场战斗。*WB*, 197; *Philippidos*, v, 18–50.

31 *Rigord*, 130. 毫无疑问，豪登的罗杰与迪切托的拉尔夫均未记载这一败绩。

32 豪登的罗杰记载了这一协议的全文，参见*Chron.*, iii, 257–60。另据里戈记载，理查还赎回了沃德勒伊的俘虏。*Rigord*, 130.

33 *Chron.*, iii, 267. 关于理查一个月前的态度，参见*ibid.*, 255。据罗杰记载，理查之后制作了一枚新的玺印，并宣布盖有旧印章的文件废止无效。这一记载引发了大量讨论，相关讨论参见Landon, 177–80。理查可能在1194年夏天抱怨停战协议条款时威胁要制作新玺印，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

34 *Chron.*, iii, 276; *Diceto*, ii, 120.

35 Newburgh, Bk 5, ch. 3.

36 早在1194年8月时，理查为长期备战已在英格兰组织骑士比武。见上文384—385页。

37 *Chron.*, iii, 300–1. 据罗杰记载，理查对亨利六世的承诺深表怀疑。但腓力无疑担

心亨利六世干预他与理查的战争。里戈虽然没有记载相关细节，但他宣称理查于7月撕毁和约，挑起战争。Rigord, 130.

38 豪登的罗杰总会在有足够信息时记录下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但对于这件事，他只是含糊地将时间记为“某日”。*Chron.*, iii, 301; Rigord, 130–1; *HGM*, 10534–58; Newburgh, Bk 5, ch. 15.

39 诺曼底财政署卷宗（*MRSN*, i, 138）记录了一笔85安茹里弗尔（4安茹里弗尔等于1英镑）的大额支出，它用于将一个木栅栏从鲁昂运往沃德勒伊，这个木栅栏很可能被用于一个临时堡垒。文中两份特许令应该就是在这里签署的。感谢文森特·莫斯的建议和补充。

40 *Ibid.*, 136–8; *HGM*, 10528–532.

41 *MRSN*, i, 210. 大约发生在鲍德温从德意志返回至1194——1195财年结束之间。

42 Rigord, 131. 里戈记载了举行婚礼的具体日期。嫁妆转让的相关事宜参见*Recueil des actes de Philippe Auguste*, i and ii, ed. H-F. Delaborde, C. Petit-Dutaillis and J. Monicart (Paris, 1916–43), no. 508。这里认为此事大约发生在1195年8月，理查表示要重新夺取厄镇和阿尔克的控制权，当时他已深知两地的战略意义。

43 Newburgh, Bk 5, ch. 15. 据里戈记载，这些佣兵的指挥是梅卡迪耶。Rigord, 132.

44 Landon, no. 454; *MRSN*, i, 136.

45 Diceto, ii, 121. 类似的挑战行为，参见M. Strickland, ‘Provoking or Avoiding Battle? Challenge, Judicial Duel, and Single Combat in Eleventh- and Twelfth-Century Warfare’, in *Armies, Chivalry and Warfare in Medieval Britain and France*, ed. M. Strickland (Stanford, 1998), 317–43。

46 *Chron.*, iii, 302–3.

47 Newburgh, Bk 5, ch. 16; Rigord, 120–1. 另见Gillingham, ‘Royal Newsletters’。

48 *MRSN*, i, 221, ii, 350.

49 Stenton, *English Justice*, 176–7. 关于这份文本与威廉·隆尚的兄弟、被誉为“模范修道院院长”的亨利的相关内容，参见Bartlett, ‘Hagiography’, 49–51。

50 *Chron.*, iii, 304. 据罗杰记载，博韦主教腓力参与了这一卑鄙行动。

51 *Ibid.* 从迪耶普港内船只的损失状况来看，腓力应从海陆两面对迪耶普发起了联合进攻。腓力很可能听取了蓬蒂厄伯爵的建议，后者希望以此攻势削弱迪耶普的经济实力，以消除迪耶普对他的领地、另一处重要港口圣瓦莱里港的商业威胁。里戈坦承，理查从森林中对班师的法军发起突袭，法军的殿后部队也遭受了一定损失。R

igord, 131–2; WB, 198. 正如卡佩宫廷认为的那样，理查之所以能在森林作战中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他在军中雇用了令人生畏的威尔士佣兵。

52 *Chron.*, iii, 304–5; Newburgh, Bk 5, ch. 17. 据里戈记载，理查在两军见证下向腓力行臣服礼，为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地区向法王臣服。然而，双方在即将展开血战时突然议和的行为有些不可思议。Rigord, 133. WB, 199; *Philippidos*, v, 56–9. 关于休战时间的研究，参见Powicke, 107, n. 69。

53 全文收录于*Recueil des actes*, no. 517。总结见Landon, 107–9。

54 纽堡的威廉记载强调，理查和腓力都下定决心要重启战端，任何宗教节日、恶劣天气甚至是饥荒都不能影响他们的决定。Newburgh, Bk 5, ch. 18.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并未提及《卢维埃和约》，他认为当时双方只约定休战至“施洗者”约翰节（6月24日）。Gervase, i, 532.

55 Rigord, 133. 理查宣布放弃统治诺曼维克桑的说法显然是谎言。这份条约为重新恢复对诺曼维克桑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因为理查在和约中坚持要求：维克桑地区的博德蒙（Baudemont）城堡应由他的忠实部下隆尚的斯蒂芬（Stephen of Longchamps）控制。

56 *Chron.*, iv, 7. Newburgh, Bk 5, ch. 18. 据罗杰记载，布列塔尼人劫掠了诺曼底地区。

57 *Philippidos*, v, 147–68.

58 Landon, no. 464; Diceto, ii, appendix to preface, lxxix–lxxx. 理查在信中要求：“将你现有的全部财富尽快送至前线。”

59 Rigord, 135. A. Teulet, *Layettes du trésor des Chartes*, i (Paris, 1863), 188–9.

60 Teulet, *Trésor des Chartes*, i, 189; *Recueil des actes*, no. 541, n. 1.

61 然而，据里戈记载，腓力攻击欧马勒的原因是理查非法夺取并摧毁了贝里的维耶尔宗城堡。Rigord, 135.另见WB, 199; *Philippidos*, v, 90–8。但关于维耶尔宗领主的记录表明，理查于1197年摧毁了维耶尔宗。据此来看，里戈很可能是有意为腓力挑起战争而找寻借口。参见*Breve Chronicon Virzionis Coenobii*, *RHF*, xviii, 246–7。

62 *Philippidos*, v, 111–17; Rigord, 135; *Sig. Cont.*, 433.

63 Newburgh, Bk 5, ch. 25.

64 *Philippidos*, v, 168–257. 另见上文360页。

65 罗杰将赎金数量记为3000马克。*Chron.*, iv, 5. 俘虏中还包括居伊·德·图阿尔（Gui de Thouars）。卡佩编年史家自然详细记录了这场持续七周的围城战。Rigord, 135–6;

WB, 200. 圣斯蒂芬修道院编年史则记载，卡昂说赎金为2500马克，并记录了守军的艰苦奋战。*RHF*, xviii, 349.

66 *Annales de Jumièges*, 77.

67 *Philippidos*, v, 258–68. 但其他史家并未提及此事。布列塔尼的威廉则称，“此后不久”理查便在收复欧马勒的战役中受伤，这或许可以解释理查在1196年下半年较少露面的状况。

68 Rigord, 136. 腓力通过一天一夜的攻城器轰击攻克城堡，还俘虏了15名骑士和18名弩手。随后他将这些俘虏转交给德勒的罗贝尔。WB, 200. 纽堡的威廉则认为当时守军未能组织应有的防御。*Newburgh*, Bk 5, ch. 25.

69 *Chron.*, iv, 5.

第十七章

征战法兰西，1197——1198

为了重新夺回诺曼维克桑地区，理查给自己定下了两项新的任务：一是建立稳固的前线基地，以此对法军守备部队施加持续的军事压力；二是消除腓力的两大强援——图卢兹伯爵与佛兰德斯伯爵的威胁。

理查为实现第一个任务所建立的前线基地是盖亚尔城堡（Château-Gaillard），确切地说，是理查在塞纳河畔的安得利（Andeli）地区（现在的莱桑德利地区）建立的复杂的防御体系，而建于安得利山上的盖亚尔城堡则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所在，也是理查生前最著名的伟大建筑成果。理查和腓力都极力在此地增强己方的防御，因为《卢维埃和约》明确禁止在这一地区建立防御工事。¹ 安得利岛及庄园原本属于鲁昂教会所有，鲁昂大主教此前还设立了通行税征收所，向塞纳河上经过此地的船只征收通行税。安得利地区是鲁昂的战略要地，在鲁昂地区的其他许多地产由于战争遭到摧残后更是如此。1195年12月时，时任鲁昂大主教沃尔特试图索要一笔补偿，却被两位国王迫害，不得不逃离他的大主教区。在大主教离开教区期间，理查于1196年3月来到安得利岛，又在4月、5月、6月三次回访该地，他此时应该已经开始与鲁昂教会谈判，希望获得该地区。² 当沃尔特于1196年7月7日返回鲁昂时，腓力已经开始围攻欧马勒。眼见大主教仍不愿意将这片有利可图的土地让出，理查便

失去了耐心。³ 理查强占了安得利地区并开始修建工事，并对大主教的抗议置若罔闻。最终，大主教只得于1196年11月7日前往罗马，向教宗诉说他的苦楚。⁴ 理查得知此事后，也派出自己的特使前往教廷讨论此事。⁵

与此同时，理查仍在继续修建工事。他强化了安得利岛的防御，并在岛上建造了新的王宫，这座王宫也成为他人生最后两年内最喜欢的居所。另外，理查还在塞纳河的右岸建立了一座“最引人注目的”新城镇，即今日所知的“小安得利”（Petit-Andelys）。在这座新城镇后，有一片池塘，布列塔尼的威廉称它是“深不可测、水域广阔的池塘”，两条独立水道将其与塞纳河相连。⁶ 盖亚尔城堡则屹立在海拔300英尺的石灰岩层上，它俯瞰着小安得利地区和塞纳河，周围还有许多与它们相连的外围工事。理查对盖亚尔城堡推崇备至，将它称为“赏心悦目的岩石城堡”（fair castle of the rock）及“极美之堡”（saucy castle）。⁷ 最后，理查又在盖亚尔城堡南方修建了一道横跨塞纳河两岸的栅栏，这标志着整个防御体系最终完成。为确保工程不间断，理查还亲自进行监督。为了表达他的抗议，鲁昂大主教在诺曼底公国内颁布了一道禁行圣事令，这意味着鲁昂教区内的大多数教会服务都暂停了。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这一禁令导致“诺曼底各处城镇的街道和广场上堆满了尚未安葬的尸体”。⁸ 然而，莱桑德利地区的雇佣工人、送水工、石灰工、木匠、采石工、切石匠、伐木工、矿工、守夜人、警卫者和铁匠们仍在持续工作。1197年4月，教宗塞莱斯廷三世解除了鲁昂大主教的禁令，并让大主教与他的随从一起返回诺曼底，最终签订此前国王与鲁昂大主教在教宗与枢机主教们面前确定的和解方案。豪登的罗杰与纽堡的威廉都认为，教廷在此事上更支持理查，一位身为十字军统帅，却在他出征期间领土遭到侵占的国王。⁹

据纽堡的威廉记载，1198年5月某日天生异象：当时血雨从天而降，将安得利地区尚未完工的城墙染红。一些理查的顾问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劝说理查停止施工。但理查仍然无动于衷，他甚至不允许石匠和

工程师们稍稍减慢施工进度。威廉不由得感叹道：“国王对修建城堡一事是如此热衷，我敢保证，若此刻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命令国王停止施工，那么这位天使将遭到国王的一连串咒骂，国王仍会不顾一切地继续他的工程。”¹⁰ 理查亲自密切参与了盖亚尔城堡的建设，我们可以将盖亚尔城堡的设计方案当作理查在围城战的实际操作方面极有经验的证据（若我们真需要证据的话）。12世纪，随着攻城器在战争中被大量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传统防御工事中的“死角”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受到城堡建筑师们的重视（所谓“死角”，指的是守军的火力无法覆盖到的防守区域）。盖亚尔城堡的一大特色就是拥有曲线形围墙和椭圆形内堡，时至今日我们也能从它的残存遗址中看到这一结构。这确保了它的防御毫无死角，守军的火力也可以覆盖到所有防区。总之，从城堡的选址、设计、外围栅栏、岛城城镇到城堡，每一个元素都是这一堡垒的和谐组成部分，再加上城墙与塔楼的设计，都显示了一位伟大建筑师的作用。

¹¹ 理查信心满满地宣称：盖亚尔城堡的构造完美无瑕，即使它的城墙改用黄油砌成，他也能在此击退一切敌军。¹²

尽管盖亚尔城堡令人印象深刻，但仅从它的废墟上我们仍不能看到这一复杂的防御体系在当时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些城堡的废墟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这种感受是有误导性的，整体来看，莱桑德利的防御工事是相当令人赞叹的。与修建大教堂一样，在中世纪修建一座城堡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遗留至今的中世纪城堡无论是保存完好，还是已化为废墟，它们在建成时都至少耗费了一代人的艰苦劳动。由于理查日夜督促，如今已沦为废墟的盖亚尔城堡当时只用了两年便宣告竣工，而且它距离腓力在加永的城堡不过五英里。我们可以从理查与沃尔特大主教的协商方案中看出，他对这一区域是何等重视：为了获得安得利地区的一处庄园，理查不仅将另外两处庄园赠给鲁昂教会，还将繁华的迪耶普港一同转让。¹³ 理查对安得利地区的重视还可以从一份保存至今的莱桑德利地区开支记录中显示出来，这份资料显示，在1198年9月之前的两年之内，理查在此地区耗资近12000英镑。¹⁴ 为了准确理解这一金额

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金额与理查修建其他城堡的开支略做比较。理查在1198年修复厄镇城墙时，只花了1250英镑，而这已是1198年内财政记录中除安得利城堡外最大的一笔工程开支。¹⁵关于英格兰城堡的修缮记录则更为详尽，理查在他统治的十年内仅用了7000英镑对英格兰境内的城堡进行修缮。12世纪后期在英格兰境内修建城堡的最大开支则来自亨利二世，他在1179年至1191年间为修建多佛尔城堡花费了7000英镑。¹⁶从上述数据来看，盖亚尔城堡无疑使安茹帝国境内的其他所有城堡都相形见绌，甚至在全欧范围内都鲜有城堡能与之媲美。理查甘愿投入巨资修建盖亚尔城堡，也体现了这座城堡在他心中不可撼动的地位。那么，理查为何要在此地耗费巨资修建城堡？

对上述问题的传统解释是：莱桑德利地区需要填补自从吉索尔城堡被腓力占领后，安茹帝国在诺曼底防线的缺口，盖亚尔城堡的作用是阻断直通鲁昂的道路。¹⁷这当然是理查考虑的因素之一，但这一解释仍不够全面。在约翰统治期间，这确实是盖亚尔城堡的职责，此时安茹帝国在诺曼底地区的统治摇摇欲坠，在约翰制造的士气低落且互相猜疑的恶劣氛围中，孤立无援的盖亚尔城堡苦战六个月，已经是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战绩。¹⁸不过，这并不是理查将其作为主要防御力量的原因。理查在1196年至1199年期间更多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收复维克桑地区，而非如何增强诺曼底地区的防御。¹⁹盖亚尔城堡必然在理查的再征服战略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既能保护理查的前线基地，使前线的英军可以对腓力的城堡发起猛攻，又可以使来自诺曼底的主要军械库——鲁昂的援兵物资有一个固定的集结点，保证它们能从此安全地送往前线：这些援军可以从防御严密的塞纳河谷内进军，通过蓬德拉尔什和沃德勒伊，并跨过茹瓦港的渡桥进入莱桑德利地区。腓力于1195年7月从茹瓦港的桥梁渡过塞纳河仓皇撤军，并拆毁了这座桥。理查重建了这座桥（否则人力和资源只能乘船由水路运往前线），并在茹瓦港修建了居所，这显示了他对穿过塞纳河谷行军路线的重视。1198年财政署卷宗的记录里有一笔12里弗尔的款项，它用于支付“将国王的桨帆船从鲁昂运往安得

利岛，随后再将其运回鲁昂”的费用；另一笔166里弗尔的支出则交给一位高级木匠——巴约讷的加尔弗里德斯（Galfridus of Bayonne）和另外四位木匠，用于支付“建造四艘桨帆船的费用”。²⁰ 在13——14世纪时，英王建造桨帆船所需的专业人士主要来自巴约讷。显然，理查比其他英王都更早认识到了巴约讷的价值，并将其充分利用。早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理查就已在中海充分展现了自己指挥桨帆船进行海战的才能。据布列塔尼的威廉记载，理查组建了一支由70艘更为狭长、吃水更浅且速度更快的新型船组成的新船队，他将这种新型船取名为“快船”（*cursoria*）。²¹ 显然，这是专为作战而非运输所设计的船只。水面作战将是维克桑地区的战争形态之一，就像理查设想中的埃及远征计划一样。布列塔尼的威廉此前所说的“深不可测、水域广阔的池塘”，显然指的是理查为准备水面作战而建立的掩蔽良好的深水河港。²² 另外，理查还在连接英格兰和诺曼底边境的交通线上的另一端——朴次茅斯修建了一座新王宫、一座新城镇和一处新港口，它们距波切斯特城堡不远。与此类似，盖亚尔城堡也保卫着莱桑德利地区新建的王宫、城镇和港口。²³

1196年夏季，在理查开始在莱桑德利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后，他还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展开了谈判，由此开始的一系列外交谈判也最终催生了一场“外交革命”。自1159年以来，安茹王朝的历任阿基坦公爵几乎始终与图卢兹伯爵处于战争状态。阿基坦公爵认为，他们按照世袭权力有权统治图卢兹，尽管他们事实上未能如愿，但通常能够保持对战略要地凯尔西地区的控制。然而任何有自尊心的图卢兹伯爵都不会甘心失去位于卡奥尔附近的这块战略要地，每当阿基坦公爵陷入困境或忙于其他事务时，图卢兹伯爵总会趁机起事，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夺回凯尔西。双方围绕凯尔西的争斗也在12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成为常态，而这对腓力来说再好不过了。1194年末雷蒙德五世伯爵逝世，他的儿子雷蒙德六世继承伯爵之位。理查本有机会在1195年重建当地的政治格局。但随后腓力获得了雷蒙德六世的效忠，《卢维埃和约》中的部分条款也使得阿基坦和图卢兹地区在1195年再次陷入战争状态（尽管双方的这次战争并

未见于任何编年史记载）。然而，和约的条款也显示，腓力并未与雷蒙德商议，若雷蒙德不愿接受和约，他会随时放弃雷蒙德。²⁴这是理查可以利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1196年4月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二世逝世，重塑西南欧地区外交格局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理查的忠实盟友、纳瓦拉国王桑乔七世深陷于与卡斯提尔王国的战争中，无法继续在阿基坦南部为理查提供支援。²⁵尽管如此，理查也是在1196年夏天遭遇一系列失败后，才同意图卢兹伯爵的条件。

1196年10月，理查与图卢兹伯爵正式实现和解。雷蒙德六世前往鲁昂，与理查之妹琼完婚。理查放弃对图卢兹的宗主权，将凯尔西转让给图卢兹伯爵，并将阿让伯国作为琼的嫁妆一同转交给图卢兹伯爵统治。不过，阿让伯国仍然属于阿基坦公国的附庸，当加斯科涅地区发生战争时，阿让还应在一个月为阿基坦公爵提供500名骑士用于作战。²⁶通过这份极其慷慨的协议，理查不仅与自己的宿敌和解，还使他成了新的盟友和伙伴。而从经济角度看，图卢兹伯爵与波尔多地方领主和平共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为促进加龙河流域的沿河贸易发展将使双方获益。至少英国史家纽堡的威廉认识到了这桩婚姻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双方持续近四十年的宿怨和战争彻底结束，理查也免于陷入在法兰西、图卢兹和布列塔尼三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终于能专注进行与腓力的战争。²⁷

更重要的是，与图卢兹的同盟关系还促进了“外交革命”的发生，推动佛兰德斯伯爵加入理查一方。²⁸与波尔多和图卢兹密切的经济联系相比，佛兰德斯与英格兰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不仅更为紧密，对安茹帝国也有着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佛兰德斯是当时欧洲西北部人口密度最大、经济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境内的布鲁日、伊普尔（Ypres）、根特和里尔都是欧洲著名的手工业中心，它们拥有的人口超过了佛兰德斯土地能够供养的能力。因此，佛兰德斯对进口的粮食极为依赖。此外，由于纺织业是佛兰德斯的重要产业，它也十分依赖原料羊毛的进口。英格兰为佛兰德斯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羊毛。基于以上原因，佛兰德斯伯

爵虽然是富甲一方的诸侯，但也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压力的影响。早在1194年，理查曾颁布了一份禁止安茹帝国各地与佛兰德斯贸易的法令。一些试图向佛兰德斯出口谷物的英格兰商人因违背禁令遭到重罚。²⁹这份禁令也对佛兰德斯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195年12月，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八世逝世，但他的继承人鲍德温九世也和新任图卢兹伯爵一样，在统治初期采取了与腓力结盟的政策，鲍德温九世还在1196年夏季时为腓力围攻欧马勒的战役提供了物资援助。

1197年春季，开始有证据显示，理查在诺曼底东北部地区重获先机。这或许是与图卢兹伯爵同盟的最早成果。理查于1197年4月重启战端，对蓬蒂厄发起进攻并劫掠了圣瓦莱里港口。理查不仅将圣瓦莱里焚毁，还缴获了包括圣人遗物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理查还在港口内发现了一些载有谷物和其他食物的英格兰船只，于是他将这些船员绞死，烧毁所有船只并占有了所有粮食。³⁰理查希望他的经济制裁措施能够得到有力执行，这无疑也是对佛兰德斯商人的警示。1197年5月，理查从古尔奈向博韦西发起袭击，并攻占了米伊（Milli）城堡。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记载，威廉·马歇尔本人正是攻占米伊城堡的首功之臣，但理查却在战斗结束后责备了他：“马歇尔爵士，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人不应该从事这样的冒险行动，以后就让那些仍需建功立业的年轻骑士们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吧。”然而在此之前，理查也曾希望亲自参战，最终被他的随从劝阻。³¹当理查和威廉·马歇尔对米伊城堡发起猛攻时，梅卡迪耶率领另一支安茹军队取得了更伟大的胜利：他成功俘虏了腓力的表兄、博韦主教腓力。据纽堡的威廉记载，当博韦主教得知米伊城堡正遭受围攻时，便立刻拿起武器投入作战，但理所应当地被俘虏了。英格兰编年史家们也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将这一事件记录下来，并将其广为传播。³²威廉·马歇尔认为，博韦主教腓力“是理查最为痛恨的人之一”。³³理查随后将博韦主教关入监牢，并拒绝将其释放。一些人抗议道，教士本不应遭受如此残忍的待遇，但理查的人认为，博韦主教被俘时的身份并非神职人员，而是一位跨马出战的骑士，因为他被俘时全副武

装。总之，博韦主教腓力是一位极为好战的主教，理查也抓住这一特质在宣传上大做文章。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记载，理查自豪地宣称：天主已经证明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后者落得被俘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³⁴在这次胜利攻击后，理查又返回诺曼底，并攻占了距吉索尔城堡仅4英里的当居。³⁵布列塔尼的威廉宣称，理查当时甚至对巴黎郊区造成了威胁。³⁶

到了1197年初夏时，战局开始再次有利于理查。³⁷理查派往佛兰德斯的使臣充分利用了1192年以来鲍德温家族对腓力的怨恨情绪：后者在1192年从鲍德温家族手中夺取了包括富裕的阿拉斯、圣奥梅尔和杜埃（Douai）等城镇在内的阿图瓦地区。纽堡的威廉认为，这一举动导致鲍德温家族“失去了近一半的领地”。³⁸若鲍德温九世此时选择与安茹王朝结盟，他不仅可以免受经济制裁令的制约，得到之前被拖欠的年金，还能从理查处获得金钱赔偿。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愿意为拉拢佛兰德斯伯爵支付5000马克。³⁹当然，鲍德温伯爵的顾问和亲属们也尝到了一些与富有的英王结盟所能获得的好处。⁴⁰于是，鲍德温九世在1197年6月到7月间来到诺曼底，与理查签订了正式同盟协议。⁴¹双方约定：决不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条件下与腓力签订停战协议或者和约。理查与佛兰德斯伯爵的同盟也是他的“葡萄酒与金钱外交”政策的胜利。它导致诺曼底边区的权力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三位边区领主——默朗伯爵罗伯特、卡约的威廉与古尔奈的休的态度上，他们都为理查执行协议条款提供了担保。⁴²在1193年见风使舵转投腓力阵营后，他们又在1197年时重新回到理查一方。圣德尼的里戈认为，佛兰德斯伯爵背弃与腓力的同盟对法王及其领土均造成了沉重打击。⁴³

到7月20日，鲍德温九世已经开始入侵阿图瓦，理查同时也率军南下，向贝里进发。⁴⁴两路进军战略获得成功（1214年，约翰也采用了类似的战略）。然而腓力开始对理查和鲍德温的攻势并不在意，仍将战略重心放在维克桑地区。在重新夺取当居后，他才向北方进军。⁴⁵此时杜埃和另一些城堡已经被理查攻占，阿拉斯也处在佛兰德斯军队的围

攻中。当腓力率领大军前来支援阿拉斯守军时，鲍德温九世暂时后撤，腓力便穷追不舍，决心严惩鲍德温的变节之举。但过于愤怒的腓力中了鲍德温的圈套，鲍德温通过一系列成功的部署摧毁了法军前后通行的桥梁，并切断了法军的补给线。缺乏补给的法军只得就地征粮，那些外出征集粮秣的法军士兵则成了佛兰德斯军队的攻击目标。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当时法军甚至还被一群佛兰德斯女人击败，这令他们深感耻辱。最终，腓力意识到他已经落入对方的陷阱，不得不向鲍德温求和，并许诺，若鲍德温愿意中止与理查的同盟，他愿意满足前者提出的一切条件。但鲍德温拒绝了腓力的请求，并要求战争各方应在1197年9月来到莱桑德利和加永的交界地带进行公开和议。据马尔谢讷（就在杜埃附近）的安德烈亚斯记载，很多人得知腓力率军来袭的消息时都十分畏惧，当他们得知腓力撤军时转而喜笑颜开。⁴⁶ 鲍德温九世先与理查在鲁昂会面，随后两人才一同赴会。虽然理查此时并不打算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但他同意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从1198年圣希拉里日（1月31日）起暂时休战一年。在此期间，双方可恢复贸易，相互交换或赎回俘虏。⁴⁷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趁着鲍德温与腓力在阿图瓦交战时，还攻占了贝里和（或）奥弗涅地区的至多10座城堡。⁴⁸ 而且理查很可能就是在此时将贝里地区的维耶尔宗城堡摧毁。⁴⁹ 而在维克桑地区，尽管理查最终未能继续占有当居，但他仍然取得了新的进展。诺曼底财政署的记录表明，理查曾出资对加马什和隆尚地区的城堡进行修复，理查也逐渐将双方的边界向东推进了不少。

理论上，1197年9月签订的停战协议应延续至1199年1月。但实际休战时间注定远短于此，双方也都在利用停战间隙筹备下一阶段的战争。理查继续着手完成他的两大任务——修建城堡及寻求同盟。理查为击败腓力寻找盟友的过程中，还卷入了当时欧洲的另一个重大外交问题：选举一位新的德意志君主继承亨利六世之位。亨利六世由于热病于1197年9月28日在墨西拿逝世，年仅32岁。⁵⁰ 由于亨利六世之子、未来的腓特烈二世当时还不满三岁，因此这是霍亨斯陶芬王族的政敌们夺取德意志

统治权的最佳时机，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以科隆大主教阿道夫为首的下莱茵诸侯们，他们从1194年起便与理查建立了盟友关系。1197年底，下莱茵诸侯们派出使臣前往鲁昂，邀请理查参加新王的选举仪式。理查虽然没有出席，但他派出了由达勒姆主教普瓦图的腓力、欧马勒伯爵贝蒂纳的鲍德温率领的全权代表团前往参会。⁵¹而这次选举也成为理查与腓力政治斗争的延伸。英格兰有谣言称，理查和腓力都是德意志王位的候选人。贝蒂纳的一位编年史家甚至认为理查当选，但理查拒绝接受这一头衔。⁵²实际上，理查支持的候选人是他的侄子、布伦瑞克的亨利。这一决定可能引起了理查与阿道夫大主教的分歧，后者并不希望“猛狮”亨利之子继承皇位。然而，布伦瑞克的亨利当时正在参与十字军。随后，一群德意志诸侯们于1198年3月推选亨利六世的弟弟、士瓦本的腓力（Philip of Swabia）作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候选人。这使他们能够要求选举延期。科隆大主教及其盟友们见状，便转而推举了身在阿基坦的亨利的弟弟奥托作为王位候选人。科隆大主教从领土的角度考虑，认为奥托比他的兄长威胁更小。作为一位非常“英国”的候选人，奥托可以获得科隆商人的支持。⁵³奥托年轻时一直在安茹宫廷生活，并在1196年时成为普瓦图伯爵。⁵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理查很可能乐于见到与英格兰关系亲近的奥托继承德意志。⁵⁵

1198年6月，奥托在科隆顺利当选为王，于7月在亚琛加冕。⁵⁶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和他的兄弟也参加了奥托的加冕礼。⁵⁷另一方面，法王腓力则于1198年6月底同士瓦本的腓力建立同盟，后者承诺将运用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力量帮助法王对抗他们的敌人，尤其是英格兰国王理查、奥托、科隆大主教和佛兰德斯伯爵等人。圣德尼的里戈认为，法王与霍亨斯陶芬家族建立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压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⁵⁸这更加说明，相较于腓力而言，理查从他的德意志盟友那里获得了更多，他的盟友主要包括荷兰伯爵迪特里希（Dietrich）、林堡公爵亨利、布拉班特公爵亨利和科隆大主教阿道夫，他们不仅控制着下莱茵的战略要地，还能确保佛兰德斯伯爵后方的安全，维护理查与佛兰德斯

伯爵的同盟不受破坏。此外，理查对奥托的支持也帮助他与罗马教廷保持了友好关系。⁵⁹ 于1198年1月8日正式当选的新任教宗英诺森三世尽管在努力维持中立的假象，但他同样乐于看到出身韦尔夫家族的奥托，而非其他霍亨斯陶芬家族成员继承德意志皇位，卡佩宫廷也看出了他的立场。⁶⁰ 因此，一位瑞米耶日的编年史家认为，奥托成功当选为王也应被视为理查最为重大的成就之一。⁶¹

但在卡佩编年史家的记录看来，理查与布洛涅伯爵雷诺的同盟对法王利益的损害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布洛涅伯爵素有骁勇善战之名。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将雷诺称为“一切战斗中的旗手，在各方面都堪称出类拔萃的骑士楷模”。⁶² 不过晚至1198年4月，布洛涅伯爵仍然承认法王腓力的权威。但记录这一点的同一份档案也显示，腓力始终怀疑布洛涅伯爵的真正立场，对他缺乏信任。⁶³ 后来布列塔尼的威廉说他“早就应该在现在关押他的勒古莱城堡主楼里发霉腐烂了”，这是因为他布汶战役中为失败一方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早在十多年前，圣德尼的里戈就对雷诺伯爵转投理查阵营一事极为怨恨。里戈认为，雷诺“因受恶魔挑唆”与理查结盟，他与他部下的佣兵也对法兰西王国造成了极大损害。⁶⁴

《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则记载，当理查与布洛涅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一同携手前往位于韦尔农与布塔旺（Boutavant）的交界地带举行会议时，腓力极为惊讶而愤怒。⁶⁵ 1198年，吉纳伯爵、布列讷伯爵、圣波勒伯爵休、佩尔什伯爵杰弗里和布卢瓦伯爵路易等人也加入理查一方与腓力对抗。⁶⁶ 布列塔尼的威廉以一种更加悲观的笔触描述了腓力在1198年的不利处境：不仅佛兰德斯伯爵和布洛涅伯爵将法王抛弃，布卢瓦伯爵路易和王国内几乎所有贵族们也都弃法王而去——有些人已公然宣布与理查结盟，有些人则与理查暗中往来。因此，理查显得极为自信，甚至咄咄逼人地要直接进攻巴黎。⁶⁷ 腓力自然也不敢懈怠，他试图用传统的方式对理查进行反击：他与两位理查的阿基坦封臣——利摩日子爵艾玛尔、昂古莱姆伯爵阿德马尔建立了同盟。⁶⁸ 但相较之下，理查仍在双方的外交战中占据绝对优势。许多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布列塔

尼的威廉、豪登的罗杰、阿德尔的朗贝尔（Lambert of Ardres）、海斯特巴赫的凯撒里乌斯、贝蒂纳的“匿名者”等人都对理查外交攻势取得成功的原因做出了一致的解释：理查之所以获得众多盟友，主要与他的雄厚财力和慷慨大度的个人品质有关。正如贝蒂纳的“匿名者”所言：“理查国王在财力和土地面积上都远胜于法王。”⁶⁹

1198年9月初，鲍德温伯爵对被腓力非法夺取的阿图瓦发起进攻，这也标志着理查与腓力的战争再度爆发。鲍德温首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艾尔（Aire），随后他又与布洛涅伯爵合兵一处，对圣奥梅尔发起围攻。圣奥梅尔市民在与鲍德温达成一致后，致信腓力称，若腓力不派兵前来支援，他们将向鲍德温投降。腓力则在回信中表示：他会在9月30日前派兵来援，若他未能履行诺言，圣奥梅尔市民可自行其是。但和过去一样，理查的盟友们同时从两条战线对腓力发起进攻，腓力在9月期间一直在维克桑地区作战，无法前往支援圣奥梅尔。最终，鲍德温经过六周的围攻后，于10月13日进入圣奥梅尔城。⁷⁰与此同时，腓力在诺曼底地区遭遇了两场败仗。交战初期，腓力率军进入诺曼维克桑地区进行劫掠，由于理查当时将部队分散部署，身边士兵不多，他只得暂避法军兵锋。当理查获得200名骑士和梅卡迪耶的佣兵部队支援时，腓力已经焚毁了18处据点。于是理查集结部队在腓力撤退途中发起追击，并造成了一定伤亡，法军有30名骑士和武装军士被俘，另有100匹战马被缴获。⁷¹

腓力在诺曼底遭遇的第二场败仗则更加惨重。理查在一封广为流传的书信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9月27日，理查从当居渡过埃普特河，攻入法兰西维克桑地区，并在一天之内收复了库尔瑟莱（Courcelles）和布里并返回当居。与此同时，另一支英军又占领了塞里方丹（Sérifontaine）。理查攻占上述三处城堡并控制当居（上述材料暗示了这一点）之后，已经对吉索尔城堡形成包围之势。当腓力得知理查围攻库尔瑟莱的消息后，他立刻集结了一支规模较大的援军。这支援军中不仅有300名骑士和众多武装军士，一些当地部队也加入其中。腓力次日前往

支援，但他并不清楚库尔瑟莱当天就已失守。当腓力率领这支援军从芒特北上时，他的行迹被理查部署在埃普特河东岸的巡逻兵察觉。虽然安茹军队主力仍在当居休整，但理查本人当时像往常一样正在巡逻队伍之列，因此他迅速掌握了法军动向。当理查意识到腓力并不打算进攻安茹军队，而是在不清楚前线战局的情况下继续北上时，他决定抓住机会，趁法军行进时发起进攻。⁷²为此，理查下令让在当居驻扎的主力部队尽快加入战局。然而，随着法军继续前进，理查意识到他的机会正在逐渐流逝。待腓力抵达库尔瑟莱（甚至在此之前），必然会知晓前线的真实情况。于是理查不等援军全部抵达，便带着部分军队发起了进攻。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记载，理查如饿狮捕食猎物一般对法军发起了凶猛的攻势。腓力只得再次撤军，逃往仅有的避难所——吉索尔城堡寻求庇护。

接着，当我军追至吉索尔城堡大门时，法王正率军准备过桥入城。正当他们从桥上经过时，桥梁突然倒塌，我们听说法王落入水中，另有20名法军骑士溺亡。我军在随后的战斗中还击败了马修·德·蒙特莫伦西（Matthew de Montmorenci）、阿朗·德·鲁希（Alan de Rusci）和富尔克·德·吉勒瓦尔（Fulk de Gileval）三位骑士并将他们俘虏，抓获了上百名法军士兵。朕在此只列出其中最重要的俘虏姓名，待我们获得其余人的姓名后再做补充。此外，梅卡迪耶也率军俘虏了30名法军骑士，但朕尚未接收这批俘虏。除了这些骑士之外，我军还俘虏了不少的骑马武装军士和步行武装军士，但我们还没清点他们的人数。我们缴获了200匹战马，其中140匹是全副武装的披甲战马。吉索尔一战，朕无疑痛击了法王。但朕的胜利并非人力所致，正是在天主的庇佑下，朕才得以完成这一正义事业。此战中，我们不顾一切建议，将性命与王位都置之度外。愿诸位能与朕共享胜利喜悦。9月30日亲眼见证于当居，理查。⁷³

从安茹方面的史料来看，腓力的军队面对理查的部队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只是法军在遭受突然进攻时甚至都没有摆好作战阵形。由于理查并未携带攻城器械，无法围攻吉索尔城堡，他只能将俘虏押回当居。唯一的遗憾是，腓力再次逃脱了理查的追捕，据说他是利用干燥大道上扬起的烟尘作为掩护才得以逃脱的。然而战争仍在继续。腓力又召集一支部队劫掠了塞纳河以南的诺曼底地区，并焚毁了埃夫勒以示报复。⁷⁴理查则派梅卡迪耶洗劫了法兰西商人的市集所在地阿布维尔（Abbeville）。豪登的罗杰认为，由于此前腓力战败后在埃普特河狼狈落水的经历，1198年的战争比此前任何一年的战争都更为激烈。他将一部分俘虏刺瞎双目以泄愤。理查得知此事后，也针锋相对地将一些法军俘虏刺瞎。⁷⁵

腓力在战败后迅速劫掠并烧毁了埃夫勒，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吉索尔城下并未遭遇惨败呢？⁷⁶显然，英格兰编年史家们都认为腓力曾遭受惨败。《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中用了不少于70行篇幅记述此事的经过，而且此书的主人公在此事件中根本未出现在战场上！随后作者还自豪地宣称“30名英格兰骑士堪与40名法兰西骑士匹敌”。⁷⁷总之，英格兰编年史家们可能过于草率地完全接受了理查那封流传甚广的得意扬扬的信件的记载。⁷⁸非英格兰史料中也对腓力的这一败绩有所提及。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同样记录了腓力落入埃普特河的狼狈情景。⁷⁹布列塔尼的威廉则坦承法军有90或92名骑士被理查俘虏。⁸⁰以当时的战争规模而言，在一场战斗中损失90名骑士和200匹战马（其中140匹是披甲战马）可谓十分惨重。⁸¹更重要的是，这些俘虏都是当时的著名骑士，他们的价值显然也比一般士兵更高。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记载，这些被俘的都是法军中最优秀的骑士，他们在这种战斗中负责断后。⁸²不过，关于法军损失最可靠的记载应来自卡佩王朝方面。圣德尼的里戈和布列塔尼的威廉在各自著作中都极力为法军的失败辩护，想要挽回法国的颜面。他们认为，当理查出其不意对诺曼维克桑地区发起进攻时，他带着一支由1500名骑士、大量佣兵和步兵组成的大军，而腓力

向吉索尔城堡后撤时，法军的兵力则远少于此。里戈认为腓力当时只有500名骑士，而威廉则认为腓力只有200名骑士。他们借此显示（而非直接说明）在9月28日的战斗中法军处于明显劣势，安茹军队与卡佩军队的人数之比至少为3：1，在这样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法军仍能以少敌多，坚持作战，维护了他们的名誉。⁸³不过他们也都承认腓力遭受了惨重损失。里戈指出有多名骑士被俘，并列出了其中四人的姓名，说他由于“过度悲伤”而没有列出其他俘虏的姓名。由于法军在此役损失过于惨重，上述两位编年史家只得试图为这场惨败寻求合理的解释，最终他们将腓力惨败的原因总结如下：腓力允许犹太人进入王国境内，并与法兰西教会对抗，因此天主为惩罚腓力的不敬之举而让他遭受惨败。⁸⁴

豪登的罗杰恰好提到的其他事件也显示，理查仍在继续扩大战果。理查先是率军在帕西附近进行了两天的战斗，尽管莱斯特伯爵无法收复自己的城堡，但还是获得了一定战果。不久后，在10月的一次战斗中，里昂拉福雷（Lyons-la-Forêt）的领主威廉·勒格（William Le Queu）又俘虏了80名骑马军士和40名步行军士，他们是腓力派往支援新马尔谢的援军。这并不是一次主力会战，却是理查进攻维克桑地区期间未被记录的大量小规模战斗的典型。⁸⁵罗杰的记载或许有些偏颇，但我们可以从腓力1198年秋季的求和提议中，了解到他当时面临的不利处境。⁸⁶腓力已无力支撑两线作战，若他希望收复失去的阿图瓦领地，就必须先与理查暂时议和，放弃他在诺曼底的征服成果。于是腓力提出，愿将除吉索尔城堡外所有已征服的诺曼底领土归还理查。但理查表示：若佛兰德斯伯爵和其他转投向他的人不受这份停战协议保护，他绝不答应单方面停战。⁸⁷最终，双方于1198年11月约定暂时停战至1199年1月13日。⁸⁸1199年1月13日，理查乘船沿塞纳河而上，按照约定与腓力会面。与端坐马上的腓力不同，理查站在（他的一艘桨帆船的）甲板上与前者对话。随后双方又决定进行再次会面。当双方再会面时，教廷特使和诸多权贵作为调停者出席。最终，理查和腓力同意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为期五年的停战协议。⁸⁹遗憾的是，这份停战协议未有文本传世

，也无任何相关记录流传，因此我们并不清楚“维持现状”一词所指的真实情况。不过，《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还是记录了部分相关内容，尽管它并非官方文书，成文时间也较晚，但它的内容是基于威廉·马歇尔本人的清晰记忆整理而成，因此有一定参考价值。

威廉·马歇尔认为，如狐狸般狡猾的腓力此时失败了。他已在战争中耗尽钱财，并受到了理查势力的全面包围。许多腓力的盟友也已转投理查一方。腓力的唯一希望便是请求罗马教廷的援助。在此情况下，教廷特使卡普阿的彼得于1198年圣诞节时抵达。⁹⁰此前教宗英诺森三世已决定发起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他迫切希望安茹王朝和卡佩王朝能够结束战争，以支持他的东征计划。⁹¹在威廉·马歇尔看来，卡普阿的彼得面色蜡黄、形容卑猥，只是法国的一个花言巧语的说客，总是摆出一副令人作呕的谦卑姿态。⁹²多年之后，威廉·马歇尔也仍对理查与教廷特使的激烈争执记忆犹新。⁹³会谈开始后，理查起初表示，若腓力愿将此前强占的所有土地归还给他，他愿意与之议和，并对腓力的损失做出补偿。否则，他仍将继续进军，绝不停战。卡普阿的彼得试图以“当英法双方交战正酣时，耶路撒冷王国正危在旦夕”的理由使理查稍做让步，然而理查听罢此言显得有些愤怒，他提醒特使，腓力正是趁他远征未归之际侵占了他的领土。“若不是腓力的恶行迫使朕提前回国，朕早已将圣地全境收复。当朕身陷囹圄时，腓力更是处心积虑地希望朕永远不见天日，以便能更为肆无忌惮地侵吞朕的土地。”理查坚称，只要他的敌人腓力仍然占领着原本属于他的土地和城堡，答应腓力的议和或停战要求就是错误的决定。特使则说道：“啊！陛下，您要知道，没有人能总是得偿所愿的。”之后，特使仍按照教宗此前的指示，以圣地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劝说理查。最终，理查允许在腓力仍然占据城堡的前提下与后者停战五年，但他补充道：“此后腓力不得再侵占朕一寸土地。”

彼得表示会将这一答复告知腓力，但他的下一个要求却令理查勃然大怒。彼得提出，理查还应将博韦主教腓力释放，因为“将一位已获得

教职的神圣主教关入监狱的做法并不恰当”。“以朕的头颅起誓，”理查愤怒地说道，“他并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此他早就不能再担任圣职了。朕将他俘虏时，他的身份也并非主教，而是一位全副武装与我军作战的骑士，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镶边头盔。伪君子先生，你真是愚蠢至极！若不是由于你的特使身份，朕必然会让你带些会令教宗终生难忘的东西回去的！当朕身陷囹圄，渴望获释时，圣座从未提供过一分一毫帮助。如今他还妄想派一位使臣前来命令朕，让朕释放一位给朕带来伤害的强盗和纵火犯？给朕滚出去，你这可恶而腐朽的叛徒、骗子、阴谋家、教会的败类！永远别让朕再看见你！”卡普阿的彼得随后便立刻逃回法王腓力处，担心自己一旦停留过久便会被理查施以阉割之刑。会面结束后，理查便如同一头因受伤而狂怒的野猪一般冲入内室，关闭所有房门并卧床不起，拒绝与任何人见面。直到威廉·马歇尔进入宫内时，才有人敢去面见他。威廉·马歇尔安慰理查，他更应为现在有利于自己的形势感到欢欣鼓舞而非勃然大怒。就让腓力留着那些该死的城堡吧，既然那些城堡周边的地区已经被理查一方控制，它们就已经失去了作用，它们只会不断消耗腓力几近枯竭的财富。理查只需下令前线的将领们封锁敌军的补给线，别让城堡内的守军从周边地区获得补给即可。另据《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记载，里昂拉福雷的城主威廉·勒格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策略，他收取了吉索尔的地租，腓力任命的吉索尔城主则毫无收获，而博德蒙的法军甚至都不敢离开城堡到城外的泉水处取水。

⁹⁴ 这一记载或许有夸张之嫌，但毫无疑问，腓力可能在这一和平时期的花费比战时还多。

这段记述当然是为了说明，只有威廉·马歇尔一人能够安抚盛怒之下的理查。若书中的记载反映了真实的停战条件，那么理查应（和威廉·马歇尔一样）对己方当前的优势心知肚明，因为提出这些条件的就是他，而非威廉·马歇尔。或许早在1195年收复沃德勒伊时，理查便使用了封锁敌军补给的战术。⁹⁵ 既然理查已掌握全局，他又为何要在与教廷特使会面时大发雷霆？这是否仅仅是表演出来的愤怒呢？当然是的，

包括他猛然关上所有门窗的行为。若腓力相信理查对教廷特使的调停十分愤怒，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理查开出的条件。与此同时，理查也对腓力非法侵占其领土的举动表示愤怒。若理查真像政敌们描述的那样精明多计，那么他在众人面前展现的愤怒姿态必然是真实又经过精心计划的。⁹⁶ 因此，威廉·马歇尔认为，理查在1199年初时仍然处于胜利态势。卡佩方面则认为，理查认为自己是站在有利一方的，他也确实胜利了。圣德尼的里戈认为，这份停战协议并未真正生效过，因为理查使用一切计谋阻止了它的实施（他认为继续作战对理查也更为有利）。⁹⁷ 总之，圣德尼的里戈和布列塔尼的威廉关于1197年至1198年战争的记载都体现出极为悲观失望的情绪，因为战局对法军极为不利。

注释

1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曾向鲁昂教区索要安得利地区。*Chron.*, iv, 3–4. 我使用“安得利”指代1196年前的这一地区，而用“莱桑德利”这一新的概念作为1196年后的区域总称。

2 Landon, nos. 462, 463, 466, 468. 在理查的授意下，鲁昂主教区教长、大主教沃尔特的侄子被选为伍斯特主教。Diceto, ii, 139.

3 据大主教在罗马的特使所说，理查“反复提出了许多条件”。*Chron.*, iv, 17–18. 沃尔特大主教在7月7日后不久便给迪切托的拉尔夫写了一封信，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当时理查还没有控制安得利地区。Diceto, ii, 144.

4 在大主教给迪切托的拉尔夫的信件中，他告诉拉尔夫，自己将要前往罗马控告自己的副手利雪主教，因为后者站在理查一方反对自己。Diceto, ii, 148–50. 鲁昂编年史的记载则表明，当时他的另一个副手埃夫勒主教也站在理查一方。*RHF*, xviii, 358.

5 威廉·隆尚（在前往罗马途中逝世）、达勒姆主教普瓦图的腓力和利雪主教是理查的代表团的主要成员。*Chron.*, iv, 14, 16–17. 豪登的罗杰或许作为达勒姆主教的随员一同前往，他不仅效忠于理查，也效忠于达勒姆主教。参见Gillingham, ‘The Travels of Roger of Howden’, 165.

6 布列塔尼的威廉关于理查在莱桑德利地区修建防御工事的记载，足以体现当时人们对这一工程的惊叹程度（尤其体现了它对理查敌人的震慑）。参见WB, 208–9; *Phi*

lippidos, v, 48–85。相关的英文材料参见Powicke, 190–5; Norgate, *England under the Angevin Kings*, ii, 375–80, 411–23。多米尼克·皮特在1991年时开始组织对盖亚尔城堡遗迹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仍在进行中的浩大工程将有助于我们对这座城堡产生新的认识，参见D. Pitte, *Château-Gaillard* (Vernon, France, 1996); 以及他的报告，见*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xxiii (1993)。

7 “盖亚尔”在法语中有“厚颜无耻”的含义。WB, 209.

8 *Chron.*, iv, 16.

9 *Ibid.*, 17–19. 纽堡的威廉对理查持同情态度，认为鲁昂教区得到了足够慷慨的补偿。参见Newburgh, Bk 5, ch. 28, 34。

10 Newburgh, Bk 5, ch. 34. 这也是纽堡的威廉所著编年史的最后一章，他或许在此不久后便逝世了。总之，并无迹象表明威廉知道理查将于1199年4月逝世一事。迪切托的拉尔夫则只记录了1198年5月8日天降血雨一事。Diceto, ii, 162.

11 盖亚尔城堡于1204年陷落，这既归咎于约翰未能及时派出支援，也由于约翰在后来扩建城堡时留下的一处致命缺陷：一扇窗户被一位善于攀缘的法军扈从利用，从而成为法军的突破口。WB, 219.

12 Gerald, *Princ.*, 290.

13 *Chron.*, iv, 18–19. 关于迪耶普的名声，参见Newburgh, Bk 5, ch. 34。

14 理查在两年多时间内花费了48878安茹里弗尔。*MRSN*, ii, 309–10, repr. in Powicke, 204–6.

15 *MRSN*, ii, 386（约合5000里弗尔）。

16 R. A. Brown, ‘Royal Castle-Building in England 1154–1216’, *EHR*, lxx (1955), 353–98; *idem*, *English Castles* (London, 1954), 160–1.

17 这也是英国人为理查夺取鲁昂教会行为辩护的理由，即这是保卫诺曼底免受法国入侵的必要手段。Newburgh, Bk 5, ch. 34; *Chron.*, iv, 18.

18 从理查为修建这一防御体系耗费的金钱，以及腓力为摧毁这一体系所耗费的时间来看，以盖亚尔城堡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在双方的战争中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

19 布列塔尼的威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可以从他对茹瓦港堡垒和布塔旺的评价中体现出来。对茹瓦港评价是“他将以此为基础收复失地”，对布塔旺的评价则是“这座城堡名称的含义即是‘我将从此向前推进，收复失地’”。WB, 208–9. 沃尔特大主教在写给拉尔夫的信中，也谈及了安得利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认为“安得利应当被占领并作为防御重地”。Diceto, ii, 154. 罗杰则认为，理查在1198年修建了布塔旺城堡，

而腓力为了防御，在同年修筑了勒古莱城堡。*Chron.*, iv, 78.

20 *MSRN*, ii, 307.

21 *Philippidos*, vii, 173–4. 实际上，当时理查建造的这种“快船”应与维京式的战船较为相似，而非地中海式的桨帆船。关于船只类型的研究参见N. A. M. Roger, *The Safe guard of the Sea* (London, 1997), 64–7。遗憾的是，如今的学者们仍然把它当作理查在十字军期间所使用的地中海式桨帆船。

22 有证据表明，此前安得利地区就已设置港口，1131年的一封教宗书信中便被送到“一座据说名为安得利的港口城镇”（*oppidum quod dicitur Andeleium... cum portu*）。*MRSN*, i, xli. 这个池塘可能是这个港口新建的一部分。

23 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拙作‘Richard I, Galley-Warfare and Portsmouth’。

24 *Recueil des actes*, ii, no. 485. 1195年2月时雷蒙德六世获得了菲亚克（Figeac）的控制权。关于《卢维埃和约》的11至13款参见*ibid.*, ii, no.517.

25 一份1196年3月的文件记录了纳瓦拉的桑乔与塔尔塔斯（Tartas）子爵阿诺德-雷蒙德（Arnold-Raymond）缔结的条约，这份条约已将理查当作纳瓦拉王国的潜在敌人。参见*Documents des archives de la Chambre des Comptes de Navarre 1196–1384*, ed. J-A. Brutails (Paris, 1890), 1–3。这或许能够反映贝伦加丽娅当时的尴尬境地。另外，教宗英诺森三世在1198年5月写给理查的信中许诺，他将会劝说纳瓦拉的桑乔将圣让皮耶德波尔（St-Jean-Pied-de-Port）城堡与“棕色城堡”（*rocca bruna*）归还给理查，这两座城堡是桑乔的父亲赐予贝伦加丽娅的嫁妆。*Selected Letters*, 5. 此时，理查与贝伦加丽娅之间没有孩子的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他们既没有生育继承人，通过婚姻所维系的安茹-纳瓦拉同盟也已不复存在，这种婚姻必然岌岌可危。

26 *Chron.*, iv, 13, 124–5. 罗杰在此还记载了1200年雷蒙德六世向约翰效忠时答应的条件。

27 Newburgh, Bk 5, ch. 30. 详细内容参见Benjamin, ‘A Forty Years War’。

28 “外交革命”一词出自G. G. Dept, *Les Influences anglaise et française dans le comté d e Flandres* (Ghent, 1928), 24–32。

29 这场经济战的相关内容参见Lloyd, *The English Wool Trade*, 8–9; PR 10 Richard I, x iv–xv。

30 Diceto, ii, 152; *Chron.*, iv, 19; Newburgh, Bk 5, ch. 31. 在这些事件的简要报告中，均未提及从水上对圣瓦莱里港的攻势，但我认为这是一次海陆联合行动。

31 *HGM*, 11105–264.

32 Newburgh, Bk 5, ch. 31; Gervase, i, 544; Annals of Winchester in *Annales Monastici*, i

i, 65. 迪切托的拉尔夫和威廉·马歇尔都将这一功绩归于梅卡迪耶。Diceto, ii, 152, *HGM*, 11265–9. 只有豪登的罗杰曾提及约翰与梅卡迪耶一同进军一事，但他的这段记录是在约翰继位后才写下的。无论如何，这段后添的记录也解释了为何罗杰将此事发生的时间记录为1196年，与其他所有英格兰编年史家的记录都不同。*Chron.*, iv, 16. 圣德尼的里戈则将时间记为1198年秋季，这当然也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以便将这场败仗与当时腓力允许犹太人进入巴黎的政策联系起来，并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天主的惩罚。Rigord, 141–3.

33 *HGM*, 11265–310. 据纽堡的威廉记载，博韦主教腓力到访德意志之后，当时还被囚禁在德意志的理查的生活状况有所恶化。Newburgh, Bk 5, ch. 31. 迪切托的拉尔夫则将改善腓力主教生活环境的功劳归于休伯特·沃尔特。Diceto, ii, 158.

34 *HGM*, 11297–300. 所谓“教宗谴责好战主教”的信件其实是伪造的。*Chron.*, iv, 21–4. 数年后，博韦主教腓力还在布汶战役中表现活跃，他亲临战阵，用手中的钉头锤击杀了数名敌军——布列塔尼的威廉宣称，当时博韦主教只是“偶然”带着这件防身用的武器，出于自卫目的而进行还击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Philippidos*, xi, 538–58. 另外，布列塔尼的威廉还在里戈记载的基础上补充了博韦主教被俘的细节，他当时骑马出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WB, 202.

35 *Chron.*, iv, 20. 当居的指挥官威廉·克里斯潘（William Crispin）向理查投降。关于克里斯潘家族，参见Green, ‘Lords of the Norman Vexin’, 54–6.

36 WB, 202. 但此事更有可能发生于1198年而非1197年。

37 在腓力摧毁欧马勒城堡不久后，最晚至1197年初夏（参见Powicke, 110），理查与（或）贝蒂纳的鲍德温就恢复了对欧马勒的控制。

38 Newburgh, Bk 5, ch. 32; Coggeshall, 77.

39 *Chron.*, iv, 20; PR 9 Richard I, 62, 164, 另见Poole, ‘Richard the First’s Alliances’, 96–7.

40 鲍德温伯爵的叔叔埃诺的威廉（William of Hainault）便获得了160里弗尔，以赔偿他在图克河畔博纳维尔（Bonneville-sur-Touques）的农场的损失。MRSN, ii, 369.

41 协议相关内容参见Diceto, ii, 152–3; *Foedera*, i, 67–8; Landon, 118–19. 豪登的罗杰并未记载此事。佛兰德斯伯爵在德林库尔还有一笔100里弗尔的支出，参见MRSN, ii, 307.

42 据罗杰记载，由于受到理查赠礼的影响，香槟、佛兰德斯和布列塔尼的人加入了理查一方。*Chron.*, iv, 19–20. 关于默朗伯爵罗伯特的两难境地，参见*Philippidos*, iii, 77–89. 当腓力征服诺曼底全境后，默朗伯爵也失去了他的所有土地。

43 Rigord, 137–8.

44 Landen, 119.

45 *Chron.*, iv, 20. 腓力支付500马克赎回了守卫当居的法军骑士和武装军士。

46 战役详情参见Coggeshall, 77–9; Newburgh, Bk 5, ch. 32; *Sig. Cont.*, 434; *Chron.*, iv, 20–1。卡佩编年史家们均未记载此事。

47 *Chron.*, iv, 24; Newburgh, Bk 5, ch. 32.

48 *Chron.*, iv, 20; Coggeshall, 77; Newburgh, Bk 5, ch. 32.

49 据里戈记载，理查在1196年时靠背信弃义夺取了维耶尔宗。Rigord, 135. 但理查攻克维耶尔宗城堡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据威廉·马歇尔回忆（它的时间记录是模糊的），理查攻克维耶尔宗后，便派他前往佛兰德斯，*HGM*, 10679–87。维耶尔宗编年史（参见第十六章注释61）则宣称，城堡于1197年被摧毁。三位英格兰编年史家也确信理查在贝里地区的作战取得成功（罗杰则认为理查当时在奥弗涅地区作战），与此同时鲍德温伯爵也挫败了腓力。

50 据罗杰记载，亨利六世临终前承诺将把一部分赎金归还给理查，而教宗塞莱斯廷则下令，亨利六世应将这赎金尽数归还理查，否则将禁止他举行葬礼。*Chron.*, i v, 30–1. 理查显然接受了这一命令。然而当新教宗英诺森三世于1198年5月继位后，却允许亨利六世的遗体下葬。英诺森三世还告诉亨利六世的弟弟士瓦本的腓力，这部分赎金不需强制归还。*Selected Letters*, 4–5; Csendes, *Heinrich VI*, 193.

51 *Chron.*, iv, 37–9. 普瓦图的腓力肯定是豪登的罗杰在此事上的信息源。

52 Gervase, i, 545, Coggeshall, 88; *Histoire des duc de Normandie*, 90.

53 *Chron.*, iv, 38. 关于选举时政治局势的分析，参见Ahlers, *Die Welfen*, 180–4; B. U. Hucker, *Kaiser Otto IV* (Hannover, 1990), 22–35; Natalie Fryde, ‘King John and the Empire’, in *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s*, ed. S. Church (Woodbridge, 1999).

54 关于奥托早年的情况，参见Ahlers, *Die Welfen*, 169–78; Hucker, *Kaiser Otto*, 4–15. 不久后，法王腓力曾向英诺森三世控诉：奥托在担任普瓦图伯爵期间侵害了他的利益。

55 参见A. V. Murray, ‘Richard the Lionheart, Otto of Brunswick and the Earldom of York: Northern England and the Angevin Succession, 1109–91’, *Medieval Yorkshire*, xxiii (1994), 5–12. 不过，正如朗顿指出的，约翰曾于1197年8月签署的一份文件表明，当时他已成为理查的继承人。Landon, 121–2. 1199年后，奥托（和他的兄弟们）或许也曾干预英格兰的继承事务，直到约翰的儿子于1207年降生为止。参见Hucker, *Kaiser Otto*, 17–19.

56 关于理查帮助奥托当选的花费，参见Caesarius of Heisterbach, *Dialogus Miraculor*

um, ed. J. Strange (2 vols, Cologne, 1851), i, 102f. 较为夸张的记录则来自吕贝克的阿诺德，参见*Chronica*, 50。

57 *Chron.*, iv, 39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认为鲍德温伯爵为博得理查的欢心而支持奥托。Gervase, 545. 鲍德温在1197年秋季时前往坎特伯雷。 *Chron.*, iv, 24.

58 Rigord, 143.

59 关于理查在教廷对奥托的支持，参见Ahlers, *Die Welfen*, 190–6。

60 Ibid., 192; Rigord, 138. 腓力废弃与英格堡的婚姻一事也招致了英诺森三世的不满。

61 “哦，正是这位伟大的君王，帮助他的侄子赢得了一个主宰世界的帝国。”*Annales de Jumièges*, 77. 这位编年史家在行文中始终是对理查真心赞美的，所以这句并非讽刺。

62 Coggeshall, 136.

63 *Recueil des actes*, no. 580. 这一记载还表明雷诺与圣波勒伯爵的密切关系。

64 *Philippidos*, iii, 90–5. WB, 202, 205. 里戈将他称为“富有煽动力的恶棍”（*instigante diabolo*），Rigord, 138. 布列塔尼的威廉宣称，雷诺并未从理查处获得新的领地，这不是他转投理查的理由。事实上，雷诺的妻子继承了在诺曼底和英格兰的地产，并获得了王室文书的确认（Landon, 526, 526a）。而1197年至1198年的财政署卷宗记载也表明，雷诺在英格兰继承的地产得以恢复。

65 *HGM*, 10688–740.

66 *Chron.*, iv, 54. 据罗杰记载，布列塔尼公国和香槟伯国于1197年加入理查一方。 *Chron.*, iv, 19–20.

67 WB, 202–3. 1198年9月1日，香槟伯爵蒂博和布洛瓦伯爵路易仍公开声称，他们并未加入与腓力敌对的阵营。不过他们此举意显示，有人怀疑他们的立场。Landon, 133.

68 这是根据一份标记为1199年4月的文献记载，但是基于研究，我们认为这里指的应该是1198年4月。相关研究参见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75–6。

69 Anonymous of Béthune, ‘li rois Richars estoit trop riches de terre et d’avoir, asés plus que il rois de France n’estoit’, *RHF* xxiv, pt 2, 758. 豪登的罗杰认为，“他慷慨大方的品质居于所有美德之上”。*Chron.*, iv, 19–20. Caesarius of Heisterbach, *Dialogus*, i, 102; *Philippidos*, iv, 590–7; Lambert of Ardres, *Chronique de Guines et d’Ardres*, ed. M. de Godefroy Meniglaize (Paris, 1855), 371.

70 上述内容来自接近事件的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的记载。*Sig. Cont.*, 435.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还记载了圣奥梅尔城投降的具体日期，并提及布洛涅伯爵也出现在围城的军队中（安德烈亚斯只是将围城的军队简单地称为“一支大军”）这一细节。*Gervase*, i, 573. 在圣奥梅尔围城战的后期，由威廉·马歇尔和他的侄子约翰，以及彼得·德·普雷奥（Peter des Préaux）和阿尔·巴塞（Alan Basset）四位统帅率领的军队可能也参与了围攻。不过他们均没有见过1198年9月18日至11月间的王室文书。而在截至圣米迦勒节的1198年财年结束后不久，威廉·马歇尔和彼得·德·普雷奥作为理查的代表，带着1730马克前往佛兰德斯。*PR 10 Richard I*, 172. 尽管学界一般将《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中威廉·马歇尔在佛兰德斯的战斗记为1197年，但比起1197年的类似事件，这段描写实际上与圣奥梅尔围城战的胜利以及理查攻占库尔瑟莱并击退腓力等一系列事件更为相似。或许正是由于威廉·马歇尔巧施妙计，腓力才会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打得落荒而逃。*HGM*, 10783–840. 事实上，考虑到腓力对维克桑地区十分在乎，他当时不大可能向圣奥梅尔派出大量的援军。

71 只有豪登的罗杰对这一事件做了记录，但罗杰在记录时似乎描述了两次类似的事件，并给出了法军在这两场战斗中的损失。此处记录的战斗应发生在著名的吉索尔追击战之前不久。*Chron.*, iv, 55, 59.

72 《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中的记载表明，理查当时参加了巡逻行动。记载还强调，理查拒绝了梅卡迪耶的建议，而是跟随一位熟知这一区域情况的骑士一起行动。*HGM*, 10933–56, 10967–71.

73 *Chron.*, 58–9. 这是被交给达勒姆主教腓力的副本。而豪登的罗杰应是从达勒姆主教处获得了信的副本，信中还记载了俘虏的名单。信件译文参考了Holt, ‘Ricardus Rex’, 31. 正如霍尔特所言：“理查这位‘戎马诗人’似乎用这样的文字彻底打破了书信体裁的束缚。”

74 不久后，腓力宣称自己派出援军防止“新的城堡”（Novum Burgum）被约翰焚毁时遭遇袭击，又损失了17名骑士和许多武装军士。参见*Chron.*, iv, 60. 但从1198年9月的战况来看，约翰并无焚毁勒讷堡的必要。我认为罗杰在此指的是埃普特河畔讷沙托堡（Neufchâteau-sur-Epte）。

75 *Chron.*, iv, 54, 60. 布列塔尼的威廉认为，先对俘虏施以酷刑的人是理查。*Philippidos*, v, 309–27.

76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124.

77 *HGM*, 10907–1067.

78 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理查将这封信的复制品送给了他在英格兰的所有教俗友人。*Chron.*, Maj., ii, 449. 除了豪登的罗杰的记载，我们还能看到这封信流传的证据：*Magna Vita*, ii, 109（林肯主教休收到的副本）；*Diceto*, ii, 164; *Gervase*, i, 574（大概

是)；Annals of Winchester, *Ann. Mon.*, ii, 70; Annals of Margam, *Ann. Mon.*, i, 23。

79 *Sig., Cont.*, 435.

80 90人的说法出自WB, 202; 92人的说法则出自*Philippidos*, v, 428, 437。

81 在1186年理查与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二世缔结和约时，双方承诺：若一方与图卢兹伯爵交战，另一方则应提供200名骑士的援军。见上文114页。

82 *HGM*, 11022–30. 此处记载被俘的法军骑士为91人。文多弗的罗杰认为，这些法军精锐之所以被俘，是由于殿后的法军部队要努力确保腓力能够成功逃脱。*Chron., Maj.*, ii, 448.

83 Rigord, 141–2; WB, 201–2; *Philippidos*, v, 355–440.

84 Rigord, 141; WB, 202; *Philippidos*, 440–89. 布列塔尼的威廉认为，理查在吉索尔城堡取得的胜利是他这时期军事成就的顶点，这一胜利也令理查变得自负而狂妄，忘记了一切恩典均来自天主的事实，他最终也因过于自负而死。但无论理查的真实想法如何（威廉的评价或许属实），他在信中提及这次胜利时写道：“在吉索尔击败法王绝非一人之功，这次胜利应是天主助朕伸张正义的结果。”

85 *Chron.*, iv, 60, 78.

86 当然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罗杰的记载是准确的。卡佩法国未留下任何记载。

87 *Chron.*, iv, 61.

88 *Ibid.*, 68.

89 *Ibid.*, 79–80.

90 *HGM*, 11311–57; Rigord, 143–4.

91 据罗杰记载，英诺森三世在1198年8月13日的信件中宣布，将派出枢机主教彼得促使理查和腓力保持长久和平，或达成为期五年的停战协议。*Chron.*, iv, 70–5.

92 威廉·马歇尔确实对他怀有偏见。因为一年后，卡普阿的彼得就执掌议会，并对法兰西王国颁布了教廷禁令。

93 *HGM*, 11373–688. 我在此处使用的译文来自Jessie Crosland, *William the Marshal* (London, 1962), 78–81。

94 *HGM*, 11727–44.

95 见上文403——405页。

96 关于君主的愤怒姿态在11和12世纪的政治意义，参见White, ‘The Politics of Anger

’。

97 Rigord, 144.

第十八章

霸业未竟，抱憾身死

理查在1199年意外身亡，无疑是震惊全欧的重大事件。安德尔（Andres）修道院院长威廉不禁感叹道：“当整个世界都向英王理查或表示恐惧，或对他进行赞颂之际，他却突然离开人世。”¹当时最著名的拉丁诗歌写作参考书《新诗学》（*Poetria Nova*）的作者文绍夫的杰弗里也写了一首著名的挽歌哀悼理查，而这首篇幅较长的挽歌也被收录在《新诗学》当中。这首挽歌显示了理查的死有多突然。²

死神啊！你知道从我们身边夺去了什么样人物吗？他是映入眼中的明光，是入耳即醉的乐曲，更是我们心中铭刻人心的奇迹。不敬的死神啊，你知道从我们身边夺去了什么样人物吗？他的勇武冠绝世人，他的荣光远胜诸王，尘世因他倍感欢欣鼓舞。他是大自然的完美造物，多一份嫌多，减一分嫌少。哦，万恶的死神，你定是因嫉恨如此完人而夺其性命！若天堂容许的话，我亦当怒斥天主——哦，万能的天主，为何您未能令他化险为夷？他曾为保卫雅法，独自击退了数以千计的异教徒，并为您夺回阿克。所有与您的神圣十字为敌者亲眼见证，所有活着的人仍旧因恐惧而害怕他，哪怕他已经死了。哦，万能

的天主，我在此斗胆进言——请您怜悯我们，您本可用更仁慈的手段，不那么匆忙地带走他，只需您稍缓片刻，他就能击败仇敌——毕竟他已胜利在望。他本能为您留下更多宝贵财富。哦，万能的天主，您竟如此冷酷地告诉我们——尘世欢乐多短暂，逝者使人长挥泪。³

立场不同的布列塔尼的威廉则认为，理查于1199年的突然离世则象征着天主成功地拯救了法兰西。⁴但1199年初时双方的战况也与过去四年的情况没什么不同。虽然为了表示对教宗英诺森三世策划的十字军事业的支持，理查和腓力曾约定休战五年，但种种迹象表明，双方之间的休战甚至都无法持续五个月。约定休战后不久，理查就指责腓力率先破坏了停战协议。他派梅卡迪耶率军南下，帮助他的宫廷总管镇压利摩日子爵和昂古莱姆伯爵的联合叛乱，但梅卡迪耶在进军途中却遭到四位法兰西的伯爵的袭击。腓力宣称自己并不知情，这也很有可能是真的——考虑到当时人们对雇佣兵的厌恶，这有可能是几位伯爵的自发行为。但当理查亲自率军南下时，腓力又趁机在塞纳河流域的加永和布塔旺交界处修建一座新城堡。不过腓力修建城堡的举动遭到了理查的御前大臣、伊利主教尤斯塔斯的警告，尤斯塔斯表示：腓力应将城堡摧毁，否则他将中止停战，宣布双方全面恢复战争状态。随后教廷特使也出面要求腓力停止施工，最终腓力只得做出让步，拆除了城堡。⁵但此时双方之间已经毫无信任可言，并不时相互指责，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于是，教廷为促成双方的和解又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在允许腓力继续控制吉索尔城堡的前提下，通过其他方面的让步使理查同意议和。长期以来，法王对图尔教会的控制始终令安茹诸王极为不满。若腓力愿意让出对图尔教会的控制权，或许可以让失去吉索尔城堡的理查稍感宽慰。基于这一思路，教廷特使又提出了一份新的和平方案：腓力之子路易将与理查的外甥女、卡斯提尔国王之女订婚，理查则将吉索尔城堡和2万马克作为外甥女的嫁妆交给路易；相应地，腓力则应放弃对图尔

教会的控制权，停止与士瓦本的腓力结盟，并支持理查的外甥布伦瑞克的奥托巩固在德意志的统治。⁶但我们并不清楚理查本人是否批准了这些条款，因为理查当时还在曼恩和安茹地区活动，无暇顾及此事，便让他的官员们处理此事。此时，被豪登的罗杰称为“不和之剑”的腓力则故技重演，试图离间理查和约翰。腓力首先告诉理查，他的弟弟约翰此前已承诺成为他的盟友，并向理查出示了据说是约翰签署的文书。据罗杰记载，令人震惊的是，理查得知此事后信以为真，于是他再次下令没收约翰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领地。然而约翰得知此事后立刻派出两位骑士前往法王宫廷与腓力当面对质，但法王宫廷无人敢于回应。理查意识到中计后也很快改变主意，恢复了约翰的地产，并表示将不再轻易听信腓力的话语。⁷

1199年3月15日后不久，理查便离开希农城堡，前往阿基坦与梅卡迪耶会合。由于腓力的盟友昂古莱姆伯爵和利摩日子爵都不受停战协议的保护，因此理查有权进攻他们。1176年以来，理查便反复与这两位仇敌交战，他们对阿基坦公爵的强烈敌意也成为威胁理查统治的一大政治问题。3月末时，理查已经率军包围了属于利摩日子爵的沙吕-沙布洛尔（Chalus-Chabrol）城堡，这座城堡位于利摩日南部不远的地方。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对这次战斗的记载如下：

当理查国王与法王腓力议和后，便趁此机会在大斋期时率军进攻利摩日子爵。这位子爵曾在他与腓力作战时起兵反叛，并成了腓力的盟友。另外，据称，人们在利摩日子爵领地内发现了一批价值不菲的财宝，于是理查国王要求子爵将财宝上交，但子爵拒绝了国王的要求，这令他更为愤怒。尽管在大斋期内禁止动武，但国王不管不顾，率军在子爵的领地上大肆烧杀，最终，国王兵临沙吕-沙布洛尔城下……⁸

拉尔夫关于沙吕-沙布洛尔围城战的详细记录，很可能是由理查的一位赈济专员、西多会修士米洛（Milo）向他讲述的。米洛当时是距普瓦捷不远的勒潘（Le Pin）修道院的院长。据拉尔夫记载，米洛曾倾听了理查的临终忏悔，为他施涂油礼，并在国王逝世后为他闭上了口和双眼。⁹当理查抵达沙吕-沙布洛尔后，他连续三天发起猛攻，他部下的弩手完全压制了守军，迫使他们只得龟缩在城墙后方，无法还击。与此同时，理查的工兵们也在努力摧毁城墙。虽然守军不时从城头上抛下礮石打击攻城部队，但有着特殊保护的工兵们却不受影响，依然继续行动。由于城墙随时可能大片坍塌，城中的40名守军已打算向理查投降。

1199年3月26日晚饭后，尽管当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暗，理查还是打算独自一人离开营帐查看围城战况，并打算锻炼自己使用弩弓的技巧（他经常会如此锻炼）。由于此时理查并不是去冲锋陷阵，于是他没穿甲冑，只戴着一顶铁盔，并带着一面用于护身的方盾便走出营地。当晚，只有一名以煎锅护身的守军士兵有勇气在城墙上露面，并不时向城外射击。他的行为可以说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对英军做出的最大挑衅，但他零星的射击只能让理查手下的职业军人感到小小的烦躁。理查注意到了城墙上这位孤独的士兵，于是不禁鼓起掌来，对这位士兵的勇气表示赞许，对方却精准地向他射出了一箭。理查来不及用盾牌护住自己的身体，一发弩箭正中他的左肩。被箭射中后，理查不希望惊动自己的士兵，亦不愿此事传入敌军耳中令他们士气振奋，于是他安静地返回帐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当理查回到帐内，他便试图自行将弩箭拔出，但他在拔箭时只弄断了箭柄，一掌长的铁箭头仍然深深地陷在他的体内。一名军医迅速赶来。在微弱的火光下，军医彻底将箭头拔出，但在拔出箭头时他又不慎加剧了理查肩部的伤势。虽然军医最终用绷带包扎了遭到手术刀进一步破坏的弩箭伤口，但理查的伤口开始腐烂，受感染的部分不断扩大。在战场上目睹众多死者的理查此时深知自己大限将至。于是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埃莉诺，心急如焚的埃莉诺立刻赶来。在埃莉诺抵达前，理查为防止伤情泄露留在帐中静养，只允许四位最信

任的助手出入他的营帐。¹⁰不久后，沙吕城堡被攻陷的消息传来，但理查已经无法庆祝这一胜利了。理查宽恕了那位将他射伤的士兵，并做了临终忏悔，接受了涂油礼。1199年4月6日夜，理查于沙吕逝世，时年42岁。¹¹

据罗杰记载，理查的遗体按照他生前的嘱咐被分为三份埋葬。他的大脑和内脏被安葬在位于普瓦图和利穆赞交界处的沙鲁（Charroux）修道院中，这所修道院宣称自己的建立者正是查理曼。他的心脏则被送往鲁昂，被葬在他的兄长“幼王”亨利旁边。据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理查的心脏极为硕大；还有人说，他的心脏甚至比一颗石榴还大一些。

¹²据温切斯特编年史家的记载，理查遗体的其他部分则与他曾在温切斯特加冕时所用的王袍和王冠，在圣枝主日（4月11日）被一同葬在丰特夫罗，埋在他的父亲亨利二世脚下。¹³理查棺材的雕像头戴王冠，手持权杖，身着盛装，他的佩剑也放在一旁。¹⁴

当理查的遗体被送往北方时，关于理查死因的诸多解释也纷纷出现。人们的核心观点在于“理查试图将发现的财宝据为己有”。从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对理查前往利穆赞的动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听说了埋在地下的财宝，但他还花费功夫证明了这只是一个与打击腓力在利穆赞同盟的战事不相关的故事，在记录时还加上了“有人宣称”的前缀。¹⁵实际上，这批财宝可能根本不存在。¹⁶最了解理查出征一事的贝尔纳·伊捷（Bernard Itier）留下的记载中，也并未提及理查夺取财宝一事。1199年，三十余岁的贝尔纳是利摩日知名的本笃会圣马夏尔修道院的一位修士，不久后他成了修道院的图书馆管理员。尽管利摩日子爵与圣马夏尔修道院时常关系紧张，但他们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利摩日子爵的城堡紧挨着修道院，而修道院也是历任子爵逝世后的安息之所。贝尔纳留下的大部分历史记载，均以短边注或备忘录的形式收录于圣马夏尔修道院的馆藏文献中。贝尔纳在他的记录中通常会加上“贝尔纳·伊捷所记”的字样。他关于理查之死的记载出现在修道院的藏书之一、维茹瓦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geois）所著的编年史抄本之中。

此事由贝尔纳·伊捷于施洗约翰节前的星期五所记。这年，被称为“狮心王”的理查国王逝世，并与他的父亲一同埋葬在丰特夫罗修道院。许多人为此欢庆，其余人则悲伤不已。他的死因有如下述。我主1199年，最强大的英王理查在围攻利穆赞地区的沙吕-沙布洛尔城堡时，被一发弩箭射伤肩部。那座城堡中的男男女女共有40人，其中只有2名骑士，他们分别是彼得·布鲁（Peter Bru）和彼得·巴西尔（Peter Basil）。据说正是后者射伤了理查。理查于伤后第十二天，也就是圣枝主日前的周二（4月6日）入夜时逝世。在理查养伤期间，他还下令军队围攻属于艾玛尔子爵的农特龙（Nontron）城堡和另一个叫蒙塔居（Montagut）的城堡，随后理查的军队也将它们成功占领，但当他们得知国王逝世的消息后，便在一片混乱中撤军了。理查本打算将子爵统治的所有城堡和市镇统统摧毁。¹⁷

可以看到，贝尔纳的记录中不仅未提及发现财宝一事，还指出如下事实：理查并非仅仅围攻了一座小城堡。事实上，当时理查对子爵的三座城堡同时发起了围攻，利摩日居民们也认为理查打算征服利摩日全境。¹⁸因此，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的“国王在子爵的领地上大肆烧杀”一事似乎符合实情。但偶然之下，贝尔纳的这段记载却由于转抄时的一处微不足道的笔误而被几乎所有的现代史家们所忽略。虽然圣马夏尔修道院所藏的维茹瓦的杰弗里著作副本已经遗失，但在17世纪，一位不甚专业的抄写员抄录下来。但此人看错了这段边注的开头，错误地将“贝尔纳·伊捷所记”（*scripsit B. Iterii*）抄成了“受祝福者所记”（*scripsit Beati*）。¹⁹这句话毫无意义。因此，17世纪的法国文物收藏家拉贝神父（Père Labbe）在印刷杰弗里所著的编年史时，便决定将开头意味不明的这一句话删去。在拉贝的印刷本上，这条边注的开头便是“公元1199年”一句。²⁰受此影响，人们仅把这段记录视为一段出处不明的匿名作品，因

此并未过多关注。若史学家们能够更早地认识到这份记录出自贝尔纳·伊捷之手，那么关于理查寻找财宝的不实之论便早就烟消云散了，人们会将理查出征的主要原因视为平定叛乱。²¹ 毕竟，这场叛乱是因法王腓力煽动而起的，利摩日子爵的叛乱实在过于频繁，前者曾在1176年至1179年、1182年至1183年、1192年和1194年时四次发起叛乱，如今他又在1198——1199年间发起了第五次，理查有充分的理由重视这次叛乱。实际上，利摩日是安茹帝国理查最为致命的弱点，腓力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总之，由于上述误解，人们便倾向于将寻宝视为导致理查中箭身亡的主要原因，而非为镇压叛乱出征。这些故事的作者们或许认为：对理查这样一位疏于政事而又热爱冒险、极为好战的国王而言，为寻宝而中箭身亡与他的性格极为相符。这位富有权势的英格兰国王、当时最伟大的十字军统帅竟然会在处理阿基坦地区的一起小争端时死于非命。傲慢、贪婪而短视的性格导致理查在寻宝这一不足道的小事中死亡。正如布伦戴奇所言：“理查总是寻找一切能使自己立刻获利的机会，因此他在攻克塞浦路斯后，便为了获取金钱将其转卖他人。而他也正因为追求这类蝇头小利而使自己丧命。”²² 莫里斯·波威克爵士的著作《诺曼底的陷落》（*Loss of Normandy*）时至今日仍是英国失地方面的主流著作。波威克爵士认为：“理查竟然由于利欲熏心而丧命，这实在令人伤心。但理查始终为维护他的王权而战，他的死亡也是他战争生涯的象征。他之前一直满怀着对收复圣墓大教堂的热情。只是这一次，他的热情来自毫无用处的古代遗物。”²³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理查终其一生都为贯彻骑士精神而战，他是一位英勇的军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他被奉为传奇英雄，但更是一位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疏于职守的国王。理查因寻宝而死的“传奇故事”更符合公众心中的形象，也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无论真假，理查因寻宝而死的传说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已流传甚广。这个故事印证了人们对理查的印象。据圣德尼的里戈记载，当理查要求

一位不知名的骑士将他从地里挖出的宝藏交给自己时，这位骑士拒绝了他的要求，并逃往他的封君利摩日子爵处避难。尽管教会严禁在大斋期内进行战争，但理查不顾一切地对沙吕-沙布洛尔城堡发起围攻，最终被一位不知名的弩手射杀。²⁴ 布列塔尼的威廉在他的叙事史诗《腓力国王传》（*Philippidos*）中不仅沿用了里戈的记载，还将这个故事大大扩充了一番。威廉用了五十行诗句对理查的傲慢形象进行了道德批判，他竟然对自己的封君法王腓力发起战争。以此为背景，威廉讲述了利摩日附近发生的奇妙事件：一位农民在耕种时从地里挖出了一批埋藏在地下的钱币，随后他将这些钱币全部交给了他的领主沙吕的阿沙尔（Achar d of Chalus）。理查很快听到了利摩日发现财宝的传言，于是他放下了一切事务，想要将其据为己有，并为此率军包围了沙吕城堡。在理查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前，阿沙尔请求理查在大斋期内暂时休战，并建议将双方的争执提交法王进行仲裁。然而阿沙尔的提议激怒了理查，于是理查对城堡发起猛攻，很快，沙吕城堡的城墙便已摇摇欲坠。叙述至此，威廉突然中断了对沙吕战况的介绍，转而为读者讲述了命运三女神的故事。根据传说，她们主宰着凡人的命运，决定着人的寿命长短。威廉借三女神之一的阿特洛波斯（Atropos，负责剪短生命之线的女神）之口，发表了一段长达三十行的演说，解释了理查即将死亡的原因：理查贪得无厌，对天主和圣日毫无敬畏之心，他还撕毁与自己封君签订的条约，甚至违背自然之理与自己的父亲兵戎相见。²⁵ 当阿特洛波斯说服她的姐姐们理查死期已至后，她便出手干预了沙吕围城战。阿特洛波斯出现在阿沙尔面前，帮他找到一发弩箭并让他交给一位名为杜度（Dudo）的弩手。“既然理查率先将弩弓带入法兰西，那就让他死于弩箭之下，体验那些曾被他用弩弓杀死的人们的痛苦吧。”²⁶ 显然，威廉的记载并非对真实历史的叙述，而是一段有着明显道德劝谕含义的历史故事。包括所有荒谬细节在内的情节都用来反映作者的政治诉求。比如，其中提及的“理查率先将弩弓带入法兰西”一事即是无稽之谈。

不过，我们也不应将理查寻宝的故事简单地视为法兰西王室为抹黑

理查所进行的不实宣传。《马格姆编年史》（Margam Annals）中关于理查死亡的主要记载就是利摩日地区发现财宝以及理查为夺取财宝在大斋期进攻子爵城堡。尽管《马格姆编年史》成文于13世纪30年代中期，但记载此事的马格姆修道院修士们可能仍记得威廉·德·布里乌兹（他逝世于1211年）的叙述。根据当时的文书证明，1199年4月5日，威廉·德·布里乌兹恰好身在沙吕城堡。²⁷ 尽管《马格姆编年史》的简短记载较为晚出且来源不明，但它仍然与豪登的罗杰的记载有相似之处，有一定参考价值。豪登的罗杰关于理查之死的主要消息源之一是索恩厄姆的罗伯特。罗伯特熟知内情，对理查之死的叙述也较为全面可信，因为在1199年，罗伯特管理着希农城堡，当理查逝世后，他也在处理善后事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²⁸ 据罗杰记载，当利摩日子爵维多马尔（Widormar）在自己领地内发现一批可观的金银财宝后，便主动将一部分财宝交给理查。但理查向子爵索要全部财宝，并率军前往沙吕-沙布洛尔城堡，试图以武力将其夺取。在理查的大军面前，守军打算献城投降，请求理查饶恕他们的性命，并允许他们保留武器，身体健全地离开。但理查拒绝了守军的提议，并宣称将在破城后绞死所有守军。然而，理查在当天的战斗中便被一位名叫贝特朗·德·古尔登（Bertrand de Gurdon）的弩手射伤，身受重伤的理查随即退出战场，返回营帐。当沙吕城堡最终被攻克后，理查绞死了除贝特朗·德·古尔登之外的所有守军士兵，并宣称，待他伤愈之后将残忍地把贝特朗折磨致死。当理查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便派人找来贝特朗，当面问他：“朕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你竟要置朕于死地？”贝特朗答道：“因为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和两位兄弟，还打算夺取我的性命。不过，此时得知你即将死去，我已心满意足。你要怎么惩罚我都悉听尊便，我亦乐于忍受你所施加的任何酷刑。”理查被这一回答打动，于是他宽恕并释放了贝特朗。²⁹

可以看到，罗杰的记载中并未提及理查在大斋期作战，或是利摩日封臣请求法王仲裁的内容。他的故事中也包含了道德说教的成分：一个残忍嗜杀成性的人在临终的病床上，通过仁慈之举赎了他的罪。坎特伯

雷的杰维斯对理查之死的记载中也有同样的说教。据杰维斯记载，理查拒绝了守军用投降换取生命的要求，而城内的弩手在向理查射击前还祈求天主“指引他命中目标”，以使无辜民众免遭理查压迫。他也说理查在临终前赦免了射伤他的弩手，还为他此前侵害坎特伯雷教会利益的举动表示忏悔，这一点尤其值得尊重。³⁰ 理查很可能真的希望沙吕守军无条件投降，并最终饶恕了射伤自己的弩手。从理查在1192年达鲁姆围城战和1194年诺丁汉围城战的情况来看，他经常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并在之后（也只会之后）宽恕他们。³¹ 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就在不久之前，英国学者仍旧按照传统，将罗杰视为一位“以冷静客观的中立态度”记载了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统治期间“重大事件真相”的编年史家。³² 因此，罗杰关于理查之死的叙述对后世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他的记载也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位国王统治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但罗杰并非一位绝对中立的“历史事件记录者”。

罗杰是一位宗教观念极强的编年史家，而他的宗教情怀也随着年龄增长而与日俱增。所以，和布列塔尼的威廉一样，罗杰的著作中同样不乏进行道德劝谕的实例。而他在记载理查之死时所体现的道德观念，与他之前评判理查生平事迹时所体现的道德观念并无差异。他最早记述了理查在参加父亲亨利二世葬礼时，当理查靠近父亲的遗体，遗体的鼻腔内突然喷出鲜血的故事。随后，罗杰又记载了理查在墨西拿的雷金纳德·德·莫雅克（Reginald de moyac）礼拜堂内诚心忏悔的情景——理查由于受到天主感召，在诸位大主教和主教们的注视下，赤裸身体匍匐于地，手握三束鞭子，为他犯下的罪行忏悔。“仁慈的圣父不希望罪人死去，而希望他们自我忏悔，改邪归正。愿这位忏悔的罪人迷途知返，切勿重蹈覆辙。”³³ 罗杰还记载道，1195年理查忍下了他对考文垂主教休、约克大主教杰弗里的愤怒与怨怼，宽恕了他的弟弟约翰，但他随后写道，由于理查忽视了不久前一位隐士让他改过自新的劝告（见上文364页），“天主带着铁棒向他显灵，令他重病缠身”，让他记住隐士的教诲，诚心悔改。“天主的作为是伟大而不可言说的，他的仁慈遍及一切造物

。当理查国王改邪归正后，天主将他看作儿子。须知，天主之手已经深入诸王心中，将他们的内心塑造为合乎本性的模样，他也向理查灌输正义之道，使他的生活与同伴日渐完满。天主之所以会使罪人历经磨难，并不在于让他们毁灭，而在于敦促他们悔改。”³⁴ 我们在阅读理解罗杰关于理查之死的记载时，必须注意到他反复提及理查罪恶的这一状况。在理查之死的故事里，若将沙吕-沙布洛尔城堡塑造为叛军，那理查的行为就显得不那么邪恶了。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理查出兵征讨敢于反抗国王的人是理所应当的，他也有权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他通过将理查最后的善行塑造为无情的寻宝之旅的后果，而非镇压叛乱中的牺牲，更加突出了自己的论点：无论一个人生前有着多么邪恶的本性，他在临终时仍然可以通过真心忏悔获得救赎。³⁵ 随后罗杰引用（也可能创作）了四五首讽刺短诗总结了理查的一生。罗杰引用的第一首四行诗中提及了理查贪婪、好色、盲目的欲望和无礼的傲慢四大罪恶，它们随着理查在统治十年后被弩箭射死而终结。在剩下的三四首共十八行诗中，罗杰则对理查之死深表哀悼，将理查称作“死于蚂蚁之手的狮子”。它们显示了罗杰仍对理查心怀敬畏。“再多的军队都无法与他的勇气匹敌，再多的艰险都无法令他止步不前；无尽怒海、深暗之渊或是巍峨高山都无法令他退却半步……”³⁶

在科吉舍尔的拉尔夫为理查之死所做的讣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内涵。理查逝世两年后（1201年），拉尔夫决定记述1195年后发生的历史事件。截至1195年时，拉尔夫关于理查的记载中满是赞美之词，他对理查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事迹更是赞不绝口。³⁷ 因此理查在归途中意外被囚禁一事令他极为困惑，他坦承自己并不知道天主让理查身陷囹圄的原因。³⁸ 不过，拉尔夫认为理查之死是天主注定之事，因此他在自己的编年史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解释为何理查应接受上帝的惩罚，在一处偏远的小城下被人射死，而不是在与异教徒的伟大战役中壮烈牺牲（就像一个武士国王应得的那样）。³⁹ 经过思考后，拉尔夫的结论是：理查当年提前结束十字军征程的决定过于草率，他也因此未能实现朝圣

的目标。拉尔夫指出，无尽的贪欲堪称理查的“万恶之首”（summit of all devil），最能体现理查贪欲的，则是他在财政方面的苛政：为满足财政需要，理查启用了新的王室印章，并要求国内所有的地产所有者再次缴纳一笔费用，以获得新的王室特许令。⁴⁰

据我所知，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出现过像理查这样善于敛财的国王。在理查重获自由，返回国内后的五年时间内，他从王国内部征收和积累的巨额财富，比此前任何一位国王的财富都更多，连那些统治时间比他更长的国王们在这方面也甘拜下风。当然，理查也利用这些财富获得了诸多功绩。在巨额财富的支持下，理查在与法兰西王国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帮助他的侄子赢得了德意志王位，此外他还成功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并使周边地区的诸侯们向他臣服。⁴¹

然而理查对这些功绩仍不满足，他为了积累财富而继续压榨封臣们，并坚决镇压敢于反抗自己的叛乱分子。天主为伸张正义将他及时击倒，以免他犯下更多恶行，并因此遭受更为严酷的惩罚。因此，理查在沙吕受了致命伤，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并接受了涂油礼。⁴² 作为一位西多会修士，拉尔夫不可避免地从神学角度进行解释，并将这一事件视为天主对其罪恶的惩处。理查过去所犯的罪就是他征敛了大量财富，用于正义的事业。但可以确定的是，理查未来还会进行更多（不那么正义的战争），这使天主仁慈地决定现在就彻底阻止他。

不过，拉尔夫对理查并不只有批评。他认为理查为其他所有世俗统治者树立了绝佳的榜样，他并没有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让圣职长期空缺以获利，而是迅速寻找合适的人填补空位。拉尔夫还提及了理查对教会音乐的热爱，以及他在倾听弥撒时的得体行为。⁴³ 最后，拉尔夫介绍了理查对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尊崇，对英格兰教会（尤其是西多

会)的慷慨捐献。这使拉尔夫充满希望地认为,考虑到理查对教会的功德及他临终时的忏悔和捐献行为,他的灵魂足以因此获得救赎。⁴⁴因此,西多会的观点非常类似于吟游诗人“无继承权的”高瑟姆(Gaucelm Faidit)在一首哀悼理查的著名挽歌《突闻噩耗》(*Fortz chausa es*)中表达的看法:“哦!永恒而慈悲的天主,请宽恕这位已逝的罪人吧!他迫切需要您的怜悯。请您想想他曾为增进您的荣耀所完成的事业吧,与之相比,他的罪恶实在微不足道。”⁴⁵总之,拉尔夫总体上对理查持赞赏态度,他认为上帝对理查“对金钱的无尽索取”的惩罚是理查突然离世的原因。⁴⁶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当拉尔夫对理查和约翰的统治事迹进行总结时,都使用了“*satis laboriose*”这一拉丁词组。此前学者们一般将其译为“不知疲倦地”或“充满活力地”(后一翻译有明褒实贬的意味)。然而,与拉尔夫同时代的另一位编年史家对理查的相同评价则鲜有人关注。这位匿名的瑞米耶日编年史家认为“理查国王‘*satis laboriose*’统治了十年”。从他对理查的其余评价来看,这位编年史家无疑是理查的崇拜者。正如普雷斯特维奇所说,对“*satis laboriose*”更恰当的翻译应是“历尽艰辛”,这一词组并非用于概括统治者本人的作为,而是用于概括他的政敌们带给他们的麻烦。⁴⁷由于萨拉丁、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和腓力·奥古斯都这几位劲敌的存在,极少有君主像理查一样,在其统治期间始终要面对极为艰难的外部挑战。用另一位吟游诗人吉罗·德·波尔内伊(Giraut de Borneil)的诗句说:“理查国王在应对诸多磨难(*mains assais*)时,展现出了无人能及的高贵品质(*plus pros*)和绝伦勇武(*plus valens*)。”⁴⁸最后,让我们以《旺多姆编年史》的一位匿名编者的话语来结束对理查之死的讨论吧:“唯有至高无上的天主能击败理查国王。”⁴⁹

注释

¹ *RHF*, 18572.

2 乔叟在《女尼的教士的故事》（*Nun's Priest's Tale*）一节中则对杰弗里进行了嘲讽：“啊，杰弗里呀，我的尊师，当你那高贵的理查王被人射死，你是何等善于致哀，我何以没有你那文才？”出自*Canterbury Tales*, trans. N. Coghill (Harmondsworth, 1951), 244。

3 译文出自*Poetria Nova of Geoffrey of Vinsauf*, trans. M. F. Nims (Toronto, 1967), 28–31。这首挽歌开头如下：“在理查国王的守护下，英格兰平安无虞，但此刻英格兰已失去了她的守护者。”其他版本则将“英格兰”写作“诺曼底”。豪登的罗杰在转抄时则将“英格兰”写作“纽斯特利亚”（*Neustria*）。这首诗被抄录进了*Vitellius E xvii*手抄本版*Gesta Regis*，参见*Gesta*, i, xxiv。

4 “公元1199年，理查国王在利摩日的一处小村庄里丧命，天主拯救了法兰西王国。”（*Anno incarnationis Dominice MCXCIX visitavit Deus regnum Francorum. Nam Ricardus rex occiditur in pago Lemovicensi.*）*WB*, 204。

5 *Chron.*, iv, 80. 1199年2月时，理查将他的行宫设置在曼恩的拉苏兹（*La Suze*）地区，负责为王室文书盖章的人则是御前大臣副手，而非尤斯塔斯。因此，当时尤斯塔斯应当离开了宫廷，将理查的警告传达给腓力。参见*Landon*, 142–3。

6 *Chron.*, iv, 80–1。

7 *Ibid.*, 81. 值得注意的是，罗杰的这段记载显然成文于约翰继位之后。关于理查统治后期重新对约翰失去信任的记载，参见*Magna Vita*, ii, 137; *Coggeshall*, 99。

8 *Coggeshall*, 94。

9 葬礼后的一份特许令的见证人名单表明，米洛参加了理查的遗体在丰特夫罗的葬礼。*Calendar of Documents preserved in France*, ed. J. H. Round (London, 1899), 389. 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理查来到距普瓦捷14英里的勒潘修道院（此地位于蒙特勒伊-博南的公爵城堡附近），发现这里已成了一片废墟，随后理查慷慨地赞助了修道院。关于理查发给勒潘的特许令，参见*Landon*, nos 107, 144, 433, 469。米洛在1190年至1226年间担任勒潘修道院院长。

10 根据一份拉尔夫最早手抄本页底的一条批注，理查在营帐中失去控制，拒绝接受医生的建议。*Coggeshall*, 96.这可能也意味着，理查在临终前还与女子行房的说法（无论它是真是假，参见*The Chronicle of Walter of Guiseborough*, ed. H. G. Rothwell, 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 lxxxix, 1957, 142）并非来自米洛。布列塔尼的威廉也声称，理查在临终前拒绝接受那些“有益健康的建议”，仍然沉迷于“纵欲享乐”（*joys of Venus*）。*Philippidos*, v, 604–5. 一部现代著作则声称理查“在几天内与沙吕附近的一些年轻女子行房”。M. Mitchell, *Berengaria* (Burwash Weald, 1986), 88。

11 上述记载来自*Coggeshall*, 94–6。但理查逝世时间的记载来自*Chron.*, iv, 84。他曾是文书署的成员，在这方面的记载应当是精确的。拉尔夫则将理查逝世的时间定为4

月7日。

12 Gervase, i, 593; *Annals of Winchester*, in *Annales Monastici*, i, 71. 当理查逝世后不久，刻有雕像的理查棺材和一座银质祭龕很快便被放在主祭坛旁边。19世纪的考古学家对棺材雕像和理查心脏再发现的研究（和素描）参见A. Way, *Archaeologia*, xxix (1842)。当我在鲁昂市博物馆见到理查的心脏（如果那真是理查的心脏的话）时，发现它就像上述资料所说的那样，“已和一片枯萎的黄叶无异”。

13 理查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位身着加冕袍服下葬的国王，不过他的父亲亨利二世可能也曾采取了这一做法。参见D. A. Carpenter, *The Reign of Henry III* (London, 1996), 436。若亨利二世确实身着加冕袍服入土，那么这应是理查的主意。据威廉·马歇尔说，理查当时曾指示“厚葬我的父王”。参见HGM, 9358–60。

14 关于这一创举的研究，参见J. Martindale, ‘The Sword on the Stone: Some Resonances of a Medieval Symbol of Power’, *ANS*, xv (1993), 219–30。另外，难以确定理查和他父母在棺材上的雕像的具体时期，只能将它们大致定为13世纪早期的产物。E. M. Hallam, ‘Royal Burial and the Cult of Kingship in France and England, 1060–1330’, *JMH*, vii i (1982)。此文引用了安德鲁·马丁戴尔的观点。我并不清楚人们是基于什么理由（除了后来的记载）认为一个是理查的雕像，另一个是亨利的雕像。

15 在拉尔夫关于沙吕-沙布洛尔围城战的长篇记载中，除了正文所提的部分，他仅在另一处使用了“有人宣称”这一说法。他说，“由于理查对法国国王怀有不死不休的仇恨”，他有七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圣餐礼。Coggeshall, 96。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表明，理查对参加弥撒极为热衷，而理查拒绝参加宗教活动的传言，可能与安茹家族出身于恶魔的传说有关。参见上文34和358页。

16 “发现埋藏财宝”的传说通常用于解释一些令人费解之事，参见K.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1971), 279–82。

17 这份材料在19世纪出版，参见F. Arbellot, *La Vérité sur la mort de Richard Coeur-de-Lion* (Paris, 1878) 61–4。但这份材料长期被人忽视。

18 贝尔纳在另一份手抄本的边注中，列出了14处曾在1199年被理查围攻的地点，其中包括沙吕-沙布洛尔、农特龙和蒙塔屈。*Chroniques de Saint-Martial*, 66。

19 关于本段和下一段的更为详尽的研究，参见Gillingham, *Coeur de Lion*, 155–80。

20 P. Labbe, *Novae Bibliothecae Manuscriptorum Librorum*, ii (Paris, 1657), 342。拉贝的原文重印本参见*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xviii (Paris, 1879), 239, n (a)。

21 即使确实存在这样一份财宝，它也并不重要。它并不是理查再次南下的原因。其他记载理查率军平叛而并未提及任何发现财宝的原始史料包括：HGM, 11573–5; M

agna Vita, ii, 130–1; *Chron. Maj.*, ii, 451–2。后两部文献有力地论证昂古莱姆伯爵为叛乱的主谋。

22 Brundage, *Richard Lionheart*, 254.

23 Powicke, 126.

24 圣德尼的里戈谈及寻宝传说时也用了“我曾听说”（*ut ferebatur*）这一说法。Rigord, 144–5。

25 此处还指理查的同性恋行为。

26 *Philippidos*, v, 440–620.

27 *Annals of Margam*, in *Annales Monastici*, i, 23–4, Landon, no. 418. 关于《马格姆编年史》成文时间的研究，参见C. Petit-Dutaillis, *Le Déshéritement de Jean sans Terre et le meurtre d'Arthur de Bretagne: étude critique sur la formation et la fortune d'une légende* (Paris, 1925), 84–7。罗伯特·帕特森认为，当时马格姆修道院的编年史记录者主要是一位活跃于1225年至13世纪中期的抄写员，参见Robert Patterson, 'The Author of Margam Annals', *ANS*, xiv (1991), 203。另外，这位编年史家或许曾听了威廉·德·布里乌兹的一名随从的讲述，当时这位随从正与他的主人一同在法王宫廷避难。

28 *Chron.*, iv, 86. 证明索恩厄姆的罗伯特是罗杰主要消息源之一的相关研究，参见D. Corner, 'The Earliest Surviving Manuscripts'和J. Gillingham, 'Historians without Hindsight: Coggeshall, Diceto and Howden on the Early Years of John's Reign', in *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s*, ed. S. Church (Woodbridge, 1999)。

29 临终前体现出慈悲之心的理查成为他最常见的艺术形象，是19世纪艺术家们最热衷的创作题材。但据罗杰记载，理查的这一命令最终未被执行，贝特朗仍被囚禁，当理查逝世后，他被梅卡迪耶处以剥皮之刑。*Chron.*, iv, 82–4。温切斯特的编年史家也记述了相似的故事：虽然理查宽恕了贝特朗，但梅卡迪耶随后将贝特朗暗中交给了理查的妹妹琼，琼便下令将他残酷地折磨致死。*Annals of Winchester, Ann. Mon.*, ii, 71.

30 Gervase, i, 592–3. 虽然杰维斯将这一事件发生的地点记为农特龙城堡（他说这座城堡属于昂古莱姆伯爵），但他并未提及寻宝或叛乱一事。

31 Kessler, 318–20. 罗杰在他虚构的关于理查围攻耶路撒冷的记载中宣称，理查拒绝接受城内居民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投降。*Gesta*, ii, 231.

32 Stubbs in *Chron.*, i, xiii, lxix.

33 *Gesta*, ii, 146–7; *Chron.*, iii, 74–5. 理查极可能在此之后又再次犯了罪。正文要强调的是罗杰将这个事件纳入理查的生平记载中。

34 *Chron.*, iii, 286–9.

35 加布尔雷斯（Galbraith）认为，这一故事旨在“突出理查冷酷无情的性格”。参见 V. H. Galbraith, ‘Good and Bad Kings in History’, *History*, xxx (1945), 126。但它的真实用意显然不止于此。

36 *Chron.*, iv, 84–5. 罗杰记载亨利二世之死时，并未附加类似的短诗进行总结。

37 不过作为一位英格兰爱国者，拉尔夫认为理查在十字军东征时过于慷慨地支持了法兰西十字军和其他国家的十字军。Coggeshall, 51–2.

38 *Ibid.*, 56–7.

39 *Ibid.*, 93–4. 详细分析参见 D. Carpenter, ‘Abbot Ralph’, 1210–30.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也将理查的突然死亡归结为天主对他“暴虐的傲慢态度”的惩罚——只是他的分析不同寻常地简短。参见上文374页。

40 而圣德尼的里戈认为，腓力废除与英格堡的婚姻，并将后者囚禁的行为堪称他的“万恶之首”。Rigord, 147. 拉尔夫也希望以诡计和背叛发起这场不义之战的腓力遭到天主的惩处。让英格兰人稍显宽慰的是，在12世纪90年代末的饥荒时期，腓力的封臣们比理查的封臣们遭受了更多的损失。Coggeshall, 74, 76.

41 Coggeshall, 93. 拉尔夫同时指出，当理查恢复自由后，他使用武力从腓力手中夺取的城堡也要多于腓力以阴谋手段从他手中夺取的城堡。参见 *Ibid.*, 76–7.

42 *Ibid.*, 91–6.

43 *Ibid.*, 97. 拉尔夫这是在挖苦亨利二世，后者听任教职空缺，并在弥撒仪式上谈论政务。

44 *Ibid.*, 97–8. 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在1232年，罗切斯特主教宣称，他曾三次在神示中看见理查从炼狱升向天堂。*Chron. Maj.*, iii, 212, 216.

45 *Les Poèmes de Gaucelm Faidit*, ed. J. Mouzat (Paris, 1965), no. 50, ‘Fortz Chausa es q ue tot lo major dan’. 这也是高瑟姆最著名的诗作，它的法语和奥克语版本均广为人知。

46 戴维·卡彭特认为，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对约翰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约翰将难以脱离地狱的折磨。参见 ‘Abbot Ralph’, 1229–30.

47 J. O. Prestwich, ‘Mistransl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Medieval English History’, *Peritia: Journal of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Ireland*, x (1996), 326–7.

48 R. V. Sharman, *The Cansos and Sirventes of the Troubadour Giraut de Borneil: A Critical Edition* (Cambridge, 1989), 475, 478.

49 原文为“solo a summo iudice superatus”，参见*Annales angevines*, 74。

第十九章

狮心虽逝，余威犹存

据豪登的罗杰记载，理查临终前将约翰指定为他的合法继承人，并宣布后者将接管所有城堡及自己四分之三财富，剩下四分之一的财富将分发给他的臣仆和穷人们。¹无论理查当时的真实想法如何，他的母亲埃莉诺和其他王室成员们无疑都支持约翰继承英格兰王位。理查的葬礼结束三天后，约翰于4月14日抵达希农城堡，准备参加正式的选举仪式。²安茹宫廷总管、索恩厄姆的罗伯特将希农城堡及城堡附带金库正式转交给约翰。³约翰即位伊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问题。当腓力得知理查逝世的消息后，便再次率军攻入诺曼底，并夺取了埃夫勒桑（Evrecin）。⁴安茹、曼恩和图兰的男爵们则支持理查的侄子、布列塔尼的亚瑟继承王位。⁵面对这一情况，约翰当机立断，迅速采取行动维护了自己对诺曼底和英格兰的合法统治权。4月25日，约翰在鲁昂正式受封为诺曼底公爵。⁶5月27日，约翰在威斯敏斯特正式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一个月后，他率领大军返回诺曼底，与腓力签订了休战协议。随后，约翰利用休战时间与理查的盟友们进行联系，维护了与他们的同盟关系。据《瑞米耶日编年史》记载，“一天之内就有15名伯爵来到约翰的宫廷，包括巴尔伯爵、佛兰德斯伯爵和布洛涅伯爵这样的显赫人物，他们都发誓要与约翰国王一同对抗法王。”⁷此时是1199年8月。⁸就在同一

个月，理查的侄子、德意志国王奥托四世也向约翰派出使臣，表示支持后者与腓力作战。众所周知，教宗英诺森三世更希望奥托四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⁹ 由于理查留下的外交体系依旧完好，约翰居于有利地位。正如詹姆斯·拉姆齐爵士所言：“当时约翰有很大机会将教宗和神圣罗马皇帝纳入他的反腓力同盟。”¹⁰ 约翰迅速向曼恩进军，迫使腓力不断后撤，并于9月22日成功收复勒芒。随后，亚瑟军队的统帅威廉·德·罗什（William des Roches）将亚瑟和他的母亲布列塔尼的康斯坦丝一同交给了约翰，康斯坦丝母子也向约翰表示臣服。豪登的罗杰认为，威廉·德·罗什由于被腓力的高压政策激怒，因此决定向约翰效忠。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威廉·德罗什认为形势对约翰更为有利，因此决定与腓力决裂。¹¹ 总之，无论威廉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约翰的王位竞争对手们都已向他臣服，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¹²

然而在1199年底，风云突变，约翰的地位突然变得岌岌可危。1199年圣诞节后不久，约翰就与腓力会面，大致确定了《勒古莱条约》的内容。于1200年5月正式签订的《勒古莱条约》被雅克·布萨尔（Jacques Bousard）称为“腓力·奥古斯都的伟大胜利”。这份条约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理查与腓力在1199年1月签署的临时协议影响（见上文434——436页），但其中许多具体条款发生了变化，且它们都对约翰极为不利。约翰允许腓力继续保有近期侵占的诺曼底领土，并将贝里的战略要地割让给后者；此外，约翰还应向腓力支付2万马克，并放弃与奥托四世的同盟。¹³ 是什么导致约翰对腓力做出如此让步？我们可以从约翰与奥托四世同盟关系的终结中找到答案。早在1199年1月的停战协议曾希望腓力放弃支持士瓦本公爵腓力，转而支持奥托四世。如今，形势反转。理查缔造的反腓力同盟体系也开始瓦解。

据圣德尼的里戈记载：“在拥有伟大战绩的英王理查逝世后，许多贵族与战士踏上了东征的路途，除了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路易、佩尔什伯爵斯蒂芬等诸多法兰西贵族之外，还有蒙特费拉侯爵等许多久

负盛名的诸侯和勇士们。”¹⁴ 在布列塔尼的威廉的记录中，参与东征的贵族包括“佛兰德斯伯爵和其他一些抛弃法王、转投英王的人”。¹⁵ 如我们所见，里戈将众多欧洲贵族参加十字军的决定与理查之死相联系，但他们中并没有人“在理查逝世后不久”便宣布参加十字军。早在1198年8月，新教宗英诺森三世就曾倡议组织新的十字军，但一直以来响应者寥寥无几。到了1199年11月，招募十字军战士的行动才正式展开。当时，香槟伯爵蒂博在埃纳河畔埃克利（Ecry-sur-Aisne）组织了一次骑士比武大会。蒂博与他的表兄布卢瓦伯爵路易，以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们放下了武器，正式宣布将参加新的十字军。¹⁶ 在随后数月内，许多法兰西北部的贵族们也效仿香槟伯爵和布卢瓦伯爵加入了十字军，其中就包括佩尔什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那些曾在1199年8月前往鲁昂宫廷与约翰会面的法兰西盟友（此前他们也是理查的盟友）此时都为了参加十字军而抛弃了约翰。

为何约翰的盟友会在1199年11月第一次“背叛”他，开始离他而去？我们已无法得知确切原因，但可以从罗杰记载的一出极具戏剧性的事件中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据罗杰记载，威廉·德·罗什将康斯坦丝母子带到勒芒交给约翰的当天，有人警告亚瑟，声称约翰将会把他关入监狱。当天约翰还强迫图阿尔子爵艾默里将希农城堡交给自己。所以当晚，康斯坦丝母子便与图阿尔子爵一同带上随从趁夜逃往昂热避难。¹⁷ 凯特·诺尔盖特于1902年首次提及了这一记载，但并未引起史学家们的关注。¹⁸ 尽管近代以来的约翰传记作家们都忽略了这段内容，但它对于我们理解约翰遭到背叛的原因十分重要。这起叛逃事件表明，约翰在其统治初期便已经失去了封臣的信任，并因此遭遇了严重挫折。鉴于此前约翰已有背信弃义的恶名——他曾于1189年背叛父亲亨利二世，于1193至1194年背叛兄长理查，又于1194年背叛法王腓力，因此他们担心约翰也会在处理康斯坦丝母子一事上出尔反尔。很久之后，《威廉·马歇尔生平述略》的作者回忆了这一事件，他认为，约翰由于仍对亚瑟在1199年时与他争夺王位之举怀恨在心，因此拒绝了1202年威廉·德·罗什的请求。

¹⁹ 作者在写作时肯定想到了诺曼底的失陷，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未被注意的事件，人们在后来回溯时会发现之前未察觉到的重要性。但亚瑟在1199年秋天逃离约翰的控制却在当时就得到了重视。不仅豪登的罗杰（逝世于1201年）记载了这件事，另一位学识渊博的编年史家迪切托的拉尔夫（逝世于1202年）也认为约翰1199年对亚瑟的处理并不恰当。从约翰1199年6月返回诺曼底至1199年末期间，拉尔夫只记载了两件事：约翰与首任妻子格洛斯特特的伊莎贝尔离婚，以及亚瑟第一次逃离约翰阵营。拉尔夫认为，约翰由于“受到奸臣指使”才与妻子离婚；拉尔夫还认为，在亚瑟向约翰臣服后，“约翰过于冒失的表现”令亚瑟心生戒备，后者才选择逃往法王腓力处寻求帮助。²⁰ 总之，无论约翰是否真的用言语或行动冒犯了亚瑟，亚瑟、康斯坦丝和他们的亲友的逃亡使很多人想起了约翰此前的种种劣迹，让他们恐慌不已。总之，1199年底时，受到新的十字军宣传影响，约翰的法兰西盟友们纷纷投身其中，离开了约翰的阵营。²¹ 此时，约翰已经完全被孤立，他却还要在与腓力的和约中放弃自己仅有的盟友、他的侄子奥托四世。

此外，1199年秋季时发生的诸多事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约翰在1203年至1204年间接连丧失诺曼底和安茹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丧失领土的责任不应由约翰承担，毕竟他的对手法王腓力更为富有，战争最后的成败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资源。1999年时的正统观念认为：从1199年开始，安茹帝国已无力负担构建大陆防御体系的巨额军费，即使是骁勇善战的理查也无法长期维持安茹帝国的领土。然而，这一假设无法解释这一现象：1199年9月中旬，约翰仍保持着相对优势，为此威廉·德·罗什才会主动将亚瑟带给约翰，而仅仅在三个月后约翰便实力骤减。²² 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关于财政资源的各种讨论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约翰盟友们的资源。由于卡佩王朝在1202年至1203年之前的财政记录全部遗失，因此我们的论证只能从1202年至1203年期间约翰和腓力所拥有的相对个人财富入手。根据这个基础，人们认为，腓力享有的资源优势使他在战争区域可以征得的财富要远超过约翰能获得的一切资源，人们还

自然地将这个结论衍生到理查统治末期。²³ 根据现存的档案（阿基坦和安茹地区的档案已遗失）计算约翰和腓力的个人财富状况也并非易事，霍特将其称为“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谜题”。²⁴ 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则认为，若考虑到卡佩士兵获得的薪酬较高，即“税收总额更多被用于军事目的”，那么安茹帝国实际上是略占优势地位的。²⁵ 但即使腓力在1202年至1203年期间确实比约翰更为富有（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仍可以确定，在理查统治的大多数时期，以及约翰即位初期的1199年春夏两季内，安茹王朝都是实力占优的一方。1193年至1194年间，腓力要更富有一些。在理查领地内的大量财富被送往德意志用于缴纳赎金，导致安茹王朝国库亏空的同时，腓力则可以将他的财富集中运用于战争，还可以得到佛兰德斯伯爵、图卢兹伯爵等盟友的物质支持。然而1197年至1198年间，由于许多法兰西贵族转投理查阵营，卡佩王朝财力锐减，开始面临着巨大挑战，理查此时不仅能从诺曼底获取资源，得到英格兰、安茹、普瓦图、加斯科涅甚至爱尔兰的财政收入（此时英国已经不再有赎金的负担），还能得到盟友的支援。从1197年开始，理查获得了佛兰德斯和埃诺伯爵鲍德温的支持，1198年及以后，他还获得了布洛涅伯爵、吉纳伯爵和圣波勒伯爵的支持。²⁶ 在此期间，腓力又失去了阿拉斯、杜埃、圣奥梅尔和艾尔等法兰西东北部的富裕市镇，这使他的收入大为减少。²⁷ 总之，从经济角度来看，理查建立的反腓力同盟的瓦解对约翰的经济状况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相较于各种结构性原因，约翰的个人品性更是导致反腓力同盟瓦解的具有说服力的原因。但其中一个结构性原因也有着重要意义，那就是，在传统上，相较于其他宗主，法国国王享有最高的宗主权，法兰西贵族在与国王对抗时，可能会产生不适感——当然他们也是很坦然的。

²⁸ 1196年以来，理查成功地说服越来越多的法兰西诸侯加入自己一方与法王作战。研究腓力·奥古斯都的专家鲍德温（John W. Baldwin）认为，理查能够策动众多法兰西诸侯反抗其封君的原因是：“理查慷慨大方的举动使他在法兰西诸侯间建立了良好声誉，相较而言，作为封君的

腓力则显得臭名昭著——他曾非法侵占了十字军统帅的领地，还恶劣地对待自己的新婚妻子英格堡。因此，理查得以成功地组建了反腓力同盟。”²⁹ 然而当理查逝世后，法兰西诸侯们发现，他的继任者约翰比腓力更为声名狼藉。亚瑟“侥幸逃生”的故事（它们至少像豪登的罗杰和迪切托的拉尔夫所讲的故事那样具有戏剧性）飞快地传到法兰西诸侯耳中，他们想起了约翰恶劣的名声，因此法兰西北部的诸侯们更倾向恢复与法王的传统同盟，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参加十字军。

那么，理查是如何获得“慷慨大方”这一美名的呢？安茹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和卡佩编年史家布列塔尼的威廉一致认为：理查比腓力更为慷慨地向法兰西诸侯赠礼，因此赢得了众多盟友。³⁰ 这是否是因为理查外交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要高于腓力呢？若是这样，那1197年至1198年的事件显示腓力出现了严重的判断错误。还是说，理查在财政支出方面拥有比腓力更大的自主权，这使他能比腓力花更多钱寻找盟友与下属，就像他在十字军中做的那样？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很难摆脱过去的观念，即当时和稍后的人都认为理查比腓力更加富有。人们对这个传统观点的怀疑几乎完全是恩舍姆的亚当所写的《林肯主教圣休传》中的一个段落带来的。据亚当记载，当休伯特·沃尔特在1197年12月的会议上将理查“一年内提供300名骑士”的要求转达给参会者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还解释了国王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此时国王正与实力更为强大的法王作战，理查的财力和军队数量都不如后者，而后者试图利用其一切财力优势剥夺他的继承权，并将他彻底击败，因此国王需要获得封臣们为他提供支持”。³¹ 我们在解读这段话时，应当时刻记住两点。第一，亚当是在根据自己的想象还原休伯特·沃尔特向国人求助的演说，因此这个演说需要强调理查所处的困境。这些话并不一定是他对两位国王财富的真实看法。第二，亚当写作的时间是1213年，如果他借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口说的话反映了他的观点，那么他对腓力实力的理解也受到了腓力占领诺曼底之后所获得更多财富的影响。³² 不过，尽管有种种争论，如果亚当的记载是当时关于两位国王财富的唯一证据，那么我们仍应

当重视它。然而这并不是唯一记载。豪登的罗杰和布列塔尼的威廉都有关于理查赠礼的记述。有人明确指出，约翰在1203年至1204年间的失败并不是金钱的缺乏造成的——他在暗示理查在1197年至1198年所处的形势。克莱尔马来（Clairmarais，此地距圣奥梅尔不远）的修士相信，约翰在1203年至1204年丢失诺曼底，导致他被击败的原因是懦弱，而非缺少金钱。贝蒂纳的匿名编年史家则更明确地指出，“理查在土地和财力方面都胜于腓力”。³³此外，阿德尔的朗贝尔（Lambert of Ardres）在约翰丢失诺曼底之前的记载也声称，理查通过向佛兰德斯伯爵赠送大桶金银赢得了后者的效忠，佛兰德斯伯爵也因此拥有“取之不尽”的财富。³⁴虽然强调理查在与一个更加富有的敌人战斗能凸显他的英雄形象，但是从不同阵营记载的证据（其中大部分来自两位国王激烈争夺的地区——圣奥梅尔、贝蒂纳、阿德尔）来看，事实恰好相反。

那么，理查耗费巨资为自己赢得盟友支持的举动是否导致他的领地，尤其是诺曼底和英格兰陷入贫困呢？一般认为，1195年和1198年的诺曼底财政署记录均表明“公国已被压榨到了极限”。³⁵从卷宗记录来看，理查1198年从诺曼底获得的财富比1195年获得的财富更多，而他在1195年获得的财富又比他的父亲亨利二世在1180年获得的财富更多。文森特·莫斯将这个现象称为“诺曼财政革命”（Norman Fiscal Revolution）。³⁶但上述记录并不足以表明诺曼底因此变得贫穷。战争的毁灭性往往是局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战役时常会被停战协定或和约打断。战斗总是在短时间内集中发生：1194年持续了约10周；1195年约10周；1196年也是10周（包括在布列塔尼的战斗）；1197年时间最长，持续了半年；1198年时间最短，仅有8周。平均下来，双方一年内只有约三个月的实际交战期。更重要的是，双方的战场局限于前线地带，诺曼底公国的大部分领土其实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理查在停战期间始终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意味着他总在购买各种货物或服务。其中还包括大型建设工程，如在莱桑德利建造的新城镇和城堡、厄镇的城墙、蓬德拉尔克的新城镇。上述措施其实也促进了诺曼底经济的发展。早

在1913年，波威克就认为，在1203年至1204年期间，“诺曼底在整体上很可能并未受到战争的摧残，它并未像英格兰地区那样在人力和财政上受到反复压榨”。波威克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英王从英格兰和债权人处获得的财富都被用于诺曼底”。³⁷当萨姆森修道院院长于1198年来到诺曼底时，他不仅用124英镑雇用骑士充当厄镇守军，还带回一个金十字架和一本价值80马克的珍贵福音书。如果就像布雷克隆德的乔斯林暗示的那样，这些服务与商品都是他在诺曼底购买的，那么这意味着诺曼底的工匠和艺术家获得了更多的工作和英格兰来的金钱。当然这也意味着，根据这位修道院院长（非常敏锐）的商业判断力，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在1198年也保持了较为富足的状态，并未像1180年时那样陷于破产边缘。³⁸

那么，当时其他著名教堂是否也像圣埃德蒙兹修道院一样富足呢？又或者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只是在优秀修道院院长领导下为数不多的特例？是否真如波威克所言，当时英格兰经济面临着极大压力（无论他指什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经济压力在多大程度是诺曼底前线的战争产生的影响？³⁹在理查统治期间，英格兰大体上处于和平状态，英格兰筹集的金钱都被送到了大陆（如果不是这样，反而令人费解）。那么，战争征收的税真的让英格兰陷于贫困吗？罗杰在1198年留下了这段著名记载：“由于各种公正或不公的繁重的税负，整个英格兰日渐穷困。”⁴⁰据1198年英格兰财政署卷宗记载，这年的税收总额为25405英镑，此外还应加上1000英镑的犁头税（根据1194年以来的平均值计算）。但这一数额比起十多年后约翰的横征暴敛来说，显然是小巫见大巫。据统计，约翰在1210年至1212年的各类税收总额分别为51913英镑、83291英镑和56612英镑（刨除了数量颇大的其他来源收入）。⁴¹从约翰的征税情况来看，他从理查手中继承的显然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英格兰。总之，“贫困”始终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征税是否会使国家贫困取决于税收最终用于什么目的。

无论如何，罗杰在1198年时对理查的财政需求颇有微词。他的这段

评价是夹在一份巡回法官日程表与《森林法》的文本之间的，因此他在说“各种繁重的税负”时，主要指的很可能就是这两个机构。若我们对财政署卷宗进行分析便会发现，罗杰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1198年，理查恢复了父亲亨利二世时期的制度，利用巡回法庭制度征收罚款来筹集资金。违反《森林法》应付的罚款一直以来都不受欢迎，豪登的罗杰尤为不满，但是在1198年之前，理查都未派出过森林巡回法庭。据统计，1197年至1198年治安法庭和巡回法庭的总收入为1588英镑，是理查统治期间罚款总额的最高值。然而在亨利二世统治的最后一个财年（1187年至1188年）内，他所征收的这两项罚款总额达2800英镑。⁴² 1198年，理查还提出了其他财政要求。豪登的罗杰提到了当年提出的犁头税（尽管有很多人反对），理查还要求人们为用新的印章重新签署新的特许令交一笔钱。至1198年年底时，也就是豪登的罗杰最早记下这些抱怨的那一年，英格兰民众已对理查的苛捐杂税极为不满。科吉舍尔的拉尔夫也在理查的讦告中暗示了他的不满，并称英格兰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像理查这样善于敛财的国王（见上文456——457页）。

纽堡的威廉在1197年或1198年的记载中，则对理查的财政需求和英格兰民众的不满提出了新的看法。威廉认为，尽管理查统治时期的税赋比亨利二世时期更为沉重，但民众对此的怨言反而更少。“这些无知的民众在遭受酷刑折磨时，反而比遭受普通刑罚更少抱怨了。”威廉在12世纪90年代末时回看，亨利二世是一位伟大而值得赞扬的统治者，但他注意到，亨利二世在他统治时期曾十分不得人心，英格兰民众只对他的过失和缺点印象深刻。⁴³ 英格兰民众在抱怨理查征税的同时，又认为这些税收得到了合理的利用——被一位广受民众爱戴的君主（不像他的父亲）用于一场正义的战争。罗杰、拉尔夫和威廉都对法王腓力怀有强烈敌意，他们相信，不应让腓力长期占有他非法夺取的安茹领地，理查有权采取军事行动收复失地。正如戴维·卡彭特所说，“所有英格兰编年史家都将理查视为英雄”，即使是那些指责他为索取金钱而压榨民众的人也不例外。⁴⁴

相较而言，诺曼底民众对理查的态度则难以判断。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否削弱了理查的诺曼底封臣们对他的忠诚？尽管缺少史料记载，但许多历史学家们都认为确实是这样。沃伦认为：“约翰在1199年时集结军队的行动令人印象深刻……但难以隐瞒的事实是，诺曼底已由于长期战争耗尽了它的人力物力。”⁴⁵ 拉尔夫·特纳则认为，“对诺曼底教会而言，理查对他们的压迫越来越严重，他对金钱的无尽索求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到12世纪末，许多诺曼底教士和世俗贵族已经极度渴望和平，为此他们甚至愿意被法王吞并，接受法王统治”。⁴⁶ 但上述观点所依据的史实过于零散且缺乏说服力，仅有一个史实有一定说服力，即库唐斯的沃尔特与理查的争执。沃尔特对理查的不满显然事出有因：双方的主要战区——维克桑地区和诺曼底东北部地区恰好位于他所管理的鲁昂教区内，鲁昂教区的地产也因这场战争蒙受了惨重损失。

但其他诺曼底教士的态度则可能非常不同。当鲁昂大主教沃尔特前往罗马，向教宗抗议理查强占安得利地区的行动时，代表理查前往教廷处理此事的使臣中就包括沃尔特的两位下属：埃夫勒主教和利雪主教。鲁昂编年史家也明确记载，两位主教正是为了“取悦国王”才公然与大主教对立的。⁴⁷ 另外，理查统治时期诺曼底进行了四次主教选举，所有新当选的主教也都对理查忠心耿耿。⁴⁸ 理查统治期间，主教区与座堂的人员仍和过去一样“受到公爵的统治”，诺曼底传统的主教管区和教会法规依然维持原状，身为诺曼底公爵的理查也并未过多干预教会事务。因此，理查也赢得了诺曼底教会的支持。而1202年时约翰对塞斯大教堂的严重摧残则成为腓力用于拉拢人心的反面事例。⁴⁹ 唯一一位对这件事进行较多记载的是瑞米耶日的匿名编年史家，他将加冕时的理查称为“卓尔不群之人”，热切歌颂了理查在十字军中的功绩，并赞扬了鲁昂市民顽强抵抗法王腓力，成功保卫城市的英雄事迹。此外，他将理查支持侄子奥托获得德意志王位一事评价为“一位可敬国王所做的一件值得赞许之事”，最后他还对理查之死表示深切哀悼。⁵⁰ 诚然，由于12世纪90年代诺曼底地区的历史记录较为缺乏，我们很难了解诺曼底民众对理查

的真实看法，但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大多数诺曼底教士应对理查较为认同。

在当时的诺曼底和英格兰地区，没人比鲁昂大主教更渴望和平，但他并非唯一渴望和平之人。下文引用的纽堡的威廉和豪登的罗杰的两处记载，常被人们引用，作为人们对战争的厌倦，以及战争对诺曼底造成严重破坏的证据。威廉写道“那些之前十分富足的省区，如今都已遭到战火摧残”，随后他叙述了1196年腓力围攻欧马勒的情景。这句概括的下文也很重要，他写道，在理查蹂躏法王领土的时候，腓力在1196年围攻欧马勒，并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它。⁵¹ 罗杰则生动而概括地叙述了1198年战争中烧杀掠夺的情景（这也是人们常常引用的段落）。他在叙述1198年战争的细节时指出，真正的战斗直到9月才开始，因为双方商定停战状态应在庄稼收割完之后结束。随后的战争主要局限在埃夫勒桑（腓力焚毁了埃夫勒）和维克桑地区（包括诺曼底和法兰西的部分），只有梅卡迪耶袭击了阿布维尔的集市，洗劫了那里的法兰西商人。距罗杰记载，当梅卡迪耶返回诺曼底时，“他用从法兰西掠夺来的战利品填满了诺曼底”。⁵² 总之，这两段详细记载显示，这场战争对腓力臣民的影响至少是和理查一样的。

如果安茹王朝出现了厌战情绪，那么卡佩王朝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安茹人民对征税极其不满，卡佩的民众也会有同样的情绪。纽堡的威廉、豪登的罗杰与科吉舍尔的拉尔夫的记录可以说明，此时安茹帝国“面临的种种压力将足以动摇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的统治，即使是理查也不例外”。但他们的评论不应被视为“安茹帝国注定衰落”的论据。⁵³ 安茹帝国是否衰落还要看腓力因战争面临了多大的压力。事实上，这三位编年史家和安布鲁瓦兹都认为，理查是1197年至1198年战争的胜利者。据拉尔夫记载，在理查去世时，他占领的城堡远比他被囚禁时失去的多。威廉则指出，1197年时“逐渐势弱的法王开始转为防御，而英王的财富和权力则与日俱增”。⁵⁴

据纽堡的威廉记载，里昂大主教约翰告诉他的英格兰友人，腓力对本国教会的财政压迫更甚于理查对英格兰教会的压迫。“我要对你们说，若与法王相比，英王则堪称一位品行高洁的隐士。”⁵⁵这番话语或许会让他的友人略微感到宽慰，但这并非表明理查和腓力压榨臣民的有力证据。圣德尼的里戈和布列塔尼的威廉与腓力的利益勾连比任何英国编年史家与理查的利益勾连都要深，他们仍然说腓力也是一个压榨民众的统治者。据里戈记载，当腓力结束十字军征程返回国内后，他便以“收复耶路撒冷”和“保卫法兰西王国免受外敌侵犯”的名义聚敛了大量财富，然而“不知国王真正用意的不明智的人纷纷谴责国王过分贪婪的野心。”到1198年，里戈可能也开始倾向于相信这些不明智的人的说法，因为在那一年，他提到腓力“对天主的教会进行了严重的迫害”。⁵⁶即使是频繁使用“宽宏大量”（magnanimus）一词形容腓力的编年史家布列塔尼的威廉，在1197年至1198年的记载中也承认腓力对国内的一些教会进行了压迫。⁵⁷从当时卡佩编年史家的视角来看，腓力的经济状况无疑比理查更为恶劣，他对法兰西王国的压迫程度也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当时腓力的封臣们，尤其是那些靠近诺曼底和佛兰德斯的法兰西封臣们十分清楚：腓力在理查的战争中快要一败涂地。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里戈和威廉在记载1197年至1198年的战况时显得极为悲观，当理查逝世后，他们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即使理查能比腓力活得更久，幅员辽阔的安茹帝国也无法长期在欧洲政治版图上存留。实际上，所谓的“安茹帝国”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⁵⁸保持安茹帝国在一个统治者治理下长治久安的关键，就是这个家族的利益，分裂国家的因素始终是存在的。⁵⁹虽然在约翰在1203年至1204年丧失诺曼底后，人们常将英国国王剩下的领土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英王在1204年保住了诺曼底公国和安茹伯国，这种观念反而不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兰西所有贵族的法理封君，卡佩王朝的历代法王将持续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对安茹帝国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地施加政治影响，试图分裂安茹帝国。而且，总会有安茹的封臣们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这种诱惑吸引。从亨利二世建立安茹帝国之初，它在结构上就注定是会分裂的。但理查显然不会因此悲伤，当他结束东征并重获自由后，便立刻为解决两个密不可分的难题——为自己赢得更大的荣耀，收复被腓力夺取的世袭领地而持续奋战。或许早在1191年《墨西拿条约》签订时，理查就已意识到，如果他有不止一个婚生子，安茹帝国可能会分裂。果然，安茹帝国在1199年开始衰落，到1203年至1204年间则土崩瓦解。这是因为约翰作为统治者的弱点使腓力能够利用帝国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它的分裂并不是因为它被战争带来的花费和压力拖垮——花费和压力给腓力的打击要大于理查。

在1198年至1199年，理查在与腓力的战争中仍处于优势地位，这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极具竞争力的统治者，无论是行政管理、外交、政治还是军事，就像他在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证明的那样。伊本·安西尔认为，“理查勇猛无畏、计谋多端、精力充沛且极具耐心，这些特质足以使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卓越的人物”。⁶⁰ 难能可贵的是，理查不仅能在实力和盟友占据上风时把握优势，赢得胜利，还能在处于劣势时反败为胜，1192年的雅法之战和1196年的欧马勒之战便是最好的证明。理查在这些时刻体现出两项伟大特质——英勇无畏、重视荣誉（他也给布列塔尼的威廉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正是这些特质使他跻身传奇英雄之列。虽然理查为追求荣誉频繁身处险境，但这些伟大特质帮助理查赢得诸多丰功伟绩。在他死后，它们使他的英名万世流传。

注释

1 *Chron.*, iv, 83. 理查将他的御宝赠给了奥托。

2 *Magna Vita*, ii, 137.

3 *Chron.*, iv, 86; Coggeshall, 99.

4 “理查死后不久，复活节后，腓力占领了埃夫勒城堡及城镇（Statim, eo mortuo, Ph

ilippus magnanimus post Pascha capit Ebroicum et munit, et municipia circum adjacentia) 》。WB, 204. 豪登的罗杰也使用了“立刻”(statim)一词形容腓力的行动, 参见*Chron.*, iv, 85。

5 4月20日时, 约翰失去了对勒芒的控制。*Magna Vita*, 147. 随后腓力接管了安茹、曼恩和图兰地区的所有市镇、城堡和要塞, 并将亚瑟带往巴黎。埃莉诺和梅卡迪耶手下约翰的军队只能蹂躏了安茹。*Chron.*, iv, 87–8.

6 *Chron.*, iv, 87–8.

7 *Annales de ... Jumièges*, 77. 罗杰还记载, 那些曾支持理查的法兰西的伯爵和男爵们都向约翰效忠, 并发誓将与他一同对抗腓力。*Chron.*, iv, 93, 95. 关于约翰与布洛涅伯爵雷诺和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的和约, 参见*Rotuli Chartarum 1199–1216*, ed. T. D. Hardy (London, 1837), 30–1。前一份和约上注明的时间是8月18日。

8 当时, 普瓦图的形势已基本稳定, 腓力承认了埃莉诺对普瓦图的宗主权, 她还(很可能在7月31日)签署了一份特许令, 将约翰定为她的继承人, 这可能是为了回击自称为埃莉诺继承人的亚瑟。*Rigord*, 146. 关于文书签署日期的记录, 参见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i, 352–4。关于埃莉诺的特许令和约翰对此的响应的法律意义, 参见J. C. Holt, 'Aliénor d'Aquitaine', 95–100。

9 *Chron.*, iv, 95.

10 J. H. Ramsay, *The Angevin Empire* (London, 1903), 383.

11 关于威廉·德·罗什的出身和生平, 参见N. Vincent, *Peter des Roches* (Cambridge, 1996), 23–6。

12 *Chron.*, iv, 94–6. 据文书署档案的记载, 约翰获得胜利的日期应在9月18日至22日期间(*Rotuli Chartarum*, 30), 然而罗杰却将其误记为10月份。据罗杰记载, 腓力在9月时攻占了孔什, 若罗杰的记载属实, 那么腓力在此后不久便再度失去对孔什的控制, 因为他很快在1203年第二次将其攻占。

13 *Chron.*, iv, 106–7; J. Boussard, 'Philippe Auguste et les Plantagenêts', in *La France de Philippe Auguste: Le temps de mutations*, ed. R. H. Bautier (Paris, 1982), 279;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134. 此前我曾错误地将这一条约视为约翰的外交胜利(*Coeur de Lion*, 67), 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 我将约翰1200年时的情况与约翰随后的困境进行比较, 而非与约翰在1199年夏季时的状况进行比较。

14 *Rigord*, 153.

15 WB, 205.

16 D. E. Queller, *The Fourth Crusade* (Leicester, 1978), 1–3 and n. 46.

17 *Chron.*, iv, 96–7. 随后康斯坦丝与居伊·德·图阿尔（Gui de Thouars）结婚。

18 Norgate, *John Lackland* (London, 1902), 70–1. 她指出“约翰在处理此事时并未保持一贯的谨慎”，但她对此仍未给予重视。波威克在1913年时虽然对此展开讨论，但他的分析极为晦涩，且完全忽视了年表记录。Powicke, 138–9.

19 *HGM*, 12472–92.

20 Diceto, ii, 166–7. 我对迪切托的拉尔夫和豪登的罗杰对约翰态度的详细的分析，可参见拙作‘Historians without Hindsight’。

21 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与腓力在1200年1月签署了《佩罗纳条约》，但我们并不清楚鲍德温是什么时候决定于腓力议和的。

22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说资源问题与1202年8月至9月间约翰的突然溃败有关。

23 关于这一观点的最新研究参见R. V. Turner, ‘Good or Bad Kingship? The Case of Richard Lionheart’, *HSJ*, viii (1999), 78.

24 Holt, ‘The Loss of Normandy and Royal Finance’, in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d. J. Gillingham and J. C. Holt (London, 1984), 99.

25 N. Barrett, ‘The Revenues of John and Philip Augustus Revisited’, in *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s*, ed. S. Church (Woodbridge, 1999).

26 我之所以在此使用“至少”一词，是由于史料中缺乏对布列塔尼及其他地区相关状况的记载。

27 可能是这些领土以及贝里的丧失使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认为，在理查逝世时，他从腓力手中夺取的城堡已经多于腓力趁他被囚禁时夺取的城堡了。Coggeshall, 76–7.

28 然而，参见D. Bates,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mandy c.911–1204’,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in the Middle Ages*, ed. D. Bates and A. Curry (London, 1994), 34–5.

29 Baldwin, *Government of Philip Augustus*, 91. 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记载似乎更能证明，理查的外交手腕足以使他获得“蜘蛛国王”（spider-king）这一称号。参见上文26—30页。

30 *Chron.*, iv, 19–20; *Philippidos*, iv, 588–97.

31 *Magna Vita*, 98. 诺曼底本身的资源不如腓力的资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亚当指的可能也仅是诺曼底的资源。

32 由于在1213年写作的亚当有可能了解1208年之后约翰在英格兰的收入，亚当的这段记载很可能有着相反的意思，参见下文471页。

33 *RHF*, xxiv, part 2, 758; *MGH SS*, ix, 330.

34 Lambert of Ardres, *Chronique de Guines et d'Ardres*, 371.

35 最新的研究可参见Turner, 'Good or Bad Kingship', 73。

36 V. Moss, 'The Norman Fiscal Revolution 1193–8'. 另见Moss, 'Normandy and England in 1180: the Pipe Roll Evidence'。

37 Powicke, 239. 未来文森特·莫斯博士的研究将有助于扩展这一研究。

38 *The Chronicle of Jocelin of Brakelond*, ed. H. E. Butler (London, 1949), 87. 同样可能的情况是，萨姆森修道院院长是在返回英格兰后，在返程的路上购买了这些物品，很有可能就是在伦敦。但毫无疑问，乔斯林暗指这些珍贵物品是萨姆森在出国旅行时买的。“只要他从海外回国，便总会为教会带回一些典礼用品。”

39 关于英格兰在1200年前后的经济状况，可参见伯顿（J. L. Bolton）和拉蒂默（P. Latimer）的相关论文，收录于Church, *King John*。

40 *Chron.*, iv, 66.

41 N. Barratt, 'The English Revenues'; idem, 'The Revenues of King John', *EHR*, cxi. 另外，在理查和约翰统治期间，有意获取监护权者愿意支出的平均费用也不相同：理查统治时期为1158马克，约翰统治时期则为3068马克。参见S. L. Waugh, *The Lordship of England: Royal Wardships and Marriages in English Society and Politics 1217–1327* (Princeton, 1988), 157–8。

42 N. Barratt, 'The English Revenues'.

43 Newburgh, Bk 3, ch. 26.

44 Carpenter, 'Abbot Ralph', 1222.

45 W. L. Warren, *King John* (London, 1961), 72. 时至今日，这仍是正统观点。另可参见基弗（T. K. Keefe）的相关评论，原文收录于*Speculum*, lxxi (1996), 716–17; 另见Turner, 'Good or Bad Kingship', 72–8。

46 Turner, 'Richard Lionheart and the Episcopate in His French Domain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xxi (1998), 525, 539; cf. idem, 'Good or Bad Kingship?', 74.

47 *RHF*, xviii, 358. 诺曼底财政署卷宗曾有利雪主教提供一笔2000马克资金的记载，正文的记述意味着这并非利雪主教与诺曼底公爵敌对的证据。参见*MRSN*, i, 253. 通常来说，这意味着双方已消除敌意。

48 Turner, 'Richard Lionheart and the Episcopate', 524–5.

49 上述内容基于斯佩尔的系统分析，参见D. Spear, ‘Power, Patronage and Personality in the Norman Cathedral Chapters, 911–1204’, *ANS*, xx (1997), 205–21。正如斯佩尔所言，在诺曼底教会中，只有库唐斯教区有着独立于诺曼底公爵之外的传统，有鉴于此，令人厌恶的诺曼底财政署所记载的一笔针对教士的总额为266里弗尔13先令4便士的罚款很可能由库唐斯主教威廉（他从1180年起开始担任库唐斯主教一职）支付，因为他的部下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军中撤退。参见*MRSN*, ii, 477。

50 *Annales de Jumièges*, 73–7. ‘O laudabilis viri laudabile factum qui totum mundi imperium nepoti suo comparavit.’ 原文表明了作者对理查之死的哀悼，但这位作者记载亨利二世之死时却没有留下任何评论。

51 Newburgh, Bk 5, ch. 25.

52 *Chron.*, iii, 301; *ibid.*, iv, 54, 59–60.

53 Keefe, *Speculum* (1996), 716–17. 基弗认为安茹帝国衰落无法避免的观点，已被新近研究所证实。

54 *Chron.*, iv, 19, 54–61; Coggeshall, 76–7; Newburgh, Bk 5, ch. 31, ch. 32; Ambroise, 12333–40.

55 Newburgh, Bk 5, ch. 3. 约翰此前曾担任约克教区司库和普瓦捷主教之职。

56 Rigord, 129, 141.

57 WB, 202.

58 12世纪时将亨利二世的统治区域称为“帝国”的最早记载出自“属于您的帝国的男爵们”（les baruns de tun empire）这一短句，出处参见*The Song of Dermot and the Earl*, ed. G. H. Orpen (Oxford, 1892), 22。

59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Holt, ‘The End of the Anglo-Saxon Realm’, Gillingham, *The Angevin Empire*, ch. 3; Turner, ‘The Problem of Survival’。

60 Ibn al-Athir, 43. 关于同时代穆斯林对理查的评价，参见上文21——33页。

参考文献

I 原始史料部分

ADAM OF EYNHAM, *Magna Vita Sancti Hugonis*, ed. D. L. Douie and H. Farmer (2 vols, Edinburgh, 1962).

AMBROISE, *L'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ed. G. Paris (Paris, 1897). Trans. by M. J. Hubert and J. La Monte as *The Crusade of Richard Lionheart* (New York, 1941).

ANDREAS OF MARCHIENNES, *Sigeberti Continuatio Aquicincta*, MGH S S, vi.

——, *Historia regum Francorum*, MGH SS xxvi.

ANDREAS CAPELLANUS, *De Amore*, ed. and trans. P. G. Walsh (London, 1982).

Annales de l'Abbaye Royale de Saint-Pierre de Jumièges, ed. J. Laporte (Rouen, 1954).

Annales Marbacenses, ed. H. Bloch, MGH SRG (1907).

Annales Stederburgenses, MGH SS xvi.

Annals of Margam, in *Annales Monastici*, i, ed. H. R. Luard (RS, 1864).

Annals of Rouen, *RHF*, xviii.

Annals of Salzburg, MGH SS xiii.

Annals of Winchester, in *Annales Monastici*, ii, ed. H. R. Luard (RS, 1865).

Annals of Zwettl, MGH SS ix.

ANONYMOUS OF BÉTHUNE, *RHF*, xxiv, Part 2.

ARNOLD OF LÜBECK, *Chronica Slavorum*, ed. J. M. Lappenberg, MGH, S RG (1868, 1930).

BEHA ED-DIN, *What Befell Sultan Yusuf*, trans. C. W. Wilson (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 xiii (London, 1897).

BERTRAN DE BORN, *The Poems of the Troubadour Bertran de Born*, ed. W. D. Paden, Jr, T. Sankovitch and P. H. Stäblein (Berkeley, 1986).

BLONDEL, *Die Lieder des Blondel de Nesle*, ed. L. Weise (Dresden, 1904).

Breve Chronicon Virzionis Coenobii, *RHF* xviii.

CAESARIUS OF HEISTERBACH, *Dialogus Miraculorum*, ed. J. Strange (2 vols, Cologne, 1851).

Cartulaire de l'abbaye de Noyers, ed. C. Chevalier,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Touraine*, xxii (1872).

CHRÉTIEN DES TROYES, *Arthurian Romances*, trans. W. W. Kibler (Harmondsworth, 1991).

Chronica Albrici Monachi Trium Fontium, MGH SS xxiii.

Chronica Monasterii de Melsa, i, ed. E. A. Bond (RS, 1866).

Chronica Regia Coloniensis, ed. G. Waitz, MGH SRG (1880).

Chronicon Turonense Magnum, ed. A. Salmon, Recueil des Chroniques de Touraine, (Tours, 1954).

Chronique d'Ernoult, ed. L. de Mas-Latrie (Paris, 1871).

Chroniques de Saint-Martial de Limoges, ed. H. Duplès-Agier (Paris, 1874).

Chroniques des Comtes d'Anjou, ed. L. Halphen and R. Poupardin (Paris, 1913).

Codice Diplomatico d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ed. C. Imperiale di Sant'Angelo (3 vols, Genoa, 1936–42).

Continuatio Admuntensis, MGH SS ix.

La Continuation de Guillaume de Tyr (1184–1197), ed. M. R. Morgan (Paris, 1982). English trans. in P. W. Edbury,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and the Third Crusade. Sources in Translation* (Aldershot, 1996).

Crusade and Death of Richard I, ed. R. C. Johnston (Anglo-Norman Texts, xvii, 1961).

Documents des archives de la Chambre des Comptes de Navarre 1196–1384, ed. J. A. Brutails (Paris, 1890).

Epistolae Cantuarienses, in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the Reign of Richard I*, ii, ed. W. Stubbs (RS, 1865).

Foedera, conventiones, litterae, i, part 1, ed. T. Rymer, A. Clarke, F. Holbrooke and J. Caley (London, 1816).

GAUCELM FAIDIT, *Les Poèmes de Gaucelm Faidit*, ed. J. Mouzat (Paris, 1965).

GEOFFREY OF VIGEOIS, 'Chronica', in *Novae Bibliothecae Manuscriptorum Librorum* ed. P. Labbe (2 vols, Paris, 1657), ii, 279–329. For Book 1 of Geoffrey see P. Botineau, 'La Chronique de Geoffroi de Breuil, prieur de Vigeois', (unpub. diss., Paris, 1964); for Book 2 *RHF*, xviii, 211–23.

GEOFFREY OF VINSAUUF, *Poetria Nova*, trans. M. F. Nims (Toronto, 1967).

GERVASE OF CANTERBURY, *Opera Historica*, ed. W. Stubbs (2 vols, RS, 1879–80).

GIRALDUS CAMBRENSIS., *Expugnatio Hibernica. The Conquest of Ireland*, ed. and trans. A. B. Scott and F. X. Martin (Dublin, 1978).

GIRALDUS CAMBRENSIS, *Opera*, ed. J. S. Brewer, J. F. Dimock and G. F. Warner (8 vols, RS, 1861–91).

GIRAUT DE BORNEIL, *The Cansos and Sirventes of the Troubadour: A Critical Edition*, ed. R. V. Sharman (Cambridge, 1989).

GISLEBERT OF MONS, *Chronicon Hanoniense*, ed. L. Vanderkindere.

GUILLAUME GUIART, *Branches des royaux lignages*, ed. J. A. Buchon (Paris, 1820).

Histoire de Guillaume le Maréchal, ed. P. Meyer (3 vol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1891–1907).

Histoire des ducs de Normandie et des rois d'Angleterre, ed. F. Michel (Paris, 1840).

Historia de expeditione Friderici, ed. A. Chroust, MGH SRG (1929).

IBN AL-ATHIR, *el-Kamil*,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rientaux, ii, part 1 (Paris, 1887).

IMAD AL-DIN, *Conquête de la Syrie et de la Palestine par Saladin*, trans. H. Massé (Paris, 1972).

INNOCENT III, *Selected Letters of Pope Innocent III concerning England*, ed. C. R. Cheney and W. H. Semple (London, 1953).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d. H. E. Mayer (Stuttgart, 1962).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in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the Reign of Richard I*, i, ed. W. Stubbs (RS, 1864). English trans. by Helen Nicholson,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Ashgate, 1997).

JAQUES DE VITRY, *History of Jerusalem*.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N. de Wailly (Paris, 1868). English trans. M. R. B. Shaw,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Harmondsworth, 1963).

JOCELIN OF BRAKELOND, *The Chronicle of Jocelin of Brakelond*, ed. H. E. Butler (London, 1949).

JOHN OF SALISBURY,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ed. W. J. Millor, H. E. Butler and C. N. L. Brooke (2 vols, London, 1955–79).

Jordan Fantosme's Chronicle, ed. R. C. Johnston (Oxford, 1981).

LAMBERT OF ARDRES, *Chronique de Guines et d'Ardres*, ed. M. de Godefroy Menilglaise (Paris, 1855).

Magni Rotuli Scaccarii Normanniae, ed. T. Stapleton (2 vols, London, 1840–4).

MAGNUS OF REICHERSBERG, *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 MGH SS xvii.

Der mittenglische Versroman über Richard Löwenherz, ed. K. Brunner (Vienna, 1913).

Œuvres de Rigord et de Guillaume le Breton, ed. H. F. Delaborde, (2 vol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1882–5).

OTTO OF ST BLASIEN, *Chronica*, ed. A. Hofmeister, MGH SRG (1912).

PETER OF EBOLI, *Liber ad honorem Augusti*, ed. G. G. Siragusa (Rome, 1905–6).

Great Roll of the Pipe for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Richard I, ed. J. Hunter (London, 1844); for the rest of the reign, ed. D. M. Stenton (Pipe Roll Society, London, 1925–33).

Radulfi Nigri Chronica, ed. R. Anstruther (London, 1851).

RALPH OF COGGESHALL, *Chronicon Anglicanum*, ed. J. Stevenson (RS, 1875).

RALPH OF DICETO, *Radulfi de Diceto Decani Londiniensis Opera Historica*, ed. W. Stubbs (2 vols, RS, 1876).

Récits d'un ménestrel de Reims, ed. N. de Wailly (Paris, 1876), 41–4; trans. E. N. Stone, *Three Old French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x, Seattle, 1939).

Recueil d'Annales angevines, ed. L. Halphen (Paris, 1903).

Recueil des actes de Philippe Auguste, i and ii, ed. H.-F. Delaborde, C. Petit-Dutaillis and J. Monicat (Paris, 1916–43).

RICHARD OF DEVIZES, *Chronicon*, ed. and trans. J. T. Appleby (London, 1963).

RICHARD THE POITEVIN, *RHF*, xii.

ROBERT OF AUXERRE, *Roberti canonici S. Mariani Autissiodorensis Chronicon*, MGH SS xxvi.

ROBERT OF TORIGNY, *The Chronicle of Robert of Torigni*, in *Chronicles of the Reigns of Stephen, Henry II and Richard I*, ed. R. Howlett, iv (RS, 1889).

ROGER OF HOWDEN, *Chronica*, ed. W. Stubbs (4 vols, RS, 1868–71).

ROGER OF HOWDEN, *Gesta Henrici II et Richardi I*, ed. W. Stubbs, (2 vols, RS, 1867).

ROGER OF WENDOVER, *Flores Historiarum*, iii, ed. H. G. Hewlett (RS, 1886–9).

Romance of Horn, trans. J. Weiss, in *The Birth of Romance* (London, 1992).

Rotuli Chartarum 1199–1216, ed. T. D. Hardy (London, 1837).

RYMER, T., *Foedera, Conventiones, Litterae*, i, part 1, ed. A. Clarke and J. Caley (London, 1816).

SALIMBENE DE ADAM, *Cronica*, ed. G. Scalia (Bari, 1966).

TARDIF, *Coutumiers I*, i.108.

TEULET, A., *Layettes du trésor des Chartes*, i (Paris, 1863).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Marsh lying between the Abbey of Croyland and the Priory of Spalding, 1189–1202’, in D. M. Stenton, *English Justice between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Great Charter 1066–1215* (London, 1965).

Urkundenbuch zur Geschichte der Babenburger in Österreich, ed. H. Fichten

au and E. Zöllner, iv, 1 (Vienna, 1968).

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Courtiers' Trifles*, ed. and trans. M. R. James, C. N. L. Brooke and R. A. B. Mynors (OMT, Oxford, 1983).

Die Werke der Troubadours in provenzalischer Sprache, ed. C. A. F. Mahn, i (Berlin, 1846).

WILLIAM OF NEWBURGH, *Historia Rerum Anglicarum*, ed. R. Howlett, i in *Chronicles of the Reigns of Stephen, Henry II and Richard I*, i and ii (RS, 1884).

II 研究论著部分

ABULAFIA, D., *The Two Italies* (Cambridge, 1977).

AHLERS, J., *Die Welfen und die Englischen Könige 1165–1235* (Hildesheim, 1987).

AILES, A., *The Origins of the Royal Arms of England* (Reading, 1982).

ANDRIEU, J., *Histoire de l'Agenais* (Agen, 1893).

APPLEBY, J. T., *England without Richard* (London, 1965).

ARBELLOT, F., *La Vérité sur la mort de Richard Coeur-de-Lion* (Paris, 1878).

ASPERTI, S., 'Miei-sirventes vueilh far dels reis amdos', *Cultura Neolatina*, lviii (1998).

AUBRUN, M., 'Le Prieur Geoffrey du Vigois et sa chronique', *Revue Mabillon*, lviii (1974).

AUDOUIN, E., *Essai sur l'armée royale au temps de Philippe Auguste* (Paris , 1913).

AURELL, M., 'La Cour Plantagenêt: entourage, savoir et civilité',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 'Noblesses et royauté Plantagenêt 1154–1224', in *Noblesses de l'espace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1).

BAAKEN, G., *Die Regesten des Kaiserreich unter Heinrich VI. Regesta Imperii IV/3* (Cologne , 1972).

BALDWIN, J. W., *The Government of Philip Augustus* (Berkeley, California, 1986).

——, 'La Décennie décisive: les années 1190–1203 dans le règne de Philippe Auguste', *Revue historique*, cclxvi (1981).

BARBER, M., 'The Albigensian Crusades: Wars Like Any Other?', in *Dei Gesta per Francos: Crusade Studies in honour of Jean Richard*, ed. M. Barber, B. Z. Kedar and J. Riley-Smith (Aldershot, 2001).

BARBER, R. W., *The Knight and Chivalry* (revised edn, Woodbridge, 1995).

BARBER R. W. and BARKER, J., *Tournaments. Jousts, Chivalry and Pageants in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89).

BARKER, J. R. V., *The Tournament in England 1100–1400* (Woodbridge, 1986).

BARRATT, N., 'The English Revenues of Richard I', *EHR*, cxvi (2001).

——, 'The Revenues of John and Philip Augustus Revisited', in *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s*, ed. S. Church (Woodbridge, 1999).

——, 'The Revenues of King John', *EHR*, cxi (1996).

BARTLETT, R., *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 (Oxford, 2000).

——, *Gerald of Wales 1146–1223* (Oxford, 1982).

——, ‘The Hagiography of Angevin England’,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v (Woodbridge, 1995).

BATES, D.,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mandy c.911–1204’,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in the Middle Ages*, ed. D. Bates and A. Curry (London, 1994).

BAUDRY, M-P., ‘Le Château des Plantagenêt à Niort’, in *Les Fortifications dans les domaines Plantagenêt XIIIe-XIVe siècles*, ed. M-P. Baudry (Poitiers, 2000).

——, *Les Fortifications des Plantagenêt en Poitou, 1154–1242* (Paris, 2001).

BAUTIER, R-H., ‘La Collection de chartes de croisade dite “Collection Courtois”’, 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1956).

——, *La France de Philippe Auguste—Le temps des mutations* (Paris, 1982).

BEC, P., ‘Troubadours, trouvères et espace Plantagenêts’, *CCM*, xxix (1986).

BEECH, G. T., *A Rural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the Gâtine of Poitou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Baltimore, 1964).

BENJAMIN, R., ‘The Angevin Empire’, *History Today*, xxxvi (February, 1986).

——, ‘A Forty Years War: Toulouse and the Plantagenets, 1156–96’, *Historical Research*, lxi (1988).

BENTON, J. F. ‘The Court of Champagne as a Literary Center’, *Speculum*, x

xxvi (1961).

BERESFORD, M.,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Gloucester, 1988).

BEZZOLA, R. R., *Les Origin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 en occident*, Part 3, *La Société courtoise* (2 vols.).

BILLORE, M., 'La Noblesse Normande dans l'entourage des Plantagenêt',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BISSON, T. N., *The Medieval Crown of Aragon* (Oxford, 1986).

BOSWELL, J.,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Chicago, 1980).

BOURGAIN, P., 'Aliénor d'Aquitaine et Marie de Champagne mises en cause par André le Chapelain', *CCM*, xxix (1986).

BOUSSARD, J., *Le Comté d'Anjou sous Henri Plantagenêt et ses fils 1151–1204* (Paris, 1938).

——, *Le Gouvernement d'Henri II Plantagenêt* (Paris, 1956).

——, 'Philippe Auguste et les Plantagenêts', in *La France de Philippe Auguste: le temps de mutations*, ed. R. H. Bautier (Paris, 1982).

BRADBURY, J.,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1223* (London, 1998).

BRIDGE, A., *Richard the Lionheart* (London, 1989).

BROUGHTON, B. B., *The Legends of King Richard I* (The Hague, 1966).

BROWN, R. A., *English Castles* (London, 1954).

——, 'Royal Castle-Building in England 1154–1216', *EHR*, lxx (1955), 353–98.

- BRUNDAGE, J. A., *Richard Lionheart* (New York, 1974).
- CARPENTER, D. A., 'Abbot Ralph of Coggeshall's Account of the Last Years of King Richard and the First Years of King John', *EHR*, cxiii (1998).
- , 'The Decline of the Curial Sheriff in England, 1194–1258', *EHR*, xci (1976).
- , *The Reign of Henry III* (London, 1996).
- CARPENTIER, E., 'Les Historiens royaux et le pouvoir Capétien', in *L'Histoire médiévale en Europe* (Paris, 1991).
- CHAMBERS, F. M., 'Some Legends concerning Eleanor of Aquitaine', *Speculum*, xvi (1941).
- CHAOU, A., 'Arturus redivivus: royauté arthurienne et monarchie politique à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199', in *Noblesses de l'espace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1).
- CHAUVENET, F., 'L'Entourag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en Poitou Aquitaine',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 CHENEY, C. R., *From Becket to Langton: English Church Government 1170–1213* (Manchester, 1956).
- , *Hubert Walter* (London, 1967).
- CHURCH, S., *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s* (Woodbridge, 1999).
- CLEMENTI, D., 'The Circumstances of Count Tancred's Accession to the Kingdom of Sicily', in *Mélanges Antonio Marongiu* (Palermo, 1967).
- , 'Some Unnoticed Aspects of the Emperor Henry VI's Conquest of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xxxvi (1954).

- CLOULAS, I., 'Le Douaire de Bérengère de Navarre, veuv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et sa retraite au Mans',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 COLKER, M. L.,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Leaf of Ambroise's *L'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Revue d'histoire des textes*, xxii (1992).
- COLLET, J-P., 'Le Combat politique des Plantagenêt en Aquitaine: l'exemple des viscomtes de Thouars (1158–1199)', in *Noblesses de l'espace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 2001).
- CONTAMINE, P., 'L'Armée de Philippe Auguste', in *La France de Philippe Auguste: le temps de mutations*, ed. R-H.Bautier (Paris, 1982).
- CORNER, D., 'The Earliest Surviving Manuscripts of Roger of Howden's *Chronica*', *EHR*, xcvi (1983).
- , 'The *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 and *Chronica* of Roger, Parson of Howden', *BIHR*, lvi (1983).
- CORVISIER, C., 'Château-Gaillard et son donjon. Une Oeuvre expérimental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Les Fortifications dans les domaines Plantagenêt XIIe-XIVe siècles*, ed. M-P. Baudry (Poitiers, 2000).
- COULSON, C., 'Fortress Policy in Capetian Tradition and Angevin Practice. Aspects of the Conquest of Normandy by Philip II', *ANS*, vi (1983).
- CROSLAND, J., *William the Marshal* (London, 1962).
- CROUCH, D., *William Marshal* (London, 1990).
- CRUMP, J. J., 'The Mortimer Fami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rch',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VI* (Woodbridge, 1997).
- CSENDES, P., *Heinrich VI* (Darmstadt, 1993).

- DANIEL, S., *The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 (London, 1621).
- DEBORD, A., *La Société laïque dans les pays de la Charente X-XII siècles* (Paris, 1984).
- DEPT, G. G., *Les Influences anglaise et française dans le comté de Flandres* (Ghent, 1928).
- DEVAILLY, G., *Le Berry du Xe siècle jusqu'au milieu du XIIe siècle* (Paris 1973).
- DION, R.,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59).
- DOBSON, R. B., *The Jews of Medieval York and the Massacre of March 1190* (Borthwick Papers, xlv, York, 1974).
- DOUIE, D. L., *Archbishop Geoffrey Plantagenet and the Chapter of York* (York, 1960).
- DRONKE, P., *The Medieval Lyric* (2nd edn, London, 1978).
- DUBY, G., *William Marshal. The Flower of Chivalry* (London, 1986).
- , *The Legend of Bouvines* (Berkeley, 1990).
- DU GARDE PEACH, L., *Richard the Lionheart* (Ladybird History Book, London, 1965).
- DUNBABIN, J.,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2nd edn, Oxford, 1999).
- DUNCAN, A. A. M., 'Roger of Howden and Scotland, 1187–1201', in *Church, Chronicle and Learning in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Scotland*, ed. B. E. Crawford (Edinburgh, 1999).
- EDBURY, P., *The Kingdom of Cyprus and the Crusades 1191–1374* (Cambri

dge, 1991).

——, ‘The Lyon *Eracles* and the Old French Continuations of William of Tyre’, in *Montjoie: Studies in Crusade History in Honour of Hans Eberhard Mayer*, ed. B. Kedar, J. Riley-Smith and R. Hiestand (Aldershot, 1997).

——, ‘The Templars in Cyprus’, in *The Military Orders: 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ed. M. Barber (Aldershot, 1994).

EDWARDS, C., ‘The Magnanimous Sex-Object: Richard the Lionheart in the Medieval German Lyric’, in *Courtly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ontext*, ed. K. Busby and E. Kooper, (Utrecht Publication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xxv, Amsterdam, 1990).

EICKELS, K. VAN, ‘“Homagium” and “Amicitia”: Rituals of Peace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Anglo-French Negotiation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Francia*, xxiv/i (1997).

EVERARD, J., ‘The Justiciarship in Brittany and Ireland under Henry II’, *AN S*, xx (1997).

EVERARD, J. A., *Brittany and the Angevins: Province and Empire 1158–1203* (Cambridge, 2000).

——, ‘Lands and Loyalties in Plantagenet Brittany’, in *Noblesses de l’espace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1).

FAGNEN, C., ‘Le Vocabulaire du pouvoir dans les actes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duc de Normandie’, in *Actes du cent cinquièm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Caen 1980* (Paris, 1984).

FALMAGNE, J., *Baudouin V, comte de Hainaut 1150–95* (Montreal, 1966).

FAVREAU. R., 'Les Débuts de la ville de la Rochelle', *CCM*, xxx (1987).

FAVREAU-LILIE, M-L., *D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Amsterdam, 1989)

.

FICHTENAU, H., 'Akkon, Zypern und das Lösegeld für Richard Löwenherz', *Archiv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cxxv (1966).

FLANAGAN, M. T., *Irish Society, Anglo-Norman Settlers, Angevin Kingship* (Oxford, 1989).

FLORI, J., *Richard Coeur de Lion. Le Roi-chevalier* (Paris, 1999).

FOREY, A. J., 'The Military Order of St Thomas at Acre', *EHR*, xcii (1977).

FRANCE, J., *Victory in th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 (Cambridge, 1994).

——, *Western Warfar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1000–1300* (London, 1999).

FREYTAG, H-J., 'Der Nordosten des Reiches nach dem Sturz Heinrichs des Löwen', *DA*, xxv (1954).

GALBRAITH, V. H., 'Good and Bad Kings in History', *History*, xxx (1945).

GIBB, H. A. R., 'The Arabic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Saladin', *Speculum*, xxv (1950).

GILLINGHAM, J., *The Angevin Empire* (2nd edn, London, 2001).

——, 'The Art of Kingship: Richard I', *History Today*, xxxv (April, 1985);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Conquering Kings: Some Twelfth-Century Reflections on Henry II and Richard I', in *Warriors and Churchme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Essays*

- ys Presented to Karl Leyser*, ed. T. Reuter (London, 1992),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Henry II, Richard I and the Lord Rhys’, *Peritia: Journal of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Ireland*, x (1996), 225–36, repr. in J. Gillingha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Woodbridge, 2000).
- , ‘Historians without Hindsight: Coggeshall, Diceto and Howden on the Early Years of John’s Reign’, in *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s*, ed. S. Church (Woodbridge, 1999).
- , *Richard Coeur de Lion. Kingship, Chivalry and War in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94).
- , ‘Richard I and Berengaria of Navarre’, *BIHR*, liii (1980),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Richard and the Scienc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in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ssays in Honour of J. O. Prestwich*, ed. J. Gillingham and J. C. Holt (Woodbridge, 1984),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Richard I, Galley-Warfare and Portsmouth: the Beginnings of a Royal Navy’,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VI*, ed. M. Prestwich, R. H. Britnell and R. Frame (Woodbridge, 1997).
- , *Richard the Lionheart* (2nd edn, 1989).
- , ‘Roger of Howden on Crusade’, in *Medieval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Christian and Islamic Worlds*, ed. D. O. Morgan (London, 1982),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Royal Newsletters. Forgeries and English Historians: Some Links between Court and History in the Region of Richard I’, in *La Cour Plantag*

- 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 , ‘Some Legends of Richard the Lionheart: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fluence’, in *Riccardo Cuor di Leone nella storia e nella leggend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roblemi attuali di scienza e di cultura, cccliii, 1981),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The Travels of Roger of Howden and his Views of the Irish, Scots and Welsh’, *ANS*, xx (1998), repr. in Gillingham, J.,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Woodbridge, 2000).
- , ‘The Unromantic Death of Richard I’ *Speculum*, liv (1979),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War and Chivalry in the 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II*, ed. P. R. Coss and S. D. Lloyd (Woodbridge, 1988)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 , ‘William of Newburgh and Emperor Henry VI’, in *Auxilia Historica. Festschrift für Peter Acht zum 90. Geburtstag*, ed. W. Koch, A. Schmid and W. Volkert (Munich, 2001).
- GOLB, N., *The Jews in Medieval Normandy* (Cambridge, 1998).
- GOSSE-KISCHINEWSKI, A., ‘La fondation de L’abbaye de Bonport’, *Connnaissance de l’Eure*, lxxxix-xc (1993).
- GRANSDEN, A.,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c.550–c.1307* (London, 1974).
- GRANT, L., ‘Gothic Architecture in Normandy, c.1150–c.1250’ (unpub.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6).
- GREEN, J., ‘The Lords of the Norman Vexin’ in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 Middle Ages*, ed. J. Gillingham and J. C. Holt (Woodbridge, 1984).
- GROUSSET, R., *Histoire des croisades*, iii (Paris, 1936).
- HAJDU, R., 'Castles, Castel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Poitou 1152–1271', *JMH*, iv (1978).
- HALLAM, E. M., 'Aspects of the Monastic Patronage of the English and French Royal Houses c.1130–1270' (unpub.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6).
- , *Capetian France 987–1328* (London, 1980).
- , 'Henry II, Richard I and the Order of Grandmont', *JMH*, i (1975).
- , 'Royal Burial and the Cult of Kingship in France and England, 1060–1330', *JMH*, viii (1982).
- HARVEY, J. H., *The Plantagenets* (London, 1948).
- HEISER, R., 'The Extent of the Lionheart's Folly: Richard I's Arrangements for Count John and Archbishop Geoffrey prior to the Third Crusade',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xliii (1999).
- , 'Richard I and His Appointments to English Shrievalties', *EHR*, cxii (1997).
- , 'The Royal *Familiares* of King Richard I', *Medieval Prosopography*, x (1989).
- , 'The Sheriffs of Richard I: Trends of Management as Seen in the Shrieval Appointments from 1189 to 1194', *HSJ*, iv (1992).
- , 'The Sheriffs of Richard Lionheart: A Prosopographical Survey of Appointments, Politics and Patronage, 1189–99' (unpub. Ph. D., thesi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93).

HIGOUNET, C., *Bordeaux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Bordeaux, 1963).

——, ‘La Rivalité des maisons de Toulouse et de Barcelone pour la prépondérance méridionale’, in *Mélanges d’histoire du moyen âge dédiés à la mémoire de Louis Halphen* (Paris, 1951).

HILL, G., *A History of Cyprus*, i (Cambridge, 1940).

HIVERGNEAUX, M., ‘Aliénor d’Aquitaine: le pouvoir d’une femme à la lumière de ses chartes’,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HOFFMAN, H., ‘Französische Fürstenweihen des Hochmittelalters’, *Deutsches Archiv*, xviii (1962).

HOHLER, C., ‘A Note on Jacobu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 xxxv (1972).

HOLT, J. C., ‘Aliénor d’Aquitaine, Jean sans Terre et la succession de 1199’, *CCM*, xxix (1986).

——, ‘The End of the Anglo-Norman Real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i (1975), repr. in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 *King John* (London, 1963) repr. in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 ‘The Loss of Normandy and Royal Finance’, in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d. J. Gillingham and J. C. Holt (London, 1984).

——,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London, 1985).

——, *The Northerners* (Oxford, 1961).

——, ‘Richardus rex Anglorum et dux Normannorum’, in *Riccardo Cuor di*

Leone nella storia e nella leggend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roblemi attuali di scienza e di cultura, xxliii, 1981), repr. in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HOLT, J. C. AND MORTIMER, R., *Handlist of the Acta of Henry II and Richard I in British Repositories* (London, 1986).

HOOK, D., 'The Figure of Richard I in Medieval Spanish Literature',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L. Nelson (London, 1992).

HUCKER, B. U., 'Die Chronik Arnolds von Lübeck als "Historia Regum"', *DA*, xliv (1988).

——, *Kaiser Otto IV* (Hanover, 1990).

HYAMS, P., 'What Did Henry III of England Think about in Bed and in French about Kingship and Anger?', in *Anger's Past*, ed. B. Rosenwein (Ithaca, New York, 1998).

JAEGER, C. S., *Ennobling Love: In Search of a Lost Sensibility* (Philadelphia, 1999).

JAMISON, E. M.,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London, 1957).

JONES, M. H., 'Richard the Lionheart i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L. Nelson (London, 1992).

JORDAN, K., *Henry the Lion* (Oxford, 1986).

KEDAR, B. Z., 'The Battle of Hattin Revisited', in *The Horns of Hattin*, ed. B. Z. Kedar (London, 1992).

——, 'The Patriarch Eraclius', in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

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 Prawer, ed. B. Z. Kedar, H. E. Mayer and R. C. Smail (Jerusalem, 1982).

KEEFE, T. K., Proffers for Heirs and Heiresses in the Pipe Rolls: Some Observations on Indebtedness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Magna Carta (1180–1212), *HSJ*, v (1993).

KEEN, M., *Chivalry* (London, 1984).

KESSLER, U., *Richard I. Löwenherz. König, Kreuzritter, Abenteurer* (Graz, 1995).

KIBLER, W. W., *Eleanor of Aquitaine: Patron and Politician* (Austin, Texas, 1976).

KÖHLER, M. A., *Allianzen und Verträge zwischen fränkischen und islamischen Herrschern im Vorderen Orient* (Berlin, 1991).

LABANDE, E-R., 'Pour une Image véridique d'Alienor d'Aquitain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l'ouest* 4th series, ii (1952).

LABORDERIE, O. DE, 'Richard the Lionheart and the birth of a national cult of St George in England: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legend',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xxxix (1995).

——, 'Du Souvenir à la réincarnation: l'image de Richard Coeur de Lion dans la Vie et Mort du Roi Jean de William Shakespeare',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L. Nelson (London, 1992).

LANDON, L., *Itinerary of King Richard I* (London: Pipe Roll Society, new series, xiii, 1935).

LATIMER, P., 'The English Inflation of 1180–1220 Reconsidered', *Past and Present*, clxxi (2001).

- LEES, B., 'The Letters of Queen Eleanor of Aquitaine to Pope Celestine III', *EHR*, xxi (1906).
- LEJEUNE, R., 'Le Rôle littéraire d'Alienor d'Aquitaine', *Cultura Neolatina*, xiv (1954).
- , 'Le Rôle littéraire de la famille d'Alienor d'Aquitain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i (1958).
- LEPAGE, Y. G., 'Richard Coeur de Lion et la poésie lyrique', in *Et c'est la fin pour quoy sommes ensemble: hommage à Jean Dufournet II* (Paris, 1993).
- LE PATOUREL, J., 'The Plantagenet Dominions', *History*, l (1965).
- LEWIS, B., *The Assassins* (London, 1967).
- LEYSER, K., 'The Angevin Kings and the Holy Man', in *St Hugh of Lincoln*, ed. H. Mayr-Harting (Oxford, 1987).
- , 'Frederick Barbarossa, Henry II and the Hand of St James', *EHR*, xc (1975).
- LLOYD, J. E., *History of Wales* (3rd edn, London, 1939).
- LLOYD, S.,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216–1307* (Oxford, 1988).
- LLOYD, T. H., *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77).
- LYONS M. C. and JACKSON, D. E. P., *Saladin.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War* (Cambridge, 1982).
- MCCASH, J. M. H., 'Marie de Champagne and Eleanor of Aquitaine: a Relationship Re-examined', *Speculum*, liv (1979).

MARKOWSKI, M., 'Richard Lionheart: Bad King, Bad Crusader?', *JMH*, xxiii (1997).

MARTINDALE, J., "'Cavalaria et Orgueil" Duke William IX of Aquitaine and the Historian', in *The Ideals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Knighthood*, ii,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1988), repr. in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 'Eleanor of Aquitaine'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L. Nelson (London, 1992), repr. in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Aquitaine and France, 9th to 12th Centuries* (Aldershot, 1997).

——, 'Succession and Politics in the Romance-speaking World c.1000–1140', in *England and her Neighbours: Essays in Honour of Pierre Chaplais*, ed. M. Jones and M. Vale, (London, 1989), repr. in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 'The Sword on the Stone: Some Resonances of a Medieval Symbol of Power', *ANS*, xv (1993).

——. "'An unfinished business": Angevin Politics and the Siege of Toulouse, 1159', *ANS*, xxiii (2000).

MASON, E., "'Rocamadour in Quercy above All Other Churches": the Healing of Henry II', in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xix, ed. W. Sheils (Oxford, 1982).

MATTHEW, 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Cambridge, 1992).

MAYER, H. E., *The Crusades* (2nd edn, Oxford, 1988).

- , ‘A Ghost Ship called Frankenef: King Richard I’s German Itinerary’, *EHR* (forthcoming)
- , ‘Henry II of England and the Holy Land’, *EHR*, xcvi (1982).
- , *Die Kanzlei der lateinischen Könige von Jerusalem* (2 vols, Hannover, 1996).
- , ‘Die Kanzlei Richards I von England auf dem Dritten Kreuzzu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lxxxv (1977).
- MAYER H. E., and FAVREAU, M. L., ‘Das Diplom Balduins I. für Genua und Genuas goldene Inschrift in der Grabeskirche’,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 lv/lvi (1976).
- MESQUI, J., ‘Les Tours à archères dans le domaine Plantagenêt français 1160–1205’, in *Les Fortifications dans les domaines Plantagenêt XIIe-XIVe siècles*, ed. M-P. Baudry (Poitiers, 2000).
- MÖHRING, H., *Saladin und der dritte Kreuzzug* (Wiesbaden, 1980).
- MONNA, A. D. A., ‘Diagnose van een omstreden 13e eeuwse kalender uit de Servaasabdij te Utrecht’,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de Katholieke Kerk in Nederland*, xxv (1983).
- MOORE, O. H., *The Young King Henry Plantagenet 1155–1183 i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 (Columbus, Ohio, 1925).
- MOSS, V., ‘The Defence of Normandy 1193–98’, *ANS*, xxiv (2001).
- , ‘The Norman Fiscal Revolution 1193–98’, in *Crisis, Revolutions and Self-Sustained Fiscal Growth*, ed. R. Bonney and M. Ormrod (Stamford, 1999).

- , ‘Normandy and England in 1180: the Pipe Roll Evidence’,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in the Middle Ages*, ed. D. Bates and A. Curry (London, 1994).
- , ‘Normandy and the Angevin Empire. A Study of the Norman Exchequer Rolls 1180–1204’ (unpub. University of Wales Ph. D. thesis, 1996).
- MURRAY, A. V. ‘Richard the Lionheart, Otto of Brunswick and the Earl of York: Northern England and the Angevin Succession. 1190–91’, *Medieval Yorkshire*, xxiii (1994).
- NELSON, J. L., ed.,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London, 1992).
- NORGATE, K., *England under the Angevin Kings* (2vols, London, 1887).
- , *John Lackland* (London, 1902).
- , *Richard the Lionheart* (London, 1924).
- NORWICH, J. J., *The Kingdom in the Sun* (London, 1970).
- NOWELL, C. E., ‘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Speculum*, xxii (1947).
- ORME, N., *From Childhood to Chivalry. The Education of the English Kings and Aristocracy 1066–1530* (London, 1984).
- OWEN, D. D. R., *Eleanor of Aquitaine* (Oxford, 1993).
- PACAUT, M., *Louis VII et son royaume* (Paris, 1964).
- PAINTER, S., ‘The Houses of Lusignan and Châtellerauld, 1150–1250’, *Speculum*, xxx (1955).
- , ‘The Lords of Lusigna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Speculum*, xxxii (1957).

——, *William Marshal* (Baltimore, 1933).

PARTNER, N., *Serious Entertainment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1977).

PATERSON, L., 'Military Surgery: Knights, Sergeants, and Raimon of Avignon's Version of the *Chirurgia* of Roger of Salerno (1180–1209)', in *The Ideals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Knighthood II*,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1988).

PATIER, P., *Le Siège de Chalus-Chabrol par le Roy Richard Coeur de Lion, l'an 1199. Étude des deux châteaux de chalus* (Limoges, 1973).

PHILLIPS, J., *Defenders of the Holy Land* (Oxford, 1996).

PITTE, D., *Château-Gaillard* (Vernon, France, 1996).

——, 'Château-Gaillard dans la défense de la Normandie orientale 1196–1204', *ANS*, xxiv (2001).

POOLE, A. L., *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2nd edn, Oxford, 1955).

——, 'Richard the First's Alliances with the German Princes in 1194', in *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F. M. Powicke*, ed. R. W. Hunt, W. A. Pantin and R. W. Southern (Oxford, 1948).

POWER, D., 'L'Aristocratie Plantagenêt face aux conflits capétiens-angevins : l'exemple du traité de Louviers', in *Noblesses de l'espace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1).

——, 'Between the Angevin and Capetian Courts: John de Rouvray and the Knights of the Pays de Bray, 1180–1225', in *Family Trees and the Roots of Politics*, ed. K. S. B. Keats-Rohan (Woodbridge, 1997).

——, ‘What Did the Frontier of Angevin Normandy Comprise?’, *ANS*, xvii (1994).

POWICKE, F. M., *The Loss of Normandy* (2nd edn, Manchester, 1961).

PRAWER, J., *Histoire du royaume latin de Jérusalem* (2 vols, Paris, 1969–70).

——,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972).

PRESTWICH, J. O., ‘Military Intelligence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in *Law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Normandy*, ed. G. Garnett and J. Hudson (Cambridge, 1994).

——, ‘Mistransl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Medieval English History’, *Peritia: Journal of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Ireland*, x (1996).

——, ‘Richard Coeur de Lion: *Rex Bellicosus*’, in *Riccardo Cuor di Leone nella storia e nella leggend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roblemi attuali di scienza e di cultura, ccliii, Rome, 1981); repr. in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ed. J. L. Nelson (London, 1992).

PRINGLE, D., ‘King Richard I and the Walls of Ascalon’,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 cxvi (1984).

——, ‘Templar Castles between Jaffa and Jerusalem’, in *The Military Orders: Welfare and Warfare*, ed. H. Nicholson (Aldershot, 1998).

PRYOR, J. H.,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QUELLER, D. E., *The Fourth Crusade* (Leicester, 1978).

RAMSAY, J. H., *The Angevin Empire* (London, 1903).

REGAN, G., *Lionhearts. Saladin and Richard I* (London, 1998).

RENOUARD, Y., *É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Paris, 1968).

RICHARD, A., *Histoire des comtes de Poitou 778–1204* (2 vols, Paris, 1903)

.

RICHARD, J., *The Crusades c.1071–c.1291* (Cambridge, 1999).

——,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979).

——, 'Les Révoltes chypriotes de 1191–1192 et les inféodations de Guy de Lusignan', in *Monotjoie: Studies in Crusade History in Honour of Hans Eberhard Mayer*, ed. B. Kedar, J. Riley-Smith and R. Hiestand (Aldershot, 1997).

RICHARDSON, H. G., *The English Jewry under Angevin Kings* (London, 1960).

——, 'The Letters and Charters of Eleanor of Aquitaine', *EHR*, lxxiv (1959).

RICHARDSON, H. G. and SAYLES, G. O., *The Governance of Medieval England* (Edinburgh, 1963).

RILEY-SMITH, J., *The Feudal Nobility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1174–1277* (London, 1973).

——,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c.1050–1310* (London, 1967).

RODGER, N. A. M., *The Safeguard of the Sea* (London, 1997).

ROGERS, R., *Latin Siege Warfa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Oxford, 1992).

RUNCIMAN, S.,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iii (Cambridge, 1954).

SAYERS, J., 'English Charters from the Third Crusade', in *Tradition and Change. Essays in Honour of Marjorie Chibnall*, ed. D. Greenway (Cambridge, 1997).

dge, 1985).

SCAMMELL, G. V., *Hugh du Puiset* (Cambridge, 1956).

SCHMANDT, R. H., 'The Elec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Albert of Louvain, Bishop of Liège 1191–2', *Speculum*, xlii (1967).

SIBERRY, E., *Criticism of Crusading 1095–1274* (Oxford, 1985).

SMAIL, R. C., *Crusading Warfare 1097–1196* (Cambridge, 1956).

——,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150–92',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ands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ed. P. M. Holt (Warminster, 1978).

——, 'The Predicaments of Guy de Lusignan, 1183–87', in *Outremer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 Prætor*, ed. B. Z. Kedar, H. E. Mayer and R. C. Smail (Jerusalem, 1982).

.

SPEAR, D., 'The Norman Empire and the Secular Clergy, 1060–1204',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xxi (1982).

——, 'Power, Patronage and Personality in the Norman Cathedral Chapters, 911–1204', *ANS*, xx (1997).

SPETIA, L., 'Riccardo Cuor di Leone tra oc e oïl', *Cultura Neolatina*, lxi (1996).

SPUFFORD, P.,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1988).

STENTON, D. M., 'Roger of Howden and "Benedict"', *EHR*, lxxviii (1953).

STRICKLAND, M., *War and Chivalry. 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 (Cambridge, 1996).

——, ed., *Anglo-Norman Warfare* (Woodbridge, 1992).

——, ‘Provoking or Avoiding Battle? Challenge, Judicial Duel, and Single Combat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Warfare’, in *Armies, Chivalry and Warfare in Medieval Britain and France*, ed. M. Strickland (Stamford, 1998).

STUBBS, W.,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to the Rolls Series*, ed. A. Hassall (London, 1902).

THOMAS, H., ‘Portrait of a Medieval Anti-Semite: Richard Malebisse’, *HSJ*, v (1993).

THOMPSON, K., *Power and Border Lordship in Medieval France: The County of the Perche, 1000–1226* (London, 2002).

TRINADE, A., *Berengaria: In Search of Richard the Lionheart’s Queen* (Dublin, 1999).

TUCOO-CHALA, P., *La Vicomté de Béarn et le problème de sa souveraineté* (Bordeaux, 1961).

TURNER, R. V., ‘Eleanor of Aquitaine and her Children: an Inquiry into Medieval Family Attachment’, *JMH*, xiv (1988).

——, ‘Good or Bad Kingship? The Case of Richard Lionheart’, *HSJ*, viii (1999).

——, ‘The Households of the Sons of Henry II’,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 ‘The Problem of Survival for the Angevin “Empi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 (1995).

——, ‘Richard Lionheart and English Episcopal Elections’, *Albion*, xxix (1997).

7).

——, ‘Richard Lionheart and the Episcopate in His French Domain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xxi (1998).

TURNER, R. V. and HEISER, R. R., *The Reign of Richard Lionheart* (London, 2000).

TYERMAN, C.,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095–1588* (Chicago, 1988).

——, *The Invention of the Crusades* (London, 1998).

VERBRUGGEN, J. F., *The Art of Warfare in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97).

VERYNAUD, G., *Histoire de Limoges* (Limoges, 1973).

VIELLIARD, J., *Le Guide du pèlerin de St Jacques de Compostelle* (Macon, 1938).

VINCENT, N., *Acta of Henry II and Richard I*, part 2 (*List and Index Society*, London, 1996).

——, *Peter des Roches* (Cambridge, 1996).

——, ‘The Poitevins in the Household of Henry II’, in *La Cour Plantagenêt 1154–1224*, ed. M. Aurell (Poitiers, 2000).

——, ‘William Marshal, King Henry II and the Honour of Châteauroux’, *Archives*, xxv (2000).

WARREN, M., ‘Roger of Howden Stirkes Back: Investing Arthur of Brittany with the Anglo-Norman Future’, *ANS*, xxi (1998).

WARREN, W. L., *Henry II* (London, 1973).

——, *King John* (London, 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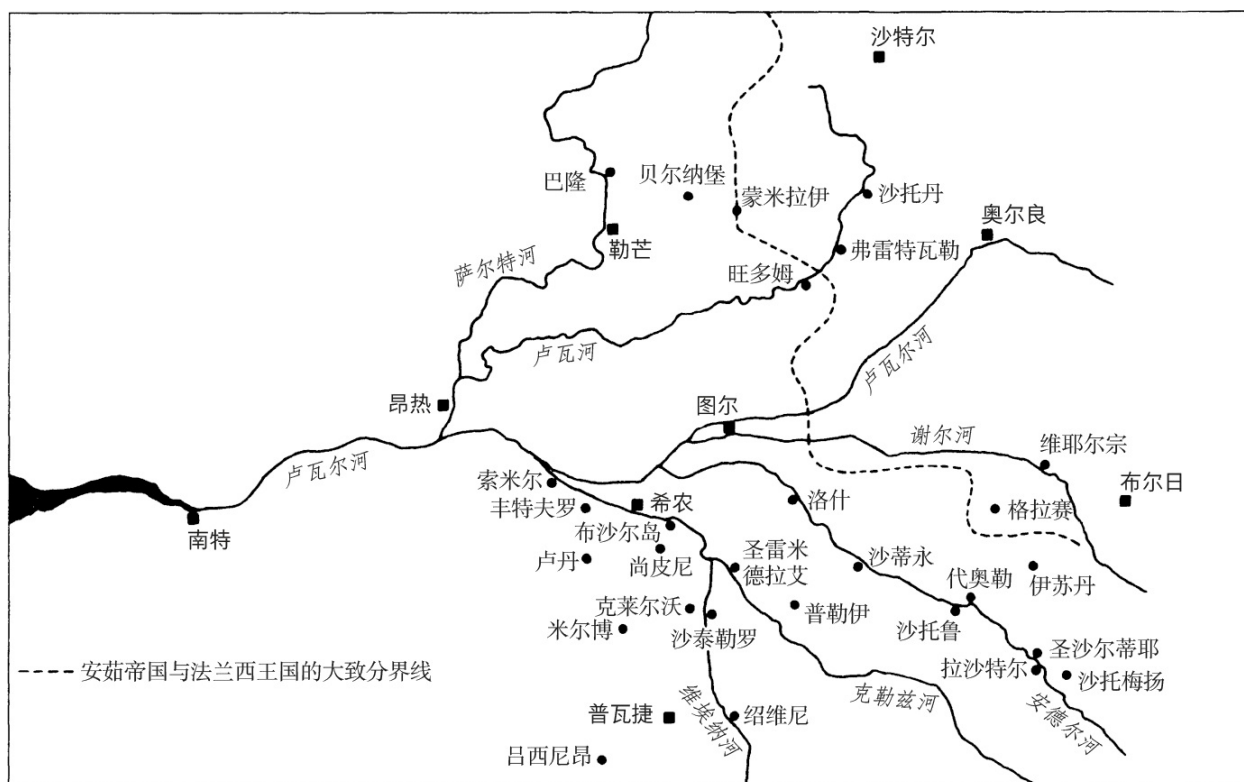
- WATSON, R. C., 'The counts of Angoulême from the ninth century to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unpub.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79).
- WATTENBACH, W. and SCHMALE, F-J.,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im Mittelalter*, i (Darmstadt, 1976).
- WAUGH, S. L., *The Lordship of England: Royal Wardships and Marriages in English Society and Politics 1217–1327* (Princeton, 1988).
- WAY, A., 'Effigy of King Richard Coeur de Lion in the Cathedral of Rouen', *Archaeologia*, xxix (1842).
- WERNER, K. F., 'Andreas von Marchiennes und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Anchin und Marchiennes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2. Jahrhunderts', *DA*, ix (1952).
- , 'Kingdom and Principalities in 12th-Century France', in *The Medieval Nobility*, ed. and trans. T. Reuter (Amsterdam, 1979).
- WEST, F. J., *The Justiciarship in England 1066–1232* (Cambridge, 1966).
- WHITE, S. D., 'The Politics of Anger', in *Anger's Past*, ed. B. H. Rosenwein (Ithaca, New York, 1998).
- YOUNG, C. R., *Hubert Walter, Lord of Canterbury and Lord of England* (Durham, North Carolina, 1968).

理查治下的安茹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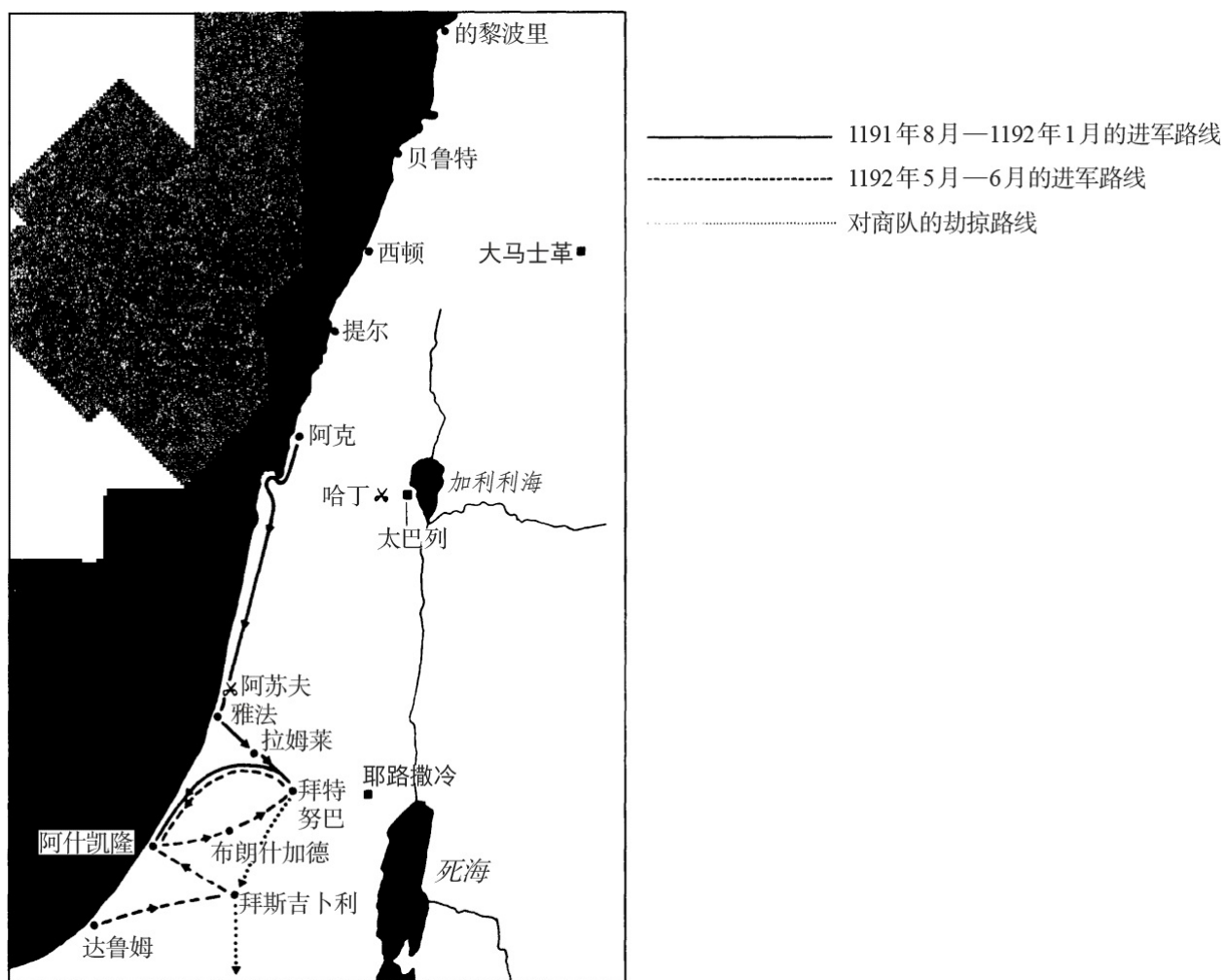
*本书地图均系原书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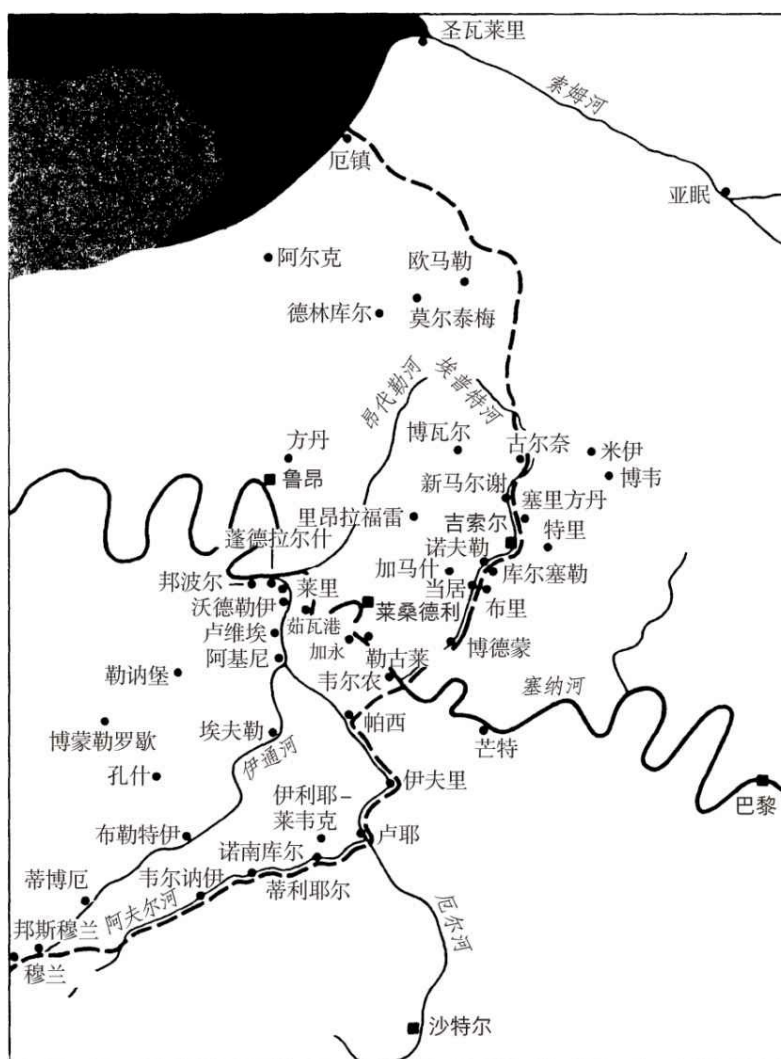
昂古莱姆与利穆赞地区



下卢瓦尔河谷地区



进军耶路撒冷



至1194年3月时被腓力·奥古斯都攻占的地区：

迪耶普 阿尔克 厄镇 欧马勒 莫尔泰梅
 德林库尔 古尔奈 新马尔谢 蓬德拉尔什
 沃德勒伊 卢维埃 莱里 阿基尼 勒讷堡
 埃夫勒 博蒙勒罗歇 孔什 布勒特伊
 蒂利耶尔 诺南库尔 伊利耶-莱韦克
 卢耶 伊夫里 帕西 韦尔农 加永 维克桑

至1195年圣诞节时腓力·奥古斯都占领的地区：

新马尔谢 诺夫勒 吉索尔 当居 加永
 帕西 伊夫里 诺南库尔 韦尔农 加马什

—— 河流
 - - - - - 诺曼底与法兰西王国的边界

东诺曼底地区

出版后记

理查一世可能是1066年威廉征服以来英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君主，也可能是英国历史评价变化幅度最大的国王。

与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理查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英格兰编年史家称他是勇猛的战士，出色的军事家；法兰西人说他是狡猾的骗子、背叛基督教盟友的不义之人；穆斯林认为他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有着出众的勇气和伟大的灵魂”。

在因意外在战场上去世后，理查迅速成了一位传奇君主，骑士精神的代表，典型的骑士国王。14世纪的英格兰史学家将他与亚瑟王、亚历山大、屋大维和查理曼相提并论。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人们对理查的评价出现了反转。休谟和吉本都批评过他；他不会英文，只会法语与奥克语；他身为英格兰君主，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待了6个月；他穷兵黩武，在英格兰征敛了大量钱财用于战争与赎金，却似乎很少关心英格兰的政治。他俨然成为一位不合格的君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约翰·吉林厄姆试图通过整理英格兰、法兰西与穆斯林编年史家留下的记述，还原一位12世纪的国王。他向我们展示了，尽管理查没有将主要精力投入对英格兰的管理，但他通过自己对行政的了解与对身边大臣的洞察，为英格兰选出了几位合格的管理者，使英格兰在他远征时也能得到较好管理。

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大量引用了古法语、奥克语与拉丁语材料，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这些引文的处理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后浪出版公司

2020年4月



左图：理查一世的第一枚国玺的背面。右图：理查一世的第二枚国玺的背面，1198年启用。理查的两枚国玺的背面图案的设计沿用了传统的骑马骑士图案。但这两枚国玺有重大不同。第二个骑士戴着（更先进的）桶盔。最重要的是，第一枚国玺的盾牌图案上是直立单狮，第二枚国玺的盾牌图案上有三头露出正脸向前直走的狮子。理查采用的部分纹章元素（红色，三头露出正脸向前直走的狮子）一直在英国王室纹章中留用至今，并且他是第一位此类英格兰君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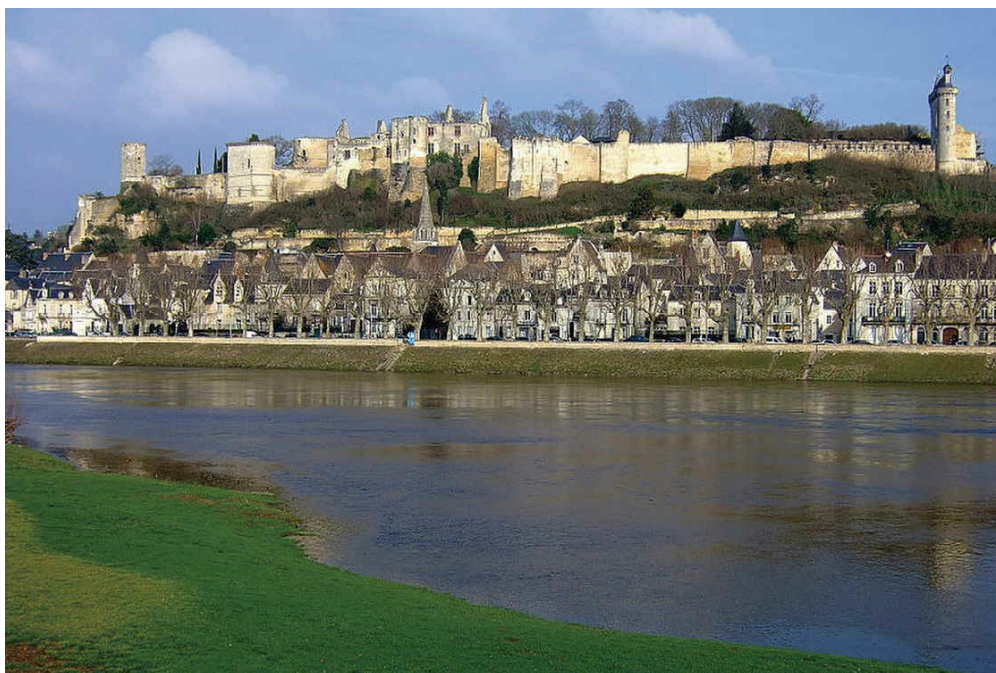
左图：理查一世第二枚国玺的正面。右图：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国玺的正面。武器是英格兰王权象征的一部分，在这枚国玺上，理查的形象遵照了传统，显示了一位坐在王位上的国王，他头戴王冠，手中握着一柄出鞘的剑。相比较而言，腓力遵照的则是卡佩家族的传统。他的国玺上展现的是一位手持权杖的国王——尽管这个更为和平的信息与腓力父亲的政治风格更为契合，而不是他自己的。



一幅16世纪的木版画。理查正从狮子口中掏出狮子的心脏。当然，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夸张的故事，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个故事被一再讲述。



沙吕-沙布洛尔城堡。据当时的地方历史学家贝尔纳·伊捷记述，当理查包围这座小塔时，塔中仅有2名骑士和38名男男女女。



希农。希农城堡和金库曾是法国安茹王室战略中心之一，见证过安茹王朝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安茹和图赖讷地区于1203年落入腓力·奥古斯都之手后，这个位于维埃纳河畔的大型要塞坚守到了1205年。



盖亚尔城堡。俯瞰塞纳河畔的这座岩石城堡的遗迹。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曲线形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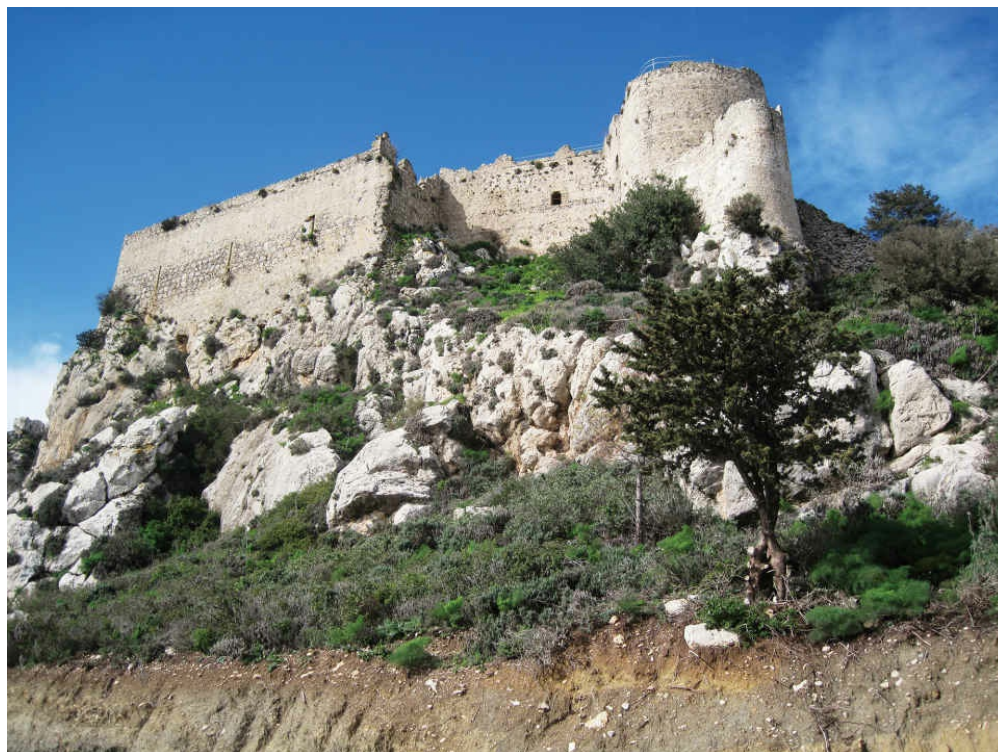


《布永的戈弗雷的故事》中的抛石机。这幅图片生动展现了攻城武器在摧垮高墙和塔楼时的作用，例如，在攻打阿克和达鲁姆的高墙与塔楼时。阿克围城军到底有没有使用图片上这种配重式抛石机，我们并不确定。



卡洛·马洛切蒂制作的理查一世骑马雕塑。首次展示于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它是用青铜雕刻的，后被安放在这个英国历史上的焦点位

置（威斯敏斯特教堂和议会大厦之间的威斯敏斯特宫广场）。



坎塔拉，塞浦路斯。这是位于战略地位重要的凯里尼亚山脉最东端的城堡。据安布鲁瓦兹记述，就是在这里，伊萨克顽强抵抗理查，直至听闻自己的女儿被俘。



亨利皇帝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大型海德堡歌集手抄本》的开篇图片，这反映出亨利六世也有几首自己写的歌曲。

后浪出版公司

弗里德里希 大王

开明专制君主与
普鲁士强国之路

〔英〕蒂莫西·布莱宁——著

TIM
BLANNING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译——栗河冰 成昱臻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大王

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

[英]蒂莫西·布莱宁 著
栗河冰，成昱臻 译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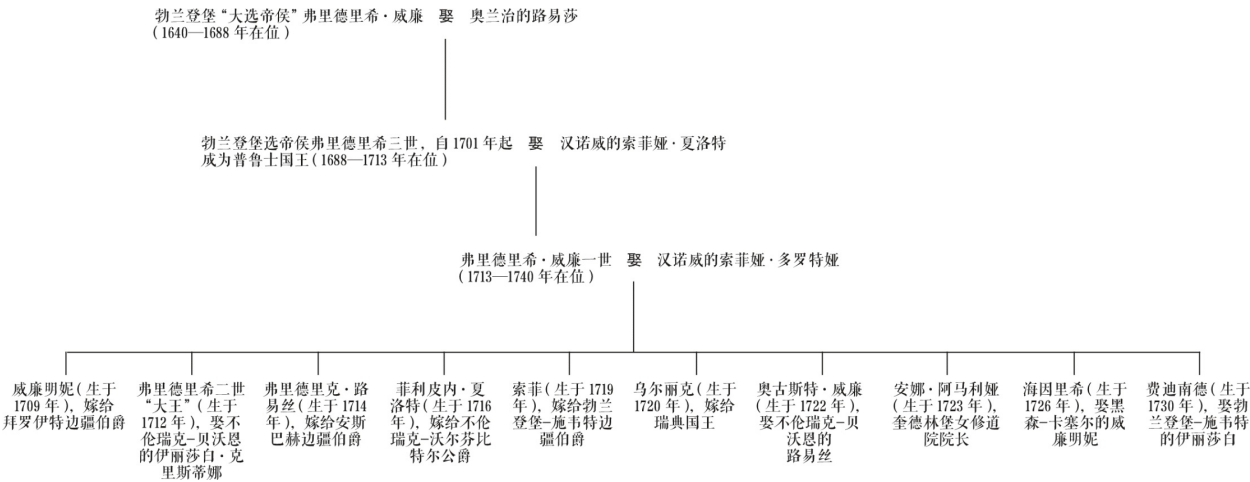
书名：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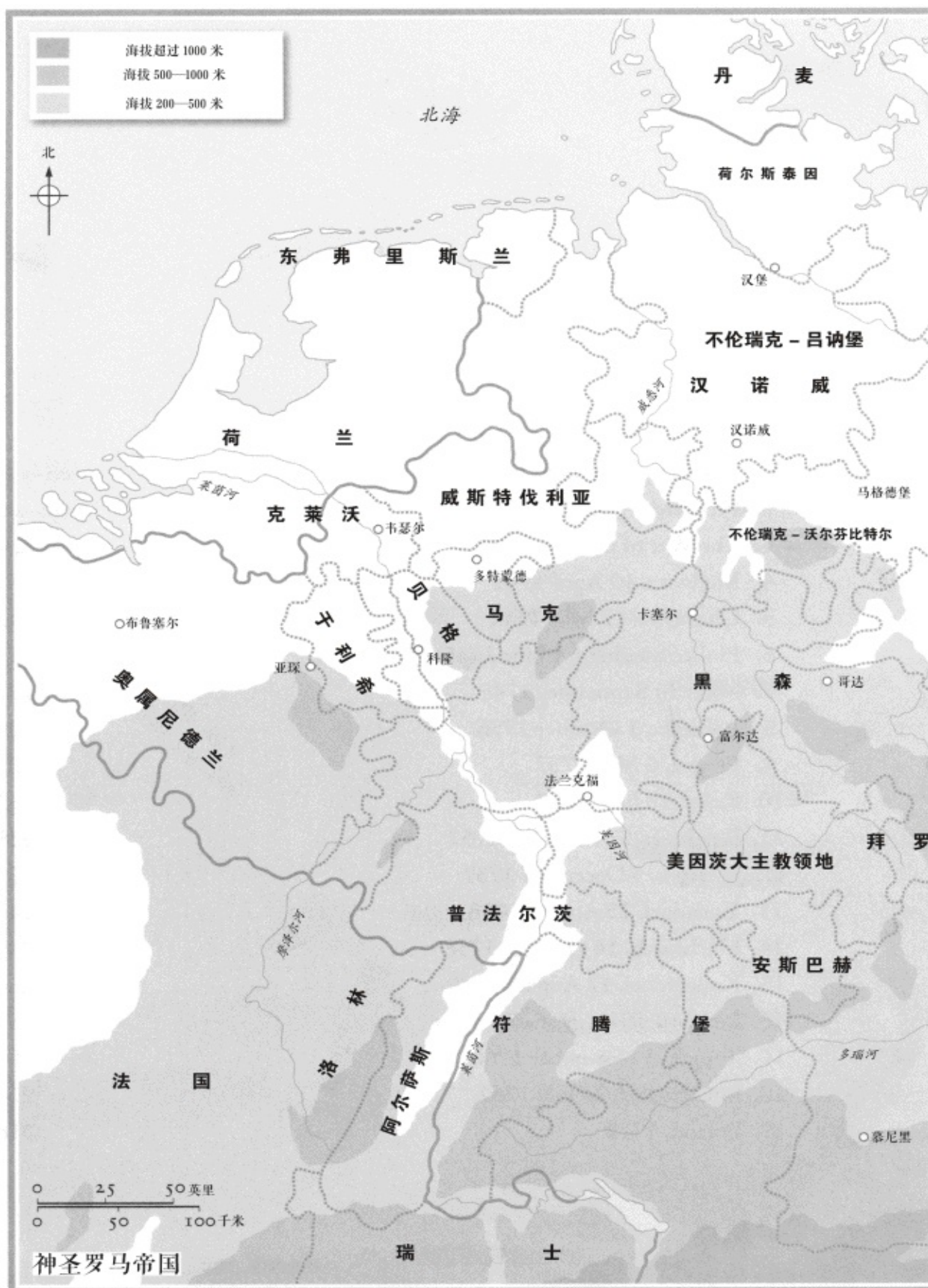
作者：[英]蒂莫西·布莱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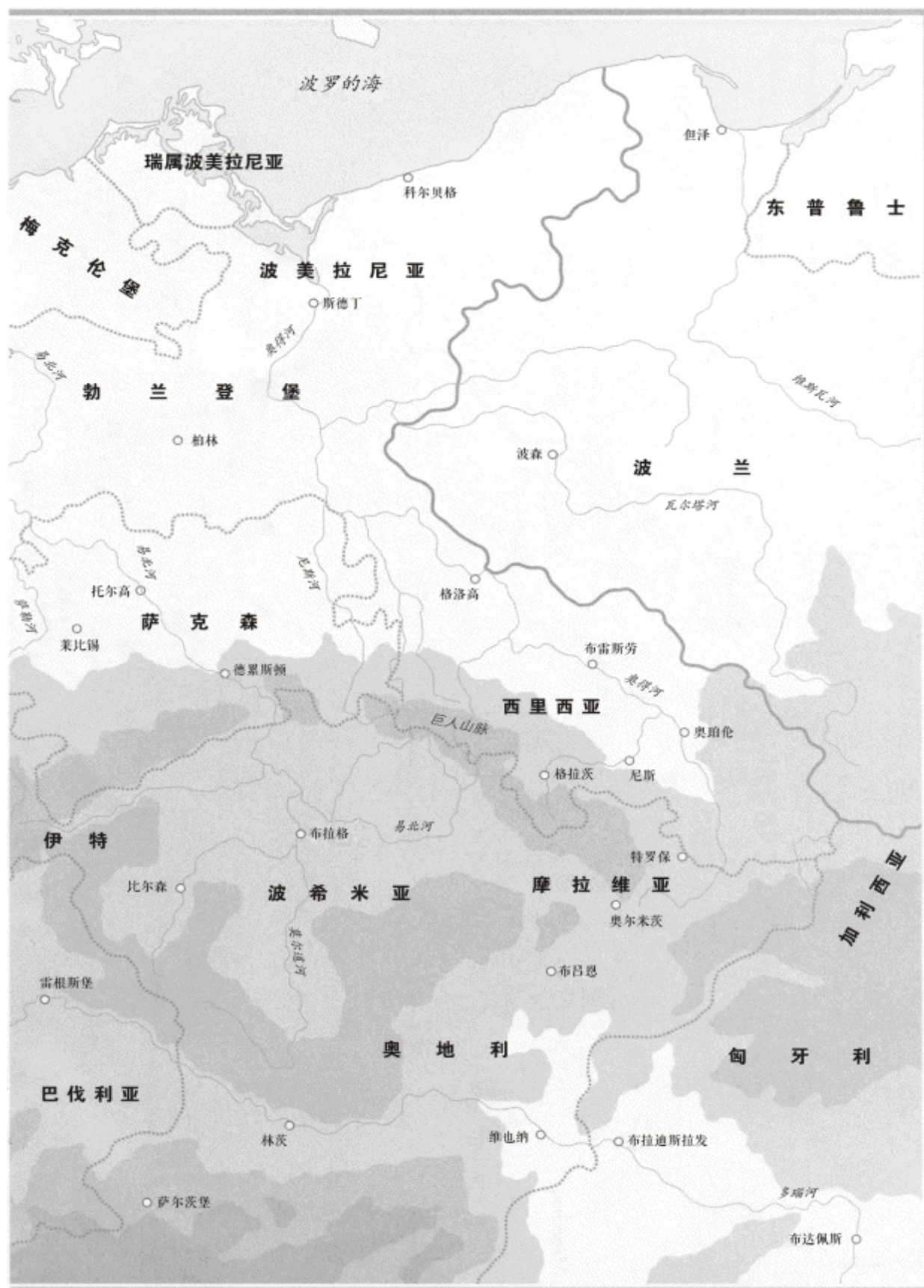
译者：栗河冰，成昱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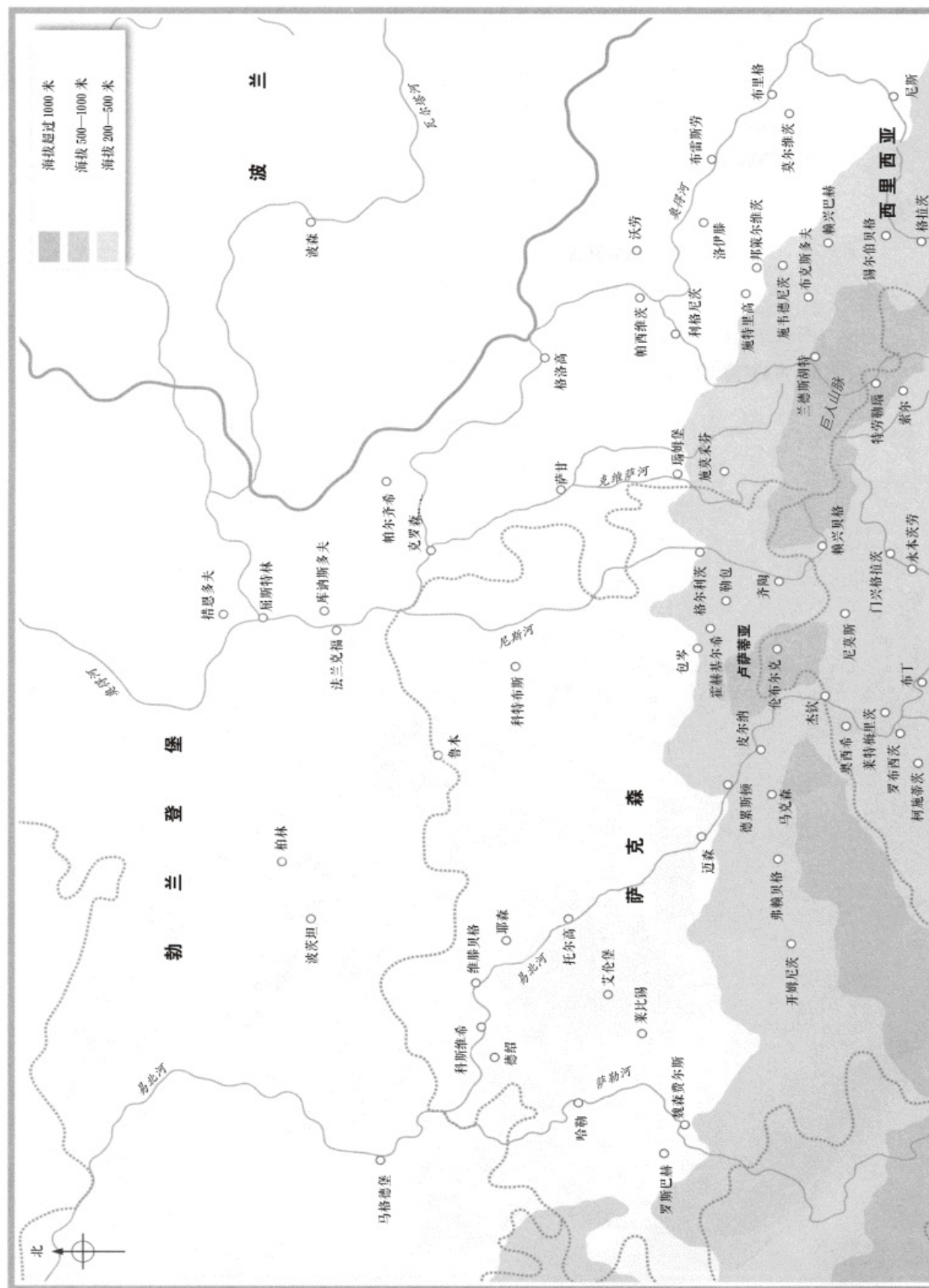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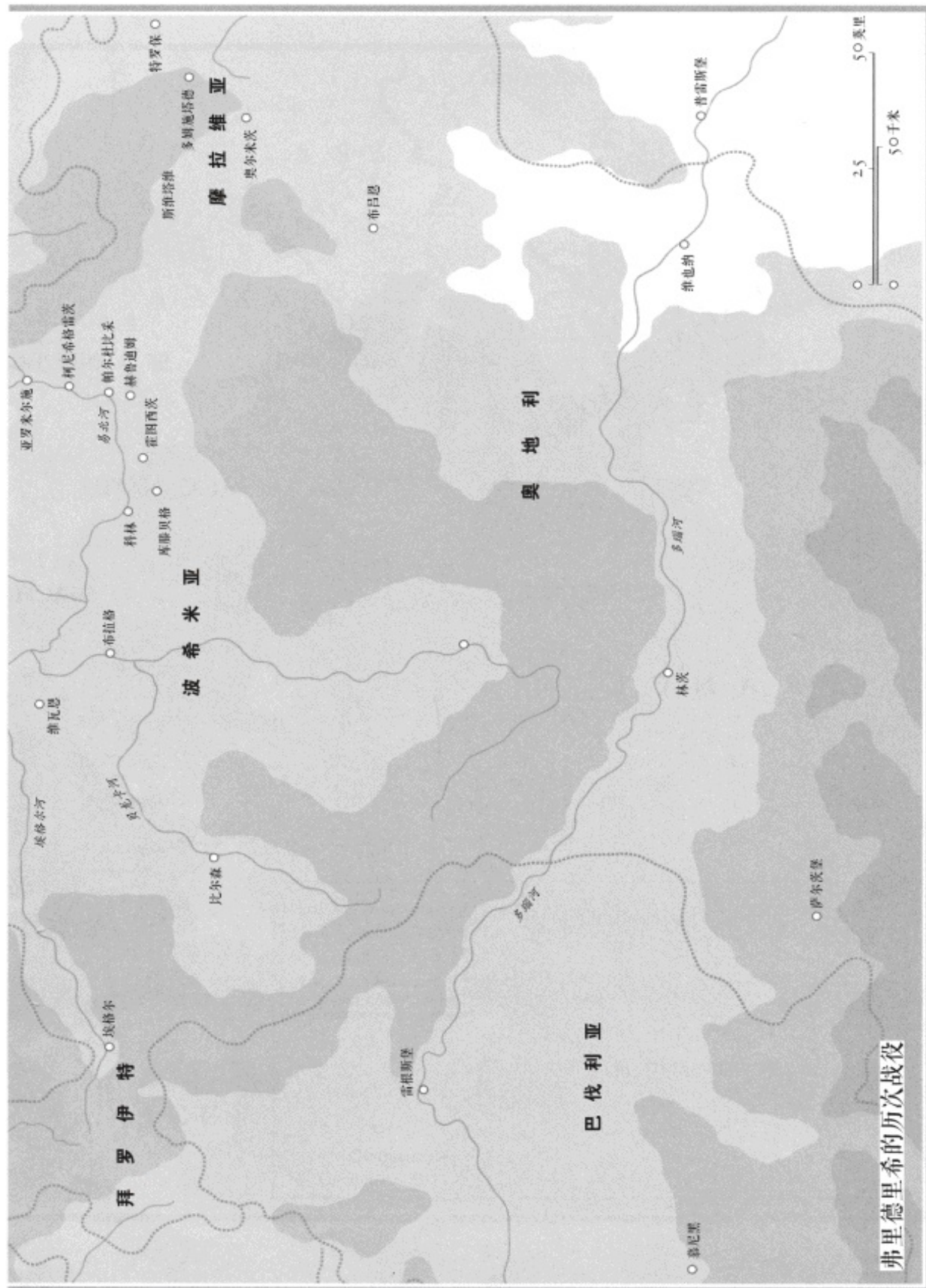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的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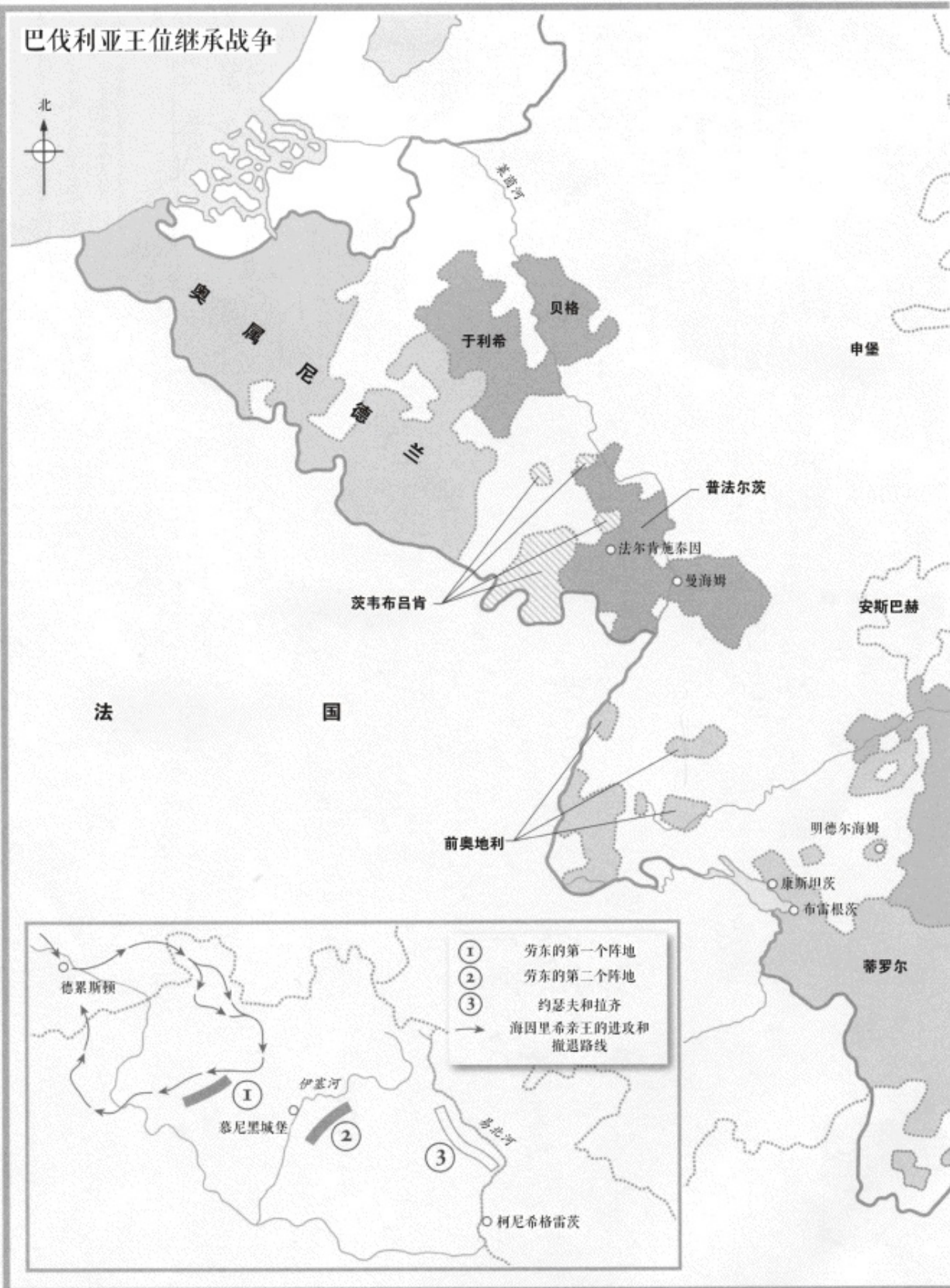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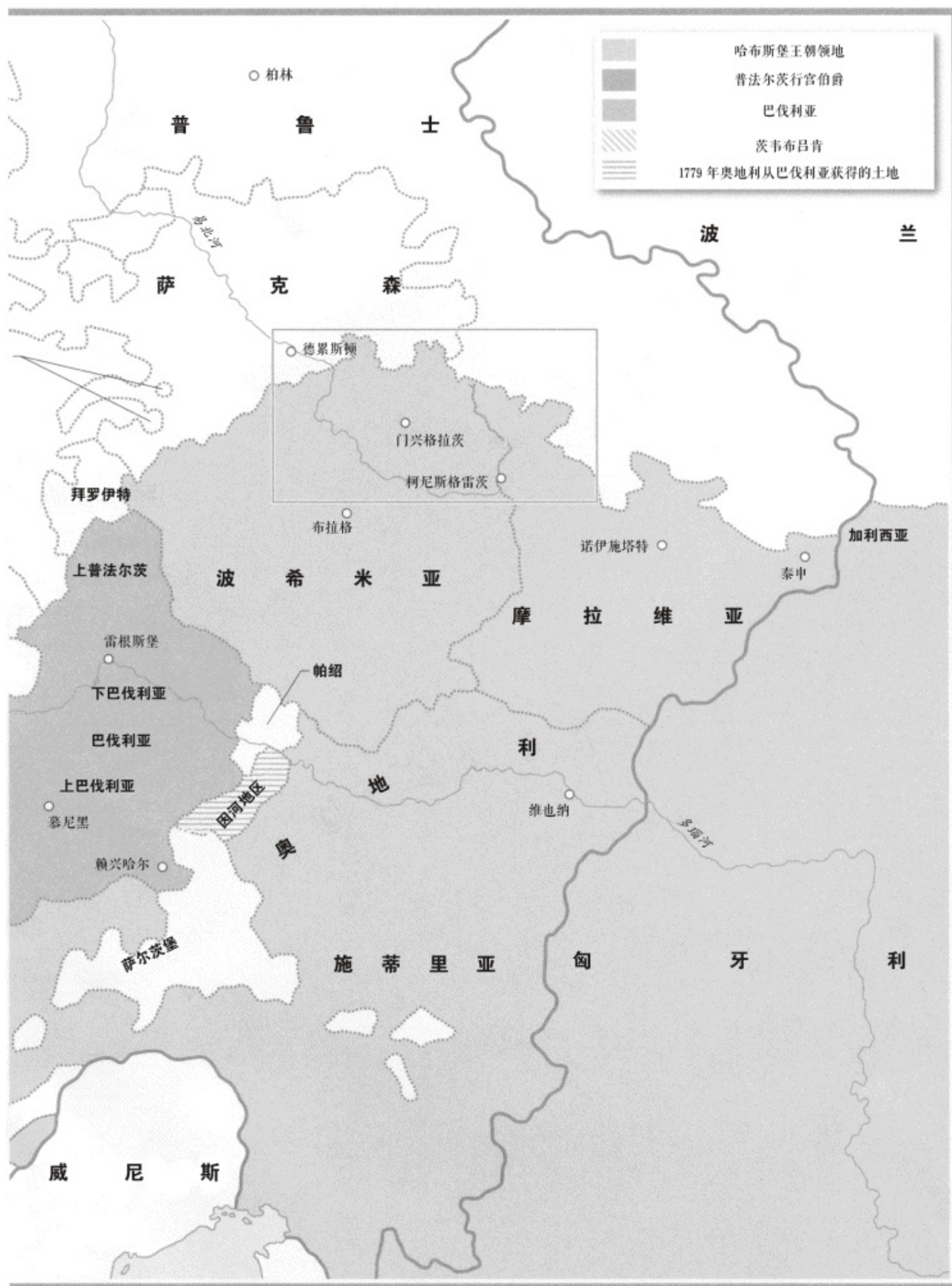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引言

1760年1月28日，在萨克森弗赖贝格的冬季营地中，自1740年以来君临普鲁士且已经荣享“大王”称号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做了一个噩梦。醒来以后，他对他的瑞士秘书亨利·德·卡特详细叙述了这个梦。他梦到自己被父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下令逮捕，要被带到易北河畔马格德堡的阴冷要塞之中。他问他的姐姐，他做了什么要受此惩罚，她回答说，这是因为他爱他们的父亲爱得不够。虽然他试图争辩事实并非如此，但还是被一辆双轮马车带走了。¹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声可以理解的、来自潜意识里可能是他生命中最黑暗时刻的尖叫。在前一年的战争中，他在奥得河畔的库讷斯多夫会战（1759年8月12日）中差点被敌人打得全军覆没。由于他自己的固执愚蠢，奥地利人3个月后在萨克森的马克森迫使大量普鲁士军队投降，使这场灾难雪上加霜。疾病缠身，筋疲力尽，沮丧又绝望的弗里德里希连夜晚安眠的慰藉都无法得到。

那个时常缠着他的鬼魂来自父亲，这绝非偶然。弗里德里希那可怕的父亲强加给他的印记是如此深厚，以至于永远无法抹去。一段发生在1730年夏天的插曲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时弗里德里希18岁。像往常一样，他整个上午都在阅兵场上度过，身体裹在紧绷的制服和靴子里，带波浪的头发紧紧地贴在头皮上，并绑成一根辫子。午餐后，他被准许离开，可以回到王宫的私人套房里，技艺高超的长笛演奏家约翰·约阿希姆·匡茨在那里等着他。两年前，弗里德里希在德累斯顿拜访波

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特的奢华宫廷时认识了他。随后，宠爱弗里德里希的母亲索菲娅·多罗特娅王后又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让匡茨每年两次到普鲁士来给他上课。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严格保密，不能让国王知道，因为他把任何带有高级文化气息的东西都视为“娘娘腔”。走出国王的视线后，弗里德里希可以脱下他极其厌恶的军装，穿上一件更加舒适的衣服——一件织满金色花纹的华丽红色丝绸晨衣——把他的头发放下来，人也可以放松下来，投入到音乐创作中。这愉快的午后演奏长笛的时光被粗暴地打断了，弗里德里希的密友汉斯·赫尔曼·冯·卡特中尉突然闯了进来。他警告说，国王因怀疑有人在做“娘娘腔”的事情大发雷霆，正在上楼的路上。匡茨连同乐器和乐谱被塞进衣柜，晨衣被丢到一旁，制服又被穿在身上。气喘吁吁地赶到之后，矮胖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并没有上当，尤其是弗里德里希还没来得及解开头发编成的时髦发髻。虽然匡茨和卡特的藏身之处没有被发现，但那些违反规定的衣服很快被发现了，并被直接扔进了火里。一批私藏的法文书籍也被没收并被送去出售。²

这虽然只是王储遭受的众多屈辱之一，但也可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这之后，他几乎立刻试图利用一次与父亲去莱茵兰旅行的机会从普鲁士逃往英国。这次出逃以灾难告终。弗里德里希·威廉威胁说要把他的儿子兼继承人以逃兵罪处决。虽然他没有真的这么做，但他还是让儿子亲眼见证了他的同伙、朋友和疑似情人冯·卡特中尉被斩首。随后是一个漫长且非常艰巨的改造过程，其间还伴随着进一步的残酷贬黜。只有当弗里德里希结婚时——父亲将此视为最终屈服——他才得以解脱。在包办婚姻的时代，不爱自己的新娘是很常见的；许下一个秘密的誓言，等促成婚事的父亲一过世就将妻子撂在一边，则是不那么寻常的。弗里德里希不喜欢他的妻子，因为她不聪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他父亲选的人。不喜欢她的一个更为根本的理由也有可能是她的性别。

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的时候，不完全的解脱升级为完

全的解放。28岁的弗里德里希现在可以着手进行心理修复了。他用了3种方法。首先，他利用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非常可观的财产，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即使算不上奢华，也算得上舒适的物质环境。他建造了一座歌剧院；扩建了两座宫殿并委托他人建造一座新宫殿；扩大了他的音乐机构；买了衣服、绘画、书籍、瓷器、鼻烟壶和其他的艺术品，其中许多慷慨地送给了他的男性朋友；从整体上将他父亲的“斯巴达”变成了“雅典”（甚至可能是“巴比伦”，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活着见到的话，可能会称之为“所多玛和蛾摩拉”）。其次，他在周围聚集起了一个讲法语的知识分子圈子，为他提供智力上的刺激并充当他的敏捷才思、哲学研究、文学创作和音乐表演的观众。这个亲密圈子的氛围既是同性社交的（homosocial），也是同性恋的（homoerotic），而弗里德里希本人，也可能是同性恋。他生活的这个方面不应该被看作次要的东西。正如他自己清楚表现的那样，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塑造对他的个性、抱负和成就至关重要。

这也与他修复父亲所造成的伤害的第三种方法密切相关：他要做父亲最想做的事，但要做得更好。这不应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类别：文化与权力政治更多是在辩证关系中进步，一个滋养另一个，而非同时进步。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要在对手萨克森的韦廷家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或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及将普鲁士提升到大国的地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锻造了武器，但他胆子太小，不敢使用它们。他的儿子将证明自己比父亲更有男子气概，拥有父亲所缺失的胆量、决心和耐力。1740年弗里德里希入侵西里西亚的时候，或是1757年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击败法国人、在洛伊滕击败奥地利人的时候，真希望弗里德里希·威廉能在现场！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在场的，即使只是出现在弗里德里希的潜意识里。在1760年1月对德·卡特讲述那个噩梦的6个月之后，弗里德里希再次梦见了他的父亲。这时，令人绝望的军事形势已经稳定下来。梦开始时，弗里德里希在斯特拉斯堡与奥地利的道恩元帅对峙，然后他突然被送到了柏林附近的夏洛

滕堡宫，他的父亲和他最信任的将军，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正一起在那里等着他。“我做得好吗？”弗里德里希问道。“是的，做得很好。”弗里德里希·威廉说。“那么我就满足了，”弗里德里希答道，“对我来说，你的认可比宇宙里其他所有人的认可都更有价值。”³

弗里德里希在位46年，在国内外各个领域都异常活跃。将他的统治视为一种长期的治疗活动，当然是一种荒谬的简化。众多强大的因素在约束和影响着他。事实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马克思一句格言的完美诠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显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他父亲能够理解、爱护、支持他的话，弗里德里希会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他从1740年到1786年的发展轨迹并不平静。那不是个状态稳定的宇宙；相反，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这次爆炸发生在他继位不到一年后，即他决定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时。简单地说，他从抢劫一位明显处于防御性的女人开始，花费余生努力保住自己的战利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影响了他所有的外交和国内的政策与行动。这次最初的行动导致了如此多的后果。因此，他在青春期和成年时代早期的长期创伤后的心理状态，是理解他令人惊叹的一生的一个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维度。

注释

¹ Paul Hartig (ed.), *Henri de Catt, Vorles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Die Tagebücher 1758–60* (Munich and Berlin, 1986), p. 151.

² Friedrich Nicolai, *Anekdoten von Friedrich dem Grossen und von einigen Personen, die um ihn waren* (Munich, n.d.), pp. 187–90. 尼古拉是从匡茨那里听说这一切的，肯定有一定的真实性。

³ Hartig (ed.), *Henri de Catt*, p. 163.

目录

弗里德里希的家谱

引言

第一部 弗里德里希的苦难与荣耀

第1章 遗产

霍亨索伦家族的土地

王家领地

容克

专制统治

军队

虔敬主义

萨克森

从选帝侯国到王国

第2章 弗里德里希的驯服

弗里德里希与他的父亲

父与子

弗里德里希失败的出逃

弗里德里希的屈服

第3章 弗里德里希的塑造（上）

恢复

弗里德里希与妻子的关系

弗雷德斯多夫

阿尔加罗蒂

第4章 弗里德里希的塑造（下）

渡过卢比孔河

查理六世的死亡

1740年欧洲的国际体系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

第5章 国家的专横仆人

第6章 文化

歌剧

神圣化

音乐的乐趣

音乐与启蒙

私人音乐

公共领域中的音乐

音乐保守主义

音乐室

夏洛滕堡宫和波茨坦

无忧宫

宫殿

绘画和雕塑

弗里德里希的同性恋圈子

第二部 战争与和平

第7章 1745—1756年的和平与战争

第8章 七年战争：战争的前三年

1756年

1757年

1758年

第9章 七年战争：灾难与生存

1759年

1760年

1761年

1762年

1763年 《胡贝图斯堡和约》

第10章 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为何获胜

第11章 长久的和平、短暂的战争和双重外交

第一次瓜分波兰

神圣罗马帝国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约瑟夫二世

第三部 在国内

第12章 公众和民族

审查制度和自由的界限

拉美特利

让-雅克·卢梭

伏尔泰

普鲁士的公共领域

弗里德里希对德语和德语文学的态度

作为宣传者的弗里德里希

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

第13章 国内的光明与黑暗

启蒙运动

宽容

犹太人

犯罪与惩罚

法律与正义

第14章 乡村和城镇

贵族和农民

教育

农业

贸易和制造业

第15章 在宫廷和家中

弗里德里希的众多宫廷

家庭恩怨和友谊

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姐妹们

亲密圈子和“营地”文化

老年

结语 死亡与形象变化

致谢

缩略语

出版后记

插图

第一部
弗里德里希的苦难与荣耀

第1章

遗产

霍亨索伦家族的土地

“说到沙子，除了利比亚，很少有国家能与我们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在1776年初给伏尔泰的信中如此写道。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论普鲁士政府》里补充道，普鲁士“贫穷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¹ 弗里德里希的核心领地勃兰登堡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箱”是有原因的。这是一片土壤贫瘠、人烟稀少的土地，其中湖泊与荒野交错，沼泽与荒原遍布。弗里德里希告诉达朗贝尔，亚琛的善良人民已经开始相信，他们难喝的泉水代表着上帝造物之巅峰，就像犹太人崇拜耶路撒冷的淤泥一样，但对他本人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普鲁士的沙子永远无法激发他同样的热情。²

当然，一再的贬损其实是想换来恭维。弗里德里希的潜台词是：“以如此贫乏的条件我都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拥有法国的人口或者英国的财富，我能完成什么样的伟业？”这都被说得太夸张了。勃兰登堡的大量土壤可能不肥沃，但至少不是山地。蜿蜒宽阔的河流分布在平凡无奇的景观中，缓缓地流淌着，在那个道路“在阳光照耀时沙尘飞扬、在大雨降临时遍地泥泞”的时代，这里的河流非常适宜运输。这是给弗里德

里希的先祖们的慷慨的自然馈赠。例如，在17世纪60年代，弗里德里希的曾祖父“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建成了“米尔罗瑟运河”，该运河始建于1558年，可令航运船只穿过奥得河到达施普雷河和柏林，再从那里经由哈弗尔河抵达易北河和北海。³ 他的对手奥地利人在艰难地翻山越岭时，一定会嫉妒普鲁士人的水道能让他们轻松地转运人员和物资。

况且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远不止勃兰登堡一地。在遥远的西部，与荷兰的交界处，有横跨莱茵河的克莱沃公国，还有与之相邻的默尔斯伯国。默尔斯伯国包括克雷菲尔德城，那里有门诺派教徒的一个大型居住点及其兴旺的纺织工厂。莱茵河的右岸（东侧）是马克伯国，它被鲁尔河一分为二，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正是以这条河流命名。在肥沃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还有拉文斯贝格伯国、泰克伦堡伯国、林根伯国，以及明登公国。再往东，紧邻勃兰登堡南部的领地是哈尔伯施塔特公国和马格德堡公国。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市以拥有德意志最大的教堂和最强的防御工事而自豪。⁴ 这是一个以富饶著称的地区，那里所有的沙子都被用来建造建筑。七年战争结束前不久，伦道夫伯爵和其他300多位客人在城外参加了一个农民的婚礼，他们的宴席上有42只熟阉鸡、2头阉牛、14头小牛、价值150塔勒的鲤鱼，还有价值150塔勒的佐餐葡萄酒和白兰地。⁵

勃兰登堡的东北方是波美拉尼亚公国，该公国有着长长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和位于奥得河入海口的优良海港斯德丁港。在弗里德里希苛刻的父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眼中，这是“一个富饶的省份”。⁶ 再往东去，被波兰统治的一大片领土隔开的，是东普鲁士，它位于神圣罗马帝国疆界之外、讲德语的欧洲地区边缘。这个省份尽管因1708—1710年的瘟疫而人口锐减，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丧命，又在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中被反复争夺，它此后还是享受到了持久的复兴。到1740年，从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受压迫或是人口过剩地区避难而来的移民浪潮，其中包括萨尔茨堡大主教1732年驱逐的1.7万名新教徒，使东普鲁士的人口从16万人增加到了60万人。⁷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要为新来的定居者提供

优惠条件，由完全保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占有的土地比例高得惊人，这类土地大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⁸

王家领地

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获得的零碎领土在欧洲北部平原排成一条线，横跨1000英里^①。⁹ 它们被4条不同层次的线连结在一起：王朝、宗教、语言和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成员身份（东普鲁士除外，该地在1660年之前是波兰国王的领地）。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是精神方面的，因为宗教改革后，教会财产的世俗化使得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们拥有了一块巨大的领地，远超欧洲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享有的土地。与英格兰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那些挥霍无度的君主不同，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们紧紧抓住这份意外之财不放，甚至还让它增了值。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他的官员发布了一个长期命令，要他们定期购买马格德堡公国市场上出售的价值10万到15万塔勒的所有大地产。¹⁰ 他在自己统治期间（1713—1740年）花费了800万塔勒收购新领地，并将领地的收入翻了一番，达到了每年约350万塔勒。¹¹

说国王是他国家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还不足以让人对他优势之强有深刻印象。事实上，国王的这些领地在他所有领土中所占的面积不少于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国内大约三分之一的可耕种土地，提供了1740年总岁入的约50%。¹² 只有十几处地产——其中大部分是种马场——处在直接管理之下。大部分土地则被分成约2000英亩^②的小块，通过竞拍租赁给了约1100—1500名租户，租期为6—12年。要成为这样的直属租户，不仅要出最高的竞价，还要提供经济担保，并且他最多保留2到3个农场，要将其余的农场连同他租用的磨坊、啤酒厂、蒸馏酒厂、砖瓦厂和其他王家产业一起转租出去。¹³ 也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被称为“Beamte”的官员都是平民，贵族甚至被明确地排除在招标过程之外。¹⁴

容克

在农业社会里，土地就是地位，土地就是权力。就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这种控制土地的程度使得弗里德里希能够精确地指导农业发展，这是那些地产较少的君主做不到的。霍亨索伦家族也因此被提升到了一个崇高的位置上，远远高过它治下哪怕最大的地产主。无论如何，后者的数量极少，也肯定不像法国或者英国的显贵们住在宫殿里，如同诸侯一般。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则根本就没有大的地产主。¹⁵ 只有在东普鲁士，多纳家族、芬肯施泰因家族和施利本家族才在大地产上过着稍显气派的生活。但即使在这个省份，420处贵族地产的平均面积也只有667.5英亩。¹⁶ 用来称呼普鲁士贵族的词“容克”（Junker）的来源能揭示很多东西。这个词来自“年轻的老爷”（junk herr）这一称呼。在中世纪，这个词是指那些被从德意志内部打发出去，到东方的荒芜之地寻找财富的年轻男性子嗣。¹⁷

对这些移民而言，名声和财富常常是难以捉摸的。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了一项在易北河以东土地上确立下来的、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獨特制度的受益者。这就是兼具社会控制与经济控制的庄园地产制度。对于自己地产上的农民，容克不仅可以行使司法权和警察权，还可以征召他们给自己耕种土地、挤奶、照料羊群、运输货物、在酿酒厂或磨坊干活，甚至是到他家里服侍。他还负责管理社区的宗教、社会和教育设施（如果存在的话）。当农民想结婚、换个不同的职业或是离开庄园的时候，需要获得容克的许可，这通常需要出钱购买。作为回报，容克为农民提供一块土地，并有义务在他们生病或年老时提供帮助。¹⁸ 不用说，并非所有这些条件都以平等的标准存在于所有地方、所有时期。在一些地方，农民是完全自由和独立的土地所有者，或是享有世袭的土地所有权，或是可以在提供额外服务后获得工钱。¹⁹ 不过，这种庄园制度还是给了普鲁士容克一种独特的身份和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甚至欧洲的许多地方一样，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容克也在省一级享有代表权。这些议会被称为“等级会议”，这个名字令人费解。得益于其较高的信誉，等级会议在财政和司法事务方面都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精力充沛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漫长的统治时期（1640—1688年），等级会议的作用被减弱了。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一个独立于等级会议的中央权力机构——枢密院，还有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这些制度的建立在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上重新树立了君主权威。²⁰ 这是否代表一种“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意味着国家层面的决策权现在牢牢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并且民事和军事管理都达到了相对的高度整合。²¹ 1653年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勃兰登堡等级会议之间达成了被称为“Rezess”的协定（勃兰登堡议会协定）。过去这项协定通常被描述为统治者和贵族之间一个可耻的交易，前者获得了中央控制权，作为回报，他把控制农民的权力给了土地所有者。目前的观点是，在这项交易中容克获得的很少，或是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得到，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得到了想要的一切。²²

甚至“妥协”一词也并不完全适合描述1653年的这个协定。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与其贵族之间的关系总是合作多于对抗。只是偶尔才不得不挥舞一下大棒，比如1672年，顽固的东普鲁士贵族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卡尔克施泰因被从华沙绑走并处决。²³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另一位东普鲁士容克的处置更加残酷。顾问官冯·施卢巴胡特被指控挪用了原本用于救济萨尔茨堡难民的资金。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31年驾临柯尼斯堡时亲自审讯了他。冯·施卢巴胡特对于自己的罪行轻描淡写，倨傲地许诺会把钱还回去。当得知他应被处绞刑时，他进一步的言论——“处死一个普鲁士贵族是不成体统的事情”——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君主一无所知。当天夜里，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施卢巴胡特的办公室外竖起了绞刑架，第二天就将他绞死了。然而在这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首先参加了礼拜，并聚精会神地倾听了一场关于仁慈的布道。（“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马太福音》5：7）。

24
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他的贵族普遍评价很低。在1722年写给儿子的“政治遗嘱”中，他谴责东普鲁士的那些贵族“虚伪又狡诈”，阿尔特马克、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的那些贵族“非常糟糕而且叛逆”（特别是舒伦堡家族、阿尔文斯勒本家族和俾斯麦家族），而克莱沃和马克的贵族则是“愚蠢的牛，像魔鬼一样恶毒，非常迷恋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他非常赞赏波美拉尼亚的容克们（“他们老实规矩，有一点儿喜欢争辩，但如果讲得合适，他们会服从”），还有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乌克兰和米特尔马克等地区的贵族。²⁵决定性的考验是他们送自己儿子参军的意愿。过去，他们对军职几乎毫无热情。如果真要从军的话，他们更喜欢加入荷兰、丹麦或波兰的军队。弗里德里希·威廉很快就结束了这一风气，他将12—18岁的所有年轻贵族汇总登记。如果他们像在东普鲁士常做的那样，在需要奋勇向前的时候退却，弗里德里希就派出武装民兵围捕他们。到了1722年，他在柏林的新学校的学员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人。²⁶就像他直率地承认的那样，他的目的有二：一是进行社会规训，二是提高军事效率，两者同等重要。²⁷

普鲁士军官学校的生活甚至可能连英国寄宿学校都比不上，但也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其中就包括——就如在英国寄宿学校中那样——良好的教育。弗里德里希·威廉向不情愿的父母们承诺，他们的儿子将学习阅读、写作、数学、法语、地理、历史、击剑、跳舞和骑马，起居饮食条件会很好，并且——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将会被培养成敬畏上帝的基督徒。²⁸当然，国王也保证他们能在普鲁士军队中就职。鉴于大部分容克家庭相对贫困，这一保证是非常受欢迎的。即使是只让长子靠地产过上与贵族身份相称的生活，也只有极少数容克才能办得到。他们的新教信仰令他们无法谋求教会的有俸圣职，于是他们在军队中找到了简朴但受欢迎的替代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军队规模扩大了一倍还多，军官的人数增加到了3000名。²⁹

对于年轻的容克来说，早年生活无疑是艰难的。无论血统多么古老，他们都不得不从报酬不高的少尉开始做起，没有家庭的资助，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但晋升到上尉军衔并掌管一支连队的财务就能过得舒适一些；下一步晋升到上校并掌管一个团的话就会相对富裕起来了。³⁰ 在1717—1740年就读柏林军官学校的1600名容克男孩中，超过90%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时期得到委任，有40人成为将军。³¹ 无怪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那么赞赏波美拉尼亚人：早在1724年，那里的贵族就几乎全部由现役或是退役的军官组成，该省的每个家族里都至少有一个在军中服役的成员。³²

容克退役后可以在民政管理机关找到职位，特别是可以担任县长一职。这是普鲁士体制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80多个县长构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正是他们管理着所有的重要事务：监督赋税的征收，在军队过境的时候提供给养，调节农民与其地主之间的关系，促进农业发展，预防或减轻自然灾害，收集情报，以及公布政府法令。³³ 他们既代表着他们的容克同胞，又代表统治者，因为他们由后者任命但由前者提名。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往往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但这始终是一个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普鲁士政府的高效率：中央颁布的命令通常都能真正付诸实施。欧洲最高效的地方政府出现在英国和普鲁士并非偶然现象，因为这两地的政府都是建立在中央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的合作关系上。如果说英国的治安法官是“寡头统治的伙伴”³⁴，普鲁士的县长就是“专制统治的伙伴”。

专制统治

“专制统治”，不是“寡头统治”，也不是“贵族统治”，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远比他的汉诺威亲戚们专横得多。英国的前两位乔治国王

永远写不出这种话：“我要摧毁容克的权威，我要实现我的目标，使我的君主权威稳固如青铜铸造的岩石。”³⁵ 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在向东普鲁士贵族征税的法令空白处草草写下这句话的。这是他偏好的行事方式。他既不喜欢和大臣们组成的内阁讨论，也不喜欢和专家小组讨论，他喜欢的是一份书面报告，他会独自在上面批示决定。

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决策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是等级制和官僚化的执行方式。在县长之上是省一级的战争与领地管理委员会，按照次序，委员会又对柏林的总执行局负责，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专业人士。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官员职位不同，普鲁士的官员职位既不能购买也不能继承。这同样适用于城市里与县长一职对等的税务官，这些税务官每个人负责在6—12个城镇中行使类似的权力。³⁶ 对于这两个官职，弗里德里希·威廉引入了一项制度，对隶属于省委员会的见习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结束时以考试淘汰不合格者。同样展现出弗里德里希·威廉出人意料的前瞻性的是，他于1727年在哈勒大学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设立了“官房学”（应用政治学）教席，并明确指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训官员。³⁷ 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近乎现代公务员的官员：他们社会出身多种多样、择优选任、清正廉洁、领取薪水、等级森严、受过学院教育，并且由中央政府任命、管理和监督。至于这一制度在现实中运作状况如何，那就需要加上很多限定条件了，因为裙带关系、贪污腐败、阻挠干涉和无能失职，以及所有其他的在任何时代都与官场密不可分的恶习都是肯定存在的。³⁸ 尽管如此，1740年弗里德里希从他父王那里继承的行政管理制度，还是比他对手们拥有的任何制度都更有效率。正如伊拉斯谟所言：“盲瞽国度，独眼为王。”

军队

真正重要的考验是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能力。普鲁士不仅有一支规模

庞大的常备军，还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然而，在18世纪，这种状况才出现不久。1610年，当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指示他的民兵训练演习时，胆小的士兵拒绝开火，理由是这可能会吓着他们的女人。³⁹唉，这种考虑事情的优先顺序虽然令人愉悦，但在8年后三十年战争爆发时并未给勃兰登堡带来好处。对于一个位于北德平原、没有天然屏障的邦国而言，安全保障只能来自强大的军队。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年在位）曾尝试置身于冲突之外，这一努力却以灾难告终。1630年，他派一名使臣去见他的连襟、刚刚进入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要求他尊重勃兰登堡的中立。古斯塔夫·阿道夫尖刻地回复说，在这场善与恶（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并没有中立这个选项。⁴⁰格奥尔格·威廉的玄孙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做了极为尖刻的叙述。他描绘道，选帝侯的大臣们建议向瑞典人投降的时候，可怜地哀诉着“我们能做什么呢？大炮都是他们的”。⁴¹在战争的最后20年里，勃兰登堡被各方参战者反复争夺，人口损失达全部人口的40%—50%。⁴²

格奥尔格·威廉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640年继承其父亲爵位时年仅20岁。^③他已经学到了一课：宁为刀俎，不为鱼肉。在统治的后期，他对首席大臣奥托·冯·什未林说道：“我经历过中立，即使处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你也会被恶劣对待。我发誓，只要我活着，就再也不会选择中立。”⁴³到1646年，他好不容易凑起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这使得他在三十年战争这段难挨的时期里获得了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行动的空间。⁴⁴在最终的和平协议里，他得到了回报。虽然他对西波美拉尼亚和至关重要的奥得河出海口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这令他十分失望，但他确实获得了贫穷的东波美拉尼亚，以及3个世俗化的教会诸侯辖区（卡明、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还获得了富裕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马格德堡大主教领地的继承权，并于1680年最终得到了这一领地。⁴⁵弗里德里希·威廉此时处于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循环之中：手中掌握的军队越多，他就能从等级会议榨取更多的钱，而榨取的钱越多，他就能招募更

多的军队。1654年神圣罗马帝国通过的一项决议也帮助了他：这项决议允许诸侯提高税收来维持基本的卫戍部队和防御工事。⁴⁶到168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一支3.1万人的常备军可以供他支配。⁴⁷

这支军队也更加牢固地掌握在他的指挥下。他以前不得不依靠雇佣军首领为自己提供军队，直到他统治的后期才摆脱这一依赖。1672年，出生于奥地利、曾在包括瑞典在内的数国军队中征战过的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尔将军，拒绝听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一项命令，理由是他的合同里并没有规定无条件服从。⁴⁸3年后，也就是1675年6月18日，德弗林格尔将军在费尔贝林会战中担任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副手，那次战斗是勃兰登堡军队仅靠自身赢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参战双方的人数都不太多（1.2万—1.5万人），但同时代的人都认同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他们给予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帝侯”的称号。他的曾孙评论道：“他的敌人称赞他，他的臣民祝福他；勃兰登堡王室后来的显赫地位，可以追溯到那个著名的日子。”⁴⁹

尽管在接下来的3年里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军队将瑞典人赶出了德意志，但这没有在和约签订时给他带来什么回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控制的大部队手中。路易十四介入谈判，希望拯救他的瑞典盟友。弗里德里希·威廉经过5年成功的作战，得到的只是有限的边界调整，以及瑞典人转让的分享勃兰登堡治下的波美拉尼亚地区之通行费的权利。所有征服来的土地不得不归还。在一枚纪念这次和约的纪念章上，失望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铭刻了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中狄多写给还未出生的汉尼拔的诗句——“愿你从我的骨头中出生，你这不知名的复仇者”。⁵⁰相当奇怪的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这版狄多的故事中扮演汉尼拔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竟然没有在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中提到过这件事情。

尽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继承者们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但

在他1688年去世的时候，勃兰登堡还只是个二三流的国家。直到执政的晚期，他才成功维持住了对军队的单独控制权，而且他仍然要依赖外国资助来进行战争。⁵¹ 他“结盟虽好，但自己的军队更棒”的说法，只是一种愿望而非已实现的成就。⁵² 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身上（他在1701年获得了“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一头衔，名字里的数字于是减去了两个，成为弗里德里希一世）。过去通常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可以分为两类——天赋异禀的和昏聩无常的。被夹在两位成就卓著的人物之间（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弗里德里希三世（一世）的不幸，同时他也成了他的孙子弗里德里希大王某些最尖刻的批评针对的对象。然而，弗里德里希三世成功带领国家度过了九年战争（1688—1697年）、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掀起的惊涛骇浪。有几次，他的军队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尤其是在1704年的布伦海姆会战中，他的军队帮助马尔博罗公爵和欧根亲王，为他们赢得对法国的压倒性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1709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已经将军队扩张到了4.4万人，其规模在神圣罗马帝国中仅次于奥地利。⁵³

同样是1709年，这支军队也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血腥的这场战斗中，马尔博罗和欧根再次击败了法国。领导普鲁士军队、为普鲁士军事地位之提升做出决定性贡献的人是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将军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尽管这场残杀导致获胜一方的伤亡比例达到25%——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始终坚持认为，1709年9月11日这场战斗发生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庆祝这次战斗的周年纪念日。⁵⁴ 当他于1713年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和利奥波德亲王立即决定扩充军队的数量并提高军队的素质。通过残酷的纪律和不断的操练，他手下的军队被变成了一架反应灵敏的杀人机器，可以迅速移动，跨越国界，然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部署在战场上。他们的革新举措包括：使用一根金属通

条，这能加快开火速度；改良刺刀，让其能随时投入使用；还有步调一致的快速行军。⁵⁵ 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如此评价他父亲的成就：“一个普鲁士营成了一排行走的火炮，填装火药的速度使其火力提升了3倍，这让普鲁士在与敌人作战中获得了3对1的优势。”⁵⁶ 但他们对骑兵的把握就差得多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于大个子士兵的痴迷备受指责，这意味着必须为大个子士兵提供体形高大、动作缓慢的马匹。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轻蔑地称他们为“大象背上的巨人”。⁵⁷ 这一评价是基于亲身体验。当1740年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将这些骑兵带上战场的时候，奥地利的骑兵发现，通过一刀砍下马头让他们敌人巨大但笨拙的坐骑停止移动，实在是太容易了。⁵⁸ 弗里德里希·威廉痴迷于招募巨人般的士兵给自己做卫兵，其军事价值同样值得怀疑。这些人的花销是其他军团的4倍，却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⁵⁹

总体而言，士兵的质量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可挑选范围远非如此。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13年登上王位的时候，可供他从中征募士兵的总人口数只有大约160万。⁶⁰ 他立刻废除了因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的民兵制度，采用国内强制征召和国外志愿征兵的混合征兵制。但前者不受欢迎，后者则费用不菲，这导致1733年的一次重要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普鲁士的土地被分为若干个征兵区，每个征兵区包含约5000个家庭，每个区都被分配到一个团的征兵名额。所有男孩年满10岁即被列入团队名册。尽管这一制度非常坚决地规定：“所有居民生来都要为国家服役”，但许多群体可以豁免：农民和他们的长子、移民、商人、制造商、工匠和从事某些“保留职业”比如航海的人。⁶¹ 即便如此，还是有足足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列入征兵名单中，三分之二的军队来自本土的兵源。⁶²

结合相对高效的财政和行政系统，这些征兵区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使得普鲁士跻身欧洲第一流军事强国之列。1713年，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军力约为3万人，使其能与皮埃蒙特或萨克森平起平坐；到174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8万人，超过了西班牙、荷兰共和国、瑞典，也即将赶

上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大王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评论道：“这些征兵区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根基。”⁶³奥地利人诚心诚意地以敌人为榜样，尽管经过漫长的拖延，但在1777年，奥地利也引入了征兵区制度。⁶⁴

虔敬主义

历任的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不仅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分配给这个国家有限的人力资源，而且还设法提升他们的素质。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想入非非，但他们都鼓励并受益于普鲁士有关责任的道德思想。其核心是“虔敬主义”，这是路德宗内部的一场改革运动，在17世纪后半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虔敬派认为，官方的路德宗教会思想僵化且形式主义泛滥。作为对这些现象的反应，虔敬派强调，所有信徒都是神职人员，需要经历重生般的皈依体验，以及“内心之光”的优先性。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一书中，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博士很好地总结了虔敬主义的观点。他将这一运动描述为“一种虔敬情感和神圣喜悦的革命，与连乞丐也不愿意从中再接受一块面包的僵化的正统观念相对立”。在德意志所有的新教邦国中，勃兰登堡是最乐于接纳虔敬主义的。自17世纪初期勃兰登堡统治者皈依加尔文宗以后，促进和谐——至少是促进新教各派系之间的和谐——就一直符合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教导他的儿子：“你一定要爱神托付给你的臣民，并为他们寻求更多的福祉和利益，不要在意他们的宗教信仰形式。”⁶⁵这种宽容的态度不仅是由传统和信念所培养的，也受到政治利益的驱使。勃兰登堡的统治者需要让那些被三十年战争破坏的地区再次吸纳人口，这决定了他们对移民信仰归属的宽松态度。萨克森是勃兰登堡在德意志新教地区领导地位的主要竞争者，它坚持正统路德宗，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基于同萨克森竞争的考虑，勃兰登堡选帝侯1694年在新近获得的马格德堡省创建了新的哈勒大学，以此与邻近的两所萨克森的大学——维滕贝格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竞争，这两

所大学都以其严守正统而享有盛名。⁶⁶

哈勒大学的主导人物是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63—1727），他曾在萨克森与正统路德宗教徒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先知和官僚的非凡组合体，他将虔敬主义从一种信仰形式发展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一方面，他拥有为忏悔而绝望斗争的个人体验，包括对永恒诅咒的全部恐惧，最终以强烈的信仰转变告终，并将特定信念的宗教热忱带到了他的使命中。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了弗兰克（在他自己眼中）最高级的赞美。国王说：“他肩负神的祝福，因为他用2个塔勒办到的事情，比我用10个塔勒能办到的多。”⁶⁷担任哈勒近郊格劳哈的牧师之职后，弗兰克在几年之内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综合机构。虔敬派所有的内省和神秘主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倾向。他们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看待工作，不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赎罪的手段，还将工作本身视作一种善行。对所有的信徒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因为建设性的活动是克服罪恶诱惑的最好手段，而践行慈善则是基督教美德的最佳外在表现。在弗兰克看来，懒惰散漫的人是注定要遭受地狱之火的。在虔敬主义的教规中，穷人不配得享天国。

弗兰克很快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在他使用一笔匿名的意外之财建立的孤儿院附属学校里，学生们被传授实用的技能，以帮助他们为社区做出实际的贡献。同样的原则也推行到其他很快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中。这些机构包括一所为年轻贵族开办的学院，那里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制造业和采矿业；还有一所为有志成为外交官的人设立的学校，它的教学重点是现代语言。在弗兰克创建的众多商业企业之中，最成功的是一家书店和一家药店，那家书店将虔敬派的出版物以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那间药店则是“第一家以商业规模生产标准化品牌药物的企业，有能力也有强烈意愿面向城市或省份出售完整的公共卫生用品，并通过拉丁语、法语、英语、荷兰语和希腊语的小册子推销自己的产品”。⁶⁸弗兰克去世的时候，正在主持建造欧洲最大的综合建筑群之一，这一建筑群将为2200名孩子和167名教职工提供住宿。弗兰克的名声和信仰广为

流传，即使没有传遍整个地球，也已经到达了这片大陆的每个角落。他来到哈勒时身无一物。

如果没有历任普鲁士国王持续不断的援助，弗兰克可能很快也会一无所有地离开。勃兰登堡的正统路德宗像他们在萨克森的教友们一样反对虔敬派。而且，这种敌意不仅来自神职人员，也来自马格德堡省的等级会议，其代表由衷地厌恶虔敬派事业中的平均化意味。在所有重要的时刻，弗兰克和他的继任者们都能够说服他们的君主，让他们相信虔敬派非但没有构成威胁，而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他们确实帮助普鲁士政府解决了一个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即士兵的妻子和家属的贫困问题。他们也为成千上万的普鲁士人提供了极好的实用教育。他们还对贵族和平民、士兵和百姓都反复灌输了责任、服从和勤奋的理念。正如弗兰克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王储时告诉他的那样，虔敬派教育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阶层和各个行业都培养出了老实又顺从的臣民。⁶⁹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虽然起初持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被说服了。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虔敬派教徒杜比斯拉夫·格涅奥马尔·冯·纳茨默将军，他于1713年被任命为皇家近卫军指挥，因此每天都可以见到他的国王。⁷⁰当弗兰克成功地让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皈依虔敬派之后，虔敬派完成了对权力中心的渗透。⁷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期间，他确保了自己的军队牧师都由虔敬派教徒担任，并允许虔敬派掌管柯尼斯堡大学，他还规定从1717年开始，（路德宗）牧师职位候选人必须在哈勒大学完成两年的神学学习。弗里德里希·威廉让虔敬派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宗教。⁷²当然，由此就认为普鲁士士兵个个都是洁身自好、言语纯洁、敬畏上帝的完人，就荒谬可笑了，但他们还是和克伦威尔的铁军有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在战斗前后唱起圣歌和赞美诗的时候。

萨克森

在好斗的天主教徒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做一个持宗教宽容态度的新教徒是明智的选择。1683年土耳其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奥地利再次征服了匈牙利；紧接着，路易十四强制胡格诺教徒皈依天主教，否则就将驱逐他们。这些事件在德意志新教徒中造成了强烈的恐慌。他们已经因为统治者多次的叛教改宗感到恐惧了：1650年到1750年，至少有31位诸侯皈依天主教。⁷³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1697年的萨克森——路德宗教改革的心脏之地：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其“强者奥古斯特”的叫法更为出名）为了能选上波兰国王脱离了路德宗。他在随后的王位争夺中胜出，这似乎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制造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萨克森领土广袤、实力雄厚。萨克森原本就是中欧经济和文化最为先进的邦国，如今又并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这部分领土几乎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覆盖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千米。事实证明，为了华沙并不值得去做弥撒。^④尽管萨克森选帝侯国保住了名义上的帝国议会新教成员主席之位，但实际上的领导权现已北移到了柏林。当奥古斯特的儿子和继承者也皈依天主教并迎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女大公之后，这一领导权的转移成了永久性的。

这并非只是信仰改变。奥古斯特二世（1697—1733年在位）和奥古斯特三世（1733—1763年在位）都焦虑地意识到，他们是靠着奥地利和俄国施加的贿赂和外交压力，才得到波兰王位的，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在每个方面都显示出国王的气派。他们用奢华的炫耀掩饰军事实力的欠缺。其结果就是出现了“欧洲最炫目的宫廷”，这是周游各地的珀尔尼茨男爵在1729年给出的权威评判。⁷⁴萨克森号称拥有帝国除维也纳之外最棒的舞会、游行、歌剧和狩猎活动。奥古斯特的野心是让德累斯顿成为北方的威尼斯，既是精英们度假游乐的首选之地，又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经济上的中转地，实现这个目标花了很长时间。人们可以从贝尔纳多·贝洛托那些名副其实的名画中一窥这座城市传说中的美丽，这

些画作中圣母教堂的圆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威尼斯的安康圣母教堂。

这种文化地位的上升确实产生了效益。强者奥古斯特已经跻身欧洲一流君主之列，最明显的标志出现在1719年，这一年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迎娶了哈布斯堡的女大公、已故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女儿玛丽娅·约瑟法。为了庆祝这一隆重的场合，奥古斯特将宫廷盛大地布置了一番。准备工作做了两年，其中包括扩建“茨温格宫”，这座宫殿作为紧邻选帝侯宫的大型代表性建筑本来就很出名，而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歌剧院的落成，让为欢迎新娘和新郎从维也纳回来而举行的整整一个月的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典礼的过程可以被相当精确地重现出来，因为奥古斯特仔细地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将每一个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以小册子和版画的方式向全世界广为传播。此外，这场婚姻为家族的子孙后代带去了持续不断的红利。奥古斯特的儿子后来接替他成为波兰国王，在他的孙辈中，玛丽娅·阿马利娅嫁给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玛丽娅·安娜嫁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玛丽娅·约瑟法嫁给了法国王太子，成了路易十六的母亲；阿尔贝特娶了玛丽娅·特蕾莎皇后的女儿玛丽娅·克里斯蒂娜，后来成为奥属尼德兰的总督；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成了弗赖辛、雷根斯堡和奥格斯堡的采邑主教，以及特里尔大主教和选帝侯；库尼贡德成为托恩和埃森的女修道院院长兼领主（在那里她可以为被约瑟夫二世抛弃的遭遇寻求精神慰藉）。单是这份名单应该就足以提醒我们，由具有代表性的宫廷文化支撑的家族政治能够带来大量的好处。⁷⁵

萨克森—波兰的情况并非特例。奥古斯特二世登上王位是17世纪后半期席卷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化浪潮”⁷⁶的一部分。这部分原因是一些外国君主获得了帝国的领地，例如瑞典获得波美拉尼亚的部分疆土，丹麦得到了荷尔斯泰因；部分原因是一些德意志诸侯继承了外国的王位，比如茨韦布吕肯公爵继承了瑞典王位。从普鲁士人的立场来看，目前最重要的是不伦瑞克—吕讷堡家族的称王野心。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巧妙地利用了利奥波德皇帝在对法战争中对军事援助的需求，于1692年获

得了“汉诺威选帝侯”的地位和头衔。⁷⁷同时，一份更大的战利品开始显露端倪，因为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妻子索菲娅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因此，如果斯图亚特王朝新教世系绝嗣，她将成为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1700年，安妮公主唯一在世的子格洛斯特公爵的去世，让王位归属几乎无可争议。不过，直到1714年，索菲娅的儿子才继承英国王位，成为乔治一世。

从选帝侯国到王国

一个国王头衔有多重要？对当时的人来讲，答案是“非常重要”。那时，在那个权力的象征不是外壳而是核心的时代，王权便是实力。国王拥有最高统治权，这一地位表现为他有权册封和废黜贵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诸侯而言，这也是走向完全独立的一步。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构通常看似很神秘，特别是对英国或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各自的国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是统一的状态，故而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帝国的结构。最好将其看作一个“复合式的国家”，下辖大约300个领地，这些领地的统治者享有一般君主拥有的绝大部分权力，但不是全部权力。这些领地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密切结合在一起：对皇帝的效忠义务、受由2个帝国法院执行的帝国法律的制约以及它们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的代表。帝国议会分为3个议事团，第一议事团由九大选帝侯组成（美因茨、特里尔、科隆、波希米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以及1692年以后的汉诺威）。第二议事团也是人数最多的议事团为诸侯院，包括34个教会诸侯，以及约40个修道院共享的2张集体选票，还有60个世俗诸侯，再加上100余名帝国伯爵共享的4张集体选票。第三议事团包括51个“帝国自由城市”，这些自治的共和政权，只服从皇帝的权威。这种体制结构在1500年左右固定下来，但世界在继续发展，实际的权力与表象在此过程中分离了。⁷⁸在17世纪的后半叶，最为活跃的是地位更重要的世俗诸侯们，正如他们纷纷获得国王的头衔展现的那样。只原地

踏步就意味着落后于人。如果勃兰登堡选帝侯只是无所事事地干坐着，看着他的汉诺威和萨克森邻居们从大厅阴冷的角落移到主桌贵宾席上，他将很快发现自己被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挤开了。众所周知，其他的诸侯，特别是巴伐利亚选帝侯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在谋求国王甚至是皇帝的头衔。为了避免被赶超，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在17世纪9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1697年的赖斯韦克和平谈判上，勃兰登堡的特使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对弗里德里希三世来说，这是对他附属地位的一次刺眼的提醒。⁷⁹

和之前的例子一样，皇帝对人员和财物的迫切需要给了他机会。1700年11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承诺，在即将开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勃兰登堡会为皇帝提供8000名士兵，还承诺支持帝国的政策，由此获得了称王所必需的认可。1701年1月18日，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宣布，从今以后，他将是“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之所以是“在普鲁士的国王”（in Prussia）而非“普鲁士国王”（of Prussia），是因为西普鲁士仍处于宗主国波兰统治之下。⁸⁰而舍弃“勃兰登堡”选择“普鲁士”作为国王的名号则是因为普鲁士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界之内，他毋庸置疑对其拥有最高统治权。

加冕典礼在东普鲁士的首都柯尼斯堡举行。为使众人更加信服，弗里德里希使出了浑身解数，确保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配得上最伟大的君主。由3万匹马拉着的1800辆马车，将王宫人员从柏林送到了加冕礼现场。弗里德里希猩红色的加冕长袍上镶嵌着钻石纽扣，每颗价值3000杜卡特。而且，仅是为他自己和王后制造王冠的花费，就已经超过庆典的全部预算。弗里德里希亲手为自己戴上王冠，比拿破仑还早了一个多世纪。实际上，在柯尼斯堡城堡的一个房间里举行完加冕典礼后，国王夫妇才前往大教堂，接受两名专门为此场合选定的主教（一个来自加尔文宗，一个来自路德宗）为他们举行涂油仪式。⁸¹在加冕日当天，新国王设立了黑鹰勋章，以此象征霍亨索伦家族所有领地的统一。⁸²

加冕典礼的肆意挥霍以及典礼前后奢侈的炫耀，充分显示了普鲁士王室的暴发户性质。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一世将柏林从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为一座合乎国王身份的首都。他父亲的文化喜好一直是简朴无华的，偏向荷兰共和国的实用主义，他父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度过好几年时光。而新的风格看起来更南方化一些，倾向于以凡尔赛为代表的那种宫廷文化。两座宏伟的新宫殿拔地而起，一座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庞大的冬季居所；另一座是矗立在柏林西北部一片绿地上的夏季行宫，名为夏洛滕堡。另一项深受路易十四影响的举措是对文化事业的促进，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包括：在哈勒建立的一所新大学；1697年成立的一所艺术学院，它将成为“像罗马和巴黎的学院那样的高等艺术学校或艺术大学”；还有1700年成立的科学院，其第一任院长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莱布尼茨。⁸³

弗里德里希三世受到了历史学家的粗暴对待，这尤其是因为他的孙子在《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对他的严厉谴责。这本书中对他的控诉可以概括如下：这位新国王以头衔的膨胀来弥补他在邻国面前坚持自身主张时的无能。个子矮小、身有残疾的他贪慕豪华排场，把王权的虚饰误认为实质。他任性的奢侈挥霍并无有用的目的，仅仅是出于虚荣心和愚蠢的浪费行为。他让自己的士兵为其盟友白白牺牲，还剥贫穷人以使富人获利。他对自己王国东部省份的饥荒和瘟疫坐视不理。他的宫廷榨取民脂民膏，成了一个腐败朝臣沆瀣一气的大污水坑。他意志软弱又迷信，醉心于他的加尔文教信仰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于只要神职人员为迫害行为设计了一个适宜又华丽的仪式，他就会诉诸迫害的手段。他唯一能被称赞之处就是获得了国王头衔，这至少让勃兰登堡从奥地利君主国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但这也只是一个给子孙传递了如下信息的空壳：“我为你们挣得了一顶王冠，现在赋予它一些实质性内容吧，以证明你们配得上它。”⁸⁴

弗里德里希二世应该承认，建造一个华丽的宫廷被视作是任何有自尊心的诸侯必备的条件，更别说国王了。弗里德里希三世认为他的宫殿

建筑是“一项必需品”。⁸⁵ 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从1700年左右开始就遍布着宏伟的宫殿——巴伐利亚有宁芬堡宫和施莱斯海姆宫，萨克森有德累斯顿王宫和莫里茨堡，汉诺威有海恩豪森王宫，普法尔茨有曼海姆宫，黑森-卡塞尔有威廉高地宫，符腾堡有路德维希堡，还有布吕尔（科隆）、布鲁赫萨尔（施派尔）、美因茨、班贝格和维尔茨堡等地也有宫殿，以上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⁸⁶ 逆此潮流而动的国王并非弗里德里希三世，而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后者于1713年登基，他对文化的冲击可谓惊人至极。曾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最迷人的宫廷之一的普鲁士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戏剧、歌剧、音乐会、舞会和所有其他宫廷活动都是“撒旦的工作”。⁸⁷ 宫廷预算被大幅削减；宫廷画家安托万·佩恩的薪水被砍掉了一半；管弦乐队被解散。⁸⁸ 王家图书馆的置书费被削减到侮辱性的每年4塔勒，图书馆员的职位变成了名誉称号。⁸⁹ 供人娱乐的花园被夷为平地并改建成了练兵场。⁹⁰ 从各处宫殿和狩猎别墅里收集来的大量银器，不论多么精美，都被集中熔化成银条，打上军队的烙印，并存放到波茨坦宫酒窖的木桶里。⁹¹ 这些银条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实际的遗产：到1740年，这笔巨额财富的价值膨胀到了870万塔勒，他的儿子对此感激不尽。⁹² 要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其统治后期增加了宫廷和宫殿的经费开支，这笔钱的数额会更大。⁹³

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习惯于服从的忠诚的贵族阶级；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一笔数额巨大的战争基金，足以在不额外征税或是贷款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些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王于1740年5月31日死去时留给他的遗产。有过其他的王储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继承王位吗？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在同一年稍晚时候（10月20日）去世时，他给女儿玛丽娅·特蕾莎留下的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堆积如山的债务，一个充斥老朽之辈、派系丛生的内阁和一支战斗力不足其名义上一半的军队，这支军队还在舔舐着与土耳其人的灾难性战争后留下的伤口。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在传统方面维持着优势。就

像弗里德里希二世尖刻的评论那样，“它的骄傲弥补了它力量的缺乏，它过去的辉煌遮盖住了它现在的耻辱”。⁹⁴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给他儿子留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厚物质遗产也相应伴随着巨大的心理负担。

注释

¹ *Œuvres*, vol. 23, p. 412; vol. 9, p. 217.

² Frederick to d’Alembert, 4 October 1768, *ibid.*, vol. 24, p. 491.

³ Hugo Rachel, “Der Merkantilismus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ol. 2, p. 954; Joachim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1: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2011), p. 274.

⁴ Jürgen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1650–1800* (Cologne, Weimar and Vienna, 2004), p. 117.

⁵ Haug von Kuenheim (ed.),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dorff* (Berlin, 1982), p. 145.

⁶ Dietrich, p. 229.

⁷ Hans Dollinger, *Preussen. Eine Kulturgeschichte in Bildern und Dokumenten* (Munich, 1980), p. 102; Mack Walker, *The Salzburg Transaction. Expulsion and Redem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Ithaca and London, 1993), p. 74.

⁸ Koser, vol. 1, p. 370.

⁹ 在Karin Friedrich的作品*Brandenburg-Prussia 1466–1806. The Rise of a Composite State* (Basingstoke, 2012)第一章中，有对近代早期勃兰登堡历史精彩又简洁的描述。

¹⁰ Koser, vol. 1, p. 364.

¹¹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18; Gustavo Corni, *Stato assoluto e società agraria in Prussia nell’età di Federico II* (Bologna, 1982), p. 79. Werner Heegewaldt在其文章中给出了一个略微低一些的数字——30万，参见“Friderizianische Domänenpolitik am Beispiel der Kurmark,” in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163。

12 Hintze, p. 295;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73.

13 Hans-Heinrich Müller, “Domänen und Domänenpächter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m 18. Jahrhundert, ”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1, p. 316; Wilhelm Treue, “Staat, ‘Untertan’ und Gemeinde als Unternehmer in Preussen, ” in *Preussen – Versuch einer Bilanz* (Hamburg, 1981), vol. 2: *Preussen – Beiträge zu einer politischen Kultur*, ed. Manfred Schlenke, p. 222.

14 Hintze, p. 287.

15 F. L. Carsten, “Die Entstehung des Junkertums, ”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1, p. 265.

16 Robert M. 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 (Princeton, 1988), p. 15.

17 Ibid., p. 16.

18 Otto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Berlin, 1962), p. 77.

19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p. 162–3.

20 Christof 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Frankfurt am Main, 1991), pp. 287–8.

21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216.

22 Peter H. Wilson, “Prusso-German social militarisation reconsidered, ” in Jürgen Luh, Vinzenz Czech and Bert Becker (eds.), *Preuss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701–2001* (Groningen, 2003), p. 363.

23 Volker Press, *Kriege und Krisen. Deutschland 1600–1715* (Munich, 1991), p. 363.

24 Walker, *The Salzburg Transaction*, pp. 80–81; Carlyle, vol. 2, pp. 318–19. 在某些记载中他被称为“施拉布特”（Schlabuth）。

25 Dietrich, pp. 228–31.

26 Gustav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2, pp. 762–3.

27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80, n. 8.

28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 p. 763.

- 29 Edgar 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 1600–1786," in H. M. Scott (ed.), *The European Nobili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5), vol. 2, p. 95.
- 30 Helga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sidenz* (Berlin, 1987), p. 153; Günter Vogler and Klaus Vetter, *Preusse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Cologne, 1981), p. 35.
- 31 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 p. 96.
- 32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pp. 94–5; Christian Graf Krockow, *Warnung vor Preussen* (Berlin, 1982), p. 115.
- 33 C. B. A.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1985), pp. 143–4.
- 34 Frank O’Gorma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1688–1832* (London, 1997), p. 136.
- 35 Hintze, p. 281.
- 36 Ibid., p. 294.
- 37 Günter Birtsch,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die Anfänge der Aufklärung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Oswald Hauser (ed.), *Preussen, Europa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7), p. 88; 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reussischer Absolutismus, Merkantilismus, Militarismus* (Göttingen, 1977), p. 111.
- 38 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Boston, 1966), *passim*. Rosenberg对普鲁士官僚政治的叙述持无情的否定态度。
- 39 Peter Paret, "Nationalism and the sense of military obligation," *Military Affairs*, 34, 1 (1970), p. 3.
- 40 Hintze, p. 171.
- 41 *Œuvres*, vol. 1, p. 46.
- 42 参见下面这本书中的总结表格: Günther Franz,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3rd edn (Stuttgart, 1961), p. 15.
- 43 Quoted in Clark, *Iron Kingdom*, p. 66.
- 44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49.
- 45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627.

- 46 Press, *Kriege und Krisen*, p. 333.
- 47 Hans Meier-Welcker, *Deutsches Heerwesen im Wandel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56), p. 10.
- 48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49.
- 49 *Œuvres*, vol. 1, p. 90.
- 50 Press, *Kriege und Krisen*, p. 360.
- 51 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p. 302.
- 52 Carl Hinrichs, “Der grosse Kurfürst,” in Gerhard Oestreich (ed.), *Preussen als historisches Problem* (Berlin, 1964), p. 234.
- 53 Werner Schmidt, *Friedrich I. 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König in Preussen*, 2nd edn (Munich, 1998), p. 181.
- 54 Heinz Kathe, *Der Soldaten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 König in Preussen* (Cologne, 1981), p. 23.
- 55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56; Wolfgang Petter, “Zur Kriegskunst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n Bernhard R.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Kriege* (Munich, 1989), p. 254.
- 56 *Œuvres*, vol. 1, p. 47.
- 57 Robert Ergang, *The Potsdam Führer: Frederick William I, Father of Prussian Militarism* (New York, 1941), p. 67.
- 58 Johann Christoph Allmayer-Beck,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im Spiegel ihrer österreichischen Gegner,”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Herford and Bonn, 1987) [no editor listed], p. 36.
- 59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 348.
- 60 Gerd Heinrich, *Geschichte Preussens. Staat und Dynasti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1), p. 142.
- 61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60; Walter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Absolutism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75), p. 132.
- 62 Wilson, “Prusso-German social militarisation reconsidered,” p. 364; Clark, *Iron Kingdom*, p. 98.

63 Dietrich, p. 518.

64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Maria Theresa: The Armed Forces of Imperial Austria 1740–1780* (London, 1977), p. 52.

65 Dietrich, p. 184.

66 Klaus Deppermann, *Der hallesche Pietismus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 unter Friedrich III. (I.)* (Göttingen, 1961), p. 62.

67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84.

68 W. R. Ward, *Christiani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1648–1789* (Cambridge, 1999), p. 80.

69 Deppermann, *Der hallesche Pietismus*, p. 166.

70 Carl Hinrichs, *Preussentum und Pietismus. Der Pietismus in Brandenburg-Preussen als religiös-soziale Reformbewegung* (Göttingen, 1971), p. 128.

71 Ibid., pp. 146–51.

72 Ibid., p. 175. See also Mary Fulbrook, *Piety and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England, Württemberg and Prussia* (Cambridge, 1983), pp. 165–77.

73 Peter H. 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495–1806*, 2nd edn (Basingstoke, 2011), p. 49.

74 *Mémoires de Charles-Louis Baron de Pöllnitz, contenant les observations qu'il a faites dans ses voyages et le caractère des personnes qui composent les principales cours de l'Europe*, new edn (Liège, 1734), vol. 1, p. 154.

75 韦廷家族的兴衰在下面这本配有大量插图的展览目录中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得到了最好的重现，参见Werner Schmidt and Dirk Syndram, *Unter einer Krone. Kunst und Kultur der sächsisch-polnischen Union* (Leipzig, 1997), 其中包含许多优秀的学术文章。我曾在我的著作中更详细地讨论过德累斯顿宫廷，参见*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ch. 8。

76 Heinz Duchhardt, *Altes Reich und europäische Staatenwelt 1648–1806* (Munich, 1990), p. 27.

77 Ragnhild Hatton, *George I* (London, 1978), p. 46.

78 我对此做过进一步的讨论，参见*The Pursuit of Glory*, pp. 275–85。目前对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最权威的描述是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79 Thomas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Inszenierungen des Preussenkönigs in Fest und Zeremoniell 1740–1815*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2012), p. 34.

80 Heinrich, *Geschichte Preussens*, p. 130.

81 在Clark, *Iron Kingdom*, pp. 67–77中有对加冕典礼及其背景的精彩描述，还可以参考他的文章“*When culture meets power: The Prussian coronation of 1701*,” in Hamish Scott and Brendan Simms (eds.), *Cultures of Power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07)。有关同时代人对加冕典礼和黑鹰勋章设立的叙述，参见Karin Friedrich and Sara Smart (eds.), *The Cultivation of Monarchy and the Rise of Berlin* (Farnham, 2010), chs. 5 and 6。

82 Press, *Kriege und Krisen*, p. 362.

83 Schmidt, *Friedrich I.*, pp. 109–10.

84 *Œuvres*, vol. 1, pp. 112–44.

85 Wolfgang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Stuttgart, 1996), vol. 1, p. 188.

86 Peter Baumgart, “Der deutsche Hof der Barockzeit als politische Institution,” in August Buck, Georg Kauffmann, Blake Lee Spahr and Conrad Wiedemann (eds.), *Europäische Hofkultur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Vorträge und Referate gehalten anlässlich des Kongresses des Wolfenbütteler Arbeitskreises für Barockliteratur in der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vom 4. bis 8. September 1979* (Hamburg, 1981), p. 28. 显然，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柏林的城市宫殿不在这个幸存名单上，它于1945年因遭受轰炸而受损，并于1950年被东德政府拆除。

87 Dietrich, p. 222; Baumgart, “Der deutsche Hof der Barockzeit als politische Institution,” p. 29; Volker Bauer, *Die höfis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von der Mitte des 17. bis zum Ausgang des 18. Jahrhunderts. Versuch einer Typologie* (Tübingen, 1993), p. 68.

88 Gerd Bartoschek, “Die Malerei im friderizianischen Berlin,” in Hans-Joachim Giersberg and Claudia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Potsdam, 1986), vol. 2, p. 169. 其中一些音乐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侄子，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那里找到了工作，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721年将“6首多重乐器协奏曲”献给了他，后来这些乐曲以“勃兰登堡协奏曲”之名闻名于世。

89 Dollinger, *Preussen*, p. 103.

90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98.

91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51; Carsten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Sammlungen und Kabinette als Schnittstellen einer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Sös

emann, vol. 1, p. 309.

92 *Œuvres*, vol. 2, p. 1.

93 Thomas Biskup表明，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节俭被夸大了。他指出，在其统治的后半段，宫廷扩大了一倍，大量钱财被花在柏林王宫的内部装饰上——*Friedrichs Grösse*, p. 36 and idem,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101。弗里德里希还在1733年掀起了一股建筑热潮，到18世纪30年代末，有33座新的贵族府邸拔地而起，参见Melanie Mertens, *Berliner Barockpaläste . Die Entstehung eines Bautyps in der Zeit der ersten preussischen Könige* (Berlin, 2003), p. 10. Gerhard Oestreich充满信心的断言，国王在其宫廷上的支出只占其岁入的1%，虽然无法核实，但这个数字肯定是太低了，参见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61。

94 *Œuvres*, vol. 2, p. 8. 我在这里使用了（之后也会使用）一个极好的翻译版本，参见*Posthumous Works* (London, 1789), vol. 1, p. 12。

① 1英里约合1.6千米。（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注，下文不再说明。）

② 1英亩约合4046.8平方米。

③ 霍亨索伦家族取名的选择范围很有限——不是弗里德里希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这自然会导致混乱。“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20—1688）不能与他的孙子、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混淆。不过图林根的罗伊斯家族君主们在选择名字时更为吝啬，其无数个儿子受洗的名字都是亨利。——作者注

④ 此处化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典故。亨利四世本为新教徒，为继承法国王位改信天主教。据传他曾说“巴黎值得一场弥撒”，意指为了得到法国值得改信天主教。

第2章

弗里德里希的驯服

弗里德里希与他的父亲

一个明智的父亲，不会试图把他的儿子变成一个缩小版本的自己。如果按一个模子雕刻时用力过猛，结果就可能偏向非常意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他最年长的儿子，出生于1712年1月24日的弗里德里希身上。弗里德里希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这次他很幸运，因为之前的两个儿子分别在1708年和1711年夭折。（之后还有一个儿子在1719年夭折。）直到弗里德里希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才有了急需的候补继承人——精力充沛的奥古斯特·威廉，后来又有了海因里希（1726年）和奥古斯特·费迪南德（1730年）。此外，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7个女儿中有6个活过了童年，总共10名成年子女的数量令人印象深刻。

就其本质而言，君主与其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问题。18世纪初就发生过一些惊动一时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最为著名的便是1718年彼得大帝的长子阿列克谢的死亡，他在酷刑下屈打成招又被他的父亲下令鞭打。在与霍亨索伦家族关系密切的汉诺威家族，家庭冲突虽然没那么致命，但次数更为频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汉诺威的索菲娅·夏

洛特女公爵的儿子，他娶了他的汉诺威表姐索菲娅·多罗特娅，后者是汉诺威选帝侯，1714年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女儿。

当然了，近亲结婚是欧洲统治家族的常见现象，但浅薄的基因库可能造成不幸的后果。汉诺威家族有精神不稳定的遗传基因，这种不稳定后来显现在英国的乔治三世、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及其弟弟奥托（他们的母亲来自霍亨索伦家族）身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情况肯定是卟啉症导致的，乔治三世的情况大概也是因为同一种疾病。卟啉症是一种痛苦的遗传性疾病，从都铎王朝经由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女儿，普法尔茨的伊丽莎白，传到了汉诺威家族。¹虽然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描述过卟啉症，但这种病直到1871年才有了生物化学角度的病理解释，并且直到1889年才被赋予现在的名字。²

在许多传递者身上，这种疾病都呈休眠状态或是轻微到检查不出来的程度，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身上，它释放了全部的威力。他的病严重发作过4次，1707年、1718年和1734年的发作让他差点死掉，而1740年那次致命发作让他在51岁的年纪去世。³在这几次严重发作之间，还有一些不至于让他丧失活动能力但仍然很可怕的发作。通过那个时代的人描述这种病的症状时使用的词汇，可以获得一些关于这些症状的概念：“晕厥”“坐立不安”“妄想”“精神错乱”“愚蠢的幻想”，尤其是“暴怒”。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卟啉症折磨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他时而失眠，时而噩梦缠身，行为偏执，生殖器肿胀（这导致排尿很痛苦），便秘与腹泻交替，嘴里起了大水疱，口吐白沫，还伴有剧烈的腹痛。与这种病相关的痛风也是常客。⁴1734年10月，弗里德里希从波茨坦给他姐姐威廉明妮写信说，他们父亲的情况非常糟糕：他的腿一直肿到了大腿根部，小腿和脚趾之间的脚部是明亮的猩红色，充满了脓液，双臂和脸颊消瘦得可怕，他的脸色蜡黄，布满了蓝色的斑点，他痛苦得几乎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⁵

172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无奈地写道：“我不能违背上帝的意愿，我必须耐心地承受这一切。”⁶ 他经常表达这种对神恩的顺服之意。1734年，他儿子记述道，他“面带着一种动人的、悲切的神情”说，他只有46岁，已经拥有了一个男人在人世间所能要求的一切，然而同时也忍受着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我希望能耐心地忍受这一切。我的主为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大概也要因为自己的罪孽受上帝的惩罚。愿主的意志得以实现，愿主根据神圣意志决定我的命运。我会永远祝福和颂扬他的大名。”⁷ 不幸的是，这英勇的决心无法付诸实践，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明显缺乏耐心这种美德。他天生就任性，4岁的时候便显露了暴躁的性情，当时他的女家庭教师要把他当作玩具的一枚金鞋扣拿走，他就吞下了那枚扣子。在一开始的歇斯底里之后——那时他母亲的高声尖叫足以“粉碎岩石”——一大剂泻药解决了问题，鞋扣被送去放在宫殿的“珍奇馆”里展出。⁸ 还有一次，女家庭教师说要惩罚他，这个小男孩就爬到楼上育儿室的窗台，威胁要跳下去。⁹ 在去汉诺威看望祖父母时，因为动手打了表兄乔治，他不得被送回家。¹⁰ 弗里德里希·威廉长大后身材变得圆滚滚的，脸色红润，个子不高（他身高5英尺5英寸^①），耐性也很差，而且出了名地喜怒无常。¹¹

显然，我们无法确定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粗鲁行为有多少是由于他的个性，又有多少是源自对身体疼痛的反应。然而，即使他享有最好的健康状况，他很有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相处的父亲。例如，他的母亲很早就发现了他那传说中的吝啬。当她发现这个孩子对“我的金币”精心地记账时，她评论说，“他年纪这么小就是个守财奴！”¹² 他的独裁主义也深入骨髓并经常表现出来，他对基督教加尔文宗的迷恋同样非常强烈，尽管他认为宿命论非常可怕，并以自己典型的放纵态度拒绝这种信条。¹³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毫不意外表现出了军国主义思想。他一登上王位，就公布了一份新的官秩表，以牺牲文职人员的利益为代价提升军人的地位。陆军元帅现在跨越国家和宫廷的所有高级职位，直接位列社会

等级的最前列。再往下，连上校的地位都提升了55位。¹⁴ 1725年以后，除了相当迂腐地穿着一件上校军装，人们再也没有见到国王穿过其他衣服，因为这个军衔是他父亲授予他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他父亲死后再无人有资格可以晋升他的军衔。¹⁵ 他告诉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他从来没有像在凶残的马尔普拉凯会战中那样享受过；没有比领导一支军队更高的使命了；如果能征募到更多士兵，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指挥官，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¹⁶ 在他看来，人民存在是为了国家，国家存在是为了军队，军队存在是为了勃兰登堡王室的领袖。¹⁷

同样也无法用疾病的因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娱乐和文化的态度辩解。他喜欢的是打猎。对他来说，仅次于杀死敌军士兵的最好消遣就是猎杀柏林和波茨坦周围森林中的各种动物。他细致的记录显示，在1717年到1738年间，仅在武斯特豪森一地，他就猎杀了25 066只野鸡。弗里德里希·威廉虽然出了名地厌恶仪式，但他为狩猎破了例，为自己最喜欢的一只猎鹰精心举办了葬礼，它在与一只苍鹭的“英勇搏斗”中落败。¹⁸ 11月3日的圣胡贝图斯节（圣胡贝图斯是猎人的主保圣人）是仅有的两个他会庆祝的节日之一（另一个是9月11日的马尔普拉凯会战周年纪念日）。¹⁹ 他为自己修建的唯一一幢建筑是位于波茨坦东南的一个猎人小屋，此事很能揭示他的性情。这座小屋非常像一座简单的荷兰式排屋，仅有一间餐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和一间给副官用的房间，它被称为“星星”，因为这座小屋修建在辐射状的猎场大道中心。²⁰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有另外3个可供他使用的狩猎小屋：一个在柏林东南的克佩尼克，现在那里是首都的一部分；一个在柏林以西的格鲁内瓦尔德森林里；还有一个在柏林以南20千米的武斯特豪森。其中最后一处是他最喜欢的居所。²¹ 据他的大女儿威廉明妮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退位，然后到武斯特豪森做一个每年领1万塔勒年金的普通乡绅。他声称，当他在祈祷和耕作的时候，其余的家庭成员将负责操持家务，威廉明妮负责管理放纺织品的柜子、缝纫和修补衣服。²²

在武斯特豪森，弗里德里希·威廉结束狩猎之后最喜欢的消遣是他的“烟草议会”，一个专为男性举办的聚会，“烟草议会”的议事日程就是吸烟、喝啤酒和言语粗野的聊天。大部分受邀者都是军官，这毫不令人惊讶。据奥地利大使冯·泽肯多夫伯爵回忆，聚会从晚上5点钟开始，能一直持续到午夜。²³ 格奥尔格·里希夫斯基1737年的一幅著名画作展示了这种场景：在一间陈设简陋、墙壁粉刷成白色的房间里，弗里德里希·威廉坐在朴素的橡木长桌一头，客人们坐在没有靠背的长凳上。在场的人中，只有他年纪最小的3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15岁）、海因里希（11岁）和奥古斯特·费迪南德（7岁）不抽烟喝酒。²⁴（使王储弗里德里希大为解脱的是，他结婚后逃脱了“烟草议会”，并在莱茵斯贝格获得了自己的住宅。）在桌子的另一头坐着两个平民，既没有拿烟斗，也没有端酒杯。他们是“逗乐子议员”，被邀请来给聚会人士的粗鄙幽默当笑柄的学者。坐在他们之间的是一只竖着耳朵的大兔子，这象征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他们职业的轻蔑态度：怯懦和华而不实的吹嘘。²⁵ 根据他的指示，付给科学院院士的薪水被归到了“各类皇家小丑费用”的名目之下。²⁶

正如上述现象显示出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不喜欢进行学识上的追求。他的一个传记作者说：“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独特，几乎完全没有文化。”²⁷ 即使是泽肯多夫伯爵也不得不偷偷夹带书籍到武斯特豪森，免得被弗里德里希·威廉怀疑他把本可以用来狩猎、喝酒或祈祷上的时间浪费在阅读上。²⁸ 弗里德里希·威廉10岁的时候还不能认全字母表，也不会10以上的加法。²⁹ 他在1722年写给继承人的“政治遗嘱”与其说是文理不通，不如说是无法阅读，他写的是一种混乱的意识流，甚至其中数不胜数的拼写错误也不一致。大小写字母的使用十分随意，大写字母出现在单词的中间。他给这篇文章标注的日期为1722年2月17日在“Bo stdam”（应为Potsdam，即波茨坦），而在前一页他拼写的是“Postdam”。³⁰ 他一如既往以一段祷文开始：他要总是信赖上帝，坚信得救，并忏悔自己的罪。他的继承人不得有情妇（“或者应该更确切地称她们为

妓女”）；他必须过敬虔的生活，为国家和军队树立榜样；他不能沉迷于暴饮暴食；他绝不能容忍公共娱乐，因为它们都是撒旦的活动，霍亨索伦王室一直都避免这种事情——这就是上帝之所以赞赏他们的原因；他必须敬畏上帝，不能挑起非正义的战争，但也必须捍卫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利。³¹

他宣扬的大部分内容自己都能身体力行，虽然人们都认为他从来没有戒过酒。据他女儿威廉明妮回忆，他离通奸最近的一次，是对他妻子的侍从女官之一、美丽又贞洁的冯·帕尼维茨夫人产生了欲望。一如既往缺乏细腻的他以唐突无礼的方式直接表露了自己的欲望，然后被以同样激烈的方式拒绝了。然而，当整个宫廷前往不伦瑞克公爵宫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时，他在狭窄的楼梯上又遇到了这位夫人，他抓住她的乳房再度求爱。结果那位夫人狠狠打了他一拳，他的嘴和鼻子流了很多的血。这段经历让他回到了正道上，但从此以后，他把冯·帕尼维茨夫人称为“那个邪恶的女巫”。³²

尽管举止粗鲁，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不是个傻瓜。他机智敏锐，充满活力且意志坚定，他是那种能做成事儿的人，而且通常是以他想要的方式做成。他甚至也有敏感的一面，这在一幅他用来打发失眠夜晚并缓解身体疼痛的画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那幅已完工的作品上贴着标签：“弗里德里希·威廉在饱受折磨中所画”。³³这是一幅极具表现力的自画像，显露出一凡的才能，也能体现出他遭受的苦难。³⁴他意外地对妻子索菲娅·多罗特娅很宠溺，竟然允许她保留在柏林施普雷河畔蒙碧尤宫的庭院，这座宫殿是在他的前任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时期始建并完工的。³⁵

与性情无常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保持任何关系必定都是十分困难的。对王后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其实本想和安斯巴赫的夏洛琳结婚，而夏洛琳却选择了她讨厌的表亲、汉诺威和英格兰的乔治，这对他来说既是伤害又是羞辱。³⁶王后索菲娅·多罗特娅教养

良好、喜爱享乐，对自己的韦尔夫血统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她需要调动所有的善意与温和性情去适应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一起的生活。34年来，她忍受着他的坏脾气，照顾着他度过了许多病痛，并为他生了14个孩子。当她在1757年去世时，非常了解她的冯·伦道夫伯爵写道，这位“国王之女、国王之妻、国王之母和国王之妹受到如此之多的人的敬佩、敬重和爱戴”，是因为她善良、宽厚、仁慈又高贵。他补充道，她也非常肥胖，需要众多的抬棺者——他就是其中之一——用尽全力才能把她的灵柩送到她最后的安息之所。³⁷

父与子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在这对不般配的夫妇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母亲那边，有爱、有关怀、有修养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父亲那边，则是责任、虔诚、严厉和残忍。在人生的前6年里，王储弗里德里希不需要选择。他由一位年老的胡格诺教徒德·罗库尔夫人（她曾经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己的第一位家庭教师），还有她的女儿悉心照料着。因为弗里德里希生命中的其他女人（他母亲和他姐姐）都只说法语，他早年的快乐时光是在一个完全说法语的、充满女性气质的环境中度过的。只有偶尔去武斯特豪森探访他父亲时，才有另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在那里等待着他，那是一个讲德语的、充满男性气质的世界。³⁸在他7岁的时候，随着两个男性家庭教师的新获任命，这种男性的生活方式闯进了他的舒适世界。这两个家庭教师都是高级军官——将军冯·芬肯施泰因伯爵和上校冯·卡尔克施泰因。非常熟悉他们的威廉明妮公主说，前者是一个正派的蠢货，后者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偏执狂。³⁹对弗里德里希来说，幸运的是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雅克·迪昂·德·让登，他是一位胡格诺教徒，给弗里德里希·威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施特拉尔松德国城战中的勇敢表现，而不是他的知识造诣。⁴⁰

这个家庭教师团队受命将弗里德里希训练成一个节俭的管理者、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个热情的士兵。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们俩〔芬肯施泰因和卡尔克施泰因〕尤其必须极其精心地向我儿子灌输对军旅生活的热爱，让他深刻认识到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剑更能给一位王子带来名声和荣誉，同样，如果他不爱剑并且希望用别的方式寻求荣耀的话，再没有什么能令他更受鄙视的了。”⁴¹ 他们面临的是一项艰难的任务。1717年圣诞节，也就是在弗里德里希6岁生日之前不久，他父亲已经给了他一整个连队的士兵。他们装备齐全，有武器、鼓、旗帜和军旗，甚至还有能发射炮弹的微型大炮。但这个小男孩仅仅看了他们一眼，就转头看起了一卷装订华丽的法国乐谱，并很快用他的鲁特琴让女听众们如痴如醉。⁴² 培养的第二个目标也是有问题的，虽然目前问题还不明显。根据下面由172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口授的武斯特豪森每日日程安排来看，王储已经竭尽所能了：

早上5点30分，起床：王储必须起床，大声祈祷，然后必须快速洗漱、穿衣并收拾好头发。

早上5点45分，迪昂及所有的仆人进来，他们要聚在一起跪在地上背诵他们的祈祷词；然后迪昂应当读一章《圣经》并至少唱一首动听的赞美诗；当仆人走了之后，迪昂要读当天的《圣经》文本，解释和讨论这段文本，并重复教义手册中的段落。

上午7—9点，由迪昂教授历史课。

上午9点—10点45分，由诺尔特纽斯教授宗教课。

上午11点，用肥皂清洗后，去见国王。

下午2—3点，迪昂教授政治地理。

下午3—4点，道德教育课。

下午4—5点，迪昂教授用德语写信——从文体方面加以改进。

下午5点，洗手，再去见国王，跟他一起骑马。

下午6点，自由活动时间，在不违背上帝律法的前提下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

周日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被允许睡到7点，但还得跟他父亲一起参加一个（冗长的）教堂礼拜仪式。⁴³

不可能精确地断定弗里德里希·威廉何时开始意识到，他为儿子兼继承人设计的完美计划出错了。小弗里德里希既狡猾又聪明，善于对他父亲喜爱但他自己暗自讨厌的一切事情伪装出兴趣，尤其是狩猎、操练、射击和指挥他6岁时专门为他设立的那支由130名军校学员组成的连队。⁴⁴到1724年，他父亲肯定开始怀疑了，弗里德里希·威廉说：“我很想知道那个小脑袋里装的是什麼。我很清楚弗里茨〔弗里德里希〕与我品味相左，我也知道有人给他灌输了相反的观念，毁掉了我的一切努力。”⁴⁵就餐的时候，那位虔敬派教徒弗兰克看到弗里德里希和他姐姐威廉明妮只是用蓝色的大眼睛彼此对望，在他们父亲面前一言不发，他感到很不安。只有当国王外出打猎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才活跃起来，他嘲笑在场的学者和教士们，其中也包括弗兰克本人。⁴⁶1724年，在外国的外交官中间开始流传这位父亲不喜欢弗里德里希表现出的“娇气”的小故事，比如，在寒冷的天气里戴着手套打猎，或是使用三齿银餐叉而非士兵们偏爱的双齿钢餐叉。⁴⁷害怕枪声是另一个令人沮丧的迹象。⁴⁸1726年，弗里德里希被带到波茨坦，成为国王亲卫团的上尉，此举意味着对他的教育将更多地侧重军事方面，与此相应，他结束了此前一直享受的那种微不足道的“舒适或快乐”，过上了一种简朴的生活。在阅兵场上，弗里德里希在他父亲面前从马上跌落，这一事故戏剧性地宣告了芬肯施泰因和卡尔克施泰因把他训练成模范士兵目标的失败。⁴⁹

宗教也引发了分歧。弗里德里希自己可能没有说过是何时开始质疑每天被硬塞进肚子的基督教教义的。对于一个天生对“形而上的虚构”——这是弗里德里希后来对基督教的定义——不感兴趣的心灵来说，这种强迫灌输可能适得其反。这种灌输肯定很多。从7岁起他就不得不抄写新约中那些比较重要的章节，任何小错误都会被惩罚，惩罚的手段就是死记硬背教义和赞美诗。⁵⁰吃饭的时候尤其乏味，要诵读祈祷文、布道辞和唱圣歌，并且只允许讨论虔诚的话题。⁵¹在弗里德里希十几岁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彻底拒绝他父亲的冷酷信仰。1720年，弗里德里希的家庭教师对他的宗教教育还是满意的，但到了1726年，在快要举行坚信礼的时候，额外课程被认为是必要的。⁵²仪式最终于1727年4月举行，但这似乎并没有用处。到那时，在家庭教师迪昂的帮助下，弗里德里希已经收集了一套秘密文库，包括约翰·洛克、皮埃尔·培尔和伏尔泰的作品。⁵³它们被藏在安布罗修斯·豪德位于“自由区”的书店里，“自由区”就是一排正对着柏林宫的房子。这批藏书最终达到了3775卷之巨，装在15个书橱里。⁵⁴这一藏书癖好和其他一些小小的奢侈享受，让弗里德里希负债累累，因为他直到17岁才拥有自己的收入。在1727—1728年的那个冬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一个柏林银行家那里借了7000塔勒。鉴于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外的吝啬，他得知这个消息是不可能开心的，但他付清了借款。如果他知道这不是他儿子负债最多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⁵⁵

虽然人们可以想象，在某段时间的某个地方，一位父亲可以与他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保持着一贯和谐的关系，但这并不是经常能看到的现象。对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来说，这对父子天然的紧张关系在后者十几岁时就超过了正常的程度，出现了肢体冲突，最严重时到了父亲几乎要杀死儿子的地步。对弗里德里希意志的毁灭是一场持久战，他父亲要把他变成一个顺从的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的手段很残酷：他从来没有表扬过儿子，从来没有对儿子流露过慈爱，对待儿子的态度比对待宫廷小丑还恶劣。⁵⁶一个讨厌军队、思想自由的败家子，

这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噩梦。不过，只要弗里德里希的缺点隐藏在服从的外表背后，某种暂时的妥协还是可以实现。但随着弗里德里希变得越来越好动和自信，这变得更加困难。1728年1月王室对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的访问是一道分水岭。弗里德里希·威廉本来不打算带儿子同行，只是在东道主的强烈要求下，弗里德里希才被允许参加宴会。

57

强者奥古斯特那虽算不上堕落，但也堪称享乐主义的宫廷，与家中厉行的朴素之间的对比不可能更大了。至少有三项活动是弗里德里希第一次体验。他第一次听到了歌剧，剧目是约翰·阿道夫·哈塞的《克莱奥菲德》，这是最精彩的大歌剧之一。他还第一次听到了由约翰·约阿希姆·匡茨表演的艺术大师级别的长笛演奏。⁵⁸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可能有了第一次与异性恋爱的经验，这也激发了他开始创作诗歌。据他姐姐威廉明妮所述，在用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萨克森国王招待他的普鲁士贵客们进入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国王突然拉开帘幕，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斜倚在壁龛的沙发上，不仅非常漂亮，而且一丝不挂。那时弗里德里希也在场，吓坏了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把他儿子从房间里推了出去，但弗里德里希已经看到的“风景”足够让他想看更多。毕竟，他到了这个年龄——他在德累斯顿度过了自己的第16个生日。奥古斯特这一精心设计的展览是为了转移弗里德里希对他的私生女（据说还是他的情妇）安娜·卡洛琳娜·奥泽斯卡女伯爵的注意力。他把沙发上的女孩——一位名叫拉·弗麦拉的歌剧演员——呈送给他的客人，条件是要弗里德里希放弃女伯爵。威廉明妮总结道：“为了拥有这位美人，我弟弟答应了一切条件，她成了他的第一个情人。”⁵⁹从德累斯顿充满欢乐的宫殿回到阴冷的柏林，弗里德里希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之中，他体重下降，还晕倒过。⁶⁰与奥泽斯卡女伯爵的再次相见是在奥古斯特回访普鲁士宫廷的时候，这次见面带给他的是苦涩的失望，因为她现在怀孕了。沮丧的弗里德里希转向了其他形式不详的放纵行乐。⁶¹

关于这一插曲的几乎所有已知描述都来自弗里德里希的姐姐威廉明

妮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是不可忽视的史料，因为她与弗里德里希非常亲密，还是他秘密的倾听者。但另一方面，她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开始写作的，回忆录里满是错误。⁶²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德累斯顿过得很不自在。回去之后，他写信给泽肯多夫说，他对那里宫廷不敬神的行为感到震惊，并虔诚地补充道，“但上帝为我作证，我从中并没有得到乐趣，我跟我离开家时一样纯洁，也会在上帝的帮助下保持这种纯洁，直到生命尽头”。⁶³所有参与者都不愿确切地说明“放纵行乐”到底指的是什么，也不愿说清楚“一个善良的人”究竟是谁，这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一个善良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在1737年8月16日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写到的一句话，他在信中说，正是这位匿名的缪斯女神第一次激发了他的两种强大的情感：爱与写诗的渴望。他还说道，“这个自然的小小奇迹拥有一切可能的魅力，以及精致和良好的品味。她试图把这些品质传递给我。我在爱情中很成功，但在诗歌方面却很差。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坠入爱情中，也一直是一个诗人”。⁶⁴对于自己顿悟的时间，弗里德里希没有给出具体日期，只是说它发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在这封信的一个脚注里，编辑J. D. E. 普罗伊斯认为，那个“善良的人”指的是“德·弗雷奇夫人”，并将这段经历的时间定在1731年，原因是弗里德里希在1734年给威廉明妮写的信中说，“作为贺拉斯的学生”，站在帕尔纳索斯山的脚下已经3年了^②。⁶⁵然而，这一浮夸的表达并不意味着他在更早的时候没有开始诗歌写作。事实上，普罗伊斯在此前的一部作品中写道，弗里德里希在1737年写给伏尔泰的信中提到了奥泽斯卡女伯爵。⁶⁶

在德累斯顿度过的4个星期让弗里德里希意识到，家中的“文化”是多么狭隘、庸俗和目光短浅。在萨克森的廷臣之中，他结识了王储奥古斯特，这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曾经在法国和意大利完成大旅行^③，在凡尔赛受到太阳王的接待并与哈布斯堡家族联姻。⁶⁷当弗里德里希回到波茨坦沉闷重复的军团职务之中，处在残酷的父亲永远的注视之下，他多么希望能逃脱铁笼。一个微小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迹象，就是他开

始在书信上署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这是从他在德累斯顿时开始的，表明他开始反抗了。⁶⁸从他的父亲越来越过激的行为也可以推断出他越来越自信了。弗里德里希的传记作者普遍认为，在出访德累斯顿时之后，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⁶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终于发现，弗里德里希在德累斯顿时归来后的病症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性需求受压抑引起的。愤怒迅速取代了同情，弗里德里希·威廉要赏赐给第一个举报其子任何不端行为的告密者100杜卡特。⁷⁰

1728年秋天，被逼到心烦意乱的弗里德里希给他父亲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抱怨自己处处受到“残酷的仇恨”。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强硬的答复中，指责儿子是一个“娘娘腔”，不通骑射，外表肮脏，头发留得太长，性格任性，总的来说外表和举止都像个傻瓜。⁷¹弗里德里希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骑马、进食甚至只是散步，都让他父亲浑身不舒服。当然了，还有很多告密者特别乐意告诉国王他想听到的话，比如，弗里德里希把他的掷弹兵制服称作“寿衣”。⁷²弗里德里希经常被与弟弟奥古斯特·威廉进行比较，这很可能加剧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恼怒。奥古斯特·威廉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甚至长相都与其父非常像。⁷³至于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简直看都不想看他。萨克森公使冯·苏姆在1728年10月17日写道，弗里德里希告诉他，他的处境已经无法忍受了。他恳求苏姆请奥古斯特国王出面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好给他更多的自由并允许他外出旅行。⁷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进一步收紧了笼子的栅栏。下一年年初，他给弗里德里希增加了两名年轻的副官，专门监视他的行为。这两人接到的指令专门指出，弗里德里希缺乏“真正的男子汉的志趣”，也就是从军、狩猎和豪饮。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弗里德里希相信，“所有娇弱、淫荡和女性化的活动在男人身上是非常不得体的”。⁷⁵

这时候，国王和王后之间关于他们儿子婚姻问题的尖锐分歧，又给父子间在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冲突增加了政治维度。作为乔治一世的女儿和乔治二世的妹妹，索菲娅·多罗特娅自然热衷于推动汉诺威与普

鲁士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在她看来，要做到这一点，一个理想的方式就是两对表亲结合：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1707年出生）和威廉明妮（1709年出生），以及阿梅莉亚公主（1711年出生）和王储弗里德里希（1712年出生）。当1725年这个提议首次被提出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并没有拒绝，他意识到这一建议能带来明显的好处，即组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横跨德意志北部的新教联盟。威廉明妮写道，她与她的英国未婚夫交换了信件，甚至收到了一枚订婚戒指。⁷⁶ 据英国驻柏林公使杜伯盖准将说，威廉明妮的弟弟也对自己的未来伴侣充满热情，向英国发出了“爱的讯息”。当有人说阿梅莉亚公主的妹妹夏洛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时，“殿下更是陷入了对阿梅莉亚公主极度的爱恋与狂热之中，并对他和夏洛琳更相配的言论表现出很不耐烦，这令普鲁士国王大为惊奇，也令王后非常满意”。⁷⁷ 这段话写于1728年底，而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开始反对王后的计划。他现在与儿子的关系如此疏远，以至于本能地反对任何可能带给他快乐的事情，考虑到给幸福夫妇居住的单独宅邸费用不菲，更是坚定了他的想法。⁷⁸ 他讨厌的表兄乔治于1727年继承英国王位更是增加了反对的理由。奥地利大使泽肯多夫与收受贿赂的普鲁士大臣格伦布科勾结策划的一个阴谋激起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偏见。⁷⁹ 为了协助他们的阴谋，维也纳方面借没有子嗣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获得于利希和贝格公爵领地之机，以皇帝的支持来吊他的胃口。⁸⁰ 否决对英联姻方案的致命一击是1729年夏天普鲁士与汉诺威之间的一场短暂但恶意的争执，起因是普鲁士的征兵军官被逮捕，还有一起边界纠纷，而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回应则是调集一支多达4.4万人的军队。

婚姻能给弗里德里希带去自由，即使不是完全的，也至少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松动。这件事变得越不可能，他就越是急迫。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他因婚姻计划瓦解所产生的痛苦的回应则是轻蔑地问他，究竟怎么会爱上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并大声说“这真是一场闹剧！”。⁸¹ 弗里德里希每天都要遭受他父亲“残酷的憎恶”。杜伯盖在1729年7月记载道，

弗里德里希·威廉现在拒绝跟他儿子坐在一起吃饭，而是让他坐在桌子尽头的一个座位上，他因此经常吃不到东西，不得不依靠他母亲随后送到他房间的食物充饥。⁸² 1729年12月10日，杜伯盖写道，在他父亲讥笑支持英国人的“邪恶分子”时，弗里德里希回应说，“我尊重英国人，因为我知道那里的人爱我”，弗里德里希·威廉抓住他的衣领，用手杖抽打他。⁸³ 身体上的暴力行为现在很常见。在同一个月，弗里德里希还曾被扔倒在地，被迫吻他父亲的脚。⁸⁴

弗里德里希失败的出逃

1730年夏天，在引言中叙述的那痛苦一幕发生后不久，国王和王储一起前往奥格斯堡，弗里德里希的妹妹弗里德里克将要在哪里嫁给安斯巴赫边疆伯爵，然后前往符腾堡和下莱茵地区的霍亨索伦领地。现在杜伯盖在前一年12月的预测应验了，“人们普遍担心不久就会发生悲剧性的事情”。⁸⁵ 弗里德里希的未来看起来非常黯淡。1730年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年仅42岁，他父亲活到了55岁，祖父活到了68岁，所以弗里德里希不太可能短期内通过父亲死亡获得解脱。可能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自吹自擂：“你知道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有些人安慰弗里德里希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父亲的脾气会变得柔和一些，而现实却是，弗里德里希·威廉铁了心要对儿子更严苛一些。在另一个场合，弗里德里希·威廉变本加厉地嘲讽道，如果他被自己的父亲以同样方式对待的话，他早就开枪自杀了。对弗里德里希身体上的虐待也加剧了。在1730年5月访问萨克森的拉德维茨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拳打在弗里德里希的脸上，扯着他的头发让他穿过阅兵场，以便让大家都能看到脸上受辱的痕迹。⁸⁶ 弗里德里希似乎从来都没有思考过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弑君，但他的确计划过逃跑，先去法国，然后从那里逃到英国，他希望在英国实现结婚的计划。

1730年8月5日，弗里德里希在莱茵河畔、曼海姆附近的那次逃跑是一次彻底的惨败，甚至在开始之前就备受挫折。这次逃跑行动是如此笨拙，以至最近一位极具洞察力的弗里德里希传记作者暗示说，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自己。⁸⁷的确，这次行动是如此徒劳，弗里德里希·威廉几天后才完全意识到他儿子打算干什么。然后，他采取报复性的行动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弗里德里希被严密看管起来，沿着德意志的疆土送回柏林，返程路线经过精心挑选，因为国王怀疑英国人参与了密谋，路线避开了汉诺威的领地。根据各方面的说法，弗里德里希毫无悔意，无动于衷。泽肯多夫报告说，弗里德里希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事，也不在乎是否要因此付出生命。不过他补充道，如果那些提前知晓计划的人因为弗里德里希的行为而受难，他会难过的。⁸⁸这被证明是弗里德里希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使对弗里德里希·威廉这样的人来说，处决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也是很难下手的，尽管他确实谈起过这个念头。普鲁士不是俄国，但他肯定会让儿子间接地感受到痛苦。两个主要的同谋中，冯·基恩中尉设法逃到了荷兰共和国，并从那里去了英国，但汉斯·赫尔曼·冯·卡特中尉在柏林被逮捕。⁸⁹

弗里德里希的姐姐威廉明妮也知道出逃计划，王储很久以前对她吐露过这件事。她第一个体验到了父亲的愤怒。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回到柏林时，她记载道：

我们都跑去亲吻他的手，但他一看到我，就充满了愤怒和狂暴。他的脸色阴沉，眼睛冒着怒火，嘴边直冒白沫。“你这个讨厌的恶棍！”他尖叫着说道，“你还敢靠近我？让她滚出去！她可以去跟她的流氓弟弟待在一起。”说这些话时，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脸上打了好几次，其中一下重重地打在太阳穴上，我摔倒在地。如果不是冯·桑斯菲尔德小姐抓住我的头发扶了我一下，我的头就会撞在镶板的棱边。我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国王彻底发狂了，他想再过来打我踢我，但王后和我的

弟弟妹妹把他拉了回去。

她补充道，当她恢复意识的时候，她抱怨那些保护她的人为何要将她从死亡中拉回来，死亡要比她现在被迫面对的生活好上一千倍。⁹⁰这种暴行是无法保密的。法国和英国的大使都记录到，国王的咆哮和受害者的尖叫声响彻了整座宫殿。⁹¹

弗里德里希一开始被带到了柏林附近的米滕瓦尔德，9月16日，由弗里德里希·威廉最亲密的顾问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格伦布科元帅率领的一群人在那里审问了他。他们问了弗里德里希185个问题，全部都是国王亲自起草的，其中许多问题都暗示死刑是最可能的结局。⁹²然后弗里德里希被押送到奥得河畔屈斯特林的监狱中，在那里他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里只有墙壁高处一个缝隙能照进来些许光亮。他在那里思索着自己的命运。⁹³他写信给威廉明妮说，他现在知道了，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被自己的父亲憎恨。⁹⁴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正忙于报复那些小角色们。经过一场军事法庭审判，在逃的冯·基思中尉的模拟像被吊起来泄愤。波茨坦一位牧师的女儿，仅仅因为曾经和弗里德里希一起演奏音乐，被判处在父亲的住宅外面、在公共广场及“城里的所有的十字路口”受鞭打，然后被送到施潘道监狱“终身监禁”。就连无生命的物体也不能幸免。弗里德里希在他家庭教师迪昂的帮助下搜集起来的那个大型秘密图书馆被打包售卖出去。迪昂被流放到位于波兰边境的梅默尔（相当于普鲁士的西伯利亚）。⁹⁵

然而，在国王复仇行动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冯·卡特中尉。军事法庭已经判处他终身监禁，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干涉下，他被判处死刑。甚至他的贵族亲戚也救不了他。弗里德里希·威廉拒绝了卡特的外祖父、冯·瓦滕斯莱本元帅对他宽大处理的请求，他对冯·瓦滕斯莱本元帅说，一个人死掉总比“整个世界或是帝国被摧毁”要好，卡特本来要被烧红的钳子撕开，他将其改为斩首已经是宽大施恩了。⁹⁶这种报复的狂热

很可能是由于他相信卡特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涉及了性。⁹⁷他在出逃事件后第一次见到弗里德里希时曾反复追问：“是你引诱了卡特还是卡特引诱了你？”尽管记录上并没有清楚显示他到底指的是性还是出逃。⁹⁸具有暗示意义的是，1730年10月17日，一个叫安德烈亚斯·莱普施的人因为“鸡奸”被烧死在波茨坦的火刑柱上，但他似乎是跟一头牛发生了关系，而不是跟某个男人。⁹⁹

经过审讯，卡特被带到屈斯特林，于11月6日被斩首。当随军牧师进入弗里德里希的囚室，告诉他死刑马上就要执行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还以为自己是要被处死的那个人。¹⁰⁰据随军牧师贝塞雷尔记载，卡特被带出来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最后一次看到了他心爱的约拿单”^④，因为他被迫从刑场正上方的窗口观看行刑。¹⁰¹随着斧头落下，歇斯底里的弗里德里希倒在看守的怀里不省人事。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命令，一位随军牧师陪伴左右，他父亲想利用这次预料之中的心理崩溃引导他重归基督教的慰藉怀抱。¹⁰²

无法断定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否真的打算把他儿子也杀掉。奥地利大使泽肯多夫向王后汇报说，只有皇帝的干预才能救弗里德里希。后来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己公开说，是查理六世请求他宽大处理才改变了他的想法。¹⁰³1730年的秋天，弗里德里希·威廉无疑处在一种可怕的状态中，他喝下比平时更多的酒，在王宫里随意晃荡着，大喊他被鬼缠住了，他还在午夜时分下令要马车载他去武斯特豪森。英国公使盖伊·狄更斯说：“普鲁士国王无法入睡，军官们每天晚上都陪着他，在睡梦中他胡言乱语，谈论着鬼魂和幽灵。”¹⁰⁴11月9日，弗里德里希被告知，他将被赦免，条件是他要发誓“作为仆人、臣民和儿子”对国王无条件地顺从。此外，发誓的时候不能含糊不清，必须声音嘹亮清晰，内心不得有任何保留。¹⁰⁵

弗里德里希的屈服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里希一直在屈斯特林被密切监视着。虽然他已经从监禁状态中被释放出来，但作为惩罚，他接受了政府实际行政事务的培训，培训只有在举行冗长的宗教仪式时才会中断，包括周日4个小时的布道和礼拜。知道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后，弗里德里希开始屈服并把内心隐藏起来。他被捕后表现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蔑视再也没有出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直密切关注着对他的改造。例如，1731年5月，首席监护人冯·沃尔登上校被告知，弗里德里希必须把他脑袋里捡来的所有法国和英国垃圾清除干净，换之以纯粹的普鲁士的东西，他必须忠于他的父亲，拥有一颗德意志的心，时常祈求神的恩典，眼中始终要有神的存在，要祈愿上帝在当下和以后会永远垂怜于他。¹⁰⁶ 1731年8月1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亲自率领众多的随从来到屈斯特林，检验改造的成果。在觐见国王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扑倒在父亲的脚下。然后他的众多错误和罪行以相配的粗暴生硬方式被重复了一遍。亲眼见证这一切的格伦布科透露，弗里德里希·威廉处在一种令人震惊的得意之中。此外，弗里德里希·威廉告诉儿子，如果他真的成功逃到了英国，他的母亲和姐妹会被关到一个“再也看不到太阳或月亮”的地方，而他本人则会带领一支军队入侵汉诺威，一路烧杀抢掠。伴随着这熟悉的残酷腔调，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显露出一种相当可怜的自卑感，他半得意半懊恼地说，他不懂得“法国礼仪”，想不出“如珠妙语”，而只愿意作为一个朴实的德意志诸侯活着和死去。他还补充说，弗里德里希一直憎恨自己所爱的东西。不出意外，他长篇大论的指责以对不虔敬后果的可怕警告收尾。弗里德里希顺从得无可挑剔，他痛哭流涕地伏在地板上，亲吻父亲的脚，感激他最终的宽恕。¹⁰⁷ 作为无条件服从的标志，两周后，弗里德里希汇报说自己外出打猎了，他对一头牡鹿和一头幼鹿开了枪，可惜都没有打中，但他下一次会努力做得更好。¹⁰⁸

这种羞辱仪式还要经过一个步骤，弗里德里希·威廉才能认为自己已经对儿子取得彻底胜利：他必须让儿子结婚。现在与乔治二世的女儿阿梅莉亚结婚是不可能了，特别是英国显然未能事先揭发弗里德里希的

出逃计划。1730年9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触及王后因双重联姻计划最终失败而失望的痛处，他要她为“英格兰的垮台”干杯，这令她伤心大哭起来。¹⁰⁹ 1731年11月，他还强迫威廉明妮嫁给了她的霍亨索伦远亲、拜罗伊特边疆伯爵，这又一次伤了王后的心，这一人选是一次可怕的屈辱，威廉明妮早先是有望成为英国王后的。更糟糕的是国王为弗里德里希挑选的新娘——贝沃恩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她出身于不伦瑞克家族的一个小旁系，换句话说，是索菲娅·多罗特娅王后的亲戚，但至少在王后眼里，比起有着选帝侯身份和国王头衔的汉诺威家族，她的身份还是低了不少。¹¹⁰ 失望的母亲进行了报复，她用最黑暗的词汇给从未见过未婚妻的儿子描绘了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她就是一个“傻瓜”，一个脾气暴躁、臀部畸形的偏执狂。¹¹¹ 她对威廉明妮说，她未来的弟妹“像两块短木板那样粗壮，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天知道我的儿子要怎样忍受这样一个小矮子”。¹¹² 弗里德里希·威廉也没起好作用，对弗里德里希宣布决定的时候，他说她“既不丑也不漂亮”。对于父亲的进一步评价——她是“虔诚的”——弗里德里希也不太可能有深刻的印象。¹¹³ 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姐妹们甚至说得更为狠毒。他的一个妹妹在和他一起吃饭时说，她某天早上已经见过了未来的嫂子，那时她正在沐浴，结果发现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让人不能呼吸。“她肯定得了十几个肛瘘，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他的妹妹补充说。¹¹⁴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1732年1月，弗里德里希写信给格伦布科说，一想到他的未婚妻，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反感。¹¹⁵ 在3月10日的订婚仪式上，人们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眼中的泪水，人们认为这不是快乐或期待的眼泪。交换完戒指后，他迅速离开了他的未婚妻，公然与另一位年轻的宫廷淑女开始聊天。就连曾努力促成这桩婚事的泽肯多夫也认为，事情太仓促了，他还说弗里德里希·威廉至少应该等到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脸上因轻微天花造成的红点消失。¹¹⁶ 婚礼直到下一年的6月10日才举行。弗里德里希与妻子性关系上的难题将放到下一章去讨论。¹¹⁷ 无论弗里德里希在新婚之夜的感受如何，他的新娘都帮了他很大的忙。

婚礼标志着他父亲改造工程的最后一步。现在他被允许获得自己的收入、自己的住所、自己的家，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自由。弗里德里希的自我塑造之路开始了。

注释

1 Ida Macalpine and Richard Hunter, *George III and the Mad-Business* (London, 1969), p. 196, 214. 他们的发现虽然长期被人接受，但最近受到了挑战，参见 Timothy J. Peters and D. Wilkinson, in “King George III and porphyria: A Clinical Re-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History of Psychiatry*, 21 (2010), pp. 3–19。 后者的结论是，国王是“非常不可能”患有卟啉症的，而他心智错乱的原因永远无法知晓。

2 Nick Lane, “Born to the Purple: The Story of Porphyria,” *Scientific American*, 16 December 2002,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born-to-the-purple-the-st>, accessed 20 March 2012.

3 Claus A. Pierach and Erich Jennewein,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Porphyrie,” *Sudhoffs Archiv. Zei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83, 1 (1999), p. 52.

4 Ibid., pp. 53–61.

5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4), vol. 1: *Jugendbriefe 1728–1740*, p. 248.

6 Ibid., p. 54.

7 弗里德里希王储1734年10月14日从波茨坦写给他姐姐威廉明妮的信，参见 Otto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Ausgewä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eiherr vom Stein- Gedächtnisausgabe (Darmstadt, 1982), vol. 22, p. 56。

8 后来它在霍亨索伦博物馆中展出——Eva Giloi, *Monarchy, Myth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750–1950* (Cambridge, 2012), p. 3。

9 Carl Hinrichs,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in Preussen. Eine Biographie* (Hamburg, 1941), pp. 19–20.

10 Ernest Lavisse, *The Youth of Frederick the Great*, trans. Mary Bushnell Coleman (Chicago, 1892), p. 34.

11 Robert Ergang, *The Potsdam Führer: Frederick William I, Father of Prussian Militarism* (New York, 1941), pp. 25, 44.

- 12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rinz Heinrich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Doppelporträt* (Stuttgart, 1996), p. 16.
- 13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19.
- 14 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reussischer Absolutismus, Merkantilismus, Militarismus* (Göttingen, 1977), p. 50; Peter Baumgart, “Friedrich Wilhelm I.,” in Frank-Lothar Kroll (ed.), *Preussens Herrscher. Von den ersten Hohenzollern bis Wilhelm II.* (Munich, 2000), p. 142.
- 15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 17.
- 16 Arnold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eines Staatsmannes* (Tübingen, 1934), p. 3; Baumgart, “Friedrich Wilhelm I.,” p. 142.
- 17 Volker Hentschel, *Preussens streitbare Geschichte 1494–1945* (Düsseldorf, 1980), p. 54.
- 18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21.
- 19 Wolfgang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Stuttgart, 1996), vol. 1, p.198.
- 20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 27. 图片和完整描述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Jagdschloss_Stern。
- 21 Marina thom Suden, *Schlösser in Berlin und Brandenburg und ihre bildliche Ausstattung im 18. Jahrhundert* (Petersberg, 2013), p. 12.
- 22 Ingeborg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Eine preussische Königs tochter* (Frankfurt am Main, 1990), p. 103.
- 23 泽肯多夫1727年1月22日从阿尔滕堡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Friedrich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Potsdam, 1835), vol.3, p. 333。
- 24 高质量的复制品可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Datei:Tabakskollegium-1.jpg&filetimestamp=20111030163456>。
- 25 <http://de.wikipedia.org/wiki/Tabakskollegium>.
- 26 Ergang, *The Potsdam Führer*, p. 30.
- 27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50.
- 28 Ergang, *The Potsdam Führer*, p. 28.
- 29 Hinrichs,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in Preussen*, pp. 36–7.

30 Dietrich, p. 243.

31 Ibid., pp. 221–43.

32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p. 285–6.

33 Carlyle, vol. 2, p. 55.

34 我没能找到一份好的彩色复制品，可以见到的最好版本参见http://www.google.co.uk/imgres?q=friedrich+wilhelm+i&hl=en&biw=1366&bih=599&gbv=2&tbm=isch&tbnid=pKaQCELNYjIVUM:&imgrefurl=http://www.preussen.de/de/geschichte/1713_friedrich_wilhelm_i./friedrich_wilhelm_i._-_fortsetzung.html&docid=ks-E-FPGts3yPM&imgurl=http://www.preussen.de/Bilder/Geschichte/friedrich_wilhelm_I./friedrich_wilhelm_I_selbstportrait_LDM.jpg&w=210&h=267&ei=svFqT7HvLs7I8gOPl6HKBg&zoom=1&iact=hc&vpx=882&vpy=271&dur=3524&hovh=213&hovw=168&tx=82&ty=173&sig=103754279896405635068&page=1&tbnh=121&tbnw=87&start=0&ndsp=30&ved=1t:429,r:27,s:0。下面这本书里有一幅黑白复制版：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 14。

35 Gerd Bartoschek, “Die Malerei im friderizianischen Berlin,” in Hans-Joachim Giersberg and Claudia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Potsdam, 1986), vol. 2, p. 169; Martina Weinland, “Friedrich II. Der erste Kronprinz und seine Erziehung durch Friedrich Wilhelm I.,” in Martina Weinland (ed.), *Im Dienste Preussens. Wer erzog Prinzen zu Königen?* (Berlin, 2001), p. 76.

36 Hinrichs,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in Preussen*, pp. 211–13.

37 Lehndorff, vol. 1, pp. 323–4.

38 Wolfgang Venohr, *Der Soldatenkönig. Revolutionär auf dem Thron* (Frankfurt am Main and Berlin, 1988), pp. 263–5.

39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63.

40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22.

41 Ibid., p. 16.

42 Venohr, *Der Soldatenkönig*, p. 265.

43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p. 23–4.

44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27.

45 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26.

46 Ibid., pp. 10–11.

47 Lavissee, *The Youth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130.

48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vol. 2, p. 10.

49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3.

50 Ibid., p. 8;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 8.

51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102.

52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8.

53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30.

54 Eugen Paunel, *Die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Ihre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 während der ersten zwei Jahrhunderten seit ihrer Eröffnung* (Berlin, 1965), p. 46. 宫殿前的“自由区”在1896年被威廉二世下令拆毁，以给他祖父威廉一世的一尊塑像腾出地方。

55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 21; Lavissee, *The Youth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25.

56 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 114.

57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21.

58 Heinz Becker, ‘Friedrich II.,’ in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ed. Friedrich Blume (Kassel and Basle, 1955), vol. 4, p. 955; Eugene Helm and Derek McCulloch, ‘Frederick II, King of Prussia [Friedrich II; Frederick the Great],’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0176?q=frederick+prussia&search=quick&pos=1&_start=1#firsthit. Accessed 11 April 2012. William Christie和Cappella Coloniensis乐团有一份绝佳的《克莱奥菲德》录音唱片，最近Capriccio唱片公司将其再版了。

59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p. 107–8. Carlyle, vol. 2, p. 27. 本书中写道，弗里德里希与奥泽斯卡女伯爵之间还有性关系，但在威廉明妮的回忆录中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份回忆录似乎是他唯一的史料来源。

60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112.

61 Ibid., p. 48.

62 对它们可靠性的最新讨论，参见Ruth Müller-Lindenberg,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die Hofoper als Bühne des Lebens* (Cologne, 2005), p. 12。

63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 261.

64 *Œuvres*, vol. 21, p. 96.

65 *Ibid.*, vol. 11, p. 44.

66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 48, n. 1.

67 有文字和图像很好地展示了萨克森宫廷在这一时代的魅力，参见Werner Schmidt and Dirk Syndram (eds.), *Unter einer Krone. Kunst und Kultur der sächsisch-polnischen Union* (Leipzig, 1997)。

68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10.

69 例如, Carlyle, vol. 2, p. 27;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3; 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Munich, 2004), p. 23。

70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113.

71 Max Hein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erlin, 1914), vol. 1, p. 16.

72 Carlyle, vol. 2, p. 110.

73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 55.

74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22.

75 *Ibid.*, p. 21.

76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46.

77 Carlyle, vol. 2, p. 51.

78 *Ibid.*

79 Andrew C. Thompson, *George II. King and Elector*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 p. 82–3.

80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17.

81 *Ibid.*, p. 33.

82 Carlyle, vol. 2, p. 89.

83 *Ibid.*, p. 113.

84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29.

85 Carlyle, vol. 2, p. 114.

86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p. 29–38.

87 Luh, *Der Grosse*, p. 18.

88 泽肯多夫1730年8月14日从韦瑟尔写给皇帝弗朗茨一世的信，参见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 4。

89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51.

90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p. 206–7.

91 Hahn, *Friedrich II.*, p. 35.

92 Pierre Gaxotte,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41), p. 60.

93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p. 214–15.

94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68.

95 Paunel, *Die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p. 47.

96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 14.

97 Ursula Pia Jauch, “Annotationen zu den Asylanten, Querdenkern und Avantgardisten in der ‘Tafelrunde’”, in Sösemann, vol. 1, p. 203.

98 Wolfgang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biografisches Porträt* (Freiburg, Basle and Vienna, 2011), p. 83.

99 <http://www.erwin-in-het-panhuis.de/online-bibliographie-zur-homosexualit%C3%A4t/bibliographie-1820-bis-heute/>.

100 Thomas Stamm-Kuhlmann, “Vom rebellischen Sohn zum Landesvater. Der Herrscher zwischen Familie und Staat,” in Sösemann, vol. 1, p. 14.

101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p. 82.

102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40.

103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p. 9, 15.

104 Carlyle, vol. 2, pp. 281, 298.

105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71.

106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 47.

107 “Protokoll über die Zusammenkunft Sr. Majestät des Königs mit dem Kronprinzen K. H. in Cüstrin den 15. August 1731,” in *ibid.*, p. 50.

108 Hein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 19.

109 泽肯多夫1730年9月5日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ibid., p. 11。

110 以下文章中有一份极好的族谱：Thomas Biskup, “The Hidden Queen: Elizabeth Christine of Prussia and Hohenzollern Queenship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larissa Campbell Orr (ed.), *Queenship in Europe, 1660–1815: The Role of the Consort* (Cambridge, 2004), pp. 310–11。

111 Karin Feuerstein-Prasser, “*Ich bleibe zurück wie eine Gefangene.*”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Regensburg, 2011), p. 18.

112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311.

113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 77.

114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p. 349.

115 Hein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 24.

116 Lavissee, *The Youth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388.

117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 74.

① 1英尺约合0.3米，1英寸约合2.5厘米。

② 贺拉斯是古罗马诗人，帕尔纳索斯山是希腊神话中缪斯的住所。

③ 进行“大旅行”的习俗在17—18世纪的欧洲贵族中十分流行。他们往往在成年之际游历欧洲，以提升文化修养，并积累为人处世的经验。

④ 《圣经》中，约拿单是大卫的密友，他的死使大卫非常悲伤。

第3章

弗里德里希的塑造（上）

恢复

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监禁中解放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1731年8月的和解仪式之后，弗里德里希被允许离开屈斯特林日常出游，一段时间以后，他能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尽管只能在勃兰登堡境内游玩。11月，他在柏林参加了威廉明妮的婚礼，并正式被军队重新接纳。¹在屈斯特林，他被安排学习省级行政机构的基本业务，特别是经济节约和精细核算的需求方面。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指示，这一切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因为从书本上什么也学不到，只有实践经验能教人东西，就是因为阅读了太多无用的书籍，王储才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危险和有害的处境”。因此，弗里德里希的读物仍局限于一本赞美诗集、《圣经》和约翰·阿恩特名为《基督教真义》的虔诚的反思录。²

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的订婚令弗里德里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一个月后，即1732年4月，弗里德里希被任命为一个步兵团的上校并搬到了第一营指挥部的所在地、柏林西北的小镇鲁平（第二营驻扎在鲁平以南35千米处的瑙恩）。在这里，弗里德里希表现出认真遵守对父亲许下的誓言的样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事务。他确实非常地勤勉，以至

于1734年，以要求严苛出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当年年度考核之后专门对他的团给予特别表彰（然后在下一年的表彰活动后拥抱了他）。这次嘉奖之后不久，弗里德里希被擢升为少将。³同样是在173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经历了一次卟啉症的剧烈发作，彻底的解放似乎指日可待。弗里德里希已经准备好执政了，但他父亲出人意料地康复了，这令他非常失望。⁴

弗里德里希清楚地知道他的自由是有条件的，所以他做到了所有的要求。但在经历了过去的屈辱后，他也开始重拾自尊，并在父亲强烈的个性下维护自己的本性。他通过采用引言中提到的那三方面策略实现了这一目标：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召集友好的伙伴，以及超越父亲。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文化。从基督教虔诚的节制中解放出来后，弗里德里希重新开始阅读1730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收并出售的那类书籍。他不会拉丁文——这是由于他父亲命令没必要学这么“没用”的东西⁵，他也几乎不会英语，并且只在跟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讲话时说德语，因此，这意味着一切都必须用法语。弗里德里希阅读了希腊和罗马古典著作的法文译本，还有英国乃至德意志的哲学。还可以推测，1730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禁止订购的法国葡萄酒，又回到了他的餐桌上。⁶

弗里德里希长期以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皮埃尔·培尔（1647—1706），其作品曾被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虽然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试图把培尔收归基督教阵营，但他还是被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者视为非常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那位的话。⁷他1697年出版的《历史和批判词典》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版再版。伏尔泰称赞它是“第一本教人思考的词典”。为表达敬意，弗里德里希资助了这部著作，并从其简明的全文中挑选出若干文章编成两本选集。在他看来，这本书“撕下了蒙在人类眼睛上的谬误的眼罩”，给了宗教致命一击。⁸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和书信中，对培尔及其影响力的赞誉之辞比比皆是。他称赞培尔是“伏尔泰的真正先驱”“欧洲首屈一指的辩证法大师”“在古往今

来的所有人中，他最懂得如何使用辩证法和推理得到最多的东西”，等等。⁹ 弗里德里希写道，在反对宗教不宽容的斗争中，伏尔泰站在了另一个巨人培尔的肩膀上。¹⁰ 在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向达尔让斯侯爵抱怨道，他无意中把培尔的书落在了布雷斯劳。他要求把《关于彗星问题的思考》尽快送过去，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一治愈我们偏见并提供必需营养的精神食粮，来维持我们的理性和良好的判断”。¹¹ 这本书后来被他誉为最好的逻辑思维指南。¹²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培尔对弗里德里希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在弗里德里希图书馆中的《历史和批判词典》这本书里，有大量的着重线和旁注。¹³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即1785—1786年的那个冬天，他仍在让人把他4版培尔《历史和批判词典》中某一版里的部分段落读给他听。¹⁴

在鲁平，弗里德里希还可以将注意力投入到音乐中去，他认为音乐值得他这么做。音乐对他来说远不仅是令人愉快的消遣和闲暇时刻的私人娱乐。终其一生，他都把音乐当作自己本性和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自视为阿波罗，是学术和艺术（特别是音乐）的保护神。这种认同作为主旨贯穿在他的工作中。¹⁵ 1738年，他给绍姆堡-利珀伯爵写了一封言辞雄辩的信，强调音乐对于一个真正贵族的存在以及积极生活的核心意义。他把这样的贵族与那些可鄙的西班牙贵族们比较，那些贵族认为懒惰是高贵身份的真正标志。弗里德里希坚称，音乐传达情感、直击灵魂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¹⁶ 他刚到鲁平，就着手组建了一支由器乐演奏家和歌手组成的乐队。约翰·戈特利布·格劳恩是第一个加入乐队的，他是一位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曾担任过瓦尔代克亲王的音乐总管。1735年他的弟弟，教授弗里德里希音乐理论的卡尔·海因里希也加入进来，他将成为弗里德里希宫廷里最重要的作曲家。¹⁷ 弗里德里希洞察到了格劳恩兄弟的才华并确保长期雇用他们，这点非常值得赞扬。这两人一直为弗里德里希服务，直到他们在1771年和1759年分别去世。另外两位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兼作曲家弗朗茨和约翰·本达兄弟也是这样，他们先后于1733年和1734年被弗里德里希纳入麾下，直到分别于17

86年和1752年去世。¹⁸ 弗朗茨·本达在自传中声称曾上万次为弗里德里希演奏的长笛协奏曲伴奏。¹⁹ 鲁平其他的杰出音乐家包括大键琴演奏家克里斯托夫·沙夫拉特和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约翰·戈特利布·雅尼奇。²⁰ 还有一位偶尔到来的访客——长笛演奏家约翰·约阿希姆·匡茨，如果没有被波兰—萨克森国王留住的话，弗里德里希本来很愿意聘请他。

弗里德里希在鲁平的音乐团队最终达到了17人的规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到安哈尔特—科滕亲王利奥波德处就职时，利奥波德的乐队也只有16人）。²¹ 1736年，他们全部随着弗里德里希搬到了鲁平以北约20千米，位于莱茵斯贝格的新住所。这处住所是173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应弗里德里希之请买下的，代表着父子和解之路的完成。这座城堡位于风景如画的格仁尼瑞克湖畔，莱茵河水汇入湖中，四周环绕着山毛榉和橡树林，现在急需修整。国王的慷慨之举有着严格的限制，他不允许拆除现有建筑完全重建。尽管初步的调整是在皇家建筑总管约翰·戈特弗里德·克梅特尔监督之下进行的，但弗里德里希很早就秘密地向他的朋友，也是他选中的建筑师格奥尔格·文策斯劳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男爵咨询，他是一位有军队背景、富有天赋的业余建筑师。他接受的第一项正式委托就是为弗里德里希在鲁平修建一座规则式园林，主要建筑是一座阿波罗神庙。²² 之后，在1736—1737年，弗里德里希派他到意大利长期游历，研究古代和现代的建筑，特别是剧院建筑。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克诺贝尔斯多夫着手把莱茵斯贝格的城堡改造成合乎王储身份的宅邸。最后成果是一座中等大小，比例合适的乡间别墅，其外形延续至今几乎未曾改变。²³ 单独的庭院伸出两个侧翼，由开放的柱廊连接，尽头是两座圆形塔楼，因为需要把已有的塔楼纳入建筑中，这座建筑拥有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虽然克诺贝尔斯多夫绘制设计图并担任工程负责人，但提供设计理念的是弗里德里希，特别是那些与内部空间相关的设计。这所建筑不追求象征性的炫耀目的，它的朝向远离城镇的公共空间（宫殿背对城镇），而是对着花园和湖泊组成的私人领域。弗里德里希可以从位于南边塔楼的小图书馆的3个方向俯瞰

湖泊和花园，视线不受其他建筑的阻碍。紧邻这间房间的是他的主图书馆，接着是一间书房和一套有8个房间的套房，占据了南翼大部分的空间。塔楼房间的天花板上是一幅名为《书房中的安宁》的绘画，由宫廷画家安托万·佩恩绘制，画中智慧女神密涅瓦为科学、艺术和文学的拟人化形象围绕，其中一人手指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两个作家的名字：贺拉斯和伏尔泰。²⁴ 同时代人的描述揭示了建筑里的家具和内部装饰是多么豪华，银色、镀金与柔和的色调十分显眼。²⁵ 在室外，中世纪的护城河与莱茵河都被裁弯取直，显得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建造的、以直线为特征的法式花园相得益彰。²⁶

弗里德里希与妻子的关系

紧邻着弗里德里希住处的是他妻子的套房，她于1736年8月20日搬来莱茵斯贝格。她的卧室里摆放着一张巨大又华丽的卧床，这是一份来自她公公的礼物。²⁷ 弗里德里希·威廉急于让这张床立即发挥令人满意的功能，这心愿如此热切，以至于他答应等弗里德里希生下一个孩子后就允许他出国旅行。²⁸ 一年前，他给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送生日礼物的时候附了一张短笺：“夫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地祝贺你，愿你长寿，早日生下一个结实健壮的胖小子。”²⁹ 他这个愿望的受挫引出了对弗里德里希性取向重要却含糊的质疑。

过去，历史学家们要么不去提这个话题，要么就是轻蔑地迅速跳过去，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奥托·欣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1915年，他关于霍亨索伦家族历史的权威著作首次出版，其中有一段谈论弗里德里希的性取向问题。他表示，“流言蜚语”是矛盾的，无须去反驳；关于“变态倾向”的恶意故事不应重复提及；弗里德里希年轻时已经耗尽了（异性）爱情之杯的最后一滴甘露，然后因为健康的原因回避爱情；并且他对女人的那种冷淡是18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态度（但这一观察结论在

考虑到伏尔泰、卢梭或狄德罗等人时就不合适了）。³⁰ 下一代的传记作家里最杰出的一位格哈德·里特尔更是敷衍，只是记录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以及“弗里德里希的性生活没有异常之处”，虽然他承认说“他在心理方面的性需求同身体方面一样是非常有限的，这点不同寻常”。³¹ 特奥多尔·席德尔也没有什么新的成果，他一本正经地写道，“没有官方记录”能解释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很早就确定他不会有孩子（说得好像这就解决了什么疑问似的）。席德尔补充道，虽然伏尔泰散播过有关他性取向的恶意谣言，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时陪伴过他的医生、生于瑞士的约翰·格奥尔格·冯·齐默尔曼，这位医生写道，弗里德里希确信自己是因为婚前不久被妓女传染了性病而导致阳痿的。³² 目前公认的权威传记的作者约翰内斯·库恩施也坚持认为，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是个彻底的异性恋者，但他的“同性恋倾向”在他即位后变得明显起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³³ 他也重复了齐默尔曼的叙述。³⁴ 但是，在庆祝弗里德里希三百周年诞辰时发表的两项短篇研究的观点是很明确的：“解释弗里德里希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是他的性取向。弗里德里希是同性恋者。”这是沃尔夫冈·伯格多夫的结论，而莱因哈德·阿灵斯对于自己所提出的“弗里德里希是个同性恋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有合理的怀疑。”³⁵ 他们的观点最近被彼得·米夏埃尔·哈恩出色的传记所证实。³⁶ 接下来我们将要论证，最近的这些观点是最符合已知材料的，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定无疑的答案。

关于弗里德里希的性取向，最翔实也是影响力最持久的同时代记录是齐默尔曼提供的。根据这一版本，弗里德里希在年轻时是热情的异性恋。因为他父亲残忍地拒绝让体面的女人们陪伴他，迫于需求，他投向了妓女的怀抱。不幸的是，就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要带他去不伦瑞克见他的准新娘时，他感染了严重的急性淋病。在他堂叔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的建议下，弗里德里希“接受了马尔肖的医生”诊治，他认为病已经治愈，然后继续行程了。他对这位父亲强迫他娶的新娘产生的所有顾虑，都被“无与伦比”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的“魅力和美貌”所打消，

所以他们的婚姻最初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对幸福的夫妇每晚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可惜在6个月幸福的婚姻生活后，淋病再次严重发作，弗里德里希生命都处在危险之中。公认的唯一补救方法是做外科手术，这导致他的生殖器轻微变形。齐默尔曼强调，这并不等于使人变得“胆小、狡诈又虚伪”的阉割手术。虽然只是“一点点的残缺”，但他没有被阉割，仍能产生精子，因此他还是他一直以来的样子：“聪明绝顶，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无所畏惧的英雄。”他“肯定还”有异性恋的冲动，却认为自己的小缺陷让自己成了一个阉人。这是“完全违背他的爱好也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的”，因此他觉得有义务疏远他如此热爱的妻子，并假装他是因为这桩强迫的婚姻疏远了她。但弗里德里希走得更远：他假装自己喜欢齐默尔曼含糊其词地提及的那种“苏格拉底式的爱情”，以便他能继续表现得精力充沛而且有性能力，尽管是对男人。他不愿暴露导致无法有性行为的轻微畸形，而宁愿忍受认为他有“与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相同的堕落恶习”的猜测。³⁷

这种说法除了本身让人难以置信外，还缺乏任何类型的证据。最根本的是，齐默尔曼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消息来源，如果真的有消息来源的话。1733年所谓的手术引起的生殖器变形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是检验齐默尔曼叙述真伪的试金石。作为弗里德里希临终重病的治疗医生，齐默尔曼几乎肯定会有机会做必要的检查。然而，协助筹备弗里德里希遗体安葬事务的外科医生戈特利布·恩格尔愤怒地宣称，国王的生殖器“跟正常的健康人一样完美无缺”。³⁸ 这一观点为协助清洗遗体的3名卫生人员在1790年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证实。³⁹ 虽然以下这点不一定会证明齐默尔曼的话站不住脚，但还是有必要指出，齐默尔曼长期充满热情地崇拜着弗里德里希，尽管他出生于瑞士，又自愿成为汉诺威人。1771年他第一次遇到他的偶像，眼泪汪汪地离开房间后感叹道：“哦，我对普鲁士国王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达！”⁴⁰ 不过，他的记载错误太多，可靠性肯定值得怀疑。例如，他说新婚夫妇结婚后立即搬到了莱茵斯贝格，而事实是3年后。⁴¹ 此外，他自己为弗里德里希的辩解经常走向意料

之外的方向。比如，他写道，“几乎每个”了解弗里德里希的人——朋友和敌人，君主和仆人，甚至他最亲密的知己和同伴——都认为他“卷入了类似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之间的那种关系”。就连齐默尔曼自己也曾相信过这些，特别是由于弗里德里希的一个男性宠臣曾告诉过他，1756年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在同性性行为方面仍然积极主动。⁴²

另一方面，当然也有一些确定的证据表明，就算没有积极活跃地进行异性恋活动，弗里德里希也为异性所吸引。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模棱两可的德累斯顿事件。他与一位已婚女子的调情得到了更详细的记录。这位女子是埃莱奥诺蕾-路易丝·冯·弗雷奇，弗里德里希对她的追求开始于他在屈斯特林的日子。保存下来的7封信写于1731—1732年间，语气热情但轻快，带着讥讽，近乎轻浮并且高度程式化。⁴³有4封信是以诗歌形式写的，或者包含着诗句，例如：

接受吧，夫人，一颗温柔过度的心灵
它不耐烦地等待唯有你的许可
甜蜜地拜服在你面前，
而它到现在为止，还在犹豫不决。
我数着时辰，数着分钟，
直到我收到你的决定，
这将决定我所有的行动。⁴⁴

与这段关系相关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1732年8月30日大臣冯·格伦布科写信给奥地利大使冯·泽肯多夫（他的姓“Seckendorf”经常被拼成“Seckendorff”）说，弗里德里希·威廉曾告诉他，弗里德里希已经让冯·弗雷奇夫人怀孕了，戴了绿帽的丈夫会拒绝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弗里德里

希·威廉为儿子这一性能力的象征感到高兴，并希望弗里德里希能让未婚妻同样印象深刻。⁴⁵对泽肯多夫而言这不足为奇，因为6个月前他已经向维也纳的欧根亲王汇报过，弗里德里希热切地恋慕着这位女士，陷入了与她激烈的寻欢作乐之中，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任何事情。⁴⁶这个故事的最终来源又是格伦布科，他领着奥地利付给的津贴，在弗里德里希身边安插了间谍，并通过泽肯多夫把任何可能有价值的消息送回他的赞助人手中。虽然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故事，但他也没有透露他是如何得知的。他很可能在弗里德里希身边埋下了一个线人，但此人很难出现在这类约会的现场。当然，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人存在什么肉体关系，并且冯·弗雷奇夫人也没有怀孕。泽肯多夫自己都不相信这种说法。一个月后，他告诉欧根亲王，虽然弗里德里希性欲勃发，但“大家公认”他的身体能力无法匹配他的野心，因此他多情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卖弄炫耀，而非真正的欲望。⁴⁷

当然，到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已经订婚了。正如泽肯多夫感叹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对他准新娘的态度在闷声服从和强烈拒绝之间摇摆不定。1732年3月他写信给他姐姐说，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不是没有优点，因为她有一张相当漂亮的脸，一头金发，肤色好看，胸部匀称，身材苗条，但另一方面她眼窝深陷，嘴巴丑陋，牙齿不好，笑容讨嫌，走路的样子像一只鸭子。此外，她所受的教育非常糟糕，谈话过程中很紧张，所以几乎总是保持沉默。她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礼貌文雅，态度谦逊，总之“不是我猜想和被误导的那样糟糕”。不过，他最后说，他对她一点儿也不满意，她是他父亲选中的人就是充分的理由。⁴⁸他自己宁愿从其他的候选人中挑一个，挑一位萨克森—爱森纳赫的公主或是一位梅克伦堡的公主。他刚表示同意婚事就对格伦布科说道：“我的人生一直都不快乐，我相信一直这样就是我的命运……但我还有最后一招，一颗子弹会让我的痛苦和人生同时终结。”他恳求格伦布科停止婚礼。这位大臣的回应是严厉地提醒他想一想腓力二世之子唐·卡洛斯^①的命运。⁴⁹18个月的漫长订婚期并没有让他与自己的命运和解。1732年9月他告

诉威廉明妮，他非但没有爱上自己的准新娘，反倒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厌恶。这桩婚事会一事无成的，他补充说，他们没有亲密感，没有友善的关系。⁵⁰

泽肯多夫仍然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弗里德里希虽然极度抵触，但也能理解，婚姻提供了逃出当前屈从状态的唯一机会。⁵¹他是正确的。同样是1732年9月，弗里德里希在致格伦布科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们想控制我进入一种多情的心境中；但不幸的是，我本性又不是驴子，我很怀疑他们是否会成功……婚姻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年，一旦我达到这个状态，我将成为我自己家里的主人，我妻子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女人不管是在管理还是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她们的份！我相信一个让自己受女性管束的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胆小鬼，配不上男人这个光荣的称号。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以绅士的方式结婚，也就是说，我让夫人做她认为合适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万岁！……我会遵守我的诺言，我会结婚，但在这之后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再见，夫人，再见吧。⁵²

弗里德里希在婚礼临近时的感受也表现在1733年初他写给格伦布科的一封充满嘲讽的信中：“我的公主寄给我一个鼻烟壶，收到的时候已经打破了，我不知道这是否象征着她的贞洁之身、她的美德和她整个人的脆弱。”⁵³在这之前不久他告诉威廉明妮说，他出于“极度的必要性”才接受这场婚礼，他在内心是拒绝它的。⁵⁴鉴于她自己的包办婚姻就很不幸，威廉明妮大概会很赞同弗里德里希对婚姻的说法：他把婚姻比作鼠疫，后来还说“结婚”这个词令他极度痛苦。⁵⁵

婚礼后发生的事鲜有证据。弗里德里希在自己新婚之夜的第一反应

是写信给威廉明妮大呼道“感谢上帝它结束了！”，还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姐姐，他是完全属于她的。⁵⁶对这桩婚事早期阶段最有趣的评论来自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冯·泽肯多夫收藏的一本日记，他是奥地利大使的侄子，1734—1737年在柏林。他虽然并非弗里德里希小圈子里的成员，但经常见到弗里德里希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活动在普鲁士上流社会之中。1734年10月，泽肯多夫记载道，弗里德里希“喜欢王储妃”，并给冯·德·舒伦堡伯爵展示了她的来信，他还加上了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点评：“即便如此，她还是有常识的。”泽肯多夫大概也是从舒伦堡处得知“他和她多次上床”，因为他接着补充说，人们都说弗里德里希登基的时候会抛弃自己的妻子，而舒伦堡对此只是笑笑而已。⁵⁷泽肯多夫还与弗里德里希·冯·瓦滕斯莱本伯爵交好，后者是莱茵斯贝格圈子里的一员，1741年被弗里德里希挑选为他人生中最爱的6个人之一。⁵⁸他在1735年6月写道：“弗里德里希·瓦滕斯莱本向我透露，那位年轻人〔弗里德里希〕在下午的时候跟他妻子上床，还说她有可爱的身体和漂亮的屁股。”瓦滕斯莱本证实说，接下来的一个月弗里德里希都跟她同床共枕。⁵⁹

当然了，瓦滕斯莱本无法知道在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但他肯定知道弗里德里希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对泽肯多夫而言，他没有理由在一本不打算出版的私人日记里伪造或夸大这些记录。至少，齐默尔曼有关弗里德里希被外科医生手术羞辱的故事被驳倒了。泽肯多夫的可靠性被他次年日记里一条起到部分佐证作用的记录所增加。在1736年夏天，他记录道，在弗里德里希抱怨经济拮据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曼陀菲尔伯爵曾告诉他，如果他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该生下一个继承人。弗里德里希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但补充说：“我不能出于欲望跟我的妻子睡觉，我跟她睡觉是出于责任，而非爱好。”曼陀菲尔回答说，激情并非总是必要条件，很多孩子的受孕也不是父母之间相爱的结果，王储妃很漂亮，似乎是特意为“那种事”而生的。弗里德里希也同意她很漂亮，但抗议说他从来没有爱上过她。他接着赞扬了她的许多优秀品质，包括急切

地准备着满足丈夫的任何愿望。最后他总结道：“无论怎样，她都不能抱怨我不跟她睡觉，我也不知道孩子为何还不降临。”⁶⁰

在泽肯多夫笔下，这次交流就好像是弗里德里希跟曼陀菲尔之间有过交谈一样，之后曼陀菲尔又把此事告诉了泽肯多夫。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和曼陀菲尔是通过信件交流的。1736年8月26日曼陀菲尔给弗里德里希写信，敦促他诞下继承人，还说这是他所有的朋友都期望的。他还表示，希望莱茵斯贝格的安定生活——弗里德里希和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刚刚搬到莱茵斯贝格——比起以前弗里德里希随军驻扎在鲁平而妻子住在柏林时必须短暂又急促的相见更有助于受孕。⁶¹ 在9月23日写于莱茵斯贝格的信中，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提到他对妻子的感情，仅仅写道：“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生育子孙的关心，我跟正在发情的牡鹿有相同的命运；从现在起9个月后你请求的事情可能会发生。”⁶² 即使没有发生，也没什么好担心的，“王国总能找到继承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王冠空悬的状况”。⁶³ 在这种书信交流之外，是否有像泽肯多夫记录的那种对话呢？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希望曼陀菲尔知道——从而让他父亲知道——他正在尽力孕育出个继承人来。

换句话说，他们在莱茵斯贝格一起生活的这4年中，弗里德里希煞费苦心地向他的父母展示自己的婚姻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在写给姐姐威廉明妮的信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妻子，就好像他的婚姻没有发生似的。1738年他派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携带秘密使命拜访神圣罗马帝国的副首相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舍恩博恩，想寻求皇帝的帮助来解除婚姻关系。⁶⁴ 此外，迄今为止未发表的、曼陀菲尔写给他人的信件和弗里德里希写给一位冯·德·格勒本中尉的信件都表明，他继续维持着与他军团中年轻军官的亲密关系。⁶⁵ 他在1739年夏天，随其父赴东普鲁士的旅途中写给他母亲的两封信也暗示了他在演戏。在7月27日写给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并会被呈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感情，比如：“我很期待回到莱茵斯贝格，更期待要吻你的快乐……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夫人！请不要忘记我，

允许我全心全意地拥抱你，确信我完全地奉献给你。”而两周后，在一封他明确写明不要拿给他母亲看的信中，就没有那么虚情假意了，他在信的末尾仅仅写了句“你最忠实的仆人”。⁶⁶ 弗里德里希·威廉刚去世，他对妻子的语气就变得更为尖刻。1740年5月31日，他作为国王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只是发出简短的命令，告诉她应在何时去往何地，以及要做的事情，并以“我没有时间告诉你更多的东西。再见。”草草收尾。⁶⁷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成为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普鲁士王后的任何希望都被次日的一封信打破了：

夫人，等你到达[柏林]，你要先去王[太]后那里致以问候，你要努力将职责完成得比以前更好；然后你可以留在这里，你的存在是必要的，直到我写信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会见到很少的人或者见不到人。明天我将决定哀悼时女人们要做的事并向你告知细节。再见，见到你身体健康我会很开心的。⁶⁸

正如其中所暗示的，从此以后弗里德里希的生命中只有一个女人：他的母亲。1731年参加姐姐威廉明妮的婚礼时，他告诉她，他的心只属于她和他们的母亲。⁶⁹ 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那样，弗里德里希“永远是他母亲的男孩”。当她试图称呼他为“陛下”时，他回答说：“请叫我儿子，因为那是所有头衔中最适合我的称呼！”并在回应致意时坚持称她为“王太后陛下”（Her Majesty the Queen Mother）而不是“王太后”（Queen Dowager）。⁷⁰ 他登基一周后，有外交官记录道，“新国王对他母亲明显很热爱”。这位外交官还预言，国王的母亲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将把普鲁士推向汉诺威的方向，事实证明他错了。⁷¹ 弗里德里希不会听任何人的指挥，即使是他的母亲。然而，他明确地将她视为普鲁士的第一夫人，她在蒙碧尤宫的宫殿是来访的权贵们的第一站。弗里德里希在柏林的时候就去那里用餐。⁷² 他总是对母亲表现出“伟大的爱”，给那些见

到这场景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⁷³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王后被晾在一边，被从属于婆婆的残忍现实公开地羞辱着。“你不可能知道我受了多少罪，”她在1740年6月28日给她兄长不伦瑞克的卡尔公爵的信中写道，“只有上帝知道，也只有上帝能帮助我。”⁷⁴ 弗里德里希把她打发到了申豪森宫，一所位于现在柏林北部潘科区的朴素住宅。与王太后的蒙碧尤宫相比，这座宫殿要差很多。在申豪森宫，她组建了自己的小宫廷，勉强维持着显然是孤独和失意的生活。1744年3月，她写信给她的堂兄弟、不伦瑞克的费迪南德：

在其他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仍然如囚犯一般被困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我通过阅读、工作和音乐自娱自乐。对我而言，收到你的信时永远是快乐的日子——这让我整整一天都沉浸在快乐之中，给你写信的时间是放松时间。⁷⁵

弗里德里希对她的忽视只能说是故意、轻蔑且带有恶意的。这种态度在1748年夏天的一段插曲上表露无遗。为了庆祝夏洛滕堡宫新侧翼的完工，弗里德里希筹备了一次所有家庭成员都出席的庆祝活动——只有一人除外。虽然王太后明确表示如果她儿媳出席的话，她不会有异议，但王后并没有被邀请。弗里德里希在给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我极度敏感又坏脾气的妻子长途跋涉来到夏洛滕堡，我怕她会破坏整个活动。”接着他特别虚伪地说，那里没有足够的住处，因为遵照礼仪，需要把新侧翼的整个套房全部分配给王后。在一段充斥着厌女气息的文字里，弗里德里希如此总结道：

无论如何，如果我那纤弱的配偶住到夏洛滕堡来，我们要怎么应对一大群侍女和宫廷女官呢？我们怎么给这些脾气坏得无可救药的低等女人提供食物，解决所有晃悠在宫廷宅邸周围

的乌合之众的住宿？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用远足和乡间娱乐活动取悦母亲。让我们维持这一解决办法吧，不要把荨麻和杂草混在茉莉和玫瑰中间。⁷⁶

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到申豪森宫看望过妻子，也绝不允许她去见他。她唯一一次看见无忧宫是在1757年秋天，为了躲避入侵的奥地利人而被疏散到马格德堡，途经波茨坦，方才见到这所宫殿。作为她的宫务大臣，伦道夫伯爵在日记中刻薄地写道，需要玛丽娅·特蕾莎皇后派一支军队到柏林，才能让普鲁士王后有机会看到她丈夫最喜欢的行宫，真是咄咄怪事。⁷⁷

国王夫妇只在很少几个场合见面，地点通常是在柏林的王宫，王后冬天会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在此期间的狂欢季节有一个节庆活动。虽然弗里德里希确保她生活舒适，为她偿还债务，偶尔通过赠送生日礼物或问候健康表示自己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但他的所作所为只能用残酷来形容。他非但没有参加1765年11月8日她的50岁生日宴会，还于次日在波茨坦主持了为王储妃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举行的盛大欢宴，而与王储妃同名的王后甚至都没有得到邀请。⁷⁸ 1783年是这对不幸夫妇的金婚年，却不事声张地过去了，有一个印刷匠印制了想象中的庆典场面，然后他的版画被警察没收了。⁷⁹ 最令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痛苦的，肯定是她所蒙受的羞辱成了公众话题。1763年，弗里德里希经过七年战争的七年别离后回到柏林，他在整个宫廷面前对他妻子（捎带说一句，他从来不说“我的妻子”，而总是以“王后”称呼之）⁸⁰ 打的招呼是：“夫人您长胖了。”在随后的宴会上，他回避她的陪伴，宁愿坐在他弟媳威廉明妮和他妹妹阿马利娅中间。⁸¹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以平静的自尊忍受着她的命运，这更凸显了弗里德里希的残酷。对她而言，他一直都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英雄”，她告诉那些愿意倾听的人，她一直没有孩子只是因为神的旨意。⁸²

弗雷德斯多夫

这对夫妇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之后从和平共处到排斥的转变时间，肯定令人对弗里德里希在过去4年中扮演理想丈夫所怀的诚意表示怀疑。就在他刚刚获得独立以后，弗里德里希在莱茵斯贝格附近的策尼考为他的贴身男仆米夏埃尔·加布里埃尔·弗雷德斯多夫买了一处地产。得到这份慷慨礼物的幸运儿于1708年出生在奥得河畔的加尔茨，是一个城镇音乐家的儿子。1730年，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火枪手团担任乐手的他被指挥官什未林伯爵介绍给了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与他共同进行音乐创作，来调剂在屈斯特林的囚禁生活。⁸³ 获得自由后，弗里德里希解除了弗雷德斯多夫的兵役并雇用了他，先是做听差，然后是贴身男仆。在莱茵斯贝格，弗雷德斯多夫被公认为弗里德里希的“最爱”，他只为主人演奏。⁸⁴ 1739年秋天住在莱茵斯贝格的比尔菲尔德男爵写道：“王储的首席贴身男仆弗雷德斯多夫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聪明敏锐，殷勤体贴，娴熟灵巧，善于钻营但也慷慨大方。我相信有一天他会位居要职的。”⁸⁵

他的推断是对的，尽管弗雷德斯多夫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幕后人物。1740年弗里德里希任命他为枢密司库，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758年去世。⁸⁶ 虽然他的确在这个职位上为弗里德里希处理个人财务，但他实际上更像一个私人助理，“弗里德里希国王的家务大总管”——伏尔泰如此形容。⁸⁷ 他负责一系列活动，比如购买鼻烟壶、艺术品和乐器；安排弗里德里希出征时的个人饮食；指导宫殿和花园的装修；组织庆祝活动，包括发出邀请这一首要任务等等。⁸⁸ 弗里德里希宫廷的一位法国访客观察到，那里有一个从不开口的首相，一个连鹌鹑都不敢杀的猎人，一个不知道地窖是否有酒的仆役长，一个不知道怎么给马装鞍的马厩管理员，一个从来不递衬衫的管家，以及一个不知道宫廷裁缝名字的王宫服装大总管——因为所有这些任务都是由弗雷德斯多夫执行的。⁸⁹ 伦道夫伯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是如何发现“著名的弗雷德斯多夫”在波

茨坦扮演着一种“首席大臣”的角色，前厅里挤满了有权有势的人，他被这些有求于他的人包围。⁹⁰正如这些情况表明的那样，如果你想在弗里德里希国王的宫廷里办成某事，就要去见弗雷德斯多夫。1748年，王后徒劳地想获得即将在夏洛滕堡举行的庆祝活动的邀请时，求助的正是他，王后请他向弗里德里希转达她“最卑微的”出席请求。她可怜地补充说，她只会带5个人随行（她那得到邀请的婆婆和小姑，总共带了45个随从）。⁹¹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是怎么看待她丈夫与他的“大总管”之间的关系？宫廷里自然对此议论纷纷。伦道夫伯爵委婉地问道，为何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能够“从波美拉尼亚的最底层”上升为王国的第二号人物，国王之下唯一一个可以以专横的方式发号施令并且经常滥用职权的人？他在自己日记中透露的答案很简单：弗雷德斯多夫“脸蛋非常漂亮”。⁹²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他们之间有性关系的证据（怎么可能有证据？），但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怀有强烈的感情。弗雷德斯多夫也是1741年弗里德里希认定的“那些我生命中最爱”的6个人之一。⁹³弗雷德斯多夫唯一一次似乎要失去位置，是弗里德里希在出征时青睐一个英俊的骠骑兵，弗雷德斯多夫被逐出了弗里德里希的帐篷。他的对手不久后就神秘地自杀了，弗雷德斯多夫又重获弗里德里希的欢心。⁹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里德里希即位后通过给弗雷德斯多夫购买大份地产实实在在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这一姿态更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处骑士封地，也就是说这是一块保留给领地贵族的地产。况且，弗里德里希一直坚定地认为，贵族的土地不应该被允许落到平民的手中。弗雷德斯多夫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锐意进取的地主，他购入更多的土地，合并到他原来的地产上，并建立了一个桑蚕养殖园。后来他涉足商业，购买了一艘商船，来往于波罗的海港口和荷属圭亚那种植园之间。从他在施潘道和柯佩尼克建立的酿酒厂里生产出来的“弗雷德斯多夫啤酒”在柏林广获赞誉。⁹⁵他还对炼金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甚至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弗里德里希与一个叫诺特纳格尔的女人订

了一项协议，她声称能将贱金属变成黄金。⁹⁶

弗里德里希写给弗雷德斯多夫数量庞大的信件，语气和内容都很亲密——人们可能会以为它们来自一个百依百顺的丈夫。很明显，他使用的是亲密的第二人称“你”（du），而不是给仆人写信时常用的冷静客气的第三人称。^②大部分的信件内容都是弗里德里希在讲述自己的健康状况（往往是糟糕的），并对弗雷德斯多夫的疾病表达温柔的关心（后者的病情更糟糕）。两人都经常遭受肛门疾病之苦。例如，“我正经受痔疮的折磨”，弗里德里希于1747年3月写道，并补充说，因为它在一次灌肠治疗后发作，所以可能是由一根有瑕疵的管子引发的。⁹⁷ 1754年4月他告诉弗雷德斯多夫说，为了庆祝后者从疾病中康复，他喝掉了两瓶匈牙利葡萄酒，还说在当时的场合，“卡雷尔”被逗得尖叫起来，这里指的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希，国王身边给弗雷德斯多夫传送信件的青年侍从之一。当时15岁的卡雷尔被弗里德里希称为“白弥尼”，因为他长着一头金发，肤色白皙，与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狗的名字“黑弥尼”相对应。然而，弗里德里希补充说，卡雷尔也“非常调皮”，所以他的零用钱被扣下了。⁹⁸ 在来往信件里有太多这样的玩笑，带着明显的同性恋色彩。

弗里德里希默许了弗雷德斯多夫1753年与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的婚事，然后他与妻子气派地生活在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所大宅邸中。⁹⁹ 1757年他说服弗里德里希让他退休。根据伦道夫的说法，这是由于他持续不佳的健康、积累财富的愿望，也是由于他对“著名的格拉佐”的嫉妒，伦道夫不怀好意地补充说，他钦佩弗雷德斯多夫知道什么时候退出，“就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能够在自己的美色衰退时意识到”。¹⁰⁰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格拉佐因其所犯的所有错误而出名。1755年，当时是西里西亚布里格某步兵团二等兵的他吸引住了弗里德里希的目光，然后成了国王的勤务兵。¹⁰¹ 他正是在同一年陪弗里德里希到荷兰共和国进行私人旅行的两个同行者之一。¹⁰² 由于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他们的关系在1757年突然终结了。当年曾在普鲁士军队担任

候补军官的约翰·威廉·冯·阿兴霍尔茨后来写了一部关于七年战争的著名历史作品，他称格拉佐是“国王最喜欢的人，如此受宠，以至于他经常被要求睡在国王的卧室”。他接受贿赂对主人下毒，意外地在最后一刻被逮捕并送往施潘道，很快就死在了那里。¹⁰³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由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提供：格拉佐的罪名是未经授权使用国王的御玺发布命令。¹⁰⁴ 格拉佐的父亲是一个服役46年的炮兵少尉，他的请愿书落款是1757年6月22日，其中显示罪犯当时为20岁，他的年轻是唯一提到的减刑理由。弗里德里希在请愿书的末尾处写道：“他儿子的罪行非常严重，但有一些减免理由。”¹⁰⁵

阿尔加罗蒂

从弗里德里希在他父亲的去世后的性解放开始，弗雷德斯多夫和他短暂的继任者已经花掉了我们很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的另一位男主角则是意大利文人弗朗切斯科·阿尔加罗蒂。1739年在莱茵斯贝格，弗里德里希首次见到陪同英国的巴尔的摩勋爵来访的他。阿尔加罗蒂与弗里德里希同年出生，是一个富有的威尼斯商人的儿子，在开始欧洲旅行之前曾在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求学。1736年他因为出版《供女士们阅读的牛顿理论》而出名，这本书是科学大众化的成功案例，这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并在西雷接见来访的他。¹⁰⁶ 后来阿尔加罗蒂怀揣着伏尔泰的介绍信，搬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很快虏获了两位贵族的心，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双重征服：这两位贵族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金斯顿公爵的女儿）和赫维勋爵（布里斯托尔伯爵的儿子）。这两位之间不仅有着断断续续的婚外情，还都是双性恋。赫维的传记作者说：“他们接受对方是有缺点但有趣的人，玛丽女士作为一个女人，有时想成为一个男人，赫维勋爵则是相反的。威廉·普尔特尼说赫维是‘费因勒夫先生’^③...两种性别如此美好的一个结合，以致难以区分哪一种更占据主导地位。”¹⁰⁷

即使以18世纪中期伦敦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段有异国情调的三角关系。情书以多种排列方式流传。“我全心全意地爱你，求你永远别忘记我对你的爱，也别让你对我表露的爱意减弱。”赫维给阿尔加罗蒂写道。“别了，我的大人，继续爱我吧，偶尔想起我。”后者回复道。这些话写于圣彼得堡，阿尔加罗蒂和他（柏拉图式）的朋友巴尔的摩勋爵1739年到那里旅行，参加沙皇外甥女的婚礼。¹⁰⁸然而，当阿尔加罗蒂遇见弗里德里希的时候，赫维勋爵和玛丽女士都出局了。根据马可·富马罗利的说法，这是一见钟情，双方都一眼看中了彼此。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伏尔泰：“我见到了，噢，我真幸福，这位迷人的王子……我无法用言语诉说我经历了多少快乐！”¹⁰⁹弗里德里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甚至更为热情。阿尔加罗蒂只逗留了8天，他刚刚离开，弗里德里希就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帕多瓦的天鹅”。在日期为1739年9月1日的第三封信里，他大呼：“那些可以享受聪明人的陪伴的人是快乐的！更快乐的则是那些可以拥有他们的君主！”他在10月底补充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一周，然后突然写起了诗歌：

我永远不会寻求
虚无的荣誉那毫无价值的好处，
因为我把我所有的努力和勇气
与我的力量相比较。
据说在他的后宫土耳其
……
一百个美人任他处置；
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走自己的路，
让阿特拉斯独自支撑世界，

让赫拉克勒斯驯服巨人，
让众神打败泰坦：
一次不那么显赫的胜利
让我的天赋得到尊崇
我的荣耀就已永远足够。

弗里德里希在信的结尾处声称，他很高兴阿尔加罗蒂在莱茵斯贝格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他在这里的记忆将会是永恒的，在这里他是不朽的”。¹¹⁰

弗里德里希还写信给伏尔泰，狂热地称赞阿尔加罗蒂的“热情、活力和甜蜜”。他们在阳光下谈论一切事情，他高兴地补充说阿尔加罗蒂答应尽快返回。¹¹¹ 伏尔泰以诗句答复弗里德里希，就好像他正在对阿尔加罗蒂说话一样。这首诗包含了以下几行暗示性诗句：

停下来吧，阿尔加罗蒂，不要再看其他人，
威尼斯的应召女郎和罗马的应召少年，
在法国的剧院里，在德意志人的餐桌旁，
大臣、国王、英雄和圣徒；
不要再让自己精疲力竭，不要再寻找一个男人：
他已经被发现了。上天塑造了他的美德，
上天，把我的英雄放在莱茵斯贝格……
让你的漫游生活结束在莱茵斯贝格脚下，
宇宙再无价值；

你没有其他东西要看了。 ¹¹²

7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40年5月31日这一天去世。6月2日弗里德里希写信给阿尔加罗蒂：“我亲爱的阿尔加罗蒂，我的命运已经改变。我急切地等待着你；请不要让我痛苦。弗里德里希。”他以诗句作为附言：

来吧，阿尔加罗蒂，从泰晤士河畔

来与我们分享幸福的命运。

赶快来到这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在这里你会发现自由是我们的口号。

这是为了让你知道，4天前，弗里德里希二世

继承了弗里德里希·威廉。

他所有的人民跟我们都感受不到快乐，

作为忠诚的儿子，他孤单一人，被悲伤捕获，

不在乎这样一种讨人喜欢的命运的吸引力，

他值得被爱，并占据你的心。 ¹¹³

然后弗里德里希加了一句拉丁文，此句是用马提雅尔的《铭辞集》第八卷第21首改写的，可译为“不要耽误我们的欢庆。阿尔加罗蒂回来吧，晨星把白昼带回”（*Ne gaudia igitur nostra moreris. Algarotti venturo, Phosphore, redde diem*）。晨星，当然指的是金星维纳斯（爱神）。

在阿尔加罗蒂的回应中，弗里德里希得到了他所能希望的一切。几天后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他的兄长博诺莫，说他刚刚收到“古往今来最美

丽的信”。¹¹⁴ 受弗里德里希的指示，“犹太人门德斯”提供了50个几尼和一张阿姆斯特丹的信用证让他尽快上路，他于6月28日到达柏林。7月7日，两人动身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弗里德里希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的加冕典礼。1701年他祖父弗里德里希一世需要动用3万匹马和1800辆马车来运送选帝侯家族、宫廷以及随从，整个活动耗资600万塔勒，大约是整个国家岁入的两倍。¹¹⁵ 弗里德里希只带了3辆马车，几乎一文钱没花。¹¹⁶ 坐在王家马车里国王的身边，阿尔加罗蒂像个“王家情妇”。¹¹⁷ 不用说，王后不在随行者之列。在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他们回来了，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他的兄长说，国王“给了我无数的爱抚，还用一千种不同的方式赐我荣耀”。¹¹⁸ 其中有：任命阿尔加罗蒂为新成立的“功勋勋章”军团的骑士，授予他宫务大臣的头衔并提升他为贵族“伯爵”，这一荣誉也赏赐给了他的兄长。伴随着这些荣誉的是昂贵的礼物，包括瓷器、怀表和装饰着钻石的鼻烟壶。¹¹⁹ 就像1740年6月7日巴尔的摩勋爵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既然你现在已经身处迦南乐土，就可以什么都不缺地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¹²⁰ 阿尔加罗蒂用威尼斯贵族乔治·巴福写的淫秽的十四行诗和歌曲取悦弗里德里希，他特别喜欢《赞美屁股》这首诗。¹²¹ 在伦敦，玛丽女士和赫维勋爵意识到他们已经出局了。后者在1740年6月28日悲伤地给阿尔加罗蒂写信：“有一些人被全能的上帝创造出来就是要招人喜欢的，还有一些人把自己培养成了可以被爱的人，世界上这两种人都太少了。如果我告诉你，我每小时都在遗憾，我在这少数人中找到了一个两者兼具的人，你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别了。”¹²²

1740年7月29日弗里德里希从夏洛滕堡宫写信给伏尔泰，说他已经从加冕典礼返回，并附上一首题为“高潮”的诗。¹²³ 创作这首诗受到了阿尔加罗蒂的刺激，因为后者说北欧人没有意大利人那么强烈的情感。弗里德里希试图用诗歌的方式证明并非如此，尽管他承认有一些经验是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比如“如日中天的辉煌”。这首诗长期被认为是遗失了（或被封存了），最近柏林档案馆披露了一份副本。¹²⁴ 它写给“帕

多瓦的阿尔加罗蒂”，开头写道：

在这个夜晚，强烈的欲望得到满足，
阿尔加罗蒂游弋在欢乐之海。
他的遣词用语当然是欣喜若狂的，足以恢复北方的名誉：
神圣的欲望！世界的至尊主宰！
吾等快乐之母，永远的富饶之源，
用你自己的声音在我的诗里歌唱
激情，行动，感官的狂喜！
我们的快乐情人，在极限之巅狂乱，
在他们爱的愤怒中，只知对方的存在：
接吻^④，高潮，感受，叹息和力竭，
恢复，拥抱，急于重获更多的快乐。

在诗中，没有任何文字表明弗里德里希自己就是阿尔加罗蒂的伴侣。相反地，这段引文之前的诗句可以确认这位爱人是仙女“克洛莉丝”，她的躯体比希腊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在克尼多斯的神庙雕塑的阿佛洛狄忒更完美。下面这点也应该被记录下来：在至少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关系不是肉体上的。1740年11月29日他写道，他再次见到长期不在身边的阿尔加罗蒂之后非常高兴，就好像梅多罗与他心爱的安杰莉卡重逢一般，“不同的是，只有我的理智单独享受这种快乐，而且它只是在寻求你闪闪发光的才华之火来温暖自我而已”。¹²⁵ 对这种含蓄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指向另一个方向，即9月24日的一封信中所暗示的含义，在信中弗里德里希称阿尔加罗蒂为“爱情帝国里著名的病人”

，希望他从“基西拉岛的伤痛”^⑤中早日康复，并表达了当他们在柏林相遇时至少可以从阿尔加罗蒂的智慧中受益的愿望。¹²⁶ 也有证据表明，在弗里德里希的圈子中有明显的同性恋行为。1740年12月15日伏尔泰在秋天访问过普鲁士之后写诗给弗里德里希：

伟大的国王，我曾向你预言
柏林将成为新的雅典
因为肉体 and 智力的双重愉悦；
预言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时，是在胖胖的瓦洛里家中^⑥，
我看到亲爱的阿尔加罗蒂
迷恋于一个热情的拥抱
英俊的吕雅克^⑦，他的年轻朋友，
我以为我看见的是苏格拉底被缚在了
亚西比德的臀部。¹²⁷

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正忙着征服西里西亚，在他心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阿尔加罗蒂身负外交使命去了都灵，怀着（渺茫的）希望想诱导皮埃蒙特去袭击奥地利。然而，尽管这种关系只能是断断续续的，但它仍然充满激情。1742年4月，弗里德里希从他在波希米亚的军营中写信说，他不得不遵循战争（贝娄娜），但害怕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和性（基西拉）的愤怒。^⑧他对阿尔加罗蒂呼吁道，作为后面两者的最高代表，以他的名义出面，将雷电从“为他们而生的人”身上转移开。阿尔加罗蒂的回复特别热情洋溢地称颂弗里德里希的恩惠。他补充说，他们会确保自己的不朽，因为当谈到阿喀琉斯的功绩时，后世也会永远记住他

的帕特罗克洛斯。¹²⁸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迹象了。然而，这种关系即将被冷藏，因为在1742年秋天，弗里德里希对阿尔加罗蒂不愿意在普鲁士担任长期职务感到恼火。¹²⁹阿尔加罗蒂搬到了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在那里他度过了5年，这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德累斯顿的要求不高，环境也更豪华。弗里德里希的依恋依然强烈，1746年，英国外交官托马斯·维利尔斯（后来的克拉伦登伯爵）从柏林写信给阿尔加罗蒂。“国王让我告诉你，他应该非常高兴见到你，我不能将你们的分离称作争吵，因为激情仍在继续。恋人间的争吵是幸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¹³⁰1747年回到柏林后，阿尔加罗蒂再次成为柏林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昔日与国王的那种亲密关系并没有恢复。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阿尔加罗蒂于1753年回到意大利，1764年在比萨去世。弗里德里希倾力为他在那里的公墓建立了一座精致的纪念碑。¹³¹

当讨论弗里德里希的宫廷时，我还会谈到弗里德里希性取向的话题。本章试图表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次要的事情，可以用偷偷摸摸的沉默或是简单的解释回避过去。这是弗里德里希在28年的压迫和约束后，对自己的个性主张的核心。当他父亲暴政的沉重压力被移除之后，他终于可以成为自己了。他撇开妻子，给了弗雷德斯多夫一份地产，还让阿尔加罗蒂成为伯爵，这些都是其独立宣言的组成部分。1740年5月31日，死神结束了弗里德里希所说的“埃及奴役时代”。他现在是国王，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自我塑造之路的下一个阶段，不是要否定他的父亲，而是要在国王职责最重要的层面——战争和征服的层面超越他。

注释

1 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 (Munich, 2004), pp. 54–5.

2 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81.

3 Ibid., p. 197.

4 Peter Baumgart, “Kronprinzenopposition: Friedrich und Friedrich Wilhelm I.,” in Oswal

d Haus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seiner Zeit* (Cologne and Vienna, 1987), p. 12. Baumgart延续G. B. Volz的观点，认为比起围绕着1730年出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说，这件事造成的心理危机更为严重。

5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4.

6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82.

7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67), vol. 1: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pp. 290–95.

8 ‘Avertissement de l’Éditeur,’ *Œuvres*, vol. 7, p. vi; Pierre-Paul Sagave, “Preussen und Frankreich,” *Jahrbücher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31 (1982), pp. 67–8.

9 最后这句颂词出自他1764年4月22日写给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的信，参见*Œuvres*, vol. 26, p. 343。

10 Werner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geistige Welt Frankreichs*, *Hamburger Studien zu Volkstum und Kultur der Romanen* (Hamburg, 1932), vol. 11, p. 41.

11 *Œuvres*, vol. 19, p. 282.

12 Horst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p. 79–80.

13 Stefan Lorenz,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er Bellerophon der Philosophie. Bemerkungen zum ‘Roi philosophe’ und Pierre Bayle,” in Martin Fontius (ed.), *Friedrich II. und die europäische Aufklärun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new series (Berlin, 1999), vol. 4, p. 77.

14 Brunhilde Wehinger, “Introduction,” in Brunhilde Wehinger and Günther Lott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Berlin, 2012), p. 14.

15 Sabine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 Musiker und Monarch* (Munich, 2012), pp. 12–14. 在为纪念弗里德里希诞辰300周年而出版的众多书籍中，这是篇幅较短的一本，但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本。

16 *Ibid.*, p. 11.

17 Christoph Henzel, “Johann Gottlieb Graun” and “Carl Heinrich Graun,”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1653pg2#S11653.2>. Last accessed 1 May 2012.

18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3903pg2#S43903>.
2. Last accessed 1 May 2012.

19 Douglas A. Lee (ed.), *A Musician at Court: An Autobiography of Franz Benda* (Warren, MI, 1998), p. 40.

20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4744?q=Schaffrath&search=quick&pos=1&_start=1#firsthit;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4134?q=Janitsch&search=quick&pos=1&_start=1#firsthit. Last accessed 1 May 2012.

21 Christoph Wolff,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Learned Musician* (Oxford, 2002), p. 195; Daniel Heartz, *Music in European Capitals: The Galant Style, 1720–1780* (New York, 2003), p. 357.

22 Hans-Joachim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Baumeis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3rd edn (Leipzig, 1998), p. 38.

23 Claudia Sommer, Detlef Fuchs and Michael Rohde, *Schloss Rheinsberg* (Berlin and Munich, 2009).

24 Theodor Fontane, *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 ed. Helmuth Nürnberger (Munich, 2006), vol. 1, p. 274.

25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p. 57.

26 Ibid., pp. 60–62.

27 Ernst Posseck, *Die Kronprinzessin. Elisabeth Christine, Gemahli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geborene Prinzessin von Braunschweig-Bevern* (Berlin, 1943), p. 355.

28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43.

29 Karin Feuerstein-Prasser, “Ich bleibe zurück wie eine Gefangene.”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Regensburg, 2011), p. 39.

30 Hintze, p. 343.

31 Gerhard Ritt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 Historical Profile*,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Paret (London, 1968), p. 26.

32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56.

33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p. 79.

34 Ibid. 库尼施引用了一篇文章: Ernst Lewy, “Die Verwandlung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sych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und ihre Anwendungen*, 49, 8 (1995), pp. 758ff。这是一篇文章的德文译本, 它最初以英文发表于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y*, 4 (1967), pp. 252–311。然而, 在这篇文章中, Lewy简单地重复了齐默尔曼的故事, 就好像这个故事已经得到证实了一样。在2011年刊载于 *Der Spiegel Geschichte* 的一篇访谈中, 库尼施更为强调他的否认态度。当被问及弗里德里希所谓的同性恋倾向之时, 库尼施明确无误地回答道: “弗里德里希不是同性恋。他在年轻时跟女性发生过性关系, 特别是跟农家少女们, 在这个过程中感染了梅毒 [原文如此]。手术给他留下了性功能障碍, 他对此显然是羞愧的。他不再在性方面活跃。国王非常害羞, 直到老年都不让他的贴身男仆给他换内衣。”在进一步回答一个关于安提诺乌斯塑像的问题时, 库尼施说道: “弗里德里希是在拿这个开玩笑, 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没有需要严肃对待的迹象表明他是同性恋。”——Uwe Klusmann and Norbert F. Pötzl, “Es gibt das Bedürfnis, ein Heldenbild zu pflegen: Spiegel Gespräch mit Johannes Kunisch,” *Der Spiegel Geschichte*, 2 (2011), 网上访问地址为 <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geschichte/d-77506743.html>。特别不幸的是, 他在一次采访中将这个观点当作已被证实的真相说了出来, 该采访出现在德国电视二台的系列纪录片《德国人》(Die Deutschen) 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和皇后》(Preussens Friedrich und die Kaiserin) 这一集中, 现在可以在DVD中看到。齐默尔曼的故事最近一次被重复, 是在 H. D. Kittsteiner, *Das Komma von SANS, SOUCI. Ein Forschungsbericht mit Fussnoten* (Heidelberg, 2001)。

35 Wolfgang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biografisches Porträt* (Freiburg, Basle and Vienna, 2011), p. 76; Reinhard Alings, “‘Don’t ask – don’t tell’ – war Friedrich schwul?,”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46.

36 Hahn, *Friedrich II.*, pp. 15, 36–7, 61, 157, 167.

37 [Johann Georg] Ritter von Zimmermann, *Fragmente über Friedrich den Grossen zur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seiner Regierung und seines Charakters* (Leipzig, 1790), vol. 1, pp. 74–80, 93–4, 100.

38 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Zuverlässige Beyträge zu der Regierungsgeschichte Königs Friedrich II.* (Hamburg, 1790), pp. 20–21. 这一消息是恩格尔1790年4月2日从波茨坦写信告知比兴的。齐默尔曼在他的书中第99页记载道, 作为尸检流程的一部分, 恩格尔从弗里德里希的胃里排出了一些液体。

39 它被 Gaston Vorberg 在其论文中转载, 详见 *Der Klatsch über das Geschlechtsleben Friedrichs II. Der Fall Jean-Jacques Rousseau* (Bonn, 1921), p. 14. 他补充说, 弗里德里希赤裸的遗体摆了超过一个半小时, 至少有十几个人看到了, 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的生殖器畸形。

40 Thomas Lau, “Wie fälscht man einen König? Johann Georg Zimmermann und der Frie

drichmythos,” in *Friedrich 300 – Politik und Kulturtransfer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 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kulturtransfer/la_u_zimmermann. Last accessed 15 May 2012.

41 在第38条注释所引用的作品中，比兴出版了一本单独分页的“历史附录”，他在里面纠正了齐默尔曼书中的很多错误，还提到了许多其他内容。

42 Zimmermann, *Fragmente über Friedrich den Grossen*, pp. 70, 72.

43 *Œuvres*, vol. 16, pp. 9–20.

44 *Ibid.*, p. 13.

45 Friedrich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Potsdam, 1835), vol. 3, p. 112.

46 泽肯多夫1732年2月23日从波茨坦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ibid.*, p. 81。

47 泽肯多夫1732年3月29日从柏林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ibid.*, p. 91。

48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4), vol. 1: *Jugendbriefe 1728–1740*, pp. 84, 89. See also 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p. 123–4.

49 泽肯多夫1732年2月23日从波茨坦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vol. 3, p. 80。

50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102.

51 泽肯多夫1732年3月29日从柏林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vol. 3, p. 92。

52 弗里德里希1732年9月4日从鲁平写给格伦布科的信，参见*ibid.*, p. 178。

53 弗里德里希1733年1月27日从鲁平写给格伦布科的信，*Œuvres*, vol. 16, p. 86。

54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140.

55 *Ibid.*, p. 142.

56 *Ibid.*, p. 143. 这封信的顶端标明的时间和地点是“萨尔茨达卢姆，1733年6月12日午夜”。

57 *Journal secret du Baron Christophe Louis de Seckendorff* (Tübingen, 1811), p. 11.

58 弗里德里希1741年4月8日从波加雷尔写给奥古斯特·威廉亲王的信，*Œuvres*, vol. 26, p. 99.

59 *Journal secret du Baron Christophe Louis de Seckendorff*, pp. 71–2.

60 *Ibid.*, p. 147.

61 *Œuvres*, vol. 25, p. 538.

62 *Ibid.*, p. 540.

63 *Ibid.*

64 1986年在拜罗伊特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Peter Baumgart和Volker Press发表了论文，Rudolf Endres在随后的讨论中陈述了这一观点——Manfred Agethen, “Diskussionsbericht,” in Heinz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6), p. 196。

65 Hahn, *Friedrich II.*, p. 47.

66 *Œuvres*, vol. 26, pp. 7, 10. 在他从莱茵斯贝格写给威廉明妮的所有信中，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妻子，即使在描述来往宾客以及他们所享受的娱乐活动之时也是如此——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assim*。

67 *Œuvres*, vol. 26, p. 14.

68 *Ibid.*

69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80.

70 Carlyle, vol. 2, p. 44; vol. 3, p. 29.

71 “Gesandtschaftlicher Bericht aus Berlin, über den Regierungsantritt Friedrichs des Großen,” *Neue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February 1804), p. 99.

72 Thomas Biskup, “The Hidden Queen: Elizabeth Christine of Prussia and Hohenzollern Queenship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larissa Campbell Orr (ed.), *Queenship in Europe, 1660–1815: The Role of the Consort* (Cambridge, 2004), p. 305.

73 Sophie Marie Gräfin von Voss, *Neunundsechzig Jahre am preussischen Hofe* (Leipzig, 1887), p. 10.

74 Quoted in Feuerstein-Prasser, “*Ich bleibe zurück wie eine Gefangene*,” p. 53.

75 *Ibid.*, p. 62.

76 *Ibid.*, pp. 67–8.

77 Lehndorff, vol. 1, p. 359.

78 Alfred P. Hagemann, “Im Schatten des grossen Königs: Königin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Friedrich II.,” *Friedrich 300 –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p. 1,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sse/hagemann_schatten. Last accessed on 24 May 2012.

79 Ludwig Geiger, *Berlin 1688–1840. Geschichte des geistigen Lebens der preussischen Hauptstadt* (Berlin, 1893), vol. 1: 1688–1786, p. 318; Eva Giloi, *Monarchy, Myth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750–1950* (Cambridge, 2011), p. 23.

80 Geiger, *Berlin 1688–1840*, vol. 1, p. 316.

81 Lehndorff, vol. 1, pp. 457–8.

82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152; Hagemann, “Im Schatten des grossen Königs,” p. 3.

83 Bernhard Mundt, “Fredersdorf, Michael Gabriel, Geheimer Camerier und Obertresorier, Vertrauter Friedrichs d. Gr., ” <http://www.ostdeutsche-biographie.de/fredga08.htm>. Last accessed on 24 May 2012.

84 Johann Friedrich Borchmann, *Briefe zur Erinnerung an merkwürdige Zeiten und ruhmreiche Personen, aus dem würdigen Zeitlaufe, von 1740 bis 1778* (Berlin, 1778), p. 29.

85 *Lettres familières et autres de Monsieur le Baron de Bielfeld*, 2 vols. (The Hague, 1763), vol. 1, p. 75.

86 Johannes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an seinen vormaligen Kammerdiener Fredersdorf* (Mörs, 1979) (unchanged reprint of the 1926 edition), p. 20.

87 Mundt, “Fredersdorf. ”

88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1.

89 Koser, vol. 1, pp. 490–91. Koser的史料来源表是出了名的不精确，从中不可能确定这一评论的出处。他并没有引用真正的史料来源，即粗俗的*Idée de la personne, de la manière de vivre et de la cour du roi de Prusse par M. de... juin 1752*, p. 13。据法国公使、詹姆士二世党人蒂尔康奈伯爵所说，弗雷德斯多夫从寻求王家恩惠的恳求者那里收取金钱——Reinhold Koser, “Aus der Korrespondenz der franzö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Berlin 1746–1756,”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7 (1894), p. 84。

90 Lehndorff, vol. 1, pp. 359–60。

91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150. 这一插曲促使Richter接下来花了9页的篇幅去为弗里德里希与弗雷德斯多夫的关系辩解，说那只是当时很普遍的那

种“热情的友谊”，并且断言说弗里德里希在登基后对他妻子态度的转变是出于不想因感官欲望而偏离责任之路的决心——*ibid.*, pp. 151–9。

92 Lehndorff, vol. 1, p. 360.

93 弗里德里希1741年4月8日从波加雷尔写给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信，*Œuvres*, vol. 26, p. 99。

94 Hahn, *Friedrich II.*, p. 62.

95 Mundt, “Fredersdorf”;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0.

96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p. 103–4.

97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98.

98 *Ibid.*, pp. 282, 315–16.

99 Mundt, “Fredersdorf.”

100 Lehndorff, vol. 1, p. 360.

101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2, p. 34.

102 Lehndorff, vol. 1, p. 210.

103 J. W. von Archenholz, *The 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 War in Germany* (Frankfurt am Main, 1843), pp. 32–3.

104 Büsching, *Zuverlässige Beyträge*, appendix, pp. 35–6.

105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2, p. 402.

106 Walter Bussmann, “Algarotti, Graf Francesco v.,”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53), vol. 1, pp. 199–200.

107 Reed Browning, “Hervey, John, second Baron Hervey of Ickworth (1696–1743),”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May 20 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13116>. Last accessed 29 May 2012.

108 Robert Halsband, *Lord Hervey: Eighteenth-century Courtier* (Oxford, 1973), pp. 200, 248.

109 Marc Fumaroli, “Francesco Algarotti et Frédéric II,” in *idem*, *Quand l’Europe parlait français* (Paris, 2001), p. 150. 最近Norbert Schmitz所做的一项关于阿尔加罗蒂和弗里德里希的研究轻率地忽略了所有关于阿尔加罗蒂双性恋的证据，仅提到赫维一次，而且只是作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的一个“朋友”被提到。Schmitz还一本正经地

评论说：“在著名人物的床罩之下偷窥是小报所为。”——Norbert Schmitz, *Der italienische Freund. Francesco Algarotti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Hanover, 2012), pp. 121, 201。

110 Heinrich Menu von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Berlin, 1837), pp. 5–8. 编者并没有解释为何插进去了两行圆点。

111 *Œuvres*, vol. 21, p. 367.

112 Theodore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Geneva, 1954), vol. 9, p. 265. 正如Roger Peyrefitte观察到的，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之间的通信显示了“作家和君主之间一种男同性恋的惺惺相惜”——Roger Peyrefitte, *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Paris, 1992), vol. 1, p. 64。

113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p. 16.

114 Rita Unfer Lukoschik and Ivana Miatto (eds.), *Lettere prussiane di Francesco Algarotti (1712–1764)* (Padua, 2011), p. 55.

115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p. 67–8.

116 Koser, vol. 1, p. 30.

117 Fumaroli, “Francesco Algarotti et Frédéric II,” p. 150.

118 Lukoschik and Miatto (eds.), *Lettere prussiane*, p. 56.

119 Domenico Michelessi, *Mémoires concernant la vie et les écrits du comte François Algarotti* (Berlin, 1772), p. 133.

120 John Murray Archive, 50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Algarotti Papers, box 2.

121 Peyrefitte, *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vol. 1, p. 270.

122 John Murray Archive, box 2.

123 1740年7月29日从夏洛滕堡写给伏尔泰的信，*Œuvres*, vol. 22, p. 21.

124 Vanessa de Senarclens, “Friedrichs Schossgebet,” *Die Zeit*, 15 September 2011, p. 21. 这首诗在其中以法文原文转载并被翻译成德文。Vanessa de Senarclens在与之配合的评论中说，阿尔加罗蒂是一位“受女性欢迎的男人”，但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也是一位“受男性欢迎的男人”。

125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

arotti, p. 26. 梅多罗和安杰莉卡的爱情故事出自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被很多艺术家加以描绘。阿戈斯蒂诺·卡拉齐有一幅画，清晰地描绘这对恋人的交欢：http://es.wikipedia.org/wiki/Archivo:Carracci_Angelique_et_Medor.jpg。

126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p. 18.

127 Christiane Mervaud, *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une dramaturgie des lumières* (Oxford, 1985), p. 121.

128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pp. 39–42.

129 Ibid., p. 56.

130 John Murray Archive, box 1.

131 Maria Santifaller, “Christian Bernhard Rode’s Painting of Francesco Algarotti’s Tomb in the Camposanto of Pisa at the Beginning of Neo-Classicism,”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ebruary 1978), vol. 120, no. 899, pp. i–vii.

-
- ① 唐·卡洛斯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长子，因反叛父亲被监禁，数月后死去。
 - ② 德语中的第二人称有“你”（du）和“您”（Sie）两种形式，前者较为亲密，后者较为客气。在18世纪的德语中，主人对仆人说话时常用第三人称“他/她”，不用第二人称，以示身份差异。
 - ③ 费因勒夫是英国作家斯梯尔的喜剧《温柔的丈夫》中的人物，是一名扮男装的女性。
 - ④ 弗里德里希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但在下一节，他用的是“baiser”，这个词可以表示“亲吻”“拥抱”甚至有更加淫秽的含义。尽管在这种场合里弗里德里希使用粗俗的语言，但在诗歌的语境中，更高雅的含义似乎更合适一些，虽然是在暗示肉体上的关系。——作者注
 - ⑤ 据说，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在基西拉岛附近的海中出生，因此基西拉岛被视为爱情之岛。
 - ⑥ 路易·居伊·亨利·德·瓦洛里侯爵（Louis Guy Henri Marquis de Valori），法国大使。——作者注
 - ⑦ 查理·安托万·德·介朗·德·吕雅克侯爵（Charles Antoine de Guérin Marquis de Lujac

，也被拼作Lugeac），瓦洛里的秘书。——作者注

⑧ 贝娄娜是古罗马的女战神，伊壁鸠鲁是古希腊的享乐主义哲学家。

第4章

弗里德里希的塑造（下）

渡过卢比孔河^①

“我大张旗鼓地渡过了卢比孔河。”1740年12月16日，弗里德里希在给他在大臣波德维尔斯伯爵的一封信中写道。就在那一天，他率领军队越过勃兰登堡与哈布斯堡治下的西里西亚省之间的边界，这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掠夺行动（到那时为止）。他情绪高涨：“我的士兵们胸怀壮志，军官们野心勃勃，将军们渴望着荣耀，一切都对我们有利，我有理由期待这次冒险可能会取得的最好结果。”¹

这次出击并非意想不到。弗里德里希继位还不到6个月，但在这6个月里，他引起的轰动比他父亲统治的27年里还多。了解更多或更敏锐的观察者早在弗里德里希还是王储的时候就预测，他会更加积极主动。1736年10月2日，小泽肯多夫在他的日记中吐露：“等那个年轻人〔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的时候，可不会用如此爱好和平的方式思考，而是会以让人震惊的举动开启自己的统治，即使这要冒着自己承受攻击的风险。”²另一位地位显赫的观察者曼陀菲尔伯爵同意这一看法，并补充说，比起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更加傲慢、活泼、大胆、狡猾、难以捉摸，新的统治一定会更加不稳定。这个预测是在收到弗里德里希在维劳的一

个训练营写的一封信后做出的，这封信的开头写道：“唉！我始终是从安静的营地给你写信，难道我永远不能从战场或壕沟里给你寄信吗？难道我要像一把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器铺、挂在钉子上生锈的剑一样度过我的一生吗？”³在同一年，英国驻柏林代办盖伊·狄更斯向伦敦报告说，他在比较了普鲁士和马其顿的军队之后，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历山大大帝能以这么少的军队征服这么多的地方，那么弗里德里希以这么多的军队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⁴他们的预测都是对的。1740年6月，弗里德里希告诉他的使者，他被派往凡尔赛是要强调“他倔强而有活力的性情”，并警告法国人，进取心是年轻人的天性，他们渴望成为英雄的野心往往被证明是具有破坏性的。弗里德里希接下来的补充甚至更具挑衅性，他说，他指挥的军事扩张极有可能在欧洲燃起一场大火。⁵虽然他解散了他父亲的“巨人卫队”，但同时他给军队增加了7个步兵团。⁶奥地利对抗土耳其的灾难性战争最近刚刚结束，许多德意志诸侯因此要为他们部队寻找一个新财主，弗里德里希军队的这次扩张就得益于此。⁷

在弗里德里希向法国人发出警告后仅一周，他通过干预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与黑森-卡塞尔方伯关于美因河上奥芬巴赫附近鲁本海姆的城堡和村庄的纠纷公开宣示了自己的意图。他坚决反对选帝侯先发制人的军事占领——他称其为“一次强奸”——并威胁说，如果美因茨军队不立即撤回的话，他将会采取报复措施。⁸不用说，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压服这位倒霉的大主教满足了弗里德里希两个最强的偏见——对神职人员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偏见。

此事也让他在同类事情上有了更大的胃口。现在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帝国高级教士，列日的采邑主教，他正在与普鲁士竞争默兹河畔的埃斯塔勒男爵领地。然而，这次大卫得到了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位歌利亚巨人支持，所以弗里德里希的顾问建议他谨慎行事。他的回应潦草地批示在他们的备忘录边缘的空白地方，对他们的谨慎态度不屑一顾：“当大臣们谈论谈判的时候，他们证明自己是聪明人；但当他们谈论战争

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易洛魁人^②在谈论天文学。”他补充说，他不惧怕皇帝，皇帝从前可能是强大的，但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偶像的古老幽灵”。⁹事实上，他否认纠纷与帝国有干系，主张这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事务。¹⁰弗里德里希使用的语言又一次显示出，他强烈地意识到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优越，凌驾于那些无名小卒之上。他声称，这位主教傲慢莽撞、出言不逊且唐突无礼。¹¹惩罚如期而至，12个掷弹兵连和1个龙骑兵中队被派去教导冒犯者以后该如何正确处事。在柏林的外交使节们议论说，普鲁士新国王生硬粗暴的外交风格让人联想起了路易十四最专横跋扈的模样，这种说法不无理由。¹²受到恐吓的采邑主教适时地投降了。¹³

查理六世的死亡

这两位主教很好欺负，几乎不值得出太大力气。然而，一个强大得多的目标几乎立刻出现了，并招致了泽肯多夫预测的“巨大打击”。1740年10月20日，55岁的皇帝查理六世突然意外死于食物中毒。像这种偶然事件，是对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解释的嘲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皇帝的死亡，也是一个王朝的死亡。在这个男权世界，只有男性才能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自1452年以来，近300年都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当选。现在，这一传统被打破了。但是，被统称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哈布斯堡世袭土地，是不排斥女性继承人的。1713年查理六世就曾发布过一份被称为“国事诏书”的文件，宣告家族领地不可分割，并下令，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家族领地可以传给他的长女。这位继承家族领地的长女就是1717年出生的玛丽娅·特蕾莎，她于1736年与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结婚。

这一“真正革命性的文件”¹⁴必将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它（故意）绕过了前任皇帝，查理六世的哥哥约瑟夫（1705—1711年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的两个女儿。玛丽娅·约瑟法于1719年嫁给了萨克森王储，玛丽娅·阿马利娅于1722年嫁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虽然她们之前接受了“国事诏书”并因此放弃了自己对哈布斯堡继承权的要求，但这些承诺是否比写着它们的那张纸价值更大，仍有待观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国事诏书”的国际认可，查理六世在余下的统治岁月里，为相关协商谈判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做出了那么多的让步。

许多统治者签订了承认“国事诏书”的保证书，其中就包括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他在1728年签订了保证书，作为回报，皇帝答应等莱茵河畔于利希和贝格公爵领地的现任统治者死后，支持普鲁士对这些领地的诉求。¹⁵这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特别是因为萨克森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苏尔茨巴赫旁系也得到了类似的承诺。到了1732年，结果已经很清楚，查理六世肯定会食言；到1738年，事情已成定局。¹⁶即使比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脾气好的人也会被激怒。他对哈布斯堡皇帝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最新的这一次不守信用的行为将他推入了法国的怀抱。甫一登上王位，他的儿子立刻着手重申他的要求，试探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态度，但没有成功。有模糊议论说普鲁士会从于利希—贝格继承过程中得到些“收获”，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自己以第三人称所写下的那样：“对于一个年轻又雄心勃勃的国王而言，这很难满足他的愿望，他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¹⁷

当皇帝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弗里德里希还在因为这次挫败感到痛苦。他立即把注意力从西边转向了南方，从莱茵河转向了奥得河，那里出现了一个更理想的猎物。此时形势再好不过了。查理六世执政的29年让哈布斯堡君主国处在一个真正危险的境地，处在自1618年的黑暗日子以来最脆弱的状态。哈布斯堡君主国在财政和军事这两个关键的方面都处于瘫痪状态。由于持续不断的财务超支和会计水平的不足，总债务已经增加到了18世纪初的大约5倍。在查理六世去世前不久，一个犹太代理人甚至被派到柏林寻求借款，可见国库空虚到了什么程度。¹⁸由于每年收入的一半都用来还债，军队即使在战时也必须削减，结果就是在17

40年，号称有16万人的军队几乎只有一半是真正有装备的。¹⁹ 查理六世的一个心腹讽刺地总结道，他的统治是“迟钝、优柔寡断、相互指责”。²⁰

以下两个根本性的失败给哈布斯堡君主国带来了灾难，先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然后是与土耳其人的战争（1737—1739年）。前者的结果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失去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后者则以丧失了大片的巴尔干土地（包括贝尔格莱德）告终。据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指挥和士气都糟糕透了：有3名参加与土耳其人的战争的将军最终入狱。²¹ 1735年，一名英国外交官在报告中这样评论奥地利行政机关死气沉沉的作风：“最小的事务也要有一份报告（或备忘录），一份报告又会导致一个会议，如果镇子上着火了，必须召开一个会议审议是否要灭火以及如何灭火。”²² 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君主国的新统治者从她父皇那里继承了一群各式各样的大臣，她最伟大的传记作家阿尔弗雷德·冯·阿尔内特形容他们为：“老态龙钟……能力有限……贪婪腐败……自我放纵又懒惰闲散……精神上和身体上衰败……老朽胆怯。”²³ 玛丽娅·特蕾莎是如此评论自己继承的遗产的：“没有钱财，没有信用，没有军队，自己没有任何经验或知识，最后，还没有任何建议。”²⁴

所有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弗里德里希对此尤其了解。1740年11月5日，也就是他得知玛丽娅·特蕾莎继位的消息10天之后，他写信给他在维也纳的特使卡斯帕·威廉·冯·博尔克：“皇帝死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王室现在是群龙无首，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财政枯竭，军队被毁掉了，各省都被战争、瘟疫、饥荒和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的税收负担耗尽了。”博尔克的报告促使弗里德里希写下了这段无情的描述。该报告说，奥地利人相信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领土完整。弗里德里希接着反问，这可能吗？他们忽视了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国、西班牙和撒丁的贪婪意图，难道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可能的盟友中，英国正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俄国受制于瑞典和土耳其的威胁，而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在没有金钱援助的情况下都是按兵不动的？总之，弗里德里希抱怨说，

因为奥地利人未能将他登基时他们发出的友好声音贯彻到底，他对此越来越恼火，不得不更积极地思考如何利用当前的局势。²⁵

这种带着不祥之兆的话语是弗里德里希的第一本重要的文学作品《驳马基雅维利（或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考察，附历史和政治笔记）》在海牙出版仅仅数周后发表的，后世更为熟悉这部作品最初简短的法语标题《反马基雅维利》。²⁶在前一年秋天完成第一稿后，他曾告诉阿尔加罗蒂，他的意图是要表明，无限制的野心、叛逆、不忠和谋杀都违背了君主的真正利益，从道德和审慎的观点来看，只有良好且公正的政策才是明智的政策。²⁷在最后一章中，弗里德里希专门关注了战争。他预设的前提是战争是恐怖的：“战争如此充满不幸，其结果如此不确定，其后果对国家是如此具有毁灭性，因此君主在发动战争之前应该三思。我说的不是他们施于邻国的不公正和暴力，而是他们的臣民所直接承受的不幸。”²⁸他说，只有防御性的战争才是唯一正义的战争，不过预防性攻击也可能是允许的。其他可以允许的战争包括维护“有争议的权利或要求”，以及履行对同盟者的契约义务。²⁹君主不能把他们的臣民视为奴隶，而应该平等相待，甚至要把臣民视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君主，比古代的任何暴君都更为残酷和冷血。他们将有义务保护的无数人的幸福献祭给自身冲动的激情。”³⁰

在这些动听的话语出版后不到3个月，弗里德里希就入侵了西里西亚。显然，他发动的这场战争不能说是防御性的、预防性的或是支持盟友。至于“有争议的权利或要求”，弗里德里希自己甚至都没有认真地坚持过他对西里西亚有任何的合法要求。当他的外交部门为入侵精心炮制了历史性理由时，他评价道：“太好了！一个优秀的骗子才能做出这种东西。”³¹这种虚伪在一定程度上是“照我说的做，别照我做的做”的简单例证。伏尔泰肯定是这么想的，他给朋友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写信说：“你会知道我的好朋友普鲁士国王的胜利，他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写得这么好，同时又立即像马基雅维利的英雄一样采取行动.....你一定了解我的普鲁士国王，当他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他热情地爱着你的英

国政府，但国王的位置已经改变了这个人，现在他像一个穆斯塔法、塞利姆或苏莱曼^③一样享受专横的力量。”³² 伏尔泰也观察到：“如果马基雅维利有一个君主做他学生的话，他给学生的第一个建议就会是让学生写文章反对他。”³³ 这真是太讽刺了。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说人道主义和权力政治的冲动在弗里德里希身上以一种充满张力的方式并存。³⁴ 说服力更胜一筹的是特奥多尔·席德尔对上述洞见的描述，即弗里德里希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只渗透到他天性中理智的一面，而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³⁵

这一更为深思熟虑的观点，早在弗里德里希写作《反马基雅维利》很久之前的思考中就已经有所体现。1731年，出逃失败被关在屈斯特林时，19岁的弗里德里希在纸上写下了他对“普鲁士当前政治形势”的思考。³⁶ 他认为，最根本的是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如此多块领土在欧洲北部排成一排，是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因此，普鲁士必须与众多的邻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冲突。而另一方面，不作为并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不进则退”。因此，统治者必须时刻留意获得领土的机会，以填补他支离破碎的领地之间的间隙。其目标清单的第一项就是波兰的（西）普鲁士，获取这片土地之后，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将连成一片，并能控制住维斯瓦河沿线的波兰贸易。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也非常值得拥有，它本身就非常有价值而且可以为未来获得梅克伦堡提供便利。“就像这样，”弗里德里希总结道，“我不断从一个国家进军另一个国家，不断地征服，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在寻找可以征服的新世界。”³⁷ 这可能带有讽刺的语气，但他进一步的断言是完全严肃的：只有通过这样兼并土地，普鲁士国王才能从他目前蜷缩的尘土中爬起来，跻身欧洲大国之列。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想到西里西亚，但更为敏锐的奥地利人能够嗅到危险的气息。在阅读完弗里德里希的一本沉思录之后，经验丰富的统帅和政治家欧根亲王注意到，虽然弗里德里希的计划没有完全经过深思熟虑，但它们确实显示出“活力和良好的判断力”，假

以时日，他会成为一个危险的邻居，除非他能被其他东西吸引而摆脱当前的想法。³⁸ 3年后，弗里德里希来到他位于德意志西南部菲利普斯堡的军营亲身体验战争时，欧根亲王有了印证他的判断的机会。欧根亲王惊愕地发现，这位王储“满脑子法国人的想法”。他给皇帝写信说：“把这个年轻王子争取到自己这边事关重大，总有一天，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会结交比他父亲更多的朋友，而且他能引发的危害和他带来的好处一样大。”³⁹ 弗里德里希回到普鲁士后，年迈的亲王写信给他，称赞他之前在军营里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欣喜地期待他未来取得非凡成就。⁴⁰ 但他恭维的对象并没有回报这些赞美，而是尖酸地评论说欧根亲王“肉体仍在但灵魂已经逝去了”。⁴¹

欧根亲王错了。弗里德里希并不是“满脑子法国人的想法”。他对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评价特别低。1737年，法国外交大臣肖夫兰被免职，弗里德里希写道，他太诚实了，“在一个只由像枢机主教〔弗勒里〕那样的卑鄙小人组成的部门里待不下去，这些人只配给懒惰、愚蠢、卑劣如路易十五的国王作工具”。⁴² 如果说他对法国人的态度是鄙视，那他对奥地利人的态度就是厌恶，他斥责他们尽管处境糟糕，还“过度骄傲”。⁴³ 他还急于改变长久以来用“致命的昏睡”解决普鲁士事务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更善于谈判，而非发动战争。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很有利的，但我们的外交却缺乏活力。”⁴⁴ 解开这个死结需要强大的力量，对于常年溃烂的痛处——于利希和贝格之争——来说尤其如此。

奥地利人可能合情合理地期待着从弗里德里希那里得到某种程度的感激之情。毕竟，在173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似乎打算让弗里德里希与他朋友卡特遭受同样的命运时，查理六世曾出面干预，争取了宽大处理。正是奥地利大使泽肯多夫帮忙清还债务并再三馈赠礼物，才让弗里德里希在18世纪30年代维持了财务的稳定。⁴⁵ 然而，在弗里德里希知道泽肯多夫正是他被迫迎娶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一事的推手后，所有的慷慨都变得苍白无力。她不仅是奥地利推出的候选人，还是

查理六世皇后（也叫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娘家姓也是不伦瑞克）的侄女。1732年11月4日，法国大使拉·谢塔迪幸灾乐祸地从柏林报告说，任何感激之心都被这桩婚姻扼杀了。⁴⁶

此外，自从他们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一起出征弗兰德斯起，泽肯多夫就一直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密友。因此，他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暴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他被派往柏林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普鲁士留在皇帝的阵营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弗里德里希·威廉会在奉承地向皇帝致敬和对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典型的粗暴辱骂之间摇摆不定，让人难以琢磨。他回复查理六世的一封信时言辞太过粗鲁，以至于欧根亲王感叹说：“如果我是皇帝，普鲁士的国王写了这样一封信，他要是不以我能满意的方式赔礼道歉，我肯定对他宣战。”⁴⁷ 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因为奥地利在利希和贝格争端中表里不一的表现而断然与之决裂。1733年，他还告诉泽肯多夫，他如此忠诚于查理六世，以至于后者只好“用脚把他踢开”。4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永远不要相信奥地利人——有用的时候他们会奉承他，没用处的时候就会立即把他抛弃。⁴⁸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证明了自己和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740年欧洲的国际体系

因为过去的侮辱和伤害而决定羞辱奥地利人是一回事，付诸实践则是另一回事。弗里德里希很清楚，普鲁士仍然是“一个两性体，比起王国更像是一个选帝侯国”。⁴⁹ 如果它要明确地树立起自己的阳刚之气，就需要证明它可以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甚至连弗里德里希的前任中最具活力、最成功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发现自己受着大国的支配。在1679年的《圣日耳曼条约》中，他被迫将之前5年凭作战胜利征服的地区交还给瑞典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盟友、法

国的路易十四命令他这样做。

他不幸遭遇了身处权力和威望最高峰的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可以令一位法国外交官吹嘘：“除非我们的国王允许，否则连一条狗都不可以在欧洲吠叫。”⁵⁰ 60年后，好几条狗都在没有向凡尔赛请示的情况下嚎叫了起来。这场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是由于法国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衰落。要理解1740年弗里德里希的处境，就需要对法国的衰落加以解释。路易十四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1643—1715年），法国以严重的结构性损失为代价，获得了大量的领土。因为战争费用的急迫需要支配着每一个10年，所以短期的收获是以长期的痛苦为代价的。年迈的国王死后，国库空虚，即使是最紧迫的债务都无法偿还，常规税收因为免税和逃税而减少，很多王室领地被出售或赠送，累积债务已经超过10亿里弗尔。⁵¹ 上请法官里歇尔·多贝哀叹道，“那是一种悲惨的处境，其〔特点是〕巨额的债务……被税收压垮的人民……人口缩减……贸易也萧条了”。⁵²

法国从那个低谷开始出现了持续复苏。在欧洲，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深厚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但所有的其他国家也都在扩张，而且，它们扩张得更快一些。最严重的是，它们在至关重要的人口领域增长得也很快。18世纪，法国的人口从大约2000万这一相对较高的基数上增长了30%左右——但它的对手大多数都达到了这个数字的2倍，甚至更多。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国在人口方面的优势逐渐不复存在。⁵³ 法国人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源。如国家银行之类有效的金融机构未能建立起来；国家税收继续私有化；无孔不入的腐败强化了富有的个体与贫困大众之间的财富差距。凡尔赛宫廷在其创造者路易十四治下短暂的全盛时期，曾是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现在则成了功能失调的改革阻碍。⁵⁴

像其他许多曾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帝国那样，法国未能适应。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其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同哈布斯堡王室敌对的

基础上，首先是和西班牙世系为敌，然后是和奥地利世系为敌。为了对付由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低地国家的哈布斯堡领地所形成的包围圈，法国曾试图与外围国家结盟，组成一个“东方屏障”以转移威胁，这些国家包括北方的瑞典、东方的波兰和东南方及南方的奥斯曼帝国。这种跨越式的外交效果通常都很好，特别是在1630年，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德国北部，终结了哈布斯堡看起来似乎势不可挡的扩张。然而，到了18世纪初，这三个盟国的效力和可靠性都开始衰退了。1683年，土耳其围攻维也纳不仅以失败告终，救援军队还是由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亲自指挥的。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以瑞典决定性的失败和其波罗的海帝国的分裂而告终。

短期内最大的赢家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7世纪90年代，他们的军队将土耳其人赶出了匈牙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中，他们虽然没能得到绝嗣的西班牙表亲们的全部遗产，但确实控制了意大利和尼德兰南部（现今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富饶且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地区。1716—1719年，在与土耳其人的另外一场短暂但获得了胜利的战争中，他们将边界推到了巴尔干半岛的更深处，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贝尔格莱德。就像令人痛苦的18世纪30年代展现出来的那样，奥地利人随后枕在欧根亲王的桂冠上睡起了大觉，放任法国和土耳其恢复力量，并为北方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提供了机会。这就是俄国，它从法国联盟体系的衰落中获得了最庞大而且最持久的好处。1709年，在波尔塔瓦摧毁了查理十二的瑞典军队之后，彼得大帝确保了东波罗的海成为俄国的内湖，而波兰则成为俄国的卫星国。1721年8月，大北方战争随着《尼斯塔德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俄国获得了利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里亚和卡累利阿的一大部分地区。这些收获与其说是彼得一直寻求的“面向西方的窗口”，不如说是一幅完整的全景画，这表明俄国已经取代瑞典成为东北欧和东欧的主导力量。

如果知道俄国已经羽翼丰满，法国人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但在法国看来，俄国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领域。就在不久前，路易十四还写信

给米哈伊尔沙皇，竟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12年了。⁵⁵ 俄国这颗东方之星在过去偶有闪烁，然后就返回到莫斯科公国的默默无闻之中。当彼得大帝1717年访问巴黎的时候，他向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提出，要取代法国传统盟友的位置。他告诉在逗留期间奉命来陪同照顾他的政府大臣德·泰塞伯爵：

法国已经失去了它在德意志的盟友；瑞典几乎被摧毁，不能给它任何帮助；皇帝的权力在无限膨胀；而我，沙皇，向法国毛遂自荐，取代瑞典……我希望担保你们的条约；我为你们提供我与波兰的同盟……我看到，奥地利未来的强大力量肯定会让你们忧虑不安；请让我得到瑞典的位置。⁵⁶

然而无论是摄政王还是后来的其他法国大臣都没有听进去。他们宁愿加固旧有的体系，甚至敌视俄国几乎变成了法国外交政策中跟仇视奥地利一样不言自明的公理。1725年，15岁的路易十五迎娶流亡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的女儿玛丽·莱什琴斯卡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这位波兰国王在波尔塔瓦会战之后被彼得大帝从他的王国里驱逐了出去。与波兰的联姻关系被延续到了下一代，1747年，他们的儿子法国王太子与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的女儿玛丽娅·约瑟法结婚。在瑞典，法国外交官们不断地运作，力图将亲英国的“便帽派”驱逐出权力中心，而支持那些亲法国和反俄国的“礼帽派”，他们最终在1738年促成了这一转变。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外交官关注着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鼓励土耳其人抵制俄国对黑海以北的侵占，监督其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并介入了1739年的和平谈判。⁵⁷

正如这些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法国在北欧和东欧仍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然而，它必须在殖民领域争夺资源，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只会越来越强。当路易十四要求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交还所征服的瑞典土

地时，他还控制着英国的查理二世。1688年的光荣革命骤然结束了这一“主从”关系，也开启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直到127年后的滑铁卢战役方才结束。《乌得勒支条约》于1713年结束了英法之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争斗，英国获得了足够多的殖民地，这刺激了他们的欲望。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西班牙占领的佛罗里达除外），并对哈得孙湾以南的大片土地提出了要求。夹在两者之间的法国人早在1534年就对圣劳伦斯河进行了首次考察，现在他们控制着通往五大湖及其他地区的河谷。最近，法国人还对遥远南方的密西西比河河口的土地提出了要求，将他们的新殖民地以他们国王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并在1718年建立了新奥尔良。法国人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将这些新获得的土地与他们北方原有的殖民地通过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连接起来。正是在俄亥俄河流域，他们撞上了从沿海的英国殖民地西进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寻找新土地的殖民者。到18世纪30年代，武装冲突显然已经不可避免。⁵⁸自1739年起，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已经开始，也是由于殖民地的纠纷。

总之，当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时，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局势，没有一个国家占有绝对优势。至少他的地缘政治地位意味着他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机会参与到欧洲以外的争端中。但这一形势也对他有利，因为与普鲁士争夺北德意志主宰地位的两大劲敌瑞典和波兰—萨克森衰落了。前者虽然仍控制着西波美拉尼亚，包括最大的吕根岛，但其波罗的海帝国的大部分已经丧失，因此它不再有足够的人口、财力和军事上的资源来保持独立的政策。萨克森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自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在1697年被选为波兰国王，成为奥古斯特二世，他就长期致力于让他的复合国家表现出大国的样子。德累斯顿被有意改造为北方的威尼斯，一个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转站。1719年，萨克森王储与一位哈布斯堡女大公结婚，1733年，他继承其父被选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开启了将个人与选举联盟升级为永久结合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奥古斯特三世辉煌且成功的联姻政策，正

体现了韦廷家族的威望和野心。

正如波兰众多亲波兰的历史学家一直急于指出的那样，在这一世纪结束之前导致这个国家被瓜分、从欧洲地图上被抹去的一系列事件，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波兰拥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资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规模。“波兰—立陶宛联邦”，或更为恰当的称呼“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是欧洲面积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国家，它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附近，包括现在的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部或部分。在它西方距离不到80千米的地方即是萨克森选帝侯国，其虽然面积小了很多，但拥有更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萨克森拥有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商业、农业和采矿业，是欧洲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先进、最繁荣的公国。与面积庞大的波兰合并之后，萨克森的国力使得它的选帝侯—国王们非常有望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者，而这一地区包括普鲁士。从历史的角度看，萨克森成为地区霸主一事似乎也是可能的，如果不是特别可能的话。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半的波兰血统，他于1525年让条顿骑士团的领地世俗化，还前往克拉科夫宣誓效忠波兰国王，并获封普鲁士公国，这是波兰的一块封地。⁵⁹继任的每一位公爵都需要履行这一仪式，包括1618年之后继承了该公国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们，直到1660年的《奥利瓦和约》才令他们取得主权独立并因此从波兰独立出来。⁶⁰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萨克森选帝侯的地位一直被认为比勃兰登堡选帝侯更重要。他的家族更古老（萨克森选帝侯起源于9世纪晚期，勃兰登堡选帝侯起源于11世纪中期），他的领土更广阔（至少在1648年之前如此）并且更加富庶，他还是新教诸侯联盟的首领，这令他更负盛名。就算他的国王头衔只是靠选举获得的，他获得的时间也早于他的普鲁士邻居（前者是1697年，后者是1701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强者奥古斯特拥有的宫廷也比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允许自己拥有的更富有魅力。但问题就在这里。强者奥古斯特在宫殿、情人、私生子、歌剧和所有其他宫廷文化活动中挥金如土，更

不用说为两次波兰王位选举付出的数额巨大的贿赂；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则把钱花在组建军队和积累储蓄上。⁶¹ 就像弗里德里希对他父亲的描述那样，以这种方式“他默默地走向了伟大”。⁶² 据说，奥古斯特曾对弗里德里希·威廉说道：“陛下您积攒1个杜卡特时，只是把它添加到您的财富里，而我更喜欢花掉它，这样它就会以3倍回报我。”⁶³ 这种“收税—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可以得到《圣经》中有关才干的寓言故事的支持^④，但在他的继任者面临查理六世驾崩后的危机时引发了问题。18世纪初期，萨克森的军队规模与普鲁士军队相当，但到1740年，它已经缩减到不到普鲁士军队的三分之一。⁶⁴ 对于奥地利在1733年波兰国王选举中伸出援手的任何感激之情，都被查理六世拒绝支持萨克森对于利希和贝格继承权要求这件事毁掉了。⁶⁵ 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发现，在1740年围绕玛丽娅·特蕾莎的遗产的所有掠食者中，萨克森的利益最大，因为哈布斯堡的西里西亚省将萨克森选帝侯国与波兰王国隔开了。若获得此省，就会形成一片西起威悉河东抵第聂伯河的完整领土。说得更具体些，西里西亚是萨克森制造业原材料的重要产地和萨克森食盐最主要的销售市场。⁶⁶

简而言之，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萨克森肯定既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又是一个对手。另一个参与其中的重要的德意志君主，巴伐利亚的查理·阿尔布雷希特选帝侯也是如此。有必要再一次指出，虽然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是普鲁士大获全胜，但不应掩盖当时出现截然不同结果的可能性。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不仅统治着巴伐利亚，还掌握着普法尔茨选帝侯国、科隆选帝侯国和茨韦布吕肯公国，还有其他一些教会诸侯领地，这些领地的资源集合起来相当可观，包括明斯特、希尔德斯海姆、帕德博恩和奥斯纳布吕克。这个教会集团是由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的弟弟克莱门特·奥古斯特召集在一起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留下了豪华的建筑遗产，足以令萨克森的韦廷王室黯然失色：宁芬堡宫、施莱斯海姆宫、曼海姆宫、布吕尔宫和波波斯多夫宫，这里只是列举其中比较宏伟的几座。在这些豪华的宫殿中，巴伐利亚不惜血本地发展宫廷文化，导致债

务如山。1722年，查理·阿尔布雷希特与哈布斯堡女大公玛丽娅·阿马利娅结婚的庆祝活动持续了3周，花掉了400万古尔登，相当于巴伐利亚一年的收入。⁶⁷到了18世纪30年代后期，巴伐利亚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以至于要把军队提供给跟土耳其人打仗的查理六世差遣，只是为了从皇帝那里领到薪水。由于屡次战败，军队人数大幅减少，1740年的时候只剩下1万多人。⁶⁸

然而，破产和军事无能都没能抑制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野心，这种野心受到了成就受挫的刺激。尽管前面两三代人在炫耀其辉煌上大肆铺张，这一家族仍处在欧洲统治者的第二等级。汉诺威的韦尔夫家族、萨克森的韦廷家族和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都得到了国王头衔，而巴伐利亚选帝侯仍然只是原地踏步。但随着查理六世于1740年驾崩，一个能够超越对手的极好机会来临了，要选举出的是仍被认为是欧洲最显赫的头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实际上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异想天开。毕竟，过去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曾经出过两位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1314—1347年在位）和普法尔茨的鲁普雷希特（1400—1410年在位）。他们还有一个合法的要求：巴伐利亚人坚称，1546年的某项条约规定，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男性继承人断绝，继承权将传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不幸的是，当实际的文件从维也纳档案馆里拿出来时，人们发现继承权的限定条件不是“男性”，而是“合法”的继承人断绝（当然了，巴伐利亚人声称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⁶⁹更重要的是，查理·阿尔布雷希特赢得了法国的支持。法国和巴伐利亚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合作传统，这一传统建立在共同敌视奥地利的稳固基础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这一同盟在1704年的布伦海姆战役中遭遇灾难性的溃败，此后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的父亲马克斯·埃曼纽尔选帝侯流亡了10年之久。事实证明，巴伐利亚和法国最新的这次联合也会走向类似的命运。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查理六世死讯传来时，路易十五最初的反应是完全被动的：“我不想卷入这一切，”他说，“我会袖手旁观，除非有人企图选出一个新教徒当皇帝。”⁷⁰当听说弗里德里希入侵西里西亚时

，他感叹道：“他是个疯子，这人疯了。”⁷¹这种迟钝很符合年迈的首相，枢机主教弗勒里的胃口，但凡尔赛的年轻人都渴望着—场大陆战争，好在其中大显身手。他们中为首的是贝尔岛公爵，他自封为上帝的执行人，要完成黎塞留的事业并—劳永逸地摧毁哈布斯堡家族。⁷²按其—贯做法，国王路易十五选择对每—方都做出承诺。奥地利人被告知，“国事诏书”将得到遵守，哈布斯堡君主国可以凭此传给玛丽娅·特蕾莎，但路易十五也决定支持巴伐利亚选帝侯作为皇帝的候选人，而不是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被提升为法国元帅的贝尔岛公爵被派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监督皇帝的选举。⁷³

优柔寡断的路易十五在互相竞争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事实证明，在这两派中，弗勒里更明智—些，因为他的视野宽阔，足以看到在欧洲大陆实行“前进政策”的全球影响。随着1739年夏天西班牙与英国的开战，以及北美洲英国和法国殖民者之间非正式冲突的增加，在公海和海外爆发公开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1739年8月，英国纽卡斯尔公爵写道：“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国将加入西班牙—方，那么我们会在国内受到攻击。”⁷⁴1740年9月，—支法国舰队驶往西印度群岛，警告英国皇家海军不要攻击该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地。⁷⁵在这—事件中，弗勒里的谨慎态度被忽略了。早在他1743年1月去世之前很久，凡尔赛的主战派就已经把他撇到了—边。

在欧洲的另一端，由这个“国王死亡之年”的另—起死亡引起的另—种转变正在进行。这—次是俄国的女沙皇安娜，她于10月17日驾崩，比查理六世早了3天，尽管这—消息花了较长时间才传到欧洲西部。由于俄国还没有成功建立—个有序的程序来应对王位虚悬的状况，所以很可能出现长时期的国内动荡和外交无力的局面。已故的女沙皇对继承人的选择把这种可能变成了必然，她选择了外甥女安娜·利奥波德芙娜两个月大的儿子。权力争夺已经可以预见了。已故女沙皇选择的摄政者是她的情人，库尔兰公爵比龙，这触怒了圣彼得堡的高级官员和地位非常重要的近卫团。11月21日，比龙被高层军官陆军元帅伯克哈特·克里斯托

夫·冯·明尼希和海军上将约翰·海因里希·奥斯特曼发动的政变推翻。他们两人掌握着实权，安娜·利奥波德芙娜和她丈夫，不伦瑞克的安东·乌尔里希亲王作为名义上的摄政者。⁷⁶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安东·乌尔里希是他姻兄，陆军元帅明尼希对奥地利人的背叛耿耿于怀，因为奥地利人通过谈判窃取了他对土耳其人的胜利果实。⁷⁷弗里德里希不失时机地给明尼希写了几封奉承的信，署名为“你非常忠诚的朋友”，还授权他驻圣彼得堡宫廷的特使玛德菲尔德向明尼希提供一大笔贿赂以换取援助。⁷⁸没过多久，动荡的俄国派系斗争局势再次发生了变化，这次对普鲁士不太有利，但还没有构成威胁。弗里德里希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写道，正是女沙皇的死让他最终决定入侵西里西亚，因为，在伊凡未成年的时候，俄国的政策制定者会全神贯注地维持国内的稳定，无暇顾及支持国外的“国事诏书”。⁷⁹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

总之，在1740年秋冬交替之际，弗里德里希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
置。即使他没有盟友提供支援，至少也有行动自由。西边的三大列强被
实际的或即将到来的冲突吸引着注意力，东方的唯一大国又被国内的动
荡缠住了手脚。他的目标，哈布斯堡君主国，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但
是这种幸福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月相移动到另一个角度，世事起伏之波
浪的高潮时机就会过去，所有的事业就会一败涂地。弗里德里希出了名
地看不起莎士比亚，这段话正是出自后者之口，但他对尤利乌斯·恺撒
的一切了如指掌，从他在本章第一句话中引用的“渡过卢比孔河”就能看
出来。^⑤他在11月1日给大臣波德维尔斯的信中透露，他有一种强烈的“
机会来敲门”的感觉：“我给你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一个人处在有利
状况时，他是否应该利用它呢？我和我的军队以及其他一切都已经准备
好了；如果我不好好利用它，我手中就是一份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资产
；如果我好好利用它，就将说明我知道怎么利用我相对于邻居的优越地

位。”⁸⁰

3天前，在弗里德里希与什未林元帅于莱茵斯贝格会晤时，波德维尔斯敦促他要谨慎，建议谈判。作为得到西里西亚的回报，普鲁士将提供军队帮助玛丽娅·特蕾莎维持其他财产，弗里德里希投票支持她丈夫当皇帝，普鲁士将公开放弃对于利希和贝格的要求，并支付200万塔勒。⁸¹ 弗里德里希都没有接受。他在坚持为自己立即采取直接行动辩护时，还透露了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动机：“如果我们等待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开始〔对奥地利的〕敌对行动，我们将无法阻止萨克森人的扩张，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利益……但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压制住萨克森，通过阻止他们获得马匹，我们能让他们什么都做不了。”⁸² 在接下来几年里的所有波折中，弗里德里希总是留意着来自其他德意志诸侯的竞争，尤其是萨克森。11月初，他得知巴伐利亚向维也纳提出对哈布斯堡继承权的要求，不久萨克森特使告诉波德维尔斯，他的主人不得不仿效巴伐利亚的做法。⁸³ 蔑视冲淡了谨慎，因为他确信萨克森并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毫无招架之力。⁸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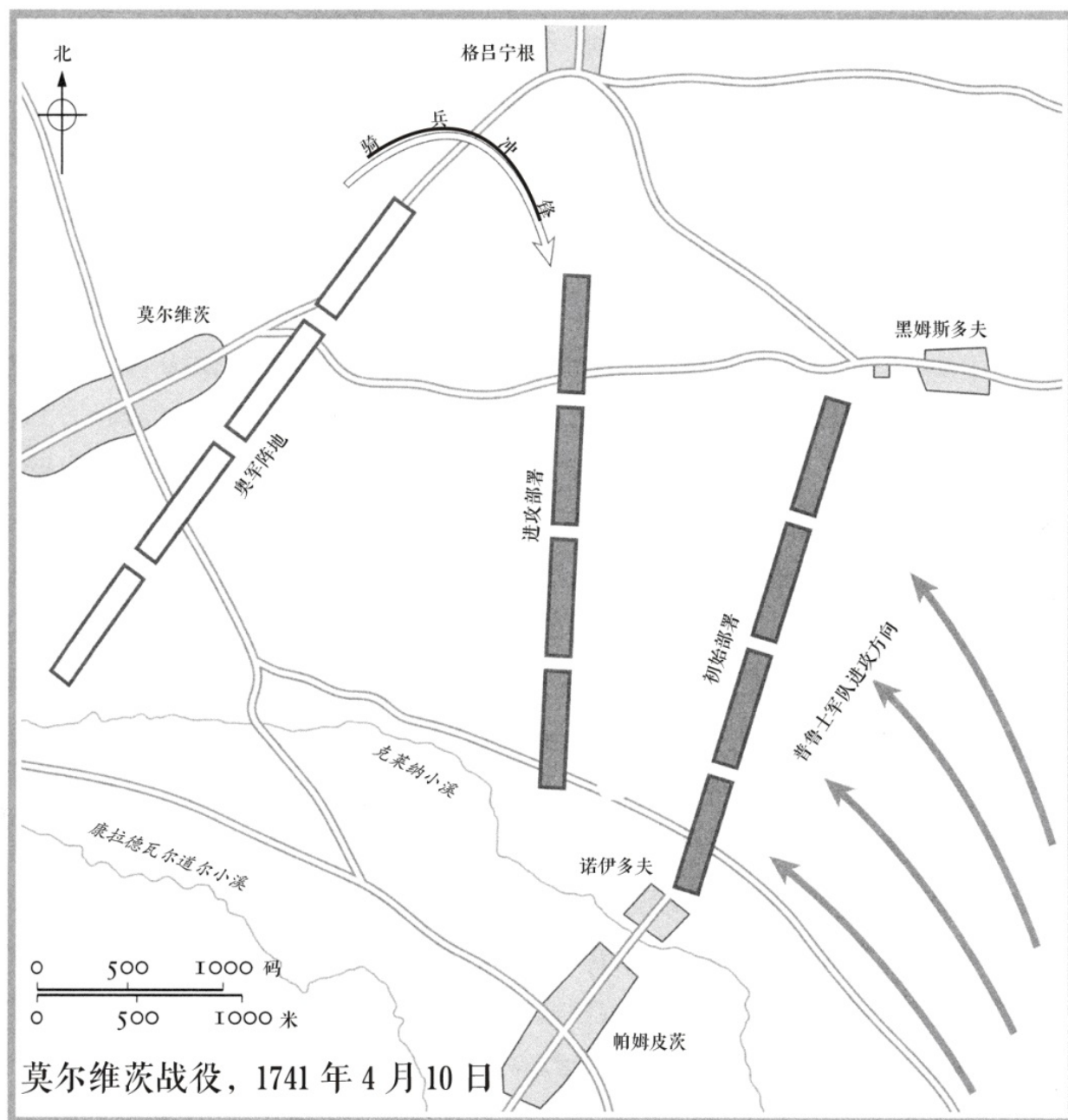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及其参谋数十年的准备工作现在要见成效了，其中最著名的参谋是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他更为人们熟知的称呼是“德绍老头”。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动员——俄国可能需要一年或更多时间——但弗里德里希能够在短短几周内将军队投入战场。10月26日，弗里德里希得知皇帝的死讯，11月7日，他就命令各团做好准备；12月2日，他从莱茵斯贝格返回柏林；12月8日，骠骑兵、克莱斯特团和叙多团开拔；他自己则于12月13日离开首都；3天后，他率领军队从奥得河畔克罗森附近的边界进入西里西亚。⁸⁵ 奥地利人在这个省的全部兵力只有3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因此，随后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占领。⁸⁶ 普鲁士军队分成两队，一队在弗里德里希的指挥下从东面沿着奥得河流域行进，另一队在西面，由什未林伯爵率领。到1741年1月初，弗里德里希已经到达了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1月17日，他在给阿尔加罗蒂的一封信中声称，他

已将整个省收归囊中。只有格洛高、格拉茨、尼斯和布里格的要塞还在奥地利人手中。他自夸道，整个战事他只损失了20名士兵和2名军官。⁸⁷

弗里德里希沉浸在自信满满的情绪中。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给波德维尔斯写信道：“你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骗子，而我是最幸运的孩子，我们的名字将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⁸⁸一个星期后，他宣布要向欧洲其他宫廷证明他的计划并非空想，而是能以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方式取得胜利的成果。⁸⁹他的骄傲自大是可以理解的。他现在已经28岁了。除了1734年在莱茵河畔断断续续的战役之外，他从来没有机会在最符合国王身份的事务——战争中证明过自己。现在，他正指挥着一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横扫敌人的土地，向着他对军队所说的他们命中注定的“荣耀之约”进发。⁹⁰他做的事情是他半是厌恶半是钦佩并且完全惧怕的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的，并且他是唯一的指挥官。12月2日，他对德绍老头说，自己的初次出征不需要他跟随，“世人不应该认为国王行军打仗需要他的导师陪同”。⁹¹这意味着，虽然弗里德里希对征服西里西亚的好处做过很多理性分析，但最本质的动机是私人性质的。一到西里西亚，他就给伏尔泰写信，描述了出征的艰苦，并补充说，他乐意将这些苦差事交给别人，“如果那名为荣誉的幽灵没有如此频繁地显现在我面前的话。事实上，这是一种巨大的疯狂行为，但当人一旦迷恋上这种疯狂，就很难摆脱”。⁹²两个月后，他向朋友夏尔-艾蒂安·若尔丹坦白道：“我喜欢战争是因为荣耀。”⁹³甚至在他为公众撰写的战争历史中，他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对荣誉的追求是首要的目的。⁹⁴有时他把自己的行为与他的国家甚至他的家族联系起来，但根本上还是只为了自己。⁹⁵这是一个太过显眼而无法不被人注意的特质。例如，法国大使蒂尔康奈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向法国宫廷报告说，驱使弗里德里希的动机是“对伟大和荣誉的热爱，特别是那些能提高他在国外声誉的事情”。⁹⁶

把德绍老头解职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恭维他说，1741年战争真正开

始的时候会是非常需要他的。弗里德里希希望奥地利不等开战就能同意割让西里西亚的想法既低估了对手的财力，也低估了玛丽娅·特蕾莎的决心。维也纳对弗里德里希入侵的反应是惊恐、悲伤、愤怒和抵制的决心混合在一起的感觉。17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普鲁士人在3月9日攻破格洛高要塞，取得了早期的重要胜利，但此时奥地利的轻装部队已经开始骚扰普鲁士的前哨基地。到了月底，由将军威廉·冯·奈佩格伯爵指挥的约1.6万人的主力部队从摩拉维亚进入西里西亚，在4月5日解救了被围困的尼斯要塞并北上朝着布雷斯劳进发。措手不及的弗里德里希只好匆忙追击，经常被无处不在的奥地利骠骑兵限制住行动。⁹⁷ 关于对方部队的位置，双方都只有模糊的认识。接下来的几天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情报都具有不可靠性，这意味着“行动发生在一种朦胧不清之中，它有如迷雾和月光，往往会使事情看来古怪夸张，甚于它们的实际情况”。⁹⁸



4月10日上午，在靠近布里格的莫尔维茨村附近，当字面意思上的雾气和比喻意义上的战争迷雾都散尽之后，在奥地利战俘和同情普鲁士的新教农民的情报帮助下，弗里德里希实现了战术上的出奇制胜。然后他放弃了奇袭战术，花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循规蹈矩地进行部署，

这表明他缺乏经验。直到下午1点30分，普鲁士大炮才开始轰击。接下来就是这样一场比赛了：是骑兵更强的奥地利会获胜，还是步兵更强的普鲁士会获胜呢？一开始前者占了上风，他们打散了普鲁士右翼的骑兵。所有记载都一致认为，弗里德里希本人在试图挽回局势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事实上，他的表现使得他的副手什未林担心他的生命并恳求他离开战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并不能确定他是否像奥地利人——以及他们的历史学家——事后宣称的那样，在同意这一提议后逃走了。但没有争议的是，老将什未林此时集中精力，让他的步兵从中路向前冲锋赢下了这场战斗。一名奥地利军官于战斗结束4天后记录下了这次决定性的进攻：

敌人的军队现在从四面八方进攻过来。他们有数量上的优势，比我们多3000人，还有位于两队后方的一个强大的后备队，他们在两翼上都围住了我们。我敢有把握地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阵形。他们以最稳定的步子向前行进，就像走在操场上一样，队列笔直如同模具。他们擦得锃亮的武器在阳光中闪着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齐射击时就像雷声在不断轰鸣。我们的军队完全丧失了士气；我们的步兵无法保持他们的行列，我们的骑兵面对敌人的时候也无法整队。 ⁹⁹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在这次进攻中，普鲁士步兵达到了“在火力使用方面至今尚未被超越的完美水平”。¹⁰⁰ 目睹自己军队分崩离析的奈佩格下令撤退。5点钟的时候，什未林派遣使者为国王送去胜利的消息。由于普鲁士军队追击的力度较弱并且并不连续，奥地利人没有受到阻挠，撤回了尼斯要塞。¹⁰¹

直到第二天早上，使者才找到弗里德里希并告诉他这一值得庆祝的

消息。他度过了一个充满冒险气息的夜晚，骑着马在西里西亚的郊野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之处，在这段50千米的冒险旅程中，他还从奥地利骠骑兵的追捕之下死里逃生。他不可能欢欣鼓舞。由于缺乏经验，他放弃了无价的奇袭优势以及它所意味着的快速、彻底和代价更小的胜利机会，而是让他的士兵经受了一场恶战，约1500名士兵死在战场上，受伤者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倍，其中许多人后来死于经常发生的坏疽。奥地利人的伤亡跟普鲁士不相上下。¹⁰²两天后，弗里德里希寄给身在柏林的大臣们的战报内容则相当不一样：“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冯·奈佩格元帅的军队，尽管比我们多了6000人，骑兵人数是我们的3倍，还是被彻底击溃，被迫撤回尼斯。”¹⁰³他没有提到什未林以及自己过早离开战场的事情。在随后写信给至交好友如若尔丹、阿尔加罗蒂或威廉明妮时，他同样没有提及。¹⁰⁴现在，弗里德里希的胜利在欧洲的其他宫廷中被大肆宣扬着。

一星期后，在写给他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信中，他显得不那么以胜利者自居了：“我们打败了敌人，但每个人都在哭泣，有人失去了兄弟，有人失去了朋友。总之，我们可能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沮丧的胜利者。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再经历一次像莫尔维茨那样血腥的战斗！一想到它，我的心就在流血。”¹⁰⁵但即使这样，他也没能把功劳归于应得的人。在1754年军事演习的时候，他对德·吉索尔伯爵承认说，在莫尔维茨战役中，他是一个绝对的新手，如果没有什未林的话自己肯定会输，是什未林把他从错误中救了出来。¹⁰⁶在他为后人写的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述中，弗里德里希做了更多自我批评。这篇记述最早写于1742年，1745年修订了一次，1775年又修订了一次，但直到他死后才发表。在这份记录中，他承认自己应该在战斗中更早地集中兵力，在莫尔维茨他浪费了两个小时去部署军队，由于没有立即进攻，他错过了第二个布伦海姆大捷的机会，全靠普鲁士步兵的勇猛和纪律才拯救了他。另一方面，他只肯承认什未林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有经验的将军”，却又一次不肯提及正是什未林在战斗的关键阶段一直担任指挥。¹⁰⁷

“莫尔维茨战役教育了国王和他的军队，这位君主深刻反思了他所犯的错误，随后试图改正它们。”弗里德里希在同一段中以第三人称如此写道（就像尤利乌斯·恺撒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的写法那样）。他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奥地利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弗里德里希没有乘胜追击，错过了一次机会。¹⁰⁸这一耽搁使得奥地利人有时间向南撤退并获得喘息之机。显然他们只是休整而非垂死挣扎，并且随着哈布斯堡君主国生锈的战争机器被开到第一挡，他们还将得到增援。在短期内，莫尔维茨的胜利使得普军可以围攻和夺取附近奥得河畔的布里格要塞，5月4日，布里格要塞被攻陷，此时普鲁士军队主力在莫尔维茨和位于通往尼斯要塞路上的格罗特考的坚固营地中休整。

¹⁰⁹奥地利人的备战情况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窥见一斑：在布里格，唯一的大炮是皮制的，是“99年前瑞典人遗弃在这里的。据说这门大炮一直装着弹药被留在那里。驻防的炮兵队长不想点火，但一个陆军炮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摸了摸炮筒，结果它就爆炸了，炸伤了12个人”。¹¹⁰

无须赘言，莫尔维茨会战的消息在欧洲引起了轰动。不止路易十五一个人认为，弗里德里希入侵西里西亚的行为鲁莽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说普鲁士人总是低估奥地利人，那么欧洲人也总是低估普鲁士人。正如在后来两者之间的几场战争中那样，消息灵通和不灵通的观察者们都预计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优势将是决定性的。因此战斗的影响和真正参与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正如弗里德里希自己写的那样：“[4月10日]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因为两支小规模军队决定了西里西亚的命运，国王的士兵们获得了时间和嫉妒都夺不走的荣誉。”¹¹¹

从短期来看，莫尔维茨会战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即将引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如果奥地利获胜并将弗里德里希驱逐出西里西亚，他们就有可能吓退其他潜在的争夺者。结果莫尔维茨会战的失败暴露了他们的脆弱，引来了一群秃鹫。卡莱尔用一种矿物做比喻，他形容说，莫尔维茨是一块引起雪崩的鹅卵石，“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石头，这些石头又在跳跃和滚动的时候击中其他石头——直到整个山体在重力

定律的作用下发生运动”。¹¹²最大的石头是法国。由于18世纪30年代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功以及竞争对手的无为或失败，法国现在再次成为欧洲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力量，虽然事实证明，这只是回光返照。¹¹³事后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740—1741年代表着法国在旧制度下再也没有达到过的权力巅峰。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旷日持久的外交活动时期，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此前欧洲史上任何一次事件。对于那些喜欢看这些活动中打太极、两面派以及讨价还价的人来说，可以在多如牛毛的文件中关注每天的事件。作为这本弗里德里希传记的作者，很高兴的是，谈判的要点很快就可以讲完。战争中的3个主要国家都在它们身处的事件漩涡中坚持着自己的战争目标。奥地利希望收复西里西亚，并保持哈布斯堡君主国其余部分的完整性。普鲁士想让它对西里西亚的征服获得国际认可。法国的目标更复杂一些。其首要目标是防止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获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为这将威胁到法国最终对洛林公爵领地的吞并。^⑥然而，以贝尔岛公爵为首的鹰派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想要更进一步，将老对手永久性地降到二流地位。这将通过在3个主要竞争者之间分割哈布斯堡君主国来实现。尽管主题几经变化，各方最终还是于1741年9月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署了一项条约：巴伐利亚获得波希米亚和上奥地利的一部分，同时还有皇帝的头衔；萨克森获得摩拉维亚、上奥地利的一部分和下奥地利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国王的头衔；西里西亚剩下的地区归普鲁士。¹¹⁴玛丽娅·特蕾莎将保留匈牙利女王的头衔，而这个王国的臃肿并不能补偿它在力量方面的缺乏。换句话说，中欧将被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4个国家，从而使得法国能够在一旁掌控局势。这是拿破仑对中欧的规划提前60年的版本。

对于凡尔赛的幻想家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可以指挥军队的波拿巴。他们面对的也不是拿破仑皇帝能无情欺负的柔弱傀儡。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布雷希特和萨克森—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是各自家族中最软弱的，¹¹⁵但弗里德里希和玛丽娅·特蕾莎的性格比他们

运气不佳的继承人更为坚毅。弗里德里希急于得到法国的援助，但仅限于按照他的条件提供的援助。他更多地把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视为竞争对手而非盟友。他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写道，法国的分割计划很明显与他的利益相抵触：“如果国王允许自己成为法国政策奴役的工具，他就将为自己制造一个枷锁，会成全法国的一切，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到。”这一联合的成功会让路易十五成为欧洲霸主，使普鲁士从盟友变成附庸。¹¹⁶很明显，让玛丽娅·特蕾莎免于在贝尔岛公爵构建的联盟面前彻底失败的命运，是符合弗里德里希的利益的。让奥地利自愿割让西里西亚对于弗里德里希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所以当贝尔岛公爵在1741年4月底来到莫尔维茨军营寻求结盟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让他空手而归，这让他大为恼怒。一个月后，维也纳断然拒绝谈判的消息传来时，弗里德里希才不再拒绝法国的提议。双方于6月4日在布雷斯劳签订条约。¹¹⁷即使在那时，弗里德里希也小心地以近乎无礼的方式明确表态，这个联盟依赖于法国人是否信守承诺。6月6日，他从格罗特考的军营写信给贝尔岛公爵说，他“满怀着可以想象的最大限度的激情和急切情绪”，期待着两支军队的派遣，一支是来援助他，另一支则去入侵波希米亚，还要与瑞典联盟，以防弗里德里希无防备的东侧受到俄国人的攻击。¹¹⁸

除去8月4日控制了布雷斯劳之外，弗里德里希在1741年的整个夏天都处在被动之中，他用这段时间整顿在莫尔维茨战役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以彻底的巡查开始他的一天，他对军官们管理得如此严格，以至于许多人都想辞职。一个对此印象深刻的见证人便是贝尔岛公爵，他描述了弗里德里希亲自操练一个警卫营时的情况：“天气非常可怕，雪花大片地落下，但这并不妨碍警卫营像晴天时一样训练。在我来之前，我对这支军队的纪律、服从和严格有些模糊的了解，但我必须说，他们被逼迫到这种程度，是我没有料想得到的。”¹¹⁹弗里德里希特别关注在战斗中表现得最差的队伍——骑兵。5月份的时候，法国公使瓦洛里侯爵发现他们的马匹营养不良，骑手缺乏训练。然而到了

7月底，弗里德里希在施特雷伦军营检阅的62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骑术精湛的中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¹²⁰这不是最后一次明显地体现出“统一指挥”——也就是最高民事和军事权力由一个人独享——的好处。增援的分队陆续到达，所以到当年年底，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参战人员总数已经上升到11.76万人。¹²¹

法国军队于1741年8月越过莱茵河，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严格地说，法军这支部队只是一支辅助性的部队，用于支持巴伐利亚选帝侯的要求。但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瓦卢瓦一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数世纪以来争斗的最后对决已经开始了。和大多数的联盟一样，分歧立即变得明显起来。弗里德里希希望法国—巴伐利亚联军能沿着多瑙河向下游进军维也纳。这将迫使奥地利撤出仍在西里西亚的军队，使得弗里德里希能够完全控制该省。然而，贝尔岛公爵想集中精力征服波希米亚，让查理·阿尔布雷希特加冕为那里的国王。而这反过来又会给查理·阿尔布雷希特额外增加波希米亚的选票，确保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¹²²

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一开始沿多瑙河进军，9月中旬时推进到了林茨。鉴于此时维也纳受到威胁，玛丽娅·特蕾莎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骄傲，与弗里德里希做了一笔交易。弗里德里希很乐意接受，因为他试图通过一次大胆的迂回包抄夺取尼斯的行动刚刚失败了。¹²³10月9日，他在小施耐伦多夫会见奈佩格，他们会面的这座城堡位于尼斯河附近，属于奥地利的施塔尔亨贝格亲王。弗里德里希做了周密的预防措施，确保没有人——尤其是法国公使瓦洛里——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者他在做什么。当天签署的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休战协定。规定弗里德里希将停止军事行动，奥地利人则会在一次佯装的围攻之后放弃尼斯要塞，撤退到摩拉维亚。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玛丽娅·特蕾莎将割让下西里西亚（北部），直到（也包括）尼斯的地区。¹²⁴后者于11月2日如期投降，不过是在佯装的围攻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相当大的物质损失之后。

腾出来的军队正是奥地利人急需的。10月21日，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已经到达圣珀尔滕，此地距离维也纳仅60千米。但随后它左转了90多度，向北进军波希米亚，以追求王冠和选举票。11月20日，2万名萨克森援军的到来增强了联军的实力，6天之后，在强者奥古斯特的私生子，德·萨克斯元帅的率领下，这支部队经过奇袭拿下了布拉格。¹²⁵ 12月7日，查理·阿尔布雷希特被宣布为波希米亚国王，12天后，400名波希米亚贵族向他宣誓效忠。¹²⁶ 开战还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君主国的第二大城市，这对玛丽娅·特蕾莎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消息传来的时候她失声大哭。即使是举办了3天祈求上帝的仪式也无济于事。¹²⁷ 波希米亚众多最显耀的权贵们——其中包括布拉格大主教——通敌的消息，更是在她伤口上撒盐。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她的不幸的最低点。当时她已被加冕为匈牙利女王，该国的重要贵族承诺提供4万人的新军队。实际上最后只动员了这个人数的大约一半，但他们已足够扭转形势。¹²⁸

在小施耐伦多夫谈判之后，弗里德里希保持中立的时间并不久。他不想让法国人和他们的巴伐利亚、萨克森总督掌控局面。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文件，保证要做某些事情，但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在《反马基雅维利》中写道，做一个骗子和欺骗所有人不仅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信任一旦被破坏，是不可能恢复的。¹²⁹ 然而，在1741年的秋天，他在给波德维尔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诚实能获得好处，那我们就该诚实；但如果我们不得不欺骗，那就让我们做骗子吧。”不幸的是，装着这封信的包裹被奥地利人截获，并被奈佩格送到了维也纳，奥地利的宣传人员收到之后欣喜万分。¹³⁰ 弗里德里希于12月再次进军，先是攻取了特罗保，然后在年底之前攻占了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他辩解说，自己单方面违约是因为奥地利人破坏了条约最后一项“严守秘密”的条款。他不会觉得惊讶，维也纳是一个出了名的走漏风声的地方。条约签署后几个星期内，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每一个宫廷。¹³¹ 他的盟友们迫切需要他重返战争，因为他们的计划出现了严重失误。弗里德里希曾经正确地预测到，向北挺进波希米亚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

为这会将他们东边的侧翼暴露给奥地利人。就在弗里德里希入侵摩拉维亚的同时，奥地利人向西移动。陆军元帅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克芬许勒伯爵率领一支由最近从意大利抵达的军团组成的1.6万人的军队快速横穿奥地利，在上奥地利（西部）的首府林茨围困了法国将军塞居尔和1万名士兵。经过短暂的围攻，林茨于1月24日失守。那时，巴伐利亚军队已经在帕绍以南的谢尔丁被击败。奥地利人继续快速向西推进，于2月12日占领了慕尼黑。¹³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一天，这座城市缺席的统治者，查理·阿尔布雷希特选帝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次序地位上看，他现在位居欧洲君主之首，但实际上他没有国家、没有军队、没有资源，完全依赖于他的法国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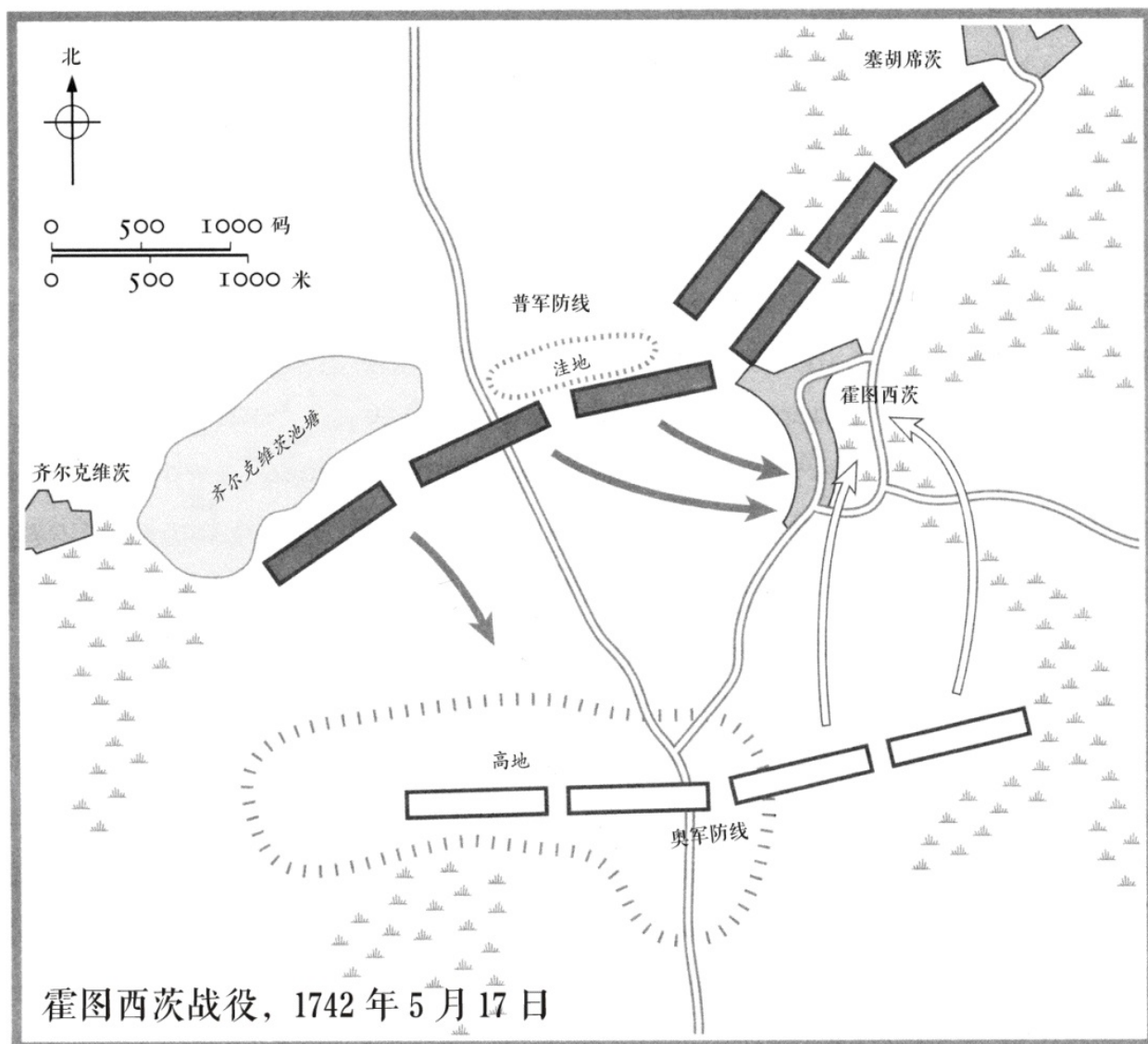
战争运气起伏不定，弗里德里希始终坚持他的主要目标——保住西里西亚，以及一个次要目标——确保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都不能占到他的便宜。1742年1月17日格拉茨城的陷落标志着他离第一个目标更近了一步，虽然有一支奥地利驻军顽强地在城堡里坚持到了4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人数从2000人减少到了200人。¹³³ 为了逼迫奥地利人承认他们的损失，弗里德里希在2月与萨克森军队联手，对摩拉维亚发动了全面入侵。这是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尝试与盟友联合行动，而他并不喜欢这次经历。他声称，萨克森承诺提供2.2万人的军队，却只提供了1.4万人，并且供应不足又缺乏配合。¹³⁴ 当他们到达布吕恩（现在的布尔诺）西北部的伊格劳（现在的伊赫拉瓦）时，萨克森人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拒绝继续前进。虽然普鲁士骠骑兵在3月1日距离维也纳只有几千米了，¹³⁵ 但此时这次联合作战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弗里德里希明白，摩拉维亚在任何最终的和平方案中注定要归属萨克森，于是在征兵和征用物资的时候特别无情地压榨当地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策略只会导致回报越来越少，同时也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玛丽娅·特蕾莎鼓励这种反抗，为他们提供了武器，并承诺会以减税来奖赏抵抗活动。3月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从奥地利的边境退回到布吕恩，一路上不断遭到匈牙利的非正规军和农民游击队的骚扰。不到一个月后，一支奥地利

军队的到来再次把他们驱逐到了北边，萨克森人回了家，普鲁士人则进入了波希米亚。¹³⁶这并不是弗里德里希最后一次在摩拉维亚折戟。

军事解决方案失败后，弗里德里希又转向了外交途径。但现在奥地利已经重新征服了那么多地方，维也纳的脾气不再随和了。弗里德里希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抱怨道：“在所有时代，奥地利宫廷的精神都遵从粗暴的自然反应。在走运时膨胀，在逆境中蜷缩，永远不会达到明智的中庸状态，而这才能让人在面对或好或坏的时运时不受伤害。”¹³⁷ 玛丽娅·特蕾莎又为奥地利这一根本性的缺陷增添了一种毒性，这是由她个人和她的性别决定的：“一个雄心勃勃、怀有恶意的敌人，又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倍加危险，她自以为是，难以安抚……为野心所吞噬。”¹³⁸ 事实上，她的意志如此坚定（比起厌恶女人的弗里德里希爱用的那些词语，“坚定”是一个不那么有倾向性的形容词），在5月份的时候与弗里德里希开战了。奥地利人削减了在波希米亚的军队，向摩拉维亚的洛林亲王查理派出了大量增援部队，并命令他们进军弗里德里希位于赫鲁迪姆的军营。由于缺乏可靠的情报，弗里德里希直到5月10日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次重大行动的目标。因为及时意识到了问题，他才来得及设法集中兵力，并于一周之后在霍图西茨村对抗逼近的奥地利军队。战斗大约在早晨8点钟开始，布登布罗克将军统率的普鲁士骑兵处于右翼，他们起初逼退了奥地利军队，之后又因为己方陷入了同样的混乱而被迫撤退，双方都没有占据上风。与此同时，主要作战行动转移到了战场的另一边，在那里，奥地利军队向着霍图西茨村推进，进入了普鲁士的军营，之后掠夺财物的诱惑使他们分心，然后他们被坚决的反击击退。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11点30分左右，此时弗里德里希将步兵的主力向前调到了战场中间的位置。他们突然转向左侧，包围了奥地利军队的右翼。由于后撤路线现在受到威胁，查理亲王下令撤退。¹³⁹ 当时正值正午。

与莫尔维茨战役不同，霍图西茨战役无疑是弗里德里希个人的胜利，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与上一次的捶胸顿足不同，他现在沉迷于拍

着胸脯说大话。在战斗当天，他给他的“导师”德绍老头儿写信说，他和他的军队已经取得了对奥地利人的“完全胜利”，在战场上杀敌3000，还进行了激烈的追击。他自己这边死伤只有2000人，另有几门大炮被夺走。整个步兵团和“各骑兵团”均表现出众。¹⁴⁰ 在3天后写给密友夏尔-艾蒂安·若尔丹的一封信里他更加膨胀：这场胜利格外让人高兴，因为他的军队“伤亡不大”。奥地利军队的溃败则非常可怕，他们的沮丧、悲伤和士气消沉是史无前例的。普鲁士伤亡总数仅有1000—1200人，而敌人的损失是这个数字的六七倍。¹⁴¹ 尽管弗里德里希声称他对战斗的描述“严格忠于事实”，但他一定知道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他损失了4800人。奥地利伤亡的6330人中大部分都是俘虏。在实际战斗中，普鲁士的伤亡人数比奥地利多了1000人。¹⁴²



奥地利军队秩序良好地撤了回去，准备改日再战。然而回到维也纳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可能在军事上消灭弗里德里希。如果要把法国人及其盟友逐出波希米亚，就必须与弗里德里希达成另外一份协议。¹⁴³新上任的英国国务大臣卡特里特勋爵渴望促成此事，其自我标榜的使命是营救玛丽娅·特蕾莎并由此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均衡。¹⁴⁴这意味着要结束她与弗里德里希之间的战争，以便让奥地利集中所有资源对付法国。这又牵涉牺牲西里西亚的问题。为了缓解奥地利目前所处的困境，英

国提供了必要的润滑剂——金钱。通过1741年缔结的条约，英国承诺3年内每年提供30万英镑的补贴。到了1742年春天，这笔钱成了奥地利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奥地利国库已经空了。英国特使詹姆斯·波特在霍图西茨战役那一天汇报说，第一笔款项“来得如此及时，使他们避免了解散全部军队的危机，这样一来，不仅施塔尔亨贝格伯爵、金斯基伯爵、希尔德布兰德男爵，所有的大臣们都老实地承认，这笔30万英镑的款项使得奥地利王室免于全面破产”。¹⁴⁵ 调停工作由汉德福德伯爵领衔，前一年秋天他在小施耐伦多夫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和约草案于6月11日在布雷斯劳签署。

弗里德里希非常高兴，去教堂参加了一场演唱《赞美颂》的宗教仪式，仪式由红衣大主教辛岑多夫伯爵主持。弗里德里希从来不肯错过每一个能够在公众面前好好表现自我的机会，他拒绝坐在高高的祭坛前设置的王座上。他说：“我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应该坐在普通的长凳上。”¹⁴⁶ 在一些细节问题处理好之后，7月28日，双方在柏林签订了一项明确的条约。细节问题之一就是弗里德里希在下西里西亚应该被授予何种头衔，奥地利人只愿意承认“有主权的公爵”这个称呼。弗里德里希以他一贯的简洁方式回答。“我不在乎该死的头衔，”他告诉波德维尔斯，“只要我得到那块土地就行。”¹⁴⁷

弗里德里希做到了。上下西里西亚，加上格拉茨要塞和格拉茨伯爵领地（严格意义上是波希米亚的一部分），现在都是他的了。但他并不是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得到这一切的。奥地利人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保留了耶格恩多夫公国的南部、泰申公国、奥帕瓦河以南的特罗保和克尔诺夫地区，以及尼斯公国的南部地区，所有这些地区合并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新省份——奥地利西里西亚省，不过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归属普鲁士了。¹⁴⁸ 弗里德里希能否安稳地控制住这块土地仍有待观察。虽然玛丽娅·特蕾莎已经接受了她的损失，但她很不甘心。目前她所有的精力都必须集中在入侵波希米亚的法国人身上，但她很可能有一天会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的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当然明白这一点，

他着手增加他的军队，充实国库，将西里西亚的要塞修筑得坚不可摧。
¹⁴⁹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

事实很快证明，这些预防措施是必要的。到1742年底，奥地利人已经将法国人驱逐出了波希米亚，并再度占领巴伐利亚，他们开始将后者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此外，在1743年，英国在已经提供的财政支持之外又增加了军事干预。6月27日，“国事诏书军”在乔治二世的亲自指挥下，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代廷根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虽然他们的战果没有继续扩大，但弗里德里希变得越来越惊慌。他也知道，萨克森在转换阵营。这次背叛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自己。他不仅在1742年春天联合远征摩拉维亚期间粗暴地对待他们，还在6月份单独和谈时让他们两手空空地离开。他嘲笑他们的军事和外交技巧，对所有愿意听的人说他们是懦夫、白痴和恶棍，这些消息促使奥古斯特三世以及他无所不能的首相布吕尔伯爵与玛丽娅·特蕾莎和解。1743年12月20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同盟条约，虽然它在严格意义上是一项防御性条约，却是直接针对弗里德里希的。¹⁵⁰ 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萨克森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为俄国要干涉西方战事只能取道波兰；萨克森选帝侯国是汉诺威和波希米亚之间的桥梁，并且只有在萨克森加入的时候，法国人、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才能联合起来。¹⁵¹ 在神圣罗马帝国这片臭名昭著的危险水域中航行，弗里德里希的掌舵之手坚定有余，灵巧不足。

在《布雷斯劳和约》签订之后的两年和平时光里，弗里德里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构建一个与奥地利—英国联盟对抗的德意志诸侯同盟。他失败了，部分原因是代廷根战役的结果使得这种做法太危险；部分原因是没有人相信他大肆鼓吹的要捍卫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人的自由的说辞；部分原因是玛丽娅·特蕾莎还能利用对哈布斯堡家族深厚的忠

诚，在天主教徒中尤其如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失误。特别是他公开支持皇帝查理七世将一些教会邦国世俗化，来增加他的领土基数，这在所有较小的帝国领主那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¹⁵² 1744年2月，弗里德里希得知前一年秋天，奥地利、英国和撒丁王国在沃尔姆斯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他认为，这项协议是针对他的，这种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¹⁵³ 他决定先发制人，这并非他最后一次这样做。6月5日，弗里德里希与法国签署了一份进攻性的盟约。他主要的战争目的是征服波希米亚并将其转交给巴伐利亚皇帝来增强他的实力，并且削弱奥地利。正如他在宣言中说的那样，他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皇帝的尊严和欧洲的和平”。¹⁵⁴ 但其中当然也包含他的一些其他目的，即波希米亚的一块与格拉茨毗邻的肥沃土地，包括柯尼希格雷茨和帕尔杜比采。¹⁵⁵ 除了践行“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一久经考验的准则之外，他与巴伐利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前景看起来不错。在过去的两年中，他的奥地利敌人一直在损兵折将，耗费金钱，而弗里德里希在这两方面都积攒颇丰。8月15日，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离开波茨坦开始远征时，他指挥着一支8万人的野战军，有468辆篷车为他们运送食物，还有600万塔勒的银币作军费。¹⁵⁶ 他的计划是攻取布拉格，然后继续南进，深入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心。由于奥地利军队大部分都在莱茵河流域与法国和巴伐利亚作战，进军维也纳的道路畅通无阻。第一步很容易。由于驻军、防御和指挥都很薄弱，布拉格于9月16日陷落。普鲁士的先头部队随后迅速向南推进，于9月23日攻下塔博尔，并于一周后再取布德韦斯。在这一节骨眼上，事情开始出现严重失误。正如弗里德里希自己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写到的那样：“在这次征战中，国王犯下的错误比所有将军都多。”¹⁵⁷ 第一项而且最为严重的错误是弗里德里希认为法国会配合将奥地利军队拖在西边不得脱身。结果法国人什么也没有做，从而让洛林的查理亲王将他的军队从莱茵河以通常被认为奥地利军队无法做到的速度调至波希米亚。他们在那里与鲍贾尼伯爵率领的1.8万人的军队合并在一起。更糟糕的是

，这支拥有大约5万人的强大军队在10月21日的时候又有2万名渴望报复昔日盟友的萨克森士兵加入。¹⁵⁸

随着冬季的临近和物资的减少，弗里德里希需要一场战斗。但奥地利军队并不配合。虽然好战的玛丽娅·特蕾莎敦促查理亲王正面击败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普鲁士人，但他的副手，狡猾老练的特劳恩伯爵说服了查理亲王让时间、距离和饥饿代他击垮普鲁士人。对于在计谋上不如对手的弗里德里希而言，最好的机会出现在10月25日的马尔绍维茨，该地位于布拉格以南大约40千米处，但他的敌人在那里占据了一个他认为坚不可摧的有利阵地。¹⁵⁹ 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吹响了撤退的号声。随着军队被疾病和逃跑摧毁，普鲁士军队在穿过波希米亚的途中数量前所未有地减少，他们最终于12月初到达西里西亚。奥地利人对敌人逃跑的规模感到惊讶：一个匈牙利军官写道，在11月26日和12月6日之间，至少有9000名士兵前来投降。¹⁶⁰ 到这一年年底，大约有多达3万人逃走，包括许多军官。11月26日弃守布拉格的1.7万名普鲁士士兵中，只有2000人保持着秩序回到了西里西亚。¹⁶¹ 在没有发生重大交战的情况下，这次出征却折损了普鲁士军队超过15%的力量。¹⁶² 路德维希·威廉·冯·明肖伯爵感慨道：“我们拥有的不再是一支军队了，我们有的只不过是一群由习惯和他们军官的权威聚在一起的人，甚至这些军官也十分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处于绝望的状态。只要有一点点挫折，或是决定在冬季继续战争，就会发生兵变。”¹⁶³ 在普鲁士军队中发生兵变，即使只是讨论发生兵变的可能性，显示出这次出征已经变得多么具有灾难性。弗里德里希留下德绍老头儿对付已经进入西里西亚的奥地利军队，其轻型部队的活动区域几乎已经可以延伸至布雷斯劳，自己则夹着尾巴回到了柏林。

法国大使瓦洛里在其回忆录中留下了对1744年弗里德里希指挥能力的尖刻评论，尽管也有“至少他知道如何从错误中学习”这样缓和语气的评论。¹⁶⁴ 虽然瓦洛里可能不会同意，但弗里德里希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再也不要开展需要依赖法国人的军事行动。第二条教训是：再也不

要低估奥地利人的军事技巧或是低估萨克森人制造麻烦的可能。第三条应该是：永远不要再尝试征服波希米亚。弗里德里希本人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写道：“必须承认，在波希米亚作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困难。”他接着解释说，这困难部分是由于地理因素——“这个王国的四周是连绵的山脉，使得入侵和撤退都有风险”；部分是由于贵族、神父和官员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部分是由于“既愚蠢又迷信”的天主教居民对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有着“无法消除的厌恶”。维也纳呼吁波希米亚农民“在普鲁士军队接近时离开自己的村庄，把庄稼藏到地下，逃进附近的森林里……因此，军队在行军过程中只能发现荒野和废弃的村庄”，这一切因素叠加在一起，结果是致命的。¹⁶⁵

瓦洛里还观察到，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弗里德里希已经完蛋了。他的主要敌人正在乐观地期待着下一次的交战（“这是奥地利人思考事情的方式”，瓦洛里简洁地补充道）。¹⁶⁶ 坏消息接踵而至。1745年1月8日，英国、奥地利、荷兰共和国和萨克森签署了一个四方盟约，其中包括为将萨克森的军队增加到3万人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¹⁶⁷ 1月20日，皇帝查理七世去世，他的儿子和继承人，18岁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要求与玛丽娅·特蕾莎谈判，双方于4月22日达成《菲森和约》。弗里德里希名义上的盟友法国的精力正集中在低地国家这个熟悉的战场上，虽然法国在美因河和兰河之间保留着一支军队，但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德意志的战争。越来越绝望的弗里德里希试图争取英国或俄国的调解，但失败了。¹⁶⁸ 如果他知道他的敌人正在考虑着瓜分普鲁士，他会更加焦急。¹⁶⁹ 只把西里西亚从他手里夺走已经不够了，他必须被削减为“一个无足轻重者”，他曾对欧洲国际体系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影响。英国外交官托马斯·维利尔斯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毁灭，并且他们[将]牺牲人类的自由去达成这个目标。”¹⁷⁰ 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出现严重的现款不足，不得不熔化了王宫里任何可以找到的银器，还强制人们给他贷款。他还尝试在阿姆斯特丹筹集贷款，但未能成功，还曾试图将位于东弗里西亚的埃姆登港出售给英国人，也未能成功。¹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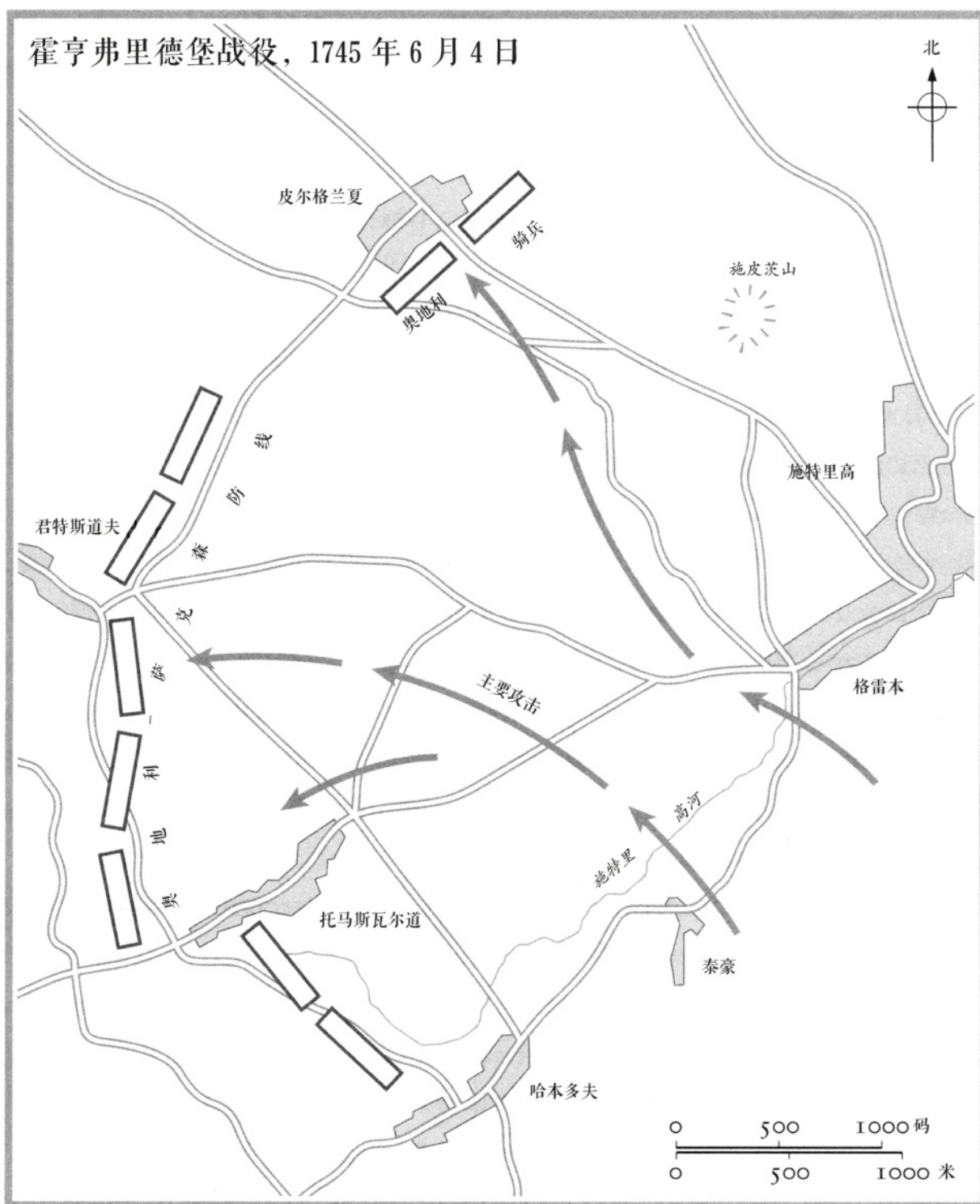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弗里德里希的军事生涯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他缺乏经验，过度自信，能力不足。他犯下的那些本可避免的错误已经造成成千上万的臣民丧命，挥霍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把国家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他值得肯定的一面是做决定的能力和坚持到底的钢铁意志。卡莱尔以他特有的华丽浮夸但又鞭辟入里的方式做过很好的总结：“才智如太阳般清醒，完全现实（不需要特别深刻），完全忠于事实；这些如果再加上速度和活力，以及快速击打的力量——这是很少能遇到的——会令一个人成为战争中非常危险的对手。”¹⁷² 1745年初春，正是这些个人品质拯救了他。3月15日，他离开柏林去了西里西亚，17日到达布雷斯劳，一周后到达尼斯。在那里，他开始整编遭受重创的部队，组织新的征兵活动，以特赦的方式把逃兵吸引回来，并下令补充人员和物资。最重要的是，他不断出现在位于卡门茨和弗兰肯施泰因的西里西亚主要军营，由此重组了军队，并恢复了士气。¹⁷³ 统一指挥的所有优势显而易见。弗里德里希向他们展示了独特的个人魅力，这种魅力带有强烈的孤注一掷的虚无主义色彩。4月27日，他从位于珀姆斯多夫的指挥部写了一封透露了真情的长信给波德维尔斯：

在我家族的扩张事务上面，我的贡献要超越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当作关乎我个人荣誉的事情；迄今为止，我已经在欧洲君主中间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这都成为我个人的义务，我决心坚持下去，即使是以我的幸福和生命为代价.....我已经渡过了卢比孔河，现在我要么保持我的权力地位，要么看到包括普鲁士之名在内的一切都毁灭，并随着我一起被埋葬.....如果敌人迎面而来，为了拯救祖国，还有我家族的荣耀，可以肯定的是，要么我们完全将敌人击败，要么我们全部被消灭。¹⁷⁴

在接下来的6周里，他把这些勇敢的话语变成了行动，尽管不得不

承认，奥地利人帮了他很大的忙。奥地利军队充满自信，在来自维也纳的命令的指挥下，他们计划让弗里德里希在西里西亚重演前一年在波希米亚的悲剧。他们打算佯攻上西里西亚，以促使弗里德里希分散兵力，而他们的主力部队则越过巨人山脉的关口，向北朝着布雷斯劳进发。5月29日，他们到达了兰德斯胡特，萨克森的大军在那里与他们会合。

¹⁷⁵ 这正中弗里德里希下怀。在1744年的波希米亚大败之后，他计划要把敌人引诱到西里西亚平原上，然后与之一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故意不在山口设防，并通过奥地利军营中的一个双面间谍散布消息说，他打算撤退到布雷斯劳背水一战。正如卡莱尔所说，他已经“打开了捕鼠器，并且近来一直用一块美味的烤奶酪做诱饵”。¹⁷⁶ 依靠着四处漫游的骠骑兵的出色情报，他没有被南面的佯攻转移注意力，而是将兵力集中在施韦德尼茨。这一次，轮到奥地利军队在黑暗中摸索了，他们认为自己面对的只是4万个士气低落的普鲁士士兵，会在第一时间向北撤退。然而实际上，那里有5.8万名士兵，由一位渴望行动的指挥官统率着。¹⁷⁷



1745年6月3日晚上，弗里德里希告诉他的朋友查索特：“现在我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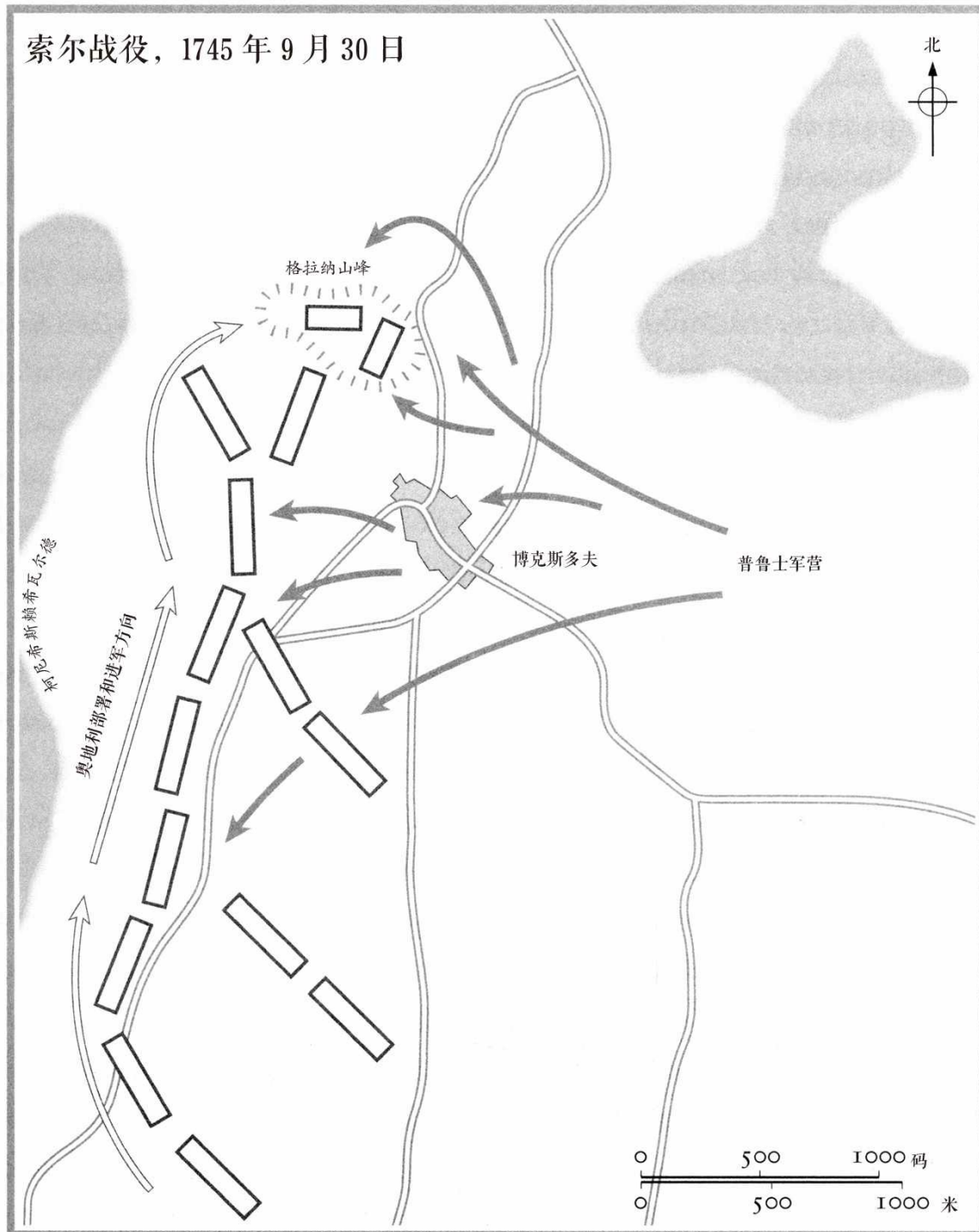
于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刚刚看见敌人的军队离开小山，在平原上散开了。明天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¹⁷⁸他把支开的帐篷留在原地，让篝火继续燃烧着，派他的军队在夜间冒险行军，他要打萨克森和奥地利军队一个措手不及。许多可能出问题的地方的确出了问题，但凌晨4点过后没多久，第一支普鲁士骑兵分队就已经在攻击联军左翼的萨克森人了。一系列激烈而残酷的战斗随之展开。到上午7点左右，战斗以幸存的萨克森人的失败和逃跑结束。同时，位于中路的主要战斗才刚刚开始。这是普鲁士骑兵第一次显示出他们现在的优势，他们击垮了位于托马斯瓦尔道和哈本多夫之间的奥地利军队右翼，身材矮小但令人生畏的汉斯·约阿希姆·冯·齐滕率领的骠骑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骑兵发动了致命一击，早上8点15分左右，拜罗伊特精锐龙骑兵的两个中队在中路发动冲锋，迫使奥地利步兵溃逃。在短短的20分钟里，他们就缴获5门大炮、67面旗帜，抓获2500名俘虏。¹⁷⁹上午9点，战斗就结束了。弗里德里希有充足的时间安营扎寨并将胜利的消息传播到欧洲各处。首先被告知这一喜讯的是路易十五，他最近才给弗里德里希送去法国于5月11日在奥属尼德兰图尔奈附近的丰特努瓦大捷的消息。写一封信给他以前军事上的导师德绍老头儿，肯定也是一件特别的乐事。弗里德里希骄傲地告诉他，自己付出了1200人伤亡的代价，而奥地利军队则有3000人死亡，5000人被俘，其中包括4名将军。两天后，他又写道，这一胜利“是所有时代中最彻底的胜利之一，自布伦海姆战役之后还未曾见过这样的全胜”。他还更新了奥地利将军们的死伤数据——4人死亡、4人被俘，还有6人受了致命伤。

在同样写于战场给波德维尔斯的信中，弗里德里希还写道：“你知道你可以利用这条消息、该用在哪儿。”¹⁸⁰不幸的是，这一失败给普鲁士的主要敌人留下的印象并没有应有的那样深刻。玛丽娅·特蕾莎当然感到失望，但是，如果这次失败还有什么其他影响的话，那就是她更加坚定了要把战争推到极限的决心，她要拼个你死我活。她命令增援部队即刻从意大利开往波希米亚，然后亲自写信给盟友，向他们保证，情况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糕，并恳求他们不要抛弃共同的事业。¹⁸¹ 然而，焦虑的乔治二世急于和弗里德里希达成协议。8月26日，双方在相互保证对方领土的基础上达成了《汉诺威协定》。乔治承诺将努力说服奥地利和萨克森解决分歧，而弗里德里希同意在即将举行的皇帝选举中不投票反对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¹⁸² 双方都没有告知其主要盟友这次单独和谈的事情，这一疏忽将会在维也纳和凡尔赛造成很大麻烦。

接下来的3个月，弗里德里希在波希米亚北部度过，在这里既可以依靠敌人地盘的供给，又保证了等他决定离开时，不会有什么留给他们。9月底的时候，他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在波希米亚的逗留也戛然而止。奥地利军队的指挥官，洛林的查理亲王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进取心，他突袭了弗里德里希位于施陶丹茨的军营，并且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3.9万对2.2万）。结束于9月30日的索尔会战本来很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普鲁士军队之所以得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弗里德里希意识到危险时决策和进攻的速度，但主要是因为士兵铁的纪律和勇气。虽然这是习惯性的训练有素，但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¹⁸³ 弗里德里希用了各种词汇来描绘这场战斗，比如“可怕但非常光荣”“非常激烈”“我打的4场仗中最激烈的”，以及“比霍亨弗里德堡战役还要血腥”。¹⁸⁴ 即使在战斗刚刚结束不久这种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刻，他也赞扬了对手：“他们的计划构思得非常精巧，执行得也很好，只是普鲁士士兵们的勇猛和他们对胜利从心底里的渴望令他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¹⁸⁵ 在856名普鲁士阵亡者中，有他妻子的弟弟，不伦瑞克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但他甚至没有给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写一封慰问信，这一疏忽如此绝情，甚至让克里斯蒂娜这样的人也被刺激得发了火。¹⁸⁶

索尔战役，1745 年 9 月 30 日



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弗里德里希仍处在危险中。补给已经耗尽，他不得不在10月初带着他的军队回到西里西亚，为下一轮交锋做准备，因为他知道，即使是现在，奥地利人还没有打算谈判，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于9月13日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之后就更是如此。尽管是在事后很久才写的，他还是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的相关段落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皇后〔玛丽娅·特蕾莎〕的坚韧有时候退化成了固执。作为一个女人，她陶醉于为她的后代恢复帝国的尊严。她的全部注意力都被美好的未来前景占据着，要她平等地与一个她认为是在谋反的诸侯谈判，她觉得这有损她的伟大身份。”¹⁸⁷ 由于萨克森大臣布吕尔伯爵的轻率失言，弗里德里希获悉，下一次攻击将来自萨克森，直指柏林。在瓦洛里看来，接下来的事情，是弗里德里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¹⁸⁸ 他一得知奥地利军队从波希米亚穿过了萨克森的边境，就派齐滕率领一支骠骑兵和重装骑兵前去阻止他们与正等待他们到来的萨克森盟友会合。11月23日，在信奉天主教的黑内尔斯多夫对萨克森人的胜利，使得查理亲王和他的军队撤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接下来需要对付的是北部的萨克森军队，他们得到了从莱茵河流域赶来的奥地利军队的增援。12月15日，德绍老头儿指挥一支部队在凯瑟尔斯多夫取得了一次艰难但决定性的胜利。3天后，他和弗里德里希一起骑马到达德累斯顿。¹⁸⁹ 这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德绍老头儿的最后一战（他在1747年去世）。玛丽娅·特蕾莎终于接受了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争端的事实。1745年圣诞节，《德累斯顿和约》为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画上了句号。西里西亚和格拉茨仍然归属普鲁士。奥地利人的全部收获就是弗里德里希承认弗朗茨一世当选皇帝。他们的萨克森盟友收复了所有的领土，但不得不付给弗里德里希100万塔勒的赔款。¹⁹⁰ 对于弗里德里希而言，和平来得并不算太快，因为根据他自己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的记载，过去16个月的征战已经花掉了800万塔勒，他的金库里现在只剩下1.5万塔勒了。¹⁹¹ 尽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又继续了3年，直到1748年10月的《亚琛和约》才结束，但弗里德里希参与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弗里德里希可以凯

旋了，他立即动身，于12月28日回到首都。弗里德里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横幅、拥挤的人群、代表团、游行、彩灯以及彰显胜利的全套复杂的华丽服饰。他首次在公开场合被欢呼为“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这成为一个永久的称号。事实上，柏林街头以各种媒介出现的口号中，最受欢迎的是“弗里德里希大王万岁！”。¹⁹² 一个小学合唱队唱道：“万岁，万岁，弗里德里希国王，胜利者，高贵、伟大、幸运的祖国之父！”多罗廷区的市民搭建了一个凯旋门献给“伟人中的伟人、无敌的弗里德里希”。¹⁹³ 为了确保这个称号能流传到欧洲其他国家，一份官方报道和两卷纪念册出版了。¹⁹⁴ 1983年，特奥多尔·席德尔在他那本卓越且有影响的传记中总结说，弗里德里希插手了他被称为“大王”的说法，“即使不说应该完全否定，至少也是非常不可能的”。¹⁹⁵ 最近，于尔根·卢令人信服地证明说，弗里德里希很清楚他在做什么，获得这一梦寐以求的称号是长期精心操纵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伏尔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向欧洲宣称，他的这位国王朋友兼笔友应该被冠以“大王”的称号，他在1742年7月《柏林条约》签订之后写给弗里德里希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这一称呼。¹⁹⁶ 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12月28日柏林的庆祝活动是由官方精心安排的，虽然还不是太清楚弗里德里希是否亲自参与其中。¹⁹⁷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必定非常清楚公众认可的重要性，并十分注意培养它。他暂时可以静下来品味他的胜利，他的人民为他冠以“大王”的称号，这个称号只有他和曾祖父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得到过。

注释

¹ P.C., vol. 1, p. 147.

² *Journal secret du Baron Christophe Louis de Seckendorff* (Tübingen, 1811), p. 157.

³ *Œuvres*, vol. 25, p. 518.

⁴ 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194.

⁵ P.C., vol. 1, p. 4.

6 Hintze, p. 322.

7 Peter H. Wilson, "P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Holy Roman Empire, 1740–1786,"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1, 2 (2008), p. 353.

8 P.C., vol. 1, pp. 9–10.

9 Ibid., p. 7.

10 Ibid., p. 45.

11 Ibid., pp. 44–5, 57.

12 Koser, vol. 1, p. 36.

13 Hintze, p. 323.

14 Charles W.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2nd edn (Cambridge, 2000), p. 129.

15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66.

16 Joachim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Oxford, 2012), vol.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p. 160; Wolfgang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Stuttgart, 1996, 2003), vol. 2, p. 9.

17 *Œuvres*, vol. 2, p. 54;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London, 1789), vol. 1, p. 83.

18 P.C., vol. 1, p. 50.

19 Gustav Schmoller, "Histor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Staatenbildung und Finanzentwicklung," *Schmollers Jahrbuch*, 33 (1909), p. 23;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p. 150.

20 Koser, vol. 1, p. 70.

21 Ibid., p. 69.

22 Quoted in Brendan Simms, *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13), p. 94.

23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1, pp. 62–70.

24 Hanns Leo Mikoletzky, *Oesterreich – Das grosse Jahrhundert. Von Leopold I. bis Leopold II.* (Vienna, 1967), p. 182.

25 P.C., vol. 1, p. 87.

26 即使是以18世纪文献学错综复杂的标准来衡量,《反马基雅维利》的出版历史也是复杂的。详尽记述可参见Charles Fleischauer (ed.), *L'Anti-Machiavel par Frédéric II, édition critiqu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5 (Geneva, 1958), *passim*。在弗里德里希在世期间,至少有50个版本出版,其中有34个法文版本,15个德文版本,4个英文版本,还有意大利文、荷兰文、拉丁文、俄文和瑞典文版本各1个,参见Gerhard Knoll, "Probleme eines Verzeichnisses der bis ca. 1800 erschienenen Drucke von Friedrichs II.," in Martin Fontius (ed.), *Friedrich II. und die europäische Aufklärun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new series (Berlin, 1999), vol. 4, p. 91。

27 弗里德里希1739年10月29日写给阿尔加罗蒂的信, *Œuvres*, vol. 18, p. 6.

28 Fleischauer (ed.), *L'Anti-Machiavel par Frédéric II*, pp. 352–3. 我所使用的译本是Frederick the Great, *The Refutation of Machiavelli's The Prince or Anti-Machiavel*, ed. Paul Sonnino (Athens, Ohio, 1981), here at p. 162。

29 Ibid., pp. 159–60.

30 Ibid., p. 163.

31 Arnold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eines Staatsmannes* (Tübingen, 1934), p. 123. 这并没有阻止后来的历史学家为弗里德里希提供追溯性质的辩解:例如,可参见Leopold von Ranke, *Friedrich der Grosse* (Leipzig, 1878), pp. 9–10。

32 Fleischauer (ed.), *L'Anti-Machiavel*, p. 50.

33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67), vol. 1: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p. 286.

34 Fried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É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7), pp. 283, 307.

35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104.

36 原始的法文译本和德文译本的全文转载,参见Otto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Ausgewä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eiherr vom Stein-Gedächtnisausgabe (Darmstadt, 1982), vol. 22, pp. 29–32。

37 Ibid.

38 Friedrich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Potsdam, 1835), vol. 3, p. 28.

- 39 Derek McKay, *Prince Eugene* (London, 1977), pp. 238–9.
- 40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p. 230.
- 41 McKay, *Prince Eugene*, p. 239.
- 42 弗里德里希1737年3月16日写给格伦布科的信, *Briefwechsel des Kronprinzen Friedrichs mit Friedrich Wilhelm von Grumbkow*, Publicationen aus den k. preussischen Staatsarchiven (Leipzig, 1898), vol. 72, p. 150.
- 43 弗里德里希1737年3月24日写给格伦布科的信, *ibid.*, p. 154.
- 44 弗里德里希1737年1月28日写给格伦布科的信, *ibid.*, p. 147.
- 45 可参见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vol. 3, 例如: pp. 95, 98, 113.
- 46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p. 288, n. 20.
- 47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156.
- 48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168.
- 49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History of My Own Times*, p. 90.
- 50 Quoted in Tim Blanning, *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p. 543.
- 51 Michel Antoine, *Louis XV* (Paris, 1989), p. 242.
- 52 Quoted in Colin Jones, *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V to Napoleon* (London, 2002), p. 52.
- 53 Pierre Goubert, “La force du nombre,” in Fernand Braudel and Ernest Labrousse (ed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aris, 1970), vol. 2: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pp. 19–21.
- 54 Blanning, *The Pursuit of Glory*, pp. 207–17; 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2), pp. 384–92.
- 55 M. S. Anderson,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1), p. 173.
- 56 M. S. Anderson, *Peter the Great* (London, 1978), pp. 78–9.
- 57 Lucien Bély,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n Europe (XV^e–XVIII^e siècles)*, 3rd edn (Paris, 2001), pp. 481–2.

58 Brendan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 (London, 2007), pp. 92–4, 244–6.其中有一幅极佳的地图在p. xxv。

59 Norman Davies, *Vanished Kingdoms: The History of Half-forgotten Europe* (London, 2011), pp. 351–2.

60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 50.

61 Jochen Vötsch, *Kursachsen, das Reich und der mitteldeutsche Raum zu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2003), p. 399.

62 *Œuvres*, vol. 2, p. 58.

63 Karl Czok, *Am Hofe Augusts des Starken* (Leipzig, 1989), p. 94.

64 Peter H. Wilson, *German Armies: War and German Politics 1648–1806* (London, 1998), pp. 104, 252.

65 Johannes Ziekursch, *Sachsen und Preussen um die Mitt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Erbfolgekriegs* (Breslau, 1904), pp. 13–14.

66 *Ibid.*, pp. 35–6.

67 Georg Schmidt, *Wandel durch Vernunft.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 2009), p. 145.

68 *Ibid.*, p. 146.

69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Stuttgart, 1997), vol. 2: *Kaisertradition und österreichische Grossmachtpolitik (1684–1745)*, p. 413.

70 Antoine, *Louis XV*, p. 301.

71 G. P. Gooch,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47), p. 14.

72 Antoine, *Louis XV*, p. 303.

73 正如Brendan Simms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所知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战争”——*Europe*, p. 97。

74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pp. 278–9.

75 *Ibid.*

76 Paul 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1613–1801* (London, 1982), p. 108.

77 Koser, vol. 1, p. 92.

78 P.C., vol. 1, p. 127, no. 189, 弗里德里希1740年12月6日从柏林写给圣彼得堡的玛德菲尔德的信。

79 *Œuvres*, vol. 2, p. 62.

80 P.C., vol. 1, p. 84, no. 125, 弗里德里希1740年11月1日从莱茵斯贝格写给柏林波德维尔斯的信。

81 Ibid., p. 74, no. 119, “Dressé et concerté avec son Excellence le Feld-Maréchal Général Comte de Schwerin, à Rheinsberg le 29 d’Octobre 1740, par ordre du roi.”

82 Ibid., p. 90, no. 140, “Idées sur les projets politiques à former au sujet de la mort de l’empereur.”

83 Koser, vol. 1, p. 44.

84 P.C., vol. 1, pp. 92–3, no. 141, 弗里德里希的旁注，标注为1740年11月7日于莱茵斯贝格。

85 对此事可读到的最好叙述见Koser, vol. 1, pp. 54–9, 最好的地图集是Holger Tümmeler (ed.), *Heimatatlas für die Provinz Schlesien* (Wolfenbüttel, 2007), 此为1922年最初版本的再版。

86 M. S. Ander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1748* (London, 1995), p. 68.

87 *Œuvres*, vol. 18, p. 31.

88 P.C., vol. 1, p. 167.

89 Ibid., p. 173.

90 Koser, vol. 1, p. 54.

91 Ibid., p. 117.

92 *Œuvres*, vol. 22, p. 65.

93 Ibid., vol. 17, p. 97.

94 Ibid., vol. 2, pp. 57, 61.

95 最近的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强调了弗里德里希对荣耀的追求，参见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assim*。

96 Reinhold Koser, “Aus der Korrespondenz der franzö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Berlin 1746–1756,”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7 (1894), p. 88.

97 Dennis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96), p. 45.

98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1976), p. 140.

99 Gottlob Naumann (ed.), *Sammlung ungedruckter Nachrichten, so die 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r Preussen von 1740 bis 1779 erläutern* (Dresden, 1782), vol. 1, p. 38. 这一作品集的编辑声称，他对这一记录的文字并未做丝毫增减。

100 Jay Luvaas, “Student as Teacher: Clausewitz 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Napoleo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9, 2–3 (1986), pp. 150–51.

101 Koser, vol. 1, p. 11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1, p. 167. 此处的说法是撤退直到7点钟才开始。

102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50.

103 P.C., vol. 1, p. 221.

104 Luh, *Der Grosse*, p. 58.

105 Eva Zieburg, *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ssen* (Berlin, 2006), p. 54.

106 Camille Rousset, *Le comte de Gisors 1732–1758* (Paris, 1868), p. 106. 吉索尔正是贝尔岛元帅的儿子，他于1758年死于克雷菲尔德会战。

107 *The History of My Own Times, Œuvres*, vol. 2, pp. 85–6. 关于其出版史，参见“*Avertissement de l’éditeur*,” p. 1。

108 Carl von Clausewitz, “Die Feldzüg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2nd edn (Berlin, 1862), vol. 10, p. 28.

109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35.

110 Christopher Duffy, *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85), p. 113.

111 *Œuvres*, vol. 2, p. 85.

112 Carlyle, vol. 3, p. 331.

113 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London, 2006), p. 8.

- 114 Hintze, p. 328.
- 115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vol. 2, p. 423.
- 116 *Œuvres*, vol. 2, p. 105.
- 117 Koser, vol. 1, p. 129.
- 118 P.C., vol. 1, p. 258.
- 119 Quoted in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ton Abbot, 1974), p. 161.
- 120 Koser, vol. 1, p. 139.
- 121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161.
- 122 Ziekursch, *Sachsen und Preussen*, p. 83.
- 123 Christopher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London, 1985), p. 36.
- 124 英国大臣汉德福德勋爵做的会议记录，关于1741年10月9日在小施耐伦道夫达成的协定，P.C., vol. 1, p. 371。
- 125 Ander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p. 87.
- 126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1, pp. 344–5.
- 127 Ibid., pp. 345–6.
- 128 Ander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p. 86.
- 129 *Œuvres*, vol. 8, p. 281.
- 130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1, p. 415, n. 58. 这事好得几乎不像是真实发生的，人们肯定会怀疑这是否是奥地利人编造出来的。在《政治通信集》中并没有找到这封信。然而，如果这是伪造的，那么von Arneth应该是同谋，这看起来又是不太可能的。
- 131 Carlyle, vol. 3, p. 490.
- 132 关于作战经过最好的描述参见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2, ch. 1。
- 133 Carlyle, vol. 3, p. 519.
- 134 P.C., vol. 2, pp. 108–9.
- 135 Ibid., p. 63.

- 136 Olaf Groehler, *Die Kriege Friedrichs II.* (Berlin, 1966), pp. 38–9.
- 137 *Œuvres*, vol. 2, p. 130.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1, pt 1, p. 196.
- 138 *Œuvres*, vol. 4, p. 8.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2, p. 12.
- 139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40–45; Koser, vol. 1, pp. 168–71;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2, pp. 51–4.
- 140 P.C., vol. 2, p. 165.
- 141 *Œuvres*, vol. 17, p. 231.
- 142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44.
- 143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2, p. 55.
- 144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pp. 308–10.
- 145 P. G. M.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Oxford, 1987), vol. 2, p. 161.
- 146 Koser, vol. 1, p. 175.
- 147 P.C., vol. 2, p. 224.
- 148 谈判详情参见*ibid.*, pp. 225–7。
- 149 Hintze, p. 333.
- 150 René Hanke, *Brühl und das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Die antipreuussische Aussenpolitik des Dresdener Hofes 1744–1756* (Berlin, 2006), p. 53. 关于萨克森人抱有的“极度敌意”，参见Henri Zosime, comte de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a Cour de Berlin. Accompagnés d’un recueil de lettres de Frédéric-le-Grand, des princes ses frères, de Voltaire, et des plus illustres personnage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20), vol. 1, p. 149。
- 151 Ziekursch, *Sachsen und Preussen*, p. 82.
- 152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p. 376–8.
- 153 Koser, vol. 1, p. 214.
- 154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207.
- 155 Koser, vol. 1, p. 220.

156 Ibid., p. 228.

157 *Œuvres*, vol. 3, p. 85.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1, pt 2, p. 128.

158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2, pp. 419–21, 434.

159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53–4.

160 Johann Gustav Droysen,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 vols. 1–4 – *Friedrich d er Grosse* (Leipzig, 1874–86), vol. 2, p. 366.

161 Groehler, *Die Kriege Friedrichs II.*, p. 26.

162 Ilya Berkovich, *Motivation in the Armies of Old Regime Europe* (unpublished Cambridge Ph.D. dissertation, 2012), p. 59. 我非常感激Berkovich博士，他允许我阅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并给了我很多有用的书目方面的建议。

163 Droysen,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 vol. 2, p. 369.

164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vol. 1, p. 204.

165 *Œuvres*, vol. 3, pp. 67, 84.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1, pt 2, pp. 102, 128.

166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vol. 1, p. 201.

167 Groehler, *Die Kriege Friedrichs II.*, p. 55.

168 Ander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pp. 142–3.

169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p. 337.

170 Quoted in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58.

171 Groehler, *Die Kriege Friedrichs II.*, p. 57; Koser, vol. 1, p. 249.

172 Carlyle, vol. 4, p. 128.

173 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 (Munich, 2004), p. 210.

174 P.C., vol. 4, p. 134. 德文译本参见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124–5。

175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3, p. 72。

176 Carlyle, vol. 4, p. 131.

177 Koser, vol. 1, p. 257.

178 Quoted in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60.

179 Ibid., p. 64. 其中包括会战的最佳记录，引用了许多同时代人的描述。

180 P.C., vol. 4, pp. 181–3.

181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3, pp. 78–80.

182 Andrew C. Thompson, *George II: King and Elector*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 p. 164.

183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69–72.

184 P.C., vol. 4, pp. 290–94.

185 Ibid., p. 296.

186 Alfred P. Hagemann, “Im Schatten des grossen Königs: Königin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Friedrich II.,” *Friedrich 300 –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esse/hagemann_schatten. Last accessed 2 August 2012.

187 *Œuvres*, vol. 3, p. 143.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1, pt 2, p. 214.

188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vol. 1, p. 260.

189 Koser, vol. 1, pp. 285–8.

190 Ander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p. 148.

191 *Œuvres*, vol. 3, p. 198.

192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478.

193 Martin Engel, *Das Forum Fridericianum und die monumentalen Residenzplätze des 18. Jahrhunderts* (unpublished Free University Berlin dissertation, 2001), p. 11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diss.fu-berlin.de/diss/receive/FUDISS_thesis_000000001297. Engel 还说，实际上这个凯旋门是弗里德里希自己花钱建起来的，碑文是约翰·戈特利布·施米特撰写的，他可以被看作一个宫廷宣传家。

194 Thomas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Inszenierungen des Preussenkönigs in Fest und Zeremoniell 1740–1815*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2012), p. 74.

195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478.

196 Luh, *Der Grosse*, p. 40. 所说的这封信参见 *Œuvres*, vol. 22, p. 114。

197 Luh, *Der Grosse*, p. 60.相反的观点参见Johannes Kunisch的论述, 他认为, 正是弗里德里希的臣民为他发明了“大王”这一称号, 而他本人对此表示“非常怀疑”——Uwe Klussmann and Norbert F. Pötzl, “Es gibt das Bedürfnis, ein Heldenbild zu pflegen: Spiegel Gespräch mit Johannes Kunisch,” *Der Spiegel Geschichte*, 2 (20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geschichte/d-77506743.html>.

-
- ① 渡过卢比孔河比喻冒险做出破釜沉舟的决定。公元前49年, 恺撒不顾元老院要求其解散军队的命令, 率军渡过卢比孔河。此举被视为叛国, 引发了同庞培的战争。
 - ② 易洛魁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 ③ 穆斯塔法、塞利姆和苏莱曼均为土耳其君主的名字。
 - ④ 此处指《圣经》中一个故事: 一个主人让三个仆人管理家产, 按其才干分别给了他们价值5000、2000和1000银子。前两个仆人都拿钱做了生意, 使财富翻倍, 得到了主人的称赞; 第三个仆人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 遭到主人咒骂, 他的钱被主人拿去给了第一个仆人。
 - ⑤ 这一段文字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尤利乌斯·恺撒》中的第四幕第三场: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 一定可以功成名就; 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 一事无成。我们现在正在满潮的海上漂浮, 倘不能顺水行舟, 我们的事业就会一败涂地。”
 - ⑥ 根据1738年结束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维也纳条约》, 洛林由弗朗茨·斯蒂芬让与路易十五的岳父、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劳斯, 待后者死后合并入法国。——作者注

第5章

国家的专横仆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侵犯行为局限于自己的臣民，他的长子成了主要的受害者。在这方面（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话），1740年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弗里德里希二世已经表明，他自己的权力欲望是转向外面的。普鲁士从一条紧跟在大国后面的安静小船，变身为欧洲国际体系中最大胆的驱逐舰。那么在国内政治方面是否会有同样彻底的变化？在理论层面上，看起来肯定是这样的。按照“政治遗嘱”透露的信息，这对父子在如何看待国家的基础这一问题上少有共同之处。接下来，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政治责任之性质上的观点清楚地显示了他政治思想的基本性质：“只要上帝让我活着，我就会像专制君主一样维护我的统治”“我的臣民必须听命于我，否则我就会下狠心，我会视他们为叛贼，像沙皇那样把他们挂起来用火烤”，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这样一句话——“毕竟，我们是主人和国王，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¹然而，他也承认3个重要的约束性条件。首先，他对霍亨索伦家族有一种强烈的依恋。当他在1713年继位后，最初的举措之一就是颁布了一部王朝法律，把家庭的每一件财产都作为限嗣继承的不动产，连珠宝首饰都包括在内。换句话说，他试图用一个英国地主的方式，通过把霍亨索伦家族的每一件财产都变成不可转让之物，防范继承人的挥霍无度。²现任

家族首领只享有终身权益^①。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展现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世袭的态度了。当他说起“国家”时，他指的是他自己的领地，当他谈及“国家大事”时，他指的是外交政策。³ 其次，尽管他跟查理六世有分歧，他还是对皇室本身和神圣罗马帝国抱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尊敬，他命令自己的继承人永远不要加入与之直接为敌的联盟。他还补充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巴伐利亚和科隆背信弃义地与法国交易后的可怕命运提供了足够的警告。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为一个信念所控制，那就是他处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惩罚严厉的上帝的不断监视之下：

永远不要发动不义战争，并且永远不要成为一个侵略者，因为上帝反对不义的战争，你终要面对他，而他的裁决是严厉的，只要想想那些发动不义战争之人如路易十四、波兰的奥古斯特二世国王、巴伐利亚选帝侯等人的下场就能知道，后面两人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奥古斯特二世还被上帝之手惩罚。⁵

在这些约束之中，第二和第三条对于他的继承人来说当然毫无意义，但是家族的自尊心对弗里德里希是否有意义就不太清楚了。在1744年2月写给他弟弟兼法定继承人奥古斯特·威廉的一封信中，他强调说，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促进“国家未来的福祉和勃兰登堡王室的荣耀”。⁶ 虽然他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但他总是坚持认为，更大的整体必须优先考虑。3份互不相干的见证记录一致承认，1740年6月2日，他作为国王首次接见大臣时告诉他们，他与自己父亲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明确区分相反：“我把国家的利益就当作我个人的利益：我不能拥有不同于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如果两者互不相容，那就永远要优先选择国家的福祉和利益。”⁷ 这种自我服从国家的主张成为弗里德里希政治话语中最著名的主旨思想。这些思想诸多的文献来源已经确定，包括斯多葛

主义者，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位皇帝的半身塑像被弗里德里希放在无忧宫自己的卧室中，还有一尊放在他在夏洛滕堡宫的图书馆里）；⁸ 弗朗索瓦·费奈隆的《忒勒玛科斯历险记》（1699年），他第一次阅读该书时只有9岁；⁹ 还有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他自两人开始通信时便对伏尔泰大唱颂歌。¹⁰

早期的理论果实已经体现在《反马基雅维利》之中。按照弗里德里希的说法，一个君主的所有个人情感应该服从于爱国之情和国家的振兴。¹¹ 这一主题思想的各种变化形式在他此后的统治期间反复出现。由于记载他这些观点的媒介包括不准备出版的文件（私人信件和“政治遗嘱”），它们的真诚性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文件也标志着与过去的明确决裂。他父亲的思想是因循守旧（参照过去的做法）、排他主义的（立足于此时此地）和虔敬主义的，弗里德里希的思想则是理性的、普遍的和世俗的。为了给自己的权威赋予合法性，他假设存在一个社会契约，根据这个契约，自然状态下的不幸居民授予君主足够的权力，以维持外部安全和内部秩序。到18世纪中叶，这样的概念已经很难说是原创的，但这样的概念由神圣罗马帝国中一个迄今为止作用尚小又落后的公国的统治者来倡导鼓吹，则无疑颇为新鲜。弗里德里希最为清晰的阐述见于他1777年的文章《论政府的形式与君主的职责》中讨论宗教宽容的部分，他在文中指出，国家的起源是所有社会成员通过协议指定一名成员作为他们的君主。弗里德里希认为，他们显然并没有因为希望接受奴役而放弃他们天生的自由。他们所寻求的只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明智的立法以及防御外来敌人。这应该是君主权力的限度。他们在前政治国家的自然状态下享受的其他所有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信仰自由，也就是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崇拜任何神明，或是完全不崇拜任何神明的权利。无论如何，强制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可以被强迫着鹦鹉学舌般附和一种教条，但如果没有“内心的赞同”，这种行为就毫无价值。然而，他补充道：“一旦协议达成，就不能更改。”¹²

当然，这是一种对社会契约的威权主义解释。统治权的授予是不可

撤销且无条件的，臣民没有抵抗的权利。另一方面，统治者有义务为全体的利益服务。弗里德里希在上述引文之后的一段文字中直言：

在此，我们从总体上了解了一个君主应该履行的职责。为使他决不能忽略这些职责，他应该经常记得，他只是一个跟他臣民中最微不足道者一样的人。即使他是共同体的第一法官、第一将军、第一大臣，这也并不是说他可以放纵自己，而是说他要履行有关的职责。他只是国家的第一仆人，行事必须诚实、智慧、毫无个人利益，就好像他时时刻刻会被要求提交关于管理同胞事务的报告一样。¹³

在他继承王位之前一年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使用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比喻来定义统治者的角色：他把自己比作人体的心脏，从所有的成员那里接受血液，然后再抽出来输送到政治体最远的末端去；他得到忠诚和服从，给予安全、繁荣和能够促进共同体福祉的一切。弗里德里希统治的辩护者指出，这种对统治者与国家关系的认定，可以使他摆脱专制统治的指控。他们指出，专制权力的本质，在于其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特征，它只依赖其行使者的一时兴致。这就是为什么同时代的人谴责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国王的绝对权力受到社会契约义务的限制，尤其还受到法律规则的限制。他们主张，没有比把威权政府和专制主义混淆起来更能误导人的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向普鲁士科学院发表讲话时，外交大臣赫茨贝格伯爵愤怒地声称，有人说——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普鲁士“是完全专制、独断、军国主义和东方的国家”，还有巴士底狱的普鲁士版本——施潘道监狱。现实是完全不同的：“普鲁士政府自成立之时就建立在自由和温和的君主制原则上[他强调]，由一位君主、以省的等级会议形式存在的中间机构、一个国务院和公共管理所必需的所有附属机构组成。”换句话说，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普鲁士勾选了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里的所有选项。赫茨贝格这么说并非毫无理由，他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赞扬指出，在一个欧洲所有国家的根基都被动摇的时代，普鲁士享受着“国内外的充分和平”。¹⁴

许多欧洲君主已经提起笔，或是已经落笔在纸上，宣称他们原则的纯正。然而他们是否实践了他们宣扬的话语，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反马基雅维利》中呈现给世人的弗里德里希，很快就显示出与入侵西里西亚的弗里德里希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的国内统治也不总是符合理论模板的。他统治的基调即使不能说飞扬跋扈，也称得上是专横的，这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虽然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之后仅仅过了6个月就去打仗了，但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宣传他将要成为什么样的统治者。就他的臣民而言，任何从他那专横父亲的铁钳之下解脱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的统治始于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举措——召回被放逐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废除酷刑，放松审查制度，开放王家粮仓以降低面包价格。但统治的风格仍然保持不变。以前的独裁统治并没有淡化，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也是在向淡化的反面变化。1740年10月2日，丹麦将军普雷托里乌斯报告说，弗里德里希自己决定一切事务，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他那位在决策上充满戒备的前任。¹⁵

弗里德里希的底牌藏得那么深，以至于外国外交官们除了流言和无聊的猜测之外，找不到什么情报可以送回他们的朝廷。奥地利大使在1749年感叹道，即使名义上的外交大臣波德维尔斯也不知道他主人的意图是什么。据说，弗里德里希自己曾说过，如果他发现自己的皮肤知道他将要做什么，他会把它剥下来扔掉。¹⁶觐见国王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还会让不受欢迎的客人遭受弗里德里希臭名昭著的刻薄话语。据法国公使德·吉讷公爵说，即使只是提出想在波茨坦受到接见的要求，也很需要勇气，他那些感到害怕的同僚很少有人敢于要求到波茨坦觐见。¹⁷不仅是外交事务做到如此保密。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开始后不久，另一位法国外交官德·博沃侯爵预测说：“他军队的将军将只不过是他的副官；他的大臣将只不过是他的办事员；他的财政大臣将只不过是他的税吏

；而德意志的诸侯们将只不过是他的奴隶。”¹⁸ 此外，选择官员的人也是弗里德里希。在他统治末期，他提醒一位资深大臣说，他才是那个负责任的人。“我的习惯是选择我可以利用的人为我服务，我任命我认为合适的人，没有人可以声称有权得到一个职位，这一切取决于我并且只取决于我。”¹⁹

正如上一任国王的统治那样，没有讨论，没有协商。没有大臣胆敢在他的国王主子明确召见之前去拜访他。²⁰ “弗里德里希绝对是个独裁者，他的大臣只是他意志的执行工具。”一位高级官员冯·德·舒伦堡伯爵写道。²¹ 大臣，更准确地说是办事员，总是要提交书面报告。弗里德里希阅读报告，在空白处写下决定，然后把它交给秘书去执行。比起他在政策上更精细打磨过的思考，这些旁注更能透露他做决定的速度、敏锐的智慧、同样的机智和偶尔的恶意。这些旁注也可以非常有趣。例如：一个市议会的成员询问，应该如何惩罚一个毁谤上帝、国王和他们这些议员的人。弗里德里希的意见是这样的：冒犯者亵渎全能上帝的话只能证明他不认识上帝，所以可以宽恕，他冒犯君主的罪也可以原谅，他对城市元老们的攻击应受惩罚，以儆效尤，对于本次事件的情况，他应该被关在施潘道监狱半个小时。²² 正如我们会不止一次看到的那样，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就是享受自己的怀疑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带来的快乐。

把一切重要事务保密并垄断决策权的这种难以抑制的愿望很可能源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被迫在可怕的父亲面前隐藏真实的自我和意见，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铁面具，只在自己的亲密小圈子中才会卸下，即使在那里，政治问题仍然是禁忌。这是他从一开始就宣布过的态度。在之前引用过的给他弟弟的那封信中，他坚定地宣称：“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个以自己的眼睛观察并亲自治理的统治者。”²³ 在写给继任者的两份“政治遗嘱”中，他都将这个建议提升到公理的地位：“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牢固的体系，其构造就像一个哲学体系，其中财政、政策和军事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国家的巩固及其权力的扩张

。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源自一个大脑。”（1752年）²⁴ 在1768年，他以更大的篇幅又一次论述了这个主题。他说，他从来没有召集过议会，因为没有什么比把国家事务交给普遍讨论更具破坏性的了。只有统治者一人可以纵观全局并维持必要的保密。在17世纪的法国，黎塞留和马萨林终究都失败了，只有路易十四能够显示出对目标的专一这一必要品质。至于和他自己同时代的路易十五，他的懒惰和无能使得法国的政策在不断更迭的大臣中摇摆不定，不断出错，直到“一个卑劣的婊子”（蓬帕杜夫人）掌握政策后滑落到了谷底。在那些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而且“对名声的热爱蜕变成了派系斗争的心理”的衰弱国家，情况更加糟糕。²⁵ 另一个议会君主制大国英国，可能看起来更强健，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的堕落腐化。在弗里德里希的讽刺诗《守护神》中，他让主角去参观英国议会，把那里描绘为一个清谈俱乐部，漂亮的辞藻与行动不能匹配，而言论自由掩盖了所有成员都已经腐化的事实。他补充说，所以汉诺威的尾巴可以摇动英国狗（“选帝侯国统治着王国”）。²⁶ 在另一个场合，他驳斥英国宪法是“混乱又野蛮的”。²⁷ 他也把个人统治这块试金石用在了自己前任们的身上，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都获得了高分，但弗里德里希一世得分糟糕。²⁸ 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晚期，他有时会把负责外交事务的两位大臣赫茨贝格和芬肯施泰因从柏林召到波茨坦讨论事务，但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是充满戒备地将消息有保留地告诉他们。²⁹

即使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工业企业中，首席执行官也有必要把一些任务委派给下属。弗里德里希试图经营的是一个在欧洲绵延上千千米、臣民超过200万的国家，这还只是普鲁士在他统治之初的规模。他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国家，是由于他努力工作的能力非同凡响。他每天只需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他会在早晨3点到4点之间起床（冬季则延后一个小时），然后直接去他的办公桌，首先处理他的公使们送来的破译电文。在向负责的秘书口述回复之后，他会去处理国内事务，潦草地批下旁注并口述指令。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另一名秘书则正在

准备一份不太重要的材料和私人请愿书的摘要。然后秘书退下去准备必要的信函或法令，在当天稍晚的时候带回来以备细读和签署。³⁰这就是普鲁士的“内阁政府”（Kabinettsregierung）——翻译成“密室里的政府”（Government from the closet）更好——与大约同一时间正在英国发展的“内阁政府”（cabinet government）恰恰相反，尽管两者在名称上很像。根据弗里德里希的一本最新传记中的权威观点，唯一一个能让弗里德里希愿意听从其建议的人是伏尔泰——那也只是在文化事务方面。³¹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这个体制，他甚至更进一步，时常直接与外交官和省级高级官员通信。弗里德里希的目标是实现“信息的垄断”。³²

众所周知，靠近权力比正式的公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更多。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的私人秘书每天都能享受到见到他们主人的便利。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施加了多少影响。认为他们是国王意志的被动工具的看法肯定会受到质疑。他们中领头的是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艾歇尔，弗里德里希从前任那里继承来的3个秘书之一。他从来没有远离弗里德里希的身边，即使是在出征的时候。他被神秘所包围，因神秘莫测而更显高大。法国公使，詹姆士二世党人蒂尔康奈公爵的结论是：“没有凡人了解他。”³³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柏林的大臣肯定是相信这些的，因为他们试图讨好艾歇尔，希望艾歇尔为他们交给国王批准的提案铺平道路。³⁴廷臣伦道夫伯爵称他为“我国的马萨林”，这体现了他的优势地位，却不是一个合适的绰号，因为艾歇尔并不像在路易十四幼年主持法国政务的那位枢机主教那样，艾歇尔是非常难见到的，谨慎得几乎是个隐形人。夏洛·德尼纳神父形容他是“某种意义上的首相”。³⁵他获得这一地位是因为他把自己变成了不可缺少之人，尤其是因为他的勤劳。他起得甚至比弗里德里希还要早，从早晨4点一直工作到下午2点，经过漫长的午休之后，再从下午8点一直工作到午夜。³⁶正常的一天内有十几道有法律效力的国王命令被发出，艾歇尔和其他秘书有很多机会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起草文件和“诠释”国王的意志。主人的独裁意志和暴躁脾气使得这份工

作无疑很危险，但弗里德里希不可能仔细阅读每一份要他签署的文件。³⁷ 尤其当他出征打仗时，他们的行动自由更会增加，以填补权力空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因为秘书被要求不论白天黑夜，任何时间都要随叫随到，并且要站着处理大部分的业务。当一个人试图以自己结了婚的理由来逃避任命时（艾歇尔和其他人是单身汉），弗里德里希回答说：“你的妻子不需要知道一切。”³⁸ 虽然他们的薪水微薄，但一定有其他的赚钱机会。尽管享有清廉的名声，当1768年艾歇尔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为自己的朋友，首相雅里格斯的家族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³⁹

在无情地坚持个人控制这一点上，弗里德里希表明了他在政治上与时代气息格格不入。在一个世界由于人口和经济的扩张而变得更加复杂的时代，特别是普鲁士的扩张如此迅速的时候，决策工作中对授权的需求也在相应增长。七年战争结束后，弗里德里希私人秘书的数量翻了一倍，每个人被分配以专门职责，但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⁴⁰ 不断增长的年龄意味着他对事务的掌握必然随着卷宗不可阻挡的增加而松懈。当他遗留下来的这一体制在1806年的灾难中崩溃时，施泰因等改革者针对旧秩序的主要抱怨就是内阁秘书（他们享有“不负责任的权力”）的影响力以及君主与大臣之间的距离。⁴¹ 这是弗里德里希遗留在指挥链条中的一个缺陷。当他找到可以信任的官员时，他会让他们负担过重的责任。例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德·舒伦堡-肯纳特，或弗里德里希·安东·冯·海尼茨，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行其是。前者积累了如此多的业务，以至于他只有在自己私人住宅里安排的25个秘书的帮助下才能处理。他无暇阅读每天涌进他办公室的所有报告，更别说熟悉它们了，这使得他又不得不给下属很大的处理余地。⁴² 弗里德里希有时也会显露出他意识到了需要授权他人。当大卫·伦茨于1744年被派往新获得的领土东弗里西亚时，他被告知，国王只会给他关于行动和政策的大体建议，因为国王对当地情况不了解。伦茨要在熟悉情况之后决定什么是合适的。⁴³ 这看起来只是规则中的例外。随着弗里德里希年龄的增长，他在

细节管理方面的爱好也愈加浓厚。1783年8月的一份内阁命令吩咐他的官员，他们不可以“自己在任何事情上做决定，而是要先问我，所有事情都要问我，即使只是琐碎的小事”。⁴⁴

弗里德里希试图通过不断的巡回视察，给这个呆板的体制带去改变。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其他方面那样，他遵循并且加强了他父亲的做法。在1740年夏天去柯尼斯堡的路上，每当他在一个行政区停下来，就期望有一位县长（地方官员）正带着关于当地情况和需求的报告等着他的到来。普通人也被允许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知识。⁴⁵ 这些活动设定了他典型的统治模式。在接下来的4年半时间里，他多次来回奔波于自己的领地上，去劝诱，去恐吓，时常会批评，有时会赞美，总是会问问题。弗里德里希1779年夏天召见官吏的时候，一个叫作弗罗姆的费尔贝林地方官员把他的经历记录了下来，这份记录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弗里德里希巡察内容的信息。弗里德里希询问的内容包括：为什么看上去没有在一个特定的地块种植作物；牛的数目和牛的疫病发病率（弗里德里希建议使用岩盐治疗牛的疫病）；排水、土地开垦和水上运输情况；土地所有权；为什么一个军官从王家军队中退休（他不断回到这个话题）；小麦的产量和施肥情况；为什么没有种植大麻和菘蓝；农民的兴旺程度、防卫情况，有无无礼行为；移民的情况；一个骡子饲养场，还有木材的管理等。如果该记录可信的话，弗罗姆在认为国王说错的时候坦率地指了出来，并在意见冲突的时候坚持己见。然而他没有成功，当他抱怨说自己的畜群被口蹄疫摧毁却没有受到减免税费的待遇时，弗里德里希说：“我的孩子，今天我的左耳朵有些问题；我听得不是很清楚。”⁴⁶ 他最关注的是军事问题，还有无处不在的克莱斯特家族，这在下面的对话中显示得很清楚：

国王：前面的村庄叫什么名字？

弗罗姆：普罗岑。

国王：主人是谁？

弗罗姆：冯·克莱斯特先生。

国王：哪一个克莱斯特？

弗罗姆：冯·克莱斯特将军的一个儿子。

国王：哪一个冯·克莱斯特将军？⁴⁷

国王在路上的消息一定让每一个官员的内心感到恐惧，但同时也让他管辖的臣民感到高兴，尤其是那些被选中提供招待的人，因为弗里德里希为一顿饭支付50塔勒，为床和早餐支付100塔勒。⁴⁸他们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委屈，甚至是在驿站换马的时候。国王容易接近的声誉还可能有助于限制那些较为残酷的地主。例如，1779年，柏林以东的一个村庄马策恩的农民威胁要派一个代表团在弗里德里希视察波希米亚的路上去见他并呈上抗议书。⁴⁹当然了，国王的队伍——通常规模很小——经过之后发生的事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就像古往今来所有国王出巡时一样，紧张的官员匆忙做出的改进往往被证明是装点门面的临时动作而已。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官员之一，负责西里西亚的大臣卡尔·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霍伊姆伯爵，竭尽全力提前获知了弗里德里希通过该省的可能路线。下属人员事先对可能提出的问题获得提点，流浪狗和乞丐被围捕并赶走，国王巡行路线上的房子被粉刷一新，在当天借给了农民漂亮的衣服，等等。特别是那些在上一次巡视中被指出过缺点的地方，要做出些行动表明这个问题正在处理。例如，在一栋破旧的建筑物四周搭起了脚手架（等弗里德里希离开又被拆除了）。⁵⁰知道自己的主人最喜欢被告知他国家的人口增加了，霍伊姆伯爵大笔一挥，虚构了2万移民出来。⁵¹

弗里德里希一定怀疑过自己被骗了。尽管他精力充沛又勤勉，他也不能去到每个地方。他就很少去东弗里西亚和莱茵省。在他庞大领地中

的大多数地方，生活会平静地继续，不受中央发出的命令打扰。偶尔，弗里德里希对行政系统的僵化感到不满，导致对他手下的官员发怒，他在批示中给他们起了各种绰号比如小偷、猿猴、流氓、走狗、饭桶、小丑、傻瓜、骗子和无赖。⁵² 战争与领地管理委员会（各省的主要行政机构）的官员被他视为“懒惰”和“粗心”的“白痴”，只擅长暗中策划“制度化的阴谋”反对他。收到的匿名告发信似乎证实了他沮丧的看法，这让他颇为感激，他很快采取了惩罚性措施。他统治期间，41个省负责人中有11个被革职。⁵³ 因此，普鲁士公职人员要想过得还可以，基本要求是能扛得住批评，有一张厚脸皮。官员必须为定期发生的斥责做好准备，例如，弗里德里希在发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过失之后告诉西普鲁士的管理机构：“凭良心的话，100个战争委员里通常能绞死99个。如果其中有1个诚实的人，就已经很不错了。”⁵⁴

一个被经验证实过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横行霸道者曾经就是横行霸道的受害者。对弗里德里希来说，他父亲对比自己弱小的人发表过激言论这一点，也在他身上重演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弗里德里希在统治初期就下结论说，他的外交大臣波德维尔斯伯爵曾对普鲁士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泄露关于两国谈判的秘密情报。被激怒的弗里德里希从萨克森的军营写了一封信给波德维尔斯说，如果他无法挽回局面，他将成为“一个永远消失的人”。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又发表了更加激烈的言论，他怀疑波德维尔斯把自己出卖给了英国人，并说普鲁士有足够的监狱来容纳背叛自己的大臣，甚至威胁要杀他的头。⁵⁵ 波德维尔斯颇有尊严地回复道，他的贫困和声誉足够提供抵御对他有关腐败的指控，弗里德里希的威胁对于一个珍视荣誉胜过生命的人来说没有效果，而他之所以把与瑞典谈判的信息通知了冯·德·林德，是因为有弗里德里希本人的直接命令。并且，波德维尔斯还正中要害地补充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抱怨口头发布过的命令被遗忘了。当这种毁灭性的还击回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一定非常尴尬。他让艾歇尔回复说这都是“有点过度仓促”的结果，他对整件事感到后悔，忘了这件事吧。⁵⁶

波德维尔斯名义上是弗里德里希级别最高的大臣（虽然弗里德里希始终是他自己的外交大臣）。⁵⁷ 在弗里德里希生硬粗暴的人员管理方式的恐吓之下，处于管理系统下层的普鲁士官员通常把头缩在护墙之内，不敢贸然出头。如果他们鼓足勇气质疑国王的决定，会发生什么事情？1766年就出现过戏剧性的一幕，一个高级财政官员艾哈德·乌尔西努斯奉命调查自3年前的七年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困扰普鲁士的经济危机。在报告中，乌尔西努斯指出了3个主要的罪魁祸首：战争无法避免的后果；来自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国王错误的经济政策。尽管报告的言辞委婉，但对最后被点名的人的批评是激烈的。被挑出来对普鲁士经济特别有害的因素包括：授予黎凡特公司的垄断权；与萨克森的贸易战；对过境贸易的限制；新的消费税条例引起的税费增长；以及更普遍的贸易保护措施使得普鲁士的制造品价格昂贵，质量低下，无法出口。⁵⁸ 这篇报道无异于对弗里德里希的整个经济政策提出了控诉，而弗里德里希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写信给总执行局说：“我对他们给我的这份出言不逊的报告感到震惊。我可以原谅大臣们的无知，但〔报告〕作者的恶意和腐败必须受罚以儆效尤，否则我将永远无法成功地惩治这些恶棍。”⁵⁹ 他心目中的惩戒性的惩罚就是立即解雇报告作者并在施潘道监狱监禁一年。⁶⁰ 这似乎促使了其他人日后把批评国王政策的话憋在心里。

不幸的是，在弗里德里希青年时代对其积极影响最大的人是伏尔泰，他从伏尔泰身上学到了很多智慧，但也学到了很多恶意。1732年，舒伦堡伯爵从鲁平汇报说，弗里德里希一心想在他见到的每个人身上发现一些可笑的东西，他对伤人感情的嘲弄的嗜好以后也会给他带去麻烦。⁶¹ 他成为国王后，有了无限的机会以刻薄和小气的方式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权力。爱卖弄的双性恋廷臣，伦道夫伯爵的日记特别能揭示这一点。他很崇敬弗里德里希，认为他是该世纪最伟大的君主，他是如此富有魅力，即使放在外国城市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中也是鹤立鸡群。⁶² 然而，他还记录了一些弗里德里希式的恶意表现，读起来令人痛苦。17

56年1月29日，为了庆祝普鲁士的亲王妃（他的法定继承人的妻子）的生日，弗里德里希在宫廷里举行了一场庆祝晚宴，宴会“以一种实在是很可怕的方式”结束。一位坐在贵宾席上的未婚女士冯·布兰德小姐激怒了弗里德里希，他威胁要把她赶出去。然后他在伤害之外又补上了侮辱：他对聚在一起的人群宣布说，只有那些漂亮的女士们能够勾搭到一个丈夫，丑陋的人只是在宫廷里闲逛，“你在几英里外就能闻到这些可怕的奶牛”。伦道夫补充说，当这可怕的一餐结束后，人们纷纷涌向出口，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公主说，只要能够离开，她甚至愿意坐抬轿（而不是马车）。⁶³ 伦道夫本人在同一年也受到了弗里德里希乖僻性情的伤害。他爱上了一位英国贵族查尔斯·霍瑟姆爵士，查尔斯不仅非常英俊，而且异常聪明（“即使按照英国标准也是如此”，他神秘地补充了一句）。伦道夫受邀与这位贵族一起返回英国，但他必须先获得国王的许可。经过一周的焦虑不安之后，他从艾歇尔那里收到了可怕的消息——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而且没有理由，这让可怜的伦道夫坠入绝望的深渊：“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⁶⁴ 他也很生气，在日记中大肆发泄自己的愤怒，说没有什么是他不愿意为国王做的，但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他肯定会想到，他在王后家中的高级职位不可能使他获得弗里德里希的喜爱。

来自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证据太多了，让人无法避免得出这一结论：弗里德里希与其他人的关系是威权性质的，甚至到了独裁的程度。这在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文化领域体现得尤为清晰。在他的歌剧院里，弗里德里希选择不坐在王家包厢，而是更喜欢位于乐池前面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同时清楚地看到舞台和音乐总监的乐谱。⁶⁵ 1744年，观看格劳恩《亚历山德罗与波罗》歌剧表演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博尔希曼描述了弗里德里希是如何坐在前排的位置上的，他就在格劳恩兄弟身后，卡尔·海因里希在弹琴，小提琴演奏家约翰·戈特利布是乐队指挥，他们都穿着红色的外套，与乐队其他人区分开来。⁶⁶ 英国音乐理论家查尔斯·伯尼于1772年访问柏林，他提供了一份亲眼看到的有关表演者的

生动记录：

国王总是站在乐队指挥身后看得到乐谱的地方，他经常去看乐谱，实际上在这里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就好像战场上的最高统帅一样……在歌剧院，就像在战场上一样，陛下如此严格地执行纪律，如果某个乐章或变奏出了错误，他会立即记下来并指责犯错的人；如果他的这些意大利部队胆敢偏离严格的纪律，增加、更改或减少他们表演内容中的一节的话，就会收到一份来自国王的命令，让他们严格遵守作曲家的乐谱，否则后果自负。当一部作品内容很好，歌唱家又很随意的时候，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这肯定也阻碍了所有的尝试和改进。因此音乐在这个国家是真正固定的，陛下在音乐方面允许的自由并不比他在政府社会事务方面允许的更多。他不满足做臣民生活、财富和事业上的唯一君王，他甚至要给他们最无辜的娱乐制定规则。⁶⁷

前文已经提到的弗里德里希对行政事务细节管理的爱好在文化事务中得到了更大的放纵。“独裁”或“专制”是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形容词。这种音乐上的制度，是“艺术专制的一个惊人实例，君王为了满足自己坚决且恒久不变的音乐品味，在音乐创作上实现了近乎偏执的控制，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⁶⁸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并不算不寻常，因为“谁付吹笛钱，谁有点曲权”，不过弗里德里希管得更宽。据他最后一位乐队指挥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夏特说，弗里德里希干涉音乐创作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节奏、调性（不准使用小调！）还是编曲。“没有什么不是由他决定的，”赖夏特总结道，“对于违规者的处罚是严厉的。”⁶⁹ 正如弗里德里希给他的演出导演冯·齐罗廷—李格瑙伯爵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歌手和音乐家完全服从于我的选择，其他很多与戏剧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这是我自己安排、自己出钱的”，还有一次他写道

，“你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并不再争辩，你的行为就会更加明智一些，因为争辩是我不能容忍的”。⁷⁰ 这种专横的态度还夹杂着一种更令人不快的怨恨。他在解雇芭蕾舞大师波捷时，还在柏林的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波捷是一个傻瓜和恶棍。⁷¹ 消息传开后，1777年，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费兰迪尼谢绝了柏林的工作邀请，因为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把歌唱家当士兵一样使唤。⁷²

有一位歌唱家充分感受过这种态度，她就是格特鲁德·伊丽莎白·玛拉（娘家姓施梅林），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她在自传中写道，1774年，她收到来自伦敦的邀请，其报价是普鲁士的歌唱家梦寐以求的：12个晚上1200几尼，还有200几尼的旅费和一场义演音乐会。起初，弗里德里希答应了，但坚持要求她的丈夫得留在柏林以保证她会回来，但在最后一刻他又反悔了。当这对夫妇为了履行契约而试图逃离的时候，他们在柏林城门口被捕，她丈夫被监禁了10个星期。这不是他第一次被监禁，弗里德里希之前因为他写文章抱怨妻子被迫唱不喜欢的咏叹调而监禁过他。国王的反驳是玛拉夫人是受雇来唱歌的，不是来写文章的。由宫廷作曲家赖夏特创作的咏叹调按计划演出了。⁷³ 1780年玛拉生病了，但弗里德里希拒绝允许她去波希米亚的温泉疗养。“但现在我开始感受到奴隶制度的沉重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不仅因为他〔弗里德里希〕葬送了名声和财富，现在还要葬送我的健康。”所以这一次，她和她的丈夫仔细策划了他们的出逃。在描述自己在安全的波希米亚第一次醒来的感受时，她写道：“一个美丽的早晨在等待着我醒来，房子前面有一片草坪，我在那儿喝了茶，感到十分幸福。噢，自由！”⁷⁴

“玛拉”也是普鲁士一个流传甚广的著名轶事的主人公，这一轶事是弗里德里希轻视德意志文化的一个例证。据说，当他第一次听说一个本地女孩拥有一副美妙歌喉的时候，他嗤之以鼻。“一个德意志歌唱家？我宁愿从马的嘶鸣中获得快乐。”⁷⁵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他说“我宁愿让我的马去唱歌剧中的咏叹调，也比一个德意志女歌唱家强”。弗

里德里希甚至拒绝听她唱歌，因为她会有“粗鲁的德意志口音”。⁷⁶事实上“狗的咆哮”是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因为根据玛拉的记录，当她最终得到一个试演机会的时候，她发现弗里德里希和陶恩齐恩将军以及3只意大利格雷伊猎犬一起坐在沙发上，3只狗立刻开始嚎叫——就像它们平时见到女士时的反应那样。⁷⁷然而，应该要说一句，玛拉的自传写于40多年以后，也没有提及她那声名狼藉的丈夫给她雇主惹的麻烦，以及她自己同她父亲的混乱关系。⁷⁸

这个世界让人联想起《爱丽丝漫游仙境》，书中的红心皇后一直在大喊：“砍掉他们的脑袋！”耻辱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危险。在弗里德里希的众多朗诵员兼图书管理员中，只有两位——第一位（若尔丹）和最后一位（丹塔尔）——没有被革职。⁷⁹长期为国王服务的建筑总监海因里希·路德维希·曼格提交了一份被认为过高的预算，被指责为小偷和骗子，并被投进了监狱。他很快就被释放了，但这只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在第二个月去世了。⁸⁰不是每一个国王任性的受害者都这么幸运，例如，一个名叫海文布吕克的农民狠狠地殴打了一位未能遵守法院裁决的邻居，受害者死了。他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处3年监禁。弗里德里希愤怒地在页边空白处写下指令：“你们应该为自己被称为法官、有知识的人和法院官员并做出这样一个裁定和判决而感到羞愧。依照理性和自然法，我希望海文布吕克被斩首。”⁸¹更为严重的是西里西亚的一个天主教随军教士的情况：2个普鲁士士兵在忏悔时透露了他们打算逃跑的意图，这位教士涉嫌给了他们错误的建议，他立即被绞死。尸体在路边的绞刑架上挂了4年，直到1760年被奥地利人砍倒。⁸²

一个独裁者生活中的这些插曲不可能使弗里德里希受到那些受害者的爱戴，但肯定使他们对他们心生敬畏和尊重。英国公使休·埃利奥特的负面评价在外国人中很流行：“普鲁士这个君主国让我联想起一座巨大的监狱，伟大的看守在监狱的中心照顾着他的俘虏。”⁸³作为一位苏格兰准男爵的富有的儿子，10岁进入警卫团服役，22岁获得首个外交官职位，埃利奥特有条件表示蔑视。⁸⁴生于普鲁士的艺术史学家约翰·约阿

希姆·温克尔曼严厉指责他的出生地是专制主义的完美典型并移民国外，他先去了萨克森，然后又去了罗马。但这并不是完整的情况。只了解这一面是不太公平的，需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治下的普鲁士如何运转得这么好，还要了解另外一面。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下，有一股移民潮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来自社会阶梯顶端的移民包括那些希望在欧洲最有声望的军队里任职的王公贵族们，而在社会阶梯的另一端，贫困的经济移民受到普鲁士提供的免费土地的吸引。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数量出人意料、认为普鲁士是一个值得为之服务的国家的人群。

最著名的是帝国骑士卡尔·冯·施泰因，未来的普鲁士改革家。他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事实上，施泰因的最新传记作者写道，“整整一代年轻人突然转向了柏林的方向”。⁸⁵ 1780年，施泰因决定到普鲁士寻求一个官职，这一决定是对弗里德里希所创造的风气的盛赞。在过去，大多数的帝国骑士，即使是其中的新教徒，都是去维也纳的，理由是哈布斯堡皇帝是帝国秩序的主要保护者。这些“自愿的普鲁士人”将为这个国家从1806年的灾难性惨败中恢复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包括哈登贝格、费希特、黑格尔、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布吕歇尔。⁸⁶

有职业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他出生在莱姆戈，是利珀伯爵的臣属。毕业后，他拒绝了汉诺威的一个职位，因为他希望得到来自普鲁士的邀请。他说只有最诱人的条件，才能使他放弃“一个我认为最适宜于受压迫人们的国家，它为建设性活动提供了最大的活动余地，没有尔虞我诈和其他障碍”。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在卡塞尔的一个教职，但他仍然期待着搬去柏林。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普鲁士作家格莱姆说：“为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服务，是我的坚定打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愿望。我将此视为我人生的主要目标。”⁸⁷ 3年后，即1779年，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作为一个忠实的“自愿的普鲁士人”活到1820年去世。在他迁居的这个国家的亲身经历并没有遏制他的热情；相反，多姆成了普鲁士最有效的宣传者之一。1781年，他在给另一个知识分子朋友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的信中写道：

我的原则是真正的共和主义，但在所有的君主制国家中，我认为我们的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人站在它的顶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压迫和不公比这里少，如果这里有压迫，至少它是有秩序有规则的，并尽可能少地取决于个人情况。如果国王愿意，每一个臣民都有权向国王请愿，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好事吗？⁸⁸

他补充道，如果他生为英国人或是瑞士人，甚至是帝国自由城市的公民，他就不会搬到普鲁士，但在所有的君主制国家中，这里是最好的。多姆甚至成功出版了他关于犹太人解放的开创性作品，尽管弗里德里希并不赞成其中的内容。⁸⁹

多姆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且能说会道。他本可以在十几个德意志邦国中的任何一个找到好工作，但他选择了弗里德里希的普鲁士，这值得认真对待。他被国王的责任、服务、自我牺牲、公平和效率的精神气质所吸引。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偶像的军事成就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⁹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多姆和他的同道深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尽管有诸多限制但还是促进了开明进步和法治的国家。这种文化与权力的诱人结合，与神圣罗马帝国许多诸侯的自我放纵和软弱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注释

¹ Dietrich, pp. 221–43; Volker Hentschel, *Preussens streitbare Geschichte 1494–1945* (Düsseldorf, 1980), p. 54; 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reussischer Absolutismus, Merkantilismus, Militarismus* (Göttingen, 1977), p. 49.

² Hintze, p. 281.

³ Fritz Hartung, “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

ol. 3, p. 1505.

4 Dietrich, p. 240;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 65.

5 Dietrich, p. 239.

6 *Œuvres*, vol. 26, p. 101.

7 Leopold von Ranke, *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and History of Pruss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849), vol. 2, p. 45.

8 Carsten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Sammlungen und Kabinette als Schnittstellen einer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Sösemann, vol. 1, p. 322. 无忧宫的那尊半身塑像实际上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但弗里德里希并不知道真相。关于弗里德里希对马可·奥勒留的钦慕之情，另参见Ullrich Sachse, “Caesar und Cicero sind seine Lehrer,”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162–4.

9 Peter Baumgart, “Kronprinzenopposition. Zum Verhältnis Friedrichs zu seinem Vater Friedrich Wilhelm I.,” in Heinz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6), p. 9.

10 Voltaire, *La Henriade*, ed. O. R. Taylor,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65), vol. 39, p. 338.

11 Charles Fleischauer (ed.), *L’Anti-Machiavel par Frédéric II, édition critiqu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eneva, 1958), vol. 5, p. 248.

12 *Œuvres*, vol. 9, p. 208.

13 Ibid.

14 Ewald Graf von Hertzberg, “Mémoire sur la troisième année du règne de Frédéric Guillaume II, et pour prouver que le gouvernement prussien n’est pas despotique,” in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Lettres. Cl. de belles-lettres. 1786/1787* (Berlin, 1792), pp. 645–6.

15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77–8.

16 Erich Everth, *Die Öffentlichkeit in der Aussenpolitik von Karl V. Bis Napoleon* (Jena, 1931), p. 319.

17 H. M.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1756–1775* (Cambridge, 2001), p. 149.

18 “Portrait du Roi de Prusse et réflexions sur le caractère de ce prince,” in *Recueil des instructions données aux ambassadeurs et ministres de France depuis les traités de Westphali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01), vol. 16: *Prusse*, ed. Albert Waddington, p. lxxxi.这段话的德文译本参见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seiner Zeit* (Berlin, 1901), vol. 1, p. 154。

19 Quoted in Rolf Straubel, “‘Bedienungen vergebe Ich nach Meinem Sinn’. Zur Personalpolitik Friedrichs II. im Zivilfach,” in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137.

20 Walter L.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t 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6 (1931), p. 411.

21 Wilhelm Naudé, “Denkwürdigkeiten des Ministers Grafen von der Schulenbur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15, 2 (1902), p. 83.

22 Georg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otsdam, n.d.), vol. 2, p. 78.

23 *Œuvres*, vol. 26, p. 101.

24 Dietrich, p. 326.

25 *Ibid.*, p. 610.

26 *Œuvres*, vol. 11, p. 254. 另一方面，《守护神》以对洛克和英国的自然神论者的一首赞歌作为结尾，他们取代天主教的圣徒，占据了天堂里的位置，参见Thomas Biskup and Peter H. Wilson, “Gross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in Friederisko, *Ausstellung*, p. 147。

27 Friedrich Luckwald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Anschauungen von Staat und Fürstentum,” *Historische Aufsätze Aloys Schulte zum 70. Geburtstag gewidmet* (Düsseldorf, 1927), p. 229.

28 Dietrich, pp. 608–12.

29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116.

30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p. 344 and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411, 其中包括门肯留下的一份对弗里德里希工作日的记录，他是弗里德里希的私人秘书之一。

31 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 53.

32 Wolfgang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Stuttgart, 1996, 2003), vol. 2, p. 20.

33 *Recueil des instructions données aux ambassadeurs*, p. 509.

34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od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vom letzten Viertel des achtzehnten und vom Anfa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1778 bis 1806* (Lemgo and Hanover, 1814–19), vol. 4, pp. 112–21. 冯·多姆记录道，人们普遍认为，鉴于科克采伊的司法改革所激起的强烈反对，如果没有艾歇尔在王家内阁中的支持的话，科克采伊的改革是无法获得批准的。

35 Abbé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Berlin, 1788), p. 419.

36 Lehndorff, vol. 1, p. 242.

37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vol. 4, pp. 115–16;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298.

38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p. 351.

39 Ibid., p. 350; Lehndorff, vol. 2, p. 101. 伦道夫记录了一些传闻，说艾歇尔借操纵货币来给自己赚钱。通常记载的艾歇尔死亡时间是1770年，但弗里德里希在1768年2月5日一封写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中记录了他的死亡，并不客气地补充说，艾歇尔是“保持首相府秩序的人”——*Œuvres*, vol. 26, p. 354.

40 Wolfgang Neugebauer, “Zur neueren Deutung der preussischen Verwaltung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2, p. 555.

41 J. R. Seeley, *Life and Times of Stein, or Germany and Prussia in the Napoleonic Age* (Cambridge, 1878), vol. 1, p. 277.

42 Walter L.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t 2,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7 (1932), p. 82.

43 Koser, vol. 1, p. 419. 伦茨利用这一行动自由在该省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驯服了主要城市埃姆登倔强的市议员。

44 Günter Vogler and Klaus Vetter, *Preusse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Cologne, 1981), p. 90.

45 Koser, vol. 1, p. 30; Vinzenz Czech, “Friedrich der Grosse auf Inspektionsreise,”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 234.

46 J. W. L. Gleim (ed.), *Reisegespräch des Königs im Jahre 1779* (Halberstadt, 1784). 一个质量极好的译本可参见Peter Paret (ed.), *Frederick the Great: a Profile* (New York, 1972), pp. 79–98。原文可在线浏览：<http://books.google.co.uk/books?id=GeAAAAAAcA>

AJ&pg=PA1&lpg=PA1&dq=Reisegespräch+des+Königs+im+Jahre+1779&source=bl&ots=HSOy91IGJO&sig=PmozgKo32f09H_x16r-6YL1Hogs&hl=en&sa=X&ei=DGYSUeiKO46o0AXK04GwCg&ved=0CDUQ6AEwAA。

47 Ibid.

48 Ernst Pfeiffer, *Die Revuereis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esonders die schlesischen nach 1763 und der Zustand Schlesiens von 1763–1786* (Berlin, 1904), p. 69.

49 Wolfgang Neugebauer, “Friedrich als Risiko?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der Sicht von Untertanen und Geschichtsschreibern,” in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Beiträge des drit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25./26. September 2009*,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eds.), (Friedrich300 – Colloquien, 3),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sse/neugebauer_risiko, published on 21 September 2010. Accessed on 6 February 2013.

50 Norbert Conrads, “Politischer Mentalitätswandel von oben: Friedrichs II. Weg vom Gewinn Schlesiens zur Gewinnung der Schlesier,” in Peter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p. 231–2.

51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t 1, p. 414.

52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p. 36, 452.

53 Hubert C. Johns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5), pp. 44, 48.

54 Quoted in Gerhard Ritt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 Historical Profile*,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Paret (London, 1968), p. 157.

55 P.C., vol. 1, pp. 261–2.

56 Ibid., p. 262, nn. 1–2.

57 关于弗里德里希作为外交大臣的一面，有一项精彩分析，参见H. M. Scott, “Prussia’s Royal Foreign Minist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ussian Diplomacy,” in Robert Oresko and Graham Gibbs (eds.), *Royal and Republican Sovereignty: Essays in Memory of Ragnhild Hatton* (Cambridge, 1997), pp. 500–526.

58 Ingrid Mittenzwei, *Preussen nach dem Siebenjährigem Krieg. Auseinandersetzungen zwischen Bürgertum und Staat um die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1979), pp. 39–43. 乌尔西努斯的故事被复述过很多次。Mittenzwei的详细记录基于对普鲁士档案的改编。

59 Ibid., p. 43.

60 也有人声称乌尔西努斯收受商人的贿赂，跟他们同流合污，但证据很薄弱，参见Rolf Straubel, *Zwischen monarchischer Autokratie und bürgerlichem Emanzipationsstreben. Beamte und Kaufleute als Träger handels- und gewerbepolitischer Veränderungen im friderizianischen Preussen (1740–1806)* (Berlin, 2012), pp. 23–4。在被释放之后，乌尔西努斯搬去了马格德堡，并于1785年死在那里。1776年他因为穷困申请一份养老金，但被拒绝了——Rolf Straubel,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preussischen Verwaltungss- und Justizbeamten 1740–1806/15* (Munich, 2009), pp. 1039–40。

61 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95.

62 Lehndorff, vol. 1, pp. 46, 218.

63 Ibid., p. 246.

64 Ibid., pp. 249–52.

65 Dieudonné Thiébault, *Mes Souvenirs de vingt ans de séjour à Berlin; ou Frédéric le Grand, sa famille, sa cour, son gouvernement, son académie, ses écoles, et ses amis littérateurs et philosophes*, 4th edn (Paris, 1813), vol. 2, p. 209.

66 Johann Friedrich Borchmann, *Briefe zur Erinnerung an merkwürdige Zeiten und rühmliche Personen, aus dem wichtigen Zeitlaufe, von 1740 bis 1778* (Berlin, 1778), p. 184.

67 Percy A. Scholes (ed.), *An Eighteenth-century Musical Tour in Central Europe and the Netherlands. Being Dr Charles Burney's Account of his Musical Experiences* (Oxford, 1959), vol. 2, pp. 164, 207.

68 Thomas Bauman, “Courts and Municipalities in North Germany,” in Neal Zaslaw (ed.), *The Classical Era: From the 1740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9), p. 242.

69 Walter Salmen, *Johann Friedrich Reichardt. Komponist, Schriftsteller, Kapellmeister und Verwaltungsbeamter der Goethezeit* (Freiburg im Breisgau and Zürich, 1963), p. 42.

70 L. Schneider, *Geschichte der Oper und des Koeniglichen Opernhauses in Berlin* (Berlin, 1842), p. 17; Ludwig Geiger, *Berlin 1688–1840. Geschichte des geistigen Lebens der preussischen Hauptstadt* (Berlin, 1893), vol. 1: 1688–1786, p. 609.

71 Ibid.

72 Walter Rösler, “‘Die Canaillen bezahlet man zum Pläsier.’ Die königliche Schaubühne zu Berlin unter Friedrich II. und Friedrich Wilhelm II.,” in Georg Quander (ed.), *Apollini et Musis. 250 Jahre Opernhaus Unter den Linden* (Frankfurt am Main and Berlin, 1992), p. 26.

73 Geiger, *Berlin 1688–1840*, vol. 1, p. 610.

74 O. von Riesemann, ‘Eine Selbstbiographie der Sängerin Gertrud Elizabeth Mara,’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10 (11 August–29 September 1875), pp. 561, 564, 577.

75 Scholes, *An Eighteenth-century Musical Tour*, vol. 2, p. 167.

76 E. E. Helm, *Music at the Cour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orman, 1960), p. 129.

77 Riesemann, “Eine Selbstbiographie,” p. 533.

78 Sabine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 Musiker und Monarch* (Munich, 2012), p. 53.

79 Brunhilde Wehinger, “Introduction,” in Brunhilde Wehinger and Günther Lott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Berlin, 2012), p. 21.

80 http://www.potsdam-wiki.de/index.php/Heinrich_Ludwig_Manger. Last accessed 13 February 2013.

81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p. 94–5.

82 Conrads, “Politischer Mentalitätswandel von oben,” p. 228. 另一方面，有一则在弗里德里希活着的时候到处流传的趣闻说明了他的宽容：“那个优秀的士兵为什么戴着镣铐？”“有人发现他对着他的马兽性大发。”“傻瓜，干嘛让他戴上镣铐，让他去步兵团。”于是那人对士兵说：“很抱歉，你要失去你的马了。”参见Nancy Mitford,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70), p. 112。

83 H. W. V. Temperley, *Frederic the Great and Kaiser Joseph: An Episode of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15, reprinted 1968), p. 21.

84 H. M. Scott, “Elliot, Hugh (1752–183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2004); online edn, Jan. 20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8664>). Accessed 19 February 2013.

85 Heinz Duchhardt, *Freiherr vom Stein. Preussens Reformer und seine Zeit* (Munich, 2010), p. 18.

86 Oswald Hauser, “Preussen und die Preussenforschung heute,” *Jahrbuch der 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2 (1974), p. 57.

87 Ilseget Dambacher,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aufgeklärten Beamtentums und seiner Reformbestrebungen am Ausgang des 18. Jahrhunderts* (Bern 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p. 12–13.

88 Rudolf Zoppitz (ed.), *Aus F. H. Jacobis Nachlass. Ungedruckte Briefe von und an Ja*

cobi und Andere (Leipzig, 1869), vol. 1, p. 49.

89 Horst Möller, “Wie aufgeklärt war Preussen?,” in Hans-Jürgen Puhle and Hans-Ulrich Wehler (eds.), *Preussen im Rückblick* (Göttingen, 1980), p. 200.

90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vol. 4, p. 615.

① 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终身权益指对不动产或动产享有的权益或请求权，低于所有权，并以权益享有人或相关他人的生存期为限。

第6章

文化

歌剧

继承了王位的弗里德里希成了一位极其富有的年轻人。他父亲留给他的财富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还是现款。与同时代的人如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莎或是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不同，他现在可以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放纵自己。鉴于他在继承王位的同年年底就入侵西里西亚，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以这一大笔积蓄为基础的军事活动，但他也有了时间以更大的规模继续他结婚之后开始的自我塑造过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第一个放纵行为就是送钱到伦敦去，以带回他的情人阿尔加罗蒂，然后大量地送礼物给他。这种性解放伴随着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审美环境的营造，这是一种他在其中会感到舒服的环境。

音乐是这一营造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鲁平以及随后的莱茵斯贝格，由于他吝啬的父亲允许他获得的资源有限，弗里德里希不得不相应地有所节制。现在他可以尽情享受了。他不得不从萨克森宫廷借用独唱演员表演专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葬礼而写的清唱剧，这一事实令人痛苦地显露了他继承的乐队的窘迫状况。¹ 这部清唱剧的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立即被派到意大利，招募用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歌

手。² 他于1741年3月带着5名男歌手和3名女歌手回来。³ 弗里德里希的建筑师朋友格奥尔格·文策斯劳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也被送了出去，他参观了德累斯顿和巴黎的剧院，以准备在柏林建造一座宏大的新歌剧院。⁴ 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在莱茵斯贝格时就已经进行过深入讨论。弗里德里希在1732年就精心筹备，将克诺贝尔斯多夫送去德累斯顿。4年前，正是在德累斯顿，弗里德里希对强者奥古斯特的剧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然后，克诺贝尔斯多夫又于1736—1737年被派到意大利，研究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大剧院。⁵ 英国的帕拉第奥风格跨过更远的距离发挥了影响，这种风格通过科伦·坎贝尔的《不列颠的维特鲁威》一书传来。这是一套1715年至1725年出版的插图华丽的3卷本设计汇编，属于弗里德里希的个人财产。在他的图书馆里，还有坎贝尔的资助人，同为建筑师的伯灵顿勋爵编纂的《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绘制的古代建筑》。这种影响受到了无所不在的阿尔加罗蒂的鼓励。逗留伦敦期间，他对帕拉第奥的狂热喜爱将他拉进了伯灵顿的圈子里。他为弗里德里希弄到了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并且是带有华丽新版画的威尼斯重印版本，而非木刻版本。⁶

克诺贝尔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建造的歌剧院被誉为“德国新帕拉第奥主义第一座重要的纪念碑”。⁷ 建筑师和赞助人需要结合在一起，因为是弗里德里希提供了设计方案，而克诺贝尔斯多夫只是把它变成建筑图纸。⁸ 实际上，这座建筑十分缺乏原创性，北侧的外观直接照搬科伦·坎贝尔在威尔特郡斯托海德的设计，而西侧的外观则来自坎贝尔在埃塞克斯郡旺斯特德宅邸的设计。⁹ 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出了不少问题。部分原因是弗里德里希的亲戚，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不愿意出售位于该选址处的地产。进一步的延误则是由于要在沼泽土地上建造这座建筑，必须从波兰进口非常大的木材来打深的地基。¹⁰ 弗里德里希从1740年12月就出征西里西亚，他不在国内帮不上忙。他的弟弟，15岁的海因里希亲王于1741年9月5日给建筑奠基。在弗里德里希一连串命令的催促下，随后的工作进展得很快，1742年12月5日就举行了首演。¹¹ 那个时

候，3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第一次已经圆满结束，战败的奥地利人割让了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以比肩路易十四的胜利者姿态，为他的新剧院选择了格劳恩的《恺撒与克莱奥帕特拉》作为首演歌剧。不过，他是否打算学习他的罗马榜样到了要与自己征服的女王玛丽娅·特蕾莎上床的程度，就值得怀疑了。

尽管贾科莫·法布里斯的布景非常壮观，还有40名演奏者组成的管弦乐队，新歌剧院还有更多装修工作需要完成，首演当晚，脚手架还搭在建筑上。¹²一年后，歌剧院完工的时候，伏尔泰在给莫佩尔蒂的一封信中将其誉为“欧洲最好的歌剧院”。¹³它也是最大的歌剧院之一，能容纳2000名观众，有5个宽敞的入口，每个入口可允许5个人同时通过。¹⁴室内通道同样宽敞，可以供轿子直接进出，甚至可以去到最高一层。令参观者们赞赏不已的还有宽敞的包厢（“更像是闺房”），视线良好，通风顺畅，音响效果出色。最前沿的技术让倾斜的观众席可以迅速转变成可供舞会使用的平地。屋顶的大水池是为了舞台的特殊效果准备的，喷泉可以让休息室保持凉爽，并兼有灭火功能。¹⁵

如预期中的那样，弗里德里希新歌剧院的名声传遍欧洲，外国来客数量不断增加，借用米其林指南的说法，他们相信柏林“值得一游”。英国商人和慈善家乔纳斯·汉韦在1750年从波斯回来的途中参观了柏林，他写道：“国王极度喜欢音乐，他个人又在这方面有着广博的知识，将这项娱乐〔歌剧〕带到了异常完美的境界。歌剧《法厄同》的服装、布景和机械装置，确实是最优雅最华丽的。”¹⁶那些不承认他人亲身经验的人，可以通过无数的图画描述自己感受一下。和现在的插图相比，这些图画以清晰太多的程度强调了下面这一点：这是一座独立的建筑，非常独立，据说它周围的空间可以停放1000辆马车。¹⁷实际上这是欧洲第一座独立的歌剧院。¹⁸以前的皇家剧院要么位于皇宫建筑之中，例如凡尔赛宫、慕尼黑宫和曼海姆宫；要么位于与皇宫毗连之处，能让王室成员通过专用通道进入包厢，例如在维也纳、都灵和那不勒斯。此外，巨大的皇家包厢在歌剧院内饰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直接面对舞台，

通常高达两层以上。柏林歌剧院也有一个皇家包厢，但弗里德里希没有使用。¹⁹

神圣化

建筑的作用比表面看起来的更复杂。例如，1737年为那不勒斯国王查理四世建造的圣卡洛（查理）皇家剧院首先服务于象征性的目的，这座建筑是为了宣扬其资助人的威严。弗里德里希的歌剧院同样打算让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帝王们印象深刻，同时也作为他个人的娱乐场所。但歌剧院也代表了他对艺术的整体敬意和对音乐的特别致敬。他刻在门廊上方的铭文不是“圣弗里德里希皇家剧院”而是“弗里德里希国王献给阿波罗和缪斯们”，这是一座有审美趣味的神殿，来自他们自封的大祭司。在临街的山墙上描绘着阿波罗与塔莉亚（掌管喜剧的缪斯）和墨尔波墨涅（掌管悲剧的缪斯），南边墙上装点着阿波罗与卡利俄珀的儿子，具有音乐才能的俄耳甫斯。²⁰ 我们稍后将看到，阿波罗还会在七年战争之后，弗里德里希在波茨坦建造的新宫中出现。

这座自发的艺术神殿的建造是一场强大运动的早期预兆。这场运动就是文化的神圣化，在欧洲讲德语的地区尤其强大。这场运动意味着高级文化从象征性和娱乐性功能中解放出来，成为本身受到崇拜的神圣活动。充满矛盾的是，其核心正是其表面上的对立面：世俗化。随着组织有序的宗教的传统形式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其他地方寻找形而上的精神寄托。艺术的地位提高了，从彰显上帝荣耀的工具被提升为神本身。这一新兴艺术宗教最有影响力的典型人物就是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1717—1768），他出生在普鲁士，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罗马。他厌恶弗里德里希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当我想起普鲁士的专制和那个压迫各民族的暴君，我从头到脚都战栗……他让自己的国家成了人类永恒的诅咒和恐惧对象。”²¹ 但事实上这两个人有很多

共同点，至少在性取向和对古典雕塑的热情方面。通过将虔敬主义的反思与异教对感官享受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温克尔曼创造了一种美学的宗教。例如，他对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雕像的描述，超过了对一尊雕像的欣赏，成了一项宗教活动，因为对他而言这尊雕像并不代表神，它本身就是神。²²

弗里德里希经历过同样的感官享受和高尚唯美主义的混合。1742年4月他从位于波希米亚的军营写信给正出使皮埃蒙特的阿尔加罗蒂，请求他设法聘请歌手平蒂并批准了每年4000塔勒的慷慨聘金。然后他突然写起了诗歌，赞扬他对艺术的献身：

啊，甜蜜快乐的伙伴，众神钟爱的孩子

快点来满足我的感官：

向我打开，你这生命之门。

平息我的激情燃起的火焰。

而你，阿拉伯的香水，

而你，匈牙利的花蜜，

慷慨地给予我你的美味。

而你，迷人的旋律，

其神奇的效果

把它们的魔法通过器官传给心脏，

无论悦人的甜蜜忧郁，

还是强烈的喜悦涌动。

当灵魂在宁静中独处，

告别无用的顾虑，
它知道如何品味这份狂喜，和这些快乐的时刻
天上之人享受着，
来吧，啊，艺术的伙伴，随时欢迎的伙伴，
让你与我在不朽之所中永恒。²³

柏林歌剧院是弗里德里希艺术宗教的教区大教堂。那里是伟大的宗教仪式上演的地方，在狂欢季节以大歌剧的形式出现。这些都是奢华的多媒介产品，呈现出戏剧、音乐和芭蕾舞的结合，通过华丽的服装吸引眼睛，用繁复的配乐吸引耳朵。他们还是多民族的：大多数的歌手是意大利人，舞蹈演员是法国人，音乐家是德意志人。虽然弗里德里希经常被说成一个崇拜法国的人，但他事实上对同时代的法国文化整体评价颇低。他认为，在17世纪中期的黄金时代，由高乃依和拉辛领衔的法国作家们创作了品质无法超越的戏剧作品，但此后他们的星光已经消逝。他贬斥法国人的音乐“幼稚”，吩咐格劳恩停止创作法国式的序曲。现代意大利音乐正确演唱时很动听，但本质上是“愚蠢的”。²⁴ 弗里德里希要求的是德意志人创作意大利风格的音乐。有人说他曾说过一句格言：“法国人只知道如何写戏剧而意大利人只知道怎么唱；只有德意志人知道如何写音乐。”²⁵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他统治期间的歌剧剧目是由以下几个人主宰的：他的第一任乐队指挥格劳恩；在格劳恩于1759年去世后接任这一职位的约翰·弗里德里希·阿格里科拉；然后是约翰·阿道夫·哈塞，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聘用过他，但自从1728年在德累斯顿听了他的歌剧《克莱奥菲德》之后就十分赞赏他。²⁶ 英国著名音乐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伯尼指出：“这个国家的音乐比帝国的任何其他部分更是真正德意志的；虽然在狂欢的时候意大利歌剧不断地上演，但普鲁士国王陛下无法忍受作曲者不是格劳恩、阿格里科拉或哈塞。”²⁷

音乐的乐趣

与欧洲其他宫廷的对比是惊人的。他的许多同时代君主一样知识渊博、热情洋溢且专横傲慢，但他们没有这么多不受限的现款。当弗里德里希下定了决心想要得到一个特定的歌手时，他有达到目的所需要的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里德里希的钱罐子里总是有可观的钱任他处置，他的钱由家务总管弗雷德斯多夫管理，完全独立于正常的国家财政。正是从这里支付出来的现金，在1740年把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还有许多其他人带到了柏林。²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顶尖歌手——乔万尼·卡雷斯蒂尼、安东尼奥·乌贝里（“波波里诺”）、费利切·萨林贝尼、保罗·贝代斯基（“保利诺”）、贝妮代塔·莫尔泰尼、乔凡娜·阿斯特鲁亚——都是由于前任国王一毛不拔，给弗里德里希留下了一大笔钱，才得以来到这里。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知道他的积蓄都挥霍在意大利阉人歌手和法国芭蕾舞演员身上，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在音乐世界里，舞台上的明星和乐池里的乐队成员的工资之间始终存在着鸿沟。波波里诺每年的报酬是2000塔勒，萨林贝尼和卡雷斯蒂尼是他的两倍以上，而乔凡娜·阿斯特鲁亚更是高达6000塔勒。²⁹

即使是匆匆瞥一眼弗里德里希的书信，也能看出他在大歌剧的世界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思。这远远不只是炫耀或与他同时代的君主竞争的问题。在剧院里为自己创造一个视觉、戏剧和声音的世界是一种心理需求。弗里德里希很鄙视德累斯顿演出歌剧时的过度展示，他认为那是华而不实的，没有原因地搞出一堆效果。1755年1月他写信给他姐姐威廉明妮，讨论那里上演的波尔波拉的《埃齐奥》，该剧在舞台上出现2个掷弹兵连队和2个轻骑兵中队，都穿着罗马服饰，还有20头骆驼、4头骡子和4匹白马拉着的一辆马车。他观察到，萨克森人的这些华丽场面只针对视觉，无法触及内心。对他而言，一个动人的场景的价值远超所有大肆庆祝胜利的自夸：“祸哉，那些从来不知道眼泪之狂喜的人！”³⁰ 然而，他的热情受到自我意识的影响，并因为意识到其他选择而受到限制

。这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得特别清楚，这首透露了很多东西但不受重视的诗被简单地题名为《论享受》，1749年写给演出导演恩斯特·马克西米利安·斯韦尔茨·冯·莱斯特男爵^①。这首诗总长两百行，它以拒绝妓女们强烈但短暂又充满危险的肉体欢乐做开头，之后以斯韦尔茨之口下令：

去巫术和魔法的宫殿，
那里的演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
结合一百种不同的乐趣，创造出唯一。 31

弗里德里希回答斯韦尔茨说，他非常愿意服从，因为他爱被“一种假神秘论”（指基督教）谴责的所有快乐，将始终遵循伊壁鸠鲁的福音。他补充说，他只希望他的灵魂有一百扇门，就像底比斯古城那样，一切可能的快乐都可以从中进入。但是，弗里德里希随后以相当长的篇幅赞美自然现象的巨大吸引力——黎明、雾气、山脉、花朵、鸟儿——并总结说它们远胜过斯韦尔茨提供的人造美景（“自然有权战胜艺术”）。弗里德里希还借机倡导多元主义：

我们对别人的乐趣不感兴趣，
如果本能迫使我们更喜欢自己的乐趣，
那就让我们容忍其他人的爱好：
像人类的一切那样，它们都是不同的。
不如让我们祝福智慧的上帝，
提供了如此丰富如此多样的风格
足够分配给每个人。

这首诗在结束时攻击了把戏剧视为道德学校的观点。弗里德里希写道，我们是去那里获得享受，而不是去听布道。不管怎样，没有人在那里皈依了美德。自我改进只能通过个人奋斗和反思来实现。弗里德里希以使人感到愉快的评论结束，他说，所以斯韦尔茨所提供的，只是每日辛劳结束的时候可以享受的“虚幻的快乐”。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很难知道弗里德里希的习惯性反讽有没有变成虚伪。这首诗1750年出现在《无忧宫哲学家作品集》中，收入这首诗的是专门为亲密的朋友印刷的一个小版本，不过10年后在法国出现了盗版。³²头号密友当然是伏尔泰，弗里德里希试图模仿过他那嘲弄的口吻，他也总是试图给伏尔泰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艺术更为认真和有可能更为真诚的表达体现在上面引用的写给阿尔加罗蒂的诗体书信中。这两份作品的用词即使不说是色情的，至少也是刺激感官的。在那首名义上是针对斯韦尔茨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爱之岛的可爱神明……沉醉于一百种炽热的乐趣中……淫荡的气氛……撩人情欲的感觉……”，这只是第一页上的诗句。

音乐与启蒙

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里希没有遵照自己对斯韦尔茨所说的话，把剧院应该避开说教这一观点付诸实践。他在位期间上演的所有大歌剧的剧本都在提倡美德，尤其是那些与古典时期的理想统治者有关的内容：逆境中的勇气、中庸、无私，还有仁慈——这是最重要的品质。鉴于这些剧本往往由奥地利宫廷诗人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首先创作的文本改编而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弗里德里希肯定在他的至少一部剧本中留下了完全的个人特色。这就是《蒙特祖玛》，是他用法语写的，并由他的宫廷诗人詹彼得罗·塔利亚祖基翻译成意大利语，然后由多产的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作曲，这是他在柏林创作的第24部歌剧。³³歌剧

深受伏尔泰《阿尔齐尔，或曰美洲人》（1736年）的影响，于1755年在柏林歌剧院举行了首演，豪华的布景出自卡尔·弗里德里希·费希海姆之手。³⁴ 作为格劳恩最好的歌剧之一，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755年它上演了8次，在七年战争之后的数个场合再次重演。³⁵ 它也可以被称为一部“改革歌剧”。根据弗里德里希的命令，返始咏叹调由分两节的独唱短曲取代，合奏被用来推动情节发展，这种做法早于莫扎特。³⁶ 遵循着古典美学要求的三一律，它详细叙述了与歌剧同名的墨西哥国王生命的最后一天以及他被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杀死的故事。情节并不精妙，是靠陈述而非细腻的表达。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统统是不容异议、傲慢、残忍、好色又奸诈的，异教徒的墨西哥人都是温和、礼貌、热情、开明又宽容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范例就是下面的交易情节，这发生在科尔特斯成功以诱骗方式进入王宫之后：

科尔特斯：世人万物都必须向我崇拜的全能上帝跪拜。

蒙特祖玛：这就是你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

科尔特斯：我们的法律命令我们消灭仍旧以人献祭的野蛮人。我们走上战场并不是要征服，而是以我们的上帝的名义，我们追求的是让你皈依这崇高的信仰，这会让万能的上帝喜悦。

蒙特祖玛：什么！我要相信一个宽恕谎言的上帝吗？我怎么能理解一种命令你谴责所有与你意见不同者的信仰？我怎么能理解一个认可你所有暴行的上帝？

科尔特斯：你配不上你所冒犯的宗教。

蒙特祖玛：但我们的宗教是非常优越的，因为它命令我们热爱每一个生命，并禁止我们蔑视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它要求我们以行动证明自己的美德并对你所犯的那种罪行施以

最严厉的惩罚。哦，多么地不同！哦，野蛮的敌人！³⁷

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开明的自然神论信仰者，在被拉去处死的时候，蒙特祖玛唱的是：“没有恐惧，我把一个纯洁的灵魂返还给自然的怀抱；没有惧怕，我将我的身体返还给诞生它的元素”，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后来出现在了弗里德里希最后的遗嘱之中。³⁸与蒙特祖玛订了婚的墨西哥公主奥帕芙丽萨自杀了，让科尔特斯的欲望未能得逞，在此之前她组织人焚烧了城市。恼羞成怒的科尔特斯断言处理当地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他们，下令他的士兵持剑屠城，杀害了里面所有活着的生物，歌剧的最后一句话是他说的：“所以墨西哥将被西班牙王和真正的信仰征服。”³⁹在剧院里，这抢劫、谋杀、强奸、大规模骚乱的最后一幕由一支芭蕾舞和特殊的舞台效果加以强化。⁴⁰

弗里德里希在1753年10月给阿尔加罗蒂的一封信里解释了他剧本里有争议的地方，就好像有必要这样做一样：

如果你的歌剧〔在意大利〕是糟糕的，你会发现这里的一部歌剧可能也超越不了他们。这就是《蒙特祖玛》。我选择了这个主题，正在把它写出来。你一定了解，我是同情蒙特祖玛的；科尔特斯是暴君，因此人们可以痛骂，在音乐方面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之野蛮的一些嘲笑。但我忘了，你现在身处在宗教法庭的土地上，我表示歉意，希望能在即使是歌剧也可以改革道德和破坏迷信的异教徒土地上很快见到你。⁴¹

他还可能补充说，蒙特祖玛应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卫他的国家，反对外来的掠夺者。至少可以说，弗里德里希是完全真心地厌恶天主教并支持宽容的。同样的话不能用来评价他的另一部歌剧《苏拉》，这部剧也是由塔利亚祖基翻译成意大利语并由格劳恩作曲，剧中主角在

紧急状态结束后放弃独裁，恢复罗马的宪政并退休过起私人生活——这绝对不是人们能够期待弗里德里希在真实生活中实践的场景。⁴²

正歌剧只代表了弗里德里希音乐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是最正式的部分。他也为另一部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就是喜歌剧。弗里德里希的统治时期与该剧种的黄金时代相一致。喜歌剧的黄金时代在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于那不勒斯，它迅速向北传播，大获成功。喜歌剧引发了许多争论，包括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喜歌剧论战”。这场论战发生在法国音乐支持者和意大利音乐支持者之间。弗里德里希非常支持后者，他建立了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无有其匹的剧团。这涉及很多工作，包括在波茨坦城市宫东北翼为他们修建一座宏伟的新剧院。建筑方案由弗里德里希构思并由克诺贝尔斯多夫执行，背离了传统的马蹄形设计和阶梯形结构，而是选择了古罗马露天剧场的设计，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看到舞台，也没有突兀的皇家包厢。⁴³ 为了与这种平等的座位安排相协调，歌剧的情节大多取自哥尔多尼的作品，经常出现的是狡猾的仆人对贵族的欺骗。例如，在《贝托尔多》中，与作品同名的农民告诉阿尔博因国王：“我们都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脱下你的绣金长袍，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⁴⁴ 波茨坦仍然是喜歌剧演员们的总部，不过狂欢节期间他们也在柏林歌剧院表演。正如萨比娜·亨策-多林已经表明的那样，喜歌剧并不是弗里德里希的私人活动，而是他的美学计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当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和继承人于1776年访问柏林的时候，普鲁士为一场代表性活动花了很多钱，效果也很好，其中音乐庆典的重头戏就不是大歌剧，而是喜歌剧。⁴⁵

私人音乐

在歌剧事业之外，弗里德里希音乐事业的另一方面是他在卧室和书

房独处时进行的长笛独奏。从1728年他在德累斯顿第一次听到演奏家约翰·约阿希姆·匡茨的表演，直到他在晚年失去了牙齿，一支长笛从来没有远离过他身边。奥地利大使报告说，弗里德里希在黎明破晓之时（或是之前）起床之后，会立刻一边踱来踱去吹奏自己的长笛，一边等待咖啡的出现。一旦上午的军事和政治事务都已处理完成，他就回到他的内室之中，演奏起乐器来，直到每日主餐时间到来。⁴⁶ 他告诉达朗贝尔说，他从来不知道他在演奏什么，但他的即兴表演有助于思考。⁴⁷ 每天晚上，会有一场持续约2小时的私人演奏会，开始的时间在6点到7点之间，通常的参加者只有7到10位音乐家，虽然偶尔也会有客人被允许入席。在这些时候，弗里德里希表演3到5首协奏曲和一些奏鸣曲，曲子由他本人或是匡茨谱写。然后他倾听匡茨表演的一首曲子。结束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偶尔是一支大提琴独奏曲，通常则是一支咏叹调。⁴⁸ 正如这件事所暗示的那样，匡茨在弗里德里希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至于有人说普鲁士实际上是被匡茨夫人的哈巴狗统治着，因为弗里德里希对匡茨言听计从，匡茨对他妻子言听计从，而她对自己的宠物百般顺从。⁴⁹ 匡茨之重要性的更好象征则是他为弗里德里希谱写的299首长笛协奏曲，只是因为他在1773年去世，才没写出第300首。失去了朋友的弗里德里希现在放弃了管弦乐音乐会，从此以后只在键盘伴奏下进行独奏表演。⁵⁰

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是一个有造诣的长笛演奏家。这一点从他自己的作品或为他创作的作品中可以推断出来，也为少数被挑选出来真正听到他表演的听众所证实。其中有查尔斯·伯尼，他的专业意见必须受到尊重。他描述了他在波茨坦参加的一场音乐会：

音乐会开场表演的是一首德国长笛协奏曲，陛下在其中的独奏部分表演得非常精确；他的口型清晰又均衡，他的指法华丽，他的风格纯粹又简单。我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是惊异于他在快板部分表演的干净利落，以及他在慢板部分的表达与情

感。总之，他的表现在很多细节上超越了我听过的所有业余爱好者的表演，甚至超过了某些专业人士。陛下接连表演了3首时间长且难度大的协奏曲，每一首都同样地完美。⁵¹

另外，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夏特的评价也是有权威的，尤其是因为他总体上不喜欢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政权。他批评弗里德里希对快速乐段的演奏，因为他往往滞后于管弦乐团，尽管乐团中的音乐家们尽最大努力调整自己的节奏；但赖夏特承认，在慢板部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毋庸置疑，他感受到了他所演奏乐曲的情绪；感人的过渡，极其细微的重音和小小的装饰旋律，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精致和温柔的感觉……他的整个慢板是一种温柔的倾诉，有着纯洁的、优雅的、经常很感人的、唱歌一般的声调——这是他的表演来自他灵魂的最可靠证据”。⁵²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门下弟子中有门德尔松——记载道，弗里德里希的键盘手卡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法施“为国王服务了30年，还比他多活了14年，他反复跟我提起过，他只听过3个演奏家以真正感和庄严的方式演奏一首慢板。第一个是他的朋友、使用键盘的伊曼纽尔·巴赫，其次是使用小提琴的弗朗茨·本达，而第三个则是使用长笛的国王”。⁵³

像他的导师匡茨一样，弗里德里希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不顾父亲对任何这样的“娘娘腔”行为的反对，他从7岁开始就在通奏低音和四部和声作曲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⁵⁴他最雄心勃勃的管弦乐作品——4首长笛协奏曲和1首D大调交响曲——是他还身为王储的时候创作的。1738年，他下了一个痛苦的结论：他将永远无法获得能让他在这类作品中扬名立万的技巧，真正一流的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在其家中的存在可能加速了这一决定，更不用说匡茨还偶尔来访，他在演奏和作曲方面都超过了弗里德里希。⁵⁵从此他将自己的音乐创作限定在歌剧咏叹调、宫廷舞曲，尤其是长笛奏鸣曲方面。⁵⁶他完全放弃作曲之时，是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时他已经创作了121首长笛奏鸣

曲。这些乐曲在他在世时都没有出版过，它们被创作出来只为他和匡茨演奏使用。⁵⁷ 这些虽然可能缺乏深度和独创性，但还是令人愉快的片段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唱片和演出录像中听到。⁵⁸

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宫廷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体现了当时主宰欧洲的“华丽”风格。这种风格意味着“音乐的旋律是有周期的，伴奏轻柔，并以适当的方式演奏”，研究这一风格的最重要的现代历史学家丹尼尔·哈茨这样描述道。⁵⁹ 复杂的对位法和赋格曲被称为“博学的风格”，华丽音乐则与之截然相反，“意味着追求取悦人”（伏尔泰）。⁶⁰ 它当然做到了这一点，弗里德里希作品众多的录音可资证明。他的音乐团队也是华丽风格的理论中心，因为巴赫、匡茨、阿格里科拉、弗里德里希·威廉·马尔普格、约翰·菲利普·克恩伯格和约翰·格奥尔格·苏尔兹阐述了这一风格的目标。用巴赫的话来说，音乐应该表达人性，因为它是情感的语言。它反映了人类的情感世界，任务是“把心灵转变成温柔的感性”。它召唤出来的“温柔的眼泪”不是自我放纵的情绪化，而是促进了德行。⁶¹ 换句话说，华丽风格音乐追求和同时代的塞缪尔·理查森非常成功的小说达到同类效果。弗里德里希是这个感性世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给姐姐威廉明妮的信中所显示的那样，比如有一次他告诉她，他写的一段音乐，灵感来自与她分离的痛苦，这解释了这段音乐为何带有忧郁的特征。⁶²

弗里德里希在歌剧院、在音乐厅，甚至在卧室都有音乐相伴。他也将音乐随身带到了战场上，不只是他可靠的长笛（由弗雷德斯多夫照管），还有挑选出来的音乐家，当他们看到战场上无法摆脱的困苦生活时，无疑会诅咒自己的命运。其中就有法施，他带着便携式的键盘陪同弗里德里希出征，那键盘一直是王家辎重车的一部分。它是在巴黎制造的，可以被拆成三部分以便于运输。⁶³ 在弗里德里希于1745年12月15日的凯瑟尔斯多夫会战中击败萨克森军队、胜利进入德累斯顿后，他很快行使的征服权力之一就是命令萨克森的乐团在第二天晚上表演哈塞的歌剧《阿米尼奥》。歌剧按时上演了，由作曲家指挥，并由他的妻子、女

高音明星福斯蒂娜演唱。然后，在弗里德里希逗留的9天中，这对夫妇被迫每天晚上都为弗里德里希表演室内音乐会。⁶⁴ 在1760—1761年的冬季，他回到这座城市，发现在5年的毁灭性战争中，普鲁士人住在这里耗费萨克森人的钱物，已经破坏了乐团，所以他不得不派人把自己的管弦乐队从柏林搬过来。⁶⁵ 乐团也被用作外交政策的武器。当1769年8月弗里德里希在西里西亚的尼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见面时，他建了一个临时剧场来表演喜歌剧，既娱乐自己，也给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⁶⁶ 次年，他们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再次会面，此时也有一个歌剧团陪着弗里德里希。⁶⁷

公共领域中的音乐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弗里德里希的世界都充满了音乐，音乐发挥了娱乐、展示、表达、治疗甚至外交的作用。但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在地理上限制在柏林、波茨坦和弗里德里希碰巧去过的地方，在社会影响上也仅限于被邀请的人士。柏林的新歌剧院这么大，即使把整个宫廷都装进去也还有空位，而穿着体面的市民在贿赂过门卫后也可以进入乐池。他们也可以买到最上一层包厢的票，下层包厢的票则是为贵族保留的。《柏林日报》在庆贺1743年的狂欢季时发布了以下的新闻：“外国人和土生土长的〔普鲁士〕居民一样，不论身份，都被允许免费参加歌剧、戏剧和假面舞会。”⁶⁸ 正如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那样，这里的军事元素也是突出的。根据弗里德里希的明确命令，所有的将军和参谋人员都参加了1743年12月的开幕之夜，排队站在乐池里，站在留给国王和高级官员的两排扶手椅后面。⁶⁹ 此后，驻扎在城市的每个团都有权要求一定数量的门票，这必然限制了市民们能获得的票数。⁷⁰ 市民能获得的票数还进一步受到外国游客优先获票权的限制。⁷¹ 据女高音歌唱家伊丽莎白·玛拉所述，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士兵会被派到剧院，以他们身体散发的热量温暖观众席。⁷²

音乐会也会在柏林的其他地方由王后、王太后和王室的其他成员举办，借用的是国王的乐队成员，但这些音乐会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另一些小型乐队的演出也是如此，他们的主人是弗里德里希的弟弟们，海因里希亲王和奥古斯特·费迪南德亲王。⁷³普鲁士贵族家庭所掌握的财力让他们无法像奥地利显贵们如艾斯特哈齐亲王或洛布科维茨亲王那样资助一个适合海顿或贝多芬的乐队。普鲁士的公共领域也没有大到足以让一个自由职业音乐家谋生，像莫扎特在18世纪80年代的维也纳所做的那样。不过，上层树立的榜样确实鼓励了准独立的音乐文化的发展。⁷⁴它只能被称为准独立，是因为参与其中事务的很多人，特别是处于指导地位的人，都受雇于王室。他们正是在大量的休闲时间里才能组织音乐协会和活动。早在1755年，在柏林靠着做音乐记者勉强谋生的弗里德里希·威廉·马尔普格就报道称，自从弗里德里希登基以来，该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音乐中心，音乐会频繁上演，音乐社团十分活跃。例如，由皇家风琴手约翰·菲利普·扎克组织的音乐表演社团，每个星期六都有音乐会，“有身份的淑女绅士纷纷参加”。⁷⁵这些是小规模的活动，出席的最多只有几十人，但到18世纪80年代，堪与巴黎的圣灵音乐会或伦敦的萨洛蒙联票音乐会比肩的一系列音乐会已经出现了。⁷⁶然而，必须承认，柏林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与巴黎、伦敦，甚至是与曼海姆或维也纳并驾齐驱的交响乐中心。⁷⁷

戏剧界的发展类似，不过，因为经营剧院需要获得正式的经营“特权”，它必然更为规范一些。两个企业家（1733—1735年是海因里希·戈特弗里德·科赫，然后是卡尔·特奥菲尔·多伯林）在贝伦斯街的一个剧院经营着一个商业剧团，这个剧团对柏林的平民们有着广泛的吸引力。1776年它拥有58名演员、歌手和音乐家，在剧目方面呈现出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喜歌剧的混合。⁷⁸在1778年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弗里德里希解散了他的法国剧团，使得这个商业剧团有更多演员可供选用。到1781年，它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大的剧团。从最初“整体而言邋遢、糟糕的一群人”（托马斯·鲍曼语）⁷⁹，多伯林将剧团发展成为德意志

北方最好的剧团，包括女高音明星玛丽·索菲·尼克拉斯、天才作曲家约翰·安德烈和多产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布雷茨纳。⁸⁰他们在一起给予大众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强烈的情感体验，正如记者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冯·博宁所说：“高级悲剧和近似滑稽的喜剧现在在这里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的公众不再要求缺乏强烈活力的东西。人们想被感动得不行或是笑破肚皮——简单的感伤是做不到的。”⁸¹

总之，随着弗里德里希统治时间的推移和公共领域的扩大，他在首都音乐生活中的影响力减少了。这在一个弗里德里希与其说是忽视不如说是鄙视的流派上特别明显——教堂音乐。查尔斯·伯尼1772年访问柏林时，他被告知那种神圣的音乐在柏林是被忽视的，因为弗里德里希拒绝听它，并且他对这种音乐“怀有的偏见如此之强，以至于当他听说任何作曲家写了圣歌或清唱剧，他就认为该作者的品位被它污染了，并对该作者的其他作品评论道：‘哦！这有教堂的气味。’”⁸²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弗里德里希最喜爱的作曲家还创作了18世纪欧洲德语地区最受欢迎的受难曲，远超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任何杰出的受难曲作品。这就是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的《耶稣之死》，于1755年圣周的星期三在柏林大教堂首演，歌词是诗人卡尔·威廉·拉姆勒的作品。此前不久，使用了同一份歌词但由泰勒曼谱曲的版本在汉堡首演。这一清唱剧在复活节的表演非常受欢迎，在18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成了柏林一年一度的固定表演节目，几乎持续到19世纪末期。事实证明，它是格劳恩所有作品中最久经考验的，频繁被搬上舞台，在几种唱片中出现，还有无数的精华选段被上传到网络。

王家音乐重要性的下降只是相对而非绝对而言的。大众认为，弗里德里希在晚年丧失了对音乐的兴趣，并缩小了他的音乐机构，这是没有道理的。赖夏特的回忆录要对这种大众观点的产生负很大责任。弗里德里希似乎确实瞧不起赖夏特的能力，给他的待遇也是与这一评价相应地差，但他的回忆录中还是包含有许多谎言。例如，他说弗里德里希憎恶喜歌剧且很少出席，这就是“纯粹的虚构”。⁸³根据弗里德里希·尼古拉

列举的数字，弗里德里希1779年的音乐机构无疑是庞大的：一个大约40名乐手的乐队，由8个独唱者和24人的合唱队组成的正歌剧剧团，5个独唱者组成的喜歌剧剧团，10人的法国剧团，和一个包括1名芭蕾舞教练、3位主演和12名舞者的芭蕾舞团，更不用说大量的后台工作人员，包括木匠、理发师、服饰女主管等。⁸⁴然而，在其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越发少地出现在柏林歌剧院，他最后一次出席是在1781年。⁸⁵

音乐保守主义

弗里德里希到死都没有改变风格，尽管流行的风格不断改变。他尤其固执己见，会马上做出反应，批评他的同行音乐家们。他一直都是这样。“亨德尔的伟大日子结束了，他的灵感已经枯竭，他的品味落后于时尚。”他在1737年这样说，当时亨德尔还没有创作《薛西斯》《弥赛亚》《塞默勒》等作品。⁸⁶他热衷的音乐范围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不算大，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更是进一步缩小了。他越来越抱怨欧洲的文化已经衰败了。1771年他告诉伏尔泰，目前流行的那种歌剧在路易十四的全盛时期是不会获得认可的。但现在它已经被当成了高质量的作品，“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天才和常识一样稀有，普遍平庸暴露出的坏品味将把欧洲推回到野蛮状态中，过去是一大群伟人把欧洲从这一状态中解救出来的”。他虔诚地补充说，目前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因为他们有伏尔泰，“他是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将倾大厦的阿特拉斯”。⁸⁷6年后，他写了一封真情实意的信给他有音乐天赋的红颜知己、萨克森选帝侯的遗孀玛丽娅·安东尼娅：

这里的观众正在享受哈塞的歌剧《克莱奥菲德》，它正在歌剧院中复兴。好东西是持久的，即使我们在过去已经听过它

们，我们也喜欢再次聆听。无论如何，当今的音乐已经堕落为一片喧嚣，是在攻击而非爱抚我们的耳朵，并且高贵的歌唱艺术在这一代已经遗失。为了再次找到它，我们必须回到芬奇、哈塞和格劳恩。⁸⁸

与自己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直率态度一致，弗里德里希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法国音乐是他不能接受的；海顿的交响乐是“抽打耳朵的喧嚣”；格鲁克被他用“暴力的表达和侮辱”痛骂；赖夏特不被允许为柏林狂欢季写歌剧，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把所有事情都做错了”；莫扎特他从来没有提到过。⁸⁹ 1780年5月，卢凯西尼侯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弗里德里希对所有“现代音乐”的抨击。⁹⁰ 甚至他喜欢的作曲家也不能免于困扰。反复受命重写咏叹调的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最终反抗，说他的歌剧《德摩封特王》中的咏叹调“可怜的宝贝”的谱曲是非常好的，他无法再改进了。弗里德里希立即下令在演出中用约翰·阿道夫·哈塞的同一咏叹调替代它。⁹¹ 法施认为，公众表示喜欢格劳恩的原版，不过他没有解释这种对国王干预的含蓄批评是如何表达的。⁹²

弗里德里希作为鉴赏家和资助人的局限在消极的一面暴露得最明显，也就是他没能认识到自己是“18世纪后期音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作家、教师、演奏家之一”的雇主。⁹³ 这个人就是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众多儿子中最有天赋的一个。⁹⁴ 弗里德里希尚为王储的时候首次临时雇用过他，从1740年到1768年他是乐团中的常驻成员。这一时期里他创作了300多部作品，主要是键盘乐和室内乐，但也有9部交响曲、38首键盘协奏曲、1首《圣母颂》、1部《复活节康塔塔》和众多的歌曲。⁹⁵ 这种创作能力表明，他有大量的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尤其是在弗里德里希外出演习或打仗的时候。即使在他的雇主回到波茨坦的时候，巴赫也可以与第二大键琴手轮流为弗里德里希的音乐会提供键盘伴奏。⁹⁶

被低估的痛苦感觉是让人难以愉快的。在巴赫通过艰苦努力争取到为匡茨的又一首长笛奏鸣曲做伴奏的机会时，他一定非常渴望有机会展示自己更大的才华。1755年，情况到了紧急关头。根据弗雷德斯多夫的说法，他提交了一份包含了“太多怨言”的抗议书，通过弗雷德斯多夫呈送给弗里德里希。关键的不满在经济方面的。他每年300塔勒的可怜工资不仅不够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也是侮辱性的，因为他知道他以前的学生克里斯托夫·尼歇尔曼和约翰·弗里德里希·阿格里科拉的薪水是自己的两倍。弗里德里希批下的旁注很简洁：“巴赫在撒谎，阿格里科拉只有500塔勒。”他又说，巴赫还很“自大”。弗里德里希确实勉强同意增加巴赫的薪水，但补充说要等到下一次支出的时候。⁹⁷这让他普鲁士又待了10年，但到1768年，他终于去了汉堡，接替他教父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做该城的教堂音乐总监。弗里德里希至少能够欣赏巴赫作为键盘手的技能，只是“经过反复〔且〕恭敬的规劝”之后，他才允许巴赫离开。⁹⁸

对于他的同时代人而言，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是“伟大的巴赫”；对后世而言，这个头衔是他父亲约翰·塞巴斯蒂安的。⁹⁹1747年，后者去波茨坦看望儿子。在所有访问过弗里德里希宫廷的人中，这一位留下的纪念物是最持久的，以《音乐的奉献》（BWV 1079）^②的形式。5月7日老巴赫出现在波茨坦城市宫，请求参加弗里德里希的晚间音乐会。这个故事后来被巴赫的首位传记作者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传播开去，说是弗里德里希得知巴赫在城里，派人请他来，但其真实性是有问题的。¹⁰⁰无论如何，他被及时地许可进入，并被展示了弗里德里希所收藏的、由戈特弗里德·西尔伯曼打造的精美古钢琴。（它们的存在表明，至少在这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处在音乐技术的前沿，因为该乐器是大约1700年才由帕多瓦的巴尔托洛梅奥·克里斯托福里发明的。）根据柏林一家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弗里德里希坐在其中一架前面，弹奏了一个主题，并邀请巴赫按照此主题即兴创作一首赋格曲：

上述的这位乐队指挥如此恰当地完成了作曲，不仅陛下因此高兴地立刻展示他的满意之情，而且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巴赫先生发现国王给他提供的主题极其漂亮，他打算把它作为一首固定的赋格曲写在纸上并刻在铜上。¹⁰¹

第二天晚上，巴赫再次参加晚间音乐会，这一次他被要求即兴作一首六声部的赋格曲。1774年奥地利公使戈特弗里德·范·斯威滕记载道，弗里德里希热情地谈论巴赫的能力，“为了证明给我看，他高声唱出一个半音阶的赋格主题，这是他给这位老巴赫的主题。巴赫当场把它变为四声部的赋格曲，然后变成五声部，最后变为八声部”。¹⁰² 这个故事大概是随着讲述成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巴赫在回到莱比锡之后的几周内，就把弗里德里希的主题变成了一部高度复杂的作品。他的献词标注的日期是1747年7月7日，声称他的《音乐的奉献》中“最高贵的部分”出自国王本人之手。¹⁰³

音乐室

弗里德里希所拥有的数量众多的西尔伯曼钢琴中由巴赫弹过的那架放在波茨坦城市宫华丽的新音乐室中。这座房间由雕刻家和粉刷匠约翰·奥古斯特·纳尔根据“国王规定的指导方针”完成，位于东南角，紧邻弗里德里希的书房和卧室。¹⁰⁴ 它的装饰方案是“弗里德里希式洛可可风格”的典型例证——窄浅的壁柱框住了许多细腻、精致、非对称的图案，一些是抽象的，一些来自植物、动物（特别是鸟类）和音乐，所有图案都镀上了银色，类似的图案遍布整个天花板。朗克雷的两张画，《秋千》和《喷泉畔的舞蹈》，纳入了装饰方案，还有一张鲁本斯画作的小型复制品，这可能看起来不太协调，但事实上，它非常适合一个为弗里德里希建造的房间，因为它表现的是维纳斯限制玛尔斯的徒劳。¹⁰⁵ 装饰

方案通过匹配的家具得到了补充，家具放在由形成鲜明对比的菱形对称图案组成的镶木地板上。整体效果明亮、优雅、精致、高雅。以一种不太同情的眼光看，尤其是对那些从现在往回看的人来说，它也可能显得过于华丽。同样的评论适用于宫殿西南角建造的第二个类似的音乐室。在城市宫中，洛可可螺旋装饰的房间一个连着一个，这确实可能让人感到疲乏无力。但这是弗里德里希喜欢的，他的口味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可以从他在莱茵斯贝格的第一个重要建筑项目和最后一个重要建筑项目——波茨坦新宫上看得出来。

在莱茵斯贝格，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在建筑方面展示了他对音乐的热情：建筑中最大的空间——镜厅被分给了这项爱好。那里以音乐为主题的装饰很丰富，包括奥维德《变形记》中显示音乐转换之力的场景。

¹⁰⁶ 弗里德里希在品味方面是极其连贯的，奥维德的这些音乐场景在他的许多其他建筑上一再出现。¹⁰⁷ 除了这个大音乐厅，他还曾在莱茵斯贝格的私人套房中修建了一个较小的专用音乐室并被一直使用下去。1745—1747年在柏林的王宫中为他修建的套房里，也包含着一间音乐室，位于宫殿二楼，可以俯瞰施普雷河。¹⁰⁸ 它每年使用的时间只有几天，因为弗里德里希只在狂欢季住在这里，从12月下旬到1月24日他的生日，1763年之后他在首都花的时间更少了。¹⁰⁹

夏洛滕堡宫和波茨坦

显然，弗里德里希在波茨坦最有家的感觉。在和平时期，当他没有身处众多的巡回视察之中或指挥军事演习之时，他就在那里的城市宫度过冬天，在无忧宫度过夏天。在他刚继承王位的时候这并非显而易见的选择。起初他似乎更有可能偏爱夏洛滕堡宫，那里地处乡下但靠近首都，水路便利且有很大的扩建空间。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他就在那里度过。¹¹⁰ 次月，也正是在那里，他做出了第一个大型建设项目的委托

。弗里德里希和克诺贝尔斯多夫一定提前做好了计划，因为施工立即开始了。12月以后，弗里德里希外出打仗，战事并没有阻止他对施工进展的密切关注。“告诉克诺贝尔斯多夫，让他写信谈谈我的建筑、园林、家具和歌剧院，好让我开心。”1742年4月他从西里西亚给他的朋友夏尔一艾蒂安·若尔丹写信说道。¹¹¹ 克诺贝尔斯多夫按时满足了这些要求，但弗里德里希发现他的信讲得不充足：“这一切都太干巴巴了，没有任何细节。我想让你写满4张4开的纸来描述夏洛滕堡的每一个圈线装饰，那会给我带来很多乐趣。”¹¹² 类似的要求连续不断。5月底，弗里德里希嘱咐若尔丹，让克诺贝尔斯多夫告诉他夏洛滕堡宫、花园和歌剧院的进展，并补充道：“置身这些建筑之中我宛若一名孩童；这些是我自娱自乐的玩具。”¹¹³

所有这些威逼的话语都达到了弗里德里希想要的效果。1742年8月25日，《布雷斯劳条约》签订后，弗里德里希从战场归来，立刻去夏洛滕堡检查克诺贝尔斯多夫新建的侧翼。工程已经取得足够的进展，可以正式开放他的私人套房，4天后，被称为“白厅”的大宴会厅也完成了。¹¹⁴ 在1743年底竣工的内敛的古典主义外观之下，其内部则是弗里德里希最偏爱的洛可可风格。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巨大的接待室，后来被称为“黄金长廊”，长42米，横跨整座建筑。不用说，这里也有一个音乐室，墙壁装饰为白色和灰色相间的优雅组合，还有一个镀金的天花板，由约翰·奥古斯特·纳尔和约翰·米夏埃尔·赫本豪特设计并完成。¹¹⁵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一楼有为王后保留的大型套房，虽然她从来没有使用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未能获得出席1748年庆祝新侧翼落成的活动的邀请。

尽管这一建筑工程花销巨大，但夏洛滕堡从来只是弗里德里希偶尔的落脚地。1740年曾予以讨论的另一种方案是扩建他现有的居所莱茵斯贝格，可能因为此地距离柏林将近100千米被否决了。波茨坦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地方。虽然在他统治的第一年，城市宫里有一套套房为他翻新了，但这个项目仅仅是提供基本的住宿而已，是为了让他在城里处理

军事事务时使用的。直到1743年底，他才下令开工建造一个更为持久——也更为辉煌——的套房。¹¹⁶到了第二年，建设的规模表明，他最终选择了波茨坦作为他的主要居住地。在接下来的10年里，城市宫内外都得到了整修。为了庆祝并宣扬对西里西亚的征服，外墙上的盾形纹章扩大了，还大量使用西里西亚的大理石。¹¹⁷虽然旧建筑的基本楼层方案被保留了下来，但外部只有命运女神之门得以保留，这扇门是1701年由弗里德里希的祖父为了庆祝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升格为普鲁士王国而修建的。¹¹⁸在其他地方，弗里德里希的建筑师克诺贝尔斯多夫将侧翼架高了一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外观，并在花园一边添加了一座有外部楼梯和独立柱廊的华丽建筑，弗里德里希非常喜欢这样。¹¹⁹在内部，在霍亨索伦家族宅邸的历史上首次没有为王后分配住处，然而有为弗里德里希的弟弟们修建的套房；柏林科学院的负责人莫佩尔蒂，甚至布雷斯劳的采邑主教（伦道夫伯爵给他起了一个暗示性的绰号“所多玛的主教”）都有安排房间。¹²⁰还有一间小却装饰华丽的剧院。不出所料，以前小教堂占据的空间现在被世俗化了，改为客房使用。¹²¹

无忧宫

决定性的突破于1744年的夏天到来。6月，弗里德里希把莱茵斯贝格给了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8月10日，他发布命令，开始建造无忧宫。这座宫殿一直与他联系最紧密，这是无疑的。在他主持修建的众多建筑中，其他建筑都是模仿他人的：它们当然优雅且精致复杂，但被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方更好的晚期巴洛克或洛可可风格建筑所超越。和这些建筑相比，比如和1744年完工的维尔茨堡宫相比，无论波茨坦的城市宫还是新宫，都无法望其项背。弗里德里希宫殿的大部分天花板都是安托万·佩恩画的，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但跟1751—1753年间绘制了维尔茨堡宫宏大的天花板壁画的乔万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不在同一个水平。柏林的歌剧院是非常大的，也拥有独立式建筑的特色，但在审美情

趣方面远不及拜罗伊特或慕尼黑的剧院。在规模方面，弗里德里希建造的任何建筑都没法跟曼海姆拥有450米长外墙的庞大宫殿相比，该宫殿是普法尔茨选帝侯于1720年和1760年之间修建的。而要论建筑规模和美轮美奂的室内装饰之结合，桂冠必须授予哈布斯堡家族的夏宫——美泉宫，玛丽娅·特蕾莎皇后于18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将其重建。

然而，弗里德里希小巧的无忧宫能够骄傲地彰显自己在魅力和创意上的地位。此外，这座宫殿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创作。他选择的地点是一处未开发之地，在波茨坦城外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城市和哈弗尔河，他父亲在那里有一个菜园和一座小型避暑别墅。他嘲弄地称该别墅为“马尔利”，这是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庭院里修建的一座宫殿的名字。8月10日弗里德里希的命令是要求在山坡上开凿6级台阶，以容纳前一年从法国订购的大量果树和葡萄藤。¹²²虽然直到1745年1月，建筑材料才订购好，但他很可能早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版本的马尔利。像往常弗里德里希所青睐的项目一样，工程急速进展着。1745年4月14日安放了奠基石，秋天已经铺上了屋顶。1747年4月，弗里德里希位于东翼的房间已经可以住人了，最后一个重要的房间——大理石大厅在第二年竣工。要确定设计由谁负责，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虽然有两张出自弗里德里希之手的图纸幸存了下来，但还不清楚它们是在建筑物完工之前还是之后画成的。最好的猜测是，他提供了所有的想法，直到装饰细节，而克诺贝尔斯多夫和他的助手们画出了必要的图样。¹²³在主顾和建筑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为了防潮，克诺贝尔斯多夫强烈要求安装酒窖，也要求把建筑推进到平台的角落，并把它建在抬高的地基上，以改善从下往上看这座宫殿的效果。他的建议被拒绝了。¹²⁴弗里德里希只关心自己眼中的、从内往外看的无忧宫风景。¹²⁵它的位置明确表明，它不是要承担重大典礼功能，引道太陡峭，不能供马车行走。¹²⁶

以皇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座小型建筑，一座非常小的建筑。实际上它就是把莱茵斯贝格或波茨坦城市宫里弗里德里希的私人套房变成了一座独立的居所，再添上为少量客人准备的第二套房间。他在建设无忧

宫时想到了莱茵斯贝格，他在自己的草图上写给克诺贝尔斯多夫的指令体现了这一点——“柱廊要是科林斯式的，但其他的要像莱茵斯贝格那样〔那里的柱廊是爱奥尼亚式的〕”。甚至建筑物尽头的圆形房间也让人联想起在莱茵斯贝格的塔楼，弗里德里希曾将其中一座作为图书馆使用。对于这个房间，他在计划上也写了“跟莱茵斯贝格一样”。在风格上，北面相对朴素的法国式外观与前方繁茂的花园形成引人注目的对比，花园中突出的中央阁楼和18对承接檐口的女像柱在整体上有一种雕刻般的、意大利风格的感觉。¹²⁷

像往常一样，内部装饰更为奢华。无论是由于建筑规模较小还是因为用心更多，其结果都是无忧宫成了弗里德里希所有建筑工程中最为成功的，排在该世纪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即使是最为严厉的清教徒肯定也会屈服于这些迷人房间的魅力之中。这些房间风格不一，有入口大厅和大理石大厅的代表性的辉煌，也有弗里德里希图书馆的私密。就像在莱茵斯贝格一样，图书馆是一排中的最后一个房间，也是最私密的，很少有人能获准进去，只有伏尔泰和达朗贝尔这样的人才可以。¹²⁸显而易见，每个房间里的手艺都是最高级的，从马赛克、拼花地板以及装饰华丽的天花板都可以看出来。传言弗里德里希喜爱大理石，尤其是曾经专供罗马皇帝使用的稀有品种，这一点也体现得特别明显。¹²⁹

对细节的注意，还明显地体现在围绕在小小宫殿周围的花园和庭院里。由于他年轻时从未被允许去进行大旅行，弗里德里希不得不依靠描绘欧洲伟大园林的版画激发灵感。¹³⁰从6级葡萄藤台阶下去，底部是法国风格的、有花坛的规则式花园，花坛中的植物排列成漩涡状的阿拉伯式图案，整体上又被多排樱桃树框住。在中间，在从宫殿延伸出来的路与一条由东至西的林荫道垂直交会处，是一个观赏池塘，点缀着一组雕像，雕刻的是海洋女神忒提斯和她的随从。到处都可以发现弗里德里希热爱雕塑的证据：庭院的东门口有标志性的方尖碑，西头有柱廊，圆盘形的装饰不时打断连接两者的林荫路。¹³¹多年来弗里德里希在庭院里增添了许多小型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精致——又极度奢侈——的中国

茶亭，由约翰·戈特弗里德·布林于1755年至1764年之间建造，是欧洲当时流行的中国风格中最为出色的建筑案例之一。¹³²更接近真实的中国风格建筑是在1769—1770年在庭院边缘修建的“龙屋”，其设计灵感来自威廉·钱伯斯爵士的《中国建筑的设计》。¹³³七年战争后，弗里德里希将庭院向东扩建、以便为新宫腾出地方时，也显示出他意识到了审美口味的变化。这一工程包括把中轴大道向西延伸，完工后的大道西端距东端足有2.5千米。

弗里德里希、克诺贝尔斯多夫和项目经理约翰·博曼指挥协调着大批艺术家和工人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创造出了无忧宫及其庭院这样一个杰作，值得获得赞许。此外，最初建筑的几乎全部面貌到现在都仍然可以欣赏得到。宫殿里弗里德里希的私人房间之中，只有书房兼卧室在他死后有明显变动。宫殿整体上躲过了二战的炸弹，而许多的家具和大多数画已经放回了它们应在的位置。¹³⁴至于花园和庭院，可惜就保留得不是那么完整了，虽然原因更多是19世纪时尚的变化，而非敌人的行动。

宫殿

如果弗里德里希坚持只进行小规模的建筑项目如莱茵斯贝格或无忧宫的话，他可能会更快乐，他的国家也肯定会更富裕些。他涉足大规模展示性宫殿的冒险，无疑是失败的。第一次就是完全失败。在他统治之初，他筹划了一个在菩提树下大街修建庞大复杂建筑群的计划，阿尔加罗蒂将该建筑群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广场，就在当时的王宫西边。¹³⁵尽管后者是欧洲最大的王宫之一，且投入使用不到50年，但弗里德里希不愿意住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在那里已经遭受他父亲太多的折磨。¹³⁶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他曾计划在往西几百米开外的地方另建一所宫殿。他把这座计划中的宫殿称作“王宫”，它规模巨大，宽300米，纵深150

米，前方的广场宽500米，还要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所有建筑物都拆掉，一直到弗里德里希大街。这可能是受到最近完成的维尔茨堡宫的启发，虽然这一计划是那座巨兽般的宫殿的两倍大小。¹³⁷ 弗里德里希的妹夫、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拒绝出售自己的宫殿，因此弗里德里希的宫殿计划不得不修改。这座宫殿要向北推得更远一些，歌剧院的方向重新调整90度，网球场让位于一座给科学院使用的大型建筑。这是最大规模的巴洛克式城市规划了。宫殿前112根20米高的柱子组成名副其实的森林，显然是受到了贝尔尼尼为罗马圣彼得广场所设计的石柱廊的启发。¹³⁸ 最后，项目不了了之，因为弗里德里希的兴趣转向了波茨坦。1744年他将莱茵斯贝格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这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回到他以前的家；1747年，他命人在新的歌剧院对面建立了一座宫殿，又送给了这位颇受宠爱（尽管并不领情）的弟弟，这证实了他不会选择柏林作为自己的主要居住地。

弗里德里希确实建造了一座新的宏大宫殿，但位于波茨坦。这就是新宫，18世纪50年代初期就筹划了，建筑计划因七年战争推迟，在1763年恢复和平之后迅速开工，成为胜利的立体象征，同时也是显示普鲁士治理有方、尚有余裕大兴土木的广告。这座宫殿的确很宏伟——外部长220米，高55米，装饰有220根壁柱、312扇窗户和468座雕塑。宫殿内部约有200间有装饰的房间，总共638个房间。¹³⁹ 它也是始终如一地乏味，一个窗户接着一根高大的壁柱，反复重复。詹姆斯·利斯-米尔恩对那不勒斯附近更庞大的卡塞塔宫令人难堪的评论也适用于它：“密集的窗户和复杂的装饰迷失在庞大的身躯里，像一个无节制的胖女人胸口上方的小项链。”¹⁴⁰ 内部空间的安排方式之所以如此不寻常，是因为这座宫殿的目的同样如此。它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座国王的居所，而是一个在夏天时接待弗里德里希的家庭成员和其他显贵访问的宾馆。¹⁴¹ 所以那里并没有大楼梯，只有4个相对便利的楼梯供私人进入专用套房使用。有一套房间是为国王修建的，隐蔽在一楼的南侧。不过，新宫里也有4个主要的展示性房间：一楼的人工洞室，也被称为“贝壳室”；“大理石

长廊”；二楼被称为“上层长廊”的舞厅；还有“大理石厅”。“大理石厅”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跟整个建筑一样宽，有两层楼那么高。当然了，还有两个音乐室，每层一个。¹⁴²建筑中最成功的房间是剧院，让人再度体验无忧宫那种私密的优雅感。座位只有100个左右，并未设置国王包厢，这突出了剧院的私密性质，弗里德里希选择坐在正厅第三排的座位上。¹⁴³每个房间的装饰和布置都极为奢华，正如一个匿名的匈牙利贵族在1784年记载道：“宫殿内部的富丽堂皇和品味超越了我所有的期望。我从未在其他宫廷见过如此珍贵的桌子、花瓶、雕塑和地板。”墙壁“是紫色和白色的大理石”，地板“是黑色、白色、黄色和紫色的碧玉和紫水晶”，桌子上“镶嵌玉髓、玛瑙和青金石”等。¹⁴⁴

无论是新宫的外观还是内饰，都在其魅力和原创性方面不如庭院另一端的无忧宫。事实上，即使说不上是老派守旧，新宫也是彻头彻尾的模仿品。它的外观明显抄袭了范布勒和霍克斯莫尔的霍华德城堡，却没有后者那么有趣，该城堡位于约克郡，1699—1712年为卡莱尔伯爵建造。¹⁴⁵贝壳室也是落后了一个时代的设计风格，估计之前在德意志有十几个类似的房间。总的来说，其夸耀胜利的特色更像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而非一位开明统治者的住宅。最近从萨克森作为战利品带回来的宝贵艺术品在突出的地方展示着，包括24件迈森瓷器“雪球花瓶”，还有从萨克森首相、弗里德里希痛恨的布吕尔伯爵宫殿里洗劫的镜子。¹⁴⁶在大理石厅，8位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雕塑傲慢地看着4位伟大的皇帝：尤利乌斯·恺撒、君士坦丁、查理曼和（相当狗尾续貂的）鲁道夫二世。新宫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座重要的巴洛克式宫殿，正如其看起来那样。¹⁴⁷南侧的施工工程，包括弗里德里希自己的套房，完工得很快，以便他搬进去并直接指挥其余的工程。¹⁴⁸建筑师通常被认为是卡尔·冯·贡塔德，但是，像往常一样，真正的指导之手是弗里德里希。他傲慢又无知的干预往往导致出现问题。他在主门厅设计的两个楼梯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补救、昂贵的拆除和重建。专家们劝告说，由于地下的高水位，必须要打深地基；由于他拒绝听从，形成了一个永久

性的问题。不可避免的水灾问题直到20世纪末才得以解决。 ¹⁴⁹

从建筑方面来说，更有创新性的地方是新宫的附属建筑，它是两座大型服务性建筑的巨大混合体，以柱廊连接，由法国建筑师让-洛朗·勒热设计。这部分建筑包含了厨房以及仆人和廷臣的住处，它们级别不够高，不足以进入主宫殿。它也用来隔开外面让人讨厌的沼泽景观。 ¹⁵⁰

在建筑风格上，就像在音乐上那样，弗里德里希的品位早早确定并且毫无进步。无忧宫是莱茵斯贝格的晚期版本，新宫是波茨坦城市宫的晚期版本。看着为他制作的天花板或墙面装饰，很难确定它们是出自18世纪40年代还是18世纪70年代。 ¹⁵¹ 有人可能会进一步补充说，新宫表明弗里德里希的品位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复古。他收藏的大量建筑概略图和版画是被他父亲所拒绝的大旅行的替代品，他从更早的时代选择设计风格，让建筑师来实现。 ¹⁵² 所以波茨坦城市宫外面的老集市呈现出一副罗马建筑的外观，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外形借鉴了罗马的圣母大教堂，牧师住宅和学校都脱胎于罗马费迪南多·富加设计的奎里纳尔山上的康苏塔宫。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出现了：这些罗马-巴洛克风格建筑所体现出的宗教文化与帕拉第奥式的城市宫所代表的理性世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¹⁵³ 市政厅仿照的是帕拉第奥在维琴察安加拉诺宫未实现的设计。其他能在广场找到影子的帕拉第奥式建筑还有瓦尔马拉纳宫和朱利奥·卡普拉宫，它们都位于维琴察，以及威尼托区的巴巴罗别墅。为了营造统一的焦点，克诺贝尔斯多夫在广场中央巧妙地设置了一座方尖碑，上面有4个铜制的勋章形雕塑，分别表现弗里德里希和他的3位前任，他们都身着罗马盔甲，也宣示着霍亨索伦家族的力量和弗里德里希对家族的自豪感。 ¹⁵⁴ 在波茨坦的其他地方还可以找到模仿罗马宏伟宫殿的迹象：布拉曼特的卡普里尼宫和拉斐尔的维多尼宫。 ¹⁵⁵ 正如阿尔加罗蒂观察到的那样，弗里德里希似乎试图让波茨坦成为建筑风格的学校，就像它已经是军事艺术的学校一样。 ¹⁵⁶ 在他统治期间，超过20座建筑的外观直接照搬自古典意大利、中国或英国的原型。 ¹⁵⁷

在弗里德里希的建筑工程中，最为落后的是柏林王家图书馆，这也是他最后的重要工程。在他已经在位30年以后，弗里德里希才采取措施，为超过15万卷的、庞大的王家藏书提供一座专门的建筑，它们以前收藏在主宫殿的一个侧翼中。因为其中主要是他无法阅读的拉丁语作品，或者是他不想阅读的德语作品，因此它们不得不等待这么久才引起他的注意，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似乎是被自己秘密小圈子里的一名成员说动了才采取行动的，这个人就是查理·泰奥菲勒·吉夏尔，1759年弗里德里希在开玩笑的时候给他取名“昆图斯·伊启里乌斯”，因为他在打赌恺撒麾下一名将军的正确名字时输掉了。¹⁵⁸虽然从理论上说，受命在歌剧院附近建造一座建筑的建筑师是米夏埃尔·菲利普·博曼和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翁格尔，但他们的任务只是简单地将奥地利著名的巴洛克建筑师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拉赫1726年首次设计的图纸转化为施工图。埃拉赫的设计只有一部分已经在维也纳实现；之所以不能全部实现，要么是因为会毁坏宫廷剧院，要么是因为资金短缺，还可能是两种原因兼有。鉴于这一点，弗里德里希很可能是想证明自己能够将哈布斯堡竞争对手只能在纸上完成的计划变成现实。埃拉赫的计划在维也纳只是霍夫堡宫整体的一个部分，效果很好，但把它变成在柏林的一座独立建筑，就不那么成功了。尤其是新图书馆的“凹字形状”让无礼的柏林人戏称它为“抽屉柜”。

弗里德里希的建筑设计频繁模仿他人。例如，波茨坦的法国人教堂，直接取自罗伯特·莫里斯1751年《建筑备忘录》中的插图。在无忧宫的庭院里，古代神殿照搬的是威廉·肯特1734年在斯托建的古代德行神殿；中国茶亭仿照的是1738年法国建筑师埃马纽埃尔·埃瑞·德·科尔尼为洛林公爵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修建的三叶草府邸；龙屋取自威廉·钱伯斯爵士送给弗里德里希的两本建筑设计图册——《中国建筑的设计》（1757年）和《邱园花园与建筑的设计图、立面图、剖面图和透视图》（1763年）。¹⁵⁹从波茨坦的另外两座建筑上也能看到英国人的影响：希勒-勃兰特大楼基于伊尼戈·琼斯为白厅一座新宫殿所做的（未执

行的)设计,新哥特式的瑙恩门也受到英国的影响。¹⁶⁰

绘画和雕塑

为了装满这些大大小小的宫殿,弗里德里希成了“18世纪中期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¹⁶¹事实上,他是霍亨索伦家族第一个收集绘画作品的统治者。¹⁶²虽然他从未被允许出国旅行,但他在以下几处也看过一些重要的收藏品,它们可能激起了他的爱好:不伦瑞克亲戚们的萨尔茨达卢姆宫;舍恩博恩家族在法兰克尼亚地区的波默斯费尔登宫殿;当然了,还有德累斯顿。¹⁶³虽然他作为王储的微薄财力意味着他不得不从小件收藏开始,但他在莱茵斯贝格时已经在购买绘画了。

¹⁶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在那里,他着手创建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世界,以便他可以从他的父亲的残暴中恢复。冷酷、大男子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军国主义政权和弗里德里希所青睐的华丽雅宴画中柔和、温柔、慵懒的享乐世界之间的反差巨大无比。他一登上王位,就可以放纵这种爱好充分发展,虽然他一直坚持他的代理人不应支付太多钱,当然了,这并不能阻止他经常被要价过高或买到赝品。¹⁶⁵他早期购置的绘画中有一幅伟大的名作,安托万·华托的《热尔桑的画店》,这幅画于1744年被他收入囊中。最后他拥有24幅(署名为)公认的华丽雅宴画大师华托的作品,32幅尼古拉·朗克雷的作品和31幅让-巴蒂斯特·帕特尔的作品。¹⁶⁶他在此类绘画上最后的重要收获是另一幅卓越之作——华托的《发舟西苔岛》,1763年购于海牙。

弗里德里希把这幅画挂在波茨坦城市宫的私人房间里,也许是将它作为一个令人怀念的视觉提醒,令他回忆起年轻时那些不那么操劳的日子,与窗外操场上演练的士兵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比。¹⁶⁷那时弗里德里希的品味已经变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更早更宏大的风格上。他在视觉艺术中的审美是坚定的: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正如他告诉他姐姐

威廉明妮的那样，他认为美是能给予他快乐的东西，而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没有价值的，不管它们有多古老。¹⁶⁸ 不过，虽然弗里德里希很专横，但似乎在绘画上比在音乐或文学上更容易受影响，因为他在后两个领域里的知识、才华和自信更大。华丽雅宴画肯定对他阴柔的一面有吸引力，但也受到了朗克雷的朋友安托万·佩恩以及佩恩的学生克诺贝尔斯多夫的鼓动。¹⁶⁹ 在18世纪40年代后期，弗里德里希与佩恩和克诺贝尔斯多夫都闹翻了。1748年他从巴黎请来两位年轻一代的画家，夏尔-阿梅代-菲利普·范洛和布莱斯·尼古拉·勒叙厄尔，尽管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保守派们画得好。¹⁷⁰ 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已经深受阿尔加罗蒂、伏尔泰和达尔让斯侯爵的影响，他们都不喜欢华托及其模仿者的洛可可派轻浮风格，并鼓励弗里德里希转而购买早期绘画大师们的作品。¹⁷¹ 在1754年，有人拿出一包朗克雷画作，他回复说，他对这种艺术已经失去了喜爱，现在他更感兴趣的是16和17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大师们。¹⁷²

他很快就对此得心应手了。1755年11月他告诉威廉明妮，他收藏的早期绘画大师作品已达到3位数，其中包括2幅柯勒乔、2幅圭多·雷尼、2幅韦罗内塞、1幅丁托列托、1幅索利梅纳，还有不少于12幅的鲁本斯和11幅凡·戴克。他补充说，还要从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得到50多幅绘画：“所以你看，我亲爱的姐姐，哲学并不能将人类脑袋里的愚蠢消除。”不过，他并没有期望这种狂热在自己身上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等墙壁都满了，他就不买了。¹⁷³ 他购置的绘画里面包括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特别是柯勒乔的《勒达与天鹅》（1531年），鲁本斯的《圣塞西莉亚》（1640年）和伦勃朗的《打碎〈十诫〉石板的摩西》（1659年）。¹⁷⁴ 为了安置它们，弗里德里希在无忧宫下方从前是温室的地方修建了一个专门的画廊。这是欧洲现存的最早的独立画廊，由克诺贝尔斯多夫的学生约翰·戈特弗里德·布林设计，不过，像往常一样，他是在由弗里德里希严格规定的风格范围内完成的。¹⁷⁵ 工程开始于1755年的春天，被弗里德里希惯常的不耐心所催促着，结果到同年秋天，除了中央圆顶

以外，外部已经完工。在建造它的决定以及建造方式上，阿尔加罗蒂的影响很大，他写过一份鼓吹独立自主的艺术圣殿的宣言。¹⁷⁶

如果没有七年战争的中断的话，整个工程可能在2年内完工。但由于施工中断，它到1764年才投入使用，以建筑和形象的方式庆贺其修建者历尽艰险后的绝处逢生。这座建筑在费用上是不惜工本的，墙壁和地板使用的是来自北非和锡耶纳的大理石，稀有又昂贵。¹⁷⁷ 这座建筑具有双重的功能，在弗里德里希遇到恶劣天气不能去花园的时候为他提供一处娱乐和活动的空间，同时也是向世界表明，任何其他欧洲统治者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即使没有超越他们，至少也和他们做得一样好。新画廊里的每一幅绘画，都是由他亲自收集来的。他拒绝把它们与自己继承来的、悬挂在柏林宫殿中的那些画作放在一起。其中也没有任何霍亨索伦祖先们的画像。¹⁷⁸ 这必须是专属他个人的成就。¹⁷⁹

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落在德累斯顿的后面。在那里，萨克森—波兰的统治者奥古斯特三世在1745—1747年间重建了他的画廊，以便将他惊人的收藏最有效地炫耀出来。它迅速地获得了欧洲可供公众访问的最好的博物馆之一的名声，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大旅行者常去的重要一站。¹⁸⁰

不想在这种文化竞争中落败，弗里德里希想方设法地宣传自己的收藏，尽管它大大逊色于萨克森的竞争对手。马蒂亚斯·厄斯特赖希被从德累斯顿挖来担任美术馆长，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写和出版《无忧宫的王家画廊和私人藏品》，后来无数次更新版本。¹⁸¹ 厄斯特赖希还担任藏品导览员，允许任何穿着体面的人前来参观，当然，作为回报，参观要收取费用。¹⁸² 一个由7位艺术家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出版两大卷图册，包含这些藏品的版画复刻品，但后来可能由于成本问题放弃了这一计划。¹⁸³ 这一独立的圣殿，与宫殿毗邻但又与之分离，为本章前面讨论过的艺术神圣化提供了又一例证。虽然是虚情假意的，但达尔让斯在1760年告诉弗里德里希，每个有品位的人都从柏林

到波茨坦进行朝圣之旅，他们热情地去参观画廊，就像基督教朝圣者前往洛雷托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¹⁸⁴ 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像路易十四那样，命人以吹嘘胜利的风格创作描绘自己军事胜利的绘画，但他的确将艺术呈现为一个合适的尊敬对象。更不严肃的一点是，新画廊也给了他放纵他对基督教之蔑视的机会，他将卡洛·马拉塔的《圣母像》与圭多·雷尼的《维纳斯的梳妆室》挂在一起。¹⁸⁵（他在波茨坦城市宫也有同样的恶作剧，在那里，柯勒乔的《忏悔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与一组充满色情的华丽雅宴画放在一起，其中包括华托的《发舟西苔岛》。）¹⁸⁶

画廊里很少有同时代的绘画，一个显著的例外则是蓬佩奥·巴托尼的《丘比特和普赛克的婚礼》，这幅作品受弗里德里希委托作于1756年，并在未来的七年战争中伴他度过所有征战。¹⁸⁷ 波茨坦城市宫和新宫里面有更多此类作品，法国艺术家在那里大出风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里德里希所拥有的18世纪早期法国绘画作品比法国国王拥有的还多。¹⁸⁸ 他还委托法国艺术家为新宫绘制4幅大型历史画。其中有夏尔·范洛不朽的《伊菲革涅亚的献祭》，被誉为“18世纪中叶法国最重要的画作”。¹⁸⁹ 1757年在运往普鲁士之前在巴黎的沙龙里展出，在欧洲艺术界引起了轰动。¹⁹⁰ 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德·凯吕斯伯爵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热烈地赞扬这幅作品：“如果欧里庇得斯手中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支画刷的话，他会完成范洛先生取得的成就。”¹⁹¹ 当年沙龙的一位参观者在另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得益于范洛的绘画的尺寸和位置，他一进入展览厅就被这幅画所击中。他用批判的眼光继续描述并详细分析这幅画，并不以为然地谈起它在公众中引发的过度热情。¹⁹² 围绕这幅画作的争论随后在格林男爵的《文学通信》中得到总结并传播到欧洲各地，他也借机暗示，法国国王理应比普鲁士国王赞助更多的法国历史画。¹⁹³

从数量上来说，弗里德里希在雕塑收藏方面更加热情。一个不太可信的估计认为，他的宫殿里安置了5000件雕塑。¹⁹⁴ 它们是在4个重要阶段获得。1742年，他花了8万里弗尔购买了刚去世的枢机主教梅尔基奥·

德·波利尼亚克的藏品，后者充分利用在罗马担任法国大使的时间收集了一批大约有300件的一流藏品，大部分是古典时期的文物。¹⁹⁵ 弗里德里希在1758年从姐姐威廉明妮那里继承了130件收藏品。还有一笔数量非常大的藏品，主要包括贵重的雕刻宝石，是他在1764年从臭名昭著的菲利普·冯·施托什男爵的继承人那里花了3万塔勒外加一笔400塔勒的终身年金购得。¹⁹⁶ 施托什出生于普鲁士，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意大利，从事古典文物的大宗买卖，真假都有，他从众多正在进行挖掘的现场将文物倒腾到市场上。除了很多其他的活动，他还受英国政府雇佣，暗中刺探斯图亚特王位觊觎者，尽管沃波尔认为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最为声名狼藉的人物”，这似乎暗指施托什明目张胆的同性恋行为。¹⁹⁷ 最后一次集中大购买是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为了填满弗里德里希的新建筑，尤其是新宫。最后这批雕塑主要从罗马的代理人那里获得。¹⁹⁸

正如这些所显示的那样，弗里德里希非常喜欢他的建筑、花园和用雕刻装饰建筑内部。例如，重建后的波茨坦城市宫自豪地拥有76座雕塑、92个花瓶、16个奖杯和3个大型的漩涡装饰牌匾。¹⁹⁹ 他颇费心思地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安置它们。在无忧宫他个人的“小画廊”里，摆放有阿波罗、狄俄尼索斯、雅典娜和玛息阿的雕像，玛息阿是不明智地向阿波罗挑战长笛演奏的萨梯。^③ 在对面墙上放置着12座半身塑像，其中有弗里德里希特别欣赏的3个罗马人物：马可·奥勒留皇帝和哈德良皇帝，以及后者的变童安提诺乌斯，这些塑像是该世纪早些时候发现于蒙德拉戈内别墅的雕塑的风格。²⁰⁰

弗里德里希的同性恋圈子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后，弗里德里希刚从父亲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就把妻子抛在一边，赐予他最爱的两个

男人弗雷德斯多夫和阿尔加罗蒂铺天盖地的礼物和宠爱。他还开始营造一个物质上、社交上和文化上能令他舒适的环境，让他从之前28年的恐怖中恢复过来。这是一个柔软奢华的世界，他新得到的财富能让他沉迷在他父亲认为是女人气的爱好之中。它是有同性社交的、有同性爱欲的，也可能是有同性关系的。当然，必须注意，不要用年代错置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21世纪人眼中的“女子气”，对于18世纪中期的恩主而言可能是完美的男子气概。在对于异性恋的热情上，欧洲的统治者中无人能比得过风流成性的路易十五，但他也是洛可可艺术的慷慨赞助人，他赞助的艺术跟弗里德里希委托的那些一样精致优雅。尽管如此，波茨坦的气氛与凡尔赛宫廷，或任何其他欧洲宫廷是非常不同的。

参观无忧宫的游客从北边走向宫殿，会穿过一个院子——荣誉院，它由柱廊环绕，柱廊是弗里德里希最喜爱的建筑形式之一，也是之前的莱茵斯贝格宫、计划中的柏林新宫殿和波茨坦城市宫的特色之一。这显然令人联想起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主门通向一个入口大厅，那里有两个相对的雕像，西侧是玛尔斯，东侧是墨丘利。前者是罗马卢多维西藏品的法国现代复制品，其母版是公元2世纪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原始雕塑的复制品。玛尔斯被塑造成一个赤裸、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的剑插在鞘中，脚边有一个丘比特在玩耍，象征着军事活动应该为爱情让路。东侧是墨丘利，这是从弗里德里希姐姐威廉明妮那里继承来的一尊古典雕像。墨丘利被选中，也许是因为他（除了其他身份之外）是商业之神，以此暗示普鲁士的经济状况良好；²⁰¹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美丽的裸体青年，正在等待着玛尔斯的注意。弗里德里希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将雕像移除，再也没有搬回原地。²⁰²这个房间色情的、酒神式狂欢作乐的氛围为门上方的镀金浅浮雕所增强，其醉酒淫乐的场面表现为萨梯们演奏音乐，向酒神巴克斯致敬，仙女们围绕着潘神跳舞。²⁰³参观者自门厅进入宫殿最大的房间——大理石大厅。这里醒目地陈列着雅克-菲利普·布沙东所制作的瑞典查理十二的半身像，他是独裁者、军事英雄和同性恋，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都热情洋溢地写过关于他的文

章。 204

查理“象征着军事与王权、胜利和灾难的结合，还象征着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以及同性恋取向”。²⁰⁵ 慵懒的情欲是接待室的主题，这个房间同时也作为一个非正式的用餐室使用。情欲也是音乐室的主题，这个房间装饰着由安托万·佩恩绘制的奥维德《变形记》中的场景——皮格马利翁和伽拉忒亚；维尔廷努斯和波摩娜；潘和西琳克丝；酒神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以及一大幅狄安娜洗澡的绘画。一种可能带有很大推测成分的解释是：

无忧宫的音乐室是弗里德里希的套房中正式的和更为“私密的”房间之间的过渡。弗里德里希打算在一连串房间的这个特定位置上明确（尽管不太精确地）表现出爱情的本质，在这里，进入了他自己的私人领域。就像这些绘画中所显示的那样，爱情是可怕的、虚幻的或彻底失败的。女人是不能或不应该去接近的。在最有希望的绘画中，画面展现的是突然出来拯救了孤单情人阿里阿德涅的天神，这幅画紧邻着通往国王书房和卧室的门。国王本人，转身离开了女人的爱情，被他的爱人所抛弃，等待神来拯救自己。²⁰⁶

从他紧邻弗雷德斯多夫房间的图书馆向外看，弗里德里希能看到一尊安提诺乌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被他放置在一座精致的铁艺凉亭内。这无疑是弗里德里希藏品中最优秀的雕塑作品，在欧洲的任何画廊中都会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于1503年发现于罗得岛，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虽然男孩的身份肯定是不确定的，但这尊雕像在弗里德里希的时代总是被称为安提诺乌斯，也因此被赋予了同性恋的内涵：“弗里德里希因此购买了一座男色的、男性对男性欲望的标志，这尊雕像已经有很长时间被如此定义了。”²⁰⁷ 直到他去世之后，这尊雕像才被改名为“祈

祷的男孩”，并迅速被移到了一座博物馆里。²⁰⁸ 安提诺乌斯死的时候哈德良悲痛欲绝，他宣布前者是神祇并为他设立祭祀仪式。雕像几经转手，到了奥地利元帅欧根亲王的手中，他是著名的同性恋。1734年，在莱茵兰地区的战役中，他迎接王储弗里德里希到他的军营。弗里德里希很清楚欧根的性取向，他后来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写道，路易十四拒绝委任亲王以军职是因为廷臣们给他起了个嘲弄的绰号“克洛德女士”。²⁰⁹ 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冯·泽肯多夫1734年在他的秘密日记中写道，弗里德里希在模仿欧根亲王简洁的表达方式。他还记录了以下的对话：“安哈尔特-德绍亲王说：‘殿下您还勃起吗？’欧根亲王吸了一撮鼻烟：‘不，我不能勃起。’”²¹⁰ 1734年约瑟夫·文策尔·冯·列支敦士登亲王也在莱茵河畔，他与弗里德里希建立了友谊，在弗里德里希回普鲁士之后与他通信，甚至还借钱给他。²¹¹ 正是列支敦士登亲王从欧根亲王的继承人手中购买了安提诺乌斯的雕像，然后将它以5000塔勒的高价卖给了弗里德里希，后者已经从朱塞佩·卡梅拉塔的版画中了解过这尊雕像。²¹² 欣喜于这一收获，弗里德里希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维也纳运回来，他指示那里的大使馆给予他派去的接收人员一切帮助。²¹³

把这座雕像放置在能从书房直接看到的地方，相当于做了一个明白无误的声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任何来无忧宫的访客利用这种方便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因为它紧邻着弗里德里希为自己准备的墓穴，这可以理解为他在悼念汉斯·赫尔曼·冯·卡特中尉，卡特为了自己的爱人而牺牲，就像安提诺乌斯为了哈德良而死一样。²¹⁴ 还能看到的是修建在庭院西端的友谊圣殿，这是为了纪念弗里德里希在1758年去世的姐姐威廉明妮而建的。圆柱上的4个大圆形浮雕刻画了4对古代的男性恋人：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德斯、尼索斯和欧律阿罗斯、赫拉克勒斯和菲罗克忒忒斯、忒修斯和皮瑞苏斯。²¹⁵

同样的同性恋主题也可以在附近新宫中最重要两幅委托画作中发现。第一幅是蓬佩奥·巴托尼绘制的《大流士家族》，描绘了另一对著名的男性恋人，亚历山大大帝和赫费斯提翁，安慰战败的波斯国王的妻

子和孩子，这是在历史画家中长期流行的一个主题。在巴托尼的笔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赫费斯提翁放在亚历山大手腕上的手所凸显。

²¹⁶ 这幅画于1763年接受委托，但直到1775年才交货，但弗里德里希非常重视它，为它分配的空间一直保留着。²¹⁷ 它就挂在通往弗里德里希套房的蓝色前厅。

更为显眼的是夏尔·范洛在大理石大厅绘制的壁画《伽倪墨得斯被带到奥林匹斯山》。弗里德里希为他最大的宫殿里最大的房间的最大壁画选择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同性恋主题，在表现自身的方式上简直是不能暴露更多了。^④这也是由来已久的，安托万·佩恩在莱茵斯贝格毗邻音乐室的塔楼房间中为弗里德里希绘制过同样的主题。²¹⁸

弗里德里希的同性恋关系曾经是一个禁忌话题，现在仍然很棘手，但它太重要了，无法被忽视。不愿接受它是有理由的，它涉嫌概念在时代上的误用，因为“同性恋”这个词和它的同根词是19世纪晚期的发明。但这说服不了人。在一个特定的词被用来形容它们之前，许多现象已经存在了——例如“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承认，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明确的异性恋者和明确的同性恋者之间的界限更不固定。但他们都存在。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称他儿子为“娘娘腔”和“鸡奸者”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指的是什么意思。人们也强调过，在那个时代在男性之间还有一种“友谊崇拜”，它可以是与性欲无关的强烈情感，虽然这通常被视为“资产阶级”对于贵族文化之繁文缛节的一种反应。²¹⁹ 不可能断言一段柏拉图式的关系何时变成了苏格拉底式的关系。普鲁士军官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给约翰·威廉·路德维希·格莱姆写信说，他欲望的表白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我真的爱你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女孩”，难道其中没有某些性的成分？²²⁰ 对弗里德里希而言，他肯定是喜欢热情的友谊的。这些热情的友谊几乎都是和男人建立的，不过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他姐姐威廉明妮、卡马斯伯爵夫人和萨克森选帝侯太后玛丽娅·安东尼娅。除非能发现一份证明弗里德里希何时与何人所作所为的文件，否则就必须存疑。然而，累积的证据之重量是难以抗拒的。

注释

- 1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48.
- 2 Christoph Henzel, “Graun,”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 19 April 2013,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1653pg3>.
- 3 Carl Mennicke, *Hasse und die Brüder Graun als Symphoniker* (Leipzig, 1906), p. 458.
- 4 Hans-Joachim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Baumeis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3rd edn (Leipzig, 1998), p. 340. 托马斯·卡莱尔在其作品第三卷第129页写道, 1740年克诺贝尔斯多夫被派往意大利, 但该书可能是混淆了这次考察与他早前的意大利之旅。
- 5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p. 129.
- 6 Norbert Schmitz, *Der italienische Freund. Francesco Algarotti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Hanover, 2012), p. 193. 1751年, 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伯灵顿报告说, 他正在鼓励弗里德里希接受伯灵顿在英格兰所提倡的建筑风格。但这一自吹自擂是错误的, 因为弗里德里希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在阿尔加罗蒂出现之前就自己接受了英格兰风格的新帕拉第奥主义, 参见 James Lees-Milne, *Earls of Creation: Five Great Patrons of Eighteenth-century Art* (London, 1962), p. 138. See also Thomas Biskup and Peter H. Wilson, “Groß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47.
- 7 David Watkin and Tilman Mellinghoff, *German Architecture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1740–1840* (London, 1987), p. 18.
- 8 Hans-Joachim Giersberg, *Friedrich als Bauherr. Studien zur Architektur des 18. Jahrhunderts in Berlin und Potsdam* (Berlin, 1986), p. 30.
- 9 Reinhard Wegn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englische Kunst,”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Kunstwissenschaft*, 42, 1 (1988), pp. 52–5.
- 10 Martin Engel, *Das Forum Fridericianum und die monumentalen Residenzplätze des 18. Jahrhunderts* (unpublished Free University Berlin dissertation, 2001), http://www.diss.fu-berlin.de/diss/receive/FUDISS_thesis_000000001297, p. 64.
- 11 L. Schneider, *Geschichte der Oper und des Koeniglichen Opernhauses in Berlin* (Berlin, 1842), p. 21.

12 Walter Rösler, “‘Die Canaillen bezahlt man zum Pläsier.’ Die königliche Schaubühne zu Berlin unter Friedrich II. und Friedrich Wilhelm II.,” in Georg Quander (ed.), *Apollini et Musis. 250 Jahre Opernhaus Unter den Linden* (Frankfurt am Main and Berlin, 1992), p. 14.

13 Carlyle, vol. 3, p. 718.

14 Carl Martin Plümicke, *Entwurf einer Theatergeschichte von Berlin, nebst allgemeinen Bemerkungen über den Geschmack, hiesige Theaterschriftsteller und Behandlung der Kunst, in den verschiedenen Epochen* (Berlin and Stettin, 1781), p. 120, 该书声称，在必要时，歌剧院里挤得下3500到4000人。

15 Ibid., p. 119;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268; Martin Engel, “Architektur und Bauherrschaft,” in Sösemann, vol. 1, pp. 280–81. 歌剧院最好的平面设计图，可参见Paul 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bildende Kunst* (Leipzig and Berlin, 1922), p. 63。

16 Jonas Hanway,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Trade over the Caspian Sea: With a Journal of Travels from London Through Russia into Persia and Back Through Russia, Germany, and Holland* (London, 1753), vol. 2, p. 187.

17 Carlyle, vol. 3, p. 599.

18 Michael Forsyth, *Buildings for Music: The Architect, the Musician, and the Listener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MA, 1985), p. 104.

19 但是，他到达歌剧院的仪式是完全遵循传统的，由小号 and 鼓声宣布。直到他给出信号，表演才能开始——Johann Friedrich Karl Grimm, *Bemerkungen eines Reisenden durch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in Briefen* (Altenburg, 1779), vol. 2, p. 7。

20 Sibylle Badstuebner-Groeger, “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 in den Bildprogrammen friedericianischer Architektur?,” in Martin Fontius (ed.), *Friedrich II. und die europäische Aufklärun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new series (Berlin, 1999), vol. 4, pp. 45–7.

21 Quoted in 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Boston, 1966), p. 42.

22 L. D. Ettlinger, “Winckelmann,” in *The Age of Neo-classicism*, the fourteenth exhibit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London, 1972), p. xxxiii.

23 Heinrich Menu von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Berlin, 1837), p. 39, Chrudim, Bohemia, 18 April 1742.

24 E. E. Helm, *Music at the Cour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orman, 1960), pp. 73–4.

25 Wilhelm Kothe,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Musiker, sowie Freund und Förderer der musikalischen Kunst* (Braunsberg, 1869), p. 17: “Die Franzosen wissen nur Comödie zu spielen und die Italiener zu singen; aber Musik zu schreiben, das verstehen nur die Deutschen.”这句话被Helm误译为：“只有法国人会写喜剧，只有意大利人会唱歌，只有德国人会作曲。”弗里德里希的原话（如果他说过这句格言的话），自然是用法语说的。

26 Heinz Becker, “Friedrich II.,” in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ed. Friedrich Blume (Kassel and Basle, 1955), vol. 4, p. 955.

27 Percy A. Scholes (ed.), *An Eighteenth-century Musical Tour in Central Europe and the Netherlands. Being Dr Charles Burney’s Account of his Musical Experiences* (Oxford, 1959), vol. 2, p. 207.

28 Christoph Wolff et al, “Bach,”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 22 April 2013,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0023pg12>. 早在弗里德里希在莱茵斯贝格时，巴赫就为他演奏过。

29 Sabine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 Musiker und Monarch* (Munich, 2012), pp. 39–44; E. Eugene Helm and Derek McCulloch, “Frederick II, King of Prussia,”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 22 April 2013,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0176>.

30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4), vol. 1: *Jugendbriefe 1728–1740*, p. 287.

31 “Épître XIV. À Sweerts. Sur les plaisirs,” *Œuvres*, vol. 10, pp. 195–201.

32 Werner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geistige Welt Frankreichs*, *Hamburger Studien zu Volkstum und Kultur der Romanen* (Hamburg, 1932), vol. 11, p. vii.

33 Mark Berry, “The King in Prussia,” *Opera*, Annual Festivals Issue (2012), p. 28.

34 Thomas Bauman, “Montezuma,”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Opera*, ed. Stanley Sadie,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 23 April 2013,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O903255>.

35 Albert Mayer-Reinach, “Introduction,” in idem and Hans Joachim Mayer (eds.), *Carl Heinrich Graun: Montezuma. Oper in drei Akten* (Wiesbaden and Graz, 1958), p. viii.

36 Berry, “The King in Prussia,” p. 29.

37 Frederick the Great, *Montezuma*. Text accompanying the Capriccio recording, conducted by Johannes Goritzki, Deutsche Kammerakademie (Königsdorf, 1992), recording no. 60 03

2-2, pp. 101–2.

38 “欣然地，不带任何抱怨，我将生命之气息还给好心把它赋予我的仁慈自然，并将我的身体返还给造就它的元素”——最后的遗嘱，日期为1769年1月8日, *Œuvres*, vol. 6, p. 243。完整引文参见p. 498。

39 Frederick the Great, *Montezuma*, pp. 111, 125, 129, 131, 133–4.

40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 91.

41 Quoted in Daniel Heartz, *Music in European Capitals: The Galant Style, 1720–1780* (New York, 2003), p. 367. 法文原文参见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p. 98。

42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81–3.关于歌剧《苏拉》的创作和表演，以下文章中有详细的叙述：Franziska Windt, “Friedrichs Bühne,”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344–59。弗里德里希写作或是参与撰稿的剧本全部目录，参见Claudia Terner,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Hofoper,”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116–29。

43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25.

44 Ibid., pp. 133–4.

45 Sabine Henze-Döhring, “Die Musik,” in *Sösemann*, vol. 1, p. 254.

46 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 46.

47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347.

48 Ibid.; Koser, vol. 1, p. 512.

49 Peter Schleuning, *Das 18. Jahrhundert. Der Bürger erhebt sich* (Hamburg, 1984), p. 62.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C. P. E.巴赫说匡茨夫人的狗即使不是整个欧洲，也是普鲁士最可怕的生物，因为它让匡茨夫人惊恐不安，匡茨夫人则让匡茨先生惊恐不安，而匡茨先生又让国王惊恐不安。策尔特在1809年的一次演讲中讲过这个故事，并被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3, pp. 480–83转述。

50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21.

51 Scholes (ed.), *An Eighteenth-century Musical Tour*, vol. 2, p. 181. 另一个英国访客詹姆斯·哈里斯证实了这一意见，参见Earl of Malmesbury (ed.),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London, 1844), vol. 1, p. 3。

52 Schleuning, *Das 18. Jahrhundert*, p. 63.

53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3, p. 481.

54 Helm and McCulloch, “Frederick II, King of Prussia.”

55 Henze-Döhring, “Die Musik,” p. 241.

56 若想了解弗里德里希的音乐作品有哪些录音版本，以下网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http://www.jpc.de/s/friedrich+ii>。

57 Helmuth Osthoff, “Friedrich II. als Musikliebhaber und Komponist,” in Erhard Bethk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Herrscher zwischen Tradition und Fortschritt* (Gütersloh, 1985), p. 179.

58 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例子是《向弗里德里希大王致敬（无忧宫长笛协奏曲）》，由伊曼纽尔·帕胡德、特雷沃·平诺克和波茨坦室内乐团演奏，有蓝光版本和DVD版本。尽管副标题如此，但音乐会实际上是在新宫的剧院里举行的。

59 Daniel Heartz and Bruce Alan Brown, “Galant,”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 24 April 2013,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article/grove/music/10512>.

60 Ibid.

61 Hans-Günter Ottenberg (ed.), *Der Critische Musicus an der Spree. Berliner Musikschiffthum von 1748 bis 1799* (Leipzig, 1984), pp. 15–16; Daniel Heartz and Bruce Alan Brown, “Empfindsamkeit,”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 24 April 2013,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article/grove/music/08774>.

62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277.

63 Helm, *Music at the Cour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p. 36–7.

64 Heartz, *Music in European Capitals*, p. 336.

65 Koser, vol. 2, p. 285.

66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73.

67 Thomas Biskup, “Das Ceremoniel des grossen Königs: Völkerrecht, Reichsrecht und Friedrichs Rang in der Fürstengesellschaft” (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conference Repräsentation und Selbstinszenierung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otsdam Museum, 28–29 September 2012).

68 Quoted in Tern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Hofoper,” p. 4.

69 Schneider, *Geschichte der Oper*, p. 21.

70 Dieudonné Thiébault, *Mes Souvenirs de vingt ans de séjour à Berlin; ou Frédéric le Grand, sa famille, sa cour, son gouvernement, son académie, ses écoles, et ses amis littérateurs et philosophes*, 3rd edn (Paris, 1813), vol. 2, p. 310.

71 Tern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Hofoper,” p. 5.

72 Otto von Riesemann, “Eine Selbstbiographie der Sängerin Gertrud Elizabeth Mara,”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10 (11 August–29 September 1875), p. 546.

73 Ludwig Geiger, *Berlin 1688–1840. Geschichte des geistigen Lebens der preussischen Hauptstadt* (Berlin, 1893), vol. 1: 1688–1786, p. 603. 对这些社团的各类规章制度的充分讨论，参见Hertz, *Music in European Capitals*, pp. 385ff.

74 Christoph Henzel, “‘Die Zeit des Augustus in der Musik.’ Berliner Klassik. Ein Versuch,” in Ursula Goldenbaum and Alexander Košenina (eds.), *Berliner Aufklärung: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Berlin, 2003), vol. 2, p. 25.

75 F. W. Marpurg, “Entwurf einer ausführlichen Nachricht von der Musikübend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 in *Historisch-kritische Beyträge zur Aufnahme der Musik* (Berlin, 1754–78), vol. 1, 5 (1755), p. 385.

76 Walter Salmen, *Johann Friedrich Reichardt. Komponist, Schriftsteller, Kapellmeister und Verwaltungsbeamter der Goethezeit* (Freiburg im Breisgau and Zürich, 1963), pp. 48–9.

77 Giorgio Pestelli, *The Age of Mozart and Beethoven* (Cambridge, 1984), p. 37.

78 Thomas Bauman, *North German Opera in the Age of Goethe* (Cambridge, 1985), p. 137.

79 Ibid., p. 132.

80 Ibid., p. 174; John Warrack, *German Opera: From the Beginnings to Wagner* (Cambridge, 2001), p. 120.

81 Quoted in Bauman, *North German Opera in the Age of Goethe*, p. 179.

82 Scholes (ed.), *An Eighteenth-century Musical Tour*, vol. 2, pp. 160–61.

83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18, 73, 143–4.

84 Friedrich Nicolai, *Beschreibung der Königlichen Residenzstädte Berlin und Potsdam* (Berlin, 1786), vol. 1, p. 210.

85 Thomas Biskup,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108.

86 Quoted in Hertz, *Music in European Capitals*, p. 38.

87 *Œuvres*, vol. 23, p. 208.

88 Ibid., vol. 24, p. 324; Helm, *Music at the Cour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73, 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且不准确的）的译本。

89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52, 78; Helm, *Music at the Cour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71;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 46; Mennicke, *Hasse und die Brüder Graun als Symphoniker*, p. 480.在Mennicke的书中，还有弗里德里希残酷轻蔑地对待赖夏特的其他几个例子。

90 Friedrich von Oppeln-Bronikowski and Gustav Berthold Volz (eds.), *Das Tagebuch des Marchese Lucchesini (1780–1782). Gespräche mit Friedrich dem Grossen* (Munich, 1926), p. 13.

91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3, p. 481.

92 Ibid.

93 William S. Newman, “Emanuel Bach’s autobiography,” *The Musical Quarterly*, 51, 2 (1965), p. 363.

94 Henze-Döhring, “Die Musik,” p. 246; Wolff et al, “Bach.”

95 Hans-Günter Ottenberg, *C.P.E. Bach*, trans. Philip J. Whitmore (Oxford, 1987), p. 33.

96 Ibid., p. 86.

97 Ibid., p. 57.

98 Newman, “Emanuel Bach’s autobiography,” p. 367. 根据一则不太可靠的轶事，在一场王家音乐会上，弗里德里希表演完长笛独奏之后，一名听众吹捧道“何其好的节奏！”对此，巴赫以听得见的低声冒险说了一句：“何其多的节奏！”

99 Thomas Bauman, “Courts and Municipalities in North Germany,” in Neal Zaslaw (ed.), *The Classical Era: From the 1740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9), p. 250.

100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16.

101 Christoph Wolff,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Learned Musician* (Oxford, 2002), p. 425. See also James Gaines, *Evening in the Palace of Reason* (London, 2005), pp. 223–9. 尽管其副标题为*Bach Meets Frederick the Great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但书中涉及实际会面的内容很少，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那就是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但是，它对《音乐的奉献》进行了有趣的记录和分析。

102 Christoph Wolff (ed.), *The New Bach Reader: A Life of Johann Sebastian Bach in Letters and Documents*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 p. 367.

103 Ibid., pp. 226–8.

104 关于宫殿的平面设计图，参见Hans-Joachim Giersberg, *Das Stadtschloss zu Potsdam* (Karwe, 2008), p. 28。

105 Carsten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Sammlungen und Kabinette als Schittstellen einer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Söseman, vol. 1, p. 322. 原作题为“战争的后果”，保存在佛罗伦萨的皮蒂宫。

106 Claudia Sommer, Detlef Fuchs and Michael Rohde, *Schloss Rheinsberg* (Berlin and Munich, 2009), pp. 15–16.

107 Hans-Joachim Giersberg, *Schloss Sanssouci. Die Sommerresidenz Friedrichs des Großen* (Berlin, 2005), p. 16.

108 Ibid., p. 29.

109 Thomas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Inszenierungen des Preussenkönigs in Fest und Zeremoniell 1740–1815*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2012), p. 38.

110 Karl Heinrich Siegfried Rödenbeck, *Tagebuch oder Geschichtskalender au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Regentenleben (1740–1786)* (Berlin, 1840), vol. 1, p. 10.

111 *Œuvres*, vol. 17, p. 188.

112 Ibid., p. 219. 《牛津英语词典》对“圈线”的定义是“一种小型装饰线条，有一个半圆形截面，有时是没有其他装饰的，有时候雕刻着树叶或是切割成串珠状，放置在柱子的顶端或是底端，用于分离装饰性柱上楣构中柱顶过梁的不同部分”。

113 Ibid., p. 240.

114 Rödenbeck, *Tagebuch*, vol. 1, p. 71.

115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pp. 122–3.

116 Giersberg, *Das Potsdamer Stadtschloss*, pp. 55–6.

117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154.

118 Gert Streidt, *Potsdam. Die Schlösser und Gärten der Hohenzollern* (Cologne, 1996), p. 15.

119 Jörg Kirschstein, *Das Potsdamer Stadtschloss. Vom Fürstensitz zum Landtagschloss* (Berlin, 2014), pp. 37–9. 这本书特别有用，因为宫殿内部在二战中因轰炸被毁，而这

本书中有很多展现宫殿内部的照片。

120 Lehndorff, vol. 1, p. 129.

121 Kirschstein, *Das Potsdamer Stadtschloss*, pp. 56–7, 62–3.

122 Giersberg, *Schloss Sanssouci*, p. 34. 下文中大部分的描述都基于这一详细又具有学术性的叙述。

123 Ibid., p. 41.

124 Ibid., pp. 38–9.

125 关于无忧宫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弗里德里希的详细研究，以及对他粗糙草图的出色说明，参见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bildende Kunst*, pp. 96–101。

126 Hahn, *Friedrich II.*, p. 55.

127 Giersberg, *Schloss Sanssouci*, p. 45.

128 Ibid., p. 69.

129 Hahn, *Friedrich II.*, p. 155.

130 Clemens Alexander Wimmer, “Der Garten – ein Bild. Knobelsdorff und die Gartenkunst,” in Ute G. Weickardt, Tilo Eggeling and Gerd Bartoschek (eds.), “*Zum Maler und zum grossen Architekten geboren.*”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1699–1753. Ausstellung zum 300. Geburtstag* (Berlin, 1999), p. 81.

131 关于无忧宫花园最早形态的优秀描述，参见Kadatz, *Georg Wenzeslaus Knobelsdorff*, pp. 207–14，该书配有很好的插图。

132 Michael Rohde, “Friedrich II. und die Gartenkunst in Sanssouci,”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52.

133 Alfred P. Hagemann, “Zitat und Kopie bei Friedrich II.,”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79.

134 对那些无法亲自去波茨坦参观的人来说，Giersberg插图丰富的描述是个很好的替代品，该书配有Hillert Ibbeken的250页照片。另一本书中也有出色的插图：Marinathom Suden, *Schlösser in Berlin und Brandenburg und ihre bildliche Ausstattung im 18. Jahrhundert* (Petersberg, 2013)。

135 Martin Engel, *Das Forum Fridericianum und die monumentalen Residenzplätze des 18. Jahrhunderts* (unpublished Free University Berlin dissertation, 2001), p. 12. 直到20世

纪，它的名字才变成了拉丁化的弗里德里希广场（*Forum Fridericianum*）。很奇怪的是，Engel的这部重要作品还没有出版，尽管能在网上看得到：http://www.diss.fu-berlin.de/diss/receive/FUDISS_thesis_000000001297。正如Engel指出的那样，以前对这一广场的记叙都只集中在实际修建的建筑上面，很少乃至没有关注弗里德里希最初的建筑计划。

136 那是萨克森大使在1740年7月16日写下的看法。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弗里德里希重建了波茨坦的城市宫，而他在那个地方遭受的折磨不会更少，只会更多。对他影响更多的可能是他敬爱的母亲，她力劝他不要再建造一座新宫殿，参见ibid., pp. 91, 94。

137 Ibid., pp. 62, 82.

138 Ibid., p. 84.

139 Klaus Dorst, “Das Neue Palais von Sanssouci. Architektonischer Schlussakkord des friderizianischen Zeitalters,”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80; Streidt, *Potsdam*, p. 88;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31; Manuel Brug, “Warum Friedrich die Kaiserin im Schrank baden liess,” *Die Welt*, 26 April 2012, <http://www.welt.de/kultur/history/article106217006/Warum-Friedrich-die-Kaiserin-im-Schrank-baden-liess.html>.

140 James Lees-Milne, *Baroque in Italy* (London, 1959), p. 187.

141 Henriette Graf, “Das Neue Palais – Funktion und Disposition der Appartements,”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95.

142 Hans-Joachim Giersberg, “Architektur, Stadtgestaltung und Gartenkunst,” in Gert Streidt and Peter Feierabend (eds.), *Preussen. Kunst und Architektur* (Cologne, 1999), p. 203.

143 Streidt, *Potsdam*, pp. 100–101, 其中也有一份出色的插图。

144 Claudia Sommer, “Edle Gesteine in den Schlössern Friedrichs II. von Preuss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86. 在此应该补充的是，弗里德里希在1763年之后也展示过自己的财富，他命人制作了一套黄金餐具，其中包含96个浅盘和大盘，7打汤匙、餐叉和餐刀，还有各式各样的碗、汤碗、加热器和烛台——Claudia Meckel, “Gold und Silber,”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96。上述所有餐具都在1809年被熔化以支付拿破仑勒索的赔款。

145 Watkin and Tilman Mellinghoff, *German Architecture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p. 22.

146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 107. 当弗里德里希1763年离开萨克森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79箱瓷器——Michaela Völkel, “Nicht alle Lust will Ewigkeit. Friedrich und das Porzella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91。

- 147 Engel, “Architektur und Bauherrschaft,” p. 277.
- 148 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bildende Kunst*, p. 121.
- 149 Volker Thiele, “Architectura fridericiana – Der König und das Bauwesen,”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187–8.
- 150 Watkin and Tilman Mellinghoff, *German Architecture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p. 22.
- 151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 162.
- 152 在他的图书馆里有40多本建筑书籍以供参考——Jutta Götzmann, “Veduta ideata. Der Alte Mark zu Potsdam als Auftakt und Höhepunkt friderizianischer Stadtgestaltung,” in idem (ed.), *Friedrich und Potsdam. Die Erfindung seiner Stadt* (Munich, 2012), p. 23.
- 153 Alfred P. Hagemann, “Das Nauener Tor in Potsdam. Der ‘Roi philosophe’ und das Gothic Revival,”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157–8.
- 154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Knobelsdorff*, pp. 214–15.
- 155 Fritz-Eugen Keller, “Probleme der spätfriederizianischen Architektur,”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Kunstwissenschaft*, 42, 1 (1988), pp. 66–7.
- 156 Engel, *Das Forum Fridericianum*, pp. 32–3. 东德政府在1981年修复方尖碑时，用4位在波茨坦城市发展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建筑师的石像取代了4个普鲁士统治者的雕像。
- 157 Hagemann, “Zitat und Kopie bei Friedrich II.,” p. 176.
- 158 Eugen Paunel, *Die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Ihre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 während der ersten zwei Jahrhunderten seit ihrer Eröffnung* (Berlin, 1965), p. 50.
- 159 Wegn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englische Kunst,” pp. 56–7; Hans Kania, *Potsdamer Baukunst. Eine Darstellung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Berlin, 1926), p. 48.
- 160 Ibid.
- 161 Christoph Vogtherr, “An Art Collector on the European Stage,” 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to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symposium convened by Thomas Biskup and Katrin Kohl at Jesus College, Oxford, 13–14 July 2012.
- 162 Ernst Curtius, “Friedrich II. und die bildenden Künste,” in idem, *Alterthum und Gegenwart. Gesammelte Reden und Vorträge* (Berlin, 1882), vol. 2, p. 203.
- 163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p. 311.
- 164 Gerd Bartoschek, “Friedrich II. als Sammler von Gemälden,” in Hans-Joachim Giers

berg and Claudia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Potsdam, 1986), vol. 1, p. 86.

165 Paul 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Sammler von Gemälden und Skulpturen,” *Jahrbuch der Königlich-Preussischen Kunstsammlungen*, 13 (1892), p. 192.

166 Helmut Börsch-Supa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atteau,” in Margaret Morgan Grasselli and Pierre Rosenberg (eds.), *Watteau 1684–1721* (Berlin, 1985), p. 553. 很有可能的是，巴黎的造假者特意制造假的华托画作卖给弗里德里希——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bildende Kunst*, pp. 163–4。实际上，只有11幅“华托作品”是真迹，尽管如此，考虑到画家的寿命之短暂，这也是个可观的数量——他死于1721年，年仅36岁。

167 这至少是Helmut Börsch-Supan的推断，参见Grasselli and Rosenberg (eds.), *Watteau*, p. 562。

168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p. 319.

169 Adolf Rosenberg,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unstsammler,” *Zeitschrift für bildende Kunst*, new series, 4 (1893), p. 210.

170 Helmut Börsch-Supan, “Brandenburg und Sachsen – die Spannungen im Kunstleben,”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 29.

171 Nina Simone Schepkowski, *Johann Ernst Gotzkowsky. Kunstagent und Gemäldesammler im friderizianischen Berlin* (Berlin, 2009), pp. 77–8.

172 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Sammler von Gemälden und Skulpturen,” p. 188.

173 Ibid.

174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p. 317.

175 Tobias Locker, “Die Bildergalerie von Sanssouci bei Potsdam,” in Bénédicte Savoy (ed.), *Tempel der Kunst. Die Geburt des öffentlichen Museums in Deutschland 1701–1815* (Mainz, 2006), p. 219.

176 Schepkowski, *Johann Ernst Gotzkowsky*, pp. 79–80.

177 Saskia Hünecke,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Die Schönste der Welt. Eine Wiederbegegnung mit der Bildergaleri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erlin and Munich, 2013), p. 9. 这本信息丰富且制作精美的书详细描述了这些藏品。

178 Börsch-Supan, “Brandenburg und Sachsen,” p. 30.

179 Helmut Börsch-Supa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Umgang mit Bildern,”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Kunstwissenschaft*, 42, 1 (1988), p. 30.

- 180 James J. Sheehan, *Museums in the German Art World: From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to the Rise of Modernism* (New York, 2000), p. 32.
- 181 Engel, "Architektur und Bauherrschaft," p. 276.
- 182 Sheehan, *Museums*, p. 37.
- 183 Alexandra Nina Bauer, "Die Gemäldesammlung bis 1786," in Hünecke (ed.), *Die Schönste der Welt*, p. 41.
- 184 Hünecke, "Introduction," in *ibid.*, p. 9.
- 185 Christoph Martin Vogtherr,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als Sammler von Gemälden und der Marquis d'Argens," in Hans Dickel and Christoph Martin Vogtherr (eds.), *Preussen. Die Kunst und das Individuum* (Berlin, 2003), p. 43.
- 186 Börsch-Supa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Umgang mit Bildern," p. 29; Reinhard Alings, "'Don't ask – don't tell' – war Friedrich schwul?,"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41.
- 187 Locker, "Die Bildergalerie von Sanssouci bei Potsdam," p. 225.
- 188 Vogtherr, "An Art Collector on the European stage."
- 189 *Ibid.*
- 190 Daniel Hartz, *Mozart's Operas* (Berkeley, 1990), p. 3.
- 191 *Description d'un tableau représentant le sacrifice d'Iphigénie peint par monsieur Carle Vanloo* (Paris, 1757), p. 25. Available at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430070/f25.image>.
- 192 *Extrait des Observations sur la physique et les arts. Lettre à l'auteur sur l'exposition de cette année* (Paris, 1757), pp. 2–8. Available at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43009t/f3.image>. See also Thomas E. Crow,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5), pp. 104–5.
- 193 Friedrich Melchior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October, 1757), available at <http://artflsrv02.uchicago.edu/cgi-bin/philologic/getobject.pl?c.1:29.grimm.338962>.
- 194 Curtius, "Friedrich II. und die bildenden Künste," p. 204. Koser, vol. 1, p. 479 也给出了同样的数字。
- 195 Luh, *Der Grosse*, p. 29.
- 196 <http://ub-dok.uni-trier.de/argens/pic/pers/Stosch.php>.
- 197 Dorothy Mackay Quynn, "Philipp von Stosch: Collector, Bibliophile, Spy, Thief (169

1–1757),”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941), p. 339. Jonathan Israel在*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Oxford, 2002), p. 222中说施托什是个“著名的自然神论者，共济会会员，还是公开的同性恋”。

198 Astrid Dostert,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Sammler antiker Skulptur,”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230–45.

199 Giersberg, *Das Potsdamer Stadtschloss*, p. 29.

200 Dostert,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Sammler antiker Skulptur,” pp. 28–30.

201 Detlev Kreikenbom, “Die Aufstellung antiker Skulpturen in Potsdam-Sanssouci unter Friedrich II.,” in Max Kunze (ed.), *Wilhelmine und Friedrich II. und die Antiken*, Schriften der Winckelmann-Gesellschaft (Stendal, 1998), vol. 15, p. 48. 其中也包括插图。玛尔斯雕像的出色图片参见Giersberg, *Schloss Sanssouci*, p. 197。

202 Giersberg, *Schloss Sanssouci*, p. 49.

203 Thomas Blisniewski, “Mythologie,” in *ibid.*, pp. 103–11. 另见pp. 181–9的插图。

204 Hahn, *Friedrich II.*, pp. 37–8. 查理十二的主要传记作者Ragnhild Hatton用大量的篇幅解释了他为什么从未结婚，但没有讨论他的性生活——*Charles XII of Sweden* (London, 1968), *passim*。

205 Hahn, *Friedrich II.*, p. 156.

206 Christoph Martin Vogtherr, “Absent Love in Pleasure Houses: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as Art Collector and patron,” *Art History*, 24, 2 (2001), p. 237. See also Thom Suden, *Schlösser in Berlin und Brandenburg*, p. 206.

207 Hahn, *Friedrich II.*, p. 167; Vogtherr, “Absent Love in Pleasure Houses,” p. 231.

208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deutsche Nation: Geschichte als politisches Argument* (Stuttgart, 2007), p. 215.

209 *Œuvres*, vol. 2, p. 3. 弗里德里希的《诽谤颂》也提到了这一流言蜚语，以及人们常常对尤利乌斯·恺撒提出的同性恋指控——*ibid.*, vol. 10, p. 5。

210 *Journal secret du Baron Christophe Louis de Seckendorff* (Tübingen, 1811), p. 12.

211 Thomas Fischbacher, *Des Königs Knabe.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Antinous* (Weimar, 2011), pp. 47–8.

212 *Ibid.*, p. 80; Emile Michel, “Frédéric II et les arts à la cour de Prusse,” *Revue des deux mondes*, 56 (1883), p. 893.

213 P.C., vol. 5, p. 442.

214 Vogtherr, “Absent Love in Pleasure Houses,” p. 239.

215 俄瑞斯忒斯、皮拉德斯、尼索斯和皮瑞苏斯都是伏尔泰的诗作《友谊圣殿》中的主要人物。这首诗写于1732年，1738年寄给还是王储的弗里德里希时增加了一段，参见Hagemann, “Zitat und Kopie bei Friedrich II.,” p. 183。

216 Franziska Windt, “Künstlerische Inszenierung von Grösse. Friedrichs Selbstdarstellung im Neuen Palais,”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131–49. 关于同时对亚历山大和赫费斯提翁之间包含性关系的认知，参见Hannah Smith and Stephen Taylor, “Hephaestion and Alexander: Lord Hervey, Frederick, Prince of Wales, and the Royal Favourite in England in the 1730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507 (2009), p. 13。

217 Vogtherr, “An Art Collector on the European Stage.”

218 Sommer, Fuchs and Rohde, *Schloss Rheinsberg*, p. 16;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seiner Zeit* (Berlin, 1901), vol. 1, p. 77.

219 Albert Salomon, “Der Freundschaftskult des 18. Jahrhunderts in Deutschland: Versuch zur Soziologie einer Lebensform,” ed. Richard Grathoff,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8, 3 (1979), p. 290; Jost Hermand, *Freundschaft. Zur Geschichte einer sozialen Bindung* (Cologne, Weimar and Vienna, 2006), p. 11; Wolfdietrich Rasch, *Freundschaftskult und Freundschaftsdichtung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des 18. Jahrhunderts* (Halle-Saale, 1936),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vol. 21, p. 83.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也论证说，正是在18世纪早期，男性的性欲被重新定义，从规范性的经验中排除了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异性恋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占据一般的优势地位的性关系范式，因此，奔放的异性恋成为男子气概的证明——Smith and Taylor, “Hephaestion and Alexander,” p. 14。

220 Helmut Walser Smith, “The Poetry of Friendship and the Prose of Patriotic Sacrifice in Prussia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 in Goldenbaum and Košenina (eds.), *Berliner Aufklärung*, p. 10.

-
- ① 我几乎找不到有关他的信息，除了他的名字有十几种不同的拼写方式这一点。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这首诗之前似乎都没有被讨论过。——作者注
- ② BWV是“巴赫作品目录”的简称，用于给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编号。
- ③ 萨梯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生物。

- ④ 温特在《大王的艺术展演》一文中尝试解释说，伽倪墨得斯代表一个“美好的灵魂”，这无法让人信服。她忽略了同性恋方面的因素。——作者注

第二部

战争与和平

第7章

1745—1756年的和平与战争

1745年12月25日对弗里德里希而言是快乐的一天。他在这一天庆祝的并非基督的诞生，因为他并不相信基督，他庆祝的是与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和平，这是他的确相信的事情。他的钱库已经空了，正是该离开战争的时候，从战争中已经得不到更多东西了。他知道他是幸运的，因为玛丽娅·特蕾莎宁愿与路易十五单独媾和。她同意与弗里德里希和谈只是因为她发现法国人丝毫不肯妥协，因为最近在低地国家取得的胜利，他们的脊梁骨变硬了，并且，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叛乱转移了英国人的注意力。¹ 法国人曾期待在1746年取得胜利。尽管怀揣这样的信心，当他们在12月中旬得知普鲁士盟友要再次抛弃他们的时候还是震惊不已。法国驻柏林大使瓦洛里展开了最后的努力，他将自己的秘书克洛德·艾蒂安·达尔热派去德累斯顿，试图阻挠正在进行的谈判。

为什么小小一个秘书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使命呢？很有可能的理由是，达尔热已经吸引住了弗里德里希游移的目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到了他被邀请到普鲁士任职的地步。²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达尔热将在弗里德里希的同性恋诗篇《守护神》中扮演着反英雄的角色。可惜弗里德里希知道如何将性与政治分开。在送给瓦洛里的关于他们会面的详细报告中，达尔热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其外交使命方面，他彻底失

败了。³ 自从弗里德里希在1741年11月首次单方面抛弃他的盟友后，普法关系一直不稳定。1742年《布雷斯劳和约》以及1745年8月的《汉诺威协定》，都是秘密且单方面缔结的，这加深了法国人的一个信念，即他们临时的盟友普鲁士是不可信赖的。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他带着强烈的蔑视，拒绝了法国代替军事援助提供的补贴，他说这笔钱的数目小得可怜，勉强只够3个营用，这对于像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这样的小诸侯来说可能很适合，但对普鲁士国王来说仅仅是种侮辱。⁴ 以路易十五的名义送回来的回复，语气同样冷淡，回复事实上告诉弗里德里希，他现在只能靠自己：“谁能比您自己更有资格向陛下您提出建议呢？您只需按照您的智慧、经验和——最重要的——荣誉告诉您的去做就行。”⁵

这次书信交流很典型地反映了弗里德里希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末期充满问题的处境。他暂时赢了，但未来是不确定的。1740年，他夺取了西里西亚，并在接下来的5年里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战利品，这已经惊动了其他的欧洲大国。最令人不安的是什么呢？最初入侵时的野蛮侵略？普鲁士军队的惊人战斗力？决定和执行的速度？狡猾的外交手段？对盟友的一再背弃？愤世嫉俗和不信神的名声？在这个古板、缓慢、喜欢花费时间慢慢处理纠纷的大国外交的世界里，闯进来一个破坏性的入侵者，一个肆无忌惮的暴发户。路易十五可能认为，进攻西里西亚是疯子的行为，但是弗里德里希已经表明，当疯狂成功时，它将改名为无畏。

在所有那些希望看到弗里德里希回到他所属之地——精神病院的人中，玛丽娅·特蕾莎是最坚决的。当然了，弗里德里希也不抱任何幻想。他在对仅仅十几年之后就最终爆发的下一场战争的记载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在和约的墨迹未干时就开始备战的，他说“蚂蚁在夏季就开始储备冬天要用的东西”。他还说如果他国家的资源允许，他会做得更多，因为玛丽娅·特蕾莎是无法和解的敌人。她的目标之一已经达到，她深爱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已经于1745年9月当选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现在更恰当的称呼是哈布斯堡-洛林家族）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被短暂中

断的关系现在已经恢复了。这对她非常重要，既有家族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然而，那件更大的战利品——夺回西里西亚，她仍旧没有得到。维也纳“各阶层的人”都以沮丧的心情迎接和平条约的消息，威尼斯大使埃里佐如是说。⁶

他们的沮丧是很容易理解的。很多理由都说明西里西亚的损失是重大的。最明显的是，西里西亚大约110万的居民使得普鲁士的人口增加了约50%。⁷西里西亚占地面积超过50万平方千米，也就是约为英格兰的三分之一。⁸这一地区不仅面积广阔，同时也很繁荣。它是哈布斯堡家族所有领地中最富裕的省份，农业产量高，矿产资源丰富，还有繁荣的纺织工业。⁹弗里德里希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说，西里西亚的亚麻对于普鲁士的意义就像秘鲁的黄金对于西班牙的意义。西里西亚的税收约为哈布斯堡君主国总税收的四分之一，它为新统治者做出的贡献更大，事实上，西里西亚的税收大约占普鲁士总税收的40%。¹⁰

大自然提供了奥得河作为帮助，这条河将该省一分为二，向西北方向流经勃兰登堡，最后从斯德丁进入波罗的海。该河大部分水域均可通航，这给弗里德里希提供了一份无价的军事资产，他得以相对迅速地运送士兵和作战物资，这使他能够在内线作战。在更普遍的意义，只要瞥一眼当时这一地区的任何一张地图，就能发现西里西亚的战略重要性。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这片土地像一条舌头伸到德意志北部，使得奥地利军队与柏林的距离只有150千米；损失这一地区不仅降低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北部的影响力，也让普鲁士军队与布拉格的距离变成了150千米，与维也纳的距离变成了200千米。西里西亚由几个重要的要塞防御：奥得河畔的格洛高、布雷斯劳、布里格和科泽尔，西南方威斯特瑞兹河畔的施韦德尼茨，还有尼斯河畔的格拉茨和尼斯（令人困惑的是，有4条河流被称为“尼斯”，它们都是奥得河的支流）。¹¹此外，这笔巨大资产交给普鲁士，对奥地利人造成了加倍的伤害，因为如果将西里西亚所有的各种资源加在一起，用代数符号“X”表示，在两个国家的实力上转移的不是“X”，而是“X”的2倍，因为从一方取走的东西加到了另

一方身上。用足球运动的说法来讲，征服西里西亚对弗里德里希而言是赢了一场“六分赛”^①。在七年战争中期，玛丽娅·特蕾莎在给道恩元帅的一份备忘录中抱怨说，西里西亚给弗里德里希的军队增添了4万人，而让自己的军队损失了差不多的人数。¹²

事实证明，普鲁士的统治对西里西亚人来说是喜忧参半的。该地区的经济已经与“圣瓦茨拉夫王冠”的另外两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紧密融合在一起。虽然和平条约承诺会有一个商业条约让这一关系继续下去，却从来没有兑现过。相反，弗里德里希侵略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西里西亚的商人将贸易活动转向北边的奥得河和易北河，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直到18世纪80年代，他们才充分融入普鲁士的经济。¹³在文化方面，主要的受益者是占总人口一半左右的新教徒。¹⁴兰克甚至称赞弗里德里希在1757年12月洛伊滕会战中对奥地利的胜利为新教徒对白山会战迟来的回应，1620年，天主教徒在白山会战中取得胜利，揭开了对异端者长达一个多世纪残酷迫害的序幕。¹⁵弗里德里希不仅制止了迫害活动，也禁止任何报复行为。但是他遵守诺言，维持了该地区宗教信仰的现状，这可能意味着让新教徒失望，因为他们抱怨说，他们仍然必须经常离开自己居住的社区去找一个教堂，而在自己的村里，少部分天主教徒仍继续垄断对他们需求而言过大的教堂建筑。¹⁶

在某些地方依然存留着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尤其是在上（南）西里西亚，那里森林茂密，农田贫瘠，促进了实行农奴制的大庄园的发展，普遍信仰天主教，大多数讲波兰语的居民（占总人口的28%）居住在那里。¹⁷还有一个特殊问题，有300多名贵族地产拥有者居住在省外，他们大部分担任着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官职。¹⁸弗里德里希确实尽全力赢得了他的新战果。西里西亚可能是被征服了，但它从来没有遭受被征服者的待遇，也没有像那些被暂时占领的地区如梅克伦堡或是萨克森那样经受剥削。¹⁹实际上，它受到特别的优待，由弗里德里希直接管理，而不是分配给总执行局。²⁰他的诚意的一大象征就是在西里西亚

首府布雷斯劳购置了一座贵族宅邸，并将其改建为一座王宫。²¹ 他每年来访两次，不知疲倦地巡视以搜集信息，虽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经常被告知那些他想要听到的话。当然了，他很快就采取了措施，充分利用这份新资产，他将普鲁士的行政和征兵区制度引入此地。200个年轻的西里西亚贵族被派往柏林军官学校接受军官训练。²²

总之，西里西亚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值得付出一切努力留住它或收复它。眼下奥地利人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与法国人作战。1746年秋天，寻求全面和平的谈判在布雷达开始，但在下一年以失败告终。两大联盟——奥地利、撒丁王国、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为一方，法国和西班牙在另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法国在印度和奥属尼德兰获胜，但在加拿大、意大利和公海战败。最终，财政枯竭将和平强加于诸国。根据1748年10月18日的《亚琛条约》，各国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交易，但在地图上只有轻微的调整。这场持续将近10年、耗资巨大、遍及全球的毁灭性战争只带来了很小的变化。法国和英国交换了在加拿大和印度征服的土地，法国还将征服的低地国家领土分别还给了奥地利和荷兰共和国。法国人唯一的收获是间接获得的，奥属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公国交给了路易十五的西班牙女婿唐·菲利普。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唯一明确的胜利者是3年前退出战场的普鲁士国王。毕竟，他对西里西亚的占有，是得到《亚琛条约》明确保证的。²³

弗里德里希知道，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法国和英国之间关于海外殖民地统治的冲突，还是自己跟哈布斯堡家族对中欧统治权的争斗，全都没有结束。他写道，这份和约“是人们匆忙缔结的，结论是草率得出的，各国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解决了他们目前的尴尬。他们扑灭了正毁灭欧洲的部分火焰，但他们只是把可燃材料堆了起来，这些材料一有机会就会重燃”。²⁴ 如果他知道奥地利决策者在想些什么，他或许还能使用更具煽动性的比喻。资深大臣约翰·克里斯托夫·冯·巴滕施泰因在一份备忘录中声称，过去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面临着两个死敌——西

方的法国和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更危险更邪恶的掠食者。这就需要重新评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联盟体系。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一直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对抗法国，但在对抗东方的敌人方面就几乎毫无用处。巴滕施泰因总结说，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提供协助的，是俄国。²⁵

巴滕施泰因是对的，弗里德里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瞧不起俄国人（说他们“笨拙、酗酒、迷信、卑鄙”），但很明智地尊重俄罗斯帝国。由于物理距离远，这个国家本身是不可摧毁的；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它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因为战时它可以派出大批非正规军四处劫掠。²⁶ 弗里德里希在1743年6月告诉在圣彼得堡的手下玛德菲尔德男爵：“为了维系与俄罗斯帝国永久的和谐关系，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愿意去做的。”²⁷ 他也知道，俄国的外交政策是由执拗地厌恶普鲁士的副首相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别斯图热夫伯爵决定的，弗里德里希指责他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管理能力很差，因无知而傲慢，生性虚伪，甚至在跟那些贿赂了他的人打交道时也是双重面孔”。²⁸ 1743年8月，玛德菲尔德被告知，要尽力确保别斯图热夫被免职。²⁹ 这一计划和随后几年里弗里德里希的其他尝试一样都失败了，转而使用的行贿途径也没有成功，1744年6月时，玛德菲尔德被授权开出“10万、12万甚至15万克朗〔埃居〕”的价码。³⁰ 到了8月，未被诱惑的别斯图热夫升任首相，并一直执政到1758年，他始终是弗里德里希的眼中钉肉中刺。

对于其他所有欧洲大国来说，对俄国的政策都是难以处理的，因为圣彼得堡的局势即使说不上混乱，也是动荡的。有句老话说，俄国的政府制度是“由暗杀来调节的专制统治”，当遭遇继承这一基本问题时，这句话就最为适用。1722年，彼得大帝决定由现任沙皇自行选择继承人，这一决定导致每当出现皇位空缺时，就可能出现使政权不稳定的争夺。接任彼得大帝的是他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1727年在位），之后是他的孙子彼得二世（1727—1730年在位）和他的侄女安娜（1730—1740年在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安娜在1740年10月17日的驾

崩，促使弗里德里希入侵西里西亚。安娜选择了她外甥女安娜·利奥波德芙娜（沙皇伊凡五世的外孙女、彼得大帝的侄外孙女）两个月大的儿子伊凡六世做继承人，使俄国出现了长期的不稳定。1741年11月，婴儿沙皇和他的父母在政变中被赶下台，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坐上了皇帝宝座，并一直统治到1761年。³¹未婚的伊丽莎白很快确定12岁的外甥卡尔·彼得·乌尔里希为继承人，他是伊丽莎白已故的姐姐安娜和荷尔斯泰因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儿子。他被带到圣彼得堡，皈依东正教，并改名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作为继承俄国皇位的代价，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对瑞典王位的权利，该王位传给了他的叔叔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弗里德里希的命运深深卷入罗曼诺夫家族和荷尔斯泰因家族的这些来往交替中。1744年8月，他似乎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机，彼得大公与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侯爵小姐索菲订婚，她皈依东正教后改名为叶卡捷琳娜。弗里德里希得意地说：“没有人比她更符合俄国的目标和普鲁士的利益了。”³²叶卡捷琳娜的父亲是普鲁士军队的一名将军，她的母亲是荷尔斯泰因家族成员、瑞典王位继承人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的妹妹。为这种对北欧的婚姻征服锦上添花的是，在同一个月，弗里德里希的妹妹乌尔丽克嫁给了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并在1751年她丈夫继位的时候成为瑞典王后。经过一场混乱的订婚仪式，叶卡捷琳娜和彼得大公最终于1745年8月完婚。

可惜普鲁士、瑞典和俄国这个三角家族关系并没有转化为3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和谐。1744年8月，正在乌尔丽克与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王储成婚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正在发动对波西米亚的入侵，开启了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意识到圣彼得堡可能认为国家利益比家庭关系更重要，弗里德里希试图去争取俄国宫廷的新盟友。在祝贺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夫人和她女儿叶卡捷琳娜的“胜利”的信中，他称这一天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并表示自己虔诚地期望沙皇伊丽莎白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保护她的政权和家族，别

让普鲁士的敌人在她的宫廷里歪曲自己对奥地利重启战端的行动。³³

他的希望落空了。正是弗里德里希为支持法国联盟重启战端，证实了别斯图热夫对他的“激烈的仇恨”。³⁴在这件事情上，别斯图热夫得到了家族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他巧妙地让自己的儿子安德烈与阿芙多季娅·拉祖莫夫斯基女伯爵结婚，据称，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这位名义上的侄女实际上是他的女儿。她的母亲不是别人，正是沙皇伊丽莎白，她秘密地下嫁给了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玛德菲尔德微妙地说，他缺乏智慧，却是个“基西拉岛的赫拉克勒斯”）。³⁵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伊丽莎白个人强烈反感弗里德里希。³⁶鉴于这两个人从未谋面，这种反感很可能是来自别斯图热夫精心呈上的报告，报告说弗里德里希取笑她众所周知的对烈酒和强壮男人的喜爱。当然，别斯图热夫已指示俄国外交官可以在文件中加入任何对弗里德里希不利的内容。³⁷弗里德里希在公开场合把伊丽莎白同另一位东方大国的专制君主土耳其苏丹相提并论，这也引起了她强烈的反感。³⁸所以弗里德里希试图博取她欢心的礼物——由安托万·佩恩为她绘制的一幅画像和一辆华丽的节日马车——并未获得喜爱，甚至连一句答谢都没有。³⁹

虽然这些表面上的琐事在俄国宫廷这样一个拜占庭式的环境中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在裂痕背后，还有更根本的考量。一方面，普鲁士和俄国在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一直是相互扶持的。正是彼得大帝在大北方战争中解决了瑞典的查理十二和萨克森一波兰的强者奥古斯特这两个霍亨索伦家族的劲敌，这场胜利使俄国成为波罗的海东部的主导势力，也在德意志东北部创造了一个真空地带，普鲁士感激地填补了进去。甚至有人认为，普鲁士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胜利者，尽管它的军事贡献不太大，而且是断断续续的。⁴⁰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普鲁士的“宿敌”与其说是奥地利，不如说是萨克森一波兰。

总之，波兰不是三明治的填充馅料，而是两块砖之间的砂浆。然而，只有在普鲁士还被视为这对伙伴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时，波兰才能起到

黏合的作用。1716年，彼得大帝介入了波兰的混乱事务，迫使国王和瑟姆（议会）代表达成俄国给予担保的协议（俄国由此获得以下权利：未来一旦协议被破坏，俄国可以随时干涉）。1717年1月30日，在包围议会建筑的俄国士兵的恐吓下，“沉默瑟姆”同意了协议。从这天起，俄国的霸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⁴¹ 俄国经常得到普鲁士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与彼得大帝在1720年达成一项协议，维护“波兰的自由”。其中第一项是自由否决权，所有的议会立法必须全体投票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可以预见，这会导致议会瘫痪。⁴² 俄国和普鲁士联手，可以挫败法国创建包含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的“东方屏障”，并使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在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强者）去世后当选为波兰国王的意图。⁴³ 这次“选举”也表明了俄普之间谁才是更强大的一方。仅仅几个月以前，一位俄国公使，勒文沃尔德伯爵，被派往柏林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双方既不把票投给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也不投给奥古斯特的儿子，而是推选一位葡萄牙王子上位。⁴⁴ 结果俄国出尔反尔，策划让新任萨克森选帝侯被选举为奥古斯特三世，尽管前提是他必须保证不会试图改革波兰的宪法。⁴⁵ 这样的选择，在根本上是有违普鲁士利益的（更别提波兰人的利益了），愤怒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奥地利提供了一支5万人的军队去推翻它。有趣的是，他们不愿意将普鲁士视为地位平等的盟友，拒绝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只接收了1万人。⁴⁶

换句话说，普鲁士和俄国的利益有重叠，但不完全相同。只有当萨克森—波兰的联系被打破，普俄联盟才会显得更自然些。与此同时，俄国人密切关注着局势，看到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对待萨克森盟友的方式很不体面，并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进攻了萨克森，俄国人很愤怒。他们对弗里德里希与法国的联盟深感不安，这似乎让普鲁士成了“东方屏障”的一部分。⁴⁷ 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是瑞典。瑞典人希望利用俄国的国内动荡，于是在1741年8月对俄国宣战并入侵芬兰。他们打错了算盘。战争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双方最后于1743年1月签订

《奥布和约》，屈米河以东的芬兰南部领地被割让给俄国，包括维尔曼斯特兰德和弗里德里希港两个要塞。⁴⁸这次试图推翻彼得大帝基业的最新尝试使俄国人对于瑞典的政治动荡形势敏感起来。由于弗里德里希与法国结盟（时断时续地），并且他的妹妹在1744年8月之后成为瑞典的王后，圣彼得堡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1747年，瑞典和普鲁士正式结盟，证实了俄国的怀疑。

如今已经完全控制了沙皇的别斯图热夫开始密谋在瑞典发动一场政变，将王位继承权从阿道夫·弗里德里希那里转到现任国王的侄子，黑森-卡塞尔王储手中。在1748年，这发展成为一次大型战争的宏伟计划：由丹麦、俄国、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组成联盟，在英国舰队的支持下入侵瑞典，而奥地利将借此机会在俄国的协助下收复西里西亚。⁴⁹到1749年，这一计划土崩瓦解。英国人和奥地利人都不同意这样一个挑衅的政策。弗里德里希进行的有力的且广为宣传的军事准备，以及法国对他表示支持的外交干预，更加强了他们不情愿的态度。即使法国没有忘记和原谅弗里德里希的背叛，他们也不希望看到瑞典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

到了1750年的春天，危机结束了。弗里德里希舒了一口气，但如果他能得到更多来自维也纳的情报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有信心了。他不知道，在1749年3月，玛丽娅·特蕾莎皇后要求她所有的资深大臣提交有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的报告。事实证明，她的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伯爵的报告是最冗长也最激进的。他给这项任务带来了令人敬畏的外交经验。从任职于意大利（1741—1744年）、奥属尼德兰（1744—1748年）和1748年担任奥地利和平谈判代表的经验中，他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首先，未来奥地利必须专注于其说德语的核心领地；其次，必须停止以英国作为联盟体系的基础。早在1743年3月，他就写道：

比起在意大利的扩张和获得那些会遇到很多困难、本质上需要依靠英国才能征服和维护的遥远土地，奥地利应该更多关注其德意志领土的安全并清除永久的敌人、危险的邻国和皇冠的竞争对手〔普鲁士〕。⁵⁰

1745年的《德累斯顿和约》被他视为“必要之恶”。他继续写道，时机成熟的时候，普鲁士应该被“消灭”。⁵¹

他于1749年3月24日呈交给玛丽娅·特蕾莎的报告是其他5位大臣的报告加起来的2倍长。⁵²其基本前提是收复西里西亚的绝对必要性，西里西亚是哈布斯堡政治有机体的一部分，它被切断后造成了一个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他总结说，由于现有的联盟体系已经失败，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现在的头号敌人是普鲁士，在现在和将来，普鲁士都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⁵³弗里德里希远未止步不前，他会试图进一步削弱奥地利，以确保他的战利品的安全。未来依靠海上强国是没有意义的。荷兰共和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而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②一次又一次对困境中的奥地利弃之不顾。此外，这个“旧体系”有根本性的缺陷，因为它不是针对普鲁士的，而是针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乔治二世和他的汉诺威大臣们可能会讨厌那位普鲁士暴发户，但英国公众舆论非常赞赏他。

考尼茨接着说，现在只有一位大陆盟友可以帮上忙，那就是法国。他承认，推翻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国际体系的核心支点——哈布斯堡家族与波旁家族之间的敌意——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因为法国从来只顾及自己自私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曾经是个威胁，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路易十五无知又懒惰，而他的外交大臣德·皮西厄侯爵没有经验，消极被动，比起前任们来说不是那么仇视奥地利。他们俩仍然都对弗里德里希在上次战争中的3次背叛耿耿于怀。为了平复法国的反对意见，考尼茨建议由多方交换领土：路易十五的女婿唐·菲利普，将从撒丁国王

那里获得萨伏依，奥地利则把米兰公国补偿给撒丁国王，然后唐·菲利普把1748年割让给他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公国还给奥地利。如果这些还不够具有吸引力的话，哈布斯堡的卢森堡公国对法国是个合适的诱饵。然后，通过许以普鲁土的领土，其他的盟友——俄国、萨克森、普法尔茨和汉诺威——可以加入联盟。⁵⁴

鉴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财务困窘，并且正在着手开展国内改革计划以修复对普鲁士战争暴露出的各种缺陷，正如更保守的大臣指出的那样，此时并不是这样一场革命的有利时机。然而，玛丽娅·特蕾莎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她对弗里德里希有非常强烈的厌恶之情。1750年，考尼茨被派往凡尔赛担任奥地利大使。⁵⁵在那里，他发现一个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国此时正因致命的弱点开始崩溃。法国舆论对把在印度和低地国家征服的所有地区交还回去的《亚琛和约》报之以惊愕和愤怒，“像和约一样蠢”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比喻。⁵⁶人们都相信，实际上的首席大臣是国王的情妇蓬帕杜夫人，朝廷在无能之外又加上了丑闻。⁵⁷她实际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策（相对于任免权），一直有很多争论。⁵⁸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反对国王明显不连贯且优柔寡断的政策的人而言，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替罪羔羊。⁵⁹弗里德里希很看不起路易十五，更不会在意他的情妇，厌女症和势利眼（娘家姓普瓦松的蓬帕杜夫人出身金融界）的有力结合使他的蔑视更加强烈。当伏尔泰1750年转达她的问候时，弗里德里希轻蔑地回应道：“我不认识她。”这是愚蠢的。玛丽娅·特蕾莎一贯拘谨，在与蓬帕杜夫人通信的时候，她还是强迫自己称蓬帕杜夫人为“我的亲戚”甚至“夫人，我亲爱的姐妹”。⁶⁰我们将会看到，她的礼貌会在1756年给她带来一大笔政治红利。⁶¹

从总体上说，弗里德里希在跟法国打交道的时候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局限性。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普鲁士和法国之间有一个天然的、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在1740年写给法国外交大臣，枢机主教弗勒里的最初几封信之一中，他明确表示：“法国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所有的一切都将我们团结起来。”⁶²但这没有阻止

他在1741年到1745年之间3次单方面背弃法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触怒了凡尔赛，甚至在得知弗勒里1742年6月听说《布雷斯劳条约》签订流下了愤怒的泪水时也毫无警觉。⁶³ 他相信两国被最有力的黏合剂联结在了一起。“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正如他在1752年“政治遗嘱”中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曾从哈布斯堡—洛林家族攫取了大块领地：他娶了年长的女儿（西里西亚），而法国带走了年轻的女儿（洛林）。⁶⁴

奥地利已经取代了萨克森成为普鲁士的首要对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那么明显的是，对法国而言，奥地利仍然扮演着对手的角色。正如弗里德里希自己在“政治遗嘱”中承认的那样，一个更好的候补者已经出现在西方，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英国从法国的小伙伴转变为令它痛苦的竞争对手。查理二世是路易十四的总督，而威廉三世则是打击他的锤子。在印度、非洲、加勒比海，以及最重要的北美洲，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发生了更频繁、更猛烈的冲突。在1744年到1748年之间，他们在圣劳伦斯湾附近发生了局部的但是激烈的冲突。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745年英国占领路易斯堡，虽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得不又还了回去。有了这么多利害冲突，和平只能是休战，北美容不下两个有抱负的世界大国。在英国殖民者不断从沿海殖民地涌入西部寻找新土地的时候，他们前进的步伐受到了从圣劳伦斯河流域南下、与他们同样贪婪的法国竞争对手的挑战。如果法国人成功地与他们从路易斯安那北上的同胞会合，英国人横跨密西西比河直到更远的大草原的进一步扩张计划就会被阻断。1749年春天，一支法国远征队受命顺俄亥俄河而下，驱逐英国商人。⁶⁵ 一位新总督德·迪凯纳侯爵于1752年被派往法属加拿大，他得到的命令是占领俄亥俄河流域，从而将这片地区与路易斯安那在地理上连成一片。1754年，他在阿勒格尼河与莫农格希拉河交汇形成俄亥俄河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要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随着战争不可避免的临近，双方现在都指望着让其他大陆国家保持

中立，好腾出手在海外作战。两者中更紧张的是英国，因为乔治二世备受羡慕的汉诺威选帝侯国对于法国而言是一个诱人的目标。这片领地坐落在北德平原，没有天然的边界，它可以被轻易地占领并在任何的和平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使用。⁶⁶ 为了在整体上确保领土的安全，特别是保障汉诺威的安全，英国从1749年起一直在寻求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加强与奥地利的盟友关系。这一努力的主要方式是，推选玛丽娅·特蕾莎的长子约瑟夫成为“罗马人的国王”。这将保证他父亲死后，他继承皇帝的称号，从而避免1740年至1745年的事件以任何方式重演。不幸的是，与选帝侯们的谈判并不顺利，整个计划于1752年屈辱地失败了。⁶⁷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奥地利人对这一倡议并没有出多大力，他们认为整个计划是误入歧途，对于选帝侯之中资历最浅者——汉诺威选帝侯——竟然霸占帝国事务的领导地位感到愤怒。⁶⁸ 更不用说，在这方面（如果其他方面不是这样的话），弗里德里希极力支持他们，并帮忙毁掉了纽卡斯尔公爵的宏大计划。⁶⁹

从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和奥地利人都逐渐认识到，现在他们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并不一定是相互敌对的，但绝对是不同的。英国对西里西亚毫无兴趣；奥地利对欧洲外面的世界也毫无兴趣。奥地利无法派遣军队去美洲；英国也没法派一支舰队沿奥得河而上。当然了，考尼茨很久以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在凡尔赛，他一直在培养与蓬帕杜夫人的友谊，经常去她的贝尔维尤城堡拜访她，奉承她，并告诉她，他所知道的那些消息会直接报告给路易十五（或曰“法国”，据说她在他们最亲密时刻得意忘形时这样称呼他）。⁷⁰ 1753年初，考尼茨回到维也纳后，发现他所有较资深的同事仍然坚持与英国联盟。不久之后，他升任首相，并因此负责外交事务，他还满意地看到保守派的两员大将，他的前任乌尔菲尔德和经验丰富的参赞巴滕施泰因退休了。⁷¹ 像往常一样，维也纳的磨坊运转得很慢。^③ 直到1755年8月中旬，奥地利和英国之间的联盟谈判才终于破裂。⁷² 奥地利那时才决定采取一个旨在收复西里西亚的进攻性计划。在8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考尼

茨宣称，哈布斯堡君主国要生存下去，普鲁士必须被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已经失去了在欧洲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和声望。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事情，因为弗里德里希正在计划彻底摧毁这个家族。⁷³

军事行动将由奥地利和俄国承担。由于得到以下几点承诺，法国会保持中立：将奥属尼德兰的一部分划给唐·菲利普；如果波兰王位空缺，奥地利将支持法国的德·孔蒂亲王；与英国作战时，法国可以使用奥斯坦德和尼乌波特这两个面对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把普鲁士的部分土地割给法国的盟友（瑞典、萨克森、普法尔茨），以此将这个狂暴的国家削减为三流国家，即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之前的那种状态。⁷⁴奥地利驻凡尔赛的大使，施塔尔亨贝格伯爵奉命进行必要的疏通。⁷⁵

这一计划在法国得到的反响是混乱的，尤其是因为有两个对立的群体都参与了法国政策的安排，一个是正式的外交部门，自1754年起由安托万·路易·鲁耶·德·茹伊伯爵领导，另一个是围绕在蓬帕杜夫人周围的非正式小圈子，最重要的成员是受她庇护的贝尼斯神父。这两个群体名义上的首脑都是国王。他竟然同时为这两个经常互相争吵的组织负责，这恰恰体现出了他犹豫不决，行事神秘。这就是1755年秋天的情况。鲁耶对奥地利的方案不感兴趣，倾向于恢复与普鲁士的联盟，并决定派出一名高级大使，德·尼韦奈公爵前往波茨坦。⁷⁶然而，据贝尼斯所说，国王和他的情妇都更倾向于另一边。路易十五说，他一直想期待与奥地利结盟，理由是：这将确保和平；将团结两个天主教大国以支持真正的信仰；他对玛丽娅·特蕾莎的尊敬；他同样发自内心地不信任和不喜欢普鲁士国王，特别是他已经厌烦了“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这是他对普鲁士国王的称呼）对法国国王的称呼方式，就好像他们两人地位平等似的。⁷⁷贝尼斯补充说，与奥地利结盟将保护法国不受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任何敌对行动影响，增强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力，并除去英国的主要盟友。⁷⁸

贝尼斯很可能受到了蓬帕杜夫人的鼓动，备受考尼茨奉承的蓬帕杜夫人却遭弗里德里希羞辱。据施塔尔亨贝格所言，她怀着“一种对普鲁士国王的莫名仇恨”。⁷⁹ 1755年9月3日，施塔尔亨贝格和贝尼斯进行的第一次谈判会议正是在她的贝尔维尤城堡举行。⁸⁰ 似乎没有人特别着急。尽管英国表现出了战意，最近的例证是驶离加拿大海岸的两艘法国船被英国扣押，鲁耶仍然希望殖民地的危机可以在不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⁸¹ 以贝尔岛公爵和达尔让松侯爵为首的，在凡尔赛反对与奥地利结盟的亲普鲁士小团体，也有可能进一步延缓了进展。⁸² 不久，法国人就被欧洲其他地方的事务缠住。尼韦奈公爵实际上直到1755年12月22日才动身前往普鲁士。当他在1月12日到达那里的时候，事情已经决定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有许多都令人感到讽刺。其中一件就是胆小怕事、思维迟缓的英国外交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弄掉了那块导致山体滑坡的鹅卵石。尽管他是旧体系的热心支持者，但到了1755年秋天，他也不得不得出结论，奥地利不会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帮忙，即使法国入侵低地国家，奥地利也不会帮助英国。像以往一样，他在欧洲大陆主要关心的是汉诺威的安全。由于担心法国会引诱弗里德里希进攻该地，纽卡斯尔向俄国求助：“大家都知道，普鲁士国王只会因为利益或恐惧采取行动，在利益方面我们无法满足他，在恐惧方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只有俄国可以。”⁸³ 几年来，别斯图热夫一直倡导一个旨在“进一步斩断普鲁士国王翅膀”的联盟，但伊丽莎白沙皇对此并不怎么热心。然而，1755年9月19日，她同意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在圣彼得堡签署，包括以下内容：英国每年提供10万英镑的补贴，以维持一支5万人的军队和一支50艘战舰组成的海军，永久驻扎在俄国的西部边境，英国还承诺，如果俄国真的在愤怒中部署了这些部队的话，还可以得到40万英镑的额外补贴。⁸⁴

虽然沙皇伊丽莎白推迟了批准，但这足以让弗里德里希感到来自上帝的恐惧。12月20日，弗里德里希责备了大臣波德维尔斯，因为后者暗

示说圣彼得堡协议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相反，他说他有可靠的情报显示，在10月份举行的一次有沙皇出席的会议上，俄国已经决定，如果普鲁士攻击俄国的盟友，或者——弗里德里希在此添加了一个“注意”以示强调——俄国的一位盟友攻击普鲁士，那么他们就将立即准备进行军事行动。从那以后，他们与奥地利协同作战的准备工作急速进行着。⁸⁵ 由于法国的不作为，受到孤立威胁的弗里德里希无奈转向了英国。幸运的是，他与乔治（二世）舅舅的关系已经从一贯的深度冷冻状态中解冻了一些。早在1751年，弗里德里希就故意派詹姆士二世党人，马歇尔伯爵乔治·基思去凡尔赛担任普鲁士大使，这让乔治二世很生气。当外交大臣波德维尔斯问乔治二世会做何反应时，弗里德里希粗暴地回答道：“我他妈才不管呢！”⁸⁶ 然而，在1754年底，两个国王已经联手遏制因黑森—卡塞尔王储皈依天主教而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对新教一方形成的损害。⁸⁷ 1755年5月，弗里德里希横穿德意志前往他在西边的领地，路上接近了居住在海恩豪森的乔治。僵局被进一步打破。虽然这两个国王没有见面，但彼此交换了友好的消息。弗里德里希还借着不伦瑞克公爵夫人因为其婚姻事务来访之机，向汉诺威宫廷非正式地转达了自己不会攻击舅舅领地的保证。⁸⁸

伊丽莎白沙皇仍在拖延批准圣彼得堡协议，到1755年底，英国愿意接受普鲁士的示好了。为了相互取暖，两个被孤立的国家通过1756年1月16日于伦敦签署的《威斯敏斯特协定》走到了一起。协定的目的是让德意志在殖民地战争期间保持中立，虽然这场殖民地战争实际上已经进行了许多个月，但还没有正式宣战。他们强调，这不是一份联盟协议。这是一个具体的协议，规定英国和普鲁士不互相攻击并阻挡外国军队进入，换句话说，阻止法国攻击汉诺威和俄国人进攻普鲁士。协定还有两条秘密条款，首先是协定内容不包括奥属尼德兰（这就是为什么正文中使用的是“德意志”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第二条是规定英国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缴获的普鲁士船只支付2万英镑的赔偿。⁸⁹

这个协定即使谈不上是和平的，也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成了通往世

界大战的重要一步。在欧洲各个国家的首都，人们都感到惊慌，圣彼得堡和凡尔赛则是愤怒。对于俄国人来说，前一年9月份的时候与英国人谈判达成的补贴条约重点是反普鲁士。然而，现在他们发现，英国人实际上是在保证弗里德里希的安全！对法国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证明了——如果需要证据的话——他们的普鲁士“盟友”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坏蛋。他们还错误地认为，如果英国没有获得汉诺威安全的保证，他们会在美洲事务上让步。⁹⁰事实上，法国也只能怪自己。从尼韦奈公爵被任命为大使到他实际到达柏林，已经白白浪费了5个月的时间。1755年12月8日，克尼普豪森从凡尔赛发回报告称，尼韦奈公爵还在巴黎，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⁹¹他实际上是在《威斯敏斯特协定》签订前几天到达普鲁士的。如果他在前一年的秋季到达，并向弗里德里希提出保持德意志中立的建议，那么所有的一切就可以避免。

在维也纳，人们感到非常满意。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告诉法国，弗里德里希要与英国做交易，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理智地抵制住了揭人伤疤的诱惑。当然了，在私下里，他们热烈拥抱彼此。“解救奥地利的决定性事件”，考尼茨得意地说道。事实上，路易十五对弗里德里希的背叛非常恼火，以至于情况从奥地利追求和他建立联盟，变成了他主动追求和奥地利结盟。1756年2月19日，贝尼斯向施塔尔亨贝格递交一份声明，表示法国将寻求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以促进欧洲的和平、对天主教的拯救和两个宫廷的共同利益。⁹²然而事实证明，达成联盟条约的路是崎岖不平的。凡尔赛的好几位大臣都心怀疑虑。正如弗里德里希指出的那样，《威斯敏斯特协定》并没有阻止法国占领奥属尼德兰，该省已经被故意排除在协定外，就是为了这一可能性。⁹³路易十五没有听进去。一旦决心放弃普鲁士，他就一反常态坚持与奥地利结成全面的联盟。没有一个大臣敢于反对他。⁹⁴1756年5月1日，鲁耶、贝尼斯和施塔尔亨贝格签署了《凡尔赛条约》。

这就是伟大的“外交革命”，在法国被更为温和地称之为“联盟颠覆”。其核心是相互保证领土，以及承诺在任意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的时候

，每个国家各出一支约2.4万人的军队。法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的冲突被排除在外。换言之，它完全是防御性的。然而，法国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对普鲁士采取更有进攻性的行动。这些进一步的谈判需要时间，可能是几个月，所以1756年5月22日，考尼茨告诉他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要求俄国把进攻普鲁士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春天。⁹⁵

弗里德里希的最初反应是困惑：“我不明白法国和维也纳的宫廷想从所有这一切中获得什么”，他在5月11日写给克尼普豪森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并告诉他在法国大臣在场的情况下要假装毫不在乎的样子。

⁹⁶ 那天弗里德里希也带着乐观的心情首次接见了新任英国大使安德鲁·米切尔，至少在短期内是乐观的。他向米切尔保证：“今年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可以用我的头来担保，但我不能保证明年会发生什么事。”然而他也表达了他主要的焦虑：“你对俄国人的情况有把握吗？”米切尔回答说：“国王陛下，我认为是这样。”弗里德里希不肯就此罢休，他在后来的接见中再次询问：“我们对俄国人的情况是否有绝对的把握？”米切尔再次向他保证，这一次更为明确。弗里德里希当然想相信并且很可能相信了，因为他还谈到了前一年秋天的《英俄协定》，协定规定要从海路将一支3万人的俄国军队运到波美拉尼亚。⁹⁷ 一星期后他不那么确定了，他告诉自己在伦敦的手下亚伯拉罕·路德维希·米歇尔，他已收到可靠情报，沙皇对《威斯敏斯特协定》“前所未有地不满”。⁹⁸

6月和7月间，这件事的分量在弗里德里希的眼中逐渐下降。⁹⁹ 通过阅读《政治通信集》^④的第十二和十三卷中翻印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事件每日的进展。弗里德里希从两个间谍那里获得了详细的情报，一个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馆的秘书，另一个是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内阁办公室的官员。此外，荷兰驻圣彼得堡公使的信件在送往海牙途中，在柏林被截获并被破译。¹⁰⁰ 弗里德里希收到的关键信息可以概括如下：

6月17日：俄国在西部边境集合了17万正规部队和7万非正

规军。

“6月下旬”：奥地利军队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集结。

6月27日：俄国已经停止了军事准备。

7月16日：匈牙利境内的奥地利军队受命调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7月21日：俄国已经停止动员，但只是因为攻击被推迟到了1757年。

还不完全清楚最后两条信息中哪一条使得弗里德里希决定在1756年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¹⁰¹可以肯定的是，他在7月23日已经得出结论，既然战争是必然的，那么“先发制人胜过后发制于人”。¹⁰²只是为了确保俄国和法国在这一年无法作战，行动被推迟到8月下旬。8月13日，他下令正在马格德堡的不伦瑞克亲王费迪南德将军取消所有休假，并在19日准备好出发。8月26日，他命令费迪南德于3天后越过萨克森边境。¹⁰³8月28日，米切尔向伦敦汇报：“今天早上4点到5点之间，我〔在波茨坦〕告别了普鲁士国王。他立刻骑着马去检阅部队了，他的军队经过很短的训练之后，由他亲自领头，直接开往贝利茨，明天他将从那里进入萨克森的领土。”¹⁰⁴弗里德里希这次“与荣耀的约会”将把他带到全面灾难和考虑自杀的边缘，然后，在6年半不断的危险和焦虑之后，才以平淡的胜利告终。

入侵萨克森的直接影响就是激活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联盟。法国人并不希望受限于1756年5月1日《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2.4万军队，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渴望派一支主力部队与弗里德里希作战。这部分原因是法国不想在大陆战争中被当作地位较低的伙伴看待，部分原因是法国认为敌人肯定会很快败北，想在谈判桌上预定一个好位置，到时候好对敌人发号施令强加条件。纯粹的愚蠢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些

要求从海战中获得资源的人和那些希望在陆战中获得资源的人发生了冲突，而解决冲突的方式就是让双方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简单的权宜之计。法国的大臣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法国总管财政的大臣莫拉被告知，不能对国王指出法国的资金根本支撑不起这一切的慷慨。尽管谈判花了些时间，第二份《凡尔赛条约》还是在1757年5月1日签订了。根据这份条约，法国承诺提供一支约10.5万人的军队，再加上法国资助的4000巴伐利亚军队和6000符腾堡军队。作为回报，玛丽娅·特蕾莎同意割让自己在尼德兰的领地，其中一部分直接并入法国，但大部分则归路易十五的女婿唐·菲利普。当然，西里西亚会归还哈布斯堡君主国，马格德堡分给萨克森，普属波美拉尼亚并入瑞典（如果它加入战争的话）。此外，还提到了将普鲁士的领土割让给荷兰共和国、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的可能性。就好像以上这些承诺还不够似的，法国还承诺每年支付给奥地利1200万古尔登的补贴。¹⁰⁵

换句话说，纽卡斯尔公爵在1755年秋天弄掉的那块鹅卵石引起了欧洲针对弗里德里希的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联盟。最强大的3个大陆强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还得到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大多数诸侯的协助。普鲁士竭尽全力换来的只是与英国达成的一项有限的协议，而英国当时正忙于殖民地的争斗。弗里德里希只能归咎于自己。早在1742年《布雷斯劳和约》签订之后，他就告诉他的外交大臣波德维尔斯：“至于我的新领地未来的安全，我将依靠一支优秀而庞大的军队、一个充足的国库和坚不可摧的要塞，以及一些装门面的联盟，用来震慑他人。”他还说，最坏的可能是法国和奥地利结盟，但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海上强国和俄国也会支持普鲁士的。¹⁰⁶ 1756年，最坏的情况确实发生了，而且一个海上强国荷兰共和国宣布中立，而俄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直到特别晚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还相信法国和奥地利是永远无法联合的天敌。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的那样，只要摇晃得足够厉害，即使是油和水也能短暂地混合在一起。¹⁰⁷

正是弗里德里希摇晃了它们。虽然对一个脱离实际的政治家而言，

像玩棋盘游戏那样搬动筹码是很容易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弗里德里希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他对海外的利益争端是如此无知，以至于他一直未能理解英国的政策，对法国的政策理解也不够。他对英国大使安德鲁·米切尔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关于美洲的战争，他说他不禁对两国的荒诞行为感到奇怪，它们将精力和财富耗费在他觉得很不值得的目标上。他相信到明年两国都会厌倦这一切的。”¹⁰⁸ 弗里德里希无法领会美洲的局势可以影响到多远的地方，还在1755年9月得意扬扬地说：“从俄亥俄到施普雷河的路很远。”¹⁰⁹ 他完全误解了《威斯敏斯特协定》可能带给路易十五的影响，这正给了考尼茨可乘之机。虽然 he 不能对随后法国政策制定者的愚蠢行为负责，但他当然应该考虑到这一可能性。他的第三个错误是误以为英国可以用贿赂和补贴控制住俄国。¹¹⁰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急速崛起在圣彼得堡引起的敌意，以及伊丽莎白沙皇及其首席大臣别斯图热夫对他的个人憎恶。第四个错误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军事优势，这要留待下一章仔细考察了。

总而言之，有三个问题可供考虑。首先，弗里德里希能不卷入一场大陆战争吗？他断然且反复否认了这一点。1753年，他的弟弟兼法定继承人奥古斯特·威廉祝贺他取得了安全保证，因为“你的敌人恐惧你，就像你的朋友尊敬你”。弗里德里希回复说，这一评价过于乐观了，因为战争即将到来。它可能不会很快到来，但它会来的。他还说，因为普鲁士士兵比起他们的敌人更加训练有素，反应更加灵敏，所以他们会生存下来，但前提是他们的盟友与敌人一样多。¹¹¹ 虽然他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他对待法国人的总体态度，特别是对待《威斯敏斯特协定》的态度，决定了他是在一个不如1740年或1744年那么有利的形势下挑起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的。

其次，这次先发制人的打击是一场得不到回报的愚蠢赌博吗？（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评判说这是“疯狂的”）¹¹² 答案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当然，它触发了奥法结成同盟，也未能在俄国人能够参与进来之前把奥地利人踢出战场。另一方面，法国早在普鲁士入侵萨克森之前就在寻

求一个进攻性联盟，而奥属尼德兰的诱惑很可能会把它吸引过来。在1761年7月战争结局尚未明朗之时写给威廉·皮特的一封重要信函中，弗里德里希就强调说，他发动攻击只是因为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一个针对他的巨大阴谋已经形成。他补充说，即使是最愚蠢的统治者，也不会袖手旁观，等着他的敌人完成摧毁他的计划。他承认，这场战争中并非所有事情都如他所愿，但至少他占领了萨克森的一大部分，他不会放弃的，除非法国人、俄国人和奥地利归还他们从自己这里抢走的一切。¹¹³

最后，弗里德里希挑起的战争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吗？还是说，他有一个进一步吞并领土的计划？这是一个让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极为困扰，却不可能解决的问题。¹¹⁴ 他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提出了获得萨克森的愿望，这并不是确凿无疑的答案。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是，弗里德里希并不是为了吞并萨克森、西普鲁士或是梅克伦堡才开战的，而是想在这个正在积蓄力量的联盟击败他之前将其瓦解。不过，如果他取得了全面胜利的话，他无疑会尽可能多地夺取战果。¹¹⁵

我们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确定弗里德里希的麻烦的根源。我们必须回到1740年11月和他入侵西里西亚的决定上。这是他的原罪，再多的苦难也无法弥补。¹¹⁶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他的荣耀，要为自己博取一个名声，以显示他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是比他父亲更优秀的男子汉。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和平了。他将永远处在惴惴不安之中，因为他知道报应正在路上。他已经鲁莽又笨拙地闯进了欧洲的大国之列，但永远无法在这行列里放松下来，因为目前占据位子的国家总是想方设法要把他再推出去。他不得不让自己此后余生都背负着这种焦虑的负担。正如拿破仑谋杀了当甘公爵之后，塔列朗评论的那样：“这比犯罪更严重，这是一个错误。”

注释

¹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3, pp. 160–66.

2 Jürgen Ziechmann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Das Palladion* (Bremen, 1985), vol. 2: *Kommentarband*, p. 55.

3 Henri Zosime, Comte de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a Cour de Berlin. Accompagnés d'un recueil de lettres de Frédéric-le-Grand, des princes ses frères, de Voltaire, et des plus illustres personnage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20), vol. 1, pp. 290–94. 它的英文译本被Carlyle, vol. 4, pp. 222–7全文转录。

4 Edgar Zevort (ed.), *Le Marquis d'Argenson et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18 novembre 1744 au 10 janvier 1747* (Paris, 1879), p. 368.

5 Ibid., p. 370.

6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3, pp. 164–8, 445.

7 Karl Heinrich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in Peter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 172.

8 Carlyle, vol. 3, p. 165.

9 Herman Freudenberger, “Industrialization in Bohemia and Moravia in the 18th century,”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19 (1960), p. 348.

10 Ibid.; Dietrich, p. 274;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90.

11 Carlyle, vol. 3, p. 182. 在以下这本书的前内封上，有一幅西里西亚（以及普鲁士其他地方）要塞的优秀地图：Bernhard R.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Kriege* (Munich, 1989)。

12 Johannes Kunisch, *Das Mirakel des Hauses Brandenburg: 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Kabinett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Zeitalter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Munich, 1978), p. 95.

13 Wilhelm Treue, “Schlesiens Eingliederung in das preussische Wirtschaftssystem,” in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pp. 121–3.

14 James Van Horn Melton,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 (Cambridge, 1988), p. 94.

15 Leopold von Ranke, *Friedrich der Grosse* (Leipzig, 1878), p. 34.

16 J. E. Biester, “Bemerkungen auf einer Reise in Schlesien; in Briefen,” in F. Gedike and

J. E. Biester (ed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Berlin, 1783)(1), p. 242.

17 Norbert Conrads, “Politischer Mentalitätswandel von oben: Friedrichs II. Weg vom Gewinn Schlesiens zur Gewinnung der Schlesier,” in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p. 222;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 51.

18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p. 176.

19 Harm Klueting, “Die politisch-administrative Integration Preussisch-Schlesiens unter Friedrich II.,” in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p. 59.

20 Koser, vol. 1, pp. 392, 395.

21 Ute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Friedrich II. als Herr über die Herzen?* (Göttingen, 2012), p. 61.

22 Ernst Pfeiffer, *Die Revuereis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esonders die schlesischen nach 1763 und der Zustand Schlesiens von 1763–1786* (Berlin, 1904), p. 21.

23 关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最后几年及和约，最好的简明记叙可参见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London, 2006), pp. 59–67。

24 *Œuvres*, vol. 4, p. 18.

25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4, p. 266.

26 *Œuvres*, vol. 2, pp. 26–7. Translation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History of My Own Times*, vol. 1, p. 40.

27 1 June 1743, P.C., vol. 2, p. 370.

28 *Œuvres*, vol. 3, p. 33. Translation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History of My Own Times*, vol. 1, pp. 49–50.

29 P.C., vol. 2, p. 408.

30 *Ibid.*, vol. 3, p. 169.

31 参见下书中有帮助的族谱：Simon 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2009), pp. vi–viii。这一杰出的传记作品也包括对彼得大公和叶卡捷琳娜订婚和结婚的精彩记录。

32 *Œuvres*, vol. 3, p. 32. Translation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History of My Own Times*, vol. 1, p. 48. 伊丽莎白沙皇最初考虑过弗里德里希的妹妹乌尔丽克做她继承人的配偶，但弗里德里希已经选中了瑞典王子，认为他会更加有用处，参见Agnieszka Pufelska, “Vom zufälligen Feind zum umworbenen Freund: Friedrich II. und Russland,” in Fr

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122–3.

33 P.C., vol. 3, p. 237.

34 Walther Mediger, *Moskaus Weg nach Europa. Der Aufstieg Russlands zum europäisch en Machtstaat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runswick, 1952), p. 249. 不幸的是，这份对俄国政策非常详尽的记录并没有使用脚注作为支撑。

35 Koser, vol. 1, pp. 466–7.

36 Gaston Zell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es temps modernes*, vol. 2: *De Louis XIV à 1789* (Paris, 1955), p. 223.

37 Koser, vol. 1, p. 467; Mediger, *Moskaus Weg nach Europa*, p. 276.

38 R. Nisbet Bain, “Russia Under Anne and Elizabeth,” in A. W. Ward, G. W. Prothero and Stanley Leathes (ed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1909), vol. 6, p. 318.

39 Pufelska, “Vom zufälligen Feind zum umworbenen Freund,” p. 124.

40 Klaus Zernack, “Preussen als Problem der ost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ol. 3, p. 1608; Klaus Zernack, “Preussen-Frankreich-Polen. Revolution und Teilung,” in Otto Büsch and Monika Neugebauer-Wölk (eds.), *Preussen und die revolutionäre Herausforderung seit 1789. Ergebnisse einer Konferenz*,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zu Berlin (Berlin and New York, 1991), vol. 78, p. 22.

41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1981), vol. 1, p. 500 .

42 Robert Howard Lor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A Study in Diplomatic History*,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Cambridge, MA, 1915), vol. 23, pp. 21, 34.

43 Michael G. Müller, *Die Teilungen Polens 1772 1793 1795* (Munich, 1984), pp. 18–19.

44 F. C. Schlosser, *Geschicht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und des neunzehnten bis zum Sturz des französischen Kaiserreich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istige Bildung*, vol. 1 (Heidelberg, 1836), pp. 346–7.

45 Müller, *Die Teilungen Polens*, p. 20.

46 Hintze, p. 314.

47 Michael G. Müller, “Russland und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Jahrbücher für die Geschichte Osteuropas*, new series 28 (1980), p. 205.

- 48 Nisbet Bain, “Russia Under Anne and Elizabeth,” p. 314.
- 49 关于这一故事的最详细记载，可参见Koser, vol. 1, pp. 465–76。要详细了解弗里德里希的回应，可参见P.C., vols. 5–6。
- 50 William J. McGill, “The Roots of Policy: Kaunitz in 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 1742–1746,”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 (1968), p. 137.
- 51 Ibid., p. 145.
- 5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4, p. 271.
- 53 备忘录全文可参见Johannes Kunisch (ed.), *Expansion und Gleichgewicht: Studien zu r europäischen Mächtepolitik des ancien régim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vol. 2 (1986), pp. 168–239。大量的摘录，包括最重要的段落，可在线参阅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pdf/deu/9_MilitaryAffairs_Doc.6_German.pdf。
- 54 对这份令人敬畏的文件的最好总结和讨论仍旧是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4, pp. 271–82。
- 55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p. 84.
- 56 Michel Antoine, *Louis XV* (Paris, 1989), p. 400.
- 57 Colin Jones, *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V to Napoleon* (London, 2002), p. 130.
- 58 Sven Externbrink, *Friedrich der Grosse, Maria Theresia und das alte Reich: Deutschland und Diplomatie Frankreichs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Berlin, 2006), p. 44.
- 59 Richard Waddington, *Louis XV et l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Sept Ans 1754–1756* (Paris, 1896), p. 170.
- 60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p. 432.
- 61 Max Braubach, *Versailles und Wien von Louis XIV. bis Kaunitz* (Bonn, 1952), p. 430.
- 62 P.C., vol. 1, p. 43.
- 63 Erich Everth, *Die Öffentlichkeit in der Aussenpolitik von Karl V. Bis Napoleon* (Jena, 1931), p. 330.
- 64 Dietrich, p. 344. 通过1738年的《维也纳条约》，洛林被割让给了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他死后则在1766年并入法国。
- 65 T. R. Clayton, “The Duke of Newcastle, the Earl of Halifax, and the American origins of the Seven Years’ Wa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4, 3 (1981), p. 573.

66 H. M. Scott, “Hanover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Franco-British Geopolitics,” in Brendan Simms and Torsten Rott (eds.),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 (Cambridge, 2007), p. 277.

67 最好的简要叙述见于Andrew C. Thompson, *George II: King and Elector*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 pp. 192–7。

68 Reed Browning, “Holles, Thomas Pelham, duke of Newcastle upon Tyne and first duke of Newcastle under Lyme (1693–1768),”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May 2011,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1801>. Accessed 25 June 2013.

69 Volker Pres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Reichspolitiker,” in Heinz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a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6), p. 42.

70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4, p. 341.

71 Ibid., pp. 343–6.

72 Waddington, *Louis XV et l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pp. 148–9. Waddington一贯将“Starhemberg”错拼写为“Stahremberg”。

73 以下文章引用并讨论了这篇备忘录：Johannes Kunisch, “Der Historikerstreit über den Ausbruch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1756),” in idem,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seiner Zeit. Essays* (Munich, 2008), p. 75。

74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4, p. 390.

75 Ibid., pp. 395–6.

76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175.

77 Frédéric Masson (ed.), *Mémoires et lettres de François-Joachim cardinal de Bernis* (Paris, 1878), vol. 1, p. 223.

78 D. B. Horn, “The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7: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ed. J. O. Lindsay (Cambridge, 1970), p. 445. 贝尼斯在他的《回忆和通信》中写道，他曾经反对对法国的联盟体系进行如此彻底的改变，因为这在法国国内会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还将激怒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们，并且会将法国拖入没有准备好的战争之中。当然了，他是在事后写的，有人怀疑，如果与奥地利的联盟结果不是那么悲惨的话，他的记忆可能会有所不同。

79 Eckhard Buddruss, *Die franzö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756–1789* (Mainz, 1995), p.

42.

80 Antoine, *Louis XV*, p. 675.

81 Waddington, *Louis XV et l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p. 182.

82 Horn, “The Diplomatic Revolution,” p. 453.

83 Quoted in Manfred Schlenke, *England und das friderizianische Preussen 1740–1763. Ein Beitrag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und öffentlicher Meinung im England des 18. Jahrhunderts* (Munich, 1963), p. 194. 这些话写于1753年，但它们在两年后才得到了更有力的论证。

84 Nisbet Bain, “Russia Under Anne and Elizabeth,” p. 319;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p. 89.

85 P.C., vol. 11, pp. 439–41.

86 Reinhold Koser, “Aus der Korrespondenz der franzö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Berlin 1746–1756,”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7 (1894), p. 85.

87 Waddington, *Louis XV et l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pp. 197–8;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Stuttgart, 1997), vol. 3: *Das Reich und der österreichisch-preussische Dualismus (1745–1806)*, pp. 79–80.

88 Waddington, *Louis XV et l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pp. 199–202.

89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pp. 90–91. Jürgen Luh在“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Mark H. Danley and Patrick J. Speelman (eds.), *The Seven Years War: Global Views* (Leiden, 2013), p. 13中争论说，弗里德里希并非受恐惧所驱使，而是为一种信念所激励：英国在海外的成功能够为他们在欧洲的盟友争取到有利的和解条件。

90 Waddington, *Louis XV et l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p. 234.

91 P.C., vol. 11, p. 436.

9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4, pp. 418–19.

93 Buddruss, *Die franzö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pp. 78–9.

94 Ibid., p. 82.

95 Ibid., p. 84.

96 P.C., vol. 12, pp. 322–3.

97 Ibid., p. 327. 其中转录了米切尔送回英国的急件。Cf. Mediger, *Moskaus Weg nach Europa*, p. 628.

98 P.C., vol. 12, p. 336.

99 Mediger, *Moskaus Weg nach Europa*, p. 633.

100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78.

101 Ibid., p. 179; Hintze, p. 361; Koser, vol. 1, p. 601.

102 Ibid., p. 602.

103 P.C., vol. 13, pp. 206, 280–81.

104 Ibid., p. 309.

105 本段基于Buddruss, *Die franzö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pp. 92–9的记叙，它是最为权威也是最为审慎明智的。

106 P.C., vol. 2, p. 213.

107 Fried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É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7), p. 319.迈内克在一个脚注中补充道，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评价荷尔斯泰因对1914年之前的英国和俄国的错误看法。

108 P.C., vol. 12, p. 330.

109 在1755年9月21日写给威廉明妮的信中，参见：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6), vol. 2: *Briefe der Königszeit 1740 – 1758*, p. 316。

110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Historical Episode: The History of the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Seven Years War,” in idem,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1969), pp. 147, 157, 164.

111 P.C., vol. 9, pp. 350–51.

112 Paul Langfor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London, 1976), p. 140.

113 P.C., vol. 20, p. 508.

114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争议和研究，以下文章中有一份详细而又审慎的记录，参见Kunisch, “Der Historikerstreit über den Ausbruch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pp. 48–106

115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120, 170; Buddruss, *Die franzö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pp. 90–91 and n. 140.

116 正如Peter-Michael Hahn所评论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利用玛丽娅·特蕾莎之困境的决定，支配了他统治的整个过程。他被驱使着，成为他最初成功的囚徒——*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p. 67, 85。

-
- ① 在足球联赛的赛季即将结束时，两支积分相近的球队进行比赛，获胜方不仅可赢得三分，而且同时可阻止对方赢得三分，造成六分的差距，因此这样的重要比赛有“六分赛”之称。
 - ②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Perfidious Albion）是一个在国际关系和外交背景下使用的贬义词，指英国（或英格兰）的君主或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和现实政治的要求时的两面派、背叛和不忠行为。
 - ③ 此处化用西谚“神的磨坊运转得很慢，但确实在运转”，意指奥地利的外交政策虽然暂时还没有变化，但终究会大变。
 - ④ 即《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政治通信集》。

第8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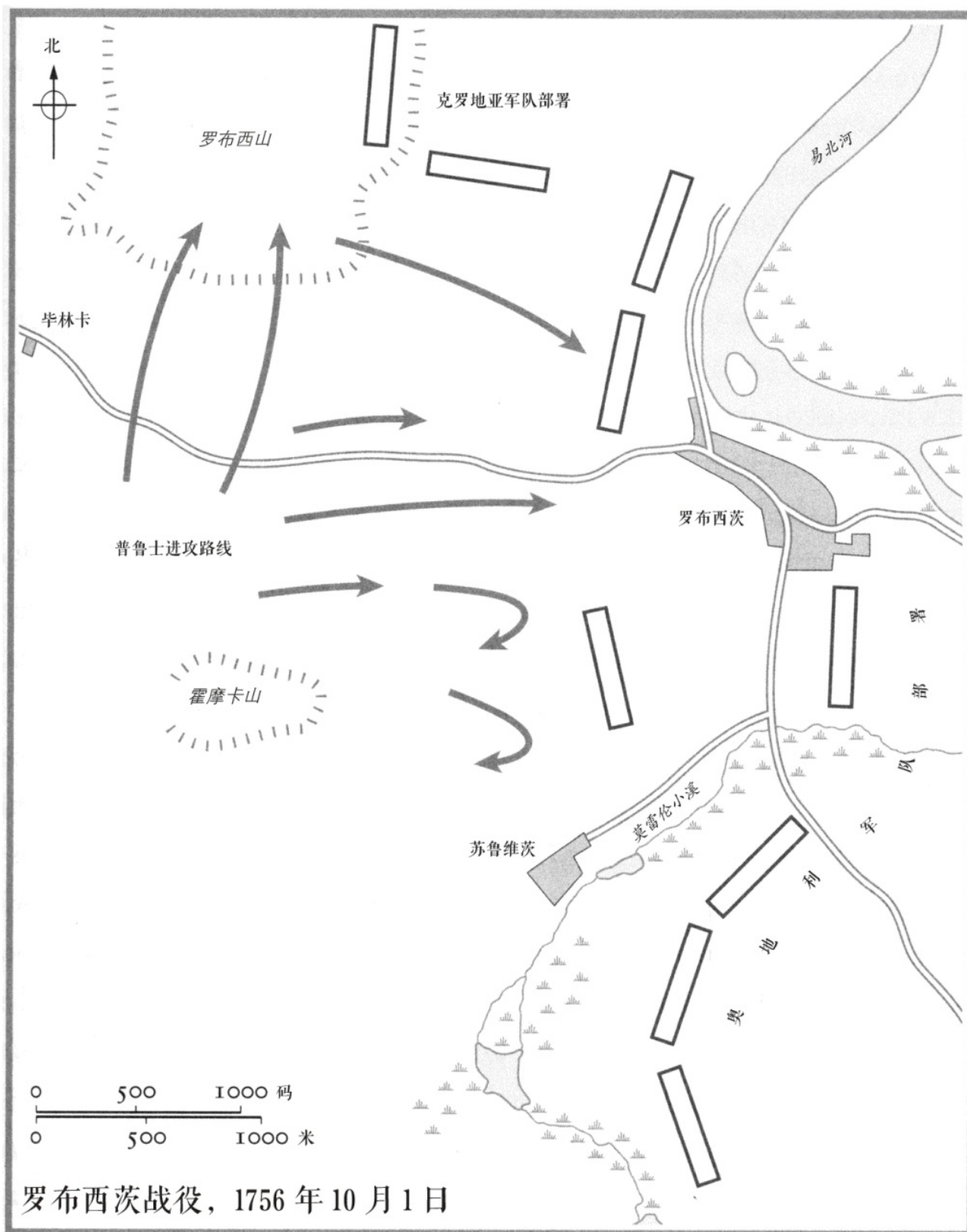
七年战争：战争的前三年

1756年

在解释战争行为中“冲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恰恰是困难的。”¹他本人在1793年的战争中作为普鲁士军队一名13岁的少尉受了伤，当时人们认为那场战争只会持续几个月。结果，直到1815年，普鲁士人和他们的盟友才在巴黎举行最终的胜利游行。就实际情况而言，他的偶像弗里德里希在1756年有了同样的发现。这就是在上一章最后提到的他的4个错误中的最后一个：高估了他自己的军事实力。1756年8月27日，他告诉英国公使，他的计划是迅速通过萨克森，他估计在那里只会遇到很少的抵抗或是不会遇到抵抗，然后再越过山区进入波希米亚并占领布拉格，那么，“当冬天来临时，他就可以在波希米亚舒服地休养，这将扰乱维也纳的财政，也许还能让那个宫廷更明白些事理”。²

两天后，这一计划被付诸实施。不幸的是，萨克森人用的是不同的剧本。他们既没有奋起抵抗，也没有投降，而是向南撤退到易北河畔皮尔纳的一座要塞。如果他们能费些心思在那里储备物资的话，或许能够把弗里德里希拖上好几个月，“中欧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就是如此坚

不可摧。³ 在他1750年的讽刺诗《守护神》中，弗里德里希曾嘲笑萨克森人的战斗力：当他们在战场上遇到普鲁士人时，他们就转身露出屁股，于是他们仁慈的对手就叫这群“多愁善感又谄媚的胆小鬼”跑回家去，继续制造瓷器去。⁴ 所以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萨克森人证明了自己能够拖延他足够久的时间，来撕毁他对米切尔勾画的那张时间表。1744年惨败的记忆使弗里德里希确信他不能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放任一支萨克森军队留在自己的后方。9月9日他到达德累斯顿，但不得不在那里等待。与此同时，他的主要敌人的反应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起初，玛丽娅·特蕾莎对于弗里德里希迫在眉睫的入侵行动毫无知觉，以至于消息最初送到的时候，她正在摩拉维亚和匈牙利边境上霍利赤的一个乡间寓所。她匆匆赶回到维也纳，开始带着哈布斯堡政府不常有的急迫感安排必要的动员。⁵ 到了9月20日，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尤利西斯·冯·布朗尼和主力部队已经到达波希米亚北部的布丁（奥赫热河畔的布丁尼），就在布拉格和特普利茨的中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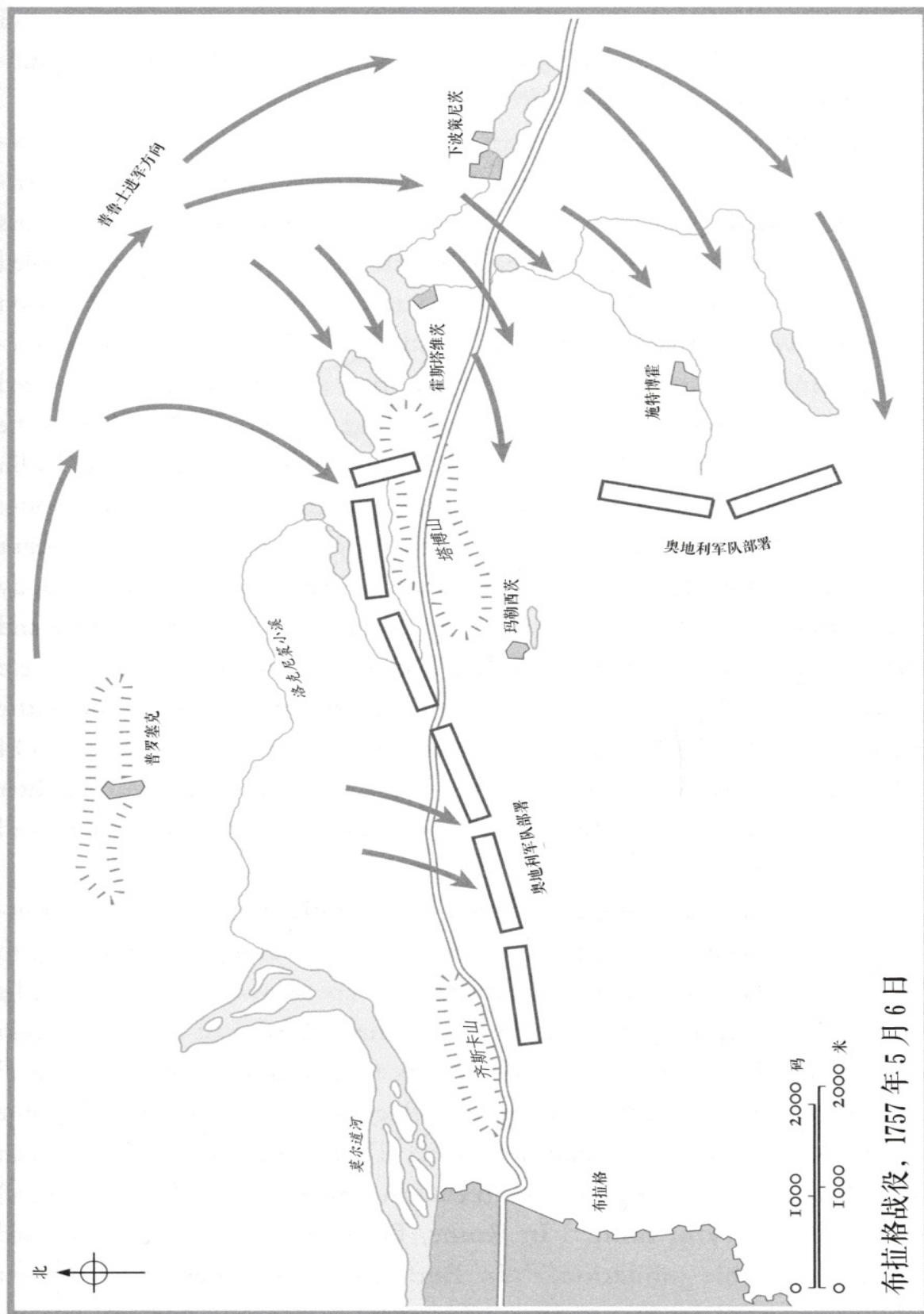


布朗尼的任务是拯救被困在皮尔纳的萨克森人。具体计划是让萨克森人渡过易北河突围到右（东）岸，然后南下到尚道与奥地利救援部队会合。但当奥地利部队在9月30日从布丁北上时，迎面撞上了驻扎在易北河畔罗布西茨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的情报出现了纰漏，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以为自己面对的只是一支正在撤退的奥地利后卫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意识到危险：他面临的是一群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大约2.85万名普鲁士士兵对阵大约3.4万名奥地利士兵）。⁷随后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双方各自有约10%的伤亡。经过不分胜负的炮兵互射和骑兵交战之后，又是稳健可靠的普鲁士步兵打破了僵局。奥地利军队被迫撤回罗布西茨小镇，该镇也遭到普鲁士军队的炮击，之后布朗尼下令撤退到布丁。

因为最后是普鲁士军队在死人堆里扎下了营寨，理论上说，这是一场普鲁士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很快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他告诉姐姐威廉明妮，他把奥地利人打得抱头鼠窜，还跟施韦林元帅（正在指挥位于西里西亚的第二支普鲁士军队）吹嘘说，他击败了一支两倍于己的军队（他声称是2.4万人对6万人），“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⁸他告诉他的另一个高级军官安哈尔特-德绍的莫里茨亲王，他的士兵们战斗力如此强悍，他现在相信他们可以做到任何事情。⁹但这场战斗也表明，两军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了。一个名叫雷措夫的普鲁士军官沮丧地说：

这一次，弗里德里希没有碰到他在连续4次战役中打败过的那些奥地利军队。与他打交道的也不是奈佩格或是洛林亲王查理那样虚张声势的人物。他面对的是长期在军队服役的布朗尼元帅，他的天资和阅历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之一。他面对的是一支由列支敦士登亲王自费训练得十分完善的炮兵部队，他面对的是一支在十年和平之中对战争艺术更加精通的军队，他们致力于采用以前战胜他们的军队的方法，并比照这些胜利者的训练方式来打造自己。¹⁰

罗布西茨会战并不是弗里德里希急切期盼的决定性胜利，这一点被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布朗尼再次试图解救被围困的萨克森人。这次战役结束4天之后，布朗尼亲自率领一支8000多人的分队渡过易北河，沿着右岸向尚道进发，并于10月11日到达，这是他与萨克森人约定好的日子。可惜事实证明，萨克森人自己没有办法——或者可能是不愿意——从皮尔纳突围。14日，他们那士气低落的指挥官投降了。¹¹即使这不是萨克森军队最辉煌的时刻，他们也让弗里德里希被拖延了6个星期，这意味着冯·布朗尼元帅将在布拉格过冬。弗里德里希则不得不在德累斯顿挨过冬天。



1757年

弗里德里希知道他在1757年将面临俄国从东方、瑞典从北方、法国从西方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从西南方向的入侵。如果要把这个巨大联盟的敌意抑制住，就必须迅速弥补最初未能将奥地利人逐出战场的失败。怀着这种念头，弗里德里希在1757年4月中旬派出约12万人的主力部队南下到波希米亚去。拿破仑式的战争提前发生了，这支军队分成独立的4部分，形成100英里长的战线，最终于5月初在布拉格正北边集合。¹² 弗里德里希再次显示出了自己对经典类比的喜好，他告诉他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白山的胜利将对目前帝国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公元前48年，恺撒为了争夺罗马，在法萨卢斯击败了庞培，那次战役决定了罗马的命运。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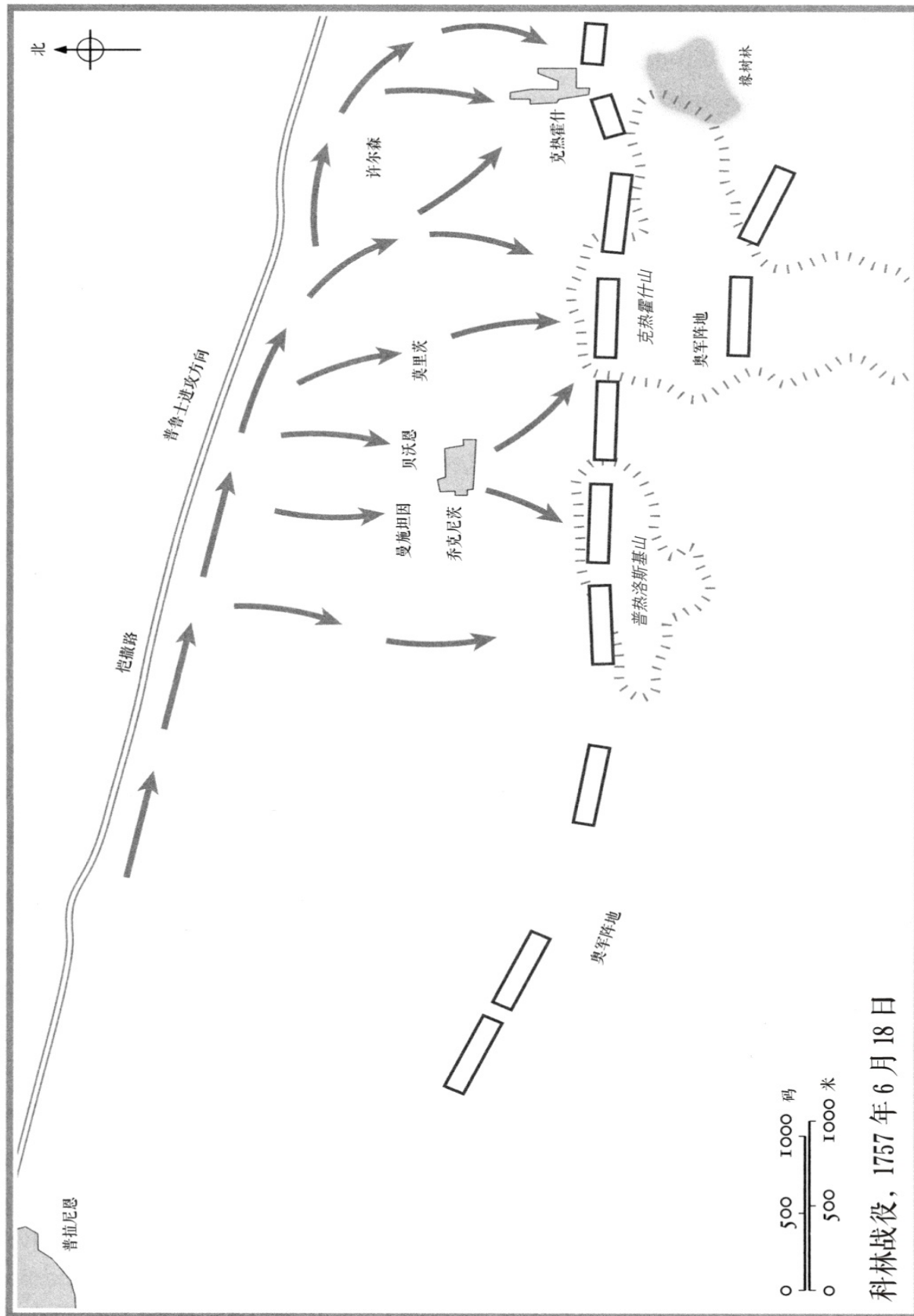
命运很快让他付出了代价。弗里德里希在5月6日取得了胜利，但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布拉格会战如此混乱不堪，甚至最清醒的军事史学家在研究这次战役时也备受挑战。¹⁴ 对战双方都有几名高级军官死伤，这对指挥的连贯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弗里德里希本人曾多次因食物中毒而无法行动，什未林元帅在率领他的部队反攻时被炸成了碎片，另一名高级指挥官温特费尔特将军也受了重伤。奥地利方面，布朗尼元帅的腿受了伤，洛林的查理亲王受到某种突然发作的疾病影响，失去了意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布朗尼的最后一次冲锋的成功，为另一支普鲁士部队打开了攻击奥地利军队侧翼的道路。¹⁵ 营一级的上校和少校的主动性表明普鲁士军队绝不是传说中的机器人。¹⁶ 双方的人员伤亡都是惊人的，以至于这场战斗成了屠杀的代名词，在歌谣和戏剧中被纪念着。两天之后，普鲁士军队清点的结果为3099人死亡，8208人受伤（其中许多伤员后来死掉了），还有1657人失踪。¹⁷ 这可怕的伤亡

人数甚至还是不完整的，随着战斗尘埃落定，伤亡人数还在增加。他们的敌人的损失与之相差无几，不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战俘。¹⁸

虽然垂头丧气，但奥地利军队再次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快速恢复能力。¹⁹ 他们仍然掌握着人数占优的部队。布拉格城内的驻军加入了战斗的幸存者，现在大约共有4.6万人，而在东南方向，道恩元帅正在集结另一支军队。到6月12日，奥军人数达到了5.5万人，并且正在行动。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发现自己缺乏必要的人力和武器攻下布拉格，事实证明，这座城的补给状况比他预想中的要好很多。6月13日，他动身去应对道恩元帅的部队。5天后，两军在易北河附近的科林交战。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这场会战的曲折性甚至比前一次更令人困惑。但结果是足够清楚的。普鲁士军队的失败是彻底、血腥的且重大的。步兵有8755人死亡或失踪，3568人受伤；骑兵有1450人和1667匹马死亡，总的伤亡数字十分可怕，约占其战前人数（3.4万人）的40%。奥地利的伤亡人数明显少一些，共8114人（1002人死亡，5472人受伤，还有1640人失踪），约占其战前人数（5.4万人）的15%。奥地利人掩埋了6500名普鲁士人，还俘虏了5380名战俘。²⁰

难怪喜讯传到维也纳之后，社会各阶层举行了狂欢的庆祝活动。人们向战神献上了一首《赞美颂》，礼物和称号纷纷落向他的勇士们。皇后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玛丽娅·特蕾莎勋章以庆祝胜利，并将首枚大十字勋章授予了道恩元帅。²¹ 宫廷诗人梅塔斯塔西奥写下了一部寓意作品，讲述了库勒涅（萨克森）梦到阿塔兰忒（玛丽娅·特蕾莎）如何杀死了卡吕冬的野猪（弗里德里希），并和欧阿德涅（俄国）以及忒格亚（法国）一起出发开始了一次欢乐的狩猎。²² 在罗马，教宗本笃十四世表达了他“无法形容的喜悦”。²³ 然而在柏林，伦道夫伯爵发现每个人都在流泪，因为17年来的连续胜利已经惯坏了他们所有人。²⁴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斗的失败，弗里德里希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超人的名声已经倒塌了。奥地利骑兵雅各布·德·康戈纳佐写道，现在人人可以看到，普鲁士人是会被打得逃跑的，弗

里德里希也是会被打败的。在那一刻之前，光是普鲁士步兵露面就足以在奥地利人的队伍中散播恐慌了。²⁵



到底错在哪里？按弗里德里希自己的说法，他指责手下的指挥官，特别是贝沃恩公爵、曼施坦因和安哈尔特-德绍的莫里茨亲王不执行他的命令。²⁶ 19世纪亲普鲁士的历史学家忠实地重复了这一理由²⁷，但仔细把官方和私人的众多记录都重审一遍就会发现，责任在于弗里德里希自己。在试图包抄奥地利的阵地时，弗里德里希突然下达了致命的命令，让安哈尔特-德绍的莫里茨亲王率领的部队排成一线，从正面攻击敌人的阵地。在原本的计划被国王推翻之后，亲王说：“现在战斗已经输了！”事实上，还要过几个小时，这场战斗才最终失败，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很可能导致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在随后的每一个阶段，普鲁士人都能发现敌人在充分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和优越的防御位置。²⁸ 弗里德里希在战后第二天写给基恩元帅的信中更为坦率，他承认自己试图以少胜多，奥地利人一直顽强地保卫着他们精心选择的阵地，由列支敦士登亲王新近改革过的炮兵非常有效。他以典型的厌恶女性的口吻结尾：“命运背弃了我。她存心要伤害我；她是一个女人，而我没有那种倾向。”²⁹ 他还评论说，他的弟弟海因里希“创造了奇迹”，并说他担心海因里希，因为他“太勇敢”。海因里希亲王并没有回应这句恭维，在给他们的姐妹阿马利娅的一封信中，他感叹道：“法厄同^①最后还是坠落了！”³⁰

遇到如此的打击，弗里德里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沮丧又迷茫的他告诉海因里希亲王，要安排解除对布拉格的围攻并让剩下的部队向北撤退。他试图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在刚刚引用过的那封信中告诉基恩，是成功导致了过度自信，他们下次会做得更好。“你不知道吗？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挫折，似乎我的挫折也来了。”这是他在战斗刚结束后对一名军官说的一句沮丧的话。³¹ 但这个挫折包含着潜在灾难的因素，因为它完全打乱了弗里德里希的战略。在胜利后振作起来的奥地利人现在准备干掉他。受到弗里德里希并非不可战胜的鼓舞，他的其他所有敌人都冲过来，要亲眼见证他的失败并要分得一杯羹。³² 弗里德

里希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回顾这些事件时表示，如果他赢得了科林会战的胜利，布拉格城里的奥地利军队就不得不投降，法国军队就不会越过莱茵河，俄国人就会待在家里，奥地利则不得不按普鲁士提的条件媾和。³³

结果呢，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战争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简单地讲，一场运动战变成了一场消耗战。特奥多尔·席德尔说，科林会战之于弗里德里希，正如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之于德皇威廉二世，或者说1941年的莫斯科战役之于希特勒。³⁴随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7月23日，奥地利人推进到萨克森的齐陶并毁掉了普鲁士人的一座大型补给仓库。3天后，法国元帅德埃斯特雷指挥的一支军队在威悉河畔哈梅林附近的哈斯滕贝克，击败了乔治二世之子，坎伯兰公爵指挥的汉诺威和黑森军队。众多的外交角力以9月10日的《克洛斯特采文协定》告终。如果该协定生效了，那么联军将解散，英国将从欧洲大陆的战争中撤出，弗里德里希的西边侧翼将打开。那时，大批俄国军队已经在阿普拉克辛元帅的指挥下进入了东普鲁士，并于8月30日在大耶格恩多夫扫除了一支人数比它少得多的普鲁士军队。更多坏消息接踵而至。9月7日，在格尔利茨东边的莫耶斯，一支1万人的普鲁士军队被纳道什迪将军指挥的人数更多的奥地利军队击溃，最严重的损失是汉斯·卡尔·冯·温特费尔特将军，他的死让弗里德里希几乎发狂。³⁵一周后，瑞典人越过普鲁士边境向南进发。10月16日，一支3400人的奥地利快速行动部队在哈迪克将军率领下开进了几乎毫不设防的柏林，这更凸显了普鲁士的脆弱。第二天这支部队就离开了，但在这之前他们榨取了一笔高昂的赎金。³⁶

弗里德里希的唯一机会是阻止法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联手，于是他赶紧向西进军，去对付德·苏比斯亲王指挥的法国军队。11月4日，他在莱比锡以西约25千米的米谢尔恩找到了这支法军。他们大约有30200人，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弗里德里希亲王指挥的10900人的帝国军队的加入，使得这支部队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尽管敌方和己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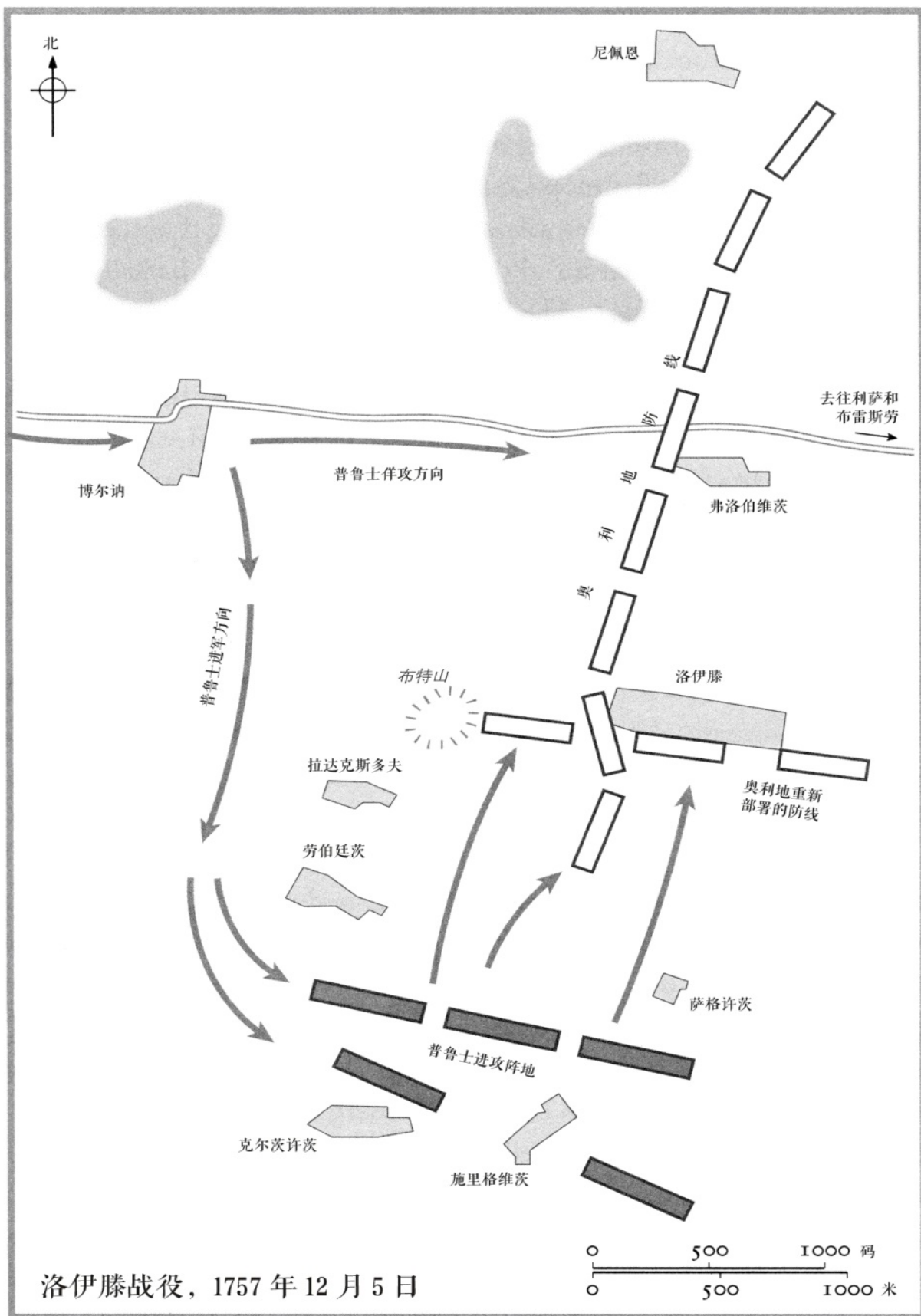
数比几乎达到了二比一，弗里德里希还是急于一战，并在距离法军驻地约4千米处的贝德拉村和罗斯巴赫村之间，面向西侧驻扎下来。两支部队的力量对比如下：

	步兵	骑兵	总人数	火炮
普鲁士	16600	5400	22000	79
法国	33770	7340	41110	114 ³⁷

这一次双方都失算了。约瑟夫·弗里德里希亲王认为，弗里德里希想避免交战，于是说服了不情愿的上级苏比斯，在第二天发动攻击。11月5日清晨，法国军队按计划南下，打算转向东面，从侧翼攻击普鲁士军队。对于弗里德里希而言，他认为法国军队会试图逃跑，一个消息更坚定了他的这个判断：法军已经收起营帐并启程向南进发。在法军转向东并在这个新方向上走了几千米之后，弗里德里希才被手下越来越焦虑的参谋们说服，放弃了这个怀疑。下午3点，普鲁士人迅速行动。幸运的是，法国人缓慢的行军速度，给了他们弥补的机会。在长长的山脊的掩护下，冯·赛德利茨将军指挥的普鲁士骑兵能够先向东行进，然后转向南正面迎击对手。他们第一次冲锋遭到一支奥地利胸甲骑兵的顽强抵抗，法国骑兵赶来支援，但事实证明，赛德利茨后备部队的新一次冲锋是无法阻挡的。

尽管还在列队行进之中，但法国和帝国的步兵已经因普鲁士炮兵的炮击焦躁不安，这些炮兵位于东北边的雅努斯山上，由普鲁士的左翼指挥官、弗里德里希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指挥。³⁸法国和帝国的步兵目睹了自己的骑兵被打败而士气低落。所以当可怕的普鲁士步兵以战斗姿态进入他们的视线后，普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帝国军队直接丢下武器逃跑了。他们的一些法国战友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才放下武器，但他们也很快被冲散了，慌忙溃逃。就在此刻，赛德利茨的骑兵再次从南边发起冲锋，彻底击溃了对手。夜晚仁慈的迅速降临才结束了屠杀。普

鲁士的胜利是如此迅速、如此轻松、如此彻底，以至于大部分的步兵甚至还没有开火。“这是一场平淡的战斗！”弗里德里希在战斗结束之后立即写给姐姐威廉明妮的一封信中惊呼。³⁹他在给达尔让斯的信中写道，他们俘虏了8个法国将军、260名军官和6000名士兵，自己损失了1名上校、2名军官，另有67名士兵死亡，223人受伤。⁴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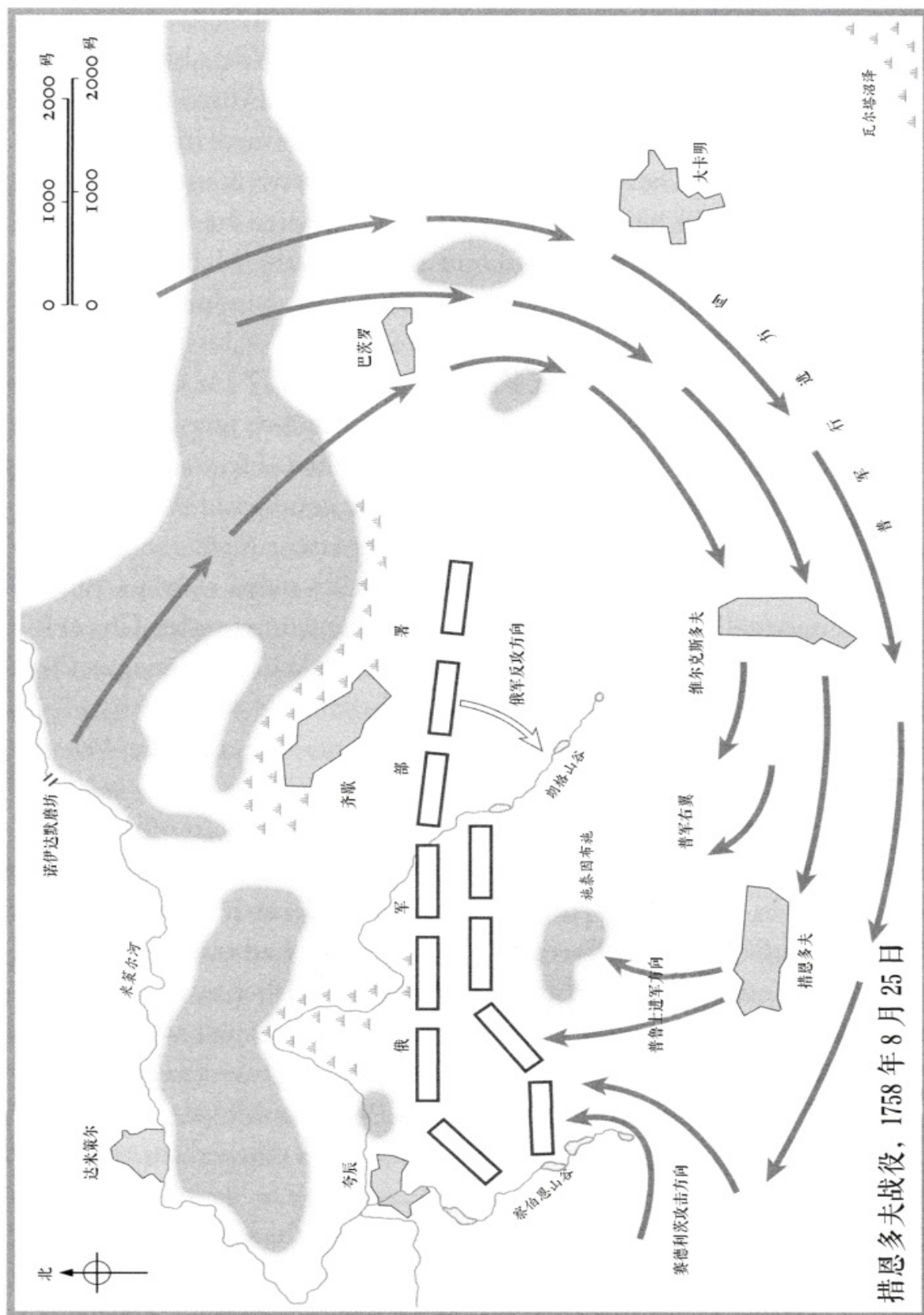
这是一场著名的胜利。⁴¹ 在科林会战中诸事不顺，在罗斯巴赫战役则顺风顺水。当然了，主要的区别在于，弗里德里希的对手相对而言的能力水平不同。他在科林所面对的是久经考验的奥地利士兵，支援他们的是在伺机为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普鲁士人令他们遭受的屈辱复仇的萨克森人。战斗的关键时刻，萨克森骑兵尖叫着冲锋：“为施特里高报仇！”，指的就是1745年他们在霍亨弗里德堡的败仗。⁴² 而在罗斯巴赫，法国士兵在横穿德意志的长途行军之后精疲力竭，并且因为使他们臭名昭著的不断抢掠而组织涣散。圣日耳曼伯爵曾担任过吃力不讨好的后卫部队指挥，他给巴黎的一个朋友写信道：

毫无疑问，你像我一样，在5个月前就能预料到罗斯巴赫的灾难。从未有过一支如此有缺陷的军队，第一声炮响就决定了我们的溃败和耻辱。我率领的是一伙强盗、一伙应该送上绞刑架的杀人犯，他们会在第一声枪响的时候逃跑，他们总是准备着哗变。国王拥有太阳底下最差劲的步兵，他们的纪律也是最糟糕的，这样的军队什么都做不了。⁴³

至于帝国的军队，他们是一群来自神圣罗马帝国许多不同公侯国的乌合之众。指挥官向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皇帝报告说，他们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训练、管理、武器、装备、工资、后勤、纪律和领导者——一切都有问题！⁴⁴

此外，就算不是绝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在为错误的一方战斗。法国士兵备受憎恨，在他们向东行军时的不规矩的行为之后就更是如此，因此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合作总是麻烦不断。⁴⁵ 这种敌意在新教徒中尤其明显，在斯图加特和纽伦堡试图派遣军队去攻打普鲁士的时候，都发生了暴力抵抗。⁴⁶ 格奥尔格·雅各布·格戈尔回忆说，弗里德里

希将战争描述为信仰之战的宣言，已经在德意志西南部产生了影响。“在斯图加特，它给普通人带来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到处都有人怀着对《圣经》一般的崇拜心情去阅读它。”他补充说，被派去支援法国军队的符腾堡年轻人被明确告知，他们不能没有一丝愧疚地去跟新教信仰的保护者弗里德里希打仗。⁴⁷然而，不愿与普鲁士为敌并非是新教徒特有的情绪。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格奥尔格·威廉是帝国的一名元帅，他的秘书在1757年7月11日从菲尔特（纽伦堡附近）报告说，几乎所有的帝国士兵，无论信仰如何，来自哪里，都是亲普鲁士的，并且他们告诉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他们不会跟弗里德里希打仗。⁴⁸讨厌法国的流行趋势在罗斯巴赫会战之后席卷德意志的公共领域，这显示出此种情绪已经传播很广，程度很深了。⁴⁹



当弗里德里希给他的姐姐威廉明妮写信谈到自己的胜利时，他补充说，他现在可以平静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人民的名声和荣誉已经得到了拯救。⁵⁰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他再也不会被迫面对法国军队的直接威胁了。与他们打交道的事情可以留给他的内弟，不伦瑞克公爵费迪南德，他在罗斯巴赫指挥右翼部队，此时被派去接替倒霉的坎伯兰公爵，担任受英国资助的西线部队的指挥官。俄国军队也已撤退，他们在10月末撤退到了利沃尼亚和库兰过冬。在北方，普鲁士从林务人员和猎场看守人中招募了一支规模达10个民兵营、一个骠骑兵中队和一队骑兵的中型部队，事实证明，他们足以防御缺乏热情的瑞典人了。“他们曾经很勇猛，但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俄国将军萨尔特科夫对他们的瑞典盟友的轻蔑评论。⁵¹到1757年底，瑞典人已经被赶回了瑞属波美拉尼亚。⁵²但奥地利人还是很危险的，这在罗斯巴赫会战过去仅仅一周之后就体现了出来：奥地利人攻占了西里西亚重要的施韦德尼茨要塞，缴获了180门大炮，俘虏6000多人，弗里德里希很难承受这么大的人员损失。这打通了奥地利人前往布雷斯劳的道路。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普鲁士士兵死伤和被俘超过9000人，该城于11月24日投降。⁵³奥地利重新夺回西里西亚的最终目标似乎已经达到了。

冬天已经到了。白昼变短，天寒地冻。按理说，所有战斗人员应该进入冬季营地。但弗里德里希知道，如果这么做就等于承认失败。他在《七年战争史》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一刻也不能拖延，无论要冒多大的风险，都必须不断进攻奥地利人，并把他们驱逐出西里西亚，否则就会永远失去这个省。”⁵⁴此时，弗里德里希率领着罗斯巴赫的胜利者们从莱比锡开往西里西亚，12天内行军的直线距离约300千米。他在11月末到达奥得河西岸的帕西维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收容了在西里西亚秋季战事中受到奥地利人屡次痛击而意志消沉的残兵剩勇。到12月4日，他已经集结了3.5万人左右的军队，向南开往了布雷斯劳。在同一天，奥地利军队在皇帝之弟，洛林的查理亲王率

领下从布雷斯劳向北进发。⁵⁵

两军于第二天在洛伊滕相遇。接下来发生的战斗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最辉煌的时刻。⁵⁶拿破仑这样的权威早已下了定论：“这场战役是运动战、调遣和决断的杰作；足以令弗里德里希不朽，并让他跻身最伟大的将军之列。他的道德品质和他的军事才能均在最大程度上得以体现。”

⁵⁷对弗里德里希来说，一切都很顺利：敌军将他们的防线延长到2000米。地形使得他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调动营队和中队。这片战场过去曾是普鲁士军队演习的场所，弗里德里希和他手下的将军们了解每一寸土地，所以命令被误解的可能性即使不能消除，也降低了很多（在其他情况下，这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麻烦来源）。在战斗中，至少有3个关键时刻，下属们主动采取措施，使普鲁士军队扭转了局势。3个兵种——步兵、骑兵、炮兵——配合得力。⁵⁸

幸亏弗里德里希充分发挥了这些优势，因为他严重低估了奥地利军队的数量。他以为双方部队的人数是差不多的，这再一次暴露了他情报方面的缺陷。实际上，3.5万名普鲁士士兵面对的是大约6.5万名奥地利士兵。⁵⁹战术上的出其不意克服了人数上的悬殊差距。正如地图上所显示的，他没有如奥地利人预料的那样选择去攻击奥军右翼，而是把很大一部分军队调到了自己的右翼，让他们不被发觉地向南开进了1英里，然后再让他们掉头攻击奥地利军队的侧翼。在这次决定战斗胜负的攻击中，“斜线战术”的使用提供了决定性的冲击力，步兵营以50步的间隔错列着向左展开。机动的野战炮兵部队给予了强大的掩护，他们先是被部署在格兰茨山上，然后又到了尤登山，最后移动到了布特山上。致命的一击由冯·德里森将军的骑兵发动。就像在罗斯巴赫一样，普军大获全胜，更棒的是，他们战胜了一支士气高涨、因为最近的胜利而兴奋不已的军队。普鲁士伤亡人数共计6382人，大部分是受伤的。奥地利损失了2.2万人（其中的大多数——1.2万人——是战俘），其中包括17名将军死亡或受伤，还损失了116门大炮和51面军旗。⁶⁰

虽然罗斯巴赫会战对法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对弗里德里希的影响不大。洛伊滕会战则完全不同，虽然他自己只把它说成是暂时的缓和，⁶¹但如果他输了这场战役，一切都会结束。结果，查理亲王率领军队撤出西里西亚，回到了波希米亚，布雷斯拉夫于12月21日投降，一个星期后，利格尼茨也投降了。在维也纳，战争命运的骤然转变引起了恐慌。威尼斯大使鲁齐尼报告说：“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痛苦和恐慌，普遍的失望情绪比5月份布拉格惨败后还要强烈得多。”⁶²对于普鲁士人而言，这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催生了一个不朽的传奇。托马斯·卡莱尔讲述了普鲁士军队在战斗结束后向利萨行军时的情况，这段描写来自他笔下最感人的篇章之一：

幽暗浓郁；万籁俱寂；步履沉重，步履沉重：一个普鲁士掷弹兵以庄严的男高音再次开口唱起了圣歌；一首著名的圣歌，一曲朴素的赞美诗；另外两万五千个声音和所有军团的乐队很快加入了进去：

都来感谢恩主，
以心，以手，以声音，
主既完成奇事，
世人欢颂主圣名。

他们就这样前进着；悦耳又遥远的声音，穿过空虚的夜空，以非常引人注意的方式再次响起。一个虔诚的民族，有着纯正的德意志血统，坚毅但又温柔；他们也许是除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少数铁军之外，迄今为止可能出现过的最完美的士兵。⁶³

“都来感谢恩主”这首歌原本只是家庭在饭后简单的感恩祈祷词，从

此则被提升为一首胜利者的赞歌，被称为“洛伊滕的赞美诗”。⁶⁴ 每当普鲁士军队或是（后来的）德国军队取得胜利，活下来的胜利者们都会在战场上大声唱起这首歌。⁶⁵

1758年

然而，在1757年底，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处于胜利者的心境之中（他并不会从唱基督教赞美诗中获得这种乐趣）。12月19日，他告诉达尔让斯，洛伊滕会战是“一张贴在我伤口上的膏药，但它还没有治愈一切”。⁶⁶ 在后方，气氛也是忧郁的。伦道夫伯爵记载道，洛伊滕会战和布雷斯劳的收复，意味着西里西亚的一切又回到一个安全的基础上，但这没有阻止更有远见的柏林人渴望在敌军联盟的重压摧毁他们之前，迅速获得和平。⁶⁷ 在该联盟的3个主要组成部分中，法国人是最没有威胁性的。雄心勃勃的不伦瑞克公爵费迪南德很早就打击过他们，他在1758年2月中旬发动了一场战役，在6周之内让法国人向后溃退了300千米，从德意志西部退到了莱茵河对岸。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折损了约三分之一的军队，也就是说，大约有2.6万人逃跑、染病或是被俘。法国人的另一次进军于6月23日在克雷菲尔德因遭遇费迪南德的军队而突然终止，之后他们又被赶回了莱茵河和兰河对岸。⁶⁸ 瑞典人从波美拉尼亚再次南下，甚至到达了费尔贝林，但在遭遇一支不大的普鲁士军队时再次掉头逃走了，当时他们面对的普鲁士士兵只有5000人。⁶⁹ 更危险的敌人是从东方出现的。1757年8月底，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大耶格恩多夫击溃了一支小规模普鲁士军队，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向东撤退到冬季营地去了。弗里德里希在他的《七年战争史》中嘲讽地写道，他们赢得了战斗，“却像吃了败仗一样撤退”。⁷⁰

尽管俄国人并没有走远，只是去了库尔兰和利沃尼亚的冬季营地，弗里德里希还是假定他们需要好几个月才会到达普鲁士的中心地带。所

以他新一年的战略在本质上跟前几年是一样的：又狠又快地打击奥地利。然而，这一次的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东部。这次他没有选择从萨克森入侵波希米亚，而是从西里西亚入侵摩拉维亚。弗里德里希的第一个目标是奥尔米茨（奥洛穆茨），他希望在那里把奥地利人拖入战斗，让他们遭受洛伊滕会战一般的决定性失败，然后向南进军维也纳。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前些年的一些未竟事业得到了解决：经过漫长的围攻，施韦德尼茨于4月18日被攻破；4月29日，普军穿过奥地利的边境，5月3日攻占了奥尔米茨。⁷¹ 此处是通往奥地利首都路上的最后一个要塞。但随后所有令战争变得如此充满变数的“摩擦”都开始出现。最成问题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摩擦：车轮和车辙之间的摩擦妨碍了军队所需的所有物资的运输。攻城所需的大炮直到5月20日才到达，直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炮击才得以开始。⁷²

摩擦也为奥地利人所利用，弗里德里希再一次致命地低估了他们。玛丽娅·特蕾莎和她的大臣们迅速从洛伊滕惨败造成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并采取了积极行动来弥补损失。他们征募了新兵，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进行了招募；设立了总参谋部，参谋长为弗朗茨·莫里茨·拉齐伯爵；洛林的查理亲王不再担任总司令一职，这一职位由谨慎持重但诡计多端的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伯爵接替。⁷³ 弗朗茨皇帝告诉他的兄弟，他必须离职，因为公众舆论反对他。这一理由正是时势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盛行的军事文化的区别：查理亲王输了5次重要战役（霍图西茨、霍亨弗里德堡、索尔、布拉格和洛伊滕）才被解职，与之相反的是，弗里德里希仅仅在一次失败的撤退行动后就撤了他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职。

回到奥尔米茨，弗里德里希沮丧地发现，在需要保卫家园的时候，奥地利人也跟自己的军队一样坚决，事实上，他们更加坚决。与去年11月份放弃布雷斯劳的那些没骨气的普鲁士士兵不同，当地的奥地利指挥官马歇尔将军给大家上了一堂如何抵御围攻的示范课，内容包括：加强守卫、囤积重要物资、疏散平民、拆除郊区村镇等。他得到了道恩的援

助，后者利用普鲁士围城部队的一个缺口，向驻军输送了新鲜粮草和1200人的增援部队。然而事实证明，奥地利人最有力的帮手是后勤。普鲁士军队围城需要的一切都得翻越群山，穿过森林运送过来，因为奥尔米茨与他们在特罗保（奥帕瓦）的基地被这些山脉和森林隔开了。这种地形非常适合奥地利优秀的轻型部队，他们是奥地利军队中最有效的武装部队，而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决定性的一击出现在6月30日，普鲁士的一支大规模有护卫的车队绵延了好几千米，在多姆施塔德遭到道恩手下最大胆的指挥官——雅努斯、劳东和齐斯考维茨的伏击。在随后的混乱中，大部分被征召入伍的摩拉维亚农民带着他们的马和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带上了他们的马车——逃进了森林。普鲁士人表现出色，却不能阻止车队在混乱中四散奔逃。从特罗保出发时的四轮运货马车超过4000辆，但最终到达奥尔米茨的只有大约250辆。⁷⁴

在多姆施塔德灾难发生的前一天，弗里德里希给基思将军写信说，他期待着车队的到达，然后与道恩进行一场渴望已久的战斗。⁷⁵两天后，他不得不告诉基思，“这个可怕的挫折”意味着围城必须解除，并开始向西里西亚撤退。⁷⁶和1744年从波希米亚的溃退不同，这是一次有秩序的撤退，而且他们还能偶尔反击一下追击的奥地利军队。纳撒尼尔·拉克索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撤退了，但这是狮子的撤退，它转身离开追捕者。他受了挫折，但未被征服，即使被击败也令人畏惧，他带着所有的大炮和辎重，留给道恩的不过是一场意义不大的胜利。”⁷⁷不过，这次出征毫无疑问还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也是弗里德里希最后一次尝试入侵哈布斯堡君主国。⁷⁸在放弃围困奥尔米茨的那一天，查理·约瑟夫·德·利涅亲王在场，他是其父的奥地利军团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也见证过科林会战和洛伊滕会战。⁷⁹考虑到被围困的敌人总是可以得到增援和补给，他对围城表示惊讶。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弗里德里希在围城中的做法。⁸⁰

现在是弗里德里希把注意力转向东北方向的时候了。那里的情况一直以其惯常的缓慢速度发展着，尽管在开始时异常迅速。俄国的新指挥

官维利姆·维利姆维奇·弗莫尔伯爵于前一年10月取代阿普拉克辛，并受命尽早开动军队。1758年1月中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率领的一个军团越过普鲁士边境，拿下了提尔西特并向着柯尼斯堡进军。该省软弱的普鲁士军队未做抵抗就撤退到了维斯瓦河。弗莫尔的部队得以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就行进了约200千米。⁸¹ 弗里德里希低估了1758年俄国可能投入的兵力，把他在东普鲁士的高级指挥官莱瓦尔特连同他的大部分部队一起调到了波美拉尼亚去对付瑞典人。⁸² 他这样做也无妨，因为在第一次急行军之后，俄国人就恢复了他们旧有的步调。到7月1日，他们刚走到波森，直到8月中旬，他们才穿过波兰，抵达了奥得河畔的屈斯特林。

8月25日，就在屈斯特林北部的措恩多夫村，弗里德里希遭遇了他们。他的军队在12天里行进了250千米，其中10天赶路，2天休息，平均每天20千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接下来的战斗有几个特点：战斗进行了很久，持续了整个白天，总共10个小时；战斗异常残酷，俄国军队伤亡率达到42%，普鲁士军队则是35%（双方共计8万名士兵中有3.1万人伤亡）；这次战斗比往常更为混乱，两支军队的位置都旋转了180度，结果在那一天结束时，他们各自占领了对方的原始阵地；此外这场战斗的指挥也比平时更加分散，双方指挥官都失去了对形势的控制。⁸³ 普鲁士在人数上略占下风（3.7万对4.45万），优秀的炮兵、一向表现稳定的步兵和冯·赛德利茨将军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挥的骑兵冲锋使得劣势减小了一些。但也只是有所减小，而不是压倒对方，因为战斗的结果实际上是一场血腥的平局。柏林和圣彼得堡都唱起了《赞美颂》。⁸⁴ 特别是俄国的步兵，事实证明他们完全跟对手一样不屈不挠。萨克森的炮兵上尉约翰·戈特利布·蒂尔克，曾经被借调到俄国军队中，他带着钦佩之情记载道：

无法描述俄国人那时非凡的沉着和勇猛；它超越了人们听说过的关于最勇敢的军队的一切。虽然普鲁士的炮弹把整排的

队伍都打倒了，但没有人出现动摇的征兆，或是打算退让，第一排的缺口立即被第二排或预备部队填补上。⁸⁵

这场会战有两个特征值得评论。首先是双方普通士兵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坚韧，更不用说凶猛了。同时代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普鲁士人被俄国人对该地区的破坏激怒了。⁸⁶正如一名战士记载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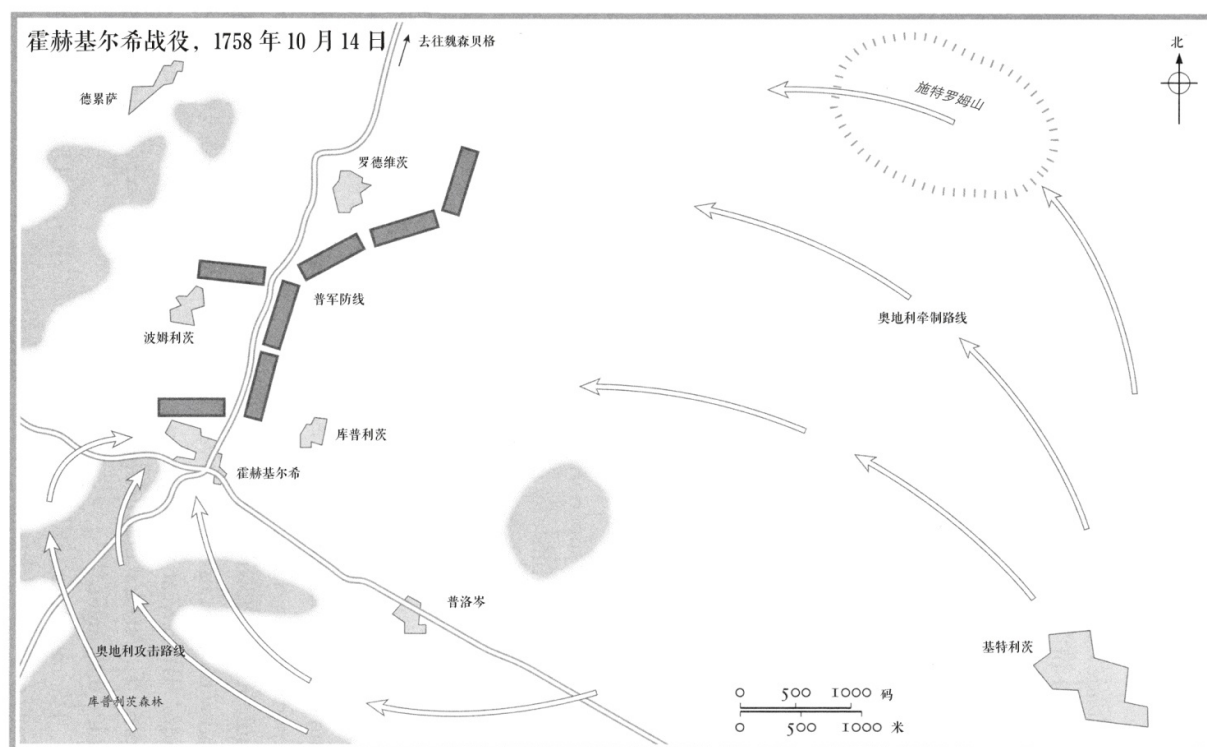
由于屈斯特林的被毁和乡村贫穷百姓遭受的苦难，我们胸中都郁积着怒火。敌人破坏并摧毁了一切，他们甚至闯入教堂抢掠。贫苦农民像绵羊一般带着妻子和孩子分散在树林和田野。孩子们哭着要面包，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的口粮给了他们，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水作为回报。许多人已经被哥萨克人的马鞭打得伤痕累累，甚至有人死亡。⁸⁷

第二点是有数千名俄国士兵和普鲁士士兵毫无必要地死去。军事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弗里德里希本可以通过夺取俄国人不小暴露在大卡明（见地图）的运货马车停车场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俄国人送回家。⁸⁸他并不只有一次机会，而是有3次极好的机会这样做，最后一次实际上就出现在战斗中，但他更喜欢寻求军事上的胜利。⁸⁹他在《七年战争史》中写到这一事件时承认：“敌人将沉重的辎重留在该村〔巴茨罗〕和卡明之间，只留了一支小规模部队护送。如果国王不是那么匆忙的话，他本可以轻易夺取，并通过几次进军迫使俄国人退出这个国家；但当时必须做出决策，一切都可能发生。”⁹⁰

俄国人已经吃够了苦头。撇开措恩多夫会战中的杀戮不提，他们还周围的乡村进行了如此大的破坏，导致食品和草料都已经被耗尽了。因此，弗莫尔把他的军队向东撤到兰茨贝格。他不愿恢复攻势的原因是他与军营中奥地利代表圣·安德烈发生了争执。后者怀疑俄国指挥官的

能力和善意，而弗莫尔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奥地利人甚至没有派一支辅助部队来援助他。⁹¹相反，他们正在准备对弗里德里希留在萨克森的一支由他弟弟海因里希亲王指挥的普鲁士实力弱小的部队进行决定性的进攻。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们行进得太慢了。在弗里德里希不在北方期间，他们的战果就只是夺取了索嫩斯泰因的小型要塞，俘虏了那里1400人的普鲁士驻军。即使是这项不太大的功绩，也是由帝国军队，而不是奥地利军队取得的。正当道恩元帅准备对海因里希亲王采取行动时，他得到消息，弗里德里希已经回到了萨克森，并在9月11日再次将他的军队集合到德累斯顿周围。这足以让道恩以守势待在德累斯顿以东施托尔彭的防御工事里。他的胆怯（他称之为谨慎）使他遭到了在维也纳失去耐心的玛丽娅·特蕾莎的严厉批评。⁹²

但道恩是笑到最后的那个。在整个9月，越来越沮丧的弗里德里希试图绕开他，去威胁他的东部补给线。道恩最终离开了施托尔彭，但只是在10月7日转移到包岑附近的基特利茨继续防守。此时弗里德里希由于低估奥地利的突袭能力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把军营建在霍赫基尔希村四周，但阵线拉得如此之长，就像邀请敌人来攻击一样。10月14日，在这里他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幸的是，他的情报再次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在其雄心勃勃的参谋长拉齐伯爵的巧妙建议之下，道恩于破晓时分充分利用他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大约8万对3.6万）发动了攻击。焦虑的普鲁士参谋军官们很难让弗里德里希起床，即使情况如此危急，他还坚持认为战斗的声音是克罗地亚人喜欢在清晨发起的常见的小规模战斗。他手下的将军们试图组织抵抗。普鲁士普通士兵没有崩溃，这充分说明了他们保持着传说中的良好纪律。即便如此，屠杀也是可怕的。霍赫基尔希的一条街从那以后被称为“血巷”，尸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死者无法倒下，血流成河，涌向水沟。⁹³到上午10点，一切都结束了。普鲁士的幸存者已经往西北方向撤退，把超过9000名战友留在了身后。撤退是由齐滕和赛德利茨组织的，他们不顾弗里德里希的指令，谨慎地让马鞍整夜都留在马身上。⁹⁴



伤亡者中包括弗里德里希的姻兄不伦瑞克的弗里德里希·弗朗茨公爵（被一颗炮弹削去了头）、盖斯特将军、安哈尔特-德绍的莫里茨亲王（他再也没有从伤病中恢复到能够重返军队的程度）以及——所有伤亡中最惨烈的——弗里德里希的密友詹姆斯·基思元帅。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大规模伤亡并不少见，但肯定也是非常严重的。弗里德里希在罗布西茨损失了4名指挥官，在布拉格损失了4人，在科林和莫耶斯各损失了1人，在布雷斯劳损失了3人，在洛伊滕损失了2人，在措恩多夫损失了3人，现在又有3人死在了霍赫基尔希。⁹⁵ 弗里德里希要求他的将军们建立个人勇气的榜样，无疑鼓舞了他们的下属，但代价就是会造成指挥官的损失。更下级的军官也有相同的折损率，在前三次战役中，弗里德里希已经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军官。⁹⁶

弗里德里希因为霍赫基尔希会战惊魂未定，这更多的并不是因为其

军事的失败，毕竟道恩未能将其辉煌成就贯彻到底，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唯一一个应该为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一贯令人钦佩的英国公使安德鲁·米切尔对此解释说：“他非常蔑视他的敌人，我早就观察到，他不愿意相信那些不符合他个人想象的情报。”⁹⁷ 弗里德里希躲进文学作品中寻求庇护。战斗那一天的下午3点，他召来他的图书管理员兼私人助理亨利·德·卡特。毫不奇怪，颤抖的德·卡特怀着深深的恐惧走进房间。弗里德里希朗诵着拉辛的《米特里达特》中同名主角的演讲走来，这是他熟记的众多篇章之一。这些话非常应景：

所以，在整整
一年后，虽然你在这里再次见到我，阿尔巴特——
不再是命运所青睐的米特里达特，
他在命运的天平上
与罗马统治世界的重任相平衡，
这已长久地遭到质疑。我遭遇了失败！
庞培很机警，他的功业已经完成，
在黑暗中，为勇气留下的空间不足。
我们的士兵被半包在夜的黑暗中，
他们的队列到处散乱不齐，保持不住，
他们的混乱使得他们更为恐惧，
把武器转向彼此，哭泣声
在岩石间和天空中回响——
伴随着午夜打斗的所有恐怖，

勇气有什么用？恐慌支配了所有。

有人死去，其余的人逃生，而我，毫无疑问地

将我在全面溃败中的性命，

归功于我自己的死亡传闻，我

将它传播开去。⁹⁸

在朗诵到“我遭遇了失败！”这句话时，他突然停住，明显激动了起来，然后表示基思的死令他格外悲伤，赞美着基思的功绩和品格，泪水顺着他的面孔流了下来。⁹⁹

两天后，当得知他亲爱的姐姐威廉明妮在战斗的同一天去世的消息，他更加悲痛了。弗里德里希拉上了窗帘，到书本中寻求安慰，例如波舒哀的《葬礼演说》和“扬的一卷书”（可能指的是爱德华·扬的《夜思》）。¹⁰⁰也是在这时，他给卡特看了他戴在一条项链上的椭圆形小锡盒，里面装着18颗鸦片药丸，他仔细地数过，说它们足够送他到有去无返的黑暗之地。¹⁰¹霍赫基尔希会战的战报在玛丽娅·特蕾莎的命名日到达维也纳，整个宫廷和高级贵族们都聚集到美泉宫举行庆祝活动，她的酒杯都满得溢了出来。¹⁰²

然而，尽管1758年的战事以失败、死亡和沮丧结束，但整体上的战略形势并没有显著改变。普鲁士军队的牧师屈斯特在其战争记录中写道，从来没有一场失败的战斗对那些被击败者而言如此有利。¹⁰³漫不经心地考虑过奥地利人关于进一步出击的请求之后，俄国人已经渡过维斯瓦河回到了他们的冬季营地。弗里德里希很快摆脱了霍赫基尔希会战之后的沮丧情绪，开始着手挽回局面。就像他在战斗过后一天给海因里希亲王信中所写的那样，“事实上，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但必须以决心和勇气来挽回局势”。¹⁰⁴11月5日，罗斯巴赫会战纪念日的当天，奥地利人在弗里德里希军队逼近的时候放弃了对尼斯的围攻。当月月底

，向西进一步挺进萨克森的进军促使道恩将他的军队撤回到波希米亚过冬。弗里德里希因此仍然占有着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霍赫基尔希会战带来的回报竟然如此之少，这自然导致了对道恩的尖锐批评，但考尼茨和玛丽娅·特蕾莎这两个最重要的人并没有批评他。事实上，后者以物质支持表达了她热情的赞美，她给了道恩和他的继承人一笔25万古尔登的资助。¹⁰⁵ 特蕾莎仍然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特别是因为俄国和法国最近重申了他们坚持到底的决心。

注释

1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1976), p. 119.

2 P.C., vol. 13, pp. 296–8.

3 Christopher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London, 1985), p. 101. 关于懒惰的萨克森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准备不足，参见René Hanke, *Brühl und das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Die antipreuussische Aussenpolitik des Dresdener Hofes 1744– 1756* (Berlin, 2006), p. 320。

4 *Œuvres*, vol. 11, pp. 302–3.

5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5, pp. 1f f. 这仍然是对七年战争中奥地利一方最充分最令人满意的叙述，尽管它有过于突出的亲奥地利倾向（但跟同时期的普鲁士一方的叙述比起来，它的倾向性并没有更强）。以下书中的叙述很精彩，但不可避免地没有那么丰富全面：Michael Hochedlinger, *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83–1797* (London, 2003), ch. 14。

6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15.

7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02–3. 像往常一样，该书中包含对该会战的最好的详细记录，在第345页还有一幅质量颇佳的地图。

8 P.C., vol. 13, pp. 482, 487.

9 *Ibid.*, p. 482.

10 Quoted in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Maria Theresa: The Armed Forces of Imperial Austria 1740–1780* (London, 1977), p. 173.

11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18.

12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347 有一幅良好的地图。

13 Karl Zabeler (ed.), *Militärischer Nachlass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Generallieutenants, Gouverneurs von Königsberg und General-Inspektors der Ostpreussischen Infanterie Viktor Amadäus, Grafe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Zerbst, 1846), vol. 1, p. 192. 弗里德里希对在场的英国外交官安德鲁·米切尔爵士发表了同样的言论——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15。白山在此处用作反讽，指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斐迪南二世1620年在布拉格取得的大捷。

14 最好的记载参见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15–21。更为简明的记叙可参见Dennis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96), pp. 152–6, 尽管该书没有地图，并且在第153页还有一个奇怪的印刷错误，把会战日期印成了6月6日。

15 Ibid., p. 155.

16 Wolfgang Petter, “Zur Kriegskunst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n Bernhard R.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Kriege* (Munich, 1989), p. 253.

17 Koser, vol. 2, p. 86.

18 Franz A. J.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 (London, 2008), p. 58.

19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179.

20 Reinhold Koser, “Bemerkungen zur Schlacht von Kolin,”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11 (1898), p. 198.

21 Ibid., p. 199.

22 Koser, vol. 2, p. 148.

23 Johannes Burkhardt, “Religious War or Imperial War? Views of the Seven Years War from Germany and Rome,” in Mark H. Danley and Patrick J. Speelman (eds.), *The Seven Years War: Global Views* (Leiden, 2013), p. 117.

24 Haug von Kuenheim (ed.),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ndorff* (Berlin, 1982), p. 81.

25 Johann Christoph Allmayer-Beck,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im Spiegel ihrer österreichischen Gegner,”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Herford and Bonn, 1987) [no editor listed], p. 43.

26 例如*Œuvres*, vol. 4, pp. 146–8。另见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

en (Berlin, 2012), p. 19, 以及他对其私人助理德·卡特发表的评论, 参见Paul Hartig (ed.), *Henri de Catt, Vorles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Die Tagebücher 1758–60* (Munich and Berlin, 1986), p. 70。

27 例如Koser, “Bemerkungen zur Schlacht von Kolin,” pp. 174–200。

28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26–30.

29 *Œuvres*, vol. 20, p. 298.

30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rinz Heinrich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Doppelporträt* (Stuttgart, 1996), p. 79.

31 Karl Heinrich Siegfried Rödenbeck, *Lebensbeschreibungen Friedrich Wilhelms I. und Friedrichs des Grossen, Könige von Preussen, nebst einem Anhang, enthaltend ein Tagebuch au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Regentenleben von 1740–1786* (Berlin, 1836), vol. 1, p. 309.

32 Matt Schumann and Karl Schweizer, *The Seven Years War: a Transatlant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 52.

33 Dietrich, p. 558.

34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190.

35 Koser, vol. 2, p. 119. “Nádasti”的拼写方式各种各样, 有“Nadasty”“Nadasky”等等, 这体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语言的混乱。

36 关于1757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 最好参见Koser, vol. 2, pp. 106–27。

37 Olaf Groehler, *Die Kriege Friedrichs II.* (Berlin, 1966), p. 105.

38 Chester V. Easum, *Prince Henry of Prussia: Brother of Frederick the Great* (Westport, CT, 1942), p. 59.

39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6), vol. 2: *Briefe der Königszeit 1740 – 1758*, p. 399.

40 *Œuvres*, vol. 19, p. 51.

41 “罗斯巴赫会战的胜利是一个几乎无法超越的例证, 说明了卓越的统帅能力、训练水准和斗志胜于单纯的人海战术”: Christopher Duffy, “Rossbach,” in Cyril Falls (ed.), *Great Military Battl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 65。

42 Koser, vol. 2, p. 96.

43 Claude Louis, Comte de Saint-Germain,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du comte de Saint-Germain, ministre d'état, avec M. Paris du Verney* (Paris, 1789), p. 157. 这封信写于1757年11月11日。

44 Koser, vol. 2, p. 214.

45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Stuttgart, 1997), vol. 3: *Das Reich und der österreichisch-preussische Dualismus (1745–1806)*, p. 97.

46 Koser, vol. 2, p. 87.

47 Quoted in Michael Sikora, *Disziplin und Desertion. Strukturprobleme militärischer Organisation i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96), p. 284.

48 Ibid., p. 219.

49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vol. 3, p. 97.

50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2, p. 399.

51 Christopher Duffy, *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85), p. 117.

52 Gunnar Åselius, “Sweden and the Pomeranian War,” in Danley and Speelman (eds.), *The Seven Years War*, pp. 149–52.

53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256.

54 *Œuvres*, vol. 4, p. 183. Translation from *Posthumous Works* (London, 1789), vol. 2, p. 196.

55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263.

56 “这一点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的争议：洛伊滕会战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胜利，并且也许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胜利，仅靠此一天，弗里德里希就可以在最著名的指挥官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参见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53。

57 Quoted in Carlyle, vol. 5, p. 265.

58 像通常一样，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46–54, 给出了最清晰、最引人入胜的战斗记载。

59 Ibid., pp. 146–8. 许多德国历史学家给出的奥地利士兵总数明显较高。最近的一份论述称，战场上的奥地利士兵一共有8万人——Schumann and Schweizer, *The Seven Years War*, p. 96。

60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53;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266

. 在1757年12月19日写给达尔让斯的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声称他现在总共接收了2.3万名奥地利战俘，包括15名将军和700名军官——*Œuvres*, vol. 19, p. 53。

61 在1757年12月19日写给达尔让斯侯爵的一封信中——*Œuvres*, vol. 19, p. 53。

6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268.

63 Carlyle, vol. 5, pp. 259–60. 卡莱尔给出的是一个更遵从字面意义的译本，但我更倾向于英国教堂里通常演唱的版本。

64 Siegmund Keil, “Der ‘Choral von Leuthen’ – ein preussisch-deutscher Mythos,” *Die Tonkunst*, 4 (2007), pp. 442–9.

65 我在以下这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The Triumph of Music: Composers, Musicians and Their Audiences 170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8), pp. 231–3。

66 *Œuvres*, vol. 19, p. 53.

67 Lehndorff, vol. 1, p. 373.

68 Petter, “Zur Kriegskunst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n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45.

69 Klaus-Richard Böhme, “Schwedens Teilnahme am Siebenjährigen Krieg: innen- und aussenpolitische Voraussetzungen und Rückwirkungen,” in *ibid.*, pp. 208–9.

70 *Œuvres*, vol. 4, p. 200. Translation take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2, p. 221.

71 施韦德尼茨要塞的围城战是一个缓慢的进程，相关论述可参见Duffy, *The Fortresse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p. 122。

72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58.

73 像往常一样，对维也纳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完整记载可参见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here at pp. 347–55。

74 Johann Wilhelm von Archenholz, *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in Deutschland*, ed. August Potthast (Leipzig, 1866), pp. 112–16;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p. 371–6. Laudon经常被拼成“Loudon”，Ziskowitz则有多种拼法——“Siskovics”“Siskovich”等。

75 P.C., vol. 17, p. 82.

76 *Ibid.*, p. 85.

77 N. William Wraxall, *Memoirs of the Courts of Berlin, Dresden, Warsaw and Vienna in the Years 1777, 1778 and 1779*, 3rd edn (London, 1806), vol. 1, p. 180. Duffy, *Frederick the*

e Great, p. 161也引用了这段话。

78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 154.

79 关于德·利涅的军事生涯，参见Philip Mansel, *Prince of Europe: The Life of Charles Joseph de Ligne (1735–1814)* (London, 2003), ch. 2。

80 Charles Joseph Prince de Ligne, “Mon journal de la Guerre de Sept Ans,” in *Mélanges militaires, littéraires et sentimentaires* (Paris, 1796), vol. 14, p. 114.

81 Dieter Ernst Bangert, *Die russisch-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usammenarbeit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in den Jahren 1758–1759* (Boppard, 1971), pp. 46–7.

82 Ibid., p. 42.

83 关于该会战的最好记载，可参见Adam Storing, *The Battle of Zorndorf* (forthcoming)。我非常感激Storing先生允许我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前阅读并引用他的论述。这部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编页码。以下作品中也有出色的记载，还有高质量的地图佐证：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63–72, 以及他的*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n Military Power 1700–1800* (London, 1981), pp. 83–90。

84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409.

85 Quoted in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p. 89.

86 Petter, “Zur Kriegskunst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52.

87 “A truthful description of the bloody Battle of Zorndorf by an old Prussian soldier who served for thirty-four years and is still living now (1793),”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Officier-Lesebuch*, ed. C. D. Kuster (Berlin, 1793), trans. Martin Lange of Toronto.我非常感激Ilya Berkovich博士，给了我这篇文章的一份复件。

88 Schumann and Schweizer, *The Seven Years War*, p. 97.

89 Storing, *The Battle of Zorndorf*.

90 *Œuvres*, vol. 4, pp. 230–31. Translation here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2, p. 265.

91 Bangert, *Die russisch-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usammenarbeit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p. 106.

9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p. 411–12.

93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76.

94 Wolfgang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biografisches Porträt* (Freiburg, Basle and Vienna, 2011), p. 161.

95 Koser, vol. 2, p. 204.

96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233.

97 Easum, *Prince Henry of Prussia*, p. 80.

98 *Racine's Mid-career Tragedies*, trans. into English rhyming verse with introduction by Lacy Lockert (Princeton, 1958); Jörg Ulbert, "Friedrichs Lektüren während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in Brunhilde Wehinger and Günther Lott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Berlin, 2012), p. 76.

99 Willy Schüssl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Gespräche mit Henri de Catt* (Munich, 1981), pp. 277–8; *Œuvres*, vol. 15, p. ii.

100 Ibid.

101 Schüssl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280.

10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 423.

103 C. D. Küster, *Des Preussischen Staatsfeldpredigers Küster, Bruchstück seines Campagnelebens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2nd expanded edn (Berlin, 1791), p. 93.

104 *Œuvres*, vol. 26, p. 221.

105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5, pp. 435–7.

① 法厄同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他不自量力，试图驾驶父亲的太阳车，结果造成了灾难，自己也从空中坠落。此处指弗里德里希。

第9章

七年战争：灾难与生存

17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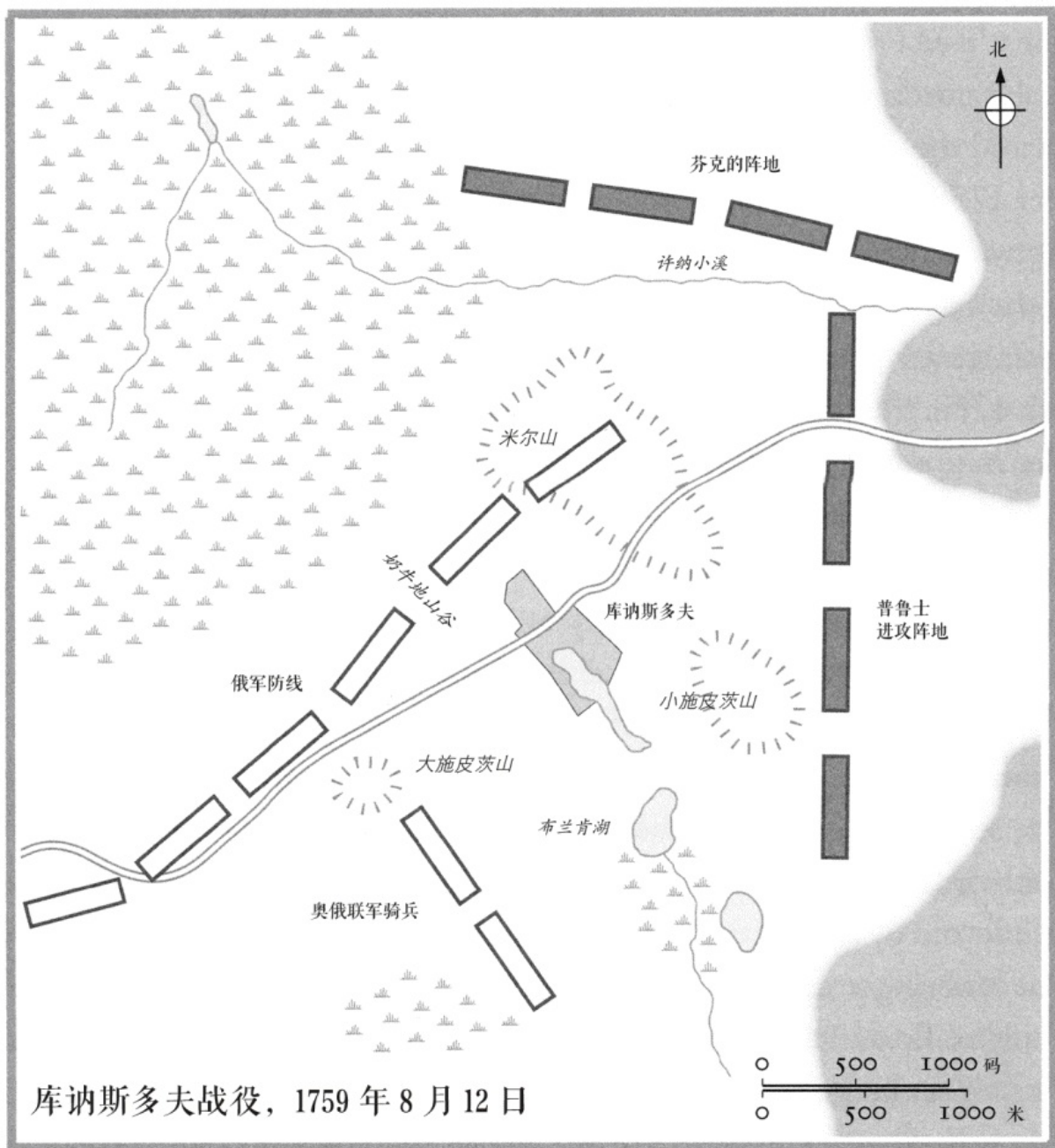
在1758—1759年冬季的积极招募意味着弗里德里希在新的作战季里的军队规模与一年前大致相同，约有16.3万人。¹至于士兵的素质是否相同则是另外的问题了。即使是其中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能承受的劳累和屠杀也是有限度的。然而，最主要的麻烦是和敌人人数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俄国军队开始显示出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普鲁士方面还担心，各敌对国家可能终于要开始协同作战了。正如弗里德里希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楚克曼特写给达尔让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最大的麻烦是在前些年里，我们的敌人未能够协调一致，使得我们可以将他们逐个击破，而今年他们打算同时行动。”²

在遥远的西部很快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尽管财务方面的麻烦日益严重，法国人还是下定决心要花大力气征服汉诺威，然后快速结束与英国的战争。一开始，一切进展都很顺利。4月13日，由德·布罗伊公爵指挥的一支法国助攻部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卑尔根击败了不伦瑞克的费迪南德公爵。这使得德·孔塔德侯爵统率的主力部队得以再次横渡莱茵河，向黑森推进。6月初，他们拿下了卡塞尔，然后向着威悉河

进军，并于一个月之后占领了至关重要的明登要塞。³ 8月1日，正是在那里，费迪南德指挥的约4.2万名英国、汉诺威和黑森士兵让孔塔德的5.4万名法国士兵吃了一次决定性的败仗。后者伤亡人数大约为7000人，联军的伤亡人数仅为2800人左右。⁴ 在同一天的一场次要战斗中，费迪南德的侄子、不伦瑞克的储君击败了德·布里萨克公爵率领的另一支法国军队，法国军队与其补给站的联系因而受到威胁。士气低落的法国士兵开始撤退，向西撤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北边的兰河。于1758年10月取代失败者德·贝尼斯神父继任法国外交大臣的德·舒瓦瑟尔公爵充满歉意地给考尼茨写信说：“谈起我们的军队时，我脸红了。我根本想不到那群汉诺威人竟能打败国王的军队。”⁵ 等到双方军队在1760年1月相当迟地进入冬季营地时，他们实际上回到了一年前开始时的位置，当然了，他们的人数因为死亡、疾病和逃跑而减少了数千人。

对于中部和东部的交战方而言，西部的战事只是次要事件，尽管法国人在明登的胜利很可能给弗里德里希带去彻底的灾难，他的主要麻烦还是敌人从4个不同的方向汇拢过来的问题。在他的西南方向，帝国联军和奥地利军队正向着萨克森行进；在南方和东南方向，有道恩和奥地利的主力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夺回西里西亚；在北方的是瑞典人，他们还得到了一支俄国军队的增援，正计划向柏林进军；在东方，还有大群俄国军队正虎视眈眈。当他们都汇集到中间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就会粉身碎骨。他唯一的机会是快速并多次打击个别敌人。正如他在3月底对费迪南德亲王所说的那样，他所处的战略形势“尴尬万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对其中一个折磨他的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好让他腾出手来去应付下一个。⁶ 积极进取的海因里希亲王开了一个好头，他首先摧毁了奥地利人位于波希米亚北部的补给站，然后转向西，深入法兰克尼亚，通过突袭夺得了兵源和补给，破坏了帝国军队进军萨克森的计划。⁷ 另外一支普鲁士分遣队，在海因里希·奥古斯特·德·拉·莫特—富凯将军的指挥下，对上西里西亚特罗保和耶格恩多夫周围的奥地利补给站造成了同样的破坏。但是奥地利人并不着急，他们在波希米亚北部等待时机。奥

地利人肯定没打算下到西里西亚平原，给弗里德里希制造另一个霍亨弗里德堡会战或洛伊滕会战的机会。正是他们的俄国盟友打开了局面。6月25日，他们从波森开往奥得河，这是一支在初夏季节集结起来的6万人的军队，新的指挥官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萨尔特科夫亲王。弗里德里希从西里西亚派出卡尔·海因里希·冯·韦德尔将军和一支有2.8万人的规模不大的部队去阻止俄国人的前进。这支普军是不够的，韦德尔笨拙的攻击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奥得河东岸祖里肖附近的卡伊（有时也被称为帕尔齐希）会战中，他们被击溃，人员伤亡达8000人。⁸ 8月1日，萨尔特科夫占领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通往柏林的道路（只有80千米）现在已经打开了，弗里德里希不得不亲自上阵。他是幸运的，历来谨慎的道恩只派遣了劳东率领2.4万人与萨尔特科夫的部队会合。他们加在一起约有6.4万人。正如前一年的措恩多夫会战前夕那样，弗里德里希率领军队到达奥得河西岸，在屈斯

特林附近渡河，然后向南行进。8月12日，两军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东北方的库讷斯多夫相遇。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弗里德里希最大的军事灾难，也是“18世纪俄国军队最伟大的功绩”。⁹ 战斗刚结束，弗里德里希就给他的大臣芬肯施泰因写信道：

我的外套上满是弹孔，有两匹马死在我的脚下。不幸的是，我还活着。我们的损失非常大，我4.8万人的部队只剩下3000人。我在写信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东躲西藏，我无法控制我的手下。你应该考虑自己在柏林的安全。我无法在这一残酷的命运转折中生存。其后果将比失败本身更糟糕。我没有任何资源了，坦率地说，我认为一切都输了。我不能在祖国灭亡后苟活。永别了！¹⁰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他自己对战斗的记录中，弗里德里希写道，这一切都是偶然，“谁能察觉到那根悬吊着胜利的细线呢！”要是奥地利的劳东将军晚几分钟到达俄国的炮台，战局就不会转向他那边。¹¹ 他告诉达尔让斯侯爵，“我们很不幸，但这不是我的错”¹²，但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失败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的情报是错误的，他自己的侦察不充分。他没有正确地理解对方的部署，因此不得不在最后一刻改变他的攻击路线。这一动作花费的时间让萨尔特科夫有机会采取适当的应对行动。在一切都变得太迟之前，他拒绝叫停，这一行为也是致命的。通过炮兵开火紧接着步兵突击的组合攻击，普军已经夺取了俄军位于米尔山高地的阵地（见地图）。为了攻击俄军的主阵地，普军此时不得不下到被称为“奶牛地”的山谷，然后再爬上另一侧，在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弗里德里希拒绝听从他的高级军官要求他停止行动的忠告，坚持认为敌人将不得不很快撤退，他自己的士兵已经筋疲力尽了。¹³ 和在措恩多夫的时候一样，弗里德里希决心要彻底赢得胜利。但这次不同的是，他的情况不那么有利，敌人的指挥更好，而他自己的军

队人数更少，效率更差。普鲁士步兵的稳健曾经被奉为传说，此时也最终崩溃了。战斗结束后4天，弗里德里希写信给芬肯施泰因说：“我们本来已经取得了胜利，突然我那可怜的步兵动摇了。对被送往西伯利亚的荒谬恐惧感〔如果被俘虏的话〕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¹⁴ 他自己则更应为鲁莽的勇气（而非懦弱）承担责任。在战斗中，有两匹马在他正骑着的时候被射中，第三匹则是在他要上马的时候被射中。¹⁵

一旦开始失利，普鲁士军队就会土崩瓦解。战斗结束后，弗里德里希只剩下3000人还是有组织的军事编队。其余的人散落在四面八方——或是横尸战场，或是躺在战场上奄奄一息。有6000多人当场死亡，伤亡总数达到1.9万人，占总兵力的40%。¹⁶ 受重伤的包括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他是那个世纪作品最受欢迎的德意志诗人之一。另外还损失了172门大炮和28面信号旗和军旗，这象征着此次惨败的规模。¹⁷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俄军与剩余的奥军会合并向柏林进军了。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一封写于9月1日，常被引用的信中，弗里德里希在大致位于柏林和包岑之间的沃尔多对他弟弟海因里希亲王说道：

我可以对你宣告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就在敌人渡过奥得河，只要再冒险发动一场〔另外的〕会战就能结束战争的时候，他从米尔罗瑟开去了利伯罗瑟。我先是进军到特雷巴奇，并于昨天从那里去了沃尔多，在那里，我的阵地将他与已被我占领的吕本隔开。因此我切断了他与卢萨蒂亚的联系，而他不得不从那里征用补给。¹⁸

正如这封信表明的那样，在过去的两周内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场会战之后，弗里德里希一度处于深深的绝望中，甚至到了考虑自杀的程度，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并开始集合幸存者。剩下的士兵在几天之内就

再次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这充分体现了普鲁士士兵强大的纪律性。¹⁹ 会战一周后，弗里德里希就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西边几千米处的马德利茨集结了一支约2.8万人的军队，盯防着通往柏林的路。如果联军想进入他的首都，将不得不与他决战。敌军没有这样做。俄国人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队——在卡伊会战中损失了4700人，在库讷斯多夫又损失了1.9万人。²⁰ 他们有理由认为，是时候让他们的奥地利盟友承担更多风险了。德累斯顿于9月4日投降，这意味着萨克森现在已经全部落入奥地利人之手，这本应促成奥地利和俄国联合入侵西里西亚的长期计划。然而到此时，萨尔特科夫和道恩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能进行联合行动的地步。这两个盟友也因海因里希亲王在西里西亚北部的一些富有创见的部署而被分开了。9月7日，萨尔特科夫宣布，由于缺乏补给，他不得不向东退到奥得河，他于25日到达那里。10月15日，俄国人开始了漫长的撤退，进入位于维斯瓦河畔的冬季营地。²¹ 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金钱和作战物资之后，他们这次战役差点就获得全面胜利，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同时，战事的焦点已经转移到萨克森。随着俄国人撤走，弗里德里希能够集中精力重新夺回对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控制，并将奥地利人赶回波希米亚。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到9月底，前一个月丢掉的所有萨克森土地全部回到了普鲁士手中，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德累斯顿除外。普鲁士军队受益于奥地利军队的不作为。尽管维也纳越来越恼火的上司给了他巨大的压力，道恩还是拒绝冒险作战，而是选择了一系列从容的部署，将海因里希亲王从他在易北河边托尔高的防御阵地里驱赶出去。这个行动失败了，看起来战事结束的时候会跟开始的时候一样，弗里德里希重新控制了萨克森，而道恩则回到了波希米亚。然后，弗里德里希以一个大胆但灾难性的主动行动帮了他敌人的忙。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芬克将军和一支1.5万人的部队被派往德累斯顿以南的马克森，对奥地利的补给线施加压力，并以此迫使他们离开。尽管弗里德里希的高级将领们一再警告，但他还是坚持己见。结果，芬克的部队被切断、包围、

袭击并被迫投降。弗里德里希的愚蠢固执造成了2000人伤亡，1.3万人被俘，其中包括9名将军，还损失了71门火炮，换句话说，除了在库讷斯多夫，这是他遭受的最大损失。²²即使是弗里德里希最狂热的崇拜者也很难找到任何借口为他辩白。弗里德里希很缺乏自知之明，他竟然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倒霉的芬克，但芬克只是服从了他自己都明白是错误的命令而已。当芬克从奥地利人的囚禁中回来后，他又被军事法庭审判，监禁一年之后被解除了军职。²³甚至弗里德里希极度忠诚的私人秘书艾歇尔，也认为芬克并没有错。让这一年的灾难到达无以复加之地步的是，在马克森会战的两周后，一支3500人的普鲁士小规模部队在迈森附近被截住，随后被迫投降。奥地利人此时拒绝交换俘虏，他们知道自己在人数上有天然的优势，而且一个经验丰富的普鲁士老兵比奥地利自己的士兵有价值得多，因此这两次投降的净损失更大。弗里德里希自己写道：

在马克森会战和迪雷克指挥的行动中损失的军团实际上在冬季已经被替换了，但这些人既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也不是适于作战的队伍，他们是在那里摆样子的。这群人可能做成什么事呢？他们一半是萨克森农民，另一半是逃兵，由迫于形势需要被任用的军官率领，这可能会产生什么效果呢？²⁴

1760年

经过4年活动不断和压力强烈的战事之后，弗里德里希开始感到紧张。在此期间，他不得不目睹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或奄奄一息，这些人全都是他野心的受害者。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他也很少是健康的，而他现在越来越容易因为疾病发作而丧失行动能力，痛风和痔疮的问题更严重了。前一个秋天，由于痛风发作和随之而来的发烧，他在关键时期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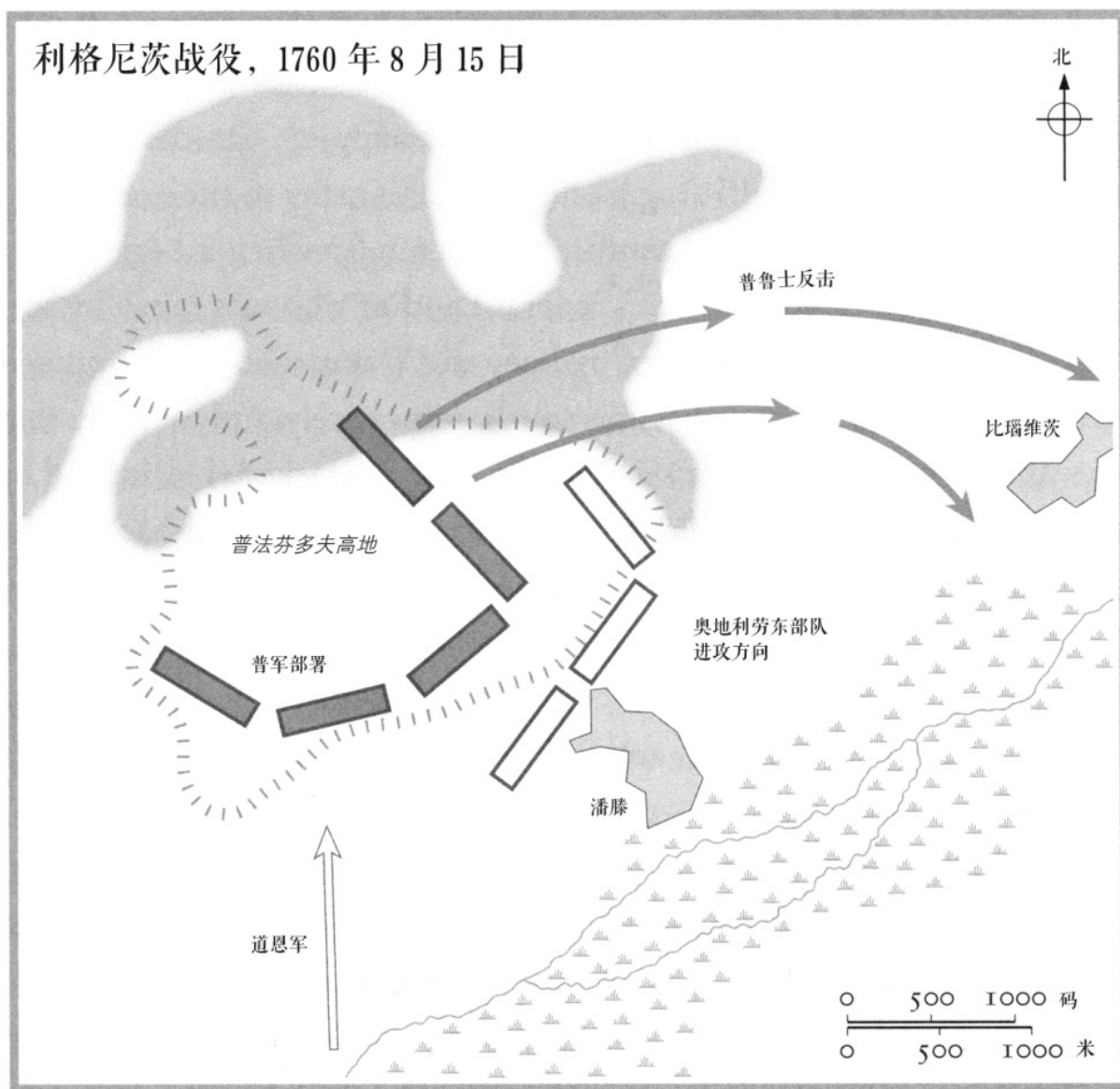
西里西亚的旅程被推迟，可见病痛之强烈。他告诉海因里希亲王：“我应该插上爱国心和责任的翅膀飞到你的身边，但当我到达时你会发现我只有一副骨架。”虽然他补充说，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仍会驱动起他虚弱的身体。²⁵ 到1760年1月，这一精神也枯萎了。他写信给达尔让斯，感谢他承担发表自己的“废话”的麻烦，但又问他，在自己的精神“太不安，太焦虑，太沮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写得出好的诗节。他哭诉道，他没有获得和平前景的希望，再失败一次的话就是致命一击了。忧心忡忡，仇敌环伺，活着变成了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他就以这样的语气一直哀叹自己的命运。²⁶

这还不完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因为弗里德里希还要活过一个更黑暗的时刻。他的整体策略仍然没有变——保持对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控制，并且他的首要目标也没有变——夺回德累斯顿。他到底有多少军队可供支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好的猜测是，他现役军人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11万，所以他与敌人相比在人数上的劣势大约至少是1比2。²⁷ 这一差距在6月23日还增加了，当时德·拉·莫特-富凯将军在兰德斯胡特被劳东将军指挥的优势巨大的奥地利军队击溃，在战场上损失了2000人，还有8000人成为战俘，只有不到1500人成功逃脱。这种情况又一次出现了：一位普鲁士将军忠实却不明智地服从他的国王陛下。弗里德里希重新考虑了最初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保住兰德斯胡特的命令，但他的看法改变得太晚了，没能拯救富凯的部队。²⁸

回到萨克森后，弗里德里希一直很积极，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想把拉齐或道恩拖入战场的尝试都失败了。他对德累斯顿的围困无功而返，7月19日围困开始，4天后就放弃了。3天之后，劳东的军队暴风般迅速攻下西里西亚的格拉茨大要塞，这群奥地利人向他展示了应该如何打围城战。不可否认的是，德累斯顿有坚决果断的麦圭尔少将指挥的1.4万名老兵驻守，而不幸的格拉茨指挥官巴托洛梅·迪欧中校，所能调动的只有3000名缺乏积极性的萨克森人和奥地利逃兵。但当他最终从奥地利的囚禁中返回后，也没有逃脱被军事法庭审判和处决的命运。²⁹ 双

方防御力量的差异表明，奥地利人更丰富的人口资源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弗里德里希此时的处境是极端危险的。他正在失去对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控制，也要把人力用光了，这都是由于他自己犯的许多错误。更糟糕的是，切尔内绍夫将军率领的一支俄国军队已经渡过了奥得河，并向着西里西亚进军，去与道恩会合。除了西里西亚几座防守空虚的要塞，联军和完全的胜利之间似乎已经毫无阻碍。劳东将军刚刚拿下格拉茨，就向着布雷斯劳进军，这是所有战利品中最大的一个，他相信自己能让胜利重演。现在，缝隙中的光终于开始穿过黑暗照射到弗里德里希身上：事实证明，比起在格拉茨的同事迪欧来说，弗里德里希在布雷斯劳的指挥官博吉斯拉夫·弗里德里希·冯·陶恩齐恩将军更为坚毅。海因里希亲王以闪电般的速度让自己大约3.5万人的军团在3天内赶了100多千米的路驰援布雷斯劳，而俄国人未能与劳东会合。³⁰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开启了从萨克森到西里西亚艰苦的行军，这花去了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道恩指挥的奥地利主力部队和拉齐指挥的一支辅助部队与其说是追赶弗里德里希，不如说是陪同。3支军队行军时如此接近，看起来就像是一支军队似的。玛丽娅·特蕾莎和考尼茨强烈要求一战干掉弗里德里希，在他们的鼓励下，道恩计划在布雷斯劳以北，奥得河的一条支流卡茨巴赫河畔进行决战。³¹



道恩在8月15日实现了计划，却不是以他预料的方式实现的。他的部队加起来有9万人，在数量上有3对1的优势，他相信自己可以包围并消灭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后者就在利格尼茨东北数千米处安营扎寨。这一次，弗里德里希没有措手不及。相反，在8月14到15日的夜晚，他让部队向北移动，留下燃烧的篝火以迷惑敌人。所以当凌晨3点刚过，天色微亮之时，轮到劳东将军遭到突袭了。他期待着能够得到拉齐和道恩

的援助，他们应该分别从西边和南边开过来。劳东没有察觉出自己面对的是普鲁士的主力部队就出击了。被大炮击溃又侧腹受敌的奥地利军队被迫退回到卡茨巴赫。早晨6点，战斗结束了，³²过程短暂但激烈。劳东折损了大约1万人，包括4000人被俘，其中有2名将军和80名军官，还损失了83门大炮。普鲁士军队这边死亡775人，另有2500人受伤，伤者中的大多数是在奥地利人掩护大军撤退的最后两次骑兵冲锋中受伤的。³³

在七年战争的多次会战中，利格尼茨会战并不算特别大的一次，大多数奥地利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在盛怒之下开火，然而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这是一场弗里德里希必须要赢的战斗，或者说这是一场他输不起的战斗。如果如同计划中的那样，道恩和拉齐的铁锤砸在劳东的铁砧上，被夹在中间的普鲁士人就会粉身碎骨，结果会比库讷斯多夫会战还惨烈得多。任何的残兵败将都会被切尔内绍夫指挥的俄国部队清除干净，这支部队是萨尔特科夫曾承诺会派来的，他承诺让这支部队于15日渡过奥得河。结果俄国人现在正谨慎地往东走而不是往西走，而此时道恩和奥地利大军开动去围攻布雷斯劳西边的施韦德尼茨要塞。事后来看，利格尼茨会战是七年战争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它结束了一系列可以追溯到将近两年前霍赫基尔希会战的军事失败（虽然弗里德里希属下的一些将军，尤其是海因里希亲王，曾在中间赢得小规模胜利）。一支军队相信运气（也被称为天意、命运、上帝等）站在其指挥官一边的信念非常重要，拿破仑并非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统帅。正如若米尼注意到的那样，利格尼茨会战恢复了“他军队的全部士气”。³⁴弗里德里希在大国之间的声誉也恢复了。英国国务大臣霍尔德内斯勋爵写道：“那位伟大君主的卓越天才从未比他在最近一次的西里西亚远征中表现得更为闪耀。整个行动被看作军事才能的杰作。”³⁵这本是奥地利—俄国联军在库讷斯多夫之后果断结束战争的最好机会，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此后，他们的进攻再也没有恢复势头。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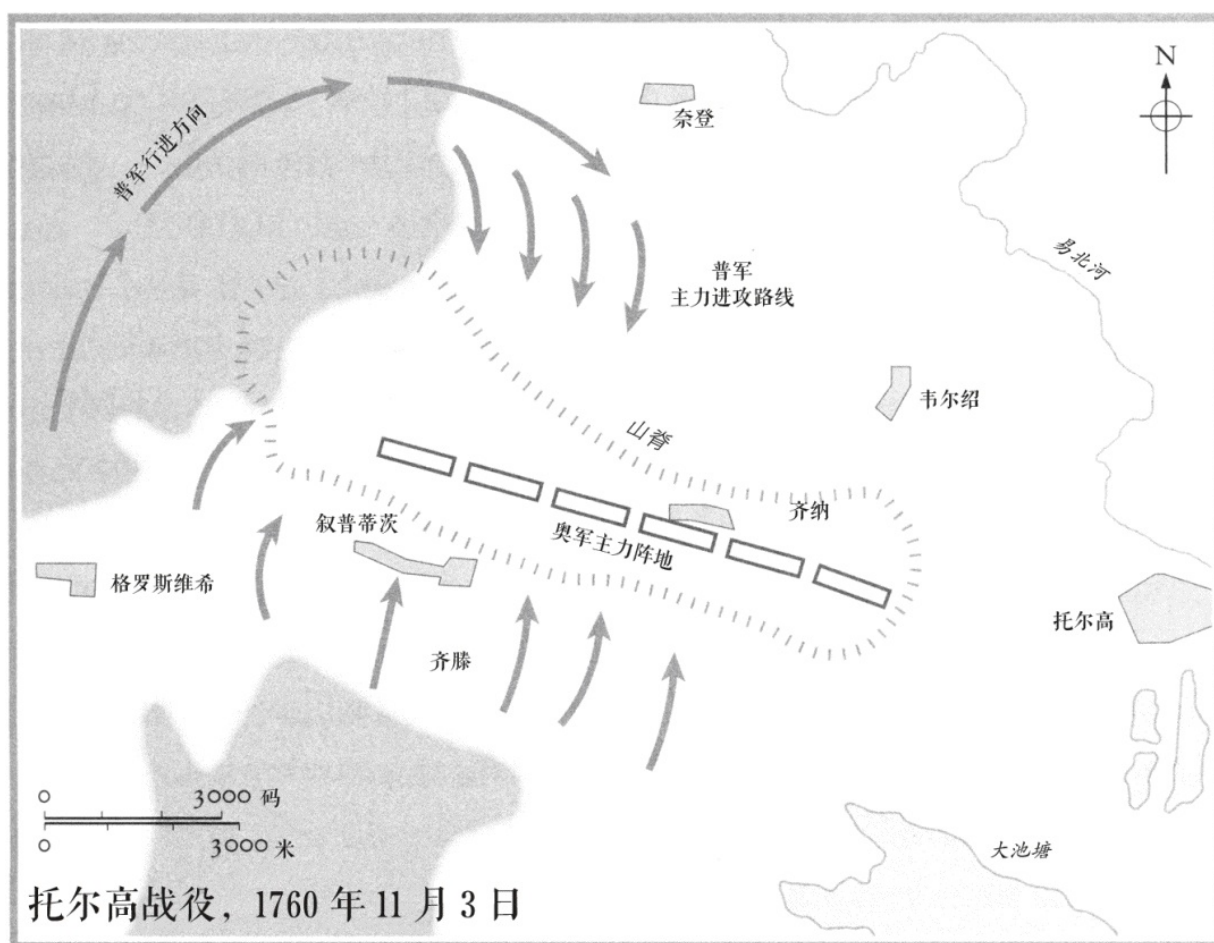
从短期来看，在这一串短暂但猛烈的行动之后，僵局持续了几周，

道恩和弗里德里希在西里西亚西部的山中各自调兵遣将。9月末，弗里德里希对海因里希亲王抱怨道，他一无所获。道恩坚守营壑，弗里德里希也是闭营不出，双方都找不到进攻机会。³⁷ 受其军营中法国军官的鼓动，俄国人在更远的北边采取了短暂但非常有力的主动行动，打破了僵局。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支由切尔内绍夫率领的部队占领了柏林，在那里，从道恩军队中派来的1.8万名奥地利人和萨克森人加入了他们。虽然对于当地居民来讲这是一次损失巨大又令人不快的经历，在夏洛滕堡宫和申豪森宫发生了大量的打砸抢掠行为，但为期3天的占领并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主要伤亡是因尝试炸毁炸药厂失败而丧命的15名俄国士兵。³⁸ 正如肖沃尔特评论的那样：“这是一次打劫，不是一次作战行动。”³⁹

利格尼茨会战并没有恢复弗里德里希的个人信心。他对海因里希亲王哀叹道，他的资源太有限了，无法抵抗各路敌军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他补充道：“如果我们被消灭，你可以将我们的失败追溯到马克森的致命事件上。”⁴⁰ 他现在不得不意识到，一贯谨慎的道恩在西里西亚赢了自己，而他如果不想让战役以彻底失败终结的话，必须撤回萨克森去。他怀着阴沉的情绪出发了，并在10月7日对海因里希亲王说道：“鉴于我的现状，我唯一的座右铭是——征服或死亡。”⁴¹ 道恩也承受着来自维也纳的压力，越来越不耐烦的玛丽娅·特蕾莎明确指示，要保持对萨克森的控制，并且无论情况如何都要谋求一战。⁴² 结果，11月3日，弗里德里希与道恩在莱比锡东北方的托尔高打了一仗，奥军在那里采取了强有力的防守态势。如果不能把他们赶出去的话，普鲁士就会失去萨克森及其资源。在库讷斯多夫会战中，正面攻击导致了一场灾难，这让弗里德里希设计了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迂回进攻方式，他让大部分部队——2.4万名步兵、6500名骑兵和50门12磅大炮——去攻击奥地利的后方，由冯·齐滕将军指挥的1.1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组成的较小规模的部队则在前面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事实证明，这种战术的缺陷是主力部队到达攻击位置之前需要行进很长的路。有太多可能出纰漏的地方，事实上

也的确出了纰漏，行军耗费的时间太长，足以让道恩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随后的战斗甚至比双方之前几次遭遇战更为激烈。弗里德里希自己被一颗失效的子弹击中晕倒，不得不在抬下战场一段时间。事实证明，这也成了他军事生涯中最血腥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是由于下级军官在关键时刻的主动和齐滕兵团的及时进军。直到午夜前1分钟，战斗还没有决出胜负。事实上，道恩已经派了一名信使去宣布胜利，然后战局出现了反转，这一误会在维也纳引发了强烈的沮丧情绪，最初的欣喜化为了灰烬。⁴³ 双方的损失都很可怕。在第二天写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声称，在这场“艰难和棘手”的战斗中，他手下士兵的伤亡达2万—2.5万人。⁴⁴ 他甚至没有提及自己受伤的事。当他的副官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在战斗结束后几天计算最终伤亡人数时，弗里德里希告诉他：“如果这个数字算出来的话，你将会掉脑袋！”无法知晓最终伤亡数字到底有多高，估计是在16 670到24 700之间，但即使是最低的数字，也超过奥军伤亡的总数（弗里德里希严重夸大了奥军的伤亡数字）。⁴⁵



弗里德里希虽然大谈自己的胜利，但并没有获得胜利的心情。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今后根本无法承受这种进攻战术的损失。⁴⁶正如他在11月5日给达尔让斯的信中所述，他获得了一段和平时光度过冬季，但这就是一切收获了。5天后，他又写信说，奥地利人被赶回了德累斯顿，但暂时还无法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他写道：

事实上，我们在这场战役中筋疲力尽，付出了巨大努力，得到的却只是一个悲惨的前景和一份可怜的回报。处在所有这些困扰之中，我唯一的支持便是我的哲学。在这段困顿的时间里，当一切都分崩离析的时候，它是我的依靠和唯一的安慰源

泉。正如你会看到的，我亲爱的侯爵，我没有夸张地吹捧我的成功。我只是如实陈述，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会因为胜利带来的魔力而眼花缭乱，但是“处在远处的人羡慕我们，而身处其中的我们则恐惧焦虑”。⁴⁷

这就是他在这一年开始时的那种阴郁的情绪，也许他对自己太严厉了。毫无疑问，1760年比1759年好很多。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未能有效地联合起来，他已经赢得了两场重要战斗，唯一的净损失是格拉茨要塞。克劳塞维茨将做出更加明智的评估。他不赞同那些把这场战斗视为一件艺术品和杰作的看法，但他确定钦佩弗里德里希的智慧：

以有限的资源追求一个重要目标，他没有尝试任何超越他力量的事情，但总是正好足够让他得到自己想要的.....他的整个行动.....显示出一种克制的力量，它总是平衡的，从来不缺乏活力，会在危机时刻上升到惊人的高度，但随后立刻恢复到平静的振幅，随时准备着适应政治形势的微小改变。虚荣、野心、报复心，都不能让他偏离这一方针，正是这一方针给他带来了成功。⁴⁸

西部战线上的情况不太令人满意。法国1759年在海外战场的损失迫使他们寻求在德意志战场的胜利来作为最终和平谈判的筹码，大约15万人的大军于1760年6月出动。尽管赢得了一些战斗，费迪南德亲王还是被迫从黑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撤出。7月31日在瓦尔堡的胜利并未能阻止法国在一周后拿下哥廷根，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他们深入汉诺威领土的极限。⁴⁹从长远来看，对弗里德里希更为不祥的是他的英国盟友对大陆战争的热情在逐渐降低。他们已经在北美洲、加勒比海和印度达成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战争目标，现在正寻求让这一消耗巨大的

战争早日结束。此外，乔治二世于10月25日去世，新王登基，后者在一年前把汉诺威称为“可怕的选帝侯国，一直靠这个可怜国家的重要命脉活着”。⁵⁰ 英国停止给予弗里德里希宝贵的资助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2月，普鲁士驻伦敦的代表克尼普豪森警告弗里德里希说，议会中反对大陆战争的人数在增长，相应地，对与法国单独言和的热情也在增长。⁵¹

1761年

1761年，在东部战线的主战场上没有发生重大战役。联盟战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疲惫感。在萨克森坐镇的道恩元帅，还在从托尔高之战的伤痕中恢复，急于辞职，比以往更加倾向于安守不动。他的更有进取心的下属劳东，要与一支俄国军队联手，这支俄军现在归沙皇的宠臣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布图尔林伯爵指挥，还在谋求重复库讷斯多夫会战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将海因里希亲王和2.8万名士兵留在萨克森以盯防道恩，自己则率领约5.5万人的主力大军开往西里西亚。他把两名劲敌分开的企图失败了，特别是因为他在8月15日浪费了一次在利格尼茨攻击俄国人的机会。⁵² 就事态发展来看，这可能是明智之举。4天后布图尔林与劳东会合，但随后发生的事证明了他们不愿意继续进攻。在他们会合的前一天，弗里德里希告诉海因里希亲王：“俄国人仍然没有进攻的欲望，但我认为劳东会催着他们这样做。”⁵³

奥地利的指挥官无疑尝试过催促俄军，但弗里德里希让自己的军队进入了施韦德尼茨西北方向的邦策尔维茨筑垒兵营，以此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反驳。通过集中的铲土作业，弗里德里希获得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普鲁士士兵12小时一轮班地工作，创造了一个由壕沟和栅栏网组成的强大防御网。萨克森的蒂尔克上尉钦佩地写道：

在这个位置，普鲁士军队占据了一系列低且大多地势平缓的山丘，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势。并不是说接近他们是不可办到的，但很多阻碍使得他们难以接近：小溪流、沼泽般的草地，还有从每个方向上发射过来的炮火。⁵⁴

闯入这座堡垒的代价会被证明是极其高昂的，因为有460门大炮守卫着它。俄国人先退却了。一开始布图尔林告诉劳东他会配合进行联合进攻，然后他有了别的想法。9月9日，他终于放弃了，率领着他的军队向东撤往奥得河并渡河回到对岸。

到此时，这次平静的战役该以双方进入冬季营地为结束了。弗里德里希当然认为这一切都结束了。9月27日他从比尔岑写信给海因里希亲王说，既然俄国人已经走了，那么在萨克森的奥地利人是几乎不可能试图袭击柏林的；至于那些在西里西亚的军队“我相信你不需要有任何担忧，因为我们的战事基本上结束了，毕竟不论是我们还是奥地利人没有任何的打算”。⁵⁵ 他的判断是错的。这一年里还会发生3次冲突，一次是令人愉快的，另两次则显然并非如此。第一次是杜比斯拉夫·弗里德里希·冯·普拉滕将军和一支约8000人的部队的杰作，他们被弗里德里希派去骚扰撤退和正在行军的俄国军队。9月15日，他们攻击了俄国军队位于波兰戈斯滕的主要补给站，摧毁了5000辆运货马车，并俘虏了1845人和7门火炮。他们从那里继续向普鲁士位于波美拉尼亚海岸的科尔贝格要塞进发，一路扰乱俄国人的补给线。⁵⁶ 但弗里德里希刚发了对此行动的祝贺，真正可怕的消息就传来了，10月1日，劳东以一场夜间突袭攻下了巨大的施韦德尼茨要塞。弗里德里希被这“如此非比寻常又几乎难以置信的形势反转”震惊得完全不知所措。⁵⁷ 这确实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施韦德尼茨要塞地控从波希米亚取道弗里德兰之要津，因此是“下西里西亚的钥匙”，特别是因为扼守从柯尼希格雷茨到尼斯的要道的格拉茨，已经完全落入奥地利人之手。⁵⁸ 鉴于过去他曾在劳东手中

栽了好几次跟头，最明显的两次是在格拉茨和霍赫基尔希，弗里德里希的自满情绪既令人惊异又具有破坏性。第三个坏消息在这一年的年底到来，科尔贝格要塞于12月16日落入俄国人之手，他们首次能够通过港口来运送物资。这是俄国人首次在波美拉尼亚过冬，而奥地利人也首次在西里西亚过冬。同时，在萨克森，海因里希亲王被道恩逼迫着撤离了他位于迈森的军营。⁵⁹

唯一能够看到的一线光芒出现在西线，法国军队在11月中旬已经进入了冬季营地，在漫长的作战季节中没有取得任何持久的成就。更令他们失望的是，那一年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可还是一无所获。两支大型军队被派往东部，一支大约9.5万人，在德·苏比斯亲王的指挥下从下莱茵出发；另一支由德·布罗伊公爵指挥，大约6.5万人，从更远一些的南部出发。他们因此在人数上远超过费迪南德亲王，比例至少为2比1。

⁶⁰ 接下来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行军和向反方向行军、调动和反调动，双方唯一真正接触的是7月15—16日在利珀河畔哈姆附近发生的韦灵豪森会战，费迪南德亲王明显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没有结束这一年的战事，但它有助于保证汉诺威1761年不被征服。⁶¹

1762年

1762年1月6日，情绪低落的弗里德里希从布雷斯劳写信给他的首席大臣芬肯施泰因说，如果不能促使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开辟与奥地利人对抗的第二战场的话，他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发起谈判，希望能从残局中为他的继任者保存些东西，这暗示弗里德里希正在考虑自杀（这不是第一次了）。⁶² 仅仅两周之后的1月19日，他收到手下从华沙送来的消息，伊丽莎白沙皇终于在5日去世。他的直接反应是谨慎的。他写信给芬肯施泰因说，他们无法确定她的继任者彼得三世是否会屈服于俄国现有盟友的花言巧语。懒散的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罗伯特·基思爵士

，应该被煽动起来，对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影响做出反击。他最后沮丧地补充道，比起3年前西班牙查理三世的继位，他不觉得这次统治者的变更会带给他更多好处。⁶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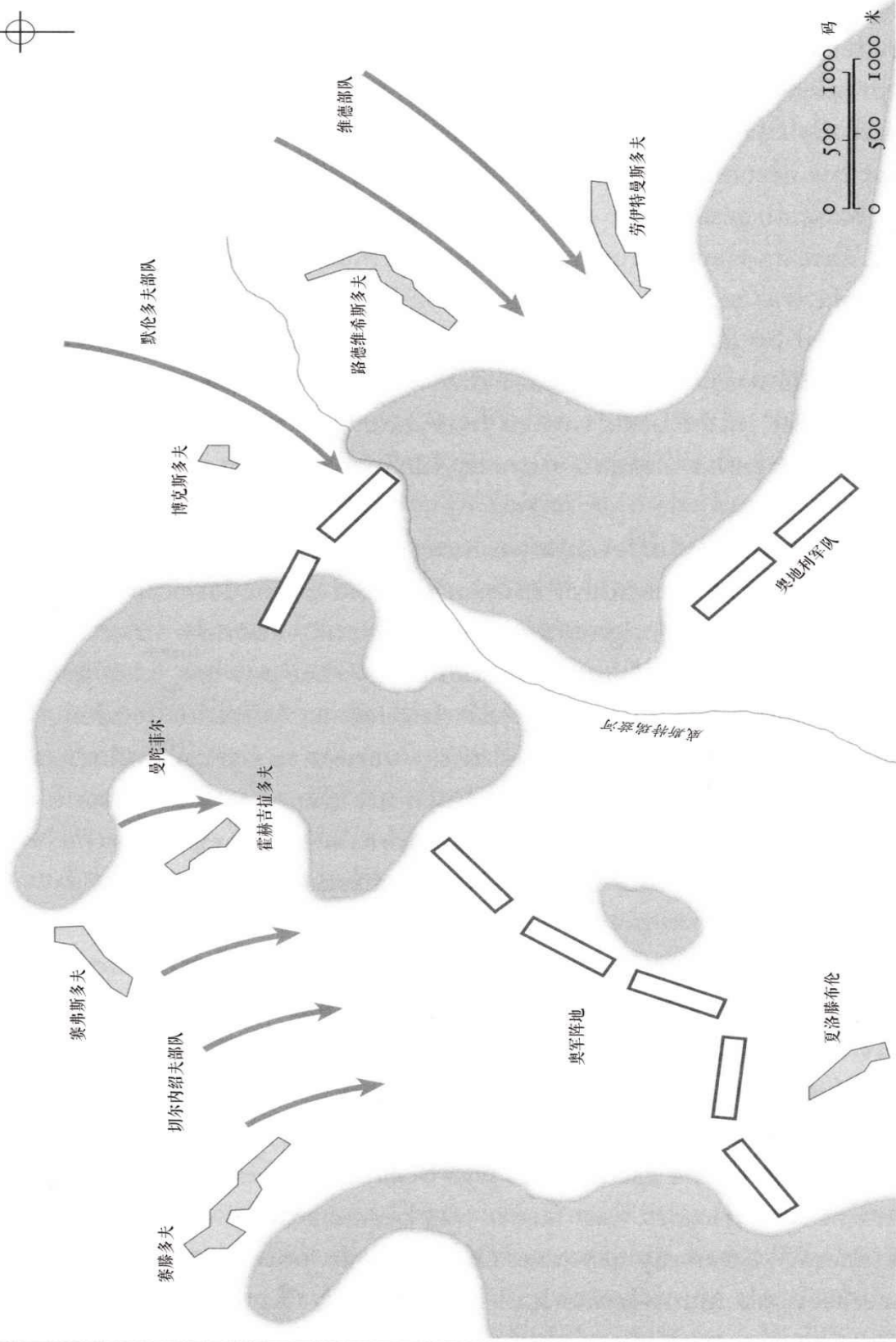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大错特错了。正如法国人抱怨的那样，新沙皇对弗里德里希与其说是有一种依恋，不如说是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情”，他在一封亲笔信中称呼弗里德里希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之一”。⁶⁴他经常身着一身普鲁士少将的制服，在他的套房里挂着他能收集到的所有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还不停地亲吻一枚戒指上的弗里德里希肖像，这枚戒指是波茨坦送来的礼物。⁶⁵他这样做，部分是出于英雄崇拜，部分是由于在为他出身的荷尔斯泰因家族从丹麦夺回石勒苏益格公国时需要普鲁士的帮助。⁶⁶没过多久，一个好消息为弗里德里希带来了欢乐。在2月5日俄国宫廷的晚宴上，彼得毫无节制地数落其奥地利盟友的缺点，以至于奥地利大使梅西伯爵觉得自己无法将他的原话写到呈送维也纳的报告中。⁶⁷俄国的将军们接到命令，停止一切针对普鲁士的敌对行动。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被鼓动着去进攻奥地利。5月5日，俄国与普鲁士签订了联盟条约。俄国外交官作为中间人安排了普鲁士和瑞典之间的和谈，双方于5月22日签署和约。⁶⁸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揉揉自己的眼睛。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北方和东方的敌人就转向了中立，俄国从敌人变成了盟友。难怪他在写到这段历史时欣喜若狂：

把我们叙述的事件总结起来看，我们会看到普鲁士在上场战役结束的时候濒临毁灭的边缘；在所有政治家眼里，这个国家都不可能复苏了，但一个女人的死让它复苏了；不但如此，它还是被那个曾经最急于寻求其毁灭的力量所支撑的.....如果极度微小之事可以影响、改变帝国的命运，人类事务该是怎样相互依存的呢？命运的玩乐就是这样，它在嘲笑凡人徒劳的谨慎，激起一些人的希望，而打击另一些人高度的期望。⁶⁹

弗里德里希是否是因为沙皇的去世而获救，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值得单独讨论。这里只需要注意到弗里德里希说得太夸张了。如果他知道他敌人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他可能就会改变他的观点。当他听说有2万名士兵从奥地利军队退役时，他认为这是因为玛丽娅·特蕾莎对全面胜利的自信。⁷⁰实际上这是因为没钱给他们付工资了。⁷¹奥地利征收了太多的新税，增加了太多的旧税，筹措了太多的贷款，奥地利人民已经被榨干了。现在，只是为了支付累计债务的利息，就需要花费大约40%的岁入。到次年战争结束时，债务总额已经相当于七八年的固定收入了。⁷²法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国家破产这种事在那里似乎真的有可能发生。⁷³当奥地利的财政专家路德维希·青岑多夫伯爵被法国大使问及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财政结构时，他的回答是：“一个盲人能给另一个盲人指路吗？”⁷⁴

一旦清楚圣彼得堡的风向改变了多少之后，弗里德里希真的变得轻松愉快了。1762年3月6日，他给达尔让斯写信说，跟俄国言和已成定局，这在维也纳引发了巨大的惊恐，并且“风暴云正在散去，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美丽平静的日子，闪耀着太阳发射的光芒”。⁷⁵但仍有工作要完成。俄国人撤离了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还有待重新夺回。主要的目标必须是施韦德尼茨要塞，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依旧保持着对下西里西亚的控制的话，他们在和平谈判中就可以采取强硬手段。弗里德里希留下海因里希亲王和3万名士兵盯紧萨克森，自己带着人数约在6.6万到7.2万人之间的军队开往西里西亚，在那里他遇到了防守在施韦德尼茨要塞的道恩和约8.2万名士兵。在那里，切尔内绍夫率领的1.5万到2万名俄国士兵加入了他的队伍。他们一起把道恩赶到了施韦德尼茨要塞西南方的布克斯多夫。

布克斯多夫战役，1762年7月21日



在7月的前两周，弗里德里希派弗朗茨·卡尔·路德维希·冯·维德·祖·诺伊维德将军（一位德意志诸侯的小儿子）和一支2万人的军队在波希米亚东北部地区故意制造混乱，意图引诱道恩离开。道恩似乎不为所动，所以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人被召回。事实上，大量的人被派去保卫交通运输，于是他们就参加了布克斯多夫会战，弗里德里希在这一次终于享受到了人数上的优势。如果俄国积极参与的话，人数优势会更大的。然而，7月18日，切尔内绍夫不得不告知弗里德里希，圣彼得堡的宫廷政变推翻并杀害了彼得三世，他和他的军队被召回。借助一大笔贿赂，弗里德里希说服了他在原地逗留3天，尽管他不参与作战。事实上，切尔内绍夫的部队在7月21日会战开始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把它跟自己的11个营队连在一起，布置在奥地利军队的对面，让道恩误以为主要攻击会从那里发动（见地图）。同时，普鲁士的主力旅被派去占据东北方向和东方的位置，那里守卫薄弱。正是他们的进攻威胁到了道恩的侧翼，迫使他命令整体撤退。在七年战争的历次会战中，这是一场相对不那么血腥的战斗，双方的伤亡都约为1600人，但其结果具有最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⁷⁶布克斯多夫会战也是弗里德里希的最后一战。道恩被迫撤回波希米亚山区，与施韦德尼茨要塞的联系被切断。围城持续了63天，奥地利驻军的指挥官是彼得·瓜斯科将军，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积极又坚决地捍卫这座要塞。只是在一枚幸运的普鲁士炮弹炸毁了一座弹药库之后，普军才打开了一条进攻之路，迫使他于10月9日投降。⁷⁷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西里西亚重归普鲁士的控制。在谈到道恩在围城过程中的无所作为时，若米尼写道：“当代史上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怯懦实例了。”⁷⁸在西线，战事随着11月1日卡塞尔法国驻军的投降而结束。

到了这个时候，考尼茨的大联盟已经分崩离析了。很明显，英国和法国将很快达成和平条约（初步的条约已经于1762年11月3日签署），还有俄国新统治者——彼得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不会恢复与弗里德里希

为敌的行动了，因为俄国的财政已经枯竭，这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

⁷⁹ 奥地利很快将独自面对这一切了。最后一根稻草是10月29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德累斯顿西南的弗赖贝格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实际上恢复了普鲁士对萨克森的控制。⁸⁰ 兴高采烈的弗里德里希给他写信说，这个消息让他感觉自己年轻了40岁：“昨天我是60岁，今天我又回到了18岁。”⁸¹ 他告诉萨克森—哥达公爵夫人，命运在7年的战事中让他吃尽苦头，但现在似乎已经决定要更宽容地对待他，和平已经握在自己手中。⁸² 他说得很对。在维也纳，即使是最强硬的强硬派，现在也能看得出来，他是不可战胜的。在所有的参战方中，萨克森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所以由一个萨克森人，卡尔·托马斯·冯·弗里奇出面通知弗里德里希奥地利准备谈判是很合适的，弗里奇于11月25日在迈森把奥地利的打算告知了弗里德里希。⁸³

1763年《胡贝图斯堡和约》

正式谈判于1762年12月30日在萨克森莱比锡附近的胡贝图斯堡宫开始。弗里奇代表萨克森，海因里希·加布里埃尔·冯·科伦巴赫代表奥地利，埃瓦尔德·冯·赫茨贝格伯爵代表普鲁士。奥地利在谈判中居于弱势地位，甚至在弗赖贝格会战的消息到达之前，道恩就对玛丽娅·特蕾莎说，“如果没有和平的希望，那么我就不能明白陛下您何以继续进行战争，因为目前的形势已到这般程度，军队恐怕无法完整无损地度过整个冬天”。奥军严重缺乏补给，士兵们不得不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休养，因此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普鲁士军队的袭击。特别是军官团，他们已经“彻底丧失士气了”。⁸⁴ 考尼茨在1760年写道，最糟糕的和平将是让西里西亚全部落入普鲁士之手。而这正是弗里德里希此时得到的结果，即使是从1760年7月起就在奥地利人控制之下的格拉茨伯爵领地和要塞也保不住了。⁸⁵ 但条约的签订一直推迟到1763年2月15日，这不是由于奥地利的顽固，而是弗里德里希在拖延，他要从萨克森榨取最后一点一滴的资源

：男人、金钱、粮食，还有妇女——大量的萨克森妇女被带到普鲁士以促进交战区的人口恢复。⁸⁶

在《胡贝图斯堡和约》的21项条款中，最重要的是第12条，它承认了1742年和1745年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布雷斯劳条约》《柏林条约》和《德累斯顿条约》。换句话说，和平是在确认战前现状的基础上达成的。六年半耗资巨大又死伤无数的破坏性战争，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但这并不是比较有远见的同时代人看待它的方式。最为敏感的是丹麦首席大臣约翰·哈特维希·恩斯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他成功地让自己的国家置身战争之外。1759年12月，当战争结果还不明朗时，他在给法国外交大臣德·舒瓦瑟尔公爵的一封信中提供了精辟的分析。在谈到法国与英国—普鲁士联盟之间的和平前景时，他评论道：“但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条件，他们能提供什么呢？这就是困难所在。英国国王想获胜，普鲁士国王不想输，因为，如果他不输的话，他就将赢得一切。”在北美洲有这么多的领土可供移民定居，然而

这不是普鲁士国王的情况，他的伟大或屈辱是德意志战争的唯一焦点。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就是这点使得这场战争如此残酷，如此充满变数，如此难以解决。它不是因为不重要或是一时的兴趣而爆发，不是为了这个省份或那个城市，而是为了这个新兴君主国的生死存亡。普鲁士国王令其崛起的才华和普鲁士崛起的速度已经震惊一部分欧洲，并戏弄了另一部分欧洲。

此外，伯恩斯托夫继续说道，这是一种不同的国家形式，“彻底的军国主义并且仍然具有一个年轻苗条机体的全部活力、敏捷和贪婪”。未来难料的正是德意志的二元对立：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是否会在其正式的皇帝之外，又在北方拥有另外一个统治者，这名统治者把他的国家

变成了一支卫戍部队，把他的人民变成了一支军队，他可以在欧洲其他大国之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⁸⁷

如果有机会阅读这一分析的话，弗里德里希可能会一直点头表示赞许。他知道生死攸关的东西是什么，他知道他的赌注是多么地接近彻底失败的边缘，他并不想继续进攻了。他告诉海因里希亲王，他现在要开始支付他的国家债务，“然后我就可以在我愿意的时候死去了”。⁸⁸虽然他相信玛丽娅·特蕾莎和考尼茨已经厌恶战争并真诚地想要恢复良好的关系，但他补充道，他永远不会忘记猫和老鼠的寓言。⁸⁹尽管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征战，但他对于回归故里并没有很期待。他告诉达尔让斯侯爵，他的臣民应该会为和平感到高兴，但“对于我这个可怜的老人而言，我将回到这样一个城镇：在那里，我熟悉的东西只有墙壁，我不会碰到任何认识的人，巨大的工作任务在等着我，而不久之后，我就会把我的老骨头留在一个不受战争、灾难和人类罪恶打扰的安息之所”。⁹⁰

注释

1 Dennis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96), p. 232.

2 *Œuvres*, vol. 19, p. 72.

3 关于1759年西线战事的精彩记录，可参见Franz A. J.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 (London, 2008), pp. 213–20, 256–64。

4 *Ibid.*, p. 261.

5 *Ibid.*, p. 262.

6 P.C., vol. 18, p. 137.

7 Koser, vol. 2, p. 214.

8 Christopher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n Military Power 1700–1800* (London, 1981), pp. 105–8. pp. 106–7有几幅高质量的地图，描绘这一地区和战斗本身。

9 Ibid., p. 111.

10 P.C., vol. 18, p. 481. Translation as in Christopher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London, 1985), p. 189, 不过我更喜欢把“patrie”翻译为“祖国”（fatherland），而不是“国家”（country）。

11 *Œuvres*, vol. 5, p. 21. Translation here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3, p. 31.

12 *Œuvres*, vol. 19, p. 88, 是一封从马德利茨寄出的信，日期为8月16日。

13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 237.

14 P.C., vol. 18, p. 487.

15 Carlyle, vol. 5, p. 480.

16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89.

17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249.

18 P.C., vol. 18, p. 510.

19 Ilya Berkovich, *Motivation in the Armies of Old Regime Europe* (unpublished Cambridge Ph.D. dissertation, 2012), p. 15.

20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p. 112.

21 关于那个秋季复杂的来往情况，最好的叙述参见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p. 241–7。

22 Ibid., p. 252.

23 Ibid., p. 253.

24 *Œuvres*, vol. 5, p. 50. Translation here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3, p. 71.

25 Koser, vol. 2, p. 233.

26 *Œuvres*, vol. 19, p. 133.

27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197.

28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 279.

29 Ibid., pp. 283–4.

30 Jürgen Luh, “‘Der fehlerlose Feldherr’ – Der Prinz und die Armee,” in Burkhardt Göres (ed.), *Prinz Heinrich von Preussen: ein Europäer in Rheinsberg* (Berlin, 2002), p. 83.

31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6, pp. 138–40.

32 对该会战的最好记载，可参见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201–6。

33 Koser, vol. 2, p. 265.

34 Antoine Henri, Baron de Jomini, *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Frédéric II, comparées au système moderne*, new edn (Brussels, 1842), p. 333.

35 Quoted in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206.

36 Carlyle, vol. 6, p. 79.

37 P.C., vol. 19, p. 605.

38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pp. 114–15.

39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283.

40 P.C., vol. 20, p. 5.

41 Ibid., p. 14.

42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6, pp. 173–4.

43 Ibid., p. 179.

44 P.C., vol. 20, p. 46.

45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217.

46 Daniel Hohrath, “Friedrich, die Armee und der Krieg,”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272–3.

47 *Œuvres*, vol. 19, p. 230. 引文来自伏尔泰的《塞米拉米斯》第一幕第一场。

48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1976), p. 179.

49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 305. 这一章中包含了对1760年西线战事的最好的记载。

50 Quoted in T. C. W. Blanning, “‘That horrid electorate’ or ‘Ma patrie germanique’? George III, Hanover and the *Fürstenbund* of 1785,”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 2 (1977), p. 338.

51 Carl William Eldon, *England's Subsidy Policy Towards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 p. 10.

n Years War (Philadelphia, 1938), p. 136. 英国的补贴总数达到2700万塔勒，或者说，约占弗里德里希军费总支出的20%。参见Thomas Biskup and Peter H. Wilson, “Gross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54。

52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220.

53 P.C., vol. 20, p. 602.

54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221. 另见pp. 376–7优秀的地图。

55 P.C., vol. 20, p. 630.

56 Carlyle, vol. 6, pp. 194–5.

57 10月3日写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P.C., vol. 21, p. 6。

58 Hintze, p. 375.

59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p. 225–6.

60 Richard Waddington, *La guerre de sept ans: histoire diplomatique et militaire*, vol. 5: Pondichéry. Villinghausen. Schweidnitz (Paris, 1914), pp. 60–61.

61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 353. 这一章，即第六章，包含对1761年西线战事的最完整记录。

62 P.C., vol. 21, pp. 165–6.

63 Ibid., pp. 189–90.

64 *Recueil des instructions données aux ambassadeurs et ministres de France depuis les traités de Westphali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01), vol. 16: Prusse, ed. Albert Waddington, p. 514. 彼得被Colin Jones描述为“一个疯狂迷恋弗里德里希的人”，参见*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V to Napoleon* (London, 2002), p. 244。

65 Agnieszka Pufelska, “Vom zufälligen Feind zum umworbenen Freund: Friedrich II. und Russland,”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24.

66 Simon 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2009), pp. 177–80.

67 Johannes Kunisch, *Das Mirakel des Hauses Brandenburg: 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Kabinetts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Zeitalter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Munich, 1978), p. 56.

68 Koser, vol. 2, pp. 303–5.

69 *Œuvres*, vol. 5, pp. 185–6. Translation here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3, pp. 268–9

- .
- 70 *Œuvres*, vol. 5, p. 183.
- 71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6, p. 253.
- 72 Ibid., ch. 12 *passim*. See also P. G. M.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ia 1740–1780* (Oxford, 1987), vol. 2, pp. 2–3, 37, 282.
- 73 Jones, *The Great Nation*, p. 241.
- 74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ia*, vol. 2, p. 186, n. 3.
- 75 *Œuvres*, vol. 19, p. 332.
- 76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240.
- 77 关于这次围城战的精彩记载，可参见Christopher Duffy, *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85), pp. 126–30, 包括帮助很大的地图。
- 78 Jomini, *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Frédéric II*, p. 401.
- 79 Walther Medi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Russland,” in Oswald Haus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seiner Zeit* (Cologne and Vienna, 1987), p. 119.
- 80 Chester V. Easum, *Prince Henry of Prussia: Brother of Frederick the Great* (Westport, CT, 1942), pp. 210–15; Michael Kaiser, “Prinz Heinrich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 der Oberbefehl in Sachsen und die Schlacht bei Freiberg,” in Göres (ed.), *Prinz Heinrich von Preussen*, pp. 99–100.
- 81 P.C., vol. 22, p. 303.
- 82 Ibid., p. 306.
- 83 Carlyle, vol. 6, p. 325.
- 84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6, p. 372.
- 85 Koser, vol. 2, p. 278.
- 86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p. 423. 1月1日，弗里德里希告诉海因里希亲王，所有的要点都事先商定好了，只有小的附属细则需要处理——P.C., vol. 22, p. 429。
- 87 *Correspondance entre le comte Johan Hartvig Ernst Bernstorff et le duc de Choiseul, 1758–1766* (Copenhagen, 1871), pp. 112–15.

88 P.C., vol. 22, p. 423.

89 Ibid., pp. 534–5. 他指的可能是伊索寓言中猫和老鼠的故事：曾经有一所房子，老鼠泛滥成灾。一只猫听说了，就对自己说：“这正是适合我的地方。”它就到那所房子里住下来，一只接一只地抓老鼠，然后吃掉它们。最后，老鼠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于是决定躲到自己的洞里，再也不出来。“这还真不好办了，”猫自言自语道，“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诡计哄他们出去。”它琢磨了一会儿，然后爬上墙，用后腿勾住木桩倒挂下来，假装已经死了。过了一会儿，一只老鼠向外窥探，看到了挂在那里的猫。“啊哈！”老鼠大叫，“夫人，你还真聪明，不过，就算你假装成一袋粮食挂在那里，你也骗不了我们，休想让我们接近你。”

90 *Œuvres*, vol. 19, p. 425.

第10章

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为何获胜

在《胡贝图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弗里德里希没有以胜利者自居，但欧洲的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他有权利这样做。正如1772年法国外交部在派遣一名新的公使去普鲁士的时候承认的那样，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胡贝图斯堡条约》已经成为“荣耀”。对很多国家来说，七年战争有着诸多不同的意义。¹对于普鲁士而言，它是“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为争夺大国地位进行的生存斗争。兰克归纳得很好：

如果可以如此定义大国，即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大国相抗衡，即使它们联合起来，那么弗里德里希就将普鲁士提升到了这种位置。这是在萨克森王朝和狮子亨利〔1129—1195〕的时代之后，在德意志北部首次出现的自给自足的大国，不需要联盟，只依赖于自己。²

此外，这场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也是最后的西里西亚战争。因为奥地利尽管有着法国、俄国、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持，还是未能夺回该省份，在未来也看不到任何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考尼茨的“将勃兰登堡王室降级到它原来所在的二流国家水平”的目标不得不放弃。

³早在战争结束之前的1762年3月，玛丽娅·特蕾莎就曾告诉她的驻法大使施塔尔亨贝格亲王，重夺该省“是个空想，不可能实现”。⁴那时候，她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是得到格拉茨伯爵领地及其要塞，事实证明即使这个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对1756—1762年七年战事的记载已经表明了导致战争结果的部分原因，现在是时候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了。首先涉及的是萨克森。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的先发制人看起来非常像一场失败的赌博。当地的抵抗比预期中坚持的时间更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作战季节结束之前对主要的敌人发动一次致命的打击。此外，它触发了此前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一直仅为防御性质的联盟，迫使前者来援助后者。但它真的像经常被断言的那样“疯狂”吗？⁵很明显，无论如何法国人都会加入以普鲁士为敌的进攻性战争。更为明显的是，俄国人已经决定进攻，只是奥地利坚称有必要延迟进攻，这才阻止了他们在1756年行动。

还有3个理由支持弗里德里希的决定。第一个是战略层面的。对于奥地利人而言，入侵勃兰登堡的路线显然是沿易北河穿过萨克森而下。因为柏林是不设防的，从萨克森边境行军至多两三天便可到达，所以普鲁士占领萨克森选帝侯国提供了急需的缓冲区域。⁶由于萨克森的强烈敌意，弗里德里希更加需要先下手为强。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因为以下3点与哈布斯堡王室联系紧密：婚姻（他娶了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女儿）、宗教因素（他皈依了天主教，并展现了新皈依者的全部热情），还有因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被背叛和利用而生的愤恨。贪婪促使他加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一方，企图在1740年分割玛丽娅·特蕾莎继承的遗产，但在1744年他回到奥地利的阵营，即使没有更明智，至少也学到了教训。⁷指引他并让他保持这一立场的是其首席大臣海因里希·冯·布吕尔伯爵，他对弗里德里希有着强烈的个人仇恨，弗里德里希也发自内心地同样仇恨他。⁸在1756年，看起来弗里德里希会不可避免地被击垮，萨克森人希望能够分得的战利品是一条贯穿西里西亚、连接萨克森与波兰的陆地桥梁。⁹弗里德里希则对自己的邻居只有极

大的蔑视，称奥古斯特“这位继承者从其前辈诸王处继承到的只是骄傲”，还把他的国家比作“没有罗盘的船，风浪的猎物”。¹⁰

其次，立即占领萨克森获得了巨大的后勤好处，让普鲁士垄断了几乎整条易北河的通航，这是必然的结果。在这里至关重要是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上的马格德堡大要塞，它正好在萨克森边境以北，弗里德里希的前任们将它建成了王国里最庞大最坚固的要塞。¹¹ 它不但控制着易北河的渡口，也是下萨克森平原的门户，还能控制汉诺威和梅克伦堡以及萨克森。¹² 在于尔根·卢看来，这座要塞在七年战争中被证明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而克里斯托弗·达菲写道，没有它，普鲁士几乎肯定会失败。¹³ 从马格德堡沿易北河而上运送的食物、饲料和弹药，让普鲁士军队在交战区维持下去。如果河流上游在奥地利人手中的话，这一巨大资产就会成为同样严重的不利条件。

最后，最重要的是，夺取萨克森为普鲁士的征粮官们打开了欧洲中部最富有的省份。在接下来的六年半时间中，它被榨干以维持弗里德里希的战争大业。当然了，战争期间每个国家都是这么对待所占领的领土的。令弗里德里希对待萨克森之手腕与众不同的，是其强度、持续时间和成就。这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早在入侵行动启动之前，详细的指令就已经发给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博尔克，他是来自总执行局的官员，监督方案的实施。他被授权掌控被征服地区的每一个公共收入来源，同时安抚萨克森纳税人，向他们表明普鲁士没有毁灭他们的意图。事实上，根据承诺，他们将比在前一个政权统治下缴纳的税额少，因为总额为500万塔勒的统一税将取代过去多如牛毛的杂税，这些杂税估算起来数额明显高于现在的总额。征收粮食或饲料的时候会发给收据，并在评定税额的时候纳入考虑。¹⁴ 博尔克和他由普鲁士人组成的小团队征召当地的萨克森官员进入他们的机构，干劲十足地开始工作，虽然在他们那严格的国王陛下看来，他们的效率总是还不够高。据估计，弗里德里希在战争期间的总花销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萨克森人被迫奉献出来的，换句话说，萨克森是收入的最大来源。此外，这项收入明显比法国或俄国设法

从普鲁士西部（克莱沃、马克等地）或东部（东普鲁士）领土上分别榨取的都多很多。通过让经验丰富的官僚负责征税，弗里德里希让回报最大化了。¹⁵不用说，他对自己的新臣民们所许的不造成破坏的承诺在战争期间是无法兑现的。他自己的一句名言是：萨克森就像一个面粉袋，不管怎么频繁地摔打，总能掉出面粉来。¹⁶因为海因里希亲王过于体谅当地人民，征用事务被重新分配给3名平民专家，结果亲王抱怨说3个小人被授权去抢劫掠夺。¹⁷

通过占领萨克森控制了易北河，这一做法与通过占领西里西亚来控制奥得河的策略十分相似。正如1756年8月的先发制人占领了萨克森的要塞那样，1740年12月的先发制人令西里西亚的要塞落入弗里德里希之手。事实上，彼得一米夏埃尔·哈恩的主张很有说服力：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军事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他很早就征服了西里西亚。¹⁸因此当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强势地位了。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严重的结构问题给他们造成了障碍。不管是波希米亚还是摩拉维亚都不像西里西亚或萨克森那样肥沃，同时它们也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从位于柯尼希格雷茨的主基地进入波希米亚山区的路线相对简单，但从另一侧穿过狭窄的峡谷走下去的道路则很成问题，在冬天常常是不可能办到的。¹⁹一旦任何奥地利军队到达西里西亚平原，它就要面对普鲁士人的要塞，其中最难以对付的是尼斯、格拉茨和施韦德尼茨。这就是为什么1757年格拉茨陷落、1760年再次陷落以及1761年施韦德尼茨陷落被弗里德里希视为非常严重的打击——夺回它们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这也解释了他在和平谈判的时候为何如此地固执于一定要拿回格拉茨。正是这些要塞而非那些会战使得普鲁士牢牢掌握着西里西亚。²⁰其他重要的要塞有波罗的海沿岸的科尔贝格、柏林以东奥得河上的屈斯特林、奥得河口的斯德丁和易北河上的马格德堡。²¹按照弗里德里希的说法，它们组成了一个“强力钉子”的网络，将各省连接在一起，使得他能够利用自己的中心位置，在“内线”作战。²²这一概念，备受军事史学家追捧，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位于中央位置

的防御者在数个敌人汇集的时候享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敌人的补给线和通讯线在延长，同时他自己的在缩短。弗里德里希在战争中数次展示过这一点，最引人注目的是1757年的罗斯巴赫会战以及紧随其后的洛伊滕会战。因此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待要塞的态度竟然如此漫不经心。卡莱尔说得很好：“没有什么比弗里德里希对其卫戍部队之状态的习惯性疏忽更令我吃惊的了。他有最优秀的指挥官，也有最糟糕的指挥官：布雷斯劳的陶恩齐恩、科尔贝格的海德，在世界上无人能及；格拉茨的那位迪欧、施韦德尼茨的一位察斯特罗，让他付出高昂代价。”²³

弗里德里希享有的另一个明显但重要的有利条件是统一指挥。²⁴他既是国家的专制首脑又是军队的统帅，他集所有的权威于一身。他实际的存在意味着，不仅他自己的命令是立即执行的，那些由下属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命令也是立即执行的。²⁵因此，他的行动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比对手快太多了。他非常清楚这一事实，赞扬了同样有此优势的前辈的功绩——比如瑞典国王查理十二，“那位北方的亚历山大，如果他有同样的运气，会在所有方面与那位马其顿的征服者相似”。²⁶弗里德里希根本不需要跟大臣们商议或是向议会要钱！对他来说，决定、命令和执行之间的差距仅仅会因为他的代理人的缺点而拖延（尽管他们缺点很多）。在凡尔赛、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情况是多么地不同啊。即使是如玛丽娅·特蕾莎这般强大睿智的统治者，也发现自己艰辛劳碌，不得不与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他毕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她的儿子约瑟夫、她的首相考尼茨以及所有列席她政务会议的其他显贵们一起商议。²⁷

在另外两个盟友的宫廷里，软弱统治者和强势派系的错误结合使得决策很不连贯。路易十五是那么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又行事隐秘，以至于他设立了一种私人的、秘密的外交机关，“国王的机密局”，它往往与官方机构相互掣肘。²⁸因此，一位法国公使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困境之中：他会收到两份指令，都由他的国王陛下签署，但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在德意志作战的法国高级将领们——德·布罗伊公爵、德·孔塔德侯

爵、德·苏比斯亲王——在操纵彼此上花的时间似乎跟与费迪南德亲王作战的时间一样多。²⁹ 伊丽莎白沙皇虽然精力更为充沛，但经常因疾病而无法行动，还容易受到宫廷阴谋的影响。结果在俄国人参战的5年中，每年的总司令都不一样。³⁰ 其中最后一个，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布图尔林伯爵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曾经是沙皇的情人，此人清晰生动地集中体现了俄国军队的不佳表现。他不仅看不懂地图，还没有战场经验。³¹

统一指挥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滕佩尔霍夫，在整个战争中都在普鲁士军队服役，首先担任炮手，后来成为军官，他写了一本六卷本的战争史，他坚定地说道：“军队由最高统治者指挥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即使最伟大的将军也不能，并且不可以冒国王率领军队时所能冒的风险。”³² 道恩元帅沮丧地承认了这一点，他比大多数人有更好的理由去抱怨指挥不统一引起的阻碍。³³ 他的主要目标是保卫哈布斯堡君主国，这意味着首要任务是保持军队完好无损，正如他写的那样，“军队很快就可以被毁掉，但不能那么快地再聚起来，没有武装力量，君主国就失去了支撑手段”。³⁴ 七年战争的热心学生拿破仑赞同这一说法。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在观察到大革命时期反法同盟的不统一之后，他领会到“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不能站立”的道理。^① 回首自己的军旅生涯时，他宣称：“统一指挥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事情。”³⁵ 然而，事实上，说这些话的时候，拿破仑正在圣赫勒拿岛的流放生活中备受煎熬，他应该停下来，进一步反思一下。统一指挥让他赢得了奥斯特里茨大捷，但这也让他1808年在西班牙、1812年在俄国、1813年在萨克森、1815年在比利时执行了错误的战略。同样，统一指挥成就了弗里德里希的霍亨弗里德堡会战、罗斯巴赫会战、洛伊滕会战和托尔高会战，但也导致了科林、霍赫基尔希、库讷斯多夫和马克森的失败。事实证明，统一指挥是一把双刃剑。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可以把机会转变成胜利。但它也能够把挫折上升为一场灾难。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这是加倍的危险，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是一个上了瘾

的冒险家，一个喜欢大喊“孤注一掷！”的赌徒。在1760年夏天的黑暗日子里，他在给达尔让斯侯爵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事务正在经历可怕的转折，不论我喜欢与否，我现在必须开始一项大冒险，要么加倍赢钱，要么输得精光。”³⁶

继续运用弗里德里希的比喻，可以说，他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打出的牌是继承而来的，就像他直率承认的那样。在第三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在王座上坐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必须承认他打出的是他自己抽的牌。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更确切地说，他得到父亲和德绍老头儿遗赠的“行走的炮台”，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大大扩大了它的规模。内政管理也一样，他模仿并增强了他父亲那种对事务的亲自关注。演习，演习，更多的演习；训练，训练，更多的训练；操练，操练，更多的操练——这就是各级普鲁士士兵的命运。尤其注重的是装弹演习——一项每日例行仪式——结果普鲁士火枪手开枪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2次以上，这意味着一个营可以每分钟射击12次，是欧洲最快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快了不少。³⁷ 奥地利将军奈佩格感叹道，在同样的时间里，自己的士兵还没完成2次射击，普鲁士步兵就能完成5次了。³⁸ 弗里德里希在七年战争中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在这一点上的想法，尽管有很多证据证明冷兵器非常重要。在他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强调战斗是因为火力优势而取胜的，因此填装弹药速度最快的步兵将占据上风，所以每天练习是必要的。³⁹

为了执行这一铁的管理制度，弗里德里希挑剔的眼睛永远不会远离。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或在哪里会突然出现。当他出现时，他会亲力亲为。例如，在演习中冲锋时，他会和骑兵一起骑马，他要确保他的命令被遵守了。⁴⁰ 甚至连柏林军事学院的学员也可能发现他出现在考试的时候，以确保考试的严谨并问出自己的问题。⁴¹ 在和平时期，军队每年2月开始同时在勃兰登堡、马格德堡和波美拉尼亚举行演习，随后5月在柏林和波茨坦、6月在马格德堡、7月在波美拉尼亚的施塔加德、8月或9月在西里西亚举行大阅兵。⁴² 在真正的战争

期间，弗里德里希个人对军队的关注颇负盛名。战争期间曾在普鲁士军队中效力的约翰·威廉·冯·阿兴霍尔茨记载道：

国王自己树立了一个无时无刻不保持警惕的榜样。人们从未能远离他，无论在最荒凉的地方还是最危险的地方，在星光灿烂的夜晚还是最可怕的雷雨天气中，都会有他的身影。他成功地让高级和低级军官们都畏惧他胜过畏惧敌人的子弹，以至于只是他有可能来访问就足以令人加倍警惕。他经常视察，却不透露他的行踪。⁴³

弗里德里希在3个领域里改善了他继承到的遗产。我们已经看到，他一开始就改善了常规骑兵中的胸甲骑兵和龙骑兵。随后，他以增加骠骑兵的方式，大大增加了轻骑兵部队的数量和重要性，骠骑兵的数量在1740年仅有大约1000人。他要求模仿奥地利军队中克罗地亚人的致命威力。在数量上面，反响肯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统治末期，军队总人数的9%左右是骠骑兵——但质量上与其他兵种相比要逊色很多。这些轻装部队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松弛的纪律没有与普鲁士精神保持一致。所以新队伍很快被加强了管理，变得几乎与常规骑兵没有什么区别。⁴⁴然而1756年以后，弗里德里希却允许组建所谓的“自由营”，这些是由准罪犯聚集起来的类似帮派的团伙，他们能从后方破坏敌人的防线，但也因抢劫和其他罪行而臭名昭著。⁴⁵1778年，一位英国观察家纳撒尼尔·拉克索尔在维也纳写道：

玛丽娅·特蕾莎能带上战场的非正规部队是她胜过对手的一大优势。这些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凶猛散漫，几乎不受任何军法限制，由于他们独特的宗教、风俗、教育方面的偏见和偏好，他们效力于奥地利王室。弗里德里希没有一支类似的同

样忠诚可靠的队伍来与他们抗衡。克罗地亚人很少或从不临阵脱逃。⁴⁶

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弗里德里希对炮兵的改进。在这个兵种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已经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很长的一段路，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冲刺追赶。铸造工艺的改造、炮管和炮架重量的减轻、机动性的增强以及口径和零部件的标准化使得战场上部署大炮的数量大量增加。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方吹嘘拥有的大炮至多不过几十门而已，而1709年奥地利和英国联军在马尔普拉凯排列出100多门炮来对阵法国人的60门炮。⁴⁷ 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弗里德里希抱怨说，他继承的野战炮兵营只有一个，他立即增加了一个炮兵营。⁴⁸ 然而，这一早期的倡议并没有贯彻到底。1744年宣布的扩充计划在和平之后并没有实现，其结果是到1756年，普鲁士军队的炮兵规模跟10年前一样。⁴⁹ 而且，火炮的质量很差。柏林和布雷斯劳的武器制造商尚未开发出在实心上钻孔（而不是铸造一个核心）的现代技术。现在，弗里德里希发现自己面临着艰巨的学习任务，因为在一场又一场战斗中，造成最大伤亡的是大炮而不是火枪。⁵⁰ 但他确实学到了。在七年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拥有662门可供使用的大炮，这还不包括重型攻城炮。此外，他还证明了自己是一位革新者，他创立了一支骑乘炮兵小队，包括6门6磅火炮，每门炮由4匹马牵引，由3名军士和42个炮手操纵。它们在库讷斯多夫遭受损失，被及时替换，在马克森再次受损，然后再次被替换。从1759年6月起，海因里希亲王有了自己的类似队伍，而且没有损失过。这种超机动火炮的效果在其被模仿后得到了广泛宣传，首先是奥地利人（当时炮兵发展事业的领袖），然后是其他欧洲军队。⁵¹ 弗里德里希此时坚定地相信炮兵制胜的潜力，正如他在1771年所写的关于“要塞与战术”的论文中告诉他的将军们那样。⁵² 实际上，他认为炮兵如此重要，以至于将炮手们的培训中心搬到了柏林，以便他能密切关注。⁵³

归根到底，战争的成败取决于步兵。从七年战争的记录来看，普鲁

士人绝不是无敌的。在16次主要会战中，他们输了8次。⁵⁴然而，他们通常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往往是严重劣势，但在1762年战事结束时，他们仍然坚持着，而他们的敌人已经放弃了。1757年和1759年浴血奋战中遭受的可怕伤亡，意味着那些1756年8月走上战场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老兵，在第五个作战季节开始的时候，很多（若非大多数）已经被杀或是因伤残退役了。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趁着冬季补足折损的兵力越来越难了，因此每个作战季节开始的时候，参战人数都比上一年要少。由于从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区招募军士的很多渠道都被敌军切断，本国的征兵区不得不承受更大压力。应召入伍的新兵年纪越来越小，训练也越来越差。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起不上作用。1758年6月的多姆施塔德会战表明，新兵也可以表现得很出色，即使在失败之时也是如此。⁵⁵另一方面，事实证明，在战争中强行征用战俘之类的权宜之计会弄巧成拙，因为他们是出了名地不可靠，一有机会就开小差或是投降。到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仍然留在普鲁士部队的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⁵⁶在战争结束后弗里德里希很感激地写道，“这些征兵区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精华”。⁵⁷正是他持续征召军队的能力，帮他渡过了难关。⁵⁸

“盲瞽国度，独眼为王。”伊拉斯谟如是说。没有比军事史这一界限模糊的领域更适用这句话了，在这个领域，每一个概括都是有条件的，每一个优势都会被一个劣势抵消。普鲁士步兵抢掠、脱逃、欺瞒、逃跑，甚至有时不服从命令，但关于其相对优势，同时代留下了太多不容忽视的证据。乌尔里希·布雷克尔是一个被哄骗加入普鲁士军队的瑞士人，他对普军绝没有什么好感，他记载道，当他和战友们在1756年10月的罗布西茨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和勃兰登堡人像复仇女神一样攻击奥地利人。我自己的情绪是如此激烈和兴奋，以至于我既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恐惧，只是把所有的弹药连续发射了出去，直到我的火枪变得炙热，我只好用皮带绑着它；虽然我不认为我打中了一个活人，我所有的射击都是乱打的”。⁵⁹亨利·劳埃德少将曾在

奥地利军队中服役，拥有七年战争的亲身经验，他说普鲁士军队是“一架巨大又有规则的机器……他们操纵部队的能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军队……他们的胜利必须首先归功于此，因为其富有才华的领导人没有这点就什么也做不成，有了这点就几乎什么都可以做成”。⁶⁰

普鲁士普通士兵为人熟知的形象是残酷纪律训练出来的盲目机器人，会毫不退缩地走进鬼门关。弗里德里希自己对此有责任，他发布了著名（且经常被反复提及）的指令：士兵们应该被教会害怕他们的军官甚于敌人。⁶¹他在1748年的《战争原理》中用第一章整整一章来论述擅离职守的问题，并确定了14种可以减少这一问题的方法，这些论述表明了他的军队本质上是强制性的。⁶²甚至连赞同弗里德里希观点的观察者，如法国的吉贝尔将军也认为，军队中的非普鲁士人——他认为其人数占普通士兵的50%——如果没有被逃兵近乎肯定会被抓获的命运和随之而来的可怕惩罚阻止的话，会立即脱逃的。⁶³行进中的弗里德里希军队是“一座移动的监狱”。⁶⁴

然而，最近这一残忍图像已经被修正了很多。军队中的生活已被证明不是只有恐怖、匮乏和暴力。也有证据表明，对弗里德里希和普鲁士的忠诚乃至奉献更为普遍。这些证据很多都是轶事，所以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不是所有证据都这样。当奥地利人试图从施蒂里亚军营中囚禁的1.1万名战俘里招募士兵的时候，战俘们只有微弱的反应，所有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都没有应声，尽管他们处于囚禁状态下。⁶⁵众所周知，普鲁士士兵的待遇要比敌人更好，这多亏了他们能在内线作战，且他们的后勤供应相对有效率。冯·巴泽维施少尉参加过整场战争，也参加过罗斯巴赫会战、洛伊滕会战和托尔高会战，他声称：

我们从来不缺面包，而且我们的肉经常吃不完。确实，咖啡、糖和啤酒往往是得不到的，即使出高价也得不到，而在摩拉维亚，我们有时会把葡萄酒喝光。但在波希米亚我们有很多

当地的葡萄酒，特别是1757年在梅尔尼克军营的时候。你知道战时的样子：如果你想很舒服，你应该留在家里。⁶⁶

约翰·威廉·冯·阿兴霍尔茨也参加了战争，他赞同道：“普鲁士军队从来不欠工资，从来不缺面包或饲料，很少缺蔬菜，缺肉甚至更少见。”⁶⁷ 每周每个士兵发放半磅肉的传闻吸引了许多饥饿的逃兵从联军军队跑去普鲁士的军营。⁶⁸

有多少人走了另一条路？一定也有数千人逃离的事件，1744年的摩拉维亚撤退是最臭名昭著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也并没有导致军队的永久解散。例如，在庫讷斯多夫会战结束后的两天内，大多数幸存者就回到了军旗下面，并改组成纪律严明的部队，准备新一天的战斗。⁶⁹ 最近的研究表明，普鲁士纪律之严酷被夸大了，激励士兵们的除了畏惧，还有荣誉、团队精神、敬业精神、新教信仰和爱国主义。⁷⁰

普鲁士普通士兵较高的相对素质在军队更高层的成员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弗里德里希所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他的士官的数量和质量，这点虽然不太可能去证实，但至少很有可能。每个连队有14个士官，是奥地利军队的2倍多，他们主要是自由农家庭有文化修养的儿子。他们受到获得授衔、成为军官之前景的鼓舞，如果他们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话，甚至还可能获得贵族地位。⁷¹ 那个时代的一位传奇人物是50岁的掷弹兵大卫·克劳埃尔，1744年8月12日他第一个爬上布拉格齐斯卡贝格防御工事的城墙，立即被授予军衔并被册封为贵族“克劳埃尔·冯·齐斯卡贝格”。⁷² 贵族也加入了这些平民之列，他们一开始都必须从少尉做起，履行的职责和居住的营地都与其他军士一样，拿的是中士的工资。⁷³ 七年战争后一份英文匿名报告陈述道，“军队的活力体现在中尉和士官中，他们无疑是世上最棒的”。⁷⁴

同一份报告接着评论道，“似乎随着军衔的上升，这种活力在下降

；在除了单纯的执行，还需要其他资质的时候，这种活力也会下降”。这一断言似乎不是那么合理。在弗里德里希的许多战役中，正如他自己沮丧地承认的那样，下属们采取的措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⁷⁵大多数军官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大多数出身于背景相近的贵族家庭，除了那些从行伍之中晋升的军官，他们接受过相同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和其他军队中的军官相比，他们的凝聚力要强很多。⁷⁶弗里德里希深信“部队的英勇仅仅在于军官的英勇”，⁷⁷他恩威并施地让他的军官们时刻保持着警觉。在年度检阅中，任何被视为能力不足、身体不佳或是年纪太大的军官都会被淘汰，送到警备团去，然后用最好的少尉来接替他们。⁷⁸此外，不论他们的级别或地位如何，他们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跟他们的团队一起服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正是这种要求给法国观察者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在他们所习惯的世界里，许多军官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凡尔赛或是自家的庄园中度过。⁷⁹无论背景多么令人敬畏或是军衔多高，普鲁士军官都要与他手下的人患难与共。1753年7月，伦道夫伯爵拜访了弗里德里希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他和他的骑兵团驻扎在新鲁平西边的屈里茨。伦道夫在日记里记录道：

这个镇子是糟糕的，它实在是一个悲惨的垃圾场，亲王居住的房子也是如此。看到他住在一个家具只有一张木制桌子和三把椅子的房间里真的很滑稽。房间里并没有窗帘！他在柏林的厨房小厮住得都比他更好。但亲王致力于训练他的团队，并且非常满意。他对他的军官很好，因此他们格外爱戴他。这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区别之处：我们的亲王自己也是士兵，必须忍受与普通士兵同样的苦难。⁸⁰

这个榜样正是高位者树立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无忧宫或是在波茨坦城市宫，弗里德里希肯定是自我放纵的。但一旦他投入到战争中，甚至只是参加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比拿破仑更早地特意给所有级别的军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他们的一员，他们在一起经历危险、困苦和胜利。这意味着，跟他们一起骑马，用方言交谈，在他们围坐在篝火旁时前来探望，因他们的笑话大笑（不管多粗鲁），睡在营地中心的帐篷下面，记住他们的名字等等。⁸¹ 虽然可以认为他跟他们的教会游行保持着距离，但他允许虔诚的下属组织祈祷会，允许部队唱路德宗的赞美诗。⁸² 据普鲁士士兵约翰·弗里德里希·德赖尔所言，他和他的战友们唱着“主是坚固的堡垒”投入了战斗，如果活下来就唱“都来感谢恩主”。⁸³ 在洛伊滕会战之前，弗里德里希甚至自己也参加进去，唱起了歌：

不要胆怯，哦，幼小的人们，
虽然你的敌人意在
让你完全心烦，
让你走向堕落，对此
你会极为苦恼、极为困惑：
但这将不会持续太久。⁸⁴

克里斯蒂安·塔格是一位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牧师，在措恩多夫会战之后记下了普鲁士军队伴着鼓声变换成斜线阵形的“可怕骇人的时刻”。在他们前进的时候，首先听到了一声横笛的声音，然后1000个声音吼着路德的赞美诗“主啊，我在你的权能之下”。⁸⁵ 普鲁士士兵以唱歌而闻名。诗人军官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1758年给他的朋友约翰·威廉·路德维希·格莱姆写信说，在行军的时候他们喜欢先唱赞美诗，然后唱赞美弗里德里希的歌。⁸⁶ 显然军事领袖和他手下士兵之间这种密切关系的影响是无法量化的，但它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有人把这种关系比作苏格兰高地族长与他宗族之间的关系。法国军官德·图龙若侯爵在弗里德里

希统治末期访问普鲁士，认为“普鲁士军事力量之大厦的根基是国王和他的将军们所树立的榜样”。⁸⁷ 奥地利骑兵雅各布·德·康戈纳佐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国王对待他的普通士兵怀着一定程度的同伴之谊，这在我们的军队中连一个贵族上尉都不会表现出来，更别提趾高气扬的将军了。所以，普军士兵知道自己没有委屈、没有饥饿、没有寒冷、没有连续值班、没有日常负担，总之，他们在战争中任何危险或困苦——无论多大——都不会跟他们的“弗里茨大王”一起承担，他们怀着孩子般的尊敬和热爱这样称呼他。⁸⁸

当然，还有大量的轶事在流传，宣扬了这一点。例如，伦道夫伯爵在1759年11月的日记中记录道，当弗里德里希在从西里西亚到萨克森的路上病倒以后，他被放置在一个由30个人抬着的担架上，以免受马车颠簸之苦。当轮到第一队被替换下去的时候，他们拒绝让路，并坚持抬着他们的国王走完全程。“军队向他表示的尊敬就是这样的”，伦道夫宣称。⁸⁹

简而言之，尽管他性格势利且藐视人性，弗里德里希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了有必要培养与军队的亲密关系。虽然通过惩罚来强化的恐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他也知道如何奖励。就像丹尼尔·克劳埃尔·冯·齐斯卡贝格那样，在战场上有着明显的勇猛表现，会立即受到赏识。晋升、公开或是书面表达的赞赏，“功勋勋章”（后来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蓝马克斯勋章”）和直接的现金奖励都在使用。例如，在利格尼茨大捷之后，每个团都因缴获的大炮收到137塔勒，因缴获的军旗和旗帜收到50塔勒。⁹⁰ 弗里德里希领导才华的许多方面都引起了德·吉贝尔伯爵的赞赏，这方面是其中之一。他注意到，在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之后，弗里德里希亲手书写了一份奖状感谢拜罗伊特龙骑兵团，其中提到了每一个军官

的名字。⁹¹“功勋勋章”不只发给上战场的人。例如，它也被授予冯·弗赖塔格中尉，他发明了漏斗状的火药洞，使得给火枪填充弹药更加容易。⁹²

当然了，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对怯懦或无能同样即时的惩罚。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弗里德里希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他在1757年被用下面的话残忍地羞辱：“你将永远只是个可怜的将军。如果你愿意的话去统领那些后宫侍女吧；但我永远不会再委托你去指挥10个人。”⁹³再往下一级，最臭名昭著的集体耻辱，是1760年7月安哈尔特-贝恩堡团在德累斯顿城外受到奥地利人攻击时溃逃所招致的。下个月在利格尼茨他们实现了救赎，同一批士兵喊着“要么荣誉要么死亡！”用刺刀发动了一次毁灭性的反击，“是军事史上少有的步兵进攻骑兵的战例之一”。⁹⁴战斗结束后，弗里德里希骑马走过该团的幸存者：

军官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地期待着国王会给他们公正的裁决。但4个老士兵冲到他的马镫下，抱住他的膝盖，恳求他恢复对他们的喜爱，承认他们这一天是多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弗里德里希被感动了。他回答道：“好的，小伙子们，一切都会还给你们的。忘记所有吧！”⁹⁵

事情在奥地利军队中则是完全不同的，那里在战争时期并没有军事法庭。⁹⁶

弗里德里希在七年战争中的成功是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还有一项因素需要提及。它既能囊括又超越了已经提到的观点。这便是超凡魅力（卡里斯玛），虽然它很难确定但依旧很重要。马克斯·韦伯对它的著名定义是：

个人的某种品质，而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作不同寻

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或素质。这些力量和素质为普通人不可企及，而被认为出自神圣来源或者被当作楷模，在此基础上，有关的个人则被视为领袖。⁹⁷

在提出这一概念时，韦伯想的是基督和圣女贞德这样的宗教领袖，而在政治领域——相当令人惊讶的是——他将格莱斯顿先生视为典范，但是弗里德里希肯定也很合适。这是特奥多尔·席德尔的一大主题，他指出，玛丽娅·特蕾莎和她的对手一样受欢迎，她在仁慈和正直方面远远超越弗里德里希，但她缺乏“他那种受到内心恶魔驱动的人格上的超凡魅力”。⁹⁸他也注意到了1757年12月3日洛伊滕会战前夕，弗里德里希在帕西维茨对其将军和参谋军官们所做的著名演说。它简明扼要，激情洋溢，富有启发性。他一开始强调了他们所处的绝望困境：施韦德尼茨和布雷斯劳都已经陷落；他们的补给被缴获了；贝沃恩公爵被击败并且被俘；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已经落入奥地利之手。他宣称，如果没有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以及他们所指挥的人的坚定不移、勇气与爱国心可以依靠的话，他会绝望的。时钟已经敲响，正是现在：要么成功，要么死亡！

我决定违背一切战争的规律，向查理亲王的部队进攻，无论我在哪里找到他，尽管他的兵力差不多是我们的3倍。现在，问题就变成了有多少敌人，他们所占据位置的优势如何；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我部队的热情，和我命令的精确执行克服。我必须冒险采取行动，否则一切都完了。我们必须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全体死在他们的炮火之下。这是我所想的，这也是我将要做的。把我的决定传达给你们所有的军官，让士兵们为必然随之而来的行动做好准备，还要告诉他们，我指望他们无条件服从。记住你们是普鲁士人，你们将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一荣

誉；但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害怕与我共同经历危险，那就让他走吧，他不会受到我的丝毫责备。⁹⁹

但他最后还是挥舞了大棒：如果一个骑兵团在命令下达后未能冲锋，他们就会被赶下马去，送到卫戍部队；任何退缩的步兵队伍，即使只是踌躇不定，都会失去军刀、旗帜和团队徽章（德累斯顿之战后安哈尔特—贝恩堡团所遭受的耻辱就是这样的）。

超凡魅力型的权威或合法性既非常有力又非常脆弱，因为它依赖于个人的表现。如果奇迹不再发生，预言未能实现或是胜利停止脚步，它就会很快崩溃。拿破仑和希特勒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尽管即使是他们这些最终失败的人，直到最后也都成功地保留了一定的支持（甚至在失败之后还仍然保留着）。但弗里德里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失败并没有削弱他的魅力，反而起到相反效果。如果他死在措恩多夫，或者在库讷斯多夫会战之后他的国家全面崩溃并被肢解，那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正是因为他坚持要面对显然是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偶尔的失败可以被不断增长的神话所吸收。例如，屈斯特牧师是霍赫基尔希惨败的目击者，他写下了有关这场失利的生动记录。然而这场惨败只是增强了他对国王的崇拜，因为——他反问道——什么时候一场失败的战斗能有这么美好的结果？奥地利人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尼斯和科瑟尔得以解围；瑞典人离开了波美拉尼亚；俄国人回家了；在当年年底，奥地利人撤离了西里西亚和萨克森。¹⁰⁰

这自然让人考虑到以下这点，它可能是弗里德里希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盟国未能协调好他们的战争投入。大陆上的5个盟国各有不同的战争目标。4个国家寻求领土扩张，或是用来保有，或是用来交换：奥地利要西里西亚，法国要比利时和汉诺威，俄国要东普鲁士，瑞典要普属波美拉尼亚，而神圣罗马帝国试图维护弗里德里希入侵萨克森所违反的帝国宪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5个国家中只有最后提到名字且最弱

的一个达到了它的目标，尽管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军事成就。如果弗里德里希被迅速又彻底地击溃，所有的一切都很可能会成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多的裂痕就开始显现。正如后来的普鲁士改革家沙恩霍斯特明智地观察到的那样，每一个联盟内部都携带着秘密背叛的萌芽。

¹⁰¹ 一只危险的蠕虫从一开始就处于萌芽状态了。战争开始时发生了两起外交革命——不仅出现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联盟，而且出现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盟，后者达成的标志是1757年1月11日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法国的传统政策一直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东方屏障”以反对俄国任何形式的扩张行为。¹⁰² 瑞典是一个突出的争论焦点，法国人支持的一派被称为“礼帽派”，而俄国人支持的一派被称为“便帽派”。

奥地利也对俄国的扩张有保留意见。1760年底，考尼茨告诉玛丽娅·特蕾莎，不能允许俄国向西扩张，以免对哈布斯堡君主国造成比普鲁士更大的威胁。¹⁰³ 此外，俄国人的军事行动太分散。这部分是由于距离上的问题。路途如此遥远，赶去前线的增援部队在途中多有折损。1759年出发的一支20 799人的部队中，有5539人（所占比例为26%）生病或死亡，849人脱逃。¹⁰⁴ 虽然这一点在战争过程中有所改进，但俄国的巨大潜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¹⁰⁵ 还有一部分问题在于政治。圣彼得堡总是有一个强大的团体，其成员没有像沙皇那样，对弗里德里希怀有个人反感。他们非常合理地提出，在任何与弗里德里希的联盟中，俄国将永远是占主导地位的合作伙伴，能够让他去对抗奥地利。¹⁰⁶

同样的缺陷削弱了法国—奥地利同盟。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的方向转变如此剧烈，逆转了法国对哈布斯堡王室两个半世纪的敌视立场，反对的声音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一政策与国王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密切相关，这自然引起了凡尔赛派系斗争的全部恶意。她派去商谈外交革命的大臣贝尼斯神父于1758年4月感叹道：“我们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动地反对战争。对普鲁士国王的喜爱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那些把自己事务经营得很成功的人总是受欢迎的。维也纳宫廷遭人嫌弃，因

为它被看作我们国家的吸血鬼。”¹⁰⁷ 正如俄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伊丽莎白沙皇对弗里德里希的强烈憎恶而扭曲，法国的国家利益也因为路易十五对玛丽娅·特蕾莎的强烈喜爱而扭曲。¹⁰⁸ 几乎每个人——除了国王、他的情妇和他们所选择的大臣这些重要例外——都能看出需要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平衡奥地利。路易十六的外交大臣德·韦尔热纳伯爵问道，如果七年战争中的“巨大努力”获得成功且普鲁士被消灭的话，法国会发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呢。¹⁰⁹

在1759年9月1日给海因里希亲王的那封宣布“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的信过后4天，弗里德里希以同样的口气给费迪南德亲王写了一封信。他说，只有奇迹发生或是他的敌人犯了“上帝保佑的白痴错误”的话，战争才能以好结局结束。¹¹⁰ 结果错误出现的形式是，俄国人和奥地利人拒绝联合起来发动最后一击。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拿破仑评论道：“一切都倾向于证明，如果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这些大国能认真行动的话，他〔弗里德里希〕不可能抵挡得了它们一年时间；如果圣彼得堡内阁允许其军队在战场过冬的话，他不可能与奥地利和俄国抗衡两年。”¹¹¹ 这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可以根据伊丽莎白、玛丽娅·特蕾莎和路易十五的性格来解释的。这是联合作战中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同样的结构缺陷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末期解救了路易十四，并且本可以在1814年解救拿破仑，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么愚蠢的话。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谈到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支持另一个国家的事业，但永远不会像对待自己的事业那样认真对待它。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会被派去帮忙；但如果事情出错，行动就几乎会取消，该国会尽可能以最小的成本撤回的。”¹¹²

这一点本身就应该让人警惕下面这种轻率的假设了：弗里德里希只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1762年1月5日伊丽莎白沙皇的死亡——才免于毁灭。第一次将这种看法付诸公众的是弗里德里希自己，这是一个神话，至今依然被反复提起。¹¹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大陆国家的战士们都筋疲力尽，缺少金钱，缺少意志力。只有普鲁士仍

然可以产出赢得最后战斗所需的资金和人力。此外，沙皇的死亡早就被预料到了。早在战争开始之前，自圣彼得堡发回的报告就声称，沙皇的身体非常糟糕，她经常憋气，吐血，双腿肿胀，胸部积水。¹¹⁴她死去的时间只会很早，不会很迟，这一可能性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已经尽人皆知了，那些俄国指挥官尤其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她的继承人是热情的亲弗里德里希派。¹¹⁵

弗里德里希赢了，因为，并且只是因为他继承到的力量、他臣民的非自愿牺牲、敌人“愚蠢”和联合作战的固有缺陷。当然了，最后的问题是，他自己到底做了多少贡献？毫无疑问，助他渡过痛苦难关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创造。一只更软弱的手会让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遗产失去活力——他自己的继承人就是这么做的。弗里德里希将军事机器的效率提升到更高，作了重要的改进并大大增加了其规模。他在促进内政和军事管理上树立的个人榜样所激发出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¹¹⁶只是到了战场上，这一画面才开始模糊了。他在科林、霍赫基尔希、库讷斯多夫和马克森犯下的可怕错误（这里只提及更加明显的），肯定否定了他那些狂热崇拜者所声称的任何天才评价。他一次又一次地被下属的进取精神和普通士兵的牺牲所拯救。大肆吹嘘的“斜线攻击”实际上只起了一次作用，就是在洛伊滕会战。其他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因为练兵场上的状况不可能复制到战场上。¹¹⁷在战争中，海因里希亲王证明了自己是目前更有才能的指挥官，在战术部署和战场上都是如此。弗里德里希自己也承认这些，他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次宴会向他这个弟弟祝酒，称他是“唯一一位从不犯错误的将军”。¹¹⁸这是一句肯定得不到回敬的赞美。海因里希对他的王兄抱有病态般的强烈憎恶，这可能要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偷偷挖走了他心爱的变童、小侍从冯·德·马维茨。¹¹⁹

海因里希亲王的确是位更优秀的将军，但他会输掉战争。如果弗里德里希在库讷斯多夫战死或是在随后自杀（他似乎打算过这么做），海因里希会达成这样一种和平：西里西亚归还给奥地利，普鲁士成为二流国家。¹²⁰归根到底，弗里德里希成功的最大因素在于：无论情况看起

来多么绝望，他都能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冷酷的决心坚持前进。总之，他是一个中等水准的将军，但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军事领袖。

注释

1 关于七年战争在欧洲和欧洲之外各方面的精彩简明的记录，可参见Marian Füssel,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Munich, 2013)。

2 Leopold von Ranke, “The Great Powers,” in ide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1973), p. 86.

3 Michael Hochedlinger, *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83–1797* (London, 2003), p. 349.

4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6, pp. 300, 476.

5 例如，Paul Langford在*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London, 1976), p. 140中就这么认为：“也正是弗里德里希，他在1756年的夏季基于最轻微的俄国阴谋的证据，疯狂地入侵了萨克森，对他的盟友和欧洲公共舆论的敏感之处都缺乏考虑，将法国推向了第二个《凡尔赛条约》。”

6 Jürgen Luh,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Mark H. Danley and Patrick J. Speelman (eds.), *The Seven Years War: Global Views* (Leiden, 2013), p. 18; Gerd Heinrich, *Geschichte Preussens. Staat und Dynasti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1), p. 205.

7 Frank Göse, “Nachbarn, Partner und Rivalen: die kursächsische Sicht auf Preussen im ausgehenden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Jürgen Luh, Vinzenz Czech and Bert Becker (eds.), *Preuss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701–2001* (Groningen, 2003), pp. 58–9.

8 Henri Zosime, Comte de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a Cour de Berlin. Accompagnés d’un recueil de lettres de Frédéric-le-Grand, des princes ses frères, de Voltaire, et des plus illustres personnage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20), vol. 1, p. 236.

9 Göse, “Nachbarn, Partner und Rivalen,” p. 57.

10 Dietrich, p. 630.

11 Jürgen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1650–1800* (Cologne, Weimar and Vienna, 2004), p. 117.

- 12 Koser, vol. 1, p. 3; Henry Lloyd,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 betwee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the Empress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 (London, 1781), vol. 1, p. xxxv.
- 13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1650–1800*, p. 117;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ton Abbot, 1974), p. 128.
- 14 P.C., vol. 13, pp. 303–4.
- 15 Hubert C. Johns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5), p. 170.
- 16 Günter Vogler and Klaus Vetter, *Preusse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Cologne, 1981), p. 82.
- 17 Werner Gembruch, “Prinz Heinrich von Preussen, Brud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n Johannes Kunisch (ed.), *Persönlichkeiten im Umkrei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Cologne and Vienna, 1988), p. 100.
- 18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p. 139–40.
- 19 Johannes Kunisch, “Die militärische Bedeutung Schlesiens und das Scheitern der österreichischen Rückeroberungspläne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in Peter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 32.
- 20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p. 119.
- 21 Lloyd,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 vol. 1, pp. xxxii–iv.
- 22 Dietrich, p. 424.
- 23 Carlyle, vol. 6, p. 215.
- 24 Daniel Hohrath, “Friedrich, die Armee und der Krieg,”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72.
- 25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 141.
- 26 *Œuvres*, vol. 1, p. 125.
- 27 关于维也纳宫廷错综复杂的各方活动，详细描述可参见Arno,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s. 5 and 6，尤其是大量的尾注，它们往往富有启发性。
- 28 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London, 2006), p. 82.
- 29 这是Franz A. J.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 (London, 2008)中

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

30 Johannes Kunisch, “Die grosse Allianz der Gegner Preussens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in Bernhard R.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Kriege* (Munich, 1989), p. 95.

31 关于布图尔林的缺点，参见John L. H. Keep, “Die russische Armee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in *ibid.*, p. 140, and H. M.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1756–1775* (Cambridge, 2001), p. 46。

32 Georg Friedrich von Tempelhoff, *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m Könige von Preussen und der Kaiserin Königin mit ihren Alliierten, als eine Fortsetzung der Geschichte des General Lloyd* (Berlin, 1783–1801), vol. 4, p. 168; Marian Füssel,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ilitärische Grösse,”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53–5.

33 Johannes Kunisch, *Das Mirakel des Hauses Brandenburg: 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Kabinett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Zeitalter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Munich, 1978), p. 77.

34 Johann Christoph Allmayer-Beck,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im Spiegel ihrer österreichischen Gegner,”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Herford and Bonn, 1987) [no editor listed], p. 48.

35 David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London, 1966), p. 84.

36 *Œuvres*, vol. 19, p. 198.

37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p. 143. 弗里德里希坚持认为，有必要每天进行快速装弹练习，参见他1768年的“政治遗嘱”——Dietrich, p. 532。

38 Allmayer-Beck,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im Spiegel ihrer österreichischer Gegner,” p. 37.

39 Dietrich, p. 532. 根据Jürgen Luh的观点，更能决定战斗胜局的是剑和刺刀，而非火力——*Kriegskunst in Europa*, p. 151。

40 Koser, vol. 1, p. 548.

41 Edgar 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 1600–1786,” in H. M. Scott (ed.), *The European Nobili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5), vol. 2, p. 96.

42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378; Carlyle, vol. 5, p. 293.

43 Jörg Muth, *Flucht aus dem militärischen Alltag: Ursachen und individuelle Ausprägung der Desertion in der Arme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Freiburg, 2003), p. 179.

44 Peter Paret, *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1807–1815* (Princeton, 1966), pp. 23, 26, 44.

45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76.

46 Quoted in Frank Wernitz, *Die preussischen Freitruppen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1756–63* (Wölfersheim-Berstadt, 1994), pp. 8–9.

47 David Parrott, “Armed forces,” in William Doyl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ncien Régime* (Oxford, 2012), p. 62.

48 Dietrich, p. 520.

49 Curt Jany,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Armee vom 15. Jahrhundert bis 1914*, 2nd revised edn (Osnabrück, 1967), vol. 2: *Die Arme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1750–1763*, p. 180.

50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pp. 165–73.

51 Ibid., p. 165; Gunther Rothenberg,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London, 1977), p. 25.

52 *Œuvres*, vol. 29, p. 47. See also Marcus von Salisch, “Von Preussen lernen ... ? Die friederizianische Arme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und die Entwicklungen der Zeit,”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p. 68–9.

53 Dietrich, p. 520.

54 Wolfgang Venohr, *Der grosse König. Friedrich II.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Bergisch Gladbach, 1995), p. 349.

55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56.

56 Otto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Berlin, 1962), p. 31.

57 Dietrich, p. 518.

58 Hahn, *Friedrich II.*, p. 98.

59 Horst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 214.

60 Quoted in Jay Luvaas (ed.),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p. 12. 对普鲁士军队优势的进一步评论，可参见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 *Journal d'un voyage militaire fait en Prusse dans l'année 1787* (Paris, 1

790), p. 135.

61 Dietrich, p. 532.

62 *Œuvres*, vol. 28, pp. 4–6.

63 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 *Observations sur la constitution militaire et politique des armées de S. M. prussienne, avec quelques anecdotes de la vie privée de ce monarque* (Paris, 1777), p. 135.

64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67.

65 Hans Bleckwenn, “Bauernfreiheit durch Wehrpflicht – ein neues Bild der altpreuussischen Armee,”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p. 66.

66 Ernst Friedrich Rudolf von Barsewisch, *Von Rossbach bis Freiberg 1757–1763. Tagebuchblätter eines friderizianischen Fahnenjunkers und Offiziers*, ed. Jürgen Olmes (Krefeld, 1959), p. 65; translation from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138.

67 Walther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Absolutism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75), p. 129.

68 Guntram Schulze-Wegener, “Leuthen 1757 – Genesis einer operativen Doktrin,” *Historische Mitteilungen*, 18 (2005), p. 11.

69 Ilya Berkovich, *Motivation in the Armies of Old Regime Europe* (unpublished Cambridge Ph.D. dissertation, 2012), p. 15.

70 Ibid., p. 85; Sascha Möbius, *Mehr Angst vor dem Offizier als vor dem Feind? Eine mentalitäts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preussischen Taktik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Saarbrücken, 2007), pp. 103, 106, 137; Muth, *Flucht aus dem militärischen Alltag*, pp. 160–61; Peter H. Wilson, “Prusso-German Social Militarisation Reconsidered,” in Luh, Czech and Becker (eds.), *Preuss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701–2001*, p. 367.

71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64;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30.

72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vol. 1, p. 208.

73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Absolutism and Administration*, p. 32; Jules Finot and Roger Galmiche-Bouvier (eds.), *Une mission militaire en Prusse en 1786. Récit d'un voyage en Allemagne et observations sur les manœuvres de Potsdam et de Magdebourg. Publiés après les papiers du marquis de Toulangeon* (Paris, 1881), pp. 285–6.

74 Quoted in Manfred Schlenke, *England und das friderizianische Preussen 1740–1763*.

Ein Beitrag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und öffentlicher Meinung im England des 18. Jahrhunderts (Munich, 1963), p. 293. Schlenke在附录中完整转载了“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upon the Present Military State of Prussia, Austria and France”, pp. 371–4.

75 Luvaas (ed.),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p. 118.

76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35.

77 Luvaas (ed.),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p. 146.

78 Dietrich, p. 414.

79 Finot and Galmiche-Bouvier (eds.), *Une mission militaire en Prusse*, p. 286; Guibert, *Journal d'un voyage militaire fait en Prusse*, p. 130.

80 Haug von Kuenheim (ed.),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ndorff* (Berlin, 1982), p. 24.

81 Tempelhoff, *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in Deutschland*, vol. 4, p. 169;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od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vom letzten Viertel des achtzehnten und vom Anfa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1778 bis 1806* (Lemgo and Hanover, 1814–19), vol. 4, p. 334.

82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47.

83 Möbius, *Mehr Angst vor dem Offizier als vor dem Feind?*, p. 107.

84 Ute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Friedrich II. als Herr über die Herzen?* (Göttingen, 2012), p. 59. 歌词见于J. S. 巴赫的康塔塔《那个安息日的晚上》(BWV 42)。翻译自Alfred Dürr, *The Cantatas of J. S. Bach*, rev. and trans. by Richard D. P. Jones (Oxford, 2005), p. 295.

85 Berkovich, *Motivation in the Armies of Old Regime Europe*, p. 237.

86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p. 80.

87 Finot and Galmiche-Bouvier (eds.), *Une mission militaire en Prusse en 1786*, p. 166.

88 Quoted in Michael Sikora, *Disziplin und Desertion. Strukturprobleme militärischer Organisation i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96), p. 310.

89 Kuenheim (ed.),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ndorff*, p. 126.

90 Möbius, *Mehr Angst vor dem Offizier als vor dem Feind?*, pp. 118–19.

91 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 *Éloge du roi de Prusse* (Paris, 1787), p.

. 231.

92 Koser, vol. 2, p. 511.

93 P.C., vol. 15, p. 258.

94 Christopher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London, 1985), pp. 199, 204; Möbius, *Mehr Angst vor dem Offizier als vor dem Feind?*, p. 106.

95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p. 205.

96 Allmayer-Beck,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im Spiegel ihrer österreichischen Gegner,” p. 46.

97 Reinhard Bendix,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Dennis Wrong (ed.), *Max Weber* (Englewood Cliffs, 1970), p. 169.

98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 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220.这部富有洞察力的传记中还有对弗里德里希超凡魅力的进一步讨论，参见pp. 72, 193, 348, 482。

99 在场者对该演说的记录不止一个版本，我更偏好的是Friedrich August von Retzow的版本，在他的*Charakteristik der wichtigsten Ereigniss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in Rücksicht auf Ursachen und Wirkungen* (Berlin, 1802), vol. 1, pp. 240–42中得到了翻印。卡莱尔书中有一个缩写版的英文译本，见Carlyle, vol. 5, pp. 232–4。

100 C. D. Küster, *Des Preussischen Staatsfeldpredigers Küster, Bruchstück seines Campagnelebens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2nd expanded edn (Berlin, 1791), p. 93. 关于弗里德里希在普通士兵中所获得的支持，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参见Sikora, *Disziplin und Desertion*, p. 310。

101 Bernhard R. Kroener, “Die materiellen Grundlagen österreichischer und preussischer Kriegsanstrengungen 1756–1763,” in idem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47.

102 关于法国和俄国战争目标和战争计划根本上的不统一，可参见Lawrence Jay Oliva, *Misalliance: A Study of French Policy in Russia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 (New York, 1964), pp. 195–6。

103 Kunisch, “Die grosse Allianz der Gegner Preussens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p. 85.

104 Keep, “Die russische Armee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in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136.

105 Christopher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n*

Military Power 1700–1800 (London, 1981), pp. 118–22.

106 Gaston Zell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es temps modernes* (Paris, 1955), vol. 2: *De Louis XIV à 1789*, p. 244; Keep, “Die russische Armee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p. 165.

107 Quoted in Michel Antoine, *Louis XV* (Paris, 1989), p. 743.

108 Eckhard Buddruss, *Die franzö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756–1789* (Mainz, 1995), p. 289.

109 Ibid., p. 126, n. 39.

110 *Œuvres*, vol. 26, pp. 620–21.

111 Quoted in Luvaas (ed.),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p. 11.

112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1976), p. 603.

113 例如Matt Schumann and Karl Schweizer, *The Seven Years War: A Transatlant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 492, 或是Dominic Lieven, *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Battle for Europe 1807 to 1814* (London, 2009), p. 19。

114 Carlyle, vol. 4, p. 521.

115 Kunisch, *Das Mirakel des Hauses Brandenburg*, p. 13.

116 Muth, *Flucht aus dem militärischen Alltag*, p. 178.

117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pp. 206–7.

118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rinz Heinrich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Doppelporträt* (Stuttgart, 1996), p. 98.

119 Wolfgang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biografisches Porträt* (Freiburg, Basle and Vienna, 2011), p. 30; Lehdorff, vol. 2, p. 77. See also Gerd Fesser, “Der König von Rheinsberg,” *Die Zeit*, 32 (2002), http://www.zeit.de/2002/32/Der_Koenig_von_Rheinsberg?page=all.

120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72;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 97.

① 出自《马可福音》3: 25。

第11章

长久的和平、短暂的战争和双重外交

第一次瓜分波兰

勃兰登堡的奇迹也意味着波兰的分崩离析。¹

1745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时，弗里德里希写信给他的外交大臣波德维尔斯：“既然我们已经逃离风暴的漩涡，就让我们待在这平静的港湾，再也不要离开了。”²然而，等到了1756年，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组成的“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地平线上，更不用说后面还跟着的瑞典和德意志诸侯国组成的“小型舰队”，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再一次出海迎战。7年以后，当那些幸存的船只狼狈不堪地回到它们各自的港湾，弗里德里希并没有陷入自信的情绪之中。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差一点点就要遭遇彻底的惨败。最终拯救他的奇迹，不是沙皇伊丽莎白的意外去世，虽然这的确有所帮助，而是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不能有效地联合行动。只有一次例外，1759年8月12日在库讷斯多夫，俄奥联军共同进攻普军，这也是此次战争中弗里德里希最命悬一线的时刻。所以，当和平再次降临，他比之前更坚定地认为，从此再也不要开战了。

在弗里德里希看来，维持大海平静和航运繁荣的关键在于为船只寻

找到避风港，以抵御从东方吹来的风。1739年在《反马基雅维利》一书中，他还嘲笑俄国只是一个刚刚从野蛮中诞生的国家，在陆海军力量上并不比小小的荷兰共和国更让人害怕多少，在财富和资源上更是大大地逊色。³ 30年后，吃过苦头才明白过来的弗里德里希告诉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俄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奥地利的过错，他继续说，因为正是奥地利为了重新调整西方的格局，首先把这个东方势力引入了欧洲的国际体系中。⁴ 和查理十二（或者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弗里德里希意识到，俄罗斯帝国绝对广阔的领土可以使其在防御上无懈可击，而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可以使它在进攻中造成巨大的破坏。就像1756年发生的事情所表现出的那样，如果不是有俄国的帮助，奥地利人永远没有胆量进攻普鲁士。⁵ 所以，弗里德里希的首要任务一直都是把奥地利和俄国分开。

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波兰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一任务变得更容易，但也更加复杂了。1763年10月5日，和蔼可亲但又好逸恶劳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去世。弗里德里希马上给圣彼得堡寄去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叶卡捷琳娜，从现在开始，他将尽其所能地在新一任君主的竞选活动中支持她。⁶ 在随后的几封信中，他热切地做出保证，自己会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她，甚至包括命令驻华沙的普鲁士官员听从俄国的意见行事。“虽然我们之间还没有结成联盟，”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我把自已看作是您的盟友，我也正是这么做的。”⁷ 他曾经非常警惕萨克森和波兰因处在同一个国王统治之下而产生的威胁，所以现在特别希望能打破这种关系。

其实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不需要担心。叶卡捷琳娜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决定，她的前任情人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将成为波兰新一任国王。⁸ 选择他，并不是因为他曾在宫闱之内一展雄风，而是因为他性格软弱。根据叶卡捷琳娜的观察，在所有的候选人中，他是最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王位的人，所以也会是最感激她的人。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波尼亚托夫斯基被迫承诺以俄国的利益为己任，继续不

断地向他的恩人表示“忠心”，永远不会拒绝她“正义的要求”。⁹但是，为了确保她的这位手下能够当选，叶卡捷琳娜还需要其他势力的支持。因为法国和奥地利与萨克森在皇室姻亲和宗教信仰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英国对此缺乏兴趣，剩下的唯一人选就是弗里德里希了。“您千万别笑话我，一听说波兰国王去世，我一下子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她告诉她的外交大臣尼基塔·帕宁伯爵，“普鲁士国王也从他的桌子上一跃而起。”¹⁰

然而，真正成功缔结条约还需要数月的时间。弗里德里希对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不感兴趣，他想要一个彻底永久性的联盟，最终他得偿所愿。从1763年11月开始，叶卡捷琳娜似乎认为即使没有普鲁士的支持，她也能保证波尼亚托夫斯基赢得选举。因此，弗里德里希以奢华的标准款待了一位土耳其公使，以此毫不掩饰地向叶卡捷琳娜施加外交压力。¹¹虽然他并没有打算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联盟，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圣彼得堡非常反感这样的联系，所以表现出自己很认真地在考虑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建立联盟的可能性。此时，轮到叶卡捷琳娜慌了。1764年1月26日，普鲁士大使获得了一份弗里德里希基本上可以接受的防御联盟草案。¹²在附属细则整理完毕以后，双方于4月11日正式签署条约，条约承诺普鲁士和俄国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支持波尼亚托夫斯基，同时保证保护对方在欧洲的领地免于受到第三方的攻击。换句话说，之前俄国承诺支持奥地利夺回西里西亚地区的协定自此失效了。¹³也许弗里德里希会庆祝这一时刻，毕竟只要同俄国的联盟存在一天，普鲁士就是安全的。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在9月6日的选举中，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如愿成为波兰国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不棘手的”一次选举。¹⁴但是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普鲁士人对自己权力的标榜太毫无顾忌了。当瑟姆对本国的海关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时，弗里德里希在马林韦尔德用1排共10门重型火炮把波兰的船只封锁在维斯瓦河上，直到波兰被迫取消此次改革。¹⁵不过大部分时候，弗

里德里希还是满足于让叶卡捷琳娜掌管波兰事务。叶卡捷琳娜对此非常热心，她与其说是把波兰当作一个受庇护方看待，不如说是要把波兰完全变成俄国控制下的傀儡国家。虽然新任国王企图通过改革来改变混乱的政治结构，但这一尝试很快就被扼杀了。因为知道天主教贵族永远不会臣服于俄国的统治，叶卡捷琳娜自诩为东正教教徒和新教徒的保护者，试图利用这种身份让另一个群体成为自己的代理人。1767年12月，在俄国军队的威胁下，瑟姆通过了“欧洲最全面的宗教容忍法令”。¹⁶ 结果就导致了内战——以热切的天主教徒为主的波兰贵族拿起武器抗争。1768年初，一群波兰贵族在位于波兰东南部波多尼亚地区的巴尔建立同盟。同盟发动了起义，俄国人耗费4年之久才逐渐控制住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俄国干涉波兰的恶劣行径促使土耳其人在10月份的时候向其宣战。¹⁷

这是弗里德里希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他的国家还正在努力地从七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元气。他告诉在维也纳的使臣冯·罗德伯爵，这一消息“令人极为不快”，因为战争很有可能波及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普鲁士，这实在是非常危险。¹⁸ 不管愿不愿意，他已经间接地被牵扯进来，因为土耳其向俄国宣战就触发了他之前同叶卡捷琳娜签订的共同防御同盟。虽然不是必须直接派出普鲁士军队，但是在战争期间，他不得不支付每年大约40万卢布（或48万塔勒）的巨额补贴，这相当于普鲁士年收入的3%左右。¹⁹ 他宁愿将这笔钱花在修建新宫之类的项目上，此时位于波茨坦的新宫即将竣工。仿佛噩梦般的，却又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俄国取得优势，叶卡捷琳娜要求吞并更多领土，奥地利为了阻止她而加入战争。这将使弗里德里希不得不牵涉其中，他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会失去一切。

这场战争的走势和弗里德里希担心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1769年底，俄国人控制了东南方的亚速海，并在西南方向上占领了布加勒斯特。此后的事实证明，接下来的这一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7月份，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以少胜多，两次重创土耳其军队。第一

次是7月7日，在拉尔加河与普鲁特河交汇处；第二次胜利是两个星期之后，在卡胡尔河上。这一系列精彩的军事行动打通了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之间的整个广阔地区。到了战争的最后时刻，土耳其在这些地方设立的所有重要的军事要塞已全部被俄国人攻陷，其中最著名的要塞当属本德尔，俄军一直向前推进到多瑙河三角洲地区。不过，也许切斯马海战的场面更加壮观。切斯马位于希俄斯岛旁边，安纳托利亚海岸附近。一支俄国舰队从波罗的海穿过英吉利海峡一路航行到直布罗陀海峡，最后于7月5日在切斯马打败土军取得胜利。人们立即把俄国的这场奇迹般的胜利同1571年勒班陀大海战相提并论。俄国人举国欢庆这场胜利，他们也赢得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尊敬。²⁰

随着俄国以压倒性的优势越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直推进到多瑙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弗里德里希需要在不让奥地利感到威胁的同时，满足叶卡捷琳娜的领土要求。而既能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能给普鲁士带来额外好处的方法，就是把叶卡捷琳娜对土耳其贪婪的诉求转移到波兰身上。毕竟在他看来，是波兰首先挑起土耳其对俄国的攻击的。

²¹紧接着，瓜分波兰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巨大愤慨，以至于大家都忘记了，这块土地其实已经摆在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很久了。第一次讨论这件事还是在约翰·卡齐米尔（1648—1668年在位）混乱的统治时期，当时俄国、普鲁士、瑞典和奥地利讨论过瓜分波兰的可能性。

²²约翰·索别斯基（1674—1696年在位）在位期间，波兰复兴，瓜分波兰的计划就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搁置了。1683年，波兰军队在约翰·索别斯基的带领下解除土耳其对维也纳的围困，这是他的功绩之一。但是在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中，待瓜分的国土又重新回到列强们的谈判桌上。这些持续时间久、破坏性大的战争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波兰的土地上，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波兰要想不依赖外国势力已经不太可能了。²³萨克森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不断提议把领土“奉献”给自己的邻国，以换取它们承认他对剩下的波兰领土的世袭继承权。²⁴甚至他去世之前，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还在1732年签署了《勒文沃尔德条

约》，暗中安排波兰王位的继承人选。三国约定，不得再选择萨克森人继承王位，但俄国最终违反了这一约定。²⁵

弗里德里希在很早的时候就把目光对准了波兰的领土。1731年2月，他在19岁生日过后不久，就写了一封雄韬伟略的信给普鲁士陆军元帅杜比斯拉夫·格涅奥马尔·冯·纳茨默，他在信中分析了普鲁士的地缘政治局势。在他看来，一方面，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零零散散地排成一排横跨北德平原，太容易受到攻击，周围的邻国都是潜在的入侵者，必须和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不进则退”，每一次填补领土间空隙的机会都要抓住。最大的空隙是在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之间，波兰的一块土地把二者完全隔离开。如果能吞并这块波兰领土，从易北河一直到涅曼河的普鲁士领土就可以连成一片，而且，原本在波兰控制下的维斯瓦河贸易也可以转移到普鲁士的手上。²⁶在1752年和1768年，他分别写了两份“政治遗嘱”，其中也涉及这一问题。他在1768年的遗嘱中预言：“我很清楚，从长远来看，周围这些过于强大的邻居们终究会达成一个协议，瓜分战利品〔波兰〕。也许，一个大幅缩小的波兰王国会继续存在下去，处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大国的包围和限制之下。”²⁷

宗教、历史、社会、政治和民族上的偏见加强了这种权力政治的考量。弗里德里希对波兰人的评价极低，他毫不掩饰这种看法，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他那本《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的说法：

波兰永远都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下，为了争夺各自的利益，大的家族早已四分五裂。他们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公共福祉之上，只有在压迫普通民众的严重程度才能达成一致。那些被压迫者做牛做马，忍辱负重，不被他们当人看待。波兰人是多么自负啊，在好运眷顾他们时一脸傲慢，在逆境中则卑劣刻薄。他们使用一切手段来聚敛钱财，到手后，又大肆挥霍，毫不

谨慎。他们性格轻率，缺乏判断，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随时准备着改变阵营，彼此间又不能一致行动，常常使自己陷入十分不堪的境地中……这个国家的人的心智已经女性化了，所有派系的支持者都是妇女，在自己的丈夫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她们就处理一切事务。²⁸

在他看来，波兰唯一的好东西，就是优良的马匹了。²⁹ 弗里德里希与启蒙哲人来往的信件中充满了各种反波兰的言论。比如，1772年1月，他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中说，如果孟德斯鸠要从“波兰共和国”中找出一些共和原则，可要费一番力气了，因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只会使国家充斥着自私、骄傲、腐败和懦弱。那里根本没有启蒙哲人，他接着写道，只有因愚蠢至极的迷信而变得野蛮的无赖，一个懦夫能做的坏事他们都做得出来。³⁰ 弗里德里希特别喜欢他的朋友伏尔泰的那句著名的讽刺：“一个波兰人——一个有魅力的人；两个波兰人——一场斗争；三个波兰人——啊，那就是波兰问题。”³¹ 叶卡捷琳娜试图强迫波兰实行宗教宽容的行为，激起了波兰人的反抗。在弗里德里希那些最冗长、最乏味的诗歌中，有一首诗的灵感就来源于此，这首《同盟者颂歌》足足占了他文集的60页。在这首诗中描绘的一个场景里，“愚蠢”回到波兰，故地重游，很高兴地发现，这里的居民一点儿都没变：

粗野、愚蠢和无知

名人、犹太人、农奴和醉醺醺的权贵

全都呆板懒散，不知廉耻。³²

弗里德里希原本把这首诗寄给了圣彼得堡的索尔姆斯伯爵，让它在俄国宫廷里传阅，但是，这位大使先生竭力劝说他不要这么做，所以弗里德里希又反悔了。³³ 也许索尔姆斯是对的，虽然俄国讨厌波兰的程

度一点儿都不会比普鲁士少，但是俄国在与其邻居打交道时，的确拥有更多的选择。实际上，俄国人自己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是应该继续单独控制波兰，但只能实行松散的控制，还是直接吞并它一部分领土，即使这意味着允许普鲁士（也许还有奥地利）从中分一杯羹？

决定波兰命运的最后一个阶段，几乎同时分别在维也纳和波茨坦拉开帷幕。1768年的夏天，巴尔同盟在波兰发动内战，战火烧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东北部的国境线上。与此同时又暴发了疫病，军队把瘟疫传染到各地，情势越发紧张。作为回应，奥地利沿着整个波奥边境线建立了一条军事防护警戒线。许多飞地就被警戒线划入奥地利这一侧，这些飞地还是1412年匈牙利王国抵押给波兰的领土，此后就再也没有赎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斯皮什伯爵领地，这一地区通过一个狭长地带和波兰连接起来。由于巴尔同盟在这一地区的煽动活动，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实际上是请求奥地利，介入这一地区的事务。然而到头来，当奥地利人下令吞并这些土地时，他们就声称自己对这些地方拥有主权，以此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³⁴ 大约同时，弗里德里希写信告诉驻扎在圣彼得堡的索尔姆斯伯爵，丹麦外交官利纳尔伯爵最近到访柏林，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这位外交官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主意”以解决东欧问题，他主张奥地利接手与其目前边界毗邻的波兰领土，包括斯皮什地区；普鲁士获得波属普鲁士、埃姆兰（又称瓦尔米亚），而但泽港将作为一个“保护区”存在；俄国占领波兰哪个地区都行，只要它觉得合适就好。弗里德里希继续写道，这个计划令人吃惊，但是很有诱惑力，与其说是切实可靠，也许更应该说是绝妙非凡。他让索尔姆斯自己决定是否把这个方案递交给俄国政府。³⁵ 不必多说，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次极为虚伪的对话充满了弗里德里希自己的观点。³⁶

很容易就能找到弗里德里希这么做的理由。不能完全通过牺牲土耳其来满足叶卡捷琳娜对领土的渴望，因为那样会把奥地利及普鲁士卷入战争中。所以，必须把矛头转而指向不幸又无助的波兰，并且还可以用它的领土收买奥地利。而弗里德里希自己能获得的好处，或者用他的话

说是“给予俄国大笔补贴费用后的补偿”，就是他垂涎已久的战利品——西普鲁士地区。在这个链条上，奥地利显然是薄弱的一环，毕竟，一个被削弱的波兰和一个被加强了普鲁士，对它来说不仅没有什么好处，还会失去原本的优势，陡增许多危机。俄国每获得一次胜利，弗里德里希的焦虑就要增添一分。当然，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这样。1769年8月，有着同样担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前往位于西里西亚的尼斯城拜访弗里德里希，商讨面对俄国的大肆扩张，如何维护好两国的共同利益。两个人都无可挑剔地彬彬有礼，争先恐后地申明自己的诚意和对永久和平的希望。弗里德里希向他的访客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被雄心壮志所驱使，现如今已经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在你看来，我毫无诚信可言，”他对约瑟夫二世说，“我也知道，过去我的确活该被这么指责，但是，那时是受形势所迫，现在一切都已经变了。”³⁷私底下，他对约瑟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位年轻的皇帝（此时，约瑟夫28岁，和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入侵西里西亚时同岁）“充满野心”，一旦逃离母亲玛丽娅·特蕾莎的掌控，他就会立刻开始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³⁸所以，虽然约瑟夫二世不断保证，奥地利已经彻底放弃西里西亚地区，但还是让他心存疑虑。

必须承认，弗里德里希高超的外交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他带领着普鲁士稳稳地在两个强大的邻国间杀出一条生路，既没有被吞并，也没有遭受欺辱。首先，他营造出一种和奥地利之间亲密友好的氛围，并利用这一关系，促使俄国与其谈判，以便重新修订即将于1772年到期的同盟条约。如他所愿，1769年10月12日，俄普签订了新的条约，不仅他的安全感可以延长到1780年，而且俄国也答应支持他吞并德意志南部的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两个侯国。此时，这两个地区仍由霍亨索伦家族的旁支统治，但其统治者没有继承人。³⁹接着，他继续向奥地利开展魅力攻势。1770年9月，他与约瑟夫二世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再次举行会谈。这一回，奥地利外交大臣考尼茨亲王也来了，和以往一样，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此次会晤又没能签订实质性条款，只是就争取调解俄

国和土耳其之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⁴⁰

最后提到的这项提议也只是徒劳。随着叶卡捷琳娜在军事上不断获得胜利，她对领土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她要求克里米亚独立，获得亚速海沿岸的大片领土，以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沿岸的公国。虽然土耳其只是把这两个公国“租借”给俄国，租期25年，但显而易见，它们最终就会被吞并。⁴¹正当一切看起来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弗里德里希突然交了好运。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不断推进支持西班牙对抗英国的政策，这看起来像是要把法国带进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⁴²1770年12月24日，路易十五把他解职了。在接下来的6个月左右，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直接控制法国的外交政策。换句话说，法国停止了一切外交运作。这是一个在关键阶段出现的决定性的变化，因为法国这个以前总是为波兰和土耳其所倚赖的、对抗俄国的力量此时无法行动了。弗里德里希称舒瓦瑟尔公爵是“欧洲大纵火犯”，1768年，就是在他的煽动下，土耳其进攻俄国。⁴³在维也纳，也只有玛丽娅·特蕾莎对他的离开感到遗憾。她可以预料到，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挡奥地利走上一条由“野心勃勃的约瑟夫，痴心妄想的考尼茨和那知道如何利用人的激情和弱点的狡猾的普鲁士国王带领的满布荆棘的道路了”。⁴⁴实际上，法国外交的崩溃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偶然。欧洲国际体系的长时段发展使法国的利益已经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与英国在欧洲之外的竞争中，出现这一转变的征兆和原因都是“东方列强的崛起”，而普鲁士就成为不能忽视的存在。

随着法国这只“阻碍之手”的消失，1771年事态发展的速度开始加快了。普鲁士在这一进程中的主要代理人是国王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早在1770年的夏天，弗里德里希就派他前往斯德哥尔摩，以警告他们的姐妹乌尔丽克王后^①，如果瑞典进攻俄国或者修订宪法，那么普鲁士必将出兵占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海因里希在瑞典的时候，俄国邀请他到圣彼得堡去，亲自了解之后国际格局的安排。⁴⁵但他有自己的打算，和弗里德里希此时想要的比起来，他想要的东西更多：“我想让您成

为波罗的海沿岸的主人.....如果这只是一场梦，至少这也是一场美好的梦。您可以相信，我对您荣耀的关注会使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弗里德里希回复他说，其他强国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幸运之风”还不够强劲，不足以战胜这些阻碍。⁴⁶在他看来，海因里希在圣彼得堡最主要的任务是推进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调解土耳其战争的计划。

很难断定海因里希亲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怂恿了俄国人说出了他想听到的话。但可以确定的是，1771年1月8日，他给弗里德里希写了一份报告，描述了他和叶卡捷琳娜之间一次令他十分愉快的对话。对话之初，叶卡捷琳娜提到，奥地利已经占领了波兰的许多领土，到处都挂上了他们的徽章，以标记他们新的边界。她继续说道：“为什么大家不都分一点儿呢？”海因里希亲王答复她说，弗里德里希也建立了一条军事警戒线，和奥地利相似，但是没有占领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但是，”叶卡捷琳娜笑着说道，“你们为什么不占领它？”过了一会儿，切尔内绍夫伯爵也凑到海因里希身边，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为什么不占领埃姆兰采邑主教区？毕竟，每一方都应该获得一些好处，这很有必要啊。”海因里希评论道，虽然这一切都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他毫不怀疑弗里德里希有能力把这些笑谈为其所用。⁴⁷

海因里希亲王于1771年2月18日回到波茨坦，很快他就使弗里德里希相信，“幸运之风”已经足够强劲，此时是瓜分波兰的大好机会，普鲁士是时候起航了。“您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维持着平衡，”他对弗里德里希说道，“以后，俄国终究要与我们达成某种协议，给予我们一些利益，以回报您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奥地利一旦知晓此事，必定也会想要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好处，那么，这三个大国就会基于对它们真正有利的因素，达成一个互惠协议。”⁴⁸2月27日，弗里德里希告诉驻圣彼得堡的索尔姆斯伯爵，俄国原本也应该从波兰割占许多领土，毕竟这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至于普鲁士，则需要获取“一丁点儿土地”来维持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对抗奥地利，以及补偿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作为补贴支付给俄国的钱款。⁴⁹结果，这“一丁点儿”土地居然有3.6万平方千米

之多。⁵⁰

在获得这3.6万平方千米的一年多前，雪花般的信件往来于谈判各方。⁵¹在那个交通还依赖四足动物的年代里，谈判只能依靠信使逐渐推进，他们艰难地四处奔波，脚下的道路在下雨时泥泞不堪，烈日炎炎时则尘土飞扬。弗里德里希通过充当战争双方的调停人，实现了他最基本的目标，或者用一句德语谚语来说，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Der lachende Dritte）。土耳其在1771年拖住了俄国扩张的步伐，而奥地利一直表现出想要与土耳其建立联盟，双方的谈判于6月25日结束，但并没有达成条约。这两件事都对弗里德里希有利，但使弗里德里希获益更多的是玛丽娅·特蕾莎女王出于好意决定介入这一事件，然而她的做法并不明智。1771年9月，她向普鲁士驻维也纳的大使冯·罗德伯爵保证，她永远不会允许奥地利再次陷入战争之中。她的儿子，共同执政者约瑟夫二世在盛怒之下写信给他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说她“颠覆了我们整个体系，我们希望向俄国施压，也许还会和土耳其结盟，诉诸武力来威胁他们等等。她就这么强烈地向普鲁士大使保证，永远不希望或是允许爆发战争，克里米亚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小小的芝麻，她根本不介意俄国是否会吞并那里”。⁵²当最终达成和平协定时，俄普奥三国都不得不各自放弃一些利益：弗里德里希被迫放弃占领但泽地区；俄国不得不同意撤出多瑙河诸公国；奥地利也只好接受俄国割占一部分土耳其领土这一事实。

弗里德里希和叶卡捷琳娜在1771年7月就对瓜分波兰的事宜在原则上达成一致，1772年2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而就在协议最后签署之前，从奥地利传来了消息，他们同意一起瓜分波兰。又耗费了数月之久，才最终实现各方要求的所谓“完全平等”的瓜分协议，一直到8月5日，俄普奥才在圣彼得堡签订三方瓜分波兰的协议。⁵³奥地利虽然最后才参与到瓜分中来，但是收获最多，具体情况如下：

	人口	面积（平方千米）
--	----	----------

普鲁士	58万	3.6万
奥地利	265万	8.3万
俄国	130万	9.2万 ⁵⁴

不过，反倒是奥地利对瓜分成果最不满意。玛丽娅·特蕾莎哀叹“残酷的必要性”，称这迫使她不得不批准那些在她看来“不道德”和“不幸”的行动。即使是考尼茨，奥地利统治集团核心三巨头中最热衷于参与瓜分波兰的那位，也认为瓜分结果实属“齷齪”。而约瑟夫二世则害怕其他人据此认为他是一个“人云亦云，没有准则的人”。⁵⁵ 弗里德里希毫不掩饰自己的冷嘲热讽，他说：“我和叶卡捷琳娜就是强盗，但我很想知道玛丽娅·特蕾莎女王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后是如何面对她的忏悔神父的！……她边拿边哭，哭得越凶，拿得也就越多。”⁵⁶ 一旦他们解决了诸多顾虑，奥地利人也就尽其所能地榨取起土地来。原本指定波多古瑞埃河作为奥波之间新的领土边界，结果最后却发现该河流并不存在！所以后来奥地利人要求以兹布鲁奇河为界，又把他们的边界向波兰方向推进了30千米。⁵⁷ 而对弗里德里希来说，他觉得“内茨河”就意味着“内茨河洪泛区”，所以他又把自己的边境线向外推进了几千米，把整个洪泛区都占为己有。⁵⁸



早在此次划归普鲁士的波兰领土被正式占领之前，弗里德里希就曾到这一带巡视过。不过，在他以前去往东普鲁士的途中，他肯定经过这里无数次了。1772年6月，他在写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中提到，他不断贬低西普鲁士的价值，声称在西普鲁士，除了“沙砾、松树、沼泽和犹太人”什么也没有，只是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大国的嫉妒。但实际上，“不论从战略位置还是经济资源看，获取这一地区都对普鲁士大有裨益”。

⁵⁹ 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观点：

我已经看到了我们通过这次瓜分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好处。我们这部分最大的优势是商业上的，波兰生产和进口的商品都受到我们控制。而其中最大的好处在于，因为我们控制了波兰的粮食贸易，我们再也不会遭受饥荒的威胁。此次获得的土地上，人口大约有62万，很快就会上升到70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在波兰持〔宗教〕异议的人士都会到这里寻求庇护。⁶⁰

普鲁士权力、经济、人口的扩张很难成为他掠夺一个无害邻国的正当理由。弗里德里希没有用这一点为自己辩护，而是采取了以下两种辩护策略。他告诉伏尔泰，要避免一场战争，就必须瓜分波兰，而战争是带来痛苦和各种犯罪的根源。⁶¹ 在另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了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赋予了使此地文明开化的任务。他到波兰“废除农奴制；修改残暴的律法；引入更合理的法律法规；开挖人工运河，把维斯瓦河、内茨河、瓦尔塔河、奥得河和易北河连成一体；重建自1709年瘟疫肆虐以来荒废的城镇；排出100余英里沼泽地的积水；在这片蛮荒之地上建立起法律和秩序，在此之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甚至连这些概念都没听过”。⁶² 但结果却并不理想，西普鲁士人内心十分抗拒这种同化政策，当地贵族精英非常顽固并且十分有效地保护了他们的传统体制和文化，对抗普鲁士的集权化管理。⁶³ 一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的“文明开化任务”取得了哪怕一星半点儿成果。对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悲惨的境遇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⁶⁴

也许有些意外的是，欧洲人对瓜分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毕竟比起道德原则，他们的态度更取决于国家利益。所以法国人感到非常愤怒，

而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英国人反而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⁶⁵ 大卫·休谟哀叹道：“两个最文明的国家，英国和法国，竟然正在衰落；而那些蛮族，德意志和俄国的哥特人及汪达尔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竟然都在不断扩大。”不过，想到只有法国受到羞辱，他得到了些许心理安慰。他写道：“签订瓜分协议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通知法国一声，简直有辱法兰西的威名，曾经震慑四方的帝国如今已经威信扫地。”⁶⁶ 此时已经是查塔姆伯爵的老威廉·皮特说：“我的看法更像俄国人，我相信随着波旁王朝的衰败，奥斯曼帝国一定能推翻它的统治。”⁶⁷ 在德意志，天主教地区的谴责声最为强烈，不过即使在那里，奥地利人参与瓜分的行为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而新教徒则明确表示，被割占地区的波兰人应该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他们从此逃离了神职人员控制的地狱。激进的施瓦本记者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在他的《德意志纪事报》中写道：

跪下，波兰，保持沉默！那些毫无理由的迷信还未从这个国家彻底消除。只要这恶意的神魔还在建造它的庙宇，理性就一无所获……除了极少例外，大部分波兰人仍然相信女巫、神灵、喧闹鬼；只知道宗教的表面含义，却不了解其核心内涵；对那些不信仰他们宗教的人充满极端憎恨。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令人作呕。以最恐怖的方式，数以百计的犹太人遭到处决，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犹太人需要基督徒的血来庆祝自己的复活节。只要有一个基督徒孩子失踪或者意外溺水，他们就揪住一个犹太人的胡子，直接处决，甚至施以火刑。⁶⁸

在普鲁士国内，伦道夫伯爵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他因为普鲁士不费一枪一炮就拿下了一个省份而欣喜若狂，大声欢呼这是弗里德里希个人的胜利。⁶⁹

后来关于这次领土分割的大部分评价都是批判性的，尽管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都在不断庆祝自己的胜利，并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在特赖奇克看来，1772年标志着“500年来，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关于谁能占有波罗的海海岸的斗争，终于以德意志人的胜利告终”。⁷⁰ 反对阵营的代表性说法见于亲波兰的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在1981年使用的一个比喻：“波兰是一系列政治活动的受害者，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活体解剖——切割、截肢，最终彻底肢解。而唯一的借口却是病人不太舒服。”⁷¹ 不过戴维斯在书中也援引了俾斯麦对此事的评论，即三国瓜分波兰的行为和中世纪晚期波兰强行瓜分自己邻国领土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促使人们指控这一事件为“我们世代的恐怖”（雅克·马莱·杜·潘）或是“可耻的罪行”（麦考莱）？答案是，接下来的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国家的完整开始成为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概念。⁷² 为了方便采用这种政治话语，这些自由主义评论家闭口不谈那个应该被称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混合的国家。正如保罗·施罗德所指出的，在18世纪的欧洲，瓜分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这次瓜分波兰特殊的地方在于，当时波兰的遭遇类似于殖民地，各国通过瓜分它来缓和国家间的冲突，这和19世纪后期非洲大陆的情形相似。但是，施罗德补充道，瓜分波兰本质上与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出的政治体系是一致的：“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罪行’直接源自18世纪政治活动中典型的规则和需求。”⁷³

神圣罗马帝国

当波兰错综复杂的局势尘埃落定后，生活在彼时的人们纷纷猜测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呢？“波兰仅仅是一顿早餐而已，而且数量有限，并没有很多个波兰可供瓜分。那么，他们的晚宴会在何处进行？”埃德蒙·伯克问道。⁷⁴ 结果，接下来成为“大餐”的就是土耳其人了。他们曾对波兰施以援手的好意被证明是短暂的。1774年7月，《库楚克—凯纳尔吉

和约》结束了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灾难性的战争。凭借这一条约，胜利者俄国在黑海北部海岸线附近获得了许多重大利益：向东，控制了亚速海的入口；向西，控制了布格河—第聂伯河河口；而中间则是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的克里米亚汗国。不仅俄国舰队可以在黑海自由航行，商贸船还可以进入地中海，这就意味着黑海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海，俄国现在也成为影响东地中海地区局势的一股力量。由于流经波兰中部、南部以及俄国西部的水系纷纷向南流去，新占领的这些地区商业潜力巨大。没有人认为叶卡捷琳娜的野心就到此为止了。正如罗斯伯里勋爵所写到的：

如果说历史总是在某一点上不断重复，那么，这指的就是：在某些固定的时间段里，俄罗斯帝国感到自己有向外扩张的需求；而这一扩张通常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此时，其他大国，或者其中某些国家，就会感到恐慌，并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俄国的扩张行动，结果就像试图修剪掉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的枝丫一样。⁷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最近一次的俄土战争期间，“修剪树枝”的活动由奥地利进行。正是由于奥地利的行动，俄国不得不撤出多瑙河诸公国。但是现在约瑟夫皇帝和他的首相考尼茨亲王开始考虑改变策略，也就是要和俄国一起掠夺奥斯曼帝国，而不是百般阻挠俄国。1774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场威胁性的行动，企图以此割占布科维纳地区。布科维纳位于奥地利不久前割占的领土的东南方，是一块重要且广阔的楔形土地。虽然地广人稀（约瑟夫认为这里是“一片真正的沙漠”），但是它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这块土地，就可以把奥地利现有的两块领地——加利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连接在一起。这项要求是基于1771年的联盟条约草案中的一个承诺。奥地利以此作为占领的借口，让整个事情愈发荒诞，因为曾经就是奥地利自己拒绝批准该草案通过

。他们清楚地知道，此时的土耳其已经毫无招架之力。1775年4月，土耳其人只能签署这个强加给他们的条约。⁷⁶

经过18世纪70年代前5年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事件后，昔日群雄纷争的东方归于平静。此时，大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海外。北美殖民者在殖民地发动了叛乱，1778年2月，当法国加入战争后，叛乱演变成了美国独立战争。西班牙和荷兰相继于1779年和1780年开始支援美军对抗英军。然而，弗里德里希对此依旧心神不宁，他意识到，瓜分波兰和俄土战争造成了一个新的并且致命的危险，另外两个东方大国间的和解很有可能以牺牲他为代价。在俄国西侧，叶卡捷琳娜（暂时）非常满意她从波兰获得的利益。在她新情人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的怂恿和帮助下，她贪婪的眼光开始投向南方。在1774—1775年，叶卡捷琳娜曾任命他为俄国南部的总督。⁷⁷ 1774年3月，弗里德里希在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中说，帝国宫闱的守卫发生这种变化“使我郁郁不乐”，接着在10月份，他在信中又发表了一段典型的歧视女性的评论：“女人终归是女人，在女人统治的政府里，由合理的理性引导的稳定政策算什么？对男人的欲求更有影响力！”⁷⁸

波将金（弗里德里希嘲笑地把他叫作“波小金”或者“小波金”[Patukin或是Tapuquin]）和叶卡捷琳娜意识到，如果想把俄国的边界推向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普鲁士基本是指望不上了，但是可以从奥地利获得不少好处，只要可以化解现在两国间的敌意。不过，叶卡捷琳娜知道，只要“圣特蕾莎”（她给玛丽娅·特蕾莎起的绰号）还活着，这就几乎不可能。但是，16次怀孕的辛苦早已让玛丽娅·特蕾莎未老先衰，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算，生于1717年的她已经步入老年。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则倾向于接受俄国的扩张，自1765年起，他独自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在奥地利，还得和其母亲共理朝政，所以他迫切地希望可以早日成为自己国家唯一的主人。他对参加对抗土耳其的行动充满热情，这种热情由来已久：比如，早在1772年的时候，比起瓜分波兰，他就更倾向于瓜分奥斯曼帝国。⁷⁹

18世纪70年代后期，在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强了与俄国结盟的吸引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境况不佳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又一次成为冲突的中心。鉴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没有男性继承人，而现在他又已经50多岁高龄，迟早要出现继承危机。危机发生得很突然：他感染上一种极为致命的天花病毒，回天乏术，很快于1777年12月30日丧命。也许人们会认为，最显而易见的继承人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年长一支的族长。但是，在帝国法律这个神奇的世界中，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自1323年以来就分裂为长幼两支，对于他们是否仍构成一个家族，还有很大讨论的余地。⁸⁰此外，巴伐利亚的领地并不是明确的铁板一块，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很多不同的情况下逐渐积累起来的。简而言之，维特尔斯巴赫继承更迭对法学家来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讨论材料，而对政治家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

在维也纳，长期的规划从1764年就开始了，那时考尼茨写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筹谋之后的计划。⁸¹弗里德里希也从未放松警惕。1777年夏天，他告诉派驻法国宫廷的普鲁士大使戈尔茨男爵，约瑟夫“得步进尺，贪得无厌”，一旦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去世，约瑟夫会马上吞并巴伐利亚。⁸²他在写给自己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中说，这是下一轮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我确切地知道考尼茨亲王曾经说过‘帝国绝不能容忍普鲁士为所欲为；为了掌控它，我们必须清除它’。”弗里德里希还说：“每一个普鲁士人都应该用这句神圣的话时刻警醒自己，以防止我们在安全的错觉中沉沉睡去。”⁸³

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在行动过程中都根本不受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其宪法和法律被他们视若无物。18世纪70年代早期，出于善意，约瑟夫试图对帝国法院进行改革，但毫无成效。在此之后，约瑟夫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轻蔑态度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他把皇帝的职位比作“名誉性权力光环下的幽灵”，帝国事务“令人厌恶”，帝国宪法“十分恶劣”，各

小国君主既无知又懦弱，任由那些迂腐促狭、贪赃枉法的大臣摆布。

⁸⁴ 弗里德里希对帝国的态度也没好到哪里去。约瑟夫把皇帝的职位比作“名誉性权力光环下的幽灵”，弗里德里希则说帝国皇帝是“一个偶像光环下的古老幽灵，虽然曾手握大权，但现如今已经毫无价值”。⁸⁵ 接着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比喻，他说帝国议会“只是一种幻影……各国派往议会的使节就像是圈养在后院朝着月亮吠叫的家犬，叫嚷的声音再大，也是徒劳无益”。⁸⁶ 在统治初期，他就曾利用自己对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皇帝查理七世的绝对影响力，斩断与帝国在司法和礼节方面的最后一丝联系，把勃兰登堡束缚在封建服从义务上的枷锁也就荡然无存了。最具标志性的行为就是，普鲁士代表此后再也不用向帝国新当选的皇帝行跪拜礼了。⁸⁷ 同样，普鲁士的臣民也不能再到帝国法院上诉了。⁸⁸ 查理七世还被迫承认，弗里德里希册封贵族的文书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都有效。⁸⁹ 处于强烈的反帝国、反基督教情绪中的弗里德里希又让人们停止在普鲁士的教堂里替皇帝祷告，他说“这一习俗既陈旧又愚蠢”。⁹⁰ 不过，最具象征性的拒绝神圣罗马帝国的事件，是由他派驻雷根斯堡的代表埃里希·克里斯托夫·冯·普洛托做的。1757年10月14日，帝国的公证人格奥尔格·马蒂亚斯·约瑟夫·阿普里尔到勃兰登堡使节驻地，打算传达帝国议会对弗里德里希入侵萨克森的谴责。⁹¹ 普洛托一把抢过文件，粗暴地把文件塞进了阿普里尔衬衫的前襟，“要多暴力有多暴力”。普洛托又叫来自己的仆人，把阿普里尔扔下楼梯，赶到街上。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亲普鲁士的人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据阿普里尔自己的记述，他是哭着回家的。⁹² 不用说就知道，这故事很快就越传越夸张。倒霉的阿普里尔还因为自己的名字和“4月”同音，结果这件事就被说成是在愚人节（April Fool's Day）那天发生的。⁹³ 报纸上添油加醋、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还配上了栩栩如生的插图。据歌德说，1764年普洛托去法兰克福旅行的时候，当地人把他当成一个名人，他成为象征弗里德里希战胜天主教国家奥地利的化身。⁹⁴

对弗里德里希这样接受过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者来说，神圣罗马帝

国这样的国家“怪异且早已过时”，它是“贵族们的共和国”“一群吵吵嚷嚷的小诸侯国”。⁹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利用这其中的错综复杂的状况，使奥地利的计划落空。所以，当约瑟夫打算改革帝国枢密法院时，他成功地阻碍了这一计划。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家族联盟”的关系和1756年法奥联盟的成立，意味着几个天主教大国联合成一个阵营，这就促进了所谓的帝国政治的“再教派化”。而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要求，任何涉及宗教信仰方面的争议都必须通过谈判解决，这就使弗里德里希和新教诸侯手中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宪法武器来阻挠天主教一方。⁹⁶在德意志境内，宗教上的恐惧和仇恨程度是如此强烈，乃至1756年弗里德里希入侵萨克森，也没能彻底破坏他新教徒英雄的伟大形象。⁹⁷

弗里德里希花了很长时间才变成一个高效的帝国政治家。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皇帝查理七世（1742—1745年在位）短暂的统治期内，弗里德里希提出了一项欠考虑的改革方案，即对几个采邑主教区进行世俗化改革，这一提议几乎让所有人都疏远了他。⁹⁸但是，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利用自己掌握的可观的有利条件。他不仅是帝国议会院的九大选帝侯之一，还手握多张诸侯院的选票（他还拥有马格德堡公爵、哈尔伯施塔特亲王、波美拉尼亚公爵、明登亲王、东弗里西亚亲王等头衔）。除此之外，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3个帝国行政区，弗里德里希的影响即使不说是支配性的，至少也是相当大的。这3个帝国行政区——威斯特伐利亚、下萨克森和上萨克森——覆盖了德意志北部。⁹⁹弗里德里希和他的父亲一样，残酷无情地迫使家族成员进行各种利益联姻，因此，姻亲结盟是霍亨索伦家族扩大影响力的另外一条途径。尽管在那个反军事化的年代有些奇怪，但非普鲁士贵族对普鲁士军官团依然心驰神往，特别是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胜利以后。1756年伦道夫伯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领地的继承人在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对时喜不自胜，在他看来，服务普鲁士国王的荣耀远高于回家继承自己一片还不错的封邑。不过，他的亲戚，黑森-卡塞尔伯爵领地的继承人就没有这

么好运了，在错失冯·哈克军团的指挥权后，他痛心疾首。在伦道夫伯爵眼里，这些愚蠢的人，哭着喊着要在普鲁士谋一份差事，他们原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做得更好。¹⁰⁰ 军官团也吸引了一部分更低级的贵族。1786年，拥有少校以上军衔的689名军官中，有203人不是普鲁士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与普鲁士有亲缘关系的诸侯国的德意志人。¹⁰¹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在七年战争以前，弗里德里希的帝国战略基本上是消极的。但是，当约瑟夫建立自己帝国权威这股短暂的热情在18世纪70年代初期消退以后，¹⁰² 他看到了可以开展更多积极行动的机会。当哈布斯堡从猎场守卫者变成偷猎者，霍亨索伦家族作为偷猎者可能会——也许甚至不得不——变成猎场守卫者。开启这一角色转换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性事件是巴伐利亚选帝侯之死。对此，弗里德里希的第一反应小心而谨慎。正如他写给丹麦王太后的信中所言，他将谨遵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教诲：“欲速则不达。”¹⁰³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处于被动。根据法国使者戈桑骑士的记述，当时有一支奥地利军队进驻巴伐利亚，以支持约瑟夫的主张，当这一消息传到弗里德里希的耳朵里时，他大声说道：“这些人一定以为我死了，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恰恰相反！”¹⁰⁴ 随着土耳其即将向俄国宣战（或者他自己这样认为）以及法国和西班牙马上要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整个欧洲群情激昂，乱成一团。他意识到，巴伐利亚事务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以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为首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其他继承人是什么态度。所以他派格尔茨伯爵前往曼海姆，打探卡尔是否已经和奥地利人达成某种协议。¹⁰⁵

但协议已经达成了。由于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全部继承遗产，卡尔·特奥多尔已经签署了一份公约，承认奥地利人对下巴伐利亚大部分地区、位于施瓦本的明德尔海姆公爵领地以及上普法尔茨（北巴伐利亚）

的波希米亚领地的权利。此时，奥地利正在筹划接下来的谈判，以最终完成兼并计划。¹⁰⁶ 这项计划在维也纳有许多支持者，玛丽娅·特蕾莎尊称考尼茨是“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约瑟夫为自己成功实现一个绝妙的外交计谋而沾沾自喜。¹⁰⁷ 他们还期望之后能以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西南方和尼德兰地区的领地作为交换，占领整个巴伐利亚地区。鉴于他们对弗里德里希的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误判弗里德里希对此的反应？他们真的以为弗里德里希会允许德意志权力的平衡顺利发生这样的转变？他也许会在写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中称自己已是“剑老无芒”，但与此同时，他发号施令，命令军队整装待发。外交部也接到通知要起草一份抗议书，抗议奥地利“不公正和暴力”的行为，寻求开启“某种谈判”的机会，让这些事情不紧不慢、陆陆续续地持续到春天。他以要提前进行例行军事检阅作为借口，要求西里西亚军团于4月1日就位。正如1月26日弗里德里希对他的一位将军说那样，看上去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不可避免了。¹⁰⁸

事实也确实如此。也许奥地利曾使出伎俩引诱了卡尔·特奥多尔，但鉴于他自己也没有继承人，所以还需要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下一位继承人卡尔·奥古斯特、茨韦布吕肯公爵同意才行。弗里德里希还是非常幸运的，卡尔·奥古斯特原本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仰仗法国的补贴才得以勉强应对本国的经济状况，而他的法国金主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的扩张。1778年2月，据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透露，奥地利正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3月24日，法国知会奥地利，割占巴伐利亚的计划并不在1756年条约的范围内，法国不会为此提供外交或军事上的援助。这对约瑟夫和考尼茨来说有如晴天霹雳，他们两人的政策总是要比玛丽娅·特蕾莎激进。这就使整个领地置换方案化为泡影，甚至连保留之前卡尔·特奥多尔已经勉强同意的那部分领土也变得非常困难。¹⁰⁹ 虽然弗里德里希还不能诱使他的俄国盟友提供军事支持，但他觉得，即使直接与奥地利较量也有很大的胜算。正如他在4月份对芬肯施泰因表示过的那样，在之前的战争中他同时阻挡了多方力量，此

次只有奥地利一方，应该完全不是问题。¹¹⁰所以他感觉有必要果断出击。3月18日下发军事动员令，4月6日他离开波茨坦前往西里西亚。不过，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还在进行外交交涉。他向奥地利下发最后通牒，只收到奥方含糊其词的答复。于是，在7月3日，弗里德里希向奥地利宣战，两天之后，普军跨过两国边界。¹¹¹

对普鲁士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从短期看并不光彩，即使从中期目标来看也只能算是勉强满意，如果把眼光放长远点，对此就要有所担忧了。弗里德里希最后一次征战沙场时，已是66岁高龄，体弱多病。冯·施麦陶将军在一份记录中写道，他太虚弱了，就算坐在一匹走得很慢的马上，也几乎坐不稳。¹¹²即便如此，这也没能阻止弗里德里希不断进攻（这预示了普鲁士军队及后来的德军在1792、1806、1813、1866、1870、1914、1939和1941年的行动）。他有理由如此自信。和1756年的光景不同，现在的奥地利人没有一个盟友可以帮他们在西线、北线和东线牵制普鲁士，而此时普鲁士的力量却得到大大增强——2.2万名萨克森人因支持他们的首领对巴伐利亚的部分遗产拥有继承权而支持普鲁士。所以，接下来双方陷入的僵局令弗里德里希极其失望。起初，海因里希亲王的军队在西线赢得了不错的开局，他通过人们原本以为无法通行的关口进入波希米亚地区，突袭了劳东元帅，让后者被迫退守慕尼黑城堡^②。¹¹³也许是因为他本意并不赞成战争，海因里希取得胜利后，就转向了防守态势。同一时期，弗里德里希的东线部队在摩拉维亚地区毫无进展。拉齐元帅带领奥地利人在柯尼希格雷茨以北的易北河上游地区建立起牢固的防御阵势，坐观其变。¹¹⁴这也许会使人回想起弗里德里希描述1744年那场灾难性的战斗时写的话：“必须承认，在波希米亚作战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困难。”34年之后，同样是这个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作战依旧非常困难，甚至更困难了，因为在这段时期内，参战双方之间的军事差距明显缩小了。

进入秋天，军需供给越来越少，逃兵人数攀升，天气也愈发恶劣。9月初就大雪飞扬，注定当年的冬天比往常来得更早些，而且会是一个

严酷的寒冬。9月中旬，海因里希亲王借口军需供给严重短缺，率领部队撤回萨克森，10月初，弗里德里希也随之退回西里西亚。¹¹⁵ 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只有一些小规模冲突，普鲁士往往表现不佳。无所事事的这3个月导致弗里德里希的军队士气低落，军营里疾病滋生，逃兵也越来越多。这三方面原因综合在一起，致使他的部队人数减少了4万人。¹¹⁶ 这是上文所说的“不光彩”的一部分。但是弗里德里希做的这一切已经足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这一直是他各种活动的主要目的。对手阵营内部尖锐的矛盾给了他可乘之机。玛丽娅·特蕾莎极其渴望避免战争，甚至在弗里德里希已经开始进攻之后，她还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向他发出私人请求，说亲自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上战场，对这颗“母亲的心”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¹¹⁷ 她还派图古特男爵作为特使前往普鲁士军营，以期找到某种和解方案。¹¹⁸ 可以理解约瑟夫对母亲在他背后搞小动作的行为愤愤不平：“我们这样做是在告诉他〔弗里德里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武装力量无足轻重，只要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就有义务满足……我声明，我认为这种行为会造成极大的危害。”¹¹⁹

奥地利由三人共治，他们意见不一、没有连贯性，而弗里德里希则是一言九鼎，前者根本不是后者的对手。宣布放弃巴伐利亚所有权，企图以此换得弗里德里希放弃他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有充足得多的理由）应继承的利益，这一尝试显得非常笨拙，只会暴露奥地利的软弱。¹²⁰ 如果战争在1779年得以继续会发生什么？这种猜测毫无意义。到了1778年11月，玛丽娅·特蕾莎已经受够了这一切。正如她告诉奥地利驻凡尔赛大使梅西伯爵的那样，鉴于七年战争的经验 and 普鲁士更强大的财力，打消耗战的想法想都不要想。¹²¹ 截止到这个时候，奥地利已经花费了1亿古尔登，国库已经空空如也。¹²² 此时，欧陆另外两个大国给奥地利提供了一条生路。随着法国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与英国的战争中，沙皇掌控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之时，她拒绝提供军事支援，理由是普鲁士并没有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弗里德里希对此颇然不悦。理论上讲这么做没错，但这有悖于两国的联盟关系

。 ¹²³ 为了向弗里德里希道歉，她10月份派列普宁公爵进行外交斡旋，以期和解。她告诉列普宁公爵，如果奥地利人仍固执己见，就与弗里德里希联络，商讨军事援助的事情。同时，沙皇向波兰西部派遣了3万名士兵以壮声势。 ¹²⁴

由俄国和法国组织的谈判从冬天一直持续到春天。不管是在往来的书面文件还是会面磋商时，双方都不断含沙射影地攻击对方，致使谈判过程异常艰难缓慢。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评论道：“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状态，一边兵戎相见，一边协商谈判。” ¹²⁵ 一直到1779年5月1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才最终在位于萨克森的泰申签订条约。至此，战争正式结束。从领土上来看，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收获最大，1778年1月3日他在与奥地利签订的条约中放弃的几乎所有领土都重归其名下，除了因河东岸的一小块人口约12万的领土。约瑟夫皇帝把这一地区命名为“因河地区”，这就是他辛苦努力后所得到的一切。就像在瓜分波兰事件中一样，真正的胜利者是弗里德里希。他不仅避免了德意志的权力平衡发生颠覆性变化，现在，他对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继承权还得到了周围几个大国的保障。在1772年，西普鲁士可比加利西亚地区有价值得多，而到了1779年，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因河地区。 ¹²⁶ 叶卡捷琳娜也为自己的成功洋洋自得。作为调停的回报，俄国成为条约的担保方。由于《泰申条约》更新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不仅使俄国上升为和法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还开启了俄国继续干涉帝国事务的道路。 ¹²⁷

弗里德里希统治下的普鲁士眼下的处境还好，但是从长远来看，前景则令人担忧。根据许多参战者的记录，普鲁士军队的表现十分糟糕。其中一个记录写道：“普鲁士军队和以前相比，差别很大。将领们暮气沉沉，军官们也一样，他们全都意志消沉，哪怕一点儿战斗秩序也找不到。” ¹²⁸ 海因里希亲王也是满腹牢骚，他埋怨说自己麾下的几位将领早已不适合服兵役，简直就是军队的累赘。冯·布里茨克，80岁，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上战场了；洛绍，自从1760年托尔高战役以来，就有一颗子

弹永久地留在了他脑袋里并且使他失去了记忆；克莱斯特年事已高，动弹不得；有3位少将已经70多岁了；应该指挥后卫军作战的将军只能坐在四轮马车里行进，等等。¹²⁹士兵的质量也在不断退化，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鲁士本民族人被免除了兵役。¹³⁰虽然弗里德里希强调义务和责任的必要性，但他始终没能下定决心清理这些年老力衰的老人，他的后继者们同样如此，一直要等到1806年遭遇惨败他们才不得不这么做。在这次惨败后，路易丝王后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她说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荣耀中睡着了”，但是事实上，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在1763年以后“打起了瞌睡”。¹³¹1767年，他在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中说，七年战争已经“摧毁了军队，破坏了纪律”，但是他的恢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接下来的3年内，一切都将回归正轨。¹³²1778年的战争证明这一预期并不准确。在他统治后期，军队的数量增加了，但是质量并没有相应得到提高。¹³³

1779年5月4日，弗里德里希在泰申会议上的谈判代表约翰·威廉·冯·里德泽尔男爵报告称，法国和俄国的调停者们宣称，马上要签署的这个条约将会保证德意志地区“稳定、安全和持久的”和平。他们还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做出了如下的总结：当奥地利侵害他国利益时，弗里德里希显示出其当机立断的能力，迅速做出回应；法国和俄国显示出他们的外交干涉多么地富有成效；奥地利至少需要15年来修复它千疮百孔的财政状况；鉴于已经知道俄国会出面干预，阻止奥地利的任何扩张行为，约瑟夫原本决意在巴尔干半岛扩张的野心也不得不收敛起来。¹³⁴在弗里德里希的回复中，他同意只要法国、俄国和普鲁士共同行动，德意志的确不会受到侵扰。但又忍不住补充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并引用了诺曼人会说给自己儿子的忠告：“要信任！”“但是我应该相信谁，爸爸？”“谁也不能相信！”¹³⁵

约瑟夫二世

事后证明，弗里德里希的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而调停者们最后的预言很快被现实打破，他们彻底错了。现在还远未到俄国反对奥地利扩张的时候，叶卡捷琳娜正在寻找一位盟友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她知道，玛丽娅·特蕾莎活着的时候是没有机会了，但完全可以等到她去世之后。1780年11月29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玛丽娅·特蕾莎去世不到一个月，约瑟夫就告诉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俄国和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和俄国通力合作，可以获得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若没有彼此，我们就很难获得任何重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¹³⁶ 由于双方都如此热切，盟约的达成并没有拖延太久：1781年5月，两国换文正式结盟。¹³⁷ 联盟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双方必须给对方提供相同的军事援助，但前提是遭受土耳其的攻击。如果遭受其他入侵者攻击，只需要提供一般水平的援助：1万名步兵，2000名骑兵以及适量的大炮，如果战区太远，不便直接派兵援助的话，需提供40万卢布的现金补贴。奥地利在意大利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地被排除在外。¹³⁸ 不管怎样，这一同盟都很有可能产生，但这确实让弗里德里希疏远了叶卡捷琳娜，他在瓜分波兰时算计波兰边界的一系列狡猾的行为，他一贯低估叶卡捷琳娜的能力和决心，以及他常常对女统治者的性生活作出粗俗无礼的人身攻击这一不可救药的习惯，使他把叶卡捷琳娜推到了约瑟夫那边。¹³⁹

不久之后，叶卡捷琳娜就开始利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明显不平等的联盟。此时，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都在北美殖民地上厮杀，她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1783年4月，她宣布吞并克里米亚。俄国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的路线图看起来越来越清晰了，而在这张图上，克里米亚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中转站。1779年，叶卡捷琳娜给她年幼的孙子取名为康斯坦丁，她还打造了一枚纪念章，一面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另一面则是一颗星星闪耀在黑海之上，这就等于公开了她的扩张目标。¹⁴⁰ 占领克里米亚至关重要，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可以确认并加速把俄国的商业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进程。而奥地利却空手而归，因为约瑟夫拒绝了考尼茨的建议，没有吞并多瑙河诸公国。¹⁴¹

可怜的弗里德里希被冷落了。他肯定预见到了这场最近发生的外交变革。1780年夏天，约瑟夫会见叶卡捷琳娜，这就意味着俄国外交风向标已经开始转向南方。这次会面最终被证明“对两国和两位统治者个人来说都是一场胜利”¹⁴²。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普鲁士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完好，1781年5月，或者说，恰好是在叶卡捷琳娜支持约瑟夫抛弃他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加入了俄国反对英国的“武装中立”联盟。¹⁴³两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告诉芬肯施泰因，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协商无果而终，一直到第二年，他还确信不疑。¹⁴⁴直到1783年7月，俄国大使多尔戈鲁基公爵才通知普鲁士外交大臣赫茨贝格，俄国和奥地利已经“续订了他们过去的条约”。¹⁴⁵此时，弗里德里希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约瑟夫在外交上支持俄国占领克里米亚的行为，让一切维持俄普联盟的幻想都化为泡影。¹⁴⁶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沙皇去世，同时暗中扶植她的儿子保罗大公，大公的性格虽然算不上错乱，但也有些反复无常，不过众所周知，他非常喜欢普鲁士，对弗里德里希充满了崇敬之情。¹⁴⁷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风流放纵的生活方式，实现这一计划的希望看上去还不算太渺茫，尽管最后身体强健的她一直活到了1796年。

自1781年5月起，弗里德里希只能依靠自己了。1764年，他和他的俄国盟友似乎一同建立起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但如今，港湾的围墙已经破裂，普鲁士的小船被放逐，又要被迫面对公海上的惊涛骇浪了。面对如此可耻的被孤立的状态，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与另一个被孤立的英国结盟。但他拒绝这么做，原因有三点。第一，长久以来，他一直特别讨厌英国，他常说英国人腐败放纵，物欲横流，挥金如土，还暴饮暴食，尤其是太过傲慢。¹⁴⁸他对海因里希亲王说，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英国人就屈服于“骄奢淫逸、风流放荡之风”的诱惑。¹⁴⁹第二，他永远都忘不掉1762年英国人是如何背叛他的，英国当时背着普鲁士与法国单独媾和，他尤其视“臭名昭著”的布特勋爵为眼中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早已不再受布特勋爵的影响了，弗里德里希却仍然认为他是“

幕后主谋”，在背后操纵一切。¹⁵⁰ 第三，美洲殖民地战争使他相信，在欧洲国际体系中，英国已是强弩之末，这个国家疲惫不堪，濒临破产，派系纷争混乱。¹⁵¹ 所以，他拒绝了英国多次的结盟提议。他把英国和普鲁士比喻成两个溺水的人：如果他们抱紧彼此，只会下沉得更快。¹⁵² 美国独立战争后，这种错误的认识迅速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开来，比如，在约瑟夫二世眼里，英国现在已经降级为一个二等或者三等国家。¹⁵³

有些矛盾的是，最后事实证明，俄奥联盟并没有像看起来那样成为关乎普鲁士生死存亡的威胁，却成了普鲁士外交胜利的跳板。这一胜利包括两方面，首先是法国的反应。自两个半世纪以来，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是法国在东欧的天然盟友，俄国占领克里米亚使他们倍感恐惧。为了支持北美殖民地的叛乱者，他们刚刚才结束了一场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虽然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军事干涉，但法国人却可以发动外交攻势，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他们要求——也有权利要求——得到奥地利盟友的帮助。所以，当法国人发现约瑟夫不仅全力支持叶卡捷琳娜，而且在过去两年里还秘密结盟时，他们有理由感到气愤。难怪无能的奥地利驻凡尔赛大使梅西伯爵要被迫与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进行了几次“热烈交流”。¹⁵⁴ 于是，外交中的不变法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促使法国和普鲁士联手，在非正式的合作中走到了一起。¹⁵⁵

另一方面是，与俄国结盟，使约瑟夫躁动不安的野心继续膨胀。他满脑子都是各种新奇的主意，其中一些想法也有道理，但这些想法都没什么可操作性，特别是同时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1784年，他在维罗纳更换马匹时，问及该城的人口数量，就立刻有谣言说他图谋占领威尼斯共和国，这就是他的盲目扩张给人留下的印象。¹⁵⁶ 不管是真的，还是只是一种想象，他的计划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引起人们深深的恐惧和愤怒，以至于弗里德里希可以像一个彬彬有礼的骑士一样站出来。约瑟夫这个人急躁冒进，他是莱辛定义的那种现代人的典型：“他对未来常常

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但他没有耐心等待未来的来临。”¹⁵⁷ 在过去39年令人沮丧的岁月里，他被自己强势的母亲束缚；现在所有曾经被压抑的能量都爆发出来。差不多在两三年内，除了一小撮想法和他一致的人外，他几乎疏远了所有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那些神职人员、贵族，还有平民中大量的既得利益者以及维护自己保守观点的人，很快就开始大声抗议了。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甚至那些传统上忠于皇帝的诸侯也被他不明智的提议赶出了自己的阵营。他年轻时曾到处宣扬国家政权至高无上的信条：“一切存在的事物皆是为了国家，‘国家’这个词包括一切，因此所有居住在国家中的人都要团结一致，促进国家利益。”¹⁵⁸ 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他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包括中央集权化、标准化、世俗化、德意志化，以及一切和现代化有关的各种运动。鉴于他统治的这两个国家——哈布斯堡君主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尝试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奥地利的国家利益与帝国法律产生冲突，所有那些依赖于维护后者而生存的人都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寻求保护。首当其冲的是附近那些教区管辖范围伸到哈布斯堡领土上的采邑主教。约瑟夫迅速清理了这些所谓的“外国”管辖权，并使主教管辖区范围和奥地利的领土边界相一致。1783年，他没收了帕绍主教在奥地利的所有财产，这是对帝国法律非常粗暴的践踏。¹⁵⁹ 更令诸侯们担忧的是，他在帝国内大肆扩张奥地利的势力（而不是帝国影响力）。早在在玛丽娅·特蕾莎去世之前，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就已经成功当选为科隆大主教兼选帝侯和明斯特采邑主教的“副手”。这就意味着，现任主教去世之后（这两个主教区由同一个人兼任主教），一位哈布斯堡大公就将自动继承这两个位于德意志西北部广阔、繁荣且极具战略意义的公国。有人认为，这位身兼数职的大公还要兼领其他许多教会国家的领地。¹⁶⁰

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784年突然传出一个消息，约瑟夫正在恢复实施他以前的一个计划，即用奥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选帝侯国。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意识到这将给奥地利带来巨大的

好处。巴伐利亚曾经像一枚楔子把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希米亚和蒂罗尔的领地分隔开来，而一旦获得巴伐利亚，它将成为连接两者之间的纽带。随后，哈布斯堡家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德意志南部的主宰者。从各个方面来看，巴伐利亚都是西里西亚完美的替代品。如果约瑟夫不把事情变得复杂，也许他的计划真的可以圆满完成。现任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渴望离开这里，他不喜欢慕尼黑，但1778年他不得不移居此处（慕尼黑也不欢迎他），他出生在布鲁塞尔，他的母亲出身阿伦贝格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幻想自己成为“比利时国王”，他也不想搬回曼海姆，回到与他分居的妻子身边。¹⁶¹

自从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弗里德里希就一直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警惕状态中。1779年9月，他告诉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卡尔·特奥多尔性格胆小到病态，完全处于奥地利的控制之下，他所有的顾问都被奥地利收买了，甚至连听他告解的神父也包括在内。他预测道，约瑟夫一定会再次试图吞并巴伐利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由于在《泰申条约》中，法国和俄国出面担保，他才没有采取行动。¹⁶²3年之后，他又和自己的外甥不伦瑞克公爵抱怨道：约瑟夫在各方面都对他耍阴谋诡计，让他70多岁的肩膀还要被迫扛起重负。¹⁶³而且，情况正在恶化。经过北美战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后，法国的力量被削弱了；而俄国成为奥地利的盟友。在吞并克里米亚这一事件中，约瑟夫全力支持叶卡捷琳娜，却没有为自己要求任何利益，现在他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回报。1784年5月，他将换取巴伐利亚这一计划的详情告知叶卡捷琳娜，并请求她的帮助。她迅速答应了约瑟夫的要求，承诺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¹⁶⁴

弗里德里希很幸运，屡教不改的约瑟夫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刚提出交换计划后就反悔了，他不想放弃在奥属尼德兰的所有利益。接下来对计划的许多混乱的微调，只能激怒卡尔·特奥多尔。更可怕的是，他还认为，这是一个向荷兰共和国施加压力的好时机，可以迫使他们向外国船只开放斯海尔德河的航道。实际上，自1585年荷兰占领

河口后，就禁止外国船只在斯海尔德河航行，从法律上讲，则是在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对外关闭的。而这就意味着昔日繁华的安特卫普港将变成一汪死水。这当然和交换巴伐利亚的计划有关，因为如果安特卫普港重新忙碌起来，奥属尼德兰地区无疑会对卡尔·特奥多尔更具有吸引力。不幸的是，就在约瑟夫向荷兰发出外交照会的同时，法国恰好决定争取与荷兰结盟。法国人相信，只要驻扎在好望角和锡兰的荷兰海军可以帮助他们保护其在印度洋上的岛屿，法国就能够与驻扎在印度的英国人抗衡，就像之前在北美殖民地一样。认为这一决策将关乎法国人未来在海外世界的命运也不为过。所以，当不得不在现在的盟友奥地利和未来的盟友荷兰共和国之间做出选择时，法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¹⁶⁵

约瑟夫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他派出一艘奥地利船驶入斯海尔德河，企图迫使荷兰就范（荷兰人看出来约瑟夫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把这艘船赶了回去）；他主动提出降低对荷兰的要求，以换取法国支持他们交换巴伐利亚（法国拒绝了）；他还让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向路易十六施压（事实证明，路易十六在政治问题上永远不会受她的影响）。¹⁶⁶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完全找不到办法绕开法国的阻挠，在整件事情中，法国人坚定的态度和高明的外交手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法国旧制度的大幕即将落下之前，他们最后一次采取了如此果断的行动。1785年1月2日，法国国务会议在凡尔赛召开，对于是否支持奥地利交换巴伐利亚的问题，每位大臣都投了反对票，只有外交大臣韦尔热纳除外，而他这么做也只是因为害怕玛丽·安托瓦内特事后怪罪于他。¹⁶⁷卡尔·特奥多尔的继承人茨韦布吕肯公爵成了这一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他本身就属于亲法派，最近法国又赠予他600万里弗尔的巨款，并许诺将来还会给他更多，这使他愈发亲近法国。所以，当俄国公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试图请求他批准交换计划时，他当即驳回了这一请求。他还不愿就此打住，非得再往对方的伤口上撒把盐不成，他紧接着就给约瑟夫写了一封“无礼且荒谬的”信，强调他拒绝合作。

他还写了一封信寄往波茨坦，把上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弗里德里希，并恳请他的支持。¹⁶⁹ 弗里德里希自然是欣然同意。理论上说，此时法国仍然是奥地利的盟友，俄国又如此积极地推动巴伐利亚交换计划，而英国显然是靠不住的，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同德意志诸侯们建立起联盟，合力阻挠约瑟夫的计划。弗里德里希萌生这一想法已经很久了。早在1780年，他可能就已经在考虑此事了，但直到1783年春，他第一次和赫茨贝格讨论起此事之后，才有史料表明他持续关注此事。¹⁷⁰ 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的君主也曾计划建立一个类似的邦联，他们希望在两个德意志霸权国家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¹⁷¹ 他们讨厌约瑟夫，但是也害怕弗里德里希，像“一艘小船被两艘战舰夹在中间”。这是歌德的一个比喻，用来描述他的雇主萨克森-魏玛公爵深感不安的状态。萨克森-魏玛公爵是夹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众多诸侯之一。¹⁷² 一旦弗里德里希统领全局，这些小船就没有独立行动的机会了，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喜欢他而不是约瑟夫，所以就站到了普鲁士这边。¹⁷³ 弗里德里希强调，他所希望的一切，就是保护帝国传统宪法免受暴力革新的影响，这就使周围的小诸侯国感到很放心。¹⁷⁴ 赫茨贝格起草了联盟宪法的最终版，日期为1785年3月15日。这部法律承诺保护帝国所有成员免受“侵犯、世俗化和交易”，而不是仅仅保护那些实际加入联盟的成员。¹⁷⁵

联盟的招募工作立即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举其实毫无意义，因为约瑟夫一听说法国持反对意见，茨韦布吕肯也抵制交换计划，他就已经绝望地放弃了计划。¹⁷⁶ 更重要的是，约瑟夫这一系列愚笨的活动——“其行事方式和所获得的成果都为人所不齿”¹⁷⁷——对弗里德里希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借此机会，他一跃成为帝国的“救世主”。一时间，一大群诸侯纷纷拥入他的庇护之下，比如：萨克森-魏玛、萨克森-哥达、茨韦布吕肯、不伦瑞克、巴登、黑森-卡塞尔、3位安哈尔特诸侯、安斯巴赫、普法尔茨-比肯费尔德、梅克伦堡-什未林、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除了以上这些“小虾米”，还必须加上3条重量级的“大鱼”：美因茨大主教兼选帝侯，作为帝国宫相和德意志的总主教，他虽然权力不大但威望很高；此外还有萨克森选帝侯和汉诺威选帝侯。¹⁷⁸尤其使人高兴的是，乔治三世非常热衷于参与这件事。普鲁士驻英国大使卢西伯爵向弗里德里希汇报的时候称，乔治三世“对陛下的爱国热忱赞不绝口，近乎时时致以最崇高的礼赞”。弗里德里希对此感到惊讶，但总之他非常满意。¹⁷⁹英国各部大臣们此时恰好正在千方百计地想与奥地利结盟，乔治三世直接漫不经心地忽视掉他与各部大臣之间的冲突，继续在联盟的发展中发挥极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¹⁸⁰

当诸侯联盟最终于1785年7月23日正式建立时，距离弗里德里希生命的尽头只剩下一年了。尽管普鲁士仍然没有一个大国盟友，但它已经不再孤立，而且，通过汉诺威王室的关系，普鲁士也和英国建立了某种联系。就在弗里德里希去世一年以后，这种联系带来了英普联盟在荷兰共和国的一场大胜。宿敌奥地利遭受的失败和羞辱也会让弗里德里希感到满意。如果让弗里德里希活到1787年以后，看见约瑟夫被卷入巴尔干半岛一场代价极其高昂又没有意义的战争，不知他得有多兴奋。经过这场战争，哈布斯堡君主国滑向彻底崩溃的边缘。弗里德里希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诸侯联盟在公共关系上为他赢得的赞誉。随着赫茨贝格的宣传队伍开足马力，一大批宣传册、诗歌、戏剧和画作涌现出来，颂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弗里德里希被誉为第二个赫尔曼，因为他也捍卫了德意志的自由。¹⁸¹这一系列事件在18世纪80年代激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爱国主义的讨论，预示着之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将引起许多更为经典的辩论。¹⁸²诸侯联盟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¹⁸³弗里德里希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而且，尽管对约瑟夫最致命的打击是他自己造成的，弗里德里希也完全可以将其说成是自己的胜利。弗里德里希也非常幸运。因为法国已经惹得约瑟夫非常不快，在不进一步激怒约瑟夫的情况下，他们也无力

宣传自己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泰申条约》的两个担保国都被排挤在外了。叶卡捷琳娜对此格外愤怒，对她来说，诸侯联盟的出现是对她的德意志政策的一次“粉碎性打击”。¹⁸⁴ 弗里德里希应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政策，尤其是诸侯联盟的成立，也许是他帝王生涯中，唯一一个获得历史学家们毫无保留的交口称赞的方面。这些溢美之词花样繁多，从“辉煌的成就”（冯·阿雷廷）、“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政治家”（彼得·鲍姆加特）、“史上最成功的帝国政治家之一”（福尔克尔·普雷斯）到“一个杰出的帝国政治家”（乔基姆·惠利）。¹⁸⁵ 事情很快就要起变化了：法国逐渐陷入了破产危机；随着俄、奥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爆发，“东方问题”争端再起，紧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引发了一系列战争。但是这一切都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弗里德里希在一个完美的时刻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¹ Klaus Zernack, “Negative Polenpolitik als Grundlage deutsch-russischer Diplomatie in der Mächtepolitik des 18. Jahrhunderts,” in idem, *Preussen, Deutschland, Polen: Aufsätz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ed. Wolfram Fischer and Michael G. Müller (Berlin, 1991), p. 234.

² P.C., vol. 4, p. 101.

³ *Œuvres*, vol. 8, p. 207. See also Wolfgang Stribny, *Die Russlandpolitik Friedrichs des Grossen 1764–1786* (Würzburg, 1966), p. 9.

⁴ *Œuvres*, vol. 26, p. 358.

⁵ Koser, vol. 2, p. 425.

⁶ P.C., vol. 23, pp. 141–2.

⁷ Ibid., p. 167.

⁸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1981), p. 188.

⁹ Robert Howard Lor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A Study in Diplomatic History*,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Cambridge, MA, 1915), vol. 23, p. 48. 这本书仍然是有关该时代波兰方面情况的最好的英语记录。Herbert H. Kaplan的*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d (New York and London, 1962) 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Michael G. Müller, *Die Teilungen Polens 1772 1793 1795* (Munich, 1984), p. 98, n. 43认为, 这本书并非如波兰人批评的那样倾向性太强, 更大的问题是不充分和错误。

10 Quoted in Simon 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2009), p. 186.

11 Franziska Mücke, “‘Le mamamouchi est arrivé ... ’ Friedrich II. und die erste Gesandtschaft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28–33.

12 P.C., vol. 23, p. 273. 这一幕在后面这篇优秀的文章中被描述得很详细, 见H. M. Scott, “Frederick I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Prussian alliance of April 1764,”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7 (1977), pp. 2–22。

13 Koser, vol. 2, p. 437.

14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1981), vol. 1, p. 517.

15 Ibid., p. 513.

16 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2, 1793, 1795* (London, 1999), p. 40.

17 Simon 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2001), p. 162. 这部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精彩分析不应该与前面注释10列出的同一作者的更有传记性质的研究相混淆。

18 P.C., vol. 27, pp. 417–18.

19 Albert Sorel, *La Question d’Orien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78), p. 15; Koser, vol. 2, p. 455.

20 关于这场战争, 可以读到的最好的记录是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pp. 205–14, 尽管在日期上有很多印刷错误。

21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p. 66.

22 Lor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p. 31.

23 Müller, *Die Teilungen Polens*, p. 13.

24 Lor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p. 35.

25 Müller, *Die Teilungen Polens*, p. 19.

26 *Œuvres*, vol. 16, p. 3; Hans-Jürgen Bömelburg, *Friedrich II.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Polen. Ereignis- und Erinnerungsgeschichte* (Stuttgart, 2011), p. 16.

27 Dietrich, p. 670.

28 *Œuvres*, vol. 2, pp. 27–8. Translation used is from Posthumous Works (London, 1789), vol. 1, pt 1, pp. 41–2. See also Bömelburg, *Friedrich II.*, pp. 84–8.

29 Agnieszka Pufelska, “Die verpasste Grösse: Friedrich II. und Pol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08.

30 *Œuvres*, vol. 23, pp. 235–6.

31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1, p. 511.

32 *Œuvres*, vol. 14, p. 219.

33 Abbé Denina, *La Prusse littéraire sous Frédéric II, ou 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plupart des auteurs, des académiciens et des artistes qui sont nés ou qui ont vécu dans les états prussiens depuis MDCCXL jusqu’à MDCCLXXXVI. Par ordre alphabétique. Précedée d’une introduction, ou d’un tableau général des progrès qu’ont faits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dans les pays qui constituent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Berlin, 1790), vol. 2, p. 80.

34 奥地利一方最全面的记录，可参见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8, pp. 170ff. 也可以参见Derek Beales, *Joseph II* (Cambridge, 1987), vol. 1: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1–1780*, pp. 282–3。

35 P.C., vol. 28, p. 84.

36 H. M.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1756–1775* (Cambridge, 2001), p. 189.

37 P.C., vol. 29, p. 42, n. 1.

38 To Finckenstein, Breslau, 29 August 1769, *ibid.*, p. 53. 关于此次会面的奥地利方面的情况，可参见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284–5。

39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p. 194.

40 *Ibid.*, p. 207. 这段叙述清晰透彻，令人钦佩，最好地呈现了事件的经过。

41 *Ibid.*, p. 206.

42 Colin Jones, *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V to Napoleon* (London, 2002), p. 278.

43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p. 50.

44 Sorel, *La Question d’Orient au XVIIIe siècle*, pp. 144–5.

45 Kurd von Schlöz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Katharina II.* (Berlin, 1859), p. 230, 坚持认为邀请来自叶卡捷琳娜。

46 Quoted in Chester V. Easum, *Prince Henry of Prussia: Brother of Frederick the Great* (Westport, CT, 1942), p. 263.

47 P.C., vol. 30, pp. 406–7; von Schlöz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Katharina II.*, pp. 24–50. Stribny坚持认为，正是俄国对海因里希亲王提出的这一建议，让弗里德里希开始行动了。参见Die Russlandpolitik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68。

48 Quoted in Koser, vol. 2, p. 466. See also Frank Göse, “Prinz Heinrich und die erste Teilung Polens,” in Burkhardt Göres (ed.), *Prinz Heinrich von Preussen: ein Europäer in Rheinsberg* (Berlin, 2002), p. 129.

49 P.C., vol. 30, p. 483.

50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p. 100.

51 通过P.C., vols. 30–31，可以追踪每周乃至每日的谈判情况，Adolf Beer, *Die erste Theilung Polens* (Vienna, 1873), vol. 3翻印的文件可以作为补充。vol. 2翻印了弗里德里希和芬肯施泰因的通信节选，更完整的版本可参见P.C.。Beer书中的大部分文件都与奥地利方面相关。

52 Quoted in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 295.

53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p. 81.

54 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London, 2006), p. 166.

55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297–8.

56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1, p. 516.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1994), p. 16.正如此处指出的那样，这句嘲讽的话更能证明弗里德里希的玩世不恭，而不是玛丽娅·特蕾莎的虚伪，因为她确实有真正的道德顾虑，也能够看出如此瓜分波兰是违背奥地利的利益的。

57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p. 89.

58 Ibid.

59 P.C., vol. 32, p. 249. 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有德文译本出版，参见Otto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Ausgewä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eiherr vom Stein-Gedächtnisausgabe* (Darmstadt, 1982), vol. 22, p. 473.

60 P.C., vol. 32, p. 267. 该文本已经有德文译本出版，参见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473–4。

61 *Œuvres*, vol. 23, p. 290.

62 Ibid., p. 293. 弗里德里希指示的距离是“20里”。在当时的普鲁士，1里大约为7.5千米，参见Fritz Verdenhalven, *Alte Masse, Münzen und Gewichte aus de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Neustadt an der Aisch, 1968), p. 36。在这段文字中，弗里德里希口中的“*quelque police*”的最佳翻译大概是“法律和秩序”。

63 Wolfgang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Stuttgart, 1996, 2003), vol. 2, pp. 41–2.

64 Hans-Jürgen Bömelburg, *Zwischen polnischer Ständegesellschaft und preussischem Obrigkeitsstaat. Vom Königlichen Preussen zu Westpreussen 1756–1806* (Munich, 1995), p. 470.

65 Pierre Rain,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d'Henri IV à Vergennes* (Paris, 1945), p. 293;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p. 222.

66 Ibid., p. 4.

67 D. B. Hor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and 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Edinburgh and London, 1945), p. 11.

68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 (ed.), *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 1774* (reprint ed, Heidelberg, 1975), 74 (12 December 1774), p. 586.

69 Lehndorff, vol. 3, p. 242.

70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Leipzig, 1927), vol. 1, p. 63.

71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1, p. 511.

72 Ibid., p. 525.

73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p. 19. See also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Tausch, Teilung und Länderschacher als Folgen des Gleichgewichtssystems der europäischen Grossmächte,” in Klaus Zernack (ed.), *Polen und die polnische Frage in der Geschichte der Hohenzollernmonarchie 1701–1871* (Berlin, 1982), pp. 56–9.

74 Quoted in Hor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and 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p. 13.

75 Lord Rosebery, Pitt (London, 1892), p. 103. 这仅仅是这本才华横溢的英文散文杰作中众多引人入胜的比喻之一。

76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301–2.

77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p. 359.

78 P.C., vol. 35, p. 215; vol. 36, pp. 96–7.

79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 432.

80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Wiesbaden, 1967), vol. 1, p. 111; Georg Schmidt, *Wandel durch Vernunft.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 2009), p. 197.

81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389–90.

82 P.C., vol. 39, pp. 150–51.

83 Ibid., p. 152.

84 Quoted in T. C. W. Blanning, *Joseph II* (London, 1994), p. 148. 这些言论的完整出处见于该书p. 158的注释81。

85 P.C., vol. 1, p. 7.

86 *Œuvres*, vol. 2, p. 32. Translation used is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1, pp. 46–7.

87 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 *Des Kaisers alte Klei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und Symbolsprache des Alten Reiches* (Munich, 2008), p. 293. 要了解这一重要作品的英文摘要，可参见她的“On the Function of Rituals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R. J. W. Evans, Michael Schaich and Peter H. Wilson (ed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495–1806: New Perspectives* (Oxford, 2011), pp. 359–73.

88 Arnold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eines Staatsmannes* (Tübingen, 1934), p. 170.

89 Peter H. Wilson, “P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Holy Roman Empire, 1740–1786,”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1, 2 (2008), p. 362.

90 Joachim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Oxford, 2012), vol.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p. 400.

91 虽然当时使用了“剥夺法律权益”这个词，但这并不是当时强加给普鲁士的惩罚，尽管奥地利人尽了最大努力。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将获得合法的理由来肢解普鲁士，因为弗里德里希的土地将被没收。参见Wilson, “P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Holy Roman Empire, 1740–1786,” p. 350.

92 阿普里尔的叙述在Carlyle, vol. 5, pp. 184–5得到了翻印。

93 Manfred Schort, *Politik und Propaganda.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in den zeitgenössischen Flug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2006), p. 143.

- 94 Goethes Werke (Weimar, 1890), vol. 26: *Dichtung und Wahrheit*, pp. 288–90.
- 95 Gustav Berthold Volz, “Friedrichs des IIten Plan einer Losreissung Preussens von Deutschland,”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22 (1920), p. 276.
- 96 Gabriele Haug-Moritz, *Württembergischer Ständekonflikt und deutscher Dualismus.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verbands i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geschichtliche Landeskunde in Baden-Württemberg*, series B (Stuttgart, 1992), p. 145; 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 *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 vom Ende des Mittelalters bis 1806* (Munich, 2006), p. 104.
- 97 Ibid., p. 169.
- 98 Peter Baumgart, “Säkularisierungspläne Friedrichs II.,” in Joachim Köhler (ed.), *Säkularisationen in Ostmitteleuropa* (Cologne, 1984), p. 64.
- 99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397.
- 100 Lehndorff, vol. 1, p. 276. 1757年，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储君路德维希在他父亲的命令下回家了。
- 101 Wilson, “P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Holy Roman Empire, 1740–1786,” p. 361. Wilson在pp. 366–71列出了1713—1786年间在普鲁士担任团队指挥官的所有帝国诸侯和伯爵。
- 102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132–3.
- 103 P.C., vol. 40, p. 5.
- 104 *Recueil des instructions données aux ambassadeurs et ministres de France depuis les traités de Westphali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01), vol. 16: *Prusse*, ed. Albert Waddington, p. 532.
- 105 Ibid., p. 9.
- 106 Koser, vol. 2, p. 523.
- 107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392–3.
- 108 P.C., vol. 40, pp. 55–9.
- 109 H. W. V. Temperley, *Frederic the Great and Kaiser Joseph: An Episode of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15, reprinted 1968), pp. 91–5.
- 110 P.C., vol. 40, p. 356.
- 111 Koser, vol. 2, p. 530. Koser提供了有关战争的最佳描述。还有一份很好的英文记

载，参见David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2000), ch. 22。

112 Kurd Wolfgang von Schöning, *Der Bayerische Erbfolge-Krieg* (Berlin and Potsdam, 1854), p. 1. Schmettau也评论道“这是优秀演员表演的一场蹩脚戏”，见ibid., p. 2。

113 Daniel Hohrath, “Die Rolle des Prinzen Heinrich im Bayerischen Erbfolgekrieg von 1778–1779,” in Göres (ed.), *Prinz Heinrich von Preussen*, pp. 113–14.

114 Koser, vol. 2, pp. 531–4.

115 P.C., vol. 41, p. 473.

116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ton Abbot, 1974), pp. 204–5;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Maria Theresa: The Armed Forces of Imperial Austria 1740–1780* (London, 1977), pp. 210–13.

117 他们的通信见于 *Œuvres*, vol. 6, pp. 205–33。

118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10, pp. 449–69.

119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 407.

120 Aretin,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vol. 1, p. 119.

121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ol. 10, p. 579.

122 Beales, *Joseph II*, vol. 1, pp. 421–2.

123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257.

124 Alexander Brückner, *Katharina die Zweite* (Berlin, 1883), p. 314; Temperley, *Frederic the Great and Kaiser Joseph*, pp. 186–7.

125 Ibid., p. 202.

126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Stuttgart, 1997), vol. 3: *Das Reich und der österreichisch-preussische Dualismus (1745–1806)*, p. 203; Volker Pres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Reichspolitiker,” in Heinz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6), p. 50.

127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p. 381; 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Russia as a Guarantor Power of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Under Catherine II,”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 Supple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00–1806* (1986), pp. 141–60.

128 Koser, vol. 2, p. 534. Cf.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205.

129 Schöning, *Der Bayerische Erbfolge-Krieg*, p. 23.

130 Hans Bleckwenn, “Bauernfreiheit durch Wehrpflicht-ein neues Bild der altpreuussischen Armee,”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Herford and Bonn, 1987) [no editor listed], p. 59.

131 关于露易丝是否真的写过这些话的争论，可参见Luise Schorn-Schütte, *Königin Luise. Leben und Legende* (Munich, 2003), p. 74。

132 *Œuvres*, vol. 26, p. 349.

133 Marcus von Salisch, “‘Von Preussen lernen ... ?’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und die Entwicklungen der Zeit,”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72.

134 P.C., vol. 43, p. 70.

135 *Ibid.*, p. 71.

136 Joseph to Count Ludwig Cobenzl, 23 December 1780 – Adolf Beer, *Joseph II., Leopold II. und Kaunitz. Ihr Briefwechsel* (Vienna, 1873), p. 26.

137 在所有语种中关于奥地利政策的最好记录可以参见Derek Beales的约瑟夫传记的第二卷 *Against the World, 1780–1790* (Cambridge, 2009), ch. 11。

138 关于谈判有一份非常好的描写，参见Karl A. Roeder, *Austria’s Eastern Question* (Princeton, 1982), pp. 159–62. See also Isabel de Madariaga, “The secret Austro-Russian Treaty of 178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8 (1959)。

139 Stribny, *Die Russlandpolitik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p. 77–82, 107.

140 Brückner, *Katharina die Zweite*, p. 334.

141 Beales, *Against the World*, p. 383.

142 Beales,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p. 436.

143 Isabel de Madariaga, *Britain, 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 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62), pp. 320–21.

144 P.C., vol. 46, p. 15. 《政治通信集》没有收录1782年4月以后的信件。弗里德里希一直相信，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必然存在敌意，相关论述参见P. Bailleu, “Der Ursprung des deutschen Fürstenbunde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41 (1879), pp. 415, 425。正如Bailleu评论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对于叶卡捷琳娜的意图“了解不足”。

145 Bailleu, “Der Ursprung des deutschen Fürstenbundes,” p. 425.也可参见 Robert Salo

mon,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Vergennes* (1780–1784) (Paris, 1935), p. 73。

146 Koser, vol. 2, p. 610.

147 Simon Sebag 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The Life of Potemkin* (London, 2000), p. 158. 即使是大公和他那出生于符腾堡的妻子玛丽，也在1781年末站到了奥地利那边。
。——Stribny, *Die Russlandpolitik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154。

148 Koser, vol. 1, p. 498; Dietrich, p. 660.

149 *Œuvres*, vol. 26, p. 550.

150 Leopold von Ranke, *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 (Leipzig, 1871–2), vol. 1, p. 149. 1782年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还坚持着这一观点——P.C., vol. 46, p. 427。
。

151 Bailleu, “Der Ursprung des deutschen Fürstenbundes,” p. 433.

152 Friedrich Karl Wittichen, *Preussen und England in der europäischen Politik 1785–1788* (Heidelberg, 1902), p. 31.

153 T. C. W. Blanning, “‘That horrid electorate’ or ‘Ma patrie germanique’? George III, Hanover and the *Fürstenbund* of 1785,”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 2 (1977), pp. 314–15.

154 关于法国的反应，最好的叙述见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and Jules Flammarion (eds.),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du comte de Mercy-Argenteau avec l’empereur Joseph II et le prince de Kaunitz* (Paris, 1889–91), vol. 1, pp. 185, n. 2, 188–9。

155 John Hardman and Munro Price (eds.), *Louis XVI and the Comte de Vergennes: Correspondence 1774–1787,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vol. 1, p. 134. 该书的长篇导论 (154页) 目前是对这一时期法国外交政策的最佳描述。

156 Karl Gödeke, “Hannovers Antheil an der Stiftung des deutschen Fürstenbundes,” *Archiv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Niedersachsen* (1847), p. 70. 弗里德里希在《从胡贝图斯堡和约到瓜分波兰的回忆录》中写道，众所周知，约瑟夫盯上的目标是弗留利、巴伐利亚、波斯尼亚、阿尔萨斯、洛林和西里西亚——*Œuvres*, vol. 6, p. 78。

157 Quoted in Christof 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Frankfurt am Main, 1991), p. 225.

158 Quoted in Blanning, *Joseph II*, p. 56.

159 *Ibid.*, pp. 94–5.

160 *Ibid.*, pp. 148–9. 另见注释中列出的文献。

- 161 Blanning, *Joseph II*, p. 144. 最全面的叙述见于Beales, *Against the World*, pp. 393–8。
- 162 P.C., vol. 43, p. 261.
- 163 Ibid., vol. 46, p. 427.
- 164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ed.), *Joseph II. und Katharina von Russland. Ihr Briefwechsel* (Vienna, 1869), pp. 224–5, 231.
- 165 关于这一事件，最好的叙述见Beales, *Against the World*, ch. 11。
- 166 Ranke, *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 vol. 1, p. 203.
- 167 Paul P. Bernard, *Joseph II and Bavaria: Two Eighteenth-century Attempts at German Unification* (The Hague, 1965), p. 203.
- 168 Beales, *Against the World*, p. 396.
- 169 Schmidt, *Wandel durch Vernunft*, p. 221.
- 170 Bailleu, “Der Ursprung des deutschen Fürstenbundes,” p. 411; Ludwig Häusser,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Tod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is zur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Bundes* (Berlin, 1861), vol. 1, p. 165.
- 171 关于这一计划的早期状态，参见Maiken Umbach, “The Politics of Sentimentality and the German Fürstenbu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1, 3 (1998), pp. 679–704。
- 172 Schmidt, *Wandel durch Vernunft*, p. 220.
- 173 Alfred Kohler, “Das Reich im Spannungsfeld des preussisch-österreichischen Gegensatzes. Die Fürstenbundbestrebungen 1783–1785,” in Friedrich Engel-Janosi, Grete Klingenstein and Heinrich Lutz (eds.), *Fürst, Bürger, Mensch. Untersuchungen zu politischen und soziokulturellen Wandlungsprozessen im vorrevolutionären Europa* (Vienna, 1975), pp. 76–92.
- 174 Horst Möller, *Fürstenstaat oder Bürgernation. Deutschland 1763–1815* (Berlin, 1989), p. 267.
- 175 Ranke, *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 vol. 1, p. 223.
- 176 Beales, *Against the World*, p. 396.
- 177 Ibid., p. 397.
- 178 Kohler, “Das Reich im Spannungsfeld des preussisch-österreichischen Gegensatzes,” p. 92.

179 Wilhelm Adolf Schmidt,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Unionsbestrebungen seit der Zei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erlin, 1851), vol. 1, p. 147.

180 Blanning, “‘That horrid electorate’ or ‘Ma patrie germanique’?,” *passim*.

181 Wolfgang Burgdorf, *Reichskonstitution und Nation. Verfassungsreformprojekte für 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 im politischen Schrifttum von 1648 bis 1806* (Mainz, 1998), p. 289.

182 Ibid., pp. 347–51; Schmidt, *Wandel durch Vernunft*, pp. 221–5.

183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281–2.

184 Lor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p. 71; Dietrich Gerhard, *England und der Aufstieg Russlands* (Munich and Berlin, 1933), p. 182.

185 Areti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 vol. 3, p. 315; Peter Baumgart, “Schlesien im Kalckül Friedrichs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europäischen Implikationen der Eroberung des Landes,” in idem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 11; Pres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Reichspolitiker,” p. 26;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382. 这仍然是一个有足够研究空间的领域。正如Peter Wilson所写的那样, “普鲁士的帝国政策史, 或与帝国的政治关系史, 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写出来”。——“Prussia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1700–40,”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36, 1 (2014), p. 6。

① 瑞典王后乌尔丽克是弗里德里希的妹妹、海因里希的姐姐。

② 波希米亚王国境内的一个城镇, 位于今捷克北部。

第三部 在国内

第12章

公众和民族

审查制度和自由的界限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里德里希以两个大胆的姿态开启了他的统治时代——在公开场合大力鼓吹启蒙运动，在私下宣扬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第三个大胆的姿态，是承认社会上公众群体的存在，并且认为应该把它管理起来。当然，公共领域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特别是在意大利、英格兰以及那些低地国家城市化比较明显的地区，具有自我意识的公众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然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他们才正式成为社会中一股强有力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中欧和东欧的农村，这股力量才刚刚出现。此处提到的“公共领域”是指一个虚拟空间，作为个体的人聚集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力量比其中所有人的总和还要大。通过互相交换信息、想法和评论，他们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在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公众，这个群体从此主宰了欧洲文化。现代社会的许多（如果不说是大部分）文化机构和习俗都源于这一时期，例如期刊、报纸、小说、新闻记者、评论家、公共图书馆、音乐会、艺术展览、公共博物馆、国立剧院。当然，所有的这些都能在更早的时期找到踪迹，但是，正是在18世纪，它们走

向成熟，并且共同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也许最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公众舆论”开始被看作审美品位和政治事务上的最终裁决者。¹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公众的态度极为残酷，这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他一继位就取缔了所有的报纸，理由是那些“该死的耍笔杆子的人”会通过鼓励读者形成自己的意见，把他们引入歧途。后来为了筹措征兵费用，有一或两家期刊获准出版，但是只要有一丝不同意见的迹象，刊物就会立刻被禁止。²所以，他的儿子在1740年准许安布罗修斯·豪德出版德语和法语报纸的时候，一定特别高兴，因为豪德曾帮助年轻的弗里德里希秘密地收集图书，并把它们藏在自己的书店里。豪德不仅被允许打破当时约翰·安德烈亚斯·吕迪格尔的垄断（吕迪格尔也不敢抱怨），他还免于被审查。这无所畏惧的革新行为，引起了普鲁士某些高级官员的不满。外交大臣波德维尔斯在报告中提醒弗里德里希，那些外国宫廷，尤其是俄国，对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的任何评论都非常敏感。弗里德里希的回复和他对宽容的看法一样值得纪念，他在报告边缘的空白处写道：“报纸要想有趣，就一定不能被干涉。”³

他潦草地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有不同的想法了。这倒不是豪德滥用特权。尽管声称要客观，但是他名下的《柏林政治和文化新闻报》所聘请的编辑队伍却不加批判地搞个人崇拜。第一期报纸以下面这首韵文作为发刊词：

圣明的弗里德里希希望把本报
置于他一贯慷慨仁慈的保护下，
愿因他的命令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每一期报纸的题图都是一只在地球上空飞翔的普鲁士鹰，它带着代表胜利的棕榈树枝和一摞书，还配有一句标语“真理和自由”。⁴然而事实则是，弗里德里希在处理与其臣民有关的一切事情时，最看重的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到了1740年底，豪德也必须和其他新闻记者一样接受审查，他对战争的报道被认为太过深入，泄露了许多不该讲的内情。⁵他向弗里德里希抱怨现在甚至书评也要被审查，希望能把审查制度稍微放宽一些，然而对于他的诉求，弗里德里希充耳不闻。⁶1743年7月，由于有出版物的内容涉及对外国宫廷无礼的“诽谤”，弗里德里希批准重新实行预先审查制度。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波德维尔斯一直都是对的。⁷审查委员会于1749年成立，在普鲁士以外地区出版的“诽谤性和侮辱性图书”也被禁止销售。⁸之后，他时不时就警告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审查尺度正在放松。例如，1750年8月，他告诉波德维尔斯，大量令人讨厌的书刊报纸正在印制。⁹次年2月，著名的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从柏林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把当地报纸寄给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已经让报纸变得沉闷而乏味，没有任何可读性。¹⁰

对普鲁士以外的记者，弗里德里希的态度也很傲慢。这一迹象表明，他非常重视公共领域，因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设法把各种异见声音打压下去。一位众所周知的受害者是约翰·伊格纳茨·罗德里克，他自1734年以来，就在帝国自由城市科隆，经营着一份相当成功的双周刊《科隆报》。1740年战争爆发后，该报表现出强烈的亲奥立场。当弗里德里希知道这份亲奥派的报纸在整个欧洲境内散发时，他心中的怒气又增加了几分。他要求科隆市议会查禁《科隆报》，但愿望落空，随即诉诸直接行动。弗里德里希授权他在科隆的代理人冯·罗德以100杜卡特的价格在当地收买一个暴徒，“好好地”教训罗德里克一下。吝啬的冯·罗德只花了一半的价格就找到一位愿意接受任务的人。稍加惩戒（鼻青脸肿）之后，罗德里克也就妥协了，除了奥地利一方的报道外，他也在《科隆报》上刊发普鲁士一方的战况报道。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他的

立场又重新偏向奥地利一方。冯·罗德再次威胁他，称自己还有50杜卡特存在银行里，完全可以再雇人揍他一顿。罗德里克迅速向他道歉。

¹¹ 这些简单粗暴的威胁从没停止过。1749年，冯·罗德的继任者冯·迪斯特得到弗里德里希的指示，再次找上门来，质问他是不是周期性讨打。¹²

在18世纪的欧洲，如此强硬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是很少见的事。弗里德里希一定知道，年轻的伏尔泰曾在1725年用言语讥讽德·罗昂骑士，结果被德·罗昂骑士的侍从当众鞭打以示惩罚。¹³ 只有在英国，记者们才有可能（相对）不受干扰地发表各种激进的政治评论，伏尔泰后来也移居到了英国。上台之初，弗里德里希短暂地支持过出版自由，但很快就结束了这种支持。根据后来那些严苛的法律条文推测，此后他对出版自由的控制非常严格，然而在实践中，也许并非如此。不过必须承认，莱辛写于1769年的那篇关于普鲁士言论自由最广为人知的评论完全是负面的。要想充分了解莱辛对此事的看法，有必要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毕竟经常被后人引用的只是文章的一部分：诗人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起草了一份计划，打算在维也纳成立一家研究院用于促进人文和科学的发展，计划书已经递交奥地利宫廷。如果这项计划落实，莱辛将受托监管维也纳剧院。弗里德里希·尼古拉——一位柏林书商、高产作家，以及弗里德里希的狂热崇拜者——朝该计划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写给莱辛的信中提到，摩西·门德尔松和他一样，是柏林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员，但是门德尔松的一部作品刚刚被奥地利审查人员没收。莱辛是这么回复他的：

也许维也纳就是这样，但即便如此，也比您法国化的柏林有希望得多。如果门德尔松的书在维也纳被没收，原因也只能因为它是在柏林出版的，难以想象，在柏林会有人写书支持灵魂不朽。以及，不要试图与我谈论您在柏林思考和写作上的自由。你们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拥有肆意辱骂宗教的自由。一

个诚实的人应该对利用这种自由感到羞愧。让柏林的人们尝试着去自由地写写其他事情吧，就像〔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在维也纳写的那些东西一样。就让他和索南费尔斯一样，揭露宫廷上下这群鱼龙混杂的朝臣们的真面目吧。让他设法捍卫臣民的权利，对抗剥削和专制，就像丹麦和法国正在进行的事情一样，之后，你很快就会知道哪一个国家是欧洲最卑躬屈膝的国家。¹⁴

必须指出，除了上面这种严厉的批评性意见，还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更友好的评价。1775年，苏格兰内科医生约翰·摩尔陪同汉密尔顿公爵在欧洲大陆进行大旅行，他是这样描述柏林的：

当我第一次来到柏林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里的自由氛围更让我惊讶。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讨论政府的措施和国王的行为。我曾经听过一些政治话题的讨论，以及其他一些我当时觉得应该更敏感的话题，在这里讨论这些话题，就像在伦敦咖啡馆一样，非常自由随意。书店里的氛围也是如此，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公开出售。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瓜分波兰的小册子对国王的评价非常不好，但要得到它也不会遇到什么阻力。演出也一样，那些充满嘲讽意味，含沙射影攻击某些最显要的权贵的戏剧也在上演。不过，拥有18万人组成的军队支持，一个政府完全可以放心地不去理会几个投机政客的批评和讽刺作家的笔杆子。¹⁵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因为摩尔是一位博学的、公正的、敏锐的观察者。他和汉密尔顿公爵在柏林和波茨坦住了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幸得到弗里德里希少有的偏爱，与他私下里进行了一场面谈。在他的书

里，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普鲁士和其他地方的经历——这本书名叫《法国、瑞士和德意志社会与风俗习惯概览》，非常畅销，摩尔活着的时候就印了21版。¹⁶还应该指出的是，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不可思议地与1784年伊曼努尔·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的观点相吻合，并支持了他的观点，即“较小程度上的公民自由可以给精神的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让其得以充分发展”，因为“只有一位本身受到启蒙，不怕幽灵，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敢说之前没有一个共和国敢说的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¹⁷

德尼纳神父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最后4年生活在普鲁士，他在文章中写道，弗里德里希对那些批评自己的声音付之一笑，甚至还到了这种程度：他自己出钱加印那些批评自己的小册子；无忧宫的大门上挂了许多辱骂他的大海报，他还命人把海报往下挪一挪，以便过往的人们能看清海报上的内容。¹⁸还有一件极具弗里德里希个人风格的事情是他对一位路德派牧师的劝告。尽管牧师的上司们警告他要有分寸，但这位牧师仍然持续不断地用激烈的言辞攻击弗里德里希，斥责他不敬畏上帝。他劝告这位牧师说：“你想让我迫害你，想成为上帝的殉道者，但我一点儿也不想给你获得这个荣誉的机会，你现在这副模样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所以啊，还是一心一意为你的信徒谋福祉，借此获得内心的平静，追寻你的幸福吧。”¹⁹这种轻松态度的另外一位受益者是一名学校老师，他在醉酒之后，发表了许多冒犯国王的言论。当人们问弗里德里希应该如何惩罚他时，国王回复说，既然是酒精让他失去理智的，你们骂他两句也就得了——不过，还是应该提醒他喝酒的危害。²⁰对于那些议论他的性取向的流言，他也漠不关心。1753年，他告诉自己在伦敦的代表，对那本正在流通的恶意中伤他的小册子，无视就好。就像他在给乔治·基思的信里谈到此事时说的那样：“我一直很鄙视公众的意见。在评价我自己的行为时，我只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²¹这种鄙视的态度被很多人传播开来，例如，达朗贝尔在他的评论中写道，由于他的才能

和名望，弗里德里希自视甚高，根本不把这些讽刺放在眼里。²²

必须注意，还有很多人反对莱辛简单粗暴的否定，这些意见虽然略输文采，但数量更多。例如，柏林牧师丹尼尔·耶尼施是这样说的：

和上一个时代相比，18世纪最大的进步就是智识上的探索更为普遍了，程度也更深了，正是普鲁士君主竭尽全力地唤起了人们的这种意识，并且使之充满活力；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启蒙运动中的其他知名人物相比，他为之付出了更多，做出贡献的方式也更多。²³

在18世纪90年代初年轻的普鲁士学生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所撰写的论文中，可以发现一种不一样但也很令人信服的证据。所有人都表达了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以及法国君主政体的专制统治才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²⁴

拉美特利

当然，这并不是21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自由，甚至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也和他们不同，但是在18世纪的欧洲大陆，这意味着在大部分国家当下的社会实践中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进步，特别是那些仍然由天主教会支配文化政策的国家。在宗教方面持异端观点的自由（或者就像莱辛所说的“肆意辱骂宗教的自由”），对某些人来说也可能非常重要。在弗里德里希的这种宽松的态度下，最著名的受益者当属朱利安·让·奥弗雷·德·拉美特利（1709—1751），他的唯物主义著作《人是机器》被认为非常有攻击性，以至于他不仅被自己的祖国法国通缉，甚至还在逃亡荷兰共和国后，被荷兰当局通缉（皮埃尔·培尔称荷兰是“难民的大方舟”）。在法国与荷兰，当局下令由刽子手公开

焚毁其书籍；如果他本人被抓住了，那么刽子手的斧子就会砍向他的脖颈了。²⁵ 弗里德里希准许他到普鲁士政治避难，在柏林科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还有一份抚恤金，并邀请他进入自己的亲密小圈子，成为宴席上的座上宾。²⁶ 弗里德里希还写了一篇颂扬拉美特利的文章，让人在科学院大会上朗读，一时间引起轰动。在包括一群年轻诸侯的观众面前，在皇家宫殿（会议召开的地方）这么庄严的地方，居然把赞美的光环戴到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头上，不仅虔诚的基督徒对此感到愤慨。²⁷ 在普鲁士期间，拉美特利和达尔让斯侯爵合写了《哲人特蕾莎》，这本书是18世纪最著名和最畅销的情色书籍之一。实际上，小说中好色的耶稣会神父迪拉戈的唯物主义观点就是拉美特利的观点。²⁸

这样看来，拉美特利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这两方面都深深地吸引着他的赞助人。弗里德里希的自然观也是机械论的、决定论的和宿命论的。²⁹ 他大概也喜欢拉美特利的一篇论文《论感官》，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

哦，感官喜悦的上帝

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神，

请你，为我的忠贞加冕。³⁰

弗里德里希可能也会同意拉美特利1748年在《幸福论》中发表为同性恋辩护的言辞。³¹ 拉美特利于1751年突然去世，据说是因为吃了太多的野鸡肉做的派。在弗里德里希写给他的悼词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哲学家的身份，以及我们皆知的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足以使拉美特利在普鲁士获得庇护，我也应该给他一笔抚恤金。”当然，他也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拉美特利所遭受的迫害，给基督徒们一记重击，例如他说：

这部著作《人是机器》导致莱顿全体神父都站起来反对它的作者。它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不悦，那些人所从事的职业使他们公然成为人类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敌人。加尔文派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教徒暂时忘记了彼此间关于圣餐变质说、自由意志、安魂弥撒，以及教宗无误论这些曾致使他们分裂的争论，他们联起手来，合伙迫害一位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总结说：“自然天性使他（拉美特利）成为演说家和哲学家；但他还从那里得到了一个更珍贵的礼物——一个纯洁的灵魂和一颗乐于助人的心。”³² 这份悼词，甚至于对一直都顺从于国王的院士们来说都难以接受。弗里德里希发表完他的悼词后，他们态度冷漠，鸦雀无声。³³ 不过，弗里德里希写信给自己的姐姐威廉明妮时就没有这么不吝表扬了，他说：“他很有趣，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的医生，但写作水平真的很差。”³⁴

让-雅克·卢梭

弗里德里希给拉美特利和其他激进人士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毫无限制的写作自由。拉美特利的《幸福论》在柏林被公开焚烧，《拉美特利哲学作品集》也被禁止出版。³⁵ 有一个比拉美特利更有颠覆性的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那就是让-雅克·卢梭，他可以说是18世纪最有颠覆性的一位思想家。他1761年出版《新爱洛伊丝》，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他是欧洲大陆最为著名，也是被迫害得最为严重的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他的故乡日内瓦，他的书被焚烧，当局还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³⁶ 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位于瑞士地区的纳沙泰尔邦国向他伸出橄榄枝，为他提供庇护，他当时竟然考虑接受。由于继承的关系，纳沙泰尔自1707年以来属于普鲁士

。在《忏悔录》中，卢梭以一种典型的讽刺的恭维语气描写了弗里德里希：

这一提议实在是及时雨，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我心里有一个难处，不便启齿，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再加上我心底里又倾慕法国，所以我便厌恶普鲁士国王，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的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³⁷

卢梭把普鲁士国王的一幅肖像画摆在自己的桌子上，但在画上，他题写了一段话：“荣耀和自尊，是他的上帝，是他的法律；他像哲学家一样思考，行为举止却如同一位君王。”³⁸ 1762年7月抵达纳沙泰尔时，卢梭写信给该省的行政长官、弗里德里希的密友、詹姆士二世党的苏格蘭马歇尔伯爵乔治·基思，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的怜悯：“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我遵从您的一切命令。尽管，如果您要求我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我还可以往何处去。”³⁹ 乔治·基思和弗里德里希相似，他性格多疑且反对教会对世俗政治的干涉，他把卢梭的请求呈递给正在西里西亚战场上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对卢梭还是很了解的。他读过卢梭的不少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他也不太喜欢。⁴⁰ 早在1760年的时候，达尔让斯侯爵就警告他说，卢梭是一个危险的疯子，此人对社会平等的看法不仅奇怪，还很有颠覆性。⁴¹

当时，弗里德里希刚在布克斯多夫赢得胜利，正忙于组织对施韦德尼茨实施围攻。尽管如此，他还是抽出时间通知乔治·基思“向这个不幸的人”提供政治庇护，不过他还补充道，要尽可能使他停止写作，以免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不满。⁴² 一个月之后，他又写信说：“我们应该拯救

这个可怜的、不幸的人！他唯一的罪过不过是有一些自认为很好的奇怪想法而已。”他还随函附上100克朗（埃居），以资助卢梭的日常生活，又明智地说，如果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而是以实物的形式资助他，这位被资助对象更有可能接受他的帮助。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补充道，如果不是战争耗尽了他的财力物力，他还会给卢梭建造一个带有花园的隐居之处，在那里卢梭就可以模仿自己所说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至于他自己，他写道，他的观点和卢梭的观点截然不同——就像“有限”与“无穷”之间的差别那么大，他完全无意放弃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他总结道，他认定卢梭是一个不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人，他应该是生活在荒原中的一位隐士，住在柱子上，行神迹，被封圣，并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长长的殉道者的名单上。⁴³ 这封信可以说是这类混合着慷慨大方和冷嘲热讽的信件中，弗里德里希写得最好的一封。

可想而知，和别人之前与卢梭打交道的情况一样，这一次的结果也不会太好。基思给卢梭提供了一份年金，他这一不明智的行为激起了卢梭言辞尖刻的回复：“我有足够的资产支撑我再生活两三年，而且我也从未去设想两三年后的情况。但是，就算我快要饿死，鉴于我们这位好国王目前的情况，以及我对他毫无价值可言，我宁愿吃草、挖树根，也不愿意接受他哪怕一丁点儿面包。”对弗里德里希本人，他写道：“您想要给我面包，难道您的臣民们就没有一个人缺少面包？”⁴⁴ 1765年秋天，当地人不满意卢梭所谓的不虔诚，朝他家的房子扔石头。这之后，卢梭再次搬家，这一次是在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协助下，搬去英国。在那里，他依旧和每一个人都争吵不休，包括寄宿处的房东。顺便讲一件离奇的小事：有一封据说是弗里德里希写给卢梭的信，这封带着点恶作剧性质的信其实是霍勒斯·沃波尔写的：

祝你幸福，我会好好地待你，如果你希望我这么做。但是，如果你一直坚持拒绝我的帮助，相信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如果你不断折磨你的大脑去发现更多新的不幸，就选择你喜

欢的那个吧。我是一个国王，你想要多少折磨，我都可以满足你——还有各种你无法从你的敌人那里获得的折磨——当你停止追求“被迫害”的荣耀之时，我将停止迫害你。⁴⁵

弗里德里希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欣赏过卢梭。在1762—1763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和平谈判进行期间，弗里德里希在阅读《爱弥儿》，但是正如他告诉萨克森—科堡公爵夫人的那样，他觉得这本书毫无意义。⁴⁶迪厄多内·蒂埃博于1765年前往普鲁士，开始在新建立的军事学院担任教授一职时，弗里德里希问他，在法国所有的散文作家中最喜欢哪几位。当他提到卢梭名字的瞬间，弗里德里希厉声打断他：“啊！他是个疯子！”⁴⁷但他继续对卢梭的处境表示同情，1766年他严肃地对伏尔泰说：“我认为他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难过……我们应该尊重不幸的人，只有堕落的人们才会谴责他们。”⁴⁸鉴于伏尔泰习惯性猛烈地抨击卢梭，他一定感受到了这句批评是多么有力。

伏尔泰

在所有在普鲁士得到庇护的颠覆性作家中，伏尔泰无疑是最有名的那位。弗里德里希经常急切地邀请他来自己身边，其中的一个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希望他能修正和润色自己用法语写的散文和诗歌。⁴⁹然而，不需要是一个母语为法语的人，也能看出来他的拼写、语法和句法问题有多大。他们俩特别喜欢互相争论，但他们的交流也富有成效。这也许是所有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的关系中最有吸引力的一种。从1736年8月8日弗里德里希第一次给他写信，到1778年4月1日伏尔泰的最后一封回信（两个月后伏尔泰去世），两人交换的信件足足占了弗里德里希全集中厚厚的三大卷，弗里德里希自己写了654封，其中很多信篇幅都很长。⁵⁰从某种程度上说，两人之间是一种彼此钦佩欣赏的交往。伏尔

泰变着花样把弗里德里希比作各种伟大的人物：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马可·奥勒留、图拉真、安东尼·庇护、提图斯、尤利安、维吉尔、普林尼、贺拉斯、梅塞纳斯、西塞罗、卡图卢斯、荷马、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布瓦洛、所罗门、普罗米修斯、阿波罗、帕特罗克洛斯、苏格拉底、亚西比德、亚历山大、亨利四世和弗朗西斯一世。⁵¹“他如马可·奥勒留一样思考，像西塞罗那样写作”，这是一句典型的称赞。⁵²

弗里德里希对伏尔泰的仰慕也是由来已久。他年少时建立的那座秘密图书馆里还收藏着《伏尔泰文集》第一卷，两个版本的《亨利亚德》和《查理十二传》。⁵³住在莱茵斯贝格的时候，他请画家安托万·佩恩在书房的天花板上画了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写着他最敬仰的两位作家的名字：贺拉斯和伏尔泰。⁵⁴1740年9月11日，在普鲁士领地克莱沃附近的默兹城堡，弗里德里希和伏尔泰第一次碰面。后来，弗里德里希给他的挚友若尔丹写信的时候说：“[伏尔泰]有西塞罗的雄辩，普林尼的温和，阿格里帕的智慧；简而言之，他集合了这三位最伟大的古代人物的美德与才能。”⁵⁵不过，弗里德里希追捧伏尔泰最诚挚的形式还是模仿。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去世，伏尔泰和他的作品都是弗里德里希最为痴迷和敬仰的对象。⁵⁶

他还模仿伏尔泰写诗，尤其是其丰富的内容。两个人一页接着一页地，以各种东西为主题，写出了许多格外流畅、短小押韵的诗行。甚至他们的散文通信也经常穿插着诗歌。对弗里德里希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炫耀自己游刃有余的法语水平，也是一种治疗方式。如果他能用诗歌把自己的经历表达出来，那么他也可以最终接受这些经历。所以在七年战争最关键的那几年，他的诗作尤其多。⁵⁷然而，在质量上，两人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弗里德里希虽然写了难以数计的书信、赞词、颂歌以及讽刺作品，但这些作品单调乏味、令人恼怒、拙劣且轻浮。不难想象，必须去修改这些作品，还得给它润色、增补，伏尔泰的耐性也耗光了。西奥多·贝斯特曼评论弗里德里希1749年的《战争的艺术》时

毫不留情：“结构混乱，写得很差，在诗意美学方面平庸陈腐。”在送给伏尔泰修改之后，弗里德里希“像一个毫无创见的小学生一样”研究他的修订稿，对所有修改意见悉数全收。然而这是弗里德里希所有长诗中最好的一部作品，贝斯特曼补充道，毕竟这1600行长诗中有300行完全是伏尔泰写的。⁵⁸利顿·斯特雷奇的评价更加尖酸刻薄：

他的诗歌也凑出数卷本，这几册诗卷的目录或许完美地体现了文学上那句古老的谚语——诗人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可以想象这样一番光景：这位笨重的日耳曼缪斯把双脚硬挤进尖头鞋，极其认真地跳起舞来，时而是高贵的凡尔赛小步舞，时而是轻快的巴黎吉格舞步。整个场景看起来很可能会十分无聊，无聊中还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沉闷，人们就在惊愕的颤抖中厌恶地避开视线。如果不是这样的无聊，那这个场面看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可笑或者可悲，至于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悲，就不知道了。⁵⁹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互补关系：一方面是弗里德里希的政治权力和才智，另一方面是伏尔泰的文学天赋和智慧。在只需要两人互相恭维对方时，这段关系可以说是非常融洽。正如伏尔泰曾经写道的那样：“他把我称作神圣的存在，而我把他唤作所罗门。这些绰号信手拈来毫不费力。”⁶⁰但是相互钦佩也势必包括相互利用。对伏尔泰而言，众所周知有这样的一个有名望的君主敬重他，无形中就赋予了他一种地位，这是其他哲学家无法夸耀的。“一般来说，只有我们文人处处恭维国王，”伏尔泰写道，“但这位国王恨不得把我浑身上下赞美个遍。”⁶¹当时，伏尔泰在凡尔赛失宠，被巴黎的社交圈冷落，随时处在可能被指控不敬神的危险中。在这种境遇下，他很愿意到国外避难。⁶²对弗里德里希来说，被时下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称为“大王”，也就意味着把他抬高到王座上的哲学家这样一个孤高傲然的位置。和每一个业余作家一样，他

渴望专业人士的认可。所以，当伏尔泰在写给巴黎朋友的信中提到，他那兼具阿波罗和马可·奥勒留优点的赞助人正在把柏林变成下一个雅典，弗里德里希据此就有些洋洋自得，觉得自己进入了文学界精英的圈子。⁶³

要让两位如此聪明、任性又傲慢的男人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到了1750年，伏尔泰在这里长住的时候，两人对彼此都足够了解，也因此都有所警惕。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得知伏尔泰把自己的一封信拿给他的巴黎朋友看，但这封信是一封被篡改过的信。于是他在1749年9月向阿尔加罗蒂抱怨说，伏尔泰像猴子一样，喜欢捉弄别人，还说自己欣赏伏尔泰的才智，但同时也怀疑他的人品。⁶⁴正如斯特雷奇所说：“如果有人曾时刻警惕地睁大着双眼，那就是弗里德里希在他自己邀请伏尔泰到柏林来的时候。”⁶⁵1740年，就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反马基雅维利》即将出版时，他入侵西里西亚，伏尔泰对他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他也知道，弗里德里希处处奉承他的得意门生巴屈拉尔·德阿诺，说他才是法国文学界冉冉升起的太阳，伏尔泰的时代已经落幕，以此诱惑德阿诺来到柏林。⁶⁶但是，当弗里德里希邀请伏尔泰成为自己文学上的家庭教师时，虽然这份工作的前景并不算很诱人，伏尔泰还是去了。一年以后，他向黎塞留公爵道出了如下缘由：

我抵达波茨坦后，国王蓝色的大眼睛，令人愉悦的笑容，充满磁性的声音，赢得5场战争胜利的光环，宣称自己喜欢独处、热爱工作、喜爱写诗和散文，还有他所展现出的友谊使我眩晕，与他交谈很愉快，他宽宏大量，讲话平易近人，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即使是一个普通人具有这些特质，我也会完全为之着迷，这一切都让我神魂颠倒不能自拔，出于激情和痴心，我无条件地向他缴械投降。⁶⁷

就像他在柏林和波茨坦时写的那些信里描述的那样，一开始，伏尔泰在这里过得非常开心，他沉迷于国王、宫廷和大众对自己的谄媚与奉承，享受着舒适的住宿，陶醉于自己作为宫务大臣的崇高地位，不仅获得4000塔勒搬迁费，年薪更是高达5000塔勒。⁶⁸然而，到1750年8月时，一旦他正式开始为王室服务，他的地位就从尊贵的客人变成了服务者。⁶⁹9月12日，他告诉外甥女（兼情人）德尼夫人，他才不是什么国王的宫务大臣，就只是一个改语法的而已。⁷⁰随着白昼一天天变短，普鲁士阴冷的冬天即将来临，他开始另做打算。两个月后，在他写的一封信中，他列出了所有使他感到快乐的理由，可是，每一项理由后面，都接着一个“……但是……但是……”，最后他写道：“天气开始变得刺骨的寒冷。”⁷¹紧接着，他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虽然已经非常富有——1749年一年，他从写作和投资两方面获得的收入高达7.5万里弗尔⁷²——但他实在是太贪财，他与柏林的犹太人亚伯拉罕·希舍尔进行了一场欺诈性的非法交易，其中包括购买萨克森战争债券。⁷³由于这两人互相起诉对方，这在当时成为一场公共丑闻，对此，弗里德里希有多尴尬就有多恼火。他对威廉明妮说，此案就是一个流氓试图欺骗一个骗子。⁷⁴1751年2月，他给伏尔泰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引起“可怕的骚乱”，并警告他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行为。⁷⁵

两条不怀好意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导致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拉美特利告诉伏尔泰，弗里德里希提起他时曾说：“我最多再需要他一年，不会更久了。人们挤出橙汁后，橙子皮也就扔掉了。”⁷⁶另一边，有人告诉弗里德里希，只要有人愿意听伏尔泰讲话，他就告诉那人，弗里德里希写的诗就是垃圾，每次收到国王的文章需要进一步润色修改时，他就叹息道：“难道他永远不会厌倦把他的这些脏衣服送给我洗吗？”⁷⁷伏尔泰认为，最后这句谣言是柏林科学院院长皮埃尔·路易·莫佩尔蒂捏造和散布的。起初，这两人是朋友，实际上正是伏尔泰最初向弗里德里希推荐了莫佩尔蒂。然而，现实证明，柏林一波茨坦地区不足以同时容纳这两个人。在普鲁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莫佩尔蒂原本是最有声

望的一位，但更有魅力的伏尔泰来了之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对此耿耿于怀。是莫佩尔蒂，把柏林科学院在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地位提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他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⁷⁸对他来说，“伏尔泰受不了除了自己还有别人重要这一点”。⁷⁹这一切导致的激烈争吵再次证明了那句众人皆知的格言完全正确：学术纷争是如此残忍，因为争的东西根本无足轻重。

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抨击对方。之后不久，莫佩尔蒂和塞缪尔·柯尼希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学术争论，这也成为双方最后一次论战。毫无疑问，伏尔泰选择站在柯尼希一方。1752年夏天，他在荷兰的一份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和嘲笑莫佩尔蒂那些推测性较强的研究，包括向地心钻孔，解剖那些据说住在巴塔哥尼亚的巨人的大脑，等等。⁸⁰对伏尔泰来说很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选择支持莫佩尔蒂。这也不奇怪，毕竟是他自己的科学院院长的名誉受到威胁。他以一封信进入公众视野：《一位柏林科学院成员给一位巴黎科学院成员的信》（前者即弗里德里希，后者即伏尔泰）。伏尔泰鲁莽地在回信中表示，自己依旧支持柯尼希。他一定知道这封信会被公之于众。他还匆匆赶制了一本恶毒的小册子《纯良博士的指责》（“*Diatribes of Doctor Akakia*”），这是他最恶毒的小册子之一。“Akakia”意指没有恶意，让这个标题显得特别有嘲讽意味。毋庸置疑，这一切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在柏林，还波及了整个德意志地区，甚至影响到整个欧洲。⁸¹伦道夫伯爵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让柏林人特别愉快，他又明智地补充说：“这些拥有伟大思想的人都有品格缺陷。”⁸²弗里德里希已经受够了。别的不说，现在这件事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异见者容忍的底线。在他的命令下，政府的刽子手在柏林的几个广场上烧毁了伏尔泰的小册子，然后把烧完的灰烬送给莫佩尔蒂。这种处置方式如果出现在当时最蒙昧的国家，倒也没什么不合适的。⁸³在写给姐姐威廉明妮的一些信件中，弗里德里希不遗余力地斥责伏尔泰，说他“卑鄙、虚伪、坏透了、令人作呕”，是“下流的恶棍”。⁸⁴伏尔泰的反应相对温和，他退还了象征着自己职位

的徽章，并附上了一首诗：

我温柔地接受了它们；
如今归还你，满心悲伤；
就像是一个情人，在极端的激情中，
归还他情妇的肖像画。⁸⁵

也许可以想到，启蒙哲人和哲学家国王之间的这场情事，最终在苦涩的眼泪中落幕。在这个故事漫长且同样不愉快的结尾中，还有更多的眼泪。1753年3月26日，伏尔泰终于可以把普鲁士的尘土抖落了，但在抵达萨克森获得安全之后，他重印了《纯良博士的指责》，战火立刻重新点燃。但他低估了弗里德里希权力所及的范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伏尔泰遭到逮捕，并被软禁，行李也被扣押、搜查。弗里德里希最关切的事情是找回他的一版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集的一个副本，这一版本收录了《守护神》。现在，在被允许继续上路之前，伏尔泰不得不在法兰克福度过非常郁闷的5周（5月29日—7月7日）。⁸⁶ 伏尔泰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挑衅，但弗里德里希回应的方式，只能说是非常专横了，同时也是非法的（法兰克福是一个帝国自由城市，普鲁士在这里并没有司法管辖权）。

在两人关系恢复之前，需要一段长久的时间冷静。尽管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确实在1754年的春天重新开始通信了。⁸⁷ 至少，弗里德里希表现出，在他眼里，伏尔泰这个人 and 作家伏尔泰是有区别的，他继续鄙视前者，同时欣赏后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伏尔泰更伟大的天才，但我绝对鄙视他，因为他不诚实。”⁸⁸ 在他的整个余生中，伏尔泰仍然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和剧作家。1770年，为了向伏尔泰表示敬意，有人呼吁给他立一座雕像，弗里德里希慷慨地批准了这一提议，他

写信给格林男爵说：“没有一位作家像这位伟人那样拥有如此完美的品位；古希腊人会为了纪念他而把他供奉为神，并为他筹建一座神庙。”同样，在写信给达朗贝尔时，他还补充说，伏尔泰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纪念碑，因为它们会比圣彼得大教堂、卢浮宫以及其他所有“因人类的虚荣而致力于永恒”的建筑更为持久。⁸⁹ 1775年夏天，当法国著名演员亨利-路易·卡安（通常被称为“勒·卡安”）在波茨坦演出时，弗里德里希写信告诉伏尔泰说，自己太了解他的戏剧了，以至于可以在没有文本的情况下说出台词，他在观看《俄狄浦斯王》和《扎伊尔》演出时流下了眼泪。⁹⁰ 在弗里德里希弥留之际，他耳边在听的最后一本书就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⁹¹

普鲁士的公共领域

弗里德里希对欧洲知识界名人的资助虽然有限，但众所周知非常慷慨，这和他对国内文学界的赞助情况完全不相称。在弗里德里希漫长的统治时期，公共领域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极大的扩展，但这与他的鼓励没有太多关系。他的官方态度当然是支持的。他在自己第一本重要的出版物《反马基雅维利》中写道：“众所周知，公众有多么好奇。公众会看到一切，听到一切，传递一切听见的和看到的東西。当公众对公民个体的行为充满好奇时，这种好奇只是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消遣，但当这种好奇开始评判统治者的性格品质时，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公众在品评人物名誉时是一个“可靠的评判者”，这也算是件好事。⁹² 在1751年出版的《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修订版的前言里，弗里德里希表示自己的修订是“出于对公众的考虑，每个作者都应该尊重他们”，他还在开篇的段落里声明他不会重复关于王朝起源的童话故事，因为它们配不上“本世纪睿智而开明的公众”。⁹³ 他赞扬他的朋友若尔丹，因他展现出了“应该给予公众的尊敬和尊重”。⁹⁴

公众可能已经拥有“一种敏锐的目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就像他为符腾堡年轻的公爵卡尔·欧根撰写的行为规范手册（“君主之鉴”）中所说的那样，但弗里德里希的视角是非常自上而下的。文人的任务是教导公众，哲学家的任务是传播真理。⁹⁵没有什么比他的文化传播模式更精英主义的了，在这种文化传播模式下，正确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传播，“从那些注重人文和科学素养的人传播到公众，然后再传播到普通人；从宫廷到城区，再从城区到各个省份”。⁹⁶然而，等到未来启蒙思想抵达它最终的目的地时，他觉得没人会愿意听。1770年1月，在一封与达朗贝尔推心置腹的信中，他估计在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士兵这几种人群是教育工作者难以接触到的。剩下的5万人中，有一半人因为是女性而被排除在外。剩下的贵族和受过教育的市民阶级中，那些懒惰的、愚蠢的、懦弱的、堕落的人也必须被剔除，只剩下不到1000位博学的人。即使在剩下的那群人里，人们的才能高低也各不相同。如此，弗里德里希心灰意冷地总结道：“在任何一个时代，哲学家的数量总是极少的，而世界会被某些迷信主宰。”⁹⁷

这种对一般公众评价极低的论断是在一份私人信件中出现的。只有当他知道不会被偷听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才会彻底发泄他对人类的那些充满偏见的观点，正如接下来这些简短但有代表性的观点所呈现的：

人们多久才能看到一次聪明的骗子来证实那些愚蠢公众的错误！

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是无知且愚蠢的。

公众是盲目的，生来就会被误导。

白痴公众终生被空洞的偏见所奴役。

哎呀！仔细地观察公众吧，他们愚蠢，无知，糊涂，卑鄙

和野蛮。

这些白痴公众天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事物的表象具有欺骗性，但这是公众评判的唯一方式。

我一直鄙视公众的判断。

必须有一个国王指挥这些愚蠢的群众，这群舌头长但目光短浅的畜生。⁹⁸

但是，弗里德里希真正生气和绝望的原因，是知道这些愚昧无知的人认为他们有资格批评那些比他们更优秀的人。以下内容来自一封寄给东普鲁士容克地主阿斯穆斯·埃伦赖希·冯·布雷多将军的信，在这封题为“论名誉”的诗体书信里，他彻底爆发了：

每个人，甚至是女人，都认为他们有权
在当前的重大问题上自己做决定；
在他们的法庭前，大臣，将军，
作为侵略者的国王和作为他们敌人的国王，
不到一分钟就得到他们的判决，
声誉被他们创造，被他们诋毁；
美德，天赋，王冠和权杖，
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纪里，一切都不能幸免。

.....

布雷多，这就是人民和愚蠢的公众，
没有什么可以逃脱他们明嘲暗讽的舌头。

.....

所以，你怎么看？对一个男人来说明智吗？

付出所有努力，全心全意、埋头苦干，

放弃他的快乐，他的时间和他的安逸，

只是为了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和谴责

这些无知、自私和不忠的人，

充满偏见，为错误所奴役，

同时代人的声誉就仰赖这些全然荒谬的评判者？⁹⁹

弗里德里希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他对批评的敏感。例如，1742年6月签订《布雷斯劳和约》后，他告诉若尔丹他知道自己肯定会受到“愚蠢和无知者”的攻击，但他毫不在乎“公众荒谬的胡说八道”。显然，他其实非常在意。一个星期后，他要求若尔丹向他汇报柏林公众所说的一切有关和平协议的评论，确保不遗漏任何信息。¹⁰⁰有一种防御机制叫作“我从来不读和我有关的评论”，这个说法现在也很流行。在1759年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境况非常惨淡，在寄给伏尔泰的信中他写道：“我选择走自己的路，我不会做任何违背自己内心和良心的事情，我也毫不在意那些没有头脑的人如何评述我的行为。”¹⁰¹另一种防御机制则是，他声称自己不能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公开捍卫自己的政策，所以甘愿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¹⁰²结果事实证明，后人其实是相当不值得信赖的评判者。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情形也大致如此。弗里德里希与言论自由的蜜月期十分短暂，这正说明他原本非常想控制普鲁士的公共领域，特别是在他的首都。但公共领域范围之广、质量之高使他无法做到。1648年，柏林人口总数大约只有1万。¹⁰³幸好普鲁士在17世纪后半叶的德意志各

邦国中出生率最高，到1709年时，柏林人口总数翻了5倍多，包括卫戍部队在内，大约5.5万。¹⁰⁴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缩小了宫廷规模，实施经济紧缩政策，这就导致大约1.7万手工业者和家属离去，不过，卫戍部队人数迅速增长，算是一些补充。¹⁰⁵ 等到1740年弗里德里希继承王位的时候，通过自然增长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9万，这其中包括2.1万士兵和士兵家属。¹⁰⁶ 柏林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长，1770年达到132 365人，在他统治时期的最后，人口已经达到14.5万—14.8万人。¹⁰⁷ 尽管识字率数据很难得到，但有几处小小的迹象表明，识字率可能很高：1782年，94.1%的住在自有房屋中的业主会签署自己的名字，而且在整个波茨坦—柏林地区，在6—14岁儿童中，“很有可能”有60%—70%在学校读书。¹⁰⁸ 1783年的一期《柏林月刊》报道称，总体来说，柏林城里的学校都非常优秀。¹⁰⁹ 在柏林人中，有胡格诺派背景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1720年占20%），这或许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该地区的识字率在整个欧洲的排名都非常靠前。¹¹⁰

18世纪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阅读革命”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识字率从西向东、由北向南呈递减趋势，但无论如何读书看报的能力成为一种大众现象，在欧洲大陆很重要的一部分土地上蔓延开来，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此外，人们也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发生，因为同时代的人都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开始阅读，且大多对这一现象持肯定态度。极具影响力的期刊《德意志博物馆》在对1780年莱比锡书展进行评论的时候写道：“60年前，买书的人只有学者，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女人不读书。不论是哪个阶层，都有人在读书，在城镇、乡村都可以找到看书的人，甚至是大城市的普通士兵也从可以借阅的图书馆里借书。”¹¹¹ 画家兼版画家丹尼尔·霍多维茨基出生于但泽，但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柏林居住，他形象地把这一变化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创作了两幅差异巨大却意味深长的作品：画面上的人物分别是一个农民和一群中产阶级，他们都在阅读。识文断字的人创造了一个文学市场，商人迅速活跃起来，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到了1748

年，莱辛抵达柏林的时候，柏林有13家书店，其中4家也是图书出版商，5家专门出售法国文学作品。¹¹² 最负盛名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同时也负责2份最成功的德语文学期刊——《最新文学通讯》（1759—1765年）和《德意志万有文库》（1765—1806年）。¹¹³ 前者立即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宣传阵地，诸如莱辛、赫尔德和摩西·门德尔松等备受瞩目的作者都为其撰稿。¹¹⁴ 它的继承者维持住了它的地位，在这本期刊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大约刊载过8万本书的书评，而且杂志发行量很少低于保本的1000册，经常达到这个数字的2到3倍，可以说又替杂志的编辑赚了一小笔钱。¹¹⁵ 尼古拉也是歌德和席勒《赠辞》的讽刺对象之一：

即使你在德意志人教育事业中没能享有声望，

弗里茨·尼古拉，你也在这个过程中赚了一大笔钱。¹¹⁶

期刊总发行量看起来似乎并不高，但要想算出读者的总人数，应该记得至少乘以10或20，甚至也许可以乘上30或40。¹¹⁷ 尼古拉和社里的编辑们可以利用已经极大改善的邮政服务体系，这得益于帝国邮政局长（图尔恩—塔克西斯亲王）对邮政服务的改进，以及普鲁士和萨克森邮政部门之间的竞争（各自有760家和140家邮局）。这就使得包括期刊在内的邮件能够以每天130—150千米的速度移动。¹¹⁸ 到18世纪末，所有德意志人从他们的生活聚居区到邮局（驿站）的距离都在半天以内。¹¹⁹

阅读可以是个人行为，可以是群体行为，甚至也可以是一种“机构性的”行为，因为18世纪也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世纪。虽然随着印量增加，单本图书的成本下降，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特别是在纸张生产方面的限制——导致图书价格降低幅度有限。对此，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人们集资成立一个读书小组，购置图书后，在小组内部传阅。这

些协会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是在诸如柏林这样的城市里，人们成立了许多常设读书俱乐部，且数量越来越多，它们拥有管理委员会，并且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柏林第一个读书俱乐部始建于1764年，到弗里德里希的统治结束时，在其他几座城市也可以找到这类读书俱乐部。¹²⁰ 还有一些文化团体，往往也是非正式的，它们定期组织读书讨论会，甚至胆子更大一些的，还在一起议论时政。在柏林有一些组织以其每周的聚会日期而得名。1749年，一位路德派牧师成立“星期一俱乐部”；1783年“启蒙之友协会”或者叫“星期三协会”成立，柏林启蒙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尼古拉·门德尔松、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卡尔·戈特利布·苏亚雷斯、恩斯特·费迪南德·克莱因、约翰·约阿希姆·施帕尔丁、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约翰·埃里希·比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格迪克。后面这两位是柏林另一份重要期刊《柏林月刊》的联合编辑，该杂志的发行范围也遍布德语区，被誉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杂志”¹²¹。《柏林月刊》不仅仅是一本书评集刊，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主题：从蒙戈尔菲耶兄弟的热气球到最新上演的歌剧，以及诸如普鲁士新司法体系之类的政治问题。¹²²

鉴于大家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对德语文学十分不屑，很可以怀疑在他的桌子上到底能不能找到上述的任何一种德语杂志。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在组成公众领域的任何其他媒体中发挥过直接作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通过一些组织间接施加自己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乐团对柏林的音乐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不过，他的确在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共济会中，亲自树立了一个榜样。共济会的现代形式是18世纪的产物，可以追溯至1717年在伦敦成立的英格兰共济会总会。1738年，还是王储的弗里德里希就在明登由绍姆堡-利珀伯爵阿尔贝特·沃尔夫冈介绍进了共济会。回到莱茵斯贝格后，弗里德里希在这里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共济会分会。¹²³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对共济会的热情。¹²⁴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的确是一位先驱，因为德意志第一个共济会分会也是不久前（

1737年12月)刚刚在汉堡成立。¹²⁵ 继承王位后,他在德意志共济会总会——“在三个地球仪之上”——于柏林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亲自介绍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些普鲁士贵族入会。¹²⁶ 王室的公开认可给共济会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提供了“巨大的扩张动力”,尤其是在普鲁士,到1764年,共济会在普鲁士境内拥有28家分会。¹²⁷ 到弗里德里希的统治结束时,仅在柏林的各分会的会员总数就超过400人。¹²⁸

虽然此后弗里德里希参与共济会活动的积极性减弱了,但他对这一运动的持续支持却被广泛宣传。举个例子,他于1774年通知一个位于柏林的共济会:“有一件事将会一直令国王陛下格外愉悦,那就是他乐于有机会向一切真正的共济会提供他强大的支持,以促进它们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提高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智识水平,使他们更加高尚,更加慷慨仁慈。”¹²⁹ 作为对这类赞美的一种回应,有10多处共济会分会的名称中都包含“弗里德里希”(例如“弗里德里希黄金权杖共济会”);此外,共济会还不断强调其会员有义务忠诚于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国家。在他即将去世的那一年,共济会的一次演讲称:“凡不能忠诚而诚实地为其国王和祖国服务的人.....都不配做共济会会员。”¹³⁰ 他去世之后,共济会的一篇祭文称赞他“不仅仅是共济会会员以之为荣,而是全体人类都将永远以之为荣;他不仅仅是最伟大的统治者,更重要的是,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¹³¹

弗里德里希对德语和德语文学的态度

对所有政权来说,这种不断扩大、迅速成长的公共领域,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威胁。更加严格的审查可能会带来负面批评或积极迎合,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导致法国绝对君主制土崩瓦解,而哈布斯堡君主国在1789—1790年间面对同样的动乱却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牵涉其中的这两位君主,在如何向公众树立实际有效的形象方面,能力有高下

之分。¹³²事实证明，不管是和路易十六还是和约瑟夫二世相比，弗里德里希都更擅长于此，但是他肯定没有费心思去恳请柏林文学界的那些重要人物帮助。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统治期间发生的那场伟大的德语文学复兴不仅知之甚少，而且充满敌意。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写信给伏尔泰称，德意志永远不可能发展出任何有价值的用德语书写的文化。他承认，德意志人的确拥有一些美德：他们不缺乏智慧，十分理智（就这一点而言，和英国人非常相似），勤奋刻苦，甚至非常有思想深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沉闷、啰唆和无聊。最主要的问题，而且确实也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就是语言。他写道，由于德语区被划分成许许多多多个领地，就哪一地区的方言可以成为标准语言形式这一问题，绝不可能达成一致。¹³³不管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人信件中，他都经常流露出对德语的厌恶，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比如：“如果我们古代的共和政体的自由还留下什么东西的话，其中就包括以下这点毫无价值的遗产，那就是我们有机会随意破坏一种粗暴且近乎野蛮的语言。”¹³⁴他使用的德语虽然充满了独特的活力，但言语粗鲁，充斥着拼写和语法错误，这证实了他自己的偏见。¹³⁵用这种粗糙的语言媒介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引起他的鄙视。1775年（歌德的畅销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774年出版）他写信给伏尔泰的时候还说，德语文学不过是一个“膨胀的词组的大杂烩”而已，德意志历史学充满了一股迂腐的学究气，甚至德意志哲学自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之后也已灭绝。简而言之，他声称，德意志当下的文化水平差不多落后于法国两个半世纪。¹³⁶

私底下在信件中向伏尔泰表达这些谩骂是一回事，然而以印发小册子的形式公开传播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然而，这就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中所做的：《关于德意志文学——可以批评的缺点、导致缺点的原因和改进的方式》。仿佛是在反复强调他和德语文化之间的疏远，这本小册子是用法语写的，他手下的一位官员（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把它翻译成了德语。¹³⁷他在小册子中明确否认德语文学正在取得进展：“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用这种尚未完善的语言写出

好东西。”从这点出发，羞辱性的说辞接二连三：

德语仍然是一种半野蛮的语言，德意志被分割成多少个领地就有多少种方言……德语体系混乱，使用起来非常困难，听起来不讨人喜欢，也不富于隐喻……德语单词的尾音听起来生硬刺耳，加上一个字母“a”就会大大改善，“sagen”（德语词，意为说，告诉）就可以变成“sagena”，等等。¹³⁸

他至少在这一点上还算通情达理：他承认最后这条建议非常愚蠢，不可能被接受。但弗里德里希随后又挑出那位德语文学界的青年才俊——歌德——特意羞辱他，好像是故意要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一样：

随便去任何一家剧院，都能感受到德意志现在的品味有多糟糕。在那里，你将会看到莎士比亚那些令人生厌的戏剧被翻译成德语上演，观众在这些荒谬的闹剧前哈哈大笑，这些剧明明只配演给加拿大地区的那些野蛮人看……莎士比亚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生活在英国文化虽有所发展但水平不高的时代。但是，我们同时代人没有任何借口犯同样的错误，例如，歌德的《葛兹·冯·贝利欣根》就是对那些糟糕的英文戏剧的拙劣模仿。但是，面对这些垃圾，公众热烈地鼓掌，还要求反复上演。我知道不应该在有关品味的问题上争论，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一个人从木偶戏中获得的满足和从拉辛的悲剧中获得的一样多，那这个人不过是在寻找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而已。¹³⁹

不出所料，这本小册子引起的（主要）反响是大家的愤怒。¹⁴⁰ 一年之内，有9本反驳他的小册子出版。¹⁴¹ 然而，人们也没有真的觉得惊讶，毕竟在弗里德里希整个统治期间，他已经无数次公开炫耀自己对德

意志文化评价之低。他于1743年复兴柏林科学院的时候，给了它法语名字、法语章程、一个法国的院长（莫佩尔蒂），学院主要成员都是法国人，并且他还颁布法令规定法语为科学院口头交流和书面通信的官方语言。¹⁴²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从七年战争结束到弗里德里希去世，他一共为科学院任命了18名正式成员，其中只有5人是德意志人。¹⁴³这也就难怪会出现下面这种现象了。德意志知识分子虽然数量和自信都在迅速增加，却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发现，虽然有本国丰富鲜活的文化精华供弗里德里希享用，但他更偏爱法国那些酸冷稀薄的残渣。把安托万·约瑟夫·佩内蒂误认为是雅克·佩内蒂，从而把他任命为图书馆馆长的惨痛教训就证明了这个问题。¹⁴⁴雕刻家弗朗索瓦·加斯帕尔·巴尔塔扎·亚当以类似的方式被带到柏林，因为普鲁士人误以为他是他哥哥——比他更著名的雕塑家尼古拉·塞巴斯蒂安。¹⁴⁵过去，法语当然是大部分欧洲贵族的首选语言，至少在欧洲大陆是这样，但现在，在欧洲的德语区，弗里德里希刻意的偏好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正如《关于德意志文学》这本小册子所表露出的，弗里德里希就是一个活化石，是以前年代的遗存。冯·格林男爵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类比：弗里德里希评论德语文学就像盲人试图描述色彩。¹⁴⁶他的文化品位在他继承王位之前就形成了，根本没有新的发展。维尔纳·朗格尔对弗里德里希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最深入的研究，如他说，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弗里德里希在莱茵斯贝格（1736—1740年）居住的那段重要时期中，那些亲密的朋友——若尔丹、凯泽林克、德·拉·莫特·富凯——都比他大12—15岁。换句话说，他们属于出生于1700年左右的那一代人，和伏尔泰是同时代人。其实，弗里德里希是有意识地决定让这些成熟的男人围绕在他身边的，这样他就可以向他们学习，而且，他也公开宣称他应该迅速领悟各种事物，但是，他的文化品位再也没有新的变化。¹⁴⁷正如我们看到的，伏尔泰本人对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许多事情上都对他帮助颇多，尤其是为弗里德里希第一本重要的著作《反马基雅维利》的诞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¹⁴⁸结果这就导致了深深的

文化保守主义。

在人文艺术的每一个领域，弗里德里希都被他的臣民超过了。尤其是柏林人，他们特别迅速地拥抱各种新事物，从音乐中的喜歌剧到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1777年，著名演员约翰·弗朗茨·布罗克曼（“德意志的加里克”）在维也纳国家剧院有演出安排，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到访柏林。当然，他已经被所有的皇家舞台驱逐，毕竟皇家舞台只容得下意大利语歌剧或者是法语演讲，所以他出现在贝伦斯街上的公共剧院，这个剧院由兼任经理的演员卡尔·特奥菲尔·多伯林管理。布罗克曼扮演的哈姆雷特轰动一时，12场演出的票全都售罄。想要票的人，不得不提前好几个小时在剧院门口排队。¹⁴⁹ 他被上流社会奉为名人，到访柏林的盛况被富有创新精神的丹尼尔·霍多维茨基以一系列版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当时的一些状况，经常看戏的观众中至少有一些人是肯定可以领会到它的意义之所在的：一个演员，他是他同时代最著名的演员，在去往维也纳的路上到访了柏林。在柏林，他的演出受到限制，只能短暂地在公共剧院进行。等他到了维也纳，却是要在由国家资助的国家剧院演出。被弗里德里希嘲笑的“那些糟糕的英国戏剧”受到柏林人的热烈追捧，《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三世》《奥赛罗》《麦克白》和《亨利四世》也深受他们喜爱。¹⁵⁰

这是一种饱含悲观情绪的保守主义。在1771年写给伏尔泰的信中，弗里德里希诋毁新式的喜歌剧是“陈词滥调配上了音乐，叫喊和歌唱都跑了调，只为了让观众发笑”。“弗里德里希笔下对现代文化的记述也很悲观，在他看来，从路易十四的黄金时代开始，人们的品位不断堕落，最终会不可逆转地终结于重回彻底的野蛮。当时被认为是高品位的东西对他来说只是无关紧要的垃圾，天才和理智一样罕见。”¹⁵¹ 弗里德里希越来越脱离时代，他鄙视像流泪喜剧和市民剧这样的新式戏剧，他也压根儿没把小说当成是一种文学体裁，觉得小说不过是一种“消遣”罢了。¹⁵² 他嘲笑《尼伯龙人之歌》，认为这部伟大的日耳曼史诗“连一枪火药都不值”，中世纪在他眼里也不过是“愚昧的一千两百年”，这样的人是

不太可能会欣赏赫尔德或歌德的。¹⁵³ 视觉艺术方面，他也没有什么新的探索，虽然对绘画的品味有所变化，但也只不过是喜欢的风格更古老了——先前他喜欢接近同时代的画家，诸如华托、帕特爾、朗克雷，后来则更偏爱荷兰、佛兰德和意大利的那些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¹⁵⁴

弗里德里希通常都能敏锐地意识到民众中正在流行什么样的风潮。然而，说到和戏剧相关的各项事宜，他就有些太迟钝了。尤其是，由于没有注意到人们越来越喜欢“国家剧院”，他错过了一个相当便宜而且容易的方式在德语区鼓动人们支持自己。法语剧团一家接一家地相继关闭，信号就再明显不过了——1757年在汉诺威，1758年在慕尼黑，1767年在斯图加特，1769年在德累斯顿，1770年在曼海姆，1772年在维也纳和拜罗伊特，等等。¹⁵⁵ 约瑟夫二世在1776年采取了一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举措，他把自己的宫廷剧院改为“国家剧院”，致力于上演德语剧目（莫扎特的《后宫诱逃》也将会是其中之一）。这让德意志知识分子非常满意。托比亚斯·冯·格布勒写信给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称：“所有爱国者肯定会特别高兴，我们德意志的约瑟夫已经把国家剧院的舞台当作他的宫廷剧院。他必然不会雇用法国人，除非凡尔赛宫里也安排德语戏剧演出。”¹⁵⁶ 一本以戏剧为主题的刊物欢欣鼓舞：“德意志人现在拥有国家剧院了，而且还是由他们的皇帝建立的。对每一个能感受到自己德意志人身份的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愉悦、多么伟大的想法啊！每个人都由衷地感谢皇帝，敬佩他为德意志诸侯们树立的伟大榜样。”¹⁵⁷ 维也纳很少能有机会庆祝自己在文化的前沿性上占得先机，走在柏林的前面。弗里德里希也曾于1774年在御林广场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剧院，却委派一家法国剧团管理，这家剧团在1778年战争爆发时被解散。德意志演员被拒于这家剧院之外，直到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结束，整座剧院都是死灰一般的沉寂。¹⁵⁸

作为宣传者的弗里德里希

如果弗里德里希认为，十分有必要阻止错误的信息传到公众的耳朵里，那么他也同样关心正确的信息该如何传播。他既是自己的首席大臣，也是自己的首席记者。他允诺给报纸出版商安布罗修斯·豪德许多好处，不仅是对其所提供的服务表达感谢，更是因为他需要报纸向人们传播自己的各种信息。在他第一次外交方面的冒险中，也就是和列日采邑主教产生纠纷的那一次，他授意公开出版物刊登支持普鲁士一方的论据。¹⁵⁹他很清楚，从低地国家到莱茵兰再到瑞士的这片新月形地带出现了一批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主要出版法语期刊和小册子并在欧洲范围内传播，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建立起自己的喉舌。¹⁶⁰从一开始，弗里德里希就忙于撰写各种文章和小册子。在征服西里西亚之后不久，他创立了《西里西亚新闻报》，还写了一篇关于自己战胜奥地利的报道发表在该报上（未署名），甚至把他肖像的版画版本作为增刊出售。值得注意的是，《西里西亚新闻报》一直不间断地在发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¹⁶¹弗里德里希特别急于对付反普鲁士情绪占主导的荷兰报刊，这毕竟是欧洲最资深、在欧洲各地广泛发行的报刊。1744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时，他吩咐达尔让斯侯爵创办《荷兰观察家报》，为了增加可信度还宣称该报将在莱顿出版。这份报纸在荷兰共和国被迅速禁止，并于次年停刊。¹⁶²弗里德里希依旧不屈不挠，在他整个统治期内继续利用报刊，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他在位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的报纸数量从60种增长到200多种，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掀起了一股报纸热，报刊彼此间的竞争也极为激烈。七年战争期间，政治和宗教间的争论不断激化，这就尤其有利于报业发展。¹⁶³

在欧洲，英国拥有最有活力也最广阔的公共领域，没有哪个地方能与之相提并论。在18世纪中叶，英国的首都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至7位数。面对这个重要的同盟国，自1756年起，弗里德里希谨慎地向英国公众传递战况，大肆宣扬胜利的愉悦，对战役失败的原因轻描淡写。¹⁶⁴在英国，反天主教可以说是其政治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弗里德里希可以被标榜为古斯塔夫

·阿道夫第二，一位捍卫欧洲自由的新教斗士，对抗着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这3个专横的天主教巨头的邪恶计划。海外战场险象环生，凯尔特人边境叛乱，此时的英国人急需一位能够给他们带来信心的英雄人物。和他们自己日渐衰老、毫无领袖魅力的君主乔治二世相比，弗里德里希无疑是合适得多的人选。因此，弗里德里希受到公众的热烈追捧，数不清的诗词、颂歌、布道、陶瓷艺术品、勋章、版画都表达了对他的赞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各地差不多有数百家旅馆改名为“普鲁士国王”（有一些甚至在1914年和1939年憎恶德国的浪潮中保留下来，一直存续到今天），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过生日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全都在为他庆祝生日，连苏格兰地区也是如此。¹⁶⁵

在德意志地区，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从桌布到鼻烟壶，从刀具到手镯，大量装饰有弗里德里希的形象的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在普鲁士境内，克莱沃公国的城市伊瑟隆成为大规模生产这类产品的主要中心，包括表面绘有作战计划图的纯铜或黄铜匣子，装饰华丽的勺子，涂了釉彩的香烟锡盒和造型像是弗里德里希的烟用剪刀，所有的产品从这里出口到整个帝国，甚至“出口到世界各地”。那些印有爱国主题、图像和诗句的“万岁丝带”风靡一时，常被人们用别针别在马甲或帽子的边缘。这类丝带之所以如此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特别便宜。

¹⁶⁶ 描绘战争场面的图画旁边通常会配上一首奉承的诗歌和一段描述性文字，以至于这些版画看起来更像是一本绘有插图的小册子。¹⁶⁷ 即使弗里德里希知道这一情况，他也并没有对此留下评述。鉴于本章前面所述，他对公众充满蔑视，这些事情也不太可能得到他的认可。虽然他曾委托他人制作自己的肖像画，特别是在统治早期，但他也不会为了画家好好地端坐在那里。然而也很可能有两例例外，一次是为了不伦瑞克宫廷画家约翰·格奥尔格·齐泽尼斯，弗里德里希曾于1769年拜访妹妹阿马利娅时让齐泽尼斯替自己绘制肖像画，还有一次是1775年安娜·多罗特娅·提亚布施为他绘制肖像画的时候。¹⁶⁸ 两位画家呈现给大家的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男人。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最能表现其神韵的肖像画当数画家安东·格拉夫于1781年创作的那幅。借弗里德里希多次在波茨坦阅兵的时机，画家仔细观察钻研他的五官、神态，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了这幅肖像画。这件作品屡屡被制作成版画，所售出的副本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¹⁶⁹在形象这方面，弗里德里希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且尤其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所以，当1763年丹尼尔·霍多维茨基用繁复的巴洛克风格把他描绘成一个带来和平的使者时，他直接下令清缴，图版被收购、捣毁，所有能找到的副本都被付之一炬。¹⁷⁰然而，官方的反对并不能减少霍多维茨基的吸引力，根据学者埃克哈特·赫尔穆特的权威意见，霍多维茨基的受欢迎程度“怎么估计都不为过”。¹⁷¹

弗里德里希对公众的态度时好时坏，变化无常。1763年3月30日，当他回到阔别7年的首都时，他故意让人群在路边苦苦等候数小时，自己换了一条不同路线前往王宫。那些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准备以合适的方式迎接英雄的人怨声载道，也就不足为奇了。“人民的诗人”安娜·路易莎·卡尔施的忠诚和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格莱姆，连她也对弗里德里希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冷淡”感到气愤。她评论道：“他辜负了10万人民的期望……那一刻，他对我来说失去了伟大的意义。”¹⁷²在其他场合下，弗里德里希则展现出不同的一面，他可以像现代政治家一样和人群热烈地互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也许他从未亲吻过婴儿，假装享受快餐或是戴着棒球帽，但他的确特别注意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在那时，还没听说过有谁会向社会地位比他低的人脱帽致意，但弗里德里希每次骑马经过他人身边时，通常都会摘下帽子，这就令人印象深刻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维茨，后来成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785年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年迈的弗里德里希骑马通过柏林时向经过他身边的人脱帽致意，那时候他才只有8岁，但此后从未忘记过这一画面。他估计在哈勒门和科赫大街之间，弗里德里希脱帽致意的次数肯定至少有200次。¹⁷³10年前，安娜·路易莎·卡尔施也曾看到过同样的一幕，她说：“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一幕中，他才彻底地成为弗里德里

希大王。”¹⁷⁴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海因里希·弗兰克所绘制的弗里德里希脱帽致意的肖像画如此受欢迎，这位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以该主题为母题，创作了多幅作品，当然也有被制作成版画。

弗里德里希的另一个标志性姿态是愿意接受请愿书，不管是在他旅行途中直接递交上去，还是在他回到波茨坦之后写信给他。根据拉克索尔的说法，任何人都可以给他写信，并且相信一定会收到回信。拉克索尔举了一个例子，柯尼斯堡的一个裁缝写信抱怨道，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当地长官多纳伯爵付钱给自己。弗里德里希回复说，请再试一次，因为到那时候，伯爵已经受过必要的训斥了。¹⁷⁵

在英国和德意志，弗里德里希的很大一部分吸引力都来自他新教徒的身份认同。人们倾向于把18世纪看作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时代，如果非要说这个看法有对的成分，那也只适用于社会的上层阶级，甚至在那里也不一定真的如此。像考尼茨、叶卡捷琳娜大帝或是弗里德里希这样的犬儒主义或不可知论者也许已经开始完全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了，但是整个社会却仍然生活在一个虔诚的信仰时代。¹⁷⁶ 人们通常热衷于把18世纪描述为“理性的时代”，这一形容还不如“宗教信仰的时代”或“基督教世纪”听起来更具合理性。¹⁷⁷ 而且，至少在18世纪的前50年里，似乎是天主教会处于优势地位，且势力不断扩大，他们在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施瓦本等地大肆兴建雄伟的巴洛克式修道院和教堂，就是这种优势的明证。在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平衡看起来已经彻底偏离了新教徒一方。过去新教徒的几个重要阵地都转向了天主教：普法尔茨选帝侯国自1685年起、萨克森选帝侯国自1697年起、符腾堡公国自1733年起就开始由天主教徒统治。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至少有31位德意志诸侯皈依天主教。¹⁷⁸ 1754年黑森-卡塞尔伯爵出乎意料地转信天主教（据说是为了在天堂和一位情妇重聚），两年后奥地利-法国同盟建立，遍布欧洲各地的新教徒害怕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弗里德里希毫不意外地大力打出宗教信仰牌，向所有愿意追随他的人保证，他是新教对抗天主教这一事业的支持者。¹⁷⁹ 不管有多么虚情假意，这一姿态确实产生

了一些影响。汉诺威面点大师埃伯哈德·于尔根·阿贝尔曼在他的日记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宗教信仰气息，他觉得德意志人的自由和新教信仰已经处在危险之中。¹⁸⁰在瑞士，人们甚至把弗里德里希描绘成一个当代威廉·退尔的形象，说他要捍卫自由以对抗天主教联盟终将出现的暴君，而这种形象并不太符合事实。¹⁸¹

出现这种反响也理所应当。弗里德里希不仅经常声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仆人”，在由他支持建立的公共领域里，他亦是第一位参与者。他致力于文化建设，并不只是被动地资助一些代表性的艺术作品，而是积极地作为一个建设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即使不是普鲁士国王，作为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剧作家、作曲家以及长笛演奏家，他也应该在18世纪的文化史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他的政权，或是它对德意志历史后续发展的影响，如果不能意识到他身上非凡的天赋的话，人们就无法读懂他的作品或是理解他的音乐。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他对“个人的自我教化”（Bildung）的重视恰好把自己置于德意志文化的主流中。一个把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带上战场的人，一个在胡贝图斯堡和平谈判的间隙阅读卢梭《爱弥儿》的人，必定是一个高度重视才智的人。¹⁸²除了创作音乐，阅读是他最喜欢的一项消遣。他对他朗读的德·卡特说：“我今天读了很多东西，太幸福了。”¹⁸³1771年的时候他曾说过，在他这个年纪唯一适合自己的娱乐就只剩下好书了。¹⁸⁴在他最重要的6座宫殿（柏林、夏洛滕堡、布雷斯劳、波茨坦城市宫、无忧宫和新宫）中都有藏书量巨大的图书馆，此外，他还拥有一个便携的书箱，以备在旅途中和出征时使用。¹⁸⁵

弗里德里希屡次宣扬自己的信仰，例如：“从小我就喜欢艺术、文学和科学，如果我能为传播它们做些事情，我将竭尽全力奉献我的身心，因为如果没有它们，这世界上就再无真正的幸福可言。”¹⁸⁶这些宣言无疑是真诚的。对持怀疑论立场的非教徒弗里德里希以及其他许多德意志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并不赞成启示宗教，所以广义上的艺术就取代了启示宗教，填补了超验领域的某种空白。许多试图阐释这种新的美学信

仰的人——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都对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政权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但他们和弗里德里希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相信艺术的神圣化。上面引用的弗里德里希的信条比下面很多类似的话产生更早，例如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的笔名）曾说：“无论是谁，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不快乐，如果他有所追求却求而不得，那么，就请他进入书籍、艺术和自然的世界吧，这个永恒不朽的世界同时是古代和现代的，就让他生活在这更加美好的世界里的这座秘密教堂。在那里，他必将找到一位爱人、一个朋友、一个祖国和一位上帝。”¹⁸⁷ 此外，弗里德里希宣扬智识主义，尊重知识分子，他们又反过来把他塑造成一个榜样。皮埃蒙特神父卡洛·乔瓦尼·马里亚·德尼纳被弗里德里希请到柏林，成为柏林科学院成员。正如他写道的那样：“一位国王，一位作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一位无时无刻不在与文人墨客保持往来的国王表现出来的热忱，对任何智识上的努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动力。”¹⁸⁸ 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毕竟是它缩小了人们常说的亲法派君主和德意志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

然而，在处理文化事务方面，弗里德里希不仅仅是个积极的活动家，他也是带有批判性的。从他第一本重要的出版物——《反马基雅维利》——开始，他屡次进入公共领域参与辩论。正如歌德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是出版一本关于德意志文学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就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界的辩论，没有一个在世的人能与之匹敌。有点矛盾的是，他对文化的厌恶对德语作家来说反而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将通过激起他们的反应来刺激作家群体本身。歌德继续说道：“而且，同样地，弗里德里希讨厌把德语作为文学媒介，这对德语作家来说也是件好事。他们尽其所能使国王注意到他们。”¹⁸⁹ 弗里德里希关于德意志文学的言论是不符合事实的，是片面的，甚至有时是荒谬的，但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普鲁士的国王进入到公共领域，与所有参与者较量。此外，他的论著就是针对公众的，因为在出版前，他已在柏林的出版界刊载了一部分，以引起公众的好奇。¹⁹⁰ 当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共领域出现。他

曾经拿起笔来攻击过霍尔巴赫的《论偏见》和《自然的体系》，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和《爱弥儿》，总之启蒙哲人们一般都没逃过他的攻击。¹⁹¹而且他还鼓励其他人以一种批判精神进入到公共领域中，为此，1744年他命令柏林科学院每年组织一次年度有奖征文比赛，设置一些参赛主题，诸如：“在文化繁荣的国家，政府对文化的影响是什么？”（赫尔德获得第一名），以及“是什么使法语成为欧洲的通用语言，它是否应该享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¹⁹²。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1777年的征文，主题是“欺骗人民是权宜之计吗？”，这次一共吸引了42位参赛者，在德意志各期刊杂志上也引起了广泛讨论。¹⁹³在整个统治时期内，弗里德里希一直都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巴黎寄来的新作品。¹⁹⁴

似乎有些矛盾，但是这种棒喝和鼓励政策的结合的确促进了德语文学的发展。不是所有受他冷嘲热讽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他们不应被如此对待。伟大如歌德这样的人物也时不时会使用类似的说辞。1785年，歌德觉得不太喜欢莫扎特的《后宫诱逃》，只有说服自己忽视剧本是用德语写的，才能勉强接受。大约在同一时间，他放弃了自己正在写作的德语剧本，甚至想转而用意大利语而不是“这野蛮的语言”写一部替代品。

¹⁹⁵普鲁士作家莱昂纳德·迈斯特也坚持认为，德意志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弗里德里希的批评是合理的，并声称这些批评性的话语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喝彩”。¹⁹⁶他甚至可以从弗里德里希所谓的对法国的崇拜中发现有益的一面：“就连他对法国的偏爱似乎对德意志人民也有好的影响。他们不仅向法国人学习，而且还从中培养出一种高贵的竞争精神，德意志知识分子想要成为他们才华横溢的法国同行优秀的伙伴。”¹⁹⁷自愿成为普鲁士人并且一直对普鲁士十分忠诚的托马斯·阿伯特相信，如果在弗里德里希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德语文学就像现在这样出色，他说不定也会用德语写作。¹⁹⁸

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加尔弗在18世纪末回顾了这场争论，他的评论则要更为谨慎。一方面，他认为弗里德里希夸大了德意志各个地区之间互相不能理解的程度，毕竟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全民族

范围内通用的“标准”书写形式，以方便人人都能理解，德语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他也愿意承认，德意志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要比其他国家内部更大，这就导致书面文字和间接引语、标准德语和方言来回切换使用，就会产生一种矫揉造作的不自然之感。对于当时的文学水平，他也没有过分乐观：“作为一个诚实的德意志人，一个热爱真理甚于祖国名誉的人，我不能拒绝同意国王的看法：就文学而言，我们落后于外国人。”到目前为止，德意志尚未诞生像法国的拉辛、莫里哀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这样广受欢迎的剧作家。最后，他审慎而明智地总结道：“他〔弗里德里希〕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他也指责了我们早已不再犯的罪过，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他的阅读量还不够，不足以找到那些确实存在的许多美好事物。”¹⁹⁹

倘若一些德意志知识分子愿意承认弗里德里希是对的——或者至少对了一半——那么他们也深信，他把普鲁士确立为一个大国就已经给德意志文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歌德在他的自传中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说法：“德语文学中最初的真实和崇高的、生气勃勃的内容，来自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七年战争的事迹。”²⁰⁰ 他进一步论证道，弗里德里希的英雄壮举，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新教阵营一个无价的文化优势，这是奥地利和天主教徒们永远无法匹敌的。²⁰¹

不管怎么样，实在是难以证明歌德是否正确。人们可以举出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路易十四的法国、17世纪晚期奥地利的巴洛克文化或是20世纪的美国为例证，来支持“权力和文化步调一致”的假设。而另一方面，也可以以15世纪的勃艮第、18世纪的威尼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或20世纪早期的巴黎为例，印证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只有在历史的黄昏里，密涅瓦的猫头鹰才会开始她的飞行。”歌德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上许多与弗里德里希同时代的人都对这一关系有和歌德类似的评价。作为弗里德里希那本《关于德意志文学》小册子的译者，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认为：“弗里德里希的伟大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

激发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对文学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²⁰² 阿希姆·冯·阿尼姆则认为，强调这一过程的矛盾性质更为重要：

在德意志有这样一群诸侯，他们只愿意支持外国戏剧，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热情，也愿意提供资助，弗里德里希大王就是其中的一位。然而，因为恰好是在他统治期间，对抗法国的胜利让德意志人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出现了对外国戏剧强有力的回应，一群伟大的德语戏剧人才得以成长，从而导致外国戏剧的影响被驱除，但弗里德里希本人或是任何受委托来执行他政策的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²⁰³

弗里德里希自己也更简洁有力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对米拉波说：“对于德意志文学，还有什么能比我不去花时间管它而更有助于其发展呢？”²⁰⁴

与此前的所有欧洲君主相比，弗里德里希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公共领域的重要性。²⁰⁵ 他对公共领域的意识如此之强，以至于在他统治末期，他同意公开讨论正在拟订中的《国家通用法典》草案摘要。在一份1784年3月24日印发的公告中，首相约翰·海因里希·卡齐米尔·冯·卡默宣称，由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影响到全体人民，因此听取公众的意见才是合适的做法。他们还邀请国内外专家提出意见。在一篇刊载于《柏林月刊》的文章中，“一位爱国者”利用这个机会吹嘘说，普鲁士人所享有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在公开场合“相当自由地”讨论重要的政治议题，即使他们支持的观点与政府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还说道，大量的出版物都已经证实这一情况，现在卡默向公众咨询意见的行为也确凿不移地证实了这种思想自由，毕竟国王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他补充道：“

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必须尊重这一开放、自由和高尚的行为，借此人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人和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²⁰⁶这与法国大革命的语言类似，但比革命的爆发还要早5年。莱昂纳德·迈斯特在1787年的一部作品中也举出了同一个案例，以证明普鲁士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依照法律规则治理的国家：

这位在诸多君主中独树一帜的国王还有很多功绩。他不仅通过颁布一部明智的法典增进秩序和安全，而且在起草法典时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论你是普鲁士公民还是外国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他本人也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下。他公开宣称，在司法问题上农民和诸侯具有同等价值……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政府，难道我们的民族精神还得不到提升？有了这样的民族精神，德意志民族可以更加勇敢地展翅高飞，因为他们不会被迷惑，也无所畏惧——宝座之上，君王的纸醉金迷不会使他们眼花缭乱；圣坛之上，教皇发出革出教门的威胁，亦不会使他们感到恐惧。以这种方式，弗里德里希就给了艺术和科学最好的关照：安全、自由和宽容。这一点强调多少次都不过分。²⁰⁷

只要弗里德里希在位，这一切就都能运转良好。但一个不那么开明的继任者会怎么做呢？1785年《柏林月刊》的观点向立宪国家的方向推进了一步，它认为未来的任何政策改变都应该先得到整个民族的同意。²⁰⁸可以有把握地说，专制的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考虑放弃他的绝对权威，哪怕是放弃一点点权威。在普鲁士人民准备好（1848年）夺取他们的国王不愿给予的东西之前，更多的暗涌还将从施普雷河桥下缓缓流去。

。

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

如果人们对弗里德里希的了解再深入一些，就不会如此乐观地幻想普鲁士进一步自由化的美好前景。但他个人魅力的魔咒如此强大，以至于这种错觉不仅在他统治期结束后仍然持续存在，甚至，随着他的美名变成了神话，上述错觉还在继续增长。直到20世纪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后，人们才幡然醒悟。“公众”的种种特性也同样适用于，甚至更适用于另一个在18世纪获得更多动力的强大的抽象概念——民族。下面这种观点很常见，但实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弗里德里希对德意志文化评价不高，崇拜伏尔泰，所以他自己选择成为法国人。然而正相反，他对自己的德意志民族身份有着清晰的意识。就算他在两种民族身份之间犹豫不决，这两种民族身份也不是法兰西和德意志，而是德意志和普鲁士。²⁰⁹ 1742年，弗里德里希告诉法国大使德·瓦洛里侯爵：“身为德意志的诸侯，我对我的祖国怀有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和一个好的公民所具备的一切情感。”²¹⁰ 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与伏尔泰往来的信件中会有他最国际化的一面。然而，在这些信件里，他不断重复提及自己的民族身份，例如：“我只是一个称职的德意志人，我并不羞于坦率直白地表达自己，毕竟这是我们民族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

我打赌，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会这样想：“这真是个典型的德意志人，他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缺乏热情的特征。”没错，和法国人比起来，我们就像植物一样；既没有写出《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也没有写出《亨利亚德》[伏尔泰的史诗]这样的作品。自从查理曼突然想到要通过割断我们的喉咙把我们变成基督徒以来，我们就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阴云密布的天空，以及漫漫冬日里的寒霜，也都促进了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²¹¹

正如最后一句话表明的那样，弗里德里希热心学习孟德斯鸠的作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他自己讨论习俗问题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由于“各个民族本身都具有不可磨灭的特点”，所以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特殊的风韵。例如，于帕多瓦、伦敦和巴黎出版的图书，就算是用同样的语言或是讨论相同的主题，也很容易区别开来。教育也许能起到一定的改变作用，但绝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性格。²¹²

虽然弗里德里希在批评德意志人的缺点时是一个无情的人，并且（有人也许会认为）他对这些缺点——迂腐，缺乏幽默感，粗鄙，以及“有一种毛病，话痨”²¹³——拥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但他对法国人的批评也同样苛刻。他不断尖锐地攻击他所谓的榜样们，尤其是因为他们在迫害异见者方面不可救药的嗜好。“英国人可以公开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他说，“但是一个法国人几乎不敢透露一点儿自己的想法。”²¹⁴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法国可以产生像笛卡尔或是马勒伯朗士这样的人，但永远不会诞生像莱布尼茨、洛克或牛顿这样真正无畏的思想家。由此可见，对于包括弗朗西斯·培根、亚历山大·蒲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内的英国作家，弗里德里希也有深刻了解。²¹⁵再者，法国的时代也已结束。在黎塞留担任首相及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曾有过那么几年，法国像一颗璀璨而明亮的星星，但这只是愚蠢的历史长河中短暂的智慧瞬间而已。²¹⁶弗里德里希屡次对伏尔泰说，他是最后一位杰出的法国作家，这不仅仅是出于奉承。²¹⁷他告诉伏尔泰，现代法语文学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最好一把火烧掉。²¹⁸在他看来，卢梭已经“疯了”，狄德罗的书他似乎就没有读过，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私人藏书中。²¹⁹对于法国的先锋人物，他用了特别恶毒的语言加以批评：为了反对霍尔巴赫，弗里德里希特意撰写了两篇言辞尖刻的驳斥文章；面对“百科全书派”，他冷嘲热讽，觉得他们肤浅且傲慢。²²⁰

当然，他也相信，在17世纪中叶的黄金时代，出自法国作家之手的那些戏剧作品已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水平，但在人文艺术的其他领域，他不允许他们独占鳌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对法国音乐的评价很低；

对于建筑风格（或者说是多种建筑风格，因为他博采众长），他更看重意大利和英国，而不是法国。²²¹对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文化并不是法国文化而是古典文化，实际上他只接受了在古典文学允许范围内的法国作者。²²²而且，随着他一天天老去，他转而拒绝当代法国腐朽的文化，七年战争之后这一转变尤为明显。²²³弗里德里希非但没有鼓吹法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反而谴责那些对其不加批判就直接模仿的群体，就像狂飙突进运动一样言辞激烈：

对法国戏剧的爱好和法国人的时尚一起进入德意志，路易十四的一举一动给人留下富丽堂皇的印象，他的宫廷高雅精致，那些伟大的人物为他的统治增光添彩，这一切都使人心潮澎湃，整个欧洲都试图模仿它所崇拜的法国。整个德意志的人们都去法国旅行，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在凡尔赛宫度过一段时光，那他可算得上是个傻瓜。法国人的品味统治着我们的厨房、家具、衣着，所有的小装饰、小摆件都任由法国人的时尚暴政摆布。这种过度的激情变成了狂热；女性常常被夸大的时尚所影响，最终推动这一切走向奢侈和浪费。²²⁴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也清楚地认识到，德意志文化终于开始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关于德意志文学》中，他对德意志文学状况的以下这点评价和记录是正确的：三十年战争、宗教冲突以及路易十四的战争造成巨大破坏，导致德意志元气大伤，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德意志才真正开始复苏。起初，所有的努力都必须集中在物质世界的重建上。不过这个过程非常迅速，德意志现在又重新繁荣起来，人们越来越富有，他相信这最终也将引起文化复兴。确实有一些充满希望的迹象，比如，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不再羞于使用本地方言进行创作；第一本德语词典也已出版；更普遍的是，有一种激动之情在不断生长，从公众对德意志民族声誉的讨论中就可以感

受得到。如果可以找到足够的赞助人，那么德意志人也能公平享有自己的天才，且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典文学作品。于是，他以惆怅却也不失乐观的口气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说道：“我们文学的美好岁月尚未到来；但它们正在接近，看起来这一愿望终将实现。我甘心做它们的使者，虽然我年事已高，失去了亲眼见到它们的希望。我就像摩西，从远处看见应许之地，自己却无法进入。”²²⁵

在读完他的那篇诗体书信《献给不伦瑞克费迪南德亲王的颂歌，1758年法国人撤退时》之后，任何关于弗里德里希崇拜法国的残念都将不复存在，但如此具有揭示性的文章被人们所忽视。²²⁶这首长诗展示了一系列描绘法国人及其国王特点的话，这些语言可能来自最厌恶法国的小册子：“傲慢……言辞浮夸……骄傲〔重复4次〕……狂妄……贪婪……高傲……轻浮……空虚……虚弱……堕落……暴力……罪孽深重”。弗里德里希详细叙述了一支庞大的法国军队如何浩浩荡荡地越过莱茵河，希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德意志人赶走。然而，他们别的不会，烧杀抢掠倒是很擅长，“贪婪地四处搜刮战利品，用战利品的大小来衡量他们的勇气”。²²⁷当遇到英勇的费迪南德和他的勇士时，他们就龟缩起来，从莱茵河游了回去。作为类比，弗里德里希意味深长地把话题转到日耳曼神话，以及公元9年条顿堡森林战役的那场胜利，日耳曼人赫尔曼（拉丁语形式是“阿米尼乌斯”）在这场战役中击败了罗马军团：

一大群人

潮水般从法国涌入，

瓦卢斯第二率领他们，

正准备大获全胜之时，

始料未及，遇到

赫尔曼第二。²²⁸

赫尔曼是弗里德里希的榜样。在《教育书简》中，他斥责当下年轻人颓废、堕落，同时反问道：赫尔曼——“骄傲的德意志捍卫者”——会如何看待他们？²²⁹ 不管有意与否，弗里德里希在当时德语文学的主流中再次发挥巨大作用，恰好在他统治期间，也正是由于他统治的鼓舞，人们对赫尔曼的英雄传奇再次燃起极大热情。德意志文坛涌现了许多戏剧和史诗，包括约翰·埃利亚斯·施莱格尔的《赫尔曼》（1740年），尤斯图斯·默泽尔的《阿米尼乌斯》（1749年），克里斯托夫·奥托·冯·舍奈希男爵的《赫尔曼，或被解放的德意志》（1751年），还有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的《赫尔曼的战役》（1769年）。²³⁰ 在诸多描绘赫尔曼的绘画作品中，约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的作品《战胜瓦卢斯之后带着战利品的赫尔曼》（1772年）最为出色。在写给费迪南德的颂歌中，弗里德里希用特别恶毒的言辞攻击法国罪恶的化身——路易十五，嘲笑他是一个衰弱无力、沉溺酒色、虚度光阴之人，不过是他的情妇蓬帕杜夫人的玩物，却还要擅自充当欧洲的立法者。这是一场民族间的斗争，弗里德里希写道：

法国人，吹嘘你们的财富，
你们的奢华，你们的慵懒
还有普路托斯的所有恩赐；
面对萨丹纳帕路斯的行为
我的民族，更勤俭节约，
只能用它的德行与之对抗。²³¹

这首诗的措辞可谓十分犀利，显示出弗里德里希对法国人的讥讽之情有多强烈。他在一封散文体的信中以更轻佻的语气让费迪南德一脚踹在这些逃跑的法国人屁股上，留下他靴子的痕迹。²³² 法国人自命不凡

的态度和徒劳而返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让弗里德里希感到特别愤怒。前一年年底，他作诗一首，讥讽地题为“致毁灭者”，在诗的序言中写道：“在朝罗斯巴赫进军的途中，苏比斯亲王写信回国称，他要去给太子妃摘一束花。”²³³

当然，太子妃从来没有得到自己的花束，因为罗斯巴赫之战最终成为18世纪法国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按照伏尔泰的说法，这场失败比克雷西、普瓦捷以及阿金库尔3场战役失败都更令法国蒙羞。²³⁴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他们并不关心被击败的军队中有很多是讲德语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这场胜利首先被看作是一场民族胜利之战，德意志人击败了那些自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宪兵”的法国人，他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断跨过莱茵河，带来死亡和毁灭。²³⁵一时间涌现出大量庆祝胜利的宣传册、歌曲、诗歌和版画。在诸多为颂诗谱曲的作曲家中，也有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他把约翰·威廉·路德维希·格莱姆创作的《罗斯巴赫战役前的挑战之歌》谱成乐章。²³⁶1757年12月，格莱姆收到他的朋友、诗人卡尔·威廉·拉姆勒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在柏林大教堂举行的感恩仪式：

我刚从我们无与伦比的〔宫廷牧师〕扎克关于胜利的布道中回过神来。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因为爱和感谢而热泪盈眶...我们的年轻人仍没有停止射击胜利的子弹，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枪声仍围绕着我。为了纪念这两场战役的胜利，商人们生产了花式的多样的绸带，我们用它们来装饰我们的马甲、帽子和刀剑。²³⁷

在七年战争期间，扎克的布道特别受欢迎，不仅一印再印，还在普鲁士各地的集会上被高声朗诵。²³⁸在这个时代，各个年龄层的人大都经常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因此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媒介，但大部分历

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期间的普鲁士，新教牧师在制造舆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意象当然来自《圣经》。弗里德里希被比作大卫王，是神的工具，要无情地击杀非利士人（天主教徒），普鲁士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当代的以色列人。²³⁹与此同时，在同时代的英国，牧师们为汉诺威王朝提供同样的服务，亨德尔也在他创作的以色列清唱剧中以宏伟壮阔的方式展现了这一宗教叙事。²⁴⁰不管弗里德里希本人怎么想，大多数臣民最喜欢他身披捍卫新教的铠甲。的确，有传闻称他真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坚持要求他的士兵参加教会游行，高唱赞美诗。

根据文学审美意趣的不同，弗里德里希的胜利启发或者说催生了一整个文学次级门类：战争歌谣。最受欢迎的是《1756年和1757年战役中的普鲁士战歌集》，据说由“一个掷弹兵”写的，但实际上出自格莱姆之手，他相信弗里德里希正在打的是“有史以来最正义的战争”。²⁴¹在他1758年出版的该作品合集版的序言中，莱辛也提到了这个“掷弹兵”，他称作者是一位“普通士兵，上帝赐予他同样多的诗性才华和英雄主义情怀”。²⁴²至少，格莱姆也具有直接的军事经历，他曾经是普鲁士将军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的秘书，一直追随着自己的雇主征战前线，直到将军在1744年围攻布拉格的战役中阵亡。²⁴³战歌集的语言简单、直白、生动，也是根据英国民间歌谣《切维山追捕》的韵律来演唱。《切维山追捕》曾刊登在艾迪生主编的《旁观者报》上，经由克洛普施托克的介绍传到了格莱姆这里。²⁴⁴《普鲁士战歌集》语气充满攻击性、暴力甚至嗜杀血腥，此处摘录第一首诗歌“1756年的战役拉开序幕”开篇第一节：

战争是一曲属于我的歌! 因为全世界

都想要战争，那就开战吧!

让柏林成为斯巴达! 祝普鲁士的英雄

被荣耀和胜利加冕吧！²⁴⁵

第二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位掷弹兵就期待着能用匈牙利士兵的头骨制成高脚杯，畅饮匈牙利葡萄酒。²⁴⁶ 弗里德里希不屈不挠的形象矗立在本书的中心，他被尊崇为无所畏惧、无与伦比的英雄，在失败和胜利时都一样伟大。以往“为了上帝与祖国”的传统呼号扩展为“为了上帝、祖国和弗里德里希”。²⁴⁷ 在上帝的帮助下——行文中常常提到上帝——他打赢了许多显然没有胜算的战役，而且还总是像父亲一样体贴地照顾他的士兵。尽管字里行间流露出军国主义情绪，但格莱姆的诗歌不仅在大众中获得了经久不衰的成功，还获得了同行知识分子的赞许，其中甚至还有莱辛，要知道他对弗里德里希的态度非常矛盾，这种矛盾的态度尤其出于他对萨克森持久的忠诚。²⁴⁸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真正受欢迎的是安娜·路易莎·卡尔施的诗。她于1761年2月从战火纷飞的布雷斯劳移居马格德堡，受到格莱姆的照顾。她纪念弗里德里希胜利的朴素诗作，在格莱姆的帮助下被收入了一本诗歌选集，在知识界和公众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诸多胜利的战役中，她特别偏爱托尔高战役。²⁴⁹

弗里德里希的感染力不局限于普鲁士境内。在整个德意志新教地区及瑞士德语区，都有证据表明人们对他狂热的支持。²⁵⁰ 七年战争并没有催生出德意志民族主义，但是它的确以英雄般的情节为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民族主义转向普鲁士，拓展了其使用的语汇，也让它更深地融入德意志社会和文学作品中。²⁵¹ 大量文学作品表明，几乎没有一个活跃的诗人可以与战争划清界限。²⁵² 长期以来，受过教育的德意志人都因为文化上的自卑感和政治上的虚弱感到痛苦，特别是在面对占主导地位的法国人的时候。这种痛苦持续得太久了，以至于只要有人能扭转这种形势，无论是谁，他们都愿意回应。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位知识分子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他出生于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公国（上松特海姆），并在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型自由帝国城市（阿伦）长大。德意志南部许多新教徒都支持弗里德里希和普鲁士

，但对二者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认识，舒巴特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员。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在纽伦堡上学，“我所有的热情都完全奉献给了普鲁士”。他在那里写下纪念弗里德里希胜利的歌曲，被当地人传唱，却也让他被占领这座城市的奥地利军队打了一顿。²⁵³ 在他创立于1774年的《德意志纪事报》上，舒巴特欣喜于德意志的世界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候有理由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那么现在就是了。外国人嫉妒地看待一个他们试图通过煽动混乱和渗透他们的时尚来征服的国家”（例如法国）。他坚称，出现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弗里德里希，“他的右手掌握了欧洲的天平，左手握着权杖——谁能毫无热情地说出他的名字？他是这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是现在和将来英雄的伟大原型，他是一个德意志人，并且仍处于盛年”。²⁵⁴ 在这篇文章中，舒巴特让弗里德里希与皇帝约瑟夫二世分享他的荣誉（“谁可能比我们崇高的约瑟夫更加活跃、睿智、勇敢或敏感？”），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后者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政策改变了舒巴特的观点。在他简单地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一首诗中，他赞扬弗里德里希建立了诸侯联盟，挫败了约瑟夫的计划：

德意志的诸侯冲向

弗里德里希的石头堡垒，这位巨人在那里

躺在铁床上沉思。

他们向他伸出手来，称赞他为

他们的基本权利的守护者，并大声疾呼：

“做我们的领导者，弗里德里希赫尔曼！”

他表示同意，德意志联盟成立。²⁵⁵

为了增强他的神话力量，这首诗中的弗里德里希不仅以赫尔曼的形

象出现，还以沃坦^①的形象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舒巴特是一名激进分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符腾堡公国腐败滥权的乱象，这导致他被判10年监禁。正如一本权威的18世纪德意志文学通史所言：“舒巴特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压迫，反对神职人员对民众的蒙骗，反对剥削农民。他通过反对这些事物的斗争，具体表达了‘自由’的观念。”²⁵⁶舒巴特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证据则不那么经常被强调。他不仅为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而骄傲，而且为德意志强大的力量而骄傲。他声称，现在为欧洲立法的是德意志人，他为弗里德里希手下拥有的25万军人而自豪。²⁵⁷他后来补充道，任何能够幸运地参加弗里德里希的军事演习的人都只能说：“这里超过了罗马和斯巴达！”²⁵⁸他高兴地继续说道，弗里德里希在哪些方面引领了潮流，其他人就在那些方面跟随，现在（1774年）甚至较小的公国也在军事上达到了完美。德意志骑兵与英国相当，而且德意志的火炮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火炮匹敌。舒巴特感叹道，如果可以让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个诸侯都一致行动，那么这样一支巨大的德意志力量将是无敌的。²⁵⁹

在普鲁士，军国主义也很受欢迎，尽管其财政和社会成本巨大。不仅是容克军官，还有很多其他人被军事荣誉的危险诱惑所吸引。在弗里德里希去世一年后，一位特别敏锐的法国观察员德·吉贝尔伯爵在普鲁士访问后写道，“普鲁士的普通民众，即使是最低阶层的普通民众，也充满军事精神，提到他们的军队时充满敬意，知道他们的将军的名字，谈论他们的累累战功和他们扬名立万的时代”。²⁶⁰浪漫主义诗人路德维希·蒂克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述他在柏林的童年：

国王以伟大军事领袖的形象出现在阅兵式上，他成功地抵挡了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联盟；他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支军队赢得了如此多的战斗。当在柏林的某个城门之外——可能

是哈勒门或普伦茨劳门——进行军事训练或演习时，柏林的市民便蜂拥而至，前来观看。我的父亲〔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匠〕也习惯把他的孩子带到这些受欢迎的节庆现场。在拥挤的人群中，在炮兵编队的涌动和士兵的行进中，我们准备忍受几个小时的炎热天气和尘土飞扬，只是为了看到我们的“老弗里茨”被他耀眼的几名随从包围着，这些随从都是知名的将军。²⁶¹

弗里德里希推动了公共领域、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大众军国主义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更多是出于偶然，而非有意为之。在1806—1815年那段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普鲁士历史中，上述三种力量融合到一起，他作为“独一无二的弗里德里希”（这个称号由拉姆勒首次发明，他认为“弗里德里希大王”不够合适）²⁶²的神话地位得到了保证。普鲁士对拿破仑在莱比锡和滑铁卢的惨败贡献颇多，然而，与拿破仑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里希的缺点也像伤口结痂一样慢慢消失了，只留下怀旧的雾霭中无瑕疵的英雄主义。1836年，为纪念弗里德里希逝世50周年，勃兰登堡的等级会议迫使不情愿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建造弗里德里希的骑马雕像，给后者的英雄形象赋予了视觉表达。雕像是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的作品。他最初对雕像基座的设计要求在正面表现和平，两边表现科学与艺术，后面表现战争。然而，国王坚持把雕像的3个面都用来表现军事，3种和平的元素被限制在后面这一个面上。²⁶³尽管如此，以下这些名字还是得到了一席之地：佩恩、克诺贝尔斯多夫、沃尔夫、拉姆勒、格莱姆、加尔弗、克莱斯特（作为诗人而不是士兵）、莫佩尔蒂和温克尔曼（考虑到他对弗里德里希的厌恶，他出现在这里非常奇怪）。格劳恩、莱辛和康德以立体雕像的形式出现。²⁶⁴ 3幅浅浮雕图像表明了弗里德里希对促进经济和艺术的贡献：在第一幅图像中，他在检查布料；在第二幅中，他在演奏长笛；在第三幅中，他在欣赏他的安提诺乌斯雕像。

注释

1 我曾讨论过这个话题，参见*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2), pt 2. See also James Va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2001)。

2 Franz Etzin, “Die Freihe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unter der Regierung Friedrichs des Grossen,”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33 (1921), p. 89.

3 Ibid., p. 96.

4 Ibid., pp. 97–8. 这让人想起一个关于苏联的两大主要报纸《消息报》和《真理报》的老笑话：“《真理报》上没有消息，《消息报》上也没有真理。”

5 Ibid., p. 99.

6 Ernst Consentius,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Zeitungs-Zensur,”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115 (1904), p. 220.

7 Ibid., p. 226.

8 *Acta Borussica. Denkmäler der preussischen Staatsverwaltung im 18. Jahrhundert, Behördenorganisation und allgemeine Staatsverwaltung, vol. 8: Akten vom 21. Mai 1748 bis 1. August 1750*, ed. G. Schmoller and O. Hintze (Berlin, 1906), p. 317.

9 Ibid., pp. 32–3.

10 Etzin, “Die Freihe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p. 103.

11 这个故事被讲述了很多次，最完整的叙述见Ludwig Salomo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eitschriftenwesens von den ersten Anfängen bis zur Wiederaufricht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2nd edn (Oldenburg and Leipzig, 1906), vol. 1, pp. 149–50.

12 Etzin, “Die Freihe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p. 122.

13 Peter Gay, *Voltaire’s Politics* (New York, n.d.), p. 35. 关于这起事件的一个说法是，当时正在一辆马车上往外看的骑士说，伏尔泰的头不应该受伤害，“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好东西”。

14 Quoted in Horst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p. 50, 290, n. 3.

15 John Moore, *A View of Society and Manners in France,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4th edn, Dublin, 1789), vol. 2, p. 130.

- 16 关于摩尔，参见H. L. Fulton, “Moore, John (1729–1802),”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January 20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19130>. Accessed 11 November 2013.
- 17 Hans Reiss (ed.),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1970), p. 58.
- 18 Abbé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Berlin, 1788), pp. 456–7.
- 19 Dieudonné Thiébault, *Mes Souvenirs de vingt ans de séjour à Berlin; ou Frédéric le Grand, sa famille, sa cour, son gouvernement, son académie, ses écoles, et ses amis littérateurs et philosophes*, 4th edn (Paris, 1813), vol. 1, p. 60.
- 20 *Acta Borussica*, vol. 8, p. 785.
- 21 P.C., vol. 10, pp. 59, 135–6. 他们说的小册子是*Idée de la personne, de la manière de vivre et de la cour du roi de Prusse*。
- 22 Charles Henry (ed.), *Œuvres et correspondance inédites de d'Alembert* (Paris, 1887), p. 89.
- 23 Daniel Jenisch, “Denkschrift auf Friedrich den Zweiten,” in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pp. 234–5. 另见p. 414引用的摩西·门德尔松的颂词。
- 24 C. B. A.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1985), p. 182.
- 25 Ann Thomson, *Materialism and Society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La Mettrie's Discours préliminaire* (Geneva and Paris, 1981), p. 10.
- 26 H. B. Nisbet,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His Life, Works, and Thought* (Oxford, 2008), p. 88.
- 27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p. 98.
- 28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London, 1996), p. 95. Darnton在此书中收录了《哲人特蕾莎》的一个全译本。
- 29 Hans-Joachim Gehrke, “Klassische Studien. Paradoxien zwischen Antike und Aufklärung,” in Sösemann, vol. 1, p. 112.
- 30 *Œuvres*, vol. 14, p. 28.
- 31 Ursula Pia Jauch, “Frederick's ‘cercle intime’: Philosophy at Court,” in Thomas Biskup and Katrin Kohl,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Symposium Oxford 13–14 July 2012*, forthcoming; Nisbet, *Lessing*, p. 88.

32 *Éloge de M. de La Mettrie*, *Œuvres*, vol. 7, pp. 26–32. 该文本有一份英文译本，参见<http://vserver1.cscs.lsa.umich.edu/~crshalizi/LaMettrie/>。

33 Nisbet, *Lessing*, p. 126.

34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6), vol. 2: *Briefe der Königszeit 1740 – 1758*, p. 210. See also Werner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geistige Welt Frankreichs*, *Hamburger Studien zu Volkstum und Kultur der Romanen*, vol. 11 (Hamburg, 1932), pp. 177–8.

35 Thomson, *Materialism and Society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p. 14.

36 David Edmonds and John Eidinow, *Rousseau's Dog: 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2006), p. 49.

37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ed. J. M. Cohen (London, 1953), p. 547.

38 Maurice Cranston, *The Solitary Self: Jean-Jacques Rousseau in Exile and Adversity* (Chicago, 1997), p. 15.

39 *Ibid.*, p. 17.

40 Avi Lifschitz, “Adrastus Versus Diogenes: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Jean-Jacques Rousseau on Self-Love,” in Biskup and Kohl,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41 *Œuvres*, vol. 19, p. 207.

42 *Ibid.*, vol. 20, p. 321.

43 *Ibid.*, p. 322.

44 Cranston, *The Solitary Self*, p. 38.

45 *Ibid.*, p. 158.

46 Winfried Böhm, “Bildungsideal, Bildungswesen, Wissenschaft und Akademien,” in Erhard Bethk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Herrscher zwischen Tradition und Fortschritt* (Gütersloh, 1985), p. 186; *Œuvres*, vol. 18, p. 249.

47 Thiébaud, *Mes Souvenirs*, vol. 1, p. 7.

48 *Œuvres*, vol. 23, p. 131.

49 Volker Wittenauer, *Im Dienste der Macht. Kultur und Sprache am Hofe der Hohenzollern. Vom Grossen Kurfürst bis zu Wilhelm II.* (Paderborn, Munich, Vienna and Zürich, 2007), pp. 122–5.

50 Roland Vocke, “Friedrich II. Verhältnis zur Literatur und zur deutschen Sprache,” in Bethk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75. *Œuvres*, vols. 21–3. 更多的信件随后被发现并被出版，参见Reinhold Koser and Hans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Friedrichs des Grossen mit Voltaire*, Publikationen aus den K. Preussischen Staatsarchiven, vols. 81, 82, 86 (Leipzig, 1908–9, 1911)。伏尔泰通信的最完整版本则是Theodore Besterman编辑的*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Geneva, 1953–65)，共有107卷，其中第18—22卷覆盖了伏尔泰在普鲁士逗留的时期（1750—1753年）。

51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69), vol. 2: *The Science of Freedom*, pp. 483–4.

52 Uwe Steiner, “Die Sprache der Gefühle. Der Literaturbegriff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m historischen Kontext,” in Brunhilde Wehinger (ed.), *Geist und Macht: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Kontext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geschichte* (Berlin, 2005), p. 30.

53 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145.

54 Ullrich Sachse, “Gross im Tod sei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erste Verfügung zur Inszenierung seines Nachlebens,” in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eds.),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Beiträge des drit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25./26. September 2009*, (Friedrich300–Colloquien, 3) http://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esse/sachse_tod. Last accessed on 14 May 2014.

55 Carlyle, vol. 3, pp. 90, 96.

56 Christopher Clark, “‘Le roi historien’ zu Füßen von Clio,” in Sösemann, vol. 1, p. 162.

57 Koser, vol. 2, p. 120.

58 Theodore Besterman, “Voltaire’s Commentary on Frederick’s *Art de la guerr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 (1956), pp. 64–6.

59 Lytton Strachey, “Voltaire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in idem, *Books and Characters, French and English* (London, 1922), pp. 168–70.

60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54.

61 Quoted in Gay, *The Science of Freedom*, p. 484.

62 Roger Pearson, *Voltaire Almighty: A Life in the Pursuit of Freedom* (London, 2005), p. 214–16.

63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18, pp. 43, 104.

64 *Œuvres*, vol. 18, p. 74.

65 Strachey, “Voltaire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p. 168.

66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18, p. 120.

67 Ibid., vol. 20, pp. 38–9. 法国人似乎对弗里德里希的蓝色大眼睛特别敏感。——“我见过的最美的眼睛”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判断，他注视过那个时代不少美丽的眼睛。——quoted in Bernd Klesmann, “Friedrich II. und Frankreich: Faszination und Skepsis,”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44.

68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18, p. 515.

69 Pearson, *Voltaire Almighty*, pp. 217–18.

70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18, p. 193.

71 Ibid., p. 197.

72 Ibid., p. 214.

73 以下文献简明地叙述了他们争执的问题：appendix 56 of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18, p. 263。尽管Besterman在他写的传记*Voltaire* (London, 1969), p. 17中承认，“我毕生都是他的崇拜者，虽然还没有达到偶像崇拜的程度”，但他对希舍尔事件的结论是：“他（伏尔泰）的行为不能也不应该得到辩护。”

74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19, p. 29.

75 Besterman, *Voltaire*, pp. 315–16.

76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vol. 20, p. 43.

77 Ibid., pp. 390–91.

78 Avi Lifschitz, *Language and Enlightenment: The Berlin Debat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12), p. 10; Iwan-Michelangelo D’Aprile, “Aufklärung, Toleranz und Wissenschaft in Preuss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101–2.

79 Pearson, *Voltaire Almighty*, p. 226.

80 Ibid., p. 227.

81 Ursula Goldenbaum (ed.), *Appell an das Publikum: die öffentliche Debatte i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1687–1796* (Berlin, 2004), vol. 2, pp. 522–9.

82 Lehndorff, vol. 1, p. 62.

- 83 Ibid., p. 229.
- 84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2, pp. 253–7.
- 85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248.
- 86 Besterman, *Voltaire*, pp. 329–30.
- 87 *Œuvres*, vol. 23, p. 3.
- 88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geistige Welt Frankreichs*, p. 180.
- 89 *Œuvres*, vol. 25, p. 369; vol. 24, p. 545.
- 90 Steiner, “Die Sprache der Gefühle,” p. 29.
- 91 Brunhilde Wehinger, “Introduction,” in Brunhilde Wehinger and Günther Lottes (eds.) ,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Berlin, 2012), p. 14.
- 92 *Œuvres*, vol. 8, pp. 133, 251.
- 93 Ibid., vol. 1, pp. li, 1.
- 94 Ibid., vol. 7, p. 9.
- 95 Ibid., vol. 9, pp. 4, 276.
- 96 “Avant-propos sur la Henriade de M. de Voltaire,” *ibid.*, vol. 8, p. 62.
- 97 *Œuvres*, vol. 24, p. 522.
- 98 Ibid., vol. 9, pp. 107, 161; vol. 12, p. 255; vol. 13, pp. 60, 116; vol. 19, p. 151; vol. 23, p. 290; P.C., vol. 10, p. 135; Jacques Droz, *L’Allemagn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49), p. 12.
- 99 *Œuvres*, vol. 10, p. 164.
- 100 Ibid., vol. 17, p. 261.
- 101 Ibid., vol. 23, p. 62.
- 102 Ibid., vol. 2, p. xx.
- 103 Helga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sidenz* (Berlin, 1987), p. 33.
- 104 Ibid., p. 61; Rudolf von Thadden, *Fragen an Preussen. Zur Geschichte eines aufgehen*

benen Staates (Munich, 1981), p. 279.

105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66.

106 Ibid., p. 122.

107 Reinhart Koselleck,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3rd edn (Berlin, 1981), p. 125; Horst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n. Der Verleger, Publizist und Geschichtsschreiber Friedrich Nicolai* (Berlin, 1974), p. 265. 前者将卫戍部队及其家属的总人数列为60677人，后者列的数字则为33400人。还有相当不同的数据，参见 Felix Escher, “Di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Residenz und Hauptstadt Berli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Wolfgang Ribbe (ed.), *Geschichte Berlins*, 2nd edn (Munich, 1988), vol. 1: *Von der Frühgeschichte bis zur Industrialisierung*, p. 383。

108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278.

109 “Ueber Berlin von einem Fremden,” in F. Gedike and J. E. Biester (ed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Berlin, 1783), p. 337.

110 Iwan-Michelangelo D’Aprile, “Die königliche Toleranzpolitik in der Wahrnehmung der brandenburgischen Untertanen,” in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43. 另见我在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pp. 111–15 给出和讨论过的数字。

111 Quoted in Lutz Winckler, *Kulturwarenproduktion. Aufsätze zur Literatur und Sprachsoz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73), p. 24, n. 28. 要想了解其他几个事例，可参见我的书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pp. 133–5。原始的材料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参见 <http://www.ub.uni-bielefeld.de/diglib/aufkl/deutschesmuseum/deutschesmuseum.htm>。

112 Nisbet, *Lessing*, p. 81.

113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n*. 两份期刊都可以在线阅读，地址分别是 <http://www.ub.uni-bielefeld.de/diglib/aufkl/brieneulit/index.htm> 和 <http://www.ub.uni-bielefeld.de/diglib/aufkl/adb/adb.htm>。

114 Hans Dollinger, *Preussen. Eine Kulturgeschichte in Bildern und Dokumenten* (Munich, 1980), p. 125.

115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n*, p. 198.

116 Quoted in Horst Möller, “Wie aufgeklärt war die Aufklärungsforschung? Friedrich Nicolai in historiographischer Perspektive,” in Rainer Falk and Alexander Košenina (eds.), *Fr*

Friedrich Nicolai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Hanover, 2008), p. 7. 这两句诗是依靠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verdient*”产生讽刺效果的，原文是：Hast du auch wenig genug verdient um die Bildung der Deutschen,/ Fritz Nicolai, sehr viel hast du dabei doch verdient。（前一个*verdient*意为“享有声望”，后一个*verdient*意为“挣钱”。）

117 Andreas Gestrich, *Absolutismus und Öffentlichkeit.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utschland zu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1994), p. 171; Ute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Friedrich II. als Herr über die Herzen?* (Göttingen, 2012), p. 79.

118 Christof 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Frankfurt am Main, 1991), pp. 174–5.

119 Klaus Gerteis, “Das ‘Postkutschenzeitalter’. Bedingungen der Kommunikation im 18. Jahrhundert,” in Karl Eibl, *Entwicklungsschwellen im 18. Jahrhundert, Aufklärung*, 4, 1 (1989), p. 66; Michael Erbe, *Deutsche Geschichte 1713–1790. Dualismus und 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 (Stuttgart, 1985), p. 58.

120 Wolfgang Neugebauer, “Brandenburg im absolutistischen Staat. Das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Ingo Materna and Wolfgang Ribbe (eds.), *Brandenburgische Geschichte* (Berlin, 1995), p. 367.

121 By Horst Möller, in *Aufklärung in Preussen*, p. 251.

122 例如1784年后半年的那一卷，可参见<http://www.ub.uni-bielefeld.de/diglib/aufkl/berlmon/berlmon.htm>。该卷包括康德著名的论文《什么是启蒙运动》。

123 Rüdiger Hachtman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Freimaurerei,”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4, 1 (1997), pp. 21–2.

124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mit seinen Verwandten und Freunden: Eine historische Skizze* (Berlin, 1868), p. 36.

125 Horst Möller, *Vernunft und Kritik. Deutsche Aufklärung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p. 217.

126 Hachtman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Freimaurerei,” p. 37. See also Karlheinz Gerlach, “Die Berliner Freimaurerei 178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in Helmut Reinalter and Karlheinz Gerlach (eds.), *Staat und Bürgertum im 18. und frühen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6), p. 192.

127 Manfred Agethen, “Diskussionsbericht,” in Heinz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6), p. 196.

128 Hachtman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Freimaurerei,” pp. 46–7; Gerlach, “D

ie Berliner Freimaurerei 1783,” p. 199.

129 Hachtman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Freimaurerei,” p. 44.

130 Ibid., p. 48.

131 “Maurerrede zum Andenken Friedrichs. Berlin den 14. Sept. 1786,”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6 (2), p. 338.

132 我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pt 3。

133 Koser and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vol. 1, pp. 71–2.

134 *Œuvres*, vol. 1, p. 255.

135 K. Biederman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 Verhältniss zur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lebens* (Brunswick, 1859), p. 5.

136 Koser and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vol. 3, pp. 347–8.

137 法文版本可参见*Œuvres*, vol. 7。有一个很好的德文版本，参见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该版本也包含了其他许多相关的同时代资料。我参考的即是后一个版本。

138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pp. 61–2, 73, 77. See also Winfried Woesler, “Die Idee der deutschen Nationalliteratur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in Klaus Garber (ed.), *Nation und Literatur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Tübingen, 1989), p. 722.

139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pp. 81–2. 看起来弗里德里希读过莎士比亚的德文译本，但这可能只是加固了他的偏见——Wehinger, “Introduction,” in Wehinger and Lottg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p. 12。

140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中有几个例子。

141 Daniel Fulda,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das deutsche Publikum und die Herausbildung des modernen Literaturbegriffs,” *Germanisch-Romanische Monatsschrift*, 63, 2 (2013), p. 226.

142 Adolf von Harnack,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Berlin, 1900), vol. 1, pt 1, pp. 266–7, 293–4.

143 Ibid., p. 362.

144 Thiébault, *Mes Souvenirs*, vol. 4, pp. 76–8.

145 Eugen Paunel, *Die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Ihre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 während der ersten zwei Jahrhunderten seit ihrer Eröffnung* (Berlin, 1965), p. 74.

146 Harnack,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vol. 1, pt 1, p. 464.

147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1.

148 Christiane Mervaud在*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une dramaturgie des lumières 1736–1778*,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85), vol. 234中极其详尽地描述了他们的关系。

149 Johann Friedrich Karl Grimm, *Bemerkungen eines Reisenden durch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in Briefen* (Altenburg, 1779), vol. 2, p. 2; Ruth Freydank, *Theater in Berlin von den Anfängen bis 1945* (Berlin, 1988), pp. 106–7.

150 Ibid., pp. 106–8.

151 Koser and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vol. 3, p. 209. 也可以参见他在1774年9月19日进一步写给伏尔泰的信件, *ibid.*, p. 304。

152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94–5, 185. See also Vocke, “Friedrich II. Verhältnis zur Literatur und zur deutschen Sprache,” in Bethk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75.

153 Eckart Klessmann, *Die deutsche Romantik*, 2nd edn (Cologne, 1981), p. 27; Pierre-Paul Sagave, “Preussen und Frankreich,” *Jahrbücher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und Ostdeutschlands*, 31 (1982), p. 69.

154 Gerd Bartoschek, “Friedrich II. als Sammler von Gemälden,” in Hans-Joachim Giersberg and Claudia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Potsdam, 1986), vol. 2, pp. 86–8; Paul Seidel,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Sammler von Gemälden und Skulpturen,” *Jahrbuch der Königlich-Preussischen Kunstsammlungen*, 13 (1892), p. 188; Adolf Rosenberg,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unstsammler,” *Zeitschrift für bildende Kunst*, new series, 4 (1893), p. 210

155 Roland Krebs, *L’Idée de “Théâtre national” dans l’Allemagne des lumières. Théorie et réalisations* (Wolfenbütteler Forschungen), vol. 28 (Wiesbaden, 1985), p. 529.

156 Quoted in Derek Beales, *Joseph II, vol. 1: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1–1780* (Cambridge, 1987), p. 233.

157 Quoted in H. Kiesel and P. Münch, *Gesellschaft und Literatur im 18. Jahrhundert* (Münich, 1977), p. 84.

158 Ruth Freydank, “Friedrich II. und das Theater,” in Giersberg and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vol. 2, p. 149; Freydank, *Theater in Berlin*, pp. 112–13.

159 P.C., vol. 1, p. 58.

160 Margaret C. Jacob, *Radical Enlightenment* (London, 1981), *passim*.

161 Norbert Conrads, “Politischer Mentalitätswandel von oben: Friedrichs II. Weg vom Gewinn Schlesiens zur Gewinnung der Schlesier,” in Peter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p. 229–30.

162 Etzin, “Die Freihe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p. 111.

163 Andreas Gestrich, “Kriegsberichterstattung als Propaganda. Das Beispiel des ‘Wienerischen Diarium’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1756–1763,” in Ute Daniel (ed.), *Augenzeugen. Kriegsberichterstattung vom 18. zum 21. Jahrhundert* (Göttingen, 2006), p. 24.

164 Manfred Schlenke, *England und das friderizianische Preussen 1740–1763. Ein Beitrag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und öffentlicher Meinung im England des 18. Jahrhunderts* (Munich, 1963), p. 235.

165 Ibid., pp. 237–46.

166 Eva Giloi, *Monarchy, Myth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750–1950* (Cambridge, 2011), pp. 25–6;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 224; Doris Schumacher,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in der bildenden Kunst. Von den Anfängen durch Johann Wilhelm Ludwig Gleim und Friedrich II. bis zu den populären Illustrationsfolgen des späten 18. Jahrhunderts,” in Wolfgang Adam, Holger Dainat and Ute Pott (eds.), “*Krieg ist mein Lied.*”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in den zeitgenössischen Medien* (Göttingen, 2007), p. 242.

167 Gerhild H. M. Komander, *Der Wandel des “Sehepuncktes”: die Geschichte Brandenburg-Preussens in der Graphik von 1648–1810* (Münster, 1995), pp. 166–9.

168 Thomas Weissbrich, “Inszenierungen im Porträt,” in Leonore Koschnick, Arnulf Scriba and Thomas Weissbrich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Verehrt. Verklärt. Verdammt* (Berlin, 2012), p. 19.

169 Weissbrich, “Inszenierungen im Porträt,” p. 25.

170 Rainer Michaelis,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der Werke des Daniel Nikolaus Chodowiecki,”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264.

171 Eckhart Hellmuth, “Die ‘Wiedergebur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und der ‘Tod fürs Vaterland’. Zum patrio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in Preusse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Aufklärung*, 10, 2 (1998), p. 47.

172 Quoted in Thomas Biskup, “Das Ceremoniel des grossen Königs: Völkerrecht, Reich

srecht und Friedrichs Rang in der Fürstengesellschaft” (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conference Repräsentation und Selbstinszenierung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otsdam Museum, 28–29 September 2012).

173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Friedrich II. als Herr über die Herzen?*, p. 70.

174 Ibid., p. 72.

175 N. William Wraxall, *Memoirs of the Courts of Berlin, Dresden, Warsaw and Vienna in the Years 1777, 1778 and 1779*, 3rd edn (London, 1806), vol. 1, p. 119. 拉克索尔写的是1777年发生的一件事。

176 Peter-Michael Hahn在*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126中很好地论述了这一点。

177 Derek Beales,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pp. 131–3.

178 Clark, *Iron Kingdom*, p. 218.

179 Hahn, *Friedrich II.*, p. 194.

180 Antje Fuchs,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als virtueller Religionskrieg an Beispielen aus Preussen, Österreich, Kurhannover und Grossbritannien,” in Franz Brendle and Anton Schindling (eds.), *Religionskriege im Alten Reich und in Alteuropa* (Münster, 2006), pp. 320–21.

181 Ulrich im Hof, “Friedrich II. und die Schweiz,” in Martin Fontius and Helmut Holzhey (eds.), *Schweizer im Berlin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1996), p. 16.

182 Gay, *The Enlightenment*, vol. 1: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p. 100; Böhm, “Bildungsideal, Bildungswesen, Wissenschaft und Akademien,” p. 186.

183 Quoted in Wehinger, “Introduction,” in Wehinger and Lott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p. 9.

184 Ibid., p. 10.

185 Hannelore Röhm and Sabine Scheidler, “Die Bibliothek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Friedrichsrisiko, Ausstellung*, p. 322.

186 Rosenberg,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unstsammler,” p. 209.

187 Quoted in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24, 1 (2 January 1822), p. 1.

188 Abbé Denina, *La Prusse littéraire sous Frédéric II, ou 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plupart*

des auteurs, des académiciens et des artistes qui sont nés ou qui ont vécu dans les états prussiens depuis MDCCXL jusqu'à MDCCLXXXVI. Par ordre alphabétique. Précédée d'une introduction, ou d'un tableau général des progrès qu'ont faits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dans les pays qui constituent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Berlin, 1790–91), vol. 1, p. 43.

189 Goethes Werke (Weimar, 1887–1912), vol. 27, p. 106. 在他的《格言和感想》中还可以见到类似的段落：“弗里德里希大王完全不想与他们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激怒了德语作家们，因此他们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在他们眼中显得有些东西。”——*ibid.*, vol. 42, pt 2, pp. 201–2。这段话也被以下文章引用：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Integrationsfigur des deutschen Nationalbewusstseins im 18. Jahrhundert?,” in Otto Dann (ed.), *Nationalismus in vorindustrieller Zeit* (Munich, 1986), p. 127。哥达的奥古斯特亲王在1780年12月25日写给赫尔德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Bernhard Supha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Schrift 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 (Berlin, 1888), p. 38。

190 Fulda,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p. 227.

191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190–93.

192 Harnack,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vol. 1, pt 1, pp. 397–421. 关于有奖征文比赛对赫尔德的重要意义，参见Robert E. Norton, *Herder's Aesthetics an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Ithaca and London, 1991), p. 105。感谢H. B. Nisbet教授向我推荐了这一文献。

193 D'Aprile, “Die königliche Toleranzpolitik in der Wahrnehmung der brandenburgischen Untertanen,” pp. 44–5.

194 Lifschitz, “Adrastus versus Diogenes: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Jean-Jacques Rousseau on Self-Love,” in Biskup and Kohl (eds.),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这一观点是Thomas Biskup在Lifschitz论文后的讨论中提出的。

195 Thomas Bauman, “Courts and municipalities in North Germany,” in Neal Zaslaw (ed.), *The Classical Era: From the 1740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9), p. 262.

196 Leonard Meis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olthätige Rücksicht auch auf Verbesserung deutscher Sprache und Litteratur* (Zürich, 1787), p. 21.

197 *Ibid.*, p. 152.

198 Thomas Abbt, “Einige allgemeine Anmerkungen über das Genie der Deutschen und den Zustand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riefe, die Neueste Litteratur betreffend*, 15 (1762), pp. 55–7.

199 Christian Garve, *Fragmente zur Schilderung des Geistes, des Charakters, und der Regierung Friedrichs des Zweyten* (Breslau, 1798), vol. 1, pp. 31, 33, 36, 57, 60, 122.

200 Goethes Werke, vol. 27, p. 104.

201 Ibid., p. 105.

202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od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vom letzten Viertel des achtzehnten und vom Anfa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1778 bis 1806* (Lemgo and Hanover, 1814–19), vol. 4, p. 615.

203 Rudolf Payer von Thurn (ed.), *Joseph II. als Theaterdirektor. Ungedruckte Briefe und Aktenstücke aus den Kinderjahren des Burgtheaters* (Vienna and Leipzig, 1920), p. 4.

204 Biedermann, *Friedrich der Grosse*, p. 38.

205 Möller, *Vernunft und Kritik*, p. 203. 类似的评论可参见Günther Lottes, “Fürst und Text. Die Leserevolution der Aufklärung als Herausforderung der friderizianischen Selbststilisierung,” in Wehinger and Lott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p. 35.

206 “Über die neue preussische Justizverfassung,”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4 (1), p. 521–2, <http://www.ub.uni-bielefeld.de/diglib/aufkl/berlmon/berlmon.htm>. See also, Möller, *Vernunft und Kritik*, pp. 203–5.

207 Meis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olthätige Rücksicht auch auf Verbesserung deutscher Sprache und Litteratur*, pp. 154–5.

208 Horst Möller, “Wie aufgeklärt war Preussen?,” in Hans-Jürgen Puhle and Hans-Ulrich Wehler (eds.), *Preussen im Rückblick* (Göttingen, 1980), p. 198.

209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Integrationsfigur des deutschen Nationalbewusstseins im 18. Jahrhundert?,” in Dann (ed.), *Nationalismus in vorindustrieller Zeit*, p. 115.

210 P.C., vol. 2, p. 280.

211 Letters of 19 April 1753 and 13 August 1766, in Koser and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vol. 3, pp. 3, 127.

212 *Œuvres*, vol. 1, pp. 214–15.

213 Harnack,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vol. 1, pt 1, p. 388.

214 *Œuvres*, vol. 2, p. 41.

215 Thomas Biskup and Peter H. Wilson, “Gross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47.

216 Koser and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vol. 3, p. 105.

217 Ibid., pp. 130, 135, 148.

218 Ibid., p. 105.

219 Thiébault, *Mes Souvenirs*, vol. 1, p. 9;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91.

220 *Œuvres*, vol. 14, pp. 290–91.

221 David Watkin and Tilman Mellinghoff, *German Architecture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1740–1840* (London, 1987), pp. 17–18; Biskup and Wilson, “Gross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p.147. 正如他们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要成为一个讲法语的人，并不一定需要是一个亲法国的人。

222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44.

223 Wilhelm Dilthey,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deutsche Aufklärung,” in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Leipzig and Berlin, 1927), vol. 3, p. 130.

224 *Œuvres*, vol. 1, p. 265.

225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pp. 65–7, 97–9. See also Fulda,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p. 228.这是一个在德意志君主中广为运用的意象：约瑟夫二世1766年在西里西亚边境给他母亲写信说道：“就像摩西那样，我们看到了应许之地，却无法进入”——引自 Josef Karniel, *Die Toleranzpolitik Kaiser Josephs II.*, Schriftenreihe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Universität Tel-Aviv (Gerlingen, 1986), vol. 9, p. 129。

226 *Œuvres*, vol. 12, pp. 9–16.

227 Ibid., p. 12.

228 Ibid., p. 14. “瓦卢斯”指的是德·克莱蒙伯爵，他在1758年6月23日在克雷菲尔德被费迪南德亲王（“赫尔曼”或是“阿米尼乌斯”，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诗中用的是拉丁拼写形式）打败。

229 *Œuvres*, vol. 9, p. 141.

230 Gesa von Essen, *Hermannsschlachten. Germanen- und Römerbilder in der Literatur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1998), pp. 57–144; Hans Peter Herrmann, “Arminius und die Erfindung der Männlichkeit im 18. Jahrhundert,” in Hans Peter Herrmann, Hans-Martin Blitz and Susanna Mossmann (eds.), *Machtphantasie Deutschland. Nationalismus, Männlichkeit und Fremdenhass im Vaterlandsdiskurs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des 18.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1996), pp. 161–91.

231 *Œuvres*, vol. 12, p. 14. 普路托斯（正确拼写是Ploutos）是希腊的财富之神；萨丹纳帕路斯是声名狼藉、放纵堕落的亚述末代国王。

232 Bernhard R. Kroener, “Militärischer Professionalismus und soziale Karriere. Der französische Adel in den europäischen Kriegen 1740–1763,” in idem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Kriege* (Munich, 1989), p. 99.

233 *Œuvres*, vol. 12, pp. 84–5. 这首诗标注的日期是“1757年12月20日，布雷斯劳”。他认为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决定帮助奥地利人摧毁他，这一想法显然让他愤愤不平。在他的《七年战争史》和《从胡贝图斯堡和约到瓜分波兰的回忆录》两本书中，他都说凡尔赛已经决定“粉碎”他。 *Œuvres*, vol. 12, pp. 84–5.

234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455.

235 Ibid., p. 248;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p. 113–14.

236 Peter Schleuning, *Das 18. Jahrhundert. Der Bürger erhebt sich* (Hamburg, 1984), p. 553.

237 Clark, *Iron Kingdom*, p. 219.

238 Ibid., p. 221.

239 Ibid., p. 220; Thomas Nicklas, “Die Schlacht von Rossbach (1757) zwischen Wahrnehmung und Deutun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new series, 12 (2002), pp. 35–51. 另见Franz Muncker (ed.), *Anakreontiker und preussisch-patriotische Lyriker* (Stuttgart, 1895), pp. 243–87翻印的诗歌，它们有着强烈的宗教气息。

240 Ruth Smith, *Handel’s Oratorios and Eighteenth-century Thought* (Cambridge, 1995), p. 220.

241 Ernst Rohmer, “‘Der Vater seines Landes [...] ist nicht geringer als der Held.’ Johann Peter Uz und die Haltung zum Krieg im Markgraftum Brandenburg-Ansbach,” in Adam, Dainat and Pott (eds.), “*Krieg ist mein Lied*,” p. 177. 以下书中选辑了格莱姆等人的诗歌，是一个好的选本：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seiner Zeit* (Berlin, 1901), vol. 2.

242 J. W. L. Gleim, *Preussische Kriegslieder von einem Grenadier*, ed. August Sauer (Heilbronn, 1882), p. 3.

243 Muncker, *Anakreontiker*, p. 183.

244 Gleim, *Preussische Kriegslieder von einem Grenadier*, Sauer's Introduction, p. vii.

245 Ibid., p. 7.

246 Ibid., p. 12.

247 Hans Peter Herrmann, "Krieg, Medien und Nation. Zum Nationalismus in Kriegsliedern des 16. und 18. Jahrhunderts," in Adam, Dainat and Pott (eds.), *"Krieg ist mein Lied,"* p. 29.

248 Michael Rohrwasser, "Lessing, Gleim und der nationale Diskurs," in *Lenz-Jahrbuch, Sturm und Drang Studien*, 7 (1997), pp. 137–8; Nisbet, *Lessing*, pp. 232–6.

249 Guido Heinrich, "Leibhaftige Ästhetisierung und mediale Endverwertung. Die Rezeption der Kriegsslyrik Anna Louisa Karschs in Berlin, Halberstadt und Magdeburg," in Adam, Dainat and Pott (eds.), *"Krieg ist mein Lied,"* pp. 137–40.

250 Volker Pres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Reichspolitiker," in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und das Reich*, p. 42.

251 Herrmann, "Krieg, Medien und Nation," p. 33; Gonthier-Louis Fink, "Der deutsche National- und Regionalcharakter in der Sicht der Aufklärung," in Ruth Florack (ed.), *Nation als Stereotyp: Fremdwahrnehmung und Identität in deutscher und französischer Literatur* (Tübingen, 2000), p. 75.

252 Klaus Bohnen, "Von den Anfängen des 'Nationalsinns'. Zur literarischen Patriotismus-Debatte im Umfeld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in Helmut Scheuer (ed.), *Dichter und ihre Na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 123.

253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 *Leben und Gesinnungen von ihm selbst im Kerker aufgesetzt* (Stuttgart, 1791–3), vol. 1, pp. 33–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zeno.org/Literatur/M/Schubart,+Christian+Friedrich+Daniel/Autobiographisches/Leben+und+Gesinnungen>.

254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 (ed.), *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 1774* (reprinted, Heidelberg, 1975), vol. 1, pp. 5–6.

255 Quoted in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Integrationsfigur des deutschen Nationalbewusstseins im 18. Jahrhundert?," p. 122. 完整的诗歌可以在网上找到，网址是<http://www.zeno.org/nid/20005636779>。

256 Hans-G. Winter, "Antiklassizismus: Sturm und Drang," in Viktor Žmegač (e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2nd edn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4), vol 1, pt 1, p. 213.

257 Schubart (ed.), *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 1774*, p. 77.

258 Ibid., p. 133.

259 Ibid., p. 394.

260 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 *Journal d'un voyage militaire fait en Prusse dans l'année 1787* (Paris, 1790), p. 128.

261 R. Köpke, *Ludwig Tieck.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des Dichters nach dessen mündlichen und schriftlichen Mittheilungen* (Leipzig, 1855), vol. 1, p. 27.

262 Thomas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Inszenierungen des Preussenkönigs in Fest und Zeremoniell 1740–1815*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2012), p. 136.

263 Brigitte Schmitz, “Christian Daniel Rauchs Denkmal im Berliner Linden-forum,” in Giersberg and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vol. 1, p. 57. 以下书中有一个名单，列出了在这座纪念像上得到描绘或被刻上了名字的所有人：Kurd Wolfgang von Schöning,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unter allerhöchster königlicher Bewilligung nach der Original-Correspondenz Friedrich des Grossen mit dem Prinzen Heinrich und Seinen Generalen aus den Staats-Archiven bearbeitet* (Potsdam, 1851), vol. 1, pp. x–xiv。

264 以下网址有一批很好的图片：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eiterstandbild_Friedrichs_des_Großen。以下网址也有一批极好的高清照片：<http://www.baedicker.de/FriedrichII/index.php?directory=Der%20alte%20Fritz/&page=1>。

① 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

第13章

国内的光明与黑暗

启蒙运动

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隐喻之一是“光”（*lumière*）。它遍布于他的通信、诗歌和散文作品中。他使用“光”的复数形式（*lumières*）的频率是单数形式的2倍，因为这个复数形式也是用来指启蒙运动的法语单词。^①这能说明很多东西。他的词汇中突出的还有“启蒙”的反义词“迷信”及其同源词。正如这一点所表明的那样，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自我形象，认为自己是理性的灯塔，因为投射到一个黑暗的非理性世界而更加明亮。他在伏尔泰的史诗《亨利亚德》的序言中简洁地说明：“一个人受到的启蒙越多，身上的迷信就越少。”¹正如这种观点的浪漫派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光是一种主宰18世纪话语的隐喻。1799年，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他的笔名“诺瓦利斯”更加著名）在回顾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时表示不屑：“光由于其数学上的服从和行动自由而成为他们最喜欢的主题。他们对光线的折射比对其颜色的变幻更感兴趣，所以他们用光来命名他们伟大的事业——启蒙运动。”²诺瓦利斯论述道，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启蒙的信仰“只是被知识”拼凑在一起的，所以弗里德里希的国家——或者说“工厂”——注定要崩溃。³

而在1740年，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事件向浪漫派揭示了一个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政权的危险之前，相信理性的进步是更容易的。弗里德里希以盛大的姿态开始了他的统治，宣布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一姿态就是召回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让他继续为普鲁士服务。他于1723年被驱逐出哈勒大学一事是一个很大的学术丑闻。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听信了沃尔夫一直在鼓吹无神论的说法，命令他在24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就要处决他。这一命令表现出弗里德里希·威廉长期未变的急躁性情。⁴事实上的多元主义是神圣罗马帝国众多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受益于这种多元主义，沃尔夫只是搬到了黑森-卡塞尔的马堡大学，那里的方伯很高兴为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提供避难和就业机会。从那里出发，他的哲学和他的学生遍及德意志的大学世界。弗里德里希·威廉后来对自己的急躁感到后悔，于18世纪30年代3次尝试吸引他回来，甚至于1739年阅读了他的一些作品。⁵

到那时，经导师恩斯特·克里斯托夫·冯·曼陀菲尔伯爵的介绍，王储弗里德里希已经沉浸在沃尔夫哲学中。曼陀菲尔伯爵在柏林建立了一个推广沃尔夫哲学的社团，以“sapere aude”（“敢于知道”或“敢于明智”）为口号。⁶由于沃尔夫只用拉丁文或德文写作，弗里德里希不得不让人把他的作品翻译成法文。1736年4月，弗里德里希写信给沃尔夫作品的译者、萨克森学者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冯·苏姆说：“我正在非常勤奋地学习沃尔夫，并且越来越多地按照他的推理方式塑造自己，这种推理方式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正确。”⁷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惊叹道：“多么深刻！为了揭示大自然的所有秘密，并为迄今为止一直陷入阴影和黑暗的地方带来清晰和精确，他用了多么连贯一致的推理啊！”⁸弗里德里希在1736年时已经24岁了，但他的热情还像青少年那样强烈。在给他的新朋友伏尔泰和他的老朋友、姐姐威廉明妮的信中，他赞扬了沃尔夫的哲学，说它优于迄今为止出现的任何哲学：笛卡尔开辟了这条道路，牛顿完善了自然哲学，但只有沃尔夫令人信服。⁹1740年5月23日，弗里德里希写信给沃尔夫，感谢他关于自然法的最新作品。由于他一定知道

这封信很快就会广为传播，所以应该在此引用全文：

每个思考和爱真理的人都一定会对您的书感兴趣；每一个正直的人和每一个优秀的公民都一定会把它视为一个宝库，您的敏锐让您发现了它，您的慷慨把它给了世界。您把这本书献给了我，这让我更为感动。哲学家应该是世人和君主的教师。他们必须合乎逻辑地思考，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行动。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判断力来教导世界，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榜样来教导世界。他们必须发现，而我们必须将他们的发现转化为实践。我现在已经阅读和研究您的作品很久了，并且相信所有读过它们的人都一定会尊重它们的作者。没有人可以对您否认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请相信我，我始终对您表示完全的尊重，这是您的服务应得的。您心爱的弗里德里希，王储。¹⁰

这封信声明了弗里德里希以“哲人王”的姿态进行统治的意图，在这类声明文章中无与伦比。8天后，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并迅速将口头表扬转化为行动。6月6日，他写信给柏林圣彼得教堂的教区长和牧师约翰·古斯塔夫·莱恩贝克，请求他通过谈判让他的朋友沃尔夫回到普鲁士，并授权他提供“一切合理的条件”。弗里德里希亲自用德文补充道：“我请求他尽全力争取沃尔夫。任何追求和热爱真理的人在人类社会中都值得尊敬；我相信，说服沃尔夫回到这里的人会在真理之地有所征服。”¹¹ 这再次证明了弗里德里希有着记者的眼光，善于使用打动人的表述，这一点也给他带来了回报，那就是他的话在公共领域中不断被重复。40年后，地理学家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仍然在重复这句话，并补充说，它给沃尔夫带来的荣誉比其他任何关于他的颂词都要多，并且还为其作者带来了“不朽荣誉”¹²。这句话可能也有助于弗里德里希达到他的目的。1740年12月6日，沃尔夫回到他以前在哈勒受迫害的地方，卡莱尔说，“几乎就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样”。¹³ 1743年，他成为哈勒大学校

长，同年，他在莱比锡附近买了一幢大房子和一处贵族庄园；1745年，他受封为男爵。他于1754年去世，享年75岁，表明天才和勤奋的结合可以让一个布雷斯劳工匠的儿子获得名誉和财富。他也是一个引领未来的人：

[沃尔夫] 是以下这种人的第一个代表，这种人到20世纪仍然没有面临灭绝的威胁：这种教授，特别是哲学教授，通过他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延伸到许多大学的帝国，并被公众视为一个类似世俗传教者、民族教育者的角色。沃尔夫之后，这种模式从康德到哈贝马斯一直是连续的，因为在过去的300年里，在德国的所有机构中，大学的变化最小。¹⁴

沃尔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回归的人。菲舍尔教授也回来了，这位教授因为表达了对三位一体、魔鬼和原罪的怀疑，于1725年被从柯尼斯堡开除。¹⁵

宽容

“在真理之地的征服”是值得纪念的。更加值得纪念的是，1740年6月22日，在回应一位官员关于新教徒歧视天主教学校的问题时，弗里德里希在批注中写的话：“所有宗教都必须被容忍，官员的唯一任务是确保没有一种宗教干扰其他宗教，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被允许以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寻求拯救。”¹⁶ 即使对占臣民大多数的正统派路德宗信徒来说，这条格言可能也是可以接受的。更有争议的是同一个月的另一条批注，其缘起是总执行局询问他是否可以授予天主教徒公民权。“只要信奉宗教的人是诚实的，那么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和好的；如果土耳其人和异教徒来到这里并希望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将为他们建造

清真寺和礼拜场所。”¹⁷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肯定不能接受的，是这种宽容还扩展到了性行为上：“我希望我国的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上帝祈祷和做爱”；或者，伏尔泰叙述的另一个版本是：“在我的领地上既有良心自由，又有下体自由”。¹⁸在1774年给达朗贝尔的一封信中，他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更明确的方向：“我不知道巴黎与所多玛能否相比；无论如何，我肯定不想烧掉这两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座，而宁愿对天使伊图里尔说，虽然不是一切都好，但一切都可以接受。”¹⁹

并非弗里德里希的所有言论都以原始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例如，“所有宗教都必须被容忍”这条批注，直到他去世后才公布，尽管它的要旨“远播海外，飞向世界各地”（卡莱尔）。²⁰公众意识到的是弗里德里希蔑视所有形式的启示宗教，无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基督教的还是穆斯林的。一位丹麦外交官1740年说，新国王对宗教公然的冷淡态度让柏林平民百姓感到“惊讶和沮丧”。²¹和其他所有欧洲城市一样，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容易因不虔诚的指控而被激怒。1748年，在听到一篇鼓吹反对自由思想者的布道之后，一群暴民出门上街，打破了一个当地居民的窗户，这个人是启蒙运动的热心支持者，名声在外。²²虽然皇家宫殿的窗户从来不会面临危险，但没有人会对他们君主的观点有任何怀疑。他只是忍不住把宽容变成嘲笑。例如，保守的路德宗信徒请求允许继续唱他们的老赞美诗，而不是去唱教会当局希望他们唱的新赞美诗，针对此事，弗里德里希在批注中写道：“在我这里，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仰，只要他是诚实的。”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但他又补充说：“就赞美诗而言，任何人都可以唱‘此刻万木俱静’^②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愚蠢的废话。”²³如果他虔诚的臣民们能够在弗里德里希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读到他对基督教的想法，他们会更加震惊和愤怒。“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虚构，充满奇迹、矛盾和荒谬。它在东方人头脑发热的想象中产生，然后传播到我们的欧洲，在那里有一些狂热分子赞成它，一些阴谋家假装信服，一些傻子真的相信它。”²⁴即使对后人来

说，这个话题也太棘手了。在20世纪之前，这些政治遗嘱一直被锁起来，保存在霍亨索伦家族档案中。

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能够用以下这种方便的观点安慰自己，说弗里德里希的敌意源自对信仰的无知。他严酷的教育让他对《圣经》有了深刻的了解（根据德尼纳神父的说法，他对《圣经》“烂熟于心”），他喜欢以最好的伏尔泰式的方式运用它。²⁵ 例如，有个年轻人致信弗里德里希，说他要和很多更年长的候选人激烈竞争同一个牧师职位，而弗里德里希只是在信的边上写了“《撒母耳记下》10：5”，这一节经文的结尾是这样的：“国王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²⁶ 另一位教会人士写信恳求弗里德里希给他安排一个更富有的教区，后者回复道，第一批使徒在宣讲基督福音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报酬，他也应该这样做。²⁷ 他也喜欢提醒他的臣民，从根本上说，他同时是他的领土上路德宗和改革宗（加尔文宗）这两大教会的首领。一名男子想和寡居的姨妈结婚，没有得到教会当局允许，遂上书请愿，回复这份请愿书时，弗里德里希写道：“宗教法院算什么。作为耶稣基督的牧师和马格德堡的大主教，我宣布这对夫妻应该在神圣的婚姻中结合在一起。”²⁸ 波美拉尼亚一个村庄的教区居民要求解雇一名不相信肉体复活的牧师，弗里德里希告诉他们说，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在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这位牧师想不想趴倒在地，就要由他自己决定了。²⁹ 一位牧师在宣讲时反对地狱永恒的观点，因此遭到他的教区居民反对，从而被解雇。弗里德里希在重新任命这位牧师时说，如果他们希望永远被诅咒，他不会有什么意见的。³⁰

弗里德里希不可能是第一位名义上信仰基督教、实际上却不相信其教义的欧洲君主，但他肯定是第一个如此公然地宣扬他的怀疑论的人。1756年到普鲁士长期访问后，尼韦奈公爵写了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的性格和观点的冗长的记述。³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信仰缺失，弗里德里希将这种信仰缺失“升格为系统”。尼韦奈并没有被弗里德里希观点的深度所打动，而是对它们不屑一顾，将它们视为培尔论点和伏尔泰

嘲讽的混杂体，但弗里德里希表达这些观点的热情和频率肯定让他印象深刻。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双方密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³² 尼韦奈继续说，通过公开表达对宗教的藐视，弗里德里希可以说已经将自己变成了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个反立法者。以这种方式，他宣布他在他的王国中所有不同的教派之间完全中立。这意味着“这里的宽容是绝对、普遍和无限的，普鲁士是欧洲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人可以信奉任何喜欢的宗教信仰，可以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甚至可以信奉无宗教信仰”。加尔文宗信徒、路德宗信徒、再洗礼派和天主教徒可以随意谩骂对方，但不允许互相伤害。“普鲁士是已知的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让多种宗教共存而不让其成为问题的国家，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新教的原则、北欧人对知识问题的漠不关心以及国王的榜样使柏林的无宗教信仰现象非常普遍。”³³

“我在罗马和日内瓦之间是中立的。”弗里德里希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说。他在这里引用了伏尔泰的《亨利亚德》的一行，但略微出了点错误。在那部作品中，与作品同名的主角、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说道：“我不在日内瓦和罗马之间选边站。”³⁴ 在他的统治初期，弗里德里希在柏林市中心分配了一块绝佳的土地，用于建立一座新的天主教堂，以此来宣传他的中立性。城市里的信徒们需要或想要把教堂盖得多大，就可以盖得多大，要一座或多座塔楼，大钟或小钟，都没有限制。³⁵ 这座教堂毗邻弗里德里希自己喜欢的礼拜场所——歌剧院，是计划中弗里德里希广场的一部分。这里值得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一决定在当时有多激进。在这个世纪里，一批反天主教的暴民可能控制伦敦一个星期，造成的财产损失比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巴黎造成的损失还要高出10倍。³⁶ 弗里德里希的天主教堂不可能在伦敦或在另一个据称宽容的欧洲城市阿姆斯特丹建立。³⁷ 柏林的这座教堂以西里西亚的守护圣人“圣黑德维希”命名，以便让弗里德里希新的天主教臣民放心，他们政治归属的改变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是一个以宏大的方式做出的盛大姿态。奠基仪式于1747年6月13

日举行，配有许多庆祝活动，至少与两年前西里西亚战争结束时的胜利庆祝活动一样复杂。看台为观众们建立起来，一支铜管乐队和皇家教堂合唱团提供了音乐，教堂的奉献仪式由普列梅特的熙笃会修道院院长图尔诺主持，在一座建立在巨大的华盖下的祭坛进行。最近抵达普鲁士为弗里德里希工作的让-洛朗·勒热，制作了一本包括7幅版画的画册，记录仪式并描绘教堂完工时的样子。勒热在第一幅版画上说，教堂是国王自己设计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里德里希在建筑方面负责的东西很多，至少很可能提供了基本的想法，特别是教堂圆形的形状和圆顶，让人想起罗马的万神殿。他原本打算为所有信仰创造一个礼拜场所，但这一计划不得不缩小到只建立一座天主教堂，尽管这在一个新教占压倒性优势的城市中也足够有争议了。³⁸ 弗里德里希还编排了仪式，并且下令铸造纪念勋章。³⁹

他为教堂提供了建筑地点，也为此开放了皇家建材仓库，但没有准备好建筑资金。必须通过向天主教欧洲发出呼吁，来筹集必要的资金。起初一切顺利。在勒热令人鼓舞的画作的帮助下，在七年战争使工作突然停顿之前，已经筹集了超过10万塔勒的资金。⁴⁰ 但是直到1773年11月1日——天主教在勃兰登堡被正式废除的233年后——完成后的建筑才得以由埃姆兰的主教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亲王举行祝圣仪式，他自从前一年波兰被瓜分以来就成了普鲁士的臣民。⁴¹ 又举行了一系列复杂昂贵的仪式活动。尽管弗里德里希没有亲自参加，但他派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被称为“普鲁士亲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到场，还有不伦瑞克公爵、黑森-达姆施塔特亲王、几位将军和高级官员。皇家乐队和合唱团也前去助兴。⁴² 为了纪念这一盛事，帮助欧洲公众从中获得正确的教益，普鲁士出版了一本74页的报告，开头是这样写的：“一个懂得哲学的统治者的特征包括宽容、宗教自由和对所有臣民一视同仁的爱；我们最仁慈的君主弗里德里希大王，正体现了以上几种因素的高度结合。”⁴³ 在仪式中，主教把一块纪念碑放在祭坛里一个隐蔽的地方，这块纪念碑献给“弗里德里希大王，不可战胜者，祖国之父，他不因为某些人

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就憎恨他们，而是为他们建造了这座教堂”。这块献给他的纪念碑和一个圣物匣放在一起，匣子里有圣黑德维希的头骨，还有一些其他的圣物。⁴⁴至于弗里德里希得知此事时会是什么反应，我们就知道了。对祝圣仪式的描述以下面这段响亮的颂词结束：

弗里德里希大王为欧洲的其他君主和统治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胜利，他的立法，他对科学和文艺的促进，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创造的奇迹，已经让他的名字不朽；他仁慈而庄严的智慧则使他变得宽容，会让他的美名永久流传。这让他成为对人民一视同仁的父亲和保护者，无论他们的背景和信仰如何。⁴⁵

此时，圣黑德维希教堂优美的古典式外观已经名满欧洲，因为在描绘新歌剧院的众多版画上，往往就画着艺术家想象中这座天主教堂完工后的样子。奥格斯堡的格奥尔格·巴尔塔扎·普罗布斯特是当时最好的插画家之一，他1750年创作的一幅版画被广泛翻印，十分流行，这幅画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⁴⁶

教堂的圣物由特雷布尼茨的熙笃会女修道院提供，这座修道院是圣黑德维希的丈夫亨利公爵在1202年建立的。官方致谢信首先送到了布雷斯劳的巴斯蒂亚尼神父那里，在这封信上，弗里德里希亲自用法语添加了以下内容：

教堂将在几天之内举行落成典礼，那堆莫名其妙的东西都将被用来举行仪式。如果人们现在还不能对我的宽容感到信服，他们就很难取悦了，在班贝格、维尔茨堡或萨尔茨堡，或者在.....抑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建立路德宗或加尔文宗教堂。你们中其余的人，无论你怎么说，都仍然被强烈的狂热的仇

恨所驱使，所以你们只是半人。⁴⁷

弗里德里希在位期间，柏林天主教徒数量迅速增加，为他的政策提供了统计上的依据。1740年城里只有大约50个天主教徒，到1786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8000。⁴⁸在信仰光谱的另一端，他重新接纳了1732年被他的父亲驱逐的门诺派教徒，甚至免除了他们的兵役，因为这种信仰禁止他们服兵役；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每年要向库尔姆的军官学校支付5000塔勒。⁴⁹《柏林月刊》在1784年自豪地声称，在柏林可以找到“各种”宗教信徒，包括摩拉维亚兄弟会、门诺派、吉希特尔派、分离派、阿里乌派、一位论派和索齐尼派教徒，所有这些人都是从欧洲其他地区被驱逐出去的。⁵⁰这个名单上还可以增加几个教派，包括施文克费尔德派和胡斯派。弗里德里希统治下的普鲁士是欧洲“难民的大方舟”，这是皮埃尔·培尔原本授予荷兰共和国的荣誉。

在21世纪初，当不断增长的宗教不宽容给许多人造成痛苦时，弗里德里希政策的好处比50年前看来更为明显，当时宽容的世俗主义的胜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些进步的同时代人知道宽容带来了哪些好处。哥达的杰出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卡尔·格林写道，尽管普鲁士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但它还是“平静安宁”的。只要不批评政治体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对宗教的看法。他补充说：“思想自由是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启蒙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柏林，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亲眼观看、亲自调查支持自己信仰的一切证据，真是太棒了。”然而，格林不是唯一一位注意到这种轻松氛围的负面影响的基督徒。他不仅仅遇到了对宗教真理的冷漠，还遇到了对它们的公开蔑视。在一些社交聚会中，他对他听到的东西感到十分惊恐。甚至工匠在嘲笑基督教时也未表现出任何羞耻和抑制。⁵¹尽管他谨慎地补充说，所有这些不虔诚的表现都是伏尔泰留在这座城市的遗产，但上下文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弗里德里希负有责任。

弗里德里希对宗教宽容的投入程度为人所共见，没有人能提出什么合理的怀疑。他的动机则不那么简单直接。他本人可能也很难对任何自我诊断有信心。他父亲和他父亲的牧师多年来向他强行灌输宗教思想，在他逃跑的时候和随后精神世界的黑夜里尤甚，这可能已经让他对所有宗教事务的厌恶落地生根。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点是他与他的兄弟姐妹共有的，他们也遭受了类似的灌输。1755年1月，虔诚的伦道夫伯爵出席了一次晚宴，当时弗里德里希的3个弟弟——奥古斯特·威廉、海因里希和费迪南德——也在场。伦道夫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这次晚宴：“有关于宗教的讨论，并且有人针对宗教问题说了一些很有力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⁵² 弗里德里希对宗教的态度并不是漠不关心。正如他尖锐的话语一再表示的那样，他认为启示宗教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是有害的，因为相互冲突的教派之间的不容忍造成了很多痛苦。他谴责这些迫害，既出于审慎的考虑，也出于自己的原则。弗里德里希在其《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写道，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取消了新教徒享有的有限的信仰自由，导致40万最富有和最有进取心的法国臣民移民国外。大多数人去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因此加强了这两个国家，它们后来被证明是路易最大的两个敌人；2万人去了勃兰登堡，他们因此帮助勃兰登堡恢复了人口。⁵³

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了耶稣会，弗里德里希有机会实践他所宣扬的内容了。耶稣会士已经被一些国家驱逐出境了：1759年被葡萄牙驱逐，1764年被法国驱逐，1767年被西班牙、那不勒斯、帕尔马和马耳他驱逐。可以预见，对这个与罗马教廷最密切相关的宗教团体早些时候遭到的驱逐，弗里德里希的反应是很热情的。1761年，他告诉达尔让斯：“事实上，亲爱的侯爵，我对世界了解得越多，世界看起来就越凶恶、愚蠢和不合情理。我从未预料到耶稣会士会受到迫害。如果这个团体完全被取缔了，会是一件好事，就像取缔圣殿骑士团那样，只是取缔后者的理由更不充分。”⁵⁴ 但是在要把耶稣会从他自己的领土驱逐出去时，他就改变了想法。他先是试图得到教皇解散耶稣会诏书的特别

豁免权，在这一尝试失败之后，他禁止出版这份诏书。正如他向不赞同这一行为的法国朋友解释的那样，西里西亚的天主教教育完全依赖布雷斯劳大学的耶稣会士。如果他们被驱逐，他所有的天主教圣职候选人将被迫去波希米亚接受培训。此外，他还加上了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布雷斯劳条约》要求他维持西里西亚的宗教现状。天主教君主可以背信弃义，再让教皇赦免，却没有人给他赦罪，所以他不得不信守承诺。⁵⁵他对达朗贝尔大声说道：“用各种方式指责我过于宽容吧，我会以这一过错为荣；如果这是唯一一个会被归咎于君主的缺陷该多好啊！”⁵⁶

除了这些审慎的考虑外，他还认为迫害是根本错误的。这一点在他1777年的论文《论政府的形式与君主的职责》中有最明确的陈述：

一个人可以强迫某些可怜人说出某种形式的话，但后者内心不会同意的；因此迫害者一无所获。但如果回到社会的起源，那么君主无权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恐怕只有疯子才会认为，一群人会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我们让你高于我们，因为我们喜欢成为奴隶，所以我们给你权力随意指引我们的想法。相反，他们说的是：我们需要你维持我们希望遵守的法律，明智地管理我们，保护我们；在其余的方面，我们要求你尊重我们的自由。一旦达成这项协议，就不能改变。⁵⁷

把这样一份响亮的原则声明如此坚决地转化为实践，在18世纪的欧洲是不常见的。玛丽娅·特蕾莎皇后自己的不宽容使她的异端臣民遭受了强烈的迫害，弗里德里希对她写道：“我对我臣民的要求只有公民的服从和忠诚。只要他们在这方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认为我就有义务给予他们所有人同样的支持、保护和正义，不管他们可能会对宗教事务怀有什么样的推测性意见。”⁵⁸所以派往西里西亚的新教牧师们被指示

不要使用那些专为天主教徒保留的教堂，而要在市政厅甚至谷仓中宣讲教义。⁵⁹ 各种教派被禁止互相诋毁，但在其他方面则被允许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他的父亲希望消除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之间的差异，他则不同，他没有兴趣干涉教会内部问题，因此同意了路德宗教会的请愿，再次允许该派宗教人士穿白色罩袍，在举行葬礼时使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等。⁶⁰ 虽然他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写道，天主教是所有宗教中“最荒谬的”⁶¹，但他还是注意不要歧视它。他坚持那封关于《布雷斯劳和约》的信中的原则，拒绝让新教徒接管天主教堂，甚至分享教堂也不行，即使在他们占大多数的社区中也是如此。⁶²

犹太人

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歧视普鲁士各种不同教派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确实歧视犹太人。⁶³ 他的反犹主义在很多公开和私人的言论中都非常明确，最直接地表现在他的“政治遗嘱”中：

在所有这些宗教派系中，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损害了基督徒的贸易，还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确实，我们需要犹太人与波兰进行贸易，但我们必须防止其数量增加。我们不仅要限制家庭的数量，还要限制总数。我们还必须限制他们的商业活动，使他们远离批发贸易，只从事零售业务。〔1752年〕

城镇里有太多的犹太人。在靠近波兰的城镇中需要它们，因为那里只有犹太人参与商业活动，但离开边境越远，他们就变得越有害。他们从事高利贷、走私和千百种坏事，损害公民和基督教商人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因此迫害过他们或任何其他团体，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他们，并确保他们的数量不会增加

。 [1768年] ⁶⁴

当然，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对犹太人抱有这种特殊的偏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除外；但弗里德里希的这种偏见可能因为他对伏尔泰的崇拜而得到了加强，而伏尔泰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在《亨利亚德》中，伏尔泰嘲弄了犹太人的迷信、野蛮、无知和偏见。⁶⁵ 对于这两人来说，对信《旧约》的犹太人的敌意只是他们对信《新约》的基督徒的敌意的一个侧面。⁶⁶ 例如，在弗里德里希1760年3月完成的讽刺作品《中国皇帝欧洲特使费西胡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位使者以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风格报道了他在欧洲遇到的荒谬现象，特别是与天主教会有关的那些。在罗马，他遇到了一位葡萄牙犹太人，这位犹太人告诉他：“基督徒的律法书以我们的为基础；他们承认他们的宗教来自我们的宗教；但这些忘恩负义的孩子攻击和虐待他们的母亲。为了避免在里斯本被烧死，我的家人不得不服从这种宗教的习俗。”⁶⁷ 此外，这本书是为了出版而写的，随后很快就出版了，还在柏林报纸上刊登了广告。⁶⁸

至少弗里德里希在语言上的辱骂比他的父亲少，后者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写道：“犹太人背叛了基督，即使最诚实的犹太人也是一个流氓。”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起初在实践中比他的父亲更严厉。他宣布愿意修建清真寺和寺庙以吸引土耳其人和异教徒移民，但并没有说愿意修建犹太会堂。1671年，他更开明的曾祖父、“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请他在维也纳的代理人招募40到50个犹太家庭在柏林定居。这次行动利用了奥地利一次周期性排犹的机会，这些周期性的排犹经常出现，一直是奥地利历史上一个令人沮丧的特征。虽然最后来柏林的犹太人比预计的少得多，但这还是标志着犹太人回到柏林，回到了这座他们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之前被驱逐出的城市。⁶⁹ 到1700年，有117个犹太家庭共约600人入驻。⁷⁰ 1714年，一座新的犹太会堂举行了落成典礼，它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犹太会堂之一。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他的宫

廷人员出席了仪式，但他统治时期的其余部分却以定期的迫害犹太人为特征。1737年执行的一系列措施计划让城市中的犹太人社区逐步减少，最终灭绝。⁷¹

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干涉犹太人的信仰自由，但他确实收紧了对他们人数的限制。1750年实行的一项全面的新法规确认并强化了把犹太人分为不同类别的政策。⁷²这一分类系统的顶点是一小撮具有“普遍特权”、受到特别优惠的家庭，他们被赋予居住在王国任何地方的权利。接下来是150个被定为“常规”犹太人的家庭，他们有资格将其居住权转让给一名家庭成员，但要想让第二名和第三名家庭成员获得居住权，就需要分别证明拥有1000和2000塔勒的财富。⁷³“特殊”犹太人，主要是专业人士，只享有本人的居住权，不可转让。依此类推，给犹太人的权利在另外4个类别中逐渐减少，直到犹太人的仆人们，他们是根本没有权利的最底层。理论上，任何超过官方配额的柏林犹太人都应该和任何贫穷的乞丐一起被驱逐出境，但执法很困难。尽管有定期提醒，犹太人的数量还是在不可阻挡地增加。⁷⁴考虑到邻国波兰巨大的犹太人口数量，这是不可避免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尤其如此。从1750年到弗里德里希的统治结束时，柏林犹太人社区的人口从2188人增加到了3379人，增加了54%，占该市总人口的2.3%。⁷⁵在整个勃兰登堡，增长率更高，达到61.75%。⁷⁶

弗里德里希的态度在他统治的中期也有所缓和，尽管只是暂时的，而且只是因为他发现犹太人在两个关键领域很有帮助。首先是帮助七年战争融资的货币贬值。这一行动是由丹尼尔·伊齐希，法伊特尔·海涅·埃弗拉伊姆和摩西·伊萨克领导的一个财团组织的，他们为弗里德里希创造了2900万塔勒的利润，自己则从中赚了不知道多少钱。⁷⁷不出所料，后一点招致了大多数公众的谴责。⁷⁸这些被贬值的硬币被戏称为“埃弗拉伊姆”，并被编进对句诗中嘲笑：

徒有其表，败絮其中，

外面画着弗里德里希，里面不过是埃弗拉伊姆。⁷⁹

互利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制造业，其资金部分来自战争期间的利润。在慷慨的补贴和垄断的帮助下，一群犹太企业家在柏林和波茨坦涌现出来，主要从事纺织业。⁸⁰埃弗拉伊姆接管了柏林的金银制造厂，把它变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丹尼尔·伊齐希仍然主要是一位金融家，但也经营着波茨坦的皇家皮革厂；而摩西·伊萨克专注于丝绸制造业。⁸¹

在众多犹太企业家中，有一位是那个时代，乃至所有时代里最著名的犹太人之一，那就是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于1743年从德绍抵达柏林，那时他14岁，之后一直在柏林居住，直到他于1786年去世。他的职业生涯体现出弗里德里希与犹太人关系的起起伏伏。他到达时身无分文，但去世时十分富有，在整个欧洲的启蒙世界受到尊敬，留下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充分融入社会的家庭。他有6个孩子活到了成年。其中，女儿多罗特娅先是嫁给了西蒙·法伊特，后来又嫁给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下了约纳斯和菲利普2个儿子，他们后来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是拿撒勒运动派^③的创始人。摩西的儿子约瑟夫创立了门德尔松银行，这家银行一直业务兴隆，直到1939年被纳粹没收为止。摩西的另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是音乐家和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和范妮·门德尔松的父亲。摩西在很多哲学和宗教主题方面都有作品，著述甚丰，他充分利用了柏林提供的文化和智识条件。他对他人慷慨的款待和孜孜不倦的通信帮助这个城市成为西欧犹太启蒙运动的中心。⁸²在其他欧洲城市，他几乎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或做出如此之多的贡献，正如他自己认识到的那样：

在我居住的国家里，曾统治人类的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已经

使艺术和科学蓬勃发展，合理的思想自由如此普遍，以至于其影响已经惠及了他的领地上的最卑微的居民。在他光荣的统治下，我既有机会也有灵感反思自己和我的同胞们的命运，并尽己所能地提出我对人类命运和天意的看法。⁸³

门德尔松在迎接七年战争胜利的布道中，称赞弗里德里希是神圣天意的工具。⁸⁴ 另一方面，他的出众成就因他遭受的各种形式的歧视而更显得出类拔萃。像他的所有犹太同胞一样，为了获得居住权，他必须支付比基督徒更高的费用；他也不能迎娶基督徒或雇用基督徒；不能被国家机构雇用，不能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行会和购买地产；他结婚时不得不从皇家工厂购买昂贵的瓷餐具；他受到一系列侮辱性规定的约束，例如只能通过普伦茨劳门和哈勒门进入柏林。⁸⁵ 要与汉堡的弗罗梅·古根海姆结婚需要极大的耐心，等待特别的皇家许可。⁸⁶ 他也经常意识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或者说不是公民，只是“被容忍”的外人。门德尔松在1762年写给瑞士哲学家伊萨克·伊塞林的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下，思想自由确实在几近共和主义的辉煌中蓬勃发展；但你知道，和我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人在这个国家享有的自由多么稀少。由于一种太过普遍的偏见，我们遭受着民事方面的压迫，这对精神的提升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让我们的精神从不敢尝试像生而自由的人那样飞行。⁸⁷

至少有两次，门德尔松亲身体会到了弗里德里希对犹太人的鄙视。1771年，萨克森的大臣冯·弗里奇被弗里德里希邀请到无忧宫。在他即将踏上返程的时候，他说他将在旅途中经过柏林，去拜访“著名的摩西·门德尔松”，他对门德尔松评价很高。弗里德里希回答说，没有必要绕

道去柏林了，因为他会下令让门德尔松到波茨坦来。尽管在犹太人的节日期间旅行需要获得特殊的许可，门德尔松还是遵从命令，准时到来了。第二天，他出现在波茨坦城门前，在那里受到一名年轻军官的讯问。他拿出国王的命令给军官看，军官问他为什么被称为“著名的门德尔松”。门德尔松知道，一个军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犹太“哲学家”，于是回答说：“我是一个魔术师。”这个回答足够好了，他被允许进入。在城门口的这段插曲，是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经常复述并且让他从中获利甚多的众多轶事之一，特别是在霍多维茨基把这些故事刻成版画的时候，就更加有利可图。然而，这个故事的真正重点在于，门德尔松的确见过弗里奇两次，但弗里德里希没有会见他。⁸⁸

门德尔松在1771年遭受的侮辱和伤害则更严重。当时，柏林科学院投票决定向弗里德里希推荐门德尔松，希望国王允许他进入科学院。他们的要求被忽略并且最终被放弃了。每个人都知道，国王之所以用沉默的方式否定了这一提案，是因为门德尔松是犹太人。⁸⁹ 1783年出现了一些补救措施，当时一张带有国王签名的通告被送到各个法院，宣布犹太人的宣誓形式得到了改进，并表示这份通告是在“一位知名犹太学者”的协助下起草的，“他因为他的知识和正派的思维方式而闻名”。虽然没有提到这位学者的名字，但这里指的无疑是门德尔松。⁹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1778年弗里德里希对一次事件的干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6名犹太学生向国王请愿，要求解除禁止他们讲课的命令。大学当局通知弗里德里希说，就像在德意志的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一样，犹太人不能获得讲课所必要的博士学位。他回答说，这是纯粹的偏见，任何有资质的人都应该被允许讲课，不管是否接受过洗礼。⁹¹

从非官方的角度说，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普鲁士犹太人的处境的确有所改善。值得记住的是，当时在萨克森的莱比锡，犹太人连进城都不被允许，只有贸易博览会期间除外；而在柏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合作编辑期刊。⁹² 到1786年，普鲁士的犹太人更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得更富裕，受到更好的教育，但这些都不是由于国王的政策。

⁹³相反，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最后几年，他加强了让犹太人购买大量瓷器的要求。这一政策是因为国王本人的直接命令而强制执行的，他深信他的官员们工作懈怠，没有严格执行命令。从犹太人那里榨取的资金达到20万塔勒之巨，导致了犹太人被迫出售财产、全家人被驱逐出境等现象。⁹⁴犹太人的状况无疑有所改善，但那是由于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提供了有力的自助措施，特别是在教育领域。⁹⁵其中一个结果是，犹太社区内的社会氛围变得更加多元化和自由了。直到18世纪中叶，犹太社区的氛围还一直非常保守，特别是在诸如留胡须等社会习俗方面。在18世纪40年代，一个戴假发、剃胡子的犹太人出现在犹太会堂里，还可能会引起一阵抗议风潮。⁹⁶俄国的彼得大帝有一项著名的举措，让他手下的贵族刮胡子，以此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相比之下，弗里德里希1748年的这条法令更鲜为人知：犹太人不应该剃掉他们的胡须，以免被当成罪犯。⁹⁷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程度很深的侮辱，因为它基于这一假设，任何选择把胡子剃干净的犹太人都肯定是在为了邪恶的目的伪装成基督徒。

然而，这条冒犯性的法令也揭示了犹太人的状况在另一个方面的改善（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引起了当时最优秀的剧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的回应。莱辛的独幕喜剧《犹太人》写于弗里德里希的法令公布一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是对该法令的回应。剧中，一位男爵的两名无赖雇工戴上假胡子，把自己伪装成犹太人，试图在男爵乘马车回家时在公路上抢劫他。由于一名匿名旅行者的介入，他们的计划受挫了。男爵以为袭击他的歹徒是犹太人，于是谴责这个民族唯利是图、为获利不惜犯下任何罪行，并且说这个民族是所有生物中“最邪恶和最恶毒的”。⁹⁸在最后一幕中，他发现袭击他的歹徒是他自己的基督徒雇工，而他的救命恩人，那位在此前的剧情中体现出受过教育和启蒙、基本上是一位道德模范的旅行者，则是一位犹太人。“噢，如果犹太人都像你一样，将是多么可敬啊！”他感叹道。一个基督徒仆人以更粗鲁的方式附和了这句双刃剑式的恭维：“见鬼了！所以真有

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啊！”⁹⁹ 剧中许多有讽刺意味的情节之一就是真正的罪犯——他被恰当地命名为马丁·克鲁姆（这个姓有“骗子”的含义）——对犹太人的谴责，他还要求灭绝犹太人。¹⁰⁰

《犹太人》一剧直到1766年才开始演出。这是当时几部以较为正面的方式呈现犹太人的戏剧之一，尽管过去负面的刻板印象依然很流行。1806年这部剧再次上演时，反犹主义的观众对剧中马丁·克鲁姆的咆哮报以热烈的欢呼。¹⁰¹ 那时，莱辛已被公认是德意志倡导解放犹太人的人士中最为雄辩的一位。1753年，他鼓励他的朋友阿龙·萨洛蒙·冈珀茨写了一本小册子，呼吁给予在普鲁士的犹太人那些他们在英国或荷兰已经享有的权利。他还安排这本小册子出版并撰写了一篇好评。¹⁰² 他对犹太人解放事业最持久的贡献，当然是在《犹太人》30年后写的《智者纳坦》，该剧于1783年在柏林首演（几乎同时在维也纳被禁止）。¹⁰³ 这部剧作可以从许多层面去理解，其中一种角度是，可以把它视为对弗里德里希及其启蒙运动局限性的谴责。该剧主人公的形象基于莱辛的朋友摩西·门德尔松，许多年前他已经对当时的偏见进行了更加正面的攻击。这是由哥廷根的著名《圣经》学者约翰·大卫·米夏埃利斯对《犹太人》发表的负面评论引起的。正如门德尔松在一封写给冈珀茨、后来被莱辛发表的信中所说：

普通的基督教徒一直把犹太人视为自然的残次品，视为人类社会的污点。但我本希望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做出更公平的裁决.....我们继续受到压迫，在自由和幸运的公民中间，我们被迫生活在限制之下，我们继续受到嘲笑和蔑视；他们无法从我们身上拿走的是美德，这对饱受折磨的灵魂来说是唯一的安慰，对被遗弃的人来说是唯一的避难所。¹⁰⁴

可悲的是，这些话没有可能传到弗里德里希那里。正如在其他许多

方面的情况一样，弗里德里希没有改变。1780年，他告诉他掌管西里西亚的大臣卡尔·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霍伊姆，他知道后者对犹太人的“秘密癖好”，并补充说，“但就我而言，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如果可以赶走犹太人，由基督徒接管他们的生意，会是最好的结果”。¹⁰⁵

虽然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期间，没有任何从立法上促进犹太人解放的前景，但至少在公共领域出现了一些缓慢的调整。最明确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鲁士外交部门官员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178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为“论犹太人民事地位的改善”。¹⁰⁶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它“开创了德意志犹太人解放的时代……这本小册子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非常大，它确定了未来一整个世纪里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的轮廓”。¹⁰⁷多姆把莱辛的观点从小说领域带进了具体的法律、经济和教育提案中。他们两人对犹太人困境的分析的核心，都在于相信“犹太人被指责的一切，都是由他们现在生活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其他的群体都会犯相同的错误”¹⁰⁸。消除歧视、实现融合将会使犹太人自身和国家与社会都获益。多姆的9条纲领因为约瑟夫二世的一条法令变得更加重要了，该法令几乎与多姆的小册子同时公布，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引入了一个与后者的纲领非常类似的计划。犹太人现在可以就读基督教的学校和大学，学习和从事一门手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开办工厂，雇用基督徒当仆人，租赁房屋，待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方，去剧院，在基督教节日离开他们的家，并将黄色的大卫王之星从他们的衣服上取下来。¹⁰⁹奥地利的犹太人虽然起点更低，但现在明显比他们在普鲁士的同胞过得好多了。

犯罪与惩罚

1740年，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被召回普鲁士，宣告了一个理性时代拉开了帷幕。几乎同时，弗里德里希又通过废除酷刑，再次严肃认真地

表明了他的意图。这些举措与弗里德里希其他一些创新一样，需要对当时的习俗有所了解，才能理解其影响。在21世纪看来是极端的，甚至称得上难以想象的酷刑，在18世纪的欧洲是十分普遍的。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未果，其结局极为可怕：在他伤残的四肢遭受“熔化的铅、沸腾的油、灼热的沥青、熔化的蜡和硫黄”的折磨后，还活着的他的身体被4匹马拉开肢解——这就是18世纪刑事司法方式的缩影。¹¹⁰ 弗里德里希在他登上王位3天后就告诉他的大臣塞缪尔·冯·科克采伊说，未来酷刑只适用于冒犯君主罪、叛国罪或大规模杀人罪的案件。¹¹¹ 酷刑在1755年被完全废除。¹¹² 他的司法官员极力反对失去他们的“证据中的女王”——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酷刑的。¹¹³ 在欧洲大陆各处，酷刑仍然被广泛使用。18世纪下半叶，酷刑在几个国家正式终止使用，人们将其归功于弗里德里希的榜样；事实上，玛丽娅·特蕾莎皇后1776年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禁止酷刑时特意提到了他。¹¹⁴

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第一年，他还禁止了最可怕的传统惩罚之一。这种刑罚就是“装袋刑”，让一名被判杀婴罪的妇女自己缝制一个袋子，然后把她装在袋子里，扔到水里溺死。¹¹⁵ 弗里德里希对杀婴的态度表明了启蒙与务实精神的结合，这使他的政权不同于他大多数同时代人的政权。鉴于许多历史著作都倾向于夸大普鲁士历史的连续性，值得指出发生在1740年彻底的改变。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把犯罪视为对上帝犯下的罪孽，这个上帝像《旧约》中那样复仇心很强，必须设法平息他的愤怒，以免他对整个群体采取行动。惩罚不仅必须公开，而且必须是极端的，才能对旁观者（和上帝）产生最大的影响。所以罪犯在被处死之前，会先被拖到执行死刑的地方，并被红热的钳子折磨。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犯罪完全是世俗的，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其惩罚必须始终与行为相称，因为它的基本目的是帮助理性能力控制人类的激情。¹¹⁶ 公开处决不能如此可怕，以至于激起对罪犯的同情心或危险的好奇心：

无可否认的是，通过可怕的公开死刑，许多自然想要知道

这种可怕的处决的原因，特别是没有意识到更精细的情绪（就像罪犯一样）的无辜年轻人将会感到震惊，而不是得到改善，这甚至有可能会在他们中唤醒邪恶的倾向，唤醒这些他们以前毫不了解的倾向。¹¹⁷

毫不奇怪，新式“报应仪式”中的宗教因素减少了。从现在开始，未婚母亲不再被要求在教堂公开忏悔，弗里德里希认为这种有辱人格的仪式导致了堕胎和杀婴。他不仅指示父母和雇主不要惩罚怀孕的女孩，而且还要求他们通过提供劝告和物质支持来帮助她们，目的是让母亲和婴儿待在一起。¹¹⁸考虑到弗里德里希对增加普鲁士人口的关注（更准确地说，是着迷），这里的动机更多是实际的，而非人道主义的。在他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对堕胎的数量感到悲叹，说堕胎是城镇中“最常见的犯罪”。他表达了虔诚的希望，希望可以在柏林、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建立弃婴养育院，却伤感地补充说，这样做会很昂贵。¹¹⁹

另一方面，任何拒绝承担在人口方面的责任，并让普鲁士人口减少哪怕一个的妇女，都会被处死以儆效尤，尽管是通过斩首而不是溺水来实施。¹²⁰1775—1778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各类死刑案件中，因杀婴而被处决的数量最多：¹²¹

谋杀	12
配制毒药	4
公路抢劫	2
杀婴	18
纵火	8
教唆叛逃	2
共计	46

正如这些数字显示的那样，普鲁士谨慎使用了死刑。在同时代（18

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仅在伦敦一地,平均每年的死刑数量就有48例。¹²²此外,英格兰三分之二的死刑判决都是针对诸如盗窃绵羊(或羊羔)这样较轻的财产类犯罪的;而在普鲁士,只有严重罪行才被处以死刑。¹²³

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泛滥着非理性的暴行,而弗里德里希就仅仅是严厉而已。这让这位君主脱颖而出,如同茫茫大海上一座人道的孤岛:“正义、规则、秩序是新政策的口号,人道也是。对于像普鲁士国王这样的开明君主来说,一个文明社会意味着其中的人们不会经常遭受野蛮和痛苦的折磨,无论是在绞刑架上,还是在审讯室里。”¹²⁴这并不意味着弗里德里希的普鲁士是21世纪的自由民主政权的先声。轮刑仍然在继续使用,尽管受害者首先被谨慎而秘密地勒死。¹²⁵很有个人风格的是,弗里德里希还坚持控制批准对谁进行哪些处罚的权力。科克采伊在1743年提出,为了节省时间,涉及驱逐、监禁、体罚或死刑的刑事判决不应再提交国王批准。答复是明确的:“不!所有刑事判决都要转交给我,否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各省的人们只会随意乱搞。”¹²⁶

尽管弗里德里希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审查了在他的领土上所犯下的所有严重刑事判决,但有很多证据表明他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权。¹²⁷例如,他在1753年干预了一起偷猎案件的判决,原判决为6年监禁,而他要求减刑。¹²⁸他不断被要求决定犯罪分子的生死存亡,有时他似乎已经厌倦了。1748年,他确认了西里西亚2名匪帮成员的死刑判决,但他抱怨说,这已经是他发出的第九和第十号死刑命令了,而据说还有50多人在等待他的判决。难道他们不能被简单地驱逐出去或被派去服苦役吗?¹²⁹但他经常往相反的方向走。1750年,有人因公路抢劫未遂被判2年徒刑,他则把这个刑期增加到了原来的5倍,并借此机会提醒刑事司法部负责人莱文·弗里德里希·冯·俾斯麦他的判刑政策是什么样的,对由于愚蠢或贫穷而行窃的人不要严加惩罚,特别是如果有改过的希望,并且没有涉及暴力的话。然而,暴力抢劫行为,特别是那些预先计划好并由一个团伙犯下的暴力抢劫行为,应该受到死刑或终身监禁的惩罚。¹³⁰与

他的仁慈形象不一致的是，他偶尔还会授权使用酷刑，以及施加残忍和不常见的惩罚。¹³¹ 1746年，普鲁士驻但泽领事冯·费伯被砍下来的头颅被挂在施潘道监狱外的一根长矛上示众，这是对其他考虑犯叛国罪的人的一个可怕的警告。¹³² 根据当时住在柏林的皮埃蒙特人德尼纳神父的说法，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纵火犯在那里被烧死了。德尼纳补充说，弗里德里希在老年时得出的结论认为，过于宽大导致了犯罪浪潮，并且他越来越多地用死刑来代替监禁。¹³³ 考虑到普鲁士监狱的状况，死刑可能更可取。当时的一份揭露性报告声称，普鲁士监狱过于拥挤，瘟疫横行，肮脏黑暗，没有供暖，无人监督，是充斥着暴力的犯罪学院。¹³⁴

法律与正义

这种光明与黑暗的混合，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弗里德里希对民法的态度。在军事事务之外，他投入最多时间的领域就是政府管理了。他在《反马基雅维利》的第一章中宣称：“维护正义是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他应该把他所管理的人民的福利置于所有其他利益之上。”¹³⁵ 这些话是在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写的；他继位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表明他真的要把这一原则付诸行动。他先要处理歌剧院的事，然后是奥地利人的问题。1741年10月的《小施耐伦多夫协定》给了他短暂的喘息之机，使他可以开始思考他新省份的司法安排，但直到1745年的全面和平之后，他才能真正地集中精力安排此事。他很幸运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塞缪尔·冯·科克采伊这位杰出的改革者。科克采伊显然不是启蒙运动的一员，他年老（生于1679年）、虔诚（他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有着神圣的来源）又保守（他反对弗里德里希废除酷刑）。¹³⁶ 但他确实认为，执法应该公平、迅速、低成本，法律应该清晰、简洁和统一。最重要的是，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尤其善于制止愚蠢的争吵并推进政策的执行。

这使他成为弗里德里希理想的合作者。他们两个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断断续续和半心半意地尝试进行司法改革，但用科克采伊自己的话说，普鲁士的司法还是很让人耻辱的：昂贵、缓慢、腐败又武断。在波美拉尼亚，王室税务机构和坎特勒克镇之间的一场纠纷拖了两个世纪还没有解决，比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贾迪斯控贾迪斯案”还要早。¹³⁷ 在随后的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们写了数百万字，其中许多可以在《普鲁士档案》的卷宗中找到，但是要点可以很快地总结出来。早期的一项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禁止将案件转交给非普鲁士大学的法学院进行裁决，并在1746年排除了帝国的司法管辖权，从而使司法体系国有化。¹³⁸ 从象征意义和实质效果上来说，这都是通往完全主权并与神圣罗马帝国分离的路上的重要一步。

主要问题是资金问题。法官需要依靠他们的法律服务费维持生活，所以很少有法官能抵制住拖延办案时间乃至收受贿赂的诱惑。因此，科克采伊的改革举措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他能够劝说省等级会议提供必要的资金。¹³⁹ 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干预主义改革者，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他淘汰腐败和无能的法官，并迫使剩下的人解决积压的工作问题。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波美拉尼亚，在1746—1747年的8个月里，他监督了2400个旧案件的解决。¹⁴⁰ 从那里出发，他1749年去了克莱沃和东弗里西亚，1750年去了西里西亚，1751年去了东普鲁士。¹⁴¹ 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透明的等级制度，重组了高等法院，废除了教會的司法管辖权，在每个省份都把一个上诉法院确定为该省的唯一上诉法院。一个最高法院统领所有上诉法院，管理整个国家的司法事务。¹⁴² 所有想要被任命或重新被任命的法官都需要通过一个由中央委员会组织的考核。¹⁴³ 不用说，一项如此全面的改革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弗里德里希给了科克采伊慷慨的支持，这点值得赞扬。1748年，他简短干脆地要求保守派领导人格奥尔格·迪特洛夫·冯·阿尼姆放弃抵抗，还说不会再接受一个明显受到“个人嫉妒”驱使的人的抗议。¹⁴⁴ 关于科克采伊，他写道，科克采伊的智慧、正直、开明和勤奋会使他在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极盛期

也能脱颖而出。当科克采伊在1755年去世时，弗里德里希把他的一座大理石半身像放在司法部的院子里，以激励人们以他为榜样。¹⁴⁵

科克采伊的死亡和1756年爆发的战争使得改革运动停滞不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是因为一位参与者所谓的“司法灾难”而再次开始的。¹⁴⁶这就是著名的磨坊主阿诺德事件。矛盾的是，这件事既确认了弗里德里希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的形象，又否认了这种形象，这次事件在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比他统治期间任何其他轶事的影响更大。这一事件经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达到高潮。1770年，一位姓冯·格斯多夫（人们都只提到了他的姓，从未提及前面的名字）的贵族地主和治安法官（县长）在他位于奥得河畔，祖里肖附近的卡伊庄园里挖了一个鱼塘，并让一条推动水磨转动的溪流改道，用溪水填满这个鱼塘。1773年，克里斯蒂安·阿诺德声称这一行为大大减少了水流量，使得他在下游的磨坊不再能运转，因此对自己的领主冯·施麦陶伯爵提起诉讼，要求给自己减税，直到那个讨厌的池塘被填平为止。法院告诉他应该改为起诉格斯多夫。在1778年，施麦陶对不交税的阿诺德失去了耐心，收回了磨坊，并把它拍卖。它被格斯多夫买下，后者又将它卖给了第三方。阿诺德此时直接向弗里德里希提出上诉，弗里德里希任命了一个两人委员会进行调查。其中一名成员冯·霍伊金上校写了一份有利于阿诺德的报告；另一位是屈斯特林法院的一名官员，他认为案件应该先在法院履行正当程序。¹⁴⁷

可能是因为这份报告来自一个军人，而不是他鄙视的司法官员，弗里德里希选择了相信霍伊金。这件事现在成了国王与柏林和屈斯特林两地的法官之间的斗争，国王坚决认为应该给予阿诺德他所要求的一切，法官们则认定应该维护法律。即使在考虑到法官说法的各种偏见之后，事情似乎也很清楚，阿诺德是错的（或者更应该说“阿诺德一家”，因为是罗西娜·阿诺德夫人在推动案件）。¹⁴⁸当时的地图显示，转移到鱼塘的水流又流回了阿诺德磨坊上游的主流。因此，渗漏和蒸发造成的水分损失是极小的。检查现场的专家发现，水流完全可以使磨轮运转起来，

这一发现得到了新磨坊主的证实。霍伊金在1778年阿诺德一家第一次尝试向弗里德里希请愿时就认识了他们，他也极大地夸大了他们遭受的虐待，声称施麦陶曾将磨坊主囚禁了7周，并让阿诺德太太挨了一顿打。

¹⁴⁹但是弗里德里希完全相信阿诺德的说法。阿诺德一家似乎已经知道弗里德里希对律师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和厌恶，并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¹⁵⁰据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所说，弗里德里希是认识阿诺德的，后者在七年战争期间担任侦察员。¹⁵¹

弗里德里希经过多次拉锯战，终于掌握了法律。1779年12月11日，他在波茨坦召见了首相冯·菲尔斯特和3位确认了地方法院判决的顾问官。由于赶上了他的痛风周期性发作，他的脾气也没有改善。在用“贱人、流氓、恶棍”之类的词语对他们大声侮辱之后，他说他们都应该被吊死。菲尔斯特试图为自己辩护的呼声被打断了：“出去！你的位置空了！”¹⁵²其他人也被解雇了，还有6位反对霍伊金的结论的屈斯特林法官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这6位法官之一记载，当他们在逮捕者的严密监视下到达柏林时，他们被关在一个黑暗、潮湿、没有供暖的牢房中，那里几乎不足以容纳一个人。¹⁵³然后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下一个秋天。除了身体伤害，他们还要蒙受经济损失，因为他们还被要求自掏腰包，支付阿诺德一家的赔偿和诉讼费用。¹⁵⁴

难怪此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至少，它摧毁了认为普鲁士国王的官员都是无意识的机器人的观念。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他们的行为都充满了勇气和正直。司法大臣卡尔·亚伯拉罕·冯·策德利茨以他们为榜样，拒绝了弗里德里希要求按其意愿行事的直接命令，他告诉弗里德里希，霍伊金的报告是错误的，阿诺德一家是骗子，那些法官应该立即官复原职。弗里德里希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你这个耍笔杆子的人，你什么都不懂；当士兵得到命令调查某些事情时，他们会采取直接的方式挖出事情的深层原因，而且真正知道如何去处理它。但你可以肯定的是，我更加信任一个出于荣誉行事的诚实军官，而不是信任所有你们这些律师和你们的权利。”他还说，如果策德利茨不愿做他要求的事，他

会找到其他愿意做的人。然后他以不带任何明显讽刺的方式落款：“除此之外，我是你非常亲爱的国王。”策德利茨很有尊严地回复说，他一直都认为国王的恩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并一直尽最大努力配得上它，但他不会违背他的信念。¹⁵⁵即使是专横的弗里德里希也知道他棋逢对手了，并没有进一步施加压力。¹⁵⁶

弗里德里希可能输了这场小冲突，但他在公共关系上获得了胜利。他出版了自己对这件事的描述，表明他既是一位君主，也是一名政治家。在一篇个人色彩浓厚又很不准确的摘要之后，他疾呼：“每个人，不管他地位高低，财富多寡，都应该得到及时的正义，我的每一个臣民都应该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不会因为他是什人或在什么地位就有所偏向。”他承诺，要惩罚那些密谋反对磨坊主阿诺德的官员，以引起他们同事的重视，“他们必须认识到，最卑微的农民，甚至还有乞丐，和国王陛下一样都是人，都必须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在法律的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王子起诉农民还是农民起诉王子”。他最后说：“一个行事不公的法官法庭比一帮强盗更危险，更糟糕，因为可以采取防范措施来对付后者，而那些穿着法袍、把他们的邪恶欲望付诸实践的恶棍是打不败的，他们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流氓，应该受到加倍严厉的惩罚。”¹⁵⁷柏林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段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有力声明，这段话即使没有传遍世界，也很快传遍欧洲，乃至在遥远南方的那不勒斯和摩洛哥也吸引了赞赏的目光。¹⁵⁸1780年，一位普鲁士水手在里斯本观看了一部根据此事件改编的葡萄牙语戏剧。当观众发现他是普鲁士人时，他们聚集在他周围，高呼“光荣归于普鲁士国王！”和“公正的国王万岁！”¹⁵⁹他还在当地的蜡像馆里找到了弗里德里希的蜡像。¹⁶⁰

在普鲁士，人们对此事意见不一。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尖刻的结论在启蒙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这一事件对首都和全国其他地区都造成了令人麻木的印象

。我们惊恐地发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统治者之下，他可以根据他当时的心血来潮任意行事，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因为他不再尊重法律的尊严，也不会听从他的公务员的陈述和论点。¹⁶¹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弗里德里希是一个英雄人物，在富人和强者面前支持穷人和弱者。正如路德宗的牧师和作家丹尼尔·耶尼施所评论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可能在磨坊主阿诺德事件中有误判，但他的干涉使他在普通人眼中的形象更好了。¹⁶² 因此，当官员们来到被解雇的法官的家中，表明与他们团结一致时，一大群人在王宫外面高呼着“农民的国王”的赞词，许多窗户上装饰着彩灯和他的肖像。¹⁶³

这件事情也在几份版画印刷品中被形象地记录下来。其中，最复杂精致的一幅画由温琴佐·万杰利斯蒂创作，画上弗里德里希拿着正义的天平，请愿的阿诺德一家人跪在他面前表示感激，一位复仇的天使赶走了现场的邪恶法官。图片下面是标题《弗里德里希的天平》，以及从《法兰西报》摘录的一篇描述这次事件来龙去脉的短文和12月11日国王声明的全文。这幅画的英文版本《弗里德里希的正义》于1782年在伦敦出版。¹⁶⁴

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希望看到正义的伸张，但同样可以肯定，他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专制的。¹⁶⁵ 他也违反了自己坚定宣布的原则：“我决心永不干预正当程序，在法庭上必须让法律说话，君主必须保持沉默”（1752年的“政治遗嘱”）；“主权者行使其权威来干预法庭判决的行为根本不合适；在那里只有法律应该统治，君主的责任仅限于维护法律”（1768年的“政治遗嘱”）。¹⁶⁶ 这一事件至少让他重新关注起了恢复法律改革的必要性，这场改革因为科克采伊在1755年的去世和次年七年战争的爆发而停滞了。首相菲尔斯特被解雇后，约翰·海因里希·卡齐米尔·冯·卡默取而代之，他是科克采伊的门徒，自1768年以来一直担

任西里西亚司法大臣。在他导师著名的组织能力的基础上，他还具有了启蒙的观点。在卡默的监督下，弗里德里希统治的最后几年达成了“普鲁士开明专制主义最重要的成就”。¹⁶⁷

改革方案在1780年4月14日的一份皇家备忘录中得到了清楚的阐述。这是卡默最重要的同事卡尔·戈特利布·苏亚雷斯起草的，但是让它付诸实践的还是国王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告诉改革者：“我让你们进一步思考应该做些什么，并采取必要措施来实施这一切；而在我这边，我认真地向你们保证，我会有力地保护你们免遭所有阴谋和抵抗的伤害。”¹⁶⁸最简单的部分是程序性的。之前提出的更快速、更简单、更廉价和更透明的司法改革目标再次被采纳。法官的调查任务加强了，代价是辩护律师被削弱了；战争与领地管理委员会增加了司法部门，由受过训练的律师在其中任职；上诉制度进一步得到了集中。¹⁶⁹

然而，主要任务是编纂法典。科克采伊已经开始编纂法典了，但完成的工作并不太多。到1784年，改革者们已经完成了一份草案，10年之后，草案发展成为《普鲁士国家通用法典》，这是德意志所有法律和宪法文件中最为著名的文件之一。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这部法典本质上是保守的，特别是在社会方面：“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法律顾问带着矛盾的意图和互不相容的动机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希望创造钟表般有规律的秩序和一致性，同时也要保持特殊的权利和社会特权。”¹⁷⁰然而，他们的启蒙观点也显现无疑。¹⁷¹法典中有足够多的进步元素，足以让受过教育的普鲁士人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体现了法治原则的国家，并使得他们在1789年后受到革命法国的压力时更喜欢它。他们因公众对改革进程的积极参与而受到鼓舞。像星期三协会这样自愿组成的协会成了作家、记者和官员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讨论为“几乎所有”改革项目做了准备。¹⁷²卡默于1784年经弗里德里希批准发起的、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活动是尤其具有革命性的一步，被认为是普鲁士正在走向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志。¹⁷³

至于这条宪政之路能不能走通，永远也不可能有答案了。毕竟，这一发展进程最后被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战争打断了。而在当时，社会上至少有很多华丽的称赞之词，足以把人们对弗里德里希的回忆包围在政治乐观主义的温暖光芒中。那个在磨坊主阿诺德事件中如此严厉地批评弗里德里希的多姆也写道，虽然弗里德里希没能活到《普鲁士国家通用法典》编纂完成的那一天，但他还是应该因为推动了这项基于真正哲学和人道原则的事业而得到肯定。¹⁷⁴除了前面引用过的赞美之词，耶尼施还提出了一条更有概括性的观点：“普鲁士的司法系统的严格和保障性给普鲁士的臣民带来了一种高贵的反抗意识和少有的自信心。在其他国家的平民百姓中，只有英国人和荷兰人具有这些品质。”¹⁷⁵1784年《柏林月刊》发表的一篇匿名报道则更加细致精确，不仅重复了“弗里德里希一直坚持平等对待农民和贵族”这一观点，还补充说，法庭甚至做出过对国王本人不利的判决。文章以一桩案件为例，该案由一位女地主提起诉讼，与开采白垩有关。她曾经通过运河的水闸把白垩运往市场，而弗里德里希在纠纷中要求关闭这些水闸。柏林高等法院的判决支持这位女士，要求国王的官员立即服从判决。¹⁷⁶

弗里德里希作为“农民的国王”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乃至1792年在歌德的戏剧《布雷默·冯·布雷门菲尔德》中再次出现。这位主角描述了他洛伊滕之战后在野战医院与弗里德里希相遇的故事。8年后，两个人再次相遇，弗里德里希得以展示传说中他对名字和面孔的惊人记忆力。布雷默·冯·布雷门菲尔德告诉弗里德里希，他在和平时和战争中一样努力工作。当他的酒友惊讶于他可以如此自由地对国王说话时，他回答说：“当然可以。对他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最关心的是农民。‘我很清楚，’当他的臣子们试图说服他同意这个或那个提议时，他就对他们说，‘富人有很多律师，但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¹⁷⁷这至少证明了弗里德里希能够展示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他的崇拜者以自由作家身份进行的工作，也让他本人受益。例如，1784年，格莱姆出版了他的外甥约翰·弗罗姆的一份报告，后者是费尔贝林地区的行政长官，报

告描述的是弗里德里希一次著名的巡回考察。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对该地区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达的意见即使并不都那么专业，至少也都很有力。然后，这个故事进入了众多轶事合集中的一本，这些轶事合集对弗里德里希的形象做出的贡献，可能比其他任何媒体都更多，尤其是因为丹尼尔·霍多维茨基为其创作了插图。¹⁷⁸

这种形象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继续存在，因为他经常被展示为“开明专制主义”的典范。二三十年前，历史学家们很关注这一概念是否正确可信。¹⁷⁹就弗里德里希而言，本章表明，虽然有其他动机在起作用，但不可否认启蒙思想对其政策的一些影响。虽然他也有一些与启蒙价值观相悖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影响上述论断，就像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偶尔会违反十诫或山上宝训，但仍然可以说基督教对他十分重要一样。弗里德里希也相信启蒙哲人的核心信念，那就是理性可以理解、改变和改善自然世界。再举最后一个例证就够了。弗里德里希在1763年致萨克森选帝侯的遗孀玛丽娅·安东尼娅的一封信中，谴责由于无知造成的“古老的偏见”如此顽强，这种偏见促使巴黎高等法院禁止接种天花疫苗。他补充说，在柏林接种了天花疫苗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人死亡。¹⁸⁰在她的回答中，选帝侯夫人感谢弗里德里希让她有勇气让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还说她的臣民们现在会以她为榜样，并因此感谢弗里德里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¹⁸¹如果要体现18世纪中期法国和普鲁士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在法国，路易十五继续通过触摸给瘰癧病患者“治病”（当然，他不受上帝恩宠时除外，这种情况还挺常见的），这种病又叫“国王的恶魔”；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对这个世纪最致命的疾病采取了直接的措施，并取得了成功。

注释

¹ Voltaire, *La Henriade*, ed. O. R. Taylor,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65), vol. 39, p. 352.

2 Novalis, “Christendom or Europe,” in H. S. Reiss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Oxford, 1955), p. 134.

3 Novalis, “Glauben und Liebe oder Der König und die Königin,” in Gerhard Schulz (ed.), *Novalis Werke*, 2nd edn (Munich, 1969), p. 364.

4 Hanns Martin Bachmann, *Die naturrechtliche Staatslehre Christian Wolffs* (Berlin, 1977), p. 40.

5 Ibid., p. 43.

6 Ibid., p. 42.

7 *Œuvres*, vol. 16, p. 288.

8 Ibid., pp. 294–5.

9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4), vol. 1: *Jugendbriefe 1728–1740*, pp. 314, 318–19, 326, 331–5; Reinhold Koser and Hans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Friedrichs des Grossen mit Voltaire*, Publikationen aus den K. Preussischen Staatsarchiven (Leipzig, 1908–9, 1911), vol. 81, pp. 1, 13–15, 25.

10 *Œuvres*, vol. 16, p. 195.

11 Ibid., vol. 27, pt 3, p. 207. 像往常一样，当面对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时，弗里德里希使用第三人称。

12 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Beschreibung seiner Reise von Berlin nach Kyritz in der Prignitz welche er vom 26ten September bis zum 2ten Oktober 1779 verrichtet hat* (Leipzig, 1780), p. 57.

13 Carlyle, vol. 3, p. 203.

14 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1: *The Poetry of Desire* (Oxford, 1991), p. 18.

15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138.

16 Georg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otsdam, n.d.), vol. 1, p. 79.

17 Ibid., pp. 79–80.

18 Dieudonné Thiébauld, *Mes Souvenirs de vingt ans de séjour à Berlin; ou Frédéric le Grand, sa famille, sa cour, son gouvernement, son académie, ses écoles, et ses amis littérate*

urs et philosophes, 4th edn (Paris, 1813), vol. 1, p. 59; James Steakley, “Sodomy in Enlightenment Prussia: from execution to suicid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6, 1–2 (1989), p. 166.

19 *Œuvres*, vol. 24, p. 701.

20 Wolfgang Neugebauer, “Friedrich als Risiko?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der Sicht von Untertanen und Geschichtsschreibern,” in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Beiträge des drit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25./26. September 2009*, ed.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Friedrich300 – Colloquien, 3),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esse/neugebauer_risiko. Last accessed 3 December 2013; Carlyle, vol. 3, p. 17.

21 “Auszüge gesandtschaftlicher Berichte aus Berlin 1740,” *Neue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July 1804), p. 16. 报告的日期是1740年10月16日。

22 Neugebauer, “Friedrich als Risiko?,” p. 8.

23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 79. 关于这一事件，参见Peter Weber, “Der Berliner Gesangbuchstreit 1781 – Aporien der Aufklärung ‘von oben,’” in idem, *Literarische und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Studien zur Berliner Aufklärung*, ed. Iwan Michelangelo D’Aprile and Winfried Siebers (Berlin, 2006)。

24 Dietrich, p. 600.

25 Abbé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Berlin, 1788), p. 404.

26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 84.

27 *Acta Borussica. Denkmäler der preussischen Staatsverwaltung im 18. Jahrhundert, Behördenorganisation und allgemeine Staatsverwaltung* (Berlin, 1907), vol. 9: *Akten von Anfang August 1750 bis Ende 1753*, ed. G. Schmoller and O. Hintze, p. 134.

28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 84.

29 Ibid., p. 87.

30 Ibid.

31 “Portrait du roi de Prusse,” *Œuvres*, vol. 6: *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en vers et en prose* (Paris, 1796). 德语翻译可参见Otto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Ausgewä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eiherr vom Stein-Gedächtnisausgabe* (Darmstadt, 1982), vol. 22, pp. 555–62.

32 Nivernais, “Portrait du roi de Prusse,” p. 316.

33 Ibid., p. 322. 即使是极力否认弗里德里希任何开明特征的Ursula Goldenbaum, 也承认是他让普鲁士成为一座灯塔, 在周围领土的神学压迫下显得更加光明, 参见Ursula Goldenbaum, “Friedrich II.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in Günther Lottes and Iwan D’Aprile (eds.), *Hofkultur und aufgeklärte Öffentlichkeit: Potsdam im 18. Jahrhundert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 (Berlin, 2006), pp. 127–8.

34 Dietrich, p. 316; Voltaire, *La Henriade*, p. 380.

35 Christine Goetz and Victor H. Elbern (eds.), *Die St. Hedwigs-Kathedrale zu Berlin* (Regensburg, 2000), p. 21.

36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rinceton, 1959, 1964), vol. 1, p. 299.

37 Anton Schindling, “Friedrichs des Grossen Toleranz und seine katholischen Untertanen,” in Peter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 270.

38 Hans-Joachim Giersberg, *Friedrich als Bauherr. Studien zur Architektur des 18. Jahrhunderts in Berlin und Potsdam* (Berlin, 1986), p. 235. 根据卡洛·德尼纳神父的说法, 他曾想建造一座供奉朱庇特、阿波罗和其他异教神的神庙, 但被他的朋友若尔丹劝阻了, 参见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p. 450.

39 Martin Engel, “Architektur und Bauherrschaft,” in Sösemann, vol. 1, pp. 281–2.

40 Ludwig Geiger, *Berlin 1688–1840. Geschichte des geistigen Lebens der preussischen Hauptstadt*, vol. 1: 1688–1786 (Berlin, 1893), p. 374.

41 Goetz and Elbern (eds.), *Die St. Hedwigs-Kathedrale zu Berlin*, p. 15; Iwan-Michelangelo D’Aprile, “Aufklärung, Toleranz und Wissenschaft in Preuss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81.

42 Geiger, *Berlin 1688–1840*, vol. 1, p. 375.

43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der neu erbauten catholischen Kirche zu St. Hedwig in Berlin nebst einer ausführlichen Erzählung und Erklärung aller Ceremonien welche bey der feyerlichen Einweihung derselben am ersten November 1773 beobachtet worden sind* (Berlin, 1774), p. 3.

44 Ibid., p. 37. 关于把圣物从西里西亚转移到柏林一事, 参见以下书中翻印的通信: Max Lehmann, *Preussen und die katholische Kirche* (Leipzig, 1878), vol. 4, p. 554.

45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der neu erbauten catholischen Kirche zu St. Hedwig in Berlin*, p. 74.

46 这幅画被翻印了很多次。以下书中有一个质量很高的版本：Goetz and Elbern (eds.), *Die St. Hedwigs-Kathedrale zu Berlin*, p. 23。

47 Lehmann, *Preussen und die katholische Kirche*, vol. 4, p. 555. Lehmann解释说，两个“——”是无法辨认的字迹，但其中之一可能指的是维也纳，约瑟夫二世10年后确实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新教教堂。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475刊载了这份文件的德文翻译，但翻译有瑕疵。

48 Helga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sidenz* (Berlin, 1987), p. 189.

49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37;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336.

50 “Ueber Berlin von einem Fremden,” in F. Gedike and J. E. Biester (ed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Berlin, 1784) (1), pp. 269–70.

51 Johann Friedrich Karl Grimm, *Bemerkungen eines Reisenden durch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in Briefen* (Altenburg, 1779), vol. 1, pp. 548–9, vol. 2, p. 86.

52 Lehndorff, vol. 1, p. 192. 在其日记的其他地方，伦道夫明确地说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经常参加礼拜，听讲道，领圣餐。关于奥古斯特·威廉的不可知论立场，参见Eva Zieburg, *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ssen* (Berlin, 2006), p. 25。

53 *Œuvres*, vol. 1, p. 102. 40万是弗里德里希给出的数字，但肯定夸大了。学界普遍接受的数字是25万。

54 *Ibid.*, vol. 19, p. 284. 根据约瑟夫二世的说法，弗里德里希1769年8月在尼斯与其会面时“高度”赞扬了耶稣会士，但这很可能是在开玩笑——P.C., vol. 29, p. 43。

55 To Voltaire, 10 December 1773 – *Œuvres*, vol. 23, p. 303.

56 *Ibid.*, vol. 24, p. 700.

57 *Ibid.*, vol. 9, p. 237.

58 Günter Birtsch, “Religions- und Gewissensfreiheit in Preussen von 1780 bis 1817,”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11, 2 (1984), p. 184.

59 Carlyle, vol. 3, p. 274.

60 Koser, vol. 1, p. 14.

61 Dietrich, p. 454.据说，他在听说一个熟人转变为天主教徒后说了下面的话：“我同意：如果一个人必须信一种宗教，那么他应该信一种真正愚蠢的宗教。”我无法验证这一传闻的真实性。

62 J. E. Biester, “Bemerkungen auf einer Reise in Schlesien; in Briefen,” in Gedike and Biester (ed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 p. 248.

63 Tobias Schenk, *Wegbereiter der Emanzipation? Studien zur Judenpolitik des “Aufgeklärten Absolutismus” in Preussen (1763–1812)* (Berlin, 2010), pp. 78–80.

64 Dietrich, pp. 314, 506.

65 Selma Stern, *Der preussische Staat und die Juden: Die Zei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Tübingen, 1971), vol. 1: *Darstellung*, p. 7.

66 Peter Gay, “Voltaire’s anti-Semitism,” in idem, *The Party of Humanity: Studie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London, 1964), pp. 97–108.

67 *Œuvres*, vol. 15, p. 165.

68 Ibid., p. xv.

69 Joachim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Oxford, 2012), vol.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p. 263.

70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57.

71 *Jewish Encyclopedia*,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3083-berlin>.

72 Schenk, *Wegbereiter der Emanzipation?*, pp. 83–7.

73 Alexander Altmann, *Moses Mendelssohn: a Biographical Study* (London, 1973), p. 17.

74 Christopher M. Clark,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 1995), p. 44.

75 Britta L. Behm, *Moses Mendelssohn und die Transformation der jüdischen Erziehung in Berlin* (New York, Munich and Berlin, 2002), p. 54; Horst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n. Der Verleger, Publizist und Geschichtsschreiber Friedrich Nicolai* (Berlin, 1974), p. 265.

76 Gerd Heinrich, *Geschichte Preussens. Staat und Dynasti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1), p. 247.

77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ton Abbot, 1974), p. 131. 根据 Peter Baumgart, “Absoluter Staat und Judenemanzipation in Brandenburg-Preussen,”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13/14 (1965), pp. 83–4, 犹太财团从波兰、匈牙利和俄国获取了5000万金塔勒。

78 Lehndorff, vol. 2, pp. 295, 354.

79 Koser, vol. 2, p. 311.

80 Anton Balthasar König, *Annalen der Juden in d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sonders in der Mark Brandenburg* (Berlin, 1790), pp. 290–96.

81 Baumgart, “Absoluter Staat und Judenemanzipation,” p. 84.

82 Altmann, *Moses Mendelssohn*, p. 346; 要了解门德尔松的通信人的名单，可参考Michael Albrecht, *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 Das Lebenswerk eines jüdischen Denkers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Weinheim, 1986), pp. 124–5.

83 Quoted in Ludwig Geig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die Juden* (Berlin, 1910), pp. 58–9.

84 David Sorkin, *Moses Mendelssohn and the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London, 1996), p. 96.

85 Koser, vol. 2, p. 397; H. B. Nisbet,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His Life, Works, and Thought* (Oxford, 2008), p. 64.

86 Brigitte Meier, “Die königliche Toleranzpolitik in der Wahrnehmung der brandenburgischen Untertanen,” in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p. 52–3.

87 Quoted in Günther Holzboog, “Mendelssohn – Autor und Verleger im 18. Jahrhundert,” in Eva J. Engel and Norbert Hinske (eds.), *Moses Mendelssohn und die Kreise seiner Wirksamkeit* (Tübingen, 1994), p. 242.

88 Bruno Strauss, *Moses Mendelssohn in Potsdam am 30. September 1771* (Berlin, 1994), pp. 19–35.

89 Altmann, *Moses Mendelssohn*, pp. 264–5, 801–2. 科学院还将柏林著名的犹太医生和动物学家马库斯·埃利泽·布洛赫拒之门外，布洛赫是欧洲数家科学院的成员和《鱼类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Fish*）的作者。面对一封请求帮助出版此书的信，弗里德里希的旁注颇为轻蔑：“我们知道鱼是什么，没有必要写一本关于它们的书，因为没有人会买它。”结果这本书大获成功。参见D’Aprile, “Aufklärung, Toleranz und Wissenschaft in Preussen,” p. 103。

90 “Tolerante Gesinnung der Regierung,” Gedike and Biester (ed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pp. 159–60.

91 Meier, “Die königliche Toleranzpolitik in der Wahrnehmung der brandenburgischen Untertanen,” pp. 54–5.

92 Goldenbaum, “Friedrich II.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p. 134.

93 Iwan-Michelangelo D'Aprile, *Friedrich und die Aufklärer* (Berlin, 2012), p. 49; Schenk, *Wegbereiter der Emanzipation?*, pp. 490–96.

94 Tobias Schenk, “Friedrich und die Juden,”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171.

95 Behm, *Moses Mendelssohn und die Transformation der jüdischen Erziehung in Berlin*, *passim*.

96 Steven M. Lowenstei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Jewish responses to Moses Mendelssohn,” in Engel and Hinske (eds.), *Moses Mendelssohn und die Kreise seiner Wirksamkeit*, p. 336.

97 Stern, *Der preussische Staat und die Juden*, vol. 2: *Akten*, p. 208.很遗憾，Stern并没有刊出该法令的全文。

98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Die Juden,” *Lessing. Dramen*, ed. Kurt Wölfel (Frankfurt am Main, 1984), p. 122.

99 *Ibid.*, p. 148.

100 *Ibid.*, p. 114. 剧中描述的这位旅行者不可能是摩西·门德尔松，虽然有时有人认为是这样，因为这部剧本完成的时候，他才19岁。斯宾诺莎是个更有可能的候选人——Willi Goetschel, “Lessing and the Jews,” in Barbara Fischer and Thomas C. Fox (e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Woodbridge, 2005), p. 193。正如Ritchie Robertson所指出的，《犹太人》不是亲犹太人的，而是反对反犹太主义的——*The “Jewish Question” in German Literature 1749–1939: Emancip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Oxford, 1999), p. 34。

101 Nisbet, *Lessing*, p. 69.

102 *Ibid.*, p. 65.

103 Goldenbaum, “Friedrich II.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p. 138.

104 Lessing, “Die Juden,” p. 759.这一上佳版本完整刊出了门德尔松的信和莱辛的评论。

105 Stern, *Der preussische Staat und die Juden*, vol. 1: *Darstellung*, p. 7.

106 *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Berlin and Stettin, 1781). 它是由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出版的。这本书已经再版很多次了。原始版本可在线阅读，参见http://books.google.co.uk/books?id=IY4vAAAAY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107 David Sork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Jewry 1780–1840* (Oxford, 1987), p. 2

3. 关于多姆的论文引发的公开辩论，参见Gerda Heinrich,“... man sollte itzt betsändig d as Publikum über diese Materie en haleine halten.’ Die Debatte um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1781–1786,” in Ursula Goldenbaum (ed.), *Appell an das Publikum: die öffentliche Debatte i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1687–1796* (Berlin, 2004), vol. 2, pp. 813–95。米拉波通过1787年出版的“Sur Moses Mendelssohn et sur la réforme des juifs”，在法国传播了多姆的观点——D’Aprile, “Aufklärung, Toleranz und Wissenschaft in Preussen,” pp. 96–7。

108 Dohm, *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Translation from Robert Liberles, “Dohm’s Treatise on the Jews: A Def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1988), vol. 33, pt 1, p. 34.

109 T. C. W. Blanning, *Joseph II* (London, 1994), p. 72.

110 参见以下书中引用的图片说明：Tim Blanning, *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pp. 202–5。

111 *Acta Borussica*, vol. 6, pt 2, p. 8.

112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291.

113 Werner Ogris,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Recht,” in Oswald Haus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seiner Zeit* (Cologne and Vienna, 1987), p. 67.

114 Monika Wienfort, “Gesetzbücher, Justizreformen und der Müller-Arnold-Fall,” in Sösemann, vol. 2, pp. 40, 45.

115 *Acta Borussica*, vol. 6, pt 2, p. 77.

116 Eberhard Schmidt, *Die Kriminalpolitik Preussens unter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Friedrich II.* Abhandlungen des kriminalistischen Instituts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3rd series (Berlin, 1914), vol. 1, pt 2, pp. 7, 12–14, 19–20.

117 Quoted in Richard J.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p. 122.

118 Oscar Helmuth Werner, *The Unmarried Mother in German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770 to 1800* (New York, 1917), pp. 36–7.

119 Dietrich, p. 506.

120 Schmidt, *Die Kriminalpolitik Preussens*, pp. 64–5.

121 Ibid. 另见弗里德里希于1781年12月7日写给海因里希亲王的信，信中他声称一

年中只有大约12次处决，在西里西亚根本没有——*Œuvres*, vol. 26, p. 550。

122 V. A. C.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 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1770–1868* (Oxford, 1994), p. 9.

123 Ibid., p. 7;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320.

124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p. 126.

125 Ibid., p. 122.

126 *Acta Borussica*, vol. 6, pt 2, pp. 611–12.

127 Janine Rischke, “‘auss Höchster Landes-Herrlicher Macht und Gewalt.’ Zum Einfluss von Naturrecht und politischem Wertehorizont auf die Rechtspflege Friedrichs II. in Kriminal-sachen in den ersten Jahren seiner Regierung,”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 255.

128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321.

129 *Acta Borussica*, vol. 7, p. 441.

130 Albrecht Heinrich Arnim, *Bruchstücke über Verbrechen und Strafen, oder Gedanken über die in d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merkte Vermehrung der Verbrecher gegen die Sicherheit des Eigenthums: Nebst Vorschlägen, wie derselben durch zweckmässige Einrichtung en der Gefangenanstalten zu steuern seyn dürfte*, vol. 1 (Berlin, 1803), pp. 11–13.

131 关于授权使用酷刑一事，参见*Acta Borussica*, vol. 9, pp. 309–10。

132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222. 收录于P.C., vol. 5, pp. 203, 205–6和*Acta Borussica*, vol. 7, pp. 157, 166的文件表明，费伯已经编撰了两篇诽谤弗里德里希的文章，供别斯图热夫在俄国宫廷煽动弗里德里希和伊丽莎白女沙皇之间的不和。唉，这些文件没有具体说明诽谤的性质。

133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p. 426.

134 Arnim, *Bruchstücke über Verbrechen und Strafen*, vol. 2, pp. 190ff.

135 *Œuvres*, vol. 8, p. 71.

136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p. 86–7.

137 Herman Weill,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Samuel von Cocceji: A Study in the Reform of the Prussian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1740–1755* (Madison, 1961), p. 5. 关于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司法制度的恶化，可参见p. 21。

138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

don, 2006), p. 243.

139 Peter Baumgart, “Zur Geschichte der kurmärkischen Ständ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Dietrich Gerhard (ed.), *Ständische Vertretungen in Europa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69), p. 159.

140 Gustav Schmoller, *Preussische Verfassungs-, Verwaltungs- und Finanzgeschichte* (Berlin, 1921), p. 162.

141 Koser, vol. 1, p. 328.

142 Hintze, pp. 349–50.

143 Hubert C. Johns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5), pp. 113–14.

144 *Acta Borussica*, vol. 7, pp. 449–50.

145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od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vom letzten Viertel des achtzehnten und vom Anfa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1778 bis 1806* (Lemgo and Hanover, 1814–19), vol. 1, p. 350.

146 C. B. A.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1985), p. 108. 最为全面的英语叙述见于David M. Luebke的文章“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Celebrated Case of the Millers Arnold (1770–1779): A Reappraisal,”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2, 4 (1999), pp. 379–408。

147 这段案情提要基于两位主要当事人以第一人称撰写的叙述。这两个人是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卡尔·芬克·冯·芬肯施泰因伯爵和格奥尔格·卡尔·弗里德里希·班德尔，他们的叙述分别见于“Geschichte des vor der Neumärkischen Regierung geführten Arnold-Gersdorfischen Prozesses und der Folgen desselben,” ed. J. D. E. Preuss, *Zeitschrift für preussische Geschichte und Landeskunde*, 1 (1894)和F. Graner, “Aus den hinterlassenen Papieren des im Müller Arnoldschen Prozess zur Festungsstrafe verurteilten neumärkischen Regierungsrats Bandel,”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38 (1926)。

148 Luebke在“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Celebrated Case of the Millers Arnold”中尽最大努力复原阿诺德事件，但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案件的每一个方面都存在争议。关于诉讼中迂回曲折的一切，以下书籍进行了详尽无遗的叙述，读来令人疲惫：Malte Diesselhorst, *Die Prozesse des Müllers Arnold und das Eingreif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Göttingen, 1984), 这本书也翻印了许多档案文件。关于水流问题，参见p. 41。

149 Finckenstein, “Geschichte des vor der Neumärkischen Regierung geführten Arnold-G

ersdorfischen Prozesses,” p. 138.

150 Luebke,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Celebrated Case of the Millers Arnold,” pp. 402–3.

151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vol. 1, p. 268.

152 Koser, vol. 1, p. 543.

153 Graner, “Aus den hinterlassenen Papieren des im Müller Arnoldschen Prozess zur Festungsstrafe verurteilten neumärkischen Regierungsrats Bandel,” p. 94.

154 Ibid., p. 99.

155 Finckenstein, “Geschichte des vor der Neumärkischen Regierung geführten Arnold-Gersdorfischen Prozesses,” p. 150.

156 Peter Baumgart, “Wie absolut war der preussische Absolutismus?,” in *Preussen – Versuch einer Bilanz* (Hamburg, 1981), vol. 2: *Preussen – Beiträge zu einer politischen Kultur*, ed. Manfred Schlenke, p. 103.

157 这段声明被重印了很多次。一个容易找到的出处是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vol. 1, pp. 534–8, 可以在网上找到。

158 在普鲁士之外，关于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积极反响，参见Iwan-Michelangelo D’Aprile, “Friedrich und die Aufklärung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 41和Peter Weber, “‘Was jetzt eben zu sagen oder noch zu verschweigen sei, müsst ihr selbst überlegen.’ Publizistische Strategien der preussischen Justizreformer 1780–1794,” in Goldenbaum (ed.), *Appell an das Publikum*, vol. 2, p. 742。

159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seiner Zeit* (Berlin, 1901), vol. 3, pp. 178–81.

160 Diesselhorst, *Die Prozesse des Müllers Arnold*, p. 67.

161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vol. 1, p. 274.

162 Daniel Jenisch, “Denkschrift auf Friedrich den Zweiten” (1801), in Horst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 244.

163 Koser, vol. 2, pp. 543–4.

164 Hans Gerhard Hannesen, *Lovis Corinths “Fridericus Rex.” Der Preussenkönig in Mythos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86), pp. 60–62.

165 Diesselhorst, *Die Prozesse des Mülers Arnold*, p. 69.

166 Dietrich, p. 464.

167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292.

168 Peter Weber, “Das Allgemeine Gesetzbuch – ein Corpus Juris Fridericianum?,” in Martin Fontius (ed.), *Friedrich II. und die europäische Aufklärun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new series (Berlin, 1999), vol. 4, p. 106.

169 Hintze, pp. 396–7.

170 James J.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 p. 70. See also Reinhart Koselleck,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preussischen Vormärz,”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ol. 1, pp. 379–81.

171 Hermann Conrad, “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Allgemeinen Landrechts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 von 1794,” *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Forschung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77 (1958), p. 17.

172 D’Aprile, “Friedrich und die Aufklärung in Brandenburg-Preussen,” pp. 40–42.

173 Horst Möller, *Vernunft und Kritik. Deutsche Aufklärung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p. 303.

174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vol. 1, p. 290.

175 Jenisch, “Denkschrift auf Friedrich den Zweiten,” p. 245.

176 “Ueber Berlin von einem Fremden,” in Gedike and Biester (eds.), *Berlinische Monatschrift* (1), p. 47.

177 Goethe, *Die Aufgeregten*, act 1, scene 6. 在网上可以看到几个版本。这部剧原本题为“布雷默·冯·布雷门菲尔德，或时代的征兆”，后来更广为人知的标题是“被煽动的人们”。情节提要和相关讨论参见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2: *Revolution and Renunciation 1790–1803* (Oxford, 2000), pp. 169–71。

178 Vinzenz Czech, “Friedrich der Grosse auf Inspektionsreise,”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p. 51–2.

179 以下是两本有帮助的论文集：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 *Der aufgeklärte Absolutismus* (Cologne, 1974)和H. M. Scott (ed.), *Enlightened Absolutism: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Later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90), 后者包括我自己的一篇文章“Frederick the Great and Enlightened Absolutism.” See also Günter Birtsch, “Der Idealtyp de

s aufgeklärten Herrschers. Friedrich der Grosse, Karl Friedrich von Baden und Joseph II. i
m Vergleich,” *Aufklärung*, 2, 1 (1987), pp. 9–47。

180 *Œuvres*, vol. 24, p. 46.

181 *Ibid.*, p. 47.

-
- ① 使用弗里德里希在线版作品集的搜索引擎，搜索“光”的单数和复数形式，使用单数的有160条结果，使用复数的则有358条。——作者注
 - ② 路德宗的一首赞美诗。
 - ③ 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绘画中的一个流派。

第14章

乡村和城镇

贵族和农民

弗里德里希在这方面非常关注。有很多例子表明他注意为农民伸张正义，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行为视为作秀不去重视。例如，在1777年，他向司法大臣们发出了一条措辞严厉的指示，要求他们必须恰当地对待贫穷的请愿者。这是由雅各布·德雷埃尔的一次请愿引起的，他从东普鲁士的利伯米尔一路长途跋涉到柏林，想要讨个公道，但警方以逮捕相威胁。弗里德里希提醒他的官员：“在我看来，一个贫穷的农民与出身最高贵的伯爵或最富有的贵族一样有价值，而且法律不分高低贵贱。”他补充说，官员必须给穷人公平的申辩机会，不得虐待他们，并且必须迅速做出正义的判决。¹在普鲁士农民中，他找到了接受这些观点的听众。过去无所不能的容克地主压迫农村群众的旧有印象早就被打破了。国王的权威并没有止步于贵族的庄园门口。领主不能自行惩罚触犯刑法的臣民，在他的庄园法庭审判的民事案件也可以上诉至皇家法院。²农民利用这一权利的情况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弗里德里希死后一年，新国王就抱怨起了他们“对诉讼的无限热情”。³易北河以东的施塔韦诺庄园属于冯·克莱斯特家族的一位成员，对这座庄园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农

民在同领主的长期纠纷中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合法权利，最终通过“一种痛苦的妥协”解决了冲突。正是弗里德里希的法律改革让他们更容易到皇家法院上诉了，这才使得施塔韦诺村民能够进行司法活动。他们相信法庭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判决，如果不满意他们就会抵抗。⁴

然而，如果弗里德里希有资格获得“农民的国王”的称号，那他更有理由获得另一个称号——“容克的国王”。他活了这么久，写了这么多东西，从他的作品中既可以挖出珍贵的金子，也可以挖出有害的铅。他1752年的“政治遗嘱”不是为公众写的，他在其中很清楚地说明了他最重视哪个社会群体：“一位君主应该以保护贵族为己任，这是他皇冠上最好的宝石，是他军队的光彩所在。”⁵ 他的父亲竭尽全力扩大王室领地，牺牲贵族利益，购买和收回土地。弗里德里希立即停止了这一进程，告诉总执行局：

应禁止官员骚扰贵族，以及重新对他们提出索赔要求，违者处死。一个贵族地主需要做的就是证明他在1740年之前实际上占有了一块土地。如果贵族地主和王室领地官员之间出现任何争议，那么总执行局不仅要确保断案公正，还应该确保一点，那就是宁可对我不公正，也不要让贵族遭受任何不公正的对待。因为让我遭受一点儿小小的损失，可能就让贵族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收益。他们的子孙是这个国家的保卫者，他们的品质如此优秀，因此他们应该以各种方式得到保护。⁶

当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吹嘘自己从本国的贵族那里获得的土地数量时，弗里德里希便尖刻地回答说，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犹太人和乞丐占领了。⁷ 弗里德里希可能会争辩说，他自己能够区分单个贵族的行为和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他在1750年10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告诉科克采伊，给残酷地虐待仆人的格斯纳伯爵夫人判6

年的徒刑是不够的，这个刑期比犯相同罪行的普通人可能被判的年数少得多，必须增加。然而2个月后，他告诉他的首相，他注意到属于旧贵族家庭的地产被平民大量收购，以后必须采取行动来阻止这种现象。⁸类似的话反复出现，说明这是一种经常被表达但很少实现的愿望。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仍然对贵族财产大量流失的现象颇为不满。⁹他非常热衷于推动限嗣继承制度，防止贵族们的遗产被奢侈的继承人败光。这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少数几个他认为值得模仿的方面之一。¹⁰由于富裕平民的数量在18世纪下半叶迅速增加，因此市场力量冲开了弗里德里希的保护壳。到1800年，平民已经购买了745处贵族庄园，这个数据还必须加上新近受封的贵族买来的庄园，以及贵族替那些比他们社会阶层低但物质上更富有的人购买的庄园。到那个时候，几乎有20%的“贵族”庄园都处于非贵族手中。¹¹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也无法阻止不幸的或缺乏才能的贵族降低身份从事诸如邮政局长或药剂师之类的平民职业。¹²

事实证明，阻止资产阶级的壮大并非弗里德里希力所能及。更容易控制的是有资格进入军官团的群体，他认为军官团是国家的基石。1757年，一位高级官员请求弗里德里希把他的儿子封为贵族，他已经进入冯·塔登军团，并且由于很有才能，已经成为一名中尉，但随后被调到一个地位较低的卫戍团，因为他只是平民。弗里德里希亲自在请愿书上写道：“我绝不会容忍军官中的非贵族害虫，他的儿子能在卫戍团当军官，应该已经够好了。”¹³随后，七年战争中可怕的伤亡迫使他把这些“害虫”委任为军官，但是当和平来临时他很快就清除了他们，理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心胸狭隘，不是好军官”。¹⁴尽管所有贵族都必须从底层士兵做起，但在不执勤的时候，他们被禁止与平民混在一起。¹⁵1786年，在711名少校及以上军官中，只有22名军官不是贵族。¹⁶这样看来，贵族在军官中几乎完全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一结论的误导性很强。虽然不可能量化，但有相当数量名字带有“冯”（Von）字的人根本不是贵族出身，而是秘密地将“冯”添加到他们的姓氏中，希望最终能够通过

这个字的使用体现合法性。这种做法经常奏效。在这些假装贵族而获得晋升的人中，包括普鲁士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名字：洪堡、克劳塞维茨、约克和格奈泽瑙。¹⁷ 另一方面，可以凭借杰出的军事服务受封贵族和晋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大卫·克劳埃尔，他在1744年领导对布拉格的袭击后成了大卫·克劳埃尔·冯·齐斯卡贝格，但还有更多其他的例子。不那么具有贵族气质的骠骑兵和炮兵团中的许多将军都是平民出身。¹⁸

正如这一点所表明的那样，弗里德里希的偏见与其说是贵族对新富的偏见，不如说是军人对文职官员的偏见。在一位长期服役的文职官员的请愿书的边上，他潦草地写道：“要获取贵族地位，不能靠笔，只能靠剑。”当自封的冯·霍尔岑多夫少校要求让他的贵族地位“重新生效”时，弗里德里希不耐烦地回答说，他一开始就不是贵族，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团里的一名外科医生，也是一名好的军官，他的请求将被批准。¹⁹ 得到弗里德里希恩宠的关键是服务，而不是出身，正如他告诉负责西里西亚事务的大臣恩斯特·冯·施拉布伦多夫的那样：

让我一劳永逸地说清楚吧，我不会为了钱而卖头衔，更不会卖贵族庄园，那样会使贵族贬值。贵族身份只能通过剑、勇敢和其他优秀的行为和服务来获得。我能容忍的封臣只有那些随时能够为我的军队提供有用服务的人，以及那些因为特别出色的行为和优秀的服务而被我选择进入贵族阶层的人。²⁰

所以，对于那些认为他们的家谱长度可以使他们免于为国家服务的贵族，弗里德里希的评价很低。他特别不喜欢伯爵，尽管普鲁士的伯爵数量相对较少。绝大多数普鲁士贵族都是没有头衔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给他们的姓氏加了“冯”，不过也有一些人享有男爵的头衔。弗里德里希认为，“无足轻重的伯爵”在军中服务的时间就那么几年，恰好足以获

得一点儿军功，然后他们就辞职了。²¹ 冯·德·舒伦堡伯爵要求让他的儿子获得晋升，理由就只是他的伯爵身份，而弗里德里希回答说，他发布了一条长期有效的命令，不允许更多的伯爵进入军官队伍了。²²

弗里德里希想要的是一个依靠军事服务维持生计的贵族阶层。幸运的是，普鲁士各地区的贵族都很少拥有大到足以让他们独立维持生计的产业。大多数庄园只有1000—1500英亩。东普鲁士的情况则不寻常，那里有几个富有的大贵族，420个贵族庄园的平均面积是667.5英亩。²³ 由于所有的儿子都继承了贵族身份，年轻贵族的数量约为庄园的3倍。²⁴ 在库尔马克省，只有17%的贵族是直接和永久地与他们的庄园联系在一起的。²⁵ 因此，大多数人进入军队，最终他们会在军校获得良好的教育，还会获得社会声望和良好的收入前景。1752年，一位姓冯·博宁的贵族自豪地告诉弗里德里希，他有7个儿子已经在军队服役，另一个也已经准备好在他足够大的时候参军了。²⁶ 他们都是从底层做起的，首先作为普通士兵进行3个月的基本训练，只有那些以前有军事经验的人被允许跳过训练。随后至少3年担任士官，军衔为下士或少尉。因此，当查尔斯·冯·林登贝格请求弗里德里希允许他的儿子以中尉的身份进入普鲁士军队时，他被告知：“在这里的情况不是那样的。在成为候补军官之前，每个人都必须从底层做起，从下士做起。”²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恩威并施，将就业不足的容克赶到不断扩大的军官队伍中。这一趋势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下加强了。在他执政期间，军官人数增加了77%，从3116人增加到5511人。²⁸ 此外，弗里德里希坚持认为，各级军官都要在前线指挥，而他又会采取莽撞冒进的战术策略，导致战时有很多职位空缺。1740—1763年间，共有1550名贵族军官战死，其中包括60名将军。冯·克莱斯特家族失去了23名成员，明肖家族14名，赛德利茨、弗兰肯贝格和申肯多夫家族各有8名，温特费尔德、克罗西克、阿尼姆、布雷多、舒伦堡、叙多和普特卡默家族各7名。²⁹ 七年战争后弗里德里希到访波美拉尼亚时，他发现冯·韦德尔家族没有一个人来招待他，对此他很惊讶，结果人

们只是告诉他：“他们全都在战争中丧生了，陛下。”³⁰

可以有把握地推测，3次西里西亚战争的艰难时期让幸存者与其军事领袖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起吃尽了苦头，面对过显然毫无胜算的绝境，但最终还是胜利了。尽管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906年的这条评论的主旨可能看起来过时了，但他的评论在本质上是颇有洞见的：

在普鲁士社会的所有群体中，贵族成为第一个与国家的新概念建立真正关系的群体，这是一种建立在信念而非单纯的被动服从基础上的关系，并且有力地表达了真诚的信仰。贵族过去仅仅是一个政治上自私的社会精英阶层，而今，贵族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民族阶层的東西。用弗里德里希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具有团队精神，还具有一种民族精神。其狭隘的地方自豪感在弗里德里希的战场上消融了。贵族与王国之间的联系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能够在所有变化中幸存下来。³¹

弗里德里希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出现了“团队和民族精神”这个短语，他写道，无论他的贵族来自哪个省份，他都试图鼓励他们把自己理解为普鲁士人。³²将这一愿望变为现实的，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西里西亚战争。这种变化是双向的。贵族军官们的每一次牺牲，都会加强弗里德里希对他们的情感依恋。这既是本能的情感反应，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曾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知道君主制的核心是荣誉，他只在贵族身上发现了这种美德。在《从胡贝图斯堡和约到瓜分波兰的回忆录》中，他如此解释自己为何在1763年以后清理了军官团中的平民：

对军官的选择给予这样的关注，比人们想象中更有必要；因为一般来说，贵族是有荣誉感的。不过，必须承认，一些出

身较低的人也有优点和能力，虽然这种事很少发生；当发现上述的这种入时，应该加以珍惜。然而，总的来说，贵族除了用剑之外无法让自己脱颖而出。如果他们失去了荣誉，他们就无处避难，即使在他们的父亲的宅邸中也不行。而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在犯了不光彩的行为之后，回到他父亲的住处也不会羞愧，不会认为自己名誉受损了。³³

荣誉、责任和服务，这些是弗里德里希试图灌输的观念的口号。这种观念导致普鲁士贵族面临严峻的生活：很早就进入军官学校，接触到严苛的纪律，长期的贫困，以及极度乏味和极端危险交替的职业生涯。这样的一位贵族不能租用属于王室的许多产业。³⁴ 他的个人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他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而获得许可的情况很少发生。他还被禁止从事商业或贸易方面的职业。³⁵ 他还需要获得国王的许可才能结婚，而且结婚许可到来的时间几乎总是被推迟，直到他达到上尉级别时才会下发（1752年的柏林卫戍部队的463名军官中，只有64人已婚）。³⁶ 积极的一面是，在七年战争之后，弗里德里希大力干预，拯救了众多为长期的市场力量和短期的动荡混乱所困扰的贵族地主，这些动荡混乱是由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共同造成的。赠予现金，提供种子和牛，暂停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停止破产程序，都是弗里德里希试图让他们恢复的方式。³⁷ 更长期的援助以抵押贷款机构的形式出现，通过使全省的地产所有者成为个人信用的担保人，贵族更容易获得贷款。可以预见的是，这带来了并非政策本意的结果：这一政策鼓励了投机，从而使土地市场变得更加剧烈波动。³⁸ 在1763年之后，招募非普鲁士士兵的工作集中化了，因为这会显著减少可供连队指挥官支配的现金。³⁹

最重要的是——至少在容克的眼中如此——弗里德里希不愿改革领主和农民的关系。原则上，作为启蒙哲人的弗里德里希完全反对农奴制，但作为君主的弗里德里希知道，废除农奴制会动摇社会制度，直到它

的牙齿嘎嘎作响。他在1777年的《论政府的形式与君主的职责》中发表了以下这段务实的声明：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一些地方的农民是领主的农奴，被固定在土地上；这是一种最可怜的境况，其余的人都会感到厌恶。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生来就是某个人类同胞的奴隶；憎恨这种虐待是合情合理的，人们相信，要废除这种制度，只需要有意愿就可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它源于土地所有者和在此定居者之间的古老契约。农业是在农民劳役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试图突然废除这种可恶的安排时，人们会彻底破坏土地经济，并且有必要向贵族赔偿他们遭受的收入损失。

⁴⁰

弗里德里希的推理源自痛苦的经历。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决定在波美拉尼亚的所有土地上“完全”废除农奴制度，无论这些土地属于王室、贵族还是市政府。如果领主抵制，就会使用强制措施。⁴¹波美拉尼亚等级会议在回复时强烈否认领主和农民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农奴制”。相反，这是一种良性互惠的契约关系，农民通过这种契约关系获得财产和安全，代价是提供适当的劳役。废除这种契约关系只能以补偿为基础，这对农民来说是极其昂贵的，并会导致社会崩溃。可能更有说服力的是他们的进一步论证：如果农民的劳役被取消，他们这些贵族和他们的儿子将不再能够为军队服役。⁴²弗里德里希退缩了。他活得不够长，没能看到约瑟夫二世试图强制废除农奴制的行为把哈布斯堡君主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他看到了这一景象，他可能会带着冷酷的满意之情冷眼旁观。

这位绝对君主显然达到了他的权威的极限，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他试图改善农民的社会状况，同时又要不损害他认为自己所依赖的贵族的利益。⁴³他不断重申，需要保护他臣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免遭他们的领

主和他自己的官员的侵害。⁴⁴然而，正是这种重复揭示了问题的棘手。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官员们因为他想听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声名狼藉，所以农村生活的不足之处被抹消了，不在他们精心安排的报告内容之内。在情况特别严峻的西里西亚，恩斯特·威廉·冯·施拉布伦多夫坚决要把弗里德里希的愿望付诸实践，试图赋予农民世袭的土地使用权，他的做法引起了地主的强烈反对。1769年他去世后，这一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他的继任者卡尔·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霍伊姆伯爵报告说，所有农民现在都如国王所愿，享有稳定的地位。直到1785年，一个特别委员会才报告说这个说法是完全虚构的。霍伊姆假装因为被治安法官欺骗了很多年而愤愤不平。⁴⁵当一位旅行者问道谁会遵守旅店挂出来的农民保护法令时，旅店老板答道：“只有钉住它的钉子！”⁴⁶

1740年，普通普鲁士农民的命运很不幸，1786年仍然不幸。只有在西部省份和东普鲁士，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是自由的。在其他地方，对领主和国家的义务是多方面的。最麻烦的是以现金和实物方式缴纳的捐税，以及每周在领地上工作几天的义务。婚姻、教育、职业选择和搬迁都需要领主的许可。所有的民事诉讼都是首先在庄园法庭进行审理的。每年必须把固定数量、固定价格的谷物交给皇家粮仓。骑兵的马匹一年中有4个月在露天田地上放牧，如果不想这样，就不得不支付“骑兵费”作为替代。役用动物会因建设防御工程和运输国王的官员而被征用。⁴⁷受影响最严重的当然是在3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死亡的约25万农民兵。⁴⁸人口压力的增加导致18世纪下半叶无地劳工人数激增，这是弗里德里希无法控制的。⁴⁹

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农村世界表面上并没有太大变化。普鲁士的农村还要经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动乱、1806年的失败以及更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发生转变。然而，把农民的处境描绘得太黑暗，会导致错误的认识。在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的王室领地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变得更加稳定了。在全国各地，直接侵占农民财产的行为即使没有被消除，至少也受到限制。⁵⁰这听起来可能不像是很大

的成就，但这比梅克伦堡、荷尔斯泰因或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等邻近的公国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更不用说跟波兰比了，那里的农奴制就是奴隶制。⁵¹还应该记住，不利的法律条件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较差的物质条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许多“自由”的爱尔兰或苏格兰农民都会证实这一点。⁵²此外，普鲁士的庄园制度是“一种双方都有权利和责任的制度”，农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大部分的关系维持良好，适合双方”。⁵³

教育

文化上，农村的情况变化不大。在这方面，宣布的政策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1763年颁布的“地方学校通则”要求家长把5岁及以上的孩子送到学校，在冬季每天都要上学，在夏季每周上两天学。直到他们学习了基督教的基本知识、阅读和写作，或者至少在他们13岁或14岁之前，他们都必须留在学校。在这项基础教育完成之前，有权让农民子女为其进行家政服务的地主不得征用这些孩子为其劳动。穷人的学费应由教区基金支付。每个教区都要有一位教师，由社区支付其报酬，并由教会监督。⁵⁴以英国为例做个对比，鉴于英国的类似立法直到1880年才会出现，普鲁士的义务教育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领先于时代的方面。事实上，即使只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是非常保守的，规定主要基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7年的条例，而后者本身不过是对现有惯例的编纂。⁵⁵根据弗里德里希的明确愿望，课程是传统的，并由虔敬派基督教主导。⁵⁶他在1779年写信给主管教育事务的大臣卡尔·亚伯拉罕·冯·策德利茨：

这个国家的教师应该向年轻人传授宗教和道德，以便他们忠于他们的宗教并且不会去信天主教，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新教比天主教要好得多。所以，学校老师必须确保人们继续忠于他们的宗教，并教育他们，让他们不至于沦落到去偷窃和谋杀的地步。⁵⁷

有一点点知识是件好事，因为它有助于社会控制，但知识太多就危险了。正如他在上述指令中告诉冯·策德利茨的那样：

在农村，如果教一点点阅读和写作，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如果他们了解得太多，他们就会跑到城镇去尝试成为文员等等。因此，在农村，儿童的课程必须组织起来，以便他们学到对他们有必要的东西，学到让他们高兴地留在原地的东西，而不是使他们想离开村庄的东西。⁵⁸

结果，农村生活照旧以缓慢的节奏进行着，没有受到中央政府意图的影响。最有活力的教育改革者之一，约翰·伊格纳茨·费尔比格在离开普鲁士去哈布斯堡君主国担任高级职位之前写道：“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最明确强调的命令，而且过去5年里已经有一个高级官员和两个国务部门参与其实施，却竟然只在这么少的地方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⁵⁹ 弗里德里希自己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抱怨农村学校仍然“缺陷很大”。⁶⁰ 在某些地方，它们根本不存在：例如，在库尔马克的1997个村庄中，有337个没有学校。⁶¹ 一个了解情况的证人是柏林灰衣修士文法学校的校长，杰出的地理学家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他的批判性观点比刚才引用的弗里德里希的评论时间更早。他感叹说，普通百姓的教育要么完全被忽视，要么以粗暴的方式组织起来，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职业不需要启蒙的理解力，而过多的见解可能会让他们对自己遭到的束缚产生疑问。⁶² 他抱怨说，学校教师的地位低，工资低，住房条件不够好，这也难怪其中许多人能力不佳：

在众多的学龄儿童中，只有少数儿童上了国立学校或由有能力的导师教授，我感到很遗憾。大多数人从堕落的牧师或候补牧师，士兵或退伍军人，工匠和老年妇女那里得到他们的教诲，但他们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会被欺骗和误导；或者他们根本不上学。⁶³

他在勃兰登堡附近的雷卡恩发现的优秀学校，由开明的贵族地主冯·罗肖创立并出资，这道闪光只是让整体的黑暗看起来更加不透明了。他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库尔马克的1760名教师中，只有82名教师获得了100塔勒及以上的年薪，1031名教师的年薪不到40塔勒，还有163名教师没有任何报酬。⁶⁴ 比兴以真诚的大声疾呼结束了他的报告：“如果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学校方面该多好啊！”⁶⁵

农业

弗里德里希的确在农村生活的一个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这个方面就是农业。在1775年12月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他称赞这是“诸技艺中最重要的一种，没有它就不会有商人、朝臣、国王、哲学家。唯一真正的财富就是由土地创造的财富。提高土壤质量，清理荒地，排干沼泽，就是取得对野蛮的胜利。”⁶⁶ 他的通信和指示清楚地表明，他对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实行的农业改良了如指掌，并派出过大批普鲁士农民到当地学习他们的第一手经验。⁶⁷ 他向他的官员和地主们称赞了他们所有的技术：农牧轮作，减少甚至消除休耕的轮作，畜舍饲养，人工牧场，在休耕地上种植根用作物，使用播种机，市场园艺，选择性育种等。⁶⁸ 提供实际帮助的方式有分发种子，从西班牙进口美利奴公羊，从荷尔斯泰因进口公牛，以及奖励和补贴有进取心的农民。⁶⁹

弗里德里希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将马铃薯作为大田作物进行推

广，这一点今天仍然被人们铭记。他的仰慕者在他位于无忧宫的墓碑上放上了马铃薯，以示纪念。⁷⁰推广马铃薯的举措非常明智，因为欧洲农业在主食方面长期过度依赖谷物，而马铃薯是打破这种依赖最有力的武器。据估计，在18世纪，马铃薯每英亩的产量比小麦高10.5倍，比黑麦高9.6倍，这不仅弥补了热值低的缺点，还具有一定的优势。马铃薯的净热值是谷物的3.6倍。⁷¹据估计，10平方米的土地如果都用来生产肉，能产生500千卡热量，生产谷物能产生2000千卡，生产甘蓝能产生6300千卡，生产马铃薯能产生7200千卡。⁷²

知道该做什么是一回事，让耕农去做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伏尔泰写道的：“许多有用的出版物都是关于农业的，每个人都读到了它们，农民除外。”⁷³农民本能地敌视任何变化，特别是抵制任何可能减少可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壤面积的变化，加之可供种植的几种马铃薯在外观和质地上并不招人喜欢，农民不愿种植马铃薯，认为这种新作物只适合他们的牲畜。正如弗里德里希恼怒地感叹道：“习俗，地球的女皇，以蛮横的专制统治着思想狭隘的人。”⁷⁴对他来说不幸的是，普鲁士农业仍然是以社区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乡村社区组成了一个法人团体，有权起诉创新者。⁷⁵因此，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个人主义——是缺乏的，一个车队只能以其最慢的成員的速度前进。⁷⁶不过，对弗里德里希来说幸运的是，王室领地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即使在那里，租户也必须被说服而不是被强迫。他在那里无疑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库尔马克，马铃薯的产量从1765年的5200吨增加到1779年的1.9万吨（到18世纪末为10.3万吨）。⁷⁷1776年，波美拉尼亚的吕根瓦尔德庄园这块王室领地的承租者写道：“已经没有必要再鼓励种植土豆了，因为在这块地产上，这项事业已经被推到了尽头，不仅在田间如此，而且在乡村花园中也如此。由于〔1771—1772年谷物〕歉收，当地人确信了种植马铃薯的优势。”⁷⁸如果在弗里德里希逝世时，马铃薯还算不上常见的大田作物，那么它也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⁷⁹

除了寻求提高现有农地的肥力之外，弗里德里希还开展了持续而有

力的土地开垦活动，以增加可用的土地面积。这是他国内政策的一个立足点，就是人口的增加：“新臣民〔是〕君主的真正财富”（1752年“政治遗嘱”），“首要的、最一般和最真实的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在于人口众多”（1768年“政治遗嘱”）。⁸⁰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人口稀少的国家，这些国家17世纪因战争、瘟疫和饥荒而屡次遭受重创，“人口政策”是每个政权的头等大事。政策的基础是相信世界人口自古典时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并将继续下降，所以吸引移民是一场零和游戏。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卡斯特尔伯爵是这种政策的化身，他站在他位于法兰克尼亚吕登豪森的城堡外的道路上，恳求路人定居在他人烟稀少的领地上。⁸¹

在弗里德里希的国内政策中，只有少数几个方面获得了历史学家的一致肯定，土地开垦是其中之一。奥得河、瓦尔塔河、内茨河和后来的维斯瓦河沿岸的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始于1747年，最初由荷兰专家监督。⁸²奥得河湿地包括一个长达50千米、宽达16千米的巨大区域，同名河流经过许多不同的水道，蜿蜒流过这一地区，每年泛洪两次，改道几乎也是如此频繁。这里是鸟类、鱼类和两栖哺乳动物的天堂，也充满了使疟疾流行的蚊子。这条河被驯服了，被限制在一条水道中，其洪泛平原得以被排干，变成了普鲁士最肥沃的耕地，“柏林的蔬果农场”，代价是牺牲了许多动植物和大多数渔民。⁸³尽管对开垦的土地面积的估算差异很大，但最低的数字也相当可观。⁸⁴如果君特·弗朗茨提供的40万公顷（约100万英亩）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弗里德里希有理由声称他在“和平时期征服了一个省份”。⁸⁵此外，这里有极为肥沃的冲积土壤，又紧邻水运航道，这两大因素的结合促进了高产商业作物的种植。

为了填补这些新开垦土地和其他的空白地带，弗里德里希竭尽全力吸引移民。他并不挑剔他们来自哪里：“如果土耳其人和异教徒来到这里并希望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将为他们建造清真寺和礼拜场所。”结果，大多数移民来自与普鲁士毗邻的公国——波希米亚、萨克森、梅克伦堡、安哈尔特、不伦瑞克，以及波兰的讲德语的地区，尽管免费土

地的诱惑也吸引了从瑞士和普法尔茨等地远道而来的移民。普鲁士领事馆实际上变成了移民招募办事处，宣传弗里德里希的诱人宣言，为旅程预付款项并组织行程。在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设立了中转营。⁸⁶特别是对那些遭受宗教歧视（在选帝侯改信了天主教的普法尔茨地区，这一问题尤其严重）或土地短缺（在人口过剩的德意志西部，这是个常见问题）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土地，定居补助金，免费种子，牲畜和设备，个人自由和免服兵役的前景很有吸引力，足以抵消旅途中的不确定性和不适。⁸⁷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极其重要的劳动力，还有金融和文化资本以及大量的牲畜。根据一份精确到有些可疑的统计数字，这些牲畜的数量为6392匹马、7875头牛、20 548只羊和3227头猪。⁸⁸总之，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期间，约有25万移民进入了普鲁士。⁸⁹并非所有人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根据冯·多姆的观点，有些人对普鲁士气候下的农村生活的严酷程度毫无准备，并转而去城镇乞讨。⁹⁰弗里德里希则并不介意，至少他是如此声称的：只有第二代移民，才能给他的投资带来回报。⁹¹

贸易和制造业

农业是普鲁士经济的基石，占用了大约80%的人口，但是弗里德里希知道，当需要现款时，更容易被利用的还是贸易和制造业。他还认识到，普鲁士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交通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了易北河和奥得河如何协助他的军事行动。它们对经济同样重要，但它们都是从东南到西北纵向流动的，需要帮助它们增加横向联系。1740年以前，易北河贸易一直由汉堡支配，奥得河贸易则由萨克森和布雷斯劳支配。⁹²征服西里西亚的一个重要的好处是，整条奥得河现在都在普鲁士手中了。弗里德里希立即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水道网络，使他能够控制整个易北河—奥得河地区。1743—1745年间，普鲁士以惊人的速度在易北河上的帕赖和哈弗尔河上的普劳恩之间挖了一条新的运河。这条运河长32

千米，有3个船闸来处理东西5米的落差，它将柏林到马格德堡的行驶距离减少了一半。⁹³与此同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废弃的菲诺运河得到了重建。这条运河也是32千米长，因为落差更大，它需要17个船闸。在这两条运河的共同作用下，来自布雷斯劳的船舶可以前往北海，来自汉堡的船只可以通过普鲁士领土抵达波罗的海。柏林位于该网络中心也获得了相应的好处。⁹⁴第三个大型工程是布龙贝格运河，它是在1772年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后，为了将维斯瓦河与奥得河联系起来而建成的。按照任何标准，弗里德里希的运河建设计划都是土木工程方面的一大成就，也切实地说明了坚决的政府行为能够取得何等成效。⁹⁵1785年德意志的上千千米的人造水道大多数（85%）在普鲁士。⁹⁶同时代的人也对此印象深刻。1774年布龙贝格运河建成，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在奥格斯堡出版的《德意志纪事报》发表了一篇庆祝文章：

西普鲁士新开放的运河从布龙贝格出发，将维斯瓦河与内茨河、瓦尔塔河、奥得河、施普雷河连接在一起，因此也就与哈弗尔河、易北河和北海相连，它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在德意志，没有一个邦的统治者像勃兰登堡的这样富有远见，用水运为国内外贸易带来了如此大的优势。⁹⁷

舒巴特接着补充道，只了解普鲁士公路的旅客也会完全错误地判断普鲁士贸易的发达程度。正如这句话暗示的那样，这些道路的落后臭名昭著。⁹⁸在1786年，没有一条建造得当的公路可以与法国的王家公路或英格兰的收费公路相媲美。⁹⁹据说弗里德里希认为，旅行者被迫留在他的领地内的时间越长，他们会花的钱就越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似乎没有想到他们可能会选择一开始就不来。¹⁰⁰一个真的坚持不懈地来到了普鲁士的人是伏尔泰，他一到达就说他在路上简直像经历了炼狱。¹⁰¹1779年，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从柏林出发向北方旅行，他发现

，穿过奥拉宁堡门后，就立刻走上了一条如此多沙的道路，只能缓慢前行。他还记录了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政策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了改善首都柏林周围的道路，政府下令，来到这里的所有农民都要带2块鹅卵石放在城门口。农民不愿在旅途中承受这额外的负担，就一直等到快到城门口时，才去捡所需的鹅卵石。结果可想而知，柏林周围道路上的石头都被拿光了。¹⁰²

旅行者艰难地经过泥泞或沙土到达目的地时，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征收消费税的要求造成了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绝对隔离，以及对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任何人进行严格的检查。普鲁士的边界非常长而且空隙众多，因此消费税只能在城门口征收。在柏林周围，这意味着一道6米高的墙壁。¹⁰³这也意味着在城门口和酒店的审问，就像俄国人尼古拉·卡拉姆津发现的那样，“一名中士从哨所走出来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来到柏林？你要住在哪儿？你会在这里长住吗？你要从柏林去哪里？’”¹⁰⁴他住宿的旅店的店主也拿出了一张表格，上面也重复了同样的问题，但这次的回答必须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当地的普鲁士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当比兴前往勃兰登堡附近的雷卡恩时，他和他的旅伴们宁愿在波茨坦附近绕一段漫长的弯路，以避免在抵达和离开时有人在门口搜查物品。¹⁰⁵

这种待遇让普鲁士政权显得很没有吸引力。从根本上说，对控制的需要源于弗里德里希建立战争专用金库的决心。这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另一个特征。他父亲去世时，给弗里德里希留下了800万塔勒的现金，这笔钱主要花在了夺取西里西亚上。于是，弗里德里希竭尽全力，试图再攒出这样一笔钱，还要增加其金额，因为弗里德里希同意西塞罗的观点，“战争的关键是无穷的资金”。¹⁰⁶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弗里德里希的想法是保守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父亲竭尽全力将他培养成一个军人，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弗里德里希甚至在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中服役过一段时间。但是，在如何管理经济方面，他没有得到类似的指导。屈斯特林战争与领地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希勒报告说，弗里

德里希在1731—1732年接受他的指导时，对经济事务没有表现出兴趣。然而，希勒可能比他自己知道的成功得多，因为此后的事实证明，弗里德里希认同了他的重商主义观点。¹⁰⁷

从本质上说，重商主义者认为欧洲经济是一场零和游戏。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世界上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一个国家只能以牺牲对手为代价来提高其份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是通过其他手段继续进行战争。

¹⁰⁸ 贸易顺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出口产品能够比进口产品更多，那么就可以赢得世界上更多的财富。弗里德里希如此表述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经济学家反复论述的观点：

当一个国家只有很少的产品可供出口，并且不得不依赖邻国的产业时，贸易差额必然不利于这样一个国家；它向外国人支付的钱一定比自己收到的更多；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那么在经过若干年之后，它必然会发现自己没有硬币了。如果一个钱包里每天都有钱拿出去，却没有钱放回来，那钱包很快就会空了。¹⁰⁹

他批评他的前任统治者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防止这种现金大量出血的状况。他继位时抱怨说，普鲁士每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20万塔勒，并全部流到国外，流入竞争对手的国库。¹¹⁰ 解决的办法是促进制造业：

避免金钱外流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以前进口的各种商品都在普鲁士境内生产……制造业可以在国内创造大量财富……普鲁士统治者必须鼓励制造和贸易，无论是通过直接补贴还是通过免税，以便他们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贸易。¹¹¹

因此，在登基后不到一个月，弗里德里希就在总执行局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由塞缪尔·冯·马歇尔领导，他要求该部门改善制造业，引进目前缺乏的产业部门，并吸引有技能的工人移民普鲁士。为了证明他对此事的重视，他授予马歇尔他新设立的“功勋勋章”。¹¹²

马歇尔是第一个贸易和工业大臣，也是最后一个。当他于1749年去世时，并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弗里德里希自己成了负责人。在这两人的领导下，该部门工作的大部分重点都放在国内工业上。由于取消了斯德丁、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和布雷斯劳所享有的贸易中心特权^①，普鲁士内部的自由贸易得到了促进，但商业自由化也就仅限于此了。马格德堡的贸易中心特权实际上在1747年恢复了，以此为对萨克森和汉堡进行持续贸易战的武器。¹¹³ 促进对外贸易的唯一重大举措，是1751年在新获得的港口——东弗里西亚的埃姆登——建立了一个普鲁士王家亚洲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在1755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争爆发之前，4艘船完成了6次前往东方的航行，获利很多，而上述战争结束了这段贸易往来。¹¹⁴ 1763年恢复和平时，东方贸易没有重新开始，第五部门（即新建的贸易和工业部）仍主要关注工业。

弗里德里希继位时，普鲁士已经有了两大制造业门类，他又增加了两个门类。最传统的是毛纺织业，因为不断扩大的普鲁士军队是穿着羊毛制服执行任务的。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于柏林建立的仓库中，500名织布工使用240台织机生产布料，使用的纱线是由5000名外包工人纺制的。¹¹⁵ 尽管最好的客户当然是普鲁士军队，但还是有大量的布料被出口：例如，该厂出口的布料足以在1725年为整个俄国步兵部队提供服装。¹¹⁶ 尽管不是正式的垄断者，但由于“仓库”规模庞大，而且可以使用来自国家的资本，它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它也受到了有力的保护。1740年，所有未处理完成的羊毛都被禁止出口。1766年和1774年再次发布的禁令表明，很难防止它通过空隙众多的普鲁士边界外流。最后一次禁令不得不以死刑相威胁，这证明了该政策的失败。¹¹⁷ 亚麻纺织业兴起得晚一些，但也属于传统行业，主要集中在西里西亚地区。西里西

亚的亚麻出口贸易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弗里德里希声称它对普鲁士如同秘鲁对西班牙一样有价值。¹¹⁸ 这一行业很有竞争力，因为国家支持的农奴制使劳动力成本保持在低水平，18世纪80年代严重的劳动纠纷让这一优势凸显出来。¹¹⁹ 西里西亚领主还阻止技术革新，以便从他们手下受契约束缚的劳动力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取利润，弗里德里希阻止纺纱机的进口，又助长了这种行为。¹²⁰ 这两个纺织业部门在弗里德里希执政期间都得到了扩张，特别是在普鲁士从七年战争造成的经济灾难中复苏之后。弗里德里希去世2年后，赫茨贝格宣称亚麻工业每年产值900万塔勒，雇用8万人。羊毛工业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800万和5.8万。¹²¹

除了发展原有的羊毛和亚麻纺织业，弗里德里希还发展了丝织业。严格地说，这是复兴而不是创新，因为首先推广种植桑树，为养蚕提供桑叶的是上个世纪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1740年，其产量下降到200磅（约93千克）。由于丝绸比其他纺织品昂贵得多，这对弗里德里希的重商主义野心尤其有吸引力。他很快着手在领地内的每个教堂庭院促进桑树的种植，为教士提供免费的树苗、指导手册和种植成功后的经济奖励。令人高兴的是，桑树在勃兰登堡的沙质土壤上长势茂盛。¹²² 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声称10年来他把产量增加了10倍，生产的丝绸的价值达到了40万塔勒。¹²³ 1775年，他向伏尔泰吹嘘说，丝线总产量已达到1万磅（约4650千克）。¹²⁴ 为应对巨大的丝产量，织机数量也需要相应增加，才能把它们变成布料。弗里德里希又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企业主提供了补贴，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企业就会完全被国有化。¹²⁵ 据估计，他在统治期间花费了超过200万塔勒来补贴丝绸工业。¹²⁶ 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成功。在柏林，织机的数量从1748年的238台增加到1769年的802台。¹²⁷ 有很多图像证据表明，弗里德里希热衷推广桑树。例如，约翰·弗里德里希·迈尔描绘1773年波茨坦的威廉广场的绘画，就展示了广场上布满桑树的景象，还有更多的桑树正在被种植。¹²⁸

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制造项目是瓷器，这一产业在普鲁士是全新的

。欧洲许多君主都热衷于瓷器。瓷器具有价格昂贵、美观且实用的优点。今天，人们更喜欢通过收集绘画作品展示大笔财富和良好品味，但在18世纪，瓷器的价格最高，能博得的声望也最高。¹²⁹ 1747—1761年间，不下6名德意志君主创办了瓷器制造厂。¹³⁰ 他们试图重复萨克森的统治者的成功。此前，中国人一直对制造瓷器的方法严加保密，但在1708年，萨克森发现了这一方法，导致其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的瓷器制造业迅速扩张。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了强者奥古斯特150件中国瓷器，以换取600名萨克森龙骑兵，典型地体现了他对事物优先级的判断。¹³¹ 弗里德里希1728年访问德累斯顿给他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形成了对当地产品的爱好，并开始建立自己的收藏。1737年，他就有了对自己的瓷器制造厂的第一个计划，当时他还是王储。¹³² 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夺取萨克森首都，使弗里德里希能够大大增加他的收藏。52箱最好的迈森瓷器送到了柏林。¹³³ 他为自己保留了最好的作品，其余的都送给了弗雷德斯多夫，让他把这些瓷器卖出去，换取任何他能换来的东西。¹³⁴ 尽管有这个意外收获，但瓷器制造方法的秘密不可能与这些东西一起获取。所以，当羊毛商威廉·卡斯帕·韦格利声称能够生产出与迈森一样好但价格更便宜的瓷器时，弗里德里希热情地回应了他。定期生产于1754年开始，主要从美因茨选帝侯位于赫希斯特的工厂招募工匠。¹³⁵ 留存至今的物品的高质量表明韦格利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不幸的是，1756年爆发的战争不仅在普遍意义上破坏了市场，而且讽刺性地给这家普鲁士制造商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弗里德里希于1756年8月占领德累斯顿，为他带来了大批迈森瓷器库存，同时也有机会将制造权租给他人，换取大笔资金。¹³⁶ 尽管还没有破产，但韦格利可以看出不祥之兆，然后又做起了制造毛织品的生意。在他的首席造型师的领导下，他放弃的业务继续经营，但大大缩小了规模。

弗里德里希知道韦格利迟早会离开萨克森，所以他试图恢复自己的大规模瓷器生产企业，以避免进口昂贵的迈森产品。1761年，他劝说约翰·恩斯特·戈茨科夫斯基接管这一企业，后者是一位富有的柏林丝绸商

人，也经营奢侈品和绘画。该厂1762年底开始生产，迅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戈茨科夫斯基在影响北欧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继而破产，该厂又面临停产的威胁。¹³⁷ 由于弗里德里希对货币的贬值和操纵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唯一合适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亲自接管这项业务，并支付戈茨科夫斯基22.5万塔勒。¹³⁸ 他对这家新收购的企业十分关注，又为其注入了14万塔勒的资本。¹³⁹ 通过垄断生产和禁止外国进口，稳住了国内市场。禁止进口的产品不仅限于瓷器，还包括所有可能与之竞争的其他陶瓷制品，如韦奇伍德陶器。¹⁴⁰ 在哈勒附近和西里西亚地区发现的高岭土矿床被迅速留给了柏林工厂专用。¹⁴¹ 对另一种重要原材料——木柴，只收取砍伐费和运费。¹⁴² 弗里德里希是一个积极活跃的工厂主，兼具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作用。考虑到他对国家的其他每个方面都要进行精细管理，也就难怪他会如此管理瓷器厂了。虽然他不能一直亲自到场，但他坚持要求每月给他发送账单，并经常到现在的莱比锡大街参观工厂。¹⁴³ 他的信函表明，他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超越那些讨厌的萨克森人，这是他常有的一个愿望。他对工厂制作的第一批工艺品发表了评论：“我的瓷器工厂比迈森的瓷器工厂好得多。我们在制造的东西比迈森想到过的都要美丽得多。”¹⁴⁴ 在波茨坦的新宫，他把瓷质吊灯和镜子放在迈森产品附近展示，以证明前者的优越性。

虽然弗里德里希总是坚持把瓷器厂作为一个商业企业来运作，迅速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客户所需的产品，但实际上他是他自己的最佳客户，他的消费占第一个十年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左右。¹⁴⁵ 到1786年，该厂为他的各种宫殿制作了20多套完整的成套餐具，每套72件，价格为5000—7000塔勒。¹⁴⁶ 类似的成套餐具也赠送给外国统治者，例如1764年送给了土耳其特使艾哈迈德·雷斯·艾凡迪。¹⁴⁷ 1770—1772年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制作了最精美的一套餐具，其图像方案由弗里德里希本人设计。沙皇坐在华盖下的宝座上，接受着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敬意，围绕着她的人物寓意着她的诸多美德。¹⁴⁸

在送到圣彼得堡之前，这套餐具在柏林公开展出时引起了轰动。

¹⁴⁹另一套奉承性的餐具是给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大公的，装饰着俄国战胜土耳其人的场面，包括切斯马海战的大捷。¹⁵⁰与其他一些因为非常喜欢某种产品所以购买了相应公司的企业家相比，弗里德里希拥有足够的资源，即使在七年战争后的动荡时期也能保持其运转。他还有权力迫使潜在客户购买这些产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犹太人在获得特许权或结婚时不得不购买一定数量的供出口的瓷器。^②1779年，他们的强制购买额达到了当年营业额的25%。¹⁵¹在此后的统治时期，彩票的承租人也被迫每年购买价格为6000塔勒的瓷器，这一数字在1783年增至9600塔勒。¹⁵²

具有独特的选帝侯杖标志的柏林瓷无疑是温室里的花朵。但它幸存下来了，实际上一直存在到今天。这不仅归功于所有者创造的良好条件，也归功于其质量。洛可可瓷器装饰品、花瓶和餐具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但只有最坚定的现代主义者才可能无法欣赏其精致复杂的美。根据一位专家的权威观点，通过吸引优秀的模型师、画家和工匠，柏林的瓷器很快就超过了迈森。¹⁵³账目数字无疑显示了这项产业的成功：年度营业额从第一年（1763—1764年）的大约1.2万塔勒增加到1771—1772年的94 500塔勒，同期职工数从1763年的146人增加到354人。经过1778年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导致的短暂危机后，1779—1780年间的营业额增至12.4万塔勒。¹⁵⁴其他数据显示，1763—1786年间利润总额为464 050塔勒，1786年的职工数为500人。¹⁵⁵从1763年到统治时期的最后，弗里德里希在瓷器上花费了超过200万塔勒。¹⁵⁶

有一个显然易见的问题是，普鲁士的瓷器制造业是因为弗里德里希的重商主义政策而成功的，还是未受政策影响？不可能有一个确凿的答案。他可能会争论说，普鲁士不是英格兰，而在缺乏资本和企业家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介入。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普鲁士就不会有瓷器工业，而即使有丝绸工业，至少也小得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像约翰·格奥尔格·韦格利这样的私人企业家能够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建立一个比国营“仓库”更大的毛织品制造企业。¹⁵⁷在西部的克雷菲尔德，由门诺派的弗里德里希和海因里希·冯·德·莱恩两兄弟经营的纺织公司发展成为德意志最大的公司之一，员工超过3000人（不包括经常在织布机上做兼职工作的许多孩子）。柏林派来一个政府委员会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他们告诉这个委员会说，他们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们首先模仿荷兰人，之后超过了荷兰人。¹⁵⁸更普遍地说，棉纺织业在1763年之后迅速扩张，这一产业并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因为政府倾向于选择羊毛。¹⁵⁹1800年以前，在普鲁士中部和东部的各省没有一个工业区发展起来，唯一一个成功的行业——棉纺织业——是国家几乎完全忽略的一个产业部门。¹⁶⁰1779年，当一个柏林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总执行局抱怨政府近期的干涉时，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暴露了出来。¹⁶¹

在普鲁士商界内部，对保护主义存在尖锐的分歧。大多数制造商似乎感觉待在关税壁垒背后很舒适，这一壁垒阻止了英国或荷兰这种掠夺性的竞争对手。想要自由化的是商人和那些从事新兴产业（如棉纺织业）的人。¹⁶²还有地理上的差异，位于遥远西部的克莱沃和遥远东部的柯尼斯堡的企业主非常渴望与低地国家和波兰做生意。¹⁶³所有人都会认同弗里德里希在七年战争结束时的行动是灾难性的。每场重大战争的后果都会给胜利者和战败者带来很多困难，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普鲁士的情况而言，弗里德里希实行了无情的货币操纵政策，为他的战争提供资金，让经济状况变得更糟。在战争年代的贬值之后，硬币突然重新升值，给所有人带来了混乱，并使许多人陷入了毁灭。戈茨科夫斯基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柏林的一名面包师记录说，他2293塔勒的储蓄在一夜之间缩水到了908塔勒。¹⁶⁴也是在1763年以后，弗里德里希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从上到下重塑普鲁士经济。该计划由安东尼奥·迪·卡尔扎比吉起草，他原本是普鲁士从里窝那引进来负责管理彩票的金融家。该计划要求中央银行与一个贸易垄断网络和一家保险公司合作，它们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托拉斯来经营经济。¹⁶⁵

结果完全是一场失败。尽管来自上方的压力很大，柏林商人还是拒绝投资银行。中央银行最终在1765年建立时，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在计划建立的公司中，真正建立起来的只有那些经营烟草、木材和柴火的公司，以及东弗里西亚埃姆登的一家鲱鱼公司。¹⁶⁶ 黎凡特公司于1765年5月发行4000股股票，结果只有822股有人认购，这表明了人们对弗里德里希的计划缺乏信心。¹⁶⁷ 此时，弗里德里希下令进行调查，导致高级财政官员艾哈德·乌尔西努斯因批评弗里德里希的政策而进了施潘道监狱。与萨克森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同时进行的贸易战使事情变得更糟。在一个各国都同样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地区，不可能确定贸易战是谁开始的，因为情况一直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贸易战中只有输家没有赢家。那些每次穿过边境都会被海关官员找麻烦的商人，无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制造商，不得不支付虚高价格的消费者，甚至那些在价格上获利但在数量上受损的政府也是得不偿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弗里德里希的以下政策把对本国的伤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对自己的西部省份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因为他怀疑这些商品实际上来自法国和低地国家。¹⁶⁸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真的讨厌什么，那就是他所说的“所谓的过境贸易”。他之所以加上了“所谓的”一词，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在掩护向普鲁士走私货物并逃避消费税的行为。¹⁶⁹ 因此他征收了极高的过境费用，导致外国货物不得不在普鲁士领土转一圈，这在普鲁士征服西里西亚后尤其麻烦。¹⁷⁰ 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他在维斯瓦河沿岸征收的关税让普鲁士的布龙贝格港取得了小幅收益，但其代价是破坏了波兰城市但泽的经济。¹⁷¹ 1792年，汉堡的著名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比施称赞弗里德里希在各方面都是伟大的——但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事务上除外。他还补充道：“他憎恶通过他的邦国的过境贸易，在他控制的每条路线上过境贸易都受到阻碍。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幸的是，他掌握了，或者让自己掌握了欧洲中心的5条大河，因此也掌握了主要的交通方式。”¹⁷²

1763年以后的年代是阴沉的。1766年6月，伦道夫伯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说，莱茵兰的每个人都对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西部领土上征收的新关税表示愤怒，他们预测关税会导致沿河贸易的停止。¹⁷³在秋天回到柏林时，他发现那里现金极其短缺，通货紧缩严重。即使那些资产丰富的人也面临现金不足的问题，甚至无法筹集到1000塔勒，所以不久前还可能换来2万塔勒的贵重物品现在可能只能卖7000塔勒。所有阶级都怨声载道，指责新的商业法规和银行。¹⁷⁴伦道夫的确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他通常是弗里德里希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指责在其他地方又被弗里德里希的另一名支持者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印证。¹⁷⁵

争论的一个特殊焦点是1766年成立的征收间接税的“执行局”（它的官方全称是“消费税和关税总署”）。¹⁷⁶像往常一样，弗里德里希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自己在七年战争中离失败有多近，拼命想要重建他的财政来修补和加强他的军队。至少他对财政政策有足够的了解，认识到间接征税，而不是对土地毫无弹性的直接税收，会对他最有帮助。他对现有人员深表不满。他抱怨说，有能力的官员全都死了，幸存者甚至无法告诉他普鲁士消耗了多少咖啡。¹⁷⁷为了应对普遍存在的贪污、走私和敲诈勒索，需要一批新的官员。他聘请了一个由马克·安托万·德拉艾德·洛奈领导的法国专家团队来监督普鲁士官员。¹⁷⁸通过把征税工作从现有的地方当局收归中央，并集中和规范程序，弗里德里希期望大幅增加收入。¹⁷⁹为了使这种苦涩的药丸变甜，并让那些适应了廉价食品的人更容易吃下去，弗里德里希命令最重的负担应该落在富裕的人身上。葡萄酒、啤酒、烈酒和牛肉的消费税提高，但穷人更喜欢的猪肉税率保持不变，粮食全部免税。最后这项让步在实践中意义不大，因为面包税同时提高了。¹⁸⁰

执行局失败了。¹⁸¹税收增长了，但收税成本也在增加，从每年30万塔勒迅速增长到80万。¹⁸²此外，根本无法知道税收增长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效率提高，多大程度上是由于18世纪60年代的危机消退了，经济活动自然恢复了。1783年，高级官员弗里德里希·安东·冯·海尼茨在一份

冗长的备忘录中谴责了执行局。尽管国王对该部门的支持众所周知，他还是向国王提交了这份备忘录。事实上，弗里德里希愿意接受这一批评。1781年5月25日，在一位名叫鲁热蒙的法国官员因贪污被逮捕后，他写信给德·洛奈：“你要用一个值得信赖的德国人替代这名雇员，而不是从法国的那群职业流浪汉里找一个，他们很可能是在逃避自己的国家。”一年后，他补充说：“你的同胞们不值4个马蹄铁；他们盗窃可以用手触摸的所有东西，但从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走私。”他在其他几个场合重复了这一指责。¹⁸³海尼茨指责执行局官员妨碍贸易，尤其是西里西亚和波兰之间的贸易，他们给自己付的工资太多，并且骚扰商人和制造商。在收到这份备忘录5天后，弗里德里希告诉德·洛奈不要再雇用法国人，因为他们都是“恶棍”，只想要尽量多榨取一些钱，然后带着不义之财逃跑。¹⁸⁴

执行局在弗里德里希的臣民中更加不受欢迎。人们认为它开支巨大，勒索钱财，捣乱侵扰，是一个外国机构。法国领导雇用大量退役士官担任视察员，结果只是强调了其威权性质。根据海因里希·冯·贝古林的说法，所有阶级都团结一心，憎恨并反对这个新机构：“市民唉声叹气，才子冷嘲热讽，士兵赌咒骂人。”农民们将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国人里的大人物”，他们有权征用6匹马来拉动他们的货车，而“法国人里的小人物”在这方面受到限制，只能用2到4匹马。¹⁸⁵“事实证明，在弗里德里希的众多想法中，也许没有哪个[比执行局]对于他的国家来说更加有害，引入这一机构的时期必须被认为是整个统治中最悲惨的时期”，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写道。¹⁸⁶1773年，著名的法国官员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德·吉贝尔伯爵访问了普鲁士，并记录道：“这个新的管理机构（执行局）受到诅咒——这个国家被毁，愤怒——商业受阻，停滞——这个法国财政机构就是人们过度恐惧法国的原因。”¹⁸⁷在国内的批评者中，最著名的是“北方的术士”约翰·格奥尔格·哈曼，他在柯尼斯堡的税务部门担任职员，以此勉强度日。他对弗里德里希经济政策的批评如此严厉，以至于他的出版商在1772年以后拒绝印刷他的书。

¹⁸⁸ 弗里德里希在1784年下令，要求对杀害执行局官员者公开处以轮刑，针对税务官员的暴力抵抗由此可见一斑。¹⁸⁹

弗里德里希一过世，他的继任者就解雇了所有法国官员，用本国人取而代之，不过制度本身基本没有变化。¹⁹⁰ 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一般也只有些装点门面的改变。直到1806年的惨败动摇了旧的重商主义的基础，普鲁士才驱除了弗里德里希统治的阴影。“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赞成自由贸易了”，这是卡莱尔对弗里德里希经济体制的评价。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有时，弗里德里希的表现也体现出，他认识到了自己自上而下统制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有局限性。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英国，但他认识很多去过那里的人，对荷兰共和国及其自由放任的商业资本主义也有亲身体验。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由于普鲁土地缘政治形势的要求，为军队征税必须是第一位的，而这就意味着中央对经济的严格控制。¹⁹¹ 他很可能错了。在英法1688—1815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中，最终证明更胜一筹的还是英国的经济和财政模式。但从1786年的有利形势看，弗里德里希可以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他获得了足够的资源，足以让普鲁士从欧洲的三流国家跃升为一流国家。他不仅征服了西里西亚，还把西普鲁士这个面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省份收入囊中。

注释

¹ Otto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Ausgewä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eiherr vom Stein-Gedächtnisausgabe (Darmstadt, 1982), vol. 22, p. 496.

² C. B. A.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1985), pp. 105–6.

³ William W. Hagen, *Ordinary Prussians: Brandenburg Junkers and Villagers, 1500–1840* (Cambridge, 2002), p. 574.

⁴ *Ibid.*, p. 590.

⁵ Dietrich, p. 310.

6 Quoted in Otto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Berlin, 1962), p. 102.

7 Koser, vol. 1, p. 369.

8 Rudolph Stadelmann (ed.), *Preussens Könige in ihrer Thätigkeit für die Landescultur* (Leipzig, 1882), vol. 2, pt 1: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296–8. 给科克采伊的第二份命令在以下书中得到了翻印: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63.

9 Ernst Pfeiffer, *Die Revuereis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besonders die schlesischen nach 1763 und der Zustand Schlesiens von 1763–1786* (Berlin, 1904), p. 179. 关于他扭转资产阶级潮流的尝试, 可参见Peter Baumgart, “Zur Geschichte der kurmärkischen Ständ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Dietrich Gerhard (ed.), *Ständische Vertretungen in Europa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69), p. 148.

10 Hintze, p. 352; Dietrich, p. 594.

11 Reinhart Koselleck,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3rd edn (Berlin, 1981), p. 83; Horst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n. Der Verleger, Publizist und Geschichtsschreiber Friedrich Nicolai* (Berlin, 1974), p. 295.

12 Frank Göse, “... die Racce davon so guht ist, das sie auf alle art meritiret, conserviret zu werden,” in idem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115.

13 Corina Petersilka, *Die Zweisprachigkei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Ein linguistisches Porträt* (Tübingen, 2005), p. 153.

14 Quoted in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104.

15 Carmen Winkel, *Im Netz des Königs: Netzwerke und Patronage in der preussischen Armee, 1713–1786* (Paderborn, 2013), p. 41.

16 Ibid., p. 93.

17 Paul R. Sweet, *Wilhelm von Humboldt: A Biography* (Columbus, OH, 1978–80), vol. 1, p. 4; Peter Paret, *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1807–1815* (Princeton, 1966), p. 8;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64; Peter Paret, *Clausewitz and the State* (Oxford, 1976), p. 14.

18 See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p. 93–4; Koser, vol. 2, p. 507; and Carmen Winkel, “Ziele und Grenzen der königlichen Personalpolitik im Militär,”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 151.

- 19 Georg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otsdam, n.d.), vol. 1, pp. 8, 10.
- 20 Quoted in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64.
- 21 Koser, vol. 2, p. 506.
- 22 Borchardt (ed.), *Die Randbemerkung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vol. 1, pp. 14–16.
- 23 Robert M. 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 (Princeton, 1988), p. 15.
- 24 Koselleck,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p. 80.
- 25 Gerd Heinrich, “Der Adel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Hellmuth Rössler (ed.), *Deutscher Adel 1555–1740* (Darmstadt, 1965), p. 307.
- 26 Koser, vol. 1, p. 530.
- 27 Winkel, *Im Netz des Königs*, pp. 40–41.
- 28 Hubert C. Johns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5), p. 245.
- 29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65.
- 30 Edgar 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 1600–1786,” in H. M. Scott (ed.), *The European Nobili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5), vol. 2, p. 98. Melton给出的贵族伤亡数字要比Schieder高出许多——韦德尔家族72个，克莱斯特家族53个——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几乎不可信。
- 31 Friedrich Meinecke, *The Age of German Liberation, 1795–1815*, ed. Peter Pare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77), pp. 12–13.
- 32 Dietrich, p. 310.
- 33 *Œuvres*, vol. 6, p. 106. Translation used here is from *Posthumous Works* (London, 1789), vol. 4, p. 151.
- 34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81.
- 35 Ibid.; Arnold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ss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eines Staatsmannes* (Tübingen, 1934), p. 241; Gustavo Corni, *Stato assoluto e società agraria in Prussia nell'età di Federico II* (Bologna, 1982), p. 260.
- 36 Helga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sidenz* (Berlin, 1987), p. 2

26.

37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p. 105, 112;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 155; Karl Heinrich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in Peter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Schlesi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Sigmaringen, 1990), p. 182.

38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p. 200; Hanna Schissler, “Die Junker. Zur Sozialgeschichte und historischen Bedeutung der agrarischen Elite in Preussen,” in *Preussen in kritischer Perspektive*, ed. Hans-Jürgen Puhl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special issue 6, 1980, p. 97.

39 Marcus von Salisch, “‘Von Preussen lernen ... ?’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und die Entwicklungen der Zeit,”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65.

40 *Œuvres*, vol. 9, p. 235.

41 Klaus Epstein, *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 1966), pp. 212–13.

42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136.

43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83.

44 例如，参见他在大臣米夏埃利斯接管总执行局的一个部门时发出的指示，时间是1779年12月8日，在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506中得到了翻印。

45 Walter L.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t 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6 (1931), p. 418.

46 Hans Thieme, “Die friderizianische Justizreform und Schlesien,” in Baumgart (ed.), *Kontinuitäten und Wandel*, p. 20.

47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22; Koser, vol. 1, pp. 370–72;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pp. 304–5; Pfeiffer, *Die Revuereis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p. 121–3.

48 Patrick J. Speelman, “Conclusion: Father of the Modern Age,” in Mark H. Danley and Patrick J. Speelman (eds.), *The Seven Years War: Global Views* (Leiden, 2013), p. 524.

49 Koselleck,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p. 132.

50 Corni, *Stato assoluto e società agraria in Prussia*, p. 415.

51 Ibid.; Büsch, *Militärs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p. 159–60. 然而有一些孤立的农民土地被卖事件，就好像他们是真正的农奴一样——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79。

52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140.

53 S. A. Eddie, *Freedom's Price: Serfdom, Subjection and Reform in Prussia, 1648–1848* (Oxford, 2013), pp. 12, 29.

54 该法令在以下书中得到了翻印: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426–41。

55 Koser, vol. 2, p. 590.

56 Wolfgang Neugebauer, *Absolutistischer Staat und Schulwirklichkeit in Brandenburg-Preussen* (Berlin and New York, 1985), p. 180.

57 *Œuvres*, vol. 27, pt 3, p. 281, also reprinted in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505.

58 Ibid.

59 Quoted in Neugebauer, *Absolutistischer Staat und Schulwirklichkeit*, pp. 184–5.

60 Dietrich, p. 504.

61 Koser, vol. 2, p. 591.

62 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Beschreibung seiner Reise von Berlin über Potsdam nach Rökahn unweit Brandenburg welche er vom dritten bis achten Junius 1775 gethan hat* (Leipzig, 1775), pp. 230–31.

63 Ibid., p. 38.

64 Ibid., p. 322.

65 Ibid., p. 295. 关于罗肖, 参见Iwan-Michelangelo D'Aprile, “Aufklärung, Toleranz und Wissenschaft in Preuss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00。

66 Reinhold Koser and Hans Droysen (eds.), *Briefwechsel Friedrichs des Grossen mit Voltaire*, Publikationen aus den K. Preussischen Staatsarchiven (Leipzig, 1908–9, 1911), vol. 8, p. 371. Also in *Œuvres*, vol. 23, p. 406.

67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p. 190; Koser, vol. 2, p. 370.

68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p. 188; Hans-Heinrich Müller, “Domänen und Domänenpächter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m 18. Jahrhundert,”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ol. 1, pp. 318–20.

69 Ewald Graf von Hertzberg, “Sur la population des états en général et sur celle des États

Prussiens en particulier,” in *Dissertations qui ont été lues dans l’assemblée publiqu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lettres à Berlin les années 1784, 1785, & 1786, pour le jour anniversaire du roi*, p. 54; Joachim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Oxford, 2012), vol.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p. 498.

70 弗里德里希敦促种植土豆的例子可参见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381, 444, 453。对于弗里德里希土豆政策的影响，更多怀疑的评论参见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 48。

71 B. H. Slicher van Bath, “Agriculture in the Vital Revolution,” in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1977), vol. 5: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p. 78.

72 Georg Schmidt, *Wandel durch Vernunft.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 2009), p. 274.

73 Quoted in Tim Blanning, *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p. 148.

74 *Œuvres*, vol. 6, p. 95. Translation used here take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4, p. 136.

75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149; Werner Heegewaldt, “Friderizianische Domänenpolitik am Beispiel der Kurmark,”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 173.

76 关于阻止农业增长的因素，“La lutte pour l’individualisme agraire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 (1930)，基于Marc Bloch的这篇经典论文的讨论见Blanning, *The Pursuit of Glory*, pp. 148–53。

77 H. Kiesel and P. Münch, *Gesellschaft und Literatur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 1977), p. 34.

78 Müller, “Domänen und Domänenpächter,” p. 320. Cf. Kaufhold, “Friderizianische Agrar-, Siedlungs- und Bauernpolitik,” p. 190.

79 Antonia Humm, “Friedrich II. und der Kartoffelanbau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pp. 200–202.

80 Dietrich, pp. 264, 494.

81 Hellmuth Rössler, “Der deutsche Hochadel und der Wiederaufbau nach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101 (1965), p. 132. 卡斯特尔家族

的伯爵们——现在是亲王们——仍然居住在吕登豪森城堡中，拥有大片的地产、森林、葡萄园，甚至还有一家银行。

82 Koser, vol. 1, p. 374.

83 Bernd Ingmar Gutberlet,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e Reise zu den Orten seines Lebens* (Darmstadt, 2011), pp. 82–9.

84 Corni, *Stato assoluto e società agraria in Prussia*, p. 110; Gustav Schmoller, “Die ländliche Kolonisatio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 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2, p. 935.

85 Günther Franz,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auernstandes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zu 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70), pp. 200–201.

86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124.

87 Schmoller, “Die ländliche Kolonisation,” pp. 942–5.

88 Ibid., p. 926. Franz,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auernstandes*, p. 200也给出了同样的数字。

89 Walther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Absolutism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75), p. 110, 该书给出了分省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被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339证实了。另一本书提供了一个大得多的数字——284487——参见Horst Möller, *Fürstentum oder Bürgernation. Deutschland 1763–1815* (Berlin, 1989), p. 80。

90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od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vom letzten Viertel des achtzehnten und vom Anfa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1778 bis 1806* (Lemgo and Hanover, 1814–19), vol. 1, p. 391.

91 Schmoller, “Die ländliche Kolonisation,” p. 925.

92 Johns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pp. 100–101.

93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279.

94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44.

95 Johnson,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p. 102.

96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Munich, 1987), vol. 1: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ära 1700–1815*, p. 120.

97 “Aus dem Brandenburgischen,” in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 (ed.), *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 1774 (reprinted, Heidelberg, 1975), 54 (3 October 1774), pp. 427–8.

98 Karl Biedermann, *Deutschland im 18. Jahrhundert*, ed. Wolfgang Emmerich (Frankfurt am Main, 1979), p. 252.

99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vol. 1, p. 121.

100 Biedermann, *Deutschland im 18. Jahrhundert*, p. 252.

101 Voltaire to Count and Countess d'Argental, Potsdam, 24 July 1750, in Theodore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Geneva, 1956), vol. 18, no. 3604, p. 104.

102 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Beschreibung seiner Reise von Berlin nach Kyritz in der Pignitz welche er vom 26ten September bis zum 2ten Oktober 1779 verrichtet hat* (Leipzig, 1780), pp. 5–7.

103 Felix Escher, “Di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Residenz und Hauptstadt Berli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Wolfgang Ribbe (ed.), *Geschichte Berlins*, 2nd edn (Munich, 1988), vol. 1: *Von der Frühgeschichte bis zur Industrialisierung*, p. 386.

104 Nikolai Mikhailovich Karamzin, *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er 1789–1790: An Account of a Young Russian Gentleman's Tour Through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and England* (New York, 1957), p. 50.

105 Büsching, *Beschreibung seiner Reise von Berlin über Potsdam nach Rekahn*, p. 72.

106 这是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1989), p. v 卷首的题词之一。

107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Denk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Mainz and Wiesbaden, 1979), p. 13.

108 Volker Hentschel, “Der Merkantilismus und die wirtschaftlichen Anschauungen Friedrichs II.,” in Erhard Bethk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Herrscher zwischen Tradition und Fortschritt* (Gütersloh, 1985), p. 139.

109 *Œuvres*, vol. 6, p. 86. Translation used here taken from *Posthumous Works*, vol. 4, pp. 119–20.

110 *Œuvres*, vol. 2, p. 1.

111 Quoted in Charles Wilson, *Mercantilism* (London, 1958), p. 24.

112 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60.

113 Hintze, p. 354; Volker Hentschel, “Manufaktur-und Handelspolitik des merkantilistischen Wirtschaftssystems,” in Bethk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p. 148.

114 Thomas Biskup and Peter H. Wilson, “Gross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158–9.

115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p. 61.

116 Hans Bleckwenn, “Bauernfreiheit durch Wehrpflicht – ein neues Bild der altpreussischen Armee,”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Herford and Bonn, 1987), p. 56.

117 W. O. 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63), p. 144.

118 Dietrich, p. 274.

119 Sheilagh C. Ogilvie, “The Beginning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idem (ed.), *Germany: a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96), vol. 2: 1630–1800, p. 616.

120 Ibid., p. 597; 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145.

121 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43–6.

122 Büsching, *Beschreibung seiner Reise von Berlin über Potsdam nach Rekahn*, p. 192.

123 Dietrich, p. 286.

124 *Œuvres*, vol. 23, p. 407.

125 Peter Baumgart, “Absoluter Staat und Judenemanzipation in Brandenburg-Preussen,”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13/14 (1965), p. 84.

126 Koser, vol. 2, p. 399.

127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165.

128 Hans Dollinger,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ein Bild im Wandel von zwei Jahrhunderten* (Munich, 1986), illustration 147. 1775年，卡尔·克里斯蒂安·威廉·巴龙描绘波茨坦新宫的漂亮画作显示，弗里德里希骑着他的灰色马，沿着两旁种着桑树的大道骑行。

129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160.

130 Michaela Völkel, “Meissen on My Mind: Die Königliche Porzellanmanufaktur im internationalen Wettstreit,”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378.

- 131 Johanna Lessmann, “Die Berliner Porzellanmanufakturen im 18. Jahrhundert,” in Johanna Lessmann, Michaela Braesel and Katharina Dück (eds.), *Berliner Porzellan des 18. Jahrhunderts* (Hamburg, 1993), p. ix.
- 132 Nina Simone Schepkowski, *Johann Ernst Gotzkowsky. Kunstagent und Gemäldesammler im friderizianischen Berlin* (Berlin, 2009), p. 271.
- 133 Lessmann, “Die Berliner Porzellanmanufakturen im 18. Jahrhundert,” p. x.
- 134 Michaela Völkel, “Nicht alle Lust will Ewigkeit. Friedrich und das Porzella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91.
- 135 Angelika Lorenz, *Berliner Porzellan 1763–1850* (Münster, 2006), p. 8. 这是位于明斯特的威斯特法伦州立艺术和文化史博物馆2006—2007年举行的一次展览的目录，包含了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瓷器的许多极其精美的图片。
- 136 Günter 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Berliner Porzellanmanufaktur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Munich, 1987), p. 64.
- 137 关于戈茨科夫斯基事业兴衰的详细叙述，可参见Schepkowski, *Johann Ernst Gotzkowsky*, pp. 274–301。
- 138 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p. 85.
- 139 Arnulf Siebeneicker, *Offizianten und Ouvri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en Porzellan-Manufaktur und der Königlichen Gesundheitsgeschirr-Manufaktur in Berlin 1763–1880* (Berlin and New York, 2002), p. 23.
- 140 Ibid., p. 24.
- 141 Erich Köllmann, *Berliner Porzellan 1763–1963* (Brunswick, 1966), vol. 1, pp. 35–6; Lessmann, “Die Berliner Porzellanmanufakturen im 18. Jahrhundert,” p. xv.
- 142 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p. 111.
- 143 Friedrich Hermann Hofmann, *Das Porzellan der europäischen Manufakturen im XVII I. Jahrhundert: eine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Berlin, 1932), p. 281.
- 144 Völkel, “Meissen on My Mind,” pp. 378–9. See also Schepkowski, *Johann Ernst Gotzkowsky*, p. 30.
- 145 Siebeneicker, *Offizianten und Ouvriers*, pp. 25–7.
- 146 Lorenz, *Berliner Porzellan*, pp. 12–13.
- 147 Ibid., p. 14.

- 148 Hofmann, *Das Porzellan der europäischen Manufakturen*, p. 492. 关于这套非同寻常的作品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一件，以下书中有其复原图：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p. 88。
- 149 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p. 141.
- 150 Ibid., p. 139.
- 151 Siebeneicker, *Offizianten und Ouvriers*, p. 28.
- 152 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p. 112.
- 153 Lessmann, “Die Berliner Porzellanmanufakturen im 18. Jahrhundert,” p. ix.
- 154 Siebeneicker, *Offizianten und Ouvriers*, p. 26.
- 155 Schade, *Berliner Porzellan*, p. 122; Köllmann, *Berliner Porzellan*, p. 31.
- 156 Thomas Biskup,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106.
- 157 Günter Vogler and Klaus Vetter, *Preusse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Cologne, 1981), p. 59.
- 158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285.
- 159 Ingrid Mittenzwei, *Preussen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Auseinandersetzungen zwischen Bürgertum und Staat um die Wirtschafts politik*(Berlin, 1979), pp. 21–2.
- 160 Ogilvie, “The Beginnings of Industrialization,” p. 614.
- 161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 181.
- 162 Mittenzwei, *Preussen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pp. 144–5.
- 163 Ibid., p. 90.
- 164 Hahn, *Friedrich II.*, p. 106.
- 165 Hintze, pp. 380–82.
- 166 Ibid., p. 382; Mittenzwei, *Preussen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p. 19.
- 167 Ibid., p. 20.
- 168 Ibid., p. 69.

169 Dietrich, p. 468; Koser, vol. 2, p. 400.

170 Hintze, p. 381.

171 Agnieszka Pufelska, “Die verpasste Grösse: Friedrich II. und Pole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20.

172 Johann Georg Büsch, *Theoretisch-praktische Darstellung der Handlung in deren mannigfaltigen Geschäften* (Hamburg, 1792), vol. 2, p. 258.

173 Lehndorff, vol. 3, p. 19.

174 Ibid., p. 30.

175 Friedrich Nicolai, *Anecdoten von Friedrich dem Grossen und von einigen Personen die um ihn waren* (Berlin, 1788–92; reprint, Munich, n.d.), pp. 13–14. See also Klaus Schwieger, *Das Bürgertum in Preussen vo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Kiel, 1972), p. 421.

176 Florian Schui, *Rebellious Prussians: Urban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Successors* (Oxford, 2013), ch. 4.

177 Walter L.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t 2,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7 (1932), pp. 79–80.

178 *Œuvres*, vol. 6, p. 85.

179 参见他1766年4月14日的公告和1766年5月21日的指示，reprinted in Heinrich von Beguelin, *Historisch-kritische Darstellungen der Akzise- und Zollverfassung in d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rlin, 1797), pp. 114–15 and 123–4.

180 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69.

181 Markus A. Denzel, “Wirtschaftlicher Wandel und institutionelle Erneuerung. Eine merkantilis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Leitgedanken,” in Sösemann, vol. 1, p. 375.

182 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p. 70.

183 W. Schultze, “Ein Angriff des Ministers von Heinitz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égie in Preussen,”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5 (1892), p. 192–3.

184 Ibid., p. 195.

185 Beguelin, *Historisch-kritische Darstellungen*, pp. 115–17.

186 Dohm,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vol. 4, p. 512.

187 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 *Journal d'un voyage en Allemagne, fait en 1773* (Paris, 1803), vol. 1, pp. 222–3.

188 Roy Pascal, *The German Sturm und Drang* (Manchester, 1953), pp. 46–7.

189 Florian Schui, “Learning from French Experience? The Prussian *Régie* Tax Administration, 1766–86,” in Holger Nehring and Florian Schui (eds.), *Global Debates about Taxation* (Basingstoke, 2007), p. 54.

190 Ibid., p. 50.

191 1780年，他在无忧宫对一个由路德维希·蒂克的父亲率领的、呼吁他抗议行会欺诈行为的代表团说，他也反对这种行为，并将采取行动。但他从来没有——Horst Krüger, *Zur Geschichte der Manufakturen und der Manufakturarbeiter in Preussen. Die mittleren Provinze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1958), p. 76。

① 中世纪的一种商业特权。在拥有该权利的城市，过路的商人必须在此卸货，售卖一段时间，然后才能继续上路。

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犹太人中，拥有瓷器猴子的人特别受尊敬，因为这标志着该家族有着来自柏林的古老血统——这一信息来自与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的私下交流。——作者注

第15章

在宫廷和家中

弗里德里希的众多宫廷

1786年，一位到访普鲁士的法国人声称：“弗里德里希没有宫廷。”¹这句话总结了当时许多人的共识，例如，在伏尔泰笔下，弗里德里希过着“没有宫廷，没有议会，没有信仰”的生活。²他当然无需议会告解，但显然不能没有宫廷。实际上，他掌控着多个宫廷。虽然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宫廷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功能都如出一辙：婚姻市场，“获取资助的门厅”，娱乐中心，社交场所，以及外交讯息互通。³普鲁士宫廷最为特殊的一点就是国王的经常缺席。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继承王位后的几年里，弗里德里希就决心定居波茨坦，冬季在城市宫度过，夏季则住在无忧宫。只有在5月和8月进行军事检查，出席重大的家庭活动，以及12月至1月的狂欢节期间，他才例行到访柏林。而且，即使是这些例行的逗留，时间也越来越短，因为他去得越来越晚，走得越来越早。正如赖因霍尔德·科泽尔所说，弗里德里希“是自己宫廷里的陌生人”。⁴

那时候，几乎无人不知弗里德里希对宫廷礼仪的厌恶，这一点后来也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他在《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公开

谴责祖父挥霍无度的生活，私下又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抨击典礼仪式，从而构建出一个富有魅力的统治者形象：开明通达，不愿被这些无用的礼法束缚。他写道，大多数欧洲君主给自己铸就了一道礼仪规范的枷锁，现在只能在它们的重压下唉声叹气。只有他的父亲曾展现出破除陈规的勇气，树立了出色的榜样，他循着父亲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且走得更远。他补充道，自己尽可能地远离外交使团，这样一来，普鲁士也就不必忍受那些无聊透顶的争辩，应该遵循何种礼仪，不同级别的人在外交仪式上又要遵循什么样的等级次序，那么多国家被这些繁文缛节所奴役。⁵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那些倒霉的外交官抱怨道。只有在他们到达和离开的时候，他们才能短暂地会见国王。除此之外，能看到他的身影就已属幸运，更不用说和他交谈了。⁶1750年，英国新任使节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足足等了1个小时才见到他，而此次会见，只持续了5分半钟。更多的接触越发证实他最初的印象，“一个人与其去讨好柏林的那个宫廷，倒不如向一群猪献殷勤”，他如此评断。⁷但另一方面，如果弗里德里希认为其他国家宫廷没有给予他和他的王国应得的尊重，他很快就会做出回应。正如另一位英国使节安德鲁·米切尔爵士观察到的那样：“尽管在某些场合，他对所有礼节都嗤之以鼻，但是只要他觉得触犯到自己的等级、尊严和考量时，没有人比他更固守这些礼节。”⁸

不幸的是，各个社会阶层的公职人员都需要去关注那些令人厌烦的人，这是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弗里德里希让自己在外交使团面前表现得和蔼可亲，他很可能会获得政治利益。在一个信息来源非常有限的时代，正是外交官们构成了他们雇主的主要信息渠道。因此，当弗里德里希不遗余力地通过问他是否与一名同名记者有关系来侮辱新上任的俄国公使冯·格罗斯时，他也导致了每一条恶意的流言蜚语都会被呈报给圣彼得堡。⁹流言多不胜数。弗里德里希的舌头既尖酸又不严实。尤其是在欧洲的女性统治者——安娜女皇、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玛丽娅·特蕾莎皇后，

还有法国国王的正式情妇们——蓬帕杜夫人和杜·巴里夫人——中，他因发表恶意和伤人的言论而获得了应得的恶名。

即使他无法完全避免公众事务，他也肯定将其限制在了最低限度。他对基督教的厌恶排除了教堂礼拜仪式的可能性，而在大多数宫廷，教堂礼拜仪式都是次数多、定期举办且耗时冗长的，而且在展示权力、地位和恩惠方面也起着核心作用。¹⁰ 在弗里德里希这里，它们的位置是由军事检阅和演习取代的，这些检阅和演习是他在波茨坦日常公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750—1767年，他平均每年在首都的宫廷活动出场的次数仅为34次，在1768—1785年降至17次。¹¹ 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宫廷职责的负担落在两位王后身上：王太后索菲娅·多罗特娅（直到1757年去世）和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这两个女人都很愿意承担这种代理职能。在她儿子的统治之下，聪明、有教养又高傲的索菲娅·多罗特娅现在可以以她专横的丈夫弗里德里希·威廉从未允许过的方式掌握着柏林的大权。她不再被迫在阴暗的武斯特豪森度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现在，她冬天住在柏林王宫，而在夏天，从5月到9月，她住在自己的蒙碧尤宫。挥金如土的弗里德里希让克诺贝尔斯多夫对蒙碧尤宫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扩大其面积，还购买了邻近的一块地产，以扩大其花园。当这项工程完成时，他已经把一座朴素的避暑别墅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宫殿。¹² 外国达官显贵和外交官首先要去她那里表达敬意。正是她的宴会、音乐会和舞会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前半段为首都定下了基调。王后的处境则相当不同。弗里德里希一登上王位，就把妻子撇在一旁，此外她还得给王太后做第二小提琴手。这一点很痛苦，即使是报纸上明显无恶意的声明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比如1749年的以下内容：

上周五王太后陛下出席了在国王的游乐宫苑无忧宫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在出席了周六在那里举行的另一场盛大宴会之后，王太后陛下在阿马利娅公主殿下陪同下返回她自己的蒙碧尤宫。在同一天，王后陛下在普鲁士公主殿下陪同下从非常

受人尊敬的鲍姆加滕牧师手中接过了圣餐，牧师在现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布道。¹³

在王太后去世以后，因为没有人的身份比王后更合适，她晋升到宫廷的最前列，履行了同样不可或缺的职责。尽管她在柏林主宫里有一套很大的展示性的套房，但她不被允许搬到蒙碧尤，蒙碧尤宫作为一位孝子怀念母亲的无声纪念碑，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一直空置着。唉，在弗里德里希不在时，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忠诚地为他尽职尽责，而那位受益人却并没有用任何有人情味的接触回报她。1764年，这对王室夫妇只见过14次面，尽管这是弗里德里希最常逗留首都的一年（39次）。弗里德里希偶尔从妻子的随从中邀请女士参加波茨坦的宴会，这是他从未给予她们女主人的一种恩惠，让王后受到的屈辱雪上加霜。¹⁴普鲁士上流社会当然注意到了他的厌恶并进行仿效，程度如此地过分，乃至弗里德里希觉得有必要要求人们给予王后应有的尊重。¹⁵她没有气馁，坚持不懈、勤勤恳恳、毫无怨言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这无疑得益于她明显的虔诚信仰。这样的信仰使她的宫廷成了路德宗教士的中心，并与波茨坦的自由放纵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¹⁶

王后主持的公开宫廷活动并不活跃，她的侍从伦道夫伯爵的日记对此描述得非常清楚。而且，国王统治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就变得越单调。¹⁷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弗里德里希才下令举办全面的宫廷仪式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大多数发生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前半期。最盛大的一次是1750年8月在柏林王宫前的卢斯特花园（供人娱乐的花园）上演的“骑士竞技表演”^①。这次活动名义上是为了迎接弗里德里希的姐姐威廉明妮和她的丈夫拜罗伊特边疆伯爵而举行的，但其主要目的是庆祝1748年《亚琛和约》的缔结，该和约使得弗里德里希对西里西亚的征服得到了国际认可。¹⁸当时举行了为期3周的歌剧和戏剧表演、宴会、化装舞会和烟花表演，最终在骑士竞技表演中达到高潮。这场表演是模拟比武和马术的结合，由奥古斯特·威廉亲王率领的“罗马人”、由

海因里希亲王率领的“迦太基人”、费迪南德亲王率领的“希腊人”和他们的亲戚，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卡尔率领的“波斯人”负责表演，整个宫廷坐在看台上观看。¹⁹表演刻意模仿1662年路易十四充满传奇色彩的“五国骑士竞技表演”，向全世界宣布普鲁士进入了大国的行列，而它的国王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君主，值得与路易大帝并肩。骑士和马匹的奢侈服饰则表明，这个宫廷的等级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邦国都不同。²⁰活动在夜间举行，由3万盏灯笼提供照明，这是老派的展示性宫廷文化的代表。²¹为了让那些不幸无法到柏林参加庆典的人也能感受到其气氛，这一大事被以文字和图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²²要说哪份记录更有效地打动了弗里德里希最喜爱的听众——欧洲知识分子，可能要属伏尔泰广为人知的记载，他刚刚来到这里，结果却停留了3年。事实上，伏尔泰本人也是骑士竞技表演上的明星人物。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游客亚历山德罗·柯里尼伯爵记录道：“在国王出现之前不久，一阵怀着钦佩的低语在我周围响起，我听到了这个名字：‘伏尔泰！伏尔泰！’”²³这位伟人适时地创作了一首赞美这一盛事的诗作为回应，这首诗很快就被印在了官方记录和报刊上。他还向巴黎宣传道：

没有哪句话能充分描述我刚才亲眼所见的骑士竞技表演，它把路易十四的骑士竞技表演和中国的灯节结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的混乱，没有噪音，每个人都像在巴黎一样舒适、专注、安静地坐着……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他的5次胜利和《德累斯顿和约》构成了这一壮观景象的美好装饰。²⁴

正是在这个夏天的几个月里，伏尔泰在柏林完成了《路易十四时代》，并于次年在那里出版，以反复出现的“弗里德里希比路易十四更伟大”一语，完成了两位君主之间的关联。²⁵

骑士竞技表演的巨大成本大部分都转嫁给了参加活动的诸侯和贵族

们，尽管这看起来很不寻常。²⁶ 这样的盛况没有再次出现。事实上，类似的庆祝活动少之又少。后来仅有一次出现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177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和继承人保罗大公与符腾堡的索菲·多罗特娅订婚，索菲·多罗特娅的母亲来自霍亨索伦家族。当时，弗里德里希正在认真谋求提前延长他与俄国的同盟关系，²⁷ 这笔钱花到了刀刃上。除此之外，柏林宫廷只会在家族访问和缔结婚姻时举行庆典，尽管此类活动很多。在传统的印象中，弗里德里希治下的普鲁士是一个简朴的“北方斯巴达”，与天主教世界里的奢华宫廷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印象是错误的。虽然说柏林宫廷在规模和华丽程度上无法与维也纳或凡尔赛相媲美，但它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中等规模的宫廷也算水平相近，在1763年之后尤其如此，因为那时大部分宫廷（例如被摧毁的德累斯顿）都被迫缩减开支。²⁸

家庭恩怨和友谊

此外，首都有着“多元的宫廷景象”，因为在两位王后的宫廷之外，还必须加上弗里德里希为其众多兄弟姐妹创建的独立地盘。他对霍亨索伦家族很依恋，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这种依恋也表现在为他的兄弟姐妹提供了大量的宫殿一事上。他最大的弟弟和法定继承人奥古斯特·威廉被赠予了奥兰宁堡宫；他的幼弟费迪南德接受了位于威廉广场上的圣约翰骑士团宫作为他的主要住所，另有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宫作为避暑别苑；未婚的阿马利娅公主得到了维尔泽诺布雷宫。待遇最好的是弗里德里希排在中间的弟弟海因里希，他在1744年被赠予了莱茵斯贝格宫，七年战争之后，他又获得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一座巨大的宫殿（即今天的洪堡大学）。²⁹ 他们还可以使用波茨坦的新宫，每年4月到9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搬到这里。由于弗里德里希的妻子被禁止进入波茨坦，因此由阿马利娅充当了女主人的角色，甚至——根据传闻——她还要负责她王兄的衣物清洗事务。³⁰ 不伦瑞克、施韦特和符腾堡的亲戚们也

经常会来参加在新宫举行的家庭聚会，聚会可能是为了要向全世界表明，霍亨索伦王朝是安稳坚固的。事实上，根本不是这回事，因为自1758年8月奥古斯特·威廉去世后，下一代中唯一幸存的男性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他最终在弗里德里希死后继位，成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1761—1791年这段时间里，拜罗伊特、安斯巴赫和施韦特的3个霍亨索伦旁支全部绝嗣。³¹

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姐妹们

威廉明妮（1709—1758），1731年与拜罗伊特边疆伯爵弗里德里希结婚

弗里德里克·路易丝（1714—1784），1729年与安斯巴赫边疆伯爵卡尔·威廉结婚

菲利皮内·夏洛特（1716—1801），1733年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卡尔结婚

索菲（1719—1765），1734年与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结婚

乌尔丽克（1720—1782），1744年与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结婚

奥古斯特·威廉（1722—1758），1742年与不伦瑞克—贝沃恩的路易丝结婚

阿马利娅（1723—1787），未婚，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院长

海因里希（1726—1802），1752年与黑森—卡塞尔的威廉明妮结婚

奥古斯特·费迪南德（1730—1813），1755年与勃兰登堡—施韦特

的安娜·伊丽莎白结婚

另有3个兄弟和1个妹妹在婴儿时期夭折。

由于弗里德里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波茨坦度过，霍亨索伦家族的年轻成员们在柏林的社交场合占据着主导地位。伦道夫伯爵的日记表明，他们举行了一系列传统的活动，包括舞会、晚宴、音乐会和业余戏剧表演，以及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的年轻王族们的典型幼稚狂欢。例如，在1754年1月，大队人马去了海因里希亲王的住所，在那里他们都伪装成犹太人。与此同时，奥古斯特·威廉亲王被蒙上了眼睛，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在一个装饰得像犹太会堂的房间内，蒙眼布被揭下来。随后，宫廷司仪冯·赖泽维茨化装成圣徒来到这里，把他们都变回了基督徒。之后，每个人都按照喜好戴上面具，奥古斯特·威廉装扮成一个女人。“这一切都非常好玩”，伦道夫评论道。³² 同月晚些时候，本廷克伯爵夫人也开始穿异性服装，希望渺茫地期盼这能赢得只喜欢同性的海因里希亲王的注意。³³

在与兄弟姐妹的私人关系中，弗里德里希没有表现出他最好的一面。瓦洛里侯爵在弗里德里希统治的最初几年担任法国驻普鲁士大使，他记录说：“他对他的弟弟——亲王们既冷酷又专横，他使他们处于一种他自己永远无法习惯的依赖状态。弟弟们要依赖他，而他要依赖那位令所有人惊慌害怕的父亲。”³⁴ 也许，弗里德里希完全不让他们参与任何决策的做法并非毫不合理。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写道，具有王室血统的亲王是一个威胁，他们过于自恃高贵而不能服从命令。他补充说，他们应该得到与他们的等级相适应的荣誉，但仅此而已。³⁵ 结果，他对海因里希亲王格外开恩，亲王作为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的卓越品质很快被他认可并加以利用。另外两个弟弟也被要求参军，但当他们被发现达不到期待时就被抛弃了。

弗里德里希对待长弟奥古斯特·威廉的方式尤其残忍，尽管这个弟弟是他的法定继承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欺凌受害者变成欺凌者的案例。

³⁶ 他父亲一死，弗里德里希就开始专横地对待他的兄弟姐妹。虽然没有采用身体暴力，但强迫他们的情况还是很多。也许是因为自己曾经是父王最喜欢的儿子，奥古斯特·威廉发现自己首先被欺负了，他被兄长告知应该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去做，包括阅读什么内容；而且，他作为军官的行为不断遭到批评，这一直折磨着他。³⁷ 1754年，弗里德里希让德里森少将担任他的胸甲骑兵团的指挥官，此举暗示奥古斯特·威廉不称职。奥古斯特·威廉被激怒了。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1757年7月在科林战败后，弗里德里希撤退到西里西亚，他不仅怪罪他的弟弟，实际上还指责他既懦弱又无能：“击沉我的不是我的敌人，而是你所采取的卑劣行动。”³⁸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弗里德里希自己撤退的时候不想带着所有的大炮、帐篷和浮舟，而奥古斯特·威廉就被迫担负起运送这些装备的职责，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做得很好，肯定比弗里德里希自己在1744年从波希米亚撤退时处理得要好多，后者的失败更加惨烈。³⁹

身心都受到严重打击的奥古斯特·威廉离开军队，回到奥拉宁堡，第二年就在那里去世，享年35岁。尽管他很可能死于脑膜炎，但同时代的许多人选择相信他死于心碎，被他残暴的兄长欺凌致死。在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海因里希亲王与弗里德里希的关系尤其令人担忧。与奥古斯特·威廉不同的是，海因里希非常聪明，活泼善变，而且容易激动。他也是一个性生活随便的同性恋者，经常坠入爱河又失恋，被一群年轻军官随从团团围住，他们为了博取他的欢心而竞争。通过伦道夫伯爵的日记，可以了解他的爱情生活的一些细节——伯爵本人就对亲王很痴迷，如下示例所示：

1753年5月1日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天，因为海因里希亲王要离开；我去见他，心中充满了悲痛。我赶快去见我亲爱的亲王，多么令人伤心的会面！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他，看见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世界上最亲爱的人，多么值得崇拜的人，

多么让我失望的事，我发誓永远忠诚。我悲伤地回到家，睡不着觉，给我的亲王写了封信。

5月2日，我从他那里得到一封令我热泪盈眶的信。我跳上马，策马去迎接他，但当我看到他的马车靠近时，我就下马躲藏起来，否则我的心会碎的。我不认为一个人能如此倾心于另一个人；在异教时期，他们会让他成为神。⁴⁰

看到身穿紧身马裤的海因里希亲王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美丽”，就足以让伦道夫陷入情欲的狂喜之中。⁴¹这表明，普鲁士强硬的军事化男性世界也有其女性化的一面。不利于兄弟间的和谐关系的是，1746年弗里德里希和海因里希发现他们两人在为同一个变童、漂亮的侍从约翰·弗里德里希·冯·德·马维茨竞争。弗里德里希在这件事上动用了自己的权力，尽管他后来告诉海因里希，他们喜爱的对象“身体肌肉松弛”，还有淋病。⁴²大约在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给他的弟弟寄了几封痛苦的信，痛惜双方关系的破裂，并坚决地表示自己的感情。他写道，在过去，海因里希只有在为自己的恋爱事务寻求帮助时才向他表示热情；其他时候，海因里希表现得“极度冷酷”。⁴³

跟对待奥古斯特·威廉的方式一样，弗里德里希也通过派遣冯·罗尔上校去海因里希所在的团恢复秩序，在军事上羞辱海因里希。他还借此机会告诉海因里希，看起来他在军中服役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只是“作为实现你的小计划的借口”，弗里德里希此言可能指的是海因里希的性征服。⁴⁴他在1752年实施了最残酷的打击，让海因里希跟美丽又迷人的黑森-卡塞尔的威廉明妮结婚，他完全知道这段婚姻不会圆满，海因里希对待他的新娘也会像他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轻蔑。正如他告诉他们的姐姐威廉明妮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让海因里希结婚，即使只是名义上的结婚。⁴⁵这是在重复他父亲对他的虐待，以示报复。

结果海因里希特别憎恨弗里德里希，如此深的恨意看起来只会在王

室兄弟姐妹中出现。当世界上其他人都称赞弗里德里希征服西里西亚时，海因里希以“格斯勒元帅”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批评弗里德里希的战略，并将胜利仅仅归功于普鲁士士兵的勇气。⁴⁶海因里希在1757年战役中表现出的毋庸置疑的军事才能让弗里德里希印象深刻，他写道，如果海因里希不是他的弟弟，他会更加称赞他。⁴⁷这一尊重明显没有得到回应。海因里希在写给姐姐阿马利娅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怨愤，他对弗里德里希在科林战败的消息欢呼雀跃。“法厄同^②最后还是坠落了！”他还说，弗里德里希甚至在决战之前就已经想着怎么自救了。这封不谨慎的信件在送往柏林的途中被奥地利轻装部队截获并被适时地公布了出来。⁴⁸1757年，奥古斯特·威廉亲王被革职的事情使裂痕成为定局。当年12月，亲身跟随普鲁士军队的英国使节安德鲁·米切尔写道：“海因里希王子非常虚荣，憎恨他的兄长，嫉妒他的伟大。”⁴⁹海因里希继续为弗里德里希作战，尽管他不赞成战争的开始方式和进行方式。1759年12月，弗里德里希从被雪困住的弗赖贝格给他寄了一封信，劝告他耐心。被激怒的海因里希在信上写道：

我绝对不相信他的消息，它总是和他的性格一样充满矛盾，含糊不清。正是他把我们卷入了这场可怕的战争，而只有他的将军和士兵的勇气才能使我们摆脱这场战争。从他与我的军队会合的那一天起，他就播撒了混乱和不幸，我在这场战役中所做的一切努力和随之而来的好运都被弗里德里希夺走了。

⁵⁰

在海因里希亲王写给弟弟费迪南德的信中，对弗里德里希的辱骂词语包括“残忍”“无情”“嗜血”“诽谤”“骗子”“邪恶”“虚荣”“嫉妒”“愚蠢”“无能”和“幻想狂”。“要是我们母亲在1712年1月24日生了个死胎就好了！”他感叹道。⁵¹时间没有使他变成熟。1781年，他在斯帕会见皇帝约瑟夫二世时告诉后者，他只想让弗里德里希去死。⁵²1788年，当弗里德

里希的《七年战争史》在其死后出版时，海因里希愤怒地在页边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假的！”“一个谎言！”“何等暴行！”“天方夜谭！”他还针对罗斯巴赫战役的描述写道，弗里德里希想撤退，他的将军们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打了这场仗。⁵³

兄弟姐妹之中与弗里德里希关系最为亲密的是他的姐姐威廉明妮。两人的年纪相差不到3岁，由于出众的聪明才智特别是对音乐的热爱而团结在一起，在孩童时代就非常亲密。在弗里德里希写给她的信中，现存最早的写于1728年1月26日，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声明爱意之语。⁵⁴在他们父亲那里经受的共同苦难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1731年，威廉明妮嫁给了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此后，分离使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在他自己的婚礼之夜，弗里德里希正是给威廉明妮写道“感谢上帝它结束了！”，他还补充说，他希望她能因为他想到的是她而觉得感激。⁵⁵即使以18世纪中叶的话语标准来看，弗里德里希的信也是夸张过度的。1732年10月，边疆伯爵到鲁平拜访时，弗里德里希写道，他们两人曾在歌颂“我们这个世纪最无与伦比的存在”的过程中度过了快乐的3个小时，而在争论谁最爱她时，他们几乎打了起来。⁵⁶1758年10月14日，威廉明妮死于癌症（与霍赫基尔希战败是同一天），弗里德里希对此感到了强烈而持久的悲痛，他的真挚情感是毋庸置疑的。⁵⁷然而，这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威廉明妮从来没有被允许忘记她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诸侯之妻的从属地位。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弗里德里希1734年访问拜罗伊特时，他嘲笑“小君主”的“小宫廷”的地方偏狭观念，并坚持认为，即使是他的随行人员中的下级官员也应优先于当地的显要人物，国王的中尉比边疆伯爵的大臣地位更高。⁵⁸

最终，这种专横导致了弟弟与姐姐之间的裂痕。导致不和的事情本身只是个小插曲，但重要的是，它正好揭示了弗里德里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和他的父亲相似。当威廉明妮嫁到拜罗伊特时，与她随行的有担任侍从女官的威廉明妮·多罗特娅·冯·德·马维茨，她是一位普鲁士将军的女儿。1744年4月，弗里德里希得知这位女士将与奥托·冯·伯格豪斯伯爵

结婚。他告诉威廉明妮立即停止这门婚事，理由是1731年冯·德·马维茨小姐离开普鲁士时，规定过她不允许在国外结婚。这一命令得到了加强，弗里德里希威胁说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嫁妆。3天后，又有一封信告诉威廉明妮，说冯·德·马维茨将军想让他女儿回来，因为他有自己选中的新郎在等着她，而且“孩子的首要职责是服从父母”。他姐姐没有被吓倒，很尖刻地回答说，这一承诺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起去世了；强迫一名女子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是错误的，而且无论如何，这场婚事在弗里德里希的抗议到来的前一天已经发生了。⁵⁹ 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海因里希亲王的遭遇一样，看起来就好像是弗里德里希决心要让所有已婚夫妇受苦似的。在战争期间，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明显同情奥地利，让姐弟的疏远成了定局，这种疏远持续了数年。弗里德里希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允许个人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友谊基础上，甚至连他最爱的姐姐也不例外。⁶⁰

从长远来看，弗里德里希对待继承人的态度更令人担忧。正如我们所见，他在1757年波希米亚战役失败后无情地伤害了自己的弟弟。第二年奥古斯特·威廉去世后，他那于1744年出生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成为法定继承人。他长大后身材高大，比后来普鲁士历史学家对他的粗暴描写中的样子更聪明。尽管他和他伯父一样喜欢音乐，而且还是一个天才的演奏家（大提琴），但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其他的共同点。这位“普鲁士亲王”——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官方头衔——是个随和懒散、奢侈浪费、寻欢作乐、精力充沛的异性恋者，经常因金钱和女人而陷入困境。他与表亲不伦瑞克-吕讷堡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结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只过了4年便离婚了，仅育有一个女儿。好在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弗里德里克·路易丝，她以每年至少一个的速度生下了8个孩子，其中包含4个男孩，从而确保了王朝的未来。⁶¹ 他还豢养了一个正式情妇——外表迷人的威廉明妮·恩克，她是一位王家乐师的女儿。⁶²

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享受着丰富多彩的性生活，但他的日子过得

并不愉快。他的伯父决心要让他成为一个军人，所以参加所有的军事检阅和演习是必须的，就像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一样。正如弗里德里希自己的父亲曾鄙视他“娘娘腔”的法国时尚的品位一样，弗里德里希现在也把同样严厉的管教强加给了他的侄子。伦道夫伯爵记载道，在波茨坦的一次宴会上，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从餐桌上站起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侍童递过来的不是他带来的时髦小帽子，而是弗里德里希为他挑选的一个更大的替代品，弗里德里希尖锐地告诉他，他应该戴与其他警卫军官相同的头盔。⁶³勇敢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有被吓倒，继续穿着“一件鲜红的雪尼尔花线上衣，一件饰有希腊刺绣的蓝色缎子背心，戴着高高的假发”在柏林散步。⁶⁴幸好弗里德里希没有看见他。上述事件发生在1764年。在他等待伯父去世的时候，他的命运并没有改善。21年后，德·布耶侯爵报告说：

普鲁士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住在波茨坦最穷的一个酿酒商的房子里，未经王室许可，他不允许在外过夜。他今年41岁，只升到了中将军衔。他的房间又小又简陋，家具又脏又破，甚至没有一个普通上校家里应有的体面。⁶⁵

在新宫里，弗里德里希·威廉被分配到一套拥有3个房间的套房，比家族其他成员所享有的要小得多，这种空间上的耻辱是会被忽视的。⁶⁶

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儿子结婚前几年对他的待遇。当弗里德里希谈到他的侄子时，听着几乎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谴责他的儿子：“他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迟钝的动物……他做的每件事都很笨拙，粗俗、顽固、喜怒无常、放荡、堕落、邪恶、笨头笨脑，还令人讨厌……家族的渣滓。”⁶⁷虽然弗里德里希在身体层面上对自己的继承人不那么残忍（且不说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毕竟是个大块头），但他在心理上更为无情。我们又一次看到，弗里德里希作为王储

时期遭受的虐待和他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弗里德里希·威廉以行为回应了这番“恭维”，他拥抱他伯父不喜欢的一切事物——女人、德语和英语文学、宗教和神秘主义。⁶⁸ 1780年，他写信给他的情妇威廉明妮·恩克说：“那只动物〔弗里德里希〕就是上帝降下的天灾，上帝的愤怒把它从地狱喷到了地上，”并迅速补充道，“小心，不要让这封信落入其他任何人的手中。”⁶⁹

霍亨索伦家族的其他成员会被告知何时以及和谁结婚。当然，在欧洲的统治家族中，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安斯巴赫的卡洛琳拒绝皈依天主教以嫁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大公（后成为皇帝查理六世），这一例外反倒证明了存在这种规则。然而，有人认为，弗里德里希故意从等级较低的帝国贵族中为他的弟弟们选择新娘，以使自己与具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们拉开距离。因此，在宫廷庆典上，他的弟媳们被明显地置于比他的姐妹们更低的位置上。⁷⁰ 他的侄女和侄子们也被纳入了王朝政策。1763年，奥古斯特·威廉的女儿威廉明娜与荷兰执政威廉五世结婚，为普鲁士在低地国家的影响力的扩大铺平了道路，尽管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后不久，这一点才派上用场。⁷¹

亲密圈子和“营地”文化

弗里德里希对他的继承人评价很低，从不允许他做任何接近决策的事情，结果弗里德里希·威廉在41岁最终登上王位时准备不足。⁷² 对于一个如此依靠个人的制度而言，不为未来的政府做出适当的准备，只能被认为是对君主职责的根本而严重的渎职。王储也没有被允许进入波茨坦的亲密圈子中。弗里德里希把最繁重的宫廷事务留给了母亲、妻子和其他亲戚，而他则可以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放松。当无忧宫建成以后，他给达尔让斯写了一封诗体书信，宣布在他的新家里会举行简单的聚餐，由聪明的谈话和对愚蠢的嘲笑活跃气氛，而不是传统的宫廷里

乏味和无休止的宴席。他模仿的是一种被贺拉斯称赞的罗马乡间宅邸聚会，实际上他的诗体书信就是在模仿他最喜欢的这位拉丁文作家。⁷³

所有可以接近柏林的其他影响力中心或信息中心的人，都会被这个精选的团体排除出去。弗里德里希只选择那些依赖他的人作为他的同伴。

⁷⁴ 他们必须聪明、知识渊博、博览群书又诙谐机智。说法语的能力是绝对必要的，当弗里德里希的新秘书迪厄多内·蒂埃博到达时，弗里德里希问他是否会说德语。他道了歉，答应尽快弥补不足。“不，不，”弗里德里希回答说，“我坚持要求你不学德语，因为如果你学了，德语习语很快就会开始污染你说话的纯洁性。”⁷⁵ 正如伏尔泰在1750年8月抵达后不久所记述的那样，德语是最不常用的语言，只被士兵和骑兵使用。⁷⁶ 他沾沾自喜地补充说，法国的语言和文学比查理曼征服的地方更多。

那年晚些时候，伏尔泰从波茨坦写信给德尼夫人说：“我知道，我亲爱的孩子，全欧洲都在谈论波茨坦。女人们尤其愤怒，就像她们在蒙彼利埃反对达苏西^③先生那样；但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他又加上4行诗句：

我已经度过了诚实爱情的快乐年代，

也没有成为一名侍童的荣幸：

在帕福斯^④及其邻域所做的一切，

始终是我漠不关心的事情。

信的结尾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不干涉，除了继续给一家之主修补散文和诗句的工作。”⁷⁷ 正如信中暗示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在波茨坦的社交圈子是清一色的男性。霍亨索伦家族的女性成员可能会被邀请参加盛大的活动，并可能被允许在夏天住在新宫里，但即使是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两个姐妹，威廉明妮和阿马利娅，也从未成为他的随行队伍的

成员。这不仅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还是一个反对女人的世界。正如他的几个亲密朋友——比如弗雷德斯多夫、达尔让斯、达尔热、卡特——发现的那样，婚姻并不受欢迎。任何与女人在一起的仆人都感受到了国王愤怒的全部力量。作为他最早也是最具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之一，约翰·大卫·埃尔德曼·普罗伊斯评论道，无忧宫是一座修道院，弗里德里希就是修道院院长。⁷⁸

这是个同性社交的圈子，但它是否也如同伏尔泰在写给德尼夫人的信中所暗示的那样，是个同性恋圈子呢？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作为自我塑造过程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实际上在1740年表现出了他的同性恋倾向，这一自我塑造过程让他能够接受父亲的虐待。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他似乎很有可能更喜欢与自己同性别的人。当然，他选择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人作为他的亲密伙伴，并且经常不遗余力地促进他们的事业，就像他对令人毛骨悚然的巴斯蒂亚尼神父或是菲利普·戈特哈德·冯·沙夫戈奇伯爵做的那样。他让前者做了布雷斯劳采邑主教的助手；有关后者的传闻各种各样，伦道夫伯爵称他为“所多玛主教”，法国公使蒂尔康奈勋爵说“他是不敬和堕落的典型，把这二者表现得令人作呕”。⁷⁹当时的小册子和回忆录中不断出现的谣言如同漩涡，同样令人遐想。⁸⁰有一部极端的作品显然在恶意中伤、带有政治动机，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所谓的著作中发现的所有下流和自夸之语的字典》，由维也纳多产的记者约瑟夫·里希特撰写，他指责弗里德里希在军事行动的间隙中以与他漂亮的侍童、他的卫兵甚至他的灰狗鸡奸来消磨时间。⁸¹相比之下，伏尔泰的《回忆录》更值得重视，因为这书据称是基于个人观察写出的。其中出现了这样的叙述：

当陛下穿好衣服，套上靴子，斯多葛派就为伊壁鸠鲁派腾出了一点儿时间：他召唤了两三个喜欢的人，无论是他所在团的中尉还是侍童，或是男仆，或是年轻的士官。他们喝过咖啡。然后那个被扔了手帕的人，无论是谁，都可以与国王单独面

对面地过上一刻钟的时间。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当他还是王子的时候，他的爱情受到了父亲的残酷惩罚，导致他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害。所以他不能再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必须凑合着满足于被动地位。⁸²

很明显，即使这些幽会真的发生了，伏尔泰也不可能在场，但他确实在1750—1753年期间在弗里德里希身边咫尺之处生活了2年多，并且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无忧宫。另一方面，这本回忆录可追溯到1757—1759年间，⁸³或者换句话说，在这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伏尔泰丢脸地离开了波茨坦，发誓要复仇之后。

由于缺乏那种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确凿证据，我们不可能断定弗里德里希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的同性恋者。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私人宫廷的氛围非常独特。此外，它一点儿传统模式的痕迹也没有，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这种氛围最好用英语单词“camp（营地）”来表达，这个词有明确的同性爱或至少是性暧昧的暗示，但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弗里德里希写于1748—1749年的长篇讽刺诗《守护神》是最好的文学表达，这首诗模仿了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该诗大致是根据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即法国大使瓦洛里的秘书达尔热被主人误会，并被奥地利士兵俘虏的故事。改编版与真实故事出入很大。它使弗里德里希能够攻击许多他最喜欢的靶子，其中包括萨克森人、基督教和天主教会。他还加上了一些目标，包括荷兰人（脑子很慢，要花一个小时才能说出两个字）、英国人（腐败、自杀性的、娱乐狂、连最下层的乞丐都是百万富翁、有梅毒）、葡萄牙人（该国的国王如此虔诚，以至于他找了一个修女当他的情妇）、俄国人（自从彼得大帝之后才会两腿直立行走），等等。⁸⁴

戏谑、讽刺、反教士，在某些地方相当机智，而又相当冗长，《守护神》概括了弗里德里希在无忧宫亲密圈子的气氛。气氛也是恶意的，

甚至是残忍的，这在达尔热详细讲述他的生活时尤其明显。真正最让达尔热反感的是诗中声称他在一所耶稣会学院的经历：

他们发现我长得有点美
还有一些活泼的念头。
一位老师，欲望强烈，垂涎三尺，
怀着邪恶爱抚我，
一天带我去他宿舍的房间，
极其无礼地向我求欢。

达尔热义愤填膺地拒绝了这些求欢行为，但不久另一个教士又有企图。这一次达尔热只抵抗了“一点点”，最终在被以下为同性恋辩护的理由说服后屈服了：

你不知道你的历史吗？
你会发现那里有光荣的英雄，
主动和被动地响应
他们那些身体柔软、乐于助人的朋友们。
这就是苏格拉底从亚西比德那里得到的，
据我所信，他不是一个阴郁的希腊人；
欧律阿罗斯和尼素斯也是如此。^⑤
我还能说出多少？很多，
尤利乌斯·恺撒，有关他的风流轶事

说他是所有罗马女人的丈夫，
而他其实是所有丈夫的妻子。
但只要浏览一下苏埃托尼乌斯的大作
看看他是怎么描写罗马帝王的。
他们都包括在这个名单中；
他们都事奉良善的兰萨库斯之神。^⑥
如果世俗的例子对你还不够的话
让我们把攻击转移到神圣的地方：
善良的耶稣，你觉得他是怎么
让约翰睡在他床上的？
你看不出他是他的伽倪墨得斯吗？⁸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与达尔热有同性恋关系。达尔热经常被他称为“露西妮”。但是，达尔热对这种公开曝光感到不满，这也并非没有理由。这首诗的内容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尽管弗里德里希私下印刷了这首诗，但只有很少的几本被分发给亲密的朋友。当然，这个秘密是无法保守的，尤其是在伏尔泰1750年抵达时收到一份副本之后。弗里德里希试图用冗长的关于王权之负担的诗体书信弥补达尔热，但他们的关系无法恢复了。⁸⁶

不过，“营地”不仅仅涉及性或冒失无礼，它还涉及一种特殊的环境，包括华丽的装饰、消费和自我放纵。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弗里德里希对装饰精美的鼻烟盒的热爱，这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种品味。⁸⁷在他统治期间，他收集了很多鼻烟壶，关于数量的说法不一，有说300件的（弗里德里希·尼古拉），也有说1500件的（迪厄多内·蒂埃博），

最有可能的总数在300到400件之间。⁸⁸ 镶有贵重宝石的这种盒子可能比早期绘画大师的一幅画作要贵得多，有人估计这些盒子的总价值为175万塔勒。⁸⁹ 当然，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鼻烟盒处于使用状态，但弗里德里希确保房间里总是陈列着精选的最好的作品，他去柏林参加狂欢季活动时也带着他的收藏品。⁹⁰ 弗雷德斯多夫的众多职责之一是购买和维护这些收藏品。弗里德里希频繁地把它们拿出来使用，正如英国公使詹姆斯·哈里斯所说的那样：“现任国王很爱吸鼻烟。我甚至看不到他那丰富的鼻烟盒收藏。他携带的是一个巨大的鼻烟盒，他吸鼻烟的时候，不是一小撮一小撮地吸，而是一大把一大把地吸。接近他很难不打喷嚏。”⁹¹ 珠宝收藏也同样丰富。例如，1770年，弗里德里希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与约瑟夫二世会面时，左手戴着两枚贵重的戒指，上面镶着单粒钻石；右手戴着一枚绿宝石制成的大戒指，这是一种非常罕见又美丽的绿色宝石，其产地西里西亚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⁹²

会面时，他穿着一身绣满银线的白色丝绸套装，这种景象只能靠想象来还原，因为它绝对没有被视觉艺术作品记录下来。同时代人更喜欢推广的形象是朴素的“老弗里茨”，他总是穿着朴素的制服，仅仅以黑鹰勋章的星星为点缀。弗里德里希在1740年后拒绝被画像，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会选择什么样的衣服。不过，他的确助长了穿着破旧制服的君主的神话：他在一次著名的骑行中，穿着破旧制服出现在柏林的街道上，向路人脱去他的三角帽。在公众视线之外，他喜欢回到他父亲非常不喜欢的那种精致的法国时尚。特别是在统治的前半段，他出席宫廷宴会时会穿着华丽的晚礼服，服装上缀有金银刺绣、钻石纽扣和鞋扣，还喜欢穿真丝长袜。他众多的私人侍从也穿着华丽的制服。⁹³ 他还喜欢气派的旅行，乘着华丽的马车，马车上装饰着绘画和镀金装饰，拉车的马匹挽着华丽的马具，还伴有穿制服的男仆。⁹⁴

一个君主生活在奢华中，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弗里德里希的惊人之处在于斯巴达式的朴素形象与巴比伦式生活方式的现实之间的脱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弗里德里希的日常生活。⁹⁵ 他夏天早上5点起床，

冬天6点起床，在出发开始军事检阅之前，先处理政务。他返回无忧宫或波茨坦城市宫时，才可能开始向更加放纵的生活方式过渡。与亲密圈子一起度过的午餐会常常是漫长的，随后是休息、更多的事务、散步、长时间的阅读或听人朗读、音乐会以及最后的晚餐，晚餐也有他喜欢的对话伙伴参加。⁹⁶ 对待美食，他不惜任何代价。⁹⁷ 他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厨房，由几位顶级厨师组成。在平常的日子里，当他有客人的时候，皇家餐桌上会有8道菜，而当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数量就会少多了。⁹⁸ 厨师们提议的菜单在前一天晚上提交给弗里德里希审批，每道菜都标着值班厨师的名字，例如：⁹⁹

菜单

1780年10月23日

亨诺 小龙虾汤

格雷本丁克尔 山鹑翅膀配酸模和生菜

新主厨 英式羔羊胸部软骨肉、绿酱

席尔格 丸子和烤野鸡肉

格雷本丁克尔 洋葱配青豆和肉排

席尔格 梭鲈和角鲨鱼片

新主厨 维也纳风味鹌鹑肉奶油烤菜配帕尔马干酪配烤云雀

结果，弗里德里希在这些推荐菜单上划了条直线，并且亲手用自己独特的法语写上替代菜肴：

婆罗门参汤

松鸡翅配洋蓍和豌豆

罗马式糕点

云雀

英式小牛肉排

为了把食物冲下肚子，有无限量的摩泽尔酒和庞塔克酒，这是一种口味较轻的红葡萄酒，可供他的客人享用，尽管他自己更喜欢掺了水的贝尔热拉克酒。¹⁰⁰

至少在饮食方面，弗里德里希是领先时代的。他非常喜欢吃水果，并且在无忧宫的花园里建了许多昂贵的温室来满足自己的口味。在他统治期间，他可能为此花费了50多万塔勒。¹⁰¹ 品种有橙子、柠檬、甜瓜、无花果、杏子、香蕉、桃子、樱桃、桑葚、石榴、青梅、李子、草莓、菠萝、葡萄、木瓜、核桃、杏仁和许多种类的蔬菜，特别是芦笋，这些全部是由一群园丁种植的，通常都是种在加热的温室里。¹⁰² 有商业头脑的果蔬种植者搬到了波茨坦地区，利用弗里德里希愿意为反季节水果支付高价的意愿挣钱。虽然这听起来几乎不可信，但王室账目显示，弗里德里希购买早上市的樱桃的价格每个超过1塔勒。¹⁰³ 1761年，也就是在七年战争中，一个特殊的温室建了起来，用来种植香蕉，由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园丁负责栽培。¹⁰⁴

王家厨房还负责为弗里德里希的爱犬准备食物，它们真的像国王一样生活，即使说不上“像斗鸡一样生活”^⑦的话。国王喜欢狗并不奇怪，但把它们当作同伴而不是打猎的助手来珍视，肯定是很奇怪的。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与喜欢打猎的父亲完全不同。¹⁰⁵ 1740年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他把自己的猎狗送给了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叹息说自己再也不能打猎了，他担心弗里德里希永远也不会喜欢上打猎。¹⁰⁶ 如果他活的时间足够长，能够

读到他儿子的论文《反马基雅维利》的话，这本书就会证实他的怀疑，因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对狩猎的强烈谴责。弗里德里希写道，这是一种反智的、残酷的浪费时间的行为，只有粗野的人才喜欢它，而像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博罗公爵和欧根亲王这样伟大的军事英雄却拒绝它。¹⁰⁷ 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狗不是为了其力量和体力而饲养的强壮猎犬，而是小体形的意大利小灰狗或惠比特犬，它们综合了优雅、精致和教养。¹⁰⁸ 其中有三四只是他的忠实伙伴，他们可以在王家套房里自由活动，并在主人外出骑马或散步时陪伴着他。为了从英国获得最好的品种，他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外交官托马斯·维利尔斯于1747年在给阿尔加罗蒂的信中写道：

意大利灰狗的任务并没有因为难以处理而被放弃。这种狗非常稀有，非常受欢迎。我不会错过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机会，但我恐怕必须等待下一代。除了女士们，很少有其他人有，也不能指望她们会放弃适合她们的小狗。¹⁰⁹

维利尔斯坚持不懈，最终成功了。现在这只最受宠的狗和弗里德里希一起坐在沙发上，吃饭时躺在桌子下面，晚上和他同床共枕，由一个专门的侍者照顾，根据命令，侍者称呼这条狗的时候，要使用正式的“您”（而不是更为亲切的“你”）。¹¹⁰ 据他的医生齐默尔曼说，弗里德里希1785年在西里西亚进行军事检阅时，每天让人从无忧宫派一个信使，向他报告一只生病的狗的健康状况。齐默尔曼补充道：“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只小动物已经死了并被埋葬了，他就让人把它挖出来，让他能再次看到它；他一整天都闭门不出，像个孩子一样为它哭泣。”¹¹¹ 对一只受喜爱的狗的终极嘉奖是被埋葬在无忧宫的露台上，就在弗里德里希为自己的坟墓所划定的地点旁边（尽管直到1991年他的尸体才与他的爱犬随从们团聚）。在弗里德里希的喜爱方面，它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他最喜欢的马，1777年从英国买来的一匹灰色骗马，以路易十四的元帅

的名字命名为孔代，弗里德里希对它给予了同样的关爱。¹¹²

老年

弗里德里希多年来一直希望和他的爱犬们一起长眠在它们的地下墓穴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1745年，32岁的他写道，他不指望自己能再活12年以上。在他于2年后遭受同时代人认为是轻微中风的痛苦时，这一预言看起来并不很愚蠢。¹¹³那一次，他写道：“我再一次逃离了冥王的国度，但我距离冥河只有一站之遥，听到了刻耳柏洛斯^⑧的嚎叫。”¹¹⁴1758年，他告诉他的秘书亨利·德·卡特，他只剩下5年了，他说：“我老了。我老了。”¹¹⁵他喜欢怀着忧郁的快乐写信给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不可阻挡的身体衰败已经过早地将他变成了一个老朽之人。毫不奇怪，最沮丧的叙述是在七年战争的军事失败时期写的。1759年10月，也就是库讷斯多夫的灾难发生后不久，弗里德里希对达尔让斯侯爵说：“如果你再次见到我，你会发现我老了很多。我的头发变白了，我的牙齿也掉了，我无疑很快就会胡言乱语了。”¹¹⁶他还对他母亲的老朋友卡马斯伯爵夫人说，他脸上的皱纹和女人衣服上的褶皱一样深，他的背像弓一样弯曲，他像一个特拉普派的苦行僧一样悲伤和沮丧。¹¹⁷

事实证明，弗里德里希还有超过25年的寿命。他在74岁时去世，按当时的标准，活到这个年龄已经很令人钦佩了。像其他许多长寿的老兵一样，他不断地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对他来说，这并非不合理，因为他反复遭受腹绞痛、胃痉挛、偏头痛、皮疹、丹毒、腿部溃烂、痛风、抽筋、哮喘、窒息、呕吐、便秘、胸痛、发烧、水肿和痔疮的困扰，而且常常是以上的几种毛病同时发作。¹¹⁸这些症状表明，他很可能遗传了使他父亲的生活非常痛苦的卟啉症。¹¹⁹痛风（通常伴随着高烧），是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因为疼痛往往严重到他不得不卧床休息。他在1775年底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写道：“痛风把我捆绑起来折磨了4

个星期，痛风在双脚、双膝、双手肆意发作，在双肘也如此。目前，发烧和疼痛已经消退，我只感到非常疲惫。”¹²⁰ 痔疮是另一种经常发作的疾病，这激发伏尔泰在1751年写出了一首有趣的诗：

我希望您王者之躯

上面的痔疮

可以停止打扰您的休息。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

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说，我的英雄的屁股

跟他的头脑一样好？¹²¹

随着弗里德里希进入他人生的第七个十年，他的身体状况自然地恶化了。这并没有阻止他踏上视察之旅，也没有阻止他享受生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流行的弗里德里希的形象，都是“老弗里茨”，一个早衰、苦恼、孤独又厌世的人。¹²² 他怀有最深感情的人（凯泽林克、罗滕堡、弗雷德斯多夫、若尔丹、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威廉明妮）无疑绝大多数都已经过世。他还比约翰·约阿希姆·匡茨（1773年去世）、海因里希·奥古斯特·德·拉·莫特-富凯（1774年去世）、查理·泰奥菲勒·吉夏尔（别名昆图斯·伊启里乌斯，1775年去世）和基恩元帅（1778年去世）都长寿。最后一位，詹姆士二世党人马歇尔伯爵的去世，对他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这位单身汉被弗里德里希安置在无忧宫花园边上的一座别墅里，有一个被称为“兽群”的异域人士组成的随从队伍，包括一个西藏人、一个卡尔梅克人和一个摩尔人。¹²³ 他每天都会去看望弗里德里希，至少在他变得过于虚弱之前都是如此，随后变成弗里德里希去拜访他。¹²⁴ 除了这些偶然的损失，还应该加上被弗里德里希的剥削行为赶走的朋友。阿尔加罗蒂，1742年离开，1747年返回，1753年再次离开；

达尔热，1752年离开；达尔让斯，1765年离开，1766年又被迫返回，以逃避法国更多的迫害，最后在1768年离开。¹²⁵ 弗里德里希对达尔让斯恶毒的临别赠言是：“我一直认为君主们在这个世界上只会创造忘恩负义者，你强化了我这个观点。”¹²⁶ 在某种程度上，伏尔泰也必须被加入这个名单。因此，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在晚年经历了孤独，那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事实上，吉罗拉莫·卢凯西尼侯爵的日记显示，在无忧宫里可能持续5到6个小时的进餐时间仍然是欢乐的。1779年，28岁的卢凯西尼来到弗里德里希身边，成了他的内宫侍臣，根据德尼纳神父的说法卢凯西尼也是弗里德里希交谈最多的人。¹²⁷

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弗里德里希可能会要求苛刻，不体谅人，脾气糟糕。由于他也是国王，他的暴躁自然使离他最近的随从人员的生活变得艰难。至少他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能认识到自己无法阻止能力的日渐衰退。在他去世前10年，他建议达朗贝尔以哲学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健康问题：“我们脆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它们的衰退逐渐让我们为肉体的完全消失做好准备。我的痛风向你的风湿病致以问候。”¹²⁸ 1776年早些时候，他抱怨耳朵里有脓肿，然后说道：“大自然给了我们疾病和痛苦，让我们对此生不再抱有幻想，我们最终是不得不离开它的，我很清楚这一点，并且听天由命。”¹²⁹ 所以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一点：“因为我的痛风只在脚上发作，而不是在头上，亲爱的达朗贝尔，所以这并不能阻止我保留一些我以前快乐的痕迹。”¹³⁰ 他声称，放荡不羁的诗人纪尧姆·阿姆菲耶·德·肖利厄（1639—1720）提出了关于衰老的最好建议：

就这样，没有悲伤，没有沮丧，

我感到缓慢又致命的毒药结束了我的日子。

然而，我还是沿着这条留给我的小路

撒了些花。¹³¹

自从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以来，他把自己的身体潜力用到了极限。他宣扬尽职尽责的美德，并身体力行。3次西里西亚战争的严酷已经对他的身心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尽管这是他自己招致的。然而，他继续把身体往极限上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例如，1780年6月13日，弗里德里希在东部省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艰苦考察后，于凌晨3点离开奥得河畔的屈斯特林。在6小时内赶了大约100千米的路后，弗里德里希在9点30分回到了无忧宫的办公桌前，然后在餐桌上待了三个半小时，“就好像他那天什么都没做似的，精神焕发，心情愉快”。¹³²直到1785年，周期性的疾病发作才合并成了最终的衰退。弗里德里希像往常一样去西里西亚参加军事演习，但8月24日这天，在倾盆大雨中骑了6个小时的马之后，他因高烧躺在了床上。第二天，他又起来了，一个月后被中风击倒，无法参加秋天的演习。1785—1786年的冬天，他在波茨坦城市宫度过，他行动艰难，出现了水肿的症状。¹³³4月17日，他回到无忧宫，仍然早起并努力工作，但呼吸困难导致他不能再躺下来，不得不在扶手椅上过夜。7月4日，他骑着最喜欢的灰马孔代走了45分钟，这让他筋疲力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法国准将，德·图龙若侯爵，前来无忧宫拜访。当他在露台上看到自己的“非凡的英雄”时，他几乎激动得晕倒了，胸中激荡着“神圣的尊敬”之情。¹³⁴在丹尼尔·霍多维茨基的笔下，垂暮的国王坐在扶手椅上注视着窗外的花园，他的狗在他周围嬉戏，这后来成了弗里德里希标志性的形象。

注释

1 Jules Finot and Roger Galmiche-Bouvier (eds.), *Une mission militaire en Prusse en 1786. Récit d'un voyage en Allemagne et observations sur les manœuvres de Potsdam et de Magdebourg. Publiés après les papiers du marquis de Toulangeon* (Paris, 1881), p. 128.

2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 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50.

3 John Adamson, “The Making of the Ancien-Régime Court 1500–1700,” in idem, *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 Ritual, Politics and Culture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1500–1750* (London, 1999), pp. 7–41. Markus Völkel写的关于普鲁士的一章结束于1740年，不过实际上还有两页关于弗里德里希的论述，在第228—229页，标题是“军事宫廷”。这样的处理很能说明问题。

4 Koser, vol. 1, p. 527.

5 Dietrich, p. 330.

6 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 “Offensive Formlosigkeit? Der Stilwandel des diplomatischen Zeremoniells,” in Sösemann, vol. 1, p. 354.

7 H. M.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1756–1775* (Cambridge, 2001), pp. 143–5.

8 Quoted in Thomas Biskup, “Preussischer Pomp. Zeremoniellnutzung und Ruhmbegriff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m Berliner ‘Carousel’ von 1750,”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er Hof. Beiträge des zwei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10./11. Oktober 2008*, ed.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Friedrich300 – Colloquien, 2),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hof/Biskup_Pomp, p. 5.

9 Reinhold Koser, “Vom Berliner Hof um 1750,” *Hohenzollern-Jahrbuch*, 7 (1903), p. 17.

10 Adamson, “The Mak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 Court 1500–1700,” p. 24.

11 A. P. Hagemann, “Der König, die Königin und der preussische Hof,”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er Hof*,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hof/Hagemann_Zeitung.

12 Martin Engel, *Das Forum Fridericianum und die monumentalen Residenzplätze des 18. Jahrhunderts* (unpublished Free University Berlin dissertation, 2001), p. 7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diss.fu-berlin.de/diss/receive/FUDISS_thesis_000000001297.

13 Hagemann, “Der König, die Königin und der preussische Hof,” p. 31.

14 Ibid., pp. 27, 32.

15 Thomas Biskup,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111.

16 Thomas Biskup, “The Hidden Queen: Elizabeth Christine of Prussia and Hohenzollern Queenship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larissa Campbell Orr (ed.), *Queenship in Europe, 1660–1815: The Role of the Consort* (Cambridge, 2004), pp. 307–8.

17 Lehndorff, *passim*. 以下书中有一个好的选本: Haug von Kuenheim (ed.),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ndorff* (Berlin, 1982)。

18 Biskup,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p. 109.

19 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277.

20 Thomas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Inszenierungen des Preussenkönigs in Fest und Zeremoniell 1740–1815*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2012), p. 81.

21 Thomas Biskup, “Preussischer Pomp.” 正如Biskup 所说, 活动的华丽场面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一世的“亚洲式的豪华排场”, 而这是他的孙子在《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严厉谴责的。关于路易十四的骑士竞技表演, 可参看以下书中的叙述: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1992), pp. 66–7.

22 *Historische Nachricht von denen Lustbarkeiten, welche der König, bei Gelegenheit der Ankunft Sr. Königlichen Hoheit und des Durchlauchtigsten Markgrafen von Brandenburg-Bayreuth, im Monate August, 1750, zu Potsdam, zu Charlottenburg und zu Berlin angestellt et hat* (Berlin, 1750). 这一活动也获得了传奇般的地位, 为阿道夫·门采尔一幅描绘颁奖的画提供了灵感。2012年, 马术表演“无忧宫的骑士竞技表演”在新宫外举行, 是弗里德里希诞辰3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23 Quoted in Biskup, “Preussischer Pomp,” p. 27.

24 Ibid., p. 28.

25 Ibid.

26 Thomas Biskup, “Höfisches Retablissement: Der Hof Friedrichs des Grossen nach 1763,”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perspektivische Bestandsaufnahme. Beiträge des ers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28./29. September 2007*, ed.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Friedrich300 – Colloquien 1),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bestandsaufnahme/biskup_retablissement, p. 36.

27 Koser, vol. 2, p. 519. 关于此时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 可参见詹姆斯·哈里斯的记载, 见于Earl of Malmesbury (ed.),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 1 (London, 1844), 例如p. 150上关于1776年7月27日的记载, 以及Henriette Graf, “Das Neue Palais – Funktion und Disposition der Appartements,” in *Friedrichsriego, Ausstellung*, p. 295.

28 Biskup, “Höfisches Retablissement,” especially pp. 12, 18, 22, 26.

29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p. 46.

- 30 Graf, “Das Neue Palais – Funktion und Disposition der Appartements,” p. 294.
- 31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pp. 109–10.
- 32 Lehndorff, vol. 1, pp. 131–2.
- 33 Ibid., p. 132.
- 34 Henri Zosime, Comte de Valori (ed.), *Mémoires des négociations du marquis de Valori,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a Cour de Berlin. Accompagnés d’un recueil de lettres de Frédéric-le-Grand, des princes ses frères, de Voltaire, et des plus illustres personnages du XVI^e siècle* (Paris, 1820), vol. 1, p. 266.
- 35 Dietrich, p. 316.
- 36 Peter Loewenberg, “Psycho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 2 (June 1975), pp. 234–5.
- 37 Eva Zieburg, *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ssen* (Berlin, 2006), pp. 8–9.
- 38 *Œuvres*, vol. 26, p. 162.
- 39 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 67.
- 40 Lehndorff, vol. 1, p. 70.
- 41 Ibid., p. 128.
- 42 Ibid., p. 77. See also, Gerd Fesser, “Der König von Rheinsberg,” *Die Zeit*, 32 (2002), http://www.zeit.de/2002/32/Der_Koenig_von_Rheinsberg?page=all.
- 43 *Œuvres*, vol. 26, pp. 175–9. 这些信只标明了年代“1746年”，没有具体日期。
- 44 Ibid., p. 180.
- 45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4), vol. 1: *Jugendbriefe 1728–1740*, p. 209;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rinz Heinrich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Doppelporträt* (Stuttgart, 1996), pp. 73–4.
- 46 Lothar Schilling, *Kaunitz und das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Studien zur aussenpolitischen Konzeption Wenzel Antons von Kaunitz* (Berlin 1994), p. 96.
- 47 Koser, vol. 2, p. 100.
- 48 Alfred Ritter von Arneth, *Geschichte Maria Theresias* (Vienna, 1863–79), vol. 5, pp. 198 and n. 264 on p. 502.

49 Andrew Bisset (ed.), *Memoirs and Papers of Sir Andrew Mitchell K.B.* (London, 1850), vol. 1, p. 110.

50 P.C., vol. 18, p. 696.

51 Otto Herrmann,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seines Bruders Heinrich,”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26 (1931), pp. 365–76.

52 Gustav Berthold Volz, “Prinz Heinrich als Kritik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27 (1932), p. 393.

53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 84.

54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p. 63–5.

55 Ibid., p. 143.

56 Ibid., p. 105.

57 可参见一位目击者的详细叙述，他是弗里德里希的私人秘书亨利·德·卡特——Willy Schüssl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Gespräche mit Henri de Catt* (Munich, 1981), p. 285–91。

58 Ingeborg Weber-Kellermann (e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Eine preussische Königs tochter* (Frankfurt am Main, 1990), p. 432.

59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2, pp. 74–7, 94.

60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p. 169, 207.

61 Daniel Schönplüg,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Ehe stifter. Matrimoniale Strategien im H aus Hohenzollern 1740–1786,”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81.

62 Karin Feuerstein-Prasser, *Die preussischen Königinnen* (Regensburg, 2000), pp. 203–5.

63 Lehndorff, vol. 2, p. 395.

64 Ibid., p. 399.

65 René de Bouillé, *Essai sur la vie du Marquis de Bouillé* (Paris, 1853), p. 138. ‘另见以下文章中哈登贝格的评论：Thomas Stamm-Kuhlmann, “Vom rebellischen Sohn zum Landesvater. Der Herrscher zwischen Familie und Staat,” in *Sösemann*, vol. 1, p. 19。

66 Alfred P. Hagemann, “Friedrich und sein Nachfolger – déjà vu eines Traumas,”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30.

67 Ibid., p. 232.

68 Ibid., p. 230.

69 Ibid., p. 232.

70 Karoline Zielosko, “Die Dynastie als Ressource. Friedrich als Oberhaupt der brandenburgischen Hohenzollern,”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80.

71 我讨论了1787年普鲁士对荷兰共和国的成功入侵及其后果，可参见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London, 1986), pp. 49–51。

72 Wilhelm Bringmann, *Preussen unter Friedrich Wilhelm II. (1786–1797)* (Frankfurt am Main, 2001), pp. 100–101.

73 Gregor Vogt-Spira, “Das antike Rom im geistigen Haushalt eines Königs,” in Sösemann, vol. 1, pp. 128–9.

74 Biskup,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p. 102.

75 Dieudonné Thiébault, *Mes Souvenirs de vingt ans de séjour à Berlin; ou Frédéric le Grand, sa famille, sa cour, son gouvernement, son académie, ses écoles, et ses amis littéraires et philosophes*, 4th edn (Paris, 1813), vol. 1, pp. 7–8.

76 Theodore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Geneva, 1956), vol. 18, pp. 131, 188.

77 Ibid., p. 209.

78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424.

79 Lehndorff, vol. 1, p. 129; *The Memoirs of Casanova*, vol. 5 – <http://romance-books.classic-literature.co.uk/memoirs-of-jacques-casanova/volume-5e-russia-and-poland/ebook-page-48.asp>; 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m Spiegel seiner Zeit* (Berlin, 1901), vol. 1, p. 271.

80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118.

81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p. 128. 以下书中有很多关于里希特的信息，但可惜没有关于这部作品的任何内容：Leslie Bodi, *Tauwetter in Wien. Zur Prosa der österreichischen Aufklärung 1781–1795* (Frankfurt am Main, 1977)。

82 Jacqueline Hellegouarc’h (ed.),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a vie de M. de Voltaire, écrits par lui-même* (Paris, 2011), p. 124. 编者坚持认为这本之前有争议的作品是真实的。

83 Ibid., p. 10.

84 完整文本参见*Œuvres*, vol. 11。有一个现代的带评论的注释版本——Jürgen Ziechmann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Das Palladion* (Bremen, 1985)。还有一个方便实用的德文摘要——E. Cauer, “Über das Palladion, ein komisches Heldengedich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Zeitschrift für preussische Geschichte und Landeskunde*, 3 (1866), pp. 484–99。

85 *Œuvres*, vol. 11, pp. 244–5. 在1849年的这个官方版本中，“耶稣”和“约翰”都被换成了两个点。See also Fritz J. Raddatz, “‘... die Erde freimütig zu kritisieren.’ Zum 200. Todestag Friedrichs II. erschien sein frivol-gotteslästerliches *Palladion*,” *Die Zeit*, 34 (1986). 弗里德里希还有一部对基督徒、尤其是其中的天主教徒极具攻击性的作品《蓬帕杜夫人和圣母玛利亚这两位死者的对话》。在作品中，前者嘲笑后者是一个滥交的妓女，其被钉死的儿子是由木匠或罗马士兵生的——Gerhard Knoll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Totengespräch zwischen Madame de Pompadour und der Jungfrau Maria* (Berlin, 1999), p. 16. See also Jean Delinière,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Totengespräch zwischen Madame de Pompadour und der Jungfrau Maria,”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323, January–March 2001, online since 6 April 2004, accessed on 4 November 2014, <http://ahrf.revues.org/1043>。

86 Ziechmann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Das Palladion*, vol. 2, p. 67. 诗体书信见于*Œuvres*, vol. 10, pp. 238–49。

87 Winfried Baer, *Prunk-Tabatièr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Munich, 1993), p. 1. 我很感谢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Richard Edgcumbe博士提醒我注意这部重要的著作。

88 Nina Simone Schepkowski, *Johann Ernst Gotzkowsky. Kunstagent und Gemäldesammler im friderizianischen Berlin* (Berlin, 2009), p. 22; Carsten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Sammlungen und Kabinette als Schnittstellen einer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Söseman, vol. 1, p. 311; Baer, *Prunk-Tabatièr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

89 Hahn, *Friedrich II.*, p. 161. Baer, *Prunk-Tabatièr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

90 Carlyle, vol. 4, p. 279; Baer, *Prunk-Tabatièr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12.

91 Earl of Malmesbury (ed.),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 1, p. 6.

92 Baer, *Prunk-Tabatière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6.

93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422.

94 Ibid., p. 427.

95 Frank Althoff, “Die Arbeit im Kabinett,” in Frank Althoff and Eef Overgaauw (eds.), *Homme de lettres. Frédéric. Der König am Schreibtisch* (Berlin, 2012), pp. 23–5.

96 参见以下书中总结的奥地利公使约瑟夫·弗里德里希·冯·里德的描述：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 46。以下书中讨论了一些变化：Ute Christina Koch,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p. 312–21。

97 关于对弗里德里希的饮食生活的全面讨论，可参见Bernd Maether, “Kochen für den König. Der friderizianische Hof im Spiegel der Speisezetteln und Hofrechnungen,”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er Hof. Beiträge des zwei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10./11. Oktober 2008*, ed.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Friedrich300 – Colloquien, 2),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hof/Maether_Kochen。

98 Abbé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Berlin, 1788), p. 400.

99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p. 356–7.

100 Ibid.

101 Gerd Schurig, “Die Blüte der Fruchtkultur im Sanssouci Friedrichs II.,”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60.

102 Ibid., pp. 56–61. Detlef Karg, “Die Gärten Friedrichs II. Anmerkungen zur Gartenkunst in der Mark Brandenburg,” in Erika Schmidt, Wilfried Hansmann and Jörg Gamer (eds.), *Garten. Kunstkammer. 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Dieter Hennebo zum 70. Geburtstag* (Worms am Rhein, 1994), pp. 110–11.

103 Schurig, “Die Blüte der Fruchtkultur im Sanssouci Friedrichs II.,” p. 61.

104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 355;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p. 400.

105 对于狩猎，他唯一一段热情的评论写于1732—1733年，那时他试图重获父亲的欢心——Mario Huth, “[...] denn gegenwärtig siehet es in den hiesigen Heyden etwas lüderlich aus.’ Forstliche Theorie und Praxis in Brandenburg-Preussen unter Friedrich II. – archivalische Stichproben,” in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267。

106 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214.

107 Charles Fleischauer (ed.), *L’Anti-Machiavel par Frédéric II, édition critiqu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5 (Geneva, 1958), pp. 254–9.

108 Ulrich Feldhahn, “Die stillen Teilhaber der Macht –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Hunde,” in Althoff and Overgaauw (eds.), *Homme de lettres. Frédéric*, pp. 129–33. 由于狗的品种直到下个世纪才被正式定义，所以不可能准确地对弗里德里希的狗进行分类。

。

109 John Murray Archive, 50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box. 1.

110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1, pp. 414–15.

111 *Doctor Zimmermann'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Late King of Prussia, When He Attended Him in His Last Illness a Little Before his Death* (London, 1791), p. 129.

112 Nadja Geissler, “Condé,”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337.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对孔代很好，让它在柏林兽医学校度过了余生，1804年它在那里去世，享年38岁。它的骨骼在柏林自由大学兽医解剖学研究所展出。

113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 74. 事实上，这可能不是中风，而是神经末梢的神经炎或神经病——Ida Macalpine and Richard Hunter, *George III and the Mad-Business* (London, 1969), p. 247。

114 Quoted in *ibid.*, p. 252.

115 Paul Hartig (ed.), *Henri de Catt, Vorles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Die Tagebücher 1758–60* (Munich and Berlin, 1986), p. 74.

116 *Œuvres*, vol. 19, p. 105.

117 Koser, vol. 2, p. 285.

118 Walther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Absolutism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75), p. 124; Eva Zieburg, *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ssen* (Berlin, 2006), p. 90; Hans-Uwe Lamm, “Philosophen, Leibärzte, Charlatane. Von königlichen Hämorrhoiden und anderen Malaisen,” in Sösemann, vol. 1, pp. 52–67.

119 Macalpine and Hunter, *George III and the Mad-Business*, p. 253.

120 *Œuvres*, vol. 23, p. 401. Translation taken from Macalpine and Hunter, *George III and the Mad-Business*, p. 253.

121 *Œuvres*, vol. 22, p. 322.

122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p. 221. 类似的论断参见 Fritz Hartung, “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ol. 3, p. 1513。

123 Thomas Biskup and Peter H. Wilson, “Grossbritannien, Amerika und die atlantische Welt,”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153. 卡尔梅克人是“生活在里海西北海岸的一个蒙古民族的成员”。

124 Koser, vol. 2, p. 347. See also Edward M. Furgol, “Keith, George, styled tenth Earl Marischal (1692/3?–1778),”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May 2006,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15265>. Accessed 13 October 2014.

125 Jürgen Luh, “Freundschaften? – Verhältnisse. Friedrich und seine Vertrauten,” in *Friedrich der Große, Ausstellung*, pp. 336–8.

126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pp. 212–16.

127 Denina, *Essai sur le règne de Frédéric II*, p. 354. 另请参阅伦道夫伯爵的日记，以获取与弗里德里希在1763年后成为厌世者的观点相矛盾的证据。

128 *Œuvres*, vol. 25, p. 43.

129 *Ibid.*, p. 62.

130 *Ibid.*, p. 166. 这封信的日期是1780年5月1日。

131 *Ibid.*, p. 91. 最后两行被Koser, vol. 2, p. 652引用了。

132 Friedrich von Oppeln-Bronikowski and Gustav Berthold Volz (eds.), *Das Tagebuch des Marchese Lucchesini (1780–1782). Gespräche mit Friedrich dem Grossen* (Munich, 1926), p. 22.

133 Koser, vol. 2, p. 653.

134 Finot and Galmiche-Bouvier (eds.), *Une mission militaire en Prusse en 1786*, pp. 130–31.

-
- ① 《牛津英语词典》将“骑士竞技表演（carousel）”定义为“一种由骑士们参与的比赛，将骑士们分为小队（四对），以其制服和服装为区分，参加各种戏剧和练习；其中经常增加战车比赛、其他表演和娱乐活动”。——作者注
- ② 法厄同（Phaeton），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私生子，因驾驶父亲的马车失控导致发生灾难，被宙斯以闪电打落马车，此处指弗里德里希。
- ③ 夏尔·夸波·达苏西（1605—1677），放荡的恋童癖同性恋者，可能是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的情人。——作者注
- ④ 在古希腊，帕福斯是崇拜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宗教中心，有传说称这位女神就是在附近的海域出生的。

- ⑤ 欧律阿罗斯和尼素斯是无忧宫友谊圣殿圆柱上的4个圆形饰物上描绘的4对同性恋人之一。——作者注
- ⑥ 兰萨库斯，祭祀普里阿普斯的中心，普里阿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男性生殖力之神。——作者注
- ⑦ 英语中“像斗鸡一样生活”意指生活奢华。
- ⑧ 希腊神话中看守冥府的狗。

结语 死亡与形象变化

1786年7月8日，抵达无忧宫的外交大臣赫茨贝格伯爵在写给留守柏林的同事芬肯施泰因伯爵的信件中，详细记录了这年夏天弗里德里希最后的日子。人们已经不抱希望了，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医疗队伍的人数减少了。7月11日，弗里德里希把齐默尔曼医生送回了家。他上个月把齐默尔曼从汉诺威召唤过来，这暗示着他对他的私人医生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泽勒缺乏信心。尽管齐默尔曼的30次床边诊治花费了2000塔勒，但这位难以相处的患者认为，这最后的治疗是“无用的”。¹7月底，弗里德里希的病情急剧恶化，这是由消化系统的问题引起的。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已经非常痛苦，无法聆听他的私人秘书丹塔尔为他大声朗读，而这曾是他的每日例行日程。恰如其分的是，最后一次给他读到的正是伏尔泰的作品。²接下来的10天情况有所缓解。弗里德里希恢复了食欲，睡眠好了点，享受着一天两次与他的亲密圈子的相处，还处理了事务。但在8月12日，在宣布自己感到“重生”后，他陷入了深度睡眠。尽管弗里德里希最终从这次深度睡眠中苏醒过来，赫茨贝格还是记录道：“他仍在处理所有的事务，但处理它们时既不情愿又匆忙，而且因为他不得不强迫自己，他的思想没有完全集中在他正在读的东西上。”³3天过后，他仍然在清晨与秘书们一起工作，尽管他那歪歪扭扭的签名暴露出他越来越虚弱。他长期以来“工作直至倒下”的承诺，几乎完全实现了。8月16日，他从前厅召唤罗迪希将军进来，但他说不清自己

想表达什么，然后就睡着了。下午他又重新振作起来，最后一条命令是给他的狗找个垫子。一阵咳嗽发作缓解了一点儿痛苦，然后，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们翻过了山，现在我们的路会更容易走。”8月17日星期四，凌晨2点19分，他停止了呼吸。⁴几乎不需要补充说明，当时没有牧师在场。⁵他的妻子也不在场。不寻常的是，当天就制作了遗体面部模型，其原因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46年来，弗里德里希一直试图以一己之力统治普鲁士。如果说他对自己要求太多，那么他对仆人和臣民的要求也一样多，到处都是一样的。当把他们绑在劳动上的铁箍终于断了的时候，他们都有什么感觉？根据米拉波的说法，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如释重负。⁶不管其他方面会是什么样，下一个统治者肯定会比弗里德里希轻松。继承王位的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很可能是最感到如释重负的。41年来，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一直受到对他不满甚至可以说是鄙视的伯父非常严格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已经到了中年（1744年出生），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弥补过去的遗憾。

新国王将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个早期的迹象就是，他推翻了弗里德里希关于如何处置其遗体的严格指示。弗里德里希在1769年1月8日的最后一版遗嘱中坚定地说：

我欣然地，不带任何抱怨地将生命之气息还给好心把它赋予我的仁慈自然，并将我的身体返还给造就它的元素。我过着哲人的生活，也希望像一个哲人一样被埋葬，不要任何华丽壮观的排场和仪式。我不希望被解剖或遭防腐处理。我将被安葬在无忧宫的顶层露台上，我已经在那里建造好了墓穴。⁷

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有下令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但他的确根据1740年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举行的仪式，组织了一系列宏伟的葬

礼活动。在弗里德里希去世的那天晚上，他的尸体覆盖着第一警卫营的制服，由8匹马拉着的灵车载着，被转移到了波茨坦城市宫。⁸ 在供人瞻仰后，第二天（8月18日），遗体被移到了驻军教堂的墓穴里，放在一口朴素的锡铅合金棺材里，旁边就是他父亲的棺材。⁹ 与此同时，一个由建筑师和艺术家匆忙集合而成的团队在城市宫内建造了一套哀悼室，墙上覆盖着紫色和黑色的布料。觐见室里放着一个空的仪式性棺材，棺材“用银色布料装饰得很华丽，镶着金子”。¹⁰ 棺材上面放着弗里德里希的剑、黑鹰勋章的肩带、金马刺和元帅的指挥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约有6万名公众前来瞻仰，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¹¹

弗里德里希还会更加憎恶他的继任者强加的宗教因素。8月底，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宣布所有在普鲁士举行的追悼会都将使用《旧约》中的一句经文：“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历代志上17：8）¹² 9月9日，国葬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弗里德里希的遗体将一直躺在那里，直到1943年盟军的轰炸加剧，它被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后来美国士兵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钾盐矿中发现了它，先将它转移到马堡的一个教堂，然后转移到了多瑙河上游锡格马林根的霍亨索伦城堡。直到1991年8月17日，弗里德里希的愿望才最终实现，和他的爱犬一起埋葬在无忧宫。霍亨索伦家族的代理人约伯·费迪南德·冯·施特兰茨明显绷着脸，证明了弗里德里希遗骨漫长的奥德赛之旅就应该在这里结束，因为他是“德国统一的象征”。¹³ 弗里德里希葬礼后的第二天，在柏林大教堂举行了一次追悼仪式，当时新任国王和所有王室成员都在场，包括弗里德里希的遗孀在内。宫廷牧师弗里德里希·塞缪尔·戈特弗里德·扎克发表了一篇恭维过度的悼词，但并没有试图假装死者是因虔诚而卓越不凡的。相反，他强调说，上帝与弗里德里希同在，是他的“保护者、帮助者、引导者和救世主”，这意味着无论弗里德里希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发生了。¹⁴

对弗里德里希的崇拜立刻开始了。商人们一拥而上，以满足对纪念

物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他的形象被复制到酒杯、钟表、手镯、丝带、鼻烟盒和万岁丝带上，也被复制到书籍、小册子、期刊和日历上。¹⁵也许这些人中最有创新精神的是帕格斯兄弟俩，他们从宫务大臣那里买了弗里德里希的衣服，穿在蜡像身上，然后在德意志、法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到处展示，一路发财。这尊蜡像如此贵重，他们拒绝了4000塔勒的报价。他们很快就真诚地被满足了，因为模仿者也急于赚钱。到19世纪初，有16尊弗里德里希的蜡像在柏林展出。¹⁶1796年，一家著名的德意志杂志《奢侈品与时尚杂志》报道了在贝伦斯街剧院上演的一场幻灯表演：

远处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它逐渐变大了，从中显露出一幅和本人非常相似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画像，穿着他通常穿的制服，以他通常的站姿站在那里……这一景象给观众的印象是惊人的。掌声和欢呼声没有停止。当弗里德里希开始退回星星里面时，许多人高喊：“哦，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当他真的消失的时候，人们喊着“再来一次！”，喊声如此热烈，他不得不再出来了两次。¹⁷

狂热的崇拜继续发展。1833年，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纪念馆馆长惊奇于“那些急于到这里来了解这位伟人的那些人似乎无法抑制的渴望……我每天都能看到各个年龄层、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参观者看到保存在这里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的珍贵纪念品后震惊的反应”。¹⁸令人欣慰的是，他被证明是一个异常千变万化的人，一个可以被用来反对反动派的启蒙之人，一个反对贵族的平等主义者，一个反对平民的军事英雄，一个反对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反对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等等。

弗里德里希的性格如此强势，以至于他在死后和在活着时一样容易

引起纷争。他死后变故多发的遭遇已经被人讲述过很多次，不需要在这里重复。¹⁹两个家庭成员的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用来说明他所引起的极端反应。没有哪个亲戚比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更加受益于弗里德里希的慷慨大度，海因里希亲王获得了巨额的收入、莱茵斯贝格宫和柏林的一座大型宫殿，在军队中担任最高指挥，并被委托执行几项重要的外交任务。然而，这种慷慨获得的回报只不过是强烈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和。弗里德里希死后4年，海因里希在莱茵斯贝格宫修建了一座大型方尖碑，其位置十分突出，任何人从宫殿望过湖都会注意到它。它的主要目的是纪念奥古斯特·威廉亲王，他是弗里德里希在1757年从波希米亚撤退后唾弃的弟弟。但它也意在为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弗里德里希提出更广泛的控诉。28枚奖章用来纪念其他英雄，他们的奉献、技能和勇气使普鲁士取得了成功，但弗里德里希在自己对战役的叙述中忽略了他们的功绩（“关于他们，他那本该死的回忆录什么也没说”，这是海因里希在给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将军的信中写的）。²⁰随附的铭文把功劳从总司令转给了下属。例如，对什未林元帅的颂词中有一部分是：“1741年4月10日，他赢得了莫尔维茨战役。”对冯·默伦多夫将军的颂词则是：“1760年，在托尔高，他占领了斯皮蒂兹高地，从而从敌人手中夺取了胜利。1762年，他以同样的方式占领了布克斯多夫上方的山丘后，迫使道恩元帅撤退。”普拉滕将军被认为在库讷斯多夫的灾难后恢复了秩序，并掩护了撤退。更微妙的是，对冯·齐滕将军的褒奖是“对那些以牺牲被征服的平民为代价而使自己富裕的人表示蔑视”。尽管弗里德里希从未被提及，但他显然是海因里希亲王愤怒的目标。²¹

海因里希亲王的极端反面是弗里德里希的遗孀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如果有哪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他的去世，那肯定是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最后一次亲眼见到丈夫是在1785年1月18日海因里希亲王的59岁生日聚会上。然而，据带来这条消息的拉齐维尔亲王夫人说，当她得知弗里德里希去世时，她变得“非常痛苦，她为国王哭泣，仿佛她

被他爱过一样！”²² 在寡居的10年里（她于1797年1月13日去世），她一直抱着单纯的爱纪念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感情，总是找借口来原谅他对她的行为，比如“虚伪的朋友”的影响，以及他身体不好，使得从波茨坦到柏林的旅行变得困难。她还继续收集着更多的弗里德里希肖像。早在1736年，她就写信给祖母，说她为能嫁给这么伟大的男人而感到骄傲，因为他的智慧、才智和正义感，他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君主。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最后。²³ 她始终虔诚，在年老时变得超乎寻常地虔诚，为那个时代撰写和出版了许多有教育意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只会引起她已故丈夫的嘲笑，但赢得了柏林平民的尊重和爱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波茨坦的放荡生活的态度即使不是厌恶的话，可能也是不屑一顾的。

“所有的政治生命，除非在中途一个快乐的时刻中断，否则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是政治和人类事务的本质。”伊诺克·鲍威尔在他创作的关于约瑟夫·张伯伦一生的书中如是写道。²⁴ 他认为，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家，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辞职，他们几乎总是在滑到艰难处境之前在位置上待得太久，但这同样适用于世袭的君主，尽管不那么明显。如果路易十四死在1688年甚至是1697年，他现在可能会拥有“大王”这个称号。如果拿破仑1809年在瓦格拉姆丧命^①，他也有资格获得超人的地位。在为数不多的死得恰逢其时的人中，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大王脱颖而出。就在后者死后一年，土耳其向俄国宣战，把东方问题推到了国际议程的首位，并开始了后来发展成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进程。在短期内，这带来了以牺牲波兰为代价的大规模领土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1年的统治时间里，普鲁士增加的领土比其前任46年统治期间增加的更多，虽然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挥霍遗产的懒惰纵欲者。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1806年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迎来了让人泪流满面的终结。争论弗里德里希应该为这场双重灾难承担多大责任并没有什么益处。然而，他去世时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遗留下的问题很多，他的两

位继任者要用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此外，除了这些问题，他们还继承了许多资产，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普鲁士人坚信，由于弗里德里希的成就，他们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自豪的国家。

正是拿破仑本人凸显了弗里德里希遗产的矛盾性。1806年10月15日，也就是他对普鲁士大胜的第五天，他的第五份军队公报宣布，罗斯巴赫50年的污点终于被洗刷了。一周以后他到达柏林，紧接着就参观了无忧宫和驻军教堂地下墓穴中的弗里德里希墓。他把弗里德里希的一批遗物——包括他的剑、雕像和绘画——运到了巴黎，在卢浮宫的圆形大厅里展出，并把这座大厅重新命名为“胜利大厅”，这些做法都体现了他对击败普鲁士一事的重视。²⁵ 当时，普鲁士本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对待，因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被剥夺了一半的领土，因巨额赔款而变得贫困，被占领的军队榨干了血汗。²⁶ 如果没有众多“自愿的普鲁士人”，特别是格奈泽瑙、沙恩霍斯特、哈登贝格和布吕歇尔参与，普鲁士制度，以及最重要的普鲁士观念的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自愿的普鲁士人”正是受到弗里德里希所倡导的风气的吸引，从德意志的其他邦国来到普鲁士的。正是这种转变，使得这个残缺的国家在1813—1815年动员了27.9万名士兵，动员的成年男性的比例（11%）高于任何其他参战国。²⁷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战斗方式表明，他们已经采用了法国大革命的军事手段，而且又将其发扬光大，“他们创新的种子已经存在于普鲁士的土壤中”，这促进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军事手段的运用。²⁸ 继续用这个园艺的比喻来结束吧：虽然1786年普鲁士的叶子看起来像老国王的身体一样枯萎，但这棵树扎根颇深，如果栽培得当，将会再次结出力量和文化的果实。

注释

1 Hans-Uwe Lammel, “Philosophen, Leibärzte, Charlatane. Von königlichen Hämorrhoiden und anderen Malaisen,” in Sösemann, vol. 1, pp. 33, 54.

2 Koser, vol. 2, p. 654.

3 Ibid.

4 Ibid., pp. 655–6.

5 在弗里德里希的最后时刻，在场的有卧室男仆施特吕茨基（他把弗里德里希扶坐在椅子上）、另外两个仆人、泽勒医生、赫茨贝格和冯·格尔茨将军——Karl Heinrich Siegfried Rödenbeck, *Tagebuch oder Geschichtskalender au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Regentenleben (1740–1786)* (Berlin, 1842), vol. 3, p. 365.

6 Koser, vol. 2, p. 657.

7 *Œuvres*, vol. 6, p. 243. 有一份德文译本，参见Otto Bardong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Ausgewä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eiherr vom Stein-Gedächtnisausgabe (Darmstadt, 1982), vol. 22, p. 454.

8 Carlyle, vol. 6, p. 697.

9 Friedrich Laske, *Die Trauerfeierlichkeiten für Friedrich den Grossen, mit Rekonstruktionen des Castrum Doloris im Stadtschloss und der Auszierung der Hof- und Garnisonskirche zu Potsdam am 9. September 1786* (Berlin, 1912), pp. 7–9. 这册对开本的书配有丰富的插图。

10 Comte de Mirabeau,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ourt of Berlin* (London, 1895), vol. 1, p. 146. 关于当时柏林的气氛，参见以下书中引用的报道：Johann-Wolfgang Schottländer (ed.), *Carl Friedrich Zelters Darstellungen seines Lebens* (Weimar, 1931), p. 176.

11 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 (Munich, 2004), p. 537; Eckhart Hellmuth, “The Funerals of the Prussian King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Michael Schaich (ed.), *Monarchy and Relig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yal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2007), pp. 464–6.

12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pp. 537–8. 至少，赖哈特和卢切西尼根据贺拉斯的一首颂歌谱写的葬礼康塔塔没有提到上帝，只提到了“奥林匹斯”。——Laske, *Die Trauerfeierlichkeiten*刊出了歌词的拉丁文原文和Ramler的德文翻译。

13 “Sarg und Asche,” *Der Spiegel*, 33 (199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13488171.html>. No author is listed.

14 *Gedächtnisspredigt auf den allerdurchlauchtigsten, grossmächtigsten König und Herrn Herrn Friederich den Zweyten, König von Preussen etc. etc.* (Berlin, 1786), p. xiv.

15 Eckhart Hellmuth, “Die ‘Wiedergebur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und der ‘Tod fürs Vaterland.’ Zum patrio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in Preusse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Aufklärung*, 10, 2 (1998), p. 27.

16 Eva Giloi, *Monarchy, Myth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750–1950* (Cambridge, 2011), p. 88. 这部极其有趣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17 Hellmuth, “Die ‘Wiedergebur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und der ‘Tod fürs Vaterland,’” p. 26.

18 Giloi, *Monarchy, Myth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p. 109.

19 简要的概述见Karl Erich Born, “Die Wirkungsgeschicht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ublished as an epilogue to Hans Leuschner, *Friedrich der Grosse. Zeit-Person-Wirkung* (Gütersloh, 1986), pp. 205–32。更全面的论述见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deutsche Nation: Geschichte als politisches Argument* (Stuttgart, 2007)。

20 Leo Amadeus Graf Henckel Donnersmarck (ed.), *Briefe der Brüd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an meine Grosseltern* (Berlin, 1877), p. 54. Also quoted in Giles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A Life in Deed and Letters* (New York, 1999), p. 385.

21 关于这些铭文的德语译文，可参见Theodor Fontane, *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 ed. Helmuth Nürnberger (Munich, 2006), vol. 1, pp. 283–91. See also,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preussischen Brüder. Prinz Heinrich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Doppelporträt* (Stuttgart, 1996), p. 173.

22 Karin Feuerstein-Prasser, “Ich bleibe zurück wie eine Gefangene.”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Regensburg, 2011), p. 106.

23 Alfred P. Hagemann, “Im Schatten des grossen Königs: Königin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Friedrich II.,” in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Beiträge des dritten Colloquiums in der Reihe “Friedrich300” vom 25./26. September 2009*, ed. Michael Kaiser and Jürgen Luh (Friedrich300 – Colloquien, 3),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esse/hagemann_schatten. Last accessed 6 August 2014.

24 Enoch Powell,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1977), p. 151.

25 Thomas Biskup, “Das Schwer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Universalhistorische ‘Grösse’ und monarchische Genealogie in der napoleonischen Symbolpolitik nach *Iéna*,” in Andreas Klinger, Hans-Werner Hahn and Georg Schmidt (eds.), *Das Jahr 1806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 Balance, Hegemonie und politische Kulturen* (Cologne and Weimar, 2008), pp. 185–204.

26 Rudolf Ibbeken, *Preussen 1807–1813. Staat und Volk als Idee und in Wirklichkeit* (Berlin, 1970), pp. 91–4.

27 Ibid., p. 398.

28 Peter Paret, *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1807–1815* (Princeton, 1966), p. 24
2.

① 拿破仑在1809年的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胜了奥军。

致谢

在某种程度上，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阅读和写作关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文字。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德国通史，特别是普鲁士历史无疑是剑桥历史学科的一大特色，以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和贝蒂·贝伦斯的讲座为开端。在几十年里，我欠了许多人情，尤其是对合作开设1740—1914年德国历史课程的众多同事，包括乔纳森·斯坦伯格、克里斯·克拉克、布伦丹·西姆斯、乔·惠利、尼尔·弗格森、巴里·尼斯贝特、尼古拉斯·博伊尔、麦肯·翁巴赫、理查德·埃文斯和伯恩哈德·富尔达。名单上的前三位还阅读了我完成的文本，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和尖锐的批评。我也从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友好环境中受益匪浅，这里的环境使得许多问题可以在午餐或晚餐时提出并得到回答。尤其要感谢艾玛·吉尔比帮助我解决了一些棘手的法语问题。像往常一样，德里克·比尔斯一直是鼓励和启发的源泉。我还要表示对理查德·埃奇库姆、奥利弗·考克斯、弗吉尼亚·默里、已故（且非常令人怀念）的哈根·舒尔策、乌韦·普什纳、哈密什·斯科特、彼得·威尔逊、海因茨·杜赫哈特、海因里希·迈尔、卡特琳·科尔、于尔根·卢、安德烈亚斯·佩查尔、克里斯托夫·福格特赫尔、詹姆斯·普伦和乔纳森·杰奥的感激之情。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位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和一位编辑西蒙·温德尔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很支持我，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评价，并且很有耐心。在我多年使用过的众多图书馆中，我特别感谢剑桥的西利历史图书馆

和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和雅典娜俱乐部图书馆、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柏林国家图书馆、慕尼黑州立图书馆以及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虽然我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的家人一直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缩略语

Œuvres: Œuvres de Frédéric le Grand, ed. J. D. E. Preuss, 30 vols. (Berlin, 1846–56) <http://friedrich.uni-trier.de/de/oeuvres/toc/>

P.C.: Politische Correspondenz Friedrich's des Grossen, ed. Johann Gustav Droysen et al, 46 vols. (Berlin, 1879–1939) <http://friedrich.uni-trier.de/de/politKorr/toc/>

Carlyle: Thomas Carlyle, *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 6 vols. (London, 1858–65)

Dietrich: Richard Dietrich (ed.), *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Cologne, 1986)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Jürgen Luh and Ullrich Sachse (eds.), *Friederisiko. Friedrich der Grosse. Die Ausstellung* (Munich, 2012)

Friederisiko, Essays: Jürgen Luh and Ullrich Sachse (eds.), *Friederisiko. Friedrich der Grosse. Die Essays* (Munich, 2012)

Hintze: Otto Hintze, *Die Hohenzollern und ihr Werk*, 8th edn (Berlin, 1916)

Koser: Reinhold Koser, *König Friedrich der Grosse*, 2 vols., 3rd edn (St

uttgart and Berlin, 1904)

Lehndorff: Karl Eduard Schmidt-Lötzen (ed.), *Dreissig Jahre am Ho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Reichs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ndorff, Kammerherrn der Königin Elisabeth Christine von Preussen*, 3 vols. (Gotha, 1907–13)

Sösemann: Bernd Sösemann and Gregor Vogt-Spira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Europa*, 2 vols. (Stuttgart, 2012)

出版后记

蒂莫西·布莱宁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这本书是他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一部精彩著作，出版后既赢得了普通读者的好评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可。

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不仅带领普鲁士从一个小邦跻身强国之列，在文化领域也有诸多创见。这位国王曲折的成长经历使他有着复杂多面的性格。他对君主自身局限的理解，以及宗教宽容的态度，更显示了其超越时代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21世纪阅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的演变很有教益。

编者始终追求能为读者提供完美的阅读体验，但面对这本厚重的历史著作仍感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还请读者指正。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后浪出版公司

2021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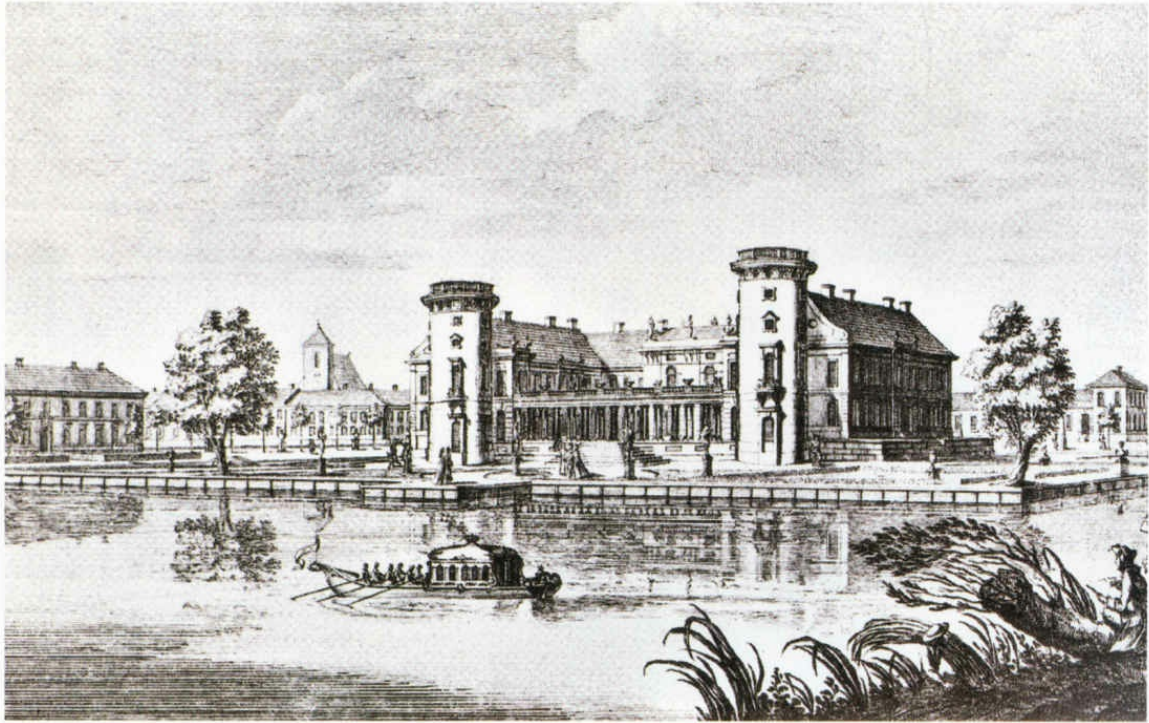
1. 弗里德里希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国王的自画像，他将练习绘画作为一种治疗的方式。这幅画是1737年的作品，上面写着“F.W.在痛苦中所绘”。



2.狩猎小屋武斯特豪森，在这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最开心的，而他儿子弗里德里希是最痛苦的。



3.1737年，25岁的弗里德里希（左一）和他的弟弟们：奥古斯特·费迪南德（生于1730年）、奥古斯特·威廉（生于1722年）和海因里希（生于172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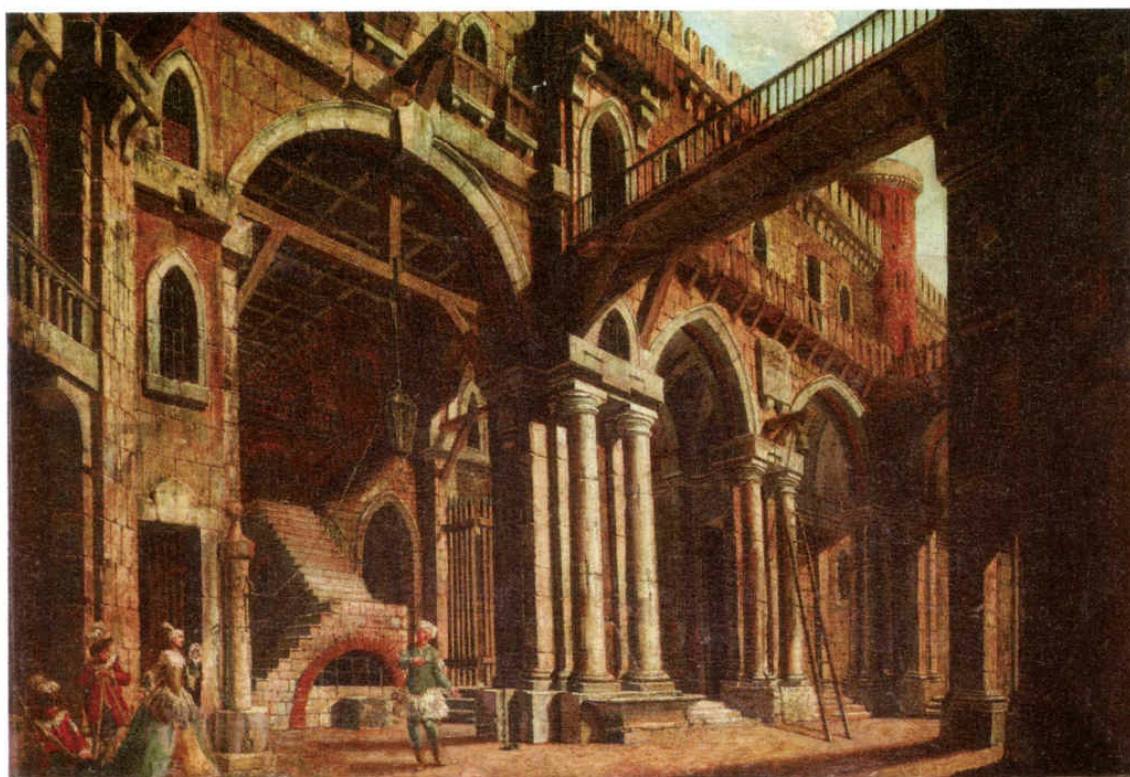
4.这幅1740年的版画展示了莱茵斯贝格的城堡，弗里德里希从1736年起一直到1740年即位前都住在这里。



5.申豪森宫，位于柏林郊区的一座朴素住宅，弗里德里希在即位后将这座城堡分配给了他的王后。



6. 弗朗切斯科·阿尔加罗蒂，威尼斯鉴赏家和文学家，他是一位双性恋。1739年，弗里德里希爱上了他，并在次年即位后，封他为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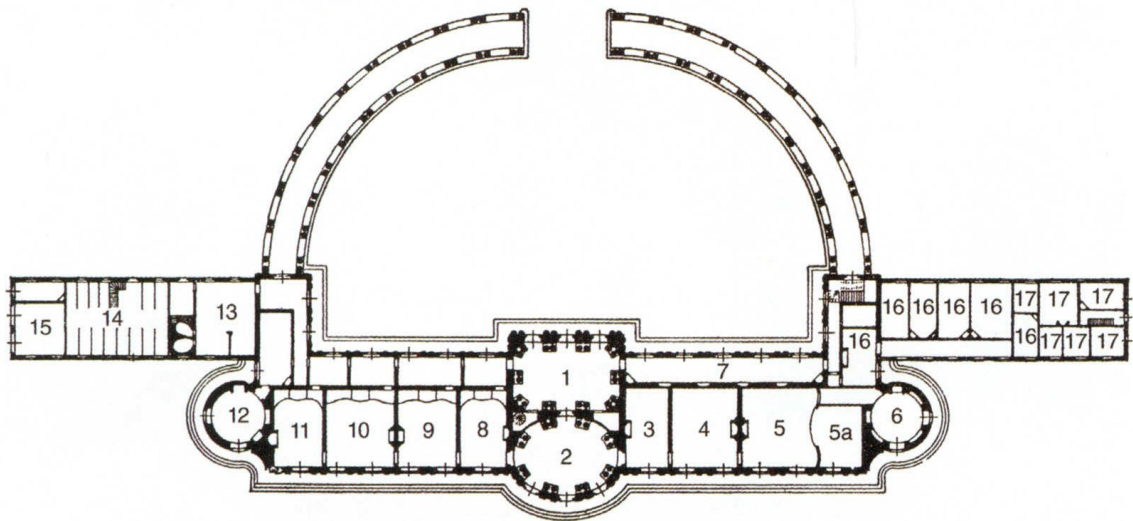
7.卡尔·弗里德里希·费希海姆为弗里德里希的歌剧《蒙特祖玛》第三幕设计的布景。



8.夏洛滕堡宫里的“金色大厅”，1746年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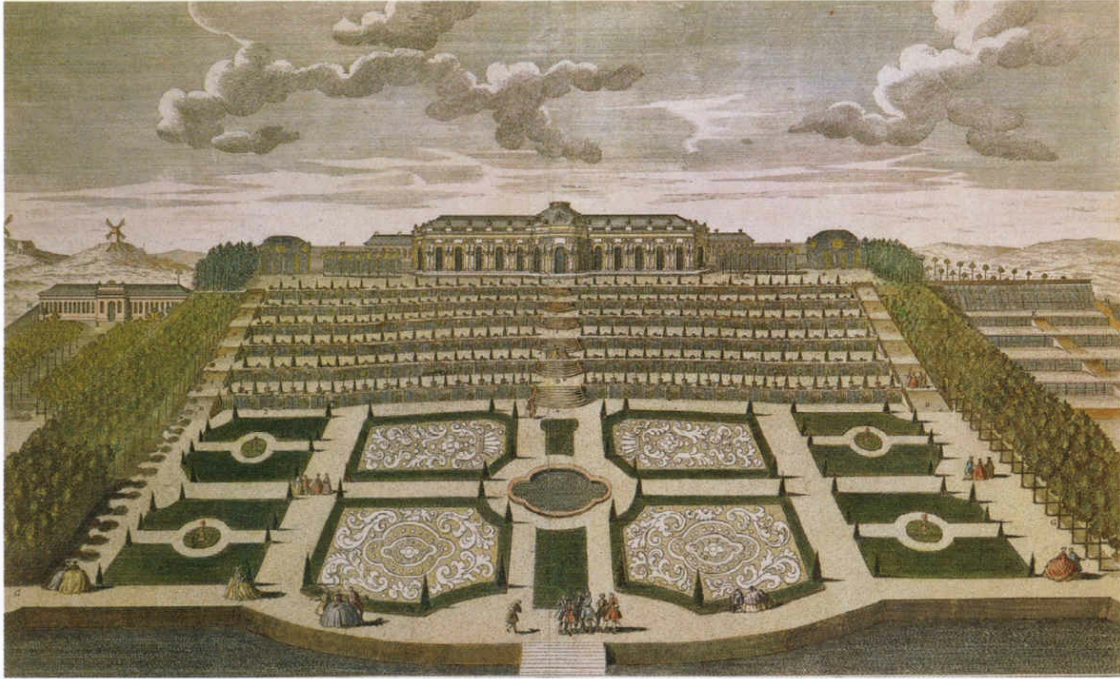


9.波茨坦城市宫南面的花园。



10.无忧宫平面图 (1) 入口大厅, (2) 大理石大厅/正式晚宴餐厅, (3) 前厅 (小餐厅), (4) 音乐室, (5) 书房和卧室, 带有放床的凹室 (5a), (6) 图书馆, (7) 画廊, (8—12) 客房, (13) 厨房, (14) 马厩, (15) 外围建筑, (16)

秘书和仆人的房间（第一个房间归弗雷德斯多夫使用），（17）园丁和管理员的房间。



11.无忧宫的葡萄藤阶梯和花圃，绘于约1765年。



12.无忧宫里的音乐室。



13.紧挨着无忧宫的独立画廊，不要和无忧宫内的小画廊混淆。



14. 《从克劳斯山看波茨坦的新宫》，作者是卡尔·克里斯蒂安·威廉·巴隆（1775年）。可以看到在新宫前的大道上种植着桑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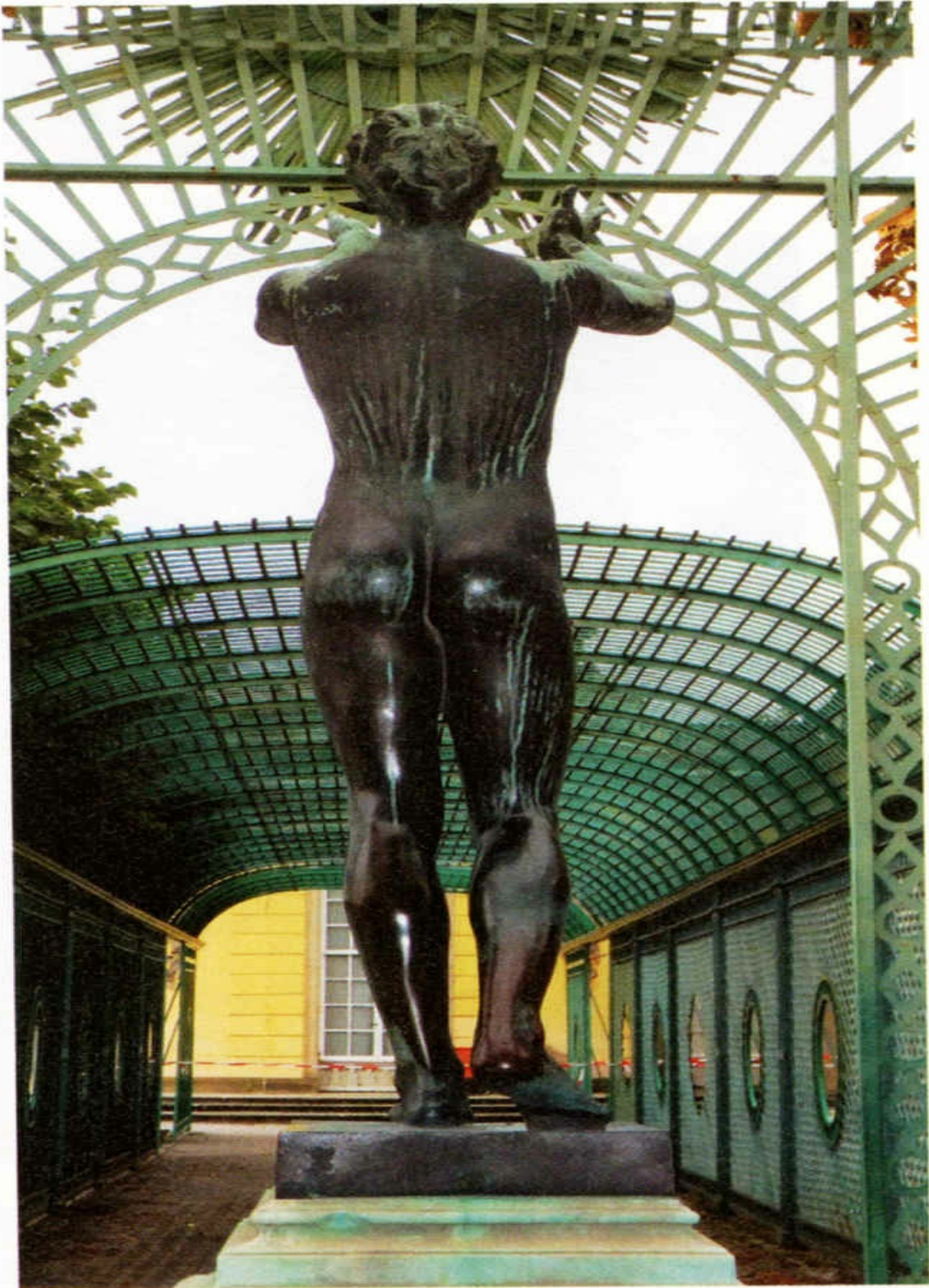
15.无忧宫入口大厅的《墨丘利》雕塑。



16.无忧宫入口大厅的《玛尔斯》雕塑。入口大厅的两座雕塑对面而立，也许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爱的时代要开始了。



17.雕塑《安提诺乌斯》。在弗里德里希死后改名为《祈祷的男孩》。原件现藏于柏林老博物馆。



18.《安提诺乌斯》的一件复制品。原雕塑在弗里德里希死后很快被移走，现在这件复制品又回到了无忧宫原来的位置，望向弗里德里希书房的窗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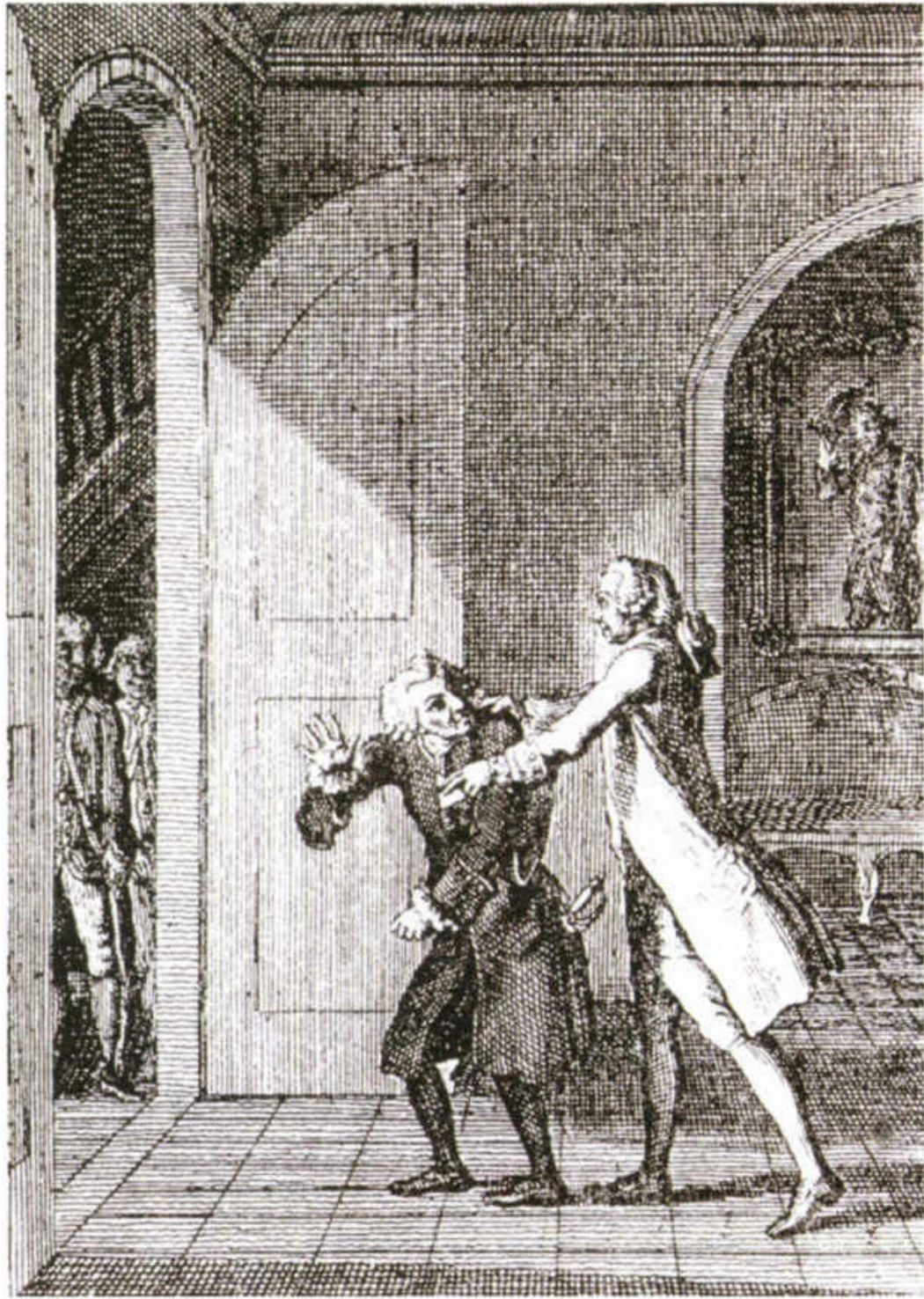
19.王室瓷器厂生产的部分餐具，1772年弗里德里希将其赠送给了叶卡捷琳娜二世。



20.位于波茨坦无忧宫公园里的友谊亭，弗里德里希为纪念姐姐威廉明妮而建，上面装饰着描绘古时男性恋人的圆形浮雕。



21. 《伽倪墨得斯被带到奥林匹斯山》，夏尔·范洛为波茨坦新宫大理石大厅所画的天顶画。



22. 《阿普里尔向普鲁士大使冯·普洛托宣布帝国议会的谴责时遭驱逐》。可以看到普洛托的仆人在门外等着，在画面右侧的壁龛里，弗里德里希的半身像举起了帽子喝

彩。



23. 《弗里德里希大王作为德意志诸侯联盟创始人的寓言》（伯恩哈德·罗德绘于1786年）。在日耳曼妮娅（或者是日耳曼传奇英雄赫尔曼的妻子瑟内尔达）的协助下，胜利的弗里德里希用白衣女子递给他的象征政治智慧的橄榄枝，将德意志诸侯们的长矛捆绑起来，形成一个牢固的束棒，从而维护了和平。画面右侧，富饶的象征被本着和谐精神带来，画面下方，剑被锻造成了犁铧。



24.“万岁丝带”，一种廉价而流行的庆祝弗里德里希获胜的方式。



25.海因里希·弗兰克1764年创作的弗里德里希肖像画。骑马经过他的臣民时脱帽致意，成为弗里德里希最著名而且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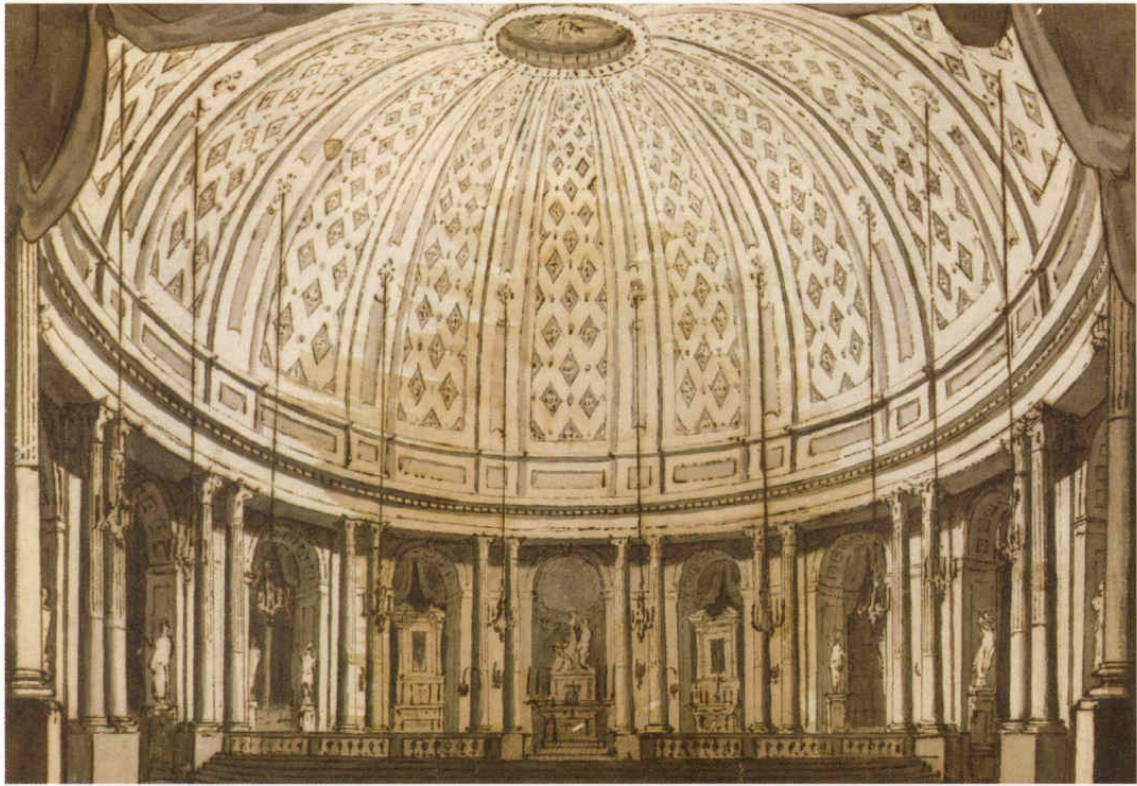


26.《罗斯巴赫战役》。原作的说明写道：“1757年11月5日，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赢得了胜利。战斗快获胜时，弗里德里希站在雅努斯山的炮兵阵地俯瞰战斗临近结束时的情形。他随从中的一位副官拿着望远镜，站在他旁边向他汇报着战斗的情况。普鲁士骑兵攻击了法军的侧翼和后方，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战斗的胜利。两名近卫兵手持的缴获的法国旗帜宣告了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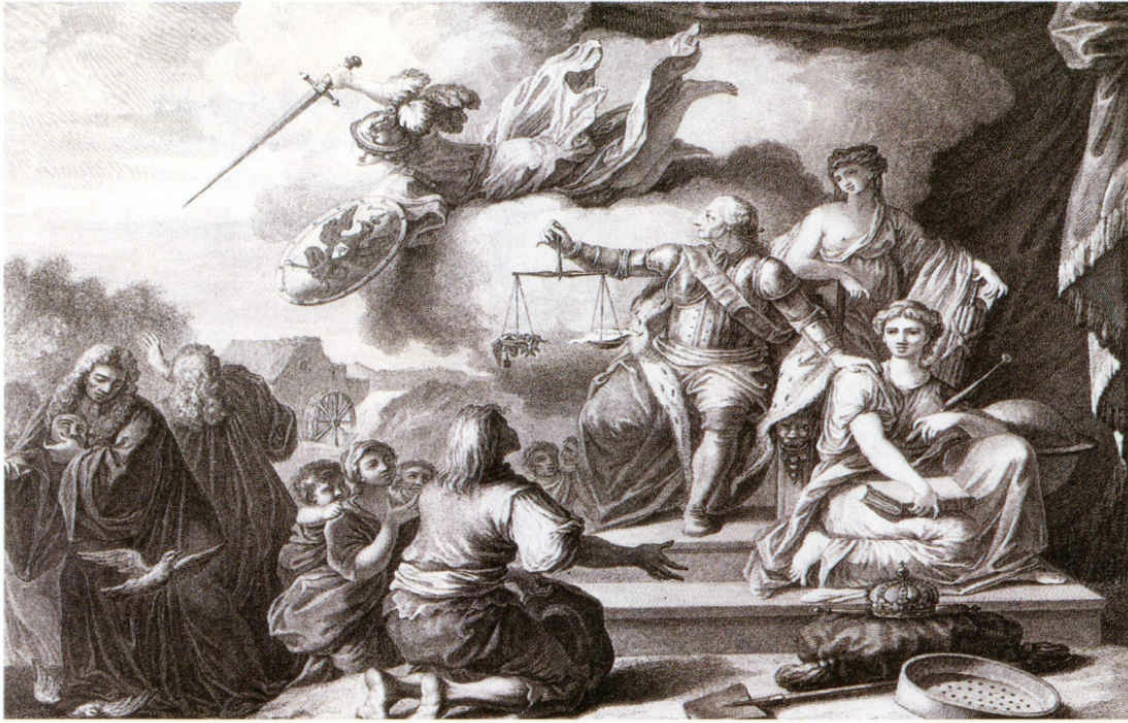


27.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骑马雕像，由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创作。弗里德里希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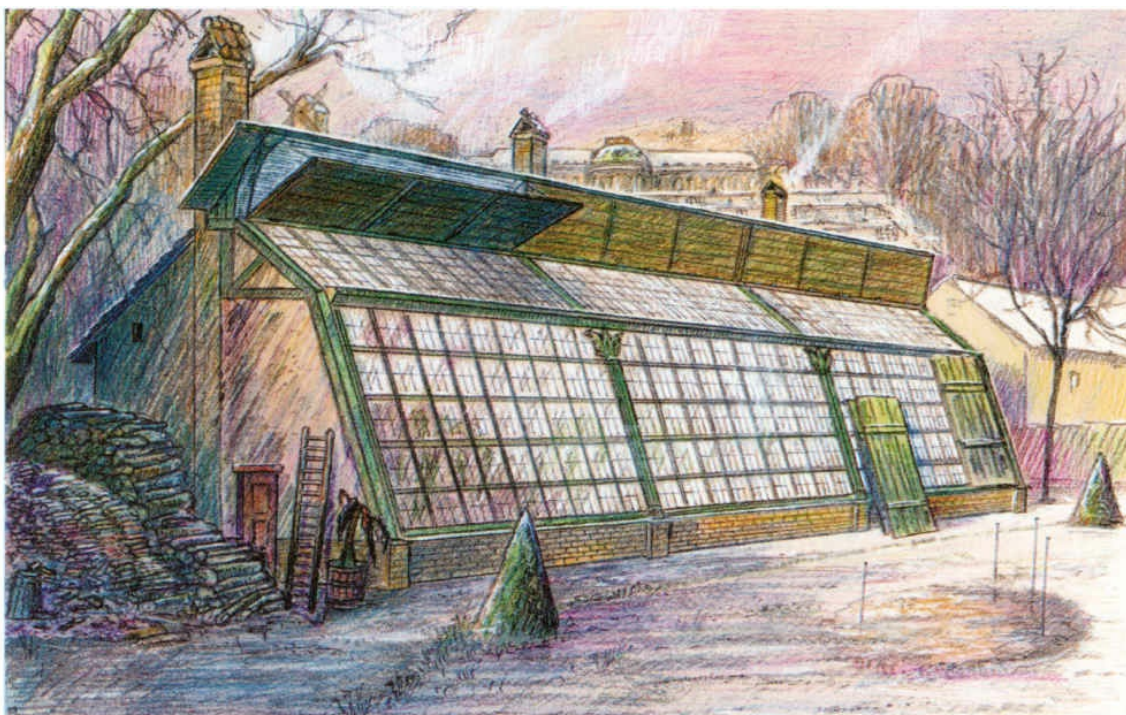
后，关于应该修建什么样的纪念碑，人们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直到1851年，这座位于菩提树下大街中央的雕塑才揭幕。雕塑展现的是弗里德里希正骑马奔向东方。



28.柏林罗马天主教大教堂的内部。这座教堂是献给西里西亚的守护圣人“圣黑德维希”的，于1773年建造完工，以建筑的形式体现了弗里德里希对宗教宽容的坚持。



29. 《弗里德里希的天平》，温琴佐·万杰利斯蒂于1780年创作。描绘了弗里德里希站在磨坊主阿诺德一方，干预司法的情景。这可能是一种专制行为，但对弗里德里希来说，这是他赢得公众好感的一个妙招。



30.重塑无忧宫的香蕉温室。弗里德里希喜欢异国水果，他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保证定期供应，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吃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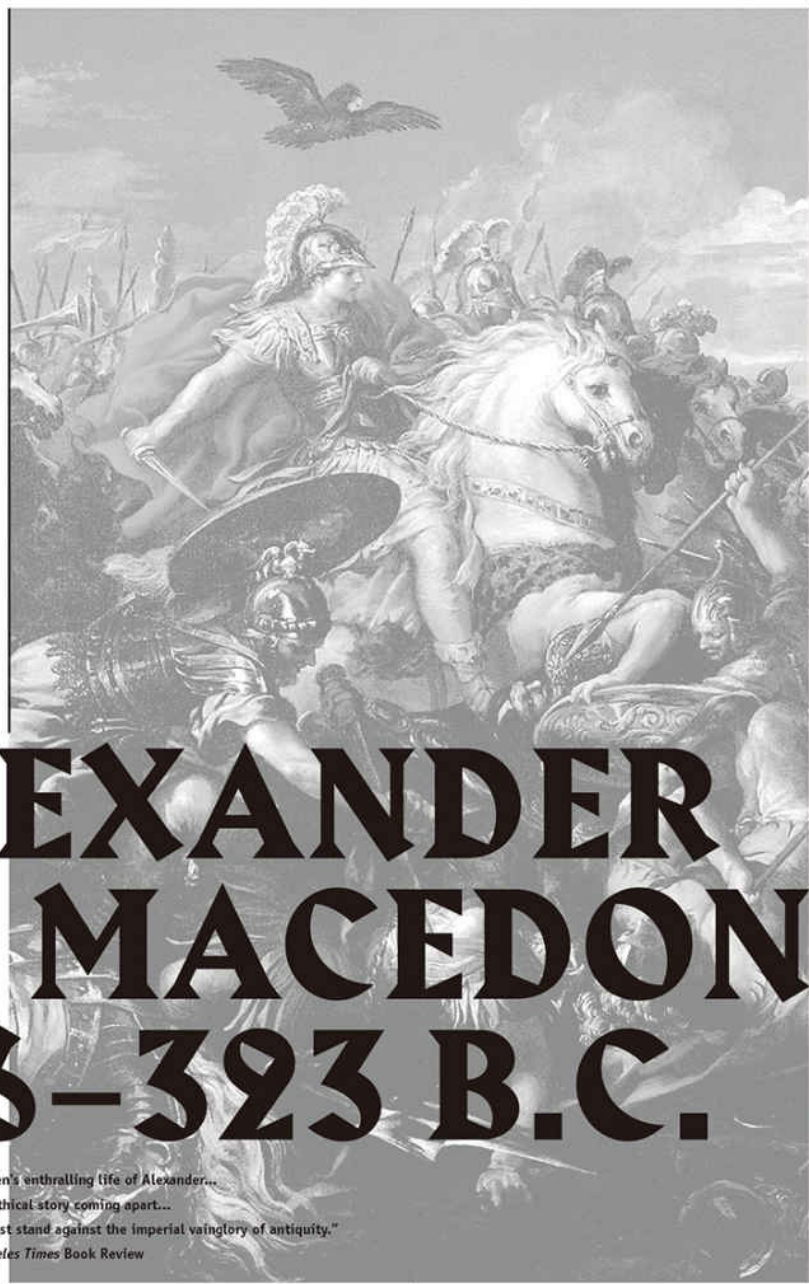
31.临终前的弗里德里希在无忧宫的露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他的两只意大利灰狗在他身边嬉戏。



32. 约翰·埃克施泰因在弗里德里希去世当天制作的死亡面具。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英」彼得·格林 著 詹瑜松 译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

"As one reads through Peter Green's enthralling life of Alexander...
one feels every strand of the mythical story coming apart...
Green takes a very bold revisionist stand against the imperial vainglory of antiquity."
—Christopher Hitchens,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PETER GREEN

后浪出版公司

A HISTORICAL BIOGRAPHY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AND A FOREWORD BY EUGENE N. BORZA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英]彼得·格林 著；詹瑜松 译

版权信息

书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作者：[英]彼得·格林

译者：詹瑜松

书号：ISBN 978-7-5139-1842-8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纪念恩斯特·巴迪安
依旧“更卓越的匠人”

- ποῦ εἶναι ὁ Μεγαλέξανδρος;

- ὁ Μεγαλέξανδρος ζεῖ καὶ βασιλεύει

——亚历山大大帝在哪里？

——亚历山大大帝活着并统治着。

——中世纪希腊谚语

Ἡδέως ἂν πρὸς ὀλίγον ἀνεβίουν, ὧ Ὀνεσίκριτε, ἀποθανόν, ὥς μάθοιμι ὅπως ταῦτα οἱ ἄνθρωποι τότε ἀναγινώσκουσιν. εἰ δὲ νῦν αὐτὰ ἐπαινοῦσι καὶ ἀσπάζονται, μὴ θαυμάσης· οἴονται γὰρ οὐ μικρῷ τινι τῷ δελέατι τούτῳ ἀνασπάσειν ἕκαστος τὴν παρ' ἡμῶν εὐνοίαν.

奥涅西克里托斯，如果我死后能活过来一小会儿，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诠释现在这些事情的，那么我会很开心的。如果现在他们赞美并欣然接受这些事情，不要惊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取得我的青睐的上好诱饵。

——亚历山大大帝，引自卢奇安的文章《如何书写历史》第40章

目录

前 言

2012年版序言

1991年重印序言

序言与致谢

地图和战役平面图目录

略语表

年 表

谱系图

第一章 马其顿的腓力

第二章 弥达斯花园

第三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第四章 王国的要害

第五章 统帅

第六章 通往伊索斯之路

第七章 永生的宣示

第八章 亚洲之主

第九章 探寻大洋

第十章 巴比伦之路有多远？

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

注释及引文

资料来源

译名对照表

前 言

在一篇发表在爱荷华古典协会的新闻通讯中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自传性访谈里，彼得·格林曾形容自己为“本质上我是一位作家”。他接着引用哈姆雷特对“您在研究什么，殿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哈姆雷特回答说：“言语，言语，言语。”就是言语！对格林来说，不仅是英语，还有拉丁语、古代和现代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他在著名的卡特豪斯公学接受古典学的训练，但是二战期间他在英国的远东军队中服役数年，这打断了他的正常教育。战争结束时，他成为了剑桥三一学院古典学系的研究生，在那里他于19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时候，他为古典学专业的僵化而感到幻灭，于是格林决定回到他最爱的文学世界（据说他六岁时就把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全部读完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位文学批评家、影评人、电视解说员以及古代和现代文学翻译家。由于早年对希腊的热爱，他携全家离开英国到累斯博斯岛定居，在那里他专心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著作，同时也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最终，他加入了雅典年岁学院，教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古代史，于是重新唤醒了对他先前放弃了的東西的热爱。1971年，他移居美国，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得到了一个终身教职，此后他一直在该机构服务直到退休。在得克萨斯，他指导过许多研究生的学习，并且是一位成功的本科生任课教师。1997年，他以杰出的荣休教授的身份从大学中退休，这时他迁到爱荷华大学去和他的妻子卡琳（Carin）团聚

，当时他妻子是那里的古典学系的一员。自此以后，他成了爱荷华大学古典学系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担任爱荷华大学的古典学期刊《古典学集刊》（*Syllecta Classica*）的编辑。

有两个彼得·格林。一个是古典学者，在希腊史领域笔耕不辍，创作过针对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文学批评，并因其将几位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语而受到高度赞扬，其中包括尤维纳利斯、奥维德、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和卡图鲁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产的操英语的古典学者之一。另一个彼得·格林是评论家和记者。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他的艺术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不会陌生。他是《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定期评论员。他以其强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卓然于众，例如他惊人地给二十五本（！）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写过批评性书评，在1979年图坦卡蒙国王的展览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开幕时发表在《纽约书评》上。1981年，在辛辣地评论国家美术馆的“探寻亚历山大”展览时，他也创作了规模稍小的关于马其顿的书籍的一系列书评。在这些评论中，他不仅奉献出针对相关对象的令人深思的叙述，而且对那些站在背后、促成古代财宝到外国展览的政治力量也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来没有其他的古典学家——或许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和已故的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除外——能把文学与学术技艺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格林的天分更为广泛：在他的人生中，除了是古典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外，他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和诗人（“言语，言语，言语”）。他这部卓越的亚历山大传记展现了他的两大兴趣是如何相得益彰的：格林对描绘人类境况的文学艺术的深切热爱，丰富了对亚历山大之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刻画又是源于对古代史料的精细研读。这不仅仅是亚历山大的历史，还是一部全方位的传记（正如标题所示），意在阐释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性格和动机。格林完全理解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的开场白：

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阐释美德或者邪恶；比起尸堆如山的战役、最为庞大的军阵和围城战，微不足道的行动、言辞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因而就像画家在刻画人物时，着重面容与眼神而较少关注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我将更专注于灵魂的种种表征，据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而把鸿业与战功留给他人去写。

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的亚历山大传记，其中多数是为了满足大学本科生市场的课程需求。这些著作主要是重述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功绩——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是历史但不是传记。有些批评者反驳说格林经常越出古代史料所允许的范围，对此他在本版的序言中有详细的回应。在其初版近四十年之后，彼得·格林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旧是对这位著名国王的最博学、最优美全面的现代评述。

尤金·N·博尔扎
古代史荣休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12年版序言

去年我的被题献人去世，随后他的《论亚历山大大帝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Alexander the Great*）最终出版，这两件事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契机，让我得以回顾自1991年以来本书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术洪流中幸存下来的。当我经过深思熟虑，故意模仿艾略特（T. S. Eliot）把 *il miglior fabbro*（“更卓越的匠人”）附加到献辞上时，普遍的反应是我明显没有理解艾略特事实上有多么获益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为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做了全方位的编辑工作。相反，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也知道恩斯特·巴迪安多么耐心和全面地审阅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显然，要是我先前没有发现恩斯特的文章，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在那些文章中——正是这些文章驱使我首先跟他取得联系——恩斯特在方法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史学方面他比我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其他一般理论都更令人信服。最近在本传记初稿完成约四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看看本书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我不禁要惊讶于它们彻底的逻辑，对支配人性的霍布斯式“现实”的悲观承认，它们把每一条古代证据都放在语境中根据常识进行分析，在形成判断时，只有将古代或现代的偏见作为历史因素时，才会对其有所让步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在本传记中，被归到亚历山大身上的政治、家庭和个人的动机，就是全然基于恩斯特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非常谨慎地得出的诸多结论。

恩斯特对史料审视得极为透彻，对人们在追逐权力时所能做出的事情有着冷峻的认识——这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获得的；今天我感觉无论怎样都很难反驳那些结论，这正是对以上两点的证明。（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当他听说暴徒在水晶之夜捣毁犹太会堂，叫嚣着要进行屠杀时，他还是个孩子；一直到1938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时他才和父母一块从维也纳逃到新西兰。）从一开始，对我著作的批评（据我所知，最近的是在沃辛顿的著作 [Ian Worthington, *Alexander the Great, Man and God*, 2004] 的第329页中），总是说我过于轻信古代可疑史料中的各种故事，一般认为这些故事乃恶俗、野蛮、血腥和拙劣的小说家言，并非真实历史。过去几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东和中东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使这些故事看起来相对温和了许多。古代的*andrapodismós*（变卖为奴）和现代的种族清洗几乎毫无区别；跟已灭亡或尚存的阿拉伯各王朝相比，马其顿的宫廷阴谋并没有更加残忍、贪婪或下流，更不用说跟第三帝国相比了。

因此，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有益成果，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本传记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是一个在军事方面才华横溢的着魔之人，痴迷于征服事业；随着一个个无与伦比的胜利接踵而来，他迷信般的自恋很容易就滑入妄自尊大和升格为神的幻想之中；为了获得至尊地位，他在内部与马其顿的权势贵族不断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的亚洲远征，其残酷不亚于希特勒；他洗劫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财宝，然后用这些财宝来大规模地讨好疲乏的军队，由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他对反对他的阴谋的猜疑日渐增长，验证了那句古老的箴言，即猜疑之人总有可猜疑之事；到了他短暂一生的末年，他的目标与他所领导者的目标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以致他一死他所制定的每一个计划，无论军事的还是其他的，统统被取消掉，可以说就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想把这种冷峻的形象修饰一番。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所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的作品醒目地题作《亚历山大大

帝——对一种新的过去的探寻》（*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 [2004]）。此书明显理智而稳健，在书中卡特利奇反对所谓的巴迪安式的“冷嘲热讽”，而支持塔恩（W.W. Tarn）的“相信人类团结的空想家”的说法；他强调事实很明显，亚历山大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以一种永久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把希腊人与东方人的合作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人”（第338—339页）。但是，事实上这种举动是迫在眉睫的，正如其动机是非常实际的：征服者需要军队，而对马其顿人的持续疏远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往其他地方去征募新兵。有些姿态，譬如苏萨的集体婚礼（不幸的是，这让我想起了文鲜明 [Sun Myung Moon] 牧师为统一教而举行的类似的公共婚礼），就意在为未来的远征军提供有意愿的军人，目的在于把亚历山大所期望的波斯—马其顿混合体，打造成一个一直处在运动之中的军人社会。

另一方面，恩斯特革命最杰出的继承者布赖恩·博斯沃思（Brian Bosworth），就其整体而言亦是当前最好的亚历山大历史学家，他则强调亚历山大对屠杀的纯粹喜好；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Alexander and the East: The Tragedy of Triumph* [1996]）中，他把相关记载与中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杀做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杀戮和指导杀戮，大概杀戮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第 v 页）。这一次我要站在分歧的另一边。这种激进的简化论其实跟塔恩的理想主义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只需稍微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亚历山大的情况要比科尔特斯（Cortés）复杂得多。在遥远的东方，他梦想着到达大洋和世界的尽头，然而却受挫于雨季的暴雨、热带的潮湿、地理方面的致命错误、强悍的印度战士、前线的大象以及最后不堪重负的军队的抗命，于是，亚历山大心中生发一种充满愤恨和受挫的狂暴，不仅指向敌人，还指向他自己的过分膨胀的远征军（因此故意利用格德罗西亚沙漠中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来清洗商贩和其他随从人员）。自那以后，猜疑支配了他的余生。

亚历山大一向残酷无情，特别是对那些曾挫败他意志的人（他对加

沙当地指挥官的处置就是明证：就像阿基琉斯对待赫克托尔那样，他把此人拖在战车的后面，但与赫克托尔不同，此人当时还活着），但其波及的范围从来没有这么广，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失控过。

在本传记的主要事实方面，我可以说（当然，我可能遗漏了一些，但我不这么认为）最近的学术发展并没有表明，它们跟当前的研究相比已经完全过时了，或者急需重写一遍——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我去努力出一个新版。另一方面，这些内容总的来说并没有为新颖的研究模式所触动，无论性别研究还是叙述学，抑或后殖民主义，这些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与如何看待旧事实而非与发现新事实相关。再者，由于它们多数还处于发展阶段，当需要对证据进行评判时，它们仍然不够可靠（或者说至少容易为短期的变革所影响）。不管任何时候，要做出长久的历史判断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我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自其在英国初版近四十年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这方面还不至于太糟；我不想把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只是一时之风尚的东西，运用于对本书主角的人生的评价，由此削弱它如今已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如今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它们可以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更好更容易地理解亚历山大及其世界，这篇序言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此类读者去了解对补充本书内容特别有价值的书目。例如，在往日唯一可用的（但是对英美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获得）亚历山大世界的人物志指南是两卷本的贝尔佛的《基于人物志的亚历山大王国》（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 [Munich, 1926]），但现在我们有了沃尔德马·赫克尔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各色人等——亚历山大帝国人物志》（Waldemar Heckel, *Who's Who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rosopography of Alexander's Empire* [Malden, 2006]），这本人物汇编兼具完全的学术性与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可以查阅数百个吸引人人物的资料，甚至比最啰唆的传记作家都更详细得多。最近新出的三部指南为了解过去数十年关于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参考文献，提供了便利的一般性入门指引：罗伊斯曼（J. Rois

man) 主编的《博睿亚历山大大帝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lexander the Great* [Leiden, 2003])；罗伊斯曼和沃辛顿(I. Worthington)主编的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古代马其顿指南》(*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Blackwell, Oxford, 2010])；和福克斯(R. Lane Fox)主编的以考古学为主的《博睿古代马其顿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 [Leiden, 2011])。

关于亚历山大远征实际过程，阿里安的叙述是我们的主要史料；现在远征的经过可以比之前更有深度地探讨下去，这得益于两部杰出的作品：卓越的牛津古代史学者布伦特(P. A. Brunt)修订的两卷本的洛布版阿里安(Loeb Arrian [1976, 1983])，和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编的《路标版阿里安——亚历山大征远征记》(*The Landmark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New York, 2010])。前者提供了可靠的希腊文本，并带有经过修订的对照译文；后者则是全新的译文，并带有路标版惯有的精良的地图和照片；二者都提供了关于重要话题的极好的附录，从“拜访西瓦”到“亚历山大之死：毒杀的谣言”，全部基于顶级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也大大发展了我最初关于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和建设的观点：详情可参见我的文章《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s Alexandria*”)，最方便获得的是在《从伊卡里亚到星星》(*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Austin, 2004])的第172—196页。

某些时段和地区会研究得比其他的更好一些。现在关于古代波斯和阿契美尼德帝国，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半个世纪之前多得多。即使这些知识很少可以直接运用于这场因马其顿入侵而引起的最后冲突，进一步认识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享有的广大权力和声望，也会大大提升我们对亚历山大在推倒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尊敬。有两部概括了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著作有着特别的重要性。皮埃尔·布里昂(Pierre Briant)的《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波斯帝国史》(*From Cyrus to 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Winona Lake, Indiana, 2002])，由彼得·T·丹尼尔斯(Peter T. Daniels)翻译，既更新了布里昂

原始的法文版，又订正其中的许多错误。阿梅莉·库特（Amélie Kuhrt）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时期史料集》（*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提供了所有现代史学阐释所依赖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库特本人还写过对该时期的阐述：参见她所写的《古代近东：约公元前3000—330年》（*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的第二卷第13章。

另一个极大得益于学者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的上乘研究的古代地区是巴克特里亚——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对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犹如阿富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先后落入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之手：《进入白骨之地》（*Into the Land of Bones* [Berkeley, 2005]；第2版于2012年出版），此书将古代历史和现代结合起来，透彻地说明了无比崎岖的地形、好战的部落和暧昧的忠诚，这些因素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前景，对亚历山大如此，对一心想想要入侵此地的当代后继者亦是如此。五角大楼里的每一位乐观的指挥官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然后严肃地自问是否觉得自己比亚历山大更聪明，在后者远征亚洲期间从未有一个地方像巴克特里亚这样差点儿让他栽了跟头。《进入白骨之地》——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巴克特里亚》（*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New York, E. J. Brill, 1988]）——对任何叙述亚历山大的巴克特里亚征战及其后果的著作、特别是本书来说，都是一部基本的指南。以更为轻快但同样深入的风格写就的，是霍尔特精巧的侦探性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与大象钱币之谜》（*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 [Berkeley, 2003]）。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总是基于他的钱币学背景，在此他巧妙地揭示出，亚历山大之所以能用宣传手段引导他疲乏的军队，关键在于他自称的不可战胜的领导力。正如霍尔特所说，“他在钱币上夸耀的领导力确实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替代的”（第164页）——亚历山大死后的那些年就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然，那是另一故事了。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多年来读者们反复询问的话题，我不得不坦承有些失败。这个问题便是我在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中所处理的著名难题。人们会想起关于那场战役有两种不可调和的叙述。在阿里安所给的且得到普鲁塔克支持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在他抵达的当天下午强行渡河，并赢得了随后的战斗。而在狄奥多罗斯所用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等了一夜，未遇抵抗地渡过了河流，然后打了一场仗，在大部分细节上都和阿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载的一样。我的解决方案是假定当天下午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于是撤退，在河流下游未遇抵抗地渡河（可能是在晚上），次日赢得了像其他版本所记载的那样的战斗。我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这是非常巧妙的，但正如恩斯特马上指出而我当即紧张地记下的，“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尽管阿里安的版本在我所假定的情况中是可以理解的，但狄奥多罗斯的却完全讲不通，更糟的是我违背了在处理史学证据时所应遵循的准则，试图在重重困难中调和两种根本对立的文本。我也无法解释矛盾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必须说一下，恩斯特在其支持阿里安版本的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文章《格拉尼科斯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注释15，见于他的《文集》第224—243页）中也忽视了这一问题，因而违背了他自己的史学准则之一。

这些年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不像1991年那样确信我的假说“绝对错了”，但是根据史料来看，我的假说依然站不住脚，而矛盾依然无解。在古代史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证据不足要求我们承认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情况比我们愿意承认得更多，而此处便是这样的状况。由于缺乏新的史料或更加有力的论据——未来几年也不会出现——正如戴维斯（E.W. Davis）所说，围绕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仍将是个谜团，而对此我们根本没有答案。

彼得·格林
爱荷华城，2012年6月

1991年重印序言

自我收拾好初步的笔记和基本的文本——阿里安、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福斯、查斯丁等的，然后退居到当时不为人知的希腊岛屿阿斯堤帕莱亚岛上去创作《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现在已经二十二年过去了。我沉浸在亚历山大的学术史中，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现代希腊的（作为爱国象征的亚历山大——不止是在上校军政府的统治下——值得另写一部专著），直到我觉得快要淹死了。我需要脱身一下，清理一下我的脑袋，找回透视感，清楚地看一看亚历山大，跳出那让人分心的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大合唱。当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宣传（有些是自发产生的）贯穿国王的一生，而且他一死就被人神话化了——其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种神话化就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

尽管如此，我最初进行叙述时的境遇还是在本书中留下了印记，正如类似的限制对琼斯（A. H. M. Jones）的出色且独树一帜的斯巴达研究（1967年）所造成的情况一样。特别是，我不得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仔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存的史料，依靠他们现存的状态来做判断（即便最早的狄奥多罗斯也是生活在他所写事情的约三个世纪之后了），而不是去进行复杂的史源探究训练，这种史源探究是专门推断并评价现存史料所利用的更早的作家作品的学问。

作为初步的研究方法，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也就是说，做出判断经常是基于常识而非学术论证或共识；但那时候我不认为，现在回顾的时候也不认为这必然是件坏事。我所沉浸于其中的学术史——尤其是当时恩斯特·巴迪安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极简主义论点——不可避免地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就像后来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而且住在希腊的时候，我比多数人都更清楚马其顿研究正在发生怎样激动人心的转变。但是，很大程度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然只是一部基于文本的史学尝试，另外还受惠于对希腊的地貌、气候和只有长年定居才会产生的对风俗习惯的熟悉。1971至1973年间我在本版出版前做了大量的修订，但其中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修订是在大学院系里进行的，那里可以充分接触到学术文献。做此修订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以补充初稿中经常忽略的学术背景和争论。

结果便形成了一部有趣的混杂之作。由于一些与文学或史学都无关的原因（版权纠纷、出版商之间的分歧），本书只作为一本厚厚的平装书在英国问世，此后——因为此版很快就脱销了——像一个学术幽灵一样存在了几年，之所以没有被人不公正地遗忘，只是因为少数学者发现了我的研究的价值，引用并向他们的学生推荐了本书。不幸的是，要找到本书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在过去的十六年里，重印的念头一再出现，但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才最终有了结果，只是有人觉得实际上已经太迟了。

由于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研究自1974年以来也在不断发展，在过去一两年里，我的想法逐渐倾向于在第二版中做一次相对彻底的修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准备编写的这一文本。任务十分繁重，很可能——我还有其他事务——要花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许多领域已经完成大量研究，我需要加以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其顿史，由于博尔扎、考克威尔（Cawkwell）、埃林顿（Errington）、格里菲斯（Griffith）、哈蒙德（Hammond）和沃尔班克（Walbank）等

学者的工作，以及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kos）在维吉纳大墓（Great Tumulus of Vergina，现已确认是古代的埃盖，正如哈蒙德早就预测过的）中所取得的著名考古发现，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海伦·桑启西-威尔登堡（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苏珊·舍温-怀特（Susan Sherwin-White）和阿梅莉·库特等学者对波斯和其他东方档案的最新研究，阐明了亚历山大的东方联系和帝国管理制度。铭文得到重新解读，钱币得到研究，地形图得到修订；军事后勤这一大块问题也因我从前的学生唐·恩格斯（Don Engels）的研究而有了全新的基础。任何修订都需要参考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在准备修订和更新文本的过程中，我想我还找到了一个重新发行1974年版——实际上该版从未在美国发行过——以满足（迟做总比不做好）学院和大学持续增长的需求的有力理由。确实，我目前的著作还缺少额外的一个方面，即最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所能够且应当提供的东西（包括关于阿里安的第一种批判性注疏，虽然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通常很小但令人不快的各种印刷错误以及文学或事实方面的笔误仍然存在（例如，第53页“学园”[Academy]误作“吕刻昂”[Lyceum]，第405页“源头”[headwaters]误作“总部”[headquarters]），足够挑剔的评论者作靶子用。

但是，最近重读全文——再加上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生组成的研讨班提出的那种不仅尖锐而且有时还很激烈的意见——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我重获信心。的确，有好多地方我都需要再考虑考虑（例如在菲罗塔斯事件中，阴谋是实有的还是被人捏造来反对他的？）。有些难题（例如哈尔帕罗斯的第一次出逃）依旧令人困惑。而更为突出的例子便是本书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附录，最新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绝对错了。但是，总的来说我找不到理由说我1968年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天赋或动机的分析是错误的，却可以找到大量的论据来支持我通过仔细研究古代史料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并非乐事，他们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国际法的支持者，相信法治原则；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

者是热衷冒险的浪漫理想主义者，依旧热切地固守着塔恩的博爱幻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事这项寂寞的任务时所在的希腊岛屿，恰好是上校军政府用来放逐保皇派军官和那些拥有独立想法的思想家的地方。当“不做我兄弟，便做刀下鬼”这句革命笑话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出现时，我正看着亚历山大把它运用到忒拜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提尔或奢羯罗的防御者身上。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的事件促进了我的判断的形成，正如塞姆对奥古斯都的论断——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驻罗马古典研究院中构思出来的——不可能不受墨索里尼派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影响。

在学术界中有一种贬低这种偶然的个人经历的倾向，认为这种经历会影响我们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历史书写。我不同意。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奥斯都非常清楚，要书写历史就得参与到历史当中去，无论其角色多么边缘。吉本（Gibbon）明白，担任汉普郡近卫步兵第一团上尉对他成为罗马帝国史专家不无裨益。正好，上校军政府把亚历山大宣传成伟大的希腊英雄——特别是对军队新兵：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把亚历山大看作半马其顿半伊庇鲁斯血统的野蛮征服者，他们定会和我一样觉得这种变换太过讽刺。

此外，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希腊化时代，特别是亚历山大继承者们（Diadochoi）——这些瓜分了战利品的坚忍不屈的元帅们——的帝王习性，这大大加强了 my 信念，即亚历山大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且雄心勃勃）的战场统帅，而且与所有的管理才能和理想主义追求全然无涉，那些都是后人，特别是那些单纯觉得这位征服者对于他们的自由主义情感来说有点难以接受的人偷偷赋予他的。我非常肯定，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不会根本改变这一论断。毕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无论我们在细节方面如何计较，关于亚历山大一生的历史事实确实没什么争议。说到底，关键在于我们对它们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我很高兴看到当前的版本连同它所有的不足，竟能够获得新生。

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90年10月

序言与致谢

本书的缘起或许需要做一番解释。我对亚历山大一直很感兴趣，六年前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邀请我给他写一部简短的传记。我为承担这项任务而做的研究，使我对这一主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广泛，大大超出了我和出版商的预料。我的初稿最终写得太长了；于是我做了删减，去掉了文献资料，由此形成了第二个版本。之后又做了大规模的削减和编辑，最终在1970年出版，题为《亚历山大大帝》。至于当前的版本，我返回去以原始的第一稿为底本进行修订，最后的文本其篇幅是先前版本的三至四倍。最初的构想的内核仍然保留在基本的章节安排当中，但正文得到了彻底的修订和扩充，得要一位哲学家来判定这两本书到底是不是同一作品。实际上，我也不是简单地重新拿出初稿并把初稿的文献资料恢复。我在无数的地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有时是因为公开和私下的中肯的批评，有时是因为读到了1968—1969年以来的新书和新文章），最后通过整合此类修订而成当前呈现出来的版本。

我非常受益于亚历山大研究领域的同行：这次我很高兴可以在注释和引证中以个人名义就我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益处逐一表示感谢，这些益处是我从同行的学术出版物中获取的。然而出于敬意，我禁不住要再次提及恩斯特·巴迪安教授的名字，他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公认的耆宿和在世的最杰出的古代史学者之一，无论我何时向他请教，他都不吝时间，慷慨地拿出他无可匹敌的知识。每当我发现我与他的观点存在分歧

，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鲁莽之感。因而在此我不是出于纯粹的客套才强调，无论他还是这里所提及的任何学者，都毋须为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以及书中众多且不可避免的缺陷负责。献辞只是对诸多恩德和启迪的不成其为回报的回报。

此次终稿的研究和写作是1971—1972年间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古典学系客座教授期间进行的，那里的条件近乎完美，任何学者都会觉得那是个天堂。我衷心感谢古典学系的同仁，他们以各种方式做了许许多多，使我住得非常开心。1971年秋，我开了一次亚历山大研究的研究生研讨班，可以肯定地说我从中学到的至少和我的学生学到的一样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提出众多极有见识的意见，其中有些在经过同意之后融入了我的文本。战役藏品室的管理员安妮·范德胡夫（Anne Vanderhoof）夫人给了我无尽的帮助——远远超出了职责的要求——不仅是在这项特定的项目上，而且在我研究工作的方方面面。

最后，我要表达一下我对尤金·N·博尔扎教授的感谢，他不仅以超乎应有的友善态度评论了我最初的简本，而且邀请我到美国古代史年会上演讲，间接使我的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在出版前至少去掉了部分不足和错误。在此，我又一次深深地感激巴迪安教授，他对这篇文章的敏锐的批评（最初是在演讲时提的，后来通过讨论和通信做了补充），证明他是一位完美的批评家：既有同情心，又有想象力，但完全不能容忍谬论。

这里所用的阿里安著作的译文（我多有改动）是已故的奥布雷·德塞林科特（Aubrey de Selincourt）的译文（企鹅经典丛书），现在又有修订版，带有杰出学者汉密尔顿博士（Dr J. R. Hamilton）所撰新导言和注释。我所引用的（同样偶有改动）狄奥多罗斯的著作是已故的 C·布拉德福德·韦尔斯（C. Bradford Welles）教授的洛布丛书版（由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同样，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是贝纳多特·佩林（Bernadotte Perrin）的洛布丛书版（海涅曼出版社）。第364页欧里庇得斯

的《安德洛玛刻》的引文是约翰·弗雷德里克·尼姆斯（John Frederick Nims）先生的译文，见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腊悲剧全集》系列；第377页欧氏的《酒神的伴侣》的引文是威廉·阿罗史密斯（William Arrowsmith）的译文，见于同一系列。

古典学系 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72年3月

地图和战役平面图目录

希腊大陆

喀罗尼亚战役

小亚细亚

波斯行省

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平面图

伊索斯战役

埃及、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

从塔普萨科斯到高加美拉的路线

高加美拉战役

伊朗中部和东部

巴比伦平面图

阿富汗、俾路支、印度河河谷

杰赫勒姆河战役范围

杰赫勒姆河（叙达斯佩斯河）战役

略语表

[]表示缩略语的其他形式

Acta Class. *Acta Classica*. Proceedings of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Cape Town, Balkema.

Aelian: Claudius Aelianus (c. A.D. 170-235).
VH: Varia Historia
HA: Historia Animalium

Aeschin.: Aeschines, Athenian orator (c. 397-c. 322 B.C.)
De Fals. Leg.: De Falsa Legatione
In Ctesiph.: In Ctesiphontem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ew York, Macmillan.

AJ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Princeton, 231 McCormick Hall.

AJPh: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AM: *Ancient Macedonia*. Papers rea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Thessaloniki, 26-9 August 1968. Ed. Basil Laourdas and Ch. Makaronas.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Thessaloniki, 1970.

Andoc.: Andocides, Athenian orator (c. 440-c. 390 B.C.).

Ann. Serv.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Égypte*. Cairo, Impr. de l'Inst. français
Ant. Egypt. d'Archéol. Orientale.

ANSMusN: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Museum Notes*. New York, Broadway be

tween 155th and 156th Streets.

A[nt]. C[l].: *L'Antiquités Classique*. Lou vain, Vlamingenstraat 83.

A[nth]. P[a l].: *Anthologia Palatina, Planudea*.

Ant. Kunst.: *Antike Kunst*. Hrsg. von der Vereinigung der Freunde antiker Kunst in Base l. Olten, Urs Graf-Verlag.

Appian: Appianos of Alexandria, Greek historian (first-second century A.D.).
BC: *Bella Civilia*
Syr: *Syriaké* [*Syrian Wars*]

Aristoph.: Aristophanes, Athenian comic playwright (?445- ?385 B.C.).
Thesmoph.: *Thesmophoriazusae*.

Arist.: Aristotle of Stagira, Greek philosopher (384-322 B.C.).
Eth. Eud.: *Ethica Eudemia* [*Eudemian Ethics*].
Pol.: *Politica* [*Politics*].
Rhet.: *Rhetorica*.

Arrian: Aulus (or Lucius) Flavius Arrianus Xenophon, Greek historian (second cent ury A.D.).

Athen.: Athenaeus of Naucratis (*fl. c.* A.D. 200).

Athenaeum: *Athenaeum*. Studi periodici di Letteratura e Storia dell 'Antichità. Pavia, Un iversità.

Aul. Gell.: Aulus Gellius, Roman author (*c.* A.D. 130-180).
NA: *Noctes Atticae*.

Badian, Stu d. Ehrenb.: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 is 75th birthday. Ed. E. Badian. Oxford, 1966.

Badian, Stu d. GRHist.: E. Badian,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1964.

Bellinger: A. R. Bellinger, *Essays on the Coin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umismati c Studies 11). New York, 1963.

Beloch, GG K. J. Beloch, *Griechische Geschichte*. 2nd edn. Vols. III i-ii, IV i. Leipzig-

- : Berlin, 1922-5.
- Berve, *AP* 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 2 vols.
G: Munich, 1926.
- Bickennan, E. J. Bickerman, *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68.
Chronology
 :
- Bieber, [*Po* M. Bieber, *Alexander the Great in Greek and Roman Art*. Chicago, 1964.
rtraits]:
- B Mus B*: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 Bonner Jah* *Bonner Jahrbücher des Rheinischen Landesmuseums in Bonn und des Verei*
rb.: *ns von Altertumsfreunden*
im Rheinlande.
- Bull. Class.* *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de l'Académie Royal de Belgique*. Brussels
Lett. Acad. .
R. Belg.:
- B[ull]. C[or* *Bulletin de Correspondence Hellénique*. Paris.
r]. H[ell].:
- Bull. Inst. E* *Bulletin de l'Institut Egyptien*. Cairo.
gypt.:
- Bull. Inst. F*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Cairo.
ranç. d'Arc
h. Orient.:
- B[ull]. V[er* *Bulletin van de Vereeniging tot Bevordering der Kennis van de Antieke Bes*
.] A[nt.] B[e *chaving*. Leiden, Brill
schaving]:
- Burn, [*AG*]: A. R. Burn,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2nd rev. edn, N
 ew York, 1962.
- CAH*: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1923-39.
- Cary, *GB*: M. Cary,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
 d, 1949.
- Cic[ero]: Marcus Tullius Cicero, Roman scholar and orator (106-43 B.C.).
Pro Arch.: *Pro Archia*

Tusc. Disp.: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 Classical Folia:* *Classical Folia*. Studies in the Christian perpetuation of the Classics. New York.
- Clem. Alex.: Clement of Alexandria (Titus Flavius Clemens Alexandrinus) (c. A.D. 150-c. 215)
Protrept.: *Protrepticus*
- Comp. Rend. Acad. Ins. cr.:*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 CPh:* *Classical Phil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Q:* *Classical Quarter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W:* *The Classical World*. Bethlehem, Pa.
- Deinarch.: Deinarchus, Greek orator (c. 360-c. 290 B.C.).
In Demosth.: *In Demosthenem*
In Philocl.: *In Philoclem*
- Demades: Demades, Athenian politician (fl. 350-319 B.C.).
Twelve Tears: Ὑπὲρ τῆς δωδεκετείας, attributed to Demades but almost certainly not by him.
- Demetr.: Demetrius, Greek literary critic (late Hellenistic or Roman period).
De Eloc.: *De Elocutione [On Style]*
- Demosth.: Demosthenes, Athenian orator (384-322 B.C.).
C. Aristocr.: *Contra Aristocratem*
Chers.: *De Chersoneso*
De Cor.: *De Corona*
Halonneso.: *De Halonneso*
In Leptin.: *In Leptinem*
Olynth.: *Olynthiaca*
Phil.: *Philippica*
- Dio Chrys.: Dio Cocceianus or Chrysostomus, Greek orator and philosopher (c. A.D. 40-c. 115).
- Diod.: Diodorus Siculus of Agyrium, Greek

historian (first century B.C.).

D[iog.] L[ært.]: Diogenes Laertius, Greek biographer (? third century A.D.).

Dion. Hal.: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Greek rhetorician and antiquarian (first century B.C.-first century A.D.).
De Camp. Verb.: De Compositione Verborum

Diss. Abstr act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A guide to Dissertations and Monographs available in microfilm. Ann Arbor, Michigan.

Eddy: S. K. Eddy, *The King is Dead. Studies in the Near Eastern Resistance to Hellenism, 334-331 B.C.* Lincoln, Nebraska, 1961.

Eur.: Euripides, Athenian tragic playwright (c. 425-406 B.C.).
Androm.: Andromache
Hipp.: Hippolytus
IA: Iphigeneia at Aulis

Eustath.: Eustathius, Metropolitan of Thessalonica (d. c. A.D. 1194).

Festschr.: *Festschrift*.

FGrH: F. Jacoby,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1923- Leiden, Brill.

fl.: *floruit*.

Front.: Sextus Julius Frontinus, Roman consul and technical writer (c. A.D. 30-104).
Strat.: Strategemata

Fuller: J. F. C. Fuller,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58.

F[orsch.] u nd F[ortsch r.]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Berlin, AkademieVerlag.

Geogr. Jour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Geographic Society.

GR: *Greece and Rom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By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Grote, *HG:* G.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Rev. edn, 12 vols. London, 1888.

- Hamilton, J. R. Hamilton, *Plutarch: Alexander*. A
PA: Commentary. Oxford, 1968.
- Hammond,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2nd edn. Oxford, 1967.
HG:
- Hammond, N. G. L. Hammond, *Epirus. The geography, the ancient remains, the history*
Epirus: *and topography of Epirus and adjacent areas*. Oxford, 1967.
- Harv. Theo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 Rev.:
- Harv. Stud.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
[Class. Phil ity Press.
.]:
- Hdt: 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 Greek historian (c. 485-c. 425 B.C.).
- Head-Hill- A Guide to the Principal Coins of the Greeks from circ. 700 B.C. to A.D. 2
Walker, Gu 70. Based on the work of B. V. Head, rev. G. F. Hill, John Walker. London,
ide: British Museum, 1959.
- Hellenica.: Ἑλληνικά. Φιλολ., ἱστορ. καὶ λαογρ. Περιοδικὸν Σύγγραμμα τῆς Ἑταιρείας
Μακεδονικῶν Σπουδῶν. Thessalonica.
- Hermes: Hermes. Zeitschrift für klassische Philologie. Wiesbaden.
- Hesperia: Hesper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A
thens American School.
- Historia: Historia. Wiesbaden.
- Hist. Ret.: History of Relig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st. Today History Today. A monthly magazine. London, Bracken House.
:
- Hist. Zeitsc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Munich, Oldenbourg.
hr.:
- Hogarth: D. G. Hogarth, *Philip and Alexander of*
Macedon. New York, 1897.
- Homer, Il.: Homer, *The Iliad*.
- Homer, Od. Homer, *The Odyssey*.

: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Roman poet
(65-8 B.C.).

Epp.: Epistulae

AP: Ars Poetica

Hypereides Hypereides, Athenian orator (389-322 B.C.).

:

Eux.: pro Euxenippo

IG: *Inscriptiones Graecae*, 1873-

ii²: *Editio minor* of vols. ii and iii, ed. J. Kirchner, 1913-35.

Inform. Hist.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Paris.

t.:

Isocr.: Isocrates, Athenian orator and pamphleteer (436-338 B.C.).

Epist.: Epistulae [Letters]

Ep. Phil.: Epistulae Philippo (Letters I and II to Philip]

Panath.: Panathenaicus

Paneg.: Panegyricus

Phil.: Philippus

Jahr. Oest. Arch. Inst.: *Jahreshefte des Oesterreichi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Vienna.

JBerlM: *Jahrbuch der Berliner Museen*. Berlin.

JH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London.

JNG: *Jahrbuch für Numismatik und Geldgeschichte*. Kallmünz.

Josephus: Flavius Josephus, Romanized Jewish historian (first century A.D.).

Ant. Jud.: Antiquitates Judaicae

Journ. Austral. *Journal of the Australas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s Association*.

Univ.

Lang. Assoc.

c.:

Jul. Val.: Julius Valerius Alexander Polemius, Latin author (third-fourth century A.D.).

Justin: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Latin epitomator (? third century A.D.).

- Klio*: *Klio*. Beiträge zur alten Geschichte. Berlin, Akademie-Verlag.
- Lucian*: Lucianus of Samosata, Aramaic-Greek writer (c. A.D. 120-c. 180).
Cal.: *Calumniae non temere credendum*
Quom. Hist. Conscr.: *Quomodo historia conscribenda sit*
Rhet. Praec.: *Rhetorum Praeceptor*
- Lycurg.*: Lycurgus, Athenian statesman and orator (c. 390-c. 325/4 B.C.).
In Leocr.: *In Leocratem*
- Lydus*: Ioannes Laurentius Lydus, Greek writer
(sixth century, A.D.).
De Mens.: *De Mensibus*
- MAO*: *Minor Attic Orators*. Vol. I: Antiphon, Andocides, ed. K. J. Maidment, London, 1941. Vol. II: Lycurgus, Demades, Dinarchus, Hyperides, ed. J. O. Burtt, London, 1954 (Loeb).
- MDAI(A)*: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 (Athen. Abt.)*, Berlin.
- MDAI(R)*: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 (Röm. Abt.)*, Berlin.
- Milns*: R. D. Milns,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68.
- MP*: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main problems*. Ed. G. T. Griffith. Cambridge, 1966.
- Nat. Geogr. Mag.*: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New York.
- Nouv.Clio*: *LA Nouvelle Clio*. Brussels.
- ns*: New Series.
- Olmstead*: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1948.
- Opus [cula]* *Opuscula Archaeologica*, Lund.
Arch[aeologica]:
- Orac. Sib.*: *Oracula Sibyllina*.
- Parke*: H. W. Parke, *Greek Mercenaries*, Oxford, 1933.
- PP*: *LA Parola del Passato*. Rivista di Studi antichi. Naples.

- Paus.: Pausanias of (?) Lydia, Greek travel-writer (second century A.D.).
- Philostratus : Flavius Philostratus, Greek writer (second-third century A.D.).
Vit. Apoll. Tyan.: *Vita Apollonii Tyanae*
Vit. Soph.: *Vitae Sophistarum*
- Phoenix:* *The Phoenix*. The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Plato: Plato, Athenian philosopher (c. 429-347 B.C.).
Gorg.: *Gorgias*
Protag.: *Protagoras*
Rep.: *Respublica* [*Republic*]
Symp.: *Symposium*
- Pliny: Gaius Plinius Secundus [Pliny the Elder], Roman scholar and antiquarian (A.D. 23/4-79).
HN: *Historia Naturalis*
- Plut.: (?) Mestrius Plutarch us of Chaeronea, Greek scholar and biographer (c. 46 B.C.-c. A.D. 120).
Moral.: *Moralia*
Vit. Par.: *Vitae Parallelae*
Ages.: *Agesilaus*
Alex.: *Alexander*
Artax.: *Artaxerxes*
Cam.: *Camillus*
Demosth.: *Demosthenes*
Eum.: *Eumenes*
Lys.: *Lysander*
Pelop.: *Pelopidas*
Per.: *Pericles*
Phoc.: *Phocion*
Pyrrh.: *Pyrrhus*
- Polyaenus: Polyaenus, Macedonian rhetorician (second century A.D.).
Strat.: *Strategemata*
- Polyb.: Polybius, Greek statesman and historian
(? 203-? 120 B.C).

- P. Oxyrh.*: *Oxyrhynchus Papyri*, ed. B. P. Grenfell and A. S. Hunt. London, 1898-
- Proc. Afr. Class. Asso*: *Proceedings of the African Classical Association*. Salisbury, S. Rhodesia.
- c.*:
- Proc. Brit. Aca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oc. Camb. Phil. Soc.*: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s-[Arist.] Oecon.*: Pseudo-Aristotle, *Oeconomicus*.
- Ps-Call[isth.]*: Pseudo-Callisthenes, title given to anonymous author of the 'Alexander-Romance'.
- PWK[RE]*: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Ed. A. Pauly, Georg Wissowa, W. Kroll, K. Mittelhaus, K. Ziegler. Stuttgart [1839], 1893-.
- Quintil.*: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Roman rhetorician (c. A.D. 30-c. 100).
Inst. Orat.: *Institutio Oratoria*
- QC*: Quintus Curtius Rufus, Roman Alexander-historian (first century A.D.).
- RA*: *Revue Archéologique*. Paris.
- Radet, AG*: G. Radet, *Alexandre le Grand*. 2nd edn. Paris, 1950.
- REA*: *Revue des Etudes Anciennes*. Bordeaux.
- REG*: *Revue des Etudes Grecques*. Paris.
- Rev. Bibl.*: *Revue Biblique*. Paris.
- Rev. Phil.*: *Revue de Philologie*. Paris.
- RFIC*: *Rivista di Filologia e di Istruzione Classica*. Turin.
- Rhein. Mus.*: *Rheinisches Museum*. Frankfurt.
- :*
- Riv. Fil.*: *Rivista di Filosofia*. Turin.

Riv. Stor. It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Naples.
al.:

Robinson, C. A. Robinson (ed.),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vol. I [Brown University Studies XVI], Providence, R.I. (1953).
HA:

Saeculum: *Saeculum. Jahrbuch für Universalgeschichte*. Freiburg.

Sallust: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Roman historian (?86-35 B.C.).
Bell. Iug.: *Bellum Iugurthinum* [Jugurtha].

schol.: scholium, scholiast.

SE: *Studi Etruschi*. Florence.

SEG: *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Leyden, 1923-71.

Seltman, G C. Seltman, *Greek Coins*. 2nd edn. London, 1955.
*C*²:

Seneca: Lucius Annaeus Seneca, Roman philosopher and moralist (4 B.C.-A.D. 65).
De Benef.: *De Beneficiis*.

Sext. Emp.: Sextus Empiricus, Greek doctor and philosopher (? first-second century A.D.).
Adv. Math.: *Adversus Mathematicos*
Adv. Gramm.: *Adversus Grammaticos* [= Bk I of *Adv. Math.*]

*SIG*³: W. Dittenberger, *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3rd edn, Leipzig, 1915-24.

Sitzungsb.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hist. class.*
d. preuss. Akad.:

Snodgrass: A. M. Snodgrass, *Arms and Armour of the Greeks*, New York, 1967.

Snyder: J. W. Snyder,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1966.

Stark, AP: Freya Stark, *Alexander's Path*, London, 1958.

Stud. Class. e Orient.: *Studi Classici e Orientali*. Pisa.

Symb. Osl.: *Symbolae Osloenses*. Oslo.

- TAPh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Cleveland, Ohio.
- Tarn, [AG]: W. W.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2 vols., Cambridge, 1948.
- Temenos: *Temeno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presented by scholars in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Helsinki.
- Theophr.: Theophrastus, Greek philosopher and scientist (c. 370-288/5 B.C.).
HP: Historia Plantarum
- Thuc.: Thucydides, Greek historian (c. 460-c. 400 B.C.).
- Tod, II: M. N. Tod,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vol. II: From 403 to 323 B.C. Oxford, 1948.
- Val. Max.: Valerius Maximus, Roman historian (first century A.D.).
- Vell. Pat.: Velleius Paterculus, Roman historian (first century B.C.-first century A.D.).
- Vet. Test.: *Vetus Testamentum*. Leiden, Brill.
- Virgil, Aen.: P. Vergilius Maro, 70-19 B.C., *The Aeneid*.
:
- Wilcken-[Borza]: U. Wilcken, *Alexander the Great*. Trs G. C. Richards. New ed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bibliography by E. N. Borza. New York, 1967.
- Xen.: Xenophon, Athenian soldier and historian (428/7-c. 354 B.C.).
Anab.: Anabasis
Hell.: Hellenica
- Yale Class. Stud.: *Yale Classical Stud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Zeitschr. f. Alttest. Wiss.: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Berlin.

年 表

- 356 亚历山大诞生于佩拉。确切日期不清楚，但可能是7月20日或26日。
腓力占领波提狄亚。
帕美尼翁打败派奥尼亚人和伊利里亚人。
- 354 德摩斯提尼抨击“反波斯远征军”的理念。
仲夏？：腓力占领墨托涅；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
- 352 阿尔塔巴佐斯和门农在腓力那里避难，后者现在成了反波斯远征军的潜在领导者。
- 351 腓力的舰队袭扰雅典的船只。
德摩斯提尼发表《斥腓力辞一》。
- 348 8月：腓力占领奥林托斯。
埃斯基涅斯联合希腊城邦对抗腓力的尝试失败。
- 346 3月：雅典派遣使团出使腓力。
哈罗斯被帕美尼翁围困。
4月：菲罗克拉特斯和约得到批准。
第二个雅典使团被扣留到7月份。
7月：腓力占领温泉关。
8月：腓力同意加入近邻同盟议事会，并主持皮托赛会。

- 伊索克拉底发表《致腓力辞》。
- 344 腓力被任命为塞萨利终身执政官。
- 343 腓力与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埃斯基涅斯的受审和开释。
- 343/342 亚里士多德受邀到马其顿做亚历山大的导师。
- 342/341 奥林匹娅斯的兄弟亚历山大在腓力的支持下继承伊庇鲁斯的王位。
- 340 同盟大会在雅典召开。
亚历山大被留下来做马其顿的摄政：他突袭迈狄人并建立亚历山德罗波利斯。
腓力征讨佩林托斯和拜占庭。
- 339 9月：腓力占领厄拉特亚。
伊索克拉底发表《泛雅典人节集会辞》。
- 338 8月2日？：喀罗尼亚战役。
亚历山大作为使节之一出使雅典。
腓力迎娶阿塔罗斯的侄女克里奥帕特拉。
奥林匹娅斯和亚历山大流亡国外。
- 337 春天：希腊同盟在科林斯召开会议。
亚历山大被召回佩拉。
冬天：科林斯同盟批准反波斯远征军。
- 336 春天：帕美尼翁和阿塔罗斯被派往小亚细亚进行军事准备行动。
6月：大流士三世科多曼诺斯即位。
克里奥帕特拉为腓力生下一子。
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与奥林匹娅斯女儿结婚。
腓力遇刺。
亚历山大登上马其顿王位。

- 夏末：亚历山大在科林斯召集希腊同盟会议，被确认为反波斯远征军的统帅。
- 335 早春：亚历山大北上对付色雷斯和伊利里亚。
忒拜反叛。
- 334 亚历山大和进攻部队渡海进入小亚细亚（3—4月）。
5月：格拉尼科斯河战役。
得到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的普遍承认。
围攻并占领米利都。
秋天：征服哈利卡那索斯。
- 334/333 亚历山大穿过吕西亚和潘菲利亚。
- 333 亚历山大的军队北上刻莱奈和戈尔狄昂。
门农去世（早春时候）。
波斯军队在巴比伦集结。
戈尔狄昂之结事件。
亚历山大行军到安库拉并从那里南下到奇里乞亚关。
大流士从巴比伦西行。
9月：亚历山大到达塔尔索斯；他在那里生了病。
- 333 大流士渡过幼发拉底河。
9—10月？：伊索斯战役。
亚历山大南下通过腓尼基。
马拉托斯：大流士的第一次提出和谈。
- 332 1月？：比布罗斯和西顿归顺。
提尔围城开始。
6月？：大流士第二次和谈条件被拒。
7月29日：提尔城陷落。

- 9—10月：加沙被占领。
- 11月14日？：亚历山大在孟菲斯加冕为法老。
- 331 早春：拜访西瓦的阿蒙神谕所。
- 4月7—8日？：亚历山大里亚奠基。
- 亚历山大回到提尔。
- 7—8月：亚历山大抵达幼发拉底河边的塔普萨科斯；大流士从巴比伦调动大军。
- 9月18日：亚历山大渡过底格里斯河。
- 大流士最后一次和谈被拒。
- 9月30日或10月1日：高加美拉战役。
- 马其顿军队从阿比拉进军巴比伦，该城于10月中旬陷落。
- 阿吉斯的反叛败于麦伽罗波利斯。
- 12月初：亚历山大未遇抵抗地占领苏萨。
- 331/330 亚历山大强行通过苏西亚关。
- 330 1月？：亚历山大抵达并洗劫波斯波利斯。
- 5月？：焚毁波斯波利斯的神庙等。
- 6月初：亚历山大启程前往埃克巴塔那。
- 大流士退往巴克特里亚。
- 希腊盟军在埃克巴塔那被解散；帕美尼翁被留在那里，哈尔帕罗斯也留下来担任财政官。
- 继续追击大流士，通过卡斯比亚关。
- 7月（15日后）：大流士在赫卡通皮罗斯附近被杀。
- 贝索斯在巴克特里亚自立为“波斯大王”。
- 开始向叙尔卡尼亚行军（7—8月）。
- 8月底：行军至德兰吉亚纳（锡斯坦湖）。

“菲罗塔斯阴谋”。

通过阿拉霍西亚行军至帕拉帕米西代。

329

3—4月：亚历山大通过哈瓦克山口翻越兴都库什山脉。

4—5月：亚历山大进入巴克特里亚；贝索斯撤退到奥斯苏斯河对岸。

6月：亚历山大抵达并渡过奥克苏斯河；老兵和塞萨利志愿兵被解散。

贝索斯被交出。

亚历山大进入马拉坎达（撒马尔罕）。

斯皮塔美涅斯反叛，马其顿分队被歼灭。

329/328

亚历山大在扎里亚斯帕过冬。

处决贝索斯。

328

征讨斯皮塔美涅斯。

秋天：黑面的克雷托斯被杀。

328/327

斯皮塔美涅斯失败被杀。

327

春天：占领索格底亚那石堡。

亚历山大与罗克姗娜结婚。

招募30000名波斯“继承者”。

“侍从们的阴谋”和卡利斯特涅斯的结局。

初夏：亚历山大通过库山山口再次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入侵印度开始。

327/326

亚历山大抵达尼撒（杰拉拉巴德）；“狄奥尼索斯事件”。

占领阿奥尔诺斯（皮尔-萨尔）。

326

进入塔克西拉。

对战印度王公波洛斯的叙达斯佩斯河（杰赫勒姆河）战役。

布凯法拉斯去世。

7月？：叙伐西斯河（贝亚斯河）抗命。

返回杰赫勒姆河；援军从希腊前来。

11月初：舰队和军队往下游走。

326/325 征讨婆罗门城市；亚历山大严重受伤。

325 巴克特里亚反叛：3000名雇佣兵逃散在亚洲。

亚历山大抵达帕塔拉，建设港口和船坞。

9月？：亚历山大行军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

哈尔帕罗斯从小亚细亚叛逃到希腊。

总督清洗开始（12月）。

涅阿尔科斯和舰队抵达哈尔摩吉亚，在萨尔摩斯（古拉什基尔德）与亚历山大取得联系。

克拉特洛斯从德兰吉亚纳抵达。

324 1月：涅阿尔科斯和舰队被派往苏萨。

居鲁士陵墓事件。

亚历山大返回波斯波利斯。

来到苏萨，在此长时间停留（2—3月）。

春天：30000名经过训练的波斯“继承者”抵达。

苏萨集体婚礼。

3月：发布流亡者法令和神化法令。

克拉特洛斯受命接替安提帕特做摄政，护送军队回乡。

亚历山大从苏萨前往埃克巴塔那。

赫淮斯提翁去世。

323 哈尔帕罗斯在克里特遇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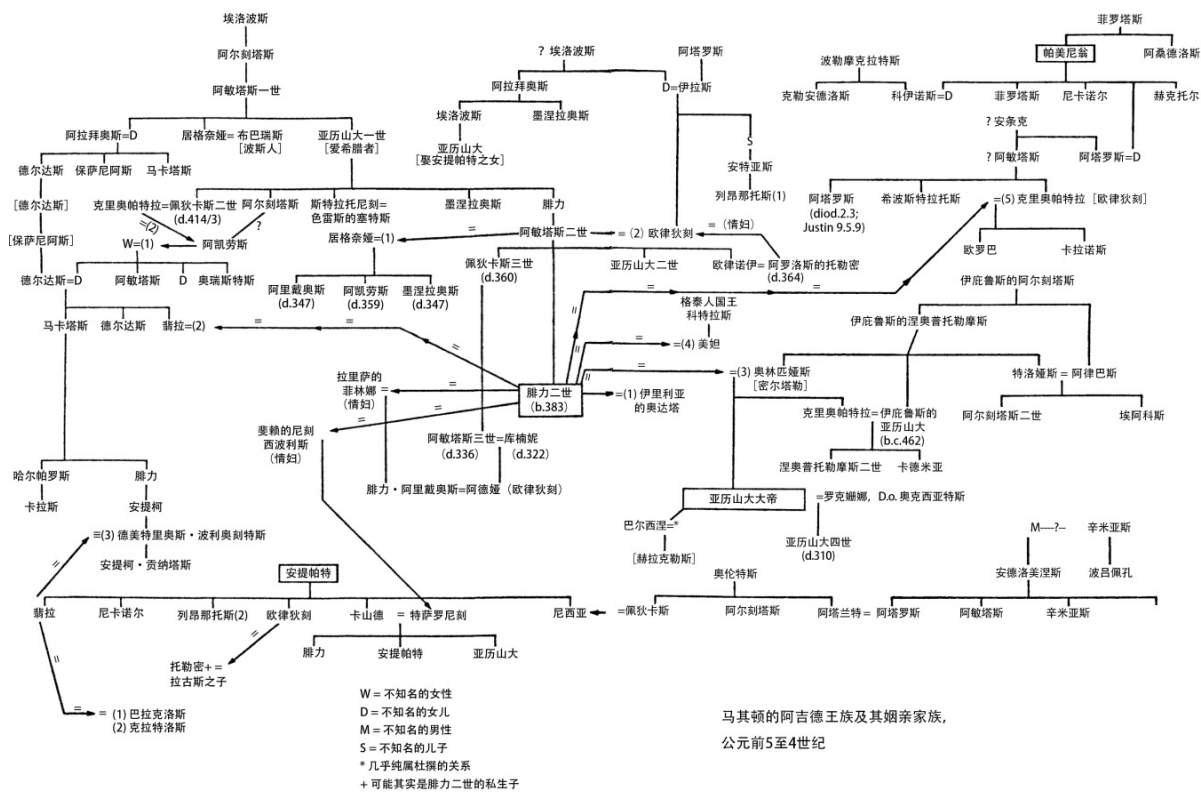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征讨科塞奥斯人，并返回巴比伦（春天）。

亚历山大开凿帕拉科帕斯运河；在沼泽中航行。

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来向亚历山大陈情。

5月29/30日：亚历山大在一次聚会后生病，并于6月10/11日去世。

谱系图



第一章 马其顿的腓力

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与他的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II）及祖国马其顿密不可分。腓力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最为了不起的主宰人物；而马其顿，正如当代人所评论的那样，¹“是欧洲大陆出现的第一个拥有真正的集中的政治、军事及行政体制的地域大国”。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内容，否则对我们来说，亚历山大的一生只不过是一颗彗星，这颗彗星曾以无比恢弘的气势划过天际：令人惊叹，但难以理解。亚历山大完全是个天才；但是，天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环境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腓力和马其顿塑造了亚历山大，因此我们必须从他们讲起。

公元前356年9月初的一天，²一位信使从马其顿的新都佩拉疾驰而出，身上携带着给国王的急件。他奔向东南方向，穿越大平原，渡过雅尼扎湖（那时，人们称其为“波耳波罗斯湖”或“泥湖”。这对超爱一语双关的希腊人来说无疑是个天赐的妙词：*borboros-barbaros*，简言之就是粗野和原始）；在遥远的天际，奥萨山和奥林波斯山闪耀着白光。薛西斯（Xerxes）也曾目睹这样的景象；当年他一马当先，统率侵略大军，在荷马所说的“水流广漠的阿克西奥斯河”畔安营扎寨。信使没有耽搁任何时间就到达了目的地波提狄亚。这是卡尔基狄刻半岛上的一座城市，马其顿军队正驻扎在这里。自公元前359年以来，腓力就一直统治着马其顿这个统一但不甚稳定的国家。³腓力是阿敏塔斯（Amyntas）的儿子，为人严苛，对手下人的延误或拖拉从不手软。然而现在，在刚刚迫使

波提狄亚投降后，他的情绪和善很多，还有可能喝了很多酒。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波提狄亚都是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诸强的争夺对象，是马其顿稳步扩张的领土中最有价值的新收获。

如果信使从未见过腓力本人，那他恐怕很难在贵族同侪和参谋人员当中认出腓力。腓力穿戴着紫色披风和宽边帽子，这同样也是马其顿贵族日常穿戴。他不爱佩戴任何王室徽记，也不喜欢任何尊称，总是让人直呼其名，而且实际上他从未在任何官方文件中将自己称作“国王”。⁴我们常常可以用迈锡尼来类比马其顿，这里也是如此：⁵腓力与那些不安分的贵族处于同一等级，他是他们的最高领主，以瓦纳克斯（*wanax*，“王”）的身份维持着脆弱的权威。或许他也觉得他的地位，尤其是在佩拉派系林立的封建宫廷中的地位，不宜规定得太过严格。他的争位者一直在散播谣言，说他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篡位者——那两位兄弟是他之前的国王，都死于非命。⁶有关私生子的指控是马其顿权力游戏中的一件常见武器。

腓力现在27岁了，他强壮、好色、胡子浓密，经常沉溺于酒色，有时突发幻想，还会狎昵变童。腓力平时就性情快活，在阅读了信使带来的急讯后，他更有理由高兴起来。他最可靠的将军帕美尼翁（*Parmenio*）赢得了与伊利里亚和派奥尼亚联军的决战；他们是马其顿征程上最强大的部落，占据着大约与现代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相当的领土。在刚刚结束的奥林匹亚赛会上，他的赛马参赛者赢得了第一名。而最令他高兴的是，7月20日⁷他的妻子密尔塔勒（*Myrtae*），也就是我们通常更为熟知的奥林匹娅斯（*Olympias*），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就叫亚历山大（这名字之前阿吉德王朝的两位君主已经使用过了）。

在读完急讯后，据说腓力曾乞求命运女神给他一些小伤害，以抵消如此势不可挡的恩惠。⁸也许他回想起了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教训：波吕克拉特斯收到一封来自埃及法老阿玛西斯（*Amasis*）的信，信中表达了他过分好运的忧虑。阿玛西斯说：“我从未听说

有人可以好运连连，最终还能免于灭顶之灾。”阿玛西斯建议波吕克拉特斯扔掉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波吕克拉特斯便将一个绿宝石戒指投入大海，但过了一周他在一条鱼的腹中又拾回了戒指。⁹于是阿玛西斯迅速终止了他们的联盟。而波吕克拉特斯的结局则是被一名波斯总督施以刺刑。因而，在那份重大急讯所列的三件事情中，我们知道腓力仅仅公开庆祝了他在奥林匹亚的胜利，这虽说不算性格反常，但仍然有些奇怪。马其顿王家铸币厂发行了一款新银币：银币正面是宙斯的头像，反面则是一匹硕大而精神饱满的骏马，相比之下它的裸体骑师身量较小，头上戴着胜利花环，手中挥舞着棕榈枝条。¹⁰

那么对他而言，是什么赋予了这三个特殊事件如此重大、几乎是象征的意义呢？为了理解国王的反应，有必要暂且回顾一下，看看他登基之前马其顿的成败历史及其古老习俗。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在地理和种族上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地区：低地和高地。¹¹这一点可以拿苏格兰的情况来做一个直观而贴切的对比。下马其顿地区由平坦而富饶的环塞尔迈湾平原构成。这个平原流淌着两条大河，阿克西奥斯河（瓦耳达河）与哈利亚克蒙河（维斯特里扎河）；同时，平原三面山峦起伏，除了东面，那里流淌着第三条河流斯特里蒙河（斯特鲁马河），是它的第一条自然边界。下马其顿地区是王国古老的中心区，相传是牧牛地主们建立的，他们一望便知这是极好的牧场。马其顿地区如今则受阿吉德王朝统治，腓力就是王朝一员。大约公元前700年，这个高贵的部族为了寻找耕地，从品都斯山脉的奥瑞斯提斯向东迁徙而来。他们最初占据了奥林波斯山以北的滨海平原皮埃里亚，随后进一步征服了塞尔迈湾以西的冲积平原波提埃亚，亦即荷马所说的厄马提亚。在扩张的过程中，他们也占领了堡垒城镇伊德沙，该城风景如画，屹立于西北边界。这个地区果园漫山遍野，葡萄园星罗棋布，它如此富饶，因此被人们称为“弥达斯花园”^①。伊德沙还有不容忽视的战略价值，它位处关隘，控扼着通往伊利里亚和西方的横贯巴

尔干的干道，亦即后来罗马的厄格那提亚大道。¹²在伊德沙附近，阿吉德王朝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首都——埃盖。甚至在政府所在地已经下移到平原上的佩拉后，埃盖仍然是马其顿国王的神圣陵寝所在地，所有重要的王室礼仪都在那里举行。¹³

上马其顿地区和派奥尼亚则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是一片高原和草场，如同一块马蹄铁，从南到东北包围着平原；而它自身枕崇山，靠峻岭，唯独在东面例外，即斯特里蒙河那边。若要翻越这些大山，只能通过少数几个山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林波斯山的滕比山谷和厄格那提亚大道途经的关隘。因此，马其顿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孤立于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就像斯巴达一样，它保留着许多在其他地区已经废止了的制度，诸如王权和贵族封建制度。高地主要处在中心平原的西面和西南，最初分为三个独立自治的王国：南部的厄利密奥提斯，西部和西北部的奥瑞斯提斯和林刻斯提斯，后者傍着吕克尼提斯湖。林刻斯提斯的北面与派奥尼亚接壤，同时这三个地区还共同挨着伊利里亚和伊庇鲁斯。事实上，从各方面来说，它们的居民更近似于伊利里亚人、派奥尼亚人以及色雷斯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低地同胞。下马其顿人崇拜希腊诸神；他们的王室自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而高地居民却更热衷于色雷斯的神灵——萨巴吉奥斯（Sabazius）、克罗多涅斯（Clodone s）和密马罗涅斯（Mimallones）；他们狂野欢纵的崇拜活动非常类似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酒神的伴侣》（*Bacchae*）中所描绘的情景。实际上，他们算是有部分伊利里亚血统，而且较之平原上的马其顿人，色雷斯人和伊庇鲁斯人才是他们更常通婚的对象。

最初，这三个地区都曾是相互独立的王国，各自有着野心勃勃、世系显赫的王族。他们一直努力保持——或者说不断申明——他们的独立地位；这自然会促使他们与伊庇鲁斯人、派奥尼亚人或者伊利里亚人联合起来。同样地，下马其顿的统治者们也决心要兼并这些“域外王国”，无论通过征服、政治劝诱，还是王室联姻。¹⁴林刻斯提斯受巴齐亚德王朝的子孙统治，他们于公元前657年被逐出科林斯，随后来到了马其顿

。 ¹⁵在特雷贝尼什特，人们发掘出大量的黄金面具和墓葬器具，其年代约在公元前650—前600年之间； ¹⁶这些人犹如塞浦路斯的国王们，是有权有势的君主，因袭着真正的荷马传统。挨着奥瑞斯提斯和厄利密奥提斯边境的伊庇鲁斯由莫罗西亚王朝统治，他们自称是阿基琉斯（Achilles）的后裔，传承自他的孙子皮洛士（Pyrrhus）——此事对年幼的亚历山大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他的母亲奥林匹娅斯正是出身于莫罗西亚一系。

如我们所见，阿吉德王朝将自身的血统追溯至赫拉克勒斯，又因为赫拉克勒斯是宙斯的儿子，于是他们像所有的迈锡尼君主那样，将自己标榜为“宙斯之裔”，所以宙斯和赫拉克勒斯便经常出现在腓力的铸币上。但很显然，还有其他的部族对统一的马其顿的王位的诉求也有一定的可信性。从阿吉德王朝的视角来看，除了将上马其顿纳入某种程度的中央控制之下，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看起来矛盾的是（虽然原因本身很显然），这个目标越是近乎实现，某位走投无路的域外王国君主为了保住王位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宫廷政变的危险就越大。

至少到公元前5世纪时，阿吉德王朝就一直宣称拥有对上马其顿的“传统”宗主权，这种“传统”同样是建立在类荷马式的世系之上。他们的领主地位非常类似于阿伽门农凌越于诸王之上的地位：每个地区献予阿吉德王朝的忠诚，和任何君主个人所能要求得到的忠诚一样多。这些域外王国即便没有积极支持，至少也十分倾向于默许伊利里亚人和派奥尼亚人的入侵。除此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发生在阿吉德宫廷中，常常以流血的杀戮和篡权告终；同时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在腓力之前马其顿在希腊历史上扮演了那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个国家极为原始，保留着许多连斯巴达人见了都会惊愕不已的风俗和制度。例如，为了对军队进行正式净化，祭司会将一条狗劈成两半，然后部队就在这劈开的两半之间行进。此外还有各种各样仪式性的战争舞蹈，本质上是对战争的模仿，但对现代读者来说，它们却无疑有着一种祖鲁人的风情。

对于这块半荷马式的飞地，城邦中的希腊人持一种温和而复杂的轻蔑态度。大体上，他们视马其顿人为半野蛮人，说话笨拙，方言粗野，在政治制度上倒行逆施，是无足轻重的战士，积习难改的背信之人，这些人身着熊皮，豪饮浊酒，暗杀与乱伦恒常发生。雅典人则抱着一种更加乐善的心态，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看待阿吉德宫廷将自身希腊化的企图，如同某位名门贵族款待殖民地的制糖大亨。没有人曾忘记，那位以“爱希腊”闻名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曾十分讽刺地被奥林匹亚赛会拒于门外，直到他编造了一份将阿吉德王室与古代阿尔戈斯国王联系起来的谱系。¹⁷

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马其顿的事迹也很难提升她在热爱城邦的希腊人中的身份地位。亚历山大一世曾全心全意地与波斯人合作，将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波斯总督，并且在薛西斯的军队中充当随军联络人——不过当希腊人似乎有望获胜时，他也会小心翼翼地两面下注。¹⁸在普拉塔亚战役后，他攻击了正在撤退的波斯人，在斯特里蒙河下游的九道（Ennea Hodoi）歼灭了他们中的一大部分。随后他用战利品在德尔菲竖立了一尊金质的个人塑像，以强调他站在正义一方，为对抗蛮族人而战斗（哪怕是在最后一刻）。¹⁹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他还利用波斯人撤退之机，在西边臣服了品都斯山中的部落，在东面制伏了色雷斯的比斯托奈和克瑞斯托尼亚，这样几乎把他王国的领土扩大了四倍。从斯特里蒙河下游的银矿中，他现在每天能征得高达一塔兰特^② 银的收入。他开始以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是第一个这么做的马其顿君主。这些皆是斐然可观的业绩，但都不是那种能在希腊城邦中为他赢得声望的成就。而他的继任者们则甚至给人一种更加蝇营狗苟的形象。他的儿子佩狄卡斯二世（Perdiccas II）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反复摇摆，屡换阵营，为此有个现代学者精心制作了一个表格，以表明在任一节点时他到底站在哪一边。²⁰雅典的民主派必定会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能干什么呢？更不要提那令人不堪启齿的阿凯劳斯（Archelaus），他是佩狄卡斯的私生子，靠谋杀他的叔父、侄子和异母兄弟而

获得王位，进而又娶了他父亲的遗孀，最后因自己耸人听闻的同性恋计谋而被害死。²¹

然而，正是佩狄卡斯和阿凯劳斯的统治为我们揭示了马其顿的真正潜力。佩狄卡斯之所以能反复变换阵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大量掌握着一种双方都迫切需要的基本原材料：造船和桨橹所需的上等的马其顿冷杉。上马其顿地区是大陆性气候而非地中海气候，古时候它的山上覆盖着浓密的原始森林，如今尚有遗迹可寻。佩狄卡斯曾竭力地与雅典建立同盟协定和友好关系（Thuc. 1.57.2），虽然对这种协定，双方都以背信而非守誓为荣。如果说马其顿国王表现得出尔反尔，那么这与雅典一方的侵扰不无关系。公元前437年雅典人建立了安菲波利斯，三年后又占领了墨托涅，于是他们可以直接对马其顿施加压力；在公元前413年之前，雅典人一直禁止佩狄卡斯在没有雅典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出口木材（他们维持了垄断）。²²然而从长远来看，佩狄卡斯才是交易的最大受益者，他以冷酷的玩世态度挑拨斯巴达与雅典相互对抗，同时出售木材给双方，缔结和撕毁专卖协议有如儿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也极力避免使马其顿过分卷入其中，以免耗尽自己的人力资源，正是这种损失严重削弱了当时战斗双方。所以，当腓力说出下面这话时，想必他脑海中就闪现着佩狄卡斯的榜样：“欺少年以骰子，诈成人以誓约。”²³

很难看出佩狄卡斯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在他统治期间，马其顿依然四分五裂、虚弱不堪，连像样的抵抗都谈不上，更不必说任何形式的扩张了。至少他设法保护了国家的自然资源——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相当大的成绩。但是，第一次以现实主义的洞察力明确提出根本问题的却是阿凯劳斯，如果马其顿想在希腊事务上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强权，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阿凯劳斯本人就致力于此。当然，亚历山大一世已经指出了方向，而且不仅仅是在领土扩张方面。他费力地使马其顿被接纳为希腊家庭的一员（主要是通过阿吉德王朝和阿尔戈斯之间建立起一种虚构的联系），鼓励希腊人到马其顿的土地上定居，这项政策也为佩狄卡斯和阿凯劳斯所遵循。尤为特别的是，他为品达（Pindar）和巴

库利得斯（Bacchylides）这样杰出的艺术家提供了极为诱人的赞助。²⁴ 他的总策略非常清晰：拓展疆界，同时改善马其顿在国外的文化形象。

当阿凯劳斯于公元前413/412年^③登基时，雅典已不再构成直接的威胁：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导致了这一局面。现在当她的执政者与马其顿国王接洽时，他们是作为请求者而来，极需船用木材：一个授予了阿凯劳斯“指定代表和赞助人”的荣誉称号的法令和诡诈的雅典政治家安多基得斯（Andocides）所提供的证据都表明（在公元前407/406年）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²⁵但是，保卫国家抵抗野心勃勃的邻国的不断侵犯依旧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既要加强军队，又要实现上下马其顿的永久统一。亚历山大一世已经把古老的“侍友”（*hetairoi*）^④ 风俗建制化了；他把服侍国王的地主贵族转变成了正式的骑兵队伍，组成著名的侍友骑兵。很可能也是他首先创立了同等的步兵团体，即“步战侍友”（*pezetairoi*），他把新征服地区的大量土地赐予各个等级的侍友，以此确保新拓边境的稳定。同时正如埃德森（Edson）所指出的，²⁶“通过这些赏赐，他提升了王室的威信，加强了马其顿人对他以及阿吉德家族的忠诚”。阿凯劳斯似乎已经改善了军队、马匹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给养。他还建立了一个由道路与设防站点构成的网络，其中有着双重目的：既可以促进交通，又能够让他牢牢控制住桀傲不驯的封臣们。²⁷不管以武力还是外交手腕，他与诸域外王国确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协定，故而在他的统治末期（公元前400/399年），他便准备通过侵害塞萨利和卡尔基狄刻同盟来夺取一小片“生存空间”。

阿凯劳斯很清楚，要想让更先进的希腊城邦开始平等对待马其顿，更深程度的希腊化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宣传计划。在皮埃里亚的狄翁，他设立了一个特别的马其顿节日，敬献给九位缪斯女神，并大胆冠名为“奥林匹亚的”。和其同名节日一样，它提供了体育和音乐的竞赛。像古代的许多僭主一样，他自命为一名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开明赞助者。著名画家宙克西斯（Zeuxis）便受委托去装

饰他的宫殿。其他定居于马其顿的卓越人物还有悲剧诗人阿伽通（Agathon）和如今已是八旬老人的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这等天才之终曲可谓动人心脾，能赢得如此回报的赞助恐怕凤毛麟角。阿凯劳斯宫廷的奢华与浪费臭名昭著，但很少有人能拒绝得了那里的邀请。（事实上，如果阿里斯托芬对阿伽通柔弱习性的刻画稍微切近真相，那么他在阿凯劳斯的陪伴下想必会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便是苏格拉底，他表示他不愿接受他回报不了的恩惠，这很符合他的性格。²⁸

但是在阿凯劳斯被刺杀后，他苦心经营的整个大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前所未见的40年的混乱和阴谋暗算。从王朝角度来说，阿凯劳斯对王位的声称最多也只能说很弱，何况他的继任者还只是个孩子。域外王国的君主们看到了机会，于是见机而起。对此他们无可非难。对他们来说，阿凯劳斯所给的前景毫无吸引力。只要有机会，他们决不甘心沦为地方性的依附贵族；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极度厌恶前国王的希腊化政策。作为战士，他们腰缠绳索直到在战斗中杀死敌人；除非独自用矛刺杀一头野猪他们决不坐下与同伴割肉共餐；他们如维京人一样用牛角喝水饮酒——这样的人自然不是文化新兴的可用之材。²⁹

因此我们不免要怀疑，除了他的近臣，阿凯劳斯对艺术的支持是否曾在其他人的心中激起过一丝涟漪。绝大多数的马其顿贵族更醉心于更具男子气概的娱乐，诸如打猎、欢宴、临时起意的通奸等等。他们同样十分热衷与年轻男孩、必要时相互之间的鸡奸；但是他们从来不想让这种事情受到精神升华这种颓废的柏拉图观念的污染。³⁰在亚历山大的总部里，粗野的马其顿军官和希腊文职智士并存共事，一定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紧张气氛和敌对情绪（下见第163页、第372页及以下）。但即使这样，阿凯劳斯没有能确立一个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贵族们的违逆。国家收入——或者说国家收入的匮乏——也必须予以考虑。木材出口和采矿权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但并不足以弥补军备、对来访

名人的过度慷慨和全国范围的道路建设开支。不管怎样，阿凯劳斯似乎已经开始把王室土地转让出去，以换取临时的财政援助——后来亚历山大在发动远征前恢复过这种做法（下见第155—156页）。域外王国的贵族们对这样的机会尤为垂涎：与下马其顿的“御赐采邑”相比，阿凯劳斯不管提任何要求都是在贱价售卖。

在这种情况下，林刻斯提斯的君主埃洛波斯（Aeropus）担任阿凯劳斯的小儿子奥瑞斯特斯（Orestes）的“监护人”就不是什么无关紧要之事。到公元前396年为止，他们一直是联合执政。随后，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埃洛波斯除掉了奥瑞斯特斯独自进行统治。两年后他去世了，既然当时他的孙子已经成年，所以他竟然可能是自然死亡的。他的儿子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继承了他的位子，但很快就被阿吉德的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的孙子阿敏塔斯刺杀了。公元前394年，阿敏塔斯已年过五旬而将近六十了；大约30年前，他就曾与他狡猾的老叔父佩狄卡斯争过王位，但是没有成功。即使现在，他还是觉得继承王位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既然一度取得过马其顿的王权，林刻斯提斯王朝不经一番斗争是不会将其拱手相让的。在保萨尼阿斯之子的领导下，林刻斯提斯的贵族们召集伊利里亚人的军队来帮助他们，再一次将阿敏塔斯逐出了马其顿。但是公元前392年，在塞萨利人的支持下，他卷土重来——这一次便不再得而复失了。³¹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70年，虽说摇摇欲坠，但奇妙的是他竟挺了这么长时间。他晚年生了三个合法的儿子，这是非常必要的预防措施，因为他已经有三个私生子在打王位的主意了。在这几个老来子中最小的是腓力，即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生于公元前383/382年，那时阿敏塔斯都已经六十五岁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孩子都不合法的谣言了。

对老国王来说，生存的代价就是持久而公开的屈辱。起初，他设法通过偿付丰厚的岁币来阻拦伊利里亚人入侵。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与域外王国的反叛贵族勾结，那些人一心想要发动宫廷政变，好让林刻斯提斯家族得以回到王位上。事实上自公元前384年以来，伊利里亚就

事实上统治着林刻斯提斯自身的西部边陲；这是一块战略要地，处在吕克尼提斯湖（奥赫里德湖）和切尔纳河之间。阿敏塔斯还能倚赖剩下的域外王国厄利密奥提斯的帮助，因为它的首领德尔达斯（Derdas）是他的私人朋友。但是他不敢冒然发动一场全面内战。边界不清的马其顿东部地区他掌握得也并不牢固。公元前394/393年，在被武力驱逐之前，他已经把一片很有价值的边陲之地割让给了卡尔基狄刻半岛上实力最强的海军城邦奥林托斯，可能作为回报他换来了一定的军事援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有援助，那也来得太迟了些。在他最终夺回王位之后，他便索还这块地，理由是他只是将它委托给奥林托斯人直到他复辟。后者直接无视了他的声明，反过来还进一步蚕食了马其顿的土地。

最明显暴露马其顿此时之虚弱的，是阿敏塔斯在雅典和斯巴达等强权那里所受到的冷遇：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因为来自北方的特里巴利和其他野蛮部落既能侵扰马其顿，也能损害希腊人的利益。对雅典来说，马其顿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缓冲国，便于她处理与卡尔基狄刻和色雷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又是她的一个爪牙，帮助她牢牢控制住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粮运航线。当斯巴达决定要派一支远征军前去对抗奥林托斯时，他们并不是出于对阿敏塔斯的关心，而是因为（以奥林托斯为首的）卡尔基狄刻同盟的发展构成了色雷斯卫地区的一大威胁。公元前379年，奥林托斯投降了，卡尔基狄刻同盟暂时被解散了，而斯巴达人回国之后无疑自以为做了一项很有政治眼光的工作。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大概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致命的战略误判之一。40年后他们以及包括雅典和忒拜在内的所有其他城邦才幡然醒悟：他们致命地削弱了一个强权集团，这个集团本来有可能在马其顿真正开始迅速崛起之前就将其扼制住。认识总是来得太迟。

但就算是德尔菲的预言，在公元前379年也猜不到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众人皆云，阿敏塔斯是个笑话，如同他的大多数先辈一样，他们被视为见风使舵之人、背信弃义之徒、酒鬼、谋杀者、优柔寡断的守财奴，懦弱而无能的暴君——阿吉德王朝还没有赢得希腊公共舆论的尊重，

而阿敏塔斯在这方面并没能做出什么有所裨益之事。他不加区别地招揽同盟者，在不同时期经常涵盖各色人等，从忒拜人到著名佣兵头目斐赖的伊阿宋（Jason of Pherae）。为了取悦雅典（和保护自己脆弱的权威），他甚至收养了一个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为子。很明显，他以及马其顿都可以被忽视。

此外，惯常的宫廷阴谋依旧盛行。国王的妻子欧律狄刻（Eurydice）曾养过一个情夫，他名叫托勒密，是一个来自阿罗洛斯的马其顿贵族。欧律狄刻为人沉着冷静，大概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把托勒密留在家中，她把他指婚给了自己的女儿。没过多久，由于她一时大意，阿敏塔斯竟将她和他女婿捉奸在床。愚蠢的是，他一如既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深切地爱着自己的女儿，极力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她悲痛丑闻。³²然而，托勒密对这种容忍一点儿感激也无。如同大部分马其顿贵族，他野心有多大，人就有多无耻。对他来说王权所能给予的欢乐令人心醉神迷，享有王后的身体只是获得王权的前兆罢了。跟他相比，里奇奥和达恩利只不过是感情用事的；不过可以猜想，欧律狄刻大概也能够教给玛丽一些手段。^⑤

这有趣的一对现在决心杀掉阿敏塔斯，然后由托勒密代之做马其顿的国王：这是一次实打实的篡位，而不是为了某个域外王国利益的小算计，因为阿罗洛斯位于波提埃亚，是下马其顿地区的一部分。（认为托勒密实际上是阿敏塔斯之子³³的传统说法，显然是替他辩护的王室宣传。）然而在此，他们忽视了欧律狄刻的女儿，她有着格丽泽尔达（Grizelda）^⑥一样孝顺的性格，显然是不会接受弑父行为的，因此她及时告知了她父亲眼下的危险。不过或许是由于惊骇，阿敏塔斯竟猝然晏驾，从而消解了宫廷局势可能引起的任何社会震动。毕竟他已经将近80岁了。

如果托勒密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占有这个应时而空的王位，那么他要失望了。国王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立即登上了王位。可是

他太不明智了，竟卷入了塞萨利的争位者之间的战争，于是在他在外期间，托勒密便积极篡夺他的王位。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以至于此事被交付了仲裁。杰出的忒拜政治家佩罗皮达斯（Pelopidas）做出裁定支持亚历山大，而托勒密则知趣地退出了，至少直到佩罗皮达斯妥当地离开马其顿。随后，一向狡诈的他的一次马其顿式民间舞蹈演出中刺杀了这位年轻的国王，娶了欧律狄刻（至于她女儿的结局史无明文），并当上了亚历山大的弟弟佩狄卡斯的摄政，因为佩狄卡斯是王位的顺位继承人，但尚未成年。他知道这样的行为容易让国外政治讥刺者拿到把柄，于是他开始和忒拜人商议结盟，后者刚刚在琉克特拉会战（公元前371年）中打破了斯巴达军事霸权的神话，并迅速崛起为希腊最强大的国家。

为表真诚，他还派去了一队高门显贵作为人质：也许他很乐意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放心地送出去，特别是阿敏塔斯仅存的另一合法儿子年轻的腓力，当时他才15岁。³⁴托勒密没法预料到这一举动的后果。因为腓力在忒拜是和潘美涅斯（Pammenes）待在一起的，这人不仅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将军，而且是厄帕密农达斯（Epaminondas）的密友，后者便是琉克特拉会战的胜利者，可能是亚历山大之前希腊最出色的战略家。腓力（以及他之后亚历山大的）整个军事生涯受到了忒拜将军所授训练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操练和战术上的专业训练、骑兵和步兵的密切合作以及周密策划与快速进攻相结合，并且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通过观摩忒拜的一流步战军团圣队（Sacred Band）的演习，他深切地认识到了一支常备精锐军团的潜力，以至三十年后他和他强悍的儿子都竭尽全力地要将这支赫赫有名的军队彻底歼灭。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一条基本原则，即：“赢得一场决战最快且最合算的方式，是击败敌军最强而非最弱之处。”³⁵

腓力在权力方面所受的训练也许不合正统，但却非常有用。作为马其顿王室的一员，他的经历给了他一种合乎情理的冷峻的人性观：在这个世上，谋杀、通奸和篡位都是司空见惯的，一个人的母亲做这些和他人一样容易。在后来的人生中，腓力将此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有

外交都是基于自利，每个人自有其价值，而实际情况也往往如其所料。在忒拜，他也看到了一个民主城邦难以克服的诸多弱点——长年累月的派系斗争、强大行政力量的缺失、快速决策的无能、公民大会投票时不可预知的怪异反常、使严肃的长期规划变得不可能的年度选举、业余的临时征兵（尽管在这方面忒拜要比雅典好得多）。他第一次感觉到，马其顿深受其他希腊人鄙夷的过时制度有可能变成对付这些对手的力量源泉。纵其一生，他通过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民主的无能——常常是同时利用——取得了他最大的进展。

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说，马其顿国王拥有对其人民的最高权威。就字面来说，他可以以波旁王朝的名言自夸：“朕即国家”。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传统，国王不能以叛国的罪名（例如有意针对国王本人的行刺或者篡权）处决一个自由公民，而必须以原告的身份出席马其顿公民大会。³⁶但是历史上君主完全无视公民大会而处死马其顿显贵的情况屡见不鲜，故而这一规则纵使曾经存在过，也似乎早已被束之高阁了。确实，马其顿公民大会确认了每一任国王的继位（如果能赢得公众认可的话，篡位者也能获得公民大会的承认），并且至少理论上能够通过投票罢免国王；他们还听取关于死刑的指控。然而，除了这一点和遵循“传统法律”的要求，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他“拥有所有土地，手握战争最高指挥权，是法官、祭司和财政首长，能够在出国时授权监国”。³⁷他的地位很像迈锡尼的瓦纳克斯，统治着一个部落式的社会。

马其顿贵族在古代相当于封建领主；原则上他们从国王那里获得永久继承的土地，相应地，他们连同家臣一道需要为国王提供私人服务。国王正是从这些部落贵族中挑选他的“侍友”，这些人平时参与议政，战时则随军参谋。（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和米尔弥冬人又是一个十分贴切的相似例子。）他们还会充当近身护卫官（*somatophylakes*），人数大约是八人，³⁸时刻跟在国王左右，而不仅仅是在战斗中。他们穿着和国王一样的衣服，并且以平等的身份与国王交谈，双方都不拘礼节，直率而随性。马其顿专制统治自有其平易近人的一面。

就像另一个封建性质的驯马城邦塞萨利一样，马其顿也有一支精良的重装骑兵。我们发现，公元前429年这些骑兵在对抗色雷斯人时有着优异的表现。一支来自厄利密奥提斯的骑兵分队在公元前382/381年的奥林托斯战役中尤为出色。这支马其顿骑兵的核心就是由侍友们亲自担任的，他们最初的职责是充当王室骑卫队。他们头戴盔帽，身着胸甲；修昔底德把他们描绘为“优秀骑手”，说“他们无人可挡”。但是，正如有学者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把他们想象成中世纪的骑士或者拿破仑的龙骑兵是一种错误。他们的马体格很小而且未钉蹄铁，甚至比健壮的矮种马还小，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利用在希波战争中掳获的纯种马来繁育体型大型的马匹。正如我们在西顿石棺中看到的，他们既不用马鞍，也没有马蹬；这意味着中世纪的长枪冲锋战法是他们所不曾知晓的。相反，他们携带一支短尖枪，即绪斯顿骑枪（*xyston*），大约六英尺长；在短兵相接时，他们很擅长用此枪刺中敌人的面部。³⁹

然而至于马其顿步兵，至少在腓力改革之前是无比弱小的。这几乎是所有贵族封建国家的通病，波斯这样，马其顿也不例外。（阿契美尼德帝国败于亚历山大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和他父亲解决了步兵问题而波斯大王未能做到。）最初，这支军队是由纯粹的部落征兵组成的，一群农民和牧人杂七杂八地跟在骑兵之后。虽然阿凯劳斯曾努力过要训练和组织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一直微不足道。但经济的发展使马其顿慢慢地产生了一个自耕农中产阶层；而放眼希腊，中产阶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重装步兵军团——不管这种军团有多么不够胜任——出现的同义词。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一世⁴⁰正式组建了一支常备的“步战侍友”部队，这或许是专门用来制衡那些特别跋扈不安分的贵族的。这一称呼暗含的不仅是一种组织，而且是社会的接纳，这一点也许同样重要。这些“步战侍友”变成了马其顿军事体制中的一种永久编制；但只有腓力才看到了他们的真正潜力，并且把他们锻造成了当时世界所曾见过的最可怕

的战斗部队——传奇的马其顿方阵。它的成员如同罗马军团一样进行严格训练和操演；他们的主要武器是萨里萨长枪（*sarissa*），这种长枪大约13—14英尺长，从枪杆到枪尖由粗骤细，非常类似于中世纪的瑞士长枪。要想有效地操控这样的武器，就必须有阅兵式般的队列和纪律；而一旦习得了这种纪律，方阵在战斗中就能享有巨大的初始优势。因为正常的步兵推刺长矛只有萨里萨长枪的一半长度，所以马其顿人总是可以在敌人和他们缠斗起来之前发起第一击。⁴¹

在忒拜，年轻的腓力一边等待国内发生变故，一边学习军事策略并接受毕达戈拉斯派导师教育。（恐怕没有什么比让腓力信奉一种倡导素食主义、和平主义与彻底禁欲的哲学更难的了。）托勒密的统治一直受到相当严重的反对，但其主要反对者又是林刻斯提斯家族，他们现在支持另一位保萨尼阿斯，他大概是上一个争位者的侄子，他们差点儿就争得了王位。欧律狄刻声泪俱下地向她丈夫先前所收养的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求助。雅典人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可以干涉他国政治的机会，因此伊菲克拉特斯（在其政府的默许下）驱逐了保萨尼阿斯，同时出于应尽的孝道，他没有提及欧律狄刻在婚姻上的罪愆。

没有人注意年轻的佩狄卡斯，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和阿凯劳斯一样，佩狄卡斯可能沉迷于文学和哲学，但他绝非因此就是一个可被玩弄之人。他等了三年，直到达到法定成年的年龄，此时没有理由给他再指派一个摄政大臣，然后他就处死了托勒密（公元前365/364年）。至于他母亲对此有何说法，或者他在除掉她情人后如何处置她，我们的史料没有记载，而且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她的任何消息。现在佩狄卡斯开始亲政了，而作为国王，他最初的举措之一便是安排腓力从忒拜释放，或者说逃跑回来。他的导师和幕后参谋是一个名叫欧弗莱奥斯（*Euphraeus*）的哲学家，他在柏拉图的推荐下来到马其顿。据说他出身平凡，说话十分恶毒伤人，而且卡律斯提奥斯（*Carystius*）告诉我们：“他在为国王挑选助手时学究气十足，某人要是不通几何或哲学，他就不可能参预政事。”⁴²但是他给了佩狄卡斯一个极好的建议，即任命腓力担任一

个地区总督，并在那里征兵和训练军队。

腓力立即着手将从厄帕密农达斯那里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纪律和组织得到了彻底的革新。由征兵而来的马其顿步兵很快投入到战术演习和复杂的密集队形操练之中。腓力让他们进行35英里全副武装的徒步行军，然后（在他们疲惫欲死而无力抗议时）发表鼓舞士气的演讲。贵族骑兵和农民步兵需要进行长期的联合训练，此事引起了一些争议，至少一开始有些人感到十分不安。当然腓力自己表现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样子。有个军官曾试图在军营里洗澡，于是被剥夺了指挥权；有个出身高贵的少年为了喝水而打乱队形，结果遭到了公开鞭打。⁴³ 迄今，只有雇佣兵曾达到这种层次的效率。现在，腓力缓慢而稳当地开始训练一支由专业战士组成的精干队伍，与此同时他们依旧是马其顿无偿的国家征召兵。这是一项重大的革新。

佩狄卡斯继承了他父亲政治上的灵活多变，同时比他父亲更有干劲。在此期间，他和雅典订立了新的盟约。他可能正在打造一支军队，但他在造船和海军技艺方面仍十分欠缺，而这两方面正是雅典的长处。有一个雅典人是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此人名叫提摩修斯（Timotheus），是一个友好的佣兵队长，还是伊菲克拉特斯的朋友。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提摩修斯在色雷斯的凯尔索涅索斯——即现在的加利波利半岛——作战（和往常一样，雅典对她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粮食航线十分忧虑），并在马其顿的协助下占领了几个关键的卡尔基狄刻城镇，其中包括波提狄亚。但提摩修斯毕竟是雅典人，得执行雅典的政策。现在他冷酷地夺取了佩狄卡斯南部两个最好的港口墨托涅和皮德纳，随后又把注意力转向重要的边境城市安菲波利斯，它在斯特里蒙河边，马其顿在那里有驻军。现在路人皆知，雅典的真正目标是恢复她所失去的公元前5世纪时的海上帝国。佩狄卡斯迅速派遣他所能调拨的军队前去防卫该城。到公元前362年，两国之间的盟约已经化作烟尘。一年后，雅典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竟反过来与塞萨利缔结了“永久同盟”，而更加危险的是，雅典开始向域外王国的贵族们施以援手。⁴⁴

有些人谴责腓力后来的侵略政策（特别是针对雅典的，因为现代学者几乎很少有对卡尔基狄刻半岛感兴趣的），但他们有时忘了雅典在希腊东北部同样贪得无厌、劣迹斑斑。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所说之事不可尽信。⁴⁵雅典人自有一种令人称羡的接受自己的政治宣传的能力：埃斯基涅斯（Aeschines）不仅谴责佩狄卡斯没能帮助雅典夺取安菲波利斯，而且竟能让雅典赢得虽遭不公却依旧保持友好的名声。⁴⁶从政治上说，腓力和雅典人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他们的成功大小有别。事实证明，比起他所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任何雅典人来，腓力是一个更卓越的将军、更敏锐的外交家，有着更鲜明的个性；但若论政治品德，二者可谓半斤八两。

到公元前359年，佩狄卡斯觉得马其顿已经强大到足以和伊利里亚做一个了断了。他西部边境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境地。林刻斯提斯或多或少脱离了马其顿的控制；尽管佩狄卡斯每年都屈辱地奉上岁币，但他仍然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在某个时候被一场伊利里亚支持的政变赶下台。他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将腓力留在后方监国，然后便向西进军。几天后，一个风尘仆仆、惊慌失措的信使带回了悲惨的消息：在和伊利里亚人的大战中，佩狄卡斯战败被杀，大约4000名马其顿人与他一同战死沙场。⁴⁷马其顿的腓力终于继承了王位，但很难想象，他的统治竟是在一片不祥中开始的。

那时的政治专家，无论是雅典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很少有人会觉得新国王可以撑上六个月，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西部边境已是门户洞开，而且腓力新练的部队相当一大部分已经战死。伊利里亚人在他们国王巴底利斯（Bardylis）的率领下，正准备大规模入侵。派奥尼亚人早已开始集结，从北方南下劫掠马其顿的领土。国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佩狄卡斯一死，至少有五个潜在的争位者（不算腓力本人）意图争夺王位：他们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团体。林刻斯提斯的保萨尼阿斯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是他的第二次尝试，他争取到了色雷斯的支持。阿尔盖奥

斯（Argaeus）则是雅典所钟意的。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他曾短暂攫取过权力，现在他正在墨托涅纠集一支可观的军队。为回馈雅典人的支持，他答应一旦事成，就割让安菲波利斯给他们。最后还有腓力的三个异母兄弟，都是非婚生的——阿凯劳斯、阿里戴奥斯（Arrhidaeus）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可以猜想，他们都希望能够赢得马其顿人民的直接支持；昔日有关腓力身世的流言又开始四处传布了。

以福煦元帅（Marshal Foch）的作风，腓力冷静地评估了当前的绝境，随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首先，他逮捕并处决了阿凯劳斯，另两个兄弟成功逃脱了，他们逃离了国家，到奥林托斯去寻求庇护。接着，腓力收买了色雷斯国王，使他不但撤回了对保萨尼阿斯的支持，而且还派人刺杀争位者，可谓一举两得。随后他派遣一个使节前往派奥尼亚，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记载，“对一些人贿以重礼、对另一些人许以慷慨，此后他们与他们达成了维持当前和平的协定”。⁴⁸所有这些都是几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现在腓力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仅剩的争位者阿尔盖奥斯了，此人在墨托涅除了雇佣兵外，还有在雅典将军领导下的雅典重装步兵，人数不少于3000人。腓力立即将他的驻军调出安菲波利斯，宣布其为自由城邦，同时跟雅典作了一笔秘密交易，他把安菲波利斯交还雅典，作为回报他将换来皮德纳。阿尔盖奥斯感到有些困惑，他发现在向旧首都埃盖进军的路上，竟只有他的雇佣兵跟随着他。尽管情况不妙，但他仍尽最大的努力，号召公民前来“欢迎他的回归，作他践祚的首义之臣”。公民们对他漠然不顾，他们如今早就明白了腓力的实力。阿尔盖奥斯无可奈何，只得转身溜回墨托涅。腓力以看热闹般的态度看着这场小小的闹剧，随后他中途截住阿尔盖奥斯，并迫使他屈辱地投降。雇佣兵中所有的雅典人都被仔细地甄别了出来，拿到报酬后便被送回雅典。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任何时候，腓力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雅典的公开敌对。⁴⁹

伊利里亚人看到马其顿的新统治者远比他的先辈们难对付得多，于

是暂缓入侵。这样，在夏秋之际遏止或消除了所有反对之后，腓力把公元前359/358年的整个冬天都用来推行他的军事速成训练。早春时候传来消息说派奥尼亚的国王去世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蛮族君主的继任者登基之前，腓力横扫其南部各个山口，在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中打败了派奥尼亚人，迫使他们承认马其顿的领主地位。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腓力深知，在这种紧要关头，他仅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粉碎伊利里亚人的威胁。但是，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他动员了王国中所有的壮年兵；当他向西朝林刻斯提斯进军时，他身后有600名骑兵和不下10000名的步兵。出于惊恐，巴底利斯提出了一些谈判的条件，但其前提是得维持现状，他不愿放弃他所占有的任何领土。腓力拒绝了他的提议，不过拒绝时很可能还是有所顾虑的，这些打败了佩狄卡斯

的伊利里亚人毫无怜悯之心，且不让赎回战俘，即便遇上佩狄卡斯的兄弟，他们恐怕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⁵⁰两支军队最终在摩那斯提尔附近、欧克里达湖边的平原上相遇了。⁵¹

这场决战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第一次看到腓力运用厄帕密农达斯所教授的战术，而后亚历山大也采用这种战术。伊利里亚人和马其顿人在人数上相差无几，关键之处在于更高超的战术和训练。伊利里亚人看到自己有被马其顿骑兵从侧翼包围的危险，便组成了一个空心方形战阵。腓力本人统率着步兵，他命令中军和左翼稳住阵线，从而展开他的斜梯阵形，亦即厄帕密农达斯所专长的战术。如其所料，伊利里亚人拉长右翼，然后回转过来以投入战斗。腓力一直在等，等到方形战阵左侧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致命缺口，这时他派出他的右翼骑兵冲击对方的侧翼和后方。他们如一个巨大的楔子般插入缺口，而马其顿方阵亦随后跟进。紧接而来的便是一场漫长而殊死的战斗。然而最终方形战阵破开，7000名伊利里亚人被歼，这是巴底利斯全军的四分之三，剩余的残兵败将逃到了山中的安全地带。在此，我们只需稍加调整便可得到腓力或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格拉尼科斯河和伊索斯取得胜利时所用的战术——斜线前进，中军和左翼有意向后退，由此形成一种扇形转动，以便骑

兵从右侧发起致命一击。这样煞费苦心的部署只为使敌阵露出一个缺口——厄帕密农达斯的军事原则就是总兵力要精打细算，同时在决胜之处要占绝对优势。⁵²

现在，终于轮到腓力来提出条件了，他多少有点享受这一时刻。巴底利斯非常不愿意，但他知道他已经输了，只得放弃他所侵占的马其顿的西部领土。对腓力西部边陲的直接威胁现在已经清除了，域外王国反叛的危险也随之消解。下一次对抗伊利里亚人的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56年，我们知道，那时腓力派去指挥战役的乃是帕美尼翁。⁵³在此后的执政期间，尤其是公元前355—前351年和公元前346—前342年间，信心不断增长的腓力在伊利里亚人的边境上持续征战，驱逐了潜在的敌对部族，巩固了自己的边境，并最终将许多伊利里亚部落纳入他的直接统治之下。⁵⁴无疑，对腓力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完胜巴底利斯立即提高了他的声望，从而使他赢得了全面的认可。他为他兄弟的战败和死亡报了仇，他发觉自己成了某种民族英雄。如今没有什么能挑战他的地位了。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最受欢迎的马其顿君主之一，这既是对其战场指挥技艺，也是对其雄伟人格魅力的证明。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绝非仅是小有所成。

在腓力从巴底利斯那里得到的让步中，有一条是腓力与巴底利斯之女奥达塔（Audata）的婚约。与发展程度更高的希腊城邦不同，马其顿、色雷斯和伊利里亚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运行机制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和互利互惠的部落体系。对他们来说，作为政治自保的手段，王室婚姻的作用仅次于政治谋杀。某人若是与另一些人建立起正式的亲属关系，那么这些人便不大可能会图谋反对此人，而且在危急时刻，首领的女儿往往会被用作一个高级人质。腓力自然不会无视这种外交利器，在他相对不长的一生中，他至少娶了五个妻子。

自普鲁塔克（Plutarch）以来，多数学者严重混淆了腓力对性、女人和婚姻的一般态度。中产阶级浪漫化的责任感（普鲁塔克在婚姻家庭

理想上几乎和考文垂·帕特莫^⑦一样无聊)使他们对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风俗太过大惊小怪,这点在性和饮酒习惯的问题上同样适用。马其顿社会不知何为浪漫婚姻,他们仅仅在意妻子的忠贞,以免在王室的巢穴中出现任何王室血统之外的人。像所有部落首领一样,腓力娶妻为的是生育儿子、确保王位继承、管理家事和拉拢盟友。因此,他的婚姻必须与他不可胜数的情人截然分开,毕竟这些情人丝毫不曾影响他的婚姻关系(尽管这些也可能是特定情况下的准外交手段)。现代观念认为,男人自应将性行为限于婚内,理当与妻子培养好感情,而在马其顿人看来这既毫无意义而且非常古怪。所以如果她们的丈夫收纳情妇或狎嬖变童,马其顿妇女并不会就此心生醋意。我们将会看到,真正激起奥林匹娅斯愤怒的,乃是她本人的王后地位或其长子的储君地位遭受的威胁。

在古代有一个流传许久的笑柄,即腓力“凡征战,必再娶”。⁵⁵这应当说是他政治机敏的明证,而不是说他好色。与情妇结婚,这种驱使克里平医生^⑧进行谋杀的观念,只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想法,差不多是20世纪才出现的。事实上,腓力对婚姻的态度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十分相近:作为外交手段,联姻要比战争划算得多。有人说得很对:“他复杂的婚姻史乃是其政治扩张进程的反映。”⁵⁶

然而,腓力与伊利里亚公主的联姻只能给他带来暂时的外部安全,对于稳固他在国内的地位则无半点益处。公元前357年春,奥达塔去世了,可能死于临盆;她为腓力产下了一名女婴——库楠妮(Cynane,又名库娜[Cynna])——而不是腓力一定梦寐以求的嗣子。可以想见,他此时又找了一位妻子,她来自一个离马其顿更近的高贵部落,属于域外王国中向来最忠诚的厄利密奥提斯。翡拉(Phila)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主,她是德尔达斯的女儿,而且机缘巧合地还是亚历山大的帝国财政官哈尔帕罗斯(Harpalus)的姑母。表面上,这乃天作之合。但是,腓力早期在婚姻上所做的投机似乎都逃脱不了厄运。翡拉在结婚后不久也去世了。公元前357年盛夏,腓力又在寻找合适的妻子了。

与此同时，他还忙于其他事务。公元前358/357年冬，斐赖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Pherae）遭到刺杀，他的近亲进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于是塞萨利的一些反对派贵族——阿琉阿代（Aleuadae）家族——便邀请腓力来驱逐他们（刺杀一事是由亚历山大的妻子与其兄弟一同策划的）。腓力一向伺机介入邻国政治，自然是求之不得。塞萨利人十分感激，而腓力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超凡魅力。（他所做到的自然要比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多得多，后者仅仅是给策划者发去一份倡导温和政治的公开信。）也就在这时，他得到了一个情妇，她是个舞女，名叫菲林娜（Phlinna），来自阿琉阿代家族的家乡拉里萨；正如萨提洛斯（Satyrus）所说，腓力此举“意在在诸多对塞萨利有继承权的声称中，加上自己的一份。”马其顿王室的继位合法性只论父系血脉，因此无论私生子的身份还是弱智，二者都不是菲林娜之子阿里戴奥斯继位的障碍。⁵⁷

然而，没有什么能比腓力对安菲波利斯一事的处理更能体现他的外交斗争手腕了。当他将这个关键港口出卖给雅典时，他一点也没把这个诺言放在心上。一如既往，他只不过是争取时间。安菲波利斯坐落在斯特里蒙河边，位于色雷斯和马其顿交界处，有着巨大的商业和战略意义。它为运送马其顿木材提供了港口；更重要的是，它还通往潘盖奥斯山附近的富饶矿区。雅典将军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曾因丢掉安菲波利斯而遭到流放（他能写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间接地要归功于此），自那以后雅典一直试图夺回该城，可惜未曾成功。

公元前357年春，腓力挑起了与安菲波利斯政府的纷争（要在涉及希腊人的地方制造开战借口绝非难事），随后便围攻该城。后者立即向雅典求援。但雅典人自己正闹饥荒，忙于就来自色雷斯和黑海的粮食供给而讨价还价，无暇顾及斯特蒙河的战斗。⁵⁸而且，雅典人仍然特别天真地——有时这种特别的天真会让政治腐败者深受其害——相信腓力的目的是为了履行他们之间的秘密协定。那么当袭击本身就是为了雅典的

利益而发动时，他们为什么要前往安菲波利斯和马其顿人战斗呢？他们还认为，一旦安菲波利斯落入他们手中，腓力就休想得到皮德纳。看起来，他们似乎从未想过腓力会在他们身上耍几乎同样的把戏。

那年秋天，安菲波利斯陷落了。腓力非但没有将他的新战利品作为大礼送给雅典，反而确立了它的独立地位——如此一来便赢得了一个心存感激的盟友，在希腊东北部城邦中赢得了真诚相待的声望。这种阴险的诡计果然惹怒了雅典人，他们自己也想要东北部的盟友，于是他们便对马其顿宣战。⁵⁹但是因为粮食短缺，加之自己在爱琴海的一个盟友的反叛，雅典人能做的实在有限，而这正是腓力当初就算计好了的。一不做二不休，腓力现在继续向皮德纳进军，重新占领了该城。这一次，全无戒心的雅典政客被腓力玩弄于股掌之间。奥林托斯人多少对腓力的行动有所警惕，当他们请求成为雅典的盟友时，却遭到了委婉的拒绝。雅典人以为，不管怎样腓力终究会履行他的诺言。而奥林托斯人，作为彻头彻尾的务实之人（正如他们的财富所表明的），他们就此回国，并且代表卡尔基狄刻同盟反过来与腓力达成了协定。这份协约的条款之一规定，为了奥林托斯的利益腓力应当重新占领波提狄亚——狄奥多罗斯说，“这是奥林托斯人一直渴望拥有的城市”。⁶⁰这一次腓力没有食言，因为在色雷斯卫地区他需要掌握自主权。不过在征服了波提狄亚后，他小心谨慎地把雅典驻军送回了国。留一条退路总归没有坏处。

腓力的第三任、同时也是最为出名的妻子又是一个外国人，来自伊庇鲁斯的莫罗西亚王族。伊利里亚暂时不用担心了，而与其南部邻邦兼对手结盟，则可以换来明显的优势。伊庇鲁斯的当政国王阿律巴斯（Ar ybbas）有两个侄女。大的名叫特洛娅斯（Troas），他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娶来作媳妇，但她的妹妹密尔塔勒（也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奥林匹娅斯）还未婚嫁。阿律巴斯当即同意了这门亲事，甚至有点急不可耐。普鲁塔克断言，腓力和奥林匹娅斯在四五年前就已经见过面了，那时候他们一起在萨摩色雷斯加入秘教，当时两人一见钟情。故事本身可能是真的，虽说在这类事情上普鲁塔克的婚姻理想主义不免让人有所怀疑

，再说奥林匹娅斯在普鲁塔克所说的入教的时候也才勉强进入青春期。不管怎样，腓力自己对后续事宜并不急切热心。腓力拥有两任妻子以及至少一位情人，很难让人想像他会是一个为伊憔悴的痴情汉。

无论如何，在公元前357年的秋天，腓力迎娶了他的伊庇鲁斯公主，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他竟娶了一个超出他掌控范围的女人。虽然奥林匹娅斯还不到18岁，但她的个性已经相当强势，如果不说很古怪的话。尤其是她十分狂热地投入到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狂欢仪式中去，她的酒神伴侣式的癫狂也很难说有助于平静的家庭生活。而她更加奇异的爱好之一则是养一群驯服的巨蛇当宠物（除非这确如人们猜想的那样，有其仪式上的渊源）。将这些动物用于宗教场合没有人会反对，但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奥林匹娅斯的床上，这一定是处心积虑想要吓倒最坚毅的新郎。此外，古代史家们虽然坦承奥林匹娅斯很漂亮，但又在不同地方将她描绘为阴沉、善妒、残暴、傲慢、任性以及爱管闲事。除此种种，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强烈的政治野心和十足的嗜杀脾气。她决心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王后。这使她难讨马其顿贵族的喜欢，之后还会把腓力卷入其政治生涯的最大危机之中。但是当前他主要关心的是生育一个继承人，而且很快就让奥林匹娅斯怀孕了。⁶¹

目前为止，作为战略家兼外交家，腓力几乎不曾走错一步。然而，在他的扩张计划中还缺少一个关键元素，即庞大而稳定的收入来源。和他的儿子一样，腓力天生就不是经济专家。当遇到财政问题时，两人都有一种海盗的心态。对他们来说，资产仅仅意味着金库里有充足的金银可以应对紧急的危机：财政部的作用就是金库。而且他们只知道两种获得贵金属的方式：从地下挖出来，或者从比他们更弱者那里偷来。无论腓力还是亚历山大，两人都丝毫不懂何谓贸易平衡，这种欠缺给他们希腊化时期的后继者们留下了不少严峻的经济难题。

最近且最佳的金银产地是潘盖奥斯山的周边地区，位于斯特里蒙河东边。严格说来，这个地方处在色雷斯的领土范围内，而腓力至少目前

还不想被打上侵略者的标签。然而，克瑞尼德斯要塞给他提供了他恰好需要的借口。这个位于潘盖奥斯山东北方向的城镇是塔索斯的殖民地，它的居民（或许是为了回应腓力明显的暗示）向腓力求助以对抗色雷斯的侵略。腓力在公元前356年春占领了克瑞尼德斯，将其更名为腓力比，同时派遣一大群人前去定居，并且让工匠们开始采矿。贵金属，尤其是黄金很快就开始流入马其顿的金库中。现在腓力的年收入增长了1000塔兰特，或者说300000个金币——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从她整个庞大的海上帝国那里榨取的总量。他立即着手大规模铸造货币，发行金币（他称之为“腓力斯”[Philips]，大概是有意模仿对应的波斯金币“达里克”[Daric]），和银币“西格劳斯”（sigloi），又叫谢克尔（shekel）。这些盈余马上就为腓力的准职业化军队和用于外国政要的巨额行贿所消耗殆尽，后者恐怕还是一个更大的无底洞。后来他本人曾自诩“是黄金而非军队才是他拓展王国最常用的手段”，而他的庞大开支则成了希腊世界的一句谚语。⁶²

因此，公元前356年夏末，马其顿的腓力坐着细读来自佩拉的急讯，吁请命运女神给他来点小挫折，好抵销一下如此络绎不绝的成功。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把马其顿从一个落后而原始的王国转变成了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边境的威胁如果说尚未解除，那至少也已经大大减小了。国家有了一个稳定且真正充足的国有收入，更不用说还诞生了合法的嗣子。一支强大的新军正在训练当中，而各域外王国也开始不情愿地接受阿吉德王朝的领主权。末了，腓力希望他在奥林匹亚的胜利，能成为他被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认可的序曲。

腓力和雅典的关系总是多少有点矛盾。他鄙夷她喋喋不休且贪财受贿的民众领袖，鄙夷他们空洞的修辞和卑劣而浅陋的伎俩。他觉得那摇摇欲坠的民主体制从头到尾都相当荒谬。他曾说：“雅典人每年都设法发掘出十个将军^⑨，而我这一辈子也才发现一个——帕美尼翁。”⁶³不过他并没有低估他的对手。他知道，贪财常常跟纯真的爱国主义相依相待

，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就是鲜明的例子，而且即使是民主政治有时也能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出于非常现实的动机，他尽力避免发生正面冲突，特别是跟强大的雅典舰队发生冲突，因为马其顿从来都不是一个海军国家。但是，他照样也会钦佩雅典近乎传奇的过去。这个城邦曾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打碎波斯大王的雄心，还培育了埃斯库罗斯、伯里克利和柏拉图，它神秘而迷人的魅力难免会在他心中留下印记。所以，他的轻蔑总是夹杂着一种朴素的殖民地式的钦佩。

现在，他终于准备着手进行惊人的扩张和征服事业，直到不幸早逝。他已经为他眼前的任务作了良好的训练。他洞悉他人或其他城邦的最弱之处，从未走眼。通过挑唆他人对抗，他可以把敌对派别变成自己的盟友。腓力向来对季节性作战和公民兵制的理念嗤之以鼻。在腓力看来，战争没有休战季节，胜利只属于最刻苦训练的一方。他本人不间断且近乎独裁地控制着马其顿的种种事务，无论是内政还是军事。就如德摩斯提尼所意识到的，当规划和执行长期事业的时候，较之任何实行选举的民主政治，这种体制赋予了腓力极大的优势。他父母的教训，包括整个马其顿贵族阴谋的套路，让腓力生来就对所有人类自命的美德或理想充满不屑。（他曾说，没有一个城市真的固若金汤，只要它的后门足以让驴子载金而入。）国家长期以来屈辱而无能的历史已经为他指明了终极目标，他非实现不可。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轻视都会被清除，所有对马其顿野蛮、怯懦或无能的讥讽和影射都将得到彻底的清算。

与此同时，斯巴达作为一个霸权大国的惊人历史（公元前404—前371年）教给了腓力极为重要的一课。从长远来看，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所造成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⁶⁴ 抚慰往往更为有利，哪怕只是给对方保留表面的自尊，不用让渡任何利益。侵略的炮弹必须裹上恪守原则和真诚相待的糖衣。在此，我们还会看到腓力的另一政策，该政策后来被他闻名世界的儿子继承，并发挥到了极致。狡诈而喜好撒谎和推诿的雅典民众领袖将会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比他们更能言善辩、更蛊惑人心的诓骗大师。对于那些空谈爱国与自由的热血之徒，会发现由实

战而非修辞训练的军队的面前，这两者都算不上什么。最终是高效的独裁战胜了无能和腐败的理想主义，是冷血的行家里手战胜了聪颖却又混乱的业余票友，后者彼此之间从来不会团结一致。

对希腊而言，这也是真正的自由的终结。因为自由就其最基本的含义来说，意味着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无论是好是坏；意味着有权愚蠢、复仇、不诚或内讧，只要这些是出于多数人的意志。自由的人们总是宁愿在公开投票中把事情搞砸，而不愿在独裁者的胁迫中变得高效和成功，无论其何等有远见或仁慈。这个终极真理恰恰是腓力常常视而不见的，一如其后的亚历山大。对他们而言，功业才是第一位的；胜利即合理。意识形态上的敌对，他们既不理解也无法解决：腓力对此是持一种戏谑的玩世态度，而亚历山大则简单粗暴地置之不理。城邦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
- ① 弥达斯（Midas）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非常富有，与之相关最有名的神话就是“点金术”的故事。不过，也有版本说弥达斯及弗里吉亚人原本住在欧洲，后来才迁徙到小亚细亚。这里的“弥达斯花园”当指希罗多德所说的马其顿的一个长满野生玫瑰的弥达斯花园（Hdt 8.138）。——译者注。除非特别标出，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
- ② 塔兰特（talent），古代货币及重量单位，各地标准不一，阿提卡的约为26千克重。
- ③ 古希腊历法与现行公历大不一样，各城邦历法不同，但新年大致都从现行公历的7月份开始。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事件的具体月份，就无法确定其对应的公历年份，因此学界通常会同时标出前后两个年份。公元前413/412年就相当于从公元前413年7月至公元前412年6月。
- ④ 又译作“伙伴”（即hetairoi的基本含义），《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则译作“侍卫”。
- ⑤ 里奇奥（Rizzio，约1533—1566）是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1542—1587）的侍臣，达恩利（Darnley，1545—1567）则是玛丽的丈夫。达恩利怀疑里奇奥与玛丽通奸，便将里奇奥杀死。

- ⑥ 格丽泽尔达是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人物，反复经受了其父对其服从与孝顺的考验，成为服从的代名词。后来彼得拉克，乔叟等人都写过相关的传奇。
- ⑦ 考文垂·帕特莫（Coventry Patmore, 1823—1896），英国诗人，以诗歌《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知名，该诗歌表达了诗人心中理想的幸福婚姻。
- ⑧ 克里平医生（Dr Crippen, 1862—1910），美国医生，为与情妇结婚而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 ⑨ 年度选举产生的将军委员会（*strategoi*），实际上是一种内政和军事内阁。——原注

第二章 弥达斯花园

根据传统说法，亚历山大出生的当晚，阿耳特弥斯（Artemis）神庙被烧毁了。当地的波斯玛哥斯僧（Magi）解释说，这是更大灾难即将到来的征兆。他们“东奔西跑，一边拍打自己的脸，一边大声喊叫道，亚洲的不幸和大难就在那天诞生了”，亦即一个注定要摧毁整个东方的祸根。类似地，在婚礼的前一晚奥林匹娅斯梦见她被一个霹雳击中，于是烈火从她的子宫中迸发而出，四处喷溅后方才熄灭。一两个月后，腓力也做了一个梦：他封住了他妻子的阴道^①，而封蜡却印出了一只狮子的图案。一些宫廷占卜师将此梦解释为腓力应更仔细地看好他的妻子。但特尔美索斯的阿里斯坦德洛斯（Aristander of Telmessus）——此人后来跟随亚历山大征战亚洲——则提出了一个更合人意的解释：奥林匹娅斯怀孕了，而且怀的是一个斗志昂扬、如狮子般勇猛的男孩。他对腓力说，没有人会给一个空瓶封上蜡印。

人们还谣传说，国王（可能比表面上说的更加认真地采纳了其他占卜师的建议）有一天通过卧室的门缝偷窥到奥林匹娅斯环抱着一条蛇。他不相信台面上的说法，即这仅仅是她酒神伴侣式的宠物之一。他相信她要么是个巫女，要么是某个伪装起来的神明的情人，此后他开始避免跟她行夫妻之事。事实上他深受困扰，于是便带着疑惑前去德尔菲神谕所，在那儿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回复。神谕告诉他，从此以后他必须特别尊崇宙斯-阿蒙神（Zeus-Ammon），这是一个希腊化了的埃及神

，其圣地和神谕所位于利比亚边境上的西瓦绿洲。他还会失去那只看到神——即那位“化身为蛇而与其妻子同床的神明”——的眼睛。这一次，人们很难指责德尔菲神谕模糊其词了。¹

在古代，诸如此类的传说总是会围绕某个著名人物的出生和童年而不断累积起来。其中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母题，其一是要有征兆，其二是要有许多预示其将来之伟大的故事。如果没有相应的背景素材，那就编一个。无论何时都很少有人具备特殊的洞察力，能看出当下的少年会变成未来的领袖；而一个缺乏充足的记载或档案的社会甚至更急于表现出事后之明。总有一些伟人的同代人急切地想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出了伟人之伟大，而一些心怀妒忌的对手渴望报仇雪恨。对这些历史见证人来说，真相只是一种可无限变通的说辞。

就亚历山大的情况来说，恣意的政治宣传，无论拥护的还是敌对的，很早就出现了，甚至在他成为国王之前就已经有了。几乎所有通过私人交往——以及许多并非如此的²——而写到他的人都别有企图。在这点上，上文所引轶事就呈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显而易见，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是捏造出来的，而且各有所图：它们要么攻击或捍卫奥林匹娅斯，要么质疑或维护其子出生的正统性，再或者通过追溯既往的方式，让亚历山大的征服及其臆想的与宙斯-阿蒙神之间的神圣关系，获得命运女神的背书。当然，蛇的故事是一把双刃武器：它所蕴含的既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世间平常的私生问题。而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则是关于腓力眼睛的“预言”，在亚历山大出生两年后的公元前354年，那只眼睛在墨托涅围城战中被射中了。很久以后，亚历山大自命为神并且得到了一个虚假神谕的认可，而其起点便是此事。的确，以弗所的阿耳特弥斯神庙大致就是这个时候烧毁的；但是，有关摧毁亚洲之祸根的预言听起来非常可疑，像是波斯人的宣传，当亚历山大入侵亚洲之后他们便开始散布这个预言了。³

实际情况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亚历山大童年的任何形式的直接材

料出奇地少，而且流传下来的资料其历史价值都十分有限。⁴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个举止不凡的早熟孩子，很可能确实如此。马其顿宫廷生活充满纷争和阴谋，尽是醉酒宴席和荒淫无度，恐怕很难培育出单纯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聪慧少年，其早熟正是我们所能料想得到的。这也可能是在公众人物的孩子身上我们常常能看到的一种特别的识见力，这些孩子几乎在学会走路之前便已习惯于为政治家、艺术家、使节或将军等所围绕，不甚了了却又精确无比地模仿着他们的措辞和交谈策略。据说当亚历山大还只有7岁时，他曾在腓力外出作战期间款待过一队波斯使臣。（他们带着波斯大王的赦免令，要求召回在腓力这儿避难的三个反叛者：埃及人墨那匹斯 [Menapis]、波斯总督阿尔塔巴佐斯 [Artabazus] 和希腊雇佣兵头目罗得岛的门农 [Memnon of Rhodes]。）在通常的外交礼仪结束后，亚历山大便开始像情报人员一样盘问来宾。他没有问有关各种奇闻逸事的幼稚问题，诸如世界奇观空中花园、波斯王室的徽章服饰、波斯大王饰满珠宝的黄金葡萄树，等等。他要知道的——或者说我们只能相信他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些事情，诸如波斯军队的规模和士气、去往苏萨的旅途的长短和道路的状况。

很明显，这则轶闻曾因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被人修饰过，不过，它可能的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普鲁塔克说，这给使节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对于亚历山大要知道的，使节们是否如实相告则是另一回事，但至少阿尔塔巴佐斯和门农不太可能会忘记这次会面，倘若它确实发生过的话。后来在命运的奇妙安排下，前者变成了亚历山大的东方总督之一，而后者则是他在小亚细亚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参见第170页及以下）。门农不像他的波斯雇主，他从未错误地低估亚历山大。不妨猜想一下，这位卓越的指挥官可能还记得一个7岁小孩的惊人求知欲，甚至对此有所警觉。⁵另一方面，他的访问无疑让他看清了孩子父亲的侵略意图。在色雷斯、塞萨利以及其他地方接连不断地大获成功后，腓力现在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卡尔基狄刻半岛。他无法亲自招待波斯使节的原因是，那时他恰好在围攻奥林托斯。另一个表明腓力的利益无所不在

的例证则是一个好看的12岁男孩，他与亚历山大同名，来自伊庇鲁斯，如今一直住在马其顿的宫廷里。这个男孩是奥林匹娅斯的弟弟，通过一次快速的惩罚性征伐，腓力把他带回来作为人质和宠臣，同时要是他的伯父、腓力的岳丈阿律巴斯表现出要独立或反叛的迹象的话，他还会是伊庇鲁斯未来的国王。⁶

腓力至公元前349年为止的扩张进程，在德摩斯提尼那里得到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在第一次劝说雅典人支持被围困的奥林托斯人时，德摩斯提尼质问他的听众：“难道你们当中没人看见腓力的发展，没人注意到他已经由弱变强了吗？腓力先是夺取了安菲波利斯，接着是皮德纳，然后是波提狄亚。而后便轮到了墨托涅。之后他又侵略了塞萨利……接下来则是色雷斯，在那里他废黜了许多酋长，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任命的各个首领。腓力消停了一阵子，那是因为他病了；但病情稍稍痊愈，他便立即带兵围困了奥林托斯。而所有的这些还不包括历次对抗伊利里亚、派奥尼亚和阿律巴斯国王的只有少数能叫得上名字的小型战役。”⁷这简直和丘吉尔或范西塔特（Vansittart）对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之前的活动的概括一模一样。

腓力宫廷的人员构成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其中不无道理。他扩大了原有的马其顿侍友部队，增加了许多募自希腊各地的雇佣军官。其中包括科林斯的德玛拉托斯（Demaratus of Corinth），来自密提勒涅的两兄弟厄里吉奥斯（Erigyius）和拉奥墨冬（Laomedon），这三个人后来都在亚历山大手下效命。这支职业军官团总数约800人，其成员都从腓力新征服的边境地区那里分配到了土地，例如厄里吉奥斯和拉奥墨冬在安菲波利斯附近就拥有许多地产。希腊人的宣传满怀敌意，非常耸人听闻地描述这些人的品行和社交习惯。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写道：“在马其顿，腓力的宫廷是希腊内外所有最最放荡和最最厚颜无耻之人的汇聚所，在那里他们被叫作国王的侍友。”他接着写道，这些人各因在酗酒、赌博或者滥交等方面的本事而被精心选拔出来。“他们中有些人惯于剃净全身从而使皮肤变得光滑，尽管都是七尺男儿；而另一些

人竟彼此淫纵，虽说皆为堂堂须眉。……无论希腊还是外邦世界，几乎所有淫荡、可憎或凶恶之人都蜂拥到了马其顿。”

德摩斯提尼尽管罗列了许多相同的毛病，但他也承认这些侍友部队素有“骁勇善战、深谙战争技艺”的威名（这些确实难以否认）。在现存的谟涅西马科斯（Mnesimachus）的宣传剧《腓力》的残篇中，这些人当中有人曾经自道：

你们是否知道

我们在作战时是多么强大？对我们来说

霍霍的刀剑是美味的大餐，熊熊的火炬是

可口的小吃。然后，我们当作甜点的，

不是坚果而是残破的箭头

和断裂的枪柄。我们拿作睡枕的

是我们的盾牌和胸甲；箭矢和投石

撒满在脚下，而弹弓缠绕在眉梢。

除了有些明显的夸张外，总体的氛围可能正如这些文本所述的那样。雇佣兵——还有马其顿人——在古代从未有过生活清简的美名。⁸

这便是年轻的亚历山大在其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一个由粗俗的职业战士组成的喧哗而吵闹的男性世界，这些战士把同样粗俗的精力和激情用来骑马、醉酒、战斗、通奸。尽管奥林匹娅斯非常溺爱自己的儿子，但她从来不会伤害他的男性自信心，我们将会看到，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她也不曾有意要腐化他幼小的心灵，教他反对自己的父亲。这种老生常谈的故事只不过是现代人的心理学神话罢了。一直到公元前338年，腓力和奥林匹娅斯之间才出现裂痕，那时亚历

山大已经18岁了，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嫌隙最初乃是源于宫廷政治。在此之前他们似乎一直都在同心协力地抚养他们的孩子，而两人也确实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⁹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亚历山大崇拜奥林匹娅斯。塔恩就指出，“除了他可怕的母亲，亚历山大从不把任何女人放在眼里”¹⁰，这种结论很难反驳。他和腓力的关系很少受到关注，但两人的关系却要更复杂、矛盾得多，既有真心的崇拜，也有潜在的较量。如果说模仿就是最真心实意的恭维，那么亚历山大对他父亲的态度就完全是一种英雄崇拜。但是竞比也在所难免：既憎且爱，这是一种永恒的爱憎关系。儿子跟随他父亲的脚印，既意在效法，又力求超越。作为一个男孩，他常常自比为阿基琉斯（Achilles）；而他母亲的家族就自称出自阿基琉斯，通过埃阿科斯（Aeacids）的子孙传承而来。至于父系一脉，亚历山大则将其祖先追溯到了赫拉克勒斯。这些系谱古人是极为严肃对待的，对此若有所低估，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无论希腊人还是马其顿人，对他们来说，英雄神话是一种鲜活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为政客或宣传家们所援引。¹¹精明老练的政治家，有时也会戏谑似的用这类神话来为他们的政策作辩护，这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所利用的是一种近乎普世的信仰，否则没人会听他们的话。

《伊利亚特》中最受亚历山大喜欢的那一行诗，明明白白地展现了他的雄心壮志：要“同时成为高贵的国王、强大的枪手”。同时，他必定也记得阿基琉斯的另一个、或许还是更为典型的目标，即“要永远做最优秀者，做世人中最杰出者”。当腓力的事业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胜利一波接着一波时，亚历山大经常向他的朋友发牢骚说，什么事情都被父亲抢了先，“他不会留下任何伟大或耀眼的成就，能让你们在你们的帮助下展现给世人”。但是，他的朋友反驳说：“但他取得所有这些东西正是为了你啊。”而亚历山大回答道：“如果我什么成就也没有，那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¹²

历史告诉了我们关于亚历山大老师的一些事情，至于他们教给了他什么，历史却几乎付诸阙如。他的保姆名叫拉尼刻（Lanice），她的兄弟就是被称为“黑面的”克雷托斯（Cleitus the Black），他曾在格拉尼科斯河边救过亚历山大的命，后来在发生于撒马尔罕的一次酒后争吵中被亚历山大杀死。他的第一个家庭教师是奥林匹娅斯的族人列奥尼达斯（Leonidas），一个上了年纪的严厉而乖戾的训导者，就像和他同名的斯巴达人一样，他极为重视对身体忍耐力的锻炼。亚历山大常说，在列奥尼达斯的思想中，早餐就是一次长途的夜行军，而晚餐则是一次小分量的早餐。尽管那时候亚历山大对这种训练十分恼怒，并且腓力也说他可以说服而不能强迫，但是列奥尼达斯的训练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个人的忍耐能力、横穿沙漠和翻越高山的强行军，已然成为一个传奇。他从来不曾忘记这位年老而粗暴的导师，我们看到，他曾用一种夹杂着沮丧的骄傲口吻对卡里亚的阿达女王（Queen Ada of Caria）说，当年列奥尼达斯“经常过来打开我装被褥和衣服的箱子，看看我母亲有没有在其中为我私藏什么奢侈或多余的玩意儿”。很显然，在这方面，溺爱孩子的奥林匹娅斯也只能守本分了。

不过，有一则关于亚历山大和列奥尼达斯的轶闻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有一次，当这位年轻的王子正要奉献祭品时，他为了表现王室的慷慨大方，取了整整两把的香料，将其投入祭坛的火中。这招来了老师的严厉斥责。列奥尼达斯用一种全世界学校教员所常有的嘲讽语气说道：“等你征服了出产香料的地区后，只要你愿意，你想扔多少就扔多少。但在那之前，别乱挥霍。”多年之后，亚历山大占领了整个中东地区最主要的香料集散地加沙。他像往常一样往家里给母亲和妹妹寄送礼物。不过，这一次他也给列奥尼达斯准备了一份。至少18吨的乳香和没药被送到了这位老者那里（光转手倒卖就足够让他发一笔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横财），“以此纪念当年老师用以激励学生的那种期望”——顺便也告诫老师不可再对神明如此吝啬俭省了。¹³

这个故事暗含了不少令人悚栗的东西：招致15年积怨的纤介之失、

一掷千金的慷慨、处心积虑而难以回复的辩驳。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亚历山大性格的最有价值的洞见。谁要是曾伤害过亚历山大，无论多么细小，最终都将悔之不及。亚历山大一向记仇，而且绝少原谅：“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②他既睚眦必报，又隐忍以行。他能怀恨在心达十年之久，只为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而时机一到，他便奋然一击。

亚历山大的第二任家庭教师阿卡纳尼亚的吕西马科斯（Lysimachus of Acarnania），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一个粗野却又精明的老滑头，他之所以颇受欢迎是因为他鼓励学生的幻想。他常常把亚历山大叫作阿基琉斯，把腓力称为佩琉斯（Peleus），而把自己唤作福尼克斯（Phoenix，在《伊利亚特》中是阿基琉斯年迈的老师）。吕西马科斯既教亚历山大音乐——亚历山大在弹里拉琴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资——也教他读书和写作。专业的教练则指导亚历山大剑术、射箭和掷标枪。和所有出身名门的马其顿孩子一样，他从小就学会了骑马。不过，他似乎从未学过游泳，而且一生都十分厌恶大海。

现存有关亚历山大最著名的轶闻之一源自他超常的骑术。大概在公元前347年，那时亚历山大不过才八九岁，而腓力正好在狄昂举办“奥林匹亚”赛会；这时候来了一个名叫菲罗奈科斯（Philoneicus）的塞萨利饲马人，他给国王带来了一匹纯种的牡马，并且狮子大开口，要价高达13塔兰特。（直接换算成现在的价钱容易使人误解：在公元前4世纪，这笔钱足够个人用作一百年的糊口之资了。）除了额上有一抹白斑外，这匹牡马是纯黑的，并且烙有菲罗奈科斯牧场的公牛头标志，因此它的名字就叫布凯法拉斯（Bucephalas）^③。想要喊出如此高价，布凯法拉斯必须正当盛年，亦即大约七岁左右。¹⁴

这则故事是普鲁塔克讲述的，细节十分详尽，充满戏剧性，可谓活灵活现。腓力在他朋友和随从的陪同下，来到开阔地上，准备试马。亚历山大也跟了过来。国王的马夫很快就发现，布凯法拉斯很难驾驭。他

们既无法哄诱它，也没能跨上马背；它又是后腿直立，又是猛然前冲，似乎对一切命令都充耳不闻。腓力没了兴致，便叫菲罗奈科斯把马带走了。然而，亚历山大看不下去了。他大声说道：“这么膘壮的一匹马，他们竟舍得放弃！而这全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勇气去驯服它！”这位少年的悲叹真诚而不带丝毫的掩饰；而他父亲和往常一样，十分警觉地注意到了他的嘀咕。

他看着8岁的儿子说道：“哦？这么说，你觉得你比你的长辈们更清楚如何驾驭马匹，是吗？”

“嗯，对付这匹马，我肯定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腓力的独眼一下子从满是伤疤和胡须的脸上放出光来。“那好。你来试试，倘若失败了，你准备为你夸下的海口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那匹马的价钱。”亚历山大大胆地说道。而国王身边的人群登时哄然大笑。

“成交。”他父亲回答道。

亚历山大跑到布凯法拉斯身边，牵起它的缰绳，使它转身面向太阳。因为他注意到，这匹马一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面前晃动就又惊又怯。亚历山大就地站了一小会儿，轻轻地拍打这匹高大的牡马，渐渐使它平静下来，同时估量着它的烈性。随后他解下披风，轻轻一跃便跳上了马背，其行动充满了活力与敏捷，而这正是他成人之后的典型特征。起初他勒紧缰绳，随后便信马由缰。于是，这匹强健的骏马就风驰电掣般在平原上飞奔起来。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腓力以及他身边的那些人都“焦急地说不出话来”，但亚历山大很快就调转马头，慢悠悠地冲他们跑回来。这时人群爆出一片欢呼声来。而腓力半是自豪半是气愤，他开玩笑道：“去寻找另一个王国吧，马其顿早晚不够你驰骋。”他亲了儿子一口，双眼满是泪水。不过，最后是科林斯的德玛拉托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他把布凯法拉斯买了下来，送给亚历山大作为礼物。从此，

少年与骏马须臾不可分离。布凯法拉斯载着亚历山大，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它死于30岁的高龄，就在它主人的最后一次大战胜利后不久；那次战役对的是印度王公波洛斯（Porus，又叫保拉瓦 [Paurava]），发生在杰赫勒姆河上。¹⁵

我之所以长篇大段地引用这则轶闻，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亚历山大和其父之间为数不多的重要交流记录。真实情况是他们俩极少碰面。腓力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征战上，而且即便回到了佩拉也总是忙于各种外交事务，更不用说还有专为到访使节而设的喧闹的国宴了。着实让人惊讶的是，亚历山大似乎很小就已经开始参加这类宴饮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后来为何沉溺于此。作为公元前346年雅典派往佩拉的十位使节之一，埃斯基涅斯有过记载，说这位10岁的王子曾在晚餐过后弹奏里拉琴来娱悦他们，还带有强烈个人指涉地作过朗诵。可能就是在这个场合中，腓力问他的儿子，弹琴弹得这么好，难道就一点都不引以为耻吗？（正如普鲁塔克强调指出的）腓力此话的意思是“对国王而言，他若能拨冗聆听他人弹奏，就已经足够了”。¹⁶也许还有别的涉及亚历山大的教养的事，但他必定从小就深谙生活之现实。

公元前348年8月，奥林托斯在腓力的围困下失陷了，同时腓力的两个异母兄弟也被俘虏和处决了。雅典人在公民大会上犹豫不决，等到他们派出增援部队去救援时已经太迟了。他们对腓力的背信弃义大为光火。埃斯基涅斯谴责了腓力的残暴和野心，但当他试图联合希腊各城邦来反对马其顿时，结果却只落得一场空。雅典接纳了奥林托斯的逃难者，以此稍慰良心；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他们最后于公元前346年3月派了一队和平使团前往佩拉。¹⁷腓力对付这些可怜使节的手段，堪称外交史上最可笑可叹的一章。使团团长菲罗克拉特斯（Philocrates）是他的受雇代理人。其余的多数人，在他们访问期间，腓力都设法进行了贿赂。德摩斯提尼确实执拗，因此腓力便在他和他同僚们之间挑拨离间——这实在是太容易了。当基于维持领土现状的和平协议经过表决后，雅典的签约人在佩拉无所事事，而腓力却拿下了色雷斯的一大片土地。最后，

腓力批准了该协议。¹⁸

雅典公民大会被骗得有些糊涂了，竟以为忒拜会中立，奥洛波斯可以收复，优卑亚可以用来交换安菲波利斯，而这一切都毋须他们付出一分一毫。他们很快就会学乖的。此事所产生的影响和反诉，让雅典法庭忙活了好几年。有关受贿与腐败的控诉与反诉，就像人们胡闹时所扔的奶油派一样来回抛掷：大部分控诉中都包括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和所有被彻底愚弄过的人一样，那些责任人试图转嫁责难，但却几乎毁了自己。菲罗克拉特斯受到弹劾，于是逃离了雅典。德摩斯提尼起诉了埃斯基涅斯，但后者在投票表决时以一票之差侥幸脱罪。大规模的政治丑闻竟公然得到洗刷，而其最大受益人自然就是腓力本人。这样，通过败坏雅典领导人的名声，使其显得不但卑劣而且无能，腓力大大加强了他在与忒拜等敌对国家谈判时的地位。分而治之的策略再一次送来了相当可观的红利。¹⁹

与此同时，腓力一直在巩固他在其他地区的地位。对他来说，所谓的“神圣战争”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福基斯的公民（相当合理地）觉得，既然德尔菲在他们领土之内，他们就有权控制该神谕所；于是，他们动用武力接管了它，而所有试图驱逐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诚然，福基斯只不过是希腊最小的城邦之一，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阿波罗神谕所积累的献品能够几近无限地支撑一支庞大的雇佣军。于是，负责管理德尔菲的国际宗教组织近邻同盟议事会就向腓力求援。

腓力起先有点诧异，随后迅速做出回应。他一面打出支持维护宗教正统的旗号，为自己赢得国际声望，一面有了绝佳的理由将军队开进了希腊中部。在此后的这些年中，神谕所本身也给予了相应的政治支持：尽管德尔菲的历史相当复杂多变，但它依然有着巨大的权威和声望。到公元前346年夏末，腓力摧毁了福基斯残余的抵抗力量，同时把军队向南推到了温泉关附近。他所获得的回报便是该年的皮托赛会的主持权，以及此前福基斯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中的两个席位。²⁰

现在，腓力当之无愧地成了希腊最强大的统治者。可能早在公元前352年，²¹他就被任命为塞萨利的终身执政官了。如今他又着手将塞萨利分为四个分区，这样一来塞萨利实际上成了马其顿的域外王国。当他为此而在塞萨利停留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情人，名叫尼刻西波利斯（Nicesipolis）。谣言传到了奥林匹娅斯的耳中，说这个女人正对腓力使用巫术的咒语和药水（塞萨利的女巫在古代极负盛名）。王后派人召来尼刻西波利斯，发现她不仅漂亮，而且机智而有涵养。“去他的谣言！”据说奥林匹娅斯如此惊呼道，“亲爱的，你就是你自个儿最好的魔法。”这两个女人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起了终身的友谊。在尼刻西波利斯死后，奥林匹娅斯将她与腓力所生的女儿特萨罗尼刻（Thessalonice）抚养成人，后来特萨罗尼刻嫁给了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儿子卡山德（Cassander）。这段趣事对于消除现代的传奇故事的偏见大有益处，因为现代的传奇故事把奥林匹娅斯描绘成一个妒忌的一夫一妻主义者。她残暴而嗜杀，这毋庸置疑，但她的道德伦理源自部族，奉行的是血亲至上的原则。只要她本人及儿子的地位不受动摇，腓力随便有多少情妇也无关紧要。事实上，这种婚外恋的后代有权在王室家庭中得到一个被认可的位置。²²

就在此时，即公元前346年秋天，雅典老练的宣传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发表了名为《致腓力辞》（*Address to Philip*）的演说，号召组建一支由腓力领导的对抗波斯的泛希腊远征军。组建这种远征军的理念并不新奇。在公元前408年的奥林匹亚庆典上，高尔吉亚（Gorgias）就曾提出过。公元前384年，吕西亚斯（Lysias）又再次提及，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因为三年前斯巴达曾迫使希腊诸城邦与波斯达成一个屈辱的协定，即“安塔尔基达斯和约”。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被割让给了波斯大王，那些曾在萨拉米斯或温泉关战斗过的人的子孙如今却要承认波斯大王的领主权、希腊内部纷争的裁决权和各城邦“自治”的监护权。²³可以想见，这激起了广泛的议论，人们想要发动一次联合战役以结束如此屈辱的状况，并将伊奥尼亚各城邦从波斯的控制下解放出来。²⁴但是，第一

次以严肃、理性的方式阐释这一计划的是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Panegyricus*，公元前380年）。这是一篇格调高扬的专论，它设想组建一支对付亚洲蛮族的远征军，由雅典领导，而以悔悟并改过自新的斯巴达为副手。

然而，它的实际效果却有违初衷。雅典人觉得，对于重建他们旧有的爱琴海海上帝国而言，这正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原初的方案在持续不断的内讧和残暴嗜杀的阴谋中消失不见了。伊索克拉底很失望地把雅典从远征军的未来领袖名录中除去，并且针对其不负责任的侵略行为以及帝国主义的苦果，创作了一篇劝诫性的小宣传文。²⁵但是，他从未放弃那个计划，将之视为“唯一比和平更好的战争：它更像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而非军事远征”。大约在公元前356年，他将这一想法提请未来的斯巴达国王阿奇达摩斯（Archidamus）考虑，他甚至偶尔设想过跟可怕的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Syracuse）接洽。²⁶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想法的发展趋向。雅典或许是文明、自由和民主的源头，但这并不一定能使之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领导者，特别是与其他希腊城邦的合作至关重要时。腓力的崛起似乎就是对伊索克拉底的祈望的回应。远征军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尽管《泛希腊集会辞》与《致腓力辞》在调子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二者相隔的岁月已经将伊索克拉底的理想主义抹擦得所剩无几了），但几个主要论点还是相同的。它们都强调波斯的怯懦、阴柔和军事上的无能。两份演说辞都详述了侵略军只需付出小小代价就能掠回的无比丰厚的战利品：是可忍孰不可忍——蛮族人竟比希腊人还要繁荣！同样，二者都着重指出，这种远征军将会吸收庞大而危险的无地游民和游手好闲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乃无穷无尽的战争和派系争斗的副产品，如今正散布在希腊各地。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倡导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一起行动，以此作为可能解决无穷无尽的邦际仇怨的最好方法，这些仇怨持续撕裂着希腊世界，使之无法做出任何的协同行动。伊索克拉底宣称：“为打败波斯大王从而夺得他的帝国而战斗，要比为霸权而相互争斗光荣

得多。”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一样，他也把波斯人当作“天然对手和世代的仇敌”。因此，远征军既有种族性，又有文化性，还兼有宗教性。²⁷

另一方面，《致腓力辞》这篇演说辞又是为特定的听众构思的，其中包含了一些新的特征。对自由制度的赞颂被小心翼翼地去掉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潜台词是独裁统治的优势。此外，伊索克拉底还对比了另一场战争，即那场由赫拉克勒斯领导的对抗特洛伊的战争，那是为了人类的总体利益而发动的。当然，赫拉克勒斯被奉为腓力的直系祖先，而演说辞也是这么叙述的。伊索克拉底在他精心构思的演说辞中写道：“作为一个有幸享有无拘无束之自由的人，能将整个希腊看作你的祖国是你的殊荣。”——这是一种修辞学的夸张，但最终腓力差不多就按这种字面意思执行了，甚至原作者都没料到他会这么一丝不苟。²⁸事实上就整体来说，《致腓力辞》必定会让它的演说对象既觉得有点轻蔑，又让人愉悦。

首先，该演说在种族方面的骄傲自大一如演说本身的天真幼稚。路人皆知，伊索克拉底已经历了一切可能的选择，不得已才转向那位马其顿的强人。其谄媚太过露骨，而其政治转变又太过明显。而且，这好像是在说腓力领导这种远征军将完全是出于利他的动机，也就是说，腓力将要扮演的乃是自由希腊联盟的义务军事领袖，并且除了一点小小的战利品和在希腊世界中的美名以外，他将别无所求。伊索克拉底似乎未曾想过，在这方面腓力有自己的打算。然而，腓力对此还是心存感激的。毕竟他的赫拉克勒斯血统得到了德高望重的雅典贤人的支持，这不仅十分可喜，而且非常有利。再者，这位贤人所提出的计划是一个明显可行的方案，其中的诸多具体设想后来都一一实现了。²⁹尽管腓力对泛希腊主义这一理念十分不屑，但他立即看出它可用作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旗号（后来他的儿子就把这一现成的理念继承了下来）。不经意间，伊索克拉底就为腓力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宣传路线。从今往后，他只需要给他的马其顿野心披上一件恰合时宜的泛希腊主义的外衣就行了。

但是腓力并非唯一读了伊索克拉底演说的利益相关者。很显然，它也引起了波斯大王的注意。当公元前346年底演说全文被送达苏萨时，它必定引起了相当大的警惕。波斯的许多反叛者和流亡者，已经把年轻而强悍的马其顿国王视为未来推翻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远征军领袖了。而腓力在佩拉为其中的一些人提供庇护，同时还纵容他们的这种念头。他很有可能会把如此诱人的计划付诸行动。³⁰此时，波斯正处于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奥科斯（Artaxerxes III Ochus）的统治之下，人们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诸如“古代近东最后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和“最嗜血的阿契美尼德君主”，这些说法未必相互矛盾。他所推行的严酷统治迫使一些臣民起而反叛，而更多的人则前往国外寻求庇护。阿尔塔薛西斯甫一登基，最先下达的命令之一就是杀掉他的所有亲属，不分年龄和性别。接着，他命令小亚细亚的总督们遣散他们的雇佣兵。阿尔塔巴佐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设法争取雅典的支持以发动叛乱，在叛乱计划流产后，他流亡到了腓力的宫廷中。

叛乱最终失败了，波斯大王立即逼迫雅典撤回对叛乱的支持；一时间连伊索克拉底也开始怀疑他的远征军设想。这些波斯人不再是经希腊宣传裁剪过的怯懦而阴柔的样子，他们一下子变得充满敌意，而且决非虚张声势。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看起来不可戏弄（在这点上，他给雅典政府的信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谣言一时满天飞，说奥科斯雄心勃勃地想成为第二个薛西斯，他要再次征服希腊。一万两千头骆驼已经从苏萨出发，满载着用于招募希腊雇佣兵的黄金，顺着皇家大道而行，络绎不绝。雅典的民众领袖对此大做文章。

在埃及，阿尔塔薛西斯同样雷厉风行、果断决绝。这个关键省份已经脱离波斯好长时间了，目前处在反叛的埃及民族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45年，在《致腓力辞》发表不到12个月后，一支波斯军队从巴比伦开拔，来到腓尼基海岸，占领了西顿。公元前344/343年，一份总集结令发送到了希腊各城邦，要求他们为波斯大王即将进行的埃及征战提供援助。这是阿尔塔薛西斯极为漂亮的一招。腓力自然支持埃及的

反叛者，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希腊人对使团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各城邦对波斯的传统敌意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衰退了，因为与之相比，对马其顿扩张的恐惧要更切急得多。最终，忒拜和阿尔戈斯提供了援助，而雅典和斯巴达则不予回应。现在，阵线已经足够清楚了。就在此时，雅典人通过法令，呼吁腓力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波斯——这一次，他们的行动乃出于理性而非冲动。但是，腓力并不想在别人的催促下过早采取行动。在侵略亚洲之前，他必须牢牢地控制住希腊，而希腊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之一正是雅典本身。因此，雅典的呼吁没有得到回应。

腓力所有残存的疑虑都被接下来几个月的事件消除了。阿尔塔薛西斯充分地把握住了机会。在得到希腊雇佣兵的有力支援后，他的军队无往不胜，一路南下，经由内盖夫进入了埃及。到了秋末，所有抵抗都已经被摧毁了。当地自称法老的涅克塔尼布（Nectanebo）逃离了埃及（后来他在传说中重新出现，被认定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尼基和埃及又一次回到了波斯人的手中，后者很快就被重组为帝国的一个行省。在行动过程中，阿尔塔薛西斯曾经派遣使节到腓力那里，与之商谈一个互不侵略的协定，其条款对波斯大王极为有利。³¹他结盟的主要条件非常简单：马其顿必须撤回对所有本应忠于阿尔塔薛西斯的反叛分子的支持。现在，腓力不仅庇护所有向他寻求保护的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叛乱分子，出于个人目的，他还暗中支持小亚细亚各地许多谋求独立的统治者。其中，有些他秘而不宣，有些则路人皆知，例如他对塞浦路斯当地国王的反叛的支持。

腓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眼下，他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及时中止了各项——至少是那些已为波斯人所知晓的——秘密协定。波斯-马其顿联盟达成了，而塞浦路斯的反叛也平息了。腓力又一次为自己挣得了宝贵的时间，虽说代价比往常稍大了些。他（在估量过风险以后）依旧和赫尔迈亚斯（Hermeias）维持私下的谅解。此人是一个阉宦，曾经作过奴隶，如今统治着阿塔纽斯，该地位于特洛亚斯南部、密提

勒涅对岸，是将来入侵行动的绝好的桥头堡。³²不过，这种联系能维持多久则是另一回事。赫尔迈亚斯已经受到了怀疑。他控制着特洛亚斯过大的地盘，行动太过独立，而且掌握着一只强大的雇佣军。早晚有一天，波斯大王必定会将他逼上绝境。到那时候赫尔迈亚斯家族中有一个成员，腓力非常乐于在佩拉为其提供庇护——不仅是因为他本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而且因为他能为腓力的入侵计划奉献专业知识。

此人是老阿敏塔斯的宫廷医师之子，是腓力本人的发小，比腓力略长三岁（公元前343年，腓力刚过40）。他是柏拉图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而且在其师去世前不久——亦即公元前348/347年——他很可能被任命为柏拉图学园的领袖，接替柏拉图。然而，临终的柏拉图最后选择了自己的侄子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这让他备感失望。大约同时，他的家乡遭到了马其顿军队的洗劫和焚毁，他们正忙于扫荡卡尔基狄刻半岛上残存的抵抗力量。作为马其顿的门客，他本人在雅典同样不受欢迎，而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继续留在雅典了。

所以，他和朋友、未来的学园领袖色诺克拉特斯（Xenocrates）一道移居他国。他们居留于赫尔迈亚斯的宫廷，并且立即开始工作，力图把这位前奴隶和前金融家改造成理想的哲人王——这种使命，希腊哲学家曾如此珍视，而今人却觉得无此怪异。这个小组日益成功，渐渐获得了声名。他们以“赫尔迈亚斯及共事者”的名义与周边城邦订立了条约。没过多久，赫尔迈亚斯热诚的导师娶了他恩主的侄女，于是就出现了恶意的谣言，说他先前就已经与赫尔迈亚斯勾结在一起了。除了进行科学和哲学活动外，他还作为秘密的政治代理人，充当赫尔迈亚斯和腓力之间的联络员。^{④ 33}他的个人形象有些浮夸，如果不说怪诞的话。其人谢顶，双腿细长，眼睛很小。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他穿着时髦的衣服，用刻意的方式修理和卷曲头发，而且说话有点咬舌。他手上还戴满了戒指，熠熠生辉：总的效果必定和小迪斯雷利（the young Disraeli）最糟的一面相仿。³⁴他的名字是亚里士多德。

他比多数人更早意识到，阿尔塔薛西斯新的强势政策很可能会给赫尔迈亚斯带来麻烦。公元前345/344年，他深谋远虑地越过海峡来到密提勒涅，可能是受到了当地一位名叫特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年轻植物学家的邀请，此人曾到阿塔纽斯去聆听他的讲课。亚里士多德在岛上待了两年，一直在教书、做研究，同时密切关注着波斯人在特洛亚斯的活动。也就是在这个岛上，他于公元前343/342年收到了腓力的邀请。那么，他是否会同意回到马其顿并担任亚历山大的个人导师，以此回报与之相应的高薪厚禄呢？这个少年眼下已经13岁了，需要一个一流的老师来指导他学习。腓力委婉地表示，他现在有些难以管束。作为额外的条件，腓力承诺会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斯塔吉拉，并召回“那些正在流亡或已变成奴隶的公民”。³⁵这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导师职位，它必定会带来非常特殊的个人和政治上的责任。

这位哲学家就此做出的决定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作为一个男孩，亚历山大的身材比常人略矮，但肌肉强健，身体结实。（和他的英雄阿基琉斯一样）他已经是一个出色的跑步能手了。他的头发金黄而蓬乱，据说很像狮子的鬃毛；同时，他还有着白人常有的红润面色。他的眼睛则有些奇怪，其中一只呈灰蓝色，而另一只却是深褐色。他的牙齿特别尖锐——根据亚历山大传奇的说法，“像是一些小钉子”，这种不同寻常的写实修饰一直为人们所深信。他有一副尖而高的嗓音，当他激动时声音有点刺耳。他走起路来快速而有力，这种习惯他是从老列奥尼达斯那里学来的；他的头略微向前和左倾——至于这是由于某些生理缺陷还是因为单纯的偏好，至今仍不得而知。他最早的肖像甚至有一种非常女孩子气的感觉，而在这种温柔的魅力背后却潜藏着一种受压抑的歇斯底里。人们觉得，亚里士多德那段时间大概非常头疼。³⁶

鉴于佩拉潜藏着各种政治阴谋且奥林匹娅斯的影响无处不在，腓力很明智地断定，此地已不适合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亚历山大了。更高的教

育需要有乡村般的清静环境。所以，他把米扎的所谓宁芙区指定给亚里士多德，这个地方是贝尔弥昂山脉东缘的一个村庄，位于贝罗亚（维里亚）以北。该地区可能是著名的弥达斯花园的一部分，涵盖了现在的维里亚-纳乌萨-沃德纳区域，这是一个遍布优质葡萄园和果园的地方（纳乌萨现今仍在出产类似勃艮第的精良红葡萄酒）。³⁷晚至普鲁塔克时代，亦即公元1世纪时，游人依旧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授课之处的石凳和林荫道。亚历山大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唯一的学生，而这又一次展现了腓力的远见卓识。腓力为年轻的王子挑选了一群同龄人，随他一同在米扎读书。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终身好友赫淮斯提翁（Hephaestion）、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和拉古斯之子托勒密（Ptolemy）——后面两位后来都成了国王。此外还有佩拉的马尔西亚斯（Marsyas of Pella），他后来写过一篇题为《亚历山大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lexander*）的专论，现已佚失。³⁸

古代史家告诉我们，腓力曾嘱咐他的儿子要努力学习，尤其要注意亚里士多德所教的内容——他说：“这样你就不会做太多那些我悔之不及的事情。”此时，亚历山大略为无礼地责怨腓力，“因为除了他的妻子外，他还总是和其他女人生养孩子”。要注意的是生养孩子，而不仅仅是性关系：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排除现代人的观念，即认为亚历山大是青春期的哈姆雷特而腓力则是克劳狄斯（Claudius）。事实上，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对王位继承权的忧虑。毕竟，非婚生的异母兄弟就给腓力带来过巨大的麻烦。为什么亚历山大自己也要重新经历这种糟心的过程呢？而国王的回复也说明他深知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回答他儿子的责难时，他说：“好吧，如果你有众多争位者（强调为笔者所加），那你就证明你是可敬而且优秀的，这样你赢得王位就不是因为我，而是全凭你自己。”³⁹

这个故事基本排除了类弗洛伊德式的元素，而某些学者⁴⁰认为他们在亚历山大与奥林匹娅斯的关系中发现了这种元素。真相少了许多传奇色彩，但对于未来的许多事件而言却意义重大。即使是在这个年纪，亚

历山大最为萦心挂念的（也是他母亲最挂念的，如果说到这方面的话），乃是他作为嗣君的地位。纵使 he 确有俄狄浦斯情结，跟热切的王权野心相比，那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因为这种野心正是奥林匹娅斯孜孜不倦地在他心中培养起来的：那些坚持心理动机论者若以阿德勒（Adler）^⑤而非弗洛伊德作导师，或许能做得更好些。

当有人向他提议，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短跑健将，完全可以去参加奥林匹亚赛会时，他回答说只有其他国王作他的竞争对手，他才会参加比赛。⁴¹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性格，而且跟我们对他成年后的性格的了解相当吻合。当亚历山大正在整个亚洲追赶大流士（Darius）时，他听说亚里士多德发表了一篇专论，一篇关于形而上学的更加深奥难懂的重要著作，这篇专论原本只留与少数优秀学生口头讨论，因而也是米扎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国王尽管忙于其他燃眉之事，但仍抽出时间给他的前任老师写了一封信，一封简短而带有怨怒之气的信。他质问道：“倘若这些我受其训练的学说成了所有人共有的知识财富，那我又能有什么方面超过其他人呢？”亚里士多德安慰性地回复说，这篇专论对于没有上过他课的人而言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它发表出来只是作为初学者的备忘纲要而已⁴²——这个回答有点苍白无力，绝非精心措辞来抚慰亚历山大那被激怒且有极端王者心态的自我。

要永远做最优秀者：荷马式的理想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支配着亚历山大诸多行动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看法（如果《政治学》第三卷跟他在米扎阐述的观点存在联系）也并没有弱化王太子自身的想法。人们大概会猜想，作为一个优秀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觉得他的王室学生的地位和雄心让他备感为难。当时政治理论的整个趋势，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独裁主义，都在转向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由《政治学》可知他一直在设法回避这一难题。尽管总体上他谴责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但他仍给为君主制留了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也是唯一的一个，即卓越的个人的 *areté*（成就 [achievement]），一如文艺复

兴时期的*virtù*)。选择这种独特的荷马式标准绝非偶然。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在凡人当中如神明一般”，他和宙斯一样，是不会屈从于同辈之人的统治的，而且超然于法律制裁之上，因为他就是法律的化身；这样的人只能当国王，没有其他道路可选。

即使这样，君主制也只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即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当国王或其家族的*areté*是如此地卓越超群，以至竟远远胜过其他公民的*areté*的总和时。”要是腓力所雇之人没有清楚地说明阿吉德王族恰好符合这个标准，那也至少可以说太欠考虑了。这种学说也许不会鼓励亚历山大在多年之后自命为神（也有人认真地这么认为），但它无疑不会削弱他的王者式的自信。⁴³亚历山大极为渴望通过打败蛮族人而获得荣耀，而在为其寻找理论支持方面，亚里士多德一点儿也不迟钝。实际上，他对波斯的态度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种族中心主义。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制度；相应地，所有“蛮族人”（即非希腊人）天然都是奴隶。所以，希腊人统治蛮族人既正确又合适，反之则不然。如同许多有种族主义之用心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在从地缘政治学或“自然法”中提取的事实中找到了他的理论依据。希腊人的优越显然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恩赐。在一份著名的残篇中，他建议亚历山大做“希腊人的领导者（*hegemon*）而做蛮族人的暴君；要像对待朋友和亲人一样照顾前者，而像对付野兽或植物那样处置后者”。⁴⁴

他这么想有其充足的个人缘由。公元前341年，苏萨方面已经知晓了赫尔迈亚斯与腓力的私下交往。波斯大王派他的希腊雇佣兵将军门托尔（*Mentor*）前去解决阿塔纽斯的那位哲学家兼阉人。门托尔诱骗赫尔迈亚斯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立即将其逮捕。在雅典，德摩斯提尼不怀好意地幸灾乐祸，以为赫尔迈亚斯将会在酷刑之下供出马其顿的绝密计划。可惜，他看错了人。赫尔迈亚斯遭受了肢体残害和刺刑，奄奄一息的他仍设法让人带信给他的旧友们。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与学者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事情。腓力的秘密便和他一起进了坟墓，而身处米扎舒适的静修之所的亚里士多德则为他写了一首深情的纪念颂诗。⁴⁵

人们经常认为，亚历山大在排外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位未来的世界征服者有着比“城邦”更广阔的政治眼界。有的学者甚至断言，“天才与天才的相遇……既没有更深的意义，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⁴⁶但是，即使假定亚历山大后来采取了某种形式的种族融合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最初不曾由衷地支持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甚至他最理想主义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塔恩（Tarn）说：“亚历山大之所以侵略波斯，首要原因无疑是他从未想过不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他继承而来的使命。”⁴⁷

再者，他背后还有整个希腊文化舆论在支持他。欧里庇得斯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蛮族人”应当（*eikos*）臣服于希腊人。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把所有的非希腊人视为天然的敌人，他们可以被随意地奴役或消灭。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则认为对抗蛮族人的战争本质上就是正义的。⁴⁸这些说法可能会被认为荒诞不经而受到不屑；但是它们并没有比德·戈宾诺^⑥的雅利安超人理念更荒诞。而且无论荒诞与否，它们都具有支配信念的力量，从而能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当希特勒要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时，他的行动正是基于某些人可以被当作次等人而加以清除的信念，也就是说，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他将这些人与野兽或植物等同了起来。

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蛮族人的兽性或植物性有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必定在他的学生心中激起过一阵回响。他写道，“没有人会把生存的价值简单地等同于饮食或性的乐趣……除非他是奴性十足之辈”（即奴隶或蛮族人）。另一方面，对这样的人而言，是野兽还是人毫无区别。他引用的重要例证是纵情声色的亚述人萨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us，即亚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可见，蛮族人之所以受到蔑视，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完全沉溺于感官之乐的生活。⁴⁹事实上，单纯的享乐生活正是亚里士多德教他的学生要予以鄙弃的东西。这种学

说对亚历山大必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向来看重自制和克己（至少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是这样），而且他热烈而易感的天性显示出他具有很强的英雄崇拜倾向。（对他来说，英雄是神话人物还是当代豪杰，这并无分别：他可能会以阿基琉斯为榜样，但他同样也会学习老先生列奥尼达斯快捷的步伐。）亚历山大饮食很有节制；他对金钱极为轻蔑，慷慨地把战利品分发出去，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部分；他说，他最能感知自己也是凡人的时刻是“在性爱与睡觉之时”⁵⁰。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好是坏，在米扎的几年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当然，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别对待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建议也可以有更加现实的解释：谁要是想最大程度利用所要利用之人，他就必须尽可能地迎合他们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希腊人要求以平等相待，独立感——无论多么虚幻——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与之相反，亚洲人只响应、或者说尊崇严厉的威权——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政事务官员的信条。不管亚里士多德是否有意设计这门课程，亚历山大学都学得再好不过了。我们会看到，他把它应用到了他后来所接触到的每个人和每个团体中。

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其师无所不包的科学兴趣，以及与之相应的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在一次课堂测试中，他被问及遇到某些情况时怎么办，他回答说碰上了才会知道——这个回答必定深得亚里士多德的赞许。和他的伟大前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经验和观察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基础，现代科学依然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原则。当亚历山大发动亚洲侵略行动时，他随军带了一大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勘探员；他们收集的材料和信息为好几部划时代的科学著作提供了基础，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同样，这一前无古人的业绩的幕后推动者是谁不言而喻。

此外，亚历山大对医学和生物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二者都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特别喜爱的学科。普鲁塔克说，终其一生，亚历山大“不

仅喜爱医学，而且实际上当朋友生病时他还会前去救助他们，为他们开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和饮食疗法”。⁵¹此类科学教育让他最受益匪浅的，或许是由此形成的敏锐而灵活的头脑，以及根据事情的本身、不带偏见地即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其实已经触及了他作为战场统帅最鲜明的品质。

从更一般的层次上看，亚历山大学习的课程正是柏拉图所规定的，在当时的学园成员中十分流行。他阅读并谈论诗歌，特别是荷马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对《伊利亚特》有多么迷恋。他在几何学、天文学和修辞学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修辞学的分支、通常所说的辩论术，即以同等的辩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辩驳。亚历山大十分喜爱辩论术，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后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不难看出。对普通率直的马其顿人来说，“一个从正反两方同样善辩之人显然是虚伪之徒，这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⁵²年老的伊索克拉底因亚历山大的教育没有委托给他、或者他修辞学校的某个成员而愤恨不已，在他眼里整个学园式的训练都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尚有一封他大约于公元前342年写给亚历山大的信，在信中他用一种委婉的外交辞藻告诫年轻的王子，那些只会钻牛角尖的智术师根本无法教他如何有效地应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他指出，君主的职责不是说服而是命令，亚历山大应当远离辩论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建议，即便它是出于偏狭的动机。然而不用多说，它被无视了。⁵³

亚历山大在弥达斯花园待了三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马其顿和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的关系不断恶化。当年轻的王子和他的导师在米扎的林荫中漫步时，腓力有许多更急切和更现实的事务要处理。公元前342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色雷斯上，马其顿与之相邻的边境最为虚弱，于是他沿着赫布鲁斯河谷建立了许多军事殖民地。殖民者是马其顿的渣滓——各类惯犯、失业的雇佣兵和各种捣乱分子。其中有个地方获得了波聂洛波利斯的别名，意为“匪徒之城”：很显然，腓力这一安排可谓一举两得。与此同时，（根据他一惯的王朝政策）他又娶了第四位

妻子——一个色雷斯君主科特拉斯（Cothelas）之女美妲（Meda）。她为他带来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和一个有力的盟友。而据我们所知，奥林匹娅斯没有任何反对。⁵⁴

对于腓力的最终目标，德摩斯提尼不抱有任何幻想。他说，马其顿国王在那里过冬，“不是为了色雷斯人仓储中的黑麦和谷子”，而是作为一项长远计划的一部分，意在夺取“雅典的港口、船坞、战舰和银矿”。⁵⁵这一前景让雅典人非常惊恐，于是他们派遣一位名叫狄奥佩特斯（Diopithes）的雇佣兵队长前往色雷斯的凯尔索涅索斯（加利波利半岛），任务是在那里“保卫雅典的利益”——这是一种经典的委婉说法。狄奥佩特斯随行带了一些所谓的“殖民者”，看起来这些人和腓力沿赫布鲁斯河安置的那些人一样，同属无赖之徒。他本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由政府赞助的海盗，以敲诈保护费为生。伊索克拉底对这种进攻性策略颇为不安，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腓力，建议马其顿和雅典达成谅解，并且再次提出共同远征波斯的方案。⁵⁶

腓力对狄奥佩特斯的行动提出了正式抗议，雅典公民大会为此进行了一场激辩。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色雷斯征集一支大军，其中包括来自塞萨利和马其顿的援军。德摩斯提尼发表了两次激烈的演说，反对召回狄奥佩特斯，强调事态紧急，决不能让腓力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占据上风。他还指出，与民主城邦的征兵制相比，马其顿的常备军有着巨大的优势。腓力的战士要更加训练有素得多，而腓力本人“无论冬天还夏天，不会有片刻空闲”；雅典可能无意与腓力对抗，但腓力已经向雅典开战了。⁵⁷不仅如此，德摩斯提尼还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腓力是如何最有效地对雅典施加压力的。马其顿人“正在建造战船和船坞”，他们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如果腓力占领了拜占庭，那么雅典的粮食供应将受到严重威胁。几年之后，在重述腓力的事业时，德摩斯提尼简要地说道：“他注意到我们比其他国家消耗更多的进口谷物，于是力图控制粮食贸易。”公元前342—前338年，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诡计背后，潜藏着无时不在且非常有效的经济勒索的威胁。⁵⁸

德摩斯提尼积极主张不要妥协，必须让狄奥佩特斯留在原地。更重要的是，应当派一个使节前往苏萨，是时候跟波斯大王和解了。希腊城邦应当消除分歧，并组建一个新的泛希腊联盟；特别是要说服拜占庭与雅典重新恢复旧日的友谊。⁵⁹这些建议大部分都得到了执行。拜占庭和阿拜多斯加入了雅典同盟。狄奥佩特斯仍旧担任指挥官，同时雅典与一些希腊城邦组建了一个反马其顿联盟。当腓力将奥林匹娅斯的叔父阿律巴斯从伊庇鲁斯的王位上赶走，并代之以莫罗西亚的亚历山大时，雅典针锋相对地为阿律巴斯提供政治庇护。海军建设计划得到了扩充。雅典公民大会还举行投票，决定授予色雷斯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友好城镇特别荣誉。公元前340年3月，公民大会又投票授予德摩斯提尼一顶金冠，他在大酒神节上接受了这份荣誉。⁶⁰

重中之重的是，一个秘密使节从雅典前往苏萨，并且斩获硕果。波斯大王最终被说服，决定公开与马其顿对抗。这一举动对希腊城邦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必定相当巨大。他还为使者提供了一笔庞大的应急资金，专供贿赂希腊政客以挑起反对腓力的战争（后来单单德摩斯提尼一人便被控私吞至少3000金德里克）。腓力发现他面临着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于是他以其特有的机敏和精力立即行动起来。⁶¹作为试探，他请求拜占庭和佩林托斯（普洛彭提斯〔马尔马拉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兑现他们与马其顿达成的协议，配合他征讨狄奥佩特斯。二者至少在名义上还是他的盟友，却都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腓力不作过多的争论，直接调动他的新舰队；他决心在形势恶化之前教训一下这些叛逆的盟友，迫使他们回到联盟中来。这次他打算亲自指挥远征，于是他召16岁的亚历山大回到佩拉，正式任命他为马其顿摄政和掌印大臣，由老练的安提帕特作他的顾问。

① 作者说是“vagina”，而普鲁塔克的希腊原文为τῆ γαστρί，当为子宫（或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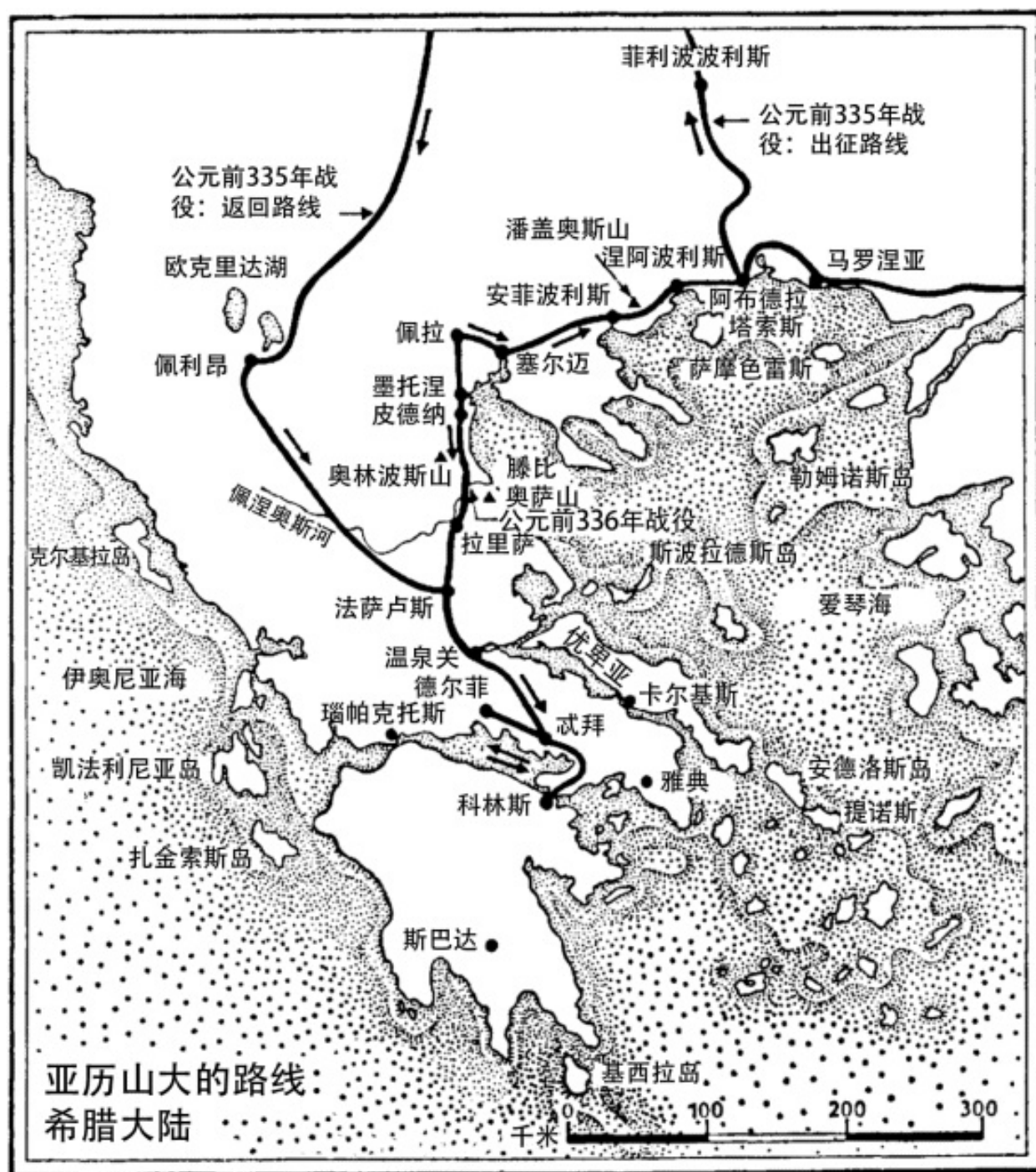
- ② 《罗马书》12:19.
- ③ 布凯法拉斯就是牛头马或有牛头烙印的马的意思。
- ④ 近来，赫劳斯特（Chroust）提出，他早在公元前348年——亦即柏拉图死前就离开了雅典，并且是由于雅典反马其顿情绪的增长，而不是因为哲学抱负受挫；进而，他随后在赫尔迈亚斯和密提勒涅居留，更多是源自腓力的政治命令，而非受科学求知欲的驱使。尽管政治因素不应被低估，但这种观点似乎走到了另一极端，过犹不及。——原注
- ⑤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年），维也纳心理治疗师，以及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
- ⑥ 德·戈宾诺（de Gobineau, 1816—1882），法国小说家，著有《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

第三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亚历山大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从现在起，这位年轻的王太子将在一个甚至比伊索克拉底所规定的还要更严酷的学校中接受训练，并且还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可能就是腓力刻意安排的“刚毅训练”策略。根据特奥弗拉斯托斯的说法，¹他和奥林匹娅斯都因儿子对异性恋爱不感兴趣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他会变成一个充满女儿气的性别倒错之人（*gynnis*），甚至为此招来了一个名叫卡利克塞娜（*Callixeina*）的漂亮的塞萨利名妓，以帮助激发他的男性本色。据说奥林匹娅斯本人经常求他去跟这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这表明他实在对她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谁家的孩子会乐于接受母亲为其挑选的情人呢？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作为摄政的行动却丝毫没有阴柔之气。腓力刚刚踏上他的拜占庭征途（首先是攻打佩林托斯），迈狄人就发动了叛乱，他们是色雷斯和派奥尼亚边境上的一个强大而好战的部落。亚历山大立即北上讨伐，他打败了叛军，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并将其变成马其顿的军事前哨。他将这个新殖民地重新命名为亚历山德罗波利斯，效仿的是腓力的另一个类似的军事前哨——菲利波波利斯。在他父亲操心的领域，亚历山大从不缺乏竞争精神。人们常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城邦，亦即建立一个城邦，就是一种公开的僭越，其行为与反叛无异。但话说回来，他是摄政，手握大印就足以说明他的权限之大。再者，严格说来建立一个单纯的军事殖民地原本就是他的权利之一。可是即便如此

，他的行动也是一个危险信号，腓力必定会觉察到的。在奥林匹娅斯的长期熏陶之下，亚历山大对王权的渴望使他绝不会满足于做一个临时的摄政，而腓力本人正当盛年，仍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迟早有一天，他们俩之间一定会出现纷争。²



不过目前他们仍然维持着亲密而融洽的关系。在国外期间，腓力和年轻的摄政定期通信。现存的他的一些信件残篇充满了父亲的忠告诫勉，犹如切斯特菲尔德伯爵^①的《诫子书》一般。例如，只要可能，亚历山大必须在马其顿贵族中结交朋友（事实上，这位少年的密友很少有属于高层贵族的，其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他的半伊庇鲁斯血统）；作为王太子，他在这个位置上还可以赢得民众的欢心，因为他还可以表现得容易相处，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亲王（Prince Hal）^②。而对于执政的君主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普鲁塔克说，“腓力还向他建议，他应当结交各个城邦中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贤良还是恶徒；而后，他应当利用前者而打击后者”。但是，亚历山大却曾试图通过收买来赢得某些马其顿人的忠诚，而这给年轻的摄政招来了严厉的批评。既然腓力本身就是收买伎俩方面的老手，那么他的意见就很值得注意，他质问道：“你怎么会产生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竟以为通过收买人心能交到忠心的朋友？”³

与此同时，腓力的征战并不顺利。在围困了佩林托斯三个月后，他不得不撤兵。他抓获了230名雅典商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外交争执，最终导致雅典对马其顿宣战。⁴当年秋末，他转而进攻拜占庭，但是该城的防御十分顽强（雅典派了一支海军分队来帮它守城），而他的最后一次进攻却又因不合时宜的犬吠而暴露了。他不得不再次撤退，借助一项铤而走险的计策，才得以把他的舰队从黑海中解救出来。此时，他无疑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局面。雅典的武装民船袭扰着他的船只和补给。波斯已经公开反对他；对此，忒拜等城邦多半会深受影响，它们有可能会切断他通往希腊南部的陆上交通。而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对色雷斯的多布罗加发动的一次损失惨重的突袭（公元前339年春天）。在回国的途中，他遭到特里巴利人的伏击，并吃了败仗；这些特里巴利人乃是一个留长发的原始部落，他们曾给阿里斯托芬提供了一些绝好的

舞台笑话。他丢掉了所有的战利品，大腿还被枪严重刺伤，这导致他后来终身残疾。⁵

到公元前339年夏天，腓力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只是他的对手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点。这些年，他对希腊各城邦一直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而且屡试不爽。但是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他的危险可谓迫在眉睫。此前，他曾设想在泛希腊主义的旗帜下率领军队入侵波斯，届时，无论被迫还是自愿，雅典、忒拜和斯巴达都将派兵随他一同出征。而如今，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希腊人已经和阿尔塔薛西斯达成了协议，如果腓力不赶紧行动起来，那么结果自己的领土被他们入侵，而不是相反。最后，实际情况是他的行动比任何人所能预想的都要快得多。

在马其顿军队实际已经往南朝希腊中部进军时，腓力仍在释放花言巧语的外交烟幕弹，以此减弱希腊人的疑心。他的使者先行到了雅典和忒拜，他们带的信件狡猾地利用了这两个强大的城邦之间的传统敌意：他极力想要阻止二者在紧急关头缓和彼此的关系。甚至在这博弈的最后阶段，他似乎仍希望可以达成和平协议，特别是跟雅典。他对这座“紫云冠之城”的钦佩是真心实意的，但还有其他更加务实的因素影响着他。很显然，他越快和阿尔塔薛西斯打响战斗，形势就越有利。但是，在稳住身后的整个希腊之前就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这无疑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自杀行为。而反过来，和雅典结盟则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威望，同时，这还会促使许多摇摆不定的城邦转投他的阵营。腓力也不想浪费好几个月的宝贵时间去摧毁比雷埃夫斯港无比强大的海上防御。⁶如果雅典不愿改变她的意志，那么必须和雅典军队在陆上进行战斗，并在全世界面前将其击败。腓力还必须设法让雅典及其盟友按照他的方式进行战斗——不是在海上，他们在那里占尽了优势，而是要让他们去面对训练有素的马其顿方阵步兵。而命运女神的安排更加讽刺，因为最后正是德摩斯提尼给了他所渴求的东西。

当年9月的一个深夜，雅典公民大会惊恐地听到消息说，腓力没有

往西南朝安菲萨进军（他宣称的目标），而是在多里斯的居提尼翁向东进军——这个决定和恺撒越过卢比孔河一样意义重大——并占领了厄拉特亚，即通往忒拜和阿提卡的主干道上的一个战略要地。⁷这时，德摩斯提尼作为危急时刻的爱国英雄和雅典自由的狂热拥护者站了出来。迄今为止，他一直用轻蔑的讽刺口吻告诉他的同胞，“腓力深谋远虑地用虚假人性来伪装自己，而他们足够幸运一直能享受这种伪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但是现在，他们不能指望他会继续处心积虑地隐忍下去了。凭借慷慨的热情和激昂的雄辩，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促成了腓力最为担心的事情，即雅典和忒拜组成了一个防御联盟。而仍旧坚持和腓力结盟的伊索克拉底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衰朽的卖国贼而遭人唾弃。⁸

雅典军队开进了波奥提亚，随后这两个新盟友立即着手在西北各山口设防。一支10000人的雇佣军也被派往西面的安菲萨。如果腓力占领了瑙帕克托斯，他就能在科林斯湾最狭窄的地方越过海湾，从而与他的伯罗奔尼撒盟友会师，进而通过科林斯地峡进军雅典。而这些部署切断了他可能的前进路线。公元前339/338年的整个冬天，腓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雅典人则为自己的远见洋洋得意。公元前338年3月，德摩斯提尼再一次因其卓越的公共服务而在大酒神节上被授予一项金冠。不幸的是，爱国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在战略上做出良好判断。德摩斯提尼经常受到指责说他摧毁了雅典的自由，而伊索克拉底的政策本来是能够保存这份自由的，但是，他真正的致命错误是执行了一项正中腓力下怀的政策。

雅典的政治家们不顾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采取的策略，也不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穷无尽的昂贵教训，在国家的危机时刻依然保守地迷恋马拉松之战中的重装步兵传奇。他们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一个多世纪以来雅典早已不再是一个陆军强国，她一度令人胆寒的公民重装步兵现在基本上已经被雇佣兵取代了。雅典真正的军力和长处在于她依旧强大的海军。此时此刻，她拥有超过300艘的现役三层桨战船。雅典在赫勒斯滂的战斗，以及在拜占庭被围期间的行动，充分说明了腓

力在海上是多么不堪一击。如果在厄拉特亚被占领之后，雅典马上动员海军的后备部队，派一支强大的舰队北上塞尔迈湾，那么腓力必定会从希腊中部撤军。然而现在，德摩斯提尼以一种自取灭亡的勇敢，却提出要在陆地上阻击腓力，这几乎就是照着腓力的计划来的。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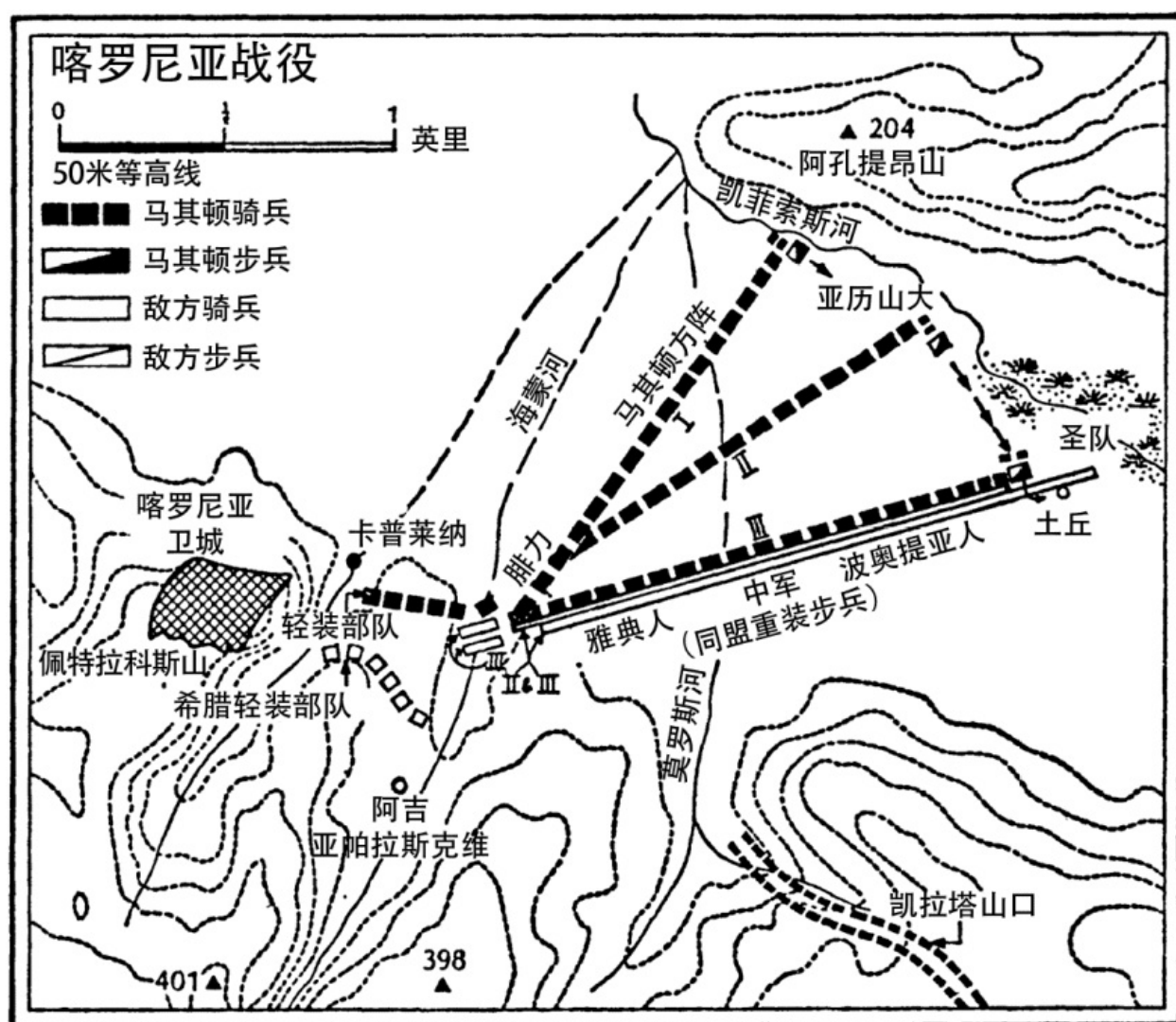
眼下腓力唯一要做的就是引诱希腊军队越出防御阵地，然后进行交战。一旦完成了这一步，剩下的就可以交给马其顿强悍的骑兵部队和训练有素的方阵兵团了。最终，事情的进展无比顺利。腓力伪造了一份急讯，故意让安菲萨的卫戍部队缴获。他们从信中得知，国王正撤回军队以处理色雷斯的叛乱。想到敌人已经走了，希腊的雇佣兵便粗心懈怠了起来。而腓力却在夜间发动了一次强攻将其歼灭。¹⁰他的纵队横扫安菲萨和德尔菲，然后从侧翼包抄波奥提亚西北部的守军，进而挺进离其南面不远、位于列巴德亚附近的平原。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别无选择，他们放弃了各个山口，而在位于凯菲索斯河和要塞之间的喀罗尼亚建立一个更短的防线。这使他们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的西面、东面和南面都有高山作为屏障。在其南边，他们还占有另一优势，即控制了通往列巴德亚的凯拉塔山口，如此一来，腓力就无法使他们腹背受敌。他们的交通极为便利，照目前的情况看，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将马其顿人一直拖到冬天。如果腓力绕过他们直接进军阿提卡，那么他们就会位于他的后方。他唯一的机会就是直接从北边率领军队——实际规模比雅典的小一些，不管后来希腊人的宣传如何夸大其词——对该防线发动正面进攻。在骑兵方面，他们旗鼓相当，两边大约各有2000名，但是希腊人征募了约35000名步兵，对战腓力的30000名，后者可能就是马其顿军队的全部野战兵力。不过另一方面，腓力拥有实战经验和职业化的优势。眼下，雅典最好的将领都已经去世了，现任总指挥是略显平庸的卡瑞斯（Chares）。¹¹

然而，腓力仍在作最后的努力，以期能与雅典和忒拜达成和平协定。雅典指挥官福基翁（Phocion）建议接受腓力的提议，此人刚从出征

北爱琴海的一次劳而无功的小型海上行动中回来，但是，不知疲倦同时又固执己见的德摩斯提尼，拦下了所有想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的企图。德尔菲神谕做了悲观的预言；而德摩斯提尼却将其斥为宣传伎俩而不予理睬，他断言——这可能是真的——皮提亚已经沦为腓力的受雇代言人了。现在，腓力看到外交手段毫无作用，便准备摊牌。和雅典人预想的一样，他占领了瑙帕克托斯，只在德尔菲留下少量驻军，而将其余所有军队都部署在喀罗尼亚以北的平原上。正是在此处，公元前338年8月4日，双方的军队相遇了，随后便展开了整个希腊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场遭遇战。¹²

战斗在黎明时分打响。联军的右翼是波奥提亚人，约有12000人，由著名的忒拜圣队率领，这支圣队曾于公元前371年在琉克特拉打败当时不可战胜的斯巴达军队。左翼则部署着雅典的10000名重装步兵。剩下的联军分队组成了中军，同时还有5000人的雇佣军作为补充力量。而在最左端则有一支轻装侧卫队作为屏障将大军与要塞联系起来。至于骑兵，他们将作为预备队来使用。希腊的指挥官们把战线拉开，由西南偏西朝东北偏东，斜穿过平原。如果腓力进攻受挫，那么左翼雅典人的推进就会迫使他通过旷野退到河边——这种枢转运动就如同扇子的收折。反过来，如果他成功突破了，那么他们依旧能够通过凯拉塔山口有条不紊地退回列巴德亚。这是一个巧妙的方案，要是由更好的将领来指挥，或者遇到的是不那么聪明和专业的对手，很可能就会成功。



阶段一

马其顿人前进；希腊人不动。

阶段二

腓力回撤，中军和左翼前进；雅典人、中军和波奥提亚人前进到左前部，但圣队保持阵形。

阶段三

亚历山大冲锋，中军交战，腓力将雅典人驱至海蒙河河谷。

腓力深知，他所能碰到的最强劲的对抗还是来自忒拜人。因为严格说来，当他们站到雅典一边时仍是他的盟友，所以他们特别害怕，万一失败，他们就会落入他的手中。而腓力对叛徒从不手软。再者，他们的部队本是由久经战场的老兵组成，和他自己的军队一样训练有素：腓力比谁都清楚，马其顿军队的训练正是得益于忒拜人的方式。另一方面，

雅典人都是公民志愿兵，缺乏实际战斗经验。自雅典军队上一次参加战斗以来，已有过去了20年，而且那次也仅仅是为期一个月的战役而已。腓力明白，他的主要目标必然是消灭圣队。同时他也意识到，雅典人的鲁莽和无纪律将极大地有助于他实现这一目的。¹³

于是，他做了相应的战斗部署。他本人指挥右翼，身处翊卫队③的最前面，同时有一支强大的轻装部队保卫他的侧翼。在中央，他安排了方阵军团。而最左端用以对付圣队的重骑兵则交由亚历山大指挥——对一个18岁的男孩来说，这个任命可谓千钧重负，因为他必须发出那致命的一击，倘若成功便能使腓力锁定胜局。（四百年后，普鲁塔克作为喀罗尼亚的本地人，还见到了凯菲索斯河边的一棵树，这棵树一直被人们叫作“亚历山大橡树”，因为据说战前的那个晚上亚历山大就是在此树下搭的帐篷。）本质上，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腓力在欧克里达湖边用以对付伊利里亚人的方案的翻版。

在战斗开始后，腓力的右翼似乎要侧面包抄左翼的雅典人，而他的中军和左翼则滞后一些，从而与希腊人的阵线形成一个梯形的斜角——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回撤”。于是，当他及翊卫队和雅典人开始接战时，其余的马其顿人还在前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策略还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可能也是无意中达到的——情况，即希腊中军的盟军和雇佣兵逐渐向左边的雅典人靠拢。起先，就像腓力所预想的那样，雅典人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他们的将军斯特拉托克勒斯（Stratocles）看到翊卫队开始后退时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声喊道：“来呀，把他们赶回马其顿去！”

但是，（斯特拉托克勒斯本应看出）腓力的撤退绝非因为惊慌错乱。翊卫队步伐齐整地向后移动，同时仍旧面朝前方，他们手中的萨里萨长枪宛如刺猬的保护刺一般，使追击者难以近身。雅典人一边叫喊一边欢呼地向前冲，希腊中军则随之伸展，其情势变得越发危险了。很快，腓力等待的两件事发生了。马其顿人退到了挨着一条不大的海蒙河（又

名血河）河堤边的一个高地上，并且希腊中军和他们右边的忒拜军队之间终于露出了一个致命的缺口。而讽刺的是，卓越的军纪反成了他们的劫数。他们保持住了阵形，但中间的部队却没有。缺口一开，率领着马其顿精锐骑兵分队的年轻王太子便怒吼着冲了进去（这是唯一一次明文记载说他处于指挥左翼的位置），同时第二支骑兵分队从侧面攻击圣队。不一会儿，忒拜人便被完全包围了起来。与此同时，远在右翼的腓力停止后退，并向下发起反攻——狄奥多罗斯说：“即使是亚历山大，腓力也不想把胜利的荣誉让给他。”

雅典人在他们的冲击下溃不成军，现在他们要为斯特拉托克勒斯业余的头脑发热行为付出代价了。马其顿人径直将他们赶下小丘，就地戮杀千人，俘虏人数则倍之。其余残兵则通过凯拉塔山口败逃而去。逃亡者当中就有德摩斯提尼。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逃跑过程中，一株荆棘勾住了他的披风，于是他立即转身过来说：‘活捉我吧！’”就连战败也偶尔会引出一些滑稽之事。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溃败。进攻始于骑兵，而终于方阵。方阵兵团跟着亚历山大冲破了敌阵，从正面和侧面同时进攻希腊的中军。在做了一番无谓的挣扎后，整个盟军都崩溃了，他们一个个落荒而逃，唯独圣队没有。就像在温泉关由列奥尼达斯率领的斯巴达人那样，这300名忒拜人在原地战斗至死，宛如在尸体堆中接受检阅一般。仅有46人被生擒。其余的254人安葬在他们的英勇战斗之地。他们在那里安息至今，以军人的方式排成七行，就像考古挖掘者所发掘的那样；紧挨着他们的公墓有一只喀罗尼亚之狮，任凭风吹日晒，它依旧屹立如初，忧思着这片伤感的平原。¹⁴

在战斗结束之时，腓力命令骑兵不要追击，然后树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并向诸神献祭，接着表彰了许多勇猛无畏的将领和战士。（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是否也位列其中，这是他理所应得的。）紧接着便是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在宴会上，国王以马其顿人典型的放纵风格，豪饮了不计其数的烈酒。随后，他头戴花环，迈着微醺踉跄的步伐走了出来，在高级将领们的陪同下沿战场进行餐后巡视。或许是在放松紧张的神经，

他对着敌人的尸堆放声大笑，蔑视他们的英勇，还用粗俗的言语辱骂他们。（另一方面，有人说，他曾为圣队的覆灭而哭泣，这倒也符合他的性情。）他孩子般地重复着德摩斯提尼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正式开场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以此取乐；这个开场白恰好可以构成一句朗朗上口的韵句：“德摩斯提尼，德摩斯提尼之子^④，派安尼亚人，提议——”希腊的未来最终落入了精明强干的腓力的手中。但是他比谁都清楚，喀罗尼亚之战只是一次险胜而已。

腓力此时既筋疲力尽，又欢欣鼓舞，在这种情绪下他甚至准备拒绝刚从列巴德亚前来的希腊使者，这位使者请求运走和安葬已经战死的同盟士兵。不过，他的一个俘虏、雅典演说家德玛德斯（Demades）很机智地让他冷静了下来。他说：“腓力国王，命运女神已经安排你来做阿伽门农，但你似乎决心要做特尔西特斯^⑤。”暗含在责备中的恭维起到了作用。而这也反映了腓力的性格，他立即从醉酒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不止一个轶闻曾说他在必要时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对这位敢于大胆批评他的人表达了热烈的赞赏。事实上，他随后就将德玛德斯从囚禁中释放了出来，此后便以贵客之礼相待。¹⁵

不过，腓力表面上的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其实有着非常务实的考量。如我们所见，他可能觉得德玛德斯是一个性情相投的好友，但他也需要一个有良好声望的雅典人替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和平条款：要选就得选这样的人，他得能够真心地劝说他们接受条约，并宣扬马其顿国王是一个文明而宽厚的胜利者。雅典仍然能给腓力造成很多麻烦，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事实上，第二天战斗消息就传到了喀罗尼亚，声称雅典人正在武装他们的奴隶和定居的外邦人，准备为保卫城邦而战斗至死。我们知道——没有理由怀疑这样的记载——腓力完全被这种抵抗行动惊到了。雅典舰队尚且完好无损，比雷埃夫斯港及其军备库亦是如此。除非腓力能突破这些极其强大的防御，否则雅典人就可以通过海上航线几近无限地维持供给和交通。

在这种情况下，纵然已在喀罗尼亚大获全胜，国王仍必须表现出愿意和解的姿态。此刻，他最不想要的就是重复那次漫长且最终失败的拜占庭之战，不用说，他既没有时间，大概也没有资源这么做。何况从现在起，他主要关心的将是如何建立一支入侵亚洲的泛希腊远征军。摧毁雅典的军事设施和战船——或者说雅典表现出友善的可能性——是毫无意义的，他自己马上就需要这些重要的物资。¹⁶

德玛德斯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是那群点缀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古怪而有趣的滑头中的一个，在历史学家那里，这群人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他的反马其顿的敌人将他描述成一个粗野、不忠和堕落之人。普鲁塔克说他是“国家的倾覆者”，这个说法很可能就出自公元前4世纪的某些宣传物或演说。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贪财本性。当他听说有个剧作家夸口说通过朗诵赚了一塔兰特的钱时，德玛德斯评论说：“这没什么，国王曾给我十塔兰特，只为让我缄口不言。”大腹便便且贪食如饕餮的他，花钱的速度丝毫不亚于赚钱。安提帕特提到过他，说他晚年时“巧舌如簧、肚里可撑船”。然而，他的三寸之舌确能饶出一些效果来。没有人会否认他的即席演说能力，而他在骂人方面更是天赋异秉。他曾把德摩斯提尼描述成一个“由音节和舌头构成的小人物”。当他带着国王的和平条款回到雅典时，他说他觉得这个城邦“就像一个拖着凉鞋、喝着安慰酒的老太太”，而他对公民大会所说的话简单而粗暴：“我们只能用和平而非讨价还价来对付马其顿方阵，因为当讨价还价之人的力量跟不上他们的欲求时，讨价还价就毫无作用。”¹⁷

腓力对心理转变的时机把握十分精准。在雅典，对主战派的反动原本就已经在发酵了。而德玛德斯这时在惊恐的公民大会前所宣读的和平条款，要比任何人所期待的都要好得多。雅典的战死士兵的骨灰——因为此时仍是炎热季节——最终会被归还。所有的2000名俘虏不需赎金就能获释。腓力保证不会派马其顿军队越过阿提卡边境，马其顿战船也不会进入比雷埃夫斯港。雅典可以保住爱琴诸岛的核心部分，包括提洛岛和萨摩斯岛。她还将得到在通往优卑亚的陆路上的奥洛波斯，这个要塞

先前由忒拜人占据。然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放弃其他所有的领土要求、解散雅典海上同盟并成为马其顿的盟友——正如后来事情发展所证明的那样，这一招对她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她的领袖们的预料。可是，他们眼下如释重负，于是便没有异议地全盘接受了腓力的条件。不单如此，出于由衷的感激，他们甚至授予了腓力和亚历山大雅典公民权，并通过投票决定在市政广场为国王立像。

三名使节——埃斯基涅斯、福基翁以及德玛德斯本人——接受委派，北上去使协定生效。当他们睡眠惺忪地签订协议时，已经是清晨了，他们刚刚与腓力一起度过了又一个醉酒狂欢的夜晚。¹⁸他们没有提出异议的余地。雅典此后所能享有的优惠只是马其顿国王自愿给予的，随时可能被取消。尽管如此，雅典多少还能得到一些慰藉，毕竟他们所得到的待遇要比忒拜好太多了。同样，腓力这么做自有原因：他如果要控制希腊中部，就必须系统地摧毁忒拜的强大力量。她的领袖们曾经无视他们的协约义务，此后仍然可能会再次无视。必须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教训——这个教训最好还能打消其他地方的类似企图。而且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像样的舰队，所以可以无所顾忌地逼迫他们；这跟对雅典人不同。

因此，腓力着手废除波奥提亚同盟，该同盟实际上就是忒拜帝国的雏形。包括普拉塔亚，它的成员邦都恢复了独立——这是一招非常精明的外交计策。而忒拜人自己则被迫召回所有政治流亡者（这将使他们难以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并有一支马其顿驻军从卡德迈亚予以监视。先前的民主领袖们或者被处死，或者被驱逐。和雅典的俘虏不同，忒拜人只能以适当的价格被赎回，否则他们就会被卖为奴隶。不过，合适的时候他也会变得宽宏大量。忒拜人要在喀罗尼亚树立一块巨大的纪念碑以纪念圣队，对此他没有反对。腓力自身就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他欣赏真正英勇的对手。他有所克制地没有在大多数——尽管并非全部——重要的希腊城邦中强行驻军，他说他“更乐于被长时间地称作一个好人，而非做一时的主人”。尽管有这样的小恩小惠，但是如今真正的权力所在之处却显而易见。希腊城邦所保有的只不过是

先前自由的苍白余影罢了。¹⁹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腓力在奥林匹亚建立并奉献了一个圆形的大型建筑物，被称为腓力宫（Philippeum），有点类似德尔菲著名的^tholos（圆形建筑物，它本身可能也是腓力委托建造的，目的是一样的）。²⁰这座建筑由烧制的砖块砌成，内外各有一圈围起来的柱子。屋顶梁由中心的青铜夹具连接在一起，形如一株巨大的罂粟。腓力宫内有多个黄金和象牙的人物雕塑，它们是由雕刻家列奥卡瑞斯（Leochares）特别制作的，其中包括腓力本人、奥林匹娅斯、亚历山大以及腓力的父母欧律狄刻和阿敏塔斯的雕塑。就整体的外形而言，它必定和日本神社非常相像。我们可能会问，腓力建造如此不同寻常的纪念物的真实目的何在？

结论似乎只能是这样：他希望建立起对他本人及其家族的类神崇拜。（我们发现亚历山大更为个性的行动其实已经是由他父亲先行实践的，这便是其中的一例。）其他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一假说。一个如此务实的享乐主义者竟严肃认真地相信自己具有神性，这不管怎么说都不太可能，毕竟他总是急不可耐地要嘲弄其他自许神圣之人。但是，他这么做本质上可能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建立神圣的统治者崇拜。对希腊人来说，人神之间的鸿沟并不如我们今天这么大，而且很大程度上由“英雄”，即那些后来获得神明地位的半神话的卓绝之士填补上了。而且，腓力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先例，即他自己的先祖赫拉克勒斯。更晚近、更有趣的事例还有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萨摩斯人似乎建立了定期的崇拜制度，连同礼拜堂、节庆日和官方献祭，一应俱全。可能稍晚一些，在帕罗斯岛上我们发现了对诗人阿奇罗科斯（Archilochus）的类似崇拜。同样，他的圣所也被叫作阿奇罗科斯宫（Archilocheum）。如我们所见，以弗所的公民们支持腓力自命为神，而至少可以说，这不太可能只是他们的一时冲动。如果国王正筹划着让自己跻身奥林波斯诸神之列——这似乎是可能的——这事就会广为人知。²¹

毫无疑问，这种策略有着巨大的优势，其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运用足以证明这点。腓力快速扩张的权力所制造的问题，一点不亚于它已经解决了的，特别是他个人的地位问题。和他之后的奥古斯都一样，他也深受如何将*imperium*（权力）转换为*auctoritas*（权威）这个问题的困扰，而包含在腓力宫之中的策略便构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建造腓力宫可能也从伊索克拉底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得到了一些间接的鼓舞，该信写于喀罗尼亚之战结束后。这位年老的宣传家——此时他已经年届98，并且几周后就去世了——宣称，如果腓力能让波斯匍匐在希腊人的脚下，那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他成为一个神。²²

然而，腓力宫中的雕像群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在举行奉献仪式时，即大约公元前338年9月，腓力所做的王室安排虽已延续了近二十年，但依旧坚定而不变。奥林匹娅斯仍然是他的妻子，亚历山大还是他的合法继承人，这不仅因为他的长子身份，也因为国王的恩宠。16岁当了摄政、两年后便做了名副其实的骑兵将军的亚历山大，已然成为众望所归的法定继承人。实际上，他的整个教育阶段都是被指向这个目的的。没有人会怀疑他到一定时候就会继承王位。就算这20年中有人曾反对过他，我们的史料中也没有任何记载。然而，在喀罗尼亚之战后仅仅过了一两个月，国王就准备以通奸为由休弃奥林匹娅斯，公开对亚历山大的血统表示怀疑（说明这两种指控是相关联的），并且将娶一位纯正的马其顿贵族作他的第五任妻子，其目的明显是为了生育一个新的男性继承人。那年秋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致腓力的长远计划竟出现如此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大约与腓力的大胜同时，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被他的大维齐尔^⑥巴戈亚斯（Bagoas）杀害了。在狄奥多罗斯轻快的笔下，此人“其实是一个阉人，但生性是个好战的小人”。直到11月，波斯一直处于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其间苏萨因残酷血腥的宫廷阴谋而动荡不安。在成功翦除了所有王位争夺者后，巴戈亚斯将奥科斯最小的儿子阿尔塞斯（Arses

）扶上了王位，然后转身继续扮演他最拿手的木偶提线人的角色。²³这些发展变化不太可能会逃过腓力机警的眼睛。奥科斯当之无愧是一位可畏的统治者，而阿尔塞斯只不过是**大维齐尔**的傀儡。在8月至11月期间，希腊已被实际控制住，而波斯的领导能力也被严重削弱，入侵亚洲的时机一时就在眼前。此时也没有必要四处搜寻一个使希腊城邦转向马其顿阵营的方案：伊索克拉底已经提供了一个现成的。

泛希腊主义现在成了腓力的口号，而战争将以宗教远征的名义发动，意在为希腊向薛西斯一个半世纪前发起的侵略报仇。余下的任务是做好组织细节和军事后勤，并看看每个城邦到底有多大的意愿进行配合。一如既往，腓力首要关心的总是雅典。停战协议甫一签订，他便立即派一队正式的外交使团护送雅典阵亡将士的骨灰回国安葬。可以想见，在这种姿态所产生的友好气氛中，外交往来必定大有收益。²⁴腓力任命安提帕特、阿尔基马科斯（Alcimachus）^⑦和亚历山大作为特使。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王太子最后一次接受与其地位相称的重要任务，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腓力去世。亚历山大对雅典的访问——据我们所知，这是他唯一一次踏入其境——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与他的失宠相呼应。

访问本身进展得很顺利，受到了优厚的礼遇。腓力的雕像正式揭幕；名誉公民权通过代受的方式授予了腓力，也授予了亚历山大。安提帕特和许多有影响力的公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话，其中包括九十多岁的伊索克拉底，此人也是他的私人老朋友。（此时伊索克拉底很机智地把整个入侵波斯的想法都归于腓力，他说他自己只是赞同腓力的意愿罢了。）表面上，雅典的领袖们必定给使节们留下了乐意合作、感恩怀德和急于讨好的印象。但是，这种公开的顺从显然是有限度的：恭敬有礼绝不允许沦为彻底的卑躬屈膝。当阵亡将士骨灰瓮交接过来后，被选出来发表国葬演说辞的并非某个可靠无虞的亲马其顿的谄媚之人，而是顽固的德摩斯提尼，腓力最不妥协的对手。他在葬礼上所讲的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还存有**为公墓而作的动人的碑文**：²⁵

睽睽注目、洞观人事的光阴，
去告诉世人我等所经受的命运，
为保卫希腊的神圣国土，
在波奥提亚平原我们慨然身殉。

特使们在来雅典之前已经得到了简要的指令。他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非正式地和福基翁、吕库古（Lycurgus）等几个主要政治家商讨腓力未来的计划，并评估他们的反应。他们所强调的主要建议包括，在所有希腊城邦中间建立“普遍和平”（*koiné eirené*）、组建新的希腊同盟；而更大胆的提议是，在马其顿的领导下发动泛希腊的反波斯之战。所以，亚历山大在他父亲的所有绝密计划制定之初就有所了解，这是一种特别优先权。更重要的是，他对与之相关的时间表十分熟悉。我们对他在雅典的活动知之甚少，但即使是这少量的信息也十分有趣。东道主们听说他是个跑步健将，于是出于奉承，他们鼓动他和一流的奥林匹亚运动员一较高下。当后者“似乎有意放慢步伐时，亚历山大感到非常地气愤”。可能就是在这个场合上，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即只有以王者作为对手他才与之赛跑。他还请求色诺克拉特斯——目前的学园领袖，以道德实用主义闻名——为他草拟一份“君主政体的法则”。人们自然会想，他觉得他再过多久就会用上它们呢？²⁶

与此同时，从不愿浪费时间的腓力率领军队从希腊中部南下到了伯罗奔尼撒。他致信斯巴达人，询问自己是要以朋友还是敌人的身份过去呢，而他得到的是一个典型的拉科尼亚式的回答：“都不。”另一方面，阿尔戈斯等斯巴达的传统敌人则热诚地欢迎他。尽管之前做过不驻军的声明，但他还是在科林斯卫城留下了一支卫戍部队，可能在其他几个要地也留了一些驻军。他把许多拉科尼亚的土地分给了反斯巴达的城邦，并且使美塞尼亚摆脱了受奴役的状态。有个斯巴达官员没好气地探问，

他是否会给美塞尼亚人留下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以保卫他们所获得的东西。²⁷

他和每个城邦单独签定协议，“分而治之”的原则如今已经成了他的习性。唯有斯巴达以其对抗性的执拗拒绝谈判，而对此腓力也不强求。他可能觉得，一个独立的斯巴达可以有效地制衡他那些新的伯罗奔尼撒盟友，毕竟他们刚从斯巴达的领土中分得了一些土地。腓力宫的奉献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它提醒人们，从今往后无论民主形式怎样变成希腊人自尊的慰藉，终究都是腓力领导而希腊人服从。当国王宣布要在科林斯举行一次普遍和平的大会时，只有斯巴达拒绝参加。²⁸

大约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代表们都来了；腓力煞费苦心地取悦他们，抚慰他们受伤的自尊心。他需要希腊人支持他的波斯冒险，并且他决心要得到这份支持。首先，他宣读了一份有关他的提议的宣言草案（*diagramma*），这份草案私下里已经通过多种外交渠道传播开了。这份宣言构成了随后所有讨论的基础，而且没做多少改动就得到了批准。²⁹大体上，它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内容。希腊城邦将实现普遍和平，同时相互结盟，共同组建一个联邦式的希腊同盟。该同盟将通过联合议事会（*Synhedrion*）共同做决策，在议事会中各个城邦根据本身的规模大小和军事力量的重要程度而享有相应的代表权。由五位主席（*prohedroi*）构成的常设指导委员会设在科林斯，而议事会本身则在依次在四个泛希腊节日——分别在奥林匹亚、德尔菲、尼米亚和地峡——期间举行全体会议。

同时，同盟将和马其顿单独结盟，而马其顿本身并不成为同盟中的一员。这份协议是和“腓力及其后代”达成的，永久有效。国王将是同盟的联合部队的“领袖”（*hegemon*），这是专为希腊的总体安全而设的一个兼具内政和军事功能的职位。至少在理论上，决议要由议事会通过，而领袖则是执行者。如果希腊人卷入战争，那么他们可以要求马其顿支持他们。同样，如果腓力需要军事援助，那么他有权从同盟那里获得援

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到另一个更加纯粹军事性的身份。除了作为领袖，他还变成了*strategos autokrator*，即战场上所有马其顿或同盟军队的全权代表或最高统帅，在敌对状态持续期间一直如此。

尽管腓力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权力伪装在这个精心构建的准联邦的外衣下，但谁真正在做决策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说，领袖的职责之一就是评估每个城邦的军事义务，以替代相应的税金。（交税会损害腓力苦心维持的自由和自治的表象；此外，当前他需要的是人力而非金钱。）虽然出于明显的安全因素的考虑，尚未有人公开讨论这一话题，但是谁都知道，这项条款之所以添加进来，是因为腓力打算远征波斯。这项条款充分表明，腓力拥有事实上近乎无限的执行权，从而可以任意地支配未来希腊外交政策的整个走向。腓力的泛希腊主义只不过是稳定盟友的权宜之计，仅仅是进一步扩张马其顿势力的一个掩护罢了。

大部分希腊政治家对此心知肚明。对他们而言，这位自封的领袖仍旧是一个半蛮族的独裁者，通过征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到他们的头上；当亚历山大接替腓力时，他也继承了一笔憎恶和怨恨的遗产，而他自己的政策也并没有改变这点。事情的残酷真相是，绝大多数的希腊人之所以屈服是因为在喀罗尼亚之战后他们别无选择。腓力也没有被他们佯装的忠诚所欺骗。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分遣部队就是腓力为了让他们安分守己而索要的人质。我们将会看到，希腊人只要见到有一丝儿的机会可以摆脱马其顿的枷锁，他们就会乘机而起。这种棘手而坚定的怨恨，是腓力和亚历山大都难以压制的。它总是隐藏在背后，一直威胁着他们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³⁰

在为和平大会打好基础后，腓力回到了佩拉。³¹在他事业的这个节点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不惜一切代价想避免的就是内部的或家庭的动乱。在国外有太多东西处在紧要关头，在国内决不能有爆发贵族战争的风险。然而就在此时，国王似乎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将马其顿王室分裂成了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并导

致贵族阴谋迭出，甚至迫使迄今尚十分受宠的王太子流亡在外，而当时王太子那特殊的、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天赋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不带偏见的局外人来说，腓力想必是突然发疯了。

公开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毫无争议。腓力宣布他打算迎娶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她是一个低地贵族家庭的女儿；这一举动必定在域外王国的贵族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他们一定会觉得，除了别的目的，这次婚姻还意在降低他们在佩拉的影响力。克里奥帕特拉的叔叔阿塔罗斯（Attalus）是一位勇猛且受欢迎的将军，³²他本人最近娶了帕美尼翁的女儿。在他们之间，两个家族似乎在宫廷中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派别。然而，亚历山大仍是腓力无可争辩的长子，是公认的法定继承人。他的继承权一直是无可质疑的——直到腓力准备以涉嫌通奸为由休弃奥林匹娅斯，并且纵容谣言说亚历山大本人很可能是非婚生的，借此表明他打算再次结婚。³³

此时此刻，没有人会看不出国王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他长期以来为继位问题所做的慎重安排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抛弃了。他与奥林匹娅斯的婚姻代表着低地地区与高地地区的整合，而这一政策同样也要被放弃了：由克里奥帕特拉做他的当朝王后，马其顿王室就“不再是东部与西部的联合，而将只是一个平原王朝”。³⁴所谓腓力真的相信亚历山大乃是非婚生的，纯属无稽之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类指控只不过是王室权力游戏的常规武器而已，而且人们也是这么看的，腓力本人及其直接先辈也曾在不同时期被人用这种方式诋毁过。³⁵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突然决定要采用这些策略，特别是在此时——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去这么做，而且事实上其后果将是失去所有的一切。

可以想见，那场婚宴的气氛必定十分紧张。当亚历山大走进来，走到他理所应得的尊位——即他父亲的对面——时，他对腓力说：“当我母亲再婚时，我会邀请你去参加她的婚礼的。”这句话是不会让任何人

感到自在的。那天晚上，人们以真正的马其顿作派，喝了不少的葡萄酒。最后，阿塔罗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举杯敬酒，在敬酒辞中他“号召马其顿人一起来祈求诸神，让腓力和克里奥帕特拉生下一个真正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窗户纸终于捅破了，而且它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出来，没有人可以——至少亚历山大没法——听而不闻。

怒不可遏的王太子站了起来。“你在说我是个私生子吗？”他大声吼道，并将杯子往阿塔罗斯的脸上掷去。阿塔罗斯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喝得比那两人都醉的腓力拔剑而起，蹒跚地向前走去，他挥剑要砍的却不是阿塔罗斯（此人毕竟污辱了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而是亚历山大。这一举动其意义已昭然若揭。然而，由于喝了太多的酒，加之腿瘸，腓力竟被凳子绊倒，一头栽倒在地。亚历山大用冷冷的蔑视口吻说道：“先生们，这就是那位准备从欧罗巴跨向亚细亚的人，他甚至连从这张躺椅跨到另一张躺椅都做不到！”在这危急时刻，他们三人都暴露出了各自心中藏得最深的念头。亚历山大随即愤恨而去，连夜出走；待到次日清晨，他和奥林匹娅斯就已经出了边境。在护送他母亲回到伊庇鲁斯的亲戚那儿后，王太子本人继续前往伊利里亚，可能是和他的朋友阿格里安人的国王兰伽洛斯（Langarus）待在一起，此人后来给他提供了一些最为强悍和可靠的轻装部队。这些行动可谓意味深长。很明显，从现在起亚历山大和奥林匹娅斯将积极地与腓力作对，尽其所能地通过西部边境的所有部落给腓力制造麻烦。³⁶

腓力的举动乍一看几乎没法用理性的方式予以解释。古代的史料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猜想腓力疯狂地爱上了克里奥帕特拉，以致多少失去了理智。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腓力决不是那种会把婚姻和心血来潮的色欲相混淆之人。纵使克里奥帕特拉像安妮·博林^⑧那样，坚持要求结婚，那也没有理由说腓力就非得休弃奥林匹娅斯不可（他娶第四任妻子时就没有这么做），³⁷更不用说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的亚历山大了。这一步必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除非

是有迫在眉睫的肘腋之患——某种更严重的、因而需要走这一步以尽力避开的威胁，否则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这么做。

但是，这种威胁会是什么呢？大多数的现代史家没能给出任何稍微充分一点儿的动机解释。有人说，腓力那些不安分的贵族们决意要有一个血统纯正的马其顿王位继承人，因而是他们逼迫国王这么做的。但这根本解释不通。此前，亚历山大作为法定继承人没有人曾反对过，为什么现在他们会突然这么做呢？不管怎样，马其顿王位的继承完全是根据父系进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腓力二世决非甘受他人强迫之人，尤其是在这种既私人、又容易在政治上引发爆炸性反应的事情上。有人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但似乎更不太可能。这种解释认为，如果腓力和亚历山大全都在亚洲战役中被杀，那时将没有合适的继任者，毕竟阿敏塔斯一无所长，而腓力·阿里戴奥斯是个弱智。故而，在发动远征之前必须再生一个第二继承人才行。但是我们不免要问，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替补者甚至还没有孕育的情况下，就要先无情地抛弃现有最好的继承人呢？³⁸

事实上，有且仅有一个动机会驱使腓力这么做，即他相信亚历山大和奥林匹娅斯正密谋要推翻他，不管这种信念有无根据。除此以外别无他解。如果这就是国王心中所想的，他的举动立马就可以说得通了。他不可能启程去征讨波斯大王，而把马其顿留给潜在的篡位者。同样，他也不能把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交由一个其忠诚与否尚且存疑的人去指挥。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更不用说可能有某种确切证据——其风险也太大了。于是，只能牺牲掉亚历山大，连同奥林匹娅斯。

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对现代读者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腓力的怀疑实际是否是有理由的，而这里唯一可能的结论是“证据不足”。尽管如此，要看出这些怀疑是如何产生的并不难。从一开始，奥林匹娅斯就一直鼓励亚历山大设想仅靠自己的能力而当上国王，而非只是作为腓力的最终继承人。我们不必怀疑，这就是父子俩之间几次“大争吵”³⁹

的主要源头；王后的嫉妒天性常常火上浇油，而且在争吵中她总是站在亚历山大一边。

喀罗尼亚之战还进一步加剧了亚历山大与其父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人们会说，是亚历山大为腓力赢得胜利的，而我们看到，腓力千方百计地要否认这种说法。或许国王确实有理由恼怒，因为亚历山大后来夸口称，“著名的喀罗尼亚胜利本是他的功劳，但如此伟大战役的荣誉却因忌恨和嫉妒而被他的父亲夺走”。⁴⁰另一方面，是腓力本人将亚历山大提升到一个内政和军事的高位上，这本是他慎重考虑过的政策。倘若这位少年在履行职责时完成得格外出色，那他也无可抱怨。但是，在嫉妒和反叛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我们有什么理由假定，腓力的继承人越过了这条界线呢？而且如果他确实越位了，那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别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亚历山大是怎样把自己想像成年轻的阿基琉斯的，他设想自己命中注定会在征讨亚洲蛮族的战争中获得荣誉和美名。他对战争的态度完全是荷马式的：对他来说，战争始终是通向个人*areté*的皇家大道。他睡觉时枕下放着两样东西：一把匕首和一本翻旧了的《伊利亚特》。奥林匹娅斯从小就教他要把王权视为自己的使命。而亚里士多德则在他心中植入了这样的信念，即只有凭借卓越的*areté*，王权才会合法，并且他还强调了征讨波斯之战的合法性，以此向他表明如何才能够实现这样的*areté*。但是，在亚历山大和他视为个人神圣权利的王位之间，还矗立着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他的父亲。

腓力的人生太过传奇。二十多年来，在他所参与的每场战斗中他都奋不顾身。可他还是活了下来，尽管腿瘸了，伤疤多了，一只眼睛没了，连锁骨也折了，手也受了伤，⁴¹但是他依旧活力四射、热情洋溢，其雄心壮志丝毫不弱于他的儿子，何况他还更有经验，45岁左右却已是身经百战。当亚历山大抱怨他父亲不会留下任何伟大或耀眼的功业让他去建立时，他决不是在说笑。在喀罗尼亚之战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很可能

就要发生了——他恐怕只能像阿基琉斯那样无可奈何地说：“你们都看见我的礼物就要失去。”⁴²

现在，正筹划发动反波斯的泛希腊远征大军的，是腓力而不是亚历山大。如果此等壮举得以成功，收获由此而来的不朽美名的也将是腓力而不是亚历山大。除非有某种偶然的灾祸将国王击倒，否则亚历山大所能期待的只有副统帅所能享有的次等荣誉，也许甚至连次等荣誉都不可得，因为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远征中，腓力很可能会选择他年长而深受信任的副手帕美尼翁为副统帅。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有可能会被再次留在后方做马其顿的摄政，从而与这项他视为天降于己的大任无缘。因而无可否认，他非常强烈、非常迫切地希望腓力能让位。

据说在喀罗尼亚之战后，马其顿人就开始说腓力是他们的将军而亚历山大是他们的国王了。⁴³不难猜测，是谁制造了这个传言，或者说，是谁在散布消息说腓力对这种恭维他继承人的话感到“很高兴”。我们还留存着一些宝石浮雕——据说是公元前4世纪的原作的复制品——这些浮雕表现的可能是亚历山大和奥林匹娅斯（其描述还不能完全确定），风格非常像是一些罗马皇帝及其配偶。⁴⁴那么，这些是不是专门用来宣扬母子联合统治的宣传手段之一呢？在亚历山大实际登基之后，他将会想方设法使奥林匹娅斯待在幕后。但是，在这早期阶段（而且考虑到她和伊庇鲁斯王室的关系），他可能觉得助长她的野心在政治上比较有利。

事情的真相已无法确知。从受益者有责的原则出发来看，亚历山大通过在远征开始之前就发动政变，可以毫无疑问赢得一切。另一方面，在马其顿宫廷中还有一个由阿塔罗斯和帕美尼翁组成的强大派系，他们厌恶这位高傲的王子及其盛气凌人的外国母亲，极力想让阿吉德王朝摆脱域外王国的影响，而且还可能一心想阻止亚历山大继位。腓力与克里奥帕特拉的婚姻，以及更为重要的他对奥林匹娅斯的休弃，都是这一派系运作相当成功的有力证据。散布谣言暗指高层作乱，就是消解腓力对

亚历山大与奥林匹娅斯的信任的最明显和最有效的方式。

无论如何，到公元前338年秋末，亚历山大一直高照着的吉星似乎完全失色了。当他和奥林匹娅斯愤而去国时，敌人的地位恰恰更加稳固了。入侵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同时腓力新妻怀孕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现在，前景似乎十分明朗，而当时很少有人预料到，不久之后事情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

公元前338/337年的整个冬天，和平大会继续在科林斯召开。到了春天，代表们最终批准了他们的“普遍和平”条约，并根据腓力在宣言中所建议的方针组建了希腊同盟。同盟的代表们宣誓就职完毕，不久之后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全体会议。会议随即投票通过与“腓力及其后代”结盟的决定，并全体一致地选举腓力担任领袖一职。更重要的是，这还使得他成了联合议事会的当然主席。以此身份，他正式提议同盟应当对波斯宣战，以报复当年薛西斯对希腊诸神的神庙所犯的渎神罪行。⁴⁵

这项动议也得到了拥护，但那时同盟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同盟也只能任命腓力作远征军的战场统帅，并使其“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条意味深长（且非常必要）的法令规定，从今往后任何希腊人要是选择为波斯大王效命，就会被当作叛徒处理。此时，大约有15000名希腊雇佣兵，还不算为数众多的医生、工程师、技术员以及职业外交家，正拿着波斯人所给的薪酬。实际上，这是同盟最终为计划中的讨伐大流士的泛希腊远征军贡献的人数的两倍还多。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早已对所谓的“解放战争”不抱幻想，特别是当这些战争由雅典和斯巴达等希腊本土大国指挥时。他们的主要目标似乎是为了从波斯手里夺得富裕的附属盟友，而当他们需要波斯的支持时，他们也随时准备将其出卖给波斯大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起码比较温和，而且维持了长时期的稳定，许多伊奥尼亚城邦更乐意接受这种状态，其原因不言自明。⁴⁶

腓力从科林斯回到佩拉，心情非常愉快，尤其是当他听说埃及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叛乱时。⁴⁷此时此刻，任何有可能牵制波斯大王的事情都

格外令人欣喜。然而，他的喜心乐事不过是昙花一现。大约仲夏时候，克里奥帕特拉的孩子出世了，不过不是腓力所期待的男性继承人，而是一个女孩。⁴⁸国王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他出征期间，他绝对不能让马其顿连一个公认的王位继承人都没有。他此时也无法动身前往亚洲，因时一个危险而愤懑的王位继承人正在伊利里亚人那里制造麻烦，而在伊庇鲁斯，他自己的被休妻子同样也在其兄弟的宫廷中筹谋着。⁴⁹没别的办法，必须让亚历山大回来并恢复其原有地位。

问题是，他会回来吗？当腓力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年迈的科林斯的德玛拉托斯恰好来访，此人也是亚历山大的密友。在相互寒暄客套一番之后，腓力开始谈论正事。他问，现在希腊各城邦团结一致吗？德玛拉托斯答道：“此时您家中正乱作一团，您还在谈论希腊人的和睦问题！”腓力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立马看出德玛拉托斯可以充当理想的中间人。即使如此，要应对这一棘手的局面，这位科林斯人也得竭尽他所有的智谋和手段。⁵⁰

不管怎样，德玛拉托斯一行不辱使命（至于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史无明文），他成功把亚历山大带回了佩拉。至少腓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保证，亚历山大仍旧做他的既定继承人，尽管看上去未必如此。另一方面，国王决定不再让儿子受到其母亲的有害的影响。因而，他让奥林匹娅斯留在伊庇鲁斯，如果她在宫廷中，她完全可能闹得鸡犬不宁，与此相比，她在遥远的伊庇鲁斯所造成的任何尴尬都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他也没有让亚历山大回到他原来深受信任的位置。而且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他在克里奥帕特拉分娩之后马上又让她第二次怀孕了。

公元前337/336年的那个冬天，腓力的宫廷平静却又透着稍许的不安。腓力正忙于训练军队，准备将其作为先头部队派往小亚细亚，事先为大部队控制一个安全的据点。同时，他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耗尽他的财政储备。部队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被首先牺牲掉——已经拖

欠得很严重了。有一天，腓力正在体育馆打拳击，这时一队士兵围住了他，冲他大声抱怨。满身都是尘土和汗水的腓力，欢快而厚颜无耻地咧着嘴笑。他说：“没错，小伙子们。但是这会儿不要来打扰我——我正积极训练对付蛮族人，以便能用战利品十倍地偿付你们。”说完，他拍拍手，从他们中间冲了过去，一头扎到水池中，和刚才打拳击的对手溅着水玩，士兵等烦了后便自行离开了。⁵¹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腓力与其部下之间轻松而不拘礼节的关系。但它也提示我们，腓力在时间和金钱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困境。眼下，他根本无法转移目标去发动任何小规模战役。所以，当有消息称奥林匹娅斯已经说服她兄弟对马其顿宣战时，他采用的是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这并不是说他低估了他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是一个独立自主且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得以继位要归功于腓力，但他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公平的回报，对他在敏感的年纪忍受姐夫的同性恋骚扰的报偿。但是，一贯务实的腓力并没有气馁。虽然这位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好像对他靠裙带和男色上位的说法无动于衷，但他仍有可能会对一场乱伦婚姻感兴趣，特别是如果这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好处的话。

所以，腓力写信向那位伊庇鲁斯国王提出联姻，希望对方迎娶自己和奥林匹娅斯的女儿克里奥帕特拉^⑨——当然她也是她未来新郎的外甥女。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伊庇鲁斯国王欣然接受了提亲。婚礼定在6月，在马其顿旧都埃盖举办。至于克里奥帕特拉本人对这场奇怪的婚姻是怎么想的，史无明文。可以设想，作为亚历山大的妹妹的她是一个坚强且热情的女孩。和她的哥哥不同，她似乎还很喜欢性爱。亚历山大对她的小过失颇为容忍。有一次，有人向他报告说她找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小伙子作情人，而他竟只是说道：“我看不出为什么她不能也利用她的王室身份捞一些好处。”⁵²

公元前336年早春时候，一支包括1000名骑兵的10000人的先遣部队

渡过海峡来到了小亚细亚。他们的任务是确保赫勒斯滂海峡的安全、储备物资以及——用腓力消遣般的玩世不恭的说法来讲就是——“解放希腊城邦”。这支军队由帕美尼翁、他的女婿阿塔罗斯和阿拉拜奥斯（Arrhabaeus）之子阿敏塔斯领导。在此，我们可以瞥见腓力更加棘手的难题之一，即前线与后方之间优先性的冲突。他不得不派出他所能信任的将领；同时，帕美尼翁与阿塔罗斯的外派，意味着当他最需要他们时，这两位最有力的支持者都远在佩拉之外。这一弱点，任何潜在的篡位者——尤其是马其顿人——都会加以利用。

起初，帕美尼翁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在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后，他的军队沿着伊奥尼亚海岸向南进击。基俄斯倒向了他，厄里特莱紧随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征服行动，特别是在特洛亚斯和阿德拉米提昂湾附近，但我们残存的史料没有相关的记载。当帕美尼翁接近以弗所时，当地居民自发起义，驱逐了亲波斯的僭主，热烈欢迎马其顿人的到来。他们还在阿耳特弥斯神庙中为腓力立了雕像，与女神的雕像紧挨着。如此奇怪的礼赞举动到底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是根据腓力人所共知的愿望而做的，这一直有疑问。我们只能说，该举动不寻常地非常契合他众所周知的君主崇拜宣传。这位建造了腓力宫并且随后试图让自己也跻身十二奥林波斯神之列并导致严重后果的腓力，如果觉得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优势，自然不惮于与以弗所的阿耳特弥斯共享尊位。

毋庸置疑，在筹划入侵行动时他确实非常渴望能得到神明的支持。他派了一个代表前去德尔菲（在那儿他被授予了赞助人的荣誉），后者以不容商量的直白口气询问皮提亚女祭司，腓力能否征服波斯大王。女祭司很从容地回应了这种直率的探问。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征询神谕的人对于捉摸不定的回复向来很满意，倘若他们能够按他们所预期的方式来解读的话。腓力获得的回复也不例外。神谕说：“公牛已被戴上花环。一切皆已完成。献祭者已经准备就绪。”腓力将此理解为波斯君主将会像牺牲那样在祭坛上被屠宰。事情的实际进展则表明，德尔菲神谕（从回顾的角度常常如此）其实另有所指。然而此时，腓力“很高兴地认

为，亚洲将会成为马其顿人的阶下囚”。⁵³

很明显，其他人也相信他的判断，包括小亚细亚的众多地方统治者；当决战时刻到来时，他们都渴望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其中之一，卡里亚的君主皮克索达洛斯（Pixodarus）现在派遣使节来到佩拉，为他的长女提亲，他想让她与亚历山大的异母弟腓力·阿里戴奥斯共结连理。皮克索达洛斯实际想要的自然是与马其顿结成军事同盟。他将他的姊妹阿达逐出哈利卡那索斯，从而夺得了王位，而他与波斯的关系至少可以说并不稳定。他也没有高估自己充当盟友的资格。尽管他自称是伟大的摩索罗斯（Mausolus）的子孙，^⑩但对腓力来说，他仅仅是一个边鄙之地的贵族而已，再没有比腓力这样比自己也被称为蛮族的人更势利的了。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即将入侵波斯，国王认为能在卡里亚找到一个盟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此外，皮克索达洛斯必定很清楚，腓力·阿里戴奥斯有精神障碍，因此若有机会通过这个孩子的婚姻而获得政治利益，国王一定会欣然接受的。

然而，此时深深缺乏安全感的亚历山大开始变得有些偏执了，他坚信腓力的真实目的是“通过一场奢华的婚礼和重大的联姻”，把年轻的阿里戴奥斯立为继承人。且不说腓力是否真的会把马其顿王位传给一个智障儿，假如亚历山大真的相信那位卡里亚的地方君主抛出的是一场“重大的联姻”，那他显然已经不会理性思考了。可以肯定，他所设想的是，皮克索达洛斯在估量了马其顿王室各派系之后认为，政治前景更好的乃是阿里戴奥斯而非亚历山大。

这一推断必定加强了他原本就已深重的疑心。这也许还解释了，为什么他此时会派他的朋友、演员特萨罗斯（Thessalus）⁵⁴带着另一提议，秘密前往哈利卡那索斯。他建议皮克索达洛斯不要理会弱智的阿里戴奥斯，而应反过来选亚历山大作女婿。即使作最善意的理解，这也是一次明目张胆的欺君犯上之举，而且完全可以解释成叛国行为。再者，倘若皮克索达洛斯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提议，他们的秘密协定必定很快就会

公之于众。到时亚历山大要怎么办？他预计他父亲对此有何反应呢？会送来慈父般的祝福吗？

皮克索达洛斯显然以为自己误判了佩拉的局势，于是颇为兴奋地接受了新提议，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腓力已经知晓并同意了。从任何角度来看，亚历山大都要比他的异母弟好得多。但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朋友菲罗塔斯（Philotas）也秘密参与了这些洽谈，同时他恰好也是帕美尼翁的儿子，于是就把亚历山大的计划告诉了他的父亲。对腓力一向忠心耿耿的帕美尼翁，立即向腓力报告了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国王勃然大怒，带上菲罗塔斯作见证人，⁵⁵狂暴地训斥了亚历山大。普鲁塔克说，他“严厉斥责了他的儿子，痛骂他为人可耻，配不上他的高贵地位，竟然想要成为一个蛮族国王的女婿”。亚历山大小心谨慎地一言不发，而当时腓力似乎也没有对他个人采取什么直接的行动。

不过，他立马处置了亚历山大的朋友和帮手，其处置方式说明他嗅到了阴谋的气息，有必要采取措施来保卫他自己的地位。演员特萨罗斯逃到了科林斯。作为同盟的统帅，腓力要求立即将他引渡回国，于是这位可怜的演员便带着镣铐被送回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后来释放了他，并让他充分发挥个人专长。）与此同时，一群后来在亚历山大手下获得声名和财富的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他的帝国财政官哈尔帕罗斯、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传说是腓力的私生子）、克里特人涅阿尔科斯（Nearchus）、密提勒涅的厄里吉奥斯及其操波斯语的兄弟拉奥墨冬。⁵⁶皮克索达洛斯一事充斥着矛盾和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说辞，在其背后，人们可以感觉到有一场未遂的政变。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腓力在这危急关头选择宽恕其子，其唯一可能的动机便是个人的爱——这份爱大概让他付出了王权和生命的代价。

腓力的所作所为似乎是为了妥协。他没有处决亚历山大的朋友，也没有动亚历山大一根毫毛。或许他觉得，远征波斯在即而且佩拉的权力平衡并不稳定，他不敢贸然进行一次大清洗。不管怎样，清洗行动对他

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有时候，他也会处决众所周知的反叛者，比如他的异母兄弟，这些人对他个人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但是作为权力政治的一种特殊工具，恐怖统治不是腓力的风格。另一方面，此事最重要的后果无疑是国王公开表明了他在继位一事上的态度。现在已不存在支不支持亚历山大继承权的问题了。在腓力的纵容和默许之下，有关王太子非婚生的谣言再度沉渣泛起。更为不祥的预兆是，国王现在为他兄弟的儿子、温良但无大志的阿敏塔斯和他自己与奥达塔的女儿库楠妮安排了一场婚礼。局势又一次变得对亚历山大很不利；随着克里奥帕特拉即将在一个月后生下第二个孩子，亚历山大的前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妙了。⁵⁷

对腓力而言，公元前336年6月表面上有着一个再好不过的开头。首先，波斯方面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宫廷中又爆发了一次新的政变，波斯大王在这场政变中被弑。政变的主谋又是大维齐尔巴戈亚斯，原因是傀儡国王阿尔塞斯似乎有想要独立自主的倾向。这最近的弑君举动彻底终结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直系血统，看起来波斯即将进入新的混乱和内战时期，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缺乏意志和协作来抵抗一次蓄谋已久的进攻。正如后来事情的发展所证明的，这种前景有点过于乐观了。巴戈亚斯到处寻找既合适又听话的继承人，最后选定了一个名叫科多曼（Codoman）的王室旁系成员，此人现在便以大流士三世的名号登上王位。但要命的是，这一次狡猾的老宦官竟看错了人。新国王在军事方面有着傲人的记录（我们将会看到在伊索斯他曾让亚历山大吃了不小的苦头），明显要比可怜的阿尔塞斯坚强得多。不管怎样，他登基后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让巴戈亚斯喝下他自己曾让其他许多人服过的毒药——这开局第一招虽然有点让人不安，但好歹终结了潜在的宫廷阴谋（至少目前是这样）。不管后世有何严厉的评判，大流士三世绝不是一个可以低估的对手。⁵⁸

与此同时，在马其顿的旧都埃盖，亚历山大的妹妹克里奥帕特拉与她的舅舅、腓力先前的嬖幸、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的婚礼正在筹备之中。腓力打算借这场国家婚庆做一次华丽的——如果不是张扬的话——

展示和宣传。总之，他想给希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觉得，他应当用一场恰如其分的宴会来回报他们，回报“他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的荣耀”。但是不仅如此，他还渴望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善意，从而赢得他们真心的支持。他必须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暴君，而是一个文明而慷慨的政治家。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各界名流云集埃盖。腓力从希腊召来了他自己所有的朋友，并且命令马其顿贵族也这么做。腓力以为，一旦客人来齐，剩下的只要交给他那盛大的宴会就行了。⁵⁹他已经安排了一连串不间断的丰盛晚宴、公共比赛、音乐节庆以及“给诸神的豪华献祭”。腓力不惜一切代价，想让它成为真正令人印象深刻且难以忘怀的盛典。事实证明，它最终比任何人所能预见的都更加难以忘怀。⁶⁰

在筹备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从腓力的角度看，这事来得真的太是时候了：国王年轻的妻子赶巧生了一个儿子。似乎是为了强调这孩子将来要做他的继承人，腓力以神话中阿吉德王朝的创立者卡拉诺斯（Caranus）为之命名。⁶¹不难想象，亚历山大对这一举动会有何反应。如今在宫廷中，他几乎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在贵族旧部当中，只有安提帕特还可视作潜在的盟友，因为他“对其权势因帕美尼翁和阿塔罗斯而不断削弱愤恨不已，而且十分厌恶腓力僭称为神的做法”。⁶²如果亚历山大不马上行动起来，那以后就来不及了。然而，当新郎一方从伊庇鲁斯到来时，亚历山大有了一个支持者，在他看来抵得过其他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腓力一直设法使亚历山大远离其母亲的直接影响。但他很难阻止奥林匹娅斯作为其兄弟婚礼上的宾客回到马其顿。⁶³当亚历山大、安提帕特和前任王后最终再度碰面时，他们必定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讨论了。

第一天的庆祝仪式进行得很顺利。会场上的来宾甚至比腓力之前所期望的还要多。不仅有私人朋友，而且还有来自包括雅典在内的重要的希腊城邦的诸多使节，他们向腓力赠送了荣誉金冠。雅典的使者宣布，

“如果有人图谋反对腓力国王并且逃到雅典来避难，那他将会被遣送回来”。这是一句传统的套话，但事后看来，这句套话却有着一种不祥的预言性的寓意。国宴过后悲剧演员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的表演亦是如此。腓力命令他朗诵几段诗歌，要与当前的场合相宜，特别要与远征波斯以及预期中波斯大王的陨歿相关。涅奥普托勒摩斯选了一节诗（可能是出自埃斯库罗斯的一部已失传的悲剧），这一段讲述了由积金至斗和野心膨胀导致的命运。他朗诵道：“你有雄心万丈高，梦想着袤野稼穡丰饶……殊不知，自有人……让我们梦想难圆——死神，这多少凡人的不幸之源。”就像皮提亚神谕，这几行诗可以有不止一个的解释。⁶⁴

第二天专门用来举行竞技比赛。破晓之前，剧场里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而当太阳升起时，一支华丽的仪仗队伍列队整形，缓缓地走入会场。打头的是“十二尊神像，其雕刻之精湛、装饰之绚烂，足以让观众们心生敬畏”。紧随其后的是腓力本人的雕像，该雕像“有如神明”，作为不太吉利的第十三位神插到队伍中来。国王的希腊来宾开始明白了，这种宣传造势除阿谀奉承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人们可能会问，现在又是谁如此僭慢呢？可以肯定地说，现场没有人会忘记在奥林匹亚的腓力宫，很多人还会联想到树立在以弗所的阿耳特弥斯神庙中的腓力雕像。而这最新的举动的含义确实令人不安。

最后，腓力本人出现了，他穿着白色礼服，面带笑容地独自走在两个亚历山大——他的儿子和新女婿——之间。他此前已经下令，让近身护卫官远远地跟着，“因为他想公开表明，他有着所有希腊人的善意作保护，根本不需要什么长枪卫队”。当他在舞台入口处稍作停驻时，一个年轻人——本身正是一名近身护卫官——突然从披风中拔出一把短小宽刃的凯尔特剑，迅速向前奔去，把剑完全刺入腓力的胸肋，当场将其杀死。随后，他径直逃到大门口，那里有几匹马正等着他。现场霎那间陷入死寂，人们完全惊呆了。接着，一群年轻的马其顿贵族急忙去追捕刺客。刺客被葡萄藤根绊了一下，于是摔倒在地。当他正要爬起来时，

追捕者赶了上来，用标枪击中了他。⁶⁵

那些把剑从腓力身上拔出来的人看到，象牙剑柄上刻着一辆战车的图案，于是有人回想起腓力所得到的特洛福尼奥斯神谕^⑪，该神谕警告他要“当心战车”。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步行进场的原因，腓力也有他迷信的时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神谕和往常一样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益处。如今，他摊倒在尘土里，白色披风溅满了鲜血，他那宏伟的梦想已然破碎，就此遗落于世；尽管他已弃世不在，但他的雕像却依旧和其他众神比肩而立，既是人类虚妄意愿的见证，又是一种无声的嘲讽。

⁶⁶

刺杀腓力的人是国王近身护卫队中的一员，名叫保萨尼阿斯（Pausanias），来自域外王国奥瑞斯提斯。他即使不是王族成员，至少也是一名贵族。一两年后，⁶⁷腓力为他非凡的青春俊美所吸引，把他带回来作情人。然而不久之后，国王便移情别恋，故而保萨尼阿斯对那位新人极为嫉妒，甚至把他称为“阴阳人”和放荡的小杂种。不过，在一次与伊利里亚人的战斗（公元前337年？）中，那个男孩（也叫保萨尼阿斯，真叫人晕头转向）为了救腓力牺牲了自己，证明了自己的男儿本色。这个保萨尼阿斯也是那位把侄女嫁给腓力的阿塔罗斯的朋友。

此事在宫廷圈子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慨，阿塔罗斯决定向挑唆者报仇。他选择的方式虽然野蛮而且让人作呕，但倒也有一点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的意味。他宴请保萨尼阿斯，将其灌得死醉。然后他自己以及所有的客人轮奸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轮奸之时其他人便在一旁观看，一边嘲笑，一边辱骂。最后，保萨尼阿斯被转到阿塔罗斯的马夫和骡夫的手中，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他，顺带还把他痛打了一顿。保萨尼阿斯恢复过来后，便跑到腓力那里控告阿塔罗斯。这使国王陷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我们只知道，他“和保萨尼阿斯一样对这种野蛮行为十分愤怒”，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他没办法冷落阿塔罗斯，因为此人不仅是他的叔丈，而且刚刚被任命为小亚细亚先遣队的联合指挥官（公元前336年春

）。克里奥帕特拉也为她的叔叔拼命地向腓力求情。因此，腓力就只是用各种理由敷衍保萨尼阿斯，或者（如果我们能相信查斯丁 [Justin] 的话）将此事当作一个玩笑，直至最后完全不理保萨尼阿斯的指控了。他希望大家能尽快忘掉这件事。可惜，事情并不如愿。⁶⁸

这种同性恋情与报复的秽事乍一看并不能充分解释保萨尼阿斯刺杀腓力的动机，实际上我们的古代史料作者也不这么认为。他对国王的怨恨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时也是次要的。他真正的敌人是阿塔罗斯，但阿塔罗斯却很幸运地离开了马其顿。不管怎样，腓力说到底只是没有为他的前任情人主持正义而已。即使保萨尼阿斯最后确实是出于个人动机而刺杀腓力的，他也不大可能在没有其他人的主动帮助和怂恿之下就干出这种事来。他的怨恨极其强烈，而且尽人皆知，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成为政治谋杀的绝好工具——至于现在谁具有最强的动机想让腓力出局，这同样不言而喻。⁶⁹普鲁塔克说：“大部分人都归罪于奥林匹娅斯，原因是她曾给这位年轻人火上浇油，并挑唆他去做这件事。”正是她（查斯丁断言，“千真万确”）为刺客准备好马匹，以便他能快速逃离。实际上她随后的举动也表明，她不仅策划了谋杀其夫，而且公然引以为豪¹²——这可能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目的是让亚历山大免遭嫌疑，毕竟他才是保萨尼阿斯行动的最大受益人。

凶手的尸体被钉在一个公共绞刑架上，而当天晚上奥林匹娅斯却把一顶金冠戴在他的头上。过了几天，她把尸体取下，将其置于腓力的骨灰上焚烧，随后安葬在附近的一个坟墓中。每年的刺杀周年纪念日，她都会来这儿奠酒。她得到了保萨尼阿斯所用的剑，并且奉献给了阿波罗——以她的娘家姓密尔塔勒的名义。那时候，已无人再敢说三道四。

叛乱从未成功：原因何在？

因为倘若如此，无人敢称之为叛乱。

有其子必有其母：奥林匹娅斯也从不宽恕任何傲慢的言行，尤其是直接针对亚历山大的。而当她进行报复时，除圣经《旧约》中更加血腥的章节以外，其残暴程度少有其比。⁷⁰当时，亚历山大本人不可避免也会招致广泛的猜疑。众所周知，克里奥帕特拉的新生幼子是对他王位继承权的严重威胁。而且保萨尼阿斯在向腓力控告无果后，就向王太子痛诉自己所遭受的暴行，亚历山大听他说完之后，引用了欧里庇得斯的一行谜一般的诗句——“嫁女的国王、结婚的王子和出嫁的公主”；这可以理解为他在挑唆保萨尼阿斯去谋杀阿塔罗斯、腓力和克里奥帕特拉。⁷¹

现代学者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少量的细节。如果亚历山大要策划一次政变（在他强悍的母亲的帮助和鼓动之下），这正是他最好的时机。帕美尼翁和阿塔罗斯连同他们的众多封建依附者恰好远在亚洲。再者，来自希腊所有重要城邦的使节都适逢其时地齐聚埃盖，一同参加此次婚礼。假如腓力死了，他的继任者能否立即赢得广泛认可就非常关键。这种认可不仅要有马其顿的，同时也要有外国的。因为如果成为同盟的领袖，远征亚洲的最高指挥权就会移交到他的手中。这正是赚取支持的绝好时机。⁷²安提帕特在主持继位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提示我们，他同样深深卷入了此事。

刺杀事件本身有一些很有趣的特点。那三位追捕并杀死保萨尼阿斯的年轻贵族——佩狄卡斯、列昂那托斯（*Leonnatus*）和安德洛美涅斯（*Andromenes*）之子阿塔罗斯——全都是亚历山大的亲密好友。列昂那托斯与佩狄卡斯（和保萨尼阿斯一样）同属奥瑞斯提斯贵族，而阿塔罗斯则是佩狄卡斯的妹夫。最近有人提出，⁷³腓力之死实际上（如同亚历山大随后宣称的那样）是域外王国那些不满的密谋者们策划的，他们担心国王的新婚会彻底消除他们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毋宁说，就全部证据而言（特别是亚历山大个人与奥瑞斯提斯贵族团体的亲密关系），无论是谁策划的，这次的谋杀案都狡猾地利用了域外王国的愤恨，从而达成了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一个众所周知对阿吉德王朝满怀怨恨的人自然要安全得多，这种人，日后还可以认定他具有真实或臆想的、代表高

地势力篡夺王位的企图。最好的宣传就是最接近真相的宣传。有此意图的人不难发现：作为腓力王国的失势的——且有一半伊庇鲁斯血统——继承人，亚历山大正是这种潜在的谋反行动的天然首领。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刺杀腓力是如何策划和执行的。⁷⁴依旧对所受暴行怨恨不已的保萨尼阿斯可能和奥林匹娅斯接洽过，而且得到允诺说，如果他愿意与奥瑞斯提斯的三个族人一同刺杀国王，他就能获得高官厚禄。奥林匹娅斯随后将负责为他们四人准备好马匹。⁷⁵但是，保萨尼阿斯显然并不知道他的同谋者们、亦即亚历山大的亲密好友们真正要起的作用是什么。他们的任务不是干掉腓力，而是杀他灭口。他知道得太多了，而一旦完成使命，他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在他死后，宣传机器便可以立即开动起来。杀死保萨尼阿斯可谓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步。⁷⁶

间接证据不会构成有效的证明，但是曾经有人因为比这里更弱的证据而被吊死过。这里的动机非常强烈，而机会千载难逢。事实上毋庸置疑，亚历山大“是通过弑父而成为国王的”。⁷⁷当然，一旦他登上王位，所有对他罪行的怀疑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其原因不难理解。常言道，一有百有；何况腓力现在已是人死不能复生。大多数人宁愿对他们所知道或怀疑的事情保持沉默，并转身投向新政权的怀抱。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①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Lord Chesterfield, 1694—177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文学家，有《诫子书》（*letters to his son*）传世，影响颇为广泛。

② 哈尔王子是《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他还是王子的时候和底层人民一齐无拘无束纵情声色，极其亲民。但在《亨利五世》中，他成了一个威严正派的国王。

③ 翊卫队（*hypaspists*）为腓力和亚历山大手下的一支精锐部队，其希腊文字面意思为持盾卫士。在军队中常起保护侧翼、进行突进等工作。他们所持的武器有所争议，有人认为是和方阵步兵一样的萨里沙长枪，有人认为是和重装步兵一

样的长枪。

- ④ 德摩斯提尼的父亲也叫德摩斯提尼。
- ⑤ 《伊利亚特》中的一个丑陋的滑稽角色，曾当众责骂阿伽门农，后遭奥德修斯痛打。
- ⑥ 作者以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对译希腊语中的 **χιλίαρχος**（亦作 **χιλιάρχης**，字面意为千夫长），可能意在强调该职位地位之高，仅次于国王。但是二者又明显不同：大维齐尔相当于首相，掌管帝国印章，而 **χιλίαρχος** 则是负责波斯大王人身安全的卫队长官。亚历山大后来也设立了这一职位，参见原书第448页。
- ⑦ 除了他是一个曾为腓力和亚历山大效命且颇受信任的将军和大使外，对于此人我们知之甚少：参见 **Berve, APG, II, p. 23, no. 47** 和 **Tod, II, no. 180**。——原注
- ⑧ 安妮·博林（**Anne Boleyn, 1501—1536**），英王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原本是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的侍从女官，但与亨利八世暗中偷情。1533年，她与亨利八世秘密结婚，不久成为合法妻子。后来两人关系恶化，1536年安妮·博林以通奸罪被斩首。
- ⑨ 这有别于腓力的新妻克里奥帕特拉——欧律狄刻。研究马其顿史特别令人恼火的问题之一便是，少数几个名字颠来倒去、没完没了地在用。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经常无法确定所讨论的阿敏塔斯或保萨尼阿斯（实际上也包括腓力和亚历山大）到底是哪一个。——原注
- ⑩ 他的妻子（兼妹妹和继任者）阿耳特弥西亚（**Artemisia**）为纪念他建造了摩索罗斯陵墓——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并且将他的骨灰掺入她每天所喝的葡萄酒之中，直到两年后她本人去世为止。——原注
- ⑪ 特洛福尼奥斯（**Trophonius**），是神话中的人物。相传他与其兄弟阿伽美德斯（**Agamedes**）共同建造了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之后又为某位国王建造金库，但特意留了一个秘密入口。后来在偷窃金库时阿伽美德斯被陷阱抓住，特洛福尼奥斯怕人认出其兄弟的身份，便砍下他的头，然后继续逃跑，在逃入一个地下洞穴后从此消失不见。后来当地便发展出特洛福尼奥斯神谕，征询神谕同样也要下到洞穴中去。
- ⑫ 其他的一些细节已被多数现代史家当作无稽之谈摒弃掉了。但是，一个后来至少犯下五桩政治谋杀案（包括把一个小孩放在碳炉上烤）、下达过不止一百个处决令的女人，不太可能会是一个拘谨的人，而且奥林匹娅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会隐藏或抑制自身情绪的人。——原注

第四章 王国的要害

腓力的遗体被人从剧场里移走了，在现场秩序稍稍恢复之后，安提帕特以极快的速度把亚历山大带到马其顿军队面前，军队立即拥戴他为国王。¹率先向新君效忠的贵族有与他同名的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Lyncestis），他是埃洛波斯（Aëropus）三个儿子中的一个。有时学者们认为埃洛波斯的儿子们也有权利要求继承王位。这种观点最近受到了质疑，²并且理由相当充分。实际上，这几位林刻斯提斯兄弟是否具有王室血统尚且存疑，他们可能仅仅是贵族而已。即使他们有王室血统，地处偏远山区的林刻斯提斯也使他们很难跟现有的阿吉德王子在地位上一较高下。毕竟除去一次短暂的篡位（篡位者是阿罗洛斯的托勒密），阿吉德王朝自公元前5世纪初以来一直在佩拉统治着马其顿。

因而，那时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和他的两个兄弟显然并不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不过，普鲁塔克有一段关键文字（*Moral.* 327C），却明确把他们与真正的夺位者联系了起来：在腓力死后，“整个马其顿局势下面暗流涌动，大家正观望着阿敏塔斯和埃洛波斯的儿子们”。阿敏塔斯是腓力的侄子，即其兄长佩狄卡斯儿子；在腓力死前不久，他刚和库楠妮——腓力与伊利里亚的奥达塔所生的女儿结婚。阿敏塔斯不仅是一个阿吉德家族成员，拥有足够的资格来争夺王位，而且很可能已经在波奥提亚人的支持下秘密进行实际的夺权行动了。³这种阴谋自然会吸引域外王国的支持，埃洛波斯的儿子们似乎就只是在参与这场阴谋，他

们本身并无争位之心。⁴

密谋刺杀腓力的并非完全不可能是阿敏塔斯，但这基本不大可能。直到腓力死前，他似乎一直在宫廷中平静而快活地生活着。使其变成亚历山大的眼中钉的，很可能就是他与库楠妮的婚姻。如果腓力把阿敏塔斯视为王位的候补继承人，那么不管这种想法出现得多么迟，其他人随后自然也会往这方面想。众所周知，埃洛波斯儿子们就是他的朋友和帮手。在从欧洲动身之前，亚历山大所采取的清洗行动，无论是针对克里奥帕特拉的亲属还是他自己的，都明确是为了消除反叛、尤其是争位者反叛的危险。⁵腓力刚刚遇刺，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他似乎对人性有着精准的判断，并且很了解亚历山大的为人）就立马看出此刻他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他没有片刻的迟疑，立即“穿上铠甲，护卫亚历山大进入宫殿”。

事实证明，他很有先见之明，因为国王立即就传讯他的两个兄弟，指控他们涉嫌谋反。（他们后来在腓力的墓旁被处决了。）这样一来，亚历山大不仅甩掉了其父被刺的罪责，而且借此干掉了阿敏塔斯的两个公开的支持者。而第三个兄弟的宣誓效忠速度之快，说明他很可能事先就已经暗中得到了消息。他刚好是安提帕特的女婿，而安提帕特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亚历山大的计划至关重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历山大直到几年之后才处置那个林刻斯提斯人。事实上，他也没有立即动手对付那两个主要的王位候补人：阿敏塔斯本人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幼子卡拉诺斯。如果亚历山大在其父尸骨未寒之时就清洗王室，那么这将会在国内外造成最为恶劣的印象。所以，此时他没有动阿敏塔斯和卡拉诺斯一根毫毛：这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尽管就目前来看阿敏塔斯可能没有策划政变，但是现在即使只是为了自保，他也完全有可能会这么做。⁶

亚历山大的下一步行动是对“马其顿人民”——或者对他在埃盖所能召集的尽可能多的马其顿人——发表演讲。他向他们保证，“唯一的变化只不过是国王换了个名字，国家会继续运作，其统治原则会跟他父亲

的一样有效”——这是一种相当含糊的许诺。他还宣布，免除个人除兵役以外的所有公共义务。换句话说，马其顿公民将免去直接的纳税义务，这显然是为赢得民众支持而开出的价码。在解决完人民方面的事务之后，亚历山大正式会见外国使节。他必须取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这将决定他能否成为同盟的领袖。不过，他根本不用担心。在听完他精心准备、亲切友善的发言后，代表们毫不迟疑地报以热烈的欢呼。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地位，现在他把所有的密友从流放中召回，并任命他们在新政府中担任关键职位。⁷

他必须快速行动起来。腓力去世的消息激起了一大片的反叛浪潮，不仅有希腊城邦，还包括一些像色雷斯这样的边疆部落地区。有些城邦（包括阿尔戈斯和斯巴达）把这看作恢复自由的最佳时机。在安布拉基亚和忒拜，腓力的驻军被驱逐出境。忒拜人和阿卡狄亚人（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没有派代表去埃盖）公开拒绝承认亚历山大的领主地位。他的王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忌恨、强烈的敌意和无处不在的危险”。⁸也许就在此时，但更有可能是公元前335年春天，即亚历山大北上征战多瑙河时，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伙同安条克 [Antiochus] 之子、另一个阿敏塔斯）从佩拉逃了出来，从而跟波奥提亚的各种反叛势力建立了联系。碑铭材料表明，他们的身影在奥洛波斯和列巴德亚出现过，他们必定还访问过忒拜。⁹

但是，最深的敌意却来自雅典，虽说此前他们曾发表过词藻华丽的效忠声明。德摩斯提尼通过私人情报来源得到了有关在马其顿发生的事情的消息，¹⁰在官方使者到达之前就已经知道腓力死了。于是，他公开宣称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众神许诺要赐给他的城邦重大的神恩。当这份“神恩”的内容显露出来时，雅典人的反应几乎是歇斯底里式的狂热。他们刚刚通过投票为腓力立了一个雕像，并且宣誓要把任何阴谋反对他的人引渡回去，而现在他们却颁布了公共感恩一日的法令，还效仿奥林匹娅斯奖励国王的刺杀者一项金冠。

此时刚刚痛失爱女不到一周的德摩斯提尼脱去丧服，身着白袍，头戴花冠，出现在了这一场合中。这种姿态自然不见容于雅典城中正派的保守人士，然而他绝不妥协的反马其顿政策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德摩斯提尼一直密切关注着佩拉派系斗争的一举一动，他十分清楚亚历山大的最大弱点在哪里。如果雅典想要颠覆马其顿的新国王，那么她最大的希望在于和支持克里奥帕特拉的贵族军事集团结盟。公民大会被他的主张说服了，于是授权他跟在小亚细亚的帕美尼翁和阿塔罗斯私下接洽。德摩斯提尼立即给他们写信，鼓动他们对亚历山大（“一个年轻人，一个实足的傻瓜”，他轻蔑地说道）宣战，并许诺说雅典将会全力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果真宣战的话。

不出所料，阿塔罗斯欣然接受了这项提议，而如果没有他丈人帕美尼翁的认可和支 持，他是几乎不可能这么做的。亚历山大时间上恰到好处的政变行动——如果确实是政变的话——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王朝计划，要是他们不抓住机会发动一次反政变的话，那也太不合情理了，而且也不像马其顿人的风格。而第三位指挥官阿敏塔斯更是迫不及待想要加入反亚历山大的阵营中。¹¹他的父亲埃洛波斯之子阿拉拜奥斯，已经成了亚历山大首批牺牲品之一，在腓力遇刺当天被处决了；这层关系还提示我们，小亚细亚的最高统帅部通过阿拉拜奥斯之子跟波奥提亚的反叛势力取得了联系，他们把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看作潜在的盟友，甚至可能把他当作亚历山大的真正替代者。在此关头，没人会真的对克里奥帕特拉及其孩子抱太大希望，只要他们——还有奥林匹娅斯——都还待在佩拉。再者，要是把卡拉诺斯立为国王，那就意味着会有很长的一段摄政期，而这正是各个派别所极力想要避免的。很难说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是否也卷入了这张阴谋之网，但是从后续事件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别忘了帕美尼翁的同僚阿敏塔斯可是他的兄弟。

然而，德摩斯提尼及其他人最终以自身代价发现，在这种政治斗争中，亚历山大要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更老练。亚历山大立马看出，自己潜在的最大反对势力必定来自小亚细亚的最高统帅部，特别是他不共戴

天的仇敌阿塔罗斯。阿敏塔斯也没有理由会爱戴他；但另一方面，帕美尼翁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机会主义者，如果以足够多的利益劝诱，他很可能就会转敌为友。因此，亚历山大挑选了一位名叫赫卡泰奥斯（Hecataeus）的可靠的朋友，让他带着一支精锐小队前往帕美尼翁的司令部：他表面上是一名联络官，实则是一个特工。赫卡泰奥斯得到的密令是“如果可能，将阿塔罗斯活捉回来，如果不能，则尽快将其刺杀”。至于他所得到的涉及帕美尼翁的指令，下文我们很快就会知晓。“于是他跨越海峡来到了亚洲，”狄奥多罗斯说，“与帕美尼翁和阿塔罗斯会合，然后等待时机以完成使命。”¹²

与此同时，德摩斯提尼还劝说雅典政府和大流士接洽。但是，这次他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至少目前是这样。当马其顿的权力斗争足以实现他所期待之事而且不用花费他一分一厘时，波斯大王就不想在雅典身上浪费优质的波斯金币。因此，他写了一封回信，埃斯基涅斯将其形容为“最野蛮和最傲慢的信件”；在信末，波斯大王写道：“我不会给你们金子，你们也不要再向我索要，你们是不会得到的。”但是不久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改了主意。¹³

以安提帕特为首的马其顿大臣都劝亚历山大要小心行事。他们说，现在马其顿的国际形势十分危急，随时可能崩溃。他们的建议是，不要理会那些希腊城邦，同时想办法通过让步和外交手段安抚蛮族部落。对此，亚历山大言辞激烈地回答道，如果他表现出一丝的软弱或妥协，他的敌人就会立即向他扑过来。他告诉他们，他打算通过展现“勇气和无畏”的方式来应对当前的局势。这不是提议，根本就是宣言，而且是极富个性的宣言。¹⁴ *De l'audace, toujours 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无畏，永远无畏，仍将无畏）：终其一生，这一直是亚历山大的指路明星，而他的第一次践行就如此令人惊叹，以致后来他也只曾追平，而未曾超越。

年轻的国王策马在前，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佩拉出发，取道墨托涅

和皮德纳，沿海岸向南进入塞萨利。当他到达奥林波斯山和奥萨山之间的滕比山谷时，他发现这个山口已经做好了防卫工作。塞萨利人让他停止进军，他们还没想好是否应当接纳他。亚历山大以一种危险的礼貌态度表示同意，同时立即派工兵沿奥萨山靠海的陡峭一面开凿阶梯。（这些台阶人称“亚历山大阶梯”，其遗迹至今仍在。）在塞萨利人觉察到所发生之事前，他就已经翻过大山，出现在他们身后的平原上了。由于侧翼被包抄，他们决定进行谈判而非战斗。亚历山大在达到目的后，表现得十分友善而且富有魅力。他提醒他们之前在腓力领主权之下所享有的好处。他强调，通过赫拉克勒斯和埃阿科斯的联系，他本人与他们的各个显赫家族都有亲缘关系。按照他父亲切实可行的准则，即“好言相劝再许以厚报”，他说服了塞萨利同盟任命他为同盟的终身执政官，一如腓力之先例。他们还选出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置于亚历山大之麾下，¹⁵而且同意向马其顿国库纳税，而此时国库已经被腓力危险地消耗殆尽了。

一般的统帅可能就此稍作休整，享受一下拉里萨贵族的殷勤款待，同时巩固一下个人地位。但是，亚历山大从不在这些琐事上浪费时间。在希腊人知晓他在滕比的侧翼包抄策略之前，他就已经到达温泉关了。在此，根据其父先前享有的特权，他召开了近邻同盟议事会会议，此次会议立刻支持了他的同盟领袖地位。和梵蒂冈一样，近邻同盟议事会并无庞大军队作支持，但它一直享有广泛的宗教和道德声望。在古代，很少有政治家或将军能比亚历山大更敏锐地意识到良好的公共形象所能带来的优势。

当他还在温泉关时，一些相当慌张的使节从伊庇鲁斯南部的安布拉克亚赶来——这是很多这样惊慌失措的外交使团中的第一批。亚历山大亲切有礼地接待了他们，并且“使他们相信，他们在争取独立的问题上有些操之过急了，他马上就会赋予他们自由的”。¹⁶亚历山大可能对那位与他同名的舅舅（现在也是他的妹夫）颇存疑虑：一些独立的伊庇鲁斯城邦的存在，将有助于约束莫罗西亚国王的野心。此前腓力也曾在波奥

提亚使用过同样的伎俩，以便抑制忒拜的势力。不过，主要信息十分清楚：合作必有回报。很多城邦都能够心领神会。

不出所料，忒拜成了亚历山大的下一个关切目标。作为希腊中部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城邦，它可靠与否至关重要，可是忒拜对马其顿的顽固敌对态度却让人无法乐观。他们驱逐了腓力的驻军，而且拒绝承认亚历山大的地位。他们完全有可能还跟亚历山大的堂兄弟、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秘密联系上了，至于亚历山大本人是否知晓尚且无法确定：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可能。不管怎样，他决定看看需要把军事实力展现到什么程度才能吓住他们。某日清晨醒来，忒拜公民惊恐地发现，马其顿军队严阵以待地驻扎在了卡德迈亚城前面。亚历山大的最后通牒很简单：他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承认他的同盟领袖地位。如果愿望能够实现，他可以不计较他父亲的驻军被驱逐一事。当然，他们将会重新进驻城中。否则的话……忒拜人往下看了看这些可怕的身经百战的马其顿战士，没有讨价还价就投降了。俯首称臣并不会损失什么；在恰当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更适合采取直接行动的时机，此时仓促抵抗可谓愚蠢之极。

他们的举动在离忒拜不到40英里的雅典城中引起了一阵恐慌。德摩斯提尼轻蔑地把亚历山大描绘成一个怯懦的年轻人，“只满足于在佩拉周边闲荡，沉迷于各种占卜预兆”，^①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错得离谱而且致命。雅典人预感会有围城战发生，便把他们的财产从周边的农村转移到了城里，并开始修复城墙。然而，当亚历山大向他们提出和他给忒拜的一模一样的最后通牒时，他们欣然接受了他的条件。雅典使团立即北上，向亚历山大郑重致歉，后悔没有早些承认国王的法定地位。德摩斯提尼本人也在使团当中，他对他所肩负的使命颇不情愿；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了对亚历山大的公开品评（没有哪位自尊自重的年轻人会对此一笑了之），他还曾给阿塔罗斯和帕美尼翁写过足以招灾惹祸的信件。而现在这些信件可能已经落入了亚历山大的手中。更糟糕的是，德摩斯提尼已经公开了他与波斯大王的私下谈判，而且据说成果斐

然。一想到这些，他失去了勇气，还没走到基泰隆山就转身回家了。¹⁷

他对阿塔罗斯有一种天然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尽管这位马其顿将军“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叛乱的准备，同意与雅典联合起来反对亚历山大”，但是当国王迅速进军希腊而雅典又怯懦地投降了的消息传来后，他马上就改了主意。他设想这种悬崖勒马的举动或许可以救他一命。他保留着所有与德摩斯提尼往来的信件，现在他把这些信件悉数送到亚历山大那里，同时极力强调自己的忠诚。他其实不用这么费事。事实上，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确实有一部分人改变过立场，并且得到了赦免；但阿塔罗斯，这位公然辱骂亚历山大之出身的人、亚历山大母亲的争宠者和替代者的叔父，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得到宽恕。他自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而这绝对是一个致命的误判。再者，到目前为止赫卡泰奥斯一直遵照亚历山大的指示，私下跟帕美尼翁进行了沟通，而且似乎也跟阿敏塔斯交流过。正是双重的阵营变换最终决定了阿塔罗斯的命运。

那位年老的马其顿元帅——如今他已65岁左右——无须别人多劝便改变了立场。亚历山大出色的统御才能以及随之而来雅典可耻的临阵妥协，都充分证明推翻新国王绝非易事。在政治丛林中，帕美尼翁要是没有学到一点处世之道的話，那是不可能腓力手下生存这么久的。故而他决定选择止损，站到胜利的一边。在这一阶段他的支持举足轻重，于是他决心为此开个好价钱。实际上，他所能提供的乃是多数低地贵族的支持，倘若不是全部的话：这样一来，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或者其他可能的争位者，就只能与域外王国和忒拜等反叛的希腊城邦结盟了。如果帕美尼翁把他的追随者全都推到新国王这边，那又有谁胆敢挑战亚历山大的地位呢？

亚历山大此时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没法就帕美尼翁的条件讨价还价。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当马其顿军队最终进入亚洲时，几乎每个指挥要职都由帕美尼翁的某个儿子、兄弟或其他亲属担任：亚历山大花

了6年的时间方才打破这个强大派系的束缚。然而，作为对如此巨大让步的回报，帕美尼翁必须牺牲一个人，即阿塔罗斯。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不容商量。或许，这种牺牲其实并不算大：毕竟女婿还可以再有。几天之后，阿塔罗斯被悄悄地杀死了，这肯定得到了帕美尼翁的默许，甚至可能就是他直接下的令。第三位将军阿敏塔斯用冷静而现实的眼光估量了眼下的实力变化，决定忘掉其父被处决之事。于是，他和亚历山大达成和解，后者任命他作各种相对次要的指挥官，包括让他指挥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前的侦察队（*skopoi*）。¹⁸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亚历山大已经取得了任何人在腓力死时所不曾设想过的成就。他没有进行一次战斗，就赢得了塞萨利、近邻同盟议事会、忒拜以及雅典的认可。阿塔罗斯被杀和帕美尼翁投诚，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能够应对任何马其顿贵族的反叛。现在，是时候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了。于是，他在科林斯召开了希腊同盟会议。受邀（如果能称得上是“邀请”的话）参加的不仅有现任的代表，还包括来自直到目前仍拒绝承认其领主权的城邦的代表。¹⁹

而他们的回应正是他所期待的。他的行动已经彻底镇住了希腊人，现在他们的使节云集科林斯，一个个都匆忙得顾不上体面。麦加拉人甚至要授予他荣誉公民权；当他（可能因为心中一直记着雅典的先例）“笑话他们过于着急时，他们答说长久以来他们只授予过赫拉克勒斯公民权，现在则是他”。麦加拉的某个人摸准了亚历山大的脾气。他接受了这份荣誉。作为一个只跟国王赛跑的年轻人，他很难拒绝跟一个半神英雄——同时也是其祖先——一同享有公民权。只有斯巴达人保持冷淡态度，他们告诉国王，他们国家的传统不允许他们受外国领导人驱使。（马其顿对希腊主义的自我标榜就此止步。）亚历山大没有过分坚持。他本可以轻松制服斯巴达，但如此一来，这就成了赤裸裸的专制统治。此刻他所需要的是通过恪守宪制程序确保希腊人的合作。如果他赋予他们表面上的自治，那么这些惶恐的盟邦或许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方面，只要可能，亚历山大就不想让斯巴达或阿卡狄亚这样的反马其顿势力在他身后制造大麻烦。因此，在与其相邻的阿开亚、特别是美塞尼亚等城邦中，他任命了一些严厉的合作者作为统治者，以此维持现状。赶在同盟条约以亚历山大的名义重订之前，这些任命公然通过玩弄法律条文的手段而生效了，因为它们违反了禁止强行干涉现任政府的条款。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愤恨。²⁰

这样，同盟大会准时在科林斯召开，并选举亚历山大作为领袖，以取代其父的位置。他们与马其顿的条约也得到了修订：这次同样具有无限的有效期，以便可以适用于国王本人及其子孙。不过，条约并没有什么实质变动。希腊城邦仍将保持“自由和独立”；不难想象，代表们在批准该条款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²¹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同样，他们不得不选举亚历山大作为入侵波斯的盟军的统帅。为了鼓舞他们，国王向他们介绍了一位来自以弗所的代表。这位代表自称为“亚洲的希腊人”代言，恳请亚历山大为了他们而肩负起解放战争的重任。亚历山大声称，这一吁请的份量对他来说要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因素的考虑。这段暗中操纵的插曲听起来着实精彩。

但是，如果希腊人以为这最后的荣誉只是一种空洞的仪式，他们很快就会得到教训的。这位新统帅立即呈上一份复杂的时间表请他们批准，这份时间表“规定了订约各方在联合远征中的义务”，涵盖了从军饷——普通步兵每天一德拉克马^②——到粮食津贴条例等各个方面。雅典人颇为失望地发现，根据条约他们需要为亚历山大提供战船和海军军需品。因此，这一条款受到德摩斯提尼的反对，他说，谁能保证亚历山大不会利用这支海军来攻击它的供应者呢？他的意见遭到了否决，于是亚历山大得偿所愿。²²因为马其顿军队已经护卫他到科林斯了，所以这最后的议题实际上根本不在话下。

当代表大会闭幕时，“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来到〔亚历山大〕身边，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场面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不过，有个著名人物

却因缺席而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既有些恼怒又带着点好奇，亚历山大最终出了门，来到第欧根尼所住的郊外。亚历山大见他待在一个黏土大桶中，便亲自走了过去。他发现这位哲学家正在晒太阳，除了一块缠腰布外几乎赤身裸体。第欧根尼被跟在统帅身后的众多随从的喧闹和嘲笑打乱了沉思，于是他以一种直盯盯、叫人不自在的眼神看着亚历山大，但一言不发。

有生以来头一次，亚历山大竟觉得有些困窘。他彬彬有礼地向第欧根尼问好，然后等待他的回应。可是第欧根尼依旧沉默不语。最后，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地问这位哲学家，有什么事情是他亚历山大可以为他效劳的。于是就有了这句著名的回复：“有，请让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此次会面便到此结束。当他们回到科林斯时，亚历山大的随从想要把这段插曲改编成笑话，以此嘲笑第欧根尼并贬损他的做作。但统帅用谜一般的评论堵住了他们的嘴。他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就可能是第欧根尼。”²³这表明他有着十分敏锐的感悟力。两人有着相同的顽固而不妥协的态度（而且肯定在对方身上认出了这一特征）。只不过，第欧根尼选择出离世间，而亚历山大则决心征服世界：他们是同样一个现象的不同表现，只不过在外在表现上一个消极一个积极而已。因而毫不奇怪，他们两人的相遇竟是一种粗暴的碰撞。

在从同盟那里获得全权后，亚历山大解散了代表大会，随后率领军队返回马其顿。不过，在回去的路上他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德尔菲，急切地想要就远征波斯的后果咨询神谕。科林斯会议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期的更长，于是当他到达德尔菲时已经是11月末了。从11月中旬到次年的2月中旬，神谕都不再回应人们的征询。这是宗教事务，即便希腊人的统帅来了祭司们也不会因此而破例。其实他们应该放聪明点的。亚历山大完全无视他们，强行传唤皮提亚女祭司过来。她不愿过来，她说这是不合法的。听到这话亚历山大勃然大怒，他一把抓住她，生拉硬拽地想把她拉进圣殿中。女祭司气喘吁吁地说道：“年轻人，你真是不可战胜啊！”亚历山大一听这话便立马放开了她；他说，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相

当好的预言了。（后来，“不可战胜的”[*aniketos*]这一绰号就成了他的固定头衔之一。）为表满意，他向神庙的金库捐献了150个腓力斯金币；这一数目不像他的奢侈风格，只是眼下这位统帅的现金储备实在是有点捉襟见肘。²⁴

尽管存在这样的困难，但是亚历山大不想准备得过于匆忙或粗略。他把公元前336/335年的整个冬天全部用作军队的山地作战密集训练，以便做好准备，只等关口的冰雪一消他就要出兵作战。他深知，在彻底平息巴尔干局势之前他无法离开欧洲。虽然希腊城邦已不再构成直接的威胁，但马其顿北面和西面的野蛮部落依然不容小觑。单纯在战场上打败他们无济于事。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北境的安全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即穿越欧洲作战最艰难的区域，由此向前推进一百英里直到多瑙河畔。²⁵

因而，此次征战有三重目的。一来可以稳定边境，当国王不在国内时，安提帕特——亚历山大已指定他承担摄政之重任——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马其顿的那些恼人的希腊盟友。二来可以迫使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承认，亚历山大也是一个强悍的对手，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最后，这也作为进攻波斯所做的全部战术训练的一部分。亚历山大经过筹谋，对此战非常乐观。他命令一支舰队从拜占庭驶入黑海，然后沿多瑙河溯流而上，在那里按约定与大军会合——该地可能就位于布加瑞斯特南部、现代的卢楚克附近。然后，他自己从安菲波利斯出发，由陆上进军：首先往东经过涅阿波利斯（卡瓦拉），越过涅斯托斯河（梅斯塔河）和罗多彼山，接着往北到达他父亲的前哨基地菲利波波利斯（普罗夫迪夫，在保加利亚境内）。

直到此时，他一直是在友好的地区内行军，但现在他遇到了第一个敌对势力。要想到达多瑙河畔，他必须翻越海穆斯山脉（巴尔干），可能得通过希普卡山口。那些“自治的”色雷斯人——也就是说独立于马其顿统治之外——决心控制住这个山口不让他通过：这是很聪明的一招，

因为除此就没有其他容易通过的路线，亚历山大只能艰难且不受掩护地登上这个主要的隘口。色雷斯人在隘口之前把他们的车辆排成一行，类似于布尔人^③的车阵，然后等待亚历山大的到来。

亚历山大在许多地方不同于其他优秀的战场统帅，而其中最让他显得卓尔不群的品质之一，便是他可以出人意料地事先猜出敌人的战术。有时这要归功于他一流的情报人员，但有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极为敏锐的心理直觉。其他人可能会猜测色雷斯人想要把他们的车辆用作路障，然后在其后进行作战，这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合理。然而，亚历山大知道他们最热衷的战术乃是手持砍刀冲锋，进而立即推断出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一旦他和他的部队进入峡谷的狭长地带，这些车辆就会从山坡上滚下来，打乱马其顿人的方阵，然后在乱作一团的军队得以重新集结整队之前，色雷斯人就会向长枪阵的缺口发起冲锋，近距离地连砍带刺，而在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中，笨拙不便的萨里萨长枪毫无用处。

这种策略所造成的危险一半在于惊骇，但由于亚历山大已经鬼使神差般地预料到了，所以这种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他仔细向他的战士们简单地说明了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及需要采取的规避行动。如果空间允许，那就敞开阵线，让那些车辆过去（这种防御方法后来在高加美拉战役中也被用来对付大流士的卷镰战车，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他们正好处在向上攀登的最狭窄部分，那就跪下来或者紧紧地躺在一起，同时把盾牌相互搭在头顶上，幸运的话，这些车辆就会顺势飞奔而过（毕竟它们只是一些轻型的山地车而已）。表面上，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全不可行的计划。该方案可能对前排士兵有效（即使在前排也必定会导致大量的断腿），但那些不幸紧挨着前排士兵的人该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弹跳的车辆最后肯定是要服从重力的，等它停下来的时候最后不要位于车下。然而，根据对此类细节十分审慎的阿里安的说法（1.1.9-10），当车辆如预期的那样呼啸而来时，马其顿人没有损失一个士兵。显然，这是马其顿人良好训练和纪律的极好例证，即使其中有所夸大

。色雷斯人最初的策略失败后，战斗本身则进行得相当平淡。亚历山大的弓箭手从方阵右翼上方的岩石上提供掩护，亚历山大本人率领精锐部队登上西面的山脊，此时步兵主力——他们无疑会庆幸自己还活着——便咆哮着向山隘猛冲而去。色雷斯人很快就溃散了，他们共有1500人被杀，同时还抛下了许多妇女和小孩。通往多瑙河的道路就此被打开了。

马其顿人劫掠了许多战利品，亚历山大命人将其押送回海滨。随后他率领部队从希普卡山口的背面下来，向前推进到了多瑙河平原。他们一路上没有遇上敌对势力。当马其顿人在森林茂密的吕吉努斯河（可能就是扬特拉河）河岸安营扎寨时，多瑙河离他们就只有三天的路程。不过，他们的行动一直被占据着这一地区的特里巴利部落监视着。特里巴利人的许多战士连同妇女和小孩现在已经撤到了多瑙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于是，当亚历山大从吕吉努斯河出发继续前进时，第二支强大的土著军队溜到了他的身后，切断了他的退路。

当他获悉这一行动时，亚历山大立即回师。他发现特里巴利人处在河流附近的一个树木密集的峡谷中，想要从那里对他们发起大规模进攻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他派弓箭手和投石兵到峡谷的入口处，表面上没有支援，实际上方阵和骑兵都隐蔽了起来。特里巴利人被倾泻到他们阵营中的箭矢激怒了，都冲了出来要教训这些恼人的轻装小卒，结果马上就被马其顿大军打得七零八落。有3000个土著士兵死在这次猛烈的冲锋中，而亚历山大一方（或者说根据传言）只损失了11名骑兵和大约40名步兵。在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地证明了马其顿人的士气和军事优势后，亚历山大继续进军。三天后，先头侦察部队来到多瑙河南部，发现了正等待与他们会合的海军分队——这是高效的军事策划的又一显例。

这个会合地点不是亚历山大随意选择的。这个地方与特里巴利人避难的小岛隔岸相对。亚历山大声称，²⁶就是在这个名叫波刻岛或松树岛

的小岛上，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14/513年征战斯基泰人时曾搭建浮桥以跨越多瑙河。很显然，亚历山大研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像任何计划入侵波斯的人必定会做的那样），而且表面上是在效仿、实则也是为了超越大流士的成就。战略上的准备总是要与英雄的*areté*的需要相适应。现在，好像是在回应亚历山大的僭慢，情况开始有点不妙了。根据常识可知，在做其他事情之前，马其顿人理应先把这个安置着大量敌军和避难者的小岛拿下。但是，波刻岛上岩石交错，壁如刀削，周围又尽是湍涌急流。而亚历山大的战船既少又小，难以实现大规模登陆作战。在建立滩头阵地的企图连续失败了几次之后，国王明智地选择了放弃。

与此同时，一支庞大的约有4000名骑兵、两到三倍于这个数目的步兵的格泰游牧部族，出现在了多瑙河的对岸。尽管出现了这样一支部队，但是亚历山大此时有一种想要越过多瑙河的“难以抑制的冲动”。倘若遇困受阻，那就迎难而上。希腊语中有一个形容这种冲动的词，即*pothos*；该词在亚历山大的一生中反复出现，意为“渴求尚不在手的、未知的、遥远的、不可得的东西”，²⁷在古代这个词从未如此集中地被用在其他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pothos* 乃是专属亚历山大的性格用词。

为了知晓那些或未可知之事，

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金光大道。

弗莱克^④笔下的朝圣者不仅在追随伟大的伊斯坎德尔^⑤的步伐，而且也在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做这些事。

我可以不那么诗意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别无选择，除非撤退，而这是不可想像的。再者，如果他成功侵袭了格泰人的领土，那么就很可能触动岛上的防御者们，使其与之谈判。因此，他命令巡逻队去强征他们所能找到的每条独木舟（河边有许多这类用于捕鱼和运输的独

木舟），其他人则需要往皮制的帐篷盖中填干草，然后缝制成简易的浮筏。通过这种方式，亚历山大在夜幕的掩护下把15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卒运过了多瑙河——这一数目要比单独用舰队来运大得多。

他们在黎明破晓前登陆，在他们登陆那个的地方庄稼长得很高，正好可以用来掩护他们上岸。步兵打头，他们“把长枪放平并与行进方向成一斜角，以便前进时可以把庄稼压倒在地”。当他们开出了一条道路后，亚历山大指挥骑兵和方阵以更密集的队形平行展开向前推进。单单这种从天而降般的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的长枪阵线，就足以让格泰人吓破胆；当骑兵开始发起冲锋时，整个部族便转身溃逃了。起初，他们逃到了大约四英里外的最近的定居点。但是，亚历山大的军队继续进军，其中骑兵在两翼散开，提防可能的伏击。显然，亚历山大是认真的。由于定居点没有设防，于是格泰人赶忙把妇女、小孩以及粮食储备放到马背上，然后逃往大草原去——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古老的手段。

亚历山大没有追击他们，他知道这种冒险实无必要。相反，他洗劫了该定居点并摧毁了它。虽说战利品也没多少，但他还是命人送回了营地。在多瑙河畔，亚历山大向救主宙斯、赫拉克勒斯以及多瑙河河神献祭，感谢他们允许军队顺利通过。接着，在充分实现了个人的*pothos*和声望后，他率领军队退回南部海滨，在此扎营，等待蛮族人的反应以便做下一步的打算。他没有等太久，特里巴利人彻底被他的武略震惊了，他们从避难小岛中出来，派遣使节来寻求友谊并与这位强大的战士结盟。多瑙河沿岸的其他独立部落很快获悉此事，一个个前来与之结盟。此事的反响甚至远及亚得里亚海的凯尔特人，他们也主动前来示好——有人觉得，他们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好奇而非恐惧，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亚历山大的作战区域实在是太远了。

然而，这些使节却有着独特的名声：他们是唯一的有明文记载的觉得亚历山大的夸耀既不令人敬畏、也并不可怕的一群人，相反他们觉得他有点可笑。阿里安说，他们是一群“傲慢自大、身材高大的人”。不妨

想象一下，当亚历山大满怀希望地问他们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时，他们抖动着大胡子，耐心地俯视着眼前这位身体强壮、头发金黄、精力充沛的矮小君主。当然，亚历山大所期待的答复肯定是“您啊，陛下”；但是，凯尔特人并不想落入这样明显的一个圈套。在沉思了一会儿后，他们说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是天塌下来砸到他们。不过，他们既略带傲慢又假装正经地补充道：“除此之外，他们把与像他这样的人的友谊放在首位。”亚历山大板着脸（不然他还能怎样呢）和凯尔特人达成了友好协议，然后便送他们回国了。不过，据说他曾小声地嘀咕道，这些蛮族人如此自视甚高，真是可笑。²⁸

马其顿人从多瑙河回师，在越过希普卡山口后他们没有朝南走，而是折向西方，顺着巴尔干山脉、沿着今天连接连斯基格拉特和索非亚的路线前进。他们走出了特里巴利人的领土，进入了亚历山大的老朋友阿格里安人的国王兰伽洛斯的领地。兰伽洛斯本人及其精锐近卫军原本就随同亚历山大出征多瑙河。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辅助军队行动，而是与翊卫队混编在了一起——这是已知的军事同化政策的最早事例，²⁹后来亚历山大在亚洲和印度将这项政策发展得更为完善。

这时候，最紧急的消息开始从伊利里亚这个向来危险且不稳定的边境地区传来。我们可以猜想，亚历山大最初的计划是让军队在友好领地内休整——他们在两个月甚至不到的时间里已经行军和战斗了500英里，而且一直行走在恶劣的道路上——然后顺便巡视一下西部边境。但事与愿违，他又卷入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乃是他整个人生最艰难的战斗之一。伊利里亚国王克雷托斯，就是那个很早之前在欧克里达湖被腓力彻底击败的巴底利斯的儿子，发动了武装反叛：亚历山大的多瑙河远征给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更糟的是，他还联合了另一个酋长、陶兰底人的领袖格劳基亚斯（Glaucias）。陶兰底人是来自杜拉左地区的一个粗野原始、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是现代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此外，第三个伊利里亚部落奥塔拉提亚人还准备在亚历山大行军过程中发动袭击。

如今几乎回到了腓力早年的状况，马其顿的整个西部边境都陷于极大的危急之中。亚历山大问兰伽洛斯这些奥塔拉提亚人是什么人，他得到了一个极为乐观的回答。兰伽洛斯告诉他不必担心，他们是这一地区最软弱、最不能打的战士。这与我们从某个可靠的史料中得来的说法不同，³⁰在这则史料中，他们被描述为“最大和最优秀的伊利里亚部落”，事实上他们曾效仿亚历山大征服过特里巴利人。然而，兰伽洛斯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承诺由他对付这些奥塔拉提亚人，而让亚历山大前去征讨克雷托斯。亚历山大感激地接受了这项提议。亚历山大多大程度上相信阿格里安人有能力应对奥塔拉提亚人是另一回事，但现在，速度是最重要的。格劳基亚斯及其高地居民尚未和克雷托斯会师，于是亚历山大星夜兼程，想要在二者会合之前赶到克雷托斯的佩利昂要塞。疲惫不堪的马其顿军队再次上路——倘若那条今天还连接着朱马亚和铁托韦莱斯的艰险山道能称得上是路的话——越过派奥尼亚山脉向西南急速行军。佩利昂要塞控制着阿普索斯河（得沃尔河）河谷以及通往马其顿的主干道。要塞的三面为密林高山所环绕，只有一条经过一个浅滩的狭小通道可以到达，可谓固若金汤。除非遇上最高明的敌人，否则要塞前的小平原还很容易成为进攻者的死亡陷阱。

亚历山大实现了第一步：他抢在格劳基亚斯之前到达了那里。伊利里亚人的先遣队在遭遇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退回到了佩利昂要塞内。马其顿人发现了一些充分又恐怖的证据，可以说明他们的到来完全出乎意料：有一个被弃的祭坛，上面还放着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和三只黑色公羊的遗体。当发出警报的时候，献祭活动一定正在进行之中，而此时亚历山大的先头骑兵正通过隘口飞奔而来。

国王决定封锁佩利昂，并且调来了围城器械。这种策略失误极为奇怪。他根本没有时间围困克雷托斯，而且靠这么小的一支特遣队，他想要拿下这个防御坚固、难以到达的要塞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糟糕的是，格劳基亚斯随时都有可能赶来救援。事实上，他不到24小时就到了，并立即占领了亚历山大身后的山峰。现在，马其顿人被切断了退路，陷入

了供给中断的危险境地。只是由于亚历山大及其骑兵的快速行动菲罗塔斯所率领的一支搜掠分队才得以免遭覆灭的命运。

但是，如果说这位年轻的国王由于使自己以这种方式被切断退路而理应受到责难，那么他的脱身之计却足以名列战争史上最富机变的计谋。次日早晨，他在平原列队集合全军——佯装没有察觉到敌人的到来——然后以密集队形进行演习阅兵。方阵以120人的纵深队列行进受阅，两侧则各有一支200人的骑兵分队。由于亚历山大有明确的命令，演习的军队调动完全是悄无声息的。这一场面必定显得怪异并且令人不安。根据指令，密如茂林的萨里萨长枪或者坚持作“敬礼”之姿，或者平举作战斗之态。而如刺猬一般的整个长枪阵形则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一会儿右转，一会儿左转。方阵在行进中不断进行着各种复杂多样的行列变换，宛如就在练兵场上一样，整个过程所有人都一言不发。

蛮族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在周边山上的营地中瞪大了眼睛，向下盯着这种古怪的仪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一个又一个蛮族散兵小队开始向营地边缘缓慢移动，半是出于惊恐，半是出于好奇。亚历山大一直注视着他们，只等能达到最佳心理效果的一刻。终于，亚历山大发出了最后的预定信号。左翼骑兵迅速变换为楔形阵形，随即发起冲锋。与此同时，方阵中的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枪拍打盾牌，数千人一同喊出马其顿人可怕的战斗呼号——“啊啦啦啦啦”，喊声在山谷中来回震荡。在经过先前死寂一般的肃静之后，这突如其来、震耳欲聋的叫喊完全使格劳基亚斯的部落战士们吓坏了，他们一个个都慌乱地从山脚逃回自己安全的营地。³¹亚历山大和他的侍友骑兵从一座可以俯瞰浅滩的小丘向那些人中的掉队者冲去，然后他下令阿格里安人和弓箭手负责掩护，其他部队由翊卫队打头，开始快速越过河流。

在最初的惊恐散去后，那些部落战士突然意识到，马其顿人即将突破他们精心设下的包围圈。于是他们重整队伍，并发起了反击。亚历山大率领骑兵和轻装部队把他们堵在那座小丘前，以便攻城的投石机能

足够的时间渡过浅滩，然后可以在对岸架设起来。同时，弓箭手在国王的指示下占据了中流的防御点。他们射出的箭和投石机抛出的大石（这些投石机的射程有数百码之远）迫使克雷托斯的军队难以接近，于是最后几支部队也得以顺利过河。富勒（Fuller, p. 226, n. 1）评论说，“这是有记载以来投石机第一次被用作野战炮”：这是亚历山大非凡的创造才能和临机应变之天赋的又一例证。他又一次不失一兵一卒地完成了复杂而危险的军事行动。³²

此时此刻若换作其他统帅，他们只会庆幸自己竟能从如此险恶的局势中脱身，感慨一下自己运气真好，然后尽快地离开这里。眼下兰伽洛斯那边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亚历山大只知道他与马其顿的联络可能已经被切断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沉着。他算准蛮族人会认定马其顿军队已经远远地逃走了，于是他撤退了几英里，连续三天按兵不动，从而使他们更加确信那种想法。然后，他派出一支侦察小队，该小队带回的消息正是他所期盼的；蛮族人的营地没有设防，他们既没有挖壕沟，也没有树立栅栏，甚至都懒得设立哨兵，而且，他们的阵线也伸展得过于分散。敌人的自负散漫正可助良将一臂之力。此外，正如先前战斗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利用部落兵士的无纪律性而造成强烈的心理效果是亚历山大的拿手好戏之一。

他立即回军，亲自统率一支由翊卫队、阿格里安人、弓箭手以及常规突击队组成的精锐机动力量，同时命令其他部队随后跟上。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派弓箭手和阿格里安人（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古代的廓尔喀兵^⑥）做收尾工作。这场屠杀可谓干净利落。大部分部落战士还在睡梦之中，亚历山大的部队便将他们全部就地屠杀。其他人则在企图逃跑的过程中被砍倒。当时的惊恐与混乱实在难以形容。克雷托斯在绝望中一把火烧了佩利昂，然后跟着格劳基亚斯逃到了后者在杜拉左附近的山地堡垒。伊利里亚人的威胁至少已经暂时被清除了。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去世十年之后（公元前314/312年），当时另一位马其

顿国王卡山德与格劳基亚斯发生纠葛，试图夺取沿海的杜拉左，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冒险。

在获得了全面胜利之后，亚历山大首要关切的是重新与兰伽洛斯取得联系，如果必要的话亲自收拾奥塔拉提亚人。不过，最后兰伽洛斯不失其诺，证明了自己足以对付那些奥塔拉提亚人。他快速洗劫了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作物，这样他们只好退出叛乱：看起来他对他们战斗能力的判断也没有那么离谱。在消灭了威胁后，兰伽洛斯立即动身前往佩利昂支援亚历山大，于是两支军队在内陆的某地相遇了。（最有可能的地点是现代南斯拉夫境内普里莱普和比托拉之间的道路上的某地：或许就在与切尔纳河的交叉处。）这本该是一次胜利的会师，但是，亚历山大的喜悦之情却被兰伽洛斯带给他的来自希腊的急讯一扫而光——显然，这是他自多瑙河远征开始以来收到的第一条急讯。急讯所传达的消息让人无法安心。

当然，要是希腊人（和任何幻想着自己还有机会的马其顿争位者）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没有充分利用一下亚历山大出征的有利时机，那倒是有些奇怪了。各个城邦——特别是忒拜和雅典——的行动多大程度上做过协调，现在还没有定论，更不用说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篡夺亚历山大王位的计划了。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暴动是经过协调的，阴谋者的首要目标是，倘若成功便奉阿敏塔斯为名义上的领袖，并且废黜亚历山大（更不用说废除亚历山大的侵略政策），那么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容易理解。亚历山大本人随后的行动有力地说明，至少他是这么看待这一系列事件的。³³

显然，暴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宣传极力弱化亚历山大代表的威胁，来争取尽可能多的观望者。在雅典，德摩斯提尼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一任务中去，而且费尽心思精心安排了一个场景。他在公民大会上宣称，亚历山大连同整支远征军已经被特里巴利人屠杀殆尽了。为了使谎言更加可信，他宣称一个扎着绷带、浑身是血的人是信使，这位“信使”

发誓说他就是在那场战斗中受的“伤”，而且真真切切地目睹了亚历山大之死。³⁴这种戏剧性的声明其效果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有人怀疑消息的真实性，他就立马把他们压制住：毕竟这正是每个爱国的希腊人所希望和祈盼发生的事。于是，反叛之火席卷了整个半岛上的希腊城邦。马其顿的驻军或者被驱逐，或者被围困。甚至当亚历山大从多瑙河向佩利昂进军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时，仍然有人信心满满地声称，德摩斯提尼只是把各种事情弄混了，实际上国王是被伊利里亚人杀死的。³⁵

不过，到目前为止最危险的其实是忒拜的反叛。这需要精心的筹划——亚历山大此前在卡德迈亚留下了一支尤为强大的驻军，而且在忒拜的公民大会中到处安插了亲马其顿分子。然而，叛乱的领导人一直与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大部分在雅典——保持着联络，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趁夜偷偷溜进了城里。反叛分子事先制定好了计划，而且实施得非常顺利。首先，他们抓住并杀害了驻军的两位高级军官。（这不仅使驻军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击，而且迫使忒拜人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已经无路可退。）随后，他们召集了公民大会，呼吁所有忒拜人甩掉马其顿人强加的枷锁——阿里安冷峻地写道：“他们着重强调‘解放’和‘言论自由’等古老而宏大的口号。”³⁶最终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从亚历山大的角度来看，即使忒拜人是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自发反叛的，那情况也已经够糟的了。然而到目前为止，他必定至少已经听说了阿敏塔斯图谋政变的消息，而更让人头疼的是，暴动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摩斯提尼提供的武器和金钱，而这是经过雅典政府公然默许了的。说服忒拜流亡分子参与政变的主要也是德摩斯提尼。当政变成功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公民大会欣喜若狂，立即投票通过给予忒拜军事支持的提案，而这多半也是由于德摩斯提尼的煽动。现在，反叛的各个城邦组成了一个反马其顿同盟，看起来一场全面的反叛之战已经就在眼前了。

然而，这时一些头脑比德摩斯提尼更冷静的人认为，事情发展得太快太过火了。此刻的雅典在吕库古的精明管理下，只是刚刚开始加强海军和军事储备。³⁷过早地和马其顿发生直接冲突，后果可能会非常惨重。因此，在派遣军队去支援忒拜之前，雅典政府决定观望一阵子，“看看战争会走向何方”。不过，尽管她外交上持骑墙态度，但明眼人皆知雅典同情的是哪一方；毫无疑问，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诸城邦更不用说了。整个希腊随时都有可能全面失控。³⁸马其顿国内的局势同样岌岌可危，就算阿敏塔斯还没公开表态，他的计划也早已尽人皆知，整个佩拉都充满了一股阴谋的气息。所以显而易见，国王越快回国越好。³⁹

此外，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什么比波斯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能引起亚历山大的警觉了。波斯大王总算明白了过来，亚历山大不仅意在侵略小亚细亚（帕美尼翁的活动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而且就目前来看，他也已经为这个任务做了非常好的准备。一旦局势变得明朗起来，大流士便改变了早先的不干预政策，开始向希腊输送金子，哪里可能有效果，就往哪里送。迄今他还从未如此明确地要做某件事，而这一次他显然希望希腊人的叛乱可以帮他把难题解决掉。但是，单单这种希腊-波斯联盟的构想就已经足以使亚历山大不寒而栗了。

大流士通过代理人为雅典政府提供了不少于300塔兰特的黄金，以此引诱其支持忒拜的解放事业。这项提议遭到了官方的拒绝，因为接受该提议与派遣军队一样，都是对马其顿的公开冒犯。但是在雅典，谁都知道德摩斯提尼现在给忒拜流亡分子派发的钱从何而来。大流士只是决定（在雅典的默许下）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运作。⁴⁰他还觉得现在是时候消灭帕美尼翁的远征先遣队了：如果能把这支军队清除掉，那么亚历山大的任务，特别是让军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这一关键步骤，就会变得危险得多。

迄今帕美尼翁一直顺风顺水，为所欲为。沿海的许多希腊城邦都已投靠了他，而他让那些没来投靠的都为之后悔。例如公元前335年7月，

帕美尼翁袭取了累斯博斯岛和基俄斯岛之间伊奥尼亚的一座海滨小城格律尼翁，并把它居民都变卖为奴隶。亚历山大的解放政策似乎不允许有人冥顽不化地拒绝被解放。⁴¹比起我们根据现存史料所作的猜测，帕美尼翁的军队在亚历山大侵略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要更为重要得多。它有两大任务，一是通过建立桥头堡来保证侵略路线的畅通，二是（以各种手段）拉拢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帕美尼翁共有三支作战分队，分别占领了伊奥尼亚、埃奥利亚和特洛亚斯。除了担任总司令，帕美尼翁还亲自统率其中的一支分队。

现在为了拔掉这颗眼中钉（不过很难说大流士是否对此看重），大流士挑选了最有经验和最专业的军事家罗得岛的门农。门农得到了一支5000人的精锐雇佣军，而且可以便宜行事。首先，他前往特洛亚斯南部的海滨地区，此时帕美尼翁正在那里围攻另一座小城皮塔涅。但是在半道上，他收到了波斯大王的急讯。普洛彭提斯中的重要港口居吉科斯有陷落的危险，此时可能已经陷落了：那么门农会赶过去救援吗？

门农此次向北突进非常有名，为了节约时间，他率领军队经最短路线翻越了伊达山脉。他差点儿就救下了居吉科斯，可惜终究晚了一步。狄奥多罗斯写道：“救援失败后，他洗劫了该地区，并掠走了许多战利品。”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直到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他的军队向西快速推进到赫勒斯滂海峡，重新占领了兰普萨科斯。门农的主要战略很清楚：他意在控制住马其顿侵略军最有可能的两个会合点。他本人往南折回去寻觅帕美尼翁，而另一支波斯分队则被召去对付马其顿在特洛亚斯的分队（该分队现在由哈尔帕罗斯之子卡拉斯[Calas]指挥，他在阿塔罗斯被处决后接管了这支分队）。卡拉斯进行了一次防御作战，他发现自己人数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因而被迫向南撤退，一直退到了特洛伊附近的洛埃泰昂。在此，他给帕美尼翁发去了一份紧急求救的报告：阿拜多斯，这个尚在马其顿手中的另一个最佳会合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住。而如果没有外援，它的驻军不足以守住该城。于是，帕美尼翁立即解除对皮塔涅的围攻，然后避开门农，向北急行。

军到了海峡边上。他保住了阿拜多斯，但是他先前征服的许多地方现在都已丢失了。⁴²

对大流士来说，这些来自希腊和小亚细亚的情报尽管重要，但也只是纷繁复杂的帝国统治事务中的一部分而已。他征召的军队和舰队⁴³除了用于遏阻马其顿可能的入侵以外，还要用于其他方面的行动。其中，在埃及的军队高效地解决了最后一位本土的法老，将这个反叛已久的国家重新变成了波斯的一个行省，而大流士本人则正在波斯波利斯忙着为自己设计和建造王陵，事后来看这似乎带有一种讽刺性的先见之明。⁴⁴然而，对远在伊利里亚的亚历山大来说，他眼下所得到的消息却是关于最高等级危机的。

目前，他没有时间去反思其中所蕴含的教训：在他的这种政体当中，个人的支配地位便是一切，所谓的感激或效忠宣言不可轻信；他终身都得采用具有超凡魅力的强权政治。所有这些日后才会提上议程。他马上看出，自己首要而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粉碎有关他已经死亡的谣言。关于马其顿的争位者及其拥戴者，他可以并且也将以传统方式进行处理；但是希腊的反叛必须立即予以遏止，以免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亚历山大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消灭那些铤而走险和死磕到底的民族主义者，他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必须给希腊一个具体的教训，这种教训要足够恐怖，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粉碎所有想以武力实现独立的希望（从心理学上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现代的抵抗运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在哪里以及如何施展这种教训，国王已经心里有数了。

他的第一项行动便是派遣特快专使到佩拉，传达他即将回来的消息。除了给安提帕特的例行指示外，这位专使还带了一封私人的（可能还是加密的）信件给奥林匹娅斯——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亚历山大还能绝对信任的人。他要求她立即清除那两个王位竞争者：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幼子卡拉诺斯。至于这次清洗多大程度上涉及已

知的阿敏塔斯的朋友和支持者则尚有疑问。安条克之子阿敏塔斯似乎没遇到多大困难就逃离了马其顿。他径直跑到了小亚细亚，在那儿成了大流士的雇佣兵指挥官。（根据阿里安的说法）他还随身携带了一封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给波斯大王的信件。信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很可能涉及叛变，因为大流士的回应是给这个林刻斯提斯人提供了1000塔兰特的金钱；而且如果他能够成功刺杀现任国王，那么大流士还将全力支持他登上马其顿的王位。⁴⁵倘若此事当真，恐怕亚历山大当时并不知情，因为他随后不久便任命这个林刻斯提斯人担任重要的军事指挥职位。他是安提帕特的女婿，这个身份可以给他提供一定的保护，但可以设想，这并不能使他免于因涉嫌高层叛变而被传讯。⁴⁶

奥林匹娅斯忠实地执行了亚历山大的指示，而亚历山大也知道她会如此。（在分开之前，亚历山大曾给予兰伽洛斯许多荣誉，其中就包括安排后者与他的异母妹妹库楠妮的婚姻，那会儿她还是阿敏塔斯的妻子：这真是一种恐怖的幽默。）⁴⁷实际上，王太后所做的要远远超出她简报中的内容。被她处死的不仅有卡拉诺斯，还有他的姐姐欧罗巴，至于处决的方式，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说法，但很可能都是通过将二人面朝下按到火红的炭炉中的方式杀死的。最后，她逼迫他们不幸的母亲自缢；此时，可怜克里奥帕特拉已是生无可恋。当亚历山大听到这件事时，他感到非常愤怒，这并不难理解。⁴⁸诸如此类的王室谋杀无可厚非，而且早有先例，但是，无论是克里奥帕特拉还是欧罗巴，她们都不会对王位构成任何威胁，奥林匹娅斯对她们的处置完全是出于怨恨的报复心。亚历山大的敌人马上就会借机进行不利的宣传。当使用铁腕手段时，国王宁愿严格遵守宪制的权利约束，随后几周的事情也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解决了这一紧急事务之后，亚历山大拔营起兵，行军速度之快连腓力的老兵都有些吃不消。他从欧克里达湖出发，“取道厄奥尔戴亚、厄利密奥提斯、廷法亚山脉和帕拉淮亚山脉”，直奔东南而去。根据这个记载，他此行只有一条可能的路线，即那条崎岖而陡峭的山间小径。

这条山路依然还在，从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比利什特穿过希腊北部的山区，经由卡斯托里亚和格雷维纳，终于特里卡拉附近的塞萨利平原。古往今来，大多数旅行者更愿意从西面的迈措沃山口进入希腊，不过连这条也相当崎岖难走，现代的希腊人仍然将其称为“咒恶山口”。但是亚历山大非常需要赶时间。

仅仅七天，他便把军队安全地带到了特里卡拉东边数英里远的佩林那。由此他进军拉米亚，越过温泉关，最后在波奥提亚的昂克斯托斯驻扎下来；此时离他出发只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已经到来的传闻甚至都还没来得及传到希腊南部。他行军将近250英里，平均每天18英里。更让人惊奇的是，他在山区的速度并不比在平原上慢多少；任何曾经从卡斯托里亚走到特里卡拉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何等的壮举。

昂克斯托斯往前20英里便是他的最终目的地：忒拜。⁴⁹

那时，叛乱的领导人只知有一支马其顿军队越过了温泉关，离忒拜仅有一天的路程；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所要面对的竟是亚历山大本人这一事实。他们对德摩斯提尼的宣传深信不疑得让人感动，他们坚信亚历山大已经死了，眼前的军队是由安提帕特率领的。当更多的消息传来而且都报告了同一事实时，他们仍然拒不相信。如果军队是由某个亚历山大率领的，那也必定是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他们的这个猜测很有意思，可以印证其他指向他曾参与叛乱的证据。但是24小时过后，当马其顿军队在城墙外挖掘濠沟时，一切侥幸的幻想都破灭了。亚历山大果真还活着，而且依然在位；反叛者唯一还能做的选择就是抵抗或谈判，这个选择至关重要。

亚历山大不大可能预料到会碰到很多麻烦。不久前，只需展示一下武力就足以吓得忒拜立即投降。他统率着一支30000人的军队，这些乃是腓力老兵中的精华，是一流的战斗队伍，在战场少有败绩：忒拜人自然不会鲁莽到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与之一较高下。此外，和通常一样，倘若不费太大工夫就能获得他想要的，那亚历山大可以既往不咎。现在

，他所有的兴趣全部集中在远征波斯上，根本不想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在控制这些桀骜不驯的希腊城邦上。如果真的需要做些惩罚以为鉴戒，他从不手软；不过，自离开伊利里亚后，他的怒火似乎已经平息了一些，他准备再次采用权宜做法。于是，他明白无误地提示忒拜人，他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行为做一次外交上能让人接受的辩解。事实上，如果亚历山大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已经死了，那么同盟条约就会立即失效（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因而他们独立的诉求便是完全合法的。他们此前的行动是发自内心的，如果现在他们重新宣誓效忠，那么整个事件都可以一笔勾销，而且双方都可以保住颜面。⁵⁰

然而，忒拜人竟出人意料地选择顽抗到底。他们对此友好姿态的回应不是举起休战旗帜，反而是迅速袭击了亚历山大的前哨部队，不少马其顿人因此丧生。次日，国王率领军队绕到忒拜城的南边，占据了厄勒克特拉城门外通往雅典的道路的阵地。这样一来他跟被围的驻军的距离就非常近了，因为此处卡德迈亚的岩壁就紧挨着城墙。^⑦但是，他还是没有发起进攻，仍然想着签一份城下之盟。

当亚历山大的到来第一次得到证实后，忒拜政府起草了一份决议，并得到了公民大会的一致通过。该决议认为，他们应当“为了自己的政治自由战斗到底”。现在公民大会再次召开，但这次就不再那么同仇敌忾了。有一股很强的呼声要求放弃抵抗、寻求谈判。阿里安这位曾任罗马行省总督的希腊人写道，这一呼声“来自所有那些真正把城邦利益放在心上的人”。但是，那些直接领导起义者，特别是那些回国的流亡者，坚持反对任何妥协。他们根本不相信亚历山大的美好承诺。他们的魁首杀了两个马其顿军官，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积极参与波奥提亚同盟的重建活动。一旦落入亚历山大的手中，这些人很难指望能够逃过惩罚。

再者，他们曾痛快地呼吸过自由的空气，不想就此轻易放弃。他们确实有机会不用被迫放弃这种自由。忒拜粮草充足，城墙修缮良好，而且有着希腊最出色的重步兵。此外，卡德迈亚被一道牢固的双层栅栏隔

绝起来，马其顿驻军几乎不可能跟城外的同胞取得联系。于是，公民大会投票通过，坚持原先的决议。

现在，亚历山大明白他该做什么了。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心彻底摧毁这个城邦，并以此恐怖之举震慑任何胆敢挺身反对他的人”。不过首先，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希望借此在忒拜人中间制造分歧，他发布了最后的通告。任何有心的个人仍然可以向他投诚，并同享希腊人的“普遍和平”。如果那两个反叛的祸首能被交出来，那他将特赦其他人。这是很高明的一招。这份通告提醒世人，严格来说，忒拜反叛的不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而是希腊同盟。由此类推，亚历山大并不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暴君，相反他的行动有着无可非议的宪制上的正当性。他是同盟正式选举出来的统帅，执行的是同盟的命令。不少同盟城邦跟忒拜有旧帐要算，因此亚历山大完全可以找到足够法定人数的支持者。

当然，和其他人一样，忒拜人对此心知肚明，而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故意以尽可能公开的方式，摧毁亚历山大的政治谎言。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注定了自己的命运。在忒拜最高的塔楼上，他们的传令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和条件。他宣布，如果马其顿人首先交出安提帕特和菲罗塔斯，那他们就愿意跟亚历山大谈判。在这个小小的客套之后，他接着说：“任何有心想要加入波斯大王和忒拜阵营以解放希腊人并摧毁希腊之暴君的，都理应站到他们这一边来。”⁵¹

这一满怀恶意、简洁明了的控诉蓄意要让亚历山大震怒不已；而传令官所提到的与波斯的协定（这完全可以设想是真的），更是正中亚历山大的要害。如果忒拜人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王撕掉那假仁假义的面具，那么他们已经得偿所愿了。“暴君”一词深深地刺痛了亚历山大——没有人会喜欢听到与自己相关的令人难受的赤裸真相，尤其是对一个其士兵就在身边的统帅而言，因此亚历山大大发雷霆，这是他著名的发怒事件之一。他发誓，从现在起他将“对忒拜人处以极刑”。他说到做到。围

城器械被带来了，栅栏很快就被突破了。忒拜的军队在城墙外英勇作战，差点儿就把亚历山大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国王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也无济于事。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亚历山大突然看到有一个后门无人防守。他立即派佩狄卡斯率领一支部队进入城中与被围困的驻军取得联系。佩狄卡斯成功完成了任务，不过他本人也在行动中受了重伤。

忒拜人一听说他们的城墙已被攻入，便丧失了斗志。于是，亚历山大发起反攻，忒拜人军心动摇，很快就全线崩溃，一个个落荒而逃。厄勒克特拉城门挤满了撤退的部队，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想要逃入城中。骑兵赶了过来，许多人被践踏至死，在巨大的拱门下，尖叫声、咒骂声和铁蹄拍地声混杂在一起，震耳欲聋。通道还来不及清理，大门也来不及关上，亚历山大的老兵劲卒们便涌入了忒拜城中，随后是野蛮而血腥的巷战，最后演变了一场大屠杀。部分忒拜骑兵调转马头，从平原上逃走了；大部分忒拜的守护者则用破损的残枪或者直接徒手搏斗，他们就地战死，而绝不跪地投降；当然，此时他们也无处告饶。妇女和老人被从圣殿中拖了出来，“任人随意凌辱”。每间房屋都遭到洗劫，每座神庙都被掠夺一空。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残骸。每个角落都堆着大量战利品和哭泣不止的可怜的孩子。

这场大屠杀决非只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将士们造就的。过去曾被忒拜征服并被纳入其霸道统治之下的许多族群——诸如特斯匹埃人、普拉塔亚人、奥尔科迈诺斯人：他们都是波奥提亚人——现在都疯狂地报复这个已经陷落的城邦。到夜幕降临时，至少6000个忒拜人被杀，约有30000人被俘，而马其顿及其同盟部队则损失了500人。周边乡村的许多地区也被洗劫和焚毁。⁵²一直到次日早晨，亚历山大才最终下令恢复秩序，而当他认真起来时，他可谓雷厉风行。他发布命令，禁止继续不加区别地屠杀忒拜公民，此时马其顿国库迫切需要现金，把他们卖为奴隶会更有价值得多。双方取回并安葬了各自的阵亡将士，忒拜的重装步兵战士被集体葬在厄勒克特拉门旁边的大型公墓里。接着，亚历山大召开了一次同盟议事会特别会议——或者说是就近召集一些听话的代表——以

决定这个城邦的最终命运。

同样，此项决议的官方责任也不在他身上：他可以也确实宣称，他仅仅是执行同盟的裁决而已。不过，在场的多数代表本身就很厌恶忒拜人，正好可以利用他们来做一次严厉的判决。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心中所认为应当施加的惩罚准确反映了亚历山大的念头。要是他觉得宽恕忒拜乃是上策，那他早就给予宽恕了。最终，大部分人想要彻底摧毁忒拜。人们强调说，忒拜在希波战争中为不正义的一方而战。普拉塔亚人则说起了他们在忒拜人那里遭受的苦难。不过，投靠波斯才是代表们反复提及的罪行。

当然，没有人会忘记忒拜传令官的恐吓言辞：这些精于阿这场大屠杀决非只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将士们造就的奉承的人很清楚国王心中最关切的是什么。有个忒拜俘虏提了一个可敬而有说服力的上诉请求，出于程序上的考虑，议事会允许他在会上宣讲，但当即被驳回了。随后议事会进行了最终的投票。代表们的决议是“夷平城邦，变卖所有俘虏，忒拜流亡分子在整个希腊都为非法，任何希腊人不得为其提供庇护”。卡德迈亚保持原有的驻军，而忒拜的领土则由参与围攻的那些波奥提亚城邦瓜分。这个拥有七个城门、历史悠久且富于传奇的城邦，俄狄浦斯曾在此统治过，泰瑞西阿斯（Teiresias）也曾预言过它的命运，如今却因为一个傀儡委员会的命令而被从大地上抹去。裁决立即得到了执行（公元前335年9月）。⁵⁴

在实现了主要的目标后，亚历山大十分乐意做些个别的让步，特别是如果这些让步代价轻微，并且能够提升他仁义、虔敬或热爱文化的名声的话。在集体变卖为奴的通令中，他下令赦免所有的祭司、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曾投票反对反叛或者与马其顿人有过客谊的人（包括当腓力作为人质时曾招待过他的那个家庭），以及抒情诗人品达的后裔。此外，他还下令不得破坏这些人的房屋以及所有的圣殿和神庙。一些著名艺术家所刻的雕像似乎也幸存下来：有个逃难者把他的现金藏在了某个此类

雕像中空的披风中，当30年后城邦重建时他又一分不少地取了回来。

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有位忒拜将军的遗孀因谋杀的罪名而被带到亚历山大面前。有个强占了她房屋的军官，先是喝醉了，接着又强奸了她，然后还要她交出金子和银子。她镇定地说，她把所有贵重之物都藏在了花园中的一口枯井里。这位醉醺醺的马其顿军官穿着衬衣下了井。于是，夫人便在侍女的协助下不断向下扔石头砸他，直到将其砸死。亚历山大不仅没有惩罚她，还给予她自由，并且“对他的军官下令，他们应当注意行事，不得再冒犯名门望族”。强调的字眼很值得仔细琢磨。我们会看到，亚历山大对任何被占领地区的贵族的处理手段都极为老练。他们如果愿意合作，就可以成为他的代理人代他统治；如果不愿意，那他们也会比该国其他所有人加起来更为麻烦。所以，此事的寓意就再明显不过了。⁵⁵

此前没有哪种灾祸曾像忒拜的覆灭这样震惊希腊世界，让希腊世界感到如此地恐怖和惊骇。⁵⁶公元前413年的西西里惨败发生在海外，雅典城本身不受影响。普拉塔亚只是一个小城，而米洛斯则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岛。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在琉克特拉战败，但是这只是关乎声望，而不是什么灭顶之灾。然而忒拜不同，它是希腊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城邦之一，该城被彻底摧毁，其居民遭受了所谓的“变卖为奴”（*andrapodismós*）的命运，即全体被驱逐并卖为奴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行动决非无利可图。马其顿的国库从俘虏的售卖中赚了440塔兰特，亦即平均每人88德拉克马。⁵⁷⑧

亚历山大此番行动的直接效果正是他所期待的。希腊各城邦都纷纷为自己开脱罪责，请求亚历山大宽恕他们的“错误”。由于害怕遭受和忒拜同样的命运，雅典人中止了他们在厄琉西斯的秘仪庆典，雅典城中又一次挤满了从阿提卡蜂拥而来的避难者。德玛德斯这个通敌政客劝说公民大会选出十个公认的亲马其顿者，委派他们作为使团，“向[亚历山大]保证——虽说有点晚了——雅典人民很高兴看见他从伊利里亚和特

里巴利人那里安全返回，并且完全支持他因反叛而对忒拜施加的惩罚”。这份声明或许让国王感到有意思，但肯定不足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对使团以礼相待，但使团带回雅典的却是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要求交出“反对他的利益”的十位雅典将军和政治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吕库古、海盗出身的雇佣兵队长卡里德摩斯（Charidemus）和德摩斯提尼。如果他们被交出去，其命运可想而知。

对此，公民大会上爆发了激烈的辩论。福基翁似乎比较乐观，他力劝少数人为了多数人而牺牲一下自己的生命。德摩斯提尼则以绵羊将牧犬丢弃给“马其顿饿狼”的寓言进行反驳。他大声说道：“交出我们，就等于变相地把你们自己、把你们所有人都交了出去。”最后，德玛德斯自愿率领第二个使团前往佩拉，目的是为那些人求情（据说他收受了德摩斯提尼及其同难者共5塔兰特的钱）。

这时，亚历山大的怒火平息了许多，他的长远的战略考量重新占了上风。他明确地告诉德玛德斯，他认为雅典在忒拜的反叛一事上难辞其咎。他还提醒德玛德斯，雅典收留忒拜的逃亡分子本身就是对同盟法令的公然违抗。在从头历数了种种咎责后（这是为了让德玛德斯想不到他正准备做一些让步，但他确实是在让步），亚历山大说，出于宽宏大量他愿意宽恕而不去计较。他将所有人都从黑名单上删除了，除了那位得到雅典特许的海盗头子卡里德摩斯，对于此人德摩斯提尼想必乐意见到他离开，但即便此人，亚历山大也仅仅是要求雅典人将其驱逐出境而已。他顺带还废除了有关忒拜流亡分子的法令。

德玛德斯胜利回国；公民大会十分感激，为他树立了一座青铜像并准许他在市政厅（Prytaneum）终身免费进餐，以此作为嘉奖。的确，这是他理所应得的。他用极其精明的眼光估量着形势，看穿了亚历山大的虚张声势。如同他的父亲，国王无意进行一场旷日持久且危险的围城战，因为他此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⁵⁸再者，他所做的让步是非常重要的。卡里德摩斯径直投奔到了波斯大王那里，亚历山大想必知道他定

会如此；其他几位雅典名人也这么做了。他们没有与大流士结成军事同盟——这是亚历山大最担心的事情——但他们得到了大量资金，以此来支持希腊内部不断兴起的反抗运动。⁵⁹

如果亚历山大指望能从他的宽容仁慈中获得感恩和回报，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从长远来看，他对忒拜的处置将会是他所犯过的最严重的心理方面的错误。要是他赦免了该城邦，他最终可能会与希腊城邦达成某种真正的和解。但现在已不可能了。随着最初的惊恐逐渐消散，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态度变成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强烈厌恶。表面上他们很配合，还总是进行玩世的阿谀奉承，但是，他们从未原谅过他。目前，明面上的一切显得十分平静。马其顿的显贵获得了各种荣誉公民权，驻军指挥官在大街上也受到人们的笑语相迎。穷酸文人们还创作了大量虚伪做作、溜须拍马的垃圾文字。但是私下里，脸色阴沉的年轻人们抚剑弄刀，翘首以盼解放和复仇之日的到来。如果雅典和斯巴达曾弥合分歧并达成真正的谅解，那这个故事或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① 引自 Aeschines, *In Ctes.* §160。德摩斯提尼把亚历山大称为“马尔吉特斯”（Margites），这是一种极具侮辱性的影射：马尔吉特斯是伪荷马讽刺阿基琉斯的混杂诗作中的一个人物——这种隐喻暗指亚历山大只不过是对他所热爱之英雄的滑稽模仿。所谓“在周边闲荡”（*peripatounta*）针对的是他在亚里士多德门下的漫步式学习。——原注

② 德拉克马（drachma），古希腊银币，各地标准不一，阿提卡的约为4.3克重；6000德拉克马等于1塔兰特。

③ 布尔人（Boer）为居住于南非境内荷兰、法国与德国白人移民的后裔，在迁徙中使用牛车，常将牛车围成首尾相接的圆阵，组成防御工事。

④ 弗莱克（Flecker, 1884—191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文中所引诗句出自他的《通往撒马尔罕的黄金之旅》（*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但略有出入。

⑤ 伊斯坎德尔（Iskander）就是亚历山大这一名字在中东的变种。

- ⑥ 廓尔喀兵（Gurkhas）是在英国或印度军队中服役的尼泊尔籍士兵。
- ⑦ 卡德迈亚位于忒拜城内，离厄勒克特拉城门不远。
- ⑧ 亚历山大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他或许会冷酷地回想起居鲁士曾对伊奥尼亚人说过的有关一个笛手的故事。在故事中，该笛手试图通过吹笛来引诱一群鱼上岸；当鱼群不为所动时，笛手撒出了一张鱼网，而这一网捕下来就是上百条。看着鱼儿四处乱跳，他对它们说：“现在才跳太晚了；你们本可以跟着我的音乐起舞，但你们没有机会了”（Hdt 1.141）。——原注

第五章 统帅

在大体解决了希腊的叛乱后，亚历山大离开了已成废墟焦土的忒拜，匆匆北上返回了佩拉。要做的事情还有那么多，而留待去做的时间却又那样地少。他的回归似乎意味着新一轮的清洗运动，这一次遭殃的是高层的克里奥帕特拉的亲属，很显然，他希望在出国时能做到万无一失。¹帕美尼翁被从小亚细亚召了回来，作为腓力手下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将军，他将成为亚历山大的副统帅。如果国王在这个职位上有其他人选，那他肯定会任用他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什么选择。这位老将不可或缺，而他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接着，亚历山大召开议事会，商讨那最最重大的事情——远征波斯。远征该何时发动，又当遵循何种战略？和往常一样，安提帕特和帕美尼翁都建议他谨慎行事。因为他们对继位的残酷斗争还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合情合理地规劝国王，在离开马其顿之前他应当先结婚并生育一个继承人（鉴于此时两人皆有适婚的女儿，他们的动机未必就全然无私）。然而，国王当即驳斥了他们的想法，而这一决定在他死后将引发无数的流血杀戮和政治动荡。他说，作为希腊的统帅，他手握腓力留下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却要把时间消磨在结婚浪荡上，真是太令人羞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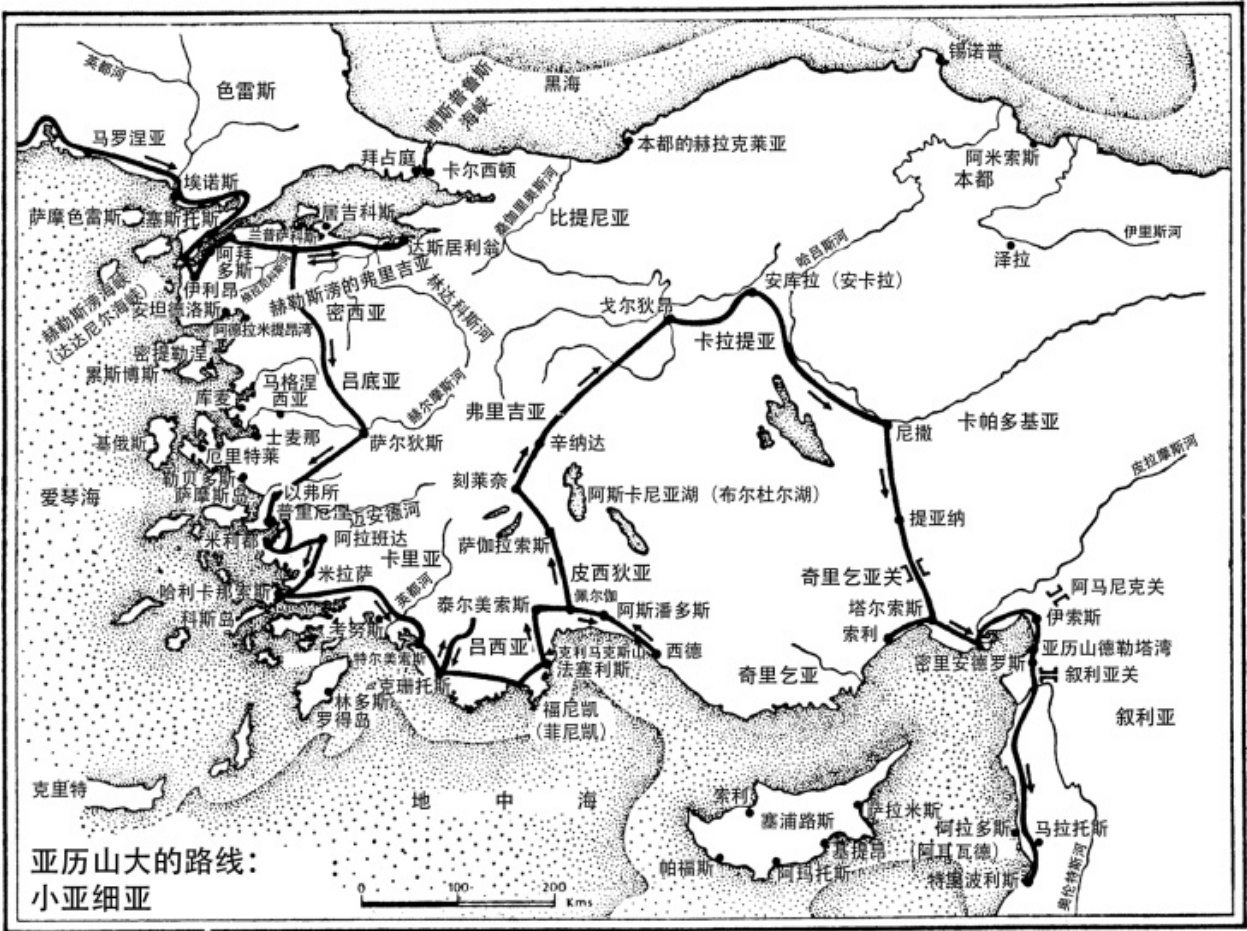
跟通常人们所做的猜想不同，亚历山大的决定可能还有更多的考虑。无论他是从域外王国还是从低地贵族中挑选妻子，注定会有一方觉得

不满，进而伺机反叛，所以，在他凯旋之前最好先搁置此事。但这么说也可能是对年轻的亚历山大的不当奉承。亚历山大对女人的兴趣，即使委婉地说，也是比较淡，比不上他心中炽热难抑的使命感。在此，我们又听到了年轻的阿基琉斯的说法；又一次，我们瞥见了那个充斥着荷马式 *areté*（成就）、本质上无关乎政治的世界，其中战争是首要的，战争乃增进英雄个人光荣的利器。随着年岁的增长，亚历山大逐渐学会了用政治算计来平衡个人的幻想。但是，他心中有一股“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冲动。他拒绝结婚恐怕不能算作“亚历山大不负责任的最突出的证据”。但另一方面，这毕竟有失政治家的风范。²

不过可以肯定，亚历山大之所以急不可耐，自有非常迫切且实际的理由。腓力对金钱的态度（这种态度被其子继承了下来）或多或少类似于普鲁士将军冯·毛奇^①；1914年有人呈递给他一份经济总参谋部的备忘录，对此他回复道：“别拿经济学烦我，我正忙着指挥战争呢。”³但是，维持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所产生的经济问题不可能被无视。腓力死时留下了一笔高达500塔兰特的债务，⁴军饷也拖欠了很久。即便他每年能从潘盖奥斯山的银矿中获得1000塔兰特的钱币，这笔钱也仅能支付维持常规水平的马其顿野战军的三分之一费用。⁵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在继位时把直接税给废除了：这或许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也导致国家迅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马其顿的国家债务依旧逐月高涨。这一局面必须解决，而且刻不容缓。

实际上，亚历山大正面临着一个非常现代的困境。想要削减开支，就只能遣散这支庞大的军队，而军队恰恰是他一切希望之所在。对他而言，这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倘若他志在必得的话，那就得增加财富；而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可以说他知之甚少。在他看来，填满空虚国库的最好方式就是去抢夺别人的，而众所周知，波斯大王的金库满满都是金子。换言之，要解决经济危机，亚历山大要么倒退到湮没无闻的状态中，要么发动一次成功的侵略战争。至于他会选择哪一种，这是不言而

喻的。



不过，他的时间有点太紧了。巴尔干和伊利里亚战役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变卖忒拜俘虏所得的钱只是刚好能够清偿腓力的债务；到何处为野战大军寻觅军饷依旧是个难题——至少在他们得到波斯的金币之前是这样。即使盟军们能够自给自足，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供养常备军，那至少也得花费1000塔兰特的钱，而六个月是最短的训练周期。因而，侵略行动绝不能推迟到明年（公元前334年）春天之后；对于这个日期，议事会勉强同意了。亚历山大还有一个明显的求援之道，即借入资本，但是，在一个信贷银行尚被视为危险的奇异事物的时代（这种意识即使今天也没有从希腊人的脑中根除），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

况，如果把后获得公民身份的也算在内，大部分银行家和放贷者也都是雅典人，倘若体面地逃掉，没有一个雅典人会愿意借钱给亚历山大。

因此，国王便转向他自己的贵族们，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很难拒绝国王的要求。随后的宣传将这种交易浪漫化了，有意加强亚历山大宽宏大量和高度自信的声望。根据记载，在远征开始之前国王调查了他所有朋友和侍友的财务状况，并且把大部分王室田地及其收益一起转让给了他们。事实上，在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份额之前，他都拒绝离开欧洲。当佩狄卡斯问他，“但你为自己留下了些什么呢，亚历山大？”他给出了那个著名的回复：“我的希望。”佩狄卡斯回说：“如果这样，那我们应当做同样的事情。”他接着说，贵族们接受亚历山大的领地是不合适的；既然有望瓜分大流士的财富，那么他们就应当继续忍耐下去。

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但它遗漏了核心的真相。显然，亚历山大想要做的是从他的侍友那里借取资金，而王室田地则是他所能提供给他们唯一的抵押品。佩狄卡斯以其真正荷马式的得体方式，无偿捐献了一笔战争钱款，而其他人可没有如此大方。例如，保存至今的一份铭文便记录了亚历山大赏赐近身护卫官托勒密土地一事。⁶通过这些方法，国王又筹集了800塔兰特的钱，但是他依然极度缺乏现金。当远征开始时，他只携带了70塔兰特的钱（对他的军队来说这大概是两周的军饷，甚至更少）和30天的储备。但另一方面，根据某份史料，他的个人债务已经减少到了200塔兰特；这意味着除了少数例外，他的贵族们都效仿佩狄卡斯的先例，直接馈赠而非放贷给他。当然，这笔钱的大部分已经用于清偿欠饷了。⁷

从许多方面来说，远征军的最终兵员名册都是一份很值得玩味的文件。⁸扣除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开展行动、约有10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的先遣部队，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大军还有超过30000人的一线步兵，和约3300名的骑兵。⁹即使是这个规模也决没有耗尽马其顿的人力储备。时不时还会有新的援军被派出来，而为数众多的农民则继续留在国内

耕种土地，保证土地的收益。^{10②}在这30000人的大军中，可能有5000到6000人需要在被占领城市中充当驻军，其余的24000人则由亚历山大自由支配。然而还有多达总数一半的军队——这个数目着实惊人——连同3300名现有骑兵中的1500名，他们都留在国内由安提帕特统领充当国土防卫军。没有什么还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亚历山大是如何看待希腊和巴尔干的局势的了；或者反过来说，希腊是如何看待亚历山大的。

这对远征行动所声称的泛希腊远征的性质，正好构成了一个反讽的注脚。理论上，亚历山大受同盟委任，代表希腊对波斯发动复仇之战，以报复一个半世纪之前薛西斯对希腊犯下的罪行。这就是伊索克拉底反复鼓吹的泛希腊远征军的目标，而目前国王也仍然是这么宣传的。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曾鲁莽到去问这一明显的问题：如果这是一次泛希腊的远征，那么希腊人的军队在哪里？但是，许多人必定意识到了，抵抗运动已经开始取得间接成果了，因为它迫使国王留下半数军队作为实际上的占领军。

在亚洲，亚历山大统帅着总数为43000人的步兵，同盟对此的贡献是7000人。骑兵方面他拥有不下6000名，希腊各城邦只提供了可怜的600名。同盟为亚历山大负责舰队事务，但也不过如此：总共160艘，其中坐拥超过300条三层桨战船的雅典只勉强提供了20艘。（这些连同200名骑兵便是亚历山大从雅典那里所得到全部兵力，占整个希腊分队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尽管希腊同盟发布了官方禁令，但远比亚历山大所征募的要多得多的希腊人在为波斯大王而战，而且坚持到最后依然忠心耿耿。^③再者，为亚历山大效力的同盟部队从未在关键战役中被使用过（这是另一条重要线索），而是一直充当驻军和负责控制交通线的任务。除了用作宣传以外，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便是作为人质以确保他们在希腊的朋友和亲属安分守己。在亚历山大看来，他们更多时候是尴尬的存在而不是有用的资产，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他便立马甩掉他们。

和别的许多事情一样，亚历山大把军队当作人质的做法也是从他父

亲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一计策虽然简单但却非常管用，它最成功的范例可能是那支皇家侍从军团，该军团由马其顿世家子弟组成，直接服侍国王个人，同时也作为后备军官接受训练。但是，他们的存在也让亚历山大得以牢牢地控制住那些不安分的世家贵族，如同创始者腓力时候的情况一样。结盟的部落首领的情况与此类似：亚历山大将这些人当中意志坚强或雄心勃勃者带在身边——如查斯丁所说这是为了避免反叛——而把他们的国内事务留给温和而谄媚的归顺者去管理。¹¹

如果以表格的形式开列出来，远征军的整体构成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

步兵		骑兵	
12000	马其顿人（方阵和翊卫队）	1800	马其顿人
7000	同盟部队	1800	塞萨利人
7000	欧德里西亚人、特里巴利人以及其他部落士兵	900	色雷斯和派奥尼亚侦察部队
1000	轻装部队（弓箭手和阿格里安人）	600	同盟部队
5000	雇佣兵	1000（？）	先遣部队
11000（？）	先遣部队	6100	总计
43000	总计	合计49100	

阿格里安人和弓箭手数量之少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亚历山大在每次交战时都会使用这支部队，因此它必定有征自巴尔干人的固定兵源作为补充。另一方面，雇佣兵的不足恰恰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这时候亚历山大根本供养不起他们。¹²我们还应注意一下塞萨利骑兵的特殊

地位，他们在同盟分队中自成一系。

早先腓力已被选为塞萨利的终身执政官，后来这一职位又为亚历山大所继承。从种族上说，塞萨利与马其顿的亲缘关系要比它跟希腊城邦近得多，它的政体也是类似的封建贵族制。因而，塞萨利骑兵跟马其顿骑兵有点难分彼此，二者装备相同，组织方式也一样，即按地域进行编队。¹³这支部队与其他同盟军队之间的另一关键区别是受亚历山大信任的程度不一样，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也是有点迫不得已。塞萨利人的固定战斗岗位是在左翼，也就是说他们处在帕美尼翁的直接指挥下。有人曾提出一个有力的观点，认为“他们实际上变成了帕美尼翁个人的侍友骑兵，其中法萨卢斯分队的地位就类似于皇家侍友分队”。¹⁴

若从后来的事件来看，这个有趣的队形安排有着重大意义：它跟我们已知的帕美尼翁和亚历山大之间看似平静却又生死攸关的对军队有效控制权的争夺十分吻合，这种斗争从最初就已存在了。每个关键指挥职位必定都经过了一番苦心争夺。不过在这个阶段，帕美尼翁可能还只是把年轻的国王当作一个较为活跃的名义元首，闯劲十足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而他则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谈判。在战场上，他不可或缺；在继位问题上，他也曾助亚历山大一臂之力。而他为这些无价的功劳所开出的要价亦十分高昂。他的几个儿子中，尼卡诺尔（Nicanor）获得了翊卫队的指挥权，而菲罗塔斯——就是那个将亚历山大与皮克索达洛斯往来交易泄露给腓力的菲罗塔斯——则成了侍友骑兵的长官。帕美尼翁的女婿科伊诺斯（Coenus）分得了六大方阵兵团中的一个，而轻装骑兵部队则可能落入了帕美尼翁的兄弟阿桑德洛斯（Asander）的手中。由于帕美尼翁本身就是整支远征军的副统帅，所以他的地位看起来必定牢不可破。

再者，当准备就哪些部队与安提帕特一同留下、哪些将到亚洲作战这一关键事务作出决定时，帕美尼翁确保了后者主要是从腓力的老兵中抽调组成的。师团级和侍友级的军官团更是如此。尽管亚历山大为他的

几位年轻朋友——克拉特洛斯（Craterus）、佩狄卡斯等——争取到了方阵兵团的指挥权，但在公元前334年大部分军官仍是那些早先就在腓力手下效力的，他们并不比帕美尼翁年轻多少。当查斯丁说参谋总部看起来“更像是旧式共和国里的元老院”¹⁵时，他并非是在夸大其辞。亚历山大同意这项安排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在大战中，久经沙场的老兵要比未经试炼的新兵有用得多，而从政治角度看，最好还是把帕美尼翁的旧部队——更不用说帕美尼翁本人——留在身边，以便能时时监视他们的活动。但当亚历山大在亚洲登陆时，情况依然如此，这些旧部身居腓力的军队的领导层，军队中主要是腓力的军官，他的参谋长又是腓力的老将。帕美尼翁完全有理由自信满满。

除去一线部队，侵略大军中还有大量技术员和专家。塞萨利人狄亚德斯（Diades）还率领着一支工兵和围城工程师队伍：这些人不仅要负责制造投射武器和攻击器械，还要承担挖坑道、开矿以及建设道路和桥梁等任务。还有一个勘察部门（*bematistae*），“负责收集有关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的信息，并记录行军里程”。¹⁶参谋机关和秘书处由腓力手下的前法务长官卡尔狄亚的欧美涅斯（Eumenes of Cardia）负责。这支部队有一个更不寻常的特征，那就是有惊人之多的以官方身份随军行动的学者和科学家；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亚历山大向来清楚良好情报工作的价值，现在他把这条军事原则应用到了更加广泛的领域中。他的团队包括建筑师、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以及动物学家，等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所有关于东方的科学知识最终都依赖这些人带回的信息。

据我们所知，亚历山大还是古代第一个组建官方信息报道和宣传部门的战场统帅。阿基琉斯有荷马来帮他名垂千古，而阿基琉斯的后裔也决心不让自己的成就湮没无闻。除了逐日记录远征之事外，^④还需要一些更有文学色彩和妙笔生花的作品。为了实现这一点，亚历山大任命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利斯特涅斯（Callisthenes）作远征军官方历史学家。

¹⁷一般认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选择，在这次选择中裙带关系压过了对合适与否的考虑。卡利斯特涅斯是个讲求原则、推崇秉笔直书的人——这两种特质通常对创作有效的宣传材料没什么益处。亚里士多德听说他在与国王交谈，于是引用了一行荷马的诗句：“孩子啊，如果你这样说话，你的死期将至。”当亚历山大还在米扎做学生时，卡利斯特涅斯就已经认识他了，不觉得有必要去奉承他。在这一时期，他的东家也仍然只是腓力的儿子，一个哪怕面临着非常低的胜算也要凭空虚的国库进行一次不顾后果的冒险的年轻人。¹⁸

然而事实上，国王看起来已经冷静地——如果不是玩世般地——估量过了这个候选人。亚历山大自己在气质上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心态，而且还会充分利用这种心态来为自己服务，就像他在别的方面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卡利斯特涅斯恰好可以满足亚历山大的需要：他是一个坚定的泛希腊主义者，（在他舅姥爷的教导下）相信哲学上基于*areté*对君主制的正当化解释，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的清白的。作为历史学家他已经小有名气了，而他的背景（他来自奥林托斯）则使他将来易于为未来的希腊舆论所接受。他确实有用，但并非至关重要。一旦完成任务，他很可能会被抛弃掉，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将要接手的任务是为国王的功业撰写编年史，要写得能给希腊人留下正面的印象。随着远征的深入，相应的记录一份接着一份被送回国内。尽管亚历山大保留着审查卡利斯特涅斯终稿的权利，而且有时（如我们所知）会暗示要对特定事件曲笔粉饰，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位编年史家所写的实际上全是由他口授而成。完全没有必要不让卡利斯特涅斯把他所看到的真相写下来：他的学术观点很容易被猜到，而这正是他最初受雇的原因。

卡利斯特涅斯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也根本不知道他的作品将如何被人使用。他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被牺牲掉，跟很多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不仅心直口快，而且极为自负。但凡有一点点的常识，他就会明白他受到荣宠，只是因为亚历山大还需要跟希腊世界进行

妥协。但正如他舅姥爷所知道的，常识判断力并不是卡利斯特涅斯的突出品质；缺乏常识判断力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¹⁹

然而，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当人们知道亚历山大不仅想让自己的功业垂诸史册，而且愿意为此开出高价时，一大群三流诗人、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都纷纷跑来分一杯羹。他们的人数日益膨胀，因为亚历山大接连不断的胜利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素材，而且提高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谄媚极为粗俗，他们的作品让人不忍卒读，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历山大告诉其中之一的科伊里罗斯（Choerilus），他宁做荷马的特尔西特斯（Thersites）也不当科伊里罗斯的阿基琉斯。但是，在宣传领域中纯粹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报酬的判定标准：另一位细心的效颦者皮洛（Pyrrho，他大概摸准了东家的弱点）后来因为一首歌功颂德的诗作得到了不下10000个金币。不难想象，腓力的老兵们会如何看待这些喋喋不休的文人墨客。²⁰亚历山大自己也经常不怀好意地挑拨他们相互竞比，然后以此取乐。

这样，在军事准备工作完成后，亚历山大按照阿凯劳斯国王所创立的传统，举行了所谓的“奥林匹亚”赛会；赛会是为庆祝宙斯和缪斯女神而举办的，为期九天，地点在埃盖或狄昂。期间会有丰盛的祭品献给诸神，随后则是戏剧和音乐竞赛。国王决定让军队高兴一把，此时花上几塔兰特也无所谓。实际上，一场规模宏大的展示可能有助于消除马其顿已经破产的传闻：较晚的一份史料记载说，亚历山大只是在剧场中安装一整个的青铜制的前舞台拱顶时才被建筑师劝阻，反对理由是这会影响音响效果。可以肯定，他下令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帐篷，帐篷之大足以容下一百张进餐躺椅。然后他在其中为侍友、高级将领和希腊各城邦的使节举办一次盛大的晚宴。后来这顶帐篷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征途，所谓他只是被波斯的奢华腐蚀了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献祭的动物全都分发给了军队，“以及其他所有适合参加节日庆典的人员”。²¹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参照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此事更

是撩人心弦。就在远征大军离开马其顿前不久，据说奥林匹娅斯告诉亚历山大，“而且是单独对他一人说了他身世的秘密，并激励他要有配得上高贵出身的目标”。不管这个秘密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后来人们（其中包括卡利斯特涅斯）是怎么想的却是毫无疑问的。据说他的母亲是这么说的，亚历山大乃神灵所生，而这位神灵可能就是宙斯·阿蒙神。另一个几乎跟这一模一样的故事也确认了人们所抱有的想法，故事的主人公是塞琉古（Seleucus）；此人是亚历山大的战友，后来自己也成了国王，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塞琉古王朝。他的母亲拉奥狄刻（Laodice，她实际嫁给了腓力手下的一个将军）曾经梦见自己和阿波罗睡在一起，然后就怀孕了。她还得到了一枚戒指，其宝石上刻有一个锚具，这便是生父为神的象征。神命令她在她所怀的儿子成年时把这个戒指交给他。

次日早晨，拉奥狄刻醒来时便在床上发现了这枚戒指；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果真怀孕了。她所生的孩子名叫塞琉古，他的大腿上的的确确有一个锚状的胎记。当他长大后准备与亚历山大一同远征时，拉奥狄刻“告诉了他身世的真相，并把戒指给了他”。当然，这整个故事明显是编造出来的，大概是以某个很巧合的胎记为基础，当塞琉古需要有非凡的祖先来证明他的神圣王权时，这故事便流传开了。正因如此，这个故事并没有得到其应得的关注。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编造故事者所采用的特别的形式。毫无疑问，塞琉古是在自觉地努力模仿亚历山大，并把最初关于奥林匹娅斯的传说转换到了他自己的母亲身上。他选择这种方法就充分说明，不仅该故事广为流传，而且人们还认定这就是亚历山大在离开欧洲前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真正的秘密。²²

公元前334年早春时候，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国王终于从佩拉起程，统率着远征大军，向赫勒斯滂进发。他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憧憬着这一刻，现在梦想实现了，他即将踏上命中注定的征服之旅。很少有人能这样把自己的私人梦想化为具体的现实。他是年轻的阿基琉斯，再次起帆前往特洛伊多风的平原；他还是希腊人的统帅，其任务是报复薛西斯

对希腊的入侵。这两种身份在他心中融为一体，犹如那两大事件汇流于历史长河之中。“薛西斯已经表明，他的远征行动乃倒转过来的特洛伊战争；所以，现在轮到亚历山大把这场东方人最著名的入侵翻转回去。

”²³

首先，他在同一地点跨越海峡。他率领主力部队取道安菲波利斯和色雷斯，行军300英里来到塞斯托斯；此行历时20天，这是个不错的速度。先遣部队已经占据了滩头阵地，而横渡海峡也没有遇到波斯人的抵抗。无论如何，这是亚历山大最为幸运的一步。舰队是他的一大软肋，他只有同盟提供的160艘船，而所配的船员绝非最出色的。大流士的腓尼基海军几乎是它的三倍规模，而且高效得多。在实际的渡海过程中，一次致命的海上攻击可能就足以在侵略真正开始之前便将其消灭。但是，这样的攻击并没有发生，甚至连一艘敌舰都未曾出现。协同作战并非波斯统帅部的真正强项。

看起来，亚历山大自己对这种可能发生的反击行动并不上心：或许他已经从情报部门那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消息。总之，他留下帕美尼翁指挥主力军横渡到阿拜多斯——这是一项复杂而烦人的工作——而他自己则启程踏上另一条旅途，人们对此说法不一，有人当作宣传之旅，也有人称之为浪漫的宗教朝圣，还有人说这纯粹是亢奋青年的胡闹之举。²⁴可能它实际包括了所有这三种要素。在至少6000人的陪同下，²⁵他经由陆路来到位于色雷斯的凯尔索涅索斯（加利波利半岛）的南端厄莱翁。在此，他在普罗特西劳斯（Protesilaus）的墓前献祭，传统认为这人是阿伽门农军队中第一个跳到特洛伊海岸的希腊人。亚历山大祈愿他自己在亚洲的登陆行动能更幸运些；这个请求可以得到理解，因为他打算让自己第一个登陆，而普罗特西劳斯几乎是当场就被杀死了。

接着，亚历山大在准备由之离开欧洲的地点设立了一个祭坛，然后献祭，祈求诸神赐予复仇之战胜利。完成此事后，他和随行人员登上帕美尼翁从塞斯托斯派来与他会合的60艘战船，进而横渡达达尼尔海峡。

亚历山大亲自为舰队的旗舰掌舵。当舰队航行到半道上时，他向波塞冬献祭了一头公牛，并用金杯奠酒，一如此前薛西斯之所为，个中意味自不待言。进入“阿开亚港”后——我推测这其实就是已被卡拉斯的部队牢牢控制住的洛埃泰昂——亚历山大全副武装地站在旗舰船头，然后将一支长枪掷向沙滩，“表示他已经从诸神那里以长枪获赏的形式赢得了亚洲”。然后，他跳上了海岸。他这番仪式性的投枪动作备受争议。因为它只出现在一则较为晚近的史料中，许多学者认为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假如确有其事，那么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宣战吗？抑或是素有古风精神的亚历山大在运用“以枪征服”这一过时已久的象征元素？还是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彻底推翻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打算？似乎最后一种猜测最有可能，日后所发生的事情也有助于印证这一点。²⁶

国王登陆后的第一个行动是为雅典娜、赫拉克勒斯和掌管安全登陆的宙斯设立另一个祭坛，并祈求“这片土地能出于自愿而非被迫接受他为国王”——终其一生，亚历山大在宗教事务上，无论大小总是表现得极为虔诚。²⁷然后他启程踏上了前往伊利昂的朝圣之旅。有点讽刺的是，那并不是荷马的特洛伊的真正所在，而是后来兴建的；在亚历山大时代它还只是一个村庄，村中有一个“小而简陋的”雅典娜神庙以及一些来自特洛伊战争的遗物，怎么看都是一些赝品。²⁸他受到了当地来自西吉昂以及该地区其他城镇的希腊人委员会的欢迎。在向导墨涅提奥斯（Menoeitius）的带领下，他们向他献上一个礼仪性的金冠。接着，亚历山大在埃阿斯和阿基琉斯，或者当地传统所指认的墓前举行献祭。（这是可以想到的，因为薛西斯在入侵行军期间也曾造访特洛伊，并为特洛伊英雄的亡灵洒下了奠酒。）为求万全，国王还在掌管围城的宙斯的圣灶前举行了抚慰亡灵的献祭，因为根据传说，他的先祖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就是在这里杀死了普里阿摩斯（Priam）。

不过在我们看来最奇特的仪式是，亚历山大和他形影不离的侍友赫淮斯提翁分别在阿基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墓前放上花环（埃里安〔Aelian〕认为这表示他们两人也具有类似的关系），然后遵

循传统习俗裸体并涂满橄榄油，围绕墓地跑一圈。年轻的国王大声说道，阿基琉斯多么幸运啊，他的一生竟有一个如此忠诚的好友，而且在他死后还有一个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为他传颂美名。之后，在沿小镇游览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看看原属帕里斯的里拉琴。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帕里斯用此琴弹出来的都是“一些俘获和蛊惑女人心的淫邪之曲”。不过他又补充道：“我倒是很乐意去看看阿基琉斯的琴，就是那把他过去常常用来弹唱勇士光荣业绩的琴。”²⁹

在离开伊利昂之前，亚历山大在雅典娜的圣殿中举行了献祭。他的私人占卜师特尔美索斯的阿里斯坦德洛斯，注意到神庙外边有一尊被人推倒的前叛乱总督的雕像，于是预言说国王的骑兵会赢得一次大胜，而在此战中国王将亲手斩杀一名敌将。阿里斯坦德洛斯在解释预兆方面可以说无所不能。有人报告说有一尊俄尔甫斯像一直在冒汗，他解释说这意味着“颂诗和史诗的作者以及歌唱诗人们在用诗与歌曲颂扬亚历山大及其功业方面，将会有繁重的工作要做”。不过，国王一向酷爱好兆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阿里斯坦德洛斯能服侍国王如此之久。不管怎样，现在他为雅典娜女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献祭，并把自己的盔甲奉献在了女神的祭坛上。作为交换，他得到了经鉴定出自特洛伊时代的盾牌和全副甲胄，在亚洲土地上的第一次交战，即格拉尼科斯河之战中他便是穿着这副甲胄作战的。不过，在战斗过程中甲胄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于是此后亚历山大就只是让侍从先行把它们带到战场上而已。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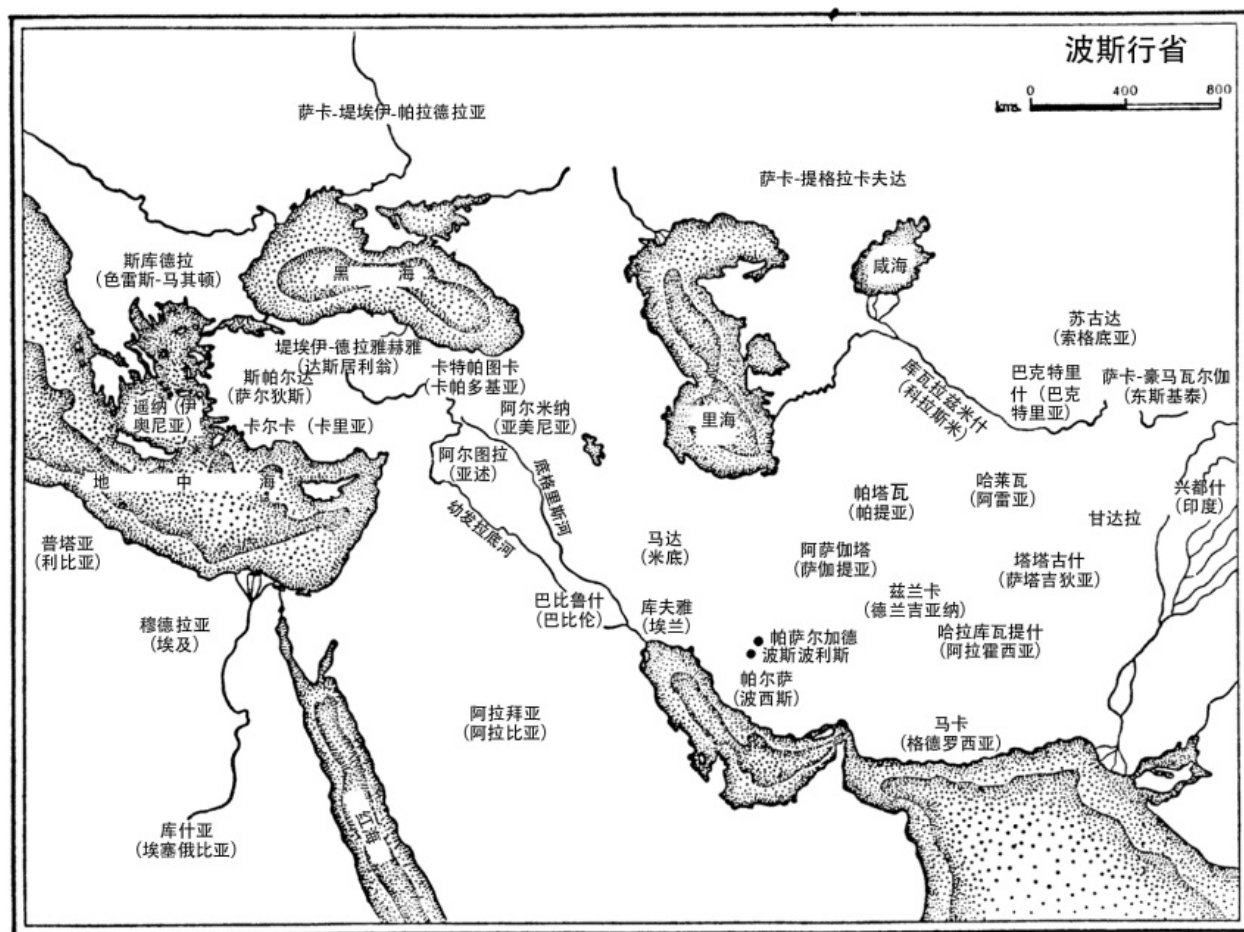
从伊利昂出发，亚历山大北返与正在阿里斯贝的大军会合，此地就在阿拜多斯城外不远的地方。他宣布，在进军过程中不允许出现掠夺或抢劫。他告诉军队，这片土地现在是他们的了：谁都不应糟蹋自己的资产。特别是他们还应该尊重大流士的希腊将领门农的地产，他希望此举能让波斯大王怀疑他雇来的将军是否正和敌人私通。³¹在检阅和清点大军之后——又跟薛西斯曾做过的一样——亚历山大带领他们向北朝达斯基翁进发，该城是弗里吉亚总督的治所。

他们首先到达的城镇是尚在马其顿手中的佩尔科特。但是，他们要前往的下一个大城市兰普萨科斯现在已被门农掌控，而且根据我们不多的证据可知，当时小亚细亚还有相当多的希腊城邦亦是如此。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担任他自己的城邦的官方使节，劝了亚历山大绕过兰普萨科斯，可能还提供了大量的贿赂：国王缺钱一事在亚洲早已尽人皆知。由于不辱使命（他后来对此事做了些渲染以提升自己的地位），³²阿那克西美尼获得了在奥林匹亚立像的荣誉，该雕像是他感激的同胞们奉献的。实际上，他们本可以省下这笔费用。不算亚历山大在当地所能征用的东西，他只有一个月的补给和可发两周的军饷，所以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引诱波斯人进行一次有准备的战斗，并从中取胜。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储备可以用来围攻一座城市：如果该城在他接近的时候没有投降的话，那他也无可奈何。比如，科罗奈也得到了和兰普萨科斯一样的结果，但它并没有为此花费一分钱。

不过，当亚历山大到达普里亚波斯时，他的运气更好一点。他的侦察队报告说，公民们愿意接纳他入城，于是他派了一支小队接管了该城。这位统帅实施了他的第一次“解放”行动，而我们可以肯定，随军的卡利斯特涅斯在他的短讯中一定会对此大加渲染的。³³这时候，已经来不及³⁴在达达尼尔海峡阻拦亚历山大的波斯人，终于看清了他的真正意图之所在。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总督阿尔西特斯（Arsites）派人求助于他在小亚细亚的同僚：统治奇里乞亚海滨的阿萨梅内斯（Arsamenes）和统治吕底亚及伊奥尼亚的斯皮特里达特斯（Spithridates）。三人在位于格拉尼科斯河以东的泽莱亚（萨里-凯亚）建立了一个大营，并召集军事指挥官举行战前会议。显然，他们仍旧觉得此次危机可以控制在行省层面上，这表明他们严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亚历山大。^⑤

最明智的战役计划是罗得岛的门农提出来的，这位经验丰富的专业雇佣军深知亚历山大缺乏金钱和补给，而且关于希腊的局势他似乎有着极好的情报来源。（在这两方面，他的信息可能都来自叛变的马其顿将

军安条克之子阿敏塔斯。)目前，他提出的是一项焦土政策：毁掉所有庄稼，清空乡村地区，必要时烧掉城镇和村庄。正如他阐明的，这项政策将很快迫使马其顿军队因缺乏军需供应而撤军。与此同时，波斯人这一边应集结一支庞大的舰队和军队，并在亚历山大的部队尚分两头时把战争引向马其顿。



这是一流的建议；不幸的是，它出自一位希腊雇佣兵，而此人的才华和直言不讳使他不讨波斯同僚的喜欢。只需采取一点策略，门农便能达成他的目标，但他却继续直言不讳地说道，他们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短兵相接的战斗，因为马其顿步兵要远胜于他们自己的军队。这种断言把真相说得很直白，却让人难以接受。波斯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

害；阿尔西特斯的爱国心压倒了常识，加上他可能也一直在关注着大流士，这位国王对总督的怯懦可不会手软，故而阿尔西特斯宣布，他绝不会让其治下任何子民的房子遭人焚毁。^⑥所以，门农的计划遭到否决，波斯人决心死战到底。³⁵

没有什么比这项决策更能让亚历山大欢欣鼓舞的了。不过，他的对手仍然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即战斗地形的选择。亚历山大从阿拜多斯出发，径直向东北而非其他方向（即沿着通往萨尔狄斯的皇家大道前进，这条路看起来会更合理些）行进，唯一的直接原因便是波斯总督们正在那里集结军队。一旦他的对手意识到他多么迫切需要一场战斗——门农必定已经反复陈述过这一点了——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他们乐意的时间和地点与之对战。最终，他们选择了防御战略：既然门农的计划已经被抛弃，那么这可能就是最明智的替代方案了。很显然，亚历山大干劲十足的性格早就声名在外了。如果能引诱他来进攻一个防御良好的据点，在没有遮蔽的地带作战，他的骑兵难以发起冲击而马其顿方阵又无法保持队形，那么此次入侵很可能就会止步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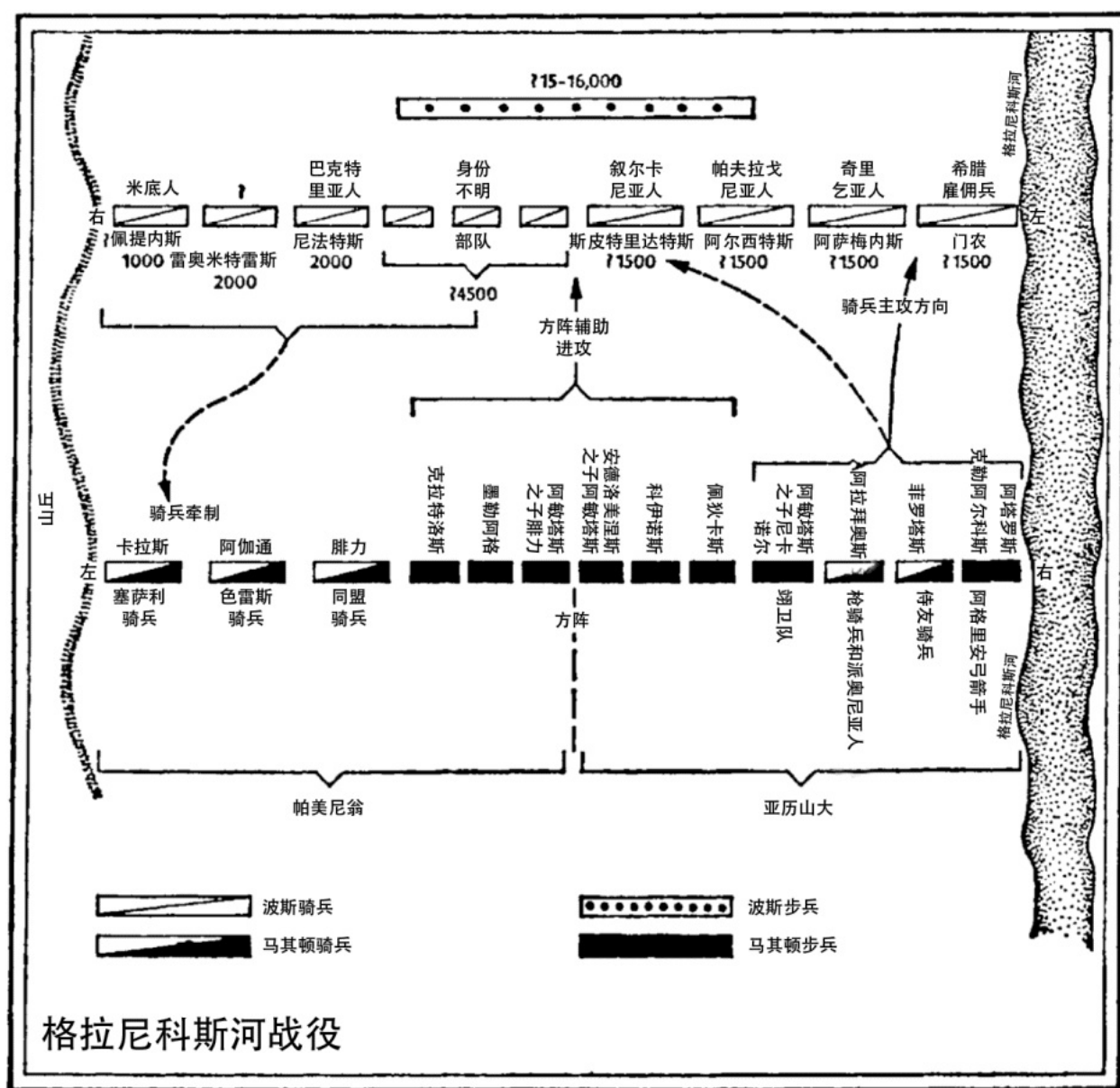
在集结了所有可用的援军后，总督们从泽莱亚出发来到格拉尼科斯河（即现在的科贾巴什河）；如果亚历山大想去达斯居利翁的话，那他必须渡过此河，也就是说进行一次交战。他们选择了该河的一水流急水位深的位置，并且东岸的河堤地势较高，其下还有一层厚厚的冲击沙土沉积层。³⁶这正是他们构想的军事部署的最佳条件。^⑦³⁷阿尔西特斯把门农及其雇佣军部署在敌人的渡河点上，大约5000—6000人：这俨然就是一面枪墙，再配以轻装的标枪兵，可以说就是对付骑兵正面冲锋的最好防御了。³⁸他们的侧翼则是波斯的骑兵团。尽管阿尔西特斯在此事上颇为敏感，他还不至于糊涂到想用自己的征召步兵来稳住前线。骑兵将会放弃机动性，到时充当临时的马上步兵，但是他不得不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部队。

事实上，他处于明显的劣势。他的全部军力还不到30000人，而亚

历山大单单步兵就有43000人。不过，在骑兵方面他则拥有人数的巨大优势：他将以15000—16000人对阵亚历山大的6000余人。³⁹这个因素决定了他后来的诸多部署。不管怎么做，他必须避免在开阔的平地上将较次的步兵暴露在马其顿方阵的面前。他如果要打败亚历山大，就得巧妙地协同使用骑兵和雇佣军。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正往格拉尼科斯河进军，辎重马队跟在后头，“步兵分作两部，侧翼均有骑兵保护”，同时一支精锐的轻装分队被派遣出去，负责侦察前方的地形。当侦察兵返回并报告说敌人就在眼前时，他下令全军摆开战斗队形，全速向河边行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作好准备。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并且看到他们将在那种情况下发动进攻时，亚历山大的军官们有点泄气了。这些人都是长年征战的老兵，他们觉得那就是个死亡陷阱。

帕美尼翁竭尽所能地想要说服国王。波斯人是不可能被引诱出他们既有的防御位置的：他们具有各方面的优势，而且对此一清二楚。河流的水深和流速意味着马其顿人无法以展开的队形前进。他们只能以列的队形渡河，而当他们挣扎着要爬上对岸光滑的河岸时，由于秩序大乱，他们极易受到攻击。而且，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毫无疑问，最明智的做法是就地扎营，先过一夜再说。阿尔西特斯的步兵人数处于明显的劣势，他很可能会撤军。这样，马其顿人就可以在黎明时分渡河而不用担心对方的抵抗。或者，他们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往下游行军，寻找一个更容易的渡河点。帕美尼翁作出结论，这或许也是他最有力的理由：“开头遭遇失败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对我们的成功极其有害。”



但是，亚历山大不愿意听从规劝，他不顾一切地坚持就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敌人就在眼前，而他的供给和现金储备正快速地消耗着；他觉得，要么此时，要么就没有机会了。帕美尼翁在建议中说阿尔西特斯可能会在晚上拔营撤军，跟其他因素相比，这必定更加坚定了国王的决心，因为这正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事情。再者，他的使命感正召唤着他，让他像他的榜样阿基琉斯那样，通过伟大的事迹来获得英

雄的美名——而且，还有比跨过格拉尼科斯河、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作战更好的机会吗？⁴⁰亚历山大的参谋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国王有着敏感的荷马式骄傲，迫不得已，他们试图以宗教理由反对他。现在是5月，亦即马其顿历法中的戴西奥斯月（Daisios），在此期间军事征战是一种禁忌——这种禁律最初可能跟收割庄稼的需要有关。⁴¹对此，亚历山大的回复是对历法进行专门置闰，这样一来，按照王室法令，当月就变成了第二个阿尔特弥西奥斯月（Artemisios）。他已经下定决心，看起来任谁也动摇不了。

实际上，如果这样的一场直接进攻确实发生了的话，⁴²那几乎肯定会是一场惨败。不管有没有发起这样的进攻，也不管有多么地不情愿，亚历山大最终都被迫接受了帕美尼翁的建议。这是目前最明智的方案，而在内心最深处，国王比谁都明白这一点。但是，颜面尽失以及此项决定背后所暗含的耻辱，像亚历山大这种脾气的人是不会轻易忘记的；这件事在后来他对帕美尼翁的处置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要比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要大得多。可以看到，从现在起卡利斯特涅斯在他的官方记录中，从未遗漏任何据说由帕美尼翁向国王提出的糟糕建议。不用说，这样的建议一直都被亚历山大忽略了，这样对涉及的各方都好。

至于是谁把这样的念头注入这位历史学家的脑中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出丑让亚历山大怨恨不已，而这种对帕美尼翁系统化的诋毁就是那些更让人不快的后果之一。总的来说，作为进步的希腊知识分子，卡利斯特涅斯在这一阶段似乎在原则上很厌恶腓力的那些贵族保守派们，一直到后来发生了“匍匐礼”（*proskynesis*）事件后他才转向他们的阵营，那时可能是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总之，他极为偏私地执行了亚历山大的指示，这种诋毁最终在高加美拉战役中达到了顶峰。卡利斯特涅斯在战报中很不公正地指责那位老师怯懦而无能。⁴³不过，那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准备而且有能力收拾帕美尼翁了，而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时，帕美尼翁依旧掌握着大多数的王牌。

在黑夜的掩护下——亚历山大可能让所有的营地火把继续燃烧以迷惑波斯人⁴⁴——军队朝下游行进，直到发现合适的渡河点为止。在此，他们露营休息了几个小时。渡河在黎明时分开始。当一切都还在进行中时，阿尔西特斯的侦察兵发出了警报。几个骑兵团匆忙向敌人的渡河点奔去，意图在亚历山大的军队还处于不利境地时发起冲锋，就像他们昨天下午所做的那样。^⑧但是，这次他们来得太晚了。马其顿军队的主力已经登上了河流东岸，马其顿人的纪律让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这种突如其来的进攻。当方阵列好队形掩护尚在河中的战友时，亚历山大率领手下的骑兵快速发起侧翼冲锋。波斯人很明智地撤退了。亚历山大让其余部队也从容地过河，然后以战斗阵形进行部署（参见第174页的平面图）。这片富饶而略微起伏的平原正好适合骑兵交战；那时，山丘上的春麦在清晨的微风中起伏，恰似今日的美景。⁴⁵

阿尔西特斯和他的同僚必须快速想出办法来。他们已失却先机，现在就只能在开阔的平原——查斯丁称之为阿德拉斯泰亚平原——上战斗了，其左翼位于河边而右翼则朝山脚方面伸展开来。他们在骑兵上很强，在步兵上则弱得可怜。对他们来说，仅有一事可行。他们把所有的骑兵团都置于前线，尽可能地把正面战线拉长，而步兵则留作预备队，然后向亚历山大的位置行进。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通过大规模的侧翼包抄来包剿亚历山大的两翼。

如果他们像塔恩所认为的那样，决心杀死亚历山大，那他们肯定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来。亚历山大穿着从伊利昂的雅典娜神庙那里得来的华丽甲冑，盾牌装饰得跟阿基琉斯的一样炫烂，而他的头上则有一顶非比寻常的头盔，头盔上饰有两只硕大的翅膀或羽毛（这听起来绝对是荷马式的风格）。⁴⁶聚集在他身边的则是一大群谄媚的侍从和参谋军官。波斯人注意到他处在右翼的战斗位置上，于是便从中间调来一些最好的骑兵以应对他的攻击。这正是亚历山大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和他的诸多行动一样，他的高调表现自有其非常实际的隐秘动机。

过了一会儿，随着战斗号角响起，周围的山丘和河流都回荡着方阵可怕的战斗呼号，而国王则亲率骑兵以楔形队形发起了冲锋。他佯装要攻击敌人的左翼，那里门农和阿萨梅内斯正等着他；接着，他突然往里转向，朝已经变得薄弱的波斯中军冲去。与此同时，远在左翼的帕美尼翁正与米底人和巴克特里亚人激战着。亚历山大正在进行一次经典的枢转或梯形攻击，和往常一样其左翼恰好构成那个枢轴。当波斯人的右翼向前移动以对付帕美尼翁时，由于他们想从侧翼包抄他，以致他们的中军便开了一个口子，于是亚历山大和侍友骑兵立即插了进去。⁴⁷国王本人就在核心作战：刀剑枪矛从四面而来，重重地击在他的盾牌和盔甲上。

紧接着便是一场真正荷马式的殊死搏斗。大流士的女婿密特里达特斯（Mithridates）身先士卒，率领手下的伊朗骑兵分队，在40名波斯高级贵族的跟随下发起了反击，开始以同样的楔形队形冲入马其顿的中军。亚历山大的长枪在第一次突击中就已经折断了，年迈的科林斯的德玛拉托斯便把自己的给他。国王调转方向，径直朝密特里达特斯冲去。那位波斯人向他掷来一支标枪，力气之大不仅刺穿了盾牌，而且穿透了胸甲。亚历山大拔出标枪，策马向前，拿着自己的枪刺中了密特里达特斯的胸甲。狄奥多罗斯说，此时“两军中正在酣战的将士们都为这无比英勇的行为而尖叫”。这种战斗场面简直就是从《伊利亚特》中摘录出来的，不过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虚构的。

然而，胸甲扛住了冲击，而国王的枪头却折断了。密特里达特斯虽被震了一下，但仍旧战意高昂；他拔出剑来，准备短兵相接进行马上决斗。亚历山大非常镇定地拿起断枪，猛然朝对手的脸部刺去，一下便把他击倒在地。然而，由于他如此关注密特里达特斯，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存在。这时，另一位波斯贵族罗萨刻斯（Rhosaces）从侧面向他冲过来，举起马刀，向他头部重重地砍下去；这一下削掉了他带翼的头盔，削到了头皮使骨头都露出来了。亚历山大虽有些晃悠和眩晕，不过他还是成功地把袭击者干掉了。但就在此时，罗萨刻斯的兄弟、伊奥

尼亚总督斯皮特里达特斯（Spithridates）正好来到他身后，高举利剑，准备给予致命的一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亚历山大的保姆的兄弟、黑面的克雷托斯狠狠地劈了斯皮特里达特斯的肩膀一刀，卸掉了他的胳膊。这可真是刻不容缓；国王此时晕头转向，从马上摔了下来，双方便立即围绕着他展开了一场混战。

与此同时，方阵步兵正涌进波斯中军的缺口，开始干净利落地解决阿尔西特斯的的地方步兵。亚历山大的轻装部队则对波斯骑兵进行了密集射击，有效地阻遏了他们的战马的行动，并引起了大规模的混乱。国王总算挣扎着重新爬上了自己的战马，同时侍友们也紧紧地聚集在他身边。敌人的中军开始溃败，侧翼也就跟着暴露了出来。许多杰出的波斯指挥官已被杀死，现在战局已经锁定了。这时，处在左翼的帕美尼翁的塞萨利骑兵适时地发起冲锋，顷刻间整个波斯战线就全面崩溃，开始四散逃窜了。

除了雇佣兵，波斯的步兵分队没有进行太多的抵抗。不过，门农及其士兵有序地撤到了战场中的一个小圆丘上，在那里做着最后的抵抗。他们派了一个传令官去请求亚历山大的宽恕，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国王不愿批准这一请求。此刻，他集中全部精力，只想消灭他们。当方阵发起正面攻击时，骑兵从各个方向包围住他们，防止他们大规模逃跑。眼见求饶无望，门农的部队便以顽抗到底的勇气血战到底。于是，跟战役中的其他部分相比，马其顿人因此而战死的要多得多。统率骑兵部队的亚历山大，其胯下的战马也死在长枪之下。不过，这种战斗只可能有一种结局。大约有3000—4000名雇佣兵就地战死，剩余的2000人则放下武器投降。门农本人成功脱逃了，亚历山大跟他还有些事情要了结。阿尔西特斯的其余部队全都穿过平原仓皇逃窜，亚历山大也任由他们离去。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结束了，统帅赢得了一场非凡的胜利。他个人在此战中的表现非常英勇；除了他，还有谁更配得上那枚“由全军一致授予的”勇气徽章呢。⁴⁸

波斯骑兵的伤亡人数约有2500人，其中有1000人是伊朗土著。阵亡簿上还有许多大贵族：大流士的女婿密特里达特斯、其子阿布帕勒斯（Arbupales）、其妻舅法那刻斯（Pharnaces），连同斯皮特里达特斯、卡帕多基亚指挥官密特罗布扎涅斯（Mithrobuzanes），以及其他许多人。阿尔西特斯本人幸免于难，成功逃到了弗里吉亚；不过，他自认为要为这场灾难负主要的责任——不管是否如此——于是便在那儿自杀身亡。波斯步兵的损失被人为夸大了许多（特别是狄奥多罗斯），而我们又没有确切的办法可以确定具体数目。⁴⁹不过，既然他们已经全线溃败，没有多作抵抗便落荒而逃，他们的伤亡也就不可能太严重。马其顿人的损失同样十分可疑。关于亚历山大步兵的伤亡人数记录最高的也就30人，另外两则史料甚至将此数字缩减到9人。骑兵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关于其损失的最高记录是120人。但是，两大权威说法（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都认为不超过60人，并且其中有25人是侍友骑兵，他们死于“第一波冲锋”之中。⁵⁰随后，亚历山大在马其顿的狄昂为这25人立了雕像：一人一种姿势，绝不重复。他还把自己的模样也列入其中，这点倒是符合他的性格。⁵¹

门农的2000名残存雇佣兵像重罪犯一样被人用锁链锁起来，然后被送到马其顿去做苦工，很可能就是挖矿。按理说，他们非常适合以低廉的价格招募到马其顿的军中服役：亚历山大的举措似乎完全出于报复。他放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他们违背了希腊舆论，竟与东方人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希腊人”，今天很多人还相信这个说法。换句话说，这是他作为同盟统帅而做出的安抚姿态。但是，希腊公共舆论只是符合亚历山大要求时他才会加以关注的东西，同盟也仅仅是他用来遮掩众多阴险行动的遮羞布而已（毁灭忒拜城便是一例）。事实上从现在起，只要能控制得住，他就会征募希腊雇佣兵，包括那些先前在大流士手下效力的人。阿里斯托布罗斯说，他“更多的是受愤怒而非理智影响了”；显然，真相就是如此。⁵²

从胜利的战利品中他挑选了300副甲冑，派人送到雅典献给帕特农

神庙。随奉的铭文如下：“腓力之子亚历山大与希腊人——拉凯戴梦人除外——献上从居住在亚洲的蛮族人手里夺得的战利品”。在执行同盟法令的名义下，亚历山大再次充分表明了将来可能会落在希腊人——包括雅典人——头上的事，如果他们还一心要反对他的话；对斯巴达的怠慢只是顺带的而已。亚历山大没有提及马其顿人，这究竟是意在强调他们的希腊属性（以及他本人作为同盟仆人的角色），还是另有阴暗而狡黠的动机，恐怕还无法轻易下断言。⁵³

战后次日，国王为牺牲将士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他们像真正的战士一样带着各自的武器和甲冑而下葬。他还免除了他们直系亲属的兵役、各种地方税和财产税——他心中算计着这些特权将会“激起战士们更大的热情去面对战斗时的危险”：他的举措向来不难找出隐秘而务实的动机。或许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专门去看望了伤兵，鼓励他们尽情夸耀交战时的个人英勇事迹。大部分落入他的手中的奢侈物品——紫袍、酒杯等——他都送回去给他的母亲了。⁵⁴

此次大败之后，大流士再也不能小瞧马其顿人的威胁了。在可能失败的险境中，亚历山大竟夺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现在，整个小亚细亚西部完全暴露在了他的面前，远征波斯的行动以坚定不移之势拉开了序幕。在5月的那个的清晨，当亚历山大视察格拉尼科斯河战场时，这位希腊统帅完全有理由志得意满。不过，他也非常清楚，一切才刚刚开始。漫长而危险的征程还在前方等着他；至于有多漫长和有多危险，或许他还不曾意识到。

① 冯·毛奇（von Moltke, 1848—1916），俗称“小毛奇”，于1906—1914年间担任德国参谋部长，“一战”初期曾主持施里芬计划。

② 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跟腓力于公元前359年招募的10000名步兵和2000匹战马的满编军队作一下对比，很明显二十五年的持续繁荣带来了总人口的显著增长，

一如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所发生的那样。——原注

- ③ 在伊索斯之战后，大流士在他的薪酬名单中大概有不下5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参见 QC 5.11.5, Paus. 8.52.5。学者们通常会极力缩减这些数字，但往往不能提供充分的理由。参见 C. L. Murison, *Historia* 21 (1972), 401 n. 7。——原注
- ④ 迄今为止，这通常被归名在卡尔狄亚的欧美涅斯的名下（参看 Arrian 7.25-6, Plut. Alex. 76；相关残篇参见 Jacoby *FGrH* 117），以“皇家实录”（Royal Ephemerides）知名。但学者们一直感到很困惑，因为无论是阿里安还是普鲁塔克，除了在亚历山大临死之前的部分，他们都从未引用过“实录”。目前对这一遗漏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由博斯沃思（A. B. Bosworth）在《亚历山大大帝之死——传闻与宣传》（“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Rumour and Propaganda”, CQ ns21 (1971), 93-105, esp. 117ff.）中提出的；如果博斯沃思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实录实际上可能被贬低成了一种史料来源。尽管如此，但似乎可以肯定确实存在着某种日志：其中少不了会涉及远征军的规模、行军范围以及复杂程度。——原注
- ⑤ 很可能大流士的主力部队仍有一部分被牵制在埃及（参见奥姆斯戴德 [Olmstead] 第492—493和496页），亚历山大在入侵时算到了这一点。参看 Davis (Bibl.), p. 36。——原注
- ⑥ 宗教伦理也部分揭示了阿尔西特斯的回应：根据受琐罗亚斯德影响的改革过的信条，“战士和贵族的职责乃是保卫农业”（伯恩：《波斯和希腊人》[A. R. 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第62—63页）。——原注
- ⑦ 下文所述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的胜利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别于传统版本，该版本主要基于官方宣传和阿里安（Arrian 1.13-15.5）与普鲁塔克（Plutarch, Alex. 16.1-3）所保存的史料，后者充分利用了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记载。二者所记载的时间是同一个下午，都认为战斗是从渡过河流后直接的正面进攻开始的，这着实让人难以置信。这里所述的导致交战的事件次序，遵循的是狄奥多罗斯的版本（Diodorus 17.19.1-3）。对相关问题的全面分析参见本书的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原注
- ⑧ 最后这一句有点突兀，原因是作者认为亚历山大在到达的当天下午就曾渡河进攻过一次，只是被波斯人击退了，但不知为什么，作者在前面的正文中没有提及此事（在2012年版的序言中有提及），或者原先提过但又删掉了。详细情况参见本书附录。

第六章 通往伊索斯之路

在征战之初，亚历山大计划走多远，他所设想的路线有多明确？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将来也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有一段时间，流行着一种说法，即他“有着坚定的长远目标和横扫一切的政策”；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他几乎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走多远或者结局会是怎样”。¹不过他很清楚，波斯帝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从红海延伸到里海，从赫勒斯滂到兴都库什甚至更远。无论亚历山大心中有何其他念想，他必定想要打败（如果不说取代的话）大流士；鉴于波斯大王有着众多可用的资源，单单这一条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或许，事情的基本真相是（这里再次引用他最精辟的评论家的话），“和其他完全相信其个人命星的人一样，无论此星引向何处，他都做好了追随的准备”。²

这也可以解释他在行政管理、种族问题、政治体系和军事战略等方面的灵活态度。一个对个人命运有着压倒一切的信念的人，在别的方面不会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其他所有一切都必须服从那个闪耀的目标。看起来相悖的是，真正执着的征服者总是偏好采用无差别的机会主义再配以政治宣传，这种现象在亚历山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最清楚地说明他的态度的，便是他处置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的手段。

希腊同盟已经成立，是为了必要时便可用来对付希腊大陆城邦的反

叛行为。在那里，民主制是一个危险因素；对此，身在欧洲的安提帕特可以自由行事，包括使用强制实行僭主制、寡头制，或者派遣驻军等手段。另一方面，大流士在小亚细亚所任命的希腊人经常是一些寡头分子，这点对亚历山大倒是比较便利。的确，这非常适合卡利斯特涅斯的泛希腊主义宣传策略。至少在表面上，亚历山大是在推行一项解放政策；而且很关键的是，他越来越长的交通线不能有太多的麻烦。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肯定其中并没有什么理想主义的动机），他在欧洲推行的政策必须倒转过来。所以，他推翻了寡头制或僭主制，然后设立民主制以取而代之。他似乎不存在任何的意识形态信念（除了决心要以自己的形像来塑造世界以外），而且事实上总是低估那些有这种信念的人。任何手段只要能为他的雄心壮志服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在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任命熟谙此地区的卡拉斯担任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总督，以顶替阿尔西特斯的位置。同时，他还赦免了那些逃到山中避难的人。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旧体系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只是弗里吉亚的总督由波斯人换成了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甚至指示卡拉斯“要继续以原有的标准来征税”。泽莱亚拿下了，但亚历山大并没有处罚它的居民，假装相信他们是因为受到胁迫才站到波斯人一边的。实际上，他要让合作显得比抵抗更有吸引力。帕美尼翁继续向达斯居利翁（厄斯基利）进军，他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该城，因为波斯驻军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经逃走了。³

亚历山大不知时机地甩掉了一直伴随着他的同盟部队——这是对他作为泛希腊远征军领袖之角色的又一讽刺注脚。负责指挥同盟骑兵的墨涅拉奥斯之子腓力，已经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中被杀。现在，国王任命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代替他做指挥官；除了由卡拉斯指挥、负责维持弗里吉亚治安的阿尔戈斯人以外，国王不仅把骑兵而且把所有同盟部队都留给了他。这时传来消息说，包括门农在内的波斯军队的残存力量，撤到了海滨的米利都，于是亚历山大立即向南进军去追击他们。⁴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走沿海的道路，而是取道密西亚向南行进。他最初的目

的地是萨尔狄斯，该城是吕底亚行省的首府、“蛮族人在海滨的统治堡垒”，是通往苏萨的皇家大道的起点，具有极高战略价值。

当他还有大约9英里的路程时，萨尔狄斯的波斯总督密特里涅斯（Mithrines）在一群显要公民的陪同下出城来见他。密特里涅斯提出，他愿意交出萨尔狄斯城，还有它的卫城以及储藏在那里的财宝。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的胜利开始获得让人满意的金钱回报了。⁵马其顿军队在赫尔摩斯河边上扎营，离城墙外围仅有不到3英里的距离。或许亚历山大觉得这是一个圈套，故而他把密特里涅斯留在身边，然后派一支先头部队去接管驻军。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于是亚历山大开始着手安排吕底亚的行政事务：这些安排值得研究。⁶

为了管理这个辖区，他选择了帕美尼翁的兄弟阿桑德洛斯以取代斯皮特里达特斯：表面上这是一项荣誉，但我们可以推测，亚历山大身边那位老师的亲属越少，他就越高兴。至于要塞的指挥官，他任命了他的侍友保萨尼阿斯，并把仅剩的希腊同盟部队亦即阿尔戈斯分队留给他作为驻军。这样，另一问题也就得以解决了。他还建立了一个独立部门来征收税款和贡赋：其首任财政长官是个马其顿人，名叫尼基亚斯（Nicias）。吕底亚的富庶久负盛名，亚历山大不想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其他他做了类似安排的地方是埃及和巴比伦：可以注意到，二者都是巨富大省，除文职总督外还驻有军事指挥官。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财政长官都是绕过同僚而直接对国王负责的。

亚历山大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他可能想改革财政管理制度，既为自己的利益，也为他的新臣民；但是正如格里菲斯（Griffith）指出的，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剥除对本省税收的控制来平衡和限制总督的权力”。同样，亚历山大仍旧尽可能地保留了现有的组织制度；例如，他没有使用当地的铸币厂来铸造自己的货币，直到他到达塔尔索斯后方才采用这一做法，其最初动机是为了宣传。原则上，他还准许萨尔狄斯和整个吕底亚的公民“遵循他们国家的旧有习俗，并给予他们自由”。事实上，

这并不像表面听起来的那么慷慨大方。作为既定方针，波斯人向来允许其臣民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吕底亚人并不需要把他们的旧组织重新解放出来，因为他们不曾停止过运转；亚历山大这里所说的“自由”，只不过是保证不会实行奴役而已——这种命运绝非不可能，帕美尼翁在占领格律尼翁后的所做所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又一次，国王仅仅是认可了现状，但却因此坐享美名。

现在，亚历山大从萨尔狄斯启程前往以弗所，这是波斯与西部之间的另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他们仅用四天就走了70英里路程。一听说他到来，城市的雇佣兵驻军就逃走了，其中还有马其顿的叛徒安条克之子阿敏塔斯。显然，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对门农部队的处置已经广为人知。两年前（公元前336年）以弗所一度被帕美尼翁拿下，那时候以弗所公民甚至在阿耳特弥斯神庙中为腓力建立起准崇拜活动。但是，当亚历山大正要发动侵略时，城中的波斯同情者在门农的支持下赶走了亲马其顿的“民主派”，并拆毁了腓力的雕像。眼下仓皇撤出要塞的正是门农的驻军。以弗所人很不明智地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而这在他们波谲云诡的历史上既不是头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亚历山大自然立刻就恢复了民主派的地位；于是，在国王干预之前（有人怀疑，国王并没有马上干预），这些人疯狂地迫害他们的政治对手。但它该适可而止，过了一阵子，亚历山大叫停了此类报复行动，据说这为他在城中赢得了极大的欢迎。即使这样，他重建阿耳特弥斯神庙的提议（前提是功劳归在他的名下）还是遭到了婉拒——很有象征意味的是，该神庙在他出生的当晚被焚毁，而且从未得到重建。⁷

当时，著名画家阿佩勒斯（Apelles）正在以弗所，于是亚历山大便委托他作一幅肖像画。他最初的尝试是表现骑在布凯法拉斯上的国王，这听起来就像是大卫（David）或者安格尔（Ingres）在最糟糕状态下的作品。亚历山大对此很不满意，也照实说了。于是，阿佩勒斯让人把布凯法拉斯带到画棚里，牵到画的旁边。当活生生的马对着它的画像嘶鸣

时，阿佩勒斯说：“国王你看，这匹马的艺术判断力可比你强多了。”这（不管它给我们讲述的公元前4世纪的审美价值是怎样的）是一段非常生动的小插曲。亚历山大错误地以为自己在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并以此自豪。有一次，在阿佩勒斯给他画像时他一直在高谈阔论，阿佩勒斯轻声地建议他换别的话题，因为给画家研磨颜料的年轻学徒们都在笑话他。但是，在这幅肖像上国王非常固执，阿佩勒斯无可奈何，只能再次尝试。最后的版本是把亚历山大表现成手执闪电的宙斯——这一奇思怪想使得阿佩勒斯被雕塑家吕西波斯（Lysippus）讽刺为没有品味。但是，在主要为宣传而作的艺术中，审美方面的考虑往往会被牺牲掉。国王志得意满，而阿佩勒斯也得到了不菲的报酬。⁸很显然，自我神化的思想（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深深扎入了亚历山大心中。

当他还在以弗所时，马格涅西亚和特拉勒斯两个地区都遣使表示归顺。舆论已经在周围传开，即无论亚历山大在国内会做什么，至少在这里，马其顿侵略者更加青睐民主制。在希腊城邦中，那些一直翘首期盼能有一个稳固靠山的平民派系很快就心领神会。迄今为止，亚历山大可能一直在摸索怎样管理一片被征服地区；而现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似乎已浮现在眼前。在帕美尼翁和阿尔基马科斯的率领下，两支大军分别被派出去接受伊奥尼亚、吕底亚和埃奥利亚地区的城邦的投诚。在离开萨尔狄斯之前，两位将军都得到了简要而审慎的指示。寡头集团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府。地方法律和习俗均不受影响。最后，各个城邦向波斯人进贡的贡赋都将得到免除。

表面上，这些条款听起来相当慷慨；但它们其实只是意味着一群傀儡统治者被另一群所替代。此外，尽管得到了萨尔狄斯的财宝（其中大部分可能被立即分发下去以补偿欠饷），亚历山大仍旧非常缺乏现金。此时放弃贡赋是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其代价他恐怕难以承受。但是，只换个名称又不费什么事。他所做的实际上是为了要求所有“被解放的”希腊城邦都加入到希腊同盟中来。一旦他们加入，在同盟章程的约束下就有义务为泛希腊的战争大业支付“献金”（*syntaxeis*），以此作为

兵员和船只的替代。⁹我们猜测，涉及的总金额大概会与他们先前以贡赋形式献予波斯人的没多大不同。不过，“献金”这一委婉说法并不会引发令人不快的联想；而且整个计划暗示有一个统一希腊阵线，因而必定可供国内大肆宣传。

帕美尼翁和阿尔基马科斯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在一个又一个的城邦中——就像以弗所，就像整个希腊历史上的那样——平民派系都时刻准备和渴望在外力的援助下夺取政治控制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无情地清算他们的对手。（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以弗所，大概是在处理行政问题。不过他也去了趟士麦那，而且此事在他死后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大约在公元前624年，这个古老城邦被阿吕亚特斯 [Alyattes] 摧毁，自那以后该城就一直荒废着，只有个别人还定居于此。当外出到帕古斯山打猎时，亚历山大以其在地形方面的超凡眼光，发现了一处绝佳的新城址，离旧城南面约2.5英里。不久，该城由安提柯 [Antigonos] 建造完成，由此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新士麦那城。）帕美尼翁所得到的另一指示是加强伊奥尼亚的沿海防御，以对付波斯舰队可能发动的海上进攻。克拉左美奈通过一条永久堤道而与大陆相联，有人曾试图在附近的米马斯半岛挖一条运河，但没有成功。¹⁰

事实证明，诸如此类的预防措施决非无用功。有人看见波斯大王的海军分队离开了卡里亚，向北航行，他们显然是去和雇佣兵以及其他部队会合，这些部队目前还控制着米利都。早些时候，米利都的驻军指挥官认为守城无望，便派人送信给亚历山大，提出要献城投降。现在，他突然改变了主意。¹¹因此，国王不得不加紧步伐。同盟舰队已经从以弗所派了出去；¹²如果舰队能赶在波斯人之前到达米利都，那么港口就可以拿下，而城市也将得以保全。帕美尼翁和阿尔基马科斯被召了回来；即便如此，在副统帅回来之前，亚历山大似乎已经带着他所有能用的部队上路了——不算伤兵，有超过15000人留作驻军或被派出。

途中，他还抽出时间解决了普里厄涅的问题：他派驻了军队，并定

下了献金数额。这同样反映了亚历山大对待希腊城邦的真正态度。可以想象，普里厄涅肯定很抵制解放。在此，国王还成功获得了在以弗所被拒绝的东西：奉献一座伟大神庙的权利。雅典的圣所仍在建造当中：亚历山大为建造慷慨解囊，而得到的回报是一篇铭文，今天在大英博物馆尚可见到：“亚历山大大国王为雅典娜·波利娅斯（Athena Polias）建造此庙。”他最后总能得偿所愿。值得玩味的是，在有如此众多急迫之事要处理的时刻，他还是抽出时间去消除这种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不快记忆。

14

希腊舰队的指挥官尼卡诺尔赶在波斯人到达的三天前，进驻了近海的拉德岛。他对外号称有400艘船，实际上只有160艘，不过他的防御位置极佳。亚历山大本人也及时赶到了米利都，并派了一支精兵去加强拉德的防御。波斯人不得不在米卡勒山下的近海抛锚。这个位置无遮无挡，而且被切断了淡水补给，因为亚历山大委派菲罗塔斯驻守迈安德河河口，以防止他们上岸取水。亚历山大此时已占领了外城，正准备进攻卫城。

这时，帕美尼翁和阿尔基马科斯与亚历山大会合，举行了军事会议。帕美尼翁建议冒险进行一次海战，即使他们在数量上明显不利。他认为，胜利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声望，而失败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波斯人在海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此事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亚历山大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己方船员仍旧训练不足（同盟城邦必定是从最劣等人员中选拔的）；而且此时战败有可能诱发希腊城邦的全面反叛——这句实话透露了很多想法。这样一来，泛希腊远征也就到此为止了。毋须多疑，亚历山大的主要担忧其实就是，同盟舰队一旦有机会就很可能会抛弃他。

与此同时，米利都的执政者派代表到他的指挥部，提出只要他解除围城，他们“愿意让亚历山大和波斯人一样自由使用他们的港口，自由进出他们的城市”。换句话说，米利都将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亚历山

大一口回绝，并且开始进攻。同盟舰队封锁了港口以防止守城者从波斯盟友那里获得援助，接着国王的攻城器械攻破了城墙。防线已被撕开，马其顿人蜂拥而入。部分守军，包括300名雇佣兵，逃到了一个小岛上；其他人则弃械投降。亚历山大按照他的新政策，很宽大地对待所有米利都公民，不过凡是落入他手中的外族人都被变卖为奴隶。至于希腊雇佣兵，只要他们愿为他效力，他可以宽恕他们（据说是“被其勇气和忠诚感动了”）。很显然，他们是门农旧部的一部分；但这一次，急切的军事需求压过了亚历山大对同盟法令表面上的遵从。

同样，这里也没有发生像摧毁忒拜时那样的劫掠和大规模屠杀。据说，有些士兵因为亵渎了德墨特尔的神庙而离奇失明。即使这种传闻不是亚历山大编造出来的，他肯定也会大加宣扬，以此威慑可能的抗命者。他还不厌其烦地重申，这是一场种族战争，是一场复仇远征，为的是报复大流士大帝及其子薛西斯对希腊人犯下的罪行（当地舆论要是觉得有点牵强也可以被原谅）。当别人向他展示那些在皮托和奥林匹亚赛会为城市赢得荣誉的众多运动员的雕像时，亚历山大只回了一句：“当蛮族人围攻你们的城市时，那些身体像他们一样强壮的人去哪儿了？”米利都曾于公元前494年被波斯人占领，那时伊奥尼亚反叛行将结束；可以猜想，在这种情况下米利都人并不愿意回想这件事情。¹⁵

波斯大王的舰队离开了米卡勒山一段时间，一直想着要挑起一场海战。但是，除了有一些小规模冲突以外，他们没有达到目的；而且由于他们被切断了一切陆地补给，从而认为自己实际上陷入了被围状态。最后他们放弃了，起锚向南航行到了哈利卡那索斯（波德隆），那里波斯人正在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威胁并没有消失。所以，我们必须把亚历山大此时所采取的重大决定，放在这种背景之下来加以审视：他解散了自己的舰队，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陆地征战上。雅典的海军分队加上另外的一两艘船则留下来作为运输船队，同时也是作为人质。赫勒斯滂的海军分队亚历山大也保留了下来。（六个月后他们因军事需要回到了爱琴海。）但是，同盟海军的主力现在已经被付了报酬，

遣散回家了。¹⁶

许多人为这一举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希腊舰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实力都较弱（毫无疑问，确实如此）。亚历山大没法一直供养着它，因为舰队每个月至少要花费他100塔兰特的钱币。如果马其顿人知道他们已无退路，就只能背水一战。最后，亚历山大有了一个新战略，可以让一支舰队丧失作用：他计划从陆上占领所有波斯和腓尼基的港口，这样一来敌军就无法在他背后行动。不过，他得冒非常大的风险。想要使波斯舰队失去活动能力，就得打下从赫勒斯滂到埃及、从奇里乞亚到提尔的所有大港口。在此期间，大流士的海军仍然可以自由地突袭希腊大陆，斩断亚历山大的交通线，并在爱琴海两岸挑起各种矛盾。（其中的多数事情后来他们都做了。）有400艘腓尼基战船逍遥在外，希腊完全有可能在波斯的鼓动下发动叛乱。而一旦成功，亚历山大打败大流士的机会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从实际情况来看，亚历山大完全不信任他的希腊盟友——这倒也合情合理——他“宁愿冒因大规模反叛而征战失败的风险，也不愿把安全事务寄托于希腊舰队”。¹⁷相应地，他还不无道理地寄希望于希腊大陆上的城邦继续窝里斗，因为长久以来希腊城邦一直做不到统一行动，甚至都保卫不了自己的自由。但如我们所见，在一段时间内，局势非常不明朗。

米利都陷落后，残存的波斯军队向南撤退到卡里亚的哈利卡那索斯；这是一个巨大而防御优良的要塞，有着一流的港口，内部设施齐全，可以抵抗长期的围城。¹⁸现在，门农自己跟亚历山大有仇要报，他已经写信给大流士，要求授予他最高军事指挥权。为了防止宫中政敌诽谤，他将妻儿送往苏萨作为人质。波斯大王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下亚洲总管和舰队总司令”。

直到两年之前，哈利卡那索斯一直由当地效忠于波斯的卡里亚王朝统治。其末代国王就是皮克索达洛斯，年轻的亚历山大曾试图通过婚姻

而与之结盟，不过没有成功。在计划落空后，皮克索达洛斯明智地与波斯大王和解，然后将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奥隆托巴特斯（Orontobates）的波斯贵族。现在，皮克索达洛斯已死，奥隆托巴特斯作为波斯大王的直接代表掌管着哈利卡那索斯。皮克索达洛斯最初是通过篡位而夺得政权的，实际上，真正的合法统治者是他的姐姐阿达女王，她现在仍控制着卡里亚最坚固的要塞阿林达。这些事情亚历山大一清二楚，他马上就明白下一步该如何行事。卡里亚人觉得波斯人的统治就像一根刺扎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王朝复辟更让他们高兴的了。在这件事上，亚历山大既给予了真正的解放，同时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因此，当亚历山大离开米利都时，他没有沿着海岸向南行进，而是绕了远道，翻山越岭来到阿林达：或许他早就跟被放逐的女王取得了联系。总之，她出城与之会面，并自愿交出了那个要塞。为了回报她的支持，亚历山大承诺一旦拿下哈利卡那索斯，他就助女王复位。由于女王个人十分怨恨奥隆托巴特斯，所以亚历山大在恰当的时候还把围攻卫城的任务交给了女王和她的部队。两人相处得似乎融洽无间。亚历山大把这位中年女王叫作“母亲”，而她后来也一直亲手做一些蛋糕和甜点送给他作为小礼物。最后，她还把他收为养子和正式继承人。

这一切十分感人，但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亚历山大在政治上的精明和远见。和对手结盟是一个很少让他失望的备用手段，无论对方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也不管他们是得人心的还是反动的。收养就意味着，在阿达死后他有权在卡里亚任命自己的总督，而时机一到，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地政权只需从效忠波斯大王转投亚历山大就可以了。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的所有行政安排都遵循着同一基本模式。他可能一边高谈着反对波斯统治的泛希腊远征，然后一边原封不动地采用波斯的组织制度，包括总督和附属王国。¹⁹唯一的差别在于波斯总督换成了马其顿人，贡赋变成了“献金”，最高权威属于波斯大王而属于亚历山大自己。

然而，卡里亚人只看到这位马其顿冒险家把他们从波斯人手中解放

了出来，并使他们的合法女王得以复辟。当亚历山大被收养的消息传播开来时，“各个城邦立马遣使为国王戴上金冠，并且保证会在所有事情上与国王合作”。²⁰亚历山大已经通过海路把围城器械先行派了出去，可能是派往伊阿索斯，毕竟时间比较紧了。现在，他跟阿达女王道别，然后向西南行进，先翻越拉特摩斯山脉，再取道拉布兰达和欧洛摩斯。²¹尽管当他来到希腊人为主的地方时，他作为被收养的卡里亚人的身份会有些尴尬，但是沿途的城镇都敞开了双臂欢迎他。在这些场合中，他一直强调“他之所以要承担起这场反波斯之战，其目的就在于给希腊人以自由”。²²

他来到了伊阿索斯的海岸，在那里他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个港口看来已经友好地接待过了他的运输船队。总之，当公民们向他请愿，请求恢复他们在波斯治下失去的某些地方渔场时，国王当即予以批准。²³在伊阿索斯，亚历山大还会见了当地的一位名人，他是个学童，曾赢得一只海豚的钟爱。按照某种说法，国王后来“任命这位男孩担当巴比伦的波塞冬神庙的祭司长，因为海豚对他的爱便是神明眷顾的明证”。²⁴亚历山大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迷信倾向，而且这时他肯定非常期望海上的好运。

他从伊阿索斯出发，沿海岸行进，途中经过巴古利亚，然后从东北方向靠近哈利卡那索斯，在米拉萨城门外半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²⁵有一支侦察分队被派出去执行任务，他们遭到城墙上投射武器的密集攻击；接着，门农的部队突然出动，其进攻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在对方还没弄清楚情况时就通过城门撤了回来。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亚历山大对哈利卡那索斯的防御研究得越多，心中就越感到不安。他可能已经跟城中的亲马其顿势力取得了联系。²⁶如果是这样，那由此得到的情报必定很令人失望。门农身边有数千名希腊雇佣兵（包括两名雅典指挥官厄菲阿尔特斯 [Ephialtes] 和特拉叙布罗斯 [Thrasybulus]，在摧毁忒拜城后亚历山大曾要求雅典交出二人）。门农的物资和军备都很充足，并且防御装备中还有围城弩炮。

堡垒的陆地一侧矗立着高大的有雉堞的城墙，其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哨塔，墙外还有一条45英尺宽、超过20英尺深的护城河。此外至少还有三个防御良好的要塞，即使城市本身沦陷，它们仍然可以，实际上也确实坚持了很长时间。其中之一就在旧卫城西北角的堡垒那里。另外的两座，一个叫萨马基斯要塞，在海岬的最南端；另一个是所谓的“国王城堡”，在近海的阿孔涅索斯小岛上；两座要塞控制着海港的入口处。港口本身还受到波斯舰队的保护，此时舰队就停泊在那里。

既然亚历山大已经解散了自己的海军，那么他就没法从海上进行封锁。如此一来，哈利卡那索斯不可能缺乏补给，更不用说因为断粮而投降了。另一方面，自从在小亚细亚登陆以来，亚历山大第一次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补给问题。当他的部队路过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时，当地正获丰收；那是一块肥沃的土地，边上有三条大河灌溉，其中包括格拉尼科斯河和斯卡曼德河（根据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将军〔General Sir Frederick Maurice〕的看法，单单这条河流就足够为公元前480年的薛西斯大军提供饮水了）。一直到米利都为止，向南进军的途中都是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是富饶的耕地，还有来自大迈安德河的充沛水源。库尔提乌斯（Curtius）告诉我们，即使这样，凡马其顿人过处，便有如飞蝗横扫，其消耗之大连原路返回都几乎不可能。现在正值旱季之末，而他们又驻扎在多岩石的波德隆半岛上（一块著名的贫瘠之地）。最近的水源远在20英里之外，而且可能满足不了需要。食物、饮水和草料可能都得从米利都那里运来，而这又是一段长达两三天路程。²⁷

显然，国王的一大希望便是通过直接进攻拿下哈利卡那索斯。但是，在此他面临着另一难题：他的攻城器械还没到。波斯海军一直在海岸巡逻，亚历山大的运输船队一直无法躲开他们。他最初的计划是把这些重型装备卸在闵都斯，即哈利卡那索斯西面10英里远的一个小港口。他跟通常的反对派取得了联系，其领袖向他保证，如果他在某个晚上把军队带过来，城门自会打开，城市也就自然落入他的手中了。但是，有些

事情出了差池，这也是此类安排经常出现的情况。亚历山大于午夜时分到达，却发现城门紧闭，城墙上到处都是守卫者。尽管如此，他还是让他的步兵在某个哨塔下挖掘坑道。正当挖掘之时，有大批海上援军从哈利卡那索斯赶来，马其顿人只得撤退。要么出于背叛，要么是因为谈话走露风声，亚历山大差点掉进预设的陷阱之中。

接连几天，由于没有港口可以卸载攻城武器，亚历山大在没有这些武器的情况下攻城只是徒劳。不过，他的运输船队最终突破了封锁，大概是在刻拉密克湾沿岸的一个废弃小湾登陆的。自那以后，围城才真正开始。在棚子或弹盾的掩护下，亚历山大的士兵填平了某段护城河。接着，他架起了移动塔楼，用石头和其他投射物轰击守城者，同时破城槌不断撞击城墙，坑道工兵也在挖掘哨塔的基底。通过这些方法，他成功打破了哈利卡那索斯的防御工事，于是方阵步兵便踏着碎石一拥而入。但这时他们才真正遇到对手。门农的雇佣兵同样训练有素，并且还具有额外的优势，即他们可以从设在城墙上的弩弓的密集射击得到掩护。进攻如此反复再三，士兵都在奋力搏斗一番之后被赶了回去。到了晚上，工人们轮班工作，用半月形的间壁墙把缺口围上，而门农则派遣一支突击队去烧毁亚历山大的塔楼和器械。随后又是一场殊死战斗。最终波斯人被迫撤退，不过在此之前已有约300名马其顿人受了重伤。

现在，亚历山大把攻城武器转移去进攻城市的北面。破城槌和弩炮在连续不断地轰击后，终于摧毁了两座塔楼以及二者之间的间壁墙，随后亚历山大决定尝试进行一次夜袭。²⁸这次行动遭到了惨败，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其顿人被里层的一道间壁墙挡住了去路。他们设法撤离了战场，但是次日早晨亚历山大不得不向门农请求休战，以便把牺牲将士带回来。

这时，驻军的几位指挥官——门农、奥隆托巴特斯和两位雅典人厄菲阿尔特斯和特拉叙布罗斯——正在举行军事会议。厄菲阿尔特斯生来力大过人，而且勇气非凡，他坚持认为如果想要保住哈利卡那索斯，他

们就必须采取攻势，门农很明智地表示了赞同。两人制定了一个极为高明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差点儿成功。他们从驻军中挑选了2000名雇佣兵，这些是他们整个军队的精华。接着，他们将这些人分成两个突击队。第一组配有火把和沥青桶，天明时从间壁墙后面冲出去，放火烧毁亚历山大的攻城器械，“立刻引燃了一场熊熊大火”。正如门农预计的那样，国王立刻率领步兵前来救援，并派其他部队去灭火。一旦方阵开始投入战斗，门农的第二支突击队就从附近的主城门冲出去——阿里安说，“这是马其顿人最没有预料到会有人冲出来的地方”，然后从侧翼和后方进行包抄。同时，门农还把新攻城器械投入使用：这是一个高达150英尺的木塔，每层都布满了弩炮和标枪兵。当厄菲阿尔特斯在下面凶残地率兵出击时，飞石箭雨便从上方朝马其顿方阵倾泻而下。

门农一直密切关注着此次交战的进展，这时他把后备的波斯步兵也投入了战斗。看起来，亚历山大几乎就要失败了：他被四面围住，除了拼死一战以外别无他法。最终，他被老兵预备队救了下来，这些人曾和腓力并肩作战，现在已被免除了战斗职责。受到眼前混战的刺激，他们决心给这群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展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战斗。他们组成盾墙，长枪闪亮，由此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阵形，然后加入到战斗中。这对厄菲阿尔特斯及其士兵产生了相当大的心理冲击。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唾手可得之时，却发现还有第二波战斗要打。他们一时军心动摇，而马其顿人则借机扳回劣势，并且很幸运地杀死了厄菲阿尔特斯。

在短短几分钟内，整个波斯突击队全线崩溃，纷纷逃回城里。随后，在间壁墙附近发生了血腥的肉搏战，同时由于有太多人挤上护城河上的桥，该桥因不堪重负而坍塌。城门内的守卫者大为惊慌，由于一心想阻止马其顿人入城，他们竟把许多自己人关在了门外。²⁹有些人在奔跑过程中被践踏至死；其他人则死在了马其顿追兵的枪下。此时夜幕开始降临，于是亚历山大选择撤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勉强获胜已属幸运。马其顿人撤回了营地，亚历山大知道此时不宜继续冒险。

不过，守城者承受不住了。他们的伤亡惨重，特别是最后的那次出击。城墙也多处毁损。当晚，门农和奥隆托巴特斯决定突围。他们让残存的最好部队留驻港口要塞；其余的守备力量连同轻便的物资和装备一起由海路撤到科斯岛上。（很可能一大部分公民也追随离去，尽管古代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此事。）在离开之前，他们放火烧毁了军械库和装有攻城器械的大木塔，以及与城墙毗邻的房屋。当时正在刮着大风——此时秋季干燥的西北风还吹拂着波德隆——大火迅速蔓延开来。

亚历山大目睹了一切，但无可奈何。他也没办法阻止他们撤退——这正是对他完全放弃海军政策的有力批评。他没有像样的舰队，再说港口的据点也还在波斯人手中。他和他的部队只能借着火光驻足观望，看着门农把所有他能塞到船上的人员、物资和装备都运走。黎明时分，马其顿人进入尚在燃烧的城中。他们接到严令，要尊重有礼地对待所有公民，还要营救那些受大火围困的人。哈利卡那索斯毕竟是亚历山大的盟友兼义母阿达女王的首府。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以忒拜为范例，将城市夷为平地的习惯做法，在此显然是不行的。不得已时，他的工兵部队或许会做一些紧急的拆毁工作，以防止火势蔓延。他考察了一下尚在敌军手中的要塞，发现它们固若金汤，于是明智地决定不去管它们。他用一座高墙和一条濠沟把萨马基斯要塞围住，不过对于岛上的阿孔涅索斯堡垒就无能为力了。³⁰虽然拿下了主要目标，但代价十分高昂。现在，他必须继续前进。

阿达女王正式成为了卡里亚总督，尽管除了残垣断壁和硝烟未散的碎石乱砖外，她曾引以为傲的首都已经什么也不剩了。亚历山大给她留下了3000名雇佣兵和由托勒密指挥的200名骑兵，他们的任务是肃清该地区波斯残存的抵抗力量。（这些行动，包括消灭哈利卡那索斯城的要塞中的驻军，花了他们整整一年时间。）现在，所有新婚将士都被送回国去过冬假，这一举措使国王大受拥戴。作为护送他们回国的军官，克勒安德洛斯（Cleander）和科伊诺斯得到指示，要从马其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招募一些新兵过来。这两人是兄弟，而且克勒安德洛斯还是帕美

尼翁的女婿。^①此前亚历山大通过任命其为吕底亚总督的方式，摆脱了老师的兄弟阿桑德洛斯：没有马其顿贵族会拒绝升迁。

远征军现在分成了两支独立的部队，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减轻冬季征战时的补给压力。帕美尼翁率领塞萨利骑兵、同盟部队和辎重队伍——包括亚历山大的重型攻城装备——向北折回到萨尔狄斯，从那里出发，征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各个部落。与此同时，国王本人则往东进入吕西亚和潘菲利亚，“力图控制住海岸一带，以便使敌军舰队丧失机动能力”。完成此事后，他调转方向，经由皮西狄亚内陆地区，于翌年早春时候在戈尔狄昂与帕美尼翁会合，这里也是那些结束休假的部队的会合点。³²

两位统帅就这样分开了，或许各自都乐得能离开对方一阵子。亚历山大从哈利卡那索斯向东南行进，³³沿着科耶吉兹湖东岸前行，绕过考努斯和克尼多斯这两个尚在波斯手中的海滨堡垒（后来它们被托勒密拿下了）。他渡过达拉曼河，占领了一个名为叙帕尔那的城镇——目前该城尚未确认具体位置——然后到达了海边的特尔美索斯。这个城镇很顺利地落入了他的手中。克里特人涅阿尔科斯和他的私人占卜师阿里斯坦德洛斯都有朋友在这里，其中有人会见了涅阿尔科斯，问他怎么才能最好地帮到他。涅阿尔科斯派了一群舞女及其奴仆去卫城，作为给波斯驻军指挥官的礼物。这些人在长笛中藏了匕首，在筐子中藏了小盾牌。晚餐之后，酒过数巡，他们动手杀了主人，于是卫城很快就沦陷了。³⁴由于在这一计策中所起的作用，涅阿尔科斯随后受到嘉奖，被任命为吕西亚和潘菲利亚总督。

从特尔美索斯出发，亚历山大来到克珊托斯河畔，在那里他接受了大约30个城镇和村庄的归顺。不过，在这期间他跟帕美尼翁的队伍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之间隔着崇山峻岭，现在又为积雪所阻。因此，他向北进击，一直打到能出克珊托斯河谷的山口，目的是为了打通连接弗里吉亚和海滨的主干道。在此，由于高山积雪和敌对部族的阻遏，他陷入

了困境，仍没能实现目标。这时，来自吕西亚东部的法塞利斯和其他城镇的使节到了，“给他带来金冠和友谊”；³⁵他们必定也透露了更便捷的路线就是他最后取道萨伽拉索斯和刻莱奈走的那条。

亚历山大估量了一下风险，决定暂时搁置通讯联系一事。他返回海边（除了疯子，没有人会在严冬季节直接翻越山岭），在克珊托斯河这边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确信自己不去冒险是对的。由于地下的某种震动，城市边上的一个泉眼像间歇泉一样喷发起来，从中吐出了一块刻有古代符文的青铜板，这可能是某个丢失多年的还愿物。对于任何有点脑子的占卜师而言，这必定是神的馈赠。阿里斯坦德洛斯随即解读了这篇神秘的铭文：铭文说（谁会反对他的说法呢？），“终有一天波斯人的帝国将会被希腊人摧毁而走向终结”。亚历山大大受鼓舞，于是再度出发。这次他选择了靠东边的路线，沿着海滨道路一直走到福尼凯（菲尼凯），然后从那里穿过凯利多尼亚半岛，最终到达法塞利斯。³⁶

法塞利斯和西德之间的唯一一条陆路最初的那一段，农民骑骡而行毫无困难，但对大部队来说却并不好走。这是克利马克斯山上的一个山口，狭窄而陡峭；开始是一条侧壁高耸的石灰石隘道，从凯梅尔谢开始逐渐升高，一直延伸到贝尔迪比南缘的潘菲利亚平原。亚历山大还记得当初翻越奥萨山时所用的计策，现在他派色雷斯工兵上前工作，命他们凿出阶梯并拓宽隘道。³⁷

在法塞利斯短暂停留期间，亚历山大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帕美尼翁的信息（关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路线状况，这位老师似乎比国王有更好的情报来源）。来的是一支小队，他们随行带来了一个名叫西西涅斯（Sisines）的波斯囚犯。此人所叙述的有关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之事十分详尽且令人不安；当时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作为色雷斯骑兵指挥官正在帕美尼翁手下效力。据西西涅斯所说，这位林刻斯提斯人给大流士写信，准备向波斯投诚。波斯大王在回信中允诺给他1000塔兰特的黄金，如果他能成功刺杀亚历山大，波斯将全力支持他登上马其顿的王位。

。西西涅斯则被选中充当秘密中介。不过，（他告诉国王）他还没来得及完成任务便被帕美尼翁的卫兵抓获，为了保命便在受讯时全盘招供了。³⁸这件事只能由国王亲自裁决。

西西涅斯的供词让亚历山大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就像此事给现代史学家造成的困境一样）。他要不要相信此事呢？奥林匹娅斯在最近的来信中一直要他警惕这位林刻斯提斯人——至少他后来是这么宣称的。尽管我们可以看出，此人对王位的要求根本站不住脚，但这未必会妨碍大流士去刺激他的野心。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已死，权力的诱惑看起来非常诱人。另一种可能是，整个故事都是波斯间谍捏造的，目的是为了在马其顿最高统帅部中制造猜疑和不合。但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不禁怀疑，在所有人中，为什么是帕美尼翁突然这么特别关心他的利益；对此，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马上浮现了出来。

在远征开始时，亚历山大任命那位林刻斯提斯人做色雷斯骑兵指挥官。现在，色雷斯人在帕美尼翁手下服役，这个职位虽在保萨尼阿斯^②军中却不受其支配，而他本人肯定也格外反感。帕美尼翁或多或少把色雷斯人和塞萨利人看作是自己的侍友骑兵，而亚历山大则决心消除这种潜在的危险。对那位林刻斯提斯人的任命可以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同时这也绝不是唯一的一步。到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为止，塞萨利人一直由卡拉斯指挥，此人是帕美尼翁亲自提名的，此前在先遣部队时就在帕美尼翁手下当差。不过，在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迅速把他从该职位上调走，改任为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总督；这一升迁他几乎不可能拒绝。空缺的塞萨利骑兵指挥职位则由亚历山大自己的助手墨涅拉奥斯之子腓力填补；不过，要想削弱帕美尼翁的权威还得更进一步。

因此，这位老师有着充分的理由想摆脱那个林刻斯提斯人；后者的域外王国背景（加之他的两个因背叛而遭受处决的兄弟），给出了一种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明显办法。如果帕美尼翁捏造了一份非常可信的报告，证明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是一名叛徒，那么只需轻轻推一把——

事实证明，从长远来看这就足够了——就能保证他遭受处决。西西涅斯被派去与他接洽，这或许是真的；但作为潜在的叛徒，他却未必知情。倘若其身后有另一把刀顶着，这位波斯人自然不会太讲究他对亚历山大所讲的故事的确切性。再说，亚历山大一直远在法塞利斯，他怎么可能彻查此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可能会立即下令处死那个林刻斯提斯人；实际上，如果他听从了参谋人员眼下所提出的建议，那结局便是如此。

国王显然因这个间接叙述的故事感到怀疑和焦虑。但是，他不想在没有对此事做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就把一位优秀军官牺牲掉。因此，他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他派了一个名叫安福特洛斯（Amphoterus）的参谋押送西西涅斯回到帕美尼翁那里，并指示说那个林刻斯提斯人应予以拘禁并严密看管，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国王还抢先一步，在帕美尼翁打空缺的骑兵指挥官职位的主意之前，把它交给了他交情最深和最为信任的朋友密提勒涅的厄里吉奥斯。^③

在此期间，色雷斯人在克利马克斯山上开出了一条不错的小路。亚历山大命令大部队以纵队形式翻越隘道，而他自己则在一支小型护卫队的陪同下沿着海岸行进。这条路只有在北风怒吼时方可通行，其他时候，大海在海岬之下咆哮，而海岬之上只有一条小路在岩石和砂砾中间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沙滩上。现在，时不时地还有南风呼啸，想走这条捷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亚历山大决定碰碰运气。根据卡利斯特涅斯和其他人的说法，大风在适当的时候变成了北风，于是国王及其护卫队得以顺利通过这条路。

卡利斯特涅斯自然会在官方通讯中对此事大书特书。风向的改变被归功于神明的干预：大海认出了亚历山大的皇家威仪，为表礼敬（*proskynesis*）它选择了让步。³⁹事实上，这一奇迹般的风向变动很可能根本就没发生过，纯粹是为宣传而虚构出来的。亚历山大在他的信件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不过，当时这种自我包装也不是安提帕特所感兴趣的事情

。此外，如果斯特拉波（Strabo）对此事的记载是真实的版本（似乎确实如此），那该记载也是用于审查而非宣传的版本。按他的说法，亚历山大“在海浪消退之前就出发了，结果他的士兵们全天都在齐肚脐深的海水中行进”。⁴⁰

一翻过克利马克斯山，军队便来到了富饶而美丽的潘菲利亚平原——即现代土耳其的里维埃拉地区；这是一个60英里长、18英里深的灌溉良好的新月沃地，是大海与如高墙般环绕的山岭之间的一块闪亮飞地。这是亚历山大沿海岸进行的突袭的最东端。从西德一直延伸到奇里乞亚的是一块荒凉、崎岖且无人居住的地区，既没有港口也没有适当的陆上交通，这里不需要再派军深入。⁴¹不过，当亚历山大通过平原向佩尔伽进军时，他的后卫遭到一伙皮西狄亚土匪袭击。这些强盗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岩石要塞，以此为基地定期侵扰低地地区，恐吓农民和抢劫旅客。他们的突然袭击给亚历山大的辎重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马其顿人伤亡惨重，而袭击者则带着大量的俘虏和役畜逃走了。

然而，这次皮西狄亚人挑错了下手的对象。亚历山大愤怒却又很冷静，他下令暂停前进，包围了那座岩石要塞。那些强盗顶住了他两天的进攻。接着，当看出他不拿下要塞就绝不会善罢甘休时，强盗中的年轻人决定孤注一掷。他们约有600人，都无视年长者的投降提议，在家中活活烧死了家人以防他们被俘，而自己则在夜幕的掩护下从亚历山大的封锁中偷偷溜走，逃到山里去。⁴²

国王自有十足的理由来清理这些强盗的老巢。既然他已稳稳地控制住向东远达潘菲利亚的海岸，那么他主要关心的就是向内陆进击，并重新与帕美尼翁取得联系。他似乎还不太清楚那条经由萨伽拉索斯和刻莱奈通往戈尔狄昂的相对便捷的路线。因而，他仍旧试图向西北强行翻越山口，由此打通前往基布拉的干道。这座岩石要塞——弗雷娅·斯塔克夫人（Dame Freya Stark）已令人信服地将其确定为坎狄尔——正好处在这条路线上。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法塞利斯还是潘菲利亚沿海地区的

居民，都不急于告诉他更短的路线。他们将马其顿军队视为上天派来为自己清除山上的敌对要塞的工具，眼下这支军队正以最热忱的方式完成使命。如果亚历山大决定沿着基布拉的道路逆势而上，他们甚至可以完成得更好。这条路在离开海岸后便深入到一个峡谷当中，从泰尔美索斯这座强大城市俯瞰可以俯瞰该峡谷。为了强行通过这条隘道，亚历山大将不得不去对付泰尔美索斯人——这些海滨城市显然凭自身力量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国王在向内陆进击之前，必须先处理好海滨地区的事务。佩尔伽干脆地投降了，马其顿人进一步推进到阿斯潘多斯。在城外他们遇到一个代表团，其人表示归顺，但同时也要求免除有损尊严的驻军。亚历山大早就了解了阿斯潘多斯的资源情况，而且眼下他既缺少现金，也缺少战马，因而他同意不在城市中驻军；但他为此特权开出一个非常高的价格。阿斯潘多斯需把他们著名的种马饲养场为大流士驯养的所有马匹转交给他，除此以外，还要“奉献50塔兰特的钱币作为酬报”。阿斯潘多斯人或许有钱，但这简直就是勒索。不过，代表团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他们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条件，然后返回城中。国王继续前进，来到了重要港口西德，在这里他留下了一支驻军。接着，他转向西北，越过山岭来到了叙利昂，这是雇佣兵控制的一个孤立要塞。这看起来是项棘手的任务，而且偏离他行军的直接路线。所以，亚历山大决定绕过它。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部分原因在于来自阿斯潘多斯的消息。该城的公民在听说了他蛮横的条件后，拒绝了以他们名义签定的协议。当亚历山大的军需小队前来征收马匹和“献金”时，却发现城门紧闭。阿斯潘多斯位于一个能俯瞰欧律墨冬河的小山上，其城郊建有城墙，墙下便是河流。现在，公民们撤离了地势较低的城郊，躲到了城堡当中，妄想着国王会因为忙于他处的事务而无暇返回对付他们。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王需要金钱和马匹，而且一心想要得到它们。很快，阿斯潘多斯人就看见亚历山大及其部队进驻了空无一人的城镇。这时候，他

们丧失了勇气，于是派了一个传令官下来，请求按原先同意的条件投降。

不过，亚历山大不想就这么轻易地饶过他们。他说，他们须按照前约交出马匹。但是，那已经高得离谱的“献金”现在得加倍；此外，他们每年还需交纳一定的金钱作为贡赋——应注意的是，这些贡赋不是交给同盟，而是要交给马其顿。阿斯潘多斯将被置于总督的直接控制之下，这几乎肯定包括在城市中驻军。所有的公民领袖得交出来作为人质。最后，国王下令公开调查有关阿斯潘多斯从邻居那里窃夺土地一事：至于调查团会发现些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⁴³阿斯潘多斯的例子赤裸裸地展现了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的根本目标。只要他能得到别人自愿的合作，泛希腊远征军的表象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任何抵抗，哪怕只是对他意志的轻微违背，都会面临即时而野蛮的报复。“不做我兄弟，便做刀下鬼”：自此，亚历山大的行为就变成一种阴沉的陈词滥调、一个反革命的笑话。但是，对那些像阿斯潘多斯人一样的受害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笑话。

就这样，他的海岸事务圆满解决了，于是亚历山大带着新补充的战马和几周的军饷回到了佩尔伽。由此他开始朝泰尔美索斯方向的内陆地区前进。他所选择的路线需经一条狭长的峡谷，而泰尔美索斯人则控制着两边的峭壁，看起来几乎无法攻克。不过，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他对“蛮族人”心理的精准判断。他不打算强行通过这一山口；相反，他命令士兵们就地扎营过夜。如他所料，泰尔美索斯人在看到这一情况后，便把主力撤到了附近的城镇中，只留下一个小队看守隘道。一次突击就解决掉了这些守卫。亚历山大沿着峡谷前进，却发现又被泰尔美索斯城本身的城堡挡住去路，该城堡居高临下，海拔有3000英尺。除非长期围攻，否则毫无办法，而这恰恰是亚历山大所极力避免的。

幸运的是，这时候有一队使团前来拜见；他们来自塞尔加，一个靠近阿斯潘多斯北面的山城。这些塞尔加人都是出色的战士，而且敌视泰

尔美索斯：他们向亚历山大表示友好并且愿意提供支持。他们还告知了穿越安纳托利亚中部的更便捷的其他路线，而这正是亚历山大一直缺乏的关键情报。他当即放弃泰尔美索斯，调头回返，在塞尔加人的引导下，经由基尔克戈兹和德设美，朝布尔杜尔湖前进。⁴⁴在这一地区，他所遇到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抵抗是在萨伽拉索斯。在此他不得不进行了一场最为棘手的战斗。在此战中，他要仰攻山上一座防御坚固的据点，而且因为地势极为陡峭和崎岖，骑兵无法提供支持。不过，马其顿人的训练和纪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萨伽拉索斯被攻陷了。

亚历山大花了点时间清理山上的一些小据点，然后全速向高原进发，途中所经地区“水流顺着赤裸的沙地流淌，村庄在白杨中若隐若现，几条曲径在岩石中间蜿蜒”。⁴⁵绕过有着荒凉盐滩的布尔杜尔湖，他离刻莱奈只有五天的路程了。这个城市位于迈安德河和马尔西亚斯河这两条河流的源头区。马尔西亚斯河发源于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穴，水流在岩石间奔腾激荡，直向平原的另一边流去。居鲁士曾经在这里有过一个行宫，还有一个满是野生动物的大园林。对于长途行军劳累的马其顿人来说，这景色必定令人心旷神怡：此地草木繁盛，郁郁葱葱，是贫瘠的安纳托利亚荒野中的一块绿洲。

不过，它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刻莱奈位于横穿高原的几条主要干道的交叉处，其中一条往南到达潘菲利亚，亦即亚历山大来时所走的路；另一条向西通往赫尔摩斯河和迈安德河河谷；还有一条朝北直抵戈尔狄昂。后两条路线构成了波斯皇家大道的一部分。薛西斯此前便是通过刻莱奈而前往萨尔狄斯的。亚历山大在继续前进之前，必须要确保拿下刻莱奈。这条南北尚有未征服部落的狭长“走廊”，将是他连接中东与伊奥尼亚唯一可靠的交通要道。

该城有一个地势高、防御强的卫城，对于这种卫城亚历山大不会愚蠢到想要去进攻它。他刚刚到达，城市的居民便放弃了地势低洼的城镇

，准备坚守这座城堡。国王派了一位传令官过去，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投降的话，就会以各种残忍手段进行报复。于是，他们带着传令官巡视了一遍防御工事，让他知道亚历山大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要对付的是什么。传令官带着消息回来，报告这个要塞坚不可摧，而且居民们准备战斗到底。亚历山大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只是将卫城封锁住，切断它与外界的联系，然后等待。十天的时间足以动摇防卫者的信心，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储备并不充足。

这时，他们便向亚历山大提议，如果在接下来两个月内大流士没有派遣任何援军过来，他们就自动投降。亚历山大接受了这一提议：时间很宝贵，而他并没有太多选择。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次危险的赌博。因此，他把他最好的将军之一、人称“独眼的”厄利密奥提斯的安提柯（Antigonus of Elimiotis）留在了刻莱奈；此人后来自己也成了国王。他给了安提柯1500人的部队，这是他所能抽出的所有力量，用以保卫交通线，同时任命他为中弗里吉亚总督（尽管事实上大流士的命官还在卫城上坚守着）。一个信使被派去帕美尼翁那里，再次确认在戈尔狄昂会合一事。然后，亚历山大自己也启程了，沿着皇家大道向北行进。⁴⁶

他和将士们平静无事地走了130英里，于公元前333年3月初到达了戈尔狄昂。在路途的最后部分，他们沿着桑伽里奥斯河而行，朝北绕过了已故多年的弗里吉亚国王的陵墓；在进入戈尔狄昂时，他们经过了那个巨大的亚述大门，该大门在弥达斯统治时就已经非常老旧了。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该城自愿投降了。在这里，他没过多久^④就和帕美尼翁的军队以及那些被送回国过寒假的部队会合了。他们很及时地给他带来了一支援军——3000名马其顿步兵、500名骑兵和150名来自厄利斯的自愿兵。但是，据返回的军官报告说，希腊和爱琴海的总体局势非常糟糕，远比他所担心的还要严重得多；同样，主导者又是亚历山大最危险的对手，诡计多端且难以捉摸的雇佣军首领，罗得岛的门农。

在他那卓越但最终徒劳的哈利卡那索斯防御战之后，门农被大流士

任命为小亚细亚所有波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现在，波斯大王批准他——迟做总比不做好——去实行他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之前提出的战略：把战火引向马其顿和希腊。波斯舰队（或者准确点说，腓尼基舰队）早已归他支配；此外，大流士还给他提供了一笔资金，足以招募一支职业雇佣军。这正是门农所做的事情——或许还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克勒安德洛斯在伯罗奔尼撒会遇到自愿兵不足的情况。

有了这么一支海陆兼备的军队，门农开始有系统地夺取爱琴海东部的岛屿：这是任何剑指希腊本土的远征的首要一步。科斯岛和萨摩斯岛已经向他投诚，不久基俄斯岛也步其后尘。他可能还夺回了米利都和普里厄涅；他迫切需要一个伊奥尼亚海岸的基地。他肯定没有遇到太强烈或太顽固的抵抗。亚历山大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很少讨希腊城邦的喜欢：鉴于门农本人也是个希腊人，许多城邦将其当作更加名副其实的解放者。其他城邦则可能觉得选择此占领军与选择彼占领军之间并无太大分别。当这位来自罗得岛的将军从基俄斯岛继续向北驶往累斯博斯岛时，他的代理人正在希腊忙着把波斯大王的黄金分派给潜在的支持者，并且向他们允诺，门农很快就会带着一支大军和一支300艘战船的舰队在优卑亚登陆。

这一前景确实很诱人。在雅典，军事上的准备工作正在日夜不停地进行中：现役可用的三层桨战船已有400艘之多。包括斯巴达在内，许多希腊城邦都已做好反叛的准备，只等门农一句话了。当门农通过一场血战拿下密提勒涅这一关键港口时，希腊人更是热情高涨。一听到这消息，基克拉迪群岛中几乎所有的岛屿都派出使节以示效忠。⁴⁷看起来，侵袭优卑亚和希腊本土的许诺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

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就面临着一个关键决断。如果继续前进，他很可能就会失去赫勒斯滂，甚至马其顿本身：希腊已经到了全面反叛的边缘。但是，如果回师救援，他远征波斯之使命的最终实现就变得遥遥无期。撇开心理上可能存在的有失颜面之感，无论大流士还是门农，他们

都不太可能错过这一喘息的机会。当门农让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的努力前功尽弃时，波斯大王就有时间来组建和训练一支真正强大的防御力量。更糟糕的是，马其顿仍旧处在濒临破产的危险边缘，而大流士那传说中的财富目前落入亚历山大手中的却少之又少。就在年轻的国王仍为这一问题苦苦思虑时，那个著名的戈尔狄昂之结的故事登场了。和许多面临两难之选择的人一样，亚历山大也准备把一切寄托于神的预兆：现在正是倾听来自天国的声音的时刻。

在戈尔狄昂的宙斯·巴西琉斯神庙边上，他找到了他一直在寻觅的东西。这是一辆古老的货车，据说是戈尔狄亚斯之子弥达斯在成为弗里吉亚国王时奉献的，当时作为受人崇敬的遗物仍旧放在卫城上。它有一个非常奇特之处：它的轭被绑在一根带有许多皮带的辕杆上，皮带上则附有山茱萸的树皮，然后打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节，水手们称之为花箍结。有一个古老的神谕曾预言说，任何能成功解开此结的人将会成为全亚洲之主。^⑤这种挑战正是亚历山大所无法抗拒的。实际上，不试图解开这个戈尔狄昂之结就离开戈尔狄昂是绝无可能的。敌人马上就会借机宣扬，说他对远征的最终结果信心不足。

所以，当他和侍从们一起走上卫城时，一大群弗里吉亚人和马其顿人也在后面跟着，驱使他们上去的远不止是随随便便的好奇心。气氛既紧张，又充满期待；国王的许多侍从都被他的盲目自信搞得紧张兮兮的，乍一看他们也不无道理。花箍结的一大特征就是它没有任何端头露在外面。亚历山大很努力地解这个错综复杂的绳结，但解了好久却一点进展也无。最后他放弃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失败将会是最有害的政治宣传，因此必须做点惊人之举。阿里斯托布罗斯说，亚历山大抽出了贯穿辕杆和轭的木栓，于是便解开了绳结。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事后追溯的文饰说法。根据其他的史料（从心理学上说，它们更符合亚历山大的性格），亚历山大一边高喊着“我是怎么解开的又有什么关系？”^⑥一边拔出剑来，朝着绳结一剑劈下，就这样把深藏在内部的端头暴露了

出来。

当晚又是雷鸣又是闪电，对此亚历山大及其占卜师都认为，这说明宙斯认可了国王的行为（当然，这同样可以解释为神明的愤怒）。⁴⁸不管怎样，现在亚历山大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将继续征战下去，无论代价如何。安福特洛斯已被任命为保卫赫勒斯滂的海军司令，而赫格罗科斯（Hegelochus）则指挥以阿拜多斯为基地的陆军。亚历山大给了他们500塔兰特的钱以从希腊盟友那里招募一支新的舰队（这纯粹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同时又给了安提帕特600塔兰特，用于偿付驻军费用和国内防御。诸如此类的权宜安排充分暴露了他膨胀的野心。现在，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在必要的时候，他连马其顿都准备牺牲掉。他从来都没把联军统帅的职位当回事，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临时的便宜安排，跟成为亚洲之主的前景相比，它显得无足轻重。此时此刻，他的祖国必定显得非常地渺小而遥远。

最新的情报证实，大流士仍在苏萨，但已经开始召集一支大军了。亚历山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在劈开戈尔狄昂之结后，他便立即率领军队再次上路（公元前333年5月）。在他们离开之前，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使团刚好从雅典赶来，他们请求国王释放那些在格拉尼科斯河一战中被俘、现在被拘留在马其顿的雅典囚犯。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亚历山大用一种阴沉的暧昧的口吻告诉使团，当局势变得更有利时，他们再来找他。⁴⁹

从戈尔狄昂出发，他朝东北行军，来到卡帕多基亚和帕夫拉戈尼亚交界的安库拉（安卡拉）。帕夫拉戈尼亚人派来一个使团，在向他表示归顺的同时，相应地要求他不要侵略他们的国家。此时亚历山大最不想要的就是在北方进行山地作战，因而欣然同意。他还免除了他们的贡赋（毕竟他们也没给波斯人交过）；但为了保全颜面，他告诉他们，现在他们应对新任的弗里吉亚总督卡拉斯负责。不过，这种例行公事双方谁也不会太当回事。他也接受了哈吕斯河以西整个卡帕多基亚和“对岸诸

多地区”的“投降”。在这儿，他甚至都没有强行建立一个马其顿政府，而只是任命了一个地方贵族萨比克塔斯（Sabictas）代他管理这一地区——这是此类做法的第一个有据可查的实例，往后他将越来越依赖这一做法。不过，在此（而且后面也经常如此）这种做法并不是很奏效。当地人对亚历山大的手段了然于胸：他们在觐见他时开了张愿意合作的空头支票，而他前脚一走，他们就开始在后头闹事。一年后，独眼的安提柯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不下三场大战，以保持亚历山大交通线的畅通。

在安库拉时，国王收到了一个让人欣喜若狂的消息：在围攻米利都之后不久，门农因病去世。门农是大流士在小亚细亚所拥有的唯一的一流将领，他从战场上消失对亚历山大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对希腊的入侵完全依赖这位罗得岛人的技艺和主动性。随着他的去世，整个计划大概也瞬间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即7月中旬），有消息传来说，大流士最终离开苏萨到达巴比伦，正忙着准备让帝国军队进入实战状态。不过，迄今亚历山大对波斯大王处理此类事务的悠然作风一直有着精准的认识，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改变自己最初的战略。⁵⁰从安库拉出发，他向南经奇里乞亚关到达塔尔索斯，由此沿着海岸取道提尔和西顿到达埃及。只有当东地中海的所有主要港口都在他手中，并且腓尼基舰队就此不再构成直接的威胁时，他才打算与大流士一决胜负。

门农死后，他的远征军的指挥权落到了两位波斯贵族手中：他的外甥法尔那巴佐斯（Pharnabazus）和奥托弗拉达特斯（Autophradates）。他们首先在密提勒涅驻扎了2000名雇佣兵，并对公民征收重税以偿付军费。接着，这两位指挥官分头行动。奥托弗拉达特斯继续在爱琴海诸岛征战，而法尔那巴佐斯则率领一支强大的雇佣军由海路来到吕西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夺回亚历山大所征服的沿海地区。但是，这一看上去大有可为的战略很快就被大流士叫停了，和亚历山大一样，他知道没有门农本人的直接运作，这一侵略计划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因此，他召开了一次秘密的议事会，把问题摆了出来。他是应该继续尝试把战争引向欧洲？还是和马其顿军队硬碰硬地一决雌雄？

波斯大臣们的总体意见是，大流士应当和亚历山大进行决战。他们还强调，如果他能亲自率军出战，那必能鼓舞全军的士气。这种观点受到了雅典将军卡里德摩斯的反对，他的反对十分有力但却不够得体。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让大流士把王位孤注一掷实在是太过愚蠢。波斯大王应当留在苏萨，从全局掌控战争进程，而让专业的将军去对付亚历山大。当被问到需要多少人投入战斗时，卡里德摩斯提出需100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希腊雇佣兵。他还明显地表示，他非常乐意亲自担任最高指挥官。这简直就是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前的门农；看起来没有一个希腊人能忍住不提对波斯士兵战斗能力的蔑视，哪怕在会议上表达一个观点时也不能。

可以想见，大流士的大臣们对这种侮辱的反应极为激烈。他们含沙射影地说道，卡里德摩斯只是想得到指挥权，以便更容易把军队出卖给马其顿人。这时，卡里德摩斯非常要命地大发脾气：作为雇佣兵，他比其他人更容易受此类臆测的攻击。于是，会议变成了一场口水仗。他对伊朗人怯懦和无能的指摘也激怒了（精通希腊语的）大流士，以致大流士“按照波斯人的习俗抓住他的腰带”，并下令立即处死他。当他被人拖出去时，卡里德摩斯大声叫道，大流士将会为这不公正的处罚付出失去王位和王国的代价。

大流士的怒火一平息，他就幡然悔悟，不该处死他现有的最优秀的将军，然后下令为卡里德摩斯举行一个特别的葬礼。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谁来代替门农这个问题。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结果，入侵欧洲的方案被正式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与亚历山大的正面对抗：可以说，这一决定改变了整场战争的结局。法尔那巴佐斯被正式批准为门农的继任者；但这一荣誉却成了一个空衔，因为同时大流士又把他所有的雇佣兵都召了回去，他自己迫切需要用他们来加强波斯的步兵阵线。法尔那巴佐斯尽心尽力地去干这项苦差事，他带着缩了水的部队去和奥托弗拉达特斯会合，然后一块继续他们的海上作战。达塔迈斯（

Datames）率领10艘三层桨战船去袭击基克拉迪群岛，其余的则向北行驶，占领了特奈多斯。马其顿人依旧组建不出一支差强人意的舰队，因而他们也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安提帕特的一个海上巡逻队成功地在西弗诺斯岛附近粉碎了达塔迈斯的海军分队；但是，这种小成就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现在波斯人实际上控制着整个爱琴海。⁵¹

当大流士在巴比伦等待援军的到来时，亚历山大顶着8月的炎炎夏日，越过卡帕多基亚磐石交错的火山台地，全力向南推进。其中约有75英里的行程，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水源和补给：和另一类类似的、路程相近的行程一样，亚历山大率领军队进行强行军，一路上只带了野战口粮和最低限度的饮水。横亘在他们与海滨平原之间的是托罗斯山这座巨大的屏障。唯一的通道是一条幽深而蜿蜒的峡谷，峡谷两边的峭壁可谓遮天蔽日。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位故去已久的国王曾派工程师沿着峡谷开凿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此人们便不用再绕大弯了。这条幽森的隘道就叫作奇里乞亚关。在人们炸开一条现代公路之前，峡谷几乎没有可以容纳两匹负重骆驼并排而行的空间。只需一个团的兵力，就可以在弓箭手箭矢的配合下，方便地利用落山的滚石来抵挡住一支大军。这条隘道中间还穿越了好几处沟壑和山间河流。

亚历山大自然预料到了在此关将要遇到的麻烦，但也没有其他可行的路线。不曾想，奇里乞亚的波斯总督阿萨迈斯（Arsames）竟给他省去了许多麻烦。阿萨迈斯是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指挥官之一，当门农提出焦土政策时他也在场。拒绝该政策所带来的灾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阿萨迈斯只不过是一个常见现象的突出例子而已，亦即一个二流指挥官得到了一个点子，然后就固执到底。不幸的是，这个点在格拉尼科斯河那里会是一个绝妙的战略，而在奇里乞亚却完全是个灾难。

奇里乞亚关给他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防线。如果他压上所有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地扼守这条通道，那亚历山大将别无选择，只能撤退。然而相反，阿萨迈斯一心想要照搬门农的策略，避免发生正面对抗，他

只留下少量部队据守奇里乞亚关，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夷毁身后的奇里乞亚平原。这根本无法激发他前锋卫队的英雄气概，不可能让他们像温泉关的列奥尼达斯那样血战到底。实际上，这些战士很快就开始怀疑阿萨迈斯有意要抛弃他们；所以，当亚历山大对他们的据点发动夜袭时，他们立马逃之夭夭。到黎明时分，色雷斯人打头去清剿可能存在的埋伏，而弓箭手则爬上山脊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接着，全体马其顿军队沿着奇里乞亚关行进，四人一排，就这样一直走到平原上。后来，亚历山大自己曾说，在他的整个征战生涯当中从未有过如此不可思议的好运。

现在，他得到消息，阿萨迈斯正在撤空塔尔索斯。按照既定政策，这位总督打算带走该城的财宝，然后将城市付之一炬。亚历山大立即派帕美尼翁率领骑兵和轻装部队先行赶过去。听说他即将杀到，阿萨迈斯赶忙逃走，而把城市和财宝都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大流士此时已经从巴比伦启程上路，于是这位总督便往东跑去和他会合。⁵²

公元前333年9月3日，在经过托罗斯山下的急行军后，汗流浹背且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终于进入了塔尔索斯。夏末的奇里乞亚平原，在四面群山的环绕下，几乎就是一个烤人的火炉。穿城而过的是一条名叫居得诺斯河（塔尔索斯河）的河流，水流清澈而湍急，同时还带着高山积雪融化时的冰凉。当亚历山大来到河边时，这位年轻的国王从马上下来，脱掉衣服，一头扎进了河里。瞬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抽筋，旁观者以为他出现了痉挛。他的侍从立即跳到水中把他捞上来，此时他已经是半昏迷状态，面如死灰，身体冰凉。在洗澡之前，他似乎就已经得了某种支气管感染，而现在病情进一步恶化成了急性肺炎。

接连几天他都卧床不起，持续高烧。他的医生对他康复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他们甚至拒绝治疗，以免被人指控为失职或者——更恶劣点——谋杀。（他们的担心自有道理：波斯大王正公开悬赏，他愿意给予任何杀死亚历山大的人1000塔兰特的奖赏。）只有一个医生，即阿卡纳

尼亚的腓力（Philip of Acarnania）愿意为他治疗。这是亚历山大自幼便认识的心腹御医。腓力说，他有一些速效药，但它们也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国王一心惦念着大流士的到来，没有表示反对。他自己在药理学方面也颇有造诣，知道腓力的药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在药剂配制好后，帕美尼翁送来一份便笺——和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一事的情况一样，这种关切古怪而暧昧——警告说腓力已经被波斯大王收买：他所配的泻药乃剧毒之物。

亚历山大把便笺递给腓力，然后拿起药来，在腓力还没读完时便一饮而尽。这个医生相当镇定，只是说了一句如果亚历山大遵从医嘱，他自然会康复。但是，当时的情况让人心惊肉跳。泻药马上产生了剧烈的效果：国王的声​​音越发虚弱，开始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不久便陷入了半昏迷状态。腓力不断给他按摩，同时还使用了一系列的热敷药剂。最终，亚历山大的强壮体质把他从生命危险中拉了回来，剩下的就只等药力发挥余效了。他的高烧很快就退了，三天后亚历山大便恢复良好，足以下床站到焦急的将士面前。人们不禁好奇，要是他听从了那位老师的警告，后果会是怎样——无论对他还是对帕美尼翁。⁵³

不管怎样，帕美尼翁在国王康复期间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亚历山大派他率同盟步兵、希腊雇佣兵和色雷斯与塞萨利骑兵去监视大流士的动向，同时封锁各个山口。帕美尼翁横扫亚历山德勒塔湾，占领了伊索斯这个港口小城镇，以此作为前进的基地。这里有且仅有两个山口是大流士可以率军通过从而进入奇里乞亚的。帕美尼翁开始侦察这两个山口。首先，他沿着海岸向南推进，其左侧便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他渡过了两条河流——即德利河和巴耶斯河，占领了今天称为约拿之柱的狭窄隘道。大约再往前15英里便是叙利亚关（拜兰山口），穿过关口有一条大道沿着奥伦特斯河谷通往幼发拉底河上的塔普萨科斯。到达关口时，帕美尼翁听说大流士借助浮桥已经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现在正往海岸方向行进。一得到这消息，他就留下一支侦察分队来看守叙利亚关，并让主力部队驻扎在约拿之柱，然后赶忙朝北折回，扼守波斯大王的另一个

入口。这个入口便是巴塞山口，在古代也叫阿马尼克关；该山口横跨塔尔索斯城正东的山脉，如今铺设了一条铁路连接卡尼亚和阿勒颇。^⑦和在叙利亚关一样，他在此清剿了敌人的一些哨所，然后设立了自己的哨所：可能就在卡斯塔巴拉，紧挨着山口的入口处。

亚历山大从帕美尼翁的报告中得知，局势并不像他所担心的那样紧急，便又花了一两周的时间在塔尔索斯休养。即便如此，他也绝没有闲着。他接管了一个大型铸币厂，第一次铸造自己的钱币，这是意义极为重大的新举措。在翻越托罗斯山之前，他仍可以一直宣称要“解放希腊人”。但是，自奇里乞亚开始他就变成了一个征服者。如果他想要叙利亚人或腓尼基人承认他的领主权，他就得树立起和波斯大王本人所行使的相类似的权威。颁布新铸币便是这一过程中非常明显的一步。⁵⁴旧币被召回并回炉重铸，然后再打上亚历山大的名字和标志：在塔尔索斯开始的事情很快就为塞浦路斯的铸币厂所效仿，之后则是所有沿腓尼基海岸的铸币厂。一些旧式钱币继续和新币一同流通，但亚历山大无疑已经实现他的主要目的——使自己“被承认为所有新领土的主人”。由此，他还得到了一个方便支付军饷的财政中心。

也就在这时，他的财政官和军需官哈尔帕罗斯据说叛变了，不过证据⁵⁵非常含糊不清。事实上，哈尔帕罗斯可能是接受了一项观察希腊政治局势的秘密任务，叛变只是他掩人耳目的说辞。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被一个名叫陶里斯科斯（Tauriscus）的“奸人”说服，离开了亚历山大。两人一块逃到了希腊，但之后就分道扬镳了；哈尔帕罗斯留在了麦加拉，而陶里斯科斯则继续前往南意大利，在那里他加入了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所率领的远征军，^⑧后来就被杀掉了。整个事情一直隐藏在迷雾和政治宣传之中。不论哈尔帕罗斯在希腊做了些什么，都不妨碍他后来官复原职：他是亚历山大的随从当中最神秘莫测的一个，往后我们还会再次碰到他。

来自帕美尼翁的消息表明，现在至少还有时间可以稍微展现一下对

奇里乞亚的“征服”。亚历山大首先去了安奇亚罗斯，这座城位于塔尔索斯以西，约有一天的路程。在此，有人向他展示了据传是萨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us，即亚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之墓，上面有一块浮雕，刻绘着巴尼拔王正捻自己的手指。下方则是一块铭文，上面写道（或者说，导游是这么告诉他的）：“萨达那帕罗斯.....在一天之内建造了塔尔索斯和安奇亚罗斯。吃吧，喝吧，纵欲吧！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些欢乐呢！”国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亚里士多德，后者说这篇墓志铭倒不妨写在一头公牛的墓上。⁵⁶从安奇亚罗斯出发，亚历山大行进到了索利附近，这里居民着实不愿乖乖就范。结果，他们被迫接受一支驻军，并因其“亲波斯的态度”而被课以200塔兰特的罚款。国王不得不花一周的时间来对付附近山上的奇里乞亚游击队，这些事情不大可能让他心情变好。⁵⁷但是，当他回到索利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消息。托勒密、阿桑德洛斯和阿达女王最终在哈利卡那索斯打败了奥隆托巴特斯，重新占领了科斯岛，现在整个卡里亚海岸都在马其顿的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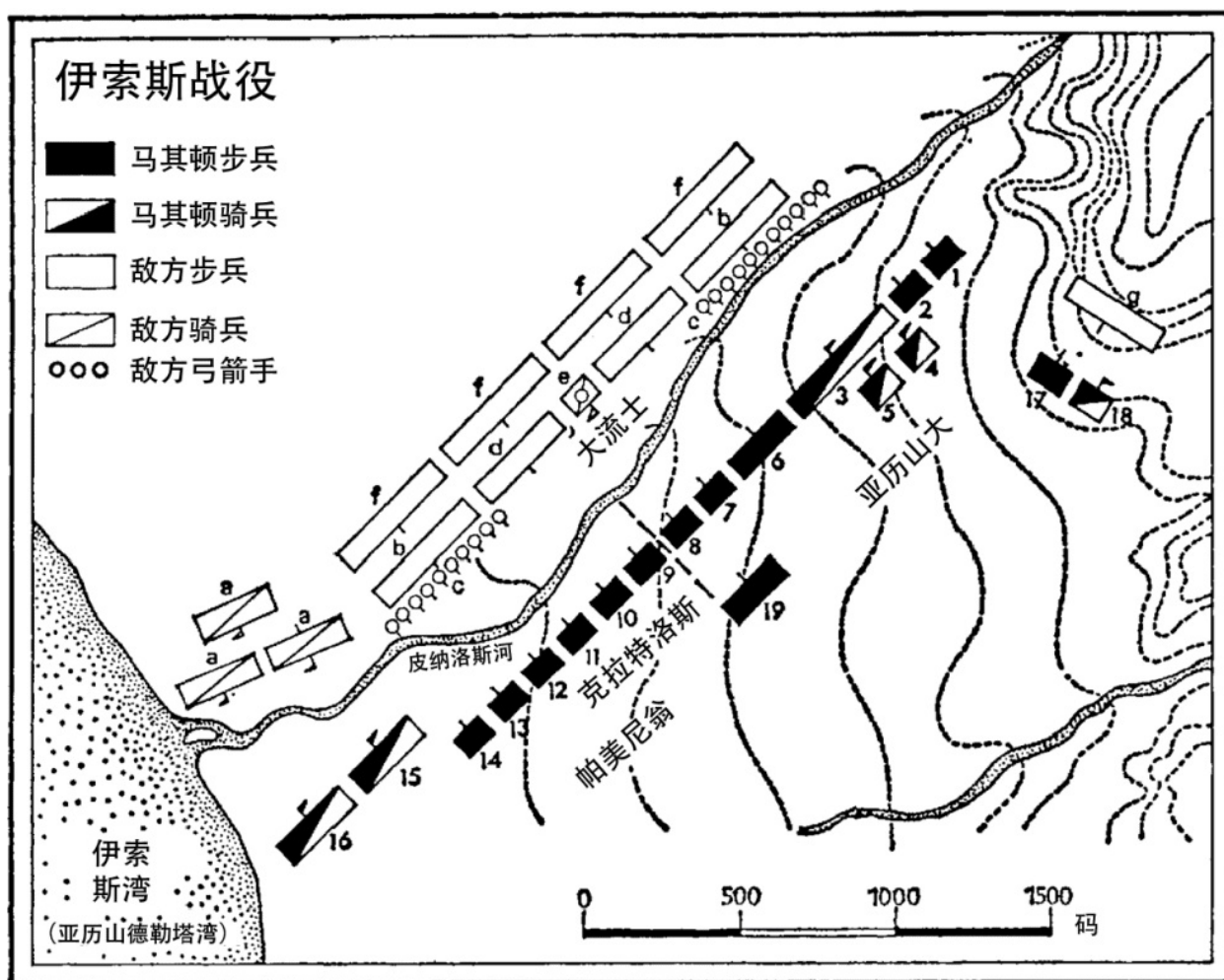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对西方事务的关切要比他所愿意承认的更多，和往常一样，他在官方庆典中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解脱感。（他要是知道在一两个月内米利都、哈利卡那索斯和多数岛屿将再次被波斯人夺去，他的狂热或许会有所减弱。）丰盛的祭品被献祭给了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作为对国王康复的感谢。此外，还有公共竞赛、接力跑、火炬游行以及文学比赛，等等。在庆典结束后，亚历山大从索利回到了塔尔索斯。菲罗塔斯和骑兵被派了出去，他们一直走到了亚历山德勒塔湾西面的皮拉摩斯河。国王本人则统率着皇家卫队和步兵。他似乎很用心地去争取沿途的奇里乞亚城镇的支持，不过这并没有明显地耽搁他的行程。

在卡斯塔巴拉，帕美尼翁带着最新消息前来觐见。大流士已在索契扎营，其位置就在叙利亚关（拜兰山口）以东的开阔平原的某处。他好像准备呆在那里：当地的地形非常适合大规模的骑兵机动。他的到来对当地城市的影响很大，许多城市又转变成了亲波斯的立场。帕美尼翁催

促亚历山大率领大军到伊索斯去，在那里等候大流士。在山海之间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马其顿人不会有被侧翼包抄的危险。讲述此事的库尔提乌斯没有提及另一明显的理由，而这一理由必定是帕美尼翁心中最关切的：在伊索斯，不管大流士选择通过哪个山口，亚历山大都可以抢先到达那里。不过，亚历山大似乎确信，大流士若要继续前进必会经过叙利亚关。或许波斯人故意“泄露”了错误的消息，而亚历山大情报部门拾获了此消息，并信以为真。

不管怎样，国王并没有在伊索斯等候。他把病号和伤员留在那里——这说明他认为此地安全，不会遭受攻击；同时他率领其他部队经由约拿之柱急行到了密里安德罗斯。他在此地亦即山口的对面安营扎寨，等候着根本不会到来的敌人。⁵⁸很明显，这正是大流士一直希望他走的一步。波斯大王已派人把辎重部队、所有的非战斗人员以及他的多数财宝护送到了大马士革，从而使他的军队更轻简机动。当亚历山大被一场雷暴耽搁在密里安德罗斯时（这个理由实在是太牵强了：马其顿军队后来完全可以在印度雨季的大雨中连续行军），大流士启程北上，闪电般地直奔阿马尼克关。^⑨

大流士通过了山口，没被发现也无人阻挡，随后从卡斯塔巴拉突袭伊索斯，在那儿俘虏了亚历山大的多数伤员。波斯人砍掉了这些人的手，并用沥青烧灼，押着他们绕着波斯军队游行；最后把人释放，让他们把所见报告给亚历山大（在希波战争期间，薛西斯也曾对在他营地中抓获的一群希腊间谍做过相同的事情）。从伊索斯出发，波斯大王一直行进到了皮那洛斯河——可能就是巴耶斯河而不是德利河⁵⁹——然后在其北岸抢占防御阵地。现在，大流士处于亚历山大的后方，正好切断了他的交通线，亚历山大将被迫回身接战。



马其顿军队

1阿格里安人

2马其顿弓箭手

3侍友骑兵

4派奥尼亚轻骑兵

5枪骑兵

6翊卫队

7科伊诺斯所辖方阵

8佩狄卡斯所辖方阵

9克拉特洛斯所辖方阵

10墨勒阿格所辖方阵

11托勒密所辖方阵

12阿敏塔斯所辖方阵

13克里特弓箭手

14色雷斯标枪兵

15塞萨利骑兵

波斯军队

a 纳巴尔扎涅斯所辖骑兵

b 卡尔达凯斯

c 弓箭手

d 希腊雇佣兵

e 大流士及其卫队

f 亚洲兵

g 分遣队

- 16希腊同盟骑兵
- 17阿里里安分队
- 18轻骑兵中队
- 19希腊雇佣兵

亚历山大掉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陷阱之中。其南边的腓尼基城市可能抱有敌意。如果他通过叙利亚关撤退，沿着大流士走过的路线向北行进，波斯大王就能及时地预知他的到来，并通过封锁巴塞山口来挡住他。届时只能背水一战，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战斗。对波斯人来说，打成平手就是胜利。正如塔恩所说，他们只要“守住阵线，亚历山大的事业将就此终结”。在策略上，亚历山大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要么正面进攻，要么彻底放弃。他必须将大流士的军队彻底击败，而且越快越好。他的马其顿军队在两天之内行军不下70英里，在这次马拉松式行军的末尾，一场暴雨冲毁了他们的帐篷。士兵们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筋疲力尽，怨声载道。不过，亚历山大那超凡的乐观精神竟有十足的感染力，这在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演讲的末尾，他提及了色诺芬和万人长征队，士兵们听罢都热烈地欢呼。

现在已是午后，亚历山大（他比拿破仑知道得更早，军队只有填饱肚子才能行军）确保士兵们吃了一顿饱饭。然后，他派了一支骑兵和弓骑兵小队外出侦察。当夜幕降临时，他统率全军行进到约拿山口；到了半夜，他在能够俯瞰该山口的高地上建立了一个指挥所，从那里可以看到大流士的营火遍布整个平原，在黑夜中闪烁。当军队抓紧时间休息几个小时时，亚历山大自己却爬到山顶，借着火炬的亮光向本地的守护神献祭。如果说亚历山大有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那就是次日早晨了。在离开密里安德罗斯之前，他还把一辆四马战车驱入海里，作为祭品献给波塞冬——这或许是希望不要遭到大流士的腓尼基舰队的突然袭击。⁶⁰

黎明时分，马其顿军队开始下山前往伊索斯。亚历山大走了3英里方才离开约拿山口，之后他还得再走9英里才能到达皮那洛斯河。山脉

的走势很不规则，有各种各样的尖坡和山脊。不过，平原却越走越开阔，像一个狭长的等腰三角形一样。等到马其顿军队走到离河流约有1000码的距离时，其正面有3英里之宽可供军队机动。即使方阵被赶到了这个楔形的顶角，也至少不会被人侧翼包抄。亚历山大率军开始是以纵队形式行进；随着地形逐渐开阔，他便以营为单位将步兵部署成一条阵线，一边使左翼紧挨着海岸（帕美尼翁接到严令，不得远离大海），一边把右翼一直延长到山脚下。

布置完毕常规步兵团后，亚历山大开始在其中安置他的骑兵分队。他把包括塞萨利骑兵在内的大部分骑兵都集中到了右翼——这次帕美尼翁不得不跟希腊盟友们共事了——因为他最初认为这个位置将是波斯主要的进攻点。侦察兵来报，敌人的部队正往山上集结；在亚历山大看来，这些调动都是大迂回运动的一部分，意在袭击他的右翼和后方。但很难确定这就是波斯心中所想的，因为他很狡猾地派了一大群骑兵和轻装部队过河，以掩饰他的真实意图。

和以往一样，波斯人的最大弱点在于步兵。波斯的亚洲征召兵在马其顿方阵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因而他自觉地把他们合到一处，放在后方留作预备队和营地卫兵。于是，组建正面战线（参见第225页的平面图）就成了问题。在正中间的位置他安排了皇家卫队，这是一支由2000多名伊朗人组成的劲旅，这些人的枪杆上还饰有金温梲。而他本人则按传统惯例，呆在巨大且装饰豪华的战车里，紧跟着皇家卫队。皇家卫队两侧是波斯极为倚赖的希腊雇佣兵：根据我们的史料，他们有30000人，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数目有所夸大。最后，处在两翼的是两队轻装的波斯步兵，即所谓的“卡尔达凯斯”（Cardaces）：这是一些伊朗年轻人，正在接受或者刚刚完成军事训练。^⑩ 为做进一步的防备，他在河岸较低且危险的地方都建造了尖头木栅（在潮湿且不稳的砾石滩上安置这些栅栏一定非常困难）。

当波斯把所有步兵都摆成战斗队形时已到下午，此时马其顿人越

来越近，近得让人有点不安。这并不是说亚历山大已经急不可耐，他率领部队以一种非常从容的步伐缓缓前进，还会不时停下来整理衣着，同时观察一下敌人的动向。大流士的意图依旧不明。接着，原先一直充当屏障的波斯骑兵突然得到号令，转身渡过河流，被调到战斗阵形的最后一列去了。这时，大流士的意图变得非常明显了，亚历山大不得不紧急重整己方阵线，因为波斯大王没有把伊朗骑兵集中起来对付亚历山大的右翼，而把他所有最好的骑兵都部署到了海边，用来对付帕美尼翁。

亚历山大立即命令塞萨利骑兵作为增援力量回到左翼，而且要求他们在方阵后面行动，这样敌人不会注意到他们的调动。这时有消息传来，爬到山脊的波斯军队占据了山上一个突出的尖坡，实际上就位于马其顿右翼的后面。亚历山大派了一支混合的轻装部队去对付他们，不过他（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仍然更担心敌人的正面包抄行动。他把骑兵巡逻队派了出去，并从中军调了两个分队以加强右翼力量。然而，山上的波斯人无心战斗，一次快速突击便马上将其击溃。亚历山大留下300名骑兵监视他们的动向，但把弓箭手和阿格里安人召回来，作为侧翼的额外保护力量。

这样，马其顿军队展开了一个3英里宽的阵形，以稳定的步伐继续前进。亚历山大在阵线上来回跑动，迅速地用他富有个性的手势压一压急躁的部队，担心他们在接战时会喘不过气来。几乎就在一箭之遥的距离内，他又停了下来，期待着波斯人会发起冲锋。但是对方并没有。亚历山大身边的参谋人员在窃窃私语，说波斯大王毫无志气。事实上，大流士占据着极好的防御阵地，他当然不想轻易地放弃掉。这时候，亚历山大觉得再拖延下去毫无意义。现在已经将近傍晚，在做了最后一遍巡视后，他再次率领军队前进，起初步伐缓慢，队形密集，直到他们进入波斯弓箭手的射程之内。弓箭手们大规模齐射，“箭矢之密足以使它们在空中彼此碰撞”。随后号角声响起，亚历山大一马当先，渡过河流发起冲锋，冲散了大流士的弓箭手，把他们赶回到轻装的波斯步兵当中去。这次漂亮进攻非常成功：在一开始的极短时间内便赢得了右翼的战斗

。

不过，他们的中军可就没这么顺利了。中军的方阵在过河时遇到了大麻烦。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陡峭的河堤，有些地方甚至高达5英尺，而且长满了荆棘——更不用说还有波斯人的尖头木栅。马其顿步兵很快就陷入了血腥的肉搏战当中，他们的对手是同样坚韧、同样专业的希腊雇佣兵，在此他们已不仅仅是在为报酬而战。好长一会儿双方谁也没法前进一步。接着，亚历山大的鲁莽冲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方阵的右翼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缺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雇佣兵的前锋深深插入马其顿的阵线：在随之而来的殊死搏斗中，塞琉古之子托勒密和大约120名马其顿军官牺牲。

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已经包剿了波斯人的左翼，现在他调转骑兵方向，杀入雇佣兵和皇家卫队的后方队列。如果说波斯人在格拉尼科斯河一战中力图杀死亚历山大，那么现在亚历山大更是拼尽全力想要杀死或俘虏大流士。波斯大王是未来任何涉及帝国所有行省的抵抗行动所瞩目的最好的——或许还是唯一的——焦点。失去他，将对波斯的事业造成重创。再者，他的广大臣民并不关心是谁在统治他们，只要自己的地方利益不受触动就行了。⁶¹谁若推翻了大流士，谁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他的后继者并得到普遍的认可。

一旦确定了波斯大王的战车的位置，亚历山大就径直朝那里冲锋，而那天每个马其顿战士也有着同样的抱负。不过，波斯人的防守同样非常英勇：大流士肯定知道如何赢得伊朗贵族的忠诚。他的兄弟奥克萨特雷斯（Oxathres）率领皇家禁卫骑兵拼死保护他。垂死的士兵和马匹堆叠在一起，混乱不堪。亚历山大的大腿受了伤，据说是大流士本人击中的。倘若果真如此，那说明他差点就实现了他的目标。^⑪大流士战车的马匹遍体鳞伤，加之受到倒在它们边上的尸体的惊吓，蹿了起来，后腿直立，几乎要发起狂来。有那么一会儿，情况危险到它们差点儿带着波斯大王直接冲到亚历山大的阵线中去。在这危急关头，大流士顾不得皇

家礼仪，亲手抓紧了缰绳。波斯人找来了另一辆更轻便些的战车。大流士眼见自己将有被俘的迫切危险，于是爬上第二辆战车，逃离了战场。

在大流士逃跑的时候，亚历山大从方阵那里收到紧急求救，他们此刻还困在河岸下，情况十分危急。左翼那边也好不到哪去，帕美尼翁的塞萨利骑兵正与纳巴尔扎涅斯（Nabarzanes）指挥的波斯重骑兵艰难搏斗，仅仅勉强守住了本方的阵线。由于中军和左翼都如此危险，亚历山大别无选择，只能暂停追击波斯大王。他一定会因失望而愤怒；不过，他也立即行动起来，极为有效。亚历山大率领整个右翼部队进攻雇佣兵的侧翼，对方惨重伤亡，被迫离开河岸。纳巴尔扎涅斯的骑兵看到中军已被击溃，并且听说大王已经逃走，也调转马头，跟着波斯大王一起逃跑。撤退很快就变成了溃败。

随之而来的是不可言状的混乱。纳巴尔扎涅斯的骑兵为自己笨重的鳞甲所累，而塞萨利骑兵则紧追不舍。没怎么参与战斗的波斯步兵，为保性命逃向山中的安全地带。许多步兵被自己的骑兵践踏，而骑兵又受到后方追击的压迫，当他们接近隘道时全都挤在了一起，于是成了亚历山大弓箭手的活靶子。后来托勒密说，他和他的骑兵分队是踏着成堆的尸体跨过深水河道的。

亚历山大一看到方阵和塞萨利骑兵脱离危险，便立马和侍友们动身去追击大流士。但是，各方面条件都不利于他们。现在已是11月的下午5点多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波斯大王逃走时原本就离他们不下半英里。更糟的是，他所走的路线——可能是通往德尔特约尔和哈萨的山路——这时挤满了波斯帝国军队的残兵败将。⁶²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追击了约25英里之远。黑夜完全降临时，亚历山大才不得不放弃，调头回来。不过，他并没有空手而回。大流士抛下战车，脱掉御用披风和所有会被认出来的标记，自己骑着马翻过山岭逃走了。这些东西连同他的盾牌和弓都被亚历山大找到并留作战利品。

与此同时，马其顿军队占领了大流士的大本营，他们发现自己进入

了劫掠者的天堂。每个帐篷都塞满了金器银器、饰有宝石的剑、有嵌花装饰的家具和无价的挂毯。尽管主要的辎重和财宝已被送到了大马士革，获胜一方还是抢到了不下3000塔兰特黄金的巨额战利品。波斯宫廷的贵妇根据习俗陪同大流士出征，而现在却被抢走了贵重物品，还遭到亚历山大军队的残酷虐待。只有波斯大王的御帐以及他的近亲家属不受冒犯，而且得到了严密的保护。根据征服者的权利，现在这些都归亚历山大本人所有。

大约午夜时分，灰头土脸的亚历山大拖着极速奔驰过后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营地。他洗浴了一番（在波斯大王的浴盆里），换上了新衣服（波斯大王的某件皇袍，对他来说必定显得太大），然后走进大流士的大御帐中，里面可谓灯火通明。桌子上放着一个御用金盘，人们正在忙着准备庆祝晚宴。躺到奢华的躺椅上，亚历山大他转身面对他的晚宴同伴，以他诸多名言中惯有的模棱两可的反讽语气说道：“看起来，似乎做国王的滋味就是这样的咯。”

正当他舒服地坐下准备就餐时，附近的营帐里却传来哭泣和哀悼之声。亚历山大派了一个侍从去查看吵闹声是怎么回事。原来，波斯宫廷的一个宦官看到波斯大王的战车和皇家仪仗，于是妄下结论说大王已经死了；此刻，大流士的母亲、妻子和子女正为他哀恸。亚历山大赶忙去澄清这不幸的误解。他一开始是想让密特里涅斯去走一遭，因为这是个波斯人。不过有人提醒他，叛徒（密特里涅斯以萨尔狄斯城投降，现正与马其顿人勾结在一起）的出现可能会使那些妇人更加难受。于是，他便改派近身护卫官列昂那托斯前往，此人同时也是他的密友。

当列昂那托斯及其侍卫来到王太后的营帐门前时，王太后的侍从尖叫着跑了进去。她们想当然以为，所有被俘妇女就要被处决了，而来人就是行刑队。列昂那托斯有点尴尬地走了进去，大流士的妻子和母亲立即扑倒在他脚下，请求让她们在临死前先把君王的遗体安葬。列昂那托斯通过翻译官之口告诉她们不要害怕，大流士没有死，而且亚历山大不

是出于个人的敌意而反对他，他是在“为亚洲的统治权而合法地战斗”。她们将保留所有与其皇室身份相称的头衔、礼仪和标志，并且还会得到与她们从大流士那里得到的一样多的津贴。正如塔恩所注意的，“后来的作家们不厌其烦地渲染亚历山大是如何对待这些妇人的，对他所作所为的赞美恰恰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人们对他所做之事的期待。”⁶³

另一方面，这种宽宏大量不太可能完全是出于利他的动机。亚历山大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波斯习俗和宗教的知识。他想必知道，在阿契美尼德王室中，王位继承权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母系方面来建立⁶⁴——这就是在波斯的宫廷政治中王太后会有如此大权力的原因之一。因而，毫不奇怪他会对大流士的家人这么好：当时机一到，她们就是他将自身篡夺者身份合法化的唯一机会。他对她们的怜悯既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充满政治意味的。当他经过长途奔袭回到营地后，他对一个侍友说道：“走，我们去大流士的浴盆里清洗战斗的汗污”——别人却提醒他，浴盆现在不属于大流士，而是他的了。不用说，相同的道理自然更加适用于这些极为宝贵的人质。

伊索斯之战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还不是真正的决战。这场胜利使亚历山大摆脱了极度危险的处境。它带来了丰厚的战利品，而且宣传意义极大。不过，有超过10000名雇佣兵有序地逃脱了，他们将构成另一支波斯军队中的希腊人部分的核心；巴克特里亚等东方行省也尚未触及；而最重要的是，只要大流士还没被擒获，战争就不可能结束。

① 原文如此，但帕美尼翁的女婿是科伊诺斯。

② 原文如此，疑为帕美尼翁。

③ 亚历山大的交通线有多么不稳当，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事实看出：安福特洛斯及其队伍必须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穿行内陆地区，还得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以免被人认出（Arrian 1.25.9）。——原注

- ④ 时间在4月底。参见缪里森的研究（Murison, *Historia* 21（1972），404），作者是根据季节的天气状况推算出来的。——原注
- ⑤ 在此背景下，有两个与货车最初之奉献相关的传说特别有趣，二者都是从弗里吉亚人那里流传下来的。第一个是这么说的。很久以前，在一次国内的斗争中，神谕曾预言会有一个驾着货车的人来结束弗里吉亚人的不和，并从此统治他们。弥达斯——一个贫穷的农民，他在民众集会争论这个神谕时驾着牛车过来，于是就成了国王。而根据第二个故事，弗里吉亚人最初居住在马其顿的边境上——其实就是弥达斯花园，该花园以他们的国王的名字命名。后来，他们移民小亚细亚，在戈尔狄昂附近定居了下来。这意味着他们成功征服了土著居民，而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在米扎做学生时必定已经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听说过了。当弥达斯把他的货车奉献给宙斯时，其实就是回报他得以统治弗里吉亚一事（大概也象征着他与其人民四处漂泊的游牧生活的结束）。——原注
- ⑥ 也可以这么认为——毫无疑问这正是亚历山大所理解的：神谕的措辞是很模糊的，因为希腊语中的“*luein*”不仅指“解开，松开”，也指“分解，打破，分解”。不管怎样，他用剑劈开就是一种正确的象征手法，因为如果要成为亚洲之主，他只能依靠武力。——原注
- ⑦ 另一可能的地点是稍稍偏南的哈桑贝利山口，那里现在铺设了一条主干公路：参见前引缪里森（Murison）著作第408页。由此出发，有一个稍小一些的卡勒科伊山口可以通往伊索斯平原。——原注
- ⑧ 亚历山大受塔伦敦之邀前往直意大利；他带着15条船和众多的马匹渡过海峡，而留下克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作为摄政。在公元前331年之前，他一直征战顺利（有证据表明他的冒险得到了他妻舅的同意，如果不说积极支持的话），但最后却死在了战场上。据说他曾评论道，他在意大利遇到的都是男人，而亚历山大在亚洲打的都是女人。——原注
- ⑨ 据说，由马其顿叛徒阿敏塔斯统领的希腊雇佣兵曾劝他留在平原作战，在那里他将具有人数上的优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大流士的大军（据某些史料说有六十万之多）纯属虚构，是马其顿宣传人员编造出来的。在伊索斯，他所指挥的军队不会比亚历山大的多多少，甚至可能还没那么多，因为他行动过于匆忙，都来不及等待边远行省的军队到来。不管怎样，即使专业人士也不得不佩服波斯大王的策略。参看 Arrian 2.7.1；QC 3.8.11-13；Plut. *Alex.*20.1-3。缪里森（前引著作第400—403页）很欣赏大流士那受人低估的战略天分，不过他对此事的叙述在一些重要方面与本文有所不同。——原注
- ⑩ 把卡尔达凯斯部署在前线是一种新的尝试，不过也仅此一次。至于战前他多大程度上信赖这些人的战斗勇气，可以从他安排在他们前方及两侧的强大弓箭兵中做些推测。参见塔恩的论述（Tarn, vol. II, pp. 180-82）。据说大流士的雇佣兵有30000人，而卡尔达凯斯更是多达60000人；这一数字遭到了波利比奥斯的批

判（Polybius, 12.18），他认为狭窄的海岸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士兵。这一反对意见对于许多现代学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不过它忽视了方阵纵深这一因素。这些部队的各个单元会排成多少行呢？这一问题仍有待探讨。——原注

- ⑪ 然而，在战后他写给安提帕特的信件中（Plut. *Alex.* 20.5, *Moral.* 341C），亚历山大只提到：“我碰巧被一把匕首击中大腿。不过，这一击并没有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第七章 永生的宣示

大流士一刻也不停地逃跑，不顾崎岖的山路，也不管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心只想在黎明之前尽可能把亚历山大甩得远远的，而陪在他身边的只有少数几个参谋军官和侍从。次日早晨，他和其他散乱的逃跑部队会合，其中包括4000名希腊雇佣兵。他带着这些残兵往东奔跑，一路马不停蹄，直到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巴比伦为止（参见 Arrian 2.13.1; QC 4. 1.1-3; Diod. 7.39.1）。此时此刻，波斯大王完全吓坏了。大流士估算着亚历山大几天内就能赶来攻打巴比伦的城门，而他那被击溃的部队根本没法再打另一仗。帝国的管理彻底乱了套；波斯大王的御前会议成员大多也是战场指挥官，天知道他们此刻到底在哪儿。

因而，大流士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靠自己主动采取行动。既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打一仗，他决定尝试一下外交手段。虽然还有很多疑虑，这位逃亡的、忧心忡忡的亚洲之主还是草拟了一份外交备忘录给亚历山大，提出了一些和谈条款。如我们所见，大流士所提出的条件极为慷慨：他大概想不到他的对手竟会断然拒绝。他还不了解亚历山大的野心之大和抱负之强。

在战后的某天早上，亚历山大在他的挚友赫淮斯提翁的陪同下，亲自去会见大流士的女眷。两人都只穿着马其顿战袍，赫淮斯提翁更高大、帅气。王太后希绪冈比斯（Sisygambis）自然而然把他错认成了亚历

山大，于是匍匐在他脚下哀求。当侍从指出错误时，她满脸尴尬，不过她鼓起勇气“重来一遍，对亚历山大表示礼敬”。国王对她的道歉并不在意，只说：“老太太，没关系的。你没有弄错，他也是亚历山大。”接着，他亲自重申了他让列昂那托斯传达的承诺：他甚至答应为大流士的女儿们提供嫁妆，并以与其皇室身份相称的礼遇抚养波斯大王六岁的儿子。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害怕，当亚历山大叫他过去时，他立马跑了过去，搂着国王的脖子亲吻。亚历山大被这一举动打动了，他对赫淮斯提翁说，多可惜啊，做父亲的却没有儿子那样的勇气和镇定。¹

此后，根据惯例他去看望了伤兵，还为牺牲将士举行了隆重的军事葬礼，整支军队都为他们游行致敬。而那些英勇作战者则各自得到了勋章。尼卡诺尔之子巴拉克洛斯（Balacrus）被任命为奇里乞亚总督，因为哈尔帕罗斯而空缺出来的财政官和军需官这两个职位，亚历山大则分派给了菲罗克塞诺斯（Philoxenus）和科厄拉诺斯（Coeranus）。除了其他职责，他们还负责监管各地的铸币厂（在奇里乞亚和密里安德罗斯，后来又增加了阿拉多斯、比布罗斯和西顿的），作为普遍的政策，亚历山大开始从这些铸币厂发行自己的钱币。

马其顿人第一次实际体验到东方的奢华，一个个都陶醉于其中：大流士的营地（哪怕最重要的辎重已经运到了大马士革）所提供的战利品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亚历山大自己可能不屑一顾，但将士们可不会。从今而后，他们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日渐增长。在经过马其顿的近乎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后，他们很容易堕入挥霍无度的放荡之中。有个军官在自己靴子上钉满了银钉。还有一个在御用的紫色地毯上接见自己的部下。他们还占有了大量的波斯妾婢和随营人员，随着亚历山大军队不断深入亚洲，这类人员的数量日益膨胀。有时，这倒也不见得是好事。安提戈涅（Antigone）被帕美尼翁之子菲罗塔斯纳为情妇，后来被唆使去监视菲罗塔斯，报告他的私下谈话。不过，正如普鲁塔克所说，马其顿人现在“就像狗一样渴望追逐和扑抢波斯人的财富”，这也不足为奇。

战役甫一结束，亚历山大就告诉他们，“除了用亚洲的主权来为他们的辛劳加冕以外，再无他事”。最终，这成了一项无限拓展的计划。如果他们以为将很快追上大流士，在抢得另一堆波斯战利品后胜利回国，那么注定会失望。实际上，在这征战的关键阶段，亚历山大必须仔细思考未来的战略方向。他所打败的波斯军队并没有被彻底击溃，同时也绝非大流士最后的后备兵力。这支军队的幸存者四散而逃。其中有些人，包括骑兵在内，往北跑到了托罗斯山；他们很可能会切断亚历山大那一向脆弱的安纳托利亚交通线。东部的行省未曾受过侵犯，它们的军队也根本没到伊索斯来，而在这些行省中大流士将征募新防御军队的主力。

眼下谁也无法说清波斯大王到底去哪儿了，而亚历山大也不想掉进广袤亚洲的危险的游击战当中，去面对一群游离不定的敌人。此外，腓尼基舰队依旧逍遥海上，波斯仍然控制着爱琴海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伊索斯之战必定会对希腊城邦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但这种影响很容易受到高估。而小亚细亚的局势依旧极不稳定，亚历山大的下一步战略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亚历山大能够最终击败大流士的方式是诱引他再次正面交战，而且这一仗波斯帝国还得把全部力量都投进来。因此，他很精明地决定，暂时先去应对其他事务。波斯大王的自尊心摆在那里，等时机一到，他自会来决一死战。在此期间，大流士将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整和加强已然残损的军队。

这个计划十分切合亚历山大的需要。当大流士正忙个不停时，亚历山大可以完成原本中断的征服腓尼基海岸的计划，而不会遇到大规模的抵抗。一如既往，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伊索斯之战后仅仅过了几天，马其顿军队就拔营出发，沿着海岸来到了叙利亚。在离开之前，亚历山大故作姿态地免除了他强加在索利身上的50塔兰特的巨额罚款。事实上，即使没有挑起更多的仇恨，他在后方还是容易遇到许多麻烦。再说，从今往后只要愿意，他尽可以这么慷慨大方。²

从密里安德罗斯出发，马其顿军队沿着古老的腓尼基道路向南行进：先是在内陆地区行军，途中经过了奥伦特斯河谷，在此他留下梅农（Menon）作为低地叙利亚的总督；接着，沿海岸取道加巴拉（杰布莱）和帕尔托斯（阿拉伯的马力克）到达马拉托斯，该城的海滨有一个防御坚固的小岛；最后到达了阿拉多斯（阿耳瓦德）。马拉托斯原本会给亚历山大造成不小的麻烦。但这一次他同样运气十足。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地方君主集合了各自的海军，然后驶向西方去支援爱琴海的法尔那巴佐斯。其中就有马拉托斯的统治者，他离开时把城市交给了儿子斯特拉顿（Straton）。由于驻军所剩无几而海军则几乎没有，所以斯特拉顿在面对进攻时根本无能为力。当他听说马其顿人即将到来时，他断定抵抗是徒劳的。于是，他骑马出城会见亚历山大，后者风度良好地接受了他所献的金冠，和马拉托斯、阿耳瓦德以及远至马利安纳城的所有附属内陆地区的投诚。最后提及的这个城市乃是最有价值的收获。它不仅控制着最好的耕地，而且本身就位于从帕尔米拉到巴比伦的重要商路上。

当亚历山大到达马拉托斯时，他遇到了两个带着大流士休战提议的使节。波斯大王抗议说，腓力和阿尔塔薛西斯原本一直处于和平与联盟的状态；后来腓力侵犯了阿尔塔薛西斯的继任者阿尔塞斯，而亚历山大更是背弃了“这份古老的友谊”，肆意地侵略亚洲。他——大流士——只不过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和主权。战斗已经“如神灵所意愿的那样”分出了胜负。如果亚历山大能归还他的妻子、母亲和孩子，那他愿意为此偿付相应的赎金。而且，如果亚历山大同意和波斯签署友好同盟协议，那波斯大王将割让给他“哈吕斯河以西的亚洲领土和城市”。事实上，大流士所提出的条件正是当年腓力所要征服的“从奇里乞亚到锡诺普的亚洲地区”，而这也是伊索克拉底一直主张的。

因此，亚历山大发现他现在的处境有点微妙。如果他向军事会议公布波斯大王的和平条款，那么帕美尼翁和老将们肯定会无可反驳地认为，波斯远征军已经实现了所有目标，应当立即接受这份条款。但是，亚历山大自己的雄心壮志远远超出了这样一个有限的目标。到最后，他对

什么都无法满足，只想彻底推翻大流士，自己成为亚洲之主，通过征服的方式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位和帝国。既然有此目标，那么波斯的提议就必须予以拒绝。因此，亚历山大把原始文件压下，伪造了一份新的，新提议不仅语气傲慢、令人愤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遗漏了有关割让领土的条款。毫不奇怪，军事会议当场表示拒绝。

于是，亚历山大草拟了一份答复，开头就非常傲慢，即“亚历山大国王致大流士”。他把波斯大王视为一个卑劣十足的篡位者，通过和巴戈亚斯共谋，“以不正义和不合法的手段”夺得王位。他还把针对薛西斯及其继任者的陈年控诉都搬了出来。他指责大流士阴谋杀害腓力——这是不实的；而且支持希腊内部的反马其顿的第五纵队——这倒是真的。他自称愿意归还王太后、王后及其孩子而不要赎金——只要大流士亲自过来谦恭地恳求他。不过，他最后的几句话才是最引人注目的：

将来〔他写道〕你要和我联系就得写上致全亚洲之王。不要以平等的身份给我写信。你所拥有的东西现在都是我的了；所以，如果你想要任何东西，都得以恰当的言辞让我知晓，否则我会把你当作一个罪犯来对待。不过，如果你对王位归属存有异议，那就起来战斗到底，不要逃跑。无论你藏身何处，我都一定会把你揪出来。

被选去递送这份措辞严厉的控书的使节得到严令，“不要讨论任何可能从中提出的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预防措施。

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信表明了他的目标有多么远大，那么它也充分展现了亚历山大对人心的精准把握。在写作时，那最后的威胁只不过是一种吓人的、有意制造的虚张声势；但它很可能会刺激大流士——他的声望已经严重受损——去做能让亚历山大彻底毁灭他的事情，亦即召集另一支帝国军队，并再次与马其顿军队一较高下。在苏萨，头脑冷静的人

必定明白，胜利在于避免发生此类正面对抗；但是现在牵涉到了荣誉和声望的问题。另一方面，单单大流士要割让小亚细亚这一提议，就充分说明了伊索斯之战给他造成了多大的震撼。将来无论亚历山大愿意进行什么样的谈判，那都会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信号。

大流士一收到亚历山大的回复，就立即开始筹划一场新的战役。东部行省还有大量未曾利用的人力资源，只不过他需要时间把他们组织起来。与此同时，门农把战争引向欧洲的计划——由于波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而被暂时搁置——又重新得到了讨论。如果大流士能完全控制住赫勒斯滂从而切断亚历山大在亚细亚的陆上交通，并且说服希腊城邦全面反叛安提帕特，那么马其顿军队的处境就将变得岌岌可危——至少人们会这么认为。波斯大王盘算着，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不用进行另一场大战就可以迫使亚历山大撤退。再不济，他至少还能赢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他那支离破碎的军队。

因而，他发出了一份重要指令给伊奥尼亚沿海地区的指挥官们。毫不奇怪的是，自伊索斯之战后，爱琴海战役一直处于停火状态；而由于大流士的指示，它重新获得了最高优先权。法尔那巴佐斯（他已经占领了米利都和哈利卡那索斯并以后者为作战基地）一直和斯巴达国王阿吉斯（Agis）保持着私下联络，现在正积极策划一场民族主义抵抗运动。一得到大流士的命令，法尔那巴佐斯就把阿吉斯召到哈利卡那索斯，让他带着波斯的战船、波斯的黄金（“以便使希腊的政治局势转而支持大流士”）和不下8000人的雇佣兵回国；这些雇佣兵是在伊索斯之战后从伊索斯逃到卡里亚的。^①也就在此时，内马尼的塔伊那隆港口成了一个登陆点和反叛自愿者的招募中心。同时，根据大流士的命令，另一支雇佣军被派去重新占领赫勒斯滂地区。小亚细亚的许多重要城市（我们的史料没有提及它们的名字）也被波斯人重新占领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些部队——包括纳巴尔扎涅斯的精锐骑兵分队——在沿托罗斯山北部逃跑时引发了卡帕多基亚和帕夫拉戈尼亚的全面反叛。如我们所见，亚历

山大的交通线需要经过刻莱奈这一狭窄的瓶颈地区。大流士估计，在山地部落的帮助下，用不多久就可以完全封锁这个交通瓶颈。被留作安纳托利亚中部总督的独眼的安提柯却又非常危险地缺乏兵力。如果亚历山大发现自己被切断了与欧洲的联系，他可能更愿意听从意见。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猜想，尽管大流士并不知道这点。在戈尔狄昂时，亚历山大已经做出关键决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希腊和马其顿都可以被牺牲掉。而伊索斯之战的胜利则只可能加强这一立场。⁴

与此同时，帕美尼翁和往常一样又接到了最烦人和最危险的工作，而他的部队人数却又不足以安全地执行任务。他在伊苏斯战后所得到的指令是，通过低地叙利亚朝大马士革进军，接受该城的投降并看管好波斯大王的辎重。除了塞萨利骑兵，他手下并无一流的部队，因而不免会觉得有些不安。现在已经入冬了，如果大马士革的公民决心关闭城门，坚守以待，那他也无可奈何。他的部队在暴风雪中行进。即使雪停了，地面也满是冰霜，冻如坚石。天气真可谓严寒刺骨。不过，当他们离该城大约还有四天的路程时，收到了该城总督的一封信，信中说“亚历山大应当快速派一名将军带着少量部队过来，他会把大流士交由他负责的东西移交给那人”。

借口说大马士革的城墙和防御工事过于破旧而无法抵御进攻，总督现在下令全面撤离，而且算好了时间，以便财宝、辎重和显要的囚徒能在帕美尼翁到来时顺利交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马其顿人遇到了一长队在雪中缓慢行走的逃难者（由于太冷，财宝搬运者身上裹着大流士的金色和紫色的袍子）。塞萨利骑兵发起了冲锋。辎重搬运者和武装护卫队当即逃走，而波斯皇室的财宝则散落在雪地上，到处都是钱币、黄金饰品、镶有珠宝的马笼头和战车。每一物品帕美尼翁都仔细登记，以便作为清单呈递给亚历山大。这里共有2600塔兰特的钱币和500磅银制品。倘若我们的史料可以信得过的话，金杯的总重约有4500磅，或者说超过了两吨；杯中内嵌的贵重宝石则有3400磅。此外，大流士的所有内侍都被俘虏；清单上显示，其中共有329名奴婢（受过音乐训练）、277

名宴饮侍者和17名酒保。其他俘虏没有那么富有异域气息，但却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各种各样的波斯达官贵人、大流士将领和亲属的妻儿，以及门农的遗孀、阿尔塔巴佐斯的女儿巴尔西涅（Barsine）。最有趣的是，里面还有来自忒拜、斯巴达和雅典的使节。

帕美尼翁给亚历山大送去一封急讯，详述了种种事情；同时，一块送去的还有一个制作工艺和镶嵌的宝石都很华丽的黄金珠宝箱，人们都说这是大流士最好的艺术藏品。（亚历山大以他典型的风格，把它用作《伊利亚特》的旅行盒。）在急讯中他还询问道，国王现在有何指示？亚历山大的回复非常干脆而实际。他命令帕美尼翁配合新任总督门农为低地叙利亚组织一支防卫军。大流士的财宝仍然留在大马士革，而被俘的使节则需送往马拉托斯接受讯问。帕美尼翁还得到授权，可以在大马士革铸币厂发行马其顿钱币。在信中他问道，对那两名被控强奸雇佣兵妻子的马其顿士兵该如何处置？亚历山大回说，如果确实有罪，他们就应“像生来要糟蹋人类的野兽那样被处死”。

也就在同一封信中，他跟帕美尼翁说——或许还有点执拗——他从未见过，也不想见大流士的妻子，甚至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讨论她的美貌（可能在伊索斯之战后的早晨她就被盖上了面纱），进而还说波斯大王的女眷很“辣眼睛”。帕美尼翁这人颇有一种圆滑的幽默感，他不仅按要求把三位使节遣送到亚历山大那里，还把巴尔西涅也一并送了去；这时候的她不到四十或四十出头，既有波斯的贵族教养，又受过极好的希腊教育。这次尝试（倘若我们能够相信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话）可谓极为成功，虽然传说中的此次结合所诞生的儿子多半是杜撰出来的。⁵

公元前332年1月初，亚历山大从马拉托斯出发继续前进。比布罗斯很顺利地投降了。马其顿人沿着海岸向南行进，渡过凯勒卜河到达商业大港西顿；在途经凯勒卜河时，他们可以看见来自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先驱者早就在河边的崖面上刻下了自己的铭文。西顿的居民很欢迎亚历山大的到来——据阿里安说，这是由于他们憎恶大流士和波斯人（Ar

rian 2.16.6)；不过，西顿和几十英里外的提尔港的长年竞争恐怕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西顿人抛弃了自己的执政君主（他似乎已经被处决了），并把继任者的任命权留给了亚历山大。据说，亚历山大要求他的好友赫淮斯提翁选一个合适的候选人。赫淮斯提翁选择了王室的一个旁系成员，此人眼下生活穷困，只是市场中的一名园丁。

这个人名叫阿布达罗尼摩斯（Abdalonymus），其腓尼基语的含义是“诸神的奴仆”。现在，他正式登上了王位；后来，古代的道德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他的事迹，以此作为“命运所影响的不可思议的剧变”的经典例子。（亚历山大肯定算计过了，这种一步登天的升迁将会使他永远顺从他的神一般的恩人。）阿布达罗尼摩斯还有另一项声名：是他制作了那个如今在伊斯坦布尔的巨大的“亚历山大石棺”，上面雕满了狩猎和战斗的场景。这些浮雕不仅描绘了亚历山大本本人，很可能还包括赫淮斯提翁和帕美尼翁（尽管相关身份的鉴定受到了质疑）。石棺浮雕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和亚历山大开始在西顿的古老铸币厂（自公元前475年以来一直很兴旺）发行的钱币一样，国王被描绘成了年轻的赫拉克勒斯——强健、帅气，而且戴着赫拉克勒斯传统的狮皮帽。

这点在马其顿的传统中有很多先例，因为阿吉德王朝的君主们一贯认为，强调他们的赫拉克勒斯血统是非常有用的。不过，亚历山大新发行的金币和德卡德拉克马②银币中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在铸币图案中，这位征服者正在接受尼刻女神（胜利女神）的加冕，而后者则伸着手臂，拿着花冠；并且早期钱币上的蛇也被波斯的狮首格里芬像取代。此外，赫拉克勒斯通常是和腓尼基的神祇墨尔卡特③相等同的。亚历山大夺取东方统治权的野心可谓昭然若揭；实际上，这种苦心孤诣、强调赫拉克勒斯血统的宣传手段为理解后来某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种有趣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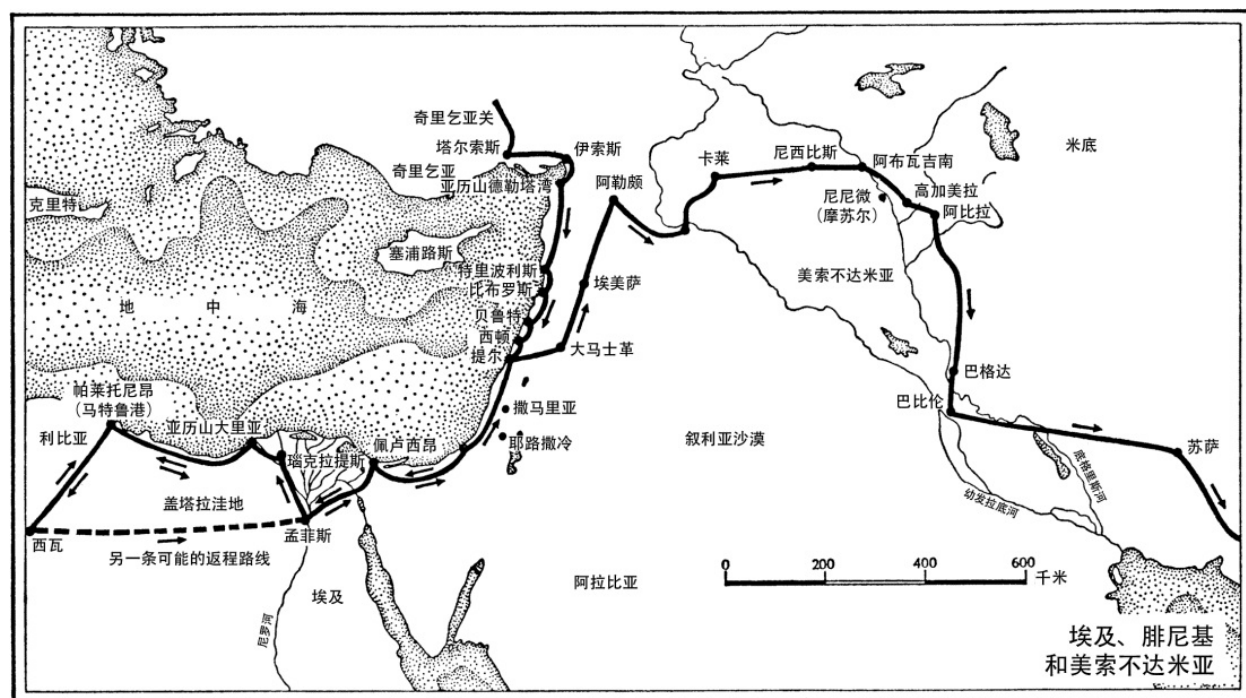
从西顿出发，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推进到了提尔，这是奇里乞亚与埃及之间最有影响力的军港和商港。提尔港位于离海岸半英里远的一个岩

石岛上，边缘有高达150英尺的城墙保护。当亚历山大的军队到来时，一个包括王子在内的使团前来欢迎他，他们献上了一顶金冠并且反复表示效忠。⁷不过，他们的热情态度是有欺骗性的。他们根本不想把提尔港交给马其顿人；相反，他们打算为大流士和腓尼基舰队坚守这座岛屿。如果他们能通过一点外交贿赂而免去麻烦，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他们随身带来的丰盛礼物至少能够使这些粗野而讨厌的来客不去劫掠周边的乡村）。但他们不想妥协。要是亚历山大不肯让步，那就让他尽管来围城好了。之前他们就打退过不少围城者，何况马其顿军队连舰队之利都没有。再者，他们把亚历山大拖得越久，大流士就越有时间动员一支新军队，并在小亚细亚执行他的作战计划。⁸

亚历山大很快就看出，提尔人“更愿意和他结盟而不是归顺他的统治”。他感谢使团带来的礼物。接着，他用平淡的语气说，作为赫拉克勒斯的王族后裔，他最大的心愿是亲临该岛，并在墨尔卡特的大神庙中为其献祭。提尔人很清楚这种赫拉克勒斯和墨尔卡特的等同关系，可能也知道亚历山大想要借此捞取何种利益。现在正是墨尔卡特的年度大庆，⁹庆典吸引了许多访客，特别是迦太基的。让亚历山大得偿所愿，无异于承认他是他们的合法君王。（如果我们可以套用其他的近东的惯例，在此庆典期间向墨尔卡特献祭就完全是一种皇家特权。）因此，使节们镇定自若地告诉他，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大陆上的旧提尔城里还有一个同样好的神庙，不知他是否愿意在那里献祭？¹⁰他们说，他们无意冒犯，只是想严守中立而已。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不想让波斯人或马其顿人进入他们的城市。

面对这种明显的虚与委蛇，喜怒无常的亚历山大一下子火了。盛怒之下，他发出各种威胁，赶走了使团。一回到城中，使团就建议执政者，在跟如此可怕的对峙之前要再三考虑一下。但是，提尔人对他们天然和人工的防御工事信心满满。提尔城和大陆之间的海峡深达20英尺，而且常有猛烈的西南风来卷动风浪。他们相信，他们的防御工事足以抵挡现今最强大的破城槌。城墙高耸于海上，没有船，哪支军队能够爬

得上来呢？距离如此遥远，岸上的攻城武器同样无可奈何。迦太基访客们承诺会派来大量援军，于是深受鼓舞的提尔人决心坚守到底。¹¹



即便亚历山大本人，对发动如此危险的围城战也有所犹豫，这或许是因为部下给他指出了一些难以令人乐观的困难。因此，他派了传令官到提尔城去，劝说他们接受和平协议。然而，提尔人误以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于是便杀了传令官，把尸体扔在城垛上。¹²这种愚蠢的暴行即便没有其他作用，至少也让亚历山大赢得了全体参谋人员的坚定支持。亚历山大对他们发表演说（当时在场的托勒密记下了演说全文），¹³阐明了对战略现状的深刻理解。当时有些人提议，留一支驻军在旧提尔城里以“牵制”该岛，然后直奔埃及。另一些人则急着要放弃整个腓尼基，然后继续追击大流士。而亚历山大强调，只要提尔仍然是波斯舰队的潜在基地，两条道路就都不可行。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东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埃及自然就唾手可得；到那时，埃及和腓尼基都已稳定，他们便可启程前往巴比伦。^④

这些理由或许可以说服亚历山大的高级军官；但是，马其顿的普通士兵却毫不关心这种战略问题。他们只看得到自己将要的工作，而且不大喜欢。亚历山大宣布，他打算建一个跨海峡的、直抵提尔城的防波堤。士兵们仔细看了那深深的、风急浪高的海峡，还有彼岸的提尔要塞以及敌人已经搬上城墙的投射武器。这一障碍实在是太过明显而难以克服，即便亚历山大没有海军这一弱点也比不上。一条半英里长的防波堤，穿过这样的水域？这一次，国王的要求太过分了。¹⁴但正如库尔提乌斯所说的，亚历山大“一点也不缺做士兵思想工作的经验”，他声称自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看见赫拉克勒斯站在提尔城墙上向他招手。阿里斯坦德洛斯解释说，这个梦的意思是提尔城将会被攻下，但只有在他们付出了如赫拉克勒斯般的辛劳后才有可能：其推论已经再明显不过了。¹⁵

最后，所有的反对意见都被克服了，于是亚历山大开始了他的整个征战生涯中最漫长、最艰苦的一次战役。¹⁶他先是拆了旧提尔城，以获取基石和碎石。¹⁷同时，他派了一队工兵前往内地，穿过下贝卡河谷，到安提勒巴农山山坡砍伐木材，特别是雪松。这次考察行动和随后亚历山大亲自对该地区的劫掠，很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对建造防波堤至关重要的木材，同时也是在搜刮粮草。尽管离城市约有5.5英里远的利塔尼河提供的水量十分充足，但当地的储备明显无法长期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提供食物。约瑟夫斯（Josephus）告诉我们，在围城结束之前，亚历山大曾给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写信，“要求他派一些援手过来，并为他的军队提供粮草”。¹⁸在此期间，不仅是亚历山大自己的军队，就连周边城镇和乡村的所有强健男子都被征作临时劳工，其规模之大据估计达“好几万人”。

这项工程的前期阶段，¹⁹亦即跨越滩涂和浅水区的部分，并没有遇到什么难题。亚历山大的攻城技师们把成堆的木材沉入泥沼，然后在木材之间放置石块，在此基础之上再放置大块的木料。最终，这个防波堤据说有不下200英尺之宽，因为亚历山大想要他的进攻面尽可能地宽一些。他本人一直亲临现场，随时准备解决任何技术难题，同时也不断鼓

励士兵们，并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而颁发奖赏。

一开始，提尔人把这项工程当作笑话看。他们经常挤在一块观看，坐在投射武器射程之外，放肆地说三道四。他们嘲笑那背负重物的士兵像役畜一样。他们还戏谑地问道，亚历山大是不是已经狂妄到要跟波塞冬一较高下的地步了。²⁰不过，工程快速而高效的进展很快就使提尔人变了腔调。他们撤走部分的妇女和小孩，²¹同时开始为陆上防御另行建造额外的弩炮。²²现在这些人不再嘲笑亚历山大的防波堤，而是积极尝试破坏它，以免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威胁。八艘满载着弓箭手、标枪兵和轻型弩炮的战船开向工地的两侧，接着枪林箭雨就朝工地上成千上万的劳工倾泻而下。²³这么短的距离他们基本不会射歪，而亚历山大的士兵则因为工作时没有穿盔甲，一时伤亡惨重。^⑤

为作防范，国王树立了一些由兽皮和帆布制成的防护障，并且在防波堤的末端附近放置了两座高大的木塔。站在木塔上，弓箭手和弩炮手可以直接朝下射到敌人的船中去。此类预防措施此时极其必要。工程进展到这个阶段，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城墙上弩炮的射程之内；但是同时因为已经到海峡的最深部分，工程的进展之慢几如龟速。²⁴无数的石块倒入海里，但其下的基础却没有显著地升高。木材的供应速度也没有预计的那么快，因为伐木分队经常要停下来对付阿拉伯劫掠者。²⁵除此之外更要命的是，机敏多变且善于相机而动的提尔人在这时候发动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突袭。

他们取来一艘宽大老旧的运马船，在里面装满干燥的木柴，又在木柴上浇了大量液态沥青。船头安了两根新桅杆，在桅杆突出的桁端位置挂上一口满是易燃物质的大锅，里面装的可能是石脑油。最后，他们在这艘怪船的船尾压了大量重物，以致于本身装满东西的船头在航行时都翘了起来。当大风开始吹向海岸时，他们派了一队基干船员上船，用两艘快速三层桨战船拖着这艘临时装备的火船朝防波堤冲去。水手们卖命地划桨，好让火船能达到最高速度。到了最后一刻，两艘三层桨战船一

个左转一个右转，各自调头离开，而运马船上的水手们则把拖缆解开。他们把火把扔到易燃物质当中，然后迅速跳船潜入水中。

这艘熊熊燃烧的驳船径直冲向防波堤，其船头粉碎并碾压着最外层的基础，而亚历山大的木塔就近在咫尺。木塔马上也被引燃。与此同时，那两艘三层桨战船调转方向，停靠在防波堤边，一有马其顿人把头探出木塔或试图灭火，就立即对其射击。接着，挂着大锅的绳索烧断了，锅中的石脑油登时倾泻而下。其后果有如炼油厂发生了一场小型爆炸：两座木塔当即被烈火吞没。同时，一直跟在火船后面的小船队从四面八方冲到防波堤里。其中有一支突击队大肆屠杀从岸边搬运石块的士兵，其他人则拆毁亚历山大的防护障，并放火烧掉在最初的大火中幸存的攻城器械。整个进攻仅仅进行了几分钟，袭击者就撤退了，留在他们身后的只有遍地残骸和漫天的黑烟。此时，整个防波堤上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和烧得变形的木材。²⁶

对此，亚历山大毫不气馁，下令建造新的木塔和弩炮，并指示应进一步加宽防波堤。然后他留下佩狄卡斯和克拉特洛斯负责各项事务，自己则在翊卫队和轻装部队的护卫下回到西顿。这次损失惨重的挫折充分说明了一点：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他还是彻底放弃为好。只有从水陆两面同时进攻才真正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要获得战船并没有原来设想的那样无望。在他对高级军官的演说中，他曾预言当伊索斯之战以及随后种种胜利的消息传到爱琴海时，许多在法尔那巴佐斯手下效命的腓尼基舰队将会叛变。现在，这一乐观的预判得到了证实，而且其进展十分惊人。

比布罗斯和阿拉多斯（阿耳瓦德）的国王听说他们的城市落入了马其顿人手中，就撤走各自的舰队，驶回了西顿。此外，有10艘三层桨战船从罗得岛（目前是波斯的一个据点）过来，还有10艘来自吕西亚，另有3艘来自索利。这样加上西顿自身的海军，亚历山大马上就拥有了103艘战船。不过，更好的事情还在后头。仅仅过了一两天，塞浦路斯的国

王就带着一支不下120艘战船的联合舰队驶进了港口。如此大规模的叛变意味着波斯舰队很快就会失去战斗力。与此同时，一艘有五十桨的马其顿桨帆船成功突破法尔那巴佐斯的封锁，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即在安福特洛斯和赫格罗科斯的领导下，一支强大的防御海军正在赫勒斯滂地区建造。

亚历山大自然是兴奋不已。只用了一两周，他就聚集了一支远比提尔舰队强大得多的舰队；同时，希腊和伊奥尼亚的局势总算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他马上从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征来新的工程师，命令他们把攻城器械（包括破城槌）装上驳船或者老旧的运输船。就在舰队整装待发之时，亚历山大却亲率一支轻兵前往黎巴嫩山脉的崎岖且覆盖着冰雪的荒原，花了十天时间去打击那些威胁其补给线的部族。

有天晚上，他和贴身侍从落在了大部队的后头，这主要是因为亚历山大年迈的导师吕西马科斯坚持要与他们同行，又没法跟上他们的步伐。到了夜里他们迷路了，一个个在寒夜中瑟瑟发抖；而那些飘忽不定的敌人的营火就在不远处闪烁着。亚历山大以印第安侦察兵的风格，独自跑出来，悄悄地溜到最近的营帐，用刀杀了两个土人，然后拿着一支大火把跑了回来。这样，他们生起了自己的火堆，勉强过了一夜，次日早晨他们便和其他人会合了。这个故事（假设是真的，因为太不可思议了）所表现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无端的个人冒险，而这种个人冒险在亚历山大的整个征战生涯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确实让人钦佩，但万一那些阿拉伯山地游击队员中有一个反应稍稍敏捷一点，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很难说在什么情况下勇敢会蜕变成纯粹无谓的不负责任。在黎巴嫩冰雪中的挥剑一击很可能就会改变整个希腊历史的走向。²⁸

这场小规模讨伐顺利结束了，亚历山大也匆忙回到了西顿。在此，他发现有更叫人欣喜的援军在等着他。²⁹克勒安德洛斯终于从伯罗奔尼撒的征兵处回来了，随之而来还有不下4000人的希腊雇佣兵。人们四处宣扬，亚历山大的远征现在不仅可以清偿债务，而且开始分发不错的红

利了。此后，国王在招募雇佣兵时再没遇到过真正的麻烦，他想招多少就能招到多少。

此时，舰队也做好了作战的准备。于是，亚历山大立即以战斗队形拔锚启航。他以五十桨的马其顿桨帆船为旗舰，两侧各部署半支大型塞浦路斯分队以加强整体的攻击力量。提尔人的舰队司令一听说亚历山大前来，第一反应是准备接战。但是，当他看到这支舰队远比其预料的庞大时，马上改了主意。亚历山大一心想要一决胜负，却发现敌军调转航向逃回港口。见此，他赶忙下令舰队全速前进，要抢在对手之前到达北面的港口，由此展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海上竞赛。提尔城的多数精锐都作为水兵上了战船，如果亚历山大能抢先进入港口，那他就有极好的机会占领提尔城。

以纵队队形行进的提尔人，正好赶在亚历山大的先锋之前成功躲到了港口中。三艘三层桨战船调头抵御攻击，然后一艘接一艘地沉了下去。与此同时，在它们身后一排整齐的战船把船头并排堵在了港口的入口处。类似的防御策略后来在该岛东南方向的埃及港那里也曾使用过。³⁰亚历山大眼见没法强行进入港口，便率领舰队停泊在防波堤的背风面。然而，如果说入港是不可能的，那么同样，他也不想再让提尔舰队出来。次日一早，他就派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分队去封锁港口。这样一来，提尔的整个海军就被有效地困住了，亚历山大通过一次出击便获得了制海权。³¹

现在，由战船组成的密集防御障足以保护工人们免受袭击，亚历山大可以放心地全速建造防波堤了。³²不过，波塞冬似乎是站在提尔人一边的。海上刮了猛烈的西北风，不仅使得工程无法取得进展，还对现有结构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亚历山大绝不会认输。许多巨型黎巴嫩雪松原木被扔到迎风一侧的水中，由此吸收了风浪的强大破坏力。在风暴平息后，这些巨型原木又被建造成防波堤的防护垒。防波堤所遭受的损坏很快得到修复，站在防波堤上的亚历山大终于发现他已经进入了城

墙上远程武器的射程范围之内。³³

于是，他开始发起古代形式的饱和攻击。³⁴投石器和轻型弩炮在防波堤的末端架设了起来。当投石器向提尔的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时，弩炮则在弓箭手和投石手的配合下，集中打击城垛上的那些守兵。与此同时，海军也从海上朝提尔城发起同样猛烈的攻击。亚历山大的工程师们制作了许多海上破城槌，每一个都搭在架于两艘驳船之间的大型平台上。其他类似的浮动平台则搭载着重型弩炮和抛石机。而所有这些都有相应的防御措施，免受来自城墙上方的攻击。³⁵现在，这些船舶在正规的战船的护卫下，围绕要塞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环形包围圈，从而使整个要塞都经受着最猛烈且毫不间断的攻击。那些巨大的破城槌通过撞击城墙的疏松部位打开缺口，而弩箭弓矢则把城墙上的守兵一个个射了下来。

提尔人也在拼命反击着。他们张起兽皮和其他柔韧物质以缓冲石球的杀伤力。在城垛上，他们建起木塔并让弓箭手进驻其中，用火箭射向下方的攻城船舶。又以极快的速度修补被破城槌撞开的缺口，而当缺口无法修补时，便在后面建起一道新的间壁墙。³⁶那天，当漫长的战斗结束时，提尔人的处境着实让人乐观不起来。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与防波堤相对的那面的防御依旧十分稳固。这里的城墙是最高的，并且是以料石配以灰泥建成的，即使面对马其顿人最重型的攻城器械也毫无压力。亚历山大对此非常清楚，不过他决定尽量发挥他的优势，尝试从海上发动一次夜袭。在夜幕的掩护下，他所有的突击队都已就位。结果，提尔城又一次被恶劣天气拯救了。当时，云层遮住了月光，还有浓厚的海雾。接着又刮起了大风，剧烈的风浪开始冲击着亚历山大的浮动平台，有些平台直接就解体了，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它们尚且笨重难当，在风暴中则更是无法操控。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只得取消行动。³⁷舰队的多数船只都安全返回，尽管有许多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这次失败给了提尔人一次短暂而宝贵的喘息机会。现在，他们非常巧妙地把一大堆石块和砖瓦倾倒在城墙下面的浅水区中——为了获得这

么多的材料他们大概拆毁了不少房屋。幸运的话，这一防卫措施足以使亚历山大的海上破城槌发挥不了作用。提尔人的工程师和铁匠看起来很有发明创造的才华，他们日夜不息地锻造出了许多奇特而可怕的武器。事实摆在眼前，除非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否则亚历山大的防波堤很快就会延伸到岛上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设计了大量用于肉搏战的武器的原因。这些武器包括垂梁（它们可以从起重机甩到船上去）、铁钩或带钩的三叉戟（连在绳索上，可以把进攻者钩下木塔）、掷火器（能抛出大量熔融金属）、大镰刀（安在杆头用以割断捆绑破城槌的绳索），以及带铅粒的渔网（用以缠住任何想要通过梯桥冲进要塞的敌人，简单却很有效）。³⁸

之所以紧急制造这些武器，其原因之一是从迦太基前来的使节带来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那些还留在城里的迦太基人肯定跟国内报告说，提尔城成功守住的可能性已经越发渺茫。他们的政府觉得提尔人即将崩溃，因此不想让迦太基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代价惨重的战争之中。于是，迦太基人突然想起自己国内尚有诸多麻烦，这个理由正好不过，所以尽管觉得很遗憾，但实在没法给提尔城派遣任何援军。³⁹这个消息在这个正受围困的城市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有个人非常鲁莽，竟然声称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神灵（可能是巴力，不过古代史家说是阿波罗）离开了提尔城；不过，马上就有人说，他编造这个故事是为了讨好亚历山大。一些年轻人甚至要用石头砸他，不得已这个人跑进墨尔卡特神庙寻求庇护。其他更加迷信之人则把愤怒转到神灵身上；他们用黄金索把神像牢牢地捆起来，以防他叛变到敌人那里去。⁴⁰

在此期间，亚历山大一直在费尽心力地要把倾倒在城墙下的海水中的石块和砖瓦清除掉。这项工作只有带有强力起重机且能平稳停泊的运输船才能完成。而提尔人的潜水员则通过切断船舶的锚索来阻挠这些打捞工作。一直到亚历山大用锁链替代了绳索，水手们才得以继续作业。最终他们清理掉了所有石块，把它们扔到了无人能及的深海里。⁴¹于是，攻击船又可以撞击城墙了。大约同时，在经过了一番连赫拉克勒斯也

会感到自豪的努力后，防波堤终于延伸到了提尔城：亚历山大所立下的他要让提尔城与大陆连为一体的诺言总算实现了。⁴²此时要是不发起正面进攻就太不符合他的个性了。现在，高达150英尺的攻城塔已经就位，登城的堤道也已经准备好，随后便开始了对城墙的猛烈轰击。⁴³

提尔人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久，他们凭借大无畏的勇气拼死抵抗着。他们手中最天才和最为可怕的武器却也是最为简单的装备。提尔人在许多大金属碗中装满沙子和细小的碎石，并把它们加热到接近白热的状态。这些碗放在胸墙上，每一个配有相应的抛掷器；这样，碗中的沙石就可以被悉数倾泻到任何进入射程之内的进攻者身上。这些火红的沙石滑落进敌人的胸甲和衬衣里，能给皮肤造成深度烧伤：这种武器恐怖而有效，堪称是凝固汽油弹的前身。最终，亚历山大被迫撤退：由于敌人的精心部署，这次进攻可谓损失惨重。此时此刻，据说身心俱疲的亚历山大曾认真考虑过要放弃围城而直接朝埃及进军。⁴⁴现在正是盛夏时节，他花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在提尔的城墙下苦心劳作，但却一无所获。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而大流士却在日夜不停地组建和训练一支新的大军。如果亚历山大仍旧咬牙坚持，那也是因为他早就没有退路。现在放弃围城的代价会比强行攻下大得多。

最终让他如愿以偿的还是提尔人。提尔人的舰队在一次午后时刻差点成功突围，但在一场激战之后又被赶了回来，仍旧困在北面的港口里——在围城期间他们一直呆在这里。现在，亚历山大可以毫无障碍地围绕该岛四处行动，以便找到其薄弱之处，然后全力进攻。他在船上架起弩炮和破城槌以攻击北面港口的防御工事，但依然无法突破。⁴⁵于是，国王把整个突击队全调到了提尔城的东南面，就在埃及港的下面。在这里，他的运气就好多了。有一段城墙在密集轰击下坍塌了，其余的也是摇摇欲坠。亚历山大迫不急待地要利用这个缺口，他立即叫人从船上搭好突击桥，然后命令突击队的前锋攻进去。但是，他们被敌人猛烈而精准的投射武器赶了回来。⁴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确信终于发现了提尔城防的薄弱之处。

怕时已经是7月28日了。亚历山大决定在总攻之前先让将士们休息两天。对于亚历山大这突如其来的信心阿里斯坦德洛斯大概已有所察觉，在占卜后他宣布提尔城将会在当月顺利拿下。大海又一次变得波涛汹涌，但是第三天晚上风突然停了，到了黎明时分亚历山大开始对城墙进行猛烈的轰击，所选的位置仍是早先攻破过的那个点。⁴⁷在把一大段城墙打得粉碎后，他撤下了笨重的弩炮船，调来两船载满突击部队的特别突击艇。与此同时，塞浦路斯和腓尼基舰队在两个港口都发起强攻，其他战船则载满弓箭手和箭矢，环绕该岛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予以援手。⁴⁸

突击艇就位，舷门一开，一大波马其顿士兵立即冲了出来，朝着城垛直奔而去。最先到达的是翊卫队，紧随其后的是克拉特洛斯手下的方阵营。先头部队的指挥官阿德美托斯（Admetus）被敌人用斧子劈开了脑袋。他倒下之后，亚历山大亲自上阵指挥。马其顿军队沿着城垛奋力地杀开一条血路。接着，从下面的港口那里传来一阵欢呼声：塞浦路斯和腓尼基舰队成功地闯进港口。⁴⁹城墙上的提尔人害怕腹背受敌，于是撤到了城市的中心，他们一边撤退，一边在狭窄的街道上设置路障。同时，他们还在屋顶上不断用瓦片袭击追兵。等退到阿革诺尔（Agenor）神庙，提尔城的防御者们已无路可退，只能死战到底。⁵⁰

在消灭了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之后，亚历山大的老兵们在全城展开野蛮的捕杀行动；一切约束都被弃诸脑后，在经过长期艰苦的攻城之后，他们变得歇斯底里而几近疯狂，如今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屠夫，一个个都在不停地击杀、践踏和肢解，直到把整座提尔城都变成一个血腥、恶臭的屠宰场。⁵¹有些公民把自己锁在屋里，然后自杀。亚历山大下令，除了那些在神庙避难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应当处死，而他的士兵们执行起此命令来简直丧心病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房屋着火后的浓烟。有7000名提尔人死在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之中，要不是因为有随亚历山大军队进来的西顿人，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得多。尽管提尔在几百年里一直是西顿的对头，但是作为受难者的邻居，西顿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于是

他们设法把大约15000人偷偷送到安全地带。⁵²

这座希拉姆^⑥曾经统治过的伟大城市，现在被彻底摧毁了。国王阿齐米利克（Azimilik）和其他众多显贵，包括迦太基的使节们，都躲在墨尔卡特神庙中避难，因此亚历山大免他们一死。剩下的幸存者，约有30000人，他全都卖为奴隶。有2000名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接着，亚历山大走进神庙里，扯掉了神像身上的黄金索（现在他下令将其重新命名为阿波罗·菲拉勒珊德尔 [Apollo Philalexander]）^⑦，然后进行他那被耽搁已久的献祭：这堪称代价最为高昂的血祭，即使墨尔卡特也从未遇到过。⁵³之后则是盛宴和游行、为马其顿阵亡将士举行的隆重葬礼、火炬比赛和壮观的海上阅兵。那个最终摧毁提尔堡垒的破城槌，亚历山大把它奉献给了赫拉克勒斯，其身上的铭文连托勒密都不愿复述出来。⁵⁴

不过，一个名叫匝加利亚（Zachariah）、在荒野中哭号的犹太先知已经为提尔城撰写了悼文：

神谕：上主的话临于.....提洛为自己建筑了碉堡，堆积的银子多如尘土，金子像街市上的泥土。看，吾主必要占据她，把她的财富抛入海中；她必为火所吞灭。 [《匝加利亚》9：1—8] ^⑧

夏日天空下的亚历山大的防波堤平静祥和，沙粒从海岸的沙丘上流动下来，打磨着石块和栏栅的尖锐轮廓，把提尔城与大陆连得更近一些。上主的惩罚已经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半岛日渐加宽。今天，在柏油街道和居民住宅的深处，这条神奇堤道的核心基石依然矗立着：这是亚历山大留给后世的有形和永久的遗产之一。

匝加利亚不是预见提尔城被毁的唯一一人。大流士必定也明白这个

城市坚守不了太久。可惜，他没法支援城中的守军。与传闻所说的情况相反，大流士并没有怎么费心组建一支新的帝国军队，而是把赌注都押在了小亚细亚和爱琴海的胜利上。他现有的所有一线部队都投到了这两个战场当中。然而，到了公元前332年夏天，即在亚历山大攻入提尔城之前不久，大流士被迫承认这一代价不菲的战略最终失败了。亚历山大在赫勒斯滂的指挥官安福特洛斯和赫格罗科斯终于成功组建起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伊索斯之战的消息可能也对此有所帮助）。他们在特奈多斯打败了阿里斯托美涅斯（Aristomenes）的舰队，随后往南横扫爱琴海，重新占领了累斯博斯、基俄斯以及其他岛屿。法尔那巴佐斯舰队中腓尼基分队的全体叛变，也使得他们的任务日渐轻松。

（从大流士的角度来看）陆上的形势也好不到哪去。巴拉克洛斯打败了波斯总督叙达尔涅斯（Hydarnes），夺回了米利都。卡拉斯对帕夫拉戈尼亚人的征讨也很顺利。不过最重要的是，被派去切断亚历山大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交通线的波斯军队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独眼的安提柯和纳巴尔扎涅斯的精锐骑兵分队打了三场血战，最后全部获胜。⁵⁵

在仔细评估了当前日益恶化的形势后，大流士决定与亚历山大再谈判一次。⁵⁶这一次他提出的条件甚至更加慷慨。领土割让条款保持不变：他愿意割让哈吕斯河以西的所有行省。不过，他为其家人提供的赎金现在则翻倍，从10000涨到了20000塔兰特；除此以外，他还愿意把长女嫁给亚历山大，顺带奉上与波斯大王的驸马相称的一切福利。他在信末还不忘告诫亚历山大一番。波斯帝国是非常辽阔的，早晚有一天，亚历山大那为数不多的军队将会进入大草原当中，对他来说那里可要危险得多。然而，已经稳稳控制住提尔城的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新条款。他告诉波斯使节，大流士许给的妻子自己什么时候都可以娶；至于嫁妆，他已经自己拿到手了。他没有渡海去赚取像吕底亚和奇里乞亚这样的不足道的利益，是因为他现在的目标是波斯波利斯以及东方的各个行省。亚历山大重申，如果大流士想要保住帝国，他必须为之战斗，因为无论他在何处藏身，马其顿人都会把他揪出来。

得到这个消息后，波斯大王放弃了通过外交手段达成协议的尝试，而“开始积极准备战争”。⁵⁷他命令所有行省总督带着全额的兵力到巴比伦来跟他会合。其中，最强的一支是巴克特里亚总督的：大流士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援，尽管他本人非常不信任巴克特里亚的总督贝索斯（Bessus），因为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当波斯大王——就血统而言他确有一定的权利。鉴于此前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装备不足，大流士这次花了更多的心血在部队的武器上。他们驯服了成群整群的马匹，以为先前徒步战斗的军团提供鞍马。用标枪战斗的人现在则分配到了剑和盾牌。同时，更多的骑兵获得了防身用的锁子甲。同时作为一支特别的威慑力量，波斯大王下令组建了有两百辆战车的卷镰战车队，“在快速行进时能将一路上的任何阻碍都切成碎末”。

当亚历山大还在提尔城时，希腊同盟派来了15名代表。他们宣布，同盟的成员国已经投票通过，决定授予亚历山大一顶黄金花冠，以此奖励他的英勇并表彰他“为希腊的安全和自由”（原话如此）所做的一切。国王非常现实，自然不会接受这种表面上的阿谀奉承，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表征，说明伊索斯之战的消息已经大大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气候。与此同时，帕美尼翁从低地叙利亚回来了，在回来之前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安德洛马科斯（Andromachus）。因而，亚历山大准备继续他的征程。

在提尔城陷落的消息传开了之后，向南直通埃及的路上的沿海城市都纷纷表示归顺，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城市就是加沙，一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堡垒，有着坚固的城墙，建在距海几英里远的内陆的一个土丘上，周围都是陡峭的沙丘。除了控制通往埃及的道路外，加沙还位于一个古老商路的端头，由此变成了东方香料贸易的一个天然集散地。它的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混杂的居民们也借此获得了巨额财富——这是不可绕过此城的另一原因。加沙的总督巴提斯（Batis）坚信此城固若金汤。当亚历山大在围攻提尔城时，巴提斯招募了一支强大的阿拉伯雇佣军，并囤

积了大量的粮草。和提尔人一样，他现在信心满满地等待亚历山大的到来；此时他很清楚地记得，上一个通过强攻拿下加沙的统帅是冈比西斯（Cambyses），而那已经是两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亚历山大不为所动，他派赫淮斯提翁由海路带着舰队和攻城器械先行出发，自己则率领军队从陆路赶过去。赫淮斯提翁的任务之一很可能是确保军队有足够的粮食和饮水供应：八九月间，在提尔与加沙之间长达160英里的路上，大部分河床都是干的，此外巴提斯早已把巴勒斯坦地区的粮食储备搜刮殆尽。亚历山大不可能只依靠沿途少数几个城市的水井和谷仓来维持生存，而唯一可用的一条大河是约旦河；所以，明显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海路从提尔城及更远地区定期运送补给。军队原先一直沿着海岸行进，可以很方便地从补给船获得物资；而后来当因受莫克兰海岸山脉的阻碍而被迫转向内陆时，他们在格德罗西亚沙漠中遇到麻烦了。马其顿军队通过阿凯（此地曾经被波斯用作进攻埃及的一个据点）向南行进，亚历山大在此设立了一个新的铸币厂；接着，他们翻越巴力的圣山卡尔迈勒山，行经约帕——安德洛墨达（Andromeda）曾在此耐心等待海怪到来——又途经了低地叙利亚边境上的亚实基伦。撒马利亚投降了——暂时而已；不过，所谓亚历山大曾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传说罢了。

到了加沙，这段轻松的行程便戛然而止。亚历山大的坑道工兵开始在城墙下挖掘坑道，但是这项工作比他们所预计的要困难得多。攻城塔顺利搭建起来，却又陷进了细小且极易流动的沙土中，沙子直接没到了车轴的位置。在巴提斯的雇佣兵的一次突袭中，亚历山大的肩膀被射中一箭，箭头直接射穿了他的铠甲。当时，他流了很多血——好像伤到了动脉——然后在半昏迷中被人抬下战场。防守的一方不断袭扰亚历山大的交通线，试图烧毁他的攻城器械。最后，他只得围绕加沙建了一个和土丘一样高的土墩——这是一个工程量极大的任务。接着，亚历山大总算可以把他最强大的弩炮派上用场了，这些弩炮通过斜坡被拉到了土墩顶上。在巨型石球的连续轰击下，防御工事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队突

击组经由这个通道攻了进去，而另一队则通过坑道破墙而入。在经过一场血腥的肉搏战之后，加沙最终陷落了。

在攻城的过程中，第一个伤口尚未痊愈的亚历山大又被炮石打折了腿。这让亚历山大愤恨不已，再加上巴提斯的抵抗还使他的行军计划滞后了两个多月。于是，他将大约10000人的守城者悉数屠杀，至于他们的妻儿则全部卖为奴隶。从加沙的库存中他还缴获了数量极其庞大的香料——借此，他特意给年老的列奥尼达斯送了一份极为可观的香料大礼。巴提斯本人被列昂那托斯和菲罗塔斯生擒，他们把他带到亚历山大面前听候处置。此人是一个高大肥胖、皮肤黝黑的宦官，站在那里，神色冷峻而充满藐视，身上尽是尘土、汗水和血污。当亚历山大问话时，他一言不发，甚至都不求宽恕。国王原本就非常厌恶丑陋之人（何况他当时脾气也非常差），此刻更是怒不可遏；提尔围城战之前的种种经历也让他变得更加暴躁。库尔提乌斯说，亚历山大把巴提斯的脚踝绑在战车的后面，拖着他绕着加沙的城墙奔驰，一直到他死了为止：这种残忍的手段正是《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对待赫克托尔遗体的方法的变种。⁵⁸

⑨

从加沙出发，亚历山大朝着尼罗河三角洲行进，一周之内走了130英里到达佩卢西昂，这次急行军可能又是因为沿途不易获得饮水和补给，这一地区纯粹就是一片贫瘠的沙漠。和之前一样，舰队仍旧负责为他陆上的部队提供补给。舰队先行一步，当马其顿军队到达佩卢西昂时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一同欢迎马其顿军队到来的还有喜出望外的埃及人，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乃是真正的解放者。自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第一次占领埃及以来，波斯人一直颇为艰辛、断断续续地统治着埃及。冈比西斯开了一个恶劣的头，因为他试图打破埃及祭司阶层的权力——他摧毁了埃及人的神庙，嘲笑他们的信仰，还亲自用剑杀死了神牛阿庇斯。

埃及的农夫要比其他民族更能忍受虐待，但是不能容忍对他们宗教

的褻瀆。兩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把波斯人當作不信神的壓迫者，一有機會就會起來反抗。其中，最成功的一次叛亂持續了約60年，在此期間埃及基本上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波斯人接連三次想要重新征服這個行省，但都收效甚微。一直到殘忍的獨裁者阿爾塔薛西斯·奧科斯時，他才最終鎮壓了所有的抵抗運動。因而毫不奇怪，自公元前343年以來又忍受着波斯人統治的埃及人，現在把亞歷山大當作解放者一樣歡迎。波斯人對待這個行省尤為嚴苛，因為他們和後來的羅馬人一樣，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巨型的免費糧倉，隨心所欲地以各種方式進行盤剝。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紀，埃及的貢賦額就已被定到了700塔蘭特，排在了帝國所有行省的第二位。這還不包括它須為波斯常駐埃及的20000人的軍隊所提供的軍糧。

所以，當亞歷山大到達時，各方面因素都對他十分有利。如果他能注意不去傷害當地的宗教感情——或者參加某種公共儀式以表明權力已經轉移到他手中，那就更好了——那他就能獲得全體埃及人的熱烈支持。最終，他所贏得的比預期的要多得多。起初被當作一種政治手段的行動，卻變成了一種深入內心的情感和精神體驗。毫不誇張地說，亞歷山大待在埃及的幾個月，亦即从公元前332年10月到公元前331年4月，是他人生中一個重大的心理轉折點。

从佩卢西昂出发，马其顿舰队和军队溯尼罗河而上，以庄严的队列朝孟菲斯行进。波斯驻军没有做任何抵抗。大流士的总督马扎刻斯（Mazaces）出城会见亚历山大，随行还带来了“800塔兰特钱财和所有的皇室家具”。这种殷勤服务给马扎刻斯换来了新政权中的一个行政职位。不过，当亚历山大进入孟菲斯时，发现还有一份大礼正等着他。通过征服本土的王朝，波斯国王在职位上就成了埃及的法老。现在，亚历山大打败了大流士，所以在祭司眼里他就变成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这样，在公元前332年11月14日，这位马其顿年轻人隆重地登基为法老。他们把红白双冠^⑩戴在他的头上，把弯钩权杖与连枷交到他的手中。现在，他

变成了神兼国王，亦即拉神和奥西里斯的化身和儿子；他是金荷鲁斯，强大的君主，阿蒙神所钟爱者，上下埃及之王。

可以想见，这种神示会对亚历山大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这里，奥林匹娅斯关于他的神圣出身的信念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法老信仰弥合了凡人与神灵之间的界限，把神性与王权融合到了个人的身上。无疑是在宣传部门的指导下，亚历山大的新臣民很快便把有关他出身的旧传说吸收到他们固有的神权体系中。那位幻化成蛇（圣蛇的形象？）而出现在奥林匹娅斯身边的神灵乃是涅克塔尼布，即最后一位埃及本土法老；这次结合所诞生的孩子就是亚历山大。

太过成功自有其危险之处：权力孕育着其自身特殊的孤绝状态。种种迹象表明，在伊索斯之战后亚历山大就已经开始疏远马其顿将士，而这种超人般的神性魅力的注入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他的成就早已超越了赫拉克勒斯。埃及文明总是不断激发起希腊人心中半神秘的敬畏，而如今在其古老的光辉下，亚历山大意识到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神，是某位神的儿子。希腊的传统将二者区分得清清楚楚，但埃及的传统没有。对亚历山大来说，这将会导致很有意思的后果。

在加冕仪式结束后，这位埃及的新法老向阿庇斯及其他埃及神灵举行公开的献祭。接着，为了表明不管怎样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希腊人，亚历山大举行了盛大的竞技比赛和文艺汇演，邀请了许多著名艺术家从希腊前来参与其中。他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的头衔不断增多，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导致许多严重的问题。此前，他已是马其顿国王、希腊同盟领袖和卡里亚的阿达女王的继子，而现在又成了埃及的法老。在新任的职位上，他迫不急待地强调他的统治将不同于他的波斯前任。在离开孟菲斯之前，亦即公元前331年1月，他下令至少在卡尔纳克和卢克索重建两座神庙（它们很可能都是被冈比西斯毁掉的）。然后，他顺尼罗河而下；这次是沿着西面的支流——即卡诺此支流——航行。

在这点上，他所遵循的乃是由来已久的希腊惯例。几个世纪以来，

所有的海上贸易都通过所谓的“卡诺比口”进入尼罗河，然后继续航行约50英里，穿过三角洲到达希腊人的国际商埠瑙克拉提斯。很明显，亚历山大的目的是访问瑙克拉提斯，并评估一下它作为商业中心的价值。在摧毁了提尔之后，现在他准备把东地中海的极具暴利的海上交通中心从腓尼基转移到埃及来。或许是因为地处内陆且相对孤立，瑙克拉提斯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当他到达海边，沿着马瑞奥提斯湖航行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这里是湖海之间的一条石灰岩地峡，就在法罗斯岛的对面。这里的港口的水很深，是一个极好的避风港。陆地两边的入口则很容易封锁起来以对付敌人的入侵。徐徐吹拂的海风带来了舒爽宜人的气候，哪怕在盛夏也是如此。这里没有雾气蒙蒙的沼泽，没有沙尘暴，没有疟疾。又一次地，亚历山大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位头发灰白的智者声称荷马的诗句间接提到了法罗斯岛。因此，作为他的第一道敕令，埃及的这位马其顿法老决定在此建造一座新城——亚历山大里亚，这也是后来所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最为出名的一个。⁵⁹

大概就在这时，赫格罗科斯来到了埃及，他带来了一个大好消息，即马其顿海军已经在爱琴海取得了胜利。此外，他还带来了许多基俄斯的“硬派的”寡头分子，这些人在法尔那巴佐斯控制爱琴海时一直统治着基俄斯岛。赫格罗科斯认为这些人过于危险，不能交付给联盟议事会去进行不可预测的裁决，对此亚历山大表示赞同；于是，他们便被立即驱逐到了厄勒潘提涅，那是尼罗河上游方向很远的一个地方。当然，这就等于公然违背同盟协议；不过，此时的亚历山大已经不在乎希腊的舆论了，一次程序上的非法行动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然而，赫格罗科斯所带来的最重要消息是关于雅典的。现今负责雅典城邦税收的德玛德斯（同时他是安提帕特的好友），成功说服了雅典公民大会不让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动用他们的强大舰队，因为此时的阿吉斯正在策划一场暴动。他指出，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就会平均每人失去50德拉克马，因为那些原本用于在安特斯特里亚节（一个春季的宗教节日）期间公开分发的资金，将会被挪用到海军身上。甚至连德摩斯提尼也保持沉默；他与赫淮斯

提翁之间可能保持着某种私下的联系。⁶⁰

这时候，亚历山大表达了一个很特别的念头，即到西瓦绿洲的宙斯-阿蒙神庙那里征询神谕的*pothos*（渴望）。⁶¹因为西瓦离这儿约有300英里之远，中间还要穿过热浪灼人且荒无人烟的利比亚沙漠，所以他必定有一个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亚历山大从来不会因为单纯的心血来潮而浪费掉六周甚至更多的时间。不过话说回来，在他征战的每次重大进展之前，他确实都会去征询一下神谕。他曾专门绕道去了德尔菲，戈尔狄昂的事件也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同样希望能把那块遮掩着前程的面纱揭下来。若说到文化背景，有一点很重要，即尽管“阿蒙”是埃及神灵阿蒙-拉神的希腊化形式，但西瓦神谕在希腊语世界中享有着最高的声誉。⁶²

克洛伊索斯（Croesus）曾派人征询过神谕，而在他之前——或者说根据相关的传说——亚历山大的先祖珀尔修斯（Perseus）和赫拉克勒斯也曾征询过。品达曾为阿蒙神创作过一首颂诗，题献在他在忒拜的神庙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向他求过神谕；阿里斯托芬在其可靠性上曾把西瓦与德尔菲、多多纳相提并论。此后，西瓦神谕的声誉一日胜过一日。包括斯巴达的吕山德在内，许多著名的希腊人都向它寻求指示。大体上，希腊人是把阿蒙神对应于他们自己的宙斯神，虽说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等同：雅典的“阿蒙神殿”（Ammonium）的存在充分说明了阿蒙神是如何被希腊人改造的。作为法老，亚历山大如果想要征询埃及的神谕，根本不用踏出尼罗河河谷一步——譬如，在有百座城门的底比斯^⑪即可。不过，亚历山大尽管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异乎寻常地狭隘，特别是在宗教事务上。他所想要的是可达范围内最值得信赖的希腊神谕。亚历山大可能觉得自己一直受到诸神的眷顾；但对他而言，那些是希腊诸神，而且只会通过恰当的希腊化了的方式谕告。

要进行这样的朝圣之旅，亚历山大自有其充足的理由。尽管一些现

代学者持有怀疑态度，但可以肯定，他十分渴望搞清楚有关他的神圣血统的重要疑问。如果他真的像祭司在给他加冕时所宣称的那样是阿蒙神——或者宙斯——的儿子，那神谕就应当支持他们的说法。此外，亚历山大即将进入征战的关键阶段，要是他对最终的胜利或失败毫不在意，那也未免太不合常理了。西瓦神谕会不会确认戈尔狄昂的预言，宣布他将成为亚洲未来的君主呢？还有一个问题，即有关他想在尼罗河口建造一座新城的问题；因为没有神谕的支持，没有一个希腊人胆敢进行这样的事业。最后，他还想知道杀害他父亲的所有凶手是否都已经受到惩处——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可以相互印证。如果他本人确实是刺杀行动的一员，这种暧昧的探询就足以使我们窥测到他心中的疑惧。对神的报复的恐惧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腓力那愤怒的幽魂就像奥瑞斯特斯^⑫摆脱不掉的复仇女神一样，仍然游荡在他的身边。再者，如果他被认定是神的儿子，那么根据这一事实，就不再是弑父之罪，而只是单纯的谋杀，而谋杀这种纤芥之罪对他来说根本就无关痛痒（他所犯下的杀伐何其之多）。

因此，大概在1月底的时候，他带着一小队人马往西而去，他走过的那条海岸之路后来因另一位伟大统帅和另一场更加现代战争而名垂千古。他所途经的村庄现在叫阿拉曼^⑬；在走了约170英里后，他到达利比亚边境的居民点帕莱托尼昂（马特鲁港）。在这里，他遇到了从昔兰尼来的使团，他们带着贵重的礼物，并且提出要建立友好同盟关系。亚历山大与他们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在协议中双方还就北非的小麦贸易达成了一致。在确保边境安全方面亚历山大一向小心谨慎。⁶³从帕莱托尼昂出发，他往西南方向走，在进入沙漠之后则沿着一条古老的商路前行。此时，距离西瓦还有200英里之远。

亚历山大的这段旅程既危险，又艰苦。⁶⁴4天之后，全队的饮水就便消耗殆尽，好在一场及时的大暴雨拯救了他们。之后，从沙漠南边吹来了可怕的喀新风^⑭，随之而来的沙尘暴则把所有的路标都摧毁了。亚

历山大的向导完全迷失了方向，直到看见了一群往西瓦方向迁徙的候鸟他们才得以重新上路。在2月底的时候，他们总算到达了西瓦，此时距出发之日已过三个星期了。此处的风景必定会让他们眼前一亮：遍地都是橄榄树和枣椰，随处都可听到泉眼的潺潺的流水声。⁶⁵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停下来放松一下。他径直朝神庙走去，早就听说他要来的大祭司正在那里等待。⁶⁶这位新任法老受到了传统的问候：“阿蒙之子，善良之神，两地之主。”就这样，在踏进这座至圣神殿之前，他的第一个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由于亚历山大不允许任何侍从跟着他，而他也从未透露过在这次著名的神谕咨询中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出于某种考虑祭司们有可能会这么做），他所得到的回复一定还是问题重重的。⁶⁷在走出神庙之后，面对大家的急切询问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他所得到的正是他心中所念想的。”在后来写给母亲的信中，亚历山大说自己了解到了一些秘密之事，一回国就会告诉她，而且只告诉她一个人。由于他死前再也没能踏上马其顿的土地，这些秘密也就随之进了坟墓。尽管如此，传统的说法可能也不会太过离谱。现在，亚历山大作为神之子的身份已经更加广为人知，同时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其他神谕所也纷纷支持了这一说法。如果说阿蒙神没有答应把阿契美尼德帝国给他，那至少也会告诉他，如果——或者当——他成为亚洲之主，他应当向哪些神灵献祭。亚历山大里亚的建城位置肯定也得到了认可。根据传统说法，在有关杀害腓力的凶手问题上亚历山大不得不改换一下措辞，因为他原先说的是“他的父亲”，而说神死于非命乃是对神的不敬。不过，无论亚历山大在西瓦听到了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神启的力量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而且给他将来的整个事业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亚历山大的目的就此达成，阿蒙神的祭司们也得到了相应的奖赏，于是他便离开西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先穿越沙漠，接着沿着滨海道路向东走到马瑞奥提斯湖。他原本可以选择更直接一点的路线，通过盖塔拉洼地直达孟菲斯；但这将是一段长达400英里的旅程，途中还要

穿越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无论是对亚历山大还是对1941年的隆美尔来说，这都不是一条可取的路线。⁶⁸何况，亚历山大正急着要去规划他的新城，往后有的是时间再访孟菲斯。回去的时候，国王显然已经做好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整体规划。新城将沿着地峡兴建，其形状颇具象征意味地与马其顿的军用披风十分相近。新城的规划者、此前曾重新规划过以弗所的戴诺卡瑞斯（Deinochares）说服了亚历山大采用轴对称-网格体系，即一条中央大街自东向西贯穿全城，其他街道则以直角与之相交。不过，在其他一些事务上国王有自己的主意，例如城市外围防御工事的部署、中心市场的位置以及为各种神庙预留的位置——包括献给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的圣所。

他在地峡上快步走着，手中用白垩粉做着标记，侍从和勘测员则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码头区和港口区就在法罗斯岛对岸，而小岛本身则通过一个大型防波堤与大陆相连（后来这条防波堤被叫作赫普塔斯塔狄昂¹⁵，因为它有7斯塔狄昂¹⁶或7弗隆¹⁷之长）。城市网格将以某种角度来安排，使得每条街道都能充分享受到地中海季风的便利。不久，亚历山大的白垩粉用光了，殷勤的侍从立即给了他一筐专门用作工人口粮的大麦粗粉。国王对城市规划充满热情——至于工人们对此有何说法，史无明文——哪里让他觉得满意，他就往哪里撒一把粗粉。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想给城墙做一次准仪式性的规划。不一会儿，成群的饥饿的海鸥和其他鸟群落了下来，迅速吃掉了这份意外的美餐，吃得一点儿也不剩。

极度迷信的亚历山大非常惊恐，一开始他把这事看作一个不祥的预兆。不过，那位天才的占卜师阿里斯坦德洛斯很快就消除了亚历山大的疑惧。他预言，这座城市将会有“最丰富和最有益的资源，而且将会成为各个民族人民的乳母”。这一次，他可以说是歪打正着，所有了解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国际大都会之辉煌历史的人都会完全支持他的预言。城市正式的奠基日是4月7日。在放置第一块砖头之后，亚历山大把城市交

给建造者们去继续建造，而他自己则溯流而上，回到了孟菲斯，⁶⁹在那里他又一次投身到了神圣王权的氛围当中。在卢克索、卡尔纳克和孔苏的神庙墙上，埃及艺术家都忙着刻画他们的新法老：“南北之王，阿蒙所钟爱者-拉神所挑选者，太阳之子，新锐之主，阿克山德瑞斯”，众神之一，正在举行献祭。

实际上，这种新的阿谀奉承并不局限于埃及一地。希腊人一听说在孟菲斯和西瓦所发生的事情，就马上看出可以充分利用亚历山大的地位来为自己赚取利益。在众多等候亚历山大回来的使团中，有一个来自米利都，他们带来了有关狄迪马附近的阿波罗神谕的好消息。自从在希波战争中被毁之后，这座神庙就再也没有发布过神谕。甚至连圣泉都已经干涸了。但是，随着亚历山大的到来——或者说使节们是这么说的——令人惊奇地，泉水又开始流动，而神灵也重新开始发布神谕。由于米利都人急着想为自己在爱琴海战役中支持法尔那巴佐斯开脱罪责，国王大概对他们所说的半信半疑。不过，这确实产生了很有益的政治宣传效果。阿波罗认可了亚历山大的宙斯血统，预言他将来会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没有提及大流士之死），还判定斯巴达国王阿吉斯所图谋的暴动是不会有结果的。^{70⑩}

自此，亚历山大开始对希腊本土的使节采取明显更加温和的立场。例如，他当即批准了所有在孟菲斯等候他的使节的请求。事业的成功连同他在西瓦所了解到的事情，可能使国王情绪变得宽宏了许多。不过不难看出，他也受到了伯罗奔尼撒一触即发的形势的影响。只要能防止希腊城邦发生全面反叛，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对埃及的管理有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规模、财富及其巨大的战略价值都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知道，作为行省，埃及有两大痼疾：一是民族主义者的起义，二是有野心的总督的割据自立。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消除这两大问题，其核心原则就是行政与军事的彻底分离。亚历山大尽可能地把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

交到埃及人手里——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拥戴。地方政府仍然和之前一样，由一群地区行政专员运转着。这样一来，尽管税收现在被用于偿付马其顿的军费，但它们依旧由本土官员来征收：即使埃及农夫有什么不满，他们也不会怪到亚历山大头上来。甚至政府高层也沿用着固有的体系，于是一名埃及的“州长”（nomarch）便继续以纯正的法老风格管理着上下埃及。不过，由于他既不掌握军队，也不负责税收，几乎没有获得实际权力的机会。

军事方面同样也是采用这种分而治之的体系。东西边境的防务由两名希腊人负责，其中之一是瑙克拉提斯的克莱奥美涅斯（Cleomenes of Naucratis），他还负责接收征收上来的税收。亚历山大在孟菲斯和佩卢西昂安置了马其顿的驻军；雇佣兵则仍由他们各自的军官统领，然后被派驻埃及其他地方。所有这些部队——总数约4000人——的最高指挥权分属两位（也可能是三位）将军。但即便是他们也无权指挥被留下来守卫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军分队。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防范措施，聪明人照样能立马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埃及的事实上的总督——这里所说的便是克莱奥美涅斯。他深知成功的关键在于要有现金，于是（借助他的军事兼财政官的职位）开始积聚巨额财富。他通过劫掠、勒索、粮食投机贸易和大规模敲诈活动，很快就掌握了大权，不过这一过程太过复杂且在这里关系不大，就不作赘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对此的反应。

没过多久——可能一年，至多两年——这个典型的中东式成功的故事就传到了国王的耳中。不过，亚历山大非但没有撤他下属的职，也没有指控他腐化堕落，反而默认了他地位的上升。之后，他又得到了官方的进一步认可，而他过往所有的越轨行为却被一笔勾销了。尽管克莱奥美涅斯可能为人狡诈，但是他做事十分高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政治野心。对他而言，对主人不忠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为自己赚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人也很聪明，知道要把最大的份额分给亚历山大。于是，克莱奥美涅斯就成了唯一一个持续任职到国王驾崩的马其顿总督。

（这里不包括独眼的安提柯，此人另有手段使自己无可替代）。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某种教益。⁷¹

现在，在埃及的休假结束了。原本一直在埃塞俄比亚游历，同时（相当有预见地）推测尼罗河源头的卡利斯特涅斯，准备继续履行他那更为严肃的官方职责。亚历山大先是为孟菲斯下游的尼罗河和附属运河架设了桥梁，在完成此事后他便启程回到了提尔。这时已经是4月中旬了。就在军队开拔之前，帕美尼翁的儿子赫克托尔（Hector）在一次航行中淹死了。尽管据说亚历山大私下里跟这位青年十分亲近，但一想到赫克托尔的死意味着帕美尼翁又少占了一个职位，他心中也就没那么悲伤了。当他沿着海岸行进时，有消息传来，他派驻低地叙利亚的将领安德洛马科斯被撒马里亚人活活烧死了。一次快速而凶狠的突袭就足以把这些游击队从他们藏身的达利耶旱谷中赶出来。凶手便被送出来处决了。

到了提尔城，亚历山大发现舰队正在等着他，与舰队一起的还有来自雅典、罗得岛和基俄斯岛的使节。雅典人再次请求释放他们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中被俘的同胞。这次，该请求没有受到任何驳斥就马上得到了批准。基俄斯人和罗得岛人则抱怨他们那里的马其顿驻军。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国王认可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他还补偿了密提勒涅公民在爱琴海战役中的损失，在对岸的大陆上划了一大块领土给他们。国王这时的所有举措表明，在东征大流士之前他急于尽可能地安抚希腊人。他授予塞浦路斯的各个独立君主以极高的荣誉，以表彰他们的舰队在提尔围城期间的杰出表现。

亚历山大的这项政策表现了他的外交远见，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从希腊本土传来的不利消息所迫。冬天的时候，阿吉斯及其兄弟阿格西劳斯（Agesilaus）成功争取到了克里特岛上多数城邦的支持。在离开埃及之前，亚历山大命令安福特洛斯（他从赫勒斯滂回来述职）率领一支海军特遣队前去“解放”克里特岛，并清剿该海域的“海盗”——即便没有特别指明，所谓“海盗”无疑也包括他们遇到的任何亲斯巴达的舰队。但到

达提尔城时，亚历山大听说阿吉斯已经公开反叛。他征集了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并且不断呼吁所有希腊城邦加入他的起义。然而正如人们所能预料到的那样，许多城邦要么犹豫不决，要么一心想撇清麻烦。这就给亚历山大提供了良机。现在，有100艘塞浦路斯和腓尼基的三层桨战船驶往克里特与安福特洛斯会合。接着，这支联合舰队前往伯罗奔尼撒海域，极力争取那些尚处中立的城邦以共同对付斯巴达。此外，还有传说色雷斯也出现了反叛。但是，亚历山大不想浪费任何时间或资源在希腊上；从现在起，一切全看安提帕特的了。

最后在离开提尔之前，亚历山大在行政方面做了一些重要调整。叙利亚总督梅农在就职后不久就死了，而临时继任的总督在为即将往内陆进军的军队提供补给方面的效率又无法满足亚历山大的高标准。于是，国王精心挑选一人以取代那位代总督。不过，这件事也提醒他，最好任命两名财政长官，分别管辖腓尼基和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马其顿治下的不计其数的“独立”城邦那里征集税收（或者说是“献金”）。

之所以做这些调整，其部分原因在于哈尔帕罗斯又神秘地回来了；作为亚历山大的前军需官和财政官，据传闻他在伊索斯之战前叛变了，不过他跑去希腊很可能肩负有秘密使命。（他或许给亚历山大带回了有关阿吉斯在伯罗奔尼撒活动的情报；从后来的发展来看，雅典没有参与暴动很可能跟他有关。）在他离职期间，国库由科厄拉诺斯和菲罗克塞诺斯两人共同管理。据说，是亚历山大亲自邀请哈尔帕罗斯回来的，他承诺不仅会给予特赦，而且——从表面上看，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还将使其官复原职，恢复其原有的大权和责任。⁷²

除非哈尔帕罗斯的“叛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否则很难相信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人竟会相信他人的忏悔，尤其是当事关一个负责管理庞大战利品和金银的职位时。无论真相如何，哈尔帕罗斯自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亚历山大的好意。不过，他一回来亚历山大就得为其他人另寻职位。

要是浪费了他们新得的技能，那未免有点可惜。因此，亚历山大任命他们作地区财政官，从而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当然，这就使他们成了哈尔帕罗斯的直接下属。

公元前331年初夏，亚历山大率领全军通过叙利亚向东北行进，在7月10日以后到达了幼发拉底河上的塔普萨科斯。⁷³这时正是两河流域的盛夏时节。平原上的温度已经达到43°C；对于背负战斗装备的战士们来说，这可不是好天气，他们很可能要背负很重的革制水袋（更不用说军用干粮了）。¹⁹由赫淮斯提翁指挥的先头部队已经搭建起了两座浮桥，不过为了防备敌人的攻击，浮桥的最后一段还没有建好。他们的行动受到巴比伦总督马扎欧斯（Mazaeus）手下一支有3000多人的骑兵部队的监视。大流士很清楚，亚历山大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巴比伦。这座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大城市乃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是保卫苏萨、波斯波利斯以及东部各行省的堡垒。在大流士的心目中，他的对手会选择哪条路线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知道，亚历山大的进攻凶狠、快速而且极其高效。因此亚历山大多半会沿着幼发拉底河东岸南下——就像公元前401年居鲁士²⁰所做的那样——然后他将会在库那克萨遭遇惨败。

种种迹象表明，大流士仔细研究过库那克萨之战，而且很想让这场战斗重演一遍。所以，在敌人到来之前马扎欧斯的前锋便同样地奉命撤退，临走时烧毁了所有可作粮草的庄稼。甚至著名的卷镰战车（一种极为过时的战争装备）也重新被引入到军队中，因为阿尔塔薛西斯曾用来对付居鲁士。显然，大流士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获胜的秘诀。库那克萨平原在巴比伦西北约60英里，非常适合骑兵机动，而波斯大王现在手头上就有大约34000名骑兵可供调遣。他估计，当到达库那克萨时，亚历山大的军队将会燥热疲惫，而且饥肠辘辘。到时由于马扎欧斯的焦土政策和两河流域的炎炎烈日，他们马上就会变成他那装备精良、人数占优的新军队的刀下鬼。

然而，如此美妙的幻想完全基于亚历山大会按他所设想的那样去做

，而这从来都是一种危险的假设，眼下更是愚不可及。波斯的最高统帅部一定能想到，他们的对手肯定至少和他们一样对库那克萨的溃败十分了解。亚历山大无疑是知道《长征记》的，而既然有了居鲁士的前车之鉴，他自然是不会走进这个陷阱的。此外，即使马扎欧斯不做损毁，幼发拉底河狭长的农业地带也不足以支撑他的大军。所以，当浮桥搭建好之后，马其顿军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流而下，而是朝东北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马扎欧斯一见他们离开，大为吃惊。于是，他快马加鞭，赶了440英里的路把这个消息送到了巴比伦。大流士只得抛掉第二次库那克萨之战的美梦，他必须立即转变战略。因此，波斯大王决定在底格里斯河迎击亚历山大：这是一个大胆而危险的方案，因为没人能肯定马其顿军队要往哪里去。一共有四个可能的过河点。其中，离巴比伦最近的一个是在摩苏尔，约有356英里远；而从塔普萨科斯走到摩苏尔则会稍远一些，约有371英里远。不过，越往北走，距离之比就会越有利于亚历山大。离巴比伦最远的渡口同时也是离塔普萨科斯最近的一个，其距离之比为308英里对422英里。

大流士的方案看起来策划得很好。他立即派了一支轻装侦察兵前去侦察所有可能的渡口；他们会把消息报告给马扎欧斯所统领的先头部队，然后马扎欧斯再亲自向大流士汇报。帝国军队的主力——现在或许有100000多人——将通过皇家大道北上阿比拉城，该城就在摩苏尔正东方向。这里是波斯大王所中意的战场，他希望亚历山大会选择在这里过河。然而，如果他选择另一个渡口，那么马扎欧斯及其骑兵部队就能打一场阻击战，直到由大流士亲自统率的主力军赶来，将马其顿军队消灭干净。但实际上，波斯大王别无他法，只能专注于摩苏尔的渡口。由于军队庞大，这是唯一他有望在亚历山大到达之前摆好阵型的渡口。即使这样，想要留出一点富余的时间也需极好的运气。整个方案依赖马扎欧斯、侦察队和统帅部之间的完美协作。帝国军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如期到达阿比拉。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亚历山大知道这个新战略：任何安

全方面的泄密都将是致命的。

波斯大王率领军队到达了阿比拉，准备继续向摩苏尔进军。在此期间，正沿着北线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亚历山大，很幸运地俘获了大流士的几名侦察兵。经过审讯，他们不仅全盘透露了波斯的作战计划，而且提供了有关波斯军队的规模和人员构成的详细的重要信息。（我们将会看到，亚历山大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的话是另一回事。）如果马其顿军队最初是想去摩苏尔渡口——这是很有可能的，此时就得赶紧改变路线；因此，他们转而朝北面约40英里远的阿布·瓦吉南方向而去。⁷⁴

从塔普萨科斯到高加美拉的路线

0 200 400 600 千米

—— 马其顿军队前往尼西比斯的路线，以及之后的可能路线
- - - 波斯军队前往阿比拉的路线，以及之后的可能路线
... 马扎欧斯从塔普萨科斯地区到巴比伦的路线

亚历山大于9月18日到达底格里斯河，一路上并没有遭遇大流士所预想的那种艰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不仅比幼发拉底河流域要凉爽得多，而且粮草也更富裕。亚历山大的士兵们既没有受饥饿之苦，也没有因中暑虚脱而萎靡不振。甚至渡河的危险也被夸大了许多，在传统文献所描绘的场景中，马其顿方阵在汹涌的、水深齐胸的河流中勉力而行，相互牵着胳膊以免被水流冲走。那里或许曾下过一场暴雨；但是根据现代旅行者的报告，在9月份，从杰济拉到摩苏尔的底格里斯河，其平均水深大约只有1英尺。不管怎么说，反正马其顿军队在阿布·瓦吉南没

有遇到什么抵抗。一些惊恐的侦察兵带着消息向南逃窜，于是波斯大王——他已经渡过大扎卜河，即将到达摩苏尔——又得改变他的作战方案。他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之间已经没有底格里斯河的阻隔了。马其顿军队就在约50英里远的地方。现在，他的最佳选择是找到一个适合骑兵和战车机动的开阔平原，然后把亚历山大引到那里。

波斯的侦察兵在高加美拉（戈美尔废墟）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点，这是一个位于哈济尔河和尼尼微废墟之间的村庄。大流士让军队停驻于此；他自己到平原上视察了一番，然后立即派工兵把所有的树木、岩石和碍事的土丘清理掉。不过，他没有派人去占领西北方向3英里远的那些小山丘，而这个疏忽后来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通过这个便利的瞭望点，亚历山大的侦察队随后发现并报告了大流士的所有军事部署。

在渡过底格里斯河后不久，亚历山大便遇到了马扎欧斯的骑兵小队。于是，阿里斯通（Ariston）便率领派奥尼亚的侦察骑兵前去解决这个小麻烦。波斯人转身便逃；阿里斯通用枪刺中他们的指挥官，然后割下他的头，“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把头放到国王的脚下”。随后，马其顿军队休整了两天。在继续行军的前一晚（9月20—21日，晚上9点20分），出现了近乎全食的月食。对此，一向乐观的阿里斯坦德洛斯解释说，亚历山大将“在一个月内”获得胜利。听到这话，军队就放心地再次启程了。四天之后（9月24日），马扎欧斯的骑兵又出现了。这是否意味着波斯大军已经来了呢？国王亲自率领骑兵进行了一次突袭，抓到一两个俘虏。这些俘虏把亚历山大想知道的都说了。现在，大流士停驻在高加美拉，就在小山那边不超过8英里远的地方。他的清场行动表明，他不会离开当前的营地。因此，亚历山大非常明智地让军队又休整了四天（9月25—28日）。平原上的热浪足以灼人，亚历山大希望能在尽可能凉爽宜人的天气里进行决战。

在此期间，大流士的特务试图散布消息说，如果有哪位马其顿人能杀掉或背叛亚历山大，那他将会得到丰厚的奖赏。这些消息都被截获，

并且（在帕美尼翁的建议下）受到了查禁。同时，军营周边也挖了壕沟、立了栅栏，以此加强戒备。⁷⁵也就在这时，波斯大王他那不幸的王后病故了，不是死于分娩，就是死于流产。自从公元前333年11月她与丈夫分离以来，已经过了两年，因此亚历山大或许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那样觉得她“辣眼睛”（更不用说他长远的帝王野心了）。王后的一个贴身宦官偷了马其顿军营的一匹马，逃到波斯的营地中，把这个悲伤的消息带给了大流士。

波斯大王的反应很有意思。他的悲伤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在恢复镇定之后，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来跟亚历山大达成协议。这一次他所提出的条件远比之前的更多：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所有领土；30000塔兰特以赎回他的母亲和女儿；以其中的一个女儿进行联姻，同时他的儿子奥克斯终身留作人质。虽然这一次亚历山大的决心不曾有一丝动摇，但还是把这些条款放到了军事会议的面前。作为老将们的代言人，帕美尼翁很反感自从占领大马士革以来一直带着这么多累赘般的俘虏，他认为，为什么不把这些俘虏赎出去，就此了结？至于那个老妇和两个女孩，倒是可以用来讨价还价。迄今还没有人曾统治过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这么大片国土——而现在还没开战大流士就主动提出了这些条件！最后，帕美尼翁总结说，“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会接受这份提议。”而亚历山大则回答说，“如果我是帕美尼翁，我也会这么做的。”他转身面向大流士的使臣们，告诉他们，天无二日，亚洲亦无二主。如果大流士想要保住王位，就得为之战斗。他随即拒绝了波斯的条款，而大流士也“放弃了任何进行外交谈判的念头”。⁷⁶

亚历山大尚未亲眼见过大流士的新军队，而且很怀疑他所听到的任何相关消息。他似乎认为，这支军队不会比他在伊苏斯打败的那支庞大多少，也不会比之更有战斗力。俘虏的报告以及类似的消息来源总会夸大其辞。当时，他自己的军队已经扩充到了47000人。在9月29日的黎明前，他登上了高加美拉附近的小山丘，第一次看到了对手的情况。这着实让他吓了一跳。大流士的军队几乎完全由骑兵组成，而且都是重装骑

兵。透过清晨的薄雾，亚历山大看到了无数的披甲骑士，并且其中还有来自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的精锐骑兵。粗略估计一下，在这个重要兵种上波斯与马其顿的兵力之比至少达到了五比一。由于无法召集一支称职的步兵队伍，波斯大王便完全放弃了让步兵参与一线作战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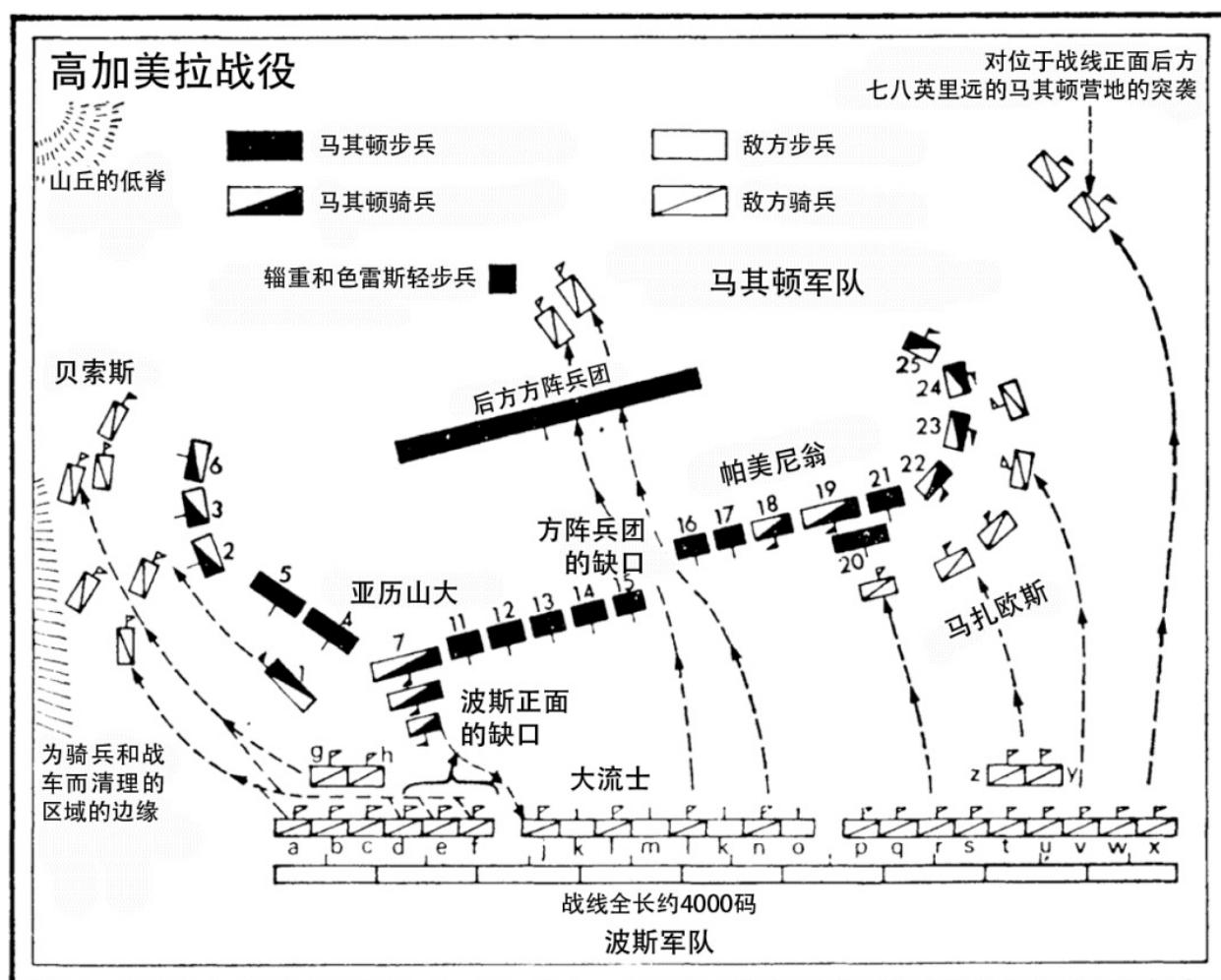
这支非同一般的军队不仅比亚历山大所预期的更强大、装备更好，其阵形也让他大为震惊。很显然，这一次大流士决心不再让马其顿军队故技重演，阻止其再次赢得像在伊索斯和格拉尼科斯河那样的胜利。在左翼，他安排了一支由巴克特里亚和斯基泰骑兵组成的强大兵力，其中还有他半数的卷镰战车。亚历山大越是研究波斯的部署，就越觉得事情不妙。因此，他召来全体将领，向他们询问意见。是现在就发起进攻呢，还是等到明天？亚历山大没有透露波斯军队要比预期的更强大，只是说可能还需要再侦察一下地形。有传闻说，战场上暗藏陷阱，其中布满了尖头木桩，此外还有许多铁蒺藜和其他类似的装置。多数将领都嚷着要立即作战，但亚历山大——在帕美尼翁的支持下——最终说服了他们。

于是，9月29日的大部分时间里亚历山大都在精骑卫队的护卫下巡视可能的战场，仔细地勘察地形和大流士的军阵。波斯人没有阻拦他。接着，（像他的英雄阿基琉斯一样，只不过原因有所不同）他回到了营地。当士兵们在吃饭和睡觉时，亚历山大却一直坐那儿，“满脑子都是波斯军队的数量”，他考虑了一个又一个的作战方案，然后一个又一个予以否定。当晚，帕美尼翁前来觐见，提议出其不意地发动一次夜袭。国王冷冷地回答说，窃取胜利只是一种廉价的诡计（他可能还会补充说，在宣传上也很不好）：“亚历山大必须光明正大地打败敌人。”此外，就像阿里安所提醒的那样，夜袭是所有作战行动中最危险和最不可预料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亚历山大故意“泄露”他有可能会发动这种袭击，于是谣言很快就传到了大流士那边。结果，波斯人枕戈待旦，一夜未眠，而到了早上便全都昏昏欲睡了。

思前想后，亚历山大终于把主要策略构思好，随后他便扎进梦中，好好地睡了一觉。太阳渐渐升高，但国王并未起床。陪侍的将领们自行吹响起床号，然后命令士兵们去吃早餐。亚历山大此时继续熟睡。最后还是由帕美尼翁把他摇醒了。现在急切需要组织战斗队形，只有亚历山大本人才知道要组成什么样。国王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当帕美尼翁对他竟能如此酣睡而大惑不解时，亚历山大回答说：“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大流士烧焦土地、夷平村庄和销毁粮草时，我确实有点抓狂；但是现在，他正准备来场大战，那我又有何可担心的呢？赫拉克勒斯在上，他所做的正是我想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言不虚，情况就如当初在格拉尼科斯河一样，其原因也是类似的；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虚张声势。大流士有34000名一线骑兵，而亚历山大仅有7250名：策略——或者说亚历山大所想——再高明也掩盖不了这一基本事实。⁷⁷亚历山大会被人侧翼包抄，而他自己也知道。这里不像在伊索斯那样有高山和大海可以保护他，而波斯人的阵线几乎比他的宽了一英里。因此，尽管基本的战斗队形保持不变，亚历山大又花了额外的精力去保护他的侧翼和后方——同时也故意让他的战线看起来比实际更薄弱一些。在右翼，他安排了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并故意让他们隐藏在骑兵部队之后。他还让两翼后退，跟主阵线保持一个45°的斜角。最后，他让同盟步兵以及其他希腊雇佣兵来保护后方。

。



右侧卫队

- 1 希腊雇佣骑兵—美尼达斯
- 2 枪骑兵—阿瑞特斯
- 3 派奥尼亚骑兵—阿里斯通
- 4 1/2 阿格里安人—阿塔罗斯
- 5 1/2 马其顿弓箭手—布里索
- 6 雇佣兵老兵—克勒安德洛斯

右翼

- 7 侍友骑兵——菲罗塔斯
- 8 标枪兵——巴拉克洛斯
- 9 1/2 马其顿弓箭手——布里索
- 10 1/2 阿格里安人——阿塔罗斯
- 11 翊卫队——尼卡诺尔
- 12 方阵——科伊诺斯
- 13 方阵——佩狄卡斯
- 14 方阵——墨勒阿格

波斯军队

左翼

- a 巴克特里亚骑兵
- b 达海骑兵
- c 阿拉霍西亚骑兵
- d 波斯骑兵
- e 苏西亚骑兵
- f 卡杜西亚骑兵
- g 巴克特里亚骑兵
- h 斯基泰骑兵
- i 战车

中军

- j 卡里亚骑兵
- k 希腊雇佣兵
- l 波斯骑兵卫队
- m 波斯步兵卫队

15方阵——波吕佩孔	n 印度骑兵
左翼	o 马尔狄安骑兵
16方阵——辛米亚斯	右翼
17方阵——克拉特洛斯	p 科伊罗——斯基泰骑兵
18希腊同盟骑兵——厄里吉奥斯	q 美索不达米亚骑兵
19塞萨利骑兵——腓力	r 米底骑兵
20克里特弓箭手——克勒阿尔科斯	s 帕提亚骑兵
21阿开亚雇佣步兵	t 萨奇亚骑兵
左侧卫队	u 塔普里亚骑兵
22希腊雇佣骑兵——安德洛马科斯	v 叙尔卡尼亚骑兵
23色雷斯骑兵——西塔尔刻斯	w 阿尔巴尼亚骑兵
24希腊同盟骑兵——科厄拉诺斯	x 萨凯西尼亚骑兵
25欧德里西亚骑兵——阿伽通	y 卡帕多基亚骑兵
	z 亚美尼亚骑兵

实际上，亚历山大这么做并不完全是迫不得已。当他独自一人在灯火明亮的营帐中思考时，仅仅是出于天才的直觉构想出了一种作战方案；在千百年后，马尔伯勒²¹在布伦亨、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都曾模仿过这种方案，除此再无其他将军（就目前所知）曾构思过它。为了减小人数上的巨大劣势，并为他的决胜冲锋创造机会，亚历山大打算把尽可能多的波斯骑兵从中军吸引出来，让他们去跟自己的侧翼防卫部队交战。当侧翼胶着在一起时，他就会猛烈地朝大流士的已经变得薄弱的中军发起进攻。当然，这种方案需要把时间掐得恰到好处。亚历山大没有多余的骑兵可以挑动大流士。波斯大王本人必定会主动出击，必定会禁不住那看似薄弱的侧翼的诱惑，发起大规模的侧翼包抄。此外，决胜的一击必须在合适的时候发起。“如果他冲锋得太早，其攻势就容易被挫败；而如果他进攻得太晚，其侧翼就可能崩溃，到时连重骑兵都得为活命而拼死一战。”⁷⁸

双方的统帅都做了战前演讲，⁷⁹并且各自的演讲都包含了有趣的神学的一面。大流士一边向密特拉祈祷，一边对他的军队强调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他对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的描绘看起来颇不寻常，很像后来波斯人对愤怒种族恶魔的谩骂（这可能实际影

响到了库尔提乌斯的叙述）。亚历山大在身穿白袍、头戴金冠的阿里斯坦德洛斯的陪同下，向塞萨利骑兵和同盟步兵——注意，不是向马其顿部队——发表了长篇的激励演说，祈求诸神“如果他真的是宙斯的后裔，就让他保卫和增强希腊人”。这时是公元前331年9月30日上午。前奏结束后，马其顿和波斯的军队开始向前行进，双方都小心翼翼，明显不愿接战；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最终这场战斗“让亚历山大有机会占有从幼发拉底河到兴都库什的整个波斯帝国”：这是他的军事杰作，无论谋划还是指挥。

和以前一样，马其顿军队的左翼在行进中逐渐往后形成一个斜角，以此引诱由马扎欧斯指挥的波斯右翼过早地投入侧翼的战斗。与此同时，波斯左翼——由巴克特里亚总督、未来的波斯大王贝索斯指挥——远远宽过亚历山大的阵线，以致亚历山大及其侍友骑兵几乎正对着大流士的指挥中心。双方都不想主动出击：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他已经了解到了对手“斜线式”前进的秘密——一直缓缓前进，直到他们快到波斯人为战车和骑兵清理过的那片地区的边缘。总得有人先动手，最终这个人是大流士。由于担心这样下去会走到危险的崎岖地带，他命令贝索斯向亚历山大正在前进的右翼发起进攻。

这正是亚历山大所期待的一步。一旦贝索斯的骑兵全力投到战斗中，国王就算好时间，不断从他深厚的侧翼卫队那里调兵增援。为了应对这持续增长的压力，贝索斯调来一个又一个的骑兵分队，决心现在就突破或包围亚历山大的侧翼；他大概还没意识到马其顿骑兵后面还有6700名雇佣兵正等着他。终于，亚历山大这支不超过1100人的骑兵部队，缠住了十倍于他们的波斯重装骑兵，并坚持了相当久。在此期间，大流士为了缓解压力，派出了他的卷镰战车，不过事实证明这总体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亚历山大安置在主力部队前面的轻装部队不断把标枪掷向拉战车的马匹，当战车驶过的时候就刺杀驭手，从而使战车部队出现混乱。战场上到处都是被削掉的脑袋和四肢，这个场面后来成了希腊罗马演说家的极好题材；不过，训练有素的方阵队伍敞开了大口，幸存者被亚

历山大的马夫围起来，这时翊卫队一些敏捷的士兵也主动过来帮忙。

现在，波斯两翼几乎所有的骑兵都在作战。帕美尼翁正拼死抵抗马扎欧斯的进攻，而亚历山大刚刚把最后的巡逻骑兵也派出去对付贝索斯。在这关键时刻，国王敏锐地发现了对手的一个薄弱点，可能只是一时在大流士中军左侧露出来的小缝隙。机不可失。亚历山大召集剩余的所有部队组成一个巨大的楔形阵发起了冲锋。楔形阵由侍友骑兵打头，亚历山大还亲自统率其中的皇家骑兵分队。其后还有七个分队，连同翊卫队和其他所有尚未交战的方阵兵团，再往后轻装部队也跟着发起了冲击。

侍友骑兵穿过薄弱的波斯中军，径直冲向大流士，击溃了他的皇室骑兵和希腊雇佣兵。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分钟内，战局完全逆转了过来。还在全力与亚历山大的右翼作战的贝索斯，突然发现自己的侧翼危险地暴露在正在冲锋的侍友骑兵面前；他与大流士失去了联络，害怕亚历山大的楔形阵随时会绕到后方把他包围。因此，他很明智地下达了撤退的号令，开始把部队撤出来。同时，大流士被亚历山大的骑兵和步兵逼入绝境，他眼见自己有被杀的危险，便像在伊索斯时那样逃离了战场。这一次，他勉强赶在包围圈合围之前跑了出去。就在这关键时刻，亚历山大收到帕美尼翁的紧急报告，说左翼的战斗十分惨烈；传令官可能在国王率领侍友骑兵发起冲锋之前就被派出来了。^{②②}

帕美尼翁的塞萨利骑兵和正在冲锋的方阵兵团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一群印度和波斯骑兵立即冲进了这个缺口，大概其最初的目的是想抄袭帕美尼翁的后方。然而最后，可能由于冲得过猛，他们既没有左转也没有右转，而是继续向前冲破了后备步兵，朝亚历山大的辎重营发起了进攻。在劫掠了一会儿并释放了一些波斯俘虏后（王太后很明智地决定继续安坐不动，直到局势变得明朗为止），他们又被赶了出来。在往回撤时，他们冲向了亚历山大及其骑兵队伍，挑起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在这场混战中，至少有60名侍友战死，而亚历山大本人也是

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

不过此时，波斯的整个战线正在迅速崩溃。同样，崩溃的关键因素又是波斯大王跑了。大流士驾着战车，穿过平原，朝阿比拉方向逃窜，在身后卷起了无数的烟尘。马扎欧斯一看见他逃跑，就立即停止了跟帕美尼翁的长时间殊死搏斗。在遥远的另一侧，贝索斯早已开始相对有序地撤退。帕美尼翁的塞萨利骑兵原本寡不敌众，打得十分艰苦，现在却可以冲出去追击落败的敌人了。⁸⁰不过，亚历山大杀死或俘虏大流士的企图又一次落空。当帕美尼翁虏获波斯人的辎重以及大象和骆驼时，国王却往尘土飞扬之处疾驰而去，还指望着能追上大流士的人马。当夜幕降临时，他让疲惫不堪的士兵和马匹休息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又继续追到了半夜。马其顿军队连夜追赶约75英里，终于在黎明时分进入了阿比拉，却发现大流士已经走了。不过，和在伊索斯一样，他把战车、弓以及不下4000塔兰特的钱币留了下来。这倒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安慰奖；再说不管怎样，波斯大王的声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相对而言他个人的逃窜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已经一分为二，它的统治者的权威也已荡然无存。如果亚历山大此时宣布自己取代大流士成为波斯大王，那么除了贝索斯还有谁会否认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呢？

马其顿的情报人员很快就整理出了有关波斯大王逃窜的情况。他和随从们匆忙撤到了阿比拉，甚至都顾不上摧毁逃跑时所经过的桥。不久，他们跟贝索斯及其巴克特里亚骑兵、2000名忠诚的希腊雇佣兵和皇家卫队的少数幸存者在这里会合。这位战败的国君把他们聚集在身边，在继续逃亡之前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正确地预言说，亚历山大将会直扑伊朗南部的富庶城市，“因为那里有人居住，道路也便于运送辎重，此外巴比伦和苏萨无疑就是这次战争的奖赏”。他还说，他本人打算翻过山岭进入米底和东部行省，从那里再招募一支军队。让马其顿人去尽情地搜刮金银，尽情地在妾婢和奢华中消磨时光：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容易削弱一支劲旅了。

有人或许会怀疑，大流士的听众是否会认真对待这种辩解，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他们遭遇了一次惨重而耻辱的失败，^{②③}这是任何言语都难以抚慰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放弃巴比伦都将会再添耻辱。然而，希腊人依旧忠心不二；甚至连贝索斯现在都不敢完全抛弃大流士。作为名义上的领袖，他还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午夜过后不久，这些波斯大军的残兵败将一起从阿比拉出发，往东翻越亚美尼亚山脉，最后从北进入埃克巴塔那。大流士在此稍作停留，以便其他散兵能与之会合。他做了一些零星的努力来重新组织和武装他们；同时，他也给巴克特里亚和其他高地行省总督和将领发去明显充满忧虑的公文，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但是，高加美拉一役摧毁了他的勇气，而他再也没能恢复过来。⁸¹

① 至少有4000雇佣兵在巴比伦和大流士会合，因而是可以直接服役的。在伊索斯之战后，约有12000多人整齐有序地撤退，并且沿着腓尼基海岸到达特里波利斯港；而把他们从爱琴海运过来的舰队仍然停泊在那里（Arrian 2.13.2-3；Diod. 17.48.2；QC 4.1.27）。他们登上所需船只并烧毁其余的以免其落入亚历山大手中，然后航行出海。马其顿叛徒阿敏塔斯带着4000人到达塞浦路斯，在那里他争取到了一些地方驻军（Diod. 17.48.3；QC 4.1.27）；从那里又到了埃及，但在孟菲斯他连同整支军队被波斯驻军全部消灭（Arrian 2.13.3；Diod. 17.48.2-3；QC 4.1.29-33）。这是大流士的希腊军队中唯一叛变的一支。（作为一个马其顿人，阿敏塔斯属于非常特殊的一类人。）其他大多数都尽忠到底，即便波斯大王已经明显不可能翻盘了。——原注

② 德卡德拉克马（decadrachm）即十德拉克马之意。

③ 墨尔卡特（Melkart），意为“城市之王”，是提尔城的守护神并被当作提尔王族的祖先。

④ 埃及和塞浦路斯（正如亚历山大对他下属指出的那样）尚在波斯的控制之下。斯巴达已经处于反叛的边缘，而雅典则只是由于恐惧而保持着观望态度，并不是因为她有丝毫的忠诚。如果马其顿军队不拿下提尔城就朝内陆前进，那么大流士就能毫不费力地重新夺回整个腓尼基海岸，之后从海上对希腊发动全面进攻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不过，亚历山大感到惊慌的事未必会触动到他的部将

）。另一方面，倘若提尔城沦陷，腓尼基海军由于丢了基地，很快就会向胜利者投降——随后发生的事情自会证明这一精准的预判。——原注

- ⑤ 库尔提乌斯（Curtius, 4.4.3-4）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 17.41.5）都记载说，在这攻守期间，有一只巨大的海怪从深海中出现并撞到了防波堤上，不过没有造成任何损坏。提尔人和马其顿人都把这当作吉兆，前者为了庆祝此事甚至彻夜狂欢，当第二天早晨要上船时，他们依然半醉半醒，头上戴着花环。——原注
- ⑥ 希拉姆（Hiram），传说中提尔城的国王，统治年代可能在公元前980—前947年。
- ⑦ 菲拉勒珊德尔即“爱亚历山大的”之意。
- ⑧ 原文为 Knox Bible，是一个天主教圣经英译本，故中文采用思高本，内容与常见的和合本有所不同。提洛即提尔，和合本中为推罗。
- ⑨ 亚历山大在征战腓尼基的过程中伤亡必定非常惨重，而且肯定比宣传所披露出来的要严重得多，因为（举个例子）在提尔之战中，他们公开承认的马其顿军队的伤亡人数仅有400人。所以，在继续前进之前，他派安德洛美涅斯（Andromenes）之子阿敏塔斯带着10艘三层桨战船回到佩拉，以便再招一些新兵（Diod. 17.49.1; QC 4.6.30-31）。当地不缺自愿者和雇佣兵；但是，亚历山大军队的主力仍是方阵，而且只有马其顿人——至少在那时——才有资格填补方阵中的空缺。——原注
- ⑩ 古埃及法老的王冠，是由下埃及国王的红冠和上埃及国王的白冠组合而成的。
- ⑪ 埃及的底比斯和希腊的忒拜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即 Thebes，但埃及的 Thebes 国内可能更多译作“底比斯”，而希腊的则更多是译作“忒拜”。译者遵从这种习惯，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区分。
- ⑫ 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子。阿伽门农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伙同奸夫谋杀后，他为父报仇，杀死母亲，最后受到复仇女神的惩罚。
- ⑬ 二战期间阿拉曼战役的发生地。
- ⑭ 喀新风（khamsin），指3月底到5月初从撒哈拉沙漠上吹来的席卷埃及的热南风。
- ⑮ Heptastadion, 即七斯塔狄昂。
- ⑯ 斯塔狄昂（stade），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180米。
- ⑰ 弗隆（furlong），英国长度单位，约合201米。
- ⑱ 不过，阿吉斯国王在伯罗奔尼撒的活动还是让亚历山大大有所担忧。安提帕特所

送来的援军之少——只有400雇佣兵和500名色雷斯骑兵（Arrian, 3.5.1）——也足以说明这位将军对当前的局势并不乐观。——原注

- ①⑨ 亚历山大显然预料到了此次行军军需供应的困难：他命令叙利亚总督阿里马斯（Arimmas）先行为军队设立好补给站，并且当总督没能提供充足的粮草时便将其撤职（Arrian 3.6.8，这段文字描述了从提尔到塔普萨科斯的旅程）。在哈马-阿勒颇地区还有一段60英里的无水地带。——原注
- ②⑩ 小居鲁士，大流士二世之子，曾率希腊雇佣军与其兄阿尔塔薛西斯争夺王位，最后在库那克萨战役中被杀，希腊雇佣军成功撤回希腊。详情可见色诺芬的《长征记》（*Anabasis*）。
- ②⑪ 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在1704年的布伦亨战役中大败法国与巴伐利亚联军。
- ②⑫ 后来，这件跟帕美尼翁相关的事情，被卡利斯特涅斯和其他人改写得不太可信。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被说成“反应迟钝且很不称职”；他“嫉妒而且憎恨”亚历山大，他的报告——可能在国王确定发起冲锋的时间之前就已经预先安排好了——无耻地向亚历山大求援，从而耽搁了亚历山大太长时间，以致他没能抓到大流士；参看 Marsden, p. 62。——原注
- ②⑬ 亚历山大不仅在敌人所选择的战场上打败了一支远比他强悍的军队，而且自身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他有据可查（P. Oxyrh. 1798）的最高伤亡人数是1000名士兵和200匹马（其他人的估算在300 [QC 4.16.26] 和100 [Arrian 3.15.6, 可能来自托勒密的记载] 之间），而根据同一史料，波斯的损失则约有53000人。——原注

第八章 亚洲之主

戈尔狄昂的神谕预言亚历山大将成为“亚洲之主”，即波斯帝国的国王和大流士的合法继承人。正因如此，在通信时，他便要求大流士这么称呼他，虽然那会儿有点过早。不过在高加美拉之战后，这一要求看起来就比较理所当然了。正如普鲁塔克所言，“人们认为波斯帝国已经彻底瓦解了”。亚历山大让将士们知道了他的梦想，于是庆贺胜利时，他们便欢呼他为“亚洲之主”。这样，高加美拉战役就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亚历山大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未把他的民主宣言当回事的希腊人认为，这个新进展完全符合亚历山大的品性。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一直都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勃勃的僭主，而现在他更加证实了他们的判断。

然而，此战对马其顿军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此以后，亚历山大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甚至到了兵变和谋杀的可怕程度。国王明显倒向了东方专制主义，这对马其顿保守贵族们震动极大。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在亚洲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应当带他们回国去，越快越好。帕美尼翁很直率地告诉他，他应该把目光转回到马其顿，而不是盯着东方。但是，亚历山大的征战视野仍在拓展，对他来说马其顿已经变得既渺小又遥远。

国王自己也深知当前的困境。他不会，也不能放弃荣耀与帝国之梦，正是这些梦想推动着他前进；但是，他必须想办法安抚那些最激烈的

反对者。在离开阿比拉之前，他慷慨地把“财宝、地产和行省”分配给他的高级将领。同时，由于迫切想得到希腊人的支持——这毫不奇怪，毕竟伯罗奔尼撒已经反叛了——他写信告诉他们，所有的僭主政治都将废除，他们从此可以在自己法律的统治下生活。这一举措似乎既美好又高尚；不过，国王私下里给安提帕特的指示可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怎样，西库昂、佩勒涅和美塞尼亚的僭主们仍旧在位；此后，当所有的危险都过去之后，拿安提帕特做此事的替罪羊就可以了。但是，亚历山大却兑现了他要重建普拉塔亚的承诺，这大概是对忒拜复兴的一种防范吧。¹



不过，随着他对波斯本土的入侵，国王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难题才刚刚开始。他迄今一直能宣称自己是一位解放者。尽管他在腓尼基沿岸施行过一些纯粹恐怖性质的政策，但是在小亚细亚和埃及，这一口号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在巴比伦这个曾经独立的骄傲城市，这一套说辞可能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一旦他开始踏上前往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道路，他就必须想出一个不同的口号来。亚历山大没法说要把波斯人从

他们自己人那里解放出来。所以，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亚历山大很快就陷入到矛盾之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时期他寄回国的公文在谈到远征的动机时，更强调复仇而非解放。他对马其顿军队无疑也是采取同一宣传政策。

然而，如果亚历山大想防止身后出现麻烦——更不用说做大流士的继承人了——他就必须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安抚波斯的贵族，而这又会使得马其顿人疏远他。许多伊朗显贵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与侵略者合作。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以波斯祭司阶层玛哥斯僧为首的抵抗分子，他们对亚历山大的敌意主要来自宗教，因为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纯粹就是一个异教侵略者。他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他不是具有阿契美尼德血统的波斯贵族，甚至不是出自“七大贵族家族”。在这群权贵眼里，他登上王位靠的是武力，而且是赤裸裸的武力。他们的宣传话语很自然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普通的篡位者，一只被派来摧毁波斯的凶残的狮子。

亚历山大曾在亚里士多德门下学习过玛哥斯僧的教义，他似乎是知道这些反对意见的。如果他想让自己被认可为波斯大王，就需要在民族的宗教情绪和王室的观感方面做非常大的让步。他唯一使自己成为合法的阿契美尼德国王的机会是除掉大流士，然后再娶一位王室成员：因此，他很认真地奉养王太后。²尽管斯塔泰拉（Stateira）^①死得不是时候，大流士又第二次成功脱逃，让他尽快与王室联姻的计划未能实施，但是他的成为阿契美尼德国王的雄心终究会导致他与同胞之间关系破裂。比如说，如果不遵循波斯的宫廷礼仪，他是很难登上波斯的王位的。波斯大王身边有无穷无尽的禁忌和宗教仪式——这跟马其顿君主与贵族之间轻松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想要把这些角色合而为一终究是不可能的，他迟早得在其中做出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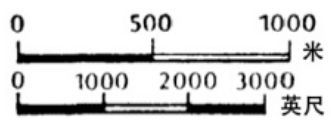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只在阿比拉待了一两天。他安葬了己方的阵亡将士，对波斯人则弃之不顾：起程在即在这时是一个绝佳理由。菲罗克塞诺斯率领

一支部队先行前往苏萨，负责接受该城的投降并保卫好城中的财宝。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自己则渡过底格里斯河，朝南边300英里远的巴比伦进军。他所走的路线经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肥沃的地带：这片地区灌溉沟渠纵横交错，完全不缺水源和阴凉地。在门尼斯、现在的基尔库克附近，亚历山大遇到了一个沥青湖，还有一口原油或石脑油油井。当地居民一心想要展示一下这种液体的神奇性质。有天晚上，他们把它们洒在那条通向亚历山大营帐的街道上，接着把火炬扔到地上，于是“火焰飞速地从这一头窜到了另一头，整条街道都变成了一条火龙”。³

这时候，亚历山大和马扎欧斯正在私下里极力讨价还价；此人在高加美拉战役后回到巴比伦，继续做他的总督。亚历山大想要该城和平投降，而马扎欧斯则希望在新政权中维持原有的职位。在南下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临时协议。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并不信任他的前对手，所以他以战斗队形接近巴比伦，随时应对对方的背叛或突袭。对那些沿着幼发拉底河长途跋涉的灰头土脸的士兵来说，巴比伦看起来想必就像平原上的一个飘渺不定的海市蜃楼：高高的白色门廊，繁茂的绿色植物和带雉堞的城墙与塔楼，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梦幻般的远景。巴比伦大致成方形（每一边约有15英里长），并且被河流和游行大道分割成两部分。其外围的防御城由泥砖加沥青构成，城墙顶上十分宽阔，可以容得下两辆驷马战车并排行驶。

巴比伦平面图

- A - 伊施塔尔门
- B - 新巴比伦宫殿
- C - 塔庙



幼发拉底河



这时，一支绚丽多彩的队伍正吹着喇叭，打着铙钹，顺着皇家大道出城迎接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倒戈的马扎欧斯骑着马走在前头，正式把城市、堡垒以及财宝交到国王的手中。其后是巴比伦的首要公民，他们带着各色牲畜作为献礼：其中不仅有马和牛，还有关在笼中的狮子和豹。再往后还有唱着庄严圣歌的巴比伦祭司团体，最后则是装备华丽的波斯皇家骑兵护卫队。现在，亚历山大登上一辆战车，并让士兵在战车边上围成一个空心队列（他似乎仍然怀疑对方设有某种圈套），然后以威严和得胜的姿态进入巴比伦。整条道路都撒满了鲜花和花环。为表对征服者的敬意，银制的祭坛上堆着高高的各式香料，现在正香气四溢地燃烧着。当亚历山大驶到那座高大的有着公牛与龙之纹饰、装饰着华丽的黄金和青金石的伊什塔尔门时，胸墙上的人们便大声欢呼并向他抛洒玫瑰花瓣。

非常讽刺的是，当两百年前（公元前539年10月29日）居鲁士大帝进入巴比伦时，他同样也作为解放者受到了马尔杜克（Marduk）的祭司们的欢迎。不过在公元前482年，由于民族主义者的反叛，巴比伦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所修建的防御工事被拆毁，最糟糕的是，他们有300英尺之高的七层金字型塔庙（ziggurat）也被拆毁了，其上还建有马尔杜克的神庙埃萨吉拉，即所谓的“开天辟地之所”，而神庙在被拆毁之后就再也没能重建起来。至于那有18英尺高、近800磅重的黄金神像，则被薛西斯的军队运走并熔铸成了金块。后来，巴比伦的城墙得以重建，埃萨吉拉却一直是个失落的记忆。亚历山大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承诺将会重建塔庙和神殿——马扎欧斯必定将这一承诺传遍了全城。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把自己表现成为一个破除波斯之不义与压迫的解放者。

不管怎样，这些快活的、喜爱奢华的巴比伦人考虑到（理由很充分），合作总比遭受提尔城的命运来得好，于是便想方设法让马其顿军队度过了一个足以让他们终身难忘的月假。军官和士兵都住在豪华的私人宅院，在那里他们绝不缺乏美食、好酒和女人。无数热情的良家女子加

入了巴比伦的名妓群，其中还包括上层人士的女儿和妻子。（餐后的脱衣舞似乎非常流行。）她们会向客人们展示通常的观光景点，包括传说中的空中花园——这是一座石阶式的树林和灌木园，是亚述国王为他的妻子修建的，她是伊朗人，很怀念家乡的森林和高地。^{4②}

军队在纵情声色，卡利斯特涅斯在监督对巴比伦祭司的天文记录的抄写（如果这些记录真的能回溯31000年，他必定会忙得不可开交），此时国王却全身心投入到了管理问题当中。他的第一步并且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批准马扎欧斯继续担任巴比伦的总督，享有铸造银币的传统权利。不难想象帕美尼翁和马其顿的保守派们会怎么看待这项对前敌人的重新任命；但这是非常现实的一步。从现在起，如果亚历山大想要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他就必须取得波斯贵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不仅仅要压制潜在的反对势力。伊朗的贵族家庭可以为帝国提供传统的管理人才，并且亚历山大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更不用说有双语能力）的文职官员可以取代他们。

从这一角度看，对马扎欧斯的任命乃是特别精明的一招，因为这位总督有一个巴比伦妻子，而且有极强的地方关系。这样，亚历山大设法改善了他在波斯人心中的形象，同时在面对巴比伦的民族主义者时，他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解放者。不过，他也不会愚蠢到把大权全部交给马扎欧斯。巴比伦的驻军指挥官是一个马其顿人；负责行省征兵和扩军工作的也是如此。马扎欧斯可能有权发行钱币，但无权征税，这项职责属于哈尔帕罗斯手下的一位马其顿财政官员。也就在此时，亚历山大第一次对巴比伦宗教和占星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或许他错误地把埃及的萨拉匹斯 [Sarapis] 等同于马尔杜克，因为后者有时指的是萨里-拉布 [Sarri-rabu]，即“大王”）。他下令重建马尔杜克的神殿和塔庙，最初可能是出于纯粹的政治考虑；但没过多久，他似乎就对这些迦勒底祭司有了发自内心的敬重。无论这些人规定了什么样的仪式，他都照做不误；而当军队继续前进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加入了他的扈从队伍。⁵

苏萨这个波斯大王的宏伟的第二首都坐落在巴比伦东南约375英里、靠近波斯湾的一个地方。它所在的平原极为肥沃，但这块平原为群山所环绕，因此有九个月的时间都热得像火炉一样。斯特拉波曾写道，“当太阳最热的时候，中午连蜥蜴和蛇都不可能在城市的街道中穿行而不会被烤焦”。亚历山大之所以在巴比伦呆了一个月，原因之一就是等苏萨凉快下来。到了11月中旬，他终于启程了，此时风向已经转为南风或东南风，而且开始下雨了。^③当军队在赶路时，阿敏塔斯带着大批援军追了上来：共有1500名骑兵和不下13500人的步兵，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在马其顿本土招募的。另外还有50名新的皇家侍从：国王肯定竭力想确保国内不出现麻烦，不过后来这些侍从本身就成了一个麻烦。

新部队的到来促使亚历山大停驻了一两天，以便在指挥架构上做一些革新。增援的步兵仍按地域原则分配到各个方阵兵团中去，同时还组建了第七个方阵兵团。但是对于骑兵，亚历山大则尽量打破所有地域编组模式。各个骑兵中队现在分成两队（*lochoi*），各有一名队长，然后在随机的、非地域的基础上进行重组互换。未来的升职将是根据战功而非资历——这使国王得以更加牢固地掌控所有的军事任免。这种改组加上在巴比伦的赏赐表明，亚历山大已经遇到了将士们明显激情消退的局面——这已经是比较缓和的说法了。这次重组有两个目的：提高效率和忠诚度。狄奥多罗斯说：“他让整支军队完全忠于它的统帅、服从他的指挥，并大大提升了效率。”其中的优先次序很能说明问题。

当亚历山大还在去往苏萨的路上时，菲罗克塞诺斯派人向他报告，该城已经投降，所有财宝都得到了保护。类似地，马其顿军队又受到了皇家级别的欢迎。总督阿布利特斯（*Abulites*）派其子护送亚历山大的军队到科亚斯佩斯河，而他本人则亲自在那里守候着。他的见面礼包括骆驼、单峰驼和12头大象：这时候，马其顿的辎重部队就像是一个流动的动物展览队一样。亚历山大一进苏萨城便立即被带进王宫，然后通过饰有生动的釉面砖浮雕的立柱大厅——浮雕上刻有带角的狮子、带翅膀

的狮身鹰首兽以及一长队的衣着华丽的波斯弓箭手——来到了金库。在这里，阿布利特斯正式把40000—50000塔兰特的金银条块连同另外的9000塔兰特的波斯金币交给亚历山大。如此惊人的宝库远远超出了亚历山大的想象。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头。金库中还有超过100吨的来自赫尔密俄涅的紫色布匹，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其颜色依旧鲜艳而没有褪色。薛西斯从希腊抢来的所有战利品都藏在这里，包括著名的“僭主刺杀者”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盖通（Aristogeiton）的组像在内。附属国送来的作为效忠的信物、装有尼罗河和多瑙河河水的坛子也收在此处。此外，金库中还有宫殿自身的陈设物品、金制盘碟和珠宝：当亚历山大坐下来与侍友们一块进餐时，其场面就像更早时候在《以斯帖书》中所记载的那样：

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

事实上，如果大流士希望这些炫目的财富能让亚历山大分心，以便后者能更充分地准备下一场战斗，那么这个诱饵真是再合适不过了。⁶

然而，亚历山大的雄心远在单纯的战利品之外，对他来说这些东西从来都没什么诱惑力。在视察过金库之后，他的第一个行动——这无疑是个精心谋划的姿态——便是坐到大流士的带有著名的黄金华盖的宝座上去。他知道，除合法的在位者以外，对其他人而言这就是在找死。年老的科林斯的德玛拉托斯见到这一幕喜极而泣，随后不久便去世了，就此永别。尽管很有象征意义，但这事还带有一点意料之外的喜剧色彩。大流士身材高大，而亚历山大则略低于平均身高；当亚历山大坐下来时，他的双脚竟够不着御用的脚凳。

有个侍从非常机敏，他迅速把脚凳拿走，然后换上一个桌子。站在一旁的一个波斯宦官看见了，便开始号啕大哭。亚历山大问他怎么了，他解释说这是他的主人大流士先前吃饭时的御用桌子。亚历山大担心冒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宗教禁忌，准备把桌子重新移走，但聪敏精明的菲罗塔斯指出，他的行动虽然是无意的，却有一种预兆性的意义。于是，亚历山大便以一种真正的圣经式的行事风格，把敌人的桌子当作自己的脚凳。于是，那个桌子就留在了原地。

差不多同时，亚历山大又犯了一个甚至更加可笑的过失，这个过失恰恰说明波斯上层与马其顿风俗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作为礼物，奥林匹娅斯派人把大批的紫色布匹送给她的儿子，陪同的还有织布的妇女。而亚历山大则将这些悉数献给了波斯的王太后希绪冈比斯。他跟她说明，如果她喜欢这些东西，这些妇女可以教她的孙女自己做。这种有点幼稚的好意被希绪冈比斯理解成了最具恶意的侮辱。单单这种让皇家女子做卑贱之事的想法，就足以使阿契美尼德的王太后怒不可遏。她认为，国王一定是在嘲笑她现在的卑屈地位。结果，亚历山大花了很大的工夫进行解释，又做了无数的诚恳道歉，方才修复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亚历山大向她保证，他自己的姐妹也会帮忙织布，而希绪冈比斯很可能觉得这话只不过是唬人的推辞而已。⁷

阿敏塔斯汇报说，希腊现在的局势非常不妙。他告诉亚历山大，斯巴达的国王阿吉斯的势力还在扩张，泰格亚、厄利斯、阿卡狄亚以及其他一些城邦都倒向了他。他现在的全部兵力已经有将近30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职业雇佣兵。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色雷斯总督门农也决心反叛——这个时间点绝非巧合，明显是为了响应阿吉斯的行动；而佐皮里翁（Zopyrion，本都地区的总督）则在一次完全未经批准的斯基泰远征中战败被杀。因此，安提帕特现在是腹背受敌（而且一定会咒骂国王把那么多他迫切需要的一线部队都调走），后方的局势十分危急。

亚历山大很清楚现在的情况，也在尽可能地帮助他处境艰难的摄

政王。他派现任的叙利亚、腓尼基和奇里乞亚监察长美尼斯（Menes）带着3000塔兰特回到地中海海岸，命令他无论拉凯戴孟之战需要多少钱，他都要按需偿付安提帕特（显然，亚历山大预计这会是一场持久战）。同时，国王也在设法使雅典保持中立：他对斯巴达-雅典的和解的担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特意把僭主刺杀者的组像送回了雅典，作为波斯的战争赔偿（这一举措不会带来任何损失，反而可以加强他作为同盟统帅的地位）；同时，他还把巨额的钱财（或者说贿赂）送给雅典的许多显要公民，金额从50至100塔兰特不等，其中包括福基翁和色诺克拉特斯，不过两人都拒绝了这项馈赠。

很讽刺的是，亚历山大原本不必如此忧虑，也不必如此破费。可惜他不知道，色雷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危机已经解决了。安提帕特全力出击以对付门农，也就是要叛乱者摊牌；门农最不希望的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于是他欣然与这位摄政大臣谈判，结果是他可以继续做总督。（他必定是个狡猾的机变之人，因为他把持着这个职位一直到公元前327/326年奉命率领一群援军到印度去为止——那时他依然有着不错的声名。）而在麦伽罗波利斯城外，斯巴达国王阿吉斯战死在了安提帕特的步兵的手中——他英勇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仍然没有得到雅典的任何援助；其时间大约是亚历山大本人在高加美拉打败了大流士的时候。

不过，在决战开始之前，阿敏塔斯就已经离开希腊了。亚历山大可能在到达波斯波利斯时才会知道阿吉斯战败和死亡的消息——只是他那敏感的军事自尊心是不会允许他承认安提帕特的功绩的，哪怕后者的功劳如此之大。他宣称，“将士们，当我们在此征服大流士时，远在天边的阿卡狄亚爆发了一场老鼠之战。”一直到公元前330年夏天，安提帕特有关希腊战役（和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大战死在意大利）的详细报告才最终送到亚历山大那里。⁸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最显著的区别就在这种传递关键信息的时间差上。

现在是1月份，各个山口都是寒风刺骨。凡是从情理考虑的人（这

也包括了大流士）都可以预测亚历山大现在将会做些什么。横亘在苏萨和伊朗的两大行省波西斯与米底之间的，是巨大的白雪皑皑的扎格罗斯山，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5000英尺。可以可靠地假定，马其顿军队将会在苏萨过冬。而当春天到来时，他们将会再度出发：要么朝东北方向去埃克巴塔那，要么往东南方向去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但是和以往一样，亚历山大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专门研究了冬季作战，打算充分利用他在高加美拉的胜利：这意味着不会绅士般地给大流士三个月的喘息时间。

1月中旬，亚历山大离开苏萨，前往波斯波利斯。^④唯一一个事先猜到他的意图的波斯人是总督阿里奥巴扎涅斯（Ariobarzanes）。自高加美拉之战后，这位果敢而精力充沛的总督便召集了一支有25000人的步兵部队，另外还有700名骑兵。一听说马其顿军队已经动身，阿里奥巴扎涅斯就占据了被称为苏西亚关的一个幽深峡谷，在此建造了一道防御墙。去往波斯波利斯有两条路线，这是其中相对直达的一条。如果亚历山大正面进攻这个峡谷，那他肯定会被击退，伤亡也会十分惨重。可是，如果他选择南部较为便利的那条路线（差不多就是现代穿越卡泽伦和设拉子的那条公路），那波斯人也会有充分时间返回波斯波利斯。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该城就可以撤空，其金库也可以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个绝妙的方案只有两个弱点。阿里奥巴扎涅斯认为他在苏西亚关的据点是牢不可破的，而且没有考虑到亚历山大可能会兵分两路。

国王的路线最初经过一个地区，那里住着一个山地部族乌克西亚人。和该地区的其他几个部族一样，他们习惯于向包括波斯大王在内的所有过往的行人征收通行费，外来侵略者自然不能例外。所以，他们告诉亚历山大，如果他要率军经由此地前往波斯波利斯，他就必须为此付钱。亚历山大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们，在山口等着，“然后从他的手中接受钱款”。他派克拉特洛斯带着精锐分队爬到隘道之上的高处。在黎明之前，亚历山大通过一条少有人知的山路下山，快速袭击了几个还在睡梦

当中的乌克西亚村庄。接着，他朝山口发起了进攻。守兵全无斗志，都逃到了山里，结果被克拉特洛斯的部队歼灭了。自此，乌克西亚不再勒索而开始进贡——每年100匹马、500头役畜和30000头绵羊。

现在，亚历山大派帕美尼翁率领辎重部队、塞萨利骑兵和所有的重装部队走南部的主干道，而他自己则带着一支轻装灵活的突击纵队，翻过山岭，去对付阿里奥巴扎涅斯。经过五天的艰苦行军，这支军队来到了苏西亚关。最初通过直接进攻夺取城墙的企图落空了，而且损失不小。阿里奥巴扎涅斯在城墙上架设了弩炮；而士兵则从峡谷陡峭的突出位置滚下大石块，并朝马其顿军队倾泻利箭和标枪。亚历山大的军队伤亡惨重，被迫撤退。不过，在突袭当中他抓到了一些俘虏，其中有一个是本地的牧人，他自愿带他去走一条极为艰难的山路，这条路可以使他绕到阿里奥巴扎涅斯的背后。国王让克拉特洛斯留守峡谷的入口，并给他配备了500名骑兵和两个方阵兵团。为了迷惑敌人，他还要保持正常的营火数量。当听到亚历山大的号角时，他就向城墙发动进攻。这样一来，阿里奥巴扎涅斯将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那条山路只有12英里，但亚历山大的突击队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才走完这段险路。就在第三天的黎明之前，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他们悄悄杀掉了两名哨兵，接着吹响号角，于是严阵以待的克拉特洛斯立即向城墙发起正面强攻。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及其士兵从阿里奥巴扎涅斯的营地后方的崖边冲了下来。波斯人发现自己遭到夹击，便试图爬上峡谷的两侧逃走。亚历山大预料到了这点，他在峡谷顶上安排了一支3000多人的部队。多数逃兵都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这大概会是一场恐怖的大屠杀。只有阿里奥巴扎涅斯以及仅仅700名骑兵成功脱逃。

即使亚历山大的部队通过了苏西亚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并不好走。一路上到处都是沟壑和水流，而且常常被厚厚的积雪遮住道路。就在这时，波斯波利斯的驻军指挥官提里达特斯（Tiridates）派来一位信使。信使说，提里达特斯愿意投降，但提醒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必须速速

赶来，否则居民们可能会在撤离之前洗劫王室的金库。亚历山立刻行动。他一边命令步兵尽可能快地跟上，一边率领骑兵立即出发。他星夜兼程，在黎明时分到达了阿拉克塞斯河。河上没有桥（也可能被人拆毁了）。于是，国王及其士兵采取了简单的应急方法，他们拆了附近的一个村庄，用从房子上拆下来的木材和料石以最短的时间建造了一座桥，然后他们继续前行。

过河后不久，他们遇到了第一个代表团。不过，这些衣衫褴褛的代表不同于此前亚历山大所接待的既文雅又趋炎附势的通敌者。他们的欢迎和哀求表明他们是希腊人：大部分已是中年甚至更老，可能是当年站错队反对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的雇佣兵。他们变成这副可怜的鬼样，显然是因为受过可怕的摧残。他们的耳朵和鼻子被全部割掉，这是典型的波斯刑罚。一些人缺了胳膊，另一些则少了腿。此外，他们的前额还烙上了印。狄奥多罗斯说：“这些人都有技术或者手艺，在传授技术方面都有不小的贡献；结果，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被人截去，而只留下那些对他们的职业至关重要的部位。”

起初，亚历山大表示会把他们遣送回国的。不过经过一番讨论，这些人说他们宁愿留下来，组建一个单独的社区。要是回到希腊，他们就会被孤立起来，变成人们可怜的对象和社会的弃民。在这里，即便身处不幸之中，他们至少还有同伴可以相互照应。国王很赞赏他们的选择，给他们提供了当小农所需要的所有东西——耕牛、种子、绵羊和资金补助，并永久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当地政府直接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福利。⁹我们不必怀疑这件轶闻的真实性，因为除阿里安以外，我们的主要史料来源都详细叙述了这件事。同时，亚历山大必定也会看到、而且也强调了这件事的宣传价值，它正好可以用来为他随后在波斯波利斯的所作所为做辩解。如果是作为——至少部分作为——对当年波斯人对希腊人所犯暴行的报复，那么有组织地洗劫和烧毁帕尔萨^⑤的圣殿看起来还算可以理解。

公元前330年1月31日，亚历山大进入了波斯波利斯。这座城市是阿契美尼德国王的传统陵邑所在地，也是他们所积聚财宝的储藏地，还是整个帝国的宗教中心（故而不受一般总督的管辖）。每年4月，庄严的阿基图新年庆典会在此举行；在此期间，波斯大王会经历一次仪式性的受难——浮雕上刻画了他与丑陋的死亡恶魔搏斗的场景——然后获得胜利，他的王权得到更迭，人们庆祝他成为阿胡拉·马兹达在人间的代表。实际上，波斯波利斯是一座圣城，类似于麦加或耶路撒冷，有着丰富的庄重的宗教关联。亚历山大如果仍想根据传统惯例，在波斯贵族和玛哥斯僧的祭司阶层的支持下继承阿契美尼德王位，那么比起其他城市，他就更应该恭敬有礼地对待这座城市。稍有差池都有可能会引起那些他最需要进行安抚的人的永久敌视。

不过，有迹象表明，当亚历山大到达波斯波利斯时，他对说服伊朗精英支持他继承王位一事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他没有料到，纯粹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竟能引起如此顽固的对抗——在这方面，他固有的务实本性蒙蔽了他的双眼。许多伊朗贵族是一心想要合作的：任何国家都不缺政治投机分子。但承认亚历山大是阿胡拉·马兹达所挑选者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玛哥斯僧曾散布对他不利的言论，¹⁰这些言论正好与大流士在高加美拉之战前的演说相呼应。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和野蛮的马其顿军队都是“长着愤怒种族的蓬乱头发的恶魔”。^⑥在《但以理书》中也有类似的态度，在书中马其顿帝国被形容成野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第7章第7节）。

有一份西比林神谕更是明白无误地把亚历山大描述成一个不敬神的、暴力的外来篡位者：

有一天，一个不信神的人将会来到富饶的亚洲，
他的肩上披着紫色的披风，

粗野、专制，而且暴戾。他会点燃
像闪电一样的大火，整个亚洲将受到罪恶的
奴役，大屠杀的鲜血将会浸透这片土地。

自伊索斯之战以来，亚历山大一直在试图改变这种形像，但收效甚微：血洗提尔城之类的事件更是印证了这种形象。军中的不满情绪、阿吉斯的暴动以及这种最糟糕的道德上顽固而无形的敌对氛围，都在不断地刺激着他原本就十分暴躁的脾气。甚至他对大流士的女眷所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提里达特斯已经正式投降，但他还是纵容军队洗劫了整个波斯波利斯——除了宫殿和城堡，因为那里是大流士财宝的所在地。既然他不能屈服，那么就选择毁灭。如果阿契美尼德的王位不属于他，那他就以武力硬抢，让自己变成一只连玛哥斯僧也不敢预言的可怕的“愤怒雄狮”。

现在，他对将领们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怒斥波斯人对希腊所犯下的罪行——此时，路遇伤残的希腊雇佣兵一事显然可以派上用场——而且把波斯波利斯说成是“亚洲最令人憎恶的城市”。马其顿军队不需要更多的鼓励。他们上一次纵情享受强奸与抢劫之乐还是在加沙。自那以后，特别是在巴比伦和苏萨，亚历山大的安抚政策都严厉地约束着他们。现在，缰绳一松，他们立马全都疯狂了起来。国王允许他们杀掉他们所遇到的所有成年男子，只要“他们觉得这对他是有利的”。现在，他大概意图通过纯粹的恐怖政策来确保波斯人的顺从。不过，他也是在给疲惫不堪的军队放个假，而后将率领他们踏上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征程，去前往东部的行省。

一整天下来，马其顿军队纵情地劫掠和破坏。每一个私人住处都放满了金银饰品、华美的挂毯和漂亮的嵌花家具。大量的无价艺术品被人打碎，以便相互争夺的劫掠者可以分得上面装饰的贵金属和珠宝。打斗经常发生，那些积聚了特别多的战利品的人常常被嫉妒的争夺者杀死。

没有人想要俘虏，因为值不了几个钱，而且许多人为保全自己免受悲惨的侮辱，纷纷自杀。

在此期间，亚历山大正忙着查看皇室金库，那里贮藏着多年积累、不下120000塔兰特的资产，可以一直追溯到居鲁士大帝时期。波斯大王的卧室里还有8000塔兰特的黄金，还有镶有珠宝的黄金藤条；亚历山大肯定知道，这个藤条乃生命之树的象征，代表着“在阿胡拉·马兹达佑护下阿契美尼德统治的合法而正当的赓续”。现在，这巨额的财富正好可以用来支持亚历山大继续往东征服。部分财宝他随军带走，其余多数则转运到苏萨，最后又从那里运到了埃克巴塔那。为了这次转运，人们从苏萨和巴比伦调来了所有的役畜，包括不下3000头的亚洲骆驼。换算成1913年的英镑，这些金银大概价值44000000英镑，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全盛时期的雅典帝国将近300年的国家收入。¹¹

现在，亚历山大的霸权有了保障。他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寒冷的冬雪之中，朝着大流士那摇摇欲坠的帝国的核心和神经中枢前进。扎格罗斯山已经干净利落地绕过去了，而波斯波利斯的陷落则打开了通往埃克巴塔那的道路。同样，根据先前的情况，任何从情理考虑的人都可以推断亚历山大下一步会做什么，亦即往北直扑，不惜一切代价去抓住大流士，从而结束这场久拖不决的波斯战役。但事实又一次证明，亚历山大的行动完全不可预知。他一直到公元前330年的5月末或6月初才离开波斯波利斯。那一阵子天气宜人，他经常外出打猎。亚历山大访问过北边50英里远的波斯旧都帕萨尔加德（他刚一到达，该城就投降了，又给他奉上了6000塔兰特的钱财），参观了居鲁士大帝的陵墓。他仍旧把巨额的礼物赏赐给朋友，这一做法不仅招来了奥林匹娅斯的警告，还有与之合作的波斯人的劝诫。¹²

现在，亚历山大给人留下的印象无疑就是他在消磨时间。但为什么呢？尽管埃克巴塔那有500英里之远，但去往那里的路线沿着一个河谷，这片区域大部分土地都相当肥沃：他如此耐心地等待，不大可能是为

了等庄稼成熟。那么，他拖延如此之久，会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毕竟普鲁塔克所做的四个月的估计看起来没错。）最近有人提出，¹³公元前331/330年的整个冬天，亚历山大与欧洲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知道希腊反叛的结果之前他不敢前进，他的援军甚至都不确定他是在埃克巴塔那还是在波斯波利斯。对任何称职的统帅来说，这恐怕不是什么恭维，更不用说亚历山大了，他向来十分重视良好的通讯和情报。去年9月，阿吉斯就已经死了，而波斯波利斯一直到1月末才陷落。一定的延误是可能的，但即便与希腊的陆上通讯被切断了（这点现在还无法确定），亚历山大也仍控制着整个的东地中海。很难想象，安提帕特胜利的消息会在2月份之后才传到他那里，实际应该快得多，可能12月中旬就已经送达了。

唯一可能使他在波斯波利斯一直留到4月份之后的原因是：波斯的新年庆典。他已经向伊朗的臣民们表明，他不是一个可轻易糊弄的人：对波斯波利斯的洗劫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马其顿军队肆意破坏的行为也得到了小心的控制。宫殿和神庙、大会堂（*apadana*），以及构成城市精神中心、建立在广阔台地上背靠拉美特山的整个建筑群，无一受到损毁。换句话说，新年庆典仍然可以举行。亚历山大觉得，经过此番教训，这些骄傲的贵族和祭司或许会改变主意。甚至现在人们的理智占了上风，而他亚历山大将会以恰当的礼仪，被宣布为阿胡拉·马兹达在人间的代表。这种认可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将是不可估量的，它的影响将会深入到帝国最遥远的角落里。

不过，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的问题。亚历山大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包括波斯大王所具有的神性）十分严肃的民族。如果说在这一棘手的问题上曾有过谈判，那这些谈判也很快就破裂了。时间从3月进入4月，随后情况很快明朗：当年波斯波利斯没有游行队伍，没有王权的仪式性更迭。大约在4月20日，亚历山大终于放弃了希望。在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时，他率军深入山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平定这个行省（这是他在紧张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之一，在赫淮斯提翁死

后他也有类似的反应）。他的征讨对象包括一群披发的穴居人，他们的妇女乃是出色的投手。此时春雨已经开始下了，马其顿军队在雪泥和雨夹雪中大吃苦头，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¹⁴

5月底，亚历山大回到波斯波利斯，他最后下定决心，必须摧毁这座城市。它象征着阿契美尼德王朝几个世纪的统治：一旦亚历山大继续向东征伐，这座城市显然会变成民族抵抗运动的一个集结点，既有宗教意义，也有政治意义。它巨大的檐壁、宫殿以及燔祭坛包含着某种马其顿征服者所难以有效应对的东西：一种纯粹精神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当面对旁遮普的婆罗门时，他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当亚历山大把计划告诉帕美尼翁时，对方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国王要是摧毁了自己的财产，那国王就是个傻子（这位老师无疑想起了，当初在小亚细亚登陆时亚历山大本人对军队就是这么说的）。他也不可能单凭征服和破坏而使伊朗人屈服。既然亚历山大已经无法通过其他途径使伊朗人屈服，那么他只能重申，焚毁波斯波利斯乃是为了报复薛西斯对希腊神庙的破坏。这一次，阿里安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一项错误的政策。”虽然对国王的动机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同时代的学者们大都认可阿里安的判断（通常还会批判这是赤裸裸的野蛮行径）。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行动最终消除了亚历山大通过和平方式使自己成为合法的阿契美尼德成员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这还促使东部行省顽抗到底。因此，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宫殿着火只是一次酒后狂欢的意外，并很快就为此感到惋惜。

这就是历史（或传说）流传下来的说法，现在也没有别的证据能够予以反驳。这个场景就是非常有名。亚历山大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喝得大醉。托勒密的情人泰伊斯（Thaïs）以雅典人的身份说，要是把薛西斯的宫殿烧了那该多痛快啊——当然，这样一来就把祸首的责任从亚历山大身上移走了。火把点燃了，一队摇摇晃晃、头戴花环的队伍在长笛和管乐的伴奏中开始行进。当来到宫殿大门时，这群狂欢

者一时有点犹豫不决。有个细心的好事者大声喊道，只有亚历山大才有资格干这事。于是，国王借着酒劲扔出了第一个火把——或许他还很高兴自己又一次成为了希腊的守护者，这个角色他已经越来越不屑一顾了。火势立即蔓延开来，吞噬了华丽的挂毯，爬上了干燥的雪松木横梁。匆忙带着水桶赶来的守卫反而停下来观火取乐。很快，整片庭院都陷于火海之中。

这是蓄意的纵火还是酒后的意外？前者明显更有可能。就像在忒拜、提尔和加沙时那样，当亚历山大的王权意志受挫时，他的判断力就容易受到遮蔽，并由此生发最疯狂的报复。他很可能有一天会后悔，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来对波斯帝国的控制将完全依赖强权政治。但是，他想要并且第一个动手摧毁波斯波利斯一事，看起来也几乎是肯定的。这跟他的性格和人生经历的其他许多方面都非常相符。¹⁵

在被毁之前，这些宫殿已经遭到了有组织的洗劫——这是另一条线索。马其顿士兵找到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钱币、金器和珠宝。他们闯入武库，拿走了剑和匕首，而撇下了成千上万的青铜和铁制的箭头。无数精致但无法直接变现的石瓶，他们全都扔到庭院中打碎。他们砍掉了雕像的头，毁坏了各种各样的浮雕。现在，征讨亚洲蛮族的希腊远征军正走向最后的胜利。今天残存的东西坚实而不可辩驳，这正是那场大火——以及大火所保存下来的东西——的证据。“在台阶和雕塑上，屋顶被烧的横梁仍留有印记。那一堆堆的灰烬全是雪松的残迹。”¹⁶不过，那场大火也把成百上千的泥板烧制一遍（否则这些泥板早已化成了泥土），另外还给薛西斯的游行浮雕上了一层极好的釉。当亚历山大把烟火未绝的废墟抛在身后时，恐怕不知道他的纵火之举已经使波斯波利斯永垂不朽了。

这时候，亚历山大当前的战略是很清楚的。他不再指望通过向王太后献好而使自己成为合法的阿契美尼德成员（自此我们几乎再也没有听说过关于王太后的消息）。他最大的希望是活捉大流士：这至少可以给

他一个极好的谈判筹码。如果波斯大王愿意退位，他就有可能说服那些顽抗的贵族以及东部的总督支持他的王权主张而非对抗到底。所以，6月初，亚历山大从波斯波利斯北上，同时留下3000人的马其顿军队以驻守该城及所在行省。留下这么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并不寻常。在去往埃克巴塔那（哈马丹）的路上，亚历山大遇到了新的援军，他们肯定是通过库尔德山区抄近路赶来的：共有5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由一位雅典将军指挥。随军而来的还有安提帕特有关希腊、色雷斯和意大利南部的局势的报告。

此时开始有传言说，大流士征集了3000名骑兵和30000名步兵——其中包括4000名忠诚的希腊雇佣兵，决心再打一仗。不过，在离埃克巴塔那还有三天路程，亦即亚历山大已经走了400多英里时，有个叛变的波斯贵族带来消息说，大流士正在撤退。他所期待的援军没有到来，所以他五天前就已经往东撤退了，一同撤走的有巴克特里亚骑兵、6000名精锐步兵，还有埃克巴塔那王宫金库中的7000塔兰特的财富。他的直接目的地似乎是卡斯比亚关，^⑦此前他已经把后宫和辎重先行送到了那里。亚历山大必须加快速度。（那位叛变者说）大流士打算沿里海海岸一直撤到巴克特里亚，边走边毁坏沿途地区。这样一来，马其顿军队将面临严重的补给问题，因为他们的路线正好处在大盐漠的北缘。如果他们被人引诱到叙尔卡尼亚之外的荒芜的山脉和大草原上，只需一支以逸待劳且熟悉当地地形的行省军队，就可以轻松将他们击溃。¹⁷

当到达埃克巴塔那时，亚历山大迅速研究了一下局势。现在，他正进入征战的新阶段。火烧波斯波利斯给希腊远征行动画上了句号，他以此为由遣散了所有的同盟部队，包括帕美尼翁的塞萨利骑兵。希腊的危机已经结束，他不再需要这些潜在的生事者作人质了。现在他所设想的是一支精干的职业化军队，一支只忠于他一人且无论去哪里都愿意追随他的军队。他从波斯波利斯得来的巨额财富也表明，征募和维持这样的帝国军队是可能的。当他遣散同盟部队时，除了远征军的薪水以外，他

还付给每位骑兵1塔兰特的奖金（6000德拉克马）。付给步兵的奖金虽然少了点（1000德拉克马），但仍然相当可观。前者相当于八年的薪水，后者则相当于三年的薪水。

摆在这些被遣散的军人面前的是一个更加诱人的诱饵。任何有意者都可以作为雇佣兵重新加入亚历山大的部队，而加入者在登记报名后便得到至少3塔兰特的奖金。只有非常高傲的老兵才能抗拒如此慷慨的条件。整个协议花费了亚历山大大约12000—13000塔兰特的钱，但他可能认为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长远投资。几乎有同样数额的钱款被狡诈的财政官员侵吞——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此时亚历山大要是知道这件事，可能还是会觉得国库有余额。对他而言，钱没有太大意义（现在更是无足轻重）；但通过巧妙的使用——马其顿人似乎同样也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赏——他一夜之间给自己买来了一支雇佣军。非常关键的是，他还弱化了帕美尼翁对军事指挥结构的掌控。他盘算着，将来他的军队的首要效忠对象自然会给他们发饷银的君王。¹⁸

被遣散的同盟部队由骑兵护送到地中海海岸，然后从那里乘船回国，他们可以安全航行到优卑亚岛。亚历山大也许认为，这些人将在各个希腊城邦中组成一个可资利用的亲马其顿势力，更不用说他们还可以作为免费的征兵宣传广告。这些人前脚一走，亚历山大就迫不及待地降低了帕美尼翁的地位。这位老师被留在埃克巴塔那，担任地区军事指挥官：他副统帅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亚历山大对他的处理很有策略。帕美尼翁毕竟已经七十岁了，他理当从一线作战中退下来休息——国王无疑这样安抚过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帕美尼翁无事可做：实际上，作为地区指挥官，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波斯大王的财宝护送到埃克巴塔那，之后他还得进行征战——亚历山大给他留下了大概6000名雇佣兵——平定里海南部和西南部的部落。当他外出征战时，财宝将由四个留下来承担轻型任务的方阵兵团守卫。在他回来后，这些兵团将前去和亚历山大会合；届时他

们的指挥官将是黑面的克雷托斯，目前他正在苏萨休病假。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合理：表面上帕美尼翁的尊严和威望都没什么损失。但是，这位老师的实际权力却被大大削减了，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在他的近亲中，只有菲罗塔斯和尼卡诺尔还拥有重要的作战指挥权。他完全失去了塞萨利骑兵，而如今取代他们的雇佣兵则从帝国的军需首长哈尔帕罗斯那领取薪水。当财宝护卫队到达埃克巴塔那时，哈尔帕罗斯将负责管理这些财宝，并通过皇家铸币厂发行亚历山大的钱币。帕美尼翁的新副手克勒安德洛斯是国王任命的。

亚历山大正一步一步、冷酷无情地困住帕美尼翁；从现在起，他已掌握了所有的王牌。有人说，埃克巴塔那标志着亚历山大的悲剧的开始，“其悲剧在于日益增长的孤独，在于对那些不能理解的人们的日益厌烦”。¹⁹事实上，马其顿的将领们，包括帕美尼翁在内，对此都心知肚明。军事胜利助长了亚历山大的自信，加剧了他对权力的渴求。加冕为法老，以及随后对西瓦的神秘访问，这些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血统。不过说到底，一直到夺得大流士的巨额财富后，对他权力的实际约束才得以彻底解除，从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于自己的幻想之中。

所有手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都会陷于精神上的孤独，他们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创造了自己的真理：这是一条令人压抑的铁律，亚历山大也不能例外。从现在开始，那为数不多、敢于当面批评他的朋友，经常要为他们正直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状态大大助长了国王身边那些更为阿谀奉承的侍臣的粗鄙吹捧；而反过来，这也加剧了亚历山大潜意识中对伟大的幻想。于是，愤恨者便生发了各种阴谋，而阴谋的泄露或传言则引爆了亚历山大潜藏着的所有多疑情绪。公元前330年，这一进程尚未开始。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加之国王越来越沉溺于饮酒——事情却以惊人的速度接连爆发。

亚历山大在埃克巴塔那片刻时间也没有浪费。事情安排妥当之后，他便马上继续追击大流士。幸运的话，他或许能赶在波斯人通过卡斯比

亚关之前追上他们。但是，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糟糕的炎热天气。他只用11天便走完了埃克巴塔那和拉格（在德黑兰附近）之间的200英里的路程。这速度已经很快了，但还算不上惊人：拿破仑曾在更恶劣的地区行军，平均每天行进28英里。即使这样，还是不断有人在路边昏迷过去，不断有马匹在他们身下死去。阿里安一直解释说，这是亚历山大行军速度过快所致。但事实上，军队一定是遭受了脱水和中暑。^⑧

在拉格，亦即在距离关口大概50英里的地方，亚历山大得知大流士已经通过了关口，现在正前往赫卡通皮罗斯（达姆甘）^⑨——该城后来成为帕提亚国王的夏日行宫所在地。若继续在烈日下不作休整或充足准备地强行军，那无异于自杀，而且毫无意义。于是，亚历山大在拉格宿营五日，然后行进到了关口面前。在关口的另一边，亦即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部，有一片现在被称为达什特-伊-卡维尔的荒凉盐漠。亚历山大需要补充一下粮草，这样军队才可能继续前进。因此，科伊诺斯带着一些骑兵被派出去劫掠粮草。

就在科伊诺斯外出时，两位巴比伦贵族——其中之一是马扎欧斯的儿子——乘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流士已被废黜，现在成了阶下囚。这场政变是由巴克特里亚总督贝索斯和大维齐尔纳巴尔扎涅斯共同策划的。看起来，亚历山大并不是唯一一个想拿这位可怜的逃亡君主作政治谈判筹码的人。这个消息促使国王立即行动起来。他甚至没等科伊诺斯回来就带着他最精锐的骑兵和翊卫队前去追击波斯军队。夜里凉快了些，于是他们连夜行军，直到次日上午也不停歇。在简短地午休之后他们继续追击，途中不再休息而一直追到黄昏，赶到了大流士被拘捕的地方。

在此他们发现了大流士的年老的希腊翻译，此人给亚历山大讲述了许多细节。一开始，纳巴尔扎涅斯提议，波斯大王可以——当然是暂时地——把王位让给贝索斯。这个提议很有实际意义。贝索斯在东部行省

广为人知且深受敬重，而且具有阿契美尼德血统；如果说存在什么民族抵抗运动，那么，比起两次战败且意气完全消沉的大流士，他可以发挥更有效的领导作用。但是，疲弱而又愤恨的波斯大王勃然大怒，拔出他的短弯刀要杀纳巴尔扎涅斯。御前会议由此陷于混乱，而且导致撤退中的军队分裂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巴克特里亚人和其他东部部队把贝索斯看作他们的天然领袖，而阿尔塔巴佐斯统领下的波斯人和希腊雇佣兵则坚定地忠于大流士。

在这当口，军队进行对决是不可能的。因此，阴谋者便在形式上宣誓效忠大流士，表面上两方就此和解。由于阿尔塔巴佐斯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所以没人敢质疑他们的真诚。然而一两个晚上过后，他们却把大流士劫持到了巴克特里亚军营中，将其置于严密的看守之下。大流士的希腊雇佣兵将领曾警告他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他拒绝任何保卫。效忠派只有两种选择，离开或者投降。起初，他们选择前者。阿尔塔巴佐斯、波斯人和希腊人往东前去帕提涅，他们“觉得干什么都比做叛徒的仆从来得安全”。但过了两天，大部分波斯人又跑到了贝索斯那里，一方面是受到他慷慨允诺的引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别人可以追随”。²⁰

现在，贝索斯自命为波斯大王，号称阿尔塔薛西斯四世，并受到了部下的热情拥戴。²¹他的前任被锁在一个老旧的有篷货车里，在行军过程中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隐藏他的关押处。当然，大流士也是反叛者的保险票：正如阿里安所说，这些人“决定如果听说亚历山大在追击他们的话，就把他交出去，借此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一得到这消息，亚历山大觉得现在一刻都不能耽搁。于是，他再次连夜赶路，一直追到次日上午。大约中午时分，马其顿人来到了一个村庄，前一天大流士及其拘捕者就在此歇息。照此速度，追击者在追上目标之前就会因疲惫和中暑衰竭而崩溃。亚历山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截波斯人。于是，他问这里有没有近路可抄。

村民告诉他，有，这里有一条小道，但这条小道要穿过一个无人居住的荒漠，而且没有水源。亚历山大没有理会这些障碍，他强行征调了当地的向导，然后让500名骑兵下马，把马匹让给他最强悍和最健壮的步兵。接着，他穿越荒漠，连夜奔袭，以惊人的速度跑了50英里，就在黎明第一道曙光出现时追上了波斯军队。波斯人拖沓地走着，没有武装，连一点准备抵抗的样子都没有。显然，他们认为自己离亚历山大至少还有两天的路程，亚历山大的突然出现完全震住了他们。不过，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实际上只有60名骑兵跟上了国王。如果贝索斯的士兵没有陷于恐慌——他们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他们就有可能创造历史，既拘捕了大流士，又俘虏了亚历山大。^⑩

相反，他们一心只想逃跑，越快越好。大流士的笨重货车明显拖累了他们的速度。贝索斯和纳巴尔扎涅斯催促里面的囚徒上马和他们一块逃跑。但波斯大王拒绝了。如果说他没能保住自己的帝国，那他至少可以有尊严地死去。他说，他是不会跟叛徒同行的。神的报应就在眼前，他愿交由亚历山大处置。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继续争论，正在撤退的部队随时可能会被包围。贝索斯和纳巴尔扎涅斯此时只能确保大流士不会被亚历山大生擒。因此，他们和同谋者们用标枪刺穿了大流士，然后各自沿着不同的路线逃跑，纳巴尔扎涅斯前往叙尔卡尼亚，贝索斯回到自己的巴克特里亚行省，而其他人则向南逃窜，跑到了阿雷亚和德兰吉亚纳（锡斯坦）去。

这给亚历山大设置了一个大难题。如果波斯大王依然被囚禁着，那么撤退中的部队哪一支是负责看守他的呢？这完全没法判断。疲惫的马其顿军官们抱着一线希望，在被弃的辎重车队里穿梭。同时，载着大流士的货车已无人驾驭，拉车的公牛偏离了道路达半英里之远，正往有水源的河谷走去。它们停了下来，身上的累累伤痕还在流血，炎热的天气也使它们虚脱。有一个名叫波吕斯特拉托斯（Polystratus）的马其顿士兵，在农夫的指引下来到河谷中的泉眼边。他看见这辆货车停在那儿，

觉得很奇怪，公牛没有作为战利品被聚拢起来，反而被刺伤了。接着，他听到了一个将死之人的呻吟。出于好奇，他走过去揭开了盖布。

大流士国王就躺在车上，仍然上着镣铐；他的御袍已被鲜血浸透，凶手的标枪还在插在胸膛里；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有一条忠诚的狗伏在他身旁。他用虚弱的声音要水喝。波吕斯特拉托斯用头盔盛了一些水给他。大流士紧握着这位马其顿士兵的手，同时感谢上苍，他不是完全孤独地死去，也没有被彻底地抛弃。随后，他那费力的呼吸渐渐沉寂了下去，生命就此终结。波吕斯特拉托斯立即把消息报告给了国王。当亚历山大最终站在对手残破的遗体前，看到大流士死于其中的肮脏难忍的环境时，他的悲痛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真心实意的。他脱下自己的御袍，盖在大流士的遗体上。在他的明确命令下，大流士被庄严地运回了波斯波利斯，以国王的身份安葬在了其阿契美尼德先辈的旁边。²²

不过，亚历山大这种宽宏有礼的姿态尽管部分是出于个人的悲悯，但也有其他更加实际的动机在其中。大流士已死，因而也就无法让位给他，亚历山大仍然是以外国侵略者的身份来夺取阿契美尼德王位的。更糟糕的是，他现在要应对的是一个强悍得多的真正的阿契美尼德争位者——贝索斯（或者说阿尔塔薛西斯国王，就像他现在自封的那样）。这乃是最危险的变化。如果贝索斯得以重整西部的力量，亚历山大就仍处在大麻烦之中。事实上，他将不得不继续在东部行省作战，没办法通过一般性的协议让他们投降。换句话说，战争远没有结束。

自大流士去世的那一刻起，亚历山大唯一可能的策略便是，自己表现得似乎他就是波斯大王实际指定的合法继承人。他必须抓住贝索斯，不是将其作为王位的竞争者而是作为叛徒和弑君者抓住。他曾追击波斯大王到他死，而现在他必须迅速转变角色，变成波斯大王的复仇者。当占领帝国东部时，他必须是作为大流士的继承者。²³但是，他最初所期望的乃是大流士本人的公开支持。因此，有几份材料记载了一个可疑的说法，²⁴说波斯大王在弥留之际承认亚历山大是他的继承者，他郑重地

请求亚历山大为他的死而向杀死并抛弃他的叛徒复仇。有的甚至暗示说，当亚历山大找到大流士时他尚未断气，亚历山大亲耳听到了这最后的至关重要的口谕。整个事件听起来更像是宣传部门临时编造的故事，宣传人员突然听说大流士已死，不得不在仓促之间尽量利用好这一坏消息。

失去了谈判筹码，亚历山大的反应非常迅速，而且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他带着骑兵直追贝索斯而去。要是能赶在这个强有力的王位竞争者逃回巴克特里亚行省之前将其抓获并处死，那一切就可能变得顺利许多。不幸的是，贝索斯已经逃走很久了，于是追击很快就放弃了。亚历山大带着部队回到了附近的赫卡通皮罗斯城，在此休整了几天。这时，军营里开始出现传言——在这种情况下很好理解——传言说这就是远征的终点了，他们很快就都能回到马其顿去。波斯大王已死，同盟部队也已经解散了。原先的一厢情愿现在变成了坚定的信念。有一天早上，亚历山大醒来听到了货车的声音，它们正在装载，准备回国。

亚历山大早就在筹划漫长的东方征战，士兵们的这种心态引起了 he 相当大的警觉。他召集了全体指挥官，“满眼泪水地抱怨说他正在追求荣誉的半道上，现在却要中途召回”。他们表示愿意竭忠尽力，但建议国王在向军队陈述时要讲究策略，要注意安抚士兵。他们说，如果他此时过于严厉，那有可能会当即引起兵变。结果，亚历山大所做的甚至更为有效：他把士兵们都吓傻了。他的整场演说都在强调其征服多么不稳固，波斯人又是多么不愿意接受马其顿的霸权。“他们克制是因为你们的武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当我们在的时候，马其顿害怕我们，而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敌人。”马其顿也不应低估贝索斯。要是现在就回国，那该有多蠢；过几个月马其顿就会发现，这个叛变的总督竟越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准备侵略希腊！除非他被制服了，否则士兵们的任务就不会结束。

到了演说的末尾，亚历山大对士兵们说，“我们现在已经站在胜利

的门槛上了。”一旦贝索斯被杀，波斯人自然而然就会屈服。再说，那位总督的首府离这儿仅有四天的路程（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个距离有462英里）。整场演讲结束后发生了什么呢？军队大声欢呼来响应他：通过个人魅力和修辞术的巧妙运用，又一场危机被克服了。

尽管把波斯的民族抵抗运动描述得毫无前景，尽管烧毁了波斯波利斯，但亚历山大仍在伊朗贵族中仔细寻找合作者。在离开赫卡通皮罗斯之前，他认真审查了他的俘虏，挑出其中出身高贵和地位较高者（总共约有1000人），此后对他们予以特别的关照，他们将是未来新政权中的管理人员或行政官员。别的不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富余的有教养的马其顿人可以担任这些职位了，而且越往东走，这一问题就变得越发急迫。

25

过了两天，军队拔营北上，前往叙尔卡尼亚。这是一个毗连里海、荒芜多山却又十分肥沃的地方。他们遇到了马匹短缺的问题：在追击大流士的过程中，已有许多马匹死于酷热，现在由于吃了有毒的草根，更多的马匹死去。在往首府扎德拉卡尔塔（萨里）行进时，亚历山大收到了纳巴尔扎涅斯的一封信。这位大维齐尔先是为自己在谋杀大流士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开脱，然后表示如果他得到安全保证和其他合理条件，他就会投降。亚历山大立即派人送去他所要求的保证。这个级别的每一个叛变者都将削弱贝索斯，并使其越发孤立。

一到扎德拉卡尔塔，国王就看到许多高层波斯人——阿尔塔巴佐斯也在其中——正等着向他表示臣服，这是最振奋人心的标志。另外还有一些希腊雇佣兵的代表。波斯人——特别是年老的阿尔塔巴佐斯，他曾是腓力宫廷的贵客——都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但亚历山大断然拒绝以相同的态度对待雇佣兵的代表，他说为了波斯而与自己的骨肉同胞战斗的希腊士兵“比罪犯好不到哪去，是个希腊人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对于这1500人，他只接受无条件投降。这种对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之后的政策的突然反转，听起来像是一场面向公众的宣传，私下里他可能会表

现得更亲切友好一些。不管怎样，雇佣兵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条件——这1500人后来全体编入马其顿军队，他们领取的是标准的薪酬。

现在，国王对马尔狄安人发动了一次快速的惩罚性征讨。这些马尔狄安人是“一个有着野蛮的生活习俗且惯于抢劫的民族”，后来他们给亚历山大提供了一些一流的弓箭手。他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免费征集新的战马，因为马尔狄安人乃是优秀的骑手。反过来，作为报复他们偷走了布凯法拉斯——亚历山大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玩笑。他放出话来，如果不归还那匹马，“他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土地全部被蹂躏成废墟，居民也将被杀得一个不剩”。马尔狄安人意识到他绝对是认真的，便立即把布凯法拉斯送了回来。马其顿还派了至少50名部落长老，带着贵重的礼物，来表达他们最深的歉意。亚历山大接受了礼物，同时还把代表团的几个领袖扣下作为人质，以此迫使该部落将来守好本分。²⁶

国王回到扎德拉卡尔塔后不久，纳巴尔扎涅斯前来觐见。为了在觐见中讨好国王，这位大维齐尔带来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其中包括“一个格外漂亮、正值青春年华的宦官，此人曾经深受大流士宠爱，往后也将得到亚历山大的喜爱”。²⁷这个不祥的少年名叫巴戈亚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对国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亚历山大已经保证了纳巴尔扎涅斯的生命安全，但是据说他献上巴戈亚斯乃是为了给自己带来进一步的好处。同样，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在马其顿人看来，更切近的问题是亚历山大的日益东方化：他采用了波斯的服饰和礼仪，先前他只留给马其顿人的荣誉现在开始授予伊朗贵族，原先的敌军也日益渗透到了野战部队中。如我们所见，他实施这些改革的动机是非常实际的，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广受欢迎。迄今，他一直在使用亚洲宫廷的礼宾官，甚至允许某些波斯人（包括大流士的兄弟奥克萨特雷斯）进入到了他的侍友行列中。他开始戴上波斯的蓝白王冠，不过没有缠上相应的冕状头巾——这是一种典型的不伦不类的折衷产物。类似地，他还采用了半波斯风格的服饰，摒弃了像裤子一类的野蛮

人的搭配，但保留了其独特的白袍和绶带。

起初，他只在私下里或与波斯朋友在一起时穿这些异族服装；但很快这些就成了他的常规打扮，甚至在公开的会见场合或外出骑马时，他也是如此打扮。总的来说，他的宫廷越来越像波斯大王的宫廷了。马其顿的战马用波斯的马具来装饰，亚历山大甚至接受了由365名妾婢（每天晚上一个）组成的传统嫔妃团，她们原来是服侍大流士的，是从全亚洲最漂亮的女人中精选出来的。亚历山大不太可能是主动或出于个人偏好而做这些革新的。他很快就厌烦了嫔妃们，波斯的宫廷仪式也是如此（至少起初就这样）。但是，他需要新的行政人员和官僚；如果能让波斯人接受他为国王，那他就必须以某种合适的方式扮演波斯大王的角色。当然，他这么做就会出现与马其顿人疏远的危险。

更要命的是，他试图进行折衷，结果是两面不讨好。如果他想采用波斯王冠，就得有毅然决然的勇气，还得戴上高高的冕状头巾。如果他身边嫔妃成群，但却没跟她们共寝，也不会有人会因此对他有所好感。所谓他“只是偶尔采用这些风俗”，对马其顿人来说毫无作用，因为他们完全反对他这么做；而波斯人也不大可能崇敬一位如此勉强地遵循他们的传统的君主（更何况此人还烧毁并洗劫了他们的圣城）。亚历山大的困境可以从他自此开始使用的两枚印章戒指中很好地反映出来。在与欧洲联系时，他用的是旧的马其顿戒指，而在波斯帝国境内传递文件时，他盖的是大流士的御印。他让侍友们——有时候是强迫地——穿上有紫色边饰的白色波斯披风，并且（当其他手段都失败时）试图用越发慷慨的赏赐和钱财来平息对他越来越严厉的批评。²⁸

然而，从长远来看，任何如此明显地想要两面讨好的统治者，都难免会遇到麻烦。诸如赫淮斯提翁等亚历山大的密友，以及通常的宫廷佞臣团伙，他们都积极支持这种新的融合政策。职业军官们——克拉特洛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则对此漠不关心，只要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前途不受影响。但是，腓力那些态度强硬的老兵们对这整个试验极为反感。

²⁹他们年轻的国王穿着异族服装走来走去，与那些他刚刚打败的聒噪、阴柔、野蛮的贵族亲密无间，这样的场景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厌恶。对他们来说，接纳先前的敌人为战友，这种观念同样恶心。就他们所关心的而言，战争已经随着大流士之死结束了，亚历山大继续东征的宏伟梦想并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只想回国，而且越快越好。

现在，亚历山大开始委任不同的助手负责与外界的联络事宜，这更是突显了他们与国王之间不断加深的裂痕：赫淮斯提翁负责与波斯人相关的所有事宜，而克拉特洛斯则负责与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相关的事宜。如果帕美尼翁依然渴求原来的大权——毫不夸张地说——那么目前的局势可以给他最有力的支持。有许许多多的马其顿人（包括几乎所有最资深的将领），他们强烈反对当下所发生的转变。任何领导人只要把亚历山大的政策扭转过来，然后马上回国，就肯定能重新赢得他们的支持。国王刚刚说服军队继续原来的旅程，而军营中绝不缺乏好事者，他们一定会强调他的训诫演说与亲善政策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气氛可谓一触即发，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亚历山大采取了几个步骤以缓和紧张局势。和大多数严厉的领导人一样，他毫不掩饰对大众人性的鄙夷，而且似乎觉得，如果他乐意，只需满足他们更大的胃口就足以控制整支军队。就在这个时期，大规模的奢华宴会和会饮开始成了军营生活的常规活动：面包加马戏的点子绝不是罗马人的发明。与此同时，国王积极鼓励马其顿士兵跟与之一路相伴的妾婢结婚，似乎是向他们提供某种原始的家庭福利来作为诱饵。³⁰

这是非常精明且富有远见的一招。在军中拥有个人家庭的士兵不大可能会整天吵着要立即回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要求回国的难度还会变得更大。最终，他们将会把军事生活当作一种永久性的生活方式。亚历山大似乎把这些安排与将来的征兵联系了起来。如果是真的，那这种想法就很值得玩味。这意味着国王把征服与探险本身就当成一种目的，当成人的自然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他预计这种状态将在未来20年里基本

保持不变。

不过，立即行动起来是对付兵变之威胁的最好办法。军队向东方开拔，从扎德拉卡尔塔到了阿雷亚的苏西亚。这里的总督、大流士的谋杀者之一萨提巴尔扎涅斯（Satibarzanes）前来归顺（大概已经通过外交接触达成了一致）。他带来消息说，贝索斯现在正被广泛承认为亚洲之主，他和亚历山大不同，毫不犹豫地戴上了冕状头巾，当然他也确实更加名正言顺。新部队正在招募，不仅包括巴克特里亚的，还有远至乌浒河的游牧部落。

这种威胁必须在其失控前彻底消除掉。因此，亚历山大批准萨提巴尔扎涅斯继续担任总督——这个决定他很快就会后悔的——然后全速往巴克特里亚进军。在行军的途中，帕美尼翁的儿子、翊卫队的指挥官尼卡诺尔病故。亚历山大着急前进，顾不上以最高的军事荣誉将他安葬；亚历山大本人继续东征，让菲罗塔斯留下来负责他的兄弟的葬礼，事后再尽快赶上大部队——我们将会看到，这次分离可能让菲罗塔斯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在马尔古斯河（穆尔加布河）时，^⑪ 亚历山大听说萨提巴尔扎涅斯屠杀了马其顿驻军，并在阿雷亚发动叛乱。国王当即决定不去巴克特里亚。他让克拉特洛斯留下来指挥大军，自己则率领一支机动部队南下到阿尔塔科亚纳，即总督的所在地，萨提巴尔扎涅斯正在那里招募军队。仅仅两天，亚历山大便赶了将近100英里的路。萨提巴尔扎涅斯被打得措手不及，于是就带着2000名骑兵逃往巴克特里亚。其余部队则躲到了附近密林莽莽的山区中（卡拉特-伊-纳狄里）。此时正是8月，亚历山大直接放火烧山，把他们全烧死在里头。

另一位波斯人阿萨刻斯（Arsaces）被任命为阿雷亚总督，以取代萨提巴尔扎涅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麻烦，亚历山大在阿尔塔科亚纳附近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叫作阿雷亚的亚历山大里亚（赫拉特）。这是第一个建立在战略要地的军事据点，后来这种据点遍布东部各行省。现在，

马其顿军队将要前往的地区，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基本不存在什么城镇，这些地区的地理状况他们也几乎一无所知。比如说，他们以为药杀河（锡尔河）就是顿河的上游，而兴都库什山脉大概是高加索山的延伸。从现在起，他们进入了不存在于已有地图之中的伊朗东部地区。各种传说和无稽之谈开始大量出现——最先出现的是一则被很多人力证的传闻，亚历山大停驻在扎德拉卡尔塔时，他接待了阿马宗女王的到访，后者一心想和他生个孩子。

另一方面，随后三年（公元前330—前327年）的山地游击战没有任何浪漫和神秘的地方。从阿富汗到布哈拉，从锡斯坦湖到兴都库什，亚历山大遇到了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最彪悍、最顽抗的对手。贝索斯及其继任者斯皮塔美涅斯（**Spitamenes**）打的是一场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的民族主义战争：比起大流士的所有参战部队，他们二人给亚历山大所造成的烦恼要长久得多。³²

建立赫拉特的任务因为一支援军的及时到来变得更轻松了——这批援军包括3000名安提帕特派来的伊利里亚人和差不多相同数量的吕底亚雇佣兵。现在，克拉特洛斯带着主力部队（包括黑面的克雷托斯从埃克巴塔那带来的四个方阵兵团）跟亚历山大会合，然后他们一同南下。亚历山大暂时放弃了直接进攻扎里亚斯帕——也叫作巴克特拉（巴尔赫）——的最初方案，因为还有另一个反叛的弑君者需要先行处理。那就是德兰吉亚纳和阿拉霍西亚的总督巴萨恩特斯（**Barsaentes**），他管辖着一片从锡斯坦往东一直延伸至印度河的广大地区。

经过这次千里绕行，亚历山大计划穿过阿拉霍西亚向东北行进，然后取道兴都库什山脉到达贝索斯的大本营。巴萨恩特斯一听说亚历山大就在附近，便逃往印度，但当地居民将其抓获并送了回来。国王下令将他立即处决，罪名是叛国和谋杀。于是，这个偏远地区的民族抵抗运动便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几个月后亚历山大还得应对来自萨提巴尔扎涅斯的更多麻烦。）马其顿军队在德兰吉亚纳的首

府休整了一阵子，该城位于锡斯坦湖的东岸，后来被帕提亚人占领，他们把它叫作弗拉达。公元前330年秋（当时的情况和德雷福斯事件¹²差不多一样隐密难测），就是在这里，亚历山大最终清除了帕美尼翁及其仅剩的儿子，傲慢且野心勃勃的菲罗塔斯。³³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步削弱了帕美尼翁的权力和威望。除了私人的宿怨以外，帕美尼翁还是马其顿保守派最顽固的代表。亚历山大近来的做派引起了整个保守派的强烈反感，他的副统帅或许是其中最为反感的一个。倘若基层士兵还能够保持忠诚的话，这倒也无妨；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士兵们的忠诚度已经严重下降。胜利、战利品和荣誉早就不能满足他们了。战争持续了太久，而和平却一天天地往东方的地平线退去。更糟的是，他们原本将其作为英雄来崇拜的领袖，现在正快速蜕变成一个不可亲近的东方式暴君。有位老兵哀叹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亚历山大，失去了我们的国王。”

随着大流士的去世以及关于继承波斯王位问题的明显意味，摊牌是早晚的事情。亚历山大以他典型的性格，决定要先发制人。帕美尼翁在军中深受爱戴，直接对他下手很可能会引发暴乱，甚至更糟。显然，亚历山大的策略是通过他的儿子来扳倒这位老师，因为相比之下菲罗塔斯可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菲罗塔斯为人不够圆滑，而且专横浮夸，许多将士都非常讨厌他那刻薄的毒舌和跋扈的作风。帕美尼翁曾告诫他要注意言行，但菲罗塔斯不以为意。近来一段时间，亚历山大一直在稳步提拔克拉特洛斯和佩狄卡斯，不断侵蚀菲罗塔斯的权力。

同时，他还采纳克拉特洛斯的建议，教唆菲罗塔斯的情妇安提戈涅向他汇报她情人的任何叛逆言论。³⁴亚历山大大概是想搜集他的一些无心言论，然后据此进行摆样子的公审。然而，这种方法取得的铁证少得让人诧异。有一次，菲罗塔斯喝醉了，他激烈地宣称，亚历山大所有的辉煌成就都是靠他和他父亲取得的——这种话或许有所不敬，但绝对称

不上有谋反或叛逆之意。实际上，菲罗塔斯最严重的缺点在于他的口无遮拦，这和叛逆非常不同。如果我们相信库尔提乌斯的话，³⁵菲罗塔斯在西瓦事件结束后曾写信给亚历山大，祝贺他拥有神的血统，并（可能只是半开玩笑地）表示他很同情那些将来要受超凡权威之领导的人。

这种巧妙的贬损恐怕也不是为了提升亚历山大对他的好感的。不过，菲罗塔斯的另一品质使他得以免受罪责，至少在高加美拉战役结束之前一直如此。他是一个杰出的骑兵指挥官，自信而神采飞扬地统率着侍友骑兵。然而现在，亚历山大的使命召唤他从平原走进山区，游击战变成了常规，因此菲罗塔斯便失去了作用，亦即他已经可有可无了。他最后一个兄弟尼卡诺尔的死，更使得他孤立无援，而帕美尼翁又远在埃克巴塔那。亚历山大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动手理由，而命运——或者某种幕后的精心操纵——正好提供了契机。

在处理完尼卡诺尔的葬礼后，菲罗塔斯在锡斯坦湖与大部队会合了。过了一两天，他在亚历山大的帐外被一个名叫凯巴利诺斯（Cebalinus）的年轻人拉住，这人向他透露了一个混乱而不可信的阴谋，说有人想谋害国王。据说，凯巴利诺斯的兄弟爱上了一个名叫杜姆诺斯（Dymnus）的人，后者邀他一同参与阴谋，当然（凯巴利诺斯说）他拒绝了...我们可以想象，菲罗塔斯一边听对方啰嗦，一边不耐烦地踏着脚步在想：又是一次同性恋之间常见的带有阴险指控的争吵，这明显是子虚乌有的事。这时，凯巴利诺斯列举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包括近身护卫官德美特里奥斯（Demetrius）。菲罗塔斯肯定觉得，这事越来越棘手了。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那个年轻人甚至都没有亲自过来，而是派了他的兄弟。现在他却在指控国王的朋友。最好还是别掺和进去——这种传闻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凯巴利诺斯一直请求个不停，非常烦人，于是为了摆脱这个人，菲罗塔斯答应会马上向亚历山大报告——他可能觉得，过一会儿这事自然

就平息下去了。也可能在他的思想背后，潜藏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念头，即虽然非常不可能，但如果传言是真的，那不妨任其发展下去：

你不可杀人，也无须

多费心力去救人。^⑬

总之，尽管他在之后的两天里数次和亚历山大谈话，但从未提起这桩传说中的阴谋。³⁶凯巴利诺斯每次见到菲罗塔斯都会问他跟亚历山大报告了没有，而菲罗塔斯（不想用捕风捉影的传言来刺激国王原本就已敏感多疑的神经），每次都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敷衍这个执拗的家伙。最后，凯巴利诺斯狐疑不定，又把这事告诉了国王的一位侍从。³⁷

这次，凯巴利诺斯马上得到了响应。侍从把他藏到军械库里，然后在国王洗澡的时候报告了这件事。³⁸亚历山大立即下令逮捕杜姆诺斯，接着又盘问凯巴利诺斯本人。他理所当然地问道，为什么拖了48个小时才让他知道——特别是，凯巴利诺斯知情时政变已经策划了三天？³⁹这时候，菲罗塔斯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到了对话之中。凯巴利诺斯无意将他牵涉到阴谋当中去，而他也不在杜姆诺斯的同谋名录之中。⁴⁰凯巴利诺斯只是抱怨菲罗塔斯迟迟不肯替他传达消息——毋宁说，他的抱怨只是为了给自己开脱，并没有别的恶意企图。

但亚历山大立马看出，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由头，一个用来扳倒菲罗塔斯的绝佳手段。等只剩一口气的杜姆诺斯（被捕时他持剑自杀了）被拖进来时，国王心中憋着一句令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话，他大声吼道：“我到底对你做了多大的恶，以致你觉得菲罗塔斯比我更适合统治马其顿人？”然而，杜姆诺斯此时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还没回答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就死了。⁴¹接着，亚历山大召来了菲罗塔斯。菲罗塔斯起初没有把这事当回事儿，据库尔提乌斯说，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把两

个情人之间的争吵汇报上去，就会受到其他人的嘲笑”。杜姆诺斯自杀的消息使他大吃一惊。他承认或许他本应上报这件事情，并为没有这么做而道歉。亚历山大接受了他的道歉，两人还握了手，表面上这事就这么过了。菲罗塔斯走出来时依旧是个自由身。⁴²

当然，事实上国王其实只是需要再多一点时间来完善他的计划。他召集了一次私密的议事会，菲罗塔斯不在席中。⁴³到场的有赫淮斯提翁、克拉特洛斯、科伊诺斯——他是帕美尼翁的女婿，但素来见风使舵——密提勒涅的厄里吉奥斯，以及两名近身护卫官佩狄卡斯和列昂那托斯。这些人后来都被提拔为高级将领，其中的四个还成了帝国的元帅。这些人构成了亚历山大所信赖的内部圈子。

凯巴利诺斯的兄弟尼科马科斯（Nicomachus）被带了进来，详细复述了他所参与的事情。⁴⁴随后克拉特洛斯站了起来，猛烈地抨击菲罗塔斯——他个人的竞争对手——和帕美尼翁，并且断言只要他们还活着，亚历山大就不可能安全。议事会上的其他人也附和着。菲罗塔斯肯定与阴谋有关联，否则他为什么不愿上报？应当对他严加拷打，或许那时他就会供出其他同谋者。

在得到下属们的支持后，亚历山大立马动手了。对菲罗塔斯的实际逮捕将是整个行动中最危险的一步，因为总有一丝可能性军队会站在他那边。国王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他宣布次日早晨将进行便步行军训练。骑兵巡逻队被派驻到营地的各个入口以及营地外的道路上，以确保没有人可以趁夜逃出去给帕美尼翁传信。为了消除菲罗塔斯的疑虑，亚历山大给他发去了一份晚宴邀请。大约午夜时分，一个精选的特遣队从国王的营帐中被派出去逮捕菲罗塔斯和凯巴利诺斯的兄弟所提到的其他同党。在菲罗塔斯睡下后，他的住所被悄悄地包围起来，所有的逮捕行动都完成得非常顺利。⁴⁵

次日早晨，亚历山大下令马其顿军队全体集合。因为在叛国罪中，国王是原告，而终审判决则属于军队。当气氛越发紧张之时，沉默良久

的亚历山大开始发表演讲。杜姆诺斯的遗体就躺在他面前，而菲罗塔斯暂时还没出现。此刻，他言之凿凿地宣布，帕美尼翁就是阴谋背后的主使者，而菲罗塔斯和其他人则是他的代理人。对此，他所能提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位老师被人截获的信件，其中有一些含糊其词的指令：“首先，你们要照看好自己，然后是你们的伙伴，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筹划的事情。”⁴⁶

凯巴利诺斯、他的兄弟以及把消息报告给亚历山大的皇家侍从，都被传唤出来作证：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菲罗塔斯有罪。亚历山大无奈地重新提起那些陈旧的传闻和流言蜚语；甚至菲罗塔斯的情妇给他提供的材料也没有任何确实可靠的根据。现在，被指控者终于被带了出来，他双手绑在后面，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披风。他的出现引起了军中同情他的窃窃私语。有个名叫阿敏塔斯的军官突然站起来试图反驳这种表示同情的舆论，他说这个囚犯曾把他们全都出卖给蛮族人，因为这个人他们所有人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子、家乡和孩子了。^⑭紧随阿敏塔斯之后的是菲罗塔斯的妹夫科伊诺斯，他指责菲罗塔斯是国王、国家和军队的叛徒，他几乎忍不住想用石头砸死他。

根据习俗，菲罗塔斯有权为自己辩护，但亚历山大在嘲讽他不用马其顿方言发言后就离开了，没有听他的发言。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菲罗塔斯以一种轻蔑的悠闲态度把整场起诉批驳得体无完肤。后来一个行伍出身的将领费了不小的力气才重新激起了大会的敌对情绪；他提醒大家菲罗塔斯多么傲慢、多么自以为是，他曾经是怎样把部队从宿舍里赶出去以便放置他的私人物品的。这引发了一阵愤怒的声讨，其中有个卫兵大声喊道，他要亲手把这个叛徒撕成碎片。

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算好时机，重新出现并解散了大会，等到明天再开。当晚，第二次议事会同意菲罗塔斯及其同党都应接受传统的惩罚，即处以石刑。不过，亚历山大希望先拿到两样东西：一份菲罗塔斯亲笔写的自白书，和某种牵涉到帕美尼翁的供状。因此，克拉特洛斯、赫

淮斯提翁和科伊诺斯得到授权可以拷打菲罗塔斯，直到他拿出这两样东西来。动手前，国王还跟克拉特洛斯私下会谈过（库尔提乌斯说，“会谈的主题没有公开”，这倒也正常）。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任由他们继续——或者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他在一块帘子后面监视着事情的发展。⁴⁷

在天亮前，施刑者拿到了书面自白书，可能还有足够的额外细节，足以把帕美尼翁也牵扯进来，不管这一切是想象的还是回忆出来的（菲罗塔斯一度还以厌倦的玩世态度，请求克拉特洛斯解释清楚到底想让他供认什么）。当这位受害者被带到全军大会上听候处置时，他只能被别人抬着出来，因为他已经没法走路了。我们主要的史料来源库尔提乌斯说，甚至在写出自白书后，他又遭受了一顿拷打。菲罗塔斯和其他被定罪之人刚被处决，亚历山大（素来喜欢一石二鸟，在这个场景里用的是真的石头）下令将与他同名的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带来受审。⁴⁸但是，三年的幽禁似乎使这个曾经高傲的贵族丢了魂。当轮到他为自己辩护时，他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只吐出了几句不知所云的话，然后就沉默了。站在一旁的卫兵有点不耐烦了（或者可能得到过授意），干脆就用枪刺死了他。

安德洛美涅斯四个儿子中的三个也被提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跟菲罗塔斯过从甚密，而且亚历山大的母亲也曾写信警告他要当心这几个人。他们的第四个兄弟波勒摩（Polemo），一听说菲罗塔斯被捕就立刻逃跑了——人们可能认为，这已经足以马上判他们有罪。但是，最为年长的（同时也是奥林匹娅斯恶意攻击的主要对象）阿敏塔斯，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辩白。他说，除了其他的因素，太后之所以对他充满恶意，主要是由于当初在马其顿征兵时，他根据国王的特旨强征了她的几个年轻宠臣。⁴⁹令人惊讶的是，亚历山大竟放他们自由了。（他们三兄弟之一的阿塔罗斯是佩狄卡斯的妹夫，他们的获释或许跟这有关系。）国王可能觉得对个别人进行宽大处理有利于证明所有审判都是公正的。^⑮于是，

当近身护卫官德美特里奥斯自辩无罪时，亚历山大就让他走了；后来在所有纷争都已平息后，亚历山大又悄悄地重新逮捕了他。⁵⁰

不过，国王无意对所有持异见的马其顿军官进行大规模清洗。他已经实现了他的直接目标，知道应当适时收手。只剩一件事——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事——还没完成。侍友之一波吕达马斯（Polydamas）被派了出去，他穿着阿拉伯服饰，带着两位阿拉伯向导，穿过伊朗中部的沙漠，带着帕美尼翁的处决令。为了保证能在那位老师听到他儿子已死的消息之前赶到埃克巴塔那，他们骑上赛跑用的骆驼，只用11天便走完了这段平常要30天才能走完的路程。

当波吕达马斯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了。他换回马其顿的装束，然后直接去找帕美尼翁的副手克勒安德洛斯。克勒安德洛斯看了一下亚历山大的处决令，这已经足够了。他命令他的参谋人员做好戒备，同时安排波吕达马斯次日早晨在皇家苑囿的小树林中与帕美尼翁会面。波吕达马斯还带了两封信给帕美尼翁本人，以免他的突然到来引起对方的怀疑。其中一封是亚历山大写的，而另一封则盖着菲罗塔斯的印章，甚至有可能是和他的“自白书”同时写的。当这位老师满怀欣喜地打开信时，克勒安德洛斯连刺两剑，第一次从肋下，接着是喉咙。他的同行军官们也紧跟这么做。甚至在帕美尼翁已经断气了后，他们依旧刺个不停。

树林外的卫兵们迅速召集军营中的战友，然后回来威胁要处死他们。对于这种危险的状况克勒安德洛斯早有防备，他向卫兵的带头人出示了信件，“这些信件叙述了帕美尼翁谋反的计划以及亚历山大要求他们将其处死的命令”。士兵们只是略微得到了安抚，他们要求安葬老师的尸体。起初，克勒安德洛斯担心这一让步会触怒国王，便当即予以拒绝。但眼看就要发生暴动，他只好同意妥协。帕美尼翁的首级被割下来并送到亚历山大那里，而他残缺的躯体则在埃克巴塔那接受军事葬礼。⁵¹

帕美尼翁的那支非常爱戴他的部队，从未忘记或原谅他被杀一事。多年以后，当那些刽子手反过来受到清洗时，士兵们一个个都欢欣鼓舞

。对亚历山大来说，此事可谓惊险至极。他煽动军队起来反对菲罗塔斯，然后借着这精心安排的问罪一并除掉了帕美尼翁和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现在他终于摆脱了压抑了他如此之久的梦魇。但是，整个事件导致了一种混杂着猜疑与仇恨的恶劣后果。自此以后，亚历山大从未完全信任他的部队，反之亦然。

为了能知道士兵们在想些什么，亚历山大创建了第一个已知的军事邮递审查体系。国王鼓励士兵和军官们写信回国，他恐吓他们说越往东进军这样的机会就越少。信件是通过他本人的信使而发送的。在经过三个邮递站后，这些信件会被召回，在闲暇时亚历山大会将它们一一过目。在信中，有些人批评他本人以及他的政策，或者为帕美尼翁之死（在他看来）而过度悲伤，或者抱怨他们那一再延长的兵役；对此，亚历山大“将这些人集中起来，组成所谓的‘纪律团’^{①⑥}，以免其他的马其顿人受到这些不当议论和批评的腐蚀”。查斯丁说，组建该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派人去执行一些特别危险的任务，或者派驻到东部边境遥远的军事要地。⁵²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决定（不过后来又撤销了），不再把他至关重要的侍友骑兵交给一个人控制。因此，他把菲罗塔斯的指挥权分割给黑面的克雷托斯——这个任命显然是为了安抚保守派旧部——和他最亲近的密友赫淮斯提翁。⁵³这是赫淮斯提翁的第一个重要职位。从此他的权力稳步增长，而且决不是完全凭借裙带关系：他看起来也是一位称职的骑兵指挥官，只是也许算不上有灵气。

当安提帕特听说帕美尼翁之死时，他说：“如果连帕美尼翁都谋反，那还有谁值得信任呢？如果他没有谋反，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⁵⁴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将来还会反复出现。整个事件自始至终都是个谜。普鲁塔克认为，唯一真正存在的阴谋是反对菲罗塔斯的；而近来大多数的史学研究也倾向于认可这种说法。⁵⁵按照这种观点，无论菲罗塔斯还是帕美尼翁，他们都是亚历山大个人的报复心和政治独裁的无辜

牺牲品。这其中或许有真实的成分在，但将此作为全部的真相无疑是一种危险的过度简单化。

除非我们决心把所有史料都弃置一旁，否则很明显，确实存在有关谋反的传言。何况，国王随后将菲罗塔斯空出来的职位一分为二，这种做法提示我们，不论正确与否，他本人——如果不算其他人的话——相信死者是有罪的。至于他是否把帕美尼翁也当作叛徒就很难说了。不满情绪早就蔓延开，而帕美尼翁自然成了其中的核心人物。再者，他还控制着亚历山大的交通线上的关键位置，而且一旦发生政变，他所在的位置正好便于夺取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收集来的财宝。无论国王的私人感情怎样，亚历山大都不可能在处决了他仅存的儿子后，还让他待在如此有权势的位置上。

如果在这关头确有阴谋存在，那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即：推翻亚历山大，扭转他那不得人心的政策，并尽快结束征战。这种谋划的天然挑动者自然是马其顿保守派，而他们的天然领袖则是帕美尼翁和菲罗塔斯这样的人物。这就是亚历山大所能做的推断；他或许决心先发制人——特别是他和他们父子俩都有旧怨要算。不过，有些细节还有待斟酌。不管菲罗塔斯的解释看起来多么言之有理，他一再拒绝汇报他所得到的传闻一事依旧让人困惑不解。从帕美尼翁给他儿子的信（如果不是纯属伪造的话）中摘录出来的话，即使做最好的解释，也还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如果说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真有成为未来名义领袖的危险，那么突然且毫无明显动机地处决他一事或许就可以理解了。

如今真相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原了。即便当时，恐怕也无人——尤其是亚历山大本人——掌握所有线索。那么，我们对“菲罗塔斯事件”的结论就应当是“证据不足”而非确凿的“无罪”。同时，我们也不应过分同情帕美尼翁，他自己也有过不义杀人的记录，那同样经不起彻底的细查。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这位坚韧而狡猾的马其顿投机者只不过比多数人生存得更久罢了。

-
- ① 前文所说的大流士的妻子。
- ② 亚历山大嘲笑了刻在宫殿青铜柱上的法律规章，这些条文规定了大流士的早餐和晚餐。条文规定许多事项，其中包括要有100只鹅或小鹅、400蒲式耳的小麦面粉和1塔兰特（57.5磅）重的大蒜（Polyaenus 4.3.32）。翻译官大概忘了告诉他，这些款项（无可否认确实很奢侈）是为波斯大王的整个宫廷和所有扈从准备的。——原注
- ③ 我们发现，此时亚历山大拿出了巨额的赏赐（Diod. 7.64.5-6; Plut. *Alex.* 34, 39; QC 5.1.45），由此可以推断他在劝说军队放弃巴比伦的温柔乡和重新上路时必定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因为他们的进军方向是往东而非往西，是深入亚洲而非返回家乡。每个马其顿骑兵得到了600德拉克马——将近一年的薪水，其他士兵各有份额。全部花费超过了2000塔兰特，不过巴比伦的财宝足以支付这笔费用。——原注
- ④ 波斯大王的母亲、女儿们和儿子被留了下来：在亚历山大未来即将进行的游击战中这些人会是一个很大的累赘，而且当最后到达目的地时，他们有时也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找来一些教师教他们希腊语（Diod. 17.67.1; QC 5.2.17-22），免得他们无所事事。——原注
- ⑤ Parsa, Persepolis 的别称
- ⑥ 作者误引作“Day of Wrath”，根据作者提供的出处，原文为“Race of Wrath”。这一短语出自《巴列维书》，在该书中反复出现。
- ⑦ 这个山口可能在达什特-伊-卡维尔和苏尔赫山脉之间，它向东延伸，通过北部的岔路可以通往菲鲁兹库哈和古都克山口，然后朝东北折向阿拉丹后面的达姆甘：参见 J. F. Standish, *G&R*, 17（1970），17-24。——原注
- ⑧ 有关亚历山大的行军速度参见 C. Neumann, *Historia* 20（1971），196-8，诺伊曼（Neumann）赞同塔恩和哈蒙德（Hammond）而反对米尔恩斯（R. D. Milns, *Historia* 15（1966），266）；后者认为36英里的行军速度“从生理上说不可能的”，而从拉格到卡斯比亚关口的52英里的冲刺是“很荒谬的”。诺伊曼引述从古至今一些非常有趣的行军速度（安提柯，每24小时44英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每24小时46至54英里；克劳福德将军，可能每24小时52英里）。参看 C. L. Murison, *Historia* 21（1972），409 n. 32。——原注
- ⑨ 即中文史料中的和犊城，今伊朗的达姆甘。
- ⑩ 另一个相同事件参见第十章内容。——原注
- ⑪ 唐·恩格斯先生在一次未发表过的交流中提出，亚历山大此时到达的不是穆尔加布河而是库什克河，离苏西亚（图斯）约180英里；阿里安（Arrian, 3.25.6）说，阿尔塔科亚纳离亚历山大调头去处理反叛的萨提巴尔扎涅斯的地方有600斯塔

狄昂（70英里），“这说的就是在库什克河的一个地方，而不是更北的穆尔加布河”。恩格斯先生颇为有力地证明，亚历山大“可能绕过了达什特—伊—科尔的南缘，顺卡沙夫河而下到达捷詹河（奥科斯河），从那里再到库什克河……如果亚历山大从图斯出发朝正东方向前进，那么在他到达穆尔加布河之前就只有一条捷詹河，该河流在100英里之外，其中有50英里要穿越达什特—伊—科尔。因此，他更有可能会选择南部的路线。”这很有可能，但目前证据还不够充分。——原注

- ⑫ 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法国的一名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德雷福斯于1906年获得平反，随后还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 ⑬ 出自英国诗人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的《最新十诫》（*The Latest Decalogue*）。
- ⑭ 这可能会煽动军队，但也触怒了亚历山大，因为他一直在努力消解早先一直存在的归国念头。——原注
- ⑮ 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为这种老套的宣传伎俩所骗：参见塔恩的第一卷第63—64页（Tarn, vol. I, pp. 63-4）和巴迪安的论述（Badian, *TAPhA* 91 [1960], 334-335）。——原注
- ⑯ Disciplinary Company，希腊文作ἀτάκτων τάγμα，字面意思是无纪律的一队士兵。

第九章 探寻大洋

等到亚历山大重新上路时已经是冬天了。如果只是单纯想追击贝索斯而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他本可以向北折回到他之前离开穆尔加布河（或库什克河）时的位置，然后再朝扎里亚斯帕进军。相反，他转向东北方向，并穿越了阿拉霍西亚，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他选择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线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南部行省仍旧不安分，其中就包括阿拉霍西亚省。的确，离心的倾向一直在蔓延。他刚刚出发就收到了后方再次叛乱的报告，这次又是萨提巴尔扎涅斯领导的。亚历山大立即派了一支讨伐军去阿雷亚解决叛乱，其指挥官密提勒涅的厄里吉奥斯在一对一的对决中亲自杀死了萨提巴尔扎涅斯，从而赢得了极大的声名。

虽然叛乱平息了，但阿雷亚依旧麻烦不断。一位可靠的马其顿人随后取代了它原来的波斯总督。亚历山大还任命另一位马其顿人梅农做阿拉霍西亚的总督，并设立一个新的军事据点以增强他的权威，这个据点可能就在现代的坎大哈附近。很显然，这整个地区远远没有臣服，更谈不上可靠。

公元前329年2月，亚历山大到达坎大哈，并于4月初开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在东阿富汗高原地区的冬季行军过程中，他的军队深受冻疮、雪盲和慢性疲劳之害，最后一项可能是高海拔缺氧所致。¹在喀布尔

附近，国王让他们做了一次短暂的休整。接着，在设立了第三个驻防城镇后（该城名为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他率领军队翻越哈瓦克山口（海拔11600英尺），并沿着索尔赫阿卜河往北朝德拉普萨卡（昆都士）进军。据说，他们翻越山口只用了17天——这是相当的了不起的成就，需要事先在营地中做好最细致的规划和储备工作。在北兴都库什山脉，贝索斯采取了焦土政策，一切储备要么被毁掉，要么被当地居民藏在坑洞中。这给马其顿人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但并没有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①

贝索斯本人带着7000名巴克特里亚军队和一些强悍的索格底亚那^②战士——后者由两位强大的封臣斯皮塔美涅斯和奥克西亚特斯（Oxyartes）统领——正在阿奥尔诺斯（塔什库尔干）自信地等待着亚历山大的到来。从喀布尔到乌浒河谷至少有七个山口：贝索斯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其顿人会选择海拔最低的那个。但一向出人意料的亚历山大并没有这么做。哈瓦克山口不仅是七个中最东边的（正因如此他选择了这个山口），而且也是海拔最高、积雪最厚的。他的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通过了该山口，而位于西面80英里远的贝索斯突然发现自己被侧翼包抄了。于是，他决定完全放弃巴克特里亚，撤退到乌浒河对岸，以索格底亚那作为防御基地。²

当他宣布这一计划时，大部分巴克特里亚骑兵当即逃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村落。不过，正如后来所证明的，贝索斯的策略既非怯懦，也不愚蠢。巴克特里亚主要由多缝隙、多岩石且人迹罕至的山区组成，几乎没有可用于战斗的地形。而在乌浒河对岸，情况就大为不同。索格底亚那（布哈拉和突厥斯坦）以平原和沙漠为主。而当地居民是彪悍而独立的游牧民族，几乎在学会走路之前就会骑马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可以完美地用来实施一种打了就跑的消耗战（参看 Fuller, p. 117），骑兵游击队可以突袭行进中的队列，当受到追击时又可以退回到茫茫草原中。



在德拉普萨卡做了短暂的休整后，亚历山大占领了塔什库尔干和巴克特里亚的首府——也是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扎里亚斯帕，而且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然后，他留下年老的阿尔塔巴佐斯做新征服的行省的总督，自己则继续朝乌浒河进军。现在是6月份，一个干旱的季节，而他的行军路线却要穿过一个酷热缺水的沙漠，原本饱受冻疮之苦的将士们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着中暑的威胁。夜间行军没那么难受，因为在夜里气温下降了很多（从超过38℃降到了21℃甚至15℃）。即使这样，在这场折磨人的长途行军中许多人还是掉了队，而且人数很多，以致亚历山大最终在日落时分到达乌浒河时不得不为他们点上烽火：否则，这些人在黑夜中可能就找不到他的营地了。

经过这次经历，塞萨利人（由于帕美尼翁被杀，这些人已经很难驾驭了）集体抗命，许多腓力的老兵也仿效他们。现在离家乡已有4000英里之远，他们受够了。国王无可奈何，只好遣散他们，并付予解雇金和津贴。这次意外的遣散行动使得亚历山大的一流部队严重不足。更糟糕的是，由于脱水之后过量饮水，许多人竟因此丧命，减员人数甚至比任何一场战斗都多。因而，亚历山大赌了一把，第一次大规模地在地方征募“蛮族”辅助军队。他的冒险非常成功——至于其他马其顿人怎样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乌浒河（今阿姆河）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条河流发源于高耸入云的帕米尔高原，带下来大量来自中亚高山的雪水。在亚历山大渡河的凯利夫，河流有四分之三英里宽，水相当深，河底又是沙质的，而且水流湍急。国王的工程师试图打下桩子以便造桥，但这些桩子很快就被冲走了。周围尽是没有树木的贫瘠之地，要收集足够的木材必定会耗时过久。最后，亚历山大回想起了他在多瑙河采用过的便宜之计，只不过这次他没有舰队可以帮忙。他们把所有皮革帐篷都用干草塞满，然后仔细缝好，制成一个个浮筏。

借助这种权宜方法，国王让军队渡过了河流。但是，这耗费了他五天的时间；如果贝索斯在此期间发起攻击，将使亚历山大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就后面的事情来看，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或许还挽救了自己的性命。³然而相反，贝索斯认为亚历山大会被乌浒河拦住，除非他募得一只运输船队——这正如此前他曾自信却又错误地推断，从喀布尔过来的马其顿人会通过哪个山口一样。在巴克特里亚撤退之后，他的军事声望已岌岌可危，而当亚历山大最新的事迹传来时，他的威信便荡然无存了。这时候，斯皮塔美涅斯和索格底亚那的封臣们觉得，变换一下宗主也未尝不可。于是，他们囚禁了贝索斯，然后派遣使节去通知亚历山大，如果他能派个将领和卫队过来，他们就把弑君者交出来。这是极为高明的一招，不仅可以让这个新的军人集团甩掉贝索斯本人，而且能够使亚历山大相信他们的合作意愿。

不过，亚历山大的反应十分谨慎，因为这消息有可能是个陷阱。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他在德美特里奥斯被清算之后成了一名近身护卫官）受命去执行这一棘手的任务。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麻烦，他带了一支很强的部队——大约16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兵。⁴斯皮塔美涅斯及其同伙同样也信不过亚历山大，他们有意避免亲自与来使接触。托勒密被带到一个偏远的村庄，他在那儿发现贝索斯正由重兵看守着。于是，他派人向亚历山大报告，询问应怎样把贝索斯带回去见他。

国王的指示非常明确。贝索斯应置于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将要经过的路旁，需赤身裸体地绑在一个柱子上，还要在脖子上戴一个奴隶戴的木枷。一切都照办了。当亚历山大（他对贝索斯的处理似乎主要是为了告诫那些桀骜不驯的伊朗贵族）行到被囚者的位置时，他从御用战车上下下来，责问贝索斯为什么囚禁并杀害“他的国王、亲人和恩主”大流士。贝索斯回答说，这是集体的决定，“为的是能赢得亚历山大的欢心，以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但众所周知，只有在他被看成一个外族篡位者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要这样的欢心，而外族篡位者这一标签恰恰是亚历山大所极力想要避免的。为了表明他对贝索斯叛徒行为的厌恶，亚历山大

先是将其鞭打一顿，接着把他送回扎里亚斯帕，在那儿贝索斯于公元前328年以弑君罪接受审判。他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了——这是一种波斯习俗，大流士一世曾用在某位争位者身上，但这里是由亚历山大直接下令执行的——最后在埃克巴塔那，当着米底人和波斯人全体大会的面，他被公开处决。⁵至于亚历山大的阿契美尼德式的主持正义的姿态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则争论不断。

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以及随后的沙漠行军使得马其顿骑兵的马匹损失很大。亚历山大用当地的突厥斯坦马来重新装备骑兵部队，这种马要比他们此前遇到过的任何品种都要高大、强壮得多。随后，由于高兴但错误地以为斯皮塔美涅斯现在已是他的臣属兼盟友，并且索格底亚那的西南部已全部归顺，亚历山大向北朝马拉坎达（撒马尔罕）和药杀河（锡尔河）进军。这条河流乃是波斯帝国东北方向最远的边界。河流的对岸便是无边无际的“斯基泰”草原和山区，那里住着野蛮的游牧民族——达海人、萨卡人和马萨格泰人。在此，亚历山大发现了一个前哨基地和一连串的七个要塞，据说是由居鲁士设立的。他把雇佣兵派驻在这里，同时还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军事据点，“既可作将来远征斯基泰的绝佳基地，又可作对付河流对岸游牧部落袭扰的防御阵地”。这个据点名叫极边亚历山大里亚（列宁纳巴德或科真德）。

许多“斯基泰”部落派遣使节前来觐见，希望能缔结盟约。亚历山大亲切有礼地接见了他们。一些马其顿军官随同这些使节返回部落，以便巩固双方的友好协定——同时尽可能地收集有关当地地形、军事装备和部队人数等各方面的信息。用外交人员当间谍决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就在这时，真正的麻烦开始了。亚历山大召集斯皮塔美涅斯及其同伙在扎里亚斯帕会面。斯皮塔美涅斯可能担心国王想借此扣留人质以使他们安守本份，于是就拒绝了。在他的领导下，整个行省都起而反叛。当地部队将亚历山大的驻军屠戮殆尽，重新占领了居鲁士的前哨基地及相连的要塞。斯皮塔美涅斯本人则率军包围了马拉坎达。一听到消息，

国王马上采取了行动，但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将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派往马拉坎达的援军根本不足以完成使命。事实上，援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法努刻斯（Pharnuches）是一位吕底亚翻译，他被选派出去可能是为了外交谈判而非战斗。他通晓当地语言，“而且能够老练地跟当地居民打交道”。他所带的只有60名侍友骑兵和2000名雇佣兵，其中有800人是骑兵，由三位马其顿军官统领。

亚历山大则亲自处理沿河要塞里的敌人。在向马拉坎达行进时，他的腿骨被流矢射中，这更让他大怒不已。他用三天时间重新夺取了七个要塞中的五个，作为报复他把守军全都屠杀掉。主要的前哨基地居洛波利斯在突击队沿着城墙下的一条干涸河道潜入城中后也陷落了。有8000名战士在无望的抵抗中战死。剩下的7000人连同其余两个要塞的守军随后（据阿里斯托布罗斯记载）被集体处决。在肉搏战中，亚历山大的面部和颈部被一块大石击伤。有一段时间，他的视力和声带都不大正常，大家一度担心他会就此失明。

他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休息和康复。骨头碎片不停地在他受伤的腿里活动，同时他一定还忍受着极为严重的偏头痛的折磨。尽管几乎无法站立，亚历山大接下来还是花了三周的时间监督了极边亚历山大里亚新城墙的建造。在康复期快要结束时，由于受到对岸游牧部落的讥讽和威胁，他深入他们的领地，进行了一次漂亮的突袭。环绕在四周的游牧骑兵反过来被亚历山大设计包围住，有1000人被亚历山大的重骑兵斩于马下。在撤退时国王喝了一些受到污染的水，渡过药杀河后，他得了肠胃炎，真可谓祸不单行。

然而，最坏的消息还没到来。当法努刻斯及其援军即将到达时，斯皮塔美涅斯从马拉坎达撤退，并巧妙地将追击者引诱到了布哈拉；该地位于扎拉夫尚河对岸，在马萨格泰人的荒芜领域内。在这里，他们遭到伏击和包围，差点儿被全歼了（确切情况各家说法不一）。只有300名步兵和大约40名骑兵成功脱逃。紧接着，斯皮塔美涅斯率军返回马拉坎

达，重新包围了该城。当亚历山大从幸存者那里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他威胁倘若他们胆敢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的话，就会处死他们。亚历山大熟读希罗多德的《历史》，大概还记得居鲁士征讨马萨格泰人时的背运；那次征伐以类似的这样一场大屠杀告终，连国王都在该役中殒歿。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斯皮塔美涅斯是自罗得岛的门农之后亚历山大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国王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前进。他带着一队骑兵和轻装步兵，沿着药杀河强行军，通过饥饿草原并进入扎拉夫尚河河谷，在第四天破晓时分到达了马拉坎达，整段路程约有160英里。斯皮塔美涅斯及其骑兵立即放弃围城，逃到了沙漠中。亚历山大追击了一会儿，但最后感觉追不上，也就放弃了。返回时，他有组织地劫掠了沿河地带：没有草料和补给，敌人将很难在冬天进攻马拉坎达。他还绕道前往法努刻斯被伏击的地方，把那些抛尸荒野的阵亡将士安葬好。⁶

完成此事后，他渡过乌浒河，回到了扎里亚斯帕的冬季营地（公元前329/328年）。在这里，贝索斯得到了最终的裁决；同时，亚历山大还处理了阿雷亚的反叛总督，此人被其贵族同党用锁链送了回来。令人高兴的是增援部队也从海岸过来了，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兵。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帕美尼翁的兄弟阿桑德洛斯（此人后来就没被提及，这可能只是巧合）和亚历山大的发小涅阿尔科斯。他直到最近一直担任吕西亚总督，现在则被任命为翊卫队的兵团指挥官。各种使团的到来也使冬天的日子显得热闹许多；其中有一个使团来自科拉斯米亚，该部落居住在从乌浒河到咸海的地区，其国王法拉斯美涅斯（Pharasmenes）亲自率团来访。

亚历山大可能是第一次从法拉斯美涅斯那里得知咸海的存在，地理概念的不足和过于臆想的翻译似乎使两人彼此严重误解。法拉斯美涅斯很想得到如此伟大的征服者的支持，以对付其西面居住在里海一带的邻居；但不知怎的，这让亚历山大想到了科尔齐斯和阿马宗人，进而他确

信法拉斯美涅斯想要远征黑海。最有意思的是国王的回应。他告诉法拉斯美涅斯，他首要关心的是征服印度以结束亚洲的征战。不过他又说，回到希腊后，他计划对黑海发动一次全面的海陆并进的远征；到时这位法拉斯美涅斯的提议将能派上大用场。⁷这是现存史料中有关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终极计划的第一次表露，完全征服了东方后还会有进一步的远征。

不过，在他能够考虑朝印度进军前，亚历山大还得对付行踪不定的斯皮塔美涅斯。公元前328年早春时候，亚历山大留下克拉特洛斯和四个方阵兵团以维持巴克特里亚的秩序，自己则重新渡过乌浒河，开始解决这项少有的棘手任务。^{8③}他把大军分成五个机动纵队，分别由赫淮斯提翁、托勒密、佩狄卡斯、科伊诺斯以及他本人统领。这些纵队在乡间扫荡，扫除了当地零星的反抗势力，并建立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军事前哨网。或者就在此时，或者稍晚一些，相同的前哨体系也在马吉安纳（巴克特里亚西部）建立了起来。原有的堡垒得到了利用，同时新的也在建造，相互之间可成犄角之势。单单在索格底亚那，查斯丁就罗列了不下13个这样的要塞。⁹

与此同时，斯皮塔美涅斯身处马萨格泰人之中，离亚历山大远远的，据说他正在招募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当五个马其顿纵队根据约定于仲夏时节在马拉坎达会合时，国王派科伊诺斯和年老的阿尔塔巴佐斯去监视他的活动。斯皮塔美涅斯轻而易举地躲开了他们的侦察兵，向南迂回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占领了边境的一个要塞，劫掠了扎里亚斯帕周边的土地，还把由冒险出城对抗他的由马其顿老兵组成的临时部队歼灭了。克拉特洛斯（他和四个方阵兵团一直在内地）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率军追击斯皮塔美涅斯，终于在沙漠边缘追上了他。接着便是一场激战，在此战中约有150名马萨格泰骑兵阵亡。但是包括斯皮塔美涅斯在内的其他人故伎重施，再次逃到了草原上，这样克拉特洛斯就没法继续追击了。¹⁰

那年夏天，营地里的气氛紧张而焦躁。原本应该只是一场快速的小型战役，如今却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两次史无前例的失败更是叫人受挫。腓力的旧部和国王的希腊-东方侍臣之间的厌恶和嫉妒达到了新的高潮。烈日下的马拉坎达酷热难耐。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所有人，都开始过度地豪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足以引爆早已紧绷的情绪。很快，在一次马其顿宴会过后的喧闹中，充满愤恨的人们愈发肆无忌惮。大家酒后吐真言，由于长期压抑，他们的话便说得更加激烈难听，就像腓力最后且致命的那次婚宴的情形一样。情绪是迟早要爆发的；而当它来临时，采取了一种特别糟糕的形式。¹¹

和平常一样，那天晚上以一场豪华的宴会开始——可能是为黑面的克雷托斯举办的，他次日将就任巴克特里亚总督一职，这是一个危险且责任重大的职位。¹²不久，宴会就变成了通常喧闹不堪的酒会。醉醺醺的亚历山大在他周围的阿谀奉承者的鼓动下，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的功业。拍马屁之人也把国王的业绩与赫拉克勒斯的相提并论。这种自命不凡的态度可能处心积虑地想要刺激保守派们的，倘若如此，那他确实达到了目的。¹³这时候，克雷托斯（在他眼里亚历山大的东方化行为和侍臣们粗俗的谄媚一样讨厌）生气地说，这是对神的不敬。总而言之，他接着说道，他们在夸大其辞。亚历山大的大部分功绩得归功于马其顿军队（这个话题克雷托斯一会儿还会再提，其结果是致命的）。¹⁴听到这话，国王“深受伤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

亚历山大的侍臣们素来喜欢煽风点火，现在更是全力贬低腓力，说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些普通而平常的事情罢了”。国王也主动接过了这个话题。腓力不愿意承认他在喀罗尼亚战役中的功劳，即便他——亚历山大——在战斗中挽救了父亲的性命。其他深藏已久的怨恨也都一倾而出。¹⁵此时既醉且怒的克雷托斯激烈地维护腓力的功业，而且（理由很充分）“认为那些功业比现在的胜利要高得多”。他甚至出言为帕美尼翁辩护，说亚历山大之所以能轻松取胜，全靠腓力的老兵。

库尔提乌斯说：“于是，这激起了新战士与老兵之间的争论。”¹⁶但是，分歧不仅是因为年龄，更根本且无法调和的是民族主义与东方化政策、简单朴素与复杂世故、坦言直谏与曲意迎合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是亚历山大（他对近来反对他的阴谋极为敏感——这或许有他的道理）故意挑起这场冲突，以便了解像克雷托斯这样的老将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不管怎样，他竟火上浇油地让一个希腊歌者出场，¹⁷此人为了取悦人群，上演了一段充满恶意的短剧，（没有点名地）讽刺某些最近在讨伐斯皮塔美涅斯时被打败的马其顿指挥官。这引发了在场年长的马其顿人的强烈抗议，但亚历山大及其侍臣却十分愉快，他们叫歌者继续演，不要停。

克雷托斯忍无可忍地怒吼道，真是耻辱，竟然任由敌人和蛮族人（他指的是国王的波斯客人）“羞辱马其顿人，马其顿人就算遭遇不幸也比这些嘲笑他们的人要好得多”。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亚历山大会挑在餐后安排这个闹剧的原因。显然，克雷托斯也是被影射的指挥官之一，而且已经上钩了。国王轻声说道，把懦弱叫作“不幸”听着就像诡辩。“正是你所说的懦弱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中救了你的命，”克雷托斯大声喊道，“正是靠马其顿人的血和我们这些人的伤，你才爬到如此高的地位——否认腓力而宣称阿蒙神是你的父亲……”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指责亚历山大谋杀，不是谋杀帕美尼翁而是谋杀阿塔罗斯，这就表明了他自己在那场权力斗争中未曾表露出来的态度。¹⁸

亚历山大的回应也非常地耐人寻味。“这就是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看法，是不是？这就是引起马其顿人之间敌对情绪的原因。别以为你能逃得了惩罚……”“听着，亚历山大，”克雷托斯说道，有意按照腓力的习惯直呼国王其名，“就算现在我们也逃避不了。我们那么辛苦，可我们又得到过什么奖赏呢？那些死了的人是最幸运的，他们不用眼睁睁地看着马其顿人被米底人的棍棒抽打，或是为了见到自己国王而向波斯人磕头。”这段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呼，但此时亚历山大或许没有他假装的那么醉，他转过头对坐在旁边的两位希腊侍臣说：“你们不觉得希腊人

走在马其顿人中间就像半神走在野兽当中吗？”这句话大概是蓄意让任何保守的马其顿人情绪彻底失控。

当时非常嘈杂，克雷托斯没有听清国王的话——实际上那句话可能是有意用来进一步刺激他的。于是，这位老战士对亚历山大吼道，你要么公开把话说清楚，要么别邀请“我们这些自由且敢于直言的人”来参加宴会，去招待那些只会匍匐在你的白袍和波斯绶带下的奴隶和蛮族人吧。亚历山大勃然大怒，抓起他手边的第一个东西，一个苹果，¹⁹扔向克雷托斯，然后回头要找他的剑。有个近身护卫官很有先见之明，事先就把剑拿开了。国王的密友佩狄卡斯、吕西马科斯和列昂那托斯感觉情况不妙，便围了上来，强行把他按住。亚历山大奋力挣扎着，同时嚷嚷说这是阴谋，他像大流士一样遭人背叛了。

与此同时，其他人在拉古斯之子托勒密的带领下，把克雷托斯生拉硬拽地拖出了宴会大厅。国王终于挣脱开了，他用马其顿语大声喊道，“警卫集合！警卫集合！”他命令号兵吹响警报，但这位勇气非凡、头脑清醒的号兵却拒绝执行命令——后来他因此举而大受称赞，因为他可能成功避免了一场暴乱——然后遭到了一顿痛打。这时，克雷托斯又挣脱了束缚，摇摇晃晃地从另一个门进来，喊了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中的一行诗句：“哎！在希腊有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府啊！”^④在马其顿，欧里庇得斯是深受喜爱的悲剧诗人，学童们都能长篇记诵他的作品，亚历山大也一定可以毫无困难地把克雷托斯非常贴切的引用接下去：

当公众树立起战争纪念碑时

那些真正流血流汗者是否得到了荣誉？

哦，没有！荣耀被一位将军攫取了！——

他不过是在千万人中挥舞着自己的一根长矛，

只做了一个人的事，却得到了无穷的赞美。

这些自命不凡的国家元老

自认为在人民之上。凭什么，他们什么也不是！

亚历山大被这种讽刺深深刺痛了，现在也不会顾得上（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斯多亚学派的博爱论，如果这种学说伤害了他的自尊的话；他跳了起来，从一个卫兵那里夺来一支枪，然后投向克雷托斯，后者当场死亡。²¹

转瞬间亚历山大就后悔不已，他把枪从那位老战友的遗体中拔出来，试图（大概并不是很拼命地）刺向自己。但是，他的朋友再次围了上来，强行把他控制住了。²²他把自己关起来，一整夜都在悲痛之中，此外还想起了自己忘记向狄奥尼索斯献祭；这听起来像是要把杀人一事归咎于神灵的愤怒，从而为自己的责任开脱。²³黎明时分，他让人把克雷托斯的遗体抬过来，哀悼了一会儿，之后遗体便被人抬走了。²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家的说法不一，普鲁塔克说36个小时（最有可能），查斯丁说四天（典型的夸张），而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则接受闭门三天的说法²⁵——他一直把自己隔离着，不吃也不喝。

很难说从什么时候他的真正的悲恸开始开始变成某种精心的作秀：也许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兼而有之。我们只能根据结果作判断，而此事的结果很耐人寻味。一旦亚历山大的追随者们开始觉得他真的会饿死自己，而使他们被抛在这遥远的蛮族之地，而且群龙无首，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来改变他的决心。事实上，国王不仅想要赦罪，还想要他们的信任支持：他两者都得到了。卡利斯特涅斯试图用睿智的哲学话语宽慰他，但没有奏效。²⁶不过，阿纳克萨科斯（Anaxarchus）作为一个政治务实派立马看出，亚历山大需要的不是理性的安慰，而是哲学上的合理化解释。于是，他走进国王的卧室，简单粗暴地叫他起床，别再哭哭啼啼的：国王超乎人类的法律之上。

毫无疑问，这正是亚历山大想要听到的；从此以后，阿纳克萨科斯不断受到重用，而卡利斯特涅斯则逐渐失宠。马其顿人从国王的反应中得到启示，于是“断定克雷托斯被正当地处死了”，其罪名大概是叛国。一些占卜师则把他的结局归咎于狄奥尼索斯的愤怒，让事情更复杂了，因为他们所“回想起”（即捏造出）的各种预兆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此一来责任便从亚历山大转到了“命运的判决”身上（在此阿里斯坦德洛斯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样的回溯，亚历山大的罪行就被合法化了，同时他也意识到，从今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在关键时刻得到军队的支持，这时，亚历山大同意起来进食。²⁷然而，宴会现场的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克雷托斯被杀是因为他勇于公开批评国王，而不是因为别的。更糟的是，亚历山大的杀人之举竟公然得到了辩护。自此，再也没有什么能约束得了他了。的确，正如库尔提乌斯所说，在帕美尼翁死后没隔多久，克雷托斯又死了，这标志着自由的终结。²⁸

现在，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度过了两次作战季，但都没什么收获。斯皮塔美涅斯仍旧逍遥在外。国王下定决心，要在春天到来之前把他干掉，因为他不想把入侵印度的计划再往后推了。这时确实已经拖延得太久了。克雷托斯的职位空出来后，亚历山大亲自执掌侍友骑兵。大部分军队都回到了璫塔卡的冬季营地，而科伊诺斯则率领两个方阵兵团和一支强大的混合骑兵，奉命去防卫西北边界。

马其顿的要塞网络现在开始发挥作用。斯皮塔美涅斯发现，补给和马匹的获得已经越发困难，更不用说一个安全的基地了。最后绝望之下，他取得3000名马萨格泰骑兵的支持，尝试进行一次大规模突围——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在部署军队时所预见的那样。科伊诺斯斗志昂扬地把这支庞大但纪律涣散的游牧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杀死了800名骑手，而自身却几乎没有损失。少部分一直追随斯皮塔美涅斯的索格底亚那人向马其顿人投降——他们的许多同胞早就在马其顿军中服役了。斯皮塔美涅斯本人则率领游牧民逃到了沙漠中，由于这场可耻的败仗，他的声望大

跌。事实上，当马萨格泰人听说亚历山大亲自追击他们时，便果断处死了斯皮塔美涅斯，并将其首级作为议和条件送给国王。^⑤ 他们的沙漠邻居达海人在听说了所发生的事情后，也立马把斯皮塔美涅斯的副手交了出来，从而得到了谅解。²⁹

随着斯皮塔美涅斯被杀，北部边境所有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都就此瓦解。尽管这位索格底亚那领袖的军事才华被高估了，但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游击战统帅。和门农一样，他也看出对付亚历山大最好的办法是突袭和游击战。亚历山大那支迄今未有败绩的大军被他牵制在突厥斯坦达两年多之久；如果他能得到比那些只想四处劫掠的沙漠游牧部落更可靠的支持的话，甚至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来。

时入隆冬，亚历山大还在清剿东南方向的荒凉山区（帕莱泰刻涅，在今塔吉克和巴达赫尚之间）的敌人，那里至少有四个大领主仍在凭借他们的石堡对抗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在瑙塔卡的马其顿军队再度出发。这时是1月初，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夜里气温降到零下，暴雨、雷电交加的风暴以及猛烈的冰雹凝为了坚冰。在这次行军过程中，大约有2000人冻死或死于肺炎。和往常一样，亚历山大展现了他应对危机时的过人品。他想尽办法来提振士气低落的马其顿军队：大量的树林被砍倒拿来生火，冻僵的肢体因而变得暖和。有个士兵在森林里迷路了，最后回到营地时几乎站不起来，更不用说拿稳武器了。国王便让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靠着熊熊的火堆。当士兵恢复之后看清所坐的位置时，出于训练有素的卫兵的条件反射，他登时跳了起来。

亚历山大的反应很有其个人特色——同时也意味深长。他友善地看着士兵，说：“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国王手下你过得比波斯人更好？对于他们，坐在国王的位置上是死罪，而对于你，却是一种救命手段。”即便在这冰天雪地的山坡上，国王也还是在焦虑着一个不解的难题（即使考虑到库尔提乌斯的罗马式修辞），即，怎样在政治上赢得所有人。他母亲的暗示、在埃及加冕为法老，甚至是伊索克拉底恭维式的预言

——在喀罗尼亚战役后伊索克拉底告诉腓力，一旦征服波斯大王，他还能做的就只有成为神——都指向了一个越发具有吸引力的答案。³⁰不管怎样，难道他不是已经超越了赫拉克勒斯的功绩了吗？

第一个遭到亚历山大攻击的山地要塞是所谓的“索格底亚那石堡”。当地领主奥克西亚特斯有一支大军驻守在此（据说有30000人，数目之大令人生疑），为了安全，他还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送到了那里。储备非常充裕，足以应对两年的围困。大雪不仅阻碍了马其顿人前进，而且为守军提供了丰沛的饮用水。石堡本身非常陡峭，可以说牢不可破，至少守卫者是这么认为的。在初步谈判时，当亚历山大提出，如果他们交出堡垒，他就保证他们安全回家时，守军对自己的守卫显然非常乐观。听完谈判条件他们大笑不已，然后问他的士兵是否会飞，因为他们只向长了翅膀的战士投降，“至于其他人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国王的名声本应使他们在发出挑战前三思而行：这不会使他气馁，而只会激发他的决心。

亚历山大立即在全军遍寻经验丰富的攀岩能手和登山家，总共找到300人。侦察表明，守军只守卫堡垒的直接通道。现在，亚历山大要求自愿者从远处的陡峭岩面爬上去，为前12个成功登山者提供丰厚的奖赏。他们带了剑、矛以及两天的补给。到达堡垒上方的山顶后，他们将以挥舞白旗作信号。

每个人都是自愿执行这场危险任务的。阿里安和库尔提乌斯所记载的细节表明，两千多年来高山攀登技术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些突击队员用绳索绑在一起，借助插入岩石缝隙的铁楔和钢锥攀上最艰难的山崖突出部。他们在夜里登山，这更添危险。大约有30人坠落到了山脚的雪堆中，其尸体再也没能找回来。不过，黎明时白旗终于在山顶上挥舞起来，亚历山大派传令官告诉守军，如果往上看，他们就能看到他那些长了翅膀的士兵。奥克西亚特斯的部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以至于他们立即投降，虽说跟登山者相比，他们的人数优势几近一百比一，而

且亚历山大的主力依旧无路可以上山。对敌人心理的洞察又一次带来了巨大的回报。³¹

不过，好戏更在后头。索格底亚那石堡投降后，亚历山大表示他对奥克西亚特斯的女儿罗克姗娜（Roxane）十分钟情；所有马其顿人都认为这个姑娘是“他们在亚洲遇到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如果不算大流士的妻子的话”。亚历山大是否真的爱上了她颇有争议，尽管不同的史料都这么说；她直到赫淮斯提翁死后、在亚历山大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才有了身孕。^⑥不管怎样，对各方面而言，这种结合所带来的政治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因而，亚历山大和罗克姗娜顺理成章地结了婚：新郎和新娘共享一块礼仪性的面包，亚历山大用剑将其切成了两份。这大概是马其顿的习俗，当然是象征性的。

浪漫传奇给历史的细节罩上了一层迷雾，而如法国学者所说，这些历史无疑是一些“精致的宣传”。³²随后，亚历山大继续他的冬季征伐，现在同行的还有其极具影响力的岳父，他是亚历山大前敌人中最强大的一位，亚历山大可以让他去说服那些顽抗的领袖们前来归顺。当他们遇到另一个在4000英尺高、周长不下7英里的山岩上的更难企及的堡垒时，幸亏有奥克西亚特斯。国王费尽力气在通往该堡垒的狭谷上架好了桥梁，然后他派奥克西亚特斯去劝说敌方统帅，继续抵抗是没用的，而如果投降，他就会得到优待。这一计策奏效了，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亚历山大同意这位领主科里厄涅斯（Chorienes）继续执掌该堡垒；作为交换，科里厄涅斯为亚历山大全军提供两个月的口粮。（他忍不住强调说这只是石堡储备的十分之一，言外之意即他投降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现在，索格底亚那全境已基本平定。³³国王派克拉特洛斯带一支部队去处理剩下的敌人，而他自己则统率大军返回扎里亚斯帕，为拖延已久的入侵印度做准备。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亚历山大十分清醒。他终于征服了东北的两大行省；但除非他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否则再次翻越兴都

库什山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严重的麻烦。通过与罗克姗娜结婚——这种策略无疑会得到他父亲的赞许——他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当地支持，虽说这可能会（又一次）疏远马其顿保守派们。除此以外，他还能怎样巩固自己的势力呢？一个方案是他所建立的军事要塞网。有些要塞可以转变为永久的城市。该地区已知至少有六座大城，全部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其中包括马吉安纳（梅尔夫）、乌浒河边的塔尔密塔（铁尔梅兹）和极边亚历山大里亚（列宁纳巴德或科真德）。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防御边境，但有几个却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同时，这些城市也可以方便地用来安置为数众多的⑦服役期已满或忠诚度可疑的希腊雇佣兵。³⁴

此外，大批援军的到来（公元前328年，光步兵就有16000人）也使得他有条件驻扎一支特别强大的军队。取代黑面的克雷托斯担任巴克特里亚总督的阿敏塔斯最终得到了10000名步兵和3500名骑兵，按此前的标准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不过，此时亚历山大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也是受腓力影响最明显的一招）是征募30000名地方青年，教他们希腊语，并进行完全马其顿式的军事训练。所有男孩都是从各行省的名门望族中根据体力、健康和智力而精心挑选出来的。

这一策略有两大目标，一个直接的，一个长远的。最终，这些学员将补充到亚历山大的军官团体中去，由于战斗伤亡、疾病、驻防和行军路线上的管理需要，军官减员已十分严重。后来国王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他所指的当然是指继承马其顿的旧部队。不过就目前来说，当他在向印度和海岸行军时，他们只是作为高价值的人质而已。³⁵

显然，这种革新举措是没法保密的，即便亚历山大有此愿望。当跟参谋人员商讨时，他无疑会强调这些“继承者”的人质属性；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整个理念不免会让他们回想起令人不快的皇家侍从军团，而且如今规模要远更大。不过，国王原有的马其顿指挥体系中的另一部分，即“将领和总督培训营”，³⁶将直接面临来自蛮族新贵的竞争。看上去，亚历山大的确像是有意（理由很明显）想把所有的马其顿影响从王

室机构中清除出去。保守派领袖们，作为唯一一个强烈排外的小团体，一直反对和嘲讽国王的帝国抱负，此时他们已经被一个个地消灭掉了。如今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体系中，波斯贵族已经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重要职位，波斯的宫廷礼仪也使那些名义上的同侪越来越难以接触到他。

然而，还是存在着一个大难题。把伊朗和巴克特里亚的部队和马其顿部队或希腊雇佣兵编在一起不难，然而，除了在侍友部队、翊卫队和方阵兵团中，上哪去找一流的兵团或师旅指挥官？无论乐意与否，亚历山大都不得不迁就他的军官阶层；而正是这些军官直率的马其顿式的无礼行为，约束着他的东方式的自我膨胀。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宫廷内部在匍匐礼或敬礼方面的分歧。对波斯人来说，这是日常的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只不过敬礼方式会随行礼者社会地位的相对差异而有所不同。对地位相等者要亲其嘴，对地位略高者要亲其脸颊，而——用希罗多德的话说——“地位极卑者则要全身匍匐以示恭敬”。可以想见，若推而极之，有资格接受所有臣民最为极致的匍匐礼而不论其等级的，自然就是波斯大王。然而，对希腊人来说，匍匐礼乃是一种只有在拜神时才会做的动作。如果只在社会语境中，他们觉得匍匐礼是一种可笑、屈辱且渎神的行为——“是东方奴性的典型表现”。³⁷在马拉松战役后，卡利亚斯（Callias）很震惊地看到一个波斯俘虏对他行此大礼。派往波斯的使节们也常常被此事弄得很尴尬。在这种关键时刻，有个机灵的外交官把印章戒指丢到地上，然后自我安慰说他只是趴下去拣戒指而已。在波斯波利斯，有一幅米底人向波斯大王行匍匐礼的浮雕被亚历山大的部队故意毁坏，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此礼的态度。

更麻烦的是，由于希腊人把匍匐礼当作一种宗教敬拜，他们错误地认为，既然波斯人在波斯大王面前行匍匐礼，他们必定认为国王是有神性的。不难想象这些冲突的信念在亚历山大宫廷中会激起何等的混乱和愤恨。波斯显贵们理所当然地向亚历山大行匍匐礼，正如他们反过来也

会接受地位更低者的匍匐礼一样。亚历山大如果想废除这种习俗，必然会使他自己继承波斯大王之位的诚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当有人行匍匐礼时，许许多多的马其顿将领总是大笑不已，或者表现出一种粗鲁的轻蔑态度。波吕佩孔（Polyperchon）曾用戏拟马其顿教官的口吻对一个匍匐在地的波斯人说：“快，别只是用下巴触地，得磕出声来，兄弟，得磕出声来！”³⁸

显然，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宫廷里一半在行匍匐礼，一半在旁边嘲笑，这是不可容忍的。但是该怎么办呢？亚历山大不可能囚禁或处决他所有的最优秀的将领。（他一度把波吕佩孔关起来，但很快就把他释放了；另一个失礼之人列昂那托斯也没有受到惩罚。）唯一的希望是，通过一步一步仔细的操控，使马其顿人把匍匐礼当作一种单纯的文明礼仪来执行。在这背后，亚历山大和宣传部门（包括卡利斯特涅斯和阿纳克萨科斯），以及马其顿高层的许多人私下里进行了无数的商讨。

这些商讨的痕迹就保留在阿里安和库尔提乌斯所述的程式化的辩论中。³⁹阿纳克萨科斯知道马其顿人对匍匐礼的反对主要在于该礼暗含了神性之义，因此在一群勤勉的宣传人员的支持下，⁴⁰他提出了一种大胆却也十分合理的建议（该建议无疑得到了国王的毫不谦逊的默许）。他问，为什么不承认昭昭可见的既成事实，把亚历山大当作神呢？亚历山大注定会在死后得到神一般的荣耀。“那么，从各方面来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给予荣耀，难道不比在他死后更好吗？那时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功业早就超越了赫拉克勒斯和狄奥尼索斯——而且本来他跟后者的联系也不强。把亚历山大当作一个纯粹的马其顿的神——这是迎合民族主义者的虚荣——难道不是更好吗？

但是，阿纳克萨科斯讨好马其顿人的企图终究失败了：他们坚定地拒绝了这份诱饵。更要命的是，他们竟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某个人的支持。御用历史学家卡利斯特涅斯站了出来，他基于传统的宗教立场，完全

反对阿纳克萨科斯的提议。为什么会这样？在将其雇主美化成宙斯或阿蒙神之子时他未曾有过疑虑。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他一直在宣传亚历山大的功业，而且有时也不是那么严谨或真实。他不喜欢保守派们，也非常乐意参与诋毁帕美尼翁的运动。尽管现代有人为他辩护，⁴¹但他此前的人生表明他其实是一个能屈能伸且自负的趋炎附势者。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突然转变了呢？可能就像他自己所表明的，他觉得把亚历山大神化的做法实在与他的宗教感情相悖，虽然对他（如同多数希腊智者）而言，现实存在与文学的修辞夸张之间顶多只有那么一丝的联系。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对宫廷中的权力平衡的变化所做出的回应。很明显，他一直期待着一旦马其顿保守势力被最终清除出去，希腊人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猜想，他之所以支持马其顿保守派，是因为将来取而代之的不会是希腊人，而是波斯人。

无论其个人动机是什么，卡利斯特涅斯对当前局势的判断相当敏锐。不管怎样，亚历山大必须倚仗他的马其顿诸将；而只要该礼仪含有把他当神的意味，他们又强烈反对匍匐礼。现在卡利斯特涅斯站在占优势的一边，亚历山大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一旁。然而，这位希腊史家所未能察觉到的是，他竟因这次不合时宜的反对而挖好了自己的坟墓。对亚历山大来说，希腊主义如今已成了明日黄花。所以克雷托斯死后，卡利斯特涅斯在意识形态上的过失使他再也得不到国王的欢心，因为国王希望他的手下不仅要高声赞成，还要把话说得漂亮。这些事情阿纳克萨科斯做得更好，于是其地位也相应上升了。当然，这方面的成功范例是阿里斯坦德洛斯，阿纳克萨科斯无疑都看在眼里，然后有样学样。

由于卡利斯特涅斯的反对，神化计划流产了；现在亚历山大伙同赫淮斯提翁以及其他一两个密友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把匍匐礼作为某种世俗礼仪引进来。他们特意安排了一场宴会，在宴会上当酒杯在众人当中传递到该计划的知情者们时，他们就站起来，匍匐在国王面前，而反过来，他们将得到国王代表同等地位的吻，以抵消这一动作可能带来的

屈辱感。他们期望，接下来其他宾客出于礼貌，也会跟着这么做。

历史上曾有过更为拙劣的变通手段，实际上当时一切都进行很顺利，直到轮到了卡利斯特涅斯——这次又是他。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侄子，他一生都在玩弄文辞，此时却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玩火。他似乎坚信，笔杆子就是比利剑更强大；亚历山大及其功业，以及其他的一切，他卡利斯特涅斯的记述既能造就之，亦能毁败之——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觉，但在此却是致命的。于是，他把酒喝了，但却没有匍匐。当时亚历山大正和赫淮斯提翁交谈，没有注意到；但边上有个廷臣马上指出了这一遗漏。于是亚历山大拒绝了卡利斯特涅斯的致敬，而这个希腊人转过身去，大声地说：“好吧，我离开时将比大家少一个吻。”⁴²他又一次扼杀了亚历山大的匍匐礼方案。赫淮斯提翁为了保护自己，被迫说卡利斯特涅斯原本是认可这一做法的，但后来又反悔了。

这次事件决定了卡利斯特涅斯的命运，不过哲学家本人好似幸福地没有看清现实。他模糊地意识到，他使亚历山大疏远了他；但是在马其顿人当中一夜走红之事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的脑子还沉浸在哲学之中，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暴君的对抗者、自由的守护人，捍卫着传统的希腊精神，使其不受堕落的蛮族式革新的腐蚀。

就因为这个故作姿态的书生，亚历山大精心安排的计划没能如愿以偿，亚历山大对此并不高兴。宣传部门已经开始散播关于卡利斯特涅斯的流言蜚语，他们攻击他古板刻薄，还上报说他发表了许多所谓的“煽动性的”言论（主要是修辞学中常见的反暴君的陈词滥调）。另外，据说他在离开国王时曾小声咕哝道：“帕特罗克洛斯也死了，他可比你强得多。”^⑧不过，国王的主要目标是消解卡利斯特涅斯在保守派中新获得的声望。事实证明这事竟如此简单。通过挑拨一方的天生自负和另一方的固有偏见，亚历山大一个晚上就达到了目标。

宴会过后，卡利斯特涅斯受邀即兴颂扬一下马其顿人，以此展现他的演说才华。他的演讲非常成功，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本人也被

戴上了花环。这正是亚历山大所想要的，他要让卡利斯特涅斯上升到一个极端自负从而再也下不来的位置。国王引用了《酒神的伴侣》中的两行挑衅性诗句（“当能言善辩的聪明人找到了好的点子/把话说得漂亮并非难事”），^⑨ 然后考察他的辩论术技巧，让他采用对立论点，以同样的力度贬损马其顿人，“这样他们或许可以在错误中学习进步”。

作为一个天生的训诫者和教师，这位哲学家不需要别的鼓励就接受了这一诱惑，开始抨击马其顿人的风俗习惯和希腊人的派系倾轧，最后以一行格言般的诗句结束——“在纷争的时候，卑鄙的人也能获得荣誉”——这明显是在嘲讽腓力，至少他的听众是这么觉得的。贵族保守派们分不出何者是辩论术的训练、何者是发自肺腑的言辞，总之他们都气得要死，而亚历山大偏偏火上浇油地说，卡利斯特涅斯所证明的其实是他的恶毒而非辩才。⁴³

在此之后，只需找到一个这位历史学家也牵涉其中的莫须有的密谋即可：在菲罗塔斯身上能奏效的，自然也能在一个普通的希腊平民身上奏效。机会很快就出现了。有个侍从因为其个人对亚历山大的怨恨，密谋要刺杀他。另外还有四个侍从也参与合谋。这次尝试失败了，由于有个侍从走漏了风声，五人全部被捕。在审讯时，他们全都供认不讳。事实上，由于抱着必死的决心，带头的赫摩劳斯（Hermolaus）趁机大肆抨击亚历山大为人妄自尊大、酗酒无度且专横跋扈。但是，哪怕是在强压之下，他们也无人牵连卡利斯特涅斯，虽然国王一听说此事就把他当作同犯进行审问。

和其他希腊哲学家一样，卡利斯特涅斯在一般意义上抨击过专制统治，但也仅此而已。对他的控告是基于个别捕风捉影的证据。据说，当赫摩劳斯抱怨他被亚历山大鞭打时，卡利斯特涅斯告诉他，要记住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审讯时这句话被解释成他在煽动弑君，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斯巴达式坚忍品德的劝诫。不管怎样，卡利斯特涅斯最终被判有罪。就像亚历山大自己说的那样，“人们所误信的谎言，往往会变

成真相”。⁴⁴五个侍从当即被处以石刑。至于卡利斯特涅斯，史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早些时候被处以绞刑，也有人说他被关在囚笼里随军行动直到病死。

在写给安提帕特的信中，国王叙述了五个侍从被处决一事，但是他说在惩罚“那位智者”——这是他对卡利斯特涅斯的蔑称——“以及那些把他送到我这儿和那些窝藏图谋杀害我的人”一事上，他个人会亲自负责：这些话必定会让亚里士多德和安提帕特两人颇费思量。

亚历山大关于印度的观念此时仍旧是非常粗略的。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印度河对面的这片土地是一块不大的半岛，北面是兴都库什山脉，东面是环绕世界的大洋，^⑩（他们相信）大洋不会离信德沙漠太远。对于印度次大陆的主体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从中国到马来西亚的广大的远东地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站在兴都库什山脉的顶峰上就可以看到大洋。对于这个谬误至少亚历山大已经通过亲身观察予以否定了；但总体上他对印度的地理状况仍旧非常无知，他整个的东方战略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假想。当他明白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恒河平原如此之大，单单其存在就足以粉碎他的梦想，比任何军队都更为有力得多。

两个世纪前，居鲁士大帝曾在白沙瓦和旁遮普北部建立一个“印度行省”，据说后来该省每年以金沙的形式上缴高达360塔兰特的贡赋。约公元前517年，大流士一世曾派一个希腊人卡律安达的斯库拉克斯（Scylax of Caryanda）去开拓印度的商贸路线。斯库拉克斯沿印度河航行，经由波斯湾返回，之后他据此行程写了一本书。而希罗多德和克特西亚斯（Ctesias，希腊医生，公元前5世纪后期曾在波斯宫廷里服务）都记述过印度的事情。这三种著作亚历山大及其参谋人员都很容易获得，他们一定仔细研究过了这些明显相关的资料。不过，就算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知道多少的，因为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波斯已经放弃了印度行省，而且即便在“欣度什”是帝国一部分的时候，那里也始终是一片未知领土，一片充斥着神话和传说的地区，就像中世纪时的中国那样。希罗多德

相信，印度的黄金是由比狐狸还大的巨蚁挖出来的；而克特西亚斯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如同耶罗尼米斯·博什^⑪所作的画。^{46⑫}

亚历山大有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要入侵这片神秘的奇幻之地。作为自封的波斯大王，他想要收复居鲁士的行省。而开伯尔山口的存在意味着他必须保卫突厥斯坦免受东方的侵犯。不过，他的主要动机似乎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对未知世界的 *pothos*，此外他还决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征服。当他站在大洋的最远海滨时，他的雄心将得以实现。正如他对法拉斯美涅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征服了印度，“他就完全掌控了亚洲”。要永远做最优秀者：无论居鲁士大帝还是半传说的人物赛米拉米斯女王（Queen Semiramis）^⑬，此前没有一位尘世的统治者曾完全征服过印度。迄今，这种胜利还只属于神明。狄奥尼索斯曾带着他的酒神随从来到这个国家，对其进行征服和教化（此外，据说葡萄就是由他带到印度的）。根据传统说法，在15个世代之后，亚历山大的先祖赫拉克勒斯也来到了这里，并通过他的女儿生育了一长串的印度国王。亚历山大决心超越他们；甚至可能是让他自己被承认为神灵，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⁴⁷

在出发前，国王极大地扩充并重新整编了原有的骑兵部队。八个侍友骑兵分别和来自中部行省的伊朗骑兵混编在一起，成了新的独立分队，即所谓的“骑兵队”（hipparchy）。这项整合政策是为了提高军事效率，但同时也是对保守派的又一次冲击。如果每个马其顿骑兵将领指挥的都是多民族的部队，那么他组织军人小团体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这支军队于公元前327年春再度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其规模几乎没法准确估算。亚历山大统领的马其顿部队不到15000人，其中有2000人是骑兵。不过，骑兵总数估计在6500人到15000人之间。步兵人数也同样不确定，约在20000人到120000人之间。塔恩估计作战部队人数在27000到30000人之间，这无疑太保守了点。另一方面，相对可靠的推测是，这120000人代表总体人数，其中包括营妓、商贩、仆从、马夫、妻子

、情人、儿童、科学家、教师、办事员、伙夫、骡夫，以及如今构成“流动国家和帝国行政中枢”一部分的其他所有人员。⁴⁸

古代史料告诉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翻越萨朗山口（120000英尺）到达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竟只用了10天时间；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先头部队建立前哨营地所用的时间，大部队而后才陆续跟进。当亚历山大还在巴克特里亚时，有一个名叫萨西古塔（Sasigupta，西西科托斯〔Sisicottus〕）的印度王公跑过来加入亚历山大的部队，此人是从贝索斯那里叛逃出来的，他很可能向亚历山大陈述了开伯尔山口那边的政治状况。不管怎样，国王事先派遣使节到塔克西拉（塔克沙西拉）^⑭的王公安比（Ambhi，翁菲斯〔Omphis〕）和“印度河以西的印度人”那里去，要求他们在方便时到喀布尔河谷来与之会面。安比和其他几位较次的君主骑着25头大象如约而至；他们带了礼物，还说了许多表示欢迎的客套话。这些大象引起了亚历山大的极大兴趣，最后——大概是在某种压力之下——那些印度人同意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不过，安比自有理由要与亚历山大交好：他希望马其顿军队能帮助他对付竞争对手波洛斯，一个领地在杰赫勒姆河（叙达斯佩斯河）对岸的强大君主。

这时，亚历山大分兵两路。赫淮斯提翁和佩狄卡斯率领超过半数的骑兵、三个方阵兵团和辎重部队，通过开伯尔山口向印度河进军。阿里安说，“给他们的指示是以武力或和平的方式拿下沿途的所有地方，一旦到达印度河就要做好渡河的准备工作”——大概就是用轻便的船只组建一座浮桥，这种浮桥直到最近仍可在当地见到。安比及其印度同僚将作为向导随军前往。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以克拉特洛斯为副手，率领一支机动部队溯科亚斯佩斯河（库纳尔河）而上，穿过巴若尔和斯瓦特等山地，同时征服沿途的敌军堡垒，以此掩护大部队的左翼。最后，两支部队将在印度河会师。⁴⁹

在这次行军中，赫淮斯提翁这一支除了有一次一个月之久的围城外，进展顺利，一路平淡无奇。然而，亚历山大这一支却一路坎坷。他所

途经的山地难以翻越，而且他所遇到的部族又大都是一等一的战士。在一次交战中，他的肩膀还中了一箭；到战役结束时（这次战役起于公元前327年11月终于公元前326年2月），他的状况实在堪忧。他所进攻的多数城镇不仅从一开始就拒绝开门投降，而且抵抗得十分顽强。¹⁵ 作为报复，当他们最终战败时，亚历山大将居民全部屠杀：和以往一样，违抗他的意志必受严厉的报复。在马萨伽他背信弃义地屠杀了7000名印度雇佣兵，包括他们的妻儿——而且是在向他们做了安全承诺之后——因为他们拒绝和他一道对付自己的同胞。普鲁塔克说，这次行动“成了他军事生涯中难以去除的一大污点”；现代的印度史家理所当然地会赞同普鲁塔克的论断。

也就在这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一些迹象，宣传部门开始宣扬亚历山大的神性，而不是神之子的身份。在马萨伽围城期间，国王的脚踝受了轻伤，当时在场的有个名叫狄奥克西波斯（Dioxippus）的雅典人，他引用了荷马的一行诗句：“灵液，就这样从永乐的天神身上往外流”。亚历山大当即喝止他的恭维：“那不是灵液，那是血。”显然，这么说有点过分了。⁵¹ 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说出这种话是一种失言；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有意思的是他竟然会这么说，或者他觉得这么说别人会爱听。即使只是作为征服印度人的一种手段，亚历山大的神性这一理念想必也得到过严肃的讨论。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两则出自该战役的著名传闻（这大概也是官方层面的宣传），二者都跟神联系在一起，一是关于赫拉克勒斯，二是关于狄奥尼索斯。

在解决了库纳尔和巴若尔河谷的阿斯帕西亚人（阿斯瓦卡人）后，亚历山大向北进军，进入了吉德拉尔之下森林茂密的山区。有天晚上，军队在一座森林里扎营。由于天气太冷，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木柴，点起了许多的营火。火焰熊熊升起，吞噬了悬挂在树上、后来才知道是雪松木棺的东西。这些木棺像易燃物一样燃烧爆裂。这时，森林那头传来犬吠的声音，这说明马其顿军队就在一个城镇边上，碰巧就在该城镇的奇

异的坟地里。

在短暂的围城之后这个城镇投降了。城镇名为尼撒，这个名字跟狄奥尼索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城据说是由一位神明建立的，（从当地居民对亚历山大所说的话来看）而且这位神明具有许多酒神的特征。对马其顿人来说，城镇周边的一座高山进一步证实了狄奥尼索斯的存在，因为那里不仅生长着葡萄藤，还有常春藤——这种植物他们在远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亚历山大与将士们登上这座大山，给自己戴上常春藤花环，并进行了为期十天的酒神狂欢（史料是这么说的），尽情地宴会、饮酒和作乐。库尔提乌斯说：“因此，这数千人的叫喊响彻了高山与河谷，他们在祈求那位居住在这片树林里的神明。”

以往一般认为，整个故事纯属虚构。它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要么是亚历山大自己提出来的，要么是（在更清教徒式的学者看来）他的敌人宣扬出来的。不过，吉德拉尔南部山区的情况——那里野味丰富，盛产葡萄和常春藤、胡桃、水榆、桑树和杏树——却跟古代的记述非常吻合。而且，那里仍然住着一个独特而封闭的民族，即所谓的卡拉什人；他们酿造葡萄酒（这种技术并不为该地区其他部族所知晓），用山羊作牺牲，还把死者放在木棺中然后悬挂在树林里。⁵²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看起来非常不可能的轶事最终证明是有其确凿的事实依据的。

第二则是亚历山大占领一个堡垒的著名故事，阿里安把这个堡垒称为阿奥尔诺斯：大概是梵语*avarana*的希腊语译名，意为“避难之地”。⁵³这个堡垒在一座名为皮尔沙尔的高山上，位于阿托克以北75英里印度河的一个拐弯处，高出河流达5000英尺。阿里安说它方圆大约25英里。堡垒水源充沛，要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陡峭而且艰难。当地传说有位神明（马其顿人认为是赫拉克勒斯）曾试图占领这个难以接近的要塞，但没有成功。阿里安尖锐而戏谑地评论道，“人们总是喜欢夸大困难，为此编造了一个连赫拉克勒斯也没能将其征服的传说”。当然，亚历山大立马产生了要亲自攻占阿奥尔诺斯的强烈欲望（*pothos*）；可以想见，“

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必定是诱因之一”。

在和赫淮斯提翁取得了联系之后（他们的会合地点定在欧印德，阿托克上游约16英里的地方），他立即开始解决这项名义上超越赫拉克勒斯的任务。正如奥雷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所说，亚历山大应对此事时的“毅力、技巧和勇气，恐怕只能在传说中神一般的英雄身上找到，而非凡尘的领袖所能拥有”。⁵⁴如果人们愿意奉亚历山大为神，那主要是由于他完成超神之功业的欲望和能力——何况这是他有挑战他的神灵先辈。在阿奥尔诺斯，为了把投石机和弩炮带到射程之内（将其拖到8721英尺高的乌纳萨尔山上本身就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亚历山大不得不在乌纳萨尔和一座俯视皮尔沙尔的高山之间的峡谷中架起一座木制通道。这种非凡的架构想必跟美国早期的铁路架柱桥非常相似。当通道建好、亚历山大的弩炮就位后，守军就逃走了。一队马其顿士兵费了好大功夫登上山顶，而“那块曾挡住赫拉克勒斯的岩石则留给了亚历山大”。⁵⁵如果国王的宣传人员能够好好利用，那至少他们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可以宣扬了。

亚历山大任命萨西古塔担任阿奥尔诺斯的驻军指挥官，然后对周边地区做了快速侦察。侦察队奉命去讯问当地居民，“尤其是要获得一切有关大象的信息，因为他对这种动物最感兴趣”。大部分印度人逃到了河流的对岸。亚历山大的随从人员中已经有了一队猎手和象夫，他们抓到了13头被人遗弃的大象（另有两头掉到了悬崖下面），并将其编入军队中。接着，他建造船只，把包括大象在内的整支军队顺流运到了欧印德。他的工兵此前已经造好了浮桥⁵⁶——这是很突出的业绩，因为即使在旱季印度河也很少少于一英里宽，一般情况下还会更宽——而赫淮斯提翁也征集了大量船只，包括两只三十桨的桨帆船。

这时，安比送来了大批珍贵礼物，包括银条、献祭的绵羊等，由700多名当地的精锐骑兵护送而来。这位王公还允诺交出他的首都塔克西拉，该城是印度河与杰赫勒姆河之间最大的城市，曾作为波斯的行省首

府。这确实是一份不寻常的礼物。在古代，塔克西拉以贸易和艺术中心而闻名，现代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它的遗址面积约有12平方英里，周边位于阿托克和拉瓦尔品第之间的乡村地区广阔而肥沃，正如斯特拉波所说的那样。

此时已是3月（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让部队休整了一个月，还举行了运动竞赛和骑兵游行。接着在盛大的献祭过后——相应地预兆很吉利——整支军队渡过了印度河，开始朝塔克西拉进发。安比出城走在自己军队的前头去迎接他们，他的军队摆出了完整的战斗阵形，军中还列有大批盛装的战象。当他们在平原上行进时，其景象必定非常引人注目。不过，亚历山大尚未从折磨人的斯瓦特战役的紧张情绪解放出来，他当即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的陷阱。他认为，安比的所有礼物和外交活动都意在使马其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从而放松警惕。现在，这个背信弃义的印度人准备在他们没有防备时大开杀戒。于是，战斗号角吹响了，命令逐级传达下去，所有马其顿人急忙转换成战斗阵形。

国王能够怀有这种荒谬想法，这为我们透露了他此时的精神状态。那位王公的军队在5英里之外，他们的行进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难看出他有突击别人的意思。事实上，当安比看到“马其顿人的紧张活动”并猜到个中缘由时，他带着一小队骑兵卫队疾驰而来，然后让自己及全军正式归顺亚历山大。⁵⁷于是国王松了一口气，命他恢复原位，继续做享有全权的塔克西拉王公。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安比慷慨地招待马其顿人，除了先前送过的，他又送了许多奢华的礼物。

但和通常一样，最后是亚历山大说了算。没有人可以超过他，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慷慨上。他返还了安比的所有礼物，并添上自己的30匹马、成套的波斯袍服、一些金银器皿，以及从军费中划拨的不下1000塔兰特的现金。⁵⁸在次日晚餐过后，兵团指挥官之一墨勒阿格（Meleager）⁵⁹酸讽地祝贺国王终于发现了一位价值如此之高的人，即便这需要大老远地跑来印度。墨勒阿格是一位信得过的侍友，这会儿喝醉了；在克

雷托斯事件后非常警惕的亚历山大，却罕见地克制着自己，只是说了一句，嫉妒的人是他们自个儿最坏的敌人。不过，这事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亚历山大在世时，墨勒阿格就再也没有晋升过。

国王对安比的慷慨有着明显且非常务实的动机。到了这时候，他的情报组织必定已经向他提供了有关杰赫勒姆河对岸敌军的规模和力量的基本信息。波洛斯这位战士国王的领地从古杰拉特绵延到旁遮普，显而易见，他和阿比萨瑞斯这位克什米尔的反叛王公联合起来足以强大到抵抗亚历山大的进一步前进。塔克西拉的安比可能是他们的宿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提出非常诱人的和解条件。因此，亚历山大必须确保，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安比能稳住立场。当地三个国王联合抵抗马其顿军队，即便不会构成致命威胁，至少也会是最严峻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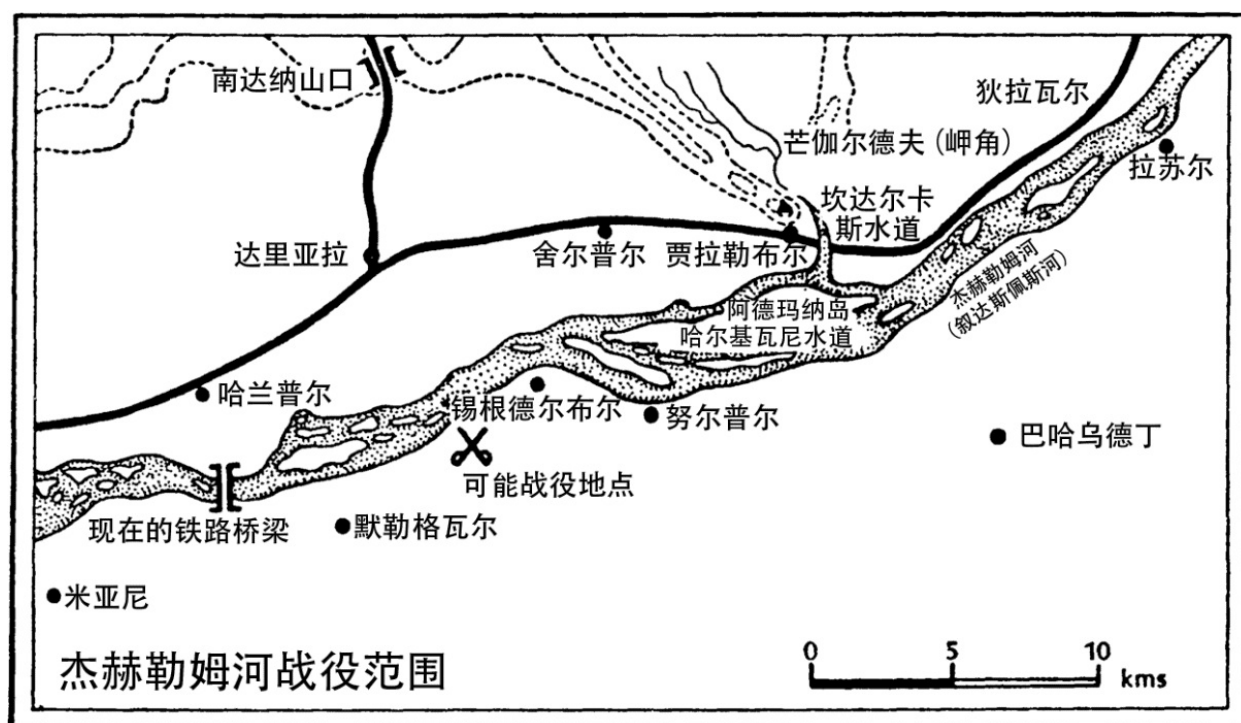
所以，国王当然得慷慨一些（这一点对任何有头脑的参谋将领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墨勒阿格从来没能晋升到更高级别，那也是因为他太过愚蠢）。亚历山大的慷慨大方并不意味着盲目信任。尽管表面上安比获得了大量的荣誉和奖赏——包括保留王位——但亚历山大又任命了一个马其顿人担任塔克西拉的军事首长，有一支强大的驻军供他调遣。在此时，没有必要做无谓的冒险。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在塔克西拉逗留达两三个月之久，在某种层面上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意味着当他踏上下一段征程时，已经是6月初了，那时雨季已经开始。即便如此，如果他能跟阿比萨瑞斯和波洛斯达成某种外交妥协，从而避免新的大战，那么时光也不算虚度。

4月初的时候，阿比萨瑞斯派使团带着礼物过来，承诺将会归顺。这些亚历山大全都接受了：他们的真诚度非常可疑，但至少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位王公的真正意图很可能是想确保自己在动员军队时不会被马上攻击。不过，阿比萨瑞斯使团的到来也促使亚历山大派遣自己的使节到波洛斯那儿去，此时向他示好正是时候。这位保拉瓦君主被要求到杰赫勒姆河边去见亚历山大（那里是他的边界），并献上贡赋以示

效忠。

他对此提议的回应正是亚历山大所担心的，也是他所预期的。波洛斯说，他一定会到杰赫勒姆河边去见亚历山大的，但会带上全部军力，并准备为他的王国而战。情报表明，他召集了三四千骑兵和五万步兵，另外还有大约200头大象和300辆战车。⁶⁰预计援军会从阿比萨瑞斯那边过来，此时印度军队已经开始在河流东岸集结。显然，亚历山大不能再拖沓了。他的第一个迫切需要是运输船队。最近的可通航的河流离塔克西拉也有好几英里远，不管怎样，从头开始造船是来不及了。于是，科伊诺斯奉命回到印度河，把亚历山大的浮桥拆解掉，然后把船只拆了，装到牛车上去。它们将通过陆地运过来，然后在杰赫勒姆河边重新组装起来。⁶¹

当科伊诺斯在忙这事的时候，亚历山大做了最后的军事和行政上的安排。5000名印度军队被征作步兵，同时国王又得到了30头大象，这些是从阿拉霍西亚的叛乱总督那里俘获的。大约6月初时，雨季开始了；过了几天，亚历山大冒着瓢泼大雨率领军队南下去迎战波洛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种暴雨将几乎不会停止。军队取道卡克瓦拉和阿拉翻越了盐岭；在通过了南达纳山口后，他们折向西南，在哈兰普尔附近抵达杰赫勒姆河，两天之内他们大约行进了110英里。⁶²即使这只是先头部队的速度，在雨季的情况下能取得这种成就也是相当惊人的。



根据先期到达的情报人员的消息，亚历山大得知，哈兰普尔是他在雨季有望渡过杰赫勒姆河的为数不多的渡口之一。（现代铁路将其作为设桥点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显然，波洛斯也考虑到了这些相关的路线。当亚历山大到达哈兰普尔渡口时，他发现对岸已经驻扎了一支大军，其中有弓箭手，也有战车。最令人不安的——尤其令马匹不安的——是波洛斯的大象。这支数量达85只之多的巨兽分队把守着渡口，它们踏着沉重的脚步来回走动，一边跺脚，一边吼叫。河流因雨季的到来而暴涨，浑浊的洪流咆哮而下，此时河面已有半英里之宽，然而看不到任何预期的渡河点。

即便能过河，渡河去迎战这样一支大军无异于自取灭亡：只要靠近大象，亚历山大的骑兵马匹就会因恐惧而慌乱。⁶⁴进一步的侦察表明，波洛斯在附近其他每一个可能的渡河地点都部署了强大的守卫部队。现在似乎陷入到了僵局之中，而亚历山大则有意加强这种印象，他命人把

粮食和其他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营地中来，而且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这么做。幸运的话，这将使波洛斯确信，对手正如他公开声明的那样，打算在杰赫勒姆河边坚持到雨季结束、河流再次可渡之时。

与此同时，马其顿部队的调动也说明他们有可能会立刻进攻。骑兵部队从一个前哨奔驰到另一个前哨。方阵兵团则沿着河岸来回行进，在深厚的红泥中艰难地、嘎吱嘎吱地走着。船只和进攻艇上下不断游动着，偶尔运送一些士兵登上哈兰普尔附近的一些小岛，这些小岛有可能会成为亚历山大的桥头堡。⁶⁵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进攻行动出现，于是波洛斯就不怎么注意这些令人分心的调动了，而当然，这正是亚历山大所想要的。在此期间，马其顿的骑兵侦察队一直在探索杰赫勒姆河地势更高的河段，一直远到东边的贾拉勒布尔。正是在那里，即在营地上游17英里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亚历山大所要的地方：一个大型的、树木茂盛的岛屿（阿德玛纳岛），两边是狭窄的水道，靠近岸边的地方则有一个深水区，便于部队和进攻艇隐藏。⁶⁶

国王决定在夜色的掩护下强渡杰赫勒姆河，于是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机巧来迷惑波洛斯，以便掩盖他的真实意图。每天晚上，火把大范围点燃着，同时喧嚣不断。每天晚上，托勒密率领大队骑兵“沿河岸上下跑动，使劲地制造各种声响——射击声、号角声以及各种可能被当作渡河前奏的喧闹声”。⁶⁷起初，波洛斯很严肃地对待这些现象。他追踪对岸的每一处声响和运动，一听到警报就唤起大象，而他的骑兵则巡视着河流的每一处可能的紧急登陆地点。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吵闹和喧哗背后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于是就放松了警惕。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熟视所以无睹。在这暴雨倾盆的半夜里，无穷无尽的错误警报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调动，势必会极大地损害印度军队的士气。可能波洛斯断定这就是亚历山大的真正目的。最后，他终止了所有的夜间调动，只依靠上下游的前哨链进行警戒。

亚历山大这时得知，克什米尔王公阿比萨瑞斯正在南下的路上，实

际上离亚历山大已不到50英里远了，带了“一支不比波洛斯的少多少的军队”。⁶⁸决不能让他们合兵一处。所以，必须在48小时内干掉波洛斯。亚历山大的船队已经被零零碎碎地调往贾拉勒布尔，在坎达尔卡斯峡谷的深水区重新集结。这时国王召开了一次紧急参谋会议，概述了他的进攻方案。保密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可能在何处及何时渡河方面骗过了波洛斯，但是一旦真的开始渡河，波洛斯的侦察兵就一定会很快发现并向上汇报。⁶⁹^{①6}因此，任何作战计划都不能寄希望于进行突然袭击。唯一能使波洛斯保持犹豫不决的方式是派一支疑兵干扰他，使他无法确定主要进攻点在哪儿，直到决战时刻到来。

亚历山大据此做了相应的部署。大部分军队连同辎重和非战斗人员仍旧留在哈兰普尔渡口的大营里，由克拉特洛斯指挥。渡河的准备工作的公开进行。国王的御帐也将扎在河岸附近的一个显眼位置，同时有一个跟亚历山大本人非常像的马其顿军官穿着御袍出现在那里，“以制造国王本人就在那段河岸的假象”。⁷⁰实际上，国王正带着进攻主力（或者像富勒所说的“迂回部队”）前往贾拉勒布尔。这支部队约有5000名骑兵和至少10000名步兵，他们将在黎明前渡河，然后沿着南岸朝波洛斯的营地行进。第二支部队由三个方阵兵团，外加雇佣骑兵和步兵组成，占领哈兰普尔和与主渡口相对的阿德玛纳岛之间的阵地，只有在交战开始后才能渡河。⁷¹在此期间，克拉特洛斯的留守部队暂时不渡河，“直到波洛斯离开营地开始攻击亚历山大时”，并且还必须等到已经没有任何大象留守在河岸之时，“或者直到他确定波洛斯正撤退、希腊人已经取胜时”。

⁷²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案，它将波洛斯置于一个两难的困境之中，对军事史家来说这种困境乃是一个经典案例。⁷³无论他往哪里移动，他的后方都会受到攻击，不是被亚历山大就是被克拉特洛斯攻击。他可能的防御安排是派遣一支规模有限的强悍部队，在亚历山大的进攻部队建立起滩头阵地之前将他们消灭掉，而自己继续在哈兰普尔牢牢控制局面。作为反制策略，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军队中挑出一些精锐，组建“迂

回部队”：皇家侍友骑兵中队，共三个骑兵旅，由赫淮斯提翁、佩狄卡斯和德美特里奥斯指挥；翊卫队，共两个方阵兵团（由科伊诺斯和白面的克雷托斯 [Cleitus the White] 指挥）；弓箭手和阿格里安人；来自巴克特里亚和突厥斯坦的骑兵部队；还有一支斯基泰的特种弓骑兵。整支部队约15000—16000人，在进攻日的清晨3点，亚历山大将其带到渡河点，然后登上船只和筏子。学者们有时认为这种军事调动不足为奇，但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够连续不断地取胜，其关键因素之一便是他在指挥补给和运输方面无与伦比的效率。1415年亨利五世花了三天时间才把8000—10000人渡到阿夫勒尔，而为了运送2000匹马和3000名步兵过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的威廉（William of Normandy）需要大约350艘船，当想起这些时，我们才能意识亚历山大在杰赫勒姆河所取得的成就。⁷⁴他必须在大白天将这么一支大军带出营地，而且不能被波洛斯的侦察兵发现；接着行军17英里（在雨季的情况下所需时间不会少于6小时）；然后重新集结并使足够的运输船下水；最后包括马匹在内的整支进攻部队要在黎明前登船。

更为复杂的是，行动的关键部分不仅要在黑夜中，还要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进行。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风暴来得正是时候。瓢泼的暴雨间或加以震耳欲聋的雷声（亚历山大因闪电而损失了几名士兵），完全掩盖住了登船的响声。⁷⁵当黎明破晓、风雨渐弱之时，船队已经航行在北部的河道中了，而且由于阿德玛纳岛上树木茂密，波洛斯的侦察兵对此仍旧毫无察觉。但是，他们一越过该岛的西端，警报便立刻发出，传令兵马上全速去向波洛斯汇报。⁷⁶

就在这时，亚历山大的一个失误差点儿让他输掉整场战斗。当他离开阿德玛纳岛时，他把全部军队都卸到岸上，并由骑兵打头。但是，亚历山大很快发现他误以为河岸的地方其实是另一个既狭且长的岛屿。如果不是情报出现大错，那就是暴风雨在夜间又开出了一条新河道。已经没有时间重新登船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找到一个涉水点。起初，这项任务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段河道并不宽，但杰赫勒姆河正裹着泥沙激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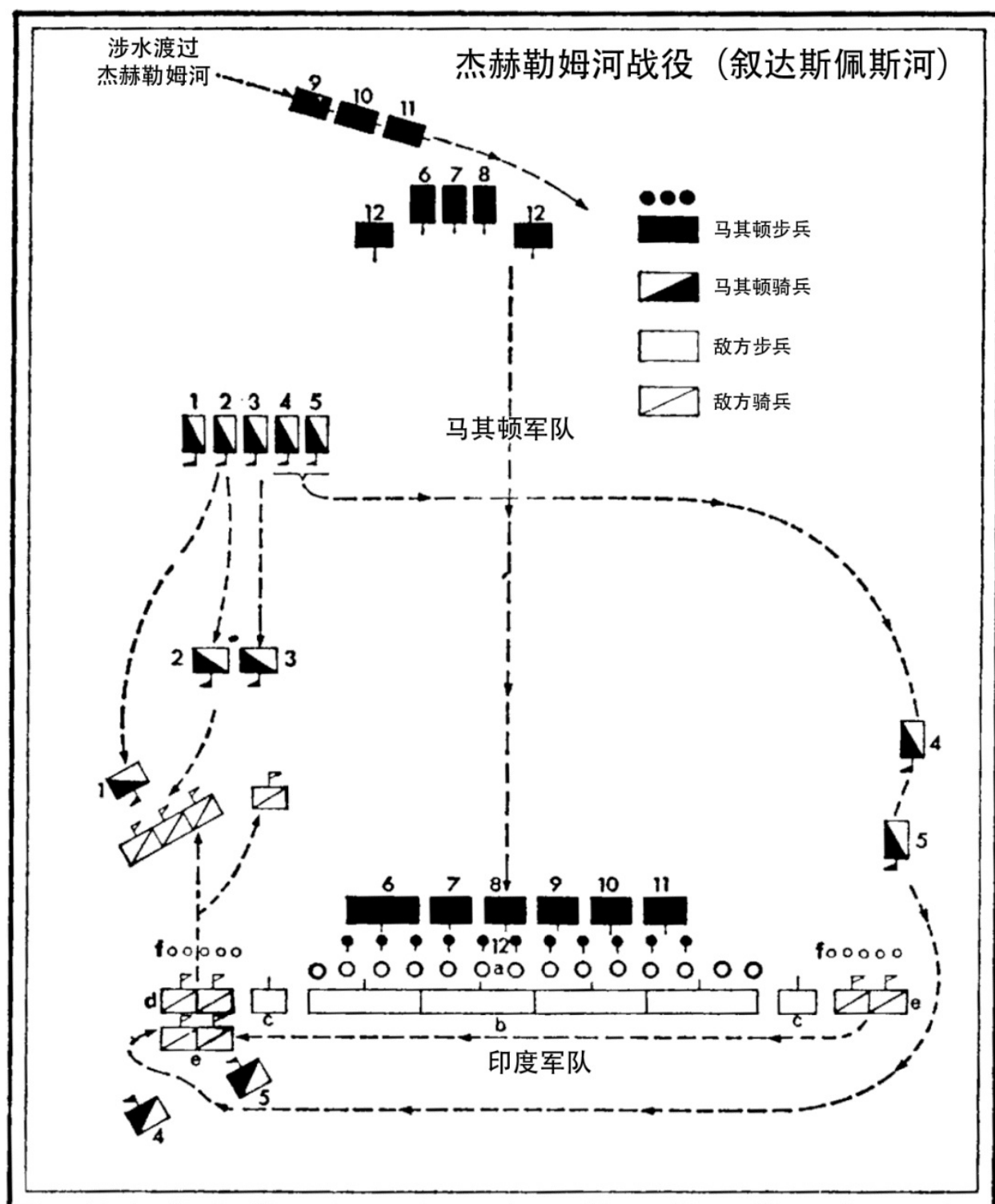
而下，以致河床没有可靠的立足点。最后他们强行登岸；当时步兵身负重甲，不得不在齐胸高的急流中挣扎前行，而马匹则几乎被淹得只剩脑袋。浑身湿透且筋疲力竭的进攻部队总算有一支先头部队在岸上站稳了脚跟——骑兵在右，步兵在左，两翼各有轻装部队掩护，并一道与弓骑兵排列在前。⁷⁷

要让这么一支部队上岸必定得花费数小时之久，那时候波洛斯无论如何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亚历山大的疑兵，还是全面进攻的序曲？这时没人敢做断言。克拉特洛斯的营地正在大规模调动：无论波洛斯怎么做，他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之中。然而，这位印度王公并非等闲之辈。他立即派出2000名骑兵和120辆战车，由其子统领，全速向东奔去；如果可能，就在亚历山大的进攻部队离开河岸之前将其消灭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他唯一可行的对策，可惜太迟了。⁷⁸再说，他儿子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后面事实证明他们也不是马其顿全军最精锐骑兵的对手。⁷⁹在短暂的交战之后——在战斗中布凯法拉斯受伤，后来它因这次伤而死——印度人逃走了。此役他们有400人阵亡，包括小波洛斯本人。⁸⁰由于战车深陷泥泞之中，他们只得弃车而走。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由墨勒阿格、阿塔罗斯和高尔吉亚指挥的预备兵团从主要渡口渡过了河流，与亚历山大的先头部队会合。国王带领骑兵一直在快速前进，步兵则在后面按自己的速度跟随。到这会儿，二者之间出现了一条两英里宽的间隙。

当儿子战败的消息传来时，⁸¹波洛斯一时有点举棋不定。无论是在进行佯攻，还是把这种小规模渡河作战当成是完全的胜利，克拉特洛斯的士兵一直在积极准备强渡哈兰普尔渡口。不过，波洛斯最后正确地断定，他的决战对手必定是亚历山大。他留下一支包含大象的守卫部队以应对克拉特洛斯，⁸²然后统率其余部队向河的上游前进，准备决战。这时候，除去守卫的和损失掉的，他可能还有20000名步兵、2000名骑兵、130头大象和180辆战车。他仔细挑选了战场：一块平坦的沙质平原，

没有淤泥，大象和骑兵都有足够的机动空间。^{①7}

波洛斯把步兵布置在正面中央，大约每一百英尺安排一只大象以增强步兵的力量。（古代的史家们说，这看起来像一座堡垒，其中大象是塔楼，步兵是间壁墙。）在两翼，他先是部署防卫侧翼的步兵，然后是他的骑兵，骑兵前面由战车掩盖。总体上，印度军队的阵线有将近4英里长，其中步兵至少占了三分之二。正如伯恩正确地指出，⁸⁴这种部署方式缺乏灵活性，该弱点一定会被亚历山大利用。在等待步兵跟上时，亚历山大对波洛斯的部署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同时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部队藏在树林和高低不平的地面之后，以免被人发现。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面对大象时马匹可能会惊慌，亚历山大绝不能冒这种风险。但是，如果由方阵步兵去对付波洛斯的中军，那首先得击溃对方的印度骑兵，否则马其顿部队就会在进攻时被人侧翼包抄，进而被击溃。⁸⁵



马其顿军队

1 骑兵、弓箭手和侍友骑兵

2 赫淮斯提翁

3 佩狄卡斯

印度军队

a 大象

b 步兵

c 侧翼步兵

4科伊诺斯
5德美特里奥斯
6翊卫队，塞琉古方阵兵团
7安提柯
8克雷托斯
9墨勒阿格
10阿塔罗斯
11高尔吉亚
12阿格里安人，弓箭手和标枪兵

d 左翼骑兵
e 右翼骑兵
f 战车

为了打败波洛斯的骑兵，亚历山大采取了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如果亚历山大的骑兵对印度军队的左翼发起进攻，并且人数正好比波洛斯的所有骑兵少得多，少到能使波洛斯确信只要他全力反击就定能消灭他们，那么波洛斯就有可能会进行大回旋，把右翼骑兵调到左翼，以期获得完全的胜利。这种策略成功的前提在于亚历山大有能力隐藏两支骑兵分队而不被敌人发现，直到波洛斯不可挽回地把骑兵都调到左翼去参战。骑兵分队的指挥官科伊诺斯收到了非常明确的指令。⁸⁶他将悄悄地绕到波洛斯的右翼，然后等待另一侧战斗的开始。如果波洛斯把右翼骑兵都转移过去，科伊诺斯就从敌军阵线的后方发起冲锋，⁸⁷从背后将敌军击溃。不然他就正常进行战斗。类似地，方阵兵团和翊卫队也得到命令，“不得参战，直到印度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显然都因马其顿骑兵而陷入混乱之中”。⁸⁸

安排妥当之后，亚历山大立即发起进攻。1000多名弓骑兵朝印度军队的左翼齐射，击溃了波洛斯几乎所有的战车——这有效地削弱了敌军的力量。⁸⁹接着，国王身先士卒，率领骑兵发起冲锋。⁹⁰波洛斯的反应正是亚历山大所期盼的。波洛斯坐在巨大战象的象轿上（这是一个极好的指挥所），快速评估了马其顿的骑兵力量，然后调来右翼骑兵，准备进行最后一击。科伊诺斯率领两支生力骑兵分队，立刻从隐蔽处冲出来开始追击。正在与亚历山大交战的印度军队，突然发现他们还得应对后方科伊诺斯的进攻。⁹¹阿里安说：“当然，这不仅对印度军队部署是致命的打击，对他们整个战斗方案也是如此。”

他们刚一回头，亚历山大就奋力攻击，而印度军队则在大象的保护下后退。现在，马其顿重步兵侧翼的危险全都解除了，于是他们在弓箭手和标枪手的支援下，开始向波洛斯的中军行进。他们很侥幸地非常走运。印度弓箭手使用一种很长的重型弓：它所发射的一码长的叶形头的箭在中程距离上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不久亚历山大将为此付出代价。但是，他们在拉弓时通常要把弓脚置于地上，而此时地面却极为滑溜，这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有效攻击力。⁹²不过，方阵步兵的真正噩梦却是那些狂怒、吼叫、暴烈的大象，这些噩梦此后一直萦绕着他们。亚历山大已经想出了一个计策来对付这些猛兽：包围它们，让弓箭手射掉象夫，接着朝它们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抛掷长矛和标枪，同时步兵用波斯弯刀击砍象鼻，或者用斧头劈砍象腿。

这些大象自己也有非常有效的计策。它们把一些马其顿士兵踩在脚下，将他们连同盔甲一块踩成血肉模糊的一团。它们还用象鼻抓住其他人，然后摔到地上。还有一些人则被这些猛兽的长牙刺穿。除了这些大象，马其顿士兵还得跟印度步兵进行殊死搏斗（不过马其顿的萨里萨长枪在此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现在到处都是泥泞、鲜血、暴雨以及如此骇人的杀戮，在这种环境中能保持战斗秩序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正是这样的纪律使得胜利成为可能。印度骑兵的一次反攻失败了。随着波洛斯的骑兵被击退，大象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开始踩踏己方的人员：骑兵为此损失特别惨重。⁹³

波洛斯亲自率领大象做最后的冲锋，但没有成功。现在，马其顿军队逐渐知道怎样以最小的风险对付这些笨重的猛兽，他们像躲避许多巨型公牛一样躲避它们，无情地朝它们及其驭手击砍和射击。不一会儿，这些大象就受不了。它们“开始像船一样慢慢地后退，同时哀号不已”。⁹⁴这时，亚历山大把围攻波洛斯军队的骑兵包围圈收得更紧，同时传令翊卫队和方阵步兵“组成盾墙以密集阵形前进”。⁹⁵到了最后，战斗就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屠杀，经历了如此创伤的马其顿军队一个个都杀红了

眼。对印度军队的伤亡的估计各有不同，从12000多人到23000人（其中有3000人是骑兵）不等。有些人成功突破了亚历山大骑兵的包围，结果却被刚渡过河流正带着生力军四处追击的克拉特洛斯砍倒。⁹⁶波洛斯的指挥官和军官团体的损失尤其惨重，他的儿子们全部战死。

波洛斯本人则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后来，当他眼见继续抵抗已无希望时，他骑着战象慢慢退出了战场；当时他失血过多，变得非常虚弱（一把标枪刺穿了他的右肩）。亚历山大“一心想要保住这位伟大而英勇的战士的命”，立即派安比带着和谈的条件去追他。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外交失误。波洛斯将安比视为叛徒和变节之人，当他靠近时，受伤的波洛斯便试图用枪刺死他。不过，最终一个更为合适的传信人来到已从大象身上下来、虚弱且口渴的波洛斯身边，然后把他带到亚历山大那里。

再没有比阿里安对这次历史性会面的记述⁹⁷更好了（其他史家当然比不上，因为他们让这事淹没在通常枯燥乏味的修辞赘语之中）：“当两人相见时，亚历山大勒住战马，以钦佩的眼神看着他的对手。此人有七英尺之高，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举手投足之间丝毫不减傲气，完全是一副曾为王国光荣战斗过的勇士见勇士、国王会国王的神态。”当亚历山大问他希望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时，这位高贵的保拉瓦战士说道：“像国王那样。”亚历山大进一步追问他。还想要点别的什么吗？他这样问道。波洛斯说：“所有的一切都已包含在刚才的要求里了。”

这则轶闻——大体上是真实的——与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场大战是十分相称的，许多学者把这看作亚历山大最伟大的事迹。高加美拉一役以少胜多，重要的是结果。而在杰赫勒姆河一战中，从最初的英明部署到最后智取波洛斯骑兵的计谋，亚历山大都充分展现了他战术上的灵活和机智，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如此出色过。此外，他还得应对糟糕的天气，而最要命的当属印度的战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自身的严重损失轻描淡写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据可查的最高伤亡数字是280名骑兵和不下7

00人的步兵，但对史料的细致考辨则提示我们，4000人的总伤亡人数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⁹⁹其中损失尤为重大的是方阵兵团。

这场可怕的战斗给亚历山大的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即使没有被吓破胆，他们的勇气也大为挫伤，无论亚历山大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没法让他们再次去面对战场上大象。¹⁰⁰他们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或许和大象一样，雨季也是最终促使他们崩溃的原因之一。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印度或缅甸的雨季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其对装备、地形和士气的影响。当金属（无论剑还是枪）的每一部分在擦亮五六个小时后开始生锈时；当帐篷、皮革和织物长了潮湿的绿色霉菌并且在几周内开始腐烂时；当每个身着军服的士兵都忍受着脚腐病和痒子的痛苦（更不用说还可能有疟疾或阿米巴痢疾）时；当大地变成桑拿式的沼泽，空气中充满蚊子如同带锯一样的嗡鸣时——在亚历山大或温盖特（Wingate）^⑮的时代一样，军营里就势必会出现抗命的言论，同时集体性的忧郁和沮丧也会迅速演变成思乡的焦虑。¹⁰¹

在战斗结束后，据狄奥多罗斯记载，“马其顿军队休整了30天，享用着充沛的储备”。即使这样，有些人还是休息得比其他人少。在这个月里，国王抽出时间，突袭了附近尚未归顺的印度部族的领地。这些新近征服的土地都转交给了波洛斯，他已经恢复了原有的王位以及相应的各种尊荣。¹⁰²实际上，亚历山大对波洛斯的宽宏处理使得印度人把他当作一位“达尔马维杰伊”（*Dharmavijayi*），亦即“公正的征服者”¹⁰³——这种观念仍影响着一部分现代史家。国王无疑非常真诚地钦佩他的手下败将，同时也将其视为最有价值的盟友、一流兵士的来源、塔克西拉的安比理想的制衡者。虽然亚历山大安排两位王公公开和解，但是他更希望二者能够相互监督。

布凯法拉斯终于死了，既由于年老，也因为受伤：亚历山大为他忠实的战马举行国葬，亲自引领送葬队伍。在战斗的实际地点，他所建立的两座新城之一被命名为布凯法拉，以此作为纪念（亚历山大把另一个

殖民点叫作佩里塔，这是他最喜爱的一条狗的名字）。第二座新城叫尼西亚（“胜利”），可能就是今天的贾拉勒布尔，建在他实施夜渡的地点。（二者都是泥砖城镇，很快就建好了；亚历山大还发现，苦力劳动非常便宜，而且用之不尽。）这样一来，尽管波洛斯不受常驻的马其顿总督的节制，但通过这些军事驻防城镇，亚历山大仍旧可以对他的活动进行一定的制约。

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作为一个高尚之人，波洛斯在国王在世时一直以坚定不移的忠诚来回报亚历山大的信任——这一点对多数印度部族而言难能可贵，尤其是在巴若尔和斯瓦特，现在亚历山大不得不去平定那里的叛乱。¹⁰⁴不过，他在杰赫勒姆河的大胜对阿比萨瑞斯这样的统治者有着重大影响——此人很精明地没有赶上战斗。现在，这位克什米尔王公派他的兄弟作为使节，带着财宝和大象（国王最喜欢的礼物）来见亚历山大，表示愿意奉献除了亲自归顺以外的一切东西——“因为他活着不能没有王权，他也无法作为俘虏而统治。”国王简单回复道，如果阿比萨瑞斯不来见他，那他自会去见阿比萨瑞斯，同时还会带上一支军队。¹⁰⁵

亚历山大的一个驷马战车雕塑组被立在战场上作为标志，而国王则慷慨地把黄金赏赐给各级将领和士兵，以表彰他们在杰赫勒姆河一战中的英勇。但是，对他来说这只是下一次征战和探索的前奏而已。狄奥多罗斯写道：“他打算走到印度的边境，征服那里的所有居民，然后再顺流而下进入大洋。”阿里安大体上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¹⁰⁶在此我认为，我们对他在战胜波洛斯后的直接目标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概括。再者，只有在亚历山大仍然相信他的远征军已经离大洋之岸不远的情况下，这项扫平印度其余地区的主张才具有战略意义。换言之，尽管他正在筹划东方征战，但是他依旧不知道恒河的存在，¹⁰⁷而且克拉特洛斯所准备的船队在渡过叙伐西斯河（贝亚斯河）后不久就奉命去寻找大洋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历山大及其参谋人员关于印度的基本地理概

念都来自亚里士多德。一手的观察已经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基本事实。然而，根据《天象学》（*Meteorologica*）的研究，亚历山大也许仍断定大洋的东部就在旁遮普之外不远的地方。¹⁰⁸这种错误观念是何时被消除的呢？可以肯定，通过与安比、波洛斯以及其他印度显贵长时间的交流，此时亚历山大必定清楚地意识到，希腊人关于东方大洋的信念与当地的有关信息完全相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马上摒弃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人们往往不愿放弃习以为常的信念，即使理性早已要求将其摒弃。尽管亚历山大的世界地理概念可能比较模糊，但是他一向会收集他所要到达地区的准确情报，这次也不例外。有人提出，他“一边继续从叙达斯佩斯河（杰赫勒姆河）东进，一边收集地理情报以便澄清疑问”，¹⁰⁹而就目前来说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古代史家说，就在军队即将到达贝亚斯河、处于反叛边缘之时，他才第一次直觉到了真相，这种说法明显不可信。

缺乏一手情报意味着低效，这恰恰是亚历山大所无法容忍的。更有可能的是他这时已经知道真相——其实已经怀疑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一直保守着秘密，担心会对军队已经低落的士气造成影响。亚历山大绝不是那种会被单纯的地理因素拦住的人。如果他能诱惑军队往前再过一条河流，同时告诉他们大洋就在下一座山的另一头，他或许就能达到目的。这种诳骗手段完全基于他对当地的情况知道得比军队更多，而他经常这样。¹¹⁰但是，贝亚斯河地区并没有山峦可以欺骗士兵，有的只是一片向东延伸的广阔平原，而再过去则是高耸入云的西喜马拉雅山脉——晴天时在古尔达斯布尔便可看到，亚历山大也许到达了那里的河流。¹¹⁰没有有效的激励手段，叛乱是可想而知的。在赤裸裸的地理事实面前，再狡诈的谎言也无能为力。

不过，在亚历山大即将从杰赫勒姆河继续前进之际，还有另一个意料不到的风险。只要可能，他就想利用一下自己的情报和军队道听途说之间的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考虑到这一点，他让宣传部门极力淡化未来

征战的范围和限度。他还散布传言（他自己是不会信的），说杰赫勒姆河和杰纳布河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成了尼罗河的源头，因为那里可以看到鳄鱼，两岸还长着“埃及”豆。¹¹¹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熟读希罗多德，甚至可能还有斯库拉克斯的《环海记》（*Periplus*）。在征服印度之后，他下一个计划是探索阿拉伯和波斯湾的海岸。附近的山脉有充足的冷杉、松树、雪松以及其他船用木材可供使用：克拉特洛斯已经被派去建造一只巨大的舰队了。¹¹²公开的消息就是这么些。但要是告诉军队这段航程到底有多长多危险，亚历山大（有理由）觉得这非常不明智。这次所用的宣传策略被斯特拉波记载了下来：亚历山大“设想这支舰队是用来远航到埃及的，他以为可以通过这条河流一直航行到那里”。但不巧的是，真相很快就泄露了出去。许多希腊人或操希腊语的商贩和殖民者一直跟亚历山大的军需部门有联系；过了一阵子，国王不情愿地承认，顺杰赫勒姆河而下确实会首先进入印度洋。¹¹³正是这次地形信息的泄露导致亚历山大和军队最后闹翻。

7月初，亦即雨季行将结束之时，国王继续他的东征之旅——从心理学上说这是个巨大的失误，但现在他似乎也有点烦躁了。他渡过了杰纳布河和拉维河，打败了一些部族并逼迫其他部族前来归顺。有一个城市奢羯罗被夷为平地。天空一直灰蒙蒙的，暴雨不断，潮湿的空气宛如蒸汽一般。¹¹⁴马其顿军队艰难跋涉着，浑身湿透，绝望又无助，整天像自动机一样地行军、战斗，同时还为蛇所困扰，为了避免被咬夜里不得不睡在挂在树上的吊床里。在行军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了解到前方的一些确切信息——根本没有海岸，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平原，那里住着强悍的好战部族。

国王及其密友受到了当地归服王公的热情招待，无论是女人还是印度猎犬他们都通通送上来，而军营里的士气却日渐低落，这是理所当然的。亚历山大的老兵再也不是8年前刚从佩拉出发时的那群热血青年。

他们行军不下17000英里，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和围城。很少有人可以经受如此考验而安然无恙。他们的武器和盔甲业已报废，只该扔到垃圾堆里，他们的马其顿服饰也早就不见踪影。现在他们已经危险地到达崩溃边缘了。服从、纪律和忠诚也只能维持他们到这种程度了。在没有明确终点的情况下，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士兵的忍耐是有极限的，而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极限。¹¹⁵对奢羯罗的围攻既艰难又血腥：即使托勒密（他一惯极力压低马其顿人的损失）也承认，在战斗中有1200人受了重伤。

现在，随着亚历山大及其军队逐渐靠近因雨水而变得宽广的叙伐西斯河（贝亚斯河），有关前方土地和人民的谣言开始传播开来。过了贝亚斯河后再行军12天，他们将会遇到一条更大的河流（大概就是萨特莱杰河），河流对岸住着一个凶猛而好战的民族，他们有着庞大的军队和战车，最要命的是他们还有不下四千头的战象。¹¹⁶再者，贝亚斯河似乎就是大流士一世帝国的东部边界，这一事实不可能不对马其顿人产生影响（尽管现代有人认为情况正好相反）。¹¹⁷到这里，亚历山大至少可以宣称，作为大流士的继承者他要收复那些丢失的行省，这些行省是他通过征服和继承而拥有的。这个终点无论多么遥远，总算是看到了。然而一旦越过贝亚斯河，亚历山大的雄心壮志的极限就无法预知，他们所面临的将是一条无限后退的地平线。他现在所计划的是走到世界的尽头（最最字面意义上的尽头），所以他的老兵抗拒这种设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迄今，亚历山大固有的对普通人的蔑视还不曾给他带来过大麻烦，因为他超凡的个人魅力足以应对一切。对于士兵，他似乎是假设他们完全是靠恐惧、贪婪和野心推动着。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假设确实可以成立。借助严酷的纪律和丰厚的战利品这对大棒加胡萝卜的组合，他使军队既高效又忠诚，如此达十年之久。为什么惯用的手法这次却不起作用了呢？士兵们累了，对此他很清楚：他们度过了身心俱疲的两个月。兵变的言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需要的是某种特别的奖励，一种能

迅速改变他们的奖励。

但是，当亚历山大最终到达贝亚斯河时，那里的地平线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无解。就算只到恒河的最西边的支流朱木拿河，那也得在北部印度沙漠中穿行200英里。随后从朱木拿河行进到恒河，再从恒河行进到大洋又得走上一千多英里。不过亚历山大似乎还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乐观态度认为，稍微放纵一下就可以诱使老兵们继续穿越这片无边无际的未知土地。于是，他给了军队一个假期，允许他们自由地抢劫和掠夺周边的乡村地区。他没法给他们第二个波斯波利斯，但这也完全足够了。当地王公招待了亚历山大两天，而且是他名义上的盟友，但亚历山大对此毫不在乎。当老兵们的忠诚已岌岌可危时，牺牲一下当地人的友善也无妨。¹¹⁸

当马其顿军队外出享受合法劫掠的欢乐时，亚历山大和任何蛊惑民心的政客一样，用免费月粮和儿童津贴的允诺来讨好他们的妻子。¹¹⁹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就不明白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这次情况完全不同：通常的收买、威胁和讨好根本不起作用。他以为军队外出劫掠、满载而归之后就会改变主意，然后继续上路。然而并没有。勉励他们继续争取光荣业绩的演说实际上毫无效果。他们没有什么大胆或过分的反叛行为，只是死一般沉寂地站着，同时拒不妥协。¹²⁰

由于拿士兵们没办法，亚历山大便召集高级将领，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眼下他需要马其顿将领甚于他们需要他——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没有他们的无可匹敌的训练和经验，他的整个指挥架构就会在瞬间轰然崩溃。目前而言，伊朗军官团体还无法取代他们。如果他们罢工了，他不可能继续。他对这个核心团体的演讲清楚地说明了麻烦的关键所在。¹²¹他向这些满腹狐疑的听众保证，未知的世界总是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可怕。他们应当明白其中的夸大成分。河流没有谣言所说的那么宽阔，印度战士既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英勇。至于大象，他们已经打败一次了，完全可以再打败它们一次。

不管怎样，他们的征程就快结束了。很快，他们很快就要达到恒河和东方的大洋。离目标已经这么近了，为什么要现在返回呢？而且如果现在就回去，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所赢得的一切。

亚历山大说完后，会场长时间鸦雀无声，场面十分尴尬，这一点也不奇怪。要反驳这一番胡说八道和特别的请求，同时又不招致国王那可怕的怒火恐怕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已经完全亮明了态度，他说：“在我看来，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事业如果有着高贵的目标，那么除其自身以外就没有其他目的。”没有人和亚历山大争论，迫不得已时人们可以保留意见，但即便这样也还是有风险。尽管如此，但是在他几次要求大家发言后，科伊诺斯——现在他已经老了，而且可能正受疾病折磨——还是勇敢地站出来跟他挑明真相。¹²²科伊诺斯一再强调，老兵们已经累透了，他们所受的辛劳已经超出了人的极限。许多人死于疾病或战斗。幸存者也是“苟延残喘，他们旧日的热血和决心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只想要一样东西：早日回家，趁一切还来得及。亚历山大可以再次从希腊发动远征，带上更年轻的战士。科伊诺斯说：“陛下，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成功者应当知道的，那便是在合适的时候收手。”

这番演说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亚历山大怒不可遏，于是宣布散会。翌日，他再次把将领们召来，试图采用另一种策略。他告诉他们，无论他们跟随与否，他都会继续前进的，其他许多人也会这么做的。就他的计划而言，他们并非不可或缺。他们如果想回国，就尽管回去。他还补充道：“你可以告诉你们的同胞，说你们弃国王于敌人之中而不顾。”说完他便回到自己帐篷里，像之前在克雷托斯事件之后所做的那样，在接下来的两天中不见任何人。¹²³这纯粹是虚张声势，而这一次大家并没有上当。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将领们没有像国王满以为的那样改变心意，而继续保持他们愤怒而固执的沉默。如果亚历山大打算饿死自己，那么他们至少没有要阻拦他的意思。现在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有他的协助他们也可以把军队带回去。职业战士对他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

到了第三天，亚历山大意识到将士们是不会声泪俱下地来求和的，也不会发誓他去哪儿就跟着去哪儿的。这一次，他那一贯可靠的个人魅力靠不住了。事实上，除非他小心行事，否则他就有被军人集团废黜的危险。科伊诺斯毕竟是帕美尼翁等旧部中仅剩的成员。他曾经转变过立场，自然还可以再变一次。所以国王结束了自己的退隐状态，宣布他仍然打算继续前进，同时会进行一次献祭，“以期获得渡河的好兆头”。当然，所有预兆都是不吉的：这是一个保全面子的便宜之计，在其背后人们又可以感受到阿里斯坦德洛斯那不知疲倦的预言技巧。在强压之下让步是万万不能的，而在天意面前低头则意味着审慎和虔诚。^{124②①}

十二座巨大的纪念性祭坛被立在河边，以崇敬十二位奥林波斯神。它们夸张的尺寸，连同外围众多的特殊防御工事和军事装备，甚至包括亚历山大所留下的宴会躺椅，无一不是用来向当地人民证明，他们的敌人乃“身材魁梧之人，有着巨人般的力量”。¹²⁵一个比较晚近的不很可靠的名叫菲罗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的作者说，¹²⁶这些祭坛上刻着这样的铭文：“献给天父阿蒙神、天兄赫拉克勒斯、雅典娜·普洛诺伊亚（Athena Pronoia）、奥林匹亚的宙斯、萨摩色雷斯的卡贝洛斯诸神（Cabairoi of Samothrace）、印度河、赫利奥斯（Helios）和德尔菲的阿波罗”——这些受奉献者的集合如此古怪，以致我非常愿意相信，这回菲罗斯特拉托斯确实是一个诚实的记录者，铭文也确实是真的。他还记载了一个黄铜的方尖碑，并且暗示说这是印度人立的，上面还刻着铭文“亚历山大止步于此”。

当国王决定撤军的消息传出来时，突然解脱、喜极而泣的人们挤在他的帐篷里，祈求上苍降福于他，因为他做了如此高尚的退让。如果说亚历山大曾有过要手刃全体马其顿将领的冲动，那无疑就在此刻。他从来没有忘却贝亚斯河边的屈辱，他也决不会原谅此事的出头者。“亚历山大的欲望被愠怒的士兵所挫败，在他对此事的反应中，人们可以最为清楚地看到专制者的怨恨、自我中心和忘恩负义……他们阻挠了他，而

这就够了。”¹²⁷他下定决心，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让士兵们的归家之路变成一场地狱之旅，而这个目标他无疑实现了。¹²⁸

-
- ① 从公元前330年一直到前326年，亚历山大可能是从希腊的“粮仓”以强征或大批采购的方式征集粮食，以保证东征期间大军的补给（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 [the Elder Pliny, *HN* 18.12.63-65]，当时的“粮仓”主要是西西里、北非、埃及和本都）。至于当时希腊普遍存在的粮食短缺以及从昔兰尼获取救济粮（高达805000埃吉纳麦丁努斯，或超过一百万阿提卡麦丁努斯，1麦丁努斯大约合1.5蒲式耳）等问题，可以参见托德所收录的那则著名的铭文（Tod, II [no. 196]）以及编者的注释（第273—276页）。——原注
- ② 索格底亚那即中文史料中的粟特。
- ③ 在乌浒河的渡口，人们在为国王的营帐挖掘堑壕时挖出了两个泉眼，一个清水，一个石油。占卜师阿里斯坦德洛斯以他惯有的圆滑和自信，将此解释成“未来之困难和最终之胜利的象征”。——原注
- ④ 作者引用的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亚历山大传》洛布丛书版的译文（Alas what evil government in Hellas），但该译文恐怕有误。希腊原文是“οἱμοι, καθ’ Ἑλλάδ’ ὥς κακῶς νομίζεται”，意思是“哎！在希腊有一个多么坏的习惯啊！”从下文可知，克雷托斯引用这句话是想讽刺亚历山大独享胜利的荣光，有点感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思，并不是要批判政治。
- ⑤ 根据库尔提乌斯的说法（Curtius, 8.3.1及以下），处决是由斯皮塔美涅斯的妻子执行的，她做了雅亿（Jael）对西西拉（Sisera）所做的事，因为她厌倦了四处逃窜的游击战生活但又无法说服他投降。——原注（在圣经中，以色列女士师底波拉召来巴拉率领一万人迎战西西拉，西西拉战败，逃到雅亿的帐篷，向雅亿讨水喝。雅亿为示热情，降低他的警觉，用自己的奶来款待他。当他睡着后，雅亿悄悄地到他旁边，用锤子将帐篷的橛子钉进他的鬓角，将他杀死。）
- ⑥ 除非我们接受梅茨史纲（Metz Epitome [c.70]）可疑的引证，根据该史料，公元前326年夏，罗克珊娜曾在杰赫勒姆河（叙达斯佩斯河）为亚历山大生下一名男婴，但这个孩子不久就夭折了。——原注
- ⑦ 后来至少有26000人叛乱，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继续留在那些城市里。——原注
- ⑧ 出自《伊利亚特》卷二十一，阿基琉斯在杀死吕卡昂之前对他所说的话。

- ⑨ 引文（《酒神的伴侣》第266行及以下）本身就意在羞辱。其后的诗行如下：
你巧舌如簧，好像很有智慧，
其实你的话中毫无见地。
胆大妄为又能说会道，这样的人
会变成一个没有头脑的坏公民。——原注（英译文偏意译，且行数跟希腊原文有出入，因此中译文由译者从希腊原文译出。）
- ⑩ 准确地说，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大洋”（Ocean）其实是一条围绕世界的环河。
- ⑪ 耶罗尼米斯·博什（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荷兰画家，其画作想象奇特，擅长描绘人类的罪恶和道德的沉沦，常以恶魔、半人半兽甚至是机械的形象来表现人的邪恶，被视为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之一。
- ⑫ 在他的《印度史》（*Indica*）中，克特西亚斯人描绘了长着尾巴和狗头的人，可怕的食人兽马提科拉（*martichora*），阴茎长至脚踝的矮人，长有八个指头、耳朵大到足以遮住太阳的弓箭手，以及一个其婴儿出生时没有肛门、直到青春期才会长出来的部落——这些奇闻轶事后来又重新出现在《曼德维尔游记》（*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中。——原注
- ⑬ 古希腊传说中新亚述帝国的传奇王后。亚洲的很多古迹上都标有她的名字，似乎伊朗或两河流域的每一件巨大工程都可以归结到她。
- ⑭ 即中文史料中的妣叉始罗。
- ⑮ 克雷托斯有一句话曾让亚历山大特别恼火，它让人回想起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意大利时说过的话：他在与男人战斗，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只不过是赢了亚洲的女人而已（QC 8.1.37）。到目前为止，这种嘲讽差不多就是真相。但从现在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印度行省的战斗部族给了亚历山大不曾遇到过的最顽强的抵抗，并且他还发现波洛斯是一个比门农和斯皮塔美涅斯都要出色的对手。——原注
- ⑯ 亚历山大让卫兵沿着从大本营到贾拉勒布尔的河岸站岗，彼此的距离在听力所及范围之内——这种新举措明显是在模仿印度的警戒体系。——原注
- ⑰ 确切的地点现在还无法确定，但必定在努尔普尔和默勒格瓦尔之间的某个地方。该地区至今还有个村庄名为锡根德尔布尔（“亚历山大镇”），尽管这个名字在旁遮普经常出现，但杰赫勒姆河战役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或者在其南边一二英里的地方。——原注
- ⑱ 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1903—1944），二战期间英国陆军上将。长期在缅甸进行对日作战。
- ⑲ 斯特拉波（2.1.6, C. 69）说，“那些和亚历山大一同远征者只知道一些粗浅的信息，而亚历山大则做过精确的调查，因为对当地最熟悉者已经向他汇报了一切

情况”。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他有亲自向当地领袖打听情报的习惯，从马扎欧斯到波洛斯无一例外：这是他能取得战略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注

- ②⑩ 克拉特洛斯（他当时不在那儿）写信回国说，亚历山大实际上到了恒河——这是两人分开时国王预计他在克拉特洛斯写信时将会实现的目标。参见斯特拉波的记述（15.1.35, C. 702）。——原注

第十章 巴比伦之路有多远？

公元前326年秋，亚历山大开始返回杰赫勒姆河。当军队停驻在杰纳布河时，阿比萨瑞斯派来一个新的使团，他们带来了30头大象和其他珍贵礼物。这位克什米尔王公又一次没有亲自现身：这回他以生病作为托辞。（生病可能不仅仅是外交托辞，因为一年后阿比萨瑞斯就死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亚历山大竟表现得十分宽大。他不仅接受了该王公的致歉，而且任命他做他自己的“行省”总督。事实上，他也是无可奈何。彻底打垮阿比萨瑞斯需要再发动一次战役，而马其顿人是不愿意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追击那些行踪不定的部族的。亚历山大突然对印度北部失去兴趣，主要是由于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为了节省时间和避免麻烦，远至贝亚斯河的所有领土通通划入波洛斯王国。¹这样一来，这位保拉瓦王公突然发现，悖谬的是，自己此时竟比杰赫勒姆河之败前更有权势了。

在东进的过程中，赫淮斯提翁和克拉特洛斯一样也被派了出去——幸亏不是去同一个地方，因为二人彼此厌恶，如同权力争夺者通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赫淮斯提翁“平定”了一大片区域，在军队抗命前不久刚与亚历山大会合。他的任务之一是在杰纳布河的渡口建立一个有防御工事的驻防城镇。现在这个“城镇”（可能也就是一个泥砖营地和市场）已经完工了。和通常一样，亚历山大在其中安置了各色人等：本地自愿者加上不够健壮或已过服役期的雇佣兵——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很少能真

的带来和平或稳定。克拉特洛斯非常高效地建成了海军舰队，一直在等马其顿军队回到杰赫勒姆河。²这支舰队总共有80艘三十桨战船，200只无甲板桨帆船，800条服务船——运马船、运粮船、驳船，还有众多的筏子和更小的河船。船员已经在随军出征的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卡里亚人和埃及人中招募好了。大型船只只是即时建造的，木材来自喜马拉雅山；其余则是征调来的。

大批援军——30000名步兵和大约6000名骑兵——也从色雷斯、希腊和巴比伦赶来了。此外，哈尔帕罗斯派来的巴比伦援军还带来了军队迫切需要的医药补给和25000副新盔甲，这些盔甲全都嵌有金银，非常美观。亚历山大把新盔甲分发给士兵，命他们把旧装备烧掉——这是对它们破损情况的一个生动注解。也许国王曾给哈尔帕罗斯送过更换装备的急令。至于他是否还要求送来金银条块或钱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很显然，两者似乎都没有送来，这既费解又可疑（跟与哈尔帕罗斯相关的其他事情一样）。

尽管传说中印度人的财富（多数是关于珠宝和金沙的）多种多样，但是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并没有收获多少战利品。另一方面，他的开销（特别是用在收买、赏赐和捐赠上）非常地大，有时甚至会引起强烈的反感，他赏赐安比的1000塔兰特就是个例子。单单他每日日常的共餐费用就得10000德拉克马，每次都有不下六七十位军官和他一起用餐。显然他完全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标准。大流士的财富使他成了已知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不过，到印度征战结束时有迹象表明他现金流十分紧张。他建造舰队所需的费用有一部分是按照雅典的方式，以任命30名“三层桨战船船长”（亦即需负责配备船只并支付水手的薪酬的富余者）而支付的。等到舰队进入印度洋时，亚历山大就像征战之初在马其顿所做的那样，又一次沦落到跟朋友借债的地步。⁴

无论波斯的财宝在何方，它们都没有运到印度来。不过，既然哈尔帕罗斯所派的7000名士兵可以随行带来25000副盔甲，那他们自然也可

以轻易地把金条运过来。我们可以推断，特别是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结论很清楚：哈尔帕罗斯对财宝另有打算，而且主要是出于私人目的。这事可以跟这位帝国财政官举止的惊人传闻很好地联系起来，这些传闻现在已经传到亚历山大耳朵里了。

起初，哈尔帕罗斯似乎没有任何特别行为，只是在实验一些异国情调的园艺。（他为皇家花园引进了大批的希腊植物和灌木，除了常春藤以外都长得十分繁盛。）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位五十多岁的跛脚的大臣发现，除了那些一年生的植物外，这些用之不尽的钱财可以用来买更多的东西。他带来了一个迷人的雅典名妓，开始在她身上肆意挥霍亚历山大的黄金。在她死后，他为她建了两座纪念碑，一座在巴比伦，一座在雅典：二者的花费超过了200塔兰特。哈尔帕罗斯似乎是一个痴情的老主顾，如果不说惧内的话：他从来不曾有过超过一个情人，而且始终如一地钟情于当下这位。他的下一个情人是格吕凯拉（Glycera），同样也是个雅典人。她对前任被当作阿芙洛狄特的化身来崇拜这事怎么看，我们无从得知；但既然她本人在塔尔索斯的宫殿中有如公主一般，那她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痴情的哈尔帕罗斯给了她一顶金冠，还让宾客们以匍匐礼向她问安。渐渐地，涉及这位“巴比伦女王”的各种笑话开始流传开了。

所有这些可能只是因为痴情，并没有其他的用意。但是，匍匐礼的引入（无论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包含着不祥的政治寓意。再有，公元前327/326年塔尔索斯铸币厂开始印制一系列波斯风格的银币，但却没有印上亚历山大。大约同时，在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也出现了独立发行的货币。不管是真是假，人们普遍认为哈尔帕罗斯只要有机会就会反叛国王。在这种背景下，他与雅典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仅在于获得一两个名妓——其意义就极为重大。在公元前330至前326年的希腊大饥荒期间——其部分原因也许是亚历山大的军事征用，哈尔帕罗斯自作主张给雅典运送了一大批小麦，为此他被授予雅典荣誉公民权。

尽管具体细节不甚清楚，但很显然，和其他许多在位者一样，哈尔帕罗斯也把赌注压在国王的政治前景上。如果亚历山大无法从远东回来——在欧洲和小亚细亚，有很多人认为这很有可能——到时候哈尔帕罗斯坐拥巨额财政储备，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帝国中最有权势之人。有了希腊的支持，他就可以进一步废黜安提帕特。但是，如果亚历山大确实带着胜利的荣耀回来了，那么这位侵吞公款（可能还煽动反叛）的帝国财政官就得尽可能地招揽盟友。无论是哪种情况，雅典公民权都是有好处的。⁵

当这些传闻第一次传到亚历山大的耳朵里时，他把报信人投到了监狱里。不过，来自基俄斯的历史学家泰奥彭波斯的详细报告似乎使他相信，至少有一部分指控是真实的。当舰队顺流而下时，在乡村狄奥尼索斯节上（公元前326年12月），上演了一部讽刺短剧，把哈尔帕罗斯、格吕凯拉、雅典人和波斯的玛哥斯僧嘲讽了一番——立这些靶子其意义不言自明。这部名为《亚真》（*Agen*，有残篇存世）^①的短剧必定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实际上根据某种说法，该剧就是他本人写的。⁶不过，在回到巴比伦之前，他对哈尔帕罗斯的所作所为也是无可奈何。不管怎样，他看起来并没有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传闻。他的波斯湾探险照常进行。或许在他看来，哈尔帕罗斯这人滑稽甚于危险：一个跛足而衰朽、如赫淮斯托斯般的帕夏，一个挥金如土、因爱而上当的垂垂老朽。

在从下游出发前，科伊诺斯病重而亡。那些忤逆亚历山大的人——无论蓄意还是偶然——很少能在触怒他之后还活得很久。阿里安不动声色地说道：“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下，亚历山大为他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葬礼。”库尔提乌斯则补充说，尽管国王为他的亡故而悲痛，但他还是“忍不住评论道，科伊诺斯为了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而高谈阔论，说得好像命中注定只有他可以再见到马其顿似的”。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最近对手波洛斯现在被加冕为除塔克西拉以外所有被征服的印度领土的国王：这种对比必定会给科伊诺斯尚在的友人们造成一种强烈的暗示，

即比起长年为之辛苦服役，败在亚历山大手中反而能带来更大更直接的回报。而且，归顺的安比尚有马其顿“常驻代表”监视他的活动，而波洛斯（像卡里亚的君主一样）却如同独立的附属国君一样，直接对亚历山大负责。⁷这种区别清楚地说明，国王对他们每个人的信任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元前326年11月初，舰队从贾拉勒布尔出发。克里特的涅阿尔科斯被任命为舰队司令，统率所有的1800只船。在出发那天的黎明，约有8000人开始列队登船——这仅是远征军总体的一小部分，但包括了翊卫队和侍友骑兵。其余的被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分别由克拉特洛斯、赫淮斯提翁和新任的塔克西拉的“常驻代表”（或者说总督）腓力领导。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亚历山大进行献祭。他站在旗舰的船头，把金杯中的酒浇奠给相应的神灵：奥凯阿诺斯（Ocean）、波塞冬和涅瑞伊得斯（Nereids）；舰队航行过的河流——杰赫勒姆河、杰纳布河和印度河；他的先祖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天父宙斯-阿蒙神。接着号角声起，缆绳解开，亚历山大的舰队以完美的队形开始向下游划动，船上都飘着鲜艳的彩旗和布条，船桨随着艇长的号子上下划水。

从此处到与杰纳布河汇合之处，杰赫勒姆河至少有2.5英里宽，这个宽度足够40条带桨船只并排航行。当时的景象必定非常壮观。当地人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竟跟着舰队走了好几英里（他们对运马船尤为惊奇）。阿里安记载道，在许多地方，“附近能听到桨手的号子声和船桨的拍水击打声的其他友好部族，纷纷跑到河岸边，一边唱着他们的蛮族歌曲，一边加入行进的队伍”。舰队以非常悠闲的速度航行着，一天不过5英里，还时常下船上岸。

克拉特洛斯和赫淮斯提翁走在前头，前者靠右，后者（统领大部队和200头大象）靠左。鉴于他们之间的宿怨，这是一个明智的安排。腓力起初带着辎重部队跟在后面，但后来被派到东边沿着杰纳布河行军，以此掩护赫淮斯提翁的左翼。⁸当舰队顺流而下时，阿里斯托布罗斯朗

读他新近创作的有关杰赫勒姆河战役的作品，试图讨好国王。这是一段哗众取宠的虚构情节，其中亚历山大与波洛斯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决斗，并且以标枪一击杀死了后者的大象。亚历山大（他看起来仍旧反对这种赤裸的谄媚，特别是那种骨子里就不可信的）把这篇阿谀之作扔到船外，还说阿里斯托布罗斯居然写出这种垃圾作品，他就该跟着跳下去。

9

杰赫勒姆河和杰纳布河汇合处的急流和漩涡使国王着实颠簸了一阵子。特别是轻型船只，它们像软木一样颠簸摇摆，几乎要失去控制，在急流处转弯时船桨甚至喀嚓折断。在有的地方皇家旗舰差点儿触礁沉没，不会游泳的亚历山大在朋友的帮助下勉强转移到安全地带。不过，舰队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现在，亚历山大可以吹嘘说，像他的偶像阿基琉斯一样，他也曾跟河流战斗过——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一旦安全航行到杰纳布河的宽阔水域，舰队便在预定地点停靠，整个远征军再次会合。

一路上亚历山大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但这时传来消息说，有两个强大的部族——马利（摩腊婆）和奥克西德拉凯（可能是刹帝利或首陀罗伽，即印度的武士阶级）——正在集结力量要阻拦他。据说他们有100000名带甲武士和900辆战车。一得到情报，亚历山大便派涅阿尔科斯和舰队率先航行到杰纳布河和拉维河的交汇处，同时将军队一分为三，准备在马利人与盟友会师之前将其消灭干净。

这时，亚历山大老兵们意识到他们又得打一场恶仗了（他们所希求的乃平静无事的旅程），于是再次威胁要抗命。他们颇为有理地抱怨说，他们“暴露在未征服的国土上，将要以他们的血为代价，打开通往大洋的道路”。就像他们的代言人迫不急待地指出的那样，就算他们最终打开了道路，大洋本身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他们已经厌倦了荣誉和美名。在这八年中，他们忍受了比大多数人一生都要多的辛苦。此刻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快速安全地回家。通过好言相劝，并加

之以动人的修辞和最为高超的谎言（大洋就在前头，他们几乎可以嗅到海风的味道；他们所面对的部族一点都“不好战”），亚历山大总算说服他们继续前进。不过尽管他们为他欢呼，但士气依旧十分低落——这一点在随后的恶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国王本人的战术才能和神气丝毫不减（通过黎明前在沙漠中行军50英里，他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但他的士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和全世界任何恐惧而绝望的军队一样，他们开始以野蛮乃至残忍至极的方式战斗。劫掠和大屠杀成了家常便饭：即使在认为亚历山大很少做恶的塔恩看来（有点夸张地说），“在亚历山大的征战中，此战也以其恐怖的大屠杀而与众不同”。^{10②}不过，由婆罗门祭司阶层激发的抵抗却因此而更加顽强，这反过来又突显了亚历山大那迄今战无不胜的军队的低落士气。

在围城时他们两次拒绝爬上云梯，直到国王带头前进，他们方才羞愧跟上。在第二次中，有位占卜师（他无疑感受到了军队的厌战情绪）告诫亚历山大不可强攻，因为征兆显示国王有生命危险。亚历山大恶狠狠地看着他，呵斥道：“如果有人在你正在做自己的工作时打断你，我敢说你会觉得欠妥而且讨厌，对不对？”这位占卜师点了点头。“那好，”国王接着说，“我的工作，极为重要的事，就是拿下这个堡垒，我不想有任何迷信的疯子挡我的道。”说完这些，他大声地命人把云梯拿来。士兵们退缩着，犹豫不前。愤怒的亚历山大自己夺来一个梯子——似乎只有两三个可用——把它靠在胸墙上，然后自己爬上去，同时拿着一个小盾牌保护脑袋。

登顶之后，他快速砍倒了上前抵挡的守兵，独自一人在城垛上站了好一会儿——对弓箭手来说这正是绝佳的靶子。他的朋友大声叫他回来。然而相反，凭着卓越却又莽撞的胆量，他竟跳到了城堡里面。他背靠城墙，身体的一侧由一棵大树保护着（这说明战斗发生在平地上），只手应对来犯之敌。过了一会儿，又有三个马其顿人加入进来：列昂那托

斯、为他持盾的佩乌凯斯塔斯（Peucestas）和一位衣着华丽的翊卫队军官阿布瑞阿斯（Abreas）。他们是众多增援者中的头一批——他的姿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但蜂拥到云梯上的士兵人数太多，竟把梯子给压垮了，导致亚历山大一时失去了联系。

当发狂的马其顿工兵用鹤嘴锄和斧子从后门砸出一条通道时，国王和三位忠诚的援手已经打退了许多人。石头、弩箭，各种投射物在他们所配备的盾牌和头盔上砸得当当响。阿布瑞阿斯脸上中箭倒下了。接着，一支印度长箭射穿了亚历山大的盔甲和胸膛，就射在肺部上方。他弯下一只膝盖，差点就晕过去，不过在完全倒下之前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用剑刺死了另一个攻击者。佩乌凯斯塔斯站在国王倒下的地方，用伊利昂的神盾护着他，同时被凶狠的敌人包围着。这时候援兵来了。一个突击队用临时制作的钢锥爬上了城墙。后门也被砸开了，一群愤怒的马其顿人冲进城堡里，无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在此期间，亚历山大被人用他的盾牌抬到了御帐里，人们开始传言他已经死了或者就要死了。¹¹

拔出箭头确实是一个冒险的举动。箭头是叶状且带有倒钩，大约有三英寸长两英寸宽，深深地插在心脏旁边的胸骨里。当箭头最后被拔出来时——有种说法说是佩狄卡斯用剑完成的，因为找不到外科医生或者无人愿意冒此风险——亚历山大出现大出血，之后便昏迷过去了。他的侍从勉强把血止住，在之后的一周里国王生死未卜。¹²没有人相信他还能活下来，对他死亡未经确认的推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地区。印度人立马重获信心，这个消息在亚历山大的大本营（当时扎营在杰纳布河和拉维河交汇处）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他的士兵们无法想象还有别人能领导他们。看起来没人有资格取代他。现在他死了，他们再也没法回家了。在贝亚斯河他们有一条相对安全的撤军路线。而在这里他们四周全是敌对而好战的部族，若没有亚历山大的名字压制他们的勇气，他们就会打得比之前更凶狠。甚至连这些河流都突然看起来更宽了。“没有亚历山大带他们走，每一个困难似乎

都无望解决”（Arrian 6.12.2）。此事最为清楚地证明了国王领袖地位的私人属性和魅力属性，亦即它的根本局限性。

亚历山大所建立的一切都基于他的肉体存在所带来的敬畏和激励作用；他一死，整个帝国就会陷入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中央政策或权威可以将其整合为一体，或者遏制在他去世后迅速出现的分崩离析之势。当这个虚假的流言传到巴克特里亚时，大约3000名希腊雇佣兵殖民者立马反叛，启程返回西方的家乡，这是对未来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不祥的预兆。同时，他的声望和个人权威是如此巨大，以致在他之后建立王国并且自己也成为伟大统帅的人们——一个是塞琉古，一个是托勒密，一个是佩狄卡斯——全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他或许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为卓越和最有才华的下级团队，但直到他死的那天，他们仍是下属，仍是称职的参谋将领，仅此而已。只有亚历山大能掌控他们，只是他的技巧如此纯熟，以致军队看不出他们中有谁能成为他天然或命定的继承者。

国王几乎一清醒过来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大本营里的军队，粉碎了他死亡的谣言，并且承诺只要身体状态适合移动他就会过去和他们在一起。但到了这时候，士兵们已经陷入失常的状态，根本不信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他们说，这封信是伪造的，是亚历山大的将领们捏造出来提振士气的计策。消息传回后，国王知道只有他亲自现身才能防止军纪的彻底崩塌。他的伤口尚未愈合，但不管好没好，他都必须立马去大本营。他被人用担架抬到拉维河；有两条船被捆在一起，他的床放在二者之间的一个高台上，这样岸上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让印度人知道亚历山大还活着，让他们失去那虚假的希望。

但是他依旧虚弱不堪，甚至虚弱到他的船得走在其他船的前头，跟它们保持距离，“这样他才获得必需的安静……以免被船桨的击水声干扰到”（QC 9.6.2）。当他们接近大本营时，他下令去掉遮阳篷，以便在阳光下他可以被清楚地看到。即使到这时，这军队仍然心存疑虑。他们

窃窃私语，说那个一动不动的是亚历山大的尸体而不是活人，不是他们的统帅。这时国王微微抬起手来向他们致意，于是士兵们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但是这还不够，还得证明亚历山大不仅还活着，而且实际上*an iketos*，不可战胜的。

当船靠岸时，有一个担架正在等他。他告诉侍从把它拿开，然后把他的马牵过来。凭借人们难以想象的如钢铁般的意志，他站起来，爬了上去，在军队的注目下缓缓骑到营地。突然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声音如此之大，连两岸及其附近的峡谷都传来回声”（Arrian 6.13.3）。快骑到御帐时，亚历山大从马上下来，自己走完剩下的路。老兵们簇拥在他周围，充满着迷信般的敬畏，触摸他的手臂和衣服，好像是为了确认他不是鬼魂。花环和鲜花撒在他的身上。之后他离开众人进入营帐——在这次超凡的努力之后，他可能立刻就晕了过去。即使像亚历山大这般超常的体格也有它的极限，有迹象表明他再也没有从这次骇人的损伤中完全恢复过来。

之后国王的朋友严肃地批评了他。他们说他没有必要为了展现自己的英雄气概而冒生命危险，这差点儿就葬送了整场远征的成果。应当率先登上云梯的是军官们而不是统帅。对此亚历山大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军官们能不那么懦弱畏缩，那他也就用不着身先士卒了。那位跟他说“亚历山大啊，功业属于英雄”^③的波奥提亚人没有完全说错。此外，亚历山大还可以说，（除了其他事情）他个人的英勇功绩大大缩短了整场战役。由于丢掉了主要堡垒，马利人被击溃了，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鉴于他们战败的过程，他们觉得继续抵抗这个神明般的人物是徒劳的，因此决定投降。与此同时，有众多使团从奥克西德拉凯那边过来，他们被亚历山大攻打马利人的战役震慑住了，未作反抗就前来归顺。¹³

如果国王有意要证明他是不可或缺的，那这回他称心如意了。从今往后，他几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惩罚，也越来越为所欲为了。或许这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相信他确实拥有超人的力量。在他康复期间，当

克拉特洛斯和托勒密外派回来向他致敬时，他心中最惦记的是奥林匹娅斯死后封神的事。¹⁴亚历山大又一次充满了成神的愿望；这一次，这种想法不但没有被弃置一边，反而日益强烈。

国王完全康复之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但非常有代表性的事情。亚历山大最出色的马其顿老兵之一科拉戈斯（Corragus）跟著名的雅典拳击手狄奥克西波斯单挑。狄奥克西波斯赤身裸体，只拿了一根棍棒，而科拉戈斯则全副武装，既拿剑又持枪。狄奥克西波斯比罗马持网斗士还要灵巧，三下五除二便把对手打倒在地。亚历山大（他支持科拉戈斯）愤而离席，因为此事关乎民族声望。这事之后佞臣们不断地诋毁狄奥克西波斯，甚至在一次晚会上偷放一个金杯在他身上，然后举报他偷窃。最后这个可怜的运动员选择自杀，而不是等待进一步的迫害。¹⁵亚历山大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和以往一样懊悔不迭。但为时已晚。

他们继续南下，中途经历了多次小型战役。大约公元前325年2月，亚历山大极大扩充了的舰队从杰纳布河进入印度河。这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就是腓力行省的南部边界。这里建了一座带有船坞的边境驻防城镇，新造的三十桨战船正等着舰队的到来。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与伊朗东部的联系，亚历山大任命自己的岳父奥克西亚特斯做帕洛帕米索斯（兴都库什）的总督，以取代原来不甚可靠的波斯总督。

国王又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印度河三角洲。在此期间，他跟许多独立的王公打了一系列的血战，他们不是要阻挡他前进就是在他离开后发动叛乱。同样，大屠杀的记录非常惊人。狄奥多罗斯（17.102.5）说，亚历山大用战火、破坏和全体奴役的方式“把对他名字的恐惧传遍了整个地区”，这点毫不夸张。他所遇到的特别顽强的抵抗主要是由于婆罗门祭司的圣战宣传。和之前一样，亚历山大只会用彻底的恐怖主义来回应意识形态的反抗。作为威慑，许多落到他手里的婆罗门被吊死。其中一个在被问到为什么要唆使某位领袖叛乱时说：“因为我希望他带

着荣誉而生，或者带着荣誉而死。”在这里国王严重误判了对手。抵抗非但没有为他的铁腕政策所粉碎，反而越挫越勇：在公元前300年之前，五河之地④的马其顿驻军就被全部消灭掉了。¹⁶

可能在现代的西卡波拉附近（细节不太清楚，因为印度河千百年来改道多次），亚历山大将军队一分为二。克拉特洛斯以波吕佩孔作副手，统领三个方阵兵团、大象和所有已过服役期的马其顿老兵，由陆路进入卡尔马尼亚行省。舰队和其他部队将在那里跟他会合，具体地点或者在幼发拉底河河口，或者在波斯湾沿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克拉特洛斯将会翻越穆拉山口进入奎达和坎大哈，进而穿越古代的阿拉霍西亚行省；然后由此折向西南，中途还会经过锡斯坦湖、克尔曼沙漠和巴瑞兹山。亚历山大再次设法将他和赫淮斯提翁分离——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一走赫淮斯提翁便成了代理最高统帅。

不过，这次行动最有趣的一面是它所反映的亚历山大方面所拥有的详细地理知识。由于该地区是沙漠环境且补给短缺，必须兵分两路，这些是显而易见的。让人惊奇的是国王事先对情况的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很显然，他已经把整个探险之旅都计划好了，包括会合地点。人们很容易忘记他的情报部门、勘察员和科学家在远征背后所做工作的巨大价值：绘图、测量、收集标本、研究自然资源以及筛选各类信息。⑤没有他们持续不断的协助和有关从盐矿到沙漠路线的各类报告，远征就不会那么顺利，甚至有可能会遇到无法补救的灾难。¹⁷

公元前325年7月，亚历山大到达了印度河三角洲头的帕塔拉。该城的统治者先前曾向他投降，但惊恐于国王的惩罚手段，把帕塔拉和周围的乡村地区都撤空了。因为亚历山大计划在此扩展港口和船坞（为此他需要苦力劳动），所以他派人传话给逃难者，说他们可以回来继续像之前那样耕种自己的土地。大部分人都回来了。佩通（Peithon）被任命为下印度至海岸地区的总督，亚历山大征服战役圆满结束了。

希腊作家醉心于这片未知的异域，极力夸大这场远征的重要性，其

实那只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袭扰罢了。亚历山大所到之处不会超过西巴基斯坦，他的名字也不曾进入之后印度的文学传统之中。曾有一小段时间，他的代理人统治着——至少从理论上，如果不总在事实上——从克什米尔到卡拉奇的广大地区。但是他们对该地区的掌控一直都不稳定，而且对印度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些野蛮的入侵者，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事实上，亚历山大刚刚离开，他的成果就开始崩溃了。总督腓力被一群雇佣兵杀死。抵抗运动开始在旁遮普聚集，由一个名为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刹帝利阶层的年轻平民领导。亚历山大死后，一个名叫帕瓦塔卡（Parvataka）的旁遮普国王也加入旃陀罗笈多的阵营，此人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波洛克斯。这两个人一块征服了亚历山大梦寐以求但从未实现的帝国。¹⁸旃陀罗笈多所建立的孔雀王朝东至本加拉和恒河，南至迈索尔。

亚历山大也不曾理解，印度人的性格跟他此前所遇到过的一切事物之间有着怎样的根本差异。当他第一次到达塔克西拉时，和所有的西方到访者一样，被赤身裸体的耆那教苦行僧和上师震惊到了，这些人在希腊人中被称作*gymnosophistae*，即“赤身哲学家”。关于这种文化冲突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多数（但并非全部）是杜撰的。亚历山大及其顾问一向秉持希腊式的调和解释，他们似乎相信这些赤身哲学家所宣扬的乃是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在当地的一个变种。这种观点确有部分的真理，因而也阻碍了对他们思想的严肃推敲；何况狂热的犬儒主义者也不会有什么顾忌去填补二者之间的鸿沟。（只有后来建立怀疑学派的皮洛好像抓到了他们的哲学的实质：他的无为和蔑视外在现象的教义与耆那教的教诲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和亚历山大生平的许多方面一样，他与赤身哲学家的遭遇很快就演变成了传奇或神话。

不过，有些奇闻轶事确有一定的真实性在其中。亚历山大曾说服一位圣人放弃苦行冥思的生活而加入他的远征军，大概是想让他做一名听话的随行智者，作为亚历山大的希腊占卜师和迦勒底占星学家的补充。此人被严苛的苦行僧所看不起，认为他是“屈从肉欲的奴隶”，选择去服

务一个并非是神的主人；后来他把自己活活烧死，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表示悔恨。又有一次，亚历山大及其随从经过一片牧场，一些赤身哲学家聚集在那里讨论哲学问题。对于军队的到来，“这些人别的什么也没做，只是在原地跺脚”。当亚历山大通过翻译官询问他们古怪行为的原因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复：亚历山大国王，每个人所能占有的地面只有我们所站的地方那么大。你和我们并无不同，除了你总是很忙但又不做好事，还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给你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了许多麻烦。瞧吧！你很快就会死去，那时你所能占有的只不过是一片刚好能把你埋葬的土地罢了。¹⁹据说亚历山大听罢赞扬了这些话，这种反应和他与第欧根尼相见时一模一样。然而正如阿里安提醒我们的那样，“他的行为总是跟他当时口头上钦佩的正相反”。

在帕塔拉，印度河在入海之前分成两大支流。现在亚历山大留下赫淮斯提翁加强城堡的防卫并监督船坞和港口的建设，而他自己则航行去勘察右侧或西边的港湾。西南季风还盛行着，舰队因风暴而遭到严重的损害。在近海的某处，他们被迫在边渠里避风，结果却被潮汐推高而搁浅——这种现象起初使这些地中海水手们非常惊恐，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他们无助地在滩涂上闲荡，小心地避开大螃蟹和其他讨厌的生物，以为他们会一直搁浅在那里。不过这种错觉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一个和刚才一样吓人的巨浪再次把他们抬了出来，同时使船只进一步受损。亚历山大尽可能做点维修，然后继续航行。舰队在河湾入口处的岛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抛锚点。他们终于到达了大洋。

在拜访西瓦期间，亚历山大曾征询神谕，问他是否能够征服整个亚洲。看起来，阿蒙神不仅给了一个他所希望的回复，而且规定了当预言实现时亚历山大必须奉上什么样的祭品给哪些神明。这一刻终于来了，国王按要求向阿蒙神所规定的诸神公开献祭。他东方的征服战役显然没法走得更远了，然而他必须展现他对大洋的权威，哪怕这种举动只是例行公事或是象征性的。因此，他航行到离海岸约25英里远的第二个岛屿，在那里他再次根据要求为奥凯阿诺斯和特提斯（Tethys）设立祭坛。

对海岸做了一次短途的探险巡游后，他回到了河湾的抛锚点。在这里他把公牛献祭给波塞冬，祈求回程平安，然后便往上游返航。尽管印度河东部港湾会使舰队多走200英里的航程，但他还是希望这条航线能少一点危险。

最终他如愿以偿。这条航道可以避开季风。这条支流注入卡奇沼泽地，在这个时期该沼泽深入内陆，由此形成一个宽阔的内陆咸水湖。在勘察了入海的水道后，亚历山大带领骑兵沿海岸向西走了三天。其他人则留下来在不同地点挖淡水井。港口和船坞就建在盐湖边上，同时还驻有一批军队。²⁰这些事务完成后，国王回到营地开始具体筹划这次远航。

如果舰队要从印度洋进入波斯湾，那么每隔一段距离就需要有水源和补给点。所有的报告都确认沿途几百英里的海岸全是贫瘠的沙漠，到处狂风肆虐，荒凉到只剩沙尘和赤岩，在今天人们称之为莫克兰。亚历山大打算沿这条路线航行，带上大部队和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尽可能挨着海岸，沿途他们会挖水井并建立补给点。至于储备，他们准备了四个月的量（Arrian 6.20.5，大概就是粮食和咸鱼）。通过仔细研读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亚历山大的策略。舰队和军队将按照协同配合的方案行进。舰队负责运载大批补给，而军队则负责寻找水源。^⑥这是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时所采用的极为成功的海陆协同策略；但亚历山大（他无疑是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借用来的）理应知道，舰队和军队长时间分开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后来这直接引发了他征战生涯中最为灾难性的一段经历。

亚历山大进行这项危险探险的动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很复杂。他可能认为这个方案是带领舰队和军队顺利通过这片极为贫瘠之地最好最安全的方法。他确实非常关心舰队重新获得供给的问题，否则他可能会让整个远征军都从海路走。再说，在伊朗-俾路支地区留下一些未征服的领地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要缩减与莫克兰相邻、尚未开化的格

德罗西亚行省面积。也许如阿里安所说（Arrian 8.32.11），他有意探寻印度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是否可以开辟一条贸易航线。

这些考虑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涅阿尔科斯（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最清楚真相）记载说，亚历山大尽管知道这些困难，但仍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pothos*，想要按这种路线行军（Arrian 8.20.1-2）。根据传统说法，赛米拉米斯女王和居鲁士大帝都曾做过这种尝试，其中女王的队伍有20位幸存者，而居鲁士的则只有不到7个。亚历山大又一次被强烈的竞争之心驱使：要永远做最优秀者。如果他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成功了，成功地带领全部军队安全通过莫克兰，这难道不是一件辉煌的成就吗？涅阿尔科斯还这么认为：通过研读关于前面状况的情报资料，亚历山大还觉得可以对他那支庞大军队进行一些修剪和精简，特别是在非战斗人员中。这次行军将会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旅程。

国王最直接的问题是购买补给。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军费已经所剩无几，亚历山大又一次沦落到要向朋友募捐的地步。他向他的秘书长欧美涅斯索要300塔兰特。欧美涅斯有点不情愿地说他只能提供所求金额的三分之一。亚历山大勃然大怒，一把火把欧美涅斯的营帐烧了，看他怎么救出那些暗藏的宝物。通过这种方式他获得了超过1000塔兰特的金银。但同时，远征军的许多文件和资料也被毁掉了（Plut. *Eum.* 2.2-3）。有些东西亚历山大也许乐见其被毁，虽然他后来又四处写信给各地总督和将军，要求他们提供复本。既然波斯的财宝完好无损，且小亚细亚的铸币厂依旧在生产，那么很显然（无论有心还是无意）至少有一批甚至更多的金银条块没有及时送来。

亚历山大经过一番犹豫，最后任命涅阿尔科斯做舰队司令。据涅阿尔科斯说，国王起初不想让他的这位密友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但涅阿尔科斯一再坚持，最后获得了指挥权。军队的士气依旧低落，涅阿尔科斯的到任将保证水手们有足够活下来的机会。不过，舰队必须等到季风结束才能起航，到时风向就不再是西南风向，风力也会较为温和，而这

最早也得到9月末。但是亚历山大和军队在8月底时就先于涅阿尔科斯出发了。这样一来，由于没人可以准确预知季风将在何时结束，所以从一开始海陆两支军队的联系在时间上就是不确定的。

不过，最初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亚历山大及其士兵在相对肥沃的地区内行军。他们沿海岸挖好水井，同时进行了一次快速出击，把紧靠现代卡拉奇西边的各个部落逐一平定。他们在这里兴建了一座城市，名为兰巴基亚，离大海不远。阿波罗法涅斯（Apollophanes）成了该地区的总督，列昂那托斯也留下来担任驻军指挥，手下有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可以调遣。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压制当地民众，并为舰队的到来做准备。²¹在这期间，亚历山大显然不缺补给，因为他征集了许多，并为涅阿尔科斯及其舰队留下了不少于十天的口粮（Arrian 8.23.7-8）。^⑦

现在亚历山大进入了格德罗西亚，尽可能地挨着海岸行进。他首先遇到的是个处于石器时代的可怕部落，希腊人称之为伊克杜奥法吉人或食鱼人。他们浑身多毛，头发又长又乱，没有剪过的指甲犹如野兽的爪子一般。狄奥多罗斯（17.105.3-4）说他们“既不友好又无比野蛮”。他们穿着兽皮或鲨鱼皮，用搁浅的鲸鱼骨架建造房屋。甚至连他们的牛群也以鱼粉为生，牛肉都散发着一股鱼腥味。想从他们那里获得补给根本不可能。这是一片不毛之地，除了一些荆棘、怪柳和偶尔可见的棕榈树外什么也没有。

随着他们深入莫克兰，土地变得越发荒凉。亚历山大让先头部队一直挖水井，但不久他到达了莫克兰的海岸山脉塔拉尔-伊-本德，该山脉一直延伸到海边。由于山脉的存在，他被迫往内陆绕了一大圈，由此失去了与舰队会合的机会，他甚至猜测舰队超了过去。可以预见，真正的灾难正是从现在开始。他们严重缺水，在一个咸水井到下一个水井之间经常要走上25至75英里的路程，而且多数要在夜间行军。当到达水井时，士兵们都渴疯了，经常连盔甲都不脱就一头扎进水中。许多人死于脱水过后的过度饮水，而更多的人则死于中暑。最后，亚历山大只得在离

取水点三四英里的地方扎营。

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与士兵们同甘共苦而成功维持了自己的威信和声望。有一次，别人从附近的沟渠中为他取来一头盔的泥水——当时仅有这么多了，他哈哈大笑，在谢过献水者后便把水泼到了沙里。“这一举动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全军上下好像都喝到了亚历山大所泼出来的水似的”（Arrian 6.26.3）。很讽刺的是，在这次可怕的行军期间，军队应该经过了一个盛产没药和甘松的地区：随军出征的腓尼基商人在役畜上载满了这些珍贵的药草，而士兵们则把没药枝挂在帐篷上，他们踩踏过的甘松根则沿途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烈日炎炎，大部队在松软不定、如海浪般起伏的无尽沙丘上艰难前进，货车陷到了车轴的位置，而靴子里则灌满了烫人的沙砾。毒蛇隐匿在草木中，到处都是有毒的植物——带刺的胡瓜会喷射出一种致盲的汁液，月桂状的灌木则能使役畜口吐白沫而死。长有多汁“卷心芽”的枣椰可以提供点救济，但食用太多未成熟的椰枣却经常让人噎死。很快，亚历山大的部队偷偷宰掉了役畜，并打开了封存的储备。亚历山大很明智地假装不知道，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要活下去。士兵在不断掉队，有的筋疲力竭地死在烈日之下，有的则因为无法行军而被抛下。

过多的水和过少的水一样危险。有天晚上，辎重部队和非战斗人员在一条干涸的河谷中扎营——马其顿将领本该知道这是绝不允许的——突然山上爆发了一场山洪。巨大的水流在黑夜中咆哮而下，把帐篷、辎重（包括御帐）、几乎所有的妇女和小孩以及剩余大部分的役畜都冲走了。许多士兵勉强逃过一劫，除了武器和脚下的一片地以外什么都没了。亚历山大立即派出特使，命令周边的行省提供粮草和其他必需的补给。这些东西将通过竞赛用的骆驼运送（大概信息也是用这种方式送出的），然后在卡尔马尼亚等待军队的到来。各个总督是否有能力执行这些命令是很成问题的，或许这时候亚历山大的主要目的是为这些突然降临的灾难找一些替罪羊。

最后的灾难是一场猛烈的沙尘暴，这场沙尘暴把所有的路标都掩埋了，以致连向导都失去方向，走了一条离海岸越来越远的路。亚历山大意识到了这一点，往南派出一小队骑兵，终于到达了海岸。他和士兵们在这里的沙砾中挖了一些水井，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这让他们大喜过望。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整支军队沿这片海岸行进，挖掘的时候总能找到水源。之后亚历山大的向导找到了通往格德罗西亚内陆首府普拉的路。在进入莫克兰60天后，这些衣着褴褛、瘦弱黝黑的士兵终于到达了安全地带。²²他们的损失非常惊人。亚历山大行军之初带了8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现在这些人只有25000人活下来。他的侍友骑兵从1700人减员到只剩1000人。²³马匹、骡子、储备和装备全都丢了。这次穿越沙漠的悲惨行军堪比拿破仑1812年从莫斯科撤军的情景。

如果亚历山大是带着超越居鲁士和赛米拉米斯的念头出发的，那么他这份僭慢的雄心必定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如果他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可以超越所有的自然危险——这看起来非常可能——那么这种骄傲和自信必定受到了极大的动摇。这两方面亚历山大必须找到替罪羊，也许所需要的还不止一个。由于他通常会采取一些明智而实用的预防措施来维持其超然地位，我们不禁要问他是否真的能找到合理的理由来指责某些下属没有执行委派给他们的命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事先关于格德罗西亚及相邻地区的情报是全面而彻底的，他的计划也是谨慎而细心的。很难想象他会不知道塔拉尔-伊-本德的存在，或者没有想到需要往内陆绕一大圈。

由此不免要得出结论，在离开港口之前亚历山大与涅阿尔科斯安排了至少一个会合点，以便为军队运送能够穿越沙漠的军事干粮。当舰队没有如期出现时，亚历山大没有办法，只能赶紧继续前进。等待的每一天都在消耗他已经很少的储备。无论涅阿尔科斯，还是格德罗西亚、苏西安纳、帕莱泰刻涅和卡尔马尼亚的总督们都没有送来他迫切需要的补给。涅阿尔科斯可以为他的延误找到充足的理由，亚历山大看见舰队回来时也松了一口气，没有过分追究这些理由。但那些总督就没有这么幸

运了，因为他们反映了某种更大的威胁。²⁴

亚历山大后来的举动表明，至少他认为事情远不止是失职这么简单。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哈尔帕罗斯没有给他送来所需要的金银条块，自己倒玩起了皇家气派，而且被许多人认为图谋不轨。²⁵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的行省总督在这次非常危险的行军中让他极度失望。舰队也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消失不见。哪怕是一个不如亚历山大偏执的头脑也难免会由此推论出哈尔帕罗斯、涅阿尔科斯以及其他人都阴谋背叛他，都盼着他死在炽热的格德罗西亚沙漠中。问题是，他的怀疑有根据吗？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掌握的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给出定论；但是在亚历山大深入印度之后涉及总督叛离倾向的证据不应受到忽视，²⁶至于涅阿尔科斯，他当然有充分的时间为亚历山大和后世雕琢一个解释他的舰队失职的故事。²⁷

国王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牺牲品是可怜的阿波罗法涅斯，因为灾难就发生在他的辖区里。亚历山大写了一封信，正式解除他的职务。这时列昂那托斯正好派人送来急讯，说当地部落民兵攻击了他的分队，在给他们造成很大损失后就撤退了。阵亡者当中就有阿波罗法涅斯。撤职不成的亚历山大想尽办法把这次失败改编成了一场胜利，说列昂那托斯歼灭了6000名当地民兵，自身只损失15名骑兵和少量的步兵。军队的士气还没有恢复到可以承受另一场失败的程度。²⁸

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消息从克拉特洛斯那里传来，他挫败了两个图谋反叛的波斯贵族，正把他们捆绑着送到亚历山大这儿来。但是总体情况并不让人乐观。关于背叛、低效和大规模贪污的传闻接踵而来。舰队也还没有任何消息。许多将领相信亚历山大不会从印度回来了，于是开始自立为独立的东方君主，并给自己配备了强大的私兵。各种僭越奢华和行政腐败的消息层出不穷。局势相当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哈尔帕罗斯也不再是一个跳梁小丑般的角色了（到这时亚历山大肯定在那方面不会再有什么幻觉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也不能再糟了。由于在格德罗西

亚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亚历山大在声望上也损失了很多，*aniketos*（不可战胜的）这一称号现在也颇受怀疑。除非国王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否则他可能会面临比单纯的渎职要糟糕得多的局面。那些感到恐惧罪恶不安的人是天然的共谋者。

在普拉做了短暂的休整之后，亚历山大再次出发，因为显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的直接目的地是卡尔马尼亚的萨尔摩斯（雅亚遗址；参看*Iran* 7, 1969, p. 185），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内陆一点的地方。在这次行军中，他很明智地放松了纪律。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说在通过一片富饶的乡村地区时他和军队连续七天举行酒神宴会。和腓力一样，亚历山大非常醉心于这样的准宗教式的狂欢，所以该故事有其可信之处。

不过，此类宴会享乐并没有让他从军国大事中分心。当军队进入卡尔马尼亚时，他们受到了伊朗总督阿斯塔斯佩斯（*Astaspes*）的欢迎。亚历山大早就得到了此人的相关材料，（除了没提供补给外）这位总督据说在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期间企图反叛。亚历山大什么也没提，热情地欢迎了阿斯塔斯佩斯，接受了他所献的一切东西，并确认了他的职位。然而等到达雅亚遗址时，国王收集了更多的证据。他也感受到了整个行省阴沉的敌对情绪。突然间，阿斯塔斯佩斯被捕，随后遭到处决。亚历山大清算行省总督的行动开始了。事实上也可以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被亚历山大的岳父奥克西亚特斯取代的帕洛帕米索斯（兴都库什）总督后来也以叛国罪遭到处决。

亚历山大不久前召集了许多总督，命他们带着粮草和役畜到卡尔马尼亚来见他，其目的显然不止一个。埃克巴塔那的队伍刚到达，他们的领导者（克勒安德洛斯、西塔尔刻斯 [*Sitalces*] 以及两位代理指挥官）就全部被捕入狱。他们是帕美尼翁的刺杀者，在军中很不受待见，因而亚历山大一点儿也不缺证人，无论波斯人还是马其顿人都出来作证，“指控他们劫掠神庙、盗掘古墓，还对行省居民犯下其他恶劣暴虐的罪行

”（Arrian 6.27.4；参看 QC 10.1.1-5）。克勒安德洛斯和西塔尔刻斯被判处死刑；他们下属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大概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然，克勒安德洛斯是科伊诺斯的兄弟。这些人很可能与神出鬼没的哈尔帕罗斯有联系（克勒安德洛斯事实上跟那位帝国财政官属于同一家族，即域外王国的厄利密奥提斯王族）。

哪怕没有反叛的证据，这个集团独立控制几大中部行省本身就相当危险。但是如果勾结真的存在，那亚历山大现在已经及时消灭了。不过，哈尔帕罗斯本人却成功脱逃了，他知道从今往后要离亚历山大远远的。召令一下达，他立刻带着6000名雇佣兵和5000塔兰特的白银逃到海边。（为什么他没有从国库中带走更多的钱呢？有没有可能亚历山大实际上采取了预防措施，把财宝分由独立的司库管理，而古代史家却没透露出来？）他由此前往雅典，希望用金钱换得救助和荣誉公民权。

在克勒安德洛斯和西塔尔刻斯被处决、哈尔帕罗斯仓皇出逃之后，关于有组织政变的担忧也就烟消云散了。亚历山大以其惯有的冷静鉴别力和心理洞察力，走了非常危险的一步。或许他回想起了公元前358年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在面临相同局势时所采取的手段。那位嗜血的君王所做的首要事情（在杀掉近亲和平定行省叛乱之后）之一，便是命令小亚细亚的各个总督解散他们的雇佣兵。当时阿尔塔薛西斯的命令引发了叛乱。不过，亚历山大做了更好的预备，当他“写信给亚洲的所有将领和总督，命令他们一收到信就立即解散雇佣兵”（Diod. 17.106.3）时，这一命令的确得到了执行。

另一方面，只有在政治危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命令。姑且不算新解散的，当时游荡在亚洲的无主雇佣兵就已经够多了。这项政策的社会后果是可以预见的。没有雇主，这些人为了生计就会四处劫掠。很快整个亚洲就会遍布这些散兵游勇，一旦希腊的抵抗运动烽火再起，他们自然会横渡爱琴海去加入其中。当这些人受到惩罚时，引来报复女神的就不仅仅是腐败，其中必定还有政治因素。那位已经变成埃及的实际

总督的希腊人克莱奥美涅斯是亚历山大的所有官员中贪污和金融敲诈最为厉害的一位。但是，他既忠诚又能干，关键还是非马其顿人。因此，国王认可了他的职位。菲罗克塞诺斯在奇里乞亚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但也逃过了一劫，虽然他因为给亚历山大献上一个漂亮的男妓差点毁了自己的前程。这种举动并不讨喜，而且亚历山大绝不是那种会让别人替他挑选情人的人。²⁹

这时已经12月了（公元前325年）。克拉特洛斯带着军队和大象安全抵达，不久之后传来消息说涅阿尔科斯也在附近出现。起初亚历山大不相信这个消息，而且以散播谣言的名义把行省总督抓了起来。甚至当涅阿尔科斯——衣衫褴褛、长发上粘满了盐渍——出现时，国王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及其五个同伴是仅剩的幸存者。想象中舰队覆没所带来的痛苦情绪完全盖过了舰队司令逃过一劫所应有的喜悦。但是，在听到涅阿尔科斯说舰队完好无损，此时正在霍尔木兹整修，而水手们也健康良好后，亚历山大欣喜若狂。

那些走海路的人有许多惊险要说。涅阿尔科斯极为厚颜无耻地这样说道，由于当地人的攻击，他被迫提前拔锚起程：亚历山大前脚一走，当地人就不再恐惧，开始像自由人一样放肆。当然，后来季风、风暴以及各种事故使他一再拖延，以致超出了亚历山大60天行军时间达两周之久，但显然没有任何消磨时间之事。涅阿尔科斯也不说他及其手下的航行相对比较轻松。他声称海岸贫瘠而荒凉，甚至说补给逐渐耗光了（四个月的补给只有略多于两个月的量能够提供：其余的呢？）。故事继续着，由于饥饿，他们被迫突袭一个友好城镇，将其储备掠夺殆尽。真正到了饥饿关头，他们宰杀并吃掉了7头骆驼。在他的叙述中，深海里的危险也没有被忽略。一群鲸鱼的突然出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但涅阿尔科斯这时随机应变，命令舰队同时吹响号角，然后向它们冲去，这样便把它们全部吓跑了。

现在亚历山大向诸神献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运动和音乐庆典，以

此感谢舰队平安归来，并且（根据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说法）还“感谢让他征服印度，感谢让军队走出格德罗西亚”（Arrian 6.28.3）。至于那些幸存者对这些惊人的、以敬神为名的谎言会怎么看，我们就只能想象了。涅阿尔科斯成了当时的大英雄：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军队则把饰带和鲜花撒在他身上。歌舞的优胜者则是亚历山大的嬖幸——宦官巴戈亚斯。在场的所有人都说国王应该亲吻获胜者。亚历山大便照做了。

有趣的是巴戈亚斯会怎样跟赫淮斯提翁相处：或许他们的雄心和影响领域差异太大，以致相互间并不把对方当作真正的手。另一方面，赫淮斯提翁跟克拉特洛斯一见面就又吵了起来。两人甚至拔剑相向。亚历山大将两人拉开，公开斥责赫淮斯提翁，“说他是蠢货和疯子，不知道没有亚历山大的支持他就什么也不是”（Plut. Alex. 47.6）。克拉特洛斯则在私下里受到了斥责。³⁰他们公开和解，但显然这两个脾气暴躁的人越早分开越好。公元前324年1月，在亚历山大起程前往波斯波利斯之前，他让赫淮斯提翁负责辎重、大象和大部队，命他们沿漫长的、容易走的东海岸行军，那里他们将会找到丰富的补给。他本人则带着侍友骑兵和轻装步兵穿越大陆。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克拉特洛斯将与他同行。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涅阿尔科斯仍和舰队在一起，他们的下一个会合地点是苏萨。³¹

波西斯的总督死了，替代他的是一个富有的伊朗贵族，其人名为奥西涅斯（Orsines），自称是居鲁士的后裔。当亚历山大来到帕萨尔加德时，奥西涅斯带着各种珍贵礼物出城迎接，其中有许多是给他的朋友和将领的。然而，对于巴戈亚斯他什么也没给。当有人小心翼翼地告诉他那个宦官是亚历山大的宠爱时，他以贵族的轻蔑口吻回应道，“他敬重的是国王的朋友，不是他的娼妓”（QC 10.1.26）。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巴戈亚斯的耳中，他马上开始恶意进谗，从各个方面污损奥西涅斯在亚历山大心中的形象。有人发现居鲁士在帕萨尔加德的陵墓被恶人盗掘，所有珍贵的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巴戈亚斯看到了机会。^⑧要让多疑的国

王相信奥西涅斯用死者的财宝来奉承活人并不难。于是，这位总督被逮捕、定罪和绞死，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那个毁灭他的奴才的嘲讽。

在格德罗西亚的灾难之后，亚历山大出现了不良的倾向。他变得日益偏执和多疑，非常轻信别人对他下属的诽谤，无论其来源多么不可靠。连小小的过失他都会进行严惩，理由是轻微的违规行为很容易发展成严重的犯罪。这句台词可能部分因为他正在进行的清算活动，但其背后也有更为根本的意指。现在有嘲笑这样一种观点的倾向，该观点认为亚历山大的性格此时发生了相当大的蜕变（古人普遍持有这种观点）。这并不是说他的天性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个烧毁波斯波利斯的人同样也是那位摧毁忒拜的少年。从一开始他的野心就是无法填满的，一旦受挫他只会更加疯狂。但是考虑到他后来的情况，连续不断的胜利、无与伦比的财富、绝对而不受挑战的权力、持续而沉重的生理压力以及初显现的酗酒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年少时还有所节制，现在却经常喝过头。导致国王此时这些举动的因素也不止是政治压力，还有他日益突显且不受控制的妄自尊大。³²

亚历山大从帕萨尔加德前往波斯波利斯，奥西涅斯在那里被处决。接替他的是国王的持盾卫士佩乌凯斯塔斯，此人最近已经升任为额外的近身护卫官。佩乌凯斯塔斯忠心不二，并且出身不高：二者是亚历山大最为看重的两个条件。另外，他忠实地接受了国王的东方化习惯，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同时，哈尔帕罗斯空出来的帝国财政官职位落入了一个称职的无足轻重的罗得岛会计师安提美涅斯（Antimenes）手里。看起来亚历山大觉得，关键职位交给名不见经传的希腊官僚或勤勉忠诚的下属会更安全些（也更容易撤职）。

公元前324年2月末，亚历山大到达苏萨，他在此停留了很长时间，总督清算行动也终于要结束了。苏西安纳总督及其子双双被处死，罪名和通常的一样：管理不善、敲诈勒索以及最重要的没有为在格德罗西亚的军队运送补给。总督阿布利特斯给亚历山大献上3000塔兰特现金作为

补偿。国王把钱扔给他的马，马没有碰这些钱，这时他问道：“你们说这算哪种补给？”据说他亲自处死了阿布利特斯的儿子，用枪刺穿了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克雷托斯的幽灵似乎已不再让他烦恼。与此同时，他又有了新的远征计划，这次的目标是地中海西部。迦太基、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是潜在的目标。甚至有传闻说他打算进行环绕非洲的航行。涅阿尔科斯带着舰队安全抵达，两人讨论起了新计划。国王下令在幼发拉底河的塔普萨科斯建造不少于700艘的大型桨帆船。塞浦路斯的各个国王受命为舰队提供铜、大麻和帆布。³³

在亚洲，所有的反对派此时都已被有效清除，亚历山大可以放手推行他的东方化政策了。尽管现代学者提出了一些巧妙的辩解，³⁴但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这项政策并非出自任何与种族融合或博爱相关的意识形态。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随处可见，³⁵这里只需简短地提一个就够了。普鲁塔克（*Plut. Alex.* 27.6）曾讲过一个关于亚历山大与西瓦绿洲的阿蒙-宙斯神祭司谈话的故事，我们还记得他就是在那里被宣布为神之子的。祭司以老调重弹但又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神是人类共同父亲；对此亚历山大回答说，“神的确是全人类的共同父亲，但他更偏爱人类中最高贵最优秀者”。根据这个陈述，塔恩找出了支持亚历山大具有博爱观念的证据。当然，这话完全可以往另一个方向理解，其中暗含着一种更为邪恶得多的口号，就像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庄园》中所说的：“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除了这句新奇的主张，塔恩的证据主要是以下两段文字：普鲁塔克第一篇修辞专论《论亚历山大大帝的命运或美德》的第六章（*Plut. Moral.* 329A-D），和阿里安所记载的“族际联谊宴会”——此事发生于欧庇斯抗命事件亚历山大与士兵们和解之后（*Arrian* 7.11.8-9）。后一件事将在恰当的语境中详加讨论；对于前者，我们只能说这是普鲁塔克年少时候的作品，意在证明一个非常不可信的主张，即亚历山大以其事迹证明了他是真正的行动哲学家。到开始创作《希腊罗马名人传》时，普鲁塔

克便审慎地放弃了这种无甚意义、似是而非的理论。当然，塔恩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解释为普鲁塔克中年丧失了理想主义——“热情之火已然低微，多半为广博的阅读所淹没”。³⁶读者只要用心观察亚历山大的人生，就不难自己看出国王的理想主义的本质和限度。

非常可能的是，亚历山大（或宣传部门）使用各种关于人类一体的哲学理念来阐释他的那些政策，使其可以被人接受，否则这些政策可以恰切地被说成单纯的政治或军事上的机会主义。这些理念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一直在流传，³⁷显然可以利用来正当化扩张主义者的征服政策。一种今天仍在使用且很有效用的宣传策略可能就是从普鲁塔克那里传下来的（*Plut. Moral.* 328E），他提出那些被亚历山大打败的人要比那些躲开他的人更为幸运，因为前者得到了希腊文化和哲学的恩泽，而后者则保持着落后野蛮的原始状态。像阿纳克萨科斯这样的宣传家，他可能会用这些理论来维护亚历山大的利益，由此开启了一个传统，后来被普鲁塔克适时地采用并沿袭。但对现代史家来说，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误把宣传话语当作真实的信念则是一种严重的政治幼稚病。

亚历山大所采取的种族融合政策都是极为有限的，都有其直接可见的纯粹务实的目的。他的政策远非出于博爱的理想主义冲动，而仅限于政府高层和军队人员（特别是军官阶层）；它的两大目的是把波斯将领和校尉吸收到现有的指挥体系中，同时创造一个波斯-马其顿联合行政阶层。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亚历山大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抛弃马其顿官员。由于在印度和莫克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他把侍友骑兵分队的数目从八个减少到了四个，然后以皇家骑兵分队为基础增加了第五个。这是第一次伊朗人不仅以分队的规模和这些部队编在一起，而且完全与之结合为一体。一些有特权的波斯人甚至被允许进入皇家骑兵分队，而且配备马其顿的武器。

更严重的是，亚历山大派去接受马其顿式军事训练的30000名伊朗青年现在重新出现在苏萨，他们已经完成了那漫长而艰辛的训练。他们

装备极好，精神饱满，热情高涨，不知疲倦地展示他们在武器操练方面的技能以及一流的体魄和纪律。亚历山大夸起这些人来不吝赞美之词。他不仅称之为“继承人”——这已经够糟的了——而且明确表示如果必要他们将被用作“马其顿方阵步兵的平衡力量（*antitagma*）”（Diod. 17.108.3）。所以毫不奇怪，这些人的出现在亚历山大的老兵中引起了深深的恐慌和厌恶，他们既鄙夷又嫉妒地把他们蔑称为“战斗小舞者”。除了独裁行为和波斯服饰，亚历山大宫廷生活中还有各种难以亲近的繁文缛节，所有这些都“成了引起马其顿人愤愤不平的原因，他们只觉得东方文化对亚历山大的荼毒日甚一日，他已不再关心自己的民族或本土的风俗习惯”（Arrian 7.6.5）。

大体上这种担忧是有事实依据的。巴比伦很早就取代了佩拉成为亚历山大的宇宙中心；比起他庞大帝国的其他边陲行省，很难说现在他对希腊所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譬如，当时有人汇报说奥林匹娅斯和克里奥帕特拉两人勾结起来反对安提帕特，并约定事成后马其顿归克里奥帕特拉，伊庇鲁斯归奥林匹娅斯。对此，亚历山大只是说了一句，他母亲的选择更加明智，因为马其顿人是不会接受女人的统治的。³⁸

国王加强高层融合的高压——如果不说独裁的话——政策在著名的苏萨集体婚礼上达到了顶点。在这次非同寻常的盛典上，约80至100位马其顿高级将领娶了波斯或米底的新娘，这些新娘全部来自伊朗最高贵的家族。婚礼采用波斯的习俗，盛大而隆重。新郎们按级别高低坐在椅子上，在祝酒过后新娘们进场，他们牵起她们的手并亲吻她们。在稍后的宴会上，在场的每一位客人的面前都有一个金杯。婚礼至少进行了五天。在这场婚礼上，亚历山大自己娶了两位妻子，分别是大流士和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的女儿。如果他想加强他对阿契美尼德王位的继承权，他最好把事情做得更彻底些，哪怕这样一来他至少得立三个王后。他还为赫淮斯提翁娶了大流士的另一个女儿，表面上是因为他希望他们的孩子做他的侄子和侄女。

然而，赫淮斯提翁的竞争对手很快就看出国王牵线搭桥其实另有意图，而且颇为不利。千夫长（Chiliarch）或大维齐尔的职位已经为赫淮斯提翁重新设立了。最近他又成了侍友骑兵唯一的指挥官，尽管此前亚历山大曾决定不再把这个职位委派给某一个人。无论亚历山大在愤怒时对他说过什么，赫淮斯提翁如今已是帝国的二号人物，也是国王最有可能的继承人。但这些都没有提高他的声望。婚礼也没有达到亚历山大预期的效果。婚礼是在国王的直接命令下被迫进行的，国王一死几乎所有新娘都遭到休弃。对马其顿人来说，这些婚礼是亚历山大东方专制主义最糟糕的象征。他试图创造“一个混血的、摆脱了所有民族忠诚或传统的统治阶层”，但这种理念最后完全失败了。³⁹

军队已彻底不再信任他，亚历山大沦落到了要用大范围收买的方式来安抚他们的地步。这种手段有时起作用，有时却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命人把娶了亚洲妻子的人登记汇总起来（总数超过了10000人），目的是给他们发放迟到的结婚礼物，对此士兵们没有异议。但是他的下一步行动，尽管明显是一种恩赐，却相当不受欢迎。大部分士兵都严重亏欠随军出征的小贩、商人、马贩、妓院老板的债务（要不是有许多未偿债务在炽热的格德罗西亚沙漠中被一笔勾销，情况还会更糟糕得多）。由于亚历山大重新拿到了充足的资金——我们看到哈尔帕罗斯只侵吞了波斯灭亡后留下来的180000塔兰特中的一小部分——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解决这些债务了，为了赢得爱戴，他宣布将为他们偿还债务。因此，他要求大家写上名字，列出清单，以便可以立即偿付。

响应者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人写下他们的名字。全军上下想当然地认为这只不过又是亚历山大的把戏，为的是找出他们中支出超过薪水的人。愤怒的亚历山大告诉他们，国王就义务而言一定会对臣民说真话，他们没有理由妄自揣度。在说出这颇为惊人的话后，他把结算办公室设在军营里，指示出纳员一见到债券或借据就立即予以偿付，并且不必登记任何人的名字。士兵们终于信了，带着勉强的感激之心陆续前来结算。最后，这次慷慨大方的举动花费了亚历山大20000塔兰特的资金。⁴⁰

还有一个更为紧急、很大程度上是亚历山大自身政策所导致的问题，即有不计其数的无主希腊雇佣兵仍在四处游荡。他们逐渐由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这已经够棘手的了）演变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严重威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流亡者，是傀儡寡头政治的受害者，而那些寡头政治正是安提帕特根据国王的指令在希腊推行的。他们唯一的谋生方式是到大流士手下服役。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非法之徒，因为效忠波斯就会被希腊同盟当作叛徒。亚历山大很快就明白，对雇佣兵采取强硬政策是行不通的；但这对同盟里的希腊城邦并无影响，它们不管现在还是未来都根本无意吸纳过去的政治敌人。这就创造了一大群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之人，要使他们不构成危害就得让他们参加正规兵役。

国王已经采取一些措施缓解这个难题了。只要能在军队中找到位子他就尽可能吸纳这些雇佣兵，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还在远东地区建立了为数众多的驻防殖民地。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他们所有人的问题；不管怎样，有些人深深厌恶亚历山大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无论诱惑有多大他们都不愿在他手下服役。当然，使危机更加急迫的是国王让总督们解散私兵的紧急法令。这立即导致一大批训练有素且残忍无情的流氓无赖失去生计，并使他们充斥整个国际市场。此外，当亚历山大开始清算帝国官员时，有相当一部分的波斯总督和将领卷款而逃，跑到了拉科尼亚南部的塔伊那隆，那里正逐渐发展成反马其顿的招募中心。

这种联合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于是有个名叫列奥斯特涅斯（Leosthenes）的雅典将军——可能是在雅典政府的默许下——开展了从小亚细亚到伯罗奔尼撒的偷渡业务，专为雇佣兵服务。现在局势有点一触即发了。雇佣兵们在此找到了中心、组织和能付给他们薪水的领袖——特别是哈尔帕罗斯，他现在带着5000塔兰特的钱来到了塔伊那隆。来自巴克特里亚的3000名反叛的殖民者也大约在这时回到了希腊。除非亚历山大采取快速而强有力的措施，否则他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

但他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巴迪安教授（*MP*, p. 220）简要概括

了亚历山大所面临的难题：“他不能把集结起来的亡命徒们解散掉，也无法把他们全部重新招募进来，他还发现没法使他们定居他国。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把他们送回国。”流亡者当中大多数是和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如果他能结束他们的流亡生活，他们也会对他产生好感的。另一方面，当不得不接收这些死敌时，安提帕特所支持的傀儡政府可能会大唱反调：这个局势是无法避免的。

亚历山大直接面向流亡者发布声明，内容如下：“亚历山大国王致希腊诸城邦的流亡者。我们不是你们被流放的原因，但是除了被诅咒者（即因为宗教亵渎或杀人而被诅咒者，亚历山大也把忒拜的流亡者排除在外），我们将是你们返回祖国的原因。我们已就此事去信告知安提帕特，如果有城邦不愿恢复你们的公民权，他将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Diod. 18.8.4）换句话说，国王施展了一些策略，准备抛弃他的那些希腊内奸（他们本来就是牺牲品）；同时把关于流亡者的困境的罪责转嫁给安提帕特（他还不是牺牲品，但很快就是了）；然后颠倒了马其顿先前的党派政策，改为支持民主派，轻易地赢得了民众的拥戴。这项法令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诉讼和行政纠纷，所以必须为奉命执行该法令的人制定具体的指示。⁴¹

到了3月份，最终草案在亚历山大的全军大会公开宣读。国王希望正式的声明可以在当年夏天的奥林匹亚赛会上公布，于是亚历山大的特使尼卡诺尔——亚里士多德的养子——稍后就出发了。此外，他还携带了第二份不相关的法令，这份法令在学者们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但在希腊人自己看来似乎就一笑话而已，而且即使作为笑话其品味也堪忧。亚历山大现在要求同盟各城邦应公开承认他是一位神。这不太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计策⁴²，因为事实上亚历山大从对他的神化中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惹恼马其顿人（不过这种情况他现在一定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而波斯人也一定会认为这纯属亵渎。世故的希腊人则用讽刺诗嘲笑国王的狂妄自大。最佳的（当然也是最讽刺的）评论也许出自斯巴达人达米斯（Damis）。当大家在争论这个属于神的

荣誉时，他说：“既然亚历山大渴望成为神，那就让他成为神吧。”⁴³

无论神化对别人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本人是非常严肃对待的。某种意义上，终其一生他一直在朝最后的神化而努力。他的血管中流着神的血液；他的先祖有许多人是英雄或半神；通过在孟菲斯的法老加冕典礼和在西瓦朝圣期间与阿蒙神的启示，他母亲关于他出生的隐晦提示也得到了彰显。如果超乎凡人的成就可以换来神性（就像阿纳克萨科斯在巴克特里亚所暗示的那样），那么亚历山大无疑可以为自己在万神殿中争得一席之地：迄今，他的功业远远超过了阿基琉斯和赫拉克勒斯。亚里士多德曾教导他，真正的国王乃凡人中的神。垂死的伊索克拉底也提出，等候亚洲征服者的没有别的，只有成神。

年复一年，随着与同胞（因而也与现实）的日益疏离——这是对不断登上绝对权力的惩罚，亚历山大对自身潜在的妄自尊大的控制已逐渐减弱。最终打破这种控制的是贝亚斯河抗命事件和格德罗西亚沙漠之难所带来的心理震动。“通过运用更大的权力，他免除了权力的不安全感：就像神干预凡人的事务，他将决定各个君主和各个民族的命运。”⁴⁴当他不再信任他作为凡人的权力时，他想成为神，用不可战胜这面神盾来与内心对失败的恐惧作斗争，用永远青春这份神礼作为护身符，来对抗对年老、疾病和死亡的忧虑：这些肉身上的危险总让他想起自己的凡人性。酗酒滋生多疑，他的梦想变成了一些浮夸的癫狂之举。他依旧强大，但离前路的终点已经不远了。⁴⁵

公元前324年春，亚历山大离开了苏萨。赫淮斯提翁带着大批步兵经由陆路西行到底格里斯河。国王本人则顺着欧莱奥斯河而下，沿着海岸航行，直到他抵达底格里斯河的河湾，然后逆流而上前往赫淮斯提翁的营地。由此继续前行直到欧庇斯这个海拔最高的通航点，该地约在巴比伦以北200英里。波斯人曾建造一系列的堤堰，预防敌方舰队突袭上游，随着亚历山大的前进，工兵们把这些堤堰都清理掉了，同时在主河道上另外建了一些堤堰，以保证三角洲地区的灌溉水源。⁴⁶可能就在这

次旅程中，在欧莱奥斯河与底格里斯河河湾的某个地方，国王建立了苏西安纳的亚历山大里亚（卡拉克斯），这个港口后来成了巴比伦主要的货物集散地。清理堤堰也具有类似的含义，除了其他目的，还希望以此促进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在欧庇斯，亚历山大把马其顿军队集合起来，同时宣布“所有因年龄或伤残而不适合继续服役的士兵”即刻遣散（Arrian 7.8.1）。他承诺他们会得到丰厚的津贴和遣散费，当他们回国时足以使同胞们艳羡（不用说这也是未来征兵工作的流动广告）。对此阿里安评论道：“毫无疑问他打算用他所承诺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确实毫无疑问。但是他知道他们的不满日甚一日，现在很不好对付。如果再次发生抗命，这必须是在形势对他有利的情况下发生的。⁴⁷不管怎样，他的话几乎引起了一场暴乱。⁴⁸他打算遣散的那些人大声喊道，把长年服役的人榨干然后再把他们扔到垃圾堆里，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年轻一点儿的过了服役期的老兵则自己要求退伍。他们服役得如此之久，战斗得如此之苦，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差别对待？所有压抑已久的对国王东方化政策的不满，全在暴烈的质问和呐喊声中爆发了出来。⁴⁹其实在表面之下，这些人一个个都非常害怕：害怕国王不再需要他们，害怕他们会变成几乎已是纯波斯军队中的卑微孤立的少数，害怕亚历山大知道他终究可以控制住局面。

他们最大而且不无道理的担忧是，“他会把王国的首都永远设在亚洲”，这样他们又会好几年见不到家乡，甚至永远也见不到了。最后他们威胁要集体离开他。“继续带着你那些战斗小舞者去征服世界吧！”一个老兵喊道，这是对波斯“继承人”刻薄的影射。“你是说，带上他的父亲阿蒙。”另一人反驳道。⁵⁰这句话大家都听到了，引发了一阵嘲讽和讥笑。这话自然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勃然大怒⁵¹的亚历山大从台上跳下来，身边的护卫军官也跟着跳下来，然后他大踏步走到队伍里将主要的闹事者一一指出来。共有13人被捕，他们被拖出去当即处决。⁵²

其他人被吓坏了，全部鸦雀无声。接着国王以其在危机中一贯的沉

着冷静径直回到台上，开始发表一场尖酸而鄙夷的演讲，逐一列举马其顿军队从他父亲腓力那里获得的福利和恩泽。⁵³他说，最初在腓力的时候，你们只是“一群穷得响叮当的流浪汉”，穿着羊皮衣，连保卫自己的边界的本事都没有。而当他去世时，他们已是爱琴海最伟大国家的主人。“但是，”亚历山大接着说，“跟我给你们相比，这些未免相形见绌。”——随后他又把他的成就一一列举了出来。他严厉斥责士兵们的不忠和怯懦。然后高潮来了，他大声喊道：“你们都想离开我，那就走吧！别让我再见到你们！”说完他便转身回到自己的住所，而全军上下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得说不出话来，他们像绵羊一样在那里站了好久，完全不知所措。⁵⁴

和之前遇到类似情况一样，亚历山大把自己关起来，不跟外人接触，就这样一直等着。就像他的英雄兼楷模阿基琉斯，无与伦比又不可或缺的亚历山大，他只要不出现便是对战友们最严厉的惩罚。成群结队的老兵们非常无助地站在他的御帐外头。他拒绝接见他们。这一回他的心理冲击策略运用得无比成功。⁵⁵到了第三天，他传出消息说他正参照旧有的马其顿精锐部队，用“继承人”组建新的波斯部队，包括一支波斯皇家骑兵分队和侍友骑兵，还有一支波斯翊卫队。同时，他召集伊朗的军功勋贵，任命他们担任先前由马其顿人把持的所有旅级指挥官。⁵⁶这些高官还按照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习惯被称为国王的“亲戚”，他们有资格与国王进行友谊性的亲吻。⁵⁷

当军队得知这些事情时，他们的反抗立即土崩瓦解：这种冷酷的情感敲诈彻底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他们全都冲到亚历山大的御帐前，一边哭喊着乞求让他们进去，一边自责为没用的忘恩负义之徒，可以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罚，但不要让蛮族人篡夺他们的位置。他们表示愿意交出煽动抗命者和“那些带头与国王作对的人”。他们绝不会散去，除非亚历山大答应他们：这是一种相反意义上的静坐罢工。⁵⁸既然已经把他们的情绪操纵到了悔过的程度，亚历山大便重新出现，准备展现他的慷慨大度。看到这些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兵都快把眼睛哭瞎了，他自己也忍不住

落泪——可能是因为彻底解脱了。

一位年长的头发花白的骑兵军官作为军队的代言人，他说他们主要气愤的是亚历山大让波斯人做他的亲戚，给他们进行友谊性亲吻的特权，但却没有一个马其顿人曾得到这样的荣誉。这种场面太好对付了。国王大声说道：“但是我把你们所有人都当作我的亲戚。”听到这话，在场的许多人在那位老骑兵军官的带领下纷纷上前亲吻他：作为公开和解的象征，他充分满足了大家的愿望。⁵⁹之后他们拾起武器（这些武器被扔在门前以示请愿）回到营地，一路高唱胜利颂歌；不过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果确实有人要唱颂歌，那也该是亚历山大。

尽管如此，马其顿人依旧是他目前最好的部队，一旦达到目的，他当即以一种公开的浮夸姿态讨好他们。现在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⁶⁰以此庆祝这次双重和解：亚历山大与老兵们之间的和解，和波斯人与马其顿人之间的和解。由于他把抗命士兵唤作“亲戚”，国王便把他们在形式上提升到了与波斯贵族相等的社会地位：这一特权地位在宴会上也得到了突显，士兵们很荣耀地坐在国王身边，并且从御用的调酒缸里饮酒。这里并没有跨民族联欢的意味，它不是所谓的博爱的盛宴，尽管至少有一位学者⁶¹声称在欧庇斯的宴会中发现了博爱精神。波斯人被明确置于马其顿人之下，而其他民族则又在他们之下。当亚历山大在宴会上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统治的和谐（*homonoia*）和共处（*koinonia*）”做出著名的祈祷时，他确实怀有此愿，但也仅此而已，至于谁才是他优先的搭档这是不言而喻的。^⑨

庆祝仪式一结束，亚历山大就继续他的裁军计划，但这回的规模要比他最初计划的大得多。⁶²至少有11000名老兵被遣散，这意味着大部分年轻一些的过了服役期的士兵也跟着走了。亚历山大的目的是在亚洲保留一支由13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组成的马其顿核心部队担任驻防职责。在如此大规模的裁军之后，甚至就连这么小的一支军队，他可能都得从波斯军队中来招募来作为补充。此外，这次遣散的条件是极其

丰厚的。在老兵们回家的路上，现役的薪水是照常发放的——这也是对他们在路上可能遇到的状况的生动提示。除此以外，每个人还会得到1塔兰特的遣散费。亚历山大指示安提帕特，在剧场和所有的公共竞赛中必须为他们保留特别席位。阵亡士兵的孤儿将会得到他们父亲的报酬。

与此同时，国王坚决要求所有的本地妻妾及其孩子应当留下，以免（他这么说）他们与在马其顿的原生家庭发生冲突。他承诺留下来的男孩子将会免费接受良好的马其顿式的教育——“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训练”。⁶³亚历山大还略为模糊地补充说，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会把他们送回马其顿。事实上，这大约10000个男孩他打算用来组建“一支王家军队，这支军队由混血且没有固定居所的军营孩子组成，他们只知效忠于他”。⁶⁴显然，在不远的将来，他并没有终止继续征战的计划。阿里斯托布罗斯曾说他的征服欲永不满足，他征服西方直达大西洋的计划尽人皆知。⁶⁵

亚历山大任命克拉特洛斯担任被遣散的返乡老兵们的行军指挥官，波吕佩孔做他的副手。不过，这个看似例行公事的任命只是帝国中最受觊觎的职位的前奏。当克拉特洛斯到达马其顿时，他将“掌控马其顿、色雷斯和塞萨利，并确保希腊的自由”（Arrian 7.12.4）。换句话说，他将取代安提帕特担任摄政，或者说亚历山大的副王。安提帕特本人也得到交出权力的命令，同时还要招募马其顿新兵，并把他们带到巴比伦来，以替代刚刚遣散的老兵。

安提帕特早就知道下一波清算可能就是针对他的。他在此呆了十年，足以巩固他的地位。在打败阿吉斯国王之后他称雄希腊，无人可与之争锋：正是在此役之后，亚历山大开始指责他“有僭越之心”。大概在同一时间，他在意志的较量中打败了奥林匹娅斯；太后现在退居伊庇鲁斯，她在给其子信件中不断地诋毁安提帕特。有人认为（不过其依据的是后来并不可靠的史料），正是奥林匹娅斯的信件最终促使国王对他在欧洲的代理人下手。⁶⁶他的怀疑是否有更为确实的依据呢？

安提帕特真的被亚历山大的神化法令深深地震惊了，他根本不想和

这事有任何相干，实际上他从根本上反对整个东方化政策。国王嫉妒他的功业，亚历山大把麦伽罗波利斯之役形容为“老鼠之战”，这话必定使他有所警醒：倘若他作为领袖过于成功，那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下场。再有，他与亚里士多德过从甚密，后者同样反对亚历山大自命为神。不久前，国王曾在信中显露过对二人的不快和威胁。他似乎确信（或者说想让别人相信），安提帕特这位最后一个手握大权的保守派贵族正阴谋篡夺他的王位。当有人赞扬这位总督生活朴素时，亚历山大呵斥道：“安提帕特外表一身白衣，但内里全是紫袍。”⁶⁷

这种性质的评说很快就传回了马其顿。流亡者法令的模糊条文和克拉特洛斯突然晋升为副王的消息同样如此，后者必定在正式文书下达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安提帕特的耳朵里。除此之外，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他将成为亚历山大在希腊的高压政治的替罪羊，虽然他只不过是执行国王的命令而已。他被克拉特洛斯取代的消息被宣传成民主新时代的曙光，而大约40000名民主派流亡者的回归一定程度上也加强这种宣传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如果安提帕特遵从诏令前往巴比伦，那他必死无疑，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即便已年过七十岁，他也不想因又一起子虚乌有的谋反罪而掉脑袋。卡利斯特涅斯、菲罗塔斯、帕美尼翁以及他自己的女婿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他们的死清楚地揭示了现在的政坛风向。现在，国王的脾气越发不可捉摸，多疑和自大的心态也跟他的行动大体相符，最近的清算行动更是残酷无情，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安提帕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他的掌控。这位副王在马其顿声望颇高（我们可以猜测，这特别是由于他如此坚定地对付奥林匹娅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本土军队的支持，因而他大可拖延一段时间。他甚至可能会利用这些优势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⁶⁸

安提帕特估计亚历山大暂时不会跟他公开撕破脸，于是没有遵从国王的召唤，而是派自己的长子卡山德前去代他进行陈情。卡山德的陈情

非常微妙。可以肯定，他得到指示不仅要当面判断国王的意图，还要评估国王的精神状态。此外，他可能还得巧妙地从小佩狄卡斯等高级将领口中打探消息，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次调任的。也许他在路上遇到了克拉特洛斯并做了一些私下交易，因为当一年后亚历山大去世时，老兵们才走到奇里乞亚。我们可以猜想，安提帕特并非唯一富有远见之人，在那最后的关键的几个月中两面下注的不止他一个。

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长期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安提帕特和亚里士多德这时开始阴谋用致命的毒药来杀死国王。⁶⁹现代有位学者甚至发展了这种假说，认为亚历山大是被他的高级将领佩狄卡斯和安提帕特等人（他们至少暂时紧密联合在一起）组成的军人集团杀死的，卡山德则是其中的联络人，瓜分帝国的阴谋已经预先达成了。⁷⁰即使没有这样的强大支持，安提帕特拼死一搏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在马其顿家喻户晓（且深受喜爱），而亚历山大却只是一个去国十年的统治者。他的军队能干、忠诚且朝气蓬勃；而亚历山大的军队则在无尽的战斗之后筋疲力尽，很大一部分已经被东方人取代（他们厌恶这些人），而且通过两次全军性的抗命表明了自身的态度。安提帕特有理由信心满满。

与此同时，他开始谨慎地在希腊城邦中寻找可能的支持者。有两个大国雅典和埃托利亚强烈反对流亡者法令，因为该法令的实施会使它们丢失部分领土（它们分别决心阻止流亡者返回萨摩斯岛和欧尼亚戴）。亚历山大准备强力打击它们的顽抗态度，这就使得它们很可能与副王进行秘密接洽。安提帕特私下里跟埃托利亚人结盟，可能跟雅典也做着类似的谈判：这个紫云冠之城有着庞大的舰队和固若金汤的海军武库，对希腊的全面防御是不可或缺的。⁷¹不过，此时安提帕特必须小心从事。在得到卡山德陈情结果之前，他不能让自己走得太远。

就在这时，即公元前324年7月初，哈尔帕罗斯再次出场，这个政治烫山芋有一种误判阴谋时机的才能。如果他向安提帕特献上资金和军队

（他如果听说副王被解职一定会这么做的），安提帕特一定匆忙地加以拒绝了。作为反叛者，哈尔帕罗斯显得异乎寻常地愚蠢。没有其他人像他这样，竟鼓动那些正在进行秘密外交的人公开反叛。接着，他满怀欣喜地要到比雷埃夫斯港去，同行的还有他的整支私兵，他天真地以为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然而相反，他发现该港口根本不放他进去。许多雅典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和亚历山大叛逃的财政官做交易——但绝不希望他们的活动变得如此明目张胆。

不过到了当月中旬，哈尔帕罗斯又回来了。这回他很聪明地把自己装扮成乞援人，只带了三艘船，外加700塔兰特的现金。由于他仍然享有雅典荣誉公民权，这一称号或多或少保证了他能够进入雅典。一进入雅典城内，他就与众多政治领袖联络，很快就为他所筹划的反叛行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时，从安提帕特、亚历山大和奥林匹娅斯而来的各路使节陆续到达，他们全都坚决要求引渡哈尔帕罗斯。（当国王的使节菲罗克塞诺斯出现在公民大会上时，德摩斯提尼说：“那些因灯光而目眩的人要是看到太阳会做些什么呢？”）哈尔帕罗斯向老朋友福基翁求助，甚至提出要把所有的钱都委托给他。福基翁谨慎地拒绝了。

至于是否要把哈尔帕罗斯交出去以及要交给谁，人们争论得非常厉害。最后，德摩斯提尼想出一条计策平息了大家的争论，并为此事留了回旋的余地。哈尔帕罗斯本人被保护性地羁押起来，有守卫负责看守。他的钱则转交到一个特别委员会那里（其中就有德摩斯提尼），为了安全而存放在卫城上。这一策略招致了主战派的强烈指责。叙佩雷德斯（Hypereides）甚至指控说逮捕哈尔帕罗斯等于放弃了反叛的机会。不过，机会其实早就失去了，而由于雅典的这种做法，哈尔帕罗斯至少还活着，且没有被亚历山大抓住的危险。

这时，德摩斯提尼前往奥林匹亚，流亡者法令和神化法令将于8月初在那里公布。作为雅典的官方代表，他得到授权可以跟亚历山大的代表尼卡诺尔就法令影响到雅典的各项事务进行谈判。除了领土问题（特

别是萨摩斯岛的地位问题，雅典有殖民者在那里）外，哈尔帕罗斯的命运必定也是会谈的重要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论两人达成何种协议，这些协议都必须保密。但是，亚历山大——他有点不情愿，这是事实——确实同意雅典人继续保有萨摩斯岛，因而双方可能有过交易，其中最明显的交易条件莫过于交出哈尔帕罗斯。如果德摩斯提尼达成的是这样的交易，那他显然并不打算兑现承诺。他刚回到雅典，哈尔帕罗斯就在名义上不知名人士的默许下成功脱逃了。

这当然成了一件政治大丑闻，当人们发现原先的700塔兰特只有一半存放在卫城上的保险库里时，这事闹得更大了。人们普遍认为德摩斯提尼本人侵吞了至少50塔兰特。控告和反诉把雅典大多数的知名人物都卷了进来，双方唇枪舌剑，不断来回。起初，德摩斯提尼承认收了哈尔帕罗斯的钱，但又说他把钱花在了公共事务上，至于什么事情他不能透露（或许是用于支付列奥斯特涅斯的伯罗奔尼撒雇佣兵）。不久他改变主意，否认了整件事。最后在德摩斯提尼本人的建议下，受人尊敬的战神山议事会——他与议事会有着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整个事件：和现在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拖延技巧。六个月后委员会仍然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在等待事情的发展。⁷²

除了进行联合抵制的雅典和埃托利亚，其他地区对流亡者法令的接受各有不同（具体得看各地当权派的政治倾向）。在每个地方，该法令都引起了大量的行政和法律问题。⁷³亚历山大的神化要求则是另一回事，既然它对生活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大多数的希腊人就只是冷眼旁观，说点俏皮话。正面回应从愤怒的蔑视到觉得好笑的鄙夷等都有，不一而足。只有少数年长的保守人士，比如安提帕特，才真正感到震惊。

正如我们可以预见的那样，在是否要承认亚历山大为奥林匹亚万神殿第十三位神——像腓力那样——一事上，雅典发生了激烈争论。把话说得最直白的是雅典政治家吕库古。他质问：“当你们在离开他的神庙

后第一件必做之事是净化自己时，这会是什么样的神呢？”有个反对者被人指责为年少轻狂，对此他反驳道，至少他比那位未来的神更年长。支持动议的德玛德斯说了一句狡猾的警告反对意见的话——后来在亚历山大确实已经死了之后，他因支持动议而被课以10塔兰特的罚金。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在神灵问题上争论不休，可能会丢掉土地——即萨摩斯岛。这个提示起了作用。即使是德摩斯提尼，神化法令原则上的坚定反对者，这时他也不情愿地支持德玛德斯，他说：“好吧，那就让他做宙斯之子，波塞冬之子也没问题，如果他想要的话。”⁷⁴于是，动议通过了。

为了躲避平原上的酷热，亚历山大从欧底斯往东来到波斯大王的传统避暑地埃克巴塔那。在旅途中，暴躁的赫淮斯提翁——他的脾气显然没有因为克拉特洛斯的离开而缓解——和秘书长欧美涅斯之间爆发了一次可笑的争吵。欧美涅斯的下属替他征用了一套房子。赫淮斯提翁把他们赶了出去，把房子给了一个希腊吹笛者。亚历山大不得不再次充当这种琐碎而烦人的私人争吵的调停人。

在埃克巴塔那，一处理完所有的紧急事务，国王就举办了一场盛大而持久的酒神庆典，庆典上有体育和音乐节目，还有被专门带过来提供娱乐的3000名希腊表演者。每个晚上都有一场盛大无比的酒会。在其中的一场酒会之后，赫淮斯提翁（他的酒量至少与亚历山大的齐平）突然倒下，发了高烧，卧床不起。医生规定饮食要非常清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赫淮斯提翁一直都遵从医嘱。不久，病情开始好转。有天早上，医生刚离开他就起床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整只鸡，喝了大约半加仑的凉葡萄酒，之后自然又病得很重。亚历山大在别人告诉他赫淮斯提翁病情恶化后立马从竞技场赶回来，当时他正在那里观看小伙子们的比赛。等他赶到好友的床边时，赫淮斯提翁已经死了。

国王的这位密友在后世看来并不算一个招人喜欢的角色。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既娇生惯养又专横跋扈，同时本质上又有点愚蠢。他是

一个称职的团级将领，但却担不了更大的权责。他最大的可取之处是他对亚历山大始终不渝的个人忠诚。有人声称克拉特洛斯同样也很忠诚，对此亚历山大回应道：“克拉特洛斯爱的是国王，而赫淮斯提翁爱的是我本人。”可以想见，奥林匹娅斯必定会强烈嫉妒她儿子那形影不离的同伴。当她在信中诋毁完安提帕特时，常常不忘抛出一些针对赫淮斯提翁的尖刻的恐吓性言辞。最后，自负且傲慢的赫淮斯提翁给她写一封私人的责备信，用的是御用复数“我们”。信的结尾是这么写的：“停止和我们争吵，也别再生气或恐吓。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们也无所谓。你知道对我们而言亚历山大比什么都重要。”

亚历山大对赫淮斯提翁意味着一切，而赫淮斯提翁对亚历山大也是。当时国王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他倒在遗体旁边一天一夜，哭泣不止，没有人能安慰得了他。他下令整个东方都要进行哀悼。军营里所有的长笛和其他乐器全部禁止使用。就像阿基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所做的那样，亚历山大削下头发以示哀悼，甚至连他的战马的鬃毛和马尾也要剪掉。赫淮斯提翁那可怜的医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阿斯克勒庇俄斯在埃克巴塔那的神庙被夷为平地——这是一个神对另一个神的快意报复。无论在天国还是在人间，亚历山大对失职行为都绝不姑息。

遗体做了防腐处理，并由佩狄卡斯统率的皇家护卫队护送到巴比伦。亚历山大所设想的华丽葬礼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准备。葬礼最终于公元前323年早春时候举行，帝国的每个行省都承担了相应的费用。火葬堆有五层楼高，底部有一弗隆见方，整个看来就像是一个饰有老鹰、船首、狮子、公牛和半人马兽的巨大的瓦格纳风格的怪物。“除了这些，上面还站着一些塞壬，它们内部中空，藏着许多为死者唱哀歌的歌者”（Diod. 17.115.4）。

赫淮斯提翁死后，空出来的侍友骑兵指挥官一职再没有人担任过：这支军队仍旧被叫作“赫淮斯提翁分队”。在欧美涅斯带头下，许多侍友机灵地把自己及武器奉献给死者。亚历山大曾派遣使节去西瓦，询问把

赫淮斯提翁崇拜为神是否合法。即便对阿蒙神来说这也有点太过分了，神谕的回答是否定的，但为他建立英雄崇拜倒是可以。亚历山大立马写信给臭名昭著的克莱奥美涅斯，亦即当时的埃及总督，承诺如果他在埃及为赫淮斯提翁建立相称的圣祠并确保“赫淮斯提翁”一名出现在所有的商业契约上，那么他过往的所有恶行都将一笔勾销。现在，“凭赫淮斯提翁”起誓成了一种时尚，同时有关参观、治病和预言的故事也开始增多。最后，西瓦的指示被人们无视，赫淮斯提翁竟被崇拜为“神之助手和救主”。

这种过分悲痛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单单那个火葬堆就花费了亚历山大10000塔兰特，他随后下令修造的繁复的陵墓则耗资更甚：无数的资源被用于实现这个自大狂的梦想。国王对死去的挚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想和打算，我们只能猜想了，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赫淮斯提翁去世的当月，罗克姗娜怀孕了，她随后生下的儿子乃亚历山大唯一的合法继承人。⁷⁵

在幸运地从雅典逃出来后，哈尔帕罗斯回到伯罗奔尼撒，召集部队航行到了克里特岛——那是所有失意者的家园，到达后他马上就被刺杀了。凶手似乎是马其顿间谍，他与哈尔帕罗斯的副手串通，并且很可能是在亚历山大的直接授意下行动的。让这位渎职叛变的帝国财政官逍遥法外绝不是国王的风格。然而，哈尔帕罗斯的管家逃到了罗得岛，在那里，素来警觉的菲罗克塞诺斯——亦即当时的奇里乞亚总督——很快就将其抓获并加以审问。由此菲罗克塞诺斯获得了有关哈尔帕罗斯所有的私密联系的完整材料。于是他——如果不是直接听命于亚历山大，也显然经过了她的批准——发送了一份官方文书到雅典，罗列了所有哈尔帕罗斯曾贿赂过的雅典公民，包括所涉及的金额。

德摩斯提尼的名字最初是否也在其中尚有疑问，但是在战神山议事会终于公布他们对哈尔帕罗斯事件的调查结果的时候（公元前323年2月），他的名字无疑在列表上。随着赫淮斯提翁的去世，德摩斯提尼失去

了他在宫廷中的朋友和联系，现在哈尔帕罗斯被杀也使他无法再以安全为由掩盖事情的真相。公元前323年3月，雅典陪审团认定德摩斯提尼犯有受贿罪，并课以50塔兰特的罚金。这一金额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于是他进了监狱。然而，不久他就脱逃了，像哈尔帕罗斯一样，得到了守卫的默许。他逃到埃吉纳岛，之后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亚历山大去世。⁷⁶

治疗悲痛最好的灵丹妙药是工作，而亚历山大所知道的工作只有一种。公元前324/323年冬，那时候他的痛苦已经减弱为一种阴郁的侵略脾性，于是他对科塞奥斯人发动了一场快速战役——事实证明这竟是他最后的战役。他们是住在埃克巴塔那西南的山区部族。阿契美尼德国王每年给他们一定的金额，换取在他们领土的安全通行权，对这种做法亚历山大嗤之以鼻。他花了五周的时间去消灭他们，并称此次行动为“给赫淮斯提翁的阴魂的供品”（Plut. *Alex.* 72.3）。⁷⁷他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新的征服和探险计划。在离开埃克巴塔那前，他派了一支勘察队到里海，包括木匠和船工。他们将在叙尔卡尼亚的大森林里砍伐木材，用来建造希腊式的战舰——表面上是用于探险，但其实是拖延已久的远征斯基泰的预备工作。包括征服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各项计划也在积极筹划之中。

等到亚历山大结束科塞奥斯人之战时，春天已经来临。现在他全军启程前往巴比伦，这次的行程较为轻松，路上经常停下来休息。行军途中还遇到了来自利比亚和南意大利的使团，他们是很多这类使团中的第一批，带着向亚历山大致敬的金冠和赞颂之辞。迦勒底占卜师发出了不祥的预言，他们警告国王，如果进入巴比伦就会有灾降临。不过他们又补充说，如果他下令重建马尔杜克的塔庙和神殿，就可以逃过此难。无论如何，他应避免从东边，亦即面对着落日进入城市。

这是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之辞。事实上，亚历山大7年前第一次入城时就已经下令开始这项巨大的工程了。费用由神庙的金库负责——这是此类事务的通常做法。然而，据估计光清理土堆石块就需要10000人两

个月的劳作；而所谓的金库一个多世纪以来早就进了祭司们的腰包。工程一旦启动，这项收益来源就会登时耗尽。结果，这项工程几乎一事无成。现在，虽然有些迟了，祭司们还是试图恐吓亚历山大让他本人买单。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很严肃地对待这些预言——这也揭示了公元前4世纪宗教信仰的整体倾向。尽管心里很清楚祭司们的小算盘，但在一番犹豫之后还是决定不冒风险。

当大部队进入巴比伦时，亚历山大及其贴身随从还在城外扎营，保持安全距离。像阿纳克萨科斯这样的怀疑派哲学家对国王表现出来的迷信思想深感震惊，他很快就说服了国王变得更理性，于是亚历山大决定无视迦勒底祭司的警告。不过即使现在，他仍旧试图（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在河流西面的沼泽和湿地中找到一条进入巴比伦的路。亚历山大入城时遇到了一些可怕的朕兆，于是他对希腊哲学家的评价低到了极点。

不过，其他分心的事情使他的注意力从命运的狡计中转移开了。每天都有来自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使节到来，特别是（当亚历山大的西征计划公之于众时，我们可以预期到）来自西西里、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迦太基的。有些是来寻找可资利用的盟友，有些是来为自己的政府反驳各种指责和控诉，但所有人都满怀希望地带了官方贡赋和用来表示致敬的金冠或花环。最后因为来人太多，亚历山大不得不明确且严格地规定觐见的优先顺序，而且这一次序值得玩味。宗教事务优先处理，献礼其次，然后是有争端要裁决的，或者是相对次要的内政问题。列在最后的（大概也是最普遍的），是“那些想要为拒绝接收流亡者而陈情的人”（Diod. 17.113.3）。

奇怪的是，阿拉伯竟没有派代表到巴比伦：亚历山大宣称，他因此要征讨阿拉伯。即便阿里安也觉得这个理由过于牵强，他很快评论道，真正的动机其实是“亚历山大永不满足的拓展领土的欲望”（Arrian 7.19.6）。派出去勘察阿拉伯海岸线的船队回来了，他们生动地报告了该地区的大小和繁荣程度，还说那里香料植物醉人的香气从陆地一直吹到海

边，岛屿和抛锚点的位置十分便利。腓尼基桨帆船被分解成块，由役畜通过陆路运送，到了幼发拉底河再重新组装起来。在巴比伦挖了一个新的大型港域，据说大得足以容纳一千条船。有人告诉亚历山大，阿拉伯人只崇拜两个神，乌拉诺斯和狄奥尼索斯。听到此事，亚历山大说他有资格成为他们那多少有点局促的万神殿里的第三位神，因为“他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狄奥尼索斯”（Arrian 7.20.1）。^{79⑩}

当海军的准备工作进行之时，亚历山大却忙于为赫淮斯提翁举办葬礼。这项虔诚的工作一结束，他立马又离开了巴比伦。他和朋友们一起登上由小船组成的舰队，顺流而下去视察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沼泽地区，检查工作包括河流的沟渠、堤坝和泄洪闸。他一直以来都对灌溉问题很感兴趣，在离开希腊之前曾专门抽出时间统筹科派斯湖的局部抽排工作。他还想检查一下他的阿拉伯舰队的航行装备，舰队里有两艘巨大的腓尼基五层桨战舰。

通过进入巴比伦并在灾难降临之前很快再次离开，国王觉得他已经否证了迦勒底祭司的预言。但是，随着船队深入那片恶臭无比、杂草丛生且疟疾肆虐的沼泽地，一个突发事件引起了他与占卜师们的极大不安。当他坐在船头时，一阵大风吹落了他所戴的太阳帽，包括帽子带着的御用的蓝白绶带。绶带飞走了，挂在一座古代王陵边上的芦苇上：据说所有的亚述国王死后都葬在这片沼泽里。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不祥的凶兆。但是，游过去把太阳帽拾回来的水手怕把它弄湿，不经意地把它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糟了。亚历山大赐给1塔兰特作为对他好意的奖赏，接着因为他的大不敬而将他一顿好打。某些版本还说，他听从预言竟把那个可怜的人斩首，因为“该预言警告他不要让戴过王冠的头颅安然无恙”。⁸⁰

当国王回到巴比伦时，佩乌凯斯塔斯正在那儿等着他，他从波斯带了20000人的伊朗军队过来。菲罗克塞诺斯也到了，统率着一支卡里亚部队。米南德也到了，他是从吕底亚过来的。入侵阿拉伯的军队开始成

形。亚历山大现在进一步推行他的融合政策。他重新整编了方阵步兵兵团，以四个马其顿人——作为班长和队长——带十二个波斯人。马其顿人仍旧装备萨里萨长枪，而波斯人则配备弓箭或标枪。或许幸运的是，这支非比寻常的混合军队从未被用于实战：要使它具有哪怕最微弱的战斗力，那也必定需要最严格的训练和纪律（更不要说交流时的语言问题了）。另一方面，这样的军队无疑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现抗命问题。

有一天，亚历山大组织士兵们重新整编为新部队，中间他离开阅兵场主席台一会儿，在侍从的陪同下去喝几杯。当他不在时，有个潜逃在外的巴比伦囚犯爬上主席台，戴上国王的御用披风和王冠，并坐到王位上去。当别人对他严刑拷打，审问他动机何在时，他只说是神教他这么做。亚历山大怀疑这是民族主义者的某种阴谋；这事也非常蹊跷，非常像巴比伦的阿基图（新年）庆典上的假国王仪式^⑪，而当时正是巴比伦新年，所以他也许是对的。⁸¹不管怎样，古代史家都一致记述了亚历山大死前的许多不祥朕兆。这些现象虽然一般不大受重视，但是它们理应得到更多的仔细考虑。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事后的宣传，是在事情发生后编造出来的。但是，在这里这些事情同样可能是在事前就已经被编造出来的，是那些最希望亚历山大死的人编造出来的。这些事情无疑暗示说国王的死是由于神意或自然原因，而不是因为人力。最好的预言家（不妨改编一下欧里庇得斯的话）是那种能预先知道所要发生之事的人。

现在有更多的代表团到达巴比伦，这回是来自希腊的，他们的代表在亚历山大面前表现得“好像他们来此是为了敬拜神明”（Arrian 7.23.2）：从国王的角度看当然是这样，而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就像在尤维纳利斯（Juvenal）^⑫的时代一样——也赶忙配合国王的异想天开。“你命他上天，他就上天。”^⑬阿里安又以一种讽刺的后视之明说道：“他的目的还远不止如此。”与这些使团一同前来的还有卡山德，他为乃父之事向亚历山大陈情，同时很可能（如果亚历山大的头脑毫无理智，

或者表现出精神不稳定的危险迹象）还会与佩狄卡斯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串通，准备将国王除掉。⁸²

安提帕特之子在巴比伦最初的表现不能再糟糕了，因为当他看见波斯人对国王行匍匐礼时竟神经质般地大笑。亚历山大见此勃然大怒，双手抓着卡山德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墙上砸。稍后，当卡山德试图反驳对他父亲的各种指控时，国王说他是在做哲学式的胡搅蛮缠，还威胁说如果那些指控被证实了的话，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这么做，大概就等于给自己签了份处决令。亚历山大那位年轻的陈情人几乎吓傻了。多年以后，当卡山德自己也成为马其顿国王时，哪怕只是看见亚历山大的肖像，他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和战栗，而且到巴比伦觐见所引起的憎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那一天。⁸³

舰队的训练正全面展开，三层桨战船和五层桨战船在河流中来回比赛，优胜的水手将获得金冠。但是，亚历山大尽管想要发动新的征战，却一直非常倦怠，而且他酗酒无度，使得希腊医生非常担忧。有一次，他坦承他“完全不知道今后的人生应该干些什么”（*Plut. Moral.* 207D 8）。对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本人也是帝国创建者）曾有过评论，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共鸣。他说他感到非常震惊，“亚历山大竟然没有觉得，让他赢得的帝国井井有条，要比赢得这个帝国本身更艰巨。”但是对亚历山大来说，征服和*areté*就是一切。枯燥但必不可少的日常行政管理对他毫无吸引力。他在东方所留下的混乱，甚至内战的威胁都也不能让他从阿拉伯的诱惑上分心。⁸⁴

然而，这回梦想却无法实现。5月29日晚上，⁸⁵亚历山大为海军司令涅阿尔科斯举行宴会，喝得酩酊大醉是少不了的。过后国王想要去睡觉——这有点反常，加上近来的倦怠，这些都暗示着（无论什么原因）他这一两周以来一直觉得身体有点不适。然而，他的塞利萨朋友美狄奥斯（*Medius*）⁸⁶正在举行午夜聚会，劝说他也一块来参加。那些持下毒论的史家认为美狄奥斯也是同谋之一。⁸⁷在又一番狂饮之后——这是在

纪念赫拉克勒斯之死——国王接过一大杯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一饮而尽，接着立即“发出一声大声的尖叫，好似受到沉重的一击”。⁸⁸于是他立即被抬回到自己住所的床上。

翌日，亚历山大发了高烧。尽管如此，他依然可以起床、沐浴和午休，接着又和美狄奥斯饮酒进餐。当晚，他高烧非常严重，以致为了退烧不得不睡在浴池里。次日早晨（5月31日）他回到卧室，玩了一天的骰子。6月1日晚上，他又睡到了浴池里，第二天早上他就在这里与涅阿尔科斯及其他高级将领商讨计划中的阿拉伯航程。这时他正发着持续不断且日益严重的高烧。6月3日晚上，他已经明显病得很重了。尽管如此，他第二天早上还是起来做了日常的献祭，并给将领们做了简要的指示。6月5日，他终于不得不承认病情的严重性，命令所有高级将领守在床边听候召唤。

到了6月6日晚上，他几乎无法开口说话，于是他把戒指交给佩狄卡斯，让他担任高级元帅，这样日常行政工作可以继续有效运转下去。听到这事，军营里开始盛传他实际上已经死了。马其顿士兵聚集在宫殿周围，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进去见他就要破门而入。最后，他的卧室墙敲出了第二道门，老兵们排成一个看不到头的队伍，依次进来与他道别。有时他会痛苦地稍微抬起头来，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转一转眼睛以示招呼 and 相识。

6月9日和10日相接的晚上，一群军官在附近的“萨拉匹斯”神庙（可能就是马尔杜克神庙）为他守夜。但是当他们问神灵把亚历山大弄到圣所里有没有用时，神谕回答说让他待在他所在的地方会更好。听到此事，国王的朋友们聚在他床边，询问他要把王位传给谁——毕竟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亚历山大用微弱的声音说：“传给最强者。”他最后且非常具有预言色彩的话是：“我预见到了自己的盛大的葬礼赛会。”公元前323年6月10日清晨，他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国王有一位侍友是安菲波利斯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Am

phipolis），此人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在巴比伦和埃克巴塔那服役，他曾讲过一个极为详尽的故事。国王从印度回来后，阿波罗多洛斯就被随后发生的对高级将领的无情清算吓坏了，害怕自己也可能被清算掉。于是，他就个人的前程询问他的兄弟、著名的占卜师佩塔戈拉斯（Peithagoras），还说他尤为害怕的是亚历山大和赫淮斯提翁。佩塔戈拉斯回信告诉他不用担心，因为在他的人生之路上这两人很快就会被清除掉。常识告诉我们，无论这位占卜师根据献祭用的没有肝叶的肝脏说了什么（这是他解释自己的先见之明的方式），真相其实是他得到了某种内部消息，或许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也被人怂恿去编造一些相关的预言。在阿波罗多洛斯得到佩塔戈拉斯的秘密消息后一两天，赫淮斯提翁就死了，他的死亡方式跟亚历山大的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大醉之后出现怪异的高烧。

古代史家们都记载一种传统说法，即亚历山大事实上是被毒死的：亚里士多德准备了毒药，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把它带到巴比伦，国王的斟酒人、安提帕特的另一儿子伊奥拉奥斯（Iolaus）把它放进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中，然后让国王喝下去。⁸⁹直到最近，这种传统说法一直被斥为荒谬的宣传。很明显，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同样明显的是，当克拉特洛斯、安提帕特和佩狄卡斯等几位元帅后来闹翻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诋毁对方：最近有人颇有说服力地提出，这种传统说法反映了佩狄卡斯抹黑安提帕特的企图。⁹⁰但我们不能就此推论出谋杀一事并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可能是一场有众多同谋者参与、执行得非常漂亮的政变。

巴迪安正确地说道，下毒的控告“如果是真的，那一定会遭到否认或无视，如果是假的，那一定会被反复申说。”⁹¹但我们至少应承认此事有很强的可能性；尽管把责任全部归于安提帕特听起来有点像事后的宣传，但别的不说，单从谁受益的原则来看这事本身仍然是有可能的。毕竟安提帕特被解职而且被召到巴比伦。而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已经被处决，他自己也可能有生命危险。两人都被他们眼中的国王的东方化的奢华

震惊到了，更不用说他自命为神的举动了。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制的、不可捉摸的暴君；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写道（*Pol.* 12 95a）：“没有一个自由人愿意忍受这样的统治。”

新近的传记作家 R. D. 米尔恩斯（R. D. Milns）也指出，⁹²亚历山大最后的症状，特别是疲乏和高烧，与马钱子碱慢性中毒很相符。马钱子碱很容易提取，而且可以保存在骡子蹄中或其他不那么奇异的容器中很长时间（某些古代史家说是前者）。亚里士多德的朋友特奥弗拉斯托斯描述过它的用法和剂量，⁹³而且特别指出掩盖它的苦味的最好办法是把它掺在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中。有许多旁证（和一些直接的证言）暗示我们，无论亚历山大还是赫淮斯提翁都不是死于自然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真相可能是两人是被由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人集团干掉的（参与者当中重要的有克拉特洛斯、佩狄卡斯和安提帕特），这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做得干净利落”。⁹⁴

如果国王不是被毒死的，那么很可能是死于急性胸膜炎，或者别的，比如更可能的疟疾（可能是在那次沼泽之行中感染的）。不管是哪一种，加上重度的酗酒和他在印度所受的重伤，最终使他那钢铁般的抵抗力降低到了他再也无望存活的程度。无论围绕他最后时日的真相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未被广泛注意到），即那时候为亚历山大的过世而哀悼的男人很少，女人则更少。在希腊和在亚洲一样，终其一生及其死后的几个世纪，他一直被当作暴虐的侵略者、外来的独裁者，只会用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头上。当他死在巴比伦的消息传到雅典时，演说家德玛德斯鲜明体现了公众的反应。“亚历山大死了？”他大声喊道，“不可能。要是那样整个大地就会散发出他尸体的臭味。”⁹⁵

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亚历山大一路劫掠、屠杀且征服了25 000英里。他所获得的持久性价值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在近东地区的开创性活动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昙花一现的特质。他前脚刚走，身后的叛乱就此起彼伏；他一死，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

其缔造的帝国立刻四分五裂，陷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而之后的40年更是见证了几位尚存的元帅之间野蛮而血腥的争斗。在这些“葬礼竞技会”的早期阶段（公元前310年），卡山德杀死了罗克珊娜及其13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国王的直系血脉就此断绝。

亚历山大生前一直渴望神化，但很讽刺的是，他死后却被神话化了。他的遗体在尚完好时被托勒密顺利地劫持到亚历山大里亚，放在玻璃棺材里供人瞻仰，并成为当地防腐技术的明证；与此同时，他的传奇故事开始生根、繁荣。阿里斯托布罗斯尚且可以就最近发生、人所共知的事情进行纯粹的虚构，并当着当事人的面公开朗诵，那么一旦人们不再担心亚历山大会把他们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扔进河里，也不再担心他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待他们，有什么是传奇作家们不敢写的呢？⁹⁶亚历山大一死，他的性格、声望和征战生涯就立即被无数的宣传人员、自立为王的君主、历史学家和许许多多别有用心利益相关者拿去做文章。

在希腊化时代他并不受欢迎（不过在艺术领域他的肖像——特别是吕西波斯所画的——却开启了一次广泛流行的肖像画风潮，同时各国统治者很喜欢把他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作为一种政治认同），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存跟他相关的主要史料都是在他死亡近三百年后写就的。等到又有人开始征服世界时，亦即奥古斯都的时代，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一起，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巨人、一个半神、一个超乎凡人的传奇人物，在中世纪时他被刻画成带双角的伊斯坎德尔（这种类型源自表现他头戴宙斯·阿蒙神的公羊角的钱币头像）。

对这一进程助力最多的是所谓的“亚历山大传奇”。或许在公元2世纪，又或许更早些时候——某些细节内容表明，传奇出现的时间就在国王死后不久⁹⁷——有位托名卡利斯特涅斯的佚名作家，就亚历山大的征战生涯写了一部耸人听闻、半神话半现实的作品，此书一出，其他更加严肃的版本尽废。它迅速火遍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甚至传到了东方。譬如在这部著作中，亚历山大据说是埃及法老涅克塔尼布变成巫师的模式

样与奥林匹娅斯交媾生下的。到了公元5世纪这个奇异的大杂烩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版本开始流传。阿拉伯和波斯诗人也利用这部著作，结果是德干高原的塞坎得拉巴等城市还保留着亚历山大的名字，尽管他从来没有去那些地方。

有一个事实让人不舒服，即亚历山大传奇偶尔也包含着明显真实但在别处看不到的材料，而反过来，所谓更可靠的来源却经常充斥着偏见、宣传话语、修辞诡辩或显而易见的歪曲和隐瞒证据。阿里安主要依据的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著作，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他们也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两个人都有很强的动机保存各有偏袒的版本。目前还没有人对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所依据的折衷版本做过令人满意的分析。⁹⁸ 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尽管有许多烦人的修辞学式的夸张，但也包含了别处不可见的珍贵史料，不可一概将其斥为克雷塔科斯（Cleitararchus）或“漫步学派”所恶意捏造的东西，就像塔恩想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⁹⁹

实际情况是，关于亚历山大从来就没有“好”或“坏”的史料传统，只有受到不同程度掺杂的*testimonia*（证引），永远都需要我们利用可能性这种外部标准进行甄别。无论是现存的完整记载还是其中所引用的早期的支离破碎的证据，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对于前者尤甚。在校勘学中，豪斯曼（A. E. Housman）曾批评这样的倾向，即“当前盛行的方式，依靠单一抄本的方式，寄希望于此，指望老天这个抄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而这种批评原则上也适用于亚历山大研究，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直到最近都是以那样的方式来对待阿里安的著作的。博尔扎曾敏锐地注意到，¹⁰⁰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形成了刻板印象，进而“以证据是否与他们的人物描述相一致为依据来选择接受或拒绝”。

这种循环论证也使得他们的判断严重受到当时风尚和偏见的左右，从结果上来看，亚历山大研究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解释者的情感与理智参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把他当作他们的私人真理、他们的梦想

和抱负、恐惧和权力幻想的一种投射。每个国家、每个世代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每个传记作家，包括我自己，都不可避免会把个人、自身的背景和信念融入到这个多变的形象中，其中的自我形象几乎和从史料中抽离出的历史真相一样多。亚历山大性格的力量和魅力是无可否认的，它们对现代学者的影响就如当年对马其顿老兵的影响一样强烈。国王的个性如此之强，如此迥然不群，任何的宣传手段无法掩盖，不论正面抑或负面：诋毁者有之，颂扬者有之，追星式神化者亦有之。

通过仔细分析，有时确实可以从宣传和传奇中找出一些真相。^⑭但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因为每位学者不可避免会根据自身社会、伦理或政治的无意识的预设来选择和设立标准。就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每个人所受的道德规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大多数人——特别是历史学家——所意识到的更大得多。而时代的风尚起到的作用也很大。对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来说，亚历山大就是当时盛行的世界征服者的原型；他们把他唤作“大帝”，这没有丝毫自卑之意，因为他们元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延续性上。在稍后写作的尤维纳利斯的年代里，帝国夸耀已经成为了某种老生常谈的东西，他把亚历山大视作人类虚荣心最突出的例子。¹⁰¹

在中世纪，欣赏尤维纳利斯对财富和野心的辛辣讽刺的人们对该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个征服了一切的亚历山大在哪里？”利德盖特^⑮这样问道；许多诗人也效仿这种修辞学式的质问。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亚历山大又反转成了一种奥古斯都式的形象。正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流行所表明的那样，伟大统帅的形象又一次占了上风。当时所盛行的风气可以用马洛^⑯的令人神往的诗句加以概括：

做一个国王并胜利地走进波斯波利斯，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事吗？

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早期而无人挑战。预示着亚历山大的名声将要发生变化的事件，无疑是紧随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希腊独立战争。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倾向迅速转而反对帝国主义；当时的风气是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为自由而斗争，亚历山大的征战生涯自然与之格格不入，除非彻底地重新审视相关的史料（如果不说是进行诡辩的话）。

这种倾向在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著名的——至今依旧非常可读——《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中达到了理论上的顶点，此人是一位职业银行家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当时这两个属性还没有后来那样显得那么不兼容。在格罗特的心中，公元前4世纪的英雄是德摩斯提尼，在他看来，德摩斯提尼在面对恬不知耻且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侵略时代表了真正的独立精神。他把腓力和亚历山大贬斥为只为追逐权力、财富和领土扩张的残酷无情的冒险者，激发他们的只是纯粹的征服欲。更早时候的历史学家当然也说到这里，但是他们没有格罗特那样的道德批判。

不过，热忱的自由主义并非19世纪学术界的普遍特征。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各有不同，有的会更加独裁一些，因而亚历山大的声名也同样多种多样。亚历山大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所写的传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sse*, 1833年），此书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人们常说，这是关于亚历山大的第一部现代史学著作，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德罗伊森无疑是第一个在审视史料时运用严格批判方法的学者，因而便有了这部奠基之作。不过，德罗伊森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也支配着他对亚历山大的看法。¹⁰²他绝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热情拥护在强大的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并且在1848年之后曾短暂做过普鲁士议会议员。

因而亚历山大的这位传记作家坚定信赖君主制，热烈地投身于普鲁士民族主义；完全可以想见，他人生的一个方面会如何影响到另一面。

对于希腊蕞尔小邦们的独立愿望（可与当时德意志诸侯相比拟），他不屑一顾。在他看来，马其顿的腓力才是希腊的真正领袖，此人注定要统一这一地区，并推动它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而亚历山大则通过在当时已知（和广大未知）世界传播希腊文化的福音，把这一进程又推进了一步。普鲁塔克早期关于亚历山大的文章也提过相同的观点，他把原始的野蛮人和幸运的少数种族做了对比，前者没能从国王的教化关怀中获益，后者则因与国王相遇而收获了希腊与东方的混合文化，德罗伊森有所误导地称之为希腊主义。

正如当代有位学者所说，¹⁰³“德罗伊森所提出的概念非常有力，它们实际影响了后来关于这一主题整个学术史。”无论他们对其成就的本质有何看法，后来多数的传记作家都倾向于把亚历山大看作某种形式的伟大的世界推动者。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世纪后期毕竟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那些在业余时间读吉卜林^⑪的小说读得热泪盈眶的学者，不大可能会去反驳德罗伊森关于亚历山大的观点。但这也是英国绅士精神的全盛期，这个迷人的传奇人物的许多特质也开始成为他们形象中的一部分——例如亚历山大对性方面缺乏兴趣，对女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他对更广泛更梦幻的帝国荣耀所抱有的理想和抱负。

这一趋势的顶峰当然就是威廉·塔恩爵士（Sir William Tarn）所写的传记，这部传记不仅著名，而且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在《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926年）中首次发表，1948年再版时，叙述框架基本没变，但增加了一大卷对许多重要话题的深入研究。塔恩对亚历山大的基本描述与德罗伊森的相仿，但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社会哲学，关于亚历山大信仰博爱的观念。他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塔恩他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有一个道德困境要解决，在他开始写作时，帝国扩张主义在进步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成了不可容忍之物，除非其中有某种理想主义式或传教式的信条作支撑。因此，塔恩无法

将亚历山大看作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征服者，同时还毫无保留地赞同他。他必须为这位帝国的冒险者找到某种值得追求的隐秘目标，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很巧的是，他的解决策略就在眼前。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国联的辉煌时期，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塔恩——连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以及其他许多人——立即为国际理想主义浪潮所席卷。和德罗伊森的情况一样（不过结果有所不同），塔恩个人的政治信仰强烈影响了他后来对亚历山大的处理。国联当时正在宣扬博爱理念。塔恩在欧庇斯的宴会上费了不少心思，他把宴会与某种不怎么可靠的原始斯多亚主义相关联，又添加一点普鲁塔克早期的可疑的修辞话语，然后逐步发展出了国联版的亚历山大。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批评塔恩犯有政治幼稚病，这自然是一部巨著中最显著且最为有害的缺陷，虽然这部巨著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判都不失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在这种背景中有两个重要的点我们应当记住。第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事实证明他的版本深受欢迎。不管是真是假，这就是大多数人乐意相信的，所以他们相信塔恩，尽管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已经用很多论据将塔恩的中心论点批判得千疮百孔了。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塔恩是在一个世纪的和平和富足之末度过他的成长岁月的，那时候所享有的金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是自安东尼治下的罗马帝国时期以来世界少有的。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把这个时代看作植根于18世纪的理性进程的顶点，如今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不用说，这种意识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

塔恩和其他相似之人认为，情感和非理性之恶已经被永远地束缚和抑制住了。他们相信人类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性根本上是善的。过去60年的残酷事实已经教育我们，唉，人类的一生依旧和修昔底德或托

马斯·霍布斯所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卑鄙、野蛮且短暂。维多利亚时代思考问题时的乐观理想主义特质与人类的总体历史并没有太大关联。等快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塔恩隐隐约约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剑桥古代史》研究的最后一段，是为博爱这一永恒理念的不灭性而做的热情辩护。然而在1948年版中，他附加了这么一条脚注：“本段的最后部分是1926年写就的，我保留原样不作改动。自那时以来，我们见证了许多新异而丑恶的事物的诞生，我们仍在走向一个我们从未意识到的世界，而我不知道该怎样来重写本段。”

在此我们听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心声，一个理想主义灵魂在衰朽无力时所发出的绝望的呼声。在这些繁杂的抽象概念背后，那些未曾倒下而只是睡着了的幽灵仍在悄悄地游荡着：譬如像毒气室和氢弹这样的可怕之物，充斥着双重思想和无情的权力政治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中的世界，这些事物修昔底德和亚历山大以及奥古斯都都可以透彻地理解，而在20世纪初的西欧或美国却根本无法想象。塔恩在道德的心理学方面也持有极为天真的态度：在他眼里，谋杀是错的，乱交是错的，同性恋尤其是错的，没有理由的纯粹侵略行为是错的。亚历山大作为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英雄，必须尽可能地免于这些罪责。从这一公理出发很容易推论出，那些表现亚历山大良好道德形象的传统说法是可靠的，而不利的证据则肯定是虚假的宣传，可以很有把握地被摒弃掉。

简而言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崛起，加上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工具回归，致使塔恩的方法原则上几乎完全失败了，只有他在细节方面的成就（比如亚历山大在东方所建立的城镇）依然突出，因为在这些方面道德的考虑并不适用。对于一个生活于20世纪中间几十年的人来说，不可能不把其中的教训运用到亚历山大的生涯之中，毕竟他在许多方面与其他自命的世界征服者极为相似，他们都把宣传作为一种有意利用的工具，都相信真理是可以为了自身目的而加以操纵的商品。

那些读过罗纳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的经典之作《罗马革

命》（*The Roman Revolution*）的人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关于奥古斯都的形象早已被这场重创人类的现代经历改得面目全非了。很难想象，旧有的对亚历山大的美好印象还能一如既往。对战后的历史学家来说，国王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世界征服者，他的征服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是一个空想的自大狂为满足他那强烈的自我的无尽欲望而进行的。¹⁸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心理学元素近年来也渗透到亚历山大人格研究中，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分析者指出，他对性的厌恶，同性恋的传闻——特别是他与相当愚钝的赫淮斯提翁和邪恶但年轻俊美的宦官巴戈亚斯的终身友情——加上他对中年或年长妇女的偏爱，以及早年他可怕的女家长式的母亲奥林匹娅斯对他的全面掌控，这些都提示我们，他的本性中有着某种接近俄狄浦斯情结的东西。

不用说，和前人一样，这一代人也无法避免自身的先入之见的影响；或许我们又在把自身在生活和社会中所恐惧、所欲求和所深切关心之事，融入了对亚历山大的多变人格的解读中。正如我先前提示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亚历山大动机的解读很容易走过头；看起来阿德勒心理学学派的权力情结理论与事实更加相符。在我看来，这种新方法真正的优点是它根本上的实用主义：至少它不会从一开始就用先入为主的道德理论来看待历史事实，而这种道德理论往往基于对人物的武断评价。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形象很难让理想主义者高兴，但它却具有许多政治的和历史的意义。揭掉层层的神话迷雾，尽可能从现存史料中发掘出历史上活生生的亚历山大，这是当代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而我也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做一下尝试。

对我来说，就根本层面上，亚历山大真正的天才在于统兵作战，他或许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最无与伦比的统帅。¹⁰⁴他在速度、临场应变和战术灵活方面的天资，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心理素质，使自己从绝境中脱身的能力，对地形的掌握，对敌人意图的心理洞察能力，所有这些品质使他得以跻身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统帅的前列。伟大统帅的神话如今日渐

褪色，对他们的成就的钦佩也在慢慢地衰减：在这点上，我们也是这个时代和自身道德规范的牺牲品。若从政治而非军事的眼光来看，亚历山大的一生有一种熟悉的可怕意味。对此我们无权去掩饰它。

腓力之子是被当作国王和战士来培养的。他的任务、他短暂但多彩的一生中最为执着的便是战争和征服。掩饰这种核心的真相，辩称他梦想着在鲜血和暴力中奋战、通过劫掠一片大陆来实现博爱理念，这是徒劳无益的。他耗尽一生，用传奇般的胜利来追求个人的荣耀、阿基琉斯式的*kleos*（美名）；并且直到近来，这一直被当作完全值得称赞的目标。他所建立的帝国在他逝世的那一刻轰然倒塌，他作为征服者而来，而他所做的工作却是毁灭。不过，他的传奇依旧在流传，他仍能在其他人心中激发信念，这便证明了他的不朽。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仍然比他所有功业之和还要伟大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不论对今人还是对后人来说，他依然还是个不解之谜。亚历山大的伟大令一切评价都黯然失色。他象征了人类天性中一个活跃而永恒的原型元素：永远执着追逐世界尽头，可以用丁尼生^{①⑨}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最后一句诗行生动地加以概括：“去斗争，去寻找，去发现，不要屈服。”

① 对标题的含义有多种推测，但均不可靠。

② 这里的注释11实际应为注释10。

③ 出自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卷六十三章，英译本为“my lord”，但希腊语原文直呼其名，译文据此做了改动。这位波奥提亚人接着引了一句诗，意为“苦难也是做事者的宿命”。

④ 即旁遮普，Panjab 字面意思意为“五河之地”，以其境内五条主要河流得名。

⑤ 可以想见，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医药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托勒密被毒箭射中时，国王用一种现代命名为蛇根木（*Rauvolfia serpentina*，原文为 *Rauwolfia serpentina*，可能有误——译者注）的植物治好了他，“现代第一种镇定剂，但在印度用于治疗蛇咬已有数千年”（Snyder, pp. 163-4, with note）。古代史家在这

件小事上的详细记载证明了托勒密回忆录的广泛影响，因为相关记载无疑是从他那里而来的。——原注

- ⑥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清楚地看出，当舰队到达霍尔木兹时，水手们状况良好，而军队却因为一度和海上补给站失去联系，由于饥饿而不得不吃掉随军的役畜。——原注
- ⑦ 至少涅阿尔科斯是这么说。我们将会看到，当他后来为格德罗西亚大难自辩时，这位野心勃勃的克里特人完全有可能出于个人原因而伪造记录。特别是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舰队和军队没有在约定地点会合，而且还要为自己没能为亚历山大提供补给做自我辩护。第一条他可以推说是因为季风的多变，而第二条他只好说亚历山大实际上有补给，而且还有剩余：如果他为舰队留了十天的口粮，那舰队司令又如何能为军队的粮食短缺负责呢？——原注
- ⑧ 陵墓被盗一事出自阿里安（Arrian 6.29）。库尔提乌斯的记载有所不同，他说亚历山大自己下令打开陵墓的，发现随葬品很简陋并表示了惊奇。
- ⑨ 普鲁塔克的记载（*Alex.* 71.4-5, *Moral.* 329A-D）连同*homonoia*和*koinonia*这两个常见的哲学术语的使用，都提示我们阿纳克萨科斯及其助手一直忙着为欧庇斯的和解提供合适的理论依据，因为这次和解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对亚历山大未来方案的实施都极为重要。但国王自己的信念则可从神化法令中一探究竟。也许所有人都是兄弟，但却是在他之下的兄弟——正如普鲁塔克生动暗示的那样（*Alex.* 27.6）。——原注
- ⑩ 促使他继续征战（不仅是阿拉伯，还有意大利）的基本动机是他“想要竞比并超越狄奥尼索斯和赫拉克勒斯远征的范围”：参见 *Plut. Moral.* 326B 和维尔肯（Wilcken）的著作第225—226页。他可能还计划把印度和埃及连接起来。——原注
- ⑪ 其中一个罪犯会穿着国王的服饰，象征性地代替国王受难，并于最后一天被处死。
- ⑫ 1世纪末2世纪初罗马讽刺诗人，作品多讽刺人类的愚蠢。
- ⑬ 出自 Juvenal, *Sat.* III, 78。
- ⑭ 最全面完整的尝试是莱昂内尔·皮尔森（Lionel Pearson）的《亚历山大大帝失传的历史》（*Th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I* [Providence, 1953]）。——原注
- ⑮ 利德盖特（Lydgate, 约1370—约1451），英国诗人和修士，著有《特洛伊书》（*Troy Book*）等诗作，是一位非常高产的诗人。
- ⑯ 马洛（Marlowe, 1564—1593），英国剧作家、诗人和翻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引文出自诗人的剧作《帖木尔大帝（上）》（*Tamburlaine, Part 1*）第二幕第5场。

- ①⑦ 吉卜林 (Kipling, 1865—1936), 英国作家和诗人, 著有《丛林故事》(*The Jungle Book*) 等, 作品带有为帝国主义扩张讴歌的色彩。1907年, 吉卜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①⑧ 以不同方式支持此类观点的学者有巴迪安、博斯沃思、汉密尔顿、米尔恩斯和沙赫尔迈尔 (参见参考文献); 或许还应再增加一下安德烈奥蒂 (Andreotti, *Historia* I [1950], 583 ff.)。——原注
- ①⑨ 丁尼生 (Tennyson, 1809—1892), 英国著名诗人, 曾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

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

格拉尼科斯河战役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不仅是亚历山大在亚洲土地上所打的第一场战役，也是表面上最具戏剧性的战役之一。然而总的来说对此役的记载非常贫乏，而且现存的记述¹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和反常之处，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动机依旧不可解，史料记载的战术部署也从任性到疯狂不等。1964年，戴维斯（E. W. Davis）曾清楚地揭示了史料的内在困难，²他在分析了先前至少四种——塔恩、贝洛赫（Beloch）、富勒和沙赫尔迈尔等人的——解释后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根据现存的信息我们无法知道波斯领导者的想法”。³戴维斯完全没有必要地被他那奇怪的假设⁴束缚住了手脚，他假定波斯军队不是受阿尔西特斯而是受一个委员会指挥——这或许是为了替波斯人不理智的策略开脱，这种策略被古代史家明确记载了下来。同时，他的悲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打这场战役，为什么要在它发生的地方战斗，为什么要像它发生的那样进行战斗”⁵——是任何研究这场难解的战役的学者必须认真面对的。

前两点不会耗费我们太多时间，对于二者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如果不说一致认为的话）。第三点真正存在一些困难。从亚历山大的角度看，立即交战至关重要。在南下之前他必须拿下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更重要的是，他迫切需要现金和补给，而只有一场胜仗才给他带来

这些。他当时已是负债累累。渡海进入亚洲时，亚历山大已欠下70塔兰特（可能代表部队两周的薪水），在外的粮草储备只有不到一个月的量。⁶在狄奥多罗斯笔下“以战略见解而闻名”（διαβεβοημένος ἐπὶ συνέσει στρατηγικῇ）的门农，他准确地断定了亚历山大的困境；因而他提出一个精明的建议，即波斯人应避免战斗，实施焦土政策，并且如果可能就把战争引到希腊。届时亚历山大将因缺乏补给而被迫撤退。⁷由于亚历山大的侵略战略非常明确，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装备可以对沿途的城市进行围城。如果它们没有自愿立即向他投降，他就直接绕过去。⁸

然而，波斯人拒绝了门农的建议，反而选择在格拉尼科斯河建立防线，企图阻止亚历山大东进到达斯居利翁；如果可能，就把马其顿侵略军消灭“在亚洲的门户”（ὥσπερ ἐν πύλαις τῆς Ἀσίας）。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这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完全可以理解。骄傲之心在作祟：阿尔西特斯宣称他不会让他行省中的任何房子被烧毁。阿尔西特斯也不信任公然蔑视波斯步兵的雇佣兵将领门农，而且认为——不论对错——他“蓄意拖延战事是为了（即为了延长）他从国王那里得到的职权”（τριβὰς ἐμποιεῖν ἐκόντα τῷ πολέμῳ τῆς ἐκ βασιλείως τιμῆς ἔνεκα）。⁹

现代学者找到了额外或替代的解释，不过并非全都让人信服。塔恩的解释我稍后处理。沙赫尔迈尔提出，波斯的贵族准则不允许他们不战而退，所以门农的建议原则上是不可接受的。¹⁰尽管伊朗贵族和所有贵族一样都遵从严格的荣誉准则，¹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半个世纪前采取类似的战术对付阿格西劳斯；而正如戴维斯所说，¹²“没有证据表明，波斯人的骑士精神要求在中间这段时间里有显著的提升”。戴维斯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看法，即总督们要应对的不仅有贵族准则，还有大流士；那时亚历山大还只是年轻的马其顿元首、腓力的儿子，并非几年后魅力四射的世界征服者；除非对侵略者采取坚定的立场，否则伊奥尼亚的希腊城邦无疑会真的进行反叛。¹³

然而，一旦做出了进行战斗的决定，那自然要守住格拉尼科斯河防线。这条今天名为科萨巴斯河的河流，发源于伊达山脉，往东北方向注入马尔马拉海，流经一个相对平坦、起伏较缓的地区，周围低山环绕，是波斯骑兵惯常作战的理想地形。到了5月份，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行进时，格拉尼科斯河将会涨水，不过届时在主要的渡河口那里仍然可以涉水而过。这时波斯人从他们的泽莱亚（萨里-凯亚）营地前来，在河流既高又陡的东岸建立阵地。正如富勒指出的，¹⁵“地势较低的南缘也得到了防卫，以防经由湖泊西面迂回而来的敌军，该湖泊现在名为埃德杰湖。”既然波斯人决定奋起战斗，阿尔西特斯及其同僚便为此选择了最好的战斗地形。

但是，有一点一直困扰着该战役的每个研究者，亦即波斯人后来所采取的策略，如果古代史家们的记载可信的话。他们沿着河岸列队，由此构成一个很宽的正面，身后则是一片高地。根据阿里安的记载，他们的步兵放在后头，实际上就失去了作用，而骑兵则置于前列，那里他们又不能冲锋。¹⁶戴维斯不无道理地评论道，¹⁷“每个错误都够糟的了，但两个错误加起来简直无可救药”。波斯人迄今不曾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而这样的举动更使他们看起来蠢得不可理喻。不用塔恩作担保，¹⁸我们也相信这决非防守河岸的恰当方式。维尔肯的评说（“一个显著的战术错误”）¹⁹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这一奇怪失误的典型反应，在战役中这一失误白白浪费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希腊职业雇佣兵，导致后来他们近乎被全歼。

许多人试图解释这样的举动，如果不说辩护的话。正如戴维斯如实指出的，所有人都“试图找出某种合理的解释，看看波斯人在这表面疯狂之举的背后怀有怎样的目的”²⁰，也就是说，他们的逻辑前提是我们的史料当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没有一个具有丝毫的说服力。比方说，塔恩提出波斯统帅们“实际上有一个非常英勇的方案，他们打算通过杀死亚历山大来把战争扼杀在摇篮阶段”。²¹他在其他地方²²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宣称“他们采用这种不同寻常的阵形是为了引诱亚历山大冲锋”。

但是像古代所有指挥官一样，亚历山大势必会亲自统率军队；鉴于他在格拉尼科斯河的位置，他不可能拒绝战斗，哪怕他有这样的念头。波斯人不必采用特殊的阵形——更不用说这种明显自杀式的阵形——来使他发起进攻，或者在他进攻时尽全力杀死他。²³

再说，我们无法想象，把波斯人唯一的一流步兵拉到战线之外，这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杀死国王。在战术问题上一向敏锐的富勒指出，²⁴“如果波斯人的唯一目标是杀死亚历山大，那么最好的方式是用枪阵迎战他的骑兵冲锋；让他自己冲上受死，要是他突破了这一关，就用标枪制服他。”在其他地方，²⁵富勒清楚说明了他们没做的正是本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把希腊雇佣兵部署在河流东岸，让波斯骑兵在两翼，同时也部署在步兵背后，以应对任何能够突破的步兵部队的攻击。”和塔恩一样，富勒也认为他们没能这么做是个事实，同时费力为其寻找解释。

他给出的答案几乎和沙赫尔迈尔的如出一辙，我们可以方便地将二者放在一起处理。这便是军事礼节或中世纪比武大会理论。根据沙赫尔迈尔的看法，这是容克对容克的正式比赛，那里只有骑兵可以参加，双方将遵循骑士的战争规则：在骑士之战中，国王想与对手面对面。但是，步兵和轻装部队事实上也参加了战斗，而并没有什么已知的骑士准则要求波斯采用那样的阵形。那么（我们有理由问）既然不打算派上用场，为什么还要花钱招募几千名希腊雇佣兵呢？富勒的回答是“纵观历史，骑兵一贯轻视步兵，把希腊雇佣兵置于战斗前线等于把荣誉之地拱手相让。军事礼节不允许这样做。”²⁷为了加强论证，他援引了塔伽那伊（公元552年）和克雷西战役。他没有强调的是这些据说被轻视的希腊雇佣兵，在伊索斯和高加美拉的战斗前线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不过这在他随后的叙述中非常明显。²⁸而且显然地，居鲁士在库那克萨部署军队时并没有这些社会疑虑。²⁹事实上，希腊雇佣兵经常在波斯的战术布置中占据荣耀之位，而不受任何假设的骑士优先的要求的妨碍。所以这种理论并不成立。

实际上有且仅有三种可能。1. 波斯指挥官完全不称职。2. 他们也非常厌恶和不信任雇佣兵将领门农，即使花了重金收编他们，也宁愿战役失败而不是让他和他的部队获胜。³⁰3. 我们现存关于战役的叙述包含重大错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虽然原则上并非不可能，但1和2基本上不需要进行细致分析。我们来看看3有什么问题。通过对三种主要史料进行细致对比，第一且最明显的事实是阿里安和普鲁塔克相互吻合得很好（某些例外我稍后会讨论），而狄奥多罗斯则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由此可以推断他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另一个不同的史源写成的：不一定是从前所认为的克雷塔科斯，³¹当然也不是塔恩假设的“雇佣兵作品”，³²不过有可能是出自特洛古斯（Trogus）的著作。³³

阿里安和普鲁塔克都说战斗发生在傍晚，狄奥多罗斯则说是在黎明。³⁴阿里安和普鲁塔克把交战描述成波斯人占据河流较高的东岸以此抵御渡河而来的直接攻击；在狄奥多罗斯那里，亚历山大使全军悄悄渡河，在波斯人采取行动阻止之前就已经列好了战斗队形。³⁵此外还有其他的差异，但这些是最为重要的。³⁶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只有相对而言不多的学者认为狄奥多罗斯的版本更值得认真对待，但其中就有康拉德·莱曼（Konrad Lehmann）、尤利乌斯·贝洛赫（Julius Beloch）、赫尔穆特·贝尔佛（Helmut Berve）以及最近的 R. D. 米尔恩斯（R. D. Milns）。³⁷贝洛赫抱怨要找到“不受阿里安崇拜影响的”的叙述非常困难；³⁸当我们读到戴维斯所说的贝洛赫“不重写整场战役绝不罢休”，³⁹很容易想起贝洛赫的抱怨——不过事实上贝洛赫只是利用了狄奥多罗斯的证据而已。

现在阿里安和普鲁塔克都间接提到了在黎明发起进攻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策略是帕美尼翁在军队最初到达格拉尼科斯河时向亚历山大建议的。那时已是傍晚，波斯人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而格拉尼科斯河河岸又陡、河水又深、水流又急，河流本身就构成了第一道难以克服的险阻（另一头阿尔西特斯军队的实际部署我现在暂时搁置一边）。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发起进攻并暴露在敌人的密集攻击之下，这

引起了腓力旧军官们不小的恐慌。这不是他们的年轻领袖第一次做出危险的错误判断：他征讨克雷托斯和格劳基亚斯的战役差一点就全军覆没。⁴⁰他们很机智地提出，对马其顿人来说戴西奥斯月是不宜作战的月份；亚历山大的回应是在历法中进行了临时置闰，这样现在的月份（至少形式上）便是第二个阿尔特弥西奥斯月。⁴¹

同样按照阿里安和普鲁塔克的说法，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战斗便开始了，在经历最初的奋战后，马其顿人大获全胜。不过，现代很少有学者会反对普鲁塔克的论断，即亚历山大所运用的策略“看起来既疯狂又愚蠢，绝非理智之举”（*ἔδοξε μανικῶς καὶ πρὸς ἀπόνοιαν μᾶλλον ἢ γνώμῃ στρατηγεῖν*）。⁴²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使得此策略没导致全军覆没的一个因素是，另一边波斯人所采用的更加疯狂的策略。这不免引人深思，特别是因为狄奥多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仅非常不同，而且明显更加理智的策略。

毫无疑问，我们得到了另一种情况，其中帕美尼翁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亚历山大在黎明行动，带领全军不受阻拦地渡过格拉尼科斯河——由此可以做出肯定的推论，前一个夜里他远离波斯人的阵地并找到了另一个相对容易的涉水点（暂且假定记载可靠）。往哪个方向呢？韦尔斯（Welles，参见第36页）主张，狄奥多罗斯或者他的资料来源可能“把战斗确定在上游远处的山脚下”。他没有引用证据支持这种观点，总的来说该地区的地形也不利于这种观点。在此波吕埃诺斯（Polyaenus）的证据也值得考虑一下（诚然该证据比较模糊）。据波吕埃诺斯记载，在渡过格拉尼科斯河时，亚历山大 Πέρσας ἐξ ὑπερδεξίων ἐπιόντας (αὐτοὺς) αὐτὸς ἐπὶ δόρυ τοὺς Μακεδόνας ἀναγαγὼν ὑπερεκέρασεν（看到波斯人占据了有利位置，便把马其顿人带到右边）。亦即波斯人正在前进（ἐπιόντας），这在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所描述的交战中是看不到的，而且他们是 ἐξ ὑπερδεξίων 前进。这个短语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上方”或“从更高处”，它的根本含义是“从右方上方”，在许多例证⁴⁴中它指的是“从上游”。然后亚历山大开始从右侧包抄攻击者，这是该战役正统

版本的另一个重要差异：ἐπὶ δόρυ... ὑπερεκέρασεν。不论我们赋予ἐξ ὑπερδεξίων以何种含义，波吕埃诺斯所描述的似乎是与河流成直角而非与之平行的一场战斗，这就提示我们他也是利用了狄奥多罗斯的说法。

这样，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中，波斯人的阵形非但不是那种完全无法解释的怪招，反而非常地合情合理。正是在亚历山大已经渡过河流并部署好军队之后，⁴⁵阿尔西特斯及其同僚才决定迎击马其顿人的攻击，以全体骑兵作正面，步兵作预备队。这种方案跟大流士在高加美拉的战斗次序很相似，其原因也是非常类似的。首先，波斯步兵（或者说任何在人数上处于明显劣势的步兵）“不适合平原上的激战，无论要对付的是重装步兵还是冲锋的骑兵”。⁴⁶其次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骑兵方面波斯要比对手更强大得多，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他们在一流步兵方面的不足。

要计算波斯人在格拉尼科斯河可用的实际军队人数很大程度上只能靠猜测，但这也是最能揭示内情的一种方式。阿里安（1.4.4）说他们有20000名骑兵和20000名步兵，后者只包括雇佣兵。狄奥多罗斯（17.19.5）给出的数据是超过10000名的骑兵，外加100000名步兵。后者的数据本身就不大可能，又跟阿里安在其他地方（1.13.3）的说法相左，因为阿里安提到波斯步兵“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因而即使最高的估计数目也应低于全部马其顿军队的43000人⁴⁷——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负责维护交通路线的。普鲁塔克没有给出任何数据，而查斯丁（11.6.11）则提出其总数高达600000人（原文如此）。

现在我们可以不妨将这些数据跟伤亡数做一下比对。狄奥多罗斯（17.2.1.6）宣称，波斯人损失超过20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普鲁塔克（Alex. 16.7）声称步兵损失20000人，骑兵2500人。阿里安（1.16.2）没有对步兵的损失做过估计，只说除了大约2000人以外希腊雇佣兵全部被歼。狄奥多罗斯还记载说俘虏有20000人——在此背景下这显然是指步兵俘虏。相比之下，根据史料马其顿军队的损失小得令人难以置信。骑兵损

失的最高记录（Justin 11.6.12）是120人；阿里安（1.16.4）的数字是60人，其中包括25名侍友骑兵，而普鲁塔克（Alex. 16.7）则根据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说法，只记载了25名侍友骑兵。根据现有的证据，步兵损失甚至更小：阿里安说有30人，而普鲁塔克和查斯丁则估计不超过9人。考虑到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历史学家或许会对此报以怀疑的微笑。

不过，从这些数据中立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且自相矛盾的事实。在这场交战中，波斯人据说完全依赖骑兵，而他们损失最惨重的却是步兵——或者说我们的史料是这么说的。不过，根据同一史料这些部队除了希腊雇佣兵以外少有抵抗：他们一触即溃，也没有被追击（Plut. Alex.16.6; Arrian 1.16.1-2）。看起来这就解释了10000名死亡人数和20000名俘虏：宣传的第一法则是把故事说圆了。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记载的骑兵损失就目前来看是完全可信的。可能有人要问，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背后隐藏着什么信息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能否找到可以从中推断出波斯军队真实规模的证据。狄奥多罗斯（17.19.4）给出了阿尔西特斯战斗次序的一些信息，当然是关于骑兵的：无论他所利用的资料来源于何处，至少这些资料既能接触到马其顿的记录也有波斯的记录，可能通过缴获的情报文件而得到的（通常假设公元前4世纪有这些东西，但我们只有很少的证据）。⁴⁸ 位于左翼的是门农及其希腊雇佣兵，一般认为这完全是骑兵部队。紧挨着他的是阿萨梅内斯及其奇里乞亚军队；然后是阿尔西特斯，他指挥帕夫拉戈尼亚人；之后则是斯皮特里达特斯以及来自叙尔卡尼亚的东方骑兵。在此，狄奥多罗斯模糊得令人生气：他说处于中间的也是τὸν δὲ μέσον τόπον ἐπεῖχον οἱ τῶν ἄλλων ἐθνῶν ἵππεῖς, πολλοὶ μὲν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ὄντες, ἐπίλεκτοι δὲ ταῖς ἀρεταῖς（其他民族的骑兵分队，他们人数众多，是凭其勇武而精选出来的）。他们的右侧是1000个米底人、2000个巴克特里亚人⁴⁹和2000个由雷奥米特雷斯（Rheomithres）指挥的身份不明的骑兵。

如果这份名录真实可信，我们就可以大致猜出波斯骑兵的规模。共

有七个分队有名可查并有相关的描述；其他“民族部队”至少提供了两个分队甚至更多，可能三个。我们知道两个分队有2000人，有一个是其半数。如果我们取一个（保守的）平均值1500人，就能获得一个大致的总数15000人——这是狄奥多罗斯和阿里安各自估计值的中位数。2000多人或2500人（即14%—16%）的损失人数可能比较符合人们的预期。⁵⁰然而，当我们转回到步兵这边来时，情况就大为不同。首先，毫无疑问阿里安（或托勒密）严重夸大了参战雇佣兵的人数。⁵¹当门农第一次接受大流士的委任时，他只有不到5000名雇佣兵，波吕埃诺斯甚至估计这个数目低至4000人。他所掌控的军队在他得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最高指挥权之前不太可能有明显的增长；而在他死后，大流士便立即召回他所拥有的所有雇佣兵——这表明作为商品，雇佣兵依然非常短缺。⁵³实际上，只有到了公元前333年，亦即当亚历山大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时，波斯大王才开始认真地招募雇佣兵。到伊索斯之战时，他大概已经把雇佣兵人数提升到了30000人，之后他有据可查的雇佣兵总人数达到了50000人。⁵⁴

但是在公元前334年5月，当亚历山大抵达格拉尼科斯河时，在埃及、小亚细亚以及包括东部行省等其他地区，大流士是否拥有总共超过15000人的希腊雇佣兵还很难说。事实上，他提供给门农去对付帕美尼翁的先头部队的人数大概是5000人；在这个阶段，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否认为腓力初出茅庐的儿子已经危险到需要进一步增兵的程度。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屠杀20000名雇佣兵中的18000人，这事本身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至少可以说可能性非常低。对忒拜的洗劫是一次更为全面和不加限制的集体屠杀，而那也仅仅造成三分之一的死亡规模；⁵⁶甚至在阿西纳洛斯河雅典人被屠戮的规模也没有那么大。⁵⁷其次，不管怎么估计，很难相信除了雇佣兵以外部队如此多样的波斯人会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步兵；实际上无论阿里斯托布罗斯还是狄奥多罗斯，他们都没有说情况就是如此。⁵⁸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寻找确实的数据，那几乎是毫无希望的。

阿里安的20000人是唯一有点可信度的估计：我们不应因为托勒密宣称其中只包含雇佣兵就断然将其摒弃。但是，即使是这个数字也显得太大了些。查斯丁的600000人的总体估计值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提示我们该数字很可能是因为文字讹误而非宣传。在某个时期，抄写员可能把希腊文中的 $M^{\wedge}$ (30000) 错看成 $M \times$ (600000)；尽管这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可信的大致数据，但无法据此提出一个可靠的假说来。如果我们接受步兵人数为15000—160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希腊雇佣兵，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接近实际数据的值。

现在让我们回到战役本身上来，就像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记载的那样。亚历山大不顾帕美尼翁的审慎建议以及在马其顿士兵中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以轻蔑的态度坚持马上进攻（Arrian 1.13; Plut. Alex. 16.1-3）。接着根据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说法（16.3），他猛地跳进河中，和他一起的仅有13个骑兵分队。另一方面，托勒密所说的战斗次序与狄奥多罗斯的黎明战斗版本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⁵⁹同时他还强调了波斯人的部署：他们沿河岸摆弄阵势，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基本重复了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大体上可以认定，他们中有一个搞错了战役的时间。按照托勒密的记载，这时战场上出现了片刻的平静，双方都注视着对方同时什么也不做。接着，亚历山大派出侦察队、派奥尼亚部队、一支侍友骑兵分队和一队步兵，并亲自统率整个右翼，以与河流成斜角的方式朝波斯中军前进。这看起来是一个更加谨慎且组织良好的调遣，也更适合通常的陆地战斗。

两位史家在随后发生的事情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其顿先头部队要对付的是波斯骑兵，后者非常勇猛，但是他们这么做没有什么充分理由，他们所做的事情要是交给门农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标枪步兵，效果会好得多（参看 Fuller，在上文）。奇怪的是，来自河流两岸如暴雨般落在马其顿人头上的是标枪（ἀκοντία, βέλη）；据说波斯人一直在ἐσακοντίζοντες（投标枪），而马其顿人则用枪——δόρατα或者ξυστά——抵抗。当亚历山大被击中时，他正在ἀκοντισθεῖς（投掷标枪）。然而我们可能

会注意到，当专门提到波斯骑兵时，明显没有提及他们的武器。和马其顿骑兵一样，他们也使用枪（δόρατα），当枪折断时用剑（ξίφος）。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装备有短弯刀或马刀（κοπίς），这是一种传统的骑兵武器。狄奥多罗斯也提到了σαύνιον（标枪）。⁶¹只有托勒密在这一场景中提到了παλτά（梭标或矛之类的投掷物），⁶²但仍旧无法确定是哪一种矛或标枪，因为它们与骑兵的运用特别相关。

可以想见，第一波进攻损失惨重（这次的失败怎样与马其顿方面极小的伤亡相吻合一直是个谜），击退敌人的部分功劳要特别归于门农。⁶³现在托勒密的版本与阿里斯托布罗斯的之间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差异。当骑兵正在这次短兵相接中进行英勇搏斗时，后者告诉我们，“马其顿方阵渡过了河流，双方的步兵开始交战”（Plut. Alex. 16.6）。但是根据托勒密的说法，波斯步兵（无论雇佣兵还是其他步兵）一直在骑兵后面。他们中哪一个说的是真的呢？（如果阿里斯托布罗斯是对的）这些身配标枪和梭标的幽灵似的步兵是谁，竟能一时（毫无疑问是在门农的命令下）抵挡住亚历山大的骑兵冲锋并随后与方阵步兵战斗：καὶ συνῆγον αἱ πεζαὶ δυνάμεις（步兵也加入了战斗）？⁶⁴在下一个句子中我们读到，他们“没有奋力抵抗，抵抗时间也不久，而是很快就溃散了，除了希腊雇佣兵以外”。这清楚地表明门农的部队不是唯一的为波斯而战的步兵。

托勒密至少前后一致：根据他的版本，亚历山大一直到主要的骑兵战斗获胜后才去对付敌人的步兵——注意，这也是狄奥多罗斯的观点。⁶⁵但是，狄奥多罗斯说得很清楚，他记述的是发生在次日黎明的一场战斗，而且战场环境大为不同：不是渡河而战，而是在对岸的开阔平原上——正如查斯丁所说（11.6.10），是在阿德拉斯泰亚平原上；这是很小的一个点，但并非没有意义。然而，在亚历山大及其军队登上格拉尼科斯河对岸并站稳脚跟之后——就在这个关键点上，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叙述在细节方面短暂地变得模糊不清，这非常引人联想——三种版本趋向了一致。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密特里达特斯和罗萨刻斯之间的

著名决斗；亚历山大在千钧一发之时被黑面的克雷托斯拯救；最后波斯军队溃败，亚历山大获胜。在狄奥多罗斯的版本中，亚历山大被处理得比较粗暴，不太像一个不可战胜的英雄：他竟然一度被打倒在地，斯皮特里达特斯及其王室亲戚从四面赶来攻击他。⁶⁶但是，在此之后三位史家在处理相同的战斗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不妨概括一下在目前探究中出现的几点事实。首先，我们有两种独立的（且表面看来无法调和的）叙述，记载了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打的战役。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有人建议他等到黎明之后而非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发起不可能获胜的正面进攻；他拒绝了这项建议，进攻并最终获得胜利。在另一版本中，他一直等到了黎明。在一个版本中，他渡河进攻，登上了对岸陡峭的堤岸；在另一个版本中，他让部队悄悄地渡河而不被波斯人发现（至少到最后一刻），然后打了一场经典的马其顿式战斗。在一个版本中，双方的策略都很不明智，波斯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另一个版本中，双方的策略都是恰当的，无可非议。在渡河时，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不仅和狄奥多罗斯存在分歧，而且相互间偶尔也有差异，这暗示我们他们可能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即在第一波攻击中门农的步兵可能扮演的角色）。在渡河之后，该战役的有关叙述都可以跟狄奥多罗斯的版本很好地合并在一起，虽然后者表面上描述的是另一种情况。最后，我们得到的是对波斯步兵人数和损失的明显夸大，托勒密的版本甚至暗示说他们全是希腊雇佣兵；与此相对，对马其顿军队的损失的估计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几乎没法将其解释为政治宣传。毕竟宣传是为了让人们相信。

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一切呢？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说，狄奥多罗斯的版本应该得到比它通常所得到的更多的关注。这就马上引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大多数学者断然摒弃这一版本。这一问题的最有启发力的答案就包含在戴维斯对贝洛赫的批评中：⁶⁷

他将阿里安-普鲁塔克的版本直斥为一种单纯的传奇式的刻画，意在以荷马式的英雄观来展现亚历山大。这里他不仅偏好更差而不是更好的来源，而且将格拉尼科斯河一役与亚历山大的整个征战生涯对立起来。他把亚历山大大帝变成了帕美尼翁。为什么当时的情况就一定是亚历山大选择了更谨慎而非更大胆的做法呢？倘若亚历山大只是一个没有个人色彩的出色统帅的话，这也没法解释亚历山大后来的征战生涯或者他死后的历史。亚历山大正是一个荷马式的英雄。

现在不论我们对呆板地信赖“更好”而反对“更差”持何种态度，都得承认戴维斯的中心论点。狄奥多罗斯的叙述确实与我们所熟知的亚历山大的行事风格在所有方面都相冲突。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加考虑地拒斥那种观点呢？恐怕未必。当时的状况可能连亚历山大都得做一次违心之举，甚至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误判。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篡改记录。我认为，我们的问题要更为复杂得多，不仅仅是在两个相异的传统说法之间做抉择。我们所面临的是蓄意、明显且成体系的篡改证据。

所以我们无法像格列佛（Gulliver）那样简单地在大头党和小头党之间做出选择^①，因为（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政治宣传不论何时都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撒谎。政治宣传通常更倾向于保留表面痕迹，然后辅以两个久经时间考验的策略——隐瞒真相和虚假暗示。这种精心歪曲过的半真半假的叙述要比单纯的伪造来得更有效，至少因为要揭露其本质会更加困难。^②如果我们能暂时接受这样的假说，即现有的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主要叙述经过篡改，隐藏了一开始的失败，那么我们不仅对亚历山大的行为，而且对两种存在分歧的*testimonia*（证引）就会有全新的认识，那两种*testimonia*也许就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调和。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官方”版本；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独立

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接受了“官方记录”的某些可疑说法（例如有关波斯步兵损失的说法），但在几个关键点上与之不同。

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二者必定对真相极为清楚）利用了经过篡改的记录，如果我们自问谁最终要为记录的篡改负责，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亚历山大，并且他很可能得到了秘书长欧美涅斯和远征军的官方史家卡利斯特涅斯的帮助。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不仅要找出真相是如何被歪曲的，而且要明白为什么被歪曲。毕竟格拉尼科斯河打赢了，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这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难题。如果亚历山大是以狄奥多罗斯所说的方式获胜的，那他为什么要苦心编造一个完全错误且对他的战略感并无加分的版本呢？⁶⁸如果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说的是真的，那狄奥多罗斯所采纳的极为正常且毫不传奇的版本又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呢？关键是狄奥多罗斯把（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的）实战中的国王塑造成一个不能再荷马式的人物；只有在战斗前，国王的谨慎才引人注目。

在此我们不免会联想起戴维斯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情况就一定 是亚历山大选择了更谨慎而非更大胆的做法呢？”难道就不能是这样，即起初他并没有谨慎行动，而是非常典型地，像他所模仿的荷马式英雄那样行动，并且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由此可以假定在格拉尼科斯河发生过两次战斗，⁶⁹第一次发生在下午，失败了；第二次发生在次日早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种假说不仅可以使我们调和冲突的证据，而且能够为亚历山大后来伪造记录提供最强有力的动机。亚洲征战一开始时的失败——即使稍后马上得到了弥补——会造成最为恶劣的印象，尤其是对小亚细亚还在犹豫不决的希腊城邦。德尔菲宣布亚历山大是ἀνίκητος（不可战胜的），⁷⁰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ἀνίκητος。其中便蕴含着亚历山大超凡个人魅力的最终秘密，即对他不可能失败、他的领导就是胜利的保证的半迷信般的信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⁷¹终其一生，一旦他的意志和雄心受到直接阻

挠，亚历山大的反应往往非常暴烈。他的本能就是摧毁一切阻碍他的人；为了寻找合适和令人满意的复仇机会，他可以等上数年的时间。一旦最终获得胜利，在格拉尼科斯河的挫败，哪怕只是暂时的，也会给所有相关人员带来灾祸。波斯一方最善战且最有经验的部队自然是门农的希腊雇佣兵。亚历山大独独对这支特殊部队持有异常残暴的态度，这是否只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呢？他将他们大规模地屠杀，并且像对待重犯一样给残存者戴上镣铐，送到马其顿去做苦力，那时候按常理他可以用优惠的费用来获得他们非常有价值的服务。再者，这乃是一个孤立的举动，自那以后，不论何时俘虏希腊雇佣兵他都会把他们招募进来。⁷²

他表面上的理由（为托勒密所公开且为大多数现代学者所接受）是，“作为希腊人，他们违背了希腊舆论，竟与东方人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希腊人”（ὅτι παρὰ τὰ κοινῇ δόξαντα τοῖς Ἑλλήσιν Ἕλληνας ὄντες ἐναντία τῇ Ἑλλάδι ὑπὲρ τῶν βαρβάρων ἐμάχοντο）。⁷³换句话说，作为同盟的统帅他正在做一个姿态。但是，希腊舆论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亚历山大才会加以注意的东西，对他来说同盟只是用于遮掩可疑或诡诈行动的遮羞布，其中摧毁忒拜⁷⁴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例。稍微好一点的希腊舆论有利无害，但是这绝不会是亚历山大的首要动机。阿里斯托布罗斯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受愤怒影响甚于理智”（θυμῷ μᾶλλον ἢ λογισμῷ），⁷⁵这听起来更像是真相。他的行为实际上具有各种暴怒的特征，他的愤怒有时连最后的一点自制都能一扫而空，而引起他暴怒的往往是个人的受辱、对他命运的挫败以及对他意志、尊严或荣誉的冒犯。

在这方面，记录的篡改非常发人深思。步兵的人数要比实际情况多得多；在托勒密的叙述中（参见上文），他们也不是纯粹的波斯征召兵，而是清一色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兵。我们已经看出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作为宣传它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希腊雇佣兵所代表的威胁被严重夸大，而战胜他们的荣耀也会相应地增长。不过同时，他们在实际渡河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从官方叙述中删掉了，即便这样做会导致波斯一方的作战方案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双重反应，加之后来亚历山

大对他们的残暴处理，暗示着他们曾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他的计划，使他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故而他决心让此事被人们遗忘。不管怎样，他所遇到的困难被严重地夸张了；如果曾一度失败，他就决心证明原本就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成功。

现在，如果亚历山大事实上直接听从了帕美尼翁的建议，在黎明时渡河并赢得胜利，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编造托勒密叙述的那个冗长的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细节还极为丰富：其中包括马其顿人的恐慌、闰月的置入、帕美尼翁的主张以及渡河过后第一波自杀式的进攻等诸多细节。这些事情真实地发生了，它们就发生在那个傍晚，正如托勒密所说的那样。如果至此我们认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同样大体上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宣传的本质就立马暴露了出来，所有表面无解的差异也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就可以重建事情的真实过程了。

当亚历山大到达格拉尼科斯河时，发现阿尔西特斯已经部署得非常妥当。阿尔西特斯让骑兵沿着河岸列阵，因为这是他手下最强的本土军队；但他们并非孤军作战。在渡河口他安排了门农的让人敬畏的雇佣兵，就像任何称职的将军都会做的那样。波斯人知道自身的防御力量，他们就那样紧挨着坐着，看看亚历山大会不会鲁莽到要发起正面进攻的程度（显然他那冲动的性格早已声名在外）。他们对敌人的判断很准确。亚历山大决定立即渡河，任何将领只要敢提出推迟进攻的计策，就有被视为怯懦的危险，如果不是说叛逆的话。⁷⁶国王年轻气盛，又不计一切代价地迫切需要一场战斗，这是他第二次同时也最后一次让冲动战胜了冷静的战略头脑。帕美尼翁建议，敌人很有希望拔营离开。⁷⁷当然，这正是亚历山大极力要避免的事情，可能也是促使他拒绝副统帅建议的主要因素。

此外，亚历山大的荷马式使命感正召唤他去实现英雄的伟业，就像他的偶像阿基琉斯那样；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面临巨大的不利条件直接渡河作战，更能实现英雄伟业呢？他猛地冲进了河流，同行的还有13个

骑兵分队。或许方阵步兵随后跟上，也可能没有。士兵中一片慌乱；帕美尼翁的建议被弃置一旁；而且几乎每个关键职位，包括翊卫队和侍友骑兵的，都被帕美尼翁的儿子、亲属或者他所提名之人占据着。伯恩问道，⁷⁹如果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和帕美尼翁之间就存在权力斗争，那为什么在格拉尼科斯河时军队不直接把亚历山大“变成乌利亚（Uriah）”^③呢？他还补充说，没什么能比这容易了。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可能做过这种尝试，但就像亚历山大后来的功业所证明的那样，在不被政治斗争所击败这方面，他的天分比他父亲腓力更胜一筹。⁸⁰

亚历山大及其骑兵分队跟门农的雇佣兵血战了一阵子，此时标枪像暴风雨一样落到了他们的头上。⁸¹如果此时有其他马其顿部队，无论步兵还是骑兵，赶过来支援，他们也很难有什么进展。最后，他们被迫承认失败，转身撤回河岸。这便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所极力隐瞒的核心事实。亚历山大和波斯人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以耻辱的失败而告终。更糟的是，事实证明帕美尼翁是对的；而且凭其六十五年的人生经验，他定会及时强调这一事实。不过，虽然亚历山大从未忘记或原谅这次的屈辱，但他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从未丢掉自己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高傲压了下去，当时必须赶紧做点什么。当晚，军队往下游行军，然后涉水渡过格拉尼科斯河。或许亚历山大只是提示了他的将领，如果次日早晨军队在战斗中大显身手，那么这个事情就算到此为止。毕竟，他比谁都希望人们尽快把第一次进攻忘掉。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马其顿军队或许为之前的失败感到耻辱，于是赢得了一场全面的胜利。但是，从亚历山大的角度看事情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些账要算，还有一件事要掩盖。帕美尼翁是不可或缺的，要过几年时间，国王才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得足以与其一决高下；⁸²但那些促使他受到屈辱的雇佣兵却是另一回事。对于他们，他马上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同时声称自己是在执行希腊同盟的判决，以此掩饰个人的动机。他最初的失败也可以为史料中马其顿极小的伤亡数字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每个学者都认同，这些数字作为总体伤亡的估计值非常荒谬。如果关键的战斗是以托勒密所说的直接正面进攻的方式进行的，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亚历山大的损失必定非常惨重，其伤亡规模决不亚于克里米亚战争中轻骑兵所遭受的损失（二者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仅仅当作那13个与亚历山大一同渡河冲锋的骑兵分队所遭受的伤亡，那这些数字就立马变得合情合理了——其中连那9个步兵也得到了解释，他们大概属于先头部队中的“一队步兵”（καὶ τῶν πεζῶν μίαν τάξιν）。⁸³亚历山大在狄昂为在格拉尼科斯河战死的25位侍友立了雕像——这又是另一个独一无二的举动，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是，据说所有人都是“在第一次进攻中”（ἐν τῇ πρώτῃ προσβολῇ）被杀的。⁸⁴纪念且仅纪念这忠心可靠的少数几个人是一种高傲之举，却非常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亚历山大的性格。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了宣传目的而更改这一记录。没有必要篡改关键的战斗，只需转移一下战斗的背景即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抹去的是第一次损失惨重、考虑不周的耻辱的冲锋。因此两次独立的交战便合而为一，关键战斗的场景则从黎明变成了傍晚，从阿德拉斯泰亚平原变成了格拉尼科斯河河岸。卡利斯特涅斯（或者其他负责人）必须赶紧完成这项任务；出现一些未交代清楚的情节、很能说明问题的不一致，以及通过仔细寻找就可发现的刻意缀合也就不足为奇了。门农在防御中的作用被精心抹去了，虽说（正如我们所见）还不够仔细；波斯人的作战方案被原封不动地放到新的情境中，于是看起来有悖常理，甚至愚蠢（这本身就是一种出色的宣传）；而关于国王个人ἀρετή（成就）的事迹则被无限地增加。

亚历山大在世时，无人敢公布真相：有太多的高级将领参与此次的篡改了。确实，在真实的故事里，相关人员也不会获得更多的功劳——或许帕美尼翁除外。这场战役毕竟打赢了，而人类又非常健忘。但是，差异注定会窜入官方的版本之中，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对真相的无意识坚守，除了一些非常敏感的地方以外。最后，狄奥多罗斯的资料来源之一

记录了亚历山大黎明调动的真实情况。这种记录的起源如今只能进行推测；但它出现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中，虽然经过了严重删减，而且查斯丁和波吕埃诺斯对此也有所暗示。⁸⁵如果这种假说是正确的，它就向我们揭示了亚历山大整个征战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亚历山大亲身遭遇过失败，由此也使他更像是一个凡人。

眼下我并不认为这里所提出的假说可以完全合理地解释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我也非常清楚那些反驳这种假说的论证。众所周知，狄奥多罗斯是一个没有批判精神、不大可靠的史家（或者说史料传承者）；他关于伊索斯之战的叙述充满问题，要是没有上文所做的（对我来说）不可回避的反思，我们很难接受他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叙述。坦白地说，正如一位更有说服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也不觉得这种说法是内在合理的，即“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我只是觉得这种情况并不比其他情况更不可能。同样，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但对亚历山大有敌意的史家为什么不立刻拿第一次失败了的进攻大做文章，并尽全力公之于众，就像其他只为更少的人所知、稍后又被亚历山大的宣传人员压制或歪曲了的事情所发生的那样呢？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就像我无法理解假如阿里安说的是真的，那狄奥多罗斯的版本（相比之下更为理智且更合乎常理）又是如何出现的。这个假设带来的问题和其他假说一样多。也许那天下午并没有发生拙劣的进攻，亚历山大未提异议，在黎明时分渡河。甚至有可能（这一点若没有对地形进行实地考察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他一开始就强行渡河成功了，我觉得这至少不大可能。但是，不管哪种情况，我所概括的真正难题仍旧有待解释。（例如，我们无法将狄奥多罗斯关于战役准备的叙述，简单地驳斥为一种其素材出自伊索斯之战的修辞学虚构。亚历山大几乎在他所打的每一场大战中都重复了这种基本的部署：如果说这是一种套路，毋宁说其是战

术性的而非修辞学的。)我只敢说,我的假说所回答的问题要比它所提出来的更多。或许到头来戴维斯是对的,谜团永远都无法解开。

-
- ① 格列佛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的人物,其中的小人国有两党,一党要求吃鸡蛋的时候先磕大头,一党要求先磕小头。
 - ② 当然,这条规则有其例外之处。巴迪安教授提醒我,在西塞罗的作品中(De Orat. 2.241)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中克拉苏(L. Crassus)声称孟米乌斯(Memmius)伤害了对手拉尔古斯(Largus)的手臂。西塞罗说:“你们看这个故事多么机智,多么文雅,与演说家的身份多么相称——要么你讲述一件真实的事情然后用少量的谎言加以润饰,要么你凭空编造一个。”或许相反的原则是,如果要虚构,那就以惊人的尺度进行虚构,以此消除疑虑,例如“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就是完全虚构的。——原注
 - ③ 乌利亚是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人物,他的妻子拔示巴被大卫看上,大卫阴谋让人派遣他到危险的地方去作战,然后故意后退,使他被杀。

注释及引文

（译者说明：按照西方学者的习惯，作者在注释中大量使用缩略语，强行译出反而不便于阅读。因此，除叙述性文字以外，译者基本保留原样。鉴于有些缩略语读者可能较为陌生，这里列出几个注释中频繁出现的，供读者参考：ad loc.=ad locum，该处，至此处；ap.=apud，见于，被引于；cf.=confer，参看，试比较；Contra 相反地，相对地；ext.=extra，额外的，编外的；f., ff.=following, followings，及下页，及以下；ib id.= ibidem，同前，同上；loc. cit.= loco citato，在上述引文中；n., nn.=note, notes，注释；op. cit.= opere citato，前引著作；passim 各处，多处；ref., reff.=reference, references，引文，参考书目；s.v.=sub verbo，在...条目下；ut supr.=ut supra，如上，如上所述。）

第一章

1. See C. F. Edson, *AM*, p. 44.

2. 相关年表参见 Hamilton, *PA*, p. 7。

3. 据说腓力曾担任其兄佩狄卡斯之子阿敏塔斯的摄政，但这种说法只是基于一些可疑的证据（Justin 8.5.9-10），而且近来有一篇文章对此提出了有力的反驳，参见 J. R. Ellis, ‘The Security of the Macedonian Throne under Philip II’, *AM*, pp. 68-75。

4. cf. A. Aymard, 'Le protocole royal grec et son evolution', *REA* 50 (1948), 232-63.

5. See now S. Marinatos, *AM*, pp. 45-52.

6. *Suda* s.v. Κάρανος.

7. 即马其顿的罗伊奥斯月 (Loios) 的第六天; 参看 Hamilton, *PA*, p. 7, and E. J. Bickerman, *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68, p. 20-26, 38-40。不过可以肯定, 腓力早就得到消息了。

8. Plut. *Moral.* 177C 3 (= 105A, 666A).

9. Hdt 3.40-41.

10. Seltman. *GC*² p. 200 with pl. xlvi, nos. 11-14; Head-Hill-Walker, *Guide*, p. 39 with pl. IIIB, no. 20.

11. 这里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哈蒙德的出色概述, 参见 Hammond, *HG*, pp. 533 ff.。我还利用了埃德森的论文, 参见 Edson, 'Early Macedonia', *AM*, pp. 17-44。

12. Appian, *Syr.* 63; Diod. 7.15; Thuc. 2.99.3; Edson, *AM*, pp. 20-21.

13. 尽管后来的一些证引 (*testimonia*, 例如 schol. Clem. Alex. *Prot rept.* 2.8, Justin 7.1.10) 声称, 阿吉德王朝只是把伊德沙重新命名为埃盖, 但是这两个地方虽然相距很近, 但很显然两者是不同的。参见 Hammond, *AM*, pp. 64-5和 Edson, *ibid.*, p. 21 n. 18, 后者指出古代史家“往往把王陵和埃盖联系在一起, 但从未与伊德沙相联系”: 参看 *AP* 7.238; Diod. 19.52.5, 22.12; Pliny *HN* 4.33; Plut. *Pyrrh.* 26.12; *FGrH* no. 73, fr. 1。

14. See A. B. Bosworth, 'Philip II and Upper Macedonia', *CQ* 21ns [65] (1971), 99-100.

15. Strabo 7.7.8, C. 326.①

16. Hammond, *HG*, p. 534.
17. Hdt 5.22; Justin 7.22.
18. Green, *The Year of Salamis, 480-479 B.C.* (1970), pp. 258-60.
19. Demosth. 23.200; [Demosth.] 12.21, cf. Hdt 8.121.2, and Edson, *AM*, p. 26, with nn. 50-53.
20. Edson, *AM*, pp. 26-9.
21. Plato *Gorg.* 471; Athen. 5.217d; Aelian *VH* 12.43, 8.9; Arist. *Pol.* 5.811-12, 1311b.
22. Edson, *AM*, pp. 34-5 and reff. there cited.
23. Aelian *VH* 7.12.
24. Hdt 5.22; Thuc. 2.99.3, 4.124.1; Paus. 7.25.6; Pindar frs. 120-21 (Snell); Bacchylides 20B (Snell).
25. *SEC* 10.138; Andoc. 2.11.
26. *AM*, pp. 30-31. 至于改革的整体情况，参见 Harpocration and the *Suda* s.v. πεζεταῖροι^②, citing Anaximenes of Lampsacus.
27. Thuc. 2.100.2.
28. 阿凯劳斯对希腊知识分子的倾慕：Dio Chrys. 13.30。宙克西斯之事：Aelian *VH* 14.17, cf. Athen. 8.345d, Plut. *Moral.* 177B。狄昂的“奥林匹亚节”的相关史料收集于 W. Baegel, *De Macedonum Sacris* (Halle, 1913), pp. 10-12。阿伽通之事：Aelian *VH* 13.4, 2.21; cf. Aristoph. *Thesmoph.* 100-130, 191, and *passim*, also Plato *Protag.* 156b。欧里庇得斯之事：AP 7.51.4, Aelian *VH* 13.4。苏格拉底的拒绝：Arist. *Rhet.* 2.23.8, 1398a; Seneca *De Benef.* 5.6.6; DL 2.25。

29. Arist. *Pol.* 1324b; Athen. 18a.
30. 有关马其顿宫廷生活的生动（而且可能并没有过分夸张）的描述参见 Theopompus ap. Polyb. 8.9.6-13, 以及 Athenaeus 引用的同一位作家, 4.167a-c; cf. Demosth. *Olynth.* 2.18-19。
31. 这段插曲可参见 A. B. Bosworth, *CQ* 21ns [65] (1971), 100-101 with n. 7。
32. Justin 7.4.7-8, 7.5.5. 整个时期的相关证引收集在 F. Geyer, *Makedonien bis zur Thronbesteigung Philipps II*,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eiheft 19 (Munich/Berlin, 1930), ch. 5, pp. 105-39。
33. Diod. 15.71.1. 很可能托勒密是某位阿敏塔斯的儿子，这个名字在马其顿非常常见（可参见 Berve *APG*, vol. II, nos. 56-65）。
34. Aeschin. *De Fals. Leg.* 29; Plut. *Pelop.* 26-7; Marsyas ap. Athen. 14.629d; Justin 7.5.1-3; Diod. 15.60-61, 67, 71, 77, 16.2 (with n. 2 in Loeb edn, pp. 236-7). 古代史家们非常混乱，有人说伊利里亚人在跟阿敏塔斯打了一仗后掳走腓力作为人质，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被亚历山大二世赎了出来，然后被送到忒拜去了。不过，这基本不成立。现有的版本主要依据的是 Aeschines, *De Fals. Leg.* 26 ff., 并得到了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认可。
35. M. Cary, *CAH*, vol. VI, p. 82.
36. QC 6.8.25; cf. Tarn, vol. II, p. 138, n. 1, and Edson, *AM*, p. 32.
37. Hammond, *HG*, p. 535.
38. Tarn, vol. II, p. 141.
39. Thuc. 2.100; Xen. *Hell.* 5.2.39; cf. Milns, p. 46, Fuller, p. 47, n. 1, Hammond, *HG*, p. 536, n. 1, and Snodgrass, pp. 119-20.
40. 其他的可能人选包括亚历山大二世和阿凯劳斯；但是前者在

位时间太短，不足以推行长久的军事改革，而后者只是因为文本校勘才出现在选项当中。参见 Edson, *AM*, p. 31, n. 80。

41. Snodgrass, pp. 118-19.

42. Carystius ap. Athen. 11.506e-f, 508d-e.

43. Diod. 16.2-3; Polyaeus 4.2.1, 10; Aelian *VH* 14.48; Tarn. vol II, p. 135 ff.

44. Tod II, nos. 143, 147, 148.

45. 即使像哈蒙德这样中庸而保守的历史学家也说，这时期的雅典“其外交和战争手段堪与海盗的相提并论”（p. 503）。至于提摩修斯的所作所为，参见 Diod. 15.81.6; Isocr. 15.108 ff.; Demosth. *C. Aristocr.* 150 ff.; Tod, II, no. 143。这里所引用的伊索克拉底的《论财产交换》（*Antidosis*）特别能揭示内情。

46. Aeschin. *De Fals. Leg.* 29-30.

47. Diod. 16.2.4-6.

48. Diod. 16.3.4.

49. Diod. 16.3.5-6; Demosth. *C. Aristocr.* 121.

50. Polyaeus *Strat.* 4.10.1.

51. Diod. 16.4.3-7; Justin 7.6.7; Front. *Strat.* 2.32; Polyaeus *Strat.* 4.2.17; cf. Bloch, *GG2*, III, i, p. 226 and n. 2, Hammond, *HG*, p. 538 (有战术方面的精彩叙述).

52. cf. Burn, *AG*, pp. 34-5.

53. cf. Plut. *Alex.* 3.4-5, Justin 12.16.6.

54. 对腓力统治时期这方面的业绩的出色叙述可以参见 Harry J. De

ll,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the Macedonian monarchy', *AM*, pp. 115-26, esp. 118-19, 121-2, with reff. there cited。主要史料有 Demosth. *Olynth.* 1.13, 23, *Phil.* 1.48; Justin 8.3.7-8; Diod. 16.69.7。

55. 奥达塔、翡拉和菲林娜的相关情况参见 Satyrus ap. Athen. 13.5 57c-e。这整段都值得仔细研读，因为它不但揭示了腓力几次婚姻的年代顺序，而且在他娶了和未娶的女人（特别是菲林娜和尼刻西波利斯这两位塞萨利人，他只是跟她们育有后代而已）之间做了清楚的区分。现代学者并非总能注意到这种区别：可参见 G. T. Griffith, *CQ* 20ns [64] (1970), 70 with n. 1。这段文字还解释了为什么查斯丁（13.2.11）会把菲林娜称为 *scortum*（妓女）。他在其他地方（9.8.2）将她描述成一个 *saltatrix*（舞女），对此我们没有理由进行怀疑。

56. E.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4. 他还引用了一句被用于全盛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欢乐的拉丁语六音步诗句：*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让其他人去作战，而你——幸运的奥地利——去结婚吧”）。

57. Diod. 16.4.1-2; Justin 7.6.6-9; Beloch, *GG2*, III, ii, pp. 68 ff.; Tod, II, p. 146.

58. Demosth. *In Leptin.* 33; Strabo 7.4.6 (C. 311); Tod, II, no. 151. 粮价自公元前393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翻。公元前357年，雅典从博斯普鲁斯的金梅里亚人的统治者琉孔（Leucon）那里进口了不下2100000麦丁努斯（1麦丁努斯约合1.5蒲式耳）。至于授予琉孔及其子的特权参见 Tod, II, no. 167。此时类似的考虑促使雅典发动远征，以确保把忒拜人隔绝在优卑亚之外：Demosth. *Olynth.* 1.8, *Chers.* 74; Tod, II, nos. 153, 154.

59. Isocr. *Phil.* 2; Aeschin. *De Fals. Leg.* 21, 70, 72, *In Ctesiph.* 54; *IG*, ii2, 127.

60. Diod. 16.8.3-4; Tod, II, no. 158.

61. Plut. *Alex.* 2.1-6, 9.3-4; Arrian 7.12.6-7. 这次婚姻可能也有政治动机在其中。至于伊庇鲁斯和上马其顿地区的特别联系, 参见 Bosworth, *op. cit.*, p. 102: “品都斯山脉东西两侧的两个大国现在以联姻的方式结盟, 他们的后代将会是混血的, 正如阿塔罗斯后来所评论的那样。”

62. Diod. 16.3.7, 16.8.6-7, 16.53.3; Theopompus ap. Athen. 4.167a; T od, II, p. 170; Bellinger, pp. 35-6; Griffith, *GR*, p. 127.

63. Plut. *Moral.* 177C2.

64. 参看 Hammond, *HG*, pp. 497-8, 作者对斯巴达的方法做了有力且正当的谴责。至于腓力的态度可参见 Plut. *Moral.* 177C-D4.

第二章

1. Plut. *Alex.* 3.1-4; Cicero *Nat. Deorum* 2.27, 2.69.

2. 例如普鲁塔克, 他尽管使用了当时的史料, 但却一心想要把亚历山大塑造成一个典型人物, 一个受激情和雄心控制的“斗志昂扬”之人。尤其可以参见普鲁塔克早年的两篇文章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Moral.* 326D-333C, 333C-345B, 以及其他富有见地的评论: A. E. Wardman, *CQ* ns5 (1955), 96 ff., E. Badian, *Historia* 7 (1958), 436 f., and J. R. Hamilton, *GR*, p. 123, *PA*, pp. xxxviii ff.。至于研究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心中的无意识偏见。

3. cf. S. K. Eddv, *The King is Dead*, pp. 11-12, 23 ff., 65-9; and below, pp. 314-15.

4. Hamilton, *GR*, pp. 123-4.

5. Plut. *Alex.* 5.1-3; *Moral.* 342B-C; Diod. 16.52.3, cf. *QC* 6.5.2, and Hammond, *HG*, p. 548. cf. *Polyt.* 12.22.

6. 至于腓力围攻并占领奥林托斯一事, 参见德摩斯提尼的三篇奥

林托斯演讲, *passim*; Diod. 6.53.2-3, 55 *passim*; Justin 7.4, 8.3。至于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莫罗西亚人”），参见 Demosth. *Olynth.* 1.13; Paus. 1. 11.3; Justin 8.6.5。

7. *Olynth.* 1.13.

8. Theopompus ap. Polyb. 8.9.6-13 and Athen. 4.167a-c; Demosth. *Olynth.* 2.17-19; cf. Parke, *Greek Mercenaries*, p. 160.

9. 至于他们的态度可参见 Theophrastus ap. Athen. 10.435a。

10. Tarn, vol. II, p. 326.

11. See, e.g., Isocrates, *Philippus*, 32-4, 111-20.

12. *Iliad* 3.179 and 6.208; 后一行诗曾被布伦特引用（P. A. Brunt, *G R*, p. 208）。至于亚历山大的谱系，参见 Plut. *Alex.* 2.1; Diod. 17. 1.5. 有关成就的轶事参见 Plut. *Moral.* 179D1。

13. Arrian 4.9.3; Plut. *Alex.* 5.4-5, 7.1, 22.5, 25.4-5.

14. Plut. *Alex.* 6.1; Arrian 5.19.5; Pliny *NH* 8.154; cf. A. R. Anderson, *AJPh* 51 (1930), 1 ff. 至于公元前347年腓力在狄昂的竞技庆典参见 Demosth. *Fals. Leg.* 192-5. 在评估布凯法拉拉斯的故事上，我十分受益于海军陆战队的巴克尔少校（Major E. N. Barker, M.C.）的专业意见，他是塞萨利的特里卡拉（Trikkala）的拉扎里纳马场（Lazarina Stud Farm）的总经理。至于塞萨利马在古代的声名，参见 Hamilton, *PA*, p. 15 and reff. there cited. 我们没有比这更高的马匹价格的古代记录。与之最接近的是多拉贝拉（Dolabella）所付的100000塞斯特斯（sesterces，大约4塔兰特）：参见 Aul. Gell. *NA* 3.9.

15. 这则轶闻普鲁塔克有长篇而详细的记述，参见 Plutarch, *Alex.* 6 *passim*. 我只是做了转述而已。至于德玛拉托斯在此事中的角色，参见 Diod. 17.76.6和 Chares of Mytilene ap. Aul. Gell. *NA* 5.2。其他史料参见 Ber

ve, no. 253, p. 133。

16. Aeschines *In Timarch.* 166-9; Plut. *Per.* 1.5.

17. Diod. 16.53.2-3, 55 *Passim*; Justin 7.4, 8.3; Demosth. *Fals. Leg.* 233, 237, 264 ff.; Tod, II, no. 166; Aeschines *Fals. Leg.* 18-19.

18. 主要的史料是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基涅斯所作的相互对立的演说《论辱命之使》（*On the False Embassy*）对于普通读者，我推荐两部作品的洛布版本，其中每一部都有一篇优秀的导论。

19. 现存德摩斯提尼、埃斯基涅斯、叙佩雷德斯以及其他人的演说辞，揭示了此次报复性诉讼的爆发的部分细节。至于菲罗克拉特斯所受弹劾，参见 Demosth. *Fals. Leg.* 114-16, 145-6。至于埃斯基涅斯受审一事，参见注释18中的各篇演说辞。

20. Diod. 16.59.3-4, 60 *passim*; Justin 8.4.12-8.5.6; Tod, II, no. 172; Demosth. *Fals. Leg.* 111-12, *Peace* 22, *Philip* 3.32.

21. Justin 8.2.1; Isocr. 5.2.0; Demosth. 1.21-2; cf. Griffith, *CQ* ns20 [64] (1970) 73 and n. 6, cf. 74 ff. 现在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任命定在公元前344年。

22. 有关尼刻西波利斯及其女儿，参见 Plut. *Moral.* 141B23, 178F22; Satyrus ap. Athen. 13.5573^③, Paus. 9.7.3, 8.7.7; Diod. 19.52; Strabo 7 fr. 24; Steph. Byz. s.v. Θεσσαλονίκη。

23. 有关安塔尔基达斯和约，参见诺林（Norlin）的分析（in Loeb edn of Isocrates, vol. I, pp. xxv, 116-17），非专业人士可以在其中看到比标准历史书更为清晰简明的叙述。

24. Diod. 15.9.19; cf. Isocr. *Paneg.* 15.

25. *On the Peace*: see esp. §§29, 34, 103, 120; and *Areopag.* 4.

26. *Paneg.* 182; *Archidamus*, *passim*; cf. Norlin, Loeb edn, vol. I, p. xl, with note.

27. *Paneg.* 140-43, 187-8, 166-8; *Philip* 99-105, 132-6, 95-8, 120-23.

28. *Philip* 127.

29. 例如亚历山大把希腊雇佣兵安置在亚洲的城市中 (§§ 122-3) 以及科林斯同盟在公元前337年所接受的条款 (参见第94页)。

30. Isocrates *Philip* 101-2; cf. Olmstead, pp. 424-9.

31. Diod. 16.44-50 *passim*; Demosth. *Phil.* 4.33-5, *Ep. ad Phil.* 6-7; Arrian 2.14.2; cf. Olmstead, pp. 436-7, 486, Cloché, *Philippe II*, p. 274. 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即阿尔塔薛西斯允许腓力自由处理色雷斯, 以此作为腓力不干涉的回报; 没有证据表明这时期波斯对色雷斯卫地区可以实施任何有效控制。

32. cf. Jaeger, *Aristotle*, p. 119.

33. Jaeger, *ibid.*, pp. 105 ff.; A.-H. Chroust, *Historia* 15 (1966), 189, and 21 (1972) 170 ff.; GR 14 (1967) 39-44.

34. Strabo 13.1.57; Diog. Laert. 5.1.3-4; Jaeger, *ibid.*, pp. 112 ff., 288-90.

35. Plut. *Alex.* 7.1-2.

36. Plut. *Alex.* 4.1-3; Aelian VH 12.14; Plut. *Moral.* 530, 179D, 331B; Ps-Call. 1.13; Jul. Val. 1.7; Bieber, *Portraits*, pp. 24-5, pl. v. 对于亚历山大头部的特有姿势人们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归因于天生的斜颈, 或者由于对某只眼睛的不良视力的代偿作用, 或者出于纯粹的个人喜好。至于肖像所表现的女孩子气印象, 参看 J. H. Jongkees, *Bull. Ver. Ant. Beschaving* 29 (1954), 32-3, and R. A. Lunsingh-Scheurleer, *ibid.*, 40 (1965), 80-83.

37. Fredricksmeier, *CPh* 56 (1961), 162-3.
38. 至于马尔西亚斯，参见 *Suda* s.v. Μαρσύας Περιάνδρου, and Berve *APG* no. 489, pp. 247-8.
39. Plut. *Moral.* 178E-F 22; cf. *Alex.* 7.4.
40. e.g. Burn, pp. 16-17; Milns, pp. 19-20; cf. Philip Slater, *The Glory of Hera*, pp. 98, n. 9, 132.
41. Plut. *Alex.* 4, *Moral.* 179D, 331B.
42. Plut. *Alex.* 7.4-5; Aul. Gell. *NA* 20.5.
43. Aristotle *Pol.* 1284a-b, cf. 1288a 28 ff.; cf. Balsdon, *MP*, pp. 185-6. 至于卓越之人如神，参看 *Pol.* 1253a 4-5, 25-9; 另可参见 Jaeger, *Aristotle*, pp. 288-90.
44. 奴隶制自然论: *Pol.* 1252a 32, 1254b 20, 1253b 32, 1278b 33. 波斯人（“蛮族人”）生性是奴隶之论: *Pol.* 1252b 8; Eur. *IA* 1400, cf. Ehrenberg,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pp. 89-90; 至于对亚历山大的建议，参见 Aristotle fr. 658 Rose.
45. Didymus on Demosth. 5.64, 6.50 [Jacoby *FGrH* 2b, p. 640]; Diod. 16.52.5; Polyaeus 6.48; Ps-Arist. *Oecon.* 2.2.28; Demosth. *Phil.* 4.31-3. 没有必要像赫劳斯特（Chroust, *Historia* 21 (1972) 175）那样，假定公元前 343/342 年腓力召回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保护一个就要被人识破的间谍，而不是真心想要为其子找一个非常出色的导师。
46. Ehrenberg,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p. 98, Hamilton, *GR*, p. 119.
47. Tarn, *CAH*, vol. VI, p. 357, repeated AG, vol. I, p. 8.
48. Eur. *IA* 1400; Plato *Rep.* 470C-471A; Isocr. *Paneg.* 3, 184, *Panath.* 163; Arist. *Pol.* 1256b 25.

49. *Eudem. Ethics* 1215b 35 (cf. Jaeger, pp. 253-5); *Plut. Alex.* 8.3.
50. *Plut. Alex.* 22, *Moral.* 65F, 717F.
51. *Plut. Alex.* 8.1.
52. See below, pp. 377 ff. 至于亚历山大对辩论术的兴趣，参见菲利普·梅兰的优秀论文（Philip Merlan, *Historia* 3 (1954/5), 60 ff.），至于此处所引的评论，尤见该论文第76页。
53. Merlan, *ibid.*, pp. 60-63.
54. *Demosth. Chers.* 2; *Diod.* 16.71; *Satyrus ap. Athen.* 13.557b-e; cf. *CAH*, vol. VI, p. 251.
55. *Demosth. Halonn.* 16, *Chers.* 43-5, repeated in *Phil.* 4, 15-16.
56. *Demosth. Chers.* 6, 24-7; *Isocr. Ep. Phil.* 2 *passim*.
57. *Demosth. Chers.* 3, 11-13, *Phil.* 3, 9, 18, 25-7, and *passim*.
58. *Demosth. Halonn.* 16, *De Cor.* 87.
59. *Demosth. Phil.* 3.70-72, *Phil.* 4.52-3, *De Cor.* 87.
60. *Diod.* 16.72.1; *Justin* 8.6.4-8; *Demosth. Halonn.* 32; *Tod.* II, nos. 1 73-4.
61. *Demosth. Phil. Ep.* 6; [*Plut.*] *X Oral.* 847F-848A; cf. *Demosth. De Cor.* 76-7.

第三章

1. *Theophrastus ap. Athen.* 10.435a. 已知最早的亚历山大肖像与这则轶闻并不冲突，参见 Bieber, pp. 24-5。
2. *Diod.* 16.74.2-76.4; *Plut. Alex.* 9.1 (cf. Hamilton, *PA*, pp. 22-3).

3. Plut. *Moral.* 178B 16-17 = 806B; Val. Max. 7.2.ext.§10.
4. Demosth. *De Cor.* 73, 76-7; *Ep. Phil.* 6; Diod. 16.76. 4-77.2; Justin 9.1; Plut. *Phoc.* 14.
5. Demosth. *De Cor.* 145 ff.; Justin 9.2-3 *passim*; Plut. *Moral.* 174F, 331B, 334A.
6. 他曾收买某个人去比雷埃夫斯船坞纵火，但没有成功；参见 Demosth. *De Cor.* 132。
7. Demosth. *De Cor.* 169 ff.; Plut. *Demosth.* 18; Diod. 16.84.2-5; cf. Grote, *HG*, vol. XI, pp. 287 ff.
8. 在这次危机期间发表的《泛雅典人节演说辞》（*Panathenaicus*），将腓力与特洛伊战争中的阿伽门农相比较，还几次提及忒拜、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尤可参见§§74-83, 91 ff., 121 ff.
9. 事实上，福基翁曾率领一支小型海军中队驶往爱琴海北部，并攻击了那里的马其顿船只；但不构成威胁，而且很快就回到了雅典。参见 Plut. *Phoc.* 14.8, 16.1。
10. Aeschin. *De Fals. Leg.* 148; Plut. *Demosth.* 18.3; Polyaeus 4.2.8.
11. 下文有关喀罗尼亚战役的叙述，我非常受益于哈蒙德的精湛分析（N. G. L. Hammond, ‘The two battles of Chaeronea’, *Klio* 31 (1938), 186-218），以及他在《希腊史》中更为简明的叙述（*HG*, pp. 567-70）。至于双方军队的规模，参看 Diod. 16.85.7 with Justin 9.3.9。
12. Plut. *Demosth.* 18.4, 20.1, *Phoc.* 16.1-3, cf. Hammond, *HG*, p. 567. 战役日期经常被认为是在8月2日或9月1日（麦塔盖特尼昂月[Metageitnion]7日）；我遵从普鲁塔克的说法（Plut. *Camill.* 19.5），即麦塔盖特尼昂月9日。7月26/27日（Bickermann, *Chronology*, p. 119; cf. C. B. Welles, Loeb Diodorus, vol. VIII, pp. 78-9, n. 1），在雅典可以见到新月，因此8

月4日是最有可能的日期。

13. 有关分析参见 Polyaeus, 4.2.7。

14. Diod. 16.86.1-5; Plut. *Alex.* 9.2, *Demosth.* 20-21, *Moral.* 845F; Polyaenus 4.2.2, 4.2.7-8; Hammond *ut supr.* n. 75 *passim*; W. K. Pritchett, 'Notes on Chaeronea', *AJA*, 62 (1958), 307-11, with pls. 80-81.

15. Diod. 16.86.6-87 *passim*; Plut. *Demosth.* 20.3, *Moral.* 715C, 849A.

16. Hypereides fr. B 18 [=MAO II, pp. 575-7, cf. pp. 364-5]; Lycurg. *In Leocr.* 16; Demosth. *De Cor.* 195, 248; Aeschin. *De Fals. Leg.* 159; [Plut.] *Vit. X Orat.* 848, 849A, 851-2.

17. Quintil. *Inst. Orat.* 2.17.2; Deinarch. *In Demosth.* 104; Sext. Emp. *Adv. Math.* 2.16; *Suda* s.v. Δημάδης; Plut. *Phoc.* 1; Aelian *VH* 5.12; Demades, *Twelve Years* fr. 29, 51; cf. Pierre Lévêque, *The Greek Adventure*, pp. 326-7, also Pytheas ap. Athen. 2.44a and Aul. Gell. *NA* 11.10.

18. Diod. 16.87; Justin 9.4; Demades, *Twelve Years* fr. 9-10; Aelian *VH* 6.1; Plut. *Moral.* 177E-F, *Demosth.* 10, 13, *Phoc.* 96; Hypereides *Eux.* 16-17 (cols. 12-13); Demosth. *De Cor.* 285; Theopompus ap. Athen. 10.435b-c.

19. 至于腓力对忒拜的处置，参见 Diod. 16.87-8; Arrian 1.7.11; Justin 9.4.6-10; Paus. 9.1.8, 9.37.8, 4.27.10。他对希腊诸城邦的总体处置，参见 Plut. *Moral.* 177C-D4，参看 Burn, *AG*, p. 42, 后者引用了现代的一句相似格言，即“拿着刺刀你可为所欲为，只要别坐上去”。

20. Paus. 5.20.9-10; cf. Bieber, p. 19, and literature there cited.

21. 参见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6-7 and n. 16, with reff. there cited; Diod. 16.92.5, and C. B. Welles *ad loc.* (Loeb edn, vol. VIII, p. 101, n. 9): “对腓力来说，这一要求的隐义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十二奥林波斯神平等，并且同样有资格接受崇拜。”这段涉及十二奥林波斯神的插曲

将在第104页那里得到更充分的讨论。至于吕山德，参见 Plut. *Lys.* 18; Paus. 6.3.14-15; Athen. 15.696; Hesychius s.v. Λυσάνδρια。至于阿奇罗科斯宫，参见 F. Lasserre and A. Bonnard, *Archiloque* (Paris, 1958), pp. lxxviii ff.。至于腓力对其他的神性主张的蔑视——譬如他对自封为“宙斯-医师”的迈涅克拉特斯（Menecrates）的处置，参见 Hegesander ap. Athen. 7.28 9c-e; Aelian *VH* 12.51。

22. Isocrates, *Epist.* 3, §5. 至于以弗所事件，参见第98页和注释53。

23. Diod. 17.5.3-4; cf. Olmstead, pp. 489-90.

24. Justin 9.4.5; Polyb. 5.10; Plut. *Demosth.* 22; Hypereides fr.B 19.2-5 (cols. 77-80).

25. Paus. 1.9.4; Clem. Alex. *Protrept.* 4.54.5; Isocr. *Epist.* 3.3; Tod, II, no. 176; Demosth. *De Cor.* 285 ff. （德摩斯提尼引用一条不同且更长的碑文，他说那是公共出资刻在纪念碑上的。）此处所引铭文参见 *Anth. Pal.* 7.245。

26. Plut. *Moral.* 471E, cf. 331B, 1126D. 短跑选手的名字被误作克里松（Crison），此人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除非这是另一位同名之人，或许是以其伟大先祖的名字命名的）；这种失误并不必然会否定这则轶闻的真实性。

27. Plut. *Moral.* 217F, 233E 29, 760A-B; Paus. 8.7.4; Diod. 17.3; cf. Roebuck, *CPh* 43 (1948), 73-92, Wilcken, p. 41, Burn AG, pp. 43-4. 维尔肯认为腓力所派驻军得到了同盟的批准，但这只不过是说同盟很明智地认可了国王的愿望。

28. E. Badian, *Hermes* 95 (1967), 172. 至于斯巴达的拒绝，参见 Plut. *Moral.* 240A。福基翁试图使雅典也追随斯巴达的榜样，但被德玛德斯否决，参见 Plut. *Phoc.* 16.4。

29. 这里关于同盟以及在科林斯召开的和会的叙述必然简化——或许过度简化——了一个极为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我们主要的史料是一份记录和约条款的残缺的铭文（Tod, II, no. 177, pp. 224-31）。文献资料不足而且容易使人发生误解：Diod. 16.89.1-3; Justin 9.5。现代最好的阐释仍是维尔肯的（Wilcken, pp. 42 ff.）；另可参见博尔扎的注释 *ad loc.*, pp. 328-9，其中包含有更新的参考文献。很少有学者还会支持拉森的论断（J. A. O. Larsen, *CPh* 39 (1944) 160），即腓力所组织的同盟“必定可以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的政治成就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确实充分证明了腓力在政治运作中的狡诈和手段。

30. Diod. 17.22.5; cf. F. Mitchel, *GR*, p. 190.

31. Diod. 16.89.3.

32. Diod. 16.93.9; 17.2.4. 至于阿塔罗斯的婚姻参见 QC 6.19.17；参看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5。

33. 至于腓力与奥林匹娅斯离婚以及他所说的亚历山大是非婚生的，参见 Justin, 11.11.3-5。

34. 参见 Bosworth, *CQ* ns21 (1971), 102, with n. 2。尽管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结合注定会对域外王国造成不好的影响，但他还是回避了对促使腓力走这一步的真实动机的讨论。

35. Aelian, *VH* 12.43; cf. above, pp. 12, 22.

36. Satyrus ap. Athen. 13.557d-e; Plut. *Alex.* 9.3-7; Justin 9.5.9, 9.7.3-4; Ps-Callisth. 1.20-22; Jul. Val. 26-8. 克里奥帕特拉在结婚前的少女名字似乎是欧律狄刻；参见 Arrian, *Succ.* 22.3; Justin 9.7.3。

37. 美姐，格泰国王科特拉斯之女；参见 Satyrus ap. Athen. 13.557 d。

38. 至于这些解释，可参见 Milns, p. 27, Badian *ut supra*, p. 244, Bosworth loc. cit., and Hammond, *HG*, p. 573. 伯恩（Burn, p. 44）似乎接受了传统的说法，即腓力完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9. Plut. *Alex.* 9.3. 注意，亚历山大在他的只和国王们赛跑的话中就暗含着对实际王位的权利要求，或许他让色诺克拉特斯草拟君主政体法则一事也有相同的意味。

40. QC 8.1.23.

41. Demosth. *De Cor.* 67.

42. Homer, *Iliad* 1.120.

43. Plut. *Alex.* 9.3.

44. Bieber, p. 23, and figs. 3-4, with earlier literature there cited.

45. Wilcken, pp. 47-9; Hammond, *HG*, p. 572, with reff. 征讨波斯的“神圣战争”的理念并不是新出的：很久以前伯里克利在动议所谓的“外交大会法令”时就提过，参见 Plut. *Per.* 17。

46. 参见米尔恩斯的精彩分析（Milns, pp. 14-15）。至于同盟的宣战，参见 Diod. 16.89.1-3; Justin 9.5.1-7; Plut. *Phoc.* 16.4; Demosth. *De Cor.* 10。

47. See Olmstead, pp. 491-2, with reff.

48. Satyrus ap. Athen. 13.557e; cf. Justin 9.7.12. 这里对事件的复原假定，克里奥帕特拉在腓力死前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孩，名为欧罗巴；一个男孩，名为卡拉诺斯。由于古代史家们从未同时提及这两个孩子，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只有一个孩子（例如参见 Tarn, vol. II, pp. 260 ff.，作者特别提出理由说卡拉诺斯是不存在的），并且把腓力与克里奥帕特拉结婚的时间往后推，推到了公元前337年春天或夏天。这种论点并

不影响我的主要结论。另一方面，这会使公元前337年亚历山大被召回一事变得很难解释。

49. Justin 9.7.7.

50. Plut. *Moral.* 179C 30, cf. *Alex.* 9.6. 至于德玛拉托斯在劝说亚历山大回来时所遇到的困难，参见 Justin 9.7.6。

51. Polyaeus 4.2.6.

52. Justin 9.7.6-7; Plut. *Moral.* 818B-C.

53. Justin 9.5.8; Diod. 16.91.2, 17.2-4, 17.7.1- 2; Polyaeus 4.4.4; Arrian 1.17.11; Tod, II, no. 192, and commentary, p. 265; cf. Badian, *Stud. Ehren t.*, pp. 40-41 and Brunt, *JHS* 83 (1963), 34-5. 至于厄里特莱，参见 SIG3 284 with Dittenberger's notes *ad loc.*

54. 至于公元前4世纪演员充任外交人员的现象，参见 A. W. Pickard-Cambridge, *The Dramatic Festivals of Athens* (1953), p. 287。他们可以自由旅行，其身份似乎使他们拥有某种外交豁免权，因而他们就成了理想的代理人。特萨罗斯是某个团体的首领，他们曾于公元前347年和340年获得雅典的嘉奖；他随同亚历山大出征，在提尔城、可能还在埃及，都进行过演出（Arrian 3.1.4）；参看 Bervic, *APG*, II, p. 180, no. 371, and Hamilton, *PA*, p. 25。

55. 普鲁塔克的记述不甚了了；但这似乎是对腓力生气一事（10.3）的最好解释。参见 Hamilton, *PA*, pp. 25-6 *ad loc.*

56. 关于皮克索达洛斯事件，参见 Plut. *Alex.* 10.1-3; cf. Strabo 14.2. 17, C. 656-7; Arrian 3.6.5;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5-6; Hamilton, *PA*, pp. 25-7. 关于托勒密的身世（或许说他是腓力之子的说法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意在证明他后来成为埃及国王的合法性），参见 QC 9.8.22; Paus. 1.6.2. 他的母亲据说曾是腓力的情妇之一。

57. Polyaeus 8.60; Justin 11.11.3-5.

58. Diod. 17.5-6; cf. Olmstead, p. 490.

59. 人们或许把这种情况跟最近（1971年）波斯国王在波斯波利斯举办的宴会相比较。

60. Diod. 16.91.4-6; Justin 9.6.1-3.

61. Diod. 17.2.3; Justin 11.2.3; Paus. 8.7.7. 至于卡拉诺斯作为阿吉德王朝的创立者一事，参见 Diod. 7.15.1-3; Plut. *Alex.* 2.1; Justin 7.1.7-12, 33.2.6, Vell. Pat. 1.6.5。在希罗多德（Herodotus, 8.137-9）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 2.100）那里可以发现不同的说法，他们把佩狄卡斯一世作为第一任国王。有人提出（例如 Tarn, vol. II, pp. 260 ff.），“卡拉诺斯谱系”只是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宣传，但这纯属推测。腓力肯定会利用现有的传统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无论其神话色彩有多浓，而不会专门为此凭空编造一个故事。

62. Milns, p. 31.

63. 通常人们——例如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9, 和 Hamilton, *PA*, p. 28——会假定，奥林匹娅斯一直留在伊庇鲁斯直到婚礼结束，因而不可能在刺杀腓力的阴谋中起到直接作用。如果考虑到结婚者是谁，那么这种观点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而且与查斯丁（Justin 9.6.8-10）和普鲁塔克（Plut. *Alex.* 10-4）所提供的证据相左。

64. Diod. 16.92.3-4.

65. 基于一份非常残破的纸草文献（P. Oxy. 1798= *FGrH* 148），博斯沃思（Bosworth, *CQ* ns21 (1971), 93 ff.）最近提出，保萨尼阿斯是交给马其顿军队处死的。事实上，该文本并没有提及他的名字，所指人物同样有可能是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的一个兄弟（参看 Arrian 1.25.1-2; *QC* 7.1.6-7）。

66.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4 ff., Milns, pp. 29-31.

67. 查斯丁（Justin, 9.6.5）说当时他乃是一位 *primis pubertatis annis*, 即一个年轻的成年人；腓力跟伊利里亚人所打的最后一场有史记载的战役（之前肯定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是在公元前344/343年（Diod. 16.69.7）。根据这份不大站得住脚的史料，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44年，即腓力被刺前八年。这实在让人无法相信，因为普鲁塔克（Plut. *Alex.* 10.4）和狄奥多罗斯（Diod. 16.69.7）都说得很清楚，这件事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更有可能的是，与伊利里亚人所打的仗是一场因流亡中的亚历山大在那里活动而起的小冲突（后来或许因此被掩盖起来），时间是在公元前337年，正好处在这个时期。查斯丁的话可以看作一种修辞学的夸张。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 8.14.ext. §4）记载了一则可疑的轶事，据说保萨尼阿斯曾问一位名为赫尔摩克勒斯（Hermocles, 这人不见于其他史料，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所委托的雕塑家很难吻合）的哲学家，他要怎样做才能立马收获声名，哲学家告诉他去杀一个著名人物。

68. Diod. 16.93 *passim*; Plut. *Alex.* 10.4; Justin 9.6.4-8; Arist. *Pol.* 131 1b 2.

69.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之子希帕尔科斯（Hipparchus）的刺杀者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盖通（Aristogeiton）这一相似例子；类似地，同性恋妒忌被精心地用到了政治目的之中：参见 Hdt 5.55-6, 6.109, 123; Thuc. 1.20, 6.5.54-57。

70. Plut. *Alex.* 10.4; Justin 9.7.8-14.

71. Plut. *ibid.*; Justin 9.7.3. 所引欧里庇得斯的诗句出自《美狄亚》（*Medea*, 288），其中指涉的是克瑞翁（Creon）、伊阿宋（Jason）和克琉萨（Creusa）。这不是亚历山大人生中唯一一处欧里庇得斯的诗句与谋杀案相联系的情况。我不会根据这种相似性推论说这些例子只是修

辞学的虚构（我可以肯定有些学者必定这么说过，或者将会这么说）。

72. cf. Diod. 17.2.2, and below, p. 113.

73. By Bosworth, in *CQ* ns21 (1971), 93-105. 尽管有少量证据（Plut. *Moral.* 327C）表明，和希腊的一般情况一样，马其顿的内部派系在亚历山大继位后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博斯沃思没有举出有力证据证明阿敏塔斯或林刻斯提斯兄弟与刺杀一事相关。

74. 参见韦尔斯的尖锐评论，见于 Loeb Diodorus, vol. VIII, p. 101, n. 2。

75. 复数的使用（Diod. 16.94.4）非常引人深思。保萨尼阿斯本人只需要一匹马，这就提示我们，最初的方案安排了好几位刺客——涉嫌之人是不言而喻的。

76. 至于类似的解释，参见 Milns, p. 31和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9。

77. Milns, *ibid.*

第四章

1. 这似乎是确认继位的传统方法：参见 Berve, *APG*, II, pp. 46 f.;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8, citing Ps-Call. 1.26。这里所暗含的对军队的平稳接管近来受到博斯沃思的辩难（Bosworth, *CQ* ns21 (1971), 103 and n. 1），但这种说法得到狄奥多罗斯（Diod. 17.2.2）和查斯丁（Justin 11.1.8）的共同证实。

2. By Bosworth, *op. cit.*, pp. 96-7.

3. See J. R. Ellis, 'The Security of the Macedonian Throne under Philip II', *AM*, pp. 68-75, further developed in *JHS* 91 (1971), 15-24.

4. 据说大流士承诺给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提供1000塔兰特，并帮助他巩固马其顿王位（Arrian 1.25.3 ff.），这种说法即使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用以证明对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的责难是正当的，那也只能说明他对大流士来说是可接受的篡位者。

5. See Justin 11.5.1-2, 12.6.14.

6. Arrian 1.25.1-2; QC 6.9.17, 6.10.24, 7.1.6-7; Justin 11.2.1-2, 12.16.4; Diod. 17.2.1; Plut. *Alex.* 10.4, *Moral.* 327C.

7. Diod. 17.2.2-3; Justin 11.1.8-10; Arrian 3.6.6; cf. Wilcken, pp. 63-4.

8. Plut. *Alex.* 11.1, cf. *Moral.* 327C-D; Diod. 17.3.3-5; Justin 11.1.2-3.

9. Ellis, op. cit., esp. pp. 72-3 and testimony there cited.

10. Aeschines, *In Ctesiph.* 77. 他的资料来源是雇佣兵将军卡里德摩斯（Charidemus）：参看 Plut. *Demosth.* 22。

11. 至于他们的关系，参见 Berve, *APG*, II, nos. 59 and 144；他在小亚细亚的职位参看 Justin 11.5.8。

12. Plut. *Demosth.* 22-3 *passim*, *Phoc.* 16.6 [*X Orat.*] 847B; Diod. 17.2.3-6, 17.3.2, 17.5.1; Aeschin. *In Ctesiph.* 77, 160; Justin 11.3.3-4.

13. Aeschin. *In Ctesiph.* 238; cf. Diod. 17.7.12; Plut. *Phoc.* 17.1-2. 拒绝希腊人对黄金的索要已经变成了波斯君主及官僚的第二本能：可参见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的有趣的段落（Aristophanes *Acharnians* 98-114），其中“大王之眼”所说的唯一一句能让人听懂的话是：“没有金子，愚蠢的伊奥尼亚人”。

14. Plut. *Alex.* 11.2, cf. *Moral.* 327C.

15. Diod. 17.4.1-2; Justin 11.2.4, 11.3.1-2; Polyaeus 4.3.23; cf. Fuller, p. 82.

16. Diod. 17.4.3; Aeschin. *In Ctesiph.* 160-61.
17. Diod. 17.4.2-7; Plut. *Demosth.* 23.2-3, *Moral.* 3270; cf. Wilcken, p. 65, Olmstead, p. 495.
18. Diod. 17.5.1-2 ; Plut. *Demosth.* 23.2; QC 7.1.3, 8.7.5; Justin 11.5.1 ; Arrian 1.12.7, 1.17.9; cf.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9-50, *Stud. Ehrenb.*, pp. 41-3, Berve, *APG*, II, no. 59, pp. 29-30. 巴迪安认为阿塔罗斯被处死发生在忒拜陷落之后，我看不出这种说法有何根据。
19. 关于这一重要区别，参见 Wilcken, p. 65。
20. 关于麦加拉所给的公民权，参见 Plut. *Moral.* 826C-D。关于斯巴达的拒绝，参见 Arrian 1.1.2。关于阿开亚和美塞尼亚的僭主统治，参见 Demades, *Twelve Years*, 4-7, 10-11; Paus. 7.27.7。
21. See Ps-Demosth. *On the Treaty with Alexander*, *passim*, esp. §§10, 15, 16, 19-20, 26. 非常讽刺的是，我们之所以知道条约的大部分条款是因为后来马其顿被指控违反条约。
22. 至于同盟在科林斯的会议，参见 Diod. 17.4.9; Arrian 1.1.1-3; Plut. *Alex.* 14.1-3; Justin 11.2.5; cf. Hamilton, *PA*, pp. 33-4, Wilcken, pp. 65-6。关于军事责任的安排，参见 Tod, II, no. 183, with commentary, pp. 240-41; Plut. *Moral.* [*Vit. X Orat.*] 847C。关于以弗所的代表，参见 Plut. *Moral.* 1126D。
23. Plut. *Alex.* 14.1-3, *Moral.* 331F, 605D, 782A; Diog. Laert. 6.32; cf. Berve, *APG*, II, p. 417, n. 3. 这则故事在古代极为流行；贝尔佛（Berve, loc. cit.）收集了至少22个条目。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现代学者将其视为虚构之事，认为这些只是用来说明亚历山大的性格。我看不出为什么此类轶事就得自动被人当作无历史根据的，即使根据平均定律，至少也可以认为某些轶事是有其事实基础的。

24. Plut. *Alex.* 14.4; Diod. 17.93.4; 参看 Tarn, vol. II, pp. 338 ff., 塔恩认为——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这则轶事是真实的; 又如 Hamilton, *P A*, pp. 34-5。至于向神庙捐献之事, 参见 SIG 251H。

25.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 我非常受益于富勒在策略方面的精湛分析 (Fuller, pp. 219-26)。唯一的详细史料是 Arrian, 1.1.4-1.6.11, *passim*; cf. 狄奥多罗斯的简短评论 (Diod. 17.8.1-2); Plut. *Alex.* 11.3, *Moral.* 327A; 现代学者的讨论参看 Tarn, vol. I, pp. 5-6, Burn, pp. 55-9, Wilcken, pp. 66-70, and Milns, pp. 35-8。

26. 没办法确切地定位这座小岛。我们只知道斯特拉波的定位 (7.3.15, C. 305) 肯定是错的, 因为他认为该岛离多瑙河河口有120斯塔狄昂 (=15英里); 该岛一定至少再往上游100英里。河岸另一头亚历山大的对手是格泰人, 和处在格泰人和大海之间的另外两个国家 (绍罗马泰人和斯基泰人的国家): 参看 Arrian 1.3.2, 虽然他是从他那个年代的情形来叙述多瑙河部落的。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同名的小岛。关于亚历山大是否沿着大流士的路线渡河 (see Hdt 4.90, with the note by How and Wells, vol. I, p. 334, and H. L. Jones's note on Strabo, Loeb edn, vol. III, pp. 216-17) 非常值得怀疑; 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迂回路线上, 而且阿里安的记述 (1.2-3, *passim*) 提示我们, 从希普卡山口到多瑙河的行程最多不超过五六天。还应注意, 据说在波刻这个地方, 河流因为河道窄而流得非常急, 这不可能是三角洲附近的状况。最后一点, 大流士的对手不是格泰人而是斯基泰人: 就大流士的情况来说, 斯特拉波的定位可能是正确的。

27. Ehrenberg,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p. 60. “Pothos”这一章 (ibid., pp. 52-61) 在心理学方面很见地。后来全文重印于 Griffith, *MP*, pp. 74-83。我没有忽视这样的可能性, 即有时亚历山大的 *pothos* 可能只是为了掩饰某些他不想示人的动机的托辞而已。

28. Arrian 1.4.7-8; Strabo 7.3.8, C. 301-2. 塔恩 (Tarn, vol. I, pp. 5-6

）指出，说害怕天塌下来乃凯尔特人（也是一千年后爱尔兰盖尔人）起誓的一种方式：“我们将遵守誓言，除非天塌下来砸到我们，或者大地裂开吞没我们，或者大海涌起来淹没我们。”

29. 阿里安（Arrian, 1.5.2）对这一点的叙述非常详细。把马其顿人和东方人整编在一起似乎最早在伊索斯之战后很快就发生了：参见 Griffith, *JHS* 83 (1963), 69。但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而且应当注意，是在警卫旅而非骑兵当中，才如格里菲斯所说（*ibid.*, p. 74），“侍友骑兵成员一般被期望会更加赞同[亚历山大的]政治计划。”当然，带上阿格里安人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

30. Strabo 7.5-11, C. 317-18.

31. 富勒（p. 225, n. 3）一针见血地说道，“有时一声突然且巨大的叫喊其效果堪比步枪齐射”。他把亚历山大的计策和1836年在阿拉莫（Alamo）激战中的类似事例做了比较。马略（Marius）在努米底亚战役中也使用过相同的计策：参见 Sallust, *Bell. lug.* 99。

32. Arrian 1.5.5-1.6.9, *passim*.

33. cf. Ellis, *AM*, pp. 72-5.

34. Demades, *Twelve Years*, 17 (他还很讽刺地补充说，德摩斯提尼和吕库古“几乎已经把亚历山大的遗体放在台上给我们看了”); Justin 11.2.7-8.

35. Diod. 17.8.2; Arrian 1.7.2-3; Aelian *VH* 12.47; Justin 11.2.9.

36. Arrian 1.7.1-3; cf. Plut. *Alex.* 11.3; Diod. 17.8.2.

37. 至于相关事情的概要参见 Mitchel, *GR*, pp. 189 ff.; 亦可参见 Ferguson, *Hellenistic Athens*, pp. 7-10。

38. Plut. *Demosth.* 23.2; Demades, *Twelve Years* 17; Diod. 17.8.6-7; J

Justin 11.3.3-5; cf. Arrian 1.7.4.

39. Plut. *Moral.* 327C.

40. 提及这事的非常多但（不可避免地）都充满偏见。例如德摩斯提尼的敌人指控他巨额贪污。特别参见 Deinarchus *In Demosth.* 10, 18-22; Hypereides, *In Demosth.* 4 (5) col. 17 [=MAO II, p. 513]; Plut. *Demosth.* 14.2, 20.4-5, 23.2-3; Aeschines *In Ctesiph.* 157, 160-1, 173, 209-10, and 239-40（其中他认为德摩斯提尼扣留了那些将交给卡德迈亚并把阿卡狄亚雇佣兵从地峡带过来的钱款）。

41. Diod. 17.7.1-2, 9; cf. Badian, *Stud. Ehrenb.*, pp. 40-41.

42. Diod. 17.7.1-10; Polyaeus 5.44.5; [Arist.] *Oecon.* 1347a 7, 1351b 29. 我的解释基本上不同于我看到的唯一一份完整的分析，即巴迪安（*ut supr.*）提出的，他似乎有点无视史料中所记载的事件的发生次序。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当门农得到命令前去居吉科斯时，为什么他的最短路线是翻越伊达山脉。

43. Diod. 17.7.2.

44. Olmstead, pp. 491-4.

45. Arrian 1.17.9, 1.25.3 ff.; Diod. 17.48.2; Plut. *Alex.* 20.1. 库尔提乌斯（QC 3.11.18）可能指的是另一位阿敏塔斯。

46. Justin 11.2.3, 12.6.14; QC 6.9.17.

47. Arrian 1.5.4.

48. Paus. 8.7.7; Justin 9.7.12; Plut. *Alex.* 10.4.

49. Arrian 1.7.5-7.

50. Diod. 17.9.2-4; Arrian 1.7.7-8; Justin 11.3.6; cf. Wilcken, p. 72.

51. Diod. 17.9.1, 5-6; Plut. *Alex.* 11.4-5; Arrian 1.7.11.

52. Diod. 17.11-13 *passim*; Arrian 1.8.1-7; Plut. *Alex.* 11.5-6; Justin 11.9.8. 阿里安遵从托勒密的记载，认为佩狄卡斯“行动过早”，没有收到命令便发起进攻。这是极为不可能的事。显然，托勒密想要弱化亚历山大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他还进一步暗示说犯下暴行的是同盟部队而不是马其顿人。此外，佩狄卡斯从来不是他的朋友。这一次，狄奥多罗斯的叙述比阿里安的更完整、更连贯而且本质上更可信，我毫不犹豫遵从了他的说法。现在可参看 Milns, pp. 40-41。至于死亡及被俘人数，亦可参见 Aelian, *VH* 13. 7；至于忒拜城被焚毁，参见 Paus. 9.25.10。

53. Plut. *Moral.* 260C; Paus. 9. 10.1.

54. Diod. 17.14.1-4; Arrian 1.9.6-10; Plut. *Alex.* 11.5-6; Justin 11.9.8-11.4.8.

55. Arrian 1.9.9-10; Plut. *Alex.* 11-12, *Moral.* 259D-260D; Aelian *VH* 1.7.

56. Arrian 1.9.1-8; 参看 Demades, *Twelve Years* fr. 65，其中这位演说家声称，“全希腊都因忒拜人的城市被毁而损失惨重”。

57. 此前人们认为（例如 Tarn, *CAH*, vol. VI, p. 356 = AG I, p. 7 and n. 2；但是那时塔恩只要有可能就总是弱化亚历山大的过失，如果不能在性质上也至少会在量级上），一个奴隶的平均价格在300至400德拉克马之间，因而所记载的忒拜被卖为奴的人数必定“只是一个刻板的数字”。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价格只适用于训练有素的专门奴隶，对于未经训练的奴隶来说，88德拉克马与平均价格相差无几。可参见 W. K. Pritchett, ‘The Attic Stelae’, *Hesperia* 25 (1956), 276-81。不管怎样，30000名奴隶进入市场中定会立即导致市场饱和，从而使价格有所下跌。

58. Arrian 1.10 *passim*; Plut. *Demosth.* 23, *Alex.* 13, *Phoc.* 17, *Moral.* 847C; Diod. 17.15 *passim*; Justin 11.3.3-5, 11.4.9-12; Deinarchus *In Demost*

h. 101.

59. Deinarchus *In Demosth.* 32-4, with Burt's notes *ad loc.*, MAO II, pp. 196-7. Cf. Plut. *Moral.* 847F, 848E; Arrian 1.10.6.

第五章

1. Justin 11.5.1-2, 12.6.15; Diod. 17.16.1. 被处死的人当中包括欧律罗科斯 (Eurylochus) (Berve, *APG*, II, no. 323, p. 159), 此人曾为腓力执行过外交任务, 并于公元前342/341年担任派往德尔菲的宗教代表 (*hieromnemon*)。

2. Burn, pp. 65-6; *contra*, Bosworth, *CQ* ns21 (1971), 104 (arguing for calculation).

3. Cited from Barbara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Dell, 1963), p. 374.

4. Arrian 7.9.6.

5. Griffith, *GR*, p. 127, n. 4.

6. See Plut. *Alex.* 15.3, *Moral.* 342D-E; Justin 11.5.5; Dessau, *SIG* 332 (cf. Berve, *APG*, II, no. 672, p. 337).

7. 关于亚历山大的债务, 参见 Plut. *Alex.* 15.1, *Moral.* 327D (都出自奥涅西克里托斯[Onesicritus]); Arrian 7.9.6 (出自托勒密)。至于他资金短缺的总体情况, 相关史料参见 Hamilton 所整理的, *PA*, pp. 36-7, 以及 Aeschin. *In Ctesiph.* 163。至于他在进入亚洲时所拥有的现金和储备, 参见 Plut. *Moral.* 342E。至于对军队开支的一种 (保守) 分析, 参看 Bellinger, pp. 36-8。不过, 即使假定每个步兵每天所需要的平均薪水是4奥波尔而非1德拉克马, 他估计每月也要花费193⅓塔兰特。(不过, 他以2德拉克马来计算骑兵的报酬, 这是差不多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注

意到，这不是他最后一次向侍友们索求现金。查斯丁（11.5.9）则强调军队非常期待远征所得的丰富战利品。

8. 只有狄奥多罗斯（17.17.3-4）给出了详细的数据。总体数据来自许多的资料来源，具体如下：

步兵	骑兵	来源
32000	5100	Diod. 17.17.3-4
32000	4500	Justin 11.6.2
30000[min.]	4000[min.]	Plut. <i>Alex.</i> 15.1 (Aristobulus)
43000 [max.]	5000[max.]	Plut. <i>Alex.</i> 15.1 (? Onesicritus)
30000+	5000+	Arrian 1.11.3 (Ptolemy)
30000	4000	Plut. <i>Moral.</i> 327D-E (Aristobulus)
30000	5000	Plut. <i>Moral.</i> 327D-E (Ptolemy)
43000	5500	Plut. <i>Moral.</i> 327D-E (Anaximenes)
40000	4500	Polybius 12.19.1 (Callisthenes)

现代最好的研究是 P. A. Brunt, *JHS* 83 (1963), 32-4。布伦特假定其中有些数据包含了已经在亚洲的远征军，并推测最后的总数遗漏了600名骑兵，由此他解释了这几组数据之间的主要差异。这得到了狄奥多罗斯的证实，他把他的数据加错了，分别得到30000人和4500人。布伦特得出最后的总体数据为步兵42000人（32000+10000：后者是一个约数，也许应当修正为11000），骑兵6100人（5100+1000），第二个数据在每一组中都是先头部队的人数。

9. Diod. 17.9.3.

10. 参见 Brunt, *ibid.*, pp. 34 ff., 和 Griffith, *GR*, pp. 129 ff., 后者为现有史料做了清晰合理的概括。

11. Justin 11.5.3. 至于侍从军团, 参见 Arrian 4.13.1; QC 5.1.42, 8.6.2-6; Val. Max. 3.3。

12. 参看 Parke, p. 186。部分现代学者(例如 Milns, p. 49)质疑这一数据, 并估计亚历山大在远征伊始至少带了15000名雇佣兵。他们的论证并不能让我信服。至于为大流士服务的雇佣兵人数, 参见 QC 5.11.5; Paus. 8.52.5。他们的人数在伊索斯之战后急剧增加, 而在那场战役前总人数估计为30000人(QC 3.2.9)。

13. 至于有关该军队的良好且最新的叙述, 参见 Milns, p. 48。

14. Milns, *ibid.*

15. Justin 11.6.4-7, 这是一个关键的段落, 但我只见过一人在讨论问题曾加以利用, 见于 Griffith, *GR*, p. 132。至于关键职位在帕美尼翁亲属及支持者中的分配, 参见 Badian, *TAPhA* 91 (1960), 327-8。

16. Tarn, vol. I, pp. 12-13.

17. Justin 12.6.17.

18. Diog. Laert. 5.5, citing Homer, *Iliad* 18.95; cf. T. S. Brown, in *MP*, pp. 36-7.

19. 阿特金森对卡利斯特涅斯的职位的分析不仅精彩, 而且在政治上十分敏锐(J. E. Atkinson, 'Primary sources and the Alexanderreich', *Acta Class.* (Cape Town), 6 (1963), 125-37, esp. pp. 126-7), 我非常受益于此。作为类比, 阿特金森援引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例子, 后者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雇佣两位有名望的美国记者巴特利特(Bartlett)和艾尔索普(Alsop), 来为他撰写执行委员会的发展历程。至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侄子缺乏常识的观点, 参见 Plut. *Alex.* 54; Johannes Lydus *De Mens.* 4.7

7。

20. 至于这些蹩脚诗人，参见 QC 8.5.7-8; cf. Tarn, vol. II, pp. 55 ff., Brown, *MP*, pp. 38-9。关于科伊里罗斯，参见 Horace *Epp.* 2.1.232, Porphry on Horace *AP* 357。关于皮洛，参见 Sext. Emp. *Adv. Gramm.* 1.282。

21. Arrian 1.11.1-12; Diod. 17.16.3-4; Plut. *Moral.* 1096B; Athen. 12. 538c, 539d.

22. Callisthenes ap. Arrian 4.10.2; Eratosthenes ap. Plut. *Alex.* 15.2; 关于塞琉古和拉奥狄刻的故事, Justin 15.4.1-6. 据说锚状胎记从塞琉古家族中遗传下来的 (ibid., §9)：可以猜想，这正是合法性的便利证据。

23. Olmstead, p. 496.

24. Arrian 1.11.3-6; cf. Wilcken, p. 84; Hamilton, *PA*, p. 38; Hogarth, p. 177; C. A. Robinson Jr *AHR* 62 (1957), 328-9 = *MP*, pp. 56-7.

25. 这一行人需要六十艘船来横渡海峡，参见 Diod. 17.17.1。

26. Arrian 1.11.5-7; Justin 11.5.4-10; Diod. 17.7.1-2; Hdt 7.54. 至于掷枪之事（只有查斯丁有记载，但这并不必然否定其真实性），参见 W Schmitthenner, *Saeculum* 19 (1968), 31 ff., 和 H. U. Instinsky, *Alexander d er Grosse am Hellespont* (Codesburg, 1949), 后者强烈主张征服波斯大王是有预谋的，并且强调亚历山大的泛希腊宣传涉及了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Contra, F. W. Walbank, *JHS* 70 (1950), 80 (reviewing Instinsky), and Badian, *GR*, p. 166, n. 1 and *Stud. Ehrenb.*, p. 43, with n. 29.

27. Justin 11.5.11: ‘*precatus ne se regem illae terrae invitae accipiant*’. 关于亚历山大根本的宗教虔诚的出色探究，参见 Lowell Edmunds, *GRB yS* 12 (1971), 363-91。

28. Strabo 13.1.25-6, C. 593, with Jones’s notes *ad loc.*, Loeb edn, vol. VI, pp. 50-51.

29. Arrian 1. 11.7-8, 1.12.1; Plut. *Alex.* 15-4, *Moral.* 331D; Diod. 17.7.3; Justin 11.5.12; Aelian *VH* 12.7, 9.38; cf. Olmstead, p. 496. 至于普里阿摩斯被涅奥普托勒摩斯杀害一事，参见 Paus. 4.7.3. 10.27; Virgil, *Aen.* 2.547。至于阿基琉斯弹奏里拉琴一事，可参见 *Iliad* 9.185-91。埃里安明显暗示说阿基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因而亚历山大和赫淮斯提翁）是同性恋关系。持有此类观点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埃斯库罗斯（参见 frs. 228-9 Mette，并参看 Plato, *Symp.* 179E-180B），不过荷马本人如何解释那就见仁见智了，柏拉图的说法有一定的偏见。

30. Diod. 17.17.6-17.18.1, with Welles's note, p. 167; cf. 17.21.2; Plut. *Alex.* 15.4; Arrian 1.11.7-8, cf. 1.1 1.2, 6.9.3.

31. Arrian 1.12.6; Diod. 17.17.3, cf. Hdt 7.44; Justin 11.6.1; Polyaeus 4.3.15. 亚历山大在此借用了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用以对付伯里克利的计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伯里克利早就预料到他们会用来损害他的名誉的诡计），参见 Plut. *Per.* 33。

32. 据保萨尼阿斯的阐释（6.18.2-4），阿那克西美尼自己声称他是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哲学计策而请求亚历山大绕开兰普萨科斯的；但真相隐含在普林尼的著作（Pliny, *HN* 37.193），他所获得的回报是当地矿坑出产极为贵重的宝石。门农清楚地意识到亚历山大的财政困境，参见 Diod. 17.18.2-4，并参看 Badian, *Stud. Ehrenb.*, p. 43 and n. 32。

33. Arrian 1.12.6-7.

34. Diod. 17.18.2. 米尔恩斯（Milns, p. 56）提示我们，由于公元前336年腓力被刺，直到公元前334年他们仍旧相信不会有侵略行动发生。这看起来比查斯丁的解释（Justin 11.6.9）更可信，后者认为大流士故意让马其顿人入侵他的国土，以便在一场大战中打败他们，从而获得更大的荣誉。

35. Arrian 1.12; Diod. 17.18.2-4. 戴维斯（E. W. Davis，参见参考文

献）探讨了大多数的难题（他的研究是近些年唯一细致研究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专论），不过尽管他对塔恩、沙赫尔迈尔和贝洛赫的批评非常有力，但他本人却没能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意见。

36. Plut. *Alex.* 16.1.3; Arrian 1.13.4; Strabo 13.1.11, C. 587; cf. Schreier, p. 15.

37. 正如塔恩提示我们的那样（*CAH*, vol. VI, p. 361= *AG*, vol. I, p. 16; cf. Fuller, pp. 148-9），波斯人可能决心“通过杀死亚历山大来把战争扼杀在摇篮里”，但这是古代所有战斗中惯有的目标，许多现代战争也是如此（1942年长距离沙漠群突袭隆美尔[Rommel]的司令部便是一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无疑是从属于波斯人的主要战略计划的。

38. cf. Fuller, p. 149.

39. 至于对人数的详尽分析，参见第498页及以下。

40. Arrian 1.13 *passim*; Diod. 17.19.1-2; Plut. *Alex.* 16.1-2.

41. cf. Hamilton, *PA*, p. 39, and reff. there cited.

42. Arrian 1.14.5-6, 15.1-5; Plut. *Alex.* 16.2-4; cf. Brunt, *JHS* 83 (1963), 27.

43. 至于“不良”建议的例子（包括本处），参见 Arrian 1.18.6 ff., Plut. *Alex.* 29.3, 31.10 ff.。在高加美拉之战中的事件，参见 *ibid.*, 33.10。至于卡利斯特涅斯在诋毁帕美尼翁过程中的作用，现在可参见汉密尔顿出色且广博的注释（Hamilton, *PA*, p. 89）——至于亚历山大特有的想要“立即把失败补回来”的欲望，参见 Badian, *Stud. Ehrenb.*, p. 47。

44. 让人惊奇的是，在古代这种简单的计策似乎经常奏效：例如尼基亚斯在撤退到阿西纳洛斯河的过程中就用过这一计策（Thuc. 7.80），大流士一世在斯基泰时也用过（Hdt. 4.134-5）。这并不一定要从阿里安的另一处中（Arrian 5.9 ff.）推出，此类行动需要数天的精心准备

。无论如何，在当天下午的事件之后，阿尔西特斯不大可能想到在次日之前亚历山大一方还会有别的行动。

45. Diod. 17.19.3; Polyaeus 4.3.16; Justin 11.6.10-12; cf. Schreider, p. 15. 至于对资料来源和战术的详细讨论。阿里安（Arrian 1.14.4）认为波斯骑兵是沿着河流部署的，前一天下午发起过攻击。波吕埃诺斯的叙述——只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他所说的既不是第一次进攻（如果确实发生过），也不是关键的战斗；因而可以从逻辑上推断，这是在黎明渡河时发生的一次小型战斗。事实上，要是像亚历山大这种规模的大军在渡河时竟完全没有被发现，那也太奇怪了。

46. 类似的头盔出现在一款德卡德拉克马银币上，这款银币是他（在公元前324年？）铸造出来用以纪念他在杰赫勒姆河战胜印度王公波洛斯（保拉瓦）的：参见 Hamilton, *PA*, p. 40, and reff. there cited.

47. Diod. 17.19.6, 20.2; 参看 Arrian 1.14.7（托勒密将此转移到第一次进攻上面），并可参见 Fuller, pp. 151-2，富勒非常理解这种调动，尽管他沿用的是托勒密-阿里斯托布罗斯的文本。

48. 这里所记载的战斗细节的主要资料，参见 Diod. 17.19.6-21.5; Plut. *Alex.* 16.4-7; Arrian 1.15.6-16.3。

49. 参见 Diod. 17.21.6; Plut. *Alex.* 16.6; Arrian 1.16.2-3, 5。

50. Arrian 1.16.4; Plut. *Alex.* 16.7 (on the authority of Aristobulus); Justin 11.6.12.

51. 至于狄昂的雕像（由吕西波斯制作），参见 Plut. *Alex.* 16.8; Arrian 1.16.4; Veil. Pat. 1.11.3-4。

52. Arrian 1.16.2-3, 6; Plut. *Alex.* 16.6-7.

53. Arrian 1.16.7; Plut. *Alex.* 16.8; cf. (e.g.) Wilcken, pp. 88-9, and my Appendix, pp. 508 ff.

54. Diod. 17.21.6; Arrian 1.16.5; Plut. *Alex.* 16.8; Justin 11.6.13.

第六章

1. Badian, *Stud. Ehrenb.*, p. 46, cf. *GR*, p. 166.
2. Badian, *Stud. Ehrenb.*, *ibid.*
3. Arrian 1.17.1-2.
4. Arrian 1.17.8; Diod. 17.22.1.
5. Plut, *Alex.* 17.1; Diod. 17.21.7; Arrian 1.17.3-8. 至于波斯到萨尔狄斯和以弗所的皇家大道，参见 Cary,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1949), p. 151; cf. pp. 162-3.
6. 参看格里菲斯发人深思的讨论 (Griffith, *Proc. Camb. Phil. Soc.* 10 (1964), 23-39, esp. pp. 24, 31-4)，我在此利用到了他的许多内容。至于亚历山大对当地铸币厂的处置，参见 Bellinger, pp. 46-7；至于他处置吕底亚人的总体情况，参见巴迪安的敏锐评论 (Badian, *Stud. Ehrenb.*, p. 44-5)。
7. Arrian 1.17.9-13, 18.2; Strabo 14.1.22-3, C. 641; cf. Badian, *Stud. Ehrenb.*, pp. 45-6; Ehrenberg,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p. 14; Tod, vol. II, p. 142; Milns, *Historia* 15 (1966), 256.
8. Aelian *VH* 2.3; Pliny *HN* 32.95, 35.16.12; cf. Bieber, pp. 37-8, 45 ff.; E. von Schwarzenberg, 'Der lysippische Alexander', *Bonner Jahrbücher*, 167 (1967), 58 ff.
9. Arrian 1.18.1-2; cf. Badian, *Stud. Ehrenb.*, pp. 45-6, 53, *GR*, pp. 167-8; Bellinger, p. 48; Ehrenberg,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ch. 1. 至于亚历山大这时期资金短缺的情况，参见 Arrian 1.20.1 and p. 156.
10. Paus. 2.1.5, 7.3.9, 7.5.1-3; cf. Hdt 1.16; Strabo 14.1.37, C. 646.

11. Arrian 1.18.4.

12. 希腊舰队用三天时间把波斯人赶到米利都去，由此可以肯定地推论出舰队就在以弗所；大流士的海军分队在通过罗得岛前不大可能被发现，我们必须得算上国王获得消息的时间。

13. 达斯居利翁和萨尔狄斯的驻军共有5000人的同盟军队；帕美尼翁的部队拥有余下的2500人，外加2500名马其顿人；阿尔基马科斯的军团也有5000人。参见 Arrian 1.17.7-8, 18.1。这些不包括与阿桑德洛斯一同留下的骑兵和轻装部队。

14. Tod, vol. II, nos. 184, 185, pp. 241-4; cf. Badian, *Stud. Ehrenb.*, pp. 47-8.

15. Arrian 1.18.3-19.6; Diod. 17.22.1-5; Plut. *Alex.* 17.1, *Moral.* 180A 8; Val. Max. 1.1 ext. §5; Hdt 6.6; Strabo 14.1.7, C. 635; cf. Tarn, vol. I, pp. 18-19; Stark, *AP*, pp. 230-32; Milns, pp. 60-61.

16. Arrian 1.20.1; Diod. 17.22.5- 23.1; QC 3.1.19.

17. Badian, *Stud. Ehrenb.*, p. 48 (这是目前对该问题最务实的讨论); cf. Tarn, vol. I, pp. 18-19 (此人认可托勒密的字面上的意思); Stark, *AP*, pp. 231-2, and Milns, p. 61 (米尔恩斯补充了一些有益的要件).

18. Diod. 15.90, 17.23.4-6; Arrian 1.20. 2-3.

19. Arrian 1.23.7-8; Strabo 14.2.17. C. 656-7; Diod. 17.24.2-3; Plut. *Alex.* 22.4-5, *Moral.* 180A 9 ; cf. Badian, *GR*, pp. 170-71, Stark, *AP*, pp. 234-5.

20. Diod. 17.24.1-3，这是一段极有启发意义的叙述。

21. 斯塔克（Stark *AP*, pp. 232-4）指出了一条经由阿拉班达和拉格尼亚的路线；但他没有考虑到与伊阿索斯相关的史料（参见下面注释22）。

22. Diod. 17.24.1.

23. Tod, vol. II, no. 190 and note *ad loc.*, pp. 252-3.

24. Pliny *HN* 9.8.27; cf. Athen. 13.606d-e. 这则故事的另一版本见于 Aelian, *HA* 6.15; 其中, 这个男孩无意间刺中海豚直立的背鳍, 海豚便因此而死。

25. 至于围攻哈利卡那索斯的大体情况, 参见 Arrian 1.20.2-23.6 *passim*; Diod. 17.24.4-27.6 *passim*; cf. Fuller, pp. 200-206。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我非常受益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的恩格斯先生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Some problems on the provisioning of Alexander’s army’, by Mr Don Engel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尤可参见下面注释27中的材料。

26. So Fuller, p. 205.

27. F. Maurice, *JHS* 50 (1030), 221;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Turkey*, vol. II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of Great Britain, 1943), pp. 36, 147; QC 3.5.6.

28. 有的版本(Diod. 17.25.5; Arrian 1.21.1-2)说进攻是由佩狄卡斯兵团中的两名酒醉兵士无意中挑战的, 这种说法是托勒密为亚历山大开脱而牺牲私敌佩狄卡斯的另一例证, 那里有关于在进攻忒拜时发生的类似事件的阐述。参看 Diod. 17. 12.3和 Milns, p. 63。

29. Arrian 1.22.6. 狄奥多罗斯(Diodorus 17.27.4)说马其顿人强行突入; 但这样一来, 亚历山大的撤退就不好理解了。

30. 普林尼(Pliny, *HN* 5.31.134)记载了一则轶事, 据说亚历山大把哈利卡那索斯的所有同性恋都赶到这座滨海小岛上, 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基奈多波利斯。

31. Arrian 1.23.6-7, 1.24.1-2, 2.5.7; QC 3.1.1, 3.7.4.

32. Arrian 1.24.3-4, 1.29.3-4; Diod. 17.27.6-7; Plut. *Alex.* 17.2.

33. 至于亚历山大在吕底亚、潘菲利亚和皮西狄亚的战役地图，我主要遵循的是 Freya Stark, *JHS* 78 (1958), 102-20, = *AP*, pp. 229 ff., and *Geog. Journ.* 122 (1956), 294-305。

34. Polyaeus 5.35; Arrian 3.6.6. 公元前379年，重新占领忒拜的民主派流亡者也曾使用过类似的诡计，参见 Xen. *Hell.* 5.4.1-5。

35. Arrian 1.24.4-5; Strabo 14.3.9, C. 666; cf. Stark, *AP*, pp. 238-43.

36. Plut. *Alex.* 17.2-3; cf. Stark, *AP*, pp. 245-7.

37. Arrian 1.26.1; Plut. *Alex.* 17.4; cf. Stark, *AP*, pp. 86-7.

38. Arrian 1.25 *passim*; Justin 11.7.1-2; 参看 Diod. 17.32.1-2，狄奥多罗斯给出了奥林匹娅斯信件的细节，但把整个事件往后推了很多，那时亚历山大已经在塔尔索斯了。

39. Plut. *Alex.* 17.3-5; Arrian 1.26.1-2; Callisthenes ap. Schol. T. Eustath. Homer, *Iliad* 14.29. 近来有人提出（例如 Pearson, pp. 36 ff., 参看 Badian *Gnomon* 33 (1961), 661），卡利斯特涅斯没有说过大海向亚历山大敬礼，该说法可能出自某位注疏家。我认为这是最不可能的事。巴迪安正确地指出，卡利斯特涅斯是个有原则的人，最后为信念而死。但是，可以为原则而死的人未必总是靠原则活着，正如每个天主教教徒都知道的那样；卡利斯特涅斯的思想在语言修辞和生命的严酷现实之间分裂，绝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知识训练中的一种独特的官僚元素。

40. Menander ap. Plut. *Alex.* 17.4 (=Kock, vol. III, p. 240); Strabo 14.3.9. C. 666-7.

41. 至于潘菲利亚海岸的地形图，参见 Stark, *AP*, pp. 248 ff., 和 Snyder, pp. 51-2。

42. Diod. 17.28.1-5; Arrian 1.24.6; cf. Stark, *AP*, pp. 80-81, 250-51.

43. Arrian 1.26.2-27.4; 参看 Badian, *GR*, p. 167, 和 *Stud. Ehrenb.*, p. 49, 后者写道: “这时期亚洲的希腊城邦的自由, 和斯大林时代的卫星国或者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 (Victor Emmanuel III) 的状况并无二致, 人们都说后者可以自由地做墨索里尼想要的任何事情。”

44. Arrian 1.27.6-28.1; 参看 Stark, *AP*, pp. 253-5, 在复原事件方面我非常受益于斯塔克。

45. Stark, *AP*, p. 103. 至于萨伽拉索斯, 参见 Arrian 1.28.2-8。

46. Arrian 1.29.1-4; QC 3.1.1-13; Hdt 7.26; Xen. *Anab.* 1.2.7; Livy 38.13; cf. Cary,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pp. 154-5; Tarn, vol. II, PP. 177-8.

47. Diod. 17.29.1-3, 17.31.3-4; Arrian 2.1.1-3 (阿里安把门农之死置于攻下密提勒涅之前)。至于科斯和萨摩斯的反叛, 参见 Arrian 1.19.8; Diod. 17.27.5-6。至于基俄斯, 参看 Chios, cf. Tod, vol. II, no. 192, with commentary pp. 263-7。至于米利都和普里厄涅, 参见 Badian, *Stud. Ehrenb.*, pp. 48-50, with reff. *ad loc.*

48. 至于戈尔狄昂之节一事, 参见 Arrian 2.3 *passim*; QC 3.1.14-18; Plut. *Alex.* 18.1-2; Justin 11.7 *passim*; schol. Eur. *Hipp.* 671; cf. Schachermeyr, pp. 159-62, and especially E. A. Fredricksmeyer's *CPh* 56 (1961), 160-68。

49. QC 3.1.9-10, 19-20; Arrian 1.29.56, 2.2.3; Diod. 17.31.3-4.

50. Arrian 2.4.1-3; QC 3.1.22-4; Plut. *Alex.* 18.3; Diod. 17.29.4, 17.31.4. 至于这个夏天的关键几个月的时间表, 参见 Miltner, *Jahr. Oest. Arch. Inst.* 28 (1933), 71; Judeich, in Kromayer and Veith, *Antike Schlachtfelder* 4 (Berlin, 1929), 355-6; and, now, Murison, *Historia* 21 (1972), 404-6 with n. 21。我不接受他因遵从贝洛赫 (Beloch, *GG* III 22 311-12) 而得出的意见 (诚然只是尝试性的), 亦即亚历山大在戈尔狄昂逗留是为了观察爱琴

海的局势。另一方面，他可能花了比一般认为的更多的时间去“平定”安库拉附近地区，因为大流士走到巴比伦的消息到了7月中旬（Murison 406）才传到他那里，而他一直9月份才抵达塔尔索斯。

51. Arrian 2.1.3-2.2.5; QC 3.2 *passim*, 3.3.1; Diod. 17.30 *passim*, 31.1-2.

52. Arrian 2.4.2-6; QC 3.1.24, 3.4.1-15; Justin 11.8.1-2; cf. Snyder, pp. 57-8. 亚历山大在补给不良的狭长地带强行军的做法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先生（参见上面注释25）向我指出的，我非常受益于此。

53. 关于进入塔尔索斯的时间，参见 Bellinger, pp. 10-11，并参看 Judeich, op. cit., p. 355。关于亚历山大生病，参见 Diod. 17.41.4-6; Arrian 2.4.7-11; QC 3.5-6 *passim*, 3.7.1; Justin 11.8.3-9; Plut. *Alex.* 19; Val. Max. 3.8 ext. §6; Pap. Oxyrh. 1798, fr. 44, col. 1; cf. Strabo 14.5.12, C. 673。库辛先生（Mr David Kusin）告诉我，亚历山大的许多症状——包括他呼吸和身体散发出的带甜味的香气（Plut. *Alex.* 4.2）以及在极端生理或情绪的休克之后出现的三天的康复—昏迷——都是临界性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54. 至于亚历山大在奇里乞亚、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铸币活动，参见 Bellinger, pp. 10-11, 34 ff.，特别是第54—55页，文中有引用到。帕美尼翁在亚历山德勒塔湾附近的行动，参见 Diod. 17.32.2; Arrian 2.5.1; QC 3.7.6-7。

55. Arrian 3.6.7; Plut. *Alex.* 41.4; cf. (with reservations) Badian, *Historia* 9 (1960), 245-6. 至于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南部的战役，参见 Arist. fr. 614 (Rose); Justin 12.2.1-11; Livy 8.24; QC 8.1.37; Plut. *Moral.* 32 6B（至于克里奥帕特拉众所周知的性生活方面的放荡，参看818B-C）；Strabo 6.1.5, C. 256, 6.3.4, c. 280。

56. 许多史家都说到了这个故事，参见 Arrian 2.5.2-4; Aristobulus a

p. Athen. 12.530b-c; Plut. *Moral.* 336C, cf. 330F; Strabo 14.5.9, c. 672; Photius and the *Suda* s.v. Sardanapalos^④。那个墓和铭文几乎不可能就是传说的那个样子，参见 Snyder, p. 60，斯奈德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至于亚里士多德对这则轶事的使用，参见 *Eth. Eud.* 1216a 16 (cf. Cicero, *Tusc. Disp.* 5.35), and Jaeger, *Aristotle*, pp. 253-5。

57.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保卫一条陆路通道，这条通道是进入奇里乞亚关以西的安纳托亚的唯一一条良好道路，参见 Stark, *AP*, p. 16。

58. Arrian 2.5.6-2.6.2; Diod. 17.32.4; QC 3.7.2-15. 亚历山大和帕美尼翁在伊索斯之战的行动很难根据现有史料复原出来。亚历山大犯了一次严重的误判，而托勒密则想尽办法来尽可能地掩盖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阿里安把约拿之柱和叙利亚关相混淆，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在马罗斯—卡斯塔巴拉—密里安德罗斯这一段路上，亚历山大一定以惊人的速度行动，在约48小时里走完了这段路程（约75英里），这一速度甚至激起学者们的质疑（参见 Murison, *op. cit.*, p. 409, nn. 30, 32），但如果是按其先头部队的速度的话也决非不可能。

59. 对皮那洛斯河的定位尚且存疑：至于不同观点的概要参见 Murison, *op. cit.*, p. 403, n. 10。缪里森本人遵从扬克（Janke），后者则坚定地认为是德利河；但扬克的分析近来受到另一位地形家斯塔克（Freya Stark）的反驳。参见 *AP* p. 6, note cited by Murison。恩格斯先生同样认为是巴耶斯河。

60. Arrian 2.7.1-2.8.3, 2.11.9-10; QC 3.8.11-21; Diod. 17.32.3; Plut. *Alex.* 20.1-3; Polyb. 12.17.2-4, 12.19.4-9; Pap. Oxyrh. 1798, fr. 44, col. 2; cf. Tarn, vol. I, pp. 25-6 (quoted here).

61. 关于这个要点，参见 Marsden, *The Campaign of Gaugamela*, pp. 4-5。

62. 至于伊索斯之战，参见 Diod. 17.33-35.4; Polyb. 12.17-23; QC 3.8-11.5; Justin 11.9.1-9; Plut. *Alex.* 20.1-5, *Moral.* 341B-C; Arrian 2.8-11 *passim*; cf. Fuller, pp. 157-62, Marsden, pp. 1-6。

63. Diod. 17.35-37.4; Plut. *Alex.* 20.5-21.3; QC 3.11.16-12.12; Justin 11.9.12-16; cf. Tarn, vol. I, p. 28 (quoted here).

64. cf. Jaeger, *Aristotle*, pp. 132 ff.; Eddy, *The King Must Die*, pp. 62-3 and reff. there cited.

第七章

1. QC 3.12.15-26; Diod. 17.37.5-38.7; Arrian 2.12.6-8; Val. Max 4.7 ext. §2.

2. Arrian 2.12.1-2, 14.7, 3.6.4 ff. ; Plut. *Alex.* 24.1-2; Ael. *VH* 9.3; cf. Wilcken, pp. 105-7, Milns, pp. 85-6. 至于亚历山大的铸币活动，参见 E. T. Newell（参考文献（一）c）和 Bellinger, pp. 10-11。

3. Arrian 2.13.8-14 *passim*; QC 4.1.6-14; Diod. 17.39.1-2; Justin 11.12.1-2; Isocr. *Phil.* 120, *Paneg.* 162; cf. F. M. Abel, *Rev. Bibl.* 43 (1934/5), 528-39 (有关亚历山大在腓尼基的行军地形图); Hamilton, *PA*, pp. 76-7, with reff. there cited; Marsden, pp. 6-7. 关于大流士和亚历山大之间的信件往来，参见 E. Mikrojannakis, *AM*, pp. 103-8，其中总结作者早期用希腊语写成的著作（参见参考文献（二）），并且尤可参见 G. T. Griffith, *Proc. Camb. Phil. Soc.* 194 [ns14] (1968), 33-48。

4. Arrian 2.13.1-6; Diod. 17.39.1, 48.1-6; QC 4.1.1-3, 27, 29-40 *passim*, 4.8.15; Justin 9.5.3; cf. Marsden, pp. 6-7, Parke, p. 200, Badian, *Hermes*, 95 (1967), 176-9; Tarn, vol. II, p. 73 (关于交通瓶颈); Burn, *JHS*, 72 (1952), 81-3 (关于大流士的西部战略)。

5. Arrian 2.11.10, 15 *passim*; QC 3.13.1-17; Plut. *Alex.* 21.4-5, 22.2, 26.1, *Moral.* 85C; Athen. 11.781-2, 784a-b, 13.607f-608a; Justin 11.10.1-3; Cic. *Pro Arch.* 10; Plin., *HN* 7.29.108-9; Strabo 13.1.27, C. 594; cf. Bellinger, p. 56. 亚历山大对使节们的处置明显不合逻辑。他释放了两个忒拜人，因为一个是奥林匹亚冠军，另一个是贵族；他让雅典人留在身边作为上宾（虽然雅典是同盟的成员），而把斯巴达人公开拘禁起来（虽然斯巴达从未签署过同盟条约）。对巴尔西涅事件最持怀疑态度的是塔恩，这也是可预料到的，参见他的附录（*excursus* §20, ‘Barsine and her son Heracles’, vol. II, pp. 330-38）。*Contra*, Berve, *APG*, II, nos. 206 and 353, pp. 102-4, 168. 很可能（参见 Arrian 7.4.4）这里出现了身份上的混淆，“巴尔西涅”也是大流士长女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帕美尼翁有充足的王朝联姻的理由去促成此次结合。大流士本人也适时提出类似的条件：参见 Arrian 2.25.1 ff., and pp. 264, 287, above, with nn. 56 and 76 *ad loc.*

6. Arrian 2.15.6; QC 4.1.15-26; Diod. 17.46.4-6; Justin 11.10.8-9; Plut. *Moral.* 340D; Anaximenes ap. Athen. 12.531d-e; cf. Snyder, pp. 78-9; Bieber, pp. 48-52; Newell, *Sidon and Ake*, pp. 22-3, *Royal Greek Portrait Coins*, p. 13.

7. Arrian 2.15.6-7; QC 4.2.1-2; Justin 11.10.10.

8. Diod. 17.40.3.

9. QC 4.2.10.

10. Arrian 2.15.7, 16.7-8; QC 4.2.2-5; Diod. 17.40.2; Justin 11.10.11.

11. Diod. 17.40.3; QC 4.2.10-12; Justin 11.10.12.

12. QC 4.2.15.

13. Arrian 2.17 *passim*; cf. QC 4.2.18.

14. QC 4.2.6-9, 16; Arrian 2.18.1-2, 21.4; Diod. 17.40.4; Plut. *Alex.* 24

.3.

15. QC 4.2.17; Arrian *ibid.*; Plut. *ibid.*

16. 至于围攻提尔城的大体情况，参见 Diod. 17.40.2-46 *passim*; Arrian 2.15.7-24 *passim*; QC 4.2-4 *passim*; Plut. *Alex.* 24.3-25.2; Polyaeus 4.3.4; Justin 11.10.10-14; Zachariah ix, 1-8; cf. Fuller, pp. 206-16; Abel, pp. 543-4; K. Elliger, *Zeitschr. f. Alttest. Wiss.* 62 (1949/50), 63-115; M. Delcor, *Vet. Test.* 1 (1951), 110-24.

17. Diod. 17.40.5; QC 4.2.18 .

18. QC 4.2.18（材来自黎巴嫩山）； Josephus *Ant. Jud.* 11.317。虽然约瑟夫斯涉及亚历山大与犹太人关系的叙述（*ibid.*, §§ 304-5, 313-45），大都是基于传说而非历史事实，但我们仍可从其中抽出一些真实的细节，这里所引用的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19. Arrian 2.18.3-4.

20. Diod. 17.41.1; QC 4.2.20.

21. Diod. 17.4 1.2; QC 4.3.20; Justin 11.10.14.

22. Diod. 17.41.3-4; QC 4.2.12.

23. Arrian 2.18.5; QC 4.2.21-2.

24. Arrian 2.18.4-6; QC 4.2.23-4.

25. QC 4.2.24.

26. Arrian 2.19.1-5; Diod. 17.42.1-2; QC 4.2.24, 3.2-5.

27. Arrian 2.19.6-20.2-3; QC 4.3.1; Plut. *Alex.* 24.2.

28. Arrian 2.20.4-5; Plut. *Alex.* 24.6-8; Polyaeus 4.3.4; cf. Snyder, PP . 85-6.

29. QC 4.3-11; Arrian 2.20.5.
30. Arrian 2.20.9-10; Diod. 17.43.3 ; QC 4.3-12.
31. Arrian *ibid.*; Diod. *ibid.*; QC 4.3-11.
32. Diod. 17.42.5.
33. QC 4.3.6-7, 9-10; Diod. 17.42.5- 6.
34. Arrian 2.21.1 ff.; QC 4.3.13; Diod. 17.42.5-7.
35. Arrian *ibid.*; QC 4.3.14-15.
36. Arrian 2.21.3; Diod. 17.43.1-3; QC 4.3.13.
37. QC 4.3.16-18.
38. Arrian 2.21.4; Diod. 17.43.7-44 *passim*.
39. QC 4.3.19-20.
40. QC 4.3.21-2; Diod. 17.41.7-8, cf. 23; Plut. *Alex.* 24.3-4.
41. Arrian 2.21.5-7; cf. QC 4.3-10.
42. Diod. 17.43.5.
43. QC 4.3.24-6; Diod. 17.43-4 *passim*.
44. QC 4.4.1; Diod. 17.45.7.
45. Arrian 2.21.8-22.7 *passim*; QC 4.3.24, 4.4.6-9.
46. Arrian 2.22.7; Diod. 17.43.4-5.
47. Plut. *Alex.* 25.1-2; Arrian 2.23.1; QC 4.4.10.
48. Arrian 2.23.2-3.

49. Arrian 2.23.4-6, 24.1; Diod. 17.45-46 *passim*; QC 4.4.10-11.

50. Diod. 17.46.3-4; Arrian 2.24.2; QC 4.4.12-13.

51. Arrian 2.24.3-4; Diod. 17.46.4; QC 4.4.13.

52. QC 4.4.15-16.

53. QC 4.4.17-18; Arrian 2.24.5; Diod. 17.46.6; Plut. *Alex.* 4.4.

54. Arrian 2.24.5-6; Diod. 17.46.4; QC 4.4.16-18.

55. 至于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的行动，参见 QC 4.1.35-6, 4.5.13-18, 22, cf. 3.1.24。法尔那巴佐斯被赫格罗科斯俘虏，但随后逃走了（Arrian 2.3）。

56. 至于大流士第二次使节去亚历山大那里，参见 QC 4.5.1-8; Just in 11.12.3-4; Diod. 17.54.1。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与大部分的古代记载相对立——只有两次使节出使：可参见 Hamilton, p. 77, 和那里引用的其他 *reff.*，作者主要依据 Arrian 2.25.1-3。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至于在高加美拉战役不久前的第三次使节出使。在提尔城时，大流士当然不会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全部领土。无论格里菲斯还是密克罗雅尼斯（Mikrojanis），他们没能澄清这一点。

57. 关于大流士在巴比伦集结一支新的大军，参见 Diod. 17.39.3-4; QC 4.6.1-4, 4.9.1-2。

58. Arrian 2.25.4-27; QC 4.5.9-12, 4.6.7-30; Diod. 17.48.6-7; Hegesias ap. Dion. Hal. *De Camp. Verb.* 18, pp. 123-6 R; cf. Abel, pp. 43 ff.; Fuller, pp. 216-18. 关于后勤问题，我必须再次承认我从恩格斯先生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关于处死巴提斯的神话方面的先例，亚历山大模仿的是阿基琉斯，可能模仿得比荷马说的还更接近；索福克勒斯（*Ajax* 1031）和欧里庇得斯（*Androm.* 399）都知道一种传统说法，赫克托尔还没死时阿基琉斯便切开他的脚踝，把他系在战车后面，拖着他围着特洛伊的城墙奔

驰。没有理由假定亚历山大既不知道这种传说，也不会去模仿。

59. 关于伤亡和重新募兵，参见 Arrian 2.24.5-6; Diod. 17.49. 1; QC 4.6.30-31; cf. Badian, *Hermes* 95 (1967), 187。关于向埃及进军，参见 Diod. 17.49.1-2; QC 4.7.1-3; Arrian 3.1.1-4; cf. Bellinger, p. 66。关于亚历山大加冕为法老，参见 Beloch, *Griech. Gesch.* III, ii, p. 315; Wilcken, pp. 112-16。亚历山大的未来新城的选址，参见 Diod. 17.52.1-3; Arrian 3.1.5; Strabo 17.1.78, C. 792-4; cf. Welles, *Historia* 11 (1962), 271 ff.; Borza ap. Wilcken, pp. 335-6。至于荷马提及法罗斯岛，参见 *Od.* 4.354-5, cited by Plut. *Alex.* 26.3。

60. Arrian 3.2.2-7; Diod. 18.48.2, cf. Plut. *Phoc.* 30. 2; Aeschin. *In Ctesiph.* 3.163 ff.; Plut. *Moral.* 818E; Tod, II, no. 192 (pp. 263-7); [Dem.] *On the Treaty with Alexander*, esp. §§4-5, 7, 10-11, 12, 17, 20, 26; cf. G. L. Cawkwell, *Phoenix* 15 (1961), 74-8; *JHS* 81 (1961), 34; Ehrenberg, *Alex. and the Greeks*, p. 27。

61. 关于此事，一般参见 Diod. 17.49.2-51.4; QC 4.7.6-32; Justin 11. 11.2-12; Plut. *Alex.* 26.6-27; Arrian 3.3-4; Strabo 17.1.43, C. 814; Ps-Call. 1. 30; Jul. Val. 1.23; Plut. *Moral.* 180D 15; Tod, II, no. 196。当代文献非常丰富而且经常很幼稚，我只提一些我觉得特别有帮助的：Olmstead, pp. 510-12 (with further reff.); Hamilton, *PA*, pp. 68-70; Tarn, vol. II, pp. 347-59; Wilcken, pp. 121-9; Welles, *Historia* 11 (1962), 275 ff. 至于进一步的参考资料，参见参考文献。

62. Arrian 3.3.1-2; Strabo 17.1.43, C. 115; cf. Snyder, pp. 102-3。

63. Arrian 3.3.3; Diod. 17.49.2-3; QC 4.7.6-9; cf. Welles, *ibid.*, pp. 280-81。

64. Arrian 3.3.3-6; Plut. *Alex.* 26.6-27.3; Diod. 17.49.3-6; QC 4.7.10-16。

65. Arrian 3.4.1-4; Diod. 17.50.1-5; QC 4.7.16-22.

66. Justin 11.11.6.

67. Diod. 17.50.6-51.4 *passim*; QC 4.7.23-8; Arrian 3.4.5; Plut. *Alex.* 27.3-5, 5-6; Justin 11.11.7-12. 流传下来的回复有：(1)亚历山大被呼为阿蒙神之子（Just. 11.11.7; QC 4.7.25; Diod. 17.51.1; Plut. *Alex.* 27.3-4），(2)对腓力的刺杀者的惩罚（Just. 11.11.9; QC 4.7.27; Diod. 17.51.2-3; Plut. *Alex.* *ibid.*），(3)亚历山大赢得战争和帝国（Justin 11.11.10; Diod. 17.51.2; QC 4.7.26; Plut. *Alex.* *ibid.*），(4)亚历山大被尊为神（Justin 11.11.11; Plut. *Alex.* 27.5-6），(5)新城选址得到认可（Welles, *Hist.* 11 (1962), 275-6），(6)关于当亚历山大成为亚洲之主时该向哪些神明献祭的指示（Arrian 6.19-4）。

68. Arrian 3.3.5, 3.4.5; QC 4.8.1; cf. Welles, *ibid.*, pp. 278-9; Borza *ap. Wilcken*, p. 336.

69. Diod. 17.52.1-7; Arrian 3.1.5-3.2.2; Plut. *Alex.* 26.2-6; Strabo 17.1.6-10, C. 791-5; QC 4.8.1-2, 5-6; Justin 11.11.13; Val. Max. 1.4.7 ext. §1; Pliny *HN* 5.11.62-3; cf. Welles, *ibid.*, p. 284 and n. 67 (for the date), 285-9.

70. Olmstead, p. 512 and reff. there cited; Strabo 17.1.43, C. 814.

71. Arrian 3.5.1-5, cf. 7.23.6 ff., *Succ.* 5; QC 4.8.4-6; [Arist.] *Oecon.* 1352a-1353b; cf. Badian, *GR*, pp. 171-2 and reff. there cited.

72. Arrian 3.6.1-5, 8; QC 4.8.7-15; Diod. 17.48.1-2; Plut. *Alex.* 29.1-3; cf. Badian, *Stud. Ehrenb.*, pp. 54-5, *Hist.* 9 (1960), 245-6; Griffith, *Proc. Camb. Phil. Soc.* 10 (1964), 23 ff.

73. 至于下面关于高加美拉之战的叙述，我非常受益于马斯登的杰出而深刻的专著（E. W. Marsden, *The Campaign of Gaugamela*, Liverpool, 1964），任何想要细致研究这场战役及其筹备过程的人都应当参考

此书。

74. Arrian 3.6.4, 3.7.1-2, 3.8.3-6; QC 4.6.1-4, 4.9.1-6, 12, 14-15, 4.10.11-15; Diod. 17.53.3-4; cf. Marsden, pp. 15-23.

75. Diod. 17.55.3-6; Arrian 3.7.2-3.8.1; QC 4.9.14-4.10.17.

76. 大流士妻子之死: Diod. 17.54.7; Plut. *Alex.* 30; QC 4.10.18-34; Justin 11.12.6-7; Plut. *Moral.* 338E。大流士所派的第三次使节: Diod. 17.54.1-6 (with Welles', note, Loeb edn, vol. VIII, p. 228, n. 1); QC 4.11 *passim*; cf. Arrian 2.25; Justin 11.12.7-16; Plut. *Alex.* 29.4.

77. 侦察巡逻: Arrian 3.9.1-3。亚历山大夜间在战术和后勤方面的考虑: QC 4.13.16-17; Plut. *Alex.* 31.2-8; Diod. 17.56.1; cf. Marsden, pp. 46-7。双方军队的相对规模: Marsden, ch. III *passim* and reff. there cited。至于亚历山大睡过头以及他在战斗当天早上所说的话, 参见 QC 4.13.23-4 (参看 Marsden, p. 9, 我在此借用了他的翻译); Plut. *Alex.* 32.2; Diod. 17.56.1。

78. Marsden, p. 64.

79. 关于战前的演说, 参见 QC 4.13.12-14; cf. Eddy, p. 31; Hamilton, *PA*, pp. 80 ff. (Darius); Plut. *Alex.* 33.1-2; cf. Wilcken, pp. 138-9 (Alexander)。

80. 至于高加美拉之战, 一般参见 Diod. 17.56-61; Arrian 3.8.7-3.15.7 *passim*; QC 4.12.18-4.16.33 *passim*; Plut. *Alex.* 32-3; Justin 11.13-14.5 *passim*; Plut. *Moral.* 180C 13; Polyaeus 4.3.6, 4.3.17; Strabo 16.1.3-4, C. 737, cf. 15.1.29, C. 399。我接受马斯登所确定的战斗日期——9月30日; 其他提出的日期有10月1日 (最常见的选择) 和9月27日 (Burn, *JHS* 72 (1952), 84-5)。另可参见 Hamilton, *PA*, pp. 83-90; Fuller, pp. 163-80; and Milns, pp. 122-6 (近来最好的总体叙述, 包含了马斯登观点的大多数有益之处)。

81. QC 5.1.3-9; Diod. 17.64.1-2; Arrian 3.16.1-2, cf. 3.19.1-2.

第八章

1. Plut. *Alex.* 34.1-2; QC 4.11.13; cf. Hamilton, *PA*, pp. 90-99, Wilckens, pp. 137-8. 至于希腊的僭主政治，参见[Dem.] *On the Treaty with Alexander* (xvii), §§4, 7, 10, 16; cf. Badian, *JHS* 81 (1961), 28.

2. 至于波斯宗教方面对亚历山大的抵抗，参见 Eddy, pp. 41-7, 58-63，此处我主要利用了作者的论述；至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玛哥斯僧教义的知识，参看 Jaeger, pp. 132-5.

3. Diod. 17.64.3; Arrian 3.16.3; QC 5.1.10-16; Plut. *Alex.* 35.1-7; Strabo 16.1.15, C. 743; cf. Hamilton, *PA*, p. 93. 普鲁塔克和斯特拉波（Plutarch and Strabo *ad loc.*）提到一个故事，说亚历山大把一个面庞纯净的小奴隶放在浴池中的火上，想看看石脑油被点燃后是否能防水。至于另一则亚历山大用火考验（又是一个小男孩成了牺牲品）轶事，参看 Val. Max. 3.3 ext. §1.

4. QC 5.1.20-39; Diod. 17.64.3-4; Arrian 3.16.3-5; Justin 11.14.8; cf. Hdt 1.179 ff. cf. Olmstead, pp. 237, 517-18; Badian, *Hermes* 95 (1967), 184-5; Andre Parrot, *Nineveh and Babylon* (1961), pp. 170-76; Eddy, p. 105.

5. 行政变化：Arrian 3.16.4-5；参见 QC 5.1.43-4, Diod. 17.64.6，重要的讨论参见 Badian, *GR*, pp. 173-5和*Hermes* 95 (1967), 185。巴比伦铸币厂：Bellinger, pp. 60-63, cf. Tarn, vol. I, pp. 130-31。卡利斯特涅斯的天文学研究：Aristotle *De Caelo* 2.12。埃萨吉拉的重建和亚历山大与迦勒底人的关系：Arrian *ut supr.* and 7.17.1-4, 7.24.4; Strabo 16.1.5, C. 738; Plut. *Alex.* 57.3; cf. Nock *JHS* 48 (1928), 21 ff.; and P. Jouguet, *Homm. J. Bidez et F. Cumont, Coll. Latomus* II (Brussels, 1949), p. 162。军队休假：QC 5.1.36-9; Diod. 17.64.4。欠付工资和奖金：Diod. 17.64.5-6; Plut. *Alex.* 34, 39;

and especially QC 5.1.45.

6. Diod. 17.65.1-66.7; Arrian 3.16.6-7; QC 5.1.39-5.2.15; Justin 11.14.9; Strabo 15.3-10, C. 731; Plut. *Alex.* 36; Esther 6-7; cf. Olmstead, pp. 164-5; Parrot, op. cit., 198-9; and especially R. Ghirshman, *Perse. Proto-iraniens. Mèdes. Achéménides* (Paris, 1963), pp. 139-45.

7. Diod. 17.66.3-7, with Welles's important note, pp. 306-7; QC 5.2.13-15; Plut. *Alex.* 37.4, cf. 56, *Moral.* 329D. 至于亚历山大对希绪冈比斯所犯的过失，参见 QC 5.2.18-22, cf. Diod. 17.67.

8. 色雷斯的反叛和佐皮里翁的斯基泰远征：Diod. 17.62; Plut. *Ages.* 15.4; Justin 12.1.4, 12.2.16-17, cf. QC 9.3.21; Tod, II, p. 272; Badian, *Hermes* 95 (1967), 178-81。阿吉斯在麦伽波利斯的失败：Diod. 17.62.6-63.4; QC 6.1; Justin 12.1.6-11; cf. Badian, *ibid.*, 190; Parke, pp. 201-2。博尔扎 (Borza, *CPh* 66 (1971), 230-35) 有力地提出叛乱是在高加美拉战役前被平定的，但尽管安提帕特关于此事以及其他事务（例如佐皮里翁悲剧的斯基泰远征和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南部的死亡，一直到公元前330年夏、大流士死后才送到亚历山大那里，当国王还在波斯波利斯时基本情况已经通过特使送达了（关于这个主题博尔扎收集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可进一步参见他的论文（‘Fire from Heaven: Alexander at Persepolis’, *CPh* 67 (1972), 233-45, esp. 239-40 (with n. 41) and 242），在文中博尔扎令人信服地提出，阿吉斯失败的消息可能在12月中旬之后的任何时间传到亚历山大那里，甚至可能早到10月份。关于僭主刺杀者雕像，参见 Arrian 3.16.4-8。关于给福基翁和色诺克拉特斯的贿赂，参见 Plut. *Phoc.* 18.1-4, *Moral.* 181E 30, 188C 9, 331E; Diog. Laert. 4.8-9。亚历山大还送了800塔兰特给亚里士多德作动物学研究之用（*Athen.* 9.398e）；埃里安（*Aelian*, *VH* 4.19）提出很有趣的一点，即这项拨款最初是腓力批准的。

9. Diod. 17.67-69 *passim*; QC 5.2.7-5.5.4 *passim*; Arrian 3.17.1-3.18.9

; Plut. *Alex.* 37; Polyaeus 4.3-27; cf. Stein, *Geogr. Journ.* 92 (1938), 314 ff., Fuller, pp. 226-34; Burn, *JHS* 72 (1952), 89-91. 我关于阿拉克塞斯桥的叙述遵从的是狄奥多罗斯 (Diodorus 17.69.1-2) 和库尔提乌斯 (Curtius 5.5.2-4), 一般更多接受的是阿里安的版本 (Arrian 3.18.6, 10), 但此版本本质上更不可信。梅迪科所收集的藏品中的大型角形杯-双耳陶瓶反映了对向导的收买, 这位向导向亚历山大指出了苏西亚关的山路, 参见 H. E. Del Medico, 'A propos du trésor de panagurišté', *Persica* 3 (1967/8), 37-67, pls. II-IV, figs. 8-15。至于不同的观点, 参见 G. Roux, *Ant. Kunst* 7 (1964), 30-41。残疾的希腊囚徒: Diod. 17.69; QC 5.5.5-24; Justin 11.14.11-12. 他们的人数据估计在800到4000人不等。

10. 至于这里玛哥斯僧对亚历山大的抵抗, 我非常受益于 Eddy, esp. pp. 12-19; 我还用到了他的西比林神谕的译文 (*Orac. Sib.* 3.388 ff.)。至于波斯波利斯的新年庆典, 参见 Ghirshman, op. cit., esp. pp. 147 ff.; cf. Parrot, pp. 193 ff.; Olmstead, pp. 172-84, 519-22。

11. Diod. 17-70-71; Plut. *Alex.* 37-1-2; QC 5.6.1-10; Justin 11.14.10; Strabo 15.3.9, C. 731; Athen. 12.514e; cf. Olmstead, pp. 519-524; Eddy, p. 29 and reff. there cited; Borza, *CPh* 67 (1972), 239, 243.

12. QC 5.6.10; Plut. *Alex.* 39.6-41.2, Moral. 333A; Strabo 15.3.7, C. 730; cf. Ghirshman, pp. 130 ff.

13. Badian, *Hermes* 95 (1967), 186 ff.; 至于不同观点, 参见 Borza-Wilcken, pp. 336-8。至于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逗留的时间长短, 参见 Plut. *Alex.* 37.3 (这受到了错误的质疑, 见于 Robinson, *Ephemerides*, pp. 74 ff., and *AJPh* 5 (1930), 22 ff.) ; cf. T. B. Jones, *CW* 28 (1935), 124 ff., and the excellent note by Hamilton, *PA*, pp. 98-9。冰和雪堆可能也阻碍了亚历山大的前进。

14. QC 5.6.11-20; Diod. 17.73.1; cf. Hamilton, *PA*, pp. 98-100.

15. Diod. 17.72; Plut. *Alex.* 38; QC 5.7.1-11; Strabo 15.3.6, C. 730; Athen. 576e; cf. Ghirshman, pp. 154 ff.; Borza-Wilcken, pp. 336-8; Hamilton, *PA*, pp. 99-101, and Borza, *CPh* 67 (1972), 243-4.

16. Olmstead, p. 523; 至于在波斯波利斯的发掘, 参见 E. F. Schmidt, *Persepolis*, 2 vols. (Chicago, 1953, 1957), esp. vol. II, pp. 91-111。

17. Arrian 3.19.1-5; QC 5.6.11, 5.7.12-19 *passim*; Diod. 17.73.1-2.

18. Arrian 3.19.5-8; Plut. *Alex.* 42.3; Diod. 17.74.3-5; Justin 12.1.1; QC 6.2.10.

19. Tarn, vol. I, p. 55. 至于帕美尼翁 (和哈尔帕罗斯) 的地位, 参见 Arrian 3.19.3, 7; Plut. *Alex.* 35; Justin 12.1.3; Diod. 17.108.4; cf. Griffith, *Proc. Camb. Phil. Soc.* 10 (1964), 24-7; Milns, pp. 143-5; Badian, *JHS* 81 (1961), 16-43, and *Hermes* 95 (1967), 188-90.

20. QC 5.12 .18-20.

21. Diod. 17.74.1-2; QC 6.6.13; Arrian 3.25.3; cf. Hamilton, *PA*, pp. 114-15.

22. 至于追击和大流士之死, 参见 Arrian 3.19.5, 3.20-22.1; QC 5.10-13.25 *passim*; Plut. *Alex.* 42-3, *Moral.* 332F; Justin 11.15; Diod. 17.73.2-4; Aelian *HA* 6.25 (Darius' dog); cf. Milns, *Historia* 15 (1966), 256 ff.; C. Neumann, *Historia* 20 (1971), 196-8; Hamilton, *PA*, pp. 113-14。

23. Wilcken, p. 150.

24. Plut. *Alex.* 43.2-3; QC 5.13.28; Diod. 17.73.3-4.

25. Diod. 17.74.3; QC 6.2.9, 6.3-4 *passim*; Plin. *HN* 6.17.44-5; Plut. *Alex.* 47.1-2.

26. 进军至扎德拉卡尔塔: Diod. 17.75; Arrian 3.23.1-9; QC 6.2.12,

6.4 *passim*（至于纳巴尔扎涅斯的信，参见§§8-14）；Plut. *Alex.* 44。波斯人和雇佣兵投降一事：Diod. 17.76.1-2; Arrian 3.23.4-5, 3.24.4-5; QC 6.4.23-6.5.10。亚历山大马匹短缺一事：Justin 12.1.2; Plin. *HN* 12.18.34。对马尔狄安人的征讨：Diod. 17.76.3-8; QC 6.5.11-21; Arrian 3.24.1-3, 5.1 9.4-6; Plut. *Alex.* 44.2-3, 45.3, *Moral.* 341B。

27. QC 6.5.23; Dicaearchus ap. Athen. 13.603b= Plut. *Alex.* 67; cf. Badian, *CQ* ns8 (1958), 144-57; *contra*, Tarn, vol. II, pp. 320-23, 塔恩极为不真诚地摒弃了巴戈亚斯的事情，认为那是漫步学派编造出来的。

28. Diod. 17.77.4-78.1; Justin 12.3.8-12; QC 6.6.4-12; Plut. *Alex.* 45.2 -3, 47.5-6, *Moral.* 329F-330A; cf. Hamilton, *PA*, pp. 120-22.

29. cf. Milns, p. 157.

30. Justin 12.3.11-12.4.6，这是很重要但通常会受到忽略的段落。

31. QC 6.6.12.

32. Plut. *Alex.* 47; Arrian 3.25.1-7; Diod. 17.78.1-3; QC 6.5.32-6.6.35; cf. Tarn, vol. I, pp. 60-61; Wilcken, pp. 152-7; Cary, *Geogr. Background*, p. 197. 至于阿马宗女王的故事，参见 Diod. 17.77.1-3 (with Welles's notes 2-3, pp. 338-9); Plut. *Alex.* 46。

33. “菲罗塔斯事件”的主要史料是 Curtius (6.7-7.2.34 *passim*); cf. Diod. 17.79.1-80.4; Plut. *Alex.* 48-49.7; Arrian 3.26; Justin 12.5.1-3; cf. Badian, *TAPhA* 91 (1960), 324-38, also *JHS* 81 (1961), 21-3; and Hamilton, *PA*, pp. 1 32 ff. (附有一些非常合理的评论)。

34. Plut. *Alex.* 48-9.

35. QC 6.9.18, 6.10.26-8, 6.11.23-5.

36. Plut. *Alex.* 49.3-4; QC 6.7.18-21; Diod. 17.79.3-4. 至于菲罗塔斯

本人对此事的解释，参看 QC 6.10.15-18（基于他在审判闹剧中的自辩）。

37. QC 6.7.22; Diod. 17.79.4.
38. QC 6.7.23-8; Diod. 17.79.5.
39. Diod. 17.79.6; QC 6.7.24.
40. Diod. 17.79.2; QC 6.7.15.
41. QC 6. 7.29-30; Diod. 17.79.6; Plut. *Alex.* 49.4.
42. QC 6.7.31-5; Diod. 17.79.6.
43. QC 6.8.1-14.
44. QC 6.7.2-17; Diod. 17.79.2.
45. QC 6.8.15-22.
46. QC 6.9.14-15.
47. QC 6.8.23-6.11.40; Plut. *Alex.* 49.6-7; Diod. 17.80.2.
48. Diod. 17.80.2; QC 7.1.5-9.
49. QC 7.1.10-14; Arrian 3.27.1-3; Plut. *Alex.* 49.7.
50. Arrian 3.27.5.
51. Diod. 17.80.3; QC 7.2.11-34, cf. 10.1.1 f.; Arrian 3.26.3-4; Strabo 15.2.10, C. 724; cf. Badian (n. 33).
52. Diod. 17.80.4; Polyaeus 4.3.19; QC 7.2.35-8; Justin 12.5.4-8.
53. 至于赫淮斯提翁的晋升，参见 Arrian 3.27.4; cf. Hamilton, *PA*, p. 131-2。

54. Put. *Moral.* 183F 1.

55. Plut. *Alex.* 49.1; cf. Badian, *TAPhA* 91 (1960), 331 and n. 18, with reff. there cited. 另一方面，塔恩（Tarn, vol. I, pp. 62-4）在没有对史料进行细致考辨的情况下，接受了对菲罗塔斯的定罪，不过在其他地方（vol. II, pp. 270 ff.）他千方百计地（但是徒劳地——正如他自己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为亚历山大杀害帕美尼翁一事开脱。正如埃德蒙兹所说，“帕美尼翁之死意味着亚历山大人生的马其顿阶段结束了”（Lowell Edmunds, *GRByS* 12 (1971), 367-8）。

第九章

1. 现有的史料（Arrian 3.28.1; Diod. 17.82.1-8; QC 7.3.5-18; Strabo 15.2.10, C. 725），包括他们所说的房屋完全被积雪覆盖等，可能夸大了亚历山大在这次行军期间所遇到的暴风雪。恩格斯先生告诉我，“至少在坎大哈，雪花一落地就融化了，等到亚历山大抵达坎大哈和喀布尔之间的山口（那里的积雪只存在两三个月）时，气温将会变得温和起来”。

2. 至于亚历山大直到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之时的战役，参见 Diod. 17.81-3 *passim*; Arrian 3.27.4-28.4; QC 7.3.3-19; Strabo 15.2. 10, C. 725. 关于萨提巴尔扎涅斯的失败，参见 Diod. 17.81.3-6; QC 7.3.2, 7.4.33-40; Arrian 3.28.2-3. 至于阿雷亚和阿拉霍西亚的地理状况，参看 Cary, *GB*, pp. 196-7. 亚历山大可能在这时接受了格德罗西亚名义上的归顺：参见 Diod. 17.81.2 (with Welles's note); Arrian 3.28.1. 至于他抵达兴都库什山脉的日期，参见 Strabo, loc. cit., and Jones (Bibl.), pp. 124-5. 翻越兴都库什山脉：Diod. 17.83.1-3; Arrian 3.28-4, cf. 5.3.2-3; QC 7.3.19-23; cf. Milns, p. 168, Cary, *GB*, pp. 198-9. 贝索斯的焦土政策和退却到奥克苏斯河对岸一事：Arrian 3.28.8-10; QC 7.4.20-25.

3. Arrian 3.29.1, 5, cf. 5.27.5, 4.17.3; QC 7.4.32-7.5.12, cf. 7.5.27; C.

A. Robinson Jr, *AHR* 62 (1957), 335 (=MP p. 63). 渡过奥克苏斯河一事：见 QC 7.5.13-18; Arrian 3.29.2-4; cf. Wilcken, pp. 155-6。

4. Milns, p. 169 (based on Arrian 3.29.7).

5. 贝索斯被交出和被处决：Arrian 3.29.6-30.5, 4.7.3; QC 7.5.19-26, 36-43, 7.10.10; Diod. 17.83.8-9; Justin 12.5.10-11; cf. Hamilton 非常可靠的注释, pp. 114-15, and reff. there cited. 托勒密-阿里安所讲的贝索斯被拘禁一事，和我这里所叙述的一致；阿里斯托布罗斯和库尔提乌斯暗示说，斯皮塔美涅斯自己把这位囚犯押送到亚历山大那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这跟某个与托勒密针锋相对的史料却是一致的，但是托勒密并非总是撒谎并借此表现自己的英勇或值得赞扬的一面，有时——比如此处——他也会做一些其敌人不想提及的事情，即使在这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

6. 进军至马拉坎达：Arrian 3.30.6-11; QC 7.6.1-10。“斯基泰人”派来的使节：Arrian 4.1.1-2; QC 7.6.11-12。极边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Arrian 4.1.3-4, 4.4.1; QC 7.6.13, 25-7。斯皮塔美涅斯反叛一事：Arrian 4.1.4-4.3.6; QC 7.6.13-23; Plut. *Moral.* 341B。渡过药杀河并进行突袭一事：Arrian 4.4.2-9; QC 7.7.5-7.19.6; Plut. *Alex.* 45.5; cf. Fuller, pp. 237 ff. 法努刻斯部队被歼一事：Arrian 4.3.6-7, 4.5.2-4.6.2; QC 7.6.24, 7.7.31-9; 参见 Hdt 1.201-13（居鲁士被马萨格泰人杀死）。至于亚历山大在马拉坎达的强行军，参见 Arrian 4.6.3-7; 参见 Borza-Wilcken, p. 338（关于行军的地形图）。

7. Arrian 4.7.1-5, 4.15.1-6; QC 7.10.11-12; Strabo 11.7.4, C. 509. 关于法拉斯美涅斯的访问，参见 C. A. Robinson Jr, *MP*, pp. 63-4; and Hamilton, *CQ* ns21 (1971), 106-11。至于阿桑德洛斯和涅阿尔科斯，参见 Berve, *APG*, II, no. 165, p. 87, and no. 544, pp. 269-72。

8. Arrian 4.15.7-8; Plut. *Alex.* 57.4-5; QC 7.10.13-15; cf. Athen. 2.42 f

.; Strabo 11.11.15, C. 518; Hamilton, *PA*, pp. 158-9.

9. Arrian 4.16.1-3; QC 7.10.15-16; Strabo 11.11.4, C. 517; Justin 12.5.13.

10. Arrian 4.16.4-4.17.2; QC 8.1.1-7; cf. Plut. *Moral.* 334F.

11. 至于克雷托斯被杀一事的总体情况，参见 QC 8.1.19-8.2.12; Arrian 4.8-9 *passim*; Plut. *Alex.* 50-52; Justin 12.6.1-17; cf. T. S. Brown, *MP*, p. 40-44 ; Badian, *Stud. GR Hist.*, pp. 197-8（极为重要）。文中所引的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 vv. 693-700）的诗句的译文，除了第一行以外全部出自 J. F. Nims (*Compl. Gk. Trag.*, vol. VI, p. 184)。

12. 分配给克雷托斯的行省：QC 8.1.20-21。克雷托斯离开前的宴会：Arrian 4.8.2; Plut. *Alex.* 50.2; QC 8.1.22; Justin 12.6.1。阿里安（4.8.1-2）和普鲁塔克（*Alex.* 50.3-4）都提到一个可疑的“预言性”因素，这强烈地表明了这经过了阿里斯坦德洛斯和阿纳克萨科斯事后的篡改，由此利用命定不可避免的死亡来替亚历山大杀死克雷托斯开脱责任。普鲁塔克记载说亚历山大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看见克雷托斯死了，穿着黑色衣服，与帕美尼翁的儿子们（同样也死了）在一起——愤世嫉俗之人可能会将此解释为买一赠一的把戏。他进一步叙述说，克雷托斯在接受亚历山大的邀请时还没完成献祭，竟带着一只献祭的羊去赴宴；（根据这一流传下来的说法）亚历山大随后征询了占卜师，发现了一些不祥之兆，于是他下令为克雷托斯的安全而献祭。说这么多我想也足够了。阿里安更为收敛些，但显然也利用了类似的政治宣传，他说亚历山大错误地向狄奥斯库里兄弟而不是狄奥尼索斯献祭，从而大概招致了后一位神明的愤怒，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结果。

13. Arrian 4.8.2-3; QC 8.1.22.

14. Arrian 4.8.4-5.

15. Arrian 4.8.6; QC 8.1.23-6; Justin 12.6 .2.

16. QC 8.1.30-37; Arrian 4.8.6; Justin 12.6.3.

17. Plut. *Alex.* 50.4-5.

18. Arrian 4.8.6-7; Plut. *Alex.* 50.6; QC 8.1.41-2.

19.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 (*Alex.* 50.2)，亚历山大举行宴会的最初冲动源于希腊水果的寄达，这些水果是商贩们从海边带来的，亚历山大想和克雷托斯分享一下。相关的港口必定是波斯湾的入口哈尔摩吉亚（即霍尔木兹）。可能就是在这个场合中，有个西顿商人告诉亚历山大有一条比通常的苏萨-巴比伦-大马士革更短的去埃及的路线，即取道卡拉克斯、佩特拉和里诺科鲁拉（参见 Lucian, *Rhet. Praec.* 5-6，这段文字最有价值但很少有人引用，另见 A. M. Harmon's useful note *ad loc.*, Loeb edn, vol. IV, pp. 140-41）。亚历山大很不明智地把商人们当成了骗子。他对交通问题的关切是由关于埃及的不满情绪的报告引起的——可能是由于克莱奥美涅斯的劫掠——因而他迫切希望尽可能快地把文书送达当地官员。卢奇安顺手提到了“驿使为传达亚历山大的命令不得不跑遍整个王国”，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涉及这项关键部门的文字。

20. Plut. *Alex.* 51.1-4; Arrian 4.8.7-8; QC 8.1.43-7.

21. Plut. *Alex.* 51.5-6; Arrian 4.8.8-9; Justin 12.6.3; cf. QC 8.1.28-9. 库尔提乌斯给出另一个不同杀死克雷托斯的版本，在这一版本中亚历山大冲到大厅里，夺过一支枪，一直等到克雷托斯最后一个出来。查斯丁（Justin 12.6.4）有一段相当粗俗的话，说亚历山大因克雷托斯赞扬腓力的军事天分而对这位不幸的死者大加辱骂。布朗（T. S. Brown, *MP*, pp. 40 ff.）相信普鲁塔克的版本要优于其他，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遵从普鲁塔克而摒弃其他版本，对此我并不赞同；在史料考辨的过程中，豪斯曼抨击编辑者的说法同样存在，亦即“依靠单一抄本的方式，寄希望于此，指望老天这个抄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D. Iunii Iuuenalis Saturae*, rev. edn, Cambridge, 1938, p. v: 这整篇前言充满了忠告，值得历史学家认真对

待)。像这样的事情，当时必定有许多原始的目击证词（以及不可避免的
细节上的添油加醋和彼此矛盾），随后便掺杂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
、开脱罪责和诡辩，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其内在的可能性从每种叙述中筛
选出每一个细节。没有捷径可走。

22. Arrian 4.9.1-2; QC 8.2.1-5; Plut. *Alex* 51.6; Justin 12.6.7-8, 10-14
(全部都是描述他如何悔恨和试图自尽)。

23. Arrian 4.9.3-5; Plut. *Alex.* 52.1; QC 8.2.6-7（记录了这样的传统
说法，即亚历山大现在想起他忘记了向狄奥尼索斯献祭）。

24. QC 8.2.8-10.

25. 关于三天的说法，参见 QC 8.2.11; Arrian 4.9.4。关于四天没有
进食的说法，参见 Justin 12.6.15。关于一天半的说法，参见 Plut. *Alex.* 5
1.2。

26. 布朗（Brown, loc. cit.）过于依赖查斯丁的记载（Justin 12.6.17
），认为卡利斯特涅斯此时对亚历山大仍有影响力。

27. Plut. *Alex.* 52.1-4; Arrian 4.9.7-9; QC 8.2.11-12; Justin 12.6.17.

28. 更具体的细节参见 Berve, *APG*, II, pp. 206-8, no. 427。

29. Arrian 4.17.3-4.18.3; QC 8.2.13-8.3.17, cf. 8.1.20.

30. QC 8.4.1-17; Isocrates *Ep.* 3 (*Phil.* II) 5, cf. *Philippus* 113-14, 151.

31. Arrian 4.18.4-4.19.4; QC 7.11 *passim*; Strabo 11.11.4, C. 517; Pol
yaenus 4.3.29.

32. M. Renard, J. Servais, *Ant. Cl.* 24 (1955), 29-47; cf. G. F. Abbott,
Macedonian Folklore (Cambridge, 1903), pp. 158 ff., 173. 至于亚历山大与
罗克娜娜的婚姻的总体情况，参见 Plut. *Alex.* 47.4, *Moral.* 332E, 3380; Ar
rian 4.19.5-6; QC 8-4-22-30; Diod. 18.3.3; Strabo 11.11.4, C. 517; Justin 12.

15.9, 13.2.5, 9; cf. Robinson, *MP*, pp. 64-5; Hamilton, *PA*, pp. 129-30; Berve, *APG*, II, no. 688, pp. 346-7。

33. Arrian 4.21 *passim*, 4.22.1-2; Strabo 11.11.4, C. 517-18.

34. 至于亚历山大在东方建立城市的情况，参见 Tarn, vol. II, pp. 234 ff.（这是最为详尽的研究）。至于以各城市作为不满分子的倾卸场，参见 Justin 12.5.8, 13。巴克特里亚希腊雇佣兵的反叛：QC 9.7.1-11; Dio d. 17.99.5-6, 18.4.8, 18.7.1-9。

35. 巴克特里亚的援军：Arrian 4.22.3。至于“继承者”，参见 QC 8.5.1（强调他们的人质作用）；Arrian 7.6.1; Diod. 17.108.1-3; Plut. *Alex.* 47.3, 71.1。

36. QC 8.6.6; 至于关于军团的一般叙述，参见 *ibid.*, 2-5, and Arrian 4.13.1。

37. Balsdon, ‘The “divinity” of Alexander’, *Historia* 1 (1950), 375 (= *MP*, p. 191). 整篇论文都极为有趣且极有说服力。参看 Hdt 1.134; Athen. 10.434d; Arrian 4.10.5 ff.; Plut. *Alex.* 54-5.1; QC 8.5.9-24。

38. Balsdon, p. 376, and reff. there cited. 至于涉及波吕佩孔的事件，参见 QC 8.5.22; cf. Plut. *Alex.* 74.2 and Arrian 4.12.2 for similar episodes。

39. Arrian 4.10.5 ff.; QC 8.5.5 ff. 至于对阿纳克萨科斯和卡利斯特涅斯在匍匐礼方面的冲突的良好分析，参见 Lowell Edmunds, *GRByS* 12 (1971), 386-90。

40. 至于这个小圈子及其对亚历山大的有害影响，尤可参见 Plut. *Moral.* 65C-E; cf. QC 8.5.5-8。

41. See, e.g., Badian in his review of Lionel Pearson’s *Th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Gnomon* 33 (1961), 661-2.

42. Plut. *Alex.* 54.3-55.1; QC 8.5.9-24; Arrian 4.12.3-5; Justin 12.7.1-3; cf. Brown, *MP*, pp. 44 ff., and Balsdon, *ibid.*

43. 中伤诽谤: Plut. *Alex.* 54.1-2, 55.1-2; Arrian 4.10.1-4; cf. Homer, *Iliad*, 21.107。辩论术的挑战: Plut. *Alex.* 53.2-5; cf. Philip Merlan, *Historia* 3 (1954/5), 76-7。《酒神的伴侣》的译文出自 William Arrowsmith, *Compl. Gk Trag.*, vol. VII, p. 369。

44. QC 8.8.15. 至于侍从们的阴谋, 参见 Arrian 4.13-14; QC 8.6-8; Plut. *Alex.* 55.2-5。关于卡利斯特涅斯之死的相关史料的简便概要, 见于 Robinson, *HA*, pp. 45-54 (trs. of Jacoby *FGrH* II B 124 T); 尤可参见 Arrian 4.14.3-4; QC 8.8.19-23; Strabo 11.11.4, C. 517。

45. Plut. *Alex.* 55.3-4.

46. Arist. *Met.* 1.13.15, 350a 21 f., 参看 *Pol.* 7.14, 1332b, 此处可以说明他对斯库拉克斯的《环海记》(*Periplus*) 很熟悉; Hdt 3.94, 98-106, 4.40, 44; Ctesias (ed. R. Henry) *Indica*, *passim*, esp. chs. 7, 11, 22-4, 31。亚历山大之后的证据 (e.g. Arrian 5.4-6; Diod. 17.90.1-3; QC 8.5.1-4, 8-9 *passim*; Strabo 15.1.5, C. 686) 在此不足为凭, 因为它们总是掺杂了许多这次远征所收集到的资料。参看 Wilcken, pp. 173-4 (还有第184—186页, 其中他很奇怪地断言亚历山大对斯库拉克斯沿印度河而下的航行一无所知); Woodcock, pp. 16 ff.; and esp. A. Dihle, 'The conception of India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literature', *Proc. Camb. Phil. Soc.* 10 (1964), 15-23。

47. 赫拉克勒斯在印度: Arrian 8.8-9。狄奥尼索斯的事迹: Diod. 2.38. 3.63, 4.3; Arrian 8.5; cf. Strabo 11.5.5, C. 505。赛米拉米斯: Diod. 2.1-20 *passim*。至于亚历山大的雄心壮志, 可参见 QC 8.8.15 - '*utinam Indi quoque deum esse me credant*' ("愿印度人也相信我是一位神!")。

48. 骑兵改革: Brunt, *JHS* 83 (1963), 27-46, esp. 29-31; Griffith, *ibi*

d., 68-74。至于侵略军的规模，参见 Tarn, vol. I, pp. 82-4, cf. vol. II, p. 169; Milns, pp. 186-7; and Fuller, p. 124 (quoted here)。

49. Arrian 4.22.3-4.23.1, cf. 4.30.4; QC 8.10.1-4; Strabo 15.1.26, C. 697; cf. Narain, *MP*, pp. 156-7; Cary, *GB*, pp. 197-8.

50. 斯瓦特战役：Arrian 4.23-30 *passim*; QC 8.10.4-8.12.3; Diod. 17.84-6; Justin 12.7。至于对印度雇佣兵的大屠杀，参见 Diod. 17.84; Plut. *Alex.* 59.3-4; Arrian 4.27.3-4; Polyaeus 4.3.20; cf. Narain, p. 157 and reff. there cited。

51. Plut. *Alex.* 28.3, *Moral.* 180E, 341B; Aristobulus ap. Athen. 251a; cf. Arrian 4.26.4; QC 8.10.28; Homer, *Iliad*, 5.340; Tarn, vol. II, p. 358, n. 5; Hamilton, *PA*, p. 74. Cf. Lowell Edmunds, *GRByS* 12 (1971), 363 ff.

52. 尼撒事件：Arrian 5.1-5.3.4; QC 8.10.7-18; Plut. *Alex.* 58.3-5; Justin 12.7.6-8。菲罗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 *Vit. Apoll. Tyan.* 2.9）说，尼撒的居民否认亚历山大曾经登上山脉（“为了让他的军队保持清醒而只饮水”）。至于现代关于卡拉什人的出色的一手记述，参见 Fosco Maraini, *Where Four Worlds Meet* (London, 1964), pp. 242-71。

53. Milns, p. 205.

54. *On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London, 1929), p. 154.

55. 占领阿奥尔诺斯：Arrian 4.28-30.4; Diod. 17.85; QC 8.11; Justin 12.7.12-13; Plut. *Alex.* 58.3; Plut. *Moral.* 181C 25, D 27; Strabo 15.1.8, C. 688; cf. Fuller, pp. 248-54, and A. R. Anderson, *Harv. Stud. Cl. Phil.* 39 (1928), 12-25, esp. 18: “希腊人自然相信他们的宗教——亦即他们的神话和神灵——是普世而普遍的（所以他们才会这么认识），随着地理视野的拓展，他们的神灵实施权力的范围也同样会扩大。”参看 Edmunds, *op. cit.*, pp. 374-5。

56. 晚至1967年，在阿托克同样的浮桥——不久便会被永久的桥梁取代——仍然横跨在冬季的印度河上，然后于春季洪水到来时分解开。参见*Nat. Geogr. Mag.* 133, no. 1 (January 1968), p. 56。

57. Arrian 4.30.7-9, 5.3.5-5.7 *passim*; Diod. 17.86.3-7; QC 8.12.4-9; Plut. *Alex.* 59.1; Strabo 15.1.28. C. 698, 15.1.32, C. 700 (the breadth of the Indus). 至于塔克西拉的发掘，参看 Sir John Marshall, *Taxila*, 3 vols., Cambridge, 1951。亚历山大所看到的城市是塔克西拉 I，所谓的西尔卡普西北的皮尔丘。

58. QC 8.12.10-18; Arrian 5.8.1-2; Plut. *Alex.* 59.1-3.

59. 他是涅奥普托勒摩斯之子，一位侍友：大约生于公元前360年。参见 Berve, *APG*, II, no. 494, pp. 249-50。

60. Arrian 5.8.2-3; QC 8.13.1-5. 至于对波洛斯军队的估计，参见 Arrian 5.15.4; Diod. 17.87.2; QC 8.13.6. 关于大象引起了许多争议：阿里安估计其数目为200头，狄奥多罗斯估计为130头，库尔提乌斯（在其文本中暗示说其他的处于预备中）估计为85头。伯恩（Burn, *GR*, p. 151 n. 2）反对说，200头大象以100英尺为间隔会导致战线过长；这很可能是对的。狄奥多罗斯的估计是最有可能的。马其顿人（参见第399和第407页）被这些巨兽吓坏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大象数量的夸大，相应地与亚历山大一同渡河的步兵人数后来也被极度缩小，以掩盖他们的巨大损失：参见 Tarn, vol. II, pp. 192-3 and Hamilton, *JHS* 76 (1956), 26，不过二者都没有推测其中的动机，而且塔恩把那缩水了的数据形容为“无法解释的”。亚历山大一方实际参战的军队大约是20000步兵和2000名骑兵：参见 Plut. *Alex.* 62.1。至于雨季，参见 Aristobulus ap. Strabo 15.1.17, C. 691-2。

61. Arrian 5.8.4-5.

62. Philostratus, *Vit. Apoll. Tyan.* 2.42; Pliny *HN* 6.21.62; cf. Fuller, p.

181.

- 63. QC 8.13.6, 8-9, 10-11; Arrian 5.9.1, 3-4.
- 64. Arrian 5.10.1-2.
- 65. Arrian 5.9.2-3; QC 8.13.12-16; Plut. *Alex.* 60.1-2.
- 66. Arrian 5.11.1-2; QC 8.13.17; Frontinus, *Strat.* 1.4.9.
- 67. Arrian 5.10.3-4; QC 8.13.17-19.
- 68. Diod. 17.87.3.
- 69. Arrian 5.11.1-2.
- 70. QC 8.13.20-21.
- 71. Arrian 5.12.1; cf. Fuller, pp. 186-7, Milns, p. 211.
- 72. Arrian 5.11.3-4.
- 73. 参见富勒的精彩分析（Fuller, pp. 188-90, with fig. 14）。
- 74. Fuller, *ibid.*
- 75. Arrian 5.12.2-13.3; QC 8.13.22-7; Plut. *Alex.* 60.2-4.
- 76. QC 8.14.1-2.
- 77. Plut. *Alex.* 60-4; Arrian 5.13.4.
- 78. Arrian 5.14.3-6; QC 8.14.1-2.
- 79. Arrian 5.14.1-2.
- 80. Arrian 5.14.4-5.15.1-2; QC 8.14.3-8; Plut. *Alex.* 60.5; Justin 12.7.4
- .
- 81. Arrian 5.15.3.

82. Arrian 5. 15.4; Plut. *Alex.* 60.5.
83. Arrian 5.15.4-7; Diod. 17.87.4-5; QC 8.14.10-13; cf. Burn, *GR*, pp. 151-2.
84. Burn, *ibid.*, p. 151.
85. cf. Milns, pp. 213-14.
86. Arrian 5.16.1-3; Plut. *Alex.* 60.5; QC 8.14.14-15.
87. 在此我遵从汉密尔顿（Hamilton, *JHS* 76 (1956), 26-31），而不同意大多数的现代学者，包括从维特（Veith）到富勒、伯恩和米尔恩斯，他们全都假定要么印度骑兵，要么科伊诺斯的骑兵队，要么二者都有，移动到了波洛斯步兵阵线的前面。但（从科伊诺斯的角度看）这种战术无疑愚蠢至极，他得飞奔4英里，同时还会使其左翼一直暴露着。
88. Arrian 5.16.3.
89. Arrian 5.16.4; Diod. 17.88.1; cf. Burn, *GR*, pp. 153-4.
90. Arrian 5.16.4.
91. Arrian 5.17.1-3; QC 8.14.18; cf. Fuller, pp. 196-7.
92. Arrian 5.17.3; cf. QC 8.14.19.
93. Arrian 5. 17.3-5; Diod. 17.88.1-2.
94. Arrian 5.17.7.
95. Arrian 5.17.6-7; Diod. 17.88.2-6; QC 8.14.22-29; Plut. *Alex.* 60.6.
96. Arrian 5.18.1-3; Diod. 17.89.1-3.
97. Arrian 5.18.4-19.3, esp. 19.1 (quoted here).
98. Diod. 17.88.6-89.6; QC 8.14.31-46; Plut. *Alex.* 60.6-8; Justin 12.7.

5-6.

99. Arrian 5.18.3; Diod. 17.89.3. 更高的估计值反映了两种总数之间的差异，一个是阿里安（Arrian 5.14.1）所给的进攻部队的人数，另一个是通过研究实际参战部队而推断出来的军队数量（相关资料见于 Arrian, 5.12.2，相关分析见于 Tarn, vol. II, pp. 192-3）。参看上面注释60。

100. 对这一点的详述参见 Milns, p. 215。

101. 杰赫勒姆河（叙达斯佩斯河）战役的一般资料，参见：Arrian 5.9-19 *passim*; QC 8.13.7-8.14.46; Plut. *Alex.* 60; Diod. 17.87-89.3; Justin 12.8; Polyaeus 4.3.9, 22; Pliny *HN* 6.21.62; Philostratus, *Vit. Apoll. Tyan.* 2.42; cf. Fuller, pp. 180 ff.; Hamilton (cf. n. 87), and *PA*, pp. 163 ff. 至于是役对马其顿士气的影响，尤可参见 Plut. *Alex.* 62.1；至于军队因长期服役、装备破损和雨季而普遍疲劳，参看 Arrian 5.25.2, QC 9.3.1, Diod. 17.94.1。

102. Diod. 17.89.6; Arrian 5.19.2-3, 5.20.2-4; Plut. *Alex.* 60.8, cf. *Moral.* 332E.

103. Narain, *GR*, pp. 158-9.

104. Arrian 5.19.4-6, 5.20.1-2, 7; Plut. *Alex.* 60.7-8, 61, *Moral.* 332E; Plin. *HN* 8.64.155; Diod. 17.89.6; QC 9.1.1-2, 6, 9.3.23; Strabo 15.1.29, C. 698-9; Aul. Gell. *NA* 5.2.

105. Arrian 5.20.5-6; Diod. 17.90.4; QC 9.1.7-8; Strabo 15.1.28, C. 698.

106. Diod. 17.89.4-5; Arrian 5.24.8.

107. 我不相信德罗伊森（Droysen *Gesch. des Hellenismus*, repr. Basle, 1952, pp. 356-7）或安德烈奥蒂（Andreotti, *Saeculum* 8 (1957), 143）的论点，即当亚历山大还在杰赫勒姆河时就已经知道恒河的存在了。但

是，现存史料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证实这一假设。

108. Arist. *Met.* 2.5, 362b 20-29. 亚里士多德估算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印度的距离要超过从埃塞俄比亚到迈奥提斯湖和斯基泰最远的部分，其比率要超过5：3。希罗多德（Hdt 3.98, 4.40）说印度东部是“贫瘠的荒原”，可能指的是信德沙漠。

109. 出自 Mr Philip O. Spann,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in an unpublished paper, ‘Alexander at the Beas: Fox in a Lion’s Skin’, 我从中提取了许多有益的信息。

110. H. G. Rawlinson, *India: 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38), p. 60.

111. Arrian 6.1.2; 当地的线人及时（6.1.5）纠正了这一荒谬无比的谎言。

112. 至于舰队的建造，参见 Arrian 5.20.1-2; Diod. 17.89.4-6; QC 9.1.4; Strabo 15.1.29, C. 698.

113. Philostratus, *Vit. Apoll. Tyan.* 2.42; QC 9.1.6; Arrian 6.1.1-6; Diod. 17.89.5-6; Strabo 2.1.6, C. 69, 15.1.25, C. 696. 至于对亚历山大此时所具有的地理知识的独特见解，可参见 Schachermeyr, *MP*, pp. 123 ff. (‘Alexander und die Ganges-Länder’), 附有丰富的参考文献; Hampl, *Nouv. Clio* 6 (1954), 106; Radet, *AG* (Paris, 1931), 300; Tarn, vol. 11, p. 281; Wilcken, pp. 184-5; Snyder, pp. 158-9. 至于更务实的观点，可参看 Milns, pp. 220-21.

114. Arrian 5.20.8-5.24.8; Diod. 17.94.1-2 *passim*; QC 9.1.14-35; Strabo 15.1.30-31, C. 698-700.

115. Arrian 5.25.2; Diod. 17.94.1-2; QC 9.2.8-11, 9.3.1, 10; Plut. *Alex.* 62. 1.

116. Arrian 5.24.5（关于马其顿的损失）；Diod. 17.93.1（关于贝亚斯河的情况）；至于萨特莱杰河对岸的军队的不同估计，参见 Diod.

17.93.2（20000名骑兵，200000名步兵，2000辆战车，4000头大象，参看 QC 9.2.3），和 Plut. *Alex.* 62.2（80000名骑兵，200000名步兵，8000辆战车，6000头大象）。至于关于贝亚斯河对岸的土地的报告，一般参见 QC 9.2.1-10; Diod. 17.93.1-2; Plut. *Alex.* 62.1-3; Arrian 5.25.1。

117. A. V. Williams-Jackson,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p. 341; Tarn, vol. I, p. 98, vol. II, p. 284. 安德烈奥蒂（Andreotti, *Saeculum* 8 (1957), 144）断言没有人知道或在乎这条边界在哪里，这不大可能。

118. QC 9.2.10-11; Diod. 17.94.1-4.

119. Diod. 17.94.4-5.

120. QC 9.3.1（把两次独立的会见混在了一起）。

121. Arrian 5.25-26 *passim*; Diod. 17.94.5; QC 9.2.12 ff.

122. Arrian 5.27.1-9; QC 9.2.31-9.3.15; Justin 12.8,10-15.

123. Arrian 5.28.1-3; Plut. *Alex.* 62.3; QC 9.3.16-18.

124. Arrian 5.28.4.

125. Arrian 5.29.1-2; Diod. 17.95.1-2; QC 9.3.19; Plut. *Alex.* 62.4; Justin 12.8.16-17.

126. *Vit. Apollon. Tyan.* 2.43.

127. Milns, p. 223.

128. 贝亚斯河兵变事件的基本史料：Arrian 5.24.8-5.29.2; Diod. 17.94-5.2; QC 9.2.1-9.3.19; Plut. *Alex.* 62.1-4; Justin 12.8.10-15; Strabo 3.5.5. C. 171, 15.1.32, C. 700; Philostratus, *Vit. Apollon. Tyan.* 2.42-3; cf. Schachermeyr, pp. 357-9, Hamilton, *PA*, pp. 170-73。关于贝亚斯河对岸领土的问题，参见 Tarn, vol. II, pp. 275-85, and Schachermeyr, *MP*, pp. 137-49。我接受普林尼的记载（Pliny, *HN* 6.62），因为有证据表明河流东岸曾立过

一些祭坛：参看（我保留一些看法）Hamilton, *PA*, p. 175.

第十章

1. Plut. *Alex.* 47, *Moral.* 337A (cf. Hamilton, *PA*, pp. 130-31); QC 9.1.35; Arrian 5.29.2-5.

2. Arrian 6.1, 8.18; Diod. 17.89.4-5, 17.95.3; QC 9.3.20.

3. QC 9.3.21-2; Diod. 17.95.3-4.

4. Ehippus ap. Athen. 4.146c; Arrian 8.18.3-9, cf. Wilcken, p. 188; Plut. *Eum.* 2.2-3.

5. Plut. *Alex.* 35.8; Plin. *HN* 16.62.144 (exotic gardening); Theopompus ap. Athen. 13.586c, 595a-d; Python ap. Athen. 13.586d; Philemon ap. Athen. 13.595c; cf. Radian, *JHS* 81 (1961), 16 ff. = *MP*, pp. 206 ff.; Bellinger, pp. 78-9; Tarn, vol. I, p. 131; Diod. 17.108.5-6; Tod. II, no. 196 (pp. 273-6); Snyder, p. 160, with nn. 24-5.

6. Plut. *Alex.* 41.4; Python as above and ap. Athen. 13.595e-596b; for the *Agen* cf. (with reservations) Bruno Snell, *Scenes from Greek Drama* (Berkeley, 1964), pp. 99-138.

7. Arrian 6.2.1; QC 9.3.2Q-22.

8. Arrian 6.2.2-6.3.5, 8.18-19; Diod. 17.96.1; QC 9.3.24; Plut. *Alex.* 63.1; Plin. *HN* 19.5.22.

9. Lucian, *Quom. Hist. Conscrib.* 12. 这则轶事现代历史学家很少引用，它并不能增加阿里斯托布罗斯的可信度，他和托勒密一起，是阿里安著作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阿里斯托布罗斯在八十四岁高龄时才创作事件的最后版本，那时他的观点可能已经变得老练一些了。参看 Ps-Lucian, *Macrobian.* 22。

10. 在急流中航行一事: Arrian 6.4.4-6.5.4; Diod. 17.97; QC 9.4.8-14; cf. Plut. *Alex.* 58.4; Homer *Iliad* 21.228-382。马利人和奥克西德拉凯的动员集结: Diod. 17.98.1-2; QC 9.4.15。兵变的威胁: QC 9.4.16-23。亚历山大的沙漠突袭: Arrian 6.5.5-6.6.5。对马利人的征讨: Arrian 6.6.6-7.6, 参看 Tarn, vol. I, p. 103。

11. 占卜师事件: QC 9.4.27-30。袭击婆罗门城市和亚历山大的受伤: Arrian 6.9.11; Diod. 17.98.3-99.4; QC 9.4.26-9.5.18; Plut. *Alex.* 63.1-4; Justin 12.9.5-11; Plut. *Moral.* 327B, 343D-344D。

12. QC 9.5.22-30; Plut. *Alex.* 63.5-6; Justin 12.9.12-13; Plut. *Moral.* 344F-345B。

13. Arrian 6.12-14.3; Diod. 17.99.5-6; QC 9.6.1, 9.7.12-15; Plut. *Alex.* 63.5-6。关于巴克特里亚的反叛, 参见 QC 9.7.1-11; Diod. 17.99.5-6, cf. Badian, *JHS* 81 (1961), 25-7 = *MP*, pp. 216-17; Parke, pp.195-6。

14. QC 9.6.26-7。

15. Diod. 17.100-101; QC 9.7.15-26。狄奥克西波斯就是那个跟亚历山大说从他伤口中流出来的血是神的灵液的人; 他似乎生来就很不幸。

16. Arrian 6.14.4-6.17.2; Diod. 17.100-102; QC 9.8.3-16; Plut. *Alex.* 59.4, 64; cf. V. A. Smith, *Oxford Hist. of India*, pp. 88 ff.; Badian, *GR*, p. 179。

17. Arrian 6.15.5, 6.17.3-4; Justin 12.10.1; Strabo 15.2.4-5, C. 721, 15.2.11, C. 725。至于沾有蛇毒的箭的使用和亚历山大对托勒密的治疗, 参见 Diod. 17.103.4-8; QC 9.9.17-28; Justin 12.10.2-3; Strabo 15.2.7, C. 723。

18. Arrian 6.17.1-6, 6.27.2; Diod. 17.104.2; QC 9.8.28-30, 10.1.20; cf. Narain, *GR*, pp. 161-3, and reff. there cited。

19. Arrian 7.1.4-7.2.1。至于关于赤身哲学家的文献, 参见 Arrian 7.3 *passim*; Plut. *Alex.* 59.4, 65; Strabo 15.1.61, 63-5, 68, C. 714-18; cf. Woodc

ock, pp. 26-7; Narain, *GR*, pp. 160-61. H. Van Thiel, *Hermes* 100 (1972), 343 ff.

20. Arrian 6.18.3-6.20.5; QC 9.8.30-9.10.4; Plut. *Alex.* 66.1-2; Diod. 17.104.1-3; Justin 12.10.4-8; cf. Fredricksmeyer, p. 167 n. 39.

21. Arrian 6.21-22.3, cf. 8.20.1-11, 8.32.11; Diod. 17.104.3-105.5; QC 9.10.5-11; Plut. *Alex.* 66.2; Strabo 15.1.5, C. 686, 15.2.1-3, C. 720-21, 15.2.5, C. 722; Plut. *Eum.* 2.2-3; for mint production in Asia Minor cf. Thompson and Bellinger, *Tale Class. Stud.* 14 (1955), 30 f.

22. 在格德罗西亚行军的一般史料: Arrian 6.22.4-26.5 *passim*; Diod. 17.105.6-7; QC 9-10.11-18; Plut. *Alex.* 66.2-3; Strabo 15.2.3-7, C. 721-3; Pliny *HN* 12.18.34。在卡尔马尼亚的补给要求: Arrian 6.27.6; Diod. 17.105.7-8; QC 9.10.17; Plut. *Alex.* 66.3。

23. 如果120000人是亚历山大进入印度时最初的军队数量 (Plut. *Alex.* 66.2-3), 然后我们从中减去 (a)克拉特洛斯的部队大约16000人 (Arrian 6.17.3-4; 7.12.1-2; Diod. 17.109.1-2), (b)涅阿尔科斯舰队的定编人数, 不少于18000 (Arrian 6.14.4, 参看8.19.2-3), 那么通过假定损失与增援的人数差不多正好相抵, 我们可以得到亚历山大军队的人数为86000人。至于侍友骑兵, 参见 Tarn, vol. II, pp. 162, 166 (然而塔恩不接受这里暗示的人数减少)。关于行军, 一般参见 H. Strasburger, *Hermes* 80 (1952), 456 ff., and 82 (1954), 251, cf. Brunt, *GR*, pp. 209-10 and n. 6。亚历山大的路线: Stein, *Geogr. Journ.* 102 (1943), 193-227 (against Strasburger)。

24. Plut. *Alex.* 68.7; Arrian 7.4.2; cf. Badian *CQ* ns8 (1958), 147 f. *Contra*, Bosworth, *ibid.*, ns21 (1971), 124 and n. 1, 博斯沃思不认为阿波罗法涅斯是亚历山大的牺牲品, 其理由是他一直和列昂那托斯配合, 列昂那托斯后来仍然得到重用: 博斯沃思推测, 托勒密把阿波罗法涅斯和卡尔

马尼亚的阿斯塔斯佩斯弄混了。但是，涅阿尔科斯玩忽职守的罪行至少一样严重，却仍然得到了国王的重用。

25. Athen. 13.595-6; cf. above, pp. 414 ff., and Diod. 17.108.5-8; Paus. 1.37.5; QC 10.2.1-3; Plut. *Dem.* 25.6.

26. Arrian 6.27.3-5, 6.29.3, 7.4.2 f.; Diod. 17.106.2-3; QC 9.10.19 f., 10.1.1-9; Plut. *Alex.* 68.2, 7; Badian, *JHS* 81 (1961), 19-20 = *MP*, 201-10; Bosworth, *CQ* ns2I (1971), 124.

27. 至于涅阿尔科斯的残篇，参见 Jacoby *FGrH* 133F *passim* (= Robinson, *HA*, pp. 104 ff.) and especially Arrian's *Indica*, 8.17.6-8.42.10。值得注意的是，伪卡利斯特涅斯（Ps-Callisthenes 3.31.8）和梅茨史纲（Metz Epitome, c. 97）指出涅阿尔科斯也是反对亚历山大的主谋之一。巴迪安（Badian, *JHS* 81 (1961), 20）认为，科伊诺斯在贝亚斯河兵变中的立场“突然间把贵族和士兵合作的可怕威胁呈现了出来”。但是，这种威胁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了；（比方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决心要清算帕美尼翁及其支持者。

28. Diod. 17.105.8; Arrian 6.27.1, cf. 6.22.3, 7.5.5, 8.23.4-5; QC 9.10.19; cf. Badian *CQ* ns8 (1958), 148, cf. *MP*, p. 211.

29. 克拉特洛斯的报告：QC 9.10.19-20；各行省的麻烦的消息：Arrian 6.27.3-5; Diod. 17.106.2-3; QC 10.1.1-9; Plut. *Alex.* 68; cf. Badian, *JHS* 81 (1961), 16 ff. = *MP*, 206 ff.。卡尔马尼亚的酒神宴会：Arrian 6.28.1-4; Diod. 17.106.1; QC 9.10.22-28; Plut. *Alex.* 67。逮捕阿斯塔斯佩斯：QC 9.10.21, 30；对克勒安德洛斯和西塔尔刻斯的审判和处决：Arrian 6.27.3 ff.; QC 10.1.1 ff., cf. Badian, *ibid.*, and Bosworth, *op. cit.*, p. 124。哈尔帕罗斯的出逃：Diod. 17.108.5-8, cf. QC 10.2.1-3; Paus. 1.37.5; Plut. *Demosth.* 25。至于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和总督叛乱，参见 Olmstead, pp. 424-5 and *reff.* there cited。解释雇佣兵的命令：Diod. 17.106.3, 17.111.1, cf. Badian,

ibid., p. 211。克莱奥美涅斯和菲罗克塞诺斯：Ps-Arist. *Oecon.* 1352a-b; Plut. *Alex.* 22, *Moral.* 333A, 1099D。

30. 克拉特洛斯的到达：Arrian 6.27.3; QC 10.1.9; Strabo 15.2.11, C. 725。涅阿尔科斯的航行：Arrian 8.21 ff. *passim*, cf. 6.28.5-6; Nearchus ap. Strabo 15.2.5, C. 721-2, 15.2.11-13, C. 725-6; Diod. 17.104.3, 106.6-7。在古拉什基尔德的庆典：Plut. *Alex.* 67.3-4; Dicaearchus ap. Athen. 13.603a-b; Arrian 6.28.3, 8.36.3-4; Diod. 17.106.4-6; cf. Badian *CQ* ns8 (1958), 141 ff.。克拉特洛斯和赫淮斯提翁的争吵：Plut. *Alex.* 47.5-6, *Moral.* 337A。尼泽（Niese）令人信服地计算了涅阿尔科斯航程的距离（参见 Welles's note 2 to Diod. 17.106.4, with ref.），即七十五天的航程：普林尼（Pliny, *HN* 6.100）说航行长达六个月，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31. Arrian 6.28.7-29.1, 8.36-37.1; Diod. 17.107.1.

32. Arrian 6.29-30.2; QC 10.1.22-38; Plut. *Alex.* 69; Strabo 15.3.7, C. 730; cf. Badian as above, n. 28。阿里安、普鲁塔克和库尔提乌斯都特别评说了亚历山大品性的堕落：Arrian 7.4.3; QC 10.1.39-42; Plut. *Alex.* 42.1-2。

33. Arrian 6.30.1-7.4.3; Plut. *Alex.* 68.1-4; Diod. 17.106.4; QC 10.1.17-19.

34. 特别见于 W. W.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Proc. Brit. Acad.* 19 (1933), 123-66, = *MP*, 243-86。

35. 参见巴迪安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E. Badian,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Historia* 7 (1958), 425-44），此处我大量利用了这篇文章。

36. Tarn, vol. II, pp. 296-7.

37. See in particular H. C. Baldry, *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

ught (Cambridge, 1965), chs. I-III, and on Alexander's own attitude (a sceptical analysis of the Tarn theory), pp. 113 ff.

38. Arrian 7.6 *passim*; Diod. 17.108.1-3; Plut. *Alex.* 68.2-3, 71.1-2; Justin 12.11.4-5; QC 10.1.43-5; cf. Hammond, *Epirus*, p. 559; Milns, pp. 245-6.

39. 苏萨婚礼: Arrian 7.4.4-8; Diod. 17.107.6; Plut. *Alex.* 70. 1, *Moral.* 329D-E; Justin 12.10.9-10; 对密提勒涅的指控 ap. Athen. 12.538b-539a; cf. Tarn, vol. I, p. 117, vol. II, p. 166; Badian, *Stud. GRHist.* p. 201 (quoted here)。

40. Arrian 7.5.1-3; Justin 12.11.1-4; Diod. 17.109.2; cf. Plut. *Alex.* 70. 3-4, *Moral.* 339C.

41. 流亡者法令: Hypereides *In Demosth.* 18; Deinarchus *In Demosth.* 81-2; Diod. 17-109.1-2, 17.111.1-2, 18.8.2-7; QC 10.2.4-7; Justin 13.5.2-5; Paus. 1.25.5, 8.52.5; cf. the masterly discussion by Badian, *JHS* 81 (1961), 25-31, =*MP*, pp. 215-21。两份与密提勒涅和泰格亚相关的铭文 (Tod, II, nos. 201-2) 充分表明该法令会引起怎样的混乱。比克尔曼 (E. Bickerman, *REA* (1940), 25-35) 认为, 亚历山大的主要动机可能是想在希腊城邦中扶植支持者。

42. 塔恩是这么论说的 Tarn, vol. II, pp. 370 ff.; Balsdon 很好地驳斥了这点, Balsdon *MP*, pp. 202-4. 巴迪安 (Badian *ibid.*, p. 219) 写道: “这种通过褻渎来为伪誓做辩护的尝试, 现在 (我们可以期待) 主要是因为学术上的好奇才值得引用。”

43. Plut. *Moral.* 219E-F, cf. Aelian *VH* 2.19.

44. Badian, *Stud. GRHist.* p. 202.

45. 关于神化法令, 现代文献多如牛毛: 尤可参见 Balsdon, *MP*, p. 199 ff. (with reff. there cited), 作者认为亚历山大根本就不曾有过神化

的要求。我欣赏但没法接受他的论证。参看 Plut. *Moral.* 219E and Aelian as above, n. 43。特格尔认为亚历山大自命为神主要是出于自身的想法，而非源自成熟的希腊理念（例如亚里士多德和伊索克拉底的理念），参见 F. Taeg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Numen Supplements)* 4 (1959), 394 ff.。至于亚历山大日渐增长的妄自尊大，参见 J. R. Hamilton, *CQ* ns3 (1953), 156-7。总体情况现在参见 Lowell Edmunds, *GRByS* 12 (1971), 363-91。

46. 从苏萨到欧庇斯的航行和堤堰体系：Arrian 7.7.1-7; Strabo 16.1.9, C . 739-40。

47. Arrian 7.8.1-2; Plut. *Alex.* 71.2; Justin 12.11.4.

48. 兵变的一般史料：Arrian 7.8-11.7; Plut. *Alex.* 71.2- 4; Justin 12.11.4-12.12.7; Diod. 17.108.3, 109.2-3; QC 10.2.12-10.3.14; cf. Badian, *Stud.G RHist.*, p. 200, and *Historia* 7 (1958), 428 ff。

49. Arrian 7.8.2-3; Diod. 17.108.3, 109.2; Plut. *Alex.* 71.2; Justin 12.11.5; QC 10.2.12-13.

50. Arrian 7.8.3; Diod. 17.108.3; Justin 12.11.6.

51. Arrian 7.8.3; Justin 12.11.7.

52. Arrian 7.8.3; Diod. 17.109.2; Justin 12.11.8; QC 10.2.30, 10.4.2-3.

53. Arrian 7.9-10 *passim*; QC 10.2.15-30; cf. Plut. *Alex.* 71.3.

54. Arrian 7.11.2.

55. Arrian 7.11.1; QC 10.3.5.

56. Arrian 7.11.1-2; QC 10.3.7-14; Diod. 17.109.3; Plut. *Alex.* 71.3; Justin 12.12.1-4.

57. Arrian 7.11.2-3.

58. Arrian 7.11.4; Plut. *Alex.* 71.4; Justin 12.12.5-6.
59. Arrian 7.11.5-7; Diod. 17.109.3; Justin 12.12.7.
60. Arrian 7.11.8-9; cf. Plut. *Alex.* 71.4-5, *Moral.* 329A-D; Badian *Historia* 7 (1958), 428-32 = *MP*, pp. 290-94.
61. Tarn, *Proc. Brit. Acad.* 19 (1933), 123-66 = *MP*, pp. 243-86, cf. his *Alexander the Great*, vol. II, pp. 440 ff.
62. Arrian 7.8.1, 7.12.1-3; Plut. *Alex.* 71.1-3, 5; *Moral.* 339C-D, 180-81, 21; QC 10.2.8-11; Diod. 17.109.1-2; Justin 12.12.7-10.
63. Diod. 17.110.3; Arrian 7.12.1-2; Plut. *Alex.* 71.5.
64. Badian, *Stud. GRHist.*, p. 201.
65. Quoted by Arrian, 7.19.6; cf. Strabo 16.1.11, C. 741. 关于远至大西洋的征服计划, 参见 Diod. 18.4.4, cf. Schachermeyr, *MP*, pp. 324 ff; Badian, *Harv. Stud.* 72 (1967), 184-9; Bosworth, *CQ* ns21 (1971), 127 and n. 5。
。
66. QC 10.10.4; Arrian 7.12.6, cf. Plut. *Alex.* 39.11, Livy 8.24.17, Bosworth, *op. cit.*, p. 126. 至于奥林匹娅斯挑唆亚历山大除掉安提帕特, 参见 Ps-Call. 3.31.1, Metz Epitome 87, cf. Diod. 17.118.1, Justin 12.14.1-3。
67. Arrian 7.12.3-7; QC 10.10.15; Plut. *Phoc.* 18.4-5, 29, *Moral.* 472E (cf. 780, 545A), 180E 17; Justin 12.12.8-9; Aelian *VH* 12.16 (关于亚历山大对安提帕特和其他人的才能的嫉妒——此处即指安提帕特的领导能力); *Suda* s.v. Antipatros^⑤。
68. cf. Bosworth, *CQ* ns21 (1971), 125-6.
69. 至于毒杀的假说, 参见 Justin 12.14; Plut. *Alex.* 77.1-3; Arrian 7.

27; QC 10.10.14-17。在这一假说的现代支持者中，最有说服力的是 Milns, pp. 255-8, 参看 Hamilton, *PA*, pp. 213-14。现在亦可参见 Bosworth, *op. cit.*, pp. 113-16。

70. Bosworth, *op. cit.*, esp. pp. 134-6; cf. Diod. 18.23.2; QC 10.6.9, 16-18, 21 ff.

71. 至于安提帕特与雅典和埃托利亚的秘密谈判，参见 Plut. *Alex.* 49.8; Diod. 18.8.6-7; Justin 13.5.1-8; QC 10.2.2; cf. Badian, *MP*, pp. 223-7, with reff. there cited; Bosworth, *op. cit.*, p. 127。

72. 对哈尔帕罗斯返回雅典以及后来发生之事最好的现代研究著作是 Badian, *JHS* 81 (1961), 131-6 = *MP*, pp. 221 ff. 亦可参见 Berve, *APG*, II, no. 143, pp. 75 ff.。关于史料，参见 Plut. *Dem.* 25, *Phoc.* 21.3 [Vit. *X Orat.*] 846A-C, *Moral.* 531A, 845C; Diod. 17.108.7, 17.111.3; Paus. 2.33.3-4; Hypereides *In Demosth.* 3, cols. 8-13, 4(5) cols. 18-19, 7(8) col. 32, cf. fr. A 13 (有为哈尔帕罗斯辩护的演说辞，可能是伪造的); Deinarchus *In Demosth.* 68-71, 81-2, 89-90, 112-13, *In Philocl.* 1-2, cf. fr. B12 (有拒绝将哈尔帕罗斯交给亚历山大的演说辞，可能是伪造的)。所有出自叙佩雷德斯和戴纳尔科斯 (Deinarchus) 的段落都可以方便地据此版本进行研究，即 J. O. Burtt, *Minor Attic Orators*, vol. II (Loeb, 1954)。关于萨摩斯事件，参见 Plut. *Alex.* 28, and J. R. Hamilton, *CQ ns* 3 (1953), 151 ff., = *MP*, p. 235 ff.。

73. Tod, II, nos. 201-2, pp. 289-301, cf. Hamilton, *op. cit.*, p. 152 f.; Badian *ibid.*, p. 227; Wilcken, pp. 217-18.

74. Plut. *Moral.* 187E, 804B, 842D; Aelian *VH* 2.19.5-12, cf. Athen. 6.58; Diog. Laert. 6.8, 6.63; Val. Max. 7.2, ext. §13; Timaeus ap. Polyb. 12.12b.3; Hypereides *In Demosth.* 31; Deinarchus *In Demosth.* 94; cf. Badian, *MP*, pp. 223-4; Balsdon, *op. cit.*, pp. 199-200.

75. Arrian 7.13-14 *passim*, 23.6-8; Diod. 17.110.7-8, 115-25 *passim*; E phippus ap. Athen. 12.538a-b; Aelian *VH* 7.8; Lucian *Cal.* 17; Justin 12.12.1 1-12; Plut. *Alex.* 47, 72, *Eum.* 1, 2.4-5, *Moral.* 181D 29, 180D 14; cf. Berve, *APG*, II, no. 357, pp. 169 ff., and Hamilton, *PA*, p. 129 with reff.

76. Diod. 17.108.7-8, 18.19.2; Paus. 2.33.4; Hypereides *In Demosth.* col. 38 (cf. *MAO* II, pp. 167-8); [*Vit. X Orat.*] 846c. 菲罗斯特拉托斯 (Philostratus, *Vit. Soph.* 538) 认为, 亚历山大亲自提供了证据, 德摩斯提尼因此被定罪。至于德摩斯提尼与赫淮斯提翁的联系, 参见 Marsyas of Pella, *FGrH*, nos. 135-6, fr. 2, cf. Aeschines 3.162, both cited by Hamilton, *PA*, p. 130。

77. Arrian 7.15.1-3; Diod. 17.111.4-6; Plut. *Alex.* 72.3; Strabo 11.13.6, C. 524, cf. 16.1.11 (该地区是优良的木材产地)。

78. Arrian 7.15.4-7.17.6; Plut. *Alex.* 73; Strabo 16.1.5; C. 738; Diod. 17.112 *passim*; Justin 12.13.3-5; Appian *BC* 2.153.

79. 使节: Arrian 7.15.4-6, 7.19.1-2; Diod. 17.113.1-4; Justin 12.13.1-2; cf. M. Sordi, *Rend. Inst. Lomb.* 99 (1965), 435-52。入侵阿拉伯的计划: Arrian 7.19.3-20 *passim*; Strabo 16.1.11, C.741, 16.4.27, C. 785; Plin. *HN* 16.80.221, 12.42.86-7。亚历山大想要超越狄奥尼索斯的雄心: Plut. *Moral.* 326B。

80. 赫淮斯提翁的葬礼: Diod. 17.114-5 *passim*。其他事件: Arrian 7.21-2 *passim*; Diod 17.116.5-7; Strabo 9.2.18, C. 407; Appian *Syr.* 9.56, cf. Strabo 16.1.11, C.741; Eddy, pp. 108-9; Cary, *GB*, p. 179。

81. Arrian 7.18 *passim*, 7.23.1-24.3; Diod. 17.110.1-2, 116.1-4; Plut. *Alex.* 73.3-4, 75.1-2; Justin 12.13.3-5; Ps-Call. 3.30; cf. Eddy, *ibid.*, Milns, p. 254, and (with reservations) P. J. Derchain and J. Hubaux, *Ant. Cl.* 19 (1950), 367 ff.

82. Bosworth, *CQ* ns21 (1971), 126-7, 134-6.

83. Arrian 7.23.2; Plut. *Alex.* 74 *passim*; cf. Badian, *MP*, pp. 226-7.

84. Arrian 7.23.5; Aelian *VH* 3.23; Plin. *HN* 14.5.58; Plut. *Moral.* 207 D 8; cf. Brunt, *GR*, p. 213; and D. Kienast, *Gymnasium* 76 (1969), 430-56.

85. 至于亚历山大的最后时日，参见 A. E. Samuel, *Historia* 14 (1965), 8, citing A. J. Sachs, *Late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and Related Texts* (Rhode Island, 1955), no. 209; Wells, Loeb Diodorus, vol. VIII, p. 467 n. 5, cf. Hamilton, *PA*, p. 210。至于当晚的事情，包括美狄奥斯的聚会，参见 Arrian 7.24.4-25.1; Plut. *Alex.* 75.3; Diod. 17.117.1-3; Ps-Call. 3.31.8; Athen. 10.434a-c, 12.537d。所谓的“皇家实录”意在解释国王最后的生病和死亡（参看 Arrian 7.25-6, Plut. *Alex.* 76, Jacoby *FGrH* 117），该实录已经得到了许多讨论，而且直到最近一直被学者们过分使用：参见 C. A. Robinson, *The Ephemerides of Alexander's Expedition* (Providence, 1932: 这是一个精巧而新奇的过程再现)。修正性的评价可参见 A. E. Samuel, 'Alexander's Royal journals', *Historia* 14 (1965), 1-12; E. Badian, 'A King's Notebooks', *Harv. Stud. Class. Phil.* 72 (1967) 183-204, and, most recently, A. B. Bosworth, *CQ* ns21 (1971), 117 ff., 博斯沃思把这份实录当作亚历山大谋杀者出于政治宣传而伪造的突出例子。

86. 至于此人的有关情况，参见 Berve, *APG*, II, no. 521, pp. 261-2。

87. 尤可参见 Arrian 7.27.2。唯一的同谋者名单（本质上并非不可信，不过可参见 Bosworth, *op. cit.*, p. 116 and n. 3），是伪卡利斯特涅斯提供的（Ps-Call. 3.31.8）：墨勒阿格、列昂那托斯、卡山德、佩乌凯斯塔斯、医师腓力和涅阿尔科斯。

88. Cleitarchus ap. Diod. 17.117.2, cf. 3-4, and Ephippus of Olynthus ap. Athen. 10.434, 后者认为这是由于试图一口气喝下12品脱的酒而导致

的晕厥。

89. Plut. *Alex.* 77.1-3; Arrian 7.27; QC 10.10.14-17; Justin 12.14; Paus. 8.18.4. For Apollodorus and Peithagoras cf. Berve, *APG*, II, nos. 101 and 618, pp. 55-6, 310.

90. Bosworth, *op. cit.*, pp. 114 ff.

91. Badian, *JHS* 81 (1961), 36 (=MP, p. 226), n. 151.

92. *Alexander the Great*, pp. 256-8.

93. Theophr. *HP* 7.15.4, 9.11.5 ff.

94. Bosworth, *op. cit.*, p. 136.

95. Demetr. *De Eloc.* §283; Plut. *Phoc.* 22.

96. Lucian, *Quom. Hist. Conser.* 12.

97. On this see now Bosworth, *op. cit.*, pp. 115 f.

98. See the useful article by E. N. Borza, 'Cleitarchus and Diodorus' Account of Alexander', *Proc. Afr. Class. Assoc.* 2 (1968), 25-45; and Hamilton, *PA*, pp. xlix ff.

99. vol. II, pp. 69 n. 1, 96-7, 131; *contra*, Badian, *CQ* ns8 (1958), 153-7 and Borza-Wilcken, pp. xxiv ff.

100. Borza-Wilcken, pp. xxvii-viii. 布朗 (Truesdell S. Brown) 在为沙赫尔迈尔的亚历山大传写书评时 (*AJPh* 72 (1951), 74-7), 批评沙赫尔迈尔的“矛盾式”解释是一种“危险的方法”, 因为“一个矛盾的亚历山大可能做出任何事情, 无论高尚的还是堕落的, 而我们没办法从现有史料中去区分相关情节的真伪”。引用这些我想已经足够了。

101. *Sat.* 10.168-172.

102. 至于对德罗伊森的立场的简练而有力的短评，参见 Borza Wilcken, pp. xii-xiii。

103. Ibid. p. xiii.

104. cf. Roberto Andreotti, *Historia* 1 (1950), 599: ‘Il profilo più netto é quello del soldato’. Cf. Schachermeyr, pp. 91 ff., 220, 233.

附录

1. 我们的资料来源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他们提供了大部分的细节，见于 Arrian, 1.13-16 *passim*, and Plutarch, *Alex.* 16——参看 Hamilton’s commentary (PA) p. 38, citing Brunt, *JHS* 83 (1963), 27, n. 3——无论其资料还来源于何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17.18.2-21.6）在此处可能也是遵从那两人的记载：参见 Borza, ‘Cleitarchus and Diodorus’ account of Alexander’, *Proc. Afr. Class. Assoc.* 2 (1968), 25-45。查斯丁（Justin 1 1.6.10-13）提供一份非常粗略的概要，而波吕埃诺斯（Polyaenus 4.3.16）则只给了一句含糊得恼人的句子（参见上面第496页）。

2. ‘The Persian Battle Plan at the Granicus’, in *Laudatores Temporis Acti: Studies in Memory of Wallace Everett Caldwell,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y his Friends and Students*. Edited by Mary Frances Gyles and Eugene Wood Davis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4, = vol. 46 of the *James Sprun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34-44. 下面简称为“Davis”。

3. Davis, p. 42.

4. Davis, p. 44. 阿里安（Arrian 1.16.3）说得很清楚，阿尔西特斯认为自己要负最终的责任，不仅是为格拉尼科斯河之战波斯的策略，而且也是为该策略的实施负责。在我看来，阿尔西特斯（Arrian 1.12.10）无法给议事会下令：他们只是赞成他而已。但是，即使议事会上没有人

指挥，战场也总得有人来指挥，而且格拉尼科斯河处在他的行省辖区内。波斯的贵族政治也并不偏好一种三头的、近乎民主的指挥体制，而且这种指挥体制在西西里远征伊始起了很坏的妨碍作用。阿尔西特斯的地位可能类似于阿伽门农，即一种不甚稳固的*primus inter pares*（同侪之首）——但毕竟是之首。

5. Davis, p. 34.

6. See above, chapter 5, n. 7, p. 530, with reff. there cited; also Badian, *Stud. Ehrenb.*, p. 43 and n. 32.

7. Arrian 1.12.9; Diod. 17.18.2-3. 关于波斯进军希腊的可能性，参见上面第六章第212页及以下，连同注释47、50和51。塔恩提出，门农其实并不支持把战争引到希腊，因为他后来有此机会却并没有利用起来，参见 Tarn, *CAH*, vol. VI, p. 361 = AG, vol. I, p. 16。但正如戴维斯指出的那样，“门农在和希腊人接洽前必须先取得一些胜利，当他去世时正在夺取爱琴海中的岛屿基地”（p. 35, n. 3）。参看上面第212和第216页。

8. 至于分别给予佩尔科特、兰普萨科斯、科罗奈和普里亚波斯的处置，参见上面第五章第169页，以及注释32和33。

9. Arrian 1.12.9-10, 13.2; Plut. *Alex.* 16.1; Diod. 17.18.3-4.

10. F. Schachermeyr, *Alexander der Grosse: Ingenium und Macht* (Vienna, 1949), pp. 141-2, cf. Diod. 17.18.3.

11. cf. A. R. 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 (London, 1962), pp. 62-3.

12. op. cit., pp. 35-6, with n. 4; cf. K. J. Beloch, *Griech. Gesch.*, 2nd edn (Berlin-Leipzig, 1922), vol. III, i, p. 624.

13. 波斯人可能低估了他们的对手的技艺、经验和决心。也可能（参见上面第170页注释）波斯可用的军队仍被拖在埃及那边：参看 Davis

, p. 36; Olmstead, *Hist.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1948), pp. 492-3, 496.

14. A. Janke, *Auf Alexanders des Grossen Pfaden: Eine Reise durch Kleinasien* (Berlin, 1904), pp. 136 ff. with pl. 5; J. F. C. Fuller,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58), pp. 147-8; H. and F. Schreider,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at. Geogr.* 133 (1968), 15.

15. op. cit., p. 148.

16. Arrian 1.14.4, cf. Diod. 17.19.1, 3.

17. op. cit., p. 37.

18. *CAH*, vol. VI, p. 361 = *AG*, vol. I, p. 16.

19. Wilcken-Borza, p. 84.

20. *ibid.*

21. loc. cit., n. 18 above.

22. *Hellenistic Military and Naval Developments* (Cambridge, 1930), p. 70.

23. Davis, p. 39.

24. Fuller, p. 149.

25. *ibid.*, p. 148.

26. op. cit., p. 143.

27. *ibid.*

28. See esp. pp. 159 ff. and 170 ff.

29. Xen. *Anab.* 1.8.4 ff.; Plut. *Artax.* 8.

30. cf. Arrian 1.12.10; Diod. 17.18.2-3.

31. 至于对“克雷塔科斯假说”的良好阐述及反驳，参见 E. N. Borza, ‘Cleitarchus and Diodorus’ account of Alexander’, *Proc. Afr. Class. Assoc.* 2 (1968), 25-45。

32. Well refuted by Brunt, *CQ* 12 (1962), 141-55.

33. C. B. Welles, *Diodorus Siculus*, vol. VIII (Loeb edn), pp. 13-14; cf. Borza op. cit., p. 26. 查斯丁（Justin 11.6.10）认为此战发生在阿德拉斯泰亚平原，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场渡河战役，因而或许可以支持韦尔斯的假说，即特罗古斯是狄奥多罗斯第17卷的一个史料来源——不过正如埃利斯所说（Ellis, *JHS* 91 (1971), 21），特罗古斯“自己与其资料的关系只有天知道”。

34. Plut. *Alex.* 16.2; cf. Arrian 1.13.3-7; Diod. 17.19.3.

35. Arrian 1.14.5 ff.; Plut. *Alex.* 16.3 ff.; Diod. 17.19.3 ff.

36. cf. the remarks by Welles, op. cit., pp. 170-71, n. 1.

37. K. Lehmann, ‘Die Schlacht am Granikos’, *Klio* 11 (1911), 230-44 (不是戴维斯[Davis, p. 34 n. 2]所说的第340页，他还错误地引证了贝洛赫的发表日期，而且把沙赫尔迈尔的页标题当作正文的一部分来引用); J. Beloch, *Griech. Gesch.*, vol. III, i (Berlin-Leipzig, 1922), pp. 623-5; Berve, *AGP*, II, no. 606, p. 300, and n. 1; Milns, *Alexander the Great* (1968), pp. 56-7.

38. op. cit., p. 625, n. 1.

39. Davis, p. 34; cf. pp. 40-41.

40. Arrian 1.5.5-1.6.9 *passim*; 参看上面第四章第131页及以下，连同注释30-32。

41. Arrian 1.13.3-7; Plut. *Alex.* 16.1-3.

42. *Alex.* 16.3.

43. 4.3.16. 巴迪安教授提出，波吕埃诺斯的这段文字其实源自托勒密-阿里斯托布罗斯的通行本；和阿里安书中的一样，这里的ἐξ ὑπερδελτίων仅仅意为“从上方”，而διαβαίνων则意味着亚历山大要渡过河流进行攻击，这样一来波吕埃诺斯所说的战斗（包括侧翼包抄）是与格拉尼科斯河平行而非成直角的。前一点无法确证，因为两种用法都存在。后一个词我认为只是意味着“在渡河时”，指的是时间意义上的——而且无论我们相信哪一个版本，河流已经渡过去了这一点仍然是真实无误的。

44. L-S-J s.v. ὑπερδέξιος.

45. Diod. 17.19.6; cf. Arrian 1.14.1-3.

46. Fuller, p. 166.

47. cf. Brunt, *JHS* 83 (1963), 30-34.

48. 但是参见 Plut. *Eum.* 2.2。

49. 可能由佩提涅斯（Petines）和尼法特斯（Niphates）指挥：参见 Arrian 1.14.4。

50. 阿里安所说的1000人似乎仅指伊朗人的损失。

51. So Tarn, vol. I, p. 16; Schachermeyr, pp. 140-41 with nn. 84-5; Hamilton, *PA*, p. 39.

52. Diod. 17.17.2; Polyaeus 5.44.4. 至于门农得到全权指挥的任命，参见 Diod. 17.29.1, cf. 23.5-6。

53. Arrian 2.2.2; QC 3.3.1.

54. 伊索斯之战前的重新征募，参见 Diod. 17.29.1; QC 3.2.9。关于

最后的总数50000人，参见 QC 5.11.5; Paus. 8.52.5。至于对这些数据的反驳，参见上面第229页和该页脚注。

55. 至于有关细节，参见 Plut. *Alex.* 16.6-7; Arrian 1.16.2, 6。

56. Diod. 17.14.1; Plut. *Alex.* 11.6; Aelian *VH* 13-7.

57. Diod. 13.19.2 (18000人被杀，7000被俘), cf. Thuc. 7.83-5.

58. 参见——比如已知的集结名录——Diod. 17.19.5, 21.6; Plut. *Alex.* 16.6-7。

59. Arrian 1.14.1-3, cf. Diod. 17.19.6.

60. Arrian 1.15.1-2; Plut. *Alex.* 16.3-5.

61. Plut. *Alex.* 16.4-5, 7-8; cf. Diod. 17.20.3, 5, 6. 斯特拉波（Strabo, 15.3-18, C. 734）把σαυνίον解释为一种狩猎枪，从马背上投出去（这一点我受益于巴迪安教授）。

62. Arrian 1.15.5 and elsewhere, e.g. Xen. *Cyrop.* 4.3.9, 6.2.16.

63. Arrian 1.15.1-3.

64. 有些论者（例如 Bryan）实际上建议把这里的αἱ πεζαί校正为αἱ Περσικαί，或者在πεζαί后面增加Περσῶν：参见 Hamilton, *PA*, p. 41。他自己的注解是：“普鲁塔克没有意识到，波斯人除了雇佣兵以外就没有步兵了”；当然，这只是乞题而已。阿里斯托布罗斯（参看上面注释58）说他们有步兵（16.6）。这完全基于人们多大程度上相信托勒密的叙述是一致且真实的。

65. Arrian 1.16.2; Diod. 17.21.5.

66. Diod. 17.21.1, with Welles' note *ad loc.*, pp. 176-7. 在现存文本中，这是唯一一处ἄκοντίζω与波斯骑兵联系在一起。即使在这里，狄奥多罗斯可能也是在投掷（某种）投射物的意义上使用该词。

67. Davis, p. 41.

68. 汉密尔顿 (Hamilton *PA*, p. 39) 说, 亚历山大“意识到了在对抗对手波斯时强行渡河的宣传价值”。这可能是对的, 但我仍然有所怀疑。最好的宣传无疑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无论胜利是怎样获得的。那导致最初失败的策略可能会导致根本就不存在宣传了。关于托勒密著作中的系统性的偏见, 现在有不少的论文加以论述, 参见 R. M. Errington, *CQ ns*19 (1969), 233-42。

69. 对于马拉松战役, 近来也有一种类似的假说, 非常巧妙 (但在我看来却是错误的): 参见 J. H. Schreiner, 'The Battles of 490 B.C.', *Proc. Camb. Phil. Soc.* 196 (ns16) (1970), 97-112。这里有必要说一下, 本附录初稿完成时施赖纳的论文我还没有看到。

70. *Plut. Alex.* 14, cf. *Diod.* 17.93.4; Tarn, vol. II, pp. 338-46, and above, p. 124.

71. 参见上面第360页及以下, 以及其他地方。

72. 例如在米利都, 参见 *Arrian* 1.19.6, *Plut. Alex.* 17.1。亚历山大在打下米利都之前无法支付雇佣兵薪水的说法依旧不能解释他在格拉尼科斯河战役后近乎残暴的处置方式。可与此相比的事例, 我们要一直等到他在马萨伽对印度雇佣兵的大屠杀; 参见上面第九章第383页及注释50。

73. *Arrian* 1.16.6, cf. 2-3, with *Plut. Alex.* 16.6-7.

74. 参见上面第四章第147页及以下, 连同注释54—57; 至于以同盟为辩护工具, 参见 *Diod.* 17.14.1-4, *Arrian* 1.9.6-10, *Plut. Alex.* 11.5-6, *Justin* 11.3.8-11.4.8。

75. *Plut. Alex.* 16.7.

76. Plut. *Alex.* 16.1-2; Arrian 1.13.3-5.

77. So Fuller, p. 149 (wrongly queried by Hamilton, *PA*, p. 39).

78. cf. Badian, *TAPhA* 91 (1960), 327-8.

79. *JHS* 91 (1971), 196.

80. 此时没有什么能阻止这样的计划。亚历山大还没有证明自己富有魅力并且不可战胜；对马其顿贵族们来说他只是一个聪明、危险和坚决的少年，迫使帕美尼翁勉强接受他的继位。参看 Badian, *Phoenix* 17 (1963), 249-50。

81. Plut. *Alex.* 16.3-4; cf. Arrian 1.14.6.

82. 然而，有许多次卡利斯特涅斯或以他的著述为基础的史料特别记载了帕美尼翁对国王提了据说有害的建议，为了全体的利益这些建议总是被忽略，这种情况非常耐人寻味：可参见 Arrian 1.18.6 ff., Plut. *Alex.* 16.3, 29.8, 31.10 ff.。我们很难怀疑这是得到亚历山大授意的：现在相关的不错的注释参见 Hamilton, *op. cit.*, p. 89，至于亚历山大特有的想要“立即把失败补回来”的欲望，参见 Badian, *Stud. Ehrenb.* (1966), p. 47。

83. Arrian 1.14.6.

84. Arrian 1.16-4, cf. Plut. *Alex.* 16.8, Veil. Pat. 1.11.3-4.

85. 很难直接让克雷塔科斯为狄奥多罗斯的版本负责——就像沙赫尔迈尔所做的那样（*op. cit.*, pp. 504-5, n. 86）——并进而将后者一下子摒弃一边，仅仅因为其有“不可靠的”来源，“我们对当时指挥部里的分歧知之甚少，正如我们对那天下午的大屠杀知之甚少一样”。沙赫尔迈尔继续说道：“也许卡利斯特涅斯对于此事什么也没讲。”我倒觉得完全不 *vermutlich*（可能）；这纯属猜测。

-
- ① C. 326是早期由 Casaubon 编辑的版本的页码，洛布版将其作为边码。——译者注
- ② 该词的拼法似误，查词典应为πεζέταιροι，在 Suda 辞书中则作πεζαίτεροι。
- ③ 5573似误，应为557b。
- ④ Suda 辞书中作Σαρδανάπαλος。——译者注
- ⑤ 在 Suda 辞书中作Ἀντίπατρος。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一）：古代史料

(a)文献

因为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我在此尽可能列出每位作家在洛布（Loeb）丛书中的贴切的对照译本，但不能据此认为我总是把该版本当作现有的最好版本，或者说最佳译本。如果我知道有更好且更容易获得的版本，我会列出来的。没有列出来的一般作家见于 Jacoby 或 Robinson（参见下面“合集类”条目）。L = Loeb。

埃里安（Aelian，全名 Claudius Aelianus，约公元170—235年），定居于罗马的文选编辑家。《轶事集》（*Varia Historia*, ed. R. Hercher (Teubner), 1864），没有可用的英译本。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约公元前397—约前322年），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演说辞》（*Works*, ed. and tr. C. D. Adams, London, 1919 (L)）。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哲学家和科学家。《政治学》（*Politics*, ed. And tr. H. Rackham, London, 1932 (L)），《优台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 ed. and tr. E. Rackham, London, 1935 (L)）。

）。

阿里安（Arrian，全名 Flavius Arrianus，公元2世纪），出身于比尼亚的希腊人，曾在哈德良（Hadrian）统治时期担任卡帕多基亚总督，在公元134年阿兰人入侵期间有过军事行动，后来在爱比克泰德（Epictetus）门下学习。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History of Alexander*）主要依据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著作，是研究亚历山大最全面的著作（不过，绝不是异想天开的狂热者所声称的那样全面：其实他巧妙地遗漏了许多史实）。《亚历山大远征记和印度志》（*History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ed. and tr. E. I. Robson (L), 2 vols., London, 1929-33），无论文本还是翻译都非常不可靠。《阿里安的亚历山大征战记》（*Arrian's Campaign of Alexander*, tr. Aubrey de Selincourt, London (Penguin Classics)），汉密尔顿1972年做了修订，且带有导论和注释。

阿特奈奥斯（Athenaeus of Naucratis in Egypt，活跃于约在公元200年），现存《欢宴的智者》（*The Deipnosophists*, ed. and tr. C. B. Gulick, 7 vols., London, 1927-41 (L)），其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公元前5和4世纪的作家（特别是剧作家）的无数残篇，这些作家的作品早已失传。相关残篇收集于 Jacoby 和 Robinson（参见下面“合集类”条目）。

克特西亚斯（Ctesias of Cnidos，公元前5世纪后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宫廷中的希腊医生，写过关于波斯和印度的著作（J. Gilmore, *Fragments of the Persika of Ctesias*, London, 1888; R. Henry, *Ctesias: La Perse, L'Inde, les Sommaires de Photius*, Brussels, Office de Publicité S. C., 1947.）。

德玛德斯、戴纳尔科斯、叙佩雷德斯、吕库古（Demades, Deinarchus, Hypereides, Lycurgus），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雅典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们现存的演说辞和残篇收集于《阿提卡一般演说家演说辞》（*Minor Attic Orators*, vol. II, ed. and tr. J. O. Burt, London, 1954 (L)）。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 of Paeania in Attica，公元前384—前322年），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奥林托斯辞、斥腓力辞等》（*Olynthiacs, Philippics, etc.*, ed. and tr. J. H. Vince, London, 1930），《金冠辞和论辱命之使》（*De Corona and De Falsa Legatione*, ed. and tr. C. A. and J. H. Vince, London, 1926 (L)）。

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出身于阿吉里昂的西西里人，著有《历史通志》（*Universal History*）四十卷，保存了相当一部分。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与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相关的最早记述：狄奥多罗斯把第17卷整整一卷都用在公元前336—前323年上。他所用的资料来源仍然是一个争议非常激烈的话题；尽管他的著作年代混乱且剪切拼凑的手法十分明显，但经常保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第17和第18卷见于洛布本的第8和第9卷，分别由韦尔斯（C. B. Welles, vol. VIII, 1963: 有精彩的学术史）和吉尔（R. M. Geer, vol. IX, 1947）编定。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公元3世纪早期？），传记文选编辑家。《名哲言行录》（*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ed. and tr. R. D. Hicks, London, 1925 (L)）。

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massus，约公元前485—约前425年），《历史》（*The Histories*, ed. and tr. A. D. Godley, 4 vols., London, 1920-25 (L); tr. A. de Selincourt,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54）。

赫叙基奥斯（Hesychius of Alexandria，公元5世纪？），辞典编纂家。可用版本有 M. Schmidt, Jena 1858-68。拉特的版本（Kurt Latte, Hahnianae, Munksgaard: vol. I, 1953; vol. II, 1966）更好，但到编者去世时只编到“O”这一字母。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雅典的小册子作家、修辞学家和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演说辞》（*Works*, ed. and tr. G. Norlin and LaRue Van Hook, London, 1928-45 (L)）。

尤里乌斯·瓦勒里乌斯（Julius Valerius，公元3—4世纪？），著有伪卡利斯特涅斯的亚历山大传奇的拉丁版本。可用版本有 B. Kuebler, Leipzig, 1888。没有可用的英译本。

查斯丁（Justin，全名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公元3世纪？）文选编辑家；为特罗古斯·庞培（Trogus Pompeius）的《腓力传》（*Historiae Philippicae*）做过摘要，该著作写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特罗古斯·庞培的腓力传概要》（*Abrégé des Histoires Philippiques de Trogue Pompée*, ed. and tr. E. and L. T. Chambry, 2 vols., Paris, 1936）。没有可用的英译本。

合集类（Miscellaneous）：

W. W. Boer (ed.), *Epistola Alexandri ad Aristotelem*, The Hague, 1953.

F. Jacoby (ed.),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FGrHist), Pt II (Zeitgeschichte) B, pp. 618-828 (Alexandergeschichte) with Commentary (pp. 403-502, nos. 117-53), Berlin, 1929.

C. A. Robinson (ed.),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vol. I (Brown University Studies XVI), Providence R.I. (1953)，其中翻译了 Jacoby 中的所有残篇，包括卡利斯特涅斯、涅阿尔科斯、密提勒涅的卡瑞斯、托勒密、克雷塔科斯以及其他作家。

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公元2世纪），旅行作家和地理学家，以其《希腊行纪》（*Description of Greece*, tr. and ed. W. H. S. Jones, H. A. Ormerod, R. E. Wycherley, 5 vols., London, 1918-35 (L)）最为知名。现在有可用的新英译本（Father Peter Levi, S.J., Penguin Classics, 2 vols., London, 1971）。

普林尼（Pliny，全名 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24—79年），将领和博学之士，他的科学求知欲导致他死于那场毁灭庞贝城的维苏威

火山喷发。《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ed. and tr. H. Rackham, W. H. S. Jones, 10 vols., London, 1938-62 (L)）。

普鲁塔克（Plutarch of Chaeronea, 约公元46—120年），传记作家、业余学者、德尔菲祭司；哈德良统治时期的行省财政官。他的《亚历山大传》基于许多现在仅存残篇的作家，包括卡利斯特涅斯、阿里斯托布罗斯、卡瑞斯和奥涅西克里托斯：可用佩林翻译和编辑的版本（tr. and ed. B. Perrin, *Plutarch's Lives*, vol. VII, London, 1919 (L)）。亦可参见他的《德摩斯提尼传》（同上）、《福基翁传》和《欧美涅斯传》（第八卷）。普鲁塔克早年写过两篇关于亚历山大的文章：《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Moral. 326D-345B (Loeb Moralia, vol. IV, tr. and ed. F. C. Babbitt, London, 1936)》，在《道德论丛》还有许多零散的指涉（*Moralia*，特别参见179D-181F, 219E, 221A9, 522A, 557B, 781A-B, 804B, 970D, 1043D）。至于一流的讨论和注疏，参见汉密尔顿版的《亚历山大传》（J. R. Hamilton, *the Alexander Life* (Oxford, 1968)）。

波吕埃诺斯（Polyaenus, 活跃于约公元150年），马其顿修辞学家和文摘编辑家（*excerptor*），现在为人所知的只有他的战术轶闻类的著作《波吕埃诺斯兵法》（*Strategemata* , ed. J. Melber, Leipzig, 1887）。没有可用的英译本。

波利比奥斯（Polybius, 公元前203? —前120? 年），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后来在西庇阿集团的庇护下移居罗马。对这段历史而言，他的主要价值在于他对作为军事史家的卡利斯特涅斯的细致批判（20.17-22），特别是涉及伊苏斯之战的内容。《历史》（*The Histories*, ed. and tr. W. R. Paton, London, 1925 (L)）。

伪卡利斯特涅斯（Pseudo-Callisthenes），这是对所谓的《亚历山大传奇》的佚名作者的称呼，该书现存许多版本（包括三个希腊语版本），其中最早的可能是公元2世纪晚期，不过其依据的可能是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就流传开来的传奇故事。文本：W. Kroll, *Historia Alexandri Ma*

gni, second edition, Berlin, 1958; tr. E. H. Haight, *The Life of Alexander of Macedon*, New York, 1955。亦可参见 P. H. Thomas, *Incerti Auctoris Epitoma rerum gestarum Alexandri Magni cum libro de morte testamentoque Alexandri*, Leipzig (Teubner), 1960。

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公元1世纪？）。他的《亚历山大传》（*History of Alexander*, ed. and tr. J. C. Rolfe, 2 vols., London, 1946 (L)）丢失第1和第2卷，第5和第6卷之间和第10卷中间存在阙漏。作为资料来源，库尔提乌斯的地位近几年有所提升：他通常没有考辨且修辞过度，但仔细分析仍可以揭示出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例如与地理方面相关的）。

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63—公元21年+），出身于本都的阿马塞亚，其人生的很长时间是在罗马和埃及度过的。他的《地理学》（*Geography*, ed. and tr. H. L. Jones, 8 vols., London, 1917-32 (L)）是一座充满有用事实和轶闻的巨大宝库，既有地理的，也有历史的，涉及亚历山大穿过的每一区域。

苏达（Suda）。这不是人名，而是一部辞书的标题（“苏达”即“要塞”或“堡垒”），该辞书于公元10世纪左右编成现在的规模，基本上是基于摘要和梗概。不过，其中的许多材料根本上是源于现已失传的一流著作。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公元1世纪），修辞学家和文摘编辑家。他的《言行录》（*Factorum ac dictorum memorabilium libri IX*, ed. C. Kempf, Leipzig, Teubner, 1888）是题献给提比略（Tiberius）的，尽管完全没有考辨，但包含了一两则大有裨益的轶闻。

(b) 铭文

腓力和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铭文收录——带有详尽的

注疏解——于 M. N. Tod in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vol. II, from 403 to 323 B.C., Oxford, 1948。

(c)钱币

AULOCK, H. von. 'Die Prägung des Balakros in Kilikien', *JNG* 14 (1964), 79-82.

BABELON, J. *Le Portrait dans l'antiquité d'après les monnaies*, Paris, 1942.

BELLINGER, A. R. *Essays on the Coin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umismatic Studies II), New York, 1963.

HILL, G. 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Persian lion-gryphon', *JHS* 43 (1923), 156-61.

KLEINER, G. *Alexanders Reichsmünzen*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Akademie-Verlag, no. 5), Berlin, 1949.

KRAAY, C. M. *Greek Coins*, London, 1967.

NEWELL, E. T. *The dated Alexander coinage of Sidon and A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Myriandros kat'Isson*, New York, 1920. *Tarsos under Alexander*, New York, 1919.

NOE, S. P. 'The Corinth Hoard of 1938', *ANSMusN* 10 (1962), 9-41.

SELTMAN, C. *Greek Coi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55.

(d)图像和合集类

ANDREAE, B. *Das Alexandermosaik (Opus nobile XIV)*, Bremen, 195

9.

BANDINELLI, G. 'Cassandro di Macedonia nella Vita plutarchea di Alessandro Magno', *RFIC* 93 (1965), 150-64. 'Un ignorato gruppo statuario di Alessandro e Bucefalo', *SE* 18 (1944), 29-43, with plates V-VII.

BERNOULLI, J. J. *Die erhaltenen Darstellungen Alexanders des Grossen; Ein Nachtrag zur griechischen Ikonographie*, Munich, 1905.

BIEBER, M. *Alexander the Great in Greek and Roman Art*, Chicago, 1964.

BIJVANCK, A. W. 'La bataille d'Alexandre', *BVAB* 30 (1955), 28-34.

DAUX, G. 'Chroniques des Fouilles en 1961', *BCH* 86 (1962), 805-13. 'Chroniques des Fouilles en 1957', *BCH* 82 (1958), 761-5 with figs. 14-16.

DELLA CORTE, M. 'L'educazione di Alessandro Magno nell'enciclopedia Aristotelica in un trittico megalografico di Pompei del II stile', *MDAI(R)* 57 (1942), 31-77.

DEL MEDICO, H. E. 'A propos du trésor de Panaguriste: un portrait d'Alexandre par Lysippe', *Persica* 3 (1967/8), 37-67, plates II-IV, figs. 8-15.

GEBAUER, K. Alexanderbildnis und Alexandertypus. *MDAI(R)* (1938/9), 1-106.

JOHNSON, F. P. *Lysippos*, Durham, N. Carolina, 1927.

JONGKEES, J. H. 'A portrait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VAB* 29 (1954), 32-3.

LUNSINGH-SCHEURLEER, R. A. 'Alexander in faience', *ibid.* 40 (1965), 80-83.

MINGAZZINI, P. 'Una copia dell'Alex. Keraunophoros eli Apelle', *JBe*

rlM 3 (1961), 7-17.

NEWELL, E. T. *Royal Greek Portrait Coins*, New York, 1937.

PFISTER, F. 'Alexander der Grosse in der bildenden Kunst', *Fund F* 35 (1961), 330-34, 375-9.

PICARD, C. 'Le mosaïste grec Gnôsis et les nouvelles chasses de Pella', *RA I* (1963). 205-9.

RICHTER, G. M.A. *The Portraits of the Greeks*, 3 vols., London, Phaidon, 1965.

ROBERTSON, M. 'The Boscoreale figure-paintings', *JHS* 45 (1955), 58-67, plates XI-XIII.

RUMPF, A. 'Zum Alexander-Mosaik', *MDAI(A)* 77 (1962), 229-41.

SCHREIBER, T. *Studien über das Bildniss Alexanders des Grossen*, Leipzig, 1903.

SJÖQVIST, E. 'Alexander-Heracles. A preliminary note', *BMusB* (Boston) 51 (1953), 30-33, figs. 1-5.

SUHR, E. G. *Sculptured Portraits of Greek Statesmen, with a special stud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altimore, 1931.

UJFALVÝ, C. de. *Le Type Physique d' Alexandre le Grand*, Paris, 1902.

参考文献（二）：现代研究

这份参考文献不敢说是详尽无遗的（关于亚历山大的文献庞大无比，全部列出会使本书的部头极为巨大）；在此我只罗列我觉得特别有用或有趣的条目——经常是因为我与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截然对立。至于进

一步的研究，可以查阅下面这篇指南：

BADIAN, E. 'Alexander the Great, 1948-67', *CW* 65 (1971), 37-56, 77-83.

ABEL, F. M. 'Alexandre le Grand en Syrie et en Palestine', *Rev. Bibl.* 43 (1934), 528-45; 44 (1935), 42-61.

ADCOCK, F. E. *The Greek and Macedonian Art of War*, Berkeley, 1962. 'Greek and Macedonian Kingship', *Proc. Brit. Acad.* 39 (1954), 163-80.

ALTHEIM, F. *Alexander und Asien: Geschichte eines geistiges Erbes*, Tübingen, 1953.

Zarathustra und Alexander, Frankfurt a.M., 1960.

ANDERSON, A. R. 'Alexander's Horns', *TAPhA* 58 (1927), 100-122.

'Bucephalas and his legend', *AJPh* (1930), 1-21.

ANDREOTTI, R. 'Die Weltmonarchi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Saeculum* 8 (1957), 120-66.

'Per un critica dell'ideologia di Alessandro Magno', *Historia* 5 (1956), 257-302.

'Il problema di Alessandro Magno nella storiografia dell'ultimo decennio', *Historia* 1 (1950), 583 ff.

Il problema politico di Alessandro Magno, Parma, 1933.

ATKINSON, J. E. 'Primary sources and the Alexanderreich', *Act. Class.* (Cape Town), 6 (1963), 125-37.

AYMARD, A. 'Le protocole royal grec et son évolution', *REA* (1948), 232-63.

‘Sur quelques vers d’Euripide qui poussèrent Alexandre au meurtre’, *An n. Inst. Phil. Hist. Or.* (Brussels) 9 (1949), 43-74 (=Mélanges Grégoire I).

‘Un ordre d’Alexandre’, *REA* (1937), 5-28.

BADIAN, E. ‘Agis III’, *Hermes* 95 (1967), 170-92.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GR* 12 (1965), 166-82.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Creation of an Empire’, *Hist. Today* 8 (1958), 369-76, 494-502.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Greeks of Asia’, *Ancient 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Oxford, 1966), 37-69.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Loneliness of Power’, *Journ. Austral. Univ. Lang. Assoc.* 17 (1962), 80-91; repr. in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1964), 192-205.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Historia* 7 (1958), 425-44; repr. in Griffith, *Main Problems* (MP), q.v., pp. 287-306.

‘Ancient Alexandria’, *Stud. Gr. Rom. Hist.*, pp. 179-191.

‘The death of Parmenio’, *TAPhA* 91 (1960), 324-38.

‘The death of Philip II’, *Phoenix* 17 (1963), 244-50.

‘The Eunuch Bagoas’, *CQ* ns8 (1958), 144-57.

‘The first flight of Harpalus’, *Historia* 9 (1960), 245-6.

‘Harpalus’, *JHS* 81 (1961), 16-43.

‘A King’s Notebooks’, *Harv. Stud. Class. Phil.* 72 (1967), 183-204.

‘Orientals in Alexander’s army’, *JHS* 85 (1965), 160-61.

BALDRY, H. C. *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 Cambridge, 1965.

BALSDON, J. P. V. D. ‘The “Divinit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istoria* 1 (1950), 383-8.

BELOCH, K. J. *Griechische Geschichte*, 2nd edn, vols. III, i-ii; IV, i, Leipzig-Berlin, 1922-5.

BERVE, H.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 2 vols., Munich, 1926.

‘Die Verschmelzungspolitik Alexanders des Grossen’, *Klio* 31 (1938), 135-68. Repr. Griffith, *MP* pp. 103-36.

BEVAN, E. R. Chapter XV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ed. E. J. Rapson), vol. I (1922), pp. 345-86.

BICKERMANN, E. ‘Alexandre le Grand et les villes d’Asie’, *REG* 47 (1934), 346-74.

‘La Lettre d’Alexandre le Grand aux bannis grecs’, *REA* 53 (1940), 25-35.

‘A propos d’un passage de Chares de Mytilène’, *Parola del Passato* 18 (1963), 241-55.

BIDEZ, J. ‘Hermias d’Atarnée’, *Bull. Class. Lett. Sc. Mor. Pol. Acad. R. Belg.* 29 (1943), 133-46.

BORZA, E. N. ‘Alexander and the return from Siwah’, *Historia* 16 (1967), 369.

‘Cleitarchus and Diodorus’ account of Alexander’, *Proc. Aft. Class. Ass*

oc. 2 (1968), 25-45.

‘The End of Agis’s Revolt’, *CPh* 66 (1971), 230-35.

‘Fire from Heaven: Alexander at Persepolis’, *CPh* 67 (1972), 233-45.

‘Some notes on Arrian’s name’, *Athens Annals of Archaeology* 5 (1972), 99-192.

See also s.v. WILCKEN, U.

BOSWORTH, A. B. ‘Philip II and Upper Macedonia’, *CQ* 21ns (1971), 93-105.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Rumour and Propaganda’, *ibid.*, 112-36.

‘Arrian’s Literary Development’, *CQ* ns 22 (1972), 163-85.

BRELOAR, B. *Alexanders Kampf gegen Poros*, Stuttgart, 1933.

BROWN, T. S. ‘Alexander’s Book Order (Plut. *Alex.* 8)’, *Historia* 16 (1967), 359-68.

‘Callisthenes and Alexander’, *AJPh* 70 (1949), 225-48; repr. Griffiths, *MP*, pp. 53-72.

Onesicritus, Berkeley/Los Angeles, 1949.

BRUNT, P. A. ‘The Aims of Alexander’, *GR* 12 (1965), 205-15.

‘Alexander’s Macedonian Cavalry’, *JHS* 83 (1963), 27-46.

‘Persian accounts of Alexander’s campaigns’, *CQ* 12 (1962), 141-55.

BUCHNER, E. ‘Zwei Gutachten für die Behandlung der Barbaren durch Alexander den Grossen?’, *Hermes* 82 (1954), 378-84.

BURN, A. R.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2nd rev. edn, New York, 1962.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GR* 12 (1965), 140-54.

‘Notes on Alexander’s campaigns, 332-330 B.C.’, *JHS* 72 (1952), 81-91.

CAROE, O. *The Pathans, 550 B.C.-A.D. 1957*, London, 1958.

CARY, G. *The Mediaeval Alexander*, Cambridge, 1956.

CASSON, L. ‘The grain trade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TAPhA* 85 (1954), 168-87.

CASSON, S. *Macedonia, Thrace and Illyria*, Oxford, 1926.

CHROUST, A. H. ‘Aristotle and Callisthenes of Olynthus’, *Classical Folia* 20 (1966), 32-41.

‘Aristotle’s sojourn in Assas’, *Historia* 21 (1972) 170-176.

‘Aristotle leaves the Academy’, *GR* 14 (1967) 39-44.

CLOCHE, P. *Alexandre le Grand*, Neuchatel, 1953.

Histoire de la Macédoine jusqu’à l’avènement d’Alexandre le Grand (336 av. J.-C.), Paris, 1960.

Un fondateur d’empire: Philippe II, Roi de Macédoine (382/2-336/5 avant J.C.), St-Etienne, 1955.

COLOMBINI, A. ‘Per una valutazione dei rapporti delfico-macedoni dalle origini del regno Argeade ad Alessandro Magno’, *Stud. Class. E Orient.* 12 (1963), 183-206.

CROSS, G. N. *Epirus: A Study in Greek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

Cambridge, 1932.

CULICAN, W. *The Medes and Persians*, London, 1965.

DASKALAKIS, A.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Hellenism*, Thessaloniki, 1966.

‘L’origine de la maison royale de Macédoine et les légendes relatives de l’antiquité’, *AM*, pp. 155-61.

DAVIS, E. W. ‘The Persian battle plan at the Granicus’, *Stud. Caldwell (Laudatores temporis acti*, ed. M. F. Gyles and E. W. Davis), 34-44 (Univ. N. Carolina, 1964).

DELCOR, M. ‘Les allusions à Alexandre le Grand dans Zach. IX 1-8’, *Vet. Test.* 1 (1951), 110-24.

DELL, H. J.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the Macedonian monarchy’, *AM*, 1 15-26.

DERCHAIN, P. J., and HUBAUX, J. ‘Le fantôme de Babylone’, *AC* (1950), 367-82.

DE SANCTIS, G. ‘Gli ultimi messaggi di Alessandro ai Greci, I: La richiesta degli onori divini’, *Riv. fil.* (1940), 1-21.

DIHLE, A. ‘The conception of India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literature’, *Proc. Camb. Phil. Soc.* 10 (1964), 15-23.

DILLER, A. *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s before Alexander*, Univ. Illinois, 1937.

DROYSEN, J. G.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1833; rev. edn (H. Berve), 1931.

EDDY, S. K. *The King is Dead. Studies in the Near Eastern resistance to*

o Hellenism, 334-331 B.C., Lincoln Univ., Nebraska, 1961.

EDMUNDS, L. 'The religiosity of Alexander', *GRByS* 12 (1971), 363-91.

EDSON, C. F. 'Early Macedonia', *AM*, 2-44.

EHRENBERG, V.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tr. R. Fraenkel van Velsen, Oxford, 1938: ch. II, 'Pothis', repr. in Griffith, *MP*, pp. 73-83.

Alexander und Aegypten, Leipzig, 1926.

EHRHARDT, C. 'Two notes on Philip of Macedon's first interventions in Thessaly', *CQ* 17 (1967), 296.

ELLIGER, K. 'Ein Zeugnis aus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332 v. Chr.', *Zeitschr. f. Alttest. Wiss.* 62 (1949/50), 63-115.

ELLIS, J. R. 'The security of the Macedonian throne under Philip II', *AM*, 68-75.

'Amyntas Perdikka, Philip II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JHS* 91 (1971), 15-24.

ERRINGTON, R. M. 'Bias in Ptolemy's History of Alexander', *CQ* ns63 (1969), 233-42.

FAKHRY, A. 'A templ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t Bahria Oasis', *Ann. Serv. Ant. Egypt.* 40 (1940/41), 823-8.

FERGUSON, W. S. *Hellenistic Athens*, New York, 1911.

FORTINA, M. *Cassandro, re di Macedonia*, Torino, 1965.

FOUCHER, A. 'Les satrapies orientales de l'empire achéménide', *Compt. Rend. Acad. Inscr.* (1938), 336-52.

FOUCHER, A., and E. B. 'La vieille route de Bactre à Taxila', *Mém. Dé lég.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II (1942).

FRASER, A. D. 'The "breaking" of Bucephalas ', *CW* 47 (1953), 22-3.

FRASER, P. M. 'Alexander and the Rhodian Constitution', *Parola. del Passato* 7 (1952), 192-206.

'Current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ult of Sarapis', *Opuscula Archaeologica* 7 (1967), 23 ff.

FREDRICKSMEYER, E. A. 'Alexander, Midas, and the oracle at Gordium', *CPh* 56 (1961), 160-68.

'The ancestral rit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Ph* 61 (1966), 179-81.

The Relig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Diss. Univ. Wisconsin, 1958, Resume: *Diss. Abstract.* 19 (1959), 1747.

FRYE, R.N. *The Heritage of Persia*, London, 1962.

FULLER, J. F. C.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58.

GALLET DE SANTERRE, H. 'Alexandre le Grand et Kymé d'Eolide', *Bull. Corr. Hell.* 71.2 (1947/8), 302-6.

GEYER, F. 'Philippos' (7) in Pauly-Wissowa-Kroll (PWK) *Real. Enc.* (RE), vol. XIX, cols. 2266-303.

'Makedonien his zur Thronbesteigung Philipps II' (Beiheft 19, *Hist. Zeitschrift*), München/Berlin, 1930.

GHIRSHMAN, R. *Iran: Parthians and Sassanians*, London, 1962.

Perse: Proto-iraniens, Medes, Achémenides, Paris, 1963. (English tr. by

S. Gilbert and J. Emmons, London, 1964.)

GITTI, A. *Alessandro Magno all'Oasi di Siwah. Il problema delle fonti*, Bari, 1951.

‘Alessandro Magno e il responso di Ammone’, *Riv. stor. ital.* 64 (1952), 531-47.

‘L’unitarietà della tradizione su Alessandro Magno nella ricerca moderna’, *Athenaeum* 34 (1956), 39-57.

GLOTZ, G., ROUSSEL, P., and COHEN, R. *Histoire grecque*, vol. IV: *Alexandre et l’Hellénisation du monde antique*, pt i, ‘Alexandre et le démembrement de son empire’, Paris, 1938.

GRIFFITH, G. T. ‘Alexander and Antipater in 323 B.C.’, *Proc. Afric. Class. Assoc.* 8 (1965), 12-17.

‘Alexander’s generalship at Gaugamela’, *JHS* 67 (1947), 77-89.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an experiment in government’, *Proc. Camb. Phil. Soc.* 10 (1964), 23-39.

‘The letter of Darius at Arrian 2.14’, *Proc. Camb. Phil. Soc.* 14 (1968), 33-48.

‘The Macedonian Background’, *GR* 12 (1965), 125-39.

‘*Malcedonika*. Notes on the Macedonians of Philip and Alexander’, *Proc. Camb. Phil. Soc.* 4 (1956/7), 3-10.

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1935.

‘A note on the Hipparchies of Alexander’, *JHS* 83 (1963), 68-74.

‘Philip of Macedon’s early interventions in Thessaly (358-352 B.C.)’,

CQ ns20 (1970), 67-80.

(ed.)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Main Problems*, Cambridge, 1966.

GROTE, G. *A History of Greece*; rev. ed. 12 vols., London, 1888.

GUNDERSON, L. L. 'Early elements in the Alexander Romance', *AM* 3 53-75.

HADAS, M. *Hellenistic Culture: Fusion and Diffusion*, New York, 1959.

HADLEY, R. A. 'Deified Kingship and propaganda coinage in the early Hellenistic Age', Diss. Univ. Pennsylvania, 1964. Résumé in *Diss. Abstracts* 115 (1965), 5881-2.

HAMILTON, J. R. 'Alexander's early life', *GR* 12 (1965), 117-24.

'Alexander and his so-called father', *CQ* ns3 (1953), 151-7; repr. In Griffiths, *MP*, pp. 235-42.

'Alexander and the Aral', *CQ* ns21 (1971), 106-11.

'The cavalry battle at the Hydaspes', *JHS* 76 (1956), 26-31.

'Cleitarchus and Aristobulus', *Historia* 10 (1961), 448-58.

Plutarch: Alexander. A Commentary, Oxford, 1968.

'Three passages in Arrian', *CQ* ns5 (1955), 217-21.

HAMMOND, N. G. L. 'The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 to the Macedonian Kingdom', *AM* 53-67.

A History of Greece, 2nd edn, Oxford, 1967.

Epirus: The geography, the ancient remains, the history and topography

of Epirus and adjacent areas. Oxford, 1967.

‘The two battles of Chaeronea (338 B.C. and 86 B.C.)’, *Klio* 31 (1938), 186-218.

HAMPL, F. *Alexander der Grosse*, Gottingen, 1958.

‘Alexander der Grosse und die Beurteilung geschichtlicher Persönlichkeiten in der modernen Historiographie’, *Nouv. Clio* 6 (1954), 91-136.

‘Alexanders des Grossen *Hypomnemata* und letzte Pläne’, *Stud. pres. to D. M. Robinson II*, Washington U.P., 1953, 816-29. Repr. in Griffith, *MP*, pp. 307-21.

Der König der Makedonen, Weida in Thuringen, 1934.

HARMAND, L. ‘Les rapports entre la Grèce et l’Orient du début du VII^e siècle à la mort de Philippe de Macédoine (336)’, *Inform. Hist.* (1952), 51-6.

HARRIS, R. I. ‘The dilemma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roc. Afric. Classics Assoc.* 2 (1968), 46-54.

HARTMAN, S. S. ‘Dionysus and Heracles in India’, *Temenos* 1 (1965), 55-64.

HEUSS, A. ‘Alexander der Grosse und die politische Ideologie des Altertums’, *Antike und Abendl.* 4 (1954), 65-104.

HOGARTH, D. G. *Philip and Alexander of Macedon*, New York, 1897.

INSTINSKY, H. U. *Alexander der Grosse am Hellespont*, Godesburg, 1950.

‘Alexander, Pindar, Euripides’, *Historia* 10 (1961), 248-55.

JACOBY, F. 'Kallisthenes', PWK, vol. X, ii, cols. 1674-1707.

'Kleitarchos', PWK, vol. XI, i, cols. 622-54.

JAEGER, W. *Aristotle*, tr. Richard Robinson, 2nd edn, Oxford, 1948.

JANKE, A. *Auf Alexanders des Grossen Pfaden*. Berlin, 1904.

'Die Schlacht bei Issus', *Klio* 10 (1910), 137-77.

JONES, A. H. M.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Constantine*, Oxford, 1940.

JONES, T. B. 'Alexander and the winter of 330-326 B.C.', *CW* 28 (1935), 124-5.

JOUGUET, P. 'Alexandre à l'oasis d'Ammon et le témoignage de Callisthène', *Bull. Inst. Egypt.* 26 (1943/3), 91-107.

'Apropos d'un livre de H. Berve...', *Rev. Phil.* 54 (1928), 361-74.

L'Impérialisme macédonien et l'hellénisation de l'Orient, Paris, 1926.

KAERST, J. 'Alexandros' (10), PWK, vol. I, cols. 1412-34.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2 vols., 2nd edn, Leipzig, 1926-7.

KAHRSTEDT, U. 'Das athenische Kontingent zum Alexanderzuge', *Hermes* 71 (1936), 120-24.

KALLERIS, J. N. *Les anciens Macédoniens. Etude linguistique et historique*, vol. I, Athens, 1954.

KANATSOULIS, D. 'Antipatros als Feldherr und Staatsmann in der Zeit Philipps und Alexanders des Grossen', *Hellenica* 16 (1958/9), 14-64.

KEIL, J. 'Der Kampf um den Granikos-Uebergang und das strategische

Problem der Issoschlacht ‘, *Mitt. d. Vereins klass. Phil. in Wien* 1 (1924), 13 ff.

KERN, O. ‘Der Glaub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Forsch. und Fortschr.* (1938), 405-7.

KIENAST, D. ‘Augustus und Alexander’, *Gymnasium* 76 (1969), 430-56.

‘Alexander und der Ganges’, *Historia* 14 (1965), 180-88.

LAMOTTE, E. ‘Les premières relations entre l’Inde et l’Occident’, *Nouv. Clio* 5 (1953), 83-118.

LARSEN, J. A. O. ‘Alexander at the Oracle of Ammon’, *CPh* 27 (1932), 70-75, cf. 274-5.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Berkeley, 1955.

LECLANT, J. ‘Per Africae sitientia. Témoignages des sources classiques sur les pistes menant à l’oasis d’Ammon’, *Bull. Inst. franç. d’Arch. Orient.* 49 (1950), 193-253.

LEHMANN, K. ‘Die Schlacht am Granikos’, *Klio* 11 (1911), 230-44.

LENSCHAU, T. ‘Alexander der Grosse und Chios’, *Klio* 15 (1940), 201-24.

LEWIS, D. M. ‘Two days: (1) Epicurus’ Birthday (2) Alexander’s Death-day’, *CR* ns19 (1969), 271-2.

MACURDY, G. *Hellenistic Queens*, Johns Hopkins Studies in Archaeology no. 14, 1932.

‘The refusal of Callisthenes to drink the health of Alexander’, *JHS* 50 (1

930), 294-7.

MARAINI, F. *Where Four Worlds Meet*, tr. P. Green, London, 1964.

MARINATOS, S. 'Mycenaean elements within the royal houses of Macedonia', *AM* 45-52.

MARSDEN, E. W. *The Campaign of Gaugamela*, Liverpool U.P., 1964.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Technical Treatises, Oxford.

MARSHALL, J. *Taxila*, 3 vols., Cambridge, 1951.

MCEWEN, C. W. *The Oriental Origins of Hellenistic Kingship*, Chicago, 1934.

MERKELBACH, R. *Die Quellen des griechischen Alexanderromans*, München, 1954.

MERLAN, P. 'Alexander the Great or Antiphon the Sophist?', *CPh* 45 (1950), 161-6.

'Isocrates, Aristotle,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Historia* 3 (1954), 60-81.

MIHAILOV, G. 'La Thrace aux IV^e et III^e siècles avant notre ère', *Athenaeum* 39 (1961), 33-44.

'La Thrace et la Macedoine jusqu'à l'invasion des Celtes', *AM*, 76-85.

MIKROJANNAKIS, E. 'The diplomatic contacts between Alexander III and Darius, III', *AM*, 103-8.

Αἱ μεταξὺ Ἀλεξάνδρου Γ' καὶ Δαρείου Γ' διπλωματικαὶ ἐπαφαί, Athens, 1964.

MILNS, R. D. 'Alexander's pursuit of Darius through Iran', *Historia* 15 (1966), 256.

- ‘Alexander’s seventh phalanx battalion’, *GRByS* 7 (1966), 159 ff.
- ‘The Hypaspists of Alexander III- some problems’, *Historia* 20 (1971), 186-95.
- ‘Philip II and the Hypaspists’, *Historia* 16 (1967), 509-12.
-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68.
- MILTNER, F. ‘Alexanders Strategie bei Issus’, *Jahr. Oest. Arch. Inst.* 28 (1933), 69-78.
- ‘Der Okeanos in der persischen Weltreichidee’, *Saeculum* 3 (1952), 522-55.
- MITCHEL, F. ‘Athens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GR* 12 (1965), 189-294.
- MITSAKIS, K. ‘The tradition of the Alexander Romance in modern Greek literature’, *AM*, 376-86.
- MOMIGLIANO, A. *Filippo il Macedone*, Firenze, 1934.
- MOSSÉ, C. *La fin de la démocratie athénienne ...*, Paris, 1962.
- MURISON, C. L. ‘Darius III and the Battle of Issus’, *Historia* 21 (1972), 399-423.
- NADELL, J. *Alexander and the Romans*, Ann Arbor, 1959.
- NARAIN, A. K. ‘Alexander and India’, *GR* 12 (1965), 155-65.
- NEUFFER, E. *Das Kostüm Alexanders des Grossen*, Giessen, 1929.
- NEUMANN, C. ‘A note on Alexander’s march-rates’, *Historia* 20 (1971), 196-8.

NOCK, A. D. *Conversion. The old and the new in religion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Augustine of Hippo*, Oxford, 1933.

‘Notes on Ruler-Cult, I-IV’, *JHS* 48 (1928), 21-43.

OLMSTEAD, A. T.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1948.

PARIBENI, R. *La Macedonia sino ad Alessandro Magno*, Milan, 1947.

PARKE, H. W. *Greek Mercenaries*, Oxford, 1933.

PEARSON, L.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istoria* 3 (1955), 429-55; repr. Griffith, *MP*, 1-28.

Th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hilol. Monogr. 20), New York, 1960.

PERLMAN, S. ‘Isocrates’ “Philippus” and Panhellenism’, *Historia* 18 (1969), 370-74.

PETSAS, P. ‘New discoveries at Pella, birthplace and capital of Alexander’, *Archaeology* 11 (1958), 246-54.

PFISTER, F. ‘Alexander der Grosse. Die Geschichte seines Ruhms im Lichte seiner Beinamen’, *Historia* 13 (1964), 37-79.

Alexander der Grosse in den Offenbarungen der Griechen, Juden, Mohammedaner und Christen, Berlin, 1956.

‘Studien zur Sagengeographie’, *Symb. Osl.* 35 (1959), 5-39.

‘Dareios von Alexander getötet’, *Rhein. Mus.* 101 (1958), 97-106.

‘Das Nachleben der Ueberlieferung von Alexander und den Brahmanen’, *Hermes* (1941), 143-69.

PICARD, C. ‘Les marins de Néarque et le relais de l’expédition d’Alexa

ndre dans le Golfe persique', *Rev. Arch.* 1 (1961), 60-65.

PICKARD-CAMBRIDGE, A. W. 'The Rise of Macedonia' and 'Macedonian Supremacy in Greece', chs. VIII and IX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 (1927), pp. 200-270.

PRENTICE, W. K. 'Callisthenes, the original historian of Alexander', *TAPhA* 54 (1923), 74-85.

PRIDIK, E. *De Alexandri Magni epistularum commercio*, Berlin, 1893.

PRITCHETT, W. K. 'Observations on Chaeronea', *AJA* 62 (1958), 307-11, with pls. 80-81.

RADET, G. *Alexandre le Grand*, 2nd edn, Paris, 1950.

'Alexandre en Syrie. Les offres de paix que lui fit Darius', *Mélanges syriens offerts à R. Dussaud* (Paris, 1939), vol. I, pp. 235-47.

'Notes sur l'histoire d'Alexandre, IX', *REA* 43 (1941), 33-40.

RAMSAY, W. M.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 London, 1890.

REHORK, J. 'Homer, Herodot und Alexander', *Festschr. F. Altheim* (Berlin, 1969), 251-60.

RENARD, M., and SERVAIS, J. 'Apropos du mariage d' Alexandre et de Roxane', *AC* 24 (1955), 29-50.

ROBINSON, C. A.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1947.

'Alexander's brutality', *AJA* 56 (1952), 169-70.

'Alexander's deification', *AJPh* 64 (1943), 286-301.

'Alexander's descent of the Indus', *TAPhA* 60 (1929), xviii-xix.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Barbarians’, *Class. Studies pres. to E. Capps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Princeton U.P., 1936, 298-305.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Oecumene’, *Hesperia* Suppl. 8 (1949), 299-304.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Parmenio’, *AJA* 49 (1945), 422-4.

‘Alexander’s Plans’, *AJPh* 61 (1940), 402-12.

The Ephemerides of Alexander’s Expedition.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1932.

‘The extraordinary idea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HR* 62 (1957), 326-44; repr. Griffith, *MP*, pp. 53-72.

ROBINSON, D. M. ‘Olynthus - the Greek Pompeii’, *Archaeology* 5 (1952), 228-35.

ROEBUCK, C. ‘The settlements of Philip II with the Greek states in 338 B.C.’, *CPh* 43 (1948), 73-92.

ROSTOVTZEFF, M.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2 vols., Oxford, 1941.

SALAC, A. ‘Alexander of Macedon and AI Iskander Dhu-I-cameiu’, *Eunomia* 4 (1960), 41-3.

SAMUEL, A. E. ‘Alexander’s Royal journals’, *Historia* 14 (1965), 1-12.

SCHACHERMEYR, F. *Alexander der Grosse: Ingenium und Macht*, Wien, 1949.

‘Alexander und die Ganges-Länder’, *Innsbrucker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3 (1955), 123-35; repr. in Griffith, *MP*, pp. 137-50.

‘Die letzten Plän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Jahr. Oest. Arch. Inst.* 41 (1954), 118-140; repr. in Griffith, *MP*, pp. 322-44.

SCHIWEK, H. ‘Der persische Golfals Schiffahrts- und See-handelsroute in Achämenidischer Zeit und in d. Zeit Alexanders des Grossen’, *Bonner Jahrb.* 162 (1962), 4-97.

SCHMIDT, E. F. *Persepolis*, 2 vols., Chicago, 1953, 1957.

SCHMITTHENNER, W. ‘Ueber eine Formveränderung der Monarchie seit Alexander dem Grossen’, *Saeculum* 19 (1968), 31-46.

SCHREIDER, H. and F.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at. Geogr.* 133 (1968), 1-65.

SCHWARTZ, E. ‘Aristoboulos’, *PWK*, vol. II, cols. 911-18.

‘Arrianus’, *PWK*, vol. II, cols. 1230-47.

‘Curtius Rufus’, *PWK*, vol. IV, cols. 1870-91.

SNELL, B. *Scenes from Greek Drama*, Berkeley, 1964.

SNODGRASS, A. M. *Arms and Armour of the Greeks*, New York, 1967

.

SNYDER, J. W.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1966.

SORDI, M. ‘Alessandro e i Romani’, *Rend. Inst. Lombard.* 99 (1965), 4 35-52.

STAGAKIS, G. S. ‘Observations on the ἑταῖροι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M*, 86-102.

STANDISH, J. F. ‘The Caspian Gates’, *GR* 17 (1970), 17-24.

STARK, F. *Alexander’s Path*, London, 1958.

‘Alexander’s march from Miletus to Phrygia’, *JHS* 78 (1958), 102 ff.

‘Alexander’s Minor Campaigns in Turkey’, *Geogr. Journ.* 122 (1956), 294-305.

STEIN, A. *On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London, 1929.

‘An archaeological journey in W. Iran’, *Geogr. Journ.* 92 (1938), 313-42.

‘Notes on Alexander’s crossing of the Tigris and the battle of Arbela’, *Geogr. Journ.* 100 (1942), 155-64.

‘On Alexander’s route into Gedrosia’, *Geogr. Journ.* 102 (1943), 193-227.

‘Alexander’s campaign on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Geogr. Journ.* 70 (1927), 417-540.

‘The site of Alexander’s passage of the Hydaspes and the battle with Porus’, *Geogr. Journ.* 80 (1932), 31-46.

STIEHL, R. ‘The origin of the cult of Sarapis’, *Hist. Rel.* 3 (1963/4), 21 ff.

STRASBURGER, H. ‘Alexanders Zug durch die gedrosische Wüste’, *Hermes* 80 (1952), 456-93.

‘Zur Route Alexanders durch Gedrosien’, *Hermes* 82 (1954), 251.

Ptolemaios und Alexander, Leipzig, 1934.

TAEGER, F. ‘Alexander der Grosse und die Anfänge des hellenistischen Herrscherkults’, *Hist. Zeitschr.* 172 (1951), 225-44.

‘Alexanders Gottkönigsgedanke und die Bewusstseinslage der Griechen

und Makedonen', *Studies in the Hist. of Religions* (Numen Suppl.) 4 (1959), 394ff.

TARN, W. W. *Alexander the Great*, 2 vols., Cambridge, 1948.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Proc. Brit. Acad.* 19 (1933), 123-66; repr. Griffith, *MP*, pp. 243-86.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2nd edn, Cambridge, 1951.

'Persia from Xerxes to Alexander',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 (1927), pp. 1-24.

TARN, W. W., and GRIFFITH, G. T.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3rd rev. edn, London, 1952.

THOMAS, C. G.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CJ* 63 (1968), 258-60.

THOMES, F. C. *Il problema degli eteri nella monarchia di Alessandro Magno*, Torino, 1955.

TIBILETTI, G. 'Alessandro e la liberazione delle città d'Asia minore', *Athenaeum* ns32 (1954), 3-22.

TODD, R. 'W. W. Tarn and the Alexander Ideal', *The Historian* 27 (1964), 48-55.

TRITSCH, W. *Olympias, die Mutter Alexanders des Grossen. Das Schicksal eines Weltreiches*, Frankfurt a.M., 1936.

VARIOUS. *Greco et Barbares: 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 8, Geneva, 1962.

WALSER, G. 'Zur neueren Forschung über Alexander den Grossen', *Schweiz. Beitr. z. allgem. Gesch.* 14 (1956), 156-89; repr. in Griffith, *MP*, pp. 3

45-88.

WARDMAN, A. E. 'Plutarch and Alexander', *CQ* 49 (1955), 96-107.

WEINSTOCK, S. 'Victor and Invictus', *Harv. Theol. Rev.* 50 (1957), 211-47.

WELLES, C. B. 'Alexander's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 *GR* 12 (1965), 216-28.

'The discovery of Sarapis and the foundation of Alexandria', *Historia* II (1962), 271-98.

'The reliability of Ptolemy as an historian', *Misc. di studi alessandri in mem. A. Rostagni* (Torino, 1963), 101-16.

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New Haven, 1934.

WILBER, D. N. *Persepolis. The archaeology of Parsa, seat of the Persian Kings*, New York, 1969.

WILCKEN, U. *Alexander the Great*, tr. G. C. Richards; new ed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bibliography by E. N. Borza (q.v.), New York, 1967.

'Die letzten Plän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Sitzungsb. d. preuss. Akad. d. Wiss. Ph-hist. kl.* (Berlin, 1937), 192-207.

'Philipp II von Makedonien und die Panhellenische Idee', *ibid.* (Berlin, 1929), 18 ff.

WOODCOCK, G. *The Greeks in India*, London, 1966.

WORMELL, D. E. W. 'The literary tradition concerning Hermias of Atarneus', *Yale Class. Stud. Phil.* 5 (1935), 55-92.

WUEST, F. R. *Philipp II von Makedonien und Griechenland in den Jah*

ren von 346 bis 338, München, 1938.

注意：此处似乎适合表达一下我对那些学者的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如此慷慨地把他们涉及亚历山大的书的复本或论文的抽印本寄送给我，并就诸多相关话题与我通信讨论。由于当前的研究远远没有穷尽我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特别是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关注或探究，如果这个领域的学者们能继续让我了解他们的研究和未来的计划，那我定会感激不尽。（在我的参考文献中，还有许多书目依旧难以获得，同样如果得到抽印本，那我也会十分感激的。）正如格思里（W. K. C. Guthrie）教授所说，^①当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而提出类似的适当请求时，“我无法承诺给予足够的回报，只能说我会真心感谢的。”

P. M. G.

^①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1962, vol. I, p. xii. ——原注

译名对照表

A

Abdalonimus 阿布达罗尼摩斯

Abisares 阿比萨瑞斯

Abreas 阿布瑞阿斯

Abu Wajnam 阿布·瓦吉南

Abulites 阿布利特斯

Abydos 阿拜多斯

Academy, Academics 阿卡德米，学园

Acarmania 阿卡纳尼亚

Achaea 阿开亚

‘Achaean harbour’ 阿开亚港

Achaemenid dynasty 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illes 阿基琉斯

Ada of Caria, Queen 卡里亚的阿达女王

Adler, A. 阿德勒, A.

Admana I. 阿德玛纳岛

Admetus 阿德美托斯

Adramyttium, Gulf of 阿德拉米提昂湾

Adrasteian Plain, the 阿德拉斯泰亚平原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Aeacids 埃阿科斯的子孙

Aegae 埃盖

Aegean, the 爱琴海

Aegina, Aeginetan 埃吉纳岛, 埃吉纳岛人

Aelian (cited) 埃里安

Aeolid, Aeolis 埃奥利亚

Aeropus (I) 埃洛波斯一世

Aeropus (II) 埃洛波斯二世

Aeschines 埃斯基涅斯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Aetolia 埃托利亚

Afghanistan 阿富汗

Africa 阿非利加, 非洲

Agamemnon 阿伽门农

Agathon 阿伽通

Agen, the 亚梗

Agenor, shrine of (Tyre) 阿革诺尔神庙（提尔）

Agesilaus (b.o. Agis III, q.v.) 阿格西劳斯（阿吉斯三世兄弟，参看该条目）

Agis III, King of Sparta 阿吉斯三世（斯巴达国王）

Agrianians 阿格里安人

Ajax 埃阿斯

Ake 阿凯

Alabanda 阿拉班达

Albania, Albanians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

Alcimachus 阿尔基马科斯

Aleppo 阿勒坡

Aleuadae, the 阿琉阿代

Alexander of Epirus (the Molossian) 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莫罗西亚人）

Alexander of Lyncestis (s.o. Aeropus, q.v.) 林刻斯提斯的亚历山大（埃洛波斯之子，参看该条目）

Alexander I of Macedon (the Philhellene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世（爱希腊者）

Alexander 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 (the Great)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大帝

)

Alexander IV of Macedon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四世

Alexander of Pherae 斐赖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Romance, the 亚历山大传奇

‘Alexander-sarcophagus’, the 亚历山大石棺

Alexandretta, Gulf of 亚历山德勒塔湾

Alexandria-of- the-Areians (Herat) 阿雷亚的亚历山大里亚（赫拉特

)

Alexandria-of-the-Caucasus 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Egypt) 亚历山大里亚（埃及）

Alexandria-the-Furthest [Eschate] (Leninabad or Khodjend) 极边亚历山大里亚（列宁纳巴德或科真德）

Alexandria-in-Margiane 马吉安纳的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in-Susiana (Charax) 苏西安纳的亚历山大里亚（卡拉克斯

)

Alexandria-at-Tarmita 塔尔密塔的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opolis 亚历山德罗波利斯

Alinda 阿林达

Alyattes 阿吕亚特斯

Amanic Gates 阿马尼克关

Amasis 阿玛西斯

Amazons, the 阿马宗人

Ambhi (Omphis) 安比（翁菲斯）

Ambracia 安布拉基亚

America 美国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Ammon (Amen) 阿蒙神

Ammonium, the 安摩尼乌姆

Amphictyonic Council 近邻同盟议事会（安菲堤奥尼克会议）

Amphipolis 安菲波利斯

Amphissa 安菲萨

Amphoterus 安福特洛斯

Amyntas I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阿敏塔斯

Amyntas (s.o. Andromenes) 阿敏塔斯（安德洛美涅斯之子）

Amyntas (s.o. Antiochus) 阿敏塔斯（安条克之子）

Amyntas (s.o. Arrhabaeus) 阿敏塔斯（阿拉拜奥斯之子）

Amyntas (s.o. Perdiccas III) 阿敏塔斯（佩狄卡斯三世之子）

Anatolia, Anatolian 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人

Anaxarchus 阿纳克萨科斯

Anaximenes 阿那克西美尼

Anchialus 安奇亚罗斯

Ancyra (Ankara) 安库拉（安卡拉）

Andocides 安多基得斯

Andrapodismós 安德拉波狄斯摩斯

Andreotti, R. 安德烈奥蒂，R.

Andromachus 安德洛马科斯

Andromeda 安德洛墨达

Andromenes 安德洛美涅斯

Antalcidas, Peace of 安塔尔基达斯和约

Antigone (Philotas' concubine) 安提戈涅（菲罗塔斯的妾）

Antigonus (s.o. Philip, of Elimiotis, known as ‘the One-Eyed’) 安提柯
（厄利密奥提斯的腓力之子，被称为“独眼的”）

Antilebanon 安提勒巴农山

Antimenes (Berve APG II no. 89) 安提美涅斯

Antipater (s.o. Iolaus) 安提帕特（约劳斯之子）

Antonines, the 安东尼

Aornus (Pir-Sar) 阿奥尔诺斯（皮尔—萨尔）

Aornus (Tashkurgan) 阿奥尔诺斯（塔什库干）

Apelles 阿佩勒斯

Aphrodite 阿芙洛狄特

Apis 阿庇斯

Apollo 阿波罗

Apollodorus of Amphipolis 安菲波利斯的阿波罗多洛斯

Apollophanes 阿波罗法涅斯

Apsus (Devol) R. 阿普索斯河（得沃尔河）

Ara 阿拉

Arabia, Arabs 阿拉伯，阿拉伯人

Arachosia 阿拉霍西亚

Aradan 阿拉丹

Aradus (Arwad) 阿拉多斯（阿耳瓦德）

Aral Sea 咸海

Araxes R. 阿拉克塞斯河

Arbela 阿比拉

Arbupales 阿布帕勒斯

Arcadia, Arcadians 阿卡狄亚

Archelaus (s.o. Amyntas III, q.v.) 阿凯劳斯（阿敏塔斯三世之子，参看该条目）

Archelaus (s.o. Perdiccas) 阿凯劳斯（佩狄卡斯之子）

Archidamus III of Sparta 斯巴达的阿奇达摩斯三世

Archilochus 阿奇罗科斯

Arconnesus 阿孔涅索斯

Areia 阿雷亚

Areté 阿瑞特

Argaeus 阿尔盖奥斯

Argead dynasty 阿吉德王朝

Argives, Argos 阿尔戈斯，阿尔戈斯人

Arimmas 阿里马斯

Ariobarzanes 阿里奥巴扎涅斯

Arisbe 阿里斯贝

Aristander of Telmessus 特尔美索斯的阿里斯坦德洛斯

Aristobulus 阿里斯托布罗斯

Aristogeiton 阿里斯托盖通

Aristomenes 阿里斯托美涅斯

Ariston 阿里斯通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menia, Armenian 亚美尼亚

Arrhabaeus (s.o. Aeropus) 阿拉拜奥斯（埃洛波斯之子）

Arrhidaeus (s.o. Amyntas III) 阿里戴奥斯（阿敏塔斯三世之子）

Arrhidaeus (s.o. Philip and Philinna) 阿里戴奥斯（腓力和菲利娜之子）
)

Arrian (Flavius Arrianus) 阿里安（弗拉维乌斯·阿里亚努斯）

Arsaces 阿萨刻斯

Arsamenes (or Arsames) 阿萨梅内斯（或阿萨迈斯）

Arses 阿尔塞斯

Arsites 阿尔西特斯

Artabazus 阿尔塔巴佐斯

Artacoana 阿尔塔科亚纳

Artaxerxes III Ochus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奥科斯

Artaxerxes IV 阿尔塔薛西斯四世

Artemis 阿耳特弥斯

Artemisia (of Caria) 阿耳特弥西亚（卡里亚的）

‘Aryan superman’, the “雅利安超人”

Arybbas 阿律巴斯

Asander (b.o. Parmenio, q.v.) 阿桑德洛斯（帕美尼翁兄弟）

Ascalon 亚实基伦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Asia 亚洲，亚细亚

Asia Minor 小亚，小亚细亚

Aspasians (Açvakas) 阿斯帕西亚人（阿斯瓦卡人）

Aspendus 阿斯潘多斯

Assibarus R. 阿西巴洛斯河

Assyria, Assyrian 亚述，亚述人

Astaspes 阿斯塔斯佩斯

Atarneus 阿塔纽斯

Athena 雅典娜

Athenians, Athens 雅典人，雅典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Attalus (s.o. Andromenes) 阿塔罗斯（安德洛美涅斯之子）

Attalus (s.o. [?] Antiochus) 阿塔罗斯（安条克之子[?]）

Attica 阿提卡

Attock 阿托克

Audata 奥达塔

Augustus (C. Octavius) 奥古斯都（C. 屋大维）

Austerlitz, battle of 奥斯特利茨战役

Austria 奥地利

Autaratians 奥塔拉提亚人

Autophradates 奥托弗拉达特斯

Axius (Vardár) R. 阿克西奥斯河（瓦耳达河）

Azimilik (King of Tire) 阿齐米利克（提尔国王）

B

Baal 巴力太阳神

Babylon, Babylonians 巴比伦，巴比伦人

Bacchiad dynasty 巴齐亚德王朝

Bacchylides 巴库利得斯

Bactra: see s. v. 'Zariaspa' 巴克特拉：参见“扎里亚斯帕”词条

Bactria, Bactrians 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人

Badian, E. 巴迪安，E.

Bagoas(I) 巴戈亚斯（I）

Bagoas(II) 巴戈亚斯（II）

Bahçe Pass : see s. v. 'Amanic Gates' 巴塞山口（参见“阿马尼克关”
）

Bajaur 巴若尔

Balacrus (s.o. Nicanor) 巴拉克洛斯（尼卡诺尔之子）

Balkans, the 巴尔干

Baluchistan 俾路支

Bardylis 巴底利斯

Bargylia 巴古利亚

Barker, E. N. 巴克尔，E. N.

Barsaentes 巴萨恩特斯

Barsine 巴尔西涅

Batis 巴提斯

Beas (Hyphasis) R. 贝亚斯河（叙伐西斯河）

Beilan Pass: see s. v. 'Syria, Syrians' 拜兰山口

Beldibi 贝尔迪比

Beloch, K.J. 贝洛赫, K. J.

Bengal 本加拉

Beqaa Valley 贝卡河谷

Bermius Mts. 贝尔弥昂山脉

Beroea (Verria) 贝罗亚

Berve, H. 贝尔佛, H.

Bessus (satrap of Bactria) 贝索斯 (巴克特里亚总督)

Bilisht 比利什特

Bitola 比托拉

Black Sea, the 黑海

Blenheim, battle of 布伦亨战役

Boeotia 波奥提亚

Bokhara 布哈拉

Boleyn, Anne 博林, 安妮

Borza, E. N. 博尔扎, E. N.

Bosch, H. 博什, H.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

Bosworth, A. B. 博斯沃思, A. B.

Bottiaea 波提埃亚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Brown, T. S. 布朗, T. S.

Brunt, P. A. 布伦特, P. A.

Bucephala 布凯法拉

Bucephalas 布凯法拉斯

Bucharest 布加瑞斯特

Burdur, L. 布尔杜尔湖

Burma 缅甸

Burn, A. R. 伯恩, A. R.

Byblos 比布罗斯

Byzantium 拜占庭

C

Cabeiroi 卡拜罗伊

Caesar, C. Julius 凯撒, C. 尤里乌斯

Calas (s.o. Harpalus) 卡拉斯 (哈尔帕罗斯之子)

Callias 卡利亚斯

Callisthenes of Olynthus 奥林托斯的卡利斯特涅斯

Callixeina 卡利克塞娜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剑桥古代史》

Cambyses 冈比西斯

Cappadocia 卡帕多基亚

Caranus (s.o. Philip II and Cleopatra) 卡拉诺斯（腓力二世与克里奥帕特拉之子）

Cardaces 卡尔达凯斯

Cardia 卡尔狄亚

Caria 卡里亚

Carmania 卡尔马尼亚

Carmel, Mt. 卡尔迈勒山

Carthage, Carthaginian 迦太基，迦太基人

Carystius 卡律斯提奥斯

Caspian Gates 卡斯比亚关

Caspian Sea 里海

Cassander (s.o. Antipater, q.v.) 卡山德（安提帕特之子，参看该条目）

Castabala 卡斯塔巴拉

Cathay 中国

Caucasus 高加索

Caunus 考努斯

Cebalinus 凯巴利诺斯

Celaenae 刻莱奈

Celtic, Celts 凯尔特

Cephisus R. 凯菲索斯河

Ceramic Gulf, the 刻拉密克湾

Chaeronea 喀罗尼亚

Chakwal 卡克瓦尔

Chalcidice, Chalcidic Peninsula 卡尔基狄刻半岛

Chandir 坎狄尔

Chandragupta 旃陀罗笈多

Charax 卡拉克斯

Chares 卡瑞斯

Charidemus 卡里德摩斯

Chelidonian Peninsula 凯利多尼安半岛

Chenab R. 杰纳布河

Chesterfield, Lord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

Chiliarch (Grand Vizier) 千夫长（大维齐尔）

China 中国

Chians, Chios 基俄斯

Chitral 吉德拉尔

Choaspes (Kunar) R. 科亚斯佩斯河（库纳尔河）

Choerilus 科伊里罗斯

Chorasmia, Chorasmian 科拉斯米亚

Chorienes 科里厄涅斯

Chroust, A. H. 赫劳斯特, A. H.

Churchill, W. S. 丘吉尔, W. S.

Cibrya 基布里亚

Cicero, M. Tullius 西塞罗, M. 图利乌斯

Cilicia, Cilician 奇里乞亚

‘Cinaedopolis’ 基奈多波利斯

Cithaeron, Mt. 基泰隆山

City-states, Greek 希腊城邦

Clazomenae 克拉左美奈

Cleander 克勒安德洛斯

Cleitarchus 克雷塔科斯

Cleitus (the Black) 克雷托斯（黑面的）

Cleitus (King of Illyria) 克雷托斯（伊利里亚国王）

Cleitus (the White) 克雷托斯（白面的）

Cleomenes of Naucratis 瑙克拉提斯的克莱奥美涅斯

Cleopatra-Eurydice 克里奥帕特拉—欧律狄刻

Cleopatra (d.o. Olympias) 克里奥帕特拉（奥林匹娅斯之女）

Climax, Mt. 克利马克斯山

Clodones 克罗多涅斯

Cnidos 克尼多斯

Coenus (s.o. Polemocrates) 科伊诺斯（波勒摩克拉特斯之子）

Coeranus 科厄拉诺斯

Colchis 科尔齐斯

Colonae 科罗奈

Copais L. 科派斯湖

Corinth, Corinthian 科林斯

Corragus 科拉戈斯

Cos 科斯

Cossaeans 科塞奥斯人

Cothelas 科特拉斯

Crassus, L. 克拉苏斯湖

Craterus 克拉特洛斯

Craufurd, Gen. 克劳福德

Crécy, battle of 克雷西战役

Crenides (Philippi) 克瑞尼德斯（腓力比）

Cretans, Crete 克里特，克里特人

Crison 克里松

Croesus 克洛伊索斯

Ctesias 克特西亚斯

Cunaxa 库那克萨

Curtius Rufus, Quintus 库尔提乌斯·鲁福斯，昆图斯
Cyclades, the 基克拉迪群岛
Cydnus (Tersus-Tchai) R. 居得诺斯河（塔尔索斯河）
Cynane (Cynna) 库楠妮（库娜）
Cynicism, Cynics 犬儒主义
Cyprus, Cypriots 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人
Cyrene 昔兰尼
Cyropolis 居洛波利斯
Cyrus (the Great) 居鲁士大帝
Cyrus (the Younger) 小居鲁士
Cytinium 居提尼翁
Cyzicus 居吉科斯

D

Dahae, the 达海人
Dalaman R. 达拉曼河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mghan 达姆甘
Damis of Sparta 斯巴达的达米斯
Danube (Ister) R. 多瑙河（伊斯特尔河）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

Darius I (the Great) 大流士一世

Darius III Codomannus 大流士三世·科多曼努斯

Dascylium (Eskili) 达斯居利翁（厄斯基利）

Dasht-i-Chol 达什特—伊—科尔

Dasht-i-Kavir 达什特—伊—卡维尔

Datames 达塔迈斯

Davis, E. W. 戴维斯，E. W.

Deccan 德干高原

Deification Decree, the 奉神法令

Deinochares 戴诺卡瑞斯

Deli R. 德利河

Delos 提洛岛

Delphi 德尔菲

Demades 德玛德斯

Demaratus of Corinth 科林斯的德玛拉托斯

Demeter 德墨特尔

Demetrius (s.o. Althaemenes) 德美特里奥斯（阿尔泰美涅斯之子）

Demetrius the Bodyguard 侍卫德美特里奥斯

Democracy, democrats, various 民主政治，民主主义者

Demosthenes (Athenian orator) 德摩斯提尼（雅典演说家）

Derdas (I) 德尔达斯 (I)

Derdas (II) 德尔达斯 (II)

Diades of Thessaly 塞萨利的狄亚德斯

Didyma 狄迪马

Diodorus Siculus 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

Diogenes the Cynic 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

Dionysius I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

Diopetithes 狄奥佩特斯

Dioscuri, the 狄奥斯库里兄弟

Dioxippus 狄奥克西波斯

Disraeli, B. 迪斯雷利, B.

Dium 狄昂

Dodona 多多纳

Don R. 顿河

Doris 多里斯

Dörtyol 德尔特约尔

Dösheme 德设美

Drangiana 德兰吉亚纳

Drapsaca (Kunduz) 德拉普萨卡 (昆都士)

Dreyfus affair, the 德雷富斯事件

Droysen, J. G. 德罗伊森, J. G.

Durazzo (Dyrrhachium) 杜拉左 (杜尔哈齐翁)

Dymnus 杜姆诺斯

E

Ecbatana (Ramadan) 埃克巴塔那 (拉马丹)

Edessa 伊德沙

Edje Göl 埃德杰湖

Edson, C.F. 埃德森, C. F.

Egypt, Egyptian 埃及, 埃及人

El Alamein 阿拉曼

Elatea 厄拉特亚

Elaeum 厄莱翁

Elburz Mts. 厄尔布尔士山脉

Elephantine 厄勒潘提涅

Eleusis 厄琉西斯

Elimiotis 厄利密奥提斯

Elis 厄利斯

Emathia 厄马提亚

Engels, D. 恩格斯, D.

Eordaea 厄奥尔戴亚

Epaminondas 厄帕密农达斯

Ephesians, Ephesus 以弗所人，以弗所

Ephialtes 厄菲阿尔特斯

Epirus, Epirots 伊庇鲁斯，伊庇鲁斯人

Erigyius of Mytilene 密提勒涅的厄里吉奥斯

Eristics 厄里斯提克斯

Errington, R. M. 埃林顿，R. M.

Erythrae 厄里特莱

Esther, Book of 以斯帖记

Etesian winds (meltemi) 地中海季风（美尔丹风）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Euboea 优卑亚

Eulaeus R. 欧莱奥斯河

Eumenes of Cardia 卡尔狄亚的欧美涅斯

Euphraeus 欧弗莱奥斯

Euphrates R. 幼发拉底河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Euromus 欧洛摩斯

Europa (d.o. Cleopatra Eurydice) 欧罗巴（克里奥帕特拉·欧律狄刻之女）

Europe, European 欧洲，欧洲人

Eurydice (I) 欧律狄刻（I）

Eurydice (II) 欧律狄刻（II）

Eurylochus 欧律罗科斯

Eurymedon R. 欧律墨冬河

Exiles' Decree, the 流亡者法令

F

Firuzkuh 菲鲁兹库哈

Flecker, J. E. 弗莱克，J. E.

Foch, Marshal 福煦元帅

Freedom, notions of, various 自由观念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Freud, S., Freudianism 弗洛伊德，S.，弗洛伊德主义

Fuller, J. F. C. 富勒，J. F. C.

G

Gabala (Jebbleh) 加巴拉（杰布莱）

Gallipoli Peninsula 加利波利半岛

Ganges Plain 恒河平原

Ganges R. 恒河

Gaugamela (Tell Gomel) 高加美拉（戈美尔废墟）

Gaza 加沙

Gedrosia, Gedrosian Desert 格德罗西亚，格德罗西亚沙漠

Getae 格泰

Glaucias 格劳基亚斯

Glycera 格吕凯拉

Golod' naya Steppe, the 饥饿草原

Gordium 戈尔狄昂

Gordius 戈尔狄亚斯

Gor Dzumaja 朱马亚

Gorgias of Leontini 勒昂提尼的高尔吉亚

Gorgias 高尔吉亚

Granicus (Kocabas) R. 格拉尼科斯河（科贾巴什河）

Greece, Greeks (gen.) 希腊，希腊人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希腊独立战争

Grevena 格雷维纳

Griffith, G. T. 格里菲斯，G. T.

Grote, G. 格罗特，G.

Grynium 格律尼翁

Guduk Pass 古都克山口

Guerilla warfare 游击战

Gujrat 古杰拉特

Gurdaspur 古尔达斯布尔

H

Haemus (Balkan) Range 海穆斯山脉（巴尔干）

Haemus R. 海穆斯河

Haliacmon (Vistritza) R. 哈利亚克蒙河（维斯特里扎河）

Halicarnassus (Bodrum) 哈利卡那索斯（波德隆）

Halys R. 哈吕斯河

Hamah 哈马

Hamilton, J. R. 汉密尔顿，J. R.

Hammond, N. G. L. 哈蒙德，N. G. L.

Haranpur 哈兰普尔

Harfleur 阿夫勒尔

Harmodius 哈尔摩狄奥斯

Harpalus (s.o. Machatas) 哈尔帕罗斯（马卡塔斯之子）

Hasanbeyli Pass 哈桑贝利山口

Hassa 哈萨

Hebrus R. 赫布鲁斯河

Hecataeus (liaison officer) 赫卡泰奥斯

Hecatompylus (Damghan) 赫卡通皮罗斯（和棧城）（达姆甘）

Hector 赫克托尔

Hector (s.o. Parmenlo) 赫克托尔（帕门罗之子）

Hegelochus 赫格罗科斯

Helios 赫利奥斯

Hellenic League (League of Corinth) 希腊同盟（科林斯同盟）

Hellenism 希腊主义

Hellespont 赫勒斯滂

Henry V of England 英国的亨利五世

Hephaestion (s.o. Amytor) 赫淮斯提翁（阿米托尔之子）

Hephaestus 赫菲斯托斯

Heracles 赫拉克勒斯

Hermeias 赫尔迈亚斯

Hermione 赫尔密俄涅

Hermocles 赫尔摩克勒斯

Hermolaus 赫摩劳斯

Hermus R. 赫尔摩斯河

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 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

Himalayas, the 喜马拉雅山脉

Hindu Kush 兴都库什山脉

Hindu warrior castes 印度武士种姓

Hindush 欣度什

Hipparchus (s.o. Peisistratus) 希帕尔科斯（庇西特拉图之子）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Hiram 希拉姆

Hitler, A. 希特勒，A.

Hobbes, T. 霍布斯，T.

Homer, Homeric 荷马

Hormuz 霍尔木兹

Horus 荷鲁斯

Housman, A. E. 豪斯曼，A. E.

Hydarnes 叙达尔涅斯

Hydaspes R. 叙达斯佩斯河

Hyparna 叙帕尔那

Hypereides 叙佩雷德斯

Hyrcania 叙尔卡尼亚

I

Iasus 伊阿索斯

Ichthyophagi 伊克杜奥法吉人

Ida, Mt. 伊达山

Ilium 伊利昂

Illyria, Illyrians 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人

India, Indians 印度，印度人

Indus R. 印度河

Iolaus (s.o. Antipater) 伊奥拉奥斯（安提帕特之子）

Ionia, Ionians 伊奥尼亚，伊奥尼亚人

Iphicrates 伊菲克拉特斯

Iran, Iranians 伊朗

Isis 伊西斯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Issus 伊索斯

Italy 意大利

J

Jacoby, F. 雅各比，F.

Jalalpur (?Nicaea) 贾拉勒布尔（尼西亚？）

Jason of Pherae 斐赖的伊阿宋

Jaxartes (Syr-Darya) R. 药杀河（锡尔河）

Jazirat 杰济拉

Jebal-Barez, the 巴瑞兹山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ws, Judaism 犹太人，犹太主义

Jhelum (Hydaspes) R. 杰赫勒姆河（叙达斯佩斯河）

Joppa 约帕

Jordan R. 约旦河

Josephus, Flavius 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

Jumna R. 朱木拿河

Justin (M. Junianus Justinus) 查斯丁（M. 尤尼亚努斯·尤斯提努斯）

Juvenal (D. Junius Iuvenalis) 尤维纳利斯（D. 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K

Kabul 喀布尔

Kalash Kafirs, the 卡拉什人

Kalat-i-Nadiri 卡拉特-伊-纳狄里

Kaleköy Pass 卡勒科伊山口

Kandahar 坎大哈

Kandar Kas nullah 坎达尔卡斯峡谷

Karachi 卡拉奇

Karnak 卡尔纳克

Kashaf Rud 卡沙夫河

Kashmir 克什米尔

Kastoria 卡斯托里亚

Kazerun 卡泽伦

Kelif 凯利夫

Kemer Chay 凯梅尔谢

Kérata Pass 凯拉塔山口

Kerman Desert 克尔曼沙漠

Khawak Pass 哈瓦克山口

Khazir R. 哈济尔河

Khonsu 孔苏

Khyber Pass 开伯尔山口

Kipling, R. 吉卜林, R.

Kirkgöz 基尔克戈兹

Konia 科尼亚

Köyejiz L. 科耶吉兹湖

Kshatriyas 刹帝利

Kuh-i-Ramet Mts. 拉美特山

Kuh-i-Surkh Mts. 苏尔赫山

Kunar Valley 库纳尔山谷

Kurdish Mts. 库尔德山

Kushk R. 库什克河

Kutch, Rann of 卡奇沼泽地

L

Labranda 拉布兰达

Lacedaemonia, Laconia 拉凯戴孟，拉科尼亚

Lade 拉德

Lagnia 拉格尼亚

Lamia 拉米娅

Lampsacus 兰普萨科斯

Langarus, King of the Agrianians 兰伽洛斯，阿格里安人国王

Lanice 拉尼刻

Laodice 拉奥狄刻

Laomedon of Mytilene 密提勒涅的拉奥墨冬

Larissa 拉里萨

Latmus, Mt. 拉特摩斯山

League of Nations, the 国际联盟

Lebadea 列巴德亚

Lebanon Mts. 黎巴嫩山

Lehmann, K. 莱曼，K.

Lenskigrad 连斯基格拉特

Leochares 列奥卡瑞斯

Leonidas (Alexander's tutor) 列奥尼达斯（亚历山大的家庭老师）

Leonidas (King of Sparta) 列奥尼达斯（斯巴达之王）

Leonnatus 列昂那托斯

Leosthenes 列奥斯特涅斯

Lesbos 累斯博斯

Leucon 琉孔

Leuctra 琉克特拉

Libya 利比亚

Litani, R. 利塔尼河

Lucian of Samosata 萨摩萨塔的卢奇安

Luxor 卢克索

Lyceum 吕刻昂

Lychnitis, L. 吕克尼提斯湖

Lycia, Lycian 吕西亚，吕西亚人

Lycurgus (Athenian statesman) 吕库古（雅典政治家）

Lydgate, John 利德盖特，约翰

Lydia, Lydians 吕底亚，吕底亚人

Lyginus (?Yantra) R. 吕吉努斯河（扬特拉河？）

Lyncestis 林刻斯提斯

Lysander 吕山德

Lysias 吕西亚斯

Lysimachus of Acarnania 阿卡纳尼亚的吕西马科斯

Lysimachus (s.o. Agathocles) 吕西马科斯（阿伽托克勒斯之子）

Lysippus 吕西普斯

M

Macedonia, Macedonians 马其顿，马其顿人

Macedonian army, the 马其顿军队

Maeander R. 迈安德河

Maedi, the 迈狄人

Maenadism 狂热主义

Maeotis L. 迈奥提斯湖

Magnesia (ad Maeandrum) 马格涅西亚（迈安德流域）

Makran 莫克兰

Malakwal 默勒格瓦尔

Malaysia 马来西亚

Malli (Malavas), the 马利（摩腊婆）

Mallus 马罗斯

Mani, the 马尼

Maracanda (Samarkand) 马拉坎达（撒马尔罕）

Marathon, battle of 马拉松战役

Marathus 马拉托斯

Mardians, the 马尔狄安人

Mareotis L. 马瑞奥提斯湖

Margiane (Merv) 马吉安纳（梅尔夫）

Margites 马尔吉特斯

Margus R. 马尔古斯河

Mariamne 马利安纳

Marius, C. 马略，C.

Marlborough, Duke of 马尔伯勒公爵

Marlowe, Christopher 马洛，克里斯托弗

Marsyas of Pella 佩拉的马尔西亚斯

Marsyas R. 马尔西亚斯河

Massaga 马萨伽

Massagetae the 马萨格泰人

Maurice, F. 莫里斯，F.

Mauryan dynasty, the 孔雀王朝

Mausoleum, the 摩索罗斯王陵

Mausolus of Caria 卡里亚的摩索罗斯

Mazaces 马扎刻斯

Mazaeus 马扎欧斯

Mecca 麦加

Meda (d.o. Cothelas) 美妲（科特拉斯之女）

Media, Medes 米底

Medimnus, the 麦丁努斯

Medism 亲波斯派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edius of Thessaly 塞萨利的美狄奥斯

Megalopolis 麦伽罗波利斯

Megara, Megarians, Megarid 麦伽拉

Meleager (s.o. Neoptolemus) 墨勒阿格（涅奥普托勒摩斯之子）

Melkart 墨尔卡特

Melos 米洛斯

Memnon of Rhodes 罗得岛的门农

Memnon (governor of Thrace) 门农（色雷斯总督）

Memphis 孟菲斯

Menander 米南德

Menapis 墨那匹斯

Menelaus 墨涅拉奥斯

Menes 美尼斯

Mennis (Kirkuk) 门尼斯（基尔库克）

Menoetius 墨涅提奥斯

Menon (satrap of Arachosia) 梅农（阿拉霍西亚总督）

Menon (satrap of Syria) 梅农（叙利亚总督）

Mentor 门托尔

Mercenaries 雇佣军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essenia 美塞尼亚

Methone 墨托涅

Metsovo Pass 迈措沃山口

Metz Epitome 梅茨史纲

Midas 弥达斯

Middle Ages 中世纪

Middle East 中东

Mieza 米扎

Miletus 米利都

Milns, R. D. 米尔恩斯，R. D.

Mimallones 密马罗涅斯

Mimas peninsula 米马斯半岛

Mithra 密特拉

Mithridates (Darius III's son-in-law) 密特里达特斯（大流士三世女婿

)

Mithrines 密特里涅斯

Mithrobuzanes 密特罗布扎涅斯

Mnesimachus 谟涅西马科斯

Molke, H. von 莫尔克特, H. 冯

Molossian dynasty 莫罗西亚王朝

Monastir 摩那斯提尔

Moscow 莫斯科

Mosul 摩苏尔

Mulla Pass 穆拉山口

Munich Agreement, the 慕尼黑协定

Murghab (Margus) R. 穆尔加布河（马尔古斯河）

Murison, C. L. 缪里森, C. L.

Muses, the 缪斯

Mycale Mt. 米卡勒山

Mycenae, Mycenaean 迈锡尼, 迈锡尼人

Mylasa 米拉萨

Myndus 闵都斯

Myriandrus 密里安德罗斯

Myrmidons 米尔弥冬

Myrtale 密尔塔勒

Mysia 密西亚

Mysore 迈索尔

Mytilene 密提勒涅

N

Nabarzanes 纳巴尔扎涅斯

Nahr-el-Kalb 犬河

Nandana Pass 南达纳山口

Naoussa 纳乌萨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Naucratis 瑙克拉提斯

Naupactus 瑙帕克托斯

Nautaca 瑙塔卡

Neapolis (Kavalla) 涅阿波利斯（卡瓦拉）

Nearchus of Crete 克里特的涅阿尔科斯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

Nectanebo 涅克塔尼布

Negev 内盖夫

Nemea 尼米亚

Neoptolemus (actor) 涅奥普托勒摩斯（演员）

Neoptolemus (s.o. Achilles) 涅奥普托勒摩斯（阿基琉斯之子）

Nereids, the 涅瑞伊得斯

Nestus R. (Mesta) 涅斯托斯河（梅斯塔河）

Neumann, C. 诺伊曼，C.

Nicaea 尼西亚

Nicanor (s.o. Parmenio) 尼卡诺尔（帕美尼翁之子）

Nicanor (of Stageira) 尼卡诺尔（斯塔吉拉的）

Nicesipolis 尼刻西波利斯

Nicias 尼基亚斯

Nicomachus 尼科马科斯

Nile R. 尼罗河

Nineveh 尼尼微

Nine Ways (Ennea Hodoi) 九道（厄涅亚·荷多依）

Numidia 努米底亚

Nurpur 努尔普尔

Nysa 尼撒

O

Ocean, Indian 印度洋

Ocean (world-stream) 奥凯阿诺斯，大洋（世界环流）

Ochus (s.o. Darius III) 奥科斯（大流士三世之子）

Odrysians 欧德里西亚人

Oedipus 俄狄浦斯

Oeniadae 欧尼亚戴

Ohind 欧印德

Okhrida L. 欧克里达湖

Oligarchies, oligarchs 寡头政治

Olmstead, A. T. 奥姆斯戴德, A. T.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an Gods, the 奥林波斯诸神

Olympus, (Myrtale) 奥林波斯 (密尔塔勒)

Olympic Games 奥林匹亚赛会

Olympus, Mt. 奥林波斯山

Olynthus, Olynthians 奥林托斯, 奥林托斯人

Onchestus 昂克斯托斯

Opis 欧庇斯

Orchomenus 奥尔科迈诺斯

Orestes(s.o. Agamemnon) 奥瑞斯特斯 (阿伽门农之子)

Orestes(s.o. Archelaus) 奥瑞斯特斯 (阿凯劳斯之子)

Orestis 奥瑞斯提斯

Orontes R. 奥伦特斯河

Orontobates 奥隆托巴特斯

Oropus 奥洛波斯

Orpheus 俄尔甫斯

Orsines 奥西涅斯

Orwell, G. 奥威尔, G.

Osiris 奥西里斯

Ossa Mt. 奥萨山

Oxathres 奥克萨特雷斯

Oxus (Amu Darya) R. 乌浒河（阿姆河）

Oxyartes 奥克西亚特斯

Oxydracae (?Kshatriyas or Kshudrakas) 奥克西德拉凯（刹帝利或首陀罗伽？）

P

Paeonia, Paeonians 派奥尼亚，派奥尼亚人

Pagus Mt. 帕古斯山

Pakistan 巴基斯坦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lmyra 帕尔米拉

Paltos (Arab el Melik) 帕尔托斯（阿拉伯的马力克）

Pamir Mts. 帕米尔山

Pammenes 潘美涅斯

Pamphylia, Pamphylian 潘菲利亚，潘菲利亚人

Pangaeus Mt. 潘盖奥斯山

Panhellenism 泛希腊主义

Paphlagonia, Paphlagonians 帕夫拉戈尼亚

Paraetecene (Tadzhik-Badakhshan) 帕莱泰刻涅（塔吉克—巴达赫尚）

Paraetionium (Mersa Matruh) 帕莱托尼昂（马特鲁港）

Paravaea 帕拉淮亚

Paris 帕里斯

Parmenio (s.o. Philotas) 帕美尼翁（菲罗塔斯之子）

Paropamisus 帕洛帕米索斯

Paros 帕罗斯

Parthia, Parthian 帕提亚，帕提亚人

Parthiene 帕提涅

Parvataka 帕瓦塔卡

Pasargadae 帕萨尔加德

Patmore, C. 帕特莫尔，C.

Patroclus 帕特罗克洛斯

Pausanias (s.o. Aeropos) 保萨尼阿斯（埃洛波斯之子）

Pausanias of Lyncestis 林刻斯提斯的保萨尼阿斯

Pausanias of Orestis (Philip II's murderer) 奥瑞斯提斯的保萨尼阿斯

（腓力二世的刺杀者）

Pausanias (friend of Attalus s.o. Antiochus) 保萨尼阿斯（安条克的朋友，阿塔罗斯之子）

Pausanias (Companion) 保萨尼阿斯（侍友）

Pausanias (travel-writer) 保萨尼阿斯（游记作家）

Payas R. 巴耶斯河

Pearson, L. 皮尔森，L.

Peisistratus 庇西特拉图

Peithagoras 佩塔戈拉斯

Peithon (s.o. Agenor) 佩通（阿革诺尔之子）

Peleus 佩琉斯

Pelinna 佩林那

Pelium (or Pellium) 佩利昂

Pella 佩拉

Pellene 佩勒涅

Pelopidas 佩罗皮达斯

Peloponnese, Peloponnesians 伯罗奔尼撒

Pelusium 佩卢西昂

Perdiccas 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佩狄卡斯一世

Perdiccas 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佩狄卡斯二世

Perdiccas I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佩狄卡斯三世

Perdiccas (s.o. Orontes) 佩狄卡斯（奥伦特斯之子）

Perga 佩尔伽

Pericles (s.o. Xanthippus) 伯里克利（克珊提普斯之子）

Perinthus 佩林托斯

Peripatetics 漫步学派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Perseus 珀尔修斯

Persia, Persians 波斯，波斯人

Persian Gulf 波斯湾

Persis (Parsa) 波西斯（帕尔萨）

Peshawar 白沙瓦

Petra 佩特拉

Peuce (Pine Tree Island) 波刻（松树岛）

Peucestas 佩乌凯斯塔斯

Pharasmenes 法拉斯美涅斯

Pharnabazus 法尔那巴佐斯

Pharnaces 法那刻斯

Pharnuches 法努刻斯

Pharos 法罗斯

Pharsalus 法萨卢斯

Phaselis 法塞利斯

Pherae 斐赖

Phila 翡拉

Philinna 菲林娜

Philip of Acarnania 阿卡纳尼亚的腓力

Philip Arrhidaeus 腓力·阿里戴奥斯

Philip 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

Philippeum, the 菲力佩翁

Philippi 腓力比

Philippopolis (Plovdiv) 菲利波波利斯（普罗夫迪夫）

Philistines 非利士人

Philocrates 菲罗克拉特斯

Philoneicus 菲罗奈科斯

Philostratus, Flavius 菲罗斯特拉托斯，弗拉维乌斯

Philotas (s.o. Parmenio) 菲罗塔斯（帕美尼翁之子）

Philoxenus 菲罗克塞诺斯

Phocion 福基翁

Phocis, Phocians 福基斯，福基斯人

Phoenice (Finike) 福尼凯（菲尼凯）

Phoenicia, Phoenicians 腓尼基

Phoenix 菲尼克斯

Phrygia, Central 弗里吉亚（中心）

Phrygia, Hellespontine 弗里吉亚（赫勒斯滂）

Pieria 皮埃里亚

Pillar of Jonah, the 约拿之柱

Pillars of Hercules, the 赫拉克勒斯之柱

Pinarus (?Payas) R. 皮那洛斯河（巴耶斯河？）

Pindar 品达

Pindus Mts. 品都斯山脉

Pir-Sar 皮尔沙尔

Pisidia, Pisidians 皮西狄亚

Pitane 皮塔涅

Pixodarus 皮克索达洛斯

Plataea, Plataeans 普拉塔亚

Plato, Platonism 柏拉图，柏拉图主义

Pliny the Elder (G. Plinius Secundus) 老普林尼（G. 普利尼乌斯·塞昆都斯）

Plutarch of Chaeronea 凯罗尼亚的普鲁塔克

Polemo (s.o. Andromenes) 波勒摩（安德洛美涅斯之子）

Polyaenus 波吕埃诺斯

Polybius 波利比奥斯

Polycrates 波吕克拉特斯

Polydamas 波吕达马斯

Polyperchon 波吕佩孔

Polystratus 波吕斯特拉托斯

‘Poneropolis’ 波聂洛波利斯

Pontus 本都

Porus (Parvataka, Paurava) 波洛斯（帕瓦塔卡，保拉瓦）

Porus (s.o. Porus) 波洛斯（波洛斯之子）

Poseidon 波塞冬

Potidaea 波提狄亚

Priam 普里阿摩斯

Priapus (town) 普里亚波斯（城镇）

Priene 普里厄涅

Prilep 普里莱普

Propaganda 宣传

Propontis (Sea of Marmara) 普洛彭提斯（马尔马拉海）

Proskynesis 匍匐礼

Protesilaus 普罗特西劳斯

Prussian nationalism 普鲁士民族主义

Ptolemy of Alorus 阿罗洛斯的托勒密

Ptolemy the Bodyguard 侍卫托勒密

Ptolemy 托勒密

Ptolemy (s.o. Lagus) 托勒密（拉古斯之子）

Punjab, the 旁遮普

Pura 普拉

Pydna 皮德纳

Pyramus R. 皮拉摩斯河

Pyrrho (philosopher) 皮洛（哲学家）

Pyrrho (poet) 皮洛（诗人）

Pyrrius (grandson of Achilles) 皮洛士（阿基琉斯的孙子）

Pythagoras, Pythagoreanism 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主义

Pythian Games 皮托赛会

Q

Qattara Depression, the 盖塔拉洼地

Quetta 奎达

R

Ravi R. 拉维河

Rawalpindi 拉瓦尔品第

Red Sea 红海

Rhagae 拉格

Rhambacia 兰巴基亚

Rheomithres 雷奥米特雷斯

Rhinocolura 里诺科鲁拉

Rhodes, Rhodian 罗得岛，罗得岛人

Rhodope Mts. 罗多彼山

Rhoeteum 洛埃泰昂

Rhosaces 罗萨刻斯

Romans, Rome 罗马

Rommel, F.-M. Erwin 隆美尔，F.-M. 埃尔文

Roxane (d.o. Oxyartes, q.v.) 罗克姗娜（奥克西亚特斯之女）

Rubicon R. 卢比孔河

Royal Ephemerides, the 皇家实录

Ruschuk 卢楚克

S

Sabazius 萨巴吉奥斯

Sabictas 萨比克塔斯

Sacae, the 萨卡人

Sacred War, Delphic 德尔菲神圣战争

Sagalassus 萨伽拉索斯

Salamis 萨拉米斯

Salang Pass 萨朗山口

Salmacis (fortress) 萨马基斯（要塞）

Salmous (Tepe Yahya) 萨尔摩斯（雅亚遗址）

Salt Range, the 盐岭

Samaria 撒马利亚

Samarkand 撒马尔罕

Samos, Samians 萨摩斯岛，萨摩斯人

Samothrace 萨摩色雷斯

Sangala 奢羯罗

Sangarius R. 桑伽里奥斯河

Sanskrit 梵语

Sarapis 萨拉匹斯

Sardanapalus (Assurbanipal) 萨达那帕罗斯（亚述巴尼拔）

Sardis 萨尔狄斯

Sasigupta (Sisicottus) 萨西古塔（西西科托斯）

Satibarzanes 萨提巴尔扎涅斯

Satyrus 萨提洛斯

Sauromatae 绍罗马泰

Scamander R. 斯卡曼德河

Scepticism, Sceptics 怀疑主义

Schachermeyr, F. 沙赫尔迈尔, F.

Schreiner, J. H. 施赖纳, J. H.

Scipio Africanus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Scorched-earth strategy 焦土政策

Scotland 苏格兰

Scylax of Caryanda 卡律安达的斯库拉克斯

Scythia, Scyths 斯基泰

Secunderabad 塞坎得拉巴

Seistan (Phrada) 锡斯坦（弗拉达）

Seleucid dynasty, the 塞琉古王朝

Seleucus (s.o. Antiochus) 塞琉古（安条克之子）

Selga 塞尔加

Semiramis, Queen 赛米拉米斯女王

Serbia 塞尔维亚

Sestos 塞斯托斯

Shikarpore 西卡波拉

Shipka Pass, the 希普卡山口

Shiraz 设拉子

Sicily, Sicilians 西西里，西西里人

Sicilian Expedition 西西里远征

Sicyon 西库昂

Side 西德

Sidon 西顿

Siege-warfare 围城战争

Sigeum (应为 Sigeium) 西吉昂

Sikandarpur 锡根德尔布尔

Sind Desert 信德沙漠

Sinope 锡诺普

Siphnos 西弗诺斯

Sisines 西西涅斯

Sisygambis 希绪冈比斯

Sitalces 西塔尔刻斯

Siwah (oasis and oracle) 西瓦 (绿洲和神谕所)

Smyrna 士麦那

Snakes, maenadic 蛇，酒神侍女的

Sochi 索契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fia 索非亚

Soghdiana, Soghdians (Bokhara and Turkestan) 索格底亚那，昭武九姓 (布哈拉和突厥斯坦)

Soli 索利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pain 西班牙

Sparta, Spartans 斯巴达，斯巴达人

Speusippus 斯珀西波斯

Spitamenes 斯皮塔美涅斯

Spithridates 斯皮特里达特斯

Stagira 斯塔吉拉

Stalin, J. 斯大林，J.

Standish, J. F. 斯坦迪什，J. F.

Stark, F. 斯塔克，F.

Stateira (wife of Darius III) 斯塔泰拉（大流士三世的妻子）

Stein, A. 斯坦因，A.

Stoicism, Stoics 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者

Strabo 斯特拉波

Stratocles 斯特拉托克勒斯

Straton 斯特拉顿

Strymon (Struma) R. 斯特里蒙河（斯特鲁马河）

Surkhab R. 索尔赫阿卜河

Susa 苏萨

Susia (Tus) 苏西亚（图斯）

Susian Gates 苏西亚关

Sutlej R. 萨特莱杰河

Swat 斯瓦特

Syllium 叙利昂

Syrne, R. 叙尔涅河

Syracuse 叙拉古

Syria, Syrian 叙利亚

T

Taenarum 塔伊那隆

Taganae 塔伽那伊

Tarentum (Taranto) 塔伦敦（塔兰托）

Tarmita (Termez) 塔尔密塔（铁尔梅兹）

Tarn, W. W. 塔恩，W. W.

Tarsus 塔尔索斯

Tashkurgan 塔什库尔干

Taulantians, the 陶兰底人

Tauriscus 陶里斯科斯

Taurus Mts. 托罗斯山

Taxila (Takshaçila, Sirkap, Bhir) 塔克西拉[坦叉始罗]（塔克沙西拉，

西尔卡普， 比尔)

Tcherná R. 切尔纳河

Tedjen (Ochus) R. 捷詹河 (奥科斯河)

Tegea 泰格亚

Tehran 德黑兰

Teiresias 泰瑞西阿斯

Telmessus 特尔美索斯

Tempe 滕比

Tenedos 特奈多斯

Tennyson, A. 丁尼生, A.

Termessus 泰尔美索斯

Tethys 特提斯

Thais 泰伊斯

Thapsacus 塔普萨科斯

Thasos 塔索斯

Thebes, Thebans 忒拜, 忒拜人

Thebes (Egypt) 底比斯 (埃及)

Themistocles 泰米斯托克利

Theophrastus 特奥弗拉斯托斯

Theopompus of Chios 基俄斯的泰奥彭波斯

Thermaic Gulf 塞尔迈湾

Thermopylae (Hot Gates) 温泉关

Thersites 特尔西特斯

Thespieae, Thespians 特斯匹埃，特斯匹埃人

Thessalonice 特萨罗尼刻

Thessalus 特萨罗斯

Thessaly, Thessalians 塞萨利，塞萨利人

Thrace, Thracians 色雷斯，色雷斯人

Thrace ward regions 色雷斯卫地区

Thracian Chersonese (Gallipoli Peninsula) 色雷斯的凯尔索涅索斯（加利波利半岛）

Thrasybulus 特拉叙布罗斯

Thucydides (s.o. Olorus) 修昔底德（奥罗洛斯之子）

Tigris R. 底格里斯河

Timotheus 提摩修斯

Tiridates 提里达特斯

Titov Velves 铁托韦莱斯

Tod, M. N. 托德，M. N.

Tralles 特拉勒斯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曼德维尔游记》

Trebenishte 特雷贝尼什特

Trikkala 特里卡拉

Tripolis (Phoenicia) 特里波利斯（腓尼基）

Troad, the 特洛亚斯

Troas 特洛娅斯

Trogus Pompeius 特洛古斯·庞培

Trojans, Troy 特洛伊人，特洛伊

Trophonius, oracle of 特洛福尼奥斯神谕

Turkestan 土耳其斯坦

Tymphaea 廷法亚

Tyre 提尔

U

Una-Sar 乌纳萨尔

Uranus 乌拉诺斯

Uriah the Hittite 赫梯人乌利亚

Uxians, the 乌克西亚人

V

Vansittart, Lord 范西塔特勋爵

Vatican, the 梵蒂冈

Via Egnatia 厄格那提亚大道

Victor Emanuel III 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

Victory (Nike) 胜利女神（尼刻）

Vodena 沃德纳

W

Wadi Daliyeh 达利耶旱谷

Welles, C. B. 韦尔斯，C. B.

Wilcken, U. 维尔肯，U.

William I of England 英国的威廉一世

Wingate, O. 温盖特，O.

X

Xanthus 克珊托斯

Xenocrates 色诺克拉特斯

Xenophon 色诺芬

Xerxes 薛西斯

Y

Yanitza L. 雅尼扎湖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

Zab, Greater, R. 大扎卜河

Zachariah 撒迦利亚

Zadracarta (Sari) 扎德拉卡尔塔（萨里）

Zagros Mts. 扎格罗斯山

Zarafshen R. 扎拉夫尚河

Zariaspa (Balkh) 扎里亚斯帕（巴尔赫）

Zeieia (Sari-Keia) 泽莱亚（萨里—凯亚）

Zeus 宙斯

Zeuxis 宙克西斯

Zimmern, A. 齐默恩，A.

Zopyrion 佐皮里翁

Zoroaster 琐罗亚斯德



居鲁士之墓，位于今天的帕萨尔加德。这位后来被称为“大帝”的波斯君主一手建立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还曾经以亵渎居鲁士之墓的罪名处死了一位总督。



琉克特拉之战（公元前371年）纪念碑。在这场战役中，厄帕密农达斯指挥的忒拜军队战胜了斯巴达军队，终结了斯巴达的霸权。



佩拉遗址。阿凯劳斯一世统治时，位于平原的佩拉取代了埃盖成为了马其顿的首都，这是亚历山大的出生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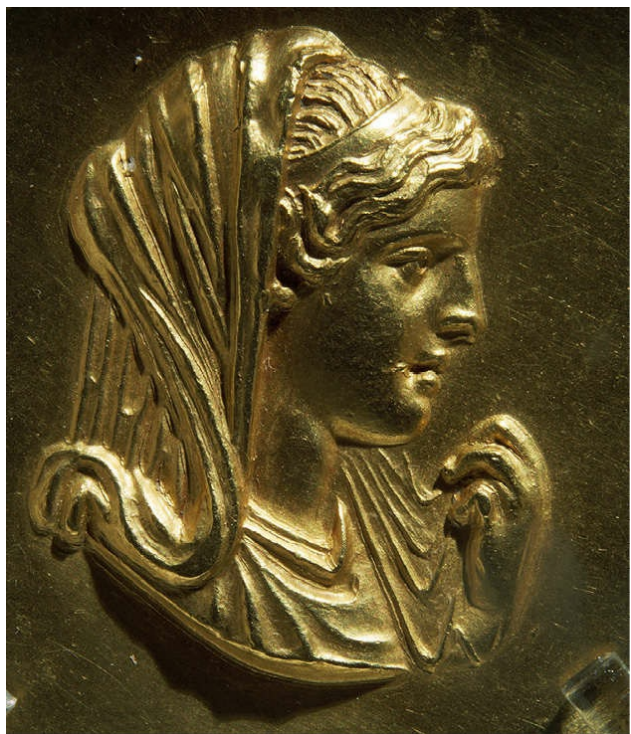


马其顿旧都埃盖（位于今天的维尔吉纳）的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这两个头像来自主墓室，镶嵌于一个豪华的家具之上。人们一般认为左边为腓力二世，头像右眼上有一处伤口，腓力这里曾受过伤。而右边的无须的头像一般认为为亚历山大。



这幅精美的画作是一个大理石宝座的座背装饰，这个宝座发现于埃及墓葬所谓“欧律狄刻之墓”的主墓室。画作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哈迪斯和珀耳塞福涅的故事，其中哈迪斯和珀耳塞福涅并排站在马车之上。

奥林匹娅斯的头像。



一个印有腓力二世头像的青铜项链垂饰，位于塞萨洛尼基考古博物馆。头像只显示了腓力的左侧，没有显示他受过伤的右眼。



亚里士多德的半身像，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科马刻斯曾是腓力的父亲阿敏塔斯三世宫廷中的医生，他本人也自小和腓力相识。当亚历山大需要一个导师时，他应召从小亚细亚来到马其顿的米扎教导亚历山大。





一座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骑马的雕像。存于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

腓力的盔甲，出自埃盖的腓力墓，盔甲为铁制，上面有金制的装饰。





埃及墓葬主墓室出土的这个精美的拉耳纳克斯棺原先是放在大理石石棺中的，棺中装着黄金和紫色织物包裹着的男性骨灰。棺盖是铰链式的，上有十六角马其顿星星，中部是带玫瑰花饰的蓝色珐琅。



这个精致的金花环发现于主墓室，有细细的扭枝，共有80片美丽的桃金娘叶子，120朵花，其中花瓣和雄蕊都是单独做就的。

德摩斯梯尼的半身像。他是腓力和亚历山大最顽固也是最不妥协的敌人。正是在他的倡议之下，忒拜和雅典最终联合起来与马其顿在喀罗尼亚激战。





喀罗尼亚之狮。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指挥的马其顿军队击溃了忒拜和雅典联军，其中忒拜的圣团全军覆灭，这尊雕像即纪念他们。



这座被称为“亚历山大石棺”的棺材于1887年发现于今黎巴嫩沿海的西顿王陵。人们认为它是阿布达罗尼摩斯所制。长面的中部阿布达罗尼摩斯在用长矛刺狮，左边穿着希腊服饰的人物可能是亚历山大。



德尔菲神谕所的遗迹。德尔菲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神谕所，腓力和亚历山大都曾经在这里寻求预言，亚历山大也正是从德尔菲得到了他的“不可战胜”的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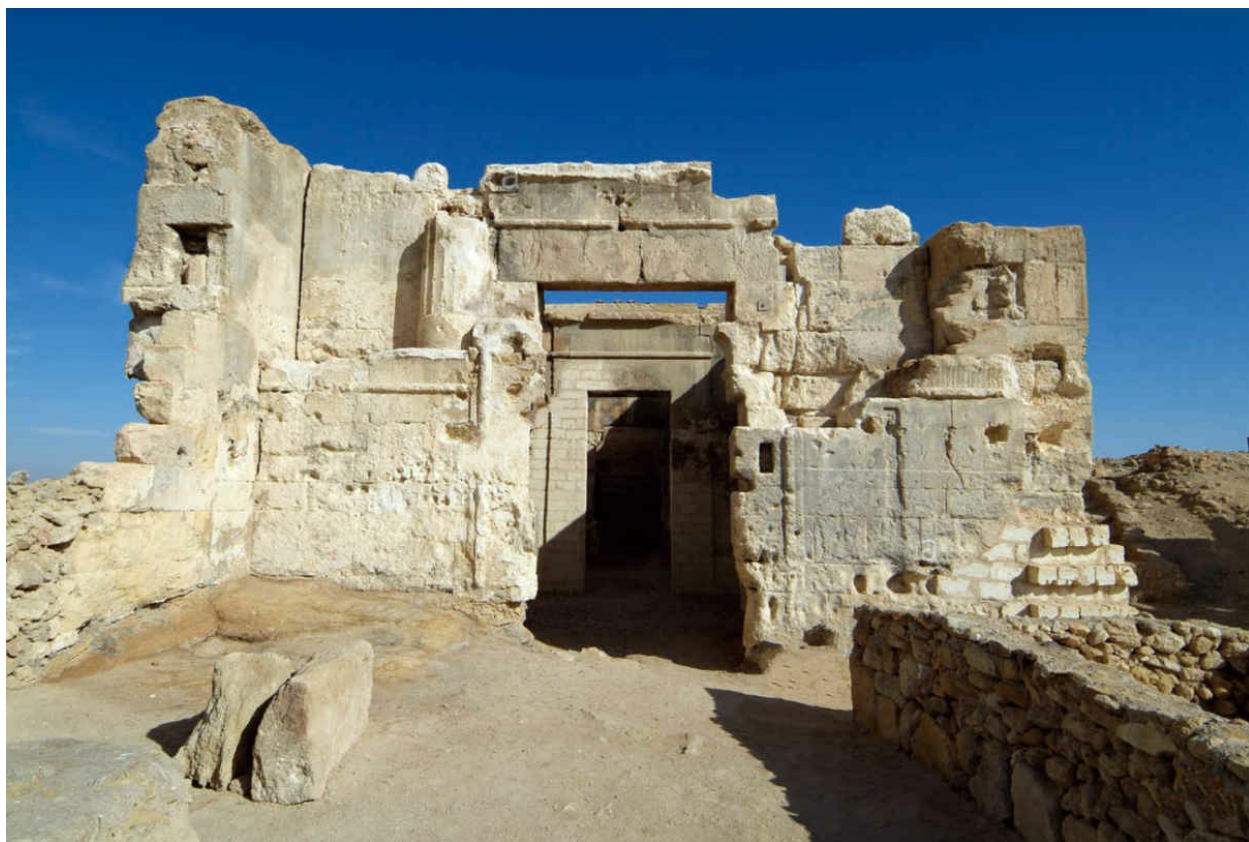
这座亚历山大半身像描绘的是他二十来岁时候的情景。所有的亚历山大像都是以这种无须的形象表现的。这座像最初出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现存大英博物馆。



赫淮斯提翁的头像。赫淮斯提翁是亚历山大终生的挚友，赫淮斯提翁死后不久亚历山大也去世了。这座头像可能出自波利克莱塔斯之手。



印有亚历山大头像的铸币。出自亚历山大里亚铸币厂，是在托勒密的命令下铸造的。像中亚历山大带着大象头饰，这是纪念他在印度的胜利。背面是女神雅典娜，挥舞着长矛，举着盾牌，右侧有一只鹰。



西瓦神谕所的遗迹，亚历山大曾经在这里询问过关于自己出身的预言，而他听到了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则神谕改变了亚历山大本身，也改变了整个古代世界。



发掘出来的巴比伦遗址，在亚历山大的时代，这是整个近东最为富饶的城市，后来亚历山大也死在这里。



这是一幅18世纪画作，出自弗朗西斯科·德·穆拉之手。画中希绪冈比斯错误地把赫淮斯提翁当成了亚历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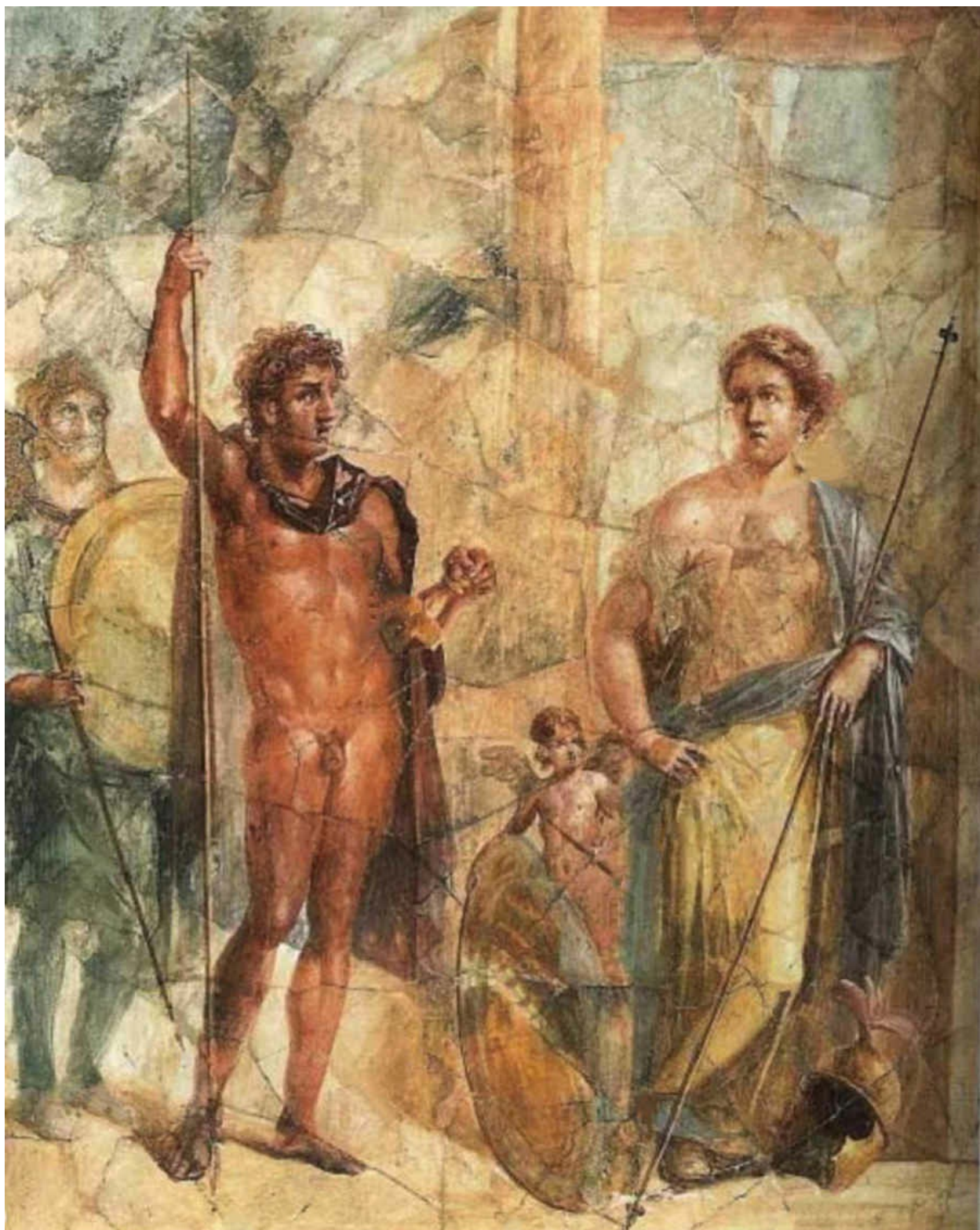
波斯波利斯遗址。这是波斯的旧都，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在亚历山大大手下付之一炬。



托勒密的半身像，位于罗浮宫。托勒密是亚历山大的好友和部将，后来建立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他的回忆录是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主要参考来源。



波斯波利斯的著名的狮子门。



这幅出自庞贝古城的壁画描绘了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之女斯塔泰拉的婚礼，现藏于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



这是一幅18世纪画作，出自普拉奇多·科斯坦齐，描绘的是亚历山大建立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的场景。



16世纪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对伊索斯之战所作的浪漫化描绘。